
字里乾坤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
该卷选录了古今之帝王、领袖、政要、骚客、哲人、名士等的稀世诗作，赏析之，自可陶冶情操，悟出人生之真谛。
——成善卿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民俗话旧
大戏台
武林拾趣
美食妙谈
名胜游记
画坛旧事
文坛忆往
故都文化趣闻
朝野遗事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神州轶闻录系列-朝野遗事

神州轶闻录系列-字里乾坤

神州轶闻录系列-大戏台

神州轶闻录系列-故都文化趣闻

神州轶闻录系列-画坛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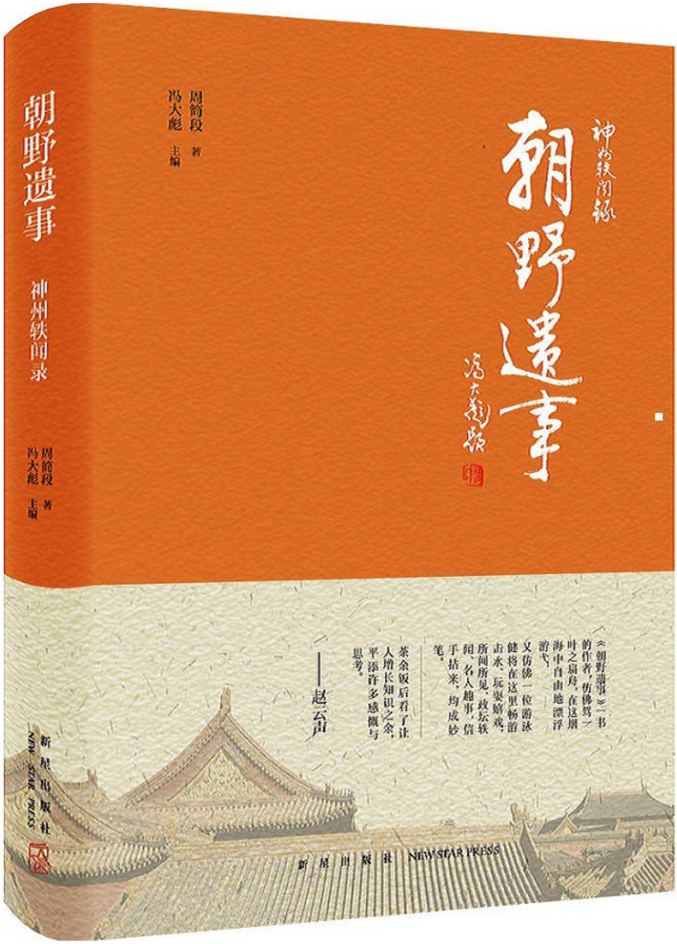
神州轶闻录系列-美食妙谈

神州轶闻录系列-民俗话旧

神州轶闻录系列-名胜游记

神州轶闻录系列-文坛忆往

神州轶闻录系列-武林拾趣


朝野遗事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神州轶闻录
朝野遗事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朝野遗事》一书的作者，仿佛驾一叶之扁舟，在这烟海中自由地漂浮游弋，又仿佛一位游泳健将在这里畅游击水，玩耍嬉戏，所闻所见，政坛轶闻，名人趣事，信手拈来，均成妙笔。
茶余饭后看了让人增长知识之余，平添许多感慨与思考。
——赵云声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朝野遗事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野遗事／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7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41-4

I．①朝…　II．①周…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08号

朝野遗事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特约编辑：曹　煜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15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41-4

定　　价：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宫闱密闻
皇帝剃头和臣民剃头
吕四娘复仇杀雍正
格格下嫁孔府衍圣公
为慈禧开火车的人
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
崔玉贵谈珍妃之死
慈禧西逃途中选妃
慈禧的侍从女官
为光绪算命
光绪之师翁同龢
西医屈桂庭为光绪施诊
溥仪的出洋留学梦
末代皇妃文绣
载涛冷对土肥原
末科状元谁钦点
末科状元的骑马游街和琼林宴
清代的太医院
京城朝野净身房
寇太监参政被杀
崔得贵走嘴遭杖杀
“戒骄戒矜”李莲英

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小德张一次堂会三千两
清宫遣散太监趣闻
逊清的宫女和苏拉
政坛旧事
《康熙字典》背后的灭门案
巡抚办公尼姑庵
才子王壬秋戏弄张之洞
义士刘三葬邹容
秋瑾遗骨葬西泠
黄花岗中女英杰
辛亥烈士无字碑
天不假年蔡松坡
袁世凯的石室金匮
朱瑞进京和“衣履备载”
孙中山三救陈独秀
孙中山关心卫立煌
段祺瑞鼻子能气歪
张学良冀东认师
冯玉祥给吴佩孚送“寿礼”
冯玉祥四次立遗嘱
卫立煌掌劈地头蛇
陈赓勇救蒋介石
杨虎城将军与中秋会
李宗仁入主居仁堂
傅作义的“最后一席话”
傅庆泰河边教子
陈校长拒用其子
犟父不认将军儿
张灵甫鬻字

何香凝诗激张治中
“一·二八”诗魂永存
宋哲元及其大刀队
宋哲元将军收养孤儿
抗战殉国的赵登禹将军
忧国剖腹续范亭
起草同盟会章程的马君武
“七君子”狱中题词
孙中山的四具棺木
真假冯国璋墓
汪精卫墓探秘
戴雨农戴山毙命
上海滩宋中缚仇人
施剑翘枪杀孙传芳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
社会杂闻
菜市口刑场耸人闻
“大水怪”震惊朝野
“活神仙”张铁嘴命丧“天子”手
警察总监住凶宅
杀气腾腾的“大令”
旧时盗匪“套白狼”
话说古今“四公子”
名妓暗救杨月楼
张老道买前门楼子
皇室宗亲办报风波
朱葆山奇招制洋人
首制“中山装”的王才运
电话号码“40000”
“朱神仙”歪打误撞蒙军阀

“弃地遗民”连横复籍
《子见南子》惹风波
胡适的“鸳鸯谱”
仗义法官郁华被害
战火中的庐山孤儿院
南京审判战犯记
康有为的风水宝地
周恩来生母万冬儿
周恩来与鲁迅同宗
宋氏姊妹的终生憾事
梅兰芳与小凤仙
名人情话
康有为与西湖船娘
伉俪情深梁启超
卢慕贞明大义支持孙中山
赛金花与魏斯灵
袁世凯骗娶李公主
梨园女杰拒当总统夫人
张勋复辟拒妻谏
顾维钧的四位夫人
陈独秀的婚恋
胡适的婚姻
郭沫若元配夫人张琼华
李宗仁钟情西山茶
冯玉祥喜逢佳偶
张作霖的“编外夫人”
张学良与于凤至联姻
赵四小姐忠贞情
张治中的“夫人作证”
卫立煌的两任夫人

佟麟阁的“模范夫人”
吉鸿昌拜妻为师
韩复榘与“才女”高艺珍
陶成章与孙晓云的婚恋
烈妇曹庄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　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

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　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

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因创作关系，我比较喜爱历史题材，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人与事。因为我觉得近现代的历史，最纷纭复杂的，当属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

明朝末年，朱氏王朝大厦将倾，崇祯虽想力挽狂澜，但因朽木不可雕。加之崇祯刚愎自用、性情多疑、用人不当，最后落了个杀妻灭女、煤山自尽的结局。而就在这一年——1644年黑色甲申之年，又灾祸连连，地震暴发、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登基称帝。之后李自成又因胜利冲昏头脑而鞭笞官吏、自相残杀，致使大顺政权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与此同时，清兵乘机借道入关。之后，清政府颁布“留发不留头”的法令、平定“三藩”、大兴“文字狱”以及南明小朝廷的花天酒地、勾心斗角等等，等等，真可谓风云乱世，世事纷繁。

及至民国之初，也是如此。自1912年民国初立，到1927年蒋介石上台，英雄四起，豪强称霸，连同土匪、流氓、恶棍竞相登场。短短的十六年里，总统、总理、执政等，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其中的故事自然也是浩如烟海。

《朝野遗事》一书的作者，仿佛驾一叶之扁舟，在这烟海中自由地漂浮游弋，又仿佛一位游泳健将在这里畅游击水、玩耍嬉戏，所闻所见、政坛轶闻、名人趣事，信手拈来，均成妙笔。茶余饭后看了让

人增长知识之余，平添许多感慨与思考。

我虽热衷于民国题材，喜欢看一些名人传记类的杂书，但对《朝野遗事》中之很多掌故却是知之不详。今汗毛充栋，忝作序言，有幸先睹此书，也是一大快事。

赵云声

2005年12月

宫闱密闻

皇帝剃头和臣民剃头

清军入北京后，发布了“剃发令”，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令理发匠巡游街市，见蓄长发的人即强迫剃去，如不从命，立即杀头，并将头颅示众。在反剃发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当年江阴百姓听到“剃发令”后，先向知县请愿，知县不答应，反而骂群众，于是百姓们把知县抓起来，坚决抗清。嘉定人民在反剃发斗争中坚持了四个月，被杀两万人，最后失败。从此，中国男人脑后统统留起了长辫子，把前额剃光。这种发式，一直存在了二百多年。

相传，雍正皇帝头上有不少疮疤，给他剃发的许多“待诏”免不了碰破疮疤，于是被定为欺君之罪，掉了脑袋。结果，弄得皇宫内的“待诏”不死即逃，再也没有人敢给雍正剃发了。后来，太监们到皇宫外面去寻找剃头匠。这些奉旨进宫的理发匠也一个个有去无回。

雍正五年（1728）正月十六，一个姓罗的道士毛遂自 荐，主动到宫中为雍正剃发。罗道士的技艺高人一筹，他先用浸泡过草药的温水给雍正洗头，然后用剪子剪头发，疮疤外露后，再用剃刀在疮疤之间慢慢地剃。由于罗道士在草药里用了麻沸散，所以剃头时雍正一点儿也不觉得痛。结果龙颜大悦，雍正亲自赐给罗道士一碗莲子汤。之后，罗道士将自己使用的剃发工具和剃发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其他人，这才保住了这些人的性命。

乾隆皇帝也在头发问题上做过文章。那是在他的老婆孝贤皇后死后，按清制全国百日之内不得理发。可是百日时间太长，有的大臣便偷偷理了发。有一位名叫塞楞额的督抚，在孝贤皇后死后二十七天就理了发。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后，立即将他革职，最后赐以自尽。

慈禧太后虽然无须剃头，她却极为爱惜自己的头发。她曾不惜用一百多两黄金打造了一个发塔，专门用来保存她的头发。这样，轮着谁在慈禧太后跟前站班或给她梳头发，谁就得提心吊胆。有一次，某太监为慈禧梳头。梳完后梳子上有一根头发，这太监不由心惊肉跳，想悄悄把头发藏起来。不料他的举动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这太监因而挨了板子。

民国之后，人们纷纷剪辫易服。但清朝皇室及旗籍人员依然如故，他们想方设法制造种种借口，阻止剪辫。后来，末代皇帝溥仪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劝说下，也觉得中国男子脑后拖条“驴尾巴”似的辫子不甚雅观，终于下决 心把自己的辫子剪了。“皇上爷”的辫子一剪，没有几天工夫，紫禁城内男人的辫子都不见了，最后只剩下几个内务府大臣还留着辫子，他们带着“大清帝国子民”的最后一点印迹进了棺材。

吕四娘复仇杀雍正

1735年8月23日，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与君主专制而屡屡杀人的雍正皇帝，在其大事扩建以供“御以听政”（语出雍正《圆明园记》）的圆明园内暴崩。雍正在位十三年，享年仅五十七岁。其墓葬在河北易县泰陵地宫。

雍正被小脚吕四娘削首之异闻，历时二百余年，迄今仍流传于民间，为京城野叟津津乐道。盖因正史未载其死因，加之生前大兴吕留良文字狱，故有吕四娘刺雍正以雪家仇之说，并披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吕留良者，乃明清之际思想家。明亡后，他散家财结友，图谋复兴，著书多种族之感，誓不仕清室。事败后削发为僧，法号耐可。雍正六年（1729），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湖南学者曾静，为反清复明而遣其弟子张熙化名张倬入陕，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飞后裔），劝其同谋举义。旋被告发下狱，供词涉及吕留良有关“论夷夏之防”与“井田封建”等言论，以及雍正即位等宫中情况。雍正　由是而知自己改诏夺位之事已流传甚广，遂十下严旨，刊为《大义觉迷录》，为己辩护，并剖棺戮吕留良尸，焚毁其著作，将其满门抄斩。吕留良之子吕葆中时为翰林院编修，虽颇有才气，亦在劫难逃。于是汉人之义愤大起，而雍正被刺之祸根亦因此而种下。

吕氏门中唯一幸免于难者，即留良之孙女吕四娘也。因其远离浙江崇德家乡，寄居安徽乳媪家，故躲过劫难。吕氏家门罹难时，四娘尚在弱龄（年仅十三岁），闻噩耗后悲泪如雨，愤心大发，遂潜藏习武以图报仇雪恨。因天意安排，她幸遇剑侠甘凤池，得其三昧而如愿以偿。

剑侠甘凤池，江宁（今南京市）人，少以勇闻，康熙年间曾官某王府。甘凤池力能扛鼎，与人角逐辄胜；手能破坚，握铅锡辄化为水；剑法尤精，轻功亦出众。中年以后，甘凤池与诸多草莽英雄过从，擅长暗杀，贪官污吏及奸宄无不闻风丧胆。雍正帝亦为其出没无常而惴惴不安，虽竭力搜捕而不能止。甘凤池年八十余寿终正寝于乡里，堪称一代英雄。

吕四娘拜甘凤池为师后，潜心研习剑术并飞檐走壁之轻功。数年后技艺炉火纯青，度无劲敌，遂辞别恩师进京。她潜入圆明园之乾元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死雍正，速提首级隐遁。据雍正心腹——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鄂尔泰所撰《西林遗稿》云，雍正驾崩的那天上午，“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入宫，外 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由此可证被刺之说或不误矣。

雍正被刺之前数月，已有征兆。其御驾赴天坛祭祀时，即有坛前所张黄幕突然断裂之异常现象。卫士疑为刺客，纷趋救护圣驾。雍正因此而大惧，防卫甚严，数日寝食不安，乃下令缉捕剑客。虽用心良苦，仍难免丧生也。

格格下嫁孔府衍圣公

曲阜孔府又称衍圣公府，虽然历朝历代都受朝廷厚待，但府中孔子后人的生活并非人人幸福美满、尽如人意，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的婚姻就是一例。

按照清王朝的律法，满汉不许通婚。可是，乾隆皇帝有个女儿偏偏不信这个邪。从小娇生惯养、盛气凌人的公主，待嫁之年非要找个汉族郎君不可。这一下可难坏了文武百官。眼看着格格眉头终日不展，饮食锐减，视格格为心肝宝贝的乾隆召来了心腹大臣——中堂大夫于敏中。于中堂奏本道："格格下嫁异族，不合大清律典。如将格格寄养汉族官员家中，以汉族义女名义通婚，就完全合理合法了！"乾隆一听，正合其意，说："于爱卿，朕欲让格格认你为义父，如何？"于敏中眼见皇帝对自己如此信任、厚爱，急忙跪谢道："圣恩浩荡，卑臣不胜荣幸，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乾隆之女成了于中堂义女，取得了与汉族男子通婚的"合法"资格。

皇帝女儿要和谁家结亲呢？据懂相面术的媒婆说，公主欲要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必须"孔雀东南飞"，才能"白头偕老至岁百"。此语一出，满朝文武大臣众口一词，只有地处京华东南方向的曲阜衍圣公府最合适。乾隆曰："此论正合朕意。"乃派人飞马通报孔府。

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闻听当今皇上欲来结亲，虽说诚惶诚恐，

但也有求之不得之意。

于是，未等其子孔宪培表态，便自作主张，答应了这门亲事。其实，孔宪培自幼博览群书，在爱情观念上强烈反对只顾门当户对，而忽视男女之间真正爱情的传统思想。既然其父已经答应亲事，自己也不好执意违抗。他的想法是，慢慢与格格亲近，在生活中逐渐培养与格格的真正爱情。就这样，乾隆女儿以于中堂义女之名嫁到了孔府。

按理说，即使是皇帝的女儿，如果成为平民百姓的儿媳妇，那也得放下架子，像普通新媳妇一样，上孝敬父母，左右团结小叔、小姑、妯娌，敬长爱幼，礼行孝悌。这位格格却不然，自恃是皇帝的女儿，俨然以高人一等之势凌驾于孔府众人之上。更可笑的是她处理夫妻关系的态度，她从不把丈夫视为与自己平等相处的伴侣，而把丈夫当作可以任意指使的臣民。

丈夫与她对话、交往、相居，事先必须一跪三叩行礼，只准俯首帖耳听命，不准有任何异议。夫妻关系成了 这种尴尬荒唐局面，还有何幸福可言。

孔宪培的愿望破灭了。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未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欢乐和幸福，只给他留下了无法摆脱的沉重的烦恼和痛苦。每天他必须违心地按格格的命令行事，逆来顺受地维持着与格格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格格不准孔宪培另娶，更不准他纳妾，另有所爱。孔宪培婚后无子无女，三十八岁便早逝。由此不难判断出他婚后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折磨。

为慈禧开火车的人

慈禧太后当年确实坐过火车，这在历史上有记载。那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明时节，慈禧太后决定到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走一走，顺便到东陵和故宫看一看，而且决定坐火车。

这列从国外购进的“御用列车”一共挂了十六节车厢，全部漆成黄色，因为黄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由谁来驾驶列车呢？李鸿章与清政府铁路督办盛宣怀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和挑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叫张美的火车司机。张美是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是我国第一代火车司机，驾驶水平较高。

临开车前，铁路督办盛宣怀特地召见张美，对他说：“你这次开火车送皇太后去奉天祭陵，万万不可有半点闪失。否则，不但你的全家性命，就连我的身家性命与前程，也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张美闻之，深感事关重大，应允一定把车开好。二人说毕，盛宣怀遂将慈禧赐的黄马　褂一件、朝靴一双交给张美。最后，又郑重地嘱咐：“皇太后恩准你一人坐着开车，其余工役等人一律半跪操作。”慈禧太后有个恶习，就是每当她驾临一个地方，第一个入内的必须是她自己。如果已有人在里边，此人必须先行退出，待她入内坐定后那人方可进入。这次慈禧上专列前，车上所有工役全部被赶了下来，唯有正司机张美可以端坐在驾驶室内，随时听令开动机车。

20世纪初年的火车还比较简陋，制动装置只有机车才有，而每节车厢均无刹车设备，列车的开停、快慢、冲坡下坡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全凭司机的经验与技术。要开好这列专车，实在不容易！列车启动后，为了保持平稳，张美叮嘱司炉工努力加煤、烧火，务使机车炉膛里始终保持着四十磅气压。然而，这样做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当时，这四十磅气压是个极限，如果再超过一点儿，就可能导致炉膛爆炸。但反过来，如果气压不足四十磅，列车就很难保持平衡。张美是拎着全家人的脑袋，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开这列专车啊。从北京到奉天，按照常规，一天一夜足矣，而这次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返回时，慈禧归心似箭，她连连催促张美加速。张美不敢违抗，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把车速提到最高点，仅用一天时间就平安地返回北京永定门车站。

奉天之行，慈禧高兴至极，她传谕：司机操纵平稳，车上摆设的古玩珠宝无一震动，赐司机张美白银三百两， 并封官加爵。然而，张美不愿做官，他辞别慈禧，回到铁路依然去做司机。几年以后，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试制成功，第一个开车的任务自然又落到张美身上。他终于开上了中国人自己的火车。

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

慈禧曾说过：只要我活着，总不许学外国。其实，她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而她自己，不但使用洋货，还请来洋画师为她画像。

按中国古代习惯，人死后才画像，以供后代祭祀之用。乾隆皇帝之母孝圣宪皇太后就是死后才“恭绘圣容”的。故当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进宫推荐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并要送画像往圣路易斯赛会供瞻仰时，慈禧虽然认为是一个大好机会，但没有一口答应下来，而是批转庆亲王酌办。其实，她早已安排好了。

慈禧过夏天照例是在颐和园住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慈禧下令让卡尔女士住到靠近颐和园的醇亲王花园，以便随时入园为自己画像。六月十四日晚上，年近七十的慈禧为了第二天“精神好些”，特意提早入睡了。次日，她换了一件周身绣有紫色牡丹的衣服，肩披一块寿字嵌珠的花巾，头上一边戴的是玉蝴蝶，一边 戴的是鲜花，手上带着玉钏和玉护指。她和卡尔女士在乐寿堂不拘礼节地相见之后，便坐在宝座上开始画像。

慈禧稍久坐就感到疲劳，只坐了十分钟便不耐烦了。后来，凡是画衣服和首饰时，就由裕庚的女儿容龄和德龄穿戴好替她坐在那里，到画面孔时，她自己再坐。就这样，到了七八月间，她终于厌烦了，不断抱怨，说画像太慢了，要是中国画家，看一次就能画了，我真是

坐够了。更为可笑的是，对西洋绘画一窍不通的慈禧，当看到把珍珠画成白、青、淡红等不同颜色时，即断定画的不对，说珠子的颜色原本是白的，怎能画成青的和红的？卡尔女士解释说，那是光线反射的结果。但慈禧仍固执己见，说，我不管反射不反射，只知道珠子是白的。无奈，画师只好按她说的办。

第二年春天，画像即将完工。在钦定的日子，慈禧亲自验收。当她发现画像脸上一边黑一边白时很不高兴，当即传令卡尔女士改成一样的颜色。尽管卡尔女士竭力争辩，但慈禧不肯让步，最后仍不得不进行改动。定稿后，卡尔女士在画像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慈禧认为“外国人做事太稀奇，不可思议”。

尽管慈禧对画像有诸多不满和迷惑，在中秋节时，她还是让总管太监李莲英将菜八品、点心四品转送卡尔女士；年末又赏其花、普洱茶、吃食等；后又派外务部大臣亲自到美国使馆赠送卡尔女士宝星一座、绸缎八匹和价值 一万二千两的银票一张。在一些公开场合下，她也常赞誉卡尔女士“颇有才能，善于绘事”。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卡尔女士共为慈禧画了四张画像。其中一幅经装饰后，由外务部专程寄往美国圣路易斯市参加赛会。赛会结束后，画像由参赞官户部主事将画像运抵华盛顿。这幅慈禧画像由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崔玉贵谈珍妃之死

孩提之时，常到鼓楼广庆轩茶馆听说评书。广庆轩茶馆位于什刹海东岸，义溜胡同路北，里面十几张八仙桌，能坐百十来人。屋子宽敞豁亮，前面有个小台，台旁挂着一副木刻对联，上联是“言易招尤且谈风月”，下联是“客多知己不着衣冠”。听客们一边喝着茶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说什么的都有。只有当说书的一拍醒木，听客们才从喧闹中安静下来。

这里的听客非同小可，有一些颇有名的人物。如一度准备继承帝位的大阿哥溥儁（人们戏称他“万岁爷”）、当过前清步军统领的江朝宗、著名画家溥心畬、末科状元刘春霖等。茶馆西头的桌子常常围着几位老人，他们穿着长袍，腰里束着褡裢，有时穿着坎肩，这是从娘娘庙来的几位太监，大家有时就叫他们“公公”。清朝倒台以后，太监散落四方，住在娘娘庙的太监都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们能够常来听说评书。其中有位六十多岁、个子较高的老 人比较引人注意，他叫崔玉贵。后来我听说他原名崔玉玺，进宫后“玺”字犯忌，就改名崔玉贵。他是慈禧身边一名炙手可热的大太监。

一天，在开书之前，大家正闲聊天时，忽然有人点名要崔玉贵讲讲珍妃落井的故事，他就讲起来了。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马玉昆率清兵与八国联军作

战，节节溃败。慈禧在乐寿堂闻报后，无可奈何问计于左右，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慈禧沉思良久，命人传珍妃来见。珍妃来后，慈禧厉声说道："现在江山已失大半，这都是由你身上所起。"痛骂珍妃一阵，接着说："总有一天，我让你给我死。"珍妃说："随便办好了。"

7月19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齐化门外八里桥，战况更趋紧急。慈禧急命太监崔玉贵、唐冠卿各带四十名洋枪手，一队守景和门，一队守乐寿堂。下午，慈禧去景和门找崔玉贵，低声细语吩咐几句后，转回乐寿堂。不一会儿，慈禧又从乐寿堂北门走出，沿着西边贴墙的游廊向北走去，并命唐冠卿就在颐和轩廊上等候，不许有人偷看，违者处死。慈禧说毕，经景祺阁西边小门走进西跨院，一人坐在南小屋石阶上，脸上浮现阴森凶悍之色。这时崔玉贵引珍妃也来到这里。珍妃跪在慈禧面前，慈禧劈头就说："义和拳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干脆我们娘俩跳井吧！"珍妃哀求慈禧，说自己没犯重大罪过。慈禧说："不管有没有罪，难道留我们在这儿，让洋人下毒手吗？ 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崔玉贵在旁向珍妃道："请主儿遵旨吧！"珍妃说："怎么你也逼我！"崔玉贵阴险地笑着说："主儿先下去，我还下去呢！"珍妃把脸一沉道："你也配！"慈禧厉声向崔玉贵喝道："把她扔下去！"崔玉贵还没等慈禧说完，猛一弯腰，左右两手一前一后把珍妃倒抱起来，扔下井去。慈禧站起身来，由崔玉贵搀扶，又回乐寿堂去了。

崔玉贵的说法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看很多小说、戏剧都说珍妃拥护光绪维新变法，直到慈禧西逃时，她还劝说慈禧应把光绪皇帝留下和洋人谈判。慈禧要她死时，她不让别人动手，自己勇敢地跳进井里，无疑这是虚构的。有的材料还说，一年后慈禧由西安归来，命人打捞珍妃尸体，捞上来的尸体面目栩栩如生，那更是违反历史真实了。

崔玉贵讲完这个故事后，很多人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你这老家伙真缺德，你竟敢害死珍妃！"崔玉贵也不示弱说："老佛爷的旨意，

我能违反吗？”霎时茶馆里闹腾起来。这时说评书的醒木拍响了，大家才安静下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鼓楼茶馆的印象已经淡忘，唯有崔玉贵说到珍妃之死的情节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慈禧西逃途中选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十三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丧权辱国的慈禧挟持光绪西逃。他们出了神武门，经居庸关，进入河北怀安县。第二天早晨，又沿洪塘河西行，准备到北九仓用膳。

怀安知县张良暹接到“滚单”（通知）后，火速赶到北九仓接驾，并派人杀猪宰羊，置办筵席。慈禧等人进村后，住进张家大院。想起一路上的情景，放声大哭。待御膳上来，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痛快。这时，光绪皇帝却咽不下饭，他想到离京时的珍妃之死，不禁落下泪来。慈禧看在眼里，想在心上。此时村中鸡不叫狗不吠，慈禧高兴地说：“这个村子鸡不叫狗不吠，真是个太平庄！”从此，北九仓改名太平庄。

在张家大院的隔壁，住着一户姓冀的人家。这家有一姑娘，名叫冀妮子，年方二八，长得十分俊秀，两只大眼非常传神，说起话来悦耳动听。村人逃难在外，她因爹爹 病倒在炕，未能远行。冀妮子好奇心重，她老想看看慈禧太后是个啥模样，便悄悄地来到紧靠张家大院的墙边。怎奈墙高人矮看不见，她便踮起脚尖，用手扒住墙头，用足气力正要跳起时，正在张家大院散步的慈禧抬起头来，只见墙上扒着一双指甲长长的秀手，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好一双凤爪！”

侍候在旁的大太监李莲英嘻嘻一笑说：“老佛爷好眼力，这可是深

山俊鸟啊！”

慈禧高兴地说：“去查访查访，把这个贵人给皇上做妃子！”李莲英遵命而去。

冀妮子听见院那边有一男一女说话，便蹑手蹑脚地退了回来，跑回屋里，心中非常不安，生怕要出什么事。

李莲英和县令张良暹来到冀妮子家，宣读了慈禧的懿旨。冀家人如五雷击顶，顿时惊呆了。好一会儿，冀老汉才清醒过来，哀求道：“山村民女足不出户，见识少，琴棋书画样样不懂，侍候不了皇上。”县令帮腔说：“皇太后选中冀贵人，这是敝县的莫大荣幸，真是皇恩浩荡。”李莲英见状，阴阳怪气地说：“老汉，这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美事啊！”冀妮子一家却哭成一团。

李莲英回去禀告了慈禧，又去转告光绪。光绪皇帝眉头紧锁，一口拒绝：“国难当头，我不纳妃！”

李莲英阴着脸说：“老佛爷的懿旨，谁敢违呀！”接着，慈禧命令李莲英送去订婚礼物——一把七星宝剑。并　　责成县令给贵人修好行宫，等日后皇上回宫，择日迎娶。

可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西逃一年又两个月的慈禧自西安回京后，又过上了餐餐都是一百多道菜的奢侈生活，早把塞外那个冀妮子忘得一干二净。

可怜的冀妮子，因是钦定的妃子，无人敢娶，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她忧郁成疾，五十而卒，埋葬在冀家坟边。

慈禧的侍从女官

裕德龄、裕容龄姐妹曾做过慈禧太后的侍从女官，在皇宫内生活两年之久。

皇宫里服侍慈禧的，除太监、宫女外，还有八个女官。这八个女官全是满族高级官员的女儿，如当时军机大臣庆亲王的两个闺女、慈禧的侄女和裕氏姐妹二人等。裕氏姐妹的父亲裕庚是满族正白旗人。当时他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办事，曾出使日本及欧洲各国。德龄、容龄姐妹和其兄勋龄也跟随父亲出国，兄妹三人在巴黎就学。到了20世纪初，裕庚全家回国。慈禧听说德龄、容龄姐妹通晓外国文，又知书达理，很惹人喜爱，于是决定请她们到宫中当女官。后来，每当外国公使夫人访问慈禧时，一切翻译接待事宜全由她们姐妹二人负责。

裕庚病故于上海。她们姐妹二人在宫中待了两年多后，便离京南下，常住上海，不断与外国人交际往来。

辛亥革命后，裕德龄与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怀德结婚。 三年后怀德调职返回美国，成为新闻记者。德龄同去美国，加入美籍，开始用英文写作。她以晚清宫廷琐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版了《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清宫二年纪》、《叩头》、《金凤》等多部作品，成为美籍华人知名作家。她的笔名为“德龄公主”，不明了情况的人见她自称公主，都以为她是皇亲国戚，其实她是为了吸引读者

和出版商的重视。德龄文笔流畅，对晚清宫廷情况只一般知晓，但为了吸引读者，她对宫内人物有虚构之处。德龄以美籍华人身份，在美国参加“中国之夜”、“一碗饭运动”，为祖国募捐，支持各种有益于人民的活动。

裕容龄也曾用英文写过两本书，即《香妃》和《清宫琐记》，但文笔不如德龄。她与唐宝潮结婚。唐宝潮是晚清御林军官，他经常陪伴容龄参加各种舞会。容龄年轻时在法国巴黎学习芭蕾舞多年，她是我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芭蕾舞的人。

慈禧对洋玩意儿很感兴趣。为了给慈禧开心，裕氏姐妹曾请兄长裕勋龄到宫中给慈禧照过很多次相。有的照片上慈禧打扮成观世音，宫女们蹲在她坐的莲花盆周围，太监李莲英扮作唐僧去西天取经；还有的照片是慈禧穿上玉皇大帝的服装，宫女和太监装作善男信女，在高台下跪拜。或在皇宫，或在颐和园内，裕勋龄给慈禧拍了很多千奇百怪的相片。相片洗出之后，慈禧则捧腹大笑。

为光绪算命

清末，京城有两个著名的算命先生——刘铁口和张瞎子。据说，这两个人算命一是不说假话和奉承话，二是往往灵验。相传光绪皇帝的命运在他刚出生时这两人就已经算定了。

光绪名载〓，本为醇亲王之子，做皇帝后则称慈禧为“亲爸爸”。他刚一降生，醇亲王即把刘铁口和张瞎子请进王府为他算命。醇亲王说，自己在书房等待儿子出生时，小心地夹下了两段黑烛芯，放进盛水的小碗里。第一段沉下去了；第二段放进后，先是升起一股黑烟，然后逐渐涨了起来，又突然在水中爆开，分成无数小点，溅满一碗，最后逐一沉下水去。醇亲王还说，自己在睡梦中还见到一丝极微细的光焰，很快变成一条长龙般的火舌，把一座盖着黄瓦的房子烧着了。在他刚好被惊醒时，下人向他报告：王爷喜得贵子。

醇亲王在讲这番话时，刘铁口一眼不眨地盯着他的嘴 唇，张瞎子则歪着脑袋把耳朵贴得越来越近。刚一讲完，刘铁口就抢先说道：王爷，这可不是吉兆啊！那段小烛芯没有完全长足就爆碎了，恐怕将来大爷不到长大，就难免被恶魔作弄的。这梦也不吉利，有乱离灾变之意。不过，王爷看到火光和盖有黄瓦的房子，这说明未来的大爷肯定是位了不得的贵人。

张瞎子是靠生辰八字进行推算的。他问光绪的出生时辰后，扳着

手指头一数，失声叫道：不巧，正是龙日虎时，龙虎不能并立，这位大爷的一生不会是顺利平安的，要有许多坎坷。接着他又凑到醇亲王耳边低声说：你的这位大爷呀，将来要做皇帝的。醇亲王一听，立刻瞪大眼睛说：你好大胆，这不是要造反吗？我哥哥咸丰的儿子不是正在龙椅上坐着吗？但张瞎子仍然固执地说：我也不敢无端妄说，只是凭着卦理说话。醇亲王厉声制止道：你休再胡说。

醇亲王对这些神秘的预言深感不安。谁知老天确有不测风云，同治皇帝十九岁时，因出天花医治无效而死。同治没有儿子，独掌大权的慈禧皇太后决定由醇亲王的儿子载黐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光绪。醇亲王得知后，立时晕倒在地——刘铁口和张瞎子的预言竟真的应验了。

光绪四岁当皇帝，慈禧垂帘听政，他实际上只是个傀儡。当时内忧外患、灾荒连年、外敌入侵、出逃西安等，这位皇帝实在是终日不得安宁。

光绪十四年的一天，紫禁城内失火，贞度门、昭德门 等均被化为灰烬。

接着是光绪大婚，慈禧强迫他娶自己的侄女静芬为皇后。光绪并不喜欢她，两人感情一直不和。他所钟爱的珍妃却被慈禧谋害。

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实行新政。由于慈禧的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囚禁在瀛台，他“欲飞无翼，欲渡无舟”。在度过了十年没有自由的生活后，他辛酸的一生结束了，年仅三十八岁。刘铁口和张瞎子的预言再次被证实。

光绪之师翁同龢

在江南，江苏常熟是有名的古城。所谓“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可见自然风光之幽美。常熟不光景色秀丽，晚清时还出了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叫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笙。咸丰六年（1856），翁同龢二十六岁时参加殿试（又名廷试，是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在金鸾殿上亲发策问的考试）。殿试前一日，翁同龢住宿京城。是夜，住房附近“恶少狂童花爆放，火星乱射惹人憎”，吵得翁同龢终夕未能成眠。第二天天亮入朝，翁同龢困顿乏力，头脑昏沉。正在危急之时，他忽然想到考袋中有长白山人参一枝，急忙取出嚼烂咽下肚。霎间便神清气爽，思维敏捷。待进殿应试，作文对答无不得心应手。因而翁同龢获殿试第一名。时人遂有“人参状元”之称。

翁同龢中状元后，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先后两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又为光绪帝师傅。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中法战争时，翁同龢主张重兵抗法，反对妥协投降，积极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保卫疆土。然而他对“火轮驰骛于昆明，铁轨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却“忧心忡忡”，日夜不安。

翁同龢喜欢养鹤，常观鹤作书，纵意所适，不受羁绊。时采北碑

之笔，融会贯通，风格浑厚豪放，蔚为一代大家。时逢中日甲午战争，翁同龢所畜二鹤突然逃去。翁即书“访鹤招贴”，悬重赏寻之。因其书法妙绝，旋贴旋被人揭去，此事轰动都门。有人曾以诗戏之云：“军书旁午正彷徨，唯有中堂访鹤忙。从此熙朝添故事，风流犹胜半闲堂。”

其实，贾似道是不能与翁同龢相提并论的。南宋奸相贾似道在杭州西湖葛岭府邸建造“半闲堂”，日夜与姬妾踞地斗蟋蟀，或游湖饮酒作乐，置前线告急文书于不顾，因而引起百姓极大的愤慨。戏曲《红梅记》就是描写李慧娘死后化为鬼雄，向贾似道讨还血债的故事。而翁同龢对中日甲午之战，力主“大张挞伐”，不能“一误再误”，否则“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矣。前方战事每况愈下，翁则“焦灼愤懑，如入汤火”。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愤于李鸿章割地求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 二万万两等），遂倾向变法图强，以“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不满慈禧太后名为归政，实则事事掣肘，欲辅弼光绪帝筹谋新政。他冀匡时变，破格求贤，给维新人物以“游说公卿”掀起变法的机会。曾以帝师身份走访康有为，讨论变法事宜。北京“强学会”成立，创办《中外纪闻》，他给予支持。他唯反对维新派提倡的民权“平等”学说，并憎恶“君主立宪”的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钟，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兵部尚书）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询问康有为，康答得头头是道。于是翁同龢再次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说“有为之才，过臣百倍”，才堪大用。不久，光绪帝见到了康有为的《上皇帝第三书》，又得读康有为历次上书和所著《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等，深受影响。他“不甘做亡国之君”，力排众议，锐意更张。于是年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智囊，又是变法维新的中坚，早为慈禧太后所记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后四天，慈禧太后就逼着光绪皇帝下手谕，说翁“揽权狂悖”，下令削职回籍。“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后，那位散布“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卖国论调的慈禧亲信刚毅，又弹劾翁同龢曾面保康有为。翁旋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翁同龢归里后，隐居于常熟县城虞山之西鹁鸽峰麓翁氏丙舍。丙舍为翁氏之祠堂，面湖背山，初创甚陋，后渐充实，揽山林之胜。正门由山前塘入，翁同龢亲书“翁氏丙舍”四字。沿街侧屋坐北三间，靠东厢房为翁同登龢接待宾客之处，布置陈设简单雅致。南面正屋五间，靠东为翁同龢起居之处，题额曰“紫芝白龟之室”。室外庭院植古柏一株，并有用太湖石堆成的玲珑假山一座。东墙间辟有一扇便门，门框上系有古瓶一只，翁同龢自题“瓶隐庐”三字，取意将己封于瓶中，从此不问朝野之事。并自号瓶笙、瓶生、瓶庵、瓶盦、瓶斋、长瓶、瓶庵居士、瓶斋居士，著有《瓶庐文稿》、《瓶庐诗稿》。翁氏丙舍靠西厢房三间，沿山塘亦辟有一扇小门，门外凿有一井，名叫“渫井”。此井为翁同龢削职归里隐居时所凿，原有花岗石井栏。传翁同龢恐慈禧加害，凿此井以备自裁，故亲书“可用汲”三字（“汲”为“急”之谐音，取意《易经》井卦），勒之井栏。翁又亲书“渫井”两字，镌于栏上，取不污之意。

翁同龢在故里虽处事谨慎，犹如“瓶隐”，但对国事日怀，忧心如焚。这从他的《浣溪纱·谢桥小泊待潮》一词中可以看出。词云：

错认秦淮夜顶潮，牵船辛苦且停桡，水花风柳谢家桥。

病骨不禁春后冷，愁怀难向酒边消，却怜燕子未归巢。

翁同龢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卒于里第。临死曾口占二十

字，以示子侄：“六十年间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为汝曹弹。”其内心之痛苦可知。

宣统元年（1909），吴中士大夫请为翁同龢湔雪，由两江总督端方代奏，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有《翁文恭日记》四十册问世。

西医屈桂庭为光绪施诊

屈桂庭是曾为光绪帝施诊的著名西医。约在1935年，年逾古稀的屈桂庭闲居在沪上寓所，慕名访者终日接踵于门。宅中客室明净雅洁，条幅嵌壁，几陈兰花。屈桂庭尽管年事已高，但面容红润，风趣健谈，侃侃而谈数小时竟无倦意。据屈自述："我自北洋医学院毕业后行医一生，亲历目睹了种种事变。其间，尤以对光绪的印象最为深刻，以至一直难以忘怀。"

屈桂庭的高足王仲芹时任袁世凯的侍从医官。1908年10月初，慈禧在乾清宫召见奕劻、袁世凯等六位亲政大臣，宣称皇帝病重，面谕六人荐医治疗。论毕，即有庆亲王奕劻启奏云："现有天津北洋卫生局长屈某精于西医，不妨征来一试。"袁世凯亦在旁边极力保荐，盛赞屈桂庭医术高超。慈禧大喜，事遂定。王仲芹得报后，立即急电津门，向屈桂庭密告了这一消息。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屈桂庭因此满怀忧虑，夜不成眠。

屈桂庭于10月10日奉旨赶到京师，14日觐见慈禧、光绪于北京颐和园。时光绪已经病入沉疴，名医陈莲舫和施愚皆束手无策。慈禧见屈后，略略问候，便问西医如何治法。屈对云："照西医规矩，皇上须得宽衣露体，然后才可治疗。"慈禧一口答应。屈诊视后发现，光绪脉息微弱，兼有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诸病齐发，极难救治。但既承旨意，亦只能尽力为之。当时，屈桂庭曾给光绪开了两张药方，一

为外敷，一为内服。然后向慈禧奏云：“臣之所开悉为西药，可去外国医院或西药房配制，而个人不便进药。”

嗣后，慈禧、光绪回到紫禁城，西医治疗仍日日不断。屈每入宫，辄听宫女笑呼云：“外国大夫来了。”光绪帝待人谦恭，脾气极好，对屈桂庭更是言听计从，信任有加。治疗数周后，光绪帝意渐惬适，神志转清，明显地出现了好转迹象。临朝之后，甚至还能以书画自娱。于是内外相庆，人心渐安，宫中一时称为幸事。

不期到了11月14日，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接着便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龙床上乱滚。当时慈禧亦已病笃，御医逃散，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立在床前。屈情知有异，唯恐多言招祸。此时所能为者，亦唯有建言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一俟光绪疼痛少解，屈便匆匆辞去。不料方至酉时，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

屈桂庭除西医外尚擅中医，于望、闻、问、切上都有独到的研究。从清朝王公到北洋要人，都曾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屈桂庭曾述云：“光绪之死实是个难解之谜，以至斧声烛影，言人人殊，今聊述所经，或能为研究者提供佐证。”

溥仪的出洋留学梦

溥仪曾做过出洋留学的美梦，这还要从他的老师庄士敦谈起。

庄士敦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苏格兰人。1919年3月4日，十四岁的溥仪在紫禁城毓庆宫向他行了拜师礼。从此，溥仪开始接触各种新奇的事物和知识，这使他越发觉得紫禁城如同监狱。庄士敦同情他，理解他，便建议他出洋留学。溥仪觉得这正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于是联合弟弟溥杰，开始秘密行动。

要出洋留学，就必须有资金，可是此事又不能张扬，所以他们想到了故宫珍藏的版本图书和字画。溥仪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宫中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先储藏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以备换取出洋经费。此后，溥杰每天从宫内放学回家，必定带走一个包裹字画的包袱，这样不间断地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他们从宫中盗走了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的手卷字画、二百多种 挂轴和册页、二百种左右的宋版书。尽管溥仪把身旁及宫门的每一个太监都花钱打点得“欢天喜地谢恩”，但在他们兄弟俩约定私逃的前一小时还是出了麻烦。不知哪位太监通报了内务府，随即紫禁城就在醇亲王载沣（溥仪父亲）的命令下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洋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出洋计划虽然破产，这批珍贵字画却成了溥仪真正的私有财产。

这批字画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怀素和尚、欧阳洵、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王维的人物画，有马远、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还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等，真是“无一不精，无一不珍”。

1932年3月9日，溥仪迁往长春前吉长道尹衙门任“伪满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溥仪又在长春郊外杏花村祭天，在“勤民殿”登基，做起了满洲帝国的“康德帝”。他从宫中盗运的那批字画古籍，由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负责全部运到长春，储藏在一个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小白楼内。

1945年8月9日晚，日本关东军在大厦将倾时撤退。溥仪匆忙坐上火车，准备逃亡日本，临走时又匆匆带上了一百多件字画、古籍及部分古董。而余下的一千余件字画、古籍随即遭了厄运。

解放后，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先是从东北，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故宫散件书画的征集工作。在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宣传引导下，迄至1952年底，东北文化部门已经从各方面征回晋、唐、宋、元以来的国宝近二百件。1963年和1964年北京荣宝斋又分别从收购的残片中拼凑出《故宫书画佚散目录》中所含的三十七件书画残迹和二十来件书画残片。

末代皇妃文绣

溥仪的皇后婉容，其事迹为世人所知者较多，而皇妃文绣的身世及她与溥仪离婚后的最后归宿，却鲜为人知。

文绣的家世，是满洲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人蒋氏的长女，其妹名文珊。

文绣乳名大秀，生于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即1909年12月20日。1916年，文绣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天姿颇为聪颖。她当时学名傅玉芳。

1921年，溥仪十五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十二岁，家世合乎条件，年龄又合适，就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12月1日，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 从此离开母亲的怀抱，进入深宫，同外界隔绝，过起形同幽禁的生活。

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溥仪于11月5日被逐出皇宫。文绣随着溥仪先移到醇王府居住，又托庇于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1925年2月，文绣随溥仪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初居张园，继迁静园。文绣在天津住了六年，与溥仪相处落寞寡欢。

1931年8月25日，文绣同其妹文珊出走，住进法租界国民饭店，并向溥仪提出离婚。她请律师张绍曾、张士骏、李洪岳为代理，向天津法院提出对溥仪的控告。溥仪请他的法律顾问林棨、林廷琛代为处理诉讼事件。经过双方洽商，最后以宣布离婚了事，由溥仪付给文绣赡养费五万元。当时文绣二十三岁。

文绣离开天津回到北京，生活费用完全依赖那笔赡养费。时间长了，不能坐吃山空，只得外出找工作。她曾到一个小学校做教员，还到《华北日报》当校对，后来还做过建筑小工，在街头摆过糖摊。抗战胜利后，她与军官刘振东结婚。

据说，1953年9月17日夜晚，文绣因心肌梗塞逝世，年仅四十四岁，葬于北京安定门外义地。

载涛冷对土肥原

1934年春，北京小汤山大柳村一所僻静的小院前停下一辆乌黑锃亮的小轿车。车里走出一位身穿西服的中年男子，身后跟着两名随从。

小院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载涛的隐居之处。载涛正在院内剪花，见来了客人忙搁下剪子迎了上去。

“啊，是您啊？”载涛认出来者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便流露出警惕的神情。

土肥原满脸堆笑：“载七爷，久违了，我是专程来拜访阁下的。”“屋里请！”载涛手一抬，让土肥原进屋，却没理会两个随从。土肥原也还识相，回头招呼那两人在屋外等着。

两人在屋里坐定，几句寒暄后土肥原道：“我们帮助你们成立了满洲国，溥仪做了康德皇帝，你是溥仪的七叔，应该为满洲国出力，辅助朝政呀！”

载涛虽是清室贵胄，却有爱国之心，极力反对溥仪去　做傀儡皇帝。他正色言道：“成立满洲国？我们‘五族’（汉、满、蒙、回、藏）是一家。溥仪投靠你们，卖国求荣，是我们家族的败类，民族的败类！他不是我的侄子！我绝不出卖民族利益，丧失民族气节！”

土肥原被载涛抢白了一顿，又气又恼，立即露出了凶相，拔出手枪对准载涛威胁道：“你要是不去长春，那好，我成全你！”不想载涛颇为平静地说：“你开枪吧！我愿为民族殉节！”说完闭上了双目。

这下倒使土肥原尴尬了，他不过是想恫吓载涛，哪里敢把赫赫有名的“载七爷”打死。

双方僵持了片刻，土肥原转而把枪收起，干笑道：“嘿嘿，七爷真是条好汉！不过，我也是为你着想，你看你现在生活苦到了何等地步！只要你到东北，就能恢复在宣统时期的职务，你又能过上王公生活了。”

清朝垮台后，载涛的生活确实很困难，曾在德胜门外卖过破烂，后来又搬到了小汤山大柳村先人的墓地上住，靠耕耘为生。但他绝不愿为了享受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断然回绝土肥原：“高官厚禄我不爱，我只想默默地度过此生而已！”说完闭上双目，不再说话。

土肥原见载涛软硬不吃，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1935年春，溥仪从长春专程到遵化马兰峪扫墓。土肥原又派特务动员载涛去迎接溥仪，并一起到沈阳北陵扫 墓。载涛义正词严地回答日本特务说：“我是民国人，不留恋过去的清朝，也不欢迎溥仪回来扫墓！”他不仅自己坚决不去，还说服那些留在北京的清朝遗老遗少也不要去迎接溥仪。

载涛冷对土肥原的爱国行动一时成为美谈。一位清朝的贵胄，末代皇帝的七叔，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能够做到如此大义凛然，确实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末科状元谁钦点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殿试后，由八位阅卷官轮流阅卷，最后定一甲一名、二甲一名、三甲一名，下至乙、丙顺次排列，一甲一名为头名状元。清朝最后一位一甲一名状元叫刘春霖，是河北省肃宁县人。这位末科状元是谁钦定的呢？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阅卷完毕，得一甲一名的是广东人朱汝珍。因为慈禧与帝党的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有隙，便厌恶广东人，二则看到自己讨厌的珍妃的“珍”字，故对一甲一名的朱汝珍不喜欢。往下看是刘春霖，刘春霖之原籍为“肃宁”。“肃宁”这两个字有吉利之意，名字“春霖”又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内涵，因此特钦点刘春霖为一甲一名。

另一种说法是：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一日，举子们的试卷经阅卷大臣评阅后，前十名的名单送交颐和园请慈禧钦定。其时，慈禧已接到“废除科举制”的奏折， 她感到取消科举制是大势所趋，便将试卷草草看了一遍，将不喜欢的朱汝珍草草地圈为一甲一名，刘春霖为一甲二名，三名为商衍鎏，四名为张启厚，以下等人未改动。她圈毕说道：“让皇上看看，由皇上钦定就可以了。”于是名单送到光绪处。光绪细读刘春霖的文章：“皇上陛下践祚以来，勤求治道，唯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治效未彰，外患日亟，熹者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乃者。”读到此，光绪百感交织，不禁仰天长叹，潸然泪下。再读：“凡察吏、治军、理财、励士、文教诸大政，均不得不因时制宜

也……”当时的政局正是内忧外患频繁，慈禧主张卖国求荣，光绪主张革新，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保持国家的尊严，于是慈禧便把光绪幽禁起来，使其不能参政、议政。数年后慈禧看到众人议论纷纷，归政呼声日涨，便觉得情形不妙，恐将受到众人唾弃，加之有些问题自己不好批示，便把光绪放出来，让光绪理政。光绪一口气读完刘春霖的文章，而且连读两遍，爱不释手。读完，沉思片刻，遂将刘春霖之名次从一甲二名提到一甲一名，御笔钦定。

据说刘春霖是一名才子，他的文章慈禧根本就没看。刘春霖的试卷是规整、匀称、清秀、挺拔的小楷字，这把光绪吸引住了。原来光绪自从幽禁瀛台，精神便萎靡不振，那天接到试卷，看了刘春霖的文章，一下子激起了他爱国爱民的情怀。如果慈禧看到这篇文章，也许不会让刘春霖当一甲一名。只可惜刘春霖正赶上取消科举制的末科 考试，虽然中了一甲一名状元，也未按照头名状元得到高官显位。混乱的时代埋没了他的才华。不过刘春霖后来在新政活动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末科状元的骑马游街和琼林宴

刘春霖中状元后，他骑马游街的盛况和大设琼林宴的情形，至今还常为人们乐道。

1904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新考中的进士要朝见皇帝，早晨便到太和殿前等候。当光绪皇帝在太和殿升座时，新考的进士都跪在殿前的石阶下的御道两旁。大学士王文韶将皇榜呈送殿内，交传胪官。不一会儿，传胪官高声读榜："一甲第一名刘春霖！一甲第二名朱汝珍！第三名商衍鎏！"三人先后从队伍中出来，跪在御道旁。传胪官读完金榜，便将榜贴在太和门外。

金榜贴出后，新中进士们退出午门。门外早搭有彩棚，由顺天府府尹将三人接到彩棚里，给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的帽上插上金花，身上披红绸，然后引出彩棚，扶上骏马。接着鼓乐开道，执事们打着"状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的牌子，开始游街。

游街的路线是：出天安门向东，到东单牌楼往北，过 东四牌楼到北头顺天府衙。顺天府府尹已先到衙门迎接，

将三人接到衙门内。府内早已准备好三桌酒席，三人每人坐一桌，府尹在对面作陪，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府尹举杯相贺，三人

同时举杯谢意，仪式即完毕。继而，出府衙西行，到钟鼓楼大街，过地安门西行到西四，转向南，过西四牌楼，到西单牌楼，转向东，又回到天安门。然后，由天安门向南，出大清门（今已拆除），过前门至外城，要游遍内外四城。这种仪式，即是人们通常说的“骑马游街”。

游街归来后，将状元送回住所（当时刘春霖住在宣武门外的直隶会馆），然后依次再送榜眼、探花（当时朱汝珍、商衍鎏同住在粤东会馆）。

刘春霖回到直隶会馆时，直隶同乡在北京的知名人士及刘春霖旅居北京的亲友，都在会馆等候迎接。当天，这些人设宴庆祝刘春霖金榜题名，欢宴畅谈一直到深夜才散去。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在礼部内大殿设宴，招待考中的所有新进士。这是一次隆重的宴会，名为“恩荣宴”，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琼林宴”。

琼林宴由恭亲王溥伟代表皇帝出席主持，大总裁同考官们全体参加。这个宴会是一个隆重的庆贺宴会，又确系一个礼仪形式。恭亲王溥伟代表皇帝作祝贺、勉励新进士的讲话后，大总裁和各同考官也先后讲话。讲话毕，恭 亲王退出，接着是新进士们拜见各考官，这就是通常说的“认房师”。

过了些天，吏部即悬挂一张榜，这个榜是新考中的进士按照规定分配官职的榜。刘春霖为翰林院修撰，这也是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一个官职。

清代的太医院

在封建时代，有一个专门侍候皇宫内院的医疗机构，叫做太医院。这种太医机构，在不同朝代名称也不尽相同。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称太医署，宋代称太医局，金、元、明、清时则称为太医院。

清代太医院大体承袭了明代太医院的旧制，是隶属于礼部的独立机构（清太医院地址在今地安门东皇城兵杖局东侧）。一般由一名王公大臣领衔管理太医院院事，下设院使（相当于院长）一人，左右院判（相当于副院长）各一人，御医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医士二十人，另有制药人员若干。人员的定制是根据太医院工作量的大小和宫廷里的需求随时增减的。太医院之建制虽不满百人，但人才荟萃，能在太医院服务者，绝非医术平庸者。

清代统治者为了保证太医院的医疗水平，制定出了相当严格的录取制度。在太医院内设立教习厅（医学校），从御医、吏目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任教。学生来源于民 间医生和太医院医官的子弟。这些学生必须“品行端谨，通晓医理”，并由院内医官作保，方能入院在教习厅习业。在教习厅习业期间随时由院使、院判进行考核，择其优秀者升任医生或医士。对于已经任医生、医士者，也同样随时予以考核。若发现“习业荒疏”者，不论在太医院供职多久，一律发回教习厅重新学习。教习厅所开设的科目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脉诀》、《本草纲目》等及临床各科。

太医院为了充实力量，提高医疗水平，还经常从各省选拔、保举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民间医生。这些民间医生由各省巡抚举荐，到北京太医院进行考试，合格者根据学识授以吏目、医士等职。如果民间医生确属医学造诣高深者，虽年事较高，太医院为了发挥其所长，就准许其带弟子一名进太医院供职。

太医院的专业分科在清初分为十一个专业，以后合并为九科，即为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科、咽喉、正骨科。凡是在太医院供职者，自院使到医士都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给事内廷”。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给皇帝看病也一样，是一种风险很大的差事。清宫规定，凡是皇帝服用的药剂，先由御医拟方上报，然后把同样的两剂药同煎，分装在两个碗中，一碗由御医或宦官先尝，一碗由太监送皇帝服用。为皇帝、皇后看病，往往是几个御医同时诊治，各拟一方， 然后经协商后再以一方为准。有时为一个病者竟有六七位御医同时会诊，商讨治疗方案。如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御医庄守和、李德昌、王应瑞等人同为慈禧太后拟“保元益寿丹”一方。

医生一旦入职太医院，就是为少数贵族所专用，到年老体弱时虽然可以告病回家，但也不能在外行医。为老百姓治病若被人告发，就会受到严惩。

京城朝野净身房

中国的宦官历来是一大害。远的不必说，单是清朝末年的李莲英，其权倾朝野犯下的累累罪行便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姑不论其权柄之大，仅就日进斗金之外快便见其进项之丰。故京畿百姓常有私自阉割幼男以求宫中收用的惨剧，而不隶清朝八旗的无籍子弟，亦有不甘贫贱已婚而自阉者，其惨烈之状可想而知。

京城之净身房作为一种热门行业，朝野均有。而民间司其业者，必须经宫中批准，属半官半私性质，彼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清代末叶闻名京城的民间净身房有两处：一处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爷，另一处是地安门方砖厂的小刀刘。这二位市面上的人物皆受过“从七品”的皇封，有朝服而无顶戴，无权柄而有实惠，以其“刀法”纯熟并能手眼通天而颇受人尊敬。他们出门时穿着朝服，梳着油光的大辫子，迈着四方步，装着斯文的样子，路遇熟人称其一 声“爷”，只从鼻子眼儿里轻轻“嗯”一声。于是有文人讥之曰：“靠割屌走红运，还挺牛B！”

宫中的太监时有因老、病或受杖刑而死者，故需经常补充。因此，毕五爷与小刀刘的生意从不萧条。故当年京城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净身房的买卖，割一个送一个，送一个收一个。”语意双关，耐人寻味。

两处净身房所收的男童多是寒门子弟和“拍花的”拐骗的小儿。“拍花的”系北京土语，指用谎言或迷药拐骗小儿，甚至加以谋害或拐卖的歹徒。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京师拍花的极其猖獗，常年出没于闹市或小巷，窥伺单独行动之幼童，以药粉迷其魂魄。幼童闻药后，如坠云里雾中，任凭歹徒摆布。净身房阉割拍来的小孩儿，久之终被外界所闻，故凡有丢失男孩儿者，必速去两处净身房寻找。

由净身房阉割调养后送至宫中的小太监，每月可领俸银二至四两，其数目相当于旗族兵饷中之“马甲钱粮”（每月三两）或“候补领催钱粮”（每月四两）的标准。彼时物价极廉，每月有此固定收入，其家属丰衣足食且尚有节余。然而依照宫中认可的惯例，凡小太监俸银之一半，须交民间净身房作为手术费或管理费。毕五爷与小刀刘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又买房子又置地，妻妾儿孙满堂，名声赫赫而不可一世。而受其“一刀之苦”的诸多童男，虽说进宫当了太监不再为吃喝发愁，但毕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奴才，且绝了子孙断了香烟，亦人间一大悲事矣！

人与某些动物比较，并无再生能力。而奇怪的是，少数年轻的太监被痛割的生殖器部位会忽又冒出一骨节儿肉柱儿来，不禁为之大惊失色。为苟活并保全性命，不得不“扫二茬”，将那“罪孽的玩意儿”再次割舍。那钻心的疼痛，那撕心裂肺的号叫，那九死一生的危险，虽非身临其境，亦可揣度个中滋味儿矣！

寇太监参政被杀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六日午刻，未满二十岁的小太监寇连材，以“私递封奏，语言悖谬”的罪名被斩于宣武门外菜市口。此案当时曾轰动朝野，寇连材也成了文人雅士茶余饭后议论的新闻人物。

寇连材，直隶昌平县人，年十五阉割入宫侍奉慈禧太后，为梳头房太监。因其聪颖伶俐而备受慈禧宠爱，举凡西宫会计事宜，皆使他掌之。少长，见慈禧所行者多淫纵事，屡次借梳头之机而谏诤，慈禧以其少而贱，不以为意，唯呵斥之而已，并不加罪。不久，慈禧令其充任奏事处太监，一年多后复为西宫会计房太监。

乙未（1895）十月，慈禧杖责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光绪为摴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光绪吸之，而别令总管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庭肆意造谣，称光绪失忆，为废立大造舆论。与此同时，慈禧又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供娱乐。

寇连材目睹慈禧所作所为，忧心忡忡，日夕皱眉，如醉如痴，诸内侍皆以为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清晨，慈禧尚未起床，寇连材便泣涕长跪榻前。慈禧揭帐叱问何故，连材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慈禧以为狂，叱之离去。

寇连材被叱退后，遂请假五日，当天回昌平与父母兄弟诀别，并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授其弟。回宫后，将几年的积蓄分赠各位低级太监。至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三请练乡兵，以加强国防抵御外侵……所言者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最奇者为末一条，言皇上至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盖不顾生死利害而言也。

慈禧阅毕这道与众不同的奏折，异常震怒，遂责问寇连材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连材对曰："奴才所自为也。"慈禧命背诵其词一遍，果无甚舛。继而目问道："本朝成例，内监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连材坦然答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折也。"于是慈禧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六日移交刑部处斩。刑部尚书叶赫那拉怀塔布曾为寇连材跪求宽办，终未获允。

处斩寇连材一事，本应由军机处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 刑部官员发布指示，慈禧越俎代庖直接下达死刑命令，全然不把军机处放在眼里。因此，恭亲王奕䜣曾对户部尚书翁同龢说："吾等为旷官矣！"言词中流露出对慈禧专横跋扈极度不满的情绪。

慈禧杀了斗胆进谏的寇连材，犹不解恨，事隔一天后，将赞成光绪帝亲政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职并驱逐出京。其手段之狠毒令人发指！

崔得贵走嘴遭杖杀

慈禧想方设法寻乐解闷时总是把小太监崔得贵找来，和他面对面地下棋。善于胁肩谄笑的崔得贵，以能陪伴大清帝国的主宰下棋而万分自豪，而内心又慑于太后喜怒无常的脾气，故每次下棋举止极为谨慎，且言语嗫嚅。崔得贵此招确实讨得太后欢心，屡屡得到金银珠宝之类的重赏，这也招来了他人的嫉妒。

一天，崔得贵来到乐寿堂的西寝室，给慈禧先叩了头，然后摆好了棋子，与老佛爷对弈。走了几步棋之后，他见慈禧有个卧槽马摆在炮口下，便迷迷糊糊地说：“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匹马！”慈禧一听，不禁大怒：“你也敢杀我的马！放肆、大胆，我要杀你全家！”

慈禧是“金口玉言”，言出法随。只听李莲英总管高声道：“把他拉出去！”众太监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有的举棒乱抽，任凭崔得贵哀求。刹那之间，崔得贵做了杖下之鬼。接着，又听慈禧厉声说：“快去捉拿崔得贵的全　家！”此时许多心地善良的宫女、太监急忙下跪向慈禧求情。慈禧本是为了娱乐而迁怒的，她也有些后悔，便说：“你们都起来，姑且饶恕他全家。”

由此看来，崔得贵被杀只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崔得贵久在西太后跟前，应是知道说话的分寸的，这次为什么没把住门呢？

原来，崔得贵久同慈禧下棋，得到赏钱太多了，便饱暖生淫欲，

托宫外的人给他说亲。媒人介绍的是海淀三角地一家孤女寡母。那寡母张贾氏的女儿小鹤，已到破瓜之年。张贾氏给人做针黹，工钱微薄，终日不得一饱，故情愿把女儿许配崔得贵做挂名的干夫妻。而小鹤明白，太监没有生殖器，过不了夫妻生活，为此多次和母亲吵闹。张贾氏知道女儿的苦衷，说："孩子，嫁给有钱的太监，总比每天挨饿强罢！"小鹤知道每天挨饿的滋味，便勉强答应了。

张贾氏经介绍人来回穿插，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崔得贵在颐和园后墙外六郎庄租了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把丈母娘也接到新居来住。

小鹤婚后经常到村外杂货铺买针头线脑儿，日久天长，就和杂货铺的少东家小赵勾搭上了。那时候，正是五月初，宫中正在筹备西太后十月初十的大寿。宫中的太监们张罗事很忙，崔得贵无暇回家，小鹤于是背着母亲在三更天把少东家引进卧房。她从十月初一起，天天与少东家 幽会，夜无虚度。偏巧初七这天深夜，崔得贵回家来了。张贾氏住在西厢房，知道是姑爷回来了，便去开了门，说姑娘早已安睡了。崔得贵快步前去敲自己的屋门。当小鹤把门拉开，一见是自己的丈夫，吓得浑身打颤。自然，那赵少东家也就成了瓮中之鳖。崔得贵想：原来小鹤已是"怀抱琵琶另有别弹了"。但是他心中还是谅解了小鹤的苦衷，故意把少东家认为是小偷，把他送到巡捕厅。巡捕厅孙管带一看是宫中的崔老爷，马上把少东家收审关押。

事后，崔得贵嘱咐张贾氏严守门户，并对小鹤一如既往，将窈窕的小娘子紧紧搂在怀里，宝贝儿长宝贝儿短地叫个不停。那小鹤刚开了荤，对崔太监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爱抚益发暗自叫苦，不禁凄然泪下。

次日清晨，崔得贵走进颐和园，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同慈禧下棋。就这样，神不守舍地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这匹马！"惹来了杀身之祸。

“戒骄戒矜”李莲英

有清一代没有封过九千岁。就是权倾朝野的多尔衮，或是宣统皇帝的生身父亲载沣，也只是个摄政王，而不是九千岁。可是，却有人把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李莲英称为九千岁。此无他，只因李莲英在慈禧的纵容下权大势大，显赫一时，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亲王大臣、文武官员都要让他三分。所以说，他是个真正的九千岁。

李莲英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太监大总管，极得慈禧宠信，陪伴慈禧左右形影不离。他对内政、外交无不涉及，是个有极特殊地位的人物。那么他究竟是何许人呢？

李莲英原名李美泰，字灵杰。祖籍浙江绍兴，明末清初其先人流落山东，后来移居直隶河间府大城县。父名李玉，是个修鞋匠，家境极为贫困，在家乡无以为生，全家辗转进京，以修鞋为业。道光二十八年（1846）李莲英出生。李莲英小时候常帮父亲削切皮头，所以人们都叫他“皮削李”。

李莲英进宫当太监的过程，很像京剧《法门寺》中刘瑾自报家门时说的那样：“七岁净身，九岁进宫，一十三岁扶持老王爷……”李莲英在七岁时受了一刀之苦，成了阉人，九岁时进宫当了一名小太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死后才“退居”出宫，在宫内待了五十三个年头。

李莲英为人乖巧机警，行事谨慎周全，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后，慈禧拉拢恭亲王奕䜣，诛除了肃顺、端华等八大臣，夺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当时为慈禧内外传递消息的人，正是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太监李莲英，那时他才13岁。此后，他更得慈禧的欢心和信任。他升为总管之后，权势日大，卖官鬻爵，营私受贿，无恶不作。甚至醇亲王去海口阅兵也要派他去监视，至于朝中文武大臣官职的任免升降，也往往取决于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如何进言。事实上，在慈禧垂帘听政的那些年，李莲英这个太监的权力要比光绪皇帝大得多。

慈禧对李莲英之宠用，实际已经触犯了大清祖制。顺治时，曾在太和殿竖立铁碑，碑上刻字云："不准内监参与朝政，违者斩。"御史朱一新因此上疏："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讹传，士庶皆愕……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礼制？"结果，朱一新由于"疏上，太后怒……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李莲英由于有慈禧的庇护，更加横行霸道。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住在颐和园，把光　绪囚禁在玉澜堂，命李莲英监视。

慈禧死后，李莲英告退离宫。他在东皇城根购置了一所宅院，虽不是琼楼玉宇，但也富丽堂皇，足以安享晚年。此外，李莲英在东华门著名的饭馆东兴楼占有三分之二的股权，收入颇丰。显赫一时的李莲英之所以能在宫廷中善保终身，全凭"戒骄戒矜"四字处世。

李莲英的前任安德海，在朝内恣肆骄横，惹怒了恭亲王。于是，恭亲王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违制出宫的罪名，将安德海就地正法。李莲英继安德海任"太后掌案"后，由于前车之鉴，所以一直是谦恭待人。后由"掌案"升"总管"，原太后"掌案"一职由王俊如继任。王失宠后被发往盛京（沈阳）秘密处死。伴君如伴虎，况且，"老佛爷"绝不是心慈手软的仁主，而是苛察秋毫、深谙驭下之道的"女强人"。李莲英的前任和后任都做了刀下之鬼，为了保己终身，不得不谨慎从事。

笔者友人邹君认识一位名叫曾毓隽的老先生，清末曾做过一任大城县令，知道李莲英是当地人。一次，值李返里省亲，曾先生便硬着头皮去拜谒，不禁诚惶诚恐。没想到这位李大总管以客礼相见，一口一声“老父台”。告别时，李送到二门，曾先生说：“请总管留步，以后总管家有事尽管吩咐。”李听后作色道：“老父台，这可不行，我家的子侄和族人如有什么不轨之事，你要严加管束，否则，你我都要被参啊。此事我拜托了，你要切记。”言词中态 度非常诚恳。曾先生在任上，确未发现李家有什么不法之事和不轨行为。

李莲英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绝不是戏剧舞台上的刘瑾。虽然有至高的权势，有上万万两的白银，但也不敢起大第。虽身为二品大员，但在1886年奉旨陪同醇亲王巡视北洋水师时，竟不戴二品红顶子，只戴了个七品小官的金顶子。因为李莲英知道，太监受二品顶戴是违制的，若在此时耀示“殊荣”，乃是招祸。一路上李莲英的态度十分拘谨，布鞋、布衣，每日手执亲王的长杆烟袋，侍立装烟。不知根底者，皆以为他是亲王的侍从。另外，李莲英知道，醇亲王是光绪的生父、慈禧的妹丈，权势绝不在杀安德海的恭亲王之下。他奉旨陪同醇亲王巡视海军，朝野舆论纷纷，恐开太监监军之先河，御史们此时正拭目以观。李莲英纵有受财之心，也只能采用韬晦之计，绝不敢“招事”。

李莲英常对手下人说：“一个内务府，每年稳稳当当的十万两银子足够我花的，用不着交外官，交外官是有危险的。”庚子之后，袁世凯、杨士骧之流给老佛爷进贡时，总派差官先给李莲英送一份。李莲英闻送礼的差官将到，早早迎出门去，不待差官请安，就先屈膝下跪等候。所获之礼如值“一千”，次日必还礼“八百”，用心可谓良苦。因为拒收得罪人，收下又怕惹出不好应付的事来，故用“八百”对“一千”之策，来个两情相抵。

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决定挖掘海淀区恩济庄六一学校内李莲英之墓。挖开一看，棺内只有人头一颗，肢体是用珍宝代替的。

据说，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昼夜之间相继死去。李莲英失去了靠山，出宫后隐居西城棉花胡同私宅。宣统登基，由光绪的遗孀隆裕太后垂帘听政。隆裕的宠宦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对头。他乘李莲英失势之机，联合群阉敲李莲英的竹杠。隆裕太后也下手谕责令清查严办李莲英，李闻讯，赶忙向江朝宗求救。原来江朝宗是袁世凯的心腹，慈禧在世时，他便与李莲英呼兄唤弟。江朝宗派人告知隆裕，对李莲英不要赶尽杀绝。隆裕畏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袁世凯，对江朝宗的话哪敢不听，故放松了对李莲英的追查。

小德张见江朝宗手眼通天，只好暂时罢手。为了与李莲英抗衡，他也把珍宝源源送进江府。江朝宗是来者不 拒，他见李莲英已成一只困兽，而小德张正年轻有为，又是当朝隆裕太后的亲信，故乐于和他交往。小德张倍述了李莲英作恶多端的罪行，渐渐改变了江朝宗对李莲英的“慈悲”之心。自此，小德张更频繁出入江宅。

笔者与江家乃世交，20世纪30年代曾居住江宅南院，听江朝宗谈过李莲英与小德张之事，但他闭口不谈李莲英被杀的原因和经过。他

的独生子江泽春（字宝仓）比较坦率，有一天，江泽春说："溥仪做了皇上，隆裕太后想没收李莲英的财产，要不是老爷子（指江朝宗）出来替李莲英说话，早就把他的家抄了。有一天老爷子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晚饭，他万分感激老爷子救了他一家。席散之后，李莲英路经后海遇到了土匪，被暗杀了。在后海河沿，只找到了李莲英的人头。"

当时，笔者心生疑窦，猜测此事是否与江朝宗有关，但又不便细问。江泽春还谈到李莲英死后的一些情况。

李莲英被杀的次日清晨，李莲英之弟去拜见江朝宗。没等其弟开口，江朝宗便问："令兄昨晚回家可好？"其弟说："家兄昨晚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给暗害了。"江朝宗故意大吃一惊，说："你放心，我一定下令捉拿凶手。"当日，江朝宗又派江泽春到李宅"慰问"其家属。这才知道，昨晚李的家人见李莲英深夜不归，便派一家丁去会贤堂寻找，途中遇见李家的车夫和跟班的匆匆赶车往回跑，报告遇路劫和李总管被杀的情形。

三人急回宅中报告，举家慌乱，赶快派家丁把李的兄弟连夜叫来。又派人到后海寻尸，直到天蒙蒙亮时，才找到李的人头。他们几个兄弟商量，此事不能向外人公布。他们恳请泽春回禀江大人，不要下令追究，并请代为保密。然后，对外以病死发出讣告。

小德张一次堂会三千两

旧时达官显宦、富商巨贾遇有喜寿事或节日，要举行庆贺家宴。家宴时广约名伶到住宅唱一日或几日戏，叫做“堂会”。

清咸丰以来有四大权宦，他们是臧德才、安德海、李莲英和小德张。小德张在天津乔迁新居后，曾举办过一次盛大的堂会，竟花去白银三千两，素日往来甚密的名伶额外开销还不在其内。此举在津门引起哗然。

小德张原名张兰德，河北省静海县唐官屯人，晚年居住天津。因他的财产不计其数，在津时生活极为奢侈。他在天津郑州道建新居，用八亩地盖自己住的楼房，另外二亩盖民房，以便出租。小德张虽然识字不多，却很聪明，所有建筑的设计、画图都是自己动手。他认为，盖房子主要是地基要坚固，这样房子才能长久。所以，在打地基时，他每天都要亲自去看，并对工人们说：“你们要把地基打坚固，打一寸厚我给一寸厚的洋钱。”工人们当然　高兴。于是每天下午二时，他便带着现洋百余元到工地视察，认为地基打得好，便把洋钱向基坑中一撒。工人们一面捡钱，一面喊：“谢老爷赏！”小德张见状，哈哈大笑，以此为乐。

这幢楼房于1924年盖成。楼分前后，前楼自住，楼内地板都是软硬木镶嵌，花纹图案极其精美。另有专唱堂会的戏楼、玻璃厅，西边

还有家祠、神堂等。专供唱堂会的戏楼，陈设非常讲究，可谓富丽堂皇。

小德张爱唱堂会，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入宫后，见慈禧太后爱听戏，并让太监们学戏，便认为这是上升的台阶，所以苦苦练习，并喜欢与艺人交往。他和谭鑫培、王瑶卿等御前吃供奉的名角儿都有往来。他的武生戏和小生戏都唱得好，有时也唱唱花脸腔，是一个功夫很深的票友。笔者曾见过一张他早年与名伶杨小朵合作演出的《破洪州》剧照，他扮演杨宗保，扮相相当帅气。

正因为熟悉京剧，故而他办堂会专请红极一时的名伶。小德张在新落成的戏楼里举办大型堂会共三天，请来的名伶有杨小楼、余叔岩、王瑶卿、陈德霖、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王又宸、郝寿臣、侯喜瑞、李万春、筱翠花等，真是名角如林，可以说把当年的名角都请到了。三天堂会中所演的剧目都是戏院轻易不演的戏码，如王蕙芳的《探亲家》，杨小楼、郝寿臣的《连环套》，筱翠花、李万春的《狮子楼》，程砚秋的《玉堂春》。这次堂　　会的声势可想而知。

这次堂会开销惊人，不算吃、住、接、送、抽（不少名伶抽鸦片烟），花去白银三千两。名伶们返京时，小德张还赠送了不少鼻烟壶、扳指等礼品。

清宫遣散太监趣闻

常有人和我谈起清宫遣散太监的事。此事笔者未得亲见，只是有所闻而已。

清宫遣散太监是从1923年7月开始的，也就是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清宫的前几个月。虽然那个时候溥仪还住在清宫里，可是早已失去了帝王的威风。自退位以后，他那当年九五之尊的地位，也随之江河日下。宫内太监虽然表面上仍称他“老爷子”，暗地里却做些趁火打劫的事。因为宫里开销过大，难以支撑局面，溥仪打算将重华宫历代所藏珍品拍卖。库房首领太监阎金福知道，库内珍品早已盗卖不少，倘若查出，罪行匪浅，遂勾结其他太监放火将重华宫一烧了之。

事后溥仪将阎金福交慎刑司严惩。这时阎金福的党羽兔死狐悲，遂勾结许多太监，以索取欠薪为名联合罢工。溥仪早有遣散太监的打算，便乘汽车去北府和他父亲商量。最后决定只留少数太监在身边，其余一律遣散。

第二天，在众太监又来索薪闹事的时候，清宫护军警察队一面把守各殿，一面将众太监拘获，以十人为一排，押出宫外。太监们被迫从神武门出宫，一个个赤手空拳，连行李也不准带出去。他们出宫后无处可去，只好在北池子附近聚集不散。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破口大骂，直到夜间十点，还在街头“打盘儿”。最后由当时的卫戍司令王怀

庆和警察总监薛之行前往弹压。先将无家可归者安置在景山后面两旁的雁翅楼内，后与内务府大臣荣源协商，宣布对遣散太监的临时措施：凡是总管一级的太监每人发一百元，首领一级的太监每人发三十元，其余太监每人发十元。

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对遣散太监一事的各种原因写得很多，而当时太监出宫的情况几乎没有写。今天偶忆及此，聊以补遗。

当时被遣散的太监有五六百人，出宫后无以谋生。1931年春，突然从上海来了一个姓朱的人，下榻珠市口中国饭店，他的任务是招太监二三十人赴沪就业，月薪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不久约有二十名太监搭车赴沪。事后闻知其出路之一是去做护工，当时上海医院女工工资太高，想以太监代替。

逊清的宫女和苏拉

民国建立之后，溥仪仍居宫内，照例每三年挑选一次宫女。凡应选的必须是上三旗旗人的女子，年龄十三四岁，身无残疾。凡幼稚子女及妃嫔之姐妹兄弟之女，不能应选。

每次挑选宫女，事先由内务府奏定日期，一般在3月份进行。备挑女子的人数每次约八十人左右。届期，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各佐领女子在神武门外等候。写好排单，分旗安排，由首领太监引导入宫。不合格者，命出宫，凡选中者，教以宫规礼节，练习写字读书。

一旦选中之宫女，便与家人和社会隔绝，要服役十年左右，至二十四岁时才能出宫婚嫁。宫女们终日早起晚睡，主人稍不如意便斥责打骂。有的积劳成疾，有的受不了折磨便私自逃跑，更多人是装笨充傻以求被赶出皇宫。据档案记载，太极殿敬懿皇贵太妃处、长春宫瑾贵妃处、永和宫端康皇贵妃处、寿西宫珣贵妃处、储秀宫庄和贵妃处、重华宫荼惠皇贵妃处，每年因笨交出的女子计有十余名之多。

由于经费日益困难，又不断受到舆论的压力，清室于1923年9月决定释放大批宫女。瑜、瑾两太妃只好命各宫秀女，凡年满二十四岁的自行陈报，于旧历中秋节前一律释放，并赏洋一百元，自谋生路。但在那动乱的时代，这些女子没有谋生之路，出宫后有的出嫁成家；有的被转卖他处，或继为仆役，或沦为妓女；也有的无依无靠、孤苦

飘零、饥寒交迫，最后悲惨死去。

苏拉，满语是“杂役”的意思。宫中凡搬、拉、抬、运等笨重的体力活，都由苏拉去做。

寿皇殿每日管供桌取饽饽、抬运的苏拉共九百二十八名，中正殿十七名、雨花阁三名、英华殿十八名、嵩祝寺六名、永慕寺六名、大高殿一百八十名、慈宁宫二十名。全月共用苏拉一千二百零二名，一年共用苏拉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二名。后来，宫中使用的苏拉逐年渐少，一是由于小朝廷的杂役事务比过去少了，再是经费受限。

苏拉常和太监串通一气，内外勾结，大肆盗窃宫中金银珍宝。常常是太监把东西从库房偷出来，让苏拉带出卖掉分赃。内务府虽有规定，苏拉进出宫门，不但要持有腰牌，而且还要搜身检查，但仍无济于事——苏拉把金器银锭或藏在裤裆里，或藏在肛门里，依然能把珍宝盗出。

政坛旧事

《康熙字典》背后的灭门案

众人皆知的《康熙字典》是清政府召集许多学者集体编纂的。它依据明代《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为中国古代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由于它是奉康熙皇帝之旨编纂，并经康熙题名，因而变得神圣不可冒犯，为此还有不少人丢了性命。

乾隆时，江西有个叫王锡侯的读书人。此人一生追求功名，三十八岁才中举，而后屡试不第，无奈在家乡瑞州从事著述。对于《康熙字典》，王锡侯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辞书收字太多，寻检不便。于是他采用另一种编排方法，按字义把字“贯穿”起来，编成《字贯》一书。由于王锡侯的《字贯》避免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缺点，故此书刊印后在南方各省广为流传。

不久，江西巡抚海成向乾隆皇帝递折，说王锡侯讥讪并恣意删改《康熙字典》，实属妄为不法，应革去他的功名，进行审讯。乾隆亲自查阅了《字贯》一书，发现《凡　　例》中竟然直书孔子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之名，毫无避讳之意。乾隆当即火冒三丈，断定王锡侯“大逆不法”，下令急速查处。同时，他还指斥想借此事捞油水的江西巡抚海成“既办此事，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粘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责骂海成“实属天良尽昧”，也应“严行申饬”。

《字贯》一案发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经过三个多月查证审理，于年底结案如下：

王锡侯，妄为著述，不避圣讳，实属大逆不法，依大清律斩决。王锡侯受诛时年六十有五。

王锡侯之子王霖、王沛及孙子王兰飞、王海飞、王牡飞、王云飞俱于秋后处决。

原江西巡抚海成，从宽为斩监候，亦在秋后处决。

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均阅看《字贯》一书，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着革职，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高晋，失察《字贯》狂著书籍，照例降职留用。

实际上，《康熙字典》确实存在一些错谬，诸如：它虽征引了不少书籍，可有的书名、篇名错误或妄改，有的 引文脱落，有的删节失当，甚至有断句错误；再如它拘泥于古代原有的训诂，在解释字义时往往不够确切或者失于简略。

发生在《康熙字典》背后的这场悲剧，揭示了清初统治者借大兴文字狱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和残忍。至今思来仍令人发指。

巡抚办公尼姑庵

这里所说的巡抚，指的是清末民初时期两广巡抚陆荣廷。陆于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在广西武鸣县垒雄村，因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十岁时便外出成为一名流浪儿。在他十六岁那年，因偷了东西，为逃避衙役的追捕，躲进一座观音庙的棺材里睡着了。睡梦中，观音菩萨指点他快往南逃，而且越远越好，日后定有出头之日。醒后，他果真向南逃去。当他从两丈多高的城墙跳下时，竟安全无恙，他认为正是观音菩萨在保佑自己。

后来，陆荣廷贩过盐，当过兵，在军阀队伍里先后当过管带、统领等。1911年，他升任广西提督，1916年又任广东督军。紧接着，段祺瑞政府又委任他为两广巡抚。在征战厮杀的几十年里，他几番大难不死，逢凶化吉，都认为是观音菩萨保佑的结果。平时，他经常仿效观世音的装束，身穿白色素装，头裹白布长巾，腰系银色长链。1912年他荣归故里时，所办第一件事即是大兴土木，重建 观音庙。寺庙落成之日，他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庆祝仪式。然而，就是这个自认为虔诚信佛的人，经常做的是杀人放火、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之事。

陆荣廷任两广巡抚到广州上任之时，正赶上当地盛行一种“开师姑厅”的风气。广东人把尼姑称为“师姑”，尼姑庵称为“师姑庵”。清末民初，世风败坏，一些达官贵人突发奇想，跑到尼姑庵去寻欢作乐。在妓院吃花酒叫“开厅”，到了尼姑庵，就变成“开师姑厅”了。陆荣廷很

快染上了“尼姑瘾”，两天不“开师姑厅”便无心办公。后来，他索性搬到尼姑庵住下来，尼姑庵变成了巡抚大人的办公室。

上行下效，巡抚常驻尼姑庵，中下层官员也都仿效。不到半年，广州的妓馆式尼姑庵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妓院生意却冷淡了。一些名妓为寻求出路，不得不忍痛削去青丝，走进尼姑庵招揽生意。

陆荣廷常去“办公”的尼姑庵叫做“药师庵”，坐落在广州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平时，那扇黑漆庵门总是紧闭着的。熟悉情况的人都不走此门，而是沿着右边一条弯曲的碎石小路向里走。拐几个弯后，便看到一扇虚掩着的小角门，从此处进去即可隐隐听到木鱼声。白天这里非常安静，一到晚上，来往的人就多了。庵里的住持是觉持师父，她当过妓女和小妾，失意后来此做了住持。因有陆荣廷这样的人物撑腰，她胆子越来越大，公开对尼姑进行妓 院式调教，精心挑选小尼姑让她们学习认字、吟诗、弹琴、作画等，学成后专门接待那些有钱的高级嫖客。“药师庵”一时名噪羊城，身价倍增。

有人戏谑地问陆荣廷：“庵堂改妓院，不愧为一大发明。只是如此公然行之，是否有污佛地？”谁知陆荣廷却振振有词地说：“尼姑兼妓女，一举两得，岂不是佛门功德无量吗？”

才子王壬秋戏弄张之洞

中国近代史上有个著名的才子叫王闿运，字壬秋，别号王湘绮，湖南省湘潭举人。他自幼饱读诗书，生性落拓不羁。处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王壬秋无法施展抱负，平时以讲学为主，敢以诗书睥睨、戏弄王侯将相。他戏弄张之洞便是一例。

当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在清末是个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一次王壬秋到湖北，被张之洞邀入督府做客。一天，张之洞请王壬秋同往洪山检阅洋式兵操。张之洞得意洋洋地对王壬秋说：“我所练之兵，可以无敌于中国。”王壬秋听罢不作声。张之洞一连说了三遍，王壬秋仍然默然不语。张之洞不解地问：“王先生是不是以为所练之兵尚有不到之处？”这时，王壬秋才冷冷地回答道：“所练之兵毫无用处。我只需要二百名乡兵，不持兵器，只携带扁担绳索，即可阵前擒汝主帅。”张之洞听罢，哈哈大笑道：“有这么容易吗？”王壬秋一本正 经地说：“你的兵将虽然精锐，但绝不会开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二百人冲入阵，必有数十人冲至主帅马前，扁担绳索一起上，主帅必然受擒！”张之洞听此滑稽之言，不禁哈哈大笑，调侃地说：“王先生真是用兵如神啊！”

事后，有位朋友问王壬秋：“你怎么在张总督面前出此儿戏之言？”王壬秋解释道：“张之洞乘马阅操时，以八人围护马行走，如同乘坐八人马轿。而以四人轿载我后行，自以为元帅威风凛凛，不把我

放在眼里。所以，我就以滑稽之言压压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岂真能以二百乡兵擒元帅？”

张之洞显然也知道王壬秋是故意戏弄他，所以二人谈话间，均心照不宣，一笑了之。

又有一次，张之洞在书房与王壬秋闲谈。张之洞自以为博学多才，对王壬秋说：“我可以算是博学，王先生可算是鸿词。你我合为一人，可以应当今博学鸿词科考之试了。”王壬秋听罢，心中颇为不悦，但又不好直接讥讽张之洞，便慢悠悠地回答说：“前代诸科所选，博学者多，鸿词者少，而不博不鸿者，几乎过半。学风极盛之时，尚且如此，全才确实难得。孔夫子说过，学然后知不足。今之少年，不学而足。中兴人物，并无中兴学风，可叹！”张之洞在当时是公认的“中兴名臣”，现在遭王壬秋巧言相讥，一时面红耳赤，默默无语。

若干年后，王壬秋在评论张之洞时还说：“张之洞是 个看书人。所谓看书人则书是书，人是人，了不相涉，即所谓记问之学，博而寡要。”王壬秋的评论对与否姑且不论，但他在达官贵人面前从不阿谀奉承，表现了一个正直文人的本色。

民国五年（1916），王壬秋在家乡病逝，包括大总统黎元洪在内的达官贵人都为他举哀撰文。他的门生杨度在挽联上写道：“旷代圣贤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师生之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义士刘三葬邹容

1905年4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兹闻邹容于昨日黎明四点钟时，病死狱中。由某君派人收殓，髀肉尽消，空存皮骨。"

据同狱者章太炎说，邹容死状甚惨，不忍目睹，人皆疑为医师受贿害之。

邹容遗体放于狱方钉制的一口极简陋的薄棺内，弃置于狱外的万人冢。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将刻有"周熔"两字的一方小碣埋于棺前。其时，在清王朝的虐政之下谁敢冒杀身之祸来殓葬这位革命志士呢？

消息传到日本，正在东京成域学校学习的刘三焦急不安。

刘三原名刘秀平，上海华泾人，平生嫉恶如仇，交友肝胆相照，人皆以义士呼之。刘三在日本留学时，十分钦佩邹容，两人结为生死之交。当闻悉挚友无人埋葬的消息后，刘三决定回国料理后事。

1906年初，刘三返回中国。他独自潜行至监狱附近的万人冢，不知哪一具棺材是邹容的。接连寻找数日，尚无法辨认。一日，刘三又到万人冢徘徊，遇一老狱卒，即上前悄声叩询。老狱卒喝道："侬问此事，朝廷知道要杀头的！快走吧。"刘三递上十枚小银，老狱卒才附耳说道："曾有人在棺前立石碣一方，上面刻着'周熔'二字。"

翌日黄昏，刘三持一把小铲来到万人冢。凡棺前有泥土隆起者，

都一一铲去仔细辨认，终于在一具已裂缝的棺前发现刻有“周熔”两字的小碣。“容弟，刘三看你来了！”刘三抱着石碣，悲不自禁。

回到华泾家中，刘三与妻子商定，就在自己的私有土地中选择地势较高的三亩，作为邹容之墓地。1906年4月3日，即邹容逝世周年忌日的凌晨，刘三雇了一条民船，唤了四位乡亲，行至万人冢之荒僻处。日落时分，他们将邹容的棺材连同石碣一并用毡毯包裹起来，抬到船上，星夜返航至华泾。等到灵柩安放入椁，封土入碣，天色已近拂晓。

秋瑾遗骨葬西泠

秋瑾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1907年7月15日）清晨就义于绍兴府城大街轩亭口的。直接杀害秋瑾的是绍兴知府贵福。秋瑾牺牲后，遗骸暂厝绍兴府山张神殿之北麓。

第二年正月，秋瑾的挚友当时文坛女杰徐自华、吴芝瑛，于杭州西湖中心点西泠桥畔购地安葬秋瑾。秋瑾墓与苏小小、郑节妇墓相邻。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会葬之日，至者达两千余人，由诸女士相继演说，闻者莫不泣下。吴芝瑛且题其墓门曰："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

不久，营葬秋瑾之事为御史常徽所闻，即奏请朝廷平毁了秋瑾墓。秋烈士灵柩迁往湖南夫家。

辛亥革命胜利后，薄海同庆，经湘、浙两省商定，决定迎送秋烈士遗骨返浙，复葬西泠桥畔。南社著名诗人陈去病有诗记之云："湘江水碧楚山青，一棹冲风下洞庭。最　　　是别情无限好，满携缣素返西泠。"

1912年10月23日上午10时，秋瑾女侠之灵柩由招商局轮船自汉口运送到沪。福字营司令长官刘福彪与全队军官及军乐队，携花圈至码头迎接。10月26日，上海各界召开追悼大会。会后，灵柩发引。前引有商团，马队十余骑，在沪的福字营牺牲队兵士及陆军第三旅各目

兵，均执枪护送。后有刘司令长官乘马压弹而行，继是各界人士五百余人执绋恭送。中有彩亭两座，悬挂吊唁匾额。随后又有一亭甚为奇特，亭之四面扎以冬青，中储有面粉做成的大乌龟一只，上嵌百果。亭中粘一长长的纸条，条幅上书“此为前清浙江绍兴府知府贵福之小像”。此亭经过各处，见者莫不大笑。秋瑾之灵榇则装在炮车上，用白马驾之，并有女校学生在两边拉引。观者又无不肃然起敬。

秋瑾遗骨回杭，浙江都督设祭，各界代表用黏饼制成“秋雨秋风”（“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为秋瑾就义前之绝笔）四字之祭品，特别致祭。吴芝瑛撰《挽秋女士联》，曰：“今夕何夕？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下署：“追挽革命流血烈士之灵，并告慰璇卿吾妹凌云一笑。”

是年12月8日，孙中山至杭，发表演说云：“去岁攻克南京，尤浙军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固不仅观览西湖风景，亦将临女侠埋骨之所一施凭吊云。”第二天一早，孙先生即亲赴西泠秋 社悼祭秋瑾，并面允担任秋社社长。同时写有挽联云：“江户矢舟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题额曰：“巾帼英雄。”下署：“鉴湖女侠千古。孙文。”

笔者曾有幸赴杭州，于西子湖畔瞻仰凭吊鉴湖女侠秋瑾墓。时值深秋，金风木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遂口占二绝以为追忆：

东瀛把酒拭吴钩，
一曲新词赋壮游。
此夜轩亭又秋雨，
鉴湖侠骨自风流。

衔悲仗剑怨尤深，
碧血黄花志士心。

万里风云忽作色，
每思遗恨泪盈襟。

黄花岗中女英杰

人们都知道视死如归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而参加起义的巾帼英雄梁梅玉却鲜为人知，她在这次起义中是军火的主要输送者。

梁梅玉是广东梅县人，幼时聪颖过人，成年后追随革命，有胆有略。梁女士婚后与丈夫李君在南京寄读，其时清政府腐败黑暗，她常在女界宣传革命，动员民众起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故而名声远播。当时姚雨平闻其名，赞赏之余派人到南京邀请她赴香港，做自己的助手，共赴义举。梁梅玉于是年二月初五，携幼子由南京抵港到姚之总机关内，参与商议在广州举义大事。

当时清廷防备甚严，行人皆受检查，起义所需的武器弹药多由梁梅玉负责运送。虽面临危险，但她很镇静，对各种盘查都能应付裕如。起义前夕，因形势有变化，革命党人不能按原计划举义，导致内部意见不统一。梁梅玉见状心急如焚，怕多时的准备毁于一旦，遂走谒饶敬夫商 议，并到双门底革命总机关黄林公馆，给起义预备子弹。翌日下午三时起义爆发，黄兴、林文率一队人马焚烧督署。但其他三队未能配合，黄兴等因寡不敌众而败遁。

起义失败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严令所部按户搜查，并滥杀行人示众。其时梁梅玉已将入党的新军名册烧毁，储存的弹药武器投入井中。后来愈查愈严，清军包围了黄林公馆，梁梅玉避匿在邻居周氏

家。李准在黄林公馆查找到井中军火，并搜到梁的照片，于是出重赏缉拿。梁梅玉困在周家一昼夜，于次日蓬首赤足、装疯卖傻乘轿出城，蒙混过守城的清军，逃出广州。

梁梅玉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了惠州同志所设的联络驿站，但主人唯恐受株连，只招待了一顿饭。她即乘轿至西濠口，搭船赴香港。梁梅玉刚到码头，清兵猝至。正在危急之际，梁梅玉巧遇昔日南京母校的一位洋教士。该教士对她早已熟知，并赞赏她的革命精神，遂出面保释，她幸免于难。

梁梅玉抵港后，即与各要人商议筹款，以图再举。后受托赴新加坡等地筹措巨款。武昌起义时，潮州、汕头响应，所用短枪多由梁梅玉在海外购得。潮州之役时，梁梅玉手持炸弹上阵，直入潮州府署。攻下潮州后，她押俘虏、缴枪械、编军民，无事不为，犹如七尺男儿。

1912年1月，袁世凯指令军阀张勋向南京临时政府进犯。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姚雨平指挥广东北伐军北　上，梁梅玉随粤军北伐。南北暂告统一后，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骤然隐迹乡里，成为一名不为人知的普通民众。

辛亥烈士无字碑

北京动物园会芳轩附近有一座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石碑底座呈正八角形，正中塔尖形的碑面上刻有“彭杨黄张四烈士之墓”的大字。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在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辅以暗杀活动。同盟会暗杀团在1912年1月先后组织了两次暗杀活动，一次是谋刺袁世凯，一次是刺杀良弼。两次活动有四位志士牺牲，他们被埋葬在这座纪念碑下。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青年时代曾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去朝鲜，因协助朝鲜国王镇压汉城兵变，清政府奖叙他五品同知衔。回国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他伪装赞成维新运动，暗中向清廷告密，用“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1903年，袁世凯借改革军制扩充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

辛亥年岁末，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的关键人物。他极端敌视革命派，很自然成为同盟会暗杀的重要目标。1月16日，革命党人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严伯勋等四人经过周密的策划，决定在袁世凯中午出宫回府的途中进行截击。当袁世凯出东华门乘车东进时，隐蔽在茶叶店门前的严伯勋用力将炸弹扔出去。一声巨响，只炸死了车后一名卫兵，袁世凯的车则转入一条胡

同，绕道遁去。严伯勋趁满街混乱之际迅速躲进茶叶店内，得以躲过搜捕。而隐蔽在附近伺机配合的杨、黄、张三位志士闻听爆炸声后持弹而去，不幸被军警发现逮捕，不久遇难。

当时迫于武昌起义后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清政府开始酝酿退位。当时官居军咨使的顽固派良弼却反对清帝逊位，他与一帮皇族成员组织宗社党，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与革命党议和，还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一决雌雄。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认为，在反动营垒中，“有军事知识，且极阴险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他自告奋勇，亲赴良宅为民除害。临行前，彭家珍奋笔写就了绝命书，以示必死决心。他写道：“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月26日，正值辛亥“腊八”，彭家珍探知良弼等亲贵将于次日到内廷，决定借领赏腊八宝粥之名趁机将良弼 击毙。行动那天，良弼外出未归，彭家珍登上马车想去寻找，没走多远，就见良弼的马车迎面驶来。彭家珍拦在马车前，将炸弹投出去。只听一声巨响，良弼顿时倒地，被炸掉大腿，后不治而死。彭家珍也被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这两起暗杀事件，先后共有四位勇士壮烈牺牲。四烈士安葬后，人称这座墓地为“四烈士冢”。原拟镌刻四烈士碑文，但只有一面刻着杨禹昌烈士的碑文，另三面则因故未刻一字，人们就称之为“无字碑”。

天不假年蔡松坡

在辛亥革命的将领中，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又不幸短命而死的，要数蔡松坡将军了。蔡松坡即蔡锷，松坡是他的字。云南起义、反袁成功之后不久，蔡锷即病死日本，年仅三十五岁。

蔡锷年轻时是梁启超的学生。梁启超二十四岁时在湖南时务学堂当教员，十六岁的蔡锷是他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蔡锷也随之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后与蒋百里同为该校的高材生。回国后任云南新军协统。辛亥革命之后，蔡锷被举为第一任云南都督。袁世凯一是看中蔡锷是个了不起的军事人才，二是不放心他在云南任都督对西南的影响，便想法把他调到北京。为羁縻、利用蔡锷，袁世凯委以昭威将军、参政、经界局督办等重要官衔和职务。为了调和北洋内部的矛盾，袁世凯有一度甚至想用他为陆军总长。

蔡锷在北京时，公馆在宣武门外棉花胡同。经常到他 家来的客人，是他在东京留学时结交下的好朋友杨度。在袁世凯面前一再替蔡吹嘘的就是此人。待到筹安会正式开张，蔡锷便策划反袁。袁世凯知蔡锷不为己用，又有所活动，便授意其爪牙——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演了一出“搜家戏”，假装不知是蔡公馆，派人闯入蔡宅翻箱倒柜，大举搜查，一想抓住把柄，二想对蔡锷施加压力。蔡锷在京如处虎口，不得不积极谋脱身之策离开北京。

蔡锷在1915年12月19日回到云南。25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率领三千余人北上进军四川。这就是著名的“云南起义”。

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幻灭后不久，这位被传为“蛤蟆投胎”的“洪宪帝”也归天了。云南起义的蔡锷将军和第一个写反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梁启超，都为这一战役立了首功。但令人痛惜的是，蔡将军已经得了不治之症。他得的是喉咙痛病，越痛越厉害，不能咽东西。7月11日，蔡锷在泸州给在上海的梁启超电云：“锷喉病自德医阿蜜思施治后，肿痛更甚，饮食俱难下咽，发音更微，闷楚殊胜。”蔡锷8月底到上海时已不能说话，后即东渡日本就医，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去世。死后北洋政府追赠他为“上将”，灵柩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与爱晚亭、湘江波影互相辉映。

袁世凯的石室金匮

袁世凯在1912年2月暗中与南方革命政府达成清帝退位后选自己为临时大总统的协议后，即胁迫清帝退位，并推翻孙中山建都南京之议，妄以清帝“委任”建立民国和北方各省军阀政客“拥戴”的名义，在北京组建临时政府。又于是年10月，召集兵痞流氓等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从早上八点直到下午十点，投票三次，袁世凯始获当选。

不久，袁世凯又规定大总统不向国会负责，而是总揽政治大权。之后，袁世凯又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修改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终身连任，还可以指定继承人，从而使自己成为终身制的独裁者。于是，有无耻政客向袁世凯进谏条陈，要他效法清代建储制度，著为国典。袁世凯即下令：“中华民国大总统继承人，由大总统亲书三人，按先后顺序继承，特设石室金匮之制。此令。”

这座石室建在居仁堂之右的一小土山上，为四方形， 全用青白石筑成，用混金锁键锁固。金匮藏置石室内正中，匮内又有镂雕金龙金盒，盒内藏有继承书一册。此书全用线装，黄绫书面，红绫包角，长一尺，宽六寸，全书共十页，书面由袁世凯亲书“万民攸赖”四字。书中首页又由袁世凯亲书“中华民国”四字。再次一页即为有三红格线之页，每一竖格顶格书写一继承人姓名。

1916年元旦，袁世凯粉墨登场，登基称帝。不料，护国军声威大震，各地纷纷独立，袁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此时袁世凯已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独夫民贼终于一败涂地，忧愤成疾，于同年6月6日，在亿万人民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由黎元洪任大总统。黎于6月7日上任，至6月9日，为了了解袁世凯在生前秘密建储之事，亲赴中南海藏匮石室，由指挥官徐邦杰呈递石室钥匙打开石室。入室后，再呈递金匮钥匙，打开金匮。黎元洪从金匮中取出金函，遂令随从一律退立门外，然后自己展阅金册。阅览指定继承人姓名后，即纳册于怀中。

第二天，有一个挚友去问黎元洪，三个继承人都是谁？黎仅说第一个是他自己。那个朋友说，我早已料定如此。黎又说，我做总统，乃中华民国合法之总统，岂待项城一笔之功。再问其余的两个是谁，黎说：“我若说出，天下皆知，岂不多生枝节。”

后来时过境迁，黎便说出其余二人，一为徐世昌，一 为段祺瑞。但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原来的第一继承人是袁的长子袁克定。帝制失败后，为掩人耳目，袁世凯遂亲自将袁克定易为黎元洪。

朱瑞进京和“衣履备载”

朱瑞是清末民初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的浙江省督军。在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兴兵讨袁时，他宣布保持中立。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后，即电召朱瑞进京述职。

朱瑞奉命进京，心中忐忑不安。他来到总统府承宣处，一位承宣官关照他说：天气炎热，朱督军不是外人，可换下大礼服，穿便装进见。当朱瑞到更衣室穿上为他准备好的便服和布鞋后，发现“衣合体，鞋适脚”，不禁大吃一惊。他认为这分明是提醒自己，自己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甚至包括穿多大衣服和鞋子，总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袁世凯在接见他时说：做人之本在一个“诚”字，乱党兴师时，你如果认为我有负于民国，可以兴兵讨伐我；如果承认我是合法总统，则应服从我，而你却宣布保持中立，岂非首鼠两端？朱瑞对此无言以对，好在袁世凯并不想听他说什么，即令他早点“回防效力”。

朱瑞回到杭州后，仍然对“衣合体，鞋适脚”之事惊魂未定，对身边工作人员疑神疑鬼，搞不清究竟谁是上边派来的暗探，但也不敢全部换掉，怕引发更大的事端。

其实，朱瑞完全是虚惊一场。这“衣合体，鞋适脚”并不是什么暗探特务所为，而是从北京“内联升”鞋店和“永增军装局”的《履中备载》、《衣中备载》里得来的。

“内联升”鞋店是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人赵廷创建的，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内联升”的含义是在大内当官的人穿他的鞋可以连升三级。所以开业后，人们图吉祥都到他的鞋店买鞋，尤其那些文官武将、大小官员更是纷纷前来购买，生意很是兴旺。后来，赵廷看到为这些官员做鞋，从量尺寸到试穿，取送要跑好几次，非常麻烦，于是就想出了一个既省事，又能拉主顾的好办法，即把清政府大小官员的姓名、年龄、住址、做鞋尺寸和特殊要求等都专门记录下来，汇集成《履中备载》。此后，为这些人做鞋既省事，又合脚，同时也给那些为官吏送礼的人提供了方便。这个办法果然使“内联升”生意越做越红火，故一直延续下来。

永增军装局是专门制作军装的，他们也仿照“内联升”鞋店的做法，把军中将领的衣服尺寸记录存档，称为《衣中备载》。后来，不但军装，连军靴、军帽、武装带、便服等也都记载得很清楚。

朱瑞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当了地方的督 军，对中国官场上这些“琐事”不很清楚，故使他想到了身边的暗探和特务。后来，据说他对袁世凯非常忠心，还特意买了一件价值八千块大洋的银狐裘衣送给袁世凯，作为总统赠送“合身衣履”的回报。

孙中山三救陈独秀

陈独秀在政治生涯中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先后五次被捕入狱。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把他营救出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五四”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奋笔疾书，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作舆论阵地，直接参战在第一线。6月11日晚，他与高一涵等在北京前门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巡警和密探当场逮捕，并押至警察厅。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全国震惊。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和上海《申报》、《民国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评论，及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的通电与函件。一时间群情激愤，“函电交驰”，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引起孙中山的关注。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十分气愤地说：“你们逮捕 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了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由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孙中山的营救，北京当局不得不将陈

独秀释放出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尽管陈独秀应陈炯明所聘，任职于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没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但凭着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誉和威望，他仍被选为总书记。不久，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政府职务，悄悄回到上海。报纸为此作了报道后，引起法租界的注意，便派出密探侦察。一日，正在寓所楼上午睡的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押解至巡捕房。陈独秀被捕，再次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孙中山随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领事，要他们放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请了一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后来，由褚辅成和张继作为保人，法租界法庭以陈独秀宣传“过激主义”为名判罚白银五百两。这笔罚款数目不小，陈独秀无力负担，只好请当时在上海的汪精卫设法解决。汪又电请广东省政府，经孙中山批准，由广东银行汇给汪精卫一千元，才了结了此案。事后，陈独秀不胜感激孙中山的营救及帮助。

1922年8月，上海法租界及反动当局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在陈独秀正在寓所伏案写文章时，法租界巡捕房会 同督察员黄金荣将他逮捕。事发后，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立即告之中共中央，并打电报给孙中山请设法营救。孙中山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以平民愤。此时长辛店铁路工会等发出紧急通电，声称如果宣判陈独秀就举行大示威，并大声疾呼：“释放劳苦群众的领袖陈独秀！”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法租界当局不得不按孙中山电报所示放了陈独秀，以判罚四百元，草草了结此案。

孙中山关心卫立煌

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虽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对身边的卫兵却十分关心，时刻把卫兵的生活、学习和进步挂在心上。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当年是孙中山先生的随身卫兵之一。这里讲的是中山先生关心卫立煌的一个故事。

1916年，卫立煌十九岁，到广州投入粤军。因他身体强壮、机智敏锐、忠诚可靠，被推荐到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卫队当兵。中山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卫兵们都愿意亲近他，有时还和他拉拉家常。一次，卫立煌跟随中山先生外出。途中坐骑受惊脱缰，狂奔疾驰，把卫立煌摔下马来。卫立煌当时口吐鲜血，伤势很重。中山先生十分关心，立即派人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并对生活、护理一一作了安排。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卫立煌伤势基本痊愈。当时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战刚结束，北洋军阀段祺瑞又解散国会，中山先生正在领导护法运动，誓师北伐， 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中山先生慎重考虑后，亲切地对卫立煌说：“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必须好好休养。现在革命斗争激烈，环境很不安全。你家安徽合肥卫杨村环境好，又有母亲照顾，身体一定恢复得快，你暂时回家住一段时间吧。”卫立煌刚到警卫团不久时在与中山先生闲谈时，曾说过自己的籍贯和家庭情况，没想到中山先生还记在心中。卫立煌十分感激地说：“一切听先生安排，先生操劳国家大事，切莫为我这小事操心。”中山先生又说：“民主革命的任务还很重，革命斗争的道路还很长，你安心把身体养好，未来

属于你们青年人。”卫立煌临行前，中山先生又厚赠川资。一位国家最高统帅，对一名来自农村的小卫兵竟如此关怀，这让卫立煌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卫立煌满怀对中山先生的感激之情，高高兴兴回到家乡。母亲遍寻民间验方为儿子疗伤。当得知用几味中草药煮一百个“喜蛋”（未孵化出雏鸡的蛋）吃了可以根治内外摔伤时，母亲立即照方办理。草药煮“喜蛋”，吃起来不是个味，可是卫立煌一想起中山先生的关怀与嘱咐，为了早日恢复健康去保护中山先生，便大口咽了下去。他坚持天天吃，吃到七十个“喜蛋”时身体就好了。他立即辞别母亲带着剩余的三十个“喜蛋”回到了广州。

孙中山先生见卫立煌满面红光地回来，十分高兴，不久便升他为警卫团排长，并鼓励他加强学习，刻苦锻炼，不断进步。卫立煌尽职尽责，一直跟随中山先生左右。中　　山先生发现他是带兵的好苗子，1918年，又把他调到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卫立煌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指挥灵活机动，反败为胜，战后晋升为连长。接着在与福建地方军阀作战中，他急中生智，勇破敌军，又立大功，提升为营长。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卫立煌率部在东征中大破陈军，战果辉煌，擢升为团长，时年仅二十四岁。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孙中山夫妇重登永丰舰与讨陈（炯明）有功人员合影的盛典。孙中山赞赏他的勇敢善战，夸他是一位会带兵的年轻的团长，同时将一张十二寸的照片送给他，并在一张六寸的单人照上亲笔题字：卫立煌同志孙文赠。

卫立煌没有辜负孙中山先生的厚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后来在回忆中称：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段祺瑞鼻子能气歪

北京人在说到生气时，常用“鼻子都气歪了”这个词来形容。细观察起来，人在生气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是有的，而真正气得鼻子都歪过去，还真少见。可是我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位经常气歪鼻子的人，那就是任过民国政府执政的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皖系军阀，在清朝曾当过北洋武备学堂校长。此人刚愎自用，脾气特大，有人曾多次目睹过他把鼻子气歪。

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是民国初年中国的“四公子”之一。他平生别无所长，唯下围棋的技术颇高。有一天，段祺瑞突发奇想，要试一试儿子的棋艺。一番鏖战之后，竟以失败告终。他认为丢了面子，于是大发雷霆，先是掀翻棋盘，然后指着段宏业大骂道：“你这个不肖之子，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整天就会胡下棋……”骂着骂着，不但脸变红了、脖子变粗了，鼻子也真的歪过去了。

还有一次，是他寓居天津时，他的一个宠妾竟和他的长孙成了相好。他得知后不禁恼羞成怒，但碍于“家丑不可外扬”，便想悄悄地将其孙遣送回乡。大管家却不知其详，在段祺瑞面前常常提起当事人，简直是火上浇油，段祺瑞不由得脾气大发，鼻子又歪了过去。

以上所说均属家事。其实因公事发怒而气歪鼻子的事也时有发生，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其“专使”徐树铮被杀一事。

徐树铮在袁世凯执政时任秘书长，后弃文从武，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只身投靠段祺瑞。因其能言善辩，诡计多端，成为段之心腹，被委以高级参议之职。在此期间，徐树铮直接挑起直、皖战争，并枪杀了直系中的政敌陆建章。当时，徐树铮以宴请为名，把陆建章诱至天津中州会馆。酒足饭饱之后，二人携手步入后花园赏月。徐树铮说：陆兄可知今晚小弟请你赴宴的真实用意吗？我是一片诚心，让老兄做个饱鬼。未等陆反应过来，即跃出两名杀手，将陆击毙。

陆建章是实力派人物冯玉祥的姑丈，曾任北洋政府执法处长和陕西督军。陆被徐树铮诱杀，引起一片哗然。1925年，徐树铮赴京述职，而当时控制北京地区的正是冯玉祥。段祺瑞怕徐会遭杀身之祸，嘱其速返天津。但徐却故意在北京招摇一番后才上了回天津的列车。火车到廊房后，徐即被冯玉祥部下张之江扣押起来。徐树铮被带到旅部，只见陆建章之子陆成班走了出来。他对徐树铮说：“请恕小侄不恭，今专程赶来，是请老叔当个饿鬼。”言罢即将徐拖至房外就地枪决了。

段祺瑞闻讯，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鼻子又歪过去了。据说，他的鼻子一气就歪，除了脾气大之外，还与其面部肌肉分布不均衡有关。他每次气歪过去之后，过一会儿还能正过来，时间大概要多半天的样子。

张学良冀东认师

1924年11月间，在直（隶）奉（天）交战之际，一天，一支自称张学良先头部队的奉军，风风火火地开进了冀东抚宁县东部的沙河寨村号房子。当地百姓见状惶惶不安，吓得家家户户急忙将米面、钱财藏起来。因为，当地民间对大兵有“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的说法，见兵就怕。

当时，村里有一位前清时的老秀才，名叫高玉瑞（字继武），生活穷困潦倒，家里只有一头刚宰完准备过年的肥猪和一条鱼。闻大兵进村，一时着慌，只好把猪、鱼顺手藏在了西厢房里的柴堆底下。

不多时，号房的大兵来到高家，一进院便东搜西翻，终于发现了柴堆下的猪肉和鱼。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对高玉瑞说：“你这老头子，还哭穷说家中啥也没有，这猪、鱼是啥？我看你这户还是满富裕的。便宜了你，不再找别的了。”说完，一挥手便让大家将猪肉和鱼带走了。 这一天的傍晚，张学良的大队人马真的进村来了。说来也巧，张学良就住在高玉瑞家。住下后，张学良礼貌地要见见房东。高玉瑞老先生也笑脸相迎，二人便和和气气地攀谈起来。张学良发现这位老人很有学问，谈吐不凡，对老人肃然起敬。

谈话间，高玉瑞便将先头队伍进村后如何翻抄老百姓的东西的事全盘端了出来，并暗示张学良部下纪律不严。张学良一听此事非常恼

火，立即召集部下训话，对翻东西的那个军官给予严厉处罚，还让他公开向全村老百姓赔礼道歉。同时，令部下退回了所拿老百姓的东西。此举让高玉瑞老人对张学良非常钦佩。

张学良在高家住时公事很忙。可是只要一有空儿，便和高玉瑞老人谈诗论画，说古道今，聊得很是投机。有时二人对对联，高玉瑞出了上联，张学良对不出下联，张便称高为“老师”。高玉瑞有个孙子叫国平，当时刚五岁，活泼可爱，惹人喜欢，张学良给他照相，还特意派人从外地买来一个皮球送给他。

春节前夕，张学良拔营起寨，高玉瑞特备了一桌酒席为他送行。他在敬张学良最后一杯酒时吟诗道：“劝君更进一杯酒，打过滦河无敌手。”张学良感动地说：“领您吉言，老师保重！”言毕，双手捧杯，一饮而尽。

张学良在冀东这一仗，从抚宁县上庄坨一直打过石门寨、海阳，直捣滦西，势如破竹，大败了吴佩孚。

冯玉祥给吴佩孚送“寿礼”

1922年，第一次直奉混战爆发。直军大破奉军，奉军败退。战后，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支持曹锟控制了北京政府。位尊权重、大红大紫的吴佩孚决定大摆寿宴，以示庆贺。

左右北京政局的“吴大帅”做寿，谁不另眼相看。一时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直军的大小头目、地方的名门大户及一切趋炎附势、附庸风雅的人，无不争送贺仪。大帅府可谓金银珠宝满箱、古玩奇珍满室、锦绣裘衣成山，歌功颂德的名家字画寿幛挂满厅堂，春风得意的吴佩孚应接不暇。时任直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踌躇再三，也破例送了一份“寿礼”。

且说冯玉祥身为高级将领，却依然布衣粗食、朴实勤奋，保持着普通士兵和农民的本色。他忧国忧民、正直坦率、扶正压邪、不畏强暴、关心时局、反对腐败；从不对上阿谀奉承，也不准下级对他奉迎讨好；他严禁随意打　　骂士兵，严禁扰民、害民；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这些规定保护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利益，因此冯玉祥被誉为“民主将军”、“布衣将军”。在吃喝玩乐、营私舞弊腐败风盛行的军阀时代，他被视为“异类”、“痴种”、“怪物”。所以，在吴佩孚眼里，冯玉祥既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将才，又是一位桀骜不驯的怪人。自清末以来，外侮内患，天灾人祸，广大民众啼饥号寒，饿殍遍地，苦不堪

言。吴佩孚却和其他军阀政客一样，花天酒地，作威作福，冯玉祥对其早已不满，对他借做寿之名大肆索礼敛财之举更为气愤。冯玉祥前思后想，忽然记起一则古训：“君子之交淡如水。”于是有了主意，立即派人到市场买来一只酒坛，灌满清水，加封后在封条上写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七个大字，送到了吴府。

冯玉祥给吴佩孚送寿礼，众人惊奇。吴佩孚则得意洋洋，万分欣喜。他认为一定是坛陈年佳酿，命人当众开坛，以示炫耀。开坛后却是一坛清水，一时哭笑不得，十分尴尬，于是自我解嘲说：“焕章（冯玉祥字）与我是君子之交。”

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军阀大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冯玉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早已对军阀统治不满。他终于在1924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驱逐了清室，取消了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囚禁了曹锟，迫使吴佩孚南逃。 之后，冯玉祥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冯玉祥四次立遗嘱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经四次立下遗嘱。

1932年，日本在上海接连挑起事端。冯玉祥满腔热情地赞扬奋起反抗的驻沪的十九路军“英勇可嘉，实抗日之先锋队也”，却遭到当局投降派的极端不满。冯玉祥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为防止不测，特于1932年6月14日写下了第一个遗嘱，内容如下

>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不平等，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给他们自由发展……我的尸首最好是火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 史观的，什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
>
> 此嘱。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动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冯玉祥极力支持，并发去电报，盼望他们能为人民挽回劫运。他

的活动遭到国民党一些大人物的反对和记恨。在当时的形势下，冯玉祥随时准备接受反动派的通缉、坐牢和枪决。为此，他于1933年11月29日又一次立下遗嘱，部分内容简要如下：

> 我父亲、母亲的坟埋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
>
> 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做即可以了。
>
> …………

这个遗嘱，表现了他为国家前途而甘愿牺牲自己和家庭的革命精神。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祥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抗日救国，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在1937年7月1日又第三次立下遗嘱，简介如下：（一）非抗 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日本投降后，冯玉祥的爱国言行再次遭到反动派的敌视。为防不测，1948年2月10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用毛笔写下了最后一份遗嘱，再次谴责独裁统治的暴行。并说：“……（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给学校和图书馆作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孩子……只要他们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卫立煌掌劈地头蛇

卫立煌少年时期拳打地头蛇，为家乡除害的事，在合肥市传为佳话。

卫立煌，字俊如，生于1897年2月16日，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卫杨村人。幼年时读了几年私塾，因家贫辍学。由于生活困苦营养不良患有皮肤病，又无钱医治，身体很瘦弱。15岁那年，为了谋生，他前去投奔在和县当兵的大哥卫立炯。

行前卫母把卫立煌送到村头，再三嘱咐："出门要事事小心，找不到你大哥就快些回家。"卫立煌拜别母亲到了和县，恰巧大哥被新任安徽都督柏文蔚任命为军事学习班主任。大哥见弟弟到来十分高兴，一面给他增加营养、治疗皮肤病，一面让他跟班参加军事训练。

每日操练，学习拳击、擒拿等术，卫立煌勤学苦练，十分认真。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卫立煌的皮肤病痊愈了，身体强壮了，个头长高了，并练了一身硬功夫。1913年7 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率先在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7月17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卫立煌随大哥参加了坚守和州的战斗。和州失守后，卫立煌与大哥一起回家暂避。

卫杨村有个姓卫的地头蛇，自幼偷鸡摸狗，游手好闲，不干正事。他自恃身大胳膊粗，终日横行乡里，欺男霸女，鱼肉百姓，无恶

不作，乡邻都恨之入骨，避而远之。卫立煌居家时就对他深恶痛绝，只因年少体弱，无力与他争斗。卫立煌闯外回乡，地头蛇认为他有点油水，便上门敲诈。一日，卫立煌早起到村外练完身体回家，地头蛇正在家中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大喊大叫、要吃要喝。卫立煌进门，地头蛇视若无人，在他眼里卫立煌还是个毛孩子。卫立煌怒火中烧，心想：早就想教训教训你，你却找上门来了。他上前指着地头蛇问道：“你想干什么？”地头蛇毫不在乎地说：“大爷想找顿饭吃，要点酒喝！”卫立煌愤怒地说：“姓卫的出了你这个败类，有饭喂狗也不给你吃！”地头蛇恼羞成怒，一拍桌子吼道：“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卫立煌怒火难遏，一个箭步冲上去，抡起劈山掌，不偏不斜正好劈在地头蛇的后脑勺上。地头蛇眼前发黑，觉得天旋地转，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待缓过气来，他照准卫立煌一个封眼拳。卫立煌轻轻闪过，利用擒拿术借势双手扣住地头蛇的左手，后退半步用力向外一扭，只听咯吱一声，地头蛇疼得嗷嗷大叫。卫立煌往后一拽，用腿 一绊，地头蛇摔倒在地，过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耷拉着胳膊灰溜溜走了，从此再没有在街头露面。地头蛇自知在卫杨村难以立足，便悄悄地逃到外地了。

卫立煌拳打地头蛇像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四乡，一时成了街头巷尾谈论的中心。尤其是卫杨村的男女老少，无不拍手称快，都夸卫立煌是为民除害的好青年。全村为此热闹了好几天。

陈赓勇救蒋介石

1924年，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了建立起一支革命的军队，决定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第一期学员共五百人，其中三名佼佼者被称为“黄埔三杰”，他们是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而三人中最突出者，当属陈赓。陈赓在湘军中当过四年兵，性格豪爽，足智多谋。

在学员入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学校突然失火，学员们见状，勇敢地投入到救火的战斗之中，奋战三四个小时终将大火扑灭。这一把火烧出了蒋介石的笑容，他对学员们的表现特别满意，尤其表扬了陈赓、蒋先云、贺衷寒等几人。9月份，孙中山在观看了学员们的军事演习后说：本党主义的实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信你们定能完成党的使命。

10月10日，正是辛亥革命的纪念日。但就在这一天，受汇丰银行等官僚买办操纵的广州商团却发动叛乱，企 图颠覆革命政府。10月14日，孙中山急电蒋介石，命他为总指挥，带领黄埔军校学生前去平定叛乱，保卫革命政权。当日下午1时，蒋介石带领学生三队、四队，乘船到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次日凌晨，开始炮击西关。商团军招架不住，被迫西撤。编在机枪队里的陈赓一直冲在最前面，紧追不舍。追到一个墙拐角处时，突然涌出一队人马，向机枪队冲来。陈赓机敏地避开射击，迅速扑过去大声喊道：“不准动，缴枪不

杀！”那个商团军的小头目一听，吓得两腿发抖，站在那里不敢再动。陈赓命令道：“把枪交出来！”那个小头目解下手枪皮套说：“枪丢了，这里只剩下一把军刀了。”陈赓接过刀一看，刚刚磨过，闪亮而锋利，是一把好刀。他斜挎在肩膀上高兴地说：“要得，要得。”正在这时，蒋介石带着几名护兵骑马赶到。陈赓急忙立正敬礼，并把缴获的军刀送上。谁知正当蒋介石欣喜地观看刀鞘上的饰物时，不提防一个商团兵挣脱看守，一个箭步冲到前面，从刀鞘中抽出军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向蒋介石刺来。说时迟，那时快，陈赓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腕，同时脚下一扫，便把他放倒了。蒋介石躲过一刀，但马受惊扬蹄嘶叫，竟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学生见状，立即上前搀扶，他推开众人骂道：“娘希匹，学生不怕死，校长还怕摔吗？”他站起来，拍拍陈赓的肩膀说：“很好，干得不错，我要嘉奖你。”

“黄埔三杰”中，蒋先云和贺衷寒都是以考试成绩优 秀而获此殊荣的，而陈赓是因实际表现突出而受赞扬的。这次和商团作战，是陈赓第一次救蒋介石。在后来的东征等战斗中，陈赓还不止一次地搭救过蒋介石。蒋介石多次称陈赓是他最好的学生。由于政见不同，陈赓最后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黄埔三杰”中，蒋先云于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牺牲；贺衷寒参加了特务组织“复兴社”，成为该社“十三太保”之一；陈赓则加入了解放军，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大将。

杨虎城将军与中秋会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1893年11月20日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兆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怀福以种田为主，兼做木工，母亲孙一莲勤劳俭朴，治家教子严厉。杨虎城仅读过两年私塾，十三岁便到孙镇一家饭铺帮人拉风箱、干杂活挣碗饭吃。十五岁那年，父亲受仇人陷害，在西安被清政府绞死。从此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杨虎城肩上。为了安葬父亲，他与本村七户农民建立了一个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

父亲含冤惨死，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种种不平，使杨虎城对清政府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仰慕农民起义英雄，立志参加反清斗争。这一年中秋节，想起元末农民利用中秋节组织反元斗争的故事，便以孝义会为基础，邀集十几名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中秋会”，并制订了简单朴素的政治纲领，即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大家公推杨虎城为“中秋会”的首领。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1911年10月20日陕西省爆发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杨虎城率领“中秋会”的成员毅然参加了民主革命队伍。但是，清政府推翻了，大权却落到了北洋军阀手里，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依然如故，劳苦大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杨虎城对此十分不满。于是，1913年他与“中秋会”的同伴们一起回家乡开展抗暴抵捐斗争，使“中秋会”的规模与声势不断扩大。当时蒲城县东南乡有个恶霸

秀才叫李桢，他作恶多端，为害一方，民愤极大。在夏天的一天，杨虎城因事去姑母家，恰巧恶霸李桢带领一伙打手凶神恶煞般地在村里逼债，搞得全村男女老少惶恐不安。有人去找杨虎城商议对策，杨虎城怒不可遏，立即带领一伙强壮农民前去讲理。李桢不但不听劝告，反而破口大骂，动手打人。杨虎城怒火中烧，冲上前去抓住李桢就打。愤怒的农民一齐拥上去，七手八脚把李桢打死了。

杨虎城带头打死李桢，为民除了一害，名声大振，“中秋会”的名声更响了。因此，反动官府派大批差役四处缉捕杨虎城和“中秋会”的骨干。杨虎城不敢待在家里，便带领“中秋会”的成员四处流浪。这时，官府从澄城县解一批税款到西安。杨虎城获悉后，组织一支精干力量，乘黑夜将税款全部截获，用于“中秋会”的活动经费，买了一枝“曼利夏”步枪，从而壮大了声势。“中秋会”高举抗暴安良的旗帜，转战在同州（今大荔县）、朝邑、合阳 （今合县）一带。

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陕西省以中华革命党人于右任、井勿幕为首，建立靖国军，杨虎城顺应历史潮流，带领以中秋会员为骨干的农民队伍投奔于右任，参加了靖国军。杨虎城被任命为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从此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经过艰难曲折，杨虎城终于成为名震神州的高级将领。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一致抗日，被誉为千古功臣。

李宗仁入主居仁堂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行辕，作为统管华北军事和政治的最高官署。行辕主任由李宗仁担任，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居仁堂。

居仁堂是清朝末年根据慈禧太后的旨意修建的，原名为海晏堂。此处本来是仪銮殿的部分旧址，八国联军入侵时被毁。慈禧从西安回来后，下令重建海晏堂，专门用来招待外国宾客。但是，海晏堂竣工不久，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来袁世凯把总统府设在中南海，并在海晏堂办公，改称居仁堂。北洋政府时期，曹锟、张作霖等均到此小住，但都好景不长，匆匆而去。这次李宗仁奉命到此就职，摆在他面前的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李宗仁入主居仁堂，名义上是华北军政最高长官，实际上却有名无实，许多事情他根本管不了。李宗仁原是桂系首领，后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但1930年又参加了倒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守广西。抗战时期，他先后 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汉中行营主任，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等，对抗战是有功的。他和蒋介石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他虽身为北平行辕主任，华北的大多数机构却直接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主管部门。尤其是那些特务机构，向来是“见官大三级”，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就是机动权较大的空军也自恃为特权阶层，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当时，行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主持接收工

作，各部门却各行其是，任意“劫收”，犹如饿虎扑羊，择肥而噬。只是在分赃不均，甚至拔刀相见时，才纷纷找到行辕申诉，要求李主任秉公而断。李宗仁只是个地道的和事佬。

有一次，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学生要举行游行示威，特务机关则要进行武装镇压。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时，市长何思源紧急求见李宗仁。李宗仁找来特务头子马汉三说：“你们真要制造血案吗？”马汉三说：“学潮越闹越不像话，不死几个人是压不下去的。”李宗仁问：“打死学生，矛盾不是更激化了吗？”马汉三不语。李宗仁厉声说：“你赶紧把人撤回去，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如发生问题，我惟你是问！”这样才算把事情压了下去。事后何思源说：“如果不是李主任严令禁止，后果不堪设想。”其实，马汉三主要还是由南京指挥。

此后不久，李宗仁从南京开会回来，有人问他：“听说何思源市长已被解职，可有此事？”李宗仁说：“谣言！我在南京时，蒋先生从未提及此事。”但到第三天时，何　思源果然被调走了。李宗仁是堂堂的北平行辕主任，北平市长是他直接管理的官员，撤换市长这么大的事，他却一无所知。他感叹自己连一个CC系报纸的记者都不如。于是，经过认真考虑，他毅然决定放弃这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行辕主任，去参加副总统竞选。蒋介石对此虽大骂“娘希匹”，但挡不住李宗仁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的多数击败孙科、宣誓就任副总统。至此，北平行辕也宣布撤消。

傅作义的“最后一席话”

1948年年底，已是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大决战的最后时刻。时任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傅作义，于12月15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他说：“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大家看该怎么办？”向来以粗鲁莽撞闻名的独立师师长孙英年忽地站起来说出一个字：“打！”傅作义问：“还能打下去吗？拼完了怎么办？”“不成功，便成仁！”这句经常挂在蒋介石嘴边的话又从孙英年的嘴中溜了出来。“啪！”傅作义在桌子上猛击一掌，怒吼道：“想死还不好办吗？难道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吗？再没别的路可走吗？”

傅作义所说的“别的路”指的是和谈之路，他想试着和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1月4日，傅作义派出和谈代表和解放军进行第一次会谈。1月14日，傅作义又派副总司令邓宝珊会见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的林彪、罗荣桓等中共领导人。16日，邓宝珊带回一份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 协议和林彪司令员的一封信。信中着重指出：如果傅作义不愿执行此协议按时撤出北平，解放军即实行总攻。傅作义当然十分清楚这几句话的分量，一旦攻城，北平这座美丽的古城将毁于战火之中，自己也将成为千古罪人。究竟如何抉择，他陷入了苦苦思索中。

傅作义有个习惯，即在作任何重大决策之前，总喜欢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现在，事关北平古城和几百万人命运之大局，当然更需慎重。他于当天下午发出几十份请帖，邀请在北平的各界名流学者晚上

到中南海赴宴，其中包括徐悲鸿、许德衍、周炳琳、康同璧等著名人士。

在宴会上，傅作义简单介绍了当前的局势后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再作决定。"面对这位名震中外的一级上将、华北剿共总司令，大家开始未免还有些拘谨，但片刻之后，见傅作义态度诚恳，也就把顾虑打消了。第一个发言的是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女士，她慷慨陈词："北平有着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都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战火。"著名画家徐悲鸿接着说："北平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局势很明显，战必败，和则安，这已是个常识问题，毋庸置疑。"历史学家杨人梗说："内战已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不能再打了。望傅将军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能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一定为您大书一笔。"大家各述己见，结论是一致的：只有和平之路，别 无他途。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能诚挚地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傅作义不同于国民党其他将领的明智之处。这次谈话对傅作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重大抉择，确实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这次会谈是他和学者名流的最后一次谈话，故被后人称之为"最后一席话"。

傅庆泰河边教子

傅作义将军在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亦称军官预备学校）上学时，因喜交往、为人大方、讲义气、生活不注意节俭，欠了二十两银子的债。放假回家时，便以郊游为名向父亲要钱还债。父亲傅庆泰未责骂他，领着他出门向村外走。出了安昌村，小道崎岖，大地一片灰白，傅庆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前面，傅作义小心翼翼紧随其后。父亲不说话，傅作义忐忑不安，不知父亲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父子俩向黄河边走去。

到了河汉，傅庆泰脱了鞋袜下了水，傅作义也紧跟父亲下去。时值初冬，寒气袭人，河水凉得刺骨钻心。傅庆泰板着面孔，指了指远处的渡口，终于开口了：“当初我在这里背人过河，背到渡口一趟挣两枚铜钱。不冷不热时，多数人自己趟水走，严寒酷暑，找我背的人才多。所以愈是天寒地冻，才愈挣钱。我的钱就是这样挣来的。儿啊，你算一算，二十两银子，父亲我要背多少人过河？” 傅作义这时才知道，父亲是对他进行现身教育，惭愧地低下头，无话以对。傅庆泰深情地看了看儿子，大概是怕傅作义受寒，便领着他上了河岸。

父子俩紧靠河边坐下，穿上鞋袜。傅庆泰耐心地对儿子讲起了家史：“咱傅家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我当家时依然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自有了你们兄弟四个（长子作仁、次子作义、三子作良及一女），日子更加艰辛。你母亲下世早，多亏你继祖母（傅王氏）抚养

你们。我起先从事背人过黄河的苦力活，后被雇为船工。干了几年，从牙缝里积攒了点钱，才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经过几年省吃俭用，积利渐多，才买了条船独家经营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我运煤售给皇家，利钱较厚，积蓄渐多，才在荣河县（今临猗县）城开设商号，方有今日。现在富裕了，也得讲勤俭，勤俭是立家之本，不然金银再多也会坐吃山空。你闯外，混孬混好是你的时运，但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忘了勤俭。为人要守信，信是立身之本，借了钱一定要还，今后要吸取教训。”傅作义诚服地点了点头。傅庆泰又说：“人不怕有过，就怕不改。”傅作义站起来，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一定记住父亲的教诲！”

父子俩回到家，傅庆泰拿秤称银子。傅作义看着父亲称银子的手不停地颤动，二十多两银取上放下，称了约半个小时。傅作义心里像压着铅块，十分内疚。从此，傅 作义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生活一直简朴，从不多花一文钱。他身居高级将领之后，依然不忘父亲在黄河边的教诲，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勤俭守信。

陈校长拒用其子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的父亲陈希文，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祖辈务农。陈希文幼年入私塾读书，光绪末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改学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后任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校长。陈家有薄田，生活清贫。

陈诚天资聪颖，但幼年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九岁入青田县高市小学。陈诚活泼好动，非常调皮，课余时间常和同龄伙伴一起上山砍柴、放牛，下河摸鱼、游泳，体质渐强。陈诚性格倔强，经常与人斗殴，且从来不服输。因此，他经常受父亲责斥，乃至体罚。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陈希文决定他在家佐理家务，经营小本生意。陈诚力图深造，不愿株守家园，自作主张步行百余里，投考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陈诚入学后学习成绩很好，尤其爱好体育，对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等兴趣浓 厚，逐渐成为全校有名的体育活动积极分子。在全校运动会上，陈诚曾夺得单杠第一名。他准备毕业后当一名体育教师，发挥自己的专长。

1917年，陈诚师范毕业。当时父亲陈希文任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校长，该校正缺一名体育教师。以前，陈诚曾要求父亲为他安排工

作，父亲以学校不缺教师为由拒绝。这次他想：这回父亲可没有理由再推辞了。陈诚高高兴兴回到家，谈及心事，陈希文就是不开口。陈诚急了，便托母亲问父亲。父亲对母亲说：“学校是缺体育教师，但是，教师为人师表，德馨（陈诚的乳名）天性顽皮，不宜任教。”体育是陈诚的特长，学校又缺体育教师，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学校的老师们也劝说陈希文：“校长，令郎师范毕业，学有专长，我校又急需一名体育教师，于公于私都好，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校长就答应了吧！”陈希文严肃认真、义无反顾地说：“多谢诸位的好意，但是，我身为一校之主，万万不可录用自己的儿子。若是那样做，岂不成了人们以权谋私的笑柄吗？我主意已定，诸位不必再劝了。”不久，陈希文又另聘请了一位体育教师。

陈诚找不到工作十分苦闷。这时，同窗好友吴子奇将其妹吴舜莲介绍给陈诚，经双方父母同意，不久结了婚。婚后，陈诚仍然终日闷闷不乐，为自己的前途忧虑。仰仗父亲是没有指望了，他决心另找出路。妻子吴舜莲很理解他，翌年，便让他带着自己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读体育 学校。

陈诚体育学校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后来在同乡杜志远将军的帮助下，进了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1922年6月毕业，分配到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两年后，他又投奔粤军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从此发迹，逐级晋升为民国一级陆军上将，成为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

陈诚发迹之后，人们常常说起当年的事。陈希文总是说：“日后发迹是他自己的事，我当年不录用他，毫不后悔。”在那个时代，陈希文用人不讲私情，是难能可贵的。

犟父不认将军儿

胡镜清，浙江省镇海陈家埔朱家塘楼人。受族兄胡俊清的邀请，到孝丰鹤鹿溪定居。先经营药材生意，后在县内清丈田亩，办理田产买卖，以文书为业。其子胡宗南生于镇海，七岁时胡镜清将他带到孝丰县长住。

胡宗南八岁入私塾，十三岁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十七岁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后回孝丰县立高小任教。因对家庭包办婚姻不满，1924年春离家出走，在上海毛竹行章旭初的资助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春天胡宗南毕业，分配到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八连任少尉见习，后调任机枪连排长。以后飞黄腾达，成为黄埔系第一个进衔陆军上将和战区司令长官的人。

1935年，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驻徐州。父亲胡镜清从孝丰老家到徐州看他，一路风尘，问来问去，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一军司令部。胡镜清详细说明籍贯、姓名、与胡宗南的关系，营门卫兵进去报告。胡宗南迟疑了一下，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向胡镜清回报。胡镜清听了十分诧异，又对卫兵说：“你一定传错了，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会不认识我呢？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的别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不敢违拗，只好再去禀报。胡宗南见卫兵二番回来报告，立刻翻脸说：“哪里来的混账老头，这样无赖，快把他撵走！”卫兵出来蛮横地说：“快走！快走！里面无

人认识你，再耍无赖我不客气！”胡镜清跋山涉水千里寻子，又饥又渴，到了儿子的大门口，儿子不仅不接见，竟无理轰撵，于是气不打一处来，把脚一跺就走了。

卫兵走后，胡宗南立即派心腹副官跟踪父亲。胡镜清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后，副官回来向胡宗南作了汇报。胡宗南这才化装着便衣带着三百块钱去旅店看父亲。胡宗南进门忙赔礼说：“儿子军务在身，在司令部未能迎接父亲，望父亲宽恕。”胡镜清满面愠色不理他，胡宗南又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找我，现在给你三百块钱，你快快回家吧！”胡镜清闻听火冒三丈，大骂道：“你当大官了，富贵了，不认亲生之父，我没你这个儿子，绝不癞狗求食，快拿走你的臭钱！”胡宗南再三解释，胡镜清只是不理。见父亲一时气愤难消，胡宗南便把钱放下走了，打算等父亲消消气再来赔不是。

胡镜清不愿再见到儿子，胡宗南走后，他钱也没拿，匆匆去找孝丰同乡借了点路费就回了老家。从此，胡镜清　只当自己没有这个儿子，直到颈上生“对口痛”不治而死，也不认胡宗南这个儿子。

张灵甫鬻字

原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是驰名疆场的悍将，而他还是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的事，却鲜为人知。

张灵甫，原名张钟灵，陕西省长安县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本村私塾读四书五经。十岁进入小学念书。1914年考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他国文成绩优良，对古文和旧体诗词有浓厚兴趣。他热爱画画写字，尤工书法，经常临摹何绍基的字帖。每逢节假日，张灵甫便带着笔、墨、纸、砚，到西安文庙（即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去临摹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的碑帖。所以，他的书法应规入矩，功底扎实。

1925年，张灵甫在开封考取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在上海接转入学关系时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于右任是张灵甫的陕西同乡，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张灵甫对于右任敬仰已久，于右任对张灵甫的字也很赏识，便给以悉习的 指导。从此，张灵甫潜心模仿于右任的字体，二人建立了师生之谊。张灵甫从军后一直没有歇笔，书法水平大有提高。

1934年，张灵甫在胡宗南部第一独立旅一团任中校团长，在陕北驻防。当时，军官的眷属都住在西安，张灵甫的第二个妻子吴海兰也住在西安。吴海兰是四川人，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贤惠正派，人缘很

好。一次一位同事和张灵甫开玩笑，说看见吴海兰与青年男子一起看电影。张灵甫信以为真，以为吴海兰“不贞”，就枪杀了无辜的吴海兰。此举引起了西安妇女界及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西安妇女协会还取得了南京宋美龄和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的支持。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押解南京查办。张灵甫善于带兵，很受胡宗南器重。因此，胡宗南对张灵甫既未捆绑，也未派人押解，而是让其自己去南京投案。

张灵甫匆匆上路，带的路费不多。他离开军营，经西安出潼关，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囊中就告罄了。路途之中求亲无亲，告友无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摆地摊卖字。不料卖字很成功，他的字很受当地书法爱好者的赏识，写的字全部卖光了。于是，他没钱了就写字卖字，有了钱就再赶路。经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一路写，一路卖，终于绝路逢生，摆脱了困境，到达了南京。

张灵甫被关进南京“模范监狱”。监狱对他另眼看待， 没有关入一般牢房，吃住都有特殊安排，仍可自由活动。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监狱的监管人员纷纷向他索字，还有人求他写牌匾。他的字很快享誉南京，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南京很多商号的招牌都出自他的手笔。

“七七”事变后，在王跃武的保举下，张灵甫出狱重返军旅。为躲避舆论谴责，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张钟灵改为张灵甫。

何香凝诗激张治中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预先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南京中央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日军残酷屠杀东北人民，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的大学生联合江苏、浙江、北平、天津的三千多名大学生，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中央政府援助马占山抗日，收复失地。张治中将军奉命在国府大厅主持处理学生请愿之事。有人主张暴力镇压，张治中坚决反对，认为对学生的正义之举绝不能用暴力镇压。

正在这时，张治中收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件妇女褂子，要他转达黄埔毕业的将领们，要听听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信中附诗一首：

杠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张治中为这位“师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义愤所感动，自愧身为七尺男儿不能保家卫国，无脸面对国人。所以，他力促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写了一个手谕，表明政府有决心收复失地，答复了学生的正义要求。

第二年，淞沪抗战爆发。张治中看到第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大为忧虑，便主动请缨，率第五军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参战。在出征的那天深夜，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遗书，表示尽忠报国的决心，要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他说：“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了。”他到了前线，担任左翼军指挥官，先后在庙行、浏河、葛隆镇等一线阵地亲自指挥，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给日军沉重打击。后来，日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张治中奉命率部退守常熟一线，以作持久抗战的准备。

张治中率部退守常熟之后，何香凝又前来慰问全体将士，并慷慨赋诗《赠前敌将士》，激励抗日将士：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又 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

焚毁我多少城市，残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张治中将军回南京后，在总理陵园附近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淞沪之役阵亡将士一百二十八人，寓“一·二八”事件之意，缅怀为国捐躯的英勇官兵，激励人们牢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不忘国耻。张治中在追悼会上致祭文说：“此仇未报，衷肠若煎，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以安慰烈士在天之灵，激励

抗日军民奋勇前进。

“一·二八”诗魂永存

1932年1月28日是令人难忘的日子。

“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奋起抗击日寇。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爱国团体的号召下，全国同胞一致要求抗日。蒋介石虽然以在野之身通电声援，受他控制的国民政府却按兵不动，并如惊弓之鸟，迁都洛阳。

在宋庆龄、邓演达等领导的“第三党”（即“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不少爱国军官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抗日，何置之不理。一天夜间，数十名军官乘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的何应钦官邸，请缨援沪。何说，日本是世界头等工业强国，拥有现代化装备的陆海空三股军事力量，而中国连机枪大炮都要依赖进口，各地军阀口头拥护中央，实则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局势，怎么能和日本人打呢？

话毕，一位军官针锋相对地质问他：“我是部长的学生，也给部长当过参谋。你经常说军人要保卫国家、爱国 爱民，才算尽了军人的天职。‘九一八’事变，东北一夜之间沦亡，国民皆骂政府卖国、军人无能。国难当头之际，正是军人报国之时。难道您身为老师和长官，竟要我们当亡国奴吗？”一番慷慨陈词，驳得何应钦哑口无言。

不久，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同意爱国将领张治中的

请求，让其率精锐的第五军出兵援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打得日寇死伤万余，四易主帅。但终因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日政策，在敌强我弱、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不得已撤离前线。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但是，广大爱国军民在“一·二八”事变中筑起的血肉长城，使得日本侵略者再也无法重温像“九一八”事变那样侵占我大片国土的美梦。第五军营长朱耀华身中七弹，壮烈殉国。他牺牲前曾作诗《月夜巡视阵线有感》四首，读来令人泪下：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
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
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
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
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
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鏖兵抗强权。
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这组诗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概。而在“一·二八”事变中怒骂敌酋而遭杀害的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生前所撰一副对联则表达了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气节：

平居宜寡欲养生，临大节则达生委命；
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

其实，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诗魂就是我们的民族魂，永远激励中华儿女为国牺牲的豪情壮志。

宋哲元及其大刀队

宋哲元生于1855年，祖籍山东乐陵县，久居天津，其宅第人称“宋家大院”。宋家为武术世家，宋家兄弟及其儿女辈皆练武，家中专设兵器库房，存放刀、枪、鞭、剑等兵器百余件。

宋哲元将军倡导以武术练兵，在军中聘有专职武术教练，挥砍大刀即为其训练项目之一。其习武所用大刀，锋利坚韧，能削铜钱。

1933年春，日军占领热河，进驻承德。驻防通县、遵化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命急行军赶到长城要塞喜峰口抗敌。宋将军依据日军武器装备和所占高地之优势，以及其胜必骄之心理，决定以夜战、近战之战术取胜。深夜，宋将军选五百名大刀手奇袭喜峰口。将士们右手持刀，左手攀登，爬至山头，杀入敌营。大刀挥舞，东杀西砍，与日军血战，塞上千名日军全部丧命。翌日早晨，日军炮轰二十九军阵地。然于炮击之前，宋将军已率部撤离 阵地，虽炮击三小时之久，却未伤及宋部之毫毛。待炮停，宋将军又率部回到原阵地备战。夜间，宋军头裹白毛巾，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军。酣睡中的日军仓皇应战，结果又被大刀队杀得落花流水。从此，宋哲元的大刀队威震全国，令日寇胆寒。其时有儿歌流传：“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日本鬼子就怕中国大刀队。”

宋哲元部队曾多次被日军及伪军围攻，然抗日救国矢志不移，发

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顽强抗敌，杀出一条血路。面对强敌，宋将军深知仅凭大刀作战绝难取胜，遂冒杀身危险，假任职于张家口海关的妹夫李武台之手下，将海关税券变为黄金，又四处托人，从国外购进新式武器，加强军力。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将军于当月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并一马当先，率部奋勇杀敌。不久，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后来，宋将军又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

宋哲元将军因长年征战，操劳过度，1940年4月病逝于四川绵阳。他逝世前留言：“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持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哲元将军收养孤儿

抗日战争初期，宋哲元将军收养了两名烈士孤儿。为纪念在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以身殉国的烈士，宋将军为这对双胞胎男孩取名宋纪峰、宋纪峪。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热河告急，平津受威胁。3月初，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部开赴喜峰口至罗文峪前线。当时日军已占领隘口高地，军情险恶，困难重重。宋将军发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精选五百勇士组成大刀敢死队，趁夜奇袭，砍杀日本鬼子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夺回喜峰口至罗文峪防线，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线的首次大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城战役"。

就在此次战役发起前，宋将军询问敢死队将士有什么要求。一位叫侯万山的班长说："我妻即将临盆，家住北平，倘有不测，望将军体恤我孤儿寡妻，纵死九泉，我也甘心瞑目。"这位班长在血肉搏斗中壮烈牺牲。战后宋 将军派员去北平给侯妻送去银元、米面。不久侯妻生下一对男婴。宋将军闻知侯家已有五个孩子，仅靠侯妻难以抚育新婴，即让夫人常淑清抱回遗孤，收为义子，取了纪念"长城战役"的名字。宋将军语重心长地嘱咐夫人："此乃烈士遗孤，要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待他们长大成人，再告以家世，并还姓于侯，以继其宗嗣。"

当时宋哲元一家住天津，将孤儿接到家中，雇了两位奶妈好生喂养。“七七”事变后，宋将军奉命南撤，家眷留在天津。宋将军嘱托管理家务的宋雁行好好照料遗孤。

1939年2月，宋将军因病到四川绵阳休养，将夫人及部分子女接到身边，在天津留下四女儿景蕴和纪峰、纪峪，由宋雁行照料。这对男孩长得十分相像，聪颖秀气，惹人喜爱。他们后来到天津私立慈惠小学读书。1940年4月，宋哲元在绵阳病逝抗战期间，直到日本投降，宋家始终抚养两位遗孤。日军曾抓住宋雁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逼其说出纪峰、纪峪的真实身份。宋雁行一口咬定这两个孩子是宋家女佣的私生子，出于善行才收养了他们。宋雁行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他宁肯将自己的孩子交出来顶替，也不让这两个烈士遗孤受罪。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8月16日这天，宋雁行挂起宋哲元家眷的照片，让纪峰、纪峪等人给将军磕头，他含泪一遍又一遍地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孩子们平安无恙，也都长大了，您老人家安息吧。”1946年春，宋夫人常淑清 到北京看望纪峰、纪峪，他俩已是十三岁的英俊少年，说长大要和二十九军一样，保卫国家，不让外国人再来欺侮我们。后来两人果然参军，服役于青年军二○八师。

两个遗孤于1949年随宋夫人到了台湾。他俩成家立业时，宋夫人说明了他们的身世，劝他们按宋哲元的遗愿还姓归宗。他们虽然还姓，但对宋夫人仍以母亲相称，尽孝膝下，直到宋夫人去世。

抗战殉国的赵登禹将军

北京有一条街叫“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著名抗战将领赵登禹而命名的。赵登禹1898年出身于山东荷泽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受山东人崇拜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思想的影响，十几岁便拜师学艺，立志扫除人间不平。1914年，十六岁的赵登禹同几个弟兄一起步行十多天，到陕西投奔冯玉祥部队当兵，连长正是后来和他一起牺牲的佟麟阁。由于赵登禹训练刻苦，武艺超群，不久即被选为冯玉祥的随身护卫。

有一次，冯玉祥外出检阅部队，突然遇到刺客，赵登禹奋不顾身扑上去，把刺客打倒，使冯玉祥免遭不测。从1922年到1924年底，赵登禹因勇敢善战，屡建战功，很快就从排长升到团长。不久，国民党军队扩编，他又被提为旅长和师长。在冯玉祥身边，他学到不少治军和为人之道，如爱兵、爱民、抗敌救国等。这对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赵登禹意识到自己作为军人，报效国家的时机来到了。他在部队中提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口号，强烈地激发了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1933年，在保卫长城的喜峰口战斗中，赵登禹带领官兵血战三天三夜后，又不顾身负重伤，亲率大刀队夜袭敌营，砍死日本炮兵大佐，使敌人遭到自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伤亡”。为此，赵登禹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晋升为中将师长。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0日，日军向北平发动进攻，直逼南苑。赵登禹临危受命，就任南苑总指挥，和副军长佟麟阁一起镇守北平。28日，日军调集两万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我方阵地发动猛攻。赵登禹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持刀督战，带头向敌人冲杀。经过几次激战后，我军虽伤亡惨重，但阵地丝毫无损。下午，敌人又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从东西两面夹攻，使我军腹背受敌。副军长佟麟阁将军被敌机炸弹击中牺牲了，赵登禹虽已多处受伤，但仍顽强地指挥部队继续战斗。他身上血流如注，最后昏死过去，醒来时他对卫兵说：“军人战死疆场是本分，你告诉我老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家战死，也算对得起祖宗了。”他战斗到最后一息，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

为褒扬赵登禹将军的功绩，国民党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京政府又决定把他生前住过的北沟沿大 街改名为赵登禹路。

这条路位于白塔寺和西四之间，南北走向，但北头偏东，南头偏西，是一条斜街。据说，与此垂直交叉的平安里西大街将很快被打通，向西直到花园村，向东直达农展馆。那时，在十字路的街心花园中，人们可一睹赵登禹将军的英雄塑像，缅怀烈士的丰功伟业。

忧国剖腹续范亭

续范亭，1893年11月出身于山西省崞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袁世凯窃国后他组织西北护国军讨袁。“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积极呼吁抗日救国，反对对日妥协。

1935年11月15日，续范亭来到南京拜谒中山陵，一路上心情格外沉重。

续范亭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对日本侵吞中国华北极为愤怒，到了南京目睹的却是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景象。他和朋友聚会，有人主张到中山陵前哭陵，他说：“哭有什么用？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只有热血才能把这些败类冲刷到人类行列之外。”他含着眼泪在旅店写下五首《绝命诗》，其中之一是：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

12月25日，续范亭和几个朋友边吃边说：“我们不要小看市井之人，荆轲、樊于期，不是鸡鸣狗盗之辈吗？实际乃真正英雄，千古留名！”说完狂饮。之后他写下了《敦促抗日绝命书》，其中写道：“余

北方之鄙人也。革命三十载，半生颇自爱。慨呼国已不国，我犹醉梦，愧无以对我同胞，更无颜见我总理。此次入都，两谒陵园，忧愤交并，拔剑穿胸。然犹冀领振臂，万众敌忾，为世界打不平，为人类振人格，和平之神，自当降临，于以救我民族于万一焉。余今以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勿笑余之怯馁。”他买回匕首，准备舍身取义。

12月26日下午4时，续范亭来到中山陵的祭堂前，先向孙中山遗像深深行大礼，又庄重地诵读了《总理遗嘱》，字字铿锵有力。诵毕控制不住感情，哭了几十分钟，最后转到祭堂大殿右前方铜鼎后，紧攥匕首向自己腹部刺去。没有刺中要害，便拔出匕首准备向胸部再刺，但流血过多，匕首掉地，人昏了过去。随即被人发现送往医院。

当时，南京《救国日报》对此作了详尽报道，主题：“续范亭忧国自杀”；引题：“大丈夫无用武之地”；副题“以宝剑刺腹险死于总理陵前，发觉幸早即送中央医院医治”。标题上面横排“山河变色”四个大字。《救国日报》、《南京晚报》都写了评论，高度评价此举。续范亭住医院期间，冯玉祥、于右任、张发奎、孔祥熙等前来探望慰问，杨虎城、阎锡山、朱绍良、宋哲元、范朴斋、邵力子等发 来慰问电。临出院前，张学良亲自到医院看望，两人谈得很投机。续范亭住院时在病床上写下豪言壮语：

将军应在沙场死，碧血胡为染绿苔？

在杭州休养时，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续范亭决心重返疆场杀敌报国，又写下了“浪花三尺横磨剑，歼虏将军莫偷安”的诗句自勉。这期间还写下《大无畏》一诗：

不怕死，不怕疼，不怕辛苦不怕穷。
养成一身大无畏，誓与倭寇决雌雄。

起草同盟会章程的马君武

马君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有“南马北蔡（元培）”之誉。

1921年7月，广西陆荣廷政权被推翻后，时任总统秘书长的马君武被任命为广西省长，兼摄军务。这是孙中山先生推举的，他认为马君武“不贪财，不惜死，既能文也懂理工”，出长广西，又符合“桂人治桂”的意旨。马君武是个学者，军政活动本非其所长，但正如他所说：“由于朋友的感情、总理的命令，而且又是服务乡梓，所以不敢固辞。”

马君武在广西从政、任教期间，一贯是学者风度，书生骨气，“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很少官僚政客那些坏作风。

马君武担任省长期间，尽管陆荣廷部队骚扰活动猖獗，枪炮声时闻，但他仍然坚持实施振兴实业、修筑公路的计划。当时驻邕将领刘震寰对他说：“马博士，现在不　是修公路的时候，陆福祥（陆荣廷亲信）已杀回来了，应该将各种款项给我充军饷。”马君武从容地说：“我素来不怕打仗，打仗早已成为中国的家常便饭。若说打仗不修公路，那就百政不办，若说不要修公路，就是叫我不做省长了。”刘震寰无言以对，便说马君武“神经不正常”。

陆荣廷在广西执政期间，逢法国驻龙州领事来访，便设酒筵款

待，唯恐不周，但法领事态度十分傲慢。马君武接见法领事时，只饷清茶一杯，连香烟也不敬一支，而法领事反而非常谦恭，足见马氏声望之高。

1922年5月，陈炯明叛变，广西风声鹤唳。马君武遂从南宁迁梧州设省长公署，随行有家眷、职员、卫队，并携现款数万元。船到贵县停泊过夜，当时驻贵军队为李宗仁所辖的俞作柏部。俞欲索取船上武器和款项，马严词痛斥，拒绝俞的无理要求。俞部开枪射击，马君武毫不畏惧，在夫人彭文蟾挡护下幸免中弹，而彭夫人与卫士十余人当场被俞军打死。后来李宗仁从郁林赶来制止了俞的暴行，并向马君武慰问道歉。马君武义正词严大骂李、俞。彭文蟾葬梧州蝴蝶山时，马君武撰挽联云：

归我三年，如形影相依，那堪一死成长别；
思君永夕，念精魂何在，未必来生得再逢。

十年后，马君武在广西大学时又赋悼亡诗云：

四面枪声蓦地来，一朝玉骨委尘埃。
十年方洒坟前泪，万事无如死别哀。
海不能填惟有恨，人难再得始为佳。
雄心渐与年俱老，买得青山伴汝埋。

可谓情真意切。

马君武长桂十月，政令不出省会南宁，一筹莫展。终于1922年结束在广西的政治生涯，先后去了上海、北京。1927年回广西创办广西大学。

马君武掌广西大学时，曾将自己的治学经历写成《一个苦学生的自述》一文，发给学生以为勖勉。贫苦辍学的青年秦道坚无钱交学费，由粤来梧找马君武帮助。马君武见秦考试得第二名，便准他先行注册，后来叫他每天在化学室工作两小时。这样的半工半读给秦解决了学习和生活费用。秦道坚在校时研究出用稻草制造无烟火药，马即在科学月刊发表并给奖金、奖状。秦道坚毕业考试第一，又获学校特制金质奖章一枚。后来秦道坚赴美留学，回国不忘母校，称马君武为恩师。如今广西的著名教授和科技专家中，甚至海外的一些学者，不少是马君武培养出来的。马君武办广西大学时，白崇禧派军训主任和军事教官驻校。后因军训科目过多而影响学习，马君武坚决反对，叫学生不上军训科目回课堂上课。军训主任拿白崇禧的命令来压马君武，马君武说："你叫他来和我说。"他曾评论李、 白主张的"自卫、自治、自给"的政策说："三自政策，应该再加一自——自杀。"他也因此招致权势的记恨。

马君武平易近人，刚正不阿，有时还表现出滑稽玩世的态度。他能文精诗善书，暇时挥毫消闲，慕名来求手迹者很多，他一概不拒，但一些权贵要人请他挥毫往往碰壁。一次，马君武接教育厅发下来的登记表，要他填写"何时入国民党"，他鄙夷地只写上"同盟会章程是我起草"这几个字。

马君武是很爱他的故乡的。他曾任北京工业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校长，本来在外省任职的待遇和生活条件都比广西优厚、舒适得多，但由于他宏才硕德，有为桑梓服务的精神，所以长期留在广西办学。他五十岁时曾在开学大会上说："把西大办好，就是我一生的事业。西大根基何日稳定，我即何日告退。"

“七君子”狱中题词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领袖的暴行，很快掀起了广泛的救援运动。

社会各界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救援运动，更加坚定了“七君子”为正义、为抗战而坚持斗争的信念和勇气。在囹圄之中，他们通过会客、写诗作文等途径表达自己力图救亡的抱负，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他们抱定“准备高呼爱国口号，从容就义”的决心。他们赤诚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一直仰慕他们的高风亮节的青年看守文六。当文六提出祈望“七君子”书赠墨宝时，他们当即应允了这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的要求。

1937年7月9日，“七君子”相继在一张巨幅宣纸上为文六题写了各自的抗战词。当时年已六十三岁的沈钧儒　首先执笔，书诗一首：“双眼看圜扉，苦笑喊前进。闻之为泪落，神往北几省。矫矫傅将军，力遏敌胆迸。联想及青岛，沈子吾夙敬。努力在前途，存亡悬一瞬。国难如此殷，吾侪乃见摒。哀哉勿自饭，驼耳犹知奋。”诗中赞扬了率部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主张抗战的青岛市长沈鸿烈，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张。

接下来，邹韬奋的题词是“团结御侮”。李公朴的题词更是充满哲理：“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是自然的法则，我们应替天行道。”沙千里的题词则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章乃器所写的是：“秉出世观，下入世愿。”王造时所书是：“我们应爱和平，但更爱正义，反抗强权。”最后提笔的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士史良，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敌人紧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抵抗才能死里求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的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1937年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这天下午，经常为“七君子”诊病的苏州名医陈起云特地赶到狱中迎接。他拿出一把一面已请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题绘了《高山远舟图》的折扇，请“七君子”在画的背面题词。“七君子”欣然命笔，再次共同书写了自己的抗战誓词，表达自己不屈不挠的斗志。

在这幅扇面上，“七君子”推举史良女士开笔首书，她的题词是：“我们要集中全国切力量抗战到底。”以下依次是：“我们不能有私见也不能有成见，时时刻刻一举一动都要顾到民族的利益”（章乃器）；“努力救亡”（李公朴）；“同心协力，抢救危亡”（邹韬奋）；“各尽所能，献与国家”（王造时）；“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沙千里）；“还我河山”（沈钧儒）。

这天下午五时二十分，“七君子”步出了设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结束了二百四十三天的囚禁生活。

孙中山的四具棺木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曾先后备有四具棺木。

第一具棺木为美式小楠木棺。1925年3月15日，即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其遗体运回北京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据史料记载，遗体经防腐处理后，由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选用一具美式楠木棺装殓遗体（因水晶棺一时尚未运到）。

第二具为楠木玻璃棺。中山先生遗体入殓后不久，孔祥熙嫌原来的楠木棺太小，于是又换了一具大楠木棺。此棺为椭圆形，前端呈方形，棺中用玻璃作隔层，俗称楠木玻璃棺。揭开棺盖即可瞻仰到中山先生的遗容。

中山先生的第三具棺木为水晶棺。中山先生临终前，曾向家属表示，愿如友人列宁那样保存遗体，供后人瞻仰。治丧处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即致电当时苏联领导人定购水晶棺。1925年3月30日，苏联特派专员多米诺夫将免费赠送的水晶棺护送到北京。该水晶棺长1.75米，高0.5　米，棺头宽0.65米，棺尾宽0.53米。棺的外盖及外层均系钢质镀镍，明亮可鉴。内棺系玻璃质，可透视内部。可是后经协和医院专家检查，发现此棺质地脆薄，易于传热，和列宁用的水晶棺不一样，加之长途运输，有几处出现孔隙，不宜长期保存遗体，故后来没用。

第四具棺木是紫铜棺，系由治丧处向美国定购，价值为一万五千两白银。此紫铜棺于1925年8月，由美商先运抵上海，暂时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宋庆龄看了以后觉得很满意。1927年4月，上海葬事筹备处迁到南京，紫铜棺也随后运到南京暂时存放。

1928年12月20日，南京政府特派林森、郑洪年、吴铁城前往北京，紫铜棺也随车由南京运到了北京。翌年5月22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进行了隆重的易棺仪式。由协和医院医生史蒂芬带领助手郭荣勋将中山先生的遗体加裹白绸，并给先生理了发。然后，由孙科、郑洪年、马湘为中山先生穿了内外衬衣、礼服、鞋袜，戴上手套。做完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才将中山先生的遗体移入紫铜棺中。此紫铜棺高0.65米，宽0.80米，长2.24米。据《中山陵趣闻》记载，易棺时，紫铜棺四周先用白绸装棉制垫，再加上白绸丝棉袋四十八叠，置于棺之上下两侧，遗体头部以下盖以锦缎方被。

四具棺木的安置情况为：小楠木棺当时暂存于北京中法中学。楠木玻璃棺于1929年易棺后，随中山先生的衣 服、鞋袜一并封入西山碧云寺石塔内，此为中山先生的衣冠冢。苏联赠送的水晶棺，停放于北京碧云寺中山纪念堂，供人瞻仰。装殓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于1929年6月1日安葬于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内，直至现在。

真假冯国璋墓

冯国璋，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间市）诗经村人，人称“冯河间”或“冯诗经”。1916年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曾任副总统，次年又升任代理总统。1918年冯国璋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先后辗转河北故里及京津一带。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帽儿胡同寓所病逝。

冯国璋死前曾给继任总统徐世昌一封信，言及“希望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于是，徐世昌利用这一点在冯国璋丧葬上大做文章。徐世昌在给国务院的命令中称，冯在“弥留之顷，犹以时局危迫促进统一为言，爱国之忱，溢于言表”。并令国务院，冯的丧式规格要参照袁世凯墓，由北洋政府负责监督施工。如此一来，北京的冯宅就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这年2月2日，冯国璋的灵柩由冯宅起杠，经过两天的行程，于4日到达河间的诗经村。因当时冯国璋的墓穴尚未完工，没有办法举行葬礼，只好把灵柩暂时安置在冯　氏家祠内。直到3月26日墓穴完工，才正式为冯国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冯国璋墓在诗经村的东北，占地约百余亩，墓区以绿瓦红墙环绕。墓门前有小石桥一座，墓门向南，为五楹琉璃瓦歇山顶式建筑。门内有三间四柱白石坊，其后有“河间冯公之神道”、“中华民国副总

统、代理大总统冯公国璋之墓”两座高约五米的巨碑。碑后的神道两侧分列着华表、石翁仲、石马、石羊、石象等石雕。再往后为宫殿式通厦三重，最后是享殿，内置有石五供。殿后就是冯国璋的墓茔所在，其墓台高约五米，三十米见方，为白石砌筑，环列石狮以壮其威。在墓台的中间，筑有高二十五米的土坟包。整个墓区的多项建筑是颇具匠心的，气势非常恢宏。

冯墓在20世纪20年代初建成后，墓地屡遭破坏，但基本上只限于地面建筑。据当地人传说，这可能是因为冯墓营建时怕后人盗掘，在地宫里安置了毒箭和大量的炸药、毒气弹，故一直未有人敢动过。可是1966年夏天，天津师范学院的红卫兵硬是不信邪，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诗经村，会同当地红卫兵一道掘开了冯墓。结果令人大失所望，里边除一口薄薄的棺材和一把军刀、一张相片外，别无他物。

红卫兵受了如此的“戏弄”，十分恼怒。于是他们走街串户访问，了解到冯国璋生前素有孝子之称，他的祖坟　在距此十余里的半截河村。于是转移方向，到冯的祖坟继续寻找。在那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冯国璋的真墓。原来，在1920年3月25日的夜里，由冯氏的亲属和从北京雇来的杠夫，悄悄把冯国璋的灵柩埋在半截河村冯氏的祖坟内。从地面看，没有堆起的墓包。

红卫兵在墓内挖出阴沉木大棺一口，棺外裹以三层石棉布，每层之间涂以四道生漆。如此密封的棺木使得棺内的冯国璋尸体保存相当完好，肌肤仍富有弹性。由于在阳光之下暴晒，尸体很快变黑。之后，红卫兵将冯国璋尸体连同棺木一起焚烧。在冯墓中出土的殉葬品有银元宝、银币、玉烟壶、玉如意、翡翠戒指、猫眼石，以及珍珠等多种。

汪精卫墓探秘

梅花山在南京市中山陵西侧，古称孙权墓。它的山巅有个“观梅轩”，据说是当年汪精卫墓穴的所在地。汪墓的建筑自下葬到被毁，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故其内幕鲜为世人所知。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病逝。两天后，日本人用楠木棺材将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伪南京政府成立了以陈公博为首的“哀典委员会”，决定为汪举行“国葬”。20日陈公博在林森路（今长江路）汪精卫的灵堂——“国府大会堂”宣誓就任“国府代主席”。23日举行国葬典礼，日伪各方委员为汪逆执绋，哀乐队开道，送葬队伍随棺柩从国府路、中山东路出中山门，抵达梅花山，葬入山巅已造好的钢筋水泥墓穴。伪南京政府曾准备为汪造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墓，以同中山陵并列，造价预算为五千万。后因日本无条件投降，工程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1946年1月15日夜，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总部内，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主持关于处理汪墓的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南京市长马超俊、宪兵司令张镇、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以及陆军参谋长等。何应钦说：“蒋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居然葬在梅花山，还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太不成样子！按委座电令，立即秘密平毁汪坟。大家研究一下，怎样妥慎地处理掉？”经过一番研究，决定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执行毁平汪墓的任务，宪兵司令部负责内外警戒，不许任何人接近。

1月20日夜，工兵点燃了一百五十公斤炸药的导火索，但只炸开了汪墓外层钢筋水泥。经第二次爆破后，才炸开内窖，发现了楠木棺材。打开棺盖，只见尸体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红旗，尸身着青色长袍马褂文官礼服，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进行过防腐处理，所以整个尸体完好无损。马超俊市长进行了棺内检查，发现死者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有“魂兮归来”四字，是陈璧君的手笔，以示招魂。另外有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其中多数诗曾在报上刊登过，但有一首绝命诗《自嘲》未具时间，亦未在外间披露过。这首绝命诗系汪死前所写，诗曰：“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从诗中看出，汪自知将永被世人唾骂，故自我安慰“天涯何处不怨尤”。汪在即将西归时，已预知伪政权、日寇的寿命将终，故而发出了“谅无后人续春秋”的 哀叹。

检查毕，由工兵指挥官指挥，将棺材送到清凉山火葬场，连尸体一起焚烧。铲掉汪墓后，为扫除遗迹，便在上面建起了一座“观梅轩”，并在山的南北两面开拓了两条小路，以方便游人游览。汪墓唯一的附属建筑，是位于东南面山坡下的汪精卫小祭堂，如今已改为游客品茗赏梅的“寿星宫”的一部分。

戴雨农戴山毙命

戴笠，号雨农，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头子。他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干尽了坏事。到抗战结束、日本投降时，他更以功臣自居，为所欲为，说一不二，到处指手画脚。他可以直接命令航委会为他派飞机，甚至连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也能够乘坐。在接受日本投降的那段时间里，他充当接收大员，整天奔忙于全国各地，安排物资接收工作。

1946年3月16日，戴笠要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途经天津和南京，最后到上海。这次飞行任务最初安排的飞行员名叫赵新。此人接受过现代化飞行训练，是位技术较为全面的驾驶员。但是，那天早上，当一切准备就绪，赵新正要启动发动机时，忽见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车上的人挥手示意，让他停止起飞。来人登上飞机后对他说：临时有变化，队长命令，改由张远仁替你飞上海，你马上回部队去，另有安排。

原来，这张远仁是个十分贪婪的人。他听说队里有飞上海的任务，便想乘机去那里做笔黄金买卖，捞一大笔钱。他和飞行队长同住在一个院里，平时关系也很好，便提出要求执行去上海的任务。队长清楚，他的飞行技术一般，这次又是戴笠的专机，如稍有差错，自己担待不起，所以开始还有些犹豫不决。张远仁又说：我去上海顺便做点买卖，也算上你的股份，一定能赚回大钱来。队长见钱眼开，便不

顾军纪，答应由他替下赵新。

也是该着戴笠倒霉。这张远仁是旧式飞行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没有接受过现代先进技术的培训，诸如利用无线电波、罗盘指导飞行技术等。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尚可应付，如果遇到复杂情况，他就缺乏应变能力了。

专机到天津作短暂停留后，上午9时又起飞。开始，戴笠打算先绕道青岛，接电影明星胡蝶一起返回上海。但后来又说时间来不及，还是直飞南京吧。中午12:05，飞机飞临南京明故宫上空，正赶上雷雨大作，能见度极低。张远仁感到降落有困难，打算临时改飞上海或济南，但地面气象报告说，上海和济南天气也不好，于是只好穿云急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天气中，张远仁心中有些慌乱，三次试降均未成功，最后一次竟偏到江宁县去了。到下午1时，专机和地面联系中断。据江宁县报告说，当时有人看到一个黑影在雨中一晃而过，然后“咔”的一声将一棵大树折断，随即撞向戴山，先是一团火光，紧接着一 声巨响便爆炸了，而后迅速燃烧起来。

机上包括戴笠在内的十一人全部被摔死。因大雨一直不停，无法抢救，尸体多被冲入山腰的困雨沟中。事后人们议论说，戴雨农撞死在戴山，滚进困雨沟，看来他起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后来，国民政府将戴笠葬于“灵谷寺烈士公墓”，其墓碑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上书“戴雨农将军之墓”。

上海滩宋中缚仇人

民国六年（1917），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秘书的洪述祖出现在上海滩。此刻，有一位少年默默地跟在他身后，这位少年已经寻找洪述祖四年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洪述祖抬腿上车之际，他一个箭步蹿上去，两臂如铁钳般地将洪拦腰缚住。这位少年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宋教仁的儿子宋中。宋中所以历尽艰辛捉拿洪述祖，为的是报洪述祖的杀父之仇。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孙中山去职下野，黄兴被解除兵权，章太炎脱离革命。只有宋教仁迎难而进，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内阁制。在民国元年末的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这使宋教仁兴奋不已。他立即由家乡返回上海，一路上不断发表演说，抨击北京政府无能，力倡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得知后，如芒在背，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设好圈套，以共商国事为名，邀宋教仁北上。有人劝宋教仁提防 袁世凯暗算，他坦然笑道："我宋教仁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国二年（1913）3月20日夜间，宋教仁欲乘车北上。就在进站之时，"砰"的一声枪响，宋教仁身子一晃，接着又是两声枪响，他皮箱落地，子弹击中后腰，立即失去平衡。旁边的黄兴急忙将宋教仁扶住，陈其美大喊："钝初，你怎么啦？"宋教仁惊呼："有人刺我！"鲜血从他的后腰流淌下来。于右任急忙截住一辆汽车，将他送进了铁路

医院。凌晨4时48分，宋教仁气绝身亡，年仅三十二岁。

“为烈士报仇！”举国一片声讨声。缉拿凶手，顺藤摸瓜，这一查非同小可。原来那天开枪的刺客叫武士英，武士英的后台是江苏巡查长应桂馨，应桂馨的后台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的后台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之后台则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此时，谋杀宋教仁的凶手无论是前台的武士英，还是后台的应桂馨、赵秉钧、袁世凯都已纷纷毙命，只剩下洪述祖一人成了漏网之鱼隐匿了起来。所以，当他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幕。宋中将洪述祖揪住之后，向围拢来的人说出了真情。之后，北洋政府慑于全国舆论的压力，立即将洪述祖处以绞刑。

施剑翘枪杀孙传芳

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枪杀案，即侠女施剑翘当众枪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孙传芳是山东省泰安人，在军阀混战时期，有“好战魔王”之称。1925年，他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军总司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誓师北伐，孙传芳先败于江西，继失江苏，后被击溃于山东，五省地盘尽失。后孙传芳投奔张学良将军，待机再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宣布抗日，孙传芳才举家迁至天津英租界寓居，并于1933年和另一寓居于天津的大军阀靳云鹏联合成立了天津佛教居士林，以皈佛诵经掩其血腥之面目。

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原是山东督办张宗昌部第五师师长，驻守鲁南一带。1925年孙传芳与张宗昌互争江北地盘时，施被孙部击败，并被俘。解送至孙传芳前，孙竟下令立即处决，从而种下恶果。施剑翘的叔父施从云是辛亥革 命广州起义之勇士，也被军阀所杀。为此，施剑翘满怀仇恨，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居士林枪杀了军阀孙传芳，那一年她三十岁整。

枪杀孙传芳的具体经过，据那日曾和施剑翘坐同一排的张坤厚女士（清末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回忆，天津的佛教居士林每周日都要请

当时的高僧富明法师为居士们念经讲法。那天，施剑翘坐在孙传芳身后第二排座。当富明法师端坐讲坛上讲经说法，居士们聚精会神聆听时，施剑翘从衣袋中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的后脑先打了一枪。孙突受枪击疼痛欲站起时，施剑翘又对孙放射一枪，孙当场倒地毙命。这时众人惊呆，只见施剑翘从容而立，取出早已写好的告国人书，散发给左右居士，并当众宣布枪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与他人无关。接着她简要历述孙传芳的种种罪行，及其父被孙杀害之经过。一时，宣讲佛法的居士林经堂成了历数军阀累累罪行的公堂。最后，施剑翘向大家诵诗一首：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通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间不可再延长。

当时孙传芳的随从虽闻枪声跑来，但见施剑翘神色从容，持枪而立，都未敢妄动。直到警察局来人才把施带走。这时，富明法师重整法衣，向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 “送往生”的佛门仪式，并从内室拿出两床棉被，将孙的尸体裹好，由孙的随从抬上汽车送回府中。时年五十一岁的孙传芳从此进了“地府”。

施剑翘被捕后，天津法院曾判以七年徒刑。但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免施之罪。当时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声援各界，支持施剑翘。国民党政府乃于1936年10月下令特赦施剑翘。1979年施剑翘在北京谢世。

川岛芳子生死之谜

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乃清肃亲王奕善的第十四女，生于日本东京。三岁时拜曾任清室顾问的日本人川岛浪速为义父，并寄养其家，因又名川岛芳子。金璧辉聪颖异常，又是清室贵胄，遂被日本军政界看中，对她进行间谍训练。“九一八”事变后，金被派往东北及京津沪等地，为日本侵略军效劳。“七七”事变后，金受多田骏提拔，任伪华北人民军总司令，搜集情报，屠杀抗日军民，罪大恶极。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金被捕归案。后经河北省高等法院审讯，判处死刑。

笔者一朋友当时在新闻界，据云，1948年3月15日5时许，他得知处决金璧辉的消息后，便和一位摄影记者驱车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谁知抵二监时，只见一切如常，看不出有任何戒备。询问值班人员，才知不在二监行刑，于是又赴宣武门外姚家井第一监狱。抵达一监时已6时20　分。这时已有不少记者在会客室与吴典狱长争吵。原来吴不准记者入刑场观看行刑，理由是南京有指示。但这时有美联社记者早已进入刑场。6时40分枪响，金伏法。

枪响后二十分钟，始得见金尸停在一薄棺材板上，仰面朝天，身着灰色棉囚衣，内穿绿色毛衣，两手紧握，脑后中一枪，子弹由两眉间穿出。脸上虽有血污，但能清楚辨出死者确为金璧辉。

由于冀高法院不准中国记者入刑场观看执行金犯死刑，却对美国记者放行，遂引起北京新闻界义愤。不少中国记者到石碑胡同中央社分社议论此事，并起草新闻稿，声称：“冀高法院不准中国记者亲临现场观看金犯伏法。事后虽将尸体抬出，任人家观看，但尸体面部已血肉模糊，实难辨出死者为谁……”中央社系向全国发稿，因此各地产生金壁辉未死，枪决者系替死鬼的流言，一时金壁辉生死竟成一谜。其实，金被处决真实如上述。

金死后，笔者曾随同朋友到她住过的贞字监第五号牢房探视。牢房门朝北开，金生前床上有丹凤朝阳锦被和红毛毯各一床，床头墙上挂有金狱中自题条幅。其中一条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另一条称：“生者尧舜，死则腐骨，生者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又谁知其异。”一派混淆忠奸、颠倒是非的唯心论、宿命论观点。据其他监犯称，金尸由日僧谷川大行领殓。金死前有简短遗嘱致其父，内称：“请告诉青年们永远地不止息地为国 的未来祈祷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可能是金几年反省，临终前悟出的真理吧！

社会杂闻

菜市口刑场耸人闻

过去，北京宣武门外有个明清两朝的刑场——菜市口刑场。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宣武门街，有市曰菜市口，刑人之所。”九十六岁高龄的北京老住户关玉福曾讲：“菜市口刑场杀人的地点，就在现在的南来顺小吃店的西墙外。”菜市口刑场，“东自铁门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亦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

在菜市口有一历史悠久的药店，叫西鹤年堂，它与杀人的刑场有密切关系。北京人有句骂人的俗话：“西鹤年堂去讨刀伤药。”这个西鹤年堂创立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年菜市口刑场杀人时，药店就得暂时关张。因为监斩官就在西鹤年堂休息。

在清代，刑场监斩官的高台座位常设于西鹤年堂店门口。搭一席篷，下放一长方桌子，上摆朱墨、锡砚和锡制笔架，笔架上搁放几枝新笔。监斩官照例先在西鹤年堂坐 一坐，稍事休息，再升座行刑。公案上的笔，是有几个犯人便要预备几枝。这是何故呢？因为凡杀一个人，刽子手提头上来，监斩官就要用朱笔在犯人头上点一点。那枝笔就会有人出大价钱买去，据说这种笔可以压邪驱魔。从另一角度讲，一个犯人用一枝笔，亦为刽子手和差役们的生财之道。

民国以后，废斩刑，改枪决，刑场移到桥南面路西，先农坛二道

门外。周作人在《补树书屋旧事》中提过："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这地段不算很好，因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所以出入总还是自由清静的。"说明在民国之后，菜市口作为刑场的历史才结束。

封建统治者草菅人命，杀人如麻。明清两代，究竟在菜市口刑场杀了多少人，是难以统计的。据载，被杀的人当中，有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志士，如"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此六人，在狱中时均意志坚定，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谭嗣同在狱中题诗，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警句；杨深秀在狱中作诗数章，"忠气之诚，溢于言表"，诗云："久拼生死一毛轻……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也有触犯慈禧威严的大臣。庚子年间（1900），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清廷"剿抚两难"，慈禧太后决定避开义和团的锋芒，先利用义和团抗击一下 列强，等时机成熟之后再镇压义和团。当时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在御前反对慈禧太后贸然对外宣战，后又联名上三疏，请严惩主战大臣和镇压义和团，结果触怒了慈禧。于是七月初三日，朝廷以"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的罪名，将他们"即行正法"。许景澄不服，说："我于朝廷可谓尽忠矣！"也有的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的失败者。如咸丰十一年（1861），肃顺监斩了因家奴受贿而遭杀身之祸的一品大员柏葰。三年后，身为顾命大臣的肃顺又被慈禧命人押赴菜市口刑场斩首示众。但被杀的更多的是无辜的平民百姓。据载，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六日短短半个月间，就毫无根据地以所谓白莲教谋反的"罪名"，接二连三地在菜市口刑场残杀无辜百姓一百多人。

清代有个叫许承尧的人写过一首诗《过菜市口》，把菜市口刑场的景象描绘得颇具声色，特录于此，以飨读者。诗曰：

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

市人竞言笑，谁知我心悲？
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
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威。
愁云泣不散，六月闻霜飞。
疑有万怨魂，逐影急啸啼。
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
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
右侧竖长竿，其下红淋漓。
微闻决囚日，两役舁囚驰。
高台夹衢道，刑官坐巍巍。
囚至匍匐伏，瞑目左右欹。
不能辨颜辅，乱发参霉泥。
欧刀厚以寸，锋钝断腕迟。
一役指囚颈，一役持刀锋。
中肩或中颅，刃下难遽知。
当囚受刃时，痛极无声噫。
其旁有亲属，或是父母妻。
泣血不能代，大踊摧心脾。

“大水怪”震惊朝野

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风景优美，平日游人络绎不绝。然而在旧时，这里却称南大洼，偏僻荒凉，坟茔累累，芦苇丛生，人迹罕至。尤其夜半时分，鬼火明灭，风吹树动，鸟枭啼叫，令人毛骨悚然。光绪二十年（1894），这里曾发生过“大水怪事件”。

当时每至深夜，湖中芦苇深处总发出阵阵瘆人的叫声，音量极大，环湖振响，整个水面亦随之颤抖。于是有关大水怪的传言四起，说“南大洼连着海，是渤海的海眼”，“大水怪复出若是震塌了海眼，北京城也就完了，这是气数，在劫难逃啊”。还有“大清进关二百多年，大水怪不出来闹事，眼下恐怕是……”

“妖言”传入宫中，慈禧老佛爷闻之震惊，御前的王公大臣们连忙献计。先是请和尚、喇嘛、老道来湖畔筑坛念经，大办法会，超度“大水怪”。再就是调八旗禁军到湖畔布阵压邪，并摆出皇上出巡的銮驾和仪仗昭示天威。 于是南大洼沿岸佛幡招展，钟鼓齐鸣，声动十里，禁军布下“混元乾坤八卦阵”，皇上的宝座驻跸阵中，大有六军出行、天子莅临之势。说来也奇，几天之后，不知是大水怪被“超度”了还是被“镇服”了，南大洼水面恢复了平静。京城上下于是又流言四起：“大清气数还长着呢”，“一正压百邪”，“北京城是块福地，大家都沾太后、皇上的洪福”……

谁知到民国五年（1916）夏，南大洼“大水怪”又出现，叫声之大，震动全湖，波及沿岸。京城传言又起：“皇上退位，没有真龙天子镇着，大水怪要翻翻身……”其时袁世凯正欲登极当洪宪皇帝，岂容“妖言四溢，惑众骇俗”。无奈京师警察局对谣言“禁而无效”，且越禁越传，越传越邪，于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不得不采用“治本”措施。

吴氏率幕僚赴南大洼视察后得出结论：大水怪既然会叫，当然是血肉之躯。南大洼芦苇丛生，湖水当然不深，“水怪”也就不会太大。北京距渤海三百余里，南大洼是一坑死水，绝无“震塌海眼之理”。“治本”方案当为武力弹压。

吴氏随即调来精锐的警察部队，十辆装甲车架着马克沁式重机枪，环湖列阵，进入战斗状态。沿湖的制高点则部署各种火器的射击阵地。

夜深，面临大敌的“大水怪”却置若罔闻，照例鸣叫。吴氏下令：“按兵不动，就此监视。查实声源，避免夜战，以防混乱误伤。”直至破晓，旭日初升，沿湖警察部队才得到射击命令。于是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大水怪”果然腾水而出，被当场击毙两只。

原来两度扰乱京城的“大水怪”，只是一种不知其名的水鸟，大者近三尺，小者二尺余，嘴又大又长。它鸣叫时将嘴插入水中，引起共振，使湖水震荡，堤岸也好像在发颤。

后来，两只“大水怪”的遗体被制成标本，送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展出。至此，这桩震惊朝野的“大水怪事件”告一段落。

“活神仙”张铁嘴命丧“天子”手

旧时京城盛行看相算命，清末民初有一个名叫张振龙的人，因其看相准，又直言不讳，被称为“活神仙张铁嘴”。

张铁嘴最早只是在天桥摆个相摊，挣钱糊口。有一天，一个穿着很破的人前来看相。张铁嘴见他虽身穿破衣，但面皮白嫩，脸上油光，双目有神，头骨丰满，断定其绝非等闲之辈。他拱手说道：客官之头，圆、健、正、丰，乃大福大贵之相。别看你身着破衣，实乃荣华富贵之人，您脱去破衣，必是紫袍加身。如说的不对，我愿金盆洗手，永不再吃这碗饭。那人听罢，二话不说，从怀里拿出一个金元宝，往摊上一丢，扬长而去。后来得知，此人乃是一位王爷，闲得无聊，来此解闷。此事情一传开，张铁嘴便被说成活神仙了。

溥仪退位后，袁世凯投机当了大总统，但他仍不满足，又得寸进尺地做起皇帝梦来。然而他又怕真的当了皇　　帝，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因此左右为难。侍卫长张洪镖看出他的心思，为了讨好，借机说，有一个看相的张铁嘴，他只要看你一眼，即可断出吉凶祸福。袁世凯说：有这等事，你把他找来，我看看他有多大本事。

张铁嘴这天正在家中眯着眼抽大烟，忽进来一人，说请张先生到袁大总统府去一趟。张铁嘴大吃一惊，抽大烟的舒服劲儿立即变成一

股冷汗，顺着脖子往下流。凡看相的人有三怕，其中之一是怕给凶残之人看相，看准了则必遭其害，袁世凯即属此类。于是他推辞说：总统爷高看我，是我三生有幸，但看相人有戒律，其中第五条是酒后不能看，醉人之眼吉凶难辨。我今天喝了酒，恕难从命。那人说：既如此，明天切勿再饮，我再来接你。

来人走后，张铁嘴心想：听说袁世凯是癞蛤蟆转世，不知面相究竟如何？他想当皇帝，又怕世人反对，我是顺竿爬还是反着说呢？最后下定决心：顺竿爬。他对家人说：这次进宫，是福不要乐，是祸躲不过。

第二天张铁嘴壮着胆子进了总统府。只见在一片森严气氛中，袁世凯坐在紫檀木椅上，墩粗肥胖，两腿垂直，一副骑马蹲裆之势。他微笑着冲张铁嘴说：听说你有些本领，你照直说吧，不必拐弯抹角。张铁嘴朝袁世凯脸上一扫，见是一脸奸相，说：相分五色，青主忧、黄主喜、白主泣、黑主病、赤主惊，总统气色是黄中显青，乃喜中见忧也。又印堂发亮，乃主大贵，但两条疑纹，必有疑而不 决之事。他故意停一下，又说：总统天授，事无不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世凯一听正中下怀，但仍二目微闭，令其说下去。张铁嘴这时忽然跪倒在地，口称：万岁爷，赦民斗胆进言，您再不登九五之尊，必有负上苍了。袁世凯把脸一沉说道：不可胡言，我乃民国总统，岂能复行帝制？说罢即拂袖而去。

未几天，张铁嘴被害而死。原来袁世凯一听自己是真龙天子相后，怕传扬出去泄露天机，于是就派人把张铁嘴除掉了。

警察总监住凶宅

过去，传说北京凶宅甚多，尤其是那些深宅大院。由于有某种背景，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人们有意无意地渲染，便越传越凶。民国年间，人称京城有四大凶宅，即二龙坑的郑王府、汪家胡同军警缉察处、小石桥警察教练所和兵马司的警察总监公馆。

这里说的警察总监公馆是指袁世凯当政期间警察总监吴炳湘在北京城的住所。他从山东巡警道调任警察总监后，就住进了这座空置了十几年的大院。此院原为清朝一个皇戚官邸，“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主人合家遇难。官邸后由官方接管，便一直闲置起来。在老百姓的意识里，杀过人的房子都是凶宅。加之里面杂草丛生，“四大仙”狐（狸）、黄（鼠狼）、蛇、柳（刺猬）繁殖甚多，又都在夜间出没，更增加了宅院的神秘感和恐怖感。吴炳湘乔迁不久，夫人滕氏忽患白喉之症，不治身亡。这使凶宅之名更甚。

新主人住进凶宅之后，原宅的一些仆从和看管人员还继续留用。这些人对老主人总是念念不忘，对他们惨死的情景印象极深。新主人住进来之后，他们经常有意无意地渲染一些凶相，警示新主人不可过分造次，尤其那些更夫们晚上打更时，嘴里总是不断地呼喊。有一天，吴炳湘毕业于日本警士学校的侄子问道：“你们在瞎叫唤什么？”更夫说：“我们巡更时，总觉得有东西在腿前挡路，不喊叫就迈不开腿。”这位侄少爷是个洋派人物，又任京师警务稽察，哪会信这个

邪。就说：“有什么东西，你们指给我看！”更夫说：“你一出来，那东西就向花园跑了。”侄少爷大怒：“带我到后花园去，找不着就拿你们是问。”他们来到花园，果然发现草丛里有个一尺多高的影子在晃动，侄少爷立即拔枪射击。大家听到枪声都点灯前来，发现被击毙的原来是个大刺猬。人们议论说：“这么大的刺猬，肯定是有灵性的。”

还有一个女仆，自从总监夫人病故后，大白天经常闹“太太附体”，拉着小姐们又哭又闹。但当姑老爷闻讯赶来时，女仆则立即恢复正常。原来这位姑老爷是个骑兵上校，年轻气盛，再加上那身笔挺的军服，手握勃朗宁手枪，身后还有两个马弁亮着盒子炮。女仆本来是装神弄鬼，一见这阵势，早吓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敢闹下去。别人却认为这是姑老爷那军人的阳刚之气把邪气镇住了。

由于接连不断地出现怪现象，为保证警察总监的安 全，警方决定加派一些警士在夜间和更夫们一起巡逻。谁知那些警士进入内宅后，也说这院子里不干净，到处是鬼鬼怪怪的。那位侄少爷追问警士到底看到了什么，警士说：“每天晚上都见到些黑影子跑到后院去，等走到那口水井处就不见了。”于是，侄少爷下令全体出动把井水淘干，最后在井底发现了几具白骨。面对此情此景，这位受过现代教育的警官也有些发毛了。他命令警士把白骨打捞出来，运到城外予以安葬。又往井里投了两颗手榴弹，驱鬼镇邪。最后把井填平，才算完事大吉。

杀气腾腾的“大令”

旧京之所谓“大令”，是指军阀时代由“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派出的弹压队伍。为首的官长怀抱一个颇似令箭的油布套子，内藏令旗一面，长二尺半，上宽下窄，其正面绣有舞龙一条，顶端书楷体“令”字，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官长左右跟随侍卫，其后是十余名荷枪挎刀持红黑两色军棍的军人、警察与宪兵，沿街而行，杀气腾腾。望者每每不寒而栗，退避三舍，如见鬼神敬而远之。

当时，为非作歹者如蚁结蜂聚且出没无常，故冯玉祥、张作霖等领兵坐镇北京时，每日必出大令四处巡查。遇鼠窃狗盗及酗酒滋事者，当即饱以老拳或用军棍将其打得皮开肉绽；倘遇土匪、流氓以及散兵游勇行凶抢劫、强奸妇女或殴伤无辜，则往往就地正法。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将马中元充任大令指挥官时，就曾在城南游艺园将一名醉酒闹事的奉军士兵就地枪决。

执行大令军务的官兵，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大大小 小的戏园子，盖因在这里可以受到最隆重的欢迎和最殷勤的招待。由于大令这支特殊的队伍掌有生杀予夺之权，故所有戏园老板和艺人无不提心吊胆，惟恐因小隙而酿成大祸。鉴于此，各家戏园均在前台系一铜铃，绳端直通大门口，由在外面招揽观众的伙计负责报警，只要发现大令过来，就立即拉动铃绳儿，台上的“鼓师”（相当于西洋乐队的指挥）听见铃响，即使演出正值高潮，也要以鼓声发出信号暂停演出，继而指

挥乐队“吹台”（也叫“吹通”，旧时戏曲开演以前吹奏的幕前曲，用以招徕观众。一般吹打三通，前两通用打击乐器，第三通改用唢呐吹奏《将军令》、《哪吒令》、《一枝花》等，以示恭候大驾光临。此时，台上浓施粉黛的男女演员个个垂手肃立；而台下那些叽叽喳喳的观众亦顿时收敛笑容，屏气凝神；至于串座位叫卖香烟、瓜子儿的小贩，更是神色惶遽，纷纷躲到旮旯儿，呆若木鸡。

一阵沉重的马靴声把戏园内所有人的心震得突突地跳。而老于世故、善于看风使舵的前台老板以及“案目”（看座的）、“茶堂”（供应茶水者），个个佯装笑脸，恭恭敬敬地将一行十余人让到特备的雅座上，以高级香烟、茶水、瓜子儿以及“热手巾把儿”（旧时戏院供观众擦脸擦手用的热毛巾，使用者须付小费）款待。官长及随从落座后，只要把那个代表令箭的东西插在木架上，鼓师便立刻继续指挥，霎间锣鼓丝竹齐鸣，演员益发精神抖擞，无论 唱、念、做、打，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支令人胆战心惊的大令队伍究竟在戏园逗留多久，没谱儿。剧目新颖、演技高超且又合乎官长的口味，也许会一直呆到散戏。倘若觉得索然无味，稍待片刻转身便走。只要中途一走，艺人就得再次暂停演出，鼓师就得再次指挥奏乐，以示欢送。

旧时盗匪“套白狼”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海光寺一带还是一片荒僻之地，一些拦路抢劫的盗匪经常在这里出没。

笔者尝闻，一日黄昏，某骑自行车者，偶见前面有一老者模样的人，身着长衫，手提蒙着布罩的鸟笼子，悠悠漫步。骑车者认为这种养鸟之人多是阔绰的闲人，年纪一般较大，不会出什么事的。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毫不犹豫地骑车从提鸟笼人身边走过。

就在他走近提鸟笼人身边时，顿觉有一件东西落在头上。刹那间眼前一片漆黑，一个跟斗栽了下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感到一个圆圆的东西扣在自己的头上，还有一些杈杈巴巴的东西把自己的脖子卡得紧紧的。他忍受着痛苦把那东西慢慢摘下，取下一看，原来就是前边那人提的鸟笼子。再仔细一看，这鸟笼子好特别，无底不说，而且勒着一圈密密倾斜的竹签，上口小，下口 大，活像一只捉螃蟹的篓子。这种东西扣在头上，怎么受得了呢？

当回过头来再找老者的时候，早已无踪无影，自行车也被劫掠而走。

这种伎俩，就是旧时人们常说的“套白狼”。“套白狼”是旧时匪徒

拦路抢劫的一种行为。这种劫匪的活动多是在路静人稀的地方，乘人不备，用系有活扣的绳索套住行人的脖颈，将其勒昏或勒死，然后抢走财物。

清代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上登载了一篇新闻，对此有形象的描绘。文章写道："本埠（上海）西门外四明公所一带，地僻人稀，黑夜时常有匪徒出没，行人咸惴惴焉。前夜，漏敲三鼓，有某洋行人某甲行经其地，突有匪徒三人，短衣窄袖，蓦从榛莽中腾跃而出。一人手持竹竿，竿梢系麻绳圈；一人从后，上前将某甲之头颈套住，一若近今西人于街市上遗恶少捉狗者然。某甲见力不能敌，噤不敢出声，任其劫掠一空而去。"这段记载，活灵活现地把"套白狼"匪徒的行凶情况描绘出来，读之令人不寒而栗。"套白狼"匪徒作案有种种方式。有的乔装打扮成脚夫模样，活动在车站、码头，帮旅客搬运行李、财物。一旦走到僻静之处，即露出本来面目，进行"套脖"抢劫。也有的匪徒暗地跟踪旅客，伺机用棍棒将旅客打昏，抢走财物。

虽然"套白狼"在旧时属小股匪徒，但其同伙也很多。 为此，他们在联络时暗定了一些黑话。如：同伙称"线上的"，走路称"踏线"，石头称"老大"，郊外无人处称"漫荒"，寺庙称"古子"，树林称"影子"，行劫不成称"风不正"，贼的住处称"榻窑子"，有银子称"露白"，有钱称"有水"，无钱称"无鱼"，钞票称"花叶子"，衣服称"臭叶子"，口袋称"桶子"，锁称"葛子"，钥匙称"把子"，分赃后逃走称"蒯蒯"等等。这些黑话同伙明白，外人不晓。

话说古今“四公子”

中国历史上屡有“四公子”之称。早在战国时期，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便被呼为“四公子”。汉朝的贾谊在《过秦论》中称“四公子”“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之俊杰。可见“四公子”是一时俊彦的美称。

明末也有“四公子”，即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侯方域（朝宗）、方以智（密之），皆为复社中人，以诗文飘逸、风流倜傥而名冠天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这“四公子”皆有生动的描写。

清末和民初也有“四公子”，其声名亦曾显赫一时。清末四公子一般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和陶菊存。谭、陈、徐、陶四人在当时都是钟鸣鼎食、肥马轻裘的官宦子弟。如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为湖北巡抚，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徐仁铸之父徐致靖为户部侍郎，陶菊存为世家子弟。而这“四公子”也几乎都是大清朝的“臣子”， 如谭嗣同是江苏候补知府、四品衔军机章京，陈三立是吏部主事，徐仁铸是湖南学政使。但他们都无意于功名利禄，而醉心于维新变法。这“四公子”当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相呼应，锐意变法图强，很为时人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决心以血激励后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慷慨赴死。陈三立、徐仁铸皆以“招引奸邪”之罪被褫夺官职。

“四公子”中以诗文称誉者为陈三立，他是清末“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有名的“海内三陈”之一。后来朝廷恢复他的官职，他却拒辞不受。晚年在北京时，他拒绝伪满洲国和北平日伪统治者的拉拢，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而死，其爱国气节极为时人所钦佩。他的两个儿子陈师曾、陈寅恪，一为大画家，一为国学大师。《辞海》中陈宝箴、陈三立、陈师曾、陈寅恪一家三代同入传，足见陈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民初以后，也有“四公子”出现。在20年代的报章上，“四公子”之名屡屡被提及。这四公子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四公子”当时都是二十岁上下，子因父显，风云一时。1922年直奉第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先生曾举奉系、皖系订立策略性的反吴佩孚的三角联盟，这四公子便互相酬酢，为联盟穿针引线。除孙、张二公子，卢、段二人不太为世人所知。其实这两人都是典型的公子　　哥。卢筱嘉一生最“烜赫”的举动当为大闹上海共舞台，痛打黄金荣一事。这是当时报纸的头号“要闻”，其实起因只不过是为了看戏捧坤角儿。段宏业在四公子之序中最为默默无闻。他不像袁世凯的“储君”袁克定那般醉心于“接班”而出入政坛，据说他的擅长是下围棋。

民初“四公子”说法还有其他版本。

有一种说法是“四公子”指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蒋纬国实际是戴季陶在日本时的私生子，后交蒋介石抚养）、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孙中山秘书金某的儿子金定国。四人的名字均为孙中山所起，寓“经纬安定”之意，且互结金兰。但四人在当时并非活跃人物，也无名气，尤其金氏之排列颇为勉强。

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说“四公子”是指张学良、卢筱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寒云）、张季直（张謇）之子张孝若。民国年间名负一时的大诗人林庚白则认为“四公子”并无袁克文的份儿而是孙科，

他的理由是，民国五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笔者曾请教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沈醉，他认为是孙科、张学良、段宏业、袁克文。

还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四公子”指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此见于张伯驹著《洪宪诗补注》。但笔者以为，袁、张、溥、张（伯驹）四公子说法之形成，主要源于北方的北京。张伯驹只是袁克文的表弟，溥侗也 不再是王侯而是沦为票友，张伯驹、溥侗加上张学良、袁克文都是以玩乐、风流闻名，故称之“京华四公子”也不无道理。

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清恭亲王奕䜣的孙子。辛亥革命后，溥失去了“铁帽子王”的衣食饭碗，只得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加上变卖祖产为生。他尤擅昆曲，是京津名票，还在燕京大学开过戏曲课。可惜晚节不保，汪伪时下水当了汉奸，任职于“考试院”。抗战后潦倒而终。

张伯驹，其父张镇芳替袁世凯管钱。张伯驹是极有名气的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和诗人，多次花重金收购流失的国宝，后捐献国家。50年代成为“右派”。他的文采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周恩来还关心、安排他工作。80年代故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天生风流，极具才华，自比曹植。他是诗人、书法家、鉴赏家、名票友，因反对其父称帝而博得人们的称赞和同情。后被袁世凯软禁，从此穷困而死。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女“四公子”，她们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她们是庐隐、王世英、陈定秀、陈俊英，因为名噪京华，遂被时人呼为“四公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亦流行“四公子”之说法。记得1994年吴祖光之子吴欢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四公子”，发 表在《北京晚报》上。我只记得有他自己和万伯翱，别的两位记不清了。万、吴两位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影剧作家，出过书，有名气。吴

欢只不过借“四公子”写了四个人，很别致，所以这篇文章颇有影响。但据说招致了他们长辈的不满，这是后话了。

名妓暗救杨月楼

著名京剧大师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同光十三绝”之一，曾几度到上海演出。有一位闲居上海的广东徐姓妇女，见他人品出众，技艺非凡，便有心将女儿许配与他，因而与之多有交往。这位妇女本是官眷，人虽半老，风韵犹存，丈夫死后拥有一大笔遗产。住沪的广东人见她与杨月楼过从甚密，便疑心两人有私情，觉得丢了广东人的面子。现又听说杨月楼要娶她的女儿，便断定杨企图吞占徐姓家财、霸占母女，出于同乡人的义愤，他们联名讼之于官。

当时的上海县令也是广东人，见了诉状便怒火中烧，即刻出签将杨月楼拘捕入狱。审讯时，杨拒不开口，县令命衙役用铁锤打他一千下。谁知铁锤落下，质软而轻，毫无痛苦。这是怎么一回事？几天以后，一名妓女到监狱探望杨月楼，才解开了这个谜。

此探监者名叫沈月春，是上海名妓，因厌恶卖笑生 涯，早已有心从良。杨月楼每次到上海演出，她都要去看他的戏，并深深爱上了他。奈因自己身份卑贱，只好把爱慕之情藏于心底。此次得知杨因事系狱后，她慌忙跑到县衙疏通关系。衙役告诉她，此事实在爱莫能助。衙役还说，县太爷已命我们准备铁锤，打算在堂审时找个岔子活活将杨打死。沈月春一听泪如泉涌，跪下苦苦哀求衙役救她的“心上人”一命。她花了一千两银子，终于买通了衙役。衙役在行刑时，用的“铁锤”是软木做的。

沈月春到监牢探望杨月楼的时候，因为杨并不认识她，她只好自报家门，并详细叙述了自己暗地救他的经过。言谈之中，她微露爱慕之情，最后竟哭着对杨说：“自君入狱，妾不敢自安，每日吃素念佛为君消灾，诚望君早早出狱。”

杨月楼听了她的哭诉，感动不已。他真想一把拉住她的手，说上几句感恩的话。但是他深知，此举非但剪不断沈月春的相思情，反而会使她陷入更深的爱恋之中。再说自己早已与徐姓妇女的女儿有过海誓山盟——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他是不可能娶眼前这位多情妓女的，又何必误了人家从良的大事呢？想到这里，杨月楼竟板起面孔，双目怒视，高声责问她：“谁叫你救我的？谁叫你吃素的？我坐班房与你何干？”

可怜沈月春哪知杨月楼的用意，面对如此“忘恩薄义”之人，她顿时心灰意冷，痛哭而返。从此厌绝尘事，自削其发，跑到杭州建了一座尼姑庵，当了尼姑。

张老道买前门楼子

张老道买前门楼子的新闻当年曾轰动过北京城，屈指已近一个世纪。

老北京人闲聊时，谈北京，必引出“九门八点一口钟”；谈九门，必引出前门楼子；谈前门楼子，必引出张老道；谈张老道，必引出孙老道研制“避瘟散”和创立长春堂的一系列故事。只要听者肯于洗耳，则尽可混迹于京腔京韵的老者中，定能大饱耳福、大长见识。

孙老道名振兰，祖籍山东招远县，本是乾隆末年草泽医生，辗转京城，于前门外长巷头条以制售“闻药”（粉状清凉小成药）为生。光绪初年（1877），其孙三明继承祖业。孙三明因受戒于京郊房山娘娘庙做火居道士（不住道观，可以娶妻生子的道士），便出资修长春观。孙三明由常闻香火味道而受启发，遂在先祖闻药基础上，聘药师察希良屡次试验，于香面儿中加冰片、麝香、朱砂、薄荷冰以及甘油等十余味药料，终于试制成功清香爽神的“避 瘟散”。“避瘟散”装以锡制八角形小扁盒，其上所铸商标即孙三明道装头像，胸前抱八卦图，望之有仙风道骨之感，下刻“避瘟散”三字。孙三明并更店名为长春堂。

1926年孙三明病故，长春堂遂由其内侄张子余接管。因张子余受戒于白云观的火居道士，故称张老道。此人精明强干，且极善钻营，

颇好交游。张老道效法其姑父遗风，常年道装打扮并别出心裁，经常坐着八抬大轿，管笛高奏，锣鼓齐鸣，招摇于四方辐辏的前门大街，路人蚁结尾随，而张老道遂乘机散发避瘟散以扩大影响。老北京人对此种宣传形式曾以歇后语戏谑：“张老道坐花轿——活广告。”有个别嘴损的无赖骂人不带脏字：“比瞧耍猴儿强，一文不花，还白闻一盒避瘟散。”

深谙经营之道的张子余靠小小的避瘟散每年赢利万余块银圆，几年之内便在京城内外开设了亿兆百货商店等八个企业，一跃成为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然而灾祸亦随之接踵而来，张老道的百万家财转眼间付诸东流。

“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宪兵队即将张老道绑架，强迫长春堂以二百两黄金赎身，超过一旬即处死。家属不敢违抗，按期如数筹款，方救出张老道。此事曾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于旧报。

事隔未半年，长春堂失火，各种芳香药材与什物皆毁之一炬，薄荷、冰片等药材燃烧后香传十里，数日渐消。火灾殃及近邻华乐戏院，富连成科班的衣箱、盔头箱、旗 包箱、把子箱一并化为灰烬。凡受此场火灾牵连者，无不向张老道兴师问罪、借机勒索。长春堂仅赔偿华乐戏院和富连成科班款就二十二万银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以三百两黄金的价格将前门楼子卖给张老道。张因不钻圈套而被关押九个月，家属迫不得已，只得忍气吞声凑齐三百两黄金，再一次将张老道赎出。

几经劫难，张老道苦心经营的万贯家财损失贻尽，只留下一段老北京人茶余饭后闲聊的话柄。

皇室宗亲办报风波

北京学院胡同三号宅第系逊清皇室宗亲德公府邸，主人德仲华公爵行二，人称德公爷或德二爷。

20世纪30年代初，德二爷有良田十余顷，煤窑四五处，并在城内开设德华园浴池。虽养尊处优，但因无社会地位而苦恼，于是萌生办报之念，借以提高社会地位，维护财势。

一向说干就干的德二爷腾出府邸房屋十余间，作为编辑室、营业部、广告部及招待宿舍，取名实权报社，自任社长，聘请洪为荃、陈蝶生、成扶平、陈逸飞等办报能手任总编、编辑。报纸辟有《见景生情》、《采风录》、《社会调查》等栏目，因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生动幽默而销行甚好。

担任该报发行工作的常振春早有自办报纸之欲望，只是苦无登记证，遂勾结编辑佟冷仙（八旗子弟），将《实权报》改头换面为《实权日报》发行，导致《实权报》处 境窘迫，濒于停刊。德二爷怒不可遏，以盗版罪控告常振春。常情知不妙，遂请风云人物——实报社长管翼贤与新北京报社长凌抚元从中斡旋，于什刹海会贤堂饭庄设宴，当面向德二爷赔罪。性情豪爽而又为人厚道的德二爷，架不住几句服软的好话，遂撤销诉讼，化干戈为玉帛。

1934年，《实权报》正处于鼎盛时期，社会威望颇高。不料是年

夏季，报社内却发生了一起轰动京城的桃色事件。

彼时为《实权报》撰文艺稿者颇多，其中有一位刘小霞女士，系某女中学生，颇有文采，所办“小霞社”副刊极受读者欢迎。刘小霞秀外慧中，副刊编辑陈蝶生不禁为之倾倒，常邀其来报社协助编稿。一日黄昏，大雨滂沱，夜阑而未霁，刘小霞遂寄宿于报社女宿舍。欲火中烧的陈蝶生以为天赐良机，竟然潜入女宿舍与朝思暮想的刘小霞发生性关系。

天下事皆无巧不成书。翌年仲春，新闻记者阎士燮采访某妓院时无意中发现刘小霞已沦为妓女。为伸张正义，阎士燮连续撰稿披露内情，并呼吁社会对刘给予救济，从而轰动了京城新闻界。各报对陈蝶生衣冠禽兽之劣迹无不口诛笔伐。小说家李熏风赶写小说《雨下残荷》，连载于彼时之《北京晚报》。

此起桃色新闻将实权报社长德二爷气得暴跳如雷，逢人便说：“肘腋之害，报社不幸！”实权报编辑成扶平（八　旗子弟）则对德二爷打哈哈说：“蝶生蝶生，蝴蝶所化蝴蝶所生，采花撷蕊，其性天成。天公作美，情欲前定。巧自宽解，勿发雷霆。”

实权报社曾是青红帮的俱乐部。德二爷是通字辈信徒，拜大字班王约瑟为师，总编洪为荃拜通字班刘振清为师。刘在报社曾收名伶高庆奎之子高盛麟为徒，荀慧生、杨盛春等梨园名家皆来祝贺。“七七”事变后，该报被迫停刊。

朱葆山奇招制洋人

复兴公园是上海建立较早的公园之一。该园乃法人投资，地处当时法租界之辣菲德路，起名叫“辣菲德公园”。那时，上海人叫它“法国公园”。

法国公园建园之初，中外公民凡是买了门票，皆可入内游览。但是时间一长，便生出两个问题，一是妓女混迹其中拉客，二是有的华人缺乏保持公共卫生的观念，瓜皮果屑随地乱扔。法租界借此理由拒华人于门外，并挂出侮辱性牌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还扬言，什么时候中国人学得与法国人一样“文明”，才能摘去此牌。

牌子一挂，引起华人的极大愤慨，但公园在法租界，国人无法干涉。一些头面人物商议对策，有人埋怨国人不争气，有人想卑躬屈膝疏通法人，也有人想花钱解决此事，著名爱国人士朱葆山却另有主意。

朱葆山因买卖地皮发财，在上海滩颇有点名气。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难免有愚昧落后的一面，法 国巴黎的妓女也不比上海少。如果秉公执法，对卖淫嫖娼及破坏公共卫生现象加以制止，甚至处分，我们不应有异议。倘若借此大做文章，污辱华人，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不该表示软弱，当以牙还牙，也让他们大出洋相，叫他们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大家问他有何良策，他只微笑不答。

朱葆山叫人买了一匹十丈长的“阴丹士林”蓝布，请著名的奉化裁缝红宝师傅裁制了一件特大长衫。十丈布，用二十五尺做袖，用二十五尺做摆，朱葆山看了十分满意。他当即叫人从法租界雇来八名无所事事的法国下人，上海人称作“瘪三”的那种，当面讲清条件：八人抬着长衫的左右袖与前后摆，从静安寺出发，到南京路外滩止，每走若干步，就跪下来拜一拜，每拜一次，给一洋元。八个人听说待遇优厚，满口答应。

朱葆山让他的大儿子穿上这件特大长衫，洋瘪三两个抬前摆，两个抬后摆，左右袖各两人。他们尚未出发，静安寺门口已观者如潮，加上洋号洋鼓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一队人开始向南京路走去，朱葆山指挥大队人马，八个洋瘪三走几步就停下来下跪一拜，拜罢，起来再走。行人驻足观看，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特别是有外国人经过时，中国人就击鼓呐喊，羞得碧眼金发的洋人低头掩面，仓皇而去。

事后，朱葆山遵约，按照八个法国人的跪拜次数，给 足了赏钱。同时放出风来，如果法国公园门口牌子不摘，他还将有新的节目演出——雇若干法国妓女，当街表演脱衣舞。消息不胫而走，法租界一看众怒难犯，只好悄悄地将侮辱中国人的牌子摘掉。

首制“中山装”的王才运

中山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中国人之国服。尤其是政府官员，在出席重要会议和在一些正式场合均着中山装，以示庄重。之所以被叫做“中山装”，是因为这个样式的服装是由孙中山首穿并认可的。而第一个为孙中山制作“中山装”的人是王才运。

王才运是浙江奉化江口镇人，其父原在日本学习西服剪裁，技术很高。王才运十三岁时到上海当学徒，继承父业，学习服装制作。他热爱这项事业，对业务刻苦钻研，进步很快。在稍有积蓄时，他便开了一间店铺，取名“荣泰”西服店。后来，经人资助，王才运于1910年又创建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这是南京路上的第一家男式西服店，其地址即如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场所在地。前店后厂，工贸合一，十开间的门面，主要经营呢绒料的批发、剪裁和制作。由于选料优良、做工精细，“荣昌祥”开业后生意很兴隆，一些要人加工服装多半到此处定制。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总理孙中山到“荣昌祥”定做服装，穿着甚觉满意。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又来到此店，送上一套日本式陆军士官服，要王才运将其改成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制服。孙中山先生要求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可插放钢笔等物，以表示革命事业离不开带笔杆子的知识分子；门襟上原有七颗纽扣，孙中山先生要求改为五颗，象征“五权宪法”。王才运按要求亲自动手，很快制作完毕。

孙中山先生试穿后，认为这套服装简朴、庄重，对王才运大加赞赏。于是，经定型后，这种样式的服装很快便流行开来。后人统称之为“中山装”。

“荣昌祥”常以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而深感自豪，并于1927年3月26日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正标题是：“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副标题是：“式样准确，取价低廉。”正文写道：“中山先生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落款是：“上海南京新世界对面荣昌祥号启。”

此后，穿“中山装”者与日俱增，而凡制作此装者均以“荣昌祥”所做之样式为标准。从此，“荣昌祥”的生意也更加红火起来。王才运为保持良好的声誉，对职工及学徒要求格外严格，对业务技术要求更是精益求精。后来上海南京路陆续开业的“王兴昌”、“王荣唐”、“裕昌祥”等十多家服装店，无一不是“荣昌祥”培养出来的学徒开 设的。王才运桃李满天下，无愧为上海服装业之鼻祖。

不仅如此，王才运的老家奉化县也在王才运的影响和带动下，服装业广泛发展，成为服装制作的重要基地。时至今日，服装业在那里依然繁荣昌盛。在王才运老家江口镇，每三四户中即有一家从事服装生产。全县共有服装厂四百多家，产品畅销国内外，其工艺水平“誉满全球”。

电话号码“40000”

早年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出租车虽多，实力雄厚的洋商云飞公司却独居沪上出租汽车行业之首。不料短短的几年内，竟败在一个乡下人手中。这个乡下人叫周祥生，他的制胜杀手锏竟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

周祥生来自浙江省定海乡下。当年他带着一个包袱和一把雨伞到了大上海，前后在一些饭店服务了十余载。由于经常代客雇车，结识了许多车主和司机，熟悉了汽车出租业务。而后，他靠分期付款的方法买进一辆旧车，开始经营汽车出租。由于经营有方，小小的车行办得很兴旺。几年后，他增购了十多部汽车，成立了“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就其实力而言，与拥有百余部汽车的云飞公司不可同日而语。

一天，周祥生在电话公司的一个朋友说，电话公司的机器正要改装，所有电话号码要更换。这个消息改变了周祥生的命运。周祥生一直认为，电话号码有无特色与公 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业务发展有重大关系。他曾为得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号码，不惜重金笼络电话公司的职员。现在更换号码，机不可失。他马上找到电话公司业务部主任索雷，请主任设法给自己一个“40000”号码。索雷答应考虑。周祥生跑到一家印刷厂，赶制出两千块有“40000”电话号码的日历牌，并将样品送给索雷。索雷见木已成舟，也就同意了。

为什么周祥生对“40000”这个号码感兴趣呢？因为，它不仅好记，而且更重要的是恰恰与当时中国人口四万万之数相关联。很快，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四万万同胞请拨四万之数电话”成了爱国口号，风靡上海滩。

周祥生利用这个电话号码大做文章。当时的电话机通常是挂在墙上的，接通后找人时机子无处放，极不方便。为此，周祥生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每个架子上压着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号码，并派人到千家万户免费安装。后来，全上海几乎每部电话机都配有这样的金属架，周祥生揽来了大批生意。

在电话之外，周祥生还不失时机地大做广告。当年北站路局空地上砌着一个水泥墩，高竖“祥生”两个大字。南来北往的旅客一踏进上海，就能看见“祥生”的大招牌，便将其当作上海第一大汽车行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一律是墨绿色，车尾部用白漆醒目地喷涂着公司标志和“40000”电话号码，甚至司机的号衣、帽子也不例外。他还买了大批饭碗，做成同样的墨绿色，印上汽车图案和“40000”的号码，分送给大小公司，以扩大影响。

由于周祥生实行全方位广告宣传策略，人们举目便是“40000”，祥生公司也就大名鼎鼎了。这使祥生公司生意日益兴隆，财源滚滚而来。云飞公司电话号码仍是“30189”，谐音“三人一杯酒”，虽小有特色，但与祥生公司相比，小巫见大巫。在后来的竞争中，云飞公司只好退避三舍，最后以失败告终。

“朱神仙”歪打误撞蒙军阀

1927年春，北伐军分三路北上。何应钦率第一路军，由镇江北渡，很快占领了扬州。接着，他率部沿运河向宝应、淮阴进发，直取陇海线，连克涟水、梅州等地，6月下旬便包围了鲁南重镇临沂城。

当时驻临沂的是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辖两个旅约七千人。北伐军为五个军的兵力，约六万人，且北伐军装备优于直鲁联军。方永昌依靠临沂城墙高厚坚固，外有护城河，奉命固守。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城内即将弹尽粮罄，军心开始动荡。

方永昌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惶惶终日。于是，他想求神问卜，以求自我安慰。当时考棚街的陈鹤泉占卦、算命、相面、拆字闻名全城，方永昌派了几名勤务兵去请陈先生。陈鹤泉知道方永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若应付不好，立刻就有杀头的危险，所以早已藏匿了。唯有没有名气的术士朱献文素日门庭冷落，自认为方 永昌不会找自己，没有躲藏。勤务兵找不到陈鹤泉，无法回禀，便找到了朱献文。朱献文自知大祸临头，又无法脱身，只得跟着勤务兵走。他边走边想：北伐军势如破竹，临沂城危在旦夕，多则五日少则三天，方永昌必兵败城破，不死也是阶下囚。最后拿定主意，顺水推舟，多说奉承话，糊弄一时是一时，求得脱身再作计较。

朱献文到了军部，见方永昌愁眉不展，六神无主，便向前参拜

说：“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方永昌抬眼看了朱献文一眼说：“方某孤守临沂，战况紧急，喜从何来？”朱献文奉承说：“方军长不但善攻，而且善守，使临沂城固若金汤，几个蛮兵不过是以卵击石，全城人都托军长的洪福。待小民为军长占一卦定见分晓。”方闻言面生喜色。占了一卦，朱又胡吹说：“这一课，按卦相上说，军长福大命大，一定有贵人相助，眼前虽然军情紧急，很快就转危为安，少则三日多则五天，蛮兵必然溃退，请军长放心。如果我说得不灵验，甘愿把首级输给军长。”朱献文一番话说得方永昌头脑发昏，乐不可支，亲自陪朱献文喝酒吃饭，然后派人将朱送回家。

朱献文惶惶不安地回到家中，立即藏匿起来，度日如年。俗话说“瞎猫捕了个死老鼠”，过了五天，北伐军真的撤退了。因为“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声称要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应付武汉政府，急令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白崇禧代理的第二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 路军全部撤回江南。方永昌装模作势追到郯城，然后摆出一副凯旋的架势，回到临沂大庆胜利。事后，方永昌大摆宴席酬谢朱献文，在大庭广众之下称朱献文“神机妙算胜过诸葛亮，是当代的活神仙”，并将“君平再生”的巨匾（君平是西汉时著名的卖卜人，后隐居不出）赠给朱献文。方永昌手下的旅长、团长们都来捧场，从此“朱神仙”誉满全城。朱献文的卦馆终日“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没过半年，朱献文就买了四十多亩地，又盖了新房。

“弃地遗民”连横复籍

台湾省当今政要连战，祖籍福建省，远祖于康熙年间移居台湾，其祖父是著名史学家连横。连横原名连雅堂，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十岁能文，熟读《春秋》、《战国策》等古籍，崇尚仁义忠勇精神。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对于“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1897年5月8日，是台湾同胞决定去留的最后日期。在此之前，仅台南就有五百多人内迁大陆，而未及迁出岛内的台胞均被强迫加入日本国籍，视为日本国的臣民。

连雅堂一家人因故未迁成，滞留台湾而成为“弃地遗民”。但连氏始终眷恋祖国，不甘为日寇顺民。他几十年如一日，广泛搜集台湾历史文献，编著成《台湾通史》、《台湾语典》等鸿篇巨著，“冀以维系民族精神不朽”，期望有 朝一日重新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14年，连雅堂寓居北京时终于夙愿得偿。当时，他向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内务部递交了请求恢复中国国籍的呈文。该呈文称：“具呈人连雅堂，原籍福建省龙溪县马崎村，现籍日本台湾中厅台中街，现寓北京南柳巷晋江邑馆……兹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施行规定第六条所规定，呈请许可复籍……”并在“愿书”中写道：“愿回复中华民国国籍并遵守中华民国一切法律。”递文时间是民国三年，即

1914年1月31日，连雅堂那年三十七岁。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次长钱能训、司长于宝轩均在审批文件上盖章，批准他复籍。2月10日，连雅堂即领到复籍执照，次日再呈文内务部，呈请将连雅堂之名更正为连横。2月14日，获批准。关于连横当年呈文和有关批文的全部档案，现仍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标题为“寄居台湾侨民回国请恢复福建原籍兼改名有关文书”。

至于连雅堂为何要改名连横，则未见记载。近代文献年谱也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连横一生热爱祖国，坚持“台湾固为中国版图”。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横时年五十四岁，适逢儿子连震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连横写信给儿子说：

> 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业祖国。全为保存 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汝而往。

两年后，连横果然偕眷回国。可惜，壮志未酬，1934年6月26日，连横病逝于黄浦江畔。

连战是连横的嫡孙，连震东之子。1993年台湾电视台《八千里路云和月》专栏节目组去福建拍片，误将泉州惠安县山腰镇坝头村认作连战的祖籍地，加以传播，以讹传讹。如今根据连横档案可以证实，其祖籍实为今属龙海市的龙溪县马崎村。

《子见南子》惹风波

1928年，林语堂所撰独幕剧《子见南子》刊登于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刊物《奔流》第一卷第六期。这是林语堂唯一的戏剧作品，孰料作品发表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翌年6月，具有新文化思想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组织学生会排演《子见南子》。该校校址恰好位于曲阜孔庙与衍圣公府之间。《子见南子》演出后立即遭到孔氏族人的围攻谩骂，他们还联名上告到教育部，要求严办以演剧侮辱孔子的宋还吾校长。呈状道：“……6月8日，该校演剧，大肆散票，招人参观。竟有《子见南子》一出，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其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先？……对于此非法侮辱，愿以全体六十户生命负罪渎恳，迅将该校校长宋还吾查明严办，昭示大众。”署“孔氏六十户族人”之名。

教育部长蒋梦麟接到这份已另呈蒋介石的“御状”后，不敢懈怠，即派员到济南，会同山东省教育厅所派督学共赴当地查究。结果表明，呈状所告不实，且告状人也名不副实，幕后操纵告状者乃孔祥藻及当地孔教会会长孔繁朴二人。宋还吾也作了针锋相对的长篇答辩书，义正词严，据理力争。此事一时成为新闻热点，报纸纷纷将此案案情，以及宋还吾的答辩书、该校学生会的通电披露于众。于是社会

各界普遍同情宋还吾。

舆论认为：山东二师学生会据名作家公开发表之剧本演剧，无可厚非。剧中亦无侮辱圣人孔子之处，孔氏族人不应该借此小题大作。岂料国民政府委员中又杀出了“程咬金”，身为孔子后裔的工商部长孔祥熙，依然力主严办宋还吾，而监察部长蔡元培则表示异议。不得已，教育部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协调，总算为宋还吾洗刷了蒙垢。但为了安抚反对者，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将宋还吾调离该校，以息事宁人。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依据《论语》、《史记》改编创作的。剧情是，孔子率学生到卫国游说国君，希望能实行仁政。但能左右国君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对孔子的欲兴乐复礼、言必称尧舜文武周公的大道理不感兴趣，而对男女交往却很热心，不但成立了便于交往的“文艺研究社”，还当着孔子的面载歌载舞。孔子师生对南子的宏论无力反驳，更对女性的魅力表现出兴奋和惶恐。最后，孔子不得　不说出“我先要救我自己”的话。

林语堂的本意是弘扬新文化思想，讥讽当时主张尊孔读经的复古派。剧本发表后，《奔流》杂志声誉大增，被抢购一空，一时“洛阳纸贵”，各地学子纷纷排演此剧。复古守旧派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孔子的故乡引发了这场笔墨官司。

胡适的“鸳鸯谱”

胡适乐于为人做媒、证婚，并备有一本特制的“鸳鸯谱”，让当事人签名留念。据说在这本“鸳鸯谱”上签名留念的第一对夫妇是赵元任和杨步伟。

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以特大字号发表了“新式人物之新式结婚——赵元任与杨步伟举行婚礼”的报道。胡适和朱经农的姐姐朱征女士同为证婚人，婚礼不请客，不收礼，但有两个例外，一是对个人书信、诗文、著作、音乐之类的礼物不拒绝，二是由各位来宾以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不拒绝。结果婚礼这天，胡适却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包，一进门就要赠送。赵元任对胡适说：“请按通知办事，不要越格。”胡适哈哈大笑说：“正对。这是我自己考证的《红楼梦》著作，自己写的东西。”赵、杨大喜，愉快地收下了礼物。这下可把朱征急坏了，来时两手空空，拿什么做礼物来祝贺呢？胡适在一旁幽默地大笑道：“那容易，他们生小孩时，你给接生好了。”朱征听了 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瞥了胡适一眼，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1936年，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胡适是千家驹求学与求职的“提携人”，千家驹请他证婚，他当然高兴应允，并拿出“鸳鸯谱”请新郎、新娘签名。在致婚礼贺词时，胡适很风趣地开玩笑道：“千家驹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要变成杨家驹了。”这里的“杨”一语双关：一是杨女士管

教起来了，二是变成一只绵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不但破格聘沈从文为教授，同时还为沈从文做媒。中国公学女学生张兆和才貌双全，沈从文一见钟情，便一天一信，三天一书展开热烈地追求攻势。一天，张兆和抱着一大包书信找胡校长状告沈从文。胡适见此情景，非但没有批评沈从文，反而规劝张兆和说，沈老师给你那么多信，你一信未回，说明他真心实意地爱你，有一片“海枯石烂”之情，你应该和他谈谈看，接触接触。结果沈从文和张兆和喜结良缘，在教育界传为佳话。

著名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相恋时，双方均已婚配。徐与陆搞婚外恋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的一大新闻。徐的父母极力反对。胡适与徐的父亲关系密切，便极力疏通，使徐父最终同意儿子离婚另娶。徐志摩因此称胡适是 比手足还要好的“好兄长”。其间，胡适夫人江冬秀也反对这门婚事，认为徐陆二人喜新厌旧，并当着朋友面十分严厉地对胡说：“你要做这个媒，将来他们结婚，你到台上，我抱都要把你抱下来！”胡适性情好，当面没有发作，事后江冬秀终于理解了。徐与陆都是再婚，非议颇多，故请梁启超为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

仗义法官郁华被害

1939年上海《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日伪暗杀后，《申报》爱国记者瞿铖又在上海静安寺路遭敌特枪杀。凶手被租界巡捕擒获，由租界中的特区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罪犯上诉到租界中的最高审判机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特区分院，当时担任该分院刑庭庭长的是郁达夫的胞兄、著名法学家郁华。

郁华系浙江富阳人，别名郁曼陀，毕业于日本法科大学，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后调任租界高二分院。自日军侵占上海与南京等地后，日伪就多次向租界当局交涉，要把法院移交伪新政府管辖。由于英、美、法等国当时只承认重庆政府，因此交涉没有结果。日伪“特工总部”曾写信给法院人员进行利诱和恐吓，企图从租界法院内部打开缺口，但遭到郁华等人的断然拒绝。当瞿铖案上诉到高二分院后，郁华就接到日伪的恐吓信数百封，恐吓电话也昼夜不停。一时间瞿铖凶杀案的复审工作 成为全上海及全国关注的大案，人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拭目以待郁华如何审结此案。敌人的无耻恫吓并没有动摇郁华维护国格和伸张正义的爱国之心，开庭前他仔细研究了全部案卷，对审判工作作了周密的准备与部署。

1939年11月22日，高二分院对瞿铖凶杀案正式开庭。旁听席上人头攒动，郁华身着法衣，神态庄重，正义凛然。郁华审讯过罪犯，便宣读罪状，最后提笔准备宣布终审判决时，人群中突然发生骚动，口

哨声、喧闹声响起。但郁华神色自若，以庄严响亮的声音宣判："维持原判！"又加重语气："死刑！"然后徐步退庭。

于是，日伪"特工总部"执法处处长汪汉章作出了立即除掉郁华的决定，并将这一暗杀任务交给警卫队长、杀人魔王吴四宝执行。

郁华家住上海法租界巨拍赖司路一号，每天乘自备人力车去法院上班，顺道送六岁的儿子上学。就在判决凶犯的次日早晨，郁华像往常一样携幼子登上了人力车。刚出家门不远，突然从四周窜出数名凶手，一起用手枪对准郁华射击。车夫惊扑，车翻倒地，幼子被摔出一丈多远，幸未伤，郁华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郁华的妻女闻讯赶来，俯身痛哭，许多行人围拢上来。只见垂危的郁华面含微笑，嘴角微动着，似乎要说什么。郁妻耳贴其嘴，只听郁华发出微弱的声音："我……用自己的……人格和头颅换取国格尊严……虽死……犹荣……"断断续续说完，就气 绝了。

郁华是上海租界"孤岛"被日伪暗杀的第一名高级司法人员。接着，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的刑庭庭长钱鸿业也被日伪暗杀。时称"司法界二血案"。

建国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们为烈士。浙江人民还在郁华原籍富阳鹳山建立了"双烈亭"，以垂永念。

战火中的庐山孤儿院

1938年7月，日军由长沙水路进逼九江，赣北游击队司令杨遇春少将决定将在庐山避难的万余民众疏送下山。下山的几条主道均被日军封锁，难民们只有从山南荆棘丛生、险峻难行的庐山垄小道下山，但无法将婴幼儿带下山。万般无奈中，一些难民被迫忍痛将幼儿弃之道旁。杨将军见状，即令人沿途将婴幼儿拾抱集中。正当杨将军为安置婴幼儿焦虑时，在庐山休养的美国姑娘布朗挺身而出，将这些几个月到三四岁的婴幼儿全部收留。杨将军将指挥部一座大别墅让给布朗小姐作孤儿院，并命名为“快乐家”。布朗担任孤儿院院长，聘请了管理员、保姆和幼儿老师，并让孩子们以管理员胡安德女士的姓为姓，取名胡美玲、胡美霞、胡美则，等等。

布朗时年二十九岁，其父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她从护校毕业后在慈善机构工作，因患病来庐山休养，战火燃起未及回国。她以柔弱的肩膀担负起抚养战火中中国孤儿的 重担后，很快向山上的外国侨民募到一笔捐款。她以美国人身份下山采购奶粉等，为节省开支，她拒绝坐轿，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来回步行几十里山路。杨将军在紧张战斗之余经常抽空来院探望，并与布朗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杨将军部队据守庐山八个月后，日军设法从水沟小道攀上山顶，守军被迫撤离庐山。日军在庐山到处征占别墅，布朗用瘦弱的身躯竭力保护着孤儿院。她找到庐山日军最高指挥官义正词严地交涉，迫使日军放弃征用孤儿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次年5月日军向布朗下了驱逐令。在四

年的困境和战火中，布朗将生死置之度外，对孩子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以至孤儿院每件物品都记载了她的艰辛。为了使战火中的中国孩子能安全健康地成长，布朗在被迫归国前将孤儿院慎重地托付给瑞典人牧选青女士。布朗回国后，汇来过三笔大额款项，并时常来信询问孩子们的情况。1943年圣诞节，她还寄来四十二件亲手绣着“我爱你”的新衣服。

接任布朗院长工作的牧选青没有辜负重托，她为孩子们的成长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解决困难，她不顾路途艰难，千里迢迢奔赴重庆找到了宋美龄。听完汇报后宋美龄深受感动，设法为庐山的孤儿们申请到一笔救济款。

1944年牧女士回国，由任劳任怨的胡安德女士接任院长。1946年7月23日上午，重返庐山的宋美龄在杨遇春将军的陪同下到孤儿院探视。随行记者报道了战火中诞生 的孤儿院及其八年苦难历程，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先后有十七名孤儿的亲生父母来认子。孩子们与父母抱头痛哭，离开时孩子们哭嚷着不愿离开胡妈妈、老师、小伙伴的场面令人潸然泪下。

此后两年间，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要员与名流来领养了十多名孩子。1948年8月宋美龄再次到庐山时，胡安德带着剩下的十余名孩子随宋女士去了南京。如今这些庐山的孤儿们均是花甲老人，散居在海内外安度晚年。

南京审判战犯记

日本影片《自尊》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为战犯东条英机歌功颂德，否认东京审判的公正性，激起了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人们的义愤，中国政府也表达了严正的立场。《自尊》还炮制了一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法庭辩论，赤裸裸地抵赖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使笔者联想起当年的南京大审判。

二战后，根据国际法原则和由中、美、苏等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甲级战犯由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为此，中国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了十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在南京大屠杀中率部烧、杀、淫、掠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人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三百余名的第六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进行杀人比赛的第十六师团少尉 小队长、副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战犯于1946年10月先后从日本引渡到中国南京受审。上述几名罪犯初在法庭上或矢口抵赖或花言巧语妄图逃脱罪责，但大量确凿的罪证使他们难逃法网。

谷寿夫呈交法庭的《陈述书》称，当时屠杀的重点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扬子江沿岸，以及紫金山方向，“与我第六师团无关……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没有任何关系”。而铁的事实是，谷

寿夫师团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并驻守在这一带，在大屠杀高峰期犯下了无数罪行。于是，军事法庭在南京全城张贴公告，号召民众特别是中华门一带的民众揭发谷寿夫师团的罪行。受害的南京人民像火山爆发般纷纷控诉日军暴行。法庭召开了二十多个调查庭收集罪证，所委托的全市十二个区公所也收集了大量人证、物证，包括从日军处缴获的照片、电影胶卷，还找到了上千证人，有关方面仅在中华门外五处就挖出了数千具受难者的骸骨。

当法庭于1947年2月6日公审谷寿夫时，他还想狡辩，说战争中双方死人难免，其部属除作战外没有滥杀。石美瑜庭长遂下令将被害人的头颅骨搬上来。宪兵们将头颅骨抬上来当庭出示，法医和检察员宣读鉴定书，这些尸骨系枪杀及铁器所击之伤痕属实。当年负责掩埋尸体的红十字会人员则介绍了埋尸缘由及经过，并指出日军不准他们正式统计所埋遇难者的准确数字。

在公审中，有八十多位南京市民和几位外籍人士到法庭作证。法官对每位入庭证人宣读："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证人供前或供后具结而为虚伪陈述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证人则宣誓"当系据实陈述，决无匿实增减"，并在《证人结文》上签字画押按手印。诸多证人陈述的一桩桩日军罪行，字字血，声声泪，揭露了谷寿夫部队杀戮无辜、奸淫妇女、焚烧劫掠的惨无人道的行径。

在1937年攻打南京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连续数次报道了进行杀人比赛的两名日军的"战绩"。最后一篇题为《刀劈百人超纪录》的报道是：

>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12日发自紫金山麓如所周知，相约攻到南京为止，作罕见的"刀劈百人竞赛"的片桐部队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10日在紫金山攻略战的匆忙混乱之际，作出了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的纪录。10日正午，两位少

尉终于是非吹牛地各提着砍缺了口的日本刀，碰到了一起。

当这一消息在日本各地传开之际，向井与野田已经继续挥舞屠刀，从郊外的紫金山麓杀向南京城，去残杀更多的中国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这两个杀人狂军阶低，但 他们所犯灭绝人寰的罪行震惊了全世界，不清算、不审判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维护国际公理和世界和平。所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作出引渡两犯的决议后，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配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于1947年八九月间，先后将两犯缉拿归案并予以引渡。11月6日，两犯被羁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南京军事法庭对两犯的审讯持续了一个多月。

当检察官责问向井敏明："你在与野田毅进行的杀人比赛中，因杀一百零六名而取胜，有当时报纸的报道、照片为证，你知罪吗？"他竟胡说八道："《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纯属虚构。那是我们为了夸耀武功，博取女性的好感，将来回国好觅得佳偶。"检察官义正词严地驳斥："《东京日日新闻》乃日本重要报纸。在作战期间，日军当局对军事新闻的检查极为严格，岂允虚构宣传？至于以杀人竞赛之凶残兽行作征婚广告，以博取女性欢心，更为现代人类史上所未闻。这完全是荒唐的编造！"向井被戳穿谎言，沮丧地低下了头，不再辩驳。

当法庭审讯野田毅时，他竟然把自己亲手杀了一百多人的经历"忘记"得一干二净，连连摇头否认与向井有过什么杀人比赛。于是法庭向他出示了十年前的一张《东京日日新闻》，上有两犯的照片和杀人比赛报道。这张作为证据的报纸是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寄来的。但野田毅看了报纸还白日呓语："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像。"但 铁证如山，岂容抵赖！经过法庭辩论，法庭认为两犯罪行是同类案件，应合并公审。

12月18日，对两犯进行了公审判决。审判长石美瑜操着一口福建官话，高声宣判：“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纲纪而维正义？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翻译把判决译成日语后，两犯当场吓得魂不附体，面色死灰。法庭内外的南京市民听到判决后拍手称快，有的竟激动得哭了。

康有为的风水宝地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时人又称康南海。1895年，他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上任，而是在京组织了“强学会”，鼓吹变法。1898年，他参与并主持“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但因慈禧太后的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他逃往日本，组织“保皇党”，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晚年的康有为在青岛定居，虽然继续主张复古，但他自己也知无望，所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安排自己的后事上。为了死后占块风水宝地，造福子孙后代，他经常坐着车到风光秀丽的崂山寻找坟地。从南麓找到北麓，从东侧寻到西侧，踏遍了千条涧、万面坡，结果竟未找到一处满意的地方，他颇感失望。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康有为乘车去郊外访友，当行至一个叫李庄的地方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座山树木 葱郁，百花盛开，美不胜收。山下一道弯曲起伏的黄土岭绵延伸展十余里长。整个山岭在阳光照耀之下犹如一只五彩凤凰，闪闪发光。康有为看罢感叹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几年来到处寻找风水宝地，终无所获，没想到今天无意之中碰上了这个好去处。”这时，正好一位砍柴的老汉由此经过，他上前问道：“老人家，这山叫什么名字？”老汉回答说：“这山叫凤凰山。”康有为听后更加高兴，朋友也不会了，令车直向凤凰山驶去。

康有为一边登山，一边四处眺望。只见那山西面高峰如凤冠，东西长岭似凤尾，山南山北两道余脉，活像凤凰的两只翅膀。在后山的凤翅之下，恰有一块凹地，草深林密，北临大河，南靠凤肚，东依高岭，西挨平川，俨然一块藏龙卧虎之地。如在此修建坟墓，肯定会后代兴旺、家业发达、前途无量。他越看越是满意，当即决定将此处作为自己死后的风水宝地。他拿出一百块银圆托人买下这块地，又亲自选定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为自己修起坟墓来。他十分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么一块好归宿。

1927年3月的一天，康有为在一家饭馆吃螃蟹，不幸中毒身亡，享年七十岁。家人遵遗嘱将其葬在凤凰山的风水宝地，坟前立有一块花岗岩墓碑，上刻“南海康先生之墓”。至此，家人及亲友均以为可以告慰康有为在天之灵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风水宝地也并不可靠。在康有 为死后三十九年的1966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到凤凰山，把“保皇派”的祖师爷康有为从风水宝地下挖了出来，用铁丝将其镶着金牙的脑袋挂在汽车上游街示众，最后抛到荒郊野外去了。

当时幸亏青岛市博物馆又把康有为的尸骨和头颅收藏了起来。1985年，青岛市政府决定将康有为重新安葬在依山临海、风光秀丽的浮山坡上，看来这里才是他真正的风水宝地。

周恩来生母万冬儿

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的万氏族谱，记载着一代伟人周恩来生母万冬儿的芳名。万冬儿之父万青选系晚清淮阴县知县，1872年冬生下一女，故取名冬儿。

1969年旧历除夕之夜，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邀请末代皇帝溥仪兄妹到家里吃年夜饭。总理嘘寒问暖，谈笑风生。当问到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时，总理深情地说："我的母亲也姓万，是江西省南昌县人，我们周家同你们万家还是表亲关系呢。"

万冬儿的父亲万青选曾经在清河县（今江苏省淮阴县）做了三十年知县，后定居清河，在当地也算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冬儿排行十二，故又称万十二姑，她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当时周家处于衰败时期，生活一天不如一天。1898年3月5日，万冬儿在江　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生下了周恩来。冬儿和丈夫商议，给孩子取名"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父辈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病危，膝下无子女。周恩来父母商议，决定把恩来过继到叔父家。叔母陈氏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粗

通医术。

恩来过继陈氏之后，生母万冬儿又怀了弟弟恩博。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嗣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继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找了蒋江氏为乳母，三人共同生活。周恩来的生母、嗣母、乳母三位母亲相处非常融洽。多年来，外界相传陈氏为恩来之母属误。其实，万冬儿才是周恩来的亲生母亲。

1904年，六岁的周恩来随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这时，外祖父万青选病逝了五年，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各种书籍。周恩来在这里的一位私塾先生的指导下读了大量的书籍，奠定了他广博知识的基础。

当时，周恩来的外祖父家家境已大不如前，一家子人多口杂，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纠纷，但总有办事公道的万十二姑出面调解，总算相安无事。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日久天长，万冬儿积劳成疾，加上忧郁，一病不起，于1907年春天不幸病逝，时年仅三十五岁。

周恩来与鲁迅同宗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伟人周恩来与鲁迅的同宗关系一直鲜为人知。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但是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绍兴人。在《射阳忆旧》中，他写道："余本浙人，自先人为宦吴省，遂迁家而居焉。"他在南开学校的毕业证和赴法留学的证件上，填写的籍贯都是浙江会稽或绍兴。抗战后，他还向美国记者李勃曼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籍贯是绍兴："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父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绍兴人。"

周恩来不但把自己看作是绍兴人，而且还凭直觉感到自己与鲁迅（周树人）还可能是同宗同族。1938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周恩来在武汉纪念会上作了演讲。他一开头就说："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 血统上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绍兴城的周家。"

1939年春，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抗战时，回到故乡绍兴，特意了解与鲁迅的关系。他多次查询了百草园的鲁迅与自己百岁堂的周家是否是同族关系，并为此查阅了同族家谱。一天晚上，他在警卫员刘久长的陪同下，到姑父王子余家与事先约好的绍兴大明电气公司的青年工人座谈。席间，他转言问姑父王子余："周家跟鲁迅是否同族？"王子

余答道："同姓不同族，鲁迅是鲁墟周，你是后马周。"周恩来听后礼貌地点头示意，继而称赞鲁迅是革命的硬骨头，说要学习鲁迅不畏强暴的精神，把抗战坚持到底。

当然，周恩来了解与鲁迅是否是同族，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鲁迅不畏强暴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又托友人继续调查自己与鲁迅的关系。经过调查，他与鲁迅的关系终于搞清楚了。他们确是同族同宗：鲁迅属于周氏鱼化桥支覆盆桥分支，他属于周氏鱼化桥支保佑桥分支。

接着，便是认宗了。1952年的一天，许广平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周恩来很恭敬地迎接她，亲热地说："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呢！"许广平年纪要比周恩来小，哪里受得住这番礼节，红着脸忙不迭地摇手："不敢当，不敢当。"

周恩来不仅向许广平认亲，后来还向周建人认亲。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特地到北京饭店拜访周建人。他用绍兴腔对周建人说："建老，我已查过了，你是绍兴周氏二十世孙，我是绍兴周氏二十一世孙，你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喽！"周建人见周恩来如此有礼，也忙说："你是总理，不敢当。"

宋氏姊妹的终生憾事

宋氏家族由于两岸分隔而天各一方，始终未能重聚，不能不说是该家族历史上的憾事。其实，是人为的因素使得宋家三姊妹重逢的机会擦肩而过。

那是1971年4月25日，当时在美国的七十七岁的宋子文，在旧金山一次晚宴上突被食物噎住，导致身亡。正在戴维营度假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得悉后，立即提前返回白宫。他很想利用宋子文葬礼这一契机促成宋庆龄与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的重逢。这样，既可以显示成全宋氏三姊妹重逢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为叩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大门找到敲门砖。因为尼克松知道，只有通过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才能疏通谈判渠道，改善中美关系。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恰是他最盼望会晤的合适人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基辛格的建议下，1971年4月26日尼克松总统向台北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唁电。唁 电不仅使宋美龄大感意外，同时也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当时美国频频向中国大陆投送秋波，展开“乒乓外交”，已使台湾预感到前景不妙。蒋介石很想借此机会再次施展其“夫人外交”的攻势，在参加宋子文葬礼时继续讨好美国。不料，宋美龄的专机刚飞到夏威夷上空就收到蒋介石的急电：“暂不飞纽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的《纽约日报》透露了秘密。该报刊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女士将于近期飞往纽约”的消

息。蒋氏不得不有所考虑。三天后，蒋介石看出尼克松急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用意，同时又担心宋庆龄前往参加葬礼会给中共实施统战造成机会，所以不希望宋美龄到纽约，出现三姊妹会面的场面。蒋再次电示宋美龄勿去纽约，宋美龄只好遵命行事。虽然到达了美国，却没有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葬礼，月底悄然返回台北。

至于宋庆龄未能成行，则是由于短期内无法解决包机问题。当时中美没有通航，中国又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人出国要考虑交通安全。解决不了包机问题，错过了时机，只好作罢。因此，尼克松安排三姊妹会面的计划也落了空。这对宋氏三姊妹来说，不能不说是件终生遗憾的事。

十年之后的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以八十九岁高龄溘然长逝，北京为这位“国母”举行了隆重葬礼。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亲属多人前来奔丧，各国领导人也纷 纷发来唁电。惟独居住在台湾的宋美龄没有应邀到大陆为姐姐送别，甚至以拒收北京拍发的讣告电报的办法装聋作哑。当时的香港报纸多有评论，认为各国首脑包括美国总统都出于礼貌发来唁电志哀，而近在咫尺的亲姐妹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甚至没有任何反应，实非明智之举。或许这位蒋夫人自有其难言的苦衷，或许北京拍去的电报根本就没有送达收件人手中，在“电报局”就被奉命退回了。

梅兰芳与小凤仙

梅兰芳是一代京剧大师，小凤仙是民初京都名妓，谈到二人的交往，还颇有一番故事。

20世纪20年代末，梅兰芳在北京天坛剧场连续演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众多的观众中有一位，崇拜他的风尘女子，天天去看他的戏，这就是小凤仙。小凤仙从小喜欢京剧，也会唱上几段。她看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后，设想到一个须眉男子会把一位柔情炽烈的女子演得如此惟妙惟肖、情深意切。尤其是看到虞姬自刎前对陷入绝境的霸王恳切陈词，联想到自己对蔡锷反袁行动的支持，小凤仙更是感慨万分。过后，她抑制不住地给梅兰芳写了封信，将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他。梅兰芳阅罢信，连连称赞写得好，而且颇有同感，可是按信上地址回访时，已人去楼空。

由此，梅兰芳想起1926年秋天的一件事。当时北伐军的号角震荡大江南北，北京街头的地摊摆满了古玩珍 品。一次梅兰芳买到一幅水墨荷花。泼墨之淋漓、气韵之生动，让他非常欣赏，再看题字写道：“出于污泥而不染，绿叶碧水映红斑。凤仙。”他也曾注意到出卖字画的摊主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明明是大名鼎鼎的小凤仙，却未引起梅兰芳的注意。

一周后，戏曲教练钟先生来到梅兰芳的寓所，无意中发现这幅水

墨荷花，当看到署名“凤仙”二字时，不禁惊愕。他当年为蔡锷将军和小凤仙唱过戏，听说小凤仙擅长书画。他便把小凤仙和蔡锷将军的深情厚谊和同心讨袁的故事讲述给梅兰芳。梅兰芳听后深深敬佩小凤仙的胆略和智慧，更哀怜她的沦落红尘。梅兰芳第二天再到小摊时，那卖画女子已不知何往了。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到了1951年初春，梅兰芳率团赴朝慰问演出返回沈阳时，住在交际处。一天突然收到小凤仙一封信，上写：“梅同志……望在百忙中来信一告……如不弃时，赐吾一谈，至为至盼。”

梅兰芳既惊又喜，多年想见小凤仙一面的愿望终于可以如愿了。梅兰芳立即吩咐秘书许姬传按来信地址回函，约她来见。

小凤仙如期前来，梅兰芳偕夫人福芝芳盛情接待了这位半生坎坷、又长期埋名匿迹的奇女子。小凤仙如见亲人，她叙说了自己幼年不幸的出身家世和沦落青楼为妓的悲惨遭遇，及这些年来孤身一人在东北的漂泊生涯。梅兰 芳恳请她讲述当年在北京结识蔡锷将军并掩护他从天津脱险的经过。小凤仙眼睛一亮，随即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当她讲述到蔡锷在北京时咽喉已患病，但日夜忙于讨袁事宜一直没能得到全面治疗，最后不幸早逝时，已泣不成声。

临别时，梅兰芳握着小凤仙的双手说：“我今天才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相见恨晚！”并赠款相济，之后还建议有关部门给她安排了工作。

名人情话

康有为与西湖船娘

杭州电视台曾为广大观众推出电视剧《西湖船娘》，该剧写的是西子湖上船娘兰花的一段曲折爱情故事。当然，这是含有虚构性的文艺创作。其实，在清末民初的西湖船娘中，不仅有兰花其人，还有荷花、杏花，曾有“西湖船娘三朵花”之誉。在袁世凯复辟称帝年代，南北军阀官僚来游西湖，往往非要指定“三朵花”为他们划桨操舟不可。一些文人墨客也对“三朵花”吟诗撰文，搞得相当热闹。“西湖船娘”成了人们对西湖摇船姑娘的亲切称呼。

“西湖船娘三朵花”中，以第一码头的兰花和长桥码头的荷花最为出色。兰花年方二八，娇媚轻盈，逗人喜爱，名气很大。荷花虽然貌美，但年龄较大，不善交际。杏花生在诸暨苎萝村，与西施同村，淳朴可爱，沉默寡言。

当时的兰花与曾经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维新领袖，后来又成为保皇党首领的康有为有过一段白发红颜的 情事。

康有为协助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晚年卜居杭州西湖“一天园”（杭州人称“康庄”）。此园位于丁家山，三面临湖，与北面孤山遥遥相对，有“小孤山”之称。这里林木葱郁，风景秀丽，西湖二十四景之一“蕉石鸣琴”就在这山上。当时，康有为虽已隐居，但仍不时外出访友，出门时常以西湖游船代步。居住南山的船工张阿毛和他妹妹兰

花看中了这位大主顾，巴结着为他划船。康有为在游船上常常一边欣赏西湖山水，一边向兰花兄妹请教些西湖掌故，慢慢地就厮混熟了。康有为对兰花逐渐钟情，感情日增。这位兰花姑娘颇有几分惹人喜爱的稚气之美。而颐养天年的康有为在“一天园”又不甘鳏居的寂寞，就将兰花接过来作为贤内助。从此，这位湖上女变成了“山中人”。

康有为的这段西湖艳史当时曾轰动杭州城，大小报刊争相登载。好事的杭州人本来将康有为尊称为“康圣人”，而今兰花从一个普通西湖船娘一跃而为“圣人”贤内助，于是有人在报上称兰花为“兰花圣母”。还说什么“一天园”里梨花海棠相映成趣，且有白发红颜徜徉于西湖山水之间，不知者误以为白发祖父携孙女共游西湖矣。

不过，康有为并不嫌弃这位西湖姑娘出身微贱，对她真情相待。1927年康有为逝世后，兰花矢志守节，隐居康庄以报康有为相爱之情。后来康庄收归市府管理，兰花便寄居康有为朋友郭庄主人那里，以后又移居上海。

“西湖船娘三朵花”中，以兰花境遇最佳。杏花操舟不久也嫁人离开了杭州。荷花年纪最大，为人老实，后与船工相爱，移居西湖茅家埠。该地为著名龙井茶产地，从此她忙于种茶采茶了，春汛时节有时也执桨操舟。

伉俪情深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夫人李惠仙女士逝世后不久，曾为文悼念。其中有句：

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时也嗒然气尽了。

悲痛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梁启超出名始于变法维新，继而宦海浮沉，晚年著书讲学。其为政的功过早已多有评品；其文章的议论畅达、感情奔放，亦为海内外同视，堪称一时之创；而他与夫人伉俪情深，尤其为人所称道。

梁夫人李惠仙出身官宦人家，堪称大家闺秀。他们是梁启超在京师会试时结的婚。梁启超会试落第后，李惠仙随梁回到新会乡间。当时梁家十分清贫，但新夫人不以为 贫，奉箕帚，敬老人，与梁启超同甘共苦，相敬如宾。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治流亡者的生活是动荡的。不久，梁启超又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当时，梁启超正是风

华正茂、勃发有为之年。一次在檀岛华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慷慨陈词，议论风生，为他担任英语翻译的是当地的一位华侨何惠珍女士。梁启超的演讲令闻者动容，而何小姐的翻译也流利畅达，获得阵阵掌声。何小姐正当妙龄，而且仪态万千，席散后即向梁启超表示了敬爱之情。

此后，梁启超离开檀岛到外埠演说时，因缺少翻译，便想起何小姐来。当时，有的英文报纸对梁启超进行抨击，他因不通英文也无从答辩。正值为难之际，他发现竟有一位作者一再为文反驳，也不知作者为谁。这时，梁启超的几位挚友都劝他与何小姐结合。在允许男人纳妾的当时，这本来不足为奇，但是梁启超以为自己流亡异地，生命毫无保障，与结发夫人尚且天各一方，哪能再连累何小姐。后来，他获悉在报上著文为自己辩护的竟是何小姐，益增对何的感激与敬慕。梁启超内心无法平静，但是他对李惠仙的情爱是坦诚深挚的。于是，梁启超给远在日本的夫人写信，详述了与何小姐相识的过程，并自白：

> 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 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梁启超并将何小姐所赠小扇一把寄给夫人代为收藏。这次经历是对梁启超与李惠仙夫妻之情的一次考验，最终他们胜利了。

卢慕贞明大义支持孙中山

卢慕贞，广东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今珠海金鼎镇外沙村）人，生于1867年7月30日。其父卢耀显与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同为檀香山侨商。经亲友介绍，两家父母同意，在孙眉的支持下，1885年卢慕贞与孙中山结婚。其时孙中山十九岁，卢慕贞十八岁。两人是过了门才相识，开始没多少感情。经过一段时间，卢慕贞敬佩孙中山的才智、勤奋和爱国精神，孙中山为卢慕贞的勤劳、贤淑所感动，两人感情日深，生育了儿子孙科、长女孙娫、次女孙婉。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卢慕贞在跟随孙中山游历大江南北的一段日子里，常为不能襄助孙中山主理国家大事而内疚。特别是她从小缠脚，走路不方便，觉得和孙中山在一起有损领袖的形象，所以逐渐萌发了为孙中山另找一位贤内助的想法。她常对孙中山的侍卫郑卓说："我是乡下人，不识字，也不懂英文，先生的事业我帮不了手。我缠着脚，连走路都不 方便，怎能帮得起先生呢？"初时，她劝孙中山纳妾，孙中山不同意，说革命党人不兴那一套。后来，她便主动提出与孙中山分手。卢慕贞善良、慈爱、深明大义，在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岁月里，她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照顾孙中山的父母，抚养子女。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卢慕贞堪称贤妻良母的楷模。孙中山坚持要长期与卢慕贞生活在一起，不同意离婚。

卢慕贞爱孙中山，又一心想支持他的事业，但孙中山不同意离开她，她便采取了逐渐淡化孙中山对自己感情的回避法。她借口照顾娘家母亲回到了娘家。孙中山几次托人召卢慕贞会面，她总是找借口不肯前往。1913年初，孙中山游历日本，卢慕贞赶到日本，再次正式向孙中山提出离婚。孙中山见她离意已定不可挽回，只得答应了她，正式结束了婚姻关系。

卢慕贞与孙中山离婚后，仍然时刻关心孙中山。1914年，宋庆龄继其姐宋蔼龄任孙中山的秘书。共同的志趣和革命理想培植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的婚事却遭到了宋氏父母和孙中山周围部分人的反对。卢慕贞知道此事后，立即托人写信给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请她成全孙宋两家的婚事。此信在当时革命同志中传为美谈。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卢慕贞与宋庆龄的关系亦处得很好，总是以姐妹相称。卢慕贞经常告诫子女一定要尊重继母。孙中山也始终关怀卢慕贞。他与宋庆龄订婚时，仍写信征询了卢慕 贞的意见；对她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关照，不时托人送钱送物，前往看望。孙中山回粤主持军政时，常抽空同宋庆龄一起回乡看望卢慕贞，并在日理万机中经常写信问候。现在翠亨中山纪念馆中保存的孙中山给卢慕贞的六封信，充分表达了孙中山对卢慕贞的深情。

赛金花与魏斯灵

晚清名妓赛金花是近代史上褒贬不一的人物。她本为苏州一贫家女，姓赵，原名灵飞。为生计所迫，入画舫陪客应酬喝酒赏景。后嫁与状元洪钧为妾，陪洪出使德国、俄国、荷兰与奥地利四国。洪死后，她为洪府弃逐，重堕风尘，改名赛金花，往来皆达官贵人。因其常常女扮男装，策舆驰骋，故人又称之为“赛二爷”。

李烈钧就任江西都督时，部下有一位叫魏斯灵的金溪人。魏斯灵是光绪甲午年（1894）举人，后东渡日本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法政专业。1913年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遂发动“湖口起义”。在“湖口起义”中魏斯灵为筹措粮饷，往上海订购枪支弹药。起义失败，魏斯灵被袁世凯通缉，逃至上海。魏斯在逃避军警追捕时误入赛金花寓所，为赛金花所救。魏斯灵早闻赛金花在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见侵略军烧杀掳掠极为残忍，曾说服在德国时结识的联军统帅瓦德西整肃军纪，使北京居民少受 蹂躏。今又见其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掩护、治伤，确是位侠骨柔肠的女子，不禁为之心动。赛金花亦从报刊上及与友人晤谈中得知魏斯灵投身革命后诸多事迹，钦佩其为国为民不顾牺牲的豪情壮志，今又见其坦率、诚挚，不失仁人志士的风度，也为之倾倒。在十多天的接触中，双方从相识、相亲、相爱，到山盟海誓。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魏斯灵在

国内也难以立足，伺机外逃。赛金花胆大心细，先让一位假扮魏斯灵者走出家门，引开便衣密探。随后魏化装成一老者，缓步而出，然后登上一辆人力黄包车奔向码头，登上绕道香港去日本的轮船，脱离了险境。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魏斯灵在日本闻讯后，连日返回香港，进入云南，加入李烈钧的第二军参与机要。此后数年，魏斯灵一直跟随李烈钧在军中服务。

驻留上海的赛金花自魏斯灵走后，停止妓业，一直等待魏斯灵回沪。后来两人重逢，悲喜交加，择日举行婚礼，并请李烈钧证婚。由于民国要人出面为红遍京沪的赛金花证婚，引起极大轰动。当时上海的社会名流、军政界的头面人物和新贵们，以及各报记者纷纷前往祝贺和采访，门前车水马龙，途为之塞。

赛金花结婚后改称“魏赵灵飞”。后魏斯灵任国务院咨议，当选为国会议员，全家北迁，定居北京。1921年7 月，魏斯灵病逝，赛金花又一次遭受丧夫之痛，并被迫离开魏家。此后，赛金花贫困潦倒，破屋坚守，于1936年12月4日病逝，结束了她大荣大辱、大富大贫、大贵大贱的一生，终年六十五岁。

袁世凯骗娶李公主

光绪二十年（1894），李鸿章推荐袁世凯驻高丽（朝鲜）汉城做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有一天韩王李熙问袁世凯：“阁下多大年纪？”答：“三十五岁。”问：“为何没有把家属带来？”答：“尚未娶妻。”问：“而立之年，何以未娶妻？”答：“总没有合适的，况且公务繁忙，没有工夫谈及此事。”

李熙对袁世凯说：“我的二女儿年方二十一岁，也是找不到适合的驸马。”袁世凯说：“岂敢高攀？”韩王说：“不然，倘阁下不弃，愿阁下前来宫中玩耍。不但我欢迎，二女儿早已闻阁下大名，必然也欢迎！”袁世凯对女人是个好“猎手”。自此，他和韩王妃及二公主热乎得如同一家人。韩王和王妃也纵容女儿同袁世凯打得火热，如胶似漆。

从韩王李熙跟袁世凯提议这件婚事起，时间不到百日，袁世凯和二公主便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大典。结婚时还有两名陪嫁：一名是王妃的妹妹金氏，一名是贵族吴氏。 袁世凯走了桃花运，喜不自禁，真是一箭三雕呀。

一年后，二公主、金氏、吴氏随着袁世凯奉朝廷之命回国。二公主这才发现，袁世凯十九岁时在家乡早已结婚了，结发之妻就是于氏。而且袁世凯早年在苏州嫖妓，同妓女沈氏又搞得火热，后用二百

两银子为沈氏赎身，纳她为妾。

韩王李熙之女到了袁世凯家位居第二姨太太，陪嫁过来的韩王妃之妹金氏和贵族吴氏分别为第三和第四位姨太太。她们身居异国，在袁世凯的强权之下常常抱头痛哭。一次痛哭时被袁世凯发现，袁猛然举起身带的指挥刀说："你们想回国，我就宰了你们。"吓得三人跪在地上求饶。袁世凯说："你们的国家已然被日本人占据了。如果你们回国，日本人不杀了你们，也会被千百个日本兵轮奸。"三人吓得异口同声说："禀报大人，我们不回去了。"

袁世凯心想，这招还真灵，便转怒为喜。以后改变策略与三美人同床共枕。日久天长，这李氏给袁世凯生了二女四男，金氏给袁世凯生了二男二女，吴氏给袁世凯生了二女一男。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中秋节，于氏分别把各房的姨太太请来，对她们说："今晚大人可高兴了，八月十五吃个团圆饭。"说着只见丫鬟们端上元宵来。袁世凯一见就说："他妈的，偏偏叫元宵，不知哪个朝代传下来的。"大姨太太沈氏说："元宵者，袁消也。外边卖元宵的　都叫汤元了。"袁世凯的二姨太太李氏想起当年袁世凯欺骗父亲说没有结婚的事，恨恨地想：你这袁世凯早就应当"袁消"了。

果然，未过一百天，袁世凯就"消亡"了。

梨园女杰拒当总统夫人

刘凤玮，天津人，自幼学戏，专攻老生。由于她嗓音洪亮，风姿翩翩，唱到十七八岁便轰动京津，因此被天津老乡、袁世凯手下实力人物曹锟看中。

这位曹三爷家中已有三房妻室，现要娶刘凤玮当第四夫人。刘凤玮出身贫寒，面对这个大军阀的淫威一口回绝。谁知曹锟并不死心，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刘凤玮的母亲是个胆小怕事的本分人，便对媒人说，曹三爷若真有诚意，得下龙凤帖子，用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才行。曹锟一口应允。就这样，母女俩相抱大哭一场，刘凤玮被抬进曹家。

刘凤玮在曹家虽然备受恩宠，但与这个家庭的官场作风格格不入。好在曹锟大大咧咧，除不许她登台唱戏外，其他事全不计较，所以她也就比较安定地过了下来，还为曹锟生了两个孩子。

袁世凯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领袖人物。他开始大肆拉　　拢各派议员，为自己上台作准备。1923年6月，曹锟迫使总理张绍曾辞职，又对总统黎元洪逼宫夺印，形成事实上的军事政变。然后在甘石桥成立议员俱乐部，很快云集议员五百多名，达到了法定人数。他给议员发出支票，普通票额每张五千元，特殊票每张一万元。在军警戒备森严的“总统选举”中，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为“大总统”。据说他为当总

统共花贿款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

按说，刘凤玮会因此事而更加尊荣起来，谁知这位梨园女杰偏不稀罕这“总统夫人”的美名，说什么也不肯伴驾入室。她从戏词里知道，凡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官都不会有好下场，并认为花钱买的总统是一种羞耻。为此，她和曹锟冲撞起来，最后一怒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天津老家。临行前，她对曹锟说：赶明儿你好了，咱不眼热，你倒霉了，也别来找我。曹锟笑道：我老曹一根枪杆打天下，咋会有向你求情的日子？

谁知曹锟说这话还不到一年，就真倒霉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他的部下冯玉祥倒戈政变，他一下子沦为阶下囚。直到张作霖打败冯玉祥后才被放出，一年后回到天津。

曹锟到天津后贫病交加，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偷偷给刘凤玮写信哀诉苦衷。刘凤玮本来抱定主意不再见曹锟，但此时见他如此凄惨，又动了恻隐之心。她亲自把曹锟接 到家中，为他求医治病，守在床边悉心照料，感动得曹锟老泪纵横。他说：真想不到你还这样待我，想想真后悔啊。刘凤玮开导他，劝他不要再涉足政坛，更不能丢掉民族尊严去当汉奸。她的苦心还真保全了曹锟的一点晚节。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天，曹锟的老部下、河北日伪省长高凌霨来劝说曹锟出山为日本人办事时，曹锟忽地坐起，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再不许登我曹家的门！”直把“高省长”吓得脸色发白，浑身打哆嗦。刘凤玮夸奖他说：“曹三爷啊，你一辈子就这两句话给咱天津父老兄弟挣脸啦！”

张勋复辟拒妻谏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张勋的军队被编为武卫前军。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勋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被称为“辫子军”。

1917年6月，张勋以应黎元洪电召调解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为名，率三千“辫子军”北上入京。张勋入京后，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拥溥仪复辟帝位，仍称为宣统。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就是史家所称的“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

张勋一生效忠清室，常对人说：“我在前清受恩深重，君恩难忘。”他始终留着那条“意义深长”的辫子，而且见客时还要行前朝的跪拜大礼。

张勋不忘清室，导演了十一天的“丁巳复辟”丑剧，这已是尽人皆知事。但关于张勋的元配夫人曹琴屡谏其改　　弦易辙、拥护共和的史实，却鲜为人知。

曹琴端正贤淑、慷慨淳朴、乐善好施，不仅是张勋的贤内助，而且在政治上也比较开明，富有卓识。可惜张勋刚愎自用，没有把她的许多忠言听进去。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迫发布诏书，宣告宣统皇帝退位。而不少皇室成员并不甘心清朝的灭亡，无时不在梦想复辟。丁巳年上半年，身为长江巡阅使的张勋集合杨度、康有为、万绳栻等主张帝制的人，加紧复辟活动。曹琴觉察后，多次劝阻张勋："民国又没有亏待你们，也没有亏待清室人员，他们都已退位，你为何去死保，自讨苦吃呢？"对于这些顺应历史潮流的忠告，张勋或置之不理，或口是心非搪塞应付。据1918年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的《复辟始末记》记载，张勋带领"辫子军"进入北京时，曹氏又随行入京劝谏。张勋与康有为在公馆常密谋到深夜，曹氏其时遣其子与婢仆执役于康前，名虽敬之，实则监听之。"及议竟，张勋退入内室，曹氏率其子女及张宠妾，跪于张前痛哭，求其即返徐州。"但遭张勋斥责。

曹氏知张勋之意无法逆转，于是私自派靠得住的堂侄张肇通，持三十万两银票，往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此举支持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为张勋铤而走险的行为及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顾维钧的四位夫人

外交界耆宿顾维钧博士于1988年11月14日晚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九十八岁。他是中国最资深的一位外交家，也是北洋政府时代的显要人物之一。

顾维钧出任阁员，是自1922年黎元洪总统任内开始的。是年春，黎先任顾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7月，颜惠庆内阁辞职，8月5日发表唐绍仪组阁令，由顾维钧出掌外交。从此，顾维钧宦海游弋，五十年始终位居要津。但是顾维钧一生婚姻一波三折，先后结过四次婚。

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幼年遵父母之命，与乡人某医生之女订下婚约。1908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顾维钧，奉母命回乡完婚。结婚后新妇随顾赴美。因新妇不谙外语，更不习惯国外的生活，不久双方同意离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时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对顾倍加赏识，向袁世凯极力推荐，被任为总统府秘书。凡袁世凯接见讲英语之外　　宾，皆由顾担任翻译。唐爱其才华，特以精通外语之长女与顾为婚。顾字少川，唐亦字少川，翁婿同名，一时传为佳话。

1915年，唐氏夫人随同顾维钧放洋。同年生育一子，即顾之长公

子、现在美国年已古稀之顾德昌也。顾唐之间感情弥笃。唐不幸于1918年生育第二个孩子时患病去世。当时顾方而立之年，为孩子失去慈母深感悲伤。

1920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担任国际联盟行政理事。时号称“亚洲糖业大王”之华侨富商黄仲涵的夫人正因夫妻失和，携带次女蕙兰旅居英伦。经黄钟涵在法国之长女从中周旋，顾维钧与蕙兰在巴黎的宴会上相识。二人一见钟情，于10月21日在伦敦结婚。因翌日国联行政开幕，新郎新娘在日内瓦的卧车上度过新婚之夜。黄家豪富，陪嫁甚丰。顾维钧与这位珠光宝气、娇生惯养之夫人虽有格格不入之处，但她精通数国语言，能随顾周旋于国际间应付裕如。顾氏活跃政坛数十年，实得黄夫人一臂之助也。然而“清官难断家务事”，1956年他俩在美国竟效劳燕之分飞。黄蕙兰后来著有《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讲述与顾维钧的一段姻缘。

顾维钧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当年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是复旦大学的校花。1929年与外交官杨光结婚。1942年杨光因拒绝为日军募款而被杀害，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坚强地生活。1959 年，严幼韵与顾维钧结婚。婚后两人琴瑟合鸣，相亲相爱。到顾维钧去世，两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六年。

陈独秀的婚恋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1915后，他先后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被誉为“思想界之明星”。他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和李大钊等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在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央领导岗位，直到大革命失败为止。但中间也有过一次误会，那就是1925年底，他曾一度神秘失踪，时间约两个月。当时中央焦急万分，后来证实只是一场婚外恋导致罢了。

陈独秀十八岁时由父母包办，在家乡和高晓岚结婚。高晓岚出身豪富家庭，长相也不错，但目不识丁，又裹一双小脚，和思想比较先进的陈独秀一直感情不和。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提出离婚，但没有结果。而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因长期和他们住在一起，又颇追求新潮，粗读诗书，逐渐和姐夫陈独秀自由恋爱起来。后二人同居，并生有一男一女，直到1925年两人才正式分居。此后，陈独秀另有红颜知己。与陈独秀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央工作人员郑超麟说：陈独秀和女医生施芝英很要好，但施芝英已经结婚，和陈独秀幽会时，即住在郑超麟家中。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却突然失踪了，四处寻找毫无踪迹。

当时，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等认为陈独秀很可能是被上海的

敌对势力暗杀了。张国焘竟哭着说：“老头子本来可以做很大的官儿，没想到竟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当时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北方冯玉祥和张作霖展开直奉大战，南方国民政府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1926年初，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主张将总部迁到北京，不少难题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却突然不见了，真是群龙无首，束手无策。

正当中央不知所措，准备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时，陈独秀却在上海出现了。来电称因病住了医院，由一女伴服侍，不久将出院恢复工作，有事可由秘书任作民前往联系。当大家知道陈独秀只是因搞婚外恋而失踪后，禁不住议论纷纷。但此女友究竟是谁，却始终是一个谜。

五十年后的1978年，有两个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反映，其外祖母施芝英于1973年病故前告诉他们，她就是当年陈独秀“失踪”时的婚外恋人。这正好和当时郑超麟所说的情况相吻合。他们是1926年3月分手的。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隐瞒自己的身份，和上海烟厂 的青年女工潘兰珍结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九岁，但感情尚好。直到陈独秀因托派案被捕入狱时，潘兰珍才知道丈夫原来是共产党的前总书记。她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居住，以便就近照顾陈独秀。陈独秀流寓四川时贫病交加，潘兰珍一直追随照顾，直至他去世。

胡适的婚姻

1904年1月，胡适十四岁，胡母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为他订了一门亲事。未婚妻江冬秀是旌德县江村人，与胡适家相距四十里，比胡适大几个月，彼此均未见过面。

1917年7月，胡适结束了在美国的七年留学生活，回到上海。接着，他又回到安徽绩溪老家看望分别了十一年的老母。家人团聚，自有说不尽的天伦之乐。

回家之后，胡适还去看望了江冬秀。因传闻胡适在海外已有女朋友，江冬秀躲在里屋不肯出来，最后终未得见。一个月后，胡适便离开家乡，8月就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教英文课。

虽未见面，胡适仍然从母亲处知道江冬秀在家履行儿媳“职责”的情况。胡适后来回忆说：“绩溪是个小地方，家家户户都是自己操作的。我的太太是山那边人，有田地，家里有用人，什么东西都不要自己动手。那时我在美国，还没有结婚，江冬秀每年都要到绩溪住几个月，像 个童养媳一样。有一天在院子里扫地，一位亲戚问，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经这位亲戚一问，掉下眼泪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后来江家知道了，买了一个丫鬟给我母亲，意思是要替这位未来的媳妇做事，但我母亲仍旧要她做事。”

是年寒假，胡适奉母命回家完婚。12月30日举行文明婚礼，胡适

穿的是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江冬秀穿花袄、花裙。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新婚期，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情趣。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可见，虽然他们有过一点误会，但话明气消，新婚蜜月期是相亲相爱的。

次年1月胡适返京，江冬秀仍留在老家侍奉胡母。

1918年夏，胡母怕儿子在外独居岑寂，即命江冬秀到北京陪伴。

从此以后，胡适夫妻生活在一起倒还美满幸福，然而 情趣很不一样，一个是农村旧式妇女，一个是留学生洋博士新人物。尽管如此，但始终相爱，至老不渝。

郭沫若元配夫人张琼华

1912年，郭沫若由父母包办，与张琼华女士结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直至1939年父亲病重才回家探亲一次。

这期间，张琼华不断寄信给郭沫若，报告家中二老的情况，并对他表示深切的思念。郭沫若虽然由衷地感激，但因对她无爱情可言，所以从未回过信，至多在给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中带上一笔而已。比如1915年7月20日，郭沫若在给兄弟翊昌的信中说：

> 八嫂（张琼华）来函亦读悉，愿弟为我传语，道我无暇，不能另函，也不必另函，尚望好为我侍奉父母也。

张琼华没有辜负丈夫的嘱托，她操持家务，孝敬公婆，与姑嫂叔伯和睦相处，赢得全家的尊重和信赖。

郭沫若与安娜结合后，曾多次想写信与张琼华离婚。可是考虑到这样做，一会太伤父母的心，二会逼得张自杀，自己实在不愿担负这“杀戮无辜”的罪名，终于提笔又止。可怜的张琼华默默地苦度着难熬的岁月。

1932年春，郭母在弥留之际还放心不下这位贤惠的媳妇，留下遗言：“他日八儿（郭沫若）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1939年，郭沫若听说父亲卧病在床已久，才决心告假探亲。回家后见老人由张琼华悉心侍奉，家中一切井然有序，尽管对张氏没有爱情，但仍当着父亲的面对她表示了感谢。

同年7月，郭沫若偕于立群，怀抱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汉英回家奔丧，他们受到张琼华的多方照顾。张琼华不仅让房子给他们住，而且在饮食方面给正在哺乳的于立群特殊照顾。

20世纪50年代以后，张琼华的一切生活费用全由郭沫若供给。郭在张琼华心目中是偶像，是无比重要的精神支柱。1978年郭沫若逝世，家人瞒着张琼华，深怕她发生意外。

1980年6月，这位慈祥而不幸的老人在人生舞台上度过了九十个春秋后，悄悄地告别了人世。

李宗仁钟情西山茶

笔者在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中看到李宗仁细细品尝乳泉春（桂平西山茶）的镜头时，不禁感慨系之。李宗仁与桂平西山茶结下的不解之缘，距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

1923年10月，李宗仁率部由玉林进驻桂平，赶走了陆云高，成为桂平的“主人”。他早就听说，离县城不远有座闻名全国的西山，山上有乳泉水泡制的西山茶。他驻守桂平已一月有余，还没有登山品尝过呢！

这天，李宗仁乘着秋高气爽，约了祖籍桂平的水上警察厅长郭凤岗一道游西山。也许是郭凤岗有意撮合李宗仁与郭德洁的婚事，便设法让李宗仁在当年孙中山曾驻足过的姚翁岩前的飞来石上与桂平城厢妙龄女子郭德洁相识，让他们一边品尝西山茶，一边倾谈。

当李宗仁先生品尝了乳泉水泡制的西山茶后，清香溢满舌尖，顿感心旷神怡，于是赞不绝口。更由于郭德洁 对西山茶颇有研究，深得李宗仁赏识。郭德洁讲了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有两位仙人来到桂平西山，在一块形似棋盘的石上下棋、喝茶。一樵夫遇见，观棋入迷。仙人便赏赠其三颗茶籽，谁知他失落在棋盘石旁，结果长出一簇簇碧绿苍翠的茶树，后人称之“棋盘石茶”。史书《浔州府志》载，桂平西山茶又称乳泉春、棋盘仙茗，为唐代高僧手植，是佛家经营的绿

茶上品。它叶嫩条细，色翠汤清，具有味鲜、回甘、醇厚、滑口等特点。郭德洁还随口吟咏道："香蔽高岭不是花，乳泉新煮绿春茶。闲来愿得杯常满，每倚亭台到日斜。"

李宗仁听得入了迷。他注视着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只见她身穿金色镶边紧身衣，外套大红罗裙，如花似玉的粉脸，缀着一双宝玉般的慧眼，两颊绯红，如同初绽的桃花……她思维敏捷，颇有才情。因此，李宗仁不但钟情西山茶，更钟情这奇才女子郭德洁。

后来，李宗仁与郭德洁结为夫妇。战事稍闲，李宗仁便游西山、品仙茗。此后，李宗仁称桂平为自己的发迹之地，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

李宗仁每日必饮茶，而且必是西山茶。无论行军作战到哪里，总也忘不了带上西山茶，并常以西山茶待客、赠友。为点缀名山，便于品茗赏景，李宗仁于1924年倡建飞阁一座于西山姚翁岩之上，南京国民党政府主席谭延闿题"飞阁"二字。

抗日战争的枪声打响之后，李宗仁率部北上抗日。在台儿庄战役前夕，李宗仁饮着夫人郭德洁寄去的西山茶，运筹帷幄，指挥了台儿庄战役，重创日本侵略者，给其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喜逢佳偶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身于河北青县兴集镇。他十四岁入练军当兵，六年后又投袁世凯组建的新军。

1921年，冯玉祥率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入陕作战。因战功卓著，其部扩编为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不久又继任陕西督军。第二年，直奉混战爆发，冯玉祥又率部大破奉军，对整个战局的扭转起了重要作用。在与赵倜和鲍德全郑州血战中，他又大败赵部。此役结束，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到任后，他马上整饬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接着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他手中掌握着一个师三个混成旅的兵力，从此青云直上，成了北洋军中有影响的人物。恰在此时，冯玉祥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他遂成为名门闺秀追求的对象，做媒者挤破了门槛。

当时，控制北洋政府的大军阀曹锟想招冯玉祥为婿。 冯玉祥出身贫寒，为人正直，生活简朴，向来不攀权贵。因从不买曹锟的账，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中被人视为“怪人”。当时，冯玉祥不了解曹家小姐的人品、才华，所以迟迟未定。后来，曹家的千金闻知冯玉祥性格“异常”，生活过于清苦，也不愿意嫁给这位“布衣将军”，曹锟只得作罢。

冯玉祥择偶以德才为重，立志选一位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伴侣，所以择偶非常慎重。凡来求婚者必须当面考问，亲自了解。一

次，一位丽质小姐向冯玉祥求婚。冯玉祥严肃地问她：“你为什么想和我结婚？”那位千金小姐羞涩地小声回答：“因为你官大，和你结婚能成为官太太。”冯玉祥闻言摇头而去。另一位俏丽千金向冯玉祥求婚，冯玉祥又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为啥向我求婚呢？”这位千金小姐细声细语地回答：“你是英雄，我爱慕英雄。”冯玉祥二话没说，摆手而退。

后来经人介绍，冯玉祥结识了李德全。初次见面时，冯玉祥仍直率地问：“你同我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李德全对冯玉祥的性格、人品、爱好早有所闻，她不卑不亢、不无幽默地回答：“乱世出英雄，也出恶魔，上帝怕你办坏事，派我来监督你。”李德全的回答出人意料，使冯玉祥大吃一惊。他敬佩地望了望端庄、文静、俊秀的李德全，点了点头，心想：这位女子出口不凡，才华出众，一定是胸怀大略的非等闲之辈。

冯玉祥与李德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相互多方了解，冯玉祥认为李德全聪颖好学、知识渊博、温顺善良、富有见识，是自己理想的伴侣；李德全认为冯玉祥智勇双全、生活简朴、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是自己的如意郎君。所以二人结为恩爱夫妻，相伴终生。

张作霖的“编外夫人”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一段近似荒唐的啼笑姻缘。“东北王”张作霖“选美”错点“鸳鸯谱”，竟然选中了一位瘸姑娘。堂堂张大帅为何偏要选一位瘸姑娘呢？说来很有趣。

那还是张大帅发迹之初，当二十七师师长的时候。按他当时的正式“编制”，除正房外，姨太太就有三房。可他的部下营长汤二虎亦有三房姨太太，他这个师长怎么能服气？

不过张大帅已非昔日绿林中人，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了，选什么样的女人做妾，是不能乱来的。有人帮他出主意，这次选美，可以由学校里选。这正合张将军的意。

这时的东北已刮起了东洋西洋风，开设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校长听说张大师长来学校选美，就将女学生集中在操场上。刹那间操场上环佩丁当，脂香阵阵，佳丽 如云。张作霖在左右陪同下，转了一圈，觉得并没有出色的，忽然发现教室的窗户上映着一个头影，心里就来了气，疑心校方藏美不献。他朝窗子那边一指，吼道：“那是谁家姑娘？如果有了主，我张作霖不做缺德事；没主嘛，就是我的人了！今天晚了，明天我来接人！”说罢，扬长而去。

等到花轿抬到家一看，张作霖傻眼了。这姑娘论面容、身材没说的，就是一副高低腿，他这才明白了校长的良苦用心。为了面子，他

没把瘸姑娘送回娘家去，而是将她塞在一栋小楼里。别的姨太太房里有的，瘸姑娘也一应俱全。但直到他做“东北王”，也没在这里住过一夜。人们只知道张大帅有五房姨太太，却不知道五房之外还有个“编外夫人”。

可正是这位“编外夫人”，不仅影响了张作霖后半生的政治态度，还救过他的命呢！那是他做“东北王”不久，一天日本侵华司令部打来电话，要他去赴宴。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件大事：张的手下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向日本人求援才平息了这场叛乱。此次日本人召张赴宴，引起了瘸姑娘的怀疑，她认为此次赴的是“鸿门宴”，便赶紧叫来汤二虎，要他马上前往宴会，一旦日本人要大帅签字盖章，必须如此这般对付。汤二虎听得连连点头，然后拔腿追去。

汤二虎来到日军司令部，果然看到日军五六个头目围 着张大帅，逼他在一个文件上签字、盖章。张作霖不管怎样还是个有气节的中国人，当然不愿签卖国条约，只好拖延时间，说：“没印章怎行？”就在这时，汤二虎在门外大喊一声：“大帅，您要印章吗？我给您带来啦！”边喊边往大堂上闯。他闯进大厅，掏枪往日军司令头上一抵，杀气腾腾地说：“快将大帅送回大帅府，不然叫你小鬼子头上开花！”日本司令没办法，只好将张作霖送回大帅府。从此，张大帅对瘸姑娘另眼看待，曾想提一提她的身份，让她正式做自己的姨太太。瘸姑娘却说：“名分、金钱、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如过眼烟云。我敬重大帅的民族气节，只要多为百姓着想，本姑娘就不白来世上一遭！”

密。

张学良与于凤至联姻

张学良的结发夫人于凤至是一位聪明贤惠、通晓大义、决事果断的女性。多少年来，人们对地位悬殊的张、于两家的联姻颇多议论。据笔者所知，他们两人的婚姻其实是很偶然的。

于家祖籍在山东海阳县司马庄，祖上有人曾官至兵部司马。因年荒至东北，在吉林怀德县郑家屯落脚，靠破车起家，经营粮栈兼丝房的大买卖，字号叫“丰巨当”。为避风险，家室全部迁居怀德县大泉眼村。

于凤至1897年出生在大泉眼村。父亲于文斗是个开明的生意人，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所以他把于凤至和其他子女接到身边，设立学馆，请先生来教书。

当时东北很乱，有一股受沙俄操纵的蒙匪经常扰乱社会。1908年夏，奉天省督军徐世昌派当时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进驻洮南府，追剿这股蒙匪。张作霖来到郑家屯时，看到“丰巨当”粮栈院落整齐，就把他的临时剿匪 指挥所设在这里。于文斗的生意也常受到蒙匪的骚扰，故对前来剿匪的“王师”特别欢迎，与张氏成了朋友，过从甚密。

一天，于文斗请来一位占卦先生，给子女们算命，并给每人写一份卦帖。刚算完卦，张作霖便进了门。闲谈时他无意中翻阅卦帖，指

着其中一个卦帖问，这可是凤至的？于还未答，张又说，我手下有个人对阴阳八卦、麻衣神相无所不通，让他再核对一下，然后就把于凤至的卦帖拿走了。原来于凤至卦帖上的“凤命”引起了张氏的注意。张作霖很迷信，认为“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是天作之合。他回去后又找下属认真地推算了一番，便下决心求这门亲事。不出三日，张便托粮栈张杏天掌柜提亲，张、于两家便由此联姻。于凤至读完私塾后，十七岁时由郑家屯出嫁，是年张学良年方十五岁。

于凤至知书明理、贤淑大度，渐渐赢得了张学良的敬重，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因于凤至年长，张学良一向尊她为大姐。于氏家族中的人，在于凤至的推荐下，其兄于凤诏任奉天铁路稽查处处长，其侄儿任县长。1921年，于家老太太病故，张作霖派兵士护送，于凤至陪灵，从郑家屯送至大泉眼祖坟地，仪式十分隆重，备极哀荣。

赵四小姐忠贞情

张学良将军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即匿迹于政坛军界，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几十年来，竭尽心力陪伴他、照顾他、给他宽慰欢乐者，乃赵四小姐也。

赵四小姐名赵一荻，又名绮霞。其父赵庆华在北洋政府时代曾官至交通次长，生有六男四女。按男女分别排行，女儿之中绮霞最小，排行第四，家里人常呼之为赵四。

赵四小姐的童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当时的达官显要如张作霖、朱启铃（北洋政府代总理）、赵庆华等在天津均安有住所，同僚之间过从甚密，其子女间亦常聚会嬉戏。因此，张学良与绮霞相识，渐成密友，感情日益亲密起来。由于绮霞求学心切和对少帅爱慕情深，二人相约，秘密去沈阳北陵同居，绮霞并在此入大学深造。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绮霞失踪”传闻。其时，张学良已同 夫人于凤至结婚多年，并生有子女。为了家庭和睦，他向绮霞提出，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是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为侍从小姐。绮霞遂有了秘书和赵四小姐的称谓。赵庆华对女儿此举异常震怒，随即于报端发表声明，与绮霞断绝父女关系。舆论压力亦属可畏，对此，绮霞毫不动摇，除努力学习之外，与张学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

1933年，张学良下野，去英国、意大利作军事考察，赵四小姐亦

陪同前往，精心照料。“西安事变”前后，赵四小姐一直在西安陪伴张学良。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协助张将军做了不少事情。

1940年，照料张学良生活的于凤至夫人健康日差，遂出外就医。张学良提出要赵四小姐接替的要求获允。自此，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相依为命，长期生活在一起。她竭尽全力给将军以安慰和照顾。凡张学良需要的，她都陪着做、跟着学，做到样样都会。张学良要用英语会话，她就学英语；张学良要打网球、排球，她就陪着对打；张学良要研究明史、写文章，她就为他购书、查找材料；张学良喜欢文物古玩，她就帮着采购、鉴定和收藏。

据说，赵四小姐胸前最常挂的一条精致项链上，有一粒红色的牙质心形链坠，内藏一张张学良的小像。她对将军的爱慕和忠诚可窥一斑。

张治中的“夫人作证”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两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洪女希厚（乳名小银子）“指腹为婚”。十九岁时与洪希厚正式完婚。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治中由南京到上海，参加学生军。后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不久正式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毕业后，张治中正式步入军界。进入黄埔军官学校执教、率入伍生总队参加平定刘杨叛乱的战斗后，张治中受到校长蒋介石的器重，三十几岁就跻身高级将领之列。

作为年轻将军之妻的洪希厚，其貌不扬，又没文化，还有一双放大了的小脚，周围人都认为他们很不般配。有的“好心”人还劝张“改组内阁”，重修婚谱。但张治中不为所动，与洪希厚恩爱如常。

1928年7月，张治中奉蒋介石电召，中止欧洲留学，经美国、日本返回上海，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 政厅厅长。旋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1929年5月，升任该校教育长（校长蒋介石兼），主持校务。

张治中上任不久，发现军校学员经常三五成群游荡秦淮河，逛妓院，宿春宫，灯红酒绿。为整饬校风，张治中决定召开军校全体学员大会，请夫人洪希厚登座。在会上，他指着貌不惊人、衣不压众的洪希厚高声对大家说：“这就是我的夫人，她虽没有文化，但我爱她，结

婚二十年了，我从没嫌弃过她。”讲到此，台下一片寂静。张顿了顿，接着又说：“论军衔，我比你们高；论薪饷，我比你们多。可我从未寻花问柳，更没添房纳妾。这些，她可以作证。”

话音刚落，台下惊奇、叫绝之声不绝于耳。“夫人作证”一时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被传为美谈。此后，该校学员的浪荡行为大有收敛。

张治中主持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十年，第六期至十四期学生均受其教育。1936年2月，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警备司令长官。9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从1909年与洪希厚结婚，到1969年逝世，张治中与夫人共同生活了整整六十年。他对夫人洪希厚忠贞不渝，始终如一。作为高级将领的张治中，与夫人终生厮守，情不二移，实属难得。

卫立煌的两任夫人

卫立煌，字俊如，于1892年2月16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卫杨村。他十五岁从军，由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卫兵，发迹为国民党“五虎将”之一，曾任第一、二战区司令和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职。在抗日战争中，因指挥忻口战役而扬名，侵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是“支那虎将”。

1927年3月，卫立煌率十四师驻守镇江，师部占用了镇江崇实女子学校部分校舍。每日车马往来，官兵进出，吵吵嚷嚷，严重影响学生上课。加之，部分官兵乱拉、乱用、随意损坏学校用具，使学校师生十分气愤。时任该校校长的朱韵珩女士是个孤儿，自幼品行端正、聪明可爱，在亲友的帮助下发愤读书，毕业于美国登威尔大学。朱韵珩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宋美龄女士结为好友。朱韵珩学成归国后，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为了维护学校师生的利益，她愤然去找卫立煌。

朱校长见了卫立煌泰然自若、理直气壮，从教育兴国的重大意义讲到军民关系的重要性，讲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最后，她强烈要求卫立煌立即把部队撤出学校。卫立煌面对这位慷慨陈词的青年女子开始不以为然，但很快就被她说服了。他十分敬慕朱韵珩的学识和谈吐，当即道歉，表示立即另找住处，尽快撤离学校。第二天，部队就撤离了学校，并对损坏的物品照价赔偿。卫立煌为了表示歉意，还特

意邀请朱校长共进午餐。朱韵珩对这次交涉出乎意料的顺利十分满意，同时，也对这位闻名沙场的战将产生敬慕之情，于是欣然接受邀请。从此，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几天后，朱韵珩也备好饭菜，邀请卫立煌前来共餐，以表答谢之情。你来我往，谈天说地，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卫立煌已届而立之年，因忙于军务尚无妻室；朱韵珩年过花信，因忙于教育事业尚未婚配。经过一番交往，是年冬天二人结婚。

卫立煌幼年因家境衰败，只上过几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从军后深感文化不足，立志苦学不辍。朱韵珩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文化基础好，便主动帮助卫立煌学文化、学外语、学现代科学知识，使卫立煌进步很快。二人互相敬重，恩恩爱爱，1930年长女道蕴出生。

抗战初期，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驻守洛阳，因形势紧迫，朱韵珩住在四川成都。1939 年10月，卫立煌突然接到朱韵珩病逝的噩耗，当即号啕大哭。他报请当局批准，立即赶回成都为爱妻料理丧事，以尽夫妻之情。

卫立煌的继配夫人韩权华女士原籍天津，出身名门。他们的结合，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韩家先人早年在天津从事海运事业，拥有船舶百艘，往来于天津、营口、大连、烟台、龙口、宁波、上海、福州、潮州、汕头和隔海的台湾，以及朝鲜、日本各口岸，被称为“天成号韩家”，为天津富贾“八大家”之一。韩权华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北京做过官。父亲韩伯鹏，名耀曾，为候补道，作过直隶总督荣禄的文案，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任咨议。韩权华有兄弟姐妹九人，她是七小姐。

1942年元旦，蒋介石和孔祥熙两家都在重庆邀请卫立煌聚餐，卫立煌竟选择了孔府之宴。原来他是借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妇之邀，趁机拜见当晚也去赴宴的孙夫人宋庆龄。因为在广东时期，卫立煌曾当过

孙中山先生的卫兵，颇受宋庆龄的照顾。但为此遭到蒋的记恨，他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不久即被撤消。

此后卫立煌在成都闲居。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韩权华女士。韩权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专攻音乐史。后在赵元任创办的一所华侨学校里任教。

1943年，卫立煌复出，继陈诚之后在滇缅边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其时，卫立煌和韩权华已鱼雁往来一年多了。1945年，韩权华回国，6月15日两人在昆明结婚。

卫立煌借住在翠湖东路上卢汉的一座别墅里，这里距西南联大很近。联大校长梅贻琦夫人是韩家五小姐咏华，卫立煌从此也与梅校长相往来。

佟麟阁的“模范夫人”

西北军著名爱国将领佟麟阁的夫人彭静智，以勤劳、简朴、贤德、孝翁尊姑闻名，被冯玉祥将军誉称为“模范夫人”。

彭静智，河北省高阳县八果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907年与佟麟阁结婚。婚后不久，佟麟阁投笔从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哨兵。彭静智在家抚育子女、孝敬公婆。她勤劳节俭、乐于助人，家里田里活计样样都行，乡亲们都夸她是个好媳妇。

佟麟阁入伍后，因好学耐劳、善于练兵带兵，得到冯玉祥的赏识，由哨兵旋为哨长，逐渐擢升，1925年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这时，佟麟阁将彭静智接到部队。彭静智当了军官太太，仍然保持农家女子的风尚，克勤克俭，简衣节食，教养子女，照顾丈夫。她跟随佟麟阁南征北战，历尽艰辛。她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纺纱织布，为将士做鞋、缝衣服，支援前防。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称她是“模范夫人”，号召军官家属向佟夫人学习。北伐战争时期，佟麟阁率十一师由陕西东出潼关，进入河南，攻占洛阳、孟津后，在黑石关与奉军展开激战。因敌军封锁，交通受阻，军饷不济，严重影响到了战事的进展。彭静智不惧艰险，化装成村妇，机智勇敢地穿越敌军封锁线，把军饷及时送到前线，解决了军队急需，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因此，她深受将士的敬佩。

佟麟阁任高级将领后，依然过着粗茶淡饭的平民生活。1932年10月，冯玉祥将军为了抗日，由山东泰安到张家口找佟麟阁，磋商组织抗日同盟军事宜。当时佟麟阁代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对冯玉祥将军的爱国行动积极支持。彭静智十分了解冯玉祥，便以小米面窝窝头、大萝卜咸菜招待。冯玉祥吃得十分香甜，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大官，还不失农民本色，难能可贵。”

后来，彭静智把年老的公婆接到身边奉养，既尽儿媳孝敬之情，又免得佟麟阁为二老挂心。佟麟阁常对子女说：“我事业成就，一半归功于你们的母亲。”他还把夫人的贤德撰拟成词，刻于手镯，赠予夫人：

> 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七七”事变时，佟麟阁将军指挥陆军第二十九军坚持抗战，喋血南苑，壮烈殉国。彭静智怕公婆经受不住打击，一直隐瞒佟将军牺牲之事。时间久了，二老每日倚门望归，彭静智乃以佟将军之名，伪拟家书，念给公婆听，以释其悬念。

吉鸿昌拜妻为师

吉鸿昌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将领，他治军有方，享有威名。在生活中，他是一位贤德的丈夫。他诚心拜妻子胡学英为师，在军中传为美谈。

胡学英，兰州女子师范毕业，文静善良，多才多艺，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她受进步老师的影响，喜欢阅读革命书籍，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妇女缠足及买卖婚姻。

1926年，吉鸿昌率军驻防兰州，戎马倥偬，三十一岁尚无妻室。吉军军纪严整，吉鸿昌又常做一些兴利除弊、为国为民的好事，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当时芳龄二十二岁、待字闺中的胡学英对吉鸿昌早有所闻，对他十分倾慕。后经人介绍，二人相识。经过一段时间互助了解，双方都很满意，不久结为恩爱夫妻。婚后，胡学英改名为胡红霞。

吉鸿昌幼年失学，常苦于知识不足，军务之暇自学不辍。他对妻子胡红霞的才学十分钦佩，决心拜妻子为师，学习古文、诗词、书法和音乐。开始，胡红霞连称不 敢当，后来见吉鸿昌态度十分诚恳，便自认为师了。有一天，胡红霞进屋，见吉鸿昌正伏案苦学，暗自嫣然一笑，装出一副严师的样子说："孺子可教也！"吉鸿昌也以小学生的样子说："学生不才，承蒙恩师栽培！"胡红霞走到跟前，认真地看着

吉鸿昌写的文章说："你进步很快呀！"吉鸿昌开心地说："若要会，跟着师傅睡，学生与恩师同床共枕，随时点化，何愁顽石不开！"胡红霞亲昵地捶了吉鸿昌一下说："又瞎扯了，再多嘴我不教你了。"吉鸿昌忙说："学生不敢了，老师宽恕。"说罢，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有一天，吉鸿昌的勤务兵交给胡红霞一封信，发信地址是兰州，字迹似吉鸿昌所写。胡红霞心中纳闷，拆开一看，果然是吉鸿昌写给自己的。信中汇报了他的学习收获，并表达了对她的思念和感激之情，建议今后经常通信，通过写信交流感情，提高写作水平。胡红霞立即写了回信，同意吉鸿昌的建议，并赞扬了他刻苦自学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敬佩和牵挂之情。从此，两人无论生活在一起，还是暂时分离，都书信往来不断。写信成了他们夫妻之间交流感情，互相勉励，甚至说悄悄话的重要方式。同居一室，朝夕相见，而书信往来不绝，这成为吉鸿昌亲朋好友中的又一美谈。

胡红霞认真细致地教，吉鸿昌一丝不苟地学，他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夫妻感情也日渐深厚。"九一八" 事变后，吉鸿昌主张团结抗日，1933年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高举抗日大旗，组织抗日同盟军，英勇杀敌。

1944年11月，吉鸿昌在北平壮烈牺牲，胡红霞闻讯痛不欲生。在入殓遗体时，胡红霞发现吉鸿昌贴身的小褂口袋里有张字条，写道："不要告诉我太太知道。不要厚殓。"胡红霞看着吉鸿昌熟悉的笔迹，顿时昏厥过去。

韩复榘与“才女”高艺珍

韩复榘是河北省坝县人，自幼家贫。少年读书虽刻苦用功，但天资欠佳，学无成。参军后，当了北洋陆军一名士兵。1910年参加冯玉祥等人发动的滦州起义有功，当上团长，此后又升迁旅长、师长。至1927年，韩复榘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当上了第六军军长兼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是冯玉祥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

当年，韩复榘的部队驻扎在天津杨柳青。杨柳青与他的家乡坝县相去很近，他驻扎此地，可谓“衣锦荣归”，其姻缘所成也在此时。

当时古文家高步瀛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大儒，也是坝县的大绅士。韩衣锦还乡时，有人向韩和高建议：韩总指挥今任要职，宜续弦以得贤内助。高老先生的千金小姐当为韩最合适的配偶。高先生的爱女名叫高艺珍，平日秉承家训，有良好之家教，是位才女。只因高女择婚甚苛，已到二十八九岁尚未出嫁。好事者这么一说，真是英雄配美人了，韩复榘当然很高兴，高先生也慨然应允。很快，韩、高结为秦晋。高艺珍虽为才女，天赋亦佳，但对古文的兴趣并不浓，而对北方流行的弹词书《再生缘》、《锦上花》、《天雨花》无比喜爱。

后来韩复榘开庭审案，大部分皆由夫人枕边提示。结婚不久，韩复榘做了河南省主席，继而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这期间，高艺珍不断教他多投权门拉关系，多巴结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要，与老上司

冯玉祥划清界限。此策果然奏效，蒋介石将韩复榘调任山东省主席，让他占了块好地盘。

韩复榘官运亨通，对高艺珍更是言听计从，奉夫人为最高秘书长，连官员任免也事先征求夫人意见。也可以说，韩氏的施政决策，决定权操在高艺珍手中。高艺珍的唯一希望是把丈夫调教成弹词书中那样的“英雄”和“清官”。韩氏在山东被恭维成“韩青天”，自然多半是夫人枕边陶冶之功。

抗战初期，韩复榘因丢失国土、贻误军情被处决。照理，他家搜刮来的财产理应归公，可是高艺珍本事很大，她戴孝前往收尸时，跑到冯玉祥那里长跪不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她一个未亡人带五个儿女无以为生的困苦。冯玉祥那时是军委会副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总司令，权位仅在蒋介石之下。他见高艺珍凄凄惶惶，于心不忍，尽管韩复榘在“中原大战”中倒过自己的戈，但毕竟还是自己的 下级。冯玉祥叫高艺珍不必担心，财产全部归她。于是，高艺珍把全部家产辗转运到香港，后来她也避居香港。

陶成章与孙晓云的婚恋

陶成章，浙江绍兴陶堰人，系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称他为“浙江革命党魁”，鲁迅誉之为“革命的真正实行家”，孙中山赞他“对革命有巨功”。陶成章与夫人孙晓云的一段十分奇特的婚恋，则鲜为人知。

孙晓云，浙江上虞崧厦人，系辛亥革命时期的女革命志士。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毅然离家出走。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她先后认识了尹锐志、蔡元培、陈其美等革命人士。

陶成章在蔡元培的资助下，于1902年8月东渡日本。同年10月，孙晓云在陈其美的帮助下，亦赴日本求学。随之，她结识了袭宝铨等留日学生中的骨干人物。之后，她又通过袭宝铨的介绍，认识了陶成章。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使孙晓云有缘与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相识。不久，她参加了同盟会，并担任该会总部的联络工作。1907年1月，陶成章也加入了同 盟会。

没多久，他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兼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这为陶成章与孙晓云之间互相了解提供了便利条件。

1908年夏，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一些人在革命斗争策略和南洋募款

问题上发生了龃龉，加之汪精卫以及一些保皇党人从中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扩大之势。陈其美原对陶成章有成见，这时竟错误地认为陶成章要独树一帜，与同盟会分庭抗礼，于是想方设法要控制住陶成章。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陈其美等决定派孙晓云去陶成章身边执行这一任务。就这样，孙晓云先加入了光复会，继而住进东京光复会的机关所在地，以监视陶成章的行动。

孙晓云在与陶成章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发现，陶成章不但对革命事业赤胆忠诚，对同志真心实意，而且学识渊博，生活俭朴，不谋私利。陶成章高尚的情操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改变了对陶成章的看法。孙晓云遂改变了陈其美定的行动计划，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尽量沟通光复会和同盟会两者之间的联系，常向两会成员作说服和解释工作，以促使双方尽快停止相互攻击，重新团结合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观察和思考，孙晓云终于决定：不仅要在政治上赞同陶成章的革命主张，支持陶成章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而且以身相许，作陶成章的终身伴侣。

陶成章和孙晓云于1909年在东京结婚，他们的证婚人是陶成章的好友、同乡周树人（鲁迅）。婚后，夫妻感情弥笃，夫唱妇随。1911年5月，陶成章与孙晓云的爱子陶珍于东京出生。

陶成章与孙晓云结成伉俪之后，陈其美等人控制陶成章的图谋落空，不免恼羞成怒。后来，陶成章被刺殒命于上海广慈医院，孙晓云携幼子陶珍隐姓埋名亡命上海滩。

烈妇曹庄

1989年是同盟会首义烈士刘道一的夫人曹庄女士去世八十周年。昔时闻烈妇事迹，尝不胜感慨，潸然落泪。今将所闻记录于此，以资纪念。

曹庄女士，湖南长沙人，处士曹祖尧之女，自幼受诗礼之训，性格开朗而刚强。稍长，就读于周南女校。适刘道一在长沙修业学堂读书。在反清秘密活动中，二人相识，情意日笃，终成伉俪。夫妻恩爱，窗前灯下常一同探讨反清救国之道。曹庄善良贤淑，又善女工，深得翁姑喜爱，妯娌间亦十分和睦。

1904年，长沙起义失败，刘道一随兄揆一东渡日本留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曹庄深明大义，变卖自己的环钗首饰，以补其川资。此后，夫妻异地而心心相印，飞鸿不断，相互勉励。刘道一尝在信中以鉴湖女侠秋瑾为范例，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也是革命力量”等语鼓励妻子努力求学。曹庄不负夫望，重返周南女校读书，极其刻苦，且以反清宣传为己任。

1906年秋，刘道一受同盟会东京本部派遣，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夫妻重逢，曹庄不避危险，全力协助刘道一。刘道一被俘后，她又四方奔走营救。斯年12月31日，刘道一壮烈牺牲于长沙浏阳门外，刘母收尸扶棺归葬于湘潭狮子山。家人知曹庄深爱道一，为防不测，

秘不以闻。其嫂黄自珍曾有诗记其事云：

尸舆拼入草堂中，婶尚金钱卜吉凶。

不料曹庄与夫心神相通，一夕忽梦夫已大去，旦而质问诸嫂，嫂不能隐，只得告之以实情。曹庄闻后一恸而绝，愈时方苏，掩面长号，泪如泉涌，欲一死以殉夫。幸得翁姑妯娌轮流劝慰、日夜防范，而终有转意，许以守节，承继夫志，侍奉双亲。曹庄至孝，每闻翁姑哭声便强忍泪水，勉装笑脸，登堂劝慰。然而话未出口，自己却先大放悲声。

刘揆一夫妇为使弟媳节哀，以己子立为弟嗣，曹庄亦很同意。然而夫仇未报，隐痛在心，悲愤之情，无可遏抑。她常常一个人躲在幽室里，伴着如豆的孤灯，哀哀哭泣。1909年2月5日，曹庄终因悲伤过度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其嫂黄自珍哭弟媳诗曰：

家家爆竹颂元日，正是娥媚死幽室。

曹庄死后，与刘道一同葬一处。民国元年，二人遗骨合葬于长沙岳麓山爱晚亭畔。墓碑为谭延闿所题，上书：“刘道一烈士、曹庄烈妇之墓”。据说该墓至今保存完好，景仰祭奠者常年不断。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 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

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 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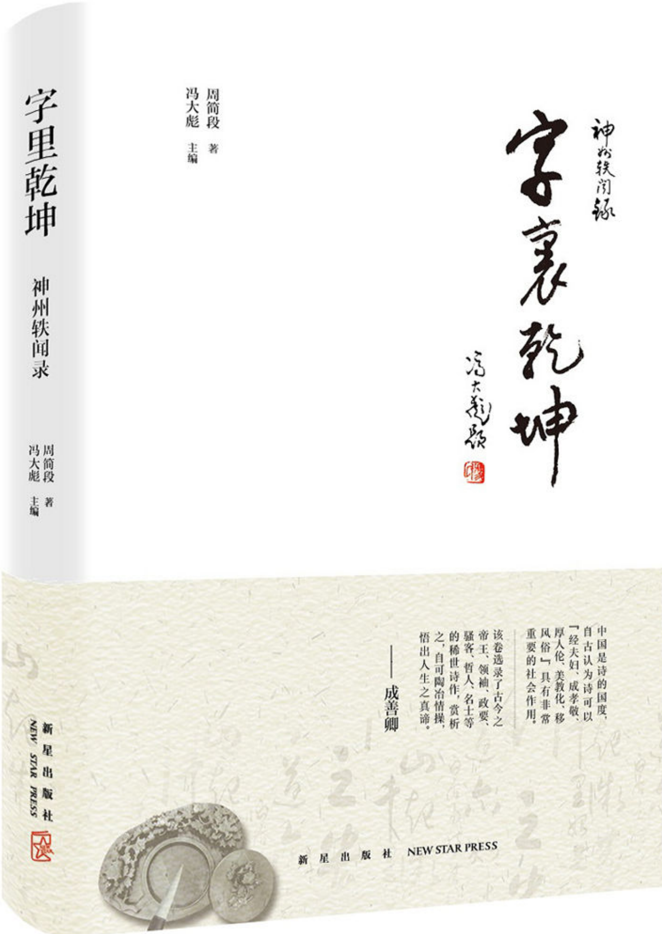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

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 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字里乾坤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
该卷选录了古今之帝王、领袖、政要、骚客、哲人、名士等的稀世诗作，赏析之，自可陶冶情操，悟出人生之真谛。
——成善卿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字裹乾坤

神州轶闻录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里乾坤 / 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7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40-7

I．①字…　II．①周…　III．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12号

字里乾坤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2.62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40-7

定 价：39.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诗话杂录

- 康熙题扇含教喻
- 吴趼人的《正名诗》
- 黄遵宪的赴港诗
- 迁客骚人咏澳门
- 康有为塞外题诗
- 章士钊与胡适之的文白诗斗
- 北大教授共赋《除夕诗》
- 蔡元培的题画怀乡诗
- 郭沫若巧改祝寿诗
- 郁达夫赋诗文官考试
- 郁达夫教嫂学诗
- 徐志摩观潮写《海韵》
- 柳亚子诗会毛泽东
- 柳无忌的嵌名诗
- 于右任嫁女诗陪嫁
- 叶恭绰港京诗词
- 诗赠盗贼
- 林林总总禁赌诗
- 讽喻世事的“剥皮诗”
- 趣改《千家诗》
- 奇巧“回文诗”

妙趣横生数字诗
十二属相诗
北京竹枝词
神仙院的藏头诗
佳联览胜
奇联与妙对
有趣的巧对悬联
趣说嵌兔联
有趣的嵌名联
医联杂谈
青帘沽酒话联谜
白话对联有雅趣
数字联撷趣
名胜叠字联拾趣
广告诗联
草木联话
妙联讽贪官
弥勒佛前趣联多
科举制度趣联
戏台趣联
会馆戏台多佳联
对联入戏文
趣谈婚帖对联
旧式婚礼作喜联
巧对佳联配佳偶
京城妙联拾趣
京城门对
石家大院的匾额
婺源“书乡”多楹联
名山胜景佳联多

- 望江楼上三联对
- 青城山长联
- 有趣的石门“绝对”
- 桂平西山赏联

名家联趣

- 历代状元对联摭忆
- 金圣叹刑场对佳联
- 李翰林寿联挂正位
- 半副对联千两价
- 挽左宗棠联记趣
- 张之洞的妙联佳对
- 梁启超集宋词联
- 孙中山妙联应对张之洞
- 毛泽东的楹联
- 鲁迅题联万千情
- 胡适题联海泉居
- 章太炎妙语成联
- 郁达夫虎豹别墅题联
- 叶圣陶为车夫撰春联
- 张大千丹青妙手写佳联
- 马寅初的寿联
- 华罗庚妙对惊人
- 蔡锷征联应对
- 杨度撰挽联
- 于右任撰联
- 挽孙中山之长联
- 冯玉祥喜书对联
- 白崇禧题联之谜

汉字摭拾

- 书“福”赐“福”

清代文字狱
闲话京津匾额
孔庙进士题名碑
酒令种种多奇趣
年龄称谓谈
古今数字趣谈
趣说北京的“三”和“四”
有趣的“拆字”
打灯谜
茶谜
中华字谜第一碑
有趣的高考“谜题”
巧用谐音兆吉祥
药名谐音表情意
名人名字多趣味
“书通二酉”源何处
“三味”与“三昧”
“鲁鱼亥豕”出笑话
“风月无边”话“虫二”
“藁城”之“藁”字趣谈
北京土话颇有味
言简意赅的北京谚语
俏皮北京歇后语
北京胡同改雅名
约定俗成儿化音
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
王懿荣与甲骨文
甲骨文专家王襄
金文专家容庚教授
语言奇才赵元任

现代名人之造字
“一字师”的故事
“幽默大师”林语堂
刘赶三嬉笑怒骂皆成戏文
施今墨巧抄妙处方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冯大彪先生主编之《神州轶闻录》系列丛书《字里乾坤》卷，嘱余作序，在下愚钝着实惶悚，颇有言不及义而贻笑大方之虞。然对旧雨雅意却之不恭，故勉为其难，斗胆序之。

《神州轶闻录》，乃香港著名文史作家周简段先生之力作。周先生文章洋洋洒洒，包罗万象，且言微旨远，非通人达才而莫能为也。而冯大彪先生则有识才尊贤之慧眼与懿德，曾通过友人为周简段先生开辟专栏长达十年之久，从而使周先生的感旧文章如源泉奔放，一泻千里，妙绝时人，赢得海内外广大读者交口赞誉。冯大彪先生功德无量矣！

经冯大彪先生重新审订的《神州轶闻录》系列丛书，是供不同阶层读者了解祖国风土人情、遗闻轶事的文化套餐，是一份翔实、隽永而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其中的《诗联闲话》卷，涉及掌故颇多，尤具文学与艺术魅力。

《字里乾坤》包括“诗话杂录”、“佳联览胜”、“名家联趣”、“汉字摭拾”四部分内容。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该卷选录了古今之帝王、领袖、政要、骚客、哲人、名士等的稀世诗作，赏析之，自可陶冶情操，悟出人生之真谛。

楹联起源于桃符，是唐代格律诗中的对偶句发展演变成的文学形式，有“诗中之诗”的美誉，系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大凡深谙律诗与楹联者，其童年时必在塾师督导下笃学《声律启蒙》和《训蒙骈句》，将“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千山对万水，九洋对三江”等等按韵分编的“对子歌”背诵得滚瓜烂熟，从而得到语言、平仄等方面的训练。自古迄今，擅撰楹联的名家层出不穷，传世佳作俯拾即是。该卷所涉及的近代与现代诸多楹联名家，有扭转乾坤的一代伟人，也有纵横捭阖的政客；有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有驰骋文坛的才子；有学优才赡的教授，也有独步天下的画坛巨擘。其作品有短联亦有长联，有奇联亦有巧对，有园林佳联亦有庭院门对，有叠字联亦有嵌名联，有数学联亦有白话文联，可谓洋洋大观、妙趣横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白话文，律诗与楹联被束之高阁，旷日弥之，致使迄今青年一代已不能领略欣赏这种至善至美的传统文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令人欣慰的是，冯大彪先生辑录并出版《字里乾坤》，实乃弘扬民族文化之举措。该书犹如甘霖，必将滋润久旱的禾苗茁壮成长。

姑作此序，聊为芹曝之献。

成善卿

2005年7月13日撰于两耕堂

诗话杂录
shihua zalu

康熙题扇含教喻

康熙皇帝自幼聪慧好学。他五岁开始读书，亲政后，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每天让人在弘德殿为自己讲儒学，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学识渊博者。

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一天，康熙来到翰林院，除了视察外，主要是与翰林们探讨“上陈道德，下达民隐”的学问。康熙顺手将自己带的一把白绢折扇放在桌子上，走进里屋。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一位叫王鸿绪的编修从外面进来，他是不久前才到翰林院供职的。此人很清高，平时谁也不放在眼里。他一进门，便看见了康熙放下的那把白绢折扇，打开一看，扇面光洁，并无字画。王鸿绪连声叹道：“可惜呀可惜，这么好的扇面怎么没有书画增辉呢？”说罢扬眉一想，何不自己在上面题诗一首呢？于是，他苦思冥想起来。然而，想了半天也未想出好句子，只好把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写上：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可是不知是写得匆忙还是记得不牢，写时竟把“间”字漏掉了。

写的工夫，康熙出来取折扇。他见王翰林正在扇上题诗，不禁一

愣。王鸿绪见是皇上到来，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康熙接过扇子，不看则已，一看哭笑不得。王翰林竟将人人熟知的《凉州词》写漏一个“间”字，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康熙直言道：“书法很好，只是不该丢掉‘间’字。”王翰林一看，果然如此。他又惊又慌，填上吧，有损章法；不填吧，又不成句子。这时，他灵机一动，躬身禀道：“陛下，我录的不是王之涣的《凉州词》，乃是学写的一首长短句。”遂读道：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康熙听罢十分恼怒，明明是误笔，却还要巧言辩解，真是胆大包天。想到老一辈翰林的谦恭之态，又不禁一阵惆怅。老翰林们相继去世了，进来一批新翰林，水平差了一大截。眼前这个四十出头的王翰林，竟如此轻狂、胆大妄为，实在应教训他一番。正要开口，又忽然想到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新老替代是势之必然。看样子，眼前这位王翰林反应机敏，头脑倒还聪明，杀杀他的狂傲之气就行了，何必苛求重责呢？

想到这里，康熙转怒为喜，微微一笑，要来笔墨，沉吟片刻，在折扇另一面写下这样一首诗：

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
平生壮志衰如许，诸事灰心赖逼真。
求简逡巡多恍惚，遇烦留滞累精神。
年来词赋荒疏久，觅句深惭笔有尘。

康熙写罢搁笔，将这把折扇赐给了王翰林。在这首诗中，明为叹岁月不居，伤形骸日颓，暗含的却是教喻、劝责之义。

吴趼人的《正名诗》

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闻名文坛的清末谴责小说家吴趼人，原名吴沃尧，字小允，广东南海（今广州）人，生于1866年，卒于1910年。吴趼人幼年居佛山镇，故以“我佛山人”为笔名。他二十五岁时到上海谋生，经常为报纸写文章。

吴趼人性格平易近人，且又幽默风趣。初到上海谋生时，他为报章撰稿以“茧人”作笔名，寓意“作茧自缚”，自叹写作之苦。吴趼人二十七岁时，有位女士为他在扇子上题字，误将“茧人”写成了“茧仁”，他看后苦笑道：“看来我要成为僵蚕了！”为了避免以误传误，他干脆把“茧”字改为“趼”字。但是，这个“趼”字很生僻，不常用，很多人不知道“茧”、“趼”二字同音，所以常将“吴趼人”读作“吴研人”或“吴妍人”。这令吴趼人哭笑不得，于是，他不得不写了一首《正名诗》。诗云：

余自二十五岁以后，改号茧人。去岁又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做“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姓氏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身。

古砚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

类似的正名诗，他还写过：“试问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

人。”

吴趼人一生创作颇丰，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还写《俏皮话》连载于《月月小说》。在《俏皮话自序》中，他幽默地说道：“我平时喜欢说笑话，大庭广众的场合，只要我一到，人们必说‘某某人来了’。我一开口说话，众人常被逗得捧腹大笑。”他这种“善诣谑”的性格，形成了他的嬉笑怒骂的创作风格。

此外，吴趼人还写了大量的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戏曲、笑话、寓言等。他日夜写作，戴着厚厚的眼镜，趴在案头笔耕不辍。不到十年时间便发表上百万字作品。

吴趼人的文思极为敏捷，下笔千言，一气呵成。他只要一忙起来，就不注意饮食，平时又嗜酒如命，常常以酒代饭，有时一个月之内只喝酒吃菜而不吃饭。久而久之，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三十九岁写完《九命奇冤》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后，就因过度劳累，得了“闻声则惊”的虚怯之症。经医治，虽有好转，但留下了哮喘病。

宣统二年（1910）初，他感觉身体状况不好，便对友人李怀霜说：“我会算命，恐怕活不过今年了！”果然于当年9月1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四十四岁。

吴趼人才高八斗、著作等身，生活上却穷困潦倒。死后家无余财，衣袋里只剩两枚银元，朋友们集资为他治丧。一个月后在他创办的“广志学堂”开追悼会，参加者有数百人之多。大家写来大量诔文、挽联，追悼会相当隆重。

黄遵宪的赴港诗

黄遵宪，字公度，清末著名诗人。他曾三度到过香港，每次都留下了诗篇。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香港的风情。

黄遵宪第一次到香港，是在同治九年，即1780年，他当时二十三岁。这年秋天，黄遵宪从家乡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到广州应乡试，没有考上。回乡时他曾绕道去香港游览，写下了《香港感怀》组诗十首，第一首是：

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
为谁刈藜蓼，遍地出芙蓉。
方丈三神地，诸侯百里封。
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

第一句是黄遵宪初到香港的印象：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弹指几十年间，出现了许多高楼大厦，不知是从何处飞来的山峰？接着就揭露“遍地出芙蓉”的丑恶现象。这里的芙蓉，不是芙蓉花，而是毒品阿芙蓉（鸦片的别名，明人《医学入门》载：“鸦片一名阿芙蓉”）。当时英国以香港为基地，向内地倾销鸦片，这一罪恶贸易是香港迅速“繁荣”的重要支柱。黄遵宪自注说：“以鸦片肇祸，开港后进口益多。”结尾说“居然成重镇”，指香港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主要基地，而且深沟高垒，泊舰屯兵，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军

事要地。

诗人初到香港的感触，可以说是相当敏锐的。

在这组诗中，黄遵宪谴责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割地求和，抒发国土沦丧的无限悲痛。最后一首是：

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
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
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
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黄遵宪自注说：“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遣使马甘利来朝，即以乞地为言。”提及乾隆曾经严词拒绝英方乞地供“夷商停歇”和“夷商居住”的要求，揭露眼下清政府割地求和、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

年轻诗人的强烈爱国之情，反映了19世纪中叶中国许多有志之士的愤懑心境。

黄遵宪第二次到香港，是在十五年后。他又写了《到香港》一诗：

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
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

一别十五年了，香港仍然飘扬着异国旗帜！

又过了五年，黄遵宪再过香港，百感交集之余又写下了《自香港登舟感怀》，最后两句是：“龙旗猎猎张旃去，徒倚栏杆独怆神！”

二十年间，黄遵宪三过香港，始终“不见黄龙上大旗”。百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黄公的是，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正是：“喜见五星上大旗！”

迁客骚人咏澳门

澳门在粤江口三角洲南端，旧名濠镜，因这里有天后宫，当地人称为妈阁，又称妈港。明嘉靖年间，澳门租赁给葡萄牙人通商；崇祯初年葡萄牙在此设官；清光绪十三年（1887）立约，清政府允许葡萄牙管理澳门，但不得让于他国，中国于此设关征税。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但被外国霸占长达四百七十四年（1551～1999），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澳门的丧失而悲愤交加，挥笔吟诗抒发爱国热情。

明末反清斗士张穆当年登临望洋台时，写下五言古诗《澳门览海》，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澳门的雄姿：

生处在海国，中岁逢丧乱。
紊怀数十年，破浪已汗漫。
故人建高纛，楼船若鹅鹳。
因之慰奇观，地力尽海岸。
西夷近咸池，重译慕大汉。
宝玉与夜珠，结束异光灿。
若梦游仙瀛，金官赤霞烂。
危楼切高云，连甍展屏翰。
水上多神山，青削屡续断。
澄波或如镜，一叶亦足玩。
尔及长风回，气色忽已换。
狂澜渺何穷，万里生浩叹！

明末清初隐居澳门的志士、诗人屈大均登临西望洋山，写有一首五律，描述当年澳门船来帆往、繁荣兴旺之景象：

浮天拜水力，一气日射空。
舶口三巴外，潮门十字中。
鱼飞阴火乱，虹断瘴云通。
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

清初到澳门的画家吴历，著有《三巴集》一书，有一首咏澳门议事亭的诗：

晚堤收网树头腥，蛮蛋群浊酒满瓶。
海上太平无一事，双扉久闭一空亭。

澳门议事亭设于明代，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商讨贸易、办理居住事宜之地，后为“澳门总督”亚马勒所毁，1784年之后改建为市政府。

清代香山县李珠光作有《咏澳门》五律两首，切时，切地，文字瑰丽，为人称颂。其中一首曰：

孤城天设险，远近势全吞。
宝聚三巴寺，泉通十字门。
持家蛮妇贵，主教法王尊。
圣世多良策，前山锁钥门。

汤小薇女士寄我一组章士钊书写的《澳门四绝》，原诗为：

一

四百年前一海门，蒲桃初乱汉并番。
紫诠往事渔山画，几度词人问种源。

二

区区赌国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计年。
隐隐扶余记人物，张坚怎抵一何贤。

三

卌载经过荷汉思，香山百里铁藜繁。
地文初次登行卷，对客摊诗录澳门。

四

槊杯夜识金银气，披雾朝窥士女颜。
浮世伶仃洋上客，梦回乍别喀罗山。

章士钊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出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与汤小薇女士之父汤澄波交往很深。1957年夏天，章士钊把这首《澳门四题》赠予汤澄波。诗后小注云：“右澳门四绝句，午夜腹稿所成，明日为澄波兄哂正。丁酉夏章士钊。”诗中章士钊联想到文天祥在港澳之间海面上写的名诗《过零丁洋》，叹惜四百多年前澳门被外国占领，现在成了赌场。诗中还提到澳门知名爱国人士何贤，何贤为澳门第一特首何厚铧之父，1983年去世，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1925年发表了热血沸腾的《七子之

歌》，将中国被列强侵占的七块土地比喻为七个儿子。其中关于澳门的几句：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姓名？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语言铿锵有力，感情真挚炽热，这深情满怀的诗句，就是诗人的呐喊，是澳门人的心声——我要回到祖国怀抱！我要回到母亲怀抱！

当时，闻一多刚从海外归来，目睹祖国的贫穷落后，深感痛心。但他没有消沉，以笔作刀枪，揭露黑暗，歌颂理想，写了大量诗作：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你猜得透火山的沉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天晴一声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诗中大量运用了隐喻手法，表现了诗人对民众革命的信心。在诗人遇难四十三年后，澳门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诗人在天有灵也该欣慰了。

康有为塞外题诗

1924年冬，康有为应幼年时期的好友陈重远之邀，从苏州北上，到达塞外张家口。

1月19日（农历十二月十四日）清晨，康有为在六十多位乡儒、乡绅和好友的陪同下，游览了张家口的古长城、大境门和玉皇阁，继而登临赐儿山云泉寺。

云泉寺乃塞外著名古刹，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此处海拔一千米之多，峭壁如削，万木峥嵘，亭台楼阁古色古香、错落有致。一条石阶路由北趋南，盘旋而上，犹如白色长龙隐现在繁茵之中。时年六十六岁的康有为神采奕奕，拾级而上。由于年事已高，攀登不多时便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因感于“山川缟素，天地一白”，遂作《雾雪云泉寺》诗一首：

山县关城早，天寒日暮愁。
夕晖千白雪，吾爱云泉寺。
日出松石上，诗清情复幽。
后人今不见，应共忆此游。

康有为题诗后游兴更浓，便沿着羊肠小路迤逦而上，过万松亭，直达山巅。群山在脚下，远处长城蜿蜒如巨龙，他俯瞰张家口全景，心胸豁然，感慨万千，不由又吟诗一首：

行行积雪里，
渐入浮云端。
前路青天近，
冷冷诗骨寒。

随后，康有为在众人的指引下，来到云泉寺大殿西崖下，观赏了风、水、冰三个洞，听友人讲述了这三个洞的由来及奇妙的传说。康有为听后又诗兴大发，旋即写下了一首八句五言诗：

崖石青天里，
悬洞堪称奇。
仙人原有宅，
醉语亦成诗。
凝静听崩雪，
山空闻折枝。
平明出谷口，
险尽尚惊疑。

在康有为兴致勃勃之时，友人又陪他到寺院依崖阁欣赏崖上历代文人墨客的壁上题诗。其中有曾与康有为同朝为官的御史安维峻、礼部右侍郎志锐（珍妃的哥哥）的题诗。这两人因上疏弹劾慈禧、李鸿章，被流放塞外，在游云泉寺时留下了诗句。

康有为在下山途中，看到云泉寺殿顶上有深绿色的脊兽，极为惊奇。乡绅士们解释说，这是明朝的遗物，乃嘉靖皇帝去五台山敬香时带回来的。康有为仔细看后，确认是明朝的遗物，连连称道。

1924年1月22日，康有为告别张家口，途经古城宣化稍停，然后返回北京。

章士钊与胡适之的文白诗斗

胡适之自幼饱读诗书，成年后却竭力倡导白话文。而同时期的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拼命反对白话文，大骂白话文。1925年正月，胡章二人在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有人给章照相，章便邀胡合影。之后章士钊在送胡适之照片时题了一首白话诗：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我不驳，
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给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之毫不示弱，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给章士钊：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章诗写于这一年2月5日，胡诗写于2月9日。今日重读二诗，的确也使人感到“好作文学纪念看”，章士钊真是言中了。

《甲寅》杂志号称“老虎报”，它一律登文言文，在广告中说：“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章士钊于1925年9月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10月又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以《甲寅》为阵地，对新文化运动发起猛攻，一时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高一涵、郁达夫、成仿吾等都奋起还击。胡适之在《京报》副刊《国语周报》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予以还击。文中引了章送他的那首白话诗，因为诗中有“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一句，所以题目说“又反叛了”。胡适之在文中说《甲寅》广告中不登白话文的话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

章胡在文章中争论十分激烈，但私下饮馔相逢，还是十分客气的。有一次在上海，汪原放[1]请客，座上有章士钊、胡适之、陈独秀。胡适之当面对章士钊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士钊却也不生气，汪原放十分赞赏他的雅量。

---

[1] 现代出版家、翻译家

北大教授共赋《除夕诗》

1918年，胡适执教北大，应某杂志编辑之请，写了一首诗，题名“除夕”：

除夕过了六七日，
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
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1]请我吃年饭，
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
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
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
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
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
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

预备明天寄与“他”[2]！

胡适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也是第一个用白话写诗的名家。这首诗也如胡适的其他白话诗作一样，平直如话。

当时，同在北大任教的刘半农，也有一首以“除夕”为题的诗：

一

除夕是寻常事，
做诗为什么？
不当他除夕，
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
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
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
把长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3]
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4]，
欲造”蒲鞭”[5]，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扰，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一个我！
天上三五寒星！

此诗风格平直如胡诗，但除夕夜犹与周氏兄弟议文艺工作，较之只是吃饺子、海参、津梨，含义似更胜一筹了。

---

[1] 孟和即陶孟和，社会学家，时亦任北大教授

[2] 当时第三人称都用“他”字，尚无“她”、“它”二字，这里“他”当为“她”

[3] 鲁迅和周作人

[4] 希腊神话中掌文艺之女神

[5] 日本杂志中倡文艺批评之栏目名

蔡元培的题画怀乡诗

蔡元培先生是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博精群籍，学识宏富，思想进步，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

蔡元培先生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家乡绍兴度过的。蔡元培中年以后，荣膺重任，离乡日久，但对故乡风物仍心向往之，且时时处处予以关怀。他说："吾辈既为绍兴之人，则绍兴一切之事，非即吾辈之责任乎！"他曾遍游越中山川和名胜古迹，并多有诗词流传，如《游绍兴石佛寺题名记》、《重修贺秘监祠记》等，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1934年，年逾花甲的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仍致力于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倾注心力。他经常往返于沪宁道上，席不暇暖。这一年的12月中旬，蔡元培的同乡挚友——时任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居住在南京的陶冶公怀抱一叠乡人陈庆均先生所作的《越州名胜图》，送请蔡元培过目题词。蔡先生逐一浏览，赞赏不绝，欣然在扉页上题七绝一首：

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常萦魂梦间。
最羡卧游若有术，十篇妙绘若循环。

诗的落款是"廿三年十二月蔡元培"九个字。

12月17日，蔡先生请人给陶冶公送去这首题诗，并寄去一封短

笺：

冶公先生公鉴：

承枉顾，领教为快。属题越州名胜图已题一绝，奉璧，请正之，并候日绥。

弟蔡元培敬启

蔡元培的这首怀乡诗和十幅《越州名胜图》，后由陶冶公装裱成册页，精心保藏，后来一并捐献给了绍兴市人民政府，收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

郭沫若巧改祝寿诗

剧作家于伶早年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俄文法政系出身，在戏剧、电影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抗日战争期间，于伶坚守在上海“孤岛”，组建了“上海剧艺社”，公演了大量的抗敌剧作和世界名剧。他的创作十分迅速，有时为了紧跟抗战的形势，干脆不打底稿，直接用钢板、蜡纸赶写剧本，剧艺社同仁则日夜赶排，以便尽快搬上舞台。他写的几十部宣传抗日救亡的“国防”剧作，有几部在沦陷区和大后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五幕剧《花溅泪》和《夜上海》均写于1939年。《夜上海》还被改编拍成电影。该剧以主人公梅岭春一家人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活动为线索，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抒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心声。《杏花春雨江南》是《夜上海》的姊妹篇，叙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岭春一家人返回故乡，和当地抗日救国军一道，为保卫乡土家园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长夜行》反映了上海沦陷前后爱国文人和敌伪的斗争，以及社会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大明英烈传》以明代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借古论今，宣扬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国人抗日救国的勇气和信心。

1943年，于伶来到陪都重庆，住在一座小山上的玉皇观里。他同夏衍、宋之的、章泯、金山、赵铭彝等人成立了中国艺术剧社，请陈鲤庭、史东山、司徒慧敏、郑君里等组成导演班子，由金山、蓝马、王苹、凰子、张瑞芳、叶露茜、路曦、秦怡、顾而已、陶金、吴茵等组成强大的演员阵容。剧团成立后，第一炮由宋之的编剧、洪深导演

的《祖国在呼唤》打响。紧接着，章泯导演的曹禺两部近作《北京人》和《家》先后上演。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赢得四川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赞赏，竟先后演了八十六场。

这年2月23日是于伶三十七岁生日。夏衍、廖沫沙、胡绳、乔冠华等欢聚一堂为他祝寿。众人在小酒馆的火锅席上联成一首祝寿诗：

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
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

诗成之后，众人请郭沫若写成条幅。郭沫若吟咏并细细品味祝寿诗后，觉得诗韵虽佳，亦将于伶的几部代表作和他的年龄拼组得天衣无缝，但作为祝寿诗，其情调略伤于悱恻，有低沉之感。于是沉吟片刻，笔走龙蛇，将原诗改为：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

虽然只改换了几个字，重排了句子的次序，但诗韵铿锵，豪情满纸，调子比原诗高出一筹，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

郁达夫赋诗文官考试

友人寄来一本新出版的郁达夫先生的诗集，收集的诗不多，其中一首写于1919年10月19日，题为“晨进东华门口占”：

疏星淡月夜初残，钟鼓严城欲渡难。
耐得早朝辛苦否？东华门外晓风寒。

诗后作者自注：“今日为高等文官考试之第一日，余起床时，刚三点半，微月一痕，浓霜满地，进东华门时口占一绝云。”这诗写得十分潇洒，颇有些清朝新进士入朝殿试时的余风遗韵。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经过几百年的沧桑，到1904年正式废除。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制定了高等文官考试和普通文官考试的办法，不定期地举行考试来遴选官吏。文官考试有政治、法律、外交等科目，考中了，就可以“荐任官吏”，政治科名次在前的可以放县长，外交科名次在前的可以放参赞。郁达夫当时在东京留学，赶回北京报考文官考试，报的是外交科。

报考高等文官，由各省地方官推荐，到了北京，还要找两位本籍京官作保，以防假冒，被保荐的人照例要送京官一笔谢仪。清代的京官官俸极少，这笔谢仪确实补益不小。民国初年，仍然参照清代的办法，参加文官考试的人，仍然要在京的官吏（有荐任资格者）作保才能应考。鲁迅先生当时在教育部任佥事，是荐任最高级，足有资格做高等文官应试者的保人。不过郁达夫当时的保人是谁就不知道了。考

试的地点是在故宫文华殿，所以郁达夫披星戴月，大清早要赶到东华门等候点名领卷。

遗憾的是这次考试郁达夫名落孙山。没有考中高等文官，便仍要到日本读书去，临行时郁达夫的哥哥赋送行诗云：

一片卢沟月，怜君万里行。
清谈当此夜，难尽别离情。

郁达夫也给哥哥留了离别诗：

迹似飞蓬人似雁，东门祖道又离群。
秋风江上芙蓉落，旧垒巢边燕子分。
薄有狂才追杜牧，应无好梦到刘蕡。
明朝去赋扶桑日，心事苍茫不可云。

郁达夫教嫂学诗

郁达夫的长嫂陈碧岑，1883年出生在安徽泗县清江浦。自幼父母双亡，虽有求知欲望，但只能自学，直到十四岁时，方得在伯父家读书数月而已。1911年陈碧岑与郁曼陀结婚后，得丈夫辅导，始读唐诗。

1913年郁达夫随兄嫂去日本时，年仅二十岁的长嫂对年方十七岁且又自幼丧父、远离家乡的郁达夫来说，确如富阳人所说“长嫂为娘”。白天郁曼陀忙公务，郁达夫入校学日文，陈碧岑做饭洗衣，料理一家人的生活。晚间弟兄二人做毕功课，才有时间谈古论今，切磋诗词。这时她也跟着学学诗，或请郁达夫辅导日文。陈碧岑回忆在日本时的生活说：“我们三人长日为伴，但达夫要谈的话，要做的事，多半先给我讲，需要经得他大哥同意的，才由我传达。我们回国后，他在日本给他大哥的信没有给我的多，光是信中有诗作唱和的就有十几封，我一直保存着，直至献给国家。”

郁达夫曾写很长的信教长嫂学诗，下面就是他1916年二十岁时所写家书中的一段：

> 吾嫂学诗，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与其失之粗俗，宁失之纤巧，女人究竟不应作‘欲上青天揽日月’语，弟意李杜诗竟可不读，入手应诵李义山温八叉诸人诗。在宋则欧阳永叔曾南丰陆剑南诸家诗可诵。元明人诗，弟未曾披读，故不敢言。然而王世贞、李东阳诸家不合使闺阁中人模仿。吴梅村诗，风光细腻，

唐宋诗之集大成者。家中有全集在，可取读之。不必半年，行见吾嫂之诗句较香菱更敏丽矣。清朝诗唯王渔洋全集可诵。赵瓯北、袁子才诸家诗瑕不掩瑜。近人樊樊山、陈伯严诸人诗则大抵画虎不成之狗矣。沈归愚尚书，最喜用好看字面，昔人之所谓“至宝丹”也。然女流诗人，正不可少此至宝丹。究竟堂上夫人，本文庵中道姑为愈耳。弟诗虽尚乏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路。有人赞“乱离年少乏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曼兄再三戒弟以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也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之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

陈碧岑于1982年在上海病故后，学林出版社为她和郁曼陀合出了《郁曼陀陈碧岑静远堂诗集》，其中收有她1914年写的《奇怀达夫弟二首》：

犹忆他乡同作客，哪知今日独思君。
一家羁旅留京国，千里音书望暮云。

扶桑西望是长安，横海风波道路难。
何日小屏红烛底，相将斗句离盘餐。

郁达夫也有《奉答长嫂兼呈曼兄四首》，回忆那段叔嫂情。

徐志摩观潮写《海韵》

1923年8月中旬，“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在北京接到海宁家中的电报：“祖母病危速回！”得此噩讯，他日夜兼程返回故乡，唯恐迟了再也见不到慈祥的老祖母。他回到家第十一天，祖母溘然长逝。

料理完后事，徐志摩约几个好朋友同去海宁盐官观潮，好让海涛冲刷去失去亲人的痛苦。徐志摩给胡适等人写了信，信中徐志摩还写上了李白的《横江词》：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
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9月29日，被徐志摩触动了雅兴的胡适、陶行知、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高梦旦、曹佩馨等人如约到达海宁。徐志摩带他们泛舟畅谈。在船橹的咿呀声中，他们品尝了徐的家乡菜饭：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等，还一路谈诗论文，好不惬意！

一行人到了盐官，登上占鳌塔。其时还没到涨潮时间，寂静的钱塘江江面如锦缎般银光闪烁。在这平静的江面上，挂着白帆的渔船荡漾着。二十余天来徐志摩紧紧压缩着的痛苦的心，在这辽阔的江面上，渐渐舒展开来了。徐志摩说：“诸位，在我眼中，这季节仿佛忘却了春天，树枝不再展现叶子的嫩绿，更没有我所喜欢的高远处蓝天上飘过的朵朵轻云。”

就在徐志摩说话的当儿，堤岸上的几个小男孩，裤腿卷得高高的，挥手高呼道："涨潮了！涨潮了！"只见远处天际隐隐一条白线在微微抖动，转瞬间那条白线已变成万匹并驾齐驱的白马，披散着白色的鬃毛，吼着、奔着，银山浪谷、吞天沃日。潮水涌至占鳌塔前，一片青气成堆雪，白虹一线呈奇观……大潮过后，江面余波荡漾，令人回味无穷。

夕阳西下，徐志摩一行人踏着晚霞归去。堤岸上的树叶在秋风中摇曳，几片落叶悠悠地飘落在江面上。途中，徐志摩发现有一女郎正独步黄昏沙滩上。少女与大自然的景观给了诗人无限遐想，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海韵》道：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
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堂。

柳亚子诗会毛泽东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从石家庄乘飞机抵北平西郊机场，在京的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到机场欢迎。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宴会，宴请来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主客两席共二十人，除柳亚子、李锡九、黄炎培、许德珩、陈叔通，沈钧儒、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外，尚有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参加。晚宴后，柳亚子回到六国饭店，满怀激动写下了“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的诗篇，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表达了亿万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欢乐心情。

3月28日，柳亚子想赴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一时无车可乘，心情十分苦闷，作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此诗写后不久，4月25日，柳亚子便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

29日上午，柳亚子游览完颐和园回到益寿堂后得到毛泽东回赠《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

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等句。当日，柳亚子依原韵奉和两首寄呈毛泽东，表示希望长期卜居北京。

5月1日，毛泽东亲至颐和园访见柳亚子，并一起游览长廊，乘画舫绕昆明湖一周，观赏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柳亚子趁此机会“面陈衷曲”，即有心拜祭孙中山灵堂而无车可乘之苦恼。5月5日是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二十八周年纪念日。这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率卫士、摄影师，带专车接柳亚子夫妇赴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及衣冠冢，了却了柳亚子一桩心愿。晚上，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款待柳亚子和夫人郑佩宜女士，由朱德、田家英等人作陪，席间宾主“谈宴极欢”。

柳亚子非常喜欢颐和园秀丽的山光水色，在给毛泽东的诗中有“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名园真许长期借，金粉楼台胜渡江”等句，表达了他对颐和园的爱恋之情。在给子女的家信中，他也十分高兴地写道：“颐和园住得非常开心，不想还家……此地是皇宫，我们居然享受帝王之乐，也算是翻身了。”

柳亚子从1949年4月至11月，在颐和园益寿堂居住了七个月。由于益寿堂内寒冷，冬季不便居住，他便迁往北京饭店居住。1950年9月11日，柳亚子从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八十九号，毛泽东用柳亚子词中“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句，为其居室题字“上天下地之庐”。

柳无忌的嵌名诗

友人送给我一本纪念南开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的《南开大学校史》。在书的插页照片中，一眼看到了当年英文系主任柳无忌教授的旧影。

柳无忌是柳亚子的独子，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生于江苏吴江县黎里镇。在家乡读完小学，而后入圣约翰青年会学校、圣约翰中学，后升入圣约翰大学。“五卅惨案”爆发后，他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升起国旗，受到美国校长指斥，遂和一些同学愤然离校，转入清华大学。两年后，柳无忌到美国留学，在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研究中国文学。在英国与留美专攻生物学的高蔼鸿女士结婚。

1931年，柳无忌回国，在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他教课颇多，有英国文学史、欧洲小说史、英国戏剧、文学批评与英国现代文学等。当时，南开的英文系教师人才济济，如陈钦仁、司徒月兰、赵诏熊、张彭春、黄佐临等，多为留学英美的博士。“七七”事变前，为南开英文系全盛时期，出版有《人生与文学》期刊，在社会上发行。抗战初期，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迁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柳无忌在外文系任教。他在课余著有《南岳日记》，记载名胜古迹、教学趣事，以及个人生活观感，抒发满怀国难家愁之感。其间，柳无忌作有一首诗，以文学院诸教授之姓名入句，颇为风趣。诗云：

冯兰雅趣竟如何（冯友兰），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字佩弦），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洛水是耶非（沈有鼎），秉壁犹能完莹归（邓秉壁）。

养士三千江上浦（浦江清），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光廷），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为文学院教授宿舍）。

半年后，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大，柳无忌仍任外文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和戏剧两门课。1941年春，柳无忌到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和师范学院英文系执教。

于右任嫁女诗陪嫁

1921年，于右任率陕西靖国军与陕西都督陈树藩部作战期间，他的爱女芝秀出嫁，乘龙快婿是被他连声夸赞为“奇士”的屈武。

于右任为何这样连声夸赞屈武呢？原来，这位屈武在“五四”运动时就是有名的学生领袖。那时他在西安上学，和同学们一起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大标语在街上游行示威，后来被选为赴京请愿代表。到北京见到总统徐世昌时，屈武激昂陈词，坚决表示“誓死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当他讲到当时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时，愤怒地以头碰地，血流满脸。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版面刊登“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消息，屈武的爱国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称颂。后来屈武考入北京大学就读，对时局仍然十分关心，经常参加陕西的革命活动。屈武与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和总指挥胡景翼都有过接触，才干备受于、胡赞赏。

在胡景翼的撮合下，屈武、于芝秀喜结连理。但是陕西干戈不止，战事频繁，于右任身为靖国军总司令，忙于军政无暇为爱女操办婚事，无奈之下只好请夫人送爱女赴北京与屈武完婚。爱女出嫁时，于右任别出心裁赋诗为女儿做陪嫁。其陪嫁诗如下：

春风苏百草，送尔出关门。
遇合从儿愿，追随念母恩。
家庭新创造，文学旧思存。
应念空山老，诗笺印血痕。

世人如问我，勉强说平安。
百战身将老，三年枕未干。
秦兵仍奋激，民党更艰难。
素蓄澄清愿，时危肯自宽。

海上攻书日，关中省父时。
岁饥兵不饱，女大嫁因迟。
多事添媒妁，无端累义师。
人心未可测，究竟有天知。

汝婿亦奇士，青年才美誉。
忱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喜偶复谁如。

从这几首诗里，可以看出于右任对屈武的赞赏之情。他赞赏女婿的革命气概，勉励女儿、女婿要“进修齐努力”，对革命前途持乐观态度。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以诗陪嫁是十分可贵的。

于右任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逝世。他的一些诗作，如《怀念大陆及旧友》、《望大陆》等，至今在读者中广泛地传诵。尤其那首“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至今读来仍令人潸然。

叶恭绰港京诗词

叶恭绰，字遐庵。1923年，在日本神户的叶恭绰应孙中山先生之召，转道香港，到广州担任大本营的财政部长。后来广东政府欲与北方段祺瑞、张作霖合作，命他北来斡旋，所以他又北上，担任了段祺瑞执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晚年在北京任画院院长及文史馆长。1968年在动乱中去世。

叶恭绰词学造诣极深，少时曾学词于文廷式。他的书法宗何子贞一派，绘事意境亦深，《遐庵类稿》中题画诗颇多。

抗战期间，叶恭绰到香港，作有七律《沪破南归至港晤次周叔有诗见及因和》：

南还依旧作劳人，投考羞存后死身。
国运倘期贞下会，乡愁频扰定中尘。
霜筠节苦终无忝，雪栝心枯久不春。
回斡旋转应有属，几时同作太平民。

这诗后来有九叠原韵，都是在香港作的。六叠结句云："凄绝归来辽鹤语，只余城郭少人民。"九叠绝句云："匡时报国吾何有，愧托尘间作一民。"感时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1938年，叶恭绰在香港度中秋，游汲水门赏月，作词《望江

南》：

中秋月，香港景翻新。箫鼓中流凌万顷，簪裙豪气压千人。碧海正无尘。

词注说：“华灯画舫，溶与碧波间，胜概豪情，一时称盛。”

叶恭绰足迹踏遍海内外，感情最深的地方还是北京。在另一首《望江南》中他深情地描述了在北京过中秋的情景：

中秋月，孤赏翠微旁。小筑幽栖原幻住，安心是处更无乡。惆怅不能狂。

词后注云：“北平西山秘魔崖下幻住园，净持葬地也。花木荫翳，景殊幽寂，余中秋数宿此。”幻住园是叶恭绰在西山群的坟地，小有园林之胜，他元配夫人早死，就葬在这里。30年代初，他寓苏州，女儿女婿北归去西山扫墓，他拍了照片，让女儿带到墓前烧化，并赋四绝句，告慰夫人于地下。其中一首道：

土木形骸一写真，临风非复旧丰神，
故吾今我凭君认，告我今宵梦里闻。

一往情深，凄婉欲绝。叶恭绰离开北京后，曾有“离燕地四年矣，春来念幻住园中群花将发，感赋一律”之作，亦极为感人。

诗赠盗贼

盗贼打家劫舍，人们谈及往往色变。有的诗人却能坦然相对，且以诗相赠。

唐代诗人李涉乘船前往九江，夜经皖口时遇盗贼拦截。盗贼厉声喝问："船上何人？"李涉站立船头，从容回答："李涉博士。"强盗头领恰是好诗之人，久仰李涉诗才，如今得见，欣喜万分，便将杀人越货之心抛去，要求李涉赋诗相赠。李涉随口吟道：

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欣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首二句写实，记此夜与盗贼相遇的事；末二句借此发挥，对盗贼的境遇寄予深切同情，抒发对当时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腐败的满怀愤慨。盗贼头领闻诗大喜，拱手致意，让李涉的船扬帆而去。

元朝末年社会混乱，江西泰和儒生邓学诗与母亲同被盗贼抓获。为首的强盗略有诗才，知道邓学诗学识渊博，又是有名的孝子，顿生同情之心，以酒饭热情款待，并提出与邓对诗，若能对上就释放他们母子二人。盗首遂当即吟诵道：

当此干戈际，负母沿街走。

遇我慈悲人，与汝一杯酒。
我亦有佳儿，雪色同冰藕。
亦欲如汝贤，未知天从否？

诗句描述了眼前情景，表达了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有邓学诗一样的道德品质的愿望，透露出自己为盗的不得已。邓学诗被其诗打动，遂唱和道：

铁马从西来，满城人惊走。
我母年七十，两脚如醉酒。
白刃加我身，一命悬丝藕。
感公恩如天，未知能报否？

盗首听了，马上派手下人护送邓学诗母子离开。

明代老儒沈质，家贫如洗，以做塾师为生。一个冬夜，一小偷越窗而入，东翻西找一番竟一无所获。因夜寒被薄而并未入睡的沈质发话道：“穿墙的君子，劳你白走一遭，姑且送一首诗给你吧！”遂赋诗道：

风寒月黑夜沉沉，辜负劳心走一遭。
架上古诗三四束，也堪将去教儿曹。

小偷听了仓皇逃走。此事传出后，沈质安居寒舍，再无盗贼光顾。

一天深夜，同乡某人潜入郑板桥家。郑板桥被翻东西的声音惊

醒，借朦胧月光他认出了小偷。为了给对方留面子，郑板桥稍加思考便吟诗道：“大风起兮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小偷一听知道已被发觉，便在原地不敢动弹。郑板桥见稳住了小偷，遂又吟道：“诗书腹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无半文。”小偷听了，知道无油水可捞，于是转身出门。郑板桥又吟道：“出门休惊黄尾犬，越墙莫碍绿花盆。”小偷于是小心翼翼地躲开黄犬，绕过花盆。刚松了一口气，又听到两句诗传至耳畔：“夜深不及披衣送，收拾雄心往别村。”小偷尴尬地摇头苦笑，然后飞快远遁。

林林总总禁赌诗

中国人有赌博的恶习，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着许多禁赌诗。这些禁赌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今天读来仍有启迪作用。

清代吴文晖有这样一首诗：“相唤相呼日征逐，野狐迷人无比酷。一场纵赌百家贫，后车难鉴前车覆。”此诗形象地写出了赌徒沉迷赌博的情景和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清代诗人黄安涛也有一首《戒赌诗》：“已将华屋付他人，哪借良田贻祖父。室人交谪泪如雨，典到嫁时衣太苦。出门郎又摇摊去（摇摊是一种赌博形式），厨下无烟炊断午。”恣意纵赌而招致家业输光、衣食无着的窘况跃然纸上，可称为禁赌诗中的佳作。

民间流传的禁赌诗更多。有一首“合字诗”，拆字作诗，合字解义，形式独特，读来非常有趣。诗这样写道：

贝者是人不是人，只因今贝起祸根。
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戌人。

“贝者”合为“赌”，“今贝”合为“贪”，“分贝”合为“贫”，“贝戌”合为“贼”。赌、贪、贫、贼四个字，就是赌徒的必然下场。这首诗用语通俗，选词精到，意境深邃，读之朴实而清新，别具一格。

清代画家李鱔的朋友李发嗜赌，闹得夫妻不和，家里鸡犬不宁。

有一次，李发又赌，直输得身无分文。李鳝闻之，就送了李发一幅画，让他作赌资。画中的人物极像李发的妻子，还有题诗云：

丈夫在外赌红了眼，妻子在家干瞪着眼。
两个孩子饿昏了眼，梁上绳扣正张着眼。

李发看后，良心上受到谴责，于是便痛改恶习。

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耍赌八害》的歌谣，采取四字一句的形式，把赌博的危害讲得深入浅出，易读易记：

输了拼命，赢了心惊，见利忘义，翻脸无情。
打架斗殴，争吵不休，穷途末路，便下毒手。
浪费时光，危害健康，昏昏沉沉，前途无望。
通宵达旦，精神不满，干活失神，事故难免。
狼藉名声，配偶难成，纵然有家，各奔西东。
输急红眼，倾家荡产，明偷暗抢，锒铛入监。
一上贼船，再下困难，苦头吃尽，受害匪浅。
贻误后代，风气败坏，毒化社会，民族受害。

正是因为赌博危害极大，禁赌自古用重刑。先秦时代对赌博者“挞其股”，还要在脸上刺字。汉代处罚也很重，老百姓要砍断手，官吏则戴枷终身劳役。宋代更为严厉，赌博者“俱处斩，邻居庇匿不报者，同罪”。这就是说，赌博罪要杀头，知情不报也要杀头。

讽喻世事的“剥皮诗”

剥皮诗，亦称“剥体诗”。在形式上，是把前人有影响的诗句巧妙地加以改动，反映作者所处时代与社会生活；在感情色彩上，则以调侃、嘲讽为主要基调。剥皮诗起于何时何人，无从查考。所见较早的几首剥皮诗，是讽喻那些偷情却又十分惧怕老婆的懦夫的。

唐代诗人李频的《渡汉江》云：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不知何人将此诗一剥，成了这样一首诗：

外遇姻缘绝，三冬复一春。
近床情更怯，不敢问夫人。

此诗把一个偷情汉对老婆的惧怕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唐代诗人张祜的《何满子》云：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经人一剥，改为这样一首诗：

三百六十日，深居又满年。
一声狮子吼，含泪到床前。

好一个河东狮吼，确实令懦夫胆战心惊，只得到床前哭泣讨饶。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云：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有人将它改为：

阴阳不分晓，羡煞双栖鸟。
妻来呵骂声，泪落知多少。

讽喻时事世事，是剥皮诗的又一大特点。有人巧妙地借孟浩然的《春晓》，稍换几个字，嘲讽赌博：

春忙不觉晓，处处闻知了。
夜来麻将声，输赢知多少。

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云：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北伐战争时，军阀吴佩孚眼看北伐军节节胜利，便乘火车逃往洛阳。行前，他表示今后不再过问军事、政治，将以饮酒赏花而终老。谢觉哉于是剥王昌龄这首诗，进行讽刺：

白日青天竟倒吴，炮声送客火车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雄心在酒壶。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池》脍炙人口：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时下，不少所谓“名人”喜欢为人题诗，以获取“润笔费”。有人剥杨万里的《小池》讽刺之：

钱眼无声惜细流，名人照水献温柔。
小楼才露尖尖角，早有题诗在上头。

趣改《千家诗》

《千家诗》第一首曰：“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语言浅近，形象生动。民国初年，有位书生沦为乞丐，终日托钵讨饭，常常三餐不济，悲从中来，便改这首诗述自况：“乞食艰难三两天，饥肠辘辘过长川。富人不识余饥饿，将谓腰弯学老年。”无意幽默，却也让人含悲一笑，这是自嘲。

还有改这首诗来嘲笑不求上进的学生的：“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怕蚊虫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韶华易逝，青春难再，虚度光阴是令人十分可惜的。为此，好心人又特意把它改成一首劝学诗：“春夏秋冬四季天，发愤读书乐如仙。长江不见回头水，人老何曾再少年？”

这样一层层地改下去，越来越不脱“温柔敦厚”之旨，却越少打油意味了。打油味浓的，还得属《怕老婆》一诗：

雨打风吹近晓天，夫人罚跪在床前。
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拜年！

一首以渔夫、樵夫、农夫和读书人为题的代拟诗，正视社会生活，体恤各种人共有的艰辛：

临江垂钓愁雨天，负薪持斧过山川。
谁知粒粒皆辛苦，铁砚磨穿不计年。

随心所欲地改动前人的诗句，轻松自如地冷嘲热讽，固然是一大快事，但有时也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康熙皇帝南巡，江苏无锡有位书生叫杜诏，恭立在道旁献诗，引得康熙一时高兴，御赐书“云淡风轻近午天”这首诗。雍正三年（1725），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获罪，从家里抄出汪景祺著的《西征随笔》，内中就有一首拿康熙开玩笑的诙谐诗：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皇帝岂是书生们可以随便开心轻薄的？结果汪景祺被“立斩枭首”，妻儿也被流放黑龙江，罚做边卒的女奴。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市流传过这样一首《官儿夜宴》诗：

云淡风轻不夜天，炮龙烹凤摆华筵。
时人不识官儿阔，将谓天天活神仙。

奇巧“回文诗”

所谓“回文诗”，是指一首诗正读、倒读或反复回旋阅读，都可以成诗的一种诗体。据专家考证，回文诗的创始人是晋代的傅玄和温峤，但他们所作的回文诗都已失传。查阅历代古诗集，可以看到有不少文人墨客的回文诗。

宋代的苏东坡曾写过一首题为“题织锦图”的回文诗，诗曰：

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梧桐。
人随雁远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

如果把这首诗倒过来读，则又是一首情意浓浓的七言绝句：

空阁绣帘疏映雨，暮城边远雁随人。
梧桐半月低凉夜，草碧余花落晚春。

宋代另一位诗人李禺也作过一首抒情回文诗。这首诗如果顺读，是一首夫忆妻的诗：

枯眼遥望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这首诗如倒读，则可变成一首妻忆夫的诗：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望遥眼枯。

在这两首诗中，一方是“枯眼望”，一方是“望眼枯”，读来贴切感人。

明代诗人蒋一葵也曾写过一首题为“咏春”的回文诗，全诗只有“莺啼岸柳弄春晴晓月明”十个字。如果从前至后顺读之后再从后到前倒读，便可发现它是一首生动再现江南美丽春景的七言绝句：

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月明。
明月晓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

读之可见诗人卓然的才华和巧妙的构思，言语中充满了节奏美和艺术美。

近代一位叫溥行的文人写过这样一首趣味无穷的回文诗《咏春》：“清波碧柳春归燕，细雨红窗映落花。”如果把它倒过来读，便会有面貌一新之感：“花落映窗红雨细，燕归春柳碧波清。”无论顺读倒读，平仄对仗均十分工整，从跃然纸上的浓浓诗情中，不难看出作

者高深的艺术造诣。

另外一首只有“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十四个字的回文诗，如果分别从第一、第四、第八和第十一个字开始回旋而读，便可欣赏到一首出神入化的七言绝句《赏花》：

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
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还有一种特殊的回文诗，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正读为诗，倒读却是词，且都符合格律。此类诗以《七律·春日晚眺》最为著名。其诗曰：

翩翩蝶舞柳飞花，碧水泉流鸣鼓蛙。
烟锁树林林宿鸟，雾笼村树树栖鸦。
船归渔唱渔舟荡，水绕山重山影斜。
天晚耀辉光灿灿，过云彩映飞流霞。

若是倒读，则可得一首《虞美人》：

霞流飞映彩云过，灿灿光辉耀。
晚天斜影山重山，绕水荡舟渔唱，渔归船。
鸦栖树树村笼雾，鸟宿林林树。
锁烟蛙鼓鸣流泉，水碧花飞柳舞，蝶翩翩。

相传清代北京有个誉满京城的饭庄叫“天然居”。一天，乾隆皇帝私访回京，到饭庄用餐。回宫后，乾隆闲坐无事，便用“天然居”几字

作对，得上联：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上联出来后，始终找不出理想的下联。于是，乾隆召集诸大学士，让他们对出下联。因为上联的后五个字是前五个字的逆读，而且词句通顺，意思完整。众人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下联。正当大家伤脑筋之际，大学士纪晓岚朗声道：

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乾隆闻之，龙颜大悦，众人莫不交口称绝，一时传为宫廷佳话。现在，这副回文诗联就挂在浙江省新昌县大佛寺内。

宋代刘敞写过一首《雨后》回文诗，也相当精妙：

绿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
竹深啼鸟乱，庭暗落花残。

此诗倒读为：

残花落暗庭，乱鸟啼深竹。
寒色砌苔青，冷光池水绿。

这首诗无论顺读或倒读，都是一幅潇潇秋雨之后的庭院图景。

更有意思的是，茶杯上常有四个字“清心明目”，随便从哪个字读起，皆可成句，如“明心清目”、“心明目清”、“明目清心”、“目清心明”，无论怎么读，意思皆不变。流传很广的五言回文“可以清心也”，也常见写在茶具上，同样可以随便从哪一字读起，字顺句通，如“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还有七言的回文句“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常写在茶具上。这是一句别出心裁的回文佳句，与前面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一日无此君不”、“一日无此君不可”、“日无此君不可一”、“无此君不可一日”、“此君不可一日无”、“君不可一日无此”。

北京前门“老舍茶馆”的两副对联，也是回文诗联。一副是：

前门大碗茶，茶碗大前门。

此联妙语偶成，令人叹服。

另一副回文诗联更绝：

满座老舍客，客舍老座满。

此联既点出了茶馆的特色，又巧妙揉进了人们对老舍的赞赏和热爱。

妙趣横生数字诗

数字在文章诗词中使用得当，不仅能使诗文生辉，而且还别有一番情趣。

宋代理学家邵康曾作五绝一首：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诗人巧妙运用数字，描绘出旅途的风光，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朴素自然的乡村景物画。读来朗朗上口，其味无穷。

清代陈沅有一首七绝：

一帆一桨一渔舟，
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场笑，
一江明月一江秋。

全诗以“一”为脉络，用得灵巧轻快，内

含“独”、“一”、“满”、“全”等多种含义，写人状物绘声绘色，极富诗情画意。

有一则以数字应考的故事，有一书生进京应试，因路途遥远，行程艰难，误了考期。经再三恳求，方准补考。但主考官要他用“一”至“十”作诗一首，考生灵机一动，趁此机会用诗申明误期原因，以求谅解：

一叶孤舟，
坐了二三个骚客，
启用四桨五帆，
经过六滩七湾，
历尽八颠九簸，
可叹十分来迟。

考官读罢，心中称奇。又命书生用“十”至“一”再作一诗，书生挥笔写下：

十年寒窗，
进了八九家书院，
抛却七情六欲，
苦读五经四书，
考了三番两次，
今天一定要中。

主考官点头称妙。

相传司马相如赴京做官几年，思念卓文君，给她写了封信。文君

拆开一看，信中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二个数字。卓文君知道司马相如的思念之情，遂回信一封：

一别之后，二地相思，
只说三四月，谁知五六年，
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
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
百思想，千系念，
万般无奈把君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
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
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
七月半烧香秉烛问青天，
六月伏天摇扇我心寒。
五月石榴如火，
偏遇阵阵冷雨落花端。
四月枇杷未黄，
我欲对镜心意乱。
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
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
噫，郎啊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在这封信中，卓文君巧妙地运用数字，先从一说到万，再从万回说到一，九曲回肠，一咏三叹，催人泪下。

十二属相诗

想到十二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忆起一首十二属相诗。

十二属相诗乃明代诗人胡俨所作，诗巧妙地嵌入了十二个属相，读起来不仅通俗易懂，而且饶有兴味。

诗的前两句是：“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难相见。”这两句嵌入了“鼠”和“牛”。诗的表面意思是说，像鼷鼠这样的小老鼠，哪能把河水喝干呢？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甚远，见一面是相当难的。而诗的内涵却寓意在“难”字上，劝人们做事要看条件，从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

诗的三四句是：“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诗的三四句，巧用典故。古代有个“诛南山之虎”的故事，说的是有个人赤手在南山打虎。这两句诗表面意思是说，空手捉虎需要勇气，而上月亮取那只捣药的玉兔，更要有顽强的毅力。这两句与前两句相辅相成，告诫人们做事固然要量力，但是还需要勇气和毅力。

五六句：“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相传，骊龙是龙的一种，它下巴上有颗珠，怕别人取走，故而常常不敢睡觉。“画蛇添足”是个成语，比喻做多余的事，反而不恰当。这两句劝人做事不要被物所累。

七八句：“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马生角是不会有

的事，而公羊用头上的角去撞篱笆，角一定会卡到篱笆里去，也是白白愤怒。这两句是劝人们不要空自忧烦，自找苦吃。

九十句：“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邱。”“沐猴而冠”是个典故，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即猕猴，意为猴子戴帽子，装成人的样子。“祝鸡”，意为呼唤鸡。语出《艺文类聚·博物志》：“祝鸡公养鸡法，今世人呼鸡云‘祝祝’，起此也。”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不要笑话楚人沐猴而冠，也不要每天过着呼唤鸡那样过于清闲的生活。告诫人们，既要生活得自由自在，又要做切合实际的事情，要有所作为。

最后两句：“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舞阳”，指舞阳侯樊哙，樊哙跟随刘邦起义之前，在沛县宰卖过狗；而汉武帝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曾在东海边放过猪。这两句告诫人们，人穷志不能短，普通人也能成大业。

北京竹枝词

20世纪30年代初，西藏班禅喇嘛从青海玉树到北平，一些要人发起“时轮金刚法会”，在太和殿传法。法会举行时，组织者向各界名流募捐，吴佩孚、张宗昌、曹汝霖等均到会，并各捐200元。然而张宗昌于次日去山东，不久在济南车站被郑全声之侄郑继成所杀，显然未受佛之庇佑。时人作《竹枝词》讽之云：

茫茫苦海正无边，
愿证菩提隔世缘。
佛力未随王气歇，
万人空巷拜班禅。

“九一八”事变后，强邻侵境，国事日急，而京城一些士女依然纸醉金迷，忙着筹备在北海漪澜堂前举行新年化装溜冰大会。偏偏是年气候特异，一冬无雪，和暖如春。等筹备事竣，湖水解冻矣，筹备者大为扫兴。有《竹枝词》记云：

寒暖不殊气候更，
去年无雪一冬晴。
银雪空作化装舞，
太液池波已解冰。

东北三省沦陷后，当局毫无收复抗御之策，而徒将故宫珍宝装成大箱，悄悄运往南京。有《竹枝词》讽之云：

山河不重连城璧，
退让堪为步步营。
御路森严同警跸，
飚车载宝夜无声。

袁良任北平市长时，市政当局于太庙开设商场，陈列百货，市民竞相购物。庙东侧古柏林中原有鹤，树上有鹤巢，因畏嘈杂而避去。有《竹枝词》感慨其事云：

登场百货各争标，
太庙翻成市井嚣。
野鹤不知人世改，
将雏相避远离巢。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在冀东成立伪政权，并直逼通州。此时北平已成边城，风声鹤唳，大有草木皆兵之势，而故宫太平花正于5月盛开。有《竹枝词》哀云：

风鹤频传刁斗鸣，
可怜上国作边城。
年年五月惊烽火，
不信名花号太平。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北京各界人士以为从此太平，孰料上下贪贿之风大起，金融崩溃，物价飞涨，国事益不堪言矣！而极乐寺海棠，春来依旧。有《竹枝词》叹云：

又见娇红濯锦尘，
海棠犹似去时春。
只今倾国倾城事，
不是名花与美人。

神仙院的藏头诗

北京延庆县有处龙庆峡，龙庆峡最高峰玉皇顶上有个神仙院，院门口有两首藏头诗，据说系当地一个叫白乐三的道人所题。

其一为：

天青山云接
泉茫茫总是
觅道人何处
舡来问渡头

第二为：

洞园桃得到时机
共却深便鼓钟心
神见明稀星闻使
仙斗下夜上不世
看牛高来天远一
象移吟李白诗间
棋少神仙来聚会

这两首诗嵌刻在神仙院大门两侧墙壁上，游人一般都要驻足猜度，最后大多是摇头而去。还是神仙院内执事人道出谜底。第一首原是七绝，第一个字先作两个字起读，再以第一个字整字收尾，这样读来就是：“一大青山云接天，白水茫茫总是泉。不见道人何处觅，舟工来问渡头舡。”前两句描绘的是龙庆峡的自然风光，青山高耸，直入云霄，周围山涧，瀑布如练，山间清泉处处。后两句写事，道人也许前来觅道友一叙，但不得，就连舟子也无以询问。

第二首原是七律，比第一首难读多了，主要是难找其头。其读法是，以中心字“夜”为开始点，逆时针转，上句最后一个字的一半，为下句首字。如是读来全诗则为：“夜来天上星稀明，月下高吟李白诗。寺远不闻钟鼓便，更深却见斗牛移。多少神仙来聚会，人间一世使心机。几时到得桃园洞？同共神仙看象棋。”诗难读，旨更远。全诗表现出道人苦苦修炼，难成正果的痛楚。“几时到得桃园洞？同共神仙看象棋。”正是道人内心的表白。在神仙院旁有处景观，曰“仙人下棋”。远远观去，山石似人，两人端坐，手指棋局栩栩如生，还有侍从立于侧。

神仙院只是一处普通的小庙。不过，这里佛、道、儒三教合一，大殿上释迦牟尼居中，其右为李耳，其左为孔子。殿中壁画也是三教内容都有。这种庙在中国比较普遍，老百姓很实际，多多信奉，东边不亮西边亮，“总会有神保佑的”。

佳联览胜
jialian lansheng

奇联与妙对

在我国众多的优秀联语中，有一些对联因构思巧妙、结构奇特、意境深远而备受人们喜爱。

早年，北京草厂胡同有一家馄饨铺，兼卖汤圆（元宵），铺内挂有这样一副对联：

宇内江山，如是包括；
人间骨肉，同此团圆。

上联点馄饨，下联切汤圆，点明小店经营特色，而“包括”、“团圆”语义双关，用词极妙。

前些年，北京有一家药店贴过这样一副对联：

神州到处有亲人，不论生地熟地；
春风来时尽着花，但闻藿香木香。

联中的“生地”、“熟地”、“藿香”、“木香”都是药材名，语义双关。全联风雅别致，诙谐有趣。

早年亦曾见过另一种诙谐联，也相当有趣，联曰：

二艇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上联中的“橹速”与三国时孙权的谋臣鲁肃谐音，“帆快”与刘邦的大将樊哙谐音，此上联之意是文不如武。下联中的“笛清”与北宋名将狄青谐音，“箫和”又与汉初的名相萧何同音，言下之意是武不如文。据传，上联是一个武将写的，下联是一个文官对的，双方都不明说，但妙语双关，含蓄而诙谐，妙趣天成。

辛亥革命后，某地一剃头铺写有这样一副对联：

握一双拳，打尽天下英雄谁敢还手；
持三寸铁，削平大清世界无不低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曹锟贿选总统，有人运用“嵌字法”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此上联中将“民国”嵌入，下联中将“总统”嵌入，均在四个分句之首，组成四个文言句式，对仗工整，天然啮合。而全联又斥“总统”“不是东西”，对当时徒有虚名的民国总统给予辛辣的嘲讽，实在令人叫绝。

1924年5月，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前几期学员中涌现出了大批

有名的军事人才。犹记当年黄埔军校的大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有趣的巧对悬联

多少年来，形形色色的佳联妙对流传于世，“联坛”生辉。但是，也有一些佳句未能“成双配对”；或者虽有下联，但下联并不尽如人意。

犹记有一副回文联的上联写道：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此联相当精巧，征下联求偶，曾有以下数联应对，但都不太理想：

京北输油管油输北京。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西湖绿柳堤柳绿湖西。
华南红花岗花红南华。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举办征春联活动，出的上联是：

碧野田间牛得草

此上联是一位作家、一位诗人、一位豫剧演员的名字。应征者如云，有一联对的是：

金山村里马识途

下联的前二人是著名演员，第三人是著名作家。对得基本得体。

偶对悬联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以自然风物为载体，便能结缘配对。有这样一副上联：

日照日照县

上联的意思是："太阳照着日照县"，日照县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名。有一人对出下联是：

月亮月亮湾

"月亮湾"也是个地名，第一个"亮"字，是"照亮"的意思。

应对悬联常常有偶然的巧合。清光绪年间，江西南昌有一位知县，因支持教民反抗主教的斗争而被杀害，激起公愤。北京有个叫江亢虑的教师在江亭（陶山亭）为其举行追悼会，当时有一学生即出了个上联：

江氏江亭追悼江西江县令

此联一连用了四个“江”字，且字句简练，层次分明，与会者赞不绝口，但无一人能对出下联。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悬联”。

百余年后，江苏泗洪县大楼乡的老教师许若峰在翻阅史料时得知，泗洪县朱湖乡臧桥村有一革命志士臧庚，1943年任县民政科长时，被敌人杀害于安徽省泗县的臧楼村。臧庚的长子臧庆栋每年清明节都要到臧楼缅怀父亲。许若峰老师灵机一动，便对出了下联：

臧子臧楼缅怀臧桥臧科长

此下联对仗工稳，含义深刻，堪称佳句妙对。

由于偶对实在不易，至今仍有许多上联无人对出下联。其中有这样一个上联：

鸟在笼中望孔明，想张飞，无奈关羽

此上联别出心裁，构思奇特，三国人物孔明、张飞、关羽尽嵌其中，且一语双关，人名改变了词性，下联至今无人对出。

趣说嵌兔联

长江沿岸，有一副流传很广的时令对联，联中有兔，很有情趣：

兔走鸟飞，地下相逢评月旦；
雁去燕来，途中偶遇说春秋。

兔因身体洁白，又传说月亮中有捣药的“兔儿爷”，故成为月亮的代称。欧阳修的《蓦山溪》中说，日中有“三足鸟”，又言“日乃鸟之精”，故鸟成为日的代名词。于是古诗中便有“兔走鸟飞不相见，人事依稀速如电”语，感慨日月更替，时光飞逝。此联“兔走鸟飞”，感叹时间流逝之快。雁和燕都是候鸟，一个冬来春去，一个春来冬去，途中相遇时，也彼此诉说时间过得太快。

山西省介休韩信祠有一副对联曰：

西望关中，百战十年空鸟兔；
北临绵上，千秋一例感龙蛇。

上联说，虽然韩信会用兵，但最后是可悲的下场；下联说，萧何虽然救了他，最后还是害了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上这种事，恐怕千秋只有此一例。此联巧妙用典，对仗工整，怀古抒情，既

赞美韩信的功业，又叹他的不幸。

明代神童戴大宾，五岁读书，出口成对，闻名乡里。邻村有位塾师想找个机会探探虚实。戴大宾六岁那年，塾师来家探访，遂以戴的座椅为题，出了上联“虎皮褥盖学士椅”。因这个椅子上铺着一张虎皮褥子，故上联如是云。戴大宾知道这是有意考他，便以自己写字用的兔毛毫笔为题，对出下联“兔毫笔写状元坊”。下联一对，塾师不胜惊讶，称他为奇才。

四川武胜县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

水月观鱼跃兔走，
山海关虎啸龙吟。

武胜县龙女寺的河对面有一个“水月观”，常年游人如鲫。有一位文人，站在水月观细端详，见观下鱼儿嬉游，又见观后树林中野兔奔跑，遂写出上联“水月观鱼跃兔走”。第二年，这位文人又到了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看了山海关的景物灵感顿发，写出了下联“山海关虎啸龙吟”。

贵阳人周渔璜（1665～1714），清康熙年间赴京应试，取进士。一天，他到了江南的碧波洞，此地一书生给他出了个上联：

赤耳银牙玉白兔，望明月，卧青草池中。

这时，周渔璜见碧波洞口正有金龙昂首，铁爪黑须，周围祥云衬托，于是对出下联：

乌须铁爪紫金龙，驾祥云，出碧波洞口。

物对物，景对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绝妙至极。

江南神童吴文也曾将“兔”字嵌入对联。一天，家里来了客人，看到蚕正在吐丝作茧，联想到自己身上的衣服，便出了个上联：

蚕作茧，茧抽丝，织就绫罗绸缎。

正在书房里的吴文听到上联，看看手中用兔毛做的毛笔和桌上的文章，马上应声对出下联：

兔生毛，毛做笔，写出锦绣文章。

当时吴文仅是七八岁的孩童，能出口对出此联，可见“神童”之号名不虚传。

有趣的嵌名联

嵌名联，是我国异彩纷呈的联苑里的一枝奇葩，深受人们的喜爱。众多的嵌人名联，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幽默诙谐，奇巧别致。

明代才子李梦阳，在江西做提学副使时，发现有个读书人与他同名同姓，便给那人出了个上联：

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相如又作“相同”解。李梦阳的意思是，两个相如不相同，你怎敢与我同名同姓？那个读书人明白李梦阳的意思，遂对出下联：

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

魏无忌是战国时魏国的信陵君，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时期的大臣。读书人的意思是，他们都不忌讳，我们也无须忌讳了。下联弦外有音，对得相当绝妙。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字复生，“戊戌变法”失败后遇害。康有为写了一副挽联：

有为，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康有为把自己和死者的名字嵌入联内，形式较为奇特，抒发了悲愤和无奈的心情。

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四十岁诞辰时，郭沫若赠联祝贺：

具田家浑憨气概，
扬汉族刚毅精神。

这副对联巧妙地嵌入“田汉”二字，既写出他那农家出身憨厚朴实的性格，又高度赞扬他高尚的民族精神。

郭沫若曾赠著名画家李可染联：

可否古今尽人事，
染点翰墨侔天工。

这副嵌名联作于抗日战争时期，既赞扬李可染绘画的高超技巧，又含蓄地启发他扩大国画的题材。

著名武生泰斗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河北省高阳县人，有“活武松”之誉。他的代表剧目是《三岔口》、《十字坡》等。早年，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特赠一副对联给他，联曰：

英名盖世三岔口，

杰作惊天十字坡。

这副对联不仅对仗工整，艺术性很高，而且将他的原名“英杰”及两个代表剧目嵌入联中，十分精当。

著名作家老舍写的嵌名联，通俗凝练，脍炙人口。记得他曾赠著名作家巴金一联：

云水巴山雨，
文章金石声。

联中嵌入巴金的名字，并对他的著作给予极高评价。

医联杂谈

旧时有句老话：“一流举子二流医。”在当时人们眼中，医生之地位仅次于做官入仕。宋代的范仲淹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便是这个道理。过去的医家，一般皆通晓儒学。由儒入医，在宋代竟成风气，辛弃疾、陆游等皆通医，便是例证。历来写医生的诗词联语不少，掇拾一二与雅好者共赏之。

记得有一副赠牙医联，仅八个字：

没齿无怨，每饭不忘。

此联虽短，却将两个典故信手拈来，毫无掉书袋之感。上联出自《论语·宪问》“没齿无怨言”。“没齿”，原为“没世”、“终身”之意，此借其字面意思喻祛除牙病。下联用杜甫之语：“忠君忧国，每饭不忘。”借以表示对牙医之感激，浑然天成，巧思极矣。

还有一副牙医联，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易牙能知味，凿齿故多才。

仅十个字，既合典故，又切牙医身份，兼述本人感受，颇富情趣。表面看，“易牙”似指换牙，“凿齿”似指拔牙，实则典故暗含其

中。易牙乃春秋时齐桓公宠幸之近臣，长于调味烹饪；凿齿为晋时名士，博识而擅文。以人名喻事物已见其巧，而换牙后之快意，对牙医高明医术之赞颂，亦俱含其中矣。琢语精妙，堪称上乘之作。

笔者藏有《对联集成》一卷，为光绪甲辰（1904）重刻本，烟台诚文信藏校，收各类对联甚详，其中“医卜”类收对联六副，兹录以飨同好：

采药云生岫，吉林飞紫燕，卖卜君平市；
烧丹月在庭，桔井起苍龙，谈玄扬子家。

春暖带云锄芍药，不必洛阳寻郤子；
秋高和露种芙蓉，何须西蜀问君平。

桔井泉香千文碧，虎守杏林春日暖；
杏林告发万枝红，龙蟠桔井水泉香。

青囊已得华公秘，
杏苑先开董子春。

身值千金取药何须问价，
心同一体活人岂必言功。

脉理精通药材一纸千金价，
经络纯熟神针三分万人生。

这些联语文采巧思，典饰回文，各有所胜，读者自可细细品玩。

青帘沽酒话联谜

旧时酒肆门前都挂有酒幌子，也称“酒旗”、“酒帘”，酒肆门上一般还写有酒联。民间流传着许多酒联和有关酒旗的谜语。

记得有一首拟人化的民间谜语：

早晨出门夜晚归，飘飘摇摇随风飞。
我请人家喝个醉，无人请我喝一杯。

读了这则谜语，似在酒文化的圈子里闲逛了一圈，自然地想到谜底——酒幌子。飘飘扬扬是酒幌子的外观，请人喝酒，是幌子的内涵。“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这迎风招展的酒幌子，分明是乡野村郭的一道迷人风景线。

旧时的酒幌子，常以青白布数幅做成帘状，大多是长方形，所以叫青帘。南宋词人辛弃疾有《鹧鸪天》词云：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

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虽酒香也不怕巷子深，所以有经营意识的酒家还是要借酒幌子来招徕顾客。从酒旗的大小、多少，顾客们可以知道酒店的规模与经营情况。一般说，凡挂较小的单酒旗，说明

是经营单一品种酒，只供应一般酒菜的小店；凡挂酒旗越大、越多者，其经营档次越高，犹如今日酒店星级标志。

关于酒幌子的灯谜，古往今来流传着不少。“围墙半掩酒家旗”，猜一字，可谓上乘之作。这里采用了象形手法，“口”象形为围墙，“半掩”便把个“沽”字一半（古）给围成个“涸”字，其创作手法可谓新颖别致。古代酒幌子中间常写个斗大的“沽”字，这是以字代旗。

与酒幌子相映成趣的是酒联。酒联与酒幌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为了招徕顾客。顾客在雅兴高昂之时，品酒赏联，把盏玩味，自有一番乐趣。

茅台酒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酒，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被评为金质奖。当时主选人送了副对联赞道：

酒味冲天鸟闻成凤，
酒糟抛河鱼食化龙。

对联用夸张手法写茅台酒的珍奇，作者的想像力令人赞叹。茅台酒载誉归来，又有人赠联：

风来隔壁三家醉，
雨过开瓶十里香。

好的酒联还可以救店。相传，某地有个酒店，因经营不善生意萧条，濒临倒闭。后请三位秀才写了副对联，贴在酒店门口：

东不管西不管，酒管；

乐也罢哀也罢，喝罢。

从此，这家酒店顾客盈门，一派兴隆景象。原来此联一语道破了当时民不聊生的境况，劝慰人们借酒浇愁。

广州潮州的韩江酒楼上有这么一副对联：

韩愈送穷，刘伶醉酒；
江淹作赋，王粲登楼。

此联套用曾贬为潮州刺史并写过《送穷文》的唐代文学家韩愈等四位名人的典故，上下联首冠“韩江”二字，尾嵌“酒楼”二字，匠心独具，十分贴切。

广州陶陶居酒家有一联：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

联语中含有四个古人故事，告诫后人饮酒应有节制，光阴需要爱惜。

白话对联有雅趣

作对联是一门学问，白话对联能做出雅趣更难。

陈寅恪是一代史学大师，作对联时有佳作。陈寅格所作对联，每于不经意时为之，信口吟出，即成佳对。1927年他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同在讲席者有王国维、梁启超。授课时，他即席吟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为康有为高足，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为溥仪之师，故陈寅恪有此即兴之作。

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出任校长，持其所编《科学与玄学》谒见陈寅恪，并求指正。是时丁文江、张君劢等正就科学和玄学问题进行论战。陈寅格对论战双方均不以为然，便送罗一对联：

不通家法科学玄学，
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并以“儒将风流”为横额。上下联中将“家伦”二字嵌入，妙手天成。罗家伦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又娶了一位漂亮妻子，故云“儒将风流”。

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时，曾集句为联：

今日不知明日事，
他生未卜此生休。

时陈寅恪病目，复忧世道人心，心情甚坏，乃有此作。

1931年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遇难，蔡元培写挽联云：

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骑马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此联豁达自然，如谈玄理，颇有魏晋风度，乃为白话联中之上乘。

鲁迅小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老师寿镜如出了个上联“独角兽”，有的学生对“八脚虫”，有的学生对“九头鸟”，鲁迅却对了“比目鱼”，受到老师称道。因为“独”不是数，却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却有“双”的意思，对得极妙。

二字对联比较少见，也有一些名联。相传明成祖朱棣说《论语》中的“色难”很难对，大臣解缙说“容易”，朱棣说既然容易，你对个下联如何？解缙说：“容易”二字便是下联。朱棣略加思索后拍案称奇。

传说乾隆皇帝一次出游时出了个上联“两碟豆”，让纪晓岚对下联，纪晓岚脱口而出“一瓯油”。乾隆闻之，立即改上联为“两蝶斗”，纪晓岚也随之改下联为“一鸥游”。乾隆马上又说：“我说的是林间两蝶斗。”纪晓岚立即又答道：“我对的是水中一鸥游。”

数字联撷趣

中国的绝对佳联，犹如一颗颗精巧奇异的明珠，散落在中国的文学宝库。在这星光璀璨的楹联星河中，嵌入数字的占有很大比重。细心人曾作过统计，数字联在全部楹联中占60%还多。这些数字联，或歌颂山河，或咏志抒怀，或抨击时弊，或刺贪讽腐，或友人唱和，或谈笑人生，读来都非常有趣。

相传，旧时两友同登临江楼赏月，面对星光闪烁、波光粼粼的美景，一人说出上联：

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

另一人闻之，脱口对出下联：

南楼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

上联巧妙用了“七”、“十”、“四”三个数字，而下联用“孤”（即一）、“一”、“双”（即二）三个数字。上下联用在水中的影子幻化成数字来对句，观察细腻，构思奇巧，意境优美，艺术效果非常强烈。

有一副数字联是反映地主与雇工天壤之别的生活景况的：

十根金龙柱，十颗小圆珠，十对宫灯十红十绿；
一只青花碗，一个大缺巴，一双筷子一白一乌。

上联一连用了五个“十”字，表现地主花天酒地的生活；下联连用了五个“一”字，表现雇工的穷困生活，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读之有趣且含义深邃。

在数字联中，有的是明明白白嵌入数字，有的却比较含蓄隐晦。这种类型的数字联大多用来讽刺和揭露。袁世凯乃近代窃国大盗、复辟狂，有一副对联是为他画像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横批是：

五世其昌。

上联省略了一个“八”字，寓意“忘”（王）八；下联隐去了一个“耻”字，寓意“无耻”。横批上的“昌”，是“娼”字的谐音。由于数字运用得巧妙，对袁世凯痛骂之狠入木三分，读之令人解气。

有时，含蓄隐晦的数字联也用于歌颂。有一数字联是概括诸葛亮一生的：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摆金木土圭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上联只用一至十这十个数字，就把诸葛亮一生的奇功伟绩勾勒出来了；下联用“五方”（东西南北中）和“五行”（金木水火土）来对上联的十个数字，同样表现了诸葛亮一生的功绩。

乾隆皇帝喜好文学，能吟诗作对，且有不少佳话逸事流传。在他七十寿辰时，曾自撰一联曰：

七旬天子古六帝，
五代孙曾余一人。

这副数字联用数字相当准确。历史上帝王年过七旬者仅六位，在这六人中，五代同堂者仅乾隆一人，故云“五代孙曾余一人”。

名胜叠字联拾趣

中国的对联是点缀门庭、园林，烘托节日喜庆气氛，表达情感和良好祝愿的艺术形式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名胜中的叠字联趣味无穷，为旖旎秀丽的自然景观增姿添色不少。

上海豫园的万花楼，游廊画亭，回环通幽，秀木异卉，鸟语嘤嘤，美不胜收。楼上有副叠字联：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风风雨雨，花花草草，年年暮暮朝朝。

游人观景赏联，赏心悦目，游兴倍增。

泉城济南的千佛山，相传是帝舜耕稼之处，峻峰叠翠，苍秀涵幽，古亭、石坊参差其间，神宫佛寺宏伟壮观。登山远眺，明湖似镜，黄河如带，泉城风貌尽收眼底。市区的泉涌，星罗棋布，其中趵突泉名列七十二泉之首。清刘鹗《老残游记》写道：

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

千佛山趵突泉的叠字联是：

佛脚清泉，飘飘飘飘，飘下两条玉带；
源头活水，冒冒冒冒，冒出一串珍珠。

杭州西湖的孤山，位于里湖与外湖之间，风光绮丽，是西湖文物荟萃之地，古人有“人间蓬莱是孤山”之说。孤山有副叠字联：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对联展现了孤山山清水秀、晴好雨奇的美好景色，游人观景咏联，流连忘返。由孤山西行十余公里，龙井南面的九溪十八涧，是西湖西面山中最胜之处。这里有副叠字联：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高高下下树，叮叮咚咚泉。

温州市依江临海，是观潮赏云的好地方。位于市北瓯江中的江心亭，又是朝夕观赏云涛海潮的最佳处。江心亭有副叠字联：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此联运用汉字一字多音多意的特点，巧妙地编成叠字联，把瓯江朝夕云聚云散、江水潮涨潮落的壮阔自然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

来，十分有趣。

苏州的网狮园，是旧时世家一组完整的住宅群，住宅与花园结合，山幽峰秀，小桥流水，花艳木秀，布局严谨。园中看松读画轩有副叠字联：

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
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

赏园景读佳联，使游人沉浸于一年四季冷暖交替变化和莺歌燕舞、枝繁叶茂、百花争艳的景色之中。

广告诗联

商业广告，源远流长。唐代诗人杜牧在诗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里的“酒旗”，就是古代酒肆主人挂在户外用来招揽生意的广告。

李白一生品酒无数，饮过兰陵美酒之后，不由欣然命笔，写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这首诗至今还常常出现在电视广播广告之中，引发人们怀古之幽思。诗因酒发，酒因诗名，这也算是名人效应吧！

据史书记载，一年除夕，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微服出游，经过一户人家，发现门上没有春联。一问方知这家是劁猪的，还没请到代字的人，于是朱元璋亲自为这户人家写了一副春联：

双手劈开生死道，
一刀割下是非根。

后来，这家人知道对联是皇帝御书，便将对联高悬中堂，烧香参拜，称为岁初祥瑞。这副对联也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劁猪业中的一副

广告联。

相传，朱元璋还为南京一家浴池写过另外一副广告联：

金鸡未唱汤先热，
旭日东升客满堂。

金田起义前，广西贵县客家人石达开派李文彩用理发店作掩护，暗地里结交各方豪杰志士。开业之初，李文彩请冯云山作联助兴，冯云山吟道：

磨砺以需，天下有头皆可剃；
及锋而试，世间妙手等闲看。

石达开闻之大笑，也乘兴吟出一联：

磨砺以需，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这两副诗联以剃头手艺表达反清壮志，形象而贴切，但用来做理发店的广告招牌显得杀气腾腾，有令顾客望而却步之嫌。

清人董邦达为一家理发店题的诗联，读来非常亲切：

相逢尽是弹冠客，
此去应无搔首人。

“弹冠”借指“弹冠相庆”，“搔首”借指“搔首踟蹰”。诗联语义双关，且有吉祥、欢庆之气，堪称广告诗联之佳作。

还有一些古人流传下来的广告诗联，亦写得相当奇妙，如一药店门侧写道：

但愿世间人无病，
何愁架上药生尘。

一些绸缎店、棉花店门上写道：

人或冻寒非我愿，
世都温暖是予怀。

“王一品斋”是中国最早经营湖笔的老店。1961年10月26日，郭沫若为庆祝笔庄创建二百二十周年题诗一首，遂被用作广告。诗写道：

湖笔争传一品王，书来墨迹助堂堂。
蓼滩碧浪流新韵，空谷幽兰送远香。
垂统以还二百二，求精当作强中强。
宏文今日超秦汉，妙手千家写报章。

草木联话

古往今来，不少名人学士所作的关于草木的对联，脍炙人口，令人叫绝。

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
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

此联来自一个有趣的传说：一次，苏东坡与黄庭坚在一棵大松树下下围棋。忽然一颗松子掉落在棋盘上，黄庭坚拾起松子，随即吟出上联，请苏东坡应对。苏东坡抬头一看，不远处小河边有一老人在柳阴下钓鱼，遂吟得下联。

苏东坡还同好友佛印和尚对过一佳联：

雪里白梅，雪映白梅梅映雪；
风中绿竹，风翻绿竹竹翻风。

对联活脱脱地描绘了自然之美。

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
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

这是明代解缙描绘树木花草的一副对联。上联蒲、桃与“葡萄”同音，蒲属草本，桃和葡萄属木本；下联梅、桂又恰好与“玫瑰”同音，梅冬末春初开花，桂和玫瑰夏秋季开花，真是对得工整贴切，妙趣横生。

种树如培佳子弟，
卜居恰对好湖山。

这是著名学者、教育家马君武晚年卜居衫湖期间，贴于门前的一副对联，意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艰辛。

自闭桃源称太古，
欲栽大木柱长天。

这是教育家杨昌济的抒怀联。他曾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拒绝当官，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以实践其“欲栽大木柱长天”之志。

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
园栽四物：青松、翠柏、白梅兰。

这是方志敏烈士生前自拟并挂于卧室的一副对联，是他高雅志趣和高尚人格的写照。方志敏的儿女都以松、竹、梅、兰取名。

高岭苍茫低岭翠，
幼林明媚母林幽。

这是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在《内蒙风光》一文中描绘内蒙古风光的对联。

此外，当代还有不少无名氏也撰写了不少关于草木的佳联，随便拈出几句，以飨同好：

经霜古柏参天碧，
傲雪寒梅漫地香。

柳影映池鱼游树，
天光入水月穿云。

瑞雪染腊梅，白里透红一两点；
和风拂杨柳，动中有静四五枝。

妙联讽贪官

封建社会，“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清朝后期贪污受贿现象更为严重。老百姓对这些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常以对联的形式揭露鞭挞他们的丑恶嘴脸。这些对联内涵深刻，妙趣横生。

曾任直隶总督的杨世骧，平时自命清高，喜欢附庸风雅，实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贪官。他死后被谥为“文敬”。有人据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作了一副对联：

何谓文？曲文、戏文，声出若金石；
乌乎敬？冰敬、炭敬，用之如泥沙。

联中的“冰敬”、“炭敬”是指清代外地官员进京时，分别在夏季和冬季贿赂京城官吏的银两。联中三次出现文、敬二字，其意趣可谓妙不可言。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贪官污吏明明是贪得无厌的硕鼠，表面上却以正人君子自居。清末有一知县，上任伊始即在县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

一不要钱，二不要命；
三不要官，四不要名。

可是，他上任没几天便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于是，有人在他的对联每句话后添了两个字，使原对联的意思大变：

一不要钱，嫌少，二不要命，嫌老；
三不要官，嫌小，四不要名，嫌臭。

清末时，有个叫多琪的人曾在湖北浠水县任县令长达八年之久。多琪在任期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年除夕，多琪竟恬不知耻地在大门口写了一副对联：

奉君命来守是邦，两度蝶飞，只求对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其民共安此土，八年鸿爪，最难忘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当晚有人将这副对联改为：

奉君命来虐是邦，两度蝗飞，哪管你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胥吏共刮此土，八年狼藉，只剩下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清末一县令在县衙门口正厅悬一副对联：

得一文，天诛地灭；
听一情，男盗女娼。

事实上，凡有送礼他照收不误，凡有权势之人向他求情，他都徇私舞弊。有人不解，问县令道：“老爷这样做，岂不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县令无耻地说：“我一点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我收的贿赂并非一文钱，我徇的私情也不是一件啊！”于是，有人背地里把这副对联改为：

只得一文，天诛地灭；
仅听一情，男盗女娼。

清末还有两个贪官，一个姓熊，一个姓卞，有人戏作一副对联相赠：

能者多劳，恐断四条腿骨；
下流无耻，难保一个头脑。

这是一副拆字联，上联合成一个“熊”字，斥骂熊姓贪官是衣冠禽兽。下联合成一个“卞”字，咒骂卞姓贪官不得好死。

弥勒佛前趣联多

佛寺中常见一尊笑容可掬的胖大和尚塑像——席地而坐，手托瓦钵，袒胸露肚，笑口常开，慈祥有趣——这就是深受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弥勒佛。

关于弥勒佛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既令人捧腹又叫人深思，历代文人雅士在他面前留下了许多妙联佳对，有愤世嫉俗的俏皮话，也有借物抒怀的牢骚语，读后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北京谭柘寺和扬州平山堂的弥勒佛龛两旁的对联均为：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这副对联，发人警醒，启人深思。山东济南千佛寺弥勒佛像两侧的对联是：

笑到几时方合口；
坐来无日不开怀。

四川峨眉山的灵岩寺里弥勒佛像两侧对联是：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四川乐山凌云山弥勒佛像前有一副令人发笑的对联：

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来无知无识；

观世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

凌云山弥勒佛像前，还有这样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

湖南武冈山胜力寺的弥勒佛前对联是：

肚肠宽肥容世界，大大大！
心肺冷静笑人生，哈哈哈！

云南丽江喜祗园寺内弥勒佛对联，更有趣：

大肚皮千人共见，何所有，何所不有；
开口笑几时休息，无一言，无一可言。

湖南衡阳罗汉寺里的弥勒像对联是：

大肚能容，问人间恩怨亲仇，个中藏有几许；
开口便笑，想世上悲欢离合，此处已无些须。

湖北当阳玉泉寺笑佛前对联，妙趣横生：

大肚能容，包含色相；
慈颜常开，指示迷途。

福州市鼓山涌泉寺内的对联更幽默诙谐：

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空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将何物供养；

年年坐冷山门，迎张接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试问这头陀，得意时有什么来由？

这是位无神论者写的，揭示了泥塑木雕自身难保的本质。

科举制度趣联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招揽人才的手段。读书人十年寒窗，一旦金榜题名，便会苦尽甘来，人生改观。可是，科举中的高中者，却是凤毛麟角。相当一部分读书人钻在四书五经堆里，到头来是一文不名，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生活无着时常常受到家人的抱怨：“读书高，读书高，米也没得吃，柴也没得烧。”

有个老学究一生科举不第，晚年贫病交困，在临终前作了一副自挽联。联曰：

想吾生竭力经营，无非是之乎者也；
问此去何等快乐，不管它柴米油盐。

联语故做旷达之状，实则沉痛辛酸。

又有一老儒一生苦读，年年落第，悲愤之余，常作自嘲联聊以自慰。联云：

这回吃亏受苦，都因入孔氏圈中，坐冷板凳，做老猢狲，只说限期已满，到头来发白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真可怜矣！

此去喜地欢天，必须到孟婆庄外，赏剑树花，观刀山瀑，可称眼界别开，再和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无以易之。

此联自我嘲谑，可见作者才气横溢，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前清时，有一老童生，虽年已花甲，仍赴京参加考试。学使见他年迈，想借此机会成全他，遂当堂命题，令其默经。谁知老童生因年高健忘，竟不能背诵一字。学使见状，哭笑不得，随即赠其一联：

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
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

此联不愧是妙语双关之佳作。

曾闻安徽无为州有一考生，因年老被钦赐为举人，戏作堂联曰：

并未出房，全凭得白头发秀士；
何尝中式，倒做了黑耳朵举人。

旧时衙门中未上名的帮差，俗称“黑耳朵”。联中的“中式”，即指科举制度中乡试或会试合格者称为“中式举人”或进士。是联据事直书，妙趣横生。

还有一廪生得了钦赐副榜，自书一堂联云：

说甚功名，只免得三年一考；
有何体面，倒少了四两八钱。

明代府、州、县学生员最初都给廪膳，补助生活。“四两八钱”即廪禄也。

旧时，士子赴京赶考，不仅花费颇多，而且路途迢迢，跋涉艰苦。边省某君莅场后，作联自嘲云：

四千里盘费花尽，故里喜遄归，亏我此番熬过去；

十三篇文章草率，今朝休盼望，请君下次早些来。

又有某童生赴郡应试，偶然想起家中新婚之妻，于是戏书一联，表达对妻子的思念：

充无罪之军三百里，
守有夫之寡二十天。

戏台趣联

戏剧源于秦汉乐舞、俳优和百戏，由来久矣。而戏剧对联肇自何时，无从考证。俚语云“戏字半边虚”，又云“假戏真做”，这当中颇富情趣哲理，值得研究玩味。

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江山。

这副对联，妙在精辟地概括了戏曲艺术的特点：集中性和假定性。幕起幕落、幕开幕合间，倏忽几十载；小小戏台，时而南国，时而北疆，展现无垠天地。

愿听者听，愿看者看，听看自取两便；
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只演三天。

这种戏联大众化，通俗易懂，就是识字不多的农民亦能自明其意，且易记诵。

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
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

此联不仅揭示了戏曲的社会功能，同时又将生活哲理巧妙地寓含其中，给人以启迪。

莫笑我们涂面挂须，煞费了多少心机，才博得人人叫好；

请看此辈装模作样，也算有几分气概，须知道件件非真。

这副楹联通过演员的亲身体会，阐述了戏曲、生活、演员三者的关系。戏曲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戏曲人物形象是靠演员辛勤创作出来的。

黄天荡，黑风帕，青山英烈；
红梅阁，白蛇传，兰英思夫。

这副楹联嵌入了六个剧目，六种颜色，搭配巧妙得当，可谓匠心独具。

下面一联从不同的脸谱和装扮，道出了角色的特点：

黑脸忠，红脸义，白脸奸悍；
老旦庄，正旦重，彩旦风流。

有些戏联，风趣地揭示了戏曲艺术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先看写戏曲表演的：

你一枪，我一刀，不伤不死；

骑骏马，坐八抬，不走不行。

再看表现戏曲娱乐性的：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父子均是梨园弟子；

哭装哭，笑装笑，打装打，闹装闹，哭笑打闹上下一片热闹。

还有寓意更深刻的，告诫世人做人要深思远虑，切莫一意孤行。如：

凡事莫逞强，作戏不如观戏好；
为人须远虑，上台终有下台时。

看戏乃寓教于乐。戏文的内容虽多属虚构，但来自生活，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教育作用。有一副戏联这样写道：

演离合悲欢，当代岂无前代事；
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戏中人。

再如：

舞台方寸悬明镜，

优孟衣冠启后人。

有些剧团为了招徕观众，常写出一些吸引观众的戏联，就像如今的广告。如：

要看早些来，大文章全凭起首；
须观完再去，好结果总在后头。

有些戏联提醒观众看戏的方法，可谓循循善诱。如：

虚迹谈实事，莫闲看镜花水月；
假象传真情，须认就暮鼓晨钟。

还有一些更有趣的戏联，多用叠字，读起来令人回味。如：

传传传，传古传，传传传古；
调调调，调腔调，调调调腔。

乐乐乐，乐音乐，乐乐乐音；
兴兴兴，兴高兴，兴兴兴高。

早年在乡间或城镇的戏园子看戏，犹记舞台两侧常挂有对联。台上生、旦、净、丑演古说今，戏联评说世事，可谓相得益彰，想来非常有趣。如：

借虚事指点实事，
托古人提醒今人。

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如此；
看今日，这般光景，疑惑有之。

戏本非真，何必真人作假戏；
人多从假，且将假处劝真人。

故宫畅音阁大戏楼，是皇家观戏的地方，左右台柱上有乾隆皇帝写的一副戏联，联曰：

琅璈逸韵应嵩乎，久矣八方从律；
阊阖晴光凝嶰吹，康哉九叙惟歌。

联中的“嶰”，指嶰竹。相传黄帝命伶伦取嶰谷（昆仑山北谷名）的竹子做乐器，后泛指箫笛等乐器。“康哉”典出舜时皋陶歌曰“庶事康哉”。“九叙”代指百官。这副戏联出自乾隆皇帝之手，无非是要通过演戏，反映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

故宫内的“阅是楼”，也是一座戏楼，楼上也有乾隆写的一副戏联：

樽饮康衢，风雨和甘均六幕；
弦调宝琴，星云景庆亘三阶。

联中的“康衢”，指康衢歌谣。相传尧时天下太平，尧微服私访出游于康衢，听到儿童唱歌，遂钦定为“康衢谣”。“六幕”，指天、地、四方。这副戏联同畅音阁戏联一样，粉饰太平，用语多用典。

贵州盘山“江山一览阁”有几副戏台楹联，不仅编撰巧妙，而且还有一段饶有风趣的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御驾盘山”，发现戏台上无楹联，便对随从的大臣说：“众爱卿谁可献上一联，将戏台装点一番？”话音刚落，便有一大臣写下一副：

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
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

此联不仅工整严谨，而且将戏曲的艺术规律巧妙地寓含其中，相当绝妙。

江苏扬州市的赵园有一副楹联曰：

坐客为谁？听二分明月箫声，依稀杜牧；
主人休问，有一管春风词笔，点缀扬州。

此联一问一答，对仗工整，台上台下情景交融，不失为令人叫绝的佳联。

浙江绍兴地区的枫桥镇和平街上，有一座杨老相公庙，庙中有一个古戏台，戏台的前台柱上镌有一副楹联：

数尺地五湖四海；
几更时三朝六代。

它简洁形象地道出了戏剧浓缩历史、反映生活的特点，典雅工整，脍炙人口。

绍兴斗门老闸上建有张神殿及戏台，戏台上有副楹联：

天地是个大舞台；
舞台是个小天地。

在流行的戏剧谚语“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中，添加了“是个”两字，成了可以顺读、倒读的妙趣横生的回文联。

旧时杭州曾有过一副戏台对联：

你也挤，我也挤，此地几无立脚地；
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场时。

当年温州乐清雁荡山区的药王庙和关帝庙，有过两副颇具特色的戏台对联。药王庙的戏联是：

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得出泼天富贵；
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

此联妙在将戏与药合在一起，表面似不相涉，实有内在联系，用以感慨世态的炎凉。

关帝庙的戏联是：

顾曲小聪明，当日可怜公瑾；
挝鼓大豪杰，至今犹骂曹瞒。

周瑜精通音乐，当时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然其智不敌孔明，所以只算小聪明。祢衡少有辩才，长于笔札，性刚傲物。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五岁，但敢于在曹操大宴宾客之际，当众击鼓骂曹，这才算是大英雄。此联虽未正面写关羽，而三国之环境气氛却洋溢于关帝庙内。

旧有“吴中第一名园”之誉的苏州留园，园内有一座色彩艳丽的戏台。台前柱子上的一副对联是数字联，为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所撰。此联亦庄亦谐，很有欣赏价值。联云：

一部廿四史，演成古今传奇，英雄事业，儿女情怀，都付与红牙檀板；

百年三万场，乐此春秋佳日，酒座簪缨，歌筵丝竹，问何如绿野平原。

曾国藩督两江时，阅兵扬州。扬州会馆为他作专场演出，进士何栻谄媚曾国藩，写了一副文采颇佳，但格调不高的戏联：

后舞前歌，此邦三至；
出将入相，当代一人。

此联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把曾国藩比作周武王。但这也成了后世讥谈笑语的话柄。

清乾隆进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曾为某戏台撰写过一副对联：

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角耳，汉祖唐宗也算一时名角，其余拜将封侯，不过肩旗打伞跑龙套；

四书白，五经引，诸子百家杂曲也，杜甫李白能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都是求钱乞食耍猴儿。

这副对联很有气势，上自尧舜汤武、诸子百家，下至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包罗尽致。生、净、丑，角、白、引、曲、弹，跑龙套、耍猴儿，处处点题，对偶工整，又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堪称一绝。

当时还有一处戏台的对联是用戏名组成的，看后也颇有趣味：

一捧雪，二度梅，三堂会审，四进士，五台山前搬和尚；

六月雪，七星庙，八件棉衣，九莲灯，十王寺里换人头。

旧时更多的戏台对联是描绘舞台上的情景的。比如：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

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

神是人，鬼是人，人也是人，一二人，千变万化；

车行步，马行步，步行也步，三五步，四海五洲。

联语把戏剧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妙哉！

辛亥革命后，戏剧界中以演文明戏（即早期话剧）著称的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不仅在戏剧表演上很有才华，而且颇有文学修养。一天，他俩闲来无事，便坐在一起作对联。夏月珊写出上联："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夏月润对下联："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这副对联，讲的是戏剧表演中的真实性和假定性的艺术创作规律。上联是说演员进入角色，从事创作，由"自我之境"达到"非我之境"，使观众只知台上人为剧中人，不知其为演员；下联是说演员塑造的艺术形象，贵在个性鲜明，互不雷同。真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也。

民国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成名较早。他二十岁那年（1924）由北京去上海丹桂舞台演出时，袁伯夔特意为他写了一副对联：

艳阳天下重，
秋声海上来。

程砚秋艺名艳秋。当年此对联悬挂于丹桂舞台两侧，观众见了无不喝彩称绝。

无独有偶，1935年，周信芳由北京载誉返回上海演出时，吴湖帆为他书写了一副对联：

百口齐唱萧相国，
万人争看薛将军。

上联中以萧相国指《萧何月下追韩信》，下联中的薛将军指《薛仁贵投军别窑》。这两出都是周信芳的拿手戏。对联生动地展现了当年周信芳演出的盛况。

解放前，曾有人以当时的几位著名艺人之名，组成对联两副：

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祖孙三代，三代三生，衣钵真传，箕裘永绍；

言菊朋、言少朋、言慧珠，艺成一家，一家一业，声名远播，技术高超。

小翠花、小翠喜，一文一武，一京一汉；

马连良、马连昆，同乡同姓，同教同科。

以上两联，堪称构思精巧，别出心裁。

会馆戏台多佳联

明清时，南北各省官僚士绅纷纷在京城设立会馆，以便为进京赶考或经商的同乡谋取公益。大凡会馆，皆有戏台，台之左右，皆有抱柱对联，其文辞皆关乎戏曲，乃中国楹联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位于北京西珠市口大街的浙绍会馆戏台联为：

地当韦杜城南，鼓吹休明，共效讴歌来日下；
人在枌榆社里，风流裙屐，恍携丝竹到山阴。

“韦杜”者，乃唐代的韦氏和杜氏，世为望族。韦氏所居名“韦曲”，杜氏所居名“杜曲”，皆在长安城南，时称“韦杜”。浙绍会馆位于京城南侧，故用此典。“日下”指京郊。封建社会以帝王比日，皇帝所在之地为日下。“枌榆”，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高祖系江苏省沛郡丰邑枌榆村人，初起兵时祷于枌榆社。后以枌榆为故乡的代称。“山阴”者，即今浙江绍兴市。

位于和平门外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其戏台联为：

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
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

联中之“魏阙”者，即古代宫门的阙门，为古代张贴法令的地方，

后来也作为朝廷的代称。下联中之“康衢”者，即四通八达的大路。《尔雅·释宫》云：“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湖广会馆地处京城交通四通八达之地，乃京城所有会馆之最，故用“康衢”一词。

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其戏台联为：

安庐凤颍徽宁池太，滁和广六泗，八府五州，良士亍亍来日下；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宫商角徵羽，五音六律，新声袅袅入云中。

其上联前八个字，即安庆、庐州、凤阳、颍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八个府，中间五字即滁州、和州、广德、六安、泗水五个州。而“亍亍”者，悠然自得之貌。下联中的前八个字，即金音、石音、丝音、竹音、匏音、土音、革音、木音，中间五字即宫、商、角、徵、羽五声。“袅袅”者，音乐悠扬之情形也。

安徽会馆戏台的又一联是：

冠盖萃江淮，尽东南宾主之欢，梼社筵开，古谊犹存乡饮酒；

楼台演歌舞，极丝竹管弦之盛，梨园美具，世情且看戏登场。

崇文门外福建会馆的戏台联是：

疏缓节兮安歌，水肥帆饱恩波远；
陈瑟竽以浩倡，楚尾吴头利泽长。

联中之“楚尾吴头”者，指其省地处古代吴楚二国之间。

宣武门外菜市口湖南会馆戏台联为：

二分明月正当头，幸寰宇澄清，好将金管玉箫吹西江月；

千里暮云同想像，对楼台歌舞，恍见珠帘画栋飞南浦云。

上联中的“二分明月”，语出《全唐诗》徐凝《忆扬州》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言天下明月三分，扬州占了二分，形容当年扬州的繁华。而下联中之“南浦云”者，系引用唐王勃《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对联入戏文

1936年，著名京剧须生马连良在北京西长安街盖起了“新新戏院”，从此，马连良有了自己固定的演出场所。马派新剧如雨后春笋，接连推出，《胭脂宝褶》即是其中之一。

《胭脂宝褶》讲述明永乐帝上元夜微服观灯，在酒馆遇书生白简，永乐帝出联，白简应对，得以封官的故事。剧中，马连良扮的永乐皇帝，儒雅风流，气宇不凡；著名小生叶盛兰扮的少年书生白简，少年老成，机敏过人。永乐帝与白简相逢在遇龙酒馆的一段戏，二人配合默契，演得妙趣横生。

先是永乐帝得知白简是重庆人时，即兴将“重”字拆为“千里”，出上联为“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白简亦将“大”字拆为“一人”，对曰“一人是大，大国大邦大明君”。永乐帝听了十分欢喜，又据元宵放灯、天子与民同乐的情景出了上联，曰“灯明月明，大明江山一统”；白简即答“君乐臣乐，永乐天子万年”。这自然更使永乐天子乐不可支，于是白简封官。

《胭脂宝褶》中的这两副对联连同天子微服出访、观灯的情节并非凭空杜撰。在清梁章钜编辑的《巧对录》中有两则记载：一是明太祖朱元璋微服行至一酒肆，和一监生对座。席间，朱元璋得知监生籍贯重庆，遂以“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为上联邀对，监生便用“一人为大，大国大邦大明君”为答。另一条记载则是永乐帝在京师奉天门观灯，与有“江苏神童”之称的彭印山应对。永乐帝出上联“灯明月明，大明一统”；彭印山对曰“君乐臣乐，永乐万年”。《胭脂宝褶》剧中，

把永乐与彭印山对联各加二字，扩充为“大明江山一统，永乐天子万年”；又巧妙地把朱元璋与监生酒馆对联事一并加在永乐天子身上，使演出风趣感人。

剧中还有一笔，即在永乐帝与白简对对之前，白简已应永乐帝之命，先有文章呈上。永乐帝看后，有“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好文才也”的评语。“文才”有了，“不知他的口才如何”，于是出对“口试于他”。可见白简当官经过了“笔试”、“口试”的几道关口，也不是仅靠拍马屁跻身宦海的。

《胭脂宝褶》这出戏现在不常演，只有北京的马长礼等马门弟子偶尔演其中的片断，因此这些妙联也就很少在舞台上听到了。

趣谈婚帖对联

太平天国起义策源地广西桂平市，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民间流传的婚帖对联比比皆是，且妙联佳对颇多。

明朝万历年间，桂平武靖州（今南木镇）水冲村一后生与鹰爪村的一姑娘举行婚礼。水冲村一文人出一上联送给对方，联曰“鹰爪铜鼓响”，意欲难倒对方。鹰爪村一文人知上联语义双关，苦思半天后便以“水冲龙窟深”来应对。

众人听了，赞叹不已。原来，上联的“鹰爪”与“铜鼓”和下联的“水冲”与“龙窟”都是各自相邻的村名；而且上联的“鹰爪”的“爪”字和下联“水冲”的“冲”字既作名词又作动词，生动、贴切、风趣，且耐人寻味。

明朝末年，桂平中秀里（今麻垌镇）容村一小伙子与东岸村一姑娘举行婚礼。容村一文人也给东岸村姑娘家送去了一联帖“一条玉笋透东岸”。东岸村的礼房先生足足半日想不出下联，无法回帖。一位担水嫂娘担满几缸水后不见打发礼，便心急地问道：“喂！时间不早了，你们还未打发礼？从东岸村到容村有十里路，怕大夜了路难行！”这时，有人说：“因为先生不能回帖，所以推迟了打发礼。”那担水嫂娘问：“他们出什么上联？”先生回答：“一条玉笋透东岸”。

那担水嫂娘素来口齿伶俐，颇有奇才，便笑着说：“那容易呗！用‘大朵梅花盖容村’来对可否？”众人听后，个个竖起大拇指，称真是一副妙对！

桂平紫荆山的盘瑶人有男嫁女“上门入赘”的风俗习惯。生儿育女还有奇数随母姓，偶数随父姓的规定。清乾隆年间，紫荆瑶王府有一姓潘的格格，年方二八，貌美如花，能诗会画，意欲征联招亲。瑶王通情达理，十分赞同。这年中秋佳节，瑶王府门前高搭彩棚，高挂格格出的上联：“有水有田方有米”。

观者踊跃，对者寥寥。眼看限期快到了，还没有人对出下联。这时，小江村一名姓何的年轻秀才访友路过瑶王府，看到村口张贴的上联以“水、田、米”合成一个“潘”字，一想，自己姓何，岂不是“人、口、丁”合成，即以“添人添口便添丁”对出下联。众人拍手叫好：“真是好对！郎才女貌，天生一对。”瑶王和格格喜得眉开眼笑，命家丁立即燃放鞭炮，亲迎何秀才进府，沐浴更衣，趁当晚花好月圆之夜拜堂成亲。

据说，桂平城有个黄员外娶亲，一来吝啬舍不得出钱请笛手，二来吉日多嫁娶，找遍方圆二十里之地请不到笛手。黄员外爱面子，便请一文人写了一副上联给女方家，联曰：“天下无笛（敌）手”。

结果难住了女方的家人，迟迟不能回帖。女方的亲友议论纷纷，有的说：“堂堂一个员外，都不能请一堂笛来庆贺，真是太吝啬了。”有的说：“员外没有一堂笛来迎亲，太失礼了，世上无人同啊！”这时写帖先生灵感突至，遂以“世上有同（童）人”回了帖。

旧式婚礼作喜联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事事处处无不蕴涵着文化气息，就连旧式婚礼，也处处体现着民族文化特色。

旧时北京办喜事讲究送绸缎或丝葛质的红色幛子，那幛光（即四个红纸金纹的斗方）上所书的贺词，婚娶与嫁女迥然不同，且千变万化。

婚娶贺词所书多为“天作之合”、“天成佳偶”、“龙凤呈祥”、“福禄鸳鸯”、“和乐且耽”、“鸾凤和鸣”、“钟鼓乐之”、“凤凰于飞”、“花好月圆”、“如鼓琴瑟”，等等。嫁女贺词则书“乘龙快婿”、“跨凤乘龙”、“之于于归”、“于归叶吉”、“凤卜归昌”、“妙造东床”、“百辆御之”、“祥徵凤律”，等等。其词或出自《诗经》，或出自《文选》，皆词雅而意美，且颇吉祥。

对仗工整的婚娶联与嫁女联，除了“燕好千秋，鸿禧百代”，“淑女成佳妇，君子赋好逑”等通用者外，尚根据不同月份与季节，灵活变化，毫无雷同。

正月之婚联，其词为“桃符新换迎娶帖，椒酒还斟合卺杯”。二月婚联为“眉黛春生杨柳绿，玉楼人映杏花红”。三月婚联则书“红雨花村交颈鸳鸯成匹配，翠烟柳驿和鸣鸾凤共于飞”。四月则书“满架蔷薇香凌金屋，依槛芍药花拥琼楼”。五月则书“才子凌云佳人咏月，榴花映日蒲叶摇风”。六月则书“槐阴连枝百年启瑞，荷开并蒂五世征祥”。七月则书“银汉新秋金闺嘉偶，人间巧节天上佳期”。八月则书“巧借花容

添月色，欣逢秋夜作春宵”。九月则书“酒酿黄花情联鸾凤，诗题红叶梦协熊罴”。十月则书“大雁比翼飞万里，夫妻同心乐百年”。十一月则书“雪飘双飞蝶，灯映并头梅”。十二月则书“合欢共醉黄封酒，度岁新添翠袖人”。

文人们还依阴历初一至三十不同日期编写新婚联语。例如初一日结婚，则书“初见钟情今结伴侣，一堂聚首齐庆新婚”。初四日结婚，则书“初夜话前情曾记否山盟海誓，四更入熊梦其然乎如意称心”。初六日则书“初衷遂两姓偕长并乾坤之寿，六律和五音协永调琴瑟之欢”。初七则书“初次合卺畅抒壮志，七夕巧渡喜结良缘”。初十日则书“初鼓月才明高手欲攀丹桂蕊，十年闺待字赤绳已系玉人心”。十一结婚则书“十里山河处处莺莺燕燕，一园春色朝朝我我卿卿”。十六日则书“十全其美五世其昌斯为贵也，六合同春万民同庆不亦乐乎”。二十一日则书“二朵彩云飞彩凤，一双红烛映红心”……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也。

此外，就连红色喜烛上亦有诸如“乾坤定矣，钟鼓乐之”，“花开富贵，云现吉祥”等金字喜庆对联。所遗憾者，旧婚礼中所涉及之文学底蕴，如今已鲜为人知矣！

巧对佳联配佳偶

在婚联问世之前，对联早就在人们的婚恋中广泛应用。巧对联语配佳偶的故事，民间流传很多。

相传，当年王安石赶考路过马家镇。正遇马家镇马员外出联择婿。上联写在一盏走马灯上：

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

王安石一时对不出，就忙着赶考去了。面试时，他一看考官出的上联，不禁喜出望外。原来上联是：

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

王安石当即以马员外的上联相对，天衣无缝。王安石考试完毕返回马家镇，便以考官那联对上马员外那联，被马员外择为乘龙快婿。完婚之日，王安石又收到了中榜的喜报，真是喜上加喜。王安石豪兴大发，挥笔在红纸上写了个双喜字贴在门上。

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才华出众。秦少游听说苏小妹以文择偶，便从扬州赶到京城。恰好苏小妹到庙里进香，他就装扮成游方道人向苏小妹化缘，并出了一个上联：

小姐有福有寿，愿发慈悲？

苏小妹一听，这个道士出口不凡，便应声道：

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

秦少游又道：

愿小姐身如药树，百病不生。

苏小妹马上答道：

任道人口吐莲花，半文不舍。

秦少游见苏小妹举止大方，两联对得工整严谨，更生爱慕之情。他见苏小妹要回去，便追至轿前道：

小娘子一天欢喜，如何撒手宝山？

苏小妹见他纠缠不休，答道：

疯道士恁地贪痴，哪得随身金穴！

秦少游决意以文求婚，而苏小妹以文择偶最后选中的，正是那个“疯道士”秦少游。

洛阳才子文必正，长得一表人才。在一次庙会上，巧遇吏部天官的女儿霍金定。霍小姐姣好的容貌和非凡的文才深深打动了文必正。不知霍小姐的心思，又不甘忍受相思之苦，于是文必正改名换姓卖身为奴，进了天官府。一天，他借送花之机，向霍小姐亮明身份，说明缘由，倾诉爱慕之情。霍小姐对文必正也是久仰大名，但不轻信眼前“家奴”所言，便出了个上联以试真假。上联曰：

吏部堂中，一史不读枉作吏。

上联的首尾二字都是“吏”，而且联中还把“吏”字折为“一史”，是比较难对的。文必正当即作答下联：

天香阁上，二人叙情夫为天。

天香阁自然是霍小姐的闺阁。下联首尾都用一个“天”字，在联中把“天”字折为“二人”，这都符合上联的要求。比霍小姐胜过一筹的是，还将“二人”合为“夫”字。霍小姐听了心中暗喜，疑团顿消。

清道光年间，广西浔州（今桂平市）出了一位才女，名叫崔娟娟。此女博学多闻，能诗善对，出口成章。她妙对招亲结良缘的故事，至今还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崔娟娟性喜郊游，每游或诗或文，或联或画，均具匠心，别有情趣。一天，崔娟娟由贴身丫环陪伴，跨浔江，游东塔，观看了东塔回

澜和风月挂铃诸景。看得入迷，流连忘返，待回到浔江岸边，时已傍晚，便雇船回城。船至江中，打开船窗，明月当空，并排邻船几位学士正在吟诗作对。其中一位学士道，我有一联求偶：

望空悬月水底朝天成一对。

这联是应景而发，意境清新。天空之月与水底之月互相辉映，天然成对，要找相应景物实属不易。几位学士一时鸦雀无声。其时适有一只南来飞雁从空中掠过，崔娟娟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便隔船吟出下联：

南来孤雁江中相映共双飞。

众学士一听，甚为惊愕，齐赞：对得绝妙，还语义双关。那位出上联的学士更是欣喜莫名，他与崔娟娟打了个照面，两人均会心微笑。

崔娟娟回到家中，有感于江中奇遇，产生与撰联书生结良缘的妙想，但对方诗才究竟如何，欲再一试。其父开明，同意并支持她的想法。于是在元宵佳节之夜，天官府搭彩楼一座，公开以联招亲。

当晚，月照中天，彩灯悬挂，笙鼓齐鸣，人山人海。崔娟娟贴出上联：

张长弓骑奇马单戈独战文章早立

观者蚁聚，但联语独特，全是拆字之句，要对得上异常困难。眼

看子夜临近，依然无人应对，就在即将收联时，有一学士上台对出下联：

妙少女闭才门今口情含见夫遵规

对联张贴后掌声雷动，观者齐赞对得妙。崔娟娟仔细看去，正是那位“隔船人”，心中暗喜。细问学士来历，答道：“某乃李少莲，湖北景山人，因仰慕西山景色及浔阳风光，故与学士们同游，不意逢此良缘，实乃三生之幸。”崔家富有，婚礼早已备办妥当，当晚即给二人完婚。

李少莲满腹经纶，人品极好，厌恶官场黑暗，不愿出仕。婚后与崔娟娟在西山脚下筑室为居，名“别有村”。李少莲专攻诗书，曾写“碧云天”三字刻于西山石壁，为后世书法楷模。崔娟娟专攻书画，所画之梅兰菊竹风靡一时，夫妻合著《别有村诗抄》流传后世，世人争相传诵。

京城妙联拾趣

北京善作对联者层出不穷，所作对联，或雅或俗，或庄重或诙谐，或短对或长联，皆别有情趣。

就幽默楹联而言，见诸古城各角落者，听诸市井口碑者，不胜枚举矣。此等楹联，对仗工整而寓意深刻，读之常令人喷饭，非思维活跃且功底深厚者莫能为也。老北京人素称这种楹联为“耍骨头”（北京土语），即调笑、嘲弄为戏也。

乾隆四十五年（1780），西藏活佛班禅六世莅京为乾隆祝寿，先居雍和宫，后奉旨在西黄寺（坐落于安定门外，与东黄寺毗连）安禅。僧徒参谒，不下千人，但见活佛趺坐禅座，屹然不动。同年，活佛病死，有人挽以联云：

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
迢迢万里，东来不见西归。

又有人赠联曰：

红豆相思，活佛变成死鬼；
昙花一现，北京即是西天。

昔日北京“八大胡同”等处的妓女，一旦红颜衰老，便“门前冷落车马稀”。因之入不敷出，境遇与乞丐相仿，故有文人作乞丐与老妓排遣联：

千舍万有，万舍千有，我的多福多寿老太太；
朝思暮想，暮想朝思，奴的知情知义小哥哥。

北京人吸烟，各有所好，有的吸水烟，有的吸旱烟，还有闻鼻烟和吸鸦片烟者，更有一种嗜烟如命者，无烟不吸，被老北京人称为“烟鬼”。有人撰联嘲讽嗜烟者：

水烟、旱烟、鼻烟、鸦片烟，无烟不满；
土气、臭气、脾气、牛臊气，其气难闻。

旧时北京的老师（或云教书匠），从私塾到官学，迫于生计，不仅要对上司恭而敬之，而且要向所教的大小少爷们的家长点头哈腰，最终一辈子教书，一辈子受穷。30年代初，某纨？子弟撰一联嘲笑教师年老而穷：

穷老师，老老师，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穷老坚壮一老师。

某教会学校一国文教师见后悲愤不已，遂作如下之答联：

大少爷，小少爷，大则以王，小则以霸，大小王霸两少爷。

同病相怜的穷教师读之，皆为这辛辣的答联拍手称快。

北京南城有精忠庙，为抗金英雄岳飞的香火之地。庙前有秦桧夫妇泥塑跪像，每年正月，进香者以火烧其像，名曰“烧秦桧”，以泄对卖国奸贼的心头之恨。有好事文人于庙垣上书秦桧夫妇问答联：

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
呸！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京城门对

老北京城，大凡四合院皆有门对，或五言或七言，或摹写或雕镌。那雅正的藻思绮语、妍捷豪迈的墨宝，为八百余年古都披上了一层浓烈的文化色彩。

门对字数最少者为四言，如“登仁寿域，纳福禄林”，可谓言简意赅；而“聿修厥德，长发其祥”，同是四言，倘不谙《诗经·大雅·文王》便不知其所云矣。

五言门对较多，如“门庭清且吉，家道泰而昌”；“诗书修德业，忠厚振家声”。意稍隐晦者如“高才食旧德，流藻垂华芬”。其中“食旧德”一语，出自《易讼》。所谓“旧德”，即先人的德泽，往日的善政。五言门对颇工者亦不乏见，例如“梅花开五福，竹叶兆三多”；“有猷有为有守，立德立功立言”。

七言门对多见于深宅大院，含义亦有深浅之别。较为浅显者，如“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逸情忘我书千卷，淡意可人梅一窗”；“握理明珠堪代日，云中奇骏欲追风”。而侧重用典者，如“道德家声传两晋，文章惠业著三槐”。“三槐”语出《周礼·秋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朝见天子时，三公面向三槐而立。后世即以三槐比喻三公一类的高级官位。

旧时北京最长之门对，字数多达十一个。每扇门板分行刻之，其辞藻更重典雅深湛；且必有名家书写，巧匠精雕，良工油漆，以不失其大家风范也。北京文史馆馆员叶赫颜札仪民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的

故居，即为十一字之门对：

室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
家无别况，唐书晋字汉文章。

上联中之谢草者，指谢眺所善之草书；郑兰者，言郑板桥工画之兰草；燕桂树者，即燕家景致，指北宋画家燕文贵（一作文季）所画的四时风景，即花村晓月、平江晚雨、竹林暮霭、松溪残雪。这副儒雅的门对，着实将书香门第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商人的宅院，为附庸风雅亦崇尚门对，而其词则往往于俗气中夹杂着铜臭，如“生财从大道，经营守中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等。

老北京四合院门对之字句，无论摹写还是雕刻，必须先披麻刮腻子，而后再以桐油、火漆及银朱（朱砂）髹饰。其格式一般是黑底儿红心儿，心子中的字或为黑色或为金色（讲究者贴金箔儿而不涂金粉），其色艳丽而润泽，或远眺或近觑，皆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也。

石家大院的匾额

坐落在天津西郊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素有“华北第一民宅”之称。石家大院又称“尊美堂”，本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石元仕的宅院，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占地六千余平方米，房屋近二百间。石家大院作为民宅不仅因其规模大而著称，还因其家族与清皇太后和大臣们的特殊关系而让人觉得非同一般。与这座古朴、庄重的灰色建筑群相辉映的还有那些名人题写的匾额和楹联。这些匾额、楹联或悬于书斋，或挂于戏楼，或置于佛堂，使这座民宅充满了文化气息。

石家大院入门处的第一副金字楷书联是：

桃花园内桃花红，
杨柳村外杨柳青。

此联点明了石家大院周围的环境，描绘了古镇杨柳青桃红柳绿的田园风光，联尾嵌有“杨柳青”之名。该联朴素自然，雅俗共赏。

诗书琴画镶家宝，
松梅兰竹蔚门庭。

此联置于第二道宅院的门柱上，为行书联，展示了大院主人附庸

风雅的情趣。一“镶”，一“蔚”，细加思索，令人感到满院书香。

中室廊柱上的楷书楹联为晚清大书法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撰：

文章真处情性见，
谈笑深时风雨来。

每读此联，不觉让人忆起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句子。

后堂门首高悬的一块巨匾，是当年的原物，黑底金字大书“津西保障”，并题“钦加三品衔诰中议大夫赏戴花翎”。此匾的来由是：1900年义和团在天津兴起，石元仕为了保全全家及“维护”乡里安全，极尽权变之能事，使义和团活动未能在杨柳青展开。为此，经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朝廷赏石元仕三品顶戴花翎，石家声名显赫一时。

石宅的戏楼，在大陆民宅中可说首屈一指。戏楼建筑古香古色，砖木石雕精美无比，墙可回音，夏日消暑，冬日有地炕御寒，在这里听戏，舒服至极。戏台的台柱上镌刻着一副楹联，联曰：

梓泽兰亭逢盛世，
绽桃杨柳庆升平。

可以想见当时的石家生活是何等的惬意。

“知足知不足斋”是石家商议大事的地方。此斋的匾额系清代书法家、东阁大学士刘墉所题，意在提醒石氏要知足长乐，又要知不足而不断努力，以求更加发达。斋中悬翁同龢书匾“尊美堂”。

“尊美堂”又称花厅，它的右室悬着一块楷书金字匾，曰“乐善好施”，此匾为慈禧太后所书。相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慈禧太后在京召见石元仕，并赐此匾。但“善”字右边故意漏下一点，其意思是你石家乐善好施，比我还差一“点”，此被传为趣话。

石宅佛堂门柱上的楹联是这样的：

至诚感神，神功还得人功助；
唯德动帝，帝力须凭物力感。

此联深富哲理，是石家大院的联中别具特色的。它巧妙地解释了人、神、物三者之间的功利关系。

婺源“书乡”多楹联

江西婺源素有“书乡”之誉。其文化氛围之浓厚，从颇为流行的楹联，便可窥见一斑。

婺源人大凡婚嫁、祝寿、迁居、建房、店铺开张及民间一些活动，都要张贴楹联，以示庆贺。一般多用纸写，如是名人撰拟，则用木刻或木雕，漆后还撒上金粉。

坐落于婺源北部的大鄣山，旧志称此是“钟灵发脉之地”。秦时，秦始皇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其中“鄣郡”就是以此山命名的。有一副楹联写的是大鄣山的“风水”：

泰岱钟灵，孔子万世表率；
鄣山毓秀，文公百代经师。

文公，即朱熹。朱熹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就像泰山孕育了孔孟一样，大鄣山造就了朱熹这位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

在婺源县龙山乡桃溪村潘氏宗祠，有这样一副楹联：

一门九进士，
六部四尚书。

该联气魄之大，炫耀之狂，真有不可一世之感。原来，该村在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共出了四十多位进士。一百多户人家，平均四户出一个，其中一房不止九位，而是十一位。九者，多也。下联有两种说法，即该村确有四人曾担任过尚书官职；另一说法是该村有个叫潘潢的人，他在六部中担任过户、工、吏、兵四部尚书。这副楹联与大鄣山的楹联可说是前呼后应，后者为前者作出了有力的佐证。

受历代文风的影响，婺源百姓人家不仅喜在自家的厅堂室内张挂楹联、字画，而且在祠堂、路亭、店铺等处也贴楹联。如婺源老字号“协和昌”茶店就有两副店联，一副是：

协力同心均遂意，
和气生财必大昌。

另一副是：

熙雨布云瑞香纷家园，
春前花雾秀片放园林。

两副楹联巧妙地把店名和该店经营的“熙春、雨前、云雾、香片、家园”五种名茶嵌入其中，耐人寻味。

过去婺源乡村的石板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供行人憩息，不少路亭内都写有楹联。如秋口镇秋溪村茶亭有一副楹联写道：

对面那间小屋，有凳有茶，行家不妨少坐息；

两头俱是大路，有名有利，各人自去赶行程。

回头岭离婺源县城五华里，古道通向各地，亭内有不少楹联，最佳者是这样一副：

因甚的走忙忙，这等步乱心慌，毕竟负屈含冤，要往邑中伸曲直；

倒不如且坐坐，自然神收怒息，宁可情容理让，请回宅上讲调和。

这副楹联是当年一位当过知县的进士写的。据说过去一些因家庭纠纷、邻里不睦而欲进城打官司的，走到这里看了这副楹联后，都怒消气平，回心转意，不再往前赶路，而是回家寻求和解。故此岭在当地被群众叫作“回头岭”。

名山胜景佳联多

余喜爱旅游，去过不少名山胜地，也搜集了不少楹联佳作。茶余饭后拿出来品赏，游景重现，真乃一大乐事。

河南省南阳武侯祠有一副楹联：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摆金木土圭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此联仅用五十四字便概括了诸葛亮的二十七年戎马生涯和历史功绩。上联巧妙地运用一至十十个数字，下联灵活地应用五个方位词和五个名词，概括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结孙权、北拒曹操，试图统一中原的战略宏图。对联还提及赤壁之战、击张鲁、取刘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五丈原归天等故事。称得上言简意赅、字字珠玑。

四川省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楹联寥寥三十字，精辟地总结了诸葛亮善于“攻心”，使身边的反对者“自消”的高明策略，指出古往今来知名善战者不一定好战。下联从否定落笔，启示后人宽严要审时度势，治国要深思熟虑。可谓金玉良言，发人深省。

浙江省杭州西湖岳飞墓的墓门上有一副楹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飞墓庄严肃穆，气势宏伟。墓墙两旁铁栅栏内，是赤身跪地的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等奸臣铸像。这副楹联歌颂岳飞，除直接赞以“忠骨”外，更深入一层，把青山拟人化——青山认为将英雄的忠骨埋在自己的怀里，是无限荣幸的！青山本来就美，得以埋葬忠骨，就显得更美了，这比直接赞颂岳飞的英雄形象更能突出所要表达的爱憎情感。下联抨击秦桧等奸佞，除直接斥之为“佞臣”外，也为白铁惋惜——白铁原本无罪，为何用它来铸造奸臣的丑恶形象，任人口吐唾沫？上下联对仗工整，耐人寻味。

秦桧和他的老婆王氏的铁像身上，有这样一副楹联：

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如是？
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据说清代乾隆年间，秦桧的第七代孙做了杭州抚台。一天与友人同游西湖，到了岳飞墓前，有人故意要他题墓联。他面红耳赤，写了

如下一副楹联：

人从宋后羞名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望江楼上三联对

四川成都东郊锦江南岸四川大学右侧的望江楼，史载是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所建，至今已逾千载。

望江楼系望江公园的主要建筑，枕江而立，高耸入云，辉煌壮丽，造型别致。楼共分四层，上两层为八方，下两层为四方，每方翘角上均悬有铜铃。游人沿楼内木梯攀上最高一层，登临四眺，锦江两岸风光尽收眼底。

清乾隆年间，有位江南才子云游到成都，登临望江楼，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副上联：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上联不仅活现了望江楼的绝妙景致，而且将上下几千年的兴亡感叹也包含在内。这位江南才子在成都居住半年，冥思苦想，总也对不出下联。于是，他将这一上联公之于世，征求下联。消息传出，轰动四川，一时引起蜀中文人墨客竞相应对，但结果终无满意者。因此，这上联一直被认为是“绝对”，空了许多年。

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成都郊外掘出了一块刻有“印月”二字的井栏石，触动了一位四川大学学生的灵感——那望江公园不就是薛涛故居的遗址吗？薛涛故居不正有一口薛涛井吗？薛涛生前想必经常去那

井畔汲水吧？那井里不就经常映现出薛涛的芳容吗？皓月当空之夜，那井中不就会映现出一轮明月吗？千年过去了，那口井至今依然存留在望江楼下，凭吊之人络绎不绝……顿时，切题的下联信手撰成了：

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中印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

佳对难得，这次的下联得到了认可，当即被有关部门刻挂在望江台上，至今尚存。从此，望江楼“绝对”不“绝”了！

1987年中秋佳节，一位离乡近四十年的海外游子回成都探亲。一天午后，他兴致勃勃地去重游久违的望江楼。当他看到这副下联时，觉得确是难得一对，又一想，仍觉下联逊于上联，以默默无闻的“印月井”对大名鼎鼎的“望江楼”，显得不够“门当户对”。后来他去了成都杜甫草堂，“广厦千万间”已成现实，溪畔又有浣花村姑花枝招展，于是灵感一来，吟出下联：

浣花溪，浣花衣，浣花溪畔浣花衣，花溪一新，花衣一新！

正是一副对联三联对，成对相隔数百载。

青城山长联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灌县县城西南十六公里处，是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也是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山上风景优美，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

建福宫位于丈人峰下，是游览青城山的起点。宫内有长达三百九十四字的对联，为四川通江人李善济于清宣统三年（1910）所撰。其联云：

溯禹迹奠岷阜以还，南接衡湘，北连秦陇，西通藏卫，东峙夔巫。葱葱郁郁，纵横八百里舆图。试蹑屐登上清绝顶，看云岭光腾，红吞沧海；锦江春涨，绿到瀛州；历井扪参，须臾踏蜗牛两角。争奈路隔蚕丛，何处寻神仙帑库？丈人峰直墙堵耳！回思峨眉秋月，玉垒浮云，剑门细雨，尚依稀绕襟袖间。况乃夜朝群岳，圣灯先列宿紫天；泉喷六时，灵液疑真君唾地。读书台犹存芳躅，飞赴寺安敢跳梁！且逍遥陟檐匐岗，渡芙蓉岛，都露出庐山面目，难遽追攀。楼观瓦玲珑，今幸青崖径达。问当初华渚姚墟，铜铸明皇应宛在。

自轩坛拜宁封而后，汉标李意，晋著范贤，唐隐薛昌，宋征张愈。烈烈轰轰，上下四千年文物。漫借瓻考前代遗徽，记官临内品，墨敕亲颁，曲和甘州，霓裳同咏，鸾章翠辇，不过留鸿爪一痕。可怜传林深杜宇，几番唤望帝归魂？高士传岂欺予哉！莫道赵昱斩蛟，佐

卿化鹤，平仲驰骡，悉缥缈若遐荒事。兼之花蕊宫词，巾帼共谯岩竞秀；貂蝉画像，侍中与太古齐名。携孤琴御史曾游，吹长笛放翁再往。休提说王柯丹鼎，潭峭趿鞋，那堪他沫水洪波，无端淘尽。英雄多寄寓，我亦碧落暂栖。待异日龙吟虎啸，铁船贾郁定重来。

上联写青城山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进而写了登峰远眺的壮丽景色，于绘景中抒情。下联写实述怀，涉及许多典故。从史实着墨，历数山川大事，于咏史中寄意。

下联中涉及的典故主要有："轩坛拜宁封"，说的是轩辕皇帝设坛拜宁封为五岳丈人的故事。"墨敕"指的是唐玄宗的手诏。"鸿爪一痕"，出自苏轼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喻往事留下的痕迹。

有趣的石门“绝对”

石门，即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为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早年，这里流传着两则“绝对”，几十年过去了，一直没人对出，忆来非常有趣。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国大总统换了一任又一任，谁也没有把中国治理好。石门老百姓在失望之余用半副对联历数自孙中山到冯国璋几位总统，表达愤愤之情。这半联是：

由山而城，由城而陂（池塘），由陂而河，由河而海，每况愈下。

联中的“山”，指孙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任民国总统一年；“城”指袁世凯，河南省项城县人，任民国总统两年；“陂”指黎元洪，湖北省黄陂县人，任民国总统两年；“河”指冯国璋，河北省河间县人，任民国总统两年；“海”指徐世昌，江苏省东海县人，任民国总统五年。联中没有提及总统姓氏，而以总统家乡地名代之，且由高到低，似水往低处流，其寓意深远。这半联自当年撰出后，一直无人对出下联，成为绝对。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获鹿（当年辖石门，今为鹿泉市）流传着半副“县长联”：

割下猪头送礼去。

1937年10月，获鹿沦陷，获鹿县顺城关镇旧官吏葛子久充当县维持会长，继而又当了伪县长。1940年县警备队副大队长张步云等七人被杀，震动了石门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查办，葛子久于当年自杀身亡。第二任县长朱能云，河北省迁安县人，在获鹿三载，横征暴敛，大肆贪污。事发后，他唆使下属纵火烧毁军火库。后被华北政务委员会齐燮元捉拿，枪决于北京天桥。第三任宋一之，保定市人，在新民会曾任职。其人貌文质彬彬，是铁杆汉奸。他在任时，走遍获鹿大大小小村庄，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并动用武装征粮、抓劳工，干尽了坏事。日本投降后，他还死守县城，与前来受降的八路军死拼。第四任县长叫李洪祥，河北省玉田县人。据传，此人上任后做了一个“割猪送礼”梦，梦见狗皮仙将猪头送给了八路军。他让别人解梦，别人不敢解。此人在任职期间，欺压百姓，做尽了坏事。1947年落入法网，不久被枪决。

对这几任县长的所作所为，老百姓恨之入骨，遂按照他们的姓氏，编出了半副对联：割（葛）下猪（朱）头送（宋）礼（李）去，至今无人对出下联。对此还有一种解释，说流传的半副对联是“割下猪头送礼留”，这“留”，指刘子寿，此人是西龙贵人，在日本投降后代理过一个月的获鹿县长，后由李洪祥接替，也被枪决。

流传于石门的“总统联”和“县长联”，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历史现实。事隔几十年，不知今天可否有人能对出下联。

桂平西山赏联

广西著名的游览胜地——桂平西山，除了林秀、石奇、泉甘、茶香、披阴石径、庵寺古迹构成一片清幽世界之外，还有耐人寻味的佳联。

西山佳联，琳琅满目，有描绘风光名胜的，有阐述人生哲理的，有言志抒怀的，有尊佛论道的。而赞美西山最妙的一联，隐身在乳泉古井旁的崖坎间：

泉边有石吾为友，
客里逢人说此山。

此联平白如话，虽不很讲究对仗，却蕴涵着作者对西山的一片挚爱之情。作者用拟人手法，以石为友，“逢人”说山，痴情一片，是爱西山之深的写照。

最能概括西山名胜的对联，莫过于挂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山洗石庵门厅大柱上的一副长联：

苍梧偏东，邕宁偏南，桂林偏北；唯此地前列平原，后横峻岭，左黔右郁，汇交廿四江河；灵气集中枢，人挺英才天设险。

洗石有庵，乳泉有亭，吏隐有洞；最妙处茶称老树，柳纪半

青，文阁慈岩，掩映十八罗汉；游踪来绝顶，眼低层塔足凌云。

上下联是由两个人撰写的。1921年秋，下联作者邹鲁奉孙中山之命，以特派员身份从广州到广西南宁劳军，途经桂平，与一班名士游宴于西山龙华寺。刚入席，有个叫孔文轩的文人出了上联邀对，说对出下联方可开席，弄得宾主面面相觑。刚游罢西山的邹鲁看到上联写的是桂平形胜，灵机一动，便将桂平西山的胜迹精集巧缀，对成下联，众人赞不绝口。

西山众联中，乳泉亭联鲜为人知。乳泉亭，位于乳泉古井旁，为桂系军阀陆荣廷所建。后滇系军阀唐继尧在亭中留下一联：

自苍梧迤逦而来，造极登峰，伫看南流一束，北流一束。

离翠海钓游之所，乘风破浪，试看在山何如，出山何如。

1921年初，唐继尧被顾品珍逐出云南，到了香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革命军政府时，主动邀他共图北伐大计，而他在孙中山集师桂林准备北伐时，暗走梧州、桂平、柳州一线，另作他图。上述对联就是他路过桂平游西山时留下的。上联字面写的是从梧州到此的事，其实却是影射当时南北分裂的局面，联中把北方军阀把持下的割据政权与南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视同互相抗衡、平分秋色的两股力量，即所谓“南流一束，北流一束”，可见作者的政治态度。下联是他对自己被赶出云南地盘——“翠海钓游之所”很不甘心的心境写照，总想“乘风破浪”，卷土重来，所以在对联中盘算着“在山”还是“出山”的问题。后来他果然没有应召去桂林参加北伐，而是唆使正在北伐的滇军三千多人倒戈返回云南，把拥护北伐的顾品珍打死，重霸云南。孙中山不得不对他发出讨伐令，在各方正义力量的追讨下，唐继尧以败亡而告

终。这一段史实正好成了这副对联的注脚。

名家联趣
mingjia lianqu

历代状元对联摭忆

自隋代至清末实行科举取士，近一千三百年共出现文状元七百六十九人。这些文状元学问很高，自然对联也做得很好。现摘取几例，以飨读者。

宋代梁灏，在雍熙二年（985）以八十岁高龄考中状元，成为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状元。他在向皇帝谢表时，写了一副精妙的对联：

白首穷经，少伏生八岁；
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

意思是说，我梁灏比商周时的姜太公大二岁入仕，比秦汉时的今文《尚书》学的开创者伏生还早八年。《三字经》中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句。

明代状元、文学家杨慎，五岁时便以文采闻名乡里。一天，杨慎在新都城外一条小河中洗澡，恰巧新都知县路过河边，听说他是个才子，又见到他把衣服挂在树杈上，便出一上联，让其对下联。

县令上联是：

千年古树为衣架。

杨慎对下联：

万里长江作澡盆。

明代正统四年（1439）状元施槃，幼时聪颖好学，少年时，有人带他拜访一姓张的都宪。张都宪出上联，让他对下联。上联是：

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

施槃脱口而出下联：

朝霞似锦，暮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江西吉水县状元罗洪先，人称其“才高八斗”。有一天，他同几个士大夫乘船游九江，有个船夫出一上联，向罗状元讨下联。上联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叶风篷，下九江，还有十里。

上联一出，竟一时无下联可对，状元大失体面。1959年6月，广东佛山有一位老装修工，到十里外找一种“九里香”木料，只用两天便找到了。这种木料，1943年有人用了一年左右时间才找到。这事被一

个叫李戎翎的人听到，对出了下联：

十里运，九里香，“八七六五”号轮，虽走四三年旧道，只二日，胜似一年。

明嘉靖年间状元林大钦，受命到地方主考。一天傍晚过汉水，天上乌云密布，这时一渔翁划来一只小船，说：“我有一个上联，你答出下联，便送你过河。”渔翁出的上联是：

孔子生舟（周）末。

渔翁讲的“孔子”是双关语，既指孔夫子，又指船尾插舵的小孔。林大钦苦苦思索时，忽然一道闪电从汉水对岸腾空而起，他随即对出了下联：

光舞（武）起汉中。

此中“光舞”也是双关语，既指闪电又指光武帝刘秀。

江西吉安有一座望仙山，山上有一孤寺，寺中有一泥菩萨。崇祯十年（1637）状元刘同升游仙山，写出一个上联：

独岭孤山，一神像单刀匹马。

吉安当时是文化之乡，众多文人对不出下联，有一渔翁却脱口而

出：

隔河两岸，二渔翁对钓双竿。

金圣叹刑场对佳联

清代文人金圣叹，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评论家。他生性诙谐聪敏，恃才傲物，放荡不羁。他虽然诗文作得很好，但总是在答卷或口试中因讥讽考官，因此每每落第。据说有一次面试，考官让他作一篇人不同于禽兽的文章，金圣叹便说：禽兽不可训导。也就是说，再怎么训导它还是禽兽。搞得考官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由于久不得志，后来他就浪迹江湖，笑傲人生。直到最后赴刑场时，他依然神态自若，从容作诗，把生死置之度外。

金圣叹自幼喜爱作诗写联，且时有佳作和警句问世。有一次，他到一座寺庙游玩，夜里二更时，忽然心血来潮，想借庙中经书一看。寺中长老有意要难为他一下，出了一个上联："半夜二更半"。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如何应对，只好作罢，心中一直为此怏怏不快。

后来，因对吴县知县搜刮民财、盗卖库粮不满，金圣叹与诸生聚合孔庙行哭以示抗议。清统治者遂以"蛊惑倡乱"之名，判金圣叹死罪。收监期间，其子梨儿、莲子前往探监，父子相对惨然。金圣叹吟一联：

莲（谐"怜"）子心内苦，
梨（谐"离"）儿腹中酸。

此诗句语义双关，对清统治者的残暴进行了谴责。

临刑前，儿子到刑场和他道别，他问儿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回答：八月中秋。金圣叹忽有所悟，长老上联是“半夜二更半”，我对下联“中秋八月中”岂不正好。这时，他异常兴奋地嘱咐儿子，回去后一定要到寺中告知长老自己对出的下联。

金圣叹被处决时，正值山河淡装素裹、雪融冰消之际。他翘首苍天，触景生情，立就一首自悼诗，并高声吟诵道：

天生悼我地丁优，万里江山尽白头。
一时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珠流。

吟罢，慷慨赴刑。

李翰林寿联挂正位

李绍昉（1787～1845），字东阳，号晓园，广西北流县清湾镇侯村人。他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李毓藩为举人，父亲李程泌为拔贡，历任隆安、藤县教谕。

李绍昉自幼聪明好学，在祖父、父亲的指导下，博览群书。嘉庆十年（1805）中秀才，嘉庆十五年乡试中列榜第一名，嘉庆十八年中举人，嘉庆二十四年中进士，保和殿复试一等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授职编修，参加国史馆编纂工作。当时翰林院、国史馆的鸿篇巨著，不少是他执笔写成。

翰林院中尽是资历颇老的老学究，李绍昉初入翰林院时，正值盛年，老翰林们不了解他的才学，不免有些轻视，言语中也时常流露出轻蔑之意。李绍昉觉得此乃人之常情，因此也未曾动怒，反而对老翰林更加尊敬，有什么问题常请教他们。老翰林见这新翰林倒是颇为谦逊，逐渐对他有了好感。

这一年，恰逢嘉庆皇帝五十大寿，满朝文武都为做寿之事奔波忙碌，翰林院的翰林们也在忙着为皇上准备寿联。每逢皇上做寿，朝中大臣都要写一副寿联作为寿礼，然后由皇上亲自评定，将他认为写得最好的一副摆在寿堂的正位上。历年来，这正位上的对联均为翰林院老翰林们的手笔。这一回，老翰林们也是悉心琢磨，挖空心思，都希望自己的寿联博得皇上的欢心，能摆在正位上。

眼看做寿之日临近，文武百官都将自己写的对联裱好送进宫里，

请皇上评阅。老翰林们更是早早地便把寿联送入宫中，只有李绍昉这位新翰林不慌不忙。老翰林们都催促他，说这寿联越早送入宫中越好，李翰林却说：“只要文笔出众，早送晚送还不是一样。”老翰林都摇头道：“此言差矣，我们的寿联每次都是最早送入宫中，因此总能挂于寿堂正中。听你的口气，似乎你的寿联虽然晚入宫，却也能博得皇上的欢心，挂于正位。如此我们便与你打个赌，如果你的寿联能摆上正位，我们几个便设宴祝贺你。”李绍昉道：“如此就多谢几位前辈了。”直到嘉庆皇帝寿辰的前两天，李绍昉才将寿联写好。

到了嘉庆皇帝做寿那天，文武百官争献礼金，金线绣的大幅寿联挂满寿堂。迟来的李绍昉却是一幅红纸呈上。嘉庆皇帝展开一看，龙颜大悦，立即命人将红纸联挂于正中。群臣不解其意，心中不平。李绍昉的祝寿联挂好后，只见上面写道：

顺泰康宁，雍然乾德嘉千古；
治平熙世，正是隆恩庆万年。

原来这副对联不但赞颂了当朝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而且把皇家列祖列宗的功德都镶嵌上去了，上下联拼起来正好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的年号。对联巧妙，难怪嘉庆皇帝如获至宝。老翰林们看后，都心悦诚服，从此再也不敢小看李绍昉这位新翰林了。

半副对联千两价

郑板桥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并不富裕。他学画出名后，即靠卖画为生。郑板桥不仅书画作品风格独特，就是平时为人处事方式也与常人不同。乾隆七年（1742），郑板桥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县令。在他受命赴任那天，正赶上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他坐在轿子里，看到前面举着“奉旨上任”牌子的老衙役行走非常吃力，便命轿夫停轿，自己下来扛着牌子开路，让老衙役坐到轿子里去。众人见后大哗，皆视其为怪人。

说他怪，确实也怪。有一天，他正在坐堂，见一干村民把一对青年男女扭送到堂前。郑板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尼姑。经查问，原来他们违反传统私通。再查问，小和尚和小尼姑都是贫苦出身，而且是真心相爱。于是郑板桥当场拍板定案，成全他们结为正式夫妻。事后郑板桥写诗一首，有句云：“是谁勾起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潍县七年中五年遭灾，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对此情形，郑板桥责令各大户人家轮流在道边巷口支锅煮粥，周济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在最危难的关头，他又毅然打开官仓，给老百姓放粮。他的做法和行为屡屡冒犯上司，在乾隆十七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准“自请免官”。他身着毡衣，头带毡帽，两袖清风踏上了归途，身边只有一头毛驴驮着他简单的行装和书籍。

郑板桥的诗、书、画号称三绝，慕名前来求书求画者门庭若市，

络绎不绝。扬州瘦西湖畔，有一“六安居”茶馆，由六安僧广慧经营。因广慧是外来户，无人买账，生意甚为惨淡。郑板桥在这里品尝了茶的独特风味后，顿生怜悯之心，特题一联相赠。联云：

从来名士善品水，
自古高僧爱斗茶。

广慧将对联裱好后挂在店堂当中，不久即有大批茶客闻名而来。文人雅士纷纷前来品茶赏字，那些富豪商贾也时常来聚会。从此，“六安居”生意兴隆。

有一大盐商，知道郑板桥的盛名，就想请他题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借以风光一番。郑板桥知道此人是为富不仁之徒，本想赶走了之，但又一转念，何不借机嘲弄他一下？于是经人说合，以两千两银子成交，条件是先付钱后写字。但至交钱时，这个盐商心疼银子，就只拿出一千两来。郑板桥并不言语，拿起笔来，很快写好上联“饱暖富豪讲风雅”，然后转身即走。盐商急忙叫道：先生只写了半副联啊！郑板桥笑道：你只付了一半的银子，当然只有半副。盐商无奈，只好又拿出一千两，郑板桥才续写出下联：“饥馑画人爱银钱。”他对盐商说：我像你们一样，爱财如命，半副对联千两价，不可少分文！

挽左宗棠联记趣

左宗棠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出将入相”的风云人物，其“大名与曾李相参”。曾，便是曾国藩；李，就是李鸿章。光绪十年（1885），正值中法战争之时，左宗棠以大学士身份督办福建军务，驻福州，整饬海军，力主抗击法国侵略者。第二年七月，左宗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病卒于福州任所，享年七十有三。其时督办幕府送的挽联是：

幕府疆圻，书生侯伯，孝廉宰辅，疏逖枢机，系中外安危者数十年，毅魄长依天左右；

湖湘中扇，闽浙戈船，沙漠轮蹄，中原羽檄，扬朝廷威德越五万里，声名远震海东西。

此联据说出自当时文人邓赓元之手，上联追述左宗棠的功名、地位，下联论及他的功业、贡献，非常贴切。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亦字朴存。早年以乡村塾师为业，并以务农为职，故自号“湘上农人”。他二十岁中举人，以后却三试而不第。左宗棠最终“拜相封侯”，死谥“文襄”（有《左文襄公全集》），这在清朝是十分难得的事。其时非翰林出身不得“大拜”（即入阁），亦不得谥“文”。故当左宗棠率“楚军”出征西北时，上奏朝廷欲赴京城参加会试（明、清两代，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亦称“春

试”、“春闱”，每三年举行一次），朝廷乃破格钦授他为翰林院检讨（俗称“点翰林”）。这样，左宗棠后来才获入“东阁”拜相，故挽联中有“孝廉宰辅”（明清两代称举人为“孝廉”）之称。

送左宗棠的挽联中，最有趣的要算是左宗棠的厨师罗穆青的：

食性我能谙，白菜满园供祭馔；
浓阴公所茇，绿杨夹道迓灵旗。

“白菜满园供祭馔”，言左宗棠生活俭朴，平日爱吃白菜，爱喝菜汤。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十五日，左宗棠入驻陕甘总督治所兰州。次月，即在总督衙门前开凿“饮和池”，引池水入园，种了一片大白菜，并池水供兰州百姓任意“烹饪汲饮”。他还为此写了一篇很有名的《饮和池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被人称为“陇中一奇”。

茇，音跋，《说文》本义草根，此处指种植；迓，音讶，义即“相迎也”。同治十二年，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时，以陇东泾州（泾河上游，与陕西接壤，今名泾川县）至玉门关，修筑了一条长达三千里的宽阔大道，并于大道两旁栽植了“根不择土”、有顽强生命力的杨柳数百万株，“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甘肃人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的得力部将杨昌濬亦有呈诗云：“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幕僚王麓坡亦有挽联述及“左公柳”：

当年拓地过乌孙，从兹春入玉门，伤心无限新栽柳；

此日陈书经白下，正待胪传金殿，放眼争看旧养花。

张之洞的妙联佳对

张之洞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可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能臣。笔者曾见过他书写的一副七言联，颇有大家风范。上联是“长松吟风晚雨细”，下联是“醉手题诗淡墨斜”。上联描述了细雨中风抚高松，发出低吟晚唱之景象，下联表现作者酒醉后兴致所至挥毫题诗，墨淡笔斜其乐融融之雅趣。联语写得消闲清雅，自然拈来，甚富诗意。

其实，张之洞在对联上的才能早就有口皆碑。张之洞有个本族哥哥，叫张之万，比他大二十五岁，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有一次，张之万在慈禧太后面前夸奖张之洞，慈禧太后很感兴趣，遂道：“把他带进京来，让我瞧瞧。”当年夏天，张之万顺便将张之洞从老家直隶南皮县带到北京。慈禧太后传下谕旨：“张之万的族弟人称神童，大家可以认识认识。”这时，进来一个顽童，高不过三尺，身矮体瘦，大脑壳，尖嘴巴，两目有神，形如猿猴，脑后小辫垂至腰间。他上殿后给太后、皇上叩头。一员武将见是一个小孩子，便想奚落一下，高声说：“螃蟹浑身是甲。”张之洞见有人用对联难他，随口答道：“蜘蛛满腹经纶。”答得巧，对得妙，一语惊众。这时，皇帝也出一联：“南皮县顽童十岁。”话音刚落，张之洞应声对道：“顺天府天子万年。”众大臣齐声赞道：“真奇才也！”

入仕后，张之洞一次与友人出游。友人见牛拉一车荞麦过桥，想出个上联：

洛阳桥，桥上荞，风吹荞动桥未动。

张之洞随即说出下联：

鹦鹉洲，洲下舟，水使舟流洲不流。

有一次梁启超去江夏拜见张之洞。张之洞见他很年轻，看不起他，便想出个对联难他一下：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梁启超也不示弱，脱口答道：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前不敢在后。

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时，正逢湖南总督曾国藩七十大寿，江南各省总督及知名人士皆往祝寿。张之洞乔装成曾的门生两广总督的随从，前往贺寿。

其时，湖南总督府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大厅中央是主宾席，各省总督就座，身后随员侍立。酒过三巡，又添一道名菜——鲈鱼。曾国藩在席间笑了笑说：“老夫素羡鲈鱼美名，因得一上联，抛砖引玉，敬求下联。”曾国藩出的上联是：

鲈鱼四腮，独居江南一府。

此联一出，众人或赞叹，或微笑，或缄口旁顾。这时，又上一道河蟹。有人高声发问：“小人能否一对？”曾国藩道：“何人？”那人道：“两广总督随员。”曾国藩道：“可。”只听那随员说：

河蟹八足，横行华夏四方。

此联一出，四座皆惊。只见曾国藩避席长揖：“湖广总督大人到了，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梁启超集宋词联

据传，北京大学教授王力老先生书斋里挂着一副梁启超写的集宋词联语：

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
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断苍茫。

上联上句出自向子？的《临江仙》，下句出自姜夔的《念奴娇》；下联上句出自姜夔的《玲珑四犯》，下句出自吴梦窗的《高阳台》。今天看来，这副对联之珍贵，已不是什么价值连城之类的词语所能形容的了。连城之璧是美玉，还有发现的可能；而梁启超却早已成为古人，他自然不会再写了。而他活着的时候，所写这样的联语，也并不是很多。几经战火，这种纸片玩意儿能够不变为灰烬，而保存到今天的，又有几副呢？

梁启超写这种联语，说起来还是受陈师曾先生的启发。陈享年不永，中道凋谢，当时文坛艺苑，莫不痛悼。陈生前多才多艺，绘事金石之外，又喜集宋人姜夔词为联语，以篆书书之。《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云："前人集词为联，多搞四字、八字为对偶，至多十余字。曾始专集姜白石（姜夔号白石老人）词为长短联语数十。记尝一日过予，举《扬州慢》中'波心荡冷月无声'，谓可对《琵琶仙》'春渐远汀洲自绿'否？此联后竟续成，惊彩绝艳，即任公先生后此所举者也。"所说梁启超所举陈联即：

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
画桡不点明镜，芳莲垂粉，波心荡冷月无声。

1923年秋，陈师曾追悼会在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召开，展出陈的遗作，挂的就是这副对联。梁启超看了，极叹其工丽。第二年梁启超住院养病，由便以读词集联消遣，集成二三百副之多。曾在《晨报》六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许多副，其前言云："去年在陈师曾追悼会会场展览他的作品，我看见一副篆书的对……今年我做这个玩意儿，可以说是受他的冲动。"

梁启超集宋词联语，最得意的一副是送诗人徐志摩的。

1924年春，印度诗哲泰戈尔到北京，由诗人徐志摩陪同专程到法源寺赏丁香。徐志摩陶醉于丁香之美，竟在树下作诗一夜。此事在当时文坛曾广为流传。梁启超得知此事后，在北海松坡图书馆集宋人词句以尺八巨宣书就大楹联一副，赠给徐志摩。联云：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这副联语，词意隽逸，风姿顾盼，共集了六个人的词句：上联出自吴梦窗的《高阳台》、姜夔的《点唇香》、陈西麓的《秋霁》，下联出自辛弃疾的《清平乐》、洪平斋的《眼儿媚》、陈简斋的《临江仙》。

梁启超的字，有浓厚的书卷气，端庄妩媚，使人爱不释手。梁启超在日本时，恭楷诗稿寄给其师康有为，康有为在诗稿上批云："何不

学龙藏寺。”康有为主张写“碑”，不主张写“帖”，因梁启超笔势，教其写隋碑，所以梁启超书法得力于此。当时北京南纸店伙计都会裁纸打格子。雪白的玉版宣、夹贡宣，又厚实，又细腻，伙计裁成对张，再按照十七个字、十五个字等，打好鲜红的朱丝格。纸色雪白，朱丝鲜红，墨色黑亮，图章古拙，再加词句、书法，浑然一体，构成足以代表中华数千年文化精粹的艺术精品。

红学家俞平伯见到此联，欣赏之余曾题七绝一首：“金针飞渡初无迹，寄与情遥绝妙辞。想见诗人英隽态，丁香如雪夜阑时。”

此联徐志摩生前十分珍视。徐于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后，此联便由他的妻子陆小曼珍藏。据说，陆小曼女士在1965年临终之际，把此联赠给与徐志摩有戚谊的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陈先生认为此联属珍品，即请叶圣陶先生重书，将原件捐赠给徐志摩先生故乡的浙江博物馆收藏。

孙中山妙联应对张之洞

孙中山早年随兄长孙眉在檀香山上学，受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思想开放，不拘封建礼教。孙眉见孙中山性格难羁，只得将他送回国交父母管教。不久，孙中山又转到香港读书。读书期间孙中山认识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饱受耻辱和灾难，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

孙中山早期曾幻想过清政府能像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施行君主立宪制。当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推行了一些新政，如开办新学堂、建设汉阳兵工厂等。孙中山在海外闻听，对张之洞甚为仰慕，认为他可能是一位改革人物。一次，孙中山从海外回来，途经武昌时，特地到湖广总督府衙门求见这位总督。

孙中山来到总督衙门，自称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并把一张上书“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帖子递给门官。门官看罢名片，一时弄不清孙中山与张之洞的关系，便把名片送了进去。张之洞接过名片一看，求见者自称学者，无任何头衔，而且不知天高地厚与自己称兄道弟，心中大为不悦，把帖子扔在一旁。张之洞想了想，不妨奚落一下来访者，于是又把帖子拿起来，提笔在帖子背面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道弟。”然后让门官退还求见者。

孙中山在门外等了很久，门官出来把帖子给了他。他接过帖子一看，心想，张之洞嫌我是布衣平民，对他不恭，故意怠慢我，把我拒之门外。本想愤而离去，不再见这种势利小人，又一想，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回敬他一副下联。略加思索，向门官借来纸笔，写道：“行

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封王作侯。”写罢交给门官又传了进去。

张之洞傲慢地接过帖子，看过之后大吃一惊。心想，此人才思敏捷，行文不俗，而且文字中透出一股轩昂高雅之气，一定胸怀大略，学问高深，日后必定大有作为。于是，立刻吩咐门官以礼请进。

孙中山昂首阔步进了总督府。张之洞以贵宾之礼相待。孙中山仪表堂堂，见多识广，侃侃而谈，畅叙了欧美各国的富强之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张之洞对孙中山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于是也大谈其兴邦安国之道，但是他实行的新政是极其有限的，他不敢也不可能触犯清政府的根本利益，不是彻底的改革派。所以，孙中山对张之洞的仰慕之情也逐渐消失，最后失望地离开总督府。

毛泽东的楹联

毛泽东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期就能熟练作出工整巧妙的楹联。

1903年毛泽东十岁整。由于他经常带领同学下水游泳，遭到老师的处罚。这位老师的处罚可谓别出心裁，在黑板上写了“濯足”二字，让毛泽东对出下两个字。毛泽东从容不迫走上讲台，用力写下“修身”两个大字。老师大吃一惊，瞪大眼睛一时哑口无言，继而点头微笑，赞叹不已。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纵观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治国之前，皆有刻苦修身的阶段。毛泽东能当场对出“修身”二字，反映出他超人的境界。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一面大量读书，一面深入社会进行调查，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夏天，趁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放假之机，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到安化县游学，作农村调查。安化县有位社会名流夏默安，毕业于前清两湖学院，任县劝学所所长。此人在当地颇具声望，毛泽东两次进谒，均遭拒绝。毛泽东再一次登门虚心求教，夏默安思忖再三，想一试其才，便在书房随意写出上联以求对：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略一思索，即琅琅对出：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安连声称好，自愧弗如。

毛泽东的同学萧三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毛泽东很想借阅。萧三狡黠一笑，说要毛对出对联方能借阅，否则免谈。萧出的上联是：

目旁是贵，眼不会识贵人；

毛泽东想也不想，张嘴答道：

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对得珠联璧合，饶有兴味。萧三赶忙履约，把书借给了毛泽东。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危。当毛泽东星夜赶回家，老人已入棺两天。入夜，毛泽东守在灵旁，回忆童年往事，肝肠寸断。他席地而坐，写下悲怆的《祭母文》。随后，又写下挽联两副，深表对母亲的思念。

其一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鲁迅题联万千情

鲁迅一生著述颇丰，对楹联也很有研究，造诣极深。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时，住所几次变动，后来住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即今鲁迅纪念馆）。在俗称“老虎尾巴”的书房兼会客室墙壁上，鲁迅集屈原《离骚》句书写成一副对联：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

鲁迅集的上联是说，希望太阳不要急忙落下山去，表现了对事业只争朝夕的精神。下联“恐？？之先鸣”是说，要珍惜春光，不要等春天过去了，后悔已迟矣。这副对联的上下联，是一个意思，都是鲁迅先生警醒自己，要爱惜光阴，抓紧时间读书，抓紧时间做事，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迁居上海，两年后与瞿秋白交往密切。瞿秋白常常住在他家，二人朝夕相处。那时，瞿秋白已经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而是秘密潜住上海养病。这期间，瞿秋白写了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杂文给予很高的评价。有趣的是，瞿秋白此时还写了几篇杂文，竟以鲁迅的笔名发表（现在已收在了《鲁迅全集》中），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鲁迅非常看重他与瞿秋白之间的友谊，他从清人何瓦琴的禊帖中摘录出两句，集成一副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把瞿秋白引为人生“知己”，并且觉得有这样一个知己此生足矣。鲁迅亲自动手研墨作书，赠给瞿秋白，瞿秋白高兴地笑纳了。

近年来，有些报刊载文提到这副对联时，常常说是瞿秋白题赠鲁迅的，其实是鲁迅题赠瞿秋白的。

1932年12月5日晚，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邀请鲁迅在上海聚丰园进餐，同席的还有柳亚子夫妇、林徽音等人。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语多谐趣。席散时，郁达夫特意取出素绢一幅，请来宾题词留念。鲁迅欣然命笔，写下刚构思好的一副对联：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12日，鲁迅在此两句的基础上续成七律一首，书成条幅，赠予柳亚子。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木勇乘题写扇面，亦录此诗。此联由此广为传诵。

“横眉”一联，系化用清代江苏阳湖（今常州）秀才钱季重柱帖，故在赠柳亚子诗的跋语中有“偷得半句”之词。

钱季重为当时狂士，“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他不让三个儿子读书，还十分娇惯溺爱他们，“饭后即引与嬉戏，唯恐不当其意”。如此轻狂的心境鲜明地反映在他写的柱帖中：

酒酣或化庄生蝶，
饭饱甘为孺子牛。

鲁迅之联与钱季重之联相比，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的区别。钱联为虚无主义狂士之语，鲁联为清醒现实主义之言；钱联为恣意溺爱三子之句，鲁联为甘心献身人民大众之声。“孺子牛”之典在此发生了质的变化，钱联只道其私爱，鲁联则兼述伟大之爱。

1946年，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会上，郭沫若与周恩来先后发表讲话，两人均引用了鲁迅的这则联语。郭沫若把“冷对”误为“忍对”，周恩来把“冷对”误为“怒向”（周身旁坐的叶圣陶亦以为然）。鲁迅1931年2月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有七律一首，其中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两句，郭取上句之“忍”，周取下句之“怒向”。事后，郭与周两位议及此事，认为他们的误记却无意中阐发了鲁迅革命精神的一个方面，即“冷”的这一方面。

1948年，郭沫若到香港。有一天，郭沫若与茅盾等人谈及鲁迅这副对联，表示愿向他学习“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愿做这头牛的尾巴，为人民服务的尾巴”。茅盾一听此语，含笑表示愿做“牛尾巴”上的“毛”：“它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大头苍蝇和蚊子扫掉。”

著名画家徐悲鸿极喜爱鲁迅这副对联。1944年，他与朱自清拒绝接受美援面粉，不止一次地告诫学生：“人贵有骨气。”并敬书鲁迅此联高悬于墙以自励。

1953年12月，全国美协、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徐悲鸿遗像两侧正是他生前所书的鲁迅的这副对联。周总理在肃穆的气氛中指着这副对联，满怀深情地对徐夫人廖静文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周恩来还嘱咐出版《徐悲鸿画集》时，要将这副对联印在画集扉页上。

胡适题联海泉居

胡适，字适之，安徽人。曾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文学革命。他和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是文学知友，号称《新青年》四枝大笔。

30年代初，北京大学东门北侧有一家四川饭馆“海泉居”，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曾多次来此就餐。店主格外殷勤的招待，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胡适又到此店，店主请胡适题副对联，胡适欣然应允，沉思片刻即下笔：

学术文章，天下咸称北大棒；
烹调技术，大家都说海泉成。

联中除“咸”字外，皆为通俗易懂的白话，尤其“棒”、“成”二字，颇具地方色彩。北京人形容某物或某人好时常说“特棒”，称可以时常说“成”、“真成”。胡适有意地将“海泉居”饭馆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无形中提高了海泉居饭馆的身价。胡适这副对联是在他精神饱满、全神倾注下挥毫泼墨而成的，字体十分精彩，北京大学的学生和过往行人，到此常驻足欣赏他的墨宝。

写字最容易泄露一个人的个性，所谓“字如其人”，大抵不诬。如果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其人大概拘谨；如果字长胳臂长腿的都逸出格外，那么此人可能豪放；字瘦如柴，其人两肋状如排骨；字如墨猪，

其人必然肥胖。郑板桥的字那样的古怪，正和他那吃狗肉傲公卿的气概相称；颜鲁公的字那样端庄凝重，也和他临难不苟的品格相合。胡适这副对联写得舒展开朗，气势夺人，用笔多变，内涵丰富，给人一种率真的感觉，很有新意，一笔一墨都熔铸着学贯古今、名闻中外的博大精神。

自从胡适为“海泉居”题联以后，来该馆就餐的人骤然增多，生意大为兴隆。

章太炎妙语成联

章太炎为人书写对联，常是信手拈来，自然成趣。其集唐宋诗句，亦似天成；而嘲弄别人的联语，则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曹亚伯尝以所作《民国开创史》就正于章太炎，章太炎说：“稍后当好为撰句以应。”但曹索甚急。章太炎说：“那只好以杜句移植相赠。”就写了“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一联相赠，见者无不叹赏其工切。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伍廷芳任其事，颇费周折，久无成议。伍心劳力拙，须发为白，后病笃，遗言火葬。章太炎赠挽联曰：

一夜白须髭，多亏东皋公救难；
片时灰骸骨，不用西门庆花钱。

上联以伍子胥寓武廷芳为国事熬白头；下联言武大郎，与伍廷芳之姓同音也。其用典似随手拈来，且语义双关，寓意颇深。

章太炎还曾以康有为名字集句嵌字作歇后联，曰：

国家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其憎恶康有为保皇之情溢于言表。

北洋政府时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奉耶稣教，后为张学良推荐，在南京政府一度任外交部长。章太炎为联曰：

正廷屡受伪廷命，
儒堂本是教堂人。

王正廷知后，啼笑皆非。

章太炎于民国初年曾被袁世凯羁于北京钱粮胡同。他曾召集寓中全体仆役，颁布家规，内有：

> 一、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大人或者老爷，不许称先生；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主人行一跪三叩首礼；三、每日早晚必向主人请安；四、在外见我须垂手鹤立；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六、如敢违犯，轻则罚跪，重则罚钱。你们能终遵者留，否则去。

据说，章太炎的仆役均是袁世凯派来的密探，所以章才故意这样侮弄他们。

黎元洪入京时，章太炎改唐诗讥之：

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入京谒隆裕太后），
南来晦气满民关。
云移鹭尾开军帽，
日绕猴头识圣颜。
一卧瀛台经岁暮，

几回请客劝西餐。

袁世凯辈对章太炎既惮且怒，于是以筹边专使名义把他远远地打发到东北去了。章一介书生，在东北做不出什么成绩，遂于民国二年（1913）回到上海。那时，章太炎已经四十四岁，中年丧偶，生活无人照料，遂在京沪几家报纸上刊登求婚广告。广告内容很简单，只对“对象”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有文化知识，能写清通顺达的短文章；二、要出身于大家之门；三、没有不良习染，性格顺从。章的征婚启事，在中国当然是具有开创性的。

后来，还是由蔡元培做“红娘”，章与汤国黎女士结良缘。民国二年六月十五日婚礼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各界要人与知名人士云集一堂，真是一时盛事。证婚人为蔡元培先生，证婚词却是由章自撰。词中有云：

盖闻梁鸿择配，
唯有孟贤；
韩姞相攸，
莫如韩乐；
泰山之竹，
结箨在乎山阿；
南国之桃，
蕡实美其家室。
……
卷耳易得，
官人不外乎周行；
松柏后凋，
贞干无移于寒岁。

国学大师连结婚也是文绉绉、酸溜溜的。

婚宴上，觥筹交错，宾客们要求新人即席赋诗，以志盛事，而且以二十分钟为时限。章太炎即席赋诗一首：

吾生虽稊米，
亦知天地宽。
振衣陟高岗，
招君云之端。

诗中把自己比作像稗草一样的小草，却把汤女士视为天人，深获宾客尤其女宾的赞赏。汤国黎女士则录其旧作一首，题为《隐居诗》：

生来淡泊习蓬门，
书剑携将隐小村。
留有形骸随遇适，
更无怀抱向人喧。
消磨壮志余肝胆，
谢绝尘缘慰梦魂。
回首旧游烦恼地，
可怜儿辈尚争存。

意境高远脱俗，淡泊飘逸，不失大家风范。而且汤女士当场对客挥毫，写毕在来客中传看，引来众口一词的赞美。不过，章、汤二人结婚后，夫唱妇随，汤女士“隐居”不成了。

章太炎在苏州病故后，钱玄同除与在京同门以“先师梦奠，惨痛何

极”发电致唁外，并挽以长联：

缵苍永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

足见对太炎先生推崇备至矣。

郁达夫虎豹别墅题联

虎豹别墅，为著名华侨实业家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所建，别墅以胡氏兄弟的名字命名。胡氏兄弟祖籍福建永定县，早年在缅甸仰光经营“永安堂”中药店，因创制“虎标万金油”而成巨富。又创星系报业，被誉为“报业大王”。胡氏兄弟致富后不忘回报社会，先后建成三座虎豹别墅，新加坡的虎豹别墅为其中之一。

1938年底，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迫客居南洋，曾应邀任新加坡《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郁达夫尝为虎豹别墅题联三副，题挹翠亭曰：

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
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

上联描绘游虎豹别墅的感觉及观赏到的美景。“爽气”，谓别墅内给人以“清爽”的感觉，表现其境界美。“十三湾”，在新加坡马六峡处，风景优美。“烟景”，春天的美景。“放眼”，点明别墅为赏景佳处，四季如春，令人赏心悦目。

下联抒发眷念故国之情，并表达美好的祝福。“中原”，此指中国。一个“劳”字，蕴藉眷念故国之情深挚恳切。“鹏程”，庄子《逍遥游》谓鲲鹏“扶摇而上九万里”，比喻前途远大。联语用典，寓祖国有朝一日再振雄风之意。联语开阔豪放，清健质朴。

别墅曲径旁有一石牌楼，上有郁达夫的两副题联，其一曰：

家学宗风承上蔡，
山居树石拟平泉。

上联强调继承优良中华民族传统。“家学”，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此指民族文化。“宗风”，某一派独有的风格，此指民族习俗、风尚。“上蔡”，地名，属河南省。周代为蔡国，汉置县，属汝南郡。相传侨居南洋的客家人均因战乱来自河南、江西、广东诸省，故用“上蔡”指代。联语蕴涵称道广大华侨继承了好学上进、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之意。

下联说明虎豹别墅的建筑风格。“山居”，山中的住所，此指虎豹别墅依山构建。“树石”，借指营造别墅的各种材料。“平泉”，指唐代李德裕建于河南洛阳的平泉庄，又称“德裕别墅”。“拟平泉”，谓虎豹别墅仿效中原古迹平泉庄的建筑风格，隐含海外侨胞爱国爱乡深情。

其二曰：

山静白云闲，辉耀一楼花影；
澜澄沧海晓，望迷万顷烟波。

上联描绘虎豹别墅的优美环境。青山幽静，白云悠悠，表现环境的静穆美。“辉耀一楼花影”，展现光与影的协调美，有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所描绘的“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之韵味。

下联描绘清晨远眺所见大海景观。“澜澄”，波涛清澈，为近

景。“烟波”，水汽茫茫的海面，为远景。联中以近衬远，托出大海的朦胧美。此联说明虎豹别墅给游人带来的美的享受。上下联所描绘的景观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叶圣陶为车夫撰春联

抗日战争时期，叶圣陶曾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住在成都新西门外。他每次出城或回家，都乘坐被当地人叫作“鸡公车”的人力车，逐渐和那些车夫都熟识了。车夫老俞很会招揽顾客，叶圣陶十有八九都坐他的车。

老俞乐观爽朗，边推车边摆龙门阵。他告诉叶圣陶，自己曾当过兵，租种过庄稼，因无法糊口，才把田退了，和小儿子各推一辆“鸡公车”谋生。他的大儿子在前方打日本鬼子，由二等兵升了排长……这种不受拘束的交谈，使叶圣陶对社会底层有了更多的了解，名作家和车夫之间也有了感情上的交流。

不久，老俞遭遇了飞来横祸：小儿子不幸得急症不治身亡。老车夫一改往日的谈笑风生，步履艰难默默地推着车。走着走着，他突然开口：“叶先生，世上有没有因果报应？”叶圣陶怕他伤心，不便多作解释，便含糊其词地答道：“有人说有的，我也不大清楚。”他又说：“真的有吗？我自己摸摸良心，没占过人家的便宜，连小鸡儿也没踩死过一个，老天爷为什么处罚我这样凶啊！”叶圣陶心里一怔，觉得这朴素的话与《史记·伯夷列传》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的感慨何其相似！再看老俞那一副痛心疾首的伤心样子，便赶忙接上话头：“你把儿子埋了？”老俞说：“埋了。哎，原来指望攒些本钱改行做小买卖，这下儿子死了，养的猪又搭上买棺材了，往后只剩独个儿推车，推到死！”说着说着，抑制不住老泪纵横。

这时候，叶圣陶蓦然想起，自己和老俞是同年生，都是五十岁，

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便岔开话题，问他的大儿子最近有没有信来，老俞说：“有，有。我回复他，俞家只剩你一个了，但打仗要紧，不能马上回来，等把东洋鬼子赶出去了，你就赶紧回家吧。”叶圣陶说：“你是明白人！”老俞见叶先生夸奖他，渐渐恢复了常态，又自豪地谈起大儿子在前线如何英勇杀敌、立功受奖，似乎忘记了丧子的痛苦，脚步也轻快多了。

新年将近，老俞请叶圣陶替他拟一副春联，并说要由自己亲手书写，来冲冲晦气。叶圣陶在颠簸的小车上精心构思，一路吟哦而成一副春联：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春节过后，一次老俞兴冲冲地对叶圣陶说：“叶先生，你编的春联，私塾先生仔细讲给我听了。对联上写的就是我心里要说的话：儿子上前线抗日，对得起国家；我推‘鸡公车’换饭吃，比哪一行都不差。是不是这个意思？”叶圣陶点头称是。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写马车夫姚纳死了儿子后，先后向几个乘客诉说内心苦痛，但无人理睬，最后只好向那匹相依为命的老马倾诉。老俞比他幸运，遇上了富有同情心的叶圣陶。在契诃夫和叶圣陶身上，都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张大千丹青妙手写佳联

张大千是蜚声中外的画家，也是书写对联的高手。

人禀山海气，书通南北朝。

这副对联大气磅礴，对仗工整，是他于1922年二十四岁时在写生途中有感而发的。

张大千曾写有一联："懒思身外无穷事，读得人间未见书。"意为排除身边无聊的干扰，就会心胸开阔。这是他熟读宋人蓝奎的诗句有感而写成的。1941年，他曾撰赠甘肃学者范禹勤先生一联："稍闻吉语占农事，欲遣吟人对好山。"范禹勤先生收到对联后甚感惊奇，连声道："妙极！妙极！"1946年，张大千从北平回到重庆后，又为张善子的女婿晏伟聪撰写一联："学业日唯不足，精神养则有余。"晏伟聪赞叹不已。

1964年11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不幸逝世，张大千当时在巴西，闻讯后潸然泪下，特写一挽联：

四海一髯，伤心系天下；
九州万劫，无泪哭天下。

于右任与张大千在20年代即相识，友谊深厚，晚年在台湾时二人常以诗联酬赠唱和。联中的“一髯”指于右任，于长期蓄须，素以“髯翁”自称。“伤心系天下”，颂扬于右任长期以拯救祖国危亡为己任。

聊复尔耳，
可以已乎？

这一联是1937年冬张大千在美国克弥尔城的新居——环碧庵内的“聊可亭”题写的。此联的形成，说来很有意思。这两句联原是张大千与妻子在建亭时的对话，最后采用两句句首字名亭，可谓妙趣横生。这一年的除夕，张大千为环碧庵新居亲书春联一副：

风景不殊，百本梅花为老伴；
日月其稔，三杯竹叶祝新年。

上联是说，这里的风景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百树梅花与我这老人做伴。这句是援引晋人王导集会于新亭时周？的话变意而成的。周？的原话是：“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下联是说，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一年，我在这里只好以三杯竹叶青酒迎接新年了。

70年代，张大千在美国西海岸散步时，偶见一块巨石，酷爱其形状，便雇人运到住处，后来又出巨资运到台湾的摩耶精舍中，并取名“梅丘”，寓含“归正首丘”之意。他又模仿苏东坡为奇石题诗的故事，为“梅丘”题联，并让人刻于石上。联曰：

独自成千古，

悠然寄一丘。

马寅初的寿联

在北京东总布胡同马寅初的寓所里，珍藏着一副对联。它是1941年3月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在重庆为祝贺马寅初六十寿辰而书赠给马老的。这副对联裱糊在两条七尺长、一尺五寸宽的挂轴上，宣纸徽墨，古朴庄重。对联上那遒劲而工整的楷书字，赫然醒目，颇有气势。上面写道：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做伴支床有龟。

上款："寅初先生六秩大庆"，下款并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

这副对联最初悬挂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为庆贺马寅初六十大寿而召开的祝寿会的寿堂上。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相持阶段。由于马寅初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和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痛斥四大家族发国难财，在1940年12月8日遭到逮捕，被投入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贵州息烽集中营。国民党政府的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极大愤慨。翌年3月30日，重大商学院师生为他们的老院长召开了隆重的祝寿会，这既是对身陷囹圄的马寅初的声援和营救，又是对国民党政府践踏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揭露和抗议。

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作为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赠送了这副祝寿对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斗士马寅初的尊敬和关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统区内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和热烈赞许。

这副对联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它用相传皆有千年之寿的“鹤”与“龟”来祝贺马老健康长寿。上联的“桃李增华”，盛赞了马老在国难当头之际不为官禄所动，以大义凛然的爱国举动教育青年学生关心民族兴亡、努力为国增辉的事迹；“坐帐无鹤”则表达了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对马老的深情怀念与牵挂。下联的“琴书做伴”，既是对马老狱中清苦生活的描述，又是对马老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和刚正不阿的品格的称颂；而“支床有龟”（谐音“归”）则表达了人民群众期待马老早日被释放出狱、重新获得自由的强烈愿望和对爱国民主运动必胜的信心。

重大商学院召开的这次祝寿大会，有数百名师生和来宾参加，马寅初的夫人和子女也出席了大会。他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把祝寿会开成了一个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赠送的这副对联被转送到重庆近郊歌乐山马寅初的家中。马寅初当时正在狱中受难，所以未能看到这副对联。直到1942年8月，当局被迫把马寅初押回重庆，软禁在歌乐山马寅初家中的时候，马寅初才第一次看到这副对联。经此，马寅初从感情上更加亲近中国共产党了。

华罗庚妙对惊人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其学术成就举世闻名。而他是作对联的高手，却鲜为人知。

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赵九章等十多位科学家。途中闲暇无事，科学家们自然要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纵谈科学史上的是非得失。科学家们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七强并起、五雄争霸、秦一统天下，一直谈到自秦汉以来科学技术、历法、算经的发展。华罗庚是研究数学的，自然对数学最感兴趣。团长钱三强的名字，使他联想到韩、赵、魏三个诸侯强国的兴起，心中形成一则上联。他对同伴们说：“我有一则上联，请诸位续对如何？”联对自古以来是文人趣事，大家十分高兴。于是，华罗庚出了一则上联：

三强韩赵魏。

韩国开国君主韩景侯（名虔），是春秋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赵国开国君主赵烈侯（名籍），是春秋晋国大夫赵衰的后代；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名斯），是春秋晋国大夫毕万的后代。韩、赵、魏三家一起瓜分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承认他们为诸侯王。他们进行改革，推行新政，励精图治，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与齐国、楚国、燕国、秦国并称为“战国七雄”。华罗庚的上联，既指韩、赵、魏三个同时兴起的强国，又包含了代表团团长钱三强的名

字，十分高妙。这就要求下联，既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又必须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诸位科学家大伤脑筋，不知所对。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无人想出对仗工整之句。后来，著名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笑着说：“看来我们缺乏文学头脑，词穷难以应对，还得请华老自续下联。”赵九章的发言，为华罗庚带来灵感，他想起了古籍《九章算术》。“九章”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自先秦到东汉初年的数学成就，首次记载了我国古代数学家发现的“勾股弦定理”。于是，华罗庚续出下联：

九章勾股弦。

“九章”对“三强”，“勾股弦”对“韩赵魏”，工整贴切，又嵌入了赵九章的名字，真是工对之极，堪称妙联，大家齐声叫好。

钱三强对华罗庚的妙联十分赞赏，因嵌入自己的名字，便很谦虚地说：“韩、赵、魏是春秋末期新兴力量的代表，推行改革促进发展，成为战国初期的三个强国，称雄一方。我钱三强何德何才，怎敢与韩、赵、魏相联系。”赵九章也说：“《九章》是古代名著，勾、股、弦具有世界意义，我赵九章岂敢与之并提，还是请华老另择佳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华老佳联可赞，三强、九章当之无愧！”科学家们说说笑笑，为寂寞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乐趣。

蔡锷征联应对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还演出了一场“登基”的丑剧。袁世凯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12月25日，在蔡锷、唐继尧和李烈钧等人的推动下，云南举行起义，反对帝制，宣布独立。1916年1月，蔡锷将军亲率护国军第一军主力北上讨袁，从云南经贵州黔西、毕节，向川南挺进，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2月初，蔡锷率部抵达川南门户叙永县城，叙永人民箪食壶浆夹道迎接。总部一行遂驻节忠烈宫，并将司令部设于此。

一日，蔡锷在忠烈宫内宴请社会各界贤达名流，酒至半酣，他即席口述一上联，征询下联。上联云：

或在園中，逐去老袁还我國。

这是个拆字联，又是个置换联，语义双关。从文字上看，把“园”里面“袁”去掉，换上“或”字，就成了“国”字。这个上联的实际意思是，打倒袁世凯，恢复中华民国！

席中乡贤刘斗山当即应声对曰：

霍邻柱侧，取消君主复民權。

下联也是个拆字置换联，语义双关。从文字上看，“柱”字去掉“主”，换上“? ”字，就成了“权”字。这个下联的实际意思是，推翻袁世凯的帝制，恢复民权。

刘斗山妙句巧对，工整贴切，蔡锷将军十分赞赏，抱拳曰：“兄弟适才名为求对，实则求贤。斗山先生既具文章功力，又富革命精神，可敬！可敬！”蔡锷当众宣布聘任刘斗山为行辕秘书。众人无不点头称赞。

不久，有人按照上联的格式也对了个下联：

余临道上，不堪回首问前途。

这个下联也是个拆字置换联。从文字上看，“道”字去掉“首”，换上“余”字，就成了“途”字。这个下联的实际意思是：我站在走过的路上，回想起袁世凯干的坏事，真让人气得难忍，至于国家的前途，更叫人不敢想。下联流露出人们对国家命运的担心和忧虑。

蔡锷将军这一征联应对的故事，至今仍在川南一带广为流传。

杨度撰挽联

杨度在清末民初特别是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可算得上一位风云人物。他在清末主张君主立宪，以四品京堂入仕。后又充当袁世凯的谋士，极力“筹安劝进”。而在晚年却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起伏跌宕，曲折多变，富有戏剧性。

杨度年轻时从学王运，自诩在乃师门墙中独得其“帝王之学”。所谓帝王之学，即古之策士纵横捭阖之术，物色非常之人，辅立非常之功成帝业，以布衣取卿相。这很可能是杨度后来成为帝制祸首的思想根源之一吧？也正因为杨度热衷此道，所以他不屑于诗词文赋。偶有所作倒也能表达他的真感情。

1916年，蔡锷发起护国之役，但大功告成之日，亦是他病入膏肓之时。黄兴先于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不过旬日，蔡锷亦于11月8日病逝于日本。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黄、蔡二将军追悼会上，杨度曾为二人写挽联以志哀切之情。挽黄联曰：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挽蔡联曰：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与二人都有旧谊，但从挽联上看，推黄为挚友，对蔡则话中有话，显有厚薄之分。杨度早年留学日本时与黄兴友善，后来政见不同，但私谊未断。蔡锷与他同为梁启超弟子，袁世凯称帝前将蔡锷兵权解去调至京师，隐有杀机。杨度为之周旋，力荐蔡为登基效劳。蔡锷表面应承，暗地里却策划护法讨袁，使杨度在袁世凯面前无以自解。难怪蔡锷死去他仍耿耿于怀。

袁世凯临死前，遗言唯三字：“他误我。”有人认为“他”系指杨度。杨度作挽联悼袁曰：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挽联自陈他未负袁，而是袁自误自。杨度一向不容别人指其过失，后来他却幡然悔悟。1925年孙中山逝于北京，杨度大恸，作挽联悼曰：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上联只提“坚忍”二字，固未必能成大事业，下联可见他颇有忧国忧民之心。原来孙中山在东京曾劝杨入同盟会，杨谢绝，而将黄兴介绍与孙结识。袁世凯死后，他痛定思痛曾专程赴上海约会孙中山，表示要参加国民革命。正要一展抱负，孙中山却不幸在北京逝世，他岂

能不哭耶？

于右任撰联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又是饮誉中外的书法大家、诗人。于右任亦擅撰联。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逝于北京，各方所送的挽联不计其数。其中最具特色的一副，就是于右任亲笔撰写的：

综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功，真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视同尘土；

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由，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间！

孙中山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段革命历程中，既有征诛（各次起义），也有"揖让"（让位给袁世凯）。此联最能表达孙中山的大公无私精神，字好、语佳，堪称大手笔。

于右任还曾为函谷关题过一联，亦十分生动有趣。联云：

送千年客去，
移一个关来。

函谷关有两个：一个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战国时秦置。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得名。另一个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汉武帝时设置，距故关三百里。于右任为之题联的就是新安的函谷关，它是雄才大略、威名显赫的汉武帝刘彻从秦关“移”来的。此联巧妙地运用了发生在函谷关的传说和奇闻轶事，从而衬托出了函谷关的雄伟、古老。

挽孙中山之长联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孙中山逝世后，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敬送挽联，寄托哀思。所送挽联之多、内容之丰富在楹联史上是空前的。

据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辑的《哀思录》记载：自孙中山逝世到4月1日的二十天中，北京治丧处收到挽联共五万九千余副。实际上比这还要多，海内外敬献的挽联大约有十万副。送挽联的有各党派领袖、各界名流、社会贤达、失意政客、新老军阀、海外赤子、国际友人、工农商兵学，甚至有逝者的敌人。以艺术风格看，浩如烟海的挽联笔法生动，活泼新颖，联想奇特，用典纯熟，庄重雅正。这些挽联烘托和渲染了悲哀的气氛，使人感到悼念者与天地同悲、与日月共挽的哀痛之情。

从字数上看，最少的一副挽联八个字，最多的一副二百余字。下面是字数最多的一副挽联：

天心太不仁矣，胡丧斯空前绝后之完人！揖让迈尧，征诛踵武，辩才优于邹孟，博爱广于墨翟，平等真于释迦。数千年专制权威，纯赖苦衷改革。旗张白日，初困雷乡；血染黄花，再挫南越。论到援宁救鄂，策画尤艰。光复汉山河，巍巍元首，敝屣尊荣。岂期约法无灵，群雄多僭名割据。珠江开帅府，挥泪兴师，利钝非所知，唯有鞠躬尽瘁死。

国运亦奚衰乎！谁竟此三民五权之主义？克强早逝，松坡云

亡，项城深负公托，黄陂徒有公心，河间直与公敌。二万里共和乐土，渐成满目疮痍。神圣劳工，畴为主宰；职业政治，痛失导师。记得行易知难，学说不朽。陶熔新社会，眷眷同盟，仔肩责任。自愧壮怀虚报，昔时曾受命阽危。行馆读遗书，服膺垂诚，精神永相感，何容乱世苟全生。

这副挽联的作者是老同盟会会员刘揆一。此联除去标点，仍有二百五十六字，实为罕见之长联。长联赞扬了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丰功伟绩，历数了反清讨袁、讨伐军阀、宣传革命、募集资金、发展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还追述了革命过程中所受的挫折和艰难，以及后来重建元帅府、改组国民党、明确三大政策，等等。凝练的诗句掷地有声，琅琅上口，没有描述人物的音容笑貌，也没有描述人物的言谈举止，但纵观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一个顶天立地、鞠躬尽瘁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一吟长联，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这副挽联如此丰富，简直就是一篇精美的人物传记。

冯玉祥喜书对联

冯玉祥是安徽巢县人。他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擅长诗画，爱好书法，兼工对联。冯玉祥撰写的对联内容丰富，语言朴素。

1933年8月，冯玉祥领导的塞北抗日同盟军被日寇和蒋介石共同镇压后，他第二次来到泰山隐居。但他并没有悲观消极，颓唐自弃。他在该处石壁上题刻了“救国安有息肩日，抗日即为绝顶人”的对联，用以自励自勉。他发奋苦读，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冯玉祥曾陪友人去“蓬莱仙境”游览，在蓬莱阁题写了一副对联：

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
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

此联缅怀抗倭名将戚继光，并以此激勉抗日民众，也倾诉了自己的爱国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斗争，但蒋介石处处压制和掣肘他，剥夺他的兵权。冯玉祥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鼓动民众奋起反抗。他在四川青城山天师洞的石壁上刻下一副对联：

要想着收咱失地，

别忘了还我河山。

联语引用岳飞誓言，表现了中国人民决心为国家民族战斗，时刻牢记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冯玉祥给他的侄子冯宏谦夫妇题写了一副对联，勉励他们要以赤子之心，为国为民英勇抗敌：

孝子贤孙须先救国，
志士仁人最重保民。

当时，针对国民党投降派的投降思潮和一些人的动摇情绪，冯玉祥撰写对联，予以抨击：

头可断，身可杀，民族斗争不可屈；
将非骄，卒非惰，外交妥协岂非忧。

正气浩然，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表现了不甘忍受屈辱的斗争精神。

冯玉祥戎马一生，走遍中华，他经常为名胜古迹撰联题对。去成都武侯祠时，他留下匾联各一。匾为“大仁大智”，联曰：

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
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

匾联文辞朴实明快，书法古雅清秀。秋瑾就义后，曾埋骨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墓上筑有风雨亭一座。辛亥革命后，冯玉祥题西湖秋瑾墓一副对联，预言革命一定胜利：

丹心永结平权果，
碧血常开革命花。

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有一副著名的讽刺联作于1927年。这颇能反映他嫉恶如仇的品格和爽直的性格。当时，正值北伐战争，武汉国民政府要员邀请冯玉祥某日下午二时开会。冯玉祥按时到会，可会场空无一人，点心水果摆满桌子，直到四时，汪精卫等要人才姗姗而来。冯玉祥当即题写一副对联：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弄得汪精卫一伙哭笑不得，狼狈不堪。

冯玉祥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成长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军，这与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和过人的毅力分不开。郭沫若曾评价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几句汤之盘铭，是冯先生一生所奉行的生活准则。”我们今天为人处事，不是也需要这种精神吗？

白崇禧题联之谜

“受降纪念坊”坐落在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城东南七里桥，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纪念物。凡到过那里的人，都为十名军政要员题词中唯独空缺白崇禧之作而奇怪。

受降纪念坊是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修建的。由于当时修建质量差，加上日久风化，又缺乏管理，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风貌。鉴于此，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于1983年11月破土动工修复受降纪念坊。在修复过程中，把蒋介石等人的题词、题额、题联复原后，发现唯白崇禧所作侧联查无依据。为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纪念坊竣工，供人们参观纪念，只好让那两根原本有白崇禧题联的柱子空着。白崇禧到底为受降纪念坊题了什么样的联语，一时竟成了谜。

为解决这个谜，当地政府、纪念坊工作人员费尽心思，想方设法四处寻找答案，可是一直没有结果。到了中国人民迎接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政府决定本着复其旧貌，扩其规模，增添新内容的精神，并参考1946年制定的《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再次修整纪念坊。新方案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对日军受降纪念部分，包括在受降园内设受降区、受降纪念馆、抗日战区、战术演示区、碑林区、中美空军联队在芷江活动情况展示室等；二是纪念部分，主要是围绕芷江城修建三座受降城牌楼、两座象征胜利的“V”形雕塑，修建大型侗乡风雨桥一座，并在桥的两头再现当年“和平永奠”的场面，还部分恢复当年芷江城墙和城门，铸“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形象；三是游乐部分，对芷江现有名胜古迹进行维修，并修建水上乐

园、明山森林公园等娱乐场所。这样大规模的修建，需要查询、征集大量的资料，是解决空缺侧联之谜的一次绝好机会。于是，纪念坊工作人员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研讨，制定了查询新方案。除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发布消息广告外，还出书介绍情况，并查询曾在芷江县工作过的官员、黄埔军校学员、八旬以上老人以及档案资料。在查遍了全省、全国各地未果的情况下，又在世界各国华侨、华人中查访。冬去春来，月月岁岁仍难解此谜。

正当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美国加州湖南同乡会监事长汤子炳教授看到《一纸降书出芷江》书中介绍尚残缺的白崇禧所作对联一事，于是他积极主动与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取得联系。1995年4月，在查访不少地方仍没查到线索的情况下，汤子炳教授再次到加州大学中文大图书馆的书海中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副对联。他迅速通过鸿雁传书将侧联遥寄到中国湖南芷江，使这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难解之谜终于解开了，恢复了受降纪念坊的完整。历经曲折终于面世的白崇禧题联是：

扬大汉天威，挥鞭虾夷；
雪百年国耻，勒石燕然。

汉字摭拾
hanzi zhishi

书“福”赐“福”

过春节时，老百姓除了贴对联之外，还要贴“福”字。这贴“福”字的风俗，还有一段传说。

相传有一年明太祖朱元璋微服私访，被一户人家无意得罪了，他便信手在红纸上写了个“福”字贴在这户人家的门楣上，准备回朝后派人按图索骥，拿人治罪。朱元璋尚未回朝，马皇后便知道了此事。马皇后乃朱元璋患难与共的结发之妻，心地善良，不愿朱元璋为这点小事就杀人，遂心生一计，命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于门楣上都贴上一张红纸写的“福”字。

然而，有一家贫寒小户，只有老夫妇二人，且都是文盲。他们也求人写了张“福”字，不料由于不识字，竟贴倒了。朱元璋听说满城人家都贴了“福”字，勃然大怒；又听说一户人家居然还倒贴“福”字，即传旨将这对老夫妇问斩。马皇后心知这对老夫妇很冤枉，便对朱元璋说：“万岁，这两老人杀不得。”朱元璋问何故，马皇后道：“万岁乃九五之尊，驾临百姓之家，自是百姓的福气。这家老夫妇倒贴“福”字，不正是颂扬万岁临门，福气到了吗？”朱元璋一听，言之有理，不但收回了处斩这对老夫妇的旨意，还赏赐了他们一大笔财物。

自此，民间倒贴“福”字的做法很快传开。

到清代，“福”字又进入皇宫。从康熙皇帝开始，每年新春之际，皇帝都要御书“福”字赐给大臣。

康熙用名为“赐福苍生”的毛笔来写“福”字。这枝珍贵的毛笔，每岁开笔只用一次，用毕即收存。所写的“福”字，要高悬于紫禁城内乾清宫正殿。年年如此，代代相传，成为清宫每岁新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项书“福”赐“福”的活动很隆重，且有一套很严格的礼节。皇帝在腊月初一开笔书“福”，凡内廷王公大臣都要颁赐。大臣们都以能得到一幅皇帝亲书的“福”字为莫大的荣耀。新春伊始，家里能贴上这皇帝御笔大“福”字，便是福海无边的幸事。此外，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都赐双钩的“福”字，这是御笔勒石制成的。

慈禧太后还曾于看完杨小楼的表演后，书写“福”、“寿”大字笺赏赐给他。她此举是违背“祖宗家法”的恣行妄为了。

清代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始于康熙，盛于雍正，乾隆时严酷程度有增无减。文字狱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害死了多少无辜，已无法精确统计，受害者之多，被株连者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康熙初年，一些前朝的文人因写了一些明史和怀旧文章，即被扣上反清的帽子而遭杀戮。如《明史辑略》是浙江吴县富户庄廷龙花钱买了明朝大学士、首辅朱国祯留下的明史初稿，又聘请人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刊印后引起轰动。一个名叫吴之荣的无赖把这事告到刑部衙门，康熙阅奏折后勃然大怒，命令予以严惩。当时已经去世的庄廷龙被开棺戮尸，凡是参加过编撰的，包括作序、刻书、卖书的总共两百多人全被处死，家属妇女则被发配到边疆为奴。还有一个叫戴名世的安徽人，也特别留心明史，他曾给自己的学生余湛写信，让其搜集南明小朝廷桂王的资料。后戴名世中举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有人告发戴私修南明历史的事，戴被处死，其祖父子孙、母女妻妾等多人受株连。

康熙六十九岁去世，四子胤禛继承皇位，年号雍正。雍正时期文字狱最盛，捕风捉影，草菅人命，叫人防不胜防。曾做过年羹尧书记官的汪景祺写了一部《西征随笔》，书中一首诗有一句“皇帝挥毫不值钱”。雍正认为是讽刺他字写得不好，便以大逆不道之罪将其斩首，妻女也被发配为奴。在翰林徐俊的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雍正认为“清风”即暗指清朝，遂以诽谤朝廷之罪将其杀害。内阁大学士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官时，出了道“维民所止”的试题。这句

原本出自《诗经》的话，却被认为“维”字和“止”字是“雍正”二字去头而来，是砍皇帝脑袋的意思。于是查嗣庭被捕，还未及定罪即死在狱中。但雍正仍不解恨，下令戮其尸，杀其子，家属发配边疆。

“吕留良事件”是雍正年间波及面最广的文字狱。早在康熙年代，书生吕留良就因不满清朝统治而拒绝应召，出家当了和尚。但他仍著书立说，主张分清“华夷之别”，他称明朝为本朝，称清朝为夷。一个叫曾静的人看到吕留良的书稿后，深表敬佩，让其弟子张熙找到陕甘总督岳钟琪，托他刻印此书并劝其反清复明。岳钟琪却上书雍正皇帝，捉拿了张熙、曾静等人，并查抄了涉案人员的书籍和诗文。雍正下令严加惩处，吕留良虽然已死，坟墓仍被掘开，劈棺戮尸，其他所有涉案人员都被满门抄斩。

乾隆在位期间的文字狱事件，比康熙雍正两朝的总和还多。他曾下令大肆搜查野史诗文，因此获罪的人不计其数。江苏东台举人徐书夔有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意思是明天早上鸟儿振翅飞往京城，但被说成是要振兴明朝、废弃清朝。当时，徐书夔和他的儿子都已去世，两个孙子还活着。乾隆下令，死了的鞭尸，活着的砍头，连当地官员也因失职罪而被杀。

闲话京津匾额

北京是座古城，处处蕴涵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姑且不论诸多文物古迹及历代相沿而成的风尚习俗，单是店铺的匾额，就足以显示出它作为文化名城的历史价值。

匾额亦称“匾榜”、“牌额”，亦可单称“匾”、“额”。它是以大字书写，悬挂在门楣、堂室或亭榭上的。南宋文学家楼钥有《玫瑰集·先兄严州行状》云：“下笔辄工，好事者争求匾榜，流传甚多。”由此可见南宋时悬挂匾额之风即已盛行。

明清以来，京城那些附庸风雅的商人，不仅求文人学士为其店铺命名，而且讲究悬挂由名人书写的匾额。以销售名人字画及文房四宝著称的“荣宝斋”，其字号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匾额是特请同治甲戌（1874）科状元陆润庠题写的。开业于明代嘉靖末年的“鹤年堂”药店（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字号取《淮南子·说林》中“鹤寿千岁，以极其游”之意，其匾额字体苍劲，颇有神韵，据传系奸相严嵩手书。

规格最高并有传奇色彩的匾额当数乾隆帝御题的“都一处”。这家驰名中外的烧麦馆，是开业于乾隆三年（1738），原名李记小酒店，以物美价廉的晾肉、马莲肉、玫瑰枣、煮小花生等小菜赢得酒客的青睐。乾隆十七年除夕之夜，皇帝携内侍二人微服私访，偶至店中，对伙计招待之殷勤、酒味之醇香、小菜之可口极为嘉许。未逾月，乾隆即遣太监将御笔“都一处”黑漆金字四周镌刻蝙蝠图案的虎头匾额送至李记酒店。自此，该店誉满京华。至同治年间，“都一处”又增添三鲜

烧麦及炸三角等别具风味的食品，名声越来越大。

清末号称“穿砚书”的王法良，专攻颜体，真草俱佳。据说他自幼居乡习字，砚被磨穿者不知凡几，故得此称号。一次，清宫太和门失火，修复后所书门额，均不合当时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之意。经翁同龢推荐，王法良书写的门额荣邀“圣览”。后又令其书昭德、贞度诸门额，于是王法良书名大振。此外，据我所知，故宫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五字原系李煜瀛所书，听说60年代改为郭沫若字。

几十年前，北京有名的匾额书家要算王埣、唐驼、冯恕诸人，有“无匾不书埣，有额皆书驼”之说。据说“同和居”现在新悬挂的匾额为宣统皇帝的御弟爱新觉罗·溥杰的手迹。如今，不少商家一改统统仿宋体死板拘泥的字号，请当代人题匾额。“文奎阁”、“邃雅斋”书店，据说是“文革”前邓拓和王昆仑的手笔。“印痕阁”刻字店落款是胡厥文，“古燕阁”落款是当代著名画家李苦禅。

当年天津，有颜、华、赵、孟四大写家。第一流商店的牌匾，大部分出于这四大写家之手。严、华、赵、孟四家指的是严范孙、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

严范孙，前清翰林，做过学部侍郎，辛亥革命后隐居津门。他写的楷字，在苍劲中见秀丽，非常好看。东马路天津造胰公司的“营业部”三字，就是严范孙写的。可惜因为他忙于办学，他的字不容易求到。华世奎字壁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在翰林院当编修。他写颜真卿体，但又有所发展。天津商家挂华世奎的匾很多，“天津劝业场”那五个大字就是华氏晚年的代表作。赵元礼字幼梅，前清举人。他写苏体字，写的匾也不少，如北马路“祥德斋糕点总店”、东马路“凯记”公司等，字体潇洒俊逸。孟广慧字定生，山东邹县人。字体近乎魏碑，后来又宗欧、宗赵，苍劲有力。他不是进士出身，但由于是亚圣孟子的后裔，在天津也享有盛名。

当然，天津的牌匾并不只是出自这四大写家。好牌匾还有很多，如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四个字的楠木金匾是翁同龢写的。翁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也是一代书家。这四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功力非凡。估衣街绸缎庄“谦祥益保记”的匾额是山东状元王垿写的，神韵清逸，百观不厌。有的商店也请北京名家如潘龄皋、张伯英等写匾，大成雨衣厂和无愧楼奠基典礼的基石，就出自张伯英之手。

天津商店除去字号匾以外，还悬挂具有广告意味的边匾的习惯。例如药店要挂“桔井”、“杏林”，茶叶店要挂“龙团”、“凤髓”，糕点店要挂“福寿长元”、“玉粒生香”，大饭庄则是“食德”、“饮和”或“旨酒佳肴”、“醉月飞觞”，法租界交通旅馆也挂有“交道接礼”、“停长者车”的边匾。但一般名家都愿意写字号匾，不愿写边匾。因为字号匾上要题名款，写年月，金滚朱印，显得高雅。字号匾两旁的边匾，则像唱戏时给名角“挎刀”一样，充配角而已。

孔庙进士题名碑

当走进北京孔庙的第一座院落，就会发现孔庙两侧的松柏林间引人注目的进士题名碑林。

这些题名碑共有一百九十八座，上面镌刻有元、明、清三代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进士的姓名、次第和籍贯。

碑上英才留名，供游人观赏，足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其中的著名人物，更令人钩古思今，浮想联翩。在大成门西侧，后一排，东数第五座碑，上有于谦题名。于谦，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人，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科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部。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于谦从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并率军民浴血奋战，击退瓦剌军，保卫了北京，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后二排从西数第三座碑，可以见到林则徐的大名。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福州）人，爱国政治家，亦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于嘉庆二年（1797）考中秀才，1804年中举，1820年后任江南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和陕西等省按察使、江宁和湖北等省布政使等职。1837年升任湖广总督。虎门销烟，林则徐震惊中外。

前二排从东数第五座碑，龚自珍的姓名镌刻其上。他是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进士。龚自珍，又名龚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名今文经学家、诗人。他痛恨清政府腐败，常对社会弊病

痛加讽刺。他认为政府用人皆凭资历，致使所有高官贵臣多为齿稀发秃、精神疲惫的老朽，在《己亥杂诗》中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东侧东数第二座碑上，可见到袁崇焕之名。袁崇焕，别名元素，广西藤县人，明末爱国将领。他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进士。后为辽东巡抚，继任兵部尚书。崇祯二年（1629），后金威逼北京，袁崇焕率部保卫北京。后因崇祯皇帝中皇太极反间计，袁崇焕冤死。

接着数到第八座碑，便能看到徐光启的名字。徐光启，字玄扈，上海人，明末杰出的科学家。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进士。

西侧前一排西数第一座碑上有蔡元培之名。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著名教育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他是光绪十八年（1892）丙戌科进士。

前一排东数第一座碑，则可以寻到沈钧儒之名。沈钧儒，浙江秀水人，著名爱国人士，“七君子”之一。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进士题名碑上，还可找到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像介绍西方思想的魏源、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洋务派领袖李鸿章……

孔庙进士题名碑，不失为中国文物之宝，是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酒令种种多奇趣

古往今来，热衷于饮酒行令的文人士大夫比比皆是，形成了饶有趣味的“酒令文化”。饮酒行令，既需博学和才华，又要机敏与伶俐，心快、腿快、嘴快、手快，四者缺一不可。酒令饶有情趣，因此这一游戏代代相传。清人俞效培是个有心人，花费大量心血辑成了一部四卷的《酒令丛钞》，颇为有趣。

酒令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旧时人们行酒令时喜作对联。如一人说：“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另一人则对：“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出对者再说：“锄麑（春秋时晋国力士）触槐，死做木边之鬼。”对者对曰：“豫让（春秋时晋国人）吞炭，终为山下之灰。”如此说下去，凡不能对上或对得不工整者，就算输，罚以酒。

酒令中有一种诗联，由一人先背诵一句名诗，接联者必须以前者诗句的末尾字为首，说出第二句诗来。如第一人诵出“两个黄鹂鸣翠柳”，第二人便以“柳”字为首，接诵“柳浦桑村处处同”，第三人以“同”为首接联“同是江南寒夜客”，第四人以“客”为首接“客路多逢汉骑营”……如此相接吟咏，凡接不上者就得罚酒。

酒令中还有改字型，首行令者将古诗故意读错一字，接联者则应另外说一句诗“解释”之。如“少小离家老二回”（“大”字错作“二”字），对“只因老大嫁作商人妇”；“菜花依旧笑春风”（“桃”字错作“菜”字），对“只因桃花净尽菜花开”；“旧时王谢堂前花”（“燕”字错作“花”字），对“只因红燕自归花自开”……如此循环，不一而足。

酒令中的拆字型也很有趣。如《云麓漫钞》中记载，陶谷使越，吴越王于席间行令：“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谷很清楚对方之意，巧妙地对曰：“口耳王，圣明天子要钱塘。”这就是酒令中的“拆字”。

另一种类似拆字型的酒令，其规格是用同音字分合，以韵相协，再用诗文中的句子结束。清末，某县县官易主，新任知县设席为前任饯行。新任知县少年得志，目中无人，在酒席上行酒令哂笑前任：“有水读做溪，无水也读奚，去其溪边水，加鸟变成鸡。得意猫儿雄似虎，失意凤凰不如鸡。”前任知县本已怏怏不快，此刻又遭此讥讽，不禁怒火中烧，遂向新任知县回一令：“有水读做淇，无水也是其，去掉淇边水，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入平阳被犬欺。”这时，座中一客人见两位知县口角相争，互不相让，赶忙站起来当和事佬：“有水读做湘，无水也是相，去其湘边水，加雨变成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此令正中两位知县的下怀，于是满座释然。

年龄称谓谈

过新年，每人都无例外地长一岁，由此想到了传统的年龄称谓。

从幼到长，依此顺序共有十几个常用叫法。童稚阶段的小孩称“总角之年”，孩童期的交往称总角之交。角，小髻，古时候小孩头顶两边留发亦称之为角。挽束在头顶的头发，称之为发髻、头髻。“总角”为收发结髻的样子，古称童年时代为“总角”。

称少女“豆蔻之年”。语出杜牧《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豆蔻”是一种植物，其花成穗时，嫩叶卷而生，穗头深红叶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淡，人们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苞花”。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苞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少女如花似玉、美丽可爱。再长一年，女子到了十五岁，则称“及笄之年”。笄，古代盘头发用的簪子，特指女子盘头发插簪的年龄，即成年。《仪礼·士昏礼》记载：“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礼记》上说“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古人早婚，“及笄”的女子就算达到结婚的年龄了。再过一年，十六岁惯称“破瓜之年”。古时文人拆“瓜”字为二八字相加以纪年，谓十六岁。

男孩长到二十岁称“弱冠之年”。古时二十岁的年轻人要举行冠礼，表示已进入成年人阶段。

《论语》中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在我国影响非常之大。“而立”是指阅历多，能力强，有主见，可以独当一面；“不惑”则是指经过几十年生活的严峻考验，遇事头脑

冷静，不慌张，认真思考，判断能力也强得多了；“知命之年”是五十岁人的代称，指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并能运用这些规律，经验也相当丰富；而“耳顺之年”是到六十岁的老人见多识广，谦虚谨慎，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

古时还称五十岁为艾。艾，是一植物，颜色为苍白色。孔颖达疏：“发苍白色如艾也。”《方言》第六：“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或谓之艾。”称六十岁为耆，老者之义。《孟子·梁惠王下》：“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晋书·食货志》：“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长孺齿，可以养耆年。”《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荀子·致士》：“耆艾而信，可以为师。”

“古稀之年”是七十岁的代称。古时候人能活到七十岁是非常稀罕的。杜甫《曲江》里就有“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礼记》上把八十、九十曰耄，就称“耄期之年”。《诗经·秦风·东邻》：“逝者其耄。”《毛传》：“耄，老也。八十曰耄。”因此，人们将这七八十的老人称为“耄耋老人”。老人一百岁，称“期颐之年”。《礼记》上说：“百年曰期、颐。”郑玄注：“期，犹要也；颐，养也。”孙希旦集解：“百年者饮食、居处、动作，无所不待于养。方氏悫曰：‘人生以百年为期，故百年以期名之。’”就是说“期”为百岁之意；颐，释之“奉养”。这就告诫后人，长辈老人特别是到了百岁，是要晚辈孝敬、奉养的。

古今数字趣谈

自然数中的一至九，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无穷的奥秘与趣味。

“奇数”，有人认为不吉利。买猪买牛不选这个日子，连妈妈带孩子回娘家都不愿在单数的日子。但也有少部分人认为阴历的初一、十五是好日子。

“三”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如佛教以经、律、论为“三藏”；佛、法、僧为“三宝”；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为“三乘”。佛教把人性分为善、恶、无记（不善不恶无法识别）“三性”；皈依佛、皈依法（佛法）、皈依僧为“三皈依”，又称“三皈戒”；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为“三善道”，又叫作“三善趣”；“三头六臂”是佛经上形容佛的法相的，常用来比喻神通广大，本领出众。佛教文化中有关“三”的用语很多，如“三学”、“三界”、“三觉”、“三身”、“三世”、“三凿”、“三纲”、“三障”、“三铺”、“三尊”、“华严三经”、“西方三圣”、“龙华三会”……

“三”的奥秘也是无穷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谚语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婚礼常行三鞠躬，志哀静默三分钟，古建筑的三层基台、三层石级、三重屋檐，等等。此外还有“三结合”、“三要素”、“三大件”……

“七”这个数字不招人喜欢，在有病人或亡者时它出现较多。刚出生的婴儿在头七天里最易发病，当妈妈的怕“七风”。人死后要过“七”，过了“三七”，一些禁忌才解除。

要想发离不开“八”！这是苗族、侗族人的一句口头禅。当今社会，无论那个民族都流行这句话。公家的、私人的大车、小车，电话的号码，甚至住宅的门牌号码，都争着要有“八”字，哪怕价钱再高也要买下。对于这个数字，苗族、侗族人还有着特殊的爱好。年轻小伙子给岳父母送的礼篮中必有八个包子；晚辈给长辈送的礼篮中必有八个糍粑；姑娘结婚时，男方会给她置办八套新衣，女方则回赠八个红包，内装八样糖果点心；姑娘出嫁的头天晚上，要邀平日最要好的八位伙伴唱歌陪房；红白喜事，主人要摆出八仙桌，还要用八种烹调方法做出八大碗菜肴宴请来宾。

“九”，因为音同“久”，人们用得也很讲究。如在苗族，姑娘出嫁时，有一位长辈会抓起大把谷米，往送亲迎亲人的头上、身上撒，前后各撒九次。往前撒九次，表示新娘去到郎家永久不会缺粮；往后撒九次，则是希望新娘以后多回娘家，娘家也永久不会缺粮。豪爽的侗家人，在酒席上也常用“九”字。主人双手高擎满满一海碗酒，一边真诚地为大家敬酒，一边连声说：“吃酒（久）！吃酒（久）！”而喝酒的来客即起身回敬主人，并答：“酒（久）吃！酒（久）吃！”双方都很巧妙地借了酒的谐音表达祝福。

趣说北京的“三”和“四”

北京名胜荟萃、古迹众多，同一类的东西用数字归纳在一起，非常有趣，其中与“三”和“四”联系最多。

建筑方面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拱卫京师的三大桥：永定河上的卢沟桥、通汇河上的永通桥和追彰忠臣的朝宗桥。在园林方面，北京云居寺有三奇石：施茶亭北半山腰的“绵羊石”、柏树沟北朝阳洞内的“木耳石”、雷音洞北崖上的“蛇头石”；圆明园有三园：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颐和园谐趣园有三趣：玉琴峡声趣、知鱼桥桥趣、瞩新楼楼趣。

过去，琉璃厂雕刻有三绝：刻铜的张寿丞、刻瓷的朱友麟、刻竹的张志鱼；老北京还有三绝：唱不过余叔岩、书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祥（白是燕京第一名厨）；老北京艺坛也有三绝：评书艺人双厚坪、京剧演员谭鑫培、京韵大鼓演员刘宝泉。

房山十字寺有三宝：白果树、辽碑、元碑；广济寺也有三宝：七叶树、陶制方缸、木化石；密云云蒙山也有三宝：杏瓣、瓜子、酸枣。其他如北京的三美味：狗肉、马肉脯、驴肉；云居寺三美：香椿、豆腐、水；京语三大师：曹雪芹、文康、老舍。以上这些有趣的“三”，只是众“三”中的一小部分，但就此亦可窥北京胜迹之一斑。

提起北京的“四”，就更是丰富多彩，饶有趣味了。

先说紫禁城有四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昌平沙河

巩华城也有四门：南曰拱京、北曰展思、东曰镇辽、西曰威汉；北京昔日的东四牌楼四坊：思城坊、仁寿坊、保大坊、明照坊；西四牌楼也有四坊：金城坊、鸣玉坊、积庆坊、安福坊；颐和园长廊有四座重檐八角亭，自东向西为：留佳亭、寄澜亭、秋水亭、清遥亭；玉泉山有四塔：玉峰塔、华藏塔、妙高塔、圣缘塔；天坛皇穹宇有四大声学现象：回音壁的回音、三音石的叠音、天心石的空音、对话石。

饮食方面，老北京有四类菜馆：书茶馆、茶酒馆、清茶馆、野茶馆（开在郊外荒村中）；老北京有四大饭庄，又称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羊肉制品有四大家：东来顺的涮羊肉、烤肉季的烤羊肉、月盛斋的酱羊肉、白魁的烧羊肉；老北京黄酒有四大茂：和茂、勤茂、同茂、盛乾茂；明末清初北京有四座官冰窖：德胜门外西护城北岸关厢西侧冰窖、北海公园东门冰窖、海淀镇西栅栏迤北军机处北口冰窖、前门外东珠市口冰窖。

另外，老北京有四大钱庄，号称四大恒：恒利号、恒和号、恒兴号、恒源号；中药行中有四大堂：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庆仁堂；老北京著名的四寺四花木：法源寺的丁香、崇效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明代北京清真寺有四大官寺：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晋寿寺、安外二条法明寺；等等。

有趣的“拆字”

早年民间流传着“拆字”的故事，从字面上看是文字游戏，却包含着重大的社会内容。

拆字源于何时？据说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不过，那时是根据做梦或其他偶然的事件进行解说推算。真正饶有趣味的“拆字”，则是在北宋年间出现。

据《夷坚志》载，北宋末年有个著名的拆字者谢石。宋徽宗赵佶传位给儿子钦宗后，曾写了一个“朝”让谢石拆。谢石看了“朝”字，对前来送字的宦官说：“这个字不是你写的。据字而言，‘朝’字分开为‘十月十日’，一定是这一天出生的大贵人写的。”因谢石拆“朝”字时说对了赵佶的生日，故赵佶对他“赐赉甚厚”。此次谢石拆字得福，有一次却因拆字惹了大祸。据说南渡后，一次有人让他拆“春”字。他说：“春”字，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当时正是秦桧得势之时，他因此被放逐，后死于戍所。

早年读《夷坚志再补》，其中也有一个拆字问国事的故事：南宋初年，有个宰相写了个“杭”字让算命先生拆字，当时杭州是南宋的首都。算命先生一看，忙说大事不好，“杭”字是“木”与“亢”合成，将“亢”字一点移至“木”上，便是“兀术”二字，这说明金兀术要南侵了。据说没过几天，金兀术果然领兵南侵。当然，这里有算命先生对形势的洞察与巧合的成分存在。

明朝末年有一个拆字者，本领也很不寻常。那是崇祯年间，李自

成的军队逼近北京，崇祯派一名太监便服出宫，探听消息，正好遇上这个摆摊测字的人。太监随口说出个“友”字让测字人测算国家大事。拆字者说，不好了，“反贼早出了头了”（“反”字出头是“友”字）。太监闻听，马上改口说：我说是有无的“有”字。测字者说，“有”字也不好，“大明已去半矣”（“有”字是“大明”二字去一半合成的）。太监又改口说是“酉”字。拆字者说，“酉”字更为不妙，因为天子是至尊，“至尊”已斩头截脚矣！太监无语而返。当时的国事如何，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演说字义也完全可以断言。不过，拆字者能把“友”、“有”、“酉”三个字编造得如此风趣巧妙，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对汉字结构研究得精到。

打灯谜

北京在酷暑季节，白天火伞高张，天气燠热。到了晚上，有时爽风习习，人们多在室外乘凉，老老少少有坐着小板凳摇扇谈天的，也有在灯下下棋的，还有些在“打灯虎”（即打灯谜）。笔者那时曾偕兄弟去猜灯谜，也曾自制过谜灯，在大门附近悬灯候教。

谜语也叫“春谜”，又叫“灯谜”、“灯虎”、“文虎”、“闷闷儿”、“谜谜子”。查查书，据说又叫“隐语”、“瘦词”、“离合体”，等等。一个小玩意儿，居然有这么多名称，你说好玩不好玩？

谜语曰“春”、曰“灯”者，因为它是元宵前后看灯时的玩意儿。《红楼梦》中，元春在元宵省亲之后，派太监从宫里送出一个小纱宫灯，灯上贴着给宝玉等人猜的谜语。为什么一定要贴在宫灯上，而不装在一个信封里呢？因为猜谜的游戏，是灯节看灯时的趣事。后来贾母主持灯谜雅会，也特地做了一架“灯屏”。不只《红楼梦》写到猜灯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写到这事，大致是说元宵之夜在宣武门外胡同中看一些人家大门口灯笼上贴的灯谜，评论哪一个做得好，哪一个做得不好，书中还记录了不少有趣的灯谜。

北京旧时特别讲究元宵节猜灯谜。康熙时人柴桑的《燕京杂记》云：

> 上元设灯谜，猜中以物酬之，俗谓之“打灯虎”。

谜语甚典博，上自经文，下及词曲，非学问渊深者弗中。

这段引文把猜谜语说成“打灯虎”，为什么呢？这是把猜谜得到“猜头”（即奖品）和打猎联系起来。过去的人认为“猜头”很难得到，像打猎得到老虎一样难，所以称之为“灯虎”、“打灯虎”。

又因猜灯谜是文人的游戏，要靠文思才情来编、来猜，所以又称之为“文虎”、“雅谜”。所得奖品，正如《红楼梦》中所写，也都是纸笔墨砚等文房用品，得不伤雅，取不伤廉，同一般赌博性的得彩不一样。自然也如俗语所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光绪都门纪略》灯虎诗云：

几处商灯挂粉墙，
人人痴立暗思量。
秀才风味真堪笑，
赠彩无非纸半张。

这就是嘲笑猜灯谜的穷秀才的呆相的。其实写这诗的人又何尝是达官贵人呢？也同穷秀才差不多吧。正因如此，所以写来有如自况，人读后别有一番滋味。

谜语有雅俗之分。雅谜如蔡中郎书曹娥碑阴八字：“黄娟幼妇，外孙齑臼。”杨修解作“绝妙好辞”四字。《三国演义》据此写了一段很好的故事。至于“花房子，红帐子，里头住个白胖子”，猜作“落花生”，那便是文人学士眼里的“俗谜”，是孩子们玩的“猜个谜儿，破个闷儿”的“闷闷儿”和“谜谜子”了。“闷闷儿”是北京儿童的娇言乖语，“谜谜子”是江南小儿女的悄悄话。写文章常恨不能表现声音，如果报纸、书籍随着文字能显示声音，那“闷闷儿”和“谜谜子”的娇嫩声音多么有

感染力啊。

至于把谜语叫“隐语”、“瘦词”等，那就是更早的事了。谜语是在三国曹魏时才出现的名词。杨修所猜中的“绝妙好辞”，当时还叫“离合体”，叫“隐语”。孔融曾将“鲁国孔融文举”六字，用隐语写成四言诗一首，共二十四句，每四句离合一字。如以“鲁”字作谜底，其谜面四句云：

渔父屈节，水潜匿方。
与时进止，出寺弛张。

简言之，即“渔”字去水，“时”字去寸，合成鲁字。而诗句又以屈原、孔子作比，表现了作者的志向。《渔父》是《楚辞》中的一篇，是屈原放逐后所写，有“屈节”、“隐潜”之意。而孔子被称作“圣之时者也”，时去寸余日字，则不能成为“时者”，进止之际，颇费周章了。这种谜语写来太难了，不但要有学识，而且要有才。孔融为“建安七子”之一，真是名不虚传。当时还没有“谜语”的说法，可能民间早有了，只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直到刘勰《文心雕龙》中才记云：“魏代以来，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者，回互其词，使昏谜也。”

南北朝时，谜语十分风行，所谓“清谈侣晋人足矣”。南朝人物，本来是最善于辞令的，加上谜语，更可以解颐了。史书中有关记载很多，现举一例：咸阳王司马禧败逃，让从官龙武作一谜解忧。龙武作“箸”谜道：“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箸”就是筷子，现在温州方言还叫箸。这样的筷子谜语，今天听来仍然生动有趣。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好谜语是非常多的。《红楼梦》中贾宝玉作过一则谜语：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
像忧亦忧，像喜亦喜。

贾政大叫：“有趣有趣。”书中说是宝玉编的，实际也就是曹雪芹创作的。然而事实上却不是曹雪芹所写，而是另有出处。明崇祯年间，吴县贡生冯梦龙，署名“墨憨斋主人”，曾编辑一本《黄山谜》，内中即收了这一则谜语。可见这则谜语早在明末已在社会上流传。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因其富有情趣并暗示镜花水月之意，遂借为宝玉的谜语了。

在明代以前，还没有专门记载谜语的书，一些著名谜语散见于史书、诗话、笔记中，有些成为流传十分广泛的趣谜。如：“目字加两点，不作贝（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猜。”谜底是“贺（賀）”、“资（資）”二字。又如：“四个口，尽皆方，加十字，在中央。”谜底是“图（圖）”字。以上二谜均载于宋人《钱氏私志》中。又如：“一人立，三人坐，两人小，两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过。”谜底是“俭（儉）”字。见于宋人洪巽的《谷漫录》。

明代出现了专门记载谜语的书，如《谜社便览》、《千文虎》等，收集了大量前人谜语，不过这种书现在很难见到了。冯梦龙的《黄山谜》就收了不少苏州吴语谜，十分有趣。举两个例子：“丝虽长，湿哩搓弗得个线；经虽密，乾子织弗得个绢。”“板板六十四，一生有正经，说嘴又说脸，眼里看弗得个灰尘。”前一谜底是“雨”，后一是“板刷”，全是方言口语所编。这种谜语，只能用吴语读才有情趣，一读普通音，便索然无味了。

茶谜

茶叶最早是作药用的，后来才作为饮料进入日常生活。而古时候饮茶又与文人墨客的生活结合起来，茶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有了茶文化，也就随之出现了“茶谜”和茶谜故事。

我国的茶谜，源远流长。最早的茶谜，当数古代谜家撷取的唐代诗人张九龄《感遇》一诗中的“草木有本心”之句。“草木有本心”，即谓“草字头”与“木”之间，有“本”字之“心”，即“人”，合起来正是个“茶”字，相当切题。

我国及近邻日本、韩国，都有为老年人祝寿赠送茶叶或以茶为题的字画的礼俗。为何以茶做寿礼呢？一则绝妙的茶谜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你看那“茶”字下部，不是包括“人、八、十”吗？再加上草字头，是个“廿”，这样，八十加二十，正好是一百。一百是个吉祥数字，寓意“人寿百岁”。这当然是最好的生日祝贺了。

至于我国民间流行的口头“茶谜”，就更多了。如“我在山中，一色相同，泡在水里，有绿有红”这个谜语，很通俗，一看就能猜出是茶叶。同时，此茶谜还是一首风景诗，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还有一些拟人化的茶谜，说来也很有趣。比如这样一首茶谜：“虽是草木中人，乐为大众献身。不惜赴汤蹈火，要振万民精神。”将茶拟人化了，含义颇深。

随着茶叶品类及茶具的增加，又萌生出许多有趣的茶叶、茶具

谜。如："一只无脚鸡，立着永不啼。喝水不吃米，客来把头低。"这是茶壶。

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妙趣横生的茶谜故事。

相传，在江南一座古刹里，有个嗜茶成癖的老和尚。他与寺外一个小店主是茶友，也是谜友，两人常在一起品茶猜谜。一天夜里，老和尚突然茶瘾、谜兴大发，便叫一个哑巴小和尚头戴草帽、脚穿木屐，代他去找那店主取一件东西。店主见到小和尚如此打扮，二话没说便递给小和尚一包茶叶，让他拿回。老和尚一见茶叶，不住点头。因为，小和尚戴的草帽，即"茶"之草字头；脚穿木屐，即指茶字下的"木"；中间的小和尚，便是茶字中间的那个"人"字，合起来是一个"茶"字。

传说，一次祝枝山去唐伯虎家，一见面唐伯虎便说："老兄来得正好，我有一个四字谜，你若猜得出，我请客；若猜不出，恕不接待。"说毕，吟诗一首：

言对青山青又青，两人土上说原因。
三人牵手缺只角，草木之中有个人。

祝枝山听罢，笑道："那就请倒茶吧！"他猜中了，这首诗谜的四个字正是"请坐奉茶"。

中华字谜第一碑

在浙江与虞舜遗迹隔江相望的上虞曹娥江畔，有一座气势雄伟的古庙，它就是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而兴建的，叫做曹娥庙，亦称孝女庙。庙中曹娥碑，为中华字谜第一碑，堪称谜坛一绝。

相传，汉安二年（143）的端午节，居住在舜江之畔的曹娥之父曹盱，与乡人迎潮神伍子胥，驾舟逆流而上，不幸被水所溺，不得其尸。时曹娥年十四，为寻父，沿江哀号，历七昼夜不得，遂投江而殉。五日之后，曹娥身背父尸，浮出江面。观者塞道，千夫失声，声动国都。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孝女投江觅父的故事。虞人为纪念她，改舜江为曹娥江，这个地方亦改名为曹娥。

在曹娥殉难后的第八个年头，即汉元嘉元年（151），上虞县令度尚为曹娥建庙立碑，碑上刻诔文一篇，以彰孝烈。据传，诔文为度尚外甥邯郸淳所撰。邯郸淳系当时才子，受命后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采飞扬，一时声震文坛。

汉议郎蔡邕，为访求王充遗作到上虞，慕名前来观碑。夜深人静，月色朦胧，蔡议郎以手摸碑而读之，叹为奇文，忙索笔在碑阴写下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以赞颂这篇碑文。观者均不解其意。

曹操是蔡邕的好友，而殉难曹娥又出自曹氏之门，故对此碑十分重视。一次，曹操见到碑文，询问主簿杨修是否破解了蔡邕的意思。杨修称已解。好胜的曹操要杨修暂且勿言，待己思之。马行三十里之

后，曹操突然省悟，原来是“绝妙好辞”四字。原来，“黄绢”者，色丝也，隐“绝”字；“幼妇”者，少女也，为“妙”字；“外孙”者，女之子也，藏“好”字；“齑臼”者，齑是姜蒜调料之碎末，味辛，捣烂这些东西之臼谓“受辛之器”，“受”字旁加“辛”为辤，是“辞”的异体字。

蔡邕的题词，使曹娥碑成了中国最早的字谜碑，一直受到后世谜家的推崇。人们还把这种形式的谜语称为“曹娥格”。从此，曹娥碑名传千古，历代墨客骚人纷纷来曹娥庙为碑事做文吟诗，临摹碑帖。罗贯中、曹雪芹等小说大家，还把碑事写进自己的作品之中。

曹娥碑流传甚广，影响颇大。日本有不少学者专家对曹娥碑潜心研究，并有论文见于报端。来曹娥庙观光之港澳台游客，对字谜碑更是情有独钟，从中领略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在游览之余，他们大都要带上几件曹娥碑的拓本，以作留念。可惜原碑已失，今碑为宋元佑八年（1093），王安石之婿蔡卞据汉碑旧藏本诔辞重书。

有趣的高考“谜题”

内地近几年的高考中，曾有三次将谜语列为试题。众多的考生面对谜题束手无策，有些人认为这是专出偏题刁难考生。其实，考试出此类题目不从今日始。

30年代初，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在一次国文考试中增加了一道对联谜题。上联是“孙行者”三字，要考生答出下联。

上联这三个字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别名。许多考生一见，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未料到会出这样的试题，再说，就是作对联，古往今来也未曾见过单独用人名作对的。更有一些考生认为，堂堂国立大学考试，竟以旧时科举考试的办法出偏题，实不应该。这可难倒了众多学子。有个考生更为不满，一气之下竟在“孙行者”联下写上“王八蛋”。

但是，这道题是非做不可的，试卷上已经特别注明了。学子们没有办法，只好乱答一气，试试碰碰，也许能侥幸得分。于是很多学子搬出了《西游记》中的人名和妖名来，诸如“猪八戒”、“牛魔王”、“沙和尚”等等，无奇不有。

自然，这些考生都吃了零蛋。只有一名考生在“孙行者”的下面对出“胡适之”，得了满分。不过，这个考生也未答出原定答案“祖冲之”。

此题以“胡适之”对“孙行者”，虽不如“祖冲之”更妙，但也有一定

道理。“胡”、“孙”都是姓，“行”与“适”都是动词，而“者”与“之”又都是文言虚词。

事后，社会上很多人对陈寅恪教授提出了诘难，教育界的人士们也议论纷纷，批评陈教授在出考题上“开倒车”。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以对联为试题了。

40年代末，某大学招生考试有一道数学题，题为：

三角几何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

这道题难倒了考生，无人答出。其实，这道题如不从谜的角度来审题，而用加减推算法来做，恐怕连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也能答出来，此题巧妙地把数学名词“三角”、“几何”，与货币的“三角”、疑问词“几何”相互混淆，煞是迷人。正确答案应为“五角”。因为此题的题意是“三角加上多少是八角”。

50年代初，有一年高考数学题为：

南京的白菜多少钱一斤？

这也是个“谜题”，它把计量词“钱”和货币“钱”相互混淆，题意为“一斤等于多少钱”。而题中的“南京的白菜”则是拟题者故意用来引开考生视线的“障眼法”。这道题的答案应是“一百”。因为，一百钱为一斤也。

巧用谐音兆吉祥

人们总是向往美好，希望人生之路吉祥如意，心想事成。汉语中有许多谐音字，音同字不同，意思也不一样。人们巧妙地利用这个特点，演变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吉祥用语来。

利用谐音制作吉祥图画，在民间最为广泛。例如在一张年画上画上鲤鱼和莲花，除了可以欣赏鱼肥花艳外，莲和鱼寓有的“连（莲）年有余（鱼）”的含义，还为百姓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在贴对联时，人们往往还在门上倒贴一个“福”或“喜”字，人家一看就说：“呀！福到（倒）了，喜到（倒）了！”

过去，在宫殿和一些官吏、富户家里，经常可看到五只蝙蝠围着一个寿字的图案，这叫作“五福（蝠）捧寿”。用“蝠”代“福”，比直接用“福”字显得更具艺术性。如果画的是一只蝙蝠口衔一枚铜钱，即表示福（蝠）在眼前（钱）；如果蝙蝠是红色的，则表示洪（红）福（蝠）无量，更是大吉大利了。

一些仕宦人家，总希望世代做官发财，常常挂猴子骑马的图画，寓意为“马（马）上封侯（猴）”。如果画的是猴骑在猴的背上，则表示“辈辈（背）封侯（猴）”。

雄鸡作为一种吉祥动物，深受画家和人们的欢迎。公鸡鸣叫含有“功（公）名（鸣）”之意。某些望子成龙的人喜欢挂雄鸡引颈长鸣的画，那是期待子女将来功成名就。

在某种特定的日子或者人们相互赠送礼品、纪念品时，巧用谐音祝福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比如结婚时，人们要往被子里或枕头里放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或栗子，表示“早（枣）生（花生）贵子（瓜子）”或“早（枣）立子（栗子）”。新房里挂的画，往往是莲子桂花图或蝙蝠石榴图等，意为“连（莲）生贵（桂）子”和“多子（石榴籽多）多福（蝠）”。还有，为了祝福新婚夫妇和睦相处，白头到老，人们就在嫁妆盒里放上一面铜镜和一双鞋子，表示“同（铜）偕（鞋）到老”。在入洞房时，让新郎新娘吃一些蜂蜜和米面做的点心，表示“甜甜蜜蜜”。

当人们翻建新房子、喜迁新居时，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在礼品中，鸡和鱼是绝不可少的，因为这两样礼物有“吉（鸡）庆有余（鱼）”、万事如意之意。如送图画，应送画有柏树、柿子和橘子的画，以示住新房后“百（柏）事（柿）大吉（橘）”。

如果要为长辈或朋友祝寿，则选用有绶鸟（火鸡）、梅花和竹子图案的画，叫作“齐眉（梅）祝（竹）寿（绶）”；或者是画有水仙花和寿石图案的画，叫作“群仙（水仙）拱寿”。

药名谐音表情意

明末，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后准备进军江南。当时江西巡抚郭某有一位在北京的同僚得知消息后，想写信告诉郭巡抚及早离开江西，但又怕信件被清兵查获，便派两个家丁带一盒礼品日夜兼程送去。郭巡抚打开礼品盒一看，上层装的是红枣，往下依次是梨子、生姜、西瓜。郭巡抚面对这四种礼物，思忖一番顿时领悟到朋友是让他“早离江西”。郭巡抚对此万分感激，便托来人也捎回两味中药，一味是“蚕蛾”，另一味是“蝉蜕”。“蛾”谐音“我”；“蝉”又名“知了”，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我知了”。送走来人后，郭巡抚马上离开衙门回故乡隐居，躲过了劫难。

多少年来，我国民间出现了许多巧借中药名写信表达情意的故事，这也反映了老百姓的智慧。

南宋抗金名将辛弃疾，在抗金前线用中药名写了一首《定风波》，作为给妻子的信：

静夜思，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苁蓉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缩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朱萸熟，地老菊花荒。

这首词很独特，是用二十五味中草药名写成的。

辛弃疾的妻子收到信后，也用中草药名写了一封回信：

槟榔一去，已历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寄奴生绕他枝，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妾仰视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来了白芨书，茹不尽黄连苦。豆蔻不消心头恨，丁香空结雨中愁。人生三七过，看风吹西河柳，盼将军益母。

回信用十五种中草药名写成，柔肠百转，意味悠长。

以中草药名写信，古已有之。从前有位年迈的母亲，他的儿子在外两年多没有回家。母亲日夜思念，寝食不安，于是请村里的老中医代笔给儿子写封家信。儿子收到信，十分惊讶。原来，信上只写了四味中药：“知母、乳香、当归、熟地。”儿子仔细一想，恍然大悟，便匆匆赶回家看望母亲。原来这封信的意思是：“你应该知道，母亲是用又甜又香的乳汁把你哺育大的，现在应该赶快回家来看望母亲。”

清末有一女子，其夫远行在外，久不归里，她遂以中草药名写信致丈夫。丈夫阅后，马上挥笔回书作答：

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苑。奈常山路远，滑石难行，姑待苁蓉耳！卿勿使急性子，骂我曰苍耳子。明春红花开时，吾与马勃、杜仲结伴返乡。至时有金银相赠也。

此信也以中药名联句，备述出门远行之艰，希望妻子体谅宥恕。

名人名字多趣味

古往今来，一些名人的名字（姓名、雅号、笔名）多有谜趣，说来颇有意思。

宋代的包拯，世称“包龙图”。在《铡美案》一剧中，有“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唱词。在宋仁宗皇帝之前，没有一个人的官名叫“龙图”，“龙图”自包拯始。那么，这个官名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仁宗皇帝是李娘娘所生。李娘娘生下仁宗后，刘娘娘设下毒计，叫太监用一只狸猫换去，并在老皇帝面前进谗言，说李娘娘是个妖怪，生了一只狸猫。而刘娘娘把李娘娘的儿子说成自己生的。老皇帝一听，便把李娘娘打入冷宫（李娘娘后来逃到陈州），而把刘娘娘扶为正宫娘娘——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老皇帝死后，仁宗做了皇帝。后来，包拯到陈州放粮，李娘娘闻知，向包拯告状，述说自己的冤情。后来，包拯为李娘娘伸了冤，仁宗把李娘娘接回宫。仁宗对包拯非常感激，要对他特别嘉奖。奖什么呢？仁宗决定亲自为包拯画张像（仁宗平时酷爱绘画，擅长画人物）。因为这张像是皇帝画的，皇帝的尊称是“龙”，故称“龙图”。“龙图”不是随便可以挂的，所以仁宗又御赐造一座楼阁，把“龙图”挂在里面，称为“龙图阁”，作为包拯的官府。后来，仁宗又封包拯为“龙图阁大学士”。自此，“龙图阁”就正式成为一种官职的名称，包拯也就叫“包龙图”了。

明代书画家唐寅（唐伯虎）在题诗作画时，常常隐其真名。他有个题款：“只在康宣两字头。”这个题款犹如一则离合体灯谜。“只”字的“口”与“八”，分别与“康宣”二字的上部分组合起来，不正是“唐

寅”二字吗？明代文学家徐渭常用“秦田水月”的印章钤款。因为“秦”拆开后为“三人禾”，扣合“徐”字；“田水月”则可合为“渭”字。多么巧妙的名字谜！

老舍先生原名舒庆春，又起了个名字叫“舒舍予”，即把自己的姓拆成“舍予”二字，意为放弃私心和个人利益，这与灯谜的离合体并无二致。文学家曹禺原名万家宝，笔名曹禺。有人问他这个笔名有何含义，他说：“我姓万，这个万（萬）字，草字头下一个禺。写文章总得有个笔名，便将万字拆为‘草禺’，但‘草’不像个姓，便取谐音来了个‘曹’字。”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原名君默，有好友跟他开玩笑：“君既默不做声，要口何用？”他听了觉得有道理，便把“君”字的“口”省去，成了“尹默”。

音乐家聂（聶）耳原名聂守信。他天资聪颖，幼年时就能够把听到的歌曲很快唱出来。因他耳朵好使，而他的姓又是三个“耳”字组成，大家便叫他“耳朵”。后来他从事专业创作，索性将名字改为“聂耳”。

京剧大师周信芳的艺名叫麒麟童，来历也很有趣。1904年，十岁的周信芳跟戏班到上海演出，由于他是七岁开始登台的，所以当时的艺名叫“七龄童”。写海报的老先生是上海人，北京话里的“七龄童”和上海话里的“麒麟童”发音十分接近，老先生听了前台管事报的艺名，认为就是“麒麟童”，便写了贴了出去，从此这个艺名便代替了“七龄童”。

“书通二酉”源何处

“学富五车，书通二酉”，是说一个人读书读得多。

“二酉”实际是个藏书的地方，那么，它究竟在哪里？若干世纪以来众说纷纭。《辞源》问世后，对“二酉藏书”作了较明确的注释：“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太平御览·四九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四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称藏书名二酉。”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二酉藏书在湖南沅陵县西北的二酉山洞。

准确地说，二酉山本是一座山，并不是古人所说的大酉、小酉两座山。发源于四川酉阳县的酉江和源于湖南古丈县的酉溪河，在这座山西面汇合，故名此山为二酉山。

二酉藏书洞，深藏在悬崖峭壁的正当中。要想入洞，须通过一段段风化脱落的岩基路，路道窄得只容半边脚落地。扒岩贴壁，牵藤拽葛，心悬悬、胆怯怯才能上去。爬上去，在一个不到一米宽的长形台阶上，矗立着四块大石碑，上面分别刻着古、藏、书、处四个斗大的楷体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清光绪庚寅年（1890）湖南督学使者闽张亨嘉书。”

在古藏书处的石碑后面，是一丈多高笔直的岩壁，须绕道爬行，才能找到二酉藏书洞，洞口宽阔，洞内敞亮，在洞两三步处，地面有一块很大的平板石，就像是当年有意放在这儿的，可以用来下棋和吃饭。藏书洞是一个天然的石洞。相传尧时，善卷隐住过此洞。它岩层

坚固，底似钢筋水泥地板，顶呈波浪形的花纹。几千年来无裂缝，也无风化脱落，真是“玉屏为顶，莲花为座”，宛如仙境。在洞口的正当中，当年有一块高大的石碑记岩。记岩记藏书之由，由于年代久远，字迹磨灭。现在碑岩已不复存在。山洞的洞身由半山腰舒展内进，而后倾斜向下延伸，进洞十五米处比较宽敞，相传藏书就在右侧。右侧的石台阶上，当年有“藏书箧”。洞的上方有炼丹池。炼丹池岩缝里常年喷水，清澈明净。继续深入，不少地方已倒塌，显得阴森森的。相传，洞的尽头通向酉江河底，前人游览时，贴壁侧耳，可以听到江面上的篙橹声。

站在二酉洞洞口，前方是起伏如涛的群山，脚下是奔腾不息的酉水，那古老的传说犹如风涛之声远远传来：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两个“秃发老儒生”偷偷将家存一千多卷竹简打点成箱，从咸阳经河南日夜南奔，然后经洞庭湖，再沿沅水转酉水逆江而上，最后藏在这“鸟飞不渡”、“兽不敢临”的二酉山山洞里。之后，这两个秃发儒生隐居此处，长日与书为伴。两人除在洞内下棋外，一个揣罐顶钟，操练武功，一个化水炼丹，求神成仙。即使偶尔下山，也要留下一人站在洞口，手持刀棒。正是“二酉奇篇人鲜识，焚书翻遣书遍存”。

此后，历代朝廷都把“二酉藏书洞”列为一大圣迹。历代都有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专程到二酉山访古朝圣。

“三味”与“三昧”

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人都知道，鲁迅先生从十二岁至十七岁在“三味书屋”读书。“三味书屋”是个三开间的小花厅，厅正中挂着“三味书屋”匾额，两旁屋柱上还有一副抱柱对：

至乐无声唯孝悌，
太羹有味是诗书。

匾额和抱柱对都出自清代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之手。

“三味书屋”原来是塾师寿怀鉴（字镜吾，晚字镜湖）的书房。寿怀鉴老先生在“三味书屋”坐馆执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三味书屋”原名叫“三余书屋”，系寿怀鉴的祖父寿峰岚定名，取“为学者以三余”之意。清末，寿峰岚把“三余书屋”改为“三味书屋”。

“三余”是个典故，三国时期的董遇曾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者晴之余。”这也是寿怀鉴先生对学生常说的话，意在勉励他们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勤奋读书。晋代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序》言：“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宋代的苏东坡也很赞赏“三余”之说，他曾做诗抒写利用空余时间读书的乐趣：“此生有味在三余。”后来，人们便以“三余”泛指闲暇时间。

“三味”的含义，据曾在“三味书屋”教过书的寿洙邻（寿峰岚之曾

孙）说："三味取义，幼时听父兄传言，读经味如稻粱，读书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但已忘其出于何书。"后来，有人考证，"三味"出自宋代李淑的《邯郸书目》。该书说："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味。"太羹指肉汤；折俎指帝王士大夫宴礼时，将牲体肢解折而盛于俎（俎是盛牺牲的礼器）；醯是醋，醢是鱼肉做的酱，乃调味品。这是把诗、书、子、史等书籍比喻为佳肴美味，说它是很好的精神食粮。后来，人们把它引申为再三体会、玩味诗书等含义，谓"三味"。

现在，有人常把"三味"与"三昧"混淆，以为"三味"即是"三昧"。其实，这是个误会。"三昧"并非是汉语词语，它是佛家用语，是梵文的音译，有的也写作"三摩地"或是"三摩提"，意思是排除一切杂念，使自己的心神平静。这是佛家修行的重要方法。在《智度论》卷七中就有言："善心一处不动，是为三昧。"后来，又称解脱束缚为"三昧"。

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中道："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宋史》中的《李之仪传》中也说："之仪能文，尤工尺牍，（苏）轼谓之刀笔三昧。"后来，"三昧"又指事物的奥妙或诀窍。如对某事深有造诣或悟解其奥，谓之"深得其中三昧"，而不能说"三味"。

“鲁鱼亥豕”出笑话

古有“书三写，鱼成鲁”之谚，后来遂以“鲁鱼”指错别字。《红楼梦》中有言：“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打窗，同消寂寞。”《吕氏春秋》上说，孔子的学生子夏到晋国去，路过卫国时听到一位读书人念“晋师三豕过河”，觉得很奇怪。他想：军队带着几头猪过河干什么？子夏到晋国一打听，方知篆书“己亥”与“三豕”写法差不多，抄书人给抄错了。后来人们便把字形相近而误读者称为“亥豕之误”。

“鲁鱼亥豕”的笑话古今皆有之。

元代有个县官审案，阅过一份案卷后大声叫道：“都上来！”原告郁工采、被告齐卞丢和证人何爺便一齐上堂。县官怒斥道：“本官令原告上堂，谁叫你们都进来？”衙役知道他将字认错了，便打圆场说：“老爷，原告的名字还有一种读法叫‘郁工采’。”县官想，既然都进来了，就这么审吧。于是，他喊道：“齐下去！”那三人一听，一齐下了堂。县官又火了：“我令被告答话，你们为何都跑了？”衙役又对他说：“被告的名字也有另一种叫法，叫‘齐卞丢’。”县官再不敢念名字了，问衙役：“这证人的名字怎么念？”衙役道：“何爺”。县官得意道：“我料定有另一种念法，不然我要念成‘阿爹’了。”

有位县官听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于是把《论语》背熟，以备判案时选用。一次，一个偷席子的被押到堂上，县官一拍惊堂木：“《论语》上说‘朝闻盗席，死可矣’，给我押下去斩首！”偷席子人心想：《论语》上说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昏官狗屁不通！

《论语》上还有一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何不将计就计？于是，偷席子的人说：“老爷，小人盗的不是席子而是钟。”县官若有所思地说：“《论语》上说：‘夫子之盗钟，恕而已。’那就放了他吧！”

旧时有两个秀才走到一座文庙前，就庙门上的两个字发生争论。陶秀才说是“文庙”，李秀才说是“丈庙”，谁也不服谁。正好一个化斋的和尚路过，二人便请和尚评判。和尚吟诗曰：“吾到东庄去化齐（斋），文庙丈庙两相异。你们不是孔天（夫）子，我也不是苏东皮（坡）。”又有一次，李秀才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岳父“安然无恙”。李秀才不解地问陶秀才：“无羔者，无小孩也。我岳父明明有二子一女，怎么说‘无羔’呢？”

据传，蒋介石也曾闹过“鲁鱼亥豕”的笑话。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一次点名把“许光熙”念成了“许光照”，喊到第三遍时才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报告校长，学生名字叫许光熙。”蒋介石很尴尬。幸好有个丁少尉解围：“报告校长，学生抄名单时写错了字，请处分。”蒋介石假惺惺地命人将这个少尉关了禁闭，可当晚他就用小轿车把他接出来，并一下子提拔为上校师长。

“风月无边”话“虫二”

在许多著名风景区的巨石上，都刻有“虫二”两个大字。笔者在山东的泰山、湖南的岳阳楼、河北的嶂石岩以及西湖岸边，都见到过。“虫二”是什么意思？缘何而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流行的一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故事。

乾隆乙酉年（1766），风调雨顺，岁稔年丰，乾隆正值五十六岁盛年，于是决定封禅。是年初秋，乾隆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一天晚上，乾隆带着几名大臣欣赏夜色中的泰山。此时正好月上东山，银光泻地，微风吹拂，香气袭人，恍如仙境。乾隆见状，不禁赞叹：“世间尽道皇宫好，哪知美景出天然！”

平时风趣幽默、敢与乾隆皇帝开玩笑的大臣纪晓岚说：“如此美景，不应辜负，圣上应当有所题留。”

乾隆点头表示同意，但千头万绪，一时竟无从写起，提笔许久不能落墨。

纪晓岚看着泰山月明风清的美景，有意提醒乾隆，连声称赞：“此景乃无边风月，风月无边！”

听了纪晓岚的启发，乾隆顿时来了灵感，大笔一挥，写下了“虫二”两个大字。

这很奇妙。“虫二”二字外边各加两笔，便成了“风（風）月”二

字，故而“虫二”读作“风月无边”，以此来形容一方绝胜。

关于“虫二”的由来，还有其他传说。据说，吕洞宾成仙前，几举进士不第，便云游天下。吕洞宾登上岳阳楼，下瞰洞庭湖，被“衔山吞水，气象万千”的景象所感染，便提笔在墙壁上题了“虫二”二字。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也为西湖美景题过“虫二”碑。

更有趣的是关于唐伯虎的传说。《葵仙琐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才子唐伯虎“题妓湘云家匾云：‘风月无边’，见者皆曰美”。去湘云家的公子哥们皆以为是一句颂词。可是祝枝山却说：“此嘲汝辈为虫二也。”虫二，古时指鸟和鼠。唐伯虎、祝枝山把“虫二”词作了别解，将逛青楼的花花公子们喻为“虫二”，可谓讽刺得入骨三分。

“虫二”是“风月无边”，如再有两字与之相对，岂不更妙？后来，果真有人为“虫二”对出了两个字：？？。这真是一副奇妙的对联，上联是“虫二”（风月无边），下联是“?　?”（年华有限）。“无边”对“有限”，自然界的“风月”对人世间的“年华”；上联是减笔画字，下联是加笔画字，而且平仄完全对仗。这副对联告诫人们：自然风光是无边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游玩者游览时可以尽情，但在玩过之后，一定要珍惜时光，加倍努力。

“藁城”之“藁”字趣谈

藁城市是河北省的一个县级市，前些年还一直叫藁城县。因这个县工业发达，又是北方有名的“鸭梨之乡”，故改为市。藁城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在石家庄市东三十公里处，有七十二万人口，面积约八百三十平方公里，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

然而，在商业往来或日常生活中，“藁城”之“藁”字却带来了许多麻烦，许多人不知“藁”字如何读，更有许多人将“藁”字误写成“蒿”、“搞”、“? ”。笔者曾查阅过内地发行量最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藁”的解释也只有一义，曰：“藁城，县名，在河北。”别无他解。

一字仅一义，这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就是这个“藁”字，千百年来不知难倒了多少学子。

据藁城县志载，藁城最早于西汉初年置县，后隋义宁元年（617）、宋开宝六年（973），及至元代初年，都为县郡。不过，在上述这些年代，藁城县之“藁”，均写作“?　”，上边并无那个草字头。为什么后来由“? ”变成了“藁”字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美妙的传说。

相传，元代初年，藁城县有一位董阁老（亦传说为董文用）在朝为官。他为官期间清正廉明，心系百姓，经常为家乡排忧解难，深受百姓们拥戴。那个时候，藁城无战事，百姓们安居乐业。老百姓们一方面在城内大兴土木，修建城池，营建了高台庙等一批庙宇；一方面

广植梨树，同时开发土特产，生产宫面，在北方销路很广。全县一派繁荣景象，老百姓丰衣足食，心气很高。

不久，藁城富庶的消息传到了京城，麻烦来了。朝廷认为藁城大兴土木，修筑城池，有“造反”的迹象。皇帝想：“这还了得！小小的藁城县要搞独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要狠狠地惩罚一下藁城的老百姓。”然而，一时又想不出良策，若贸然行事又怕惹怒百姓，不好收场，更怕引起周围县郡的动乱。于是，皇帝找来董阁老一起商议对策。

董阁老是藁城人氏，自然是心向着藁城百姓。他想，老百姓大兴土木，广植农桑，栽培果树，这是富民之举，与“造反”风马牛不相及，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但是，这些话又不敢直说，只好顺着皇帝之意想出一个“计策”，表面上是惩罚藁城百姓，实际上对百姓毫无伤害。他对皇帝说：这好办！要惩罚藁城百姓，就在“?　”字头上加个草字头，成为“藁”字，让藁城只长草，不长庄稼，使百姓们常年挨饿，这不就是很严厉的惩罚吗？皇帝听了，点头称是。

这样，“藁城”之“藁”字便从元代沿用至今。

北京土话颇有味

活跃在老北京人口头上的土语，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趣味盎然。

以吃而论，文学作品比喻贪吃常用“饕餮”一词；到了老北京人嘴里，却说“带爪儿的不吃土鳖，带腿儿的不吃板凳”。大肚儿汉吃少量饭菜不足以充饥，遂曰“茉莉花儿喂骆驼”。已然酒足饭饱而仍不撂下筷子，则曰“眼饿肚饱”。已经吃得“顶了嗓子眼儿”而继续硬塞，则谓之“搬山”。

文学作品称好色之徒为“色鬼”，近来又有人创造出“色狼”一词；而老北京人对此类人却说“爷儿们群儿里不走，娘儿们群儿里蹭痒痒”，或者说“见着老娘儿们就拉胯”。“拉胯”亦土语，言其下肢有病走不动也。

文学作品对老于世故、逢场作戏者描写起来总要费些笔墨；老北京人只用一句话概括：“见着是六月，见不着是腊月。”六月者，言其热乎也；腊月者，言其冷冰冰也。

文学作品形容少女容颜美丽常要用很大篇幅；北京土语则只说“粉棠花儿似的”。文学作品对贫病交加、面有菜色者的描绘起码要用几十字；北京土语则只说“盖张纸哭得过儿了”。

文学作品描写大雨阴天景象用“天色阴沉”或“阴云密布”；北京土语则以“黑锅底”三字描绘，其生动形象不言而喻。文学作品每每使

用“呼啸”、“凛冽”等词形容寒风；而老北京不识一丁的老太太们，却用“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这句既对比又夸张的土语状冬日之寒风。

北京土语于形容的同时，兼有揶揄的味儿。例如形容人身材太高且笨重，便曰“接骆驼粪”；形容人矮小，曰“缩脖儿坛子”；形容人肥胖，谓之“一篓油”；形容人瘦骨嶙峋，则谓之“人灯”；形容办事糊弄，谓之“猫盖屎”；形容人际间离心离德、步调不一致，则谓之曰“牛蹄子，两半子”。

北京土语具有极其鲜明的爱憎感情，对不法商人在白酒、牛奶、豆浆等食品中肆意兑水的劣迹，必讽之曰“净跟龙王爷打交道”；对并无真才实学、侥幸成功而名声大振者，必讥之曰“猴儿屁股，大红大紫”；对房顶开门、六亲不认的狂妄之徒，则讥诮为“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

北京土语亦有很深的哲理性，耐人寻味。对大处不算计，小处锱铢必较的愚者，北京土语必言其“大篓洒香油，满地捡芝麻”；对积蓄虽多但只出不进的，则必以“大海架不住瓢儿舀”儆诫当事者；对办事毫无准备、临阵磨枪者，老北京人必说“现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这句土话儿，那说话的口气，是善意的批评，亦兼有同情之心理。

言简意赅的北京谚语

北京的谚语，于通俗中不失修辞艺术之高超，或描摹，或比喻，或夸张，或对比，或对偶，妙趣横生，故能历久而不衰，迄今仍活跃于大众口头。

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喂食的。

这句对仗工整近似楹联的谚语，道破了昔日的官民关系，极其巧妙地勾勒出为官者贪贿无厌的本相，而和狗相提并论，则更见其辛辣的讽刺意味。仔细品之，实在绝妙。

忠臣不侍二主，好女不嫁二男。

此句谚言不仅对仗极工，而且以最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了为人者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老北京人对贰臣一向深恶痛绝，故对古刹中所供奉的关羽、岳飞等神像顶礼膜拜，虔诚有加。老北京人心目中的“好女”，是指坚守贞操的那类。

宁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

态度对比何其鲜明也！好汉子者，指德才兼备的人，为这样的英豪牵马坠镫，虽卑微而亦觉无上光荣；赖汉子者，言其无德无才且无魄力，若给如此鼠辈当祖宗，虽位尊而犹感羞愧矣！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

饱含居家过日子的经验和人情至理，有苦涩，有辛酸，是过来人的自我醒悟，也是对晚辈的提醒与教诲。

好过的年节，难过的日子。

这是平民百姓感慨系之的一句常用谚语。年节花销虽大，但时间短暂，糜费有限；度日则细水长流，清晨一觉醒来，便需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不可或缺，样样离不开钱。而俗语说“花钱容易挣钱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难过与否可想而知矣。日子既然难过，花钱就要精打细算，切忌挥霍无度，于是便有另一条警世谚语——“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若要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罪。

指出了事业有成的必由之路。老北京人对饱食终日者常用“仨饱儿俩倒儿，死了臭块地”（仨饱儿者指早点、午餐和晚饭，俩倒儿者指夜晚和午间睡觉）这句话。

含着怕化了，捧着怕摔了。

言辞幽默，对那些溺爱儿女的痴心父母，真是绝妙的讽刺。而与其相辅相成的一句俗话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言其溺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至于总以武力教育子女的严父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谚语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俏皮北京歇后语

北京人爱说俏皮的歇后语，有些歇后语颇具地方特色。活跃于北京人口头上的歇后语，其条目之多，不胜枚举。其历时之久，数百年而不衰；且涉及人物、政治、名胜、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之故事，内容丰富多彩而趣味盎然。

西直门到海淀——拉啦！

这是旧时北京人力车夫常说的一句歇后语。西直门到海淀距离不远，是从市内去颐和园的必经之路。后来，人们常借用这句歇后语指代儿童大小便不知预先告诉家长。

二龙坑的鬼——跟上啦！

北京西城二龙坑，即前清郑王府附近，辛亥革命后，府邸售与中国大学为校址。此处旧时是一片荒地，俗名“乱死岗子”。凡清贫人家死了人，无力发送出殡，多将尸体用芦苇席卷裹埋葬于此。民间有“二龙坑闹鬼”的传说，夜间倘若必须路过此处，须三五成群结伴，又唱又喊以壮胆。

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

北京天桥是旧时江湖卖艺人聚集的地方，其所练武艺，五花八门，有吞活蛇者，有吞宝剑、铁球者，有以头开砖者，有练刀枪把式兼卖大力丸者，有摔跤、耍中幡者……其实，天桥的把式并非净说不练，如吞宝剑、吞铁球、吞活蛇乃是真功夫，有时表演者竟在表演时口吐鲜血，其艰辛可见一斑。

打磨厂的大夫（医生）——懂得帽（董德懋）！

北京正阳门外往东有一条街，名叫“打磨厂”。当年在这条街路南有一位中医师挂牌应诊，此人姓董名德懋，医术一般，故有此歇后语流传。“懂得帽”乃北京俗语，意即什么都不懂，带有轻蔑的口气。

老太太上电车——你先别吹！

旧时，北京有轨电车每到一站停下，待乘客登车毕，售票员则以铜哨通知司机启行。有时，车将开时，老太太从后面赶来，招呼售票员莫吹哨。后来，此语成为讽刺“吹牛皮”者的话。

太和殿的匾——无依无靠。

这是康熙皇帝继位后，逐渐流传于京城的一则歇后语。康熙皇帝为避免皇子争夺帝位而招致萧墙之祸，一改退位前公布继承人之旧制，而将诏书存放于太和殿匾额后面，待临死或退位时当众取下宣

诏。文武大臣于宣诏前，在复杂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知依傍哪位皇子，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因此虑及将来仕途深感无依无靠。

宛平城里做知县——跪着的差使。

宛平城的知县——一年一换。

这两则歇后语，迄今仍被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们津津乐道。

宛平城位于北京西南，乃咽喉要道，是拱卫京师之重镇。按明清旧制，京师城区分别划归宛平县和大兴县管辖，中轴线以西，皆属宛平县界，以东皆属大兴县界。

明清两代时，上自皇帝下至朝廷重臣，凡赴西南各省办事者，皆出入宛平城。京官出行，朝廷在此为其饯行，知县须跪迎跪送；外埠封疆大吏进京先在宛平城落脚，知县亦须跪迎跪送，丝毫不敢怠慢，故有“跪着的差使”一说。

宛平县管界内的先农坛，特为皇帝辟有一亩三分地，供其每年春季来此耕耘，以皇帝亲事稼穑而告诫臣民莫违农时。秋收后，知县照例须向皇帝征税，以示皇帝带头遵纪守法。而七品知县胆敢向皇上征税，又有欺君犯上之罪，按律当斩，姑念其为国家收税，死罪可免，而官是绝对不能再做了。皇帝交税后，即为宛平知县罢免之时，久而久之遂成定例。

东岳庙的匾——善恶有报。

此条歇后语，在地道的老北京人心目中，可谓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矣。

东岳庙坐落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始建于元延佑六年（1319），为道教正一派大宗师张留孙自资兴建。张留孙事未竟而身先死，后由其弟子吴全节继续修建。元末惨遭兵燹。明正统年间重建，扩大东西两庑，设七十二司。

七十二司皆有司名，按职掌可分为七大部分，其一为东岳大帝行政部分，包括官职司、都签押司、掌曹史司等十二司。其二为都察调查记录部分，包括掌都察司、词状司、生死司等七司。其三为磨勘逮捕及划分善恶部分，包括磨勘司、勾生死司、追取罪人照证司等六部分。其四为定案及核案善恶并起诉部分，包括善报司、修功德司、行污司等二十六司。其五为审判部分，包括推动司、枉死司等四司。其六为执行部分，包括现报司、速报司、化生司等十八司。其七为压制管理游荡者部分，包括魍魉司、精怪司等三司。

举凡七十二司，各司其职，善恶有报，人们深信无疑，故有上述之歇后语广为流传。

北京胡同改雅名

俗话说“北京小巷多如牛毛”，虽不无夸张，北京胡同之多倒是事实。北京很多胡同名称还是沿用元明两代之旧名。辛亥革命以来，北京的胡同名进行了重大改革。据统计，前后改过的胡同名达三百条之多。

首先是有关动物名称的地名被改了，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地名已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如马圈、牛圈、羊圈、牛角、马尾、驴蹄等地名，今日都另起了新的名字。

且说带“尾巴”的胡同是怎样改的。如羊尾巴胡同改成扬威胡同，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猪尾巴胡同改成智义伯胡同，猴尾巴胡同改为侯位胡同，马尾巴胡同改成慕义胡同，等等。

其次带“肉”字的胡同名亦都改了。如驴肉胡同改成礼士胡同，羊肉胡同改成洋溢胡同，熟肉胡同改成输入胡同，生肉胡同改成寿刘胡同，灌肠胡同改成官场胡同等。

另外，带“毛”、“皮”、“猪”、“粪”等字的胡同名称也改了。如羊毛胡同改成杨茅胡同，猪毛胡同改成朱茅胡同，臭皮胡同改成受壁胡同，臭皮厂胡同改成寿比胡同，牛蹄胡同改成留题胡同，母猪胡同改成梅竹胡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等。

带“虫”、“鸟”、“鸡”、“鱼”等字的胡同名称也改了。如鸡鸭市改成集雅市，鹰房胡同改成英房胡同，鸡爪胡同改成吉兆胡同，屎壳郎

胡同改成时刻亮胡同，蝎虎胡同改为协和胡同，蝎子庙改为协资庙，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等。

再有就是有关人体的胡同名称改了。如嘴巴胡同改成醉芭胡同，胳膊胡同改成华百寿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达教、晓教胡同，罗圈胡同改为罗贤胡同，心尖胡同改为新建胡同等。

还有就是带有人名的胡同名称改了。如姚铸锅胡同改为尧治国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沙锅刘胡同改为沙锅琉璃胡同，豆腐陈胡同改为豆腐池胡同，汪太医胡同改为汪太乙胡同，宋姑娘胡同改为颂年胡同，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等等。

还有，有关服饰、器皿的胡同名称改了。如裤子胡同改为库司胡同，裤腿胡同改为库堆胡同，烟袋胡同改为燕袋胡同，荷包厂改为河泊厂，原筒胡同改为源通胡同，轿子胡同改为教子胡同，汤锅胡同改为汤公胡同，锅腔胡同改为罗强胡同，等等。

还有，从名称别致方面改动的也较常见。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干井胡同改为甘井胡同，井儿胡同改为警尔胡同，佟府胡同改为同福胡同，烧酒胡同改为韶九胡同，廊房胡同改为良乡胡同，油炸鬼胡同改为有果胡同等。

更名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把“下品”名称一个个地改为“上品”名称。

改俗为雅本为好事，令人遗憾的是，有些胡同名称改过之后，雅则雅矣，但原来特有的历史风貌、乡土气息反而体现不出了，使人有“齐固失之，楚亦未为得也”之憾。

有些胡同名原指代前代衙署或机构，改后意义全失。如内府库改纳福胡同，内官监改恭俭胡同，浆家房改蒋养房，奶子府改乃兹府，

只求音近意雅，却无法反映其历史风貌。

以前代人名作为巷名的，改后不知所云。如张皇亲胡同是明代天启皇后的娘家，改尚勤胡同；吴良大人胡同因明将吴良曾住于此，改无量大人胡同；噶礼胡同本清初总督噶礼旧宅，改嘎哩胡同；佟府夹道是清初国戚佟姓故居，改同福夹道；张秃子胡同当是诨名张秃子的平民所居，改长图治胡同。

有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胡同名称，改后面目全非，且易产生误解。如猪尾巴胡同改智义伯胡同，狗尾巴胡同改高义伯胡同，让人误以为此处原为王侯人家。后者还有一个小插曲：已故某作家曾指出“高义伯”一名欠妥，以为“后人不知高义伯之原语，或将以为有拾金不昧之义人曾住此地，且将编故实以实之矣”。作家的话幽默而中肯。

有的胡同改后过于典雅。如擀面杖胡同改廉让胡同，桶子胡同改桐梓胡同，鹅爪子胡同改吉兆胡同，闷葫芦罐胡同改蒙福禄馆胡同。有的则一改再改，务求典雅而后快，如锥子胡同最初改追贼胡同，后来嫌“追贼”二字不雅驯，于是又改垂则胡同，可能是取“垂典则于后世”的意思，虽然典雅，但未免太文了。

胡同名称改动太多，还会使一些“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寻不着故居旧地。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不过行文至此，顺便说说罢了。

约定俗成儿化音

近年京味文学风靡一时。笔者偶和友人闲聊，由北京话的儿化音，谈到目前个别文艺作品，以及电台的广播节目，在儿化音的使用上多有不当，乃至失掉京味。其实，北京的儿化音自有其多年形成的特点，不能随意滥用。以北京的地名而言，同是一个字，就有儿化和不儿化之别，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不加以区分，就不足以显示出地道的京味来。特举数例，以证一斑。

园：和平门外琉璃厂附近的东南园、东北园、西南园、西北园等胡同，“园”字不儿化。而与这些胡同近在咫尺的大小沙土园、前后孙公园，以及稍南的梁家园等，“园”字可儿化。

街：前门大街、地安门大街、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白米斜街、一尺大街等，“街”字不儿化。南长街、北长街、煤市街、兴隆大街、宽街等，“街”字可儿化。有的人这样解释：大的通衢如某某大街等，“街”字不儿化。实则不然，如上举的一尺大街，在东琉璃厂与杨梅竹斜街之间，虽名大街，实际等于过道，名曰一尺，其短可知。可见街名儿化与否，并不在于大小。

寺：白塔寺、护国寺、能仁寺、净土寺、圆恩寺、华嘉寺的“寺”字不儿化。舍饭寺、给孤寺的“寺”字则儿化。有人认为白塔寺、护国寺等庙宇宏伟，“寺”字不儿化以示尊崇。言似有理，但也不尽然。如上举的华嘉寺，在西城锦什坊街，规模很小，但“寺”字不儿化。

庙：帝王庙、马神庙、火神庙、药王庙的“庙”字不儿化。宣武门外的三庙、五道庙，西单牌楼迤北的白庙、红庙的“庙”字则儿化。

房：油房、糖房、报房、大小酱房等胡同名的“房”字不儿化。东官房、石板房、饽饽房、妞妞房的“房”字则儿化。

口：阜成门内宫门口的“口”字不儿化。珠市口、菜市口、磁器口、蒜市口、山涧口的“口”字则儿化。

巷：东西交民巷、南北锣鼓巷的“巷”字不儿化。果子巷、陕西巷、南北柳巷、大门巷、方巾巷的“巷”字可儿化。

沿：西河沿、潘家河沿的“沿”字不儿化。南、北河沿与南、北沟沿的“沿”字则儿化。

池：金鱼池、莲花池的“池”字不儿化。豆腐池的“池”字则儿化。

桥：东大桥、高粱桥的“桥”字不儿化。太平桥的“桥”字则儿化。

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

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
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

这是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称颂他的外公——文字大师段玉裁的一首诗。

段玉裁，生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字若膺，号茂堂，又号砚北居士，江苏金坛人，清乾隆举人。曾任贵州玉屏、四川富顺、南溪、巫山等县知县。他的成就主要是对文字训诂学的研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

据江苏《金坛县志》记载：段玉裁六岁开始从祖父学《朱子小学恭跋》，“颖异有兼人之资”，“读书日尽数千言”。十三岁时补邑庠生。二十五岁时中举，在当时的大学者钱大昕家坐馆时读到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惊其考据之广博、治学之严谨，由此爱上文字训诂学，即拜当时文字训诂学家戴震为师，一头扎进文字学的研究之中。后来他任边陲知县期间，“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之鼓，辄篝灯改窜是书以为常”。他见到好书必购求，遇到佳著必过录，获有心得必著述，求

知为学从不懈怠。多年宦游生涯结束，他回归故里时随身带回七十二只大木箱。乡人见之，误以为是钱财，皆欲借贷。他当众启封，原来所有箱笼之内，皆为书稿，求财者颇为失望。

他著述《说文解字注》（简称《说文注》）一书，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体例和宋代以前群书所引《说文解字》词句，析疑正误，参照古书上所用字义，分部逐字阐明《说文解字》的说解和一字多义的由来，职系音韵和训诂，创通条例。据说有一次，他为了搞清几个字的形、音、义，在寒冬腊月，顶风冒雪，骑着毛驴由金坛到杭州的藏书楼去查询，来回费时两个月。当他返回金坛时，有人问他："您府上有七十二箱书，难道几个字还查不到吗？"他笑着回答："书到用时方恨少嘛。"又有人问："为这几个字吃这么多苦值得吗？"他听后正色道："一字之误，贻害千古；一字之正，造福子孙啊！"

乾隆五十九年（1794），段玉裁年届花甲，值《说文解字注》一书编著工作正紧张进行之际，他的右脚不慎跌坏，成了残疾之人。此后，他便愈发自励自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说文解字注》三年必有可成，亦左氏失明，孙子膑脚之义也。"年过"耳顺"，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直面艰辛，殚精竭虑，不懈不怠。他曾痛切言道："吾似春蚕一般，茧未成而不能毙。"

就这样，《说文解字注》一书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动手，至嘉庆十二年（1807）完稿，倾注了他三十余年的心血，书中详尽地解说了九千多个汉字的形、音、义。训诂大家王念孙将这部著述誉为自汉许慎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尤其可贵的是，段玉裁七十八岁时仍闭门披读二十一经等书，八十岁时还撰写老师戴震的年谱。他著述除《说文注》外，尚有《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毛诗古文训定本》、《春秋左氏古经》和《经韵楼集》等。大学者

阮元曾对段玉裁的学术成就予以很高评价：“玉裁书有功于天下者三：言左音，一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

王懿荣与甲骨文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患病，经医生诊治开了一个药方，上有一味药是中医常用的龙骨（此药可涩精补肾）。王懿荣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鹤年堂药店买药。药买回后，王懿荣开包验看，无意间发现龙骨上有许多刀刻的符号。凭着多年金石研究的经验和敏感，他意识到龙骨上的刻痕应该是比自己所熟悉的钟鼎文还要早的文字。他立刻派人到鹤年堂及北京其他药店，采购那些刻有符号的龙骨。经过潜心研究，他断定这是殷商王室用来记载卜辞的甲骨文。这样，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在偶然的机会被发现了。

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因它刻在龟甲兽骨上，故称“甲骨文”，又称“契文”。它大约诞生在公元前14至11世纪的殷商时期，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最早发现甲骨的是河南省安阳郊区小屯村的农民，那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小屯村农民耕地时，经常发现一些带有符号的甲骨。当时，农民们随便将它们扔到地头河边。那时，村里有个剃头师傅李成，身上长了脓疮，无钱医治。有一天，他拾回地头的甲骨，碾成粉末，涂于患处，脓血马上止住了。他喜出望外，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村民们，村民们都说这是“龙骨”，纷纷把这种甲骨拿到药店去出售。从此，甲骨成了药店的中药材。小屯村农民之所以能在地里拾到“龙骨”，是因为大约公元前1378年，盘庚把都城从山东迁至小屯。直到帝辛（纣）止，安阳作为商的都城共二百七十三年。商被西周灭后，

这个都城逐渐废弃。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都城旧址称为“殷墟”。

王懿荣在药店买到的有甲骨文的“龙骨”，就是出自安阳郊区。只是，安阳郊区小屯村的农民并不知“龙骨”上有甲骨文。

自从王懿荣证实龙骨上有甲骨文后，商人想到甲骨将会身价百倍，因而对甲骨的来源一直秘而不宣。王懿荣一次从古董商手中购得十二片甲骨，每片二两白银，轰动一时。后来，他收集的甲骨达一千五百多片。

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翰林出身，曾在上书房行走，为光绪师，兼国子监祭酒。王氏位高爵贵，在北京东华门外大街锡拉胡同十五号一处巨宅定居。

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1900），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京城陷入一片混乱。王懿荣曾拟组练兵勇抗击入侵之敌，终以书生谈兵，停于纸上而作罢。八国联军在北京到处烧杀，曾闯进锡拉胡同王氏官邸抢劫。王见事急，命夫人和寡媳（王之长子早殇）先行投井，继将幼子、幼孙也投入井中，最后自己亦投井而死。幸有仆人在场，将两个幼儿抢救出井，护送到外寄养。《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追封王懿荣为“文敏公”，并指定锡拉胡同王氏府邸为祠堂，奉祀不绝。

王懿荣死后，他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从王懿荣儿子手中购得那批龙骨，又不惜重金四处求购，一共收集龙骨达五千片。刘鹗在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的怂恿下，1903年精选一千零五十八片甲骨文，影印出版《铁云藏龟》。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甲骨文的书。第二年，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资料，写出《契文举例》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考释、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后来罗振玉也著有《殷墟书契前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学者王国维、郭沫若等，对殷墟甲骨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后来形成了一

门有世界影响的学科——甲骨学。

甲骨文专家王襄

以河南安阳出土的龟甲兽骨研究殷墟文字和商周历史的甲骨学，已是人们熟知的一个科目。而最早发现甲骨的价值，致力于搜集研究工作的几个专家之中，王襄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1925年，王襄以自藏的甲骨拓片影印编成《蒲宝殷契征文》一书。1933年，古文物收藏家罗振玉和历史学家商承祚先后在他们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中引用王的研究成果；文史学家王国维《观堂集林》中，也征引了王襄研究甲骨文的资料。此后，王襄收藏甲骨及其研究成果始为世人所瞩目。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卓有成就的甲骨文专家之一。他根据甲骨文研究古代社会结构，1930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时他对王襄的甲骨文研究曾持怀疑态度，不敢轻信。他在书中说："伪片之传播者在中国当推天津王襄的《蒲宝殷契征文》一书，此书所列几乎片片可疑，在未见其原片之前，作者实不敢妄事征引。"但1956年春，王襄在天津逝世，郭沫若为之题墓碑时，尊称他为"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了。郭沫若对历史研究所研究甲骨的胡厚宜表示，当年怀疑王襄著录甲骨为伪片，如今深感歉疚。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到天津向爱好收藏古物的王襄说，河南安阳出土不少骨板，不知何物。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慧闻之以为是"古简"，促其访求。过一两年后，范寿轩几次带甲骨片来求售，但因索价昂贵，王襄只选购了少数小片。王襄经研究认出这是"龟板"，上面的画痕为一种古代文字，为殷商时期用以占卜吉凶的卜辞和有关纪事，是研究殷商历史极珍贵的资料，遂开

始搜集摹拓，进行研究。甲骨文研究，实从此开始。当时出土的大片完整甲骨多被范寿轩以高价售给名公巨卿王懿荣，刘鹗、端方等人，世人遂以为这些人是最早发现和收藏甲骨的人，对天津王襄的贡献，却知者不多。

王襄字纶阁，出生于天津科第世家，青年时期即爱好古彝器，研究金石文字。自发现了甲骨，更潜心研究，终生不懈。1920年，王襄编著出版了甲骨文的字汇《室殷契类纂》一书，把甲骨文字按部首排列，共四千八百零七字。1925年又出版了以自藏甲骨拓本影印的《室殷契征文》，共刊图片一千一百二十五片，按文字内容分类排列。

王襄先生有一块自己刻制的铜镇尺，上面刻着“廉隅自守，正直平方，居恒持重，镇静而刚”十六字。这是他自励自律的座右铭。

王襄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正是北平沦陷时期，他一心从事教学工作，洁身自爱，情操高洁，不与敌伪有任何交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闭，王先生回到天津闭门读书。当时，日寇拼凑“大东亚书道展览”，想邀请王襄参加，以壮声势，遭到他的拒绝。

天津有一座古寺大悲院，当时修复完工后，王襄用篆书题写了“古刹大悲禅院”六字，刻在一方白石板上，悬在大悲院山门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时，王襄生计维艰，靠典卖度日，但对心爱的书籍文物，从来不肯出手。而在衣食不济的困境中，又写成《古文流变臆说》和《古陶残器絜语》等重要论文，发表在《燕京学报》上。

解放后，王襄先生担任了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1956年病逝，享年九十岁。

金文专家容庚教授

现代著名的金文专家容庚教授，字希白，广东东莞人，生于1894年。他出生时，其父为庆得子，写诗为祝，有“时局正需才，生男欲壮哉”之句，对儿子抱有极大希望。

容庚不孚家人所望，幼年在乡间跟舅父邓尔雅学习书法篆刻，即显露不凡资质。二十几岁时以研究金文所得编纂成一千二百余页的《金文编》，他持此书稿远离家乡广东，到天津求见研究古文字的权威罗振玉，深得罗振玉的赞许赏识，被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做研究生，投在著名学者王国维门下，奠定了一生从事考古学和古文字研究的基础。

后来，容庚到燕京大学任教，并编辑《燕京学报》，又被聘为北京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

在此期间，容庚先后编著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吉金图录》等书。1931年发表的《商周彝器通考》，对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性地科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商周彝器研究的奠基著作。当时，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正在研究古文字，曾写信向年仅三十七岁的容庚请教。容庚虽未见过郭沫若，却复信给以支持。二人书信往来，交流研究古文字的心得。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容庚从青年时期到满头白发，不论时势如何、个人处境顺逆，数

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在书斋工作十多个小时。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孜孜不倦于古代文化的探索研究之中。

容庚的女儿容琬和容璀，谈起父亲埋头钻研的精神常说：“我们都笑父亲，仿佛有胶把他粘在书房的椅子上似的，每次吃饭时，都要一请、再请，才能把他请出来。”容庚也用这种废寝忘食的治学精神教育女儿们。他常说：“好书不厌百回读。”

容庚从书法开始，转向金文、甲骨文和古文物的研究，晚年又转回来研究书法和绘画。在“文革”狂飙中，身处困境的容庚一头埋在碑帖研究中，最后完成了一部百万言的《丛帖目》，这是他晚年开拓的一个研究领域。

容庚于1983年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九岁。据说他逝世前将珍藏的商周青铜器、名贵书画以及藏书，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

语言奇才赵元任

赵元任教授不仅是著名的音乐家，还在文学、数理、哲学等领域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堪称奇才。

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据说，他的耳朵可以辨别各种语言，很细微的声调都可以分辨。在一星期之内，他就可以学会一种方言，做到能听、会说，并且说得很好。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清华大学参观、讲学，赵元任做翻译。后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处，他都用当地方言翻译。亲友见他语言方面极有天赋，纷纷鼓励他在这方面深造，于是是年年底他辞去清华教席，留洋专攻语言学。1922年，他进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言学。1925年回国后，他在清华担任的课程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他还先后到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等省考察方言。1922~1948年，他先后发表语言学专著十四种，论文二十一篇。1948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用英文编写了《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50年代后期，他在台北作“语言问题”的系统讲演，后来讲稿汇集成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灌制了许多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省方言的唱片，就有两千多张。

赵元任不仅是一位汉语专家，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特别是出国定居以后，他有机会遍游欧美各地，了解和学习各国各地的语言，语言水平简直是到了广通博达的

地步。

赵元任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关于他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就，早在三十多年前，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先生就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

现代名人之造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都是古人今人创造的。古代有造字癖的，当属武则天，她以皇帝的身份造过许多字，如“曌”字，却没有流传下来。而现代一些名人造的字，至今还在运用。

刘半农造“她”字是著名的一例。我国古代汉语中没有“她”字，女性的“她”均写作“他”。《红楼梦》第十九回写宝玉和黛玉的一段话：“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这里的“他”，即指林黛玉。

刘半农认为，白话文的兴起，加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工作骤增，第三人称代词使用频繁，仅有一个不分性别的“他”是不够的。于是，1917年他在翻译英国戏剧《琴魂》时，试用自己创造的新字“她”。随后，为了表示第三人称中性，又使用“它”。1920年6月，他发表了《“她”字问题》一文，刊于上海《时事新报》上。1920年9月，在英国伦敦的刘半农写了著名的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将“她”字入诗。开始时虽遭到一些守旧者的攻击，但很快就流传开来，广泛使用。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成为轰动一时的事情。鲁迅在回忆刘半农时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

“猹”字是鲁迅所造。在小说《故乡》中，有描写闰土在海边沙滩上抓月夜偷吃西瓜小动物的事。这动物音“查”，但汉字中没有这个

字，于是鲁迅造出了一个“猹”字。对这个字，鲁迅在1925年5月4日《致舒新城》中曾解释说：“‘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吧！”鲁迅还造了一个“”字，指女性，犹“她”字指第三人称的女性一样，读作“人”。同时，鲁迅还造了一个“”字。1923年，学者顾颉刚认为夏禹是“晰蜥”之类的虫，鲁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于1927年5月17日给章廷谦信中说：“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睾卵而发牢骚……”意思是说，如果夏禹是虫，那么司马迁也是虫了，故在“迁”字左加“虫”旁，以讽刺顾颉刚。

剧作家夏衍也创造了两个字，一个是“垮”，一个是“搞”。1939年至1941年，夏衍在广西桂林主持《救亡日报》时，在报纸上创造并使用“垮”和“搞”两字。这两个字在《康熙字典》中查不到，胡愈之曾问他，这两个字是不是自造的？夏衍说：“这两个字是根据实际需要创造的，在报纸上试用后，被大家接受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两个字流行全国，很快成了常用字。

“烤”字相传是齐白石所造。30年代初，“清真烤肉宛”饭馆请齐白石题字，齐白石想写“烤”字，可是当时字典上只有“烘”、“考”，他想到烤肉要火，便想出一个“烤”字。他担心遭人非议，就在“烤”字下边写了一行小字释道：“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主。”

“一字师”的故事

古代“一字师”的故事很多，不仅古时有，近代和现代也有“一字师”的故事。

著名文史大家郭沫若，创作有大型历史剧《屈原》，蜚声海内外。此剧1942年上演，本来剧本已精益求精了，但郭沫若还是边演边改。演出这天，郭沫若在后台谈及第五幕第一场，那场戏中有侍女婵娟怒斥投靠南后、背弃屈原的宋玉的一段台词，台词道：“宋玉，我特别地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个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针对这句台词说：“在台下听起来，这句话总觉得不够味，感情不够。”扮演婵娟的张瑞芳也有同感。郭沫若认为，似乎可在“没有骨气”之后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这时演员张逸生脱口而出：“依我看，把‘你是’改为‘你这’就行。‘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只改一字，就够味了。”郭沫若闻之，喜出望外，觉得这一字改得非常得当，犹如指着宋玉的鼻子痛骂。事后，郭沫若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一字之师”的短文。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有一次率剧团到武汉演出《宇宙锋》。演出结束后，虚心的梅兰芳征求当地演员郭叔鹏的意见。

郭叔鹏对这出戏非常熟悉，早对赵艳蓉唱词中的一个字有疑问，现在梅兰芳当面征求意见，正中他的下怀。于是，郭叔鹏问：“梅先生，您扮演的赵高之女赵艳蓉，是真疯还是假疯？”

“您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梅兰芳不知郭问是何意，只好反问一

句。

郭叔鹏说：“我看，赵艳蓉应该是装疯，是假的。她装出来的疯像是为了蒙骗她的父亲。您听：‘我只得把官人一声来唤，我的夫哇，随儿到红罗帐，倒凤颠鸾。’赵艳蓉把亲生之父当做自己的丈夫，还要拉他入罗帐，这在赵高看来，女儿是真的疯了。可是‘随儿到红罗帐’中的一个‘儿’字，却露出了破绽。赵艳蓉自称是‘儿’，显然她还知道对方是‘父’了。这就不像疯话，这是神志清醒的表现。赵高不傻，凭这个‘儿’字他很容易识破女儿是在装疯。而在戏中赵高并未识破（当然剧情要求，他也不能识破），这既不符合生活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真实。”

梅兰芳大师听了这番话，深为赞许，说：“您提的‘儿’字，确实是一个漏洞。”

郭叔鹏又进一步说：“依我看，改起来并不难，只要把‘儿’字改为‘奴’字就行了。‘奴’是古代妇女的谦称，对谁都可以这样称呼自己。”

梅兰芳满意地说：“明天演出时我就将这句台词改过来。”说罢，梅兰芳亲笔为郭叔鹏题词，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福建闽南人，农家子弟。他不仅是世界闻名的文学家，还被誉称为“幽默大师”。

Humour，英文义为：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而又含深刻意义的言谈或举动。20年代，中国的一些名家对此语翻译各异，李青崖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相候译为“谐穆”，而林语堂别出心裁，取《九章·怀沙》中“煦兮杳杳，孔静幽默”句中的“幽默”，后为大家接受，成为汉语中的新词汇。林积极倡导将“幽默”作为处世撰文的风格，因而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有人竟把该年——1932年称为“幽默年”！后来几十年中，林语堂身体力行，在讲演、撰文中，常以动人心弦的诙谐语言警世。

林语堂长于辞令，善于讲演，特别是宴会后的即席讲演。有一天，他遇到这种场合，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借题发挥，“幽默”了一番。他说：罗马帝国的皇帝残害人民，把人投在斗兽场中，让野兽吃掉。有一次，皇帝把一个人放到斗兽场中，让一头狮子去吃。这人见了狮子并不害怕。他走近狮子，在它身边轻轻说了几句，那狮子掉头就走。皇帝看了很觉奇怪，认为那头狮子肚中不饿，胃口不好。就另外放一只饿虎去吃他。那人仍旧不怕，走到老虎身边，向它耳语一番，那老虎也回头悄悄而去。皇帝大为惊异，盘问那人：“你究竟向那狮子、老虎说了一些什么话，使它们不吃你而走开呢？”那人回答说：“很简单，我只是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是吃了以后，你得讲演一番呀！”听罢故事，大家方知讲演之不易。

一次，林语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他侃侃而谈中国文化之历史的悠久、内涵的丰富、影响的深远。一位美国女学生听后很不服气地问："难道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的吗？"林语堂听后略一思索，马上回答说："有的，有的，美国的抽水马桶就比中国的好！"全场捧腹大笑！

又有一次，林语堂应邀参加某学校的学生毕业典礼。与会的前几位发言者发言冗长，轮到林语堂时已是十一点四十分钟了。他抓紧时间，利用十分钟把话讲完后，灵机一动，便特别提高音调，借题发挥说："绅士讲话，应该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几个讲长话者在笑声中对林语堂的批评深感有理，都心悦诚服。

1934年，林语堂一家赴欧，途经巴黎时，正逢"慕尼黑事件"发生。由于时局动荡，林语堂五天未能写作。事后，他幽默而辛辣地说："五天未写作，每天按损失二百元计，共一千元，我要找希特勒赔偿这笔损失。如希特勒对此态度不好，我还要他追加赔偿利息损失！"

刘赶三嬉笑怒骂皆成戏文

清末京剧名丑刘赶三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皇帝。他最初学老生，后来改演丑角。他以扮演《群英会》之蒋干、《钓金龟》之张义著称。他演出的许多剧目标新立异，尽扫陈书，嬉笑怒骂，借题发挥，成为轰动一时的京华名丑。

刘赶三平时讲究穿戴而不讲究吃饭。一日之内，早晨、中午、晚上气温不同，他就要换三次衣服；可是吃的，一般都是粗粮窝头。他自己养了一头小驴，上街时骑着，有时遇见了达官贵人的车子，他就故意骑在驴背上挡住去路。当对方愤怒地问他为何挡道时，他便从驴背上跳下来，垂手屈膝道："小的，刘赶三也！"对方听了，哭笑不得，只好悻悻而去。

有一次，刘赶三演出《探亲相骂》，竟把自己的那头小驴牵到了舞台上。这头小驴因平时训练有素，竟很熟悉台步，还跑了个"圆场"。刘赶三因此名震京师，盛极一时。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便让他到宫里演出《探亲相骂》。刘赶三照样将小驴牵上舞台，慈禧太后观戏后很高兴，赏给小驴四两银子。

刘赶三举止随便，言谈诙谐，演出时经常借题发挥，插科打诨，嘲讽权贵。

同治初年，有一天，惇、恭、醇三位王爷到戏园子看戏。当时台上正演《思志诚》一剧，刘赶三扮演鸨母。嫖客来到妓院，鸨儿召唤妓女们出来接客。这时，刘赶三便在台上斜视着戏楼上坐着的三位王

爷，然后高声叫道：“五儿、六儿、七儿，下来接客呀！”因为惇、恭、醇三位王爷分别排行老五、老六、老七，观众听得出是在嘲讽三位王爷，不由哄然大笑。而三位王爷呢，也听出是在讽刺自己，但表情不一：恭亲王喜欢诙谐，听了不以为然；醇亲王平时谨慎，听了很不高兴；惇亲王平时严厉，听后大怒道：“什么人敢如此无礼，把他抓起来，打他四十大板！”可是，当随从们到了后台，刘赶三早已逃走了。

同治甲戌年（1874）朝廷会试，出的题目是“君子坦荡荡”。考试之后，戏园里一些演员都来问刘赶三：“‘君子坦荡荡’是何意？”刘赶三回答说：“‘君子’是京官老爷的称呼；‘坦’字是十一‘旦’；两个“荡”字里各含着一个‘旦’，合起来十三‘旦’。‘君子坦荡荡’，也就是京官老爷看上了十三旦的意思。”（当时有一名伶叫十三旦，名噪京师，老爷们办堂会，必定请十三旦去）刘赶三一席话引得众人大笑不止。

施今墨巧抄妙处方

施今墨生于1881年，卒于1969年，享年八十八岁。他早年悬壶北平，曾有一段时间往来于平津之间。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同仁和民间百姓的推崇。

20世纪40年代初，津门富贾金某身体不适，邀中医名家陈方舟先生去诊治。除先生诊后即开一方，嘱服三剂后再诊。金某服药后，觉得效果不显著，心中烦乱。适逢施今墨抵津，金某听到消息，急忙差人前去相请。

施先生来到金宅，见金某年老体胖，面色黄白，精神萎靡，语声低微。切其脉，细缓无力，望其舌，淡而少苔。金自诉：“多月来四肢无力，食不甘味，便稀如水。”施今墨诊断他为气虚之症，当以“四君子汤”补之。金某递上陈方舟所开药方，上书“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原来正是“四君子汤”。陈先生辨症用药都恰到好处。阅毕处方，施今墨说：“此方切中贵恙，照服数剂，可愈。”不料，金某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已服三剂，病体如故，还望先生高诊，另请处方吧。”

施先生心中思忖：陈方舟与己同道，况且药方准确，怎好改得？金某只服三剂就盼痊愈，心太急切。此方坚持服下去，必会见效。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唤人取来笔砚，抖腕开出一方，嘱服二十剂。金某接过处方一看，只见上写：“鬼益、杨枙、松腴、国老”四味，金某见原方已改，心中甚喜。

一月后，金某痊愈，差人携礼品赴京酬谢施今墨。施先生笑道：“应该谢陈方舟先生，是他治好了金先生的病，我只不过为陈先生抄过一次方子罢了。”来人不解，施先生解释道：“人参又名鬼益，白术又名杨枹，茯苓又名松腴，甘草又名国老，还是原方‘四君子汤’啊！”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

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 《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神州轶闻录
大戏台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北京曲艺是北京民间文艺的瑰宝。
昔日评书、大鼓的魅力迷倒各阶层的北京人，书茶馆是遍布四九城。
请读者好好看看这本《大戏台》吧！它不但会发您怀旧之幽情，更会引您深思。
如只把此书的内容当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可就阉贱它了！
——钱世明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大戏台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戏台 / 周简段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6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35-3

I.①大…　II.①周…　III.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09号

大戏台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3.25

字　　数：245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35-3

定　　价：39.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名伶掠影
程长庚“大老板”
“单刀叫天”谭鑫培
“老乡亲”孙菊仙
知县名伶汪笑侬
“关戏泰斗”李洪春
“德艺双馨”盖叫天
名丑萧长华的念白
“活曹操”侯喜瑞
“戏篓子”赵松樵
“猴王”李万春
女伶刘喜奎不畏权贵
程砚秋三请俞振飞
花脸宗师郝寿臣
老旦首座李多奎
当代名丑马富禄
北昆老艺人侯玉山
“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
杨宝森别名“杨失伍”
一代名旦荀慧生
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
须生泰斗马连良

著名武旦宋德珠
“金霸王”的癖好
“铁嗓青衣”王玉蓉
梅派青衣陆素娟
吴素秋早年二三事
童芷苓和她的弟弟妹妹
“舞台飞人”张德俊
李世芳青岛罹难前后
梅派高足魏莲芳
拜“梅”唱“程”新艳秋
艺苑双菊名坤伶
白玉霜与小白玉霜
评剧名伶喜彩莲
魏喜奎名噪京华
豫剧名伶常香玉
豫剧泰斗陈素真
越剧开山者姚水娟
梨园趣闻
同光名伶十三绝
梅巧玲生死见交情
谭鑫培随机应变
梨园世家说叶氏
京剧文人齐如山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交往
名伶争演三国戏
四大须生说“谭派”
盖叫天拒唱堂会
名净金少山说隐情
汪笑侬、李洪春联袂演出
四大名旦的竞争

“四小名旦”与“四白蛇传”
琐忆京剧女武生
名家救戏佳话
裘盛戎误场赏肉记
京剧男旦艺术的兴衰
京剧名伶“四大怪”
有趣的“对台戏”
用京剧唱外国戏
京城何处“戏子坟”
梨园名流助学义举
一柄锣槌传三代
戏曲演出中的“忌讳”
“鬼戏”面面观
《大劈棺》和《纺棉花》
名伶关德咸之死
成兆才与《杨三姐告状》
戏迷逸事
北京的戏迷
张伯驹与余叔岩
痴迷戏曲的张大千
慈禧太后看京剧
大清国的戏迷王爷
名人客串京剧
粉墨登场老报人
谭派名票韩慎先
近云馆主女名票
“票界之王”王庾生
天津老票友王君直
票友票房探源
生肖入戏

乙亥年谈“猪戏”
十二生肖入戏文
“鼠戏”中多有案情
文武兼演说“牛戏”
“虎戏”撷趣
从《嫦娥奔月》说到“兔戏”
历史悠久的“龙戏”
惩恶扬善说“蛇戏”
有趣的“马戏”
慈禧忌“羊戏”
久演不衰的“猴戏”
不多见的“鸡戏”
别出心裁的真狗上台
戏事杂陈
京剧科班富连成
中华戏校和“四块玉”
天津稽古社子弟班
旧时戏班话“班规”
旧京老戏园子
老街深处古戏楼
京都会馆三戏楼
哈尔飞戏院话沧桑
天津大舞台戏园
漫话昔日堂会戏
京胡大师杨宝忠
马派琴师李慕良
制琴高手史善朋
急管繁弦忆偶虹
京剧的脸谱
梅兰芳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石挥的生死情结
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黄宗江在南开和燕京
孙道临从艺前后
白杨拍《十字街头》
“电影皇帝”金焰
王莹饰演赛金花
一代影星阮玲玉
出于书香门第的梅熹与梅阡
《红楼梦》电影话当年
话剧、电影和小说《秋海棠》
《唐伯虎点秋香》五上银幕
“杨乃武冤案”入戏来
曲艺撷枝
漫话相声《关公战秦琼》
金喉歌王小彩舞
相声世家常连安、常宝坤
鼓界大王刘宝全
评书大家连阔如
艺人爱国讽时弊
双簧艺人孙宝才
云里飞与大金牙
天桥艺人“穷不怕”
相声艺人“老万人迷”
曹宝禄和他的单弦
王毓宝与“天津时调”
白派京韵忆云鹏
滑稽大鼓艺人富少舫
周汝昌新作《秋窗风雨夕》
扬州评话说《水浒》

评书名家陈士和
说书人钟晓帆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

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大彪兄编了一套书，内有《大戏台》一本是说北京戏曲、曲艺等方面的，命我写序。我很喜欢戏曲、曲艺，工作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大彪又是老友，那就不敢推辞了。

北京是戏剧的丛薮，京剧生于此就甭说了，其他如梆子、昆曲、评戏（昔日京人叫它“蹦蹦儿”“落子”）、评书、话剧……都活跃于此，一块儿奏起了京门的戏剧交响曲。

20世纪50年代北京戏剧之繁茂，令我追怀不已。就拿京剧说，演出团体不下二十来个，每晚有演出，星期日加场，还有早、中、晚三场的！当时许多名演员健在，新秀层出，剧目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剧场门口立起“客满”牌子，不是新鲜事。要和今日京剧冷清一比，我真扼腕叹息——今之拿京剧自娱者数不胜数，但花钱买票进剧场的有多少？昔日是看戏的多不胜计，玩票的少。我不知这现象是表明京剧繁荣呢，还是显出京剧的式微？我是不以“戏迷”多少论京剧之现状的，还是得看买票观众的多少来判断吧！有人说今之票价太贵，我也有同感。昔之票价通常在三毛到一块二之间，以平均一块算，可买五十碗豆汁；今之票价以平均三百元一张算，可买今之豆汁三百碗。豆汁由两分一碗到一块一碗，涨五十倍，而票价竟涨了三百倍！过去五十碗豆汁的钱就买前排的票，今天呢？以北京人爱喝的豆汁价格为参照数，今之前排票也就卖五十块一张！现在卖的票是太贵了！话又说回来，梨园剧场十块一张，所谓“戏迷”也不买票进去看！真爱戏的有多少？拿唱几段戏以自娱者，非戏迷也！更不叫票友！本书中没有说戏票价格的，我这也算作个补充吧。

北京曲艺是北京民间文艺的瑰宝。昔日评书、大鼓的魅力迷倒各阶层的北京人，就连小学生也会连阔如的评书《人物赞》，有的能学彭素海、刘田利的西河大鼓，关顺鹏的竹板书。电台一播王杰魁的《包公案》，能令行人走贩驻足而听，故有“静街王”的美誉。书茶馆是遍布四九城。此景象，今不见矣！

请读者好好看看这本《大戏台》吧！它不但会发您怀旧之幽情，更会引您深思：

> 为什么今之戏曲曲艺不景气？是人们的审美趣味变了？是对传统文化的感情淡漠了？还是欣赏水平、民族文化素养降低了？是别的艺术品种兴起而夺走了观众？还是没有吸引观众的好角儿和好戏、好曲艺段子？如只把此书的内容当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可就阉贱它了！

钱世明

2005年7月12日于惜阴敏求书屋

名伶掠影

ming ling lue ying

程长庚“大老板”

清代京剧名伶、剧曲活动家程长庚，名椿，字玉珊，安徽潜山人。系道光年间三庆班头牌老生，为人正直，品格高尚，且文武全才，以其德才兼备而执掌三庆班，成为该班以德服众的班主，威望甚高。

科班出身的程长庚，戏路极宽，他能演穿“红靠”的《战太平》中的华云，穿“黄靠”的《龙虎斗》中的赵匡胤，穿“绿靠”的《战长沙》中的关羽，穿“白靠”的《九龙山》的岳飞，穿“黑靠”的《白良关》的尉迟恭（反串“铜锤花脸”）。其唱法古朴沉着，字正腔圆，穿云裂帛，余音绕梁。

程长庚不仅是前无古人的角儿，而且是个戏包袱。三庆班应堂会，配演人员不够时，程长庚每每缺什么补什么，扮个“英雄”，来个“院子”，甚至“旗”“锣”“伞”“报”，什么小角儿都演，有时一场堂会，总要先后扮四五个角色。

后来，有人劝之曰：“大老板，您这么干，不怕对您的盛名有累吗？”程长庚笑答曰：“众人搭三庆班都是捧我来的，派什么，唱什么，我为什么不能来个零碎儿呢？正角儿是唱戏，配角儿同样是唱戏，同是唱戏，又有何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呢！”一席话说得听者为之动容。

同治年间，张二奎病故，余三胜又经常辍演，程长庚因此更加名声远震。以致北京城内流传着一首歌谣：“二奎今日已沦亡，三胜由来没准常，若问歌坛推巨擘，个中还数四箴堂。”（“四箴堂”者，乃程长庚之堂号）

程长庚治班极严，凡事皆以“公”字当先，为维护三庆班利益，从

来不应个人“外串”（临时参加外面演出）。光绪初年，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及各道掌印监察御史举行元旦团拜，邀四喜班演堂会。有人提出叫程长庚外串一出，却遭到拒绝。庄亲王载勋以为自己面子大，亲自来请，亦遭拒绝。问其为何不唱，答曰：“嗓子痛。”遂激怒诸贵胄，将程长庚抓来锁在台柱子下边以示惩罚。事后有人问之曰：“您宁可忍辱被锁，而何以不唱？”答曰：“以锁羞辱不足惜，安能以外串图私利而愧对三庆班诸兄弟！”其嘉言传至班中，众人无不为之感动。

道光年间，程长庚即被清廷内务府委任精忠庙庙首（精忠庙为清代戏曲艺人行会组织，以前门外的精忠庙庙名作会名，半官性质），除处理伶界纠纷外，程长庚着重整肃班纪，鼓励艺人摈弃陋习，致力于提高艺术水平。

程长庚所创“四箴堂”科班，注重选拔优秀童伶随三庆班演出，以利观摩和实践，曾培养出孙菊仙、谭鑫培、钱金福等诸多优秀人才。梨园界尊称程长庚为“大老板”，一些贵胄和朝野文人甚至赞扬他为“伶圣”。

“单刀叫天”谭鑫培

清末民初的名伶谭鑫培，其父谭志道唱老旦，嗓音脆亮，有“叫天”（一种鸟）之称，世人皆知。但谭鑫培被誉为“单刀叫天”，却是鲜为人知，说起来也很有趣。

谭鑫培从十一岁起入金奎科班学艺，学的是老生和武生，少时便崭露头角。他十五岁出科，随父亲在京城“广和成”搭班演戏。后来他嗓子“倒仓”，有一次演《银空山》，唱“自从盘古开天地”那一段，第一句就哑得唱不出声来，招来了满堂倒彩，对他打击很大。无奈，谭鑫培只好不唱老生了，只演武戏。不久，他结婚有了孩子，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舞台上的失意（不能唱文戏了）和生活中的窘迫，逼着他另谋生路。于是，他在北京郊区和河北一带农村，开始了一段闯荡江湖的卖艺生涯，也就是俗称的“跑野台子”。

在乡下卖艺的日子风餐露宿、奔波劳顿，但谭鑫培并没有停止练功，有时遇到江湖上的武林高手他还去请教问艺。谭鑫培能耍一手“六合刀”，这是一位少林寺高僧传授的。他演《秦琼卖马》时耍的拳，则是从一种叫“拦马橛”的套路中演化出来的。那时，他的武功越来越精，早已超出了在舞台上花拳绣腿的水平。在搭不上班子的时候，就有人请谭鑫培当保镖或看家护院。他在京东河北省丰润县史家，就一面看家护院，一面和同伴们研习武艺，遇到强盗夜袭，他凭着“六合刀法”勇挫群敌，名声大振。黑道上的朋友都知道有个武艺不凡的“单刀叫天”。

有一次，他在京东蓟州把看守皇家陵墓（东陵）的士兵打死了，世人大为震惊。那天，他和同伴们刚在遵化演完戏，徒步赶往蓟州，夜间露宿东陵，受到东陵士兵的粗暴驱赶。当时，谭鑫培又困又饿，火气冲天，和守陵士兵吵了起来。士兵们怎把这个穷戏子放在眼里，他们边骂边动起手来。然而，他们根本不是谭鑫培的对手，火气冲天

的谭鑫培三拳两脚就把其中一个打得一命呜呼了。

这下子可闯下了大祸，守陵大臣发下紧急公文缉捕。这时，谭鑫培已逃回遵化，得到遵化知州的庇护——这个知州是谭鑫培的忠实戏迷。谭鑫培之父谭志道又在京城央求三庆班大老板程长庚出面，烦请内务大臣从中周旋。经过上下两方面疏通，一场大祸才得以平息。此后，谭鑫培又悄然潜回京城，重操旧业，搭班演戏。

由于谭鑫培武功不凡，演起武戏来总是令人叫绝。他主演《恶虎符》，扮黄天霸，立于舞台中心，另有四人分立四个台角，逐个将酒坛掷来，他不用手接，而是全靠肩、肘、膝、足来接应，从容不迫，准确地将酒坛顶回对方手中，观众称之为“酒坛打出手”。演《打棍出箱》时，他右脚一踢，鞋子飞入空中，人随之跌坐台上，而那只鞋恰恰落在他的头上。在《定军山》《战太平》《战蒲关》一类的武老生应工的戏里，他舞出的刀花、枪花及反手接剑等绝技，勇中有美，险而又稳，又用上了他早年习武的功夫。

后来，谭鑫培到了京城，初时习武生，不久改唱老生，师事程长庚，艺名“小叫天”。光绪十六年谭鑫培被清廷选入升平署，任“内廷供奉”，受到慈禧赏识，赐四品服，专为皇家演戏。

当年，慈禧恣意享乐，沉溺声歌，她身边有一个专为她传唤“供奉”进宫演戏的小太监。有一天，这个小太监看到大总管李莲英系着一条花色美观的“凉带”，得知是谭从宫外代为购买的，便托谭也代买一条。谭因忙于戏事，竟将小太监之托忘在脑后。小太监见谭未给买来，便不露声色，私忖给谭小鞋穿。不久，有一天慈禧说想看谭的戏，小太监便趁机进言：“老佛爷，听说谭老板编了出新戏，叫《盗魂铃》，里边加了好多新花样，他演猪八戒，又唱又做，可有意思啦！”慈禧听后，当即叫小太监传她旨意，让谭两天之后进宫演《盗魂铃》。

谭鑫培接到宫里传讯，顿时发起愁来：《盗魂铃》是一出丑角应工戏，戏中猪八戒、狮子精都有一套“打出手”的绝活儿，自己向来演老生，从未演过猪八戒。可是老佛爷懿旨已下，看来不会演也得演。他苦苦思忖一个晚上，最后决心以自己唱老生的优势，在猪八戒探路化斋的戏上下功夫。

进宫演出时，他将著名老生唱段和自己所创新腔连缀一起，并把各派唱腔的音调韵味学得惟妙惟肖。为此，慈禧听得眉开眼笑，连连夸好，最后还让小太监赏了银子。小太监欲害谭鑫培结果反而成全了谭鑫培，谭靠自己扎实的老生功底躲过了这一劫，这出戏也因而开了老生饰演猪八戒的先河。

后来，流传开去的《盗魂铃》是谭鑫培熔文武于一炉、集唱做于一体的代表作，经常在社会上作为营业戏演出，成了谭派的保留剧目。

谭鑫培自创新声，独成一派，由于出色的表演而与同时代的四喜班的孙菊仙、春台班的汪桂芬鼎足而立，遂被称为“老生后三杰”，或“后三鼎甲”。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孙菊仙移家上海，汪桂芬笃信佛教，谭在北京京剧舞台上遂独享盛名。当时京师有谚语：“有匾皆垿书，无腔不学谭。”说明了谭派唱腔影响之大。

一代国学大师、康梁变法主将梁启超曾有诗赞曰：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
如今老矣偶玩世，尚有俊响吹尘埃。
艺尔蒲风晚来急，五湖深处寄烟笠。
何限人间买绣人，枉向场中费歌泣。

“老乡亲”孙菊仙

最近得一京剧老唱片，标着是京剧老一辈演员孙菊仙所唱。笔者素喜京剧，便邀老友刘君来家小酌，饭后请刘为此唱片作鉴定。

刘君是位老戏迷，精于此道。他听了这唱片后连连称赞，还给我讲了孙菊仙的成名经过和他演唱的特点，值得一记。

孙菊仙是天津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1），少年时，因喜好唱戏和习武而废学，曾赴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因挽弓伤臂落第。在京得从名伶程长庚学戏。其后辗转于行伍和粮行、海运等业，终无所成。三十五岁到上海谋生，在升平轩茶园以“孙处”为名，登台演戏，声名大起。三十六岁北归，在北京正式下海，以程（长庚）派为号召，用功钻研，技艺精进，红遍京都。孙菊仙先后搭过嵩祝成部、三庆、四喜、天庆等班演唱。光绪十二年（1886）孙菊仙被选入升平署，并在储秀宫任教，充供奉十三年。

庚子年后，孙菊仙又到上海，居沪十年，与伶界友人合作，办过天仙茶园、春仙茶园、新舞台等戏院，组班演出，直至老年嗓音不衰。旅沪天津观众称孙菊仙为“老乡亲”。民国初年孙菊仙始返天津。1931年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孙菊仙天赋佳喉，表演苍劲浑厚，感情充沛。学程而发展为自成一派，为人所难及。清末民初，孙菊仙在梨园中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被誉为“老生三杰”。其拿手剧目有《浣纱计》《鱼藏剑》《教子》《寄子》《双狮图》《骂杨广》《乌盆计》《马鞍山》《完璧归赵》等，还独创《逍遥津》一剧。中年喜演《战太平》《南阳关》等靠把戏。

当年善学孙菊仙者，在票友之中首推天津盐商窦砚峰，可惜窦过

早逝世；另有王竹生、尚仙舫、海上名画家陈网权等人，也都学有所得。在梨园中学孙派者，有双处、时慧宝、刘永奎等人。后来成为名家的马连良，也曾拜晚年的孙菊仙为师。

孙派唱法唱腔高昂，十分难学，在孙菊仙逝世后已成绝响。其后的京剧名演员汪笑侬、刘鸿升、高庆奎、周信芳、马连良等人，虽各有师承，各自成派，但从他们的好多唱腔和表演程式中不难寻出孙派踪迹。孙菊仙生前标榜一不照相，二不灌唱片，所以除非至亲好友很难给他拍照，留有遗照寥寥无几。他灌的唱片只有三张，即《探母》《上天台》《鱼藏剑》三段。外间流传的其他剧目唱片，据说是善学孙派的双处所唱，笔者邀友鉴别的那一张，也不例外。

知县名伶汪笑侬

清末民初菊坛上出了一个风骨铮铮、性情怪僻的名伶，他就是以知县身份“下海”的德克金，从艺后取艺名“汪笑侬”。

德克金（1855～1918），字润田，号仰天，别署天竹农人，出身于八旗子弟，光绪五年中举人后，捐任河南省太康知县。因他酷嗜京剧，上任时除带行李外，并携一把京胡。安排接任住宿后，德克金即拉起胡琴唱几段京剧。

他对官场礼节恶之尤甚，在衙门里公干时，口里经常低声运“过门”带唱，故人们皆以“狂生”目之。为此，家人时常劝诫，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且更加放荡不羁。后因秉性刚直不阿，得罪了当地的豪绅，德克金被罢了官。罢官返京后，他即隐于伶，自号“伶隐”，潜心习艺。一天，德克金去求教当时的名伶汪桂芬，汪桂芬见之，表现出一种鄙夷神情。德克金精神很紧张，试唱了一段也没有唱好。汪桂芬听罢，不以为然地说：“你要演戏，谈何容易！”

德克金受到冷遇，心中不快，见汪桂芬笑话自己，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汪笑侬”（侬即我，意为“汪桂芬笑话我”），以此来激发自己奋进。他还在自己的寓所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墨笑儒韩笑佛司马笑道侬唯自笑也”；下联是“舜隐侬说隐工胶鬲隐商伶亦可隐乎”。上联中嵌进了他的艺名“笑侬”，可见“笑侬”不仅是指汪桂芬“笑侬”，而且包括自笑之意。下联道出了自号“伶隐”的内涵，即自此隐于伶界耳。

于是，汪笑侬下苦功求艺。开始时，他到北京有名的“翠峰庵票房”习老生，艺事渐进。虽然他的嗓音有些干涩，但行腔很有韵味。他在艺术上宗法汪桂芬，但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发展成为别具风格的“汪派”，人们俗称“新汪派”。后来，许多名演员宗法“新汪派”，如恩晓峰、筱兰英、筱月红、小长庚等。由于“新汪派”唱法流畅，不受

音韵刻板所限，以女老生最为合适，因而在民国初年的天津相当流行，女老生几乎无腔不学汪。

汪笑侬因中过举，学识渊博，才气过人，还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写的历史题材的戏，多写亡国帝王的惨状，包含着个人对故国之思，如他写的《受禅台》《哭祖庙》《排王赞》，从取材到命意都表现出他对封建王朝的哀悼。同时，对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屈辱媚外，汪笑侬自编的新戏又常常表现出义愤，很有现实意义。如《洗耳记》，写的是许由巢父的事。许由所唱的“笑世人口圣贤心同贼盗，或争权或争利不让分毫。……位愈尊身愈险你可知道？又何必争天下糜烂同胞”，表现出对军阀混战的不满。

汪笑侬不仅在剧本中影射现实，就连在他的演出中也时常涉及时事。大连港于光绪二十四年租给了俄国，后十年又租给了日本，是为国耻！有一次，汪笑侬到大连演出《哭祖庙》，剧中的“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之语，一时间成为大连人民的口头禅——因为戏词直接抨击了权奸的卖国求荣，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关戏泰斗”李洪春

日前，应邀在友人处观看了“关戏泰斗”李洪春前几年携子演出的京剧《刮骨疗毒》和《古城会》录像。在这两出戏中，李老皆饰后半部的关羽，当时他已是九旬老人，但雄风犹在，我得以大饱眼福。

李洪春1898年生于一个京剧艺人之家，七岁入长春科班学戏。该班由内廷供奉陆华云主持，得到“老佛爷”赏识，她对诸“供奉”云：陆四起班了，你们都去教戏，我加俸供养。因此老师中以谭鑫培为首的共有三十六位。李洪春初学小生、武生，后学谭派老生。十七岁倒嗓，正式演红生戏，拜名红生王鸿寿为师，得其真传，且有发展。应该说，王鸿寿在文的方面突出了关羽的性格，而李洪春则从武的方面加强了关羽的风度。他塑造的关羽形象，富有凝重、威武、儒雅、高傲的性格。很显然，李洪春是融合了京戏、昆曲、徽调、汉剧中的文武老生、花脸和武生的表演方法来演关羽戏的，故有“活关公”“关剧泰斗”之美誉。

20世纪20年代，“南林北李”的梨园佳话曾盛传一时。当时李洪春和师兄弟林树森，不约而同地各从南北去到武汉演出。花园公司为了招徕生意，用洋鼓洋号作宣传，打着“威镇华南文武老生、王君鸿寿老三麻子授业弟子、红生泰斗林树森择日演出”的牌子。红帮头子杨庆山见状，也雇人吹着洋号，打着洋鼓举出了牌子，上写：“威镇华北文武老生、王君鸿寿老三麻子入室弟子、红生泰斗李洪春亦择日演出。”他们师兄弟一眼便识破两位老板存心让他们唱对台戏的花招，便约定在清晨遛弯儿时暗中会面，共商对策。结果，演出时第一天都唱《古城会》，使人们有唱对台戏之感。从第二天起戏码开始改变，林唱《过五关》，李唱《封金挑袍》；林唱《战长沙》，李唱《白马坡》；林唱《徐策跑城》，李唱《赵云截江》；林唱《扫松下书》，李唱《对刀步战》……如是连演两个月，众人皆不知此中奥秘。有人

最后又提出二人同唱一星期《走麦城》，两人一商量，决定林先演，李装病，待林演毕回上海，李接着演出。从此，“南林北李”的称誉就传了开来。

李洪春能演多种行当，技艺精湛，故清末以来的“名角儿”大都和他同过台，诸如陈德霖、王瑶卿、王鸿寿、汪笑侬、杨小楼、尚和玉、周信芳、盖叫天，以及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因其曾在多所科班和戏校任教，故桃李满天下，佼佼者如李万春、王金璐、宋遇春、高盛麟、奚啸伯，以及中国台湾的顾正秋、周正荣等。

李洪春夫人高剑雯，早年工青衣、花旦、老生。犹记20世纪30年代末，笔者在鲜鱼口华乐戏院，观看李洪春的《走麦城》，而后是高剑雯的大轴戏《失空斩》（高饰孔明），李则配演王平。

“德艺双馨”盖叫天

四十三集电视剧《水浒传》中，第十九集表现的是武松在狮子楼追杀西门庆，剧情动人心魄。这段戏出自《水浒传》小说第二十六回，作为戏曲，这节早有演出，清朝宫廷戏《忠义璇图》传奇即是。之后小说、电视剧和京剧凡演出这一段者，皆大同小异。

在历代京剧舞台上，扮演武松者不乏其人，但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当属有“江南活武松”之誉的盖叫天。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河北省高阳县西演村人，他自幼习艺，专工武戏。1934年盖叫天四十七岁时，在上海与陈鹤峰合演《狮子楼》，盖叫天扮武松，陈鹤峰扮西门庆。戏演到武松追杀西门庆时，盖叫天不幸折断了右腿。当时腿骨穿靴而出，疼痛难忍，但盖叫天强忍剧痛，用左腿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站住，直挺到闭上大幕。医治时，庸医又将腿骨接错，右腿变为畸形。盖叫天责问医生：“有何办法可以改正？”医生说：“别无他法，只有断骨再接！”盖叫天闻之，一气之下挥拳又砸断了刚刚接上的右腿，而后又请另外的医生重接。两年后，盖叫天又重返舞台。盖叫天的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叹，多少年来在梨园界一直传为佳话。

对这件事，细心的观众不免会提出一个问题：戏曲武功精深的盖叫天，能轻易折断腿骨吗？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

实际情况是：在演出中，盖叫天为了他人的安危才招致自身的不幸。

按照传统戏的一般演法，舞台上摆一桌二椅足矣，这既可代山代城，又可代楼代墙，根本不必搭制机关布景。可是，当时剧场老板为了招徕观众，那天竟搭了满台硬景，还别出心裁地在舞台上搭了个“酒楼”。演到武松替兄报仇，到“酒楼”上追杀西门庆时，“酒楼”就开始摇晃。西门庆见武松追上楼，吓得从窗上跳了出去，落在台面

上。武松在楼上追到窗口，自然也应往下跳。可是，脚下是一排窗栏，上面又是屋檐，中间只剩下几尺高的一个窗洞，跳高了头碰着屋檐，跳低了又跃不过去。尽管这样艰难，也难不倒演技高超的盖叫天，按照戏路，他纵身一跳，一个“燕子掠水”动作便从两丈多高的“酒楼”上跳了出去。

可是，当他跳到半空中的一刹那，忽见西门庆还躺在地上（按演出要求，西门庆跳下楼后，应迅速滚到一边，给马上跳下楼的武松腾地方）。盖叫天怕按原来的戏路跳下去压伤扮演西门庆的陈鹤峰，所以紧急中连忙在空中一闪身。由于这一闪已非戏路，又用力过大，落地时折断了右腿。盖叫天的艺德情操，由此可见一斑。为此，陈毅曾为盖叫天题诗云：“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田汉也有赞盖叫天诗：“断肢折臂寻常事，练出张家百八枪。”

名丑萧长华的念白

一代名丑萧长华，从艺八十余载，专攻文丑，以演方巾丑最著名。青年时代，萧常与谭鑫培、孙菊仙、王楞仙、黄润甫、刘鸿声等剧界名宿同台演出，民国后亦同梅兰芳、杨小楼等合作多年。

萧氏在艺术上博采群英，兼收并蓄，其表演风格以灵隽、深醇、冷峭、脱俗而独树一帜。他嗓音清脆，念白利爽。有道是："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出一张嘴。"萧长华的念白功夫是寒窗铁砚，百炼千锤，才达到这样的境地。萧长华也是著名的戏曲教育家，有六十多年的教龄，曾任"富连成"科班的总教习，很多京剧名家如雷喜福、侯喜瑞、马连良、于连泉（艺名筱翠花）、谭富英、马富禄、叶盛兰、袁世海等都曾受教于他。他常说：演戏要"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演人不演行""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

念白在丑角艺术表演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萧长华的念白流畅爽朗，富有一种音乐的美感。而且他十分讲究"语气"和"传神"，他演的蒋干虽愚蠢笨拙，然而心地还算善良，是个既可笑又可悯的人物。他表演的汤勤则是狡黠、虚伪、贪利的势利小人，是个可憎可恶的人物。萧长华对这两种人用不同的手法来表演，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京戏《玉堂春》里有请医一节，本来是过场戏，至多不过听听胡琴的功夫。而萧长华将这一段铺陈润色成了一出丑角主演的折子戏——"请医"。戏里老中医用的大段京白都是中药药名，谐言寓意，非常贴切，真是别开生面。

为了让读者能一睹萧氏念白的神采，现将这段念白照录如下：

吩咐丁香奴、柳杞奴，小心看守素门冬，谨防木贼子偷

上十二重楼，别叫他盗去丹砂袍子、脑砂褂子、瓜蒌皮帽子、皂角靴子。必须放在陈皮箱内，外加玄胡锁。若有人参来访，让在肉桂房中去坐。先治午时茶，后沏益母膏，作为茶点。别忘了把我那匹海马拉到素沙滩，饮些水银，多加豆蔻、甘草。到晚上套紫河车接我当归。叫门时，当门子在前，马前子在后，车前子在左，牛蒡子在右，后面紧跟大麦子、小麦子、枸杞子、蛇床子。若有一步来迟，绑在桑皮树上，责打三千竹叶片子、五千灯草杠子，只打得使君子直流，半夏不饶。

院公接着白：

求先生看在附子之情饶了他吧。

继又念：

若不看在附子之情，就要共药研为细末！

每念至此，台下总是经久不息的掌声。萧长华在这出戏里着装是清末民初打扮，不勾脸，瓜皮小帽，长袍马褂，眼镜手杖，俨然是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演来惟妙惟肖，令人经久不忘。

“活曹操”侯喜瑞

早年梨园界“架子花脸”侯喜瑞，名噪南北，其所演之《长坂坡》《阳平关》《战宛城》等曹操戏，表演各具特色，塑造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因而被观众誉为“活曹操”。

侯喜瑞为清真古教人，出身寒门，幼年丧母，迫于生计九岁时入喜连成科班学艺，初学“梆子老生”，后从名丑萧长华学“小花脸”，最后专工“架子花脸”，十五岁出科，在喜连成搭班演出。十九岁托人说情，递门生帖拜名净黄润甫（满族人，世称“黄三”，票友下海者，时有“活曹操”之称）为师，得其三昧，自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渐形成了自家的艺术风格，创出了“侯派”，与金少山、郝寿臣三派鼎足而立。

侯喜瑞能演之剧目甚多，除曹操戏以外，《群英会》的黄盖、《取洛阳》的马武、《宝莲灯》的秦灿、《开山府》的严嵩、《法门寺》的刘瑾，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与杨小楼合作演出的《连环套》《野猪林》，与梅兰芳合演的《宇宙锋》《太真外传》，与高庆奎合演的《七擒孟获》《哭秦廷》等剧，更是珠联璧合，并早已成为绝响。

嗓音苍劲挺拔，“沙音儿”和“炸音儿”韵味浑厚，并能性格化、感情化、意境化，是侯喜瑞唱腔与念白的突出特色，发于内而形于外的做工，更使他的表演艺术臻于炉火纯青。

这位在舞台上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的老艺术家，早年即立下了“宁可筋长一寸，不许肉厚一分”的誓言，每日坚持五更起身，步行天坛南墙根下喊嗓子、念话白、打拳、练剑、翻跟头，风雪无阻，此等锲而不舍之精神，不仅使他练就了过硬的舞台功夫，而且落下一副硬朗的身子骨，享年九十一岁驾鹤道山，成为梨园界屈指可数的老寿星。

老北京的戏迷们皆知侯喜瑞爱“赶场”，盖因其“戏路”太宽且艺术精湛所使然。凡名角粉墨登场无不约他，侯喜瑞有求而必应，从来不“拿糖”（北京土语，言乘机讲条件而不肯轻易去做），日夜连演两场甚至三场戏，对侯喜瑞来说乃司空见惯。因此，他拥有的观众，其数量之大令其他名角望尘莫及。

老北京的戏迷们皆知侯喜瑞爱“耍钱”（北京土语，指赌博），无论“推牌九”还是打麻将，只要往牌桌旁一坐，便雷打不动；甚至散了戏连彩裤都没脱，便一头扎进牌友里，又打牌又聊戏，混杂于三教九流之中，打哈哈说笑话，十足的乐天派，而输赢则置之度外。

另外，侯喜瑞还爱施舍。他因终年赶场而所拿“戏份”甚多，却视钱财如敝屣，或赠之穷人，或捐之义学，或舍之粥厂，泽被天下寒士，广积阴德，此或其长寿之道耶？

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的侯喜瑞住宅，于“十年浩劫”之初几被踏为平地，其女儿亦死于非命，而时年七十五岁的侯喜瑞居然虎口余生。他曾为距住处不远的千芝堂老药铺之座上客，聊天以遣闷。1982年，一代名净无疾而终。

“戏篓子”赵松樵

老艺人赵松樵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在京剧界有“戏篓子”之称。这“戏篓子”是说他会的戏多，戏路宽，无人可比，简直是一部活戏考。

赵松樵祖籍山东，1900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六岁学戏，七岁登台，九岁即以“九龄童”的艺名唱大轴，是当时梨园的一颗童星。但他的双亲不满足他跑外码头，当一名小红星，宁可不赚钱也要培养他继续深造。十岁时便带他到了北京，入著名的喜连成科班。当时谭鑫培到天津唱戏，需要一名小演员配唱《桑园寄子》与《三娘教子》，就到喜连成，指名道姓要上过台的赵松樵为其配戏。这可以说是赵松樵一生的荣耀，竟然和谭老板配过戏，而且配得非常好，受到了谭老板的夸奖。这两出戏连演了多场。

赵松樵在喜连成坐科，学的是武工花。武工花要能摔能打，很难唱上主角，但当时他在社会上已是能唱大轴戏的童星，如果再学下去似乎无多大出息，于是又由北而南，到了上海，准备另谋艺术上的发展之路。赵松樵在上海和周信芳配戏很久，颇受麒派影响，在塑造人物时，注重通过外部动作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和思想变化。当时他最叫响的两出戏是《白水滩》和《斩颜良》。戏中青面虎他演得凶悍，颜良他演得傲慢，人物性格丰富饱满。他的戏越演越火爆。

20世纪50年代初他回到天津，在天津大舞台演出，曾演《龙凤呈祥》，接演《夜走麦城》，前饰乔玄，中饰张飞，后饰关羽。他饰张飞不以架子花应工，而是以武二花应工，穿插大开打，因此张飞更显得勇武异常，这样的演法如今已不多见。据说，当年赵松樵还和大名鼎鼎的武生厉慧良唱对台戏，厉慧良演《艳阳楼》，他也上《艳阳楼》，厉贴《长坂坡·汉津口》海报，他也挂《长坂坡·汉津口》的广告牌，一点儿也不含糊。厉慧良闲时去看他的演出，对他的功底曾经

称赞不已。

赵松樵能上演的剧目很多，文戏、武戏、红净戏，各门各派都有，包括《徐策跑城》《古城会》《赠绨袍》《追韩信》《单刀会》《打严嵩》《周仁戏嫂》等。他演戏绝对卖力气，按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上了台，心里就只有戏和观众了，究竟有多累，只有下了台才觉得出来。

赵松樵踩着年关岁尾以九十六岁的高寿走完了人生之旅，在戏剧界可谓名副其实的老寿星。他之所以长寿，得益于他的处世之道和对京剧艺术的追求，得益于他宽厚的性格和淡泊名利的心态。艺人的生活之路充满了陷阱，但他却始终洁身自好，拒腐蚀于身外。除了爱好演戏，唯一的嗜好就是饮茶。从早年到晚年，他都是一早起来先烧水沏茶，茶喝足了再练功、练嗓。茶也是他的防身之宝。他曾多次被人拉到烟榻前，人说大烟可以提神，提神就能把戏演得更好，他几次都是用浓茶挡住，借故就从大烟榻前逃走了。

“猴王”李万春

余生也晚，连李万春的“猴戏”《安天会》（即《闹天宫》）也没有看过，更不要说杨小楼的《水帘洞》了。1985年，李老逝世前在北京演出，送我票，请我去看。我记得他似乎只演了《古城会》《连环套》《武松打虎》的折子戏，而没有演猴戏。我至今记得万春先生那天神采飞扬，唱腔响遏行云，而那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不料月旬之后，他便驾鹤而去，魂归道山，令人有广陵绝响之叹。

我是在东方书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与万春先生相识的。我如约而至，万春先生当场作画，所画的墨菊淋漓而有韵致。客厅中悬挂的一副对联颇引人注意：“昔者杨小楼，今人李万春。”不过当时聊的主要是李老拜师张大千学画之事，李老演猴的情况是后来专门聊的。

李万春演猴先学杨小楼，但受益最多的还是溥仪的叔叔载涛贝勒。载涛贝勒是名票友，以演《安天会》名动京师。李万春向载涛贝勒整整学了三年。载涛特别传给了他演猴的秘诀“人学猴，猴学人”。按他后来悟出的道理就是，舞台上演的是人格化的猴。在《安天会》“偷桃”一场，李万春练出了一种技巧，在舞台上吃真桃，转圈啃皮不断，最后用手一抻提起一长条果皮，常常得到满堂彩。

李万春演的猴机警灵活，动作优美，形象美观。他还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了新的脸谱。过去猴的脸谱有三种勾法：“倒栽桃”（载涛用此勾法）、“一口钟”（杨小楼用此勾法）、“反葫芦”（李老内弟李少春用此勾法）。“倒栽桃”上圆下尖与现实中猴脸相近，李老选择了这种勾法。为了增加美感，他逐渐发展变化，勾脸红白分明，减少生线条，给人以干净、明快的喜感。而且在接近耳朵的地方加上棕色，给人以猴毛的感觉。在耳旁鬓脚处还塞以毛球，类似武松的鬓边发髻，给人以干练利落的感觉。李老演《安天会》“八卦炉炼猴王”中还在猴脸两眼的眼圈勾上金色（以前别人演猴是不上金色的），表示已炼成

火眼金睛。到受封“斗战圣佛”时就成了满脸金色，表示已成正果。这些都是他的创造。

除《安天会》外，李万春后来排演了很多猴戏，基本循着《西游记》小说中的顺序，如《石猴出世》《花果山》《水帘洞》《闹龙宫》《闹地狱》加上《安天会》《五百年后孙悟空》《收白龙》《收沙僧》《收八戒》《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等；他在这些戏中塑造了各种孙悟空的形象，而且以黏、勾、搭、挂等各种技巧贯穿，获得观众的喝彩。光李老研究出的猴王的棍就有几十种，可见他于此所费心血之巨。李老得载涛、杨小楼真传，又有改革创新，他的表演细腻，刻画猴的心理极为生动传神，至今可以说后无来者。

女伶刘喜奎不畏权贵

早年，有姿色的女演员大多是逃不脱军阀、官僚的欺凌的，在这种环境里，一个女演员只有顺从才能红起来。反之，不仅不能成为一个红角，甚至混碗饭吃也是困难的。名伶刘喜奎却是一个例外。

刘喜奎（河北南皮县人）是民国年间轰动京城的女伶，不仅演戏出名，而且长得非常漂亮，世称“色艺俱全”。正因如此，一些军阀、官僚总想把她弄到手，然而一个个都碰了钉子，说她：“这个戏子真难斗！”

有一次，袁世凯以总统府的名义请刘喜奎去唱堂会。刘喜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去内宅，二是她扮戏的房里陌生男人不许进。袁世凯答应了这些条件。到了唱堂会那天，刘喜奎进了中南海，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化妆。她正化妆时，忽然有人闯进来说：“总统请刘喜奎到总统府大厅！”刘喜奎想：让我去拜客吗？我刘喜奎从演戏以来没有这个习惯，这是对我的职业的一种侮辱！因为你是总统吗？你官大我看不上，我对你无所求，因而也无所惧。拿我当玩物来取乐吗？叫我去陪酒清唱吗？办不到！

她带着十分警惕的心情来到总统府大厅，一看袁世凯正在那里打麻将，气就不打一处来。袁世凯的大脑袋在灯光下发亮，脸上像浮肿似的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在他的周围，男男女女一大群。刘喜奎心想，既然你袁世凯找我，我就冲着你袁大头来！她不卑不亢地走到袁世凯身边说：“你叫我有什么事？”袁世凯如梦初醒，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发问给愣住了，忙说：“没有什么事呀！”刘喜奎愤怒道：“没事儿叫我干什么？”说着，一跺脚走了。袁世凯想调戏刘喜奎的阴谋没有得逞，自讨了个没趣。

北洋军阀时期，有位陆军总参谋长叫陆锦。此人是一个善于溜须

拍马的家伙。因为他在天津时就认识了刘喜奎，所以当陆军参谋长后，就产生了占有刘喜奎的邪念。他知道刘喜奎曾拒绝过曹锟的追求，所以他想，就算飞蛾扑火，也要扑腾两下子；就是在刘喜奎面前失败了，也不算丢人，于是，下决心要把刘喜奎弄到手。刘喜奎到了陆锦的府上，看透了他的卑鄙企图，不由怒火中烧，血往头上涌。她随手把客厅里的八仙桌一下子掀翻了，桌上的大盘、小碗碎了一地。陆锦的侍从们听到声响，冲进屋来。刘喜奎见进来了这么多人，便高高举起案上的青花宝瓶，向门上砸去。一声巨响，吓得众人面如土色，警察们也不知所措。这时，陆锦不得不出面求饶道："刘大姑，我服了你了，你快回去吧！"说完，把刘喜奎放走了。

程砚秋三请俞振飞

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谢世多年了，我不由忆起程砚秋三请俞振飞的轶事。

俞老是海内外闻名的昆曲大师，他扮演的柳梦梅、许仙、潘必正等风流儒雅的艺术形象及其对戏曲艺术的重大贡献，早已遐迩闻名。当年俞先生涉足梨园，与“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鼎力相邀是分不开的。

1922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程派名剧《六月雪》，虽说演出效果很好，但他为了学习昆曲，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决心演一两出昆曲。而演昆曲需要找一位功夫精到的小生配戏，到哪里去找呢？程砚秋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一位唱做俱佳的好小生，他就是当年二十一岁的俞振飞。

不过，当时请俞振飞演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原来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是位昆曲名家，已到古稀之年，深知演戏之艰难，不愿让爱子做这一行。程砚秋为了说服俞父，到处求人，最后俞父才答应让儿子客串一次。是年秋天，程、俞在上海丹桂舞台联袂演出了《游园惊梦》，结果非常成功，因为与俞父有约在先，所以二人仅合作这一次。

到了1930年秋天，俞粟庐病故，程砚秋又率班到上海，并邀俞振飞合作。由于当时国剧界有个规矩，业余演员改为正式演员必须先拜师，俞振飞想拜当时在京的著名小生程继仙为师。程砚秋感到为难，因为他知道程继仙向来不收徒弟。为此，程砚秋只好回到北京，恳请程继仙。程继仙听说收俞振飞为徒，高兴地答应了，因为他曾看过俞振飞的戏，深知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俞振飞闻之，马上到了北京，一学就是半年。这样，俞振飞成了程继仙得天独厚的弟子。

此后，程砚秋、俞振飞正式合作演出，第一个剧目便是《玉狮坠》。程砚秋早就把剧本给了俞振飞，两人反复排练。不料演出当中戏班人欺生，俞振飞多次被迫停顿，观众差点儿喝出倒彩来。俞振飞对此非常灰心，认为这不是吃“戏饭”，而是吃“气饭”。可是，由于程砚秋情真意切，以诚相待，俞振飞想离开又难于启齿。不久，俞振飞在苏州的继母患病，他正好借故返回苏州。在这种情况下，程砚秋不便挽留，只好放行。自此之后，虽又有人多次邀俞振飞演出，但他都拒不复出。当时，正值暨南大学招聘，俞振飞便应聘登上大学讲坛，讲授中国戏曲史。这位昆曲艺术名家因而在讲坛上度过了三年。

1934年春天，程砚秋再次到上海演出，见到了俞振飞，言谈之间格外亲切。程砚秋把他在戏班里如何革新制度、清除陋习的做法说了一遍，俞振飞仍是半信半疑。程砚秋见状，便语重心长地对俞振飞说：“要成为一名好演员，可要经得起棒打呀！”愈见程说得如此恳切，遂决定再次“下海”，自此两人又合作达六年之久。

花脸宗师郝寿臣

报载北京举办著名京剧艺人郝寿臣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演出。由此我不禁想起这位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剧坛前辈。

郝寿臣原名郝瑞，艺名“大奎禄”，祖籍山西洪洞，落籍河北香河县，1886年生于北京。七岁时，因家境贫困被典押在唱影戏的艺人王德正门下，随吕福善学艺，工铜锤花脸。七年满师后，因倒嗓变声而离班，又被八国联军抓去充当杂役和马夫达五年之久，后逃出重返舞台。

1910年，年已二十六岁的郝寿臣在东安市场丹桂茶园搭班演出。他因在王瑶卿等演出的《五彩舆》中，出色地扮演了三个小角色受到观众欢迎，从而得到王瑶卿的赏识。此后，他在京先后参加了三乐、太平、玉成、鸿庆等班社，有机会与花脸前辈金秀山、黄润甫以及老生刘鸿声等同台演出，得以观摩这些名家的精湛表演。一次偶然机会，他和伶界大王谭鑫培合作演出了《捉放曹》，观众反应极佳，遂被邀请加入谭的永庆社，先后与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程砚秋等名家同台，艺术上日臻完善，声望日增；直到1938年，因不满日本侵略愤然退出舞台。他在四十余年艺术生涯中，共创作和演出了二百六十个剧目，扮演过一百四十六个不同类型的角色，发展了京剧表演艺术。笔者早年有幸连续看过他演出的不同时期的曹操形象，至今印象犹深。他一生共演了十七出曹操戏，从《捉放曹》到《阳平关》，由曹操的青年时代演到暮年时期，着意刻画曹操的刚愎自用、狡诈奸险等性格，同时也注重表现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风度和气质，因而获得了“活孟德”的声誉。

记得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我东北三省，不少戏曲名家引吭高歌，以戏为剑，意在唤起民众爱国意识，激发将士抗敌豪情。京剧花脸名家郝寿臣创作并演出的《荆轲传》，即是这时期的一部力作。

《荆轲传》讲的是战国时卫人荆轲为除暴君秦王，借献燕国地图为名，得入秦廷。荆轲在地图中暗藏匕首刺杀秦王，惜行刺未成，荆轲英勇献身。郝寿臣编演的这出戏，得到了编剧家吴幻荪，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校董严慈沦的支持。

在一次酒会上，郝寿臣提出想排演《荆轲传》，当即得到张伯苓的支持。张伯苓认为："这出戏在唤起群众、反抗侵略方面很有现实意义。"严慈沦更是为之献策，他手中有梁启超所写的《易水歌》。《易水歌》凡四段，文词清丽，曲调悲壮。词中的"等闲谈笑见心肝，壮别宁为儿女颜。地老天荒孤剑在，风萧萧兮易水寒……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成白虹"等句，抒发了荆轲壮别燕太子丹、舍身赴秦的一腔豪侠气概。严慈沦将这《易水歌》的词、曲一并奉送郝寿臣，供其演出参考。

郝寿臣得各位贤达之助，迅即排出了《荆轲传》。剧中，郝寿臣扮演的荆轲极有特色。在脸谱上，郝寿臣汲取了梆子花脸名家老狮子黑演荆轲时脸谱的画法，同时，将梆子荆轲脸谱中的主色由黑色改为油紫色，借以渲染荆轲的忠勇和胆识。在服装上，郝寿臣强调了荆轲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性格特征，为荆轲设计了"学士巾"和米、黄、蓝三色相间的鸾带，使人物显得儒雅、俊逸。

1931～1937年，郝寿臣频繁地演出《荆轲传》。每当演到"易水饯行"一场时，郝寿臣便声情并茂地唱起梁启超填词的《易水歌》。他且歌且舞，凄凉悲壮，台下观众触景生情，潸然泪下，那感人的场景，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郝寿臣在花脸行承袭前人，启迪后代，堪与生行中的谭鑫培、旦行中的王瑶卿媲美，应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在京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郝寿臣对求艺之艰难有着切身感受，所以对培养后继人才极为热

心。早年，他曾挑选了樊效臣、王永昌、袁世海、李幼春等为徒，并且倾囊相授。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受聘到中国戏校任教，参与创办了北京市戏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老旦首座李多奎

在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开幕式上，北京梨园界耆宿及后起之秀，同台演出了传统剧目《龙凤呈祥》，生、旦、净、丑珠联璧合，极一时之盛。就青年演员而论，其中最佳者莫过于扮演吴国太的王树芳，她不仅扮相俊秀，而且唱、念、做诸工，均有已故著名老旦李多奎之风范。

《龙凤呈祥》素来是李多奎所擅演的剧目之一，当年李曾多次在大合作戏中与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杨小楼同台演出此戏。他（饰吴国太）与梅兰芳（饰孙尚香）二人在台上引吭高歌，余音绕梁，迄今犹在耳边回荡。

李多奎原名李万选，字子清，河北省河间人。四岁时随父（梆子班鼓师，绰号“矬人李五”）进京，八岁时进庆寿和科班，拜贾志臣为师，工老生。翌年登台，因其嗓音甜润洪亮，十一岁时便演唱《战太平》中华云、《定军山》中黄忠等主要角色，每场戏可挣八十吊铜钱，从而享受去戏园乘骡轿车的待遇。十四岁时因倒嗓而辍演，遂再拜庆福庭改习胡琴，操琴之余，从不忘吊嗓练唱，以图东山再起。十年后嗓音复原，一次吊嗓时，前辈老师发现他嗓音中带有老旦的雌音，认定他有演老旦的天赋，从此他就又拜“同光十三绝”之一的郝兰田之高足罗福山为师，改学老旦。

李多奎于1921年（二十三岁）正式演唱老旦。因其与龚云甫乃咫尺之邻，故经常前去求教，并请龚之琴师陆彦廷（时有“老旦琴师第一名手”之称）为其操琴。经数年之勤学苦练，得龚氏全部佳腔之三味，为其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李多奎以老旦应工搭班演出不久，一次在前门外中和戏院演唱《钓金龟》，他以清晰的吐字、有力的喷口、洪亮的嗓音、流畅的行

腔博得满堂喝彩，并赢得诸多内行的赞许。1926年，上海大舞台到京邀角，二十八岁的李多奎应邀去沪与金少山合作演出《打龙袍》，二人嗓音皆高亮浑厚，唱腔挺拔如江河一泻千里，观众席上掌声雷动，时有双绝之称。翌年，李又随梅兰芳赴沪演出，声名益发显赫。

当代名丑马富禄

京剧富连成科班，原名喜连成，清末创办以来，共培养七科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演员，他们的辈分先后分别用喜、连、富、盛、世、元、韵七个字嵌在姓名中间。茹富蕙与马富禄是富社富字科两位最出名的丑角。茹富蕙在《空城计》中扮演探马，三次禀报军情的动作表演各有特点，绝无雷同，早为顾曲者所传颂。可惜茹氏中年体态过胖，过早谢世。而在京剧舞台上艺术生命最长的，当推马富禄了。

民初，马富禄出科后即搭各著名班社唱戏，曾先后与高庆奎、马连良、筱翠花、荀慧生、谭富英合作多年。特别是在与荀慧生合作期间，马氏与名小生金仲仁、老生张春彦、名旦芙蓉草（赵桐珊），并称为“留香社”四大金刚，均为荀氏得力助手，可谓极尽绿叶红花之妙。

马富禄在表演方面，不僵、不油、不瘟、不火、不贫。不管演何剧目，均能愉快胜任，自然轻松，而且不出规矩。他有一条响亮清脆的嗓子，念白亮堂打远，而且台下人缘极好，每次出场必有“碰头好”。马富禄戏路子很宽，文丑（方巾丑）得自乃师肖和庄真传；而他的婆子戏也颇出色，如《四进士》中的万氏、《拾玉镯》中的刘媒婆、《铁弓缘》中的陈母等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马氏还能演武丑及地痞无赖型的人物，如《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和“开口跳”（武丑）应工的《连环套》朱光祖一类的角色。除此以外，他还能演老旦。原来马连良主办的“扶风社”戏班正工老旦是马履云，因他与马连良失睦，《清风亭》中张继保养母一角，改由马富禄临时扮演，“救场如救火”，他临时救急接了马履云的角色，虽然隔行如隔山，但马富禄天生条件优越，能唱擅白，资质聪慧，这出《清风亭》的老旦戏一唱便红遍京畿九城，为顾曲者津津乐道。

1937年，马连良率领“扶风社”的全班人马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公演，彼时张君秋尚未唱红，需要老伶工提携，便叩头拜在马富禄膝前认干爹，自称义子。马氏乃应允陪张君秋合演《女起解》，自饰崇公道。此戏一登场，丑角“啊哈”一声就是满场掌声与喝彩。

北昆老艺人侯玉山

“北昆”老艺人侯玉山，今已九十有四高龄。现在北京安度晚年。

侯玉山，河北省高阳河西村人，生于1893年。高阳历来被称为昆曲之乡，近代著名的昆曲艺人如韩世昌、马祥麟、侯益隆等，均出生在这里。

侯玉山幼年从北昆老艺人张子久和邵老墨学艺，初习武丑，十四岁开始在乡村演唱，能演《盗甲》《偷鸡》等武丑戏，武功很有基础；后来改学架子花，擅演《嫁妹》《通天犀》《激孟良》《惠明下书》等剧，尤以《嫁妹》的吐火和椅子功最为拿手，当时有“活钟馗”之誉。

侯玉山在《嫁妹》戏中，刻画钟馗的喜怒哀乐，极尽其妙，成为后学者的典范。戏一开场，钟馗带领众鬼卒回家，要把妹妹送到好友杜平家里完婚，众鬼携带笙箫鼓乐，琴剑书箱，前呼后拥，一路上欣赏景物，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第二场，钟馗到达家门，看到门庭冷落，与妹妹抱头痛哭，倾诉自己在朝门碰死的经过，为妹妹处境艰难伤痛，情感哀怨。第三场，钟馗对妹妹讲述在京考中状元，只因貌丑，才被革去功名，又是一番愤怒形象。第四场，钟馗妹妹答应了与杜平的婚事，钟馗换穿了大红袍，以灵巧风趣的小动作，表露他的喜悦欢快，又是那么敞亮豁达。若不是有几十年的舞台经验，很难达到他那种千锤百炼的艺术境界！

侯玉山早年曾参加文安县任义礼、任铁庄父子创办的昆曲元庆社。任义礼绰号“活阎王”，其子任铁庄人称“小阎王”，元庆社被称为“阎王班”。这父子俩待人苛刻，谁也不敢惹他们。但侯玉山硬是在元庆社唱了些日子戏，这说明侯玉山有坚忍耐苦的好脾气，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他也磨炼出自己的好本事来。

1919年，二十七岁的侯玉山初次进北京，与韩世昌等合作。这以后他即长期在北京、天津演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侯玉山参加韩世昌、马祥麟、白云生、侯永奎的荣庆昆弋社，在天津小广寒戏院演出。彼时，北昆著名演员郝振基、陶显庭、侯益隆等人都在天津，人才济济，可谓北昆的兴盛时期。

1957年，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侯玉山应邀参加，一方面演戏，一方面传授徒弟。1983年，侯玉山九旬整寿，又适逢北昆老武旦吴祥珍七十五岁，青衣花旦马祥麟七十岁，北京剧协和北方昆曲剧院特为这三位老人举办联合庆寿大会，称为“三星高照”，为北昆界的一段盛事。

“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

奚啸伯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被誉为京剧“四大须生”。顷闻，前不久在石家庄举行奚啸伯七十五岁诞辰纪念演出。

奚啸伯在四十年艺术生涯中，以委婉细腻、清新高雅的唱念艺术，气质文静、感情深沉的表演才华，深受观众的喜爱。

奚啸伯生于1910年，满族人，自幼酷爱京剧。八岁时从手摇留声机学会《朱砂痣》《探母》。十一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聚会，即席清唱《斩黄袍》，博得在场的言菊朋的赞许，遂正式拜言为师。奚啸伯与京剧有不解之缘，在小学、中学期间，他坚持学剧，文戏请老生名票吕正一指点，武戏向杨（小楼）派名票于冷华求教。平时则在放学后悄悄跑到票房学艺，有时则去姑父关醉禅家串门学剧。每日清晨必到后门（地安门）喊嗓，即使刷牙漱口，也利用点滴时间耗腿。

奚啸伯高中毕业后在故宫博物院当录士，抄写白折，熟读史书，习练书法，积获酬金，奉献老师。他还常和票友秦古乐、樊子期等人票演，下海后改乳名“小白”为“啸伯”，意为爱唱的人，以志夙愿实现。奚啸伯下海后，广泛接触教授、学者、画家，以增长知识。他先后搭过尚和玉、杨小楼、尚小云的班，梅兰芳于1935年提携他进入“承华社”，与自己同台演出《宝莲灯》《三娘教子》《打渔杀家》等剧。此外，他还与尚小云合作《御碑亭》，与程砚秋合作《法门寺》，与荀慧生合作《胭脂虎》。在与“四大名旦”合作的过程中，奚啸伯深受熏陶，在艺术上颇获裨益。他喜爱靠把戏，曾对挚友说：“《定军山》我一辈子不唱也得会。”后来他真的学会了，并与徐元珊试演，他饰老黄忠，一个转身上马、甩髯、倒蹉步，便使同仁咋舌不已。

此后他组班，与金少山、张君秋、侯玉兰、张曼君合作。他不止

一次地对人说：“论嗓子我不如谭富英，论扮相我不如马连良。”但他并不甘拜下风，而是勇于探索，终于积累了以字定腔、以情行腔、错骨不离骨等科学发声方法，把“衣七”“人辰”辙升华到新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不幸的是，“十年浩劫”中，奚啸伯因受迫害而半身不遂，于1977年病逝。

杨宝森别名“杨失伍”

北京的京剧舞台上，曾有四大须生，即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马、谭影响较大，已为一般人熟知，据说不久前也为奚举办了专场纪念演出，而杨则声息杳杳。实际上杨派唱腔也拥有众多的观众，尤其是他演出的《杨家将》《失空斩》《伍子胥》最为人乐道。

记得20世纪40年代初，一次杨宝森去向他的姑父、梨园行称之为“通天教主”的王瑶卿先生请益。这位“通天教主”才高艺博、学识丰富，并且善于因材施教。他曾根据“四大名旦”各人不同的天赋条件加以指导，精心培育，使他们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梅、程、尚、荀四大流派。这次，他对杨宝森所演过的戏逐一加以评述，最后风趣地概括为“杨失伍”三个字。那天恰逢杨宝森的舅父、前辈著名小生姜妙香亦在座，姜先生在旁听了也极表赞同。从此，“杨失伍”即成了杨宝森的别号，在京剧界盛传一时。

此中，“失”即指《失空斩》，“伍”即指“伍子胥”，而“杨”者，其中有几层含义，一则杨宝森本身姓杨，另则除指《杨家将》外，更主要指的是《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说起来，此戏是杨宝森当时常演的剧目，他和梅兰芳、张君秋都多次合作过此戏。

但是，最初杨宝森演红这出戏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大约1940年冬，杨宝森在挑班组织宝华社时，贴演《四郎探母》作为打炮戏，旦角是不太有名的胡菊琴，其他配角的名字也不太引人注目，结果上座率不高，只有一百多个观众。当然那天杨本人的演唱是没的说，而且获得内行一致好评，但其效果只是叫好不叫座，反应强烈而大大亏本。隔数日，拟在上座旺季的春节再演第二场，剧场老板不同意，只好作罢。后来由李华亭（李鸣盛之父）先生出面主办，请了很多著名演员，如侯玉兰、叶盛兰、李多奎、茹富蕙、哈宝山等，仍旧合演

《四郎探母》，这次的上座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观众人山人海，险些把前门大栅栏内的广德楼剧场挤塌了。从此杨宝森的声名大振，不久便被选入“四大须生”行列。

俗云：好花尚需绿叶扶。由此观之，即使独挑大梁的名伶，亦不可小看配角演员，即所谓一台戏乃一盘棋也。

一代名旦荀慧生

荀慧生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号留香，河北省东光县人，1900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八岁被送进“义顺和”这个“梆子、二黄两下锅”的科班，学的是“梆子花旦”。十三岁即用“白牡丹”艺名登上了戏曲舞台，活跃在京、津一带。

出科后，拜吴菱仙学京剧“青衣”戏，拜路三宝学京剧“花旦”戏，同时又向陈德霖请教，最后正式拜王瑶卿为师。

荀慧生曾经杨小楼、余叔岩等指点，功底深厚，他吸收梆子唱腔唱法和表演艺术，对京剧传统技法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荀派”，在京剧界影响很大。荀慧生以扮演天真、活泼、热情的少女角色见长。在表演上他敢于突破程式的限制，善于掌握人物身份、性格、气度。荀慧生能戏颇多，代表作有全部《玉堂春》《大英杰烈》《钗头凤》《红楼二尤》《红娘》《金玉奴》《荀灌娘》《霍小玉》《杜十娘》等。

荀慧生喜读书，好绘画，文学修养颇深。他做任何事情皆有韧性，从不浅尝辄止。荀慧生自从1925年开始写艺术日记以来，不论酷暑严寒，不论在京、外出，每天必写，坚持四十余年从未间断，“十年浩劫”中被迫告一段落。

“荀派”艺术形成后，弟子遍天下，大有十“旦”九“荀”之势。荀慧生教学一视同仁，对童芷苓怎样教，对李玉茹也是同样传授，没有亲疏厚薄之分。他教学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登门求艺者皆尽心指点，倾囊相授。1959年，荀剧团重排《荀灌娘》，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荀慧生借排戏之便，将此戏传授给他的弟子孙毓敏。某日，在宣武门外山西街荀家大院里，荀慧生正向孙毓敏传艺，有记者来访，此时正排练荀灌娘改扮男装“趟马”一场，荀慧生满头大汗地在给

孙毓敏当马童，记者目睹荀慧生课徒严谨之精神，非常钦佩，提出要给荀灌娘勒马的姿势拍一张照片。荀灌娘勒马亮相，要把左脚蹬在马童的右腿上，才能塑造出一个“美”的形态。孙毓敏有点儿踌躇，荀慧生察觉后，一拍自己的右腿，和颜悦色地说：“来吧，孩子！假戏要真做，我汗都出了，蹬一下腿有什么呀！”此情此景，非常感人！

1949年以后，荀慧生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论著有《荀慧生舞台艺术》《荀慧生演剧散论》等。

1966年8月23日，荀慧生被强行押到了“孔庙”，“红卫兵”将他几十箱珍贵的戏装点燃后，勒令荀慧生跪在烈火旁。这位鬓发斑白的老艺术家被火烤烟熏得汗如雨下，背后还时有皮鞭的抽打，衣服破碎，血肉模糊，继而被押送到昌平县沙河镇劳动改造。

年近古稀的荀慧生，精神受尽凌辱，肉体受尽摧残，因而患了严重的心脏病，1968年12月下旬病逝。

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

在京剧四大名旦中，尚小云的享名是早于程、荀的。

尚小云（1899～1976）字绮霞，河北冀州人，三乐班坐科，原习武生，后改习青衣。尚小云曾向号称“老夫子”的青衣名角陈德霖学艺，如《三娘教子》《祭塔》《彩楼配》《二度梅》等都是他的拿手戏，而且始终保留传统唱法。由于他嗓子好，有真功夫，在四大名旦中属他的“本钱”最足。

尚小云初露头角时曾搭杨小楼的班，杨排演《楚汉相争》中的《霸王别姬》一折，最早扮演虞姬的就是尚小云。后来他自己组织“重庆社”，积极排演新戏，早期演出的有《秦良玉》《五龙祚》。还有一出大胆改革，以穿时装上场而风靡一时的新戏《摩登迦女》。那时尚小云班里的配角也很整齐，有老生王又宸，小生朱素云，武生茹富兰，小丑云富远、慈瑞泉等，都是杰出的演员。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尚小云还约筱翠花合作，排演了一些整本的传统剧目，如《乾坤福寿镜》《八本梅玉配》《全部得意缘》，二人一个演青衣，一个演花旦，相得益彰，颇受观众欢迎。

在四大名旦中，尚小云的武功底子最厚，有一段时间他就专演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这一类着重武功的戏，如《梁红玉》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七七”事变后，尚小云在北平创办了荣春社科戏班，虽然只有几年工夫，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如杨荣环，孙荣蕙、徐荣奎、景荣庆等，都是荣春社出来的。当今著名旦角男演员张君秋也曾是荣春社的学生。尚小云的长子尚长春，七岁就进了富连成科班学武生，是“元”字辈的学生，在科时叫尚元荪；后来他父亲自己办了“荣春社”科班，他又由富连成转入荣春社；出科前，又拜了武生前辈尚和

玉为师，所以他的武生戏很有造诣，更擅长演武生开脸的戏，出科后就和他父亲同台演出。“功夫不亏人”，尚长春现在已届老年，演起武生戏还是生龙活虎般，非常精彩。

尚长麟是老二，荣春社科班二科毕业，学的是旦角，从小就得到他父亲的熏陶，是尚派艺术的继承人。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小儿子，他原从赵荣鹏（荣春社毕业生）学铜锤花脸，后来又拜老艺人侯喜瑞为师学架子花脸，现在已是一位净角全才。

尚小云晚年住在西安，“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含冤而死，享年七十七岁，是四大名旦中最长寿的一位。

须生泰斗马连良

现代的新闻传媒极善为演员吹嘘，动辄便是“大师”“著名表演艺术家”云云；殊不知那些被冠之以“大师”或“艺术家”者，比起昔日名副其实的大师，则退避无地矣。以京剧老生论，流派纷呈，其中有墨守成规的“旧谭派”，有刚柔相济的“余派”（新谭派），有朴实大方的“后谭派”，有苍劲古朴的“言派”，有清新典雅的“奚派”，有圆润甘甜的“杨派”，有激越悲壮的“高派”，更有号称“南麒北马”的“麒派”和“马派”。

马连良先生作为“马派”的创始者，早在1930年即被著名报人邵飘萍誉为“须生泰斗，独树一帜”，此绝非溢美之词。

马连良，字温如，回族人。幼入喜连成科班学艺，先学武生，后改老生，最后归工文武老生，艺宗“谭派”（谭鑫培），出科后所演之剧目亦为谭派戏。其后他在唱工上吸收了“内廷供奉”孙菊如唱法的精华，在念工和做工上又向贾洪林、刘景然等名家学到不少技艺，经揣摩、钻研，由演唱工戏逐步改为演出唱、念、做三者并重的剧目，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于学“谭”之基础上，发展革新，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在京剧界老生行中创出了“马派”，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马派”的表演艺术特点甚多，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巧”和“帅”两个字。

马运良的唱腔，自然流畅、细腻婉转，以“巧”取胜。不但腔儿好听，而且韵味十足，虽“巧”而不流于“油”。唱与剧情结合，绝不乱耍花腔，流于形式。妙在“巧”中见“俏”，“花俏”而不越“规矩”。

马连良的念白，发音准确、咬字清楚，字字送进观众耳中，令人听得明明白白。尤具特色的是，马连良的话白无论长短皆铿锵有力，

节奏鲜明，富于音乐性，并能巧妙地把“声”和“情”融合起来。他在《审头刺汤》中指责汤勤的大段念白，把个狗仗人势、卑鄙无耻的小人嘲笑得体无完肤。每次演出此剧，观众听到这里无不拍手称快！足见表演艺术家的匠心独运。

马连良的做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飘逸潇洒，突出一个“帅”字。他的身段帅，动作美，“髯口”“甩发”，“水袖”“脚步”基本功硬，而且是以生活为依据进行艺术表演，不是单纯地卖弄技巧。

马连良前期的演出，基本上是以唱为主的剧目，如《失空斩》《四郎探母》《辕门斩子》等戏。到了后期，由于本身的条件问题，演出多为唱、念、做并重的剧目，如《清风亭》《四进士》《一捧雪》《问樵闹府》等戏。另外，还排演了不少“马派”本戏，如《春秋笔》《串龙珠》《十老安刘》《胭脂宝褶》《要离刺庆忌》《赵氏孤儿》等。

1936年初，上海向来放映电影的新光大戏院的老板芮庆荣，决定改新光大戏院为演京剧的场所。他怕头一炮打哑，特意首聘“红透半边天”的京剧名伶马连良和他的“扶风社”全班人马，另加华慧麟、刘奎官等名角，唱开场戏。

时间定在农历大年初一晚上，凭马连良和“扶风社”的声望，在各报刊登出巨幅广告后，仅仅几天戏票就争购一空。马连良见此情景，忽想到一个“怪主意”：大年初一登台，固然可造成轰动，但如在除夕的晚上，先演一场“守岁戏”，倒也不失是一件非常别致的事。

当他兴冲冲地与院主芮庆荣商量时，芮却连连摇头说：“你不要开玩笑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老少都在家中守岁，吃团圆年夜饭。那些店家则忙着盘点、算账，哪有工夫来听你唱戏？不要说卖票，我看送票都不会有人来！”马连良闻此言，笑了笑，仍信心十足地说：“芮老板，你不要管，不要你付包银，只要把场子借给我们用，

花些电费，而前后台的一切开支，由我马连良负责。卖下银来，给大家分红，作为过年红封利钱，希望你能支持。”芮庆荣听后觉得与己无损，便同意了。

老板首肯，马连良立即跑到后台，向管事说明这一设想和具体办法，大小角色、班底、场面、衣箱、龙套等，一致深表赞成。他们感动地说：“马老板肯这样热心出力，使大家能分到一些过年红封利钱，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于是排出戏码，先是刘奎官、刘连荣、杜富隆、马春樵、马四立的《英雄会庆贺黄马褂》；大轴由马连良、华慧麟、叶盛兰、马富禄、李洪福演出全本《御碑亭》《金榜乐》。结果广告一刊出，不到一个下午，戏票全部售光。乐得芮庆荣逢人便说：“马老板真有一套，年三十晚上，先卖一个满堂彩！”

说也真巧，马连良在上海新光戏院唱红之际，喜剧泰斗卓别林恰来上海游历。这天，卓别林由梅兰芳等人陪同，驱车来到新光大戏院，欣赏马连良演出的《法门寺》。进场时，正赶上马连良扮演的赵廉在唱“行路”一段，台下静寂无声，观众聚精会神地在倾听马连良的大段西皮：“郿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卓别林等一行在包厢悄悄地坐了下来，他侧耳细听演员的唱腔和胡琴的过门。当时，为马连良操琴的琴师是杨宝忠，琴艺非常高超。卓别林一面倾听，一面不由自主地用右手轻轻地试打节拍。

剧终后，卓别林上台，同马连良见面，两人紧紧握手并互表敬佩之意。当时，马连良扮的知县赵廉，头戴乌纱帽，身着蓝袍，一副明代的装束；卓别林则穿一套西装，强烈的时代反差，令人捧腹大笑。次日，上海各家报纸均以醒目位置刊登了两人握手、拱手的两张照片，现在这照片已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遗憾的是，1966年12月13日，马连良在中和戏院接受批斗时，一头跌倒，时隔三天，便像他在《清风亭》一剧中扮演的张元秀一样，凄凄而终，享年六十六岁。

著名武旦宋德珠

20世纪40年代初，予旅居北京时，广大京剧观众推选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为“四小名旦”。这是继20年代《顺天时报》专栏作家石听花倡议推选梅、尚、程、荀为“四大名旦”后的又一次梨园盛举。

李世芳、毛世来二位都是素负盛名的科班“富连成”第五科的学员，李世芳早在未出科前，即已名声大噪，博得“小梅兰芳”的称号，但不幸于1947年赴青岛演出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殒命。毛世来师承著名花旦筱翠花，他也和李世芳一样，在十二三岁未出科前，就已被广大顾曲者交口称赞。张君秋初拜李凌枫为师，李为王瑶卿高足，故张自幼深得王派青衣真传。宋德珠则是程砚秋、焦菊隐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第一科学员，他在戏校刚毕业时，即如新笋破土而出，被众多京剧观众所肯定和推崇。宋德珠的启蒙老师是张善亭（艺名“十阵风”），在武功方面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后，宋德珠继续受到著名武旦朱桂芳、阎岚秋（即“九阵风”）的教授和指点，技艺更加精进。连谢绝舞台多年的清末著名武旦老艺人余玉琴都教过他。所以，宋德珠在幼年、少年、青年三个阶段，投师访贤，多方求教，虚心好学，刻苦钻研，练就了一身舞台上的过硬本领。有的行家说，在京剧界学武旦、刀马旦的，能得余、阎、朱、张四位名家教导，真可算得天独厚的机遇了。

宋德珠毕业后成婚，娶著名杨（小楼）派武生孙毓坤（艺名小振庭）之女为妻，在武功技艺方面又得其岳父的启迪和传授，舞台艺术又跃进了一步。

德珠能戏很多，武旦戏如《扈家庄》《泗州城》《青石山》《盗仙草》《打韩昌》《打焦赞》《打瓜园》《打店》《取金陵》等都是他经常上演的剧目。刀马旦戏，他也会得很多，《儿女英雄传》（即

《能仁寺》《悦来店》）是余玉琴老伶工亲传的，自不必说，其他如《穆柯寨》《樊江关》《战金山》《小放牛》等戏，他演来也能得心应手。德珠在舞台上腰工极佳，跷工稳健，武功出手迅疾，深受观众爱重。

最近传来宋德珠病逝的消息，回首前尘，令人感到无限惆怅。

忆四十余年前，德珠风华正茂，予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六条其岳父孙毓坤寓邸得见其庐山真面，曾几何时，伊已步黄泉路上。

甚堪告慰的是，听说宋君的掌珠宋丹菊也是京剧武旦演员中的后起之秀，武旦一行，后继有人，亦可以慰德珠在天之灵矣！

“金霸王”的癖好

京剧金派花脸创始人金少山，系清内廷供奉金秀山之子，祖籍北京，满族人。家学渊源，能戏甚多。20世纪30年代初，与梅兰芳在上海演《霸王别姬》，因其唱腔与扮相俱佳，叱咤风云，气势磅礴，从而博得了“金霸王”的美号。

“金霸王”在京剧花脸演员中，以体形魁梧、嗓音洪亮见称。按净角可分铜锤（如徐延昭、包拯、姚期等角色是铜锤应工），架子花脸（如《芦花荡》中之张飞，《取洛阳》中之马武，《藕塘关》中之牛皋，《丁甲山》《清风寨》《闹江州》中之李逵等角色是架子花脸应工）和武花脸（如《状元印》中之常遇春，《艳阳楼》中之高登，《铁龙山》中之姜维，《金钱豹》中之豹子等角色是武花脸应工）。金少山则以铜锤见长，兼演架子花脸。由于他额颊宽阔，身体高大，在净角演员中可算是“得天独厚”的标准花脸扮相，又因他歌喉响亮，声如洪钟，真可谓“黄钟大吕”。

“金霸王”性豪爽、重义气，为人耿直并喜济困扶危。其一生有五癖，曾在早年间北京梨园界内外的老人中传为佳话。

终年光脚，此其一癖也。卸妆后的“金霸王”，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一年四季从不穿袜子，问之则曰“脚太热”。偶遇文人雅士登门拜访，出于礼节必急忙穿上，一旦过从频繁熟悉之后，则照脱不误。

爱当行头（京剧术语，指戏装），此其二癖也。皆因其总周济穷人，从不看重金钱，加以花销又大，包银虽多而总是寅吃卯粮，故经常当行头以接短儿，乃至有人约戏，须先付包钱赎回行头，而后方可粉墨登场。久之，梨园界便流传过一句歇后语：“金三爷唱戏——先送包银。”“金三爷”者，盖因金少山行三而尊称之也。

爱听评书，此其三癖也。“金霸王”于1936年冬自上海回京后，居宣武门外琉璃厂，每晚必到附近石头胡同三和成书茶馆听品正三（有“品八套”之美名）说《隋唐》，遇有夜戏，必事先与品正三约定，等其散戏回来再开书，并为此而另有报酬。

“金霸王”对品正三评书艺术的评价是：“立眉瞪眼，就是脸谱，发脱卖像，就是身段。”由此看来，其听书的目的是借鉴评书艺术以充实自己的舞台艺术。他在《锁五龙》一剧中扮演的单雄信，之所以分寸适度，鞭辟入里，富于感情变化，正是受益于评书。

爱收藏鼻烟壶，此其四癖也。这位从来拿钱不当回事的梨园“金霸王”，常常为购得一只绝品烟壶而倾其所有，故搜罗甚富，其所藏康熙、雍正两朝官窑五彩珍品“十八罗汉”“九秋白菜”“钟馗嫁妹”等瓷质烟壶，皆神州之拱璧也。惜其于1948年病逝（年仅五十八岁）后，所藏宝物辗转易主，下落早已不明矣！

爱养诸般动物，此其五癖也。台上的金少山，所扮演的各色人物皆勇猛暴躁之辈；台下的金三爷，对所饲养的蛐蛐、油葫芦、红子（沼泽山雀）、巴儿狗、猴子等宠物，却一概和颜悦色，极有耐心。

“金霸王”大概是因为失去了虞姬的缘故，老怕心爱的蛐蛐“打光棍”。穷小子们知其底细，便轮番登门送“三尾儿”（母蛐蛐），金三爷来者不拒，且必重金酬谢，而后择其形体小巧优美者逐罐配之，笑谓友人曰：“蟋蟀谱上说得对，蛐蛐跟人一样，英雄爱美女，不给它配上个好三尾儿，一斗准败！”

“铁嗓青衣”王玉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周璇，歌声轻柔甜润，她唱的《拷红》《四季歌》等，至今仍在流传，人们称她为“金嗓子”。可是不知为什么，京剧界的旦角演员，凡嗓子高亢响亮的，人们都称之为“铁嗓子”，而不称“金嗓子”。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嗓子冲、武功好，常常在剧中连唱带舞，人们赞誉他是“铁嗓钢喉”。女演员王玉蓉，能在一个晚上从《彩楼配》唱到《大登殿》，她一人饰演王宝钏到底，整整演足四小时，因而获得“铁嗓青衣”的称号。

说起这位王玉蓉，颇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她是苏州人，十六岁时就以王艳芳的艺名，在南京夫子庙的群芳阁、天韵楼等茶社清唱，由于她嗓音甜美嘹亮，不久就誉满秦淮，被选为“歌后”。

她十九岁时到北京，拜在京剧一代宗师王瑶卿的门下学艺达八年之久。王瑶卿对这位南方来的女弟子爱护备至，要求也十分严格，不但一字一腔绝不马虎，而且胡琴一响即不许再喝水。所以后来王玉蓉在台上从无“饮场”的习惯。王瑶卿教她的第一出戏是《女起解》，开头的四句摇板，就教了半个月，直到满意为止。后来，相继教了她《金水桥》《李艳妃》《宝莲灯》等戏，还专门为她排了一出《艳云亭》（即《孔雀东南飞》）。这个戏里快板特别多，王瑶卿告诉她，唱戏的要诀是“慢板不慢，快板不快，以字带腔，着重气口”。王玉蓉后来对人说，王师传授的这十六字真言，使她一生受用不尽。

王玉蓉在王门学有所成，需要在北京的舞台上露露面了。但因她自南方来，北京的观众对她很陌生，因此各家戏园子不敢邀她去演出，怕影响票房收入。1933年长安大戏院开幕，据说因为“闹鬼”，许多名角都不肯应邀登台。说得有声有色，于是街谈巷议，满城皆知。新戏院反成了冷角落，没有名伶愿到这里签约登台。王瑶卿不信鬼，他对王玉蓉说：“别人怕鬼，我们来打鬼，你也学成了，咱们弄个班

子唱戏院的开门戏去。”于是和长安大戏院签了约，王玉蓉挂头牌，须生为管绍华。戏院门前贴出告示：“由王瑶卿为徒儿把场，亲自上台。”这个告示，起了不小的广告作用，观众震于通天主教的大名，又觉得“把场”一举新鲜，买票非常踊跃，戏院上下坐得满满的。

王瑶卿为王玉蓉把场，是在新开的长安大戏院开了端，以后王玉蓉去上海搭班，戏院老板就央求王瑶卿“再来一次把场”，所以这个“把场”便流传到上海去了。

王玉蓉称王瑶卿为恩师，念兹在兹，情意甚殷，其实王玉蓉本人的好学和她的成就，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她不久即以“王八出”闻名遐迩，她唱《王宝钏》从《彩楼配》起，包括《三击掌》直至《武家坡·回窑》，计八个折子，一气呵成。“王八出”不是虚名，是她的真功夫与金嗓子的体现，不可多得！

梅派青衣陆素娟

> 窃符救赵一剧编，窑变名伶有素娟；多谢琴师徐督办，
> 梅家班作陆家班。

这是张伯驹在《红毹纪梦诗注》中写梅派青衣陆素娟的一首诗。注云：

> 以妓为伶者谓之窑变。南妓陆素娟因与王绍贤关系，从徐兰沅学梅派戏，曾与余演《游龙戏凤》、《打渔杀家》。东北失陷后，梅移居上海，徐组梅之班助陆演唱，并编排《窃符救赵》一剧。“督办”乃徐之别号也。

陆素娟，苏州人，端庄清丽，秀外慧中。幼家贫，20世纪30年代中，由其养母携至北平，在城南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青楼“环翠阁”操其业，在院中排行第八，人称“陆老八”。江南人来京营业的班子，分“扬州帮”与“苏州帮”两派，而苏州班身价地位较高，多为头二等，扬州班则较世俗，多沦为二、三等。由于韩家潭“环翠阁”老八陆素娟丽质天生、聪颖过人，又略识文字，善于歌唱，所以一经悬牌，即名噪九城，一时军政大员、名流富翁及银行家们都趋之若鹜。不到半载，素娟芳名便誉满故都。

此一时期，梅畹华博士（梅兰芳字畹华）为避日伪凌辱，举家南迁，定居上海马思南路“缀玉轩”。北平的京剧戏迷们，只能欣赏到尚、程、荀三大名旦的舞台艺术，却看不到梅派戏的演出。而畹华离平，梅剧团的演员及场面（乐队工作人员）均多闲散在家，无适当班社可搭。著名琴师徐兰沅为素娟吊嗓教授梅派戏，发现她是一块璞玉，倘若经过精雕细琢，必然成为玲珑剔透的琳琅美器。所以这位绰号“徐督办”的琴师，一方面教授陆素娟梅派艺术的念唱做舞，一方面召集梅剧团原班人马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杨盛春、姚

玉芙等重组剧团，捧素娟为主演，以陆代梅。

由于有这些著名演员的配合和帮助，陆素娟很快就唱红了。她主演的一些梅派名戏，如《宇宙锋》《凤还巢》《洛神》《霸王别姬》等都颇具梅派之神韵，每每引起轰动。观众称赞她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唱做皆精，融合得体。有一次她和王又宸为赈济灾民义演《四郎探母》，她饰演铁镜公主，扮相雍容富丽，唱腔优美，一段“猜一猜驸马爷袖内机关”的西皮慢板，刚柔相济，获得场内满堂喝彩。事后，一些老戏迷感叹地说，看陆素娟的戏，有“望梅止渴”之效应。

陆素娟的成功，是和几位老演员的着意配合密不可分的。萧长华配演《法门寺》中的贾桂、《凤还巢》里的朱千岁、《女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不论戏多戏少，都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小生泰斗姜妙香为其配演《玉堂春》中的王金龙、《凤还巢》中的穆居易、《俊袭人》中的贾宝玉等更是技艺超群，相得益彰。著名武旦朱桂芳为其配演《西施》中的对打宫女、《廉锦枫》中的蚌精等都是翠羽飞扬，舞姿飘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戏德高尚，虽然论资历和名气都在陆素娟之上，但为其配戏绝不喧宾夺主，而且映衬适宜，水乳交融，恰到好处。

陆素娟一般是在中和剧院唱夜场，偶然也演一两次日场。那时中和剧院在北平就算是设备较好的剧场了，这里每天车水马龙，高朋满座，一些有身份的戏迷都成为这里的常客。谁知好景不常在，陆素娟走红没几年，“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的烽火迅速在全国燃烧起来。陆素娟的戏班垮台了，她不得不悄然南下。更为不幸的是，她到达汉口不久，又染上时疫，而且一病不起，很快即谢世而去。时年尚不满三十岁。

吴素秋早年二三事

中国京剧艺术家演出团莅港献艺，戏码中有吴素秋亲授、刘长瑜主演的《苏小妹》，这使笔者想起了吴素秋这位阔别多年的名伶来。

吴素秋以演花旦著称于世，但她七岁学艺时是从武生开蒙的，其师是名武生赵盛璧。当时吴素秋虽然身体瘦弱，但有一股子“横”劲，每天坚持下腰、压腿、劈叉。后来又练跑冰地、站竖砖、站缸边和练刀、枪、剑、戟等多种器械。她勤学苦练，武功扎实，七岁就演出了《石秀探庄》《白水滩》等武戏。但毕竟在体质上先天不足。后来赵盛璧对吴母说：“素秋体弱，还是改唱旦角吧。”于是，吴素秋又拜陈盛荪为师，改学旦角。

吴素秋自幼十分聪明，据说上小学作文时曾写过“饿了吃东西甜如蜜，不饿吃东西不甜”的句子，深得老师赞赏，奖给她手绢两块。后因家贫辍学，学戏后，吴深感文化不足，所以十四岁时又提出上学的要求。吴母说：“现在指望你演戏，赚钱吃饭，怎能上学呢？”素秋回答道：“我可以晚上到戏班演戏，白天上学嘛。”母亲见她求学心切，就同意了。她为了不让同学知道自己是“戏子”，就化名“陈桂华”参加考试，结果名列榜首。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同学便知道了，课下常常起哄，吴素秋只好退学。此后吴素秋坚持自学，文化程度逐渐提高，《苏小妹》就是她亲自改编的。吴素秋挑班演出以后，不少京剧界的名宿曾和她同台演出。十五岁时，她与当时蜚声剧坛的金少山合演《牧虎关》和《霸王别姬》。金挂头牌，吴挂二牌，二人配合默契。沈阳的报纸以“大霸王，小虞姬”为题，赞美他们的合作。金少山尝言：“男旦角我愿和梅兰芳唱，女旦角我愿和吴素秋唱。”

另外，吴素秋善于“藏拙”，她曾说：“程砚秋老先生在舞台上常常是以侧身和蹲腿的姿势演唱，以藏他身高体胖之‘拙’。裘盛戎为弥补

他脸型瘦削、个子不高的缺陷，就在脸谱的勾画和端架耸肩企脚上下功夫，上台总是‘长身’。我从来不唱《贵妃醉酒》，杨贵妃仪态丰满、雍容华贵，而我体型瘦小，扮演这一角色形象不美，但是若扮演黛玉、苏三这类的角色，则较为相宜。”吴素秋身高不足一米六，为了增高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她便将跟垫垫在绣花鞋和靴子里，后来这种做法被许多剧团采用。

童芷苓和她的弟弟妹妹

素有“荀派第一传人”美誉的童芷苓，不久前客死异乡美国，友人闻讯后，无不为又一颗明星的陨落而扼腕。

六十多年前，天津有一户童姓人家，丈夫童汉侠是中学国文教员，妻子从女子师范毕业后，在学校里教外语。这对夫妻酷爱京剧，业余常到票房里粉墨登场。他们的子女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一个个从小就成了戏迷，相继“下海”后，有好几位都成了成就卓著的名演员。

在童家兄弟姐妹中，成名最早、影响最广者当属1922年出生的童芷苓。她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在春和戏院与名丑金鹤年合演《女起解》，当时只有十一岁。童芷苓十五岁进入鼎鼎有名的坤班奎德社，接替河北梆子名家李桂云，在时装新戏《啼笑因缘》里一人扮演沈凤喜、何丽娜两个角色，从此声名鹊起。1939年，她经一家报社社长介绍投拜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为师，得荀先生传授后，演技蒸蒸日上。不久，芷苓的父亲童汉侠组建了以童氏姐妹兄弟为骨干的戏班，以苓社命名，人称童家班，头牌主演就是童芷苓。这个班当年在京、津、沪、苏等地盛极一时。

童芷苓天资聪颖，很小就显示出超人的悟性。无论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也无论梅、程、荀、尚艺术流派，她无所不演。拜荀后，既师承荀派，也私淑梅派。难能可贵的是她把荀、梅两派的特色自然融合，体现在自己的演出实践中，同行们称她是“荀派梅唱”不无道理。

当年童家班的主力除芷苓外，还有她的几位手足。长兄霞（遐）苓求学时学工科，课余常到票房玩票，并向京剧名家姜妙香学了不少戏，后来下海演老生，因受嗓音所限，最终成了专业编导，1965年病逝。他的夫人李多芬，为前辈艺术家李多奎的弟子，退休前在上海戏

校教老旦。他们的儿子童强，在上海京剧院做演员。芷苓的次兄寿苓学戏也很早，后来嗓子倒仓，改随姜妙香学演小生。苓社建立后，他也是社中主演之一，芷苓所演《花田错》《红娘》《得意缘》《十三妹》等花旦戏，小生角色都是由他扮演。他的儿子童小强子承父业，现在上海京剧院唱小生。芷苓的妹妹葆苓，早年也是一边演京剧一边涉足电影界，与石挥等明星合拍过几部故事影片，在上海有一定的名气。在京剧舞台上，她花旦、刀马旦兼工，所演《汉明妃》《佘赛花》《穆桂英》等尚派名剧，得自尚派创始人尚小云亲传。祥苓是童家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弟弟，当年初登舞台演唱是由人抱到椅子上去的。成年后得到马连良、周信芳等多位名家提携，他在现代戏《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经过三十余年风风雨雨，至今依然为人乐道，可见艺术魅力深入人心。他的夫人张南云，原是上海京剧院青衣、花旦演员。据悉，祥苓夫妇现已退休，在上海开了一间饮食店，成了与艺术毫不相关的小本买卖人。惜哉！

“舞台飞人”张德俊

现今杂技节目中的“空中秋千”“杠杆”等，均有高难度的“杆上”功夫，其惊险程度令人瞠目。其实，京剧舞台上的“杆上”功夫，亦早已有之。早年，被誉为“舞台飞人”的京剧名伶张德俊，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德俊是河北省香河县新集人，与盖叫天同庚，生于1888年。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曾携子张云溪（当今内地京剧名伶）等赴台演出，饮誉宝岛，迄今台湾老戏迷们对他的表演仍记忆犹新。

张德俊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其父张玉林为著名河北梆子青衣名伶。他幼承家学，后广拜名师，以演短打武生戏见长，早年在天津、东北等地享有盛誉。他演出的《花蝴蝶》（饰大盗姜永志）、《四杰村》（饰狄仁杰）、《莲花湖》（饰孙悟空）等传统短打武生戏，都有“上栏杆”技巧，他能在“栏杆”上表演出各种高难惊险动作，相当精彩。他表演的“杆上”绝技精妙绝伦，他能头戴硬罗帽、足蹬厚底靴，在“杆上”走“三险”，下杆时，转体五百四十度翻下，整个身体飞出台口外，落地时又稳稳地回落在台上，令观众惊奇叫绝，从那时便有了“舞台飞人”之美称。

20世纪初他唱红后，曾以三百元月包银的身价应邀赴上海演出，在《花蝴蝶》中扮演大盗姜永志，开打时足蹬厚靴，头戴硬罗帽，从三张桌高处折“云里翻”，他双足跳起，腾空向后翻一周，又稳稳落下，申城观众无不称绝。由此，月包银由三百元升至六百元。从那时起，他在上海连演十年，上座率不衰。当年，张德俊演的武松戏与盖叫天演的武松戏各具千秋，他与盖叫天并称上海“武生双杰”。

张德俊在近四十载的艺术生涯中，曾先后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马连良、周信芳（麒麟童）、盖叫天等名家合作演

出。20世纪30年代初，在天津一度与著名河北梆子演员金刚钻、李桂春等合作演出《回荆州》，他扮演赵云。此戏名角荟萃，争妍斗奇，轰动津门，至今仍传为梨园佳话。长期的舞台实践，使张德俊练就了与众不同的演艺风格，他身段规矩，动作舒展，武打利索而紧凑，炽烈而惊险，跟斗翻得又高又冲，嗓音高亢激越，响遏行云。张德俊常演的代表剧目还有《嘉兴府》《白水滩》《武文华》《三岔口》《界牌关》《筏子都》等武生戏。后来，因为其子张云溪少年成名，张德俊于1933年（四十五岁时）便告别舞台，举家到北京定居。虽说“息影”，但不时亦有演出，只是把舞台让给了后代。

据悉，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曾应邀到中国戏曲学校任教，为该校“十大教授”之一。张老于1980年逝世。

李世芳青岛罹难前后

京剧“四小名旦”之一李世芳是梅兰芳弟子中的佼佼者，1947年因飞机失事在青岛罹难，至今京剧戏迷们说起李世芳来都扼腕不已。

李世芳开始在北京富连成学戏，未出科便已崭露头角，且常演梅派剧目《霸王别姬》等，颇获好评，被人称为“小梅兰芳”。有一年梅兰芳从上海返京，听说科班学生中有个“小梅兰芳”，很感兴趣，便特意前去看望。待看了他演出的几出戏后，甚是喜爱，遂收他为徒。

李世芳师从梅兰芳后，艺事猛进，以唱工扮相酷似梅先生而名列“四小名旦”之首。

李世芳为人谦和，毫无一般伶人的傲气。1932年他偕新婚夫人姚宝琏首次到青岛演出，从前没看过梅兰芳戏的人，有缘看到“小梅兰芳”的演出，连连称赞、大饱眼福。因为他不但扮相酷似梅兰芳，唱腔亦极像，这次在青岛所演的戏码又都是《生死恨》《霸王别姬》《天女散花》《宇宙锋》等梅派戏，所以特别受青岛观众的欢迎，连演十三天他才回上海。

1947年，他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与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等合作演出，号称“十大头牌”。如此阵容的演出，自然轰动一时。在此期间，李世芳主演了剧作家翁偶虹编写的新戏《天国女儿》。演出结束后，已届岁末，李世芳急于返京，适逢杨宝森夫人因事逗留，将机票转让给他，谁知飞机竟在青岛郊区灵山坠毁，李逝世时年仅二十六岁。

李世芳乘机罹难，震惊了青岛京剧艺坛，引起梨园界的哀痛。李世芳之父李子健，友郑岐山前往收尸，其尸一团模糊，无从辨认，被编为三十号。遇难者尸体均用白布裹缠，仅露一面，全部用大布一块

掩盖，停放在天后宫。宫内冷烛摇曳，哀音不绝，报上载诗曰：

冷烛摇曳照残骸，天后宫内声声哀。不见名伶真面目，芳魂永留红坛毡。

后李世芳的遗体被送入胶州路吕祖庙内举行入殓典礼，各界人士四十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李世芳的遗体运回北京后，京剧界名伶叶盛兰、马富禄、尚小云、谭福英等都前往吊唁。送去的挽联中，有一副是由四个剧目的名字组成，上联是“金山寺成生死恨”，下联是“帘锦风变镜花缘”。上联中的《生死恨》是李世芳生前经常演出的梅派戏，《金山寺》则是李世芳与梅兰芳合演的最后一个剧目。

梅兰芳从南京回上海以后，听到李世芳遇难的噩耗不胜悲痛，为此停演数日。他知道李世芳家有父母、妻子和三个女儿，生活无着，于是发起主办了两台救济戏，把全部收入寄给了李世芳的家属。常宝华、张君秋等也分别为救济李世芳的家属举行了义演。

翁偶虹曾作诗悼念：

犹记童年霞举时，望梅梅竟玉成之。乱离前后梅无恙，及折梅园李一枝。

梅派高足魏莲芳

近悉，梅兰芳大弟子魏莲芳，不幸于4月份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又九岁。

魏莲芳是梅兰芳亲传的大弟子，他在梅氏认可下“代师授徒”，不少名角儿都曾向他问学请益，真是群星璀璨，他们中有的是经魏莲芳春风化雨而进列梅氏门墙的。梅兰芳曾对这些学生说，你们称我为先生，可大师哥曾经教过你们，而且把你们引进了门，你们也该尊称他一声魏老师，从此，“魏老师”的称呼就在梅门中传开了。

魏莲芳十五岁拜梅兰芳为师，长期佐师演出，很得梅氏器重。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距今六十一年前，北京福全馆有一场盛大的堂会演出，大轴戏是北京名票张伯驹主演诸葛孔明的《失空斩》，配角之精，无与伦比。诸如：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先的马岱，陈香雪的司马懿，等等。名伶济济，前边的演出独缺了已经邀请的梅兰芳。当时梅兰芳正在上海演出，而他又是个极讲信义的人，于是便选了魏莲芳代表他在众多名演员和老前辈的注视下演出了一出《女起解》，由此可见魏莲芳在梅兰芳心目中的位置了。

魏莲芳称，每教一次戏就能对梅派多一层理解。郭沫若曾把梅兰芳的艺术创造概括为一个“美”字，魏莲芳教戏就是能够处处体现这个“美”字。如他教《宇宙锋》，着重表现赵艳蓉佯作疯状敢与昏王作斗争的贞姿劲质，要演得像雪里寒梅那样高洁芬芳；他教《生死恨》，着重表现韩玉娘虽然饱受离乱之苦犹自坚守民族大节，含辛茹苦，等到胜利在望夫妻团圆就在眼前，却因身体不支遽尔逝去时那绵绵不尽的凄婉之美。魏莲芳教戏总是按照梅兰芳的教导从“说戏先说戏中人”开始。如《醉酒》，“三千宠爱一身专”的杨贵妃遭到了冷落，她孤身独饮，借酒浇愁，以致酩酊大醉，她的种种醉态无一不是反映

了她内心的空虚与苦闷，所以要演得愈醉愈美，才能因她的红颜薄命而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如他教的《别姬》一剧最能看出梅兰芳要演员相互衬托的“一棵菜”精神。艺术是因相互对比而存在的，霸王丑，虞姬美，霸王刚，虞姬柔。所以在舞台上表演时，霸王急躁暴烈，声如洪钟，虞姬则柔声劝慰，分忧解愁。演员如不理解这些，只顾自己亮嗓子，本是由二人完成的一场戏也就唱砸了。魏莲芳每忆起梅兰芳这些话，总说如同耳提面命般记在心中。

魏莲芳搭班演出，临别梅兰芳关照他两句话：一不许“回戏”（借故停演），二不许“返场”（即台上“搭档”出了差错，不但不思补救，反而出人洋相）。20世纪50年代魏莲芳邀梅剧团在武汉演出，他刚演罢《搜孤救孤》中的程妻，梅兰芳便把他叫了去说：“你知道旦角儿的哭头有‘西皮’和‘二黄’之分吗？”魏答：“我知道，刚刚那哭头我是唱马虎了。”梅沉下脸说：“你哪里是唱马虎了，你是瞧不起那个唱程婴的老生，是不是？”一语道破，魏不得不低头认错，这更使他想起初搭班时老师的教导，这教导令他终生难忘。

拜“梅”唱“程”新艳秋

曾经名噪一时的程（砚秋）派青衣新艳秋，今年快九十岁了，她与赵荣琛、王吟秋同是响当当的程派名角儿。但赵、王都是程砚秋的门徒，而新艳秋不是，但她从取艺名王兰芳登台以来，一直唱的都是程派戏，更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她确曾是梅兰芳的门徒。梅的门徒一生唱的是程派戏，这里边阴错阳差的一段奇妙因缘颇值得一记。

新艳秋是受苦出身，她二姐是艺名珍珠钻的河北梆子演员，师事钱则诚。新艳秋原名王玉华，她十四五岁迷上了程派唱腔，她拉胡琴的哥哥王子祥也是程迷，兄妹俩经常躲在程砚秋（其时名程艳秋）唱戏的北京华乐园角落里“偷戏”，新艳秋偷的是程派的唱腔与身段、水袖，她哥哥偷的是程派的胡琴特点和强记谱子，日子久了，上天不负有心人，新艳秋学了许多程派戏，她哥哥也会拉程腔的胡琴了。

几年里，由于家境苦寒，新艳秋经人怂恿，应邀在当年的开明戏院唱开锣戏，贴出的海报每天都是程派戏，或全出，或片断，居然满有韵味，程腔十足。这个消息传到了一位大行家的耳朵里，这位行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齐如山，他与梅兰芳、程砚秋两家都有深交，他亲自去开明看了新艳秋的程派《贺后骂殿》，大为惊奇，认为是可造之材。齐特邀新艳秋到他家里，对她说：“我介绍你拜程砚秋为师，实授实学，你的前程是远大的，索性改个名字叫新艳秋吧，响亮些。”齐如山应该说是新艳秋的“伯乐”，新艳秋听了齐的话自然是喜不自胜。她从小迷的是程派，现在程派的创始人将有可能做她的老师了，这难道是在做梦吗？岂料好事多磨，齐如山的倡议没有得到程砚秋的同意，这真的成了新艳秋的一场大梦！原来程砚秋其时还很年轻，外面早有关于他收女徒弟的流言蜚语，人言可畏，他又怕当时报界手握刀笔的人，所以他已发誓不收女徒。齐如山也改变不了他的誓言，新艳秋拜师之事，只好作罢。

还是这位齐如山先生，他把新艳秋引见给梅兰芳大师，新艳秋终于成了梅大师的女弟子。梅非常欣赏这位有心胸和奋发有为的女青年，他手把手地教了她不少梅派戏，包括《霸王别姬》。这时，武生泰斗杨小楼组班演戏，选中了刚满十八岁的新艳秋与他合演《霸王别姬》和《长坂坡》，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梅大师马上又忙着为新艳秋指点《长坂坡》中投井的关键身段。

这次新艳秋得杨小楼提携合作登台，顿时声誉大振。

虽然新艳秋从老师梅兰芳学了许多梅派戏，在日后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她唱的却仍是程派戏，俨然成了程派青衣中的一家，观众欢迎她，她也越唱越红。

新艳秋现在是江苏戏校的主课老师，她悉心培养了一批程派的继承人，其中的钟荣后来成为中年程派青衣的佼佼者。

艺苑双菊名坤伶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京剧舞台上坤班盛行，生、旦、净、丑均由坤伶扮演，还有姊妹一生一旦同台演出者，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徐东明、徐东霞姊妹，杨菊秋、杨菊芬姊妹。

杨菊秋与杨菊芬，早年曾被称为“艺苑双菊”或“菊国双姝”。菊秋工青衣，其妹菊芬工老生，她们因技艺精湛而被社会各界名士誉为“并美兼优”与“并蒂秋华”。

1935年前后，杨菊秋、杨菊芬姊妹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组班演出。姐姐杨菊秋当时二十七八岁，唱花旦，学筱翠花的戏路子，为其妹当配角。杨菊芬当时二十岁上下，唱老生，艺宗言菊朋，兼取余叔岩之长，挂头牌。杨家姊妹同台演出，很有叫座力。

杨家姊妹自幼丧父，随母亲牟氏过活，因家境困难，乃延师学戏。技艺学成，在京津一带登台演出，颇受欢迎。1935年正是杨家姊妹大红时期，姊妹合演《乌龙院（坐楼杀惜）》《打渔杀家》《游龙戏凤》《四郎探母》《翠屏山》《法门寺》等戏，都很精彩，场场满座。杨菊秋也能唱青衣，所以有时也和杨菊芬合演《桑园会》《武家坡》《汾河湾》以及《二进宫》一类的戏。杨菊芬有时也演《定军山》《阳平关》《托兆碰碑》等硬靠老生戏，并且对《失空斩》一类的戏也很擅长，姊妹俩有时还串演《小放牛》《十八扯》一类的小戏，戏路很广，声名益著。

杨菊芬平素喜男装，无脂粉气。西服、礼帽、革履，宛然一翩翩公子。她擅长谭派和余派，会戏甚多，且文武不挡。她常以《碰碑》为大轴，由托兆起至碰碑止，一气呵成，颇受欢迎。《洪羊洞》一剧，吃力而不易讨好，坤伶多不愿演，杨菊芬演来，竟能博得好评。《定军山》一剧，为文武老生靠把重头戏，非有好嗓音、好腰腿、好

身手，否则绝难胜任。而杨菊芬当年在北京中和、长安等戏院露演此戏时，念白清楚，吐字真切，武功扎实。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杨菊秋作为梨园界一娉婷玉立之妙龄女子，能自爱其身，不为风气所移。她除搭长班频繁演出外，每得闲暇则勤习艺事。对于牌局、饭局等应酬事宜极少参与。这在旧日坤伶中，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她业余常习绘画，一次在义演中曾当场画扇数柄，并题云：

> 陕西饥民，待赈孔殷。欲尽绵薄，力又不逮。乃拨冗画笔数叶，所售之价，全数助赈。明知杯水车薪，不过聊尽微意耳。

“七七”事变以后，杨菊芬结识了天津“张园”主人张彪的儿子张学毅，这人当时是伪满皇帝溥仪的御前侍卫，东北口音，说话大舌头而又口吃，没什么本事，只以祖遗的一份产业为饵，赢得杨家母女的欢心，杨菊芬终与张学毅结为夫妻。

不久，杨菊秋也结婚了，她自号傲霜，她是以其音容笑貌倾倒了一位长于她十多岁的画家沈馥，得到画家的重金纳彩，结为秦晋之好，但终因年岁悬殊，性情不和，婚后几个月便离异了。

抗战胜利后，曾闻杨家姐妹仍偶有演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听到她俩在北京同台演出、张学毅充当了剧团的管事的消息。后来又有消息说杨家姐妹因年岁过大而辍演，留在戏校当教师了，其后就再无消息。如果杨家姊妹今尚健在，也已是七旬老人了！

白玉霜与小白玉霜

白玉霜是著名的评剧老艺人，是“白派”艺术创始人。

白玉霜原名李桂珍，1907年生于天津，父亲是唱莲花落子的。她十一岁时，拜一位刘姓唱大鼓的艺人为师，十四岁时，又拜孙家班班主孙凤鸣为师，改习评剧。孙凤鸣还给她起了个美丽动听的艺名“白玉霜”。十四岁的白玉霜在锣鼓声中首次登上了戏曲的舞台，也登上了人生的舞台。

白玉霜十七岁时，父亲故去，她挑起了生活重担。白玉霜曾先后在天津、吉林、营口演唱，但都未能立住脚，直到后来回到北平与孙家班头班学生安冠英合作，她以唱腔优美、表演泼辣而红遍了京津两地，被誉为“评剧皇后”。谁知好景不长，白玉霜因不愿为北平市长陪酒而被驱逐出境。那是1934年的事，二十七岁的弱女子白玉霜被武装警察押解着从小客机里出来，同她的继母及养女小白玉霜含屈忍辱离开北平。

回到天津后，白玉霜排练了《秦香莲》。恰好上海恩派亚大戏院的徐培根来到白家，双方当下签好合同。白玉霜与伙伴是夜启程，到上海演出了《夜审周子琴》《双蝴蝶》《苏小小》等戏，唱得都很红。后她又与京剧演员赵如泉合作演出了欧阳予倩编写的《潘金莲》，京评两腔合作取得了空前的盛誉，连演一个多月，场场座满。《潘金莲》使得白玉霜大大地出了名，并受到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重视。洪琛专为她写了反映艺人苦难生涯的剧本《海棠红》。

《海棠红》于1936年7月由明星电影公司摄制完成，白玉霜领衔主演，王献斋、严工上、舒绣文等担任配角。这是中国第一部评剧故事片，描述了一个名叫海棠红的评剧演员凄凉漂泊的一生。影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立时轰动了全城。

白玉霜红到了极点，不少公司和商店争着用“白玉霜”给自己的商品命名，但同时，她也招来更多的嫉妒、中伤、暗算和骚扰。为了能在上海滩站住脚，避免重演被驱逐出境的悲剧，白玉霜不得不低下头来认青红帮头子徐朗西为干爹，并被徐占有了。

在白玉霜三十岁那年，她厌倦了功名、虚荣，不顾一切地与人私奔了。而与白玉霜私奔的男子，既不是风流小生，也不是洋场阔少，却是戏班里打铙钹的李长生。

李长生是个乡下人，为人老实厚道，白玉霜喜欢这个淳朴的人。他们回到了长生的家——河北省霸县堂二里村。在那里，白玉霜过起了村妇的生活，恬静、自然、心满意足。日久天长，她的身世渐渐被外人知道，有的土豪劣绅扬言要绑她的票。为了长生一家的安全，白玉霜忍痛告别了他们。

“白玉霜重返舞台了！”天津的戏迷们欣喜若狂。此时她的艺术更加纯熟了，动作潇洒，做工洗练，唱腔优美。

然而回到天津后的白玉霜像变了一个人，不爱说笑。1943年她病倒了，被确诊为子宫癌。在弥留之际，白玉霜想到了结婚，在继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她和李长生结婚了。在呼唤新人拜堂的说笑声中，白玉霜在丈夫的怀里满足地合上了眼睛。时间是1943年8月10日。

“评剧皇后”白玉霜去了。她的一生仅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然而她在评剧事业上的贡献却不容忽视，她创造了独特的白派艺术，其低回婉转的独特唱法加强了评剧唱腔的抒情性。她还在伴奏乐器中加进南胡，在化妆、表演技巧上也有许多的创新。其养女小白玉霜继承了她的艺术风格并有所发展。

小白玉霜原名李再雯，山东人，五岁随父逃荒至北平，被白玉霜收为养女，受其熏陶，渐通戏理。

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玉霜在上海演出成功。在白玉霜与李长生私奔后，李再雯即以小白玉霜艺名开始舞台生涯，时年十四岁。

小白玉霜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白玉霜在世时，她演二旦，给养母配戏，已在群众中有了基础。白玉霜希望传艺有后，她用极严格的传统教徒方法将表演技巧传授给养女。小白玉霜以自己聪敏的天赋、刻苦习艺的精神，学得了白派艺术的神韵和精髓，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真正成了白派艺术的继承人。白玉霜死后，白玉霜戏班里的老人叫小白玉霜担起主角，街上的海报也换成了“小白玉霜”，当时新老观众都很轰动。班里的老人管白玉霜叫“大白”，管小白玉霜叫“小白”。

白玉霜在世时曾有个愿望：要让评剧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那时评剧这个剧种没有地位，不能登大雅之堂。小白玉霜实现了养母的愿望，1947年，她出面组织著名评剧演员王度芳、小月樵、新凤霞等，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了《母女恨》。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小白玉霜和席宝昆等重新组建了新中华评剧团，在评剧界第一个带头演出了现代剧《兄妹开荒》《千年冰河开了冻》等。

评剧白派艺术在一般观众的心目中，只适合于演悲剧，而小白玉霜却使其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她长于青衣戏，扮相大方，两眼传神。在舞台上她成功地塑造了《小女婿》中的杨香草、《九尾狐》中的地主婆等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小白玉霜果敢泼辣，经历过很多风雨，见过大世面，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中，竟落得个走投无路，吞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她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了两行字：“我没有文化，你们不要欺负我。”

评剧名伶喜彩莲

报载，不久前大陆举办了庆祝著名评剧演员喜彩莲女士舞台生活六十周年演出活动。由喜先生之高徒李忆兰等演了喜先生的代表剧目《凤还巢》《小借年》《孔雀东南飞》等，堪称艺坛盛举。

喜彩莲原名张菡香，1916年生于山东掖县一贫苦农家，后随父母去东北谋生。她自幼喜爱评剧，九岁师从“莲花落”老艺人吴寿朋，十岁登台。之后，她又参加了著名评剧演员李金顺主办的“元顺戏社”，在演唱方面，受李金顺影响颇深。到十八岁时，她已经成为戏社的主要演员，并蜚声剧坛。她曾与戏社演员一起南下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从而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艺术形式，开阔了视野。

喜彩莲嗓音高亮，擅演花旦戏。她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在老评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老评剧讲究“扬着唱”，即所谓“大口落子”。喜氏则将此种唱法改为“抑着唱”，即将“大口”变为“小口”。然行腔讲究情味交融，深沉，含蓄，曲调更加柔美。因此，她的演唱赢得了诸多观众的青睐。

喜氏的演唱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究咬字。她的唱腔吐字清晰，干净利落，无论什么字，行腔时总能保持原韵，从不因腔而害字。

以前，评剧的剧目大体为传统的“老八出”或“新八出”，如《杜十娘》《珍珠衫》等，一般演员唱的大都不出这些。而喜氏却上演了大量新剧目，如《凤还巢》《十三妹》《孔雀东南飞》等。同行称喜彩莲演出的是“一台新戏”。这些剧目虽系从京剧移植而来，却使评剧观众耳目一新。记得当年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在观看喜氏的演出后，极为赞赏，便将《人面桃花》剧本推荐给她，并亲自为她排了这出戏。

从20世纪50年代起，喜氏参与了诸多现代戏的演出，塑造出一些

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而且戏路更为宽广了。

魏喜奎名噪京华

友人自内地回港，谈及在北京中和戏院欣赏了著名曲艺演员魏喜奎的专场演出，称赞她虽年近花甲，仍嗓音圆润，唱腔韵味醇厚。她在演出中接连不断地演唱了奉调、京韵、梅花、乐亭等大鼓及曲剧选段，堪称多才多艺，老当益壮。

提起魏喜奎，笔者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寓居北京时，我就常到三庆戏院听她唱唐山大鼓。记得1939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为纪念曲艺界祖师周庄王的生日，各名角在庆乐戏院举行联合义演。魏喜奎唱了一段《黛玉归天》，与她同台演唱的除曹宝禄的单弦，高德明、绪德贵的相声外，还有号称“华北三艳”中的两艳——郭小霞的梅花大鼓和姚俊英的河南坠子。魏喜奎由于嗓音浑厚甜润、台风淳朴大方，初露头角就得了个满堂彩，从此名噪京华。

此后她常与曲艺名家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小彩舞、张寿臣等同台献艺。魏喜奎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善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当时她家住在虎坊桥，每天从永定门城根练功回来，料理完家务，就步行到西单哈尔飞戏园，向乐亭大鼓名艺人王佩臣学艺。王佩臣住在戏园里，起床很晚，魏喜奎就在门前等候。等老师起来，就立刻帮她收拾房间，准备洗漱，然后才向她请教。王佩臣深受感动，便十分热情地教授这个学生。

魏喜奎不仅会唱各种大鼓，还会演戏。那时，每逢年节，总要举办一两场反串京剧义演，为贫苦同业谋点福利。魏喜奎曾和金万景、张寿臣、郭荣启一同演过《法门寺》，她饰演宋巧姣；也曾和曹宝禄、高德明、绪德贵一起演过《打面缸》，她扮演周腊梅；还和小蘑菇（常宝坤）、陈亚南、荷花女一起演过文明戏《枪毙刘汉臣》《一碗饭》等。不管扮演什么角色，她都能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金万昌感慨地说：“没想到这孩子还这么会唱戏！我看她爸爸应当让她去唱

戏，更对路子！”

在曲剧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中，她饰演小白菜，不仅唱工精绝，就是做工也不同凡响。据说，曲剧是她在彩唱八角鼓和莲花落的基础上，糅合奉调大鼓唱腔而成的。她在20世纪50年代演出的第一个曲剧是老舍先生的剧本《柳树井》。

现在，她已不常参加曲剧演出，但在一些联欢会上，还能听到她演唱的段子，而且唱腔还是那么清脆、嘹亮。

豫剧名伶常香玉

近闻，六十六岁的豫剧名伶常香玉重建“常香玉剧团”，以常氏老中青三代演员为主，演出拿手好戏《西厢记·拷红》。与往昔不同的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红娘”常香玉，而今改饰老夫人一角，“红娘”则由她的孙女小香玉扮演。这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笔者早年看过常香玉的演出。她主演的《拷红》《断桥》《大祭椿》《花木兰》等剧，唱腔舒展奔放，变化自如；表演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确实令人叫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常香玉九岁便随父学戏，开始时小生、须生、武丑都学，后来才专攻旦角。由于她幼工扎实，十岁便登台演出，到1935年她十三岁时，就誉满开封了。当时，她在开封演出《桃花庵》《秦香莲》《五虎坠》，唱的是“豫西调”，观众感到很新鲜，开始时场场爆满，可是演得时间长了，观众逐渐减少。怎么办？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常香玉决心拿出新剧目和有特色的唱腔来争取观众。于是，她在父亲的帮助下请人排新戏，头一出便是连本的《西厢记》。

当时排《西厢记》是很困难的。常香玉扮演的红娘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活泼轻快，而她所唱的“豫西调”低回委婉，只适于演悲剧。其父当机立断，让她去学高亢活泼的“豫东调”。可是，当时各流派都故步自封，门户之见很深，改学流派被视为“大逆不道”。于是，机智的常香玉女扮男装，溜进“豫东调”戏班“偷”戏。此后，常香玉排演的《西厢记》，不仅将豫西、豫东两调糅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大鼓、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和京剧的一些韵味，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新唱腔。

常香玉的唱腔改革，开始时自然遭到了豫剧界一些人的反对，但

当“红娘”一炮打响，成为豫剧舞台上一个光彩熠熠的艺术形象时，便很快为人们所公认。从那时起，《西厢记》成了常香玉的代表作，久演不衰数十年。

豫剧泰斗陈素真

豫剧泰斗陈素真女士仙逝整整一周年了，每每思之，都不胜哀痛……大约六十年前，我开始知道陈素真的大名，她与豫剧作家樊粹庭合作了许多代表作品，如《涤耻血》、《女贞花》、《梵王宫》（一名《叶含嫣》）、《霄壤恨》，并整理改编了豫剧传统戏《三上轿》、《三拂袖》等。“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粹庭与素真联名创办了“狮吼”豫剧团，排练演出若干爱国主义题材的名剧，并在河南省赈济委员会主任李鸣钟的支持与资助下，在西安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吸收培养了许多豫东黄泛区无家可归的难童，既使他们免于流浪街头，又可使他们受教育，还可以利用戏剧公演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同时樊粹庭改编了《王佐断臂》。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在中国戏剧史上大书特书的。

素真并不姓陈，她原姓王，本名若瑜，乳名“狗妞”。她祖籍陕西富平，幼年孤苦伶仃，被陈姓人家收养学艺。素真学的是豫东调（俗称祥符调，因以开封地区为中心，故而得名）。“七七”事变前，狗妞的河南梆子腔祥符调，在黄河南北真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她在舞台上的表演不仅细腻传神，刻画人物合情入理，而且歌声悦耳动听，使观众听后，真如余音绕梁，日宕回响。因此，河南百姓赠送给她一个美名：“豫剧梅兰芳。”

遗憾的是，从1957年到1966年，乃至延续到1976年，素真被极左路线残酷地扣上“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她从中年以后的遭遇不言而喻。

告别舞台后，年过花甲的陈素真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给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戏曲教育事业上。数十年来，她为河南省戏剧艺术教育培养了许多出色的人才。由20世纪40年代末算起，她收了吴碧波、张雪波、李静波、马清波、郑秋波和“狮吼”培养出来的关二凤，还有河

南省豫剧三团的袁秀荣，河南省豫剧一团的周秀梅，天津的董玉兰，兰州的王喜云，以及她于1988年在杞县收的弟子牛淑贤等，可谓桃李满门。

素真临终时说：“小贤（牛淑贤）是门里出身，她的舅父刘荣鑫、母亲刘荣花都是豫剧界的‘好好’。她演戏有灵气，动作松弛、自然，不见棱角，在这方面有我的一点儿意思。小贤为人也正派，因此我很喜欢她。现在，她的几位师姐、师妹已经基本上离开舞台了，发扬陈派艺术，她要当主力军啦！”

愿素真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顷悉，北京文史研究馆李克非馆员与素真女士有乡谊之雅，其挽联云：

汴梁初见君，难忘三上三拂霄壤恨；
镐郑再重逢，始识人品如玉女贞花。

联中嵌有陈派四出剧目的名字，亦属巧作矣。

越剧开山者姚水娟

起源于浙江的越剧，如今已是风靡全国的第二大剧种。抚今追昔，人们没有忘记当年越剧发展的“开山者”——姚水娟。前不久，浙江、上海文艺界还隆重举行了姚水娟八十诞辰纪念活动。

1937年，姚水娟率领第一副女班来到上海。农历正月初一，女班在有二百五十多个座位的通商剧场演出，这天的打炮戏是《盘夫索夫》。首场就收到一位陌生同乡人送来的花篮。姚水娟以她“行不动裙”的天才演技，甜润流畅的唱腔，细腻而独具一格的表演，给观众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以后一传十、十传百，通商剧场天天爆满，愈来愈多的各界女观众都赶来看她的演出。

从此，越剧轰动沪上。但是也引来了地痞、流氓、大兵往台上抛烂橘子和烂杨梅，演员们备受欺凌。有一次演戏，一个穿便衣的“和平军”走到台前，将香烟头丢在姚水娟的戏衣上溅出火星。她很气愤地责问他为什么要丢烟头，这个为非作歹的家伙非常轻蔑地说：“侬这个戏子，丢只香烟屁股有啥要紧！”难道戏子生来就命比纸薄，可以被人任意欺侮践踏吗？姚水娟忍不住骂了一句：“侬这个流氓！”这还了得，对方横眉竖目摸出手枪进行威吓。戏院老板出来劝解，他还不罢休，气势汹汹地说：“要摆十桌酒水请我，否则老子就不客气！”姚水娟也不示弱，说：“请你吃粪！”这场风波后来虽平息了，但是，在豺狼当道、魑魅为虐的年代里，这样的遭遇是经常的。翌年秋，上海的《戏报》《戏世界》《戏剧世界》三家戏报联合举办越剧迷投票选举“谁是真正的越剧皇后”活动，姚水娟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京剧大师梅兰芳欣然题写“水娟艺家，越剧皇后”的条幅赠予姚水娟。在观众的一片捧场声中，天生聪颖而又性格刚强的姚水娟积极地向京剧、昆剧、话剧、电影等学习，吸取它们的表演特长，初创了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的分工建制。

当时上海《大公报》记者樊篱看了姚水娟演的《倪凤煽茶》《盘夫索夫》等，为她的演技所折服。恰巧姚水娟有一女友张星祯认识樊篱，她把樊介绍给了姚水娟，姚即聘樊当她的编导。樊为姚写的第一个剧是《花木兰从军》，由张子范任导演。该剧以昆曲、绍剧等剧种移植一些舞蹈、唱腔和打击乐等，对绍兴文戏进行改革，从而使它成了当年促人猛省的好戏。

姚水娟饰演的花木兰，甚至被誉为欧洲十字军时代的圣女贞德。樊篱亦由此成为越剧界第一位专职编剧。接着，樊又连续写了《孔雀东南飞》《啼笑因缘》《钗头凤》《泪洒相思地》等十多个剧本，其中时装戏占了一半。在闭幕换场时，估计到观众不习惯闲坐久等，他就安排演出幕外戏来补充，这就是幕里幕外戏的开始。同时又使用了道具、灯光和效果……从而使女子文戏冲破了只会演古装戏的局限，开拓了新的戏路。

梨园趣闻

liy uan qu wen

同光名伶十三绝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政权出现了暂时的安定。京剧在这个时期以四大徽班为基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比较完善的剧种。同治和光绪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各怀绝技的名伶。一位叫沈蓉圃的画家用写实方法将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画了出来，名为“同治名伶十三绝”。他们是谭鑫培、杨月楼、程长庚、卢胜奎、张胜金、徐小香、时小福、梅巧玲、金紫云、朱道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

光绪和慈禧都很喜欢京剧，凡有些名气的演员都被传唤听差，叫作“内廷供奉”，“十三绝”实际上成了清宫的御用戏班。这在客观上为京剧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里只谈谈其中卓有影响的谭鑫培和杨月楼。

谭鑫培是“十三绝”中的佼佼者，他旁搜博采，无所不精。著名演员萧长华说他是“逮着谁学谁”，后终成大器，影响深远，所谓“无腔不学谭”即由此而出。谭鑫培名气大，架子也大，为此也吃过亏。有一次，慈禧看到戏目上没有谭鑫培的戏，便问是怎么回事，太监说他有病请假。慈禧说：“他在我面前还摆架子，给我打他二十板子。”旨意一下，谁敢不遵？但掌印者一想：要真打二十板子，非打坏了不可，等慈禧再提出要看老谭的戏，说打坏了不能演，责问起来谁担得起？于是只好装模作样地把谭鑫培带到一间小房子里，只听板子响，其实没有真打，然后再带到慈禧面前谢罪并请点戏。慈禧想刁难他，就说：“这小子怎么使怎么有，就演《盗魂灵》吧。”这可难住了谭鑫培，他根本就不会这出戏。名丑王长林说：“你不要怕，我保你上。”于是赶紧在后台给他说戏。谭鑫培还真行，演猪八戒上场“闷帘倒板”，唱的是“龙凤阁内把衣换”。出台后“慢三眼”是“杨延昭下位迎接娘来”。此后每一句唱腔换一出戏词，还恰到好处。遇到妖精大开

打，他仗着一身好武功，也演得极为精彩。最后又做出猪八戒的几个呆相，慈禧看了甚为欢心，传旨给赏。谭鑫培挨打又受赏，哭笑不得。

杨月楼在十三绝中也很有影响，他和儿子杨小楼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武生，由于善演猴戏，素有杨猴子之称。父子俩不仅演技高，戏德也好，故深受欢迎。有时慈禧一见剧目没有他们的戏，必问杨猴子怎么没来。有一年二月二耍龙灯，杨小楼照例要来参加。但这天他实在累了，在台上耍珠子时，不小心把檀香木架子给撞倒了。众人大惊，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慈禧问："小猴子今儿怎么了？"杨小楼说："奴才今天已连演四场挑滑车，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不小心惊了驾。"慈禧听后说："也真难为你了，今后不许应这么多活，赏你二十两银子下去休息吧。"

接着上台的是李寿山。他见杨小楼惊驾倒得银二十两，也想来一下，故意把台角的架子撞倒了。龙灯一停，慈禧问道："李七是怎么回事？"李寿山一愣，不知怎么回答。慈禧说："你是看小楼得了赏，也想试试，存心捣乱啊？来人，给我打。"李寿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一直埋怨西太后对杨小楼偏心眼。

梅巧玲生死见交情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大作《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卷首第二章《梅家旧事》中，有一段“梅巧玲焚券”（梅巧玲为梅兰芳祖父）的叙述，令人读来感触良深。

“焚券”的故事是记述梅兰芳先生于1956年在扬州演出时，接到当地张叔彝先生的信，提到焚券的对象，据他了解是谢梦渔。当时，住在扬州市海岛巷五十一号的谢泽山，正是谢梦渔先生的侄孙子。

谢泽山君将从小在家里听到的事实对梅先生陈述。他说：“先伯祖梦渔公，名增，是扬州仪征籍，前清道光庚戌科的探花，官做到御史，一生廉洁，两袖清风。”谢梦渔旧学渊博，兼通音律，梅慧老（梅巧玲字慧仙）常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又兼是同乡关系，所以往来甚密，交谊很深。慧老知道先伯祖的境况很窘，凡遇到有了急需的时候，总是诚恳地送钱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谢梦渔每次拿到了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到梅家，这样的通财继续了好多年，谢梦渔总共积欠慧老三千两银子。

接着，他讲其伯祖谢梦渔享年七十余岁，病逝在北京，在扬州会馆设奠，梅巧玲亲来吊祭的情景。按当时的社会习惯，交情深的吊客要向孝子致唁，梅巧玲见了梦渔的长子，拿出一把借据给他看，谢子看完，不胜惶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梅巧玲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已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

梅巧玲讲完，就拿这一把借据放在灵前点燃的白蜡烛上焚化了。紧接着，转身又问孝子：“这次的丧葬费用够不够？”

当他得知谢家的情况实在拮据时，又顺手从自己的靴统里取出二百两的银票交给谢子，当作奠敬。他在谢梦渔的灵前徘徊了很长时间，然后黯然登车而去。

当时，在场目睹这种情况的亲友们有不少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此事马上传遍了北京城，李莼客所著的《越缦堂日记》中也曾记述了这件事。

梅巧玲作为一个京剧艺人，他这种慷慨好义、雪中送炭的事迹，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谭鑫培随机应变

谭鑫培为“同光十三绝”之一，由他所创之京剧谭派，流传至今而不衰，他在舞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也非一般伶人所能及。这里说几则故事，或可一管窥豹。

一次，谭鑫培演出《黄金台》，谭先生扮齐相田单，因上台匆忙，忘了戴帽子。观众正瞠目结舌，只听谭先生念起定场白：“国事乱如麻，忘了戴乌纱！”两句诗，既针砭了时弊，又修补了舛错。观众一听，便给以会心的笑声，无不暗暗佩服。

一次赴堂会演出，谭先生唱《文昭关》。该戏演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伍子胥全家被害，他只身逃到昭关，不能出去，愁得一夜之间须发皆白，所以，该戏又叫《一夜白发》。伍子胥乃堂堂武将，仪端威猛，出场时应腰佩长剑，其唱词有：“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空悬三尺剑，不能报仇也枉然。”谁知管行头的出了问题，马马虎虎地给谭先生挂上了腰刀，谁也没有发现。待谭先生上了场，手扶剑柄时，才知道宝剑换了腰刀。这时，锣鼓响处，过门已开，只听谭先生唱道：“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父母冤仇不能报，腰中空悬雁翎刀。”唱完，台下还没省过闷来，台旁台后先叫起好来，管行头的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识者无不称赞谭先生应变机敏。所以，后来才有东施效颦，照搬这一段唱词的，岂不知这是被逼出来的应急之举。也有说“宝刀辙”好唱的，自然是附会了。

谭先生不仅临急不乱，自圆其艺，就是其他演员逢了急乱，他也能凑趣应答，化险为夷。一次戏班唱《辕门斩子》，扮演焦赞的演员未戴髯口就上了场，台下观众哄声不绝，演员又不能下台改装，急得无法，直给扮演杨六郎的谭先生作揖。谭先生早知端的，开腔问话，剧场马上平静下来。谭先生道：“小小孩童，你是何人？”经谭先生启

发，这位演员才应声道：“启禀元帅，我是焦赞的儿子。”“你来做甚，叫你父来！”演员才得以下台，换上一个焦赞来。这件事流传很广，一时几乎家喻户晓。

梨园世家说叶氏

京戏叶氏家族是从叶春善开始的。

叶春善原是京剧演员，坐科于杨隆寿小荣椿科班。1904年参与组建“喜连成”社（后更名“富连成”社），他当了主持人，并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富连成”，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京剧舞台的名伶。

叶春善膝下有五男四女，五个儿子全都继承父业从事京剧。

长子龙章，生于1906年，六岁入私塾，七岁入小学，同时在“喜连成”二科学练基本功，十岁随大师兄雷喜福学老生戏。后一度去东北军供职。1934年叶春善患半身不遂，把龙章叫回接“富连成”社长职务，至1945年“富连成”解体。现龙章已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次子荫章，幼入“福清社”，后转入“富连成”，随唐宗成学“武场”（即打击乐），学成后留科任教，后因病去世。

三子盛章，字耀如，1912年生，幼入“福清社”，学花脸，因该社解散，又入“富连成”社，后根据总教习萧长华建议，改学武丑，受王长林赏识，亲授拿手剧目，如《九龙杯》《藏珍楼》《时迁偷鸡》《酒丐》等。不幸于“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时年五十五岁。

四子盛兰，字芝如，1914年生，幼入“富连成”社，先学青衣花旦，后根据萧长华建议改学小生，竟出类拔萃，世称“叶派”。盛兰文武兼擅，昆乱不当，举凡雉尾生、扇子生、穷生、靠把小生乃至昆曲中的官生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他所创造的周瑜、吕布、许仙、周仁等角色，皆栩栩如生，非同凡响，世有“活周瑜”之誉。不幸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指斥为“反动艺术权威”，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虽经拨乱反正，然已重病在身，终于1978年辞世，时年六十四岁。

五子盛长，幼入“富连成”社学戏。盛长原名“世长”，后因要与胞兄名字划一，遂易名盛长。盛长攻文武老生，深得雷喜福、马连良等名家传授，文武兼擅，能戏颇多。“文革”时期受挫，拨乱反正后重返舞台，然已劳累致疾，后专以传授后生为乐事。

此外，叶春善尚有四女，她们虽未从事京剧，但都与京剧结“缘”。

长女玉琪，嫁给名小生茹富兰。

次女玉琳，许配老生演员宋继亭。

三女过继给四姨母，易姓杨。

四女惠蓉，与萧长华之子萧盛萱结婚。

另有一义女叶萍，嫁给名丑马富禄之兄长。

以上是叶春善子女的简单情况。至于他的第三代也未改换门庭，常言说将门出虎子，叶家第三代从事京剧艺术的共有十人，计有八男二女，他们当中生、旦、净、丑皆有，其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如叶蓬、叶少兰、叶金援等都是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

总之，叶氏门中京剧事业代代相传，堪称名副其实的梨园世家。

京剧文人齐如山

当人们谈到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时候，必然要谈及他的编剧人齐如山，梅兰芳演出的很多剧目都是齐如山编写或修改的。

齐如山（1875～1962）名宗康，河北高阳县人，出身宦门。他的祖父齐竹溪和父亲齐禊亭都是清代进士。齐如山幼年受家庭熏陶，好读书，性聪慧。他五岁到十七岁这段时间，博习古代经典，正像封建社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成长。十九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及长曾三次去欧洲，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回国后，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他精于文史，酷爱戏剧，对京剧研究尤深。曾任京师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北平国剧学会会长。

20世纪初，其父齐禊亭在世时，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再给清政府做官，也不许给外国人当翻译。齐如山遵父命遂改业经商做买卖，后又专心研究中国的戏曲。

对中国的戏曲，历代学者都以此为小道不足观，没有人肯认真研究它，而戏曲演员又为文化视野所囿，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齐如山却尽其毕生精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殚精竭虑地从事国剧的专门研究。他曾访问过京剧界老角名宿达三四千人，记录下丰富生动的原始材料，并从古代经籍、辞赋、笔记、风土志以及西方有关的心理学或戏剧理论中寻找线索和印证，最后进行整理归纳。

自民国以来，他与梅兰芳合作编剧多年，由其执笔为梅兰芳编剧（包括印编）三十余种，如《牢狱鸳鸯》《千金一笑》《天女散花》《童女斩蛇》《一缕麻》《嫦娥奔月》《黛玉葬花》《麻姑献寿》《红线盗盒》《上元夫人》《洛神》《西施》《廉锦风》《太真外

传》《俊袭人》《宇宙锋》《凤还巢》《木兰从军》《春秋配》《霸王别姬》等，均出自齐如山之手。

齐如山所编剧本与社会联系紧密，大多数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例如《童女斩蛇》初次上演就引起轰动。全剧的唱工，虽只有几句慢板，一段流水，情节也比较简单，可是先后几场都满座。梅兰芳曾回忆他演《牢狱鸳鸯》时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吉祥剧院，当演到县官把卫如玉屈打成招的时候，县官口里正念着："你不肯招，也得叫你招了，这样才了喽这场官司！"这时台下有一位老者，大概兴奋过了火，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跳上了戏台，抓着县官说："卫如玉没有杀人，你为什么把他屈打成招，你这狗官，真是丧尽天良，我打死你这王八蛋！"说着举起拳头就打。之后，经后台管事的向其解释，才请老者走下舞台继续看戏。后来老者在回家的路上，还大嗓门不住嘴地大骂狗官混账，冤屈好人，可恶之极，我非揍他不可。可见这个剧本起到了"警世砭俗"的作用。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交往

查理·卓别林是名震全球的滑稽大师，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他主演的影片，早在1915年便开始在上海公映，20世纪20年代已风行全中国。卓别林与京剧名伶梅兰芳曾有交往，成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1930年初，梅兰芳率剧团到美国演出，5月的一天，到达电影名城洛杉矶。当晚，剧场经理举行欢迎酒会，宾主刚刚入座，一位神采奕奕的壮年人迎面走来。梅兰芳觉得似曾相识，正在思索之中，剧场经理站起来介绍道：“这位是卓别林先生。”卓别林紧紧握着梅兰芳的手，热情洋溢地说：“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今日可算幸会。啊！你原来这么年轻就享有大名声，真称得上世界第一个可羡慕的人哪！”当年梅兰芳三十六岁，卓别林四十一岁。

那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电影《城市之光》，他抽出时间专门参加了好莱坞为梅兰芳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在梅兰芳参观好莱坞时，他又竭诚相待，介绍好莱坞电影的情况，二人亲切地合影留念。

梅兰芳与卓别林再次相会是在1936年。是年3月，卓别林和宝莲高黛在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并到亚洲蜜月旅行，他们在上海停留两天，卓别林再次与梅兰芳会晤。卓别林兴致勃勃地提出想看看京剧，不巧那天晚上没有演出。于是，梅兰芳亲自陪同卓别林去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

自此以后，虽然卓别林与梅兰芳没有机会再见面，但二人一直相互关心和支持。1941年春天，卓别林的影片《大独裁者》将到香港上映。“皇后”“娱乐”“利舞台”三家影院都在争夺首映权。因为三年前梅兰芳曾到“利舞台”演出过，该剧院经理就去找当时留居中国香港的梅兰芳想办法。梅兰芳答应拍个电报给卓别林试试看，不久便收到卓别林“同意”的复电。那时，美国影片在香港通常是在外国人办的“皇

后”“娱乐”影院首映，而这次《大独裁者》却在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剧场首映，在香港引起轰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卓别林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梅兰芳对卓别林的境遇愤愤不平，时时打听他的消息，对他十分怀念。1954年，梅兰芳听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宴请卓别林，并邀请他观看了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感到非常高兴，认为卓别林可能会重访中国了，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梅兰芳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梅兰芳还深情地对一位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林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比当年如何。"令人遗憾的是，梅兰芳不幸于1961年溘然长逝，两位艺术家一直没有机会再叙友情。

名伶争演三国戏

京剧舞台上“三国戏”剧目很多，据说有五百多出，其他地方戏中的“三国戏”更是不胜枚举。

“三国戏”中的人物，出场最多的是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吕布、貂蝉、周瑜、鲁肃、司马懿等，剧情大都出自《三国演义》。与史书《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并非真史。

早年观“三国戏”，看得最多的是《桃园三结义》《捉放曹》《空城计》《借东风》《吕布戏貂蝉》《辕门射戟》《白门楼》《战宛城》《古城会》《长坂坡》《单刀会》等。各派名家争相演出，出现了不同风格以演不同剧目见长的局面。

马连良先生在《借东风》中扮诸葛亮，《甘露寺》中扮乔玄，一段“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和一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嗓音浑厚、唱腔潇洒，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谭富英先生的代表剧目是《失空斩》《定军山》《捉放曹》，他扮演的诸葛亮、黄忠、陈宫等角色相当绝妙。他的唱腔，如《空城计》中的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和二六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嗓音清亮，高亢纯正，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谭派”风格。他的后人谭元寿演《打渔杀家》和现代戏《沙家浜》时一样是此风格。

以言菊朋为代表的“言派”常演的“三国戏”有《让徐州》（言菊朋饰陶谦）、《卧龙吊孝》（言菊朋饰诸葛亮），他演唱的二黄原板“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天卸重任我就要你担承”和反二黄慢板“曹

孟德领人马八十三万，擅敢夺东吴郡吞并江南”，行腔委婉，花腔花调，听起来别有韵味。

奚派奚啸伯老先生的唱腔，苍凄悲怨，如泣如诉，他在《哭祖庙》中扮演刘谌唱的那段二黄导板、回龙“进祖庙不由人心中悲惨，将人头供神案祭奠祖先”以及他在《白帝城》中扮刘备唱的那段二黄慢板“实指望下江东把吴狗扫尽，恨不得杀孙权方称我心”，动人心弦，催人泪下。他的再传弟子张建国继承了“奚派”艺术，如今在京剧界很红。

还有，高派传人李宗义、李和曾的《逍遥津》也是声震四座。叶盛兰先生的《吕布与貂蝉》《辕门射戟》《白门楼》，更是小生行的绝活儿，现今除叶少兰先生外，很少可与之媲美。更有趣的是，有一些京剧名家为了展现自己的表演实力，在一出“三国戏”中往往连演三个角色，梨园界称之为“一赶三”。犹记李少春先生在《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前饰鲁肃，中饰孔明，后饰关羽，如没有相当深厚的功底是绝对演不来的。

四大须生说“谭派”

京剧中的“谭派”，有“老谭”“新谭”之说。老谭指的是形成于1900年前后的谭鑫培唱腔，“新谭”指的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谭鑫培之孙谭富英的唱腔。

京剧中的“四大须生”有前后之分。前“四大须生”是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达良，皆宗“老谭”而自创新腔；后“四大须生”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亦宗“老谭”而自成流派。

这里讲的“四大须生”，自然指的是后“四大须生”；这里讲的“谭派”自然也是“新谭派”，也就是谭富英。

谭氏乃梨园世家，传至今天已历七代。从谭志道、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到今天活跃于舞台的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这七代中，竟有谭鑫培、谭富英祖孙两位，分别创成独具演唱风格的“谭派”。因此，旧日有一则笑话，并由此形成一幅漫画，内容是：谭小培在中间，一边对谭富英说：“你父亲不如我父亲！”另一边又对谭鑫培说：“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洋洋自得状，溢于言表。

应该说，谭小培是把自己最大的心力用在了培养儿子上。当时京剧界传有“四大名妈”，即坤伶李砚秀、吴素秋、李玉茹和现居台湾地区的梁秀娟的母亲，这四位的母亲很能干，终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材。还有“四大名爹”，即谭富英、李万春、李少春、荀慧生的父亲，这四位的父亲亦很能干，很早就将自己的儿子培养得出类拔萃。

谭富英生就一副甜亮清脆的好嗓子。而且，练武功，肯吃苦；学文戏，一点就透。尽管这样，其祖父谭鑫培还是说：“孩子不能让他总在家里学，究属管教不严，必须让他进科班坐科！”父亲谭小培说：“眼下科班，以富连成最好，我向班主叶春善提过，可他说不收

名家子弟。”谭鑫培说：“明儿你把春善请家来，我见见他。”后来，叶春善毕竟碍于谭鑫培的面子，又加以谭小培的诚意，只好破例答应，但是却提出“约法三章”：

第一，与所有学生同样待遇，决不特殊照顾；第二，家里人不能常来看望，也不许随便回家；第三，够什么材料学什么行当，不能挑拣。

这且不算，随后又由谭小培立下“关书”。文字如下：

> 立关书人谭小培，今将长子裕升，现年十二岁，情愿投在叶师门下为徒，学习梨园，六年为满。言明四方生理，任凭师父代行。六年之内所进银钱，归叶师收用。无故不准告假回家，倘有天灾病孽，各有天命。如私自逃走，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日后若有反悔者，由中保人一面承担。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当时富连成正值“富”字辈一科，故“富英”由此而得。他先学武生，后改老生，深得萧长华、王喜秀、雷喜福等先生传授。坐科时已属“尖子”，有“科里红”之誉。谭富英十八岁出科，其时祖父谭鑫培已去世，父亲小培又令其拜在得“老谭”真传的余叔岩门下，终创出自己的风格，为区别“老谭”而称“新谭”派。有趣的是，后来，谭小培之女嫁给了叶春善之子叶盛长，二人又成了儿女亲家，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盖叫天拒唱堂会

盖叫天有“江南活武松”之称，他拒演“堂会”的事，在梨园界传为美谈。

清末，宫中常招名角入宫演戏，并给予优厚俸银。那时盖叫天在南方已有名声，杭州的织造局和上海的洋务局都向清廷推荐他，清廷也拟召他入宫“供奉”，但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居住在租界，所以清廷也奈何他不得。

后来，北方有三次盛大的堂会：一次是清逊帝宣统娶妃，一次是张作霖做寿，一次是曹锟贿选。这三次都邀请南北名角作庆贺演出，盖叫天都拒不参加。

上海抗日战争前，杜月笙新建的杜家祠堂落成，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堂会，由上海张啸林亲任演出的总提调，南北名伶云集。但在这次盛会中，南北各有一位名角没有参加，那就是北方的余叔岩和南方的盖叫天。

后来，张啸林做六十大寿，杜月笙为了回报，也给他担任大堂会的总提调。由杜出面提调，谁敢不来？但依然有一个人不来，那就是盖叫天。

盖叫天为什么对堂会如此反感呢？据他自己讲，他少年在科班时，有一次在官府中唱堂会，主角是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同台，而以他们的科班作班底。老师对盖叫天说：今天的戏要认真地看，这三位都是赫赫有名的角儿，三人合演，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盖叫天跑完龙套，在台边找个比较隐蔽的角落，全神贯注地看戏。他从未看过谭、汪、孙三位的戏，心想：今天可有好戏看了。谁知他们在台上唱，台下的老爷太太们却在猜拳行令，只顾饮酒应酬，

台上的戏很少有人注意。因此这三位名角也就草草终场。少年盖叫天失望极了，更使他反感的是这帮阔佬根本没把艺人的技艺放在眼里，演戏仅仅是为了给他们摆阔装点门面而已。所以长大后，他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唱堂会。

名净金少山说隐情

1937年，著名剧作家翁偶虹结识了京剧名净金少山，两人一见如故，翁偶虹为这位“十全大净”写了全部《钟馗传》。

一次，翁偶虹提及社会上有关金少山的一些传闻。金少山闻之，叙说隐情。他道：“我一个唱戏的，高攀了你这位老夫子，你又这样真诚待我，我真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说。我从小在戏班里滚，称得上‘菜里虫，菜里烂’。我恨透了经励科（经励科是约角组班的戏蠹），他们手里拿把剃头刀，嘴里没有准舌头，对我们唱戏的大耍花手心，喝我们唱戏的血！

“可咱们又离不开他们，我之所以常常误场，就是要故意耍耍他们，叫他们着急出汗，更叫他们知道我金少山的血不是那么容易喝的！”

金少山说：“有一次在上海大舞台演出，麻皮金荣（即黄金荣）当老板，我是他手下每月六百元的‘底包’。演就演吧！可是，每到星期天昼夜派我独挑二本‘连环套’，拿我卖肉，铁门早就关上了（上海各戏院当年演出预售票若客满，叫“关铁门”），我呀，我就到上海跑马厅看赛马去了。他们一次一次地派人去叫我，比宋王给岳飞下的十二道金牌还厉害！一下子催急了我，我干脆回复他们：‘今天我不唱了，退票！’我金少山说到做到，那天真的回了戏。这样一来，麻皮金荣气坏了，他把手枪摔在桌子上，大声骂道：‘他妈的！不要他，不要他！’这时有人出来打圆场，下星期仍是让我唱‘连环套’。我只好答应。

“既然答应了，我就认真唱。那天，我规规矩矩地按时到了后台，精精致致地画了脸，扮了戏。上台第一句‘点绛唇’的‘膂力魁元’我有意盖着唢呐唱，安慰安慰观众。这一下真引出了效果，台下观众疯

狂地叫好、吹口哨。当时，麻皮金荣也在花楼看戏，闹得他哭笑不得。他跺着脚说：‘娘的！还是他！’通过这次演出，麻皮金荣不仅没有辞我，还给我长了二百块包银。

“还有一次，汉口一位国民党大员叫我和梅大爷（梅兰芳）到汉口演义务戏《霸王别姬》。让我们坐飞机去，次日就必须走，下了飞机就得唱。我想，凭一个大官的势力，竟拿我们唱戏的当泥人玩，不行！于是我提出：‘坐飞机不行，我害怕坐飞机。’联系人听说我不坐飞机，马上威胁说：‘必须坐飞机去。如果不坐飞机，时间赶不上。要是误了演出日期，我无法交代！’

“第二天，我拉着我的‘傻黄’（蒙古狗）到了飞机场。去的其他人，一个个上了飞机，我就是不上飞机，故意拖时间。我对联系人说：‘我决不上飞机，怕摔死。’任何人劝我也不行。这时，联系人想要动手硬拉我上飞机，可是我的‘傻黄’站在我的面前，联系人刚走过来，那‘傻黄’就扑上去咬他，把他吓坏了，只好答应我坐船去。这样我们改坐了轮船，演出延误了两天。

“我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恨这些官僚大员，因为他们奴役我们。若是同行同业约我义演，我决不会这样做！”

汪笑侬、李洪春联袂演出

汪笑侬是清代末年一位出身满族的京剧演员。他生于1855年，卒于1918年。汪笑侬并非京剧科班出身，而是个“下海”者，当京剧演员前是举人出身，做过两任知县。他在官场上被人参倒后，不以失官为意，反以演戏为荣，正式“下海”。

汪笑侬“下海”后，不仅登台演戏，而且编演了许多时装新戏。其中有一出名为《采茶奇案》。这出戏说的是大哥怀疑兄弟与自己的妻子有奸，酒醉误入茶馆，杀死卖茶母女；回家后见兄弟正在读书，方知错杀了人，不久就被官府捉拿。在这出戏中，汪笑侬演弟弟，名伶李洪春演大哥。李洪春时有“活关公”之誉，唱做俱佳。这两位名角联袂演此剧，档次很高，然而却闹了许多笑话。

他们演出那天，正赶上下大雪，偌大的戏园子里，只卖出九十多个座。剧中有一场戏叫“哭监”，内容是弟弟到监牢中探望大哥，痛哭不止。扮演弟弟的汪笑侬有一段“二六”板唱腔，共一百多句唱词，要唱很长时间。汪笑侬这一唱，没完没了，可把坐牢的李洪春扮的大哥冻坏了。在场上，汪笑侬穿的是皮袄、马褂、棉鞋，他不紧不慢，暖暖和和地唱；李洪春穿的是单布罪衣、罪裤、草鞋，坐在那里哆里哆嗦地听着，冷得动弹不得。等汪笑侬把一百多句唱完，李洪春本应接唱两句：“好汉做事好汉来应下，劝兄弟不必泪如麻。”这段戏就算告一段落。可是，当时李洪春心想：汪笑侬你也真够损的，你穿得暖暖地大唱特唱，我受得了吗？再说我的手铐、脚镣都是真家伙，冷冰冰的。台下总共就那么几十个人，你不会少唱点儿吗？李洪春想到这里，越思忖越有气，便有了主意：你汪笑侬不是“大唱”吗？好！我也不“小唱”！于是，等汪笑侬刚一唱完，李洪春马上叫板：“兄弟啊！”打鼓的一听，李洪春要来“流水”板，马上开点子，李洪春现场编词，唱了起来——

兄弟二人困监衙，劝兄弟不必泪如麻。都只为我与你嫂子把架打，你不该劝架不公向着她。因此上我怒气不息离家下，去到那酒肆之中细盘查。只吃得醉醺醺又听谯楼更鼓打，左思右想火上发。也是我手拿着刀一把，只吃得醉么咕咚，糊里糊涂，马马虎虎错把茶馆母女杀。天不容被官拿，弟兄二人困监下。好汉做事好汉来应下，劝兄弟不必泪如麻。

在这段唱中，最后两句与原戏词完全一样，只是前边一大段为现编现演。虽然如此，因编得得体，还是博得台下这九十多名观众一片喝彩声。

戏演毕，二人到了后台，汪笑侬生气地问李洪春："你怎么编出这一段来？"李洪春见汪笑侬生气了，便笑着说："大爷，这出戏你卖派的地方是唱腔，我得捧捧你这出戏，才多唱了几句，失礼了。"汪笑侬闻之，无奈地骂了李洪春一句，也就算了。

四大名旦的竞争

20世纪20年代以后，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曾经开展过一场编演新戏的竞赛，使京剧舞台五彩缤纷，好戏连台。他们编演的四“红”、四口“剑”等剧目，在社会上广为传诵，使戏迷们大饱了眼耳之福。

这四位京剧艺术大师虽然同演旦角，但风格迥然不同：梅派端庄华贵，程派含蓄深沉，尚派婀娜刚健，荀派妩媚活泼；他们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各人独树一帜，互不相让。

这一时期的竞争是以四“红”拉开序幕的。所谓四“红”，是指以“红”字为首的四出剧目。梅兰芳率先推出《红线盗盒》，接着程砚秋创演了《红拂传》，尚小云创演了《红绡》，荀慧生创演了《红娘》。很快，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热。

不久，四大名旦又推出以“剑”字为尾的剧目。梅兰芳演出《一口剑》，程砚秋推出《青霜剑》。在梅、程密锣紧鼓之际，尚小云推出《峨眉剑》，荀慧生推出《鸳鸯剑》。这样，四“剑”寒光闪闪，京剧舞台又起高潮。

“剑”热一过，四大名旦又各自演了一出带有旦角“反串”小生行当的戏。梅兰芳首先上演《木兰从军》，接着程砚秋上演《聂隐娘》，尚小云上演《珍珠衫》，荀慧生上演《荀灌娘》。

当然，四“红”、四口“剑”和四“反串”的相继出现，既不是偶合，也不是凑趣，而是四位艺术家明显的艺术竞赛。这次竞赛促进了四大名旦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也促进了京剧事业的繁荣。

四大名旦虽然在舞台上互为竞争对手，在台下却是挚友。程砚秋曾师从梅兰芳，所以即使后来成名了，对梅兰芳仍是恭恭敬敬，礼貌

有加。而梅兰芳也不以师自居，他钦慕程砚秋在《金锁记》中的表演和唱腔，逢人便说他演这个戏不如程砚秋，并真的放弃了这个戏。尚小云原来的拿手杰作是《楚汉争》，但一俟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出来之后，他自叹弗如，在传授弟子技艺时总是直言劝诫：“这个戏要学梅先生！”

“四小名旦”与“四白蛇传”

半个世纪前，经常发表戏曲动态文章的北京《立言报》，曾接到读者来信建议：继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之后，应该有个“四小名旦”，经过评选，读者一致推举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张君秋四人。《立言报》负责人据此于1940年请李、毛、宋、张先后在京华的长安戏院和新新大戏院举行了两次《白蛇传》合作演出，每人一折，被称为“四白蛇传”。宋演《金山寺》、毛演《断桥》、李演《合钵》、张演《祭塔》。四人的表演珠联璧合，各展绝招，非常精彩。自此始，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便被观众公认为“四小名旦”。

这“四小名旦”履历不同，各有所长。李世芳是山东掖县人，十一岁入“富连成”科班学戏，先宗尚后转梅，兼取尚梅之长。他扮相艳丽、柔媚，做工传神，有“小梅兰芳”之称。1936年拜梅兰芳为师后，艺事猛进，1938年出科，组班演于京津。张君秋是江苏丹徒县人，先拜师李凌枫，后又向王瑶卿和“四大名旦”学戏。他扮相俏丽清新，演唱刚劲委婉，亦有“小梅兰芳”之称。毛世来是北京人，十一岁入“富连成”科班学戏，艺宗筱翠花，曾先后拜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为师，初演青衣，后改花旦，扮相娇小玲珑，戏路很宽。毛世来精通武功，有的武生都比不上他。宋德珠是天津人，先在私人科班学戏，后考入北京中华戏曲学校，曾向程砚秋、荀慧生等人学艺。他的武功坚实，扮相妩媚，以演武旦、刀马旦为主，兼演青衣、花旦，挑班演于京津沪等地。

1947年李世芳罹难青岛，宋德珠亦暂时告别舞台，是年北京《纪事报》倡议再行新的“四小名旦”选举，得到戏迷们的热烈响应。当年8月1日开始投票，历时四十五天，于9月15日揭晓，结果张君秋名列榜首，毛世来居第二，陈永玲、许翰英新入选排第三、第四名。选举

后，四人又在华乐戏院同台合作演出“四白蛇传”，许翰英演《游湖借伞》、陈永玲演《水漫金山》、毛世来演《断桥合钵》、张君秋演《状元祭塔》。连演三天，场场爆满，一时传为梨园美谈。张君秋也由此获得了“祭塔旦”的美称。

许翰英艺宗荀慧生，“文革”中逝世。陈永玲原名陈志坚，曾住青岛中山路三十号楼上，读书时就酷爱京剧，拜王芸芳学旦，后考入北京中华戏曲学校学戏，艺宗筱翠花派，亦得到“四大名旦”的亲传。他在花甲之年还能踩跷演重头戏《小上坟》《醉酒》《战宛城》等，被称为“集梅、程、尚、荀、筱绝技于一身”的“中国名旦”“花旦之魁”。中国台湾影后林青霞、名伶魏海敏暨港上名票邓宛霞等，均为他的学生。

琐忆京剧女武生

近年，梨园界出现几位女武生，深得人们的赞赏。知名的有宁夏京剧团的前鉴，河北梆子剧团的裴艳玲，上海京剧院三团的潘瑛和武汉汉剧院的邓敏等。

过去在女演员中能串演武生戏的也大有人在。我看过白玉薇串演的孙悟空，言慧珠串演的《连环套》中的黄天霸。云南京剧院的关肃霜则更是文武全才，武生戏能串演《八大锤》之陆文龙、《金钱豹》之豹精、《三岔口》之任堂惠等。

早期活跃于北京舞台上的女武生，最有名气的当推于紫云。她的短打戏有《恶虎村》《四杰村》《花蝴蝶》等三十余出，长靠戏有《冀州城》《挑滑车》等二十余出，文武老生戏有《潞安州》等。其扮相英武，武功扎实，起打勇猛，而且嗓音圆润明亮，唱、白均颇有韵味，为当时女伶中的佼佼者。稍后的女武生有赵紫云，曾搭刘喜奎班演唱，也常与刘配戏。她扮相英武，凛然有丈夫气。

再一杰出女武生为梁春楼。她起打猛烈火暴，动作如疾风骤雨，几令人不敢直视。拿手戏如《金钱豹》《夜战马超》《战冀州》《挑滑车》《白水滩》等，称绝一时。

20世纪20年代，还有一位活跃于济南舞台上的女武生筱月山。她体型较胖，演《铁公鸡》之张嘉祥，斜露半边膀子，气势威猛，翻打扑跌无所不能。“开打”时真刀真枪，火炽惊险。

30年代，在济南等地的女武生韩月樵，能演《长坂坡》《四杰村》《连环套》等戏，《挑滑车》更是她的代表作。

40年代活跃于山东青岛、潍坊、淄博、济南等地舞台上的女武生王虎宸（原名樊斌卿），能演《驱车战将》《卧虎沟》《四杰村》

《连环套》及《八大拿》等戏；她身手勇猛矫健，走“扫堂”“旋子”又冲又帅，演《淮都关》耍大刀背花，风掣电闪，动人心魄。

此外，沈阳文武生陈麒麟，扮相英武、身材高大、嗓音洪亮，曾与袁世海合演《连环套》。

名家救戏佳话

在戏剧舞台上，演员的对白、唱段和表演动作，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现，因此一旦出现误差，比如忘词、漏唱或发生意外现象时，就有可能“坍台”。但是不少名家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则能随机应变，加以弥补，使全剧善始善终，甚至取得更好的效果。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有一次演出《贵妃醉酒》，当他把高力士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凤冠上，唱到“冠上加冠”时，一不小心，帽子突然掉在台上。这时，如果弯腰去捡，就要遭到观众哄笑，甚至会喝倒彩。梅兰芳没有去捡，而是向扮演高力士的萧长华作了一个手势。萧长华心领神会，马上添了一句词儿：“娘娘，您的帽子掉到哪儿啦？”梅兰芳听到这句道白，便以醉步向帽子走去，高力士将帽子捡起来，给了娘娘。两个机智聪敏的艺术家，不仅巧妙地弥补了这一漏洞，而且更充分地表现了杨贵妃的醉态。

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有一次演出荀派名剧《红楼二尤》，演到王熙凤借秋桐之手害死了尤二姐初生的婴儿，尤二姐唱那段二黄原板时，唱到第五句：“诉不尽心内的苦，珠泪难忍！”一失神，把最后一句唱词忘了。他灵机一动，赶紧把已死的婴儿抱起来，现编了一句：“想必是我的儿，他……他又复生！”算是把忘的那句词补上了。事后很多熟人都说，他这句改得好，更充分地刻画出了尤二姐遭受迫害后精神错乱的形象。他自己也觉得这临时诌出来的词比原词还生动，从此就按这句唱下去了。

京剧之外，其他形式的舞台演出也有类似者。如弹唱名家马如飞，一次在弹唱《珍珠塔》时，不慎把“丫鬟移步出了房”唱成“丫鬟移步出了窗”，观众听后哄堂大笑。

马如飞知道唱错，但他毫不惊慌，镇静自如地补上一句：“到阳

台去晒衣裳。”听众一听这巧妙的补白，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谁知一疏忽，又把“六扇长窗开四扇”唱成“六扇长窗开八扇”。这时观众不再喧哗，静静地听他如何补漏。马如飞不慌不忙，依然如故，以他丰富的舞台经验，继续唱道：“还有两扇未曾装。”台下顿时掌声满堂。

裘盛戎误场赏肉记

京剧界常说“无净不裘”。裘，即裘派创始人裘盛戎。他后来自然是卓然成家，但早年在富连成科班学艺时却是极艰苦的。

1932年秋，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富商丁老太太大办六十寿宴，邀请富连成科班在鲜鱼口庆丰堂唱堂会。那天堂会的戏比较多，从中午一直演到深夜。大轴戏是《鱼肠剑》《刺王僚》，胡盛岩演伍子胥，刘盛通演姬光，裘盛戎演姬僚，叶盛茂演专诸。

当时戏班讲究“饱吹饿唱”，因此不管演出的戏码多少，只吃一顿午饭，等演完戏再回来吃夜宵。当堂会戏演到“掌灯”时，裘盛戎感觉肚子饿得慌，他乘人不备就溜出了庆丰堂大院，先到打磨厂后河沿吃了一盘灌肠，接着，又跑到大栅栏门框胡同吃了一碗卤煮火烧，还溜溜达达逛了几家铺子。这会儿他琢磨出来的时间不短，也该回去勾脸了，可他刚一迈进庆丰堂的门口，就被科班教师郝尧伦先生抓住，拽进了后台。裘盛戎一眼就瞧见原先扮专诸的叶盛茂在那里勾姬僚的脸谱，他明白自己误场了，要大祸临头。这时怒容满面的郝尧伦手里还拿着一根三尺多长的戒尺，拉过来一条长板凳，叫裘盛戎躺在上面。就在郝尧伦的戒尺要打下来的一刹那，一位老先生拉住了郝：“尧伦，等等，您先压压火，消消气，您能不能让他先去勾脸、扮戏，有什么事等完了戏回去再说。今儿晚上的演员名单，是本家看过点头的，咱们要是临时换人，恐怕‘寿星老’不高兴。我看不如先上《刺王僚》，再演《斩马谡》。”裘盛戎偷眼一瞧，原来是萧长华先生为自己求情。

萧先生的面子不能驳，郝尧伦总算暂时放过了裘盛戎。裘盛戎心想：今儿晚上说什么也得“卯”上，假如“奔”不下来“好”，回去这份罪是够我受的。

《刺王僚》开演后，裘盛戎扮演的姬僚上场，头一句念“大引子”：“大地山河，图霸业，一统吴国”，就先声夺人，得了一个满堂彩。当时台底下有一位年长的顾曲者，竟兴奋地冲到台上说了一句：“这小子还真有点儿他爸爸（裘桂仙）的意思！”一句话引起了听众一阵笑声。接着，裘盛戎在“西皮导板”“原板”“二六板”“快板”的唱段里，以他那优美的唱腔，又连夺四个炸窝好。本家丁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连说：“这孩子唱得真不赖，有味儿，好听！”《刺王僚》刚下来，老太太就让账房先生写了一张红条子送进后台。上边写着：

“赏给小姬僚肉丁包子一千五百个！”

由于裘盛戎的精湛技艺，那祸到临头的二十板，反而化罚为奖了。

京剧男旦艺术的兴衰

男旦在中国京剧舞台上曾经盛极一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的出现，使得京剧男旦艺术达到高峰。但自“四小名旦”之后，京剧男旦急剧衰落，如今只剩下梅葆玖、宋长荣、王吟秋、吴吟秋、温如华等五位，而真正活跃在舞台上的仅宋长荣一人。京剧男旦几近绝迹。

据记载，男旦在唐宋就已经出现，明清之际有了长足发展。乾隆年间涌现出以蜀伶魏长生为代表的男旦群。四大徽班进京之后，在中国当时所处的封建时期，女性不允许登台表演，女性角色只能由男性出演，于是涌现出以陈德霖、梅巧玲为代表的一批京剧男旦。但当时的京剧从剧目到角色都是以老生为主，男旦表演刚劲有余而柔美不足，之后，王瑶卿潜心钻研，使男旦表演更趋完美，经他培养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在表演上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四大名旦”的出现，使得京剧男旦表演艺术炉火纯青、精妙绝伦，从而彻底扭转了京剧以老生为主体的格局，使男旦上升到极为突出的地位。男旦表演艺术进入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以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四小名旦”为代表的一批男旦演员。随后，梆子戏中开始出现女演员，不久，新艳秋、言慧珠、顾正秋等一些女旦演员开始出现在京剧舞台上。

新中国成立后，赵燕侠、杜近芳、孙毓敏、刘长瑜、李维康等一批接一批的女演员在旦角表演艺术上日趋成熟，活跃在京剧舞台上，观众也接受了旦角女演员的表演水平，男旦逐渐淡出舞台，各戏校也不再培养京剧男旦。

其实，男旦在中国的出现和走向消失，也是现实社会观念的真实写照。在以往的封建社会，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登台演出乃至抛

头露面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有伤风化。京剧艺术的发展促使了男旦这个行当的出现，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男旦的出现又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包括涌现出梅兰芳这样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演员逐渐走上舞台，并在舞台上立住了脚，于是“男旦”这一名词逐渐成为历史。

尽管男旦的出现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畸形审美，但梅兰芳这批艺术大师通过自己对艺术的再加工，为世人留下了许多精湛和值得回味的传世佳作。有趣的是，在京剧票友中，男旦爱好者经久不绝，至今仍有许多男旦票友乐此不疲，倒也有意无意地将男旦艺术继承了下来。

京剧名伶“四大怪”

民国初年，京剧名伶有“四大怪”，这四个人都是残疾人，或盲，或哑，或跛，但艺术超群，世人谓之“梨园怪杰”。他们是老生双阔庭、武丑韩中和、武生王益芳和文丑赵仙舫。

双阔庭是满族正黄旗人，艺宗孙菊仙，嗓音酷似孙，几可乱真，当年有些孙菊仙的唱片，实为双阔庭所灌制。他中年时患眼疾而致双目失明，成了“睁眼瞎子”。他为了适应舞台表演，开戏前先在舞台的台毯方位环行几周，摸清上场门、下场门、表演区。演出时，观众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盲人，该喝彩之处照样满堂彩。他演《捉放曹》行路一场，上下马的马鞭放在台毯的边沿上，然后取鞭上马、跨腿打马鞭，其眼神、角度、身段有条不紊。就这样，在天津演出十余年，又到南方献艺。

另一位双目失明的武丑演员叫韩中和，他是有“河南杨小楼”称号的武生葛文玉的岳父。韩中和科班出身，自幼练就一身好武功，翻打皆精。不幸，韩中和在“知天命”之年患了青光眼，久治无效，竟致双目失明。他离开舞台后，仍天天坚持练功，踢腿、涮腰、走矮子、翻跟斗，寒暑不辍。有一年，山东曲阜衍圣公举行祭孔活动，韩中和自告奋勇参加演出。三场戏中他演了两场，一场《偷鸡》，一场《盗甲》。演出中，矮子照走，跟斗照翻，登高上椅子应有尽有，一时传为奇谈。

王益芳别号“王哑巴”，工武生，兼武花脸，他是清末天津名净王庆云之子，长靠短打无所不精，《白水滩》《金雁桥》《花蝴蝶》《十字坡》《艳阳楼》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由于演出失手而致哑巴的。在茶园时代，武戏演员讲究出场后在铁梁上露两手“绝活儿”。一天，王益芳在绘芳茶园演《四杰村》（扮余千），当上场走边时，照例蹿上铁横梁表演绝技，就在他在铁梁上施展“珍珠倒卷帘”的一刹

那，稍一失神摔了下来，伤及颈部和声带，造成了半哑而不聋，锣鼓点照样听得清清楚楚，武打亮相毫无破绽可寻。因武生戏一般没有大段念白，即或有时加以省略，观众也能理解。他后来改为“硬里子”（即主要配角），扮演《艳阳楼》之花逢春、《白水滩》之青面虎、《金钱豹》之孙悟空、《金雁桥》之张任等角色，均十分精彩。除演戏外，王益芳还辅导其外孙唐韵笙习艺，后来唐韵笙成为与周信芳、马连良齐名的名伶，世称“南麒北马关东唐”。

跛腿名伶赵仙舫（也称大鼻子）是医生出身，因酷爱京剧遂弃医从艺，他原工花旦，后改为文丑及彩旦。赵仙舫中年因患腿疾致残，步行颠跛，行动离不开手杖，但上场时一举一动毫无颠跛之状。赵仙舫上场前将拐杖置于台帘内，演毕下场即须取手杖代步，而演起戏来毫无拖泥带水之感。他的拿手戏是《连升店》《刺汤勤》，尤其是他的“丑角小八出”——《打花鼓》《打樱桃》《打灶王》《打刀》《打城隍》《打杠子》《小放牛》《小上坟》更是有名。赵仙舫艺德高尚，在梨园内外交游甚广，深为人们拥戴。

有趣的“对台戏”

旧时，无论大城市里的职业性剧团，还是乡间戏班子，常唱“对台戏”，这种形式想来有趣，对今日剧团也有启迪。

“对台戏”又称“打对台”，指的是一个班社（剧团）与另一个班社（剧团）在同一时间，并在距离相近的剧场上演相同或相似的剧目，以招徕观众，一争雌雄。当然，这两个剧团的阵容和演出水平要相差不多，否则“对”不起来。

这种“对台戏”现象的出现，有的是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报复、嫉妒、较量；有的是背后有人操纵，为了挑起事端；但更多的情况，属于艺术上的一种竞争。旧时的戏班都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为了自身的生存，各戏班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最佳阵容，演出最富吸引力的戏码（剧目），争取提高上座率，增加演出收入。

早年李万春和李少春的“对台戏”就很有意思。李万春与李少春乃姻亲（李万春是李少春的姐夫），两人均演武生戏，戏路也很接近。他们若在同一个城市相遇，必唱“对台戏”以招徕观众，观众好奇他们究竟谁演得好，争相购票。李万春和李少春也不计较谁的观众多，谁的观众少，反正收入都属于一家人的。

张翼鹏（武生泰斗盖叫天之子）也是著名武生，最难忘的是他与李万春的对台戏。一次他见李万春贴出海报，演出《十八罗汉收大鹏》，因剧名中有“鹏”字，张翼鹏认为李万春这是冲着自己来的，非常愤怒。一气之下，他也贴出海报，要主演《孙悟空棒打万年春》，要以此“回敬”李万春。弟兄们铆足劲儿一争高低，观众不明个中缘由纷纷购票，争相观看，双方都有很高的收入。

张翼鹏演技好，“打对台”也很有一套。有一次，他不但没有征得

父亲盖叫天的同意，也没有和弟弟二鹏商量，便和二鹏唱起“对台戏”来。张二鹏也是武生演员，他的演技远不如张翼鹏，结果被拉垮。演出时，张翼鹏那边人头攒动，而二鹏这边却是门可罗雀，自家人给自家人来了个难堪。盖叫天闻知此事后，非常恼怒，认为翼鹏毫无手足之情，声言要与张翼鹏断绝父子关系。

旧时乡间红白事（结婚或出殡）也常请戏班唱戏。大户人家最少请两班，有意让他们唱“对台戏”，以讨个红火热闹。两个戏班唱起“对台戏”，往往是你唱武戏，我也唱武戏，你演文戏，我也演文戏，都拿出本戏班的真功夫。有趣的是吹唢呐，甲戏班吹一个，乙戏班就一人同时吹两个，甲戏班见状，干脆用鼻子吹唢呐，乙戏班更不示弱，干脆拿起瓷茶壶吹起来……观众叫“好”声不断，把演出推向高潮。当然唱也好、吹也好，必须有真功夫，谁好谁差，观众看得很清楚。乡村戏班中艺术造诣高的人，1949年后都被吸收进了国家专业性剧团。

“对台戏”是一种艺术上的竞争，这必然会促进艺术的创新发展。而今，内地剧团都由国家接管，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对台戏”不见了。

用京剧唱外国戏

早在九十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用京剧形式来表现国外题材的戏了。1904年积极倡导改良戏曲的京剧名伶、剧作家汪笑侬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屈辱媚外，他激于义愤编写了一出外国题材的京剧，名叫《瓜种兰因》（又名《波兰亡国惨》），这应该说是最早演外国题材的京剧。该剧取材于波兰亡国，惨遭外国瓜分的历史，明确表现了民主思想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倾向。同年8月5日在上海“春仙茶园”首演，蔡元培先生在他主办的《警钟日报》上发表评论，称这个戏是“演剧改良之开山”“梨园未有之杰构”。汪笑侬自己也写了一首名为《题瓜种兰因新戏》的诗：

国香散尽野兰芳，七月食瓜热血凉，请就前因证后果，感情安得不心伤。

1907年6月，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组织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了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大型话剧《黑奴吁天录》。同年秋天，王钟生在上海创办的春阳社也演了这出戏，当时没剧本，就请许啸天将之改编成京剧剧本，按京剧的形式演出。演员全部穿西装，虽然念白较多，但还是使用锣鼓，唱的是皮簧京腔，登场也有引子、定场诗，演员有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等。

第二年，夏月润、夏月珊、潘月樵等受日本留学生的影响，在上海南市十六铺建起了“新舞台”，邀请了赵君玉、赵如泉等演员，演出了根据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京剧《新茶花》，又一次轰动一时。

辛亥革命之后，有“小谭鑫培”之称的京剧演员贾洪林和旦角周蕙芳（艺名小桃红）在北京演出了《法国血手印》。贾洪林在剧中饰法国律师，西服革履，戴眼镜，留八字胡，模仿洋人口吻。这是北京舞

台上第一次出现京剧外国戏。不久，上海新舞台由夏氏兄弟和毛韵珂等演出了京剧《英国血手印》。

20世纪30年代初，尚小云排演了根据一个古代印度传说改编的剧目《摩登迦女》，为了真实地反映异国生活，尚小云对剧中人物的扮相、服饰、台步、唱腔等方面作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尝试，不仅跳西洋舞，伴奏也取西洋乐器。著名琴师杨宝忠被邀拉小提琴为之伴奏，别开生面，新意迭出。在30年代北平中华戏校还排演过焦菊隐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京剧《铸情》。

到20世纪40年代，天津稽古社科班张春华等演出了《侠盗罗宾汉》，这是第一个以外国题材演出的京剧武打戏，戏中使用了真剑，不少格斗拼杀场面极其激烈，惊心动魄。

新中国成立后，言慧珠于1954年根据朝鲜剧本改编演出了《春香传》，剧情揭露了官僚的腐败与残暴，具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言慧珠的梅派唱腔委婉动听，感人至深。

1958年，著名作家范钧宏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名歌剧改编了京剧《三座山》，由中国京剧院演员张云溪等出演，该剧文唱武打俱全，还有不少蒙古舞蹈动作以及马术和京剧传统程式，风格热情奔放。

京城何处“戏子坟”

旧时称职业戏曲演员为“戏子”，据说含轻蔑意，余不以为然；倘读过明代成化进士、浙江右参政陆容所撰的《菽园杂记》，便知后来所言“戏子”，实则“戏文子弟”（即戏曲演员）之简称也，岂含轻蔑之意？

清朝同光年间，京剧兴起，风靡百余年，艺人生老病死，层见迭出，而北京人惯称的“戏子坟”亦逐年迭起，其著名丛冢共有四处。

北京最早的戏子坟是位于崇文门外四眼井的“安庆义园”，它是乾隆时由安徽进京的“三庆班”购置的，演员病故后皆埋于此。生前相依依，死后长相随，足见乡情之重。

安庆义园渐不敷用，“大老板”程长庚（安徽潜山人）和“春台班”（四大徽班之一）台柱余三胜遂筹资购右安门内盆儿胡同土地另辟“潜山义园”，以葬诸多同乡。

位于崇文门外南极庙街南极庙东侧的“春台班义地”，是全体演员集资于咸丰初年修建的公墓。满族著名“花脸”钱金福，虽不属于春台班，但却将其做“内廷供奉”时所得俸禄资助于义地，故同行皆谓其“大积阴德”。

上述三处梨园义地，因多年无人照管而化为荒冢，于20世纪40年代被夷为平地，并陆续变作房基，屡经变迁而难觅其遗址。

位于宣武门外陶然亭的戏子坟，系安徽、江苏、湖北三省演员集资修建，故曰“安苏湖梨园义地”。义地附近的“松柏庵”，是梨园界的“乐园”。

今日之陶然亭公园，旧称“窑台儿”，盖因窑土堆积如山而故名

也。土台上有茶馆儿，名曰“窑台茶馆”，其周围窑坑累累，芦苇丛生，凫趋雀跃，野景令人迷醉。梨园老少清晨皆来此喊嗓练功，而后到窑台茶馆歇脚喝茶，相沿成习，乐在其中。

自窑台茶馆西行百余步，即为松柏庵。其庵坐北朝南，乃两进院落。前院正殿五间，系吕祖殿，供纯阳祖师吕洞宾像，左右塑龟蛇二将。东配殿五间，曰“昆仑善社”，程砚秋书其匾，内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西配殿五间，供梨园界人士闲住，既非公寓又非别墅，来去自由且分文不取。

这座庙宇，尚有东西两个大跨院：东跨院设“九皇殿”，供伏羲、神农、黄帝等远古之帝王，梨园公会每年在此举行“九皇会”，沐浴斋戒，焚香膜拜，忏悔素日浓施粉黛、靡费膏粱之罪愆；西跨院所设为“喜神殿”，每岁正月初一祀其神。

此庙之产权属于梨园公会，梨园界生、旦、净、丑各行当演员生前以此庙为聚会之地，死后则葬于庙前及其东侧的义地。被誉为“国剧宗师”的杨小楼，著名花脸“金派”创始人金少山，著名小花脸高四保及其子“高派”创始人高庆奎等名伶，皆葬此义地。

1952年2月，北京梨园公会郝寿臣、王瑶卿、梅兰芳、姜妙香等以松柏庵为校址，创建北京市戏曲学校，遂成立迁坟委员会，把安葬于安苏湖梨园义地的骸骨迁往南苑“集贤村”公墓。

梨园名流助学义举

老北京人最爱听京戏，但最腻和唱戏的打交道，对其评价是“台上台下逢场作戏，虚虚假假无情无义”。即便是梨园中人，有时亦不免自称是“无义行”。是否属于社会偏见，姑置勿论；而诸多名伶为支援办学踊跃义演的事迹，京城有识者无不钦佩，且传为美谈。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一带，清末民初时所居贫苦回民甚多，而目不识丁者十有八九。宣统三年秋，须生泰斗马连良之父马西园、中医大夫常相臣等五位回族头面人物会商，遂于花市清真寺附近草创“文化小学”。

民国十八年（1929），文化小学更名为清真小学，共有六班学生，其校董会由创始人马西园任董事长，其子马连良、架子花脸名优侯喜瑞、清真寺阿訇哈孝先等二十五人为董事。校董们不仅慷慨解囊资助办学，而且经常莅临学校指导工作，勉励教师敬业爱校，教育学生勤奋学习、尊敬师长。该校之校训为“勤慎诚敬”，而抱柱警句牌上则有楷书“我要帮助弱小的同学”“我不和无心伤害我的人计较”，读之感人肺腑。

20世纪30年代末期，清真小学班次遽增，原有校舍不敷使用。经校董会研究，决定以一千五百块大洋买下花市东段北侧已变为私产的灶君庙，以备扩建教学楼新址。

为筹措这笔资金，以马连良为首的回汉两族诸多京剧名角皆欣然义演。马连良因系校董，支持扩建新校舍责无旁贷，故常在公演时加演一至两出义务戏。所演义务戏，皆其拿手剧目，即以做、念为主兼重唱工的折子戏加首尾而成的本戏，如《四进士》《清风亭》《清官册》《范仲禹》《一捧雪》《串龙珠》《十老安刘》等。在其影响和带动下，梨园耆宿萧长华，四大名旦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侯喜瑞、

雪艳琴、叶盛兰等十余位名角皆义不容辞联袂登台。

1937年春，马连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义演《法门寺》，由侯喜瑞饰刘瑾，萧长华饰贾桂，雪艳琴饰宋巧姣，如此珠联璧合、阵容强大之义务戏，海报贴出即告爆满，可叹早成绝响矣！彼时萧长华已年逾六旬，校董会拟于演出前派车接其前往戏院，萧先生固辞之并欣然允诺："不必来车接我，我走着上园子，绝对误不了场。你们用不着客气，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事，只要是公益事，我都愿意帮忙！"其言也掷地作金石声，其行也深得梨园内外人士嘉尚，曾传为佳话令世人敬仰！

清真小学靠梨园名流赞助及商界筹募，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落成新校舍（两层教学楼，教室凡十二间，并有诸多办公室及操场），并更名为"穆德小学"，盖取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译音头尾之二字也。

一柄锣槌传三代

日前，笔者赴沪，友人宴请，座中有久负盛名的伶人吴富琴先生。吴先生于席间拿出一柄锣槌把玩，说到兴奋处，还轻轻敲击着膝关节，好像打着鼓点。经询问，方知此锣槌已传三代。

早在清光绪帝在位时，吴富琴之祖父吴永明在梨园界曾享有盛名，其锣打得出色，故有“大锣吴”之称。光绪帝雅好京剧，经常找著名演员谭鑫培、王瑶卿等人到宫里去演戏。圣旨一下，谁敢不遵？但却常常是一场辛苦，空手而归。吴永明是给谭、王二位打锣的，自然也经常入宫，为皇帝演出。

谁料，光绪皇帝爱看戏，更爱打锣。每次演出，他总要到后台去看看，特别注意是谁打锣。有一次，他高兴起来，拿过锣槌打了几下。皇帝站着打锣，庶民谁还敢坐着？这却苦了必须坐着打鼓的，也只好站起来打。从此宫中演戏便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打鼓的都得站着打。一场戏几个小时，打鼓的就要站几个小时。

一来二去，光绪皇帝对打锣的吴永明格外感兴趣，便提出叫吴进宫教他打锣。可是吴家境贫寒，靠打锣挣钱糊口，哪有工夫去陪伴皇帝玩耍啊，心里有苦，嘴上也不敢说。

光绪皇帝学了一阵子，问吴永明：“我怎么就打不出你的那个韵味儿来？”吴永明说：“这是个功夫劲儿。”光绪说：“那好，你就常来教我吧！”

吴永明三天两头到宫里教皇帝打锣，耽误了演出，不能挣钱养家，渐渐家里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有当铺，穷人可以拿旧衣服或者别的东西到当铺当几个钱，到时候还钱付利息，再把那抵押的东西赎回来。吴永明只好向皇帝请假去典几个钱，好买粮糊口。光绪说：“好

吧，你先把锣留在这里，我练练工。”皇帝的话必须唯命是听，吴永明只好心疼地留下大锣，拿着一柄锣槌走出了皇宫。从此，光绪皇帝再也没有叫吴永明进宫教他打锣。

以后，吴永明将这锣槌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这就是吴富琴先生手里的那柄锣槌。吴富琴今年已八十四岁了，谈起往事，不禁戚戚然。最后，他转述其父临终时嘱咐的一席话：“把这柄锣槌传下去，永远记住咱艺人的苦处。”

戏曲演出中的“忌讳”

戏曲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戏中事，戏中人，往往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这样，有些戏说到了某人某事，且又是“丑化”或不恭的内容，演起来就得有所“忌讳”。尤其是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一旦认定某戏是在影射自己或与自己“冲克”时，那么这出戏就要横遭厄运了。

比如说明代故事戏《玉堂春》，“起解”一折中苏三有一句唱：“洪洞县里没好人”，这本是苏三针对自己遭遇的一句气话，并非说山西洪洞县都是坏人。就因这么一句唱，多少年来，山西洪洞县不许演出《玉堂春》。

还有，有人考证说《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潘金莲是河北省清河县人，生活中的武大郎为魁伟男子，还做过县令，潘金莲更是贤妻良母。而戏中却将武大郎丑化一番，把潘金莲写成淫荡之妇。所以，在河北清河县就不准上演有关武大郎、潘金莲的戏。

慈禧太后是个戏迷，常要戏班到宫里演出。但是，凡是剧中带有“羊”字的戏，如《牧羊圈》《洪羊洞》《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一律禁演，甚至连《玉堂春》中苏三唱的“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也得改成“我好比鱼儿入网有去无还”。为什么？因为慈禧生肖属羊。

还有凭自己手中大权禁止某场戏演出的，也不乏其人，留下了历史的笑话。

北洋军阀曹锟是个戏迷，他原来也爱看京剧《捉放曹》。这出戏说的是曹操谋刺董卓未成而逃，董卓下令捉曹。曹操逃至中牟县，被官吏所擒。中牟县令陈宫深恶董卓专权，不忍捉曹，乃弃官与曹操一同逃走。曹锟发迹前曾多次看此剧，可是1923年他用贿选手段当上大

总统后，便对剧名中的“曹”字特别忌讳。因为他怕老百姓将戏中之“曹”理解为曹锟之“曹”，使自己也像曹操那样被捉被放，因此下令禁演《捉放曹》；他对另一出《击鼓骂曹》同样加以禁演。然而这两出老生、净行角色并重的戏，观众爱看，于是艺人们只好改戏名，将《捉放曹》改为《中牟县》《陈宫计》，将《击鼓骂曹》改为《群臣宴》《庆祝元旦》，但戏的内容丝毫未变。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果真被捉，软禁一年有余。1926年4月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才被放。这可称之为一出现代戏《捉放曹》。

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头子，1927年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最高统治者。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南方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奉军败退，张作霖只好考虑回东北奉天老家。正在这时，梅兰芳推出了新戏《凤还巢》，戏的情节虽然讲的是兵部侍郎程普的女儿雪雁、雪娥的婚姻喜剧，与张作霖毫不相干，但张作霖做贼心虚，心中思忖：“凤”即“奉”也，《凤还巢》不就是要我“奉还巢”吗？这不是公然轰我奉军回老巢奉天吗？于是，他下令禁演《凤还巢》。不过，奉军还是被赶回东北，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而《凤还巢》却成为梅派代表作，越演越红火。

“鬼戏”面面观

在中国戏曲艺术中，“鬼戏”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历史久，剧目多。无论男鬼女鬼、哭鬼笑鬼、大鬼小鬼，或是天上的鬼、地下的鬼，应有尽有。大有《西游记》《聊斋》中的鬼，小有《探阴山》《活捉王魁》中的鬼。这些鬼，都是人格化了的，观众心中都明白，并不把它们看成本来不存在的“鬼”。舞台上的这些鬼，反映了生活中的正义与邪恶、真善美与假恶丑，故而历来受观众欢迎，“鬼戏”久演不衰。

鲁迅对这些来自民间传说中的鬼戏一向是赞羡的，他在《社戏》《无常》《女吊》中，直抒胸臆地写下了他儿时观戏的情景。他说：“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地正视这鬼而人、情而理、可怖而又可爱的活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与笑，口头上的硬语与诙谐。”又说，“那带复仇性的，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实在是我们戏剧的创造。”

1949年后，内地文化部门曾公布过一批“禁演剧目”，其中有一些属于“鬼戏”。从多年的实践看，有些不大健康的“鬼戏”应该禁掉，如20世纪40年代常演的《僵尸复仇记》《黄氏女游阴》等。但有不少“鬼戏”，根本没有必要禁演，如《钟馗嫁妹》《奇冤报》。《钟馗嫁妹》是京剧女武生裴艳玲的代表作，这些年曾多次来港演出。钟馗虽然是鬼，形象丑陋，但他是美的化身，是反抗恶势力的人物，值得称道。《奇冤报》又名《乌盆记》，是一出宋代故事戏，表现一个叫刘世昌的人，在外经商，携仆归家途中借宿于窑户赵大家中。赵大夫妇图财害命，杀死刘世昌及仆人，并将尸体剁为肉泥，烧成乌盆。有一个叫张别古的人以打草鞋为业，一日他到赵大家中讨债，赵大以乌盆作抵押。张别古携盆回家，刘世昌冤魂乃向张别古尽诉前情，请他代为伸冤。张别古带乌盆至包拯处告状，包拯遂审判了赵大，刘世昌

的冤案昭雪。这是一出公案戏，情节跌宕，唱腔优美，许多著名老生演员都演过刘世昌。

戏中的鬼并不让人害怕，反而令人同情。刘世昌被害后上场，头戴青纱，身穿皂衣，双手下垂，是个鬼的形象，此乃戏曲舞台上悲喜剧的处理手法，不足为怪。

其实，许多“鬼戏”中鬼的形象不仅不给人可怖之感，反而给人以柔曼凄婉之美感。如京戏《活捉三郎》和《李慧娘》中的女鬼，话剧《哈姆雷特》中的洋鬼，《钟馗嫁妹》中的钟馗，观众看后往往感到神韵横生，激荡回旋。是可谓：“鬼戏”美哉！

《大劈棺》和《纺棉花》

《大劈棺》与《纺棉花》这两出京剧，在20世纪40年代的平、津、沪等大城市的戏曲舞台上，曾经风靡一时。

《大劈棺》里的田氏与《纺棉花》里的王氏，都由旦角女演员饰演，所以当时的观众或戏剧报刊均以“劈纺坤伶”称之。

京剧《大劈棺》又名《蝴蝶梦》，它取材于《警世通言》卷二，及《今古奇观》第二十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弋腔、秦腔、徽剧均有《蝴蝶梦》，河北梆子有《庄子扇坟》，而川剧则有《南华堂》，故事情节大同小异。

故事描述的是：庄周得道，路遇新孀扇坟，盼土快干，以便改嫁。庄周因此回家试探妻子田氏。他伪装病死，成殓后，却幻化为楚王孙，携一书童来吊唁。田氏见王孙英俊年少，顿生爱慕之心，拟嫁之。洞房中王孙假装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劈棺取庄周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无地自容，终致自戕而死，庄周亦弃家而走。戏中田氏多由花旦行当中的“刺杀旦”应之，剧中表现田氏见庄周从棺中跃起之惊吓状，有许多扑跌身段。按旧日的表演而论，田氏与《战宛城》的邹氏、《乌龙院》的阎惜姣、《翠屏山》的潘巧云、《挑帘裁衣》的潘金莲均属于“刺杀旦”一类的角色。

《纺棉花》的剧情是：有银客张三者，离家出外经商，三年未归。其妻王氏思夫，于纺棉花时歌小曲自遣。适张三归来，在门外窃听，又抛银试之，妻为所动，开门，夫妻相会。

这出戏故事情节很简单：演者着时装旗袍，高跟皮鞋，浓妆艳抹，在舞台上以唱时代流行歌曲为炫耀（如电影《万世流芳》中的插曲《卖糖歌》《戒烟歌》等），专迎合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

20世纪40年代予居北京时，京剧界坤伶皆以演《大劈棺》《纺棉花》为招徕。当时上海报刊曾发表署名文章，以“歌场新咏”为题，写梨园打油诗六首，其中一首是咏《纺棉花》的。诗云：

棉花纺得软绵绵，
究竟坤伶玩艺鲜。
还有“劈棺”拿手戏，
斧头劈出大洋钱。

三十多年来，因《大劈棺》宣扬封建迷信，并有色情台词及表演，大陆一直未曾演出。近闻昔有“劈纺花旦”之称的童芷苓，在上海将《蝴蝶梦》改编试演，大概会有所创新，但愿将来能一饱眼福。

名伶关德咸之死

京剧在北京主要有两大科班：一是富连成，培养出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期学员；一是中华戏曲学校，培养出了德、和、金、玉、永五期学员。

中华戏曲学校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如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高玉倩、陈永玲等，皆大有作为。但在当年，最早走红的尖子老生却要属关德咸。在演出《四进士》时，赵金蓉扮杨素贞，王和霖扮毛朋，王金璐扮杨春，扮主角宋士杰的就是关德咸，其演出地位由此可见。

关德咸嗓音清亮，台风端庄，因其身材较胖，师兄弟们戏称其为“胖关”。

1932年冬，中华戏校首次去天津，在南开大学演出了一批传统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德咸的《马鞍山》。这出表现俞伯牙凭吊知音钟子期的戏，集中显示了关德咸的演、唱功夫。

当日的演出，关德咸唱做俱佳，颇受好评。出人意料的是，年仅十二岁的小老生王和霖扮演的配角钟子期之父更为出色，王和霖以苍劲的唱腔及惟妙惟肖的老头脚步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喝彩声甚至盖过了主演关德咸。王和霖由此被老师看中，一直到后来成为著名马派名伶。

且说是夜，戏校师生们在中和客栈住宿。半夜，一声“快来人，胖关自杀了”的喊声惊破寂静，人们忙不迭地奔向关德咸的居室。

原来，这场《马鞍山》的剧场效果使一直高居戏校老生榜首的关德咸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演出结束后，关德咸一声不响，悄悄地把各个房间中的火柴搜集到一处，然后剥下火柴头，一口吞下，想以此结

束生命。万幸此举被人发现，急送医院，经灌肠抢救，关德咸才脱离了危险。

此后，关德咸发愤图强，他和王和霖结为挚友。谁料变声期后，关的嗓音受到损害，再演主角相当困难。他审时度势，毅然转向“硬里子”，即向配角老生方向发展。很快，他成为了一位托红衬紫、不温不火的优秀里子老生。笔者藏有金少山、李多奎的《打龙袍》唱片，其中王延龄一角就是关德咸演唱的，唱腔老到成熟，说是标准的里子老生唱法，实不过誉。

由于环境的影响，关德咸不久即染上了赌博的嗜好，没日没夜沉迷于竹城战。豪赌必输，很快他就穷困潦倒了。为生计，他不得不辗转于京、沪、汉等地搭班唱戏，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一年冬天，关德咸典当已尽，只好穿着胖袄（演员扮戏时穿的内衬棉衣）御寒。

1945年，二十七岁的关德咸贫病交加，逝于汉口。

成兆才与《杨三姐告状》

在河北省滦南县，有两个已作古的奇人，世称“滦南二杰”：一个是舍生忘死为姐姐申冤的女强人杨三姐，一个是评剧鼻祖成兆才。

成兆才生于1874年，家境贫寒，幼年时为了识字，曾给本村私塾先生下跪，请先生讲《聊斋》。因买不起纸，遂在沙地上练字，自学成才。后投身“莲花落”（评剧的前身）戏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的剧种——评剧。

1918年夏，成兆才到唐山的表弟李兴周家做客，李向成谈起了最近家乡高沟村发生的高占英欺兄霸嫂、残害杨二姐之事。杨三姐为二姐喊冤告状，而受高家贿赂的县长牛帮审，不但不为民做主，反而将杨氏兄妹轰出大堂。杨三姐不服，层层上告，直至天津。成兆才闻之，拍案而起：“这帮无法无天的赃官们能为穷人做主吗？我佩服杨三姐的胆略，我要去采访她，为她写出戏！”表弟李兴周因怕兄吃亏而劝阻。成兆才却说：“不揭贪官，不写民意，我成兆才还写什么戏？”他回到家乡，立即赶到杨三姐家。当听完杨三姐哭诉二姐被害始末并准备上告天津时，成兆才动情地说：“好丫头，有骨气！”当即拿出几块银元，让三姐充当盘缠。

不久，成兆才就写出了剧本《杨三姐告状》。然而，剧本写到杨三姐去滦县告状，牛县长受贿一段时，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亟待杨三姐去天津的消息。此时，高家听说成兆才写戏，几次上门，软硬兼施，不让成写剧本，并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成兆才说：“钱只能买通贪官污吏，怎能使我停笔！我在写戏之前，脑袋已豁出去了！”

1919年9月，成兆才写的《杨三姐告状》经几次修改，开始在各地演出，并引起轰动。但剧本只是前部，他急切盼望杨三姐去天津告状的结果。10月，他听说杨三姐回来了，赶忙跑到杨家。刚进门，杨

三姐便跪到成兆才面前说："表叔，赢了，咱赢了！"成兆才弯腰扶起三姐说："好丫头，有骨气，赢了就好，我接着写下半截戏。"

高家坐不住了，成兆才到哪里演戏，高家就到哪里找茬：雇警察，雇打手，到戏园子里捣乱。然而，成兆才决不屈服于高家的淫威，继续到各地演出《杨三姐告状》，因此杨三姐的故事传遍京津，传遍冀东。直到今天，久演不衰的《杨三姐告状》，虽然演出时间缩短了，故事精炼了，但仍然是成兆才的原作。

戏迷逸事

xi mi yi shi

北京的戏迷

北京是京剧发祥地，戏园子多，戏班子也多，戏迷则更多。

北京的戏迷，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一听胡琴响，嗓子就发痒”，若不扯着嗓子唱上两段儿，浑身都觉得难受；至于瘾大者，即使无胡琴伴奏，也总喜欢“干唱”几段，并且还带道白，甚至还念着锣鼓点儿，于是不免被人取笑说：“穷得倒没把家伙当了。”

北京的戏迷，颇有“忘我”之精神，在大街上步行或骑车时，瘾头儿一上来，张嘴就唱，甚至来个花脸的“叫板”，将周围的人吓一大跳。那进入角色的忘我精神，简直胜过戏台上的“角儿”，那自得其乐的精神，倒也令许多人佩服。

北京的戏迷们，专爱在澡堂子里撒欢儿。赤条条地泡在池水中，借着回声与水音儿，越发显得嗓音洪亮好听，于是你一段儿我一段儿，或青衣或老生，或花脸或花旦，自我消遣、互相品评，外带聊聊梨园界的趣话。譬如金少山如何预支包银先到当铺赎行头，马连良在天津唱《王佐断臂》如何突然伸出了胳膊，得了“倒好”以致跳海河被救，言慧珠唱粉戏如何把她爸爸言菊朋气死……一段段的唱腔、一段段的笑话儿，使众多的澡客们无不眉开眼笑、乐以忘忧。

北京的戏迷们，最爱“拿蹭儿”，也最能“拿蹭儿”。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戏迷。别看戏迷们不买票而听戏，却个个儿都是非常“要四至儿”（北京土语，指严格要求，十分认真）的行家。不管你哪个科班哪个派，也不管你挂头牌还是挂二牌，只要“唱、念、做、打”够韵味够漂亮，便台上捧台下捧，不捧成“红得发紫”誓不罢休。昔日的谭叫天（鑫培）深知个中奥妙与厉害，故每次演出必事先关照前台“不许轰拿蹭的”，于是大轴戏一开锣，戏园的三面大墙便靠满了人，因此又称拿蹭儿为“靠大墙”。靠大

墙者心里都明白：谭叫天此举是喜得知音，不像包厢里那些又嗑瓜子儿又喝茶的姨太太们全然不懂五音六律，更不解戏文里那高雅的内涵。

北京的戏迷们，确非等闲。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了若指掌，六七百出的剧目，如数家珍；其中更有造诣颇深的文化人，对待诗词歌赋及韵律无不深有研究，虽不肯屈尊科班为师，但对“依于仁，游于艺”的名角却不吝金玉，使之受益匪浅。余叔岩倘不加入“春阳友会”票房，李万春倘不拜涛贝勒（载涛）为师，技艺焉能大进？因此，旧时梨园中人深知戏迷中藏龙卧虎，而绝不敢妄自尊大也。

北京的戏迷们，听得多，见得广，个个都是确有真知灼见的评论家。他们耿直、求实而又苛刻，褒贬恰如其分。绝不似今日之所谓评论家，将仅会唱十几出戏的中青年演员捧上了天，而居然大言不惭，岂不可悲可叹！

张伯驹与余叔岩

近代著名收藏家、诗词家、戏剧家和书画家张伯驹先生1982年逝世时，其表弟李克非写了一首博得众口称赞的挽联，联云：

> 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千古绝唱；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帖，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

张伯驹一生有两件最得意事，一是京剧师从余叔岩，一是得晋陆机《平复帖》收藏。上联即概括前者，后联即概括后者。

余叔岩出生于梨园世家，其祖父余三胜工老生，其父余紫云工旦角，为清末“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余叔岩自幼受家庭熏陶，七岁便开始登台，以童伶获“小小余三胜”之誉。时“同光十三绝”之一的名伶大王谭鑫培正红，艺名“小叫天”，有“满城争说叫天儿”之赞语，另有“无腔不宗谭”之说，故余决心学谭。但谭鑫培一向不收弟子，所以无缘拜师，便只好每有谭戏必看，偷记工尺、腔词及做派等，并向谭之打鼓佬、检场、配角、院子、龙套等请益。为表示矢志向谭学习，余叔岩将书斋更名为“范秀轩”——谭鑫培号“英秀”，取其以英秀为师表意。

余叔岩聪明勤奋，悟性又好，尤谭鑫培之云遮月嗓，学之极像，故愈唱愈红。后传至谭鑫培耳，听后果觉不错，便将余叫至家中，称赞道：“你学我算学到家了，明儿我捧捧你，陪你唱一出《失空斩》，你来诸葛亮，我来王平。”不久谭果然与余叔岩合唱了一出《失空斩》，这也算谭鑫培对余叔岩最大的恩赐了。

张伯驹结识余叔岩是袁世凯子袁寒云的引荐。原来张家与袁家籍贯皆为河南项城，系表亲关系。张之父张振芳乃袁寒云之五舅，张称

袁为表兄。张振芳是前清进士出身，光绪年间曾做长芦盐运史，卸任后创办盐业银行。时张伯驹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平素雅好余戏入迷，结识余后，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丛碧山房”做客，余因在盐业银行存款，也经常请张到“范秀轩”说戏，二人频繁往来，除京戏外，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亦多共同爱好，因此促膝倾心，关系非同一般。

余叔岩本不收徒，后偶收亦寥寥，仅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数人。且教戏极保守，就连卓有成效之女名伶孟小冬，据说也仅给她说了“三出半”，即《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和《红鬃烈马》一折，对张伯驹却是青睐有加。

张正式从余学戏时已三十一岁，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过瘾，宾客满座，子时之后始说戏，张常夤夜三时归家，如是者十年光景。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不为妄言。曾有诗记此：“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据张伯驹在《氍毹纪梦诗》中记述，余叔岩先后授张戏有：《奇冤报》《战樊城》《长亭》《定军山》《阳平关》《托兆碰碑》《空城计》《群英会》《战宛城》《黄金台》《武家坡》《汾河湾》《二进宫》《洪羊洞》《卖马当锏》《断臂说书》《捉放宿店》《战太平》《凤鸣关》《天水关》《南阳关》《御碑亭》《桑园寄子》《游龙戏凤》《审头刺汤》《审潘洪》《朱痕记》《鱼肠剑》《法场换子》《上天台》《天雷报》《连营寨》《珠帘寨》《摘缨会》《盗宗卷》《伐东吴》《四郎探母》《青石山》《失印救火》《打渔杀家》《打棍出箱》，另有《八蜡庙》之褚彪，《回荆州》之鲁肃，《失街亭》之王平，以及《别母乱箭》、弹词等，此中其他未排身段及零段之唱尚未计。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叔岩曾对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是以未传，可见余对张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叔岩教张伯驹戏之多，实独一无二；而且授之殷殷，亦非常人所及。张伯驹向余叔岩学第一出《奇冤报》时，正值叔岩应天津剧院演出，他主动提出偕伯驹同往，一路说《奇冤报》反调。天津演出毕又一同返京，即排练身段，穿上厚底靴，走台步，滚桌子，之后又在饭庄演唱。另外，伯驹从叔岩学《战樊城》和《奇冤报》时，叔岩特意演出此二剧于开明戏院，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一出。友人有不知此中奥妙者，烦而劝演他戏，叔岩不应，仍第一日演《战樊城》，第二日演《奇冤报》。伯驹曾回忆道："专为予看，甚可感也。"

1937年春，正值伯驹四十岁生日，叔岩倡议以演剧为欢，另因头年河南发生旱灾，伯驹表叔李鸣钟将军亦倡议以演戏募捐赈灾，于是同时并举演于隆福寺之福全馆，本文开端引用之挽联中的上联即指此事。

开场为郭春山之《回营打围》，次为程继先、钱宝森之《临江会》，当时因梅兰芳未在京而请其高足魏连芳演《女起解》，接下去是王凤卿、鲍吉祥之《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之《英雄会》，筱翠花、王福山之《丑荣归》《小上坟》。虽说是极一时名伶荟萃之盛，大轴却是《失空斩》，而此中之主角诸葛亮则由张伯驹饰演，其他配角都是显赫名伶。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飞等。当时消息、照片通载各报刊，轰动九城，人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张伯驹为此感怀赋诗："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尽五峰。"更有趣者，当年谭鑫培曾陪余叔岩演过王平，而今余叔岩又陪张伯驹演王平，堪称一梨园佳话也。

余叔岩夙患溺血病，自此次演出后，病情加剧。先经法国医院诊为膀胱瘤，割治半年后复发，又经协和医院割治，于小腹通一皮管导尿。1942年重阳后，伯驹四十五岁时，日寇疯狂侵华，社会更加混乱，伯驹拟将所藏国宝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等随身缝被奔赴西安。行前一日晚，往视叔岩，见状，知叔岩病不能愈，

此为生离死别之最后一面。伯驹只好作寻常语以慰藉，不言离京事，恐说出彼此难免恸哭。但师友一场，伯驹终抑制不住，泪要夺眶而出，便转身佯装如厕偷拭之，复转来闲聊两小时方怅然离去。

次年3月，伯驹在西安陇海铁路局观戏，偶遇上海《戏剧月刊》主编张古愚，云翌日即回上海，便托其带给陈鹤孙一信，信大致内容是：预料叔岩兄病凶多吉少，不能久长，兹拟好挽联一副，如其去世，务望代书送至灵前为感。联云：

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欢传李峤；
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

两个月后，接鹤孙回信，道叔岩已于5月19日仙逝，将挽联书好送到了灵前，伯驹由是而深感欣慰。

痴迷戏曲的张大千

举世闻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戏曲特别痴迷。在他的一生中，与众多的戏曲名伶过从甚密，并留下了大量写真戏画。

民国初年，张大千刚到上海滩，就听说名伶汪笑侬正在演出《刀劈三关》一剧，观众争相观看。张大千也想一饱眼福，没想到到了戏院门前，一摸口袋，没有带钱。为了看上这场戏。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的马褂，押进当铺，拿了两块大洋，就进戏院听起戏来。可是散戏之后。由于张大千看戏入了迷，把当铺给的“当票”丢失了。这样，他那件价值二十多块大洋的新马褂，也就没有再赎回来。虽然损失了衣物，但张大千看了自己钟爱的戏，也觉得很值。

张大千一生中看过许多戏，对各流派的演出都相当熟悉。但是，他最为欣赏的京剧名伶乃是剧坛老前辈孙菊仙。孙菊仙原来是武秀才，三十岁后下海学戏，与汪桂芬、谭鑫培齐名。他的唱腔淳朴苍劲，大气磅礴，喷吐有力，善于表达慷慨激昂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孙派”风格。张大千观剧之余，专为孙菊仙写了一副对联。联曰：

别有狂言谢时望，常撞大吕应黄钟。

（黄钟，中国古代音乐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大吕，六种阴律中的第四律，后人常以“黄钟大吕”形容演员的嗓音洪亮和高妙）

张大千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交往很深。他当初与梅兰芳见面时，曾对梅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梅兰芳闻之大惑不解，问他为何自称“小人”，张大千笑着答道：“你是君子动口，擅长演戏；我是小人动手，只会画画。”说罢，二人开怀大笑，自此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对川剧特别着迷。他最爱看的川剧是丑角

名伶周企何的表演。周企何主演的《做文章》《请医》等剧，早已蜚声艺坛。抗日战争时，张大千住在成都，与周企何不仅交往密切，感情深厚，而且对周企何的戏每演必看。有一次，张大千看了周演出的《迎贤店》，乘兴作诗两首。一曰：“青抹额，大红鞋（鞋读孩音），坐柜台。笑口开，恭喜大发财。”二曰：“能令公喜，能令婆怒，咄咄尔曹非主顾，钱不来谁留尔等住？”这两首诗对周企何的表演给予入木三分的评价，且幽默诙谐，颇为风趣。还有一次，张大千看周企何的《意中缘》，觉得舞台上做布景的那幅梅花画得太差，便挥笔画了一幅梅花送给周企何。

张大千去中国台湾后，三十年来他与周企何仍有信件往来。周企何曾将自己演出的录音带托人转送；张大千也曾以自己的画册相赠。四川内江还曾排演了川剧《张大千》，剧中表现了他二人交往的情节，很是感人。

慈禧太后看京剧

清末同治和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不仅是个“日必观戏”的戏迷，而且还是个精通曲律、善解文词，甚至能够粉墨登场的老内行，曾在梨园界留下了许多轶事。

慈禧看戏时，手里总是拿着“贯串”（即是唱念做打、脸谱砌末以及曲牌锣经等有关这出戏的全部详细记载），边看戏边对照，一旦发现演员表演与“贯串”有误，便立即指责演员乃至降罪。她看完戏还能“过目不忘”，记下情节和程式，到晚上便关起门来，在太后宫与太监们化装串演。

慈禧太后即兴修改上演剧目，更是心血来潮。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谭鑫培在宫里与名丑罗寿山合演《清风亭》（这是一出鞭挞知恩不报的戏），演出中慈禧忽然灵机一动，要演员在剧中增加“雷公”和“雷婆”两个角色，让台上雷电交加，把那个忤逆不孝的张继保打得七窍出血。她认为这才符合“天意人心”。同年四月，她再传此剧进宫，看戏时又让增加“雨师”一角，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宫廷三层戏楼的优势，台上霹雷闪电，风狂雨暴，把忘恩负义的张继保打得灵魂出窍，以“教化后人”。至于她修改《玉堂春》的唱词，更是别出心裁。慈禧属羊，看戏时最忌出现“羊”字。到宫里上演的剧目，不能唱带有“羊”字的戏，如《变羊记》《洪羊洞》《牧羊圈》等。凡有“羊”字的戏词，必须改。《玉堂春》中有一句唱词“苏三在此有一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以后便一直这么唱下去了。

慈禧爱看戏，却从来不把演员当回事，还百般拿演员寻开心。有一次，郎德山上演《金钱豹》里的猪八戒，她明知郎德山是回民，却让他学猪叫。郎德山一听，知道是在耍笑自己，不但不学猪叫，反而学羊叫，反戈一击。没想到一声羊叫，倒把慈禧逗乐了。慈禧就是这

样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有一次宫里正演《翠屏山》，慈禧下令停演，让人把戏提调叫来问道：“今儿这戏怎么唱的？你不想当差了？”戏提调莫名其妙，不知又犯了什么忌。后来向人请教，才知道是因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这又表现了慈禧作为女人的专横。

大清国的戏迷王爷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不遑历数，喜欢戏曲的帝王与贵族指不胜屈，《孔子家语·相鲁》即有“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之记载，《新五代史·伶宫传》则云：“时诸伶出入宫掖，侮弄缙绅。”南朝的陈后主（叔宝）是个戏迷，唐明皇李隆基更是个戏迷，后唐庄宗李存勖还是个戏迷。可上述这些，如果比起晚清的皇帝和王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近代史上的满族政治家、改革家，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与其兄咸丰皇帝奕詝 皆迷京剧。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载淳与恭亲王长子载徵贝勒更迷京剧，不仅爱听，而且常粉墨登场。载淳与载徵，自幼便是一对小玩闹儿，登台演戏更没正形，专演那些插科打诨的小闹戏。一次演《一打灶》，载徵扮小叔，妃子演李三嫂，同治帝扮灶君，身着黑袍、手持木板，被李三嫂骂一声打一下，以此取乐。肃忠亲王善耆，乃不折不扣的老戏迷，他曾与具有进步思想的名伶杨小朵联袂演出《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潘巧云。此戏取材于《水浒传》，根据清雍正抄本排演。写杨雄妻潘氏与僧裴如海私通，为杨义弟石秀所见，告之以杨雄，潘反诬石戏己，杨雄遂与石秀绝交，石愤而夜俟裴自潘处出，杀于道，剥其衣示杨雄。杨始悟，托名烧香，将潘诳至翠屏山，勘明奸情后手刃之，与石秀同投梁山。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皆相顾失色，而杨小朵却谈笑自若，扮石秀的肃亲王则更乐不可支。

宣统二年（1910），各省代表以请愿国会制集聚京师，晋谒肃忠亲王。谈话间，这位王爷戏瘾大发，忽取王帽掷于案上，高声唱起：“先帝爷在白帝龙归海境，传口诏教老臣常挂在心……”（《天水关》唱词）诸代表见状悚然惊异，王爷唱罢却笑道：“诸君不必忧

虑，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儿就得了。”大厦将倾，犹以唱戏为乐，实在想得开！

更有那别署“红豆馆主”的宗室溥侗，人称侗王爷，一辈子不问政治，自幼嗜剧成癖，遍投名师，文武昆乱各行技艺无所不精，六场（胡琴、月琴、南弦子、单皮鼓、大锣、小锣等六件伴奏乐器的总称）通透，能戏甚多。

这位大名鼎鼎的票友，所演老生戏《定军山》等酷似谭鑫培，旦角戏《金山寺》得自陈德霖，小生戏《镇潭州》为王楞仙所授，花脸戏《战宛城》颇似何桂山，《群英会》兼擅周瑜、鲁肃、蒋干三角，为世所称道。著名京剧演员言菊朋、李万春等百余人均师事之。侗王爷享年八十一岁，可谓玩了一辈子，乐了一辈子。

名人客串京剧

在京剧舞台上，有许多职业性的名伶，也有许多票友，票友中的名人演京剧，说来更有趣。

著名作家张恨水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的编辑，是个戏迷，也很会演戏。在一次北平新闻界赈灾义演中，张恨水积极参加，在压轴戏《玉堂春》中扮演崇公道。他的嗓门很高，声如洪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张以红极一时的小说家身份参加京剧演出，号召力很强，加之他表演成功，遂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的爆炸性新闻，一时成为美谈。自此，张恨水又多了一个笔名——“崇公道”。

1933年，一批新闻界人士为同事的母亲祝寿，在北平宣武门外大街江西会馆组织了一次堂会，请了许多名角演出。张恨水欣然在《乌龙院》一剧中扮演张文远（丑角）。在小锣声中，白鼻梁、头巾紧扣脑门的张恨水一出场，满口安徽、江西味，顿时引来一阵喝彩声。演出时，他的插科打诨，即兴抓哏，令人忍俊不禁。阎婆惜问宋江：“张文远是谁呀？”宋江答道：“乃是我的徒弟。”阎婆惜却逗道：“我听你说，你的徒弟可是有名的小说家呀，你怎么没有名啊？”台下哗然，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而台上的张文远走路却一瘸一拐的，且紧皱着眉头，下场后，别人问他怎么回事，张恨水这才边骂边笑着说：“真是岂有此理！有人恶作剧，在我靴子里放了一枚图钉，害得我好苦哟！”

1947年春节，北平新闻界举办了一次联欢演出，张恨水在《法门寺》中串演校尉跑龙套。当时，他已是《新民报》社长，他别出心裁地又邀了另外三个报社的社长一起来跑龙套。那三个社长都戴眼镜，张恨水为求统一，自己也戴上了眼镜，四个龙套、四副眼镜，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著名漫画家李滨声自幼爱演京剧。他十岁时就客串过《汾河湾》中的娃娃生薛丁山。20世纪40年代，他家居沈阳，上中学时加入一个业余京剧团，每周彩唱公演一次。后来，李滨声到北京上大学，课余参加票友活动，在长安大戏院演出过《白门楼》《罗成叫关》。当时，与李滨声在东北一块业余演戏的于玉衡（今为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已“下海”，拜在了“通天教主”王瑶卿门下。由于于玉衡的引荐，李滨声经常到王瑶卿家中，听王先生给弟子们说戏。

当时王瑶卿家住前门外大马神庙。王先生对李滨声讲，你到戏园子看戏，只要一提从大马神庙来的，就可以随便进。李滨声一试，果然灵。他就利用这些条件，看了许多戏。后来，李滨声与名家合演《群英会》，他在该戏中扮演周瑜。舞剑时，裘盛戎兴之所至，为之打大锣。李滨声主要演翎子武小生，他主演的《白门楼》《辕门射戟》《罗成叫关》《八大锤》《螺丝峪》等都很有名。笔者曾看过他的演出，他那起霸、耍锤、出手、开打等动作利索干净。至今在他寓所中，还有他经常练功用的大锤、翎子，俨然专业演员，而他的职业却是画漫画。

粉墨登场老报人

作为京剧发祥地，北京二百多年来一直是演员多、票友多、观众多、剧场多。

京剧者，其历史也久，其剧目也繁，其文学也深，其唱腔也美，故其魅力极大，于是乎票友的队伍，比梨园中人更见浩浩荡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或许是中国人的骄傲。

皆因京剧雅俗共赏，故很多属于纯粹文人范畴的新闻记者（亦包括某些老作家）爱之、习之、唱之，并以极大的勇气在诸多名角儿面前粉墨登场，常常产生轰动社会的效应。

20世纪30年代时，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王柱宇，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而且京剧唱得也颇有韵味。王公乃湖北人，其籍系汉调摇篮。清嘉庆、道光年间，汉调流传至北京，加入徽调班社演唱，逐渐融合演变而形成京剧。深谙汉调的王柱宇，学唱京剧可谓捷足先登矣。而有“须生泰斗”美称的余叔岩，因与王柱宇同乡并爱读其文章，故在唱念做上时有点拨。

旧京新闻界与文学界的京剧票友不乏其人，这些以“皮黄”自娱的戏迷们，每得闲暇必聚会于报馆或饭庄，调丝竹以清唱，并切磋道白、唱腔及身段，每有所悟必喜形于色。

民国二十五年（1936）秋，著名京剧老生马连良、华乐剧团经理万子和与萧振川等集资修建的新新大戏院，落成于西长安街六部口以西路南（今首都影院所在地）。继马连良、张君秋开幕式演唱后，北京各大名角杨小楼、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孟小冬、金少山等数十人均在此登台献艺。

以王柱宇为核心的文人票友，为过戏瘾并贺新新大戏院落成，遂

于是年深秋以传统剧目《失空斩》在该剧院粉墨登场。消息刚一发出，立即轰动京城，各界头面人物为一睹大记者王柱宇之舞台风采，无不纷争红票。

全部的《失空斩》，由王柱宇扮演诸葛亮，《新民报》记者吴菊池扮演司马懿，作家唐友诗扮演马谡，诗人张醉丐及新闻记者邵采波扮演老军，戏曲作家景孤血与翁偶虹指导勾画脸谱并催戏。至于梨园界的文武场面与底包人等，皆欣然捧场，有求必应。而在戏院门口挂帅站岗者，则是内二区警察署长殷焕然。

赞助这场演出的是北京前门外丰泽园饭庄。该饭庄开业于1928年，店名出自皇帝在北京中南海游兴稼穑之所——丰泽园。创建人栾鲤庭，以经营山东风味名贵菜肴而发家，附庸风雅且喜京剧，故不吝以万金赞襄新闻记者彩唱，旨在借记者之文笔为其张目也。

王柱宇等老报人粉墨登场之夜，梨园界莅临助兴者除戏院老板马连良外，尚有萧长华、郝寿臣。侯喜瑞、红豆馆主溥侗、言菊朋、奚啸伯、筱翠花、李多奎以及因爱慕王柱宇文采，后嫁之为妻的旦角演员胡淑季（艺名傅占云）等名角儿。而王柱宇的挚友齐白石及大名鼎鼎的篆刻家张志渔，亦同坐于包厢中，不时为这位“无冕之王”极富韵味的余派唱腔频频叫好，堪称旧京之韵事也。

谭派名票韩慎先

20世纪30年代，天津有一位蜚声海内外的京剧谭派名票“夏山楼主”。他本名韩慎先，字德寿，久居天津，常往返于平津间，为钻研京剧艺术孜孜以求。他曾得陈彦衡亲传，京剧表演方面的造诣与余叔岩不分伯仲。他的拿手好戏有“三子”，即《法场换子》《辕门斩子》《桑园寄子》，当年曾风靡一时，誉满平津。

当年在北平护国寺梅兰芳家里，许多戏剧界知名人士常凑在一起，谈论京剧表演和改革问题；韩慎先也是那里的常客。那时，余叔岩学习谭派唱腔的刻苦精神，是京剧界普遍传诵的，成为在梅宅聚会时谈话的资料。余叔岩倒仓休养期间，他的岳父陈德霖关心女婿的前途，就介绍他到以研究谭派唱腔著称的陈彦衡家，请其传授谭派唱腔口法。余叔岩虚心学习，受益匪浅。后来，余叔岩和陈彦衡发生误会，断了来往，但余叔岩对陈彦衡的京剧演唱修养还是赞佩的。他知道韩慎先曾从陈彦衡学过《南阳关》，而自己却不会这出戏的谭派唱腔。一次，他和韩慎先同车赴某饭庄应酬，就向韩慎先请教，并说：“你教我《南阳关》，我教你《战太平》。”两人就在汽车里一直哼着唱腔到了饭庄；宴会后，又从饭庄哼到家里。就这样，余叔岩向韩慎先学会了《南阳关》的唱腔。

韩慎先的京剧唱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由高亭公司灌了唱片。他对当时灌唱片的不良习气深为不满，常说：“梨园行的旧习气是灌唱片时都打埋伏，不肯把真玩意儿全唱出来，怕别人学去了，其实那是错误的。”而他在灌片时，总是无保留地献出真唱腔来。

韩慎先不但对京剧有深厚的造诣，还精于古文物的鉴赏和考证。他与国画大家陈少梅先生过从甚密，形同手足，故对中国书画的笔法流派、名家题跋、收藏著录，甚至纸绢印章都有研究，对一般赝品总能识别出来。据说，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作家阿英任天津文化局局

长时，特请韩慎先担任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韩一直工作到60年代逝世。他为天津艺术博物馆搜集了大量文物，其中以宋人张择端的《金明池夺标图》最为珍贵；在此以前，张择端的传世之作仅有《清明上河图》一件。

近云馆主女名票

前接天津寄来的讣告，惊悉著名女票友近云馆主于1986年12月23日病逝。

近云馆主本名杨景晖，字慕兰，系清末民初别号“云在山房”杨味云（寿枏）的次女，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近云馆主的父亲杨味云在清廷度支部做了高官，她随同母亲和大姐景昭由无锡到了北京城。辛亥革命后，全家离开北京到天津定居。二十一岁时，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第四子周志厚结婚，近云馆主就成为周家的四少奶奶，即不久前逝世的以藏书闻名于国内外的周叔弢的叔伯弟妇。

近云馆主自幼喜好京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从师访友，多方学习，曾向老演员律佩芳、郭际湘（艺名“老水仙花）、魏莲芳学青衣、花旦，向姜妙香、徐斌寿（徐碧云之兄）、包丹庭学小生，向阎岚秋（艺名“九阵风”）、朱桂芳学刀马旦，向邱富棠学把子，向昆曲名家童曼秋、包丹庭和马祥麟学昆曲。经过勤学苦练，深入钻研，近云馆主取得了允文允武、昆乱不挡的优异成就。

近云馆主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她十分注意在表演中以声宣意来表达剧中人的情感，所以她每演一出戏都能声情并茂，获得观众好评。这样的造诣，即使与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近云馆主的学戏过程，特别是登台亮相，首先要冲破家庭的羁绊。因为她本来是官宦之家的“四少奶奶”，老婆母对于维护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尊严是时刻不放松的，要求她在家中的言语行动要端庄静淑，衣装打扮要稳重朴素。那时的深闺妇女都要梳理头发，结成各种发髻，而她为了便于演戏化妆，把一头青丝剪成短发，明知这是婆母所不能允许的，于是便做了一个假发髻，在家里婆母面前就扣在脑后，一离开家门学戏去就把假发髻摘下，露出短发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到处掀起抗战热潮。近云馆主应邀到北平参加在哈尔飞戏院举办的捐献飞机义务戏，以她的《贺后骂殿》压轴。这是她首次公开票演。

第二次登台，也是在北平，近云馆主在珠市口开明戏院参加义务戏票演，同德国籍女票友雍竹君合演《玉堂春》，近云馆主唱“起解”、雍竹君唱“会审”。经过这两次在北平的义演，近云馆主一鸣惊人，声震九城。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近云馆主由北平回到天津，在法租界明星影院参加由老牌电影明星王元龙主办的一次义务戏，压轴为王元龙的《连环套》，王元龙饰窦尔敦。大轴是近云馆主的《玉堂春》，由“起解”到“会审”，一气呵成，唱做俱佳。这是她初次与天津观众在舞台相见。

后来，她以票友身份时常参加由常少亭组班的班中演出，并与京剧老伶工王瑶卿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姜妙香等研究剧艺，戏路益广。20世纪40年代初，天津“云吟国剧社”培养出不少京剧人才，如童芷苓、吴素秋、白玉薇、侯玉兰等都不时向她问艺。近闻年已高龄的近云馆主身体健爽、精力充沛，还曾在天津昆曲爱好者组织的迎春演唱会上清唱了一折《雅观楼》，腔调清丽，不减当年。

“票界之王”王庾生

近几年，天津的京剧演员多次来港表演，深得好评。笔者也爱好京剧，时常有同好谈起早年天津的京戏热，也常谈到“票界之王”王庾生。

王庾生，回族，父亲为清真寺阿訇。王幼年即喜京戏，当时每当老一代京戏名伶如谭鑫培、贾洪林、汪桂芬、汪笑侬等到天津演戏，他总要去戏团听他们演唱。余叔岩少年时住在天津估衣街侯家后，王庾生与他结为戏友，每天清晨相约去天津西站旷野森林间喊嗓练功，冬夏不辍。

著名武生杨小楼在天津演戏，常在北门外绘芳园戏园练功。王庾生赶奔那里，请求指点武功。其勤恳求教的热情感动了杨小楼，王因而曾多次得到杨小楼指教。后来王庾生演武生戏《长坂坡》《连环套》《落马湖》《战宛城》等，都宗杨派，盖皆得自杨小楼的亲传。

谭鑫培到天津演戏，经常住在喜好京戏的盐商巨富窦砚峰的家里，王庾生的家距之不远，他便请窦砚峰为之介绍，向谭鑫培请教老生戏。他所会的《天雷报》《御碑亭》《盗宗卷》《乌龙院》等戏，都得过谭鑫培的指点。谭鑫培对于向京剧同行传授剧艺本极保守，但见票友王庾生学戏认真，又具有可培养的资质，便热情地教了他《南阳关》和《断臂说书》两出戏。

经过多年的苦学钻研，王庾生博采众家之长，老生戏学谭派，武生戏宗杨派，兼擅旦、净、丑，能演戏三百多出。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王庾生剧艺成熟、登台表演最勤的时期，他经常与京剧名伶合作表演。1930年，他与田桂凤合演的《坐楼杀惜》，与杨小楼、尚和玉合演的《八蜡庙》《战宛城》，与尚小云、

芙蓉草合演的《御碑亭》，与筱翠花合演的《游龙戏凤》，与侯喜瑞、程继仙、马连昆、李春恒等合演的《连环套》《打严嵩》《打侄上坟》《群英会》等，都给当年的戏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31年6月，杜月笙在上海为庆祝杜家祠堂建成，邀请全国名伶演堂会戏，王庾生也应邀赴沪，与小杨月楼合演《庆顶珠》，震动了内外行，从此扬名于全国。天津观众推选他为“票界之王”。之后，著名老生演员孟小冬、李宗义，旦角演员章遏云、丁至云等，都曾受教于王。奚啸伯、杨宝森、吴素秋、童芷玲等尊之若师，相从问艺。

天津老票友王君直

中国的京剧，兴于北京，著名的科班和名伶多在北京，但天津却出过不少著名的京剧票友，其中佼佼者莫过于王君直。

王君直，清同治六年生于天津北门里府署街大宜门口，为大盐商王敬熙之四子，原名金保，后改益保，字君直。父殁后由其兄少连继承家业，兄病逝后，王君直接替兄职任长芦京引盐商代表，其后又被选为长芦盐务纲总。

光绪末年，严范孙任学部侍郎时，王君直为严器重，曾到学部供职。居京期间，王君直常去戏园看京戏。时谭鑫培的腔调正风行一时，谭每演唱，王必去观赏，且常到春阳友会票房，同胡琴圣手陈彦衡研习谭腔，获益良多。在天津，他参加北门里的雅韵国风票房，同当时名票友窦砚峰、陈梦九、刘永奎、王颂臣、陈筱鹤等人一起研究演唱。王君直学谭能得其精髓，因而谭所拿手的《空城计》《捉放曹》《武家坡》《洪羊洞》《托兆碰碑》《打棍出箱》《击鼓骂曹》《桑园寄子》《探母回令》等，王均能胜任，且有所创新。他的行腔吐字尖团分明，嗓音高亢爽朗，鼻音、喉音、脑后音均苍劲有力，尤为动听。

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余紫云之子，青年时艺名“小小余三胜”。当他在天津于鼓楼北元升茶园演出时，因慕王君直之名，常去雅韵国风票房，经人介绍，拜王君直为师。王常到元升茶园为小余把场。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杨柳青石元士做寿举办堂会，王君直被邀演《空城计》，小余配演王平。小余离津时，王介绍雅韵国风的票友李佩卿随之操琴，合作十多年。余叔岩能享大名与李佩卿胡琴之陪衬不无关系。

王君直对地方公益当仁不让。民国六年天津洪水为灾，京津戏曲

界在南市升平茶园义演赈灾，王君直亦参加演出，戏码是《托兆碰碑》，名净裘桂仙为其配杨七郎。民国十五年北京演义务戏，那时的王君直已年届花甲，仍应邀参加，大轴为王主演的《失街亭》，侯喜瑞配演马谡，张春彦配演王平。座无虚席，盛况空前。

以一票友，能誉满京津，被称为谭派正宗，余叔岩尊之为师实属难得。王君直对京剧艺术的修养和所得之盛誉，迄今仍为人所乐道。

票友票房探源

票友、票房等最早出现在清同治年间的北京，后及天津。到民国初期，便延及南京、上海、武汉、广州以及中国台湾和港澳等地。特别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玩票之风极盛，票友票房遂如雨后春笋，竞相而起。

票友与伶人之区别，前者为业余戏剧家，后者为职业戏剧家，伶人学艺旨在讨生活，票友学艺纯属爱好。那些业余戏曲爱好者中，有不少是造诣非凡的“名票”，他们无论在天赋资质还是唱练功力上，也无论是艺术修养还是实践经验，并不逊色于某些专业戏曲演员。据统计，早年享誉南北的名票多达数十人。仅北京一隅，就有袁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溥侗（即溥西园，红豆馆主，清朝皇族）、包丹庭（京昆兼能名票）、张伯驹（京昆兼能名票、诗词书画收藏家）等。此外，清光绪帝载湉，不但会唱戏，尤其能司鼓，而且还是位京、昆、弋腔的多面手，他曾不顾帝王之尊，登台演唱、伴奏。其弟载涛（溥仪之叔，皇室贝勒）更是位不囿身份与伶人为伍，并经常粉墨登台的名票，连内行也都为之赞叹。

关于“票友”一词的来源，据《辞海》等书解释，大体是说清初八旗子弟凭清廷所发龙票赴各地演唱“子弟书”，为清王朝进行宣传。因他们非专业演员，又都持有龙票，所以人们称之为“票友”，此称后延及民间。

据说，清雍正帝派大军征讨新疆金川地区（今四川境内）的回民，得胜还朝之日，军营中有人将欢庆胜利的情景编成太平歌词，由八旗子弟们击鼓传唱，传唱时每人发给龙票（即钱票）一张，由之得名“票友”。又传雍正就帝位前，酷爱戏曲，常与戏曲演员们同室切磋技艺。即帝位后，又命人在宫内辟出一所殿宇，安排早先结交之艺人于内，并发给他们“龙票”，以区别于专职伶人。其后，凡好为歌唱且

又不以此为职业的人，便被称为票友，票友们的同仁组织与活动场地，则被称为“票房”。

清末到民国初年，以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地区大小票房遍布九城，有些数人为伍或数十人一起，互约时间聚会排练消遣。最著名的票房有西城的“松筠庵票房”，地安门大街的“南月牙票房”等。其中历史最久、名声最著者，当数同治末年创立的“翠峰庵票房”。

这家“票房”坐落在西直门内盘儿胡同，原址是个尼姑庵，故名。

“票房”不仅指京剧业余爱好者的活动场所，同时又是研究京剧艺术、培养京剧演员的团体。因为票友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对于剧情、唱腔、戏词的研究往往要高于一般艺人。不少京剧的著名演员都是“票友”出身，例如京剧形成时期的须生张二奎、卢胜奎，花脸庆春圃，丑角刘赶三；同治、光绪年间唱须生的孙菊仙、许荫棠、汪笑侬、刘鸿声，唱小生的德琚如，花脸黄润甫、何桂仙、金秀山、郎德山，旦角孙春山、常子和，老旦龚云甫等，均为票友出身。

由业余演员转为专业演员的，称为“票友下海”。辛亥以后，票友下海的著名演员有时慧宝、金仲仁、言菊朋、郝寿臣、奚啸伯、管绍华、张稔年、李香匀、臧岚光、裴效莲等。

可以说“票友”“票房”的出现，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生肖入戏

sheng xiao ru xi

乙亥年谈“猪戏”

乙亥年按天干、地支排序，是农历的猪年。猪年来到，想起戏曲舞台上有关“猪”的剧目，说来很有趣。

剧名中标有“猪”的剧目，当推《野猪林》。这出取材于《水浒传》的宋代故事戏，相当闻名。全部《野猪林》从宋太尉高俅之子高世德游庙起，陆谦设计使高调戏林冲妻高氏，又骗林冲持刀误入“白虎堂”，被高俅诬陷发配沧州。后陆谦买通解差途中加害林冲，鲁智深暗地跟踪在野猪林相救，最后林冲在草料场杀陆谦报仇。故事跌宕，生、旦、净、丑齐全。此剧又名《英雄血泪图》，由清代名伶杨小楼编演。此前明代李开先传奇《宝剑记》、陈与效传奇《灵宝刀》，都是讲的这个故事。

由《西游记》编演的国剧，计有三十多出。凡有唐僧出场的戏，大都有猪八戒出现。但是，以猪八戒出任主要角色的，当属《高老庄》《猪八戒撞天婚》《猪八戒招亲》《流沙河》等。

《高老庄》又名《收悟能》，写孙悟空保唐僧途经高老庄，因猪八戒幻化人形，占娶高女，孙悟空降服之，同往西天。国剧、秦腔、河北梆子都有此剧目。

《猪八戒撞天婚》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黎山老母、文殊、普贤等菩萨幻化庄院，假作孀妇携三女招婿。唐僧、悟空、悟净皆不为所动，唯猪八戒百计求婚。诸仙乃戏令其撞天婚，使之薄受惩处。八戒始悟，随师西行。早年王又宸演出此剧很有名。另一出《猪八戒招亲》，则剧情时间贯穿较长，自天蓬元帅赴蟠桃会戏嫦娥被贬起，至孙悟空收猪八戒止。

黄梅戏《打猪草》是一出生活气息颇浓的地方小戏，人物只有小

生、小旦。该剧表现的是一百多年前安徽宿松二郎河崔家坪发生的实事。村姑陶金花下地打猪草，顺手偷了金三矮子家两根笋子，被金三矮子发现，并将金花的篮子踩破。金花大哭，金三矮子反向金花赔礼，又掰了几根笋子送金花回家。

这出戏的故事很简单，之所以久唱不衰，关键是剧中一个个优美的唱段极富魅力。记得金花打完猪草后唱："猎草打满篮，收拾回家转。别山我不走，单往竹笋山。"到竹笋山后，又唱："篮子来放下，随手撒把沙。有人就便罢，无人就偷它。"随即，她把两眼四周一扫，发现无人，边偷边唱："笋子掰两根，放在篮中心。浮面猪草盖，神仙不知情。"戏中的"偷"，实际上是村童的一种生活乐趣，是大人们都可以容忍的一种朴实的乡风。至今回忆起来，《打猪草》仍是乡情依依。

十二生肖入戏文

我国古时用“干支”来计算年、月、日。“干”是“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是“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从数学角度看，天干（十个）和地支（十二个）的最小公倍数是“60”，旧时人们把人的属相（即十二生肖）与地支并连在一起，各从首字排起，“天干”与“地支”乃六十年一轮回。20世纪40年代，梨园界各戏班竞相创演新剧目，以招徕观众，其中就有“生肖戏”，如《访鼠测字》《小放牛》《武松打虎》《白兔记》《龙凤呈祥》《青蛇盗库》《马前泼水》《苏武牧羊》《白猿盗盒》《铁公鸡》《打狗劝夫》等。

当然，从保留下来的京剧剧目看，每种“生肖戏”都不止一出，有的多达十数出或几十出。在诸多的“生肖戏”中，有些是将生肖直接嵌入剧名，观众一看便知；有些是含在剧情或唱词中，观剧时需要体察。

“鼠戏”中多有案情

“鼠戏”中最有名的，当属宋代故事戏《五鼠闹东京》，事见《三侠五义》。该剧讲述宋时太监陈琳深感国家武将乏人，与包拯商议，保荐南侠展昭入朝。仁宗见其武艺过人，封为四品护卫，赐号“御猫”。卢芳、韩彰、徐庆、蒋平和白玉堂，异姓结拜，人称“五义”，别号“五鼠”，除暴安良。白玉堂闻展昭投靠当朝，甚为气恼，遂往汴梁寻展昭较量。后白玉堂杀死御花园总管郭安，韩彰等计盗庞吉不义之财，卢芳在花神庙救难女、伤恶霸……各行义举后，“五鼠”归开封。此剧为连台本戏，计八本，最早为小荣椿社本戏，旧四喜班、富连成也上演过。这出戏行当齐全，武功绝妙。此剧中的包拯、陈琳虽是历史人物，但剧情是虚构的。

另一出宋代故事戏《闹东京》，书生施俊进京赶考，白鼠精得悉，乃假扮施俊，至施俊家调戏其妻。施俊归来大怒，控于丞相王延龄。真假施俊同时到堂，王延龄不能辨，遂将此案交包拯审理。此时，五鼠精复变假包拯等人相扰。包拯请来李天王降妖，白鼠精逃走。李万春当年扮演白鼠精有绝活儿。此剧内容也是虚构的。

后来，一级编剧肖方根据《五花洞》和《闹东京》的故事，编写出《新五花洞》一剧，由女武生裴艳玲扮主角玉猫神，赴中国香港演出引起轰动。《五花洞》为早年名伶胡喜禄创作，乃早期以潘金莲为题材的“荒诞戏”。裴艳玲主演的《新五花洞》，将原《五花洞》中捉拿妖精的大法官（头牌武生应工），变成了玉猫神；原五毒精幻化的潘金莲，改为以假武大郎为首的五个千年鼠精；原真假县官吴大炮，则改为真假包拯。此剧将“猫捉老鼠”神话化，赋予了古老传说新的生命，浪漫结合现实，讽世之作也。

明代故事戏《十五贯》，是观众熟知的一出“清官平冤”戏。剧情起伏跌宕，故事的发展始终与“鼠”有直接关系，不仅“鼠衔毒饼”成为

剧情发展的导火线，而且剧中丑角扮的窃贼，名字就叫“娄阿鼠”。20世纪50年代中期，江苏省昆剧院演出的《十五贯》曾轰动京华，况钟这一“清官”形象，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而况钟的“笔”（斩与赦，就在这一笔画不画），又成为秉公执法的利剑，为世人传颂。

这出戏的原型见宋人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中的《错斩崔宁》，明代冯梦龙将其编入《醒世恒言》，取名《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后又结合《后汉书》汝南李敬的事，由清初的朱素臣作成传奇《十五贯》，最早由贾洪林编成京剧，富连成科班演出。钱静方的《小说丛考》上称：“《十五贯》不必真有其事，然况太守固确有其人，盖明初循吏。”俞越的《春在堂随笔》上说：“事在南宋，非明时也。疑自宋相传有十五贯冤狱。后人改易其本末，附会作况钟太守事尔。”况钟（1383～1443）是江西省靖安人，1430年任苏州知府期间严惩贪官污吏，抑制豪强，卓有政绩。“十五贯”案件由他处理，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文武兼演说“牛戏”

京剧中的“牛戏”，或人名嵌“牛”，或地名嵌“牛”，即使有真牛作角色，也是以马鞭代之。然而也有例外，1935年的一天，有个剧团在天津中央戏院演出《牛郎织女》时，闹了个大笑话。这出戏演的是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牛郎牵牛，是剧情的需要。按通常演法，牛郎上场持一马鞭即可，可是这个剧团为了招徕观众，竟别出心裁地把一头真牛牵上舞台。那头牛平时没有受过舞台训练，一上台便被“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惊吓，满台乱蹿，屙屎遗尿，出尽了洋相。另一个剧团演《牛郎织女》，也搞过“真牛上台”，不过那牛平时训练有素，似通“人性”，当牛郎唱罢“老牛真听话，不用呼唤”时，那牛便踩着台步，直奔下场门而去，观众一片喝彩声。

《牛郎织女》只是一个神话传说，没有什么史实根据。这出戏过去演出很多，戏中的金牛星一角，一向由花脸扮，早年郝寿臣、裘盛戎演此角都影响颇大。郝寿臣身躯高大，面带忠厚，以“憨气”取胜；而裘盛戎则以“神气”见长，他驾风前往时，搬起“朝天蹬”，三起三落，功力惊人。

传统剧目中有一出小旦、小丑的“对儿戏”，名叫《小放牛》，一般唱“山歌”调。此剧朝代不明，自然不是历史事实。该剧说的是一个村姑，一个牧童，两小无猜，放牛时二人互出题目，一问一答，兴尽而别。二人对唱的词很好听，如“天上的婆罗什么人栽，地上的黄河什么人开……”向观众传播了一些神话传说知识。这是早年名伶筱翠花的拿手好戏，他演村姑，名丑马福禄演牧童，一对名角，红极一时。这也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宋德珠的代表剧目。宋德珠早年在中华戏校学戏，毕业后挑班，中国京剧戏班的“武旦”挑班自他始。

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去世，生前供职于河北省京剧团，“文革”后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宋先生早年扮的村姑玲珑活泼、天真可人，

走“圆场”时上不晃膀、下不露足，虽疾步如飞，却稳若湖中泛舟。对比现在有些歌舞团演《荷花舞》，虽也看不见迈步，但那脚下却是靠一个圆形荷叶来遮挡，与宋先生的表演不可同日而语。

有趣的是，《小放牛》中一问一答的形式被后人继承下来，人物不变，重新填词，为时事所用。20世纪40年代初，有人编演了一出以抗日战争为内容的《小放牛》，唱词改为：“什么人觊觎东三省，哪一天占了北大营？谁在卢沟桥前开了炮，谁在吴淞口外动刀兵？”以此激励万千爱国志士奔赴沙场，起到了战争动员的作用。

剧名中嵌“牛”字的剧目不下几十出，观众熟知的有《牛马栏》《牛头山》《牛脾山》《牛皋下书》《牛皋擒兀术》《卧牛山》《金牛关》《火牛阵》等。剧中人物牛皋、牛魔王等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名角中牛姓者，有晋剧表演艺术家牛桂英、豫剧名丑牛得草等。旧时富连成京剧科班的创办人也姓牛，名子厚，培养演员很有经验。

在林林总总的京剧剧目中，最富“牛气”的要数《火牛阵》。这是一出老生、小生（还要反串旦角）、花脸、小丑都很吃功的大戏。该戏表现的是春秋时期燕昭王用乐毅为师伐齐，连破齐国七十余城，齐国的田单与田法章被冲散。田单据守即墨（今山东省即墨市），先用反间计，使燕以骑劫替回乐毅，后用“火牛阵”大破燕兵，恢复了齐国。剧中的“火牛阵”场面极为壮观。田单征牛无数，命士卒在牛角上缚以利刃，牛尾处绑上柴草、火药，牛身上画上五彩斑斓、千奇百态的恐怖图案。在月黑风狂之夜，一声令下，将牛尾上的柴草、火药点燃。刹那间火光四射、响震田野。牛群受惊，发疯似的向敌营迅跑，燕国兵将被惊吓而死，田单得复齐国。在齐国故都山东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至今还流传着“火牛阵”的传说，并留有遗迹。

这出戏有历史根据，田法章的事在《战国策》中有记载；戏中的乐毅，更是史有其人，《史记》中有《乐毅列传》。关于田单破燕的

故事，《史记·田单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虎戏”撷趣

京剧中与“虎”有关的剧目，计有二十多出，剧名中嵌“虎”字者居多。这类戏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虎”字嵌入剧名中作地名用，如传统戏《卧虎关》《虎牢山》《三江越虎城》《牧虎关》《恶虎村》《独虎营》《虎丘山》《虎啸山》《白虎关》《白虎堂》，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等。二是作道具用，如《玉虎坠》《龙虎玉》《虎头牌》《虎狼弹》《虎符救赵》等。三是作人名或喻人用，如《斩熊虎》《胭脂虎》《五虎平西》《龙虎斗》等。四是指真虎，如《飞虎山》《神虎报》《武松打虎》《虎乳飞仙传》《猎虎记》等。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剧名中不带“虎”字，但剧情里有真虎出现，如《除三害》《宝莲灯》等。

地名、道具、人名中有“虎”字的“虎戏”，“虎”只是个“符号”；最有趣的当属剧中出现“真虎”（称“虎形”）。

观众最熟悉的《武松打虎》，是有名的宋代故事戏。该剧演武松去阳谷县（今山东省阳谷县）寻兄，途经景阳冈，至店中饮酒。酒醉后欲上冈赶路，酒家告以冈上有虎，劝勿行。武松拒劝，上冈果遇虎，遂与之搏斗，打死猛虎，为民除了害，猎户带武松至官府领赏。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主要是看“打虎”时的武功表演。《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景阳冈武松打虎，说道：“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舞台上的武松“打虎”一节，都要按照小说中的描绘，将“虎形”的“一扑、一掀、一剪”准确地表现出来，武松按这三个层次与之捕斗，表演相当精妙，并富有生活气息。

在这出戏中，一般都是短打武生扮武松。早年名伶张瑞云、陈桂宝扮武松很有名，随后的盖叫天、李万春扮武松更是红极一时。盖叫天是河北省高阳县西演村人，自幼习艺，功深艺精，饮誉南北，他是京剧界有名的短打武生，以演“武松戏”著称。他演“打虎”，与“虎形”的翻打扑跌精妙绝伦，成为《武松打虎》表演的“经典”。陈毅曾写诗赞誉盖叫天是“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除三害》中周处觉悟后上山杀虎，《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虽无真虎出现，但“虎”却是不可缺少的“剧中人”。至于《宝莲灯》中沉香在劈山救母途中，顷闻虎啸山林，便勇敢机智地将从“山”上“滑”下的“虎形”捉而食之，更为真实有趣。女武生裴艳玲扮沉香，在剧坛独树一帜，捉食“虎形”时，用韵白一声呐喊：“我将它吞吃了罢！”令观众叫绝。

从《嫦娥奔月》说到“兔戏”

“虎年”岁尾，第五届河北省戏剧节开幕，在全省戏剧舞台上演出了二十七台大戏，其中由杨晓利编剧、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新编神话剧《嫦娥奔月》颇为引人注目。这出戏表现的是：远古时妖兽横行，后羿为解救人间苦难，开弓射除九个太阳，惹怒天帝，赐丹丸令寒宫思过。嫦娥为让后羿留驻人间，自己吞吃丹丸奔向月宫。

这是一个伤筋动骨的“旧剧新编”。《嫦娥奔月》的故事古已有之，源于神话传说，最早出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著的《淮南子》（又叫《淮南鸿烈》）和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1915年梅兰芳据此改编成京剧《嫦娥奔月》，1957年杜近芳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主演此剧获奖。“梅本”《嫦娥奔月》演的是后羿得不死之药，其妻嫦娥偷吃后飞入月宫。从剧情看，后羿追至月宫，被吴刚率玉兔击退，从此嫦娥受王母之命，掌理月宫。这只是沿袭神话传说的俗套。杨晓利的新编本，以坚贞的爱情与博大的胸怀为主旨，没有简单停留在原传说中的“奔月”上，而是着意开掘“人的存在价值”这一深刻主题，戏文主题得以升华，显示出深邃的内涵。

因为在《嫦娥奔月》中，有“兔儿爷”和“兔儿奶奶”出场（里子角色），人们在谈“生肖戏”时，将其归为“兔戏”。

从戏文故事的时间看，源于《淮南子》的《嫦娥奔月》是最早的“兔戏”，此后的“兔戏”在舞台上也多有展现。“兔戏”适逢“兔年”演出，更增添了一种节庆气氛。

比如清代的《天香庆节》。此剧出自清宫升平署（清宫演戏的机构）昆弋本，由号称“通天教主”的内廷供奉王瑶卿改编，王还在剧中扮演玉兔一角，1914年在清宫献演。该戏演玉兔幻化女身下界，乌金羡慕玉兔之美貌暗随而至。乌金托赤兔为媒向玉兔求婚，玉兔不允，

又不便直言，遂以索要聘礼为由而故意拖延。后来，赤兔向玉兔求爱反而成婚。乌金闻之大怒，遂攻打玉兔和赤兔。此剧内容虽然演的是爱情纠葛，有点儿像当今“第三者插足”的味道，但其喜剧风格和精彩的武打场面却着实令人称道。

真正在剧名中嵌入“兔”字的，是表现五代故事的《白兔记》。该剧为元末明初“南戏”四大本之一，出自元人《刘知远白兔记》，演的是刘知远、李三娘与咬脐郎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未得志时，与李三娘结婚，但三娘之兄李洪义及嫂欲加害刘知远。刘知远赴彬州从军后，兄嫂逼三娘改嫁未果，遂令其推磨、汲水，三娘苦受折磨。一日，三娘在磨房产子，命名“咬脐郎”，却被嫂夺走投入河中，幸被窦老救生，送至彬州刘知远处。后来，刘知远以军功拜节度使，咬脐郎亦长大。有一次咬脐郎出猎，因追击一只白兔在井台与三娘相会，三娘让咬脐郎捎书信一封送刘知远。刘知远见书，回家与三娘团圆，并擒获李洪义夫妇。此剧取名《白兔记》，就是因为一只白兔令一家人大团圆的缘故。后来，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将《白兔记》更名为《李三娘》，成为“尚派”早期代表剧目。河北梆子演出此剧时，剧名为《李三娘打水》。

刘知远，史有其人，他生于895年，卒于948年，是五代时后汉的建立者，庙号汉高祖。历史上他确有战功，出任过河东节度使。李三娘也可看作史有其人。刘知远、李三娘二人的情况在《旧五代史·汉书·后妃列传》中有简单记载：“高祖（刘知远）皇后李氏，晋阳人也。高祖微（落魄）时，尝牧马于晋阳别墅，因夜入其家，劫而取之。及高祖领藩镇，封（李氏为）魏夫人。”但是，戏的内容是虚构的。

京剧和某些地方戏中，还有一些表现“行围射猎”的剧目，如三国故事戏《铁笼山》，清代故事戏《连环套》，虽然称不上“兔戏”，但舞台上时有“兔形”“虎形”“豹形”“鹿形”出现。当然，有些剧团演出时，将这些“兽形”作幕后处理，不再出场了。

历史悠久的“龙戏”

按时间说，最早的“龙戏”当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代故事戏《陈塘关》，即观众熟知的《哪吒闹海》。此剧取材于长篇小说《封神演义》。这是神话故事，不见正史。剧演陈塘关守将李靖生子哪吒，哪吒见龙王水淹百姓，便闹海打死水族及龙王太子。龙王加害哪吒，李靖责子，哪吒割肉还父而死。太乙真人用莲花化身使之复活，后哪吒寻父报仇，燃灯道人赠李靖金塔，解其父子嫌怨。此剧是武生戏，为早年小荣椿班编演。河北梆子、秦腔、徽剧、川剧都有此剧目。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女武生裴艳玲自1986年起，多次率团赴中国香港演出此剧，曾博得香港观众的极高评价。

稍晚一些的“龙戏”，是演周代故事的《龙门山》和演汉代故事的《凤换龙》。

《龙门山》表现的是春秋时晋惠公当朝之际，境内灾荒，秦穆公把粮食借给晋国；后秦遇荒年，向晋索要原借之粮，晋忘恩负义，拒付。秦穆公大怒，率兵讨伐，两军战于龙门山，晋军大败，秦俘虏了晋国君臣。此剧内容有史据。《左传》载：“僖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壬戌，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

《凤换龙》又名《龙换凤》或《反八卦》，演王莽篡政时换太子的故事，有点儿像宋代故事戏《狸猫换太子》的剧情。戏文表现王莽杀死汉平帝后，当时汉皇后身怀六甲，王莽欲害死婴儿，斩草除根。大夫徐世英占卜皇后生男孩，上大夫蔡伯钦说生女孩。二人谁也不服谁就打赌，并定下规则：徐世英若输，贬官；蔡伯钦要输，斩人头。皇后果真生了男孩。蔡伯钦眼看自己的头要落地，急忙想对策。恰好当时蔡伯钦之妻生一女孩，蔡遂将自己的女孩换了汉皇后生的男孩，携男孩到处躲藏，王莽多次搜不到。后真武大帝因蔡、徐二人是龟蛇

转世，下界收服二人，太子脱险。这是一出虚构的剧目，戏的后半部又出现了神话内容。《汉书》中的《平帝纪》《王莽传》《元后纪》，都没有王莽杀平帝的事。周信芳演出此剧扮演上大夫蔡伯钦，海阔龙腾，神采非凡。

至于取材于《三国演义》的《龙凤呈祥》，更是京剧名家们的拿手好戏。当年，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曾同台义演此剧，传为梨园佳话，成为“龙戏”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出。

这里说的“龙戏”，并非真龙出现，而是在诸多“龙戏”中将“龙”字嵌在剧名里，表达不同的意思，大致可分为四类：

其一，将“龙”比作皇帝、太子。如《遇龙封宫》《游龙戏凤》，演的是明代皇帝的故事，为“言（菊朋）派”代表剧目；《双保龙》演晋章帝事；《打龙袍》则是演宋朝皇帝宋仁宗的故事，戏中包拯是主角，这是一出著名的“黑头戏”，为裘盛戎代表剧目。

其二，将“龙”喻为武将。如《龙虎斗》《五龙斗》《五龙捧圣》等。

其三，将“龙”作地名或人名用。如《二龙山》《遇龙镇》《红龙涧》《三搜卧龙岗》《九龙峪》《乌龙院》《龙女牧羊》《龙马姻缘》等。

其四，作剧中道具名用。如《龙凤旗》《龙凤巾》《龙凤锁》《龙凤玉》《串龙珠》《九龙杯》等。

惩恶扬善说“蛇戏”

京剧中的“蛇戏”不多，仅有几出，最有名的是人人熟知的《白蛇传》。

《白蛇传》是一出朝代不明的神话戏。既是神话，当然就不是历史。演全出或单折还有《白娘子》《游湖借伞》《钱塘县》《盗仙草》《盗库》《金山寺》《断桥》《合钵》《祭塔》等剧名。这是一出流传很广的神话传说剧目，表现青、白二蛇精（小青与白素贞）下山修炼游西湖，白素贞与许仙一见钟情，结为夫妻。金山寺僧人法海破坏二人婚姻，酒致白素贞现蛇形，许仙受惊昏厥，后白为之上山盗仙草，救活许仙。许仙受法海教唆，逃至金山寺参禅。白与青赴至金山寻许，却被法海拘禁。白无奈，搬水族水漫金山，因腹胎阵痛，败走断桥。此时许仙逃出金山，在断桥与白相遇。经一番风波，夫妻和好如初。不料白产子时，法海又率兵至，将白压于雷峰塔下。小青请来三山五岳众神，烧毁雷峰塔，救出白素贞。此剧由田汉于1947年改编，后又修改。许多著名旦角都演过白素贞。旧时演出此剧，白素贞酒后现蛇形，真有一条大“蛇形”从帐帷中探出，阴森可怖。前些年拍摄的电影戏曲片《白蛇传》（李炳淑饰白素贞），也是这样处理的。

“四小名旦”之一的宋德珠在《金山寺》中扮小青，影响颇广，至今许多扮小青者，仍宗宋。

宋代故事戏《童女斩蛇》，源自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梅兰芳编演，后改为清装。这出戏演的是除暴安良的故事，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剧情有点像周代故事戏《河伯娶妇》，即观众熟知的西门豹当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县令时惩治巫婆的故事。这个戏中的何道姑，就很像《河伯娶妇》中的巫婆。此剧情节是：山西静乐县何道姑见长蛇，假称金龙大王下界，向商户诈财，建造庙宇；又假托大王生辰，用童女祭赛（赛，旧时祭祀酬神之称），致使九个女童被害。女

子奇娥也被指派祭赛，她坦然愿往，暗与何道姑之女徒慕贞结识，探明阴谋，二人设计引蛇出洞，奇娥斩蛇，至县衙首告，真相大白。后县衙斩何道姑，并将大王庙产权判归奇娥，以酬其功。这是一出惩恶扬善的剧目，当年梅兰芳扮奇娥一角影响很大。此剧后来少有演出。

有趣的“马戏”

在旧传“三千八百出”之多的京剧剧目中，“马戏”比比皆是。大凡武戏，或长靠或短打，只要涉及战事，一般均有战马出场。当然，舞台上的马，均是用马鞭代之。

从剧目看，凡剧名中出现“马”字的，不下二十出。

一类是直接表现“马”的。这类戏，最早的是西汉故事戏《马前泼水》。这出戏表现的是真人真事，只是有些情节，戏与史有区别。戏演朱买臣家境贫寒，其妻崔氏逼朱写具休书，自改嫁泥水匠张三。朱发奋苦读，中试为会稽太守。朱赴任之日，崔氏恰被张三遗弃，沦为丐妇。崔迎朱马前，要求收留。朱乃取盆水泼于马前，令崔将水收于盆内，方允收留。崔羞愧撞死。此剧又名《买臣休妻》，由近代名伶汪笑侬编演。这类剧中直接出现“马”的剧目，还有演秦琼的隋唐故事戏《当锏卖马》，演梨花与薛丁山阵前姻缘的《马上缘》，宋代故事戏《孟良盗马》，崔孝亦救驾赵构的《泥马渡康王》，杨八姐偕焦光普回三关的《挡马》，以及明代故事戏《贩马记》《千里驹》，清代故事戏《窦尔敦盗御马》等。

《泥马渡康王》这出戏很有意思，演的是康王赵构留质金营，兀术认为养子。宋代州总管崔孝亦流落金营，以治马为名，赴五国城见徽、钦二帝，以血诏暗付赵构，并借射鸟的机会，使赵构逃回中原。兀术闻知追赶，大江阻路。紧急中，泥马渡赵构过江，即位于南京。这个故事，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宋史·高宗本纪》载：“肃王至军中，许割三阵地，进邦昌为宰，留质军中，帝始得还。”《南渡录》中有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康王质于金，与太子同射，三矢俱中，以为此必拣选宗室之长于武艺者冒名为此，留之无益，遣还，换其太子来。高宗（赵构）得逸，奔窜疲困，假寐于崔府君庙，梦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已备马于门首。’康王惊，马已在侧，霜蹄雾鬣翘立，

跃马南驰。既渡河，马不复动，视之则泥马也。”后边这段描述，只是赵构梦境中的幻象，不是史实，因为泥马不可能渡江。

再一类是人名嵌入剧名之中，“马”为姓氏。诸如：演曹操施计将马腾等四人擒杀的三国故事戏《斩马腾》；演勇士马芳率部进逼京师的明代故事戏《马芳围城》；演盐贩张文祥刺杀霸占其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故事的《张文祥刺马》（此剧演的是清代实事）。还有演航海家马骏与龙女杀蛟缔姻的清代戏《龙马姻缘》，以及取材于《聊斋志异》卷十的《马介甫》等。

还有一类是剧名中的“马”字作地名用。这类戏，首推《马鞍山》，从时间上看，《马鞍山》堪称“马戏”之最。剧演周代晋大夫俞伯牙出使楚国，舟行至马鞍山，通过抚琴与樵夫钟子期结交的故事。这类戏中，还有演李白痛骂安禄山的唐代故事戏《金马门》，玄宗忍痛缢死杨玉环的唐代戏《马嵬坡》，演济公故事的宋代戏《马家湖》，取材于《施公案》表现施世纶和黄天霸故事的清代戏《落马湖》等。

慈禧忌“羊戏”

京剧中与“羊”有关的剧目，姑称“羊戏”。这类戏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直接表现羊的。最早的是汉代故事戏《苏武牧羊》。剧演苏武出使匈奴，匈奴王单于逼苏武降，苏武宁死不屈，被放逐北海牧羊，十五年后归汉。苏武史有其人，这出戏的基本史料，出自《汉书·苏建传》中所附的《苏武传》，但也有许多虚构。隋唐故事戏《龙女牧羊》和《牧羊卷》，也属此类。《龙女牧羊》演洞庭龙王之女三娘被谪放河滨牧羊，引出与书生柳毅悲悲喜喜的故事。戏的故事出自唐代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不是历史。戏曲通过神话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痛苦，故事情节曲折。《牧羊卷》演朱春登之母和妻子被其婶母逼至山中牧羊，是出悲喜剧。另一出宋代故事戏《变羊记》，竟出现巫婆变羊的场面，非常有趣。

剧名中嵌入“羊”字，作人名用，是第二种情况。这类戏中如周代故事戏《羊角哀》，取材于《东周列国志》的《乐羊子食肉》，故事曲折动人，情节起伏跌宕。《羊角哀》一剧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关中流寓志》上记述：“羊角哀与左伯桃闻楚王贤，往归之，道经岐阳，遇雪，度不能俱生，（左伯桃）乃并衣与角哀，伯桃入树（林）死。羊角哀至楚为上大夫，（楚）王备礼葬伯桃，角哀自杀以殉。”

第三种情况是剧名中的“羊”字作地名用。如演李世民的唐代故事戏《牧羊城》，演杨家将的宋代故事戏《红羊塔》《洪羊洞》（谭鑫培代表作）等均是。《红羊塔》《洪羊洞》，出自《杨家将》一书，不是历史。

还有一种情况，剧名中的“羊”字是剧中的道具。如宋代故事戏《羚羊锁》，元代故事戏《羊肚汤》（即《窦娥冤》）等。至于清代

故事戏《木羊阵》，更是把“道具羊”用于战事了。“木羊阵”是一种战术，此戏出自《彭公案》，不是历史。

其实，剧名中嵌入“羊”字，作人名也好，作地名也罢，乃至说的是真羊，观众都不会介意，因为观众是看戏，看演员的表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慈禧太后来说，“羊”却是一生大忌。因她生于1835年，属羊，故而将“羊”列为宫廷忌字。她“听政”四十余载，颇爱看戏，不仅戏中不许带“羊”字，就连剧名中有“羊”的剧目，也禁止在宫廷演出。据说，同治年间，河北梆子名伶十三旦（侯俊山）在宫里侍演《玉堂春》，苏三“会审”前有一句唱：“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慈禧一听大怒，立即命令停戏，并要严惩伶人。后经大太监李莲英再三讲情，才得以幸免。从那时起，宫里再唱《玉堂春》，便将这句唱词改为“我好比鱼儿入网有去无还”，避开了“羊”字。至今，许多剧团演此剧仍是唱“鱼儿入网”。近年听“荀派”名旦孙毓敏唱《玉堂春》，毅然改回“羊入虎口”，感到她很明智。因为，现在没必要忌“羊”了。

久演不衰的“猴戏”

在京剧舞台上，“猴戏”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以演“猴戏”著称的名家更是不乏其人。“猴戏”权威杨小楼、“南猴王”郑法祥及其父郑长泰、“赛活猴”尹凤鸣以及李万春演的“猴戏”，在中国京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猴戏”基本上都是演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不是历史。

第一个出国演出的“猴王”是郑法祥。郑法祥是河北省故城县人，自幼在上海随父郑长泰（时被誉为“赛活猴”）学戏。他在与名伶李春来、周信芳配戏的过程中，艺事进展极快，由三路武生逐步升为二路武生，中年终于成名。郑法祥在从艺活动中，潜心钻研“猴戏”，不囿于家传，时常观摩杨小楼、盖叫天等名家演出，广采博撷，从而创立了“新郑派”猴戏，以丰富多彩的剧目和大气磅礴的风格驰誉江南。郑法祥演的“猴戏”，创造了不同于他人的身法、手法、步法、棒法、唱念做功以及扮相。单就身法讲，他把孙悟空的体形概括为八点，即含胸、拔背、抱肩、弓腰、吸臀、拢胯、屈腿、藏裆。含胸，胸部往里佝，无论什么动作不能过于挺胸；拔背，把背显出来，“落似龟背，起似熊背”；抱肩，两肩往里抱；弓腰，不是折腰，要躬得圆；吸臀，走身段、亮相，小肚子提气，腰往上长，不使臀部露出；拢胯，让胯骨往里集拢；屈腿，行动坐卧腿不能伸直，把膝弯曲一点儿；藏裆，高相、矮相时，见裆不露裆。1926年，郑法祥偕小杨月楼、尹九霄等南方名家，赴日本东京演出，在日本演出了他的代表剧目《金刀阵》《水帘洞》《闹天宫》。他把京剧艺术中的精品——“猴戏”，首次带到国外。

清代“武生泰斗”杨小楼扮演的孙悟空，勾脸形象逼真，动作灵敏，舞棒圆熟，武打精到，真像一只活猴子跳跃于舞台上，攀越腾跃似有出入风云之感，故杨小楼有“杨猴子”之称。

京剧、绍剧中出过不少“美猴王”“赛活猴”，而越剧中的“女猴王”却鲜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越剧界确实出了一位“女猴王”，她叫商芳臣。

1935年，以越剧名旦赵瑞花为主的宁波瑞云舞台，从上海请来越剧编导李小楼，排演连台本戏《唐僧出世》，剧中“猴王”由老生商芳臣扮演。商芳臣嗓音洪亮，功底扎实，戏路较宽。她演“猴戏”的扮相与众不同：化妆上，不画脸谱，采用俊扮；服饰上，头戴一顶圆形和尚帽，身着一件绣花半长褶子，脚蹬一双白布长袜和一双和尚鞋。她一出场就气度不凡，跌打翻扑灵活敏捷，挥舞铜棒呼呼生风，那步法、手势、眼神、面部表情，一招一式无不表现出仙猴的幽默，其诙谐之神情誉满剧坛，风靡一时。商芳臣在《唐僧出世》和续本《大唐历史》《唐僧取经》中饰孙悟空一角，从1935年演到1937年，上座率始终不衰。

不多见的“鸡戏”

在众多京剧剧目中，只有几出与“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这几出戏大致分为四类情况。

一类是剧名中出现“鸡”字，但戏里并没有鸡，“鸡”字只是作为地名用。如殷代故事戏《金鸡岭》，演周武王伐纣，纣王命孔宣在金鸡岭抵御的故事。这出戏出自《封神演义》，不是历史，历史上不会有由孔雀修炼而来的孔宣。五代故事戏《鸡宝山》，演史彦唐、高行周等随石敬瑭在狗鸡滩（又名狗家疃）合战王彦章的故事。这出戏出自《残唐五代史演义》，不是历史。清代故事戏《鸡鸣驿》（又名《迷人馆》），演宣化府九花娘桑氏擅长邪术，与母在鸡鸣驿开设醉仙楼诱惑少年的故事。这出戏出自《彭公案》，鸡鸣驿虽是河北省怀来县有名的古迹，但戏文不是历史。早年这出戏演出水平很高，据旧时报章载：文武花旦余玉琴擅演此剧。当时台高四尺，台下凹凸不平，演至徐胜追捕九花娘“男女跑台”一场，场上角色均需从台上翻下，再穿越客座疾跑，绕场一周，之后跳到舞台上。余玉琴扮演九花娘，脚上踩着“跷”，上下翻跌，极为矫健。

再一类是，剧名中的“鸡”字作人名用。如清代故事戏《铁公鸡》，演太平天国与清廷的曲折斗争，铁公鸡乃太平天国的一名勇将。这出戏一共十二本，常演的是前四本，后八本一般不演。因剧中有太平军张嘉祥假降清军而刺铁公鸡情节，故以“铁公鸡”为剧名。因其内容歪曲太平天国起义，所以此剧早已禁演。戏中的人物多实有其人，而情节是虚构的。尤其张嘉祥这个人，历史上他并未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他初为盗贼，道光二十九年（1849）降于清廷，与太平军为敌，后兵败，赴水淹死。

还有一类，虽然剧名中没有出现“鸡”字，但是鸡在剧中必不可少，甚至贯穿着全剧剧情。如观众熟知的《拾玉镯》，演傅朋与孙玉

姣的爱情故事，孙玉姣在剧中的“轰鸡”情节生活气息浓郁，表演神态逼真，犹如真鸡在场。

同时，在其他一些剧目中，唱念中时有“鸡”的内容出现，增添了诸多生活情趣。如《打渔杀家》中萧恩唱：“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还有现代京剧《龙江颂》中阿坚伯给江水英送鸡汤；《红嫂》中红嫂为亲人解放军熬鸡汤，都是非常感人的情节。《红嫂》表现的是解放战争时山东省沂蒙山战场上的军民关系，剧中红嫂有一段唱，讲为亲人解放军排长熬鸡汤，词写得很优美且诗意很浓：“点着了炉中火红光闪亮，一样的家务事非同往常。平日里只煮过粗茶淡饭，今日我为亲人细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石家庄市评剧院尚丽华演唱这个唱段时，第一句套用京剧的旋律，到第二句“非同往常”时，很自然地归韵评剧唱腔，非常好听。

别出心裁的真狗上台

京剧或一些地方戏中，有不少涉及狗的剧目，这些剧目姑且称之为“狗戏”。一般情况下，舞台上的狗均以“狗形”出现。“狗形”即演员扮演的狗。

最早的“狗戏”，当推反映周秦时代的剧目《闹朝扑犬》。本事见《东周列国志》，史迹载《左传》之“宣公二年”。戏演晋灵公时，楚国争霸，灵公命上卿赵盾之弟领兵伐崇，以要挟秦国合力御楚。是时，晋灵公宠信的屠岸贾，投其所好，建桃园诱灵公游戏，并以弹击行人取乐。赵盾闯园规谏，并殴辱屠，因而结怨。屠遂与灵公设计，召赵盾入宫，嗾使獒犬啮之。赵盾门客提弥明见状，即将獒犬杀死，护赵盾出走。此为“袍带戏”，又名《董孤笔》，提弥明与“狗形”的翻打跌扑颇见功力，早年李万春演此剧叫得很响。这是一出有史实根据的剧目，事件、人物都是真实的。

宋代神话故事戏《宝莲灯》，演士人刘彦昌与三圣母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遭到圣母之兄杨戬的挞伐。这戏没有历史根据，剧名中虽无“犬”字，但剧中有一条跟随杨戬的“哮天犬”，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狗形”，由短打武生扮，助杨戬盗取三圣母的宝莲灯，开打时翻打跌扑，非一般武生演员所能胜任。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刘小乐20世纪60年代扮“狗形”出演此剧，颇有功夫。

故事性很强的《人不如狗》，演的是山东施员外素日行善，从一僧人那里得知将有洪水为灾，他遂广造船只，以防洪水。后洪水果至，施员外救生多人。无赖王恩夫妇及一犬被救，后来，王恩却恩将仇报，串通江洋大盗欲害施员外一家。施无奈，欲往郊外寻死，被前所救之犬阻之。这是一出表现因果报应的戏，此剧本事见《包公案》，不是历史。

另一出《义犬记》，剧中的狗颇通人性，也很有意思。苏州阿大与扬州阿二，共盗一犬，欲杀而食之。商人将犬买下，劝二人改过。阿大不听，后被犬咬死。犬随商人归家后，一日商人携银两外出，误搭贼船，被推落江中，义犬将商人救回。此剧朝代不明，与史实无关。

早年还看过一出《杀狗劝妻》，又名《曹庄杀妻》。演的是曹庄之妻萧氏不贤，虐待婆母，曹庄不能忍耐，买来钢刀一把，佯称杀狗，实欲杀萧。萧跪地求饶，后全家和好。此剧朝代不明，也不是历史。

民国初年，上海武行名角李仁杰喂养的一条狗，能登台演戏。此狗腰长腿短，人称“板凳狗”。在头本《西游记》中，狗饰哮天犬，李天王派将时，它与众将一样规规矩矩地在台上“站门儿”，俨然天宫神犬。派将毕，在“三冲头”锣鼓声中，此狗每个“冲头”都按剧情大叫三声，且一次比一次声高。二本《西游记》中，有唐太宗魂游地府的情节，此时这条狗又充当看守地府的恶犬。当唐太宗被兄长李建成追逐时，狗为解太宗之危，在“急急风”锣鼓点中，疾速冲上去与唐太宗、李建成在舞台上“编辫子”，不仅锣鼓点儿踩得准，而且尺寸走得合适，完全符合剧情要求和动作规定。

无独有偶，20世纪30年代，关东著名老生演员唐韵笙特别训练了一条狼狗，取名“吉利”，此狗竟也能作为演员上台演戏。此狗先是在《狗咬吕洞宾》里，随着锣鼓点儿，像真事儿一样前扑后咬唐韵笙扮演的吕洞宾，吕进狗退，吕行狗追，引得观众大笑不已。此狗后又在《十二真人战玄坛》里，充当二郎神的哮天犬，它与剧中赵公明的黑虎对阵，真狗与扮演“虎形”的演员邱盛华翻腾蹿跳，斗智斗勇，配合默契而有趣，令观众大为开心。

京剧中还有一出《苴镇义犬》，按南通（今江苏省南通市）一实事编剧，据传1926年冬曾在上海新舞台演出，也是表现通人性之义犬

的。此剧后来一直没有见过演出。

戏事杂陈

xi shi za chen

京剧科班富连成

北京的京剧科班，从嘉庆年间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其中历时最久者，当属叶春善主持的富连成科班。

富连成的前身是喜连成，喜连成的原名叫喜连升，科班的第一个字由喜改成富，是因为中途换了东家，其中尚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叶春善本系老生演员，1904年元月应牛子厚之邀赴吉林演唱，因忽患嗓哑而管理后台事务。牛氏见其精明干练，遂决意与之共办科班。不料适逢日俄战争爆发，吉林市民惶悚不安，娱乐场所纷纷停业，二人不违初衷，遂议定在北京筹办科班。

牛子厚是位企业家，他在吉林开设保升堂药铺，在北京开设源升庆汇票庄，企业名称皆有象征吉祥的“升”字，故所办科班则曰“喜连升”。

创办喜连升科班，初期所花经费仅三百两白银，在琉璃厂西南园租了一所三合房即告成立。

科班内的经费开支，由源升庆汇票庄随时支付，实报实销。科班业务则由叶春善全权主持。

因教授得法，一年后即应小型堂会，四年后即在广和楼（后来的广和剧场）正式演出，并更名为“喜连成”。

喜连成科班一出台，便是“挑帘红”，深受各界观众好评。除本科学生外，搭班的好角儿有梅兰芳、周信芳、林树森等，颇能叫座儿，戏班在光绪、慈禧国丧期间，曾停演百余日，继续演出后益发蒸蒸日上，遂在京城享有盛名。

牛子厚虽然将其精力主要用于企业上，但是对科班所招学生必亲

自甄别，对不宜学戏者则劝其退学，以免误人子弟，其培养戏剧人才抱定少而精原则，加以叶氏教学计划周密，方法得当，故成效极为显著。

民国初年，牛子厚因科班中之好角儿陆续脱离、营业不振而无意继续经营，遂将喜连成科班转给实力雄厚的外馆沈家。

沈家在安定门外所经营的外馆，主要业务是放款给蒙古王公，靠丰厚的利息收入而成为北京有名的富豪。沈家接管后，将喜连成改名为富连成，除投资并派一名会计管账外，其他一概不过问，科班事务及戏馆营业，仍由叶春善独掌。

沈家分家后，科班归沈七爷（秀水）所有，世字辈即将出科时，戏班又从沈秀水手中转给叶春善，叶氏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班主。1935年冬，叶春善病故，科班由其长子叶龙章任社长，而实际负责者则是其三子叶盛章。1943年叶氏兄弟分家，科班由其次子叶荫章接管，因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加之敌伪时期百业凋敝，遂于1946年停办。

富连成科班历时四十二年，共办了七科，学生分别以喜、连、富、盛、世、元、韵排名，共七百余人，是近代历时最久、培养人才最多的一个京剧科班。著名演员雷喜福、侯喜瑞、马连长、筱翠花、谭福英、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毛世来等均出身于此。

中华戏校和“四块玉”

李和曾是前“中华戏剧学校”的学员，是“和”字辈的，同王和霖同科，当年戏剧学校的情况颇有可忆者，不过这也都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

在过去，培养京剧演员只有“科班”，没有学校，如早期的喜连成，稍后的富连成，以及尚小云办的荣春社，教授方法都是比较老式的，而且出科成为名角，要有相当长的时期，所以有“三年出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个戏子”的谚语。在20世纪20年代末，程砚秋和不少名流，筹建了一所戏剧学校——“北平戏剧学校”，想用较新式的教育方式来培养一些京剧演员，还请了陈墨香、齐如山等人为教习。其实说是新式教育，在教法上也还同科班差不了多少，只是要上一些新式文化课，另外除招男学员之外，还招一些女学员。不过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以“学校”为名培养京剧演员的机构，和老式的科班究竟是有差别的。老科班师傅教戏，通常以打为主，尤其是对家中穷苦、不付膳费的徒弟，更是动辄就打，戏剧学校基本上革除了这一陋规。

戏剧学校一共办了五期，按字排辈是“德、和、金、玉、永”五科，成绩办得较好，在这五科中，生、旦、净、末、丑都出了不少名角。“德”字辈中，当年较知名的有傅德威、宋德珠等，宋德珠矫工好，那时是很出名的“刀马旦”，和李世芳、毛世来等被誉为“四小名旦”。“和”字辈有王和霖、李和曾等，王和霖小时极像马连良，可惜倒嗓之后一蹶不振，再无法唱戏了。“金”字辈则有武生王金璐、沈金波等。“永”字辈中有一青衣陈永玲，也很不错。

谈到“玉”字辈，就不能不提到当时就有“四块玉”之称的李玉茹、侯玉兰、李玉芝、白玉薇。

其中，侯玉兰宗程，在戏校学艺时，就以《王宝钏》《孔雀东南

飞》等戏蜚声京华，但舞台生涯似不太长。白玉薇、李玉芝均以花旦见长。李玉茹则青衣、花旦、刀马旦皆称擅长，舞台生命也最长。据报载，前两年她还以行将六十之年，率剧团自上海赴德国等国演出，所到之处，皆享盛誉。

李玉茹聪慧机敏，戏路很广。她文武昆乱不挡，梅程荀尚皆能，唱念做打，学谁像谁。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她专攻哪行，最擅何派。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花旦和刀马旦。扮演《拾玉镯》中的孙玉姣，《鸿銮禧》中的金玉奴，《花田八错》里的丫環时，李玉茹一副小儿女态，出口便是荀腔，讨喜得很。

她曾与童芷苓同台演出《樊江关》，童饰樊梨花，她饰薛金莲，嫂子持重，小姑娇憨，姑嫂斗口、比剑，各尽所长而又配合默契。

这戏里，姑嫂各有一个中军，以樊江关主帅樊梨花发酒肉犒赏友军为由头，二中军闹了不少笑话，有不少出色的表演，是这出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一个中军，忆似上海戏校毕业生名丑孙正阳扮演，为姑嫂比剑做了很好的帮衬。

印象很深的一次是看李玉茹的《破洪州》，剧情是穆桂英嫁杨宗保，投宋以后与番邦的一场大战。“戏”就出在元帅穆桂英与先锋杨宗保这小两口的纠葛上。夫权思想严重的杨宗保犯了军令，按律当斩。斩自然斩不得，至少要打，但穆桂英也舍不得，在将士面前又不能徇私包庇，真是难坏了也痛坏了穆桂英。

在这出戏中，李玉茹扎靠踩跷，很见功力。

天津稽古社子弟班

近见报载，京剧名净袁世海在天津演《连环套》，特邀张春华饰演朱光祖，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张春华幼年学艺于天津稽古社子弟班，1943年又拜著名武丑叶盛章为师，尽得乃师绝技，成为享名海内外的武丑演员。

稽古社戏班设于天津劝业场四楼的天华景戏院内，由劝业场场主高星桥之子高渤海经营。为培养京剧后继人才，1936年底，高又创办了稽古社子弟班，招收梨园行子弟，同时吸收了北平陈富康的“普庆社”和沈三玉的“光华社”两个戏班的一部分学生。这个子弟班既有北平富连成科班功底雄厚的长处，又有北平中华戏校男女同校兼重文化课的优点。它一成立，即引起京剧界的重视。

稽古社子弟班请京剧名宿尚和玉做名誉社长，尚的弟子娄廷玉为社长、韩富信为副社长。又请出身于富连成的各科人才做教师，如武生刘连喜，武净冯连恩、梁连柱和韩富信，武旦唐连诗，刀马旦方连元和邱富棠，二路武生兼花脸陈富康等。还增聘京剧名家萧长华、叶盛章、李吉瑞、叶德风、刘永奎、李兰亭和有“天津通天教主”之称的王云卿等人参加指导。为排演新戏，还请了一位匈牙利人巴罗泰担任舞蹈教练。

1937年2月起，稽古社子弟班开始在天华景戏院演出。每天日晚两场，日场以表演传统的老戏为主，开场是老生、花脸戏，然后是小武戏、小丑和花旦玩笑戏，中间是武生短打戏、老生和青衣的正工戏，大轴是武生和武净的合作戏。晚场则以新排的本戏作号召，他们请来上海的陈俊卿到津编新戏，所演新戏计有《西游记》《三国》《八仙得道》《乾坤斗法》《双烈女》《侠盗燕子李三》等，这些戏以灯光、布景和新颖的服装、道具吸引观众，很是叫座。

稽古社子弟班本有长期设想，以“华、承、稽、古、博、学、通、今”八个字作为各科学生的排行，但到1944年停办时，只培养出“华”“承”两班一百多名学生，其中较著名的“华”字班弟子有老生孙正华，红生李阁华、蔡宝华、李岭华，小生丁玉华，青衣花衫纪美华，青衣张秀华，武净刘武华、驾永华，架子花陈科华，文丑刘律华，武丑张春华等。“承”字班著名演员有青衣郗承鸾、武旦刘承鹤等。

1946年，孙立人的新一军附设的“鹰扬剧校”到平、津两地招生，因其缺少行头戏装，遂由高渤海将稽古社子弟班的全部戏箱，以六百万元的价格，售给鹰扬剧校。

旧时戏班话“班规”

旧时的戏班，都有严格的“班规”。班规内容包括演员、乐队人员、后台服务人员的职责范围以及道德规范等。当然，也有纪律、习俗、信仰和经济收支等方面的内容。

单从班规讲，京剧戏班就订有台上（演出）班规、后台班规、行当班规、经济班规以及前后台的禁忌班规等，有十项之多，俗称“十大班规”。其实，戏班的班规主要在于规范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生活中的行为。下面是“十大班规”的具体内容：

不坐班邀班，不见班辞班，不结党营私，不吃里扒外，不吃酒行凶，不吵骂伤人，不夜晚串铺，不夜不归宿，不阴人开搅，不临场推诿。这其中的“不阴人开搅”一条，还被订入演出规矩中。

什么是“不阴人开搅”呢？戏班规定，对舞台上规定的台词、动作等，已成规矩，演员上台之后，不得故意更改，随意增删，否则对方无法演出。有的演员上台后采取卑鄙手段，造成其他同台演员尴尬，便属于“阴人开搅”。记得有一次观剧，是武旦演员打出手，她的下手（投枪者）故意扔不到位，那武旦演员无法接枪，造成失误，招来观众一片喝倒彩声。后来方知，下手只因经济问题分配不公，故意使坏，这就是“阴人开搅”。

还有的琴师故意把弦定得很高或偏低，使演唱者不能正常演唱，这属于乐队的“阴人开搅”。有的演员上台后，故意改动台词，造成对方无法对答，那就更坏了。早年观剧，记得有一位净角演员（花脸）陪一位年老而落魄的须生演员唱《捉放曹》，那净角演员凭自己年轻、嗓子好，想在台上给那位须生演员弄个难堪，他上场后故意改动唱词。按《促放曹》这出戏的规矩，扮演曹操的净角演员上场后应该唱“八月中秋桂花香”，这时，那须生扮演的陈宫应接唱“行人路上马蹄

忙”。可是，那净角演员故意把上句唱改动一字，唱成“八月中秋桂花开”。虽是一字之改，却把“江洋”辙变成了“怀来”辙，那须生演员如果还按原来的词唱，必然招来倒彩。须生演员很有经验，他按照“怀来”辙，把唱词改为“行人路上打马来”，意思没变，辙口也对了，博得观众阵阵喝彩。

上述种种，都属于“阴人开搅”，是不道德的，违反了“班规”，自然要受处罚。

按旧戏班的规矩，生、旦、净、丑各行演员，从化装到表演都有固定的程式，丝毫不能混淆，就是坐下来休息，也有固定的地方。通常是文戏的老生、青衣坐大衣箱；武戏的武生、花旦坐二衣箱；其他人坐三衣箱。但是，不可坐两箱中间，因这是“老龙头”，坐这里是犯忌的（其实，根本原因是戏箱头上钉子多，怕剐破了戏装）。所谓“扮有扮相，坐有坐相”，大概由此而来。此外，打鼓的位置是不许别人坐的，据说这是皇上的位置，而三花脸却可以坐，因唐代的唐明皇就演三花脸。打梆子、敲锣的，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据说他们是太监，侍候人的。从这些规矩中，又可看到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痕迹和迷信色彩。

旧京老戏园子

北京早年演戏的场所，称为“戏园子”，因其性质类似茶馆，故又称“茶园”。清中叶以后，戏园子空前发展，如雨后春笋，分布于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六街三市，诸如前门外粮食店街的中和茶园、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内的吉祥茶园、崇文门外花市大街迤西的平乐茶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民国以后，茶园皆改称戏院或戏园，例如西长安街的长安戏院，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园等。

老戏园子一不贴海报，二不写戏名，只把当天所演大轴戏的“砌末”（传统戏曲所用简单布景和大小道具的统称）往门口一摆，观众即知演何戏，如大轴戏是《玉堂春》，即摆个鱼枷；是《打渔杀家》，即摆上船桨；是《艳阳楼》，即摆上石墩和石锁；是《铁冠园》，即摆上几个竹马。

戏园子的建筑与设备极其简陋，戏台面积充其量只有三十平方米，台的右后方即“下场门”的前面，名曰“九龙口”，是鼓师座位所在地，左为琴师，右为打大锣、小锣、铙钹者，五个人外加一个鼓架，便占了戏台三分之一的面积。演出时，两三位“检场”者（旧时戏曲舞台上的服务人员）频繁地出入搬置道具、撒放火彩、帮助演员更换服装，并给演员递送茶水和毛巾，拥挤、热闹而又可笑。

台下的面积亦不大，仅能容纳二三百人。在一根根的“明柱”之间，放置一条条长桌和长凳，因桌凳都竖向戏台摆放，观众只能侧着身看戏，且总不免要“吃柱子”（北京土语，言视线被柱子遮掩）。旧时一场演出中，从“帽儿戏”（亦称“开锣戏”）到“大轴戏”，长达四五个小时，侧着身看到底，脖子和腰扭得酸疼，但戏迷们乐此不疲，毫无怨言。

台下的服务人员号称“三行”：一行曰“茶房”，一行曰“手巾把”，

一行曰“小卖”。茶房负责沏茶续水，清洗茶具并打扫堂地，开戏后收茶资和小费。手巾把负责定时为观众送热毛巾，四个人在场内各站一方，相距三四丈，将几条烫手的热毛巾拧在一起，投过来掷过去，扔得准而接得稳，且不松散，其动作之迅捷、技巧之熟练、姿势之优美，可赛杂技表演，令满堂观众眼花缭乱；而台上的演员每每趁此观众视线转移的机会，接过检场者递送的小茶壶，撩起胡子饮茶。小卖脖子上挎着长方形的木盘，窜座位叫卖香烟、瓜子、糖果、蜜饯等，名角儿上场时叫卖最欢，观众听戏心切，只得破钞而购之。“三行”人皆有总管头目，其收入与戏园老板二八分成，老板除净得二成外，另收垫子钱、壶碗钱、笤帚钱。

旧日的戏园秩序极为混乱，有吸香烟的、抽水烟袋的、嗑瓜子的、吹口哨的、打榧子的、怪声叫好的，甚至还有斗殴或起哄捣乱砸戏园子的。故有权势或家道殷实者不轻易下戏园子听戏，而是将戏班请至家中办“堂会”。

老街深处古戏楼

说到北京的古戏楼，故宫的畅音阁、颐和园的大戏台，自然是富丽宏伟，但那都是皇家的；在民间有名而又保存完整的要数西河沿大街的正乙祠古戏楼了。

近报载，该戏楼已由北京市斯贝思宝业发展公司投资修复开业，头三天由名伶梅葆玖、谭元寿、孙毓敏、李维康等捧场演出，实为海内外戏迷之大喜讯。

正乙祠戏楼的前身是建于明代的一座古寺。清康熙六年由在京经商的浙籍人集资改建为银号会馆，后又扩为戏楼，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戏楼坐南朝北，戏台为二层并带地下室，戏台中心有一米见方的方孔，贯通地下室和舞台上层，形成一个三维演出空间，可以供神仙鬼怪戏目演出。

戏台对面及左右两侧由二层看楼环拱，中间有上百平方米的看池，整个戏台与看台是一座歇山顶整体建筑，总建筑面积约六百平方米，顶高十余米。

中国戏楼的发展先是戏台和看台各自为单体建筑，而正乙祠内的戏楼已是十分成熟的三面看楼、一面戏台的完整建筑，所以应该说，它是中国戏楼（或剧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自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后，这里便成了京城内演出京戏的重要戏台。《梨园旧话》记有同治年间观戏剧事，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何桂山等在此演出。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张文达等团拜，借西河沿儿正乙祠戏楼演堂会，用四喜班底，其班主为梅巧玲，乃梅兰芳大师之祖父。

笔者尝见过一张光绪末年正乙祠戏楼的演出单，京戏名伶谭鑫培、王凤卿、王瑶卿、陈德霖、朱素云、杨小朵、姜妙香等均曾在此登台演出。据《三六九》画报载：民国八年八九月，“正乙祠堂会戏记”有王琴侬、裘桂仙、张茹庭、钱金福、程艳秋、陈德霖、王凤卿、余叔岩、李光用、李寿山等演出《二进宫》《风筝误》等剧目。“同年九月十一日，余叔岩为其母六十寿辰在此演出堂会，彩衣歌舞，蔚为盛况。”又载，梅兰芳曾在此反串小生吕布。至20世纪30年代，正乙祠还经常有行会举行堂会，言菊朋、张伯驹、鲍丹庭、陈墨香等名家均多次在此演出，盛极一时。

据历史考证，正乙祠戏楼在乾隆五十一年曾进行大修，正值“三庆班”进京的两年后。而京剧形成于清咸丰年间，正乙祠戏楼却在这时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两次重要整修均与京剧发展完全同步，这绝非偶然。难怪就连京剧创始人程长庚都把在正乙祠戏楼的演出作为自己演出生涯中的一桩盛事了。

京都会馆三戏楼

过去，北京的会馆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这是为了给从该地区来京赶考的举人、监生等提供食宿；如果该地人有的做了京官，也常利用会馆来联络“乡谊”，进行一些官场内政治或派系性的活动。另一种是行业性会馆，多是一些手工艺人或商人组织的同业公会。以上两种会馆都具有租赁居住、聚众议事、酬神宴燕的作用。

因不少会馆里都设有戏楼而又经常演戏，故使会馆也带有文化场所的性质。百年来，由于年久失修，北京昔日的会馆逐渐坍塌，现在仅存大致完好者尚有三处：

一是坐落在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南角上的湖广会馆戏楼。这个会馆是清嘉庆十二年由湖南长沙籍在京官吏刘云房、李秉和等人倡议修建的。道光十年，在年初团拜时，蒋丹林与何仙槎倡议集资扩建戏楼，以作为同乡集会及公宴的地方。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联军中的美国提督一度以湖广会馆作为美军司令部。民国以后，不但湖南乡亲在这里举办堂会，就是其他省籍的官绅也常常借用这个地方。孙中山和梁启超都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讲。京剧名伶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等也曾在这里演过戏。

另一个是安徽会馆的戏楼。它稍晚于湖广会馆的戏楼，同治三年由李鸿章、李翰章兄弟倡议兴建并得到淮军将领的响应，共收集到捐银万两以上，其中李氏兄弟各捐银一千两。于同治八年二月动工，同治十年八月建成。

安徽会馆戏楼面积比湖广会馆戏楼略小，二者形制大致相同。安徽会馆戏楼舞台两侧柱子上的对联是：

冠盖萃江淮，尽东南宾主之欢，扮社筵开，古谊犹存乡

饮酒；

楼台演歌舞，极丝竹管弦之盛，梨园美具，世情且看戏登场。

戏楼小巧玲珑，因而观众容量少，商业价值不大，故此戏楼逐渐衰落。最有趣的是前门外东侧小江胡同的“平阳会馆”，一般人称“阳平会馆”。其中的戏楼结构和规模远远超过以上两个，可见平阳会馆当初之建，定有巨大财力作为后盾。由此推断，可能是山西临汾商人集资兴建的。在平阳会馆发现了一块未受损的匾额，上写“警世铎”三个大字，从字义上看，是写给演剧场所的，落款是“王铎”。王铎曾做过明、清两代的尚书，是个贰臣，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如此匾确实为王铎所书，可推断这个戏楼应是1652年以前建造的，因为王铎逝世于是年。

平阳会馆戏楼的特点是观众席由三个独立的双层楼围抱，再在上面加上屋顶使之完整，这一点和北京的旧会馆戏楼都不同。另外在戏台顶部开有方形孔道，方孔上留有装过吊车的痕迹。清代北京有不少戏楼的舞台顶上都装有供演员上下的孔道及吊车，如紫禁城内的畅音阁戏台、漱芳斋戏台、颐和园的听鹂馆戏台、德和园戏台以及南府的戏台等都有此设备。但是以上这些戏台，均属皇家使用，民间所用唯平阳会馆有此设备，实属罕见。

哈尔飞戏院话沧桑

现在已拆的北京西单剧场，原来叫“哈尔飞戏院”，再早是“奉天会馆”，说起来，有将近八十年的历史了。

张作霖年轻的时候是个家传的兽医，擅长医治马病。清朝末年，东北多匪（俗称“胡子”），而匪又多与马医相识，久而久之，张作霖也加入了“胡子”一伙。不久，张作霖受到清室管辖的盛京将军增祺的招安，成为增祺的部下，因而深得清皇室的信任。到民国以后，清朝的官员都降格为普通“平民”，增祺也去职回到了北京，这时的增祺较之在东北任上时，经济当然不算富裕。

张作霖逐渐发迹，以“东北王”的身份到北京后，感戴增祺在任上时的知遇之恩，遂出手赠送增祺一张十万元的支票。当时增祺惶恐不安，不敢接受，张说：“大帅还以为我是胡子吗？”这样，增祺才收下了这笔巨款。后来，增祺举家迁往天津，临走时把自己在北京的宅邸和花园赠给了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在京已有了公馆，便根据张学良的建议把增祺赠的宅邸和花园改建为东北同乡的“奉天会馆”。1930年，奉天会馆易名“哈尔飞戏院”，并请了原城南游艺园主人彭秀康做经理，这位姓彭的经理很懂得生意经，他在戏院开张前后，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做广告，一时轰动京城。

开幕时十分隆重。先由彭秀康报告戏院成立的经过，再由京剧界代表梅兰芳致词，他谈到最近去美国演出，以及对美国戏剧考察的情况。他还说：“哈尔飞戏院改造得很好，像这种舞台的样子很合乎中国旧剧的程式……”以后，京剧名伶尚小云、侯喜瑞、杨宝森、梅兰芳、杨小楼、贯大元等及其他在京的诸名角都在这里演出拿手戏。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也在这里上演过，剧目有《湘江娘》《春深了》《峨眉月》《特别快车》和以后在

小学中十分流行的节目《麻雀与小孩》《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

以后哈尔飞戏院又增加了电影设备。到了1938年西单附近又有了“长安”“新新”两大戏院的竞争，于是哈尔飞戏院就改成“瑞园茶社”，演曲艺和杂耍，著名的演员小彩舞、常连安、金乃昌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20世纪40年代后，瑞园茶社也实在难以维持，又改为“大光明影院”，同时约富连成科班上演京剧。勉强维持到50年代，经过整修，改为西单剧场。

天津大舞台戏园

报载，天津兴建了南市食品街，我不禁想到昔日南市西端的大舞台戏园。

过去的天津南市，戏园子很多，有丹桂、升平、广和楼、第一台等，但是论起戏园子座位多、规模大，经常有名伶演出的还要算大舞台戏园。

天津大舞台戏园，创建于民国初年，是高大而宽敞的木结构三层楼房建筑，可容纳观众三千人。走进大门，迎面是木板格扇，左右为观众进出的门。园内楼下观众席，当中是“池子”，两旁是“廊子”，放置长板凳座位。“池子”的票价比两廊为贵。迎面的舞台，面积比一般舞台宽阔，表演大型武打戏绰绰有余。二楼环绕成“U”形，面向舞台的包厢和散座，共有上下两层，上层后面是玻璃窗。

京津一带的京戏名演员大都在大舞台演出过，如杨小楼、刘鸿升、程继仙、萧长华、李吉瑞、尚和玉、韩长宝、李兰亭、七岁红、八岁红等。河北“梆子”演员小达子、小香水、金刚钻等人，也都曾献艺于此。

这些演员中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当推天津籍老演员李吉瑞和尚和玉。以奉母至孝、戏德高尚著称的李吉瑞为人谦逊，演戏不争牌次，他在大舞台戏团演出的名作《落马湖》《刺巴杰》《翠屏山》《独木关》等戏，每演必是满座。尤其他在《独木关》中饰演薛礼“叹月”时一段“在月下，惊碎了英雄虎胆……”唱腔，多少年来一直为戏迷哼唱不衰。

尚和玉与杨小楼为一师之徒，传俞润仙之艺各具千秋。杨小楼以演猴戏著称，每逢杨到津登台，尚和玉绝不同时演《安天令》，以示

谦让。因为大舞台戏园舞台宽阔，20世纪20年代前后，曾演出过多种场面火炽以招徕观众的“连台本戏”，如《包公案》《铁公鸡》《七擒孟获》《张文祥刺马》《九义十八侠》《火烧红莲寺》《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雍正剑侠图》《石头人成亲》和《枪毙阎瑞生》等，叫座力极强。

1916年天津发生南皮张氏姐妹因不堪恶霸欺压而服毒自杀的“双烈女”惨案，后来有人把这一案情编为新戏在大舞台戏园演出，也曾轰动一时。

后来因为在法租界出现了新建的“中国大戏院”，建筑设计和观众席位、舞台设备都比大舞台戏园要新颖得多，大舞台戏园才屈居第二位。近悉，20世纪50年代初，大舞台戏园已拆建改作他用了。

漫话昔日堂会戏

旧京之堂会者，乃权势、富贵之家操办喜寿庆典之事时，为讲排场而约戏班在家中或饭庄演唱，并设宴招待亲朋，谓之堂会，其演唱之剧目则谓之堂会戏。

堂会戏由来久矣，自康乾盛世以来逐年时兴。堂会戏种类颇多，以剧种分有京剧、梆子、皮影戏、八角鼓子、什样杂耍、十不闲莲花落等；以演出时间论，昼夜者（头天中午至深夜或翌日黎明）谓之“全包”堂会，半日或一夕者谓之“分包”堂会，全包者可由本家随意点戏，分包者则由戏班配戏。

乾隆年间，皇室与民间之堂会，皆喜用“全堂八角鼓”，这种满族曲艺品种原为八旗人牧居时的歌曲，乾隆年间发展为坐唱形式，并有专业艺人演出。其曲种包括清音大鼓、岔曲儿、琴腔儿、腰节儿、马头调、拆唱以及相声、古彩戏法等。盖因说、学、逗、唱、吹、打、弹、拉等无所不包，故谓“全堂八角鼓”矣。

自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京，名角层出不穷，于是豪门贵胄的堂会渐以京剧为主，并请“剧提调”出面，以重金广约名角联袂演出，以求珠联璧合。

京剧堂会正式上演前，先由演员扮成福、禄、寿三星，为本家寿星老儿跳加官以示祝贺，继而再演《封相》《赐福》《点魁》等几出敬神戏（俗称帽儿戏），然后才依次上演正式剧目。

正式剧目之内容，依堂会性质而各有固定之套子。如生日堂会戏，则必演《大四福》《麻姑献寿》《蟠桃会》等剧目；满月堂会戏，生男则必演《麒麟送子》，生女则必演《观音赐女》，此外尚加演《打金枝》《状元印》《御碑亭》等剧目。因本家主要成员皆为深

谙京剧之戏迷，每每随意点戏，故不会五百出戏的演员，是断然不敢应堂会的。

民国元年，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庆贺五十三岁寿诞所办的堂会，京城梨园界名角应邀而至，为其大演特演庆寿之吉祥戏：开头为梅兰芳的《麻姑献寿》；接演《蟠桃会》，由杨小楼饰齐天大圣，范宝亭饰小猴，钱金福饰托塔李天王；大轴戏为《龙凤呈祥》，由谭鑫培饰乔玄，余叔岩饰刘备，龚云甫饰吴国太，郝寿臣饰孙权，王瑶卿饰孙尚香，尚和玉饰赵云，侯喜瑞饰张飞，萧长华饰贾化，其阵容之强大，可谓空前绝后矣。而令袁氏遗憾者，是庆寿之举并未使其享高龄，四年之后，在他尚未登上皇帝宝座时，便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

继袁氏盛大堂会之后，满族宗室墨麒的七十寿辰堂会，其剧目之繁，规模之大，亦令人瞩目。其名角与剧目分别是：龚桂仙的《探阴山》，程继仙的《石秀探庄》，尚和玉的《挑滑车》，言菊朋的《战太平》，杨小楼、钱金福的《连环套》，言菊朋、徐碧云的《坐宫》，梅兰芳新排的《洛神》等。

民国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欢迎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陆荣廷到北京，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演堂会戏，名伶济济，规格很高，大轴戏定为谭鑫培的《洪羊洞》。当时，谭鑫培正患感冒，婉言谢绝，可是第二天，警察局来人，用恐吓的口气对谭鑫培说：“你要是不唱这个堂会，小心明儿把你抓起来；你要是唱这个堂会，明儿连你的孙子也可以放出来。眼前摆着两条道，你看着办吧！”说罢扬长而去。谭鑫培当时处于威胁逼迫之下，只好抱病去唱堂会，唱完后回家不久便病逝了。故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欢迎陆荣廷，气死谭鑫培。”由此可见当时军阀之霸道，艺人社会地位之低下。

富贵人家唱堂会，总是大讲排场，其开销令世人瞠目。民初满人宗室宝叔鸿，当年是北京电灯公司的襄理，其祖上敬中堂，乃清室贵

宦，位高权大、广有家财。宝叔鸿为其父墨麟（号润西）七十寿辰办了一次堂会，花去六千大洋，奢华至极。当时北京一所四合院价值也不过四五百元，而宝叔鸿为其父办一次堂会，便花去十多所四合院，一般人望尘莫及。

不过，伶人演堂会的报酬也是很高的，要比平常的营业戏演出高出好几倍。有的名角遇到演堂会戏时，故意索要很高的报酬，因为举办喜庆宴会，本家是不惜出钱的。当然，有的时候，因某个演员与本家有关系，也不要酬金。梅兰芳由于名气大，他演堂会戏开价很高，但他在名画家王少农（烂柯山樵）家唱堂会戏，就分文不取。在王少农八十寿辰办堂会时，梅兰芳前去演出了一出《麻姑献寿》，演完后，王少农为梅兰芳画了一幅《梅兰图》，二人皆大欢喜。

有时，梨园子弟或票友遇到喜庆寿日，也自家办堂会。这种堂会戏，虽然只供亲友观赏，不对外，但因这种堂会戏上演的大多是在剧场里极难看到的，所以更别有一番风采。如梅兰芳新排的《洛神》，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都是新排出后先在友人堂会戏上演出的。还有的名角，已不在剧场营业演出了，只有堂会戏上才露面，这就更显得珍贵，如余叔岩在萧振瀛家演出《盗宗卷》即是这种情况。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所以有些京剧爱好者为了欣赏一些好戏，或为了观看到有的名伶久违了的剧目，常常给本家凑个分子，挤进堂会观看演出。至于为一睹堂会戏托亲朋、找关系的，更是不乏其人。

清末民初，办堂会戏成风，戏码也往往有针对性。如民初，孙中山到北京，段祺瑞招待孙看戏，大轴戏是《八本雁门关》，取“南北合”之意，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余叔岩、龚云甫都粉墨登场。

京胡大师杨宝忠

著名京胡大师杨宝忠，琴技高超，曾为马连良、尚小云、杨宝森等多人操琴伴奏，久已誉满南北。

杨宝忠自幼爱好音乐，曾习文武老生，拿手戏《击鼓骂曹》鼓法娴熟、不同凡响。成年后因扮相、嗓音等关系，专事操琴，卒以天资聪颖、造诣精深，成为京剧界名琴师。

杨宝忠能自拉自唱，还学一手小提琴，经常演奏，颇具功底。他将小提琴弓指法运用到京胡上，听来别具韵味。早年戏园门前挂有黑地白字木牌，后又改为红线白字或金字黑字者，上书演员姓名及表演剧目，杨宝忠改行操琴后，戏班在头排演员名字下面加一行横字“特请杨宝忠先生操琴”，是当时琴师中鲜见者。

杨宝忠与马连良合作多年，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他操琴不喧宾夺主，必等唱角博得彩声后，才在拉过门时拉些花腔，这样既主次分明，又可给唱角以喘息机会，极尽衬托之能事。有一次，马连良在西长安街新新戏院演出《群英会·借东风》，前饰鲁肃，后饰孔明，由杨宝忠操琴。演到蒋干盗书一折，鲁肃到周瑜卧室放置假书信时，并无唱腔，只有一些做派，极易冷场。而此时杨宝忠用胡琴拉“小开门”，施展绝技，过门越拉越快，与鼓板吻合，极为悦耳，然后由快转慢。这一切与鲁肃各种表情神态配合默契，博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杨宝忠在操琴成名以前，即已研究制琴，他以高出三倍的工资待遇，请到著名乐器工人冀振江和他一起研究京胡的进料和制作。每发现上等佳品，便留下自用，或赠友好；其余大多送到百代公司等处代为销售。当时他所制京胡大部分为京剧内行或票友购去，他制作的胡琴售价比同业高，购者也承认“货高价出头”。

杨宝忠出身梨园世家却从不高傲自大，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乐器行业工人多愿与他接近，取长补短。胡琴制作名手陈绍轩与杨宝忠相交甚厚，彼此常相切磋胡琴制作技术。

某年春节，杨宝忠游厂甸，在旧货摊看到一只老竹笔筒，竹黄厚实。他以重价购得，配于常用拉二黄的胡琴杆上，发音浑厚、明亮，音色异于一般，他爱如珍宝，取名“大董”。其后，好京胡者以有无“董音”成为一时评定标准。杨宝忠在其弟杨宝森演《碰碑》《洪羊洞》《伍子胥》等看家戏时，多以“大董”伴奏。

杨宝忠已去世多年，未审“大董”等京胡落入何人之手。

马派琴师李慕良

闲暇听马连良先生唱片，不禁佩服那隽永俏皮的唱腔，更佩服那明快流利的胡琴师李慕良先生。慕良先生原名孟谔，生于湖南长沙，其父李赶三原是丑角演员。受家庭影响，孟谔从小拜董玉坤为师学老生。同时他也喜爱拉琴，十一岁便登台演戏并操琴。在武汉与“绿牡丹”（黄玉磷）同台献艺，后来孟谔变声倒仓，师父不再教他。他受此打击后并未消沉下去，而是更加努力练琴喊嗓。1928年，他在上海，买了各大流派的唱片，认真品味、消化和系统地研究，使各种唱法、拉法都烂熟于心。1935年马连良先生赴长沙演出，经介绍认识了李孟谔。马先生慧眼识英才，料定孟谔将来必成大器，于是高兴地收他为学生，并将他带回北京深造。孟谔为了表示对马先生的崇敬心情，将名字改为慕良。

慕良到北京后如鱼得水，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孟小冬、金少山的不少拿手戏都深深地吸引了他，同时他仍继续钻研胡琴，经常观摩孙佐臣、陈彦衡等名家操琴。

后来，在马先生的建议下，他放弃老生，专攻操琴。这不仅为慕良先生找到了一条最适合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马先生自己完成一整套表演体系，在声腔艺术上开拓新的领域，找到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一次，言菊朋的琴师病了，临时需要顶替者，马连良便推荐了李慕良。李“客串”三天，喝彩声大作。为此，言先生亲到马家延聘慕良与他合作一个时期。马先生欣然割爱，并将李介绍给徐兰沅当徒，以提高慕良的师承地位。有了名师指点，又与名人合作，慕良技艺大增。

十九岁时，李慕良才正式与马先生合作，那时笔者几乎天天看马派戏，且不说马先生的潇洒表演，单是看着坐在一边的李慕良，就感

到精神振奋。慕良仪表潇洒儒雅，身着深色长衫，白衬衣的袖口卷起两遭；满面春风，容光焕发，透出了“精、气、神”。就连胡琴弓子也是锃亮，像主人一样光彩夺目，后来方知那是涂的“上光蜡”。

慕良先生琴艺高超，可谓“心手相印”，善于用琴声表达丰富的感情，他并不被动地托腔保调，而是有所创新。

制琴高手史善朋

早年的京城，荟萃着许多名角和琴师，他们对胡琴的质地要求很高，从而促进了制琴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制琴能手。在笔者记忆中，京华制琴能手当首推史善朋。

史善朋自十二岁就拜在琉璃厂老艺人马良正门下学习制琴技术。二十一岁去天津久盛斋，两年后回到北京，在李铁拐斜街立店开业，直到1939年才搬到琉璃厂。

开店伊始，他免费为一些名琴师蒙皮，因此，这些琴师便帮他联系活计。渐渐地，手中的经济宽绰点儿了，史善朋便买来了当时颇为名贵的紫竹做琴杆，琴轴用黄杨木，偶尔也用黄檀木。他做的胡琴竹质坚实，表面花纹也美观，有虎皮花、芝麻花、腰横玉带、紫袍、鳝鱼黄等花纹。

史善朋刻苦钻研制琴艺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琴筒的烤干、撑圆，琴杆的擦漆、缠弦等技术上，都有独创，如琴轴雕成玉簪花形便是史善朋创造出来的。他还经常到广和、广德等剧场观看京剧，与著名琴师合作，互相切磋，终于悟出了据嗓配音的技艺。一次裘盛戎唱戏，将开演时，其琴师汪本真突然说不上场了，裘盛戎问其故，曰："没胡琴。"问："你的胡琴呢？"回答："当了。"于是，裘盛戎便给他钱又买了一把，调音一听，极好；问汪本真是谁做的，汪本真说："史善朋。"裘盛戎非常感激，事后亲自找到史善朋面谢。

著名琴师赵济羹一次欲去上海演出，未料他琴上蒙的那块皮虽然好，但不出音，于是便去找史善朋。史善朋翻遍箱子亦未找到一块合适的好皮，于是便把原来上的那块揭下来用水泡开，又蒙第二次。史善朋告诉赵济羹说："北京使差点儿，到上海正合适。"赵济羹从上海回来，一进店门便作揖说："果然不错。"之后，其他京剧界的琴师，

像屠楚材、刘洁亭、杨宝忠、何顺信、姜凤山、杜奎三、王富芝、周文贵等，也都相继让史善朋做琴。

史善朋做的胡琴，声音高亮又圆润松甜，既宽厚，又集中充实，可见他确实手艺不凡。

急管繁弦忆偶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请人看戏和请人吃饭，几乎是同样庄重而又盛行的待客礼遇。那时，请人看戏，大多是在广和楼、广德楼、华乐、三庆等戏园。

戏看多了，不仅熟悉了演员，慢慢地也知道了戏曲教师、戏曲编剧的名字，笔者“认识”翁偶虹，就是那时开始的。

翁偶虹出身于北京的书香门第，幼时就嗜剧成癖。十四岁投稿《黄报》，为程砚秋演出的《文姬归汉》作序。所作序文不但文采飞扬，而且评述得体，以髫龄童子而论大师之艺，一时剧坛轰动，内外行人惊为“神童”。

稍长，翁偶虹更潜心钻研，心注戏内，文凝笔尖，开始了编剧生涯。他为程砚秋编写的《锁麟囊》，通过几户人家富贵贫穷的变化，写尽世态炎凉，倡导人们之间友善相处。该剧一经演出，便成为程派名作。他为李玉茹、储金鹏、王金璐等编写的《鸳鸯泪》，通过周仁夫妻誓死抗暴的故事，讴歌舍己助人，鞭挞邪恶势力，戏演到周仁献妻时，真有“台上一人啼，台下千人泪”的悲剧效果。还有他为宋德珠编写的《百鸟朝凤》，为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等编写的《百战兴唐》，为李玉芝、李玉茹、张玉英等编写的《凤双飞》等，都不落俗套，各具特色，也为他获得了“翁剧”的美誉。

翁偶虹既是编剧家，又是戏曲教育家。他在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供职十年，曾任学校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并兼授文化课。在学校，他或编剧，或导演，或授课，或解难，成为众人景慕的博学顾问。戏校的“德、和、金、玉、永”几科学生，都得到他的绛帐春风。1940年，戏校被迫解散，一群学生身怀绝技却献艺无门。翁偶虹只身闯进梨园公会，要为学生组班，几经口舌，终于成立了以李玉茹、王金

璐、储金鹏为中坚力量的“如意社”和以朱德珠为首的“颖光社”。两社阵容齐整，英气逼人，北演燕京，南下上海，一时名噪京沪。应该说，翁偶虹既以严师雨露滋润于先，又挺身组班提携于后，很有些伯乐之功。至今，在内地的傅德威、李和曾、王金璐、李玉茹等，有“台湾金少山”之称的名花脸高德松，在美国的白玉薇，在日本的李玉芝等，当是不会忘却这位师长的。

日前，友人带来内地出版的《翁偶虹戏曲论文集》，书中，翁偶虹以如椽之笔，描写了杨小楼、郝寿臣、高庆奎、程砚秋、马连良、李少春等诸多名家的艺术生涯。读之，深感翁之文笔愈显老到，记述愈见精妙。

京剧的脸谱

京剧脸谱流派很多，其中早期的净角脸谱主要有三派，即：代表正净之何桂山、裘桂仙一派；代表副净之庆春圃、黄润甫一派；代表武净之钱宝峰、钱金福一派。三派各成体系，各具风格，尤其钱金福脸谱“庄严有威，朴素大方”，被时人公认为“天下一品”。当代的侯喜瑞、郝寿臣的脸谱也很有特点。

脸谱起源于面具，其渊源可追溯到6世纪之北齐。据《旧唐书·音乐志》及唐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载：北齐兰陵王高长恭貌美而勇武，自觉不能使敌人畏惧，故常戴面具出战，勇冠三军。

古代制作面具，先以纸糊其胎，而后以水墨丹青彩绘之。宋元古剧，上场演员头戴面具，手舞足蹈，而念白与歌唱则由在后台的演员任之。直至清末，凡神鬼诸戏，仍保持戴面具只舞不唱之陈规，最明显的就是《跳加官》。随着戏曲发展，要求演员必须载歌载舞，使唱、念、做、打统一，塑造完整之艺术形象，因而，那种妨碍念白和演唱的面具，逐渐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日臻完美的勾脸艺术——脸谱。

梅兰芳缀玉轩所藏脸谱可谓中国戏曲宝库中的艺术珍品，但其色彩、线条、神态，远不如现代勾脸之美。

京剧脸谱大致可分揉脸、勾脸、破脸、抹脸四大类。揉脸，是脸膛揉色，加重描画眉目面纹，如关羽即揉红脸。勾脸，是在脸上勾绘五彩脸谱，类似面具，神妖、武将、英雄等角色常用勾脸。破脸，看起来鼻歪眼邪，用于丑陋凶残之人。抹脸，是脸上涂白粉，多含贬义，如曹操涂大白脸，以示其为奸雄。

京剧脸谱之用色，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习惯。以主色而言，忠勇者

用红色，智猛者用黑色，草莽英雄用蓝或绿，凶狠者用黄或白，神妖用金或银色。

脸谱之格式种类颇多：只勾眉子叫整脸，整脸加上勾眼窝、鼻窝叫三块瓦脸，复杂化的三块瓦脸叫花三块瓦脸，比花三块瓦脸还复杂而不规则者叫碎脸。腰子粉脸、豆腐块粉脸、枣核粉脸，涂粉面积一种比一种小，以分别表示奸诈机智等人物性格。

梅兰芳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京剧大师梅兰芳一生所拍戏曲影片颇多，但第一部彩色片却拍得很艰难，这就是《生死恨》的拍摄。

1947年冬，电影导演费穆和洗片技师颜鹤鸣到梅宅，与梅商量拍一部彩色戏曲片，希望当时正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的梅兰芳领衔演出。

听了费穆、颜鹤鸣的计划和来意，梅兰芳很感兴趣，他说拍一部彩色片也是他多年的愿望。经过协商准备，很快成立了以拍摄《生死恨》彩色片为主的华艺公司，由梅兰芳主演，费穆任导演，华艺公司的吴性栽负责资金，颜鹤鸣负责彩片的冲洗和录音，黄绍芬任摄影指导。

梅兰芳和费穆对《生死恨》的舞台剧本又进行了修改，场次由原来的二十一场改为十九场。对于影片的布景，梅兰芳要求一定要注意京剧的特殊表演手法，从服装、化妆到全部表演都是夸张的、写意的、歌舞合一的。他又说，戏中的虚拟身段，如上马、下轿、开门、登舟，都用手势、脚步来表现实物，而电影却是偏重写实的，这就有了矛盾，如何解决？费穆说，他们打算遵守京剧的规律，利用京剧的技巧，拍成一部古装歌舞故事片，对于京剧无实物的虚拟动作则尽量避免。

拍摄思路确定后，便拉出了强大的演员阵容名单，姜妙香、李庆山、新丽琴、李春林都在剧中扮演角色。乐队中，王少卿操琴，倪秋萍二胡，王燮元司鼓，这几位乐师也都很有名。

1948年6月27日晚上九时，彩色舞台艺术片《生死恨》在上海徐家汇原联华电影公司三厂的第二号棚拍摄，那天天气闷热，摄影棚内

围满了文艺界、新闻界的人士，演员们在高温下拍摄，相当辛苦。

这部片子一共拍了五个月，到1948年11月停机。看样片时，大家认为影片色彩虽不及外国的，但作为首次尝试，加之条件、设备不足，达到这种效果已是很不容易了。

然而，待拷贝从美国寄回后，大家一看大失所望，颜色走样，音响不稳，时高时低，梅兰芳非常生气，他对费穆说："我这部片子是靠彩色产生号召力，现在颜色走了样，如果拿出去公映，对观众无法交代，只有坏的影响。美国电影公司太不负责，我们原来的底片是很鲜明的，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我主张不发。"

费穆感到歉疚，托人向梅兰芳解释说："由于小片放大，色彩就更淡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次拍片是我发起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如果在梅先生面前交了白卷，是很遗憾的，但如果影片不公映，华艺公司将会就此破产。"

梅兰芳虽然很不满意这部片子，但想到毕竟是第一部彩色戏曲片，对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的结合进行了尝试，最后还是同意上映了。

石挥的生死情结

石挥是杰出的电影与话剧表演艺术家，早年还出任过导演，他拍过的著名电影有《雾海夜航》《鸡毛信》《天仙配》等。其夫人童葆苓是一位家教有素的京剧艺术家，她是著名的“童家班”的重要成员。在她的兄弟姐妹中，以继承四大名旦中荀派著称的童芷苓和以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蜚声海内外的童祥苓最为出名。

石挥是在他拍第一部自编自导的影片《母亲》时认识童葆苓的，那年童葆苓才十八岁，石挥大她十五岁。当时，童葆苓还在李少春主办的京剧科班“鸣春社”里当演员，在中国戏院演出。石挥对李万春说，他正要拍一部电影，名字叫《母亲》，里面有一个小演员，是在学唱京戏的小姑娘，请帮助找一找。于是，李万春便约石挥去看了童葆苓的演出。石挥很是看中童葆苓的可爱劲儿，以及她的演出技艺，于是当场拍板由她在他的电影《母亲》中担任角色。

石挥与童葆苓由相识渐渐地发展到恋爱的关系，是在电影《母亲》拍完之后。那时的童葆苓年轻、漂亮，言谈举止都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圈内人士都称她为“童不赖”，自然是颇得“话剧皇帝”石挥的青睐与爱慕。

石挥与童葆苓于1954年在北京结婚，蜜月之后石挥便回到了上海。那时，童葆苓在总政京剧团工作，而石挥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几年的时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还是在一次会上周扬听说了他们的情况，才设法把童葆苓调进上海京剧团。

可是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开始了。石挥遭到了批判，从批判会回来后，童葆苓问他：“会开得怎样？”石挥不多说话，只是连声叹息：“结棍（上海话，意思是厉害），结棍！”他还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一个人被打成了右派，这就连蹬三轮车的也不如了。”可以看得

出，批判会后，石挥的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次批判大会，石挥没有出席，以后便传出他失踪的消息。那天下午，童葆苓要去陪同一个越南文化代表团参观上海京剧团，临出门前对正闷闷不乐的石挥说：“过一会儿，家里要来一个保姆，你在家里等等她，我要去接外国客人了。”

石挥听说妻子要走，霍地站了起来，失态地一下抱住童葆苓拥吻，怅然若失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童葆苓离去。童葆苓后来才明白，石挥这是在向她作最后的诀别。

童葆苓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就在她苦苦地等着丈夫回来的不眠之夜，石挥却买了一张船票，登上了“民主三号”轮船——过去他在这条船上体验过生活。也就在那天夜里，他趁着茫茫的夜色，跳进了汹涌的大海之中，结束了年仅四十二岁的生命。

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著名戏剧家吴祖光走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是南京。

1937年，抗战军兴，北平的大学纷纷内迁。二十岁的吴祖光中断了在中法大学的学生生涯，应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聘，到南京任职。该校位于明故宫机场附近，清澈的明御河从旁蜿蜒流过。

吴祖光在《睡与梦》里曾描写学校的景色：

> 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时节是如此美丽，前面的小河涨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后，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夹着几点红白，越显得娇艳欲滴……浅草间有一对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对着这暮春天气，听见树枝擦着窗棂簌簌的声音，看见那一对蝴蝶隐没在密叶丛中时，忽然想起了庄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觉得恍惚，轻纱似的朦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间还是梦中了。

从这段情景交融的优美文字里，可以看出吴祖光对美丽的南京的感情，也可以想见他当年的风华正茂。当时，吴祖光不仅仅陶醉于充满诗情画意的南京春光，他的内心深处，也掀起了时代的波澜。日寇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改变了吴祖光原先的生活道路。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居于北平多年。他从小就酷爱京剧，一心想当演员而未能如愿。当时京剧之盛如日中天，尤其在北平，更有许多世家子弟、男女学生盛行“捧角”，其狂热不亚于今日之“追星族”。吴祖光也有此好，并和一个叫刘盛莲的男花旦有深厚的友谊，从而使他有机会看到了“戏子”的真正生活。

尽管刘盛莲在年轻演员中已名噪一时，但因为在科班里尚未出师，只能靠微薄的“戏份儿”养活一家老小；在大红大紫和轻颦浅笑的

背后，是世人所看不见的贫苦和辛酸。就连吴祖光和刘盛莲一道上街，也会遭到小流氓的围攻辱骂。后来吴祖光进了大学，而刘盛莲亦出了科，名声日上。不料此次吴祖光到了南京后，意外地听到刘盛莲潦倒死去的消息。这件事在吴祖光的心里，如同一潭平静之水忽起波澜，他生发了“人生本是一个梦”的感慨，也加深了他对那个动荡社会多难人生的认识和思考。

一年后，吴祖光为避战火，随学校内迁至大后方重庆。一天，他打开箱子，发现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写的短文《睡与梦》，展读后百感交集。一年来的艰苦遭际，更使他觉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场梦，大有昨非而今又不是之感。他通过对过去的“梦”的艺术性升华，写出了反映艺人悲欢离合、潦倒之死的著名话剧《风雪夜归人》。该剧于20世纪40年代上演后轰动一时，并于80年代于北京重演时再获盛誉，近年还被改编拍成电影。

黄宗江在南开和燕京

当年燕京大学没有戏剧系，可是出了不少戏剧人才，可惜有的半途而废，有的早年离开人间，如今硕果仅存者只二人，其中孙道临名气最大，因为他是名演员；另一位当为黄宗江。黄近几年退居幕后，埋头编导，所以知者较少。

黄宗江1935年考入天津的南开中学，他一入学就对新剧着了迷。他受南开剧社及其活跃人物张彭春和曹禺（万家宝）的影响甚深，虽在南开读书仅两年，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影剧生活。

1936年，黄宗江在南开瑞庭礼堂看了南开剧社演出的《财狂》（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散戏之后，仍恋恋不舍，躲在台下看演员拍照。十几年后，在他的散文集《初恋》里黄宗江写道："戏演过后，好几个黄昏，我徘徊在礼堂旁，白杨树下，是什么使我这样迷惘？……"

1937年，他第一次演戏，扮演易卜生《国民公敌》中的女主角司铎克夫人（当时南开演戏都是男生演女角），真是精彩。校刊上曾评论说："黄宗江扮司铎克夫人，背影如希腊女神塑像……是万家宝（曹禺）之后，南开最佳之（扮）女演员。"从此，黄宗江就成为南开剧社的名人。

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被敌机轰炸焚毁，南开迁往重庆，黄宗江便转入耀华中学又读了一年。这年，他在天祥市场旧书摊上，搜购了散失的全部南开剧社的戏剧书刊，视为珍宝，饱览无遗。1938年毕业后，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

进燕园不久，黄宗江就锋芒毕露，他成绩优、兴趣广、多才多艺。每天早晨，未名湖畔，岛亭附近，都能听到他朗读背诵英文的声

音。他还跟邓之诚学历史、从顾随学诗词，文法两院的主要课程他都学。黄宗江天资聪颖又认真苦读，在燕京大学的学习为他以后从事戏剧编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课余，黄宗江还是不忘演戏。他与孙道临等同学组织了燕京剧社，演过不少好戏。除了话剧外，黄宗江对京剧也很喜爱，他在燕京国剧社演丑角，学萧长华很有妙趣；他还曾演过《空城计》中的老军、《王宝钏》中“算粮”一折的魏虎、《赶三关》一折中的莫老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沦入日寇手中，黄宗江携乃妹黄宗英等到上海演戏。其后到过重庆，去过英国，后来埋头于编导工作四十余年，孜孜不倦地献身于戏剧工作，在北京话剧界享有盛名。

孙道临从艺前后

当代大陆著名电影明星孙道临，原名孙以亮。1938年入燕京大学，从此，未名湖畔就时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经常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大褂，旧西服裤脚下的两只皮鞋磨得露出白色，圆圆的脸庞，浓眉大眼，文质彬彬，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帅小伙子。孙道临沉默寡言，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课下则打开教室窗子凭窗远眺，若有所思。

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被占，从此多数师生离别了湖光塔影，忍痛离校了。后来听说孙道临和黄宗江、郭元同、程述尧、石增祚等同学到上海演话剧去了。当时，这消息使人不大相信，因为他不是那种活跃的性格，怎么会演起戏来呢？

1943年左右，在天津出现了一个以孙道临为首的话剧团体，他们在北洋戏院演出《茶花女》。这个戏演得很成功，孙道临这个名字由此传遍津沽。因为他在天津下榻于老友张树柏家里，不久人们便得知，这个话剧演员孙道临原来就是孙以亮。他这个演戏的化名从此便代替了他的原名。每天夜场散戏后，他就手提化妆箱默默地回来；次日开演前，他又手提化妆箱默默地去戏院。他的化妆箱里，除了油彩等化妆用品外，还带有《莎氏乐府》一类的书，演戏空闲就取出来阅读，读得十分认真，像在学校临考前温书一样。演戏之余，他还常到天祥市场旧书摊上搜寻有关戏剧方面的书。他是在演戏、读书，读书、演戏中过日子，认真从事戏剧艺术的钻研，没有什么外务。

我一向不大爱看话剧，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台词腔调，可是看了道临演戏，发现他无论演什么角色都自然大方，不像做戏，而像是剧中人物现身说法，颇耐人寻味。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左右，他和卫禹平、黄宗英等组织南北

剧社再去天津，在北洋戏院和大光明影院演出了《甜姐儿》《魂归离恨天》《泪洒相思地》，这下更加轰动天津。但他一如既往，不骄不躁，沉默寡言，还是演戏、读书，读书、演戏。

我来港后就再也没见到他，听人说，道临在上海红得发紫，追求他的女性很多，他却洁身自爱，不予理睬，近年才听说他已与越剧名演员王文娟结合了。在港也曾看过他演的影片，三十多年不见，人有些老了。人总是要老的，可是他没有虚度年华，仍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赢得了影坛艺术上的成就。

白杨拍《十字街头》

不久前，中国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去世，时年七十六岁，让我不由想起她拍成名之作《十字街头》的往事。

白杨原名杨成芳，祖籍湖南湘阴县，1920年生于北京。其父是清末举人，民国初年，为振兴教育锐意革新，曾建立新华大学，自任校长。而后日渐挥霍享乐，终致学校倒闭，家道中落。白杨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由于其父沉溺于吃喝玩乐，且重男轻女，故她在家不受宠爱，便由奶妈带到乡下去生活。直到九岁时才接回，入北平第十四小学插班读到四年级。

1931年，由于破产，父亲弃家不知去向，母亲病故。家里只剩下姐妹三人，大姐杨沫才念中学，二姐长相漂亮，爱唱京戏，白杨此时才十一岁。一天二姐告诉她：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在北平设第五分厂，办了个“演员养成所”，劝她去报名试试。可是应考那天，二姐又不知去向，原来她随京剧票友“票”戏去了，她只好一个人鼓起勇气进了考场。那里都是大学生和青年，未料，由于她的天真稚气，居然被录取了。当时考她的老师是主演过无声片《故都春梦》的王瑞麟先生。

1935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筹办二厂，周剑云到南京招聘新演员，资深剧作家洪深郑重地把白杨推荐给他。周剑云当即和白杨订了三年的合同，头年月薪一百元，第二年一百五十元，第三年二百元。这样，白杨就成了明星二厂的基本演员。

白杨在明星二厂参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十字街头》。这部电影由沈西苓和凌鹤、尘无编剧，沈西苓导演。白杨刚从南京到上海报到，沈西苓和赵丹即拿着剧本找她。他们一起商量分配角色，并根据演员的姓改定角色的姓，如赵丹演的角色叫“老赵”，白杨演的角色叫“杨芝瑛”。这部影片主要描写一群爱国救亡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着

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道路，最终都失学、失业，因而他们苦闷、徘徊、彷徨，急于寻找出路，所以叫“十字街头”。

白杨扮演的杨芝瑛，从思想感情来说，与白杨所处的地位、境况相吻合，但剧中人杨芝瑛所经历的生活道路，有些是白杨未曾经历过的。当时没有条件深入生活，但白杨却很有见地地说：“一个演员是多方面的，无论哪一类型的人物的生活，我都应去体验或观察。可以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才能算是一个好演员；如果专演与自己相同生活的人物，那不过还是自己。”在拍摄中，由于白杨当时还缺少在镜头前表演的实践经验，有时简直是手足无措，然而，她特别虚心、用功，所以该片仍拍得相当成功。

自此，白杨的电影表演艺术颇受各方面重视。1937年4月1日，上海《大陆报》有篇评论《十字街头》的文章说：“白杨女士恐将成为中国的新影后……她虽然只有十七岁，中等的身材，可就是她的美丽、魔力、风韵和艺术天才，都卓然超出于一切。”文章说她是“瑞典女星嘉宝的匹敌”。同一天的《泰晤士报》也说：“许多中国影迷都觉得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国嘉宝’，那就是白杨女士了。她在最近主演的《十字街头》中，表现出和嘉宝异曲同工的特色。”

此片成功后，电影公司老板立即给她月薪加到三百元，并在大马路上为她竖起了有几层楼高的海报。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接连又主演了《社会之花》《神秘之花》和《四千金》等影片。

“电影皇帝”金焰

1932年，上海有家叫《电声》的小报为了扩大影响，举办了一次评选“电影皇帝”的活动。方法是每期报上印有一颗印花，读者把印花剪下，写上所选明星的名字寄给报馆。报馆不时在报上公布得票者的姓名和票数。评选结束，金焰得票最多，当选为“电影皇帝”。

金焰之所以能当选为“电影皇帝”，是因为他塑造了一系列健康、朝气蓬勃的青年形象。当时，封建、堕落和神怪武侠等影片充斥影坛，国家又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金焰在开明的联华电影公司，与阮玲玉合演了《野花闲草》《爱情与义务》《桃花泣血记》等反映社会生活，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片，深受观众欢迎。他以自己英俊、朴实的气质，真挚自然、热情奔放的表现风格征服了观众。

金焰1910年出生于朝鲜汉城一个医生家庭。两岁时，父母因发动并领导反日的独立运动受到迫害，不得已举家逃到中国。不久，父亲病逝，家庭生活陷入困境，金焰被一位姑娘带到上海读书，后又转到济南、天津免交学费读书。在初中时，金焰就兼勤杂工来付伙食费。十七岁那年，他毅然辍学，去上海进入由田汉领导的“南国社”，但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一次剧团到外地演出，他留在剧社看房子，每天在弄堂口的小面摊赊一碗十六个铜板的辣酱面。两个月后，他净欠面账七百二十个铜板。面摊师傅年三十晚上来讨债，他只得脱下身上的棉袍去典当，恰恰只当到大洋二元四角，折合铜板七百二十个。坎坷的生活道路，使金焰受到磨炼，他奋发自强、刻苦努力，进入影坛不久就一举成名，被选为“电影皇帝”。

不久，他又因在《三个摩登女性》中扮演男主角获得成功，名气更大了，经济收入也多了。他鄙视当时很时髦的抽大烟、打麻将，以及寻花问柳的花天酒地生活，把精力用在练习骑马、驾车、游泳、打球等方面。他还自任队长，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电影明星球队——“未

名篮球队”。队员有田方、刘琼等人，领队吴永刚，球队干事王人美，拉拉队由韩兰根、殷秀岑等人组成。他们既打篮球，又踢足球，每场球赛观众都在千人以上，球队坚持了近十年，影响很大。

金焰在田汉的悉心帮助下，曾成功地主演过《莎乐美》《卡门》《回春之曲》等名剧，同时也接受了进步思想，曾发表过公开信，提出演员要以自己的艺术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效力，不做资产阶级姨太太的玩物。

金焰曾两次不畏风险，掩护田汉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里，金焰是一个左倾分子，赤色明星。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单。1938年七八月间，一位很有政治背景的日本商人指使汉奸文人刘呐鸥设圈套迫使金焰与他见面，软硬兼施，逼迫金焰组织演员为日寇效劳，遭到金焰严词拒绝。日本人正要下毒手，吴永刚等人急速帮助他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此后，直到解放，他只拍了《长空万里》等四部影片，可说是创作上的低潮，而金焰威武不屈的高尚情操，却如日月行天，光彩照人。

王莹饰演赛金花

在位于香山之侧的梅山上，有一块被苍松翠柏环绕的墓碑，那便是20世纪30年代剧坛和影坛明星王莹的墓地。

王莹1915年生于安徽芜湖，1929年参加上海艺术剧社，是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她先后在复旦剧社、辛酉剧社、明星电影公司等单位演出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如《酒后》《约翰曼利》《自由神》《赛金花》等都受到广大观众和舆论界的好评。尤其是《赛金花》更是轰动一时，但为演此剧，她却得罪了另一个争演赛金花的演员——江青（当时名蓝苹），从而种下她人生悲剧的祸根。

1936年初，夏衍创作了话剧《赛金花》，由业余剧人协会排演。大家估计此剧一上演，定会引起轰动。当时的二流演员蓝苹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跃跃欲试，想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声望。但是，夏衍和欧阳予倩等一致提出赛金花由王莹主演最合适，蓝苹对此十分妒忌。她找到洪深说："我对这个剧本非常感兴趣，希望先生栽培，让我扮演赛金花。"洪深说："这个角色的演员已经定了，你将来还会有机会的。"蓝苹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竟大哭大闹，骂夏衍有私心，把王莹当成自己的女儿。

王莹见蓝苹如此折腾，深感不安，主动提出先让蓝苹试一试，如果确实不合适，自己再接替。夏衍、洪深、欧阳予倩为了平息这场风波，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由王莹、金山演A组，蓝苹、赵丹演B组。蓝苹一听，立即拂袖而去。她说："凭什么让我演她的B角？让王莹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办不到。"后来王莹主演的《赛金花》在上海金城大剧院果然一炮打响，观众看后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王莹每次都手捧鲜花，频频鞠躬谢幕。对此，江青更是耿耿于怀，把这笔账牢牢地记在心头。

1955年春，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从美国回到北京，开始翻译她的两本书：《宝姑》《两种美国人》，在文坛上辛勤耕耘。可是，1966年那场浩劫一开始，已掌握生杀大权的“文革”副组长江青就说：王莹这个人很坏，我非整死她不可。因为在江青眼里，王莹当年不仅抢了她演赛金花的戏，还对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恶行径知道得一清二楚，必须把王莹置于死地，才能免除后患。江青给她罗织了种种罪名，什么叛徒、特务，夏衍的黑干将等。经一个多月的批斗，使王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然后将其逮捕入狱。在狱中，王莹被拳打脚踢，手和脸都被踩破，鲜血直流，血压升高，一年后即半身瘫痪，不能说话了。到1974年3月3日，王莹终于停止了呼吸。

得到王莹死亡的消息后，江青欣喜若狂地说：她死有余辜，立即烧掉，不准留骨灰。但是，一位好心的火葬场工人还是把这个编号为六七四二的囚犯的骨灰保存了下来。直到江青倒台后，北京电影制片厂才为王莹举行了追悼大会，为其平反昭雪。

一代影星阮玲玉

最近一两年，中国香港与内地演艺界对20世纪30年代影星阮玲玉的表演艺术评价颇高，连续摄制了多部关于这位影后的电影及电视剧，并排演话剧，有人还写过传记小说纪念她，使阮玲玉的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响亮起来。

阮玲玉，广东人，1910年生于上海。家中并无兄弟姐妹，母女俩依靠父亲在浦东亚细亚油栈做工度日。父亲积劳成疾后来不能工作，一家三口陷于三餐不继的窘境。阮玲玉五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只好为人帮佣。从此，幼小的阮玲玉无家可依，母亲把她寄养在一个结拜姊妹家里。稍长，她便随母亲同住张姓主人家，做小婢女的劳作。过了两年，母亲用积蓄的一点钱送她上学，读了七八年书。可悲的是，当她长到豆蔻年华时竟被少东家奸污了。

1926年，阮玲玉十六岁，报名考入了规模较大的明星影片公司，当时中国电影尚处于无声片阶段。起初，她只充任临时演员角色，以后逐渐升为二三等演员。由于她注意观察生活、表演逼真，因而逐渐被导演和观众重视起来。

阮玲玉在明星影片公司只拍了三年戏，十九岁进了联华影业公司，一直到她不幸辞世。在“联华”，她先后拍有《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城市之夜》《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桃花泣血记》《小玩意》《人生》《归来》《香雪海》《再会吧，上海》《神女》等影片。

对于这些影片，阮玲玉自己感到很满意，她认为这些影片是从谈情说爱、粉红色的梦走向现实，揭露人生、表达大众心愿的。

但在阮玲玉蜚声影坛、名闻遐迩的同时，她却处于极端痛苦的深

渊之中。原来，那个名叫张达民的少东家，把懦弱的阮玲玉视为摇钱树，死死缠住她不放，以无赖手段敲诈她从水银灯下挣来的血汗钱，供他无度地挥霍，还百般凌辱、威胁，要毁灭她的声誉。与此同时，她又看穿了同居茶商唐季珊到处拈花惹草的丑恶面目。当时年轻柔弱的阮玲玉，既无法挣扎开恶势力的控制，又摆脱不了被人当作“玩物”的命运。她感到屈辱、孤独和绝望，1935年3月8日，终于愤而自杀，时年仅二十五岁！与阮玲玉同时期自杀的，还有在明星影片公司有“作家明星”称号的艾霞女士。这两位明星的陨落，对当时中国影坛是个沉重的打击！

阮玲玉死后，遗体殡于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前往吊唁者汇成了人的海洋。她的坟墓坐落在联谊山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年（指1996年——编者注）当是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影星逝世六十一周年了。

出于书香门第的梅熹与梅阡

四十年前上海大名鼎鼎的电影演员梅熹，曾因演《啼笑因缘》，在《家》中扮演觉新，在《木兰从军》《西施》中扮演男主角而名闻海内，红极一时。现在，他的弟弟梅阡与他同在北京影剧界工作，梅熹已近古稀，梅阡则已成为内地名导演之一了。

可是，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梅氏弟兄是天津人。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教务长梅贻宝，都是他的本家。人们也许更不知道，清朝嘉庆举人梅树君（成栋）是他们的曾祖，津门名士梅小树（宝璐）是他们的祖父。梅树君、梅小树都是名诗人，留有不少诗篇传世，他们广交名儒雅士，集结诗社，两代风流。

梅树君的诗，刊印的有《欲起竹间楼存稿》六卷、二册，《树君诗抄》一册。他还编辑、勘定过不少别人的诗集，如《津门诗抄》三十卷、十册，《精选五律耐吟诗》一册，《秋吟集》一册，《黄竹山房诗抄》二册。

梅小树的诗集，有《闻妙香馆诗存稿》一册，《天津梅小树、华葵生诗抄》一册。

他们两人的诗篇，久在津门传诵。梅小树为天津鼓楼所撰对联：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真是一副脍炙人口的好对。他的诗清隽淡雅，耐人寻味。早年天津胜迹经他题咏的不少。如：

桃花寺外桃花口，杨柳青边杨柳青。
七十二沽沽水阔，半飞晴絮半飘萍。

丁字沽边柳万条，青青一带锁红桥。
帆樯纵借东风力，消息全凭子午潮。

给后人对津沽旧地“杨柳青”和“丁字沽”的探幽访古，增添了情趣。

梅树君的诗，情景交融，情深意切，诗中有画，意境清新；遣词铸句，平易自然。试举几首为例：

津门名胜是诗家，沽上题襟事已赊；前辈风流摇落后，
独流清韵在梅花。

——《诗家》

玫瑰入市春花尽，芍药簪并夏景来；又是一年容易过，
樱头红映掌中杯。

——《卖花》

百花寒未吐，辜负此清明。帘里风将至，云黄雨未成。
冬衣绵又著，春暮扫难行。薄酒陈家祭，聊申窭子情。

——《清明日大风》

梅熹兄弟出于这样的诗文世家，对他们投身艺术生活，不能说没有影响。

《红楼梦》电影话当年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放后，观众莫不拍手叫好。《红楼梦》故事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是1924年梅兰芳主演的《黛玉葬花》戏曲纪录片。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和孔雀影片公司又分别制作了故事片《红楼梦》。到1942年，上海中华联合影片公司也拍摄了《红楼梦》故事片。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香港长城影片公司制作了《新红楼梦》。60年代初，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又把越剧《红楼梦》拍成了电影。

在这几部《红楼梦》电影中，演员阵容最强的，要算是1942年在上海拍摄的那部了。周璇演林黛玉，王丹凤演薛宝钗，袁美云反串贾宝玉，白虹演王熙凤，欧阳莎菲演袭人，梅熹演贾政。这些演员在当时都是红得发紫的影坛大明星。

周璇演林黛玉，是最理想的角色，她出身贫寒，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长大以后，自己又经历了爱情悲剧，所以常自称为“林黛玉第二”。她在饰演林黛玉时，浓妆淡抹，把自己打扮得雍容华贵，楚楚动人；但卸妆后，却总是穿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不施脂粉，朴实无华。

周璇文化水平低，识字不多，既然要演林黛玉，一定要先把原著《红楼梦》通读一遍；但字里行间，经常要碰到“拦路虎”，读不通，看不懂，只得借助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小词典》。反串贾宝玉的袁美云，幼时唱过京剧，读过脚本，有些文化基础，于是与周璇一起，互相勉励，并肩攻读。她俩足足读了一个月，才把原著勉强读完。周璇对袁美云说：“一个人没有文化真是苦啊！”

王丹凤原名王玉凤，在上海爱国中学读书时，就非常喜欢观看周璇、袁美云等明星的影片。有一次，她为好奇心所驱使，跟人到合众

影片公司去看拍电影，不料被导演朱石麟发现，从而踏进了电影界。她演《红楼梦》时年仅十七岁，与薛宝钗年纪相仿，那时她在影坛上已初露头角，至此更是红透了半边天。

弹指间，五十五年过去了，周璇已于1957年在上海病故，王丹凤和袁美云还健在；据说，她们看了新拍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赞不绝口，而且感慨地对亲友们说：“那时大观园里的姐妹们，已经所剩不多了！”

话剧、电影和小说《秋海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陷于孤岛时期，著名电影演员石挥，以扮演话剧《秋海棠》中的京剧演员秋海棠，一举成名，赢得“话剧皇帝”的美誉。同时，电影界也推出了《秋海棠》影片，主角由影星吕玉坤扮演，也获得了好评。

这两位著名演员都是天津人。石挥原名石毓涛，天津西郊杨柳青镇人。初在北平参加话剧活动，后到上海参加“苦干剧团”。在《秋海棠》剧中，以主角被毁坏面容后的表演最为感人，演员出场时，先是背向观众，缓步走到舞台中央后猛然转身，把一副被刀划了十字伤疤的丑面孔显露给观众，口诵昆曲《林冲夜奔》中的道白：“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一时全场震动，静寂中掩不住观众的抽泣声；直到终场，满场的掌声才冲破了那沉重的压抑气氛。

吕玉坤也是在天津长大的，与其父吕月樵同为京剧演员。后来，吕玉坤到上海进入电影圈，成为著名小生演员。他在影片《秋海棠》中担任主角，是以被毁容前的表演而被称道。因为他有京剧的功底，他的小生戏《罗成叫关》的几句唱腔，获得观众满场掌声。在和罗湘漪离别时，吕玉坤撩起长衫迈步和甩围巾过肩的动作，都显示一个京剧演员具有的身段特色，恰合身份。

《秋海棠》的话剧和电影，都是根据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改编而成的。这篇小说所采用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天津。那是六十多年前军阀统治时期，军阀魔掌惨杀京剧演员的一段实事。小说作者把当事者的姓名加以变化并把情节作了艺术加工。

事件发生在1927年1月。当时在天津做直隶省保安司令、督办和省长的绿林出身的褚玉璞，先属山东张宗昌部下，后与奉军李景林组为“直鲁联军”，分据冀、鲁两省。他于1926年春进驻天津，1928年

由于北伐军赶走奉军而倒台。褚在天津两年半时间，杀人不少。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志士江震寰等十五人，就死于他之手。有两个从上海来的京剧演员小刘汉臣和张三奎，1926年到北方演出。在天津期间，张三奎和褚玉璞的一位年轻的姨太太发生恋情，两人时常背着褚玉璞亲密来往；小刘汉臣也未加避讳地把剧照送给了这位姨太太，存放在她屋内。后来被褚玉璞知晓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将张、刘二人捕获，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秘密处死。当时报纸曾作过揭发报道。

当时，上海的小说作家秦瘦鸥即以这件事为题材，写成小说《秋海棠》，1941年在上海《申报·春秋》副刊发表。

《唐伯虎点秋香》五上银幕

两年前，中国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与内地“大腕影星”巩俐联手主演了影片《唐伯虎点秋香》，我由此忆起“点秋香”五上银幕的轶事。

唐伯虎史有其人，他名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生于1470年，卒于1523年，乃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他是江苏吴县人，少时纵酒放荡，不事科举，学画于周臣，与祝允明、沈周等相友善。后听祝允明劝，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不久，以程敏政泄试题事牵连，遂下狱，谪为吏。唐伯虎耻不就职，自放于名山大川，筑桃花坞以居，毕生致力于绘画，工山水、人物、花鸟，兼及书法，且擅诗文。

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征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与沈周、仇英、文征明合称“明四家”。有《六如居士全集》《画谱》等作品留世。唐伯虎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风流轶事，多年来成为影剧家们追寻的题材。

这次周星驰与巩俐联袂演出的《唐伯虎点秋香》，乃银幕上的第五次“点秋香”，早年还有三次，近年一次。

记得第一次是在1926年，由当时上海的“天一公司”（即今日中国香港邵氏公司的前身）拍摄。导演是“天一”老板邵醉翁，主演秋香的是老板娘陈玉梅。“点秋香”首搬银幕，影响很大。

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在1940年抗战时期上海“孤岛”拍摄。有意思的是，两部影片都叫《三笑》。一部由艺华公司出品，导演岳枫，主演李丽华、严化。另一部由国华公司拍摄，张石川导演，周璇、白云主演。

1940年上海两家公司同时拍了《三笑》，实是两个公司的“擂

台”产品。两部《三笑》的秋香分别由周璇、李丽华扮演。艺华公司听说国华公司的《三笑》起用周璇，他们为了出新意，遂大胆起用新人李丽华。李丽华当时没有名气，为了扩大她的知名度，公司别出心裁地制造“新闻”——在报纸大版面上刊登李丽华的“鸣谢启事”，声言李丽华丢失了巨型钻戒，又失而复得，遂登报致谢。影片还未上演，李丽华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待影片上映，李丽华一举成名，很快进入一流女星行列，五十余载红透内地、港台地区，被誉为“影坛长青树”。

两部《三笑》的唐伯虎，分别由白云和严化扮演。当时国华公司选定的唐伯虎的扮演者是吕玉坤，但吕玉坤在南京演剧。国华公司急电催其回沪，吕接电后，由于有戏约在身，不好毁约，又考虑国华拍片不会那么快，晚几日也无妨。一周后，吕回沪，沪市街头已贴满周璇、白云主演《三笑》的广告，影片已上映，周璇唱的《点秋香》插曲已风靡上海，使吕玉坤大为惊异。

第四次的《三笑》，是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香港凤凰公司拍摄的，李萍倩导演，陈思思主演秋香，亦轰动一时。

“杨乃武冤案”入戏来

曲剧中有一出清代冤案戏《杨乃武与小白菜》。戏演举人杨乃武与佃户毕兰英（即小白菜）通奸后脱离关系，小白菜又被余杭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和看上，刘子和用毒药将小白菜的丈夫葛小杜害死。刘锡彤为掩盖其子的罪行，买通杭州知府边宝贤、浙江巡抚杨昌浚和钦差胡瑞澜，并采用骗诈、威逼等手段，迫使小白菜招供杨乃武是凶手。杨乃武开始也被屈打成招，致使二人皆被判死刑，等候处决。嗣后，杨乃武的姐姐赴京告状，后经上级衙门复审，查明冤情，杨乃武昭雪，凶手伏法。

这出戏是历史事实。“杨乃武冤案”是清代末年“四大奇案”之一（另外三大奇案是：张文祥、春阿氏和锔碗丁）。“杨乃武冤案”在戏曲上反映很早，早在1917年12月21日，上海就将此案以京剧形式搬上舞台，剧名叫《余杭奇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出戏，从时间、地点、人物上，基本都是真实的，历史案件与戏里所表现的，基本一致。为什么说是“基本”呢？因为戏与史在个别人名、情节上有些区别。杨乃武确实是清代末年的一名举人，“小白菜”本名叫毕秀姑，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仓前毕家塘村，她在戏里称毕兰英。“小白菜”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她行为轻薄；一说她平时爱穿白鞋、绿衣，色似“白菜”。历史案件中被毒死的小白菜的丈夫叫葛品连，戏里称葛小杜（评剧）或葛小大（京剧）。

杨乃武案发生在清末1873年11月28日，这天葛品连被毒死，12月1日即革去杨乃武举人。此案发生后，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上海《申报》1874年1月13日就发表了题为《详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事案情》的报道，明确指出这是一桩冤案。这是报纸上最早为杨乃武鸣冤的一篇报道。在监狱里，杨乃武和小白菜受尽了酷刑。当年报章上披

露，杨乃武“极加五刑，使之七次昏绝”；小白菜“刑讯至三昼夜，铁链之陷入膝骨而抽之复出者，至再至三”，“锡龙滚水浇背，火烧铁丝刺乳”。这些在戏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从杨乃武的唱词“好年华消磨在刑杖以下公堂之上，我睡不尽身下的薄草，守不暖墙上的铁窗”中就可见一斑。

此案当年曾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最终得以平冤。

当然，杨乃武案昭雪，并不说明清末官场多么清廉，而是从侧面体现了官场上的派系斗争。当时，知府边宝贤、巡抚杨昌浚和钦差胡瑞澜均为清廷东宫的亲信，而西宫为了利用杨乃武一案翦除东宫这一帮异己势力，使得东宫也用此案做文章，为其平反。

平反后，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晚年生活也很凄惨，今在浙江省余杭市余杭镇的一座山上为小白菜建有墓塔。

曲艺撷枝

qu yi xie zhi

漫话相声《关公战秦琼》

侯宝林说的著名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人们大多相信所说乃韩复榘其事，也有人认为是以讹传讹。

其实这个段子并非空穴来风，实是受一个地方戏《关公战秦琼》（又名《唐汉斗》）启发而成。这出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韩复榘一度管辖的鲁西北一带，常由河北梆子剧团上演。

这出戏主要叙说一位书生自幼与一位小姐订婚，但书生家道中落后，小姐之父起意退婚。小姐遂与书生相约于关帝庙互诉心曲，并将饰珮赠予书生。两人分手后，庙里的关帝、周仓大为不满，认为两人玷污圣庙，关羽遂派周仓去捉拿书生，但行至书生家门时，却遇到门神——秦琼、尉迟恭阻挡。周仓于是请来关羽，引起“关公战秦琼”，直到惊动玉皇大帝出面调解，最后书生高中衣锦还乡，形成洞房花烛大团圆的结局。

这是一出文唱武打齐备，生、旦、净、丑俱全的喜庆神话戏，颇具有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的思想，在旧时代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据说最早说《关公战秦琼》这段相声的是天津曲艺家小蘑菇，而并非侯宝林。那时相声里的主人公就是张宗昌，由此看来，这段相声的成形应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即张宗昌1925年入鲁任军务督办被杀之后）。但是否小蘑菇创作，已不可考。据侯宝林的老搭档郭全宝谈：侯宝林20世纪50年代初对此相声段子加以改编，将张宗昌换成韩复榘，是与当时“批判”梁漱溟先生有关。因当时有“韩复榘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的流行语，故易张为韩以加强戏剧性效果。可见，侯宝林只是一个改编者。至今台湾地区艺人在说这段相声时，主人公仍然是张宗昌。

张宗昌是臭名昭著的军阀，出身于地痞匪类，后被招安，最后混成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他还当过山东的“草头王”。这位满脸横肉、流氓成性的张“督办”，当时报纸上送给他“狗肉将军”的“雅号”（他也被呼为“长腿将军”，因其逢战必溃逃也）。

张宗昌入鲁任军务督办后，每年都要大肆为自己及父母妻妾祝寿，遍请京、津名角，极尽“风光”，像余叔岩、梅兰芳等都曾被“邀请”去唱过堂会。虽然据考证，在张宗昌身上并未出现过《关公战秦琼》的荒唐事，但人们往往宁信不疑，因为这个相声段子在对军阀残暴与愚昧的揭露上堪称入木三分。

至于韩复榘，他1930年入鲁任山东省主席，而其父1927年已逝于北京，所以这桩愚昧之举也无从发生。而且韩复榘出身书香门第，少时即能诗善文，尤以书法见长，不似张宗昌，不通经史，不懂戏文，只是附庸风雅而已。

金喉歌王小彩舞

据说内地十几家省市电视台正在播映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其主题歌“千里刀光影，仇恨满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是著名曲艺演员小彩舞演唱的。这位当年睥睨鼓界的金喉歌王，笔者是很了解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宝全、白云鹏彪炳鼓坛，其后虽有几位大鼓艺人露出头角，但技艺较之刘、白相去甚远，鼓界确有后继乏人之慨。40年代初，小彩舞露演于天津中国大戏院。她天赋甚高、音域宽广、声调感人，一时芳名大噪、听者如堵，俨然成为继往开来的鼓界后起之秀。

小彩舞原名骆玉笙，七岁时在南京学京剧，后改学京韵大鼓。她仪态端庄、嗓音清脆嘹亮，能把京剧老生、老旦唱腔熔冶于京韵大鼓腔调中，独辟蹊径，大胆革新。无论唱平腔、低腔，她都能运用自由，且韵味深厚无穷、耐人寻味。当时小彩舞做工尚未臻成熟，像武段子《长坂坡》《古城会》《关黄对刀》等，虽能演唱，但不精致，因而这些段子不经常露演。但演唱悲柔缠绵的段子，则有突出的成就。如《糜氏托孤》《别母乱箭》《红梅阁》《刺汤勤》等，最为拿手，海报一出必然狂满。这些段子她唱得激越、悲凉、凄恻、感人至深。

小彩舞最擅长的是《剑阁闻铃》。此段为清代文人韩小窗所创，写的是唐明皇避安禄山之乱逃亡四川，行至剑阁夜不能寐，闻铃声而思念杨贵妃的情景。歌词开头“马嵬坡下草青青，今日犹在妃子陵。题壁有诗皆抱恨，入祠无客不伤情”，小彩舞唱得抑扬婉转，含悲带恨，把一个风流唐天子的爱情悲剧展现在听众面前。随后唱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天子自己提出设问：“自古巫山会入襄王梦，我何以欲梦卿时梦不成？”随之用了六句排比句子，一方面回答自己的提

问，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左右思量、心如刀绞的沉痛心情：“莫不是弓鞋懒踏三更月？莫不是袖儿难禁五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卿嫌闷？莫不是兵马奔驰你的心怕惊？莫不是芳卿内心含余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至诚？”小彩舞唱得如行云流水，珠落玉盘，含悲带戚，扣人心弦。接着唱：“细思量都是奸臣他误国，真冤枉偏说妃子你倾城。”“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使我血泪千行似雨倾。”歌声由低沉、如泣如诉，逐渐变得明朗、爽快，听众得到美的音乐欣赏，似乎也能体谅到误国大罪不能委之于玉环了。

相声世家常连安、常宝坤

前几年，应旅美台湾地区相声大王吴兆南之邀，中国相声代表团一行八人赴美演出，开创了海峡两岸相声演员同台演出的先河。

这个代表团中，有出身于著名相声世家的常宝霆、常宝华、常贵田等。常宝霆和常宝华是已故著名相声演员常连安之子，艺名“小蘑菇”的常宝坤之弟。常贵田是常宝坤之子，已是常家相声的第三代了。

常家相声的创业人常连安，原在北京富连成科班学京剧，工架子花脸，与著名的京剧大师马连良同属于“连”字辈师兄弟。后因倒嗓，中断了学演京剧的生涯，曾流落在街头，做过“打鼓”收买破烂旧物的营生，又摆过酒摊做小买卖，还兼为京剧票友们说戏，以之维持生活。同时，他还学会了变戏法。

六十年前的1927年，常连安带领乳名叫“柱子”的长子常宝坤到张家口卖艺。当时年仅六岁的常宝坤，跟着父亲“略地”变戏法，边表演边学艺。常宝坤天资聪明，口齿伶俐，爷俩儿在“开场”说“艺话”时，应对自如，不断博得围观顾客的大笑。张家口盛产蘑菇，当地人爱吃，因为幼年的常宝坤受人喜爱，人们便以喜爱蘑菇的心情叫他“小蘑菇”，以后越叫越响，就以之为艺名，流传于曲艺界。

常连安为培养常宝坤成才，放弃了变戏法这个行当，教导儿子学相声，父子两人一逗一捧，亦庄亦谐，配合默契。后从张家口辗转到天津，在天津为常宝坤拜了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为师，常宝坤时年九岁。从此，技艺大有进步，仍是父子俩表演，小小的儿子逗场，父亲捧场。20世纪30年代初，常连安和“小蘑菇”在天津各杂耍场表演，声名大噪，一天连赶好几场，观众兴趣始终不减。后来，因常连安到北京开启明茶社，常宝坤改与赵佩茹合作，两人配合得更好，声誉更

高。

常宝坤说相声善于“现挂”，即当场抓彩逗场。他运用相声艺术的讽刺性质，敢于说出观众要说的心里话，但因此为日伪所嫉恨。“七七”事变后，日伪统治天津期间，常宝坤曾用“耍猴儿”没有锣，讽刺日寇迫使中国老百姓献铜献铁；说“牙粉袋儿”，讽刺日伪时期物价上涨，面粉袋小成牙粉袋；说“打轿票”，讽刺旧警察对老百姓运物过桥进行勒索等，以揭露敌伪的黑暗统治，为天津观众所器重。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初，常宝坤在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时牺牲。

常宝坤的几个弟弟，还有他的儿子，均能继承家传相声技艺。

鼓界大王刘宝全

幼时常听人谈：唱戏最好的是梅兰芳，说大鼓书最好的是刘宝全。稍长，看过梅兰芳演的《宇宙锋》和《穆桂英挂帅》之后，大饱了眼福，可是刘宝全的大鼓书却一直没看过，因为刘宝全1942年就故去了，也只好听听他的唱片来过瘾。据见过刘宝全的人说，刘宝全是高高的身材，长眉大眼，隆准丰颐，举止潇洒，在台上表演时挥手目送，引吭高歌，唱做和风度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

刘宝全原名刘毅民，河北省深县人，他幼时随父学唱弹三弦和木板大鼓，中间学过京剧老生，后来又改唱大鼓。曾拜当时的名艺人胡十（金堂）为师，并得艺人霍明亮、宋五的教益。

1900年，他从天津到北京献艺，与当时的京剧名家谭鑫培、孙菊仙交往，在艺术上又得到他二位的指点和熏陶，遂对木板大鼓加以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吸收了京剧唱念的吐字发音、行腔走韵，并将河北的乡音改为北京的语音语调，同时借鉴京剧的表演，用于鼓书的身架、眼神，还融进了柳子腔、石韵书、马头调等的艺术成分，形成了完整的大鼓演唱技艺，从而使京韵大鼓从木板大鼓的母体中脱胎而出。

后来，刘宝全又得文人庄阴棠之助，把他原来经常用的本子《白帝城》《活捉三郎》《徐母骂曹》等作了修订，历十年的努力，获得成功，并首为京韵大鼓开宗立派，世称刘派。以后，他轮演于京、津、沪、宁、汉口一带，誉满南北，并博得“鼓界大王”的美誉。

刘宝全的嗓音好，声腔甜润清亮，音域宽广，高低兼备。他善于使高腔制造气氛，注重寓情于声，声情相融。在说唱的处理上，形成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风格。在当时他与谭鑫培、双厚坪并称“艺坛三绝”。他一生曾演出了《单刀会》《华容道》《长坂坡》《群英

会》《战长沙》《白帝城》《赵云截江》《大西厢》《游武庙》《宁武关》等二十三个大鼓曲目。

1939年，北京曲艺界曾举行过一次盛会，内容是北京曲艺同行欢迎“鼓王”刘宝全的联合演出，地点在鲜鱼口华乐戏院。

刘宝全在曲艺公会会长曹宝禄等人的邀请下，慨然应允连演三个晚场：第一天是他最享盛名的拿手杰作《大西厢》，第二天是《赵云截江》，第三天是《华容道》。这场盛会轰动九城，票很快被抢购一空。

“鼓王”穿着一件干净挺括的浅灰绸子大褂，白绸子裤子，系着黑色腿带，礼服呢面白千层底便鞋，白丝袜子。六十多岁高龄，显得精明强干，干净利落。

“鼓王”上场前，台下一切活动均已停止：茶房们手里的茶壶、手巾板全放下了，卖食品的挎着木盘不卖了，找个不碍事的地方面向着舞台，屏息而立，听戏的也不走动了。

这三天的确令人大饱耳福，也大饱眼福。三天的段子，各有不同的风格。“鼓王”演唱《大西厢》的特点不着重于缠绵悱恻，却在唱中突出俏皮的劲儿来，他从语气到形体主要刻画崔莺莺和红娘这两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处境的年轻姑娘，其次刻画张君瑞的痴情，惟妙惟肖。他还把京剧的身段和台步恰当地用在人物身上，唱到红娘“穿游廊，过游廊，不大会儿到了西厢”这句时，摆动腰肢，走出小脚步；唱到红娘见了张君瑞，伪装气愤地责备他“呔，书呆子，你太荒唐”一句时，脚不错步，以单臂叉腰，用手指出去，这些都使京韵大鼓的表演更丰富了。

《赵云截江》和《华容道》都是武段子，可是表演方法也有不同。演《截江》他上了“刀枪架”身段，当吴将命军士向赵云放射乱箭时，赵云“忙摆动手中枪，恰好似乌龙摆尾，怪蟒摇头，啪啪啪，把

那雕翎打落在长江”一句，随着唱，刘宝全伸出持板的左手，端拿起鼓键子的右手，比作手里拿的一杆枪，左右手互相配合着动作，立刻把“乌龙摆尾、怪蟒抬头”的唱词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来。《华容道》则侧重在眼神表情，配合以雕塑形的身段，刻画关羽、曹操那两个人物。表演关羽大多半合眼睛，形体松弛，但一到关键处，随着唱词猛地一睁眼，同时形体也挺拔起来，面部严峻，立刻令人感到关羽威风凛凛的舞台美。表现曹操时那面部的奸笑，形体的松坦，也充分刻画出这个枭雄的性格特点。

评书大家连阔如

评书界有几位著名女艺人，如南方以说《水浒》著称的王丽堂，北方以说《三国演义》《东汉演义》闻名的连丽如，都是家学渊源，艺有专长的。笔者曾听过连丽如的评书，感到其容貌、腔调和动作，皆酷似乃父评书大家连阔如。

连阔如1903年生于北京，满族镶黄旗人，祖姓毕鲁氏，原名毕连寿，连阔如是他的艺名。他学说评书，先拜师李杰恩学《西汉演义》，后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汉演义》。当时北京有一位田岚云老先生说《东汉演义》，名扬京城。听众孙昆波把田老先生书中的精华告诉连阔如，再加上他的天资和勤奋，20世纪30年代末期连阔如在东交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东汉》，声名鹊起。从此，他更刻苦地向前辈艺人学习。他还借鉴京剧表演艺术，将其融于评书中，加以马跑、马嘶等口技辅助表演，被听众称为一绝。他尝言：“说书时要做到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

连阔如度日勤俭，但不吝购书。他居住在和平门外琉璃厂，是“邃远斋”“来薰阁”等古书店的常客。为了考证汉献帝的“衣带诏”，曾购买和翻阅了七八种《汉书》和《三国演义》的版本。为了提高艺术水平，他不但向知名的艺术家学习，还结识了许多京剧界的朋友，如萧长华、徐兰沅、郝寿臣、谭富英、李万春、马富禄等，以京剧唱、念、做、打的功夫丰富自己的表演。犹记20世纪30年代末，京剧名伶尚小云曾邀请他为自己的科班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演出，倾城轰动。

连阔如不仅说书技艺精湛，而且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从不奴颜婢骨。尝闻吴佩孚专权时，他已小有名气。有次请堂会，吴佩孚得知座上有一说书人，便白了他一眼，连阔如见之，愤然而去。日寇侵华时，责令他在电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他却之不敢，便说了一段

《廉颇与蔺相如》，意在号召中国人团结抗日，结果遭到斥责。

而今连丽如承继父业，卓有声誉。据说，连阔如本认为女孩子不能说评书，但在上海见到王少堂的孙女王丽堂说《武松打虎》后改变了想法，为表达“南丽继承南王评话，北丽继承北连评书”之心情，始给女儿更名连丽如，准其说书。

艺人爱国讽时弊

20世纪40年代初，是日寇统治北平最黑暗的时期，人们敢怒不敢言，一些爱国艺人却借助演出的机会，巧妙地抒发了心中的愤懑。

那年月物价飞涨，一日三跳，钱越来越“毛”。少妇拿一分的“钢蹦儿”扎俩眼儿当纽扣使；姑娘把一元一张的伪币折叠成纸花戴在头上，都是常事。提着一口袋票子都买不回一口袋米，真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相声艺人常宝坤（艺名小蘑菇）表演相声时说：“别看现在几十块钱买一袋白面，再来几次‘强化治安’呀！白面就两块钱一袋啦！”捧哏者说：“嚯！这么便宜？”常说：“是牙粉袋呀！”

说竹板书的张海峰（艺名小蜜蜂），他手里拿着伪币，指着上面的孔夫子像说：“你看孔夫子，左手拇指和食指弓成一个圈儿，另外仨手指头伸着，右手伸食指插到左手那个圈儿里，剩下三个指头拳着，这里头有个讲究，这是说呀，一块钱哪，只能买仨烧饼。”有的听众说：“现在涨价了，买不来啦！”

他说：“是啊！还有一张哪！”于是，他又拿出一张伪币说：“你看这张，孔子把两手都揣到袖筒儿里了，就是说，连一个烧饼也买不回来啦！”接着又说：“你想，连孔圣人都急得发愣，老百姓更没法儿活啦！”

日伪政权号召献铜献铁，名曰“献”，实则无异于抢劫，就连住家户上的铜环子、旧王府门上的铜帽钉子，甚至羊肉铺的羊肉床子、烧羊肉时摆羊肉的大铜盘子，全被逼着献出了。

相声艺人高德明，在说相声“拴娃娃”时，说到老员外到庙里烧香、磕头的时候，老和尚敲磬发出“啪啦！啪啦！啪啦”的声音，捧哏

者说：“嗳！磬是铜的，敲起来应该是‘扑当！扑当！扑当！’你怎么是‘啪啦！啪啦！’的呀？”高说：“你怎不知道？不是把磬都献了铜了吗？老和尚找了个砂锅摆在那儿凑合着用呗，可不就‘啪啦！啪啦！’的吗？”把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

那时，日本人在奴化教育的方针下，还强迫中国学生学日语。冷面名丑贯盛习演《法门寺》的贾桂，演到郿邬县令赵廉看状纸时，他问赵廉：“你认识字吗？”赵廉答：“本县乃二甲进士出身，焉有不认识字之理？”贯接着说：“我以为你光学日语，把中国字都忘了呢！”把汉奸走狗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荀慧生表演《丹青引》，有一次当场作画，画了幅山水“孤城落日”，他画出了人民群众诅咒日伪统治的愤怒火焰，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杰作，当即被观众买了去。

双簧艺人孙宝才

“双簧”作为一种曲艺品种，在北京已有百余年历史。它是由清咸丰、同治年间北京评书艺人黄辅臣所创。黄擅长模仿人物语言、动作和市声、鸟兽声等，以连学带做著名。晚年的黄辅臣嗓子失声，不能再演唱，遂改为两人合作，一人模拟各种表演，一人藏在后面学各种说唱。因其姓黄，故称“双黄”，后来人们称它“双簧”。

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北京双簧艺人中的佼佼者，当推孙宝才。这位艺名“大狗熊”的演员，确实长得膀大腰圆，而且憨态可掬，只要他一开口说唱或模拟一两个动作，便能赢得全场叫好。

孙宝才早年拜卢伯三为师，学习单口、双口相声及双簧。卢氏功底深厚，以善说“八大棍儿”（笑话选段）而享盛名。孙宝才得此高人真传，无论说唱还是表演，均具乃师风范。

孙宝才所表演的双簧节目丰富多彩，其中脍炙人口的有《售声》《罗爷》《照花台》《八大改行》等。

《售声》可以说是孙宝才的代表性节目。正月的小金鱼儿，二月的带汤豌豆，三月的豌豆黄儿，四月的杨妃芍药，五月的甜巴旦杏，六月的沙瓤西瓜，七月的各种青菜，八月的葡萄和鲜枣儿，九月至腊月依次出现于市面的草芝麻秆儿、柏树枝儿、挂钞儿，以及除夕夜纸印的财神爷，凡北京一切叫卖声，无论词句简单还是复杂，也无论腔调低沉还是高亢，他都能学得惟妙惟肖。

《八大改行》亦是他颇见功底的节目。内容包括刘宝全卖粳米粥，抓髻赵卖切糕，龚云甫卖黄瓜，郝寿臣卖西瓜，萧长华卖豆汁儿，王杰魁卖馄饨，梅兰芳卖晚香玉，白玉霜缝穷。其中白玉霜缝穷，是孙宝才自己根据这位蜚声艺坛的“评剧皇后”的悲惨遭遇改编

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邀请色艺双全的白玉霜（原名李桂珍）打牌，被婉言拒绝。曹锟恼羞成怒，下令将白玉霜轰出北京。孙宝才当年演出这段节目时，声情并茂，颇为感人。

孙宝才表演双簧或相声，从来没有一句“脏口”（即污言秽语），因此，唯有他的场地，妇女们才敢涉足，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云里飞与大金牙

旧时，北京天桥的江湖艺人中，素有“天桥八大怪”的说法。而“八怪”之中，最负盛名的是两怪，一曰“云里飞”，一曰“大金牙”。

当年，云里飞用哈德门牌香烟盒子裱糊做成京剧舞台上乌纱帽（梨园行曰“盔头”），扮演剧中角色，演来惟妙惟肖。平时在天桥及隆福寺、护国寺两庙会卖艺，声名远播。他表演时夹以村言戏语，皆成趣味，诙谐幽默，观众无不捧腹。著名相声艺人侯宝林当年就曾师从云里飞学艺，故侯老对京剧之演唱，颇有功底，张口即来。

云里飞最拿手的节目为“一赶三”《二进宫》，表演时，他一人担任青衣李艳妃、花脸徐延昭、须生杨波三个不同角色，演者忙得不亦乐乎，围观者则前仰后合，几乎笑破肚皮。

20世纪40年代，有人曾作打油诗一首，吟咏云里飞其人其艺：

父老争传云里飞，东西两庙笑微微。
村言戏语皆成趣，纸冠知音已渐稀。

大金牙在天桥，用一句老北京的俏皮话讲，可以说是“蝎子屎——独（毒）一份！”

他边拉洋片边带唱，观者甚众。大金牙用那沙哑的嗓门，唱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怪调奇腔，颇能引人入胜。

大金牙有二女，长女为唱西河大鼓的焦秀兰，次女名焦秀云。可怜大金牙老年染阿芙蓉僻，终至犯瘾倒毙街头。当年过手金钱如流水，最后吃抽一尽，堪为一叹！

人亦有打油诗咏之：

洋片拉唱是独门，锣鼓声中己自尊。幸有双花堪媲美，可怜瘾死葬黄昏。

天桥艺人“穷不怕”

旧时北京天桥是个民间艺人荟萃的地方，素有“天桥八大怪”之说。其中一位名叫朱少文者，早年是京剧演员，唱花脸和武丑。后来改行在北京各大庙会和天桥地区唱太平歌词和说笑话，由此逐渐演变成一种新型曲艺形式——单口相声。

朱少文在演唱时，用两片竹板伴奏，竹板长五寸、宽三寸，上面刻有两句诗：“满腹文章穷不怕，五年书史落地贫。”由此，人们给他起艺名叫“穷不怕”，业内人士尊为穷先生。

后来，相声界分为朱、阿、沈三派，而名声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数朱派“穷不怕”了。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尤其是单口相声，一人学多人的声音，要谐而不厌，非有点儿真功夫不可。“穷不怕”是单口相声的开山祖师，后来也和徒弟表演双口相声和三人相声。他知识丰富，能当场抓哏，随编随说，雅而不俗。他常以相声这种形式对当权者进行无情的鞭挞和讽刺，对劳动者进行热情的歌颂和赞美。他所创作的《得胜图》，通过讲述太平天国起义军打垮清朝统治军队的故事，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颂扬了农民军的英勇善战，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

“穷不怕”有时边说边写，边写边唱，为表演增加了不少趣味性和知识性。例如，他讲一个“容”字，先写一撇，说：“写上一撇不是字，饶上一笔念个‘人’”，然后写出“人”字，又说：“人字头上点两点（写出“火”字），火到临头灾必临（写出“灾”字）。”又说：“灾字下面添个‘口’（写成“容”字）。”最后说：“得容人处且容人。”在此点出了“劝善”之主题，让人觉得寓意深刻，又有艺术性。他多次当场写出一副对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上联是：“画上荷花和尚画”，下联是：“书临汉字翰林书。”其独到之处是正着念和倒着念，字音完全相同，从而妙趣横生，被不少人作为佳句吟诵。

“穷不怕”有一手众所周知的绝活——白沙撒字。他用手指捏着白土，能在地上撒出丈尺双钩大字，很有气势。他每天到天桥，先用白土撒一个大圆圈，再在中间撒出一个“福”字和一个“寿”字，且均是一笔写成。大字下面又撒几行小字，即为当日说唱内容的提要。他这种边说边写的表演形式，配合非常巧妙。有一次他在地上撒出一个“二”字，对方问：“这是什么？”他回答：“筷子。”问：“干什么的？”答：“净盘大将军。”问：“现在何处？”答：“没事了。”问：“为什么？”答：“他太好嘍。”问：“好嘍？”答：“不搂盘里的菜怎么没了！”这是对贪官污吏的尖刻讽刺，表演得惟妙惟肖。因此有人用诗赞美他说：“信口诙谐一老翁，招财进宝写尤工。频敲竹板蹲身唱，谁道此人不怕穷。”

相声艺人“老万人迷”

北京早年的相声艺人中，以唱工取胜者当属“老万人迷”，老万人迷姓李，名号已不可考。他有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基本功亦非常扎实。

早年的相声艺人，要具备说、学、逗、唱、吹、弹、拉、打等八个方面的基本功，缺一不可，因此，一个优秀的相声艺人，必须有聪颖的天资与一副运用自如的好嗓子。

老万人迷的形象丑陋而怪异：头顶与下巴均尖似塔尖儿，黄鬓独眼，两腮短髭根根直立，状如猬毛。单就这副模样儿，让人一看就会发笑，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此公还一向不修边幅，衣若悬鹑。

老万人迷作艺时的全部道具只有一小口袋大白粉，一双前后开绽的破鞋，一副光滑红亮的竹板儿。别看这些分文不值的道具，却各有各的用处：大白粉用来划地为界，圈儿内就是舞台，圈儿外则是观众的席位；竹板儿用来充当锣鼓与檀板等打击乐器；破鞋的妙用是充当戏曲中生、旦、净、丑等各种角色的道具。

每场演出之始，老万人迷总是盘腿坐于用大白粉所画的圆圈儿中央，模仿妇女纳鞋底儿、贴饼子、抱孩子或梳头、洗脸、擦胭脂等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并加以艺术夸张；这些惟妙惟肖、近似戏剧小品的精彩表演，总能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而那双破鞋却被主人根据剧情的需要忽而充当梳子，忽而充当镜子，忽而充当粉扑儿，忽而又充当怀中的娃娃或柴锅里的贴饼子。

老万人迷的嗓子音域很广，对京剧老生、青衣、花脸、丑等各种角色的腔调，均能学唱得很有韵味。他演唱《钓金龟》，一人同时扮

演康氏和张义两个角色，其中的“小张义我的儿，听娘教训，待为娘对娇儿细说分明”等句的唱腔，乍一听还真有点儿清末著名老旦龚云甫的韵味。

最为可乐的是老万人迷演唱《二进宫》，将两只破鞋分别充当定国公徐延昭和兵部侍郎杨波；他自己扮演明穆宗的妃子、垂帘听政的李艳妃。这是一出老生、青衣、花脸唱工均很吃重的传统戏，而他却能将三种截然不同的唱腔一气呵成地唱下来，而且不时地摆弄手中的两只破鞋，如同耍木偶一般，做出许多与剧情相关的滑稽动作，使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其表演的迷人之处，由此可略知一二矣。

曹宝禄和他的单弦

久负盛名的曹宝禄，是老北京人非常熟悉的一位单弦艺人，他十一岁时即拜尚福春为师，学唱梅花大鼓和京韵大鼓；十三岁出师后，在天桥畅宜园等茶馆卖艺。

梅花大鼓的曲调，是清末一位别号“梅花居士”的庄亲王所创，其曲词古雅，字少腔长，委婉动听。曹宝禄当年所演唱的《黛玉悲秋》《宝玉探病》等曲目，比精于此调的北京金万昌与天津花小宝略逊一筹。他十二岁时，经著名京韵大鼓艺人白云鹏（世称白派）介绍，拜金晓珊为师，学唱单弦和联珠快书。

1937年4月，被誉为“鼓界大王”的刘宝全从天津暂返北平短期演出，曹宝禄借与鼓王同台演出的机会虚心求教，技艺遂大有长进，此后他又在“民声”“华声”“国华”等电台演唱，于是渐渐成名。因其艺术造诣高、名望大，20世纪30年代末曹宝禄被同行推举为曲艺公会会长。

曹宝禄的单弦艺术特色是唱腔跌宕激越，行腔流畅，韵味隽永，悠扬动听。他的传统曲目《风波亭》《续黄粱》《白猿偷桃》等唱段，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此外，他演唱的《五圣朝天》亦给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曲目系单弦艺人自编。所谓“五圣”，是指龙王爷、门神爷、灶王爷、土地爷和兔儿爷。故事主要描述五圣适应不了人间的种种变革，纷纷上天朝拜玉皇大帝，诉说其在尘俗被亵渎之苦。语多诙谐，富有反封建迷信及歌颂社会发展的色彩与情致。

曹氏所表演的联珠快书，大多是取材于《列国》（如《十面埋伏》）、《水游》（如《武松打虎》）等演义小说的武段子，情节紧张，唱腔铿锵，一气呵成，如“粒粒大大小小的珠子堕落于玉盘之中”，听来十分痛快。

曹宝禄所唱的单弦岔曲，词句皆出自晚清韩小窗等文人之手，如《过扬秋景词》云：

> 一叶钓鱼舟，苇漾江头，望长空烟云荡漾，静悠悠，碧天无际月轮浮（以上岔曲头）。沽美酒、且消愁，轻摇桨，荡孤舟，月扰秋水明如画（以上南锣北鼓调）。一行征雁，远下庐州，水云乡里，载酒来游，江水千古还依旧。清风明月同长久，且把闲愁一笔勾，红尘世上空争斗（倒推船调）。绿阴深处系孤舟，晚来时芦花岸上风儿骤，潇潇细雨秋水冷，隔断那山外青山楼外楼（岔曲尾）。

王毓宝与“天津时调”

友人从天津捎来“时调”艺人王毓宝最近的两盘录音带，一段是《放风筝》，一段是《摔西瓜》，其唱词轻松、腔调爽朗，充分表现了天津人的性格和感情。我已多年没有听过北方乡土气息浓郁的“天津时调”，此次听来，觉得荡气回肠，悦耳感人。

我爱听曲艺，更爱听北方乡土风味的“天津时调”。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天津南市玉壶春茶楼听王毓宝的时调，那时她才二十几岁，屈指算来，现在她也是六十上下了。然而，听她最近的录音仍是气力充沛、嗓音清脆，虽届花甲却丝毫不减当年，在使腔吐字上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天津时调”是在清代末年从“靠山调”“鸳鸯调”演变而来的。民国初年，爱好曲艺的文人墨客，把已经流行的时调段子加以整理，去粗存精并加以润色，定出“慢板”“二六”“快板”三种板式，又丰富了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的内容，可谓雅俗共赏；共计改编出《七月七》《青楼恨》《撒大泼》《下盘棋》《叹五更》《踢毽》等段子。因为曲首多有“正月里”“秋季里”“一更里”等时间性的词句，因而取名为“时调”。

第一个登台演唱时调的女艺人叫赵宝翠，此人原是唱京韵大鼓“宝”字辈的，后来兼唱时调。赵氏声韵铿锵，响遏行云，一唱就唱红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高五姑和秦翠红两人，高五姑属女中音，她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出一种疙瘩腔，极有韵味。秦翠红属女低音，嗓子宽厚，气力充沛，余音绕梁，后味无穷。以上三人，可以算作表演时调的第一代艺人吧。其后，又出现了姜二顺、赵小福、谢韵秋三人，唱词也都清脆甜润、板眼明晰，而且表情真切，声情并茂。这是第二代时调艺人。

王毓宝登台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她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又肯于努力，演唱悲剧、喜剧、闹剧各种段子都能表达不同的感情，使听者动容。跟一、二代人比，她把时调的演唱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当年我在天津听她演唱时，只有韩师傅的三弦和李墨生的四胡伴奏。最近听录音，又增加了琵琶、扬琴和笙的伴奏，有丝有竹，更加悦耳。听说又有较年轻的演员二毓宝已能接替王毓宝的技艺，我于天津时调又有传人，甚为欣慰，更祝王毓宝的时调艺术永葆青春。

白派京韵忆云鹏

往昔谈京韵大鼓，最负盛名者首推“鼓界大王”刘宝全。刘以嗓音清脆高亮、道白韵味醇厚并长于刀枪架功夫而享名，为鼓界一代宗匠，世称刘派。与刘宝全称鼎足者，尚有白云鹏、张小轩两派。

张小轩之艺，世称武大鼓，其唱腔急促、表演火炽，惜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逝世，再无传人。之后与刘宝全堪称伯仲者，唯白云鹏一人。白嗓音低沉而甜润，唱腔委婉，缠绵悱恻，道白略带怯音而字音清晰如娓娓清谈，擅演《红楼梦》小儿女情事段子，如“探晴雯”“宝玉探病”“黛玉焚稿”“双玉听琴”等，皆称绝响。

20世纪30年代津门曲艺极盛时期，白云鹏与刘宝全间替在天祥市场“大观园”曲艺厅唱大轴。白氏的“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倍伤情”（《探晴雯》）及“孟夏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宝玉探病》）之句催人泪下，誉满曲坛。30年代末期刘宝全谢世，白云鹏为京韵大鼓硕果仅存之人物，长期在津演出，叫座率始终不衰。20世纪40年代后期天津因受长期战乱影响，百业萧条，娱乐场所亦不景气，征歌逐曲之徒虽仍不乏人，但均为新贵及暴发户，出入于曲艺戏院者大多以女艺人之色貌为矢的，技艺之高低遂无论矣。

犹忆1948年中秋前后，余过津门，偶经友邀，听歌于天祥市场之“大观园”，白云鹏与其女徒弟阎秋霞同台演出。阎秋霞正值绮年玉貌，艺虽未精，而捧者甚众。是日虽秋雨连绵，而上座仍满坑满谷，但阎姝歌毕，散者大半，待白云鹏登场，台下只留不足二十人。白氏环顾台下凄然曰：“古人之得一知己不易，得一知音更难。我鬻艺一生，而不及少女！今观众虽寡，证明不仅为知己更为知音也。愿尽平生之艺，以答知音……”言辞凄楚，不忍卒听。时白云鹏已年逾古稀，生活亦甚困窘，一代曲艺大家，晚景若此，实可哀叹！屈指往事，三十五六年矣，未悉白氏何以终其老年？

去岁，相声巨匠侯宝林来港献艺，余在宴会上得相会晤，话及往事，据云白云鹏虽作古多年，但在50年代以老艺人身份很受尊重，薪资亦高。老年得享优越待遇，殊可称庆！传其艺者有阎秋霞、闻书屏二人，均负盛名。

滑稽大鼓艺人富少舫

抗日战争胜利后，名作家老舍在美国讲学期间写了两本小说，一是《四世同堂》，一是《鼓书艺人》。《四世同堂》写北平沦入敌手后的情况，内容多是根据其夫人胡絜青于1942年携全家南迁重庆后提供的北平情况而来，现已在大陆编成电视连续剧放映。《鼓书艺人》写重庆的市民生活，为老舍所亲身经历。书中男主人公鼓书艺人方宝庆，有一部分材料采择了老舍在北平旧识的滑稽大鼓艺人、艺名“山药旦”的富少舫的生活经历。富少舫于“七七”事变后在武汉与老舍相遇，此后，常演唱老舍创作的宣传抗战的鼓曲，闻名于大后方。

滑稽大鼓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民国初年，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形成京韵大鼓的三派鼎立之势，另有京韵大鼓票友张云舫和艺名“老倭瓜”的崔子明师徒二人，崔氏避开刘派的豪放、白派的缠绵、张派的粗犷，开创出一种夸张、滑稽的唱法，被称为“崔派”，即滑稽大鼓。

张云舫原为北平的名士、票友，喜鼓曲，“五四”运动后，他以世事国情，编写了宣传爱国思想、劝世济人的幽默鼓词，交与艺徒崔子明演唱。其中宣传革命的《孙总理伦敦蒙难》、宣传储蓄的《大劝国民》、劝诫嫖赌的《醒世金铎》等，很受听众欢迎，逐渐形成鼓曲的新流派。其艺徒除崔子明外，还有富少舫、叶德林（艺名“架东瓜”）、杜玉恒（艺名“大茄子”）等人。

崔子明，京东通县人，因酷爱鼓曲，拜张云舫为师，以幽默的唱词、唱腔创新流派。其出名的段子有《吕蒙正教学》《蒋干盗书》《蓝桥会》《改良灯下劝夫》《刘二姐拴娃娃》等，现有高亭公司和蓓开公司灌制的唱片传世。

滑稽大鼓的传人不多，富少舫是第二代传人中的佼佼者。抗战前

他常在沪宁一带演出，抗战期间富少舫由鄂入川，在重庆设有“升平鼓书场”，他自己经常演出，并开办“升平鼓曲班”培养艺徒。那时，在老舍等作家帮助下，他常有新的鼓词演出，因而成为抗战时期群众文艺中一支力量。抗战胜利后，富少舫重返上海，与其养女富淑媛（艺名“富贵花”）和刘宝全的女弟子章翠凤、相声演员刘宝瑞等同台演出。

富少舫为北京旗人，头大嘴阔，衣着袍肥袖长，姿态逗人；他演唱时动作幅度大，留有张（小轩）派京韵“连蹦带嚷”的狂放形迹。虽不长期在平津演出，但每次富少舫在天津书场上出现，必赢得满场喝彩。

富少舫的事迹，除在《鼓书艺人》中有所采用外，老舍在其《方珍珠》小说中，也多有采用。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被拍成电影。

周汝昌新作《秋窗风雨夕》

春节前，友人送我一盘由红学专家周汝昌新作曲词、梅花大鼓著名演员花小宝演唱的《红楼梦》新段子《秋窗风雨夕》的录音磁带。久未闻家乡曲艺，得此新曲，殊可慰我乡思。

梅花大鼓的曲目，除《昭君出塞》《杏元和番》《目莲救母》等几段外，绝大部分出自《红楼梦》，如《黛玉葬花》《宝玉探病》《探晴雯》《遣晴雯》《别紫鹃》等等。现在由周汝昌新作的《秋窗风雨夕》，内容以宝钗和黛玉的对话为主，笔法生动，情节感人。由花小宝设计的唱腔，在梅花调的基础上，作了许多创新，按词谱调，珠联璧合，非同凡响。有亲友来访，偶一播放，大家同听乡音，赞不绝口。

据说，早在1962年，北京文联为纪念《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举办了一场红楼曲艺会演，邀集演唱《红楼梦》曲目的梅花大鼓名演员于一堂，各露拿手杰作，红学家周汝昌也应邀出席。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总理也光临听曲，他不坐贵宾席，而是悄悄地坐在普通观众席里。终场后，周恩来向这场会演的主持人和曲艺界人士建议，多多撰写红楼鼓曲新词。自那时起，周汝昌即想在旧段子之外另选情节进行创作，经多年润色，终写出《秋窗风雨夕》来。

梅花调是大鼓书的一种，流行于北京和天津，原有金万昌和卢成科两派。金万昌派早已脍炙人口；卢成科是盲人琴师，虽不能唱，却在三弦伴奏上有超人的技艺，为梅花调的翻新作出很大贡献，由他培养出的梅花调演员，多取得观众的欢迎，享盛誉于曲坛，如花四宝、花五宝、花小宝等。因为她们的艺名多用“花”字，所以也被称为“花派”。花小宝是卢成科的高徒，又向金万昌学过鼓板，得两派之长，为当代梅花调演员之佼佼者。周汝昌写成《秋窗风雨夕》之后，选中花小宝演唱，可谓得人。花小宝在咬字吐音上不松不泛、不黏不钝，

缠绵悱恻，悦耳感人。

《秋窗风雨夕》的情节是宝钗到潇湘馆看望黛玉，在风雨之夕，两人倾诉心声，引起黛玉的愁思。不料宝玉也在风雨中到来，此时黛玉既忧又喜的矛盾心情，成为这段曲目的高潮。

接着花小宝唱道：“这姑娘喜极反落伤心泪，那纱窗外犹兀自阵阵风声和雨声。这一回风雨秋窗来相会，到后来玉碎珠沉，他们抱恨无穷！”以《红楼梦新证》一书闻名于世的周汝昌，不仅在考据方面功底极厚，在诗词创作上也是大手笔。

扬州评话说《水浒》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水浒》风靡了海内外，这使笔者想起影响深远的扬州评话《水浒》。

扬州评话改编的《水浒》由来已久。明末清初人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说书艺人柳敬亭在南京表演“武松打虎”的段子：

> 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暴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

经过扬州评话艺人世代努力，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少堂的评话艺术已登峰造极。

王少堂所说《水浒》只是“武（松）十回”“宋（江）十回”“石（秀）十回”“卢（俊义）十回”四部分，仅“武十回”就有百万字，大大超过这部分原著的约八万字。王少堂之父是清末说《水浒》名家。他本人七岁学艺，十二岁走江湖，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再加上长期置身小市民阶层和三教九流人物之中，阅尽人间百态，而且自己也曾遭迫害，坐牢八九个月，所以他所说的《水浒》贴近生活，揉入亲身感受，特别加重了对世间丑恶和官场黑暗的揭露和鞭挞。

如原著很简略地带过了阳谷县令将武松的死罪减成活罪。王少堂合理想象，大胆创新，演绎了“陈洪辩罪”这个段子。说的是西门庆的两个舅子把姐姐送给阳谷县令史文奎的两千两银子据为己有，陈洪得知后就把变卖武松衣物的五百两银子上下打点本县衙门和“省里上房”，为武松力求减刑。陈洪对县令说：“太爷，只要在详文中改成‘见奸杀奸，杀奸赶奸，追奸杀奸，故而尸分两地，又兼替兄报仇……’现在外面的人都说太爷得了西门庆家两千两银子，可恨那狡猾的二生员

已从中短了路。您如今反而把武松改成活罪，外面的人一定说您未曾得到赃银，这样不但保全了武松的性命，又保全了您的声誉。”说着一躬到底。其实陈洪打躬是假，玩钱是真。他把手帕解开，两手捧着三百两银子，很吃力地往案上一放。“‘哗啦啦！’史文奎眼睛一亮，说：‘这是什么？’陈说：‘这是武松家发卖的烂产，几钱银子，孝敬老爷，买点心吃。’说得轻巧！三百两银子买点心吃，不要撑死县太爷！史文奎说：‘陈洪，本县原来是不要，可对不起你。你这么大的年纪，晚上天乌黑的。高一脚，低一脚，满重的！好吧，收下罢！至于详文，就照你说的那样改罢——来人，搬到后头去！’”这段子堪称活生生的“官场现形记”，令人捧腹，引人深思，使人共鸣。

王少堂说《水浒》闻名于大江南北。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南京人想去夫子庙听他说书，十有八九要买加座票。他孙女王丽堂将乃祖的技艺发扬光大，于粉碎“四人帮”后在电台播出《水浒》，再次征服了广大听众。

评书名家陈士和

提起一代评书名家陈士和，津门的老书迷至今仍痴迷神往，津津乐道。

陈士和原是北京人，自幼喜听评书，后拜擅长说《聊斋》的张智兰门下学说《聊斋》。他白天随师到书馆听书，晚上从师学习“书”和书中的各种诗、词、歌、赋以及公文诉状为“贯口”。由于刻苦钻研，后来又在《聊斋》原作基础上，发挥改编创作才能，陈士和编纂出不少个人独有的聊斋书目，因而赢得听众的喜爱，从此成为北京书坛的新葩。

民国七年（1918）前后，陈士和应邀赴津说《聊斋》。当时天津茶楼书馆说《聊斋》的为数很少，即使有也水平有限。因此陈士和到津后，以讥讽戏谑利欲熏心、好逸恶劳的《崂山道士》为打炮书目，博得了开场红。当时津门的单弦圣手德寿山围绕故事主题，特为他编了一首定场诗：

贪贪贪，为人贪得无厌；
厌厌厌，厌其妄想白沾；
沾沾沾，沾沾自喜天天盘算；
算算算，算计着学道求仙，一生登天；
天天天，天天盼着发财致富腰缠万贯；
贯贯贯，贯足气力脑袋尖尖儿愣向墙壁上钻；
钻钻钻，只钻得鼻青脸肿脑壳白流鲜血一滩；
谁叫你痴心妄想贪贪贪！

每次他说这首定场诗时，都博得碰头好。陈士和感慨地说：“话儿开得对，道儿领得好，不愁书座儿门儿上找！”

其实天津书坛高手如云，人才济济。如说隋唐号称“活秦琼”的张诚润、声若洪钟的金杰丽、赛济癫的孙伯珍等都名声显赫。初露锋芒的陈士和能与这些前辈鼎足而立实属不易。

爱好评书的一些人，对当时的说坛是这样评说的：陈士和能把鬼说活，孙伯珍装疯卖傻赛济癫佛，张诚润的隋唐说得精，金杰丽拿手的段子是闹东京。

陈士和的书座范围很广，上自达官富绅、遗老名流、骚人墨客，下至军警商学、梨园名宿、贩类杂家，陈对这些书座都尊若神明，敬如师长。他认为这些人是他提高说书才能、丰富社会知识和人情世理的宝贵源泉。

有一次他正说《聊斋》的毛大福一段：“一到狼窝，狼眼一扫就看出哥儿俩是衙门口马快班头。用鼻子一闻，身上带有依权仗势，敲诈勒索，进饭馆儿白吃，听书看戏不但不给钱，临走还得捎走几套烧饼夹牛肉的邪味儿。”刚说到这里，台下就有人大声嚷道：“别说啦！我看你有点儿找不肃静！”陈一看，是一个叫扁食的特务王金才。他原来是饺子馆的伙计，后来认了个青帮头子当干爹，做了特务，尽干为非作歹的事。眼瞅着这家伙要闹事，又听有人说：

“什么混账东西，敢对陈先生如此无礼！你不让说，你爷爷爱听！先生说你的，看他敢把你怎样！”王金才一看，说话的人按青帮的辈分论，比自己长两辈，是“通”字班的头子，曾是北洋军阀时期探访局的老密探，马上就软了下来。忙笑着说：“三爷，您别生气呀！我跟先生闹着玩儿呢！”说完话灰溜溜地就跑了！从此，陈士和出场很少有滋事捣乱的事情发生。

陈士和在津说书三十余年，走遍津门书坛。如北门里的宝和轩、西头驴市口的德庆园、侯家后的东来轩、官沟街的润香茶楼、茶吉街的通海茶楼等，都成为他发挥艺术才能的舞台。

说书人钟晓帆

清末民初，成都有位红极一时的说书人叫钟晓帆。其人本是秀才，几次落第之后便以教私塾为生，后来偶遇淮阴一位说书人，遂得说书之道，从此改行说书。

钟晓帆起家之地是州府旁的一家茶铺，铺前挂有“评书”招牌以揽生意。一日，州官经过，看见招牌即望文生义，称此人未免太轻狂，古今书籍，浩如烟海，岂敢在州府门前狂言“评书”？便差人招钟晓帆进府“评书”，听了“评书”后才明白过来。由于晓帆通晓历史，记忆力强，思维活跃又能言善辩，把一则舌战群雄讲得起伏跌宕，绘声绘色，州官十分赏识。至此，钟晓帆名声传出，各大小茶馆纷纷相邀，晓帆所到之处，茶客盈门，茶因他贵。《三国演义》《东周列国》《水浒》《大红袍全传》《绿野仙踪》《孟丽君》等历史故事是他的代表作。

晓帆叙事演绎能力极强，一则小故事，自他口中道出，不知会生出多少枝节来。一段《三顾茅庐》，他可以紧紧凑凑地讲上个把月。

有一回晓帆在顺城街的安乐寺茶园讲《孟丽君》，其中一段说的是皇帝察觉其大臣孟丽君是个巧扮男装的女人，便设宴招待，想趁其醉酒后脱下她的靴子以证虚实。故事讲到此，他却卖起关子来，一连讲了十多天这靴子也脱不下，最后一天有个当兵的实在憋不住了，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抓住晓帆衣襟，口中厉声质问：“你这个靴子到底能不能脱下来？”晓帆见势不妙，忙说：“脱得下来，脱得下来。”兵怒问：“几时脱？”钟答：“马上脱。”当兵的松下手来又问：“哪个给她脱？”晓帆只好说：“我给她脱。”原来这个当兵的每晚从军营偷跑出来听书，已被罚过几次军棍，本想听完结局，今晚再挨最后一次打，以后不再来，哪知说客总是没完没了，于是心急如燎，按捺不住便冲将上去。

据说，晓帆说书爱以古喻今，针砭时弊，后来被权贵迫害，五十多岁就抱恨黄泉，以后成都茶馆虽有说书人，但都不及晓帆。

“文化大革命”中说书业被列为“四旧”，被扫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成都茶馆里大都以放录像为娱乐项目，也未见有人说书。

偶闻成都锦江剧场里茶价飞涨，茶客爆满。入场券从几角炒到二十多元，并不是花茶多香，而是百姓喜爱的说书人回来了，久违的成都茶文化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一位叫李白清的说书人每晚在此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由此刮起了空前的“李白清旋风”。观众说，他说书轻松诙谐，好比一盘炒油菜，正合了吃腻大鱼大肉的现代人的口味。再加上电视、电台等媒体的宣传，李白清已成为成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他的专辑磁带也陆续出版了。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

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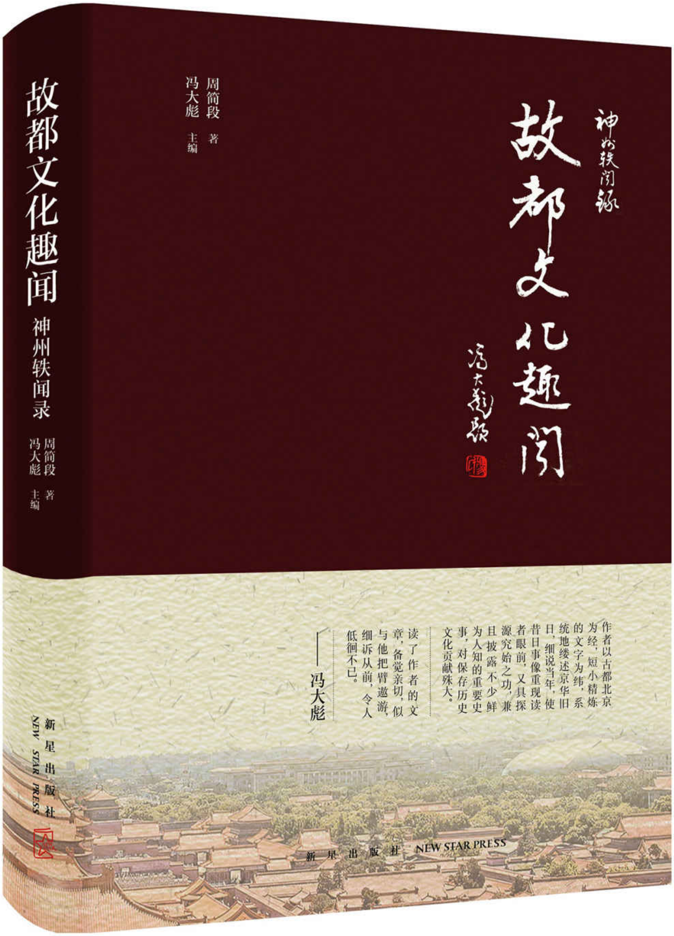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故都文化趣闻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神州轶闻录
故都文化趣闻
冯大彪题
作者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
读了作者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他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冯大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故都文化趣闻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都文化趣闻／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8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43-8

I．①故…　II．①周…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14号

故都文化趣闻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2.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43-8

定　　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科技撷英

　　詹天佑修滦河铁路大桥

　　茅以升筑钱江大桥

　　“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

　　胡明复博士墓在杭州

　　“科文两栖”丁西林

　　不愿“楚材晋用”的张钰哲

　　著名化学家杨石先

　　物理学家黄昆

　　怀念孔伯华先生

　　“万家生佛”萧龙友

　　施今墨中西汇通

　　忆著名医学家朱宪彝

　　外科名医张纪正

　　肺病专家“TB郭”

　　痛悼营养学专家俞锡璇

报人寻踪

　　“疯人”章太炎

　　报界先驱彭诒孙

　　成舍我办《世界日报》

　　怀念王芸生

　　邵飘萍和《京报》

曹聚仁与书
传奇文人聂绀弩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
女报人汤修慧
一代报人林白水
忆凌霄汉阁主
王柱宇仗义执言
满族报人成扶平
刘浚卿主宰《益世报》
《王先生》诞生记
邵力子典袍出报
冯玉祥船上办《民联日报》
北京报界忆“笑社”
新闻界张氏四昆仲
李叔同创办《音乐小杂志》
京华报馆忆宣南
图书记闻
《啼笑因缘》双包案
惜哉，海源阁藏书
四库全书与天一阁
北京最早的私人图书馆
图书馆专家袁同礼
“傻公子”创办藏书楼
最老的“天津图书馆”
全国最大的农村图书馆
藏书家孙广庭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
郑振铎藏书献国家
商务北京分馆创业史
佛教大典清《龙藏》

佛教经典《赵城金藏》
有关“北京掌故”之书
震钧著《天咫偶闻》
蔡元培的《新年梦》
顾颉刚撰写《妙峰山的香会》
《聊斋志异》手稿发现始末
朱星考证《金瓶梅》
商鸿逵和《赛金花本事》
老舍巨著《四世同堂》
文事折枝
《桃花扇》诞生何处
且说北京的“四大”
湖南会馆杂忆
京城店铺话匾额
隆福寺街的旧书业
成文厚账簿店
怪诞有趣书斋名
知名作家办书店
清代的两次反盗版
印有李白名篇的钞票
集邮戳票多趣味
“书乡”自古出人才
两通“家训”昭后人
话说鸳鸯蝴蝶派
摄影初传紫禁城
风流遗韵话南社
一次面向农民的文物展览
学府剪影
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
昔日北平五大学

水木清华八十年
难忘的燕园之夏
张伯苓的一次讲演
协和医院话沧桑
中国最早的外语学院
北大红楼的变迁
建校九十年的北洋大学
辅仁大学与贝勒王府
陈垣校长题词见大节
30年代的教授生活
学府往事
北京最早的师范学校
戏剧学校旧事
昔日京华忆“孔德”
贝满女中状元多
南开学校的“格言”
六十春秋的耀华学校
熊希龄创办慈幼院
临清“武训义塾”
千年学府翰墨香
清代殿试的阅卷
考生望榜谐趣谈
文玩赏珍
古玩杂谈
故宫标卖黄金器皿
沈阳金佛被盗疑案
小金像让位大铜佛
稀世珍宝大玉佛
满族首饰——扳指与戒指
“喷水鱼洗”天下奇

石雕瑰宝“天后宫”
青田石名扬四海
北京景泰蓝
北京的料器
北京内画鼻烟壶
漫话“北京皇宫花”
沈阳三彩熠生辉
哈氏风筝有传人
扇骨雕刻艺术
宝石旱盆景
徽派盆景见闻
北京人玩雨花石
神态各异话罗汉
紫砂与铭刻
德化古青瓷
名人砚铭述其志
且说薛素素脂砚
名人历来喜端砚
歙砚之乡话歙砚
北方的名贵笔墨
“老周虎臣”如虎添翼
衡水毛笔与易水古砚
“老胡开文”的墨
文房之宝——一得阁墨汁
铜墨盒和刻铜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　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 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　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 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科技撷英

詹天佑修滦河铁路大桥

长城几乎已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每当笔者看到长城的景象时，总会联想起一个人来。

八达岭长城距京华一百余里，笔者当年曾多次游览，而每次游览，总喜欢从西直门乘火车，一直坐到青龙桥，先去瞻仰一下詹天佑铜像。因为詹天佑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也像他身后的长城一样，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丰功伟绩，有口皆碑，是用不着再赘述了。而他修建滦河铁路大桥的一段逸事，同样也是很值得国人自豪的。

光绪十六年（1890），在沙俄加紧侵略中国领土的形势下，清政府为了保障东北祖坟的安全，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雇用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修筑关内外铁路。

越两年，工程进展至河北滦河，在宽阔的滦河河面上，要修一座大跨度的铁路桥。金达见有利可图，便聘请英国人喀克斯包工承建。喀克斯不了解滦河地质结构 复杂，结果因泥沙深厚，水流湍急，在打桩时遇到很大困难。据《滦县县志》记载：

> 修筑桥墩，屡筑屡塌，沿河面宽而流急，河底游沙极深，夏时山水暴涨，势甚猛悍，施工最难。

致使号称具有世界第一流施工技术能力的英国人一筹莫展，不得不求助于日本人和德国人；而日本人和德国人也依然徒劳无功，只有望河兴叹。

眼看交工期限迫近，金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授意喀克斯，求助于当时驻滦河东岸石门、督修从古冶到滦州这段铁路工程的詹天佑，这样便可嫁祸于人，把误期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他们还封锁技术资料，从各方面对詹天佑进行牵制。

詹天佑抱着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强烈责任感，总结、分析了外国工程师失败的教训，深入现场，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缜密测量，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新桥址选好后。在桥墩施工中他果敢地采用了“压气沉箱法”，这在中国铁路桥梁建筑史上是第一次；同时派中国的“水鬼”（潜水能人）潜入河底，以传统的方法配合必要的机器打桩，顺利地奠定了桥基。《滦县县志》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 雇用谙习水性的机匠，置备下水器具。汲水空根，考验土性的坚凝，用长松木密打花桩，施长方大石和三合土砌之，工程浩大。

光绪二十年（1894），这座长七百二十四米、宽六米四、京山路最长的钢梁骨架铁路大桥，终于屹立在滦河之上。此桥的建成通车，横扫了洋人的骄横之气。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这一年，英国工程研究会特邀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茅以升筑钱江大桥

20世纪40年代，笔者游杭州时，曾登上六和塔，俯瞰“之”字形的钱塘江，钱江大桥像一条玉带束住江身、江水，浩荡东去，消失于茫茫烟云中，真是气象万千！

钱江大桥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设计者是茅以升先生，他当时只有三十七岁。

虽然中国人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隋朝，就有李春建造跨度最宽的石拱桥——赵州桥，但在此以后近百年所造的大铁桥，竟没有一座不是依赖洋人。钱江大桥的建成，第一次证明了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得到。

钱塘江自古以江阔、潮大、流沙多著称。由于急流和涌潮相激荡，潮头高时可达九米；而泥沙的浮游流动，覆盖了江底岩石，沙深处可达四十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没底！”

茅以升来到钱塘江桥梁工程指挥部，担任钱塘江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在一间小小的 办公室里，他与同事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进行了周密的筹备设计，确定桥址定在杭州市区西南的闸口，设计桥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高七十一米，下层是单线铁路桥，上层是双线公路桥，采用双层联合桥形式。

建造这样的大桥，首先是治服流沙打桥基。最好的办法是在下面打好木桩，再放钢筋混凝土气压沉箱，然后在沉箱上面筑桥墩，最后

架钢梁。

打木桩相当艰巨，因为江底流沙层又硬又厚。轻了，打不进去；重了，木桩会断。一天只能打一根，照此进度，一千四百四十根木桩得打四年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见有个小孩用盛满水的铁壶浇花，从壶嘴喷出的水柱，将花坛泥土冲成一个个小洞。由此受到启发，他指示施工人员把江水抽到高处，再向江底猛冲下去，泥沙冲出洞后把木桩放进洞里，再用气锤砸。实行这种“注水法”打桩，一天可打木桩三十根，大大加快了打桩速度。

沉箱更加艰巨。沉箱长十八米，宽十一米，高六米，重六百吨，外观像一间没有房顶的混凝土的房子。沉箱必须先放在岸上做好，然后再运到江里，准确地放在木桩上，这个程序难度极大。有一次，突然来了狂风暴雨，沉箱像匹脱缰的野马，拖着铁锚，横冲直撞到江的下游，竟撞坏了一个渡船的码头。由此，各种闲言碎语、风凉话接踵而来。可他仍满怀信心，镇定自若，对各种议论不予理睬。他指挥施工人员把铁锚改造成十吨重的混凝土大锚， 牢牢钩住沉箱，沉箱终于乖乖地被置入规定的位置上；最为艰巨的沉箱安置工程就这样被解决了。

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当时日寇正把侵略的战火从东北、华北烧向淞沪，使得造桥工程急如星火。茅以升临危不惧，打破了历来造桥先打基础，再建桥墩，最后造桥梁的工程常规，改为“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造桥方法。他和总工程师罗英，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流沙所造成的技术困难。一面在水下建桥墩，一面在岸上构桥梁。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那天，江上还有一个桥墩和两架钢梁未完成，第二天日机便飞到大桥工地来侦察、丢炸弹了。大桥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于当年9月26日完工，整个工程只花了四年时间。

一个在世界桥梁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是：茅以升在造桥时就准备着炸桥。造桥难，炸桥也不易，要在每个钢梁爆炸点上安放炸药，用

引线接到岸上。这项工作在工程完工不久后就做好了。到12月23日杭州沦陷，通车才三个月。而在它最后一个多月中，火车、汽车、行人实际上都是在炸药上走过的，当日寇进入杭州时，轰然一声，大桥由设计者亲手炸毁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茅以升主持了大桥修复工程。回顾造桥、炸桥的过程，他曾感慨地说："切身经历使我懂得了，政治腐败，国防衰弱，只能是'人为力俎，我为鱼肉！'"

近三十余年来，茅以升历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等职，培养了一批批桥梁专家。现在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年前他还飞越太平洋到美国，接受了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授予的外籍院士的称号。

“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

提起裴文中，世人皆知他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享誉世界的古人类学家；但翻开鲁迅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便会发现书中收录了他的短篇小说《戎马声中》。书的序文称这篇小说为“乡土文学”的一种，且别有信手写来，不事雕琢的好处。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古人类学是如何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演变的呢？

原来，民国十年（1921）夏天，裴文中毕业于故乡的河北滦州师范。因为家里经济拮据，他考取了收费较低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为了维持生计，他业余时间到中法大学办的孔德学校兼课，一至四年级，什么都教；他自谦地说，尽管自己五音不全，但是音乐课也教过。兼课的收入仍不敷开支，于是便开始向报刊投稿。写什么呢？民国十三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首领张作霖用六个军的兵力分路进攻，以北京为立足点的直系首　　领吴佩孚派三路军抵抗，战事在山海关一带爆发。裴文中的家乡滦县陷入火线。他一时得不到家乡的消息，焦急万分。他把这种惊魂不定的心情写进小说，很快发表在当时孙伏园编辑的北京《晨报副刊》上。随后，他还经常发表诗歌、散文、杂感和小说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这些作品都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发表的目的无非弄几个钱换饭吃。但是，却受到鲁迅的重视，于民国二十四年将《戎马声中》收录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中。

裴文中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介

绍，到发掘化石的北京西南周口店工作。当时这项发掘工作由杨钟健和瑞典人步林博士负责，杨因病不能赴现场，因此，裴文中便成了发掘周口店化石工作的一名正式成员。

民国十八年的12月2日下午4时左右，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一位工人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招呼裴文中看，他一看忙喊："是猿人！"喊声惊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围拢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两天后，他将这件"珍宝"送到了北平。

五十万年前人类祖先头盖骨重见天日的消息，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学术界的重视，它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后，裴文中在周口店还找到了许多石器和骨器——"北京人"已经能够用火的证据。这些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学术地位。

早年，裴文中舍弃文学生涯，他的文学才能却不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显示出来。民国二十四年（1935）他发表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虽然是一篇学术报告，但该报告的文学成就经常受到文学界人士的赞誉。翁文灏在该报告的序文中称赞他"从不识猪牙鹿骨之人，一变而成为古生物学专家，世界学者莫不闻知他的大名，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方能到此境地！"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于188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06年北洋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

马寅初曾是蒋介石的老师，但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受到了马寅初坚决反对。蒋介石开始想拉拢马寅初，派人送请柬，许愿推荐其为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马寅初不仅不接受这些官位，反而公开揭露其反动本质和倒行逆施。蒋介石恼羞成怒，密令各地不准聘用马寅初，也不准其发表演讲。特务机关威胁说：如违反禁令，就生命不保。马寅初却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并于1947年5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讲，狠狠地揭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罪行。他临行前即写好了遗嘱，交给家人，表示其视死如归的决心。对此，蒋介石也无可奈何。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马寅初即结识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寅初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了筹建开国大典事宜，在讨论国号名称时，他坚决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一个“中华民国”简称的提议，认为那是不伦不类，从而表明了他厌弃旧中国，积极支持建立新中国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毛泽东希望他把北大建成第一流学府，他对此信心百倍并付出了

辛勤劳动。

作为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农村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农村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当即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过认真考虑，他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后立即引起极大反响。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马老讲得很好，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刘少奇、周恩来也都表示赞同。马寅初受到了极大鼓励，并说：“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看法，是件可喜的事，我在此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理论却遭到严厉攻击。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以理论“权威”自居的康生、陈伯达等人，蛮横地把这一理论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相联系，指责马寅初是借学术之名，行右派进攻之实。毛泽东 也提倡“人多力量大”，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马寅初一方面被迫检讨，一方面“辞官归第”，失去了北大校长之职。

二十年后，马寅初冤案被平反，中央肯定了“新人口论”的正确理论并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进行贯彻，马寅初被聘为北大名誉校长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

胡明复博士墓在杭州

中国的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之一胡明复，他的墓现已在杭州烟霞洞附近被发现。

胡明复（1891～1927），又名胡达，江苏无锡人。有兄弟姐妹九人，其中五人考取公费留美。由于胡氏兄弟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科学、教育领域成就卓著，人们把胡明复和其兄著名数学家胡敦复及其弟物理学家胡刚复，称为“三胡”，闻名遐迩。1914年胡明复与杨杏佛等留美学生创办《科学》杂志，1915年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191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中国科学社由美国迁回祖国，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年会。他代表社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在会上说：“杭州西湖以风景胜，研究科学者最好自然，故极相宜。古诗人来游西湖，歌咏名篇甚多，科学家虽不若诗人，然科学年会在学术史上实最　重要，未始不可为西湖增色也。”他一生尽瘁于振兴教育，提倡科学救国。曾协助其兄胡敦复创办上海大同大学，同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教授。平生“喜游名山大川”。1927年6月12日在家乡泗水遇难，年仅三十七岁。

胡明复遇难后，国民政府立即发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予以褒扬。文曰：“该故博士胡明复，尽瘁科学，志行卓绝，提倡教育，十年不倦……勒碑礼堂，永留纪念。”

1928年，《科学》杂志出版纪念胡明复博士专刊，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出版纪念册《明复》。

1929年7月21日，中国科学社以公葬仪式将胡明复灵柩安葬于杭州烟霞洞巅，事后出版了《胡明复博士社葬纪念》一书。据史料记载，社葬仪式十分隆重。祭坛设于烟霞洞大厅，参加葬礼的有杨杏佛、竺可桢、吴有训等，来自上海、南京、北京及杭州社友共七十余人；公葬团体有中国科学社、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浙江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同学会等。省政府并派军乐队到场奏乐。公祭毕，即由全体执绋上山，礼节简而严肃。墓穴用钢骨水泥造成，墓地之上，准备建一屋，拟名“明社”。杨杏佛为之撰写墓铭，曰：

知无涯兮生有涯，愿焚身以创造人类之光明。世方沉醉于富贵毁誉兮，先生独致力于无 名。力尽兮心安，死生成败何足谕。江流不尽兮，山色长青。千秋万世兮，永护佳城。

《胡明复墓铭》又由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之一的赵元任谱曲，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上歌唱。此后，他安卧于青山怀抱中近七十年，中国科学社社友曾多次去瞻仰过胡明复墓。

该墓刻有“胡明复先生在此”几个大字，右面几行小字是“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科学社葬”，左面是“蔡元培敬书”五个字，下有“蔡元培印”。

“科文两栖”丁西林

如今在城市工作的外地人，想租间房子，可不必大费周折。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要想在北京租房，一是要有铺保，二是要有家眷。这种社会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屡见不鲜。这可难倒了外来的单身汉。当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丁西林为之鸣不平，写了独幕话剧《压迫》。剧中两位外地来京的素不相识的男女房客，为反抗房东太太拒租房子的“压迫”，急中生智，假冒夫妇，蒙混过关。这出于滑稽的笑声中抨击了社会陋习的讽刺喜剧，初刊于1926年的《现代评论》；并由北平艺专于5月公演，轰动一时。

这是丁西林的代表作，至今仍入选为大学中文教材。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丁西林的《压迫》《三块钱国币》在北京重演。文学史家赞誉丁西林为写独幕剧的“圣手”。

丁西林本是科学家，而他之所以又能成为文学家，是因他早年留学英、法、德国时，于刻苦攻读之余，又深 入研究了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易卜生等剧作大师的佳作，这为这位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奠定了文、理科皆精的基础。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亲赴欧美延聘品学皆优的留学生来北大任教。在应聘教师中，丁西林等八人在北平吉祥大院合租了一套民宅，被北大学生尊称为“吉祥八君子”。1927年，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后，丁西林又应聘主持物理研究所工作，为中国现代物理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他主持创建的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就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抗战中，丁西林随物理研究所迁到昆明。当时云南的地方货币仍

是“老滇票”，蜂拥而至的外省人则持有兑换率高达十倍的“国币”。本地人便把物价飞涨归罪于国币对市场的冲击。一天，丁西林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呼”的一声，打破了院内的沉寂。丁西林出门问个究竟。原来，邻居一位太太因女仆失手打碎了花瓶，就逼着女仆赔三元国币。同院的大学生来劝解，反而被那位太太骂作多管闲事。大学生怒不可遏，又砸碎了一只花瓶，并说自己也赔三块钱国币。此事激发了丁西林的创作灵感，赶写了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讽刺了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们。后来，丁西林去中国香港主持一家中英合办的光学仪器厂。香港沦陷后，汪精卫下令把丁西林的家属劫持到广州，以此逼迫丁到南京就任伪职。丁不理会敌伪的威胁利诱，化装逃离了香港。从此《三块钱 国币》手稿就伴随着夫人度过了两年囚禁生活，直至抗战胜利后才物归原主并发表。

20世纪50年代后，丁西林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对外文化友协副会长等职务，工作皆有成效，被毛泽东、周恩来誉为“多面手”。

不愿“楚材晋用”的张钰哲

望河汉星辰，远溯鸿蒙探造化；
究躔离仪象，相期月窟建灵台。

这是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送子出国留学时写的一副对联，联意囊括天地，气吞河汉。联中所说“灵台”即汉代的天象台，“月窟建灵台”是想在月球上建立空间探测站。由此可见，张老望子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殷殷心情。

张钰哲于1902年出生在福建闽侯。他十二岁时偶然看到一本科普著作《上下古今谈》，激起了他立志献身于天文事业的远大理想。后来他考入清华大学，又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紫金山天文台于1934年建成之后，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担任台长四十多年。1946年他再度赴美国考察的时候，岂料两年后回国的路费竟无着落，朋友们劝 他留在美国，他执意不肯，说：“中国古代有‘楚材晋用’的事，我虽算不上‘楚材’，但亦不甘‘晋用’。”恰巧这年5月将发生一次日食，美国地理学会要派一个观测队到中国浙江省。于是，张钰哲在过去美籍老师樊比教授的大力相助下，作为观测队的成员回到了祖国。

长期以来，张钰哲和他的同事们在天文学上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紫金山天文台陆续发现的数百颗小行星，有不少已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的正式编号。星名有“中华”“张衡”“沈括”“北京”“南京”等。他的卓越贡献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赞誉，遂决定将一颗小行星

命名为“张”。这不仅仅是张钰哲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张钰哲多才多艺，诗、书、画、印皆有较深造诣，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结集的《天文学论丛》，既是一部天文学专著，亦是一部富有文采的文集。他十分仰慕汉代掌管天文的“太史合”张衡，自刻两方印章，一是“平子家风”，用张衡的学风和品格自勉（张衡字“平子”），另一为“钟山太史”（钟山即紫金山），作为担任了四十年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确也当之无愧。

1982年，天上出现天文奇观——一百七十九年才遇上一次的太阳系九大行星聚会；人间，在纪念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表彰了九位从事天文工作五十年以上的老专家，领衔的便是张钰哲。同事们为他祝寿的一副贺联道：

测黄道赤道白道，深得此道，赞钰老步人间正道；探行星彗星恒星，戴月披星，愿哲老成百岁寿星。

1986年，张钰哲与世长辞了。他虽未能活到百岁，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学术精华将长驻人间，永留钟山。近据报载，为奖掖后进，中国天文学会决定设“张钰哲奖”，这是对我国天文学界这位学术泰斗的庄重纪念。

著名化学家杨石先

近闻著名化学教授杨石先先生在天津病逝，南开大学校友会香港分会还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杨先生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名的化学家。抗战期间笔者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借读过，虽未受业于杨先生，但也曾有师生之谊。对他主持校务和勤奋治学的事迹颇有所闻。杨先生祖籍安徽怀宁，生于杭州，在天津读小学。以后学成，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授。逝世之前，任南开大学名誉校长。他的大半生同南开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杨先生曾两度赴美留学，先读康奈尔大学，后读于耶鲁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在含氮杂环化合物研究方面有新的发现，被选为美国“化学研究名誉学会”会员。

他待人真诚和霭，治学严谨认真，对学生诲人不倦，身教重于言教。“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对南开大学狂轰滥炸，他冒着硝烟烈火，指挥着学生疏散，紧急转移了 学校的贵重仪器；然后千里迢迢，迁校长沙。长沙遭轰炸后，又跋山涉水，率领学生奔赴昆明。南大、北大和清华三校组成了西南联大，他担任了化学系主任兼教务长。西南联大虽然在土墙草顶的课堂中上课，但由于有杨石先、曾昭抡、闻一多等著名教授执教，在抗战期间，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杨先生的科学研究也是成绩非凡的。他先后发表了《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和有关植物刺激素、杀虫剂研究的论文四十余篇，著有《有机磷化学进展》，译有《国外农药进展》等专著，并指导研制成功杀虫剂“久效磷”“螟蛉畏”，除草剂“燕麦敌”“胺草磷”，杀菌剂“灭锈

一号”、“枯草净”等十多种农药，对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石先先生一生执教，培养出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可谓桃李遍天下，不少人已成为当今的科技名家。据闻，近三十多年里，他一直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化学部主任，而学部委员中有十多人是他的学生。在中国的化学界中，同业尊称他为中国有机农药研究的开拓者和有机化学研究的领路人，这对于杨石先先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物理学家黄昆

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原籍浙江嘉兴，1919年出生于北京，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在燕大读书时，正是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国家多难之秋，他把满腔爱国热情化作钻研科学知识的动力，物理和数学等课程成绩特佳，年年获得高额的奖学金，因而得到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的重视。

1941年，黄昆转入昆明西南联大的物理研究院，导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其后获得诺贝尔奖奖金的杨振宁和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张守廉，都是他的同学好友。

1944年，黄昆为庚款公费考试所录取，次年赴英国深造。先后在布雷斯脱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做研究员，与英国女物理学家艾夫·里斯女士结识，结成伉俪。

在英国留学期间，黄昆在固体物理学的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发表论文多篇，取得国际同行科学家的公认。其显著者有以下几项成就：

“黄放射”。1947年黄昆在英国发表第一篇论文《稀释　固溶液的X射线漫散射》（载《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为一些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和应用，被认为是研究固体中杂质缺陷的一种有力手段。

“黄理论”。1950年黄昆在利物浦大学首次提出多声子辐射和无辐

射跃进的量子理论，与其助手里斯共同署名，发表了《F——中心的光吸收和无辐射跃进理论》，给近年研究固体杂质缺陷光谱、发光和半导体载流子复合起了奠基作用。

“黄方程”。1951年黄昆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和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发表在《关于电磁波场和离子晶体的相互作用》《离子晶体长光学波的唯象方程》等论文中，后来发展为极化激元的运动方程。1972年在极化激元国际会议印发的文集中，首先提到黄昆的贡献。

以上三项重要贡献，都被国际科学界冠以“黄”字为命题，可见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此外，黄昆还从1947年起，用了四年时间，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德的博恩合作撰写了《晶体动力学》一书，这本书在国际上受到高度的评价。

近四十年中，他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做了许多贡献。1952年，他返回祖国大陆，先在北京大学任教；翌年，又开创了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学的教学与研究，建立了一系列课程。不久，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此后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出国讲学，1980年应聘为瑞典皇家学院的国外院士。

怀念孔伯华先生

今年是孔伯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人无不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华医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名医。

孔先生名繁棣，字行，别号不龟手庐主人，生于1885年，原籍山东曲阜，为孔子后裔。他幼承家训，博览经典医籍，二十岁便学有所成，在家乡悬壶济世。1911年，应京师之聘在外城官医院任内科医师。

1918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流行虎疫（即霍乱），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当时流传一首民谣：

今夕聚首言欢，
明朝人鬼各域。

可见疫情之猖獗，死亡之惨重。孔先生得知，心急如焚，立即与当时的名医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组成临时防疫医疗队，奔赴廊坊，免费为虎疫病者诊治施药。经　　过十几日艰苦工作，局面幡然改观，千家万户对孔先生等无不感恩涕零。

“五四”运动后，他为民创制一种避瘟散，功能芳香化浊、止吐避疫，效力高于日本宝丹。

此外，为防止外感，他还创制清灵甘露茶，常年施送于百姓，深

受世人称颂。

1929年，汪精卫公然下令废止中医中药，举国上下为之哗然。孔先生为挽救祖国几千年来的医药学遗产，挺身而出，奔走呼号，联合众多同仁，在北平创立中医药协会。协会一致推举孔先生为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撤销此令。他到南京，与政府的大员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力陈祖国医药学的伟大成就。汪精卫慑于孔伯华在国内外的声望，且知众怒难犯，不得不撤销此令。

孔先生此行大获全胜，回到北平后，又与另一名医萧龙友先生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旨在培养更多的人才，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先生自任院长，亲自为学员授课。北平国医学院完全靠自费经营，先生几乎把自己的诊费收入全用在办学上，而自己却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治学严谨，艰苦经营，历时一十五载，毕业学生达七百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多数成为济世为民的医界高手。后人称誉孔先生云：

医道通今古，
桃李满天下。

在医疗中，他善用石膏，也爱用石膏，因而有人称他为“石膏孔”，足见他对石膏有独到的见解。在他所著的《时斋医话》中曾有讲述，他说：“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表肌（解除表邪，清除里热），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皮毛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乳汁，阳燥润，孔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疗伤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

孔伯华不仅善用石膏，而且善用解药。在他的处方中，常见用的鲜药有：鲜霍香、鲜佩兰、鲜荷叶、鲜藕、鲜薄荷、鲜生地、鲜枇杷叶、鲜芦根、鲜茅根、鲜姜等。这些鲜药，多取其芳香清冽，除秽通窍，效果很好。

孔伯华将其诊室称作“不龟手庐”，常自号为不龟手庐主人，此乃先生自谦之词，其含义是自己仅有治龟手之小技。先生还精于书法，每次诊病，将病因脉象之医案书于前，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配方严谨且注明炮制及煎法；书体清秀俊逸，笔势风格潇洒，患者视为墨宝。先生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逾尺， 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一家。

孔伯华曾说，学医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才有助于弄通医学之奥妙。他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如照抄古方，即泥古不化。借鉴古人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实际。这些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

孔伯华逾古稀之年，身体渐衰，终因操劳过度，于1955年3月病倒，辗转床榻达半年之久。同年11月23日，他自知不济，将不久于人世，临终谆谆遗嘱曰：“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皆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嘱署溘然辞世，终年七十一岁。

“万家生佛”萧龙友

北京的中医早年有“四大名医”之说，而萧龙友据说是四大名医之首。

萧龙友（1870～1960）名方骏，四川省潼川府三台县鲁班乡人。十八岁以秀才应试，中副榜。二十岁入成都尊经书院攻辞章科、治经史，喜研中医学。

在他二十二岁时，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余人，疫情严重。他不怕传染，挺身而出，用中草药治愈众多垂危患者，市民称之“万家生佛”。舍生取义，立志于医，始肇于此。

1897年，萧龙友进京考取拔贡，后弃官从医。每日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常以“临床当思人命重，处事莫把己身轻”为铭。他对贫困患者绝不收费，且送医送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誉满京畿。

萧龙友曾为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确诊：

1916年，袁世凯洪宪称帝，举国反对，焦急万分。袁 患水肿，延萧入总统府诊治。初婉辞，再三敦请才为一诊。萧出向人云：“袁在政治、军事各方面已是死路，在生命上安有活路？”袁果于6月6日暴卒。

1925年，孙中山病于北京，虽经中、西名医治理，无有确诊。复请萧龙友切脉。断曰：“孙总理病于肝，病入膏肓，汤药无效矣。”3月12日孙先生逝世后，由协和医院作了解剖，证实为肝癌所致。

1928年，梁启超便血。萧龙友断诊，认为梁非由肾功能有病所致，可以长服他所开中药即可痊愈。殊梁不信中医，竟于协和医院割去右肾，便血如故。再请萧复诊，诊后判为已不治。梁于1月19日病逝。

1934年，萧龙友与孔伯华（四大名医之一）、瞿文楼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他筚路褴褛，披荆斩棘，倾囊维持，与孔伯华共同担任校长，并兼任教师授课，又主动到学院门诊。坚持一十五年，毕业学生七百余人，从而造就一批中医人才，促进中医事业发展。

萧龙友相继在家乡四川、客籍山东、燕都治病救人，凡达七十年。著有《息园医隐记》《四诊说》《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等，都是医学界的宝贵财富。所藏医书，不乏善本。最值得称述的是朝鲜右本《医方类聚》一部大书，海内罕见。萧于生前热诚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

施今墨中西汇通

施今墨是京津知名的大医生，生于清同治壬午（1882）年，浙江萧山人。原名施毓黔，十三岁即从舅父李可亭学医。在挂牌行医之始，把原名中的“黔”字拆而为“今墨”，立志效法摩顶放踵的墨子，施爱于民。

施今墨曾经说过：“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他一向主张中医辨证，西医辨病，二者相结合，探索疾病与治疗的规律，才能获得医学知识的精华。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整理中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势在必行的。正是这种不断革新的思想引导着他，使他在中医医术上有独到之处，创立了中医中的施氏学派。

这种主张，也表现在他的教学、授徒工作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以自己的脉金收入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并最早改革了中医教育内容。学院里除设有中医基础课和临床课外，还设有西医基础课及西医临床等课程。学生既 要学中医辨证论治，也要学西医诊断方法，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中西医知识的人才。他先后培养出六七百名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医药卫生界的中坚力量。

施今墨认为，“临症如临阵，用药如用兵。”首先须明辨症候，再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亲自授课，并亲带学生临床实习。在用药方面，他主张“有是症，用是药”，而不应凭个人所好成为所谓温补派、寒凉派。他在医学上勇于革新，对于中药也力图改进剂型。曾创办中药制药厂，探讨中药的改进。他的处方制成“中成

药”多种，如施今墨气管炎丸、施今墨高血压速降丸、施今墨强心丸，疗效显著，流传海内外。

与施今墨同样重视中药研制改进工作的另一位名医，就是汪逢春。他主张中药剂型的革新甚力，希望早日实现国医科学化。1941年他创办国药业公会中药讲习所，礼聘多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医界前辈任教，如瞿文楼担任处方学，杨叔澄担任制药药物学，安干青担任病理学，倪即吾担任诊断学，赵树屏担任教务主任，两年间，为中医界培养了不少人才。

忆著名医学家朱宪彝

著名医学家朱宪彝先生不幸于去岁12月逝世。消息传来，不禁悲痛良久。因为笔者与朱先生20世纪40年代就相识，说来也算是老朋友了。

朱宪彝先生于清朝末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做研究工作。返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了软骨病钙磷代谢和营养不良性水肿蛋白质代谢的研究，写了三十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他第一个证实了钙和维生素D的缺乏是软骨病和佝偻病的基本病因，他的这些论文至今仍为世界医学界权威学者所重视，加拿大著名骨代谢专家称赞他是“中国钙磷代谢知识之父”。所以，四十多年前，朱宪彝已是世界知名的内分泌学专家了。

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日军封闭，朱宪彝大夫先到唐山开滦医院行医，不久便 回到天津自己开办一个诊所。

朱宪彝为人热情正直，不求名利，孜孜好学，医德高尚。他的同窗好友曾称之为“老夫子”，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去过他诊所治病，也去过他的家。他的诊所是借用朋友的一间小房子，家在旧英租界成都道上，只是两层小楼而已。家具陈设简单，中外文的医学图书却占满大部分空间。朱大夫的太太是一位家庭妇女，照顾朱大夫无微不至，朱大夫经常同朋友讲起对这位贤内助担

负全部家务的感激之情。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朱大夫一直在天津主持医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医务人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到晚年也不懈怠，曾带领研究人员到十二个省四十个县市，实地考察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摸清发病规律，制定防治措施。为许多呆、小、聋、哑，以及四肢瘫痪的病人，解除了痛苦。

朱宪彝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雅娄教授和在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生前友好给他的亲属发去唁电。曾请朱大夫治过病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打电报表示哀悼。朱宪彝大夫的逝世是中国医学界的一大损失。

外科名医张纪正

1946年经友人介绍，笔者认识了天津天和医院的外科名医张纪正。

张纪正是山东人，其夫人张碧弟是美国人。张纪正青年时期在济南齐鲁医学院读书，抗日战争前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经过一个阶段的实习，在协和医院当了外科大夫。他中等身材，圆脸，大眼，为人爽直，好说好笑，说话时常夹杂几句山东口音的英语，给人以好感。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对美宣战，把在北京、天津同美国有关的学校、医院、企业等，都查封了，还把有关的英美籍人员送进山东潍县集中营。协和医院被查封后，中国医生都失业了，不少人跑到天津另谋生路，张纪正也随之到了天津。

当时天津有个巨商名流雍剑秋在马场道开设一所很豪华的西湖饭店，因时局动荡，营业不振，就把这饭店的房合租给这些来到天津的协和医生，开办了天和医院。这些 名医包括妇产科柯应夔、肿瘤科金显宅、小儿科王志宜、内科邓嘉栋、骨科方先之、耳鼻喉科丁庸浩、胸外科张纪正等人。

天和医院开业后，由于协和医院在北京已经关门，这些名医以“协和”的牌子作号召，病户慕名而来，门前车水马龙，生意非常兴隆。

张纪正初到天津，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名气不大的医生，可是在天津不久就出了大名，走了鸿运。他遇到一位姓赵的在北京任铁路局

长的人，患肺结核，病情严重，派人到天津请医生诊治。正巧天和医院的张纪正是学过胸外科的，曾在协和医院见过为肺结核病人切除肋骨的手术，他就壮着胆子为病人做手术，结果获得成功。这一来，张纪正誉满京津，成为名医。后来，他又到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国，还带回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夫人。可是他已有一位也做医生的中国夫人，这就出了问题。有一次张纪正和新夫人张碧弟在家中办招待会，在报上登了启事，他的原配夫人跟着也登报，声明并不知其事，弄得张纪正很难堪。

笔者来港后，再无缘见到张纪正大夫，据说现在已成古人了。

肺病专家“TB郭”

近闻友人提起，说郭德隆大夫八十多岁现仍健在。此君早年从事防治肺结核病工作不遗余力，贡献卓著，所以人们称呼他为“TB郭”。记得民国十几年，他曾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当过少将军医官；“七七”事变前，他曾任燕京大学校医。他本人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他为人和气，善言谈，又诙谐，所以和师生们的关系处得不错，校务长司徒雷登也很信任他。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关门，郭德隆也辞掉燕大校医的工作，到长老会办的北平道济医院担任院长，但任职时间不长，就辞职而去。

1943年他到了天津，找到燕大校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新任总干事杨肖彭，谈起开展肺结核病防治的计划。当时，肺结核病是危害青年健康的大敌，杨肖彭对郭德隆的防治计划很感兴趣，就请他参加了一次青年会会员组织的“联青社”聚餐会，他在会上就防治结核病作了专题演讲， 当即引起了与社会员的关注。其后，经联青社社员、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先生倡议，社员大来木行经理、青年会董事长阮渭泾、东亚毛呢公司经理、青年会董事宋棐卿，以及青年会董事陈芝琴等人响应，各出资五千元，建立了天津结核病防治院，并从美国买来X光透视机，旋即开业应诊，从此“TB郭”扬名于天津。

郭德隆当了天津结核病院院长后，很快就被推选为青年会的新董事，此后对青年会工作无不全力以赴。他定期为教会人员和青年会的干事职工免费检查身体，照透视；每逢青年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儿童健美比赛，他必担任内科检查和负责评选的工作。1948年初，杨肖彭自

美国归来，郭德隆正好要去美国考察和深造，便聘请杨肖彭做结核病防治院的代理院长。

郭德隆个子不高，面白皙，大脑门，高鼻梁，目深邃而有光，说一口山东话，爱说爱笑，使人一见就产生好感。

友人告知，20世纪50年代初期，结核病防治院改名为天津第一结核病院，仍由郭德隆担任院长，并在河北石家庄中山路设立了第二结核病院。后来成立了结核病防治所，由郭德隆又任所长。近年来，他又转向冠心病的防治研究，担任了胸科医院预防科主任。他认为吸烟是导致冠心病和癌症的重要原因，因此大力提倡并宣传戒烟。

痛悼营养学专家俞锡璇

营养学专家俞锡璇教授，一年前病逝于北京，这消息最近我才听到，十分悲痛。多年以来，在我内心是非常尊敬她的。

1934年，俞锡璇在燕京大学毕业，1937年赴美留学，1939年毕业于美国奥利根大学，获营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40年到北京协和医院营养部做了由中国人担任的首届主任。她体态雍容，光采照人；性情温柔，和蔼可亲；工作能力强，处事果断，深为同事们所信赖和亲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迫关闭，俞锡璇转到辅仁大学任教。后来，毅然离开北京，投奔抗日的大后方，到四川成都基督教会办的华西大学任教。

1948年，俞锡璇再度赴美考察研究，对美国当代的营养学作了深入的了解和探讨。1950年返回中国，任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据北京友人来信告知，近几十年中，俞锡璇在协和 医院担任营养卫生教研室主任。同时，她还在有关的学术团体担任职务，中国营养学会名誉主任，《营养学报》的名誉编辑，《生理科学进展》杂志的编辑委员。为发展营养事业，改善中国人的饮食营养状况，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俞锡璇教授堪称中国最早从事营养科学研究的教育工作专家之一。几十年来，她孜孜不倦，辛勤努力，为营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任教五十多年，学生遍布全国，其中很多人已成为营养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

俞锡璇教授在学术上，对于有关维生素B、热能（卡路里）的需要，儿童蛋白质营养等项科学研究，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

同时，俞锡璇教授还可以说是中国医院临床营养的奠基人之一。她对医院的临床营养极为重视，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不遗余力，直到年逾古稀之后，还为此呕心沥血，奔走呼吁。

早年在北京念书时期，我的一位亲密好友之母亲，与俞锡璇同在协和医院工作，我在这位同学家里时常遇到俞锡璇教授，她对我也逐渐熟悉起来，把我看成和那同学一样，都称为小弟弟，关心我们的学业，鼓舞我们刻苦用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俞锡璇教授以七十六岁年龄逝世于1988年，怎能不令人悲痛！

报人寻踪

“疯人”章太炎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以“疯”著称的人物，这就是章太炎。他自己也公开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但唯其“疯”才留下了一连串传奇趣闻。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因仰慕明末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另起了个名字叫绛，别号太炎。早期的二十多年，他是在书院里度过的；他潜心于小学玄理，取得精深的学识。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他在书院里坐不住了，带着一腔火气，踏上了政治舞台。

章太炎在《时务报》就职，后到杭州编《经世报》，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号召人们“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死气沉沉的中国透出一丝生气。可是不久，政变发生，光绪被囚，改良派人物惨遭捕杀，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不得不避地台湾 地区，后又转赴日本。

1903年6月，为反击康有为鼓吹立宪污蔑革命的言论，他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登在《苏报》上，指出满族统治者恶行累累，改良派主张立宪，纯系梦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此文一发表，清政府恨不得立刻封了《苏报》馆，拿获章太炎，章氏事先得到消息，却没有逃走。反而迎着警探走上去，指着自己的鼻梁说：“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说着，伸手就缚，慨然独往。上海西牢的铁窗生涯，没有使章太炎屈服。熬过了三年监禁之后，1906

年，他出狱后又东渡日本，再次投入革命活动中。

虽然章太炎存有缺点和错误，鲁迅说：“这也不过白圭之玷”，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再逃日本，袁世凯则变本加厉地搜捕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党人。袁以电邀共和党副理事长章太炎来京商量党务为借口，将其软禁在北京龙泉寺，迫其就范。1914年1月7日，章太炎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走进总统府，声色俱厉地质问袁世凯。袁明知来者不善，拒不接见，让章太炎在传达室久候。章太炎等得不耐烦了，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室内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

之后，袁对章怀恨在心，严加监禁，使其丧失人身自由。同时，又为表示敬老尊贤，袁命令袁克定给章送去锦缎、被褥和营养品，企图收买软化。岂料章太炎早已气坏了，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袁送来的被褥上写上“袁贼”二字，然后烧出许多窟窿，连同送来的食品一起扔出窗外。并宣布绝食抗议，一直坚持十四天。袁世凯也不愿承担虐杀章太炎的罪名，于是委派一名名医日夜护理章太炎，并改善了生活境况。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纷纷前来慰问，力劝先生进食。他自认为必死，日书“死”字，曾写信给他家乡朋友，要他们在刘基（乡里先哲，即刘伯温）墓地附近为他造一生圹，死后归于此，以“申死生慕义之志”并亲书“章太炎墓”四个大字，以作碑文。

袁世凯怕这位颇有名气的革命元勋死了，于己不利，无奈将章迁居钱粮胡同，自我解嘲地说：“他一个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

袁世凯于1916年6月一命呜呼，章太炎获释南下，经过一阵彷徨之后，又站到孙中山一边，参加了护法运动。尔后，他为抗日救国而

呼号奔忙。

章太炎精于国学，博涉群书，为朴学大师。晚年在苏州讲学。在苏州中心锦帆路新盖楼房两幢，讲堂数间，又外租宿舍一处，供外埠学生住宿。不收学费，已缴者如数退还。1935年暑假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章先 生自任主讲。讲《尚书》时，凡注疏已通者一律不讲，发现错误进行驳辩，一字之微常辨析数小时而不倦，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时不带参考书，不编讲义，唯凭口诵手写，不但《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章太炎病逝，门生送有挽联：“一代大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赐而来何迟也，禹吾无闲然矣”。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他的遗嘱仅一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代代毋食其官禄。”在他身上，又一次放射出“疯子”的异彩。

章太炎死后葬于西湖，与章夫人原议甚合，虽非先生本意，没和刘基葬为近邻，却和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咫尺之隔。墓碑上“章太炎墓”四字仍用他自己书写的，名前没有任何称号。

报界先驱彭诒孙

说起中国近代新闻史，人们都不会忘记创办于20世纪初年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

因为这两份由同一位报人创办的报纸，当年曾享誉华夏，震动清廷。

创办者，彭诒孙，号于嘉。出生于苏州，在北京长大。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于是下决心办报，鼓吹爱国，维新自强。

1902年，他在京创办《启蒙画报》，这是北京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民间报纸。他以开启民智作为办报宗旨，以刊登科学常识、历史掌故、名人逸事为主，并附有永清刘炳堂所绘图画。最初日刊，后改成半月刊、旬刊，每册二三十页；虽系十岁左右儿童读物，但成人读之亦颇有兴味。他自己无钱办报，经费是借贷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存款。当时，尽管社会风气未开，人们没有看报习惯，办报艰辛异常，但《启蒙画报》对开化社会风气仍起了很大 的作用，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曾说它“启发我脑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越二年，彭诒孙又创办了一份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京话日报》。他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作牛马奴隶……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

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该报具有鲜明的仁爱和反帝色彩，初创时仅销一千份，后增至一万多份，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销售逾万份的报纸。当时的《大公报》曾经称赞说：“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

彭诒孙借助《京话日报》曾多次倡导反帝爱国运动，其中以“国民捐”运动影响最大。它缘起于一篇述评，引起了读者普遍关注。事情是这样：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年偿付，至光绪六十几年方可付清，本息累计高达九亿两。该报认为全国国民应齐心合力，一次凑齐，这是因为以当时全国四亿余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这种救国救民即是自救，故称“国民捐”。讨论一开始，就有太医院院长张仲元首先投函愿捐银二百两，之后投函捐银者纷纷而至，上至皇室亲王、文武大臣，下至工商百业、车夫小贩、妇女儿童，甚至在押囚犯，都纷纷响应。为此，《京话日报》专门开辟“国民义务”一栏，刊登认捐 者的姓名和捐数，后因揭者太多，便另附专张，随报发送。这场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前后持续一年之久，后因发起者获罪而停止，银行宣布发还捐款，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银行尚存有“国民捐”九十余万两。

当时，彭诂孙和《京话日报》因为发起“国民捐”运动而名满京师，报纸很快传遍奉天、黑龙江、陕西、甘肃等省，形成举国称道的局势。同时也惊动了清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遣内侍传旨出来，声称要看《京话日报》。

彭诒孙1921年病逝，享年五十七岁。

成舍我办《世界日报》

成舍我本来是诗人，是近世著名诗社“南社”的社员之一，后来到北京办《世界日报》，这家报纸办成功了，前后期（后期即指抗战胜利之后的几年）大约办了二十来年吧。《世界日报》发行量显著增加，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事，那时北京报纸自《晨报》增加副刊，取得成功之后，其他报纸，也特别重视副刊的编辑，以争取读者。《世界日报》副刊《明珠》，有一个时期，礼聘刘半农先生担任编辑，撰稿者有周作人、钱稻荪、钱玄同、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江绍原、沈从文、胡适之等人，名家济济，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和教授，所以那块版面虽然很小，而号召力却很大，于是《世界日报》在北京，尤其在学界很快声名雀起了。在1928年政治中心南迁之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全靠几所著名的学校维持局面，尤其报纸，只要能在学界中获得声誉，便是取得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当年北京学界中的热门报纸，前一阶段是《晨报》，等到20世 纪30年代前后，便为《世界日报》所代替。

《世界日报》于日报之外，还出画报，每周发行四开一张，用雪白的道林纸，蓝色油墨印行，百分之九十是照片，不零卖，不单订，随日报奉送，目的是为了刺激日报发行数字。第一版照例是一张名媛或燕大、辅仁高材生的照片，配一篇短文，第二三两版全是新闻照片，偶然印一张画，但不常见，第四版是电影照片，当时真光、中天等电影院放的都是好莱坞的电影，这第四版便经常登明星照片和影片中的某些镜头。

《世界日报》的社址，在当年是十分气派的。虽然说起来，只不过是一座灰色水泥的三层楼房子，可是在那时的北京，已是十分神气的了。因为任何事物最怕比，这所房子，如果和上海三马路《新闻报》《老申报》，或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比，自然都比不上，但和北京当时其他报社比，就显眼得多了。北京当时著名大报《晨报》，社址在宣外大街路东，椿树胡同口上，是老式大四合院，很不起眼。邵飘萍的《京报》馆，在魏染胡同，在胡同里面。《小实报》在宣外大街路西，也是老式房子。只有《世界日报》，在城里西长安街路北，又是洋楼，高台阶上去，行人要仰起头来看它的大门，该有多神气。

据闻现在这所房子拆掉了，所有西长安街路北的房子都已拆掉改为马路了。当年《世界日报》报馆的楼门正好对着路南著名羊肉饭庄西来顺。要吃涮羊肉，过马路就　是，名厨师褚祥的黄炆羊肉、黄牛肉，那是名满京华的。成舍我先生大概常常照顾他家生意，那辆白铜云亮的自行车，往往不是停在报馆门口，就是停在对面西来顺门口的。报馆西边有一家三开间两层楼的中央理发馆，那是当年西城最大的理发馆，能做奶油烫发的。其他还有专门出租结婚礼服的铺子——红房子等。

《世界日报》馆东面，咫尺之遥，有一个极重要的古迹，那就是著名的双塔寺，这是两座很漂亮的飞檐灰色砖塔。《帝京景物略》卷四“双塔寺”条下记云：

> 西长安街双塔寺，若长少而肩随立老，其长九级而右，其少七级而左，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七级老，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双塔地。元庆寿寺也。

两塔距离不远，好像手挽手的兄弟二人，立在西长安街北面，天天注视着十丈软红，这里最早还有金章宗石刻“飞渡桥”“飞虹桥”，当然现在这些都已没有，改成大马路了。

北京沦陷时期，《世界日报》这所馆舍，为敌伪所掠夺，就在这个原址上办起了汉奸报纸《新民报》，这家汉奸报馆后来又占用了石驸马大街西路北的大房子做编辑 部，抗战胜利，成舍我先生回北京恢复《世界日报》，便在石驸马大街，但没有再办《世界画报》，却又办了一个《世界晚报》，四开一小张，成绩很不错，而且还培训了不少人，现在还在国内外新闻界服务呢。

怀念王芸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迁回天津出刊。1947年，天津市的外勤记者联谊会请王芸生作过一次讲演。当时王芸生在新闻界早已蜚声海内，他并不常在天津，他的讲演一开头就是惊人之笔。

他说，我离开天津多年，回想抗战前我在天津刚进报馆时，有一次陪朋友在饭店吃饭，正巧隔壁餐厅里有招待记者的宴会。只听服务员们指点着那边带着绸条的人们说："那些人是专敲竹杠的！"我一看，带绸条的原来是些新闻记者。也不怪人家说，新闻记者里确实有人尽干坏事。我们要严肃对待新闻工作，不能让人背后指指点点！

最近看到一部三联书店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八卷本的一套巨作，就出自这位严肃认真的新闻工作者王芸生的手笔。但谁能想到他并未进正式学校念过书呢！

王芸生的父亲是从静海县流落到天津后，在南运河 岸的芥园庙给和尚烧菜做饭的。生了三个儿子，王芸生行三，他念了几年私塾，十三岁就到商店做学徒，但他勤苦好学，每晚总是想方设法找书报看。他后来的读写能力，就是来自少年时期的苦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当时，王芸生已在《大公报》做编辑。他奉报馆老板张季鸾之命，编写一套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以启发读者，教育国民。他就搜辑史料，撰写专栏文章，"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个专栏就在王芸生的笔下诞生，开始逐日连载。1932年，曾以单行本出版。这部著作史料丰

富，持论公允，刚一问世，即被视为从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以来的第二部研究中日关系的好书，引起人们的重视。作者王芸生的名声也在新闻出版界崭露头角。

王芸生1980年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新版的这部著作是他晚年重新修订的，直到逝世前方完成七卷修订稿；第八卷生前安排了编写计划，由他的助手在他逝世后补足的。五十多年的心血，终告全部完成。

王芸生在《大公报》工作了将近四十年，以卓越的新闻工作者闻名于世。他的妻子同他一样，原是个出身寒苦的识字不多的人，但两位老人甘苦与共，终身相偕，感情弥笃。闻友人谈，王芸生逝世后，他的夫人很伤痛，但有女儿和女婿侍奉身旁，老夫人足能颐养晚年了！

邵飘萍和《京报》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曾有一份名为《京报》的报纸，其主政者系著名报人邵飘萍，冯玉祥将军当年盛赞道：“飘萍一枝笔，批过十万军。”

邵飘萍，原名邵振青，字飘萍，笔名素昧，1886年生于浙江金华。十五岁考中秀才，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自民国元年（1911）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汉民日报》《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主编、主笔及专职记者。民国六年（1917）10月5日，他在北京创办《京报》，在创刊词中，他指出，“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必从政治教育入手”，唤醒“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3日晚，邵飘萍亲赴北京大学演讲道：“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　来，救国图存，奋起抗争。”6月4日，他在《京报》发表《为学生事警告政府》一文，支持学生爱国之举。为此，段祺瑞政府查封了《京报》，并下令通缉身为社长的邵飘萍。邵只好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化装成工人后，潜出北京，经天津去上海，后转入日本。民国九年（1920），段祺瑞政府倒台，他自日本回国，遂于同年6月将《京报》复刊。

邵飘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始终抱着崇敬和支持的态度。民国十三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他指示《京报》于2月4日至14

日连续转载这个宣言，宣言庄严宣布“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封建军阀封锁着的北方人民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鼓舞与教育。

民国十三年底，孙中山应邀北上，与冯玉祥等人共议国事，并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孙托人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专程赠给《京报》，邵飘萍在《京报》的《国画周刊》创刊号刊出，并赫然印上“全国景仰之中山先生”九个大字的标题。

民国十五年，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事后，写出了震动全国的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控诉了反动政府屠杀民众的罪恶，恳劝民众“不必再有与虎谋皮之愚举”。

邵飘萍的正义言行，加深了军阀们对他的仇恨。民国十五年3月26日，段祺瑞政府发布了通缉名单，他与徐谦、吴稚晖、李大钊、朱家骅、蒋梦麟、许寿裳、陈垣、沈兼士、马叙伦、林语堂、周树人、丁维汾、周作人、孙伏园等四十八人都在被通缉之列。为了避开风险，他再次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民国十五年4月15日，奉系军阀的军队开进北京。4月22日下午，邵飘萍回《京报》处理事务，不幸被捕杀害，时年仅四十岁。

近闻其侧室夫人祝文秀女士，仍住江苏无锡市郊区，过着安静舒适之晚年生活。

年已八十多岁高龄的祝文秀女士，早年是闻名遐迩的演员，登红氍，演旦角。邵飘萍经常出入舞榭歌场，为她的轻盈舞姿和悦耳唱腔所迷，因而神魂颠倒，决心娶文秀为妾。可是文秀认为邵飘萍是耍笔杆子的，不合她的理想，便婉言拒绝。

邵飘萍认识文秀的母亲，老人非常喜欢图画，为了追求文秀，邵飘萍经常买书画印册，作为见面馈礼。有一次，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幅仇十洲仕女临摹本，色泽清丽，又有幽鸟奇花之衬托，老人一见如获至宝。邵飘萍慷慨以赠，继之请其力劝文秀，终成佳偶。婚后，飘萍教她读书写字，故文秀亦略具文化，曾伴飘萍东渡日本。两人形影相随，甚为相得。

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马连良在收尸时，摄有照片多幅，其中有一张，右眼下有一个洞，此洞即饮弹之痕迹也。此照片文秀匿藏达数十年之久，直到飘萍昭雪，尊为烈士，她才敢出以示人。另有一祝文秀早年玉照，上面有飘萍亲笔题字“七妹留念”，因此人们以为祝是飘萍之第七位夫人，实则不然。所谓“七妹”，乃文秀在娘家姊妹中排行为第七。这张照片，据说文秀至今仍作为珍物保存。

飘萍走前，与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极为友善。飘萍辞世，文秀清苦，又无子女，孤寂异常，季鸾每月送银资助。文秀虽很感恩，但以为别人之钱不宜享用，把它积蓄储存。一日，季鸾忽向她商恳道：“余近来做一宗买卖，手头金额不足，积蓄能否暂借一时？”文秀当即慨诺，把全部储金悉数交与季鸾。大约两个月后，季鸾欣然往访，奉还借款，并曰：“此次买卖，获得意外利润，此利应各分一半，今后无再愁于生计耳！”文秀只得收下这笔巨款。实际上季鸾并未做买卖，而是故意弄此玄虚，为使文秀女士安心使用助金罢了。生死之谊，昭然心底。

曹聚仁与书

著名报人曹聚仁，在其近五十年的文人生涯中，先后主持过《正气日报》《前线日报》《循环日报》等报纸的笔政，在从事新闻采写和编辑工作的同时，教书是他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大半生中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他买书成癖，他常对人说："借来的书不过瘾。"为此，只要出一种新书，凡是被他看上眼，都不惜重金买下。有一次，他买了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竟花掉半个月的伙食费。当然，他每次买书都有自己的择书标准：（一）书面上有要人题签的不要，（二）开头排列许多名人序文的不要，（三）标明为必读书的不买，（四）封面花里胡哨的不要。他曾对友人说过："好似我的第八感觉，透过那书本，嗅得出那本书的气味的。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还逃不出我的双眼。"

他不但购书，而且读书如痴。他在上海时，有一次买到一本杂志，竟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边走边读起来， 结果，遭到一个汽车司机的斥骂："走路还看书，性命要吗？！"还有一次，他在真如车站等车，从一家书店买了一部《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家中，从黄昏看到黎明，直到将书读完才睡觉。说到他读书，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在商务印书馆廉价部买到福利德尔（E.Friedell）的《现代文化史》。这部书前页题着这样几句话："假如有任何人奇怪，为什么在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写过以后，我仍浮起了再写一次的观念，请他把以前所写的全看一遍然后再看我的；如此而

仍要奇怪，那就是他的自由了。”由此，这部《现代文化史》便成了他摆在案头的常读书了。

另外，他藏书甚丰。所藏之书，不但门类多，而且数量大。在上海时，家中书橱装满了，在墙上安装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头上方钉起搁板。陈列不下就堆起来，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到处都是书。他是研究历史和文学的，但所买之书，旁及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其中医学还分中医和西医），各式各类，一应俱全。为此，他的夫人邓诃云曾嗔怪道：“他的书库，既是百宝箱，又是垃圾堆。”并说：“他收藏的书并不是做装饰品的，我可以做证，他几乎每本都看过。”

他的藏书遭过几次劫难，“一·二八”之后，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八一三”抗战，为保安全，他将许多珍本藏书装了三十多麻袋运到家乡浙江浦江去了，结果 还是被日军一把火烧光，两次劫难，他虽发誓不再收藏书籍，但因为积习难改，过后很快又收藏起各种书籍。他夫人曾感慨地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百分之三十的钱去购买书籍。”

传奇文人聂绀弩

1981年，香港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集《三草》，集中他20世纪50年代流放北大荒的《北荒草》、60年代蛰居生活的《南山草》和抒发友情的《赠答草》。这些诗，被时人评为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

聂绀弩，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他的曾外祖父曾宪德于同治二年（1863）曾出任台湾、福建道台，被清廷授三品按察使。他的祖父在咸丰年间补过恩贡，至其生父聂平周时，家道已经中落，只靠贩布匹、开烟馆为生。

聂绀弩少年读书时，即有超人天分。一次作文，老师出两道题，一是“子产不毁乡校”，一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学生任选其一。他竟提出两题合一，还说出想法，即“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老师听后，暗中惊讶这黄毛小儿道出了自己的心中之隐，不由当众表扬。于是，小绀弩得了“聂圣人”的雅号。

年龄渐长，他受小学老师孙铁人之托，还在南洋的国 民党人鲍薏僧邀他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华侨办的运怀义学教书。不久，他辗转至缅甸，任《觉民日报》主编助手，后主编被逐，他遂独自承担一日四刊的《觉民日报》的编辑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

1925年，他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不久随军东征陈炯明，打下海丰县，留在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后来，从海丰回到黄埔军校，正面临毕业分配，恰巧莫斯科中山大学前来招生，他以第三名

的成绩被录取。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几乎云集了中国革命青年的全部骨干，他不屑参加党派斗争，遂专心于文化学习，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因为他读书多，又不时流露人道主义观点，学生都称他是“托尔斯泰”。

那时，凡进过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员，皆容易飞黄腾达。对此，他了如指掌。但他由于十足的文人气质，竟一直未领国民党证，也未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登记。当他的同窗如谷正纲、郑介民、康泽、王陆一等一个个成为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时，他内心深处却依然淡漠如常，诚如他在《钓台》诗中所云：“昔日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他所说的“占山”，就是指搞文学创作，编报纸杂志，尤喜编那些多姿多彩的副刊。

他一生编过六个副刊，他编的第一个副刊是《新京日 报》的《雨花》。曾与《新民报》副刊《葫芦》的主编金满城组织“甚么诗社”，出版《甚么周刊》《甚么月刊》专登新诗，社员一度多至百余人。

20世纪40年代，他的文学创作进一步登上高峰，表现了他丰富的阅历和精深的素养。近年，内地还重印了他的旧作，如《绀弩小说集》《聂绀弩杂文集》《绀弩散文》和《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

《大公报》是一份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报纸，它的“老家”在天津。提起它的创办人，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份报纸始创于民国前，它的创办人是英敛之。

英敛之名华，别号安蹇，满族人，1866年生。家世寒微，由自学而博览群书，能写文章。他信奉天主教，懂法文，早年即与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有交往，曾在蒙自充任法国领事馆的雇员。他倾向维新，于1901年到天津筹备办报，得到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的支持，又得以承建天主教堂房产起家的柴天宠和贩粮致富的王郅隆等人的资助，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社址就设在法租界法国领事馆旁。因有法国人和教会作庇护，英敛之办报敢于讥弹清廷时弊，他曾著论抨击慈禧，要她撤帘归政，指名批评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敢于刊载沈荩被杖事件等引人义愤的新闻。1903年发生美国虐待华工事件时，他倡言反美。英敛之在《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倡言“猬邪琐　屑之事，在所摈焉”，“从大处落墨”，拒绝刊登占卜、求签、相面、堪舆等有关迷信活动的广告，并标榜“非同牟利可比，宁愿赔钱受累，吃苦操心”，“替穷苦大众说话”。因此，报纸一创刊就发行了三千八百份，三月后销数增至五千份。

此外，《大公报》还发起举办赈灾等社会公益活动，发表过用白话文或地方土语写作的供给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英敛之本人写过《敝帚千余》一书提倡白诗文，严范孙为之作序，认为“文言不可喻俗，俗不遍喻，则教育不能普及，民族日趋于拙劣，势将不可以幸

存”。

但自1905年后，《大公报》逐渐转向亲日，社址也从法租界迁至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对过。加以英敛之原系康梁信徒，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报纸失去众望，销路乃锐减，几乎不可维持。英敛之意趣消颓，遂于1916年9月将《大公报》出售给王郅隆，自己则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后来出任过香山慈幼院院长和辅仁大学校长。1926年逝世于北京。

英敛之逝世已半个多世纪，但其后人也有足资称颂者。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的著名影剧演员英若诚，即是英敛之的裔孙。

1983年6月，在中、意、美三国合拍的《马可·波罗》电视影片中，英若诚扮演成吉思汗一举扬名，在意大利全国电视台评选会上，被评为最佳电视演员。他还应邀赴美 讲学，并为密苏里州剧院导演了我国话剧《家》，演出效果空前，轰动了美国戏剧界，得到密苏里州州议会的致敬赞誉。

女报人汤修慧

汤修慧1890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苏吴县。小时候，她家在杭州开有一家照相馆，她在省立女子师范讲书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忙料理财务。1906年，她十六岁时和著名新闻家邵飘萍结婚。

和邵飘萍的结合，对汤修慧的人生道路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使她成为一名新闻界的妇女先驱，同时也促使她踏上了政治舞台，把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结婚后，她积极协助邵飘萍从事办报活动，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写文章。当邵飘萍先后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和《京报》时，她已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了。她写的关于教育、卫生、妇女等方面的文章，论据有力、文笔辛辣，备受读者好评。为了解普通百姓的真实情况，她经常深入到社会底层进行专题采访。有时邵飘萍为了获取必要新闻需陪同政要涉足妓院花丛等处，她也欣然前往。邵飘萍开玩笑地说：“哪有太太陪着去吃花酒的道　理？”她却振振有词地说：“谁定的法律，只准男人吃花酒，不准女人吃花酒，这还叫男女平等吗？”在妓院里，她也和男人一样“叫条子”，当应召的妇女来到时，感到十分吃惊。她和妓女们姐妹相称，很快地打消掉对方的疑虑，从中获得了邵飘萍难以采访到的宝贵资料。

他们办的《京报》经常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被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邵飘萍为了躲避敌人的纠缠和迫害，有时便到外面避风头。每逢此时，通讯社和报馆的工作便由汤修慧一人负责料理，从而使她更加熟练地掌握全套新闻业务。1926年8月6日，邵飘萍终于未能逃避反动派的迫害被杀害了。但汤修慧却未被吓倒，在极

其困难的条件下，她很快又恢复了《京报》的出版工作，以继承丈夫的未竟事业。她特别注重第一手材料，经常到现场进行实地采访，京、津、太原、山东等地都留下了她辛勤的汗水和足迹。为了办好《京报》，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她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寻求一些上层知名人士的支持，如孙科、胡汉民等。“九一八”事变后，她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以及刘清扬等人一起筹办“北平市妇女界抗日救国会”，成为当时蜚声中外的女报刊活动家。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面对国破家亡的时局，汤修慧毅然抛弃家产，辗转前往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在颠沛流离中，仍念念不忘出版《京报》的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 她刚一回到北京，即着手恢复《京报》，结果，因经费困难，最后把报馆都抵押进去了。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把报馆发还给她。从此，她便一直住在那里。几十年后，报馆门口还保留着邵飘萍亲手写的那块匾额。

一代报人林白水

林白水是中国近代名记者，福建闽侯（今福州）人。

林白水，原名林獬，亦名懈，又名万里，字宣樊，别署宣樊子，号少泉、肖泉，别号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白水山人。

林白水于1903年12月在上海新闸创办《国白话报》时，即是该报论说、小说、歌谣、新闻、时事问答的主要撰稿人。他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编发的《汉族历史歌》至今还为许多史学界、文学界人士所熟知。《汉族历史歌》共十三首，最后两首云：

> 二百年，二百年，广西出了洪秀全，复土地，争权利，万世太平基。曹国藩出，剿长发，保得大清永不拔。左宗棠，李鸿章，争把同种戕。
>
> 亚细亚，欧罗巴，东西相隔不同化，过大 洋，求通商，租界连连让。甲午一战日本胜，瓜分瓜分各指定。命垂危，命垂危，我祖知不知。

林白水的书斋名“生春红室”，因得其外祖父黄莘田旧藏“生春红砚”而得名。林在此著有《生春红室石述记》传世。他非常珍爱这方外公之子——舅父所赠端砚，年轻时去日本留学随身携带行李中就有这一宝砚。

1922年5月，林在北京主办《社会日报》，以“白水”为笔名，几乎每隔一日必有一篇“白水”署名时评，以后他就以“白水”为专名了。1926年8月6日，他写了一篇题为“官僚之运气”的文章，刊在《社会日报》时评专栏上，其中有一段文字说：“某君者，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裤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某军阀”，指当时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北洋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曾为土匪。“某君”，指张宗昌的幕僚潘复，字馨航，山东济宁人，后来做过北洋政府总理兼交通总长。潘号称张的“智囊”，林白水以“肾囊”来影射“智囊”，而张宗昌又有“长腿”的绰号。因此，此文一出，读者无不大笑。但这可就激怒了“狗头军师”潘复，当天他就唆使张宗昌下令逮捕林白水。

得知林白水被抓，杨度等十多位友人火速前往营救。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了正在打牌的张宗昌，情真意切地请 求释放林白水，有的人竟长跪不起。张宗昌见此情景，表现出一种意有所动的样子，但时有宪兵司令王琦入内，和他耳语说林白水已经被执行了。众人听后，见为时已晚，再无营救之可能，便悲愤地退了出来。实际上这是反动者的一种骗局，是事先商量好对付营救人员的缓兵之计。当时林白水被关押在牢中尚未被执行，直到次日凌晨四时宪兵才通知其给家人写遗嘱。

林白水在仓皇之间一时不知写些什么，他只是对家人写道：我绝命只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谈起。只好听之。爱女好读书，以后择婿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写完后，即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声响处，他即倒在了血泊之中。

遗书中所提到的爱女即林慰君，时年仅十二岁，被林白水视为掌上明珠。父亲遇难后，林慰君悲愤之极，曾想以自杀了却自己年轻的生命，后幸被人劝阻。在为父亲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她以其幼小的身躯、声泪俱下地致答词，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同情。后来她就读于国立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女一中、女二中执教，抗战时期积极地参

加了各项爱国运动。1948年赴美，成为著名美籍华人女作家。她立志要为父亲写一本传记，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回国搜集有关资料，最后写成了《我的父亲林白水》一书。她还捐资老家神州修建了“林白水纪念堂”，里面陈列着林白水生前创办的各种报纸、著作和其他纪念 品。

林白水遇难后，随身留有两件遗物，一是玉器两件，一是铜印一枚。他酷爱读书，在自己的印章上篆刻“书磨心境”四字，可见其乐此不疲之高尚情操。还有一件最珍贵的遗物是他被枪杀时血染的罗帕，那是其好友张次溪精心收藏下来的。后来，他请社会名流叶恭绰、章士钊等在罗帕上题词，叶恭绰在上面论及林白水“几与鹦鹉赋同视”，将其之死和三国时曹操假黄祖之手杀死弥衡相提并论。这些物品后来均由其女林慰君于1986年献给了福建省博物院，现存于林白水纪念堂内。

林白水被杀害后，“洪宪皇帝”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号寒云，博学多才，善书善诗文，人称“皇二子”，写了两副情意深刻、直斥军阀、伸张正义的挽联。其中一联云：

君虽死而犹生，人间历历，剩烈女弱姬，奇文石砚；

谁能免于今世，天下荒荒，遍瘟疫盗贼，饥溺刀兵。

忆凌霄汉阁主

凌霄汉阁主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读者所熟知的人物。他早年在上海《时报》以徐彬彬的署名写的北京通讯是名噪一时的。1926年他为天津《大公报》主编《戏剧周刊》，多用“凌霄汉阁主”笔名写剧评，有时也署“彬彬”，曾在《时报》发表“彬彬通信”，夹叙夹评，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政客的丑行。“彬彬通信”与《申报》的“飘萍通信”《新闻报》的“一笔（张季鸾）通信”，当时影响很大。据与凌霄老人有戚谊的许姬传老人（许乃徐之外甥）所著《七十年闻见录》称时人评价，黄远生、邵飘萍、徐凌霄为“撰述界三杰”。并云“徐君擅长诗词，远生或叹弗如；精究京剧剧本，飘萍实如弗逮”，这确不是溢美之词。

凌霄老人曾与飘萍发起《京报》，还任过《大公报》副刊主笔，那时他的助手便是后来的名记者徐铸成。有趣的是，两人不仅是同乡，也是同族；若论辈分，凌霄老人是徐铸成的远房长辈。

凌霄老人和他的五弟徐仁钰（即徐一士，字相甫）皆长于文史掌故，尤其清末民初史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兄弟二人曾在当时的《国闻周报》上连载“凌霄一士随笔”，极有史料价值，也颇引人入胜。最初，“凌霄一士随笔”题目一行竖排，读者误为是一人所作，后改为“凌霄”“一士”并排，方知是二人。但后来，杂志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华一士”的署名，许多读者又以为“一士”又与“大华”合作了。实际上“一士”仍是徐一士，而“大华一士”另有其人。

凌霄早年原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他曾写过《长江大桥调查纪要》，由学校印行。后因身体不适应外勤气候，改行教书和写作。他给上海《时报》写稿，每千字十五元，每月稿费约五百元，收入可谓高矣。后因与统治北方的奉军张作霖的宠信杨宇霆不睦，改弦更张，以对京剧素有研究，乃专事剧评写作。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他在京津各报刊写了大量有关京剧的研究和评论文章，立论精辟，着重剧情分析和京剧程式规律的探索，从不吹捧名角。因而在剧评文章中格调独高。后来由于各报刊争相约稿，他以“凌霄汉阁随笔”的名义在京津报纸副刊上分别发表专栏随笔，谈京剧，谈演员，谈报纸，谈报人，也谈风俗掌故，偶尔还针对当时窳败的政局加以讽刺。以他丰富的见闻，渊博的知识，深邃的见解，又熟知官场内幕和军阀政客间的人事关系，加以文笔流畅，一经引证，无 不涉笔成趣，引人深思，所以深受读者欢迎。

凌霄的伯父是戊戌政变时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以及袁世凯，都是他向光绪帝推荐的。政变失败，“六君子”被害，徐致靖由于李鸿章托荣禄向慈禧求情，免掉一死，改判为“绞监候”，直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才获释出狱。上海《时报》主办人狄平子也是维新人物，凌霄为该报写稿，也可能缘于徐家先人的关系。

据徐铸成回忆，凌霄老人虽然出身簪缨世家，又是名记者，但他在北京校场头条的寓所却极简朴。本人则布衣布履，绝无轻裘之饰。这与同为20世纪20年代名记者的邵飘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飘萍是当时中国记者开自己的汽车进行采访的第一人（斯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总长们也只是自备马车而已），他吸的香烟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并印有“振青（飘萍名）制用”字样。不过，这只是生活小节，飘萍大节不亏，他是中共早期秘密党员，一直用笔抨击军阀专制，最后惨死于军阀手中。

凌霄老人则远比黄（黄远生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刺遇害）、

邵、林（亦被军阀杀害）等人幸运，仅他当年抨击袁世凯称帝的几篇文章，就足以遭致毒手。不过老人却一直安然无恙，直到1961年才故去。只可惜他没有写下完整的回忆录，只是于1935年在北平《实报》发表过简单的自传《凌霄汉阁自白》。

王柱宇仗义执言

现在北京六十岁左右的人还会记得王柱宇其人。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实报》上撰写杂文，每天一段，叫“柱宇谈话”，纵论古今，颇受读者欢迎。特别是社会下层人士，文化水平不高，常让别人念他的文章听。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言论在社会上的影响。有一次他在“谈话”中说，用刷墙的大白当牙粉用，照样可以刷牙。这自然是一种谬论，但居然有人真用大白制成牙粉出售，名字就叫“柱宇牙粉”。当时华北有人售卖“黄河奖券”，王柱宇写文章说：“我们是黄帝子孙，不能忘本，干吗叫黄河奖券？叫黄帝奖券不更好吗？”果然，不久就有人卖“黄帝奖券”。

由于他的名声大，常有人巴结他。票友奚啸伯正式下海时，专门请王柱宇吃饭，在饭庄摆了两桌；那是怕他在“谈话”中随便一骂，骂得声名狼藉。齐白石大画师也和他友好，为他画了一幅“柱宇图”，画面一轮红日从海上 升起，说明十足地重视他，还为他刻了图章。王柱宇似乎什么都懂，他在文章中甚至说什么他会催眠术，可以催人入睡。

然而柱宇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1946年圣诞之夜，美国兵在东单广场强奸北大女学生，学生纷纷罢课抗议。当时有个人力车夫曾在现场目睹了美兵丑行，他向王柱宇提供情况，由王柱宇写成了消息。此事发生后，北平警察局怕开罪美国政府，不愿声张，也不许各报刊登这条消息。王柱宇在《世界日报》工作，不顾一切，发表了这条消息，于是各报转载，波及全国，一个反对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席卷全

国。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为此拘留了王柱宇，《世界日报》也解雇了他。此后有一段时期，王柱宇失了业，没有收入，仅靠用笔名卖文度日。

20世纪40年代，他穿纺绸长衫，手持折扇，脚穿圆口软底布鞋，一派儒士风度。王柱宇会唱戏，笔者曾听他唱过《卖马》，颇有韵味。他的妻子胡淑季是个旦角演员，艺名傅占云，是他写文章捧红后嫁给他的，结婚后就息影舞台了。

满族报人成扶平

提起满族人，谓“臭在旗的”，或净是些“提笼架鸟”的不肖子弟，这实在是一种民族偏见。殊不知满族人当中亦不乏头角峥峥的文人，成扶平便是其中的一位。

成扶平乃满旗镶黄旗人，老姓佟佳氏，原名成廉，又名成芙萍。1907年出生于北京。五岁时即告别了皇上，迎来了民国，丧失了“铁杆儿庄稼”（旗人所关钱粮），变卖房产而坐吃山空，十八岁即开始卖文生涯，正如他在《世界日报》发表《旗族旧俗志》序言中所云：

> 亿昔儿时，衣锦膏粱，亦足发念载回想，曾几何时，一旦流落文丐！每日里西抹东涂。今也把我秃笔，重话旗光，或云食族旅之余唾，思想及此，不禁为之惨笑。

皆因断了钱粮，才迫使成扶平走上卖文以自食其力的 道路，在故居“红绿阁”（书房名）中猛摇秃笔，一发而不可收，于是银圆滚滚而来，其数额超过儿时所关“马甲钱粮”（每月白银三两）的三四十倍，故彼时有文艺界老友戏之曰：“成先生非文丐，乃丐头也！”

成扶平于20年代至40年代，是北京地区有一定影响的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1934年曾创办《现代日报》并任主编。其文章涉及范围较广，偏重于民风民俗。他发表在诸多报刊的文章，亦庄亦谐！针砭时弊，与老宣（名永光）连载于《实报》上的“妄谈”“疯话”和大记者

王柱宇连载于《小实报》上的“柱宇谈话”文风相近，这三位性格古怪的文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言他人所不能言，言他人所不敢言，故拥有上至旧王孙下至贩夫走卒最广泛的读者群，其各家报纸亦因文章“叫座儿”而销路甚好。三位心相通、文相似、禀性亦相同，故结为挚友。

旧时的新闻记者，号称“无冕之王”，便是总统府，亦敢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别小瞧那枝毛笔，其厉害不亚于枪杆子。于是不乏有新闻记者总是借题发挥、大敲竹杠，曾有某大记者对某大军阀大敲竹杠后照样披露其内幕而被处死者。成扶平虽亦著名记者，却不曾沾染敲竹杠的恶习，满族人的厚道传统，使他奉行“老实办报，老实采访，老实写文章”主义。他的老实主义，使他一辈子傲视显贵，不曾为他们写过“抬轿子的文章”，于是也就一辈子不曾飞黄腾达，而他对此，却无怨无悔。

成扶平一辈子不害人，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任《新民报》编辑和记者，张恨水任主编。彼时，地下共产党员马彦祥与马少波皆在该报“卧底”，张恨水与成扶平了如指掌却守口如瓶，不为赏赍而出卖灵魂，亦不惮担着知情不举的罪名。

成扶平的《旗族旧俗志》，曾被日本人盗版。成扶平晚年穷困潦倒，蜗居于陋巷，诉讼无门，1982年1月，抱着这点儿遗憾病逝于家中，身外之物分文皆无，唯有其见诸报章洋洋洒洒之遗墨。

刘浚卿主宰《益世报》

五十年前，《益世报》和《大公报》在天津对峙并存，都是在全国有声望的报纸。如果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是《大公报》的“三杰”，那么，雷鸣远、刘浚卿、刘豁轩则是《益世报》的“三杰”了。

刘浚卿本人在《益世报》根深蒂固，又给他的家属亲友打下了天下。抗战胜利后，《益世报》在天津复刊，“父传子，家天下”，刘浚卿最小的儿子刘益之当了总经理。刘益之不学无术，只凭着父荫与钻营，从天主教于斌主教那里领到“复刊”的“圣旨”和经费。他自知立不住阵脚，就把他的堂叔，抗战前曾一度做过《益世报》总编辑的刘豁轩搬来当社长，刘豁轩就成了“八千岁”。刘益之的两位哥哥也出任报馆的要职，都成为“王爷”。

刘浚卿本名刘守荣，河北省蓟县人，念过几年私塾，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很受当时在蓟县传教的比利时神父雷鸣远（1928年入中国籍）赏识。 雷鸣远调到天津望海楼教堂任坐堂神父时，刘浚卿也投奔到天津，成为雷鸣远的左右手。1912年，雷鸣远在望海楼教堂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派刘浚卿做所长。1915年，天主教在《益世主日报》的基础上创办《益世报》，雷鸣远出任董事长，刘浚卿做总经理。刘浚卿善经营，把《益世报》办得蒸蒸日上，他自己也成为社会名流，结交了掌权的直系军政要人。从此，他投靠了直系军阀，在报上则吹捧直系攻击奉系。他同当时的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合作，为曹锟贿选总统大卖力气，遂成为曹银之弟直隶省长曹锐的亲信。曹锟登上总统宝座后，论功行赏，刘浚卿得了天津电报局局

长的肥缺。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直系倒台，奉系再次进关，进驻天津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命令军警督察处处长李书凤逮捕了刘浚卿，接管了《益世报》，报社几乎垮台。1925年，奉军败退关外，刘浚卿才出狱获得自由，到1928年出面收回《益世报》，重整旗鼓，约请其堂弟刘豁轩任总编辑，还约来一批南开大学毕业生，加强了编辑部；并向开滦矿务局借款三万元，购置了轮转印刷机，编辑、经理和印刷三个主要部门的阵容整齐，可与《大公报》一争高低。

1932年，又礼聘罗隆基任主笔，写了不少篇反对独裁、抨击不抵抗主义的社论，把《益世报》的声誉推上高峰。后来，《益世报》外受政治压力，内有权力之争，刘浚卿忧愤成疾，于1934年病逝。刘家失去了《益世报》江 山。抗战胜利后复刊，刘益之当总经理，刘豁轩当社长，乃又恢复了刘家天下。

《王先生》诞生记

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市民中曾兴起一阵“王先生热”。其肇始者，乃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

1926年，叶浅予因家中店铺倒闭，被迫辍学。苦闷中，他看到报上登着上海三友实业社招收广告绘画员的启事，便按照要求，寄去几张画，没想到，很快被录取了。从小喜欢绘画的叶浅予，在学校是美术科的高材生，自然不满足画广告，总想露身画坛，一显身手。一天，他在马路上闲逛，偶然看到一家电影院门口张贴着海报：幕间举行人体姿态表演，每张票价增加两毛。出于好奇，他买了一张票过去。影片放映到一半时，只见几个半裸体女子走上台去，搔首弄姿。拙劣的表演和两毛钱的附加票，不停地在叶浅予脑海里迭现，构成了奇妙的图案，他的第一幅漫画就这样诞生了。他把画稿署上“浅予”笔名，投寄到《三日画刊》。这是一本专登漫画的杂志，由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俩创办。叶浅予的处女作很快就发表了，他得到了 这两位漫画家的赏识，并结交为朋友。

不久以后，张氏兄弟来找叶浅予，商量筹办《上海漫画》周刊，社址设在今山东路仁济医院附近。为了招徕读者，他们决定推出一套长篇漫画连载。叶浅予从报上看到美国漫画家编绘的《怕老婆》和《两个朋友》的故事，从中得到启发，设计了一个干瘦、瘪嘴、身穿长袍马褂，有着两撇老鼠胡须的王先生形象，王先生的拍档小陈为矮胖汉子，西装革履，蝴蝶须结，洋气十足。和干瘪的王先生、矮胖的小陈对比，王太太是个大块头，陈太太则又高又瘦。在两对夫妇中间

穿来穿去的是王先生的女儿阿媛。这五个角色一起，串演出一幕幕轻喜剧，逗人发笑。1926年4月，《上海漫画》创刊，《王先生》粉墨登场，每期登四幅到八幅，故事有连贯性。《上海漫画》停刊后，叶浅予应时代公司老板邵洵美之邀，主编《时代画报》。他笔下的滑稽人物王先生也跟了去，每期连载，风靡一时。不久《王先生》又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叶浅予自任制片人，创造了很高的票房价值。

邵力子典袍出报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陶家堰人，原名闻泰，字仲辉，力子是他在《民主报》任编辑时所取的笔名。

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他毕生从事和平事业，所以有“和平老人”的称号。他从事新闻事业达二十余年，以犀利的文笔，进步的思想，写了很多文章，为当时青年读者所喜爱。1907年，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进行反清宣传，邵力子参加该报工作，不久《神州日报》馆因火灾停止出版。后他又进于右任为社长的《民主报》担任编辑，同时的编辑人员有叶楚伧、章士钊、宋教仁、徐血儿等。编辑人员的阵容一新，发表的文字，多属鼓吹革命，因此很受广大群众欢迎。

191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叶楚伧任主编，邵力子任经理兼编辑，馆址设在法租界天主堂街。

“五四”运动时，全国学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游行，《民国日报》于同年6月16日创办了《觉悟》副刊，由邵力子任主编。《觉悟》在当时是一份崭新的报纸副刊，它所刊载的文章内容是号召知识青年向新文化进军，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所以在当时风行一时。经常为《觉悟》写稿的有陈望道、潘梓年、胡愈之、刘大白、叶楚伧等。

《民国日报》当时外受军阀的压迫以及租界当局的无理干涉，内

又受经济拮据的折磨，内外交困，他们过的艰难日子是可想而知的。

新闻界流传着“邵力子脱下皮袍换报纸”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民国日报》自创刊以后，十年以内，经济一直拮据，邵力子身为报社经理，首当其冲，左支右绌，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景况。报社中最大的支出是纸张，最需要的也是纸张，没有纸张，任何精辟、进步的言论也无法与读者见面。而《民国日报》馆经常拖欠各纸行的货款；日积月累，欠款愈积愈多；商人们唯利是图，就通知该报社此后购买白报纸非现款不可，不再赊欠。

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天气寒冷非常，恰巧《民国日报》社的现金奇缺，无法周转，报社职员向纸行去赊白报纸，空手而返。这时，印刷房各版均已排好，只待开印。天寒夜深，告贷无门。邵力子辗转寻思，别无他法。那时候上海租界里有“日夜典当”，是一种以高利贷盘剥贫苦大众 的行业。邵力子就在编辑室里烧起通红的炭火炉子，一边脱下了身上的皮袍子，叫人拿到日夜典当里换到现款，连夜在纸行里买出白报纸，然后马上付印，才未影响报纸次日与读者见面之后，邵力子在火炉边度过了寒冷的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派人通知家里送来棉衣，才得回到家去。这件事，上海的老报人们都是耳熟能详的。

冯玉祥船上办《民联日报》

1946年5月下旬，冯玉祥将军乘“民联轮”离重庆东下返回南京。他在船上忽发奇想，创办一张日报——《民联日报》。他用基督教利他社捐来的九万元法币，船经万县时买来油印机、纸张等一应工具、物品，于是就在轮船上办起了这张不平凡的报纸。

该报四开大小，另加八开副刊一张，淡黄色的土纸，充满一股古朴气，印上黑色字、红色报头，更呈现出一种素雅美。报纸内容异常丰富，有社论、述评、国内外时事、新闻、船上拾趣、沿途码头上的商业信息、旧事、新诗、散文、谜语、漫画等，名目繁多，五光十色。稿源也不愁，除冯玉祥自己带头执笔外，在他的一声号召下，同船的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都纷纷写来大作，每稿必酬，一篇文章，两个鸡蛋。既付稿酬，当收报费，每份法币百元。

大画家徐悲鸿正巧风雨同舟，他也很热情地为该报刻 写过一张蜡纸，书法遒劲豪放，如群骏奔驰，颇有其画之韵味。

冯玉祥在创刊号上写了篇代发刊词《民联引》兹记如下：

说民联，道民联，
民联果然如所愿；
多少好朋友，
共乘一条船。
连连挥挥手，

都说："四川，再见！重庆，再见！"
就不完的情怀，道不尽的依恋。
一路江景皆大观：眼下两排青山，
还有名城和胜迹，
过了一站又一站。
抗战胜利今返都，
应当欣跃又狂欢；
为什么心头不轻松？
为什么面上少笑颜？
那是为了政局未开朗，
那是为了各地有内战。
大家个个不安，
何时和平得实现？
时时都在祷告，
刻刻都在挂念，
同胞还需努力，
为了实现那一天。
真那样，我们才能立地顶天；
真那样，我仍才能快乐喜欢。

《民联日报》从1946年5月29日创刊，至6月3日停刊，仅六天就收场了，这大概可以算得中国报史上最短命的一份日报了。然而，办这样一张轮船报在中国新闻界的确是件创举，且因创办者又是冯大将军，所以尽管是昙花一现，却传闻南北东西，而且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十分有趣。

当然，深为遗憾的是，冯玉祥将军并没有看到他梦寐以求的那一天的来到。1948年9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了。这是中国人民的一

大损失！

北京报界忆“笑社”

1925年至1937年，北京曾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文艺团体——笑社。它的发起者是当年颇有名气的作家陈逸飞，其成员有作家耿直，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成扶平，北京历史和民俗专家张次溪，戏曲作家景孤血，戏剧理论家爨野大，小说家杨心巢，以及才华超逸的文人王梦曾等十余人。

笑社的地址在宣武门外铁门胡同四十九号东跨院内。门口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为“此地在城如在野”，下联是“个人非佛亦非仙”，系笑社成员爨野大撰并书，著名篆刻家张志渔摹刻。

笑社的成员每月举行一次例会，借以沟通信息，酌定选题。其活动宗旨是撰写“寓庄于谐”的讽刺文章，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以及城市中某些人的刁钻古怪的习气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所有作品都发表在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副刊（时称小《京报》）上。有些　　作品发表后，被日本朋友译成日文转载于日本报刊上。

由于这些千字左右的文章笔调幽默，行文淋漓酣畅，能言大众欲言而不能言，各阶层读者均可赖此宣泄心中的积郁，并于忍俊不禁之后受到启迪，故此《京报》的销路一向很好。为对笑社成员聊表谢忱，《京报》同人每月在报馆设宴款待其诸成员，社长邵飘萍常拨冗参加，并于宴席上向笑社成员致谢词。据前几年尚健在的陈逸飞、爨野大两位先生回忆，他们当年对邵飘萍的印象是目光炯炯，平易近人，言谈时总是满面春风，毫无社长架子。

笑社刚成立时，其成员皆为风华正茂的青年，年龄最大者亦不过二十三岁。他们虽年轻，但少年老成，且文思敏捷，千八百字的文章每每于谈笑间一挥而就。他们除常年为《京报》撰稿外，更多的精力则用于个人办报、从事小说或戏曲创作以及用于历史与民俗之研究。笔墨生涯之余，还曾为大学、中学及社会上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过一些讲座或专题报告会。1930年3月，老舍自伦敦回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的幽默小说《老张的哲学》，笔法与笑社文章有些同调。不久，老舍便应笑社之邀，在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为五百多名爱好文学的青年作《笑的分析》讲演，与会者自始至终无不捧腹，而老舍却神态端庄，无一丝笑容。事后，老舍又应邀到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演讲《论创作》，特地邀请陈逸飞等笑社成员前去捧场。

常年登载于《京报》上的笑社文章，其影响与日俱增。1931年，《中华新报》社长兼总编辑陈慎言特邀笑社的陈逸飞、成扶平、景孤血等“快手儿”为其报纸撰稿，以图扩大销路。

陈慎言出身于清朝一位翰林家庭，曾从事航海事业，后见列强蚕食国土，军阀混战，国是日非，遂跻身文坛，先后以其杂文和小说为警钟，旨在唤醒国人。1926年4月，《京报》社长邵飘萍不幸就义，陈慎言愤然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断送京华记》，大骂奉系军阀，于是以“亲共”罪名被捕，经亲友贿以重金百般营救，被囚禁三个月方得开释。

陈慎言的这种爱国热情，颇为笑社同人所钦佩，故此对他提出的长期供稿要求欣然允诺。

新闻界张氏四昆仲

昨与新闻界某君谈天，忆及北京报界中张氏四位昆仲：恨水、啸空、牧野、仆野，皆当时为友辈所称誉者。

恨水为名小说家，以《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杰作而蜚声文坛。他的著作构思精巧，笔法洒脱，读来流畅如醍醐灌顶，颇具吸引力，犹忆《啼笑因缘》一书，不但文笔好，而且其章回对仗亦工，音韵铿锵，如第一回：“侠语感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令人喜爱，回味无穷。啸空初在《大同晚报》，后转《世界日报》。牧野工绘事，擅长花卉虫鸟，曾授课北平美专，桃李颇众。四弟仆野曾在《新民报》主持采访，颇得陈铭德器重。四昆仲如俱独到，且难得都是正派老诚，同业咸乐与之交。

四昆仲相貌酷似，而且声音亦同，均操一口皖音京白，尤具同一特点即谈笑间每发出很重的“嘿！嘿！嘿”笑声，以故同业常说，把他四兄弟关在一间屋里，请他们 谈笑，户外闻之，绝不能辨出是谁谈什么话。

笔者与啸空时相邂逅，过从较多。啸空性情爽朗，忠厚老诚，为人正直，处世率真，喜谈笑，好诙谐，尝在采访某官员时，对某官员说：“新闻记者好比要饭的，要饭的你不给他钱，他不走，新闻记者也如是，你不给他新闻，他也不走，你要小心哪！嘿！嘿！嘿！嘿！”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左右，他语音日渐嘶哑，初以为感受风寒，服麦冬、胖大海未愈。后又晤面，声音更哑，记得啸空曾说：“已托梨园界朋友代找治倒嗓的药。”其后即闻卧病。不久噩耗传来。友辈闻之，同声惋

惜，痛失良友。啸空后事由恨水、牧野代为料理，遗柩暂厝宣武门外南横街萧寺。当时著名“打油”诗人张醉丐痛啸空物故，曾撰诗数首于报端发表，笔者迄今尚记得几句：“文人何必计穷通，万事凄凉感慨中；丐也愚顽心最痛，独挥热泪哭西风。”“七尺桐棺萧寺里，南横街畔冷斜阳。”及今思之，犹觉鼻酸。

事隔多年，笔者来港前，恨水、仆野还曾见过，牧野则未闻消息。恨水的《啼笑因缘》已拍成影片公演，大受欢迎；女主角由“影后”胡蝶主演，男主角为郑小秋，搭配硬整，轰动当时影坛。笔者曾往观赏，途中又不禁想起“侠语感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

将近四十年矣，20世纪60年代曾闻恨水作古，近闻胡蝶在美，小秋在大陆，均尚健在，但估计恐都在八旬左右。牧野、仆野音信杳然。

李叔同创办《音乐小杂志》

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留学专修音乐与绘画。次年，他创办了《音乐小杂志》，于丙午年正月十五日在东京印刷，二十日在上海发行，揭开了中国音乐期刊发展史的第一页。

《音乐小杂志》向国人介绍乐理知识，开展音乐启蒙。栏目有音乐史、乐典、乐歌、杂纂、社说、图画、插图、词府等，曾刊出木炭画一幅、木板画两帧、文章七篇、乐歌三首、词章五阕。除了刊出二位音乐家的作品外，其中有价值的音乐论著都是李叔同所作。

《音乐小杂志·序》是全刊最有分量的文章。《序》文描述了自然界的种种音响，叙述了这些声音对人体感官的作用，推论经过人加工过的声音——音乐，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功能："盖琢磨道德，促进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美，效用之烈，宁有极与！"序文仅仅五百字，但李叔同的音乐美学观以及创办刊物的宗旨都已跃然　纸上。

杂纂栏内，有一篇《昨非录》，可说是李叔同的"忏悔录"。作者以别致的形式回顾了自己音乐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告诫初学者循序渐进，否则将欲速则不达。提出了关于简谱和五线谱使用方面的见解。

图画栏内有李叔同的木炭画《乐圣比独芬（即贝多芬）像》，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西方著名音乐大师。配合画像，李叔同在乐史栏内撰写《乐圣比独芬传》，不仅对贝多芬的生平、简历和成就作了全面

介绍，还穿插了不少艺术经验和评论。

乐歌栏内以五线谱刊登了《隋堤柳》《我为国》《春郊赛跑》三首歌曲。《隋堤柳》歌词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忧思：“甚西风吹醒隋堤衰柳，江山非旧，只风景依稀凄凉时候，零星旧梦半沉浮，说阅尽兴亡，遮难回首……杜鹃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泪伤秋瘦，深愁浅愁难消受，谁家庭院笙歌又？”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行将崩溃，作者深居异国他乡，将日本人与中国人相对比，激起了他无穷的感触。《隋堤柳》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属上乘之作。

《音乐小杂志》由于种种原因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1984年这本杂志在日本京都图书馆被发现，经日本友人协助复印，才得以一窥杂志的全貌。

1913年5月，李叔同在浙江一师任教，又以浙师校友会的名义编印了《白阳》杂志。此属综合性刊物，音乐占 了较大的比重。杂志重新发表了他为《音乐小杂志》写的序文。李叔同以五线谱发表了三声部合唱曲《春游》，《春游》是中国近代音乐运用西洋作曲方法写成的第一部作品，还用图文对照方式刊出《西洋乐器种类概论》。他的学生李鸿梁绘制了贝多芬像，再次向国人介绍这位西方音乐大师。《白阳》实际上就是《音乐小杂志》的继续。

李叔同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名人，在当时政治、文化的动荡时期，他不尚空谈，而是身体力行，把西方代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音乐引入中国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京华报馆忆宣南

晚间看电视剧，见剧中人手捧报纸，聚精会神地闲读，忽然大声说：“瞧瞧今儿个的《小实报》，都登出来啦！”接着一个特写镜头——对开的大报，白底阳文“小实报”三个黑字映入眼帘。于是，我蓦然而生一个印象——假。

《小实报》是半个世纪以前北京风行一时的小报，本名《实报》，是四开小型，不是对开大张，读者爱其短小精悍，习惯以“小实报”呼之。实则报名本无“小”字。报头用碑刻拓本集成的黑底阴文“实报”两个字，极醒目。以我的眼光看，电视剧的这个细节，与史实不符。因此我不揣冒昧就我所知唠叨几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报馆多在南城的西半部，也就是昔日的“宣南”。就印象所及，略述数家。

骡马市大街路北魏染胡同有两家报馆：一家是邵飘萍先生（振青）的《京报》，抨击时政，邵先生因此殉职， 近代新闻史者早有专文论述；另一家是《实事白话报》，创于民初，四开一小张，20世纪20年代，笔者每天必看该报连载的《白话三国》，当时该报不用标点，每句空一格，作为断句。

宣武门外大街有好几家报馆：北头路西是《实报》馆，始创于1928年北伐以后，用小五号铅字排印。开张虽小，内容尚丰，副刊尤为出色。徐凌霄先生的戏评，短短一二百字，鞭辟入里，引人入胜。张醉丐先生的打油诗，多记梨园逸话，对后起之秀和票友常给予鼓

励。张氏出身世家，是清初名将一等子爵张存仁的后裔，原名裕椿，其父张国正，光绪间任福建按察使。张醉丐先生生于福州，福州古称榕城，故他有一字“榕生”。大林山人的史料笔记，颇多秘闻。大林山人是湖北黄梅人汤颇公先生的别号。汤氏曾任北平市政府参事，熟悉近代史事，著有《新谈往》一书。20世纪30年代袁良任北平市长时，编印《旧都文物略》，聘汤氏为总编纂。

《新北平报》报馆在宣武门外大街路东，和《实报》报馆遥遥相对。该报创刊于1931年，至1937年改为《新北京报》，四开一张，内容充实，副刊作者阵容整齐，颇多大手笔。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曾为副刊撰写笔记小品，隽永有味，栏目似是“幻亭戏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南有不肖生，北有赵焕亭”的说法，或曰“南向北赵”，“南向”是湖南平江人向达，字 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作品内容偏重武术技击，代表作为《江湖奇侠传》；“北赵”即河北玉田人赵黻章，字焕亭，所写多以近代史事为素材，代表作为《奇侠精忠传》。陈慎言的社会小说《庸人多福》，耿郁溪的言情小说《半夜潮》《凤求凰》，也在副刊连载。陈慎言是福州人，久居北京，熟谙旧京风土人情，《晨报》馆曾出版他的小说《说不得》。耿郁溪作品清新流利，多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备受大中学生青睐。

《立言报》报馆在宣武门外椿树上三条，创刊于20世纪30年代，四开一张。金受申的北京民俗、景孤血的戏评、连阔如的评书《东汉》均博得读者好评。1938年《立言报》停刊，改为《立言画刊》，十六开本，每星期六出版一期，内容侧重对京剧演员及剧场情况的介绍，辅以照片，图文并茂。金受申另辟“北京通”专栏，叙风物礼俗，不征引古籍，全凭亲身采访，生动朴实，吸引了不少读者。评书《东汉》仍继续连载。翁偶虹的《藕红室脸谱》，图绘精工，渊源有自，弥足珍贵。

《时言报》报馆在和平门外铁老鹳庙（今铁鸟胡同），创刊于

1930年，四开一张。该报以社会新闻、里巷琐事为主，副刊多小说连载，有高豫祝的评书《东汉》，某君的评书《善恶图》。高豫祝的《东汉》与连阔如的《东汉》路数不同，各有千秋。鸟迷的《儿女情》，则是警世的社会小说。鸟迷原名林谷治，字述砚，福州人，是林文忠公 则徐的后裔，久居北京，喜养鸽，任中学的数学教员，理科教员而操笔耕者，实不多见。

图书记闻

《啼笑因缘》双包案

张恨水是近代文学史上有极大影响的作家，他的《啼笑因缘》《春明外史》等一系列小说作品，在当时几乎每一部都是畅销书。上海电影界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时期内，纷纷将张恨水所著小说搬上银幕，成了一窝蜂的势头。

张恨水的《似水流年》是他本人将小说改写为电影剧本后交与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其他的小说《满江红》《落霞孤鹜》《欢喜冤家》《银汉双星》等则是别人将它改编后拍成电影。张恨水一时从小说界红到电影界，大有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之慨。

等到张恨水另一部小说《啼笑因缘》问世，明星公司迫不及待地请名家严独鹤改编为电影戏本，快速上马拍摄电影。不料正在这快速行动中埋伏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当年文明戏巨子顾无为，他暗中以大华影片公司名义向内政部申请《啼笑因缘》的电影摄制权，保障摄制权归大华 公司独家所有，他人不得侵权拍摄。此次申请得到内政部的批准。明星公司获悉此讯后，赶忙将摄成的《啼笑因缘》拷贝送请当时的电影检查处审查，立即得到电检处的准映执照。一方得到部的批准文件，一方持有主管方面电检处的准映执照，两雄相争，各不相让。

明星公司以《啼笑因缘》准演执照为依据，与南京大戏院商洽首映权事宜，当南京大戏院取得首映权以后即筹划放映；与此同时，顾无为的大华公司拟就一份通知书，分发给全市电影院，声明大华公司拥有《啼笑因缘》不可侵犯的部批的电影摄制权，除大华出品外不得

放映别的任何公司的出品。南京大戏院当然也收到此项通知书，但院方因有电检处的准映执照，有恃无恐，历来放映影片，都以准映执照为合法依据，所以置大华公司的通知书于不顾，毅然如期放映。

于是，顾无为方面即向法院正式控诉明星公司与南京大戏院侵权，法院准状后，即令南京大戏院暂停放映。南京大戏院迫不得已，在戏院门前贴出海报，上面书着：

“奉法院令：《啼笑因缘》暂停放映。”

事情到此并没结束，明星公司当然不会甘愿罢休。果然没隔多天，南京大戏院又贴出海报，上面写着：

“奉法院令：《啼笑因缘》继续放映。”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法院何以接连发出两个内容完全相背的命令？

这不用说，法院内和法院外，双方都紧张地对峙着：各走各的门路，当时上海有“海上闻人”拥有一种社会势力，即“海上闻人”为双方斡旋，调停成功，双方有条件地握手言和了。

这场双包案就此消失，明星公司的《啼笑因缘》放映无阻，赚了大钱。

惜哉，海源阁藏书

清嘉庆道光年间，中国沿海相继出现了多家私人藏书楼。其中著名的有四家：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杭州丁国典的“八千卷楼”，而以“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为最，时人称为“南瞿北杨”。

聊城“海源阁”藏书应始于杨兆煜，盛于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一脉相承，止于扬敬夫。可谓杨门五代人惨淡经营，才使“海源阁”名播海内。

杨兆煜，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出身，曾任山东即墨县教谕，喜藏书，在任内遍收当地图书多种带回聊城。杨以增，兆煜之子，官至督抚，宦海多年，收购了多种宋元珍本。杨以增五十三岁时，正式建楼藏书，揭开了“海源阁”鼎盛时期的序幕。杨以增三十二岁中举，三十五岁考取进士，历任贵州荔波、遵义知县、知府，广西、湖北道员，湖北、甘肃按察使，陕西巡抚，甘肃总 督，江南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官。他在江、漕督任上有机会接触江南藏书名家，如江苏泰兴的沧苇、常熟的遵王、吴县的黄丕烈等人，收购了大批宋元珍本，运回聊城，使杨家藏书日益充盈。杨以增之子杨绍和，同治四年（1865）进士，多年在京为官，曾得到清室弘晓“明善堂”藏书多部。杨以增之孙杨保彝曾任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章，子承祖业，均爱书如命，扩充家藏。

可以说“海源阁”之书来自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据杨氏辑印的《海源阁丛书》《楹书隅录》记载：“海源阁”藏书凡宋本八十五、金元本

三十九、明本十三、校本百有七、钞本二十四，共二百六十八种，加上明清本，多达三千二百三十六部，二十万八千三百卷，多为“经”“史”。

据说杨家几代均视书如命，特别珍惜。道光二十年（1840），杨以增在聊城内万寿观街北首杨宅特建了四间两层砖木楼房，上有杨以增亲书的“海源阁”匾额，取《学记》“先河后海”之意。杨家藏书秘不示人，保管妥善。两三年全部晾晒一次，加入樟脑粉防虫。珍本外有木匣，内衬锦函。

据说当年想一睹杨家藏书者很多，但都未果。历城名士解元徐金铭，来聊数月，自荐愿为杨家塾师童，竟未能进杨家宅门。聊城知县陈香圃，欲观藏书，也吃了闭门羹。

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中有老残去东昌（聊城）访海 源阁一节。作者刘鹗在第八回中写道：“又住了两天，方知这柳（影射杨）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内，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提起笔来，在墙上题一绝道：‘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缳饱蠹鱼。’”看来刘鹗也曾吃过杨家的闭门羹呢。

当年商务印书馆曾派人专程拜谒杨氏，愿出二十万元，翻印海源阁藏书之一部，但海源阁主人欲保存秘本，拒不答应。

不料后来杨氏之子孙，不知善为保存，或被盗，或自行随意售与外人，至1931年时，海源阁藏书损失殆尽。

记得1930年，王冠军率部入据聊城；因海源阁在聊城观街路北，房舍极大，司令部便设在海源阁内，使杨氏藏书遭受破坏极为惨重。当时，王冠军除将相当一批藏书运出之外，还极尽焚毁之能事。士兵用书烧火做饭，用书做褥睡觉，甚至吸鸦片烟时，用书擦枪拭灯，以及擦桌子，擦凳子，无不以书为之。无数价值连城之古书，竟遭厄

运。

此后不久，第三路军八十七旅荣光兴部击溃王冠军，驻进聊城，也将司令部设于海源阁。当时，海源阁内一片荒凉，宅人避战乱均已逃散。院内院外，堆满书籍；厕所马厩，到处是书，散乱在院内的书籍，均遭大雨淋烂。

只有十余间房内书籍依然满架，但也是劫后余存，多　已参差不齐，这当中以抄本为最多。荣光兴知道杨氏藏书的珍贵，他特命参谋长谢用霖派兵一连，将杨氏书籍无论整缺破碎，一律运入屋内，加封保存，并规定：无论何人一律不得入屋内观览，以免书籍再遭损失。同时，他设法寻找杨宅主人，以使藏书得到妥善安排。五天之后，杨氏一侄至海源阁八十七旅司令部接洽。参谋长谢用霖与其交谈，发现其人谈吐甚俗，似不甚识字，如此，海源阁藏书岂能保存下来？

果不其然，1930年12月26日，杨氏之侄将残破藏书，用几十辆大车拉运至济南，至于最后运往何处，交与何人，便不得而知。据传，有不少藏书售与日本商人了。待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政府派人调查杨氏藏书的情况时，这个海源阁便只剩下屋舍空壳了。

惜哉，海源阁藏书！

四库全书与天一阁

四库全书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纂修，历时十载，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于北京文渊、文源、承德文津、杭州文澜、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沈阳文溯七阁。其中文渊阁藏书现在台湾；文源阁在圆明园，毁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之役；文津阁在承德避暑山庄内，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澜阁在杭州孤山，由圣因寺藏书堂改建，咸丰十年（1860）捣毁，书亦流失，光绪六年（1880）重建，书经搜集抄补得全，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在大观堂，咸丰四年（1885）毁于火。文溯阁在沈阳清宫之西，位于嘉荫堂，戏楼后面，此阁重檐八角，古朴典雅。阁前后游廊环绕，给人以沉静幽雅之感。

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装潢精美，绢丝画面，按经、史、子、集分绿、红、蓝、灰四色，象征四季。书用开花 纸，朱丝拦格，字体工整端秀，间有插图。全书分订成三万六千册，纳为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加上《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等，文溯阁共藏书四万余册。

据文献载，文渊等七阁的建筑样式系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天一阁乃明嘉靖间兵部侍郎范钦所建，曾藏书七万余卷，先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而藏书无一毁损，遂引起乾隆的注意。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他“谕军机大臣等：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

用砖瓦，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瓦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荡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

其后寅著复奏：

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石为垣，前后檐上下均设窗门。其梁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置楼梯，东边一间，以近墙壁，恐有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

北京最早的私人图书馆

“共读楼”乃北京最早之私人图书馆，建于清末光绪年间。笔者幼时，曾随长辈至此。当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所幸长辈曾购有《共读楼书目》，加上长辈健谈，于娓娓所叙之中，知其始末。

“共读楼”位于京华崇文门内东观音寺胡同路北，东临古观象台，西近裱背胡同于谦故居。其主人国英，字鼎臣，姓索绰络，满族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官内阁中书，为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七品文官，后官至广东盐运使。他喜文好读，曾刊有《武经七书》。旧时藏书不是公藏就是私藏，公藏是皇家禁地，平民不能涉足；私藏每每秘不示人，平民亦只能望书兴叹。那时莫说是平民，就是寒士也买不起书。国英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很早就有感于此。闲居后于光绪二年（1876）在东观音寺胡同吉林索绰络氏宗祠东建楼五楹，贮藏他数十年所购之书。他深以为“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 人共读”，故此命名为“共读楼”，对外开放，并刻有《共读楼书目》行世。

《共读楼书目》共十卷，为巾箱本，扉页题有“光绪庚辰年刊，索绰络氏家塾藏版”字样。卷首有国英自序，并有墨刻鼎形印及“索绰络氏家塾之章”篆文方印。鼎形印腹刻有五个横列“臣”字，盖寓国英之字“鼎臣”之习，殊为别致。据长辈云，“共读楼”藏书均钤此两印及一枚“共读楼藏书”椭圆形印。凡例之后另有“共读楼在京都崇文门内单牌楼东观音寺胡同索绰络氏宗祠东坐北向南”牌记。

共读楼除正月、腊月整月开放外，平时每月三、八两日亦开放。

开放时巳正（上午10时）开楼，申正（午后4时）闭楼。共读楼为两层，楼上藏书，楼下阅览，并备有桌凳。有管理人员检取送阅，每次只限两种，但不准携出。阅览者首次借阅须经熟人介绍，经本宅附图章条方能借阅，以后即可凭条而来。但每次开放日最多只接待二十人，这是因为楼址狭小之故。读者若损坏书籍，便停止其借阅。由于楼址邻近贡院，遇乡试之年，自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初五日连续开楼；遇会试之年，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五日连续开楼，以便利来京应考士子。

我后来翻过家中所藏的《共读楼书目》，发现其藏书皆普通版本，并无宋椠元刊。然主人“共读”之意，却实比“探锁郎缳饱蠹鱼”之大藏书家高明。记得年轻时读过 一部清人笔记，载江南一藏书家，家藏万卷，却从不示人，且立家规，家中女眷亦不能一观。某女子为读书计，不惜委身嫁其家中子弟，然亦不可一观藏书。真真令人嗟叹不已。然观“共读楼”主人行事，不禁又令人钦敬之至。

图书馆专家袁同礼

大与袁同礼氏，字守和，是很值得思念的一个人。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做事很有魄力。北海西面国立北京图书馆，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可观的成绩，参加世界图书馆协会，在国际上成为与牛津图书馆、东京帝大图书馆等著名大馆并驾齐驱的书籍总汇，这是与袁氏的领导分不开的。

北京图书馆，早在清代宣统时，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时，就提议建立了筹备处，地址在什刹海后海广化寺。辛亥革命后一度停顿。后来又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筹办，不久就开馆，均名“京师图书馆”，直到1929年，才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借中南海居仁堂办公，一面在北海西岸御马厩空地筹建新馆。与此同时，袁同礼氏在美国留学，学习新的科学的图书管理法。这是袁氏担任馆长的准备阶段。

担任中国图书馆的馆长，如果只懂外国那一套分类管理法是不行的，还必须精于中国旧学，懂得中国的几千年 的图书史、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

但是只懂中国老的一套，老是抱着“四部”分类的一套，也不行，没有办法管好现代的图书馆。袁氏家学渊源，早岁即精研版本目录学，对于明清以来之书籍源流，藏书家的情况，极为熟悉，其所著《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等文，都是讲述千余年来图书源流极为清楚概括的学术著作，文章虽然都不太长，但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袁氏首先把世界上科学的编目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编古籍。不按“四部”分类，而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查考书极为便利。第二，袁氏将线装古书目录，也同新书一样，制成卡片，装入卡片箱，便于查书，这在现代图书馆中不稀奇，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改革。第三，最科学的，就是改装一切线书套子，便于上架。中国古书，大小不一，册数不同，习惯平放，上架取书，都不方便。袁氏亲自设计布匣子，像洋装书一样，插架极为便利，书名写在匣脊上，找书十分方便。东莞伦哲如《藏书记事诗》，特别称赞他这点。

更可贵的是袁氏善于用人，培养了赵万里、孙楷第、谢国桢诸人，不但都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大学者，而且都为图书馆作出很大贡献。如赵万里先生为北图工作了一辈子，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傻公子”创办藏书楼

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曾被鲁迅多次赞扬，还赠他一个雅号“傻公子”。

刘承干（1881～1963）出身于靠经营蚕丝发迹、银达千万两以上的富豪之家。其父刘锦荣，乃前清进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中过秀才。后科举制度废除，眼看“光宗耀祖”的“官梦”彻底破灭，便以极大的“傻”劲儿钻进了书籍的“王国”，钻研清代掌故，著有《再续清代碑传录》《清遗民录》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历代词人考略》，约五六十卷。而且大量购书，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时，别人见到“瑰货骈集，人争趋之”，而他却独步状元坊书店，遍览群书，满载而归。致使当地书贾携书前来找他者，接踵而至。

当辛亥革命的烽火燃起时，刘承干又乘大批古籍抛出之机，不惜花大钱，先后“照单全收”买下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 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余家的藏书。他鉴于前人藏书“聚而旋散”，受苏东坡所说李公择的书不藏在家中而藏在原来住过的寺庙僧舍的启发，于1920年初冬破土，1924年岁尾竣工，“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在南浔镇鹧鸪溪畔刘氏家庙旁边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著名文化宝库，因清宣统帝溥仪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故以“嘉业堂藏书楼”闻名于世。

而后，他又陆续增添集书六十万卷。在藏书楼全盛时期，有宋元明刊本、清刻本，以及丛书、手抄本，大量的是清人文集和各种史书。此外还有碑帖数千种。以宋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

国志》最为珍贵，号称镇库之宝。还有眉山刊本《宋书》残帙，近人张元济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另外宋开庆一百一十卷本《鹤山先生大全集》、宋淳熙戊戌本《窦氏联珠集》也都是世上罕见的海内孤本、珍本、善本。尤以收藏地方志最多最全而著称于世，据说至今尚达千余部。

当时最被人笑为“傻”的是他还出巨资雕版印书，广为流传。他先后聘请著名学者和名匠刻工，刻印了很多古籍，其中有《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以及单印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章氏遗书》等，均有红梨本雕版，刻法精湛，字迹清晰，所用纸张绵薄坚韧，共二百多种，约三千卷、书板三万多片。刻印的古书中，有不少被清廷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 遗著《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翁山文外》等。

鲁迅《病后杂谈》中曾称赞道：“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在给友人的信中还说：“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最老的“天津图书馆”

天津有一座最大最老的图书馆，是1908年5月开馆的，在过去将近八十年的时光中，它经历了沧桑巨变，馆址几经迁移，馆名也几经改变，有时隶属直隶省（今河北省），有时隶属天津市。近悉，现在又恢复了原来初创时的名称“天津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向以藏书多而闻名。

天津图书馆的创始人卢木斋，曾任直隶和奉天提学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创办天津图书馆之外，还在天津创办过卢氏蒙养园、卢氏小学和木斋中学，并为南开大学捐建木斋图书馆。南大木斋图书馆于1928年落成，九年之后，不幸在“七七”事变后，被日寇飞机炸成废墟。

当天津图书馆初创立时，还得到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的支持，他先后捐书一万二千多部，约五万多卷，以后续有捐赠。其中大量是有关天津地方文献的旧籍和许多善本书。严范孙的手稿原本，亦多捐赠，如日记手稿共装　　八十四册，分装十二函，内有“使黔日记”“黔轺信草”和有关北京、天津两地游记，以及他三次出游日本、游历欧洲诸国的日记，是研究严范孙生平的珍贵史料。该馆特辟“范孙书库”以珍藏之。

1937年，日寇侵占天津后，因强占了中山公园，原在中山公园内的天津图书馆即将全部藏书设法运出，另觅僻静地址暂存，以保安全。1939年春，新馆长郑菊如就任后，才将存书运到东门里新址。是年秋，洪水浸漫天津，原暂存藏书之地被淹没。全部藏书幸早迁入新

址，得免于难。

天津图书馆还藏有清末许多天津诗人的诗词专集，多是描写天津风物的唱和之作。

近得友人函告，现在的天津图书馆收藏中外图书二百五十万册，中外期刊八千多种，比前增加许多了。

全国最大的农村图书馆

云南省腾冲县有个和顺乡，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诞生地。这里有一座最大的农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它是由华侨捐建的，距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

和顺乡坐落于腾冲县城西三公里处，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虽然全乡只有五六千人，但是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就有一万多人，旅居世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

自古以来，和顺人就有崇尚知识的传统，从明末到清代的三百多年间，曾出了八个举人、三个拔贡、四百零三名秀才。民国十三年（1924），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华侨李秋农、寸仲猷、李德园、贾铸生等人自筹资金，联合了一些家乡的年轻人，在乡间小集镇租用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铺面，开办了“阅书报社”。

考虑到报社难以满足乡人的读书需要，李秋农、寸仲猷等人又在缅甸的曼德里成立了经理部，主要负责向和顺募款、募书。

1928年，“阅书报社”与“咸新社”合并为图书馆，即今天的“和顺图书馆”。这时候，图书数量已增加到两万余册。在管理方面，李秋农专门从国外找来美国杜威的《图书分类法》和中国王云五的《十进位图书分类法》进行研究，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整个图书馆工作步入最先进的图书管理的行列。

尽管和顺图书馆的发展也经历了日军入侵腾冲和“文革”动乱，但是，由于乡人长期形成的珍惜、保护图书的风气，图书馆里的图书和珍本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现在，图书馆里的藏书达六万余册，成为全国农村藏书量最大、类别最多的农村图书馆。1993年，和顺图书馆被云南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几十年来，和顺图书馆对乡人文化程度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长期以来，和顺人养成了工余时间到图书馆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统计表明，全乡二十周岁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具有至少初中的学历。不但如此，和顺图书馆在海外华侨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澳大利亚专门研究东南亚语言的华文教授唐立慕名到和顺图书馆参观，回国后就把自己的两本专著和朋友的一本专著赠送给该馆。缅甸华侨寸树生回国探亲时，到和顺图书馆借书，发现一本关于皮革加工的书籍，很感兴趣，当即办理了借阅手续，细加研究。回到缅甸后，他创办了一家皮革加工厂，按照书中介绍的技术投入生产。生意很成功，他也成了富翁。

藏书家孙广庭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奉天图书馆之藏书仅次于北平图书馆和南京中央图书馆，藏量位居全国第三位。其中藏书由孙广庭捐赠的多达二万五千余种，二十余万卷。

孙广庭，字丹阶，号痴侠，晚号不见子。光绪二年（1876）生于辽宁省铁岭县。幼时家贫，十四岁到私塾读书。他看到同学手中的字典，羡慕极了，遂恳求母亲：“我也要有一本字典。”母亲听后卖掉衣物，给他买了一部《康熙字典》。此事给孩提时代的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民国十年（1921），他任东三省测量总局总务官。公务之余，倾心猎取各种书籍。当他搜集到一本普通版本的光绪六年重刻自怡轩藏版的《四书便蒙》，看到书上有人用红笔圈圈点点之后，竟爱不释手，遂在扉页上写道：“真可为无价之宝矣。”

他还是目录学和版本学专家。他曾有言：“对于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我都尽力搜集来，以参校异同。”他对藏　书鉴别精严，其中清刊本《守山阁丛书》一百一十种，被同行公认为系国内外几种版本中最完善的。他在版本考证上造诣颇深，一次他从两地分别用重金买来《万首唐人绝句》，表面上书品大小不一，貌似不同版本，但他反复考证，最终确定这两本书“虽书品有长短之差，而版本确系一律，珠联璧合，庆幸矣。”他五十三岁初度时，曾以诗言志：

诗书成癖由天性，搜集人疑古董流。
济世文章真国粹，神州金石叹桴浮。
因征信史藏碑版，不为痴儿做马牛。
寻得溪山最深处，渔樵终老是吾求。

孙广庭不但爱书、藏书，还常和一些藏书学者、文人墨客、社会名流交流图书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他与许世英、林长民、熙洽、李杜、丁超、王光烈均有唱和。他与徐树铮、胡适之、江亢虎、张焕相、荣厚等也颇有交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他悲愤欲绝、仰天长叹：“皮亡毛安附，国破家何在？”当年10月20日，他主动辞去公职，拒绝日本人登门劝诱恫吓，并和卖国求荣的旧友割袍断义，从此闭门谢客，埋头读书，不问世事。

这一时期，孙广庭生活异常拮据，但他始终舍不得出售“因是堂”书库里的一本书。为了防止图书虫蛀发霉，　他经常登着四米高的梯子，把书架上的书一部部取下，搬到凉台上翻晒。每次晾晒书籍，他都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一天夜里，一伙歹徒闯进他家行劫。为了保护图书，他手持利斧站在“因是堂”门前大吼：“看谁敢进来？！”歹徒朝他开枪，幸亏夫人拉了他一把，子弹呼啸而过，人虽免于难，但书库墙壁却被子弹穿了一个半尺多深的洞。

民国三十六年（1947）岁末，他将一生珍藏用生命保护过的二十余万卷图书，还有大批名贵金石碑帖拓片、古玩及书架、书柜等全部捐献给奉天图书馆，全部捐赠用两辆载重汽车运了三天，共装满四十二车。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

学术界人都知道，清末的张之洞虽然不是学者，但是他在光绪元年（1875）却给中国学术史留下一部著名的《书目答问》。

原来，光绪当皇帝那一年，张之洞才三十八岁，他正在提督四川学政的任上。他的目的是给本省初作学问者指点门径，曾自嘲说该书“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世后，有些学者对其为典籍分类法已逐渐不满；孙星衍、张金吾所藏私人图书目录，都采用了有别于四库藏书的分类方法。到了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之后，邵懿辰的未刊稿《四库简明目录标准》，当即推崇备至，并决定为初学者另开书单。

张之洞强调所作书目之对象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家”，为此，对传统的书目分类法进行了改造，例如经部，《四库全书总提要》原分十类，先五经，后四书，附小学。《书目答问》却将它拆散，分为三类；凡清代列祖列 宗颁定的官方教本，统称“正经正注”；凡清代汉学家或汉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诠释的古典经解及其校本，题注则申明“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采”。这样，朱子学系统的“四书学”，几乎全被视为空谈而驱出。再如子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首列为“儒家类”，所收大都是宋元明道学夫子的“语录”。《书目答问》却将儒家降为二类，而新增的“周秦诸子”居首；并在子目小注中讽刺了理学诸书多“腐陋”。相反，考订之属则以它“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作理由，尽力详列清代考据家的著作。

著者策划编纂《书目答问》，初意虽然未想作一份学史的提纲，但是最终却形成了类似的提纲。结果，该书成为主要列举清代学术成果的清单，并在卷终出现了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著者解释这是应诸生为择良师要求，急中生智以此指点迷津，“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良师也”。

《书目答问》所列名单，先分门别户，再将姓名字号籍贯，按辈分排列在内；门分十四，有的门内分派，共录姓名六百四十六名，除去复见，实录学者文人四百五十二名，活人除李善兰皆不录，对理学家择录尤苛。反映现状虽欠全面，但尚属客观，从中可见清学史概况。

《书目答问》刊行后，很快便突破四川省的界限，海内各省皆风行，没几年就出现数种翻刻本，在读书人家中几近“家置一编”。

康有为在两广讲学时曾说，书目“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尽管政治倾向多有不同，但在论及读书门径或清学史的时候，都一致承认曾受到它的教益。

当代学人陈垣晚年还承认，少年时期对“四书”“五经”以外的学问发生兴趣，实肇始于《书目答问》的导引。

郑振铎藏书献国家

郑振铎（西谛）先生不幸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时间真快，正像鲁迅先生所说，一抓头皮，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西谛先生如果健在，算来也是年近120岁的寿者了。同时人尚多健在者，每一念及，未尝不惋惜先生之意外不幸了。

西谛先生与北京的关系和感情是极深的。除后来担任文化要职，久住北京外，早在1930年，即民国十九年，先生即到了北京，一边在燕京大学教书，一边从事文化工作，成绩非常大。插图本的《中国文学史》是这个时期完成的。《北平笺谱》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虽说和鲁迅先生合编，但主要的刻印等事，都是在琉璃厂做的（当时还是老荣宝斋，刻工是老西张、板儿杨），由西谛先生办理。继《北平笺谱》之后，又重印了明人海阳胡日从的《十竹斋笺谱》，这部笺谱的真本，原藏通县王孝慈先生家，也是西谛先生借来重梓的，后来又印《博古图页子》、陈老 莲《水浒叶子》，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再有，就是他主编出版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是后来时兴的大型文学刊物的鼻祖。十六开本，厚厚的一大册。每期都有六七十万字。过去我收藏着四本，第一册中就刊有曹禺的《雷雨》，连序幕一起刊出的，序幕写在精神病院中，年老的周朴园来看望两个女疯子，一个是侍萍（四凤妈）、一个是繁漪。后来演出都不带序幕，这些情节知道的人现在很少了。这是曹禺（万家宝）的成名作，应该说与西谛先生的慧眼不无关系吧。《文学季刊》前面刊印一张特约撰稿人名单，洋洋大观，几乎把当时南北的大作家都网罗在内了。当时这

些文化工作，似乎只有北京能做。1935年初，谣传他将离开北京。鲁迅曾写信说：“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部，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

可是过了一年多，西谛先生还是离开北京了。沦陷时期，先生远在上海，时时怀念北京，买到光绪丙午本《燕京岁时记》后写了长跋，充满怀旧之情。下面摘引几句吧：

> 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犹盛，古柏苍翠，柳絮拍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盂，静对盆大之花朵，雪 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飞絮，抢飞入鼻……总之，四时之中，殆无日不有可资流连之会集，无时不有令人难忘之风光。今去平六载矣！每一念及，犹恋恋于怀。

不久前，与三五知己，重阳偶聚，大家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其中有人在当年与西谛先生过从甚密，所谈者皆系耳闻目见，语言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尤其关于他购书、藏书、爱书的往事，其情发人深省，其事感人肺腑。

西谛先生藏书之多，早已闻名海内外，为人所共知，但对先生藏书之苦心孤诣，知者甚少。早年他从事戏曲小说研究工作，为了研究之便，或手头应用之所需，常热衷于戏曲小说方面的书籍搜集，所得珍本孤本颇为不少。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土沦陷，民生凋敝，京、沪、晋、鲁等地书商往往遍搜古籍转售海外，以图暴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当时大批古籍珍本销往美、日等国，新闻报纸对此也不断有所报导，还曾引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之谈话，意谓中国珍贵之图书现在源源流入美国，其中稀世孤本、珍藏秘籍、文史遗著品类备至。西谛先生对当时所见所闻，感慨万分，曾谓

古籍不断流于海外，国内日渐其少，将来必有一日论述中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岂不令人痛心疾首！为后人计，抢救古籍流 失，已为不可稍缓之事。他身体力行，扩大藏购书籍的范围，购藏古籍珍本，不使流于国外。为了保存国家文献资料，他与书商斗智斗力，历尽艰苦。

犹记他在上海以重金收购过一部明版珍本，付清书款后，书商迟至半月后始交付原书。原来书商为了争取时间，将原书全部影印后，才将原书交与先生。人多谓先生为书商所骗，但他不以为然，并谓人曰，只要珍本留存国内，即我所愿也。

1938年春，某一天晚上，得友人陈乃乾电告，在来青阁书商唐某处发现元剧抄本和刻本。这种刻本原是他多年梦寐以求而未得的古籍。他闻讯后，翌晨即到来青阁洽购。但据唐某云，来迟了一步，该书已以九百元成交，售与孙某了。此书一旦失之交臂，西谛先生懊丧万分。后经探悉，这位孙某原来也是一个书商。旋又辗转托人向孙某洽购，孙则非万元不售，经磋商，终以九千元成交。这部古籍的发现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收获。经过他的艰苦奋斗，这一部“国宝”终于免遭流失国外之劫。

视国之所需，变为己之所好，奋斗终生，为后人做出了楷范。先生于1958年飞机失事罹难后，遗属已将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国宝”终于国有矣。

商务北京分馆创业史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业伊始，资本仅四千元，厂房设备均极简陋。但至20世纪20年代，商务之股本已达数百万元，除上海设总馆外，分支机构三十余处，遍及内地各大城市，中国香港以至新加坡也有分馆，成为当时远东最大之出版印刷企业之一。

商务北京分馆馆址，当年设于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和平门外的西琉璃厂一百七十号。据分馆的老职员讲，经手购买这片地建筑分馆的是孙伯恒先生。孙是商务总公司之襄理，兼北京分馆经理，与张菊生（元济）先生交情颇深。茅盾先生进商务即是由卢学溥（鉴泉）介绍给孙伯恒，再由孙向张菊生推荐的。

孙伯恒受总馆委托觅地建造北京分馆时，最初选定的目标，本在琉璃厂与南新华街十字路口处，即南新华街路西与琉璃厂路南转角口的一排平房，商业地位相当优越。而且洽谈已近成熟了。这时有人出来向孙兜售一百七十号 那间房子，孙氏遂改变计划，将原方案放弃，改而购买了商业地位较次的一百七十号房地。

孙氏的做法颇为怪异，人们猜测亦颇多，其实这里面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琉璃厂一百七十号房地的主人是顾鳌。顾字巨六，四川人，为袁世凯之策士，曾任袁氏御用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等职。杨度等人在府外（指总统府）搞筹安会，把袁抬上洪宪皇帝的宝座；顾鳌则

在府内为袁氏出谋划策，与筹安会内外呼应。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在全国一片声讨和众叛亲离的惨境中幽怨含羞而死。这之后，顾鳌也列入了被通缉的名单之内。他在北京城站不住了，因之急欲将琉璃厂一百七十号这间店房脱售后跑到四川成都去。顾鳌遂托人与孙伯恒接洽。孙伯恒是冯公度（清末进士，北京电灯公司的创办人）的学生，与当时北京社会的上层人士交往很广，却不过情面，遂拍板成交，买下了这片房地。

房地买定后，不久就开始动工。1920年，一座三层的钢骨水泥建筑落成，做了商务北京分馆的馆址。以后由于业务的不断扩大，又在邻近买了几座房子。

听说现在北京琉璃厂的街面房屋已经大半拆除，准备恢复古老的文化街。再过一段时间，这条古老的文化街大概会令人不识旧面目，至于商务北京分馆原址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佛教大典清《龙藏》

报载，中国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木版佛教典籍《乾隆版大藏经》已开始在北京木版印制，而且举行了由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和赵朴初居士参加的首批发行仪式，这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大事。

《乾隆版大藏经》又称《龙藏》《清藏》，雍正十一年（1733）开刻，乾隆三年（1738）竣工，选材皆用没有节结的上等梨木，原有版片七万八千多块，重约四百吨，共收佛藏七千二百四十卷，分装七百二十四函，约六千七百多万字。

有人说，《龙藏》是一部佛学大丛书，此言极是。它收录经、律、论三藏以及名僧撰述、宗门语录等，其中有些在印度早已失传了。它汇集了印度佛教经典的译作以及《法显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增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历代高僧传略，内容十分丰富。当年，仅经版的采买与刊刻就耗银八万两。由于选材考究，雕造技艺精良，故虽 历时二百五十多年，仍墨迹光亮，刀口锋芒犹存。

但是，这样一部巨书，自乾隆三年刻成后，只印过四次。第一次是竣工后之次年，清廷出资印刷一百部，颁赐全国各大寺院；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奉旨补印三部；第三次是同治年间，时值鸦片战争后，清廷已无力出资，故允许各地寺院自备工料请印，在此种情况下，四川泸州合江县法王寺的空静等，于光绪十年（1884）晋京请印，仅一部；第四次是1933年，林森等人在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安奉历朝大经藏，于1936年印《龙藏》一部，以资供奉。当时，中国南北丛林闻风兴起，陆续请印，共达二十二部之多。由此观

之，自乾隆四年（1739）至1936年，《龙藏》印刷总数大约在一百五十部。

尽管如此，由于乾隆年间曾出现过三次撤经毁版，故至今保存完整的《龙藏》已寥寥无几。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载，第一次在乾隆三十年，乾隆以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为由，下令撤毁钱氏所注《楞严经疏解蒙抄》，毁版六百六十块；第二次在乾隆三十四年，乾隆以明永乐“犯顺称兵，阴谋篡夺”为由，下诏撤毁《永乐赞制序撰文》等永乐撰著四种，毁版一百二十八块；第三次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撤毁武则天所撰的《华严经》序文，版片数目不详。

佛教经典《赵城金藏》

广胜寺在山西洪洞县城东三十里的霍山南麓。近闻该寺内的稀世国珍《赵城金藏》已修复一新，并保存于北京图书馆，不禁感慨系之。

《赵城金藏》是东汉至北宋各著名高僧以及来华传教讲学者积数代辛苦之佛教经典集大成。参加翻译、编撰的中外高僧多达二百余人。其中，有最有名的译师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人。汉桓帝建和二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48～171），安息国佛教学者安世高来华译经。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译出了《安般守意经》《大十二门经》等三十九部之多。后秦弘始三年（401）12月20日，罗什（原籍天竺，生于龟兹国）被皇帝姚兴迎请到长安。用终生之精力，率弟子共译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佛经。唐贞观元年（627）秋，三藏从长安出发，至贞观十六年启程回国，前后在西域十六国取经求学十七年，这期间广泛搜集到梵文经书，带回国内六百五十七部（一部分在渡越印度 河时失落），在长安专心致志翻译十九载，共译出七十五余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是唐代另外一名著名的佛学家。三十七岁时，一人“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奋历孤行，备历艰险，诸有圣迹必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他先后翻译自己取回的经卷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

佛教诸僧译典集汇而成的《大藏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手抄本《大藏经》第一次木版雕印，刻数六千六百二十余卷，被后人称为《开宝藏》。

由于战乱《开宝藏》面临绝世之危。金皇统九年，即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山西平水县（即今临汾）有一卓然见识的尼姑，名叫崔法珍，潞州（山西长治）人。崔氏深受玄奘的感染，愿为拯救佛经，断臂盟誓，化缘募捐长达三十余年，足迹遍达秦、晋、豫诸省，遂集巨资。崔法珍延请名师高手，在山西解州天宁寺篆刻了二十五年。这样，世界上第一部七千余卷的大型巨典开宝式大藏经遂以问世，“卷轴之富，工事之巨”莫能盖焉。

这套巨帙的经卷刻成以后，存放于何处，却成了佛门久悬未定的大问题。当时晋南临汾、洪洞一带经济与文化都比其他地区发达，这部七千余卷的佛典便收藏于当时平阳附近的赵城县内广胜宇，后由于刻版于金，故称之为《赵城金藏》。

有关“北京掌故”之书

当前，旅游业大发展。去游北京的人，喜读北京掌故。北京建都八百余载，文化荟萃，有关京华名胜、人物掌故之书，卷帙浩繁，一般人实无暇穷其涯际。今偶记所藏，以供参阅。

《帝京景物略》，明人刘侗、于奕正合撰。刘为崇祯进士，用金陵派文体，记述北京城郊景物。举凡园林寺观、陵墓祠宇、名胜古迹，以至草木虫鱼，搜罗殆遍。一景一物，务求翔实。清学者纪昀曾对本书删削注释，作序详介，近人郑振铎《劫中得书读记》曾志购得此书抄本经过。

《宛署杂记》，明人沈榜撰。沈乃宛平知县，在天子脚下逢迎应差，具见封建王朝对老百姓盘剥之重。耳目所及，笔之于书，是明代北京情况罕见资料。又明人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亦多京中世故人情。

《明宫史》，明太监刘若愚撰述。刘为魏忠贤部下，司宫廷笔墨，了解宫闱内幕及生活制度甚详，后在牢中为其 罪名辩护，留下了为宫墙以外的人难知的第一手史料。《金鳌退食笔记》，清人高士奇撰。高是大臣，与刘当太监不同，为康熙皇帝重用，供奉禁庭，八阅寒暑，居住北海桥西，接近“至尊”，所记宫廷史料，实为一般文人难以目睹者。此稿难得，唯卷末应诏诗，则庸腐不堪一读。

《北平考》，明人所著，佚名。从历代正史中辑录北京地方及宫殿沿革，远溯尧舜，近至元末。《故宫遗录》，明初人萧洵撰。萧于

洪武时任工部郎中，奉命拆毁元故宫，因职务关系，有机会对元故宫详加考察，故能记下了“别人难见，正史所无”的元宫全貌，对研究北京古代宫殿，富于参考价值。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人张爵著，记述明代北京町西南北中五城三十三坊的名称、方位及胡同名，附记京师八景、山川古迹、公署苑囿、寺观祠庙等，不少人曾经引用其资料。其后清人朱一新在此基础上，再撰《京师坊巷志稿》，全面辑录明清两代北京坊巷胡同名称变化，掌故传说，一览无遗。可见北京有些胡同，存在于几百年前的明代，传留至今，其名未变。

有三本书，为研究北京掌故所不可缺考，即《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及《日下旧闻》。明末清初八十岁老人孙承泽，居北京几十年，所撰《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收录明清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沿革、人物掌故、官署制度等史料，稀罕难得，考证亦极严谨，受到朱彝尊的推崇。 《日下旧闻》为清康熙时学者朱彝尊所编撰，材料丰富，考证翔确，文笔流畅。三书相得而益彰。

渔洋山人王士祯，顺治时进士，人推为一代诗宗。写的北京掌故亦多，计有《香祖笔记》《燕石集》《藤荫杂记》《居易录》《燕都游览录》等多种，内容丰富，为人称道。清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于书无所不通”，评论精审，识力过人，于治学之余撰写的北京掌故也不少，计有《滦阳消夏录》《京城古迹考》《阅微草堂笔记》《癸己存稿》等，文情并茂，富于析理，其书颇可读。明人计成，写有《园冶》一书，专论北京及江南等地园林布置理论及艺术，是一门专门学问。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略》，谈北京旧书买卖情况，更是北京掌故中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

此外，还有清人李慈铭撰的《越缦堂笔记》、王启淑《水曹清暇录》，所记社会轶事颇多；《昌平山水记》《东京考古录》两书，则是清初爱国人士顾炎武骑着毛驴，长期在北京考察山河形势的记录；

《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由文学家孔尚任等著，从民间诗歌中可知北京节令风物；《北游录》是清初谈迁从杭州坐船经运河到北京的沿河日记，京杭远隔两千余公里，途程四阅月，旅行者备尝艰辛，至于船夫那就更苦了，这也算是一种北京社会生活史料。

写北京掌故之书那么多，有没有人写本《图书目录》?有，清缪荃孙的《纪录顺天事之书》就是。缪襄编纂《顺　　天府志》及《清史稿》，治学甚勤，暇时抄录所见史籍，存目备查，积久而成是书，于今之欲治北京史者，是一本重要书目。

震钧著《天咫偶闻》

《天咫偶闻》是谈论京华掌故、典制者常常引用、参考的一本书。它的作者震钧，博学多闻，潜心著述而颇有成就。

震钧姓瓜尔佳氏，字在廷，号涉江道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九年（1920），享年六十四岁。他祖上居于沈阳，清初随清军入关，世居北京二百五十年，算得上地道的老北京了。二十五岁中举人，在吏部做过小官，亲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正是清朝动荡多变，日趋崩溃的年代，他在宦途上没有飞黄腾达，又处身于一个没有前途的末世，于是寄情诗画，专心从事著作。目前所知他的著作有《渤海国志》《两汉三国学案》《庚子西行纪事》《洛阳伽蓝记钩沉》《八旗诗媛小传》《八旗人著述存目》《国朝书人辑略》和《天咫偶闻》等十种，其中后两种尤其受人称誉和重视。

《天咫偶闻》共十卷，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 搜集著录，至光绪三十三年刊印，历时一十三年，是一部范围广阔、记录翔实、严谨可读的著作。其主要部系记录咸丰以降的掌故逸闻，大体可分为：一、较为重要史实的记录，如有关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和议谈判的记载；二、关于清代典章礼仪的记载；三、地方性史实的考证；四、关于巨臣显宦或名儒学者故居旧里的考察，如对傅恒、刘墉、顾炎武、王渔洋等人宅第的考察；五、豪门巨族的逸闻逸事；六、关于水火旱涝灾情的记录；七、北京附近民间节令习俗、饮食起居的记载等。上至宫廷贵族，下至黔首百姓；巨至国家大事，细至民间习俗，

凡亲历、亲见、亲闻而被认为有保存价值者，均搜存笔录。所以有人认为此书可以绳“梦华”“梦梁”二录之前踪者。

震钧在《天咫偶闻》中的记载，有的目前还在发挥实际作用。如关于前恭王府（原为和珅府第）的记载，府西南两面墙外，曾从李广桥引来活水，绕墙而过，并引进府内与花园中溪水连接，现据此及其他图纸、资料进行修复。

最近，《天咫偶闻》将由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这对于京华史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蔡元培的《新年梦》

《新年梦》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所撰的白话体小说，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农历正月初二日的《俄事警闻》日报。全文近万言，连载六期刊完。此时正值“苏报案”发生之后，蔡元培受清廷通缉匿居于青岛，发表时未署名。后来，蔡元培向其夫人黄世晖口述《自传》时才透露这是他的作品。

这篇小说用第三人称叙述，主人公是一个自号为“中国一民”的中国人。蔡元培先生自号“孑民”，这“中国一民”正说明就是作者自己。他游历过各国，在梦中参观了包括议事场所、商场在内等单位，也接触了不少人士，用他的口来描绘一个新国家、新社会以及一个没有国家之分、没有争战人祸的平等、和睦、温饱、文明的大同世界。这是作为清朝翰林的蔡元培对封建社会的大胆的否定，也是他融我国儒家传统思想与西方议会政治于一体的理想世界之憧憬。他采用当时士大夫所鄙视的白话文体， 也说明他具有向群众宣传的自觉。从他的创作思想与描写手法来看，与《乌托邦》《镜花缘》如出一辙。

《新年梦》是这样开头的：

恭喜！恭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真可喜，真可喜！这两句话是一个支那人自号“中国一民”说的，在甲辰年正月初一日午前六点钟从床上跳起来时对他的朋友说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从游历、考察、思索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糜费在家上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他逢人便说这个道理，但是，“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这正反映了康梁戊戌政变以后我国知识界开始觉醒并进行探索救国之道的思想状况。

《新年梦》里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世俗人情……无所不包。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劳动三八制，四十八岁后休养（即退休）。他设想中的社会福利机构都是公立的，如公众食堂、公众卧室、男女配偶室……在外交上，恢复东三省（日俄战后），消灭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抑制租界，而且在六十年内也一一做到了。

《新年梦》里面还提到了“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中国）提出弭兵会的宗旨，请设一个万国公法裁判所， 编练世界军若干队。裁判员与军人皆按各国户口派定”。各国只设警察，不得别设军队，两国间有龃龉的事，悉由裁判所公断。有不从的，就用世界军打它。“从此各国竟没有战争，民间渐渐康乐起来。”

《新年梦》中只有一件大事是回避的，就是“皇帝”的存废问题。蔡元培用议会政治的描写来替了它。言外之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顾颉刚撰写《妙峰山的香会》

明清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城，而中国宗教中心则是位于北京西北的妙峰山。据《燕京岁时记》载，妙峰山“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

原来，距北京城约八十里的妙峰山，山顶庙中奉祀的是“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进香会期，北京、天津一带组成的几百个各种名目香会的香客便纷纷朝山进香。

民国十四年（1925）的妙峰山会期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委托顾颉刚和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前往调查进香风俗，自阴历四月初八至初十，调查了三天，五人依据所获材料，各写各的见闻，其中以顾颉刚写的《妙峰山的香会》为最好。

顾颉刚写《妙峰山的香会》，调查材料最认真。庄严 在《妙峰山进香日记》中说：“或抄录碑碣，或就和尚谈话，惟颉刚最勤。”顾颉刚还抄录了这一年各个香会的《会启》，正如他自己在调查报告中所说：“我在北京住了有八九年了，这些会启年年张贴，但以前的七八年中竟丝毫没有投入我的意识。”

顾颉刚写的《妙峰山的香会》，根据文献材料，叙述了香会的来源，指出香会是从周朝以来的社祭，是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演化出

来的。根据抄录的香会《会启》，叙述了香会组织，阐明香会组织极其精密，财政、礼仪、治安、交通、饷糈等各方面都有专人管理，还有领袖人物香首负责指挥。另外，根据文献材料叙述了明朝北京的妙峰山香会的情况。根据碑碣和《会启》叙述了清朝的妙峰山香会的情况。而且依地域将当年妙峰山香会状况予以统计，结果是：北京内城有二十个香会，外城有二十八个香会，四郊有二十三个香会，北京属县有两个香会，其余尚有八个香会，天津有十八个香会。同时将香会分为以下十大类：修路、路灯、茶棚、缝绽、修补铜器、呈献庙里和路途中用具、呈献神用物品及供具、施献茶盐膏药、技术和普通的进香。最后列出一个表，写明进会的起讫时间和进香后的生活状况。

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调查报告在《京报副刊》登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江绍原在《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中认为："现今　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不难看出顾颉刚写作该文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聊斋志异》手稿发现始末

友人从内地购得一本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卷首附有清代名画家朱湘麟在蒲氏生前为其绘制的一幅彩色画像，画像楣端有蒲松龄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亲笔题跋。题跋笔迹与手稿书体无异，证明此稿确系蒲氏亲笔所书。

两百余年来，《聊斋志异》广为刊行，尽管版本纷繁，但均是依据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抄录的本子，这就是著名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可是产生于雍正年间的殿春亭抄本早已亡佚，那么蒲氏原稿面目如何，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

这部手稿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辽宁省西丰县农民蒲文珊献出来的，曾在文化界引起轰动。蒲文珊当时已年过半百，为蒲松龄之九世孙。他虽系务农，实温文尔雅，笔者曾有缘拜识，听他讲述过蒲氏历代家藏此手稿之经过。

原来，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最后一稿誊清后，曾嘱其子孙，善自珍藏，世代相传，不要遗失。蒲松龄的七世孙蒲介人（即蒲文珊之祖父），在清光绪年间曾在奉天（沈阳）当差，其眷属亦从祖籍山东淄川县（今淄博）移居沈阳。民国初年，介人之子灏充任西丰县吏，遂迁居西丰。又据蒲文珊称，此手稿原为四函八册，现存之四册仅为前一二函，尚有三四两函（即下半部）在光绪年间，被盛京驻防

大臣伊克唐何借去，带至北京。

本来蒲氏立有家规，对所藏先祖墨本，概不外传。那么，下半部手稿何以又借给驻防大臣呢？大概是蒲介人慑于伊的权势，不敢不借。伊约以先看上半部两函，待归还后再借下半部。后来伊果然如期归还上半部，因而顺利借到了下半部。不料，伊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3月病逝。接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公私珍藏的财物多被洗劫。据悉下半部在这时被外国人掠去，流落国外。伪满康德八年（1941），《盛京时报》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48卷现存柏林博物馆。”如消息确实，则这两种情况是吻合的。

现在上海出版的，大概也只是蒲松龄手稿的上半部吧？

朱星考证《金瓶梅》

唐文治先生经营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抗日战争中并入安徽大学之后，即不复存在。原无锡“国专”同学在世者已不多，最年轻的现在也是七十岁以上了。报载朱星教授去年在天津逝世，“国专”同学又弱一个。

朱先生曾攻法文和拉丁文，20世纪30年代向马相伯老人请教过文法学，马相伯介绍他到法国教会办的天津工商学院教书；又介绍他拜北京辅仁大学陈垣先生为师。朱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造诣颇深，1946年他到北洋大学任教，以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最近有朋友从大陆来，谈起朱先生，才知道近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没有离开北方。去世以前，他在天津师范大学带研究生教语言学，还担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朋友谈起，朱先生晚年忽然对研究《金瓶梅》发生兴趣，又是演讲，又是接待记者访问，连续发表研究论文。 1980年他写的《金瓶梅考证》出版，这种学术性论著，从来销数有限，他这本书却很快再版，可见很受欢迎。于是朱星教授名声大噪，一下子成为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了，使富有道学家气味的“国专”老同学们大为惊讶。

《金瓶梅》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但因书中多淫秽描写，历来被列为“禁书”，各地大图书馆都藏有不同版本的《金瓶梅》，但对一般读者从不出借，文学史上讲《金瓶

梅》如何有价值，但多数人并没有看原书的机会，这是一大矛盾。

经朱星研究，认为《金瓶梅》本来没有淫秽描写，现在所见的淫秽语都是后人添加的，与《金瓶梅》原著者无关，《金瓶梅》不能承担淫书之名；他又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他的《金瓶梅考证》一书，主要就是讲这两个论点。但一般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们并不都同意他的观点。首先，谁都见过他所说的那种洁本，即后来所谓古本《金瓶梅》，但那书是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的删节本，并非如朱教授所说在词话本《金瓶梅》之前就有的洁本；第二，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20世纪30年代已被吴晗反驳过，现在他也拿不出推翻吴晗论点的新论据。

不过，笔者觉得朱星先生晚年考证《金瓶梅》虽无新的突破，但他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重新掀起《金瓶梅》研究的热潮来，不能不说是个大胆的创举。近闻，新版本的洁本《金瓶梅》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星先生虽已逝世，他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商鸿逵和《赛金花本事》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商鸿逵先生逝世有一年多了。

20世纪40年代他是中法大学的教授，中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对康熙皇帝、清朝宫廷生活都有卓越的研究。据说逝世前他是北京大学教授，还担任了《清会要》一书的编辑。

我这里且不说他对于明清史的贡献，只说他年轻时所撰写的《赛金花本事》一书是部对于研究赛金花颇具价值的书。

1936年，商鸿逵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生，刘半农是他的老师。刘曾说过，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丢脸。为此，他曾和商鸿逵一同访问赛金花，由赛口述，商执笔写了这本书。为了写书，刘半农约赛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家郑颖荪家中会面，参加谈话的有戏剧家余上沅等人，商鸿逵任记录。赛金花来时，由佣妈搀扶，赛虽年近六十，但 薄施脂粉，尚绰约有姿。谈话时赛说苏州话，刘半农系江阴人，为了表示接近，也操吴语。谈到吃晚饭时刻，就共进晚餐。郑家离东安市场近，就在东安市场大鸿楼叫了几个菜。赛金花有阿芙蓉（鸦片烟）癖，晚饭后该吸鸦片烟提提精神，于是就到后室休息，烟榻横陈，喷云吐雾后再谈下去，如是者三次。

《赛金花本事》一书是赛本人口述其亲身经历，应该说有很大的可信程度。世人对赛的身世感兴趣的地方，一是她系洪状元的宠妾，出过洋，后来沦为妓女；二是庚子事变时，她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有染，传说中她与瓦德西同居三个月，一夕火起，两人裸体跳窗户外逃。对于这些情节，赛是矢口否认的。她认为这是写书人嚼舌头糟蹋她，她却承认确与瓦德西接触过数次，确曾为联军筹措过军粮，确曾劝联军勿蹂躏北京这座古城。但她要见一次瓦德西也不易，瓦德西那时已六十八岁，在联军中颇有威信，很知自重，没有同居的事。《赛金花本事》一书问世后，历史学家尹达、邓之城都予以肯定。

之后，上海影星胡蝶曾致函商鸿逵，要求商伴赛金花去沪，商量拍电影的事，被商婉言谢绝。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胡适认为研究生不该为妓女立传，要处分商鸿逵，商作了检讨才罢！

算了算，商鸿逵逝世时，大约是七十五岁。中国文坛又失一人，惜哉！

老舍巨著《四世同堂》

报载，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自改编电视剧以来，内地已有十多个省市电视台播放。报刊发表评介文章百余篇，一致赞扬《四世同堂》是“激扬爱国主义的古诗”，是“一幅热爱和平的生活画卷”，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民族艺术之花”，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这使笔者忆及四十年前老舍先生创作这部巨著的情景。那是济南沦陷前夕，老舍忍痛离开妻子胡絜青和三个幼小的儿女，只身逃亡武汉。1938年，胡絜青携子女从济南回到北平，靠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直到1943年日本兵加紧掠夺，实行强化治安，挨饿、受冻、恐怖使人无法忍受下去，胡女士才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万里寻夫，奔赴重庆。

到重庆后，一家人住在市郊的北碚。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割过盲肠，身体虚弱，新知旧朋都来探望，见到胡絜青来自北平，自然详细询问起北平的情况。胡絜青一遍又一 遍地叙述老百姓的苦难，老舍在一旁默默地听了一次又一次。谁也没想到这些活生生的材料，使他长久以来构思的一部小说在心中逐渐成熟起来，终于在1944年元旦，忍着病痛开始创作起《四世同堂》。

老舍先生原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写完这部一百万字的小说，但因他屡被疟疾折磨，常因贫血头晕而写得很慢，直到抗战胜利才写完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完成了全书的三分之二。

第三部《饥荒》是先生1948年应邀在美国讲学时写完的。然而，遗憾得很，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文革”，全书最后十三章没有发表的机会。1966年，“文革”狂飙似疾风暴雨般席卷大陆，老舍先生被诬指为“资产阶级权威”，在劫难逃，这三部珍贵的手稿也像老舍先生的生命一样永远从世间消逝了。近年出版的十三章《四世同堂》，是从这部书的英文缩写本再译为中文找补回来的，但已不是先生原来的文字了。

综观先生的一生和创作，应该说，《四世同堂》是其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也是他的心爱之作。如今成功地拍摄与播放这部电视剧，使更多的人了解这部巨著的思想含义和艺术价值，也更认识世界闻名的作家老舍先生的伟大。先生九泉有知，当可稍慰于心矣。

文事折枝

《桃花扇》诞生何处

今年是《桃花扇》首演二百八十四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这部作品“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六月也”。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1699），那年孔尚任在京任户部主事、宝泉局监铸。《桃花扇》稿成，在士大夫中间广为传抄。是秋一个夜晚，康熙皇帝急于一阅。当时，孔尚任自己的缮本不在身边，只好在别处寻得一本，午夜送进了皇宫。第二年元宵节即由优伶演出了。

其实，《桃花扇》“买优扮演”以前，在孔尚任的寓所里已经清唱过一次。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那天，孔尚任邀请好友十人集“岸堂”试笔，席间饮酒赋诗，“小伶奏新声侑之”，当时唱的就是《桃花扇》。“岸堂”是孔尚任寓斋的名字，在这座寓所里，孔尚任整整住了十一年，创作了《桃花扇》，并首次清唱了这出名曲。

那么孔尚任这座名为“岸堂”的寓所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呢？笔者在20世纪40年代曾好奇地作过一番寻觅。

孔尚任在他的《燕台杂兴四十首》的序里说：“蜗寓在宣武门外。”在另一诗集的注里又说：“寓海波巷。”他的寓址当在北京宣武门外海波巷。

孔尚任在另一首七律诗序中对他的寓所的四周围作了一番描写：“岸堂予京寓也，在海波寺街，其前分青厂，乃先朝牧马处。”其

诗云：

朝朝吟啸此堂阶，一架藤萝惬旅怀。
青草官田邻马苑，海波萧寺接天街。
更翻题句无闲壁，缓急供茶少积柴。
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

由此可见，当年孔尚任旅居北京的寓所附近，有一座海波寺，海波巷即由此得名。而且海波巷又叫海波寺街。曾经牧马的青草官田“青厂”也相隔不远。

经过近三百年的人世沧桑，笔者寻访时，北京的地图上已没有“海波巷”或“海波寺街”了，海波寺的遗迹也早已无从寻觅。但是，当时出宣武门，有西茶食胡同，再超过一条南北向的方壶斋胡同，就到了一处“寻常巷陌”，名叫海柏胡同——这是不是孔尚任住过的海波巷呢？由此踪迹，继续寻访，附近又发现几条耐人寻味的胡同：“前青厂胡同”“后青厂胡同”“西草厂家”等。尽管经过二三百年的变迁，牧马的草地已荡然无存，但那几条胡同的名字　　却说明了这里曾经是青厂、马苑。用不着怀疑了，而今的海柏胡同，在二百多年前，曾经住过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孔尚任。然而历经二三百个春秋，“岸堂”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了。假如还在的话，在那里建一座孔尚任纪念馆，想是很有意义的吧。

且说北京的“四大”

早年居京，尝闻不少称“四大”者。其中，有因艺高而得名，有因医精而得名，有因美肴而得名，有因侠义而得名，有曾卖身求荣惯会欺压人民者，因奸坏而得名。

戏曲界，有“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中医界有“四大名医”：孔伯华、萧龙友、施令墨、汪逢春。在饭馆中有“四大名居”，即广和居、万福居、同和居、砂锅居。四名居各有名菜：广和居以潘色、江豆腐著名；万福居有赛螃蟹、万鱼；同和居的拿手好菜是“三不沾”；砂锅居是白肉馆，只以一味猪肉就能制作出各种口味不同的菜肴。

以作恶而闻名的则有晚清的“四大恶少”：张君宜、岑春煊、左孝同、劳太乔。这四人都出自权门，少时依仗家庭的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时，他手下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矢志效忠段祺瑞，为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主要支柱，人 称“四大金刚”。

此外，以“四”见称的，清末有所谓“四谏”，指的是陈宝琛、张佩伦、宝廷、邓承修四人。当时以陈等为首，常在竹云庵集会，议论时政，直言弹劾，声震一时。后来陈宝琛做了溥仪的老师，更以老成稳重见称。戊戌变法时慷慨就义的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而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又称“军机四卿”，因为四人在政变前光绪帝曾授以四品卿衔，又是新政的主要参与者。

还有陈三立、谭嗣同、吴彦复、丁惠康曾号称“四公子”。其中陈、谭二人均在戊戌政变时获罪。谭嗣同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戊戌政变时，嗣同被处死，而继洵却因事先写信给嗣同有所训诫，得免于罪。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戊戌政变时，父子同受革职囚禁的处分；抗日战争爆发前，陈三立一度寄居庐山。

在袁世凯称帝时，还有所谓“嵩山四友”，为赵尔巽、徐世昌、张謇、李经义。后来，李经义在丁巳复辟前，做了几天短命的内阁总理。徐世昌在丁巳复辟的后一年，被安福国会选为非法总统。“嵩山四友”的称号，脱胎于“商山四皓”，实际上类比不伦。因为他们大多逆潮流而动，终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湖南会馆杂忆

北京南城会馆棋布。报载“湖南会馆”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有其特殊意义。

菜市口迤南的烂缦胡同内，有两座湖南同乡的会馆。胡同中间路西有曾国藩营建的县馆“湘乡会馆”，计六层院落，房数十间，南行数十步即是省馆“湖南会馆”了。

清雍正始分行省前，湖南尚无专馆。同治十一年（1872），谭嗣同之父谭继洵等人在北半截胡同购置官房一所，为湖南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又购烂缦胡同房一所，设为“湖南会馆”。民国十二年（1923）编撰之《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会馆还辖有义园二处，一处在麻刀胡同，一处在永定门外马回子店；祠堂二处，及散落于各处之房屋数百间。该馆初为湖南进京举子安顿之所，民国后渐成为湖南同乡人旅居之邸舍。

笔者素爱丹青，少小时与当时被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湖南神童陈少梅交好，少梅彼时寓居湖南会馆，因此去过几次。会馆坐西朝东，高高的石阶，朱漆的大门，门首左右有石狮一对，很有些轩昂的气势。走进大门，拾级而下，经一座长方形天井，过垂花门，即到了东院，庭院宽敞，厅舍轩朗。记得南房壁上嵌有北宋苏东坡书《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为光绪十年（1884）长沙徐树钧重摹镌刻

的。会馆西院有戏楼，雕梁画栋，相当讲究；坐北一座两层小楼，即是文昌阁了，据说旧时供奉有文昌帝君。文昌帝君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多为读书人所崇祀，故北京的会馆大都供奉有他的偶像。

那时，少梅的父亲陈梅生老先生是会馆里极受尊崇的人物。陈梅生讳嘉言，为清末翰林院编修，民国首届议员，文名闻于南北。他须髯飘飘，慈眉善目，人极开明。他曾对我说，湖南有一些青年，抱负非凡，办事极干练。当地传说，有人见到衡山上走麒麟，湖南要出大人物了。此说虽不足取，但观这些青年办事，湖南肯定会出栋梁之才。他指着文昌阁说："我们那里有个毛润之，前几年在这楼上住过。"他还提到毛向他商借他主持的衡阳书院的院址和经费办自修大学，他欣然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位毛润之就是以后成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

京城店铺话匾额

北京是个历史悠久、商业云集、店铺林立的大城市。每个店铺的正门，过去称作“门脸儿”，或称“铺面”，主人一向认为非常重要，把它比作一个人的脸面，不但要装饰得体，而且要与其所经营品种、项目相称，还得有个响亮的字号，否则，就等于有脸无眉一样。而字号必须求知名人士和书法家来书写，写好后，还要请人精雕细刻，重漆贴金，制成牌匾，这样，才能衬托店铺的名气，招人注目。

例如坐落在和平门外西琉璃厂路北的荣宝斋书店，它主要是销售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的店铺。其字号主要取“以文会友，荣名万宝”之意，其匾额是清同治年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题写的。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的鹤年堂国药店，据说开业于明嘉靖末年，距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其字号是取《淮南子·说林》中“鹤年千岁，以极其游”之意，是请当朝的宰相严嵩书写的。

同时，前门外粮食店路西的“六必居”酱园，前门外珠宝市“花汉冲”香腊铺和新街口南大街路西的“柳泉居”饭庄的匾额，据说也是出自严嵩之手。严嵩虽系奸相，书法却颇具功力。在地安门大街的“百宝书局”（取《大学》“惟善以宝”之意）、北城的金城银行、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的匾额，都是郑孝胥所写，因为郑氏当过伪满“国务总理”，为日寇侵华效过力，成了出卖祖国的汉奸，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写的匾额，都被抠挖磨毁了。

从北京的地区来看，名人写的匾额，以和平门外东西琉璃厂为多。如“宝古斋”古玩铺，系清末翁同龢所书；琉璃厂的“萃珍斋”古玩铺，为寿石公所书；“静文斋”南纸店，是大总统徐世昌所书等。

北京在日寇沦陷期间，新开业的店铺当中，它们的匾额以江朝宗、颜玉泰写的居多。其实江朝宗的字，也多是由颜玉泰代笔写的。旧时有所谓“名人嘱笔作”之说。

以上说的是比较有名气的知名人士写的匾额，还有比较小的店铺，他们请不起大名人，只好请一些小名人。如鼓楼东大街有个“裕民钟表铺”，它是请伪满教育总署一个叫厉俊峰的编审写的。

请名人题写匾额的习俗，古来有之。有的是因名而得字；更多的是因字好而得名。如今市面上启功、溥杰等名书法家写的匾额自不在话下，也有郭沫若于东单、西单菜市场和首都电影院所留笔迹。

更有较罕见的名人匾额，如辛亥革命百岁老人孙墨佛给阜成门内大街西来顺饭馆的题匾；老舍夫人胡絜青给北京幽州书屋题匾；国画家董寿平为北京医药大楼题匾；在西四北大街还有相声大师侯宝林给一家饭馆题匾，名字叫“小不点”。

隆福寺街的旧书业

近闻，经营古籍、字帖和画册的“文奎堂”已在琉璃厂恢复营业，其实“文奎堂”早年是开设在隆福寺街的。早年的隆福寺街同琉璃厂一样，也是一条旧书铺林立的街道。四十年前，这里除“文奎堂”外，尚有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粹雅堂、文雅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观古堂、宝荟斋、带经堂等书铺。

科举时代，考中做了官的，总爱在这些书市逛逛，买点书或字画之类；考不中的在返乡之前，也往往要去书市卖掉一部分书，以便轻装上路。相传有江西某氏三年应考不中，无颜回乡，便在京经营书业；以后同乡投奔者日多，逐渐形成了书业中的“江西帮”。当然，实际上在北京经营书业的人，大多是来自河北省南宫、束鹿（今辛集）、冀县等地，时人皆呼之曰“河北帮”；尤其是在隆福寺街经营书业店铺者，更以这些地方的人居多。

辛亥以后，隆福寺街的旧书业开始繁荣。20世纪20 年代中期，北平图书馆建立，从这里购买了许多书籍。后来燕京大学曾出重金收购明清两代的地方志，运往美国哈佛大学和国会图书馆，致使大量珍贵古籍外流，实堪痛惜。

隆福寺街那块狭窄的天地，也曾吸引了不少藏书家，如傅增湘、邢之襄、伦明、曹岳峻、甘鹏云、张元济等。一些文化名人、大学教授，如阿英、何达、冯友兰、俞平伯等，也是隆福寺街的常客。仅以修绠堂为例，就曾为郑振铎提供过许多珍贵资料，如带有李白画像的《李太白集》、萧尺木编的《楚辞图》等，它们对郑编插图本《中国

文学史》是有帮助的。

在隆福寺街的旧书业中，还有一种小书摊，他们坐地行商，往往是到外地用低价收购旧书，在这里零散出售。书摊虽小，书源却远及山西、山东的偏僻小镇。这些经商者多是内行，因此，书摊前也常有一些文化界名人光顾。

表面看上去这里的旧书店、书摊杂乱无章，但毕竟它是一门专业，那些店摊业主，对于古籍鉴别、修补、装订、查找、整理、上架、分类、保管等，还是很有专长的呢。

成文厚账簿店

早年的京华，账房先生有句口头禅："北有成文厚，南有老立新。""老立新"是上海的账簿商店，长江以北要数北京的"成文厚"最有名了。

成文厚账簿店开张于何时，笔者不甚了了，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有了。当时铺面设在西单北路西，卢沟桥事变前又迁到缸瓦市附近。犹记从一座牌楼式的门进去，面西三间门面，是一家极普通的文化用品商店，卖一些文具、纸张、图书，也兼卖些条子账。那时内地流行的都是这种条子账，用毛边纸或东昌纸印上红色的竖格，用毛笔自右至左书写，亦称流水账。其时卖条子账的，首推前门外的"老公兴"，成文厚是后来居上。

40年代初期，会计师贾德泉著了《改良中式簿籍》一书，介绍西方会计制度及记账方法，并在西四北路东开设了"德泉会记学校"。成文厚的掌柜刘国梁看到贾氏著述，深信西方会计制度和记账方法，将会在中国广泛应用，遂 决定经营西式账簿。他请贾氏设计了国际通用之借贷式簿籍及西式记账单据等三十余种，每种均注明设计者姓名及"翻印必究"字样。于是一些商行、洋行纷纷找他加工簿籍。

这位刘掌柜，笔者曾有缘见面。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满口山东话，人很精明。自经营西式账簿后，他的买卖日渐兴旺，并与安东（今丹东）的成文信、天津的义顺兴等文化用品商店建立起密切的业务关系。这些商店经营他的西式账簿，同时，成文信供应给他日本纸张、英国丁字笔尖、美国五五六笔尖等，义顺兴则供应给他鸵鸟墨水

等文具。

这时的成文厚，门面装潢也逐渐洋气起来。门脸上方是吴兰第写的魏碑体玻璃板金字匾额，店前立起“鸵鸟墨水”大型霓虹灯广告，店堂里一排六个玻璃柜台，柜台上方左右各悬一霓虹灯，一边写“账簿”，一边写“凭记单据”。这在半个世纪前的北平店铺中，是颇令人注目的。

怪诞有趣书斋名

学者、文人都有书斋，书斋起名林林总总，气象万千，但也有一些十分怪诞有趣。

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之兄张申府，其书斋名叫“名女人许罗斋”。这名很怪诞，不解释无人懂。

张申府是河北献县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黄埔军校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1948年10月在国共两党的军事大决战中，他撰文《呼吁和平》。1949年后供职于北京图书馆。他的书斋名“名女人许罗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名”指“名学”，即逻辑之一门。他于1927年曾把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弟子）的《逻辑哲学论》译成中文，书名即取“名理论”。“女”指《列女传》，他个人对此书有偏爱。“人”指三国时期刘劭写的《人物志》，这是一本他平生最为推崇的书。“许”是“赞许”之意。“罗”即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他认为“罗素便是 最哲学而又最科学的科学哲学家”。他还解释道：“所谓最哲学的是最能辨析精微”，“最科学是最切实，是最客观”。他说他一生有“三大爱好”，即：书、女人、名声。

著名画家申石伽的画室名叫“泛珠室”，是为纪念他早逝的小女儿而起的名。原来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爱女小畹喜欢画菊，七岁时画一秋菊，申老赞不绝口。惜一年后即病逝，他悲痛之余即将画室取名“泛珠室”，以作纪念，并将此画精裱后珍藏，从此申老不再画菊。

不幸“文革”中此画不知去向。惊奇的是1985年，著名书画家钱君匋在检查发还的查抄物品中竟发现此画，并派人送还。当申石伽获此画后，喜泪沾襟，感慨万千。随即在画上题写七绝一首云：“岂仗儿魂护到家，遗笺历劫度虫沙。凄惶四十五年过，阿父从无画菊花。”

当代著名作家骆宾基，1936年由东北至上海、浙江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主编《战旗》杂志，后由南方返回东北。1949年后任山东省文联主席。1979年，他惊闻与他一起工作的朋友周钢鸣在广州逝世，时夜阑人静，又闻大雁的悲鸣，感而赋诗云：“岭南失战友，悲坐小阳台。今宵月如水，夜静雁声哀。”自此，他即以“夜闻雁鸣斋”为书室名。

著名学者柳诒徵的书斋名叫“劬堂”。“劬”是辛劳之意，取程俱“北上小集钞，和刘子厚读书”中“谁能三万卷，慰头苦劬劬”句，借以勉励自己勤奋治学。他伏案数　　十年如一日，执笔不辍，著有《劬堂全集》。

著名画家李苦禅的书斋名叫“遗诸斋”。他早年生活艰辛，半工半读，晚间靠拉洋车来维持生计。他怕遗漏太多的学习机会，为提醒自己，要时刻珍惜时间，遂取“遗诸斋”室以自勉。

知名作家办书店

作家一生一世都离不开书，所以，作家逛书店、泡书店是情理中事；而近代和现代的一些知名作家有的也办过书店，则鲜为人知。

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当年很有名，他的代表作品《小言论》《萍踪寄语》都是由他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他因癌病逝世后，“生活书店”与“读书”“新知”两个书店合并，这就是现在仍存的资深的“三联书店”。正因为邹韬奋著述出名，办书店出名，所以现在内地新闻界设“邹韬奋奖”，声誉很高。

美学大师朱光潜，声名显赫，海内外皆知。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他也办过一家书店，朱光潜早年曾在上海创办过一家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一度主持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至今还在内地出版，发行量很大）。朱光潜创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似乎已经是他远渡英吉利海峡以后的事了。他的《文 艺心理学》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艺的理论作品，这也正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张资平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他的三角恋爱小说风靡一时。1928年，张资平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的“创造社”脱离之后，自己创办了“乐群书店”。可是，他并不细心经营，只出过他的《石榴花》和少量译作，就关门停业，他又去搞其他事去了。抗战之后，先是因汉奸罪被国民党逮捕，后又因汉奸罪被共产党判刑，终于死在狱中。

“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也办过书店。1927年，他同胡适、梁实秋等人创办了“新月书店”，他早期的《翡冷翠的一夜》《云游》及与陆小曼合著的剧本《卞昆冈》，也都是新月书店出版的。胡适著名的《白话文学史》，也出自新月书店。梁实秋因为在新月书店出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竟引发一场激烈的论战。梁实秋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结果遭到鲁迅和不少左翼作家的严肃批评。当年的这次论战，至今在文坛上还有争论。

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秘书孙伏园，曾一度为军阀所迫南下上海，创办了“嘤嘤书屋”，并主编《贡献》旬刊。但是，没有见过出版过什么有价值的书。孙伏园一生重于编辑著述无多，仅有少量散文游记，倒是他的老弟孙福熙又写又画，作品很多，至今内地仍有再版。

诗人邵洵美，从英国剑桥毕业后，回国创办了一家 “金屋书店”。他的诗集《花般的罪恶》《一朵朵玫瑰》出版后多是自产自销。他写的诗是“唯美诗”，“几乎是野蛮的直感的单纯，同时又是最近代的颓废”。

作家办书店，跟藏书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作家可以自己写书，自己出书；藏书家可以自己校勘，自己刻印，这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作家的书卖出去越多越好，藏书家则是买进来的越多越好。

清代的两次反盗版

现在，畅销书刊出版后，总有一些不法之徒盗印，以获暴利。国家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制定出反盗版对策。其实，书刊的盗版反盗版，古已有之。清初和清末两次反盗版便是例证。

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是中国古代最早提出并身体力行反盗版的人。他的小说集《十二楼》和《无声戏》影响甚广，当时购者云集，一时市面上“洛阳纸贵”。不法之徒见有利可图，竞相翻刻盗印。最厉害的是当时苏州的不法书商，正版书尚未在当地上市时，盗版书已经出台。李渔见状，非常气愤，他凭借本人名气大、交际广，亲赴苏州请苏松道台孙丕承出面，查处这一盗版事件。

但是，盗版问题屡禁不止，其中最猖獗的是金陵（今南京市）。1662年，李渔从杭州移家金陵，营造芥子园，并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芥子园书肆。这家私人出版社后因李渔组织人整理、编写并作序的《芥子园画传》而名 垂千古。面对盗版，李渔依然处于一种屡败屡战的局面。他曾在一封信中悲愤地说：

> 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清末的刘春霖，在反盗版问题上更是付出了果断的行动。刘春霖

是清代末科状元，生于1872年，卒于1942年，直隶肃宁人。他的小楷书法造诣很深，考中状元前就曾为慈禧抄写佛经，深得慈禧赏识。他考中状元的当年（1904），其好友雷雨琴将刘春霖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和《灵飞经》四种小楷墨迹带到上海拓印，印成帖本发行。这四部佛经小楷，都是刘春霖考状元前为慈禧抄佛经时的副本。

小字帖一出版，供不应求。于是，有些不法之徒为获取暴利便私自翻印出售。雷雨琴见到这种情况，请求清政府保护出版权益，对盗印者予以查办。为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出告示，警告不准翻印。告示全文是：

> 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候补清军府办理，上海公共租界理事府关，为给示谕禁事，据北京职员 雷雨琴禀称：窃职存有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殿撰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灵飞经》亲笔四种，于光绪三十年带沪付诸石印，装订成帙，批销发售。与书局订定版权，不准私自代人翻印。诚恐渔利之徒翻本冒印图利，有碍销售，附呈书样，禀乞备案。布示严禁翻印，以印利权，等据。特此，除批示并予备案外，合行给示谕禁为此示，仰各书坊铺贾人等，一体知悉。尔等毋许私自翻印前项书籍。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予究惩不贷。其各凛遵毋违。特示。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示发实帖。

当雷雨琴呈请清政府保护权益时，曾将这四部小字帖样本呈送清政府存案。小字帖的每册前第一页印有雷雨琴的半身道装肖像，最后一页印有隶书大字“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由是，制止住了盗版。

印有李白名篇的钞票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成立军政府，发行地方性货币；其后民国成立，但由于新旧军阀混战，各省又先后印铸发行了地方性的银两票、银圆票、金币、银币、铜币、钱票、铜圆票、军用票、公债券等，以资流通而利军需。在这一批名目繁多、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琳琅满目的货币文物中，有一张印有李白名篇的钞票最为奇特，堪称绝品。这张钞票就是云南省发行的“云南靖国军军用银行兑换券”。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在云南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云南都督唐继尧为护国军政府都督。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因袁世凯的自毙宣告结束。在此过程中，云南实力派唐继尧接过孙中山关于“宜设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担任”的通电，扩张军力，自号为“云南靖国联军总司令”，成立了靖国军军用银行，发行了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 兑换券，流通市面。它没有收兑的期限，也没有发行条例，一切都由军用银行负责。

这批钞票有两个特色，一是钞票上的官印多，计有“靖国联军总司令官之章”“云南督军章”“督军官署军需课长印”“军用银行长之印”“陆军官署军需课长印”“军用银行行长之印”“陆军军需局局长之印”，在一元券背面有“继尧”的签字（俗称花押），五元、十元券也有中文签字，笔致苍劲，显系不是一般人的手笔，但尚未查出是何人所签。

第二个特色就是券的背面印有一方很大的朱色篆刻印章，印文竟是唐代大文豪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全文：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文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后接“时在壬申季夏上浣制”数字，合计一百二十六字。

此印何人所刻？为什么要在货币上印上这篇流传千古的散文？迄今还是一个谜。笔者臆断，从唐继尧兼长诗 文、并酷爱李白的文学作品的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唐继尧这位执掌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的主意。唐著有《黟陆主人言志录》诗集，所作《七月黑龙潭养疴》诗：“秋来何时怒龙鸣”“日驭回天鞭有力”，就出自李白《独鹿篇》中“雄剑挂壁，时作龙鸣”、《长歌行》中“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等句。又如其作“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诗句，更是援用了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浮生若梦”名句。

云南靖国联军为期不长。随着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失败，这批军用钞票也随着靖国军的结束而绝迹了。

集邮戳票多趣味

中国幅员辽阔，各处地名，名目繁多。收集地名戳票，是中国邮人固有的韵事，而这其中的乐趣，亦非他国人所可梦想。

集地名戳票趣味多多，更有根据地名、字意的异同分成不同类别，如：

倒对的地名：西安，安西；东安，安东；福安，安福；广安，安广；宁安，安宁；方向的地名：北京，南昌，西安、东安，北苑，南宁，西宁；

树木的地名：榆林，桐柏，枣强，柳泉，梅桥，木兰，桃木，桂东；

颜色的地名：白水，乌海，青岛，赤水，黄石，黄岩；

金属的地名：金井，金村，铁山，铁岭；

动物的地名：虎林，鹿邑，马尾，牛庄，鹤庆，鸡泽，龙潭，凤翔，凤凰城，羊角沟；

数字的地名：一面坡，二廊庙，三姓屯，四平街，五 里店，六家子，七树庄，八角台，九江泡，十间房，十二墟，二十四顷屯，百官，千金寨，万县；

累字的地名：大沽，小站（二字）；佳木斯，吐鲁番，桃思兔（三字）；巴彦乌苏，齐齐哈尔，和睦井镇（四字）；哈拉木格台，

苏尼特左旗，冯郭楚王村（五字）；乌布林家拉嘎，郭尔罗斯前旗，天津宫保马路（六字）等。

邮戳票中被视为珍品的当属“元年戳”。

百年之前，由于朝代更替，在邮戳上共出现过三种元年戳，即宣统元年戳、民国元年（1911）戳、洪宪元年戳。在中国早期邮票中，这三种元年戳虽屡见不鲜，可是在邮戳上加植年号却极为稀罕。如有“洪宪元年”字样的邮戳存世量极少，有“民国元年”字样的邮戳更属凤毛麟角，而有“宣统元年”字样的邮戳迄今尚未发现。

集邮家张赓伯对此进行过专门考证。刻有“光绪”“宣统”年号的邮戳是有的，通常见到的均为长方形木戳，寄发、到达的年月日空格由邮局人员用毛笔填写。此三种元年戳，如果带有年号，自然易于辨识，但常见的元年戳都无年号，这就需要联系盖有元年戳邮票的发行年月等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了。如盖在帆船邮票上的元年戳，必定是“洪宪元年”戳，因为帆船邮票在民国元年尚未发行。盖在加盖“中华民国”的蟠龙邮票上的元年戳是民国元年戳固不待言。

三种元年戳中，“洪宪元年”邮戳为时最短。袁世凯　　继孙中山之后，出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犹不满足，又僭称皇帝，篡改国体。这个短命的洪宪王朝，只有八十三天，在邮政中上却留下了它的痕迹。“洪宪元年”邮戳，将五年改元年的邮戳几乎各地皆用，所以在民国邮戳中，从民国五年（1916）1月1日至3月24日这八十三天的邮戳便断缺，反而求之不易了。这是由袁世凯称帝造成的一个小插曲。

众所周知，宣统皇帝在位三年，清政府就被推翻了，但有“宣统九年”的邮戳。民国六年（1917）6月14日，张勋以入京调停时局为名，乘机通电复辟，并由张公布上谕，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阴历五月三十日，定君主立宪国。但遭到全国讨伐，至7月12日，这一幕复辟丑剧便以失败告终。故此种复辟日戳，实际使用仅三五天而已。

如今这一邮戳已价值连城，甚为珍贵。

“书乡”自古出人才

位于赣、皖、浙三省交界处的江西省婺源县，历史上原是古文化发达的徽州八县之一，这里历代文风鼎盛，人文蔚起，代有名流。据史料记载，自唐宋以来，婺源曾先后涌现出文人五百四十六位（指中进士者），出任仕宦的达二千六百五十五人，文人仕宦列入《中国人名大辞典》的有一百五十多位，著作二千一百八十多部，其中选入经、史、子、集四库全书者一百七十五部。

在婺源县龙山乡坑头潘村一幢明代建筑的“尚书第”内，有这样一副对联：“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一查，原来在明朝一代，该村有一户人家竟出过四位尚书，十一名进士。再一查，该村从明成化到崇祯的二百多年中，中进士的就有四十人之多，一百多户人家，平均四户出一个。一时间，该村冠盖云集，钟鸣鼎食，车来人往。当时，族人为了炫耀本族的显贵，制定了一条族规，凡族中各堂各房出了九品以上的官员，允许在村中溪河上建圆洞 拱桥一座。结果一算，九品以上的竟多至百位，那得建一百座桥，于是，便改为七品以上，一算，也须建三十六座之多。据说现在，这三十六座圆洞拱桥依然保存完好，成为当地人值得炫耀的一大景观。自明以后，这个村子一直人才辈出，清朝出了三十七位进士和举人，有的官位达到二品，民国年间出了三个留学生，台湾著名红学家潘重规就是该村的后裔。

婺源不独人才辈出，且有不少是出类拔萃、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物。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和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此外，像宋代被称为“江南二宝”的文学家胡伸、汪藻，明代金石篆刻家何震，清代天文学家齐彦槐，经学家和音韵学家江永等人，都是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人物。而在近代和当代，婺源籍的教授、专家、学者更是数以三四百人计。

古人云：婺之山水，精诚抽毓，灵秀所钟，系文人发脉之地，墨皇浩瀚之邦。千百年来，婺源一地，能够孕育出众多如朱熹、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物，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婺源自古有“书乡”称誉，所谓“山间茅屋书声乡”，“读书风气甚浓，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民间历来重视教育和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自宋至清，婺源县内除有规模较大的紫阳、福山等书院二十余所外，类似当时书院集贤讲学的县学、医学、义学、精舍、书塾、学社遍布乡里，这 为婺源养育了大批的人才。古文化的发达，也使婺源自唐宋以来就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唐代李白，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亦游于此，该县的游览胜地灵岩洞群至今仍保留有历代名人的题词刻墨两千多处。

两通“家训”昭后人

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的家长们用于训诫、教育子弟后代的文字，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和解说。从周文王的《诏太子发》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家训很多，诸如诸葛亮的《诫子书》，陶渊明的《与子俨等书》。隋唐出现了《颜氏家训》《帝范》。宋以后古代家训全面繁荣，如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司马光的《家范》与《家仪》，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朱子家训》，《郑氏规范》，《温氏女训》，包拯的《戒廉家训》。清代曾国藩的《教子书》，左宗棠的《致孝感、孝宽》，张之洞的《与儿书》等。

综观大量家训，笔者认为北宋包拯与民国时期于右任的家训最为深刻动人。

包拯在历史上以刚正清廉彪炳史册。这位“包青天”一生严于律己，秉公执法，晚年回到老家合肥，想到铡了犯罪的亲侄包勉，应让子孙后代引以为戒，坚持延续包氏 家风。于是把夫人、儿子、儿媳叫到病榻之前，谆谆告诫：“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东壁，以昭后世。”因家训内容辞正言切，已载入《宋史》。此家训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出于公心，故光照千古。

于右任逝前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达三十四年。他比包拯晚死九百

多年，思想境界大大高于包拯。他是草书大家，在花甲之年用草书致信其子望德，现摘录部分：

> 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至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国事到为难处，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术，皆涉空想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于痴人吃狗粪。汝此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过。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

这份手札《家训》，现藏淮阴市博物馆，写于1937年，计二百四十四字。在国难当头之际，日寇长驱直入逼近南京，于右任想的是国家，痛苦的是“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术，皆涉空想想”。指出“学无用之学，等于痴人吃狗粪”。哲理极深，昭示后人。遗训训诫儿子 要节俭，“也可以减少几文开支”。最后谈到个人前途，愿儿孙继承复兴大业，世世代代为中华繁荣昌盛而坚持不懈地奋斗。

两通“家训”的时代虽然相差九百多年，但都是一心为公，尤其后者，更跳出了“小家”的圈子，伸张了民族大义。

话说鸳鸯蝴蝶派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期间，上海的一些作家，以成双的鸳鸯和比翼的蝴蝶为比喻，专写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小说，形成一种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流派。

这一流派的成员，以江南、特别是苏州文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创始人有徐枕亚、关双热、李定韦等人，以《小说业报》《小说新报》等期刊为中心，大量发表以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后来又在上海出版一种夹用白话文的《礼拜六》周刊，销路极广。当时，上海两大报刊《申报》《新闻报》副刊的主编和写作者多数由这一派文人操纵。其他如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范烟桥主编的《珊瑚》、严独鹤主编的《红玫瑰》等杂志，也都属于这一流派。

后来，这一流派的文人及著作又闯入电影圈，取代了中国电影创始初期的文明戏。据知，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影片六百多部，其中大多数由该派文人编剧，或 者是根据他们的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1924年，明星影片公司郑正秋根据徐枕亚的小说改编的《玉梨魂》，就是这一流派的第一部搬上银幕的作品。

提起《玉梨魂》，还有一段趣闻。当时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刘沅颖，读了轰动一时的《玉梨魂》后，竟着了迷，于是写信给徐，要拜他为师。从此，两人诗书往还，鱼雁传情，以致终成眷属，传为佳话。

鸳鸯蝴蝶派文人中，享誉最高的，当然要属张恨水了。多产作家张恨水生平创作的小说超过百部，而且大部分都是长篇。他的小说也多数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出版的。张氏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也有多部，最有名的是《啼笑因缘》《似水流年》，后者还是作者亲自动手改编拍成电影的。其余风靡一时的，尚有《金粉世家》《夜深沉》《秦淮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欢喜冤家》等等。

鸳鸯蝴蝶派创始初期，是三五友好，在茶余酒后，利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而后形成一种文学流派。“五四”运动后，该流派一些早期作家先后退隐，然而影响还在，故崛起不少新人，他们在上海控制了很多报纸副刊和杂志，作品也多数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再汇编出版。

1931年，鲁迅在一篇题为“上海文艺一瞥”的讲演中，对鸳鸯蝴蝶派作了抨击，指出这种流派是才子和佳人的小说。对鲁迅的批评，鸳鸯蝴蝶派中大多数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属于这一流派的。然而从作品来剖析，实属此种类 型。当然，鸳鸯蝴蝶派也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作品也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如张恨水等所写的小说，不仅在当时受到读者的欢迎，时至今日，仍然拥有相当市场。而在中国电影早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能打进电影圈，编写了许多反映时代气息和历史风貌的题材，打破了文明戏的控制，应该说，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还是占有重要一页的。

摄影初传紫禁城

中国最早的摄影术是从清宫开始的。大约19世纪中叶才从西方传入，当时欧美国家的照相技术已臻成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外国摄影师及爱好者，先后把摄影术带进了中国。对这一新奇的事物，清室的王公大臣是由惊异转为赞美。兵部侍郎崇厚在《脱影奇观》序中称之为：“开数千年不传之秘……”刑部尚书崇实也赋诗称绝：“光学须从化学详，西人格物有奇方。但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无遁藏。”

在咸丰、同治年间，清宫中学会照相和留过影的人寥寥无几。人们熟悉及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肖像画。当时清统治阶层一度把照相视为异端邪术，排斥于紫禁城外。他们认为，用镜头对着皇帝、后妃取影，乃是冒犯龙颜，有失体统的逆举。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同治七年（1868），办理洋务的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䜣，请英国的约翰·汤姆森为他拍照。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　奕环受命总理海军事务，于是年4月赴天津巡阅海防，让人照了一些相片，由醇亲王进呈皇帝御览。这样，摄影照片便首次进入宫中。

紫禁城内最早尝试摄影的人，当属光绪皇帝最宠爱的珍妃。她十三岁入选进宫，聪明美貌，性情淳厚，能书擅画，与光绪意趣相投。当时摄影术传入中国虽已有数十载，但在宫中仍属严禁之列，珍妃却对照相独有偏爱，兴趣极浓。她不顾慈禧的淫威，捷足先登将摄影术引入宫闱，实属难能可贵。

光绪二十年（1894）珍妃暗中从宫外购进一套摄影器材。每天给

慈禧请完早安之后，便一头扎到她的寝居景仁宫潜心研习摄影。据当年光绪大婚充任喜婆、后伴随珍妃左右的宫女刘氏回忆：珍妃不仅自己喜好摄影，也给光绪皇帝照相，还教太监使用照相匣子。而且她拍照时任意装束，姿态各异。但好景不长，此密外泄，慈禧闻之命用板笞打珍妃，并将她身边两名太监发配黑龙江充军。豆蔻芳龄的珍妃又自解私囊，暗使身边一姓戴的太监出宫，在东华门外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不久，此事又透露出去，并被光绪的皇后隆裕密告慈禧，当即将太监传来严讯。酷刑之下，戴隐瞒不过，和盘招出，当场被乱棒活活打死。珍妃也被囚禁起来。

由于珍妃“屡次犯上”，“违背祖制，大逆不道”，再加之隆裕皇后的妒忌，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于庚子年八国 联军入侵皇室外逃之前，下令将其推入井中溺死。

慈禧虽然以残酷的手段严厉扼杀了清宫早期的摄影活动，她晚年时却突然心血来潮，对照相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传旨在颐和园乐寿堂前搭席棚，以布景屏风为衬，按寝宫内御坐间的豪华制式加以摆设，进行拍照。并将其中得意之作放成巨照，着以色彩，嵌入镜框中，悬于慈禧寝宫内。

应该说，珍妃无疑是清宫早期进行摄影活动的第一人。

风流遗韵话南社

清末民初的著名诗社南社，诞生于辛亥革命前。该社成立于苏州虎丘，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诗人二百余人参加。民国以后，发展至一千余名社友。其中名人有于右任、邹鲁、叶楚伧、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陈范、苏曼殊、黄宾虹、胡朴安、马君武等，后期加入的，还有蔡元培、陈望道、曹聚仁、徐蔚南等，都是文化界的一时名宿。

据高天梅的回忆，南社创立的动机是以文字革命为旗帜，而意识不在文字之间。盖因当初社友均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认为一般入同盟会者，爱国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倡立南社，借以加强同盟会会员的文化素养。

马君武的寄南社同人诗最足代表南社的艺术主张。他的诗写道：

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
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

柳亚子的《金缕曲》词则代表了南社社友的反清意志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他写道：

宾主东南美。集群英，哀丝豪竹，酒徒沉醉。指点湖山形胜地，剩有赵家荒垒。只此事从何说起？王气金陵犹在否，问坐中谁是青田子？微管业，付青史。大言子敬原非戏，论英雄安知非仆，狂奴未死。铁骑长驻河朔靖，勒石燕然山里。算才了平生素志。长揖功成归去日，便西湖好作逃名地。重料理，鸱夷计。

南社社友的诗，不同于遗老或士大夫的酬唱之作。他们在文学上也自有见解，提出过“诗唱唐音，不尚西江；文喜掞藻，亦非桐城，不树宗派”等有见识的话。有部分社友则喜效当时颇有影响的龚自珍体，发扬所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风格。南社之词则以宋代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为榜样，抒写感慨，以激发民族精神为主。与当时崇尚形式的同光体诗派激战甚烈。

辛亥革命前后，在以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之下，创办报纸，出版刊物，鼓吹革命，宣传民众，拥护共和之声浪，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势如潮涌。在数十家报刊中，其创办人、主持人、编辑和负责撰述重要文稿的南社社员，计有百数十人，故南社荣获同盟会宣 传部表彰，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

“五四”运动兴起后，南社迅速分化解体，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征等人先行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后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与之联合，于1923年在上海成立“新南社”，旨在推动新文化运动，社员有两百余人。廖仲恺、何香凝、朱季恂、沈定一，还有新文学家沈雁冰、教育家杨贤江等人，也是它的成员。

翌年，主张保存国学的部分南社社员，以傅熊湘为首，又组织了个“南社湘聚”，参加者百余人，其中有的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有的主张新旧文化兼容并包。

1935年，为纪念南社“借诗文号召天下，鼓吹革命”的精神，由柳亚子出面，联络南社、新南社的部分社员，又成立了“南社纪念会”，并吸收了社外热心支持者蔡元培、章乃器、钱昌照、曾虚白、赵景琛、刘海粟、黄苗子、郑逸梅等人参加，会员近四百人。

南社经数十年的沧桑变故，社友大多作古了。记得最后一次的聚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春。由于右任先生在重庆曾家岩陶圆约集了柳亚子、刘成禺、陆丹林等十余位南社旧友午宴。于老即席分赠他新印的《标准草书》，并亲自写了二十件屏联，由客人自选，当场加题上下款面赠。风流遗韵，四十年前事，恍如昨日。

一次面向农民的文物展览

1941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在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联合举办了一次面向农民的特别文物展览，当时颇为轰动。消息传开，吸引了在重庆的郭沫若、江安国立剧专的曹禺以及流寓成都、乐山、宜宾的社会名流，纷纷专程赶赴这个西南小镇参观、研究。

“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何故要在李庄举办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展览？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李庄位于长江之滨，距宜宾十九公里，有“万里长江第一镇”之称，李庄历史悠久，是四川省的历史文化名镇。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沦陷区机关单位、学校内迁，李庄便成为理想的选择地。因此，自1939年起，陆续有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迁入李庄。这样，在当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教学和科研，一大批名人如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梁思永、李济、吴定良、周均时、 童第周、丁文渊及外籍教授等会聚到了李庄。

那时的李庄，还是一个民风淳朴、民智不开的地方，人们孤陋寡闻，思想守旧。同济大学于1941年3月开课，医学院开设有解剖课，当地菜农出入这些院落，给他们送菜、干活等，解剖用的人体和研究所的研究院对古人类骨骼、化石进行研究的情景难免被他们窥见，于是“‘中央’研究院吃人”谣传便在附近农村传开来。

时值春夏之交，天气多雨，“中央”研究院所在的张家大院有几处漏雨，便请了几名民工上房检漏。当其将人类体质研究所的大房子瓦揭开时，透过瓦格，猛然发现室内一具具白骨，一些戴眼镜的人围着这些人骨不知在做什么，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面色如土从房上连滚带爬地跌下来，边跑边喊：“‘中央’研究院吃人了！‘中央’研究院吃人了！”

事情非同小可，这不仅关系到众多科学家的安全，且关系到“中央”博物院上千箱文物及中央研究院十几万册图书资料的安全！情况迅速报到专署，再转报到了内政部。研究会上，傅斯年等专家学者认为，过不在民众，实乃内地偏僻、教育落后，民智不开所致。何不启发民智，公开举办一次科学展览，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此建议得到与会首脑人物的普遍赞同。

于是，经过精心筹备，举办了一次以当地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文物展览，展出内容有古代战车模型、古代兵器、 历代衣冠甲胄、国外进贡的文物和文表以及引起无知民众误解的出土的古人类骨骼和化石等。以李庄偏僻小镇之民，如何见过这等档次的珍贵展览？立即轰动四方，远至成、渝两地之学者、学生均络绎不绝地前往参观、研究。“‘中央’研究院吃人”的谣传便不攻自破。以后，这样的展览还举办了多次，在同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时，还同几个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了一次科普展。这在当时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学府剪影

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

从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可以看到，由国家办学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据《礼记》记述，西周国学盖由前代学制发展而成，可见在两千年以前，中国就设立国学了，西周时，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就有大学和小学，周天子所设的曰“辟雍”，诸侯所设的曰“判宫”。西汉时更是大兴太学，晋武帝时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亦设国子学或设太学，北齐改名为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大学、四门等学。炀帝时又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仍袭前制。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等，亦分别称为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设学部，国子监遂废，虽然历代学制有所变化，名称亦有不同，但国子学或国子监都具有最高学府的地位。北京的国子监建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明初建都南京，在南京鸡鸣山下建国子监，洪武年间，北京的国子监改为北平 府学，至永乐时迁都北京，乃改北平府学为国子监，故南北两监并存。到了清代，废南监，北京国子监就成了清代唯一的最高学府了。

北京国子监设在东城安定门内成贤街路北，建筑宏伟，房舍达数百间，主要建筑有集贤门、太学门、琉璃坊、辟雍、泮池、彝伦堂及二厅（绳愆、博士）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还有御书楼和敬一亭。监外附近设有学生宿舍“斋号”几百间，所设的职教诸官有祭酒、司业、监承、博士、助教等。皇帝有时还亲自到国子监去讲学或视察，叫作“临雍”或“视学”。学生称为监生，据史料载，明代天顺六年（1462）在监的学生达到一万三千多人，此外

还有“外番”（外国）留学生，如高丽（今朝鲜）、琉球、日本、暹罗（今泰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派来过学生，还有当时的蒙古，也派来学生，但不算“外番”，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国子监规模之大，学生之多，颇为可观。

国子监作为古代的最高学府，在社会上是极受人尊重的。皇帝就叫人在成贤街的两端，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在石碑上：“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车马都得停下来，只许步行而过。

作为封建主义的高等教育，自然以孔子为鼻祖，以儒教为宗旨，所以在国子监东侧建了规模相似的孔庙，与国子监连为一体，整个庭院真是翠盖撑空，苍苔绣径，庭 阶肃穆，风日幽闲。在这里，为封建王朝培养出大量的人才，仅在国子监里竖立的清代进士题名碑上，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至道光十三年（1832）癸巳补行正科止，共有进士一万九千四百多名，固然平均起来每年只不过一百多名，但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最主要的“仕途”了。因此，就曾有过这样一位名叫黄章的儒生，他快四十岁了，还只是一个博士弟子，六十多岁才进入大学。康熙年间的一次考试时，他已到了百岁之年，大概是感于夙愿未偿而又壮心不已，便让他的曾孙子提着灯笼，并在灯笼上着意写上“百岁观场”四个大字，颤颤巍巍地来到国子监，这样可笑的事情在当时却被当作佳话来颂扬哪！

国子监除了它的宏伟壮丽的古建筑外，重要的文物算是它的藏书和石刻碑文了。它所藏的书很多，最珍贵的是历代铁制（皇帝批准的）版本，有的是稀世典籍。它的石刻也很多，但最珍贵的是石刻十三经和十石鼓文，中国历代曾有多次大规模的刻经，但不齐全，而且因年代久远而诸多失散以至湮没，残留无多。唯清代的石刻十三经尚完整无缺，它是由江苏金坛贡生蒋衡用十二年的时间，楷书写成的，后来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起，用四年时间刻成的，共有刻碑一百八十九块，约六十三万字。

十石鼓文是在十块鼓形石上。分别刻一首四言诗，歌颂秦国君游猎情况，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历来对其书法评价很高，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大多剥落，清高宗 时曾重新收集。并新刻十鼓，谓之“国朝石鼓”。

据闻北京国子监原址。20世纪50年代经过修缮后，办了一个“首都图书馆”，藏书及文物皆妥为保存，那幽雅静谧的环境对于读书人来说，倒是值得向往的难得所在。

昔日北平五大学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笔者当年在北平上大学时经常听到的几句歌谣。

有人认为，这歌谣指的是当时的一些名门闺秀或某些女学生的择婿标准。按如此说，则北大、师大、辅仁皆难入选；只有燕京、清华可以“通融”。

其实，这歌谣如仅仅是指择婿标准，绝不会流行得那么久远，妙在寥寥几句，又恰恰概括了这五所大学的特点。

提起“北大老”，确是如此。北大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前清的译学馆，即使在全国的高等学府中，也算得上是老大哥。倘若到北大去看看，学生的年龄也比别的学校大。这是因为北大一向没有严格的点名制度，谁都可以坐进去旁听。这些旁听生有的已经工作多年，年龄自然大一些。这样出出进进，就很难分清谁是正式生谁是旁听生了。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提到的柔石，　　后来以办《世界日报》出名的成舍我，都曾做过这样的旁听生。

“师大穷”：师大学生是免费入学，这就给那些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学生开了方便之门。那时，北平的大学生多，没有钱而想到私立中学兼点课的也多。有些私立中学就乘机压价，教一小时课，一般不过两毛钱左右。有些师大同学为了两毛大洋，风尘仆仆，来去匆匆，就更显得师大穷了。

“辅仁是座和尚庙”：辅仁属天主教会，既是天主教，当然男女有别，只收男生不收女生。至于“七七”事变后，于校外另设女部，那是后话。学校不但没有女学生，工作人员也没有女的，真是目不斜视，修身养性的地方。此所谓“六根不净莫报名”也。

燕京、清华，一个由美国教会捐款，一个当初由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建校。清华校园内不但清幽宜人，还有时髦的游泳池。燕京则有秀丽的未名湖，湖畔还有条“情人路”。往远里说，清华通过研究院有横渡太平洋镀金的希望；燕京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有时可以直接送学生出国；终南捷径，人人艳羡。也难怪有些女士在择婿标准中，把燕京、清华的男士放在优先地位，此所谓“燕京清华好通融”也。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当年五大学同学，天各一方。每一念及旧日同窗，则水木清华，影事犹存；未名湖 畔，踪迹尚在；红楼的旧梦依稀，什刹海的蝉声在耳，怎不令人思绪万千，三复低回！

水木清华八十年

清华，是北京学界中的“天之骄子”。“庚子”一仗，中国给“八国”赔款白银四点五亿两。美国应分到三千二百多万两，合美元两千四百多万元。美国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分三十年“退还”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当时正是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领学部的时候，他是讲洋务的元老，于是外务部和学部合议，以此款选派人才留学美国，并在西部清华园兴建校舍，筹办“留美预备学堂”。1911年春学堂建成，因校舍在清华园，便叫“清华留学预备学堂”，分中等、高等两科招生，考生名额按省分配；1921年停办中等科，1925年改为大学，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校园的景色是极美的，人们以“水木清华”四字来赞美它。这四字出自南朝人谢昆《游西池诗》中的句子：“水木湛清华”，清华园是当得起这句诗的。北京西部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玉泉山一股水流至瓮山（即今万寿山） 下一大片平原上，不但形成了粼粼碧波的昆明湖，而且形成一个小小的水网地区。早在明代，万历生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侯李伟，就在这里修了一座大花园，因其有水有木，景色宜人，便用谢昆这句诗，名之为“清华园”。从此，西郊留下了“清华园”的地名。到清代雍正、乾隆之际，以“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为首，在这片小小的水网地区，建起了一个园林群，有澄怀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镜春园、熙春园等。清华大学即建在“熙春园”的旧址上，至今已整整八十年了。

清华在“七七”事变以前，每学年招生，报名人数大约都有几千人

左右，而录取只是四百名。不要看比例数不大，要知道这几千名报名者，都是各地的高材生，因清华录取标准较高，不具备一定水平的人是不会报名的。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在这几千人的角逐中，要高登金榜，可想是多么不容易了。20世纪30年代初，是旧时清华角逐的鼎盛年代，当年荣登金榜的得意少年，现在都已是古稀之人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师生负笈南行，先是到湖南长沙，再是到云南蒙自，最后在昆明，和北大、南开三校组成西南联大，直到抗战胜利后复校。

“清华园”走不了，留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敌人一度把它作为日军医院，在体育馆里喂养战马，在明斋、新斋等处住伤兵。在那些年代里，工字厅前的丁香、海棠 含泪；静斋南边荷塘中，菡萏萎谢，翠盖凋零；礼堂的罗马式的圆顶默默地对着燕云；图书馆前的意大利式大理石台阶上，再没有夹着讲义的人站在那里眺望西山落日。旧日的工友，不少都住在附近的成府街上，有些没有跟着流亡到昆明，他们见到人就想说说清华昔日的繁华。

抗战胜利，“清华人”又回到了清华园，一别九年的清华园，又是水木明瑟，花柳宜人，闹闹嚷嚷，弦歌不辍。

清华，清华，这所已有八十年历史的高等学府，“水”涓涓而不息，“木”欣欣以向荣，正如二六级校友赠给母校的那幅大匾上所书“人文日新”。她是永远不会老的。

清华的毕业生，估计应不少于五万人，可以说遍及世界各地。最早的老前辈，如以年龄计算，都是近百岁的人了。不知现在还有几位姗姗玉骨犹驻人间，在此谨向他们寄以遥远的祝福吧！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人”，现在都是九十岁的老人了，还有不少健在者，而且有的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呢，如陈岱孙老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1920年毕业于清华，现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听说不久前，北大为他举行了任

教五十四周年和八十寿辰的庆祝会。此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赵访雄，也都是20年代的清华毕业生。

30年代的清华人，那就更多了。年纪大的，七十来岁，年纪小的，也有六十多岁了。至于六十岁以下的，那 在清华校友中，还是小弟弟呢！

说清华的校友中人才济济是当之无愧的。著名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很多，科学家如竺可桢、段学复、叶企孙、萨本栋、钱三强、张子高、杨石先、梁思成、钱伟长、吴仲华等；文学家如洪深、闻一多、曹禺等，语言学家王力等，都是大名鼎鼎，卓有成就的人物；此外，一些知名的学者如熊庆来、华罗庚、马寅初、朱自清、吴有训、陈寅恪、钱学森，以及现在美国的学者赵元任、李政道、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任之恭，也分别是清华各期学生或培养的公费生、资助生。清华的成就及其贡献之大，在中国各学府中，可说是屈指可数的。

水木清华八十年，清华的游子怀念着西山的秀色，怀念着清华园的涓涓流水和葱茏草木。春天到了，工字厅前的丁香和海棠，又是烂漫枝头的景象了吧。

难忘的燕园之夏

溽暑炎夏，常使我想起四十多年前，留在燕大过暑假的生活来。那一段燕园度夏，终生难忘。

燕京大学的校园夏景是美丽的，眺望西北，有隐隐约约的西山，勾抹出一片远景；颐和园的万寿山佛香阁，圆明园废墟的断壁颓垣，点染为清晰的近景。清华园校舍高楼和燕大的水塔遥遥对峙，成为北京西郊这两座最高学府的标志。在燕园之内，东大地、燕南园的幢幢洋房与西侧的蔚秀园、北面的郎润园等古老园囿相配合，簇拥着校园内的楼台亭轩、湖光塔影、蔚绿青翠、树影婆娑，真是处处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那一年暑期，我住在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北楼。黎明起床，迎晓风，戴残月，先跑到临湖轩南面的球场上玩一会儿网球，然后回宿舍沐浴，早餐后，又到湖畔垂钓，待到艳阳爬上坡，略有热意，便收拾钓具而归，这时正是8点多钟，该是工作时间了。乃去图书馆，查资料、填卡 片，伏案疾书，撰写文章。

午后，在去图书馆之余，偶与留校同学结伴，骑车去颐和园龙王庙天然游泳场游泳，其时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正在那里任场长，这位田径赛元老的体态已发胖了。有时会遇到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他暑期生活是清晨骑马郊游，午后也来游水。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和我们青年同学一起游到石舫。

晚饭后，有时去燕南园教授住宅楼拜访邓之诚、齐思和诸教授，

观赏邓老珍藏的清末民初风物照片，聆听齐老谈古论今。这都非平日上课时间所能享受到的文化陶冶，时或去朗润园拜访吴雪川教授。吴老是清末翰林，在燕大是挂名校长，也给学生讲几篇古文，孤身一人，有个孙儿也不在膝下，可是门生甚众，不断有人前去承欢。他一见学生来便放下手中的书卷或正挥毫题字的笔，欣然畅叙起来，虽已白发苍苍，还是不谈到深夜不散。

新闻系主任刘豁轩，他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曾在天津《益世报》任过多年总编，与主笔罗隆基珠联璧合，把《益世报》办得有声有色。离开《益世报》后，即到燕大新闻系任教，他是我的良师益友，那个夏季，我是常去拜谒的，有时也在园内巧遇。

时光匆匆，一去已是四十三年。负笈燕园的游钓乐趣，培育我成长的良师硕德，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忘怀的！

张伯苓的一次讲演

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经常邀请名人到校讲演。校务长司徒雷登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朋友，有一次他把张校长请来了。记得讲演那天，听讲的人特别踊跃，因为张伯苓的声望太高，谁都想见见这位名人，听听他的高论。

等他登台开讲，人们一听他满口天津腔，语调平淡，缺乏名人讲演时的气魄和博学的派头，有些失望。甚至交头接耳之声竟压不下去。但是，听了一段之后，大家被他所讲的内容吸引住了，逐渐安静下来。

他讲着讲着，忽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团绳子，叫了五名同学走上讲台，分别站在他的左右和面前，把绳子的五个绳头拉开。每人拿一根绳头；五根绳子的另一端，则握在他自己手里。然后。他喊了一声："拉！"五个同学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向外拉，结果，却被他一使劲，把五个人猛拉得都向里进了一步。大家莫名其妙，只以为是炫耀他有力气呢！但他哈哈大笑说："不是我力大，是因为你们没 有团结起来朝一个方向使劲，力量分散就没劲儿了！如果你们站在一起向一个方向拉，力量集中，我是绝对拉不过你们五个人的！"台下听众恍然大悟，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掌声才住，他又接着讲："中国人为什么受外国人的欺侮？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团结，不心齐。一盘散沙怎么会有力量呢？"

掌声又热烈地响了起来。

那天，他还讲他是如何办南开中学、大学和小学的。他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学费收入有限；从修建校舍，购置设备，到经费开支，都是募捐来的。”

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不偷，不骗，不抢，只靠到处求助，到处化缘。”

天津名流严范孙、芦木斋和徐世相等人，在南开创办初期，一次就捐过白银两万六千两。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芦木斋捐款建造的，所以叫“木斋图书馆”，后来在“七七”事变时，被日寇飞机炸毁了。

张伯苓为南开募捐立过不少名目。他募集奖学金，一次就募到七万元。只要有人肯于解囊相助，他都乐于接受。江苏督军李纯捐过六十万大洋，他用来修建了“秀山堂”大楼。后来也随“木斋图书馆”一起被日寇炸毁。

张校长生活俭朴，全心全意办学，连他做寿日得到的亲友送来的祝寿礼款，也拿出来添补学校的经费。

协和医院话沧桑

“协和”这个名称在北京存在七八十年了。翻阅民国八年（1919）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实用北京指南》，就载有“协和医学校”，地址在东单牌楼石牌坊南；“协和道学院”，地址在鼓楼西大街；“协和女子大学校”，地址在灯市口佟府夹道；“华北协和女医学校”，地址在崇文门孝顺胡同。但是在医院栏内，没有“协和医院”的名字。可见在六十六年前，这家在20世纪30年代名闻中外、有远东第一大医院之誉的“协和医院”尚未诞生。

“协和”学校也好，医院也好，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同后来的燕京大学有密切的联系。教会也有很多派系，如“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协和”“燕京”都是公理会办的。其庞大的经济开支，均来自教会和美国各大财团，如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对“协和”和“燕京”都有大量的捐款。这四个“协和”学校的名字，现在莫说一般北京人 不知道，即一般的介绍北京学校历史的书上，也很少查到了，但当时都是很有名的。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还有不少健在的知名人士呢！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0日记云：

> 三点半，到协和女子大学讲演，题为“什么是文学”，略如我答玄同信里的话。是日见着协和的学生谢婉莹女士，她是很能做文章的。曾有好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署名“冰心”，她是福建人。

现在冰心已是文坛上的老前辈了，而这段日记所记的谢冰心女士还是刚入协和女子大学，初登文坛的小姑娘呢；赴美留学、给孙伏国办的《晨报》副刊写《寄小读者》，还是在此后好几年的事。当时男女大学生不同校，其后不久，“协和女子大学”即并入“燕京大学”了。

协和医院全称应该叫“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才对，因为它是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前面所说四个以“协和”命名的学校，除协和道学院是宗教性的，与外界关系不大而外，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另外两所则合并发展为“协和医学院”，还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教学医院，之后又在清豫亲王府建筑了有名的协和大楼、协和礼堂等富丽典雅的建筑物。

“协和”是豫亲王府拆除后兴建的。据说，协和盖新 楼时挖出了整缸的金元宝、银元宝，以及其他金银财宝，数额颇巨。甚至有人说，掘出来的窖藏，不但超过了购买此府的房价，而且抵得上协和大楼的造价了。这样的王府，窖藏上二三十万两白银，万把两黄金，是很平常的事；想想当年老豫亲王多大的声势，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其府邸窖藏之富，自在想象中。而后代子孙年代久远，不知埋在何处，自然卖房时也无法挖掘了。这所王府当时卖价十万两银圆左右，不过只合三万多美元，不足两千两黄金耳。这点房价，拆几根金丝楠房柱就可抵不少，更不用说窖藏了。

协和大楼是十几座五层、四层、三层连在一起的楼宇建筑群，全部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楼面都是青砖水磨对缝。内部装修为当时最考究的西式设备，包括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等，都是一色从美国运来的。在这楼群的四周是一条围墙，也是磨砖的。围墙除东南角毗邻其他建筑而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

这座在王府废址上新建的协和大楼，真是气度非凡。东西南北四

个门：南面正门是医学院门；西面大门是医院门；东面后门，出入医生、护士，通护士楼、教授宿舍；北面边门通机器房、厨房，也是进煤出灰的门。

协和最热闹的是西门，每日车水马龙，看病的人都由这个门进出。这个门正对帅府园，出来就是王府井大街；而且门前出路成“丁字形”，南北都通；南面通东单三条， 北面通小马神庙、煤渣胡同、金鱼胡同。西门进铁栅栏门，沿高台阶到汉白玉“丹墀”月台上，如宫殿般，三面都有楼，正面进去便是挂号门诊，往南往北进去是各种病房，不过里面也都连在一起，各处都可走通。而进铁栅栏门不上台阶，左右包过去，是平的环形路，通底层正门，汽车或救护车，可直接由左首进去，停在底层门前。病人可乘电梯到各楼诊病及进入病房。

现代医疗技术，离不开电，协和有自己的发电设备，电机房在东北角，有锅炉供发电和冬天水汀取暖用。高大的烟囱在楼群东北角，是当年东单一带最高的烟囱。

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它的毕业生发纽约州长签字的羊皮文凭。协和医院有医学系、护育系，但都不直接招生，学生要先在燕大读三年生物系（即医预）。考入协和医院之后，先读四年书，再做四年临床实习医生，然后完成论文。再取得学士或硕士证书。考进协和医学院固然不易，读完这八年也是很艰巨的。前两年刚刚去世的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就是这样艰苦地完成学业，又毕生献身于医疗事业的。

协和当年的医生和护士，除去一部分美国人而外，大多都是协和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有的去美国留学，有的留在协和，还有少数在中国香港及南洋一带行医。医学系毕业生很少，从开办到旧协和医学院结束，只毕业了六十几个人。那时一进协和门，等于到了美国，由挂号一直到 看病、住院，全部文件用英文；医生、护士谈话全部用英

语。挂特别号，大洋十元；普通号，大洋一元；施诊号，两角，费用是相当可观的。

当年协和有远东唯一的一台“铁肺”。煤油大王的儿子于1927年春去北平游览，突然发病，用上了这铁肺，保住了生命。协和派一名医生、两名特别护士护送他从北京挂专车去天津塘沽，再坐他父亲派来的邮轮回美国。这件事当时成为中外各报头条新闻。这是“七七”事变前夕的事了，有谁还记得协和此事呢？

中国最早的外语学院

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室里，有一块高约一米的石碣，正楷五字深刻，文曰：“京师译学馆”，放在“同文馆”史料之次。许多参观者不明来历。原来，“京师译学馆”并非翻译单位，乃是中国在七十七年前创办的第一所规模完备的外国语言学院，在教育史上占有地位。

据该馆第一届毕业生蔡璐先生早年回忆，译学馆筹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同学上课于翌年之9月14日，校址设在东安门内北河沿路西（徐用仪尚书的旧宅）。这是在“同文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所教授外语的专门学校。同文馆为何要改为译学馆？有过争论。据说，同文馆并非美名，在宋代为监狱。宋史载，奸臣蔡京残害忠良，有异己者，即下之同文馆狱。因此才把名改了，并作彻底的整顿和扩大。

首任的译学馆监督（等于校长），由清廷委派湘乡曾广铨（京卿）充当，修治校舍，购置图书资料仪器，延访 中外学者为教习，拟定招考新生计划等，开办费为白银四万多两。事未竟，曾以丧母辞职，奏以开州朱启钤（大令）接其任。

招生对象是从学有根底、略懂外文、年幼聪敏的男性中选拔（没有女生），并将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之能习外文者，隶入译馆内就读。学制五年，科目以中文和外文为主，外文分英、法、俄、德、日五国文字，其他课程有中外历史、中外舆图、算学、物理、化学、博物、植物、生理、卫生、体操、图画。后再增人伦道德；又有勤学、

立品两门德育训练。三年，普通科学院，所余重点改授专业：教育、理财、交涉三科。学生还参加京师大学生的运动会。

从开办到辛亥革命后停办，十年中招生五次，考入六百三十五人；毕业五届，只有三百五十人。毕业生经外务部复议，均以大学生一样予以出身，奖给举人。最优等（成绩八十分以上）内用呈事，外用直隶州知州，分发通商口岸省份，尽先补用；优等七十分，内用内阁中书，外用知县；中等（六十分以上）内用七品小京官，外通判。译学馆还派出留学生，前后四次，计前往英、德、法、俄、奥、比、美、日等八国，共留学生五十人。

学生分正额和附学两种，正额生不收学膳等费，附学生各学期缴费六十元，有的附学生读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就升为正额生，不用交费了。正额生书籍，服装一切 由公家供应。平日穿蓝布长衫作为制服，名曰“学衣”；出操时发冬夏操衣和皮鞋、哑铃、步枪。晚上发照明的蜡烛，至于生活津贴，按学生籍贯由各省筹寄，广东湖南两省给学生的津贴较多；浙江省每月每人给八元；有的省也不发。

学校的监督和教习，有许多名流，如蔡元培、黄绍基、许寿裳、何橘时、陈云诰、王寿彭、范沅濂等都曾任教于此，教习中还有来自英、美、俄、法、德、日等国的“洋老师”。

当时清廷摇摇欲坠，严禁学生干政，只准埋头读书，不得过问国家大事。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译学馆内也闹学运。如发动爱国运动的捐款，参加抗议虐待华工的宣传，反对学校歧视学生的罢课等。

这所译学馆开办时间虽短，但也培养了质量较高的外语人才，在为中国介绍欧美科学文化中，起过不少作用。

北大红楼的变迁

说起老“北大”，人们自然想起沙滩“红楼”；说起“红楼”，人们又自然想起沙滩“北大”。在北京，红楼几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词。其实老北大原本并不在“红楼”，而且也不只限于“红楼”，红楼是1918年才建成的，到现在也不过六十多岁。在红楼之前，人家都知道“马神庙（即后来的景山东街）大学堂”，就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原址，后来的北大理学院，也是红楼建成之前的北京大学的本部。其他还有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习惯称作“三院”，长时期是北大法学院所在地。

红楼是一所砖木结构的五层楼建筑，所谓五层，是连地下室都算上，不过它的地下室特别高，而且只有一半在地下，再加上上面四层，便是五层楼了，如看平面图，它是凹字形的。六十多年前，北京内城基本上没有什么西式楼房，因此红楼一建成，便成为庞然大物，有雄视一方之势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三十来年，由于这三十多年 的“雄视一方”，而且又在东西城的要道上，所以“红楼”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代名词了。

红楼是蔡鹤卿老先生做校长时盖的。原来盖这所房子的目的，是做学生宿舍，所以一走进楼道仍可以看出当年的意图，即房门特别多，每间有一扇门。后来二楼、三楼改作教室，三间打通做一间教室，中间一扇门关起，前面一扇门进来就是讲台、黑板；后面一扇门出入学生，坐三四十个学生听课，宽宽大大正好。容庚伯、顾羡李、赵裴云等先生都在此讲过课，这已是红楼岁月的后期了。底层一直是

图书馆，李守常先生做文科学长兼图书馆馆长，当时就在这里，20世纪30年代初，西门里盖起图书馆新大楼，才搬了过去。

红楼有一段很悲惨的伤心史，就是“七七”事变之后，做过六年日本宪兵队部，地下室全部成为囚牢，直到1943年才交还当时的伪北大。当时地下室楼道两头很粗大的木栅栏还未拆除，阴森森的，仿佛还能听到铁镣声。

伪北大时，楼下东面是院长及各系办公室，楼梯两边是教务、总务等办公室。胜利后，红楼改作教职员宿舍，一些单身名教授，如冀贡泉、向达、游国恩几位先生，有段时期，都住在这里。几十年了，仍历历如昨啊！

建校九十年的北洋大学

今年是天津北洋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居住本港的旧友中，有不少北洋大学的校友，他们之中有人去天津参加庆祝校庆大会近已归来，听他们谈起旧同学耄耋相遇时的喜悦情况，非常快慰。我虽没有在“北洋”读过书，但从前有几个好友在那里念书；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曾赴津访友在北洋大学盘桓半个多月，至今仍留有清晰美好的印象。

北洋大学在天津城北八里的西沽村北，北运河西岸。校舍之南，有桃林长堤，春天桃花盛开，是天津当时的游览胜地。

校舍是利用清代武库旧址改建的。记得在北洋大学门前还有旧炮两尊并立在武库门洞里。所谓武库，原是清代在天津的驻军老三营的兵器库。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在此设立水师学堂，建造船厂和火药厂，存放军械武器，义和团战役中，遭受从杨村败退的英国侵略军的破坏，仅存库房数座。

北洋大学始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首任校长盛宣怀（当时称为督办）。校舍原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村，八国联军侵入后，校舍为德国侵略军所占据。庚子后，清政府决定将北洋大学迁至武库，除利用旧库房改建教室和宿舍外，并新建一座带有钟楼的正门楼，1903年学校在此复课，校名为“北洋大学堂”。可惜这座钟楼于1929年因火灾焚毁，我到天津访友时所见是新楼。

学校环境幽静，校舍宏伟，师资多国内外闻名的学者，加以课程体系完整，教学认真，实验设备丰富充实，莘莘学子，于此攻读，诚乃一生幸事！

早在清末民初，北洋大学堂和北京高等实业学堂、唐山路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并称为四所著名的工业学校。北洋大学则以治学谨严，校风朴实而名声尤著。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年代里，北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出现了不可胜数的为工程技术和其有关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如桥梁专家茅以升、矿冶专家孙越崎、水利专家张含英等，均已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至于我国早期的外交家王宠惠、王正廷，政治家陈立夫、曾养甫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张太雷，“五四”运动时期和周恩来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的谌小岑等，也都出身于北洋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北洋大学西迁离津，辗转各地历经改组，有分有合，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天津复校。20世纪 50年代初，改名为天津大学，在南开大学毗邻的七里台新建巍峨校舍。现在已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生上万，在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系、电机、航空、化工、建筑等科系，为国家培养建设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这所古老的大学又年轻了！

辅仁大学与贝勒王府

当年北京的辅仁大学位于西城定阜大街，是1925年由罗马教廷天主教会设立的。那时，它的全名是“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初创时，筹措的校方以十六万元租金，永租了李广桥西街清廷的涛贝勒府。

说到涛贝勒，即载涛，系清代醇亲王奕譞之子，光绪皇帝载湉的胞弟，三岁就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宣统年间曾任军咨府大臣和禁卫军训练大臣。涛贝勒府府第阔绰，雕廊画栋，被租为校舍后，便聘教师，购图书，买仪器，置桌椅，办体育器材，当年教学设备俱已筹齐。

后来，学校利用涛贝勒府西院花园空地扩建，自1930年后便成今天的定阜大街楼房校舍。主楼设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礼堂、教室等。楼房的中心和四角为三层。其余为两层。楼后庭院，静谧幽美，游廊亭舍，闲雅宜人。后在街南辟运动场，并建造学生宿舍楼，以供学生体育活动或课后休憩之用。

定阜大街东头隔着一条小河是恭王府，它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䜣的府第。咸丰去世后，奕䜣帮助慈禧夺权有功。为此，曾被慈禧委以议政工兼军机大臣的重任。

据考证，恭王府原为乾隆、嘉庆时大学士和珅的故宅。和坤虽然被黜，奕䜣也被革职，但宅院的气派一如旧日。1935年，辅仁大学又

购恭王府作为校舍，遂称其为“女院”。这座旧式王府，按格局可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府邸部分按东西可划为三组院落。东院为五进院，无匾额。中轴院的宫殿式的嘉乐堂为王府正厅。东院和中院被学校用作教室。西一组以“天香庭院”为主，北面大厅仿照故宫的宁寿宫建成，设计精巧，布局庄严。后楼东西长一百七十米，楼上东悬“瞻霁楼”匾，西悬“宝约楼”匾，此楼被学校长期用作女生宿舍。而天香庭院曾作过在校任教的外国修女的宿舍。

恭王府花园部分，曲廊亭轩，山石花木，渠塘岸柳，皆布局精巧，错落有致。东北有戏楼，西北有水榭，由什刹海引水入园，环园一周而出，堪称中国庭园建筑的代表作。

由于恭王府宅中多处格局与《红楼梦》描写的大观园相仿，红学家中就有人演绎曹雪芹是游览过和珅故宅才写出《红楼梦》的。亦有人说奕䜣曾大事装修过花园，装修前读过《红楼梦》，有意模仿也未可知。

因此，应该说，还是启功在1979年校注程甲本《红 楼梦》的《序言》中说得好：“大观园如果确是某一家第宅园林的样子，难道作者就不怕那一家主人向他问罪吗？如果说是大观园偶合某家的园林，又怎能那么巧呢？无论南北，各地的园林都有它的特点，很少重复的。那么今天北京某人残存的某府第园林，又怎能便指为即是大观园呢？”

陈垣校长题词见大节

抗日战争胜利已四十多个春秋，追忆陈垣先生当年处于腥风血雨的沦陷古城，大勇大智，对残暴的日寇和无耻的汉奸口诛笔伐，以民族大义勖勉青年学子，那种浩然正气，今天思之犹如昨日。

陈垣先生1913年起定居北京，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导师、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

辅仁大学原先是美国教会本笃会创办的，因为经费拮据，罗马教廷改派美德两国圣言会接管，从1936年起，教务长由德国人雷冕担任。德国和日本当时是同盟国，所以辅仁大学抗战期间得以坚持下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细井次郎以校务长首席秘书兼日本语言文学系主任，带进一批日籍教师，网罗和派遣进特务学生，对爱国师生加以监视；另一方面又用读经尊孔、钻研国故麻痹学生爱国意志。于是陈垣先生巧妙精辟地运用孔子的遗教箴言，鞭策　　学生保持名节操守，勿失爱国之志。从给各届毕业生的题词中，可见他的苦心孤诣，语重心长。

他在给1938届毕业生的题词中写道："毋事浮嚣失礼于人，毋徒顾目前，毋见利忘义，永保汝令名。"

1940年的题词是："子张问行，于曰言忠信，行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今诸君毕业远行，谨书此为赠。"

1941年的题词是：“品行第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身体第二（父母唯其疾之忧），学问第三（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近来同学颇知向学，是好现象，但每轻重倒置，故以此告之。”

1942年的题词是：“毋徒事佚游宴乐，是谓之辅仁。”

这种爱国之情，也贯穿于先生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书里，先生曾写道：“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对历史上的汉奸，他写道：“人之恨，不比人类！”

陈垣勤奋严肃的治学态度，博大精深的才识，爱憎分明的气节，一直为朋友和学生所爱戴。记得沈兼士曾为他题写过诗句：“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欲弥珍。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藏颂鼎，风雨感情深。”

30年代的教授生活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些年代中，北京因政府南迁，再加受到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市面比较冷清。能够用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清华也是国立，但用的是“庚款”，是另外一笔；燕京、辅仁、中法、协和医学院，都是教会办的，款由教会拨。另外还有私立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京华美专等。一些著名的大学，经费充足，讲师、教授的工薪都比较高，因而就生活优裕，颇为大家所羡慕了。

《爱曼罗兰传》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曾留学法国，回国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法大学做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三百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一袋（二十二公斤），有些牌子的面粉（如兵船、炮车）一袋只需一元五。三百元收入就很可观　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有盥洗间，有浴缸，有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书房、客厅四壁书架上有由法国带回来的千种精美书籍。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可以想见。

有些留学国外的教授还娶了外国夫人。有的外国夫人自身也是教授，他们住的往往是有花园的房子，生活水准之高，是可以想象的。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国立大学还有“部聘教授”的名称，即聘书由教育部发，如刘半农、钱玄同、徐志摩几位先生都是，薪金高达五

百元。可惜好景不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七七”事变之后，教授生活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了。

在1937年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为“贱物”，则是一样的。

教授的生活水准，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在谢刚主先生给徐一士先生《一士类稿》写的《序言》中有几句道：“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熏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 这就是由战前的吃馆子，到沦陷初期只吃点点心，再到买烧饼当饭。不过这是家中人口少，有余力的。在最艰难的吃混合面（用玉米茎、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年月里，家中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热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是要煞费苦心，甚至是很难办到的。

冯承钧老先生是国内外都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就到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的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在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扯扯拉拉，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与夫人分着吸。现在还健在的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伯老先生，到学校时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到沙滩上课。就如前文说的鲍文蔚先生吧，这时在沙滩文学院做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由鲍师母自己做饭。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

走”去上课了。

学府往事

多而杂的私立中学

我读中学的时候，北京的私立中学（不算教会的，只说中国人办的），确实不少，现在记得起名字的有志成、四存、成达、宏达、北方、中华、山东、求实、燕冀、春明、明德、华光、平民、艺文等，这些学校，各有派别。在教员中，主要是两大派，即师大派、北大派。而师大派的实力雄厚，在地域上，也各有派系，如志成是冀东派，四存是河北高阳，蠡县派、它是讲求清初顾习斋、李恕谷学派的四存学会办的。如北方、宏达，都是东北人办的，也是师大派，有的资格很老，如求实中学，在光绪末年就办起来了。当时中学男女分校，大的私立学校，有男校也有女校，有的则只有男校或只有女校，如春明，在宣外大街路西，光华在西单白庙胡同，翊教在西单堂子胡同，这些都是女子中学，著名的已故名伶言慧珠，就曾在春明读 书，演电影的白光，在光华女中读过。

私立中学，都有一个董事会，选一个在政治界、教育界有声望的人做董事长。志成中学的董事长，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做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邓萃英氏，也就是美籍原子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氏的父亲。30年代中叶，滦县李蒸氏由法国深造归来，为河北高阳籍的李石曾氏所看中，就支持他当了北师大校长。志成中学校长吴鉴同李蒸有亲戚关系。因而李蒸对志成十分支持，师大附中的好教员，如教数学的萧佩荪、申介人等，都在志成兼课。两边赶场，一部包月洋车，跑来跑去，这边早下点课，那边晚上十分钟，中间再加十

五分钟课间操，在三四十分钟内，可以由和平门师大附中直跑到小口袋胡同志成中学。

私立学校经费全靠学生交学费，它又要广收学生，又要培养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来为它做活招牌，以广招徕。办学者想出窍门，即按程度分班，成绩最好的班级，人最少，只有五十人，教员也好，而成绩差的班级，人却多，八九十个，教员也差。实际就是用差的班级的钱来培养好的班级的学生，再用好的班级的升学率为学校制造声誉。

教会中学话春秋

教会学校登招生广告时，也说是私立，并不说是“教会”立的，当年这些学校的数字也不少。而且居然也会有 派系，什么圣公会、公理会、长老会等，各有各的学校。

教会中学中，资格老的要数汇文中学，学生最多；最热闹的，要数育英中学了。汇文在船板胡同，育英在灯市口。男女分校，汇文、育英只有男生，而在它们旁边，又都有女中，汇文旁边是慕贞，育英旁边是贝满，好像是标准的一对儿。著名女作家冰心是贝满的老校友，现在也已八十多岁了。当年在《晨报》读《寄小读者》的小读者，如今也都六七十岁了，时间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吃惊的怪物呢？

教会学校中崇德、崇慈也是一对儿，不过两校离得较远，崇慈在交道口，崇德在绒线胡同。天主教办的中学，首推辅仁附中男女校，男校在什刹海西，女校在太平仓。此外，西什库教堂前有所学校，和万桑酱院对门，校名记不清了。还有一所很少被人知道的天主教中学，就是宣武门里顺城街天主教南堂的首善中学，办得无声无息，几乎被人遗忘了，要不是我做学生时替它改过一个时期卷子，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

有一所非教会学校，却与天主教有密切关系，那就是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中学，这也是中法教育文化基金会提供经费的学校，它还得到北大文学院一些名教授的支持，如马隅卿、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都在这里兼过课，而且马隅卿主持过这里的图书馆，买过不少好书，而且不少都是孤本，当年在琉璃厂、隆福寺买旧书的大户，“孔德”也算一家。

北京私立中学大多都比较穷，房子很差，不是设在破庙，就是设在破会馆或破大院。而教会学校则不同，它们经费充足，房子也较好，在当时北京人看来，已是很了不起了。如汇文，校舍大，全是灰色砖砌的洋楼，还有风雨操场。再如崇德，在绒线胡同中间路北，有很大的足球场，有三层教室大楼，而且它还有一个小游泳池，这真是了不起的事！当时全北京市只有中南海有一个公用游泳池，而崇德竟以一个中学也有游泳池，多么难得呢？

各有千秋的公立中学

公立中学包括国立、市立、省立三种。国立的有师大男附中、师大女附中。师大男附中在和平门外新华街，这处校址原来是清代邮传部尚书陈璧建造的学堂，林琴南由杭州来北京，最早就是到这个学校教书的。

师大女附中，在西城辟材胡同。两校同属师大，都是师大毕业生“试教”的中学，但各自为政，各校有各校的领导。这两所学校，一直是北京中学中的天之骄子，教学质量最好，学生出来大都能升入清华、北大等最高学府，现在在世界各地师大男、女附中的校友，一定不在少数吧！自然也有没有升大学，走了另外途径，后来取得很大成就的。如抗战时，有“重庆程砚秋”之称的京剧名伶赵荣琛，就是师大

附中的学生。

北京当年市立中学，男校有五所，即市立一中到五 中；女中有两所，即市立女一中、女二中，另外市立的中等学校，还有市立师范、高工、高商等。其中北京市立师范影响最大，有一个时期，几乎北京的小学教员，十之八九是北师毕业生。北师在西城北沟沿祖家街，出过一个著名人物，那就是《骆驼祥子》的作者，本名舒庆春的老舍先生。他在国内的最高学历是“北师毕业生”。北师毕业的学生，不能直接考大学，要当几年小学教员之后才能考，因为它是免费又管饭的学校。

五所市立男中，一中在南长街，二中在内务部街，三中在祖家街，四中在西什库，五中在交道口南府学胡同。女一中在北长街南口，女二中好像在方家胡同，后来又在西四历代帝王庙办起了女三中。在这些市立中学中，男中以四中最好，几乎可以和师大附中一较轩轾。已故著名留德历史学家朱契，就是四中的老校友。女中内女一中较女二中出名，也培养过不少知名之士，市立中学都是由北京市教育局提供经费的，经费有限，所以当时发展也不大。有的市立中学还比不上教会中学或私立中学呢。

省立有一所河北省立第十七高级中学，简称“十七中”，只有高中，经费由河北省提供，这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学生成绩很好，基本都能考上国立大学。

令人难忘的小学

北京当年作为文化古城，大学、中学不少，小学也很 多。而且有不少著名的特殊的小学，现在海内外不少知名人物中，都是在这些小学中度过他那美丽的童年的。“千秋万岁名，不如少年乐。”即使做大总统，恐怕也不会忘记他背着书包第一天上学时的情景吧？

在北京的小学中，几十年首屈一指的，还是师大第一附小、师大第二附小。第一附小就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对门，校舍最好，师大没有礼堂，常常集会要到附小礼堂举行。二附小在西单东铁匠胡同，在某种程度上，它比一附小的名气还大。这个小学的毕业生后来不少都成为著名人物，王光美就是师大二附小的老校友。它在20世纪30年代时，很有点特殊性。当时各小学都规定穿黄咔叽布的童子军制服。只有师大二附小例外，它的制服很特别，夏天女生穿月白士林布大襟小褂，黑裙子，领子上镶两条红线，戴白布做的小边帽子，像运动场上裁判戴的一样，也有两条红线。有谁还记得这特殊的儿童制服呢？穿过这种制服的人，现在还有几人呢。

北京师范附属小学办得也很好，地址在甘石桥红庙胡同。这个小学是北京师范的“试教”小学，办得很活泼。当时在学校中有一种活动：成立模拟的市级机构，曰“拂晓市”，在同学中选举“小市长”，各局“局长”。老同学张中和，荣任过1935年到1936年度的“拂晓市市长”，前年见面，还谈往事说，一下课就到“市长办公室”料理“市政”。口气很大，大小也是拿过印把子的人了。可是后来， 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市长。

不少教会中学，也都有附属小学，如育英、汇文都有小学。孔德小学也是很有名的，这是陈香梅女士的母校。东单三条的法国学校，更是特殊的学校。当年大诗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女士就在这里读过。自然是十分贵族化的了，西长安街艺文小学，也是特殊的，它用的是奥地利人夸美纽斯的“导生制”，由学生自治，成绩好的同学教成绩差的同学。相对的四存小学，则用的是老的读“四书”的办法，各有千秋，都教育出不少好学生。

香山有个熊希龄氏办的香山慈幼院，也是小学。甘石桥有个洁民小学，校长是章宗祥氏的女儿，办得很有成绩，是私立小学中的好学校，办了不少年，现在很少人知道了。

北京最早的师范学校

早年的北京，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学校。如果从它的前身京师督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6）建立算起，到1958年北京师范学校停办，它应该是度过了漫长的五十二个年头。

鸦片战争后，国难日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一些开明人士提出了兴办教育的主张，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曾上书光绪，奏陈“改良政治，振兴国事，变法维新”，其根本在于“教民”。康在《公车上书》中指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学则智，群则强。”梁亦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主张。北京师范学校是在这种形势下创建的。当时京师督学堂选派了有新文化及科学知识的归国留学生夏锡麟为校长；后由留学生陆钧为第二任校长；第三任校长是方还，方是著名的书法家；后来曾给冯玉祥讲过课的史学家李泰也当过校长。

京师督学堂经费充足，考试制度严格，校风良好。由于学校的设备完善，学生所需书籍、纸张、文具，以及食、宿、制服都由学校供给，招生范围又不限地区，且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在当时不仅待遇不错，还极受社会尊重，故常常报考人数超出录取名额的几十倍。据笔者所知，1928年前，作文试题曾有《好学近乎智》《勿曲学以阿世》之类；1930年有《论自治应从学生做起》等，可见题目之难。其师资也远非一般中等学校所能企及。建校初期多数是留学生；稍后，则多为大学教授兼课。中期以后也有不少名教师，如熊佛西曾教戏剧理论

及导演，黎锦熙曾教“国语文法”，白涤洲讲汉语语音，著名画家李苦禅、王雪涛、于非黼、李智超、谢时尼等教国画，著名西画家孙信教西画……

北京师范学校的考生大多为贫苦人家子弟，所以学习备极刻苦，因而成才者颇多。现在体育界著名人士钟师统，即是1931年考入该校的十一届学生；著名作家老舍及其夫人胡絜青女士，也都是该校的高材生。还有第四届毕业生朱恩德，1919年曾作为中国田径队队员，参加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运动全，以顽强的毅力夺得了十项全能和五项全能冠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震撼了东方体坛。另外，音乐家老志诚、王洛宾，作家丛维熙等，也都是在这所学校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北京师范学校是当年北京唯一培养小学师资的学校， 该校毕业生大部分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它为北京的基础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戏剧学校旧事

李和曾、李世济等这次来港演出，备受好评。李和曾是前“北平戏剧学校”的学员，是“和”字辈的，同王和霖同科。当年戏剧学校旧事颇有可忆者。

北京在过去培养京剧演员，只有“科班”，没有学校，如早期的喜连成（后改名富连成），以及尚小云办的荣春社。教授方法也都是老式的，而且出科成为名角，要有相当长的时期，所以有“三年出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个戏子”的谚语。在20世纪20年代末，程砚秋和焦菊隐等筹建了一所戏剧学校，想用较新式的教育方式来培养京剧演员，这就是“北平戏剧学校”，还请了陈墨香、齐如山等人为教习。其实说是新式教育，可在教法上仍同科班差不了多少，只是增加了一些新式文化课；另外除招男学员之外，还招一些女学员。不过这是北京历史上正式以“学校”为名培养京剧演员的园地，其承前启后之意义是不容低估的。而且老科班师父教戏，常常用打的办法。戏剧学校对 这种陋规，基本上革除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戏剧学校一共办了五期，按字排是“德、和、金、玉、永”，成绩不错。在这五科中，生、旦、净、末、丑都出了不少名角。“德”字辈中，当年知名的有傅德威、宋德珠；宋德珠轿工好，那时是很出名的“刀马旦”，和李世芳、毛世来等被誉之为“四小名旦”。“和”字辈有王和霖、李和曾等；王和霖唱做极像马连良，故有“小马连良”之称。“金”字辈则有武生王金璐，以及沈金波等。“玉”字辈女演员出名的极多，如李玉茹、李玉芝、侯玉兰、白玉薇等，当年有戏校“四块

玉”之名。“永”字辈中有一青衣陈永玲，也很不错。也有原来是戏校的学员，中途因故离开，后来又成为红角的，那就是吴素秋，其《人面桃花》一剧，唱、念、做工都是不可多得的。

昔日京华忆“孔德”

现在位于北京东华门大街路北的二十七中学，原是清皇朝宗人府的孔德学校。校名“孔德”，是来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因与当时的北大三院紧邻，所以受其影响颇深。

宗人府原来的红大门很神气，约有三间大。进门后经过一个小门，旁有台阶进入正厅，便是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和客厅，有门可直通后院。后院正厅是礼堂，礼堂后边有三间房是音乐教室。左边小门进去是高小，再后院是木工房，沿东房有一大排是库房，然后往北是小学的操场，再往里走是初小部，一个朝南大教室是幼稚园。往东是个小院，东房住的是钱玄同，开后门是北河沿。后院右边往西是中学部分，最西是两个操场，中间隔有教室，美术室亦在其中，最北面有高墙。

早期孔德学校的校长，一直是蔡元培，有许多北大的知名教授，如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周作人等，都曾 在孔德任过校董。

但当时作为中、小学生，对孔德这位哲学家，一般都没什么兴趣，除了在校歌中提出“孔德、孔德，他的主义是什么”能涉及孔德的内容外再无其他可言，况且这首校歌大多数学生也不喜欢唱。

孔德学校的办学方针，与其他学校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爱校如家”这类口号，可实际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高低班关系等，都要求做到亲密无间。

当时的孔德也有许多大家子弟，如给梅兰芳编剧的齐如山，至少有八九个子弟是孔德毕业的；还有沈尹默、沈兼士的子女，钱玄同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孔德上学。当时孔德的学费相比一般的学校还是比较低的，大约是灯市口育英中学的一半。

孔德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对取得优异成绩的，从小学起，学校就给以免费学习的奖励，全班得第一名的，全免学费，得二、三名的半免学费。

日本人侵占北平时，孔德又有了自己的校刊，主要是受北大新文化的影响。这种校刊一年出三四册，只要学生的作文有特色，就可登在校刊上发表，并奖励校刊两本。学生看到自己的作文登在了校刊上，感到格外自豪。

孔德学校的考试都非常认真，每学期考试都是打乱班次，公布考场。让考生都处于陌生的群体中完成试卷。如 此严格、正规的考试，为的是让学生经历孔德考场之后，再进入到其他学校考场以后，不至于惊慌失措。

孔德学校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与美育，每周的星期六下午举办各种活动班次，而且聘请了一些知名的教员任教，如油画家卫天霖就在孔德执教多年，他不仅教绘画，而且还带领学生参观画展。女生另有刺绣组，可以学刺绣和织毛衣，男生另有木工组，可以自己做些小物件。

往事如烟，昔日在孔德毕业的学生如今有许多已经成为名人，如钱三强、吴祖光以及在美国的陈香梅等。

贝满女中状元多

曾在北平贝满女中任教的大学同窗，寄来该校《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册》，大开本，一百七十页，彩照一百一十张，印刷装帧都十分精美；封二是老舍夫人、名画家胡絜青画的巨松，题诗曰：“东风骀荡育青松。”此外还有曹禺、冰心、冯友兰、臧克家、黄宗洛、李默然等知名人士的题词。曹禺题：“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得新绿百千重。”冯友兰题：“振兴中华，再接再厉，修整园地，日新又新。”臧克家题：“一百二十年树人，栋梁之材何止百千？回顾悠久历史，瞻望前程广阔无限。”

翻阅其中介绍，贝满女中培育出的状元可谓多矣！如冯玉祥夫人、20世纪50年代曾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系1915届校友；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秀瑛，系1926届校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系1938届校友；中国科学院十五位女学部委员中，就有三位出自该校。此外 尚有著名戏剧家孙维世、钢琴演奏家鲍蕙乔等。其中，教授、研究员、工程师、艺术家、作家、画家、新闻工作者，以及厂长、经理等遍布海内外，无计其数。

笔者记忆中，该校在灯市口附近。校园很美，鲜花颇多，地铺草坪。训怀堂前有玫瑰花，东夹道有长长一排松树，中院有紫色的藤萝，后院有排排翠竹。还有几棵洁白的丁香，生长茂盛，花儿虽小，但香气浓郁。总之校舍整洁，窗明几净，学习环境清静幽雅。

贝满女中，因1864年美国公理会教士贝满夫人创建而得名。当时

教师多系传教士，学生大多为教徒，圣经课为必修课。至20世纪30年代后，学校之宗教气氛才日趋淡薄。

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并订有明确“学则”。对考勤、成绩考核、升留级制度都有严格规定。无故旷课，既扣操行成绩，亦扣学科成绩。学生衣着要求庄重朴素，在校穿“学衣”，体育课换“操服”，穿硬底鞋不能穿过操场，院内穿行不能践踏草坪，若有违反，则给予批评甚至处分。当时教师皆大学毕业高材生，一旦发现不能胜任教学或不足为人师表者，则下学期不复聘请，故教学质量高且稳定。

每届高中毕业生举行辞别会，常常排演大型剧目。犹记曾演出过话剧《雷雨》《日出》《万事师表》和京剧《孔雀东南飞》等。虽系业余，亦十分精彩。

同窗寄纪念册时附函云，该册主编拟陆续出海内外校友回忆录，尚在征集稿件。笔者亟待一读。

南开学校的“格言”

在北方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是南开中学。从南开毕业的校友，在事业上获得成就者大有人在，提起南开学校，就会想起学校东楼走廊内悬挂着的“容止格言”。这格言是被学校列为“新生入学须知”中注意事项的第一条，张伯苓校长在讲话中也必多次训导的。格言共四十字，至今还能记得起来。那就是：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敬宜壮。

这格言的内容，虽仅系对学生仪容和举止的要求，但在道德修养上具有丰富深刻的意义，对成长中的青年的优良气质情操的培养，起过很好的作用。这格言的撰写者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严范孙先生。

严范孙是一位为人所敬重的教育家，从给南开撰书的格言，也体现了他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严以律己，行必践言，他认为“惰既废事，慢亦败德，二者终身戒之，惟恐不力”。因而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自愤、自省之语。他三十岁戒赌，四十岁戒烟，五十岁戒酒，六十岁因病从医嘱才稍进酒。严范孙对于社会上的陋俗恶习与不良风气，也常常褒贬劝诫。1910年李石曾出版《吸烟与经济卫生实业上之关系及戒烟之法》一书后，他立即为之翻印一万册，并亲作序言，痛斥麻雀牌是“恶

道”，彩票是“罔民”，吸烟为无形之害。呼吁人们除此三害。

他也反对冶游狎妓。参加友人宴会时，遇有征妓侑酒者，即借故辞去。1916年得知北京有一“社会改良会”，反对纳妾，他即加入该会为会员，并投寄文稿，为之声援。

严范孙生活朴素，自奉俭约，但乐于助人，在乡里扶危济贫，多行善举。特别是他居官清廉自守，虽曾任贵州学政和学部侍郎，但却两袖清风。

蔡元培曾说，严范孙“对于旧道德素称高贵”。胡适称颂他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严范孙的为人如此，他所撰书的南开格言也自然体现他的道德修养了。

六十春秋的耀华学校

不久前，居台湾地区的一老友到天津探亲归来，途经本港，带给我一本《耀华学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专刊》。去年9月20日，是天津耀华学校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学校邀集历年毕业同学，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编印了这本专刊。翻阅之下，几十年前的天津旧事，重现在眼前。

天津耀华学校的前身是“天津公学”，成立于1927年6月，原是专为英租界内居住的中国少年儿童求学而设立的。

初创办时，校址在英租界戈登道，招收学生四十六名，于1927年9月1日开学，为初级小学，仅有教员四人。第一任校长为曾任北洋大学学监的王龙光。其后入学学生增多，学校迁至红墙道，扩充为高初级两级小学。严松章继任校长。

随着学校的发展，校舍不敷应用，学校董事会决定由壮乐峰负责筹建新校舍。遂在英租界内墙子河畔二十九号 路择定洼地五十三亩，请英国人建筑师安德森设计，按照发展为中学的规模，从第一校舍至第五校舍，1938年全部竣工。学校扩大招生，英租界以外的市区居民子女亦可入学。

在建筑新校舍期间，陆续招生入学，1935年改名耀华学校，寓意为“光耀华人”，并定校训为“勤朴忠诚”。此时的校长为赵君达。赵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曾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治校认真，在天津教育界声誉卓著。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天津沦陷，他坚持民族正义，在租界地区内继续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遭到敌伪势力嫉恨，不幸于1938年夏被暗杀殉国。

耀华学校历年多知名教师，如数学教师王瑜庭、语文教师陶继安、音乐教师张肖虎、体育教师姚思汉等人，都令毕业的学生常常怀念。六十年来，毕业生有一万五千多人，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有“美国电脑大王”之称的美国王安公司华裔总工程师朱傅矩教授，即耀华学校20世纪40年代的毕业生。

熊希龄创办慈幼院

熊希龄氏，字秉三，因他是湖南湘西凤凰县（在清代建制为直隶厅）的人，所以人称“熊凤凰”。多少年前，誉之者称他为慈善家，毁之者称他为“慈善起家”，加了一个“起”字，意义便大不相同。

熊氏自光绪十八年（1892）点翰林之后，做了一阵子庶吉士，后来回到原籍湖南，和陈三立（陈宝箴子，名诗人，陈师曾，陈寅恪之父）、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筹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戊戌时，本来和江标要补“四品京堂”，入都引见，不料让王先谦参了一本，戊戌政变后，以“庇护奸党，暗通消息”的罪名，受到革掉庶吉士，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到了庚子之后，赵尔巽为他奏请免了处分，以二等参赞官的身份，跟着载泽等人出洋考察，从此熊又走上仕宦的道路。民国二年（1913），出来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袁世凯称帝，熊氏去职，住在天津。袁世凯死后，正遇上京南、冀中一带闹大水，灾情严重，熊氏以在野身份，出来督办水 灾河工善后事宜，这是熊氏从事“慈善事业”的开始。

水灾之后，无家可归的儿童极多，熊氏广泛募集经费，筹备资金，在香山静宜园边上盖西式房子，建立“香山慈幼院”，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1920年，校舍全部盖好，请来教师和工作人员，有名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在风景秀丽的静宜园边上成立了。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止，香山慈幼院在北京一共存在了十六七年，北京沦陷之后，便无形中关闭了。

香山慈幼院办院之初，是收容水灾后无家可归的儿童，但因后来

办得很有成绩，校址又在风景优美的香山，所以不少阔人也把小孩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学，因此香山慈幼院中，便有两种学生，一是孤儿，一是阔人的子弟，因为学生都是住校的，学习专心，所以学习成绩一般说是很好的。学校后来不但有自己的校舍，而且有自己的果园、小工厂，还发行院刊，熊氏一直是慈幼院的董事长，抗战前夕，曾著有《香山慈幼历史汇编》二十二篇，香山慈幼院遂闻名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山还有一所建校更早、声誉卓著的公立小学，校址在香山买卖街南不远的红山头，校舍全为中式建筑，古色古香。清末为八旗子弟学校，专收八旗贵族子弟，民国后改称香山小学。红山头小学教学育人向来都很有特色，是一所办得很有成绩的老校。这些未免偏离本篇的正题，故不多叙。

临清“武训义塾”

“武训先生终身行乞兴学，是我们教育史上一位奇特伟大的大人物”，这是当年冯玉祥先生撰写的《千古奇丐武训先生的生平》一文的开头语。

《清史稿》列传孝义三有武训传：“武训山东堂邑（今属冠县）人……孤贫从母乞……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资设义学……积金千余建义塾临清。”

在武训家乡冠县柳林镇和他曾办过义学的临清都曾流传过许多武训行乞办义学的故事。武训筹资办义学，不惜为别人干苦活重活，吃最差的饭食。甚至为省钱剃头仅剃半边，还唱道：“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他为了多得点工钱，为人推磨时，故作驴状，学驴叫，还蒙上“眼罩”，唱：“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草垫磨道！”以博主人笑，多收点工钱。他外出行乞时，也常念念有词：“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黑狗白狗你别咬，义学症憨豆沫来到了！”以引起人们对他办义学的　　关注和同情。有时他为得几个小钱，竟吃蝎子、蛇、碎砖烂瓦，还唱：“吃蝎子，吃蝎子，修个义学我的事！”“喝脏水，不算脏，不修义学真肮脏！”他五十多岁时，已积了一笔钱，有人劝他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他却说：“我活一天，就办一天义学，有了老婆孩子，他们的衣食都要用我的钱，碍我的事，违我的心愿！”还是唱：“不要老婆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经过他超乎常人的不懈努力，他积累了一些资财，也感动了一些乡绅。在他恳求下，堂邑乡绅杨树芳才答应出面为其理财，筹建义

学。

光绪十七年（1892），他已建成义学两处，又来到距他家乡几十里远的临清乞讨筹资。临清曾是卫运河沿岸重要商业城市，他想在此地再修一处规模大些的义学。

当时临清钞关街有绅士施善政，闻武训来到临清，敬佩他的精神，主动把他从破庙中接到家中，而武训竟借机恳求施先生为其在临清筹建临清“武训义塾”。施善政也未推辞，约请了友人冯长泰等人着手筹办。他们先在城内中州御史巷内耗资四百余两，购宅院一处，又拨银六百两交冯长泰承管利息，做办学经费。后来义塾逐年扩充，规模已超过原来柳林、陶馆义学，临清义塾延聘了王丕显先生为教师。王先生字绍文，为人笃实好义，深得学生爱戴。

光绪二十二年（1897）4月，武训病倒在临清义塾檐廊下。

千年学府翰墨香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因岳麓山而得名。它和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据考，早在唐末五代即有寺僧智璇在此处读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潭州（现长沙）太守朱洞采纳刘鳌的建议，创建了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赐书“岳麓书院”匾额，从此书院名闻天下，声誉大振。南宋时，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授徒达千人，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有“潇湘洙泗”之誉。明初，由于朱元璋推崇官学，书院地位下降；明中期以后，才重新受到重视。到了清代，康熙、乾隆都曾御赐匾。1903年，在引进西学、废书院之风的影响下，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岳麓书院曾几经灾毁，又几经修复。现存书院是清代所建，为中国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它坐落在岳麓山青枫峡出口处，背倚层林叠秀的赫曦峰，面临碧波粼粼 的湘江，有“大泽深山龙虎之气”，可谓地势不凡。书院内，飞檐流彩、青石铺地、白壁红柱，互相辉映。整个书院清雅、幽静，实为读书养性的佳处。在书院的建筑格局上，体现了讲学、藏书、供祀三大功能，历代相沿发展，大体未变。

从正门步入书院，迎面便是赫曦台。台左右两壁各有一个一丈多高的大字：右壁上是“寿”字，左壁上是“福”字。只是“福”字与“寿”字相比，总觉略为逊色。

下赫曦台，穿过大门、二门，对面就是讲堂。讲堂是古代书院讲学的地方，厅中悬挂有两块金字木匾：康熙御书的“学达性天”和乾隆

御书的“道南正脉”。讲堂左右两壁嵌有朱熹到书院讲学时手书的“忠孝廉节”四字石刻，每字足有一米见方。讲堂中央摆有红漆木椅，是大师讲学之位，听课的生徒则在讲堂前的石板地上置草团而坐。有趣的是此处并排摆着两张木椅，而非一张。原来，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福建崇高来长沙拜访当时的山长张栻，两人观点不同，主张“格物”的张栻和主张“唯心”的朱熹在讲堂会讲、争论，吸引了上千生徒，一时书院外的“饮马池立涸”，开了书院不同学派自由讲学的先声。因此，在讲堂设置两张椅子也一直沿袭下来。

书院右侧的诸贤祠、文庙是祭祀之所，北面最高处的御书楼是书院藏书之地。清时藏书达六千卷，可惜抗战时全毁于战火了。

岳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不少历史人物，如王船山、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涛、黄兴等都曾就读于此。书院改名学堂之后，大批爱国志士如陈天华、邓中夏、蔡何森等来此求学。毛泽东早年也曾多次寓居书院的半学斋，主编《湘江评论》。

清代殿试的阅卷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是步入仕途的阶梯，其考试、阅卷非常严格。举人经过会试，再进行殿试，殿试后由阅卷大臣（俗称“读卷官”）开始阅卷。

阅卷在殿试后翌日进行。这一天，监试大臣和阅卷官齐聚在文华殿。阅卷官位前是一条长案，收管官把卷箱取来开封，将试卷先取出一捆打开，按照阅卷官的官职，依次一卷一卷地分送到他们面前。分完后再取来一捆，直到分完为止。每个阅卷官分多少，视考生多少而定。

每个阅卷官收完卷子后，即开始阅卷。看完一份，便在卷子上写下自己的姓氏（不写名），同时写上优劣符号。待把自己分到的卷子看完，再阅评他人看过的卷子。这样，轮流传看，每个阅卷官都能看到每个考生的卷子，均写出优劣评语。这种阅卷法，旧时叫“转桌”。

评定卷子的优劣，用一定符号标示，而不用文字。“殿试”规定，标示符号分为五等：“圈”“尖”“点”“直”“叉”，即画“○”“▵”“、”“｜”“×”五个符号。众阅卷官在评阅同一份卷子时，有不同的评价，这是正常的，但这种差别不能太大，即只有上等与中等、中等与下等的差异。如果发现同一个卷子评价悬殊过大，就得另派大臣查看试卷，以防“各存成见，有上下其手之弊”（《钦定大清会典》），查明后要受处分。由于有了这种制约，在同一卷子上，如第一个阅卷官画的是“○”，以后再阅的绝不能用“、”（可以用“▵”）；如第一个用的是“｜”，以后的不能用“▵”，即所谓“圈不见点，尖不见

直”，阅卷官们怕受到处分。

八个阅卷官“转桌”毕，最后总核，由首席阅卷官专司其事，其他阅卷官可参加意见。但是，名列一、二甲的卷子必须是八个“圈”。如卷子中有圈有尖有点的，即是三甲；有“直”的就排在三甲之后了。阅卷时间，规定在两天之内必须阅完。评定检核完毕，将前十名进呈皇帝钦定名次，前三名为一甲，后七名为二甲。皇帝评定发下后，再把其余的卷子依照名次列出，交由填榜官正式写榜。

榜用黄纸裱成里、面两层，称为“金榜”，有“大金榜”“小金榜”各一份。由中书四人写“大金榜”，四人写“小金榜”。写好后，“小金榜”由奏事处呈进宫中保存，“大金榜”由内阁大学士捧到乾清门，加盖“皇帝之宝”，待到宣读典礼时，宣读公布。宣读后用红线张挂在太和门，悬挂三日，照例交与内阁。

考生望榜谐趣谈

时光如流，暑假在迩。当此骄阳在天，灼人肌肤之际，静坐小室，扇不停挥，犹觉盛暑侵人；而参加考试的莘莘学子，数十百人济济一堂，专心致志，握笔凝思，更不免汗流如雨。等到放榜，幸而榜上有名，还算不负苦心；如果名落孙山，那就益形懊恼，徒唤奈何了。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落第诗：“题诗怨还怨，问易蒙还蒙。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对照他的登第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悲一喜，跃然纸上。

科举时代，北京地区的乡试、朝廷的会试，都在北京的贡院举行；今天北京东城的贡院东街和贡院西街，即其遗址。乡试是地方性的，发榜地点在鼓楼东大街顺天府衙署前；会试是全国性的，发榜地点在前门内西侧礼部衙署前。发榜之日，万头攒动，翘首企足，盼望殷切，自不待言。

考生望榜有过很多趣话。清代书法家王梦楼（文治），中举人后到北京参加会试，才高学富，应付裕如。发榜之日，梦楼自忖名次当列前茅，来至礼部门前忙看榜首，恰好被前面一位山东口音身材高大的汉子挡住。梦楼用手拍了一下大汉说：“吾兄山东人，请往后看或有尊名！”这位山东大汉不慌不忙答道：“兄弟正是山东人，今科侥幸名列第一。”梦楼仰面望榜，第一名诸城王克畴，就是此人。梦楼的名次

反而远在王克畴之后。

北京的乡试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参加考试的并不限于北京的旗、汉考生，各省的士子也可按照一定手续参加考试，实际上也等于是全国性的。大体说来，北京乡试的考生，仍以北京旗、汉和河北省籍的居多。河北任丘县大姓边氏，世代书香，科第连绵，有“无边不开科”的谚语。某科，中试的边某和同年聚会，彼此互问姓字。边某出身名门，即曰：“兄弟是任丘边。”身旁一同年，状貌猥琐，嗫嚅久之说：“寒族是曲阜孔！”讽刺幽默，兼而有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大中学校暑期考试新生，除在校门张榜，还在报上刊登。老报人徐凌霄先生最喜浏览考生名单，以为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新颖别致的名字，为长夏消遣之一助。

文玩赏珍

古玩杂谈

北京琉璃厂的古玩铺也是一大行业。古玩原叫“古董”或“骨董”，它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器物。这些器物，既可使后世人从中了解古代文化，又可供玩赏。

古玩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定”价。一件古玩值多少钱，几十几百，成千论万，谁说了算？买主拿钱买走就是“定价”，此即所谓“无价之宝”。古玩要价不在器物大小，而要看“值不值”。远的先不说，就以清朝末年为例，一对雍正款胭脂水小花瓶，价值银圆一万块，一个雍正官窑款霁虹小茶壶价值银圆三千块，这就是古玩的价钱。那些古玩铺或许一年半载没有买卖，但要做成一宗生意，就可赚笔大钱。因此，这行业里有句谚语：“三年不开张，开张过三年。”购买太贵的古玩，一般人的经济实力是达不到的。大凡去古旧店铺的人，多是买书、买帖一类，在购买古籍、碑帖、古钱之外，兴之所至，往往也要欣赏这里的古器物。古玩也有些便宜的，如明器、旧砖、瓦当、造像 等。明器，是古人陪葬的器物。最初的明器是死者生前用的器物，后来转为死者死后的陪葬品，如口内含的珠子、肛门塞的玉块等。鲁迅先生在小说《离婚》中就写过一位“七大人”用过的“屁塞”。所谓屁塞，是古人死后，常用玉石等物塞入肛门，当然也有将玉石塞入口、鼻、耳里的，相传可以防止尸体腐烂。殉葬的金、玉等物，出土年代久远的叫“旧坑”，出土年代不长的叫“新坑”。古人入殓时，常用水银粉涂在尸体上以防腐，出土殉葬物浸染的水银斑点，称之为“水银浸”。

古玩中的明器，常被行外人误为明代遗留下来的器物，其实，实

在是“冥器”的谐音。瓦当是古代瓦背向上的滴水瓦的瓦头，呈圆形或半圆形。造像是用泥塑成或用石头、木头、金属等雕成的像。除此几种外，还有小件物品，俗称“小玩意儿”，如铜镜、带钩、箭镞等。

琉璃厂除古玩铺这一大行业外，还有刻字、裱画、墨盒、图章、笔、墨等铺。这些铺里卖的东西，有的也可以列入“古玩”一类。琉璃厂有一家很有名的墨盒图章铺叫“同古堂”，地址在西琉璃厂路南。创始人是河北新河县人张福荫，字樾臣。他精通仿古篆刻，名气很大，刻图章，也刻墨盒，是琉璃厂一绝。他曾为藻玉堂书铺主人王子霖刻一墨盒，上刻梁任公（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所书“龙飞虎卧”四字，十分精致。胡夔文在《困知斋诗存》中有一首诗说：

厂甸西头张樾臣，
手拈铁笔仿周秦。
满腔中有燕邯味，
不似寻常市上人。

钱玄同先生在文章中也提到过他。

墨盒是琉璃厂的特产，“同古堂”墨盒上刻字、刻画亦可称之为“玩”。笔者手中收藏着一个墨盒，盒面刻有刘春霖临赵孟頫字帖，在宽三寸、长两寸的面积上，刻有四百八十三字帖文。只有在放大镜下才可见其笔墨圆润，苍秀朗逸，不是真迹，胜似真迹。

砚，也可称一“玩”。砚有《砚史》，专论砚石，北宋书画家米芾著。其中“用品”一条，论砚石当以发墨为上；“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唐以及宋代砚石形制的不同，载有玉砚、蔡州白砚等二十六种，对于端、歙二石辨说尤详。“端砚”因产地端州

（今广东肇庆）而得名，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且雕琢精美。“歙砚”因产地歙州（今安徽歙县）而得名，石质坚韧、润密，不吸水；发墨如油，不伤毫；雕刻精细，造型浑朴。

故宫标卖黄金器皿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了他命宫中内务府几次变卖黄金的事。清宫把很精美的金佛像，按分量卖给前门外金店，还要除去成色和焊药的重量，不但破坏了珍贵艺术品，而且大大便宜了金店，经手人也从中赚了不少钱。

不过那座美丽的紫禁城中，黄金太多了，明卖暗盗，连偷带骗，直到溥仪被赶出故宫，也不过盗卖了很少的一部分。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也卖过几次黄金。笔者仅就所知，谈谈五十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标卖残破金器的事。

1929年，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理事何敬之（应钦）等开会决议，因故宫博物院经费无着落，准将院藏无关历史文化的器物出售作为建院基金。决议经行政院核准，由院方邀请地方法院、市长、卫戍司令、理事、北京各大学代表，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监督执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有计划地标卖了不少金器。1932年以七八两标卖永寿宫、 景仁宫两处库房的残破黄金器皿，就是以这项决议作依据的。

标卖的器皿有金火锅、金盆、金盘、金碗、金八宝、金如意、金八仙、金筷、金勺、金炉、金杵臼、金蜡扦、金盒、金盆架等共计三十六种，共重五千数百两，都是咸丰以后的制品，且均为残缺器皿，如火锅缺两个环，筷子少一根，金碗缺个盖，八宝少一样等。

在标卖之前，故宫工作人员先把这些器皿从永寿宫、景仁宫提取出来，原册账号注销，再另编账号，手续十分严密。然后将其集中于

延禧宫，召集监察委员会委员周大文、刘瑞琛、程千云、易培基、俞同奎、吴翰、程星龄、江翰等查视鉴定，提出决议，确定哪些可以招标出售；如发现有雕刻精美，或年号在咸丰以前的，则剔除，不得随便处置。

经监察委员会议鉴定，准予招标出售的黄金器皿，分作十标，向各金店、银号、首饰楼、商会发出通知，公开出售；最重的一标为八百余两，最轻的一标只一百余两，投标商人可任择一标或数标投标购买。投标人须先交纳保证金，每标三百元，并在规定看货日看货，以试金石验看成色。投标时标单上必须注明所按各标两数、成色，填写商号及铺长姓名，并加盖水印（即图章）。得标人于两日内到故宫博物院交款取物，过期不来，以放弃得标权利论，三百元保证金院方没收。

第一次投标，7月21、22两日看货，到了金店五十二家；第二次投标，27、28两日看货，到了金店六十五家；第三次投标，8月11、12两日看货，到了金店四十五家。第三次投标后，即由各监委到场监察开标。得标商号即于当天与故宫博物院共同衡量金器重量，并当场用夹剪剪开，如发现有灌银、铜、锡者，照数剔除分量。最后折成纯金足赤重量，按照当天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所挂黄金牌价行市折合价款。

那时北京金店很多，大都集中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二条、珠宝市街一带，大大小小有一百三十多家，资本都很雄厚。著名的有三阳、开泰、天宝、中源、宝华、全聚、宝兴、三聚源、宝兴隆等。这次得标的商号是宝昌、宝善、仲记、乾泰、义聚、富聚、富源、中源、天聚兴、天聚、天益兴等。投标单是故宫印刷厂自印的，上面印有“故宫博物院处分物品投标单”字样。

金店得标，经故宫守门警士检查后，将物品运走。故宫这三次标卖黄金器皿共得款三十八万八千一百余元，存放于银行，作为基金。抗日战争爆发后，此款去向如何，则不得而知。

沈阳金佛被盗疑案

1946年，沈阳曾发生过一起爆炸性新闻，位于北市的皇寺丢失了一尊价值连城的金佛。事发之后，警察当局闹闹哄哄地找了一个多月，后来不了了之，致使此案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至今仍是个谜。

记得当时报载，这尊金佛名叫“嘛哈噶喇”，是元朝初年蒙古族大喇嘛拿出弟子们数十年化斋积捐的一千多两黄金，请金匠精工制成的。佛高一尺三寸，两腿半蹲，双臂交叉于胸前，右手操一柄月牙斧，左手执一把双刃剑，神态威武，十分精美。

金佛铸成后先是在五台山供奉，后移至内蒙古萨思遐、察哈尔奉祀；几年后，为躲避清兵，大喇嘛墨尔根率众逃跑，命人用一头白骆驼载着金佛，千里迢迢直奔盛京。行至沈阳北市附近，白骆驼突然卧倒不起，这是佛门的“吉兆”。喇嘛们又惊又喜，把白骆驼卧地处视为佛教圣地，定为他们的“生根”之处。清太宗得知后，立即降 诏，在这里设佛教，造寺院，这就是后来的皇寺。从此金佛就供奉在这里，声名远播，皇寺成为东北的佛教中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朝拜，就连西藏班禅大喇嘛也于1931年秋不远万里，专程到此参拜金佛，并在这里住了近两年。

据寺里的喇嘛说，金佛被盗的前一天，即3月30日，沈阳佛教会社居士李槃西，陪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姓兰的青年人来到皇寺。此人自称是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派来的，一是代表徐箴前来献礼，二是告知，徐箴第二天上午来拜佛，随后提出要到佛楼上看看金佛。

金佛供在二楼的神龛里，一般人不得上去。但省主席的“特使”不好得罪，大喇嘛只得陪同。那位居士在金佛前看得十分认真，那兰“特使”转来转去显得心神不安，眼睛总是扫视楼外院墙和参天古树。

这天晚上，老更夫伊庆阿巡夜格外细心。到午夜时分，隐约听到寺院东北角有老鸦起飞惊叫声，他赶忙走过去，查了大半天，但是什么也没发现。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位老喇嘛来到佛楼，正想掏钥匙开门，顿时惊呆了——佛楼大门上的锁已被锯断。他顾不得多想，赶忙检查第二道门，锁也被锯断；又慌忙去查看楼梯口的两道锁，同样都被锯断。他浑身颤抖地爬上楼，朝佛龛里一看，立刻傻了眼——那金光闪闪的大佛已无影无踪了。

与金佛一起不翼而飞的还有徐箴奉献的月牙斧和金弢 跎巴。佛龛旁只剩下盗贼作案时用的半把锯片和两根生铁炉条。这位老喇嘛一边捶打地板，一边哭喊。众喇嘛闻讯赶来一看，都吓得掉了魂似的。大寺格听此消息，战战兢兢地来到佛楼，遍寻金佛不见，连忙向沈阳市警察局第六分局报案。

当天下午两点多，正当寺院一片混乱的时候，徐箴在一些大员们的陪同下来朝拜金佛了。他进了山门，招呼也不打，直奔佛楼而去。全寺的喇嘛都慌了手脚，大寺格双膝跪地，涕泪交流，向徐氏禀报金佛被盗之事。徐听后，并不惊慌，只是小声地自语：“看来金佛与我无缘啊，佛爷不在我也要拜！”说完，他快步登上佛楼，冲着空佛龛叩了三个头。之后，他声调平静地安慰大家，不要着急，金佛一定会找回来的。

徐箴去后，六分局来了一伙警察，把皇寺的三十多个喇嘛统统抓起来。白天在班房里反省，晚上挨个过堂，押了一个多月，又不声不响地给放了。释放那天，六分局的局长特意训话，要他们出去后要识

抬举，不要到处胡说。

众喇嘛回到寺里，谁也不敢议论此事。但时过不久，徐氏又亲自带着官员来到寺院，名曰“慰问宗教团体”，并说既然金佛难以查寻，大家就不要费心劳神了，家丑不可外扬，以后别再提它了。果然此后再没人提起金佛。

有个喇嘛曾留心过李槃西的行踪，多次去盯梢，却始终没见到他。有人说他出远门了，也有人说他暴病死了， 总之金佛被盗后，他和兰“特使”都失踪了。

还有一件蹊跷事。金佛被盗的第三天早晨，皇寺突然起了一场大火，由于扑救及时，只烧了几间库房。起火原因尚未查清，谁知五天后，又起了第二场大火。这场火是夜里起的，寺院的人都抓去受审了，眼睁睁地看着牌楼和山门被烧塌。两场大火过后，警方从未追究过起火原因，喇嘛们都觉得是个谜。

笔者曾风闻徐箴情况：他是辽宁新宾县人，字士达，早年留学日本，攻电机工程。1947年秋，他携眷由海路外逃，由于轮船超载，又遇大风，船上人员全部丧生。如果那尊珍贵的金佛也带在他身边的话，也许一起沉入大海了。

小金像让位大铜佛

北京的雍和宫是座喇嘛庙，从一进门的三牌楼直到最后一层殿宇万福阁，朱墙碧瓦，金碧辉煌，气势庄严雄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对这种中国气派的建筑，外国游客赞赏不绝，中国游客引以为豪。

笔者早年尝游览法轮殿。法轮殿殿堂宽敞，共有八十一间，连建为一个整体，俗称九九相连。殿堂中供着一尊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铜像，佛像前同时可容一百零八个喇嘛席坐奉经。

提到雍和宫法轮殿，不禁回忆起一桩往事。在1929年以前，雍和宫法轮殿里所供的佛像，并不是笔者所见的宗喀巴铜像，而是一尊身披哈达的西藏喇嘛式的释迦牟尼像。像体较小，由纯金铸成，中空，里面装满了珠宝珍品。这座金像是在乾隆十年（1671）正月由西藏达赖喇嘛向乾隆皇帝进贡，送到北京来的，供在雍和宫佛殿内。由于殿高佛小，很不协调，便在殿内建造了一座雕刻有宝像 的曲栏大法坛，坛上又陈列一座鎏金千叶莲台，那尊释迦牟尼金像就被供在莲台之上。乾隆皇帝特意写了一首佛赞，因为其中第四句有“是则名为转法轮”之句，所以该殿便命名为法轮殿了。

到了清代宣统元年（1909），雍和宫喇嘛白普仁向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募捐集资，铸造一尊佛体高大的宗喀巴铜像，准备撤下小金佛，改供大铜佛。铜佛铸成后，适值辛亥革命，接着便是军阀连年混战。原来所捐款项，已然用尽，白普仁无力换装铜像，于是这尊体形高大的铜像，就被弃置于雍和宫街西一所民宅院内。

1928年，曾经一度叱咤风云、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被打得一败涂地，只好留寄津门皈依佛教。一次他来到北京雍和宫朝拜，当来到法轮殿时，也有殿高佛小之感，当即找来喇嘛询问情况。白普仁详细叙说了募捐铸佛，无力安装的经过。孙传芳听后马上叫白普仁领看了在民宅院内弃置的铜佛，并答应由他自己独自出资，将这尊宗喀巴大铜像遍体贴金，雇工匠抬入法轮殿中，把原来小金像替换下来。1929年5月21日，在雍和宫举行了“宗喀巴开光大典”，当时军政各界人士纷至沓来。此后，每年有一百零八个喇嘛在法轮殿里奉经四十九天。这件事迄今已五十多年了，回顾往事，也算是一段趣闻吧。

稀世珍宝大玉佛

北海公园南门外西侧的团城，是北京人熟悉的古迹，它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团城内建筑以承光殿为中心展开，点缀有山石、曲廊、亭台和古树，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渎山大玉海”和“大玉佛”两件稀世珍宝。供奉在承光殿内木龛中的释迦牟尼玉佛，系由整块白玉精雕而成，高一米六，重约一千二百公斤，全身洁白无瑕、色泽光润，雕刻精美绝伦。玉佛左臂披袈裟，头顶及衣褶上都镶嵌有红绿宝石，其形态慈祥端庄，栩栩如生。唯右臂上有一处刀痕，是1900年八国联军留下的罪证。

据传，这尊玉佛是僧人明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缅甸募化得来，进贡给慈裕太后的。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时光了。

当时，北京西郊海淀关帝庙，有僧人明宽，于光绪十八九年间，与广东僧人智然及弥勒院住持惠通结伴出国，赴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各地旅游， 寻访佛家圣迹。明宽学识渊博，通晓佛经典故，沿途讲经明善，介绍中国佛门净土之事，颇受各地僧侣欢迎与尊重，遂由缅甸僧人赠送了一尊大玉佛和一尊小玉佛。明宽等人获此珍宝，万分荣幸，遂请仰光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纪念照片，然后起运玉佛回国。

从缅甸至北京，起运一吨多重的大玉佛，在当时绝非易事。为避开沿途官府的盘查、纠缠，遂打出为慈禧赴南洋“请佛”的旗号，所雇车辆上挂着“奉旨请佛”字样的黄旗，从而一路还较顺利。南洋玉佛送至北京，各界人士闻讯而至，争相瞻仰，鼎沸一时。然而，步军统领

衙门内有人提出责难，谓明宽和尚犯了“冒旨罪”。

明宽和尚素与西直门内伏魔庵住持灵辉友善，而灵辉和尚收了许多宫内太监为弟子。明宽便通过这层关系，请求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莲英说情，并表示情愿将大玉佛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听了十分高兴，不仅没有治明宽和尚的罪，还赏了他五百两银子，然后择吉日，把大玉佛送到团城，供奉在承光殿内。

满族首饰——扳指与戒指

满族作为曾经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文化至为丰富且流传甚为绵长。在其与汉族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彼此之固有文化融会贯通、相得益彰。

原属于满族特有的首饰——扳指与戒指，虽非九鼎大吕，但就其渊源与文化微妙论，则颇值得涵咏玩味。

扳指亦指“板指”，又称“班指”或“梆指”。为满族男子套于右手大拇指上之短管状饰物。考其源，出于实用而始制此物。满族八旗子弟于弱冠前，照例要到本旗弓房锻炼拉弓，由“一个劲儿”（二十市斤拉力）循序渐进为“二十个劲儿”甚至“三十个劲儿”。拉弓时佩戴扳指，借以保护手指并可减少手指运动量，故昔年之八旗子弟对此物甚为重视，人手一枚，因而成习。初时因重实用，大小扳指皆选韧涩材质制作。其宽窄肥瘦不一，因人而异，以便套带。

本是辅助习武的扳指，由于满汉两族广大男士的欣羡 与效颦，竟使之成为一种极为时髦的佩饰品，上自皇帝与王公大臣，下至满汉各旗子弟及富商巨贾，虽尊卑不同而皆喜佩戴。其质地亦由原来的犀角、驼骨发展为象牙、水晶、玉、瓷、翡翠、碧玺等名贵滑润的原料。

普通旗人佩戴的扳指，以白玉磨制者为最多，然就其质量而言，优者与劣者相较，骤观之并不相上下，而骨子里竟判若霄壤。贵族扳指以翡翠质者为上选，其色浑澄不一且花斑各异，满绿而清澈如水者

价值连城，非贵胄而不敢轻易佩戴。以其大小厚薄论，又有文武之分，武扳指多素面，文扳指多于外壁精铸诗句或花纹。

戒指又名“约指”，俗称“镏子”。清朝兴盛时期，旗家男女皆喜戴此物。其式样甚多，以光面戒指（即无花者）为最普通，或做扁圈式，或做圆筒式，或做面部（即指盖部）之凸起式者不等。上有铸字者，如“福寿绵长”，或单个的“福”字或“寿”字。

八旗子弟有其友朋之投契者，与戒指一物，多有用其表示团结精神，彼此各戴一枚，皆铸有“二人平心”之字样，夫妻间亦有借用此种戒指以表示心地无二者。

按戒指之意义，戴于指上，含有警戒之告示，其上镌有“戒烟”“戒酒”“戒色”之字样。及后，汉族人士亦多效此风。凡劝人戒烟、戒酒、戒色者，聚资为之镌一戒指赠之。八旗子弟最普通之戒指，多镌有自己的姓名，此风历久不泯。

戒指之质料，满族贵胄有翡翠质者，蔚为贵品。其次为金质镶嵌宝珠玉石者，戴于指上璀璨夺目，亦非贵胄不敢如是夸张也。普通者则为金、银二质，而尤以银质者为最普通。有在银质戒指上加以“包金者”，与金质戒指鱼目混珠，北京的老旗人谓之曰“穷人美”。

“喷水鱼洗”天下奇

杭州的孤山，不仅是西湖风景的精华所在，也是西湖文物荟萃的地方。单说孤山南麓的浙江博物馆，就珍藏着不少举世闻名的国宝。

在诸多的国宝中，有一件稀世文物，叫作“喷水鱼洗”。它是用黄铜制造的，样子很像一个铜脸盆。盆高约十厘米，盆口内径约三十二厘米，盆底内径约二十八厘米。盆沿宽三厘米，沿的上面竖有两只对称的铜耳，称为“双耳”，或叫“两弦”。盆内底部铸有长约十厘米的鲤鱼四尾，鱼鳞俱全，首尾相接，按顺时针方向排列成方形。每条鱼嘴前铸有七至九条凸纹，成放射状沿盆的内壁向上延伸，称之为“喷水线”。“眼似珍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唐·章孝标诗句）“好去长江千万里，不须辛苦上龙门。”（南朝陈·阮卓诗句）中国民间向以“鲤鱼跳龙门”寓吉祥喜庆之意，故鲤鱼也就铸入了盥洗生活用具。

“喷水鱼洗”在表演时，将它放在一座特制的木架上， 其间垫上一层软垫，注入大半盆水，然后用蘸有水的两只洁净无油腻的手掌，缓慢而有节奏地摩擦盆边两耳，盆就像受击撞一样振动起来，发出“嗡嗡”而有力的声响。“拂水宜清听，凌空散迥音。”（唐·郑黨诗）好似在寒夜听到了回旋的钟音。与此同时，盆内水波开始荡漾，在鱼洗水面靠周壁四个喷水线处，就有水花飞溅而起，喷涌上蹿，形成四道水柱。在每道水柱附近的水面上，水珠跳跃，水泡翻滚，喷射的水柱最高时达七十厘米以上。整个水面，酷似元代诗人李祁在《题赤鲤图》中所描绘的：“风翻雷吼动乾坤，赤鲤腾波势独尊。无数闲鳞齐上下，欲随浪春过龙门。”确实十分奇妙有趣。如果停止摩擦，音响和喷水现

象也随之消失。这一奇特现象使“喷水鱼洗”闻名中外。近几年来，浙江博物馆的“喷水鱼洗”曾两次到日本，一次去美国展出，观众如潮，新闻竞相报道，将其誉为“中国稀世之国宝”。

“喷水鱼洗”这一罕见文物，据科学家研究，是符合物理学的共振原理的。当两手搓“鱼洗”双耳时，便产生两个振源，振波在水中传播，互相干涉，使能量叠加起来，所以这些能量较大的水点，会跳出水面直至喷射。由此也可知，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

浙江博物馆所藏的“喷水鱼洗”，原为上海文素松的藏品。文素松，江西萍乡人，字舟虚，保定军校毕业生，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教导团营长、大本营参谋、广州卫戍 司令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处长、中央兵工试验厂厂长、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等职。文先生平时喜爱古物，工余从事考古学研究，撰有《寰宇访碑录校勘记》《校补五朝鋆本书目表》《金石镜》等论著。此“喷水鱼洗”为文素松从云贵高原购得，据传系明代文物，文先生珍藏了二十余年，于1946年去世后，由当时的西湖博物馆买下这一文物，保存至今。

石雕瑰宝“天后宫”

在湖南省芷江县城芷水河西，有座乾隆十三年（1748）建造的画栋飞檐式的“天后宫”。宫门楼的青石浮雕，是中国罕见的石雕艺术瑰宝。

这座宫门楼高十二米多，宽六米多，门楼正面由一百二十八块精雕细镂的大小青石嵌砌而成，坐落在十五级台阶之上，门前由青石雕花栏杆围成台状，两侧雄狮蹲踞，石鼓对峙，每只重三千多斤，栩栩如生。

整座门楼用四根方形巨柱支撑，上面叠架着斗拱飞檐的屋顶。门楼正面的上下左右镂镶着五十二幅大小青石浮雕，或一幅一则故事，或数幅合成一典。门楼正面的上方正中，为镂空透雕的五龙四凤和双鱼跃龙门的竖形框幅匾，刻工精巧异常，形象惟妙惟肖。匾上镌刻“天后宫”三个大字，浑厚圆润，施斧凿亦不失书法之妙。相传为清代江南才子陶澍所书。楼顶两层瓦檐上有十二条金色鲤鱼翘尾伏首。在宽两米三、高两米七的弧形正中拱门门楣上 的石帘摹绘着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壮景，悟空与东海龙王厮杀，搅得丹凤引颈悲歌，两条蛟龙惊恐不安，八大天王亲率各路骑狮、坐象、乘龙、骑马、乘牛的将士凌空而下，把个猴子围得水泄不通，好一派激昂的场面。

门楣上边的石雕画“永庄升平”，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民间生活情趣：在一棵合抱的古柏下，两老翁捋须对弈，一群秀才品玩着一画友的丹青，地头歇息的农夫、樵夫也探过头来观望，四个顽童拍手凑兴……这一幅太平世界的极乐情景，寄托着人们对祥和安定生活的向

往和渴望。拱门两边的石柱上，镂着茂林修竹，别有一番“琅玕满径绿沁人”的情趣。石柱的石框内雕有一幅别具一格的楹联，“重新庙貌威灵远振潭阳，庞锡天章德泽宏敷闽海”，相传是乾隆皇帝南巡“武蛮邑地”时，乘酒兴来到天后宫门前，极目远眺，触景生情，脱口吟了上联，却怎么也想不起下联来。旁边一福建秀才方容，略加思索对了下联。乾隆皇帝酒醒后，对方容倍加赞赏，让他做了福建学政。从此，这对联流传于世。

楼正面的石柱上，还有“八仙过海”“阳桥夕照”“狮子滚绣球”等石刻图，运用传统国画写意手法，构思别致，虚实得体，独具神韵，建造精工又一气呵成，高大庄严，朴实美观，显示18世纪芷江青石浮雕镂空技艺十分高超的杰出成就，不愧是中国石雕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如今，它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修缮一新，供人们参观。

青田石名扬四海

浙江省青田县盛产青田石，自古以来就因石雕而扬名四海。早在元朝时已有石雕问世。一千六百年前的青田石雕作品《卧猪》至今还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内。

青田石色泽素雅，温润优美，质地细软纯净，脆硬度适宜，极易雕刻，石色五彩缤纷，有青、白、黄、红、绿、紫、棕、黑等色，尤以青色居多，花纹有的似云霞，有的如鸟兽，美妙奇特。青田石品类有一百多种，其中温润如玉的“灯光冻”“封门青”价等黄金，同福建寿山的田黄石、浙江昌化的鸡血石合誉为“中国印石三宝”，也是海内外收藏家青睐的奇珍异宝。

“灯光冻”质地如玉，以灯照耀，会闪闪发光。该石以产于山口镇封门一带为正宗。封门青产于山口封门矿，该石呈淡青色，微透明，素以石质晶莹、色感雅丽、硬度可人著称于世。其治印性能优于天下所有石才，毛料经艺人锯料、精镂、磨光、上腊等制成图章石，便呈现美丽的 腊光或油脂光泽。

明朝以来青田石印材便一直是金石家们的最佳石选。明代大文学家文徵明之子文彭偶然购得青田石四筐，试做印材，发现比金属治印更加得心应手，消息传开，天下文人墨客、丹青妙手、金石奇才竞相刻石，推动印坛从流传两千年之久的铜印走进石章时代。许多治印高手如董其昌、赵之谦、钱谦益、王冕、唐伯虎等用的都是青田石。连名动一时的“秦淮八艳”也从相契的文人那里喜欢上了青田石章。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大臣选用青田石刻制一套六十枚“宝典福书”印章作

为寿礼，每枚印章上都有一个“福”字。乾隆爷见了，龙心大悦。这套印章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西泠后四家印谱》所用石材中，青田石占百分之七十，青田石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青田石雕的题材日见丰富，技法日益多样。石雕艺人们吸收木雕、玉雕、牙雕等特有的艺术风格。五谷六畜、神仙佛像、帝王将相、巾帼仕女、腾龙飞凤、吼狮啸虎、鹊鹿蜂猴等无不形象逼真、层次分明地出现在石雕艺人的刻刀之下。

1920年，青田石雕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银牌奖章，从此更是名声大振。流传千百年的青田石雕造就了一代代艺术名师。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青田石雕特种邮票，收录了青田四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作：周百琦的《春》，林如奎的《高粱》，张爱廷的《丰收》和倪东方的《花好月圆》。

北京景泰蓝

朋友赠我一对北京景泰蓝花瓶，十分浑厚持重，古朴典雅，真是百看不厌。

记得20世纪40年代时，一个偶然机会，我曾见到过元代至正年间的景泰蓝产品，以为是最早的了。但景泰蓝究竟创始于何年代，至今尚未查到可信资料。据说这种工艺技术是元代忽必烈西征时，从西亚、阿拉伯一带传进中国的，先是在云南地区流行，后来才传到北京。

景泰蓝，又称珐琅。它是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形上捏出各种图案花纹，再将五彩珐琅点填在捏好的花纹内，经烧制、磨平、镀金而成，一般在器皿底部都凿刻有当朝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景泰年制”等。

明宣德时期的景泰蓝，风格自然豪放，制品以仿青铜器的罐、觚、炉为多，这些均属宫廷寺庙的祭器。到景泰年间应该说有重大突破，达到一个高峰时期。它继承、发 扬了宣德时期的精华，又创造了新的水平。其造型愈加端庄富丽，胎骨厚重，丝工粗犷有力，纹样丰富大方，内容常有缠枝莲、饕餮纹，此外还有花、鸟、果实等。釉质优美沉着，坚实浓郁。因大量以蓝釉作底，故称景泰蓝，一直沿用至今，为国内外所共认。

其实到清代乾隆时期，景泰蓝又进入了一个辉煌阶段，不仅产量多，规模大，而且品种多，技术精细。在工艺材料上也进行了一些改

革，不再使用青铜作原料，而采用延展性能较强之纯铜作原料，应用了新的打胎、掐丝技术，因此胎骨比明代制品匀实、周正，造型多变，铜丝细薄均匀，使捏出的丝流畅委婉、纹样也显得灵活精巧。制品实用范围更为扩大，除大量制作宫廷寺庙祭礼法器外，帝王后妃们活动的大殿、寝宫内，景泰蓝制品比比皆是。制品种类增添有围屏、屏风、桌椅、床、枕头、茶几、鼻烟壶、筷子等实用物，并开始在建筑的门、板壁上作装饰，其技艺又提高一步了。

北京的料器

孙儿过生日，我把一套十二属相的料器小动物送给了他。这套料器还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著名的料器行“志源号”的掌柜蒋文亮（人称蒋二先生）送给我的，色彩鲜艳，造型生动，一直是我的爱物。

料器古称“琉璃”。它和玻璃一样，采用硅酸盐和其他金属氧化物作原料，经过高温熔化，拔制成各种规格的料棍，然后在灯下烧软，以手工制成。和玻璃比较，它没有底胎，全靠艺人在灯火中手工制作；它的熔点低，颜色多而鲜艳。

料器起源于何时，尚不得而知，但远古时，已有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传说，古籍中亦有“销烁五石，铸以成器，磨砺生光”之记载。两千多年前的“中山王”古墓陪葬品中，就发现有琉璃碗和料器珠子。

北京是元、明、清几朝的都城，各种工艺匠人云集，也是料器的主要产地。据民间传说，明朝时，有一位广东 张姓秀才，赴京应试，屡试不第，衣食无着。一天闲逛，偶拾一只残破的料镯，无意中在火上烧烤捏拽，竟烧制成宝石般灿烂夺目的石头，便把它送到银楼去碰运气，果然被当作首饰料收购。从此张秀才再也不进考场，买点“广料”，专门做起了首饰石头。

清代时，北京的料器业已经十分发达。康熙年间命工部在琉璃厂设置御厂，派官员监制玻璃和琉璃制品（“玻璃”者，即料器，非今日之玻璃），专供内宫玩赏，时称“宫料”“御琉璃”。

生产料器的工具十分简单。北京人称料器艺人为“吹料活的”。艺人把各色料棍放在火灯上烧烤，待软化后用嘴吹气，边烧，边吹，边用镊子等小工具拉、拽、按、粘，就可以捏塑出玲珑艳丽、姿态万千的工艺品来。由于长年用牙咬着抻管吹气，许多艺人的牙都掉了。

辛亥革命后，江朝宗曾出资兴办“北京光明玻璃料器厂”，数年后因销路不好而倒闭。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料器行有两家，一家是蒋文亮先生的“志源号”，一家是汪福长先生的“长丰号”。据说现在内地料器行业已大非往昔可比，且成为出口工艺品了。

北京内画鼻烟壶

最近看到法国出版的《茱都夫人鼻烟壶收藏品图案集》，因而引起一些有关北京内画鼻烟壶的联想。

所谓内画鼻烟壶，就是通过只有黄豆粒大小的鼻烟壶嘴，在壶的内壁上作画。由于它小巧精致，便于把玩，所以成为独具一格的工艺美术品。

吸鼻烟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从西方带到中国来的，而内画鼻烟壶却是中国的发明。据说在清朝，有一个地方小官进京办事，因无门路，困在一寺院中。这天，他愁眉不展，躺在床上吸鼻烟，但发现壶中鼻烟已吸尽，只在内壁上残存有一些烟末，他便从炕席上抽出一根席篾插进鼻烟壶，向壁上刮去。之后，从透明的烟壶外壳观看，壶壁便出现了道道印络。这情景被寺院的一位老僧看在眼里，从中受到启发，便专门制作了一种代笔的细竹签，蘸上墨在烟壶内壁作起画来。于是，他便成了内画鼻烟壶的祖师。

内画鼻烟壶的壶料，多为玻璃和水晶的，也有采用料器的。画笔则是竹签制作的，每支长约二十厘米，笔头尖细，呈钩状，所以叫“钩竹笔”。作画前，先要在壶内装上铁砂球和金刚砂，用手摇晃，使内壁发乌，叫作“串壶”。作画的第一道工序是勾线，即打轮廓；第二道工序是上色；最后是题词，落款，盖印。由此可知，制作此物的技师，必须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有相当的造诣。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内画的“完善时期”，内画行业形成多种流派，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艺人。其中周乐元、马少宜、叶仲三、丁二仲四人最为著名，时人称为“京派”。其特点是诗画结合，色彩淡雅，古朴浑厚，粗犷无羁，行书草法，墨饱字圆，对后来内画技艺的发展影响很大。

现在内画鼻烟壶，日益受到各国工艺品收藏家的喜爱。中国香港即设有国际鼻烟壶协会，并有画刊杂志进行专门研究和介绍，每年还要举办展览。法国的茱都夫人，从十六岁开始搜集中国鼻烟壶，现在已是欧洲无与匹敌的鼻烟壶收藏家了。1981年她收藏的一百五十个鼻烟壶在巴黎公开拍卖，每个至少售价一千法郎。我想，现在北京内画鼻烟壶也不多了，物以稀为贵，若要买一个，恐怕也需要上千元吧。

漫话“北京皇宫花”

近闻，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上，裕华公司经销的“北京皇宫花”博得好评。所谓“北京皇宫花”者，即“北京绢花”也。

绢花在中国，据说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北京制作绢花始于元代，至今也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当时专供皇宫内苑妃嫔、宫女做头饰花，后来，王公大臣家的小姐亦多佩戴，进而传至民间，及至清代，北京女子皆以头戴绢花为美，并示吉祥。因之绢花艺人日增，北京崇文门外还形成了绢花之集散地，此即“花市大街”之由来。

清光绪年间出版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载：“崇文门外迤东，目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所谓花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其所举多指头花，另外还有枝花、盆景、戏剧花等。除花市外，西城之护国寺，东城之东安市场、隆福寺等处，亦有绢花产销。

由手绢花空前的繁荣，随之出现了行业性活动——白缓献花会。花会以东药王庙为会址，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绢花艺人将制作精美的枝花、盆景、花环等敬献佛前；同时，将上好的头花，进贡皇宫内苑。皇宫也要派出太监参加这一盛会，以示祝贺。

随着绢花生产的兴旺发达，制作工艺亦愈加精湛，分工也愈加精细。如有的专做供皇宫内苑用的“宫花”，有的专做供舞台演出用的“戏

剧花”，有的专做民间妇女戴的“头花”等。花商也五花八门，资本较多者均设前店后厂（作坊），亦有专卖外商“洋花”的；小本作坊制作的绢花，或卖给花店，或每日清晨到花市设摊零售。山东、河南、东北各地，每年都有“花客”到北京订货，使北京绢花流布全国，颇负盛名，被誉为“京花”。

绢花的兴旺一直延续到清末，后来由于战争频繁，便日趋萧条。许多京花艺人被迫外流谋生，而留京者亦多在冬3月做花，其他季节只好另谋生计。

沈阳三彩熠生辉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陇海铁路修到了洛阳。在探测路基时，工人们发掘出一批唐代的墓葬，墓葬中有许多色彩斑斓、姿态各异的三彩马、骆驼、人物俑和各式各样的日用陶器。这批出土的三彩器物，在洛阳引起了轰动，后来运到北京，请文物专家们品鉴。著名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和王国维看后，给予极高的评价，并根据其色彩特点将其命名为“洛阳唐三彩”。一些外国古董商和古物收藏家风闻此事，争相出重金购买。于是，“洛阳唐三彩”之美名便远播海内外了。

其实，早在光绪六年（1880），在洛阳北邙山的古墓中就出土了第一批唐三彩，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故知者甚少。李健人在1935年曾写过《洛阳古今谈》一书，书中说：

> 陶器（洛阳）出土最多。或素烧，或彩釉绘，制造精美，具美术之价值。最使人感兴味者，实 莫如唐代殉葬之人物与马。其人物，如妇女上服均反领，犹若西装，足着蛮靴，跨上马，风致潇洒，体态健美，绝不类今日女性之盈盈然如风中摆柳也。而马又特高大，亦不同于今马。

“三彩”是多彩之意，与单彩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陶器分素陶和彩陶两种。唐以前，彩陶多为单色陶。到了唐代，三彩陶异军突起，以其斑斓的色彩，生动传神的造型和精巧的技艺，将中国陶瓷艺术推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因而也有人称它为“盛唐之陶”。

北邙山古墓中出土的唐三彩器物，有的残缺不全，需要进行修补和仿制。最初是邙山一带农民自行修补，缺什么补什么；以后随着社会的需要和修补仿制工艺的提高，人们便开始进行整体仿制，这便是仿制洛阳唐三彩的肇始。早年，最负盛名的老艺人是高松茂，他不仅仿制唐三彩技艺高超，还掌握了仿制粉彩、五彩及秦、汉、魏、隋诸朝的红胎、白胎、兰胎陶器的技艺，达到了“与古无异，以假乱真”的程度。

据闻，现今洛阳美陶公司仿制的“九都牌”唐三彩是洛阳唐三彩仿制品中的最优秀者。这种仿制品除选用最佳的泥料外，在造型方面注意传神，在釉彩方面把原有的古色和现今的时代色彩结合起来，既古色古香、典雅富丽，又绚烂多彩，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哈氏风筝有传人

不久前，北京哈氏风筝第四代传人哈亦琦应美国风筝协会之邀，赴美传授风筝技艺。在一个中国风筝展览会上，他看到四只罕见的风筝，有莲花葫芦、香炉鼎、钟馗和双鱼。从材料、骨架扎法、画案设计、彩绘手法，竟与他家祖传技艺酷似，细看右下角，有一行小字：“1903年，中国风筝大师哈长英制绘。”

哈氏风筝的第一代应是哈亦琦的曾祖父，叫哈国梁。他原是清末北京的一名泥瓦匠，因冬天活少较有闲暇，又住在当时北京有名的文化街琉璃厂，耳濡目染，便钻研起风筝技艺来。先是买来风筝细细揣摩，继而学扎。由于心灵手巧，具有这方面的天分，制作的风筝小巧玲珑，别有风韵，博得顾客赞许，来购者颇多，因而改行开了风筝铺。到了中年，技术更臻成熟，他的风筝被列为清宫贡品。

哈氏风筝最有成就的是第二代哈长英。他从小酷爱 风筝，既有耐性又能钻研，苦苦挖掘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经常流连于颐和园、天坛一带，留心观察亭廊楼榭中的绘画图案，以及自然界飞鸟爬虫的运动姿态，画了大量素描，提高了审美眼光，把一只只普通风筝制作成独具特色的艺术品，既有近看的欣赏美，又具远看的动态美。《琉璃厂小志》曾记：“近数十年，以哈记制售之风筝为最著。”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美国开幕。当时政府农商部在北京挑来选去，终于选中哈长英的蝴蝶、蜻蜓、仙鹤、花凤四只软翅风筝去参赛，结果获得银质奖。

银质奖并未给哈长英带来什么欢乐。几个月后，农商部通知他去领奖章。他兴致勃勃，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服，以为自己为国争了光，政府会隆重欢迎他，招待他，说不定还会有一笔可观的奖赏。谁知到了那里，达官贵人们对他冷若冰霜。他们拿出一只精致的盒子，慢慢打开，把那枚闪光的银质奖章在他面前晃了晃说：“领这东西要交两块大洋的手续费！”哈长英一听惊呆了。他要养活妻子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平常穷得没米下锅，又到哪里去弄两块大洋呢？一气之下，扭头便退了出来。后在凄风苦雨中死去。

哈氏第三代传人哈魁明继承祖业，造诣亦高，所以才熏陶培养了第四代哈亦琦。哈亦琦在美传授风筝技艺期间，还参加了国际风筝表演比赛，最后获得了这次表演比赛的最高荣誉奖——特别奖。

扇骨雕刻艺术

笔者早年居京时，喜好收藏纸扇，一则夏日炎炎有带来凉爽的实用价值，二则从扇面到扇骨，画上或雕刻上名人书画，兴之所至，欣赏临摹，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扇，古人又谓立箑。许慎《说文解字》注：“箑，扇也。扇从羽，箑从竹。”由此可知，扇或辑羽而成，或绵竹制成。骨，《说文解字》注：“肉之核也。”扇骨，实为起固定和支撑作用。

《三国演义》中孔明所用之羽扇，公卿大夫所撑之障扇，宋元所兴圆形之纨扇，皆具扇柄，但不称为扇骨。现称为扇骨者，实为明朝以来流行的折扇之内骨及边骨也。

折扇始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季至清朝中期。这时期的实物所见边骨皆为素状，迄今未发现刻有任何铭文或图案的，说明扇骨在此之前只有一种使用的价值。雕刻扇骨为乾隆后始有之，盛行于清光绪朝至民国。所雕内容极为广泛，文字既有阴文亦有阳文，或阴阳相兼。书体，上 起三代之甲骨、钟鼎、石鼓文字，下至秦篆、汉隶、行、草、楷诸书。图案有山水、人物、花卉、竹石、秦砖、汉瓦、十二花神、汉魏碑版、古货币，不一而足。

雕刻扇骨和雕碑石、墓志、法帖等大同小异。刻碑要先书丹上石或摹勒上石，然后再进行雕刻。刻扇骨同样也需先由书家、画家将书法或画作于扇骨之上，再由刻家操刀以成。所以带铭文和图案之扇骨，都为两次艺术加工，也是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体。刻工要

保持原作的风貌，不失其神韵，就应理解书家之用笔风格、间架结构、书画层次画法，出笔入笔，全依原作，不应掺杂半点儿个人意见，率意而为。

刻骨者是以刀代笔，以骨为纸。刻家在狭窄的扇骨上，刻出各种图案，没有特技是不能完成的。尤其名人书画稿本，更须由高手雕刻方能相得益彰。笔者藏有张大千画山水人物，徐操画仕女图，范节厂刻郑孝胥书，金城作《芦雁图》等，刻工精细，层次井然，花卉、树木、人物安排恰当，能体现原作精神，堪称佳品。另有几把扇骨，是由著名篆刻家寿石工先生精心雕刻的书法作品，一是溥雪斋书《桃花源记》，一是潘龄皋书《赤壁赋》，骨窄字小，神韵极佳。现在人去物在，更觉弥足珍贵了。

宝石旱盆景

中国盆景由于取材和制作方法的不同，一般可分为山水盆景与树桩盆景两大类。而以各种宝石制成的北京旱盆景，堪称中国盆景艺术中璀璨的瑰宝。

北京的宝石旱盆景，过去大都系宫闱中的雅玩之物，贵胄之家收藏亦甚多。至于小康家庭，也每每在堂屋的硬木架几案上对称地摆上两盆，以示风雅。当时，凡小康水平以上之家办喜事，娘家送的嫁妆中，也往往有一对宝石盆景。

旱盆景所用的宝石，有白玉、碧玉、翡翠、玛瑙、松石、木变石、芙蓉石、欧伯石（音译，产自澳大利亚）等十余种。其中的翡翠，以苹果绿和菠菜绿为上品；松石，以深蓝而沉重者为上品；芙蓉石，以葡萄红色为上品；欧伯石，以白地带金星、红点、绿点者为上品。

皇家所撰的宝石旱盆景，是由官中的“造办处”承作的；民间所摆者，皆出自玉石匠之手。制作的工序包括开 料、挖脏（去掉宝石上的瑕疵与污垢）、雕琢、打眼、研磨、上光、穿枝过梗以至最后组合成完整的形体。至于所用的瓷盆、珐琅盆、硬木底座几以及硬木框架玻璃罩子等物，则订购于各有关作坊，名曰“过行”。

宝石旱盆景之造型皆为花卉，且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牡丹，象征荣华富贵；菊花，象征“涵玉散金”或“黄金满袖”；荷花，象征“并蒂连丝”或“出淤泥而不染”；石榴，象征“多子多孙”；葡萄，象

征“满斛珠玑”；梅花，象征“风光先占”或“五福临门”（梅花花瓣五片，象征着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种幸福，旧时庭院楹联常有“梅花开五福，竹叶报三多”之句）等。

以宝石穿缀而成的花卉旱盆景，质纯色正，光怪陆离，姝丽的枝叶陪衬着娇羞的花朵，富有迷醉的风致；以红珊瑚或白珊瑚栽成的盆景，虽无一花一叶，而其形如树枝，幽茂而玲珑，赏玩间，每每令人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咏珊瑚》：“绛树（珊瑚的别名）无花叶，非石亦非琼。世人何处得，蓬莱石上生。”

徽派盆景见闻

盆景被人称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皖南有个小村，原称“梧村”，不知什么时候改名“渔村”。因为村民世世代代以种花为生，所以又称“卖花渔村”。

卖花渔村的花木以梅花居多，其所产的梅，以清丽见长，或以香取胜，深得盆景爱好者的青睐。笔者曾游卖花渔村，不仅被百色纷呈的艳丽景象所吸引，更为花木造型的优美所折服。花农们用“咫尺千里，缩龙成寸，小中见大，虽假犹真”的艺术手法，创作出千姿百态的花木盆景。有的铁干虬枝，古朴苍劲；有的盘根错节，势若蟠龙；有的悬空倒挂，如龙探海；有的亭亭玉立，笔直挺拔。

中国的盆景流派众多，仅南方就有徽州派、扬州派和苏州派之别。卖花渔村的徽梅则为徽州派的代表作。徽梅号称龙桩，与徽墨、歙砚齐名。弯曲结扎做成龙桩，主干由几弯到几十弯不等；侧枝水平对称三弯如龙爪，主要有之字弯，磨盘弯（亦称螺线弯）两种，在两种弯的基础上 又有所变化，以古傲、苍老、奇峭见称。

笔者在一家花农门口，见到过一件难得的珍品，它巧妙地用一棵梅桩的主干和三根朝下生长的枝干，塑成走兽的四肢，一根较细的枝干在前肢的交叉处斜向上方，其上绽开朵朵红梅，整个造型，俨然一只脚踏实地、翘首望天的“梅花鹿”。观其形态，想其自然，思其寓意，兴味无穷。更有意思的是，像龙须、石楠、榆树这些本来生长在山野之中被人砍伐的柴薪，年复一年，砍而复生，从没有人想到它们会有什么艺术价值；而卖花渔村的花农却独具慧眼，他们看见小树长

成了粗大的柱头，刀砍斧琢的伤痕变成了自然的空漏，便采挖回去，经过艺术加工，竟也成了稀有的盆景树扎，而且妙趣横生。可谓匠心独运矣。

北京人玩雨花石

老北京人好逗鸟、斗蟋蟀、养花，也好玩石头。就以雨花石而论，此物虽产自南京雨花台，但老北京人的家中也多藏有珍品。观赏雨花石，历来被视为高雅之举，其中乐趣，实有言语难传之妙。

雨花石素以质、色、形、纹的精奇巧美著称于世。其优者玉质天章，空灵晶澈；更有佳品，或天然成画景色迷人，或似人若马栩栩传神。难怪历代名士如文学家苏东坡、诗人郝经、书法家米万钟、戏剧家孔尚任以及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徐悲鸿等，对五彩斑斓的雨花石均有极大的兴趣。

如此奇特的雨花石，价钱自然非常昂贵。当年北京的遗老遗少以及名医、名优、名作家、名画家，则不惜以重金争购之，并题以雅名，藏之密室，轻易不肯示人。

笔者早年居京时，在友人处见过不少雨花石珍品；亦常见二三藏石之挚友共同展玩，并切磋题名，那“其乐也 融融”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每当大家把各自珍藏的奇石展示在紫檀木八仙桌上的时候，一切忧愁烦恼便烟消云散。琳琅满目的雨花石，在古色古香的八仙桌的映衬下，越发显出迷人的色彩和诗一般的意境。石友们当年所藏之奇石，都有一个雅致的名称，如“云锦”“秋虫”“古鉴沉月”“游烟花三月”“水墨瓜藤图”等，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些不胜枚举的奇石中，“槐阴送子”与“归凤求凰”可谓苍穹独赠，价值连城。前者的天然画面是由乳白、墨绿、杏黄等三色组成；墨绿色的图案恰似一株古拙青郁的槐树，浓阴下两块狭长的杏黄色，一前一后，高矮不等，颇像身着古装的父子路经古陌槐阴下。

“归凤求凰”是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先生的传家之宝。此石本体为鲜艳的鹅黄色，而含在其中的猩红色细密花纹，极似两只振羽翱翔的凤凰，那栩栩如生的情态，令人有呼之欲出之感。遗憾的是，这一天然的瑰宝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不慎失落。欲再获如此珍奇之雨花石，只恐踏破铁鞋而无觅处矣！

神态各异话罗汉

“鼻高目突耳垂肩，妍丑庄谐一一传。鬼斧凿来五百态，神州罗汉亘千年。”这四句诗，是广东南华寺内，宋庆历八年（1048），游人观赏木雕罗汉像后所作。

罗汉原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佛家声闻乘断尽三界一切见思惑之圣者名，就是断尽一切嗜欲、解脱了烦恼的僧人。古人对此圣者甚是赞赏，他们为了积德纳福，解脱烦恼，就在名山古寺中捐刻佛像。因此，罗汉在中国不少寺院中都有供奉。

罗汉的造像不一，神态不同。先说广东曲江南华寺的木雕罗汉像，最初为五百尊，日久倾圮，有的毁坏，有的散逸，如今这十九尊宋代罗汉，算是仅存的了。它是以柏木雕刻而成，雕工古朴精细，形体颀长，个性而生猛，外貌奇而不俗。云南昆明玉案山下筇竹寺内的五百罗汉，分两殿供奉，每殿六排，每排六层。他们最大的特色不是传统的千人一面，而是以生活中的“众生相”为标本，他们 眉目传神，俨如活人，有老有少，有坐有立，衣衫褴褛和帽履整洁的各占一半，雕塑亦极精美可观。浙江杭州南屏山下的净慈寺，相传初塑有泥金罗汉十八尊，北宋毁于大火，高宗时又塑五百罗汉，个个神态毕露，雕工极为精良。而山东泰山北麓的灵岩寺内四十尊泥塑罗汉，更塑造得准确生动，它系宋代作品，透过罗汉的衣饰形象和表情，揭示了它们的内心世界，真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俱形于色，富、贵、贫、贱、寒碜相栩栩如生，塑工极富实质感。青筋脉管，头露清晰；肌体骨骼，分明如生。再如北京香山西北角的碧云寺中所列五百罗

汉，是明代古物，以檀香木为身，黄金为外饰，个个神态活现。另外四川峨眉山麓报国寺、新都宝光寺、河南洛阳白马寺的十八罗汉，都是罗汉佛像中之杰出雕塑之品。

且说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武侯祠内的十八罗汉，是明代之物。相传它是以前南阳最大寺院“南大寺”供奉之罗汉，原寺院坐落在白河岸边，不知何年白河发水，寺院毁于洪水之中。清朝末年又一次大洪水，把这些罗汉从坍塌的河岸上冲了出来，后经整修，始移至武侯祠内。这十八尊罗汉，是琉璃塑像，以铅硝为助熔剂烧制而成，多数作跏趺之姿，像高一百二十厘米至一百三十厘米，查考在公元1484年烧成，迄今已有多年的历史。这些罗汉由于体形较大，在施釉方面，采用了刷釉方法，罗汉衣饰以绿、赭、黄、橙、黑五种彩釉，塑像的头、脸、手和足部，一 般不挂釉，而是利用原底本色，使塑像显得格外清雅醒目。这些罗汉最大的特色，是在造型上仪态各别，有慈眉善目，妙相吉祥的；有横眉瞪眼，面目狰狞的；有伸足屈膝，打坐盘踞的；有赤足的、有登履的、有持珠的、有合十的；有双目微合，闭唇沉思的；有袒胸露腹的，有农履整洁的……真是不一而足。

紫砂与铭刻

对于紫砂壶，笔者素有偏好。细细品玩，除了造型千姿百态，泥色丰润古雅，功能奇异独特之外，还集诗、书、画、印于一壶。因此，每一只壶，都是一件别具气韵的艺术珍品。

中国人爱喝茶、赏壶、品茗、吟诗，风雅之至，流传下来的赏茶诗也不少，其中有宋代欧阳修“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的佳句，还有梅尧臣的“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等，但当时还没把这些诗句铭刻于紫砂陶中。直至明清时期，宜兴陶瓷蓬勃兴起，紫砂壶才吸引了众多书画名家来到宜兴，他们或亲自挥笔兼刻，或与艺人合作镌刻，使紫砂壶成为“字随壶传，壶以字贵”的雅玩。有的壶身镌铭曰“一杯清茗，可沁诗脾”；也有镌“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的；还有人借铭文抒发胸怀。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紫砂壶上刻一诗云：

嘴尖肚大耳偏高，
才免饥寒便自豪，
量小不堪容大物，
两三寸水起波涛。

乾隆帝也曾为紫砂题诗一首：

锦校不藉无孙掷，
练影中堆万簇花。
设与水仙作春波，
天边风月傲清华。

此壶至今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清末民初，一代紫砂书面雕刻家沈才田、韩泰、路兰芳、任淦庭等，曾与书画名家于右任、吴昌硕、程十发、唐云等合作，制成“四方古菱壶”“汉君壶”等，被陶艺界一时传为佳话。其中陈少亭与蔡元培合做的一只紫砂花盆尤为名贵：盆系树桩型，树皮深褐色，有三个树结，两处脱皮露胎，造型生动逼真；盆的口径十四点四厘米，高十一点五厘米，两侧一面刻的是蔡元培先生的题诗：

不使宝山空手回，
濒行精选赠盆栽。
花神未必增惆怅，
乞得君家衣钵来。

岳渊主任属

蔡元培

另一面刻题记：

黄氏植物，芳荣作品，少亭刻。

当时，蔡先生将此盆赠给被誉为莳菊名手的《花经》作者黄岳渊。这件紫砂杰作，如今当是稀世之珍了。

德化古青瓷

中国古代的瓷器，唐时已驰誉海外。唐代瓷器，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因有“南青北白”之说。宋元以后，渐有变化，南方也有烧白瓷的了。福建是南方生产白瓷最多的地方，而德化窑的白釉瓷器，宋元时已大量烧制，至明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建白瓷。建白亦称乳白、猪油白或象牙白，其形制除日常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外，尚有人物、动物雕塑等艺术品。至今海内外珍藏有这种明代德化窑白瓷器的，犹大有其人。

由于福建窑以白瓷著称于世，以致德化的青花瓷器在德化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反倒被人忽略了。据说，近数年来的文物考古调查表明，德化县境内已发现的一百八十五处古窑址中，青花瓷窑址即在一百处以上。其分布范围之广，产量之多，在德化古代瓷器生产中占很大比例。国内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德化瓷的青花瓷业肇始于明代，而全盛于清代。自从青花瓷器盛行，它便逐渐取代 了白瓷而成为德化瓷器的主要产品了。

德化青花瓷器的品种甚多，有碗、盘、杯、碟、瓶、炉、瓻、樽等，其胎体坚白细腻，釉色或幽清淡雅，或明快浓艳。青花纹饰题材异常丰富，既有山水人物，又有花卉鸟兽、草木鱼虫等。布局得体，构图简洁，运笔自然奔放，无繁缛堆砌之俗气，反映了民间窑业的朴素品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令人一见而生爱意。各种器物底部都有款识，最常见的是商号名称，如“顺兴”“宝兴”“瑞兴”“万利”“胜玉”“美玉”“珠玉”“合吉”等；亦有以画代款识的，如小兔、秋叶、双

鱼、火焰等，有的还有年号款识，如“成化年制”“康熙二十五年德化县知事鄞县范正格选制”等。

青花瓷器是中国陶瓷工匠一项卓越的创造，远在北宋即已出现，元明后大量烧造，以其清新明快的色调、丰富优美的装饰纹样，普遍为人们所喜爱，成为中国古陶瓷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明清时期德化青花瓷器之崛起，固然与福建省内市场的需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巨量需求。这从中外有关文献的记载，及历来亚非各国陆续发现的实物可以证实。它对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与促进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目前可确证为古时外销产品之德化青花瓷，大约有以下品类：

青花圈点碗，英国牛津东方艺术博物馆有得自非洲坦 噶尼喀出土的藏品。其源盖来自德化县之桐岭、岭兜、石僻子、竹林子、苏田等窑口，造型、纹饰，毫无二致。

吉祥器青花盘、碟，巴基斯坦出土之中国古瓷有此种盘、碟。盘碟中部写有“吉祥”汉字，周边由四层重叠的短直道半寿字纹图案组成。德化的洞上、下玲、石坊、石排格等古窑址发现的产品正是这种盘碟。

花篮纹青花盘。曾远销非洲的这种青花盆，在德化的后所、大垅口、内坂、溪碧、桐岭、窑仔林、林地、水尾、枋山等十数个古窑址均有烧制。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塞拉姆博物馆得自当地出土的藏品中，有这类吉祥纹瓷器多件可证。

阿拉伯文字纹的青花碗。碗外绘有五个栔边圆圈，每一个圈中间均写有同样的阿拉伯字，同时有作书者长长的署名，如奥玛·奥斯玛。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印尼雅加达博物馆有此项藏品。从碗上写有阿拉伯文看，当是伊斯兰国家买主的定制品。

此外尚有牵牛纹的青花碟、盘、碗，云龙纹的青花碗和盘，云龙火珠纹的青花碗，城楼纹、佛手纹、寿字纹的青花碗和半寿字的青花盆。这些器皿在中国之西沙群岛先后出土，专家鉴定为德化窑产品。德化县的岭兜、石排格等五十多个古窑址中也都发现有同样的碗盘，这不是偶然的。自古以来，西沙及南海诸岛即为中国版图，为中国与西洋各国交通贸易往来海舶必经之地。大量德化瓷器在西　　沙群岛发现，或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用器，或为德化外销瓷器途经西沙留下的遗物，是不难想见的。

德化县位于福建东部闽江支流大樟溪的上游，虽地属山区，但水运便利。随着福建沿海几个对外贸易港口的先后兴起，瓷器成为外销的热门货，推动着德化瓷器的发展。而德化瓷器业的长足发展又促进了福州、泉州、漳州、厦门这些港口对外贸易的繁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带回苏麻离青的青料，使瓷器青花的烧制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郑和船队带到亚非各国的青花瓷器为数极多，开拓了中国瓷器广泛的外销门路。海外市场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加，这时素有外销传统的德化瓷业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亚非各地先后发现之德化青花瓷器，多有“成化年制”的款识，非无因也。

大批自明代中叶始，德化的外销瓷，白釉瓷以乳白釉雕塑艺术为特色，青花瓷则以适应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器皿为大宗，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至清代，德化瓷器便在这一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名人砚铭述其志

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既是实用的工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古今不少名人都喜欢在砚台上镂刻各种各样的铭文，使得方寸之地锦上添花，平生了无穷情趣。

这些铭文以记事者为多，文字有长有短。长者如欧阳修在一块南唐歙砚上所作的铭文，洋洋近二百言，不仅详细地记载了砚台的由来及其收藏经过，还记述了南唐造官砚的历史。短者如苏辙的《铜雀砚铭》云："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台，得其遗瓦以为砚，甚坚而泽，归以朴。"

有的文人在铭文中结合记事抒发感慨，如明朝学者都元敬在一块铜雀瓦砚上所撰铭文："昔为瓦，藏歌童，贮舞马。今为砚，承铅椠，伴图史。呜呼！其为瓦也，不知其为砚也。然则千百年后，安知其不复为瓦也！盖豪雄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固得而有之。吾是以喟然有感于物也。"由铜雀台瓦今昔和明日的演变，借题发挥，感慨历史兴衰，全篇意味隽永，称得上是一篇史论佳作。

也有不少砚铭是表主人志向，明主人心迹的。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有一方砚，背后刻有铭文："坚持守白，不磷不淄。"意思是要保持玉石一般坚硬、洁白的本质，绝不让黑色所玷污，表达了他精忠报国、坚贞不渝的崇高心志。有趣的是，后来这方砚又转到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手中，他在上面也刻上一段铭文："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古

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充分体现了他要继岳飞遗志，抗敌救国的精神。文天祥另有一砚，其上所刻铭文是：“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苌弘骨。”借用古代苌弘化碧血的典故，同样还是表达他视死如归、一心报国的高远志向。

还有人利用砚铭来申鉴戒，称功德，这多见于赠砚之上。苏轼在送长子苏迈去德兴县做县尉时，曾赠给儿子一方砚台，砚台上刻有这样一段谆谆告诫儿子的铭文：“以此进道常若谒，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进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是利用这方砚学习修身应当经常如饥似渴，有所警醒；利用这方砚书写理财和断狱一类文书时，要经常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考虑到让犯人悔过自新以求新生。

近悉，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长期主持明清诗文研究所的工作，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有朋友赠以砚台，砚铭曰：“治学明清，解经以理。精研文史，校字如仇。”可谓知人善记，褒扬恰如其分。

且说薛素素脂砚

薛素素脂砚的闻名于世，乃由于《脂砚斋评今石头记》一书的作者“脂砚斋主人”，而“脂砚斋主人”又以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而享名。

笔者尝见此砚，砚小盈握，贮于珊瑚色朱红漆盒中，砚盒制作颇为精致。盒背上盖内勒细暗花纹之薛素素像，人物凭栏站立绣帷前，笔极秀雅，引人入胜。右上篆有“红颜素心”四字，左下为“杜陵内史”小方印。系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绘者。全盒宽仅一寸九分，高二寸二分许。盒底小楷书款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盒”字样。

脂砚质地细腻，如肉如脂。砚上微现鱼脑纹与胭脂晕痕。砚宽一寸五分，高一寸九分许。砚之周边镌有“柳枝旧脂犹存”。砚背刻有王百谷稚登行草书五言绝句一首云：

调研浮清影，
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
余润指兰芝。

后题“素卿脂砚”及“王稚登题”八字。

按王百谷写于明代万历癸酉，时年仅三十九岁，脂砚下边刻有隶

书“脂砚斋所珍之研其永保”十字。由此可以断定“脂砚斋”命名的由来矣。

薛素素脂砚，辛亥前曾为端方所藏。此砚与《红楼梦》佳本及薛素素自画像，同为端方收藏而随身入川者。端氏去世之后，此砚流落于巴蜀藏砚家方某之手。据张大千之表弟晏济元对李克非讲，此砚确系端方所携入川者，落于方君之手后，晏氏也曾在其藏砚楼观赏过此物。而《红楼梦》佳本与薛素素自画像，则不知所终。

另据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所见匋斋所藏书画约六十余种，内有薛素素自画像绢本，高一尺七寸二分，书栏边石竹钩叶兰自题小楷曰：“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款为“薛氏素君戏笔”，下钤“沈氏薛”“第五之名”两白文方印。

薛素素为明代南部名妓，与“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血溅桃花扇”之李香君及董小宛合称“金陵四艳”。胡应麟《甲乙剩言》称“京师院东本习诸妓无复佳者，唯史金吾宅后有薛素素，姿度艳雅，言动可爱”。世传《野获编》作者，名士沈德符纳素素为妾。后不终，嫁为商人 妇。“五”为院中行次，所以有“第五”之名小印。《玉台画史》记薛又有印曰“五郎”。薛名为素君，或称“素卿”，“素素”实为其字，又有小字名“润娘”。

薛素素脂砚是当代研究《红楼梦》著作的可贵实物资料，它的文物价值引起国内外红学界人士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名人历来喜端砚

近读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对其中谈到他喜爱端砚的事颇有感慨。

端砚是中国诸砚之冠，它产于广东古端州（今为肇庆市），端溪水一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出国，所藏的书籍和文稿大都散失，友人唐浏阳所赠、江建霞刻铭的一方菊花端砚亦同时失去，他对此殊为惋惜。他写道：“今赠者、铭者皆已没矣，而此砚也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有合并时矣。念之凄咽。”

梁启超对端砚有如此特殊的感情，好友黄遵宪获悉，便又送了他一方端砚。这方砚台雕刻精良，黄遵宪并附上拓本《媵一铭》，铭曰：“杀汝亡壁，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宝。”字里行间，道出了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期望。而梁启超得此砚后，“狂喜几忘寝餐”，便把从“失砚”到“得砚”的心境写入《饮冰室诗话》这一名著里。其中有句云：“今则　此砚亦一块宝矣。自是人间有两菊花砚。”

其实名人之喜端砚自古皆然。笔者早年曾见一端砚，乃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所用，背面镌刻有铭文：“坚持守白，不磷不淄。”旁边还镌刻有南宋名人谢枋得的题记和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题记。文天祥题记是：“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谢枋得字君直）同年所藏，成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铭之曰：砚虽非铁磨难守，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关于岳飞之铭文，窃以为，“坚”乃坚实，“磷”即薄也，“白”为洁白纯净，“淄”与缁同义，黑也。这段铭文看来是引自《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岳飞引此作铭，寄寓自己“精忠报国”志如磐石之坚也。

据著名竹刻家徐孝穆（即柳亚子先生的外甥）云，民族英雄林则徐亦藏有端砚，该砚存于李宇趋先生家中，曾经著名的花鸟画家唐云及徐孝穆先生过目，徐孝穆镌刻题记：“砚为清代林文忠公遗物，石为端砚上品，原有铭跋，遭人磨毁，将运出国被阻留而流落羊城，为赵品三先生收藏，辛丑夏赠王世英转赠于北京。壬寅春季，李宇趋记于沪上大石斋。”

歙砚之乡话歙砚

位于黄山南麓的安徽歙县，因自唐代开元年间即开始生产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而不衰，故被称为“歙砚之乡”。

歙砚的诞生颇有神奇的色彩。据《砚谱》载，当时有一位姓叶的猎人追捕野兽，见龙尾山脚的武溪之上，五色云气缭绕，如锦衾覆盖。两侧有一缕白云婉转浮游，状若行龙，遂以为龙兆吉祥，便信步踏进武溪。猎人见溪水中石，或光洁如玉，或灿若金星，便拣了一方回家，请名工雕琢，制成了第一方歙砚佳品。这方歙砚温润细腻，研墨生辉，几经辗转至歙州令手中，大受赞赏，于是歙砚始有规模地生产并名闻遐迩，成为唐明皇李隆基赐赏功臣的佳品。

到南唐时，歙砚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歙砚精品层出不穷，这当中要数著名砚工李少微呈给后主李煜的一方“蛟龙喷水”砚为最。但见一片水珠由龙嘴吐出，流入砚池，李后主拍案惊叹曰：“真乃宝砚也！”当即挥笔写 下“歙砚甲天下”五个大字，并提升李少微为砚务官，在歙州专管歙砚制造。宋代以后，歙砚深受历代书画名家的青睐，苏东坡爱砚成癖，蓄砚盈室，枕砚而卧，为得一方歙砚佳品，不惜用传家宝剑交换。清朝内府中蓄有一方歙砚，先为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所得，后归唐寅所珍藏，最后到了乾隆皇帝手中，三位名人均为此砚作铭文，尤其是乾隆铭曰：“歙之石，龙尾最”，给歙砚以很高的评价。

歙砚之珍贵首在质，它天然生有神奇色彩的星晕纹理，主要有金

星、金晕、金花、银星、眉子、玉带、水浪、鱼子、紫云、绿晕、左犀、枣心等数十种，其中以金星为上品。其次为雕刻精湛。据史载，宋代米芾得到一方盈尺歙砚，砚前刻有三十六山峰，大小间错，延伸至边；中雕砚池碧水荡漾，横生妙趣。与米芾同时的苏仲恭见之甚爱，竟不惜用自己在镇江北固山前峰的一座豪华宅第去换这方佳砚。

现代砚造型大致可分为五类，即仿古式、自然形式、长方大冠式、长方玉堂式、平板砚式。在歙县城斗山街口，有一个“文盛斋”，它的主人叫王祖伟，世传砚雕已历三代。他这里所售的砚品，大部为店主自己雕刻，且刀法不凡，引人注目。王祖伟刻砚，务求石料与工艺两全其美。对石料注重造型、纹理色彩上的素质，而对雕刻技艺，则以中国画为基础，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并尽力容纳了艺术、哲学、美学等思想内涵。在他的那个赵 朴初题写的“文盛斋”内，迎面是一方“曹雪芹作石头记”砚，呈茶几案桌形。大横幅画面上，雕琢着令人着迷的曹雪芹伏案著书的情景。整个画面，格调雅致脱俗，称得上是一幅力作。

北方的名贵笔墨

“文房四宝”中的“湖笔”“徽墨”，为过去的文人墨客所称道。“湖笔”是指湖州府（今浙江省吴兴县善琏镇）出产的毛笔，“徽墨”是指徽州府（今安徽省歙县、休宁等地）出产的墨。中国土地辽阔，出产笔墨的地方不仅是湖、徽二州，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衡水市等地出产的笔墨，也颇有名气。

首先说毛笔。早年，天津毛笔以“华经魁”的出品最有名。这家老店制作的毛笔，有羊毫、紫毫、兼毫、狼毫等类，以“七紫三羊毫”软硬相济便于日常书写使用，最受欢迎。他们制毛笔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对成品检验又非常认真，只要出厂，绝无次品，所以“华经魁”的毛笔在华北销路很畅。

河北省衡水市侯店的毛笔有“宫廷御笔”之称，是北方各地毛笔之冠。远自明朝宣德、正统年间，侯店毛笔即已出名，当年的黄狼尾毫和香狸尾毫两种特产毛笔，尤 为书画家所珍爱。清朝光绪年间，侯店制笔圣手李文魁到北京开店授徒，把侯店制笔技术带到北京，北京制造毛笔从此也有了侯店特色。后来李文魁逝世，还受到光绪皇帝的表封，所以留有“宫廷御笔”之称。最近有消息说，侯店毛笔现在恢复生产，去年仅出口一项就有一百五十多万支。

再说墨。北方出产的好墨，更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早年，天津的“淳秘阁”制造的最负盛名。其墨香经久，胶度适中，落纸不皱，书画皆宜，完全能与“徽墨”媲美。

近数十年来，研墨濡笔的书写方式，已为墨汁和硬笔所取代，一般书写，使用墨汁很方便，遂出现了北京“一得阁”墨汁。这种墨汁香味纯正，书写流畅，写后易干，耐水性强，适于揭表。不只在国内受欢迎，也极受日本书道家的称许。

关于墨汁的产生，还流传一个故事。据说清代同治年间，江南举子谢松岱进京赶考，不幸落第，身边盘缠用尽，流落北京街头，正穷困潦倒，忽然想起考场举子研墨答卷要耗费很多时间，如果研好墨到考场门前售卖，当受举子们的欢迎。他就动手研墨，端到考场去卖，一次大比完毕，他竟弄到许多钱。于是就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墨汁作坊，手工操作，研墨成汁，再行销售。他自书对联为“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上镶“一得”二字， 传说这就是“一得阁”得名的由来。当然，“一得阁”其后的大规模生产墨汁，已经改进制墨原料和工艺，绝非手工研墨了。

“老周虎臣”如虎添翼

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与“周虎臣寿记”合并的“杨振华笔庄”和“李鼎和笔庄”这两家也非等闲之辈，笔者略述一二。

杨振华笔庄，创始于1935年。店主杨振华夫妇均系湖州笔工，有一手制笔好技艺，到沪后广泛结识书画名家和社会名流，如张大千、吴湖帆、沈尹默、谢稚柳、徐悲鸿、唐云、周信芳等，请他们试笔，虚心听取意见，进行改进，直至书画家满意为止。同时，吸收国外画笔的经验，经过精心研究，改进工艺，终于在狼毫书画笔方面独树一帜，与当时北京的李福寿画笔齐名，素有“南杨北李”之佳誉。

杨振华狼毫书画笔品种很多，有大、中、小兰竹，豹狼毫，豹狼毫屏笔，联笔，鹿狼毫小对笔等五十余类。书画家们常常命名定制，如张大千定制的“大千选用画笔”、吴湖帆定制的“梅景书屋画笔”、沈尹默定制的“尹默选　颖”、任政定制的“兰斋选颖”等，狼毫书画笔具有锋颖锐利，笔锋饱满，弹性适中，刚柔相济，宜书宜画的特点。

杨振华为了增强笔头弹性，在狼毫中加以适量的石獾抢毛。制作笔杆的材料也十分讲究，系采用福建生产的凤眼斑竹和湖南的湘妃斑竹。必在每年立冬后，清明前采制，以保证久藏而不蛀。这种天然花斑竹竿装上了狼毫笔头，还镶上用牛角制成的“笔斗”和“挂头”，人们称为“三镶笔杆”。这不仅起到增添美观，加固笔头牢度的作用，而且便于用毕上挂，有利于对画笔的使用和保养。书法名家赵朴初先生喜用兰竹笔，并赋诗赞誉道：“管城今日推兰竹，圆齐挺健收纤束。挥来众妙现毫端，霹雳龙蛇腾尺幅。”

李鼎和笔庄创始于清咸丰元年（1851），专制湖笔，在上海也颇有名气，以“紫毫”“兼毫”最为著名。其特点是锋头深浅、样子尖浓、进出修短等方面合乎法度，尖齐圆健不开叉，使用得心应手，在日本、中国香港等地有相当市场。它以“鼎”牌为注册商标，曾于清宣统二年（1910）获农工商部褒奖。当年驻日大清使署黄竹生日本购用“鼎”牌湖笔，使用后赞不绝口，曾题词“制作精纯”寄赠李鼎和笔庄予以赞扬。“鼎”牌湖笔于1929年参加美国、菲律宾马尼拉狂欢节工商博览会获得奖状，1930年获国际博览会奖章。

湖笔兼毫品种有抓笔、提联对笔、长锋羊毫等，使用寿命长久，很多老书画家能使用几十年。名画家吴湖帆也常用李鼎和的笔。“臂隼牵卢纵长猎”是吴先生给“李笔”的赞词。

现在“杨振华笔庄”和“李鼎和笔庄”虽已并入老周虎臣笔厂，但是这两张“虎翼”仍在发威，它们的优良制作工艺和传统，继续在发扬光大。

衡水毛笔与易水古砚

“文房四宝”指笔、墨、纸、砚，其中毛笔和古砚占了二宝。所以在1978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访问日本，带上了衡水毛笔、易水古砚两件礼物，赠给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据文献记载，“秦蒙恬始以兔毫竹管为笔”，开创了毛笔生产和使用历史。因而蒙恬被传颂为中国毛笔制业的“鼻祖”。农历正月初三是蒙恬的诞辰之日，每年此时，河北衡水各制笔厂艺人，鞭炮齐鸣，焚香燃纸，宴请亲朋，以此纪念祖师，祝贺过去一年制笔业的成绩，并祈祷新的一年生意兴隆。相传，衡水毛笔是明朝永乐二年（1404）由山西洪洞移民、再从北京密云迁来之后开始生产的，现已二十多代，五百余年历史了。

易水砚的历史更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它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下都西南面，即南易水河畔的津水峪。唐朝末年，易州奚超父子继承了松敏烟制墨技术，并在南山 发现“易水砚”。它选用太行山区的水成岩，石制细腻，石面光泽，细润如玉，质刚而柔。古人赋诗赞美：

南山飘素练，晓望玉嶙峋，遥忆最深处，应多著石人。

衡水毛笔艺人李文魁曾在北京设庄，有一爱好书法的太监同他结为兄弟，经常把他制作的笔带进皇宫，奉为“御用”，受到皇帝的赏

识。李文魁死后，光绪帝降旨赐他一蟠龙碑，上面镌有“圣旨”二字。衡水毛笔还在外地开设了“魁文堂”“万宝堂”“德文斋”等店，所制毛笔销往全国各地。史载巴拿马赛会衡水毛笔曾获奖章。这一古老文化用品，大部分生产工艺，至今仍沿用传统的生产方法，材料以竹、木、象牙、兽骨、兽毛为主。一支毛笔从原料到包装出厂，一般要经过七十三道工序，主要有选料、水盆、零活、乾作、刻字、成装六道大工序。就拿笔头料来说，品种繁多，如黄狼尾、香狸尾、香狸毛、马毛、山羊胡、猪鬃、山兔毛、牛耳毛、石獾毛、貉子毛等。再如刻字，用尖刀刻于笔管上，有“特制水月”“大白云”“大小由之”等。

再说易水砚，起初多为圆形、方形，带盖的砚石大的称墨海。近百年来，因材造型，以型定名，一般为龙形、竹节形、古瓶形，雕出的山水、花卉、鱼虫、人物栩栩如　生，看后感到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其中鱼砚、龟砚、蚕砚、蝉砚、琴砚、棋砚七大高档砚，堪与端砚、歙砚相媲美。

易水砚的雕花图案古雅大方，有龙凤朝阳、双龙戏珠、金龟献寿、五福捧寿、哪吒闹海、天女散花、松梅竹兰等一百二十余种，画面具有民族色彩，刀法精细，形态逼真。

中国书法家、美术家对衡水毛笔、易水古砚都有高度评价。萧劳曾为笔厂写下“妙笔生花”四个大字；陈叔亮赞其笔“力敌千钧”；孙墨佛为易水砚题了“神工鬼斧”；启功写了“易水精舍”的匾额。

“老胡开文”的墨

一位擅长书法的友人请我去他家中鉴赏他新收的上品好墨，打开锦盒，一锭锭精制仿古套墨《西湖图》呈现在眼前，背面有赫然四个金字“老胡开文”。

墨为文房四宝之一，以安徽产的“徽墨”最负盛誉，1915年，曾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设在北京东琉璃厂的胡开文笔墨店，就是一家专门经营徽墨的老字号，我在北京读书时常去光顾。

老胡开文墨店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创立于安徽屯溪，当时就被誉为全国四大墨店之一。1911年，胡开文的五世孙胡祥均，在北京开设了胡开文分店，由安徽老厂批货到北京推销。

在那间雅静的店堂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徽墨。从形状看，方、圆、扁、长俱备；从颜色分，墨、红、蓝、绿齐全（包括色墨）。有的墨上，刻着名人的诗词歌赋。有的墨上，描绘出祖国的山川风光。我曾见过一套集锦 墨——《棉花图》，全套共十六锭，每锭约有一寸宽，但是上面却刻着古代从种棉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过程，图中有人有物，有情有景，可以说是一套精美的艺术品。胡开文徽墨的特点是色泽墨润，历久不褪，舔笔不胶，入纸不晕，香味浓郁，书写自如。有人形容它“湛湛若小儿目睛”，颇有趣味。

那些被当作贡品的徽墨，制作就更为精细了。有一套《御园图》墨共有六十四锭，是清朝嘉庆三年（1798）刻的模板。有雄伟壮丽的楼阁，有山清水秀的园林，每锭墨都有个富有诗意的名称：碧林馆、

清辉阁、鉴光楼……都是根据北京圆明园的景物刻制的。圆明园已毁于八国联军的大火，而在这套墨模上却留有真貌，因而弥足珍贵。

胡开文制墨的原料有油烟和松烟两种，按品级又分极品、神品、超贡、漆贡、贡烟等多种。油烟墨色泽光亮，松烟墨乌黑润和。据说，为取得油烟，要点燃几百盏油灯，一股股黑烟从灯头升起，在铁板上聚集为“烟子”；再把这些“烟子”刮下来，经过千杵万锤，制成各种各样的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它为人们留下了光耀千古的墨迹。

文房之宝——一得阁墨汁

每当展纸挥毫时，总想起北京的“一得阁”来。

“一得阁”墨汁厂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相传，那时安徽有个名叫谢松岱的书生进京赶考，屡试不中，甚为伤心。一日，在考场上研墨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在考场上研墨既费时又费力，能不能使用现成的墨汁呢？后来，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将自己精心研制出来的几瓶墨汁拿到考场外面兜售，结果深受考生欢迎。从此，这位书生放弃了考试做官的念头，在琉璃厂西街开了一间专营墨汁的店铺，生意异常兴隆。谢松岱得意地写了一副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店名便取了上下联的头一个字即“一得”。加之当时的店铺是一座二层小楼，前有游廊，东西都邻小胡同，不与其他店铺衔接，颇有点阁的意思，所以叫“一得阁”。谢松岱本人是个儒生，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他亲笔写下了“一得阁”和“墨汁店”两副匾额，挂在 店铺前。

最早制作墨汁的方法是将墨块粉碎，浸泡后再兑水成汁，这种方法效率很低。后来他们又发明用“油烟”“松烟”为主要原料制作墨汁的方法。

“油烟”是用豆油、花生油和猪油作原料在封闭的房子里熏制，房内的案子上摆满盛油的小灯，上面复盖着小碗，地下有许多小孔能通入空气。“点火炼油”之后，便可得到乌黑的“烟子”了。“松烟”则以松木为原料，放在壁火中燃烧，从房屋顶上一种特制的多节烟筒里取烟灰。一般烟筒上部的烟灰最好，叫“云烟”。由用墨块而改用墨汁，方

便了人们的书写，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墨汁缺少光泽，容易吸水反潮，不易久存，因此还不能和墨块媲美。

据说，真正使“一得阁”墨汁香飘四海的，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科技人员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更加合理的配方。墨汁的原料采用四川自贡的高色素天然炭黑，并加入麝香、冰片、碳酸等，制成的墨汁色泽乌黑，香味浓郁，并能防腐。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曾提笔试墨，写下了“一得阁墨汁浓度适合，墨度已足，不滞不漆，书画咸宜，可比美昔年之松烟也”的赞语。

铜墨盒和刻铜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个白铜墨盒子，三寸见方；一对镇尺，五寸长，一寸阔。墨盒上刻的是一枝山茶花，花枝上立着一只缩颈的鸟，而且是正面的（画家多避免画正面鸟，因为任何鸟的正面，一画就很难看，易成怪状）。边上题着一首诗：

压断千层立，山茶一枝栽。
自时寒鸟舞，犹向雪中来。

署名“茫父”。

两方镇尺并在一起，是一幅山水轴子：一条渔船，一个渔翁，远远的一角山，近处是一丛江边的芦花，上面蝇头小楷，刻了一首柳宗元的绝句：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款署“寒汀”。

这两样东西看上去不起眼，实际现在是很难得的了。这是地地道道琉璃厂同古堂的，是琉璃厂刻铜世家张樾臣的作品，距今足足有半个世纪以上。

在当年的北京，一个铜墨盒，一对铜镇尺，刻得再好，也不足奇，因为那时这类东西很多。但时过境迁，现在已很难见到。而一眼就能认出张樾臣刻工的人，就更少了。

铜墨盒的历史说起来并不很长。清代科举殿试时，最讲究写墨卷，墨色要黑、要亮、要滑润，用砚台磨墨费时而不易磨好，于是便有人发明了墨盒子：用个铜盒子，盒盖里面有块石片，可以掭笔。盒中放点丝棉，注入一些磨好的墨汁，放进考篮，带进场中，用起来十分方便。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墨盒最早创始在道光年间，到了同治、光绪之后，才盛行起来。盖上开始时刻字，光绪时最著名的陈寅生，能在盒盖上刻芝麻粒大小的楷书，两三寸见方的盒盖，能刻一篇《兰亭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还经常看到这种铜墨盒，现在可能还有人收藏着这种刻满小字的墨盒吧。

继刻字之后，又有人在墨盒盖上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都是把名家的书稿缩小了刻在盒盖上。这种技术，在光绪前后的五六十年中最为流行。其中张樾臣的作品，是最精美的，不但北京，而且流传到全国各地以及日 本、欧美等地。

近人所著《北京繁昌记》云，北京之墨盒，与江西南昌之象眼竹细工，及湖南之刺绣，为中国之三大名物。而最优之墨盒，其价值尚不过五元。及錾刻发达，名人刻者甚多，例如寅生所刻者，至今日之墨盒，遂为北京名物之一。琉璃厂、劝业场等处，墨盒店比比皆是。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想见当年北京墨盒的盛行了。

几十年前，学生的作文还必须用毛笔写小楷，因而这种墨盒是每个学生必备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生考试成绩好，常可得到铜

墨盒、铜镇尺等奖品。

《鲁迅日记》中有到琉璃厂同古堂买墨盒、铜尺赠送三弟的记载，同古堂就是刻铜名家张樾臣的铺子。

张樾臣刻铜墨盒、铜镇尺，是在陈寅生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陈只刻阴文小楷，而张则变幻刀法，把刻竹的刀法，运用到刻铜上，仿刻竹中的“沙地留青”刀法，刻出阳文花卉，极为生动古雅。一些著名画家如早期的姚茫父、陈师曾、王梦白、齐白石，后来的吴镜汀、江寒汀、王雪涛等人，都给他画稿，供他刻墨盒、镇尺用。我曾见过他刻的一对特大镇尺，上刻王雪涛先生画的荷花小鸟、柳树鸣蝉，用阴阳两种刀法，极为神似。张樾臣除墨盒而外，图章也刻得好，印有“士一居印存”，其子少丞、幼丞能传其技艺。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

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 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

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 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 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

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画坛舊事

神州轶闻录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中国画在世界上自成体系，独具异彩。中国画强调「以形写神」；注重文学色彩；

以毛笔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为造型手段；在色彩上以墨为主，通过墨的浓、淡、干、湿等变化，以及形式多样的用墨技法，取得「水墨晕章，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

中国的书画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

这本书所涉及的是近现代书画（包括篆刻）界的人物和轶闻。它对普及书画知识，提高人们对中国书画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大有裨益。

——米景扬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画坛旧事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坛旧事／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8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39-1

Ⅰ．①画…　Ⅱ．①周…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11号

画坛旧事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 / 32

印　　张：12.2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39-1

定　　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名流大家

-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
- 张大千二三事
- “旧王孙”溥心畬
- 黄宾虹铮铮铁骨
- 何香凝的绘画生涯
- 画坛寿星朱屺瞻
- 国画大师潘天寿
- 忆半丁老人
- 百身何赎一少梅
- 画像大家蒋兆和
- 养虎画虎张善孖
- 虚怀若谷丰子恺
- 画竹圣手柳子谷
- 名画家刘奎龄父子
- “末代王孙”画家溥佐
- 皇族画家溥松窗
- 吴作人师事徐悲鸿
- 辅仁大学美术系女状元
- 女画家潘玉良
- 慈禧代笔缪老太
- 齐门弟子娄师白

画猫能手孙菊生
画坛怪杰陈子庄
“老好子”画家汪慎生
记王森然老人
壁画名家陆鸿年
末科状元刘春霖的书法
晚清翰林潘龄皋
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
李瑞清二三事
“中国第一书法家”郭风惠
沈尹默学书不易
爱国志士冯公度
枫桥“双绝”两张继
章草名家王世镗
抄校巨擘张宗祥
津门书法大家华世奎
邓散木其人其事
书坛巨擘沙孟海
回忆高二适
女书法家萧娴
戎马墨海忆舒同
吴昌硕与西泠印社
张樾丞及其“同古堂”
刘淑度篆刻成名
装裱大师刘金涛
逸闻趣事
吴昌硕为平民作画
于右任茶庄书匾额
金北楼父子办画会
张大千临画“匿迹”趣闻

"二石"与悲鸿
齐白石与朱屺瞻的画谊
徐悲鸿的一次画展
徐悲鸿的"无枫堂"
张大千与溥心畬的书画缘
徐悲鸿与张大千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画谊
于非闇和张大千的友谊
梅兰芳的诗画缘
黄宾虹游蜀
李可染以牛为师
李苦禅拉洋车
吴作人战地写生
玉泉道旁风眠居
傅雷为黄宾虹卖画
郭沫若喜绘兰草
小说大师爱丹青
丰子恺蜀中卖画记
关山月第一次在成都办画展
沈醉与白石老人的画缘
伯乐陈垣识启功
王森然与齐白石的友谊
闻一多的绘画和篆刻
中石与白石间的趣闻
徐悲鸿扶助田世光
经亨颐与寒之友社
刘博琴为毛润之刻章
画虎名家结戏缘
戏曲演员与书画艺术

齐白石盛誉“刻刀张”
佳作聚珍
吴昌硕的塑像及刻像
陈师曾与《北京风俗图》
于右任与《岁寒三友图》
齐白石的《却饮图》
司徒乔绘孙中山像
何香凝的梅花横幅
珠联璧合一幅画
陆小曼山水长卷题跋
苏曼殊画《梦谒母坟图》
几经磨难《流民图》
孙之隽与《武训画传》
颐和园半廊上的字画
法海寺的壁画
朱仙镇木板年画
年画中的《关帝诗竹圣迹》
老月份牌画面面观
烟画一席谈
阅古楼碑帖历沧桑
南诏古碑今犹存
王法良书写故宫三大殿匾额
“天下第一关”书写人萧显
旧都牌匾多名家
李叔同、丰子恺与《护生画集》
《十竹斋笺谱》沧桑
国画教材说《画传》
蔚县剪纸放异彩
收藏鉴赏
张伯驹抢救《游春图》

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卷》
宋代名画留存海峡两岸
陈簠斋与毛公鼎原拓片
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
叶恭绰慧眼护国宝
张元济三觅涉园图
聚散离合“三希”珍
张大千藏画失而复得
《清明上河图》遭劫揭秘
潘天寿护国宝失己宝
周怀民沙里拣金嗜收藏
陈叔通和百梅图卷
“藏扇大王”黄国栋
曹雪芹画迹存亡记
中国第一行书《兰亭序》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

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冯大彪先生要我为周简段先生的《神州轶闻录·画坛旧事》作序，实不敢当；但看了所选的文章，写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事，冯先生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也就不便再推辞了。

我自幼喜爱书画，二十岁（1956）经董寿平、汪慎生两位先生介绍，如愿以偿走进荣宝斋，至1998年退休，在这座民族文化的殿堂里工作了四十几个春秋，民族艺术的长期熏陶渐染，使我对中国书画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中国书画（包括篆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沃土孕育的美术奇葩，是中华儿女值得引以为豪的国粹。世界美术分成两大体系，即东方体系和西方体系，中国美术则是东方体系的代表。其中书法和篆刻为其他国家所没有，无须再作赘述；下面仅就绘画来略说一说，她为什么值得我们景仰和热爱。

首先，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姜寨一座距今五千六百多年的墓葬中出土了石砚、磨棒、颜料和陶杯等一整套绘画工具，它证明了中国绘画的历史是何等古老。早在周代，我国绘画以墨线为基础的民族风格就已经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谢赫、宗炳等人的绘画理论，证明了中国画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较完善理论的画种。至唐代，中国绘画以其高度的艺术水平和瑰丽、豪放、宏伟、明快的风格，雄踞中古世界美术的颠峰。几千年来，中国绘画艺术不间断地发展，优秀画家灿若繁星，绘画瑰宝浩如烟海，在世界美术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中国画在世界上自成体系，独具异彩。中国画强调“以形写神”，画家往往按照主观意识概括与改变自然形态，求其本质的神似，而形则可以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和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绘画着重实景写生和形的逼真是很不相同的。中国画注重文学色彩，要求绘画抒情含蓄，有意境、有韵味；这种文学色彩形成了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世界艺林中独有的美学形式。中国画以毛笔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为造型手段；在色彩上以墨为主，通过墨的浓、淡、干、湿等变化，以及形式多样的用墨技法，取得“水墨晕章，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中国画也讲究“随类敷彩”，但除重彩画外总体上崇尚淡雅，并通过改动描绘对象的色彩，来适应创造意境的需要，这与西方绘画注重物体的固有色彩截然不同。在构图上，中国画不像西方画那样受焦点透视的限制，要求做到“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西画往往整个画面都涂满色彩，中国画则讲究疏密相间，“计白当黑”。早在30年代英国著名艺术鉴赏家劳兰斯秉宁特就高度评价中国画说：

> 虽然中国人对色的调和赋有极高的审美力，但却不肯多用。另外在应用构图上的空白和表现空白的技法，任何国家的艺术都不能及。

中国的书画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书画必将在世界艺坛上放射出更加炫目的光芒。

这本书所涉及的是近现代书画（包括篆刻）界的人物和轶闻。近现代以来，西方美术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传统绘画研究不断深入，中国画坛出现了观点与画派竞相发展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画学组织及书法篆刻团体和一大批成就卓越的书画篆刻名家，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书画家们思想变了，笔墨、题材、表现手法也随之变化，不少人形成新的风貌，是书画家取得成就最大的十

年，奠定了近现代画坛百年的辉煌。这些，这本书都有生动入微而富有情趣的反映，它对普及书画知识，提高人们对中国书画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一定会大有裨益。

米景扬

2005年7月于十墨山房

名流大家

MingLiu daJia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

为纪念白石老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北京于1984年初举办了白石老人藏画展览。孔圣云："三十而立"，白石老人却从二十八岁起开始学画。孔圣又云："五十而知天命"，而白石老人却是衰年变法，五十八岁后方称誉画坛。

白石老人是1917年五十五岁时到北京的。初在琉璃厂南纸铺挂卖画刻印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两元银币，比一般画家价码便宜。大概是白石老人所学八大山人冷逸风格，不为时人所贵，因而问津者稀，生活也很落寞。后来大画师陈师曾看他的画，特意到他住地法源寺访晤，劝他自出新意，变通技法，还题了一首勉励诗：

囊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业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君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我后来从《槐堂诗抄》里读过此诗。白石老人画梅原是取法宋人杨补之工笔技法，听陈师曾劝告后，才用写意笔法。待有长进，陈师曾又携带白石老人的画到日本举办二人合展，始而一举轰动中外，两人展品一销而空。法国也选了两人作品，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记得当时北京报纸披载，说日本人想拍摄两人作品及生活状况电影云云。

从此，白石老人享誉京华，外国人到北京指名买画，北京人也纷纷购买，卖画生意日益兴盛。白石老人因诗感歌：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来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外都知老画家。

二人遂成莫逆之交。陈师曾对白石老人的画多有指正；白石老人亦无不接受，且常到陈师曾的书斋“槐堂”去谈论诗画，以至白石老人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句。

1923年夏，陈师曾以四十八岁之壮年病逝于北京，中外咸为震悼。梁启超曾云：“师曾之死系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可谓入木之语。当时北京文艺界特在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并展览遗作。会场上还悬挂着数百件挽诗挽联，我至今对白石老人的挽诗记忆颇深，如“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大有再无知己之叹。及至后来读过《白石老人自传》，才知他对于陈师曾之死确是莫可名状、“异常空虚”的。鲁迅编《北京笺谱》收师曾作品颇多，在序言中亦力加推崇。足见大画师当年的地位和影响。

张大千二三事

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内江人。其母曾友贞是一位能画剪花样的民间艺人，张大千九岁便随母亲学习花鸟鱼虫白描，后到日本专攻绘画，回国后在上海拜清道人李梅庵和曾熙为师，20世纪30年代曾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授，与溥心畲齐名，有“南张北溥”之称。他擅长山水、花鸟、人物画。喜临石涛、八大山人、刘石溪、渐江的作品，并得其精髓。

抗日战争中，张大千一家为躲避战乱，曾在四川郫县太和场场口钟雨秋家大院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周围向他索画的人很多，他一般都婉言拒绝。只有一些和他较好的乡医和学校教员可以得到他的翰墨之宝。当地的恶霸势力很厉害，他不敢惹，大凡这些人开口要画，他都用一些翻印的画来应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当地一个叫钟向琼的舵把子养了一只鸦，深得张大千喜爱，因为这只鸦与众不同，一般的鸦都是黑色，而这只鸦却是白的，堪为稀世之珍品，于是张大千专门绘了一幅画，与钟交换这只白鸦。张大千得此白鸦，十分珍爱，经常拿它来写生。

距郫县大约几十里，有一个名叫邛崃的县城。有一天，张大千和一位朋友相约来到邛崃，路上把钱包给丢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一道去的朋友急得团团转，张大千却一点儿也不着急，他信步走进一家茶馆，找了空位坐下，要了两碗茶。又叫茶馆的伙计在炉灶旁边撮了一簸箕黄泥巴，端到他脚下。只见他抓起一小块泥团，在桌上来回地搓揉，继而又放在手里反复地捏，不一会儿，一个活灵活现的黄泥猪八戒呈现于眼前，遂引来不少围观者。这时，张大千对围观的人群自我介绍道：“我是张大千，在这里喝茶，手痒了，随便玩儿玩儿，哪位想捏自己的尊容，收费一元。”茶馆里的人一听说眼前这位就是鼎

鼎有名的大画家张大千，又亲眼见到他当场表演的杰作，而且要价又不高，于是大家争着请张大千给他们捏像，不大一会儿，张大千就挣了几十块大洋，终于解决了食宿所需的费用。真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天旱饿不死手艺人啊。

张大千在上海居住期间，为了生计一边作画，一边卖画，有时不得已，还要应市造些假画卖。有一次一个有钱人家装饰客厅，想在中堂布置一幅石涛的古画。这事被张大千得知，他暗地里打听到这家人中堂正墙的尺寸，于是连夜构思创作，经过几天几夜苦战，只见空蒙山色、烟云缭绕、水天一色，其笔墨雄健纵姿，又淋漓酣畅，一幅足以以假乱真的石涛山水画跃然纸上。经过精心装裱，便成了一幅待价而沽的艺术精品。

“某人手里有一张石涛山水画”的消息很快传到那个有钱人耳朵里，他几经转折终于找到了这张画，富人一见便爱不释手，拿回家一挂，长短大小真是服帖到家了，但是真伪难辨。他听说张大千对石涛画模仿逼真且很有研究，于是辗转找到张大千，请他鉴定真伪。张大千见了画后告诉他：“这画是假的。”富人怏怏。不几日，富人又听说，只因张大千想要，才谎说是假的，于是富人赶紧付款，将画买下。

“旧王孙”溥心畬

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溥心畬已在台湾过世多年，偶于友人处见其画幅，想起曩昔他在京华时的一些逸事。

他名儒，心畬是字，别号西山逸士，书画常用“旧王孙”署名和印章。

何以号西山逸士？因其曾在北京西山戒台寺苦学十年，奠定了他一生诗、书、画的根基。其诗抑扬顿挫，真隶唐音；其画曾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誉；其书则行云流水，秀色可餐。如说诗书画三绝，可谓名副其实。

溥心畬祖父恭忠亲王奕䜣，是清宣宗（道光）第六子。亲王有二子，皆封贝勒，次子载滢即是溥心畬的父亲。溥心畬与溥仪是同辈，不但第一个字都是“溥”字，而且后一个字都是“单立人”边，这叫带偏旁的亲贵，是近支皇族。他有一方图章，篆文是“旧王孙”三字。

溥心畬生母项氏，广东南海人，太医院官某女，邃于儒学，亲课心畬甚严。从溥心畬《自述》中可窥见一斑：“十七岁后，先师南归，先母项太夫人亲教读书习字。时居清河乡间，旧邸书籍皆荡然无存，身边只有听读之书数卷、《阁帖》一部、唐宋元明书画数卷而已。先母太夫人尽典卖簪珥，向书肆租书，命余诵读抄写，期满归还，再租他书。稍有积蓄，则买书命读。应用之书，先母自写一目录、次第购求。”最后写道：“余虽不才，而不知废学者，皆先母教诲也。”

宣统三年（1911），溥心畬入贵胄法政学堂，民国元年（1912）归并清河大学，嗣又并入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入德国之柏林大学。返国省亲，举行婚礼，再赴德读研究院，获天文学博士学

位归。这时候溥心畬已经二十七岁了。按理说，学业有成，已成家该立业了，但是他的母亲却说：“汝以为今日读书已有成耶？须知此初步耳，更须积学博闻，多了利物济人工夫，或立言以垂诸世。”

到哪里去学？溥心畬毕章是“旧王孙”，自然想到戒台寺是最好的去处。戒台寺是大禅林中专门给和尚受戒的庙。光绪十七年（1891），恭亲王曾出资重修，作为他避暑修养的地方。奕䜣爱听戏，当时之名优如谭鑫培、程长庚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奕䜣死后，他的神主就供在庙中，等于他家的家庙。直到后来，溥心畬还经常怀念那里，其《南游集》中有《画戒台寺慧聚堂前古松》诗云：

踏月松坛迹已陈，白云一别几经春。
图成慧聚堂前树，似向青山忆故人。

据说戒台寺有一位湖南和尚永光法师（字海印），对溥心畬影响极大。该法师出于王闿运之门，专作六朝体诗，写一笔相当洒脱的字。“七七”事变前夕，溥心畬还将保存的法师诗集手稿，交琉璃厂文楷刻印，书名为“碧湖集”。另外，在其诗集《西山集》中，亦有《送海印上人归沩山》和《怀海印上人》等诗。

溥家住什刹海恭王府多年，20世纪30年代末，将府第售与天主教堂，迁居西郊颐和园介寿堂。

心畬事母至孝，“七七”事变前后，项太夫人病逝，为了表达哀思，他在项太夫人棺盖及前后左右四周用蝇头小楷精心写满金书经文。当时有外人前往吊唁，叹为稀有之文化珍品。

40年代前后，心畬居颐和园时，一心写画，很少外出。当时北京第一中学校长杨荫庆之女曾从他学画，两家有些过从。据说心畬喜食海参、熊掌等山珍海味，很少吃粮食。平日理发由当年北京绰号“烫发杨”之杨凌风专理，每次理发都派车进城接杨到颐和园。

家有侍妾李雀屏，聪颖秀丽，颇得他喜爱，常教以诗画。40年代中期，心畬的夫人病故，即以雀屏为继室。后来外间多知溥的继室崔屏，实为雀屏之改称。

日伪时期，他曾为友人写条幅，文为：

云散西寒月，清秋万里情。
桑干飞百练，不见范阳城。
大漠殊风雨，神州尚甲兵。
望山连易水，慷慨吊荆卿。

当时百姓处于敌寇铁蹄下，心畬有此诗句，亦属有心人矣。

1947年，心畬偕雀屏及女儿共三人南下宁杭等地游览。后来据说他在杭居住处的一名交际人员偕雀屏母女潜逃去香港。这一家庭巨变，对年将花甲的心畬来说，确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只好跟踪追找，求得珠还合浦。据说临行前，赠给友人诗句，有“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隐藏他无可奈何的彷徨心情。

黄宾虹铮铮铁骨

旧时上海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霸道。黄宾虹一日上街，见一外国流氓欺侮一老伯。他虽为文人、画家，但平日运腕之余亦习武，练就一身好拳脚及剑术。此时他挺身相救，抡起铁拳怒斥外国流氓。围观的同胞亦齐声喊打来助威。外国流氓见势不妙，抱头鼠窜。事后，黄宾虹撰《自强救国论》一文即是有感于此而发的。

他看到，有的打着“学者”招牌的外国盗宝者趁中国贫弱内乱、法纪不张、惧怕洋人等积弊，肆无忌惮地剽掠中华古文物，以至于龙门、敦煌等地的宝藏无不遭毁损，黄宾虹忧伤不已，作漫画描绘这帮窃贼的无耻嘴脸，投寄高奇峰、高剑父主办的《真相画报》发表。

黄宾虹一向痛恨弄虚作假的坏风气。他后来任上海著名出版社“神州国光社”美术编辑。当时不少伪造名家字画的古董商，常利用报刊吹捧炒作，弄虚作假，牟取暴利。一次，日本某“学者”托人送来两幅伪造的明代山水画（李在的《桃源图》、杜堇的《溪山烟霭图卷》），并以优厚的报酬引诱编辑人员，以求发表。编辑部有人见利忘义，竟一口允诺。黄宾虹板下面孔说：“此事有伤国体，不能去做。朋友们若生我的气，只好忍痛割席！”由于他义正辞严，日本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抗日战争中，黄宾虹全家困居沦陷了的北京。尽管生活窘迫，他也绝不事日伪。伪文物研究会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日伪操纵的美术界为他举办八十大寿庆寿会，他也拒不赴会。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醉心于明代忠臣黄道周的爱国诗歌和南宋人的爱国山水画之中，不禁神游粤、桂、荆、楚的壮丽河山，以寄托对抗战大后方的思念和希望。他还常对家人吟咏陆游的诗句：“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坚信中华民族不会亡！并以画家的口

吻发出“青山则无衰老可忧”的心声。

一次，他经过长安街，目睹日军在新华门耀武扬威，不禁心中如噎，归家即挥笔作《黍离图》，画中玉黍一枝独秀，坚石、梨花以作陪衬，并题诗道：“玉黍离离旧宫阙，不堪斜阳伴铜驼。”此作借用《诗经·黍离》之典故，寄托了触景伤情、怀念故国的情思。后来被收入近年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书《中国名画鉴赏辞典》，足见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何香凝的绘画生涯

何香凝，原名何谏，又名何瑞谏，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她与廖仲恺结婚，后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目白女子大学求学期间，她求知若渴，课余时间每每向朱执信学数学，向胡汉民学《史记》，向廖仲恺学《汉书》。

半年之后，她因胃病休学。一天，闲来无事，便信笔画了窗外风景。凑巧，孙中山来到她跟前，发现她的绘画天分，便对她说："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和军用票证的图案，这些都需要把它画出来。"

由于孙中山的启发引导，此后，她改学美术，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转入日本东京本乡美术专科学校。既学山水花鸟，又学狮虎鹰隼。由于刻苦习练，绘画水平迅速提高。她画的狮虎斑斓彪壮，气吞山河，她画的梅树冰姿玉骨，傲雪凌霜。

这期间，她的作品《雄师西顾图》，曾受到朱执信赞赏。还有一幅《猛虎咆哮图》，是绘赠黄兴的作品。辛亥革命爆发后，她为革命军设计了军旗图样。民国十六年（1927），她出国赴巴黎，以卖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九一八"事变后，她从法国返回上海，为抗日战争筹集军费而作画，并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组成"寒三友社"。这一年12月，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她不但捐出了早年赴南洋群岛及菲律宾时靠卖画为广州仲恺农工学校筹集的全部资金，还将自己历年留存及友人捐赠的画和墨宝也全部变卖出售。此外，她还向北京、广州等地书画家征集书画一万五千余件，与郑洪年、叶恭绰等二十余人共捐款

项近一万八千元。本人为中国抗战捐款总额共有数万元之巨。

20世纪30年代初，她画古梅，经亨颐画雄松，陈树人画翠竹，于右任作诗题款，遂成《岁寒三友图》。三十年后，时届八十岁高龄的于右任偶得该画，不胜慨叹，欣赏之余，发现诗中一句漏写一个“时”字，因而补书，并赋诗二首：

三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于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于右任辞世后，唯一健在的何香凝见到于右任的诗，回忆往事，亦感慨万端，遂用原韵作奉和诗三首：

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余年忆此诗。
岁寒松柏河山柱，零落台湾知未知？

锦绣河山无限好，碧云寺畔乐同游。
驱除美寇同仇忾，何事哀伤叹白头？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忆往事念同游。
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

画坛寿星朱屺瞻

一代画坛寿星朱屺瞻于1996年4月20日在上海华东医院辞世，享年一百零五岁。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称赞屺老的人品是“为人率直、做事顾人、图画从己”。

屺老，原名朱增钧，生于清末光绪十八年（1892），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人。祖父两代，均为当地著名儒商。光绪二十六年，母亲病逝，他不思饮食，终日伏在母亲遗像前恸哭，家人解劝不能止。塾师童颂禹为自己学生的孝心所感动，不禁即兴诵读《诗经·卫风》：“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遂为他改名为屺瞻，以寓恋母孝情。数年后，其父亦去世，屺瞻哀从中来，含泪复诵《卫风》：“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因又取号“二瞻”。他深深怀念父母双亲，说：“父生我兮，母育我兮，老当由我赡养，现今两老驾鹤飞去，我惟能终身瞻望远天，永瞻在心！”

他幼时读过五年私塾，塾师童颂禹教学之外，喜画兰竹，暇时他亦模仿作画，偶被发现，常常受到称赞。十七岁时，考入上海实业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工程课外，仍致力作画，该校学监唐文治是其表叔，精小学通画艺。偶见其作画，非但不批评，还指点道：“写字作画，点画皆须着力，切忌浮滑。”成名之后，每谈及成因，他常对人说：“我一生以画为乐，皆因发蒙时侥幸，幼时受父亲影响，少时得到塾师勉励，青年时受表叔指点，没有这种种良机，我无法成为画人。”

民国元年（1912），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发愤以笔作枪，描绘战场烽烟，创作了不少揭露日军暴行、歌颂抗日爱国志士功绩的油画。并在美专同事、学生的支持下，举办了《朱屺瞻淞沪战迹油画展览》，观者问及展出感想，他义愤地

说："我一直以画作乐，这回是用画解恨！"

其时，他的故乡江苏太仓浏河镇，远离都市喧嚣；他常在故居书斋以画会友，或愤议时事，或论艺作画，互相砥砺，以示节操。"八一三"事变后，浏河镇成为日军登陆处，其故居被毁，遂清理瓦砾围成一个园子，将日寇炸弹坑拓展为池，名为"铁卵池"，以记日寇罪行。

当时，他还在园内种梅树百余株，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梅花草堂"，画友来聚，他皆索画梅花，并说："我爱梅花，由于它有傲骨，隆冬腊月，它对冰雪笑颜冷对。人就应有梅之骨气，越是艰难，越要坚贞。"借梅喻志之举，深得友人响应，不少画友从外地寄来题梅画幅——齐白石、汤完之、吴湖帆、白龙山人、黄宾虹、丁辅之、沈尹默、陆俨少、应野平、谢稚柳、贺天健、唐云、程十发、亚明、宋文治、赖少其、刘旦宅等都先后以其梅花草堂为题绘出精品寄奉。

抗战胜利后，他对达官显贵的宴请一概回避，却热心参加画友组织的画社。潘天寿、诸闻韵召集的"白社画会"，徐悲鸿、江亚尘组织的"默社画会"，陈树人、何香凝、黄宾虹组织的"力社书社"，都时常有他的身影。

国画大师潘天寿

在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浙江宁海、杭州和北京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还特意参观了遗作展。

潘天寿出生在宁海一个偏僻山村里，幼年只读到高小毕业，祖父就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要他回家种田。幸好有老师与亲友的说情和接济，祖父才同意他报考免费的浙江第一师范。两年后，他的同乡柔石（当时名赵平复）亦入学。这两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青年意趣相投，交情甚笃。他追随李叔同、姜丹书研究书画，柔石加入潘漠华、冯雪峰组织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学习写作。1920年，潘天寿就要毕业了，两位学友依依难舍。潘天寿为柔石作焦墨山水两帧，一帧为《疏林寒鸦图》，画的是三丛疏林，寂寞而荒寥，几点寒鸦远近遁飞，抬头题款为：“疏林烟光点寒鸦，已属凉秋时矣”；另一帧为《高山古寺图》，画中高峰突兀，烟树迷离，歪斜古寺隐于山坳，左边题款为：“晚山闲打一疏钟。民国九年，天授作于杭州”。画中所署“天授”即潘天寿。他在1922年以前所画作品均署此名。据考查，这两帧画是潘天寿现存最早的两幅作品。

在浙江一师求学期间，目睹才华横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看到深孚众望的经亨颐校长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被免职，更由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后中国仍处在一个“夜正长，路也正长”的黑暗时代中，年轻的潘天寿心境十分凄凉。这两幅画中表现出的迷茫、寂寥境界，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反映。

1923年，潘天寿先后结识了王一亭、黄宾虹、吴昌硕等著名画家。吴昌硕曾以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相赠，并作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诗，对他特别器重并给以勉励。

潘天寿的大作，特别是他晚年造诣极高的一些代表作，一般都以“雷婆头峰寿者”落款。原来，雷婆头峰是潘天寿宁海家乡村庄附近的一座小山。此山源自天台山脉，距村约五六公里，海拔四百六十多米，相传雷婆婆曾在此降妖伏怪而得名。潘天寿在家乡度过青少年时代，他和伙伴常去雷婆头峰踏青游玩，家乡的青山秀水哺育、熏陶了他的艺术灵性，他曾风趣地说，他就是雷婆头峰的一块石头，不言而喻，以“雷婆头峰寿者”自号，寄托着他热爱故乡的深挚感情。潘天寿的这一大号，也体现了他山一般的坦荡胸怀。画坛师友都赞赏他的画具有一种别人无法相比的“气”，许多一流画家在潘天寿的作品面前总觉得自己的“气”不如潘先生足。有一次，一位学生作一张画，平平板板，大家都认为不行，他自己也画不下去了。潘先生一到，大家让潘先生看看，他提起笔从右上到左下拉出一条枯湿浓淡变化丰富又极为老辣的线条，一根老藤上下贯串。顿时这幅画就救活了，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潘天寿作画就是大胆泼辣，而且特别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的特色。

忆半丁老人

誉满海内外的大画家陈半丁已过世多年，他的作品迄今犹为人们所珍视。20世纪40年代，我曾与他有过交往，当时他住北京地安门米粮库胡同。记得他的住所，一进门迎面是山子石，院落松林成行，清幽雅静；地面除种植花草外，还种了一些老玉米、白菜、萝卜等；红砖砌成的小楼，为半丁老人安憩及作画之处，据说以前胡适之曾住过这里。

半丁老人喜戴小帽头，穿坎肩。他虽离开原籍浙江绍兴多年，但仍有故乡口音，与人谈话诚恳亲切，待客从不虚伪。1906年，陈半丁定居北京。翌年，经画家金北楼介绍，赴肃忠亲王善耆府中为吴柳堂侍御史画像。善耆以陈半丁言近旨远、才识卓异故，待之为上宾，且许以官职。面对王爷的封官许愿，陈半丁莞尔辞谢，其视乌纱如粪土，对艺术事业无限忠诚的情愫和清贫自守的精神，令人钦仰！值得一叙的是国人画展系由他开始的，那还是肃亲王在旅顺生病时，他在大连开第一次画展。当时盛况空前，报纸刊登，不少人喜看半丁老人作品，终日在展室盘桓不去。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适老人正对两位弟子张爱林、尤元曲讲授书画。老人曾对两徒说，孔子教子路收，教颜回放，即所谓因人施教。爱林没临过帖，写出字来居然有意思，这是有天分，但今后须收，不可再放。元曲临帖时间太长，写出字来，无时不在自拘自谨，所以今后须放，不可再收了。老人说，作品拿出来，即使不比人家强，至少自己也要不惭愧，才可以谈得到开画展。老人坐在一张古老大沙发上，对两个弟子越讲越精神；谈一阵话，喝一阵茶，走到墙边看一阵悬挂着的明清名画。这两位弟子当时年约二三十岁。听说元曲画展，多半是半丁老人在画上为之题字。开画展事先必须征得半丁老

人的同意。

还记得和老人谈到艺术时，老人说，随便抹两笔的，哪里就算得上艺术？艺术范围太大了，就连建筑制造乃至枪炮子弹，全是艺术。绘画不过是文人余兴，课余爱好，往清高里说，也不过是一种高尚的玩意儿而已，像我这简直谈不到艺术。当初，学画的人没有现在这样多；那时印刷品缺乏，轻易见不到参考资料，向人借用完了一还，仍然莫名其妙。因此为了学画方便，就成立个社会团体，此即艺专的前身。老人还说，一群学生学画，叫他们都学我，这个不妥当，就如同唱戏，他是旦角的嗓子，绝不能因为和我学而唱老生，所以与我不相近的我不教，不能让人家费力不讨好。

半丁老人还说过，三年出个状元，可是三年出不了名画家。有天分也要用功，我的男孩女孩都能画几笔，但不用功就不能成功，这可不是世袭，我绝不勉强他们。

许多人不知道半丁老人原来的名字，他原名陈年，字静山。因是孪生，故以“半丁”为号。他不但能书会画，而且还长于治印。

半老性情耿介，从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北京沦陷期间，日伪政府多次聘请他任职，均遭拒绝，宁可受穷吃“混合面”，也不失民族气节。1947年，某官僚登门求画，他以树林为背景，在其下画了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并题词曰“上有魔王下有麺”，对当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半老的傲骨，亦每用石印形式表现出来。其一印刻有“不使孽钱”四字，言其拒收不义之财。另一印曰“清风明月是家传”，堪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的高人雅士。

半老的傲骨，最终要了他的命。“文革”前夜，他因未在康生面前胁肩谄笑而得罪了这个阴谋家，于是被打成了“黑画家”，天天挨批斗，每月仅领二十六元生活费。病危时，家人用婴儿坐的小竹车送他

去人民医院抢救，因医院拒绝治疗遂含冤而死！

百身何赎一少梅

世界著名收藏家、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曾收藏过陈少梅的画，听说在他访华时还曾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询问过陈少梅。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巨型画册《陈少梅画集》，由赵朴初题签，启功作序。陈少梅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代巨匠，有人把他与张大千、溥心畬、金北楼并誉为“民国四大画家”，可见他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不同凡响。

陈少梅系湖南衡山人，名云彰，字少梅，别署升湖。少梅幼承庭训。其父陈嘉言先生为光绪己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晚年归故里主持衡阳书院（船山学社），曾支持何叔衡、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嘉言先生为湘省名士，少梅垂髫时从习诗文书法。少梅画品高标古雅，傥然不群，盖得于家学风范、诗画书香。十五岁时知遇于清末民初画坛巨擘金北楼，为金关门弟子，并入金所主持之“中国画学研究会”，因其年龄最小而画品最高，故被会中名流耆宿誉为“神童”。金北楼称其“前程无限”而为其取号“升湖”。次年入名噪一时的“湖社”。1930年陈少梅画作参加比利时建国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并荣膺银奖，斯时年仅二十一岁。同年主持湖社天津分会。

陈少梅弱冠出道，壮年大成，以其独具风神、智睿超凡的画风彪炳于中国画坛，堪称不朽画笔，今犹以其流风遗韵享誉后人。书画大家启功先生曾云：“我比少梅先生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的成就之早。”（《陈少梅画集·序》）启功先生还云：“其纸不过三十年，其笔则三百年……所著者音徽往矣，百身何赎！”董寿平盛赞其“艺显千秋”。其他画坛大师前辈则以“当代唐伯虎”“唐寅以后第一人”“马夏再世”盛赞之。

陈少梅擅人物、山水，工写兼能，是近百年画坛上继承和发展北派画风取得最高成就的画家。从陈少梅的画品中可窥唐伯虎、仇十洲的清俊秀逸；亦含浙派吴小仙、戴进等人的生动滂沛；溯源而观的则是南宋马远、夏圭的风骨。陈少梅的《西园雅集图》堪称工笔山水人物中的罕见精品。他的老友王颂余教授曾云：

> 陈少梅以用色淡雅见称，即使画重彩青绿山水，也显得那么清灵透亮，一点火气也没有，这是很难做到的。他是怎样画的，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如果能把他这一技法弄清楚，对于画界无疑是很大的贡献。

陈少梅不仅堪称画坛巨匠，亦为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夫人、学生冯忠莲女士是当今著名的临摹专家。另一弟子邵英（现居美国）曾以《说佛图》荣获国际美术大奖。其他当代著名国画家王叔晖，刘继卣、黄均等，皆曾入其门墙。

惜乎天公忌才，陈少梅于1954年以四十五岁之华年猝逝。诚如古人江淹所叹：

> 自古皆有死，
> 莫不饮恨而吞声。

少梅之早凋每令知者扼腕。启功先生“音徽往矣，百身何赎”之叹，道出诸多画坛前辈的心境。至今颇多画坛前辈谈到少梅英年早逝，仍摇首叹息。倘天假以年，少梅当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画像大家蒋兆和

蒋兆和先生是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画家，他长于画人像，是写生的妙手。尤善于随地取材，随时着墨，只用一枝笔，一方砚，在一张素纸上，一小时之内，便可绘成一幅生动感人的画像。在四十年前，曾看到他的不少作品，出现在笔下的，都是一些旧日京师社会底层的人物，如街头的洋车夫，换“取灯”（即火柴）的老妇，拾煤核的幼童，还有《旗人末路》《小家碧玉》等。有的还在画上题诗两句，如《小家碧玉》画的是一个少女低头刺绣，蒋先生画毕题诗两句：“对门女儿才十五，日日学绣嫁时花。”从他的笔下画出的人物可以看出，他不仅画得姿态酷似，而且画出了人物的内心境界。当年有人看了蒋先生的画，很受感动，并且赞美他说：“这是天下人画天下画。”

蒋先生早年并不卖画，所以也一直没有“润格”。还记得有一次，三五知己在东城竹杆巷三十四号蒋先生的寓所相聚，席间征得蒋氏同意，为他定了一纸普通“润格”：每速写一张五十元，精绘加倍。

蒋先生当年曾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那时他与青年会干事舒又谦等人常相往来。在蒋先生三十九岁那年的春天，应舒又谦的邀请，连同友人杨轶厂、赵希孟、蒋汉澄、李进之以及青年会会员赵梅痕女士等，同往颐和园春游。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几个人来到颐和园，且谈且游，信步来到石舫，举目远望，碧波荡漾，春意盎然。在昆明湖里，扁舟几叶，荡漾其中，颇增游人豪兴。于是舒又谦倡议，七人购票登舟，向湖中小岛上的龙王庙划去。不料刚到十七孔桥下，陡然狂风大作，船身左右摇动。蒋氏笑着说：“现在有两蒋（指蒋兆和与蒋汉澄，谐音桨）在此，不要怕。”舒又谦说：“古诗有云：‘双桨风横人不渡，翠楼依梦可怜宵。’”但话音未落，猛一个巨浪打来，舟

覆人坠。附近游人即时抢救，将蒋兆和先生及蒋汉澄、李进之、赵梅痕等四人救护上岸，舒又谦等其余三人则未救上来，直到晚间，才打捞到他们的尸体。蒋先生遇险迄今已有四十年，每一回忆，犹有余悸。

晚年蒋先生的画笔更加苍劲，有人自北京来，谈及两三年前，见到蒋先生所画曹雪芹像一幅，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备受称道。

养虎画虎张善孖

正如徐悲鸿爱画马，齐白石爱画虾，李可染爱画牛一样，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一生中最爱画虎。因此他自号“虎痴”，时人皆称为“虎公”。

说起张善孖画虎来，曾经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那是1922年，他画了一张虎图，标明售价一千二百元，这在当时是笔了不得的巨款，因而引起轰动。但人们观后，大失所望，有人毫不客气地说，他画的不是虎，而是猫。此话流传开来，遂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张猫猫”。此事给张善孖极大的刺激与启发，他决心下功苦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善孖的画虎艺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阆中县锦屏山画了两块虎碑，系单线白描，线条刚劲，气势雄伟，分别命名为“上山虎”与“下山虎”，并各题一首诗。前者写道：“眈眈虎视遍东西，瓜豆河山在眼中。狮睡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后者写道：“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风。”画下镌有张善孖的名言：“一钱不值，万金不卖。”这两幅虎画与诗作，应该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地步。然而张善孖认为单线白描，还不能反映出国画的笔墨层次和用色丰富。以后他在研究古人画艺中，受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遁入深山观察活虎之事的启发，决心养老虎，以入画图。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善孖曾卜居于苏州网师园。就在他网师园的居所，他养了一只斑斓猛虎。提起这网师园非比寻常。苏州本来就是个美丽的水乡，李绅曾有诗云：

烟水吴都郡，阊门驾碧流。
缘杨浅深巷，青翰往来舟。

那里著名的园林很多，是一些著名园艺家的精心杰作，素有“江

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说。网师园正是苏州的一座名园。

该园始建于南宋，初名渔隐园，到了清初，一位姓宋的退休官员成了此园主人，改名网师园。园的面积不大，但布局精巧，结构疏密得当，亭台楼阁，花木山水分布独具匠心，在苏州园林中堪称上选。

张氏豢养的虎，来自江西。一位军官到山中狩猎时，发现了一只小乳虎，就把它带回来。善孖听说以后，把这只小虎讨来，带到了南京。那时，善孖正住在苏州网师园。从南京到苏州有火车可达，可是，火车可运马、牛、猪、鸡等，却从没有运载过老虎。幸而乳虎尚小，于是，制作了一个小笼，把小虎当作小犬带到了苏州。

有了这只虎，张如获至宝，每天观赏临摹，他把为虎写照的十二幅画题名为“十二金钗图”，请他的老师曾农髯为该图题诗，之前，曾说，我从来不喜欢给闺中小姐们题写什么诗词。张善孖说，哪里是什么闺中小姐，是老虎啊！及至打开图画一看，果然是十二幅兽中之王，赫然在目，于是援笔题之。

善孖不仅善于画虎，且善于画伏虎。在网师园中，本来备有关虎的笼子，但那虎却经常漫步于园中。当善孖眠于床时，虎则蹲卧榻侧，守候在善孖身旁。如有客人来访，善孖也带着老虎去迎候客人。客人可以用手去抚摸虎，虎也如一只小猫一样，去接受客人的爱抚。有一次叶恭绰氏来访，善孖携同老虎接待，并同拍了一张照片，张氏称此照为“三虎图”。

一次，张善孖带着老虎去苏州的北寺拜佛，该寺门槛特高，老虎出门时跌跤伤足，从此不良于行，半年左右，老虎死了，张善孖为之悲痛过甚，大病一场。但是通过对虎的观察，使他画艺大增。在中国画界中，张善孖称得上是驯养活虎以作画本的第一人。

1934年，张善孖与张大千在北京举行画展。张善孖展出一幅丈二

巨虎，名《黄山神虎》，为非卖品，经多方说合，最后被宋哲元以二千块银圆购去，此事震动了全国艺坛。江东杨云史曾有诗赞张善孖之虎画曰：

画虎先从养虎看，张髯意态托毫端。
点睛掷笔纸飞去，月黑风高草木寒。

自此画界中不少人称他为“张老虎”。

1935年，友人吴宗信在贵州捕得乳虎相赠，张氏兄弟从此常在网师园内，命“虎儿”做出各种姿态，对虎写生。张善孖通过长期的观摩与苦练，虎画已烂熟于胸，信笔涂去，即能将山大王的各种雄风表现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陈三立曾有诗赞张善孖《养虎图》曰：

二张画笔冠时名，画虎兼资养虎成，
视以善心无异类，愿推仁术问苍生。

虚怀若谷丰子恺

丰子恺是中国著名美术家、文学家和翻译家。青年时期到日本学习绘画，回国后介绍外国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一起，为发展中国现代美术作出了贡献。

丰子恺平日作画，坚持写《画师日记》，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他常说：“赞美的话不足道，批评的话才可贵。”在他毕生的绘画生涯中，虚怀若谷的故事很多。

早年，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有绳子。画好之后挂在墙上，正好被家里帮助挑水的青年农民看到了，于是笑着对他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子系着头羊，其余就会跟着走。”他听后恍然大悟，于是对人说：“看来要画好画，不能光凭想象，必须仔细观察事物，还应该多向有生活体验的人请教。”

有一次，他到家乡嘉兴烟雨楼去玩。忽然听到邻座有几位游客提到他的名字，他急忙闪身躲在茶客背后，“偷听”大家的议论。其中有个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脸上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其实这是受日本画家影响，叫作“有意无笔”或“意到笔不到”。但他还是倾心听取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表情。

在抗战期间，他全家西迁贵州遵义，寄居在郊外的罗庄。有一天他到庄外田野中散步，走累了坐在一条石凳上歇脚。不一会儿，一群人路过也坐下闲谈。其中一人指着他家说：“你们知道吗？丰子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这一来大家便纷纷议论起他的画。他听后立即把

头伏在膝上假装打瞌睡，深怕被他们认出来。过客多数都是赞美的话，什么“独具一格”啦，什么“中西合璧”啦，什么“闻名中外”啦。唯独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我总觉得丰子恺画的背景比较单调，每幅都差不多，再说他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几幅画，人物穿的是内地服装，背景却是江南的。看来他画惯了江南山水，对内地的山水是画不来的。”议论者无心，听者十分留意，他听完后回到家里，将批评者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画师日记》上。

此后，他便经常到郊外去写生，有一次他竟远足金鼎山，在一座寺庙里寄宿了六七天。他每天仔细观察寺院周围起伏的群山，认真写生，将当地的山形水色，一一记入画册。他后来画的《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蜀江水碧蜀山青》《蜀道难》等画中的背景，就是从这次实地观察和写生中所得到的实际体验。

他的漫画寥寥几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这与他十分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分不开的。为了记下观察所得，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速记本。利用这种自制的小本，他把捕捉到的可以入画的每一个场面都画下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画竹圣手柳子谷

绘画史上，生前无名，死后扬名；或生前名声显赫，死后即被淡忘的画家可谓不乏其人。然本为杰出画家，由于一生前后命运反差巨大，前半生潇洒辉煌，后半生却冷寂无名，这种现象则实属罕见。据我所知，柳子谷就是这“实属罕见”中的一个。

柳子谷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坛上最为活跃的画家之一，曾与徐悲鸿、张书旂齐名，时有“金陵三杰”“画竹圣手”之誉。50年代始，由于历史原因，他被时代所遗忘，几近销声匿迹。所幸的是，柳子谷晚年迎来了盛世。在他去世十年后，他的艺术成就终于为这个曾将他忘却了的时代所追认。

1901年柳子谷出生于江西玉山县一个书香世家，四岁随父习文并自学绘画，十五岁便以工书善画闻名乡里，后赴南昌求学，二十三岁考入上海美专。1926年冬，柳子谷提前毕业携笔从戎，在北伐中作《雪中从军图》，深得胡汉民、林伯渠赞赏。林伯渠在其画上题诗赞曰：“万里长征人，怀才意不薄；于斯风景中，合赋从军乐。”次年，北伐夭折，子谷退出军旅定居南京。随后几年，他埋头绘画，屡有作品展出，渐为社会瞩目。这期间，他应徐悲鸿之邀多次去中央大学讲学或作画示范；出任南京美专国画系主任并常回母校讲课；积极参加赈灾义卖；先后创作了以讴歌民族自强和反映底层民众疾苦为主题的画作：《水灾图》《流民图》《戚继光抗倭》《梁红玉击鼓抗金》《还我河山》等，引起强烈反响。

1934年柳子谷在南京举办首次个展，轰动京城。每天观众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高剑父、张大千、梅兰芳专程从上海赶来；柳亚子、何香凝、叶楚伧、冯玉祥等社会名流也都纷沓而至。参观者对柳氏画作无不叫绝。对此，有报道称：“子谷作品，见者赞美，自党国

要人、艺术巨子及骚人墨客，交相称赞。”林森不仅亲临购画还题赠“驰誉艺林”；蔡元培、何应钦、罗家伦、朱培德等均当场选购画件；孔祥熙除私人定购外，还商得柳君同意，将标有“非卖品”字样的《灾民图》购去。其实，当时柳子谷对这幅非卖品实不舍割爱，后经陈布雷说项，得知孔买画是为赈灾用，这才忍痛答应。

画展上，文人学士对柳子谷的画艺好评如潮。陈树人赞之为“六法粲然”。张书旂则云：“子谷作品，气遒韵举，风力顿挫，银钩铁划，森森然，非深得正宗精华者，曷可臻此。”徐悲鸿尤其喜爱柳子谷的《雨竹》，称其为“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于右任看了柳子谷的画后赞叹至极。他针对当时国画不甚景气的状况，当即挥毫写道：“子谷绘山水人物花鸟兰竹等物，理法、技巧、意境均能得心应手。识者谓，可起近代之衰，诚非虚声！”

这次画展，使柳子谷一举成名。次年，他在上海又举办第二次个展，盛况更是空前。报道称：“观者人山人海，几有人满为患，可谓打破本市以前个展之纪录”“为数年来沪市画展所未见”。由于观者踊跃，展期只好延长两天。画家胡藻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到上海两年多，个人画展看得不少，伟大者只是柳一人；作品之多量和整齐，亦只柳一人；在展览中订画者之多，亦只柳一人。”

柳子谷不仅画好，人也好。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工人、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高潮。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被捕入狱。柳子谷便利用自己的艺术声望，想方设法予以营救。多年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称之为“革命老人”的张纪恩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子谷先生当初挺身而出的凛然正气，仍感怀至深。

1936年，柳子谷与韦秀菁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经亨颐、邵力子为证婚人。在友人热情操办下，婚礼隆重而典雅。礼堂四周挂满了名人字画。徐悲鸿送的《双骏图》，上面题有“河山无限好，双骏任驰骋”；张书旂赠的《樱花白头》，题曰“白头长春”；另有

经亨颐的《水仙竹子》，题曰“坚贞风格，神仙眷属”；陈树人的《兰石》，题曰“如石之固，如兰之馨；天长地久，结为同心”。此外，刘海粟的《荷花》，汪亚尘的《金鱼》，吴青霞的《双雁》，谢公展《菊花》，胡藻斌的《鸳鸯》等都系名笔杰作。于右任、蔡元培、柳亚子、叶楚伧、罗家伦等赠的贺诗，犹如锦上添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婚礼书画展”，一时传为美谈。

1937年，张治中当了湖南省主席。面对贪官横行、匪患蔓延、民不聊生的情状，张治中忧心忡忡，决心从“治吏”下手改革弊政。于是，他大刀阔斧撤换不称职官员。一个偶然机会使他获悉柳子谷为避战火此刻已从南京返回江西故里，并有意继续西迁。听到这一消息，求贤心切的张治中不禁喜出望外，便电邀子谷出任湖南通道、绥宁两县县长。张对柳道：“板桥任县令有政声，你画竹师板桥青出于蓝，搞县政不亦师板桥？”对从政本无兴趣的柳子谷，一时没有更好的去处，又感到盛情难却，只好走马上任了。子谷到任后，以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精神自律，廉洁奉公，除暴安良，废除苛捐杂税，改革陋规恶习，颇得民心。是年，遇饥荒，子谷画竹义卖代赈，百姓感恩戴德。两年半后子谷卸职，当他离去时，邑人沿途相送并赠联句予他：“万家生佛千秋泽，一代艺人百里侯”“板桥三绝诗书画，靖节一官归去来”。

1948年4月底，南京政府副总统的竞选渐进高潮。各候选人为竞选成功除发表演说，还很注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程潜将自己的诗集在国大代表中广为散发；于右任则在会场上悬挂起自己的美髯画像；孙科更是“慷慨”赠送美国造的收音机，还有玻璃皮鞋、玻璃丝袜。此时，柳子谷个展正在新街口的社会服务处举行。李宗仁知道柳画多年来在社会上，尤其是上层人士中很有影响，竞相收藏，得之为快。于是，他便亲赴画展，以重金买断非卖品之外的全部展品，以答谢那些支持他的国大代表们。

新中国成立后，柳子谷告别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江南来到东北，从此投身党的教育事业，直至退休。在这三十多年里，他的作品难得发表，无缘参加全国大展，更没有机会举办个人画展。然而，身陷逆境的他并没有消沉，教学之余仍不忘画家之天职，创作了一系列紧随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和《山村新貌》两部巨制。对于前者，有评论认为“这是我国最长、世界上罕见的描写革命战争历史的画卷”。1985年，柳子谷将这部画卷无偿献给了国家。次年1月12日，一代大师柳子谷乘鹤而去。

柳子谷一身清白地来到人间，又一身清白地离开了人世。综观他的毕生经历和艺术创作，可以说，他的前半生魂系丹青，心向光明，史实作证，爱国忧民；他的后半生情寄笔墨，佳作长存，宠辱不惊，画坛留韵。

名画家刘奎龄父子

北京国画家刘继卣病逝，由子及父，联想起刘继卣之父——天津著名国画家刘奎龄来。刘奎龄字耀辰，为天津巨富“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刘家”的后裔，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985）。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为第一班学生，与后来的名人梅贻琦、俞传鉴等同学。

刘奎龄在世代先人的熏陶下，自幼爱好绘画，学郎士宁画法，造诣颇深，中西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更因学习刻苦，精于钻研，在艺坛上逐渐成名。他善绘工笔画，楼台殿阁、花卉虫鱼、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他的绘画作品，形象准确，神态生动，布局新颖，意境高超。中年以后即以卖画为生。当年，天津的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伯刚，专门收购刘奎龄作的画，好多精品都为之购去。

“土城刘家”从清光绪庚子起，家道衰落，刘奎龄生于衰落的富有人家，虽精绘画，但不知经营，许多优秀作品常被人低价买走，所以大半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奎龄的绘画艺术方受人重视，他的作品得到文化艺术界的好评，声望日隆。这位善书工笔花卉鸟兽的刘奎龄和另一位善画工笔山水的刘子久，当时并称为天津“二刘”。

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刘奎龄的姐姐嫁给天津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的侄儿为妻。她姐姐的二儿子严仁统结婚时，做舅舅的刘奎龄送了一幅画——《孔雀图》，作为贺礼。为画孔雀，他一手拿着一根孔雀翎，一面观察，一面作画，断断续续一连画了五年才画成。这幅《孔雀图》写照传神，栩栩如生，成为刘奎龄的代表作，曾受到著名画家徐悲鸿的高度赞扬。后来，北京美术出版社印制《刘奎龄画集》，就选用这幅孔雀图作为封

面。据说，这幅画曾经被选参加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画展，以后由严家后人拿出来献给国家了。

这位晚年得享盛誉的画家，以八十三岁高龄，于1967年逝世。

刘奎龄之子刘继卣于学习乃父画风之外更有独创，他在年画、连环画和国画人物、动物画方面，皆成就卓著。

1936年，刘继卣进天津市立美术馆学习作画。当时这个天津唯一的一座美术教育园地，设在河北中山公园里。他朝夕出入其间，对于花园内的花草树木的成长，鸟兽鱼虫的生活，都深入观察，作为写生题材，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次年，即开始从事卖画生涯。

刘继卣画的人物仕女、花鸟走兽，多为工笔与写意相结合，在其绚丽多彩和准确造型的基础上，显得格外凝重、奔放、潇洒、传神。他的作品把西洋画的情调渗透进中国画的意境中，丝毫不露痕迹，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1947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画家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他的艺术成就，立即引起当时美术界的重视。此后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屡获好评。

美术界谈称，他的艺术生命得到充实锻炼和发展，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0年，刘继卣从天津迁居北京，得识北京各大名家，获益匪浅，艺事更为精进。50年代初期，他创作的连环画册《鸡毛信》出版，独具匠心的构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小放羊娃的英雄故事。这部连环画一出版，立即轰动了美术界，使刘继卣的声誉大振。

“末代王孙”画家溥佐

1988年，中、意、英合拍的影片《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内地也推出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由此笔者想到一位值得一书的“末代王孙”——名画家溥佐。

溥佐字庸斋，号松堪，1918年生于北京。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爱新觉罗的“金枝玉叶”。他的曾祖父是道光皇帝；祖父是咸丰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讙，因反对“垂帘听政”，为慈禧太后所嫉恨，以致不如他六祖父奕訢、七祖父奕譞那样受宠，因而一直老死在宗人府宗令的任上。

溥佐从七岁开始，读过十一年家塾。1935年十七岁时，曾到伪满溥仪宫中读书，两年以后，因对溥仪甘当傀儡卖国的行为深恶痛绝，毅然返回北京，从此一直在北京居住，以书画自娱。

由于他出身贵族，自幼即饱览和摹写皇宫内府的藏画；及长又受其大哥名画家溥雪斋的熏陶指点，深得其父载瀛贝勒真传，对画马具有深厚造诣；同时还长于花鸟竹兰；兼工山水、走兽。二十一岁时，参加溥雪斋创办的“松风画会”，在画展中展出他的书画作品。其后参加其堂兄溥心畬在天津举办的扇面画展，得以名噪画坛。

溥佐画马学李公麟；山水宗唐寅、王翚；墨竹法顾定之；画法学赵孟頫、米芾，功力尤深。20世纪50年代起，在北京的美术学院任教，艺术创作又有新跃进，从临摹古法转为致力于花卉、动物的写生。画笔挥洒精致、形象逼真，衬以生动的背景，饶有意境。

他的书画作品颇受国内外艺术同道的爱好。1980年，内地的电视台曾在屏幕上介绍过他的《五马图》《五鹤图》《藤萝蝴蝶》《樱花》等十余幅作品，向国外播出，声誉益高。

据从北京返港的友人谈，近几年来，溥佐虽年事已高，书画创作仍很勤奋，许多大城市的楼堂建筑和高级宾馆，都请他作画。

“末代皇族”中多画家，去年在北京曾举办过“爱新觉罗家族画展”，如能在香港展出，当可一饱眼福。

皇族画家溥松窗

20世纪40年代，我见过溥松窗画的一幅《万马图》，虽尚未完稿，但跃然纸上的四千匹骏马已初具轮廓。据说这画一搁就是四十多年，近来溥松窗竟有雄心在其晚年完成这幅巨作，真所谓老当益壮也。

溥松窗本名佺，出身清朝皇族，是醇亲王奕譞的孙子，道光皇帝是他的曾祖父。他的父兄、姐姐都喜欢绘画，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到十五六岁正式开始学画，潜心砥砺，吐露芳华，没有师承，完全是家传的。

溥松窗二十岁左右，他的长兄书画家溥雪斋在北京成立了“松风画会”。这是一种“美术沙龙”。他的哥哥溥毅斋、弟弟溥佐，以及其他满族书画家思雅云（关松房）、和季笙、祁井西、启功、溥心畬、叶仰曦、惠孝同等，都是这个“沙龙”的成员。为了体现“沙龙”高洁的格调，他们都起了带“松”字的别号，如溥雪斋叫“松风”（自称“松风主人”），溥佐叫“松龛”，和季笙叫“松云”，恩稚云叫“松房”，启功叫“松壑”，溥心畬叫“松巢”，惠孝同叫“松溪”，叶仰曦叫“松荫”……而溥松窗自己就起号“松窗”。

那时他们每星期在溥雪斋家中聚会一次，研讨画理，挥笔作画，书生豪气，风流潇洒。他们还开办过几次画展，而且出售作品。但是展出地点不是在什么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而是在“松风主人”家中。参观者，购买者，也大都是他们的亲朋故旧。

在“美术沙龙”里，成员彼此沾亲带故，总是笼罩着一种温馨的气氛。这时的溥松窗就像一位沉浸在艺术世界里的骄子，因为“沙龙”中的大多数人都比他年长十余岁。兄长们的画艺在当时已属上乘，溥松

窗转益多师，旁征博采，再加以兄长们的指点，松窗画艺进步很快。他的山水画淡雅清远，格调豪迈，深得五代、宋元画家的笔意；他笔下的马，线条遒劲，生动浑成，继承了唐代韩干、宋朝李公麟、元朝赵子昂的传统，并受到清代郎世宁的影响；他画的竹俊逸挺秀，丰满潇洒，从中可以寻到元朝顾安的韵味。

1936年，溥松窗二十二岁就担任了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教授国画山水，弟子满天下。现在夏威夷一所大学任美术系教授的曾昭和女士，即是其中之一。

吴作人师事徐悲鸿

吴作人祖籍安徽泾县，自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从丹青老手祖父那里继承了嗜画如命的艺术禀赋。民国十四年（1925），正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附设高中部读书的吴作人，从《时报》副刊上看到一整版徐悲鸿的画，那深邃的意蕴、精美的作品，立即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他决意去找徐悲鸿学画，老祖母把脸一沉说："你爷爷画了一辈子画，结果功不成、名不就，一家人还不是跟他过苦日子！"全家都反对他学画，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就是饿着肚子也要跟徐悲鸿学画！"

一次他听说徐悲鸿已从法国回来，正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便报考了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当徐悲鸿看了他的一幅石膏人头习作画，称赞说："你画得蛮好啊！"接着询问了他的年龄、爱好和家庭情况，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颇有天赋，今后要多观察，多思索，多练习，多读书。"临走时，徐悲鸿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你星期日早上可以来我家看画片。"他听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叩响了徐家的门。徐悲鸿亲自开门，让座，讲述绘画的技巧。两位美术天才，一个是多年来一直在物色高足，一个是朝思暮想师事徐门，如今二人如愿以偿，实在是天缘作合。从此，吴作人便不断利用节假日，到徐家听恩师说画。

民国十七年（1928）9月，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吴作人又转到该系当旁听生，继续跟徐学画。后来，在徐悲鸿的鼓励下，吴决心到法国巴黎高等艺术院校去求学。在巴黎，吴作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考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工作室"。但因为该校学费高，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是他的恩师徐悲鸿打听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还有一个"庚款助学金"名额，于是将吴作人推荐给比利时皇

家美术学院院长巴思天教授，从此获得了稳定的学习机会。在异国的艰苦学习期间，他着意在绘画中表现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他的油画《风磨》《纤夫》《争论》《打铁趁铁热》等，都受到巴思天教授的好评。

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徐悲鸿感到自己的弟子在艺术上已日臻成熟，可以为祖国美术事业效力了。于是写信邀请吴作人回到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徐悲鸿到北京接办北京艺专，又请他在该校任教务主任。

吴作人同萧淑芳结为伉俪，其结婚证明人就是恩师徐悲鸿，徐特作《双马齐奔图》送给吴作人夫妇作为贺礼，并在画上题诗曰："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校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山。"

辅仁大学美术系女状元

中国古代绘画之珍贵杰作《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已由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该图摹本是女临摹家冯忠莲女士于1953年临摹完成的。冯女士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有不少趣闻轶事。

20世纪30年代，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溥生前曾多次提起，说冯女士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是辅大美术系之女状元。

辅大美术系开始只有男生班，1938年首届招收女生二十名，有三名取自天津，冯女士即其中之一。

开学伊始，溥先生即跑进教室，连声追问："谁是冯忠莲？"冯女士面颊红晕，惶然站起。溥先生走至座前，一迭连声道："你的晋唐小楷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此次招考，考有绘画及书法。冯女士画的是竹子，并以"唐人写经"为基础，掺入云林笔意，写了"春眠不觉晓"等几首唐诗。溥先生看后极为赏识，因此跑来教室大呼小叫，倒把冯女士吓了一跳。

冯忠莲祖父为天津巨商冯商盘先生。冯女士考入辅仁大学前，曾在天津从陈少梅学书画。陈先生对其天资和勤奋十分欣赏，恰值辅大美术系招收女生，陈先生便极力怂恿她入辅大深造。

辅大美术系中西画并重，任教者均为海内名家：溥松窗先生教山水，汪慎生先生教花鸟，陈缘督先生教人物，启功先生讲授中国美术史，溥雪斋先生亦亲自授课。此外，还学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西洋画法，讲授西洋美术史。冯女士学习极为勤勉，平日作业，以及历次考试，成绩均为优等。陈少梅先生又常寄画稿给她，冯女士星期天总是用来临学陈先生画，因此进步极快。凡教她的老师都喜欢她，尤其溥先生对她格外偏爱，每次上课总要坐到冯女士画桌前提笔指

点。

每年冯女士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受到学校褒奖。每次辅大发奖典礼，总是在雷动的掌声和欣羡的目光中，辅大校长陈垣先生亲自授予冯女士奖章及奖状。

可是近三十年，却很少听到这位女状元的芳名了。最近才听说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的临摹，故宫博物院视为一级国宝珍藏，不禁感慨系之。冯女士如春蚕吐丝，将自己的宝贵年华全部贡献给默默无闻的临摹复制工作，并有《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一书问世，其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女画家潘玉良

已故现代著名女画家潘玉良女士的事迹，已由福建电视台拍成八集电视剧在内地放映。这位旅法女画家的经历十分坎坷，且具有传奇色彩。

潘玉良是江苏扬州人，原姓张，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更为不幸的是，十四岁那年又被其舅父卖到芜湖妓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然潘玉良生性刚烈，不甘忍受蹂躏和侮辱，曾多次自杀，均未遂，后来芜湖海关督察潘赞化为她赎身。潘玉良为感其救命之恩，甘当女仆，伺候左右。潘督察为人善良、正真，潘玉良自愿做他的小妾，并改姓潘。

潘府优裕的生活条件，成为潘玉良学习之良机。她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不两年即能读书为文了。她尤酷爱绘画，在潘督察的帮助和支持下，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潘玉良女士在上海美专，虚心求教，进步很快，深得同学敬佩。其间，校长刘海粟力主开人体素描课，但寻找女模特儿非常困难。潘女士为了艺术事业，自告奋勇，充当模特儿。然而此举却遭到世俗的攻击和诽谤，潘女士几乎失去了继续学画的信心。潘督察又多方开导，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使其破除俗习，努力钻研，终于学而有成。

1921年，潘玉良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她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卓著成绩。她创作的油画《裸女》获得国际奖。

1929年，刘海粟去巴黎，得知潘玉良获奖，异常高兴，遂聘她为上海美专西画教授。潘女士欣然受聘，归国任教。由于当时社会对待妇女的偏见和歧视，尽管潘教授在事业上卓有成就，仍屡遭打击。为

了追求艺术和妇女权利，潘教授被迫于1937年离开祖国，再度赴法，直到1977年逝世。四十年漫长岁月，潘玉良女士身在异国，孤身奋斗，终得辉煌硕果。其作品曾获得二十一次国际奖，其所塑国画大师张大千像，被收藏于巴黎博物院，为该院第一件亚洲人之作品。

潘玉良女士晚年思乡心切，多次欲携带自己的作品回国，作为献给祖国的礼物，但因故始终未能成行。待中国大使馆为她办好带作品回国的签证时，她却与世长辞了。

慈禧代笔缪老太

清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太后忽然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书，常写福、寿等大字，以赐嬖幸大臣。

这位政务繁忙、养尊处优的老太后，书法颇有一定功力，欲得其墨宝者与日俱增。她便想从宫中或各王府找一两位代笔之妇人，而终不可得，于是降旨各省督抚觅之，终于在四川省觅得官眷缪氏。

缪氏名嘉蕙，字素筠，本系云南才女，通书史，善篆隶书，尤工画。嫁陈姓为妻，其夫官四川道，死于任上。缪氏早孀，益发勤于书画，以为精神寄托，间或弹古琴自娱。其子为孝廉，并未补得实缺，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倒也恬静。

慈禧太后的懿旨，缪氏不敢不尊，于是被驿送至京城。缪氏毕竟出身于大家闺秀，谈吐斯文且颇知礼节，慈禧召见面试后即大喜，又见其所书小楷亦楚楚清秀，遂将其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白银二百两（彼时上等旗兵马甲钱粮每月仅三两），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对缪氏实在是恩宠俱渥。缪氏成为慈禧太后的清客，内监皆称之为缪先生，而世人皆称其为缪老太太。

缪老太太为报答慈禧对她的恩遇，格外卖力。自此以后，各王府、诸大臣以及封疆大吏等，凡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老太太手笔也，但钤章皆为“慈禧皇太后之宝”。缪老太太自己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笔者尝于友人家见过缪氏墨宝，颇有风韵，惜“文革”期间被视为“四旧”而毁于火，实可惜也！

光绪二十年（1894）夏，慈禧于六十大寿庆典前数日忽问缪氏曰：“满族妇人大妆，尔曾见之矣；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如何？”缪氏对曰：“所谓凤冠霞帔，是也。”慈禧命令道：“庆祝之日，尔须服此，

为我陪宾。”缪氏唯唯，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慈禧一见大笑不可抑，谓缪氏如同京剧《大登殿》中的王宝钏。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举行寿诞庆典那天，特置缪氏于众所瞩目之地，诸多满族妇女祝嘏者目睹缪氏汉人大妆，无不大笑失声，慈禧见状更是乐不可支，于是大加赏赍。缪老太太虽然得了许多珠翠金银，但被冠帔束缚着整整站了一天，任凭慈禧与命妇们瞧“稀稀罕儿”（北京土语，指少见的事物），自是苦不胜言矣。

当时朝中的命妇，对缪氏无不艳羡，以为圣眷优隆，天恩高厚也。殊不知满人是把汉人当作了玩物，供其开心解闷而已。

民国期间，缪老太太的书画作品经常见诸北京琉璃厂文物字画商店，售价甚昂。盖因原八旗贵族落魄后，迫于生计而相继变卖缪氏字画，而市井中不知底细者，皆误以为是慈禧太后之墨宝。文人捉刀，其名其才不显；缪老太太为慈禧代作，其名其才亦埋没矣！

齐门弟子娄师白

有人曾在一幅画上见过齐白石题字，词曰：“娄君之子少怀之心手何以似我，乃我螟蛉乎？”在另一幅画上，白石老人题曰：“少怀弟能乱吾真，而不作伪，吾门客人君子也。”白石老人一再赞许的“心手似我”“能乱吾真”的少怀，究竟是何许人？他就是白石老人的入室弟子娄师白。

娄师白原籍湖南，生于北京。原名娄少怀，父亲在香山慈幼院任职。有一次，白石送孩子去香山慈幼院读书，与娄相遇，既是同乡，住家又相去不远，从此两家长相往来，谁知这竟是娄师白走进齐门、登上画坛的契机。

娄家与齐家既成友好，师白遂常有看白石老人作画的机会，而且竟暗地模仿起来。有一天，白石来到娄家，见案上放着师白的画，竟有点儿像自己的笔法，于是收下了这个好学的少年人为徒。从此，二十多年中，师徒朝夕相处，师严徒勤。老师对弟子倾心相教，弟子则尽心尽力去学。此外，也为老师磨墨理纸，洗笔调色，接待宾客，传送信件，购物管家等。他每天到老师家里去，学画、侍奉、做事，有时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勤奋的学生很得老师的喜爱。因而给他刻了一枚名章，将“绍怀”改成“少怀”，又刻了一个号印，文曰：“师白”。这是老师给他起的号，白者，白石也。由此可见，他们师生关系的亲密了。

白石老人常叫学生看自己作画，并且一面讲解何以要这样画。还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叫师白带回家去临摹。然后，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就这样看了画，画了改，再看再画，师白的技艺有了很大长进。但是，这仅限于模仿而已。后来，白石老人教他要认真“写真”。如在教他画虾时，叫他买虾，养虾，把较大的虾放在笔洗中观察它的

生活动态。有时还要问他：虾的身体是从第几节弯起的？鸽子的尾羽共有几根，你数过吗？鲤鱼身上有一条中线，鳞片有多少？等等，问得学生张口结舌。

有一天，娄师白把几幅习作送到老师处，请他指正，恰好一家书画店老板到白石老人处取画，白石告以“尚未画好”，来人竟以为师白的习作为白石的作品，坚欲取走，所以老人才对师白有了“能乱吾真，而不作伪”的好评。也正因为如此，娄师白坚持老师在世之时，绝不卖画求名。尽管他父亲因车祸去世后，他与母亲仅靠些许抚恤金维持生活，也矢志不渝。

近闻娄师白的弟子在北京成立了“娄师白艺术研究会”，算来娄师白也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画猫能手孙菊生

在友人家里偶翻过期的《风光》画报，见有《画猫能手孙菊生》专页，真是既高兴亦难过。高兴的是五十年前的老友今尚健在，难过的是昔日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菊生兄，今已皓首银髯，几难辨识。

菊生自幼从母学画，十岁前，曾向杭州沈子长学画菊花。其后沈氏宦游山东，他遂改学恽（南田）派花卉。他擅长画菊，常常对菊写生，瓣朵大小、颜色均与原菊无异，时人多称羡之。

20世纪30年代中期，菊生举行个人画展于稷园，成绩斐然。“七七”事变后，其父退隐家中，无力供菊生上学，菊生乃每年举行画展，以卖画收入维持学业。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他又入研究所深造三年，其后，在各高等学府担任物理学讲师、教授，绘画仅为他的业余爱好。

菊生专事画猫是从40年代初期开始的。本来，菊生在画花卉时，曾画过一些猫以为点缀。一次在天津永安饭店举行画展，花卉作品售出不多，但作为陪衬的猫却大受欢迎。某日，猫画大多卖出，只剩一幅，两位观客竟为争购此画而相持不下。后来，求他画猫者接踵而来。他不得不多方搜集资料，观察猫的生活习性，揣摩猫的形象动作，习练笔法，提高画艺。从此，他的艺术生涯竟以画猫为主，花卉为辅。他常说这是“喧猫夺主”，为他自己始料所未及。

菊生所画的猫有其特点，即“三大一小”：头大、眼大、爪大、尾巴小，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笔者昔日常观其挥笔画猫，记得有一幅画的是书案一条，上有线装书两叠及笔墨纸张、蜡台等物；另有茶几一张，上有线装书数本，五六只猫玩耍其间，将蜡台触倒，鲜红蜡油滴下，有的猫儿爪被烫，张口狂叫，书本狼藉；茶几上线装书左右，

各露出一个猫头，面露惊惶之色。这幅画可谓构思精巧，别有妙趣。

菊生于擅画之外，在诗词书法方面造诣亦很深。尤记他为《两猫争扑落花图》题诗曰：

春为轻寒滞未归，清晨如拭雨霏霏。
落花满地无人扫，欲哄猫儿作蝶飞。

画坛怪杰陈子庄

北京画界曾兴起一阵不小的“陈子庄热”。评论文章屡屡见诸报端，有的称他为“艺坛怪杰”，有的则把他比为“中国的凡·高”。据说北京中国美术馆还出现了万人争看其遗作展的盛况。日前，笔者得到一本《陈子庄画集》，细细品味，深感其画有无穷的魅力。

陈子庄是四川永川人，1913年生，自幼习武，好绘画，勤于读书，青年时代曾做过画纸扇的徒工和肉铺的伙计，开过茶馆，卖过字画。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曾给孔祥熙做过保镖，只三天就辞职了。他还给四川卫戍司令王占绪当过家庭教师，教其子女作画。

陈子庄天资聪颖，醉心于墨海丹青。20世纪30年代，黄宾虹、齐白石等诸师先后到四川，在他们的启迪下，陈的艺术视野大为开拓。他早年的画是很写实的，传统功力深厚。他仿石涛的山水，堪与真迹媲美；学八大山人的花鸟，笔墨亦酷似八大山人。他对汉代石刻下苦功钻研过。抗战时，重庆的许多山崖挖成防空洞，一些东汉年间的摩崖石刻刚被发现即遭毁坏。他得知后冒险抢先拓出，保留下一批珍贵孤本。他出门旅行，每到有古代雕刻之处，如广元千佛崖、夹江千佛崖，彭山、乐山的汉墓砖石雕刻等，总要仔细揣摩，认真地勾画学习，寻找古人雕刻朴茂的风格特色。他从古代金石中受益匪浅，曾有诗云：

自古嘉州名胜地，汉唐石刻见高文。
画师能出诸师外，横绝峨嵋巅上云。

中年以后，陈氏画风有变，开始使用夸张、拟人、变形的手法，不重自然景色之形，而取自然景物之意。他笔下的山川村野、家畜鸟禽，无不具有特殊的美的造型，笔墨不多，却能神游物外，意境高

远，情趣醇厚，有种儿童画的天真幼稚味道。所谓“怪杰”，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陈子庄一生别号颇多，早期作画号兰原；中期号南原、下里巴人、陈风子、十二树梅花主人；晚年则号石壶，喻其画若原始时期之石器，朴拙无华。陈子庄人如其画，胸襟旷达，学养深邃，生前甘居寂寞，不求闻达，知者寥寥，1976年因病逝世。“人去业显”，只是近几年，他的画才逐渐为人所鉴赏，传扬开来。

“老好子”画家汪慎生

京华名国画家汪镇生，为人忠厚正直，为画界著名的“老好子”。

慎生名溶，安徽歙县里东乡满川人，别号“满川村人”，少年失怙恃，从外祖，读书于黄浦私塾。先是加入中华书画会，研究六法，初学山水，虽无师承，但熟览古代名作，精心领会；后遨游雁荡、沧浪、烂柯等诸名胜，画学大进。曾在衢州高小充图画教员，河北第一监狱图画教师兼教诲师，并在厂肆卖画，有时兼作花鸟，颇得美誉，遂专攻花鸟。20世纪40年代被辅仁大学聘为美术导师，屡次举行画展，每次展出，售卖一空，蜚声京华。

慎生昔住北京西单文昌胡同，平日除授课外，余时以家居作画最多，画室颇雅致，写字台上置有小花盆及山水石等物，碧清可爱。作品大部署名“慎生”或“满川汪溶”。

记得慎生曾有两幅画给人印象最深。一幅是两只麻雀栖止于一梅枝上。此画虽然也是于几十分钟内完成的，但其传神之处实无法形容。画上情景似是黄昏时候，两只麻雀历经一日的奔波、劳顿、惊怖、哀怨、愉悦，以及所有挣扎等，一切都成过去，而回归此枝暂作安歇，正如人们所谓刹那之间。它们未必回恋过去，展望将来，而只图现实的安适，哪怕只是能不飞不动地合一合眼睛也好。两鸟各呈睡态，但也未必是真睡。此幅画虽是简单的枯枝与二鸟，但其神韵，令人赞叹不已。

另一幅是画猴。画猴是慎生得意之爱好，正如慎生所说，猴之为物，除人外，可谓万物之灵，但它处处显得十分幼稚。其形态易画，而神情难画，须画出其精明而又幼稚可笑的神态来。如同写《狂人日记》的作者并非狂人，乃能写出如同狂人所写，此写作之成功也。

慎生个性温和谦逊，待人诚恳朴实。他的态度和他的艺术成就成正比，艺术并不因有名声而停止努力，态度亦不因有艺术而傲慢不恭。他的画在琉璃厂各家画店挂出，门庭若市，但好友登门一经恳求，他也毫不推辞，当面一挥而就，甚至问：“行不行？”他于庄重中有随和，于肃静中有生气，因而一般人无论内行外行，都愿与之接近。他有许多朋友，许多弟子，有时少长咸集融会一堂，谈天论画。一“聊”就是半天，因此，窗外大风呼号，室内却暖融融的。

京华来人谈到慎生业已辞世，其公子国棠犹执教于某校。

记王森然老人

王森然字大曼，自号哑公，河北定县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研究院，初在北京几个大学任教，同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诸先生都有交往。多年来从事教育和美术研究工作，著述甚丰。

我在学生时代，就曾读过他的《近代二十家评传》等书，但和他相认，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后来便成了他在北京东城北下洼子住家“杏岩书屋”的常客。他的夫人李藕丹是著名史学家李泰棻的胞妹，他那两间北京旧式宽敞的北房，被院内巨槐遮得不甚明亮，几案上堆满书报和轴画。他热情好客诚挚待人，每承接待，谈锋甚健。他那豁达、乐观，以及在治学上的刻苦顽强精神，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

30年代初，他曾主编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从而结识了许多画家，尤其和齐白石老人最相知。每次拜访，常听他谈起白石老人的轶事来。有一次他去白石家，刚进北京西城跨车胡同齐家大门，见一小孩正在门道里啃烧鸡；又见一小贩手里拿着一张字画正卷起来挎着烧鸡提盒要走。森然好事，叫住小贩一问，才知他是以烧鸡骗去小孩拿着的字画。乃训斥了小贩行为不当，代付了烧鸡钱，把那字画索回，还给了白石老人，假称是从琉璃厂买回的。原来这是白石老人送给爱姬宝珠夫人的，以为被仆妇窃去卖掉，很感激森然为之赎回。森然师事白石老人，书画都学得酷似。他欣赏评价白石作品也独具慧眼，致使老人有“深获我心”之感。白石曾赠森然一副对联云：“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可见他二人相交之深。

王森然与书画名家交游广阔，收藏的名作也多。如齐白石、徐悲鸿、赵望云等名家作品，只他一人所藏，就可以分别举办各家的画展。

森然的女儿王润琴，20世纪30年代和影星王人美、黎莉莉等，同在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到全国各地演出。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们身着短裙，在舞台上辛勤地开辟着中国新歌剧的道路，黎锦晖的创业魄力是令人钦佩的。而王森然则尤为称道黎锦晖为人正派、洁身自爱，在“明月社”里为那些姑娘们视若兄长。

森然老人年长笔者很多，笔者和他相识实属忘年交。岁月不居，分手已近四十载。耳闻他晚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为人民大会堂作巨画多幅，北京电影制片厂还为他拍了纪录片。

壁画名家陆鸿年

近闻陆鸿年现在不仅担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副主席，而且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兼壁画教研组主持人，堪称内地壁画界坐第一把交椅人物。我曩与陆氏友好，时相过从，回溯青年时期种种，记忆犹新。

鸿年祖父是逊清名翰林陆宝忠，外祖父徐甫亦系清代状元，堪称世家。笔者曾承邀去其苏州胡同家中闲谈，得悉陆氏祖传名人字画文玩颇多，除如仇十洲、赵子昂、苏东坡等古代名流真迹外，并有极为罕见的名砚：豆瓣绿形似碧玉的端砚，乳白色端砚，以及“二十八宿”，即砚下面有二十八个形同乳头的“眼”的端砚，均系乾隆时代珍品。据说蓄砚如此，可谓全矣。此外，诸如宝忠老人亲注《李香莲全集》等书的朱笔墨迹很多，当时笔者亦正年轻，曾对陆氏所存徐翁的状元冠帽上所插的金花最感兴趣，久观不忍离去。

鸿年自幼即嗜画，曾在三岁严冬降雪时，用肥皂水在玻璃上画山水，被其封翁瞥见，大加赞赏，称道此儿长大必培养其学画。他果然于中学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美术系。

辅仁大学为鸿年崭露头角之基地，亦为造就鸿年一生事业根基的摇篮。时鸿年对壁画饶有兴趣，校中有白（译音）教授，系奥地利籍，教授壁画。鸿年固有心人也，常于课外独访白氏诚恳求教，白教授为其讲壁画技法，以及西方壁画的制作方法等，鸿年又多方找些中国壁画资料悉心钻研。1936年毕业时，鸿年不但居美术系考试总分之第一名，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垣先生还当众宣布鸿年为本届毕业生之“状元”。

鸿年毕业，即为辅仁留校执教，但他仍利用业余时间去找白教授

学壁画。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曾为北京西郊普照寺画了一张壁画，为鸿年从事壁画的处女作。后来，在辅仁一位专作油漆画的师傅帮助下，利用五合板，上刷桐油白粉，画出高达八尺、宽长二丈有余的《伎乐天》巨幅壁画。板的背面挂夏布涂大漆防腐。此为中国壁画由固定式改为移动式从而走上创新改良途径之肇端。

鸿年在校时，美术系有女生门荣华，系军界闻人门致中之幼女，住家与辅仁仅一墙之隔。鸿年、荣华相识，爱情不断猛晋，结婚之日，喜堂设在“状元府”。两家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允称良配。

末科状元刘春霖的书法

封建社会考状元，书法是极其重要的。1904年甲辰恩正科刘春霖考中了状元，其书法艺术自然是出类拔萃。

刘春霖自幼喜爱书法，少年时便打下深厚的基础，尤其是小楷写得更好。因此，他很早就考中拔贡（拔贡科的考试非常注重书法）。他的小楷清秀挺拔，柔中有刚，浑然一体。

在他考中状元前的几年间，住在北京准备参加科考，通过一位王爷的关系，时常为慈禧太后抄写佛经，得到慈禧太后的赞许和赏赐。考中状元的当年，好友雷雨琴将刘春霖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和《灵飞经》四种小楷墨迹，带到上海石印，印成《小楷字帖》。这四部佛经类小楷，都是刘春霖在中状元前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899～1903）之间，给慈禧太后抄录佛经时的副本。《小楷字帖》一出版问世，即销路颇畅，流传甚广。

在一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有些不法之徒，便私自翻印出售。于是，雷雨琴请求清政府保护出版权益，予以查办。为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农历十二月十一日，专出告示，警告不准翻印。告示中称："据北京职员雷雨琴禀称：窃职存有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殿撰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灵飞经》亲笔四种，于光绪三十年带沪付诸石印，装订成帙，批销发售。与书局订定版权，不准私自代人翻印，诚恐渔利之徒，翻本冒印图利，有碍销售。附呈书样，禀乞备案，布示严禁翻印，以印利权，等据。特此，除批示并予备案外，合行给示谕禁为此示，仰各书坊铺贾人等，一体知悉。尔等毋许私自翻印前项书籍。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予究惩不贷。"

当雷雨琴呈请清政府保护权利时，除将四种小楷字帖送上备案外，还特别强调了每册前第一页有雷雨琴的半身道装肖像，最后一页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以防盗版。

刘春霖后来又出版了《朱买臣传》《洛神赋》《兰亭序》三种小字帖。民国四年（1915），他又将殿试一场考中状元的文章（四道策论作品）重新整理，用工笔小楷写出，付诸石印，成为《殿试帖》。《殿试帖》一出版，销售很快，先后印刷三次。人们之所以抢购《殿试帖》，因为它不仅可作临摹之用，而且还能看到他考中状元时的文章。

刘春霖的书法自此享有盛名，而他却非常谦虚。他时常对人说：“要说正楷书法，还是首推老前辈陆凤老（陆润庠，字凤石，清同治十三年甲戌科状元），行书是以潘龄皋老翰林为佳。”

晚清翰林潘龄皋

1942年清朝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去世后，当年的老翰林、社会名流纷纷前往吊唁，其中就有晚清翰林潘龄皋。

潘龄皋是河北省安新县人，生于1867年，他自幼家贫，但天资聪颖，刻苦好学，1881年考中秀才，1894年考中举人，翌年殿试点为翰林。

在清代，凡举人和翰林都可做官。

潘龄皋在翰林院供职三年后，便派任甘肃隆德任知县，后升为兰州知府、甘肃省巡警道。民国建立之初，又一度出任甘肃省省长。当时，内忧外患，军阀争权，甘肃省内的派系斗争、民族纠纷时有发生，迫使潘龄皋不得不辞职还乡。

1922年，潘龄皋回到家乡安新县赋闲，深居简出，苦攻书法。他的书法，博采众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婿陈瑶圃亦善书法，常得指教，故笔迹极似潘。陈书中堂、对联等，常书潘之名号，加盖潘之印章，一般人实难辨别究竟出自谁手，几可乱真。当时，潘龄皋的一幅中堂，收润资四块银圆。潘龄皋和安新县豪富杨木森过从甚密，1932年杨木森为其父发丧，讣告、铭旌、碑文等一应文墨，多出自潘手，“点主”之仪亦由潘龄皋主笔。潘龄皋的书法，多为行书，圆润、浑厚、隽秀，柔中有刚，自成一体，字形之美与实用相辅相成，尤在平津、冀中颇有名气，不少人进行临摹，许多商号店铺有他书写的匾额，颐和园和团城还有他书写的碑文和楹联。早年，北京、天津还出版过他的十四种字帖，记得其中有《胡大川幻想诗》《长濠诗话》《又一村诗画》等。据说他在书法上与谭延（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齐名，时人有“南谭北潘”之誉。

潘龄皋轻财仗义，乐善好施，为乡里做了许多善事。有一年，安新县东向阳村的白洋淀四门堤决口，良田被淹，房屋倒塌，人民生活极苦。潘龄皋筹募款项，设平局，从东北购进高粱、玉米，在杨木森主办的县堤公会平卖，其运费、耗损均由杨负担。

安新县地处白洋淀，盛产苇席。1925年，安新县乡绅陈起和曲堤村的潘希福等人，经人介绍，赴天律和奉军第一师师长直隶督军李景林秘密商定，强行向安新人民征收席苇税。席民愤怒异常，依恃潘龄皋，痛打了陈起。潘希福闻之惶惶而逃，强收席苇税之阴谋遂告破产。为此，安新百姓自愿捐款建亭立碑，以示纪念，潘龄皋亲书一联并刻木嵌于亭柱之上。联为："赐福不闻宽大令，缔苛犹存好生心。"此联表达出他痛恨苛政、爱惜百姓之心意。此亭至今尚存。

1938年日军占领安新，翌年潘龄皋逃往北京，以鬻字为生。日军诱逼他出任河北省省长，他坚辞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签发委任令，任命潘龄皋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馆还聘请他为馆员，至1954年去世。

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

近代杰出的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艺术生涯已经八十载，据闻他所任职的上海交通大学将举办“朱复戡金石书画展览”以示祝贺。

朱复戡，又名朱义芳，字伦行，号静戡，1900年生于上海。他幼年有神童之誉，四岁能背唐诗三百首，七岁能悬臂写石鼓文，作巨幅临摹画。国画大师吴昌硕见之惊叹不已，称之为“小畏友”。十六岁时，扫叶山房出版的《全国名家印选》，就精选了他的作品。十八岁时，有正书局出版了他的字帖。二十三岁时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了《静戡印集》。

朱复戡博学多才，金石书画、诗词古文、青铜古玉，无所不通。尤其对商甲周铜、秦石汉碑，研究精到，所以他的篆刻高古雅丽，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望其项背。他的国画，独辟蹊径，所作人物、花鸟、山水、禽兽等，以大小篆功的特有线条来表现，具有金石画卷的气质。

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朱复戡的艺术成就推崇备至。当年，张大千寓居上海，拜访的第一位名师就是朱复戡。有一天，张大千在“朵云轩”小店闲逛，偶尔发现署名朱义芳的书法，字体遒劲，神采惊人。细问之下，原来是朱复戡的书法，于是便登门拜谒。谁知，出门相迎的是个西装革履、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张大千说：“我是来拜访朱义芳老先生的。不知他是不是你的老太爷？”朱复戡闻之哈哈大笑，说：“在下就是朱义芳，你找我何事？”张大千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美髯一把，所要拜的名师竟是比自己还小的青年人。但待看了朱复戡当场写的字和挥刀而就的篆刻杰作后，不禁惊叹说：“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融合百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

朱复戡一生好学，到老仍孜孜不倦。他曾数次赴泰山考察经石峪《金刚经》文，纠正了讹传的“唐代刻经”一说，证明是北齐大金石家安道一所作，从而澄清了千年争论不休的史实。他又亲自考证并补全了《秦始皇泰山刻石》之文。还南登峄山，辨明了所有峄山刻石的文字和年代。

李瑞清二三事

清道人，姓李名瑞清，字仲麟，晚号梅花庵主、梅庵先生、玉梅花庵道士。生于1867年，卒于1920年，江西临川（今抚州）人。晚年寓上海之“三牌楼”，易道士装。当代画坛大师张大千、胡小石，均曾投其门下，毕恭毕敬，习书学画。清道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书画家、鉴赏家，又是一位情痴、孝子、末代孤忠之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李瑞清的最高成就是书法。他自幼善书，落笔坚实，尤喜大篆、西汉碑碣，心摹手追，无不精绝，其中以北魏碑体最为闻名。他用笔有一个怪癖，“以浓墨胶笔，务使坚结。临用之时，咬开分许，即以作字”。

恰逢有位李父故交余祚馨颇为赏识李瑞清的才华，有心招他为婿，便拟将长女许配给他，谁料这位闺秀命薄，未婚早逝。不料六女余梅仙乐意代替姐姐出嫁，他们结婚后度过一段甜蜜时光，但三年后梅仙病逝而去。余祚馨老泪纵横，但他视李瑞清如己出，又将第七个女儿玉仙许配给他。当时已是19世纪末，西风东渐，女性开始追求自由，但玉仙愿意以自己的温柔去抚慰李瑞清备受创伤的心，便不顾两个已故姐姐的阴影，决然与李瑞清完婚。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玉仙不久也命归黄泉。

李瑞清揣着一颗破碎的心，把姐妹三人合葬在一起，在草地上栽上梅花，是名“玉梅花庵”，并将自己的字改为“梅痴”。从此，李瑞清没有再娶，他的字号寄寓着他一生的隐痛与哀思。他的《春日元配余梅仙墓下作》和《邓尉看梅悼逝》，表达了他对余氏姐妹尤其是对梅仙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此后，李瑞清把自己的余生都投入到书画艺术创作中去了，技艺日臻完善。

他对南京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不但把当时江南最有规模、最

早创办的新式学堂“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纳入正轨，更以其远见卓识为中国率先创办了第一个独立的美术课系“图画手工科”，使南京人引以为荣，被誉为“首辟两江文化”之功臣。

辛亥革命后不久，李瑞清迁居上海，仍留着满头长发，身着长衫，俨然是个道士，自称“清道人”。清道人患半身手足麻痹之症，其躯体“有同浦柳末秋先陨之态”。在寓居沪上之初，复患脚疾，“股臀间又生一大痈，痛苦不可言”，而一家数十口之生计全赖他一人，经济陷入困境，以至“贫至断炊”，只好日夕劳苦以鬻书画偷活。当时，他曾自嘲“已成为制米机器”。

清道人食量奇大，特别爱吃螃蟹，一餐可吃一百只，朋友们戏称他“李百蟹”。他在上海，最爱到三马路的“小有天饭馆”就餐。他曾应店主之邀，撰有一副闻名沪上的对联：

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

上联，取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而改变其含义，宣传此店每道菜都非凡品。字好意妙，一经张挂，饭馆天天宾客满座，真正成为风味独具的“小有天”了。

清道人与上海震亚书局的朱挹芬有交情，震亚书局在1915年为其出版了《玉梅花庵临古》，瞬即轰动，为海内外书画家所争购，截至当年11月已三次付梓。于是道人之声名大显，以至“儿童走卒，皆知有李道士”。

愈是晚期，清道人的画名、书名越大。东邻扶桑（日本）亦遣人远道来索书画，因此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犹终日抱病挥毫，不知写秃了多少枝笔。他所绘《危岩梅花图》《桃花源图》等杰作，已被公认为是“稀世之国宝”。道人临终前半月，应“日本书画会”之恭请，写了四幅魏碑书作送往日本参展。使人惊愕的是，此四幅展品竟全是临摹

之作。临的分别是郑道昭所书摩崖两幅：《司马景和妻墓志》及《嵩高灵庙碑》。虽是临作，仍轰动彼邦，讴歌载道，誉之为“中岳再世”“近五百年来第一人”。

1920年，贫病交加的李瑞清投水自杀。他的死，与同是民国初年投水自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死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有对旧文化的眷念，对洋文化的抵触和对分崩离析的时局的绝望。他曾对朋友说过：“衣食诚足困人，求赏识于洋人，分余沥于大贾，自非李之愿，乃不得安身之法也。”

“中国第一书法家”郭风惠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投入三十万元巨资出版了郭风惠的书画集，这是书画界的福音。人们只知道，郭氏的书法，被清末状元刘春霖称为“中国第一书法家”；郭氏的画作，可与黄宾虹、齐白石比肩。但是，他的铮铮铁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的历史贡献，却鲜为人知。

1936年，日本预谋侵华，屡屡制造事端，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宋哲元亟须良才辅佐，于是将郭风惠请到身边，授以“少将秘书长”的特殊身份，协助宋处理军政要务。郭与好友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爱国将领，力主对日本的侵略挑衅坚决抵抗。郭风惠鲜明的爱国思想和对时事的精辟见解，给了宋哲元积极的影响。

那时，在北京南苑大阅兵的场地上，以及视察部队的行列中，都留下了郭风惠的身影。为了鼓舞士气，增强斗志，郭风惠将先秦诸子及历代民族志士爱国爱家的言论，辑成语录小册子，从宋哲元、张自忠等将领到一般士兵人手一册，极大地激发了部队为国一战的精神。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将军在保卫二十九军南苑防地时牺牲。在公祭大会上，李宗仁的祭词就是请最熟悉赵将军的郭风惠写的。同时，他还记述过赵登禹将军为保卫军民生命、只身在河畔击毙一只恶虎的事迹。故事写得极简略生动，大有《史记》韵味，是难得的赵将军的逸闻趣事。

之后，日军侵占北京。把郭风惠列入了首要通缉人员名单。他来不及辞别家人，只身逃离北京。先到天津，后乘船出海到黄河入海口，再搭船沿黄河而上，开始了他艰险的流亡漫游生活。

1940年，张自忠将军又在鄂北南瓜店殉国。当时郭风惠正在上

海，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流着泪，用他惊世书法，亲自为张将军写下了两副著名挽联。

第一副有“元戎陷阵，古今曾有几人，漫云季路结缨却为殉城怀阁部”句，还有“处士虚声，辗转空劳三顾敢拟延陵挂剑，勉将直笔叙睢阳”句，公正地评价了张自忠将军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其中“三顾”包含着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张自忠向来敬仰郭风惠的人品学问。1938年，张自忠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多次邀请郭风惠出任秘书长，他再三婉绝，这就是抗战时期张自忠“三顾”郭风惠的美谈。此时，面对壮烈牺牲了的兄弟，他非常悔恨没能应允将军的邀请，没能与将军为民族共同赴难。

第二副挽联，是郭风惠代冯治安将军献出的：

不成功，必成仁，临阵几封书，公私事业均遗我；
国未亡，家未破，凭报一雪涕，生死交情敢负君。

此联，千行血泪，扶棺一哭，天地为之动容。这非有生死交谊，有谁能哭得这样痛切，写得如此动情？

1946年，郭风惠历经两年编著了《宋故上将史略》和《张赵佟将军史略》两部大型史传书。这是研究中国抗战史与研究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四位爱国将领的权威史略之一。

沈尹默学书不易

沈尹默先生是书法界的一代大师，他的字被书法爱好者视为典范，可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实来之不易。

沈尹默二十多岁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杭州，一次，读过他的诗也看过他的字的著名学者陈独秀曾当面对他说：“你的诗写得很好，可你的字不行。说真话，你这字简直其俗在骨。”这些话刺激性太大了，他面红耳赤，几乎难以忍受。从此他下了狠心，一定要练好书法。

沈尹默祖籍浙江湖州，为了在北京考取功名，报了宛平县籍。他的父亲十九岁就在陕西省安康县当了县太爷，被他的治下之民称为“娃娃官”。这位娃娃官又生了沈尹默这个娃娃。五岁时，他父亲就请老师给他启蒙读书，可能是因为年岁太小，读书又太累，竟闹得吐了血，不得不辍学休养。这一下可好了，沈尹默可以选择自己爱看的书了。几年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广为涉猎，而且在诗词方面颇有所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父亲发现这个辍学在家的孩子居然能写诗，而且写得还不错，遂叫他专学诗词，兼练书法。可是，他作诗有长进，而写字却始终不成气候。

沈尹默二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离开陕西到日本留学。但是，学业未获成就，生活更难维持，只好回到故乡湖州。后来他到杭州，与南社诗人刘三等交往。就在那时，他的字受到了批评，于是他发奋练字。

他先是临摹汉碑，字写得很大。因为穷，买不起太多的纸，就先用淡墨写在纸上，并一张张摊在地上，等墨迹干了，再用浓墨写一遍。他又买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读后按照书上的方法去做。他

要求自己写字一定要做到掌竖腕平，每次临帖写字时，都在手腕上放一面小镜子，如果手腕不平，小镜子就会掉下来。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寒暑不辍，他终于苦练出来了。

沈尹默中年以后，眼疾不断加重，医生不准他看书，只准他看字帖，这倒使他心无二用，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了。

有人曾问他，学书法曾拜过谁为师？他说，他没有拜过老师，但他的老师又多得很。他请教于汉魏六朝唐人碑帖，细读宋元明的字帖，走的是杜甫“转益多师是吾师”的道路。可以说，他是陶铸百家、博采众长，经过勤学苦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爱国志士冯公度

位于北京西四羊肉胡同二十四号的大宅院，原本是清廷重臣陆润庠故居；1920年冯公度购置居住，直至1948年逝世前寓此。故居坐北朝南，大门外有影壁、上马石和石狮。院落五进，东部前为花园，中为祠堂，后为菜地，西北角是马号。原有房屋一百三十余间，现大门已拆除，花园、菜地、马号均已建房，唯有祠堂院保存较好，尚可供凭吊者捕捉昔日辉煌身影。

冯公度（1867～1948），名恕，号华农，又因购得乾隆“自得图”匾而自称自得图主人。原籍浙江慈溪，寄籍今北京大兴。在载洵任海军都统时，曾任海军部参事、海军部军枢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职，曾随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民国后在家从事文物收藏和鉴赏工作。

北京诸多老字号匾额，多系冯恕所书，故流传有“无匾不恕”之说法。而冯公度本人最满意者，是为大栅栏张一元茶庄和西四同和居饭庄所书匾额。冯公度除写匾外，更常书楹联、中堂和墓志铭。其作品以书颜体字著称。他曾在《公度自挽诗》中写道：

贷赊质济平生耻，艰苦辛勤志不灰。
假馆课徒供菽水，骈文小札佐监梅。
扇联书罢饥寒减，谀墓文成布粟来。
堪叹哀亲共劳瘁，追思往事有余哀。

其生计窘迫时的满腹哀愁与无奈，尽情倾诉于诗中。

冯公度是一位热心兴办实业、情意拳拳的爱国志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独霸北京电业，纷纷申请在北京办电

厂。而面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刑部员外郎史履晋、御史蒋史惺、候补同知冯公度，在“挽中国之利权，杜外人之觊觎”的宗旨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呈文，奏请清廷批准成立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并特别注明“华商”二字，旨在不收一份官股，不借一文外债。公司创办时成立董事会，冯公度等三人为总办，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陈绍安和荷兰人万阿松任工程师，吸收股本总额共四百五十万银圆，在西城顺城街（今前门西大街北京供电局院内）设立电厂，于1906年开始发电，从而使北京居民告别了油灯或蜡烛，诸多老街亦安上路灯，迎来了光明。

冯公度酷爱收藏文物，正如他在诗中所云：

平生奢好为金石，钟鼎圭璋四壁阵。
山脚水湄通燥润，花文篆体辨精神。
时猜虞夏商周汉，浸别铜铅血汞鳞。
共羡兰闺双白壁，居今稽古养天真。

冯公度毕生收藏文物甚富，且不乏稀世珍宝，其中有周公旦赤刀、召公发箍、毛公鼎、秦穆公敦、克鼎、虢季子白盘等青铜器，以及古玉、石屏、金文砚和古籍《四部丛刊》《佩文韵府》《二十四史》、金石书籍等。

枫桥“双绝”两张继

唐朝诗人张继是千古绝唱《枫桥夜泊》一诗的作者；民国时的张继是同盟会元老，也是书法家。但由于同名同姓，曾被人张冠李戴。“二次革命”后，张继被袁世凯列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不得已亡命日本。有一次，有位日本文人对张继当面恭维，说他写的那首《枫桥夜泊》诗如何如何好，实在令人钦佩。张继付诸一笑，答道，承蒙夸奖，但鄙人不敢掠美；须知先后两张继，相差数千年，岂能混为一谈。那位日本文人赧然而去。

现代人张继，字溥泉，1902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后投身反清革命，历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中执委、立法院副院长、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国史馆馆长等职。尝主笔《国民日报》，与章炳麟、章士钊、邹容结为异姓兄弟，张居第三，人戏称之为“三将军”。这位“三将军”不仅文章犀利，书法亦佳，书风多章草笔意，行笔稳健，为时人所重。当时南京煦园主事者因酷爱唐诗《枫桥夜泊》，突生奇想：何不请与诗人同名的当代书家张继迻录此诗，泐石于园内，为园林生辉？遂托人转恳求书。张继欣然诺之，精心书成。不久，煦园有块两张继诗书合璧碑之佳话遂流传开来。

那时，名满天下的大书画家吴湖帆得知此事后认为，南京煦园与《枫桥夜泊》诗并无因缘，却占先勒石立碑。而苏州的寒山寺，本为诗中所咏故刹，虽说寺中历代也曾立有《枫桥夜泊》诗碑，但倘若由当代张继来书写并立碑，岂不锦上添花？遂挽濮一尘介绍张继书之。此事既由吴湖帆出面玉成，张继十分慎重，书写时格外认真。

中央书店1949年版《书法大成》和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书法》均收有张溥泉这幅佳作的影印件，其书风系章草略带今草笔意，结字美观，间架稳健，几乎每一个字都不存在一笔带过的痕

迹，也极少见“牵丝”和“飞白”；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其行笔较为缓慢。作品中正文占了五行，略小些字的题跋占了七行，虽字数、行数不算少，但布局疏密合理，既不松散、单薄，也不繁杂、拥挤。字的大小配备与整体章法都显得很匀称、和谐。在题跋中，张继出人意料地告诉人们，他从未到过苏州寒山寺。“往来吴门，迄未一游。”他在说明此事乃吴湖帆的美意后，谦虚地表示，自己只因同名同姓而“妄袭诗人也”。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印章为白文。

令人遗憾的是，张继书成此诗后，第二天突然发病逝世。此幅作品遂成书家的绝笔，作品勒石后，果然声名鹊起，中国许多名胜古迹都有以诗、书、画合称的“三绝碑”。苏州寒山寺的这块《枫桥夜泊》诗碑，称之为诗、书“双绝”亦可。而且因诗人、书家同名同姓，虽然书家未能亲身登临寒山寺，但以其作品登临，也算雄峙胜迹了。

章草名家王世镗

20世纪30年代，有“草圣”誉称的于右任极其称赞章草名书家王世镗，为弘扬民族文化留下了一段动人佳话。

章草即草隶，它流行于两汉魏晋，代表书家有汉代张芝、晋代索靖等；但后来少有问津者，到元明清代方有不多章草书家；生于清末的王世镗堪称集前人之大成者。

王世镗，天津人，曾应试科举。他少年习书便入手不凡，喜临摹龙门石刻；后壮行名山大川，神游历代法书，得见不少汉魏晋碑刻、摩崖、简牍，眼界大开，又从文字学入手，钻研文字及书法史、论、著。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不觉老之将至，遂发愤订正前人的托王右军《草诀歌》错误，将搜集的二十余种古代法帖中的章草、今草约一千五百余字加以注释（注释由汉中九位书家用楷、行、隶三种书体写成）编成韵语，内容系探讨字体演变及书法艺术，取名《稿诀》（又名《稿诀集字》）。1928年，《稿诀》被刻石嵌于陕西汉中宝峰山道院墙壁间，遂有拓本问世。

当时有书商卓某见有利可图，遂将《稿诀》拓本上“云津王世镗著”署名抹去，伪托明代人所书，付印高价出售。王世镗有口难辩，反而惹出一场风波。著名学者余绍宋、北京艺专书法教师罗复堪等人认为，《稿诀》是据明代“不着书者姓氏”的拓本改易而成，“颇疑王氏藏有旧拓，知其鲜传，故所以为蓝本，略补小注并及近世人证其为己作耳”。专家学者并非和王氏作对，而是认为《稿诀》虽系“百衲本”，来源广、集字多，但全篇风格统一，书写既佳，又学养深厚，格调高古，使人不敢相信系今人所著（确切地说，应为“编著”，但那时尚未广泛使用“编著”一词）。正如于右任后来为此笔墨官司所下结论：“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古薄今人。”一时间，世人都笑王世镗“掩毁名

字，剽窃宝藏”。王氏穷困潦倒，困居南郑县莲花池，以卖字、养蜂为生。

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购得《稿诀》印本，经过仔细考证，确认不是古人所作。恰逢于的外甥周伯敏来访，将实情禀报，《稿诀》系周的叔岳父王世镗所作，此人正蒙辱困居汉中。于右任大为惊诧，发表了权威性见解，认为王世镗可比之古代章草名书家张芝、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今世乃有如此奇才，埋没穷山，实国人之羞”。于右任遂致书驻陕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托其将王世镗请到南京。王氏由其子陪同抵宁，于右任相见恨晚，尽出自藏古今法书精品供其参阅；又授其监察院参事之职。王世镗喜遇良机，书艺猛进，又写了《重定章草之诀歌》等，并为于右任书《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有人劝王氏对卓某毁名盗印一案提请诉讼。王笑曰：“此斯文事，奈何对簿公堂；且如无此印本，我亦无缘得会于先生。”这一离奇的“章草案”遂无形化解。两年后，王氏病逝。于右任为其料理后事，葬于南京牛首山麓，与大书法家李梅庵（清道人）之墓为邻。

抄校巨擘张宗祥

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
忘餐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

这是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画家张宗祥对自己抄校古籍生涯的真实写照。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别号冷僧，浙江省海宁县人，清光绪举人。

张宗祥幼年病足体弱，人以为将成废疾（痹症），经过服中药和针灸，十一岁才能舍杖步行。自小观看外祖父沈韵楼写字，因此，少时就对书法发生兴趣。十岁临颜真卿《多宝塔碑》，后又临《颜家庙》，并参临小楷《麻姑仙坛记》。十三岁那年，正遇甲午海战，清海军溃败，张宗祥读了《普天忠愤集》一书，痛恨清朝政治腐败，内外交困。于是拼命读书，每月必有六七夜读到天明，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与同乡学友蒋百里一起去双山书院读书，每借到一本书，相约务必当天读完，互相考问，谁答不上，就罚谁停止看书一个时辰。

张宗祥二十二岁时，得旧拓《淳化阁帖》，开始学习行草。三十一岁，改习李北海《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法华寺碑》，恣意临写，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家。他的字，青年时整齐有力，中年后潇洒飘逸，晚年则苍劲有气魄，笔力所到之处，犹如秋风扫落叶。所以大文豪茅盾曾说：“张宗祥先生汉学好，字好，画好。字好极了！”

张宗祥的汉学好、字好，这就使他终于成为一代抄校古籍的巨

擘。1914年，张宗祥与鲁迅（周树人）在北京教育部共事。第二年，张宗祥出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主任。一天，周树人对张宗祥说："我看馆中有十二卷本白棉纸的明代抄本《说郛》和丛书堂本《嵇康集》，可惜内容不详，你是'圣手'，何不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我也急需。"张宗祥答应用两个月交卷。这时，张宗祥抄书速度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他用毛笔小楷日抄一万五六千字，最多时日抄二万四千字。友人的信任和学术界对古籍资料的需求，使张宗祥立志"时欲抄校古书籍，毕一生之业"，并作联"分明去日如奔马，收拾余年作蠹鱼"，他还刻有"著书不如抄书"一印。他三十二岁时，"点读二十四史毕"。三十五岁，校《资治通鉴》。直到他六十七岁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之职时，从公之暇仍忙于整理抄校古籍《国榷》《全宋诗话》《神农本草经》和三次写定《校注论衡》。

年逾七十高龄，他还自认为抄书乃"年七十以上万不可缓之事"，故仍然"夏日挥汗，隆冬呵手，朱墨粉陈，未敢稍辍"。他的小女儿在旁，时加劝阻，或故报有事有客，以冀老人略得片刻休息。张先生八十四岁，身患不治之症，在"咳嗽痰中带血，背痛加剧，夜不能寐"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完成《明文海》的抄校。《明文海》是张宗祥一生抄校的最后一部巨书，共四百八十二卷。

津门书法大家华世奎

近代，天津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推华世奎、严修、孟广慧、赵元礼。其中，华世奎位列榜首。一方面是华的书法造诣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华曾任八旗官学教习，是清朝赏加二品顶戴的大臣，可谓官高爵显。

华世奎出身旧盐商家庭，四岁开始接受家塾启蒙教育。

每天坚持练字不辍，其父要求甚严，偶见稍有懈怠，就拿烟袋锅往脑袋上敲。为了纠正执笔姿势，其父独出心裁地在他的笔杆上放一枚铜钱，只要笔杆稍有倾斜，铜钱就会掉落下来。据说，华到后来可在笔杆上放十个铜钱，仍能运笔自如，可见功力之深。

华终成书法大家。宣统退位，华脱离官场返回天津靠卖字为生。其中为天津劝业场题写匾额一事，最值一提。民国十七年（1928）天津劝业场建成，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找华求写牌匾。按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账房管事谈妥润格即可，华从不见求字的客人。

但是高星桥派来的“使者”却走进了华的书房，简明扼要地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寸以后，遂叫人端来三百块现洋，客气地说：“区区润金，不成敬意。”华淡然一笑，颔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当时，还没有影印、照排、放大的技术。主家要多大的字，书家就得写多大，像劝业场牌匾属于“榜书”。写榜书是非常见功力的，不好写。事隔几天，华刚把牌匾写好，那位“使者”又送来二百现洋，面带难色地告诉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劳烦先生在“劝业场”前再加上“天津”二字。华听了心里很是不悦，吩咐仆人当即铺纸研墨，挥笔写就“天津”二字。

华世奎还有两件轶事颇值一提。他任内阁中书行走时，与翰林徐世昌同拜在户部尚书祁世长门下。祁晚年得一子，十分喜爱，曾托华、徐日后照料。1930年祁“幼子”贫困潦倒，特从家乡来天津求助。华感念师情，赠其二百块现洋，又亲自去徐家代其求助。可徐对华说：“你近来卖字日进斗金，我的字赚钱不多。这样吧，我照你的数减赠一半。”事后华以此对后人谕讽徐世昌：“你们可要好好地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都强！”因为徐世昌曾任民国大总统。

华虽系清室旧臣，但很讲气节。他与罗振玉私交甚深，罗曾劝他辅佐溥仪。他讲：“现在的皇上是满洲的皇上，不是大清的皇上，他穿西服，勾结日本人，背叛祖宗。我是大清的臣，绝不背叛先朝与其同流合污。”看来，他不像袁世凯、徐世昌那样野心勃勃，也不像郑孝胥、罗振玉认贼作父，投靠日本人。纵观他一生，其人性品格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道的。

邓散木其人其事

邓散木，名士杰，号粪翁、一足等，散木是其字，上海人。他在二十多岁时，就以书法、篆刻崛起于沪上艺坛。因此，有人称他是“天才”，但他的天才是勤奋和刻苦才得以充分发挥的。

邓散木小时候原是学外文的，十二岁时考进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华童公学。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可以公费去英国留学。但在十六岁那年，有次他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英文作文，英国教师硬说不是他写的，争辩当中，还打了他。因此，他把英文书全部烧掉，回到家中便埋头钻研中文和书法。

当时，邓散木的父亲是上海会审公廨的一位文书，家境并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买字帖。他就天天对着客厅里的四条屏学字，练了半年光景，写得很像了，他父亲就带他去拜见这四条屏的书写人——他父亲的同事李肃之，得到李肃之的直接指点。李肃之去世后，他便于十九岁那年，进入会审公廨继承了李肃之的职位。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一天也能写到六七千字，虽不及李先生那么快，但在公廨中，也算是唯一的快手了。”而且，在工作之余，他每天在家里还要临摹几个小时的帖，总是未明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临摹至日出方进早餐。下班回到家里还要写上一段时间。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到老。

邓散木正是以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努力，使他的天资得到充分地发挥。不只是书法，在篆刻方面也是如此。他是三十三岁才从赵古泥学篆刻的，在此之前，全靠自学。他每天总要刻几十方印，每刻一印，都先要认真地在纸上描好印样，然后翻到印面再刻。刻一次不满意，就磨掉再刻，有时反复多次，从不草草了事。

邓散木给自己的书斋题写了一块匾额："三长两短之斋"，这是他对自己艺术的自我评价，即篆刻、写诗、书法是"三长"；绘画、填词是"两短"。他自己说过："世人但知我长于书法，其实我的篆刻和写诗都比书法好。"

邓散木的篆刻作品，不是从一字、一印入手，而是着眼于整体，注意气势和意境，所以每方印的整体感都很强，气势很大。他一生累积数本印谱，五千多方印拓，在雄浑朴厚、大气磅礴的整体风格下，每方印又都有不同的风貌。即使所刻的同一个十数方名章，其章法刀法，亦各不雷同。他不光注意印面文字，对边款也很下功夫，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都可刻入边款。偶一遣兴，他刻的造像、肖形，也都神完意足，饶有风趣。

邓散木的诗，也和他的性格一样，豪气纵横、奔放纯真，出手很快。他能把龚自珍的一句近体诗对成五十联；在三杯下肚，略带几分醉意的时候，文思更加敏捷，往往落笔成章，才华横溢。他一生留下诗篇达五百多首。

邓散木自谦的"两短"——绘画、填词，是与"长"相对而言的"短"，偶然遣兴，也还是颇有意趣的。

1934年，邓散木的书法篆刻展览在上海举行。章士钊先生参观后写了一封信给《晶报》编辑，说到"今日得览粪翁所设各体书法，并皆精妙。粪翁弟不知何许人，亦未闻有人道及，今世有此书法之畸士，而名誉不闻，似是读书人之公耻"，并附了一首赠给粪翁的诗：

粪翁鼻头着何粪？却惹荀令三年香。
偶尔龙蛇一挥洒，高堂素壁生奇光。
平生论书先人品，汀州嘉兴斯道强。
畸人畸行作畸字，矢溺有道其废庄。

据《辞海》解释，畸，通奇；畸人者，不合于世俗之异人也。故章士钊所说的“畸人畸行”，大概是指邓散木的“粪翁”之号及某些行为有些“怪”。

确实，邓散木为了表示其愤世嫉俗，使用了一般人不会使用的名字——粪翁。邓原名铁，字纯铁，自从书刻有了些名气，社会上相效改名用“铁”的一下子冒出了好些，他厌烦不过，干脆来了个“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从三十岁后便易名“粪翁”，并名居室为“厕简楼”，自号“厕简子”。改用了这个名字后，果然无人再愿效尤了。

其实，“粪”字，取的是“粪除”的意思，也就是“涤荡瑕秽”，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但社会上总认为粪是秽物，用以署名，似不太雅。邓散木的二女儿讲过当年这么一件趣事：有次一位求字者，先是当面称赞一番，然后声明润笔从丰，只要求改个署名，不用“粪翁”。邓散木当即拍桌子大骂，此人还不识相，仍哓哓不休，邓散木只好很不客气地把他逐出门外。

说到“怪”，邓散木的确有些怪脾气，怪行径。但这些“怪”的背后，有着他对封建社会的蔑视，有着他对崇洋媚外的抗议，更有着他对时政时弊的深切不满。1943年2月，日伪方面指定邓和白蕉及当时上海的另一位名家出席所谓“自由文化协会”，并作为发言人之一。邓接到请帖后随即当场撕毁，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是大快人心的。

还有，邓散木结婚时，不雇轿，不点花烛，不收贺礼，不摆筵席，只是给知己的朋友发了一张十分简单的明信片，并写明“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等语。

对于当年的执政不满，邓将满肚子的牢骚表现在行动中，所以也被人目为“怪”。1935年在南京开个人作品展览时，他结识了大画家徐悲鸿，两人一起到酒楼痛饮，一边喝，一边骂执政府腐败，两人越谈越喝越有兴致，越骂越上劲，竟把邻座的顾客都吓跑了。

邓散木有着鲜明的爱憎，这爱憎，时时处处流露出来，可能这也使人觉得他有些“怪”。这里引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首政治讽刺诗，题为《恭题孔老夫子像》：

镜中忽见便便像，高额乌须地阁丰。
行政有方宜姓孔，卖官无爵不须铜。
奴家天下三分定，裙带财神五路通。
天怒人怨谁管得，阿翁惯技是装聋。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孔老夫子乃当时独夫民贼之姻亲也。邓散木敢于在报刊上公开指责，其胆量是够大的，可敬可佩。

书坛巨擘沙孟海

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画坛一代巨匠沙孟海长眠在杭州西子湖畔，走完了九十二年的人生历程。

沙孟海祖籍浙江鄞县大咸乡沙村，父亲为村中儒医。他在家行大，兄弟五个，以“文”字排行，他原名文瀚，又名文若，二弟文求，三弟文舒，四弟文威，五弟文度。五四运动后，他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

为了照顾家庭生活，他中师毕业即到宁波一富商家当家庭教师，时称“坐馆”。他一面“坐馆”，一面刻苦自学，从而在国学与书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在书法上，他先学王羲之，后学倪云林、黄石斋、沈寐叟，终于独出机杼，自成一家。

后来，他离家至沪，到上海钱庄中学任教。由此，得以结识康有为、吴昌硕、章太炎、章士钊、马一浮、沈尹默、徐悲鸿这样一些文化名人，尤其是吴昌硕，为他作诗题字，对他的书法十分赞赏。民国十七年（1928），他发表《近三百年的书法》《印学概论》等专著，被学术界认为是书法和治印领域的扛鼎之作。一年后，他辗转到广东，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时年尚不满三十岁。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设立侍从室。在侍从室供职的陈布雷赏识沙孟海，引荐其亦入侍从室，为蒋代笔一般应酬文字。空闲之余，对书法篆刻旁及文字、考古和古代史等作进一步研究，以至博古通今，成为大家。

沙孟海虽身居要津，但平时深居简出，与政要不相往还，对时局知之甚微。在南京时，有一次亲友问他：“最近行政院长张群说了些什么？”他竟不知就里地回答说：“张群是干什么的？我不认识他。”对

方听后，遂瞠目以对，大失所望。

20世纪50年代初，他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被委任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不久，兼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开创历史陈列法，主要著作有《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但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书法，无论篆隶楷草，都精美绝伦，尤以行书独步书坛，其篆刻更驰名海内外，所著《印学史》《兰沙馆印式》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70年代末，年届八旬的他担任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又在浙江美术学院重开书法课，带研究生，教留学生。他所著《沙孟海写书谱》《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论书业稿》等饮誉海内，流播海外；即使到了九旬高龄，每天仍坚持伏案治学，不稍松懈。

1992年4月，浙江鄞县东钱湖畔，沙孟海书学院正式成立，学院镌刻的《颂词》曰：

一代宗师，书坛独步。
笔聚五湖浩气，书开一代雄风。
道德文章第一流，书名赫奕冠时俦。
毫端凝聚大江风，蕴借沉雄起势宏。

就在沙孟海书学院成立的当天，他不幸骨折倒地，虽经半年抢救，但仍于当年10月与世长辞。

回忆高二适

无焰残灯照楚骚，暗惊心迹上秋毫。
行文涩似填驴卷，求纸珍逾拾凤毛。
难得故人遥念我，了知退笔不辞劳。
客来倘问临池兴，唯望书家噪一高。

这是章士钊先生奉酬高二适先生的一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章士钊对高二适真挚深厚的情感和对高二适人品、学识、书艺的高度评价。

高二适，名锡黄，号舒凫，江苏东台人，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他十八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文笔过人，称道乡里。青年时代曾在上海读书，中年寓居南京城东三条巷六合里，刻苦自励，专治古典诗词及文字学，与陈树人、马一浮、于右任等名士唱酬甚密。

高二适一生治学勤奋严谨，潜心著作，他研究的章草力作《新定急救章及其考证》一书是他从1959年起广搜注本，详密细察，矫正历代所传诸本的讹误，历经十载寒暑完成的，为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学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他对唐朝的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的研究至精至深。诗作入典出新，书卷气浓厚。他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著成《刘萝客文集校录》，章士钊看后惊叹不已，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黯长岁又年，弥深企望。”

1965年在《兰亭序》真伪论辩中，高二适独持己见，对郭沫若的“后世依托”之论表示异议，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毛泽东看后，分别致函章士钊和郭沫若，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说：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真、行、草墓石，草书不曾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高二适文章于1965年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同年7月的《文物》杂志也全文影印其手迹。

高二适在世时，平日只闭门读书，拒绝庸俗的笔墨应酬和拜访。曾有人登门拜访恭维高老是大书家，高老却说：“书家多得很，我非书家，你找错了吧。”高老书法流传甚少，并非他写得少，而是练字时写完一面，反过来再写，然后揉成一团扔掉。高老写字极少应酬之作，碰上老人烦了，不管你是什么显贵要人，用拐棍一指，开了旁门要你请出，否则，就要挨骂了。

高二适逝世近二十年了，他一生为人耿介爽直，磊落坦荡，真诚热忱。随着时间的推移，高二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认识和重视。

女书法家萧娴

近见北京出版的《萧娴书法选》，方知这位中国近代卓越的女书法家仍在笔走龙蛇。

萧娴字稚秋，号蜕阁，又号枕琴室主，1902年生于贵阳。其父肖钱珊是南社成员，诗书俱佳。萧娴幼年经常随父出入南社，人称“南社小友”。平时，为父亲拂纸磨墨，处处留心书法，暗中摹习。一次其父作书于案，适因事外出，萧娴一时兴起，便摹仿父亲笔意书写一幅，其父归来，大为惊异，要她当面再写，始发现女儿才华，从此对她加意培养。

萧娴正式习书，涉猎唐碑，转习汉魏，更及金文石鼓，打下了坚实基础。十三岁时，曾为广州大新百货公司落成典礼书“大好河山，四有兆众；新辟世界，十二重楼”丈二匹对联，被誉为“粤海神童”。两年后，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为筹款劳军，宋庆龄邀集当地名家举行书画义卖，萧娴亦应邀出席，她的作品销售一空。有一条屏，为好事者争购，出价从十六元大洋起，不断加码，最后为一知名人士以一百元大洋购去。宋庆龄亲授萧娴以奖状和奖章。

后来，萧娴临写的“散氏盘”铭文，被其父的一位朋友拿走，辗转传到南海康有为手里，南海当即作诗曰：

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
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乩坛。

投桃报李，萧娴也写了“大哉南海，撮尔须弥”的榜书楹联相赠。这一老一少，书信往来多年之后，才在上海愚园路南海寓所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当时有许多书画界人士参加祝贺，其中先到康氏门墙

的书画家刘海粟也在场。

1932年，萧娴篆书《临碣石颂》，曾集刊于《当代名人书林》，一时蜚声南国。

“七七”事变后，日寇逼近南京，萧娴一家准备西走。临行时，一位朋友来做说客：“你的书法在日本有影响，日本人来了是不会亏待你的。”她说：“我们不愿当顺民。”随后便携儿带女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为了生计，她还得卖字，于是作两首《鬻字自例》诗，其一：“一枝笔走三千里，八口家余四壁风。显得千缗易尺楮，墨池便许放鹅笼。”其二：“早年托迹在碑林，翰墨生涯本素心。汉白元朱酬凤好，只须一字一千金。”

萧娴逃到重庆后，看中了一方砚台，终于凑钱买了下来。把玩之余，作了一首诗刻其上。序言是：“避寇流离来渝州，身外物已佚尽，友好每向予索书，因购此砚，发墨可喜，赋诗刻砚样以志墨缘。”诗是这样写的：

顽性真如石，生涯却是田。
此心坚自守，应不怕磨穿。

作为知名人士，社会各界都十分关心她。“那个女书法家怎样啦？”她不能一一作答，只好写了一首七律传递给关心她的朋友们：

连天烽火孕时艰，七载流亡幸健顽。
寄予故人休系念，萧娴仍旧是萧娴。

在书法事业上，萧娴是极笃实用功的人，平生与“三石”（即“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结下了不解之缘，故人称“三石之家”。此外，她又曾着意揣摩过“散氏盘”的笔意，论者对其书法渊源，又有“三石一盘”之说。

戎马墨海忆舒同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禄。1905年生于江西东乡县。他五岁即已开始习书法，至十四岁已有善书之誉。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后，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曾一度以鬻书为业。1930年开始戎马生涯，但即使在军务倥偬之际，仍潜心书艺。他利用书写告示和标语口号等机会练习书法；行军路上，在马背上比画；途中小憩，在膝盖上练字。因此，曾被毛主席调侃为“马背上的书法家”。

在舒同心目中，枪炮是武器，书法亦是武器。笔者尝见他解放战争时期写的一副中堂。当时他任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将领郝鹏举倒戈起义，把国民党部队改编成了革命军队。在改编的过程中，舒与郝有很多交往，向他晓以大义，指明方向，特以诗书相赠。诗云：“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杂向弩中生。静如油漆轻轻抹，动似蛇龙节节衔。”整幅作品气势恢宏、遒劲俊迈，运笔纯熟，跌宕如屋漏痕、如折钗股，结体揖让顾盼、生动有致。应该说，在特定的时期，书法起到了枪炮所起不到的作用。

综观舒同的书法，原从“二王”入手，继以颜、柳为本，掺之以米南宫、何绍基诸家结构而自成一家。所作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沉重，藏头护尾，点画润厚流畅，别具风格，被称为“舒体”。

舒同尤以善写大字闻名，对求题匾额巨字者，他绝不采取小字放大办法，而是需要多大就写多大。这一点，在当今书坛极少有人能做到。1962年，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推荐舒同为“全国农业展览馆”题匾，据说每个字有乒乓球台那么大，写了一张又一张，直到满意为止。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成立，时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舒同

被推选为第一届书协主席。从此，别具一格的“舒体”便更广泛地出现在全国各地。至今，有许多报纸、刊物都保留了他题写的报头刊名。由于各地求教求书者太多，为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要求，他专门书写了楷、行、草三部字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舒同一生清廉，淡泊明志。除在20世纪20年代因从事地下斗争需要出售过自己的作品外，一直不曾卖字。但在他去世前，他曾为自己的书法作品而走上公堂，状告北京荣宝斋未经许可擅自出售他的书作。他在诉状中称：1986年4月，荣宝斋以陈列为由从原告处借走十五幅作品，并立下字据，后荣宝斋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擅自将其中一幅“虎虎生辉”售出，余下的十四幅作品至今不曾交还，云云。

吴昌硕与西泠印社

在西湖西泠印社小龙泓洞的岩壁上，凿龛立有一尊艺术大师吴昌硕的铜像，而在铜像东侧的规印崖上，建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中式平房，依山取势，古朴典雅。这便是吴昌硕在杭州的居所“题襟馆”。吴昌硕每次到西湖，都住在馆中，他曾说：“居于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骈罗于胸中。”可见他对西泠印社的感情。

在“题襟馆”，吴昌硕吟诗作画，撰书治印，每每佳品迭出，如画有《西泠印社图》，写有《西泠印社记》《隐闲楼记》等。他的诗，取法唐宋诸家，清新淳朴，旷逸纵横；他的画，初法“四王”，后得石涛、八大山人、老莲之风，融会贯通，独开大写意花卉的门径；他的书法，初师颜真卿，后法王羲之，并熔秦篆汉隶石鼓于一炉，自成宗派；他的篆刻，初师浙派，后融皖派，取诸家之长，古朴苍劲，虚实相生，把数百年的印学推向到新的高峰。

故而于右任有一联赞曰：“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在西泠印社成立期间，有一名叫河井仙郎的日本人，向吴昌硕写信求教，信中夹着篆刻作品，吴昌硕看出这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日本篆刻家，他欣然命笔，表示愿与国外同行会晤，探讨艺术。

过后不久，河井仙郎果然与出版过《吴昌硕画存》的田中庆太郎一起来到杭州，拜会吴昌硕。他像小学生拜见老师似的，叩头执弟子礼，说着刚刚学会的中国话：“你老人家好！”吴昌硕忙说：“快坐下！同行三分亲，见面是朋友。”“先生书、画、印，无不兼能并擅，今日得见，大慰平生！”从此，河井仙郎经常讨教于吴昌硕，或摩挲金石，品评印谱；或谈书论画，各抒己见。

经吴昌硕的介绍，河井仙郎广交印人，与著名篆刻家丁仁、王禔、叶为铭、吴隐等人交往频繁，意趣款洽。河井仙郎回国时曾向吴昌硕告别，吴捧出自己的作品相赠。河井仙郎热泪盈眶，久久地叩头。他恋恋不舍地走出门口时，忽听吴昌硕又叫着：“回来！把一盒西湖藕粉也带上！”“先生，你自己留着吃吧。”“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藕断丝连，这藕粉你一定得带回日本去。”“是，学生从命。”后来，河井仙郎治印艺术大进，创立了浑厚清超的艺术风格，成为日本杰出的印学家。

1921年秋，他七十七岁，原藏在浙江余姚周家的一块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汉碑《三老讳字忌日碑》，被人辗转卖到上海，落入日本人之手。这块碑是东汉建武年间的遗物，是浙江仅有的两块汉碑之一（另一块是《跳山丈吉买山地记》），很有历史价值。吴昌硕得知消息，就发动西泠印社社友募集八千元巨款，把它赎了回来。现此碑珍藏在专为它而造的“汉三老石室”里。

张樾丞及其“同古堂”

在北京的琉璃厂，有一家图章墨盒刻字店，名叫“同古堂”。其创始人张樾丞，是驰名的篆刻大师。新中国成立时，第一枚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镌刻的。

1881年张樾丞出生于河北新河县。幼时家境贫寒，十四岁便徒步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不打牌，唯喜看书和钻研技艺。在他十八岁那年的一天，有位顾客领取印章后，对质量颇为不满，提出了难度很高的字样要求。正在店主和各位师傅面露难色、双方僵持不下时，他挺身而出，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捏一把冷汗。过后，他不慌不忙地刻了起来，并按时把刻好的印章送到顾客府中，那顾客对印章非常满意。从此人们便对他另眼相看，店主破格让他提前出师。

张樾丞出师后，在“来熏阁”租了一柜台，开始了自己的刻字生涯。他所以选中“来熏阁”，主要是看上了此处规模大、收藏广的特点。他白天刻章，晚上看书练字，而且常与一些文人墨客交往，从而使他在学识和技艺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其印作独具慧心，遒劲有度，慕名前来刻印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藻玉堂”店主请他为梁启超刻印章，他用尽平生绝技，刻制了梁启超亲笔书写的“龙飞虎卧”四个大字。梁启超看后倍加赞赏，此章成了他的成名之作，被内行人称之为“铁书银钩”。

1912年，张樾丞自己在西琉璃厂开了一处图章墨盒店，有门脸三间。谈到店的名称，还得从张樾丞的一次奇遇说起。原来，张樾丞有一个收藏文物的爱好，每天早上都要到“鬼市”去遛上一遭。有一天，他在地摊上见到一个生满铜锈、布满黑泥的旧铜盒状、似脸盆又不是脸盆的铜盆。虽不清楚做什么用，但总觉得有些来头，便决定买下

来。张樾丞知道，你越是想买的东西，越要装作漫不经心，否则，摊主见你特别重视，非得坑你一把不可。于是，他把铜盆随手扔在一边，然后找了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琢磨起来。小贩见他喜欢，使开始漫天要价，张樾丞和他争了一会儿，顺口说道："好吧，不争了，谁让我喜欢呢？不过，你得把那个破脸盆搭给我，拿回去喂鸡用。"小贩一看占了便宜，就顺口说了声"拿去吧"。

张樾丞回到家，里里外外一清洗，铜盆终于露出真面目。只见其四周刻满凹凸不平的文字，兼有图腾花纹，原来是一绝世珍宝——汉代铜鼓。他惊喜万分，决定借其谐音，给自己的图章墨盒店起名为"同古堂"。

同古堂主要是刻制印章和铜墨盒，兼营字画古玩。由于技艺超群，引来许多名人要人常在此谈古论今、切磋技艺。蔡元培、胡适、徐世昌、段祺瑞、康有为等都曾至此一游。清逊帝溥仪听说后，下诏令其刻制了"宣统御笔""宣统之宝"等御玺，后来均成为传世之作。

刘淑度篆刻成名

刘淑度这个名字，也许有人不知道。但是她为鲁迅先生刻的“鲁迅”“旅隼”两方印很多人都见过。鲁迅常把它钤在书的封面上。

齐白石弟子很多，其中有三个专学篆刻的弟子，刘淑度是唯一女性，还是佼佼者。1925年刘淑度在师大附中女生班读书时，国文教师董鲁安看了她刻的印，说可以拜齐白石为师。书法家张海若看了她刻的印，也建议她去找齐白石。于是刘淑度找到了北京艺专学生、齐白石的学徒李苦禅，求其向齐说项。李与齐白石老人谈及此事后，齐借口年老，不肯接收。1927年齐白石破例收年龄超过四十的于非闇为徒，李苦禅又向老人提及此事，齐白石要求看看刘淑度的作品。他一看刘刻的印后，立刻说：“叫她来吧！”于是刘淑度拜在齐白石门下，成了当时唯一的女篆刻家。1932年齐白石亲自为刘淑度订润例，挂笔单，每字两元。他在笔单上写道：“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古人得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篋法刀刀无女儿氛，取古人之长，舍师修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

这张笔单很出名，当时我在琉璃厂淳善阁看到过，曾一时传为美谈。

1930年刘淑度在女师大毕业。翌年到燕京大学帮助郑振铎编《中国文学史》，这时郑振铎托她为鲁迅镌了上述两方有名的印。刘淑度持两印请齐白石指正，老人指出“旅”字布局不好，建议磨掉重刻。但郑振铎急于和茅盾携印赴沪，来不及重刻，就只好如此了。这一时期，刘淑度为郑振铎、冰心、郭绍虞、顾颉刚、俞平伯、许地山等著名作家都刻了印。

1946年齐白石应邀到南京、上海举办画展，刘淑度在南京见到了

阔别多年的齐白石老师。当时齐白石已在刻“年八十六矣”这方印，就随手为她用自己调的印泥盖了本印谱，首页就盖了这方印，前面亲笔写了篇序：

淑度白石之门人也，北京别来已越六载，今逢于南京，值予正刊此印，求拓之，以记事。

丙戌十一月一日

不见刘淑度几十年矣。友人来信说，老人健在，已八十多岁，有时偶尔挥刀治印，海外华人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都求她治过印。听说最近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要出版她的印谱，作家冰心已为之写序。

装裱大师刘金涛

友人在北京购得一幅名画，特请装裱大师刘金涛装裱，一饱眼福，果然名不虚传。正应了大画家傅抱石讲的：“三分画，七分裱。”确实，好的裱工不但可使作品大为增色，而且可以使其“延年益寿”；蹩脚的裱工则会使作品大为减色，甚至因此受到不应有的损坏。

193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金涛从河北省枣强县沿途乞讨到北京谋生，在琉璃厂裱画店学徒时，起早贪黑，刻苦学艺，十年后，终于练得一手好装裱技术。他拿出平时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笔钱租得半间房子，便自己开业裱画。可是由于他年轻，而裱画又是个“利小关系大”的行当，所以开始生意不太好，只能勉强度日。

1946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看到了由刘金涛装裱的一幅画，大为赞赏。当结识刘金涛之后，更是喜欢这个为人敦厚的年轻人。为了帮助刘金涛，一天，徐悲鸿设家宴，向应邀赴宴的齐白石、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等著名画家介绍刘金涛，并请诸位画家每人作画三张，交刘金涛装裱。装裱好的画展出时，盛况空前。徐悲鸿还专为刘金涛题写了门匾“金涛裱画处”，刘金涛从此名声大振。昔日门前冷落的金涛裱画店，很快生意兴隆起来了。

刘金涛裱的字画干净、平整、柔软，镶料与书画颜色搭配恰当，色彩协调，明朗典雅。一件书画作品，一经他装裱，其墨色的变化，光线的明暗，用笔的气势，都会立时显现出来，宛如锦上添花，成为一件珠联璧合的艺术品。因此，他深得书画家们的信赖。据说徐悲鸿珍藏多年，盖有“悲鸿生命”印记、世人称为“国宝”的古书《八十七神仙图》，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幅关山月、傅抱石合作，长达二十四米

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还有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松鹰图》等皆出自这位装裱大师之手。

吴作人曾为刘金涛题字：

> 余与刘金涛之谊至今已四十余年，京华诸名画家莫不求其裱画。他虽已过花甲，壮心仍不减当年，仍孜孜为之尽劳，精益求精至可钦佩。

20世纪40年代末，笔者曾与刘金涛有一面之交，深感其不仅技艺精湛，人品也颇为厚道。书画家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与艺术生命，对裱师总是不惜一切地打交道，“卑辞厚币，如待厚宾”。

可刘金涛总是把钱看得很淡，而把友情看得很重。他铭记徐悲鸿对他的教诲：“做裱画艺人，不做裱画商人。”

逸闻趣事

YiWen QuShi

吴昌硕为平民作画

中国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生于浙江安吉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青少年时期辗转于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寻师访友，刻苦学艺。初从俞樾学辞章文字，后向任伯年学画。因其能够博采众长，匠心独运，于是技艺大进，声誉日隆。

吴昌硕中年以后，名声显赫，所作书画，成为当时士大夫争相收藏的珍品，许多达官贵胄都以能够得到一纸他的笔墨为荣。处在盛名之下的吴昌硕，却仍然保持了同普通百姓的深厚情谊，对下层小人物求画，他皆慨然应允。

在寓居苏州时，有一次，他从友人家出来，途中突降大雨，无奈只得到一破门楼下避雨。当时，正好有一卖豆浆的小贩也来此避雨，他遂要了一碗热腾腾的豆浆，一边喝，一边与之聊天，谈得很是投机，交谈之下，当小贩得知眼前即为大名鼎鼎的吴昌硕时，就请为其作画，他当即应允，并约好取画时间。临分手时，小贩坚决不收豆浆钱，吴昌硕遂婉词劝说：“你每天做小生意很辛苦，赚几个钱也不容易，我的钱总比你来得容易些。”说完硬是把钱塞给了对方。事后，这位卖豆浆小贩到吴寓取画时，他将早已画好的一幅画取出，并题诗记叙二人雨中邂逅经过，将画送给这位市井常人，作为纪念。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友人在上海六三园宴请他。席间，日人请他作画，他即与友人合作了一幅。没想到，为宴席歌舞助兴的日本歌伎，当得知被宴请者是赫赫有名的大画家时，也想请他赐画，但又自觉身份低贱，一直不好意思启齿。后来，他无意得知对方心思，便慷慨对歌伎道：“来，来，我给你画。”不巧，此时画纸已经用完，情急之下，歌伎便脱下斗篷递给他，他接过后，展开衬里，挥毫泼墨，顷刻而就，欣然盖上印章，遂博得满堂欢呼。为此，日本歌伎感动得热

泪盈眶，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斗篷，口中连连称谢不止。

由于“天下大手笔”为歌伎斗篷作画，一时间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他不轻视贫贱的崇高品德。

吴昌硕乐于为平民作画，心系民众，同时在官场上从不曲意逢迎。他在上海时间较长，与任伯年、蒲华、胡公寿等过从甚密，为上海画派的重要代表。他在五十多岁时，曾出任安东县知县，亲身体验了不行贿受贿、不去违心地奉承上司，便难以做官。于是，吴昌硕上任不到一个月，便辞去县令之职，并自刻印章曰：“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此后以卖画为生，甚是贫困，故而取“酸寒尉”自嘲，任伯年还给他画了一张“酸寒尉”的像，他一直珍存。

辛亥革命后，吴昌硕与同道在杭州成立了西泠印社，他被公推为社长。吴昌硕欣然就任，并当场为印社撰写一联：

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
社敢何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于右任茶庄书匾额

盛夏溽暑，北京人品茗，颇讲究味道与色泽，亦讲究茶具与茶庄字号。就茶庄而论，20世纪40年代之佼佼者当属前门外珠市口通衢南侧的永安茶庄。

永安茶庄开业于1935年，本号设在通都大邑天津市河北大街，而位于文物荟萃之地的北京则设分号，因其匾额系国民党监察院长、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所书，兼之所售自制“拼茶”芬芳馥郁，别具一格，故天下文人墨客与村客野老，无不慕名纷至沓来，借鬻茶之机兼而瞻仰于先生墨宝。

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号骚心，清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陕西渭北高原三原县鲁桥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据于右任《于母房太夫人行述》一文所记，于先生幼年丧母，伯母房太夫人携至外祖家抚养。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领乡荐，中举人。同年冬，陕甘清吏，以右任所为诗，倡言革命，大逆不道，据以入奏，及赴试汴梁春闱，而逮捕之令下。得李雨田先生帮助遁于沪。1904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旋即为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曾被清政府驱逐出境，逃亡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翌年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率师北伐段祺瑞。此后长期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1964年逝世并安葬于台湾。

于先生学书伊始，宗赵孟，继而专攻魏碑。他每于军务之暇，四处奔波苦心搜索魏墓志、魏造像记等书法珍宝，博采，约取，精读并融会变通，寓创新于继承。前期书作，着力于尽兴挥洒，笔力雄健，大气磅礴，于爽朗洒脱中表现出一种强悍奇崛的性格。1927年前后，于先生开始研究草书，1932年他发起成立草书社。于先生在草书研究上亦博稽约取，去芜存精，既能继承传统，又不泥古不化。他的草书

以形美，笔简为其结体特征。于先生主持编成的《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总结了草书规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先生所书“永安茶庄”匾额，是北京商贾中绝无仅有的珍品。其笔法特征熔楷、隶、行、草于一炉。横画或上仰或下俯，绝不僵直，左低右高与右低左高错综参差，映带呼应。撇则于伸展挺拔中略带波势，圆融处体现了使转的笔趣和力度，大有壮士屈臂回腕之力，惊蛇入草之逸象。

金北楼父子办画会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绘画团体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湖社画会了。

提起湖社，首先令人想到清末民初的画坛巨星金城。金城是浙江吴兴人，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幼年即嗜画，博学多才，书画篆刻金石六艺无所不精。山水承继马、夏，人物楷摹唐、仇，花卉擅袭恽南田之没骨画法，而且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对传统绘画技法及理论极有研究，为清末民初画坛之巨星。

1920年春，金北楼先生联合当时画界名流，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并被推为会长。其创办动机乃出于：“中国画学因潮流趋新，转又渐晦，为提倡风雅，保存国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侵华列强先后退回庚子赔款，指定用于兴办文化事业。其中，日本退款中的一部分即用于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因此该会成立后，即与日本美术界取得联系，1920年首届联展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二届联展翌年在日本东京举行，时金北楼先生携中国北方画家作品，亲自东渡日本主持展览。第三次联展于1924年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中国南北画家的作品都参加了展览。第四次联展于1926年6月，在日本东京及大阪两地举行。金北楼先生再次携带展品，东渡日本。此次展览规模增大，盛况空前，在日本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是年春天，我曾随先辈到东四钱粮胡同十四号先生寓所登门造访。其时，先生正给其弟子陈少梅讲画。先生尚未过中年，精力旺健，踌躇满志。记得他介绍陈少梅时说：“我一生教授弟子甚多，他是最小的，却是我最得意的。现在他画得很好，将来前程无限，故我

为他取号升湖。承吾业者，必升湖也！”当时陈先生还是少年，后来成就却果如先生所言，足见先生眼力之过人。不料想半年之后，先生却已作古，“画学研究会”同人及海内外画家无不痛悼。

为追念他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之功，1926年，日本政府特授予他勋三等瑞宝章，日本名画家渡边专程参加了悼念活动。后渡边先生每念及金北楼，总禁不住潸然落泪。

1926年金城去世后，其子金开藩（字潜庵、号荫湖）继承父志，会同其父的入室弟子陈缘督（梅湖）、惠孝同（拓湖）、赵梦朱（明湖）、陈少梅（升湖）等在金北楼故居钱粮胡同十四号组织画会，因金北楼生前为其入室弟子所取之号皆带“湖”字，故以“湖社”称之。当时张学良将军曾捐款支持画会，并且亲自为画会举办的展览剪彩，参加画会的活动。

当年湖社的董事会设在中山公园水榭，会员定期聚会，切磋画艺。同时还出版《湖社月刊》，刊登古今名家作品及书法、篆刻、画评、画论、诗词、轶闻等照片和文字。其发行量很广，行销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及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湖社成立之后，许多著名画家如王雪涛、吴镜汀、胡佩衡、汪慎生等相继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四百余人。社会上各界名流也慕名而至，如著名画家张大千、陈半丁，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言菊朋等都与湖社有交往。大画师齐白石不仅送画祝贺，并且为《湖社月刊》第一百期题写了刊头。同期还刊登了一百位名人的题字，其中有于右任、徐世昌、曹汝霖、何丰林、吕公望、翦碧、谭祖任、吴湖帆等。美国画家克郎贝卡克所绘金北楼先生铅粉像一帧，也刊登在这一期。

湖社会员继承了金藕湖的艺术风格，以“出古人之行，立国梓之上”为宗旨，注重国画之表现力，强调画家的功力，尤其对没骨画、干骨面更有研究。湖社在日本和欧美多次举办展览，在比利时举办的

国际博览会上，湖社会员曾获得十七面奖牌。

1931年春，湖社在天津成立分会，由除少梅、蒋养浩前往主持，参加者异常踊跃，开拓了天津美术界的新局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湖社画会被迫解散。近闻湖社画会在北京又恢复活动，由老会员、著名画家孙菊生担任会长，在琉璃厂开设了门面，并挂出张学良当年手书的匾额。据说金开藩之子金鲁瞻先生尚健在，会员有赵梦朱、溥杰、陆鸿年、田世光、宴少翔等书画界名人。

张大千临画“匿迹”趣闻

记得1937年，大千先生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画展，经人介绍结识了天津著名企业家范竹斋君。大千先生得知范收藏有许多名人书画，于是，便想一睹为快。范当即同意，并将一幅幅珍品拿出来供大千先生欣赏。其中有清末吴昌硕画的《十二条花卉》（一种花卉表示一个月份，故为十二条），有清末陆廉夫画的《十二条山水》，还有清末马家侗画的《十二条山水》和明代陈老莲画的《荷花》等。大千先生对陈老莲画的《荷花》反复玩味，爱不释手，就开玩笑地对范说：“你把陈老莲《荷花》和吴昌硕《十二条花卉》换给我怎么样？”范听罢微笑着答道：“那你打算用多少张画来换呢？”说完，二人相视大笑起来。玩笑终归是玩笑，待大千先生看完画，范没有再提换画之事，而是郑重提出请张为他画十二条山水画的要求，拟用重金酬谢，以备范竹斋本人七十寿辰时悬挂。

大约半年后，也就是1938年3月间，大千先生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完成了那幅巨制《十二条临古山水画》，在范竹斋七十整寿之前送到了范家。

此消息一经传开，书画爱好者和古玩商们接踵而至，争看此新作。笔者有幸也黍列其间。该巨制是临唐、宋、元代诸家各四条，按年代顺序分别是：《临唐代阎立本西岭春云图》《临唐代王维江山雪霁图》《临唐代杨升峒关蒲雪图》《临唐代李昭道海岸图》《临宋代范宽临流独坐图》、《临宋代山水人物图》《临宋代朱友人清溪春晓图》《临宋代沈子蕃革丝山水人物图》《临元代王蒙清浦垂钓图》《临元代倪瓒小山竹树图》《临元代盛懋苏长公行吟图》《临元代孟王山水人物图》。大千先生在十二条之一的《临元代王蒙清浦垂钓图》中题有“戊寅三月昆明湖上写拟，竹斋兄方家博教，大千张爰”。

大千先生时年四十岁。

1939年，天津发生了大水灾，范家院内水深达两米左右。水灾过后，就传出了大千先生的这十二条临古巨制山水画毁于大水的说法。从此，这“巨制”便“匿迹”了。

而今出现，据报纸介绍，原来在当年的大水灾中，“巨制”是装在硬木匣中，且藏于三楼画库，滴水未沾，完好无损。

“二石”与悲鸿

中国画家向有“南北二石”之称，即北齐白石、南傅抱石，而发现和赏识“南北二石”者，正是艺术教育家徐悲鸿大师。

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定居北京，以卖画为生。他反对保守，勇于创新，以“我行我道，我有我法”的精神，全力进行艺术上的创造。当时的京派正宗画家，出于旧时代封建士大夫的文人偏见，竭力诋毁齐氏绘画艺术。凡举办国画展览，齐氏的画只被挂在阴暗的角落，且标价极低。

1929年9月，年仅三十四岁的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天，应几位学生相邀，去参观一个中国画展览。

宽敞的大厅里，一幅幅装裱精致的国画令人眼花缭乱。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不太痛快。因为不少作画者墨守成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使观者兴味索然。他陷入了沉思。忽然，挂在角落里的一幅小画引起了他的兴趣：画面上画着几对虾，只见它们体若透明，摇须晃尾，生动、逼真、传神。这位曾经观赏过世界许多名画的大画家，居然为眼前那笔法娴熟的无名作者感叹不已。他以过人的慧眼，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暗暗地看着“齐白石”三个字点了点头。

“徐先生，这位齐白石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听说他从前是个木匠，画得不怎么样！”旁边的一位学生说。

徐悲鸿听了摇摇头说：“不！我是为这个怀才不遇的先生感到惋惜，真没想到在这个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国画大师啊！”

突然学生冷笑起来：“哈哈，你真会开玩笑，居然把一个性格怪僻、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当大师！”

徐悲鸿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我不是开玩笑，我不仅要去拜访他，而且还要聘请他当教授，这样的人才不重用，实在可惜！”

此后，徐悲鸿真的三次拜访齐白石，而且要聘请他当国画系的教授，但是一再被齐婉言谢辞。齐白石说：“徐先生，不是我不愿意，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洋学堂，更没有在学堂里教过书，连小学、中学都没有教过，如何能教大学呢？”

徐悲鸿告诉齐白石先生，不需要他讲课，只要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画示范便可，并且说：“您放心，我一定在旁边陪着您上课。”

过了些时日，徐悲鸿终于聘请到了齐白石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送他上课。当徐悲鸿看到齐白石慎重地、沉思地举起画笔，异常精练地绘出栩栩如生的虾、螃蟹、青蛙和飞翔在残荷上的蜻蜓、惹人喜爱的小鸡，以及清新秀丽的山水时，给予了“致广大，画精微”的高度评价。

在学院里，三十多岁的徐悲鸿和六十多岁的齐白石，竟亲密融洽，互相尊重。他们常在一起谈画、谈诗、谈文章、谈篆刻，各抒己见，彼此有许多相同的见解。

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了。它好似一阵春雷，震撼了当时保守气氛笼罩的中国画坛。齐白石以“我行我道，我有我法”的精神，全面进行艺术创新的举动，开始为画家们所赞赏了。原来那种出于旧封建文人的偏见、竭力诋毁齐白石绘画艺术的言论，逐渐没有什么市场了。

从此，二人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深厚友谊。齐氏激动之余，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画送给徐悲鸿，并在画上题诗：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傅抱石原名傅瑞麟，出身于江西南昌市一个穷苦人家里。约十七岁时，曾将石涛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中的一些精辟章句，作为座右铭抄录张贴，下面题款“抱石斋主人”，这便是傅抱石名字的由来。一次，年轻的傅抱石带着一卷画，去请客居南昌的徐悲鸿指点。悲鸿看了极为赏识，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深造。待学成归来，又推荐他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徐悲鸿慧眼识“二石”，无愧为画苑伯乐。悲鸿一生做了不少好事，而本人却一直身世坎坷，道路不平。有人说他性情过于拗直，他却谨遵“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一信条。他曾为犹太富翁哈同画像，后感到富翁们并不尊重他的艺术，而只是开心消遣，附庸风雅而已，便不计优厚待遇，当即辞别了。

20世纪20年代，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曾受一外国留学生歧视，被辱骂为“天生的亡国奴”“永远成不了材”，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用“一杯水，一块面包”的艰苦生活和顽强刻苦的钻研精神屡获优异成绩。他的油画《远闻》《箫声》《琴课》等展出后，轰动了巴黎美术界。他用实际行为向那个狂傲的洋学生证明了“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齐白石与朱屺瞻的画谊

朱屺瞻绘画受齐白石影响，刻意变化，终成大师，谈起他俩的交往，真是情深谊长。

1929年，朱屺瞻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见到一幅山水画，署款“白石”。此画笔墨奇崛，富有大家气势，他十分敬佩。事情也巧，当年秋天，他在徐悲鸿的寓所见到齐白石为徐刻的印章，刀触势通雄逸，朱屺瞻连连赞叹。徐悲鸿见他如此赞赏白石的治印，便为他向齐白石求章。不久齐白石寄来了一方精致的印章。两位画坛大师虽未见过面，但追求的意趣相投。这时齐白石已是古稀之年，朱屺瞻还未到四十岁，他们便成了忘年交。

此后，他俩书画交往不断。1936年，朱屺瞻为自己的书斋“梅花草堂”集画，齐白石不但赠画，而且写诗一首：

白茅盖瓦初飞雪，青铁为枝正放葩。
如此草堂如此福，卷帘无事看梅花。

诗、画、字皆佳，为“梅花草堂”收藏中之精品。齐白石还专门在画上落款云：“屺瞻先生既索予作梅花草堂画并题诗句，又索刻石，先后约四十印，今天索画此墨梅小幅，公之嗜痂可谓癖矣。当此时代，如公之风雅，欲再得未必能有，因序前事以记知己之思，神交之善，非好多言也。”可见两位大师友情之深。

不久，抗战爆发，日军侵犯上海、太仓、昆山、苏州等地。朱屺瞻义愤填膺，当日写信给齐白石云：“吾以为虽无力救国，必当以清白处世，劲节自励，决不做俯仰随流之人，因请先生刻《劲节冰霜》《傲霜》《师竹》《崛强风霜》等印。”齐白石接信后，当即刻了

印，自制木匣，亲书地址寄出。一学生见此说：“齐先生，此等劳作，尽可差旁人去办，何必亲自操劳？”齐白石不以为然。这时，他俩的友情已从书画之谊升华到爱国之情。

1946年，齐白石应他人之邀南下途经上海，见到朱屺瞻，连连说：“想煞我也，想煞我也。”当时齐白石住在愚园路，朱屺瞻每天登门拜访，欢谈竟日。齐白石返京时，特以十二寸半身照相赠，照片上写着“常相见”三字，并嘱朱屺瞻悬挂床头，以象征两人日日相见。朱屺瞻特将二十年来齐白石赠他的数方印，编成“梅花草堂白石印存”请齐白石作序，以纪念他俩的友情。

徐悲鸿的一次画展

1943年，徐悲鸿先生在成都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当时我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欣然往观。当我站在一幅题为“田横五百士”的油画前，正细细品味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OK！OK！”的洋文赞美声，我回过头去，看到余中英市长正指着一位身着灰色旧西装的中年人向一位外国人介绍说：“这就是徐先生。”于是我便也追寻过去。

我随他们走到一幅《巴人汲水图》的水墨画前。这是一幅立轴，粗粗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个挑水夫从嘉陵江边挑着水，沿着百级石阶往上攀登的景象。徐先生指着画面上一个正在江边打水的挑夫说：“找这个形象好难啊！为了表现我们民族抗战的意志，我特地选择了在炮火轰炸中的重庆人挑水的场面。但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情怀宽广、生命力旺盛的原型，勾了好几张素描都扔掉了。后来在乡下遇到了一个瘌痢头。瘌痢头很丑，是吧？但你看他小腿暴胀的肌肤，强壮的胸肌；看他扁担不离肩，侧桶打水时那腰部的力量；看他逼视江水的双眼和反光的秃顶，谁还会觉得他丑呢？”这一番分析，使周围的人不由得点头称是。

徐先生走后，我又站在一幅《会狮东京》的水墨画前。四只雄狮，从东南西北啸聚于东皋磐石之上，巨头长鬣，目瞪口张，尾加竖鞭，顾盼生风，傲视四野。虽是一幅画面，但呼啸之声，豪放之气，却犹如震耳，实是一幅预言反法西斯战争必将胜利的凯旋图。

徐先生的作品，既有豪迈奔放的巨幅，也有诙谐幽默的讽刺小品，至今还记得一幅《墨猪图》，以浑染之笔墨，描绘了一只丑态毕露的猪。画面除肥头细目、软耳短腿和圆臀之外，别无所见。画上题有七绝一首：

少小也曾锥刺股，不徒白首走江湖。
乞灵无着张惶甚，沐浴薰香真墨猪。

徐悲鸿的“无枫堂”

1928年国画大师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中大宿舍。住屋是旧式楼房，共住有四家教授，蒋碧微的父母也与他们住一起。由于拥挤，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后在钱昌照等朋友帮助下，徐氏聚积卖画所得，于1932年在南京傅厚岗六号造了一座带画室的公馆。

徐悲鸿搬进新居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的严冬，徐氏为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名为“危巢”。但蒋碧微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便被取消。蒋碧微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可舒雅的环境未能给徐氏带来快慰，反使徐氏郁郁寡欢，愁肠百结。

此时蒋碧微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潜心于绘画艺术。在徐悲鸿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徐氏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以暗合二人之名。后为夫人所闻，大肆吵闹，弄得满城风雨。

在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事机不密，又为蒋氏知道，怒不可遏，嘱用人将树苗尽折之，做炊火之薪。徐氏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怒，只好忍气吞声，乃为其室名“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也多以画枫树为题材，并钤上“无枫堂”印章。以后徐蒋关系每况愈下。抗战军兴，徐独自西去，蒋则紧追不放，但终因和好无望，长期分居，二人形同陌路。

1942年夏，十九岁的女学生廖静文由湖南往广西投考南宁大学，因日机轰炸而在桂林下车，不久投考了中国美术学院图画管理员，时

主考便是美院院长徐悲鸿。他们从偶然的邂逅到互相了解而产生感情，这给心灵遭受过创伤的徐悲鸿带来了新的慰藉和生活希望，但廖氏从未想到会和比他长二十多岁的名画家结婚。1943年廖静文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学后，还劝说徐找一位合适的伴侣，年近五旬的徐悲鸿却坚定地说：“我宁愿等待你四年！”廖静文被深深地感动了，知道当时已疾病缠身的老师非常需要人照顾，所以不到一年她又从金陵女大回到徐的身边，于1945年毅然与徐氏结合。徐悲鸿最满意的作品总是题上“静文爱妻保存”数字，可见他俩间的恩深义重。

徐悲鸿与廖结婚前，由杨仲子等人出面与蒋氏协商离婚，经过多次往返谈判，并由沈钧儒等人作证，才得以实现。但蒋提出的条件很苛刻，除了徐悲鸿画的百幅字画、巨额款项之外，还要求将“无枫堂”公馆也让给她。为避免纠缠，徐悲鸿慨然应允。同年蒋碧微由重庆返回南京，将无枫堂修缮一新，以高价出租给法国新闻处，自己在庭院空地上另盖了一所楼房，作为她和新夫张道藩的寓所。

张大千与溥心畬的书画缘

早在1928年秋，张大千就经陈宝琛的得意门生、人称“清末诗坛第一人”的陈散原（三立）介绍，在北京后海恭王府萃锦园结识了溥心畬。

溥、张交往最密的一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4～1938）。这时溥心畬由一个深居王府、靠典卖祖传文物遗产为生的旧王孙，开始步入北京画坛，靠卖画鬻书为生；而张大千则早已是一位以专卖画为职业的画家了。为了扩大卖画市场，张大千经过多次探听虚实，终于由十里洋场的海派画坛闯进了传统势力深厚的京派画坛，连连在北京举办画展，声誉鹊起。

1934年，张大千重游北京，随身拿出一幅手卷，请溥心畬题诗。溥心畬打开一看，原来是张大千1929年作的《三十自画像》。这是一幅四尺立轴，画中人宽袖长袍，虬髯秀目，神采奕奕，背景是一棵并砥双枝的参天古松。画的四周题满数十位当代名流的诗文，其中有张大千的老师、名画法家曾农髯，诗坛泰斗陈散原，著名学者朱强村，诗人兼书法家林山腴、谢无量，书法家叶恭绰，画家黄宾虹、吴湖帆等。溥心畬稍稍沉思了一会儿，便挥笔在空白处题了一首五言古诗。诗云：

张侯何历落，万里蜀江来。
明月尘中出，层云笔底开。
赠君多古意，倚马识仙才。
莫返瞿塘棹，猿声正可哀。

这次题赠也许是溥、张定交后的第一次书翰墨缘。不久，他俩合作了一幅《松下高士》，溥心畬画松，张大千补高士及山石，并题诗

道：

种树自何年，幽人不知老。
不爱松色奇，只听榕声好。

画上钤了四方石印：“张爰松印”“蜀客”“溥儒”“旧王孙”。值得一提的是，这四方印中的“蜀客”对“旧王孙”，相映成趣。蜀是四川，是张大千出生之地，但“蜀”字谐音“俗”，俗客者平民也。以一个平民的“俗客”身份与曾经是万户侯的“旧王孙”合作书画，情趣油然而生。这方“蜀客”印章，是张大千为了配“旧王孙”之印而亲自篆刻的。

溥、张都是诗书画三绝的文人画家，都是多面手，又都以山水著称。一个主北宗，偶写南宗；一个主南宗，兼写北宗；一个是雍容华贵写山水，一个是乱头粗服写山水；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基于以上的一些特点，北京琉璃厂集萃山房经理周毅侯一次当着溥、张两位和于非闇的面提出了“南张北溥”之说。于非闇心领神会，当即在集萃山房写下一篇《南张北溥》的短文，后来发表在《北京晨报》上。文中写道：“张八爷（张大千行八）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溥心畬行二）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二爷不如八爷。南张北溥，在挽近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

从此，“南张北溥”在画坛不胫而走，声名日高。

当时北京的一些小官僚政客，为了附庸风雅，既想得到溥、张的合作书画，又不愿意出大价钱去买，往往私下求助于琉璃厂店铺中的小伙计，少出钱让他们去求画。这些小伙计摸透了北京各位画家的脾气个性。他们往往先到罗贤胡同张大千在城内的居处，叫一声“八爷，赏一幅画”。张大千笑着随手从画案上取过一小张宣纸，挥笔画一幅泼墨芋头之类的画给他们；得到画的小伙计又将这幅画拿到萃锦园，再喊一声“二爷，求你一块石头。”功夫不大，一幅溥、张合作的

画就出来了。一些小官僚政客就通过这种办法，廉价地买到这样一张溥、张合作画。

溥、张合作，往往是在谈诗论画之余，心有灵犀一点通，发思古之幽情。有一天，溥心畬到张大千在北京城外寄居的颐和园听鹂馆做客，两人谈起北宋大学士、大诗人苏东坡的诗、文、词，兴味颇浓。张大千画兴勃发，在一张四尺宣纸上，寥寥数笔勾勒了一叶扁舟，舟上一位散发古人仰首而坐，然后对溥心畬说道："请心畬先生补景。"溥心畬心领神会，以宋元笔法补上了赤壁山水，一改明山秀水为黑山白水。张大千在一旁看了，不由捋须呵呵大笑道："好一幅《东坡居士赤壁夜游图》！"

又一日，张大千取石涛画荷之法，画了荷花中难得见到的一茎四萼的"四面莲"，请溥心畬题诗。溥心畬欣然提笔写道：

池塘秋日净，荷花晚及香。
菡萏多凌水，飘然送夕阳。

在日寇入侵、民族危急严重的时刻，溥、张忧心如焚。他们借诗画抒发内心的忧国之情。据书家黄均先生回忆，北京沦陷前夕，有一次，他到寒玉堂向溥心畬请教诗文，适逢张大千也在座。溥、张议论了一番北京时局，不一会儿，张大千站起身来，走向书案，从笔筒里取出了一枝大毫，挥笔画了一棵老树，这棵老树被风刮得摇摇欲坠，可是树身上缠挂的藤条却依然相安无事。溥心畬站在一旁看着，长叹一声，稍稍沉思了一会儿，挥笔题诗道：

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
尚有树枝藤，清清犹未悟。

然后题上"秋意图"三字。这幅画经他题诗点题后，意境显得更为深远。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为日占区，溥心畬由恭王府迁出，蛰居于颐和园万寿山，与住在听鹂馆的张大千结伴为邻，过从甚密。他们一起谈诗论画，切磋艺事，合作书画的机会更多了。《梅竹双清》《荷花鸳鸯》《细嚼梅花读汉书》等作品，都是这段时间合作的墨迹。

后来，张大千通过友人帮助逃离北京，辗转回到了故乡，蛰居在青城山上。溥心畬仍蛰居在万寿山。一南一北，遥遥相隔，整整分别了八年，后又在台湾相聚。

徐悲鸿与张大千

徐悲鸿和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两位成就卓著的绘画大师。他们出生的年份相近，又几乎同时扬名海内外。尽管他们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徐悲鸿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兼教授时，他就与张大千建立了画谊。据张大千的学生、北京画家刘力士回忆，1932年秋，他拜张大千为师学画时，在上海的张先生家里，曾看到过两幅老师的画像。一幅是张大千的《三十自画像》，另一幅是徐悲鸿为张大千画的全身正面像，无背景，画上题写着郑曼青的一首五言长诗。

张大千是个十分好客的人，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当时徐悲鸿就是他家里的常客。他们在一起看画谈诗，一起用膳，一起摆龙门阵。徐悲鸿曾在《张大千画集》序中写道：

> 大千蜀人也，能治川味，兴酣高谈，往往入厨作羹飨客。夜以继日，令失所忧，与斯人往来，能忘世为二十世纪。

1933年1月，徐悲鸿应欧洲多国的邀请，前往举办“中国画展”。他携带了向国内的好友（如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吕凤子等人）征集的作品和自己的佳作、收藏品，共二百余幅，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展出。这次中国画展览震撼了欧洲艺坛。法国政府选购了其中的十二幅作品，并在国家画廊内开辟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览室”，十二幅作品中，有一幅就是张大千的《金荷》；张大千的另一幅作品《江南景色》，被苏联政府购藏，陈列于莫斯科博物馆。这

是张大千的作品第一次在欧洲展出。

徐悲鸿不仅向国内美术界介绍和评述张大千的作品，而且在他主持美术院系工作期间，多次聘请张大千担任中国画教授，而且与他一起带着艺术系学生上黄山写生；课余，徐悲鸿还请张大千到家里鉴赏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

1946年8月，原在四川盘溪开办的中国美术学院迁到北京，院址就暂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在一起。徐悲鸿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兼北京艺专校长，他又聘请张大千为北京艺专的名誉教授。

徐悲鸿十分推崇张大千独具个性的创作，尤其喜爱张大千的山水、花鸟画。他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对张大千的评价是：

> 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仅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绛，便益见本来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

张大千对徐悲鸿的人品和画品都很赏识。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画集，就是请学西洋画的徐悲鸿写的序。他对徐悲鸿能将西画的长处融入中国画中，深表钦佩。他认为，徐悲鸿的画，笔墨好，能够寓书法于画法之中。他叹服徐悲鸿画的人物，但是更叹服徐悲鸿画的马。他曾经不止一次对人说：“徐先生画的马很绝，我学不到这一手。”

据说，有一次，有人问他对郎世宁和徐悲鸿画的马有何感想，张大千说道：“郎世宁的马，有许多西洋的笔法，不能算纯粹的中国画。”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从前我和两位中国画马的名家都是好朋友，一个是徐悲鸿，一个是赵望云。但是因为徐悲鸿比赵望云有名，

因此赵望云很不服气。有一天，赵望云来问我：“大千，人家都说徐悲鸿画的马比我画得好，你说说到底是谁的好？”我说：“当然是他的好。”赵望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追问道：“为什么？”于是我说：“他画的马是赛跑的马和拉车的马，你画的是耕田的马！”从这段谈话中，也可以看出张大千对徐悲鸿画马的评价。

当然，张大千对徐悲鸿的作品也有过批评，比如他认为徐悲鸿画的马有一些是跛足的，而这种跛足是一个缺点。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艺术批评，正如徐悲鸿认为张大千画荷喜欢用浅绛也是一个缺点一样。

过去一些有名望的画家，往往都喜欢收藏古代字画。他们的收藏是为了便于鉴赏，而鉴赏又是为了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徐悲鸿和张大千也不例外，而且是两位收藏颇丰的收藏家。有趣的是，这两位收藏家，由于鉴赏标准的不同，还交换了一幅在一般收藏家看来价值相差甚远的画卷。这就是张大千曾经用一幅清代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换取了徐悲鸿的一幅北宋董源的巨幅中堂山水《西岸图》。关于换画的经过，徐悲鸿在《风雨归舟图》的题跋中这样写道：“一九三八年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幅去。一九四四年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在徐悲鸿看来，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乃中国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正《溪山行旅图》、周东村《北溟图》，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之支柱也”。徐悲鸿与张大千这段换画故事，倒也不失为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9年冬，张大千往返于澳门、香港与成都之间开画展。当时，成都尚未解放。徐悲鸿以老友的身份，致函张大千，劝他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任职。可是张大千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到印度大吉岭去讲学了。从此他没有再回祖国内地，这两位艺术知音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晤面，惜哉，惜哉！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画谊

张学良与张大千，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学良曾是位叱咤风云、统率三军的少帅；张大千则是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他们一个生在东北辽宁，一个生在西南四川；一个曾官至三军副司令，一个却是一辈子平民百姓。而中年之后，他们的情况又大有不同：一个被秘密羁押，身陷囹圄，身不由己；一个却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四海为家。有趣的是，这两位身世经历截然不同的文武奇才，却有一段颇有情趣的书画奇缘。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上海、北京、南京的国画界已颇有声名，特别是他的仿石涛画作已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境地。当京、沪等地掀起“石涛热”时，爱好收藏中国古书画的张学良，也耗费巨资从各地搜集了不少石涛的作品。后来，社会上盛传石涛的作品中不全是真迹，大半是出自张大千的仿作时，张学良也为自己大上其当而感到震惊。但他并未大怒，却很想结识一下这位仅比自己大两岁的仿石专家。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已由奉军少帅调北京任国民军海陆空三军副司令。翌年，张大千北游故都，张学良听说后，递柬请他吃一顿便饭。为此，张大千有些为难：去吧，素不相识；不去吧，却之不恭。有友人提醒张大千，这恐怕是“鸿门宴”，要清算假石涛画这笔账。张大千考虑再三，还是应邀去了。临行前嘱咐家人，如果逾时未归，就要托人打听关照。张学良邀请张大千吃的不是“便饭”，而是一顿宴席，赴宴的还有北京书画界的名流。见到张学良对自己颇有礼贤下士的谦恭之风，酒席筵间，谈笑风生，这才使张大千放下了心里的“石头”。但张学良也点了张大千一下，他拍着张大千的肩头对其他客人用介绍的语气说：“这位便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

千，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张学良虽是很有气度地如此幽默了几句，却也使仿石涛名家的张大千捏了一把汗。随着张学良的笑声，在座的宾客，连同张大千在内，也一起大笑起来。这就是张学良与张大千第一次带有戏剧性的见面。从此以后，他们便交上了朋友。后来，张大千曾以石涛笔法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赠给张学良，画上题了一首借景寓意颂扬张学良雄才大略的诗，诗中写道：

天绅亭望天垂绅，智如亭见智慧水。
风卷泉水九叠飞，如龙各自从潭起。

他们虽是交上了朋友，但在收藏字画方面，遇到共同喜爱的，有时又难免发生点龃龉。有一次，张大千逛北京琉璃厂，在一家古玩铺中看到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构图新颖，形象生动，敷色鲜明，秀逸明快。他细细鉴赏一番，认定是真迹，便问古玩商要价多少，古玩商索价四百大洋，分文不减。张大千掂量此画价还算公道，可不巧的是，他这段时期正“闹饥荒”，囊中羞涩，便与古玩商说定，此画保留三日，三日之内，只等他拿钱来取，绝不卖给别人。

谁知张大千走后不久，张学良带着侍卫也来到琉璃厂，他走进古玩铺，一眼就看上了尚未来得及卷起的《红梅图》。古玩商唯利是图，违背前约，他将张大千看中的《红梅图》，以六百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张学良。事后，张大千得知，连声叹气，后悔当时没有带钱买走。

1935年10月，张大千应杨虎城之邀到西安小住，准备数日后即返回北京。这时，张学良特来拜访，并索画。张大千答应日后补赠，而张学良却说：“作画后用专机送先生回去。”张大千欲拒不能，只好暂住到张府，精心绘制一幅《华山山水图》。画成，张大千执画在炉边烘烤，因距火太近，画被烧着了，还殃及张大千的美髯。这时，天色已晚，张大千为酬答张学良的盛情，便连夜重新作画，直到一幅更

为壮丽的《华山山水图》完成后才休息。次日，张学良得知此事，非常感动地说：“这幅凝结着先生情意和精神的画，是我收藏珍品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20世纪70年代初，张大千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探亲访友。经过多方努力，有关当局终于批准他前去拜访正在软禁中的张学良。几十年没见面了，两位老朋友相见，自有一番人生感慨。张大千临返美时，张学良送给张大千一卷东西，对他说：“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不过，你一定要回到寓所后，才能打开来看。”张大千回到寓所，打开这卷东西一看，原来正是他们三十多年前在北京琉璃厂共同看中的那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张大千不由感慨万分，联想到与张学良的生死契约，不禁思绪翻滚，夜不能眠。他欣然提笔，画了一幅《腊梅图》，寄赠张学良。

70年代末，张大千从美国迁到中国台湾定居，住在台北双溪摩耶精舍。此时，张学良已被解除软禁，因此，张大千与张学良之间相见的次数日益频繁。后来由他们的好友张群提议，每月在张大千的摩耶精舍聚会一次，参加的还有原“立法委员”王新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张大千不但是大画家，而且是少有的美食家，他的厨艺也身手不凡，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了独特的“大千风味菜”。对此，张大千曾笑对朋友们作过自我评价：“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据说，他家宾客如云，很多是仰慕他家美食之盛名，前往一饱口福的。

1981年元宵节次日，张大千于摩耶精舍设午宴，招待张学良夫妇，作陪的有张群等人。这次宴席，自然是张大千精心设计，一手“导演”而成。席间共上有十六道菜点，真是山珍海味兼而有之，京粤苏川佳肴云集，当然是一席地道的“大千风味菜”。后张学良要求张大千重新手书菜单并题跋留念。翌年，张学良还将收藏的“大千菜单”装订成册，特在前面留下空白册页，请张大千书题留念。张大千在上面画了白菜与萝葡，题名“吉光兼美”，并题诗云：

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矣戒腥荤。
脏神安坐清虚府，那许羊朱踏菜园。

于非闇 和张大千的友谊

六十多年以前，张大千在北京旅居的几年中，于非闇 是他形影不离、交往密切的一位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作画，又多次联名在稷园（今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画展；他们还结伴逛琉璃厂，鉴赏、搜求古代名画，又一同出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观摩历代名画真迹；他们同任过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的导师，又同为正社书画社的社员；他们同观过昆明湖的荷花，同去天桥听戏，同进翠华楼、恩成居用餐……

于非闇 ，名照，满族，出身于清贫的书香门第，自幼随父学画习字，毕业于满蒙师范学堂。他是一位博学而又多才多艺的人。他善画，善治印，会种花，会养鸽，会钓鱼，又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著有《都门养鸽记》《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他曾任《北京晨报》文艺副刊《艺圃》的专栏编辑，经常在这个副刊上以“闲人”的笔名撰写文艺随笔、艺坛掌故、名人轶事，可说是一位渊博而多产的专栏作家。

于非闇 比张大千年长十一岁。他第一次结识张大千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名画家陈半丁的家中。这次结识，说起来十分有趣。

陈半丁是当时北方很有名望的画家兼收藏家。有一次，他扬言新搜求到一部石涛画册精品，为此，特地设宴邀请北京艺苑名流在家中鉴赏。受到邀请的有当时中国画学会会长周养庵以及徐燕孙、马晋、王雪涛，于非闇 也应邀参加，但张大千未在被邀之列。张大千是一个“石涛迷”，他风闻有此艺林雅聚，就径往陈府求见，欲求陈半丁赐赏所收藏的石涛画册。那天，陈半丁请帖上邀请客人的时间是下午6点钟，而张大千3点钟就去了。陈半丁很不客气地对这位后生说：“我邀朋友来共赏，请帖上的时间是下午6点，我不能单独先给你看，要

等朋友到齐了大家一起欣赏。你想见识，可以，但不是现在，要等到6点。”说完，便离开了，留下张大千一人在客厅里坐等。

到了6点，客人们齐集之后，陈半丁在宴会上讲了一通开场白，自称幸获名迹，不敢私密自珍，愿与友好共赏。张大千被挤在这批名流的外围，等陈半丁捧出他的宝贝画册，刚刚展开，张大千就大声叫道：“是这部画册呀！不用看了，我晓得。”陈半丁揶揄地学着张的四川口音问：“你晓得，你晓得啥子嘛？”

张大千立即朗声指出，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题的什么款，用的什么章，一一道来，丝毫不错。陈半丁边听边看，翻阅时惊奇得连眼镜都滑落到地上。

于非闇 在席上默默地听着、看着，心中也大为惊异，便不由得问道：“您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张大千得意地回答说：“这是我的画，咋个不晓得！”

这就是于非闇 与张大千的第一次相识。此后，张大千的“假石涛”越做越多，越做越真，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张大千的高超临仿技艺给于非闇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大千应当时中国画学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画学会在稷园举办的国画联展。在这次联展上，张大千展出了三件作品：一件是仿石涛山水，一件是《墨荷》，一件是白描《天女散花》。山水、花卉、人物俱全，工写彩墨齐备，笔墨淋漓，意态生动，为具有古老传统的北京画坛吹来一股春风，带来一片新意。这三件作品引起了画学会中许多老画家的关注，尤其引起轰动的是张大千与于非闇 合作的一幅《仕女扑蝶图》。

这幅画是张大千拜访于非闇 时，两人在于非闇 的画室中合作的。于画了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请张补景，张提笔画了一个简笔仕女执

扇做扑蝶状，并随手题诗曰：“非闇画蝴蝶，不减马香江。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在这首题画诗中，张大千把于非闇比作明朝“善山水，又喜杂画，信手作人物，辄有奇趣”的、以清狂之画名闻天下的郭诩，意在对当时北京画坛上专攻人物画的名家徐燕孙（诗中的徐娘）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仕女扑蝶图》展出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与徐燕孙在展厅中同观此画的有中国画学会会长周养庵。周是浙江绍兴人，他用绍兴官话对徐说：“孙儿，你看这幅画，是存心同你开玩笑的，徐娘者就是指你徐燕孙也！”徐燕孙一听，大发雷霆，认为张大千竟然公开侮辱他，于是延聘当年在北京名气甚大的梁柱大律师，具状地方法院，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张大千也只好兵来将挡，你找大律师，我找更大的律师，他与于非黦商量后，就聘请了律师江庸为他辩护。江庸曾代理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又是梁柱的老师。官司还未打到法庭，江庸就把梁柱约到家中，斥之为小题大做，要梁柱从速调解；后又经傅增湘、周养庵从中调停，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官司虽然没有打起来，但徐燕孙、张大千由此结下积怨，并引起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一场笔战。

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成了张大千的代理人。徐燕孙在《小实报》上撰文挑战，于非闇在《北京晨报》副刊及画刊上发文应战。一个剑拔弩张，一个皮里春秋；一个博古通今，一个议论纵横；一个要维护北方画派的传统，一个想引进南方画派的新风。正是在这场笔战中，张大千连年在北京举办画展，誉满京华；也正是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和张大千更成为莫逆之交。

在1934年到1936年间，张大千先后在北京参加过五次联展：第一次是《正社书画展》；第二次是《张氏昆仲（张善子和张大千）扇展》；第三次是《张大千关洛画展》；第四次是《张大千、于非闇、方介堪的书画联展》；第五次是《救济赤贫，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画展》。环绕着这几次联展，于非闇在《北京晨报》上亲自撰写发表了

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张大千的书画及他客居北京时期的活动，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梅兰芳的诗画缘

人们每每盛赞我国戏曲融汇着诗画艺术的神韵，具有浓烈的诗画情意。的确，古往今来，梨园界不少名伶都研习书画，诵读诗文，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

在戏曲和诗画交相贯通的艺术实践中，梅兰芳可说是一位既精于剧曲表演，又深通诗书画艺的一代宗师。他从涉足舞台以后，即与众多的诗画名家交往甚密，并悉心研习，进而便和诗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3年11月，梅兰芳应邀首次赴沪演出，便结识了吴昌硕、况夔笙、朱古微、赵竹君、俞粟庐、徐凌云等名家，经常同席聚会谈诗说画。翌年12月，梅兰芳第二次赴沪演出，上海《时报》主持人狄楚青特设宴为梅兰芳接风，并邀请吴昌硕、朱古微等名流作陪。席间，吴昌硕还热情地对梅兰芳说：“畹华，你这次来，我要好好地给你画一张着色的红梅。”时过不久，吴昌硕果然为梅兰芳画了一幅《红梅图》，上面还有于右任的一首题诗。

辉映天人玉照堂，嫩寒青晓试新妆。
皤皤国多情甚多，嚼墨犹矜肺腑香。

梅兰芳得到这幅珠联璧合的诗画墨宝，深为感激，不禁激起了学诗习画的兴趣。

两次赴沪，梅兰芳深切地感到戏曲发展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不能总是原封不动，应该走向新的道路去寻求发展。为此，他一方面着手编演新戏，探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研习诗画，加强艺术修养。他开始先临摹祖父梅巧玲留下来的画

谱、面具和墨迹，后来又通过热爱戏剧的诗人罗瘿公推荐，拜画家王梦白为师，开始临摹古代画幅范本。王梦白见梅兰芳学画用心，日有长进，便启发他说：“临摹范本，为的是打基础，同时也要观察自然景色、生物动态，作为写生资料。”于是他们又常在一起观察小鸟起飞、回翔、并翅、张翼的各种姿态，品赏香山山水树石的风采气韵，甚至还细致端详螳螂、蝈蝈的种种动态。因此，梅兰芳笔下的花草山水渗透着一股清丽素雅的灵气，而他的书法亦与日俱进，具有一种清柔端丽的风采。

1920年春，梅兰芳第四次赴沪演出，又与吴昌硕、何诗孙、朱古微、陈散原等名流聚会。梅兰芳即兴画了一幅《香南雅集图》、吴昌硕备极称赞，欣然在画上题写两首七绝：

明珠拂袖舞垂髫，嘘气如兰散九霄。
寄语词仙听仔细，异源乐府试吹箫。

堂登崔2初写罢，陪君禅语定香南。

临别之际，梅兰芳特到吴府辞行。吴昌硕又慨然赠送梅花一幅，并刻“清到梅花”石章送予梅兰芳的原室王明华。

从1914年起，梅兰芳即开始编演时装新戏。时隔不久，他又创排了古装新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等。在编演这些古装新戏时，人物的头饰服装就成了新的课题。梅兰芳主张“应该别开生面，从画里去找材料”。于是，许多热心的朋友便分头为他或借或买了好些古画。梅兰芳根据这些古典中仕女的装束，作为编演古装戏头饰服装的蓝本。

后来，梅兰芳又编演了《天女散花》，其中的绸舞就是根据古代绘画《天女散花图》的有关形象创造出来的。天女服装上的特征是两条风带，显示着驭风而行。梅兰芳就利用这两条风带来加强动作的舞

蹈性，创造了歌舞联翩、声画辉映的绸舞。此剧首演于北京吉祥剧院，一时轰动京华，备受赞誉。

1918年春天，那位爱戏爱才的诗人罗瘿公，特请从沪来京的徐悲鸿观看《天女散花》。观戏后，罗瘿公又出面约请徐悲鸿为梅兰芳画一幅《天女散花图》。徐悲鸿慨然允诺，随即以西洋画的写生技法和中国画的线条勾勒，画了一幅长约四尺的《天女散花图》。罗瘿公看到这幅婉丽多姿的画幅，喜不自禁，便在画上亲笔题写了一首古绝：

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可注颜。
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

日本学者久保得二当时亦观看了此剧，而且还喜得梅兰芳相赠的一幅《天女散花》剧照，亦欣然写了一首长诗，今节录几句：

一自司隶赋戏场，菊部南北较短长。
殊色昔有王紫稼，绝技今见梅兰芳。

在梅兰芳早期的艺术生活中，编演新戏和研习诗画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他热心于探求戏曲艺术的发展，更从亲身的舞台实践，领悟到戏曲艺术和诗画艺术息息相通的美学原理。因此，他始终以“学无常师，谦谦有容”的诚挚态度，广泛求师问艺，虚心向王梦白、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家学习。

1920年秋，有一天，齐白石来到缀玉轩，梅兰芳谦逊地说：“今天要请您画给我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我来替您磨墨。”齐白石笑着说：“我给您画草虫，您回头唱一段给我听就行了。”梅兰芳说：“那现成，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随后，梅兰芳一边磨墨，一边谈话；齐白石则对着白纸沉思了一会儿，就从笔筒中挑出两枝画笔，画了几幅草虫鱼虾。到了琴师来了，梅兰芳即唱了一段《刺汤》。齐白石听后点头说：“您把雪艳娘满腔悲愤的心情都唱出来

了。”接着，齐白石便在画纸上题写了两首七绝：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
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
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黄宾虹游蜀

日前在老友处偶见黄宾虹《蜀游诗草》及《蜀游画册》，由此联想起这位大画家游蜀的故事来。

那是1932年冬，黄先生入蜀游览，翌年初夏才回到上海。他在四川半年，先后登峨眉，游青城，涉夹江，抵灌县，又顺嘉陵江东下，探巫山十二峰。每到一处，他都以诗画纪胜，集成此“诗草”与“画册”。

黄老入蜀时，已年逾花甲，却没有一点儿龙钟老态。有一次去犍为，一日往返九十多里，老人健步如飞；夜晚回寓，仍作画达旦。回京后，有朋友让他谈感想，他兴奋地说：“不入蜀，不知雨中乐。”何谓“雨中乐”？原来其中有一段奇妙的经历。

那是早春天气，他去青城。清早出门，天气已有雨意；走了个把小时，雨就下起来了。老人照样前行，未料从金岩背转过朱岗口时，小雨竟变成了倾盆大雨。就在此时，他突然看到对面的崖壁，悬挂着许多条飞瀑。尽管雨下得大，老人仍选了块平整的岩石，坐着欣赏起来。此时风声、雨声、水声、松声在他周围交作。老人一边注视着千尺流泉，一边得意地吟诗一首：

泼墨山前远近峰，朱家难点万千重。
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画意浓。

那时，他好像泡在水池里，不但带去的写生本浇透了，连带去的干粮也变成了“粉糊”。老人只觉得世间好像只有他享受着这名山奇妙的雨景。

回到下榻处时，已是灯光通明，朋友看到他浑身的泥浆，都来慰问。及至他把情况说明，在座的诗人李亚衡即饶有风趣地说：“顾虎头痴绝，柳叶遮眼又隐身；黄宾虹痴绝，大雨饿肚游青城。”引得同屋人捧腹大笑。

次日清晨，他说身体不适，要求朋友们不要惊动他。其实，他是在“蒙被假寐打腹稿”，想把雨中所见，细细体会，然后从中找出画法规律。躺了半日，奋然披衣而起，磨墨展纸，一气呵成“青城烟雨图”十余幅。有的用泼墨，有的用焦墨，也有的用干皴而加彩墨。后来他在“题画嘉陵山水”中把这些体会加以总结，写道：“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淋墙头日移壁。”关于这个“雨淋墙头”，他曾在一封信中加以说明：

> 青城大雨滂沱，坐山中三移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淋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骨，墨不碍色，色不碍墨也。

可知他是从大自然中吸取笔墨颜色变化的。

李可染以牛为师

牛年来临之际，已故国画大师李可染的故乡江苏徐州发行了制作精良具有珍藏价值的金银牛卡，几百套印制有李可染牛画的金银卡一售而空。李可染的牛画有着长久的艺术魅力，而他以牛为师的精神更为可贵。

李可染自幼家贫，父母均不识字，却有着一股顽强上进的犟劲头，十三岁时因爬墙头痴迷地观他人作画，而有缘得画师钱食芝赐教。青年时代求学于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术院，1932年，所作大幅《钟馗》入选于南京兴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在画坛崭露头角。抗战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的文化工作，创作了大量抗日宣传画。作品《是谁破坏了你快乐的家园》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悲愤，激起了广大同胞的共鸣。

1942年，李可染与郭沫若等文化人同住重庆郊区金钢坡。由于敌机狂轰滥炸，许多事想做却做不成，而见到居处农家的粗壮水牛，却依然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默默耕耘。李可染耳濡目染，并联想起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郭沫若的“生也牺牲，死也牺牲”等对牛的赞语而深有感触，遂决心以牛为师，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以牛的精神去做人的工作。

他将画室命名为“师牛室”，并刻有“师牛”“师牛堂”“孺子牛”等印章自勉。他以牛为模特儿，寄托自己的理想。他在画牛跋语中题词道：

>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挤奶，终生劳瘁，事农而不居功；性情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

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把牛作为中国人民勤劳、踏实、善良、奉献等美德的写照，是李可染持四十多年塑造牛的形象且乐此不疲的驱动力。

李可染笔下的牛画，或充满了勇敢和力的阳刚之美，如《斗力图》的二牛相争，《犟牛图》的牛与牧童的较力；或具有温顺和平的阴柔之美，如一幅牛画所题："牧童悠然牛背上，信口漫唱和平歌，1985年为拯救地球上的生命而作"；或具有自然美与人物美和谐统一的意境，如《梅花开时天下春》的牧童和牛同赏梅花，简直分不清是牛像李可染，还是牧童像李可染了。据有人统计，抗战期间，李可染就画了几十幅牛图；而他流传于世的全部绘画作品，估计总数不足八百幅。他逝世后出版的《李可染书画全集》四卷，"牛"与"人物"就列为一卷。

李可染以牛为师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画上，也体现在他成就最大的山水画的创作上。他以"精读大自然""峰高无坦途""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指艺术传统），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指南，足迹遍中华，"为祖同河山立传"。七八十岁还为治疗叠趾症而狠心截去了三个脚趾，实现了登井冈、上黄山的夙愿。面对来自中外的巨大荣誉，他谦虚地说："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这正是牛的锲而不舍的精神。

李苦禅拉洋车

著名画家李苦禅，在中国画坛上卓有成就；可谁知道，他年轻的时候，竟为了糊口而拉过洋车呢。

1923年，李苦禅从山东来到北京，投奔齐门，拜白石老人为师。他寄居在古旧的慈音禅寺，每天要到北京艺专听课，还要赶去齐家学画，生活十分艰苦，若无家中接济，连大饼红薯也吃不上。

一天，李苦禅在西四碰上了拉洋车的旧友丁五，灵机一动，对丁说：“丁哥，我想请你帮我租一辆洋车，俺也干你这个行当了。”丁五问他：“哪有大学生拉洋车的？”他无可奈何地答道：“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呀！”丁五见他一片诚意，便点头应允。李苦禅非常高兴，一把将丁五推上车说：“现在我来试车，你是第一个乘客。”说完拉起车就跑。跑着跑着，一下未掌握好平衡，差点儿让丁五翻下车，急得丁五忙喊：“快压平，用力压平。”两人边教边拉，一口气跑到阜成门的洋车铺，由丁五担保，租到了一辆旧洋车。

李苦禅租到车后，把车藏在慈音寺后堂里，每天照常听课学画，傍晚或假日就去拉客。每回拉车，他都尽量远离白石老人的住所——跨车胡同，免得被人撞见，丢了老师的面子。一天，白石老人因事暂停教画，李苦禅抓紧时间，拉着车子去了商店多、生意好的王府井。不曾想路过一家书画店时，正遇上白石老人和几位朋友从里面走出。李神色紧张，刚想转身躲开，已被老师发现。白石老人大声喊道：“苦禅，快过来，送我回家。”李下意识地“哦”了一声，转身请老师上车，话也不敢说，拉起就走。路上，老师问他：“你生活艰苦怎么不告诉我啊？”李答非所问道：“我给老师丢脸了。”“丢什么脸，我是当木工出身的，也算丢脸吗？都是凭力气吃饭，是正当的。”

回到家里，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李苦禅说：“苦禅，你现在学画是最主要的。”白石老人劝他把洋车退掉。为了帮他解决困苦，老人当天便叫他搬到自己院内的一间厢房里居住。又挑选了他的一些画，亲笔提款后送去画店卖掉，资助他学画。

白石老人非常赞赏李苦禅的画和为人，曾在这位得意门生的一幅《墨扁豆》上风趣地题写“旁观叫好者就是白石老人”。还曾在苦禅早年的一幅作品上写道：

>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苦禅名）也夺我心。英也过我，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之间是无鬼神矣！

他在对学生讲课时，也常以苦禅为例，并居然断言：“你们数十年后便知，白石后笔墨便推苦禅。”白石对一个后辈作如此赞语，除李苦禅外，无第二人。

有几年时间，由于苦禅对白石的敬重与崇拜，对老师的作品手摹心随，处处效法老师的技法，谁知却受到白石老师的告诫，反对他如此学法。提醒他应学人家之长处，而不能食而不化，博采众长才能自成一家。要明白“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道理。

苦禅把老师的谆谆教导铭刻在心。几十年后，当他成为绘画大家后，也教导他的学生，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艺术上才能有所成就。

齐白石慧眼识苦禅，苦禅也不愧为白石衣钵传人。

吴作人战地写生

著名画家吴作人是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入室弟子。1930年5月，在徐悲鸿的推荐下，他到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后又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接受全面的美术训练。1935年毕业时，以一幅《男人体》油画被评为全校第一名，获金质奖章。学成后受徐悲鸿聘请，回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美术系讲师。

但是，在吴作人刚刚步入教师生涯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之后，上海“八一三”事变很快发生了。紧接着，日本飞机便大肆轰炸南京，迫使学校停课，吴作人只得停止教学，把教具等运往重庆。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之年龄，对侵略者切齿痛恨，决心投笔从戎，以报效国家和人民。在徐悲鸿的大力支持下，他辗转到达武汉，找到当年的老校长、时任总政治部宣传厅文艺处长的田汉，被分配做文化宣传工作。

此时，田汉正在物色赴前方战地写生的美术人员，吴作人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吴作人接受此项任务也感到十分高兴。然而，当他们逐级上报审批时，却遇到了麻烦。厅长郭沫若和副主任周恩来都表示积极支持，但主任陈诚却迟迟不肯签字，致使赴前线写生的计划被拖延了下来。

事情传到老师徐悲鸿那里，他想了一下，便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吴作人直接去找参谋长白崇禧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此二人均为桂系军人，当年徐悲鸿在桂林时曾绘制一巨幅油画《广西三杰》，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闳三人的骑马像画得气势非凡，深得三人之赏识。这一招果然灵验，白崇禧批示由办公室主任程思远亲自接待并提供一切经费和方便。吴作人手拿战地通行证，立即出发了。他来到前线，见到了刚刚指挥完“台儿庄大战”的李宗仁，表示了极大的敬佩

之情。李宗仁一派儒将风度，礼贤下士，为吴作人接风洗尘，并专门指定一名军官做向导，保护吴作人到前方实地写生。

吴作人在纵贯豫东、皖西一千多里的土地上，登碉堡、下战壕，探伤兵医院，访难民收容所，看到了军民团结一致、不屈不挠、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在军营里，他见士兵们军容严肃，训练繁忙，摸爬滚打，枕戈待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已如弓上弦，势在必发。此时此刻，画家的心已和战士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情绪异常激动。他艺术灵感大发，用速写记下了许多感人的英雄形象和轰轰烈烈的动人场景。他把汗水和士兵们一起洒在了阵地上，在战斗打响之前，李宗仁用车把他接回了信阳指挥部。

通过战地写生，吴作人不仅把抗战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在日寇铁蹄下千万同胞的悲惨情景活生生地画了下来，并且还综合绘制出一幅《赴战前夕》的大型油画。他们浓郁的气氛表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忘我战斗的气概，也抒发了画家强烈的爱国之情。回到重庆后，在徐悲鸿的指导下，吴作人举办了“战地写生画展”，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玉泉道旁风眠居

西湖的西北角，山峦起伏，林木茂盛，清静幽雅，颇受艺术家们的青睐。故而，此地有栖霞岭麓的黄宾虹故居，有马岭山下的林文铮老屋，还有玉泉道旁的林风眠旧宅，它们都依山面湖，风光无限。

林风眠的旧宅位于植物园山门的北侧，是一幢青砖黑瓦的两层小楼。南面是台阶和大门入口，西边为一凸出之平房，朝北则是附属用房。室内的顶壁、墙面、地板都以本色木信板拼嵌，自然大方，返璞归真。据说整幢别墅是按照林风眠先生的创意设计建造的。

林风眠于1900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家，祖父是石匠，专造石制墓椁、碑石。风眠儿时便当上了祖父的小帮手，祖父对他疼爱有加，整天叫他在一旁磨凿子，递榔头、学画图案、刻花样，还教了他许多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十七岁时，他离开家乡，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艺术专科学校。二十五岁，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创办国立北京艺专，为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颇得蔡元培的器重和厚爱，时常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

1928年春，西湖国立艺术院成立时，蔡元培着意让林风眠担任院长，当年他任校长的北大已成为新文化的摇篮，他有心把国立艺术院亦创建为新艺苑沃土。因此开学典礼时，他不仅偕夫人亲临，而且有意寓居西湖北山葛岭下林风眠的木屋陋室达五天之久，在此接待各界人士。此举无异于向社会推崇林风眠这位不可多得的艺坛英才，使之站稳脚跟，办好学校。

由于蔡元培的全力支持，林风眠与其他学者又热诚工作，从而使西湖国立艺专办得非常出色，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美学人才，赢得了“艺术家摇篮”之美誉。

林风眠在他的居所里植有竹、海、月季、玫瑰、菊花、鸡冠花、南天竺等花卉树木。在台阶的水泥条梁花架上，则又爬满了蔷薇、凌霄、紫藤等攀缘植物。花园的周围，还种了草莓、玉米、向日葵等蔬果。林先生于教学作画之余，常常自己动手，在花园里浇水、剪枝、锄草。有时，他还会指着这些花木，笑谓人曰：“这是我作画的模特儿。”他曾说：“要画好花，有条件不妨自己也动动手，种种花。画花的人，应当比别人爱花、惜花。只有这样，画起花来才有感情，才能画好花。”20世纪50到60年代，林先生寓居上海南昌路，寓所虽然没有了花园，也没有了草地，但他仍爱在门前、家中，特别是在画室内，摆上几种瓶花或盆花，如葛兰、绣球、玫瑰、月季、瓜叶菊等四季花卉，让自己的家充满花的芬芳，洋溢美的气息。

花，是林风眠笔下出现最多的画题。在林先生的画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那密密麻麻的一大堆花，也不乏疏疏落落的两三朵花。林先生赋予了他画中的花深刻、美好、丰富的内涵，或描绘人间悲欢离合，或寄托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他在临终前曾有过表示，要“将自己的骨灰用作养花的养料”。林风眠的一生确与花结有不解之缘。

傅雷为黄宾虹卖画

1937年6月，画家黄宾虹应故宫博物院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之邀，去北京鉴定古书画和教授国画。孰料甫到北京，“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维持生计，只好靠卖画为生，除北京的好友外，上海的翻译家傅雷也曾为他出过力。

1943年，适逢宾虹先生八十诞辰，北京艺专的日本顾问要为他开祝寿会，宾虹先生毅然拒绝。傅雷得知消息后，遂与上海的宾虹弟子、友人发起举办“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远在北京的黄宾虹欣然同意，加紧创作，寄往上海。

展览会主要由傅雷等人负责。由于黄宾虹的画件并非一次寄到上海，而是创作一批寄一批，虽给博雷带来麻烦，但他总是认真对待此事。每有来件，必清点登记，然后复信报告宾虹。

为了办好此次画展，傅雷又联系图录印刷、场地布置、光线照明、售件定价等，事无巨细地都要一一过问，直到满意为止。画展地点是借在宁波同乡会馆内。布置会场，悬挂画件，傅雷从半夜忙到天亮。

10月19日是黄宾虹的诞辰日，这天画展如期开幕。这次画展共展出黄宾虹供出售的近作一百七十七件，另有历年所作赠送给诸子弟好友的作品三十九件，供人观摩。画展期间，共计卖掉字画一百六十件，售得款项约十四万三千元，去掉各项开支，“大致净盈余在十二万左右”，这样的成绩是空前的。

黄宾虹的画在一般人看来有草率艰涩之感，为使观众深入理解，傅雷特撰写《观画答客问》一文，阐述宾虹的艺术的魅力所在。这篇五千余言的文章，刊于当时画展特刊上，是迄今为止解释宾虹艺术最

为深刻的一篇文字。

画展结束后，剩余的十多幅画存放傅雷家，由傅雷物色买主。以后，黄宾虹每有新作，总要寄至傅宅，托其代售。傅雷总是尽心尽力，设法予以介绍流布。但傅雷为宾虹售画有一原则，即只售给那些真识宾虹画的人。傅雷在给宾虹的信中曾写道：

> 敝处历来传播法制，均以不落俗手为原则，且寒斋往来亦无俗客，而多寒士。大抵总不致使吾公有明珠暗投之叹，可以告慰耳。

对傅雷的尽力帮助，宾虹非常感激，常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赠给傅雷，或让其自由挑选。对此傅雷常诚惶诚恐，总是设法筹款回报，彼此揖让，表现了两人在利义关头的高风亮节。

傅雷为宾虹经手画款，至1948年宾虹南下杭州而结束。前后虽不过五六年时间，但友谊与日俱增。黄宾虹一直为认识傅雷这样一位目力过人的后进而深感庆幸。

1955年宾虹临终之时仍念叨着傅雷的名字，说是他平生一大知己。

郭沫若喜绘兰草

提起郭沫若，人们只知道他是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还喜爱绘画。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驻湖北武昌。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福岗九州帝国大学的同学范寿康正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范把郭沫若和于立群安顿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教职员宿舍里，两家朝夕见面。有一天，范寿康的女儿范令棣拿出一把檀香骨的小折扇，打开白扇面，央求郭伯伯绘画题字，郭沫若推却不过，拿起笔来画了一小撮兰草花，并题了如下的字：

我本不善画画，但令棣世侄非要索画，只能勉为其难，识者见之，当发一笑。

兰草花虽仅寥寥数笔，但配上苍劲潇洒的题字，显得非常精神。多少年来，范令棣一直珍藏着，可惜在十年浩劫中也当作“四旧”给毁掉了。

郭沫若素来喜爱兰草花的高洁。就在逃离日本回归祖国前的1937年初夏，郭沫若曾给日本友人小原荣次郎的《兰花谱》题诗：

菉葹盈室艾盈腰，谁为金漳谱寂寥。
九畹既滋百亩树，羡君风格独嶕峣。

郭沫若在诗中斥责了“菉葹”（恶草，喻反动势力），并赞扬了兰花的洁白坚贞，表示了自己虽身居异国，但与祖国革命力量仍息息相通的深挚感情。这种感情又再次表现在他给范令棣的兰草花中。不同

的是，他已经逃出日本军国主义的虎口，投身到祖国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洪流里来了。

郭沫若给范令棣画兰草花，并非偶然兴起。其实，郭沫若在少年时代就曾一度喜爱绘画。话得稍微说远点。清代光绪十八年至三十二年（1892～1906），郭沫若在家乡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上一座院落里度过了十四个春秋。他在家塾“绥山馆”里，除读“四书”“五经”等古书外，还喜欢描摹《芥子园画谱》。他大哥郭开元也善书画。开元从外地寄回来《启蒙画报》，成了少年郭沫若喜爱的良师益友。据沙湾镇的父老说，郭沫若小时候不仅会画兰草花，还会画菊花和梅花。

沙湾镇郭沫若故居内有一间郭沫若小时与九弟郭开运共读的书房。房外小厅壁上悬挂着一幅开运绘的国画，画的是葵和菊。1943年12月27日，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寓所给这幅画题了一首五律诗：

不因能傲霜，秋葵亦可仰。
我非陶渊明，安能作欣赏。
幼时亦能画，至今手犹痒。
愿得芥子园，恢复吾伎俩。

从诗和题款中，我们可以知道郭沫若少年时代曾一度倾心于丹青。再从他后来给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关良、张悲鹭、东方人等人的题画诗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绘画的欣赏能力是很高的。

小说大师爱丹青

提起张恨水，人们都知道他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师，又是著名报人。他一生写了一百多部小说，共约两千多万字，据说打破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纪录。他每天可以写五千字，一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才放下笔。他写的名著《啼笑因缘》，从1929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起，到现在仍然有口皆碑，许多地方还在改编上演。他从事新闻工作多年，被人誉为旧时代新闻界的“安徽三剑客”之一，另两位是张友鸾和张惠剑。但是，他在写作和办报之余还喜爱绘画，这就鲜为人知了。

“文革”结束之后，笔者曾去拜访过张友鸾，老先生告诉我一件张恨水绘画的故事。那是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有位朋友拉张友鸾到官场中去。他自命清高，婉词拒绝。张恨水知道后，就提起画笔，在他的书页上画了一座山峰，几棵松树，并题了一首诗道：

托寄华颠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
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

张恨水题完诗笑着对张友鸾说：“你若不喜欢，就撕掉吧！”张友鸾说：“何必撕掉呢？留下作个纪念吧！”

这个故事说明张恨水的为人，也是名士清高，不恋尘俗。他写了一辈子文章，做了几十年新闻工作，从未涉足官场，在旧社会里，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像许多文人一样，张恨水也爱养花。在他那堆满文房四宝的书桌上，常有盛开的鲜花。但以菊花最多，张恨水爱养菊花，也就更爱画菊花。他曾写过一首咏菊的词《浣溪沙》：

添得茅斋一味凉，瓶花带露供书窗，翻书摇落满瓶香。
飘逸尚留高士态，幽娴不作媚人装，黄花同类哪寻常？

张恨水北京住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嵌在镜框里的《菊石图》：画上有一块石头，四朵菊花，一朵红，三朵黄，楚楚可观。书的上角题了两句诗："托根唯有石，矫叶不知风。"

还有两件张恨水画菊的故事。1947年夏天某日，张恨水去访好友左笑鸿，见其手中摇着一把新买的白纸折扇，于是拿过来看了看，问："怎么不着一字呢？"左笑鸿说："一把粗扇子，不值得写画。"张恨水说："我来。"于是提笔画了一幅墨菊，上下还落了款。这时，曾给梅兰芳编过很多戏的齐如山一步迈进，就一把拿过扇子相看，左笑鸿就说："还有一面，白的，偏劳啦！"盛情难却，齐如山只好提笔写了字，落了款。以后很多人见到此扇，都说是一把"双绝"的扇子。

也是1947年，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过生日，左笑鸿特意买了个黄铜铸的墨盒，想请张恨水添些墨笔再送给张友鸾。张恨水很高兴地在上面画了一幅菊花，还签上"应笑鸿嘱为友鸾作"数字。左笑鸿看后十分高兴，又挥笔写了"笑鸿特赠友鸾兄"几个字。由此可见三人友情之深厚了。

丰子恺蜀中卖画记

抗战时期，丰子恺卜居重庆沙坪坝，以卖画为生，署名“缘缘堂”。

1944年春，笔者曾到沙坪坝拜访丰子恺，共进午餐，在座的有重庆和成银行秘书萧伯钧和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人吴朗西。

酒酣耳热之际，大家谈笑风生。我说：“丰先生的漫画别具一格，富有生活情趣。抗战前我看到丰先生画的《穿了爸爸的衣服》那一幅画，寥寥几笔，小孩的天真神态活跃纸上，至今尚留有深刻的印象。”丰子恺笑笑说，他的画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理解。

接着，他就说了一个故事：他初到重庆时，准备以卖画为生，特制缘缘堂画笺，亲绘版式，交给沙坪坝一位擅长细木活的木工刻版，作为复印底子。这位木工刻好后说：“丰先生，布画的版式四条边线都是弯弯的，四只角也不成直角，我用木工专用工具角尺给布校正过来，比你原来画得好得多了！”丰子恺说：“你刻的这张板子我不要了，另外照我画的原样再刻一张吧，我加倍给钱。”这位木工大惑不解。丰子恺又说：“我和你不同，我就靠那几笔弯弯卖钱，你把它刻成笔直的线，我的画就卖不掉了。”

同年12月，重庆商务日报记者蒋良仙陪丰子恺到川北良中县举行画展，嘉陵江的水光山色和川北地区人物的朴实生活，曾收入他的画卷，受到当地人士的欢迎。丰子恺对嘉陵江秀雅绝伦的风光和山区人民勤劳、朴实和富有人情味的风貌，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年重庆的哑巴诗人陈未云也曾陪丰子恺到川东酆都县举行画展，丰子恺对那里的无数神奇传说感兴趣。丰子恺在酆都参观了十一座阎王殿，对庙中塑像的造型艺术颇为欣赏，但他并未像唐代画家吴

道子那样，让千奇百怪的鬼魔群像在他的笔底出现。有人向他索画时，他常爱画一幅阿弥陀佛的坐像相赠。

丰子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生活颇为艰苦，蜀道也不平坦，他毫无怨尤，安之若素，苦撑到抗战胜利，才离开四川。

丰子恺作古已多年，想到他那光风霁月的胸怀，使人顿忆起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1942年10月10日圆寂前三天写的偈语：

吾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关山月第一次在成都办画展

近日偶然阅读《关山月传》一书，不禁回想起这位领南画派大师五十年前在成都第一次举办画展的趣闻。

抗日战争当中，关山月偕夫人李小平来到大后方的四川省会成都。他们借住在督街与老马街拐弯处楼上的留法比瑞士同学会。同时，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如吴作人、庞薰琴、马思聪、刘开渠、余所亚、黎雄才、叶浅予，以及四川的张蓬舟、谢趣生、车辐等人也都居住在附近。无论是开音乐会、演出话剧，举办一切艺术活动，都是为了抗日，争取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关山月年轻勤奋，每天埋头作画，坚持不留积墨过夜。他在成都举行画展的时间是1942年，那时他刚新婚不久，妻子又患重病，处于穷困之中，幸得朋友们大力帮忙，诸如由画家姚石倩出面担保才租借到展览会场。画展开幕之前就得到张蓬舟（《大公报》特派员）、谢趣生（成都《新新新闻》漫画版主笔）、车辐（《华西晚报》外勤记者、漫画家）这几位新闻界好友的广泛宣传报道。开幕当天，文艺界的前辈、巨匠、画师刘开渠、赵望云、庞薰琴、叶浅予、吴一峰、黄独峰、黄笃维、张采芹等都及时到会祝贺。出人意外蜀中大画师张大千竟然也来了。关山月喜出望外，忙上前接待，并陪同参观。张大千在看完一遍画展作品之后问关山月：“您的作品最高价格订的是好多嘛？”关答：“最多的为一千元。”原来张大千早已选中一幅立轴，张大千对该画再次细看，便亲笔在红色标签上写了“张大千订”四个字。

这个消息立即传开，很快被报纸刊登出来。有家小报竟用醒目的标题“张大千钉‘订’著关山月”予以报道，一时轰动了锦官城。要论那时一千元确乎是个大数，因为张大千这一大出手，使得购画者更加踊跃，光是继订张大千所“钉”的这幅《玫瑰花》佳作的，就有二十多

位。这些画展后，关山月夫妇上青城寻幽，到峨眉觅景，且沿川陕公路穿翠云廊、观赏剑门七十二峰，过广元明月峡，漫步千佛岩，饱览三国故道，谒留侯庙，入庙台子。往西行走到黄土高原，踏朔北沙丘，上祁连山，至敦煌石窟，畅写大自然风光，登上艺术更高峰，其知名度亦大大提高。

沈醉与白石老人的画缘

人们只知道沈醉先生是起义将领，生前出过十余本有关军统内幕的书，也能诗擅画，但他在鉴赏方面的造诣却不大为人所知。

沈醉在抗战胜利后，曾参加故宫古物清点，颇得益于鉴赏名家的教益。他在担任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期间，经手不少文物古籍，耳濡目染，也熏陶了他的鉴赏本领。但他虽喜好书画，却无力收藏。他所收藏的字画，大多是“文革”以后当代名书画家赠予的。

不过，沈醉却因偶然的机遇，一次就得到齐白石老人赠给他的三幅精品和两方印章。那是1946年春，沈醉以军统局接收大员身份来到北京。偶然一天，一位朋友要去拜访齐白石，向沈醉提及。沈醉惊喜过望，他与白石老人同为湘潭同乡，且仰慕已久，早有求画的愿望。况且，沈醉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他幼年出生、睡觉的大床床头上就有当年白石老人雕刻的莲花、牵牛花等图案，卧室木柜的玻璃柜门后也贴的是齐白石的四幅画。他稍长后，作为南社诗人的母亲多次向他提起过齐白石。所以，沈醉可以说是自幼便耳熟能详了这位大画家的作品和名字。

沈醉见到白石老人后，因是同乡，老人首先便有亲切之感。当沈醉提到那四幅老人的早期作品时，老人竟激动得站起来，请求快把那些画拿给他，他情愿用十幅换一幅。

沈醉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他火速发电报给湘潭老家。数日之后，家人日夜兼程把画送到京，只是有一幅因年久破损已揭不下来了。当沈醉将《吉庆有余》等三幅早期作品送到白石老人寓所时，老人听说有一幅已破损，十分懊恼。但他仍然很高兴。当即回赠给沈醉《百虾图》《枇杷图》《百鸡图》三幅精品。虽然不是十幅换一幅，但沈醉

已是大喜过望了。这几幅并非即兴应酬之作，皆为用心而作的精品。更令沈醉惊喜的是，老人因为高兴，竟又主动提出为他刻两方名章，老人当即挥刀，边谈边刻，不太长的时间两方章即已刻成。一方为“沈醉”，一方为“沈泡海”（沈醉别号）。沈醉如获至宝，以后他一直将这三幅画和两方印章视为珍品须臾不离。1949年，他将画、章交与前妻带往台湾，后来前妻去香港，沈醉多次询问，其妻已没有印象了。这些珍品大概就永远留在台湾了。在沈醉逝世后也未回归。

说起沈醉的这次机遇也是有前提的：第一与白石老人是湖南小同乡，第二是送还其早期作品。否则，以白石老人厌恶官场人物的脾气，他是不会给沈醉赠画的。只是遗憾这几件精品得而复失后终未失而复得。

不过，沈醉收藏的当代名家书画作品是颇多的，当然都是后来所得。其中有赵朴初、梁漱溟、溥杰、李苦禅、范曾、李一氓等人的作品。至于文学艺术界人士相赠的作品更不在少数，有艾青、臧克家、管桦、郭兰英等。沈醉很珍视这些朋友们赠予的作品，尽管不是古董。沈醉生前多次讲过，这些书画作品几乎每一幅都体现着动人的情谊，每一幅字画都可以讲出一个体现着友谊的感人故事。

伯乐陈垣识启功

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曾应邀莅港讲学，他不但是文物鉴定专家，而且精翰墨、工绘画。他出身于满族世家，姓爱新觉罗，字元白，生于1912年。如果他是千里马的话，那么这与著名学者陈垣先生这个伯乐是分不开的。

启功幼年家境困窘，念到初中就辍学了。但是他发奋攻读，跟随一位老学者戴姜福继续学习。1933年经人介绍认识陈垣先生，陈垣看过他的功课，认为“写作俱佳”，遂推荐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两年后，因无大学文凭，遭校方解聘。

独具慧眼的陈垣先生，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他不顾舆论压力，毅然聘启功来校教授大一国文。这在当时，是需要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

陈垣不仅选拔、擢用人才，且将自身多年经验传授后学。他亲自过问一年级各班国文课，并自己教一个班；学年末全校国文课会考，他亲自出题，统一阅卷，评定分数。所以启功能够被辅仁这所天主教会所办的高等学府聘为国文教授，是与陈垣的扶掖分不开的。

由于潜移默化，悉心学习，启功在文物考证、鉴定、书法艺术方面的知识也与日俱增。陈先生的客厅、书房以及卧室，总挂些名人字画，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也摆些字画卷轴或书籍，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有时启功去了，陈先生会指着某件字画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陈先生必大为高兴，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如果不知道，则仅简单指点一下就不再往下多说，例如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就完了。而学生自愧才疏，或者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白了一些，下次再

向陈先生表现一番，先生自是既高兴且鼓励。

陈垣先生于书法有很深的造诣。他收藏了许多碑帖拓片，有极高的鉴赏力。他学风严谨，临池亦一丝不苟，其书作秀丽匀称，潇洒自如。这无疑给启功很深的影响，在他的学书经历中，尤其注重古今墨迹、法书精品，形成了温雅清净、自然大方的特有风度，被同道誉为有书卷气的上乘之作。启功的《论书绝句》中有云：

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拳未几遭。
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

这也正是陈垣先生艺术思想的写照。

如今，陈垣夫子逝世已几十载，其高足启功亦年过古稀，但启功卓著的学术成就以及对恩师遗志的发扬光大，也足以告慰陈垣先生了。

王森然与齐白石的友谊

1979年8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年过八旬的王森然教授的个人画展。中外参观者络绎不绝。著名画家李苦禅留言道：“吾辈一生追求便是如此……森然兄画，耐人长时寻味。”很有意思的是，三十五年前，也是在这里，王森然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而提及那次画展，则不能不谈到王森然与齐白石的友谊。

王森然，原名王黌，直隶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人，1895年生。他早先不涉足画坛，而是致力于文化教育，并有著述十多种。在中学时期，偶然结识了蔡元培。后来考入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因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组织了“新教育改进社”“新文化研究工会”，被曹锟下令通缉，遂改名王森然，化装逃亡北京。蔡元培接他到自己家里，为他安排了生活和工作。王森然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

王森然的国画为世人所知，是丹青高手齐白石向社会推荐的。齐白石尚未成名时，在石驸马大街卖佛像和人物画挣钱度日。王森然其时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常去买齐白石的画。齐白石后又到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王森然登门拜访过。齐白石当即挥毫泼墨，送给王森然“一头鹰”。从此，两人交往密切。

君子之交，总以诚相见。当时，齐白石的画已有声誉，但对治印中的篆书尚在学习中。有人出钱请齐白石治印一方，不久又退了回来。王森然托起这方印章一看，原来是将大篆小篆混用了。他也不客气，对齐白石从钟鼎金文讲起，直到大篆小篆，后又赠送《六书同》一册。齐白石的篆刻，经王森然的指点，大有改观。

1944年5月，王森然画了一幅京剧的花脸脸谱，颇为得意，就送给齐白石去看。齐翁看罢，便在上面题道：“森然弟不尝作画，此幅

老辣活泼不常见，如若苦禅见之当再挥笔不已。”他不信是王森然手笔，竟直率如此。王森然急了：“你是不是不相信是我画的？”齐白石笑着点点头。第二天，王森然只好请来了李苦禅对证。李苦禅老老实实地说：“我没画过这种画。”齐白石仍然不信，对王森然说：“将你的画统统拿来看看。”王森然这才将授课之后、著述之余，画的三百多幅花鸟山水画，都抱出来，请齐白石指正。谁知齐白石看了，惊喜得拍案叫绝，连声说：“我要给你办画展，马上就办！”王森然没有钱装裱，齐白石便拿出钱先垫上，并亲自题词，共有二百余幅，还为画展撰写了前言。前言中说：

> 森然之画，用工几四十年，凡昔时名家法，当冶为大成。余早知森然考据音韵，创作文艺，未知画亦能事……

在齐白石的主持下，王森然第一次个人画展便誉满京华。五天内，所有展览作品，销售一空。从此，王森然一脚踏上画坛，并与当时画坛名流赵望云、李苦禅、王雪涛、胡佩衡、徐悲鸿、王青芳、许麟庐等结为好友。

闻一多的绘画和篆刻

提到闻一多，人们想到的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和他的《红烛》、他的《死水》，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前无古人”的成就以及他壮烈的牺牲。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绘画方面也有着很高的造诣。1999年11月24日，是闻一多百年诞辰的日子。在这前后，中央美术学院和炎黄艺术馆在闻一多子女的支持下，共同举办了“闻一多美术作品展”，这个展览使几乎每一个参观者感到惊讶，他们在这里看到了闻一多的另一面——一个画家闻一多。

据闻一多的三公子、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闻立鹏先生介绍，美术界人士看过展览后也感到吃惊，并对展出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许多作品如《死水》和《猛虎集》的装帧设计，《梦笔生花》《对镜》《水墨人物》等绘画作品，不仅在当时是一流的，即使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堪称杰作。据悉《中国美术全集》和作为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国美术最高成就的《20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均收录了闻一多的美术作品。一些美术界、艺术界、学术界知名人士观看展览后认为应当重新认为闻一多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展览的前言也指出：闻一多“留至今天的美术作品已寥，但足值珍贵。它们是极富思想含量和感染力的。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现实抱以关怀的赤诚之心，看到他在艺术上求真的力度与寄注的深情，看到他在古今之变、中西之争的世纪转折之中深邃的思考和非凡的创造力。”

其实，闻一多以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闻名于世，而他的人生道路其实恰恰是从绘画开始的。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就受到美术方面的训练并表现出极高的天赋，1922年至1925年在美国留学时，又学了三年的油画，受到正规、专业的训练。回国以后，他积极参与了中央

美术学院前身——北京国立艺专的教学建设，曾担任该校教务长，并一度兼任油画系主任。而他作诗、做人，也都追求着美，追求着美与真和善的统一。他的诗，追求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和音乐的美；他的人生，追求着精神的美、人格的美：他由追求美的艺术到追求美的社会，并为了这追求而献身。他的一生就是一首美的诗，一幅美的画。

尽管如此，美术创作活动毕竟只是闻一多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闻一多的绘画作品更是数量极少。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抗战期间他随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由长沙步行到昆明途中所作的三十余幅速写，以及早年在清华做学子期间为《清华周刊》所画的插图和后来为友人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等人作的封面设计等。但各路专家认为，尽管留存下来的闻一多的美术作品数量极少，篇幅也不大，但其艺术质量与价值却是很高的。这些作品不但在艺术技巧上达到高超的水平，其鲜明的时代色彩、中国风韵和个性特征也体现了闻一多创造“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艺术追求，可以说，它们是20世纪中国美术前辈名师融合中西艺术精粹的一种成功的尝试。

闻一多不仅喜爱美术，1925年他回国之后，还对篆刻钟情浓厚，1927年夏，他给饶孟侃写了一封短信：

> 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谅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奇特的构思，凝练的诗言，巧妙的比喻，拟人的修辞，令人读后拍案叫绝。多么幽默、活泼、超脱。从简短的信中，可窥视闻一多走过的从艺道路和情感的变化。其子在电视节目中介绍，闻一多经常刻字到深夜，睡梦中都能听到刻字的声音。“何妨一下楼”这枚传世印

章，据说是闻先生半月闭户不出门而创作出来的。

由于闻一多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因此他的篆刻也与众不同。类别上有仿秦印，也有仿汉印；刀法上有切刀，有冲刀；文字上有甲骨文、钟鼎文；布局或屈曲缠绕，或平直方正。虽多为名章，但件件都可当成艺术品。其分朱布白，疏密有致，刀法刚健，风格或苍劲挺拔，或端庄浑厚，给人以雍容、古朴的艺术享受。古人云："诗言志"，闻一多则"印亦言志"。他一生不知亲手刻下多少印章，其边款皆为名言警句。1944年，他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镌刻：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短短的四十个字，生动流畅，自然亲切，道出了印章的材质、功能，赠与好友礼轻情谊重，表达了先生的赤诚之心。

一信一诗，足见闻一多的才华横溢。文笔锋利，但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幽默、诙谐，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中国古代，苏东坡、唐伯虎、纪晓岚等文人机智风趣的妙语成了他们轶闻趣事的源泉，触景生情，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寓意其中。闻一多一生爱国，学识渊博，语言惊人，超过前辈，实乃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石与白石间的趣闻

欧阳中石是逻辑学教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和京剧奚派传人，但最近报载他的玉兰丹青，出手不凡，震惊艺林。

其实，20世纪40年代中石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时，经一位友人介绍认识了齐白石老人的三公子齐良焜。良焜字子如，时与白石老人同住北京西城跨车胡同。中石和子如一见如故，过从甚密，子如便将中石介绍给齐老。齐老得知欧阳中石正在辅仁大学读书，则称其为“洋学生”。

有一次，中石到齐府，正逢齐老躺在藤椅上晒太阳。老人看见中石进来，便呼道：“洋学生，过来。”

听到齐老的喊声，子如也从他的房间走出来。

“洋学生，给我讲讲什么是平行线。”齐老接着说道。半天，中石还摸不着头脑，小声地问道：“你的意思是？……”

齐老解释说：“我是问你平行线的定义。”于是中石把平行线的几何定义背给齐老听，齐老听毕，非常感兴趣地说：“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话给我说一遍？”

中石稍加思索后，便回道：“您看见过火车道吧，火车道轨就是平行线。”

齐老点点头，以示明白，随即把子如和中石叫到画室，铺开一张宣纸，竖画两道又斜着画两道后问道：“你们看，这是不是平行线？”两位后辈点头称“是”。齐老拿起笔在纸上戳戳点点，转瞬之间，纸上的平行线找不到了。却成了一幅水墨画。中石当时如在云雾不明

所以，即请教于子如：齐老为何对平行线那么感兴趣？子如讲了其中原委之后，中石恍然大悟。原来国画中最忌平行线，视为画艺禁区。可齐老时已名闻天下，却仍在前人不敢问津的禁区苦苦求索，这是何等的胆识和勇气！这种敢于超越前人、牺牲自我的博大胸襟深深地折服了中石。他日后每忆及此便有无限感慨。于是也常教诲弟子们：一定要尊重前贤的艺术成果，在不断的探索中否定自己，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从此，欧阳中石在白石老人指点下不时也习练丹青。前年，林业大学的朋友们邀他到北京西山大觉寺，正值已有三百年树龄的两棵玉兰怒放，那沁人肺腑的清香，引发了他的诗兴。当即口占一绝：

大觉亭亭白玉兰，香清色雅不辞寒；
先花胜谢多情客，未负东风三百年。

后兴犹未尽，又写七律一首：

应春未叶竟先花，恐误东风细雨斜。
不欲人前争夜露，何须道上弄朝霞。
清香自在山深处，绰约天然萼绽芽。
古木经年常谢客，亭亭束素玉无瑕。

从此萌发了画玉兰的念头，一发便不可收。

徐悲鸿扶助田世光

20世纪40年代，徐悲鸿大师曾与笔者慨叹：为在北京未发现巨幅作品而感遗憾。

这件事徐先生肯定也同别人讲过，所以很快被当时才三十多岁却很有志向的田世光先生知道了。于是田便在自己的一次画展中，特意展出了一幅丈二画卷《幽谷红妆》。当时任北京艺专校长的徐悲鸿先生参观画展时，立刻被那栩栩如生、意境深远的画面吸引住了，伫立良久，连连点头赞叹不已，觉得作者确不失为一位有才华、有前途的良才，可惜并不相识。

过后，徐先生留下一封信，诚恳地邀请田到他家里做客。当时徐先生已是享有盛名的大师了。年轻好学的田世光接到这样的邀请又惊又喜，但因不善言辞又有些踌躇，因此延搁了几天，未料，爱才如宝的徐先生又派人来送口信了，请田世光择方便之日，徐悲鸿亲来拜访。田先生一听便觉自己失礼而劳驾不起，连连辞谢。

当时，田世光先生生活较困苦，全家住在北京新街口一处狭窄的房子里，怎能容得下一位世人崇敬的大师呢。于是，他便立刻前去拜访了徐先生。徐见到这位才华出众、年轻有为的画家时十分高兴，初次见面就谈得非常投缘。当徐了解到田曾受过另一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教导、毕业于京华美专时，更是喜出望外，连连称道：“真不愧是名师出高徒啊！”立即提出聘请田先生为艺专的工笔画师。田世光先生被大师的深情和器重所感动，立即欣然接受了。

那时教师的待遇也是较微薄的，而且一部分开支还要用在自己的事业上，所以田先生的家境仍然较清苦。一次天气寒冷，大师见到田衣着单薄，立刻脱下自己的毛衣让田穿上，田推辞不过只好从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加深。在大师的教诲下，田先生的画艺也不断提高。后来他们双双挥动画笔，常常在同一张纸上作画。大师画集中的《竹外桃花》便是二人合作的精品。

据悉，中共执政后，田世光一直在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其近年作《春晖》，高八尺，长丈余，画面是两只黄莺在高雅圣洁的玉兰花丛中喃喃地歌唱，一对喜鹊展翅翔空，另一只仍梦在枝头等待佳偶；盛开的杜鹃花和马兰花簇拥的岩石面上，成双的锦鸡昂首雄姿，望着吐艳的花朵，构成一剧宏图大志、景象万千的媚色。原画挂在中南海紫光阁内。由此可见画家的地位及艺术，然其中又渗透着多少大师的心血呢！

经亨颐与寒之友社

世人皆知西子湖畔有个西泠印社，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金石书画的组织就鲜为人知了，那就是已故教育家、金石书画家经亨颐创办的寒之友社。

经亨颐，浙江上虞人，晚年号颐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早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校长时，他就推行“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聘请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新派教员，支持新文化运动，遭到军阀当局的嫉恨，要把他撤职；广大学生却舍不得这位可敬的校长，从而导致了1919年浙一师“驱经”与“挽经”的风潮。

1921年冬，经亨颐回故乡创办了春晖中学，其间，一有空就喜欢在自己的“长松山房”里作画。他爱画大松树，宣纸总有五六尺长。有一天，他叫一学生去帮忙，学生见他长身玉立、挥毫舔墨那种洒脱的风度，竟出了神，不小心把一盆墨汁碰倒，把画纸染黑了一大片。当时这学生吓得脸色发白，连说：“这怎么好？”经先生却笑容可掬地宽慰道：“别急，别急，这块墨迹倒成全了我。”说着，拿起大笔，就着墨迹画成了一座假山，还在假山添上了一株苍松，天衣无缝地把墨迹掩盖掉了。看着这幅画，这学生的心才安定下来。瞧着经先生慈爱的眼神，他想，别人常说经先生是个严厉的校长，可眼前的经先生分明是个宽厚慈祥的长者。

经亨颐善书法、精治印，五十岁始学画，出笔不凡，无师自通。所画的题材不外竹、菊、松、梅、水仙等，借以表现自己刚正不阿、不随流俗的性格。他于20世纪20年代客居上海时，与沪杭的书画名家常相往来，聚谈之余则风雨泼墨，诗酒联欢，旋即首倡成立寒之友社。当时参加者均为一时之俊杰，如黄宾虹、张大千、诸闻韵、谢公展、王陶民、马孟容、张聿光、方介堪、郑曼青、潘天寿、姜丹书等

人；稍后，经先生移寓南京，更常与旧友王祺、何香凝、陈树人等相往还，寒之友社一时名重艺林。有天，某报记者询以何谓“寒之友社”？经先生莞尔曰：“寒，热之对立面。世人好热衷，然而寇深矣！同人蒿目时艰，畏热昏，遐而立其对面，假寒以清心、寡欲，俾不为横流席卷，当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意境，此寒之友社之由来也。”寒之友社所作之画，虽以“岁寒三友”的松、竹、梅较多，然章法的变换，无一雷同。经先生画松，一如其人，身长鹤立，霜皮十围，直指苍穹；何香凝画红梅，老干虬曲，错节盘根，凌霜傲雪，彻骨不屈；陈树人绘竹，风姿潇洒，任风吹雨打，表现其亮节高风，大有“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概。

1937年春，经亨颐托潘天寿、姜心白、姜丹书在西子湖畔物色一地，准备建筑寒之友社社址，并仿照西泠印社之制，不做子孙遗产，而永为金石书画家的游息之所。不久由姜心白访得仁寿山麓、东山弄内坡地数亩，经邀潘天寿、姜丹书等一起去实地勘测后十分满意，当即斥资并将其夫人兑换首饰之款，得两万余金购地招工，自己亲自设计图纸，赶造寒之友社，预计当年年底完成时遍邀社友开落成酒宴。不料工程尚未及半，抗日烽火骤起，杭城迅即沦陷，工程被迫停工，兵燹中建筑毁坏，材料尽散。经亦仓皇避难上海租界，翌年竟忧愤成疾而病逝。

刘博琴为毛润之刻章

1984年9月，北京著名的篆刻家刘博琴先生与世长辞了。

我认识刘博琴是在20世纪40年代，那时“博琴铁笔”驰名琉璃厂，求他治印的人络绎不绝。我在取灯胡同刘的寓所见到了他，三十多岁，为人质朴，讷讷不善言。那天他出示了所刻的各种印拓，其中铁线篆无疑是刻得最好的，刚劲挺拔，无纤细的感觉。当时老篆刻家张樾臣最擅长刻铁线篆。1957年张樾臣逝世后，刘博琴就独步京华，现在刘死了，我担心这项技艺将成绝响。

刘博琴和我谈起他的家世，流露出一种留恋的神情。他称得起篆刻世家，他的曾祖父刘宽夫（位坦）是道光年间有名的藏书家、书法家和篆刻家，家住在著名的前孙公园——清初大藏书家孙承泽的故居，刘博琴幼时还在那儿住过。家里都是文物宝藏，历史学家谢国桢就说他们家太阔了，阔得能用汉砖垫床。刘博琴给我看过他曾祖父书写的扇面，字写得飘逸秀丽。他的祖父刘子重是同光（同治和光绪）年间的碑帖收藏家和篆刻家，他所收藏的碑帖拓本后来不少流落到鲁迅手里。叔父刘士彦在松笑斋（荣宝斋的前身）当学徒，变成了职业篆刻家。刘博琴的父亲早亡，他是向他叔父学会篆刻的。有了这样渊源的家学，难怪他能刻出各种篆法的图章。他宗秦汉印，后学浙派，最后学赵之谦。他综合各家之长，难怪拿起刀来是那样地从容自如了。关于他的家庭，还有一段轶事：刘宽夫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不知怎的流落到红学家周汝昌手里，于是研究红学的人，为了弄清这部著名版本的源流，差不多都找过刘博琴。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一书里，还有一章讲刘宽夫，也讲到其曾孙篆刻家刘博琴。

在刘博琴的治印生涯里，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为毛泽东（润之）治印的故事。“七七”事变以后，华北上空乌云翻滚，不少富户举家南

迁，市场萧条，刘博琴的治印生涯变得冷落起来。一天，有人找到取灯胡同刘的寓所，指名要他刻方“润之”的石章，说是送给一个远方朋友的礼物。刘博琴认真地刻了。1949年内地易帜之后，有个身穿军装的人又找到刘博琴，要刘刻“毛氏藏书”的图章，指定要模仿明朝古印的字体，他带来关于刻这方印的要求信，刘博琴拆信一看，是毛泽东写的。刘才明白他很早以前已经为毛氏刻了图章。

刘博琴的字也写得好，在日本颇有名气，北京街头很多商店的匾额是他写的。近几年，他的字流传到深圳，有人见过。

画虎名家结戏缘

与张大千、张善孖昆仲学过画的著名画家中，北京有胡爽盦，天津有慕凌飞。现在胡爽盦已经故去，就只剩下慕凌飞了。

慕凌飞一生结缘翰墨，他除了绘画，最大的爱好要属京剧。他自己曾说过，如果当年不是拜了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孖弟兄为师，真是差点下海唱了京剧。

1929年前后，慕凌飞在上海齐鲁公学上小学，李少春姐弟四人也在这所公费学校念书，而且那时他和李少春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李少春的父亲小达子是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家庭生活很宽裕，每周都要用汽车把少春姐弟接回家团聚，慕凌飞也常常被叫了同去。到晚上吃完饭又一块儿去大舞台看戏。当时小达子演的《狸猫换太子》，一演就是几个月，不仅唱、念、做、打俱佳，还有机关、布景，都很是吸引观众。过后，少春的父亲曾对凌飞说：“你长得很漂亮，将来要是唱戏应该唱老生，可别像我勾个大花脸，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以后我给你找个师父，你会有出息的。”从此，慕凌飞就迷上京剧了。什么余叔岩、杨小楼、盖叫天、梅兰芳等名伶的戏，每演必看，因为悟性好，当时十五六岁，就会唱很多戏段。

人的生命真是变幻莫测。正在这时，慕凌飞绘画的天赋被人看中，经介绍拜在了张大千、张善孖门下，从此便走上了绘画之路。两位老师对慕凌飞格外喜欢，把他安排在自己家，不但教艺，而且还包吃、住、穿。张家是个大家庭，张善孖排行第二，慕凌飞叫他“二老师”；张大千排行第八，就叫他“八老师”。

张大千和张善孖虽已是著名的大画家，但业余特别喜欢看戏。既爱川剧又爱京剧。家里有京剧唱片，每次放时慕凌飞总侧耳细听。有

时也随两位老师到剧场去看金少山、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的戏。一次慕凌飞陪八老师看完程砚秋演的《荒山泪》后，张大千画了一张水墨淡彩的人物画，形神兼备，令程砚秋爱不释手，从看戏到画在纸上，使慕凌飞大开了眼界，从中学到了如何观察人物动态和如何在宣纸上挥洒笔墨。

我与慕凌飞早年相识，他常说："我虽潜心于中国绘画艺术，但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京剧的爱好。"说着便悠然唱起了《骂毛延寿》和盖派的《武松打虎》。

算起来，慕凌飞现在应该是八十有二的老人了。据说，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平时除画虎外，仍不断听京剧、唱京剧。

戏曲演员与书画艺术

在戏曲史上，许多表演艺术精深的演员，多与书画结缘。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不仅创造了别具特色的“荀派”艺术，而且擅长丹青。早年他演出《丹青引》（扮演女画家杨云友），在舒展的慢板唱腔中，手执画笔，几分钟内便画出一幅十分传神的山水画，观众为之赞叹。荀慧生在青年时代就曾拜名山水画家胡佩衡为师，每天演完夜戏，他都要精心作画，翌日晨携画到老师家求教。他曾说：“借鉴国画艺术，融化在戏剧舞台上，更能丰富我们的艺术创造。”胡佩衡对他的绘画艺术评价很高，曾题词咏道：

性灵烂漫见天真，余事丹青妙如神。
信是纤尘原不染，本是明月作前身。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不仅戏演得出色，而且绘画水平也相当高，尤以画牡丹、菊花见长。他十三岁时即拜张大千为师，学习画人物、仕女、花卉。天长日久，练就了一手绝妙技艺，并与张大千结下了忘年交。张大千晚年曾请人烧制了一百个瓷瓶，亲自在瓷瓶上作画题诗。去世前夕，曾托香港的朋友捎给李万春一个。画面是一枝清素淡雅的梅花，旁题专为李万春写的七绝一首：

万里春归故国山，溪边结得小屋黫。
种梅买鹤余生了，月下花前伴君眠。

河北梆子著名女武生裴艳玲，自幼学戏，声名远播海内外。她为了演好《钟馗》，以坚强的毅力练就一手草书。这出戏中有“院试”一场，即科考。考场上扮演钟馗的裴艳玲当场题诗：

一树梅花一树诗，顶风冒雪傲奇枝。
留取暗香闻广陌，不以颜色媚于斯。

诗的内容是钟馗人格的表白，他要在考场上展现自己的人格和才华，凭本事取士，不搞蝇营狗苟，不谄媚他人。在写这四句诗时，艳玲边唱边写，允称绝妙。每次演出，总有人在台后等候取走“墨宝”。

龙江剧一级演员白淑贤的当场题诗更是一绝。白淑贤主演龙江剧《花木兰》时，演至高潮处，她在横贯舞台的条幅上书写“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十四个大字，时而正面写，时而背面写，时而正写，时而反写，一气呵成，表现出深厚的书道功力。

传统评剧《人面桃花》表现唐代诗人崔护与都城南庄少女杜宜春的爱情故事。剧情源于崔护传世的名诗《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扮演崔护的演员，一般都是当场题这四句诗。石家庄市评剧院著名小生尚世华当年扮演崔护，边唱边写，右手写第一句，左手写第二句，到第三四句时，左右手同时落笔，又同时收笔。每演到此处，台下总是掌声雷动。他为了练好这四句诗，写过近千张纸，用掉几桶稀释的墨汁，终于练出一手绝活儿。

齐白石盛誉“刻刀张”

早年间，北京前门外有一家张顺兴刻刀铺，以制作刻刀、镊子出名，人们亲切地称呼店掌柜为“刻刀张”。

第一代刻刀张叫张正新，河北人，十五岁到北京一家铁铺当学徒，学做各种小刀。经过三年多，他学到一手好技艺。出师后，自己在前门外开了个小作坊，打造一些小工具出售。他制作的镊子，姑娘出嫁时用来开脸，又精细，又好使。他用铁铺做兵器剩下的下脚料打出的刻刀，不黵不卷，经久耐用，故特别受人们欢迎。

光绪六年（1880），他挂出了张顺兴刻刀铺的牌子，由于信誉好，生意很是兴隆。他在自己的每件产品上，都刻上一个“不”字，意思是货真工细不骗人，价格合理不欺人，“不”字产品很快受到信任，于是“刻刀张”名扬全国。

“刻刀张”代代相传，到第三代叫张凤鸣，他不仅继承了祖辈传下来的技艺，而且还上过三年私塾，颇喜欢书画。因此有缘结识了著名国画大师、金石篆刻家齐白石先生，齐对其刻刀的宣传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民国二十年（1931）初春的一个下午，张顺兴刻刀铺来了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买走几把金石刻刀。三天后，这位女子又回来了，一进门便高兴地说：“你们的刻刀确实很好。”她请张凤鸣再给加工几把，并特别关照说：“这是送给我老师齐白石的，他老人家学的是汉代凿印，刻前不打样，刻时不回刀。如果他能看上你的刻刀，你就不用到处推销了，篆刻家们会主动登门前来求购。”

原来，她就是深得齐白石真传、金石篆刻造诣很高的刘淑度女士。齐白石赞扬她的刀工“无女儿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

闺阁特出也”。她曾为鲁迅刻过两枚名印，鲁迅非常珍爱。但刘淑度和其他篆刻家一样，常为没有称心的刻刀而苦恼。她到处求人托友，寻求好刻刀。经友人介绍，来到张顺兴刻刀铺，买回家一试，果然锋利无比。她异常兴奋，故又特来为老师买刀。

事后，张凤鸣亲自为齐白石做了几把刻刀。白石老人试用后，也非常满意。便在刘淑度陪同下，专门乘车来到刻刀铺致谢。他称张凤鸣为凤鸣兄，大有相识恨晚之意。此后，他们即成为好朋友，相互往来不断。因齐白石已年逾古稀，行动不便，张凤鸣便经常主动到西单劈才胡同家中为老人送刻刀。为表示感谢，白石老人曾亲手为张凤鸣题写一副堂联，上书“君有钳锤成利器，我由雕刻出神工”，上款“凤鸣兄惠存”。而且对张凤鸣说：“你是一个匠人，在手艺上有如此深的研究，很不容易，我也是一个匠人，早年做木工，深知匠人手艺不可小视。”

1936年齐白石回南方之前，特意为张顺兴刻刀铺写了一块牌匾，在“顺兴刻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旁边写着：“予居京华二十年，喜用张顺兴刻刀，越明年将南归，书此赠之。”

佳作聚珍

JiaZuo JuZhen

吴昌硕的塑像及刻像

近见米景扬等先生编辑之《西泠印谱》，不禁忆起杭州之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为吴昌硕先生及其同道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的研究篆刻的学术团体，吴生前曾任社长。社址在杭州孤山脚下，面对西湖，因地近西泠桥而得名。

一次，我到杭州，伫立于孤山上，西湖美景尽收眼底，默念着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不觉心旷神怡。忽见一些人举香而过，以为是善男信女上山拜佛，便随其前行，来到一个洞口，见不少人在洞中向一尊塑像叩头进香。我初以为是尊佛像，细看竟是吴昌硕先生之塑像。先生盘膝而坐，神情自若。向别人问起，方知塑像原出自日本雕塑名家曹昌文夫之手，携来西泠时为铜铸半身像，后西泠同人以石料接为全身盘膝坐像，看上去却浑然一体。吴昌硕生前，塑像已置小龙泓洞中，常有人前往顶礼膜拜，足见世人对先生艺术之景仰。然吴本人却不大赞成，常作为笑话讲给朋友听。一天他闲步来到小龙泓洞，见人们在给塑像叩头，笑叹道：“怪不得这几天我老是头昏。被他们一拜，不昏也要昏了！”

西泠石壁上，也有吴昌硕的刻像，款云：“仓颉先生吟坛行看子，光绪丙戌十月山阴任颐。”方知是据任伯年手笔镌刻的。画面并无背景，全用绣像式手法表现。吴先生刻像身着长衫，双手后背，目含悲愤，表情抑郁，显示出人物失意、穷困之窘境。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珠）之中。”实不谬也。从题款看，此画作于1886年，彼时吴昌硕正值不惑之年，为生活流离颠沛，历尽艰辛，尝作自题诗云：

频年涉江海，面目风尘枯。
深抱困穷节，豁达忘嗟吁。
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
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书。

此诗似可为刻像之注脚。

陈师曾与《北京风俗图》

著名画师陈师曾1924年逝世。陈先生逝世之际，我正是青年学子，不及弱冠，但已知梁启超谓为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曾在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并展览遗作。后来北京淳菁阁又收罗各家藏品及其家中遗作，用珂罗版精印二十册之多，以为纪念。

记得其中曾刊有《北京风俗图》数幅，这是为梁启超所画。陈先生家学渊源，祖为陈宝箴，父为清末民初大诗人陈散原（三立）。他的画师从吴昌硕、萧谦中。后在北京数所美术学校任教。从日本归国后，画风为之一变，尝用传统笔法表现当时民俗生活。此图绘于光绪丙午年（1906），署名“闲园菊农”，这是陈先生的别号。闲章是“槐堂”，这是陈先生在北京的书画斋堂。在陈先生笔下，当时北京民俗一一毕现。凡当年在北京生活过的人，今日若把卷观之，定会油然而生亲切之情。比如驮煤的骆驼、卖胡琴的、卖菊花的、卖水果的栩栩如生，颇为真实。又如那“落子馆”，今天的小辈们只能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里去觅旧踪了，那书中说大鼓书的沈凤喜，就是陈先生笔下《落子馆》中的无名艺人。以陈先生这样出身世家名门驰誉南北的名画师，居然挥毫为下层人物写丹青，在那时是极难能可贵的。他在《卖胡琴》那幅图上曾题有一首短诗意味深长，颇耐人沉吟。诗曰：

知音识曲，自谓不俗。
此丝此竹，聊果吾腹！

据说陈先生不仅与文人墨客交，也与三教九流交。民国初年，北京琉璃厂西门内路南有一家专售铜墨盒的“同古堂”。陈先生与店主人张樾臣、张寿臣兄弟最为莫逆。那时名人对“京铜墨盒”是不屑一顾

的，崇尚古墨名砚乃为正宗。而陈先生却极愿为张氏兄弟作画稿，并与之交往，这也看出陈先生不从流俗的品格。至于他于北京识齐白石老人并为之掖助之事，更是众人皆知的佳话。当时毁白石老人者多，而陈先生不为流俗所囿，独具慧眼怜心，致使“海外都知老画家”，这也可见陈先生感人品格之一斑，难怪白石老人终身不忘感为知己了。

于右任与《岁寒三友图》

于右任先生大笔如椽，一生所作诗词甚多，其中不少与中山陵有关。1928年1月，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一起到紫金山晋谒正在建造中的中山陵墓。何香凝是人们崇敬的革命家和艺术家；经亨颐是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父亲，一生高风亮节，诗书画印的造诣都相当高；陈树人则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四人谒陵后，合作了一幅《岁寒三友图》，何香凝画古梅，经亨颐作翠竹，陈树人绘奇松，然后由于右任在上面题诗二首：

其一：

紫金山上中山基，扫墓来时墓已寒。
万物昭苏雪启蛰，画图留作后人看。

其二：

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廖哭声。
润色江山一支笔，无聊来写此时情。

诗中的“经酒陈诗廖哭声”一句，于氏曾经有过注解：

经先生豪于饮；廖夫人以仲凯先生殉国所为诗，直皆血泪；陈先生诗名“寒绿吟草”。

1932年“一·二八”之后，何香凝约当年合作《岁寒三友图》的老朋友，组成了寒之友社，他们用写字作画来排遣胸中愤慨。到1936年，国运之危，殆如累卵。于右任与何香凝、陈树人、经亨颐又重新合作了《岁寒三友图》二十幅，何、陈、经分画竹、松、梅，于右任仍旧

题写1928年作的那两首诗，件件都有特色。1936年11月，何香凝在南京主办书画义卖展览时，这批《岁寒三友图》被很多人争相购买。冯玉祥、马超俊、杨杰、梁寒操、李宗狱等人都各买了一幅，钱大均的夫人买了两幅。义卖得款，连同书画展览的其他一百多件作品的笔润所得，全部捐赠给奋战在冰天雪地里的抗日义勇军将士。

1949年于先生到了台湾，但他对故乡、亲人、旧友无时不在思念中，对中山陵也从未忘怀。这《岁寒三友图》后来有一幅流落到台湾画市上，他的一位朋友买了回去。于氏重睹当年和老友谒陵后合作的字画，不由感慨万端，联想当年寒之友社的经亨颐、陈树人早逝，潸然泪下，于是提笔在画上补写了一“时”字，增题了两首诗：

三十年来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相逢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齐白石的《却饮图》

齐白石名璜，字濒生，取“濒老生萍”之意，又号寄萍老人，他是由刻木、刻石成为现代书画家、篆刻家的，故自称“木居士”“三百石印翁”。1860年生于湖南湘潭南乡白石村，1957年殁于北京。

白石老人初到北京是在庚子后一年（1901），他因和夏午诒有旧，随夏入京。后来夏去江西赴任，齐又与夏同到南昌，夏欲出钱为其捐官，白石宁愿用此钱回乡买田，自耕自种，强似当官做老爷。结果，夏午诒真就照他的意见办了。齐白石回到白石村，闭门读书，学习山水翎毛，花草虫鱼，寄情于诗书画刻。民初，湖南兵乱，汤芗铭被逐，陈宧督湘，又遭军民反对，局势动荡不安，老人乃离开乡井，重赴京师，从此，就在北京定居下来。

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大学，曾与老人有一面之缘。那时他住在跨车胡同一五三号，门禁森严，前后门经常上锁，而钥匙则带在自己身上，仆人不得擅自开门。门外挂一“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的小牌，客来在小窗窥探后才开门。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为了谢绝应酬煞费苦心，终于画了一幅《却饮图》张挂室内。这幅画上有两个人，一人手拿酒壶，左手提壶，向左立老翁做招饮状，而老翁则右手执笔，头扭向左面，表示谢绝状，并题字于画上：

> 凡我好友最怜爱我者，不在饮食，请以心爱，吾亦心领。孔子曰：“老者安之。”苏子曰：“每出劳人，不如闭门之有味也。”吾年老神倦，不能冒暑热，伤夜寒，作无益奔走，画此画，谨申鄙意，以免见招不应之罪。

白石鬻画，按尺论价，除自愿赠送者外，无不照付笔润。一次，他有个学生要出国，向他索画，说留个纪念，老人未加可否，叫他明

日再来，第二天学生按时到达，室内有两个孩童，老人对孩童说："快去给客人行礼，他要到外国去，请他买些外国玩具给你们吧。"客人闻言很知趣，立即掏出五十元钞，说还是在国内买吧。老人即将作成之画交来人，问他可高兴，客人忙说："高兴，高兴。"老人说："孩子有钱买玩具和你一样高兴，这叫皆大欢喜。"于是相顾大笑。

司徒乔绘孙中山像

今天，当人们来到举世闻名的中山陵，到孙中山纪念馆——“藏经楼”参观时，很少有人知道五十多年前，楼内曾有一帧巨幅孙中山先生肖像。这幅油画被当时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惊人的肖像画”，它是由著名画家司徒乔创作的。

司徒乔自小家境贫寒，靠半工半读自修成材。鲁迅称他是“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曾亲眼目睹五个警察如狼似虎地对待一个弱小的穷人，便热血沸腾地画下了速写《五个警察和一个零》。这幅“初出茅庐”的作品被鲁迅买下了。司徒乔在法国巴黎时，常常带着几块黑面包，整天泡在卢浮宫，在西方绘画大师们的杰作前流连忘返。大戏剧家梅兰芳在美国访问演出期间，司徒乔促成了罗马尼亚著名肖像画家斯托恩内斯库为梅兰芳画像。当时，恰逢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到美国讲学，司徒乔运用大刀阔斧的笔触绘出了泰戈尔的肖像。这幅泰戈尔肖像参加了1936年于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美展。南京的报纸评论这幅画是：“笔画朦胧，而神思清澈，诗哲丰采粲然，如在目前。”盛名之下，中山陵园管理处特邀司徒乔于当年秋天到南京绘制藏经楼内中山先生肖像。

当时中山陵园图书馆已有一幅中山先生肖像，是大画家徐悲鸿的手笔，因此许多画家都深感棘手而未承担这一任务。司徒乔知难而进，认为这是光荣的使命，有幸的是：他少年时曾瞻仰过中山先生的丰采，并亲耳聆听过中山先生的演讲；中山先生还和他握过手，并赠他一幅与孙夫人的合影照片。他决心用画笔再现神情毕肖的伟人；他竭力追忆自己脑海里伟人的印象；又从孙夫人处借来许多照片作参考；施展自己多年来画肖像的心得和技巧；废寝忘食，八易其稿，经

半年多的精雕细刻才完工。画面上，中山先生端坐在桌旁按稿凝思，目光英慧，仪态庄重；衬托人物的图书、地球仪等井井有条。

司徒乔呕心沥血绘制伟人像，不幸积劳成疾，肺病发作，生命垂危。如进私人医院，仅押金就需一百多元，而他此次作画的酬金总共才有二百多元，起初公办医院推脱将他拒之门外，幸亏一位同乡向南京的“中央医院”交涉，才出动救护车接他住院治疗。另外，作画时由于他一丝不苟，多次返工，二百元材料费远远不够。司徒乔和夫人毅然将私人衣物送到当铺以弥补材料费。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机空袭南京，司徒乔积累了十几年的作品、书籍、文稿等不幸化为灰烬。日军占领南京期间，藏经楼遭破坏，那幅中山先生肖像亦不知所终，其下落至今还是一个谜。

何香凝的梅花横幅

何香凝老人在1932年春画的一幅梅花横幅上，题的词句是“先开战风雪”五个字，第二行是“湜德先生纪念，何香凝壬申春”等字样。壬申就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

“湜德先生”是谁？为什么老人要用“先开战风雪”这样高度赞扬的词句亲笔书赠给他呢？所谓“先开”是含有起带头作用的意思，而“战风雪”则是有“与艰苦环境奋斗不屈的精神”。用梅花来赞誉受赠者，足见老人对他的尊重和敬佩，而非一般应酬之作。

原来，湜德先生姓顾，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住在上海茂名路九十三号，夫妇俩开了一家“南京汽车出租公司”，备有自用的大小轿车、货车等，夫妇俩生活优裕，十分阔气，当时正值壮年有为之时。

“一·二八”淞沪战争起，香凝老人在租界后方组织了一个救国团体，接受社会上各界爱国人士捐献给前线浴血奋战的需用物资，还有救济难民的各种生活用品。当时在租界住的中国居民激于爱国义愤，再经何香凝老人带头振臂一呼，各界人士莫不踊跃响应。收到很多款项及各种救济物资，很快便堆积如山。

钱和物资有了，前方急需，但缺乏运输工具，很难把这些物资及时送到所需要的地方。顾氏夫妇得知这种情况，主动挺身而出，与香凝老人商定，自愿将他们自己公司的各种车辆，不要任何代价地请老人吩咐使用，无偿出人开车，由老人指挥，这在当时解决了大问题。

当时救济难民的物资，全在租界里，分发比较容易，办理也比较顺利。用车也方便，而支援全部前线的物资，必须要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才能送到目的地。顾氏夫妇的亲朋好友都奉劝他们不能不顾及车、人的丧失而给何香凝卖命。可是顾氏夫妇对亲友的劝告置若罔

闻，毅然驾驶着他们的名牌菲亚特汽车运送前线需用物资，往返多次，直到最后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顾氏夫妇的义举，使何香凝老人深受感动，因无以为谢，便画了这“先开战风雪”的横幅，送给顾氏夫妇作为纪念。顾氏夫妇接过这幅画，激动地说：“何老您的爱国行动确实感染了我们，我们夫妇对您非常尊重和钦佩。我们用激动的心情收下您这段时间画出的礼品。”顾氏对这件横幅极为珍视，把它配上考究镀金的镜框，悬挂在客厅正面墙上。即使在以后的白色恐怖情况下，顾氏也不把这张画取下来。

谁知十年动乱期间，顾氏夫妇因此画而备受“造反派”百般殴打凌辱，画幅也被抄去。直至落实政策，顾氏夫妇已经作古，这张画才发还给顾氏的后人。这幅顾氏生前最珍惜的何香凝老人的梅花横幅，能合浦珠还，也算是很幸运的了。

珠联璧合一幅画

我曾于荣宝斋副总经理、画家米景扬先生寓所见到一幅写意山水画《秋涧清流图》，系两位大师级的国画家——陈少梅和董寿平的合作珍品。只见巉岩绝壁，杂树丛生，一股急流自远处奔腾而来，切断山崖，倾泻而下。有动有静，意境深邃，笔墨娴熟，浑然一体。但是，谁又能想到，在这同一幅画面上，两位画家的着笔时间，竟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且先看画右侧的董寿平先生的题字：

> 时一九五四年秋，老友陈少梅与予合作者，未及完成而少梅遽归道山，已搁置二十六年矣！顷少梅之婿米景扬同志持以见示，并嘱补成。予老手荒率，勉为补足，心手两拙，愧对老友多矣！时在一九八年冬初

并署“董寿平补笔并识”。

董寿平先生今已九十四岁高龄，是当今活跃于画坛的画松、竹、梅、黄山大家，其故乡山西为他在晋祠专建了纪念馆，两年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了轰动中外的书画展览，是人们熟知的画坛巨擘。而提起陈少梅来，除去年荣宝斋在北京饭店拍卖了他的一幅山水画《江南春》，成交额四十六点二万元，一个《西园雅集》扇面成交额二十九点七万元，创扇面价最高纪录偶有耳闻外，一般知者就甚少了。

陈少梅名云彰，字少梅，号升湖，湖南衡山人。其父陈嘉言（字梅生）早年任清末翰林院编修，晚年主持衡阳书院（即船山学社），曾积极支持何叔衡、毛润之将书院改办湖南自修大学。生于书香世

家，少梅幼习诗文书画，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十五岁即加入著名国画家金北楼主持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因其最小，被誉为神童。后又加入金北楼子金开藩1926年成立的湖社画会。1930年比利时举行建国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湖社选画品前往参加，陈少梅作品荣膺银奖，时年仅二十一岁。翌年，湖社成立天津分会，派其前往主持，直至解放。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等，不论工笔，还是写意，无不擅长。老一辈画家曾用“当代唐伯虎”“唐寅以后第一人”、“马夏再世”等赞语来称颂他。启功在手书的《陈少梅画集序》中说：

> 画诣在同门中卓荦无少逊色。我比少梅先生虽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成就之早。

另在为少梅遗作《钟进士醉酒图》题诗注中云：

> 其纸不过三十年，其笔则三百年。

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启功先生又写道：

> 一九五四年九月，先生来北京不久，一天他怀中带着两个干馒头去向老母问安，自说已用过了饭，不意就在老母面前突然倒下。先生生于一九九年，这时仅有四十五岁。

实际情况是这样：1953年初冬，时任天津美协副主席的陈少梅，应钱杏村、叶浅予的邀请来到北京，先是寄住在好友张伯驹家中，后又到风景如画的北城西海畔板桥头条一号赁房而居。1954年9月9日上午，少梅先生的好友董寿平先生前来拜访，两人促膝而谈。这时董寿平已参加了荣宝斋的工作，敦促陈少梅也去，少梅说：“你这可谓是鲍叔荐管夷吾了。”并随口吟杜甫《贫交行》诗：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董先生见桌上铺着一张高丽纸，便提议两人合一幅画。少梅欣然同意，然后把笔挥毫，很快就画好绝壁、杂树，笔墨酣畅苍劲。因时近中午，少梅还要去南城看望老母和几个孩子，两人相约次日董先生再来画远山近瀑，便匆匆而别。孰料，这画好的半张画竟成了少梅的绝笔。当天下午少梅先生突发脑溢血，在老母面前倒下了。当医生赶到时，画家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时隔二十六年之后的1980年，正是“文革”风云已过，因家亟待振兴之际，陈少梅之婿米景扬先生想起了当初二人相约合作的半成品，持之亲往董府，请健在的董寿平先生补足。不愧是两位卓然大家，虽时隔多年，但从笔墨、神韵、气势，很难识别是出自两人之手，真可谓“珠联璧合一佳作”了。

陆小曼山水长卷题跋

陆小曼是中国早期著名白话诗人徐志摩的夫人。1931年11月19日晚，徐从南京搭飞机去北京，不幸飞机在山东济南附近失事遇难。在料理遗体时，有一张陆小曼画的山水长卷却还完好，居然保留了下来。

陆小曼是江苏常州人，与徐志摩结婚后，住在上海，曾拜贺天健为师学画。这轴长卷更为珍贵的是它的跋，计有胡适、杨铨（杏佛）、贺天健、梁鼎铭等人之手笔。

当时，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又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所以经常南北往来。这年，徐志摩于夏间携此长卷往北京装裱。胡适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 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
> 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
> 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
> 拼得死功夫，自成真意趣。

接着又题曰：

> 小曼学画不久，就作这山水大幅，功力可不小！我是不懂画的，但我对于这一道却有一点很固执的意见，写成韵语，博小曼一笑。适之二十（1931年）、七、八，北京。

这诗和跋所表现的胡适在文学上的观点，与他以前所发表的文学见解是一致的。

接着，杨铨又在此长卷上题了一首待，与胡适唱反调。诗曰：

手底忽现桃花源，胸中自有云梦泽；
造化游戏成溪山，莫将耳目为梏桎。

又题曰：

小曼作画，
适之讥其闭门造车。
不知天下事物，
皆出意匠，
过信经验，
必为造化小儿所笑也。
质之适之，
小曼、志摩以为何如？
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杨铨。

在此诗中，杨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不能过信经验。

这年中秋，陆的老师贺天健在上海为这幅画卷题了一首绝句：

东坡论画鄙形似，倪瓒云山写意多；
摘得骊龙颔下物，何须粉木拓山河。

亦是针对胡适之论点而发的。梁鼎铭接着在题词中也表达了一通意见：

只是要有我自己，虽然不像山，不像马，确有我自己在这里就得了。适之说，小曼聪明人，我也如此说，她一定能知道的。适之先生以为如何？

陈蝶衣的一段文字较长，其中语云：

> 小曼天性聪明，其作画纯任自然，自有其价值，固无待于各名家之赞扬而后显。

题后又画了一张猫蝉小幅，写了“两部鼓吹”和“蝶道人戏笔”诸字。

此画作于1931年春，那时陆小曼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她1965年在上海去世。死前将画辑转赠给浙江博物馆收藏，经十年“文革”而未丢失，也可告慰地下亡灵了。

苏曼殊画《梦谒母坟图》

1983年5月2日是辛亥革命前后曾风靡一时的人物苏曼殊逝世六十五周年的日子。苏曼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诗、小说、翻译等倾倒一时外，他的画亦为时人所推重。其同乡孙中山先生，就对他的画颇为激赏；他的老友柳亚子曾有诗赞为“千秋绝笔”；有名的“侠士”刘三咏道：“苏子擅三绝，无殊顾恺之”；于右任先生亦作诗感叹：“世人莫评曼殊画。”这当然是因为他的画潇洒绝尘，画中有诗，有极高韵致和艺术感染力。当时一代名士莫不与之交往，以能获得其墨宝为荣。但曼殊颇不轻易许人，且所绘之画多有不落款和加印者，因之传世不多。

曼殊曾为当时音韵学大师黄侃画过一幅《梦谒母坟图》，并有章太炎题跋，黄侃记文，堪称珠联璧合之珍品。黄侃在“五四”前后曾任北大文科教授，其父黄云鹄乃当代著名经学家，黄侃幼承家训，后又拜章太炎为师。章氏极欣赏他的才华，将平生所学悉心传授。黄侃后来又拜精于音韵训诂之学的刘师培为师，其实黄只比刘小两岁。但刘师培世代家传训诂之学，其祖、父均列传于《清史稿》，因之黄侃心悦诚服。黄侃后来出版了《音略》《声韵通例》《集韵声类表》等书，而致声名鹊起。

说来有趣，章、刘、黄三人竟都被同时人称作“疯子”。章氏在东京主办《民报》，因反对中山先生，致被黄兴斥为“疯子”。刘师培则是因其不修边幅，常年蓬头垢面，因之亦被视为“疯子”。黄侃则由于他的一件怪癖。因其乃翁过世早，他一直与母相依为命。他经常来往于故里湖北蕲水与北京，每次必奉母同行，而每次亦必携带着老母的寿材，直至其母弃世为止。因之人们都把他视为“疯子”。由于苏曼殊在日本与黄侃同寓，又为挚友，所以黄侃便请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

坟图》以寄哀眷之情。那时刘师培已经死了，所以只是章太炎题跋，否则黄侃亦必请刘师培赐笔以志不朽的。

后来，曼殊因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家庭不满而出家为僧，但亦并不认真面壁修行而浪迹天涯，诗酒啸傲，所以又被视为“畸人”狂僧，他自己曾有诗表白：“无端狂笑无端哭”，这亦难怪世人把他说成“疯癫”了。但是，曼殊是保持晚节的，他临死前还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北伐，便是一例。

几经磨难《流民图》

北京出版了大型的《蒋兆和画册》，巨幅《流民图》画卷亦印载其中。这使笔者记起此画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系慕宋代画家郑侠的《流民图》之名而画的。蒋兆和创作此画，从构思、搜集素材，到脱稿，约有十年之久。最后在1942年6月至9月，蒋兆和于北京东城南小街北口竹竿巷的一所四合院内，完成了这幅规模宏大的《流民图》画卷。画卷高七尺，长九丈，据说是在一块高不足六尺、宽不及四尺五寸的画板上，各自分段完成的。北京宝华斋装裱时因房间太小，遂借用韵古斋、静观阅、益古斋三家店铺门外的砖台阶，连夜托裱。装裱工师徒三人守护，一夜未眠。巡警过往，险遭践踏。翌日清晨，翻卷裁边，附近许多市民围观，无不啧啧赞叹，不期而成了盛大的街头预展。

此画卷完成之后，几经周折，于1943年9月首次在北京太庙公园展出，笔者亦曾往观。蒋先生所独创的水墨人物画风格，确令人叫绝。全画卷以一片瓦砾为背景，描绘战乱中劳苦大众流离失所之惨状。画面上有的乞讨，有的痛哭亡人，有的正要悬梁自缢，还有流浪汉、鳏寡孤独等，共有百余人物，皆近乎真人大小，个个栩栩如生。因画卷展示了由日寇侵华而造成的民族灾难，为日寇所不容，故仅展半日，即被宪兵队查禁。

第二年春，上海举办捐画展。蒋兆和与其新婚夫人萧琼女士，应友人之邀，携《流民图》欣然前往。于是此画在上海的法租界内再展，但展后即被当局变相没收，多年杳无音讯。

到了20世纪50年代，《流民图》画卷复归其主，但仅存半卷，且已霉损不堪。蒋兆和先生见此，感慨万端，遂重新装裱，装裱后的残

卷，曾随画家到苏联展出，后即由历史博物馆收藏。报载，近年《流民图》再次装裱，并于1981年在深圳举办的《蒋兆和、萧琼书画展览》中展出。至今，此卷名画，自创作四十年来共装裱三次，展出五次，其经历坎坷，沧桑磨难，为绘画史上所罕见。所幸在第一次半日展之前，为防不测，蒋兆和曾委托照相馆将此画拍成照片，洗印四十套，方使《流民图》受损后，于今仍可得见其全貌。

孙之隽与《武训画传》

写过一篇《七七前夕漫画展》，意犹未尽，更加怀念起该画展的主办人、著名漫画家孙之隽先生。

孙之隽（1907～1966）字近之，河北藁城县人，自幼酷爱绘画，中学时代便以绘画闻名乡里。早在1920年就有漫画作品发表于《北洋画报》。1930年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科。学习期间，更有大量漫画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如《华北画报》上的《饭碗问题》即是当时的代表作，先后曾在《小时报》《世界日报》《晨报》《新北京日报》《大公报》等都发表了大量作品，用近之、之隽、CCT、小苏、苏恩、特哥、慕雨柯、慕鲁委以及“彻底抗日”四个字的字头等作笔名，还出版了以北方生活为背景的《王先生外传》等漫画集。

1936年，孙之隽采用农村年画中四条屏形式和报纸连载形式开始创作《武训画传》，登在《大公报》上。1943年在重庆办育才学校的陶行知曾将画稿三次再版，又由加拿大友人文幼章译成英文，发行到英国、印度、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这部最早的《武训画传》向国外第一次介绍了那位奇特而执着地兴办义学、广受人尊敬的山东农民。

20世纪40年代末，陶行知委托友人带话给孙之隽，如能得暇，一定再画一幅更好的《武训画传》。孙之隽得此消息，便重新构思，改用水墨技法，精心绘制，以不负陶之重托。该画于1951年由上海万叶书店钱君匋主持出版，异常精美，孙瑜、赵丹二位书写前言，郭沫若题写书名。未料，刚刚问世，便赶上了批电影《武训传》的风暴。主演赵丹、绘画者孙之隽自然在劫难逃，各大报纸的劈头盖脸的批判，使他们蒙受了极大的压抑和屈辱。

从此孙之隽销声匿迹，化名孙信，在北京师范学校从事美术教

育。由于他在油画、水彩等方面的高深造诣，故深得学生爱戴。他不但自编自绘出版了老舍的《骆驼祥子》上下集，还出版了《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鼓手的命运》《大人国游记》《小人国游记》《吹牛大王历险记》《巴黎公社的故事》等三十几部连环画。可是就这样一位才华出众、功绩卓著的画家，却仍未逃出“文革”的浩劫，于1966年含冤离开了人世。

有的评论家说，孙之儁“不但是中国漫画界承上启下的人物，而且还是最早的工艺设计的开拓者”，此言颇为中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李苦禅先生的第一本画集的封面就是他设计的。40年代北京中电三厂拍的最早的恐怖片《十三号凶宅》的彩色宣传画也是他创作的，背景是王府大门，主体是身着长袍、面目恐怖的守宅老人，充分表现了恐怖影片的特色。当时贴满京城，影响巨大。

顷闻，孙之儁有爱女孙燕华，与其北京国立艺专同窗李苦禅令郎李燕结为连理，都从事美术行业，他在九泉之下也当瞑目了。

颐和园半廊上的字画

颐和园乐寿堂东跨院南端有一段游廊，游廊的南半被墙砌住，只剩下了半边廊子，所以叫作半廊。上边有一幅奇怪的字画。时间写的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接下去写有“天顺建筑厂重建乐寿堂，窝头每斤一元三毛六厘，工人每日所得之饭钱不足以一人之日费”等字，并署有“镜坡道人留此以做后人之参考”云云。

这幅奇怪的字画，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笔者当年寓居北京，曾对此充满血泪的故事有所耳闻。

当时有一位叫赵守义者，其家祖祖辈辈都是油画匠，因为手艺精湛，在北京颇有名气。后来他跟一个裱画的姑娘苏玉兰结了婚，生一男孩，取名“小山”。小山十岁那年，有一恶少见苏玉兰有姿色，非逼着给他做小老婆不可。玉兰不从，寻机悬梁自尽了。

赵守义咽不下这口气，就写了状子，告到官府衙门。结果判他“无理取闹”，要把他抓进大牢。他闻讯带着小山连夜逃出了北京。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听说要修颐和园，招募油画匠，父子俩就赶回北京应招，一同在颐和园描油彩画。

这年春天，乐寿堂的玉兰花开放，赵守义看着玉兰花，就想起了妻子苏玉兰，触景生情，心中过度悲伤，一下子病倒了，病情日渐加重。每天六元钱的工钱，乍一听不少，其实只能买四斤玉米面，吃都不够，哪还有钱抓药？临死前，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欺侮咱家，害你母亲的那个坏人，有朝一日你要是碰见，一定要报仇啊！”

事也凑巧，小山父亲死后不久，颐和园修缮工程处新来一个管事的，正是赵家的仇人。小山日夜牢记着父亲的话，买了一把尖刀藏在

身边，想找机会杀死仇人。

这天晚上，小山独自提盏马灯在画彩画，正画到乐寿堂半廊时，猛听背后有人恶声恶气地喊：“赶紧干，干好了老子有赏，不好好干，哼！别怪我不客气！”小山看清楚说话的人正是自己家的仇敌，怒火满腔，他看看周围黑乎乎的，没有旁人，就假装没听见。那坏蛋一看这个画匠不理他，心里十分恼怒，冲上来揪住小山就要打。还没容他举手，小山已把明晃晃的尖刀刺进了他的胸膛。

杀了仇人，雪了恨，小山抄起笔在游廊上写了上面的字，然后趁着天黑逃出了北京。据说以后再也没回来，不知他写的字今天还保留否？

法海寺的壁画

北京西郊翠微山的法海寺，是一处有名的佛教圣地。昔日，每于春秋之际，香客络绎而往，那时，笔者虽非进香之客，却也去观赏过寺中的古壁画。

那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出城西行，经过石景山，再往北进入翠微山麓，一座群峰环抱、苍松翠柏掩映中的古刹，就是法海寺。它翘角重檐，红垣绿瓦，金碧辉煌，在蓝天、白云、青山衬托下，更显得气魄宏伟。

院中有“法海禅寺碑”一块，据碑文载，此寺是明英宗的近侍太监李童倡议，由工部营缮的，建于正统四至八年（1439～1443）。全寺有大雄宝殿，伽蓝、祖师二殿，护法金刚殿，钟鼓楼及云堂、厨库、寮房等，而我们主要观赏的是大雄宝殿里的壁画。

原听说这里的壁画经过了五百余年仍完好无损，色彩灿烂如新，到实地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堪称中国大壁画中的罕见佳作。

正面，扇面墙上画有三壁云气和左右两壁佛会图与林泉环境，扇面墙背后画的是巨幅观世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像，总共十铺佛画，都是仪轨严格，没有掺杂儒、道二教的题材，系明代早期壁画特点，气势恢弘，构图严整，形象完美，继承了唐宋以来宗教壁画传统，珠光宝气、辉煌艳丽的服饰，贴金沥粉、锦绣斑斓的图案和细入毫芒的精勾细描，多流露着宫廷绘画的特色。

画面里共有七十七个人物，不同身份的人物的形态和气质也都不一样，四大天王眼神灵动，威武尊严；风神、雨师目光迷离，勇烈慓悍；侍女温婉矜持，亭亭而立；童子活泼天真，令人喜爱。特别是河利帝母与毕哩厚迦亲子之情的动作，形神皆动，使人叹绝，她置身于

诸天神行列之中，神情肃穆，表现出皈依佛教的虔诚，但她又用左手轻抚爱子头顶，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母子温情，这样的形态神情，突破了宗教的氛围，把观者拉回人的感情世界……

昔日一观，印象之深至今不忘，听说法海寺壁画今日尚同往昔，中外游客多有慕名而往观者，他们想必也有深切的感受。

朱仙镇木板年画

新年前夕，接到河南朋友寄赠的一本《朱仙镇木板水印年画》挂历，新颖别致，欣喜异常。

朱仙镇是中国古时四大名镇之一，自北宋起，即为东京汴梁（今开封）之水陆交通要塞。其木版年画，亦兴起于北宋。据宋代益元老《东京梦华录》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说明当时民间过年，家家户户都要买几幅年画贴于家中，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朱仙镇木版年画分春版、秋版两种。春版为全年开作，制作精美、价格较贵；秋版多为秋后开作，应时赶制，价格便宜。每年"九九重阳"过后，各地年画客商便纷纷云集此地订货，而后肩背担挑到四方去卖。

朱仙镇年画采用木版与镂版相结合，水印套色。木版设置墨线（称主板）、水墨、章丹、木红、笞绿、葵紫诸色；镂版设置槐黄、永红诸色。高档年画增设套全版；低档年画采用五版套色。颜料一般采用本地产植物和矿物质材料制作，纸张也多选材于本地的草纸、连丝纸、本胎纸、毛边纸、黄丹纸等。采用这些传统工艺印制出来的年画色彩艳丽，庄重浑厚，线条简练，粗犷流畅，有着强烈的民族艺术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朱仙镇木版年画种类繁多，有门画"门神"、灶画（灶王爷）、中堂，及桌裙、门头、影壁、斗方、对联等。画面中装点着象征吉祥如意、福寿平安的点缀物，借物寓意，常见的有牡丹（高贵）、荷花（和睦）、戟（吉祥）、磬（庆）、蝙蝠（福）、瓶（平安）、柿（事事如意）等。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历史戏剧、演义小说、

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长坂坡》《铜锤换御带》《岳飞大破金兀术》《祭塔》《哪吒闹海》《罗章跪楼》等。

五十年前，鲁迅先生曾大量收集过朱仙镇的年画，并给予高度评价："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也有，也贴在厨门上、墙壁上。"据说他所收藏的朱仙镇年画，至今仍有十九幅珍藏于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

友人函称：现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不仅仍保留着传统的艺术风格和地方色彩，而且还有创新。1982年，当地成立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法国还出版了《朱仙镇木版年画》专集，许多旅游者把它当作"东方的民间艺术珍品"购买收藏。

年画中的《关帝诗竹圣迹》

武强年画博物馆最近推出龙年传统题材挂历，其中一幅为《关帝诗竹圣迹》。此画没有大红大绿的热烈、奔放，只用黑白对比衬托出反差，但也表现了遗世独品的孤高、雅洁。画中的竹叶巧妙搭配，组成了一首诗：

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画上印着："弘治二年十月十八日扬州淘河获出汉印，共重二斤四两，文曰汉寿亭侯之印。"画上还印有道光己酉秋日，直隶定州同知会稽劳志恩对关羽和画倍加赞美的题跋。

相传三国时关羽作的这幅画，并不是普通的竹画，而是由关羽自己的一首诗拼成的竹字画，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书法，对于世传绝少的关羽竹画来说，它是有一定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珍品。细看竹叶，如果仔细辨认推敲，即为单个的字，每层竹叶从右向左，由字连成诗句，耐人寻味，饶有风趣，越看越爱看，越读越爱读。

其实，此画记载了一个历史故事，刘备与曹操徐州之战后，刘备败逃，关羽被曹操所俘。曹操爱关羽的勇武忠义，所以，"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盛情款待关羽；并送去美女、战袍和宝马，企图收买关羽。关羽在曹营时，斩颜良，诛文丑，也确实立下大功，汉献帝册封其为"汉寿亭侯"。可是关羽一直思念结义兄弟刘备，当得知其下落后即刻告辞曹操，但曹操不肯放他，拒而不见。关羽义气太深，不好不辞而别，特作画一幅，竹叶组字，以竹喻志，以画藏诗，留给曹操，然后"挂印封金"，保护着甘、糜二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冲出曹营，寻找刘备而去。曹操见到这幅画，玩味良

久，恍悟关公去志弥坚，更加钦佩他的忠义。以后曹操每每见到这幅画，欣赏品味，感叹唏嘘。

《关帝诗竹圣迹》是武强画中的传统名字，在其他地方也有此碑刻，名《风雨竹》。涿州有块《风雨竹》碑，碑上刻有风竹、雨竹，还刻有“汉关夫子手笔”。上海淞江县有一块，其碑形制为立幅，上为雨竹，下为风竹，碑上记载：“清初雍正年间，贵州学史官场赞善群人王奕仁在朝做官时，于京城正阳门外见到关羽画竹的刻石，后来买了拓本，回淞江后刻于石上。”北京故宫、西安碑林、北京房山县关帝庙内、河北正定县博物馆等地均有碑刻，形制有异，内容大体相同。

据《中国古代画史》《画论》中所记，三国时的关云长的确是个善画竹的高手。上海复旦大学伍蠡甫教授考证，中国最早的竹画画家正是关羽。在涿州这块《风雨竹》碑上，镌上一首后人的赞诗：

美髯遗雨竹，笔墨著千秋。
字迹精神在，横斜万古留。

老月份牌画面面观

月份牌画指流行于民国时期，由商品广告、月历、擦炭素描加水彩画面这三种成分融合的印刷品。最大的产地是上海，其雏形是随进口商品配发的招贴广告，画面不外乎欧美风景、肖像等，对中国人缺乏吸引力。国内画家和商家很快瞄准这一有着广阔市场的新画种。在内容上，经过传统年画题材的移植和时事题材的尝试后，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定了艳装丽人和豪华都市生活场景的统治地位。

在载体上，月份牌画得力于20世纪初引进的彩色石印技术。这种技术生产的月份牌画保真度高，色彩鲜艳，成本及价格低廉。其视觉效果和经济效益大大超过了传统木刻年画并取而代之，成为民国时期最大宗的时令性印刷消费品。1949年春节期间，仅上海就发行月份牌画八百万张。最大的发行点设在上海的“青莲阁”茶楼，每年10月起，外地批发商云集到此，挑选来年的新画样。零售方式也很独特。尽管卖年画的店铺均出售，但只要购两包英美烟草公司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就可凭烟盒内的赠券换得一张画。不少大商店还推行“购物一元，获赠香艳海报一张，多购多赠”的促销手段。

许多大财团为提高商品的知名度，都不惜重金买断月份牌画稿佳作。如商务印书馆开给郑曼陀的稿费是每张三百银圆。郑早年就职于杭州“二我轩”照相馆。因当时像片放大技术不完善，他便用擦炭画法对着照片绘制大幅素描，以满足需要大幅照片的顾客。1914年，他闯上海滩，以擦炭加水彩绘制的月份牌画稿一炮打响，使大药商黄楚久率先订货，从此门庭若市。

20世纪20年代，郑的垄断地位终于被打破。杭稚英、金梅生、徐咏青等人绞尽脑汁，破解了郑的秘法，还吸收了国际上最新的迪斯尼卡通画的某些手法，使月份牌画面的人体结构、光影、色彩、形象、

背景更加准确、逼真、鲜艳、新潮、多样。杭还成立了“稚英画室”，雇用了一批年轻画家，在产量、质量上独领风骚多年。到三四十年代，金梅生使月份牌画演变成为纯欣赏性的美术品。英美烟草公司则以高薪长期聘请胡伯翔、张光宇等十几位知名画家，并在上海浦东开办了美术学校，专门造就月份牌画的设计和生产人才，以大投入、大产出来确保占有市场的份额。上海之外最著名的月份牌画家是广州的关惠农，被广东人誉为“月份牌皇帝”。

月份牌画给后人留下活生生的、以十里洋场上海及广州为代表的大都市生活缩影的形象化史料，具有“民国时代”“市民与商业化”的艺术特色，因而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烟画一席谈

提起“烟画”一词，起码得追溯到五十年前，这种附在卷烟盒内的硬纸画，就像一张张的扑克牌，它虽然是烟草公司的一种促销手段，带有商业色彩，但画法非常高超，色彩非常艳丽，内容非常丰富。

烟画是“洋烟画”的简称，又称“洋画儿”，最早出现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时代，彼时洋人瞄准中国广阔的市场，竞相来华创办烟草公司，垄断中国所产烟草制售卷烟，因竞争日趋激烈，遂于高级或中档香烟盒内各附装潢精美的画片，以此吸引顾客。

当时高级洋烟卷儿的商标有“三炮台牌”“土耳其牌”“加立克牌”“老刀牌”“丁字牌”“黄金龙牌”“白金龙牌”以及“人顶球牌”。皆二十支装，其中的前三种，一枚之资相当于一斤面粉的价格，普通烟民望而却步。中档者计有“双刀牌”“红锡包牌”“大联珠牌”“大前门牌”“哈德门牌”“大美丽牌”以及“翠鸟牌”“金鼠牌”“品海牌”“菊牌”等。

各家烟草公司在中国的土地上激烈角逐，不仅确保烟丝的质地，而且不惜重金聘请丹青妙手，绘制成本大套的人物、山水、翎毛、花卉乃至风俗画，每盒烟内附加一张，极有吸引力，日积月累，凑成一套，便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闲时把玩，意趣盎然。

“老刀牌”的烟画，所绘皆名见经传的“古人”，诸如周武王、姜子牙、介之推、楚霸王、张良、姚期、秦琼、尉迟恭、诸葛亮、关云长、张飞、赵云等，其形象千差万别，毫无雷同之处，藏者无不宝之。

“品海牌”的梁山泊人物，诸如“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鼓上蚤时迁”“智多星吴用”“花和尚鲁智深”“母夜叉孙二娘”等，其仪态或堂堂，或威武，或凶恶，或狡黠，或妩媚，神采栩栩如生，得

之者每每爱不释手。

“人顶球牌”烟画为“三百六十行”，所绘市井人物有轿夫、车夫、堂倌、木匠、铁匠、锯碗匠、剃头匠、打小鼓的、摇煤球的、吹糖人的、捏面人的、磨剪子磨刀的等，高矮胖瘦丑俊不一，极富有生活情趣。

“哈德门牌”所附的烟画，则是“江南风物”，其画面如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寒山寺，杭州的六和塔、虎跑泉、岳飞墓、雷峰塔、三潭印月等，线条流畅且色彩协调，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巧夺天工的园林建筑微缩于方寸纸片上，令人叹为观止。

“大前门牌”烟画所涉及的内容，皆是中国成语故事，与画面相对应的文字诸如“昔孟母，择邻处”“雁来秋色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水有源头木有根”等等，图文并茂，三尺孩童把玩之，遂得以启蒙。

此外，尚有“菊牌”的各色菊花，“红锡包牌”的各色禽鸟等，皆各有特色。收藏者兴致之高，实不亚于集邮。

阅古楼碑帖历沧桑

不畏风雪寒，经历八百年的北海公园，地处北京城市中心。湖光塔影、楼台亭殿、画阁曲廊，极富诗情画意。在公园中琼岛的西北，有一座小楼阁，依山面水，古槐映盖，这就是北海公园里藏有《三希堂法帖》的阅古楼。

阅古楼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楼呈弓形，西面为弓背，东为弓弦。楼里珍藏着中国著名的《三希堂法帖》石刻和部分拓片，因此，它是书法爱好者流连不忍离去的胜地。

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局面稳定，偃武修文，朝廷除了进行编书修史、科学选士以外，还提倡书法、绘画等。乾隆皇帝尤其喜爱书法、诗文。他的题诗、题字、记文等全国各地都有。所谓“三希堂”，是指从养心殿西暖阁隔出的一个面积仅六平方米的小室。弘历自撰《三希堂记》中说：“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稀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

镌刻这部法帖历时六年。先选高手钩摹出底本，然后镌刻于房山县产的青石之上，共刻四百九十五块。同年，在北海白塔西侧专门修建了一座阅古楼，将这些刻石嵌安于阅古楼四周壁上。

当人们走进阅古楼内，往往会被满壁古朴雄健的书法所吸引。《三希堂法帖》共收集了中国从魏晋以来到明朝末年一百三十五位著名书法家的三百四十件楷书、行书、草书等作品，总计约十万多字。书法家们风格各异，有的笔势奔放；有的风度端庄；有的给人以潇洒、宕逸、舒展、雄健之美感。石刻艺术也颇精细，甚至连浓墨、破峰也清晰可见，诚属美不胜收。

但是，今天能完整保存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袁世凯于1916年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于当年6月病死，灵柩运往河南彰德安葬，随后家属迁出中南海。新任北洋政府总统的黎元洪由东厂胡同住宅迁入中南海，派副官唐中寅先带人去打扫。唐办事认真，派多人巡逻。忽有一队搬运工抬着多块碑石要出新华门，巡逻者一看是《三希里法帖》刻石，当即阻止，并报告唐中寅。唐赶到现场，将他们的雇主找来，此人乃袁世凯之第三子袁克良。唐责袁不应私运国宝，袁蛮不讲理，强令搬运工起运。唐大喝："我不怕你这皇三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私运国宝就是不行！"袁恼羞成怒，先摔坏一块石刻，中断为二，再摔一块，碎裂为四，然后扬长而去。事后，唐中寅找来石工，将袁克良未能盗走的刻石又全部嵌安于阅古楼原处。被袁克良摔为两块者，是梁诗正等所撰《三希里法帖》跋文；裂为四块者，系弘历的御题诗，碎裂处有些字已不可见。这两块断石，游阅古楼可见；从1916年以后的《三希堂法帖》拓本上亦能看出。此实盗窃国宝之罪证也。

南诏古碑今犹存

大理古迹很多，其中南诏德化碑和大唐天宝战士万人冢，是南诏时期存留不多的两处重要古迹。

南诏德化碑立于“赞普钟十五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位于下关至大理古城途中的一片农田里，背靠苍山，面对洱海。早些年，碑为土坯房保护，现已建成唐代风格的大型碑亭，很气派。碑高三点零二米，宽二点四六米，厚六十厘米，呈长方形，顶有榫孔，原应有额，今已不存。

此碑碑文长三千八百多字，词藻斐丽，文理通达，朗朗上口，一气呵成，许多句段写得极为精彩。例如，写到唐朝大军全军覆没时，仅用了“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十六个字，形象生动又高度概括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又如，在谈到修建阵亡将士万人冢的用意时，文中又这样写道：“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愿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寥寥数语，入情入理，表明了阁罗凤及南诏国不得已与大唐作战之处境，而又不忘旧恩的心迹。史书记载，阁罗凤曾经说过：“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太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我前过也。”总之，尽管已经打了胜仗，但是南诏不能脱离大唐统治。应该说，这便是竖立德化碑的用意所在。同时说明，这位南诏王确实是一位明智而又颇有预见性的君主，二十八年后，南诏与唐王朝又果然和好了。

南诏古碑的内容与史书的记载是吻合的。唐天宝十年至十三年（751～754），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宠爱有加之时，宠臣杨国忠等人操纵朝政，权倾朝野，是非颠倒，穷兵黩武，给内地和边疆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紧接着，天宝十四年便发生了长达八年

的“安史之乱”，唐朝国运从此走向衰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不少大诗人都以此为题，写过许多著名的诗篇，愤怒地谴责了这场不义的战争，无情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极大危害。

这段历史，或者说这两处重要古迹，实在发人深省。它至少说明在边疆民族地区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应该委派什么样的官吏。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任何歧视、侮辱和压制都只会激化民族矛盾。同时表明，云南这个民族自治省，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即使在发生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及至战争的情况下，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书家认为，南诏德化碑不仅文字畅达动人，书法亦是唐碑中的上乘。其书写流利挺拔，萧散朴茂，秀逸可爱，有晋唐风貌，兼具北海遗风，此碑应出自大家之手。并考证说，此碑的撰写与书法，很可能均出自时任南诏清平官的郑回。此君后来为恢复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可惜的是，由于历史久远，南诏德化碑已风化得很厉害，加上当地人将其视为“神碑”，大凡生病者，家人均从碑上取石煎水当药，更是造成了破坏，目前，德化碑所存文字与原碑比，已十不及一。

王法良书写故宫三大殿匾额

北京故宫“太和”“昭德”“贞度”三大殿，吸引了无数游人，但是这三大殿的匾额是谁写的呢？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原来，它们出自清末著名书法家王法良之手。

王法良，字弼臣，河北省任丘市人。1848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学业不佳，其父清朝进士王金台便让他改练书法。未料，他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不但字迹工整，而且秀拔苍劲。王金台大喜，便不时从京中买来名家字帖让他临摹。王法良也倍加勤奋，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地写、练。后来他又得著名书法家、同乡王斌的指教，书艺大进。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慈禧太后命彩画故宫三大殿，更换匾额，招各地书法家试笔，仅翰林院就有二十多位学士、进士应试，谁知皇上都不中意。

此时四十八岁的王法良也来到京中，他苦练几十年之后，临苏帖，仿隶书，皆能神似，他的颜体字能够乱真。翰林院大学士李鸿藻和王金台是同乡世交，他见王法良功力不凡，便向操办故宫彩绘的翁同龢推荐。于是王法良便前往一试。

未试之前，有一天，王法良把自己仿颜的字帖喷上黑豆水，又揉搓几遍，拿到“荣宝斋”书画店，掌柜即以四百两纹银买下。

再说翁同龢这日闲逛，信步来到“荣宝斋”，见到王法良的仿颜帖，暗暗叫绝，竟以五百两纹银买下。进得翰林院正遇李鸿藻，便拿出这幅仿颜帖对他说道：“此乃颜鲁公真迹，若有人有如此功力，皇上保能满意。”李鸿藻细看笑曰：“此乃王法良所书，不信揭开宣纸。”翁半信半疑，揭开上下层宣纸果见“弼臣书”之印，不禁大喜，忙禀报光绪帝，光绪遂命在三殿门前高搭彩棚，请王法良献书。慈禧又

下旨“门字不准提勾，恐皇上出入有伤龙体”。王法良受旨后，高登棚台，蘸足笔墨，稳住笔锋，“太和”“昭德”“贞度”三匾额一一挥就。皇上一看喜不自胜，爱不释手，连连称赞。自此，王法良名声大振，慕名向他求书写碑者接踵而至，应接不暇。慈禧下旨重赏王法良，并赐他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一一谢绝。

此后，王法良回归故里，整日闭门研习书画，为家乡父老撰文写碑，直到晚年，1909年，王法良在老家病逝，享年六十一岁。

“天下第一关”书写人萧显

当你在山海关仰望城楼那高悬的巨匾时，感到“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字迹酣畅遒健，气势开张，与古城雄关浑然一体：和谐、庄重、威严。该匾长一丈七尺七寸，宽四尺八寸，每个字都在一米以上，“关”字最高的一笔为一点四五米，“一”字长为一点零九米。传说手书“天下第一关”匾额的是明代奸相严嵩，实际是当时著名书法家萧显。

萧显，字文明，明山海卫（今山海关）人，少年时在角山寺读书，勤奋好学。成化八年（1472）考中进士，在京城任兵科给事中官职。当时，宦官汪直当权，气焰嚣张，有一名武将以宦官做靠山，谎报军功，希图重赏，该本章已由兵部签署了“情况属实”的意见，转兵科给事中上奏朝廷。萧显不畏权势，竟在该本章后面附了批驳的条陈。他刚直不阿，受到人们的称赞。

那时，宪宗皇帝崇尚迷信，朝野上下纷纷仿效。有个涿州巫人，在京城里招摇撞骗，假托神仙附体，造谣惑众，很多达官贵人深信不疑，特别是当权太监更奉若神明，萧显上疏，请求查禁私建庙宇，取缔涿州巫的迷信活动。皇帝阅览奏章十分反感，扣下奏折不予答复。一天，皇帝诏萧显到左顺门，由一名宦官出面斥责他狂妄。萧显据理直陈，侃侃而言，驳得中官理屈词穷。过了几天，朝廷终于下令驱逐涿州巫出京。

萧显任兵科给事中科八年，勤于职守，廉洁奉公，受到宦官权贵的嫉恨和排挤。一天，他正在家里给客人写草书字画，忽然接到朝廷贬他为镇宁同知的圣旨。镇宁（今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遥远的南方，当时那里是贫瘠的蛮荒之地。无疑，这个消息对他是沉重的打击。可是他吩咐儿子立即为他整理行装，泰然自若地把字画写

完。

萧显在镇宁当同知八年，为发展边疆生产和传播文化事业做了很多事。后来，调任衢州（今浙江衢县）同知。又二年后，提升为福建按察司佥事，兼管“屯田”事宜，政绩颇著。刑部尚书白昂发现他是人才，打算推荐他到京城为官。萧显看到朝政日非，不愿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就婉言谢绝，辞官归里。他隐居在山海关城北围春山（今燕塞湖东），建别墅名“围春山庄”，并筑有墨香亭、荫秀亭，以诗酒自娱。曾赋诗明志：

三十年来走宦途，乞归白发半头颅。
依山结屋尘偏静，临水观鱼兴不孤。

另有《登城述怀》诗云：

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
八窗虚敞堪延月，重槛高寒可摘星。
风鼓怒涛惊海怪，雷轰幽谷泣山灵。
几回浩啸掀髯坐，羌笛一声天外听。

这词同他写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一样，气魄雄伟！

萧显诗文俱佳，著有《海豹集》《镇宁行稿》，尤长于书法。《临榆县志》载，城北伯山之巅有萧写的草书石刻，早年朝鲜使臣常登山摹拓，当地人叫这块石碑为“高丽碑”。至于他书写的“天下第一关”巨匾更是闻名世界了。每当人们走到山海关，都要登上城楼观瞻这块闻名古今中外的巨匾，感到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我当年见到的那块匾额已非原物。清光绪五年（1879）因原字模糊，由附生王治勾摹重刻。民国九年（1920）又因年久破裂，由邑人杨宝清勾摹另刻。据传说，原匾额保存在临榆县孔庙大成殿内。时光

流逝了三十余载，倘有机会重游山海关，或有缘一睹匾额原物！

旧都牌匾多名家

过去老北京的牌匾，可分两大类，一为商店牌匾，二是古迹题额，就笔者记忆所及分述如下。

商店牌匾之执牛耳者，当推地安门外后门桥的“为宝书局”，这是书法爱好者公认的。该匾白底黑字，刚劲中现出婀娜之姿，柔媚里又呈通健之气，观之回味无穷。这是伪满汉奸郑孝胥所书。其人虽已附逆，然其书法确有功力。

次之，以魏碑为功底，兼呈米芾风格的书法家张伯英，其书法不知为旧都商店增添了多少风采。张伯英老而弥坚，越到晚年其佳作越流利潇洒，深为北京的书法者所赞誉。

张字首见于和平门外琉璃厂，是以其碑帖收藏家和书法家双重身份出现的。所书匾额高悬于古玩店门楣，越发显得古色古香了。此外，以宋版、明版等善本书收藏著称的“翰林院编修”傅增湘（沅叔）题匾，在琉璃厂和宣内头发胡同小市的古旧书店前均有出现，亦颇受重视。

以收藏金石，尤其以收藏着一钤武则天“金轮精舍”玉玺而闻名的金石家陶北渔的书匾额更为增色。陶先生的书法，棱角分明，一如百炼精钢，极具金石韵味。琉璃厂还有位名学者，是原燕京大学教务长容庚的墨宝，也是不可多得的神品。

当然，清末状元刘春霖，老翰林陆润庠、潘龄皋，以及以书颜体字著称的冯恕等所书匾额，既多且精，美不胜收。陆润庠以魏碑享誉中华，潘龄皋则以行书名世。

名胜古迹的题额，虽以御笔为多，但笔出官僚者亦不乏其例。

先说“御笔”，当然以紫禁城中为最多了，最突出者应属太和殿“正大光明”匾，这是康熙写的。当然他不如乾隆写得多，因而也就更显得珍贵。

旧都原来的通衢所建牌坊颇多，最著名的有西单牌楼（设于六部口）和东单牌楼（设于王府井南口）上的“敷文”“崇武”两坊，其次为北海桥上的“金鳌”“玉蝀”和北海公园内“堆云”“积翠”坊。虽不知这些出自何家手笔，但足以为京都增添一层娇艳的色泽。

更值得一提的是北海迤东三座门大街的“孔绥皇祚”和“弘佑天民”两座牌坊了。据传这两坊是明朝严嵩所写。姑不论真伪，就其书法而言，当无愧于上乘之作也。此外，还有位于北长街原班禅驻京办事处的“泽流九有”和国子监、雍和宫的牌楼，这也都是京中名胜。

最后所要提及的是紫禁城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现在这题额是郭沫若所书，原来的却是颜体书法名家李煜瀛的杰作。其书气势磅礴，观之令人振奋。然而，传说这块匾是李公集颜碑之字放大而成。

李叔同、丰子恺与《护生画集》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护生画集》是丰子恺为庆贺恩师生日而编绘的漫画集，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而感人的故事呢。

1927年的一个清晨，青年佛教学者李圆净居士前往立达学园初次参见了李叔同和丰子恺。第二天，丰子恺拿了两幅戒杀护生漫画回访李圆净征求意见。李一见这两幅漫画，就欣喜地对丰子恺说：“子恺兄能画这类作品，在当今之世，实为发扬护生其理无上利器。真该继续绘画一批，以结集济世。”悲天悯人的丰子恺接受了李圆净的恳请。同时想到，两年后李叔同将年届五十，如果绘制一批戒杀护生结集出版，正可作为恩师五十寿辰之纪念。

丰子恺回到家里，向李叔同谈了他和李圆净的设想，李叔同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题目，并让丰约来李圆净，一起商定了大体规划：一幅图画配上一篇说明文字；丰子恺绘制图画，李叔同撰写说明，出版、印刷、发行等则由李圆净负责。

在此后半年多时间中，或是先由丰子恺将绘就的画幅寄给李叔同，请他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并撰写说明文字；或是先由李叔同写出文字，由丰子恺绘制相应的画面。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李叔同多次致信丰子恺、李圆净。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整个画集的编绘思想反复作了原则性的指示，而且对字之大小、所占位置如何与画面相称相谐，以至用哪种纸张、如何装订、如何发行等具体细节，也都条分缕析，毫不苟简地予以指点，表现了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

《护生画集》的编绘出版，前后是有变化的。按照初拟计划，原先只收二十四幅图画和说明文字，也并无编绘续集的打算。后李圆净建议，画集出版后可赠送日本有关各界。李叔同觉得此建议很好，但

须“再画数十页”。丰、李二人在考虑李叔同的这些意见时，联想到画集当初原为庆祝李师五十寿辰而作，便进一步建议，将规模扩大到五十幅。李叔同自是欢喜赞同。

画集于1929年2月，李叔同五十寿辰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但这时仍无编绘续集的打算。直到1939年，在广西宜山躲避日寇的丰子恺，为了庆贺李叔同六十寿辰，才有续绘画集的设想。并想以六十幅庆祝六十寿辰。这个设想很快得到时在泉州的李叔同的赞许与合作。并致信丰子恺说：

> 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复信说：

>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出版后两年的1942年，李叔同在泉州圆寂。

《十竹斋笺谱》沧桑

《十竹斋笺谱》是明末清初画家胡正言在崇祯十七年（1644）编印的。胡正言号曰从，自号“默庵老人”，安徽休宁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

胡正言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绘画、诗文都有很高的造诣，还精于篆刻，并对医学、经学、小学等均有所涉猎。崇祯时曾授翰林院职。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满族入关南下，南都（南京）沦亡之后，胡正言已有六十余岁，隐居在南京鸡笼山。他在门前种了十余株竹子，并将其书房命名为“十竹斋”。

在“十竹斋”，胡正言先后刊刻珍贵图书约三十余种，其中尤以《十竹斋书谱》和《十竹斋笺谱》二书最为有名。它在明末清初的彩色木刻版画艺术中，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饾版”和“拱花”两种技法，而且在镂刻和设色上也有卓越的成就。它是中国版画史上极为难得的艺术瑰宝，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版画典籍。

《十竹斋笺谱》这部珍籍存于世的极为稀少，当时发现的，全国仅有三部，一部原为天津兰泉先生所藏，后又辗转售出，流入日本“文求堂”；另一部藏于上海狄氏；第三部便为王孝慈先生所珍藏。

王孝慈是中国版画收藏家，在北京琉璃厂旧书铺，以八百银圆买下了《十竹斋笺谱》，并特制一樟木盒，把笺谱珍藏起来。

王孝慈与郑振铎、鲁迅是书友。郑、鲁两人看到王孝慈珍藏的这部笺谱后，决定将其翻刻一下。

与北京荣宝斋合作重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卷，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终于在1934年年底出版了。鲁迅亲自撰出了《重印〈十竹斋笺谱〉说明》。遗憾的是，这部笺谱刻至第二卷，鲁迅和王孝慈先后因病去世，不及见到全书的刻成。

王孝慈去世时，无钱安葬，被迫将其生前遗书出售。《十竹斋笺谱》由北京图书馆代购。至今仍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直至1941年6月，郑振铎才将《十竹斋笺谱》四册翻印出齐。

当年鲁迅与郑振铎刊印的《十竹斋笺谱》只印了二百部，大部分为国外人士所购去，国内已不多见。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幸能收藏一部四册本，书后有鲁迅、郑振铎亲笔签名并编号，极为珍贵。

国画教材说《画传》

在中国画坛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孕育名家、施惠无涯者，《芥子园画谱》当之无愧也。

《芥子园画谱》，又称《画传》，诞生于清代。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曾在南京营造别墅“芥子园”，并支持其婿沈心友及王氏三兄弟（王概、王蓍、王臬）编绘画谱，故成书出版之时，即以此园名之。此画谱堪称中国画的教科书。

《画传》出世，备受时人赞赏。光绪十三年（1887），何镛在所作后序中写道：“一病经年，面对此谱，颇得卧游之乐。”并题联云：“尽收城郭归檐下，全贮湖山在目中。”

画谱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浅显明了，宜于初学者习用，故问世三百余年来，风行于画坛，至今不衰。许多成名的艺术家，当初入门，皆得惠于此。称其为启蒙之良师，是一点儿不过分的。

画坛巨匠齐白石，幼年家贫好学，初以雕花匠为生。三十岁时，随师外出做活，见到一主顾家有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仔细翻阅之后，发现自己所画，多不合章法，故如获至宝，遂借来用勾影雷公像的方法，画了半年之久，勾影了十六本之多。从此，他以所画为据来做雕花木活，既能花样出新，画法又合规则，为其后来绘画打下良好基础。据说直到晚年，白石老人还念念不忘此事。

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十四岁到县城读书时，从文具店买到一部《芥子园画谱》，成了他学画的第一位老师。无人指导下，他照谱学画，如醉如痴，终成一代大师。

山水画名家陆俨少，从小喜画，苦于无师。十二岁到南翔公学读书时，得到一本石印的《芥子园画谱》，像得到心爱的宝物一样，如饥似渴地临摹，从此迈出了画家生涯的第一步。

郭沫若先生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然其能画，则鲜为人知。他尤喜画兰花，曾画兰赠友人范令棣先生。他之所以能画，是因在家塾“绥山馆”里，常描摹《芥子园画谱》。郭沫若先生曾为其弟郭开运所画的《葵菊图》题诗道：

不因能傲霜，秋葵亦可仰。
我非陶渊明，安能作欣赏。
幼时亦能画，至今手犹痒。
愿得芥子园，恢复吾伎俩。

郭老如能学画不辍，早当成名画坛了。

《芥子园画谱》施惠画坛三百余年，育出代代名家，可谓功德无限。何镛有言，此书“足以名世，足以寿世”，然也。

蔚县剪纸放异彩

蔚县剪纸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艺术，在海外及港澳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它用手工雕刻，再用毛笔点染，色彩明快绚丽。当地人把它作为年节的装饰，贴于纸窗，故而又叫“窗花”。

蔚县剪纸历史悠久，民间传说甚多。一说很早以前，蔚县城里有个王先生，还有一名张道士，二人常用剪子和刀子剪刻彩纸，技艺甚精，后来二人便经营剪纸作坊，一个刻纸，一个染色，配合默契。另说，两百多年前，蔚县城里有几家大商号，从苏、杭二州贩来绫罗绸缎，上面贴有许多精美的商标，人们便把它们剪下来贴在窗上作为装饰品，但是，白天好看，晚上便成为黑影。后来，有个老银匠用刻刀把图案镂空了，不仅白天看上去精美，而且晚上也显着玲珑，这就是蔚县剪纸艺术的萌芽。后经代代革新，逐渐创造出手工精巧、绚丽多姿的工艺美术品——蔚县剪纸。

早年在内地，逢年过节必得在窗户上贴几幅剪纸画，以庆吉祥。记得当年蔚县剪纸的题材非常丰富，常见的有戏曲人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山水风光、生活场景以及一些谐音的吉祥物象，如表现“连年有余”即刻出鲤鱼和莲花的图案等，洋溢着欢快、健康和热爱生活的情趣。

蔚县剪纸艺术特点，是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即所谓“阴刻见色”，“阳刻见刀”；刀工精细，色彩浓艳，构图朴实、饱满，造型生动、优美，色彩对比强烈，用色大胆泼辣，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贴在纸窗上，透过户外阳光照射，就更艳丽夺目、剔透玲珑了。

当年蔚县有一大批杰出的民间剪纸老艺人，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志赏先生。他以刻画戏曲中的生、旦、净、丑角色而闻名，创作出大量

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另有周永明先生的剪纸，人物造型优美，在服饰、景物方面，采用图案化、典型化方法，尤其注重细节的镂刻。

令人欣慰的是蔚县剪纸艺术后继有人，今年四十七岁的任玉德又崭露头角了。

收藏鉴赏

ShouCang jianshang

张伯驹抢救《游春图》

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一幅最早的山水画，堪称国宝。经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氏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当年曾卖掉自己的住宅，经过情形颇有可述者。

1946年初，在中国东北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当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即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所有溥仪"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是经过鉴定确为精品者，亦作价收回。张氏认为那一千一百八十九件书画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只口头允诺，并未着手进行，遂使许多名作落于商贾之手。

当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巨川去东北最早，论文斋靳伯声继之。两人皆精于鉴别，有魄力。他们由东北收进许多碑帖字画，马巨川以一些赝品及平庸之作售与故宫博物院，真精之品则售与上海商人牟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绢本《八功图卷》，元代钱选《杨妃上马图卷》，均已流至国外。后来，这幅《游春图》又为马巨川所收，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知道后，亟向马衡建议，此为国宝，应收归故宫博物院；甚至提出如院经费有困难，他愿意帮助周转。但马衡不应。张只好自己去和商人商量，最后以黄金二百二十两成交。是时张伯驹已收购了一些宋、元巨制，手头拮据，不得已，以所居房产付款，收回此图。

在此之前，靳伯声收得宋范伯淹《道服赞卷》，后有文同的跋。当时张大千想收买过来，马衡知道，当即追索，靳故避之。最后由张伯驹变卖家产，将《道服赞卷》收购过来。

听说后来张伯驹将珍藏的许多名画书法，全部捐献国家。除上述两件外，尚有晋陆机《平复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黄庭坚《诸上座帖》、吴琚《离书诗》、蔡襄《自书诗帖》、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张伯驹毁家保护祖国文物的精神，颇为友朋称道。

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卷》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在北京主持国立艺专。一次我去拜望，适先生向朋友展示其珍藏的唐代名画《八十七神仙卷》。这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佚名，由于年代久远，绢底已呈褐色，但人物造型优美，体态生动，线条刚中有柔，遒劲而又潇洒。再加上亭台曲桥、流水行云及诸般乐器，不仅宛若仙境，且似有仙乐在耳畔飘荡。数一数确是八十七位神仙，他们列队步行，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后来，先生谈起他收藏和保存这幅名画的经过，颇感人肺腑。

1937年春天，徐先生在香港举办画展。一天，许地山夫妇介绍他去看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国书画。徐先生一件件观赏着，忽地眼睛一亮，一幅古旧的人物画卷呈现在眼前，他兴奋得手指都有些颤抖了，几乎是叫喊道："我要这一幅，我只要这一幅！"这幅画就是《八十七神仙卷》。那位德籍夫人提出要价一万元，徐先生一时拿不出，便提议以一部分现金，加上自己的七幅作品作为交换。于是这件流落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便回归到中国人的手中。

不料数年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41年冬，徐悲鸿先生赴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后经缅甸回国，下榻于昆明云南大学。一天，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他匆忙跑入防空洞。待警报解除，回到住所，不禁大吃一惊，门已被人撬开。急奔室内察看，发现《八十七神仙卷》已被人盗走，同时丢失的还有他自己的三十余件作品。他感到似一记响雷，在头顶炸开。极度悲伤之中，他挥毛写道：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任连城璧，愧此须眉负此身。

他深深地谴责自己未能保护住如和氏璧一样价值连城的国宝。1941年，徐悲鸿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他把《八十七神仙卷》的大幅照片带到教室里让学生临摹，还向学生提起了这件国宝得而复失的经过。一天，他忽然接到一位学生从成都的来信，告诉他说，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家里，见到一幅古代人物画卷，与徐先生失去的画卷完全相同。徐悲鸿先生又惊又喜，他想马上动身赶赴成都，但又担心风声传出会打草惊蛇，使藏画者因怕惹祸而将画毁掉。他考虑再三，决定请一位他熟悉的朋友去成都办理这件大事。最后，他用二十万元现金和十几幅自己的画，终于换回了《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先生高兴异常，当即赋诗一首：

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
人生总是对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宋代名画留存海峡两岸

著名古文物收藏家张叔诚，原籍北京通县，为前清工部右侍郎、开平矿务局督办、总办路矿大臣张翼（字燕谋）之子，1922年任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监察人，其后改任公司董事、协理及驻矿委员等职。张氏父子两代办矿发家，广有钱财，又都爱好收藏古书文玩，精于鉴别真伪，任何赝品也瞒不过他们父子的眼睛。抗日战争期间，张叔诚隐居天津，闭门谢客，日以欣赏古玩为乐。

张家收藏的古文物，都是稀世珍宝。单说其中的一件，宋代名画家范宽所绘《雪景寒林图》。这是一件三拼绢的大幅立轴，画面上群峰耸立，山势嵯峨，皑皑白雪，看上去寒气逼人，秦岭神采，尽收眼底。清代收藏家安麓村在所著《墨缘汇观》中，盛赞这幅画为宋范宽杰作，在宋代绘画中堪称神品。

范宽是宋代华原人，善画山水，初师李成，后师荆浩，落笔老劲。但范宽作品，传世者不多，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幅，一幅为张叔诚所藏的《雪景寒林图》，另一幅为《溪山行旅图》，均为无价之宝。

几百年来，《雪景寒林图》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明末清初，这幅画存于天津名士安仪周之手；安仪周死后，由其子孙卖给当时的直隶总督，转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甚为珍爱，在画上加盖“御览之玺”，存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抢走园内大批珍贵文物，《雪景寒林图》被一外国兵抢走，拿到肆上去卖，幸被张燕谋见到，急出重金购回，藏在天津家中，从不肯拿出示人。后来张叔诚继承家业，更视此画为和璧随珠。

至于《溪山行旅图》，原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本来极为安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北京故宫等地存藏的珍宝南迁。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下，经过挑选、造册、编号、装箱，迁走故宫博物院古物约二十万件，《溪山行旅图》亦包括在内。南迁古物暂存上海，抗战前夕运到四川，后来又转移台湾。《溪山行旅图》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据说张叔诚收藏的《雪景寒林图》连同其他珍藏文物四百五十五件，已于1981年捐献给国家，现存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陈簠斋与毛公鼎原拓片

稀世瑰宝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述周王诰诫褒赏其臣下毛公麽事，为现存铭文最长的铜器之一。此鼎对研究中国古代史、西周社会史、文字学史以及冶炼、铸造史，都极有价值，是难得的实物资料。青铜器铭文有十余字已属珍品，此器铭文近五百字，实属珍贵难得。

毛公鼎素为山东潍县陈介祺氏所藏，陈字寿卿，号簠斋，生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卒于清同治十年（1871），是清代著名的金石收藏家，与江苏金石家潘祖荫齐名，有“南潘北陈”之誉。陈氏后人家学渊源，对金石学造诣亦深，被称为金石世家。后来陈家由潍县移居天津，仍以祖藏毛公鼎知名于世。当年我有幸结识陈氏后人，对这件瑰宝的珍藏有些传闻故事，尚可一记。

陈氏家藏毛公鼎，从不肯轻易示人。盖藏此重器，极易招祸。京剧《一捧雪》演莫怀古因藏玉杯（其实是当事人因珍藏名画《清明上河图》而被当时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藩所害，所谓玉杯及莫怀古等都系假托）送掉性命的故事，剧中人起名“莫怀古”，意指莫藏古董！这是给收藏稀世珍宝的人一个警告。历来收藏家怕惹事，对所藏珍品不是保守秘密，即推说已经出手。陈簠斋有友人吴云，当时任苏州知府，也是有的收藏家，他写信给陈，想看看这毛公鼎。陈簠斋见友情难却，只好送他一份拓片。其后，为满足古文物爱好者的欣赏要求，陈家把拓片又石印若干份委托书店代售，算是公诸同好。

辛亥革命前，毛公鼎已由陈家卖给直隶总督清人端方。从此，盖有“簠斋藏印”的毛公鼎原拓片即已难得。20世纪40年代中，天津曾传言陈家出售毛公鼎前曾赶拓了若干拓片，倘有熟人介绍，原拓仍可在陈家买到云云。近年见有翻印的毛公鼎拓本问世，但总无原拓本清

晰，且缺乏手拓感。去年曾托赴津友人在天津寻访陈氏后人打听有无原拓本，今传来口信：四十年代所传陈家出售原拓并无其事，早年石印本也已无存。

陈簠斋先生生前著述甚富，其已刊的《十钟山房印举》《金文考释》等书极为学术界所重视，惜久已绝版。未刊稿也有数种，偶有传抄，多非全帙。据悉，陈氏后人正据原稿整理簠斋全部著述，不久将陆续出版。这却是古文物研究者所欢迎的好消息。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端方由陈家买到此鼎不久以后，即奉旨带鄂军入川查办四川路潮，被义军杀死。端方死后，此鼎又辗转由政府收回，现保存于台湾。

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

鲁迅先生一生收藏甚富，汉代画像拓片是他藏品中的大宗。

汉代统治阶级生前奢靡，死后厚藏，在门楣、石窟、祠堂、墓室、棺椁……留下了大量的石刻装饰画，尤其以墓葬内的画像留存最为丰富，多用石头或砖建成。在石头上刻的画叫画像石；在砖头模子上刻画，再压成砖胚烧制出来的叫画像砖。汉画像是现存汉代绘画的主要实物，内容涉及神仙传说、古圣先贤故事、社会生产生活、人物生前功绩及死后“升天”等，风格或朴质雄劲或生动遒美，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是为了继承和借鉴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从中窥见秦汉之典章文物及社会形态，以更深入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文学；而且“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或可另闯一境界”。所以他对汉画像拓片的要求很高。在现存的鲁迅手稿中，发现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目录。前面写道：“一、用中国纸及墨拓；二、用整纸拓金石，有边者并拓边；三、凡有刻文之处，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后面罗列了山东等地汉画像石的情况。很明显，这是鲁迅计划收集的汉画像拓片及对拓工操作的具体要求。这就保证了他收藏的汉画像拓片的精良。

鲁迅对汉画像拓片的收集始于1913年，直至逝世的1936年，可谓尽毕生之精力。收藏途径，一是购自北京琉璃厂的碑帖店，从鲁迅日记中得知，仅1928年7月间，他就去琉璃厂十几次，几乎隔日即去；二是托人在外地代购或代拓，主要取自河南及山东，如1935年底至1936年8月，所托之人寄给鲁迅画像拓片二百三十一幅，他收到后十分高兴，认为“纸墨俱佳”。

这些精品来之不易。如王正朔找了一位拓工同行，几乎走遍了河南南阳各地。发现不少汉画像遗存之处已被改作他用，或作房基、桥基，或作石桌、猪圈。他好不容易拓了六十七幅。鲁迅于1936年8月17日收到王正朔的信及拓片后，立即复信致谢，并托王正朔于水灾退后，将某桥基的石刻拓出寄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收集拓片的记录。至此，鲁迅共收藏了六百多幅汉画像拓片。

鲁迅早就有将自己收藏的汉画像等金石拓片“印以传世”的愿望，但未能如愿。原因一是“为时间与财力所限”，二是“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他晚年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出“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的打算。这说明在那个国家积弱、动荡不安的年代，主要靠孤军奋战、个人收藏及出资来为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些成果是多么艰难。

1986年和1991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努力下，终于先后出版了《鲁迅藏汉画像》（一）（二），共二册，实现了收藏家“印以传世”的遗愿。

叶恭绰慧眼护国宝

叶恭绰是位大收藏家。他藏书甚多，收藏古物更多，曾收藏明代宣德炉四百余件；藏周代、汉代的象牙、铜质之尺多件，并摄影以比较古今度量之异；藏古印，中有宋代名臣李纲之印；喜藏古墨，被誉为民国藏墨四大家之一（另三家为张子高、张鼋伯、尹润生）；喜藏砚，尤多文豪曾有砚，如苏东坡、鲜于枢、李笠翁、石涛等人之砚；其余如藏旧纸、古钱币、金石拓片……举不胜举。因叶氏藏品之多之精，故能对有价值之文物独具慧眼。

江苏省吴县在甪直镇有座保圣寺，始建于503年，历史上香火极盛，寺院占地几乎达半个镇。该寺不仅建筑高大巍峨，富有苏南建筑的“立脚飞椽”等曲线之美，而且雕塑尤为罕见。占据了整个山墙的塑壁，仿佛像一幅立体山水画，但见其间巉岩挺拔、奇峰突兀、洞窟错列、海浪飞涌。洞窟中有一尊尊栩栩如生的罗汉塑像。正中的达摩祖师像尤为庄重神凝，一派“静处安禅治毒龙”的神态。其左右的袒腹罗汉、降龙罗汉、讲经罗汉、听经罗汉……都各具特色。雕塑家恰到好处地捕捉了罗汉形象的最动人瞬间神态，加以典型化夸张，使塑像格外传神、耐看。

据考证，这是唐代大雕塑家杨惠之（或北宋人摹仿）的大手笔。元代大文豪赵孟頫所题该寺的一副楹联，准确概括了该寺昔日的辉煌：“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可惜到民国初年，该寺已荒芜、坍塌，衰败不堪，所幸罗汉塑像尚保存一半。至1928年，殿宇倒塌一半，半数罗汉遭毁。叶恭绰闻讯后，与马叙伦、顾颉刚、陈万里等人大声疾呼国人保护该寺无价国宝。经和蔡元培商量，由教育部与江苏省政府联合成立专门委员会，由叶氏主其事，经过募集经费，施工复原，建古物馆等措施，终

于抢救、保护了珍贵文物。至今来到保圣寺，还能看到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当年由叶氏等人筹建的古物馆，里面陈列着劫后幸存的罗汉像。

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曾奉叶氏之命，舍生忘死地保护了一件大名鼎鼎的国宝——西周的青铜器毛公鼎，自毛公鼎出土后，因收藏家陈介祺秘不示人，仅拓其铭文高价出售，故身价倍增。后为清末大臣端方所收藏。端方死后，被其姨太太以五万美元价转让。日本人闻讯后想方设法收购。此事传开后，社会名流纷纷呼吁不能让此珍稀国宝流失外人。结果，一度抵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1926年，叶恭绰出巨资买下此鼎。抗战中叶氏避乱去了香港，因不便携带，遂将此鼎留在上海，叮嘱其侄叶公超好生看管。其侄历经坷坎，终得以护住了国宝。抗战胜利后，毛公鼎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现藏于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元济三觅涉园图

戊戌老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鞠躬尽瘁，建树卓著。他三觅涉园图的故事，十分感人。

海盐涉园建于清初，为张元济之祖园。经其九世祖张惟赤（螺浮）、八世祖张皓（皓亭）父子精心修葺，成为一邑之胜。清代中叶以后，涉园又是蜚声江浙的著名藏书、刻书之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堪称江南名园。

康熙年间，张皓仿王摩诘《辋川图》，特请画家王补云将涉园诸景绘成长卷，遍征名人题咏。图为张氏传家之宝。涉园不幸毁于太平天国战争。19世纪80年代，少年张元济返乡时见到的涉园已成废址。他感慨万千地诵读先祖编印的《涉园图咏》，涉园胜景，如历目前，但以未见园图原迹为憾。

民国初，一位海盐张氏族人出示一幅涉园图。这是皓亭公所藏长卷原件，只是年代久远，图已破损，不堪触摩。张元济建议族人重新裱装，以留真迹。可惜意见不为族人所采纳，反而藏之越秘，结果毁于一场大火。张元济闻之扼腕不已。幸而，他先前托人将图上各景临摹成八幅分图，保存了涉园图的概貌。原图未觅得，这八幅简略的摹本也算是欣慰的纪念了。张元济特意配置了镜框，经常悬挂在寓所客厅壁上。

1927年，友人告诉张元济，上海徐轶如处有一幅涉园图。张赶忙求阅。根据题款知道，这是一幅副本，由张元济七世叔祖张珂（东谷）请画家查日华另摹而成，不知何时流于外姓。张元济再三恳商藏主，又请友人撮合，最后花四百元银洋购下此图。图上题咏虽非原迹，却有二十余篇可补《涉园图咏》的不足。翌年张元济编《海盐张

氏涉园丛刻续编》，悉数编入此图各篇题咏，原图已毁，此正式摹本就格外珍贵了。20世纪50年代初，张元济将此图捐献给国家，现藏上海图书馆。这是他第二次觅涉园图。

1935年初，一只涉园银樽突然在上海出现，张元济闻之欣喜万分。此银樽高十一厘米，内腔深七点六厘米，重八百六十三克。樽内壁刻有涉园全景，林峦池沼，亭榭楼阁，十分逼真。樽底还镌有清初名臣范承漠咏涉园长歌一首。此物为先祖螺浮公遗物无疑。张元济特借来，请人将银樽和樽内图、诗摄留一影，附印于《张氏族谱》之后。他还撰一短文，备述此樽原委。此幅涉园图近年由海盐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的《张元济轶事专辑之二》所转刊。可惜原樽下落不明。

聚散离合“三希”珍

北京紫禁城内养心殿西暖阁有一小室，名曰：“三希堂”，此为乾隆之书房。为何以“三希”作室名呢？

原来，乾隆皇帝酷爱翰墨，他从内府藏品中遴选出三件晋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以为稀世之珍，称其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连”。

关于三件晋帖之真伪，历史上虽有争议，但其保存价值还是公认的。《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写给“山阴张侯”的一纸短札，全文不过二十八字，但书势端庄，笔意流畅，神采不群，被古人誉作“天下法书第一”。王献之的《中秋帖》也仅三行二十余字，字体古拙肥厚，生动自然，通篇气势充沛，笔韵绵绵不断，令人不忍释卷。《伯远帖》是王珣的一封书信，落墨严谨而疏密有致，行笔遒劲却不失秀丽典雅，挥洒自如，神韵顿生，以羲之婉媚之态兼有自身险峻风貌。

说到三件墨宝的流传，却是各有际遇。《快雪时晴帖》，宋时内府收存，在其前后钤有“绍兴”印章，后经战乱入金内府，还一度落入南宋权臣贾似道之手。明代历经冯梦祯、冯铨递藏，清时冯铨之子冯源济献于康熙，始入清内府。《中秋帖》已知最早在北宋宣和内府珍藏，绍兴内府递藏。入明，为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所有，经董其昌寓目后，在卷尾留下题跋。清乾隆内府将其收进。《伯远帖》于北宋之际，徽宗赵佶亲笔为其题笔，并著录于《宣和书谱》。迨明，董其昌偶获此帖，重新装裱又辗转吴新宇、安岐等人之手。乾隆登基后，将其同前二帖共藏诸“三希堂”。

时间推至民国初年，清废帝溥仪把《中秋》和《伯远》二帖等珍玩带至天津寓所张园。为维持生计，流入郭葆昌私囊。郭氏去世，其

子郭昭俊为投身政界，欲以厚礼进献宋子文。后收藏家张伯驹在上海报章上撰文披露原委，宋氏畏于舆论压力，又退还郭昭俊。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曾怀二帖至中国台湾，旋存放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为防止两件国宝流落异邦，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国家用重金将它们购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年未被溥仪带出宫外的《快雪时晴帖》虽无前二者所引来的种种事端，却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随着“九一八”事件的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平津危急，为保护文物的安全，故宫把所存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文物精品装箱，南迁上海。不久又转移到南京朝天宫库房。然而，仅过半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京亦处于紧急形势下，这批文物不得不分三批西迁入蜀。直至抗战胜利，才重新回到南京，时隔一年半，国民党退居中国台湾之前，再次南迁留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至台湾。及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快雪时晴帖》随同众多国宝入住新舍。

“三希”法帖自1924年11月拱手揖别至今，悠悠已过七十五载。如今只能隔海相望，默默无言，虽心存团聚之意，但团聚之日仍无定期。我们相信，只要海峡两岸同胞统一之心相印，终会使“天堑变通途”。到那时，延津剑合的一幕便不远了。

张大千藏画失而复得

张大千收藏的古画中，有一轴唐朝僧巨然的《嘉陵山水图》卷，这是清宫皇家收藏的珍品。清帝宣统逊位，皇室退出故宫时，此画为末代皇帝溥仪族兄溥儒所得，大千以五十两黄金换来珍藏，难得展示于人。偶有密友来访，谈艺兴浓之时，或可展示以同饱眼福。大千先生借寓成都昭觉寺时，方丈定慧和尚、知客佛智法师等与之颇有交谊，常参与会客晤谈，也曾见过此画。他的随师学生也有多人见过此画。大千先生收藏古画珍品，这不是什么秘密的事。

1942年农历二月的一天，大千偶尔查点收藏的古画，发觉巨然的《嘉陵山水图》卷不在了，遍寻不得，询之家人、学生，大家都惊愕和茫然。这事立传给当时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因郭与大千先生交情甚厚，希望其协助查访。郭与何北衡同来看视（何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也与大千先生友善）。郭有守主张先把和尚弄来审理。他认为大千先生及其家人和学生住在御书楼，出入必然经过方丈住处的院门，而院门副值（僧人）当班，职掌进入通禀，不得须臾离位。大千先生是皈依佛门的三宝弟子，他认为不会有僧人如此贪心，对待和尚要慎重，失落的唐画，应该细细查访。唐画失落，人心惶惶。十几个随师习艺的学生当然会被人怀疑，就是大千的家人也不无嫌疑。那时，大千有三个夫人，一个随他住在御书楼，另两个虽未住在一起，也要来御书楼与大千相聚，何况其中一个还嗜好鸦片。疑云阵阵，人人不安。比较而言，学生的嫌疑颇重。于是，有几个学生便去寺内观音殿焚香礼拜，求签乞示，以解疑团。他们求得的签票偈语大意是：东、南不利，北方吉祥，明日辰时，大吉大昌。大家看了签票偈语大意，将信将疑，姑且待之，但愿完璧归赵，疑释众安。

原来，大千先生有个表弟在四川省政府工作，任职主任，他有个

儿子在树德中学读初中。这表弟把儿子带来昭觉寺拜见大千，请求给以指导，让这孩子能多受文艺熏习。因此，这孩子常来张大千处玩耍，日久渐熟，出入也就不用门上通禀。这天星期日休息，大千的表弟检查孩子的课业，发现书包内有卷东西，长约一尺二寸，用报纸包裹，拆开一看，乃是一幅古画，细视之，认出是唐朝僧巨然所绘，上面还钤印了历史上收藏者及皇帝赏鉴的宝印。他询之孩子，回答是向表叔要画，表叔让他去画室随意自取。大千的表弟立刻意会到孩子把话听错了。大千绝不是把这古画给孩子，而是让孩子在自己所绘的小品中“随意自取”。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于是，次日早饭后，这位表弟带上儿子，坐上私包车，从住家的天回镇直奔昭觉寺。表弟见了表兄说明来意和情况，将唐画递给表兄，共同展示一看，果真原物。如今完璧归赵，疑云迷雾顿然消散，几天来人们心中的压抑变成了欢快、惊叹。有人想起了观音殿求签的事，念诵起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时约摸七八点钟，正当辰时。

《清明上河图》遭劫揭秘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被历代鉴赏家视为无价之宝。然而这幅画在八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却也历经劫难。

当年，张择端完成这一历史长卷后，进献皇宫。宋徽宗赵佶十分珍视，他又用瘦金体御笔亲书了“清明上河图”五字，并钤上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作鉴赏、收藏艺术品的钤记）。宋徽宗成为皇宫第一个收藏此图的人。

1126年12月，汴京陷入金人之手，宫中金银珠宝、名贵文物均被掠走。但金人不识此画的价值，于是，《清明上河图》流落民间。

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宫廷。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后将此画从藏阁中取出，秘密送回老家湖州，后自留真迹，用赝品归入藏阁。到了明代，这幅画先落入大理卿朱鹤手里。他珍藏数年后，又被名士徐赙以重金购去。数年后，徐染沉疾，弥留之际，将此画馈赠好友李东阳。至今尚有李东阳于1515年所书的长篇跋文。后来，《清明上河图》又几次易主，流落到苏州，被明代学者王鼇购得。

明嘉靖年间，一代奸相严嵩访得《清明上河图》下落，向王鼇索画。后严嵩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严府被查抄。这样，《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入皇宫。

明隆庆时，《清明上河图》被嗜画成癖的成国公朱希忠收藏。后辗转易主，又被一内臣窃得，藏于御沟石缝之内。恰逢天降暴雨，沟内水涨，淹及石缝。待到雨停水退，画已被污损得一塌糊涂。

然而，这时在民间还流传有张择端的另一幅《清明上河图》真迹。那是南宋汴京陷落，张择端南渡以后，因思念故园，又重新绘制过《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后来几经曲折，流入民间。

清代乾隆年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被湖广总督毕沅买到。嘉庆四年（1799），毕沅因“剿匪不力及滥支军费被处死，家产被抄没入宫”，《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被收进宫廷，一直保存到民初。

民国初年，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出大批珍宝文物，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有人在长春收集到伪皇宫中流散出去的十余轴画卷，其中便有真迹《清明上河图》。

再后来，到1952年，这幅《清明上河图》第五次归入“皇宫”——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卷虽是张择端之真迹，但不是最初一幅，而是他南渡以后重新绘制的那一幅。最初的那一幅，在明代隆庆时的暴雨中，已损坏。

潘天寿护国宝失己宝

20世纪50年代初，潘天寿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民族美术教研室主任。由于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中国画很不景气，几乎要从美院的讲坛上取消。但潘天寿老艺术家怀着对祖国、对民族文化执着的爱，仍坚持从事中国书画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一天，有位画商上门兜售一幅元代大画家王蒙所作山水。潘天涛、吴茀之打开画卷，只见笔精墨妙，画境深幽，越看越舍不得放手；但听画商报价九十元，不免心生疑惑，觉得太便宜了，莫非是伪作？人们都知道在解放前夕，“美丽牌”香烟老板为了不使国宝流失到日本，硬是用一条弄堂房子的高价买下了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系著名珍藏品），一时被传为美谈。而眼前的这幅山水并不逊色于《青卞隐居图》，即使再从纸质、印章、款式、装裱等方面来鉴定，也是真品。但潘天寿深思熟虑，认为王蒙等“元四家”的作品被后人仿制较多，生怕此幅也出自明代造假高人之手。

考虑再三，潘天寿特请来他极为推崇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来定夺。英雄所见略同，黄宾虹出言掷地有声：“画虽不能肯定，但画得很好。如学校不收，我收了！”最终，潘天寿为学校以七十元价成交。不料，有人却散布闲言碎语：“哼，七十元钱收了一幅假画！”甚至还上告到校领导，给潘天寿他们无端增加了压力。

直至若干年后，人们才发现当年潘天寿主持收集的许多古画、碑帖等资料，不但成为很好的直观教材，而且为学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正因为他们在当时经费极少，压力频频的困境中，对收集的每一幅作品都仔细鉴定、研究再三，才使得该校的古画收藏成为全国美术学院之最。

潘天寿为公家护住了国宝，但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自己的五百多幅巨作却被洗劫一空。潘老一生极少卖画，更不滥画，故幅幅是精品。当时身为浙江美院院长的他被关进了“牛棚”，而那些批斗他的造反派学生们，私下里却瓜分了从老师家中劫来的“战利品”。就连平时练字的毛边纸上的习作也被他们拿走珍藏。而且，潘老师所抄“大字报”，一夜之间也被人揭走。这些人一面假作正经地批判潘老师的“黑作品”，一面却视为奇货可居而掠人之美。如果潘天寿为人乖巧，善于钻营，或许能躲过这场劫难，起码也能少受不少罪。“文革”前，康生对潘天寿十分客气，又是登门拜访，又是赠名砚，又是请进京亲为潘老画展题词……但潘老做人刚直不阿，康生一再暗示，都未主动赠画。后来通过省领导出面，康生才算得到一幅潘老的杰作《柏园图》。康生十分喜爱，还交荣宝斋制作了木版水印复制品。

潘天寿于1971年终因受迫害病重致死，于1977年平反昭雪。但五百多幅被抄的画却只剩下一二百幅。20世纪80年代，潘老的后人遵照他和夫人的遗愿，将他一生留存的书画作品全部捐给文化部，还将所得几十万元奖金设立“潘天寿基金”，用于奖掖人才和学术研究。

周怀民沙里拣金嗜收藏

作为一位收藏家，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鉴赏能力，二是经济条件。已故的集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周怀民先生，未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却成就为一位伟大的收藏家。

周怀民少年时代清苦，曾苦学于德公（荣毅仁之父）无锡家园中。十九岁到北京，虽酷爱书画，却无力收藏，只能跑旧货摊、小市，待手头宽裕时才敢到书画店去购买。由于他具有很高的鉴赏眼光，所以后来收买了大量珍贵的古字画。

1987年周老将毕生珍藏的七百七十一件捐给国家，在故乡无锡建立“周怀民藏画纪念馆”。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也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当时，出版的《周怀民藏画集》，收录了周老捐出的全部藏品，这确为无法估值的珍品。计有宋、元、明、清如赵孟頫、沈周、文征明、董其昌、倪瓒、八大山人、石涛、恽寿平、陈洪绶、郑板桥等各家的精品。周老本是一个视书画为生命的人，却慨然捐公，不能不令人钦佩其高尚品德。此后，他还陆续捐过珍品，如1982年，他将收藏的意大利16世纪来我国传教的利玛窦所作唯一传世的山水画《野墅平林》捐给辽宁博物馆，也曾轰动一时。

本来，这些珍品几乎毁于“文革”，但周老费尽心机，以交“四旧”为名送到北京画院。终幸存于世。

无雄厚财力却收藏甚丰，当代藏家如周老者颇罕见。这自然也得力他的高超鉴赏力。据说，他所费不巨，却往往于废旧堆中探骊得珠。如宋人《四喜图》，众人多以为伪，他却慧眼购藏。又如赵子昂临王羲之《兰亭序卷》，在琉璃厂一直无人问津，疑为伪作，而周老

亦不顾众议，斥金收买。当收藏家，不一定非具备雄厚财力，但必须具备慧眼。两者都具备者如张大千、张伯驹等，自然左右逢源。但如周老之聚沙成塔般艰辛，则难上加难矣。

周怀民沙里拣金，历尽艰辛而得来，殊属不易，但他并不自藏视如拱璧。如前所云，不但取珍品捐公，即便对朋友，也会慨然相赠。

20世纪80年代初，周怀民先生随中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团来香港参加“中国当代画展”，与港澳及海外不少画家友人把晤。尤其见到了老友、岭南画派著名的殿军人物赵少昂，两人已是阔别四十多年了。见面之时，两人情绪十分激动，都饱含热泪，哽咽无声。赵少昂先生犹记20世纪40年代，他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画展，周怀民为表示祝贺之情，曾将沙里拣金而购藏多年的查士标的名作相赠。当时赵少昂深感友人的高谊挚情，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由此，亦可以看出，周老虽视画如性命，但他更重情谊，所以有这一段齿有余香的画坛佳话。

陈叔通和百梅图卷

我最早知道陈叔通，是在我父亲学鉴赏时的老师张效彬的寓所。后来年长，知道陈叔通不仅是一生追求进步、对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和鉴赏收藏家。

陈叔老是杭州人，本名敬弟，叔通乃其字。其家学渊源，他的父、兄皆中翰林，他也是光绪癸卯进士，“一门三翰林”在浙江曾传为佳话。至今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上还有陈叔通及其父、兄的名字。后来他留学日本，专攻法政。曾任职于北洋政府，因愤于时事黑暗，辞官与张菊生经营商务印书馆。

陈叔老之父蓝洲公即喜藏书画，经太平天国战争而荡然无存，仅余唐伯虎画梅一幅。陈叔老有嗜梅之癖，以此唐伯虎画为本，经历年搜觅，收藏了明清渐江、郑板桥、汪巢林、杭世骏、罗两峰等画梅名作三百余幅。因后来又收藏到高澹游《百梅书屋图》，便自号“百梅书屋主人”。这三百余幅名家画梅，陈叔老曾付梓印成《百梅集》，今天坊间早已绝版。20世纪50年代后期，陈叔老认为私藏不如公藏，私藏难免湮没，公藏方可传之久远。于是他慨然将毕生心血珍藏的三百余幅古梅及其他古画献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陈叔老收藏的众多名人画梅珍品中，除唐伯虎的梅画之外，便是渐江和尚的一幅梅花。

渐江即明末画家弘仁，渐江为号。他与朱耷、石涛等并称为中国画史上的“四大名僧”。渐江和尚喜画梅，也喜种梅，因而他的一个别号又称之为“梅花左衲”。渐江的画历来为收藏家所推崇，周亮工《读画录》云：“江南人以有无定雅俗”，明末士大夫如果没有渐江的画，竟会认为不雅。陈叔老一生喜梅画，穷其财力，广为搜寻，自然也不

会放过渐江。不过，陈叔老辗转得来的这幅渐江之画，其珍贵处不仅在是渐江真迹，更在于画卷上有清代名人曹寅（曹雪芹之祖父）的题诗和跋注。曹寅不仅是簪缨显赫，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清代江南文风之盛，与曹寅当年倡导力行不无关系。曹寅题诗见之《楝亭集》，是为题胡静夫藏僧渐江画：“逸气云林逊作家，老凭闲手种梅花。吉光片羽休轻觑，曾敌梁园玉画叉。”题诗之下并有小注云：“周栎园藏画，以缺渐江老为恨。”可见那时收藏家即以渐江之画为难得珍品，故而曹寅有“吉光片羽”之叹。民国以后，不但渐江画得之极属不易，便是曹寅的墨迹也是凤毛麟角了，所以，诗画俱珍，珠联璧合，确为难得之文物珍品，难怪陈叔老爱之弥深，许为镇库之宝了。

除这数百幅珍品外，陈叔老还将藏于北京西单松坡园图书馆的十万余册珍贵古籍和藏书悉数捐给历史博物馆，更可见其君子之风，玉壶冰清。

“藏扇大王”黄国栋

上海有位“藏扇大王”叫黄国栋。这位1909年出生的老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共收藏了四百多把折扇。其中，有不少是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如冯超然的山水、王一亭的荷花、启功的紫竹、谭泽恺的书法、潘星录的蝇头小楷等。此外，还有不少社会名流的墨宝，如清末状元陆润庠、近代工业鼻祖张謇、著名慈善家朱庆润等。尤使黄国栋自豪的是京剧名伶的字画，它们是黄国栋藏扇的一大特色。

黄国栋酷爱京剧艺术，与当年梨园名流无不相熟。红极一时的京剧艺术大师、流派名伶，凡能书会画者，几乎都在黄国栋的藏扇上留下了墨宝，如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以及周信芳、马连良、俞振飞、金少山、姜妙香、李万春、谭小培、黄桂秋、黄吟秋、张君秋等。黄国栋藏扇上的字画，几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与花脸巨擘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轰动了上海滩。一次，在天蟾舞台演出后，名流巨商纷纷挤入后台，簇拥着梅兰芳求其签名题字。梅兰芳一时应接不暇，而在旁御妆的金少山顿显冷落孤单，他忍不住长叹一声。善解人意的黄国栋见此情景，连忙呈上一幅扇面，恭恭敬敬地请他题字。金少山顿时笑逐颜开，慨然应允。三天后，金少山派人送来了书法工整、运笔苍劲的扇面，上题七绝一首：“恍惚青天驾鹤游，宝山珠树不胜收。仙人笑汝且归去，乞得黄金变石头。”诗后又题句云：“无怪黄金少，尽被仙人铸作楼。”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金少山的书法功底很深，鲜为人知，又极少为人题字。黄国栋的通达诚意，又使他的藏扇中增加了这一不可多得的珍品。

秦瘦鸥的《秋海棠》一书问世后，曾轰动一时，各剧种纷纷加以

改编上演。当时上海的卡尔登剧院（现长江剧场）也准备上演话剧《秋海棠》。在上演之前，黄国栋接到了名伶黄桂秋打来的电话，欲请黄国栋出面让卡尔登的话剧停演。黄国栋当即明白，这与社会上纷传《秋海棠》的主人公原型与黄桂秋有关，经黄国栋从中周旋，《秋海棠》终于停演。为此，黄桂秋十分感激，特意制了两把工笔蝴蝶折扇赠予黄国栋以表谢意。

黄国栋藏扇的另一特色，是对扇骨、扇面的制成材料、品种十分讲究。竹质扇骨中，有著名的香妃竹、梅鹿竹、斑竹、清水竹，木质扇骨中，有名贵的乌木、檀香、桃木；其他珍奇材料，有象牙、骨、玉、珊瑚、翡翠等。有时他为了购进一种满意的材料，往往不惜重金。在不少扇骨上，还有精美的字画浅刻或纹样浮雕，真是琳琅满目，令人叹为观止。其收藏的扇面，从纸质上分，除了众多白、黑扇面外，还有泥金属、飞金扇、散金扇、飞银扇和发笺扇等。

曹雪芹画迹存亡记

今天如果发现关于曹雪芹的资料，哪怕片言只语，红学界、收藏界都会如获至宝。但在半个世纪前，红学尚不发达。曹雪芹两件画迹的一存一失颇有悲喜剧性。

一件是《菊石图》（原本无名，姑且称之）。抗战胜利后，北京书画业一度萧条，商人们成天送货上门，供人选购，以求成交。有位常为北大教师王利器送书的商人一次送来一幅水墨画单条：画的是一片立石、两棵秋菊，落款为“梦阮”二字，无上款，印章是篆文朱书的“梦阮”。王利器当时尚未从事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故不知“梦阮”是谁，而这幅画又非精品，看样子不是职业画家画的，便不愿买。商人劝道：“你留下吧，随便给几个子儿都行。”终未能成交。

20世纪50年代初，王利器为北京书画馆整理《八旗艺文编目》著录的一批稀见古籍，发现其中的《春柳堂诗稿》里有四首关于曹雪芹的诗，从未见有人道及。其中一首《题芹溪居士》诗的原注写道：“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他大惊失色，原来数年前失之交臂的《菊石图》作者梦阮就是曹雪芹！他连忙跑遍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等书画交易场所，但已“踏破铁鞋无觅处”了。他逢人便叮嘱留心此画，还请旗人文物专家吴恩裕协助寻访，结果一无所获。

他后来得知张政烺当年也当面错过良机，二人相对嗟叹。王利器后来搜集了不少关于曹雪芹绘画的文字资料，写了《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发表在1955年7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以引起人们对曹雪芹画的重视。他晚年还在《忆二宝》一文中说：“我千祈万祷，有一天曹雪芹这幅真迹会重现人间。要不然，我将负疚终生了。”

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遭遇要幸运些。据记载，他曾在北京宣武门的太平湖冰面上放飞风筝，“心手相应，变化万千，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令观众大饱眼福。为推广风筝技艺而作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扎、糊、绘、放风筝的诀窍，既有各式风筝彩图，又有配图歌诀共四十余首，还有具体画法的注释。该书是抄本《废艺靡集稿》的一部分（据游国恩考证，该抄本是曹雪芹遗作）。

早年有位日本商人金田氏从前清皇族全鼎臣手中购得一套家藏抄本，系曹雪芹的手稿。但当时人们不知道作者是谁，故未予以重视。1943年，在北京北华美术学院日籍教师高见嘉十的主持下，向金田氏商借该抄本，由制风筝高手赵雨山、孔祥泽描摹其中的风筝图谱，并转录配图的歌诀、注释。金田氏很珍惜抄本，天天亲自早出晚归，携来携去，只许用铅笔在拷贝纸上轻描，以免损伤原图，一俟完工，即不再借。日本投降后，金田氏的抄本均无下落，好在经过摹、录的曹氏风筝能得以流传，实在幸甚。

中国第一行书《兰亭序》

爱好书法的人，无人不知《兰亭序》。《兰亭序》自唐代以来，一直被誉为王羲之的传世书法极品，备受书家供奉和学者的推崇。

多少年来，有许许多多关于这本名帖的传说。可以说，《兰亭序》代表着一种传统文化，在书法界及艺术界，乃至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已享有至高的地位。

《兰亭序》历来被传为行书第一。相传，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父子及谢安、孙绰、郗昙以及会稽的豪门绅士，还有文人才子，共计四十一人，前往会稽近郊的兰诸山下，举行“祓契之礼”（此礼指的是三月初三过寒食节），他们在兰亭以曲水流觞的形式欢饮赋诗（曲水流觞指的是在弯曲蜿蜒的溪流上，放上酒杯在水中漂流，大家分坐在溪边，当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即兴赋诗，赋不出或怠慢者受罚）。最后推举王羲之为这次活动作序，王羲之即兴写下了这篇不朽的序文。据说，王羲之写此序稿时已半醉，回家酒醒，觉得原来写的不甚满意，于是又重写了几遍，终不如原来写得好。《兰亭序》从此流传下来。

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王羲之的书法，贞观十四年（640），他召见群臣时说，传王羲之书法寻求殆尽，何以独不见神品《兰亭序》？于是便下令四处查寻。后得知在一个叫辨才的和尚手中（辨才乃高僧智永和尚的爱徒，智永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在临终时将《兰亭序》传给了辨才），于是便四处派人寻找辨才。

辨才受智永临终嘱托，谎称：“过去侍奉师父，的确见过此帖，后来师父去世，又经丧乱，现该帖已不知去向了。”

辨才之言传回宫中，朝中大臣房玄龄向唐大宗献策，推荐让监察

史萧翼用计巧取。于是，萧翼带了些字画和几件王羲之的作品，化装成落魄书生来到绍兴嘉祥寺，装作观赏书画，被辨才发现。二人经过寒暄，颇有好感，辨才便请萧翼留在寺中小憩，谈文说史，感情渐深。当天，萧翼拿出王羲之的书法让辨才观赏。辨才极善于鉴赏王羲之的书法，他说："你这些虽是王羲之的墨迹，但并非上品。"随后，他拿出了所藏的《兰亭序》。萧翼见到真品，喜不自胜，但故意称这是赝品，二人争辩不下。第二天，萧翼乘辨才外出之机，对书童谎称书卷忘于房中，于是顺利偷到了《兰亭序》。

唐太宗见帖大喜，召见辨才，说明实情并赐辨才相当可观的一笔财物——这就是有名的"萧翼赚兰亭"的故事。

由于唐太宗酷爱《兰亭序》，视之如珍宝，遂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侍臣摹描，并嘱太子、诸王和近臣，真迹在他死后葬于昭陵。从此，摹刻本竞相出现，版本达几百种，其中太宗之前有隋唐时的"开皇本"，唐太宗年间的"定武本"，唐中宗年间的"神龙本"，以及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摹本。这些摹本虽失神韵，但毕竟风骨尚存。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

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神州轶闻录
美食妙谈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美食不仅是旅游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人际交往、国际交往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营养学指导下的美食必将为人的健康作出贡献。无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科学家创造发明的构思或体育健儿的竞技状态，以及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都将受益于健康的美食。
本书既有名菜佳肴，也有地方民间风味小吃，佳酿名茶，以及少数佳蔬鲜果。此外还穿插了轶闻趣事、传说掌故，某些名吃还追溯其历史渊源，读来使人兴味盎然，时而勾起美好的回忆，时而又引发人的遐思。
——于若木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美食妙谈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食妙谈／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7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36-0

I.①美… II.①周…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7939号

美食妙谈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特约编辑：曹　煜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36-0

定　　价：36.00元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饭庄佳肴

- 乾隆赐匾“都一处”
- 便宜坊和全聚德
- 仿膳话当年
- 龙袍、活鱼宴、听鹂馆
- 历史悠久致美斋
- 誉满京华泰丰楼
- 萃华楼的鸡汤菜
- 悠久美味话水饺
- “八大楼”外又一楼
- “八大堂”中惠丰堂
- 柳泉居与沙锅居
- 谭家菜名重京华
- 阮元与“满汉全席”
- 恭王府畔“厉家菜”
- “教席”之首两益轩
- 东来顺如何发迹？
- 银锭桥畔烤肉季
- 清真烤肉宛沧桑
- 誉满京华“爆肚王”
- 津门“天下第一坊”
- 难忘的中立园饭馆

秦淮河畔六华春

老店马祥兴的名菜

杭州奎元馆的爆鳝面

姑苏陆稿荐腊味

蛇餐祖师蛇王满

“改刀肉”和五奎园

忆成都药膳

秋尽江南蟹正肥

粤菜“东江盐焗鸡”

“贴饽饽熬鱼”香又美

石头门坎大素包

源远流长话豆腐

“大千风味”张家菜

临清与《金瓶梅》食谱

马叙伦与“三白汤”

茶香酒趣

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

什刹海茶棚的野趣

上海城隍庙“得意楼”旧话

韵味无穷的清茶馆

杭州的茶馆

品茗胜地“湖心亭”

闲话龙井茶

茶中极品武夷茶

香浓味醇普洱茶

曾国藩与“祁红”

刘完素与颐春茶

昔日南京茶叶棒

蒙山茶话

大理白族的“三道茶”

"天府之国"多佳酿
金奖佳酿五粮液
追寻文君当炉处
一个清明节两个杏花村
兰陵美酒郁金香
钦定御酒御河春
天津美酒直沽烧
徐水有酒"刘伶醉"
济宁名酒话"金波"
张士弼与张裕酒
绍兴加饭酒上国宴
古传即墨老酒
曹雪芹家酒四百年
炎夏谈啤酒
文学名著中的酒趣
名店特产
酱菜老店六必居
天义成更名天义顺
歪打正着的天福号
月盛斋的酱羊肉
王致和臭豆腐
宣威火腿驰名中外
扒鸡·烧鸡·卤鸡
绍兴腐乳风味独佳
济美酱园及"进京腐乳"
玉堂酱园松花蛋
天津冬日话"四珍"
中国三大名醋
银鱼·紫蟹·铁雀
天津"冬菜"史话

三水五香孟家香干
漫话“狗不理”包子
梧州的冰泉豆浆
苏北麻虾辣又香
九龙江畔品香鱼
糕点小吃
南味北设稻香春
“萨其马”及北京点心铺
正明斋京味糕点
饽饽名铺永星斋
小窝头及其他
京味特产话金糕
京东名店大顺斋
冠生园的南味食品
淮扬名点有特色
保定四美斋糕点
“驴打滚”与北京小吃
名目繁多的“炸货”
《豆汁记》和豆汁
福兴居灌肠老铺
马玉昆精制白水羊头
门钉包子杂说
关于炸酱面
京食美味“茶汤”
冬晨一碗热面茶
馄饨·云吞·抄手
万顺成小吃享誉津门
煎饼果子·锅巴菜
“赖汤圆”传奇
米粽·面粽·藤萝饼

“过桥米线”堪回味
桂林马肉米粉之妙
博望锅盔的传说
山西民间小吃“头脑”与“帽盒”
蔬菜瓜果
大白菜上宴席
燕市名蔬话茄子
山中之珍——香菇
漫话山东加祥大蒜
惠阳矮陂出梅菜
荠菜·龙须菜·榆钱儿
荸荠配菜与药用
天津萝卜赛梨
“泽畔藕”的传说
山药入馔香甜脆
芋的文化趣谈
樱桃先百果而熟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深州蜜桃群桃王
辛集鸭梨负盛名
炎夏酷暑话西瓜
话说嘉兴无角菱
浙江塘栖枇杷
闽中佳果“漳柑福橘”
圆铃红枣的传说
新秋常念炒栗香
新疆特产哈密瓜
金秋犹忆山里红
喝了蜜啦——大柿子
代后记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　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　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

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吃的欲望是人的天性，或者叫做本能，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我国古代先哲孟子说：“人之甘食悦色者，人之性也”；明代名医李时珍也说：“饮食者，人之命脉也。”

在原始社会漫长的洪荒时代，人类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寻求食物是为了求生存。

当古人类学会用火把猎获的野兽烤成熟食之后，人类的食物即发生了质的变化。熟食不但味道美好，而且容易消化吸收，改善了人类的营养状况，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从而发展了人类的智慧。

当古人类学会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就开始脱离了蒙昧时代。对中国食物史素有研究的日本学者筱田统教授说：“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种这种作物民族的命运。”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是与饮食文化同步发展的，或者说是从饮食文化发端的。人文礼教的出现是从饮食开始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的开始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走向“天下文明”重要的一步。孔子就很重视食礼，说：“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人类的艺术生活的起步与饮食亦有密切关系，无论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都与饮食有关。

欧洲最早的壁画内容以野兽为主，而野兽即人类的食物来源。原始人得温饱而兴致发，兴致发，表现为声则为音乐；兴致发，表现为动作则为舞蹈。陶器是伴随着饮食的进步，适应饮食的需要而创制的，最初的陶器是作为食物的容器或炊具而制作的。

人类饮食的进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吃饱求生存；第二阶段——吃好求美味；第三阶段——吃得科学求健康。

中华民族是最早进入第二阶段，即吃好求美味的民族。相传商汤时期的宰相伊尹即“善均五味”，懂得“五味调和百味香”，距今已三千多年了。

当饮食不仅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且从“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忘不能喻”的美味获得味觉的满足，精神的愉快就出现了美食的学问。美食可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饮食的情趣，满足生理与心理的需要，有助于增强体质，延年益寿。

历代的美食家多出自文人墨客、艺术家或学者及官宦人家。他们不但善于选择食品、品味食品，而且擅长烹饪之道、善调五味者，其中也不乏其人。有名的“东坡肉”，相传即为文豪苏东坡所创制。这点，有苏东坡旧诗为证，他诗中写道：“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据说鲁迅非常喜爱青菜，常以之宴请外国朋友并向友人介绍有关这一美味的传说故事。

历代的美食家及名厨师对美食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几千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烹饪技艺不断提高，无论菜肴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影响较大，覆盖面较宽的有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宫廷菜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菜系进入大城市后由于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产生了融合作用，都有所发展，以适应大城市人的口味。此外还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吸收了西方烹饪之精华，创制出中菜西做、西菜中做的各式菜肴，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容。

美食家多半注重养生之道，注意饮食的平衡，适可而止。“恣口腹之欲，极滋味之美，穷饮食之乐”为美食家所不取。他们在享受食物的滋味之美的同时又有所节制，擅自珍摄。因此美食家多半是清秀儒雅、文质彬彬、文思机敏而且步履轻捷的人。苏东坡在饮茶时作诗

述怀“意爽飘欲仙，头轻快为沐”。这大概是诗人追求的最佳境界。

美食与养生学是密切相关的。美食中含有养生的道理，养生学之中包含有美食的内容，美食应当受养生学的指导或制约。只有在养生学指导之下的美食才能焕发出自己的光彩。《内经》中“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就是对饮食的一个指导原则。其中既有营养需要全面的思想，也有营养需要平衡的思想，这与现代营养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内经》还告诫人们：“食饮有节，故能形成神具，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一观点也为近代营养学所验证。科学家们无论做的动物试验或对人群的观察，都证明限制食量可以延迟衰老，延长寿命。

合理饮食的近期效果应当是：肠胃舒适，轻松愉快，神清气爽；远期效果应当是：身体适中，行动自如，思维敏捷；当进入老年之后仍四肢灵活，头脑清楚，具有生命的活力，能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做到老而不衰，老有所为。人的健康与寿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饮食是否合理。

近年来，国外不仅倾心于中国烹调之美味，而且也注意到中国养生之道，认为“以健康生活言，东方胜过西方”，赞扬中国菜和茶有益健康。美国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健康饮食使患心脏病、直肠癌、乳腺癌的人比美国人少许多。美国最近发表的一千三百多页的《饮食与健康》调查报告，是迄今最全面的饮食指南，报告中提出了增加谷物、蔬菜的数量，降低脂肪、蛋白质的数量。该调查报告指出，过分丰富的动物蛋白是诱发肠癌、乳腺癌的因素。

养生学，就是我国的古典营养学，有丰富的内容，精辟的见解。许多观点、方法直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从古典养生学中可以挖掘出很多有用的东西用之于现代营养学，使之更加充实、丰厚。因为经过几千年考验的论据、观点是人类极其宝贵的财富。

我国的烹调技术、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中国作为“烹饪王国”，是各国所公认的。国际友人说：“中国悠久的吃的文化正在征服世界。”我国古人即认为饮食有共享性，即所谓“饮德食和，万邦同乐”、“饮食所以合欢也”。我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已成为各国人民共同享用的宝贵文化财富，中国餐馆遍五洲，久盛不衰即可为证。

美食不仅是旅游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人际交往、国际交往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营养学指导下的美食必将为人民的健康作出自己的贡献。无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科学家创造发明的构思或体育健儿的竞技状态，以及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都将受益于健康的美食，美食可使他们的身体处于良好的生理状态……

本书中共计一百多篇有关美味佳肴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为人所知的，如北京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等。但有些地方名吃，因地域辽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品尝的机会。其中既有名菜佳肴，也有地方民间风味小吃、佳酿名茶，以及少数佳蔬鲜果。此外还穿插了轶闻趣事、传说掌故，某些名吃还追溯其历史渊源，读来使人兴味盎然，时而勾起美好的回忆，时而又引发人的遐思。

开卷之后，您一定会获得一些有关美食的知识，从中增加生活的情趣。

于若木

饭庄佳肴

fanzhuang jiayao

乾隆赐匾“都一处”

清代自顺治入关后，经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时间，到乾隆时大局已定，民生苏发。乾隆皇帝弘历登基的时候（1736）才二十四岁，在位时，文治武功均称隆盛，他喜欢外出游览“巡幸”，诗文书法虽不见佳，却又乐此不疲。民间流传乾隆皇帝的故事不少。单就乾隆皇帝游江南就能说上几天，不过真实性如何就难说了。这里所说的乾隆赐匾“都一处”，却真有其事，因为至今尚有原匾为证。

据说是在乾隆三年（1738）旧历除夕那天，乾隆到通州府（今京郊通县）便衣私访归来，到前门外已是午夜亥时（十一点钟）了。按北京人的习惯，除夕之夜，多家店铺早已关门闭户，各自在家中团圆守岁过年了。这时乾隆却发现在前门外鲜鱼口南侧有一个小酒店依然开门营业，里面还坐着不少老人在喝酒聊天，便走进去，掌柜的招呼甚周。乾隆喝了酒，还同酒客们闲聊了一阵。临走时，问掌柜此店是什么字号，掌柜说此店从不曾有过字号，乾隆便告辞而归。

几天之后，忽有太监带来一匾，说是皇帝钦赐的。只见这匾不大不小，精工雕刻，黑漆鎏金，花边连虎头，匾正中“都一处”三个字流光溢彩。那小酒店的掌柜原是山西省浮山人，名叫王岭玉，当时是如何欣喜若狂，自不消说，“都一处”却从此誉满京华。

乾隆所赐原匾经过了二百四十多年，至今仍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今天的“都一处”开设在原址斜对面的前门大街上，门面上的“都一处”系郭沫若的潇洒遒劲的墨迹。乾隆所赐原匾则挂在大餐厅的正面墙上。

“都一处”经营的美味颇多，最负盛名的有梢麦、炸三角、糟肉和马莲肉等，各种名酒药酒样样齐全。雅座中书画陈设有致，每天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有人说乾隆赐匾“都一处”，是因为到这里来吃了梢麦，觉得味道和皇宫的御馔比也不相上下，一喜之下题字赐匾。此说虽不无道理，但据店里老师傅说，经营梢麦是在“都一处”扬名之后，原来的小酒店扩大业务，才开始的。梢麦确实有其独特的风味，它是一种由面皮包馅的食品，制作十分精细。首先用面粉和成汤面团，然后擀成薄片，又用一种特制的轴槌擀成直径三寸、带有二十三四摺，形如莲花叶的薄皮。包的馅多种多样，可随季节变换，其中以三鲜馅（海参、大虾肉、玉兰片或鸡蛋为三鲜，加猪肉，但不算为“鲜”，加韭黄或韭花腰子及其他作料，用香油调匀）最好，包的皮薄馅大成石榴形，收口处又形如麦穗，馅微露可见，上挂一层薄霜状的粉，宛如四五月正当抽穗扬花挂粉的麦子梢端，故称梢麦。

后来有人误写为烧卖，却把原义尽改。包好的梢麦上屉蒸熟，吃时极为鲜美，既可当点心，又可作主食，是著名的北京风味食品之一。后来，北京开设的梢麦馆有好几处，但仍以“都一处”最好。

炸三角是“都一处”经营的另一种具有特殊风味的传统食品。它用烫面作皮，包的是卤馅，选用好的猪肉，肥瘦分开，瘦的煮，肥的煸，然后切成肉丁，加肉皮剁泥，加青韭段，用香油、好酱油及其他精细作料，调好拌匀成卤馅，包成三角形，入油锅炸熟。吃炸三角和灌汤包一样要慎防汤溅一身以至烫嘴，可先用筷子在三角上面戳一个眼，先把里面的汤吮一吮，然后轻轻咬开，俟汤略凉之后再慢慢品尝。金黄色的三角，外焦里嫩，鲜香可口。

“都一处”经营的凉热名菜的品种繁多，最为人称道的是糟肉和马莲肉，二者都是传统的凉菜。

糟肉是白肉用香糟浸过而成，吃时不腻，微有甜味；马莲肉是用马莲草捆上五花三层肉块，加作料煮成，肉汤成冻，皆可切片成凉盘，经济实惠，别有风味。

便宜坊和全聚德

吃过北京烤鸭的人无不称好，却往往只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今得知者相告，很值得一记。

原先京都有两家烤鸭店——前门外鲜鱼口的便宜坊和前门外肉市的全聚德。前者于清咸丰五年（1855）开业，经营焖炉烤鸭；后者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开业，经营明炉烤鸭。

焖炉和明炉有何不同？据了解，前者使的是高粱秆，填满炉便点火，俟炉中烟净无焰，便置宰好洗净的鸭子于炉中，关上炉门焖烤，因火力不很旺，烤出的鸭特别鲜嫩、柔软，尤其适合老年人食用。不过一炉只能烤五六只鸭。后来全聚德开业，发明用明炉烤鸭，将净鸭置于炉中，使用果木燃料（最好是枣木），一炉就能烤好二三十只，烤出的鸭特别香酥。

入炉以前的净鸭要经过一段工序繁多的处理过程。选的鸭是京郊特产的“填鸭”，十分丰腴。

然后是宰鸭、去毛。以光鸭到净鸭还须经过打气（鼓起骨架）、掏膛和洗膛（均不得破皮漏气）、挂钩（选在合适处）、烫皮（用开水浇）、打糖（用饴糖水浇）、晾皮（阴干）等工序。每道工序要求都十分严格，若有不慎把皮弄破一点，便会因漏气而不能入炉。烤鸭的时候，还须用高粱秆塞住屁股，用开水灌入膛内，以弥补烤鸭本身水分不足，以保持鲜嫩，并达到外烤内煮、成熟均匀。鸭胸脯部分皮嫩，烤的时间不宜过长；鸭的侧面和背部，以及后膛部分，都因较为背火，烤的时间应稍长一些。总之，掌握火候均须恰到好处，处处燎匀。这是一门高超的制作技术。现在仍然健在的著名老技师张文藻和田文宽，都掌握得极为娴熟。还有一些技术也相当好的年轻技师，如甄华民、任春德、刘德长等，已为日本友人聘为专家，前往日本开业

传技。

便宜坊和全聚德两家烤鸭的烤法虽有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烤好的鸭都是皮酥肉嫩、色艳味鲜、油多不腻、久吃不厌的特点。吃时佐以黄瓜、萝卜、大葱、蒜泥，配食荷叶饼、甜饼或空心烧饼。最后，鸭架子做汤，汤色乳白，鲜美可口，解渴消食。

后来烤鸭的吃法更加细致，发展到吃“全鸭席”。用烤鸭身上的不同部分，分别做出炸鸭胗、炸鸭肝、卤鸭膀（去骨）、拌鸭肠、糟溜鸭三白、烩鸭四宝、鸭脯、金鱼鸭、炒鸭心、酥炸鸭卷、烩鸭舌等几十种菜。

由便宜坊和全聚德两家烤鸭店发展起来后，王府井、和平门外以及有些大饭店都有烤鸭店或兼营烤鸭业务，生意兴隆。

仿膳话当年

友人馈我仿膳细点一匣，内有荟豆卷、豌豆黄、小窝头、甑儿糕等。品尝着细腻的豌豆黄想起当年在“仿膳茶庄”小酌的情景。

1924年，冯玉祥命部下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宫中御厨也就散落民间。大约在1925年，原在御膳房菜库当差的赵仁斋，约御膳房名师孙绍然、王玉山、赵承寿等在北海公园北岸办起了“仿膳茶庄”。

坐在高爽的舒卷自如的天棚下面，面对着粼粼的太液柔波，望着蓝天和变幻的白云，品着香片茶，吃着仿膳特制的美味佳肴，真是如临仙境。该处茶点，非同一般，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如所制豌豆黄，定要用京东四眼井之白豌豆，在豌豆煮烂后，要用马尾编成的箩过筛，故而十分细腻可口。再如肉末烧饼这道小吃，烧饼用炭火细烤，外酥里软，肉末则炒得不腥不腻。记得一位食客说：慈禧某夜梦见吃烧饼，次日见早点里裹有肉末烧饼，以为厨师替她圆了梦，便将做烧饼的赵承寿叫去，赏了尾翎和20两银子。肉末烧饼从此就出了名。

至于小窝头，据说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慈禧仓皇出逃，路经昌平西贯市，“老佛爷”饿坏了，一个姓李的农民献了一个窝头，慈禧吃得很香，后来便让御膳房照做。这倒难坏了厨师，只得用细玉米面、黄豆面精制做成。外间传说小窝头是用栗子面做的，其实不确。此段趣闻，倒颇似相声中所演朱元璋爱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记得当年仿膳茶庄也做一些宫中传统炒菜，印象最深的是“四抓”、“四试”、“四酥”。所谓“四抓”是抓炒腰花、抓炒里脊、抓炒鱼片、抓炒大虾。这是被慈禧封为“抓炒王”的王玉山的拿手菜。所谓“四酱”则是炒黄瓜酱、炒胡萝卜酱、炒榛子酱、炒豌豆酱。所谓“四酥”，则指酥鱼、酥肉、酥海带、酥鸡。这些宫中名菜做工精细，色彩美

观，味道醇鲜清淡，很受顾客欢迎。此外如清炖肥鸭、清炖鸭舌、熘鸡脯、樱桃肉、响铃以及夏令美味西瓜盅等等，也都是仿膳茶庄的拿手好菜，无不脍炙人口，色、香、味、形俱佳。

龙袍、活鱼宴、听鹂馆

一位老友来访，畅言北游之趣事，并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我信手拈来，只见一个皇冠龙袍的皇帝和一个凤冠霞帔的皇后，彼此微微躬身下拜，成互相敬礼之状。细细端详两人的面孔，看着他们那滑稽的姿态，不禁使我捧腹大笑，原来正是老友自己和他的夫人的扮相！俟我笑够了他才说："这是颐和园听鹂馆拍的。这里不仅有好玩的，而且有好吃的，服务很好，据说美国华盛顿国际旅游服务学校把它列入世界名饭庄之一。"

"你看。"他又拿过另一张照片，"听说这里是当年慈禧太后听鹂鸣叫的地方。"

画面是听鹂馆的正门，门庭高筑，翠竹花木掩映，门顶悬一金匾"金支秀华"赫然醒目。这个地方我并不陌生，四十年前我曾多次游颐和园，听鹂馆就在万寿山南麓著名的"画中游"下面，前隔曲折绵延的长廊，面临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我还到馆内玩赏过。院内屹立着的两层戏楼，雕梁画栋，结构精巧，东侧通一院，名曰"贵寿无极"；西院无匾，俗称"西四所"。当时，院内幽雅清静，花香鸟语，景色迷人，却游人罕见。

有人认为这里是当年清朝帝后听黄鹂叫的地方，故名曰听鹂馆。此说并不确切。固然这里依山傍水，花木荟萃，不胜幽美，当会引来百鸟嬉戏争鸣，其中也不少动听的黄鹂叫声，取名为"听鹂馆"，似也不无道理。然而这里却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宠臣们欣赏戏曲和音乐的场所。正门顶上金匾"金支秀华"，乃《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歌的诗句，臣瓒曰："乐上众饰，有流溯羽葆，以黄金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此匾用古代乐器上装饰品之华美高贵，表明这里是宫廷音乐演奏之地。还有院内戏楼上的"来云依日"和"凤翔云应"二匾，都是颂扬戏曲和音乐之精彩的。再者，古代文人多喜用黄鹂鸟的

叫声比喻音乐的悦耳迷人。此乃听鹂馆命名来由之真义也。当然在这举世闻名的中国皇家花园里，又挑选这样富有古色古香的地方开设餐馆，真正是得天独厚、锦上添花了。

听鹂馆被誉为世界名饭庄，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们精于经营，富有清宫风味和以昆明湖活鱼为特色的烹调技艺而称著。

清宫风味就是仿照清朝宫廷御膳房的食谱研制出来的多种宫廷菜。如冷盘“龙凤呈祥”和“二龙戏珠”，都是精心挑选出多种精美菜式，又进行一番艺术加工制成。又如用“万”字燕菜一品、“寿”字人参鸭、“无”字散花鱼、“疆”字闹海虾等四个热菜合成的“万寿无疆”席，看起来高贵富丽，吃起来又非常醇香爽口。加上配了全套清宫食具，如有“万寿无疆”或“大清光绪”字样的著名瓷器，配上金黄色台布，绣有“龙凤呈祥”图案的椅套，雕木绘漆“百鸟朝凤”的屏风，“二龙戏珠”的地毯等，宫廷的气氛很浓。晚宴时，屋檐下彩灯齐明，餐厅内宫灯高照，更使人欣然如置身宫廷盛宴，别具一番情趣。

昆明湖水美鱼肥，放养着鲤、青、草、鲢、鳜、鲫等多种淡水鱼，用活鱼做的菜，更是鲜美绝伦。在各种吃法之中“活吃昆明湖大鲤鱼”为最妙。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经过刮鳞、开肚、洗净、改刀、油炸、浇汁等多种工序之后，端上桌时，两腮仍不停张合，口作吞吐状，等吃完剩下鱼骨架，仍可见鱼嘴在微动。食之鲜美，实在令人叹绝。还有“龙舟活鱼”，是先将鱼制成形如龙舟状，再放到装满熟蛋清的盘里，红白相间，颤颤悠悠，如龙舟漂浮在水面上，既形象美观，又鲜香可口。据说他们所经营的“全鱼宴”，全用鱼肉调制，包括冷热菜肴、羹汤、鱼肉馅的面点就达五六十种之多。

老友所述，更加深了我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烹调的确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在中国有着很高的造诣，它是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标志之一。听鹂馆的活鱼宴，只不过是中国丰富多彩的烹调技术之中的一

种点缀而已。

历史悠久致美斋

旧日北京著名饭馆有“八大楼”、“八大居”之说。其中尤以“八大楼”最为著名，即所谓“买布到八大祥，吃饭到八大楼”。

“八大楼”为致美、东兴、泰丰、鸿兴、鸿庆、新丰、安福及萃华。致美楼更是居八大楼之首，素有“八楼唯致美”之誉。

致美楼原名致美斋，坐落在北京繁华的前门外煤市街，开业于明末清初，原是一家姑苏风味菜馆。后来，乾隆皇帝的御厨景启被聘为首席厨师，使致美斋的菜点集南北烹调之精、汇御膳民食之粹而名噪一时。

清末民初，致美斋倒卖给李氏、杨氏、张氏三位山东人。此三人，各有一手制作卤味菜点的好手艺，经过他们的创造，山东风味独占鳌头。为招徕宾客，店主又购置煤市街路西一个有二十二个房间的“U”形二层红楼。至此，致美斋分为东西两院。路东原四合院式二层楼房，坐东向西，铺面平房三间，北边两间是厨房，另一间为门道，朱门两扇，“致美斋”字号高刻于门庭上端，青砖为底，颇为醒目。院内低洼处，置一近六平米长方形的木制鱼盆，鲤鱼池中游，绿草水上浮，既能观赏，亦可供食客指鱼为菜。路西，红楼坐北朝南，朱门雕漆，曲径通幽。室内贴有名人字画，青砖铺地，清静舒适；设有红方桌、凳，另备圆桌一张，房间以木扇相隔，遇有办宴席者，可随时将隔扇拉开，印有“万寿无疆”的碗、碟、盘、象牙筷子，精美雅致，古香古色。这些雅座，专供贵客饮宴。

致美斋三位店主合力经营，厨师阵容整齐，技术精湛，讲究色、香、味、形，能做一百多种菜点，如四吃活鱼、云片熊掌、百鸟朝凤、游龙戏凤、三丝鱼翅、寿比南山等等。尤其四吃活鱼甚妙，就是一条活鱼在一桌上做出四种吃法：头尾红烧改清煮做汤；中段鱼身，

从中间鱼骨劈成两片，一片糟醋，一片糟溜；鲤鱼的鱼子，营养丰富，可单另红烧。

光绪二十八年（1902），致美斋增设分店，扩建了一座三层大楼，清书法家王序亲题“致美楼”匾额。民国初年，山东人王东南出任致美斋经理，使致美斋达到鼎盛时期，店员由十几人增加到一百余人，满清皇戚、民国要员、艺苑大师等社会名流，皆是这里的常客。

誉满京华泰丰楼

北京的饭庄业，昔日有“八大楼”之说，其中之一的泰丰楼，现在前门西大街恢复营业了。

北京旧时著名的饭庄，除“八大楼”之外，还有“八大居”、“八大春”和“八大坊”之谓。其中的“八大楼”为东兴楼、泰丰楼、致美楼、鸿兴楼、鸿庆楼、萃华楼、新丰楼和安福楼。除东兴楼在东安门、安福楼在王府井、萃华楼在八面槽外，其余都在繁华的前门一带。

泰丰楼位于大栅栏煤市街一号，外观不起眼，是座三间门脸的两层小楼，可进到里面却极轩敞，有房一百多间。同时能开六十桌席，雇员常有百十号人，在南城的饭庄中，规模算得上首屈一指了。

此饭庄开业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在八大楼中除东兴楼外，数它历史最悠久。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光绪初年泰丰楼已是一座名闻遐迩的新式饭庄，其盛况“历久而不衰”。那时来这里吃饭的多为清朝王公贝勒，豪绅权贵。民国时，这里是政府官员，银号掌柜，“八大祥”东家，以及梨园名伶等宴客之所。市民红白喜事也常在这里预订大型酒席。历史沧桑，泰丰楼虽几次易主，但字号一直未变，风味也没有变，在顾客中卓有信誉。

泰丰楼是山东风味的饭庄，以烹制海鲜著称京华。经营的品种多为山珍、海味、鱼虾。其最拿手菜肴，有沙锅鱼翅、炸乌鱼蛋、酱汁鱼、锅烧鸡、烧脍爪尖、葱烧海参、油炸大虾。这里的火锅汤圆、火锅水饺也都别具特色。

笔者曾同十几位朋友在这里吃过一次“一品锅”，印象颇深。首先上的是几道下酒的凉菜，接着是四个小炒，最后是“一品锅”。锅中有1只鸡，1只鸭，1个肘子，1只火腿，20个鸡蛋，20个鸽子蛋，2斤乌

参，2斤玉兰片……码得井然有序，颇为美观。往桌上一端，热腾腾、香喷喷，让人垂涎欲滴。据一位姓王的厨师介绍说，这码锅子是很要技术的，这么多东西，没有本事是码不下的，而且还有很多名堂，什么“君君臣臣”啦，什么“文东武西”啦……懂行的人一看便知道是出自名厨之手，还是徒弟所为。酒足饭饱后，饭庄给每人送上一包风味点心，有银丝卷、枣泥方脯、四喜包、肉丁馒头、烫面饺儿等，做工精细，十分可口。

萃华楼的鸡汤菜

在北京那些上等菜馆里，烹调技术高超的厨师不仅讲究菜做得好，而且讲究汤也要做得好。所以俗话道："菜好汤好，酒足饭饱。"笔者当年居住北京的时候，曾经几乎尝遍各家名菜，比较之后，觉得汤菜应以萃华楼内最佳。他们做出的鸡汤，清汤如水，奶汤乳白。据说制作这样好的鸡汤，功夫是很不平常的。清汤要用鸡脯肉、鸡腿肉剁成鸡肉泥，再用凉水调稀往锅里倒。文火煮沸后，清去汤面上的漂浮物，使汤汁干净变清。奶汤用同样的鸡肉泥为料，用火则须猛烈，烧滚数时始见乳白。

萃华楼名菜之一"清汤燕菜"就是用其清如水的鸡汤和上等燕窝做成的，做好后透明清亮，细看还可见到燕窝的丝纹，吃时清鲜醇香。用清如水的鸡汤做鱼翅、脍乌鱼蛋，都是汤清肉白的上等鸡汤菜。

萃华楼不仅鸡汤菜出类拔萃，其他菜也很有特色。例如他们制作的山东烧鸡既不同于山东省的德州烧鸡，也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烧鸡，而是具有这家胶东风味菜馆自己的特色。这种烧鸡的制作法是先置光鸡于瓦盆之中，然后撒下适量的味精、盐、葱花、姜末、花椒、大料之类，让鸡在盆里面"重染"三个时辰之后，才上笼屉蒸熟脱骨。再经油炸、烧制，吃起来，开始时不觉有何特殊味道，待嚼烂咽下喉咙时，始有一股清香异味。再如他们的"油爆双脆"和"酱爆鸡丁"，做得既脆又嫩，且不沾盘，全凭技师掌握火候。正由于这里有好菜好汤，所以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

据说四十年前萃华楼开业之时，它的几位经理原是东华门大街的老字号东兴楼的合伙经理。他们由于和东兴楼掌柜安树棠闹了别扭退出来后，请了丰泽园的掌柜栾鲤庭当总经理，另树一帜，开了萃华楼。萃华楼之"萃"就是要出类拔萃之意，果然没几年就把自光绪年间开业的东兴楼给压倒停业了。

如今萃华楼饭庄仍在四十年前旧地，北游的友人，曾去光顾者颇不乏人。据说里外几经修葺，堪称为北京著名的上等菜馆。它仍然保持着菜好汤好的经营风格。

悠久美味话水饺

过年吃饺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民间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名叫苏巧生的御厨，技艺相当高超。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他为皇帝做了九十九个花样的菜肴，就差一样就一百个花样了。当夜他想：明天就是除夕了，只要能补上这一道菜，便可回家与家人过团圆年了。

第二天，苏巧生正为如何做好最后一样菜发愁的时候，突然看到案板上有剩下的羊肉和青菜，他便将肉和菜混合在一起剁碎，并拌上调料，用白面粉做的皮包了许多小角角，放在锅里煮熟，奉给皇帝食用。皇帝食后，龙颜大悦，忙问："此食何名？"苏巧生脱口而出："乃角食也。"自此之后，民间便流传着过年包"角子"而食的风俗。

饺子，又名"扁食"，俗称"煮饽饽"，源于南北朝至唐代的"偃月形馄饨"。1968年新疆吐鲁番发掘出土的唐代墓葬中，就发现了几个形似偃月的古代饺子。至北宋，"饺子"称作"角子"，北方人称"角"为"交"，故而叫"饺子"。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关于皇帝边吃饺子边看歌舞的记载。到了明代，饺子又称"粉角"、"饺饵"等。清代，过年吃饺子的习俗在京城和广大城乡已普遍流行，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大年初一，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清代印行的《肃宁县志》中第一次将"扁食"、"角子"定名为"饺子"。以后，饺子作为贺岁的迎春食品，一直相延至今。

饺子不仅是美食，而且蕴含着隽永的饮食文化内涵。除夕零点，旧时称"子时"，人们要在除夕之夜包好饺子，取其"更岁交子"之意（新旧年交替自子时起）。

江西鄱阳地区，春节吃饺子，有的还在饺子中放糖、花生、红枣

等，谁吃到就分别意味着“生活甜蜜”、“长生不老”、“早生贵子”。而在河北保定地区农村，大年初一总在一个饺子中放一枚铜钱，谁吃到这枚有铜钱的饺子，就意味着谁在一年中会发财。关中一带过年时，却将饺子与面条同煮，称之为“银钱吊葫芦”（葫芦象征长寿）。这种吃法在河南唐河一带，又称做“金线穿元宝”，意即“有金有宝”，新年发财之意。

随着烹饪技术的发展，饺子的种类异彩纷呈。包饺子所用的面粉一般有：玉米面粉、高粱面粉、荞麦面粉、大麦面粉、精制面粉等；饺子馆分为荤素两大类，以三鲜馅最为受欢迎。烹饪方法上，有锅贴饺、油炸饺、蒸饺、水饺、火锅饺等，其中水饺最为普遍。从口味上分，又有五香味、咸鲜味、香辣味等。我国的饺子在地方名点中，也占有一定的席位，如河北石家庄的“百尺竿”饺子、邯郸市的“一篓油”饺子，都很有名。

有趣的是西安的“饺子宴”，它荟萃了北方饺子的特点，博采众家之长，一百多种风味各异的饺子精美绝伦，酸、辣、甜、咸、麻五味俱全，一个饺子一个形状，百饺百味，被誉为“神州一绝”。

“八大楼”外又一楼

欣闻同春楼在北京崇文门外幸福大街恢复营业。四十年前，这是一个买卖很兴隆的饭庄，但又不属于“八大楼”之列，故有“八大楼外又一楼”之称谓。

当年“同春楼”坐落在正阳门大街珠市口。有两层小楼，楼上下各设雅座四间，另有二十余散桌。前边四间铺面，铺门上方有黑底金字的匾额。

同春楼是山东风味的饭庄，开业于清代道光年间，掌柜原来姓唐，大约在1946年，其第三代唐子芳将铺面租给福兴楼的由子华。

“八大楼”、“四大居”等饭庄，多经营高档菜肴，有钱人家才吃得起。同春楼地处天桥附近，手工业者和买卖人居多，逛天桥者亦多小市民，吃不起太贵的饭菜。针对这一特点，同春楼以薄利多销而又独具风味来招揽顾客。同样一桌菜，丰泽园若需二十五元，在同春楼则只需十五元，而且质量不在丰泽园之下。

北京的饭庄业，山东人居多，大致可分为两个帮。济南帮以奶汤燕菜为主，烟台帮以鱼虾海味为主。同春楼属后者，它的干烧鱼、醋椒鱼、葱烧海参、爆炒鱿鱼卷以及各种虾类，都很有特色，不亚于大的饭庄。其中笔者最喜欢吃的是它的干烧鱼，其不仅鲜美可口，香味浓郁，而且鱼身下一圈红油，鱼身上撒以玉兰片、黄瓜片，十分美观，可谓色、香、味俱佳。笔者在多家饭庄都吃过赛螃蟹，比较起来同春楼当推第一，不仅外形，而且味道都酷似真螃蟹，堪称一绝。

除了海味鱼虾，同春楼还有许多菜都是独具风味的。如油爆猪肚，选料只取肚帽，制作出来，肚肉又厚又嫩，大饭庄也无法与其媲美。它的滑溜里脊，白嫩醇香，用嘴一抿就烂，当时常听有人赞

叹："滑溜里脊哪里也不如同春楼。"它的干炸丸子更是与众不同，别处都是圆的，它是扁的，颜色红俊漂亮，吃在嘴里又酥又软，一点也不腻口。有一次我在同春楼吃饭时，遇到东兴楼的柳掌柜，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每次到这儿，都要吃这儿的干炸丸子。可我们东兴楼，怎么也炸不出这么好的味儿来。"对这里的拔丝菜，笔者也十分欣赏，诸如拔丝橘子、拔丝苹果、拔丝葡萄、拔丝西瓜、拔丝肉、拔丝丸子，名目繁多。

由于同春楼的菜货真价廉，因此在城南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小康之家请客，办红白喜事，都喜欢来这里。就连富连成、戏班马富禄以及张君秋先生也常光顾这里。顾客的普遍评语是："来这里吃饭，花钱不多，有味道。"

“八大堂”中惠丰堂

当年名噪京城的惠丰堂饭店，又恢复了老字号，这使我想起惠丰堂的过去。

惠丰堂原址在前门外观音寺街的一个带回廊的四合院内，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店堂都是隔好的一个个单间，客人往高背黑漆的木雕椅上一坐，小伙计立即送上手巾和茶水。这家饭店的美味佳肴，有糟溜鱼片、糟溜鲮鱼丁、烧四丝、沙锅鱼唇、三丝鱼翅等。此外，甜菜花样也很多，光莲子就有琥珀莲子、冰糖莲子、蜜汁莲子等。我记得这里有一道老年人最爱吃的菜叶烧烩爪尖，其实这爪尖即猪蹄，只是炖得很烂，里边的大、小骨头都已剔出，专吃烂烂的皮和筋。惠丰堂做的菜有季节性，冬天吃琥珀肘子，夏天吃水晶肘子，春天吃春饼，冬天吃锅子，颇受顾客欢迎。

惠丰堂始建于咸丰年间。旧时京城的饭馆，除了“八大楼”、“七大居”外，还有“八大堂”，诸如聚贤堂、会贤堂等，如今“八大堂”据说只剩下惠丰堂一家了。

咸丰末年，掌柜的张克宣从老家山东来到北京，开了这家山东风味的惠丰堂，开始专办红白喜事。张克宣一手操持，并不雇佣伙计，有事就招呼几个人办几桌，没事也就不开张。后来张克宣和李莲英的干儿子李季良拜了把兄弟，李季良给了张克宣一笔银子，把惠丰堂整修一番，开设了卖零吃、包酒席业务，还增添了雅座，生意渐渐兴旺起来。李季良还办了个戏班子落脚在惠丰堂，尚小云就是惠丰堂的红角。

1956年，惠丰堂由前门外搬到复兴门外翠微路，至今仍保持着山东风味。当年的少掌柜李秀庚（张克宣之孙）已六十有七了，现在依然没有离开惠丰堂。另外，当年在惠丰堂做学徒的张志钊老师傅，也

还在这里传授着惠丰正宗绝技。

柳泉居与沙锅居

当年卜居北京，曾是柳泉居与沙锅居二饭庄的常客。那醇厚的黄酒与菜肴，以及那淳朴的店风，至今难忘。

柳泉居，坐落在新街口南大街路西，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柳泉居匾额系明代奸相严嵩所书，现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据当年的掌柜说，该店初开业时，仅经营黄酒和一些小酒菜，因店内院落有一棵葱葱郁郁的大柳树，树旁有一口井，井水甘洌，此井水酿之黄酒，清香甘醇，故取店名曰“柳泉居”。据说，严嵩晚年被嘉靖皇帝革职，家产籍没，遂寄食墓舍而贫病交迫。一日行乞于酒店前，闻醇醪而倍觉饥渴，遂以为该店题署“柳泉居”之代价换取区区一碗黄酒入肚。这位累官太子太师、恃宠揽权操纵国事二十年的赫赫重臣，一朝马死黄金尽，其境遇不如庶民矣。

微不足道的柳泉居一经严嵩题匾，遂蜚声京城，酒客慕名涉足其间者，如过江之鲫。

柳泉居集宫廷、山东、清真三大菜系精华为一体，精于扒、爆、炒、煨，拿手名菜有金盅鸡、凤尾银耳、玲珑鲍鱼。同时也经营大众化的饭菜。无论腰缠万贯的“大客”还是小门小户的食客，都可以大摇大摆地步入柳泉居的店门，一样受到伙计们的热情招待，一样喝到窖香浓郁的黄酒，吃到可口而又价钱公道的饭菜。

20世纪30年代，北京各报的新闻记者以及居于寸晷风檐的落魄王孙均为柳泉居的常客。妇孺皆知的大记者王柱宇，几乎踢破了柳泉居的门槛，每借饮酒以采访，正如其当年对同人所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社会新闻也。”他在《实报》所辟的《柱宇谈话》专栏，之所以连载数年而不衰，与取材于茶馆酒肆下层社会并站在大众立场说话颇有关系。与王柱宇同工异曲者当数穷旗人出身的作家老舍，他的

《正红旗下》即以柳泉居为背景，写作该小说前，亦是为搜集素材而先做酒客。

号称“北京通”的民俗学家金受申，戏剧家景孤血，清睿亲王后裔、新闻界老编辑金寄水，对柳泉居的“碗酒”几乎饮之成癖，此三位文友兼远亲，每得闲暇必相约清酌，酒酣而发诗兴，甚至低唱几句皮黄，尽兴方归。

沙锅居，地处西四南大街缸瓦市路东，是一家地道的北京风味饭庄，开业于清代乾隆六年（1741），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这家饭店原名“和顺居”，因两百多年来，一直用一口直径4尺深3尺的大锅煮肉，人皆称其“沙锅居”，遂由此更名。据老北京人说，该饭庄源于清代王府的一个更房。当时清宫有祭天的制度，分年祭、月祭、日祭，祭品皆选用上等整猪，用罢即廉价卖给更房。更夫与曾在御膳房供职的厨师合作，用烧、燎、白煮之法做出各种菜肴。最初，只卖给一些小官吏，后来宫内当差者及庶民也逐渐来吃，于是生意兴隆，京城闻名。不过当年每天只烧煮一只猪，到中午则销售一空，售完便摘掉幌子。所以，北京有句歇后语叫做“沙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

沙锅居的名菜制法是烧、燎、白煮。烧即炸，中炸肥肠、炸卷肝、炸鹿尾儿，先煮后炸，其色金黄，外皮酥脆，内肝松嫩，蘸花椒盐儿食之，味道极美。“燎”是将带皮的肘、蹄、头由铁叉子叉之以火燎糊，再由温水浸泡后去掉糊皮，最后以沙锅煮熟切片蘸作料吃，外皮金黄而肉质白嫩，有浓郁的糊香味儿。白煮是将猪肉和肉腻洗净煮熟，使脂肪溶于汤内，上桌时切片放入沙锅，并加原汤、口蘑、海米、粉丝，再蘸韭菜花、酱豆腐、辣椒油、蒜泥，入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沙锅居还以经营北京风味的各种沙锅菜而著称，如沙锅三白、沙

锅下水、沙锅丸子，都独具风味。此外，像烩酸菜、烩酸菠菜等，则是其他饭庄所没有的了。

沙锅居发展到现在，菜品更加丰富多彩，从猪身上能做出多达百种的肴馔来，从“木樨枣”、“蜜煎海棠”、“蜜煎红果”、“大红枣干”等（见菜谱以为是果脯名称，其实都是用猪肉制成的甜菜品）传统菜品，发展到“猪全席”，都是遵循传统的烹制方法，保持一家独特的风味。所以沙锅居更是扬名中外，荣膺“京师风味，莫过沙锅”的美誉。游客都竞先光顾，为饱尝一番独特的“京师”风味，而感到齿颊留芳呢！

谭家菜名重京华

谭家菜在北京是十分有名的，直到今天，在海内外还享有盛誉。但是说到这一代名馔的主人南海谭氏，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如果说到“谭家”的家世，那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少了吧？说起来这已经是一百几十年前的事了。

谭氏是广东南海人，世居广州西关。老主人名谭莹，字玉生，举人出身，写得一手好“四六”，著有《乐善堂诗文集》，曾为其同乡人伍崇曜氏校刊《粤雅堂丛书》。《粤雅堂》所刊书，每种书面都有一段跋语，署名伍绍棠，其中大部分都是谭玉生捉刀。谭氏名祖任，字瑑青，瑑青先生的父亲名宗浚，字叔裕，是两榜出身，而且是二鼎甲第二名榜眼，著作有《希古堂文集》、《荔村诗集》，诗文都很在行，到了瑑青先生一代，兄弟们都是家学渊源，瑑青先生则因到北京做议员后即成为京华寓公矣。

瑑青先生因为排行第三，人称谭三爷。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更精于填词。长期在京居住，与京华词人、学者，以及粤籍名流，日相往还，为文酒之会。瑑青先生有两样特别的爱好，一是特别讲究饮馔，一是爱好书画，精于鉴赏，再加他的夫人又特别会做菜，所以在早期做议员时，经济宽裕，三天两头在家中请客。客人来时，都带有一两样书画，来了先在客厅中谈论鉴赏，看看每个人带的东西，品题一番，然后就入座饮宴。菜都是很精美的，每样菜都有独到之处。后来，常去的老朋友们，越吃越爱吃，但又觉得不好意思老是白吃，便大家凑公份，托其代为经营。进而别人请客，也在他家中设宴，同时总给主人送一份请帖。这样瑑青先生词家、鉴赏家的雅望反为所掩，而“谭家菜”却名著京华，有口皆碑了。近人东莞伦哲如民《藏书记事诗》有一首道：

玉生俪体荔村诗，最后谭三擅小词，

家有嬴金懒收拾，但传食谱在京师。

诗后有注云：“瑑青有老姬善作馔，友好宴客，多请代庖，一筵之费，以四十金为度，名大著于故都。”瑑青先生去世后，谭家菜仍名重京华，凡欲享口福者，须托同谭家有旧者代为预约，每席收定金百元以备筹措。为了不辱没家风，谭家还订立了两条规矩：一是所宴客人无论与谭家是否相识，均需给主人设一座位，以示谭家并非以饭庄为业，而是以“主人”身份“请客”；二是无论订宴席的人权位多高，都要进谭家门来吃，谭家概不出外设席。即使如此，前往订座者仍接踵而至。那些军政要人、金融巨子、文艺界名流，不惜一掷百金竞求之，订座排在一个月后也不嫌迟，每以赴谭家宴者为荣。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当时华北敌伪权贵，常为该宴的座上客。而谭家菜的生意日益兴隆。

谭家菜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其索价虽高，规矩亦多，也并未使慕名问津者稍减。原来那慢火煨出的鱼翅、熊掌，汤清味鲜的紫鲍河鳞，无一不是精工细制，与一般著名饭庄的为求效率而急火猛烹的菜肴大不一样。加以谭家古朴高雅的客厅，异彩纷呈的花梨紫檀木家具，满架玲珑剔透的古玩，壁挂的名人字画，也远非一般饭庄可比。吃谭家菜确实是一种高级享受。

据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北京西单北大街路西曾挂出“谭家菜”招牌，仍由谭家的女主人掌灶，风格依旧。也许正是谭家菜因不得已而面向社会，才由官府名流独享而推向民间。不知从何时开始，谭家菜名厨被纳入北京饭店，独树一帜，以招徕中外贵宾。

阮元与“满汉全席”

近年，内地一些大酒店风行“满汉全席”，一席菜肴达一百二十多样，体现了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特色。由此，我想起了清代乾隆年间大学者阮元与“满汉全席”之关系。

阮元是江苏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他二十三岁时会试、殿试连捷，入翰林院任编修。清代翰林院是国家储备人才的机关，凡正途（科甲）出身的仕子，进入翰林院乃日后飞黄腾达的第一步。阮元少年得志，进翰林院没过几年便遇上了“翰詹大试”。考试题由乾隆亲自命题。题目为“眼镜”，限于押“他”字韵。这个诗题对那些泥古不化的夫子们，显得非常生僻艰涩。因为眼镜在当时的清代并不普及，古人诗文中均未提及，何况“他”字又是险韵。而阮元诗作得最好，他的诗中有一联是“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乾隆大为赞赏。原来乾隆此时虽年逾八旬，但仍耳聪目明，不戴眼镜。阮元用“四目”、“重瞳”的典故来恭维他，意为乾隆可比尧舜，察人看事，非常清楚，无须借助眼镜。因此，乾隆高高兴兴地提拔他为一等一名。考了第一，阮元遂由编修升为“詹事府少詹”（正四品官），不久便外放为“山东学政”（与巡抚同级）。

阮元出任山东学政时，其时山东巡抚是人称“毕不管”的毕秋帆。毕秋帆见阮元少年新进，前途无量，且阮元断弦未娶，便为其牵线作伐。毕秋帆保媒的女家乃山东曲阜孔府，受封为衍圣公的胞姐。

清朝自定鼎北京后，为了加强其君主统治，极为尊孔，乾隆每到曲阜孔庙祭礼，必下榻衍圣公府。孔府接待贵客自然以吃喝为第一要务，何况孔夫子提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故而饮馔非常讲究，一道“府菜”大筵席，可达一百三十六样，并定期朝贡。

孔小姐下嫁阮元时，随孔小姐陪嫁过来的，还有四名厨师。这些

厨师个个身怀绝技，深谙孔府烹饪之奥秘。阮元后来仕途一帆风顺，做到如他自书的门联那样：“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由于历任肥缺，宦囊充裕，阮元豢养着一大批清客幕宾。这些文人雅士除了陪阮元翻古纸、究仓籀、勒金石外，就是吃喝玩乐。内有名师主厨，外有雅士陪餐，此时的阮元在饮馔上也就不断花样翻新。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曾以“府菜”为基础发展出一道席面，虽不及“府菜”规模，但也远远超出一般市面上的水平。由于这种席面能兼顾满汉人员的习惯，因此人们便称之为“满汉全席”。

由此可见，而今流传的“满汉全席”，便始自山东学政阮元。

恭王府畔“厉家菜”

在北京后海的北沿和南沿，分别坐落着清朝两个最大的王府，即醇王府和恭王府。恭王府东侧有一条羊房胡同，别看地方不大，里面却有一家海内外闻名的餐馆——厉家菜餐馆。

餐馆的主人是厉善麟，内掌柜是王晓舟。厉家菜属宫廷菜，其配方和制作技术均为祖传。厉善麟的祖父厉子嘉，在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任内务府都统，深受慈禧信任，专事主管皇宫内膳食。慈禧垂帘听政，吃饭也要和皇上在一起，其每餐之菜式都在一百种左右。那时，只要一声“传膳”令下，浩浩荡荡的太监队伍便立即抬着膳桌和食盒鱼贯而入。厉子嘉的任务就是统一管理皇宫里的这些膳食，每日制定膳单，到膳房查看烹饪质量等。慈禧和皇帝吃的每一道菜，都要经他品尝，于是，久而久之，他便成为美食专家和烹饪高手了。

后来，厉子嘉把许多宫廷菜配方和做法教给了儿子厉俊峰，然后又传给了孙子厉善麟。厉善麟对厨艺烹调极具天赋，在继承祖传技艺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营养和自己的体会不断有所创新。例如，他所仿制的慈禧日常食用的“燕翅席”，就更加别致：第一道为小菜，计有炒咸什、酱黄瓜、虾子芹心、芥菜墩、北京熏肉、风干鸡、琥珀桃仁、桂花糖藕、玫瑰小枣、炒红果等；第二道为熟菜，计有黄焖鱼翅、白扒鲍鱼、软炸鲜贝、浇汁活鱼、烧鸭和清汤燕菜等；第三道是汤和甜食，计有乌鱼蛋鸡汤、炒蛋羹、核桃甜酪等。

厉家菜一经问世，很快即引起轰动。在一次参加宴席比赛时，震惊全场观众，评比获第一名。英国大使在他的餐馆一边吃一边说：“太好了，你不用做广告，我只要在使馆区一说，这里就推不开门了。”果然没过几天，各国驻华大使和跨国公司老板们都蜂拥而至，如果不提前半个月预订，肯定是吃不上的。

厉先生的餐馆只有三人，除他和夫人外，还有他的女儿。他并不想当企业家，更多的是为了弘扬中国古老的饮食文化和吃的艺术。他1943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当过教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夫人毕业于医科大学，是儿科大夫，日语很流利。在餐馆里，外宾比中国人多，当欧美客人来时，厉先生接待，当日本客人光临，便由夫人出面。前美国国务卿贝克、前加拿大总理克拉克、拳王阿里、电脑神童比尔·盖茨等都曾是厉家菜的座上宾。港台客人也不少，成龙、汪明荃等人来京，都要提前预订好厉家菜。据说每次汪明荃吃到高兴处，总要当场献上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厉善麟听后感到格外高兴。

“教席”之首两益轩

北京“教席”的“三轩”是指：两益轩、同和轩和同益轩，它们均以回民独特的风味在京城各占一席之地，故有“三轩鼎立”之称。但要说起历史最久、名气最大的，应数两益轩。

两益轩原在前门外李铁拐斜街，原是一套四合院，五间门脸，坐南朝北，穿过斜屏风隔挡的过道，是一个满搭罩棚的后院，摆上七八张桌子，可承接百八十流水包桌；东侧房子是单间雅座；西房是制作间和存放“条和”的地方。伙什有五六十人，遇上达官显贵们办红白喜事，还可同时出去几套“外会”，登门做菜。

这家饭店开业于民国七八年间，创办人是南城牛街的杨瑞亭和王永寿两位回教厨师，请当时“京话日报”主笔，彭翼仲先生给起的“字号”。彭先生说：“你们这儿‘堂’字够不上，比‘馆’字又高点，取个‘轩’字靠谱。生意上讲究卖主受益，买主不吃亏，就叫‘两益轩’吧。”接着他们又请著名书法家冯恕，题写了金字黑底匾额，挂在门面正中。

两益轩的出名，最重要的是它有位“教席”上的“首厨”——褚连祥。褚连祥祖传清真厨行，他十几岁就在北洋府内的回教厨掌灶。当时府内的马俊超、杨开甲等文武要员，都是他灶上的主客。他掌灶时不仅用火考究，选料严谨，而且勤于动脑，像“醋（焦）溜肉片”、“煨牛肉”、“扒白”、“烩全羊”等名菜，都是他汲取大教精华，制作出来的。为了去掉清真菜中的“膻”味，他用一只三斤以上母鸡、五斤瘦牛肉，一起炖煮之后，捞去肉渣、母鸡上席，做出的一锅名曰“弟汤”的作料，既除膻味，又使其色味升格。他的这一革新创造，为清真菜系的品类增加与食客范围的扩大，立下汗马之功，难怪后人称他为清真菜厨行鼻祖。

两益轩信奉“应时小卖、随意便酌”之宗旨，凡是来的食客，它都保证“要什么配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厨师也都具有“下席问短”之习惯。这些难能可贵的做法，使“两益轩”的买卖越做越活，生意愈发红火。那时北京梨园界的李万春、李少春、马连良、谭富英、程砚秋等人与“两益轩”交往甚深，两益轩甚至备有他们的菜单；老北京的回民家中如有红白喜事，也都愿意在此办理。

东来顺如何发迹？

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东来顺，经营涮羊肉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芳名传四方。

东来顺的老板丁子清兄弟三人，原是东直门外“沙窝”村的农民，家贫如洗，家里连根扁担也没有，只靠挖黄土进城叫卖来维持生活。常言说，农民“土气”。而像丁子清弟兄这种靠挖黄土过日子的人，可算是“土”到家了。但由于经营“有方”，居然能在二三十年之间，变成北京赫赫有名的酒家老板。

辛亥革命前，1903年间，丁子清弟兄在东安市场空地上开始摆个粥摊，有时也去“赶庙会”，夜间还经常和衣而睡，露宿街头。后来结识了末朝太监魏延（东安市场原是皇宫的马场、魏任总管），得到了一块地盘和一些银子，才在1906年搭起棚子，挂上“东来顺”的幌子。1912年正月十四日，袁世凯发动兵变，溃兵抢掠东安市场，东来顺粥棚子也被抢掠一空。此时丁氏要重新开业是很难的。但丁子清心生一计，把黄土装满面粉袋，堆在店堂里，又把黄土搓成一百个铜板大小的泥条子，封上红纸，置于账柜上，假装粮钱丰足的样子，以筹措资金。进而高价重聘前门外正阳楼羊肉馆的技师，到东来顺经营涮羊肉。东来顺顿时生意兴隆，业务很快发展起来。丁老板一方面修建楼房，内设雅座和宴会厅，追赶时髦，另一方面仍旧开设粥棚，经营普通小吃，满足一般的平民百姓，可以说“雅俗共赏”，上下皆得人心。

后来，丁子清弟兄又购地（五百亩）置房（两百多间），并独资开设许多店铺。如西单“又一顺”羊肉馅，“天义顺”和“永昌顺”酱园，“长兴铁铺”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丁家老板以东来顺为中心，经营范围以农业（种菜）、牧业（养羊）、加工业（磨面、榨油、制酱），扩展到商业（粮食、副食品）、服务业（设公寓、大车店）等，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联营企业，他们也成北京城里屈指可数的

巨商。

现时“东来顺”三个大字，仍高悬旧地，生意依旧十分兴隆，无数中外人士，都以能到东来顺吃上涮羊肉而称快。

银锭桥畔烤肉季

在北京什刹海北端，有一座不大的石桥，名叫银锭桥。跨过桥，沿烟袋斜街就可到达鼓楼的前面。银锭桥的建筑本身并算不上宏伟壮观，有关京都胜景的书籍中描述过，不过倒也颇为古雅。相传有人在早晨日出之时，站立在桥上往西山看，眼力特别好的人，能看到山上打柴的樵夫，故有“银锭观山”之说。这里绿树掩映，流水碧波，花香鸟语，确是个幽美的地方。

素负盛名的一家京都菜馆烤肉季，就开设在银锭桥边咫尺处。当年季老板选择这个地方开设烤肉店，确实没有白花心思。的确，在这里吃着特别风味的烤肉，是另有一番兴致的。你看，店堂上火锅里烈火熊熊，烟雾缭绕，“肉炙子”滋滋地烤着肉，芳香扑鼻。吃客靠近火锅，为避烟火，一脚蹬在板凳上，左手擎着酒杯或是芝麻酱烧饼，右手掌着一尺多长的筷子，边烤边吃，真是痛快淋漓，气派十足。

吃烤肉有点野餐的味道，最开始源于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后来，明末清初顺治年间，宫廷里的王公显贵经常外出打猎，将猎获的野味带到京城里，让厨子给烤熟了吃。烤肉季的烤肉技术就是由此传来的。但烤肉季开业（清同治年间）之初，烤的是熟肉，到20世纪初才改烤生肉至今。该店以烤羊肉为主，牛肉次之，是汉民经营的回民菜。烤肉季之所以历史悠久，享有盛名，是因为它在制作方面有其特点和专长。

首先是选肉严格。烤肉季选的羊是单养的西口羊，即内蒙古集宁地区的小尾巴绵羊，又是选其中好的羯羊（阉割过的）。这种羊肉质好，无膻味。如果选牛则挑选四五岁、三百斤以上的西口羯牛或者乳牛；秋季用的是草牛（即用青草喂肥的），冬春夏各季用的是糟牛（即用酒糟喂肥的，故又称站牛）。选肉严格还在于取羊或牛肉之精华部分。例如羊肉则数“上脑”、“大三叉”、“小三叉”、“黄瓜条”、“摩

裆”这五部分为最佳品。然后通过十分讲究的刀法，切成纸一样薄的肉片，置于盘中，鲜红的瘦肉，雪白的肥肉，红白相映，煞是好看。

再一方面就是烤肉季特制专用的“肉炙子”和铁锅。“肉炙子”是用熟铁制成的，圆形，直径二尺，上面排列着七分见方的铁条，每个铁条之间相隔二分宽的空缝。“肉炙子”下面是铁锅，内架燃木。燃木是果木（以枣木为佳），掺染一些松枝和柏木。果木、松、柏的芳香味在烤肉的过程中能渗进肉里去，故肉既鲜美，又带有“野”味。

清真烤肉宛沧桑

北京宣武门内久负盛名的饭庄清真烤肉宛，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一般人尚不知，其创始人乃是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的宛氏人家。

宛氏家乃回民。早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大厂县的宛氏先祖，为谋生计，便把牛羊肉推销到北京。那时，宛氏落脚在宣武门外上斜街一带，推着一辆独轮小车串街走巷卖牛羊肉，下午三四点钟出车，卖到掌灯时分，每天可挣几吊钱。

当年，清代的北京由于蒙古人的进入，烤肉食品兴盛了起来。随着清代烹调技术的日益求精，烤肉这一草原的风味食品在京城备受欢迎。宛氏先人见此，便在推车上放一个炙子（用方铁条拼成，中间有细缝的平底锅，下置木柴为火），沿街边烤边卖。先是烤牛头肉片，后来也烤牛羊肉片，吸引了众多的食客。当时因本小利微，无力置办铺面，所以开始几年间，一直是流动经营。

过了几年，宛氏便把车子停放在绒线胡同西口外的一家“大酒缸”（一家酒肆）门前，供来此饮酒的人买下酒菜。不久，经由酒肆掌柜协商，宛氏在酒肆门前摆了固定的烤肉摊子。秋日凉风吹拂，烤肉炙子下松柴熊熊，鲜嫩的牛肉，拌好调料，放在炙子上一烤，吱吱流油，香味四溢，使“宛记”的烤肉名气越来越大。至20世纪20年代，宛氏第三代传人宛玉魁已把流动的小摊固定下来，先以麻袋片为棚支帐，后又改用青布为幔，最后终于在安儿胡同西口买了块地皮，建起几间平房，挂出了“烤肉宛记”的招牌，开始了坐馆经营。不久又将招牌改为“烤肉宛”。

烤肉宛经理宛玉魁不请厨师，自己动手，只找个伙计帮忙。这时的宛氏烤肉，技术已相当精到。他选的肉，都从膻味不浓的两岁羯羊

和只生过头胎的乳牛上选取。牛肉只选上脑、元宝肉、里脊等部位；羊肉只选上脑、扁担肉等部位。作料又非常齐全，不下十多种。烤肉的燃料，均用柏木、松木和枣木，烟少而有芳香味。宛玉魁切出的肉片薄似纸，状如柳叶，观之透明。他切肉极快，两三分钟便可切一斤。烤肉宛的烤肉以“含浆滑嫩，松软喷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鲜嫩可口”而著称，誉满京城。

三四十年代，不仅公子王侯、达官显贵光顾小店，而且艺坛名流马连良、梅兰芳、张大千、齐白石、金少山、张君秋，都是座上客。张大千还曾为清真烤肉宛写了匾额。

有一次《实报》记者拉国画大师齐白石去品尝烤肉宛的烤牛肉，齐白石笑问：“能嚼得动吗？”记者说：“正因为让你嚼得动，所以才请你去。”齐白石去了，一吃果然鲜嫩可口，风味独特，便连连称道。饭后，提笔为烤肉宛写了一个钟鼎文的“烤”字，下面并缀了一行“跋”：“钟鼎本无此烤字，此时齐璜杜撰。”后来这个字被装裱起来，挂在店堂之内。

誉满京华“爆肚王”

报载，20世纪40年代专营北京传统风味小吃爆肚而誉满京华的西德顺，近来在朝阳门内北小街又重新与消费者见面。而且当年的著名爆肚厨师“爆肚王”被聘为技术顾问，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想来这位王师傅也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犹记当年之西德顺开设在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内杂技场路东，是一个两间的门脸，明柱绿底贴金花，上挂两块黑底金字匾：左书“西德顺”，右书“爆肚王”。里边摆有十张八仙桌，皆金鱼池名家具店广兴、老天成榆木擦漆制品，可谓窗明几净，再衬上墙壁上的几幅字画，十分雅致。

北京同时做爆肚的，还有天桥的“爆肚石”、前门外的“爆肚杨”、东四牌楼的“爆肚满”，以及也在东安市场内的“爆肚冯”。但从买卖的兴隆，抑或名声之大，都不及“爆肚王”。究其因，大概不外乎选料精细和技艺高超吧。

笔者多次到西德顺就餐，亲尝“爆肚王”的手艺，也曾与爆肚王父子畅谈。这里的品种有十多种：诸如爆肚仁、爆牛百叶、爆羊散旦、爆肚板、爆肚领等。尤其爆肚仁和爆牛百叶，为该家父子首创。前者呈乳白色，似虾仁；后者吃来脆且嫩，别具风味。其料来源自南苑屠宰场。这些肠、肚、肝之类俗称“下水”，一般说没有正经肉干净。但是爆肚王在选料时，分门别类，极其严格，绝不鱼目混珠。为保障质量，即使在可爆与可不爆之间，亦不爆，而放在杂碎中处理。洗时，百遍不厌其烦。尤其牛百叶、羊散旦，翻过来正过去，每个叶都必洗得干干净净。切时很讲究刀口，不但薄厚适度，而且整齐不碎。最后一度关键工序是爆。要求技术熟练，水温、火温掌握极为合适，汤不稠不混，不管忙得多么不可开交，都是每份一爆，绝不大锅爆再分盘。如此虽慢，但质量精、分量足，所以博得顾客好评。其经营观点

是宁肯让顾客等不及走，绝不能让顾客吃过以后不爽口而不再来。据笔者记忆，吉祥剧院就在东安市场内，有些著名演员如马连良、马富禄、侯喜琴、姜铁麟、吴素秋，以及侯宝林、少蘑菇等，在晚间演出之前，经常来这里光顾。

西德顺也售酱羊肉、酱牛肉。为防苍蝇，当时一般用竹制冷布罩住，而爆肚王却是用玻璃罩，既可防苍蝇，又能防尘，且能放冰，使肉不干不湿，常葆鲜嫩。

而今，西德顺的复业，表明北京对传统风味的重视。老技师虽有，但已寥若晨星，如不及时抢救，当明日“风味”而非“传统”了。

津门“天下第一坊”

清末民初的京、津人，几乎无不知天津有个天一坊饭庄的。当时有“未进天一坊等于未品尝天津风味”之说法。天一坊饭庄创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坐落在天津旧城北门的闹市区，靠近水旱码头。门前即是通往京师的通衢大道，北面不足百米是钞关，即南运河漕税收衙门。当时运河是华北、江南运送各种物资进京的主要通道，来往船只很多。天津水旱码头又是京津物资集散地，游人如织，商贾云集，所以天一坊饭庄位置得天独厚。故《津门精华实录》称之为：“水陆交通，商贾云集，为商业荟萃之巨。”天津北距北京不足百公里，南与济南、南京、苏州、杭州水旱相通，南来北往的客商都想领略津门大都会的风采，品尝传统的津菜的美味。因此，天一坊饭庄名扬四海，遂有“天下第一坊”之美称。

天一坊饭庄最初由林永福、李庆山、张德贵、燕得林、魏庆远、王三爷等六股合作经营，依次领东。民国初年，由魏庆远领东，他精明强干，整修门面，结交名流，聘请名师，广集菜谱，形成色、形、味俱佳，独具特色的天津风味。其中以挣蹦鲤鱼、煎熬花鱼、官烧目鱼、炒清虾仁等最享盛名。当时，天津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每宴请宾朋都来这里。魏庆远为适应业务需要，又在南市荣吉大街开办了天一坊饭庄分号，使生意更加兴隆，成为该饭庄自开业以来的鼎盛时期。1922年益智书馆出版的《商业汇编》刊登天一坊饭庄的广告为：“专办喜庆寿筵，应时小酌，无不完备。”1935年出刊的《天津游览志》记载：天一坊饭庄是“天津市饮食业同业公会”所在地。由此足见其地位之显赫。

后来，由于军阀混战，来往商贾、游人减少，加之领东更换，经营无方，曾一度中衰。抗日战争时期，天一坊饭庄本号改为中和楼饭庄，又重整旗鼓，整修门面，改进服务设施，汇集津菜名师，增加饭

菜品种，恢复经营传统，以纯正的天津风味炒菜，吸引了不少“津门老饕”，声名一时再起。

据了解，中和楼饭庄50年代曾经改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到1988年重又恢复天一坊饭庄称号。聘请原天一坊厨师长，津菜大师杨再鑫、赵克勤分别料理，按照津门八大成的传统做菜，使天一坊饭庄再次重振声威，成为一家专做正宗津菜的高级餐馆。

难忘的中立园饭馆

天津东门脸有一家不大的二荤馆，就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立园。

中立园有几样受欢迎的食品：一是单勾卤面，用鸡蛋、肉片加木耳、黄花菜打卤，如再加虾仁，便是三鲜卤面，更是美味可口。二是锅贴饺，多用白菜（或西葫芦）、猪肉作馅，如馅里加上鸡蛋、虾仁，味道更美。三是家常饼，油大面软层次多，酥软适口，卷上葱段、青萝卜条、蘸甜面酱，不吃菜也够甜的了。

中立园的炒菜，最拿手的有糖醋鲫鱼。选中等个儿的鲫鱼，用油煎得焦黄，放进盘子，先用炒勺调好糖醋汁，乘煎鱼还滚热，端到顾客桌前，把晾凉了的糖醋汁往上一浇、凉热相激，“刺啦”一声，在色、香、味之外，又加上有声之美，别具一格，另有风味。还有个新奇的菜是“糖醋溜松花蛋”，松花蛋（南方叫皮蛋）本是下酒的菜，可是他们却独出心裁，把松花切成六瓣，温油一煎，浇上糖醋汁，多加姜蒜末，味道极美。另有一种特殊风味菜是玛瑙野鸭。在冬季野鸭最肥时，选红腿黄嘴绿羽毛的好野鸭，洗剥干净，切成匀称的方块，裹上豆皮（煮豆浆滚开后，揭下来的浮在浆汁面上的薄皮），用滚油煎炸，则外焦里嫩，再浇上糖醋稍咸的汁，则香嫩可口。中立园的坛儿肉也有名气，其不肥不瘦，又香又烂，入口即化。冬天来上一碗坛肉，外加白菜粉，热热乎乎，又好吃又下饭。饭后再来碗酸辣汤——用红、白豆腐（猪血煮成块和白豆腐）切条煮汤，甩上果儿（鸡蛋），调上醋、胡椒粉，加点味精，勾上团粉，撒点芫荽（香菜叶）——酸溜溜、辣丝丝，香喷喷，不管刚才吃的什么饭菜，一碗酸辣汤下肚，遍体生津，顿觉清快舒畅，又大有助于消化。

中立园的酒菜，如小酥鱼、糖醋排骨、琥珀豆（煮黄豆）等，经济实惠，也都精致味美。

这家饭馆虽是一家不大的二荤馆，可是名传遐迩，也能吸引一些社会名流来就餐。南开大学校长、曾任青年会董事长的张伯苓先生，东亚毛呢公司副理、曾任青年会总干事的陈锡三，以及社会名流陈芝琴、顾海田、雍剑秋等，都是中立园的常客。

在海外的天津人或到过天津的人，至今提起中立园来，还是津津乐道，尽管已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印象，但还是津津有味的。

秦淮河畔六华春

十多年前，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开了一家“南京六华春”餐厅，不知是怀念南京的六华春，还是想回味一下南京的菜肴，该店自开张以来，生意一直很兴隆。尤其是供应的南京板鸭、盐水鸭、卤味，虽谈不上正宗，但在台北饮食界堪称一绝。这不由使我想起了以京苏帮名菜佳肴著称的南京六华春。

犹如包含着六朝胜地春华之意的六华春，坐落在秦楼楚馆栉比的秦淮河畔，创业老板名朱继林，清末在此靠卖“柜酒”（简易酒店）发家，后来古董商胡某见该店生财有望，遂带头入股经营菜馆。六华春正式开业后，就以正宗京苏帮烹调技艺而闻名遐迩。所烹制的菜肴口感平和，咸淡适中，讲究色、香、酥、形、器，注意保持原汁原味醇浓及京苏帮口的鲜、香、酥、嫩的特色，所以当年每当华灯初上，门前车水马龙，各界人士翩然而至。六华春的应招及广告多为国民党元老所书，后来的应招一直是名教授胡小石手迹。

在这些京苏大菜珍馐美味中，该店的松子熏肉、芙蓉虾球、清炖鸡脯、炖菜核誉称“四大名菜”。传统炖焖烤菜肴中的炖生敲、黄焖鸭、金腿炖腰酥、金陵圆子、贵妃鸡翅、鸡蓉鲍鱼、金陵文烤及老卤浸盐水鸭，也早就脍炙人口，享誉海内外。还有那美誉“平地一声雷”的口蘑锅巴，更是号称“天下第一菜”。

据当年厨师介绍，芙蓉虾球是选用鲜活的清水大虾作原料，将虾子斩头去尾，挤出虾仁洗净沥干，拌以蛋清，在热油中一爆而成（如用小虾则成了虾米），炒时配齐作料，下锅只能翻几个身。虾球的鲜嫩色彩，全靠厨师的火眼金睛来掌握。炖菜核是选用南京特有的矮脚黄青菜，这种菜叶短而肥，色翠质嫩，制时只用其长约三寸的菜心二十四颗，削成橄榄形，交叉划成十字状，配以切成一寸五分长、三分宽的柳叶形鸡脯、肉片，用蛋清、干淀粉拌匀，分别入猪油微爆，待

菜叶色呈鲜绿色、菜根白中透明、鸡片起壳时捞起，将菜心头向外、叶朝里放入沙锅排齐，再用冬菇、冬笋、火腿、鸡脯片顺序排成圆形，置于菜叶上，放进各种作料后置旺火炖沸再用文火焖透，最后淋些鸡油放上桌。那碧绿晶莹的菜叶，你会疑为鲜货：那调和的色彩令你越看越爱。即食，则鲜嫩油润，入口酥烂，汤汁醇浓，味极鲜美，连斯文的食客也在不自觉之中连取数箸而不以为饕餮也。

该店制作的盐水鸭，向来为南京正宗榜首，它是用肥膘的仔鸭精制而成，人称该店盐水鸭“炒盐腌，老卤复，吹得干，焐得足，皮白肉红骨头绿”，是鸭肴之上乘。另外该店制作的香酥鸭亦异常香脆，据称这种鸭多炸一分钟或少炸一分钟都是不合格的，达不到理想的色泽和酥脆。

我曾经请教老厨师火候是如何掌握的，厨师笑答曰：“全凭眼力！”真是“慧眼识香脆”。

六华春的京苏名菜久享盛誉。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五院八部的官员、各界名流无不往之。如国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常在公务之暇到六华春品尝陈年花雕、京苏大菜；著名的国学大师胡小石，也常常喜欢邀请有才华的学生去六华春下馆子，且在酒酣饭饱时，将长期研究积累的知识、经验一一传授给得意门生。据当年厨师告之，“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在陵园官邸宴请张学良，菜肴就是从六华春包送去的，当时席上还有孙科、张群、何应钦、宋子文、朱家骅等军政要员。蒋纬国也是六华春的常客，每当春深之后，他总喜欢来此品尝炖生蚝、炒鳝糊之类。这时鳝鱼膘肥鲜嫩，无论炖炒软兜，都极为鲜美和富于营养。六华春鳝鱼菜肴不下十种，都是下酒的佳肴。

宋美龄与宋蔼龄亦是六华春的老食客。记得1947年元宵节，宋美龄兴之所至，邀约宋蔼龄及孔家公子和小姐等到夫子庙逛花灯市场，事前嘱咐侍从到六华春预订一桌酒席，但口味要清淡。六华春的厨师

知道宋氏姐妹不爱多吃荤腥，经过多次琢磨，由胡天保、殷长贵两名厨制定了这次别出心裁的筵席。当日宋氏一家大小围桌后，先上了一道冰糖银耳清补甜食，然后逐一上些淡雅的菜肴，当上完口蘑锅巴、汽锅鸡后，酒菜也吃得差不多了。最后上来一碟色如碧玉、清香扑鼻的小磨麻油拌腌菜心，吃粳米稀饭。上口鲜嫩异常的腌菜心，众人顿觉清爽可口，余味无穷，蒋夫人大加赞赏。她平日在官邸里没有吃过这种小菜，便传呼厨师询问菜的做法，临走时还带了一小缸回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寻常人家冬季必备的腌菜，一时跃登龙门，身价百倍。吃腻了荤腥的达官富贾们，自此，常登六华春去品尝小磨麻油腌菜心。

这件名人品尝腌菜的轶事，成了金陵饮食史上的一段珍闻。其实南京腌菜是平民百姓家的一项时令菜，开春之后，用它和猪肉或河蚌炖汤，鲜美无比，而且能清热降火，比麻油腌菜更胜一筹。南京冬季寒冷，故而腌菜能久贮不坏。

六华春不仅历史悠久，名扬四方，而且名师辈出。如现为内地特一级厨师的胡长龄，曾多年在此挂牌掌灶；冷碟名家、特级厨师杨继林也曾在此执刀多年；已故的胡贤义、屠文元等前辈都是这里负有声望的名师。建国后，该店从夫子庙迁到新街口，1968年又迁到南京车站，经营规模逐步扩大。

老店马祥兴的名菜

南京的清真风味大体有两种：一是北方菜系，以牛羊肉为主要原料，秋冬季节的涮羊肉是主要应市品种；另一种就是以鸡、鸭、鱼、虾为主要原料的本地菜系。坐落在南京鼓楼广场旁的马祥兴，就是素以本地清真菜系而誉满江南的百年老店。其菜肴的特色是清淡适口，味美醇和，用料新鲜，原汁原味。尤以那著名的美人肝、凤尾虾、松鼠鱼、蛋烧卖四大清真名菜而享誉中外，雅称“四大名旦”。

“美人肝”是用鸭胰脏为原料烹制的。早年一般清真菜馆的烧鸡、烤鸭、炖鸭、鸭脯、鸭舌、鸭掌等都属知名的佳肴，胰脏却从未上过席面。马祥兴的厨师觉得弃之可惜，于是用胰脏来点缀菜肴，倒也鲜嫩可口。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有一位名医在马祥兴设宴请客，要了一桌“八大八小”的筵席，刚巧有的原料已用完，缺少一菜，正当厨师紧张之际，厨师马定松突见放在清水中的鲜嫩诱人的鸭胰白，灵机一动，与其他几位师傅和老板一合计，便将鸭胰白油爆后配之鸡脯、冬菇、冬笋，用鸭油炒制而成，权称一菜，冠以“美人肝”之名。此菜一上桌，色香诱人，乳白光润，像京戏里名门闺秀卷帘登场一样，具有一番清新雅静的气派，赢得一片赞赏声。从此“美人肝”盛名传播开去，竟身价百倍，一跃而为名菜之冠。

马祥兴的松鼠鱼是用桂鱼为原料，剞花刀制成松鼠鱼身，用天竺果子装眼睛，以冬菇做二耳，形象逼真，色泽金黄，鱼竖伏盘中，很像伏首缓行的松鼠；鱼炸成后速端上桌，浇上卤汁，吱吱有声，犹如松鼠欢鸣，色、味、香、形、声俱全，难怪驰名海内外。桂鱼也称石桂鱼、鳜鱼、桂花鱼等等，唐人张志和曾有“桃花流水鳜鱼肥”之句。它巨口细鳞，骨硬刺少，皮厚肉紧，体具文章，营养丰富，味美异常，是春令的时菜。故晋人曾说清炖桂鱼是“黄颔霍”，唐人说其肉是“白龙霍”，把它比成天上的龙肉，可见其鲜美之程度。松鼠鱼据说

自古就是吴国有名的菜肴，当时是在火上烤炙而成，到清代才改为油炸，乾隆时流传到南京。此菜经马祥兴烹制后，增色、味、形、声，更臻新鲜完美。

杭州奎元馆的爆鳝面

杭州奎元馆面店，不但已选新址，而且还营造了高大洋楼，规模远非昔比。虾爆鳝面是该老店久享盛名的独特风味。

奎元馆设在官巷口汤养元药店旁，当年我游苏杭时，友人曾在那里为我洗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进门就是厨房，多眼炉灶居中而立，中门口置一张大圆桌，桌上一大堆新鲜河虾，四周满坐挤虾仁的伙计，可谓不付广告费的广告。在北京我可从未见过这个阵势。后面打横约有四五开间大小的地方才是“堂口”——食客就餐之处。

友人是奎元馆的常客，他告诉我，奎元馆的店主陈桂芳幼时在一家小面店学生意，满师后又在杭州一家最有名的菜馆聚丰园“过堂”（做继续深造的学徒），拜老板赵阿泉为师学艺，以后的兴旺发达就奠基于此。在那里，他不但眼界大开，还学到从刀功、配菜到掌勺一套完整的真正烹调技艺。后来离开单间门面择吉开张，主营面点，兼卖菜肴。他先从杭州特有的而又大众化的爆鳝面着手。最初的杭州爆鳝面只是将鳝片炸好之后盖在面上，亦即盖浇面。但奎元馆却将鳝片炸好，再起油锅煸炒后烧面，加上操作精细，滋味当然大不相同。烹调上的改良，带来生意上的兴旺，不久奎元馆爆鳝面声誉鹊起，规模亦随之逐渐扩大。

至于爆鳝面冠以虾仁，成又一品种，则是受菜肴的启示。与虾仁合伙而成的菜肴不下一二十种，诸如虾步鱼、虾黄鱼、虾时件、虾干贝等等，那么虾仁与鳝鱼并成双档，则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改良了的虾爆鳝面以新的姿态出现在餐桌上，食客们又多了一种面点的选择。但操这碗面的并非陈桂芳，乃是莫金生厨师。莫金生有一手精湛的技艺，后被同行誉为“虾爆鳝大王”。但进货一项，陈不敢假手他人，他对选料要求极严，如虾仁要用新鲜河虾，绝对不用冰镇货或海货。鲜虾每斤要在一百二十只上下，鳝鱼每斤在三四条之间，绝不马

虎。在做法上，一碗虾爆鳝要用三种食油，素油爆，猪油炒，麻油浇，这是其他面所没有的。而其烧法亦异，一曰混烧，将炸过的虾鳝再在油锅里略加煸炒，放入作料，另加头汤（肉骨头汤）和面同煮；一曰清烧，虾鳝煸炒后加汤稍滚盛起，留汤锅内，另加清汤（豆芽汤）煮面，面熟后装碗，虾鳝覆于其上。虾爆鳝之为虾爆鳝，即在于此。

姑苏陆稿荐腊味

北京的八面槽有家“浦五房”，专卖南味肉食，上海人“趋之若鹜”。而居京的苏州人多感到那里的货色不足味儿，总忘不了姑苏的陆稿荐。

过去，苏州人每逢农历四月十四日，都要到阊门下塘虹桥西首的吕祖庙（俗称神仙庙）去看庙会。全城男女老少纷至沓来，庙内庙外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听说，这一天吕神仙要化身挤在人群中“与民同乐”。苏州人称之为“轧神仙”，谁能碰到仙人就要交好运。传说某年“轧神仙”的头天晚上，一个背条破草荐，捧两只叠在一起的瓦钵的乞丐，走进东中市崇真宫桥的一户人家求宿，户主是个卖熟肉的，姓陆，他为人心肠好，便让乞丐在他家灶门前歇了一晚。次日天未破晓，乞丐即不辞而别，却留下了那条铺在地上的破草荐。不久，伙计来生火煮肉时，便随手扯了一块草荐塞进灶膛，不料一阵异香散发出来。陆老板联想起乞丐用两个相叠的瓦钵为枕（叠口为吕），认定是吕神仙来指点他。于是将没烧完的草荐收藏起来，每次烧肉时，只取用一根放进灶内，于是煮的肉味道独特，声誉鹊起。这就是陆稿荐得名的由来，信不信由你。

苏州之有陆稿荐，确实是早在康熙二年（1663），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每想到陆文夫写的《美食家》，我就琢磨陆稿荐是怎样为“人堂”里的人制造口福的。原来这家老字号选购的猪，多以湖猪和常州洛猪为主，鸭子则都是从鸭行中选购四至五斤重的娄门大麻鸭。他们的厨艺代代相传，迭有改进，制作酱鸭、酱肉、酱汁肉等配料方法，除选用一般辅料外，还配用丁香、砂仁、新会橙、茴香、桂皮等上等原料，精工细作。酱肉皮薄而呈麦黄色，膘白不腻，精肉细致，食之满口香酥。酱鸭亦肥嫩可口，色、香、味俱佳。“酒闷汁肉”（俗称酱汁肉）是陆稿荐又一传统名牌产品，它是用肥瘦均匀的条肉，切

成小方块，加红米、砂糖、香料等精制而成，其色红似樱桃，其味甜而不腻，入口而化。立夏后，气候转热，新鹅即将上市，陆稿荐便应时推出糟鹅、糟肉等品种。糟货的特点是乳白色，糟味香，爽口鲜美，清淡宜人。夏末秋初，新鸭开始上市，新卤鸭也开始应市。冬季是腌制各种生酱品的最佳季节。陆稿荐腌制的酱条肉、生酱鸭，便于携带，宜赠外地亲友，故销量极大。

蛇餐祖师蛇王满

生活在粤、港、澳一带的人，大多知道广州市桨栏路有一间百年老字号的蛇餐馆，它就是誉满海内外的蛇王满。

距今一百四十年前，即清咸丰七年（1857），在南海县大沥堡荔庄村姓吴的贫苦农民家庭里，一名男婴呱呱坠地，父母亲单取一个“满”字，希望日后米缸常满，他就是以后名扬四海的广东最早的蛇餐祖师蛇王满。

少年时，吴满以捕蛇、采药为生，被人称为“蛇仔满”。吴满捕捉的蛇最初在大沥圩摆卖，后来销路日广，便带徒捕捉，将蛇胆卖给制售蛇药的药店，人们尊称为“蛇王满”。

光绪十一年（1885），吴满在广州新基正中约开设蛇店，出售活蛇、蛇胆，以“蛇王满”作店名。到20世纪20年代，他又在佛山汾流街开设蛇王满分店。吴满开设蛇店后，就在蛇上做文章，对蛇类综合利用。

他用蛇胆制成药——三蛇胆陈皮末、三蛇胆川贝末、三蛇胆半夏末、三蛇胆南星末、三蛇胆油、三蛇胆追风膏药、三蛇胆酒。由于蛇胆成药能够治疗咳嗽、风湿、小儿急慢惊风等多种疾病，深受群众欢迎，产品远销国内外。

随着蛇胆成药的发展，原来的眼镜蛇（饭铲头）、金环蛇（金脚带）、灰鼠蛇（过树榕）等三种蛇的胆供不应求。

经过长期的实践，吴满和他的伙伴们逐步将银环蛇（过基峡）、三索线蛇以及白花蛇（广西产）投入使用，并创制原装五蛇酒。

过去，敢于吃蛇肉的人很少。吴满觉得杀蛇取胆后舍弃蛇肉十分

可惜。他认为蛇肉不但美味可口，还可补养身体和治疗风湿。

他鼓励病后体弱患者和风湿病患者吃蛇肉，并教人加入少量肉类或药材熬汤，但许多人未敢尝试。他将蛇肉和配料熬汤后送给保滋堂药店店员品尝，他们吃后大加赞赏。

后来，蛇王满店经营蛇餐，食客由少到多。吴满和伙伴们逐步改进吃蛇方法，他们将蛇肉撕成肉丝，加入冬菇、木耳、马蹄、姜、陈皮、鸡、蚬鸭等脍羹，称为“三蛇羹”，再加野狸，则称为“龙虎凤会”。在“蛇王满”的推动下，广州各大酒家也纷纷制作蛇餐。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佛山，广州蛇王满店被焚，夷为平地，佛山分店也关门停业。翌年，吴满与伙伴吴楫川合作，在广州桨栏路重开蛇王满店，佛山分店则由女儿吴桂荷经营。1950年9月，吴满因病辞世，终年九十四岁。

现在，“蛇王师”郑师文主营蛇王满蛇餐馆，继续在蛇上做文章，他带来新一套经营方法和新一代对蛇餐的理解，给这个百年老店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往广州的游客都把到蛇王满品尝蛇餐作为一件快事，犹如来往北京的外地游客都想到“全聚德”品尝烤鸭一样。

“改刀肉”和五奎园

塞外古镇平泉，有一家餐馆字号叫五奎园。五奎园有道名菜叫“改刀肉”。

清朝道光年间，御膳房有七位厨师，争相创造新菜谱。主厨师刘德才想，用猪肉、水笋并炒，其味道可能更佳，经多次试验，终于炒出美味佳肴。献给皇上，道光帝倍加称赞。因为这道菜在刀工上经过多次改进，故名“改刀肉”。其做法是：用四成猪臀尖瘦肉，一成猪脖领肥肉，先切成极薄的肉片，然后瘦肥肉按四比一搭配，再顺切成火柴梗粗细的肉丝。粗细要均匀，不能连刀，不能切成韭菜扁，不能切成老鼠尾（一头粗、一头细）。切笋丝更精细，先将发泡好的水笋，用骨汤煮一遍，然后切成如纸的薄片，再顶刀切成如发的细丝。最后，配以口蘑汤、鸡鸭汤、料酒、陈醋、香油、白油、葱、姜、蒜等各种调料。

刘德才创造了此味佳肴，到老了，还是被赶出皇宫。他孤身一人，辗转出京，流落到塞外八沟（即平泉）。当时的八沟是塞外通向关里的重镇，行客往来，商贾云集，有“拉不败的哈达（今赤峰），填不满的八沟（今平泉）”的盛誉。刘德才定居下来，在镇上开了一座小餐馆。由于烹调技艺超群，引来八方顾客，生意十分兴隆。许多顾客在这里吃过“改刀肉”以后，还要再买上几盘，装在食盒里，带回故乡给家人品尝。更有蒙古王爷每年进京路过这里，总要带上“改刀肉”到京馈赠亲友。

刘师傅过世后，五个徒弟谨遵师嘱，合力办好餐馆，兴旺不减当初。一日，共同商量起个字号，大师兄说：“我们五个是一师之徒，起字号也应按这个意思起，就叫五奎园怎样？”众兄弟拍手称赞。于是请来举人任维岚隶书“五奎园”金字匾额。

五奎园师兄弟五人，各收门徒，代代相传，历传八代，一百六十余年，据说，牌号至今未倒，名声未衰。

忆成都药膳

偶检旧箧，翻到一份成都同仁堂药膳食谱。

食谱所开列的菜名，每一种都是以中药与鸡鱼之属配制烹调而成。如菜肴有：陈皮鸡、妙香舌片、黑芝麻兔、玉竹心子、丁香鸭、白果烧鸡、龙马童子鸡、杜仲腰花、贝母雪梨、虫草鸭子、天麻鱼头；点心有：茯苓包子、银耳鸽蛋；饮料则有：枸杞酒、洋参五汁饮等。

这家同仁堂与北京乐家老铺虽然不是一家，但也有两百多年历史了。

药膳摆上台面来了，原来，并不是在大盘大碗中众人分而食之，而是每人一小盅、一小盘，吃完一道再上一道，很像中餐西吃办法。而且每上一道菜，侍应小姐都向我们介绍菜名、特色、医学上的滋补作用等。不过，据笔者吃过之后，深感虽名为药膳，其实讲究色、香、味俱佳还是主要的，并没有服那种又苦又涩的汤药的感觉。

据同仁堂主人相告，中国的药膳远在周代即已在宫廷中出现。秦、汉、六朝、唐及后来各朝代的医学家都很重视“食疗”。饮食疗法在中医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药膳正是饮食疗法的精华所在。

笔者所知，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孙思邈、孟诜、李时珍，在食疗方面都有专著。尤其是唐代医学家孟诜与其弟子合撰的《食疗本草》，为现存最早的食疗方面的权威之作。孟老先生为汝州（今河南临汝）人，少精医学，五旬之后得识孙思邈，并以师事之，医术大进。他主张“若能保身养性者，当需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他所著的《食疗本草》原名《补养方》，是孟老先生汲取了孙思邈及历代医家关于食疗的论述，内容博而实效佳的著作。其宝贵之处在于：以

食为药，以药为食，食药均为我用的养生见解。并且在每味食物药品下，都注明了药性，服用方法，对于益处与害处也加以分析。

《食疗本草》，问世后不久，全文散失，但书中的内容却在一些医学著作中保留了下来。

成都为“天府之国”，物产丰饶，鸡嫩鱼鲜，川菜又是名满天下的佳肴，成都同仁堂的药膳自然是味美而又滋补了。

秋尽江南蟹正肥

“秋尽江南蟹正肥。”忆往昔，每当此际，素有“蟹王”美称的太湖和阳澄湖螃蟹，整批运到南京。各大酒家无不以阳澄湖大蟹相号召，往往高朋满座，把酒持螯，咏诗唱和。此时的螃蟹，正如曹雪芹借林黛玉赋诗所形容的那样：“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味道极其鲜美。无怪乎唐人卢纯要说“四方之味，当许含黄伯第一”了。

中国人吃蟹历史悠久。据传晋代有名叫毕茂世的小吏，常常右手持蟹，左手执壶，一边吃喝一边说：“此足够我餍一生了。”记得当年京师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即是位出名的食蟹家，他每年深秋必南下一次，目的地是南京和苏州，目的是食蟹，此公食蟹不用姜醋，不执酒壶，蘸点酱油便大啖大嚼。这一点连素以“李百蟹”号称的著名清道人李瑞清也甘拜下风。施大夫还有渊博的蟹学，他把各地出产的蟹分为湖蟹、江蟹、河蟹、溪蟹、沟蟹及海蟹六等。每等还分为二级，如湖蟹以阳澄湖、嘉兴湖为一级，邵伯湖、高邮湖为二级；江蟹以芜湖为一级，九江为二级。他还戏将这些无肠公子由于出身不同，冠以官场名称：一等湖蟹为特任官，二等为简任官，三等荐任官，四等委任官……等而下之便是芝麻绿豆官了。当年在南京的各界名流几乎无不爱蟹，名教授黄季刚、胡小石等，嗜蟹如命。有一年黄氏在南京中了航空彩券，高兴之余，携家人登酒楼吃蟹，不意所食过量，归后染疾，不幸病逝，造成因嗜丧命的悲剧。

历史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蟹诗。如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咏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把蟹、酒、诗融为一体了。宋代苏东坡亦写道：“可笑吴兴饶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圆”，传神地描绘了吃蟹的乐趣。《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在大观园中食蟹咏蟹，不仅托物寄情，而且逼真地描绘了螃蟹的形态，道出了吃蟹的最好季节和方法。

“蟹肥菊花香”，当年南京各大酒家还以丰富多彩的菊花蟹宴而招徕食客。如清蒸大蟹、味透醉蟹、异香蟹卷、嫩姜蟹钳、蛋衣蟹肉、鸳鸯蟹玉、菊花蟹斗、香烤菊蟹、仙桃蟹黄、锅贴蟹贝、口洁蟹圆、爆炒蟹虾、黄金蟹羹、蟹黄鱼唇、蟹黄鱼翅、蟹黄菜心、四喜蟹饺等，洋洋洒洒，令人垂涎。除了这些蟹菜外，还有一道“芙蓉蟹”的名菜，它是用完整剥下的大蟹制成。相传清乾嘉间，秦淮有家酒肆的朱二娘长得如花似玉，有一手剥蟹绝技，能完其全身不碎，芙蓉蟹之名即由此而来。

粤菜“东江盐焗鸡”

“东江盐焗鸡”是广东的一道名菜，它以鲜、嫩、滑、香、软著称，历来被客家人所赞赏。据悉近年来它已成为国宴上的名菜。据传“东江盐焗鸡”源于明末，创于民初。它的前身是“东江咸鸡”。惠州最早在东江酒店出现，兴盛于东兴酒家，为厨师梁一梅所创造。

笔者早年认识东江酒店的学徒李林胜先生，故对其做法略知一二。“东江盐焗鸡”用料严格，制作讲究。选用的鸡是本地出产的“三黄鸡”（即胡子黄、皮黄和腿黄），这种鸡大小适中，肥瘦相宜，且肉质厚滑，一只鸡，一般重2.5市斤。制作时，先将鸡宰杀，掏空内脏，洗净，将光鸡吊起干水。然后，在热锅里将2.5斤左右粗粒的海盐来回翻炒，当听到灼盐发出哔剥声，盐的颜色由白变焦黄色时，即将灼盐铲起搁置盆中。再将干水的光鸡用土（纱）纸裹实，放在锅中，将鸡用焦盐埋实，盖上锅盖，用中火去焗，约焗至20～25分钟左右方取出。用这种方法焗出来的鸡，咸淡适中，鸡皮腊黄发亮，肉质嫩滑，皮骨香脆，老少咸宜，色、香、味俱全。装盘时，将鸡的皮、肉、骨分开成块状，按骨、肉、皮先后的顺序排装成整鸡。再在小碗碟里盛满用花生油、沙姜粉、芝麻油和精盐混成的作料，以便顾客蘸食之用。食时顾客感到香味扑鼻，胃口大开，比食其他鸡味道更胜一筹。特别是鸡皮和鸡骨香脆，越嚼越有味道，令人百食不腻，回味无穷，且有补肾健胃之功能。依笔者之体会，区别是否正宗的“东江盐焗鸡”，主要是入嘴时是否有股烟熏的味道。

不久前，笔者旅次惠州，当年的李林胜而今已是东兴酒家的经理。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来制作盐焗鸡，因此，买卖兴隆。据说，每月销售可达三千多只。不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内地旅游时，都纷纷到东兴酒家，专门点这道菜。

“贴饽饽熬鱼”香又美

“贴饽饽熬鱼”是天津人的土产小吃，也是一种家常饭。

这种吃法的发明者乃是渔船上的渔民。后来陆地上一般居民也群起仿效，因味道奇鲜，所以远近驰名。其实“贴饽饽熬鱼”是船家的家常便饭，制作方法也颇简单。北方人把煮菜叫熬菜，所熬之鱼并非一斤以上的鲤鱼，也不是半斤以上的鲫鱼，而是从海中打上的小条杂鱼。制作时，把鱼洗净后放入大锅内，不烹不炸，锅内放少量食油，以防粘锅，然后加葱、蒜、花椒、大料、盐、醋、面酱和腐乳等作料和少许清水。有时作料不全，只加食盐和面酱也可。要知道，熬鱼之美，全在鱼鲜，作料虽少，更能保持鱼的鲜味。熬煮约半小时，鱼汤耗尽，即可出锅。所谓贴饽饽熬鱼，是为了节省时间，在熬鱼的锅边上端周围，贴上一圈棒子面（玉米面）饽饽饼子，一锅熟，掀锅后，把饽饽取出，鱼盛在碟里，渔民们一手端着鱼碟子，一手拿块饽饽，坐在船头舱尾，大吃大嚼，不但鱼味奇鲜，饽饽里吸收鱼汤，也带有鲜味，真是美食。岸上居民仿效后，稍加改良，多是选用较大的杂鱼，或单熬鲤鱼或鲫鱼。制作方法略同，但因多加作料，岂知反而有损鲜味了。

后来，市内也有一些专卖“贴饽饽熬鱼”小馆摊档，其中以南市“杨奶奶熬鱼”最佳，名气不亚于北京宣外穆家寨的炒疙瘩。

天津还有一种外地少见的吃法：烙饼卷蚂蚱。所谓蚂蚱即蝗虫也。天津南郑卫南洼，涝时一片汪洋，盛产鱼虾；旱年则遍地荒草，蚂蚱成群。当地农民涝时捕鱼，旱年捕蚂蚱。市内居民或小摊买了新捕到的蚂蚱，去掉双翅，投入沸油锅内，片刻捞出，已成深红色，放入酱油加葱花的盆内浸透，用以下酒，或用新烙薄饼卷着吃，脆香可口。蚂蚱卵如鱼子，不仅富有营养，咀嚼起来尤有异香，比空腹蚂蚱尤惹人爱。

油炸蚂蚱不但下层市民爱吃，而且在大饭庄的席面上，也是一道好菜。当年天津头等的回民饭庄会芳楼，八个压席酒菜碟中，往往有一碟油炸干蚂蚱（晾干的蚂蚱）。记得北京东安市场北门内东来顺西侧的酱肉摊上，也卖过油炸干蚂蚱，可见这道美味也曾从天津传到北京。何时能再以炸蚂蚱下酒，饱餐“贴饽饽熬鱼”啊！

石头门坎大素包

多年客居海外，吃遍中西餐点和南北菜肴，忆及家乡风味，在久享盛名的大餐馆，诸如“狗不理”的包子，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聚合成的银鱼紫蟹火锅，丰泽园的燕翅全席之外，却不时想起天津的素食来。

天津的素食餐馆，在当年很有几家颇为出名，所备素食菜馔，品种繁多，各有特色。例如河北大胡同真素楼的素什锦，劝业场小食堂的烧二冬，南市六味斋的干烧冬笋，罗汉斋的整桌素席，宫南石头门坎的素包，以及在街头巷尾设摊现炸现卖的油炸素卷圈。其中享名久远，且深受大众欢迎的，当属石头门坎素包。

素食餐馆特定的主顾多半是佛教信徒，在不杀生的戒律下，要吃素食。再就是达官富贾在经常吃荤吃得脑满肠肥之后，要换换口味吃些清淡的菜肴。还有一些文人墨客讲求养生之道的，以为吃素可以增进健康，所以常去照顾素餐馆。于是这些素餐馆便生意兴隆了。素餐馆专用香油，所以其价码并不低于荤菜。又为吸引顾客，整桌素席同样有“鸡”、“鸭”上桌，只不过都是油和面的仿制品，形象逼真，浇汁之后，端上桌来，照样引人垂涎。如赶上烧香还愿，送到寺庙里去给佛上供的全桌素菜，看那“鸡”、“鸭”、“鱼”、“肉”的四大扒，真可以乱真。其实那都是仿做的假鱼假肉。因为多了一套面食塑造、涂色、油烹的手工技艺，难怪素菜要比荤菜贵得多了。

素包价廉物美，是大众食品。它是以白面做皮，以绿豆芽菜、芫荽、粉皮、面筋、香干（豆腐干）切碎做馅，用芝麻酱、腐乳、香油调料，包入面皮内，捏成有皱折的素包，上蒸屉蒸熟。蒸熟后一掀蒸屉，只见雪白晶亮，柔软细腻的素包，散发着清素的香味，引人垂涎。

每当早晚，天津各街巷之间常有清脆的叫卖声："石头门坎的大素包！""大素包，石头门坎的！"出门看时，可见小贩挎着黑漆提盒，缓缓走来，打开盒盖，见到那冒着热气的素包，谁能不买上几个品尝一番？

石头门坎在天津东门外天后宫南的一条街上，有两家具有百年历史的素餐馆，都做素菜，但更以素包最能招揽主顾。因为素包出了名，天津各处卖素包的都吆喝"石头门坎大素包"，人们吃起来味美可口，也就不问其真假了。

源远流长话豆腐

被誉为中国“国菜”的豆腐，向来以其物美价廉、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深受国内外人们喜爱。据记载，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食谱上，一顿早膳菜单就有四个菜是由豆腐做成的，分别叫做羊肉炖菠菜豆腐、卤煮豆腐、熏干丝、五香干等。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中国访问，在招待其用餐时，有一道杭州名菜——清淡别致的龙井豆腐，女王用后，倍加赞赏。据说在女王到来之前，曾从白金汉宫传来消息说，女王不喜欢吃中国菜，嫌太油腻。但当她遍尝了中国各地的名菜特别是豆腐后，即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印象，而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凝聚而成的中国菜肴所折服。

豆腐的制作历史，在中国流传已久。在河南密县发掘的一座汉墓中，即发现了石刻豆腐作坊，说明汉代已有豆腐制作，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曾经写道：“豆腐之法，始于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

相传刘安因贪图享乐，妄想永久为王，急于寻求灵丹妙药，以图长生不老。当时在淮南有八位自称能炼取金丹的方士，刘安即带着金块跟随他们登上一座高山炼丹。但见方士们把金块埋在地下，上面架起炼丹炉，口念咒语，说等九九八十一天即可炼出长生不老丹来。但是，当刘安及其随从回府中等候时，他们却挖出金块来企图远走高飞。不料，刘安在山下派兵士把守，未能逃脱。为了掩饰罪过，他们胡乱找来一些黄豆，磨成浆粉，然后放进炼丹炉内加温，谁知又加入一些卤水后，炉内即变成了又白又嫩的水豆腐，他们谎称此为长生不老丹液凝成。待刘安一尝时，果然味道非常鲜美，于是信以为真，并令其做成块状，火速送往京城进贡。

豆腐从此便诞生了，而且久传不衰。

一个新的食物品种的形成，往往是在无意中产生的。这八个方士本来是一伙骗子，在逃走不成时，为了应付刘安，却制出了鲜美的豆腐。当其正式问世后，又经不断改进和提高，从品种到质量都越来越赢得人们的喜欢。据不完全统计，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用豆腐类烹饪出的风味菜肴，至今已有四百多种。从大的类别分，就有水豆腐、干豆腐、老豆腐、嫩豆腐、豆腐汁、豆腐皮等，像国宴上用的“东方龙脑”、上海的“五香豆腐”、成都的“麻婆豆腐”、陕西的“水煮豆腐”、无锡的“银鱼豆腐”等都堪称是中华名菜。就连乡间的“小葱拌豆腐”也是人们盘中的美餐。至于那些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则更是中国一绝，不少制作臭豆腐的厂家因此而“臭”名远扬。

李时珍把豆腐也归于医药类。据称：病人多吃豆腐，能消炎健身，老年人多吃豆腐，能延年益寿，少女多吃豆腐，能永葆青春貌美。它虽然不是长生不老丹，但其营养价值却是众所公认的。

“大千风味”张家菜

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曾写道：“大千蜀人也，能治蜀味，兴酣高谈，往往入厨作羹饷客。”大千曾笑对朋友们作过自我评价：“以艺术而论，我善烹调，当更在画艺之上。”可见他的烹饪手艺之高。但说来很奇，大千的烹饪手艺竟是在土匪窝里学的，那还是大千十八岁时发生的事。

这年春节后，张大千跟随一伙商人从内江回重庆“求精中学”读书，途中，他被一彪人马蒙眼带上了山。山寨大王要大千写信告诉家中被绑了票，要家中速拿千块银元来赎人。后来见大千信中称他们是江湖好汉，又写得一手好字，遂改变主意，要留大千当山寨“军师”。从此大千“落草为寇”，开始了他平生奇特的“土匪生涯”，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生活。山王为防大千逃跑，叫一姓张的厨师负责他的“安全”，队伍外出他就跟厨师在一起守山寨，大千无事也就经常观摩或帮助厨师烧菜，在厨师指点下，大千竟将蜀味学得似如名厨。日久山王对大千戒备也松了，大千在取得张厨的理解和同情后，终于逃跑。他在这百天与土匪生活的收获，就是他对烹饪入了门。

大千一生不吸烟、不饮酒，但生性好客，所以大千家中经常人来人往，食客不断。大千有一习惯，客多热闹，他的兴致就高，胃口也就好。著名老画家谢稚柳在回忆时说：“大千的旁出小技是精于烹饪，且待友热诚，每每亲入厨房弄菜奉客。”他和客人谈笑的高潮，也几乎都是餐桌上评厨论菜的时候。张大千曾幽默地说过：“读了一辈子孔圣人的书，就只两句做得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大千一生遍游名山大川，赏尽各地美食，他集诸味之长去粗取精，以在自己的烹饪中巧妙吸收，融汇合一，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大千风味”。如“红烧狮子头”是大千拿手菜之一，他在国内制作时，沿袭传统做法，精瘦肉与肥膘要有严格比例，剁细调料精拌更有

讲究，必须下油锅炸至艳丽的金黄色，烩制时的火候亦有学问。

大千设家宴总有亲手书写的菜单，这既是张家做客的宴请凭证，也是大千的墨迹真宝，故客人赴宴不是争尝菜肴，而是争抢菜单。1981年张学良在大千家做客时得到一份菜单，他精心装裱成手卷，特在后部留下空白，于次年邀大千书题留念。大千“戏图数笔博笑”，画了白菜、萝卜和菠菜，题名“吉光兼美”，并赋诗一首。这张集诗书画于一身，有九位名人在录的普通家宴菜单，如今仍收藏在张将军藏品中，成为烹饪界和收藏家瞩目的一件稀世艺术珍品。

临清与《金瓶梅》食谱

据“金学”专家考证，山东临清已确认是《金瓶梅》的写作背景地。临清至今仍流传着一些与《金瓶梅》书中所描写相似的菜肴和饮食习俗。

元以后，因运河山东段开通，临清渐渐成为运河沿岸热闹的商埠。它的繁盛景象和社会习俗也为产生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以《金瓶梅》（词话本）为例，书中写了主食、菜肴、糕点、酒、茶、干鲜果等多达三百余种，为研究临清是它的写作背景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瓶梅》中写的面食有五十五种，多用北方的小麦、小米、黄米、豆类制作，少为大米或糯米。这五十余种面食，至今在临清多有流传。如“炊饼”（烧饼）、“黄米面枣儿糕”、“烙饼”（厚饼）、“寿面、寿桃”、“玉米面鹅油蒸饼”、“葱花羊肉一扁食”（水饺）、“粽子”、“冷糕”（切糕），还有“花糕、包子、桃花烧面、馒头、元宵、麻花”等，都是临清人常吃的面食。“炸酱面、温面”，更是临清人喜爱的饮食之一。

《金瓶梅》中写到的菜肴计一百零五种。所用原料仍与临清现在差不多，如鸡、鸭、鱼、肉、蛋、虾等主料。以《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和七十五回中写过的菜肴为例，可以看出这些菜肴仍列临清食谱中。如三十四回中有“干蒸的劈晒鸡、王瓜拌辽东金虾、白炸猪肉、水晶膀蹄、油炸烧骨”。劈晒鸡即今临清的风干鸡；白炸猪肉即今之干炸肉、干炸里脊；油炸烧骨即今红烧排骨。七十五回中有“烧脏肉酿肠儿、黄炒的银鱼、银苗豆芽菜、春不老炒冬笋、黄芽韭和海蜇”。烧脏肉酿肠，即临清今之粉肠、南肠；银苗豆芽即炒无根豆

芽。《金瓶梅》一书写了三十一种糕点，基本上是糕、酥、饼、卷之类的甜食。有的名字虽异、形状不同，但用料、味道差别不大，大多在今天临清市场见得到。如：“果馅饼、玫瑰饼、果馅椒盐金饼、丁皮饼、糖薄脆、白糖万寿糕、果馅寿字雪花糕、玫瑰元宵饼、香茶桂花饼、玫瑰八仙糕”等。其中用玫瑰花做的糕点多种，现临清每年仍有玫瑰做的“鲜花饼”大量上市。据糕点业老师傅回忆，书中那些糕点，他们大多做过、见过。

《金瓶梅》书中写茶、饮料有二十二种。书中饮茶多用果仁、盐笋佐茶。今临清仍有饮茶用瓜子、牛肉干、豆腐干、姜片等当“菜肴”。

《金瓶梅》书中写的干鲜果三十二种，其中多为北方产品。如“雪梨、莲子、榛松、栗子、荸荠、苹果、盖柿、大枣、核桃”等。

近年临清名厨们已挖掘整理出有特色的“金瓶梅筵”，以飨远方来客。

马叙伦与“三白汤”

世人多知马叙伦是革命家、政论家、哲学家、教育家，还兼擅古文、诗词、书法，殊不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余杭人。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南社，编辑过《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等，为当时士林之俊彦。民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过哲学教授。讲老庄哲学，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等。1916年袁世凯称帝，马先生大愤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

马叙伦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生死不计”，但他的兴趣却又是多方面的。从他早年出版的两种随笔集《石屋余渖》、《续渖》中，竟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美食家，竟善治佳肴美馔。

二三十年代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而其中的“马先生汤”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为当时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马先生常光顾那里的川黔馆长美轩，看到那里菜烧得好，唯独汤不甚佳，遂将己之所手创“三白汤”制作方法告诉厨师。长美轩仿制后命名为“马先生汤”，到此品尝者无不称誉，以后便成为长美轩的名肴。

何为“三白汤”？三白者，即白菜、笋、豆腐也。因皆为白色之物，故名。原料看似简单，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作料。此汤烧制后，味极鲜美。马先生在《石屋余渖》中说：

> ……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

看来作料中最重要的是雪里蕻，别的尚可“增减”，唯此不可缺

也。

据说，长美轩仿制的马先生汤虽然鲜美，但比马先生亲自所制“三白汤”的味道仍要略逊一筹。其中奥妙恐怕自然在火候、作料配置上。现在中山公园里的餐馆中已然没有“马先生汤”了，现在的人们也已不知当年还有这样一道镇堂的名菜。那时能在长美轩品尝“马先生汤”而今又健在者，至少要有两个条件，当时有一定社会身份，还要当时年龄起码在二十岁左右。我认识两位老先生：一个是健在的张中行先生，今年八十六岁高龄，在他的《负曝闲话》一书中谈起马叙伦和“三白汤”，但他没有品过；还有一位是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他1993年故去，享年九十六岁。在其所著的《南社丛谈》一书中也提到过“三白汤”，但郑老也未曾品尝过。可见称之为“广陵绝响”并不为过。

马先生虽说可称是美食家，但据郑逸梅老人记叙，他平生最爱吃大蒜烧豆腐，并云：

> 色香味三者俱备，且又价廉物美，大快朵颐。

马先生不仅擅佳肴，他的兴趣和余事还有书法、诗词等，亦皆可成家。50年代他出版过《马叙伦墨迹选集》，自书诗居多，人民美术出版社线装影印。印数极少，当时得者已可庆幸，今天则是只可与闻而不可见了。

茶香酒趣

chaxiang jiuqu

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

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个来今雨轩，它建于1915年，是著名的茶楼和饭馆，也是近代一些社会名流聚会之所。

它得名于一个典故：唐朝诗人杜甫闲居长安，曾一度被唐玄宗赏识，得官有望。一般达官贵人以为他会前途无量，便主动上门结交，可是他后来没做成官，所以与他就逐渐疏远了。一日，秋雨绵绵，杜甫贫病交迫，适一魏姓故友前去探望，使诗人既感激又伤心，因而作诗一首。诗前有一小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人便以"旧雨"指"故友"，"今雨"指"新朋"。

"来今雨轩"匾原系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是指所识朋友欢聚一堂之意，款署"水竹邨人"。大总统给茶社写匾，可以说是十分气派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来今雨轩"的茶客可以说是北京当年最阔气的茶客，外国人有各使馆的公使、参赞、洋行经理、博士、教授；中国人有各部总长、次长、银行行长、大学教授……大概当年北京的一等名流，很少有哪一位没在来今雨轩坐过吧，柳亚子组织的"南社"活动也曾在此举行。

来今雨轩不仅以它的园林秀美吸引游客，其菜肴也颇具特色。其中有著名的冬菜肉包，几十年常销不衰。它用炒熟的瘦肉末和四川冬菜做馅，略微加糖的面粉做皮，不仅鲜美可口，而且由于蒸的时间较长，一般可放三天不变味儿，价格也较低廉。游人到此，吃几个肉包，喝一杯清茶，可以饥渴顿消，游兴倍增。另外还有比较名贵的"马先生汤"，以鲍鱼、广肚、鲜贝、海螺、海参、鱿鱼等加调料制成，味道鲜美，营养也十分丰富。其他还有"赵先生鸡丁"、"鱼香鸭方"、"干烧鱼"等名菜。其菜肴兼具各方风味，又有自己的特点，以适当降低川菜"辣度"，增添一点"甜度"来适应一般顾客的口味。

近闻，现在来今雨轩较当年又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增添了许多新品种，如“清蒸活鱼”、“松鼠活鱼”、“五柳鱼”、“糟溜鱼片”等等。更重要的是将文学巨著《红楼梦》中的肴馔搬上了餐桌，大致有四十多种。如刘姥姥在大观园吃到的“茄鱼”，薛宝钗赠林黛玉的“冰糖燕窝粥”，史湘云请客的“笼蒸螃蟹”，贾母吃的“牛乳蒸羊羔”，等等。

来今雨轩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现在大概还在吧，那就是竖在大厅台阶下面的那块青色山子石。这是有名的“小青”，本是圆明园旧物，原有大小两块，曰“大青、小青”，俗称“破家石”。传说乾隆南巡，在某地见此二石，十分喜爱，惜二石太大，运送困难。有一富室，尽全部家资为运此二石来京。待石至京，该富室已破产矣。这同宋徽宗“花石纲”故事是一样的，只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了。

来今雨轩的名点是“肉末烧饼”、“梅干菜包子”，只别来多年，不知何日再能大快朵颐。

什刹海茶棚的野趣

在北京旧时夏天坐茶座，品茗消暑，如果嫌北海公园等处富贵气太重，那么最好到什刹海的茶棚中去，那是最有趣的地方了。早年间，中山公园和北海没有开放的时候，这里就已有茶棚了。

什刹海荷花市场上，搭席棚临水卖茶，是市场上的主要的生意。近人曹张叟《莲塘即事》诗云："岁岁荷花娇不语，无端斗茗乱支棚。斜阳到处人如蚁，谁解芳心似水清。"说的就是荷花市场上的茶棚。

这种茶棚是每年到了夏天临时搭起的，本来前海这条大堤，约三丈多宽，两边都是老柳树，一间房屋也没有，每年荷花市场开市时，开茶馆的人便约棚铺来搭茶棚。北京棚匠的手艺是堪称天下独一的绝技。这在李越缦、苏曼殊、震钧等人的著作中都曾被高度赞赏过。棚匠们对任何精巧的棚都能搭得出来，何况这种一般的茶棚。这茶棚都是用杉篙、竹子、芦席搭成的，十分巧妙，下面用杉篙、木板扎架子，高出平地二三尺，一半伸进水中，成一水榭形的平台，这样，自然就把大堤加宽了，堤的两侧都可设座，中间还可以供行人走过。平台上面再用芦席搭天棚，以挡雨淋日晒，平台四周还装上栏杆，天棚出檐处吊上茶馆的幌子。白布横幅，写着什么"三义轩"、"二合义"等招牌。就在这茶棚中，摆上老式高桌、方凳卖茶，也是论人头算水钱，然后再加茶叶钱。价钱比北海公园两处著名茶社，如漪澜堂、来今雨轩要便宜不少，在市制未贬值前，一般都按铜元计算，加上五大枚一包的"香片"，连茶叶带水钱，总不会超过五分钱的，但可以享受半天的"莲塘清风"。这不是很实惠的吗？

在什刹海喝茶确有野趣。当时什刹海的前、后海都有人包租了去种水生植物，海中心水较深处种莲花，水边上较浅处，种菱、种芡（俗称"鸡头米"），坐在这种席棚下茶座中喝茶，可以饱览这种江南

水乡般的荷塘景色。还可以看到有人撑着一条船摘荷叶、采莲蓬、采菱角、采“鸡头”。《一岁货声》中所载“老鸡头，才上河”的市声，卖的就是这里出产的“鸡头”。这种水乡农村中的景色，在北海是看不到的，而在什刹海茶座上，却可以一边悠悠然地喝着茶，一边吹拂着有荷花香味、菱角香味的熏风，一边欣赏着这水中的野景，听着老柳荫中的“知了”声。这种境界几乎是只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了。

上海城隍庙“得意楼”旧话

凡是上了些年纪的老上海，总还记得城隍庙有一间规模宏大，年代古老的茶馆——“春风得意楼”，简称得意楼。

当年的得意楼，每天天刚蒙蒙亮，便已是熙熙攘攘，高朋满座。到这家茶馆来饮茶的常客，大多数人都有固定的座位。跑堂的都是些有经验的老手，接待时面带笑容，殷勤而又热情。客人刚坐定，一块热腾腾的毛巾便递了过来，一转身，又将一壶香茗送来了。所用茶具很多是私人自备专用而由茶馆代为保管的。当你才呷了几口茶，跑堂的又过来问用些什么点心，如松月楼的素什锦两面黄、松运楼的蹄膀面，以及南翔馒头等，都可以随叫随到，方便得很。还有些小点心，如刚出炉的蟹壳黄、葱油饼和生煎馒头等，则由小童端着，穿梭似的来往兜售，既快，又方便，所以也很受顾客欢迎。

得意楼的三楼上，特设岛市茶座。为了适应喜爱养鸟的茶客的需要，特为提供水斗和刷帚，免费给茶客冲洗鸟笼。各式各样的笼子，各式各样的芙蓉、秃眼和百灵鸟，吱吱喳喳，百鸟争鸣，组成一曲非常悦耳的大合唱。这些爱鸟成癖的鸟主人，一面欣赏自己的爱鸟的妙奏，一面和三朋四友扯谈品茗，这种闲情逸致，不是局外人所能意会到的。

得意楼还附设三个书场：二楼和底层怡情处二间书场都是光裕社弹词名家的地盘，如夏荷生、徐云志、沈俭安、薛筱卿等，红极一时，天天满座。还有底层的柴行厅，一般属于润余社的地盘，经常聘请一些评话的响挡。当年许继祥和沈俭安在这说书，卖座始终不衰。城隍庙的书场还有一个特点，是各种小吃的品种很多，有些品种当时还只有在几家书场里才有供应，如鸽蛋圆子、鸭膀鸭舌头、面筋百叶等。听两挡书只花费五分钱，还供应一壶茶，但花费在零食小吃方面的，往往要超过好几倍。

20世纪50年代，由于把城隍庙的豫园扩建，将三穗堂、点春堂和内园三座假山园林连接起来，辟成上海的最大的古色古香的园林，因此“春风得意楼”这座古老的茶馆也就不复存在了。

韵味无穷的清茶馆

老北京人最爱喝茶，更爱喝酽茶，尤其爱喝高级的“小叶儿茶”，这种足可以益寿延年的嗜好一代传一代，祖祖辈辈已经喝了七八百年，到如今，兴致丝毫不减。

北京这块福地，虽然不产茶叶，更没有杭州虎跑泉那样的好水，但是茶文化的韵事，确实丰富多彩。

吃与喝，是人生两大需求，而渴比饿更难受，故此旧京之茶馆多于饭馆，尤其是专卖茶水的所谓清茶馆，犄角旮旯，比比皆是。

倒退五六十年，北京城十分空旷，不像现在这样拥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于是所有的清茶馆都非常宽绰，桌凳疏置，空间开阔。大家伙你一壶“雨前”，我一壶“大方”，他一壶“毛峰”，闷透了之后才一碗一碗地细品，喝得踏实，喝得自在，喝得痛快，喝得够味儿，喝得肚子里空膛了，不用人催，自然四散，各奔东西。

清茶馆的茶客，自清晨至黄昏，有如走马灯，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至于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茶腻子”，则终日泡在茶馆里，长时间占着座位，而善良的掌柜从不对其下逐客令，恪守和气生财之道，竟至于此。

闻鸡而遛鸟者，作为清茶馆每天第一批顾客，给茶馆带来了繁荣和热闹，也为北京的民俗谱写了历史篇章。这些鸟迷们涉足郊野遛早儿后，进城先奔茶馆，借以歇腿儿、喝茶兼赏鸟。此时不过清晨七时许，懒人尚在梦乡，而茶馆早已是炉火正红、水沸茶舒、清香扑鼻了。鸟迷们纷纷摘下竹笼的布罩，那百灵、红子、黄雀、靛颏儿等诸般训练有素的名贵小鸟，双双不甘寂寞，一块儿迎着朝霞，顷刻即仿效出喜鹊、山鹊、布谷、大雁、老鹰、苇扎子以及伏天儿、家猫等十

几套叫法，各逞歌喉，互不相让；其主人则互谈茶经、论说鸟道、叙述家常、评议时政，恬淡的心情，溢于言表。

步鸟迷之后座者，是五行八作的工匠。这些人于茶道并无研究且不感兴趣，迫于生计，必须在上午八九点钟在茶馆聚会，各自沏壶茶慢慢喝着，肚子里没什么油水，因怕“水饱儿”后被茶涮得越发心慌，故只是小口儿小口儿地抿，一旦被雇佣，即弃茶扬长而去；倘无人问津，则耗至中午怏怏而回。

午后的茶座儿，另是一拨人马，形形色色巧舌如簧的纤手，充斥着各个角落，一面大口喝着茶，一面交换着租赁、买卖或典押房屋的消息，或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亦有“打鼓儿的”小贩，把茶馆当做“攒儿上”（北京土语，即集散地），互通情报，以统一标准的最低的价钱收购某某户的旧货。

清茶馆的场面难以忘怀，清茶馆的招幌更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朱红的木牌，刻着毛尖、雀舌、龙井等茶叶名称，招牌下系着红布条穗，迎风飘扬，像凌空跳动的火焰，醒目，有画意，更有诗情，用它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新老茶客，虽无声而胜有声也。

杭州的茶馆

中国茶馆之多，杭州独有一份风姿，盖杭州的茶艺馆，开在天堂西湖，那是独占了一份天籁。比如风荷茶馆，听其名，便知其开在西湖十景“曲院风荷”旁，夏雨中，晚七八时到那里去，最是迷人。那时人少，可听檐外雨声，品龙井一杯，俄顷，有小姐送上莲蓬一枝，正是西湖里生的，里面有鲜嫩莲子数枚，此时意境，无法言喻，唯有独坐茶席，再品一杯。至于春和景明，杂花生树，落英缤纷，风和日暖，到有庭院的大佛茶庄，可赏盆景，赏奇石，赏春水，赏新叶，一杯在握，四处闲走，独往独来，其乐融融。这样的茶馆，哪里找去？

茶最初药用，继而食用饮用并举，最后发展到品饮，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这过程中，茶馆的诞生和发展与饮茶的历史齐头并进。茶馆的切入口为宗教。汉时有人出家，与饮茶有关，为此专门建立了一种品茶的屋子，人称茶寮。这种茶寮，也就是茶馆的雏形，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

最早记载的杭州茶馆在南宋时代。当时的茶馆集中地，有一块开在今天的清河坊一带。那个时候，茶馆已经分出各种不同的种类来了，有听琴说书饮茶的，有文人雅士聚会饮茶的，有市井引车卖浆者在街头茶摊上边饮茶边谈天说地的，等等。尤其已经出现了一种称之为瓦肆的游艺场所，这里常常有说书人说书，下面坐着的人品茶听书，入迷之极。岳飞死于杭州风波亭，他被平反昭雪之后，事迹立刻搬入瓦肆，所以有“一市秋茶说岳王”之诗。

到了明代，茶肆茶楼在杭州林立，成为这个城市的一种生活象征，有茶馆老板，每逢花事兴起，便在茶馆开花展，以此招徕茶客。

清末民初，杭州的茶馆业更是兴旺，不少革命志士，比如秋瑾、陶成章等人，也经常在茶馆中谋划革命。那时杭州著名的茶馆有三雅

园、喜雨台等。各个茶馆分工也往往不同，有专门斗鸟的，专门作人力市场的，专门下棋的，都是自然形成。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的茶馆大约有二百多家。

1949年之后，杭州的老茶馆越来越少，但沿西湖边的风景点内的茶室，却始终没有关闭过，这是沾了西湖的光。游人总有走累与口渴的时候，坐下来便有地方喝茶，且可饱览山光水色，那是何等享受。即便是“文革”最激烈的时候，这种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也没有被革除。这是杭州茶事的幸事。有人统计，今天杭州的茶馆差不多已经恢复到当年的二百多家了。

品茗胜地“湖心亭”

湖心亭茶楼，坐落在上海城隍庙。建筑富有民族传统特色，陈设古朴典雅，上下两层能容纳二百余人品茶，为沪上品茗休憩之胜地。茶楼供应各式名茶，并有配套茶食，水质经净化矿化处理，清澈甘甜，不同一般。茶楼设有专业茶艺表演队。每到周一下午，还可欣赏到江南丝竹优美的乐曲。湖心亭四面临水，池中鱼群嬉戏，桥有九曲相通，夏季荷花盛开，坐在亭中品茶赏景，别有一番情趣。

现在的湖心亭在豫园外面，原先是在豫园范围之内。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兴建豫园，万历五年（1577）后又陆续扩充到七十余亩。园内亭台楼阁，堂馆轩榭，小桥流水，怪石嶙峋，辅以名木花卉，布置得错落有致，为江南名园之一。园主潘先瑞，上海人，曾任四川布政使，为取“愉悦老亲”之意，因豫与愉同义，遂取名为豫园。先瑞故世后，此园逐渐荒芜，并数易其主。至清康熙年间，豫园为上海绅商所得，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重建，改名西园，到四十九年（1784）完工。其间，周围茶馆酒楼相继开设。湖心亭也于是年建成，迄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当年由大布商祝韫辉等人集资建于凫佚亭旧址上的这座耸立水中的湖心亭，周围为上海各业公所的经商活动之地。直至清道光年间，湖心亭还专供经营青蓝大布商贾们聚会议事的场所。

湖心亭成为茶楼，始于清咸丰五年（1855）以后，初名“也是轩”。清末有位商人名刘慎康接管茶楼，改名“宛在轩”。楼主接管后桌椅全部更新，临窗排列一色花梨木茶几与靠椅。居中放有云石面红木圆桌，配蛋圆形红木凳。墙上悬挂名家字画，为环境增添文雅，洁静宜人。茶馆服务热情，生意兴隆。城里城外一些文人雅士都喜欢到此品茗聊天。不过，宛在轩这个名字过于斯文，一般茶客呼其名并不习惯，还是叫它湖心亭。清末民初，茶楼兴旺，在城隍庙附近的四美

轩、春风得意楼、乐圃阆、凝眸阁、红舫等，都颇有名气，湖心亭和这些茶楼，一起组成了有城隍庙特色的茶市风光。当年主韬曾写到湖心亭一带风光："园中名肆十余所，莲李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饮者杂沓。"

湖心亭茶楼的楼下内外堂，都可以两个人合饮一壶，内堂茶价每位上午七十文，下午一百文。外堂上午六十文，下午七十文。楼上内堂，每人一堂，外堂可以两人一壶，而取价一律，上午七十文，下午一百二十文。这里不像一般茶楼那么嘈杂喧闹，而是幽雅宁静，为文人所向往。清末著名小说《海上繁华梦》的作者警梦痴仙，实名孙家振、字玉声，别号海上漱石生，他曾经居住在南市，对老上海风土人情很有造诣，闲来无事，经常品茗憩于湖心亭。并为湖心亭景色有感而发，留下了美妙诗句："湖亭突兀宛中央，云压檐牙水绕廊。春至满防新涨绿，秋深四壁暮烟苍。"

闲话龙井茶

笔者初到杭州时，品尝了龙井的真正味道，方知名不虚传。

龙井其实是口泉，名曰龙井。此泉位于西湖凤凰岭之中，群山环抱，东临南高峰，南通九溪十八涧，西接上天竹，北面化高峰。此岭古树参天，郁郁葱葱。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此泉泉水清冽甘甜，喝一口真乃沁人心脾，精神为之大爽。故茶因泉得名，成为茶中佳品。

据说，龙井泉水经科学测定，内含丰富的矿物质。龙井茶中含有大量的叶绿素、氨基酸和维生素C，饮之令人心旷神怡，有关部门已在此新辟一景观，取名“龙井问茶”。夏日来此游山观景，品茶避暑，情趣惬意。

杭州有一道传统名菜，与龙井茶有关，叫“龙井虾仁”。制作此菜是选用活的大河虾，剥去虾壳，配以清明前后的龙井新茶烹制而成。

关于“龙井虾仁”的来历，尚有一段传说。说是清明时节，乾隆皇帝一次便服游西湖，来到龙井，忽然下起大雨。为避雨躲进一户农家。农妇以新茶招待。乾隆喝过清香味醇的龙井新茶，赞不绝口，便趁农妇不留神，偷了一把装进衣袋里。雨过天晴，乾隆走出农家，继续游山逛景。时至傍晚，又饥又渴，进了西湖边的一家酒店。吃喝之后，颇想饮茶，忽然想起偷来的龙井茶，即唤过店小二，从衣袋里掏出茶叶，叫其泡茶。老板正在烹制“炒虾仁”，一听皇上到店，大惊失色，手足无措，慌乱中误把店小二拿来的茶叶当作葱花放入锅内，加入黄酒，颠炒片刻，倒入盘中。店小二也未察觉，便战战兢兢端到乾隆面前。乾隆一看虾仁白玉晶莹，茶叶翠绿欲滴，色泽典雅，香气清幽，夹进口中更觉香嫩鲜美，胃口顿然大开，不禁连连叫绝，竟忘记了喝茶。后来杭州的厨师将此菜不断改进，遂成为传统名菜“龙井虾

仁”。据友人说，如今到西湖的中外游客，“龙井虾仁”成为他们必尝的美味佳肴。

茶中极品武夷茶

品一杯武夷茶，顿觉滋味醇厚，香气浓郁。

早在八百多年前，苏东坡的《咏茶》诗里已有“武夷溪边菜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之句，可见当时武夷茶就已出名，而为丁谓、蔡襄等文人学士所赏识了。

武夷茶之所以脍炙人口，盛名不衰，究其原因，就在于明徐勃所说的“山中土气宜茶”。武夷山的奇峰泉水，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这里峰岩高耸，峡谷深邃，日照时间比平地短。山间岩泉渗流，终年不绝，相对湿度比较大。气候温暖，四季如春。植茶的土壤，几乎全是酸性岩石风化而成的，并含有丰富的腐殖质。有如此优越的环境，自然会“深山元地不栽茶”了，因此各岩均依崖筑成梯式茶园，有的利用岩凹、石隙垒成的盆栽式茶座，容土植茶，土层深厚、疏松，更适于茶树深根的生长。作为一个茶区，武夷山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

武夷山的茶树，品种繁多。各岩种植的，多半是土生土长的菜茶。用菜茶制成的茶叶，可分为奇种、名种、小种三类；而奇种又有提丛、单丛、名丛之别。所谓名丛，是从各岩茶园里选拔出品质特优的一二株茶树，分别采摘，单独制作而成的。如大红袍、钱罗汉、白鸡冠、白瑞香、素心兰、金钥匙、不知春、白牡丹、不见天、半天夭、水金龟等，不胜枚举。以九龙窠的“大红袍”来说，它长在绝壁上，叶片厚，色微红，只须数片冲泡，便香气四溢，故有“茶中之王”的美名。除了本山品种之外，近百年来，还从外地引进了不少良种，如水仙、桃仁、奇兰、铁观音、梅占、雪梨、黄龙、肉桂等等。所以，有人把武夷山称为“茶树品种的王国”。

自然环境的优良，茶树品种的繁多，加上管理的周到和采制的考

究，就使武夷岩茶具有色、香、味均佳的优异品质，而被誉为“茶中极品”。这是介乎红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的乌龙茶，既有绿茶的清香，又有红茶的甘醇。一片标准的岩茶茶叶，冲泡开来，有“三红七绿”之分，叶缘红似朱砂，叶片绿如宝石，茶水深澄而鲜丽，逗人喜爱。喝起来，纯而不淡，浓而不涩，令人喉下润滑，齿颊留芳，味久而益醇。不仅可以提神、益思、破闷、解乏，而且还具有消食、止痢、去暑和醒酒的功效。

清代陆廷灿——《续茶经》的作者，有《武夷茶》一诗，写道：

桑苎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
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岭云。
醒睡功资宵判牒，清神雅助昼论文。
春雷催蒸仙岩笋，雀舌龙团取次分。

诗中不仅对武夷茶作了形象的描绘，而且极力称道它的功效。更有意思的是清人戴廷栋的两句诗：

我愿息缰依止止，肯分半席作茶佣。

竟由赞美武夷茶，而甘愿去做那里的茶工了。

香浓味醇普洱茶

普洱茶盛名远扬。清人阮福在他的《普洱茶记》中写道：“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醇，京师尤重之。”檀萃的《滇海虞衡志》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普洱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端，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四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文中所列的六大茶山，皆在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境内。而西双版纳是以绮丽山水著称的，可见好山、好水与好茶是密切关联的。

普洱茶属云南大叶种茶，经科学分析，茶的水浸出物、名酚类、儿茶素的总含量均高，故色艳、香浓、味醇、耐泡。加之制作技艺精湛，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传统名牌茶叶。其中主要产品有红茶，色泽红润，滋味纯强，香气馥郁；绿茶，包括散茶、沱茶、砖茶、饼茶，汤色清澈，茶香浓爽，味醇回甘。普洱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据说现在已远销亚、欧、美等几十个国家。

云南是中国栽培茶树较早的省份，也是世界上茶叶的一个原产地。据南糯山的一些老茶农说，在他们之前的五十五代祖先，就在这一带栽种茶树，并且培育出不少优良的茶叶品种。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写到的“女儿茶”，就是普洱茶的一种。曹雪芹笔下的才子佳人，在大观园中品尝普洱茶时，曾有这样一首很别致的诗：

普洱名茶喷鼻香，饮茶谁识采茶忙？
若怜南国采茶女，忍渴登山与共尝。

听说这些年，在云南西双版纳、景谷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又老又高的大茶树，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茶树王”。比如南糯有株“茶树王”，阿尼族人叫它“沙桂茶”，树高4.59米，树幅达10.9米，直径1.83米，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它吸引着世界上好些国家的茶叶专家前去

参观。不久以前，在巴达区的大黑山里，又发现一株野生型的大茶树，树高达34米，据说树龄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了。

有人说，美丽富饶的云南，是动物、植物和有色金属的“王国”，我认为，云南也称得上是“茶树的世界”。

曾国藩与“祁红”

已记不清在哪一本前人笔记上看到一段轶闻：曾国藩归里之后，清廷因为他曾权倾一时，门生故旧遍天下，又是汉人，怕他心怀叵测，乃对他布置严密的暗中监视。某日，曾与清客们下围棋，以所饮龙井不够味，无意说了一句：“当年驻军祁门时，所喝的当地祁红胜此多矣！”不意不久之后，清廷忽派飞骑从北京送来祁红一篓，曾国藩吓了一身冷汗，才晓得自己的一言一语，早有人密达“天听”了。

这轶闻说明：清廷对于他的忠实臣仆如曾国藩之流也是不放心的。其次，作为中国名茶之一的祁红，有其为其他名茶所不及的独到之处。

祁红，即祁门红茶的简称，其名已传遍世界。其实它的产区并不局限于安徽祁门。从历史上看，至德、浮梁、石棣、东流、伙县乃至江西的鄱阳、乐平，这一带所产的红茶，都统称为祁红。

原先祁门、至德、浮梁等地所产的茶以绿茶为大宗，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吟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指的便是绿茶。千百年来，这种绿茶运销于两广，极受欢迎。后来红茶畅销，则是17世纪的事。

祁红之名所以不胫而走，主要是祁门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茶树都种于山上，终年为云雾所封，空气湿润，气温适宜，雨量又很充沛，这些都是茶树所不可缺少的。而制茶技术也是一个关键。祁红与其他名茶不同，茶庄所收购的都是湿坯，由富有经验的老师傅掌握发酵程度和一定的火候与时间，这三者都必须恰到好处，否则便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按这种卓越技术所制成的红茶，条索坚细秀长，香气馥郁，味醇和而甘浓，茶色红艳鲜亮。一杯泡开，有特殊而持久的香气，令人未饮而神怡！所以它不仅畅销全国而且畅销全球，海外

人士有饮之成癖者。18世纪，印度也广种茶树，抵制中国茶，并限制中国茶叶进入英领土及英本土，唯独祁红例外。因为英人要用祁红来掺和印度、锡兰所产的茶叶，否则淡而无味，于此亦可见祁红的身价了。

可惜的是：三十年前，由于农村破产，祁红年产量仅达二千担。据闻1954年在祁门建立了机械化制茶厂，祁红的产量、质量当一定大大改观了吧。

刘完素与颐春茶

友人送我几盒包装精美的颐春茶，用开水冲泡后，观之色泽淡雅，澄澈透明；饮之味道纯正，清香爽口，津生渴止，喉底回芳。

颐春，中老年颐养青春之谓也。这种保健茶的创始人，就是具有“金元四大家”之誉的金代名医刘完素。

刘完素，字守真（1120—1200），出生在河间府肃宁乡间。当时，由于战乱，民不聊生，瘟疫流行，其父因患病无钱医治而死。刘完素因而立志从医，稍长便为百姓治病。他除用中草药行医外，还根据《黄帝内经》《食疗本草》中所云：“医食同源”之理论，选用了既能强身治病，又芳香可口的天然药物，泡制为茶，送百姓饮用。据医典载，当时他选用的天然植物和中草药有枸杞、山楂、菊花、红花、决明子、陈皮、乌龙茶等，它们对防止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有明显医疗效能，深受民众拥戴。

刘完素从医成名后，金章宗皇帝召其入宫为御医。做御医时，仍每年还乡为百姓治病，故他谢世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医药大师，在家乡肃宁洋边村，遂取“大师完素”之意，简化为“师素村”，并在他家宅基地上建成“刘爷庙”，塑立神像。每逢农历正月十五日和三月十五日（刘完素的生卒日），河间、任丘、饶阳、蠡县、高阳等邻县的乡民，皆去朝拜，香火极盛。

1507年，明朝正德皇帝封他为“刘守真君”，后人更是奉若神明。八百多年来，冀中一带，广泛流传着神医刘完素妙手回春、用颐春保健饮品返老还童的传说。这在《刘守真传》中有详尽的记述。据说冀中一带农民种药材、养药材、泡制药材、用药材做饮料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这都是刘完素直接影响的结果。

笔者曾问过一些名医，这些植物和中药缘何有颐春疗效？名医言，枸杞和山楂有软化血管、活血化淤之功能；菊花、红花、陈皮、决明子具有清肝理气、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之效力；至于乌龙茶，能减少血液和肝脏中的稀醇及中性脂肪的积累，自然强化了血管壁的渗透能力。名医又言，保健茶的成功不仅是疗效，更重要的是口感，不然就称不上“茶”了。原料中乌龙茶是茶香、菊花是清香、枸杞是甜香、山楂是果香，便构成了颐春饮料的爽口回芳。

这番道理，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因为讲得入情入理。所以，友人馈赠的颐春茶，我爱不释手。友人告曰：而今生产这种颐春茶的，正是刘完素的家乡——河北省肃宁县颐春食疗饮料厂，厂房就设在师素工业区，采用的是现代化生产，产品已远销海内外。

昔日南京茶叶棒

一般老南京提起茶叶棒来，该没有不晓得的。早年南京的一般茶庄，多雇用一些年轻妇女，替他们分拣茶叶。把茶叶上的粗柄拣出来另放一处。用意很明显，是分档次，茶叶好提高价钱卖，茶叶柄价钱低点卖。那个时期的妇女，在家除做家务外，有的还揽点针线活，但大都闭着没事干，就每天去拣几个钟点茶叶，捞点外快。只要有熟人担保，不拿不带就行。有些恶作剧的小伙子们，对这些拣茶叶的老姬村姑，嘲称为“茶叶棒”，茶叶棒本来是指的茶叶，这样一叫，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妇女们的诨名了。

茶叶棒的供销对象，当然是背街和穷乡僻壤的小茶馆以及一些收入很少的市民，他们饮不起好茶，茶叶棒也能经得起冲两遍开水，有色有味，过过茶瘾，但比农村过路摊点上的柳叶茶和山楂叶茶还是强得多。

南京另外还有二道茶，它的身价和茶叶棒相伯仲，有的还略高一筹。南京人过去有一个习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上茶馆的人很多，谈闲聊天，一喝大半天。当然也有工作忙，呷两口茶就走的。一些高级馆子和大茶馆，把这些吃剩下来的茶水倒掉，茶叶贮藏起来，每当晴天，成担的在外面摊晒。夫子庙原市政府西围墙外漫长的人行道上，都是天然晒茶的场地。隔一两小时，就有人用竹耙子翻一遍。晒干了，又可以回炉待客。东牌楼义顺茶社茶资较便宜，南京人图吉庆，大年初一到那里坐坐的人很多。因为来路是统茶，味道并不差。还有卖三道茶的，冲两遍，就完全是白开水了。

今日南京喝茶叶棒或二道茶、三道茶的人，大概是不多了吧。但在品香啜茗时，我想，这段历史还是不应忘记的。

蒙山茶话

爱品茗饮茶的人，都知道“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一说。蒙山，又名蒙顶山。在四川省名山县境内，海拔一千四百五十米。曲曲弯弯的小道旁，茶树郁郁葱葱，宛如绿色地毯。山林中，中外名人题写的石碑，比比皆是，组成了茶文化碑林长廊。

蒙山有五大名茶：蒙顶黄芽、蒙顶甘露、蒙顶石花、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历史上都属贡茶。这些茶主要以采摘细嫩、芽叶完整、多茸毛、加工工艺独特为特色，要经过炒、揉、烘、整形等十一道传统手工操作工序精制而成。茶叶外形秀丽，紧卷多毫，色泽翠绿，鲜嫩油润，别具特色；开汤后，滋味甘鲜，醇厚香绵，耐冲泡。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末期就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基地之一。

据当地人介绍，蒙山茶好，不仅保持了传统的制作工艺，而且现在还有了新的发展，更主要是蒙山的天然条件好，蒙山山高，空气清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终年云雾笼罩达二百多天之久。春季开始，蒙山烟雨蒙蒙，阳光散射；再加之土地肥沃，酸度宜茶，所以这里的茶特别好。

据《茶谱》记载，蒙山茶功效显著：“服一两能祛宿病，二两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相传古代有一个和尚，久患重病，药石无效。一天，一个老翁告诉他，春分前后，雷声初发时，采摘蒙山中顶茶，以本地水煎服，能治宿疾。如每年服用，永无疾病。老和尚依言而行，宿疾果然痊愈，而且体健不衰，眉发绀绿，好像年轻了二十岁。于是后人都说蒙顶茶有返老还童的功用。

蒙山茶在当地还有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青衣江河神的女儿“雅鱼仙姑”采了七颗野生茶种来到人间，与本地青年农民吴里真相爱。她见蒙山气候干燥，不宜种茶，便取下头上的白头巾在空中左右舞

动，天空顿时布满了云雾，整个蒙山被云雾笼罩着，茶树受到雨露的滋润长得十分茂盛。当地百姓用它泡水解渴，有病治病，无病延寿，强身健体，返老还童。

有关文献记载，从唐朝开始，每年清明时节，茶树刚刚发芽，县官就选良辰吉日，穿上朝服，率领僚属和全县七十二座寺院的和尚上山朝拜“仙茶”（皇茶园中的茶），然后开始采摘。采摘时先由三天前就已净过身的采茶僧在上清峰下的“皇茶园”中采摘仙茶三百六十芽，送交制茶僧负责炒制。炒制时寺僧盘坐诵经，制茶僧在特制的新釜中翻炒，用炭火焙干，储入两银瓶，成为“正贡茶”，这是专贡皇帝祭天地祖宗用的。另外在上清峰、菱角峰、玉女峰、甘露峰、灵泉峰五峰中采摘“凡种”（普通茶），制成“颗子茶”二十斤，装入十八锡瓶，称“陪贡茶”，供皇帝和大臣们饮用。制作完后，县官命人将制好的贡茶全部装入木箱，再用皇缣丹印封之。“贡茶”送京进贡。每经过的州县，都要由该州县派人谨慎护送。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蒙山茶区的茶叶发展迅速，可采面积达4.3万亩，产量逐年增加。

大理白族的“三道茶”

云南大理，是个非常迷人的地方。那里十八个少数民族，聚居在风光秀丽的苍山下洱海畔，生活多姿多彩。在众多的民俗中，白族的“三道茶”最为有趣，其独特的饮茶方式令人叫绝。

所谓大理白族“三道茶”指的是苦茶、甜茶和回味茶。第一道是苦茶，又称“烤茶”或“百斗茶”，饮后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第二道是甜茶，内有乳扇、生姜、蜂蜜、核桃等配料，饮后提神补气、神清气爽。第三道是回味茶，内有花椒等配料，饮后满口清香，其内涵丰富，有着很深的哲理。主要意思是告诫人们，生活是先苦后甜，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得到幸福。它提醒人们，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要认真总结一下，然后信心百倍地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当地饮用“三道茶”，还有一种调节人际关系和传扬民族文化的作用。不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公园船头，饮用三道茶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在欢迎客人和来宾的重要场合，更加隆重和热烈。其三道茶中，每一道都伴有三至五个节目，身穿漂亮民族服装的“金花”和“阿鹏”们（白族姑娘统称为“金花”，小伙子统称为“阿鹏”）载歌载舞，边表演边劝茶，而当第三道“回味茶”饮至过半时，那些“金花”和“阿鹏”们便会热情地邀请客人走到场子中间，一起唱歌和跳舞，从而将活动推向高潮。此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大理白族的“三道茶”，确实值得“回味”。

云南的茶叶向来是很有名的，其种类繁多，大理地区尤以下关沱茶和苍山雪绿享誉中外。沱茶呈“砣”形，又因产地在沱江，故而得名。其味醇厚，汤色澄亮，香气馥郁，不仅能解渴提神，而且有帮助消化、散烟解酒之功效。近代人饮用，据说还可降低胆固醇。雪绿是采用高原大叶茶精制而成的高级绿茶，色呈暗绿而油润，味道馥郁而清爽。大理“三道茶”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与这些优良品种的

茶叶密切相关。

大理“三道茶”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徐霞客之《滇游日记》。说是在当年的一个元宵节上，徐霞客于鸡足山悉檀寺西楼观灯，“注茶为乐，先清茶，中盐茶，次密茶”，是即为“三道茶”之雏形。后来，佛教在寺庙中提倡坐禅饮茶，香客和游客也共饮之，“三道茶”便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明、清年间，这种饮茶方式已在市镇及广大农村广泛传开，并增加了乳扇茶、蜂蜜、核桃等配料。人们在举行某种仪式、婚礼及过节时，均专门加工、饮用“三道茶”助兴。其内容和形式也逐渐完善和固定下来，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

“天府之国”多佳酿

品尝四川泸州老窖特曲过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其真不愧为名扬海内外之佳酿。

四川盛产名酒，泸州特曲仅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宜宾五粮液、绵竹剑南春、成都全兴大曲、古兰郎酒。它们被称为名酒中“五朵金花”。除此之外，川酒中的名牌还有沱牌曲酒、旭水大曲酒、文君酒、太白酒、泸州老窖头曲、二峨特曲、彭祖头曲、玉蝉大曲、宝莲大曲、绵竹大曲等十多个品种。

四川名酒众多，与其酿酒历史源远流长有关。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川南就出产一种名叫“蒟酱”的酒，名气很大。左思在《三都赋》中罗列蜀中名产时，特别提到“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史记》《汉书》中均有巴蜀蒟酱远销南越的记载。古时的番禺、南越即今广州一带，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川酒的影响就已经到达沿海地区了。

唐代四川酿造的“重碧春”“荔枝绿”“剑南道烧春”“卓女烧春”等均在当时享有盛誉。这些古代的美酒分别产于成都、宜宾、泸州、绵竹、邛崃等地。这些地方至今仍以酒闻名。

四川自古文人荟萃，出过不少独领风骚的文人泰斗、巨匠奇才，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宦游入蜀或流寓进川。他们的长歌短吟闲恨别愁，不少同酒有关联。

诗仙李白一生嗜酒，相传他早期的好些诗篇，便是由唐代名酒剑南道烧春激发而成的。李白所居之地彰明青莲乡（今属江油市）与剑南道烧春产地绵竹县毗邻，那里至今流传着李白“貂裘换酒”的故事。

比起李白来，杜甫不算善饮，但他流寓四川十年，也深深爱上了

川酒，称赞“蜀酒浓无敌”。他在戎州（今宜宾市）品尝到当地著名的“重碧春”和“荔枝绿”时，即席高吟：“重碧拈春酒，轻鸿劈荔枝”。

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一生浪迹天涯、历尽坎坷，对家乡的美酒念念不忘：“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汉嘉指今乐山市，凌云即乐山大佛所在地凌云山。在苏东坡的心目中，一切功名富贵、利禄荣华，比起家乡的美酒和山光水色来，都视同等闲。

金奖佳酿五粮液

“一滴酒露落入口，千粒珍珠滚下喉。”这是人们赞誉五粮液的诗句。的确，五粮液不仅风味独特，闻名中外，考其历史亦引人入胜。

五粮液产于四川南部的宜宾城，与泸州大曲的产地泸县相距不远。这里山清水秀，背靠翠屏山麓，左挽岷江，右夹金沙江，两江相交，汇入长江东流而去。正是这里清澈透明的岷江水，黏柔绵软的土质和干湿匀调、温差不大的气候，构成了酿酒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远在公元前，这里便已开始兴起酿酒业。最早，人们酿制的单一粮食酒，各具特色。如高粱酒醇香味正，稻米酒甜香柔和，玉米酒酒香浓烈，小麦酒清香爽快。历史上，许多骚人墨客，曾为这些酒挥毫赞誉。唐代诗人杜甫有“重碧拈春酒，轻鸿劈荔枝”之句。“重碧”即当时的佳酿。到了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中说：“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泼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谁能品此胜绝味，唯有老杜东楼诗。”老杜，指杜甫。说明杜甫当年赞誉的“重碧”酒，这时又名“荔枝绿”了。黄庭坚认为，这种“荔枝绿”酒，不仅可与向皇上进贡的绿荔枝相媲美，就是和素享盛名的葡萄美酒比也不在话下。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把几种单一的粮食酒混为一体，酒质可更佳，于是便开始酿制几种粮食混合酒。黄庭坚在《荔枝绿颂》中就说过：“王墙东之美酒，得妙用于三物。三危露以为味，荔枝绿以为色。”可见这种混合酒的色、香、味极佳。

随着时间的推移，宜宾的酒几经演变，酿酒原料由过去的三种，增加到五种：即高粱、糯米、大米、玉米、荞子，酒名也由“荔枝绿”改为“杂粮酒”。1916年，“杂粮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荣获金质

奖章。1929年，宜宾前清举人杨惠泉，因爱其酒而鄙其名，遂将“杂粮酒”更名为“五粮液”。

多年来五粮液经过精心酿制，酒质更臻佳美，被评为国家名酒，荣获金质奖章。

追寻文君当炉处

邛崃，是四川省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县城的名字。卓文君乃西汉一位奇女子。可是你若说起邛崃，也许知者不多，但提到卓文君，就有说不尽的故事了。

昔日我在成都先后遇到过两位邛崃人，当我问其中一位：“府上什么地方？”他答：“邛崃，卓文君的老家。”另一位则索性自我介绍：“我是卓文君的同乡，邛崃人。”何以会如此回答？邛崃的名字不如卓文君大名响亮也。而卓文君，正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这一千古佳话的女主人公。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客居临邛（即今邛崃）时，城中首富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一天，卓王孙盛宴招待县令王吉及司马相如。酒酣耳热之后，相如抚绿绮琴，奏“凤求凰”曲。文君闻琴心动，不顾封建礼教，寅夜私奔相如，二人遂结永好。为了生活，二人又冲破世俗观念，在临邛城内开一酒店，由文君当垆卖酒，相如跑堂涤器。蜀中咸闻其事，传为佳话。

为使人们不忘这一对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夫妻，他们当年的酒肆故址还依稀可寻，并已建成一座古色古香的园林“文君井”。

园林里的“琴台”建筑还保持着汉代的风格，三面临水，芰荷飘香；台后有千竿修竹，如一座绿屏风，环境极为幽静。相如当年获得文君这一知音之后，爱情上的满足助长了文思的泉涌。继脍炙人口的《子虚赋》之后，他又写下了《凌云赋》和《上林赋》。这些名作中凝结着相如的心血，当然也有文君的功劳。

琴台对面即文君井，井形如大瓮：口小肚大、水质清洌。井壁为黑色黏土嵌以陶片，纯为西汉所遗古井。清代一位诗人来到这里后吟

诗一首：

窈窕当炉只为贫，香泉酿出瓮头春。王孙悔后如填去，千古谁传卖酒人？

幸运的是，不但文君并没有被卓王孙和后人填掉，以文君井水酿造的美酒也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如唐代的“临邛酒”，明清两代的“卓女烧春”，民国时期的“邛州茅台”，目前的“文君酒”，一直盛名不衰，为一方佳酿。宋代词人陆游入川后，曾游临邛，多次登临琴台，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

落魄西川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
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南宋距西汉约一千二百年，放翁若是早生一千二百年的话，一定天天是文君酒店的座上客了。

一个清明节两个杏花村

每到清明前后，时常想起那“杏花、春雨、江南”的情景。那温暖扑面的春风，那迷迷濛濛的细雨，那村前村后含笑迎人的杏花，那湿漉漉的石板路，那小路两旁的小酒店——尤其是杜牧那一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更是把清明、酒、杏花村连接在一起了。

山西汾阳县的杏花村确实出好酒。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南北朝时期，那里就以产美酒而享名。所产的美酒，清澈透亮，香气扑鼻，入口甘醇。凡是好饮酒的人，都以痛饮汾酒为快。在1916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杏花村的汾酒，以精美的质量荣获金质奖章，而且其质量之美经久不衰，直到现在仍为中国八大名酒之一。

杏花村酒之美，首先在于酿酒所用的水好。据说杏花村中有一口古井，其水少杂质、无邪味，清洌甘甜，用以酿酒，自是不同于一般水。其次，酿造方法精。他们的经验有七条：人必得其精，粮必得其实，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香，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可是，有近人指出，杜牧诗中所说的杏花村，并不在山西汾阳，而是在安徽贵池县。

贵池是长江岸边一个港口，离安庆不远，古称池州。境内有奇石嶙峋的齐山和碧波荡漾的清溪。县之西郊，曾有杏花村，至今故址仍依稀可寻。据《贵池县志》记载：“古时杏花村方圆十里，四周为一片杏林。阳春三月，杏花怒放，为池州十景之一。村中有酒店，名‘黄公酒垆’，店中有井曰‘黄公井’，且产美酒。”杜牧诗中“借问酒家何处有”，很可能即指此处。井，至今犹在。现在，贵池县酒厂产“杏花村

大曲”“杏花村香泉”等四五种酒，虽不若汾酒之美，但质量也属上乘。

为什么可以论定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是指贵池县的这一个，而不是汾阳的那一个呢？第一，据历史记载，杜牧当年曾在池州当过两年刺史，对当地情况熟知；第二，诗中所描绘的清明时节情景，正是江南三月的风光，而不是华北地区汾阳的景色。

兰陵美酒郁金香

友人聚会，饮山东名特产“兰陵美酒”，斟之杯中，呈琥珀光泽，纯净透明；喝一口，香气馥郁，回味悠长。

兰陵美酒产于山东苍山县的古兰陵镇。这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做官达二十余年的地方。其产酒历史更早，据考证，在三千多年以前，商代甲骨文中就有“鬯（音尝）其酒”字样，即用黑黍米酿酒，这就是兰陵美酒的前身。春秋时代，兰陵又名东阳，兰陵美酒又叫东阳酒。到唐朝，兰陵美酒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完善，而且质量和数量也相当可观。不但在本地及山东省内畅销，还畅销数千里之外的西安、洛阳等大城市。那时全国许多城镇的酒店为了装潢门面，招徕顾客，都在店前高高挂起“兰陵佳酿”的招牌。大诗人李白喜饮此酒，曾赋诗赞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诗为酒发，酒因诗名，从此之后，兰陵美酒更加驰名，香飘四海。到了近代的1914年酿酒作坊达三四十户，以王姓居多，较有名气的有德源涌、开源、醴源、黄源盛等堂号，其中王祥和开办的德源涌规模最大，产量最多，质量最佳，名气最大，销路最广，并在北京设有兰陵美酒公司。1915年2月20日，美国因巴拿马运河开掘成功，在旧金山举行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以示庆贺。中国是参展国，兰陵美酒在山东省物品展览会上夺冠，经中央农商部审查，定为赴旧金山万国博览会的参展产品，被列入农业馆参赛。在各参展国美酒如林的激烈竞争中，兰陵美酒以其色香味俱佳，赢得了世界评酒名家和商贾的青睐，一举夺得金奖，为国争光，使兰陵美酒享誉世界，走向了新的辉煌。

20世纪40年代，笔者有泰山、曲阜之游，曾慕名转道该地，犹记兰陵酒厂大门口有一副古老的楹联写道：“名驰冀北称好酒，味压江南一品香。”经询问其制作方法，确与别种酒不同，它先用上等大曲酒作水，再加玉米、糯米、红枣、冰糖、郁金香、龙眼肉、鲜玫瑰等材料来重酿。所以制出酒来，甘洌芬芳，醇厚而浓郁。另外，兰陵美酒之所以美，和兰陵独特的水质也大有关系。明代汪颖著的《食物本草》中记载：“酿造兰陵美酒所用之水，秤之重于它水，邻邑所造之酒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据化验，兰陵酒厂的几口深井，井水纯净甘洌，为一般井水所不及。

现在，兰陵酒厂不但质量在保持原风味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且在生产数量上也大大增加。此外，还研制出了新品种，如兰陵白酒、兰陵二曲、兰陵大曲、兰陵特曲、白云陈香和太白老窑等，除国内畅销各地外，还远销秘鲁、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钦定御酒御河春

友人送我几瓶古沧州的御河春酒，观之晶莹清澈，饮之浓郁芳香、绵柔甘洌。

御河春酒是由麻姑酒更名而来，历史相当悠久。据说，宋代以前沧州以酿制黄酒著称，后发展成醇香、甘洌的蒸馏酒，至宋代酿酒业已是星罗棋布。《水浒传》中有关林冲发配沧州、醉倒雪地的描写，即可见一斑。到明清两代，沧州的酿酒业更是盛况空前。古沧州是京杭运河必经要道，沿河南销北运，生意兴隆。加之沧州地处渤海之滨，盛产海味，佳酿名肴，吸引无数游人、墨客。此时，蒸馏酒已演变成麻姑酒，闻名燕京。

为何叫麻姑酒呢？传说有个美妙的故事：麻姑是个倾城倾国的仙姑，每年三月三日到降珠河畔用灵芝酿酒，献给天宫王母娘娘。王母大悦，遂到瑶池摘来蟠桃让麻姑食用，自此麻姑长生不老，麻姑酒的名声亦随之大振。清代《茶余客活》云："沧州（麻姑）酒止吴氏、刘氏、戴氏诸家，余不尽佳。盖藏至十年者，味始清洌。"明末，吴、刘、戴诸酒家的酒楼，背沧州古城面运河列屋而踞。一日，三位老者至楼上聚饮，不多时，三老皆醉。临行时将余酒倒入河中，河水色变；再取河水酿酒，酒味甘洌。清代兰维毅著《沧州图古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年的沧州，酒家众多，青旗高悬，麻姑酒闻名遐迩。

清代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多处记述麻姑酒。他说"麻姑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还记载，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由运河乘船到沧州歇息，饮用了当地官员献上的麻姑酒，赞曰"朕从未饮过这样的好酒"。遂令纪晓岚传旨，饮定麻姑酒为"御酒"。

早年笔者多次饮用麻姑酒，知其工艺相当讲究。它用冀中平原所产红高粱为原料，取颜色江黄、颗粒饱满、壳糠甚少者。制作时，又用新鲜呈金黄色的稻糖作副料，清蒸去杂味，又用新鲜麦麸制曲，为糖化剂，多微共酵，时为四十八天。后再分层出池，缓火蒸馏，精心勾兑。

据悉，麻姑酒今取名“御河春”酒，是因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生产时，“麻姑酒”注册商标已被别家酒厂先用。而御河春完全是用当年“麻姑酒”的工艺，并保持了其传统特色。

天津美酒直沽烧

天津美酒出自天津城东的大直沽。

早在元代初期试行漕运（南粮北运），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启碇，漂洋过海，千辛万苦，从大沽口进入天津大直沽，再改换内河粮船，经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大直沽既是由南而北长途运粮的重要港口，便日渐兴旺起来，当地就建起了制酒业，当时叫“烧锅”，酿制的高粱酒叫白干烧酒。

到清代中叶，道光咸丰年间，酒业大兴。清末，大直沽成为天津酒业中心，“烧锅”多达三十多家。老字号留下来的有同丰涌、同源涌、义聚永、义聚成，义丰永、同丰和、同兴、王厚记、同兴涌、同华涌、永庆、仁和义、存益公、恒丰和、承记栈、福升太等家。经过多年变化，到1950年，据《天津志略》载：天津“烧锅”最盛时为二十七家，其中在大直沽有十六家。

“佳酿必有甘泉”，大直沽酒所以好，就因其引用的河水甘洌可口。据传说，大直沽后街有一条小溪，引进御河水，经过自然沉淀，是酿酒最好的水源。大直沽的“烧锅”傍溪而设，所酿的酒醇正甘美。

大直沽酒的配料和酿造方法也很讲究。经营“烧锅”的人，从西河、御河两岸农村采购上等红高粱，经过洗料、前净、后净、采曲、发酵、加气，到头淋、二淋、三淋，每道工序都认真操作，一丝不苟。在贮存时，酒缸深埋，锡盖加封，使酒不跑味，不降度，越是隔年陈酿，色、香、味越佳。清代《津门百咏》中有诗句“名酒同称大直沽，色如琥珀白如酥”的赞咏，并非过誉。

直沽酒不仅以高粱白酒有名。后来又增制“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三种再制酒，也成为驰名中外的产品。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就已采

用香花奇草入酒，直沽各“烧锅”在清中叶开始用玫瑰花酿酒，以鲜玫瑰花二十斤放入白酒四十斤中，蒸、制成“玫瑰母”，再加入高粱白酒中，再加适量白糖，即成玫瑰露酒。被誉为“色媚如梅，清香凝玉，香露四射，芳氲不绝”。可谓妙矣。

“状元红”原名红酒。明代洪武年间，中州金家所酿最佳，后来金家后嗣有人中了状元，故改名“状元红”。清乾隆皇帝喜饮此酒，收益寿之效。大直沽“烧锅”得到制酒秘方，减去栀子增加红曲的分量，成为独具特色的“状元红”。由于酒色鲜艳，在喜庆寿诞和年节设宴时，饮用“状元红”更增加浓郁的吉祥气氛。

大直沽酒鼎盛时期，年产量达二千一百六十万斤，一直远销到南洋各地及欧美各国。

徐水有酒“刘伶醉”

“刘伶醉”，酒色明净清澈，酒质绵甘醇和，饮后余香留长。河北省徐水县酿制的这一特曲名酒。追溯它的历史，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晋朝“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字伯伦，本系安徽省宿县人士，因他不满朝廷的专权横暴，便千里迢迢到了北方的遂城（今河北省徐水县），访友张华。张华以当地佳酿款待，刘伶饮后大加赞赏。据《徐水县碑志》记载，刘伶当年常“借杯中之醇醪，浇胸之块垒”，并乘兴作诗。他在《酒德颂》中写道：“捧瓮承槽，衔杯漱醪，饮此美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太行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传说刘伶饮酒后，完全沉醉于美酒之中，竟大醉三载，后卒于遂城。据说遗冢至今尚在，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后人为刘伶修建了一座“酒德亭”，迄今犹存。

后来，不仅“张华造酒刘伶醉”成为历史佳话，而且“张华酒”也应运而生。尤其梨园界编演“刘伶醉酒”一剧后，更提高了“刘伶醉”的知名度。

“刘伶醉”之所以闻名，这与它的特殊制作工艺有关。它用本地产的优质高粱、大麦、小麦、大米、小米、糯米、豌豆等七种粮食为原料，取太行山下古流瀑河畔的甘泉井水，采用传统的“老五甑”工艺酿造，又以张华村（刘伶墓所在地）的芳香泥土封窖，发酵陈酿而成。“刘伶醉”属酱香型，敞杯不饮，酒香扑鼻；多饮也不伤神。笔者曾饮“刘伶醉”，实感它幽香浓郁，名不虚传。

而今“刘伶醉”已远销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联邦德国和香港、澳门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行家评论它“既有茅台香型，又有泸州大曲香型”，被誉为别具风味的“小茅台”。

济宁名酒话“金波”

《镜花缘》第九十六回写道：一位客官走进一家酒馆，要饮天下名酒，酒保捧出一块粉牌，上列名酒五十五种，其中有山东济宁名酒金波酒。

金波酒是济宁玉堂酱园的传统名牌产品，因色泽金黄，波光闪闪，故名。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商品博览会上，金波酒荣获金牌奖章。该酒属低度饮料药酒，入口绵软，香味醇厚。据说此酒选用优质高粱大曲配以沉香、檀香、郁金香、当归、枸杞、蔻仁等十四种名贵中药酿造而成。

俗话说：“名酒产地，必有佳泉。”济宁四周多佳泉，城南有碧波万顷的微山湖，城东有光府河，因此，自古以来，济宁的酿酒业极为发达。唐代“斗酒诗百篇”的李白，特在开元年间定居济宁，购置酒楼，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唐、宋年间，济宁的酒坊有上千家。足见“济水三分酒”的说法并非夸张之谈。

记得当年参观玉堂酱园酿造车间的时候，酿酒师傅神秘地说，金波酒是严格按照鲁国传统的酿造工艺生产的。此外，还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用药的处方特殊，十四味中药的选用和剂量，缺一不可，多一有害；二是药物的炮制，工艺奇特，手续繁多：有的要炒，有的要蒸，有的要煮，有的要炙，有的用酒喷，有的用醋泡，有的用水浸，而且泡制的时间要恰到好处，如滋补性的药味，宜文火慢煎，挥发性的中药，要武火急炒，等等；三是酿酒的技艺全凭老师傅代代言传口授，绝不轻易示人，尤其关键工艺，只有一两位酿酒艺人动手，即使作坊之内的小工，也要离场。

济宁金波酒因其有独特的营养和医疗功能，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盛誉，故慈禧太后曾指令其为贡酒。

金波酒具有强身健脑，补气壮阳，促进食欲，延年益寿之功效，且对治疗男子性机能不强有特效。只要连饮数月，诸病皆除了。

笔者当年在玉堂酱园还探听到另一治病奇方，即筋骨不活、跌打损伤，可用金波酒腌制微山湖的大螃蟹，每日进二三次，伤轻的数日则愈，伤重的月余即痊。但需牢记——一定要将醉蟹的渣壳等物砸碎捣烂，敷在患处，并且要七天一换，若有跌伤患者，不妨一试。

张士弼与张裕酒

张裕葡萄酒厂是我国最早以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的工厂，是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张士弼于1892年建造的。

张士弼本是苏门答腊的一个爱国华侨富商，后弃商从官，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任职期间，他在参加一次法国领事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品尝到法国葡萄酒。醇香甜美的酒汁，宛如一注沁人心脾的甘泉，立刻引起了张士弼的兴趣。具有爱国热情和实业家素质的张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在中国建造一个生产葡萄酒的工厂。他向法国领事打听在中国什么地方建造葡萄酒厂最合适，法国领事告诉他在烟台，因为当时烟台是对外开放的口岸，一些法国传教士已经在那里种植葡萄，并小规模地自产出高质量的葡萄酒。

为了实现在中国开办酿酒厂的愿望，张士弼辞去了领事的职务，来到烟台实地进行考察。在此，他结识了奥地利驻烟台领事巴博，这个巴博曾在奥地利跟他父亲学过酿造葡萄酒，还在酒厂干过，对葡萄酒的酿造很在行，一听张士弼要开办酿酒公司，非常高兴，正好英雄有用武之地。于是赶忙辞了职务，自告奋勇地为张士弼的酿酒公司做技师，经过一阵紧张的筹备，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正式成立。在巴博的建议指导下，张士弼拿出三百五十两白银作为开办费，先买了东西两座石山，然后填土，硬是在这石头山上填出一千多亩葡萄地来，并引进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的优良葡萄种，按品种分植于此。在海岸边建起一座三层楼的厂房，楼底有一个十米深的酒窖，厂房以东还建起一个玻璃厂，作为包装配套工程，厂房以西建有职工宿舍。巴博为公司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全套生产设备。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从法、意、德引进了一百二十万苗葡萄种，在海运途中，耐不住印度洋的高温，全部报废。他们立即又从三国引进一百二十万苗种子，这次重视了运输途中的管理，特别是经过印度

洋高温区域时，采取了降温措施，确保了种苗的质量。经过艰难的远涉重洋，终于使这些异国的葡萄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巴博的精心管理指导下，张裕酿酒公司终于酿出了纯正的葡萄酒。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金质奖章。金奖白兰地由此而得名。张裕葡萄酒也从此名扬天下。

绍兴加饭酒上国宴

现在中国礼宾工作已有所改革，国宴不用烈性的茅台酒了。绍兴加饭酒成为宴宾国酒。

加饭酒，是绍兴老酒中的名牌。素有“酒中独步”“中华第一味”的美称。它是以元红酒为基础精制而成的。顾名思义，“加饭”就是多加原料的意思。元红酒，又称状元红，因过去酒坛外壁涂朱红色而得名。用元红酒酿制的加饭酒，色泽深黄带红，透明晶莹，显露琥珀之光。它的糖度高于元红酒，酒精含量为18%～19%，总含酸量为0.45%，属低浓度白干酒类。故酒味醇厚，兼备香、柔、绵、爽，并且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一口喝下去，回味无穷。加饭酒的刺激性小，适量常饮，有兴奋精神，促进食欲，生津补血，解除疲劳的功效。添入烹饪作调料，能除腥、增香、添味，并有健脾的效能。若用于制药，能使药性移行于酒内，从而增加疗效。因此，加饭酒历来为人们所喜用，成为绍兴酒中之佼佼者。

千百年来，在古老的绍兴酒乡，人们已与加饭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绍兴人都离不开此酒。绍兴的风俗，孩子出生三天宴客叫“三朝酒”；满一个月叫“满月酒”，也叫“剃头酒”。孩子到周岁吃“周岁酒”；贺生日叫“吃寿酒”。定媳妇叫“订婚酒”；结婚吃“喜酒”，男家办的叫“筵席酒”，女家办的叫“出阁酒”。新婚夫妇首次去女家叫“回门酒”。人死悼亡叫“开奠酒”；埋葬时吃的叫“安葬酒”。新屋落成吃“贺房酒”；乔迁之喜叫“进屋酒”。商店新开叫“开张酒”；年终分余吃“分红酒”。出远门时吃“饯行酒”；返归时吃“洗尘酒”。清明节吃“春酒”；端午节吃“雄黄酒”；中秋节吃“赏月酒”；除夕夜吃“团聚酒”；过春节吃“年酒”；正月十五吃“元宵酒”。平日无事而请吃的酒，绍兴人则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吃“要酒”。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古传即墨老酒

谈到黄酒，使人很容易想起“绍兴加饭”；其实山东的“即墨老酒”，也是一种历史悠久，名闻中外的黄酒。

即墨，是胶东半岛最古老的一个县，即墨老酒始称“醪酒”，意为醇酒。只是到了宋代，人们为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黄酒，才把“醪”改为“老”，称“即墨老酒”。

据记载，战国时期，即墨物产丰盛，富庶繁华。醪酒作为一种祭祀和助兴的饮料，酿造极为盛行。据传，当时燕军攻齐，连拔七十余城，最后围困了即墨城，守城齐将田单用“火牛阵”大败燕军，转守为攻，收复了失地。其取胜原因，除田单具有军事才能等诸多因素外，与百姓用“醪酒”犒劳将士，用以振奋精神，激励斗志也有关系。即墨老酒曾受到几代帝王的推崇，春秋时齐景公驻崂山，曾把醪酒作为朝拜仙境之圣物；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均畅饮此酒；元太祖、明万历皇帝都赞赏此酒为珍浆。至清道光年间，即墨老酒已畅销全国各大商埠，并远销日本及南洋诸国。

即墨老酒属半甜型黄酒，是按照香稿必齐、曲浆必时、火炽必洁、水泉必香、火剂必得、陶器必良的“古遗六法”，选用优良黍米，陈伏麦曲，用崂泉水将米浸泡洗净，适火铲糜糊化，高温糖化，定期定温发酵，压榨后陈酿而成。其典型风格是：酒色纯正，黑褐晶莹，清香馥郁，醇厚爽口，微苦而有后味。因此，古今名人对即墨老酒都有高度评价，归纳起来可用五个字、五句话概括：色——黑褐晶莹；香——芬芳馥郁；味——微苦清香；液——盈盅不溢；功——舒筋活血。

其营养之丰富，据近代用科学测验，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酶类等。古称“回春佳酿”，今称“液体蛋

糕”或“浓缩奶油”。经常饮用，不但能舒筋活血，强壮身体，而且能促进新陈代谢。特别对产妇滋补，治疗腰腿疼，关节炎等效果尤著。故即墨老酒有日常生活中的“三料”之称，即营养丰富的饮料，菜肴调味的配料，治病必备的引料。

曹雪芹家酒四百年

今日市场上曹雪芹家酒，追溯它的历史，始产于明代嘉靖年间，盛行于清代康熙年间，起飞于改革开放的今天。

曹雪芹的先祖曹端明、曹端广，于明永乐二年（1404）从江西武阳渡北迁，定居河北丰润县。后来，兄端明留在丰润，为丰润曹之祖；弟端广去了辽宁铁岭卫，归金后，是为辽宁曹。至明代嘉靖时，丰润曹已成为名门望族，丰润县城北四十里处的白云岭，为曹家一处重要园林建筑，名“白云岭山庄”。因这里有一条浭水河，曹氏家族便取浭水酿酒，取名“浭酒”。清代光绪十六年（1894）版《丰润县志》卷九载：“浭酒以浭水酿之，所以独异者在不药不煮，即以所漉生酒贮于瓮，初则淡而有风致，窖大则香郁味覃，不觉使人自醉。韩慕卢宗伯督学京畿，饮之而甘，品为燕酒第一。”稍后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小说中，把浭酒以“直隶东路酒”名义，列为天下名酒之一。康熙三大宰相之一的陈廷敬专赋《浭酒歌》一首：

离筵尝遍京东酒，浭酒淋漓最有情。
东流浭水行相饯，近海清波净于练。
谁将浭水变春醅，曹家兄弟成欢宴。

奇酒须飨以奇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独喜浭酒。为什么在众多的美酒之中他钟情浭酒呢？这除了该酒品质确佳外，更主要的是浭水是他的故乡，一杯家乡酒在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不由吟出了“春言酌昆友，陶然知水奇”的诗句。

曹雪芹自幼生于官宦门第，自幼与酒结缘。但他之好酒与其祖父曹寅迥然不同。如果说曹寅好酒是一种清赏，一种情调，于浅斟低吟之中寄寓一点淡远幽长的乡国之思，那么，曹雪芹好酒则是男儿襟怀，英雄本色，做鲸吸百川式的豪饮。他的朋友写给他的诗中，几乎

没有一首不提到酒、不提他的豪饮。他以酒为逃避，更以酒为抗争。酒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丰润曹家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演变成历史，但曹家给后人留下的浭酒并没有因此失传，它就像后人传阅《红楼梦》一样，声名远播。为了纪念伟大的文学家，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曹氏家酒——浭酒，经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史学家杨向奎考证，浭酒即曹氏家酒。1994年6月8日，周汝昌亲自题字：“浭酒——曹雪芹家酒”。

历经几百年变迁后，曹雪芹家酒仍吸引了众多客户青睐。如今丰润县曹雪芹家酒集团公司，又将传统的曹酒酿造古方与现代酿造技术相结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高、中、低档“曹雪芹家酒”。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曹雪芹家酒特意酿造了回归喜庆酒，送到故乡各大酒店，更扩大了历史文化名酒的声誉。

炎夏谈啤酒

进入夏季，啤酒又成为每天必备的饮料。过去，我最喜欢喝青岛和北京的啤酒，近几十年在海外虽喝过不少种啤酒，但总觉得不如青岛和北京的啤酒好喝。

有人认为用大麦酿啤酒，是外国人发明的，其实，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大麦酿酒。据明朝人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我们祖先用麦芽酿酒，当时称为“醴”，是一种甜淡的酒。古人以麦酒作送别饯行之用，取其淡而不醉。《后汉书》载：“范冉与王奂善，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这说明麦酒古已有之。不过，用啤酒花酿制麦酒，则是公元12世纪法国人所首创，使啤酒有清爽微苦之味。

佳酿必有甘泉，水源是酿酒的主要条件。青岛啤酒所以好喝，跟崂山甜水有不可分的关系。美国出版的《华盛顿人》杂志，于1981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在华盛顿举行啤酒评比会，青岛啤酒两次都获得第一名，可见青岛啤酒已在世界范围站住了脚。有人认为，青岛啤酒之所以在美国畅销，关键是质量高于联邦德国和荷兰所产的啤酒。他们说，欧洲人用同样的原料配方，也难达到青岛的水平。笔者对此也有同感。

北京五星牌啤酒好喝，也是由于所用水质好，因为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玉泉曾被清朝乾隆皇帝封为“天下第一泉”，所以用来酿酒好喝也就不奇怪了。

据最近信息，北京五星啤酒厂不久以前试制出一种新产品，名叫“增富维生素啤酒”，简称“VC啤酒”。这种啤酒含低分子糖、蛋白质及十七种以上的氨基酸和十一种维生素，还含有二氧化碳气体。喝之有消暑、解渴、开胃、健身的作用。所以，这种啤酒一出厂就受到消

费者欢迎。

文学名著中的酒趣

中国古代文学与酒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早的《诗经》开始，直到文坛巨著《红楼梦》，遍览文学名著，几乎离不开酒。

《诗经》中有“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句。诗三百篇中十有其三与酒关联。曹操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他的“对酒”诗则表达了他的政治愿望。

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是唐代，而这一代的大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饮酒、没有一个诗中不写酒的。李白自称“酒中仙”，他的诗文六分之一与酒有关，如《襄阳歌》《月下独酌》《将进酒》《把酒问月》《对酒》《客中作》等，都是酒诗名篇。开元年间，李白客居东鲁，写有传世佳作《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典型的品酒诗，不但使读者如见酒色、如闻酒香、如呷酒味，而且感受到诗人豪爽奔放的性格。诗圣杜甫闻知官军收复失地，饱含激情写下了“白日放歌须纵酒”的诗句。白居易嗜酒善诗：“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在他的二千八百首诗中，饮酒诗便有八百首。名篇《琵琶行》就是“醉”中之作。诗人借酒遣兴，咏物抒怀，迸发诗兴，酿造出一种美好的意境。

酒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饮酒，使饮食文化的社会功能更加广泛。宋代苏东坡“应呼钓诗钩”句，直说酒像钓鱼钩一样，喝了酒可以把诗句钓上来。他的《蜜酒歌》则以诗的语言，表述了复杂的酿造工艺。中国传统酒文化更强调的是饮酒时的“酒趣”。饮酒乃“学问之事”，它有一套相应的礼仪规范。南宋诗人辛弃疾与酒就有一番风趣的对话。

元、明、清文人与酒更有不解之缘。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中，都有多处对酒的精彩描写。《三国演

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温酒斩华雄，演出了一幕幕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群英会”上，觥筹交错，周瑜谈笑风生、醉态毕现，却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实乃借“酒”设计骗蒋干，好一位足智多谋的统帅。《水浒传》中，武松快活林醉打蒋门神，景阳冈连饮十八大碗，乘酒兴赤手打死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宋江浔阳江头酒楼上醉题“反诗”，又引来惊天动地的水泊全伙劫法场。鲁达正是去酒店饮酒，才听到金老父女的冤情，引得这位路见不平的好汉，三拳打死“镇关西”。吴用更是以“酒”为饵，在黄泥冈的松林里导演了一出“智取生辰纲”的好戏。

《红楼梦》中，有关饮酒、饮宴、酒仪、酒的知识和酒态描写，更是十分精彩。此外，曹雪芹还用重笔浓彩，描写了不少以酒赋诗传令、猜拳行令联句、饮酒时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清代盛世酒礼、酒俗、酒歌、酒令等诗酒文化的高水平。

名店特产

mingdian techan

酱菜老店六必居

北京有一类专门经营油、盐、酱、醋的店铺，称为酱园，俗称油盐店。酱园亦有不同风味，以分别来自河北保定府、北京本地和江南一带的技师及其制作的风味为准，分为三类：老酱园、京酱园和南酱园。在北京老酱园居多，其声誉昭著者凡七家——前门外粮食店六必居酱园、天章酱园、西单天源酱园、东四天源酱园东号、西四天义酱园、地安门大街宝瑞酱园，以及开业最晚的王府井天义成酱园。其中历史久长、品种优良、名高誉重的是开设在前门外粮食店街的六必居酱菜园。

传说有人站在日本的海岛上能看到北京的“六必居”三个大字。此说当然不实，却反映了六必居声誉之大。1936年，六必居酱菜园曾参加过在青岛举办的一次博览会，当时曾发表声明称：“本园开业在前明中季，迄今已五百余年，有严嵩未揽权以先，法书匾额为证，足资可考。”

六必居的前身是一家小酒店，系山西省临汾一个姓赵的掌柜开设的。明朝嘉靖九年（1530）开始经营酱菜园。严嵩是一个专横跋扈、臭名昭著的奸臣，在他未发迹之前，却是一个好酒文人，在小酒店喝酒题字也是常事，后来书法家曾对照严嵩在朝的墨迹考究过六必居的匾额，断定确实是严嵩的笔体，如今原匾仍高悬于店门之上。

关于“六必居”的含义也众说不一，有说它原叫“六心居”，是由六个人合伙经营的，后因有人说六个心眼做不好生意，故改为“六必居”。实际上“六必”是赵掌柜根据老家临汾酿制名酒（著名的汾酒）六项必须做到的要求，应用到制作酱菜业务上来，故称为六必居酱菜园。所谓“六必”就是：一是黍稻必齐（酿酒用各种粮食品种必须齐全），二是曲蘖必实（曲酒用的曲子必须无假），三是湛之必洁（用具器皿必须清洁卫生），四是陶瓷必良（酒坛子必须良好），五是火

候必得（必须掌握好火候），六是水泉必香（必须用水质好的泉水）。酿酒与制酱和酱菜有不少共同处，六必居酱菜园把酿制好酒的要求，用于酱和酱菜的制作上，不愧是经营有方。

六必居经销自制的酱菜，丰富多彩且色香味俱佳，尤以甜酱八宝瓜、甜酱黑菜、甜酱八宝菜、甜酱黄瓜、甜酱甘露、甜酱白菜、甜酱瓜、白糖蒜、杂香菜、小酱萝卜、佛手疙瘩、稀黄酱、铺林酱油等传统酱制品和酿造品最为脍炙人口，行销全国。这些传统产品，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甜适度且按不同产地选料，故在清代被列为宫廷御用品，由朝廷赏赐红缨帽和黄马褂，作为进宫送货的服饰与标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必居之酱菜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荣获优等奖。其后又赴日本名古屋参展，以特制罐头酱菜及干黄酱、铺林酱油等展品赢得好评。1945年秋，蒋介石飞抵北平，旋在中南海设宴，点名要六必居酱菜，食后赞不绝口。傅作义、温寿泉、侯少白等军界要人亦曾令六必居送酱菜至其私邸。

六必居自创业以来一向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以免其不听使唤而影响全局——此其成功之道也。

天义成更名天义顺

近闻北京的酱园，恢复营业者有六必居、天源和天义顺三家。其实早年是有七家著名酱园的。除此三家外，尚有天章、东天源、天义、宝瑞。

天义顺原名叫天义成，创始于清咸丰年间，至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据说西太后慈禧最喜吃天义成制造的桂花甜熟疙瘩，因之天义成这面招牌不胫而走，誉满京都。

后来天义成怎么又变成了天义顺呢？约在1930年前后，天义成由于经营不善，生意衰落。经管事说和，出倒给东来顺财东丁子清。

原来天义成和东来顺都在王府井大街的金鱼胡同西口，是对门邻居。很长时间内，东来顺所用副食调料均由天义成供应。东来顺经理丁子清对天义成窥伺多年。听到天义成经营失利，有意出倒的消息后，他立即抓住时机，把管事请到东来顺楼上，一同用饭，进行密谈，并许愿说："天义成若真弄到手，我必有重谢。"经管事从中卖力斡旋，天义成很快就到了丁子清手中。于是丁子清借东来顺的"顺"字，把天义成改成天义顺了。

丁子清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天义顺一到手，就立即扩大建筑，装修门面。原来旧北京东郊颇多封建贵族墓地，墓地中有不少优质汉白玉的断碑残碣；他从看坟人手中廉价买来，又雇能工巧匠精雕细琢，打磨成天义顺大门脸。门脸两侧镶有雪白瓷砖，上面乌黑漆字，工工整整地写着"山珍海味""口蘑杏仁""燕窝银耳""海参鱼翅"等醒目广告。上方正中，是由名书法家书写砖刻的"天义顺老酱园"六个大字，庄重巍峨，极有气势。东西两个配房，东配房为青菜部，西配房为粮食部。过厅北去是三间高大门面，门额上方有一块"天义顺"金漆匾额，出自清翰林江凤鸣手笔。后院有北楼房三大间，楼上为存放杂

货之库房，楼下是加工车间和工人宿舍。院内西端有瓦房三间，是酱醅子发酵室。院中间地上有大开平缸百余口，用来晒酱腌菜；另有制造黄酱的全套设备。

装修工程完毕，丁子清为了“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在东来顺楼上大宴北京各清真寺教长、工商界名流以及东安市场内外各界朋友们。饭后，丁子清向大家说：“天义顺过三天就开营了，请各位多加指导。”然后陪大家参观天义顺。这样一介绍，对参观的人本身就有一定影响，他们回去一宣传，天义顺的招牌就算树起来了。丁子清自己曾说过：“我这种宣传的办法，比登报宣传效果大！”

歪打正着的天福号

北京有句土语——“歪打正着儿”，其含义谓本是相反的动机，结果却做成某事；或是无意中把某事做成。天福号酱肘子铺，便是因为歪打正着儿而享盛名、发大财的。

天福号坐落于北京西单路口西南侧，开业于清乾隆三年（1738），迄今已有近三百年的悠久历史。

这家老字号的创始人，乃山东掖县小商贩刘凤翔。刘氏进京谋生，因本钱不够遂与一山右人合伙开设酱肉铺。未几，山右人因获利微薄而撤出股份，刘氏只得独资经营，无奈资金周转不灵，生意冷冷清清。

一日，刘氏闲步于德胜门晓市，见旧货摊上出售一块旧匾，名曰“天福号”，其字乃颜体楷书，端庄雄浑、气势开张。刘氏揣摩其义，觉有天赐福佑之吉祥寓意，遂欣然购之，挂于店铺门楣上。此匾极为醒目，每有过往文人墨客驻足门前赏而品之，生意因此而逐渐兴隆。

该店之酱肉，向来是夜煮日售。至光绪年间，虽生意一直兴隆但尚未名声大噪。一次夜间小伙计看锅煮肘子，伏案酣睡；一梦醒来，见内已塌烂于锅中，叫苦不迭，只好轻取出锅酱上颜色以待天明出售，并准备接受掌柜的一顿拳打脚踢。清晨开门后，恰有刑部衙门派员买肘子，尝后连夸味道比往日好。傍晚即对掌柜传话道：刑部老爷爱吃今天的肘子，酥嫩味香，不腻口不塞牙，命每日送一只。掌柜大喜过望，越发精心制作，并选用万寿山六郎庄荷叶包装，其清香与肉香相得益彰，遂成京城脍炙人口之一大美食。

对天字第一号的美食家慈禧太后来说，天福号的酱肘子是其御膳

中必不可少的佳肴。当她第一次品尝此物后，即赐天福号一块腰牌，凭此送货进宫。自此，天福号遂成为慈禧太后的“外厨房”。当朝状元陆润庠为拍“老佛爷”（朝野对慈禧的尊称）的马屁，特意为天福号题署了“四远驰名”匾额，致使这家酱肘子铺大红大紫、万事亨通。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福号当年一锅煮过了火的酱肘子，居然使其日进斗金、名满天下，诚所谓福因祸而生矣。

刘氏的店员每日往宫里送菜，看到御膳房里用一个绘着金龙、漆着红漆的食盒，里面有二十来个扇面形的小托盘，每盘放着切成不同形状的酱肉、肘花、香肠、大肚、香肚、熏鸡、酱鸭、驴肉丝、清酱肉等，因此也仿制了许多盒子，分大、中、小三号，分装各种制成的熟肉，叫作盒子菜，顿获厚利。不久，顾客便以“盒子铺”呼之。

天福号酱肘子，选料很严。必须用京东八县当年所喂养的七十斤上下肉膘肥的猪前肘。拔净细毛，反复洗刷。每百斤配料大盐四斤、桂皮二两、生姜五两、大料一两、糖色八两、料酒八两、花椒一两。下锅旺火煮一小时，把油煮出来后，取出肘子，用冷水冲洗。撇净锅内浮油，煮好的汤过两次箩，捞净内渣，再放入煮过的肘子，用大火再煮四小时，然后换微火焖一小时，前后经过六小时的煮焖，汤已成汁，油已渗出，故能肥而不腻。等肉香透出味来，酱肘子遂告制成。

近闻，“文革”中停业多年的天福号请回了原来制作酱肉的老师傅，于1979年又在西单复业。每天一开门，店门前便排成两条长龙，顾客争相购买，居北京的人又可以尝到天福号酱肘子了。

月盛斋的酱羊肉

不久前友人邀我吃饭，见有酱羊肉，想起北京月盛斋的五香酱羊肉来。

笔者的祖母于饮食一道，可称“北京通”。她吃酱猪肉，要西单“天福”的；酱牛肉要前外门框胡同的；酱羊肉要“月盛斋”的；即便是酱八宝、酱萝卜和萝卜干，必是六必居、天源，后门大葫芦的也不吃。她的鉴别能力极高，入口便知真假。

那时，笔者正读中学，骑一单车，便成了专职采买员。一天，她老人家吩咐下来：“到内户部街的月盛斋买斤酱羊肉。”

那天，不知因什么，为了图省事，就在东四一家买了一斤。晚饭桌上，老太太夹起一块酱羊肉，放到眼前端详了一番，又闻了闻，这时笔者手心已经出汗。等她将肉放到嘴里，略一咀嚼，便大摇其头：“不对，你打哪儿买的？”笔者无奈，只好从实招来。

原来，月盛斋的五香酱羊肉与众不同，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脆嫩爽口，不留肉渣，且有股子特殊的醇香之味。怪不得老太太一闻一嚼便断然做出结论来。

月盛斋的酱羊肉用的是西口白羊，每头只用脖子肉、前槽肉、前后腿肉和腰窝等，既煮得烂而又不糟。其调料是从不公开的，据说是秘方。在制作火候上，掌握极严，先用旺火煮，再用温火煨，有专人随时观察调整火力。月盛斋的肉汤，号称“百年老汤”，即中国传统的烹饪方法，叫作“留宿汁”。即每次炖肉后，留下部分肉汤，次日兑入新汤中，可使肉味更为鲜美。

老太太郑重声明：“慈禧太后就爱吃月盛斋的酱羊肉。”笔者将信将疑，后来看裕庚次女裕容龄写的《清宫琐记》一书，说“冬天大内

里面非常冷，在东廊房子里摆着三个大煤炉子，在慈禧未到之前，太监们为我们预备些烧饼酱肉，我们大家放在炉台上烤着吃”。此中酱肉便是月盛斋的酱羊肉。据说，远在乾隆三十年（1765）有个回民马庆瑞，在前门外荷包巷设摊卖酱羊肉，起名“月盛”，取“日兴月盛”之意。由于风味绝佳，回汉平民，满汉文武大臣，都派人去买。十年以后，马庆瑞便在后来的前内公安街开起店铺，有的官员买了进献给慈禧，被列为御膳，赐了四道金牌，可直接送入宫内。看来，老太太之言是大有来历的。

王致和臭豆腐

提起“王致和臭豆腐”，久居北京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致和本是清康熙年间一落考举子，欲归故里，因往返所需盘费甚多，便留京以做豆腐为生计，想下科再考。开始先购置手推小拐磨，每日磨上几升豆子的豆腐，沿街销售。一次剩下豆腐较多，卖不出去，想起家乡有用豆腐制成腐乳的，但不知怎样做法，便将豆腐切成小块，加盐及花椒为作料，腌制起来。秋凉之后，打开缸盖，臭气扑鼻，豆腐已呈绿色。试尝其味，带有一股浓郁的美味，送与邻居品尝，均点头称善。这便是王致和臭豆腐的由来。

王致和官运不通，屡试不中，但臭豆腐的生意却越做越兴隆，遂弃仕经商，专做起臭豆腐来了。招牌最初是“王致和南酱园”，雇用了几个师傅徒弟，驴拉磨代替了小拐磨，以经营臭豆腐为主，兼营酱豆腐、豆腐干及一些酱菜。从清初开业以来，二百余年，掌柜虽几易其手，但臭豆腐之名气却越来越大，越传越远。它不但味美价廉，能开胃促进食欲，且具有细、腻、松、软、香五大特点。

据说，从光绪年间起，“王致和”除白天营业外，夜间也开窗售货。其中有段故事。慈禧喜欢在秋末冬初食用王致和臭豆腐，因此，主管太监经常到王致和南酱园购货。有时来晚了，赶上闭户停业，只好以头天吃剩下的顶替。骄奢享乐的慈禧太后，岂能吃剩食？她为人狡诈，有一次她在进膳时，暗地把一枚花椒埋在臭豆腐之中，到了次日，拨开一看，果然有粒花椒赫然在目，于是严厉处罚了主管太监。太监们吃了这顿苦头，就同王致和南酱园商量，夜间开窗售货，以保证不误“上用”。

臭豆腐一经“上用”，顿时身价百倍，王致和门前三块主匾，均彩绘龙头，以示是“大内上用”的珍品。“王致和南酱园”这六个字分为两

块匾。分别由状元孙家鼐、鲁琪光书写。孙家鼐还写了两副门对：一曰“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一曰“酱配龙蟠调芍药，园开鸡跖钟芙蓉”。两副门联的冠顶四个字：“致和酱园”，分别镌刻于四块门板上。太后珍食，状元手书，王致和真可说是出尽风头。

王致和臭豆腐也引起了一部分外国人的兴趣。记得1947年，北京燕京大学有几位美国教授曾慕名参观整个制作过程，拍了许多照片，品尝了一番，最后还买走了一些，以便回校进行分析化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来到王致和酱园，声称“味道不错，并含有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云云。

宣威火腿驰名中外

早在1915年，云南双猪牌火腿罐头就已打入国际市场，在巴拿马食品博览会上撷取金奖。这种名特产品产于云南宣威，大商号、总经理为爱国实业家浦在廷。

浦在廷（1873—1950）出生在云南宣威一个书香之家。他不做科举制度的奴隶，十四岁就向父亲提出参加马帮，当赶马人。当马帮赶车谈何容易，当时云南交通闭塞，须穿过瘴烟毒物的原始森林，躲过土匪强盗的抢劫。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这里曾这样赋诗："闻到云南有泸水，椒花落地瘴烟起。大军跋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浦在廷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多少次死里逃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马帮。从短途集市贸易走向长途贩运，马帮进入昆明闹市、西双版纳以及东南亚等地，成为滇东北一带拥有实力和声望的商人，担任了县商会会长。

宣威火腿是浦在廷贩卖的大宗商品之—。其火腿色润鲜艳，红白分明，咸香带甜，营养丰富，余味无穷。与浙江金华火腿、江苏如皋火腿三足鼎立，号称中国三大名腿。然而，这宣威火腿表面不洁净，粗大笨重，不便于携带。浦在廷反复思索，当时欧洲一些罐头食品流入中国，如把火腿制成罐头岂不更好？1909年8月，浦在延在宣威创办了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后又自创食品罐头公司，商号"大有恒"，商标"双猪"。随后更新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亲手把关制作，使宣威火腿从里到外焕然一新。罐头装潢别致，便于携带保存，味道更加鲜美，很快打开国内外市场销路，产品供不应求。

1916年，蔡锷率领护国军途经宣威入川，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浦在廷时任商会会长，目睹护国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带头为部队捐款。云南省长兼督军唐继尧在县城召开各界人士大会，表彰地方协助讨袁有功人士，授浦在廷银制梅花奖。还亲书"急功好义"大字匾额

以赠。1917年后，浦在廷拥护孙中山，支持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1921年，孙中山成为大总统，浦在廷随滇军入粤参加北伐，被任命为旅粤滇军军需总局局长。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只好离开羊城。1922年底，滇军受孙中山委托，入粤将陈炯明赶出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就任大元帅，设立大元帅府并嘉奖讨陈有功人员，浦在廷被授予少将军衔。

浦在廷在广州期间，于1923年底将双猪牌火腿罐头送展，参加食品博览会，获优秀奖，受到好评，孙中山为之题赠“饮和食德”，委任浦在廷为广东省烟酒公司公卖局局长、全国总商会副会长。此后，双猪牌火腿罐头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远销港、澳、新加坡、缅甸、越南、巴拿马、日本、德国、法国等市场，在国内及东南亚各地开设了二十六家分号。宣威境内也出现了上百家火腿商号，每年销往省内外的火腿约三十万公斤。

宣威火腿的腌制方法异常简便，岁暮仲冬之月，农家杀猪过年，当晚便将留待年后食用或出售的猪肉放在竹篾编成的簸箕里，用手从肉的外表搓入盐末，务求深透周遍，不使一处遗漏；然后将这些搓过盐的猪肉重叠堆积于大铁锅中，压以巨石，使肉里的水分渗沥出来；次日，将这些肉取出，用草绳一块块拴好，挂在房梁上晾干。经过如此搓盐、去水、晾干的猪肉，统称腊肉，其中，猪的前腿后腿称为“火腿”。火腿挂晾半年之后便可食用。时间在一年之内者称为“新腿”，在两年以上者称为“陈腿”。酒愈陈而味愈醇，火腿亦然，存放愈久，味愈芬芳。由于火腿腌制方法简便，故无须专人传授，便自然普及全县。其实就色香味说，宣威的腊肉与火腿相同。外地人独称美宣威火腿者，盖限于经验，不知宣威尚有腊肉也。

腌制宣威火腿，除盐以外，别无其他调料，但同样的腌制法，在别的地方就不能取得在宣威那样的效果。原因何在？据当地人说，一在水土，宣威喂大的猪，其肉质与别地的猪不同；二在空气，宣威普遍烧煤，空气中有某种化学成分促使火腿在腌晾过程中产生美味；三

在气候，宣威火腿冬腌春晾，香味醇厚，其他季节腌制者，必大逊色。

鉴别宣威火腿的品级，一看其色泽，干瘦枯涩者为上。肥腻潮润者次之；二闻其味道，用竹子削成的签子刺入火腿深层，取出一嗅，滋味香甜者为上，否者次之。火腿的吃法，在宣威本地除炒、炸、蒸、煮之外，尚有别致者，即把三年以上的陈腿切成片状或丁状，盛于碗碟，调料如油盐酱醋、葱姜辣蒜，一概不用，直接下酒下饭，给人以淡素的感觉。此种吃法，平时少见，要在讲究人家宴宾招待亲友的筵席上，方可领略。

扒鸡·烧鸡·卤鸡

鸡是家禽，到处都以鸡为美食。然而，把鸡做到有特殊风味，却非易事。中国北方，德州扒鸡、符离集烧鸡和保定卤鸡，均著称于世，远达百年，近则六七十年。

“山东德州五香脱骨扒鸡”可谓尽人皆知。津浦线火车一进德州车站，就可以听见叫卖德州扒鸡的声音。他们卖的鸡，味道确亦不错，但这不是真正德州扒鸡。真正德州扒鸡是七十多年前德州宝兰斋的扒鸡。他们选不大不小的中型嫩鸡，先过油炸得匀黄，然后在老汤里下作料，主要有大茴、小茴、桂皮、白芷等十几种；加上味精、料酒，温火炖靠，出锅后颜色黄里透红，外型完整无缺，肉烂得一抖动鸡骨，鸡肉就脱节而下，确实鲜美可口，堪称美味。跟宝兰斋相伯仲的还有个香兰斋，两家主持人是一师之徒。

符离集也在津浦线上，德州在津浦北段，符离集在津浦南段，安徽省宿县。这里出的烧鸡，有六十多年历史，与德州扒鸡比，各有特色。符离集不止一家卖鸡，真正驰名全国的，要数资格最老的王聋子烧鸡店。王聋子叫王义明，他的做法是选又肥又嫩的鸡，像北京烤鸭一样，先蘸一层饴糖，然后下锅过油，炸的火候要老嫩适度，再下锅炖。副料有高档酱油，有中药砂仁、肉蔻等提味。做成后，同样软嫩脱骨，清香不腻。

保定卤鸡又不同了。著名的马家卤鸡铺有一百来年历史，色鲜、形美、味醇、香浓堪称一绝，与南京板鸭、金华火腿等名优食品一起，被评为中国三十三种美食之一。

马家卤鸡，是河北省保定府马家鸡铺的产品，其首创人是清朝河间县果子洼村的回族农民马家兄弟。最初只是农闲时煮鸡出售，后来马家兄弟逃荒到保定，专做卤鸡叫卖。传到第三代马耀辉，方设店经

营，店名叫“耀兰斋马家老鸡铺”。由于马家卤鸡味道与众不同，一时名声大振，经久不衰。

马家卤鸡的做法考究，选料非活鸡不用。而且必膘肥体重，形态丰满者，并按照伊斯兰教规屠宰。煮前，热水脱毛，仅在臂部开一小口去除内脏，洗净掏空，鸡脯平摆，口衔一翼，另翅折后，分层下锅，初为旺火，继转温火；焖成之鸡，肉嫩皮整，骨酥不脱，软而不烂，入口酥香，大快朵颐。

值得一提的是，其味之独特，皆赖配料及老汤。配料除陈年老酱外，以砂仁、豆蔻、肉桂、丁香、白芷等18味中药材配方装袋，佐以小茴香、大料、桂皮、花椒及葱姜等入汤。老汤随用随添，长年不换，其浓度饱和，因而煮鸡时营养成分不外溢，调味尽入鸡肉体内。马家老店的卤汤是概不出售的。至亲好友如“走后门”索取，则宁可以卤鸡相赠，也不肯以老汤与之。这个规矩，不知如今仍坚持否？

据传说，马家第一代制作的卤鸡，被当时在保定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所称赞。他宴请宾客，招待僚属，馈亲赠友，总离不开马家的卤鸡。李鸿章每逢晋京，还要带上卤鸡向西太后进贡。保定卤鸡成为贡品，当然身价抬高，远近驰名了。

这里谈的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话了。听说近年在天津和北京，有不少家饭店也能做出风味不同的烧鸡或扒鸡。倘有机缘，愿能尝到这些美味，借以大快朵颐。

绍兴腐乳风味独佳

腐乳是绍兴历史悠久的产品，和绍兴老酒一样驰名。早在明代嘉靖年间，绍兴腐乳已运销各地。开始由绍兴幕友（俗称绍兴师爷）带到华北一带，逐渐引起各地注意。由此争购日繁，声誉鹊起，它不仅畅销两广、华北和港澳，还远销新马、印尼、泰国、缅甸等处。经销腐乳的商店，还往往挂有“绍兴南乳”的招牌。“咸亨”酱园出品的腐乳，1909年参加“南洋商业会”曾获得过金质奖牌，1916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获金质奖牌和荣誉奖状。

绍兴腐乳之得为名产，并不是偶然的，它选用上等黄豆、绍兴名酒、古田红曲、优良酱籽和秀润的鉴湖水配合制成，具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解腥去腻，帮助消化，久不变质等特点，因而深受人们的欢迎。江浙农民，一到夏秋，差不多每餐必备；广州、香港一带，除佐餐外，还以红乳制作糕饼，称“南乳月饼”；菜馆酒楼，也有用以煮菜当酱的；绍兴人更有以腐乳卤猪肉者，堪称佳品。

绍兴腐乳产品分“红方”“醉方”“青方”“棋方”四类。“红方”又分“太方”“门顶”“三酥”“门大”“大方”“行大”六种，都是色深红、味鲜美，含丰富蛋白质。“醉方”分“门醉”“单醉”两种，颜色淡黄。“青方”分“顶青”“门青”“行青”三种，青方不用酒，色青白，俗称“臭豆腐”，当地人很爱吃。“棋方”如一粒粒方形棋子，味鲜且柔，常作赠送远方亲友之礼品，因块小，故只称斤两，不点块数。

听说现在绍兴腐乳越做越好，不仅畅销大江南北，而且在国外也重振声誉。同时绍兴咸亨食品厂还恢复了“花雕”腐乳生产。“花雕”腐乳像“花雕”美酒一样，由富有经验的优秀技师，选上等南乳，装入洗净晒干的罐内；每放二层，加麦面一层，每罐装六层，约280～300块；装好后，灌入状元红老酒，面上再加麦面和盐，然后加盖密封；再在罐外用彩色瓷泥雕塑出精致的“稽山鉴水”“兰亭”等风景画，并在

罐口镌上“中国绍兴腐乳”字样。

济美酱园及“进京腐乳”

山东省临清市济美酱园的传统产品“腐乳”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据传，清乾隆帝乘船沿运河南下，曾在临清凤凰岭下船，地方官把济美酱园制作的红豆腐乳等土特产献上，龙心大悦。之后每年都按时进贡，因以“进京腐乳”称之。

20世纪40年代，笔者有幸结识济美酱园的汪家后代，据当时的汪克森等回忆介绍，济美酱园系安徽省歙县洪琴村汪姓到临清后创建的。“济美酱园”是原字号，还有一个别号叫“远香斋”。这“远香斋”的匾额还是夏津县一清代翰林甄梦龄所写。其招牌是葫芦形的，人称“葫芦牌”，上写“江南”二字，其左右还竖写“八宝豆豉”“什锦小菜”“包瓜磨茄”“进京腐乳”。初时，济美酱园只腌制酱菜、咸菜，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有三个零售店铺，五十多名店员、学徒，能够制作酱菜、蒸酒、淋醋、小磨香油等，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

至清代末年，济美酱园已拥有千口大缸，每缸窨菜七百余斤，每年可产酱菜七十万斤。作豆腐乳坯子的木制盒子有四五千个，每个装料五斤，每年仅制红豆腐乳、臭豆腐就需黄豆两万斤以上。据济美酱园的老师傅讲，“济美”的学徒出师后，技术优者才留下，其余全部出厂自谋职业，然后，重招新学徒。因此，使临清酱园业大兴。从清代后期到民国初年，临清就有“茂盛东记”“茂盛中记”“茂盛西记”“万香斋”“远芳斋”“茗香斋”“品香斋”等十多家酱园。但济美酱园仍处“龙首”地位，左右着临清酱园业。这时的“济美酱园”就与北京的“六必居”，保定的“槐茂”，济宁的“玉堂”齐名了，它们一起被誉为江北“四大酱园”。

“进京腐乳”是这个酱园的特产。它选用优质大豆为主要原料，经过浸泡、腐糊、过滤、煮浆、点缸、压榨、切块、培菌、腌制、拌曲、装缸、发酵等十几道工序加工而成。豆腐含水适中，自然发酵，

因而，表面呈枣红色，内呈杏黄色，具特有之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块形齐匀，质地细腻，无杂质，无异味。旧时盛具为竹编，外层糊上用豆浆、动物血浸泡过的宣纸，其形如“元宝”状的小竹篓，另外用干荷叶封口，而后再贴上古香古色的商标。一般客商及平民多以此作为临清的最好礼品馈赠他人，因此颇受欢迎。

玉堂酱园松花蛋

松花蛋是蛋的一种特殊做法，笔者虽吃过不少，但最欣赏的却是山东济宁玉堂酱园的那种龙缸牌松花蛋。

玉堂酱园是个有近三百年历史的酱菜厂，名产很多，松花蛋仅是其中之一。因其用“神龙”图案的瓷缸包装，故称“龙缸松花蛋”。记得外皮是用糠壳和泥沙掺在一起包裹的，厚薄均匀，颜色金黄。剥开蛋壳，蛋体光彩夺目，如大玛瑙，晶亮透明。拿在手上，滑不沾手，软有弹性。蛋白体上朵朵花纹图案呈松枝状，世人以“妙手出松花”来形容工艺水平之高。待用刀剖开松花蛋体之后，蛋清、蛋黄呈五彩色层，有棕褐色、暗绿色、墨绿色、草绿色、橙红色等，绚丽多姿，令人惊奇叫绝。

“龙缸松花蛋”营养丰富，含有比普通鲜鸭蛋较多的维生素，且含胆固醇很低，所以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又因含有硫化氢和氨等特殊成分，故又有清冷爽口的风味和清热解毒的功能。据说，在炎热的夏天，如果每天吃上一个，可使整个暑天不中暑。

当年笔者吃时，是将松花蛋切成四块，再以鸡蛋清、白面、糖、醋、生姜、酱油等为料汁，把松花裹起来放到油锅里煎炸，皮熟之后，外脆里嫩，清香可口。

据师傅们介绍，一只鲜鸭蛋要经过选蛋、配料、浸泡、包灰等十几道工序，前后经过40～60天的时间，才能出厂。从选蛋、配料、腌制，到封皮、包装，要求都很严格。以选蛋为例，有经验的师傅目测过的鲜蛋，不但个头一般大小，而且重量也相差无几。这些鲜鸭蛋都是从山东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收购来的。由于湖广水多，鱼虾、田螺、河蚌等天然饲料鲜嫩丰茂，故鸭子产蛋个大油多，质量绝佳。

玉堂松花蛋的生产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传说在明代，微山湖岸上有一养鸭老翁，因在房后的石灰洞里发现了鸭子下的蛋，剥开蛋壳，见蛋体凝固，颜色墨绿，上面并有美丽的松花纹，尝之，味道甚鲜，只是稍有涩口。后来，他在石灰中拌上食盐，把鸭蛋埋入，几天后取出再尝，涩口一点也没有了。从此，养鸭翁不再卖鲜鸭蛋了，靠销售松花蛋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翁。后来，“玉堂”兴起，在民间传统制作方法上不断探索试验，终于生产出誉满中外的“龙缸牌”松花蛋。

天津冬日话“四珍”

时值隆冬，想起了旧日被人们称为津门冬日“四珍”的银鱼、紫蟹、铁雀和黄韭。

天津人平时爱吃鲫鱼、鲤鱼，一到冬季就讲究吃银鱼了。银鱼谓“四珍”之首。那时，在金钢桥旁、三岔河口一带的卫河冰上，常见有人冒风寒，顶白雪，须发结霜，凿开冰面，好不容易逮住几条银鱼，自己却舍不得受用，而作为珍馐美味，把它托在白菜叶上，卖给肯出高价的人。二寸来长的银鱼，通体透明，纤细无鳞，形似面条，配上那比芝麻粒还小的黑眼睛，有的黄眼圈，有的红眼圈，煞是好看。常言说得好：物以稀为贵。如此珍品点缀在高门巨贾的春节宴席上，自是增色不少。尽管并不拿它做什么主菜，在吃火锅时涮上几条，或是加上一大海碗清汤，主宾不免都要仔细品品它那独特的鲜美清香。

提起津门名产紫蟹，记得清代有位文人写过“赚得南人思乡暖，白鱼紫蟹四时肥”的诗句。

体小如铜钱的紫蟹，并非河蟹的幼苗，而是不易长大的一种。早年是炸货铺里油炸小螃蟹那种小东西，每逢入冬蟹黄饱满，人们从河堤泥窝中破冰把它掏出来，可舍不得把它炸着吃了，而是把它加到滚沸的火锅中，品尝那扑鼻香味。

津门文人有咏《铁雀银鱼》诗：“树上弹来多铁雀，冰中钓出是银鱼。佳肴都在封河后，闻说他乡总不如。”铁雀确为冬日的好下酒菜。冬季雪后，铁雀觅食于郊，即有人网捕或用铁砂枪轰打，一日收获甚丰，然后去掉羽毛内脏，穿成串上街叫卖。人们买回后干炸，浇以糖汁，入口全是瘦肉，酥脆可口，连骨带肉，一齐吞咽，边嚼边赞曰：宁吃飞禽一口，胜过走兽半斤！

据说，近年打铁雀的人少了，而养鹌鹑生蛋卖的却比比皆是。喜好连骨带肉大嚼“炸飞禽”的天津乡亲，把拳头大的鹌鹑炸得焦黄，如吃“干炸里脊”一般，也蘸盐末、五香面，比嚼那瘦小的铁雀要过瘾得多了。

至于冬日温室里经过苫盖遮光培植的黄韭菜，每到春节前后，总是一种稀罕物，价钱昂贵。但人们总是多少要买上一小把几十根，放在饺子馅里提味。有没有它，味道确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三大名醋

独流三伏醋，是中国三大名醋之一。这种醋产自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因天津为集散地，遂称为天津特产。它始创于清代康熙四年（1665），曾名扬京、津，被选为宫廷贡品，为御膳房所乐用。

独流老醋所以驰名遐迩，除去使用的“御河”（南运河）水水质好以外，在传统工艺和配方上也有独到之处。醋厂精选优质玉米、高档红糖做原料，经过陈酿三年（必经三个伏天），才出缸外销。这种“三伏”老醋，口味醇香，用之烹调鱼肉佳肴，不仅解腥去膻，除腻增香，而且具有助消化、杀菌、降低胆固醇等功效。

所谓三大名醋，除天津的独流三伏醋，另外两种是山西醋和镇江香醋。

山西人每饭必备醋，在全国口味中遂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说法。甚至有人称山西为“醋乡”，并为此编造了不少笑料，说山西人选女婿，除去“家有箱柜”，还必须“院有醋坛”；还说火车一进娘子关，车轮节奏马上有变化，变成了“喝醋、喝醋、喝醋……”

一般人称山西人为“老西儿”。这个称呼，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山西的“西”字代称或是在太行山的西边；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含有醋的意味。古代，醋称为“醯”，“醯”与“西”同音，老西儿，便可以称“老醯儿”了。从中可以看出山西人在古代就有吃醋的习俗。

山西人普遍喜食醋，但又以中部地区的晋中、太原一带的百姓为最。正因为晋中地区吃醋习俗最盛，所以，这里也就出现了闻名全国的“老陈醋”，尤以临汾、晋祠和汾阳三地产品最为出名。

山西人吃醋普遍，酿醋也很普遍。普通农家，几乎全会酿醋，祁县的高粱醋、忻州的红粮皮醋、太原清徐的回流醋、大同的味醋、晋

南闻喜的小米封缸醋，以及河津、万荣、新绛、运城一带的家酿柿子醋，还有各地酿制的玉米醋、果醋、酒糟醋、粉渣醋、红薯醋等，品种繁多，原料不一，这足以说明山西人酿醋的普遍性。

镇江香醋的特点是用优质糯米做主要原料，因此也叫“米醋”。它质美、味佳，兼有色、香、酸、醇、浓五大特色，酸而不涩，色浓味鲜，经久而不变质。早在清宣统元年（1909），镇江香醋参加“南洋商业会”国际展赛，获银质奖，声名历久不衰。

古语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醋列为生活中七件必备物品之一，可见生活中之不可须臾离，但是醋是何时何人发明创造的，却缺少史料可稽，不过有一段民间流传的故事，很有趣味。

据说，杜康造酒之后，带领全家老小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定居，在京口小鱼巷开设了一间小糟坊，紧靠长江。江中有条白龙，常年向外喷吐水泡。杜康每天叫他儿子黑塔去江边挑水，回来酿酒，然后用酒糟喂马。黑塔用水缸装酒糟，每次倒入水后，随手用扁担搅拌几下；每喂一次马，就加添酒糟再倒进江水。如是天天消耗，天天补充，正巧二十一日后，黑塔偶然尝了缸里已变成黑色的水，酸溜溜，香喷喷，甜滋滋，又开胃，又提神。黑塔一想，这酒糟水泡二十一天，正是酉时变成这种美味，就用“廿一日”加“酉”字，组成了“醋”字，为其命名。从此有了“醋”这种调味佳品。醋是有医用价值的调味品，醋的品质越优良，它的医药价值就越高。

如今在国人的菜谱中，加入醋的菜肴越来越多，如糖醋鲤鱼、糖醋里脊、糖醋丸子、糖醋鸡块、醋熘白菜、醋沾鸡丝等，不能不说是受了山西醋的影响。这些菜肴加入了醋作调味品，味道鲜美。在凉菜中，用醋拌起来的冷盘也不在少数。而且，一经用醋，吃起来便觉得格外鲜嫩、适口了。

银鱼·紫蟹·铁雀

虽然已是1983年新春，在北国，仍是冰封的严寒时节。忆及当年在天津的金钢桥旁、三岔河口，常见有渔人凿冰捕捉银鱼的情景。他们冒寒风，顶白雪，须发结霜，好不容易捕捉到几条银鱼，作为珍贵食品出售。银鱼是一种北方的美味，是天津特产的珍稀佳品。银鱼一二寸长，色白如银，通体呈透明状，两只小黑眼比芝麻还小，白体黑眼，煞是好看。卖银鱼的人都是把三五条银鱼托在白菜叶上，向顾客兜售。这样的珍品，点缀在豪商巨富的春节宴席上，自是增色。最常见的吃法是做“银鱼坨”，即是用银鱼蘸蛋清，置油中炸熟，吃到嘴里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道。还有，用银鱼做汤，也很鲜美。不过，银鱼肉嫩，不能火大，过火就失去鲜味了。

记得曾读过清嘉庆年间冯相棻所著的《南游草》，有诗名《平望食银鱼》，你看他怎样描绘银鱼：

莺絺湖上春水生，澄波千亩琉璃明。
小鱼洋洋银苗茁，蛛丝密纲收晶莹。
疑是自古蓝田地，种玉往往有芽萌。
一寸二寸浮水面，天工游戏予物情。
又疑冰柱久不消，东风作意吹成形。
不然龙宫水晶笔，年深破碎堆满盈。
偶随长流飘荡出，墨痕两点为其睛。
呼童买取供晨馔，鲜美嫩洁腴且清。
我来江南四十日，泥螺蟛蜞皆虚名。

在诗句中，不只描写了银鱼的形体和生活环境，而且赞美吃了银鱼，就使江南的水产显得没有味道了。又想到有位清代文人写过“赚得南人思乡缓，白鱼紫蟹四时肥”的诗句，我联想到天津另一名产紫蟹。

紫蟹是蟹的一种，体小如铜钱，也是天津冬季佳品之一。紫蟹到冬季聚栖河堤泥窝中，捕紫蟹须破冰从窝中把它掏出。紫蟹虽小，但蟹黄饱满且肥，在吃火锅时汤中如添了紫蟹，就增加香味，身价十倍了。

除此两种冬季水产珍品，天津人冬季还喜吃铁雀。铁雀是麻雀的一种，冬季捕食，油烹之后，是下酒佳肴。有人咏《铁雀银鱼》诗有句云：

树上弹来多铁雀，冰中钓出是银鱼。
佳肴都在封河后，闻说他乡总不如。

不食北国严冬珍肴美味，已大有年矣！

天津“冬菜”史话

冬菜，作为天津的特产，久负盛名。这里说的冬菜，并非冬季食用的大白菜，而是把大白菜切成碎块，加工炮制而成的一种佐餐调料品。既可用来冲汤，又可配合炒制各种菜肴，是厨房中的常备品。天津制造冬菜始于清代，盛于民初，源于沧州，兴于静海，距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河北省沧县“艺丰园”酱园用白菜加盐拌以糖蒜，做成“什锦小菜”出售，称为“素冬菜”。后来，天津大直沽“广茂居”酱园又制成“五香冬菜”。1890年，天津大直沽酒店又做出“荤冬菜”。

1920年，大直沽“义聚永”酱园在静海县纪庄子就地采购白菜，设场切菜，把天津制作冬菜技术传到了静海县。纪庄子“广昌德”酱园于1923年也开办了冬菜作坊，叫“山泉涌”，所制冬菜还制定了“人马牌”商标，标签注明“山泉涌常万三制造”字样。

大直沽“义聚永”所以要在静海县设切菜场，是因为静海县有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运河水滋润着两岸菜田，所产白菜为“小核桃纹青麻叶”，筋细、肉厚、口甜，为各种大白菜之冠。每年立冬砍菜时，“义聚永”就派人到静海收菜，就近送作坊加工炮制，然后装包运津销售。静海“山泉涌”兴起后，生意也很兴旺，包装由油篓改为瓷罐，“人马牌”冬菜创出了名来，进到天津西北城角设立驻津分庄，又在天津西郊三园村建立储菜仓库，买卖越做越兴旺，还打开了出口门路。

天津冬菜色泽金黄，香味浓郁，家用和赠友都相宜，销售到国外也受欢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出口，除香港，远销到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华侨

多分居以上各地，他们对祖国特产的冬菜，特别亲切，口味也好，物美价廉，所以畅销。又因东南亚地区多岛屿，气候潮湿，冬菜用大蒜炮制，有除湿、去瘴、解毒功能，大受欢迎。

直到40年代，天津特产的冬菜，每年出口约为二十万包上下，最高年份可达三十万包，约为二十吨左右。近年听说，冬菜出口更为扩大，除了东南亚地区之外，又扩充到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因而天津和静海县，除原有制作冬菜的厂家，又出现很多新的冬菜厂。仅静海县陈官屯乡，二十四个自然村中就办起了二十三个冬菜厂，从业人员近两千人。为制作冬菜，陈官屯乡每年至少要种植大白菜四千亩，大蒜两千亩，以满足做冬菜的需要。

三水五香孟家香干

制售“三水香干”的天津信和斋酱园，开业于清代乾隆年间，东家是山东章邱孟家，与谦祥益、瑞蚨祥等“八大祥”绸缎庄的东家是同族。酱园地点在天津北门外运河南岸的北大关桥口，除专门制售“三水香干”，还兼营面酱、咸菜等，类似北京的六必居酱园。记得五十多年前，这家具有二百几十年历史的商店门面已很古旧了，但由山东状元王垿题字的“信和斋孟家酱园”七个大字的金匾，仍熠熠发光，悬在门额上。奇怪的是“信和斋”这个字号并不响亮，反不如“孟家酱园”为平津两地顾客所熟知。

“孟家酱园”以制作“孟字”香干出名。这种香干全名为“三水五香豆腐干”，颜色呈棕红色，表面油亮有布纹痕迹，四边角圆而无楞，正面中间有木型压制的“孟”字印记，因而顾客称之为“孟家香干”。它的特点，主要是选购上好黄豆做豆腐原料，然后用小布压制成硬质的豆腐干，再用糖色、大茴、桂皮、白芷、丁香等作料煮制，因而味道香美，质地硬而有韧性，不碎不裂，切成细丝不断条。保存多日，依然清香有味。

为什么叫“三水香干”呢？因为它制作过程中，要三煮三晾。以一斤黄豆制成二十块香干白坯为标准，每块大小要保持一致。下锅煮时用温火，沸后用焖火，如此煮熟取出晾干，谓之“一水”。再煮再晾为“二水”，“二水”之后晾干撒上细盐末腌进咸味，最后再煮一次，即为“三水”，晾干后始行销售。一般酱园做香干只“一水”即为成品，味道当然比不上“孟家香干”了。

回想当年香干的吃法很多，每逢“过年”，初一要吃素馅饺子，必买“孟家香干”用以做馅，切成碎末，用芝麻油、腐乳、粉皮、面筋和少许白菜，调出馅来，分外好吃。平时，做香干炒肉丝，取其切丝不断有咬劲，又有丁香、桂皮的芳香味，是办喜寿宴会“四大碟”捞面拌

菜的一碟菜。吃炸酱面切上一些香干，也为炸酱增色。此外，拌凉菜，如拌芹菜、拌莴苣、拌海蜇等，加上香干丝，既调色又好吃。嗜酒的人独酌，用一块“孟家香干”不切丝，不切片，咽一口高粱酒，咬一口香干，其乐趣犹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吃茴香豆一样，别有风味。

信和斋孟家酱园在二百几十年的历史中，几经兴衰，它的店堂本来临街，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依恃权势，在它门前占用官道建起四层大楼，开设了隆昌海味店，因而信和斋被遮进小巷里去，只好在隆昌海味店对面租赁两楼两底的门面做营业部，又在南市荣吉大街开设一个门市部，生意才有起色。

漫话“狗不理”包子

天津“狗不理”的包子闻名久矣。外省或外国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间包子铺却起了这么一个怪名字？既俗不可耐，又令人发噱。其实，北方人原有句歇后语，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卖的包子竟然狗都不理，岂非怪事？也许这就是最会做买卖的天津人之生意经。不过，这间包子铺的字号确有其来历。

一百多年前的清代同治年间，河北省有个农民叫高贵友，14岁到天津谋生，在一家小饭馆里当学徒。因为他小时候就性格倔强，不讨人喜欢，父母给他起了个小名叫“狗不理”。此人脾气虽不好，却心灵手巧，在饭馆里学手艺渐见出息。他能调配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包子馅，又琢磨出做面食的各种不同的和面方法。他做出的包子，不同于一般大路货而独具特色。后来，高贵友离开了他当学徒的饭馆，同另外两个伙友在天津旧城侯家后三叉河口开了一个专卖包子的小铺子，店名“德聚号”。他卖的包子，比北方人常见的猪肉大包小一些，又比南方人爱吃的小笼包子大一些，雅俗共赏，且皮薄白嫩，馅味鲜美。当时光顾他店铺的顾客，多是些往来于南北运河的小商小贩及普通市民。其中有些熟悉高贵友的主顾就常直呼其小名，久而久之，就把他这个卖包子的小铺也叫作“狗不理”了。

据说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曾慕其名买了“狗不理”包子去孝敬慈禧太后。慈禧也觉得味道比御膳房做的包子还要鲜美些，因此也常派专人到天津去买。也许这正是一种宣传，可谓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从此“狗不理”包子名声大振，京津乃至华北一带慕其名者大有其人。当时，天津是个“开放”城市，华洋杂处的大码头，不少官商以至洋人也纷纷慕名来尝一尝“狗不理”的包子。这个牌号流传至今，经久不衰，许多地方都设有分号。

梧州的冰泉豆浆

桂谚云：“食在梧州，玩在桂林，死在柳州。”以食味和滋补而论，梧州的蛇类、禽类、狸类、龟类，山瑞、穿山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除此之外，游客们所频频称道的，还有“冰泉豆浆”。人们常说：“未尝冰泉豆浆，不算到过梧州。”

梧州冰泉豆浆馆位于北山东部与南岭相峙的峡谷深处冰泉埔里。埔口有一个古井，《太平环宇记》云：“其水甘凉清洌，非南方泉比也，谓之冰井。”唐代容管经略使元结过梧发现了它，为之立碑，铭曰：“火山无火，冰井无冰，唯彼清泉，甘寒可凝……”苏东坡谪居岭南途经梧州，曾到此游赏，并用井水烹茶品茗，留下诗句。这两米见方的“冰井”已有千多年历史了。

近百年来，埔口居宅密布，冰井受污染，但山谷深处，源头活水仍然“甘寒可凝”。旧时这里有“冰泉山馆”，为寻幽避暑胜地。那曲曲的幽径，森森的林木，淙淙的泉水，阵阵的芳香，使人心旷神怡。抗日战争时期，广西一度成为后方，各方人士云集，这儿更是终日游人如织。初时这里没有豆浆馆，只有几间简陋的豆腐作坊。一次作坊老板黄彩洲挑豆腐下山叫卖，《梧州日报》主编陈炎见质量特佳，便相约每天清晨带糖去作坊煮豆浆吃。时隔半年，陈的多年肺病竟不药而愈。因疑是豆浆的功用，于是辗转相传，冰泉豆浆便从此出名，开始设馆专卖。

不久前重游梧州，我发现梧州人吃豆浆，已越来越讲究了，不仅豆浆好喝，还要配以琳琅满目的各色精美细致的点心，两者相得益彰，怎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坐在窗明几净的冰泉豆浆馆楼上，望着服务员把豆浆斟进碗内，瞬间即结一层薄膜，用匙羹舀起摘下，就像一串断线珍珠，入口则润滑香甜，齿有余芬，食客通常称之为“滴珠密味”。我还认得冰泉豆浆创始人黄彩洲，请他介绍制法。他

说，这豆浆的优质，一靠冰泉水，二靠巧手。要选好豆，浸豆要守时定刻，豆要磨得细，稀稠有度，滤渣要干净，掌握火候及时下锅，用“文武火”三滚三切，然后加糖，起锅后还要置于热水中慢慢炖过才上市。“那么离开了冰泉水又怎样呢？”黄先生笑道，“我看必然失色，不成其为冰泉豆浆了。”

苏北麻虾辣又香

麻虾俗称虾酱，是苏北广大地区冬春两季的一种美味，老少喜爱，闻名遐迩。乍一看上去，这种虾酱有点像辣椒酱，嗅一下，有股不可名状的怪味，吃到嘴里，又麻、又辣、又臭、又香。老乡们拿它作下饭小菜，或做作料炒菜、蘸饼、当面条浇头，吃得都津津有味。当时兵荒马乱，饥渴难挨，吃几口麻虾后，只觉味猛香浓，越吃越香。一天，看见一位老奶奶，一边在灶上炒虾酱，一边唱着小调：

麻虾臭又香，不吃也要望。
麻仁红堂堂，开胃添饭量。

这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便请教她，这虾酱为何叫麻虾。她便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南宋年间，抗金名将岳飞率大军北渡长江，一路收复失地，势如破竹，金兵望风而逃。岳家军打过泰州，来到苏北里下河地区。沦陷区的百姓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突然重聚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家家户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有钱的杀猪宰羊去劳军，没钱的穷乡亲们便端出了家常小菜虾酱。岂料岳家军中南方人特别多，最爱吃辣的，看见乡亲们纷纷送来一碗又一碗、一盆又一盆红堂堂、香喷喷的糊状虾酱，以为是辣椒糊，吃了之后更是赞不绝口："这麻虾真好吃！这麻虾真开胃！"麻虾，也就是辣虾的意思，即吃了使人辣得嘴发麻。从此以后，麻虾的美名就代代流传下去，至今也有几百年历史了。

制作麻虾的方法：冬至前后，把捕捞的新鲜虾米淘洗干净，像磨黄豆浆一样，用小磨磨成虾米浆，装入小口瓮内封口发酵，闷它半个多月，然后开罐，按照十比零点六至十比一的比例投入食盐，再闷上数日，揭开封盖，便可闻到一股十分浓烈而又说不出来的怪味，就算制成了。生食亦可，或加葱花、油、盐、辣椒炒食更佳。

九龙江畔品香鱼

福建九龙江畔有一家菜馆，笔者曾有幸品尝了当地名产香鱼。

美丽的闽南侨乡南靖县境内的九龙江，出产的这种名贵小鱼，脊背上一条腔道，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因而得名。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筵席上的有名佳肴。有人说，它的味道较长江鲥鱼、松江鲈鱼更美，堪称淡水鱼之冠。

香鱼曾引起中外鱼类学者、美食家和旅游、垂钓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8月，日本大阪曾派出“寻找香鱼访华团”到南靖县，在九龙江钓到很多香鱼，该访华团回国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轰动了日本。

香鱼原产于中国、朝鲜和日本，但目前朝鲜和日本业已绝迹，所以格外珍贵。中国的香鱼也为数不多，主要分布在南靖县境内。

香鱼属洄游性鱼类，生性喜洁，绝不活动于浊水中。由于南靖县九龙江两岸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保护良好，河水清澈，是香鱼理想的生长场所。但它的幼年却是在海中度过的。据当地渔民说，每年冬初，九龙江香鱼大量排卵，漂流到金门岛附近海域，在台湾海峡逐渐长成小鱼，次年春末，小香鱼便成群结队游回故乡九龙江，由此形成一年一度的香鱼汛期。

香鱼体长二三寸，重一二两，体形侧扁修长，纤细无支骨，鳞小洁白晶莹。它的尾部分叉，尖细窄长，形如凤尾，白中略带淡蓝色，秀美娇嫩，令人叫绝。

香鱼在台湾台北市郊新店溪的观光胜地碧潭也有繁衍，当地老百姓传说是明末郑成功部从九龙江带去的，为了纪念郑成功，所以人们就称香鱼为“国姓鱼”。

香鱼不仅以味美著称于世，而且营养丰富，它含有人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糕点小吃

gaodian xiaochi

南味北设稻香春

稻香春创始人叫张森隆，又名春山，江苏丹徒县人。1915年，张先生到北京，由于他精明能干，脑筋灵活，善于经营，又有制作南方食品的好手艺，所以，很快在其胞兄张森裕经营的小摊基础上扩展起来。

他先是利用东安市场的有利地势，办起了个“森春阳”食品店，因南方有“甡春阳”，换“甡”字为“森”字，这可能与他的名字有关。后来，他又从南方请来名技师，并租借了东安市场北门处梁姓的房子十五间，于1916年，正式经营起以南方风味为特点的“稻香春”糕点食品店。南北各方食品店多用“稻香村”做牌匾，故张先生改“村”字为“春”字，这大概又与他的别名“春山”有关。

稻香春从小到大的过程，主要有“三多、五有”。“三多”是同乡多，把兄弟多，联络关系多。“五有”是有研究、有财源、有技术、有知人善任之能、有经营特点。甚至连其胞兄张森裕，由于爱喝、爱赌、爱说大话，张森隆也不许他参加业务管理。

南方糕点之特点，不但按四季特色生产，好吃好看，花样翻新，而且油糖重，点心放一个星期，仍然爽口。如苏式的蒸蛋糕饼、肉松饼、平贝丝饼、炸花边饺、水晶绿豆糕等；镇江的脐儿、散子、猪油核桃糕、猪油松子糕、五香麻糕、椒盐烘糕等。还从南方的“紫阳观”请来技师，制作金华火腿、甜酱肘子、醉螃蟹；从上海“陆稿荐”请来技师，制作苏州酱鸡、酱鸭、酱汁肉、熏鱼、熏鸡、熏肉，还有南京的油鸡、筒鸭、肴肉、葱油饼等，虽然价格较高，但顾客们信得过，所以赚得大量利润。

后来，张森隆又在东四牌楼以西和东四北大街十一条口，增设了两个森春阳分号。职工和货品全由稻香春总号调拨。

1920年，担任东安市场联合会会长的张森隆，又将其稻香春店址全部翻新重建，增设了三楼的森隆中餐馆和二楼的森隆西餐馆。

1919年到1921年，东安市场三起大火，稻香春未受损失，传有“大火不烧旺地”之说，其实是水源临近北门之故。

张森隆从小学过食品制作技术，经营糕点可谓“行家里手”。他制作点心很注意原料的选择，南味糕点，该用南方原料的绝不用北方的代替，一些原料甚至从香港的马宝山进货，还有从汕头、上海、南京、苏州等产地选购。张老板认为，原料的好坏，是糕点质量好坏的一个关键。他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巧妇不用地道货也做不出真东西。”在糕点制作工艺上，他也很讲究，该用小炉炭火烤制的绝不用大烂煤。烤制蛋糕必须先给鸡蛋消毒。他经常对人说：“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宁可毁掉，也不以次充好。”依照他的经营原则，稻香春的声誉越来越高。吃客赞道：“稻香春的东西地道，色、香、味俱全。”

“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张森隆的经营之道，使稻香春的生意越来越兴隆，真是“黄金地段出黄金”。

“萨其马”及北京点心铺

甜点心“萨其马”，读者可能都品尝得多，但你可知它的来历？

“萨其马”，过去在北京亦曾写作“沙其马”“赛利马”等，总之是译音的写法，有似翻译文字，并不一致。这个怪名字，在《光绪顺天府志》里有一则简单的记载道：

> 赛利马为喇嘛点心，今市肆为之，用面杂以果品，和糖及猪油蒸成，味极美。

这则记录虽然仍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萨其马”是通过喇嘛传到北京的美味，过去在上海说“萨其马”是广东点心，恐怕是不知其本源的讹传。按“萨其马”的做法是以鸡蛋清和奶、糖调面粉成糊状，用漏勺架在油锅上，将面糊炸成粉条一样的东西，然后在模子中以蜂蜜黏压成型，稍蒸之后，上面洒熟芝麻或瓜子仁、青红丝、用刀切成长方块即成。因制造时调有蜂蜜，较为滋润，所以日久不会干燥；因面中加鸡蛋清调成，所以过油稍炸之后，细条中空外直，吃时入口即化，几乎不用咀嚼。而且其中有蛋味、奶味、蜂蜜味，三者和面与油混在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美味，是任何其他糕饼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萨其马”的表面铺一层染成桃红色的绵白糖，样子十分好看，名字也十分好听，谓之“美蓉糕”，价钱比“萨其马”略微便宜些，但是并不如“萨其马”好吃，一来太甜，二来绵白糖压紧之后，吃起来也不够松软。

北京旧时点心铺，大约分三种：一种叫作“满洲饽饽铺”，多在内城；一种叫作“南果铺”，多在南城；后来又有一种西式点心铺，也叫面包房，卖西式糕点，北京叫“洋点心”。如东安市场“国强”、西单“滨来香”等。在这三种点心铺中，前两种的幌子上写有“满汉饽饽”等字样，都卖很好的“萨其马”，如前门大街的“正明斋”，西单北的“毓美

斋”“兰美斋”等，有的还是庚子前的老店，最近又有恢复原来字号的了。

正明斋京味糕点

提起北京糕点，南味以稻香村和桂香村著名，清真以大顺斋为最。可谈及正宗的京味糕点，那就要算“正明斋”了。

正明斋坐落于前门外煤市街。它始建于明代中期，由一姓孙人家开设。其糕点取南、北、荤、素之精粹，融汉、蒙、满、藏之特色，以用料考究，配方严格，做工精细而闻名京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又增设了正明东记、正明东栈、正东文记、正明晋记四个店，由孙氏四兄弟分管。

清咸丰元年（1851）至清朝末年，正明斋糕点一直是宫廷喜、庆、宴、寿之御用食品。慈禧曾用以赠送宫妃宾客。正明斋糕点还被列为“御膳房”佳品，称之为正统的满汉糕点。当时许多旗人贵客、社会名流慕名而来，满意而归，使得正明斋名声大振，顾客盈门。张学良将军在京时，喜欢订做正明斋的玫瑰花饼；京戏名净郝寿臣，最喜爱食用正明斋的鸡油饼，满蒙宾客喜爱食用正明斋的奶油萨其马和杏仁干粮；正明斋的风味月饼也是老北京的名点。笔者对其中的蜂蜜蛋糕和红月饼尤感兴趣，当年常做早点食用。

正明斋糕点大致可分为硬皮、油炸、酥皮、蛋糕、糖皮五大类。其中有奶皮饼、干菜月饼、萨其马、蜂蜜蛋糕、桃酥、黄酥月饼等数十个品种，其制作之精细非一般糕点所及，就连芝麻也要去皮后再用。

笔者喜爱的蜂蜜蛋糕是以面粉、鸡蛋、白糖、蜂蜜、生油、青梅、桂花、瓜仁为原料，经过打糕、灌糕、烘烤、冷却等工序精制而成。蛋糕为扁长方形，表面呈棕红色，内部则为淡黄色，上面有青丝、青梅、瓜仁，口感松软、细腻、味道香甜纯正，有滋补养身、清火润肠等功效。一般晨起食用，再喝杯牛奶，效果更好。尽管正明斋

的糕点精工细作，但价钱并不高，它是以薄利多销为宗旨的。

正明斋的月饼亦颇著名，其中有红、白、干菜、黄酥月饼等很多品种。犹记每逢中秋佳节，一些北京人常去买些正明斋的月饼，待到秋夜月圆之前，亲朋好友在四合院中，围坐桌旁，吃着月饼，品茶赏月，实是一大乐趣。

饽饽名铺永星斋

永星斋是北京朝阳门外一家有名的饽饽铺，其产品极具特色，誉满京城。所谓饽饽铺即是糕点铺。光绪六年（1890）二月，一个叫王芝亭的人，在北京的毓盛斋学徒期满后，便到朝阳门外买了两间门脸，自己办起了饽饽铺。他认为天有日、月、星三光，北京已建有日坛和月坛，自己就占个星字，起名为“永星斋”。

王芝亭是跟毓盛斋最有名的师傅陈富学的艺。为了创出永星斋的牌子，他制作糕点要求非常严格，用料非常讲究：其面粉必须是“元”字号的重罗细面，冰糖必须是最好的“石里冰”，白糖必须是“义记”糖庄的产品，就连烧的木炭，也必须是由京西山区运来的。在其他饽饽铺陆续改用烧煤后，永星斋仍然坚持用木炭。王芝亭认为只有烧木炭才能掌握好火候，保证糕点质量。有一年冬天，一连半个多月阴天下雪，而当时正值人们买糕点摆供的日子。人们发现，在其他铺子里买的糕点很快便塌陷了，独有在永星斋买的供品却依然如故。王芝亭解释说：原因即在于永星斋烧的是木炭，火候把握得好，其他糕点铺用煤火，糖炒得太嫩，遇到连着阴天一返潮就垮了。从此后，人们更认定了永星斋，其生意愈加红火。永星斋不仅在门市上售货，还有一笔很大的收入是做“专供”。王芝亭和工部一位姓陈的尚书是世交，后又结识了主管太监李莲英，所以内务府所辖的饽饽房每年都指定由永星斋专供。满族历来有做饽饽桌子的习俗。慈禧太后每次寿辰喜宴，大多由永星斋承办。饽饽桌子分为三、五、七、十一、十三等节，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做十三节时就有一房多高了，最上面用佛手、绢花、苹果等做顶子，以示吉利。慈禧六十大寿做的是十三节，除了优厚的加工费外，还可收到一大笔赏钱。

永星斋也为各王府和大的寺庙做饽饽。像恭王府、惇王府、中堂府等都是永星斋的常客。寺庙的供品用量也是很大的，如东岳庙、关

帝庙、海慧寺、吕祖阁等大部分供品均由永星斋来做。寺庙的密供有红、白之分，红供是在上面加红丝，是供佛的，白供不加红丝，是祭祖的。东岳庙是御用寺庙，权势最大，又和永星斋是近邻，所以是永星斋的头号主顾。其第二代主持李化通和王芝亭是表兄弟，关系就更密切了。按当时的习惯，卖糕点六两就算一斤，而永星斋的密供一直是准斤足两。

小窝头及其他

当年在北京东安市场的食品摊上，常常可以买到一种小巧玲珑、香甜细腻的“栗子面”小窝头。据说，这种风味小吃是从清宫中流传出来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了。然而，制作这种小窝头，最著名的要推北海公园“仿膳”。

“仿膳”由模仿“御膳房”而得名，最初叫“仿膳斋”。北海漪澜堂、道宁斋是昔日慈禧太后游览散心时就餐的地方。现在的“仿膳饭庄”就设在那里。据闻，1956年在某一次招待外宾的盛宴上，“仿膳”的老师傅大献手艺，制作出四千个精致的小窝头，个个颜色金黄，形如宝塔，被认为既是美味小吃，又是艺术佳作，赢得食客交口称赞，从此这种小窝头更加名扬海外。

提起小窝头的来历，还得从慈禧太后谈起。那是清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陷北京，那拉氏仓皇逃奔西安，途中饥饿难挨，有一名叫贯世里的人，把北方民间粗粮食物窝窝头呈上，给“老佛爷”果腹。慈禧食之甚觉香甜，感到是从未尝到过的美餐，嗣后回到宫里，命御膳房照样制作，殊不知再也不得其味！“老佛爷”甚为不悦，后经厨师苦心研究，用细箩筛出上等玉米面，合以黄豆粉、白糖、桂花，然后捏成每重一钱的小型窝头，旺火蒸熟进上，食之香甜爽口，颇有栗子的味道，这才遂了慈禧的心愿。

正因为这种金黄小窝头入口有栗子味道，很多人以为是用栗子面做成的。其实，它和民间窝头一样，也是玉米面做的。“仿膳”曾经做过试验，即使加入少量栗子粉，制成的小窝头，其味道和颜色反而大为逊色。小窝头用料并不复杂，但制作技术却很讲究。熟练的厨师，凭两只灵巧的手，用一斤面捏出一百个上尖下圆中间空的小窝头，确实是不简单的。

仿膳饭庄的清宫风味小吃，还有豌豆黄、芸豆卷等，也都小巧玲珑，别有风味。

除此以外，仿膳的肉末烧饼，也是慈禧得意之味。据传，有一次慈禧做梦吃烧饼，第二天御膳房送来早点中果然有肉末烧饼，太后大喜，高兴地说："给我圆梦来了。"并问是谁做的？为此，厨师赵永寿得到"老佛爷"赏赐。这位赵师傅在1925年创办"仿膳斋"的时候，也到北海漪澜堂献艺，现在他虽已故去，但制作肉末烧饼的手艺却流传了下来。这种烧饼是用长把烤铲在炭火上烤制的，外酥里软，夹上由笋丁、荸荠（广东称马蹄）丁炒成的肉末，入口酥脆、醇美。这种食品在"仿膳"的食谱中，是属于大众化的风味小吃。有朝一日，重访京华，定要饱尝阔别已久的仿膳风味。

京味特产话金糕

金糕，是北京传统风味食品。20世纪30年代，京城唯一的一家制作金糕的“泰兴号”金糕庄，门面不大，掌柜姓张，人称“金糕张”。

制作金糕始于清代中叶，过去叫“山楂糕”，后因慈禧太后吃腻了各种山珍海味，点名要吃此物。“泰兴号”当时的掌柜应下这个生意，他精选原料，细致加工，做出来的金糕颜色红里透着金黄。太后品尝后非常赞赏，并赐名“金糕”，从此不再叫“山楂糕”。之后，王公贵胄也纷纷购买，一时供不应求，金糕与“金糕张”也因此名噪京华。

金糕有许多品种，八宝金糕、桂花蜜糕、改良花糕和水晶金糕等，味道有别，各具特色。八宝金糕，即往金糕中加入一定量的果脯、果浆等，外表美观，吃起来风味独特；桂花蜜糕是往金糕中加入少许鲜桂花，味道清香，以甜为主，不甚酸；改良花糕是把金糕用模具制成各种形状，常见的有八仙人、老寿星、孙猴子、八戒、唐僧等传说中的人物，如同面人一般，惟妙惟肖；水晶金糕更是独具特色，它一般制成一厘米左右厚的片状，透明性很强，拿在手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人和物。

制作金糕的原料主要是红果和白糖。先把红果洗净放在锅中煮熟，去掉皮核，碾成果酱，再加入适量的白糖及辅助原料即可。但如何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能成为固体的金糕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些操作都是掌柜要保密的，恐怕被别人偷学去，故笔者也未曾问过。

金糕可以配菜，有名的金糕梨丝，就是将金糕和梨都切成细丝，放入少许白糖，搅拌即可。白中夹红，十分好看；食之甜中略酸，十分爽口，尤其是逢年过节，人们整日鱼肉，调换一下清淡的金糕，立觉食欲大振。

京东名店大顺斋

北京人把烧饼叫火烧，是大众化的食品。以它作早点，吃起来香甜可口。北京最有名的是京东通州大顺斋产的糖火烧。

北京有句谚语道：“京东通州有三宝：烧鲇鱼、酱豆腐、糖火烧。”

通州地处京畿，自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后，日趋繁华。明清两代，为畿辅之咽喉，水陆之要冲。朝廷从南方征集的皇粮及民用、军需等物资都要通过这条运河运往北方。大顺斋的创始人，就是经此运河，从南方到通州落户的。

大顺斋创建于明朝崇祯末年，位于通州城内安家大院。因店主叫刘大顺，商店也随之取名“大顺斋”。起初只靠小本经营，专做甜、咸两种火烧。乾隆年间，大顺斋生意火旺，资本增加，扩建了厂房，增加了几种糕点的生产，成了一家颇具规模、前店后厂的糕点铺，以生产风味独特的糖火烧而享誉京城。当时北京书法家关春鸿为其题写了“大顺斋南果铺”的匾额。

大顺斋的糖火烧的原料配比与众不同。普通火烧以面粉为主，其他配料为辅。而大顺斋的糖火烧，面粉只占25%；芝麻酱、红糖、桂花、香油搅拌后，统称“调和”，约占75%。它的制作方法是把和好的面揪挤弄薄，抹上“调和”，抻长卷起，用压板压成扁圆形，打上戳记，放在饼铛里用文火烙，使两面略带焦黄色，再入炉烘烤。成熟出炉的糖火烧，外形扁圆，呈深棕色，散发着浓郁的麻酱、红糖、桂花香气。吃在嘴里酥绵松软，又甜又香，营养也很丰富，有温补的药用功能。大顺斋糖火烧之另一特点是耐贮存，因其油多糖多，可以久存不干，经夏不坏，为一般糕点所不及，是一种便于携带的旅游佳品，受到各界顾客，特别是回民的好评。据说过去回民阿訇沿丝绸之路去

伊斯兰教圣地“朝觐”，就有人带上糖火烧，以备旅途中食用和赠送友人。

冠生园的南味食品

天津是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喜吃南味食品的人很多，所以南味店成了大行业。抗日战争以前，著名的南味店有稻香村、冠生园、森春阳、奇香店、南味芳等。稻香村还分森记、明记、福记、厚记等数家。但南方风味较著者，还要数冠生园。

冠生园的经营特点有二：一是从外地进货必选老店名牌，保证货色；二是本店自制，选料精良，名师把关。例如金华火腿，在天津各味店都有供应，可是只有在冠生园才能买到真正的蒋雪舫佳品。喜欢吃火腿的都知道“金华火腿出东阳，东阳火腿出上蒋”的说法。蒋雪舫是早年东阳上蒋村制火腿的名师，他制成的火腿，色、香、味、形俱佳。冠生园非蒋家火腿不卖，所以能保持店誉，多年不衰。

天津冠生园于民国十九年（1930）开业，创办人是经营南味的名家广东人李寿初。店址在旧法租界二十六号路，前店后厂，大多数货色是自产自销。以广东腊味，如腊肠、腊肉等为主。最受天津广东同乡以及苏、浙、闽人的欢迎。还有最被人称道的糖熏活鲤、童子油鸡、酱汁方肉、团脐醉蟹等，都是吃后总想再吃的。熏鱼本来不是稀罕食品，可是冠生园精选半尺长的活鲤鱼，熏制出来，头、尾、中段卖同等价钱，有人专买熏鱼头吃，买不到还引以为憾。童子油鸡一定选八个月左右大的雏鸡，做成后，白嫩香酥，引人食欲。他们熏制食品所用的辅料为浙江绍兴酒、福建红糟等，都选上品。下料前，李寿初亲自检视，制成后又逐件品尝，稍有不合格，即另行处理，不上柜台。

冠生园还经营糖果、糕点、海味、蜜饯、罐头、酒类、小食品等。小食品中有酥糖、麻糖、皮糖等几十种。其中，以鲜橘皮为原料做的橘红糕，橘味芳芬，老幼咸宜。还有果汁牛肉、橘汁牛肉、话梅、杏花软糖、鱼皮花生等，都是独家生产的小食品。

据说，现在国内共有四十七家冠生园，都是冠生园理事会的分店，分设在沿海诸大城市。在上海就有冠生园食品厂等多处分店。南京、重庆、昆明、武汉、安徽宿州、四川大邑等地，也有冠生园食品厂或公司。

淮扬名点有特色

从前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西南一带，满布露天茶座，由北往南第一家为柏斯馨。中间是上林春（又名长美轩），南面路口是春明馆。这三家除卖茶外，兼售点心，各有一种名点闻名九城。春明馆的火腿鸡丝伊府面，配料讲究，味美可口；柏斯馨的咖喱饭，名为西点却不失中国风味；上林春的萝卜丝饼，金黄酥脆不油不腻，皮薄馅厚更是一绝。

其中萝卜丝饼，原是扬州名点之一。扬州点心名列全国前茅，到过扬州的人，必定要到“富春”去尝尝淮扬名点；就如同去北京旅游的人，非去吃一次“全聚德”的烤鸭不可，否则将是虚此一行。

“富春”开设在扬州邗江路上，这里看上去不像一家店铺，小有庭园之胜。原来这里是昔日经营花木盆景的“富春花局”。自从“富春”改业点心以来，营业发达，座客常满，成为近百年来，扬州的名牌字号。他们的点心名目繁多，最出名的是一笼三吃的包、饺、烧卖。所谓一笼三吃，就是连蒸笼一起端上来，蒸笼里有包子、饺子、烧卖三种式样的点心；虽然都是肉馅，却由于包法不同，味道各异，这是其他各地无法与之相比的。另一种一品大包，比饭碗的碗口还大，有甜、咸两种，最出名的是笋间大包，笋丁与肉丁混合，刀功到家，丁小馅多，皮薄面松，亦称杰作，广州的鸡球大包瞠乎其后矣。

扬州的点心店兼售干丝，据说这是苏北人的嗜好。苏北一带的点心店和茶馆都代卖干丝，所以无论茶馆还是点心店的学徒，按老规矩拜师以后，首先要学会切干丝；因为这一门也是技术，必须切得长短薄厚一样，才算合格。一般的点心铺，另设一摊，专卖干丝。干丝有拌干丝、煮干丝两种。苏北人讲究吃早茶，喝早酒，一般大都来一盆拌干丝，要摆摆场面才吃煮干丝。但是不管拌或煮，关键是在浇头上，各种浇头的名目不胜枚举，像“富春”最出名的是火腿鸡丝干丝，

用的鸡都是经过挑选的，以细嫩味美取胜。

扬州点心传到上海最早，从民初到北伐前，上海最风行的是淮扬名点。当时南京路上最著名的点心店如“精美”“福禄寿”“四五六”都是以淮扬名点为号召的。后来，广东菜点在上海兴起，乃取而代之。“精美”“福禄寿”“四五六”相继停业，后来出现了一家“绿杨村”，继承了淮扬名点的传统，他们做的萝卜丝饼几乎能与扬州“富春”媲美。

记得扬州除“富春”外，也有一家“四五六”，还有一家“月明轩”，都是以出售点心著称。

保定四美斋糕点

说起糕点，北京有个正明斋，保定有个四美斋，皆为北方的名字号。

四美斋糕点铺开业于清代光绪初年，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系保定府监道王家和其他三人经营，开设在保定城内西大街路北，毗邻旧藩台衙门，其“四美斋”三字匾额，乃当年藩台所书。该店经营品种达五十多种，制作精细，声名远播。据说，光绪庚子（1900）以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路经保定，品尝四美斋的糕点后，倍加赞赏，称“风味不亚于御膳房所制”。自此，四美斋糕点声誉更隆。四美斋的陈设，古色古香，别具一格：货架上层层陈列着木制油漆的扁圆形大捧盒，盒面上绘着奇花异草，松竹梅兰，造型精巧雅致，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货架下边摆着一行陶瓷坛子，坛口上是紫红色的漆木盖。柜台里手横排一列抽屉——这许许多多的捧盒、瓷坛、抽屉，都是分类盛装糕点的。既能防止糕点风干，又能保持糕点清洁。顾客们常说：“到四美斋好像进了中药铺。”

四美斋的糕点，叫得最响的有云片糕、芝麻细酥、雪花饼、姑苏八件、芙蓉糕、萨其马等。它之所以远近闻名，成为早年的名牌，是与创业人的苦心经营，钻研技术分不开的。据说，四美斋开业之先，主人便先做社会调查，对不同糕点的销路情况、群众爱好等，都进行了详细了解和分析。他们了解到，保定地区多数人向往南味，部分人欢迎北味，遂采取了“南北兼容并蓄”的制作方法：一方面，从南方苏州请来做南味糕点的名师；另一方面，从本地物色技术精湛的北味师傅。这样，南北师傅通力合作，不仅糕点花色品种多，质量高，味道美，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各类顾客的不同口味，因此，开业不久就打开了销路。南北师傅制作糕点时，选料认真，精工细做，保证质量。据说，有一年中秋节，四美斋员工不慎将一屉月饼压在了空屉之下，

翌年取出仍不失原来风味。

“驴打滚”与北京小吃

近日读林海音女士的《城南旧事》一书，笔者仿佛回到了童年时的北京。那一队队的骆驼、那夕阳斜照的紫禁城楼、那灰暗的小胡同，尤其那推着小车沿街叫卖的“驴打滚”……哪一样不是四十年前的故乡风情呢！

记得曾经住过的西单甘石桥，大门对面就摆着卖“驴打滚”的食摊，花上几分钱便可果腹。这是一种大众化的小吃，又叫“豆面糕”。是以黄米面和黄豆面为原料，将熟黄米面团放在熟豆面上揉匀，裹上豆馅，然后摊平，卷成直径约一寸的长卷，再切成一寸左右长的小段，撒上芝麻、白糖、冰糖渣和糖桂花拌成的芝麻糖，再在铺着熟黄豆面的案板上一滚就成，闻着香味扑鼻，吃起来柔软而有劲，甜中又带有芝麻香味。不光是孩童爱吃，许多成年人也常在摊边吃上一盘。

和“驴打滚”差不多的“艾窝窝”，是用糯米蒸熟后包上核桃仁、芝麻、瓜子仁、青梅、金糕及白糖、冰糖渣、糖桂合成的馅做成，形似元宵，但凉食。表面沾有熟米粉如挂白霜，吃时黏软柔韧，馅松散而香甜。过去有人作诗描写它：“肉黏江米入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搓。浑似汤圆不待煮，清真唤作艾窝窝。”此物历史悠久，元人称为“不落夹”。明万历年间内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说：“以糯米饭夹芝麻糖为凉糕，丸而馅之为窝窝，即古之‘不落夹’是也。”

北京的芝麻酱烧饼亦是大众化食品，最受市民欢迎。烧饼古称煎饼、胡饼。东汉刘岐《三辅决录》载：“赵岐避难于市中贩胡饼。”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人擀剂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北京芝麻酱烧饼一面带有芝麻仁，皮焦脆，内柔软，香味浓厚，里面层次分明，一般有十五六层。刚出炉时趁热夹上“焦圈”或是酱肉吃，真是适口充肠，其味无穷。

所谓“焦圈”，俗称“手镯”，乃自清宫传出。御膳房专做此物的孙德山，传给了升源斋烧饼铺的邬殿元，遂流入民间。这是用面和上明矾、碱面及盐，做成圈状经油炸而成。形似手镯，食时酥焦香脆，故七八日后亦不失其脆性。

另有一种名敬子麻花，亦有油炸，但带有芝麻及糖桂花，形如四个椭圆形的花环束在一起，质地酥脆香甜中带有桂花味。此物古称“寒具”“环饼”。苏东坡曾有诗赞之：“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北京的油炸小吃尚有薄脆、糖泡、脆麻花、密麻花、炸三角、炸回头、炸荷包等。其中马蹄烧饼中间空心，夹肉末吃最适宜。传说清慈禧太后一夜梦食烧饼，早点时正好进肉末烧饼。慈禧说是给她圆了梦，重赏了做烧饼的厨师。后来北海漪澜堂专售肉末烧饼。

北京的小窝头也是与慈禧有关的。据传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去西安，沿途以窝窝头充饥，觉得吃之甘美，回銮后索此物，御膳房只好以玉米面、黄豆面加白糖做成小窝头供应。北海漪澜堂的芸豆卷、豌豆黄、千层糕即出自清宫。千层糕制作精细、色彩绚丽、吃之松软而有弹性，甜中带香，每块糕有八十一层，层次清晰可数。

当年西单曲园饭店的银丝卷亦是一绝，齐白石老人曾经常派人去买。它形似花卷，但在面皮中间包藏制成的面条。面条经九次制出，成为五百一十一根细丝。故吃起来柔和松软、油润香甜。另如有二百多年的一窝丝清油饼就是用此种制出的面丝刷上香油盘成饼状烙制而成，不过制时须再制两次，制成面丝两千零四十八根。它又名“盘香饼”。

北京人还喜欢喝豆汁。当年和平门南新华街有“豆汁张”，东安市场有“豆汁何”。豆汁色灰绿、汁浓醇、味酸而微甜，喝时与辣咸菜同食，既酸而辣且烫，别有风味。

以小吃出名的尚有“馄饨侯”“爆肚满”“年糕刘”“馅饼周”以及“穆家寨”“都一处”之炸三角、后门桥合义斋之灌肠、鲜鱼口会仙居之炒肝，等等。

北京历经四朝建都，故博采四方小吃之精华，兼收各族小吃之风味。北京的奶酪，历史即颇久远。它是以牛、羊奶制成的半凝固食品，乳白滑腻，入口即化，香甜爽口，富于营养。奶酪古称醍醐、乳酪、羊酪等。唐皮日休诗中曾有“雕胡饭熟醍醐软，不是高人不合尝”之句。《红楼梦》十九回中贾妃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亦是此物。曾有人赞誉它说：“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内以养寿，外以养神。”奶酪以东安市场内之丰盛公名最著。

北京小吃不下几百种，侧闻上述风味小吃，今日都有所恢复，何时能再尝北京小吃呢？先以回忆聊作精神会餐吧！

名目繁多的“炸货”

北京早餐的小吃，称为“早点”，可说是独具特色的。热饮有：豆浆、面茶、油茶、茶汤、藕粉、百合粉、杏仁茶、莲子粥、核桃酪、红豆粥、大麦粥、油炒面、豆腐脑等，这些姑且不谈。单说“炸货”一类，也可谓品种繁多。

炸油条，俗称“炸果子”，老北京人管它叫“油炸鬼”。油条分两种：一种是炸成较细的椭圆形圈状的油条；另一种炸成一根很粗的油条，俗称“棒槌果子”。

炸焦圈，是用油和面炸成小形正圆形状的焦脆小食品。焦圈可以夹在白马蹄或红马蹄烧饼里吃，也可以在喝豆汁时，当作佐饮的小菜食用。

大薄脆，天津方言叫“锅箅儿”，也是一种油炸的食品，其质薄如纸而且焦脆，故名“薄脆”。它与焦圈的性质类似，而形状不同，可以夹在火烧、烧饼内食用，也可以就热豆汁吃。

炸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糯米面包入豆沙糖馅，过油炸熟；一种是以糯米面不包馅用油炸，外撒白糖粉。

20世纪40年代末，东城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一个弄堂口，由一家广东人制作的“奶油炸糕”，在糯米面中放入鲜奶油及香草精，吃起来香甜可口，带有西餐苹果排和菠萝布丁的味道。至今，东安市场内，尚保留“奶油炸糕”这一具有特殊风味的小吃品种。

炸麻花，用软面拌成麻绳状的花样，然后过油炸焦。炸麻花分大小两种，有的在制作时还醮些芝麻，更增添了麻花的香味。

炸排叉，是把软面和成之后，用擀面杖把它擀得菲薄，再拌成花

样，放入热油锅中，这种炸货在出售糕点的铺子也可以买到。

炸三角，炸闷子是正阳门大街“都一处”的拿手杰作，它是把预先做好的凉粉及调味作料，包在面皮之下，再捏成三角形或饺子的形状，过油炸焦，而外焦里嫩，其味极佳。

炸回头，也是当年北京地方风味的小吃，它类似江苏的炸春卷，里面有韭黄、肉馅之类，味道鲜美，只是形状不是直筒形而是蜷曲状，故名“炸回头”。

清真饭庄“东来顺”的炸羊尾、炸卷果等甜食，也是别具风味的。而北京人每逢过春节或正月十五，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炸年糕、炸元宵，人们看到这些油炸的食品，就会自然而然感到年节的欢快。

《豆汁记》和豆汁

有一出很有趣的京戏，叫作《金玉奴》又名《豆汁记》。早年是梅兰芳、姜妙香、萧长华的拿手戏。萧扮“团头”金松；梅扮金松之女金玉奴；姜扮书生莫稽，“酸生”十分当行。现在当然这样好的戏再也看不到了。在这出戏中，穷秀才莫稽在风雪中倒卧在金家的门前，金玉奴可怜他即将冻饿而死，给他喝了两碗热乎乎的“豆汁”，救了他的命，后来莫稽做了官，却遗弃了金玉奴。因此，这出戏又名《豆汁记》。“豆汁”是什么东西？也许觉得，这“豆汁”同“豆乳”“豆腐浆”“豆腐脑”“豆腐花”等大概一样吧？

回答是：不一样。不但不一样，而且也不是同类的东西，它不是以黄豆制的豆腐家族中的一员，而是以绿豆制的“线粉类”家族中的同族，这是北京特有的平民化的食品，是真正老北京人才欢喜吃的东西。简言之，它是制线粉的“粉房”的副产品。粉房中水磨绿豆做粉条或团粉时，把淀粉取出后，剩下来淡绿泛青色的下脚料，经过定时发酵之后，再把它熬熟，这就是“豆汁儿”了。《燕都小食杂咏》云：“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诗后注云：“豆汁，即绿豆粉浆也。其色灰绿，其味苦酸，分生、熟二种。熟者担挑沿街叫卖，佐咸菜食之。”这诗和注解把豆汁介绍得十分清楚了。

豆汁有一种特别的酸味，没有喝过的人第一次喝甚至是难以下咽的，似乎也同吃臭豆腐一样，要硬着头皮吃过几次，才能渐入佳境，领略其无穷的滋味。喝豆汁有在家门口叫住豆汁挑子买来喝的；有在庙会上豆汁摊子上喝的；最讲究的是东安市场东面的摊子上喝。其实豆汁大体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咸菜上，喝豆汁必须要辣咸菜，辣咸菜好坏大有讲究，把“水疙瘩”（即盐水腌的芥菜头）切成细过头发丝般的细丝，把干辣椒放在油锅中炸得焦黄，连热油带辣椒倒入咸菜

丝，“刺啦”一响，其香无比。喝豆汁时就要随喝随吃这种香喷喷的辣咸菜，同时再吃一两个“焦圈”，即很小的炸得很焦脆的“油炸鬼”。喝时要慢慢地、悠悠然地喝，直喝到鼻子尖冒汗，那真是通体生津矣。想起来，这真正是地道的北京味，喝过豆汁的朋友会有同感吧！

福兴居灌肠老铺

早年北京有一家经营灌肠的山东馆——福兴居灌肠老铺。坐落在后门桥路东，紧依着桥翅儿。煎灌肠的师傅，50岁开外，胖胖的身躯，穿着白粗布的汗落儿，光亮的脑袋上围着白羊肚手巾，大手中拿着短把儿光亮的长铁铲子，不停地翻动，压剁着高沿儿铁铛里的一片片灌肠，并不时地用铲子有节奏地敲击着铛沿儿，与油煎灌肠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应和着，招来四面八方的顾客，把六间门脸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

一铛灌肠煎熟后，老师傅挥动铁铲三敲两剁，用平底蓝花的粗瓷小盘往下一扣，铲起一翻个儿，浇上盐水蒜泥汁，刺啦一声响；再扎一根竹签儿，高喊一声“谁的——搭手！”顾客接在手中吃起来，白里透红，外焦里嫩，咸辣适中，香味扑鼻。

福兴居灌肠老铺，每天上午11点开始营业。三教九流的顾客中，斯文者里边坐着吃，爱热闹者外边站着吃，劳动者手中一壶烧酒蹲着吃，至于赶火车的，则每每是一斤大饼两盘灌肠一卷，边走边吃。这种地道的风味小吃，是将好面糊灌入猪大肠煮熟后剪成斜片状，用原来的汤油煎制而成的，选料精细，工序烦琐，制作讲究，卫生严格。与后来挂羊头卖狗肉的“煎粉闷子”（单纯用淀粉制成，犹号称“灌肠”）迥然不同。

食不厌精的慈禧太后，也曾是福兴居灌肠老铺的主顾。这位皇太后，每年总要到位于后门桥北路西的火神庙去降香。有一年，慈禧坐着黄围轿子出景山后门儿往北走，闻到一阵阵的香味儿，便问李莲英是何食品。听说是灌肠后，遂面谕：降香后品尝。灌肠铺堂柜得知老佛爷要驾临的消息，一时慌了手脚，幸亏李莲英派了小太监协助操办，教其迎接圣驾的礼仪，并命人立即到鼓楼前乾泰隆绸缎店撕了9尺黄缎子，铺在座位上；从庙门到店铺有15丈远。急用黄土垫道，净

水泼街。忙碌了半个时辰后，由庙中小道士传出话来："送到庙里去。"掌柜这才松了一口气。将二十多盘灌肠放进提盒里，在太监的监视下颤颤巍巍地送到庙中。

慈禧品尝了灌肠后，十分高兴，并给了赏钱。起驾回宫时，唯独灌肠铺没让上门板，由掌柜带领伙计在路边低头跪送慈禧回宫。自此以后，慈禧常派太监购买灌肠。福兴居因此而被封了龙罩，树了黄旗，买卖越做越兴旺，名满京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告衰落。

马玉昆精制白水羊头

老北京人说到小吃时，总要加一个“儿”化音，叫“小吃儿”，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小吃即非正餐之意。在街头巷尾小摊上随便填填肚子，尝尝味道，尽兴而已，是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在北京众多的小吃当中，回民小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回教是大教，禁食猪肉，以牛羊肉为主。其烹调手段，蒸、炸、烙、煮样样俱全，其中味道，甜香软脆各有特色。面食中有年糕、切糕、艾窝窝、糖耳朵等，汤类有豆汁、茶汤、豆腐脑等，肉类则以爆肚、羊头肉等最为出名。

单说这羊头肉，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酱羊头，一是白水羊头，均堪称京味小吃之绝。羊头肉包括脸子、信子（羊舌头）、天花板（羊上膛）、羊脑子、羊眼睛等。其中以脸子肉最有味道，其薄如纸，撒上椒盐等作料后，做下酒菜，确为无上佳品。

回民小吃大多集中在南城牛街和南横街一带。其中南横街马玉昆制作的“白水羊头”最享盛名。他制作羊头十分讲究，每天早上先到屠宰场亲自挑选年龄和个头都相当的二十个西口羊头，拿回来后用烧得通红的火筷子把羊鼻子和耳朵里的细茸毛烧掉，然后用刷子刷白再放进锅里去煮。锅里只有白水，不放盐和任何作料，故名“白水羊头”。

下锅前，要用手掐一下，皮儿老一点的先下锅，嫩一点的后下锅。煮一会儿，即用筷子扎一下，根据不同程度一个一个地出锅，以免生熟不均。出锅时，一般是七八成熟，将其掰开，放入凉水中浸泡，目的是把里面的杂质和余血浸出来，然后再分出羊脸子、耳朵、信子等部位，上市出售。

出售白水羊头都是现切现卖。马玉昆的白水羊头不仅做得好，而

且切肉的刀功也特别熟练。他用一把二尺多长的片刀，以极其优美的动作切出来的羊肉片，看起来如同薄纸，又极富弹性，呈半透明状态。只见他手拿作料瓶往肉片上“扑”地一甩，撒得十分均匀，让人立时感到香味扑鼻，口舌生津。他这作料制作，同样是特别精细，先是将大青盐粒放在火上烤去水分，再压碎过罗，其他如砂仁、丁香、豆蔻等也是如法炮制。最后，按一定比例配好，才放进特制的容器中。

由于马玉昆的白水羊头选料精、操作细、功夫深、物美价廉，所以特受顾客欢迎。每天，他的货车未到，即有人在那里排队等候。而当他开始切肉售卖时，总有更多的人前来围观，就像争看艺术表演一般，大名鼎鼎的京剧大师马连良、谭富英、尚小云、张君秋等都曾是马玉昆的常客。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玉昆调到南来顺小吃店，一些老顾客仍觅踪而至，外地人来京，也纷纷前去品尝这“一招鲜”。

门钉包子杂说

听说溥仪小时候跟小太监开玩笑，把铁丝夹在馒头里给小太监吃，小太监一咬一硌牙，逗得“小主子”哈哈大笑。“门钉包子”是否包子里也搁了门钉呢？其实不是。门钉包子原是很好吃的高级包子，只是现在很少人知道这种包子的精美了。

北京的包子，也像中国文字讲六书一样，有象形的，有指事的，有会意的。如羊肉包子、火腿包子，这都是“指事”，直接指明它的馅子是羊肉的，火腿的。又如“澄沙包子”“水晶包子”，这是“会意”的，豆沙经过沉淀而成，生猪油加白糖熟后如水晶般透明，因而可以从名称上领会其中的含意。那么“门钉包子”是属于哪种呢？是“象形”，因为它好像门钉的形状。北京过去大大小小的城门、宫门、门扇，为了坚固，都包上铁叶子，钉上一排排密密的钉子，这钉子的钉帽是圆球的，很高，其高度超过其圆的直径。这在一般宅门是不用的，只是城门上、宫门上、坛门上才用。它的特有名称，就是“门钉”。把包子做成这样的形状，就叫作“门钉包子”了。

“七七”事变前，门钉包子在北京是很普通的名称，一般人都知道。那时北京人吃包子，大体可以分作三大类：一是家庭自己做的包子，不论猪肉、羊肉，或是甜的、素的、荤的都可以。这是家常饭，小户人家，主妇自己做。中产之家，能用得起女佣人张妈、王妈之辈，便由张妈、王妈做。一些富有之家，诸如旧式官僚、高级教授、清代遗老、梨园名伶以及一般大买卖的厨房，总之，凡用得起厨子的主儿，那自然由厨子做。这种家常包子，不论谁做，都是有褶的，个儿比较大，馅儿也多，这种样子的包子，在街上一般都是买不到的。二是包子铺的包子，这是最简单的包子，其馅子不是猪肉葱花，就是羊肉葱花，都是猪肉杠或羊肉床子卖剩了的零碎肉，再卖给包子铺做包子。三是高级包子，如小笼包子、汤包、叉烧包子、火腿包子、香

菇包子、干菜包子等，而“门钉包子”正是高级包子的一种。

关于炸酱面

炸酱面是北京人的家常便饭。全部内容分“炸酱、面条、菜码儿”三部分，今分述如下：

炸酱简单说就是“肉炒酱”。分肉丁炸酱、木须（鸡蛋）炸酱。酱要黄豆做的“黄酱”或麦子做的“甜面酱”。如能是名家“天源”、“六必居”等大酱园子的酱就更好了。炸酱最好用好花生油起油锅。火要大，冒完黑烟，下葱、姜末、肉丁或肉末、木须，把预先用水调稀的酱同时入锅。经搅拌炒匀，稍炸之后，即可出锅盛入碗中，端上桌子。一碗之中，中间是酱，四周是清油，像江南“响油鳝丝”一样，端上来时“吱吱”有声。

酱之外再说面条。炸酱面吃“拉面”，又名“抻面”，俗名“大把条”。要用和得软硬正好的面，在案板上揉，揉到一定程度，拿起两端，在空中一边拉，一边上下悠动。拉长之后，再并起两头，一摇，拧在一起，如此反复数次，再并起来再拉，一变二，二变四……便变成无数又韧、又细的面条，捧在开水锅前，把两头捏断，把面下入锅中，放点冷水，再开锅面就熟了。把热面捞入一大盆冷开水中，过水之后，一碗碗盛入碗内，叫作“面坯儿”。明代刘若愚《酌中志》云：“初五日午时……吃蒜过水面。”“过水面”即唐人所说之“冷淘”也。如欢喜吃热面，谓之“锅挑儿”，直接从锅中盛出即可。

面条之外要有“菜码儿”，即不加任何作料之生切黄瓜丝、水萝卜丝、水焯绿豆芽等。吃时把炸酱、“菜码儿”盛在面条上，拌着吃。面又韧、又滑，炸酱又香，菜码儿又鲜、又爽口，真是滋味无穷。

《京兆地理志》云：“炸酱面，京兆各县富家多食，旅行各乡镇，便饭中以此为最便。”正因为其是最普通的家常便饭，所以更值得一提。

京食美味“茶汤”

北京的茶汤，已经有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原为明朝宫膳中的一种早点。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在宫中宴飨文武百官，即各赐茶汤一碗，因其色、香、味俱佳，群僚啖之赞不绝口。嗣后京城渐渐流传俗语说：“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明代沿袭唐宋旧制，置光禄卿专管皇室祭品、膳食及招待酒宴，其官署光禄寺首创茶汤，故名“光禄寺茶汤”。不久流传于民间，遂为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风味小吃。

茶汤的主要原料是糜子面，将糜子磨成粉状，再用细罗筛之。位于崇文门外的老字号福芝碾房，即是专门加工糜子面的地方。把三四羹匙的糜子粉放入用热水烫过的小碗里，用凉水调成糊状，再以沸水冲之即熟，上面撒些拌有桂花的红糖，香甜可口。倘若讲究起来，还可以撒些芝麻、青梅、核桃仁儿、瓜子仁儿、青红丝儿、山楂糕丁儿，以及染成红色的杏仁，这种精细的“八宝茶汤”，光是那绚丽斑斓的色彩，就足以吸引人的。

昔日，北京的花市、鼓楼、大栅栏、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白塔寺、护国寺、厂甸等处庙会，到处都有茶汤铺或茶汤摊；至于走街串巷的茶汤挑子，更是不计其数。

凡卖茶汤者，都有一把擦得光亮的特大号红铜壶，二三尺高不等，壶把缠以藤皮，壶中央烧着红通通的炭火，壶里的水总是哇啦哇啦地开着，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不时地从壶口与壶嘴儿里冒出来，袅袅地飘向天空，与飘忽的炭香融合在一起，古朴、美妙，别有一番诗情画意，令人陶醉。

至于那冲茶汤的动作，简直是一种绝妙的艺术。侧曲着身子，左手端着玲珑的小碗，右手拿着壶把儿，将百余斤的铜壶拎起来。那滚

烫的开水冒着白气，如同一条弧状的银柱儿，从距小碗儿两尺多高的壶嘴“哗”的一声砸进碗里。动作的准确、娴熟与优美，令人叹为观止。

冬晨一碗热面茶

在北京冬天的早晨，遇上太阳很好，但天气还是很冷的，北京人习惯上叫作“干冷、干冷的”。带好帽子，围好围脖，把手缩在袖筒里，一低头，推开屋门，冒着扑面的冷气冲了出去。这时来不及在家吃早点的肚中无食，更感寒冷难堪。一路小跑出了胡同口，到了大街上，看见边上三五个人正围着一副担子，热气腾腾地吃着什么，跑过去一看，嘿！好东西！

“掌柜的，来碗——”

叫一声掌柜的，是北京人出自肺腑的诚挚而朴实的礼貌话。其实售物者，只有一副沉重的担子，连间房、连个门脸都没有，哪里还谈得到“柜”，又如何“掌”呢？但这句称呼，也正如他那副担子，是温暖的；那个被称为掌柜的听了也热乎乎的。只见他戴着毡帽，穿着蓝布大棉袄，系着围裙，带着白套袖，便马上从一头架子上拿了一只碗，到担子另一头的锅上，一手又拿碗又掀锅盖，一手抓住勺柄，随着一股扑面的蒸汽，已经舀出一勺混合熬的糊，倒在碗中，立刻盖好锅盖。锅盖上还有一层板，放着一钵芝麻酱，而且很奇怪，略微倾斜地放着。他左手将碗捧到钵边，右手把插在钵中的筷子拿起，用筷子尖儿从芝麻酱表面挑起拉成丝，唰、唰……洒在糊上，像织女穿梭织罗一样，没几秒钟，就把那碗糊的表面布满了，似乎像美人蒙上一层面纱，轻轻的，薄薄的，一层润滑的咖啡色浮在那焦黄色的表面上，比在雪亮的橱窗中看到的巧克力蛋糕还美。洒好芝麻酱，还不算完，就在芝麻酱钵头上，还有一个竹筒，盖上有许多圆孔，像西式五味架上的盐瓶，不过它是竹的。拿起反过来，唰、唰……两三下，那糊的表面上，便落满了香喷喷的芝麻屑、咸滋滋的盐花，沾点辣的花椒末……由盛糊、淋芝麻酱、洒花椒盐，直到送到你手中，前后绝对不会超过半分钟。

一碗热乎乎的面茶送到你手中，两只手捧住碗，把嘴唇拢起，贴着碗边，吸着，由右往左，热乎乎地一口。而且还要像郑板桥说的，“缩颈而吸之”，没有几口，便寒意全消，真是又热又香，其乐融融。

馄饨·云吞·抄手

薄薄的皮，大大的馅，宽宽的汤，看起来有点像美国护士小姐或法国天主教修女的白帽子的馄饨，外貌虽然不怎么起眼，吃起来却美味适口，无论在华北或岭南，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一般人家拿它当做小吃、早点或消夜，但在北方也有把面皮包得厚些，馅更多些，个儿更大些，作为正餐来吃。鲜猪肉加葱姜调料拌馅，鸡汤或排骨汤加上味精，煮出来味美异常。爱吃酸的，加上点醋；喜吃麻辣的，撒点胡椒面，更能开胃口、增加食欲。天津有不少饭馆出售馄饨，较有名的为致美斋、周家食堂、吉美林、天和居、川鲁、登瀛楼等，其中有的是南方风味，有的是北方风味，品尝起来，味道不同，各有特色，讲究些的，汤里放上点鸡丝、蛋皮，有的放上点虾干、紫菜、冬菜，次点的放些香菜（芫荽），都能提味增鲜。

馄饨又名云吞、抄手。京津管它叫馄饨，广东叫云吞，四川的名称更别致，叫作抄手，是说它的样子像一个人揣着双手那样神气。成都有一家颇负盛名的“吴抄手”，堪称地方风味的一绝。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华西坝期间，我去访友，曾和一些同学前往品尝，其味果然名不虚传。四川人喜欢吃辣，加上辣椒油，名为“红油抄手”，对当地人是上等美味，而外地人则难以消受了。

美味的馄饨，常引起远方游子的无限乡思，忆起往昔在冬日亲人围坐火炉旁，每人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飘着香味的馄饨，边吃边话家常，共享天伦之乐的情趣。

童年时，家住北京，在万籁俱寂的寒冬深夜，听到从小巷深处传来一声声清脆的梆子响，夹着悠扬悦耳的叫卖馄饨声：“馄饨哎噢——开锅哎噢！”这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馄饨挑儿来了，特别能牵动稚子的心，引起热烈食欲，闹着父母非要买上一碗吃不可。那馄饨挑儿一头是熊熊炉火架着热气腾腾的煮馄饨的锅，另一头则放碗筷、调

料、馄饨皮、馅等。所以形成了一句歇后语：“剃头挑儿——一头热”用来形容两人的关系，特别说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一方火热、一方冷淡，确实比拟得当。这种馄饨挑子，我在海外可是好几十年未见着了。

在苏州，管馄饨挑子叫“骆驼担”，它是竹制的，比木制的馄饨担在用料上轻得多，摆在地上两头四只脚八字分开。一头较低，有小炉、锅子、柴板、水桶；一头较高，有小柜抽屉，置碗筷、调料等，其形上仰，如骆驼头。这副担子中间是连在一起的，一根横竹片做梁，就是扁担。在扁担头后，又有一根竹片，连接两头，且有立柱，立柱上有小杆可挂物，如木勺、笊篱等。由于有立柱着地，担子更稳。这样担子的轮廓，神似一只骆驼。苏州人吴侬软语，说话好听，但不会吆喝，因而骆驼担不吆喝，只打击作响以代市声，如卖糖粥打水梆、卖圆子打竹筒等。沈三白《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所写芸娘雇的馄饨担，就是这种骆驼担。如果说，馄饨担代表了北京人的浑厚，那骆驼担便表现了苏人的灵巧。

万顺成小吃享誉津门

天津有一家有名的小吃店“万顺成”，开业于1917年前后，到“七七”事变前，二十年间，已建有老字号、分号、新号三处店铺，在经营小吃的行业中，独占鳌头。

万顺成的创业人段玉庆和段玉林兄弟二人，原籍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幼年因逃水灾随其父段富荣到天津谋生。1917年前后段家在南市慎益大街什锦斋饭馆对面租了一间门脸，安锅立灶，熬秫米粥为业，店名“万顺成”。以后十年间，发展为两间门脸，增加了硬面火烧、甜蒸饼、炸果子、煮汤圆等，秫米粥多加白糖、桂花，名声渐著。

1926至1928年间，奉系军阀褚玉璞督直时，奉票流通券贬值，官方强制按票面钱数计值，商户则借口没钱找零而拒绝使用，随时有纠纷发生。一次，有褚军勤杂人员到万顺成买秫米粥，拿出奉票付款，段玉庆亲自接待，含着笑脸说没有零钱找，给盛了一盒粥，说是不要钱，白送。褚兵原不为买粥，只为付出奉票换回市面通用的零钱，见钱未换成，就恼羞成怒，不但不要秫米粥，反以破坏金融罪，把段玉庆捕走；后经托人说情又花钱赔礼，段玉庆才被释放。段玉庆为身家和店铺营业的安全之计，遂决定到租界地再设个门面。

他在法租界繁华地区，天祥商场后门的一条街里，租了一间门脸，设立了万顺成分号。分号，除发展了老号的传统，又收集了当时天津受欢迎的各种小吃，集中经营。开市不久，就在那条饭馆众多的街上站住了脚，营业火暴得很。

此外，他还在南市牌楼设立了万顺成新号，也颇具特色，受到顾客欢迎。

万顺成小吃店的特点是广泛吸收天津传统小吃的名家经验，集各家之大成。他的八宝粥仿东马路元兴斋；锅巴菜仿西大湾子大礼来；炸糕仿北门外“耳朵眼”；肉包仿侯家后“狗不理”；素色仿宫北大街“石头门坎”；甜蒸饼仿南门外“杜称奇”。他在用料与做工上多加功夫，以超过原有味道；对自己原有的秫米粥，则改为六成秫米、四成糯米，多加小枣、桂花、白糖，以提高美味，遇同业中有新制品亦不示弱。邻近的一家豆腐房制出十个层的油盐烧饼，他们就精制了十二层的油盐烧饼，以维持本号的名声。

煎饼果子·锅巴菜

幼年时，一度客居天津，据笔者所知，天津小吃以“耳朵眼”炸糕、杜称奇火烧，十八街麻花为最有名。但天津人也并非天天吃炸糕、麻花，那样是要把胃口吃坏的。“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更不是常常可以吃到的，如果并不住在附近，买起来也不那么方便。天津人每天吃的小吃（俗名“早点”）乃是煎饼果子、锅巴菜。这两种小吃却真是天津所独有，别的城市都很少的。天津、北京相隔不过一百四十公里，在北京，你早晨起来，想吃煎饼果子，对不起，没有。你只好坐早车赶回天津。一出老龙头车站，站前就有煎饼果子卖，四季供应，风雨无阻，而且总是另备有鸡蛋的。

据说煎饼果子、锅巴菜都是百余年前由山东传来天津的，经天津人改进成现在这个样子。张焘撰《天津杂记》，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羊城旧客撰《天津纪略》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也就是八国联军进犯天津的前二年，这两部书，记天津风土掌故之事，实即旅行手册，还未见提到煎饼果子和锅巴菜，所以它风行于庚子之前是不大可能的，如其从20世纪之初在天津出现，这也有将近百年了。30年代初，天津人已经和煎饼果子、锅巴菜有了密切的关系。学校门口煎饼果子和锅巴菜担子每天早晨生意极好，南开、觉民学校门口更是如此。每一热闹街道路口，没有锅巴菜担子，也有煎饼果子担子。锅巴菜以天祥市场后门“万顺成”最有名气。但马路担子要拉主顾，做起来也用心的，味道也不差。煎饼的主料是绿豆、小米、虾米（皮米）及香料、水。煎饼要用平锅现摊现卖，每张煎好（可以加摊一个鸡蛋）裹一油条（果子）成卷，煎锅涂油少许，再煎片刻，稍焦，抹面酱，撒葱花，折起，称为“一套”。天津的歇后语赞美善于言词的人，往往说此人说话“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即此之谓。锅巴菜以事先摊好的大张煎饼，切成柳叶条，放在卤锅（一直不断火）内稍加搅拌，连卤盛碗。再加腐乳汁、芝麻酱、香菜、辣子

糊，五味俱全。锅巴菜一要煎饼摊得薄，二要打卤用洗面筋洗出来的浆粉。曾见有人试用马蹄粉代替，滋味不对。

煎饼果子、锅巴菜都是热吃的，夏天也如此，这两种小吃以绿豆为主料，佐以小米，所以能解毒清热，开胃健脾，化瘀滞、疗便秘，有益健康，百吃不厌，而且酒后还可以解酒。可惜的是离了天津，别处竟吃不到这种美味小吃。

“赖汤圆”传奇

四川成都首屈一指的名小吃是“赖汤圆”。在成都市百余家名小吃中，它接待顾客最多、服务时间最长。每天从清晨六点钟开门，一直营业到深夜11点钟，供应近万份汤圆。

“赖汤圆”因其创业人叫赖元兴而得名。赖元兴系四川资阳市东峰乡人，生于1900年。他自幼家境清贫、父母双亡，由隔房姨妈何氏收留。何氏是资阳清水河乡望族，乡团练刘绪堂之妻。赖元兴寄人篱下，做了刘家佣人。1918年赖元兴已长得牛高马大，年轻俊美，而且勤劳诚实。何氏有一女，芳名翠莲，小赖元兴一岁，长得亭亭玉立，爱上了表兄赖元兴，何氏也很满意。那年农历六月十九南津驿观音庙会，何氏叫女儿去烧香还愿，由赖元兴陪送。在归途中，适逢天降暴雨，赖元兴急携表妹进岩洞躲雨。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不期被人碰见，添枝加叶当作奇闻传诵。刘团练知道后，大发雷霆，意欲处死赖元兴。经何氏跪地向夫苦苦哀求，刘团练才从轻处理，将赖元兴逐出刘家门，并不准其在资阳境内谋生。

赖元兴流落在成都东大街城隍庙内栖身，靠为人家推板车、挑水、劈柴、打杂混口饭吃。一天，城隍庙附近椒子街有一富裕人家的老太爷去世，叫赖元兴去为死者更换衣服。事毕，主人把换下的衣服送给了他。赖元兴回到城隍庙后，竟发现死者衣服荷包内有一只翠绿色的翡翠戒指。他猜想这一定是很值钱的东西，便在第二天把戒指送还给主人。主人感其为人诚实，当即赏给他五块银元。

赖元兴几经琢磨，决定用这五块银元经营汤圆生意。他便告别城隍庙，去东门城墙边租了一间旧房，买了一副担子。一头挑沙锅，一头挑汤圆粉子和糖油作料。天没亮他就把担子挑出门，走城门口、城隍庙一带，扯起嗓门大声喊叫：“奈汤圆，热和、大坨的汤圆！”川南资阳人口中的“奈”是热烙的意思，但因他本人姓赖，人们就叫他“赖汤

圆”。

“赖汤圆”给自己立了四条经营守则：一是把利润看得薄一点；二是接待顾客热情一点；三是把汤圆质量做得比人家好一点；四是资金周转快一点。他起早贪黑，把汤圆粉子磨得很细很细，糖油和芝麻熬炒得功夫到家，做出的汤圆香甜柔和，味美可口。他卖完早堂汤圆，就将收入拿到市场去买回原料，夜晚又卖夜堂汤圆。一来二去，他在成都站稳了脚跟。

一晚下雨，“赖汤圆”在东大街檐下卖汤圆。从风雨中急匆匆走来一位中年人，一是躲雨，二是吃碗汤圆驱寒。那人吃汤圆时，“赖汤圆”主动把他被雨淋湿的帽子拿在火炉上烘烤。闲谈中，知彼此都是资阳同乡。原来这位顾客是当时四川省建设厅房产课课长罗远辉。成都青羊宫花会是川西坝人春游、踏青、交流物资的好去处，那里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管理花会、分配摊点地皮的便是罗远辉。他有意提携同乡“赖汤圆”，故从此，“赖汤圆”时来运转。

成都青羊宫花会会期，每年会期是从农历正月初九，至谷雨节，每季花会罗远辉都在青羊宫划一“黄金口岸”给“赖汤圆”搭棚设摊，每天卖出汤圆上千碗，喜得“赖汤圆”每次都增加伙计帮忙。几季花会下来，“赖汤圆”的积蓄已很可观了。

当时成都房地产买卖，都要从罗远辉手中“过”一道，他明白买房子更能赚钱，便建议“赖汤圆”不要存钱，买房子更稳当。“赖汤圆”欣然赞成。罗远辉便关照他在大墙后街买了几间房主急于脱手的低价房作为住房，并在闹市总府街买一小单间铺面卖汤圆，正式挂出赫然醒目的“赖汤圆”横匾招牌，坐堂营业。

此时，“赖汤圆”思念旧情，急想把年轻寡居、又无子女的表妹刘翠莲接来，消息传到家乡，刘团练、何氏夫妻亲自把女儿翠莲护送到成都，与表兄“赖汤圆”结为夫妻。接着，“赖汤圆”又请翠莲读过六年

私塾的胞弟刘双全当他生意上的助手。

“赖汤圆”有了店面，定时定点经营，又有贤妻和表弟全力协助，对汤圆的制作技艺精益求精，生意越发兴隆，每天营业十四小时。他制作的汤圆，雪白如玉，小巧玲珑，滋糯润滑，味美香甜，煮在锅里不浑汤，舀在碗里不巴碗，吃在嘴里不黏牙。每份汤圆特配一小碟白糖芝麻酱，汤圆蘸芝麻，香味越浓。每年青羊宫花会，他都在那里的“黄金口岸”开设分店。

这样，在十年之内，他在罗远辉的关照下，相继在大墙后街、大墙东街、后子门、九思巷买了二百五十多间街房，并在东城根街买了一座精致漂亮的独院公馆。“赖汤圆”把所买的街房出租收租金，又把租金和汤圆利润收入用来开设米粮店。到1940年，他相继在成都中山公园（现文化宫）后街开设了两家米粮店，并在彭县、灌县、金堂、什审等县开设了十三家米粮分店。每年秋收季节，各分店收购黄谷，就地陆续加工成大米，米糠供应当地农民饲养毛猪，大米运到成都供应市民。生意越做越大，不惑之年的“赖汤圆”，已是成都鼎鼎有名的富翁了。

“赖汤圆”富了不忘本。他仍继续经营“赖汤圆”店，每个星期去店上服务一整天，借以鞭策自己不忘艰苦的创业史。

“赖汤圆”富了不忘家乡。抗日战争时期，他联合罗远辉和在成都建筑行业、号称“通天木匠”的资阳同乡廖剑庭，在成都创办了“资阳同乡会”，会址设在九思巷他的一座独院内。凡从资阳流落在成都的穷人，由他包干儿食宿，由他们三人介绍打短工，使穷苦乡亲免受他当年栖身城隍庙之苦。1939年，资阳筹办储彦中学，他专程回乡，慷慨捐赠了一百五十担黄谷（约折合大米二万六千斤）和一千元法币。一时名震乡里，誉满资阳，人人称颂。

米粽·面粽·藤萝饼

四十年前，天津出售粽子的著名糕点店为“两斋”、“两香”。两斋是祥德斋和胜兰斋，两香是一品香和四远香。这四家都是提前去白洋淀采购宽芦叶，又去山东乐陵采购小枣，先期购进江米，增雇工人包粽子。所包粽子皮叶鲜绿，麻绳捆扎粒米不漏。蒸熟之后，一剥粽叶，芦叶清香，枣味香甜。枣馅之外还有澄沙馅，备受顾客欢迎。

当时，稻香村、森春阳、冠生园等南味食品店还特制火腿、咸肉馅的糯米粽子，以供应江、浙、闽、粤等省旅津同乡的食用。

糕点店在江米粽子之外，还制作炉食粽子，备有玫瑰、山楂、澄沙、枣泥、瓜条、元肉等各类馅。

值得回忆的是适合大众口味的面食小吃，就是俗称的“面粽”，以红、白糖馅为主，配以青丝、玫瑰、桂花，用白面做皮蒸制而成。以南门外鱼市西的“杜称奇”面食铺所制的最出名。蒸面食做的简便点心，在天津名为“蒸食”。这虽属小生意，但要面发酵软硬适度，蒸熟后不酸不粘；馅做得稀稠得当，吃时不溢不流，却也要一套技术。“杜称奇”蒸食铺就因在此道中有出众的本事，所以才被津人叫做“杜称奇”。

春夏之交，随粽子接踵而来的还有一种名贵糕点，就是藤萝饼。

紫藤俗称藤萝，落叶蔓生木本植物，夏至前后开花，花为紫色，艳丽而有玫瑰香味，花瓣经蜜饯后可以做馅。糕点店做藤萝饼时用白面薄酥做成，藤萝花馅或配以百果馅，底面微火烘烤，上面撒以鲜藤萝花瓣，看上去色泽鲜艳，吃起来有清新的花香，属于季节性最强的名贵糕点。

做藤萝饼需要藤萝花，早年天津糕点店一进夏季就在门前竖

立“本店收买鲜藤萝花”的木牌，收购藤萝花；有些大糕点店还直接向花园收购藤萝花。由于原料来源有了保证，藤萝饼才得以大量制作。据传说，天津糕点店老字号祥德斋就因能从津西名园水西庄包购藤萝花，得到充足货源，因而使它的藤萝饼著称于世。

“过桥米线”堪回味

昆明的主人，遇有朋友自远方来，最好的接风就是请他吃一碗“过桥米线”。何以如此？因为过桥米线为昆明首屈一指的小吃。

笔者吃过桂林的马肉米粉，而且一次至少吃上二十碗，那是因为马肉米粉的碗，出奇的小。可是过桥米线却恰恰相反，那大海碗，使第一次领略“过桥米线”的朋友一定会叹道：“这碗汤，够我一家人喝了！”其大可知矣。

过桥米线滋味极美，简言之为鲜、嫩、热、辣；而且食法独具一格，故列春城小吃之首。

“老昆明”说：“一客过桥米线，足抵得上半桌筵席。”此话不假。它包含：一大碗上汤，白嫩线状的米粉，切成薄片的生鸡脯肉、猪里脊肉、猪肝、腰子片、鲜豌豆苗、嫩韭菜段、绿豆芽等每样一碟。当然，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精彩的是那一大碗上汤——用肥鸡和猪骨熬成，清澈透明。盛入大碗，再下胡椒、味精。汤极热，但因上面覆有鸡油，不冒一丝热气。吃时，先将鸡片、肉片等放入汤内，用筷子轻搅，肉片即刻烫得雪白；再放入鲜菜，少时也熟了；再放入米线，配上红红的辣椒油，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再看碗里，白嫩的鸡片、肉片、米线，翠绿的鲜菜，透明的清汤，鲜红的辣油，尚未到口已感食欲大动矣。

这种“米线”为何又冠之以“过桥”呢？据说，早年间，云南省蒙自县有一位秀才发愤攻读，为躲避尘世间的喧闹，就独居湖中一个岛上读书。他贤惠的妻子每天过桥上岛为他送饭，但往往苦于饭送到时菜已凉了。一天，她送去一罐鸡汤，却一直是滚热的。她发现，原来汤上一层鸡油保住了热度，她由此获得启示，常常为丈夫送一罐鸡汤，并用热鸡汤为他烫米线吃。这样的美食自必受到丈夫的欢迎了。

在聪明的妻子关怀照顾之下，秀才益加发愤图强，终于考取了功名，据说后来还中了状元，一时传为美谈。

由于秀才妻子为他送米线时要过一座小桥，这种米线遂称之为“过桥米线”；又因秀才后来还中了状元，所以又叫“状元米线”。

第一，过桥米线确实味美好吃；第二，它的吃法独特，别具一格；第三，又有这样一个动人故事。所以“过桥米线”不胫而走，不仅云南有卖，外省市的一些云南餐馆也都以“过桥米线”相号召了。

桂林马肉米粉之妙

“桂林山水甲天下”，我谓：桂林马肉米粉也不差。当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桂西路那家香肉米粉店。那店，门面不大，其貌不扬，店中的桌凳却洗刷得十分干净。店内，独沽一味，只卖马肉米粉；所以，进得店去，不必开口，找到座位，自己坐下就是。片刻之间，店伙手托着大托盘，里面摆着五七碗马肉米粉；也不言不问，到你面前，放下一双筷子，几碗米粉，又去照顾别的客人了。

装米粉的碗是极普通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浅浅的、似陶器又似瓷器的小碗；再看碗中却不一般：几茎雪白的米粉，半碗透明的清汤，数片嫩红的马肉，汤上漂浮着几叶翠绿的香菜，香喷喷，热腾腾，诱人食欲大动。吃一口米粉，喝一口汤，再尝一片马肉，啊，那清爽鲜美，真是“日啖米粉三十碗，不妨常做桂林人”啊。

何以要说“日啖三十碗”？原因很简单：那马肉米粉的碗太小之故。那碗比汤盘稍深，碗径不过10~12厘米左右；所以，吃马肉米粉绝对没有一碗两碗的，起码五碗以上，大肚汉要吃上十几碗，甚至二三十碗。正因为如此，当时卖马肉米粉的，在你就座之后，并不问你：“先生，你要几碗马肉米粉？”而是如前所述，用大托盘托来几碗，先把一碗放在你的面前，你不必问，只管拿起就吃，吃完把碗放在一边。当你这一碗刚要吃完时，新的一碗又摆在面前了。直到你不想吃，告诉店伙，他才停送。所以，在马肉米粉店里，你会看到，每一个吃客桌上都摞着一叠小碗，少则五七个，多则十几二十个，那都是他刚刚吃完的，到临走时按碗数算账开单。

何以当时卖马肉米粉要这样小碗，而且一吃十几二十碗呢？我问过店主人，据答称，马肉清汤要吃热的！其实，据我分析，其原因远不止此，其中有奥妙的心理学因素在。一碗马肉米粉，米粉数茎，马肉数片，三两口便可吃光一碗，其味又十分鲜美，每吃一碗，总觉得

意犹未尽；恰在此时，新的一碗送到，你便一碗一碗地吃下去，钱也便一点点进到店主的腰包了。

博望锅盔的传说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被刘玄德请出来以后，第一仗就是在河南南阳的博望坡把曹兵烧得大败而逃。“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谈笑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这诗，至今许多人都会背。其实，那次不仅烧了曹兵，据说还烧出了一种别有味道的食品呢！那就是至今还享有盛名的博望锅盔。

我的一个朋友是南阳人，少时在北平读书。暑假过后，同学从四方归来，各带一点小特产，广州的糕点、四川的榨菜、湖南的米团，同室相聚，坐而吃遍全国美味了。那位南阳的同学就带了博望的锅盔，我们都叫它河南大饼，但吃起来满有味。大约有一寸厚，底、面和心都是瓷白瓷白的，边却是焦黄的云块，吃起来酥脆甘甜，越嚼越香，而且放上一个月都不变形，不变味，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行，简直是面食中的神品。

据这位同学说，在博望，诸葛亮的一把火，把夏侯淳、于禁、李典烧得狼狈而去。刘备得了博望，就派关羽镇守。当时久旱不雨，城内井枯水断，吃水成了大问题。关羽急了，就向诸葛亮送去告急文书，请求退兵。诸葛先生马上回书一封。关羽拆开一看，见上面写道：“用干面、掺少水，和硬块，锅炕之，食为盔，饷将士，稳军心。”关羽根据诸葛先生交代的方法做成了锅盔，将士们靠它度过了缺水难关，守住了博望城。这故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上都没有。那同学又说，其实还可能更早呢？当地人都说，汉代有个姓韩的在那里开了饭铺，专卖一种二十斤左右的锅盔，群众中流传着顺口溜：“博望锅盔韩家起，一代一代有人继。家家户户都会做，最好还是姓韩的。”而且说，他买的真正是韩锅盔，卖主叫韩喜德，他家的总是比别家的做得好，销得快。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很少见到一二十斤重的锅盔了。过去，

锅盔之所以流行，主要是人们旅途大部分都是“骑早”（走路），锅盔好吃耐放，是一种很好的干粮。尤其是劳动人，担挑或推小车，一走就是几天路程，遇不上店的机会很多，需要干粮。再者，他们大都是穷人，有锅盔，有口水就能充饥，锅盔起到了我们现在的压缩饼干之类的作用呢！

山西民间小吃“头脑”与“帽盒”

三十多年前，曾赴山西太原，小住些时。在那里游览过太原西南郊的古迹晋祠，也曾饮过产自太原西南的汾阳县杏花村的名酒汾酒，但这些都未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使我多年来犹念念不忘者，却是两样民间小吃，一曰“头脑”，一曰“帽盒”。

古城太原，小吃甚多，早餐食用“醪糟”即江米酒，“麻叶”即油饼，烤包子等，各有特色。但其中风味独特，可谓全国仅有者则为“头脑”与“帽盒”。所谓“头脑”者，是以羊脑、肥羊肉、山药、藕片，加黄酒、党参、黄芪等滋补药品，共煮而成。不加盐，味道清淡而微甜。因汤中有羊脑，所以俗称“头脑”。所谓“帽盒”者，是一种面食火烧，因其形状似清代盛帽子的盒子而得名。正如北京的一种烧饼像是马蹄而叫“马蹄”一样。太原街头饭馆，如西肖墙的“西域兴”等处多供应此种早餐，其中以南仓巷的“清和园”的“头脑”为最著名。每日清晨，顾客盈门，门庭若市。入座后，侍者即端上两个小碗，一碗内有肥羊肉两片，山药两片，此即“头脑”也；另一碗则为头脑汤。再端上“帽盒”一盘，腌制咸韭菜一碟。吃“头脑”配“帽盒”，皆无咸味，故需以咸韭菜佐味；正如在北京喝豆汁要佐以咸菜丝一样。

据太原当地人讲，“头脑”的配方为明末清初山西名士傅山所传。傅山，太原人，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其少有异禀，过目成诵；善画山水墨竹，工诗文及金石篆刻，又为著名草书大家；精医术，家传秘方，乃资自给；著有《霜红龛集》。傅待母至孝，母年老，为母调制滋补养生方剂，即后来之“头脑”，供母清晨食用，以求益寿。后为各饭馆所引用，作为早餐食品出售，流传至今，近三百余年矣。

忆昔在太原至清和园吃早点，侍者捧上“头脑”两碗、“帽盒”一盘、腌韭菜一碟之后，友人食之津津有味，我则食而无味。后经解

释，方知此乃老年滋补食品，次日再次食用，仔细品尝，个中滋味，的确不凡。

事隔三十余年，但至今犹能回味，益深感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地生活方式以及食品风味，确实品目繁多，殊难遍尝。且传统医术以及养生药剂，亦多有效秘方，如有流传，而为人子者赡养父母，竭尽孝道以期益寿，尤多美传。傅青山之配制头脑汤，不过其较著事迹而已。

蔬菜瓜果

shucai guaguo

大白菜上宴席

“京华嚼得菜根香，秋去晚松韵味长。玉米蒸糇堪果腹，麻油调尔作羹汤。”

这是我昔时所写《京华竹枝词》中《咏大白菜》的一首，后面两句要稍做解释，“玉米蒸糇”，就是北京话的“棒子面窝窝头”，“糇”是“干食”的意思，把玉米面蒸窝头说成是“玉米蒸糇”，这是腐儒的酸气，这样一来就“雅”了；然重在下面一句，意为“大锅白菜汤，滴上些香油”。新玉米面蒸的现出锅的蜡黄喷香的大窝头，再配上一大碗白菜汤，热乎乎的，不仅果腹，而且在你饥饿难耐时，堪称是无上的美味，如果把大白菜切成棋子块，用粗盐曝腌一两个钟头，把盐水去掉，用滚烫的花椒油或辣椒油往里一倒，“刺啦”一声响，真是其香无比。白菜汤、窝头，如果再配一盘这样的曝腌椒油白菜，便更是妙不可言了。

当然，这是最普罗化的吃法，如果要高级呢，大白菜也完全可以摆在最丰盛、豪华的宴席上。清蒸鱼翅就常常要配一点雪白的白菜心子；满汉全席的凉菜中也少不了糖腌白菜心；全聚德的烤鸭子，在“鸭油熘黄菜”之后，照例是“鸭架烧白菜”。西来顺、东来顺吃涮羊肉锅子不仅白菜粉丝是必备的辅菜，而且最后一定要有一点酸白菜才解膻醒酒。

还有最堪入“山家清供”和“随园食谱”的是“江瑶柱蒸白菜”和“栗子烧白菜”。这两品佳蔬做法简单，而滋味无穷；蒸出来的汤像牛奶一样雪白滑腻，老年人食之，入口即化，正如施愚山诗中所说的“雪汁云浆舌底生”了。

当年北京的小饭馆卖一种名叫“醋熘白菜”的炒菜，极为经济可口。把白菜帮子用刀片成“骨牌”块。用花生油起油锅，大火，菜下锅

后在热油中翻身一转，再用加盐、糖、醋的团粉汁一淋，再翻个身便出锅；其味咸中带有甜酸，又香、又脆、又烫嘴。

把大白菜头上的菜叶子切去，下面用刀横切，成为一个个的圆饼，一个个放在大盆中，洒上粗盐“杀”一夜，第二天去掉盐水，一层层地放入坛中，每放一层，洒一层芥末，最后倒入米醋，封口，半月后取食，谓之“芥末墩”，滋味极为隽永。这是真正老北京的吃法。

燕市名蔬话茄子

北京是千年古都，不仅文物荟萃，而且城郊农艺亦颇精湛，种植农作物很有特色；尤其自明代中叶之后，蔬菜种植更为出色。这在谢肇的《五杂俎》、张燧修的《谈乘中》都有记载。在蔬菜中，初秋之际，茄子是最值得一谈的。茄子在吴地叫“落苏”，据说是因为避钱穆王儿子“钱子”之音而改名的。茄子有长茄子、圆茄子、羊角茄子数种。在江南则只有长茄子、羊角茄子而无圆茄子；在北京则多圆茄子、长茄子，而无羊角茄子。茄子生长容易，结实多而肥，是理想的园蔬。茄子开淡紫花或淡绿花，因种而异。长茄子第一次开花，每株只结四只，谓之“四门斗”，第二次开花，结实繁而小，谓之“满天星”。这也是很特别的，不过这是几十年前的事，近年园艺改革，科学发达，不知有所改善否？北京人吃茄子，最普通是炆茄子、熬茄子，再不然把长茄子上锅一蒸，蒸熟后拿出来撕碎，用香油、酱油、盐花、蒜泥一拌，或用芝麻酱一拌，做得好也是消夏的名菜。当然，这些都是最普通的吃法，如果要考究，就无穷无尽了。《红楼梦》中的“茄鲞”，恐怕现在还没有哪位名厨会做吧？

茄子是一种很“吃油”的蔬菜，凤姐介绍“茄鲞”做法，不是就说先用“鸡油炸了”，再“拿香油一收”等吗？北京大小饭馆最普通的“烧茄子”，就是把茄子洗净去皮后，切成菱形薄片，先入油锅中一炸（行话叫“过油”），然后再放口蘑、毛豆等配料红烧。荤的加肉片、肉末均可；即使不加肉，素烧也很好吃。这虽是普通菜，但做起来要火猛、油多、火候合适。这在江南很难吃到，是一味秋夏之际，物美价廉、最地道的北京菜。

把长茄子去皮横切成圆片，中间再割一刀，夹上肉，上锅蒸熟；然后把鸡蛋、面粉打成浆，把蒸熟的夹肉茄片蘸浆后，入热油锅一炸，蘸花椒盐吃，外焦里嫩，极为好吃，谓之“茄盒”。把整只长茄子

去皮，竖切一条直缝，夹上肉馅，或夹上更高级的海参、虾仁等三鲜馅，上锅蒸熟，或调汁红烧，或蘸蛋浆油炸，谓之“鹧鸪茄子”，其名贵不逊于《红楼梦》中之“茄鲞”。

山中之珍——香菇

孩提吃香菇时，听老辈人讲过香菇的故事。说是八百余年前，在浙江的龙泉、庆元、景宁三县毗邻之地，有一名灵官者，购下一大片山，砍倒树木，任凭风吹雨打，待其霉烂。结果，树上长出了香菇。采之蒸熟，鲜、香并绝。村人闻讯，纷纷前往仿学。自此，这一带即有了以“栽培香菇为业的菇民”。他们尊灵官为“五显灵官”或“五显大帝”，为志其功德，捐资募建了“五显大帝”庙宇。

传说终究是传说，其实，据记载，早在公元前239年著的《吕氏春秋》里，即有“味之美者，越骆之菌”，“菌”即是指香菇。清代黄官绣在《本草求真》中，奉香菇为“食中佳品”。载录明代史事的一些古书记载：明朝定都金陵时，遇天大旱，国府清贫，明太祖朱元璋苦对素食，无下箸之欲。其时，祖籍吴越的国师刘伯温献上龙庆景香菇，朱元璋“食之甚喜，令每岁必备若干”。香菇遂被列入宫廷菜谱，名声大振。

关于香菇之做法，近年出版的《中国菜谱》，介绍了取鲜菇或干菇若干，伴以鸡脯肉、笋块、雪里红等配料，调制成“色调清雅大方，吃来软嫩纯鲜”的“烧香菇托”和“香菇肉饼”。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食用菌》，则倡导取鲜香菇八个，切碎，拌以柠檬汁液、大蒜泥、芥末，橄榄油及少量盐、黑胡麻等作料，最后撒上少许色拉生菜和荷兰芹碎片的制法，谓之“香菇鸡球”或“香菇爪炒牛肉”或“香菇色拉”，具有西餐风味。还有“原汁菇汤”，其做法甚为简便：取干菇若干，用冷水洗净，再浸入冷水约半小时，使其吸水涨大如鲜；浸到十五分许，放入少许精盐；待水烧沸，倒浸涨浸咸的香菇入锅，煮三分钟，加入少量山粉；盛起时再加入少许猪油、葱花；食之，菇汤如同加了特殊香料，令人胃口大开。

香菇不但可做美味佳肴，而且还有奇妙的药用价值。明吴瑞的

《日用本草》说，香菇能“益气不饥，治风破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视香菇有“味甘和平，大能益味助食，及理小便不禁”之奇效。

据近年医学、医药界研究，香菇含蛋白量之高，脂肪成分之低，可与鸡蛋媲美；内中维生素含量之多，连向以含维生素多而著称的西红柿、马铃薯、胡萝卜和菠菜等，亦比之不及。据一位日本国医学博士石田名香雄声称，香菇中分离出的抗病毒物质，将可能成为消灭癌症的“核武器”。

漫话山东加祥大蒜

北京的很多地名都有来历，如花儿市、灯市口、果子巷等。崇文门外有个蒜市口，顾名思义，就是大蒜的集散地。从前每年6月上旬前后，一群群卖蒜的农民，车运肩挑，络绎不绝，把一串串蒜辫子，堆向北京菜市口出售。

当年的京都蒜市，场面虽说很热闹，但是，若与著名的“大蒜之乡”山东加祥县蒜城相比，则相形见绌矣。

加祥县每年5月中旬前后举行蒜会，会期持续一个多月。全城大街小巷，蒜棚林立，蒜摊鳞次栉比，红蒜头、绿蒜叶的串串蒜辫子，似宝珠翠玉挂满棚架，铺满摊地。仔细观看，有卖蒜头的，有卖蒜辫的，有蒜薹铺，也有蒜苗摊。饭馆门口，张贴着醒目的红纸菜单，上写“鲜嫩蒜薹怀肉”、“糖醋大蒜拌猪肝”，提醒光临蒜市的顾客，切莫错过品尝新鲜蒜味的大好季节。就连专售包子的饭铺，桌子上也摆满了一盘盘洁白光亮的蒜瓣，任凭食客选用。来自各地的购蒜客，或坐栈收购，或进棚洽谈，熙熙攘攘，把整个蒜市挤得水泄不通。为给蒜市助兴，鲁、苏、豫、皖、晋、冀等地的剧团、杂技团、曲艺团等，亦常赶来演出节目。

加祥大蒜，已有两百年的种植史。据《齐民要术》和《加祥县志》记载：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将大蒜带回中国西部地区种植。东汉时期，陕西武威太守李恂，在调任鲁中兖州刺使之际，万般珠宝无受，唯独将西域大蒜带到加祥境内，教授百姓栽培。谁知，原本白皮的西域大蒜，在曾子故乡，一经试种，竟变成红皮的了，而且，蒜头长得像鸡蛋般大，光滑鲜亮。百姓传说这是李恂的德行所至，于是李刺史成了当地官民崇敬的人物。

加祥大蒜优于别地大蒜的特点，除皮红瓣匀，个大饱满外，且有

肉汁细嫩，蒜汁浓粘，味香辣烈等特色。笔者曾试，若将加祥大蒜捣碎成泥，用一根筷子，可以把全部的蒜泥成串挑起，即使挑到一米的长度，蒜泥也不会断落，其浓粘之状，由此可见。

惠阳矮陂出梅菜

日前赴广东省惠州，朋友以“梅菜蒸肉饼”招待。因第一次尝到这种菜，故胃口顿开。

惠州梅菜是中外驰名的。其正宗产地是惠阳县矮陂镇。这里家家种梅菜，人人喜吃梅菜，素有“梅菜之乡”的美称。

据《惠阳县志》记载，矮陂村民种植梅菜的历史已有七百多年。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矮陂桥村有一个忠厚的后生叫阿牛，长年累月靠打柴度日。有一天山洪暴发，冲走了河上的木桥，阿牛打柴归来，见河边有个貌美的姑娘正为过不了河发愁，阿牛便牵来水牛，驮着姑娘过河，姑娘见阿牛这样乐于助人，便送给他一包菜籽，并授予栽培方法。阿牛依言栽种，细心管理，长势良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乡亲们很稀奇，问阿牛这是什么菜，阿牛答不上来，突然便想起姑娘临走时说叫阿梅，于是便说这是梅菜。后来，梅菜在这儿扎了根。据说还向皇帝进过贡呢！

梅菜的生产季节是冬季，一般在收晚稻前播种培育，菜苗大约一个月，收完晚稻即栽种。人们大都选择在水利条件好，能自动灌溉的稻田种梅菜，从种植开始，头一星期每天要浇水，第二星期开始，可两天浇一次，相隔一段要施肥，梅菜生长期约八十天，待菜心长至10至15厘米便可收获。收获时先将地里的菜砍倒仰晒一天，然后用刀将整棵菜开成菜心突出、一片一片连成一体的形状。再晒一天，接着把菜放进水泥池内，放一层菜加一层盐，用脚踩实，并用大石块压住，三天后便可取出晒到草地或晒谷坪，每天早上晒，晚上收，中途还要加点盐，晒至七成干，呈金黄色就可以食用了。

梅菜有三种：菜心、菜片和粗叶，味道清甜爽脆。其中菜心以心嫩、色黄、味香为上品。它不但可以做菜，同时又有消暑解热之功

效。因此，在炎热的暑天或蔬菜青黄不接的季节，人们特别喜爱用梅菜做膳食的佳品。

据说去岁有一惠州的美籍华人抵达北京时，要求吃上家乡土特产——梅菜，因而梅菜也登上了国宴。

荠菜·龙须菜·榆钱儿

唐明皇的宦官高力士被流放到贵州时，看到贵州的荠菜很多，却没人采来吃，便作诗云：“京师论斤卖，此地无人采。贵贱虽有殊，气味终不改。”荠菜是野菜，分甜荠菜和苦荠菜两种；甜荠菜有一股清香，苦荠菜略带苦味，都是春天很好的野菜，南北各地都有。在北京不少人很喜欢吃荠菜，清初柴桑《燕京杂记》云：“荠菜遍生野外，穷民采之，清晨载以小筐，鬻于市上，味甚甘脆。诗云：‘其甘如荠菜’，信然。”作者引用了《诗经》的句子，说明我国吃荠菜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了。

荠菜最普通的吃法是用肉丝炒了吃，或是在开水锅中煮熟之后，切碎了和豆腐干拌着吃，再有用荠菜和肉作馅子，包饺子吃，都是很可口的。在北京春天里吃荠菜馅饺子，如江南吃荠菜大馄饨、荠菜汤团一样，都是清香可口的食品。寄寓在北京的江南人特别欢喜吃荠菜，还另有一个原因，因为一看到卖荠菜的，不但会有春回人间之感，也会油然地想到江南郊原春色，想到故乡的风土。在江南春天，荠菜炒笋丝、荠菜拌冬笋，都是具有季节性的家常名菜啊！

说到野菜，北京在历史上还讲究吃天坛龙须菜。《析津日记》上记载：“天坛生龙须菜，清明后，都人以鬻于市，其茎食之甚脆。”《帝京岁时纪胜》也说：“三月采食天坛龙须菜，味极精美。”但这些只是书上的记载，在我的记忆中，在几十年前，再没有听说什么“天坛的龙须菜”了。大概人世沧桑，也波及京华草木，天坛虽大，可能早已没有龙须菜了吧？再有，在榆树飘香，榆钱儿满枝的时候，把榆钱儿和面蒸熟，上锅稍放精盐、葱花，用油炒食之，极为香美，这是王渔洋在《人海记》中也记载过的，它还是宫中御厨赐给翰林学士吃的珍品呢！

荸荠配菜与药用

南方人大都喜欢吃荸荠，把荸荠视为春夏间消热祛暑的水果。做菜时，它又是经常被采用的辅料；民间疾病的食物疗法，荸荠应用的范围亦颇为广泛。因而近年荸荠被制成罐头，远销东南亚各国。

荸荠原产地为印度，中国闽、粤、赣、苏、浙等省都有栽种，有人说它最初是由海道从印度引进来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食用荸荠了，但它的名称古今不一，不同地域称谓亦有异。古时名“乌芋”，又叫“凫茈”；《说文解字》段注则称“勃脐”；《尔雅》又呼之为“地栗”；粤东一带又称“马蹄”，盖其形似马蹄而云；闽南民间音讹而为“马荠”，台湾亦然；而北京人，一般都只知道它叫荸荠，并也有栽种，一般只是儿童买去生吃，价格相当便宜。

植物学上，荸荠属莎草科。它本来是多年生的水生草本植物，自生于池沼中，不属蔬果。后来人们把它在水田里栽培繁殖，品质不断改进，种植也更广泛了。荸荠，地下有匍匐茎，茎端逐渐膨大，成为扁圆形的球茎，表面光滑，到老熟时，即呈深栗色或枣红色，有三至五圈的环节，并有短喙状的顶芽和侧芽。地上茎也一丛丛长出来，直立、细长、作圆柱形，就像葱管一样，青翠可爱。茎有节，节上长着膜状退化叶，茎中有极疏的白髓。秋初，茎顶上长出1寸来长的穗状花序，开褐色的小花，很好看。

荸荠，除削皮生啖外，庖厨多用以为辅料。如阁菜中一些名菜美点，荸荠不可或缺，素菜中尤喜用荸荠，凡有肉馅的佳肴，如鸡卷、芋饼、八宝葫芦等，不论是汤食、清炖或煎炸，必以荸荠切碎搅拌其中，使肉馅香脆爽口，不致实涩寡味。“荔枝肉”“醉排骨”“炒虾仁”等物，也要用数枚去皮新鲜的荸荠切片，作为辅料。素菜中各色各菜，有用荸荠与香菇俱切成细条充作料下汤煮的，用切片或切成豆粒大小的丁拌入主菜炒的，也有与面筋香菇等一起捣成馅泥的，不胜枚举。

煎炸油酥之品，中杂荸荠碎片，则可油而不腻；蒸煮煨烧的禽畜肉块片、内脏，伴以荸荠片粒者，则入口清松有余甘。

荸荠性寒滑，味甘凉，有清热、止渴、开胃、消食、化痰、益气、明目等功效。在中医药书中，普遍可看到对它的药用价值的阐述，认为可适用于温病口渴、舌赤少津、小儿口疮、大便燥结、血痢下血、醒酒解毒等。民间常用荸荠来治疗小儿的一些疾患，如孩童误吞入铜钱或铜片时，家长往往及时给服多量荸荠，吞入物即可随便排出。脸上皮肤生癣时，将荸荠切片在患处摩擦数次，有奇效。

中医以荸荠为病人治疗的疾患和方剂，据根临床实践卓有良效者，主要有下列数种：

治百日咳：取荸荠洗净去皮，每日早晚各服食二三公两，连续食一星期。

治尿血：以荸荠一二公两，茅根一公两，一同下水煎服。

治高血压：鲜荸荠10枚，海带、玉米须各四分之一公两，清水煎服。

治小儿生板牙：鲜荸荠去皮切片，轻磨牙龈。

治小儿口疮：荸荠数枚，烧干后研末，抹擦患处。

治暴发火眼：鲜荸荠若干枚，洗净去皮，捣烂，以纱布挤汁洗眼。

中国所产荸荠，旧时以江西最有名，赣南会昌素产荸荠，其种与他处迥异，颗粒比他省所产大三倍左右，汁多且甜，肉脆嫩而香，人称隽品。相传清时该地有贡田，专门培植佳种荸荠供内廷御用，有专人负责管理，严禁百姓采取，南昌所产荸荠亦为当地名产之一。福建省以福州荸荠品种最多，佳品颗粒肥大，肉嫩汁多，渣滓甚少。其他

如苏州的黑荸荠，华林的红荸荠，都是不可多得的异种珍品。

天津萝卜赛梨

秋天了，如果是在天津，又可吃到物美价廉的青萝卜了。青即绿色，青萝卜即绿萝卜，绿萝卜到处有，也不是名贵之物，但天津青萝卜确实好吃，超过别处的。在天津，不只以绿萝卜烧菜佐餐，更主要的是当水果吃，它比天津鸭梨、苹果的价钱都便宜，但它比苹果、鸭梨似乎更受欢迎。吃萝卜可以消食化气，润喉开胃。有人说，天津萝卜是“穷人”的水果，其实不然，富人同样也喜欢吃，真可谓穷富同享，老少咸宜。冬春秋三季，每当晚饭之后，一家人切开几个青萝卜，每人吃上几角，咬在嘴里，酥脆之声悦耳，甜辣之味舒心。过一会儿，打几个嗝，顿觉胃开心畅，浑身舒适，这种享受，至今回味无穷。

北京距天津一百多公里，北京人也喜欢吃萝卜，但北京萝卜与天津萝卜不同，北京萝卜青皮紫心，俗称“心里美”。天津人吃“心里美”，往往摇头说：“没萝卜味！”这话诚然，“心里美”只甜不辣，水分又少，比不上天津萝卜酥脆有后味。

每年深秋，天津萝卜上市。直到第二年春天，不但街头小摊上摆满了翠绿的萝卜，而且晚间也有很多小贩沿街叫卖：“萝卜赛梨味，格嘣脆！”特别是这叫卖声用天津道地的方音喊出，一听就感到萝卜酥脆的味道。

天津以小刘庄的青萝卜最名贵，色绿如翡翠，落地即摔碎，吃起来不但甜辣可口，而且香脆味厚。为什么那里产的萝卜如此好吃呢？传说，明朝嘉靖皇帝朱厚审有个爱妃，喜吃鲜荔枝。荔枝产于南国，那时交通不便，不要说荔枝“鲜”不能保持，不使霉烂变质就很难。奸相严嵩献计，在南方用大船装土，把荔枝树移植到船上，一路浇水喷雾，使荔枝树叶绿果鲜，经海河运到天津，在小刘庄下船，再用车把荔枝树运到北京，船上的多余沙土就卸在小刘庄海河边上了。爱妃吃

到鲜荔枝，自然高兴，如此年年船运，南方的沙土就在小刘庄堆积有十多亩之广了。农民在这片土地上种了萝卜，长成了色味俱佳的品种。

20世纪30年代以后，小刘庄的农田多已改成住房或工厂，萝卜也少了起来，代之而起的是西郊的沙沃村，那里出产的萝卜同样清脆可口，天津人又盛赞“沙沃萝卜”。沙沃村正是沙土地，适于种萝卜，这和运荔枝船带来沙土种出优良品种的萝卜传说倒是一致的。

“泽畔藕”的传说

金风送爽，又到了吃鲜藕的季节，不由得想到了藕中的珍品“泽畔藕”。“泽畔藕”系大白莲藕。藕身似雪如玉，外型瘦而坚实，藕孔排列极为规则，中间一大孔，外围六小孔，孔呈扁圆型。因产于河北省隆尧县东良乡泽畔村，故名。

提起泽畔藕，还有一段美妙的传说。据地方志载，明永乐年间，连续两年，山西居民迁到现在的北京和河北一带落户。当时山西洪洞县某村马氏二弟兄，平素喜爱养鱼、种藕。盛夏一日，马老大在槐树下纳凉，入睡后做了一个梦，梦见老二在前边跑，一位仙女手持荷花在后边追，仙女追老二，老大追仙女。老大醒来后告诉一位长者，说他做了一个蹊跷的梦，长者听罢哈哈大笑说：“你做的梦有名堂，名曰荷花托梦。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正是荷花仙子生日。梦中的仙子就是荷仙。荷仙追老二，表明莲藕欲随老二东迁京畿；你在后边追，表明荷仙为您指引明路。梦是好梦，你应该随老二同地落户，可别错拿主意。”老大听了长者一番话，下决心随胞弟迁居泽畔。从此，马氏弟兄便来到这里种大白莲藕。既然“泽畔藕”与荷仙有关，一辈传一辈，越传越神。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泽畔藕”竟打进皇宫，得到了皇帝和娘娘的赏识，被列为贡品。

大约在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泽畔村一带连年闹水灾。这时有位秀才马存敬，自告奋勇携带联户请愿书到县衙、府衙请求赦免钱粮。知县、知府做不了主，于是马存敬倾家荡产三进北京请愿，凭其三寸不烂之舌，通过前门一家藕商，跟当朝太监挂上了钩，以“泽畔藕”为赠礼，二人交上了朋友。时值正宫娘娘闹病，吃不香、睡不好。太监乘机献上“泽畔藕”，并奏明马存敬请愿的事。娘娘好奇地吃了点“泽畔藕”，还真的好了病。“神藕”能治娘娘的病，一时成为爆炸性的新闻，那太监也一跃成为正宫娘娘身边的红人。“泽畔藕”真

的“神”起来了。于是，皇帝下圣旨，免除泽畔村的钱粮。为了纪念马存敬进京请愿，村民捐款刻制了五通石碑，分别存放在北京、大名、顺德、唐山和泽畔村。

山药入馔香甜脆

山药，有的地方又名“长山药”，以区别于别名“圆山药”的马铃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野生者为胜；供馔，则家种为良。”这是一种多年生蔓草植物，长形茎状根，黄褐色有毛刺，营养价值很高，既可入药，又可入馔做菜，也可烧来当点心。药用山药以淮河一带产者最出名，所以开药方时，写做“淮山药”，是健脾、调胃、补气的中和药。如果入馔，最好是北京的；江南虽也出产，但水分多，不够滑腻。王渔洋《人海记》云：“北方山药……为天下最，常于朱竹宅检讨席间食之，真琼糜也。”实际上昌平以北，包括延庆直到居庸关以外，土木堡、下花园一带都产很好的山药。山药是顺着开好的一条条沟生长的，土质要松，要肥，最好是沙土地，水分不宜太多。京北一带的土壤正适宜种山药。

北京的饭馆常以山药入馔，如“蒸山药”，当年是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广和居的拿手菜。徐珂《清稗类钞》就记载着：“若夫小酌，则视客所尝，各点一肴，如……广和居之吴渔片，蒸山药泥。”“山药泥”是什么样的菜呢？《光绪顺天府志》特别有记载道：“山药，冬月掘根，可蒸。京师以猪油及砂糖和之，蒸烂，谓之山药泥。”这是一味甜菜。广和居的蒸山药能得到何绍基、张之洞、樊云门的品题，其高明可知。山药泥中还可以包澄沙、枣泥。《红楼梦》十一回秦可卿吃的“枣泥馅的山药糕”，就是山药泥做的。

在馆子里，最普通的甜菜是“拔丝山药”。其做法是把山药削皮斜切成块，起猛火，把山药块过油，再起油锅，加入白糖，使糖在热油中熔成糖浆，把过了油的山药块倒入油中翻滚数过即成。因山药块为糖浆所包，混为一体，趁热来吃，用筷子夹起来时，会拉起细丝来，因而叫“拔丝山药”，又香、又甜，外脆内软，十分好吃。

最简便实惠的是自己家中买些山药，削了皮，切成块，煮山药汤

吃。烧时用文火煮，多煮一些时间，那汤雪白细腻，比牛奶还浓，还滑润，加糖食之，非常爽口。

芋的文化趣谈

当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播出引起轰动时，剧中涉及的广西荔浦芋也引起人们的好奇和食欲，使得京城的芋价上涨，这堪称饮食文化效应现象。

就拿荔浦芋来说吧，它个头大的可达数斤重；而且剖开有槟榔般花纹，所以又雅称“槟榔芋”，吃起来特粉特香。两广还有一道名菜“荔浦芋焖鸭”。广州和香港人过春节，将槟榔芋切丝油炸成一团团香脆可口的“芋虾”待客。中秋佳节，不仅早餐要用芋当点心，晚上还要用芋供月。江浙沪人于中秋节则喜食配用桂花、藕粉熬制的糖水芋。我国许多地方，甚至日本都有类似的节日吃芋的食俗。

人们何以要在节日吃芋？原来这是一种祓除不祥的饮食文化风俗。据旧刊广东《乳源县志》载：“剥芋皮，谓之剥鬼皮、去疥癞。”由于芋的外表乌黑多毛，人们便将它认为是象征恶鬼和疥癞了。但到了文艺家的笔下，却能“化丑为美”。现代著名国画家诸乐三有一幅芋图：大小芋头的布局错落有致，用粗笔以干、湿、浓、淡、润、燥之墨钩皴芋身，以细笔、焦黑点出苍劲的芋毛，极有栩栩如生的质感，嫩红色的芋芽，使冷色基调的画面产生“画龙点睛”般亮丽的暖色调，令人赏心悦目。画的附记说：“童年时常就炉火中煨熟芋头，食之味极甘美。如此景象，能不令人神往乎？”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中国的旧小说里常有冬夜的深山古寺，老僧拥火煨芋的场景。

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对火正红煨芋美，不妨乘炬雪中归”，正是这种高雅文化氛围的诗意写照。古代养生家还把芋列入山家清供，与笋蕨菰蒲一样成为斋食的妙品。宋代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说，吃了煨芋，便嫌弃美味佳肴，“却彼羊羔”，连羊肉都不要吃了。《红楼梦》中还借芋喻佳人。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说，宝玉担心黛玉饭后睡觉积食成病，就诌故事给他听，说扬

州的小老鼠成精了拟变成香芋，不料摇身一变成了“香玉”般的林小姐，来调侃身有异香的黛玉。这里所说香芋产于江苏的扬州等地。清代扬州诗人谢墉的“入室人应疑麝蚀”，将此芋的香气比作麝香。曹雪芹写此细节确有所本。

芋在我国的栽培极为普遍，南方尤其多。其品种如君子芋、百果芋、鸡子芋、九面芋、青芋、象芋、博士芋、蛮芋、魔芋……举不胜举，据说仅广东就有十几种以上。如果能挖掘出众多芋名的民俗、神话的含义，一定非常有趣。秋季芋收之后，保藏得法可存至来年夏季。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钙、磷、铁、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不仅可以入馔、制零食，还可入药，有益脾胃、调中气之功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和鱼煮食，甚下气，调中补虚。”难怪广东、香港等地有用芋煮鱼的食法。

樱桃先百果而熟

樱桃是水果中的上品，它那雅致的名称，艳丽的色彩，鲜美的味道，无一不惹人喜爱。它不仅是画家的爱物，而且也是诗人颇喜吟咏的珍品。因为樱桃“先百果而熟”，所以自古以来“人多贵之”。

中国樱桃原产于长江流域。宋人陆佃所撰《啤雅》卷十四《释木樱桃》云：“樱桃一名荆桃，一名含桃。其颗大者，或如弹丸；小者如珠玑，南人语其小者谓之樱珠。”

山东烟台西南郊审福山地区，那里所产朱樱、紫樱及白樱，皆以其颗大、肉厚、味甜而蜚声中外。福山一带丘陵绵延，一株株碗口粗的樱桃树，亭亭玉立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上。春风和煦的三月间，满坡樱桃树上数不清的花蕾先叶而怒放。繁英如雪，幽香四溢，引来蜂蝶嘤嘤翻飞，颇有“带声朱蕊上，连影在香中”的诗情画意。及至残春，落英缤纷，新生的小叶儿由鹅黄而渐渐翠绿，由稀疏而渐渐浓密，定睛看时，便会发现一簇簇乍结出的柔果嫩实，恰似万点珠玑，挂于参差错落枝杈间，在徐徐的清风中摇曳生姿。

夏初时节，果实成熟了。但见满树的樱桃，颗颗匀圆，粒粒红艳，与碧绿的枝叶相互掩映，那美妙姿韵，令人情不自禁地吟诵起白居易咏樱桃的妙句：“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眼望着这般圆润而娇艳的鲜樱桃，谁能不涌出三尺馋涎，忍不住信手摘下几颗尝尝鲜儿？

樱桃既可生食，亦能制成罐头或果脯。这种味道醇厚的蜜饯樱桃，过去在北京、上海及天津的干鲜果品店中常有出售。

樱桃用于宴席，始于唐信宗的樱桃宴。可资考证的文献，见于五代人王定保所撰《唐摭言》中《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篇：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对公第二子覃及第，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一小盎。

这段史料仅记载了将樱桃“和以糖酪”的食法，与后世的蜜饯食法略有相似之处。据说最近几年北京各大饭店增添了“橘羹湘莲”、“八宝苹果”等许多以樱桃为主要配料的甜菜，无论色、香、味、形，比起唐代的樱桃宴来，一定更绚丽多彩了。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美丽的桃花总是和春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春三月，桃花盛开，花儿虽不像牡丹那样国色天香，富贵气逼人，也不像兰花那样幽静素淡，过于洁净。

桃花，原产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在某些植物学书籍中，却被误认为是波斯的“土著”。事实上早在汉代，桃便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国传播到波斯了。

中国桃花多姿多态，多种多类，有绛桃、绯桃、碧桃、二色桃、日月桃、鸳鸯桃、寿星桃……不胜枚举。

碧桃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唐代郎士元的诗句：“重门深锁无人见，惟有碧桃千树花。”但花形花色都没有说，无法知道它究竟是怎样一种桃花。王安石的《写生碧桃花歌》则说“枝上白云吹不散，阶前明月照疑空”，显然指的是白花。范成大《咏绯碧两桃花》诗，有“碧城香雾赤成霞”之句，好像真是碧色的花。明王象晋《群芳谱》说：“千叶桃，一名碧桃，花色淡红。”现在是把专供观赏的重瓣桃花，不论红白深浅，高矮大小，都叫碧桃。

欧阳修曾有感于“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荔枝果之绝，而非名花”，而桃则是两者兼美。

桃花是许多人喜欢的观赏花卉，桃子也是人们爱吃的水果，有花有实，正如梁任昉所歌咏的：“开红春灼灼，结实夏离离。”桃子种类繁多，大小不一，形色各殊。五月桃、六月白、水蜜桃、肥城桃、黄金桃、毛桃、油桃、冬桃，琳琅满目。

蟠桃是一个别致的名称。东方朔《十洲记》说：“东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树，屈蟠数千里，曰蟠桃。”用这个神话传说中的名

称，来命名现在这种扁盘形的桃子，未知起源于何时。《群芳谱》有方桃和饼子桃，显然都是蟠桃的异名。

水蜜桃、肥城桃等，都是形大色美，玉液琼浆，甘甜适口，为人喜好的佳果。

桃树栽种生长迅速。白居易的《种桃歌》对于这个性状，有具体生动的描写："食桃种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长枝叶，三年桃有花。忆昨五六岁，灼灼盛芬华。"宋陆佃的《埤雅》说："谚曰：白头种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熟知这些谚语。

关于种桃，还有一个故事。宋代诗人石曼卿在海州做官的时候，看到那里山高路险，少有林木花卉。他于是叫人用泥裹了桃核，抛掷在山里，几年以后，便满山花开，烂漫如锦。现在飞机播种，也使用种子裹泥的方法。

中国桃子，又称寿桃，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东方朔在《神异经》里说："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煮食之，令人益寿。"但世上哪里有那么大的桃子呢？

寿桃也叫蟠桃。神话传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王母娘娘庆寿，谓之蟠桃会。现在图画里画的寿桃，都是尖嘴形的一般桃子，而不是扁盘形的蟠桃。两者同名蟠桃，意义却不相同。

桃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三千多年前的中国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在歌颂了。"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天流"，唐代诗人刘禹锡用"山桃红花"四字轻描淡写出一幅春山春水的画面，为中国自然山水增添了许多美丽的色彩。长期传颂的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千多年来，对于无数追求理想生活的人，是巨大的慰藉。其他如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刘晨阮肇遇仙的传说，以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都是有关桃花的可贵

的文学遗产。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桃花，感情有多么深了。

深州蜜桃群桃王

深州蜜桃产于河北省深县，深县古称“深州”，因此得名。

深州蜜桃的种植，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深州地处燕赵南部，位于滹沱河故道处。那里属沙质土壤，由泥沙冲积而成，沙层较厚，地下水很甜，乃蜜桃生长之良地，故而所产蜜桃，皮薄肉嫩，汁甜如蜜。每个桃重约半斤左右，最大的可有1斤2两，被称为“桃中之魁”。

说起深州蜜桃的出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哩。

相传西汉末年，王莽篡位称帝，欲围住京城捉拿汉室后裔刘秀。刘秀幸得探报，随身只带二十多人，慌忙逃离京城南去。时值八月，天气炎热，他们一路之上不敢停脚，路经深州时已是黄昏，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再也走不动了。恰巧一位农夫挑着一担鲜桃从此走过，刘秀赶忙上前施礼道：“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有无吃的，能否行个方便？”农夫见问话人态度和善，仪表不凡，遂道：“这里是深州，人烟稀少，没有店铺，请吃鲜桃解渴。”说罢，将桃筐送到刘秀面前。刘秀也不推辞，便和部下一起吃了起来，不大功夫即将一筐鲜桃吃光。刘秀感激不尽，随手从身上取下一块玉牌。送给老农，说：“此玉牌留下抵作桃价，日后可持玉牌找我，定报答救命之恩。”说罢要告辞上路。老农阻拦道：“前面就是滹沱河，天黑难行，不如先到舍下暂歇，明早送你们过河。”刘秀谢道：“我等有急务在身，吃过蜜桃，精神已振，必须连夜登程。”老农见无法挽留，便自告奋勇，为之引路，摇船送他们过河。待王莽追兵赶到，刘秀已过河走远。

后来，刘秀做了皇帝，为报深州农夫相助之恩，便封他做了专管深州蜜桃的官，并敕封深州蜜桃为“桃王”。

深州蜜桃品种有二：一为“红蜜”，一为“白蜜”。“红蜜”个大特甜，世人称之为“魁桃”。

辛集鸭梨负盛名

很久以来，大家都熟知天津鸭梨。其实，“天津鸭梨”并不产于天津，因为天津是对外口岸，又是鸭梨集散地，故而人们习惯上以“天津鸭梨”称之。实际上，天津鸭梨是产在河北省的束鹿、宁晋、晋县、交河、肃宁等地，其中以束鹿县的辛集市为佳，那里是有名的“鸭梨之乡”。

辛集地处滹沱河故道，土白水软，气温适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辛集鸭梨已有两千年的栽培历史，属古优品种，秦汉时代已成园林，形成商品，行销外埠，果农赖以为生。几百年前，有心人把山东黄河之滨的梨树移植来几株，与当地野生杜梨嫁接，逐渐形成新的品种。因其梨把偏歪，形似鸭嘴，梨形又像鸭蛋，故取名“鸭梨”。

早年在内地，金秋时节常食鸭梨。它色泽鲜雅，皮薄肉细，脆嫩多汁，香甜爽口。因形美、味佳、营养丰富，早就贡于宫廷。《束鹿县志》载，魏文帝诏曰：“真定郡（今正定。当时辛集属该郡）梨甘若蜜，脆若凌，可消烦解渴。”又云：“邑东北、西南两隅，皆有此产。”

进入宋代，辛集鸭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习商贾，工于谋利，贸易每出万里远。”宋代诗人邵雍曾有诗赞曰：“愿君须爱红消梨，红消食之甘如饴。”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鸭梨在当时便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果品之一。

辛集鸭梨不仅是历代人民习惯食用的新鲜水果，以其色、香、味、形惹人喜爱，而且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它含果糖、葡萄糖、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和蛋白质、脂肪、硫胺素、核黄素、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清人吴仪洛在其《本草从新》一书中说：“鸭梨性甘寒，微酸”，具有“清心润肺，利大小便，止咳消痰，清喉降

火，除烦解渴，消燥消风，醒酒解毒”之功效。在民间，还常用冰糖炖梨，作为医治咳嗽之偏方，疗效颇佳。

炎夏酷暑话西瓜

炎夏酷暑，口燥心烦，吃几片凉如雪甜似蜜的西瓜，能解渴去烦。

内地最有名的西瓜，当属汴梁（今河南开封）西瓜。汴梁西瓜肉多籽少，瓤脆汁甜，清香爽口。民谚有云：“萧县石榴砀山梨，汴梁西瓜甜到皮。”

有关汴梁西瓜的种植，至今在民间流传着一个和东汉刘秀有关的故事。

相传，西汉末年，刘秀为了逃避王莽的追捕，带人马逃到开封以西的杏花营一带。时值盛夏酷暑时节，烈日当头，天气十分炎热，一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又饥又渴。当时又赶上从西面刮起的狂风，飞沙走石，使人眼睁不开，脚站不稳，将士们只好伏地而卧，刘秀面对此情此景，叹息道：“汴梁之地，好大的西刮（瓜）！”他原本想说“西风”，不知怎的将“风”说成了“刮”，成了“瓜”音。

说来也巧，刘秀的话音刚落，顿时风住沙停，又见杏花营一带的沙土岗上，遍地青藤绿叶，结出了许许多多的大西瓜。刘秀一见，又惊又喜，连忙招呼将士，快快摘来尝尝。将士一看，也不认识是什么果实，一个个都是圆溜溜、光灿灿的，摘下一个砸开，红瓤儿似火，汁甜如蜜。将士们正在饥渴难忍之时，就边摘边吃，好不痛快。刘秀吃得更加高兴。他们吃了半天，大家互相询问道：“咱们吃的，这叫什么呀？”一时谁也答不上来。刘秀思忖片刻，便说：“这是西风给咱们刮来的，就叫它西瓜吧！”从此以后，汴梁一带便年年盛产西瓜了。

当然这只是传说，汴梁西瓜也并非刘秀所赐。实际上，西瓜原产

于非洲，已有四千多年的种植历史了。西瓜又叫“寒瓜”，在汴梁一带从北宋时就广为种植。因为汴梁一带，气候温和，夏季雨水均匀，又多为沙壤土质，极适宜西瓜生长。

在古代诗词中，最早提到西瓜的，是南北朝诗人沈约的《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菰已满坡。紫茄纷烂漫，绿葑郁参差。”（寒瓜乃西瓜的别称）可见中国种植西瓜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宋代诗人范成大曾有诗云：“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宋代文天祥有一首《西瓜吟》，写道：“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听冰雪声。长安清富说邵平（邵平即召平，秦代广陵人，封东陵侯。秦亡后，在其原封地东陵种西瓜为生，生产出有名的邵平瓜），争如汉朝作公卿。”

元代方夔啖食西瓜时赞美道：“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生风。”

明代诗人瞿佑的《红瓤瓜》中云：“采得青门绿玉房，巧将腥血沁中央，结成唏日三危露，泻出流霞九酝浆。”诗中把色味俱佳的西瓜描绘得那么美妙，令人垂涎三尺。

清代学者纪晓岚也写过一首西瓜诗：“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指哈密瓜）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顾渚茶（顾渚茶乃唐宋时江苏宜兴出产的贡品）。”更是用对比的手法，说就是闻名的哈密瓜与西瓜相比，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而且它完全可抵得上消暑的贡品顾渚茶。

话说嘉兴无角菱

到过江南的人谁能不忆江南呢？秋后的江南水乡，果品中没有比菱角更能勾起我的怀念了。说起菱，人们就会想起两角弯弯的小青菱，四角尖尖的水红菱。唯独浙江嘉兴的南湖，有一种圆圆的无角菱。

采菱时节，嘉兴南湖的秋色，也最牵人梦魂。满湖碧油油的菱叶，与湖边的亭台楼阁相映，放眼观赏，顿觉心旷神怡。

清晨，湖面上沐浴着曦微曙光，亮如铜镜般的菱叶下，每株上都藏着八九只菱。成片的菱叶生长在一起，据说水鸟钻不进，鱼儿浮不起，所以称为“菱网”。一行行头戴笠帽的采菱女，坐在椭圆形的菱桶内，轻舒腰肢，双手敏捷地采摘。菱桶在菱网中缓缓前进，不一会儿桶内便堆得满满的了。

南湖的无角菱是嘉兴的特产。菱肉中含有蛋白质、糖、脂肪、钙、磷、铁、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菱每年清明下种，端午移植，中秋上市。新菱上市，鲜嫩甘甜，放在嘴里一咬，双手一搓、一捏，甜脆的菱肉便滚进了嘴里。霜降前后的老菱，煮熟后如同板栗，肉糯清香。把老菱堆在楼板上，或依墙隔上芦帘，让风吹干。这种风菱，肉嫩松脆，鲜甜可口。把老菱倒进水缸，或堆放在潮湿的地方，到了寒冬腊月，菱变成了黑色，洗去乌菱腐败的表皮，菱壳显得黄澄澄的，煮熟了吃，热腾腾，香喷喷，寒气顿消。老菱浸在活水塘中，到了来年清明前后，菱长出了嫩芽，据说吃了这种芽菱，到了夏天蚊虫不会叮咬。

菱还可做佳肴，菱烧豆腐、老菱烧肉，便是两道名菜。菱还可以酿酒、制醋、制糖，做成干果、蜜饯、糕点。菱壳可做染料，菱的茎叶可做饲料或肥料。菱还有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说：菱可解酒

毒、解暑、解伤寒积热、止消渴，干菱蔓可治水土不服。

南湖菱无角，相传是清乾隆皇帝赐的。一次乾隆游南湖时，见那南湖的烟雨风光，又闻采菱女的歌声，被那“蟹舍渔村两苹平，菱花十里棹歌声”的情景所陶醉，见那鲜嫩的南湖菱大喜，遂命献菱品味。不料菱角刺破了嘴唇，惹得龙颜不悦，脱口道：“小青菱无角岂不美哉！”谁知金口一开，第二年南湖菱便没了那尖尖的刺角，成了和尚头，形如一只只元宝，人们便以形取名“圆宝菱”、“和尚菱”、“无角菱”。

当然这是传说。不过南湖菱既无角，吃时不必防刺，这倒是真的。

浙江塘栖枇杷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端午前后，正是枇杷应市的季节了。

浙江余杭县的塘栖，江苏吴县的洞庭山和福建莆田的宝坑，为中国三大枇杷产地，其中以塘栖枇杷产量最多，品种也最好。该地枇杷林蜿蜒密布，冠盖浓郁，四时苍翠。枇杷初冬开花，每一花束由60～90朵小花组成。每逢隆冬腊月，百花凋零，枇杷花冒寒开放，洁白如玉，深为历代文人和画师所喜爱，称之为“枇杷晚翠”。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就曾常常于超山赏梅之后，来到邻近的塘栖，欣赏那团团绿树，累累金果的枇杷林，并就此创作了不少以枇杷为题材的中国画，其中有一幅题诗曰：“五月天热换葛衣，家家卢桔（枇杷的别称）黄且肥。鸟疑金弹不敢啄，忍饥束向林间飞。”塘栖枇杷品种主要有“白沙”与“红沙”之分。“白沙”，皮白肉黄；“红沙”，皮肉均黄中带红。

塘栖“白沙”，俗称“软刀”，为枇杷中的极品。其形略长，外有芝麻斑点，特征在肉软而厚，水分多，入口鲜甜，因此前人有“虽岭南荔枝，无以过之矣”的美誉。塘栖的“大红袍”，乃是“红沙”中的佳品，因果皮呈橙红色，果形较大而得名。它产量高，果子又耐于储运，故销路颇好。

枇杷原产中国，栽种历史已非常悠久。根据《周礼地官》：“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珍异葡萄枇杷之属。”文中有夹注，注解为东汉郑康成所作。由此可知，至少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枇杷已为中国人民作为果树栽植了。据说它最初产于四川的夹江，到了唐代，枇杷已被列为贡品，产地逐渐扩展到大江南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的诗句，来形容当时枇杷栽培的盛况。以后它又传往国外，日本、法国、英国、印度、阿尔及利亚、智利、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等许多国家都先

后从中国引进了枇杷树。

枇杷，又名“卢桔”，江南民间有“夏月枇杷黄似桔”的俗谚。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亦曾有“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桔微黄尚带酸”的诗句，故至今广东和港澳一带，还有人称枇杷为“卢桔”的。“枇杷”与“琵琶”谐音，容易写混。据说古时，有一个绍兴人收到一筐从塘栖寄来的枇杷，大如鸡蛋，喜出望外，但一看礼帖上却写的是“琵琶”，他就捧腹大笑，立即挥笔写了打油诗一首：“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丝管尽开花。”这诗虽意在讥讽，但把“枇杷”写做“琵琶”也不无道理。翻阅古籍，枇杷得名，就同琵琶有关。宋代《本草衍义》中，就有枇杷的名称是由于它的树叶形状很像琵琶的说法。

闽中佳果“漳柑福橘”

在园艺学上，柑、橘、橙、柚等果树，同属芸香科植物。但作为水果来说，它们毕竟是有差别的。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橘实小，其瓣味微酢，皮薄而红。柑大于橘，其瓣味甘，其皮稍厚而黄。”概括指出柑与橘的不同特征。

中国是世界柑橘原产中心，自长江两岸到闽、浙、两粤、云贵、台湾等省都产柑橘，各有佳种问世。

福州产的橘，漳州产的柑，自古驰名，人称“漳柑福橘”。明何乔远《闽书》说：“唐时本地有沙橘，尝贡。近时天下之柑，以浙之衢州、闽之漳州为最。”王世懋《果蔬》说：“柑橘产于洞庭，但终不如浙温之乳柑，闽漳之朱橘。”这里说的“朱橘”就是现在“福橘”的前身。可见漳柑、福橘在明代以前已为人们所赏识了。

漳柑佳品，首推芦柑。芦柑又称凸柑，有硬芦、有审芦。硬芦果皮作橙黄色，以皮厚于常柑，又颇坚硬得名，漳州俗称“八卦芦”，因为它顶部有若干放射状的沟纹，果心空，汁多味甘，为芦柑中之上品。果实十一月中、下旬成熟。审芦树体较为高大，果实形扁圆，皮呈赤红色。皮肉之间较为疏松。果心空处大于硬芦，果汁亦多，味甘中带微酸，十二月成熟。漳州的芦柑清时已饮誉海内外，凌登名《榕城随笔》说：“漳南产柑橘，其种不一，而颗皆硕大，芦柑为最，红柑次之。芦柑色稍黄，红柑则正赤，皆佳种也。”凌代所说的芦柑即系硬芦。至今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各国市场上，漳州芦柑盛名不减。

福橘亦称红橘，为福州、闽南一带著名佳果，树健果繁，产量高，性较耐寒耐旱。果实扁圆，顶端微凹，基部略隆起，果面色丹红，鲜艳夺目，皮薄，容易剥离。果心大而空虚，肉软汁多，味清甜微酸。

福州种植福橘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或云以其产于福州，故名（见《闽中纪略》）。宋韩彦直撰的《橘录》，是世界上最早研究种植柑橘的专书之一，书中称福橘为沙橘。他说："沙橘，取细小而甘美之称。或曰种之沙洲之上，地虚且干洁，故其味特珍。"施鸿宝在其《闽杂记》一书中，对福州城郊果农采摘丰收的福橘之欢乐景象，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橘园在福州西城外，广数十亩，皆种橘树。每秋熟后，红实星悬，绿荫云护，提筐担审而来者，讴歌盈路。"可知清时福州所产福橘已名闻于世。

福建之漳柑、福橘，古时都系上献给帝王家的重要贡品。唐时贡沙橘，已见《闽书》。《福建通志》亦有"闽为古代橘柚锡贡之地"的记载。王潭谓"闽橘之美，达于京师"（《闽游纪略》）。《漳州府志》称"岁贡芦柑"。闽人笃爱柑橘，以"橘"与"吉"音谐，"福橘"象征"福气"与"吉祥"，又是那么红艳艳的，怪不得一到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购备柑橘，相互馈赠，祝贺新岁纳吉多福。

柑橘果实甜美香润，富有营养，皮、核、叶、络均可入药。橘皮晒干后久存，中药称为陈皮，性温味甘，有理气消痰之疗效。橘核性平，味甘苦，可化湿止痛。橘络亦具通络化痰的功能，枯叶则能疏肝解郁。

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地丘陵多红壤、黄壤及无色土，土层亦较深厚。而且地势起伏，有一定的坡度，接受阳光的面积较大，通风透气良好，这些都是有利于柑橘生长的优异自然条件。秋冬果熟，山间江畔，树树挂满红艳的柑橘。一树或一二千颗，或多至三千余颗，如碧海中悬挂万盏灯笼，煞是好看。令人想起东坡居士"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佳句。

圆铃红枣的传说

近闻，山东茌平有一棵五百年的圆铃红枣树结枣四百余斤，堪称是枣树之王了。

谚云：“博（平）枣、莱（阳）梨、烟台苹果。”此中博平即茌平之古称。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载，圆铃大枣“润心肺，止咳，补五脏，治虚损，除肠胃癖气”。民间也流传着：“一日三枣，一辈子不见老。”“五谷加大枣，胜似灵芝草。”可见圆铃大枣的神奇妙用。

在茌平县志上记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有一年皇上出巡，路过博平，由于旅途劳顿，便在辇中睡着了。梦中见到处长满了未曾见过的大树，树上结了艳红透亮的果实，令人摘来一尝，甜脆可口，正在此时，地方官前来迎驾，美梦被惊醒了。

皇上闷闷不乐，便对博平知县说道：“孤王方才梦中见你县遍地长满一果，圆红玲珑，脆甜可口，明年定要将此果以贡品送京，若有违误，定斩不饶。”说完，起驾而去。

博平县令把栽种此果之事，压在了路边的小刘庄，并假借圣旨说：如明年种不出此果，就将全村老幼问斩。

这下小刘庄的百姓可就犯了大难。眼看到了第二年秋天，快到进贡的时候了，全村人个个焦愁万分，均知大祸难逃，家家传出哭声，纷纷准备后事。

有一位倒骑驴的老人路过这村，见此情景，问明缘由，说：“哎呀，这有何难，把这事交给我吧！三天头上，让你们见树见果就是了！”

可是，三天过去了，人们眼巴巴地等着，不但未见树见果，而且

连那倒骑驴的怪老头也不见踪影。

未料，到了第四天清晨，人们起来一看，村子的四周竟长出了一片片树林，上面挂满了鲜红透明，水灵灵的果子。人们奔走相告，醒悟地喊道：“哎呀，这不就是皇上所要的那种贡品鲜果吗？那倒骑驴的老头，准是仙家，这树一定是他给栽种的！”说着，大家往地上一瞧，果然有不少驴蹄印儿。于是全村人向长空作揖，感激仙人的救命之恩。

原来，那倒骑毛驴的老头，正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在此与众仙相聚途中，正巧碰上小刘庄有难，就决定搭救他们。于是他连忙骑驴来到王母娘娘的百果园里，走到红珠玛瑙鲜果树下，摘下一兜儿成果，骑驴连夜来到小刘庄。见虽已交了三更，却尚未过了三日的时辰，便把果实遍地撒开，不一会生出了嫩芽，长成大树，借着风露，又很快开花，结出了成串的鲜红果实。他一直待到东方破晓，才骑上毛驴离去。

这一来，小刘庄长出了皇上所要的贡品，可这果实的名字因张果老走得匆忙，没有说于众人，只是留下一张纸条，上写“圆铃红枣”四个大字。

从此，圆铃红枣便在茌平引种开来。

新秋常念炒栗香

糖炒栗子又快上市了吧！忘不了西单牌楼“西源兴德”干果子铺门口，支着大铁锅，锅里是黄得放亮的栗子和黑色的沙子，店伙挥动平铲，“沙沙”地炒着，老远地就能闻到那引诱人的甜滋滋的焦香。“现出锅的糖炒栗子”，伙计有腔有韵地吆喝着。“来半斤”！捧过来，隔着纸包，摸着还烫手，两个朋友，一边走，一边剥着吃，一边说笑……

北京的糖炒栗子是有悠久历史的。陆游《老学庵笔记》记有“李和儿”的故事：和儿本是北宋都城汴京著名卖炒栗的，金人打来，汴京沦陷，著名店户，南北流离，李和儿却被掳掠到北京，不能归去，日夜思念故国，后来有南宋使臣到燕山，他拿了许多炒栗，献之马前，并向使臣倾诉故国之情，说明自己就是昔日东京李和儿，说罢洒泪而去，这就流传下北京著名的糖炒栗子。

北京西面、南面广大的地区都出栗子，柴桑《燕京类记》：“要称渔阳，自古已然，其产于畿内者，在处皆美，尤以固安为上。”固安县就在京南，而且出产的是最好的栗子，不过人们总因为干鲜果品由西南山区来的最多，所以都盛称良乡栗子，甚至在苏、沪一带，“良乡”成了栗子的代名词，而且大书“天津良乡”于肆门，使人更有些莫名其妙矣。

北京栗子的好处，在于又甜、又糯，比南方的大板栗子质量好得多，尤其入冬之后，天气越冷，栗子的味道越甜，炒时要把栗子和粗沙子混在一起，一边用大锅铲炒，一边往上洒饴糖水，炒熟后，铲在筛中，筛去沙子，便剩下紫光光，热手的糖炒栗子了。把筛出来的沙子，趁热倒回锅中，再炒第二锅。

栗子的吃法甚多，除炒栗之外，还可做菜，著名者有“栗子焖鸡”，点心有“栗粉糕”等，这些都不想细说，使我最怀念的是“大酒

缸”的“卤煮五香栗子”，把每个栗子用刀先勒个“十字”，然后加盐、花椒、大料等煮熟，剥来下酒，真是滋味隽永，比五香卤煮花生好吃得多，想起来真有些口角生津了。

新疆特产哈密瓜

眼下，在瓜果杂陈的时节，买个哈密瓜吃，已是很平常的事儿了。可是，旧时京华，哈密瓜却是稀有之珍。

哈密瓜本名甜瓜，又称甘瓜，共有二十多个品种，形状不同，风味也稍有差异。如“香密瓜”肉很软，有浓香；“黑眉毛”皮上有一条条黑色条纹，真像维吾尔族姑娘的眉毛；“红心脆”，呈淡红色，味甜脆；“老头乐”瓜肉细嫩，入口就化。还有些其他品种，也大都是夏末秋初上市。尽管品种不同，但都有共同的特点：味甜如蜜。据说，在新疆吃哈密瓜，都是新摘下来的，不仅甜，而且汁多，吃完瓜必须洗手和嘴，不然会黏黏糊糊，整天难受。

顾名思义，哈密瓜理应产于哈密。其实不然，新疆各地都种此瓜，而且都很甜美。只是由于两百多年前，哈密王曾把他管辖下的鄯善出产的甜瓜，当做贡品，进献给清朝乾隆皇帝。乾隆吃后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瓜？”那些人也不知其名，只知是哈密王进贡来的，信口答道：“这是哈密瓜。”哈密瓜遂由此得名，迄今未变。清代学者纪晓岚谪戍新疆路过哈密时，曾经有过关于哈密瓜之记载：“哈密瓜贡品只熟至五六分，途间封闭包束，瓜气蒸郁，至京可熟至八分，运熟者即霉烂矣。哈密王言，此地土暖泉甘而无雨，故瓜味浓厚……”所以，说哈密是哈密瓜的故乡，也并非舛误。

在新疆以外地区吃哈密瓜是有季节性的，可是，据说在新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因当地人贮瓜有方之故也。他们贮藏的方法有两种：挂藏和架藏。挂藏是用四根绳打结将瓜兜好，再打结，放上第二个瓜，这样依次缚成一串，挂在防风寒的地窖里。架藏则是存放在地窖中一层层的木架上，可存放半年以上，瓜味不变。

金秋犹忆山里红

金风飒飒，天气渐冷，不由得想起了应时果品山里红。

成熟于深秋的山里红，因其上市时间最长，且能制作许多美味食品，故从清代中叶至民国初期，一直被果行中的少数人所垄断。其垄断的凭照，便是皇帝颁发的一张“龙票”。这张龙票可以世代相传，是垄断者的祖先用生命换取来的。

清代，在京都大宗贩卖山里红的，彼此竞争十分激烈，殴伤诉讼屡屡发生。为解决这一矛盾，朝廷遂设油锅与钉板，有敢跳油锅或滚钉板者，便赐予龙票（黄绢上印有龙形，上书某某刚烈可悯，恩准世代经营字样），而胆怯的同行，只得甘拜下风，改弦易辙，另谋生路。

死者的子孙们，持有至高至尊的龙票，便可以开设大规模的货栈，一手左右着果农，一手控制着小贩。

早年，凡在北京沿街叫卖山里红的小贩，总是用较粗的双股白棉线将数十个山里红穿成一个圆圈儿，犹如老和尚念珠儿一般。每一圈儿称做“一挂”，数十挂山里红，或斜披于一肩，或放于一臂，走街串巷，一路吆喝着：“还有两挂啦——山里红哟！”用棉线穿起来卖本已奇怪，而胳膊上明明放着许多挂，为什么却总吆喝着“还有两挂”？原来，这与清王朝的“朝审”有关。

清代刑部于每年霜降后，将监中重囚的犯罪情节，摘要制册，送监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銮仪卫等各司官，按册点名，重新开审，分别情实、缓决、可矜等项，请皇帝裁定，谓之“朝审”。

当年朝审地址，在天安门金水桥西侧。囚犯之亲友，俟开审完毕，探询其家人未入死囚册内，遂伫候于西长安门（故址在今中山公

园与中南海新华门中间）外，囚车过时即趋前道喜，并购山里红两挂，分披于囚犯肩头，十字交叉，名曰“挂红道喜”。小贩投机，每每要大价，买主因逢喜事而并不还价，于是一日之营业即可获巨利。

自入民国后，不再举行朝审，“挂红道喜”的风俗随之泯灭，而小贩犹墨守成规，绝不将整挂的山里红分披于两肩，恐与囚犯形似。吆喝时仍沿袭当年的用语：“还有两挂啦——山里红哟！”

喝了蜜啦——大柿子

常常想起词曲大家顾羡季先生。顾先生讲话极为风趣，善于辞令。他爱听戏，也爱谈戏，讲课时常爱用戏来打比喻，常说：“我就爱听余叔岩的戏，又沙哑，又流利，听了真痛快，像六月里吃冰镇沙瓤大西瓜，又像数九天吃冰冻柿子一样，真痛快呀——啊！”说完了，还做个表情“啊”一声，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想起来，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顾羡季夫子作古也有二十多年了，但这旧事还历历如昨。沙瓤大西瓜南北各地都有，并不算出奇，而这三九天的冻柿子，却实在值得怀念，也只有北京三九天的冻柿子才值得词人的如此称赞。

北京是一个出产柿子的地方，西北山一带，漫山遍野到处都有柿子树。《光绪顺天府志》记云：“柿为赤果实，大者霜后熟，形圆微扁，中有拗，形如盖，可去皮晒干为饼，出精液，白如霜，名柿霜，味甘，食之能消痰。”柿子的种类很多，如硬柿、盖柿、火柿、青柿、方柿等，全国各地都有出产。其中北京出产的最多的是盖柿，就是所说的“中有拗，形如盖”的；其次出产一些小火柿，俗名“牛眼睛柿”。北京西山一带出产柿子的山村，也晒柿饼，但不多，因为离城近，大部分都运到城里来卖了。柿饼是河南、陕西一带的特产。“柿霜糖”是柿子的精华，晒柿饼时的重要副产品，性极凉，是治小孩口疮、咽喉炎等症的特效药，吃也很好吃，又甜又凉，入口即化，这也是河南的名产。

在北京吃柿子，最好是冬季数九天吃冻柿子。北京冬天室中生火炉，天气越冷，炉子弄得越旺，也越干燥，人们反而想吃水分多的、凉阴阴的东西。把冻得像个冰坨子的大盖柿买来，洗干净，等到大家饭后围炉聊天的时候，把这冻柿子放在一盆冷水中“拔一拔”，等到全部变软之后，就可吃了。这时柿子的内部组织，经过一冻一融，已经

全部变成流体，用嘴向柿子皮上轻轻一吸，便可把冰凉的柿子汁吸到口中，那真是又凉又甜，远胜吃雪糕。难怪北京卖柿子的都吆喝：“喝了蜜啦——大柿子！”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

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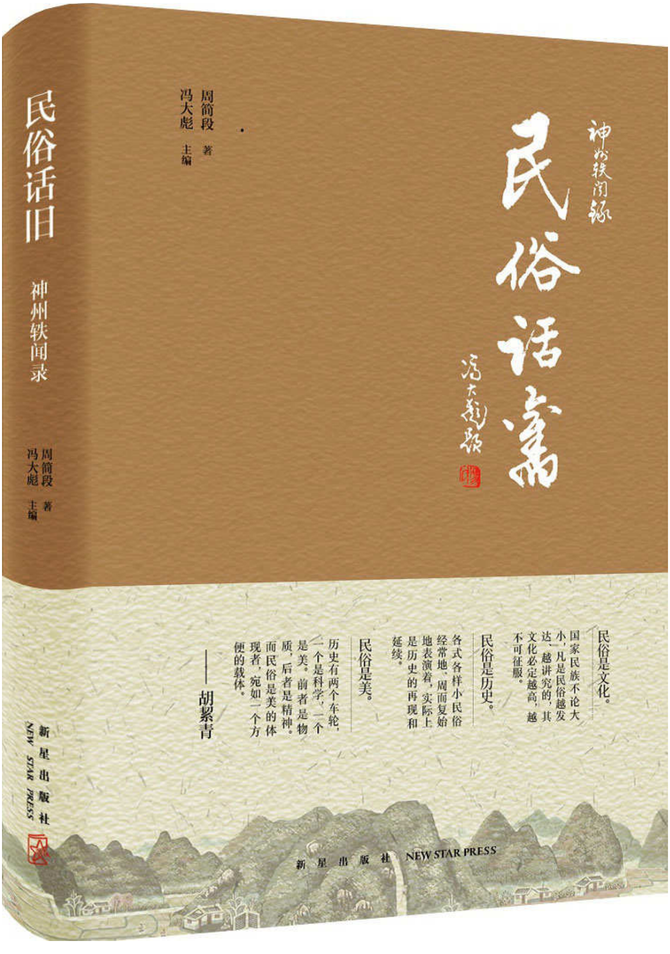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民俗话旧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民俗话旧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民俗是文化。
国家民族不论大小，凡是民俗越发达，越讲究的，其文化必定越高，越不可征服。
民俗是历史。
各式各样小民俗经常地、周而复始地表演着，实际上是历史的再现和延续。
民俗是美。
历史有两个车轮，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美。前者是物质，后者是精神。而民俗是美的体现者，宛如一个方便的载体。
——胡絜青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民俗话斋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话旧／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6

（神州轶闻录）

ISBN 978-7-5133-2637-7

I．①民…　II．①周…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07号

民俗话旧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37-7

定　　价：36.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民俗偶记

“书春”逸闻

新春话年画

北京人买年货

北京人年关搪债

门神·挂钱儿·窗户花儿

平民之家做年菜

佳肴美酒醉除夕

爆竹声中一岁除

迎春福、禄、寿

探亲访友话蒲包

北京人吃饺子

北京“杂拌儿”

春节逛厂甸

晚清官场拜年习俗

侗族春节习俗

春节话青田年糕

漫话“初五开市”

元宵之夜灯如昼

舞狮与耍龙灯

“竹马舞”琐谈

曲阜元宵点天灯

春节接姑奶奶之俗
正月十六妇女走百病
朝日坛与太阳糕
二月二，龙抬头
蟠桃盛会三月三
清明时节话上坟
端午拉杂谈
六月六天贶节
“七七”鹊桥会
放荷灯与烧法船
月到中秋分外明
九九登高倍思亲
冬至大如年
福州冬节搓丸风俗
《九九消寒图》
腊八节的来历
“小年”祭灶
时令记趣
春饼、春菜和春酒
春回大地话风筝
立夏尝新
热在三伏
伏天话扇
六月浮瓜
五月旱与六月雨
夏虫诗情
炎夏之冰
暑滞夏和贴秋膘
蟋蟀声声秋意浓
秋风吹来烤肉香

北京的糖葫芦
十月一，送寒衣
寒冬话火锅
风雪大酒缸
围炉夜话
冰床乐事
腊月京城有鲜花
市井闲趣
旧京庙会
民间花会琐谈
京城处处扭秧歌
闲话踩高跷
骑毛驴逛白云观
雍和宫“打鬼”
荷花市场拉洋片
北京民间杂戏
古拙的民间玩具
敲糖锣与捏面人
“鬃人儿”与“毛猴儿”
春意盎然小金鱼儿
鸟趣
空中音乐——鸽哨
玩交嘴雀
驯养苍鹰
冬日斗蟋蟀
驯蛙、驯蚁艺人
哈巴狗与袖狗
角灯·泥花·铁蛋
金华斗牛风俗
曲阜祭孔

赵州龙牌会
太行山麓“捉黄鬼”
妙趣横生“抬花杠”
蜀中药王会盛况
金陵茅山会
敖包相会
安塞腰鼓
巷陌风情
北京的五大“镇物”
京华“八”字何其多
龙年说龙俗
老鼠入年画
老北京人的称谓
旗袍的变迁
闲话小脚儿
柳阴蝉鸣话胡同
北京四合院琐谈
天棚·鱼缸·石榴树
里巷徜徉话门墩儿
纸窗之趣
老年间的北京儿歌
长街叫卖声
旧京百业话绝技
旧京测字先生
闲话北京“打鼓的”
茶馆·茶摊·大碗茶
井窝子与挑水的
闯线·摸驴·拴娃娃
京都花轿
京城澡堂子

街头棋摊
乞丐王国种种
漫话拉洋车
北京的四轮大马车
驼铃断想
旧京三次大出殡
平湖西瓜灯
晋南民居地窨院
满族风俗拉杂
旗人吃喝习惯
赛画眉
渔民婚俗情趣
苗族儿女的自由恋爱
畲族人的婚恋习俗
广西盘瑶入赘婚俗
浙东生育风俗
绍兴小儿“寄名”或“偷名”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

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出版社要我为《神州轶闻录》中的《民俗话旧》写序，可能因为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篇幅说的是北京的民俗，而我是北京人，今年已九十余岁，老矣，要老北京人谈老北京的民俗，顺理成章吧。我便遵命了。

先谈谈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首先是感到亲切。凡是熟悉的东西都是亲切的。书中所谈大多是我非常熟悉的，读起来备感亲切。虽然，有不少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甚至不复存在。而人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对熟悉的东西，越是不存在的，越是有一种爱恋之情悄然产生。在迷茫中、在惆怅中、在惋惜中，流出一丝丝苦涩来，因为熟悉和亲切的东西竟离我而远去。那么，留在书中的文字便更珍贵了。

其次是觉得丰富。篇目多，涉及广，这也很难得。书中所叙，几乎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并不奇特，如果不是作者提起，也许完全会被人们忽略过去。正是这些一般人视而不见的事，专门地被提拎了出来，集中了起来，反而令人吃惊，叫人不得不佩服——佩服作者的好眼力，也佩服他的好记性！

我还欣赏作者的写法。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纪实，把个人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缓缓道来，充满了感情色彩，颇似老人夏夜纳凉时的漫谈，平实自由，随便一张嘴，便是故事，但保证是真实的，都是亲身所见、所闻、所遇，信手拈来全成文章。正是这种随想式、即兴式和第一人称的描述，保证了此书的趣味性，同时也决定了上面提到的亲切感和丰富多彩。

民俗是绝对不可轻视的，不要因其“俗”而小看了它。为什么？

正是民俗的一个一个小单元构成一个民族。试想，如果没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能把中国人和朝鲜人或者日本人区别开吗？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可以把十亿人丝毫不费劲地拢在一起，不用任何人发令，一起吃饺子、吃元宵、吃粽子、吃月饼，是何等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伟大的力量！

民俗是文化。国家民族不论大小，凡是民俗越发达、越讲究的，其文化必定越高，越不可征服。因为，民俗是一种内聚力。这种内聚力越强劲，它的文化就越是出类拔萃、光芒四射，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扛得过去。不信，把民俗统统取消，独特的文化色彩必定顿时消亡，民族绝对是一盘散沙。不要说八年抗战那样的大风大浪，就是小沟小坎也难以迈过，因为它是维系着亿万人的精神韧带。所以，民俗又是潜力，埋藏得挺深，而层次很高。

民俗是历史。一个民族总有一种历史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民心团结的原动力。而民俗，正像伟大的古迹一样，便是这种心态的提醒者。各式各样小民俗经常地、周而复始地表演着，实际上是历史的再现和延续。民俗，在历史的串珠中，扮演着将珠子串挂在一起的那根绳索的角色。而且是在每个家庭中，在每个人的心中，无所不在。

民俗便是美。历史有两个车轮，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美。正好，前者是物质，后者是精神。而民俗是美的体现者，宛如一个方便的载体。北京人，有审美的天性，所以，北京人的民俗一向厉害。中国的希望，也许，就在于把科学的利用和美调和起来。那时，中国能产生出黄金时代。

这么说来，民俗真了不起。

应该热爱民俗，应该尽量多地保存那些优秀的古老的美的民俗。

应该多多地研究民俗，多写，多上镜头，多表演，多实行。

民俗万岁！它，真值得万岁！

胡絜青

1991年7月31日

北京，安定朴竹室

民俗偶记

“书春”逸闻

每到腊鼓频催的时候，素有文化古都之称的北京，家家户户和买卖商铺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过年了。这时候，在街头就会看到许多点缀过年的景色。

一过腊月初八，马路两旁的便道上便张贴出红纸条，上面写着“书春”“借纸学书”“结翰墨缘”“点缀年华”等字。这是当年一些潦倒文人借着除旧迎新，做一些临时性的笔墨生意，在街头预先贴出的广告。到了腊月二十三前后，书写春联的小摊一个个地林立街头。春联大都是一般内容，像“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

从我记事起，这种“书春”的生意是一年比一年清淡了。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当时有些文人到临街各大商铺挨门逐户求写春联，其实这是“文丐”行乞于市。但文丐走进每一家商铺，都深受欢迎，春联写完后除了付笔资外，有的还备有烟茶招待。这种现象曾引起我的好奇心，便走到一家相熟的店铺去打听，闲谈中才知道这里有一段奥秘。

潦倒文人岁末走向街头商铺乞书春联，是天津的习俗，当地人把这种习俗呼曰“触黑”。清废帝溥仪被逐出宫，定居在天津后，常和清室遗臣铁良、罗振玉及庄士敦等人来往。通过这些遗臣向溥仪求书的政客很多，他们把溥仪的字当成最后一代皇帝的“御笔”加以收藏。溥仪听说天津有“触黑”的习俗，颇有感慨。他想，一个皇帝沦为普通百姓，与一般潦倒文人何异？又想到过去听过的一个传说：孔子周游列国时，穷困潦倒，曾以书法行乞于市。于是在岁末之际，他也化装成一个窘困不堪的文人，带着纸墨笔砚来到街头，向各大店铺乞书春联。商铺大多以白眼相待。

溥仪每写一副对联，索要铜钱三五枚。有的店铺付了笔资后，当着他的面儿便把刚写的春联撕得粉碎。溥仪忍气吞声接连走了几十家商铺，写春联七十余副，每副春联都署有“青巾”二字。

第二天，溥仪便派人以每副对联一百元的高价回收落有“青巾”下款的春联，结果只有四副保存完整的被买回。这消息传出后，人们才知道“青巾”原来是“清帝”的改写，所有让溥仪写过对联的铺商都追悔莫及。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北京。有的潦倒文人故意试学溥仪，各商铺唯恐再有第二个“青巾”出现，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从此对书春的文丐再也不敢怠慢了。

新春话年画

说到新春，不禁联想起中国的年画来。

据历史记载，年画最早起源于门神画。汉《风俗通义》载：“……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可见门神画在汉以前已经有了。晋《荆楚岁时记》又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与此相关的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的传说。人们迷信“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便用彩色画神荼、郁垒的形象，挂于门，以消灾纳福。这就是最早出现的门神画。到了唐代，门神普遍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形象。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梦中常常听到鬼的呼叫，夜不能寐。他把此事告诉群臣时，秦叔宝出班请命，愿与尉迟敬德立宫门把守，以防鬼魅。太宗准奏，当夜无事，于是画二人像于宫门，邪祟从此绝迹。后代沿袭此法，二人的画像就成了门神，并成为年画的一个传统题材。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年画，是南宋版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此图一般称为《四美图》，画的是王昭君、西施、貂蝉、杨贵妃四大美人。宋代出现的《岁朝图》可以划为年画之列，但它只是文人们所特有的年画形式，可称之为“书斋年画”。到了明清时，随着版画艺术的发展，年画艺术也越发繁荣起来。由于年画的出现，使绘画艺术开始从庙堂、书斋走向普通百姓之家，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进步。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年画作坊也逐渐发展和扩大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北武强、山东潍县等，且各有其地方特色。

杨柳青年画精工细作，鲜艳雅致，题词讲究，可称北方之首。桃花坞年画严谨精致，讲究透视，注意明暗，可谓南派之魁。潍县年画也有很强的民间特色，造型夸张，色彩对比强烈，富于装饰性。

随着年画的普及，年画的题材也日益丰富，在原有门神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财神、灶神、麻姑献寿、天女散花、麒麟送子、钟馗卫福等。

北京人买年货

中国人几千年来总把过年当作一件大事。过年之前要做很多准备，要买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戴的、耍的、供的，干的、鲜的、生的、熟的，统名之曰“年货”。

《京都风俗志》云：“十五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星罗棋布。”北京年货种类之多是全国各地都比不了的。赵冈先生在其《考红琐记》中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过年情景时，有满人风俗，令人感到奇怪。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北京在清代二三百年中，都是汉人、满人，北方人、南方人杂处的。在上层社会，即官僚阶层中，各种风俗交流更普遍。满人特意学苏杭人的饮食起居习惯，汉人刻意学满人的礼数、官派，这就从各个方面混合成特殊的“北京味”。复杂的年货，也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反映。

北京的年货如按大类分，可分饮食、衣着、日用、迷信、玩耍、点缀六类。饮食中大路货如猪肉、羊肉、鸡鸭是最普通的；鹿肉、野鸡、冻鱼等则都是来自山海关之外的关东货；而水磨年糕、糖年糕、冷笋、玉兰片之类，则又是江南的东西。衣着各时代不同，那时除去“旗装”而外，也讲究南式。年货中日用品不少，来自南方的有纸张、竹器、瓷器等。祭祀用品是旧时年货的大宗，如线香、锡箔、木版印的门神和灶王爷、供佛的纸花和蜜供等，其中折“元宝”“锭子”的锡箔则全来自南方。玩耍的东西就更多了，儿童的、大人的玩意儿，都不分南北满汉。《春明采风志》云：“琉璃、铁丝、油彩、转沙、碰丝、走马、风筝、毽毛、口琴、纸牌、拈圆棋、升官图、江米人、太平鼓、响葫芦、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文中所举虽说已经不少，但还遗漏了一些很重要的玩耍的东西。如一般人家都要买些爆竹——百响、麻雷子、二踢脚（即双

响）、起花、太平花等，这又是介乎玩耍和迷信之间的东西；至于骰子、纸牌等，则是成人的玩具；点缀岁时的清供如水仙头、佛手，则都是来自南方了。

一进腊月，各闹市皆拥挤不堪，都是买年货的人。但各种东西也都涨价了不少，商人趁机做一笔好生意，故有“腊月水土贵三分”之谚。

北京人年关搪债

早年抄下一小段《债精老祖传》的序。原作很长，只抄下“序”段，其正文则模模糊糊，有记有忘矣。《债精老祖传》序言曰：

> 盖闻：无年不达，有债须搪。人握拳捋袖而来，我仍不给；抱头鼠窜而去，你算活该。债主之声，谁人不怕？敲门之响，半夜心惊。乃者，我债精老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不惜以身作则，教后代以妙法，且喜及时行之，使债主以头疼。今当岁暮，正搪债之佳期，恭录数行，作后人之榜样。如有怕债者，请往窟窿山。

昔北京每届年关，正穷人遇难之时，债主临门，气势汹汹。笔者昔日同院一家邻居，为给太夫人“做寿”，欠棺材铺款若干。每届年关，债主来家索债，恶语相加，威胁备至。此邻居胆战心惊，百般赔礼。笔者目睹，良感同情。其后于某刊物上读了《债精老祖传》一文，滑稽诙谐，大感兴趣，除将其序言抄下外，并将该杂志示给邻人看，不吝替“债精老祖”“传经”。

“债精老祖”传授搪债，确有妙方：其一，挺身而出曰：“我没钱！”说：打官司失感情，纵然押起来失去自由，对你也没好处，何况一押，我更没有办法还你了，不如容几天。万一不信，你可到我家看，爱拿什么拿什么。不过你拿去了，我就没的用了，既承情于前，你就好人做到底得了。照此说法，债主心也是肉长的。

其二，硬顶。是好小子不躲债，得搪债。三十晚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坐在家里一文不出，把债主打发走，才算本领。讨债分

文讨、武讨，搪债分软搪、硬搪。但人皆有感情，所以都是文讨、软搪为多。可说：生我者父母，救我者你债主，你既然待我好，我就应当报答你。债主说：你还钱就算报答了。他说：对呀！可我就是还不起，没有你不明白的，你比我明白得多。

其三，手持菜刀一把，去找债主，别等他上门。大声说：你借给我钱，感激不尽，我天天愿还清，老筹不出钱来，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今特登门自刎，愿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说完，等人家拉的时候再抹脖子，越拉得凶越要抹。见台阶就下，二大妈出来一劝，赶快回家。这笔债，明年见了。

搪债功夫如此，可谓绞尽脑汁矣。

门神·挂钱儿·窗户花儿

门神、挂钱儿、窗户花儿，这三样儿是老北京人欢度春节必不可少的年货。对于穷人来说，宁可不吃除夕的饺子，也不能不贴门神。

贴门神，是旧时驱恶避邪的迷信活动。门神由桃符演变而来，两汉后已逐渐成了人们避凶纳福的偶像。据汉刘安《淮南子》载：相传东海度朔山有一桃树，树下有鬼门，总管万鬼出入，门边有神荼、郁垒二神把守。恶鬼若为非作歹，二神即用苇索捆之喂虎。后人遂将二神像画在桃木板或纸上，置于门扇，因谓门神。

门神历来有各种版本，北京多沿用唐代传下来的“白脸儿”秦叔宝和“黑脸儿”尉迟敬德二位武将的木刻版画，大都来自天津的杨柳青。北京老式家庭皆讲究供奉福、禄、寿、喜、财诸神像，春节期间香火不断，供品满案。唯有二位门神冷冷清清地站在大门上，从来不受香火，更不曾享受果品、面点之类的供品，确实成了只讲奉献、不图索取的“公仆”。

旧时门神的尺寸分三种：一曰“大门之神”，高四五尺，宽二三尺，供府第和买卖人家贴于东门或整间大门上；二曰“街门之神”，高二尺，宽一尺，供一般家庭贴于小街门上；三曰“屋门之神”，幅小而精致，所绘除手执槊钺的黑白二神外，另有“麒麟送子”图——两个梳着太子冠并涂脂抹粉的胖娃娃，各乘麒麟驾祥云而来，象征大吉大利。

贴挂钱儿具有驱逐穷神的意思。传说周朝时姜子牙封其妻为“穷神”，怕她坑害穷人，令她“见破即回”。后人为避穷神，将纸剪破贴在门上，遂成贴挂钱儿之俗。

北京所贴的挂钱儿，有糙制与细制之别。糙制者，系用普通红灯花纸雕成，长一尺，宽五寸，中雕“吉祥有余”“四季平安”等吉祥语，四周连缀轱辘线儿，下方缀以穗子，贴于门檐、房檐下，或贴之于佛龛或财神洞前面。细制者则用红毛边纸雕成，刻工尤精，价亦昂，非殷实家庭莫敢问津。

另有一种满族家庭特用的白挂钱儿，是用“南连史纸”精雕而成。四周的轱辘线儿围着一个满文“灵”字，专供满族旗人贴在西墙所悬的“祖宗板子”上。此外，为已故父母“守制”的人家所贴挂钱儿为蓝色，而庙宇梵宫则贴黄挂钱儿。

与门神、挂钱儿交相辉映的是红彤彤的窗户花儿。早年之北京，玻璃尚未普及，门窗皆用木条插榫儿，糊以洁白的高丽纸。临近春节必换新窗纸并贴窗花儿，以点缀年景。其图案有简有繁，简者不外乎小猫、小狗、小公鸡，繁者则“莲生贵子”“合和二仙”“果老骑驴”“二龙戏珠”“凤凰戏牡丹”“狮子滚绣球”之类。白纸红花，色差鲜明，映带屋宇，喜气洋洋矣。

平民之家做年菜

北京的家庭主妇，大都心灵手巧，且能安之若素，一日三餐，崇尚节俭，一向讲究物美价廉。即使是春节期间的年菜，亦不求奢靡，总以好吃又不贵为原则。

主妇们自幼磨炼出来的一双巧手，每逢春节便越发有了用武之地。花钱有限，而做出的菜肴却是雕饰各样儿，样样儿漂亮，样样儿清香，样样儿可大快朵颐。

以甜凉菜论，当以“辣菜”“芥末墩”“玫瑰枣”“糖醋酥鱼”为绝妙之品。

辣菜是用芥菜头切片，大萝卜切丝，煮熟后连汤倒进小坛儿里，密封不透气，经三四日即成。食用时佐以香油米醋，其味辛辣钻鼻沁肺，汤味儿尤美，大有健脾开胃去油腻之功效，老少咸宜，无不喜食。

芥末墩本系满族小菜儿，以其味美而汉族竞相效仿。将叶儿多、帮儿嫩的白菜心切成一寸厚小段儿，以沸水焯半熟为度，撒以烘烤后的芥末面儿及白糖、高醋。俟凉透后食之，香甜而酸辣，清凉而爽口，佐酒下饭皆宜。

玫瑰枣以含糖量极高之密云小枣为主料，洗净后去蒂，拌以糖桂花煮之。其色紫红而油亮，味甘甜并有浓郁的玫瑰香味。

糖醋酥鱼非野生的小鲫鱼莫属，其味之鲜全在一个“野”字上。去其内脏，洗净置于沙罐中，调以葱、姜、蒜、酱油、米醋和白糖，微火焖三个多小时，则鳞刺皆酥，入口即化，甜酸适口，味道鲜美，实

乃鱼中之佳品也。

主妇们泡制的“白肉”，荤而不腻，与众不同。其名又称“白片肉”或“白煮肉”，本是满族人祭祀及平时常吃的风味菜肴，汉族人亦多喜食之。主料选猪臀尖，切成大块入锅以清水煮熟，泡于汤中，待凉捞出，切成薄片，佐以蒜泥、酱油、韭菜花、辣椒油食之，其香嫩适口而远胜于炖肉。满族兴盛时，除夕必煮白肉两三锅，除祭祀所用少许外，其余皆赠予亲友及邻居品尝，分文不取而只重联络感情，盖古之遗风也。

“豆儿酱”与“炒咸什”，是颇为烦琐的两道年菜，其名称与内容已渐渐被人遗忘，而知其做法者，已寥寥无几矣。

豆儿酱之用料，有猪爪尖、熏豆腐干、青豆、黄豆、蚕豆、花生仁、甜杏仁、核桃仁、胡萝卜丁、腌水芥丁以及葱白、姜片、花椒、大料、酱油、料酒凡十六种，以铁锅或铜锅先后煮之合为一体，熟而不糜为度。然后倒盆内，凉后凝结得十分筋道（北京土语，谓食物有韧性）。以铁铲切取入盘中，色彩斑斓，诱人食欲，味道之美难以言传。如今市场所售之“肉皮冻”与豆儿酱相比，当弃之垃圾桶也。

炒咸什者，即将酱瓜儿、酱萝卜、酱疙瘩等十样咸菜细切成丝，以凉水拔去咸味儿，加香油、芝麻、白糖、香菜用文火炒之可也。味道极其清香爽口，为满族传与汉族之绝妙年菜。

佳肴美酒醉除夕

北京人欢度除夕，必以茵陈酒为第一佳酿，百枝酒则次之，佛手酒又次之。酌饮时，在似醉非醉之间，意到辄止。如果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那就未免有煞风景了。

茵陈即是青蒿的嫩枝，具有清利湿热的功效，用它泡制的酒就是有名的茵陈酒。遗憾的是，当年在北京酒店里出售的茵陈酒，由于加糖太多，常使此酒名不副实。要避免上述欠缺，最好的办法是亲手泡酒。过去一入腊月，常见到一些风尘仆仆的农家少年，站在前门外大栅栏的马路边上，手拿篮筐出售茵陈。那鲜嫩的茵陈青翠碧绿，还隐隐透出一股泥土的芬芳，因此极受顾客的青睐。往往是卖茵陈者刚一出现，眨眼工夫就已货净篮空。

除夕饮酒，第一要紧的是酒具。上桌的酒杯须是红花蓝边，晶莹雅洁。要透出红火，以示吉祥。其次是酒肴，应以时令为宾，颜色为主，素菜如温朴拌白菜丝、麻酱拌萝卜丝、炒黄瓜拌胡萝卜丝等，甜脆适口，色彩鲜明，能给人一种喜悦的感觉。荤菜如清蒸鳜鱼、红烧鲤鱼等，肉质鲜嫩，热气腾腾，能给人一种喜庆的感觉。此时，再能端上一盘炒蛤肉来，自然更会给夜餐锦上添花。须注意者，凡入席的菜肴均要十分充足，便于随吃随添，以示富足有余之意。

老北京的家庭欢度除夕，惯常借助酒的色、香、味来荡起家中的欢乐气氛。澄绿的茵陈酒、嫩黄的橘皮酒，皆以色媚人，爽神悦目。槟榔汽酒则香气四溢，小饮数口，唇齿生香。莲花白酒则蕴蓄醇厚，口味悠长。此外，葡萄酒、香橼酒、木瓜酒等亦可入席。但要尽力做到扬长避短，如能令餐桌上出现五彩缤纷、香气沁人的场面，那就是拼配得恰到好处了。

除夕晚餐，一般都是在夜幕重重、爆竹四起的时候开始。此时家人团聚，轻酌慢饮，其乐融融。待到夜深酒阑，人声渐寂，这时可以把房门打开，让清凉的空气将阵阵火药味携进屋来。然后关好门窗，添旺火炉，在隐约的鸡鸣声中甜甜睡去，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爆竹声中一岁除

北京这座文化古都，集中国几千年民俗之大成。以春节期间所燃放之爆竹烟花论，那个中的文化、历史、沿革及诗一般的情味儿，足可以写出一部书来。

新春燃放爆竹的风俗始于汉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籍中描述北京元日情景时说：“闻爆竹声如骇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

古人放爆竹，相传起源于“庭燎”。庭燎即庭中照明的火炬。《诗经·小雅·庭燎》曾有“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的记载。古之庭燎用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受热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劈啪”之声，以驱逐瘟神疫鬼。据说，古时候有一种凶恶的怪兽，叫“年”，每逢除夕就出来害人。但它怕响，怕红，怕火，春节放爆竹就是为了驱魔逐年。现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一种用整根大竹做的“高升”，里面装上火药，长达几丈，重几十斤，要搭在架子上点燃，能高飞几十丈。

火药发明后，将其填充在竹筒里燃放，此即爆竹之始。据宋朝高承《事物纪原》所说，三国时的发明家马钧，是第一个用火药制作爆竹的人。

由爆竹演变而成的烟花，始于隋唐，盛于宋。北宋时烟花制造已很精致，出现了“用卷纸裹火药，燃之发声”的“起火”“爆仗”。这是当今火箭之雏形。有的爆仗还做成果子或人物的形状，成为玩具，燃放起来很有趣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除旧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元日》诗也一直传诵至今。

后来，爆竹又发展成为能喷射火花的“花爆”“花筒”“花盆”之类，更是灿烂缤纷，美丽可观了。这在明朝的《帝京景物略》《陶庵梦忆》中都有记载。

自清至民国期间，从统治者到老百姓，无不以爆竹烟花点缀年景。宫廷所用花炮，皆由吉庆堂花炮史家特供。其作坊主史惠林巧思绝世，以所做“烟火城”“花牌楼”“八角美人亭”而备受慈禧太后青睐，赏六品顶戴内廷供奉，祖孙三代在京城牛气了几十年。到了袁世凯和徐世昌做大总统的时代，亦效仿宫廷旧制，于除夕和上元节时，在中南海等地广搭木架大放烟花，以示与民同乐。

俗话说：“姑娘爱花儿，小子爱炮。”确实如此。孩子们企盼了一年的春节，女孩儿要是不戴朵花儿，男孩儿要是不放点儿花炮，做父母的便会觉得心里难受，手头儿再紧也得应应景儿，不能让儿女过年时噘着嘴。

从北京人放花炮的规模即可透视贫富之悬殊。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们，时时处处总忘不了“摆阔”，以放花炮斗富者比比皆是——你放“麻雷子”，我放“二踢脚”；你放“五千头鞭”，我放“一万头鞭”；你放“炮打双灯”，我放“飞天十响”；你放俩钟头，我放多半宿。直放得烟雾弥漫、星辰暗淡，直斗得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回屋睡觉心里也就踏实了。

贫寒之人放花炮，一律是“耳挖勺儿炒芝麻——小鼓捣油儿”。爱听响儿的，便买挂五百头的“小鞭”，拆散了，一个个地放，一声一声地听响儿。遇有“回芯儿”（引线烧完而不响）的，也舍不得扔掉，必撅成两截儿再放“刺花”。爱看花的，则买两把儿“滴滴金儿”或一包“耗子屎”，那火花在黑夜中蹿动起来，也溢彩流金，颇有新年的情趣。

响亮的爆竹、鲜红的春联唤醒了春天。尽管这时候北国还霜雪冰冻，但人们从雪花晶莹中看到了麦田金碧，从腊梅清香中闻到了桃李

芬芳。时序从此转向阳春，万里乾坤生机萌动。爆声数响，“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百一居士《壶天录》），人们正以欢畅、乐观、信心百倍的热情，迎接新春的到来。

迎春福、禄、寿

元旦之后，便是春节。按过去的说法，元旦叫“阳历年”，春节叫“农历年”。中国人习惯过农历年，尽管已改名为春节，但其热闹情况却远远超过元旦。新年来临，人们都爱听个吉祥话。人们见面，总不免互致吉祥语，说一声“恭喜！恭喜”或“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当年北京民间如此，皇家也如此。道光十七年（1837）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日记中记道：

> 帮贵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

这就是清代皇上过年赏大臣的吉祥话：“福”“禄”“寿”也。“福”“寿”是写两个字，而“禄”则是谐音，用鹿肉来表示。鹿肉滋补营养，名儿又好听，而且是由清朝的发祥之地——山海关外来的，所以意义更加深远。从清初一直到清末，过年时赏大臣鹿肉几成定例。

福、寿是写在纸上的。用什么纸呢？是印有细线泥金花纹的蜡笺。当年写字，按纸的性质分两大类：一是不同种类的生宣纸，如夹贡、玉版、六吉，以及染成梅红色或红、黄花斑的梅红宣、虎皮宣等；另一种是用宣纸加工而成，用蜡捶过的各色蜡笺。蜡笺如现代之有光纸，有亮光，十分好看，但不吸水分，因此写出的字墨色发亮，而年久墨会脱落。新科翰林写对联送人“打秋风”，都是用朱红、大红蜡笺裱好的现成书联纸来写，因其喜气洋洋，华瞻漂亮。但若干年之后卖给古董商，同样一个人的对子，用蜡笺纸写的却只及用宣纸写的一半的价钱。皇上赏给大臣福、寿字，照例用蜡笺斗方写，对角书

写，尖向上，很大的福字、寿字写在中间。所谓“斗方”，就是老式斗口大小的正方形，约合市尺一尺五寸见方，四周都印有很复杂的花纹。京内大臣尚书以上至亲王，外省巡抚、总督、将军等一般都要赏赐。外省由折差按驿站递送，最远的如云贵总督、新疆伊犁将军都要送到。前引林则徐日记，就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所记。道光十五年（1835）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也受到赏赐，不过只有“福”字和鹿肉，少个“寿”字。

清代宫中十二月初一有开笔书福之典，后改为十二月廿日。赐福仪式如《养吉斋丛录》记云：“面赐福字者……以次入跪案前，仰瞻御书毕，即叩头谢，两内监对持龙笺而出。叩谢者，正当福字下……或加赐寿字，则预书也。”外大臣自难得到“面赐”，只好摆香案恭领了。

雍正四年（1726），有“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的上谕，但够得上这种赏赐的大臣并不多，像《红楼梦》中贾府那样的皇亲国戚，也还够不上，所以书中没有写到。因为很稀少，所以得到的自然特别珍贵了。林则徐日记有：“即恭装匾额悬于二堂，九拜叩谢。”就是把福、寿字幅，精裱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堂屋正中。旧时在北京，那些祖上做大官的旧家，在堂屋中挂着“圣堂”福、寿斗方，显示家族的荣耀。自然，也有的人家。家势衰微，子孙不肖，这些玩意儿便流落到琉璃厂古玩铺成为商品，甚至被外国人买去了。

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御赐福、寿字幅，年轻人自然不知所以然了。前两年有一人突然来找我，拿着一幅给我看，问我这玩意儿值钱不值钱。细询其家世，是清代清江浦（江苏淮阴），那是清代河道总督驻扎的地方。但他自己说不清，只问“值钱不值钱”，令人感到可叹、可笑而且可厌。而我又深憾自己没有皇上赏“福”“寿”字的祖宗。这难道真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吗？

以哲学或宗教解释祸福，这对于常人来说，都没有必要。新年新

月，说个吉祥话，“多福多寿，加官进禄”，讨个口彩，听的人高兴，生活中也增添一些欢乐的气氛。

旧时农历年在院中摆“天地桌”，后面供“天地马儿”（即神像），或一座画着福、禄、寿“三星”的插屏：中间一位朱袍纱帽的“官”，两手展一小轴，上书“天官赐福”四字；一旁是南极寿星老儿，另一旁则是散财童子。这个“三神小组”总在一起，不分离。现在谁要感兴趣，还可以在瓷器店买到，那里有景德镇烧的细瓷福、禄、寿“三星”。

新春佳节，“福”字最普遍，我最怀念有些人家影壁墙上贴的大红“福”字。小时候给人家去拜年，一进大门，迎面影壁墙上，鲜艳的双红纸大斗方，乌黑油亮的大“福”字，首先像火一样映入你的眼帘。讲究的人家，是木制朱红漆金字斗方，“福”写成《圣教序》帖的行书，整个字向右上方挺起，显现了右军书法的劲俏之处，更使人感到古色古香。

用大红丝绒制成小“福”字、小“寿”字，那是簪在鬓边的花胜；由闽粤远道而来堆在果盘里的朱红果实，那是引诱儿童的“福”橘；还有印有“福”字、“寿”字的福寿饽饽……这些都是祝你多福多寿，加官进禄啊！

探亲访友话蒲包

五月节送粽子，八月节送苹果、葡萄、鸭梨，过年送苹果、橘子，都可以打蒲包。什么叫蒲包呢？简单说，就像现在塑料食品袋一样，是用来包装食品的。

过去，店铺用蒲草编成八开报纸大小长方形的片子，四个角呈圆弧形，一大摞、一大摞地放在那里备用。顾客来了，拿一张过来，四个角一折，成一长方形篓。如有鲜荷叶，里面再垫上一张鲜荷叶。三斤苹果、两斤鸭梨称罢，红的苹果、黄的鸭梨，衬在绿色的鲜荷叶上，要多美有多美，这就是当年北京人的艺术生活。放好之后，再盖一张荷叶，荷叶上再盖一张印着字号的商标，商标为红纸黑字，也有红纸金字的。版式为屋脊形长方，文字则一行横的，三行竖的。横的大多是“京都”二字，竖的中间一行是店名，如“宏兴果局”。右面一栏小字：“四时佳果，南北鲜货，童叟无欺，言不二价。”左面一栏小字：“开设南闹市口路东，认明冲天招牌便是。”全部盖放好之后，再用染成梅红色的单股麻绳一捆，拴上提梁，鼓鼓囊囊，又好看，又实惠。拿起算盘“噼啪”一打……你付钱吧，付完钱，就可提着蒲包喜气洋洋地探亲访友去了。这就叫“蒲包”。

女眷出门，大婶带着二丫头看三姨去，老太太看白头发义妹去，三姑奶奶看四舅母去，亲上作亲，亲上串亲，东一门子，西一门子。正像大观园中王熙凤所说：这中间连着四五门子亲呢。平常你来看我，我去看你也就罢了，大节下的，怎么好空着手去呢？最普通的，就是提上一个“蒲包”。因此，几十年前，“蒲包”在北京话中已经是礼品的代名词了。

打蒲包都是些“水货”，本来不值多少钱，一般都是五斤来重。但

是寻常百姓家，大多日子并不那么宽裕，人情往来，固然少不了，但也不能不精打细算。这样就把蒲包打得虚些，三斤水果，也可打个像样的蒲包，可以省些钱。北京人送礼还讲究家庭经济状况，稍有余力的人家单送一个蒲包觉得拿不出手，除蒲包外，再配一盒点心。五月节，配上一盒玫瑰五毒饼；八月节，配上一盒自来红、自来白；过年，配上一盒蜜供，花不了多少钱，可就变成双了。

北京人吃饺子

报载，北京著名饺子馆“鸿兴楼”自重新恢复营业以来，一直生意兴隆。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北京人最爱吃的饺子。

应该说，饺子在北方是极普通的食品。究其历史总有一千多年了。古时称为“牢丸”，水饺叫“汤中牢丸”，蒸饺叫“笼上牢丸”。大约在宋代以前，都用这个名称。宋以后，叫法就比较杂乱，又叫“粉角”“扁食”“水角”“煮饽饽”。统称为“饺子”大概已是清末民初的事了，用水煮的叫“水饺”，上蒸笼的叫“蒸饺”，用油煎的叫“锅贴”。它既是主食，又可做下酒菜，真是方便不过的食品。

“初一饺子，初二面”是北京人过年的老规矩。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述京师大年初一的风俗云：“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做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这个风俗一直延续下来。每至除夕，一家人欢聚一堂，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说说笑笑，煞是热闹。大年初一的第一餐一定是饺子。

不仅大年初一，北京人平时也爱吃饺子。北京俗谚云：“好吃莫过饺子。”可见北京人对饺子的喜爱程度了。包饺子却是一件麻烦事儿，因此北京的饺子馆应运而生，罗布全城。不过大都不讲究花色，供应品种一般只有菜、肉和三鲜两种。菜随季节而变，有时白菜，有时韭菜，有时茴香，有时大葱。只有“鸿兴楼”与众不同。

“鸿兴楼”是以经营饺子为主的饭庄，当年设在菜市口，由于饺子花色多，做得好，售价公道，因此顾客云集。这里的饺子全以手工制作，做工十分精细。一般饺子馆一两面只捏几个饺子，“鸿兴楼”一两

面捏二十几个。饺子有荤有素，有甜有咸，还有杂色什锦的。要高级的，饺馅用虾、用鱼、用鸡。顾客点什么，可以供应什么。水饺用高汤火锅煮，吃法同于菊花锅，所不同的只是“远远来了一群鹅，扑通扑通跳下河”罢了。蒸饺用小笼送上，同时上几个小笼，每笼一种或两种馅。

“鸿兴楼”是山东风味的饭馆，除供应饺子外，也供应高档菜肴，烹调海鲜尤为拿手好戏。葱烧海参、鸡茸鱼翅、锅塌鲍鱼盒，都不同凡响。酒蒸鸭、醋椒鱼、芙蓉鸡片之类，更是看家菜。

北京“杂拌儿”

俞平伯先生过去有一本文集，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作《杂拌儿》。这个书名，外地人看了，感觉不到亲切，甚至还有些不理解。而北京人看了，却感到特别亲切。俞先生十六岁由苏州来到北京，后来虽然曾回过南方，并且在上海中国公学教过书，但那都是短时间的，其余时间都在北京。可以说是以南方人而久居春明，最后成为完全京朝化的学者了。所以书名亦起得富有京朝风味和春明乡土气息。

什么叫“杂拌儿”呢？

北京旧时过大年时，无论贫富，家家都要预备一种食品——“杂拌儿”。“杂拌儿”，简言之就是把一些甜的干果、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瓜条、青梅、蜜枣、山楂糕、花生粘、核桃粘、麻片、寸金糖、豆沙馅芝麻糖、雪花馅芝麻糖、油枣、枇杷条、小开口笑、糖莲子、米花糖、虎皮花生、虎皮杏仁等。过去没有西式糖果，一直到清末才有进口的瓶装“摩而登糖”。至于什么太妃、牛轧、朱古力等，当年老北京是很少听到的。同“杂拌儿”近似的是“什锦南糖”，就是把麻片、寸金糖、黑白芝麻糖、各种灌馅芝麻糖混杂在一起。

对过年最感兴趣的就是一群孩子，他们除了穿新衣、戴新帽、给长辈拜年叩头、拿压岁钱外，更重要的就是有好东西吃。而在零食中，除去瓜子、花生，最普通的就是“杂拌儿”了。那些比较讲究的家庭，有高贵的客人来，就端上果盘，细细吃茶，像《红楼梦》中袭人家里招待宝玉一样。那亦是正月里接待客人的时候，有的是细果盘，而袭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可吃的，给宝玉拿了几粒松子仁，吹去细皮给他吃。至于对待焙茗呢？那就不会这么细致了，最方便的，就是捧一

大捧“杂拌儿”放在他衣袋里，让他自己摸着吃。

新年新岁，要喜气洋洋，“杂拌儿”在色彩上显示了这点，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金黄的是开口笑、油枣，粉红的是染了色的花生粘、核桃粘。不但色彩鲜艳，吃起来还又香、又甜、又脆。

多少年没有吃“杂拌儿”了，这么大岁数，难道真是那么馋吗？只是在这岁尾年头，苦苦地思念故乡那个情调。何况，那蜜枣亦真甜啊！

春节逛厂甸

几十年前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大概很少有人正月里没逛过厂甸，以及后来不怀念厂甸的。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画棚，那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书摊，那一个接一个的古玩摊，那火神庙中光怪陆离、炫人眼目的珠宝玉器摊，那海王村里里外外数不清的玩意儿摊，那喊破喉咙的各式各样的吃食摊，那挤来挤去欢笑的、潮水般的游人，那错综摆放的大糖葫芦，那几十个连在一起、彩纸哗哗乱响的大风车……这些哪一样不值得怀念呢？年年逛厂甸，年年逛不厌；时时想厂甸，时时想不厌。逛厂甸，真是迷人的事啊！

厂甸，简言之，就是琉璃厂中心的范围，以十字街为中心，东西南北各不过里许路，包括火神庙、土地庙、吕祖祠、海王村在内。乾嘉以前，此地尚未形成街市，还是“造内用琉璃瓦”的琉璃厂所在地。厂门楼名“瞻云楼”，厂内有官署，厂外多空地树木，有石桥、土阜。直到清末，空地还很多。1916年，北洋政府钱能训做内务总长时，在空地上盖了海王村公园。1924年左右，又在宣武门与前门之间的城墙上开了一个新城门，名“和平门”，沟通了南北新华街，逛厂甸就方便多了。

在20世纪30年代，逛厂甸的走法是：出了和平门，过铁路，走到北师大附中墙外，就是画棚了。一间画棚走完又是一间，等一间间地看过去，已经到了电话局门口了。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风筝摊子，路旁高大的墙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大风筝。风筝摊过去，是卖“艾窝窝”“驴打滚”等吃食的摊子。随着簇拥的人群再往南，到了海王村西面，马路边上就是接连的卖玩意儿的摊了。那里人头攒动，是厂甸最拥挤的地方。卖大糖葫芦、大风车、“步步噔”的都集中在这里。再到东琉璃厂火神庙看钻石摊、珠宝摊、玉器摊，这一部分要花不少时

间。然后出来往南徐行，看那数不清的古玩摊。约走里许再折回沿路西看那数不完的书摊，还有最精彩的“哈记”风筝摊。再往北边走，就已踏上归途了。这只是走马观花，已尽一日之时，如要细看，那就非几日不可了。

厂甸摆出的小摊，最多的是书籍和字画。但是北京正月里天气寒冷，而且风沙多。别的东西露天设摊，可以把容易被风吹走的用重物压牢，即使冷点、脏点，也还勉强能行。独有字画，如果全部露天挂出来，一阵大黄风，势必吹它个七零八落，那卖画的哭黄天也不管用。因此厂甸设有“画棚”——贴着北新华街马路两侧原师范大学、师大附中的围墙搭的芦席棚，有顶有墙，上装活络玻璃窗，光线很好，一间连一间，逶迤而去，形成世界上最别致的大众画廊。

逛厂甸的人，一到师大附中墙外（当年附中校门不开在马路旁，而是开在电话局胡同里），就可以进画棚走走。棚中挂满了各种字画。论形式，有大小立轴、各种屏条、各种对联，摆在条案上的各种插页、各式扇面。论内容，有各种山水——青山绿水、写意山水、淡墨山水；花卉有工笔着色、工笔白描、没骨写意，有带草虫的，有不带草虫的；还有工笔仕女、工笔人物；书法中楷草隶篆、魏碑、章草各色俱全。论人物则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名画家，没有一个没有的，而且最多的是大名家——工笔仕女，不是唐寅，就是仇十洲；写意花卉，不是八大山人，就是白石老人；其他什么王麓台、恽南田、郑板桥、伍子贞、成亲王的墨迹，要多少有多少，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也许有人要问，哪里来的这些宝贝呢？老实说，这些画不少是假造的。

逛画棚的主要目的是看热闹，自然是外行多、贪便宜的多，掌柜的主要做的也是这些人的生意。琉璃厂名画铺、南纸铺库房里堆的那些平日无人问津的假字画，全靠正月里弄到画棚去“出笼”。不过假中也有区别，记得曾用一块钱买过一幅萧谦中的小立轴，就是乱真之作，颇有可观。谁能小看画棚中的东西呢？不少行家也都徘徊在画棚

中淘宝，“慧眼识英雄”，淘到精品的也大有人在呢。

清代震钧《天咫偶闻》记厂甸云：“晚归，必于车畔插相生纸，以及串鼓，或连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楂穿为糖葫芦，亦数十，以为游帜，明日往，又如之。”所谓“串鼓”，说的就是大风车，只是为了文字典雅，故意用了怪名词，实际大可不必。

厂甸的风车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是地道的风土工艺品，都是北京近郊农民制作的。他们利用冬季农闲，用高粱秆先扎成“日”字、“田”字、“品”字形的架子，用高粱篾片圈成直径三四寸的圈，中间做一小轴，东昌纸条染成红绿色彩，把圈和轴粘成一个彩色风轮。用胶泥做成铜钱大小的小鼓框，用两层麻纸裱在一起做鼓皮，制成小鼓。然后把风轮、小鼓装在架子上，风轮小轴后面用麻线绞一小棍，风轮一动，小棍便击鼓作声。如果风轮在风中不停地旋转，则小鼓便不断咚咚作响。大型“品”字形架上，可装二三十个风轮，便有二三十面小鼓，随风吹动，则一片咚咚鼓声了。逛厂甸时，一走近海王村前门，便是一片风车声。古人说一池蛙唱可代半面鼓吹，记忆中那厂甸门口的风车声，真不下十面鼓吹了。

逛完厂甸，高擎一个大风车回来，迎着春风，一边走，一边听响，洋洋自得。到家往门口一插，风车仍在风中哗哗乱响。不用问，隔壁邻居早就知道你逛过厂甸了。

大糖葫芦和大风车一样，同样是厂甸的象征。《竹枝词》云：“往人毕竟难忘俗，糖蘸葫芦一丈长。”又道：“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串蘸冰糖。”京西西山上农民做的糖葫芦，用长竹签把山楂（俗名“山里红”）一个个地串起来，串成三四尺长的一大串，上面抹些饧糖，顶上再插上一面彩色小纸旗。实际上北京蘸冰糖葫芦很好吃，而这种几尺长的大糖葫芦，却是不能吃的。试想，串的都是未洗过的山里红，抹点儿饧糖，立在风沙中吹上半天，沾满泥沙，如何能吃呢？大家争着买，只不过是为了好玩儿罢了。

厂甸的玩意儿千千万，但是逛厂甸如果不买风筝，那便是如入八宝山空手而回；写厂甸如不写到风筝，那也便是探骊失珠了。

风筝是特殊玩意儿，要摆摊出卖，很占地方，又怕人拥挤碰破，所以不在海王村里面设摊。风筝摊有两大处，一在新华街电话局门口，在高墙上钉钉子，拴绳子，再挂上五彩缤纷的风筝。另一处在西琉璃厂路北，那里平时是一家粥店，早上起油锅，开炉卖粥、烧饼、麻花。到了正月里，粥、烧饼和麻花停业，专卖风筝，这就是有名的“哈记风筝”。近人孙耀卿《琉璃厂小志》中有云：“哈记风筝，厂中路北仁威观。”可能这里过去有个小的道观，但是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却只是“大沙燕”“花蝴蝶”，而不是“牛鼻子”老道了。

厂甸的风筝可以说是天下闻名的，如果详述，那是要编一部专书的。近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记云：“风筝摊，即纸鸢也。常行沙燕，一尺以至丈二，折竹结架，作燕飞式，绘青蓝色，中安提线三根，大者背着风琴，或太平锣鼓，以索绕。顺风放起，昼系纸条，夜系红灯……三尺以上，花样各别，哪吒、刘海、哼哈二圣、两人闹戏、蜈蚣、鲇鱼、蝴蝶、蜻蜓、三阳开泰、七鹊登枝之类。其最奇者，雕与鹰式，一根提线，翱翔空中，遥睹之，逼真也。”

这也只是约略地说一说。厂甸的高级风筝不但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而且材料也很特殊。六七尺的风筝往往是用绢糊成的，架子是整根藤条扎成的，色彩都是用石青、胭脂、泥金、泥银等颜料彩绘的，放风筝的绳子都是黄麻、青麻搓了又擦过蜡的。这样的风筝在当年要卖十块、二十块现大洋一个。

前些年发现曹雪芹的作品《南鸢北鹞巧工记·风筝谱》，传说厂甸“哈记风筝”用的是曹雪芹创作的谱。“哈记风筝”的制作者是回民，回民尊称人曰“爸”或“把”，原是有音无字的，因而习惯叫“哈爸风筝”或“哈把风筝”。哈家自乾嘉以来，世代相传做风筝，名满都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传了六七代了。哈家世居西城石虎胡同内果匣

子胡同，数间小屋，世代为业。这里离清代的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很近，曹雪芹在“宗学”做过教习，与哈家来往是极有可能的。“哈记风筝”中的“瘦脚大沙燕”最著名，现在说起来，也是华胥一梦了。

厂甸是读书人神往的蓬山。《同治都门纪略》中的《厂甸》竹枝词云：“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从乾嘉以来，二百余年中，在京的那数不清的大师名儒、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家、书家、画家，从李南涧到缪艺风、从翁方纲到端午桥、从黄丕烈到傅沅叔、从林少穆到张香涛、从越缦堂主人到苦雨斋主人，可以说没有一位没有和厂甸结下不解之缘的。鲁迅从1912到1926年在北京住了十五年，没有一年不逛厂甸。最多一年，在短短的半个来月会期中，接连去了七次。可见厂甸与学人关系之密切了。

厂甸又是都城妇女正月里的游乐胜地。在嘉庆年间，得硕亭《群珠一串》竹枝词就写道：“琉璃厂甸又新开，异宝奇珍到处排。妇女摩肩车塞路，都言看象早回来。（每逢得幸过象之日，车马尤多，故云尔——原注）”厂甸有数不清的首饰摊、玉器摊，各种玩意儿，各种甜食，还有数不清的游人。爱赶热闹的都城仕女，大正月里，哪一个不争着去逛逛呢？清代咸丰、同治之后，曲院勾栏都移至南城，离厂甸近在咫尺。近人陈莲痕《京华春梦录》云：“每当辰巳之交，游人已集，勾栏姊妹，辄薰沐靓妆，至此招摇，少年好事，又多追随香车，甚至夹毂调笑，亦所不禁。”

厂甸更是孩子盼望了一年的乐园。正月里，学校放假，家中无事，每个人口袋里又多少有几个压岁钱，逛厂甸去，买“黑锅底”“大沙燕”，买“步步噔”，买空竹，买大糖葫芦。爷爷带着孙子，姥姥带着外孙女，男女老幼，呼亲唤友，整个京华九陌，皆倾城而出矣。

夕阳西下，厂甸路上游人络绎归去，有的乘车，有的步行，但都扛着大糖葫芦，大风车在扑面的春风中哗哗乱响，个个都像得胜回朝

的将军一样。

晚清官场拜年习俗

晚清时，官场人物除至亲同族外，朋友与一般亲谊非有丧嫁事宜或职业上之关系，平时很少往来。而每逢春节来临，便借拜年之机以联系情谊。

官场中拜年，对于上司，以愈早为愈敬。大都清晨即至，一个个衣冠整齐，手持梅红大名片，上印黑字姓名、别号，并加盖朱色印章，章下另有一小方戳，例为八字：“专程拜谒，不作别用。”翰林所用名片，长一尺，宽六寸，富丽堂皇，其一张价值相当于五口之家三日生活费。

拜年者一般请求门房听差转致敬意后，即可不必谒见而离去。特别关系者，则由听差回禀，等候拜谒。各达官显贵的客厅，除素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科甲出身为孔子教徒者外，无论满汉均设一供佛之桌案。所供奉者多为关帝或财神，桌上满布香炉、蜡扦、蜜供、鲜果等供品，香烟缭绕，昼夜不绝。拜年者至，即在佛前大叩其头，主人在旁陪叩。若特别要好者，拜佛已毕必再请其尊长出堂受礼。斯时宾主口中所言均为“升官”“快升官”“连升三级”等诵祷之词，喃喃不绝。

叩拜后就座少息，主人即敬以红枣桂圆肉之白糖水一碗，无论如何必须小饮，因为传说此日来宾不能空坐，否则宾主均蒙不利。

宾主寒暄之际，奴仆皆须上堂向来宾拜年。来宾对于主人的幼子稚孙以及仆役奴婢均有馈赠，赠其子孙者，以红缎荷包内装一两重之金银小元宝等物；赠其奴仆者，则视其身份与关系，分别为白银二两、四两以至二十四两不等，馈赠完毕即辞主人而去。职位平等之官

或地位稍低之官，如尚书对尚书或尚书对侍郎以及一切不相隶属之官，则可派子弟为代表而互贺。

都察院衙门独不拜年。大凡御史公馆门前也贴以红贴，上书“都察院某寓”，其下附一帖，文曰：“谨遵功今概不贺年。”

除上述个人酬酢外，尚有同寅团拜、同年团拜、同乡团拜。其日期须在正月十五以前任择一日举行。同寅团拜即在本衙门举行，照例预备酒饭。同年、同乡团拜则在各会馆举行，因专为联络年谊、乡情，故不限官职，不问等级，凡同年、同乡诸人均可到会。除预备酒饭外，尚邀集梨园唱戏。开场时艺人必须加演《跑加官》，将“天官赐福”“一品当朝”的条幅逐次向台下展示，以示庆贺祝福。

侗族春节习俗

侗族生活在湘、桂、黔边境，他们过春节，有大年和小年之分。侗族称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小年，又叫“姑婆年”，是纪念姑婆的节日。意思是祖宗各代的姐妹出嫁后，年边要回家探亲团圆。农历三十过大年，除夕晚上，送旧迎新，灯火通宵，高高兴兴吃“年更饭”。

过大年这晚，村村寨寨的青年男女在本村寨互相串门、吃“年茶”。吃“年茶”是很有趣的，那时各家的姑娘（或妇女），挑水桶到井旁，等老人家敬井以后（意思是吃水不忘掘井人），便一起拿勺子舀水，舀到井里有白泡沫为最吉祥。姑娘们用这一担水给客人和家里人煮上香喷喷的油茶，这就叫作吃“年茶”。

新年初一凌晨，侗家人要抢“头水”。当全寨响起一片迎春接福的鞭炮声时，后生们就飞快地挑起水桶，手举火把，冲向井台，打上一担水飞速地挑回家。因这是新年的第一担水，所以叫“头水”。侗族人把抢来的“头水”奉为吉祥圣洁之物，家家户户都遵守古老的习俗，只抢一担水。挑回来的“头水”要专门贮放，不能用来洗东西，只能做饭、炒菜。姑娘、媳妇们把“头水”煮沸，冲上糯米酿制的糟酒加荷包蛋，泡上芳香的侗家油茶，款待贵客。相传，吃了“头水”煮的饭、炒的菜、泡的油茶，能消病祛灾。如果误用“头水”洗了东西，不能把水泼出去，只能洒在灶膛里，以示将吉祥留在家里。后生们抢完“头水”，各家主妇就用竹篮提着煮好的米饭、猪肉，来到井边，斟上米酒祭水。她们将酒慢慢地注入井中，表达侗家人的心愿——愿井水四季不断，让全村百姓在新的一年里喝上更加清澈甘甜的水。

新年初一这一天，侗家人首先是拜祭祖先。姑娘们开门的头件事，便是相邀女伴，同到山崖水畔去采摘映山红。采完花回到家中，

把一枝最美丽的映山红插到鸡笼上，献给雄鸡，以报答雄鸡啼叫司晨之恩。然后，再把其余的花朵插到房中床头、桌上，把新春打扮得像映山红那样红火热闹。

春节期间，侗族家人要走村串寨拜年做客，叫“行年”，又叫“乡客”，这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独特年俗。姑娘佩戴闪闪发亮的银质装饰品，手提小巧玲珑的蜡篮；小伙子身着节日的盛装，头缠侗帕，手举灯笼（有的手持芦笙）；老人腰插长长的烟斗；小孩打着各种各样的花灯，簇拥在烛光闪闪的龙灯四周，在一片喧闹的爆竹锣鼓声中，浩浩荡荡的做客队伍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百人。到了对方村寨，主人在寨口的风雨桥上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表示欢迎，之后便主动去接客人的灯笼，让客人休息。小伙子接姑娘的蜡篮，并帮助姑娘点燃被风吹灭的蜡烛。到了寨中的鼓楼坪，锣鼓声、爆竹声齐鸣，有的还吹起芦笙、舞起龙灯助兴。随后便挨家挨户去贺新年。贺年完毕，好客的侗家人便将龙灯挂在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中，拉着客人到自己家里去做客。哪家拉的客人多，说明这家富有、热情。当然，小伙子是绝对不会待慢远道而来的姑娘的，因为“做客”认识的姑娘，大多数能够结成终身伴侣。

春节话青田年糕

“忙了一年，炊糕过年。”这是浙江青田城乡的传统习俗。回想起来，还是挺有趣味的。

进入腊月的下旬，屋外或是雪花飞舞，或是滴水成冰，难得遇上晴朗暖和的好天气，可是家家户户的屋内却是热气腾腾的。看吧，成年人胸系围裙，卷着袖子，碾糕粉、备蒸笼、劈柴火、烧锅灶……都在紧张地忙乎着。欢蹦乱跳的孩子走家串户，不时回来报告各家的炊糕信息。

乡人称年糕一笼为一格，蒸笼是竹匠用本地盛产的毛竹劈成篾片拱卷而成，外呈圆形，三五格为一幢。笼盖也是竹篾编制，犹如一个大帽，盖上严严实实，不漏气。制作年糕时，每格选用糯米二十多斤，先浸泡一昼夜，漂清后碾成细粉末，俗称“糕粉”。再把糕粉倒进大木盆内，与红糖、橘饼丝、橘皮丝、花生米、红赤豆等配料搅拌均匀，加水揉得软硬适中。在洗净晾干备用的蒸笼边上，缚上几个透气用的小竹筒（土名“糕隔”），在笼内铺上用汤水洗净的叶，便可将拌好的糕料舀入蒸笼。中间铺上一两层切好的肉称“肉糕”；放上豆子称“豆糕”；如果中间不放其他东西，便呼“糖糕”了。拌好的糕料全部装入笼内后，糕面上用糖水抹平。讲究的人家还取红枣、桂花、芝麻等小料在糕面上摆成图案，如“凤采牡丹”“龙凤呈祥”“恭喜发财”“五谷丰登”等，也有的撒些红绿丝。糕蒸好后，色、香、味俱全，非常喜庆。

炊糕烧火很讲究。糕上锅前，锅里的水先要烧得滚开。蒸笼上锅，烧两个钟点光景，火不能烧得太旺，防止糕料溢出蒸笼或肉浮上糕面。烧到七个钟点，就可将火熄灭。利用灶里的余热，闷三至五个

钟头。之后把蒸笼端出锅灶，放置通风处冷却两天。最后从蒸笼内屉倒出来，就成为完整的大圆糕了。

蒸好的一格年糕，足有五十多斤。瞧这“庞然大物”，用手掰不开，提不动，怎么个吃法呢？食用时须用刀切，切第一块时称“开格”，就是开始吃这格糕了。再将大块切成一方方的小块，凉嚼津津有味，香甜可口；放锅里蒸热，上嘴柔软，清香扑鼻。

大年正月，友邻互相致贺后，可听到“到我家吃糕去”的热情邀请。亲朋上门，礼品里少不了年糕。餐桌宴席上也先摆上满满一盆切成小条块的年糕，开宴时相呼“吃糕”或互祝新年丰收康乐。

漫话“初五开市”

北京过大年，最少要过五天。由初一算起，到初五为止，才算过了年，俗称“破五”。

在这五天内，商店停市，戏馆子封箱不唱戏，各衙门封印不办公。在这几天里，东四、西单、前门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等繁华热闹的去处，大大小小的店铺，一律上着门板，用大红纸、梅红纸写了告示贴在门上：初五开市。《燕京岁时记》云：“初五日谓之破五……新嫁女子，亦于是日归宁……诸商亦渐次开张贸易矣。”把新嫁女子归宁和商店开市写在一起，喜气洋洋。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在这喜气洋洋的新年新月里，在商店渐次开张贸易的时刻，总有一些人是愁容满面的，这就是被各商号辞退出店的伙计。在生意萧条的年月，这些人多些；在生意兴隆的年月，这些人少些，但多少总是有一些的。

旧式商业的会计年度是以农历计算的，人事变动也是按农历计算的。如果一家店铺大年初五、初六开不出市来，那就等于告诉人们，这家字号关门大吉了。腊月底各家字号把账结好，开出总清单送给东家。是赚啦还是赔啦，赚多少赔多少，东家一目了然。再把钱分好，用红包包好送到大掌柜、二掌柜以及大小伙计手中，多少不等，人人有份。

三十晚上吃敬神酒，初一给东家拜年，初二祭财神，这些都是欢乐的事。而最最紧张的是大年初四或初五晚上开市之前那顿酒席了。这是一顿使人提心吊胆的便宴，这顿便宴行话叫“说官话”，俗名“吃滚蛋包子”。这顿晚宴是比较丰盛的，有菜有酒，酒后吃饭时，照例是

吃包子。上席时，东家、掌柜、大小伙计各就各位，小伙计依次把酒斟满。当家的举杯祝贺，吃上几口酒菜之后，便要开腔了。如果生意好，便当众宣布人事照旧，大家开怀畅饮；如果生意不好，就要辞退人。按老年规矩，辞人也十分注意礼貌。在席上当家的叹完“苦经”之后，等到包子端上来，便亲自夹一个包子放在某人碗中。此人便明白了，饭后自己就得收拾行李带着辛酸和热泪告辞走了。“吃滚蛋包子”由此得名。

元宵之夜灯如昼

春节后的第一个隆重节日，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此节在唐代称为“上元”。从唐代诗人王维的“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苏味道的“火树银花合，明月遂人来”，以及宋代女诗人朱淑贞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等诗句看，自古以来元宵节的庆祝活动便集中在夜间，而其特有的景致是花灯与烟火。

曩年北京元宵节之盛况，犹历历在目。家家户户除了煮食元宵或汤圆外，更讲究点花灯。花灯的造型，花鸟虫鱼各异，争奇斗巧；其颜色，赤橙黄绿有别，绚丽斑斓。

当团团素月度云而来时，老北京们便携妇将雏，呼朋引伴，纷纷走向街头，共尽良宵之欢。天真烂漫的顽童，提着鸡灯、鱼灯、梅花灯、走马灯，或者拉着装有四个小泥轱辘的马灯与羊灯，彼此欣赏着、品评着、嬉闹着，全然不顾小手被冻得通红。插在灯芯里的红色小蜡烛，跳动着闪烁的火焰，与那腾空而起的“起火”及“炮打灯”交相辉映，为古老的北京城增添了无限活力与生机。

最引人注目的花炮，要算是“火神爷”了。这是一种大型烟火，用胶泥捏成钟馗模样的人物。点燃之后，先是七窍生烟，旋即喷射出一株两丈多高的火树，把乌蓝的天空照如白昼。盒子花最称奇观，但燃放必在亥时之后，盒径六尺，凡六层，下为活底，导线系之。又假铁丝吊一转花，名曰“金盘落日”。点燃后，火迸花旋。升触导线时，忽见光芒一闪，彩弹升空，美如璎珞。之后则为葡萄、为花篮、为宝塔、为人物、为翎毛，种种形象，妙趣横生。其收尾往往更出人意料。如当地更夫、水夫所制之花盒，末层多嵌龟、仙、兔，其上大书伙计姓名。一爆升空，冉冉而降，笔画分明。观者忽睹怪像，不免捧

腹大笑。

灯市上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闪亮的花灯，到处是刺眼的烟火。徜徉在这灯与火的海洋里，自然会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并且会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唐代诗人郭利贞的《上元》绝唱：“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

上元良宵，京华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灯市口与前门外棋盘街一带的灯棚，以及什刹海迤西原宛平县胡同的冰灯棚。在灯棚里，悬各式花灯，有“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子夺魁”“八仙过海”“富贵有余”“鹤鹿同春”等不下百余种。灯上绘人物、山水、花鸟，无不惟妙惟肖，各具情态。形状有大的、小的、圆的、方的，色彩有红的、绿的、黄的、花的，质地有纸的、绢的、玻璃的、木头的，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冰灯，更是别具一格。其品类有人物、仕女以及桥、塔、动物，丰富多彩，尽态极妍。那水晶般玲珑剔透的灯身，配上红彤彤的蜡烛，宛然碧天中的星斗，闪闪发光。置身其中，犹如神游仙境。

南城白纸坊一带，风俗又自不同，因其地域开阔，“武焰火”便可大展神通。所放盒子花呈伞形，内中藏灯无数，放时必以巨型炮仗相衬托。一经点燃，即见火龙踊跃，万箭钻空，雷声隆隆，震天撼地。内城焰火，午夜一过，烟散花消。此时登城南眺，辄见灯山人海，气象万千，爆竹时发，红透天幕。

舞狮与耍龙灯

在电视上曾看过舞狮子和耍龙灯，有一次甚至看到马尼拉街头亦在耍，感到十分亲切，似乎是见到老乡亲一样。舞狮和龙灯在中国各地都有，虽然造型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差不了多少。从塞北到江南，以至西北、东南，风格都是一致的。

先说舞狮。舞狮的历史很久了，它是来自西域的玩意儿。到今天，南北各地狮子的造型已稍有不同。我童年时熟悉的门头沟的狮子，完全是按照北京寺庙宫殿门前蹲着的那对狮子的形状制作的。狮子的头部先制成上下两片简单的木架子，在木架子上，用竹篾编成弧形的狮子头骨的轮廓。上面再用老式旧账纸，即麻纸或东昌纸，一层层地裱糊好，晒干。轻轻敲打，像鼓皮一样，嘭嘭发响。眼睛是两个圆洞，再嵌上一个黑油漆圆球。在裱糊好的纸上，先刷桐油，再上绿油、描金、勾黑线，全部油新之后，就是一个亮光光的威武凶猛的狮子头了。

狮子尾部亦有竹木圆形架子，同样裱糊好，油漆成绿色，再装上象征性的尾巴，这样便很像狮子的臀部了。狮子整个身体实际上是一块布，上面一排排钉好青麻，拖得很长，全部用绿颜色染过，一抖动，毛茸茸的，好像狮子的长毛一样。

舞狮子的时候须两个人。一个高个子，把狮子头套在自己的头上，狮头内有两根带子，可以挂在两肩，分量不太重。狮子内还有两个架子，各有一根横木，右手握住上面横木，左手握住下面横木，这样上下一开一合，就如同狮子的嘴在不停地张动了。两手握横木左右摇摆，那就是狮子在摇头了。那块钉满绿毛的布，前端连在头上，后端连在尾部架上。另一个小个子的，把狮子尾部的架子背在背上，低

头蒙在那块布中，弯下腰，两手揪住前面那个人的腰带，随着他的动作，做狮子腰部摆动和摇尾的动作。老实说，扮狮子尾巴是份苦差事，又闷又累，玩不了多长时间，就一身臭汗。

说完了舞狮，再说龙灯。

龙灯亦是南北各地都有的。虽然不少地方是白天出来耍，纵不点灯，亦可以龙灯名之。各地龙灯亦是大同小异。有的地方制作得太简单，龙头不像龙头，龙身只是涂了颜色的大长布条子。大白天在街上绕来绕去，显得十分寒碜。老实说，这样的耍龙灯，是没什么好看的。

而北京山乡的龙灯很值得一看。先说龙头，是木架、竹篾扎成的龙骨架子。外面糊纸，装上龙角、龙须，再画上龙头，十分逼真，看上去高大威严。架子里有几处插蜡烛的地方，晚上舞，点起蜡烛，光闪闪的。因为龙头高大，所以耍起来时要一位彪形大汉来掌握，力气小的人是舞不动的。

龙身、龙尾共八节，加龙头为九节，每节二三尺。每节龙身，是一个横着的筒状架子，下面有三尺多长的柄。架子两边糊纸，画上龙鳞，上面中间留口，可以插蜡、点蜡。节与节之间，以白布连接，并彩画龙鳞。这样一节节连起来，由龙头到龙尾，鳞甲片片，便像一条真龙了。

龙不能只有一条，所谓“二龙戏珠”，必须要有两条龙，而且颜色不能一样。我少时常见的山乡的龙灯，一条画青鳞片，曰“青龙”；一条画黄鳞片，曰“黄龙”。每节一个人来撑，一条龙九个人。两条龙鱼贯前行。舞起来，龙头对龙头，探首、盘旋。随着锣鼓点，撑“珠”的那个人要把“珠”按节奏在二龙的头部晃动，引逗得两条龙翻江倒海般怒斗，这样就把观众的情绪引向高潮了。

不管舞狮，还是耍龙灯，都是晚上玩的玩意儿。似乎有的东西，

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不好看，而在月光下或不大明亮的烛光下，就会产生一种十分神奇或缥缈的感觉。在北京的街头看走会的太狮、少狮，带着大串铃，哗啦哗啦地跳动，只觉得热闹、好玩，并不觉得美。而在山乡中，在朦胧的月光下，围着密密的人群，大家提着小纸灯笼，在密锣急鼓声中，一对庞大的狮子带着串铃翻滚着、跳跃着……人堆中忽然有人放起“太平花”，那耀眼的白色火星溅到狮子绿毛上，人们欢呼着、雀跃着，那才是美妙的童话世界！

“竹马舞”琐谈

“竹马舞”是春节民间的一种花会形式，多在元宵节前后表演。“竹马舞”亦名“布马舞”，俗称“跑竹马”“竹马落子”。早在宋明年间，社火中就有这种舞蹈形式。明代阮大铖编的剧本《双金榜》中，也安排有“跑竹马”的舞蹈表演。“竹马舞”在中国许多地区流行，除冀中农村外，广东、广西、福建、中国台湾亦有“跑竹马戏”。

早年，笔者曾多次欣赏“竹马舞”。表演者腰间系着马形道具，分马头与马尾两截，舞时像是骑在马上，马儿忽而徐行、忽而疾驰、忽而跳跃，边歌边舞，生动有趣。

“竹马舞”与冀中一带的“跑驴舞”大同小异，队伍有“长蛇开阵”“龙摆尾”“跑圆场”“蝶采花”等十余种。传统的“竹马舞”大多化装为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或地方戏曲中的角色，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齐全。演员手中的道具，或马鞭，或刀枪剑戟，或棍棒，根据人物身份选定。常看到的剧目有《三打祝家庄》《昭君出塞》《状元游街》《杨八姐游春》《千里送京娘》等。表演者通过表情、姿态和唱腔，表现剧情和人物性格。只舞不唱的称“跑竹马”“竹马舞”，载歌载舞的称“竹马落子”。元宵节夜间表演“竹马舞”，在马头和马肚中安放上蜡烛或彩灯，在马脖颈系上五彩串铃，舞起来铃声清脆，灯火辉煌，非常壮观。

一次，我路经河北省高阳县，曾欣赏过一段表现一个小妞驯马的“竹马舞”。四个身着艳丽服饰的小妞骑着“枣红马”上场，时而挽缰漫步，时而纵马奔驰，以健美的舞姿表现少年驯马手的飒爽英姿。突然，一声嘶鸣，一匹骏马狂蹦乱跳，惊奔而来。马上的小妞紧勒缰绳，马下的小妞紧追不舍，最后终将烈马制伏。这创新了的“竹马

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冀中平原和渤海一带的农村，“竹马舞”尤为盛行。每逢新春佳节，民间艺人就用竹劈子扎绑成马形骨架，糊上五颜六色的绒布，经过精心设计，制成尾巴、嘴巴、耳朵、眼睛均能活动自如的小“布马”，多则几十匹，少则五六匹，成群结队地随民间花会队伍拥上街头，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热闹非凡。

曲阜元宵点天灯

几十年前，笔者曾在孔子故乡曲阜古城过过一次元宵节，与北京相比，迥然不同。印象最深刻的是“点天灯”“放天炮”。

当年的北京，每至元宵，家家户户皆在大门前挂花灯，或左或右，或多或少，总是要有的。曲阜则不然，除在门前挂灯，还在院子正当中埋上一根高大笔直的朝天杆，将花灯挂到杆子顶上，名曰“点天灯”。而声名显赫的衍圣公府，则从正月初一开始，就在号称“大观园”中心的前上房大院举烛“点天灯”了。红木雕架的大玻璃穗子灯，日夜不熄，一直点到正月十五之后。因孔府的朝天杆最高，所以在元宵节这天夜里，环顾曲阜古城，一灯之下，万灯竞放。灿烂的灯火，与明晃晃的月亮交相辉映，人间天上，尘寰碧空，令人难分。

“放天炮”也是曲阜元宵特有的奇景。元宵之夜，家家户户把一串串、一挂挂的鞭炮悬挂在朝天杆上点放，从黄昏一直放到第二天天明。真乃家家火树，户户银花，此起彼消，彻夜不绝。举国之内，唯曲阜有此独特的元宵风俗。

追本溯源，据百姓讲与孔子有关。自古以来，人们把孔子看作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盏光焰万丈的明灯。孟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学说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举世无二。正因如此，曲阜百姓对孔子的敬仰也远非他乡他地可比。当地百姓尊称孔子是“文曲星”，说他是“魁星下凡”，“主管文事”。曲阜群众感谢玉皇大帝派孔子来曲阜，所以，在祭祀玉皇元君的上元之夜，“点天灯”“放天炮”，一则表示曲阜是圣人之乡，非等闲之地；二则禀报玉皇大帝，曲阜因有孔子而殊荣，百姓以隆重的祭祀礼节来报答。世间最讲究一个“诚”字，曲阜百姓祭天，至诚之至。天灯、天炮燃放半月之久，数

量之多，耗量之大，在神州大地，哪一个县城都不能与之媲美。

“点天灯，放天炮，礼花对着龙灯照。”这是曲阜元宵节的一大特点。曲阜人耍龙灯，技艺十分高超。耍龙灯的，在焰火四射的烟雾中穿行，火不得烧身，龙灯必须丝毫无损。艺人稍有疏忽，那灼热的火星便把衣服烧个大窟窿。非精明强干的小伙子，难以胜任耍龙灯的游戏。因此，耍龙灯的高手，倘若未婚，就成了少女们极为注目的人物。

曲阜“龙灯会”的另一特点，是必须到“天下第一家”的孔府去汇演。全县所有村镇，只要耍龙灯，就要准备赴孔府表演一次。如此一来，孔府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龙灯艺术中心”。为使村镇居民都有机会进孔府表演耍龙灯，孔府主人明文规定：自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孔府全天开放，自由进出，真正做到“金吾不禁，玉漏无催”。耍龙灯的地点，通常选择在悬挂着“圣府”和“恩赐重光”匾额的孔府第二庭院。届时，衍圣公高坐庭院正北的大堂之上，从华丽的暖阁处向外观看。那气派，那风度，颇有些帝王“御楼观灯”“与民同乐”的味儿。龙灯会历代在孔府汇演，据说也是出于对孔子的热爱和尊敬。曲阜人视孔府为“圣人之家”“风水宝地”，在“圣土”上隆重祭祀上帝，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十八罗汉闹元宵，也是曲阜独有的风俗。元宵之夜，孔府到处红灯高悬，烛香点燃，红毯铺地，彩棚满院。明珠在金光中闪耀，碧玉在银彩里争辉。当华灯齐放时，锣鼓家伙一敲，表演十八罗汉的游戏就开始了。仆人们身着十八罗汉的衣冠，戴着十八罗汉的面具，表演杀贼、除贪、灭奸、受供等种种扣人心弦的节目。罗汉本是佛家供奉的神仙，一般讲是不能耍弄的。但儒家不信佛，故有让罗汉在儒家圣地供玩耍的游戏。

曲阜元宵风俗，很多与孔子有关，“提灯上学”就是其中之一。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尊师之风在曲阜源远流

长，经久不衰，“花灯敬师”就是典型事例。至少在明代之前，曲阜城乡各类学校，逐渐形成了“春节放假，元宵开学”的制度。腊月二十三，学校关门，老师回家过年，学生为感激老师一年的辛勤培育之恩，免不了赠送些过年物资。开学之日，适逢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细心的家长或亲自制作，或用钱购买，让学童提着精致的花灯返校，请老师点燃。一则期望日后孩子学业有成，前程光明；二则表示对老师的敬爱，报答老师对孩子的教诲之恩。见到那五彩斑斓的花灯，老师很高兴，学生也认为尽了一份心意，整个校园自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曲阜花灯，历史相当悠久。据说宋代就有专为孔府制作花灯的人家，名曰“花灯户”，可见花灯之盛。据花灯师介绍，花灯主要靠“扎架”。俗云：“灯架扎得巧，花灯做得好。”贵重的灯架，要在上面雕龙刻凤、镶珠嵌玉。灯架扎好后，才贴纱、装玻璃、钉羊皮、剪纸、刻皮影、写诗作画，进入灯画工序。最后在灯上涂金抹银、串珠吊玉、缠丝悬缨，做成美观的花灯。

春节接姑奶奶之俗

昔日京华，每到春节就有接姑奶奶住娘家的习俗。接姑奶奶一般在正月十六日，也有在十八日、二十日的，必择双数，单日很少。

接姑奶奶回娘家，为的是骨肉团圆以叙天伦之乐。那时，姑奶奶出嫁，平日不能随便住娘家，趁着正月过新年，在夫家一年受了不少劳累，借住娘家的机会舒畅地休息一下，并且安慰家人的相思之苦。

娘家接姑奶奶，父母兄嫂必携带几包礼品，最低也要有个蒲包。到了夫家，向尊亲长辈声明来意，给姑奶奶“告假”。如蒙允许，再“请示”住的天数。夫家规定四天、六天、八天、十天不等，也都是双数。经尊亲长辈“批准”，姑奶奶即梳妆打扮，整理包袱什物。凡接姑奶奶都兼接外孙子，有大姑、小姑的也要谦让一下，实际上大姑、小姑绝不跟随，自有婆婆代表致谢。临行之际，要向夫家的长辈请安，对大姑、小姑也要打招呼，方能动身。把姑奶奶接到家里，娘家特别优待，平素爱吃的东西尽量供给，有钱的富户水陆杂陈，筵宴丰腴。亲友听说姑奶奶住娘家，也都来问候。因为姑奶奶出嫁，亲友一般不与夫家交往，乘此姑奶奶住娘家的机会可以聚会一堂，恣意笑闹，斗趣抓哏。姑奶奶除应酬娘家亲友外，抽暇可以听听戏、逛逛庙会、看看电影（早年没有电影时就谈不上看电影了）。不愿出门，在家可以叫几个盲艺人唱唱曲儿，或找演傀儡戏的，以消遣解闷。娘家亲友也邀请姑奶奶吃尝春酒，叙旧合欢。从前姑奶奶别看在夫家像个“小可怜”，处处看人眼色行事，只要回到娘家便身价十倍。

转瞬“假期”将满，临别时，姑奶奶不免要掉几滴伤心泪。父母当然有一番劝解，无非说什么不能比未出嫁时舒适，第一要谨慎侍候公婆，大姑、小姑也要敷衍面子，对夫婿要温柔体贴，对下人也要和

气。诸般嘱咐已毕，再备几色礼品，把姑奶奶送回婆家去。

每到正月初十后几天，北京街头常见浓妆艳抹的少妇，后边跟随白发老妪、青年男子，手中携带包袱，怀抱小孩，有坐车的，有步行的，这就是接姑奶奶的情形。

斗转星移，时代前进，今日京华风俗已非昔比，老一套的家规渐渐已不存在。小两口没有那么些规矩了，男女平等，姑奶奶也不当“小可怜”了。

正月十六妇女走百病

过去，春节前后对妇女的戒律束缚是很多的。

从腊月起，腊月二十三“祭灶”，不许妇女主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除夕夜，妇女只负责做年夜饭的炊事工作，同样不准到祭神拜祖的供桌前做主祭人。守寡的女人更不能接近供桌，而是由长子主持祭祀仪式。

在天津还有一种习俗，妇女无论老幼，从腊月三十夜晚向佛祖点香上供起，就进入禁锢期，不准外出串门。连自己家亲戚处也暂不往来，只准你在自己屋里、本家院内活动。说是除夕夜“诸神下界”，妇女要回避，这是为了自身安全。不去别人家，是因为人家“忌人”，实际只忌女人。当然也不欢迎外姓女人来自己家，这包括了嫁出去的姑奶奶。年三十的晚上，姑奶奶必须住在婆家或自己家。就连腊八和祭灶那两天，住娘家的姑奶奶也必须回婆家。

除夕守岁后，在家里过初一。初二早晨邀请一位夫妻双全、儿女满堂的妇女，来家说些吉祥话，称为“开市”。这才宣布家里已经开放，妇女可以自由出入了。

妇女们不能去亲友家，却可以去影剧院或寺庙。天津当年的影剧院在除夕夜办“迎春场”，招徕了不少妇女观众。天津的天后宫是著名的过年烧香的地方，有些妇女许愿求顺，除夕夜去那里烧香拜佛，还有人去争烧初一黎明的第一炷香。

一般家庭妇女，在正月要守在家中接待亲友拜年，直到灯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才可正大光明地外出，称为“走百病”。就是说妇女这天出门散散心，可以走掉各种疾病。娘家在这一天要接出嫁的姑娘回来

轻松游乐些天。可见当年，正月十六才是妇女们的节日。

朝日坛与太阳糕

昔日的老北京人，在欢度春节与上元节之后，紧接着便在农历二月初一举行祭祀太阳神的活动，曰“中和节”。

提起民间中和节祭日之举，首先得说说朝日坛。朝日坛简称日坛，系旧时皇家祭日之处。日坛在北京朝阳门外，与位于阜成门外的月坛东西对称，遥相呼应。它是明嘉靖九年（1530），朝廷据《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的记载，分别在北京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圈建的。

日坛方五丈，高五尺九寸，九级台阶用白石砌成，唯坛面用红琉璃以象征太阳。坛西向，绕以垣墙，正西有白石棂星门三座，其余三面各一座。西门外有燎炉、瘗池；东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灯库、钟楼；北为遣官房，外有天门两座，北天门外为礼神坊，西天门外迤南为陪祀斋宿房五十四间，护坛地一百亩。

明清两代均于每年二月初一遣官致祭。清制遇甲丙戊庚壬年由皇帝亲祭。清朝灭亡后，日坛即逐渐荒凉。

不过，民间祭祀太阳神的活动，并未因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终止。正因为太阳把它的光和热恩赐于人类及万物，所以人们对想象中的太阳神极为虔诚。祭祀的仪式虽远不及皇家那样复杂而隆重，但非常严肃，一丝不苟。

昔年北京人祭祀太阳神所用的主要供品是“太阳糕”。这是一种用大米面和绵白糖蒸成的圆形小饼儿，上面印着一只朱红的（传说中的鸡神）引颈长啼的鸡，仿佛呼唤天下之鸡齐鸣，为人间报晓。

北京的糕点铺元宵节后便开始制作太阳糕。一些食品小贩亦自制太阳糕，于二月初一的前三天开始出售。每到这时，“供佛的太阳糕啊”的叫卖声随处可闻。家庭主妇们一听到这声音，即使手头拮据也总要买几块应个景儿。

中和节这天，晨光微熹时，家家户户开始祭祀活动。太阳糕整整齐齐地放在盘子里，置于供桌的中央，盘子前面摆一尊铜香炉，内插一炷高香，全家依辈分大小排列，面东肃然跪拜，以此来报答太阳神的恩泽。

天真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那盘中的太阳糕。那糕凉凉的，甜甜的，味道确实甘美。

二月二，龙抬头

相传武则天废唐立周称帝，惹怒玉皇大帝，遂降旨龙王三年不许下雨。龙王不忍人间遭难，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皇大帝便将龙王拿下天宫，压在大山下。黎民百姓感激龙王之恩，天天为龙王祈祷，最后感动了玉皇大帝，于农历二月初二将龙王释放。于是便有了“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

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民俗，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就有记载：“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施绕水缸，呼为引龙回。”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古时认为龙是天子的象征，是祥瑞之物，是和风细雨的主宰。“二月二，龙抬头”这句谚语表示春季来临，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预示着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

民间年画《天子耕地》画面题词为：“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国母来送饭，五谷丰登太平秋。”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是一年二十四节中的“惊蛰”，冬眠蛰息的动物被春雷惊醒，开始活动，民间认为龙在这时“抬头”，故二月初二又称“春龙节”。明清时代的皇帝在中和殿备耕，事先检查御用农具。北京的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皇帝沿袭古制祭祀先农，举行春耕仪式的地方。

其实惊蛰本名启蛰，汉代为避景帝讳改为“惊蛰”。“惊蛰一声雷，农家春耕勤。”中国大部分地区以这个节气为标准，开始春耕生产。现在“二月二，龙抬头”只不过是一句气象谚语，是说自即日开始，降雨量逐渐增多。

“二月二”也叫迎富日。据唐代《岁华记雨》载：“相传有生子者，

邻家于二月二日求其子归养之，邻家因此大富。”后以此日出野田采蓬，兹向门前以祭之，以迎富。这与唐代民间流行的“送穷”风俗相联系。据史书记载，于正月晦日（正月最后一天）扫除粪污及屋内尘秽，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或投于水中，谓之“送穷”。也有的于是日弃破衣于巷，还有的结柳、缚草为船以除穷。所以在唐代送穷的同时，又有“二月二”的迎富。南宋诗人魏了翁有诗云：“才过结柳送穷日，又见簪花迎富时。”其实，从即日开始春耕生产，辛勤耕耘，岂不是送走穷日子、迎来富生活吗？

二月初二这天黎明，老人未起床前嘴上念叨：“二月二，龙抬头，金子银子往家流；二月二，敲炕旁，珍珠玛瑙往家淌；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人们不仅送穷、迎富、祈望丰收，还盼望龙出，镇住毒虫，除祛病疫，以得健康。

二月初二这一天，有“引进勤龙，送走懒龙”一说。这天清晨，家家户户用柴灶里积存的柴灰，连续不断地在地上撒成一条长龙，直延伸到附近的河边或井边，用意是把懒龙送走。然后又用黄土从河边或井边开始，撒成长龙，直到自家门前，用意是把勤龙引回。因为龙可行云治水，这种“引龙”活动，用意是希望春暖后有几场好雨，以利春耕。

有些地方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妇女们必须停止针线活，以防“扎坏龙眼”；还要停止洗衣，恐怕“伤了龙皮”。

由于二月二这天已是惊蛰之后，阳气上升，各种冬眠的昆虫陆续复苏，所以，这一天还有一个驱除毒虫的活动。明人于奕正、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这天清晨，家里的老年人要有一人早起，手执小棍，挨房敲打炕沿，嘴里念叨着：“二月二，敲炕沿，蝎子蜈蚣不见面；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不露头。”认为这样一来，蝎子、蜈蚣等害虫就不能复苏了。

至于二月二这天的吃喝，一改春节期间大吃油腻之风，天津、河北等地这天应时素食是煎焖子。焖子是淀粉熬成胶状块，把它切成小碎块，放在平底锅上用油煎炒，煎到有一层黄色脆皮时，盛在碗里，把芝麻酱调稀，撒上蒜末，拌好后即可食用。佐以主食大饼或烧饼，非常可口。

在北京，这天各家各户要吃“懒龙”，说是吃了“懒龙”，可以解除春懒。所谓“懒龙”，是用发面蒸的一条长形卷体，做法是把发面擀薄制成长片，放上和好的肉馅，然后卷成长条形，盘于笼屉中，蒸熟后切开，家人分而食之。这一天，吃米饭名为“吃龙子”，吃面条名为“吃龙须”，吃春饼名为“吃龙鳞”，吃饺子名为“吃龙耳朵”，喝茶要喝龙井茶。总之，是取吉祥之意。

蟠桃盛会三月三

“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扬。”这是晚清《都门杂咏》关于古刹蟠桃宫的一首七言诗。虽非佳作，但当年庙会之盛况，倒也令后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提起蟠桃宫，久居京城的老者如数家珍。此宫又名太平宫，全名“护国太平蟠桃宫”，系道教宫观，坐落于北京东便门外桥南。始建于明代，后残毁几成废墟。康熙元年（1662）经工部尚书吴达礼重建，殿宇两层，供奉西王母。其堪称世界之最的是那座建筑在前殿墙壁上的鳌山，所塑众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或驾云，或徒步，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王母娘娘祝寿。

传说农历三月初三是西王母娘娘的寿诞，循例举行声势浩大的蟠桃盛会。宫内所居道士，遂举行法事，每年三月初一至初五日，举办五天庙会。倾城士女，争先拈香，并在送子娘娘神龛前用红线绳拴泥娃娃以求子嗣。

蟠桃宫地处护城河南岸。开庙期间，自崇文门外沿河东行三里之遥，两岸桃柳掩映，席棚林立，百戏杂陈，红男绿女，人声鼎沸。倘雇毛驴代步，所费无几即可直达宫门，令人顿有八仙中之张果老之感，兴冲冲赴瑶池谒见王母娘娘，喝她一壶仙酒，吃她两个仙桃，听她几曲仙乐，然后再骑驴回归自己的洞府。

既懒得步行又不愿意骑驴者，则可乘船。从崇文门桥头上船，春风和煦，水波不兴，船行款款，偶见鱼虾蹦出水面，有时惊动匿于苇丛中的水鸟扑棱棱飞起盘旋于天际，别有一番诗情画意。至于那技术娴熟的船家，皆系漕运士兵的后裔，不仅水性好，而且深谙早年漕运

的故事，如贪官如何虚报、“花户”如何冒领、水贼如何劫夺，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均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于是生意十分火爆。

游船行至蟠桃宫对面石桥下为一大站，稍事停泊，待上满人后继续东行二里至庆丰闸。此闸俗名二闸，乃当年漕运之要道，河宽水深，波涛汹涌澎湃，冷气森森，凡涉足其间者每每毛骨悚然。久居此处之男童，个个深谙水性，每年趁庙会之际，赤条条聚于闸口，以高超的戏水技艺博取游人的赏赏。浓施粉黛的太太与小姐们，毫不避讳那些光屁股的“野孩子”，随意将所佩戴的首饰抛入湍急的水流中，孩子们恰似一条条蛟龙即刻潜入水下，弹指间便将镯子、戒指、耳环摸上来，物归原主而笑脸请赏。更有艺高胆大的顽童，像猿猴般栖息于树杈间，相机行事，一旦发现水中目标，遂凌空翻着跟头扎进波涛中，动作之迅捷，体态之优美，真不亚于《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其所得赏赏自然丰厚。

全城各档进香朝圣的花会，亦沿两岸鱼贯而行，临河献艺，载歌载舞。另有千百面杏黄色会旗飘荡于人群中，使蟠桃盛会更显得热气腾腾。

清明时节话上坟

三月里来是清明，
桃红柳绿百草青。
别家坟上飘白纸，
我家坟上冷清清。

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寻夫时所唱《十二月小曲》之一。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情景俱见，且寄哀伤。

清明扫墓，是中华民族崇本尊亲、“慎终追远”之孝道的具体表现，已成为相沿已久的习俗。然各地清明也有不同之处。

老北京人特别重视清明节。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扫墓时，除了坟前陈列酒食、叩头祭扫外，还需竖纸幡、培新土、烧纸钱。清明这天还要采摘新柳，制成柳圈，戴在头上。民谚云：“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其实，清明戴柳的风俗缘起很早，正如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所云：“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杭州的清明，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是日，倾城上冢，南北两山之间，车马云集，樽酒担食，山家村店，享遨游，或张幕籍草，并舫随波，日暮忘返。”这是既去上坟，又作春游。浙南有一地方，清明那天，亲朋毕集，家家户户都备办馔肴酒饭，供客人饮食。不论识与不识，也不问哪一家的，可随意入席，一律受到主人的款待。到了奉化则又不一样，把清明上坟当作一年一度的大事。节日将到，家家户户除了买鱼买肉外，还要做一种上坟必不可缺的食

物，俗称“麻粢”。早在清明之前，各家妇女就到四处田野采青艾嫩苗。采归蒸熟，经石臼捣、棍压、刀切而成，三四分厚，四五寸方。相传，上古的人有十节尾巴，随着年事增长，尾巴逐节变黄，到第十节黄了，寿命也就告终。于是，在所谓“十节尾巴九节黄”时，做麻粢为干粮，大块的兼做盖被，然后进入坟穴，吃以待死。后来，子孙就效此，把麻粢切成小块，作为祭祀和分赠之物。奉化上坟的纸幡也比较讲究。凡是辈分高远的祖坟，插的纸幡也更为长、大、美观，有龙、凤、鲤鱼、如意等多种花样，素色为主，加以彩纸。因为剪制颇费工夫，每年清明之前，许多妇女，特别是剪纸巧手，为了剪幡，往往忙到深更半夜。上坟的日子，即使遇到天雨，也从不推迟。在祭扫时，刈除荆芜，整刷碑刻，添加新土，插上纸幡，供奉馔肴，炷香祭酒……然后按长辈到晚辈的次序谒拜，确有“祭如在”的虔诚。归来时，各人还分到麻粢。

至于最为隆重热闹的，要算上祖坟的那天，沿途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在外从事各项事业的族人，大多赶到。祭扫既毕，凡中等学校以上毕业者，一同聚餐，互述景况，共话桑梓，意兴盎然。

端午拉杂谈

端午节是汉族传统节日，又称端阳节、端五节、重五节。“端”“初”同义，“五”“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因“午时”为“阳辰”，亦称“端阳”。

端午节起源，说法不一。现代学者闻一多的《端午考》，曾列出有关典籍中的一百零一条记载，并推断，端午本是吴越之民举行祭龙图腾的节日。

明清以来，北京人过端午节，素有吃粽子、驱五毒、挂菖蒲、缠五色丝等习俗。

“粽”名最早见于晋代周处《风土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古籍说，食粽是为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端午投江的壮举。粽子正式作为商品出售始于唐代。宋代以后粽子制作愈发精巧，花色品种蔚为大观。粽子有南方粽子、北方粽子、广东粽子之别。南方粽子咸的居多，如火腿粽、咸肉粽等，味道鲜美，此外还有莲子、枣泥、豆沙等甜馅的粽子。北方粽子只有红枣、豆沙和净米的三种，风味不如南方的。广东的枕头粽呈长方形，体积比北方粽子大三四倍，馅更复杂，除普通枣泥、豆沙外，还有莲蓉、椰子、蛋黄的。蛋黄还有鸭蛋黄、鸡蛋黄之分。也有把咸肉和小豆、江米掺合一起做粽子，吃起来不同凡响，与北方粽子味道迥然不同。不过北方的净糯米粽子冰镇后，剥到盘里，放些白糖和玫瑰花的汁，或再蘸上点桂花，又凉又甜，米香和花香混在一起，也另有一番风味。清宫中有“奶子粽”，即用奶酪浸米一夜后煮之，味美绝伦。民国后，北海仿膳曾有出售。

驱五毒之俗亦由来已久。清代吕种玉《言鲭·谷雨五毒》载："古者青斋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宣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北京糕点铺届时特制刻有五毒图案的甜馅儿点心，名曰"五毒饼"。此俗反映了劳苦大众除害防病的良好愿望。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则是饮雄黄酒，雄黄为中药，有解毒杀菌之功效。酒和以雄黄，挥发的气味可驱虫除秽。神话故事中的白娘子，便是喝了法海和尚的雄黄酒才现了原形，以致吓死了许仙，遂引发盗仙草一场恶战。

挂菖蒲习俗，亦有实际意义。菖蒲，又名"剑水草"。据《本草纲目》载，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其根茎可做香料。此草具有提神、通窍、杀菌之功效。每逢端午，人们即至郊外采集菖蒲，挂于门户；或将其根茎刻成"小人儿""小葫芦"等饰物，挂于儿童脖项；或用菖蒲泡酒而饮，据说喝了能延年益寿。唐代元和（唐宪宗年号）进士、侍御史殷尧藩诗曰："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缠五色丝之俗，约始于汉代。南朝范晔所撰之《后汉书》中已有朱索连桃印饰门户之记载。汉代流行五行阴阳之说，据说五色丝象征五色龙，可驱邪避瘟。五色丝又叫"朱索""避兵缯""长命缕""续命缕""百索""花花绳"。端午当天，人们把它缠于手腕与足腕；或用彩丝垂金、锡重物挂于脖项；或扎作人形，插于发髻；或缠纸帛折成菱角方，缀于胸前；或缠粽子，相互馈赠。

北京人把端午节俗称"五月节"。而据康熙年间《大兴县志》载，是日少女须佩灵符，簪榴花，已嫁之女亦各归宁，故又称"女儿节"。端午节大家都吃粽子、插蒲艾。但是北京民间从来没有"龙舟竞渡"的风俗。《帝京景物略》就有过"无竞渡俗，亦无竞游耍"的记载。在清代中叶之前，端午节还有外出赏游的事，所谓"女儿节、女儿节，耍青去，送青回"。北京人习惯要到天坛"避毒"，天坛墙外走马。金鱼池、草桥、高粱桥等处游人很多，大家在树阴下席地而坐，饮酒作

乐。这种风俗，很像西洋人的郊外野餐，在康熙年间的《大兴县志》还有记载，可惜后来没有了。

六月六天贶节

农历六月初六俗称天贶节（意为天赐节）。传说唐僧历尽八十难终于从西天取来佛经，在回国途中经大海时佛经坠入海中，为水所湿。皇天感其艰辛，便在六月初六这天赐以炎晴天气，将被水所湿之佛经全部晒干，于是这天被定为天贶节。

明朝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六月六日，内府皇史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为每岁故事。”居家百姓纷纷效尤，于是日暴晒书帙衣裘，以杀蛀虫。

相传这一天，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所以这天把猫、狗也赶到河里去洗澡，以防蛀夏。民间也称这日为猫狗生日。

老北京人常说：“六月六，看谷秀。”其实这是指郊区农民在夏天观察庄稼的长势，以卜丰欠而言。在商界，估衣、皮货、喜轿铺等均于是日大张旗鼓地晾晒衣物。估衣、皮货全要挂在通风处；喜轿铺的轿围子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轿夫、鼓手们的衣帽，一律都搬到院内或街门口晾晒，以防霉防蛀。因为店伙计们忙碌一天，十分劳累，掌柜的照例给他们预备一顿丰盛的酒饭，谓之“犒劳”。

昔日沪谚云：“六月六，晒得鸭蛋熟。”认为这一天最炎热，生鸭蛋暴晒可成熟鸭蛋。村民还在这一天晒伏酱。邑庙城隍寝宫，于是日开箱晒神衣，并为神换新袍，称“晒袍会”。沪城居民还在这天包煮菜肉馄饨吃，认为可免蛀夏。这日，有不少善男信女茹素，叫做“六月素”。

六月六，有些地方有吃面食的习俗。江苏东台民谚云：“六月

六，吃了糕屑养了肉。”认为吃了用麦粉和糖油做的面食，可以长肉。

云南宣威地区在这一日大杀猪羊，上祭土地庙神，可使“土地不开口，老虎不吃人”，求得耕牛不被豺狼所害。

有些地方，妇女在这一天洗头沐发，以为这一天洗了发，可使头发不腻不垢。居民砖木结构的房屋，每年此日以桐油涂门窗、柱梁，据说可以防水拒烂，效果最好。

“七七”鹊桥会

农历七月初七夜晚，相传是牛郎和织女天河相会的日子。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在《牵牛织女》诗中写过：“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五代词人和凝的《宫词》生动地描绘了宫廷妇女乞巧的情景：“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

据《荆楚岁时记》载：“传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又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旧时，每逢七月初七，北京的各京、评、梆子戏班，纷纷贴出“牛郎织女”的演出海报，只是剧名有的叫《牛郎织女》，有的叫《天河配》罢了。在《天河配》的戏剧中，多表现喜鹊为织女搭桥的故事情节。这正符合唐人权德舆的《七夕》诗“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所表达的世人的愿望——夫妻团圆，合家欢乐。

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牛郎织女的故事津津乐道。庾肩吾《七夕》诗云：“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岁华记丽》载：“鹊桥已成，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李商隐诗：“星桥横过鹊飞回。”说的都是喜鹊搭桥以使牛郎织女渡过天河相会，倾诉一年别情的故事。至于《尔雅·翼》说得更有趣：“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笔者虽从未于任何七夕去查看喜鹊的头上有毛无毛，但相信很难有人查得出喜鹊光着头顶。还有，《五色线》载：“郭子仪从军沙塞间，至银州数里，将宿，既夜，忽见空中骈车绣幄中有美女自天而下。子仪拜祝曰：‘今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升天。”笔者认为此事离奇，很可能是郭

子仪自己编造出来往脸上贴金的！此外，白居易《长恨歌》曰：“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乐史·太真外传》：“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可见七夕无论如何都是个不平常的日子，自古以来，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非常重视这个日子。

记得幼时在京华，七夕之晚，与老人共坐院里纳凉，父辈尝指天上的银河说，河畔某某星是牛郎、某某星是织女。每年七夕前后，戏园大都演出《天仙配》。记得20世纪30年代，一次偕未婚妻看戏剧于庆乐戏院，演到天将奉王母命强令织女回天，织女苦苦哀求“……可怜我一双儿女，乍离娘怀……”时，未婚妻居然哭了。到了王母画一道天河，把牛郎织女隔离开，牛郎担挑着两个孩子，向天上的织女哭别时，她又哭了。就这样，洒泪离开了戏园。

几十个七夕过去了，也记不清是怎样过来的。但是，每到这个日子，一想起在京的情景，心里仍不免有些怅然。今天，七夕仍旧，景物全非。想到幼年时玩的“七巧板”，现在恨不得找一副“七巧板”来玩玩，以重温儿时甜梦。《事天类聚》云：“七月六日有雨，谓之洗车雨，七日雨则云洒泪雨。”但愿七夕无雨，否则，我几将洒泪以思念京华了。“七月七日天河配，天上织女会牛郎。”这个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美丽神话故事，几千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任何力量，哪怕是象征天庭最高权威的王母娘娘，企图硬将牛郎与织女隔开也是徒劳的。人们那样热切地期望着，鹊雀搭成的天桥把银河沟通，永远不再有隔河相望的哀愁与怅惘。自然，人为的隔水相望，又何能久长。

放荷灯与烧法船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汉族传统节日中元节。此节初为佛教节日，称“盂兰盆会”。传说释迦弟子目犍莲，为救在地狱中受苦的母亲而求佛超度。后演变为民间追念祖先的日子，故亦称是日为“鬼节”。

旧京之中元节，庙宇僧众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民间则举行放荷灯与烧法船的活动。

放荷灯亦称放河灯，其含义是导引鬼魂进入极乐世界或及早托生转世。荷灯之样式，其上半部皆为彩纸叠成的莲花儿，下半部的载体各异，或西瓜或冬瓜或南瓜或倭瓜，取其半并掏空瓤肉，中插点燃之蜡烛，于夜幕初降时放入河湖。其时，烛影摇曳，随波荡漾，与水中倒影上下映衬，灿若繁星。正如清道光皇帝的《养正书屋全集》（道光三年刻本）之《中元河灯》诗所云：“万盏莲灯水面浮，中元佳夕荡轻舟。繁星朗月光同映，点缀前汀一段秋。”

清末民初以来，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北京人照例要到北海公园参加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大放河灯。是日夜晚，北海太液池之上，南迄双虹榭边，北至五龙亭畔，碧波涟漪之上，灯火闪耀，如银河群星，景色极为壮观。

这天黄昏，明月初升，北海漪澜堂两侧的走廊和北河沿岸的四周以及金鳌玉䗖桥边，真是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北京什刹海、积水潭、御河桥、护城河水关等处，也有放荷灯之盛举，故清宗室文昭（号紫幢，博学工时，负有才名）的《京师》竹枝词曰：“坊巷游人入夜喧，庄连哈达右前门。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中元节烧“法船”，其用意是超度幽冥孤独之魂。此种冥器，俗称“烧活”，小者丈余，大者数丈，由冥衣铺匠人以秫秸扎架、彩纸裱糊并绘画而成。法船用料虽廉而工钱甚昂，故凡烧法船者，非殷实之家莫敢问津也。

法船之船头，为猛虎虎头图案，船身持叉之开路鬼站于前，其后相对而立者，系黑白无常。“白无常”也称“活无常”，身着白袍，头戴白色高帽，上书“利见大人”四楷书大字，手持哭丧棒若挥舞之状；“黑无常”又称“死有分”，身着皂袍，手持“勾魂牌”，上书“你可来了，正要拿你”，并用朱笔圈点，其狰狞之貌，令人望之不寒而栗。

法船舱内糊十殿阎君，即秦广王蒋、楚江王历、宋帝王余、五官王吕、阎罗王天子包、卞城王毕、泰山王董、都市王黄、平等王陆、转轮王薛。中为地藏王菩萨，正襟危坐，接受十殿阎君朝拜。神鬼以外，尚有掌舵者一人、持桨划船者数人至十余人不等。船之桅杆上挂一面旗子，正面书“盂兰圣会”，背面书“慈航普渡”。

如此庞然大物，系由四五节组合而成。送至法会现场，需由冥衣铺临时雇佣十余人（俗称“拿烧活的”）举送，丝毫不得损坏。送船者列队而行，穿街过巷，稚子顽童出于好奇，每每尾随追看，并极愿为雇工代劳，体验一番举送烧活的滋味儿与情趣。

旧时焚烧法船，皆在午夜举行，先由和尚奏法器诵经文，而后于水畔焚之。彼时，火舌冲天，光焰晃眼，煳味儿熏鼻。虽如此而观者如堵，不饱此眼福誓不罢休。恰如《都门离咏·中元》云：“朵朵莲灯放满河，烧船拯溺诵弥陀。夜深妇女归家去，萤火惊飞鬼火多。”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中秋，农历八月十五，这是中国传统的喜庆节日，又叫“团圆节”。关于中秋，古往今来留下了诸多诗赋。“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这是京剧《龙凤呈祥》中刘备的唱词。

《天宝遗事》记有唐明皇与甲天仙“中秋游月宫”的事。郑綮的《开天传信记》云：“吾（唐玄宗自称）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以上清之乐，嘹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又说：“玄宗见天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傅咸文曰：‘月中何有？玉兔捣药。’”唐代诗人唐彦谦有诗云：“蟠拿对月吸深杯，月府清虚玉兔吼。”宋代的胡宿也有“杯酒易销残梦断，却疑身在广寒宫”的诗句。

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八月十五日祭月……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八月中秋，望日，月最圆，中国民间有以月饼祭月、拜月和赏月的风俗。

一进八月，北京的各点心铺生意开始兴隆。前门大街正明斋、观音寺蕙兰斋的京味月饼自来红、自来白、翻毛、提浆，以及稻香村、桂香村、聚顺和的南味月饼，便供不应求。卖水果的鲜货店，两百支光的大灯泡，照耀着挂着白霜、色鲜甜脆的苹果、鸭梨、葡萄、石榴。店主用鸡毛掸子轻轻拂去水果上的微尘，高声吆喝；一有主顾，立时满面含笑招呼；遵主顾吩咐将水果打成方方正正的蒲包，上盖红绿商标，送客出门。生意出奇地好！

中秋之夜要摆供拜月。一般百姓比不得豪门大户的铺排，但恪守“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古俗。除月饼、水果外，家家还蒸团圆饼，图个吉利。团圆饼用上好的白面发酵，搓成圆形薄片，每层放入

红糖、玫瑰、桂花，一层层叠加，厚达十几层。最后用一张大而圆的薄面片包好，表层上置青丝、红丝、瓜子、杏仁等果料，上屉蒸熟，成直径盈尺、高达数寸的大蒸糕。然后切成块，全家老少分食，以示团圆之意。

逢节必有应节戏，这也是老北京的规矩。中秋前，各戏园演戏也多以月亮和兔儿爷为题材，如《嫦娥奔月》《唐王游月宫》等。舞台上出现欢蹦乱跳的活兔儿爷，勾脸豁嘴，足踏朝靴，手执玉杵做兵刃，在台上蹿跃做兔状，常常博得大家一笑。

旧日北京农历八月，大街小巷的店铺、小摊都摆设着各式各样的泥塑兔儿爷肖像。有的身着蟒袍，腰围玉带；有的披挂铠甲，背插靠旗；有的凤冠霞帔，簪环佩玉；有的方巾皂履，神态端肃……小者犹如玩具“不倒翁”“泥叭狗”，不足三寸；大者尺余以至数尺，亚赛庙寺神佛泥胎，真是叹为观止。

清《帝京岁时纪胜》说：“京师以黄沙土做白玉兔，饰以五彩妆颜，千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灯火荧辉，游人络绎……”《燕京岁时记》在《兔儿爷摊子》一段中也写道：“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售出，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戴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其余匠艺工人，无美不备，盖亦谑而谑矣！”把动物中的白兔，以人格化手法描绘一番，确为中国民俗文化增添了奇异的色彩。

杜甫的名句云：“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还在异乡的游子，每逢中秋赏月的时候，能不忆起故乡的明月吗？以超脱豁达的态度赏月，还是要数苏东坡，他的《水调歌头》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多少漂泊在外的游子生出几多温馨和感怀。是啊，明月几时有？就让这轮明晃晃的中秋月，普照所有怀念家乡和家人所怀念的亲人吧！

九九登高倍思亲

传统习俗，人们常在春回大地的清明节远足踏青，而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则要登高望远，思亲怀旧。

农历九月古称阳月，九日古称阳日，九月九日二阳相遇，故称“重阳”。据魏文帝与钟繇书云：“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杜甫诗有：“旧日重阳日，传杯更放怀。”可见重阳节之来源远自汉、唐。重阳这一天，除登高以外，还有饮酒赋诗、插茱萸，以及琴棋竞艺等活动。这是一个士林雅集的节日。

北京人登高，近者到景山、北海、法塔，稍远则去万寿山、玉泉山、香山、西山八大处，再远则至居庸关、八达岭。

登高地点除了人们熟悉的北海揽翠轩、景山顶端的碑亭以外，天坛东墙外迤东，还有一座历经八百多年沧桑的古塔——法藏寺弥陀塔。据《北京案内记》记载，这座塔共有七级，中空可登。昔日每逢重九登高之日，北京城的老幼纷纷登塔观光。“居庸叠翠”为“燕京八景”之一，此地苍松翠柏，山峦起伏，游此既可登高，又可赏景；而去香山碧云寺的游客必以攀登最高峰“鬼见愁”、欣赏满山“红于二月花”的红叶为乐事。

登高的“高”与“糕”字同音。故每逢九月九，北京人均买各种满汉糕点，欢度佳节。旧时，北京的芙蓉糕、萨其马以正阳门外正明斋制作得最为精细味美。

芙蓉糕以米花、蜂蜜、白糖等原料做成，表面上染以粉红色，其色若芙蓉花，故名“芙蓉糕”。萨其马则是满族糕点的名字，是用鸡蛋

和白面做成细条，过油煎炸，再加入蜂蜜、白糖、瓜子仁、金糕条，糕面撒上青红丝。其味尤为甜香可口。

北京的蛋糕分槽糕、碗儿糕、喇嘛糕数种。槽糕为桃形、扇面形、银锭形、圆形，以模槽制成。碗儿糕则是以蛋、面和成糊状，掺以瓜子仁、核桃仁、松子仁、杏仁、花生仁，灌入碗中，蒸制而成。喇嘛糕是蛋糕中呈黄色者，面上印以红色“福”“寿”篆字，以其色调如喇嘛僧衣色而得名。也有说雍和宫供佛均用此种糕点，故名。

冬至大如年

关于冬至，在北京有两种说法：一是“冬至不算节”，一是“冬至大如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故安在？因为北京是六百多年的古都，做官的人各地都有，这样，北京城里的风俗习惯就比较复杂了。

明代赵可与《孤树裒谈》记云：“京师最重冬节，不同贵贱，贺者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自正统己巳之变，此礼顿废。”

所谓“正统己巳之变”，是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历史上称为“土木堡之变”。就是说，民间风俗的变化，也常常受到时局影响。但是“冬至大如年”这句话一直在民间流传着，小时候还常常听到老人们这样说。

清末《燕京岁时记》云：“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民间不为节，唯食馄饨而已，与夏至之食面同，故京师谚曰：‘冬至馄饨夏至面。’”这段记载中提到“民间不为节”，可见清末与明代风俗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宫廷中还是十分重视冬至的。除去百官互贺而外，官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一天一律要戴暖帽（有皮檐的帽子）。当然“翎子”“顶子”照旧，但是要有皮檐，由皇帝到官吏都是如此。再有从这一天开始，按官品够得上穿“貂褂”的人都要穿起来，谓之“翻褂子”。貂褂是毛朝外穿的，好像现代女士的翻毛皮大衣一样。一件貂褂价钱很贵，又非穿不可，这在有钱的王公大臣中自然不成问题，而有些冷官，如礼部、翰林院、御史台等清水衙门的官员怎么办？那就要到估衣铺买旧的，不管如何光板无毛，只要是件貂褂就可以了。因而，有的貂褂实际还不如一件棉袄暖和呢。

在京的京官，都按各人的家乡习惯来过冬至。林则徐在翰林院做编修时，家住虎坊桥，年年过冬至，都在日记上记着“夜搓丸”（即做汤丸），这是按照福建的风俗过冬至。李越缦同治元年（1862）住在宣外大街，冬至那天日记记云：“天未明即醒，早起盥漱毕，焚香张烛，拜祖宗遥敬。”冬至祭祖，这又是包括绍兴在内的江南人的规矩。至于北京人呢？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吃顿馄饨就行了，同过年吃饺子差不多，不过换换花样罢了。

北京人冬至吃的馄饨，多为猪肉馅，羊肉馆也有卖羊肉馅的。笔者幼时也吃过人家的素馅馄饨。素馅也可以说是甜馅，作料包括红糖、白糖和青红丝。这种馄饨煮不得，而是蒸熟。蒸熟的甜馅馄饨很好吃，如果把它晾凉了再吃，则又别有一番风味。后来，甜馅馄饨在市上渐渐绝迹了，一般都是肉馅的，用猪骨汤或鸡汤来煮。馄饨用的作料也日渐发展，从过去的香菜、虾皮、紫菜、冬菜，又进一步增添了辣椒油、味精、胡椒等。有的卖馄饨的还附带卖自制的火烧、酱肉，更受人欢迎。

福州冬节搓丸风俗

福建历来重视冬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宋代梁克家《三山志》有“冬至，州人重此节”的记载。

明代冬至最热闹，王应山《闽火记》中说：“冬至日，粉米为丸。”现在福州流行的“搓丸”“贴丸”“馈丸”，就是那古老风俗的遗韵。

搓丸，是团圆的象征。冬至前一天晚上，福建人在祖先神龛前陈列三盆簪花的寿面，炉喷香，台插烛，还放一个插着金橘的花瓶，五彩缤纷，洋溢着吉庆的气氛。在堂中另摆一张圆桌，桌上放着一只大竹箩，箩中盛着糯米磨成的粉面，点缀福橘数枚和新购红筋一副，筋的两端各簪有一朵四季花和绸制的长春花。此外还有一只泥塑的裸体胖娃娃，叫作“孩儿弟”。

准备好了，全家男女老幼洗净手，穿上整洁的衣服，就围坐在大竹箩周围搓捏米粉团。搓出来是圆的——或大或小的粉丸，捏则不拘。大人喜捏蝙蝠（福）、鹿竹（禄）、寿桃（寿）、山羊（吉祥）、如意、鲤鱼（有余）等象征吉利的东西，小孩们却喜欢捏老虎、雄狮、白兔等小动物。小孩子每捏出一件东西来，大人都用吉利的语言来表扬一下，叫作“喝彩”。即使小孩捏了一只乌龟，大人也要喝彩说：“长寿！长寿！”这种全家团聚一堂、欢欢喜喜搓米团的场面，是其他节日所没有的。

小粉丸煮熟后，调糖就可以吃；大粉丸煮熟后，要放在掺糖的豆粉中滚一滚，味道十分芳香可口。除当夜吃些外，第二天清早还馈赠亲戚朋友，作为贺节礼物。至于所捏的形形色色的粉丸，煮熟后小孩们都抢着吃，特别是自己捏的。

在搓丸的时候，人们一边搓还一边唱，唱的歌谣内容很多，一般流行的词是：

搓丸试搓搓，年年节节高。
红红水党菊，排排兄弟哥。
大人增福寿，妮子唱诗歌。

搓丸时点烛的烛台称为“回进宝”，也有写成“火儿母”的。这是搓丸时特制的烛台。用泥土捏塑，塑的是一对胸围红肚兜、手抱聚宝盆的胖娃娃，盆上可以插烛。外敷彩色，极逗人喜爱。因为是用模翻的，价格也便宜。这种“回进宝”是回回进宝之意。福州早在宋元时期就与阿拉伯国家通商，这些商人多是崇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又称回回。凡与他们通商的人，大多发家致富。因此，“回进宝”烛台便成为吉利发财的象征了。

《九九消寒图》

在北方，按时节说，一到冬至，就进入严冬期了。人们计算着，九九八十一，八十一天之后，九个“九”过完了，就算熬过严冬，天气转暖了。据《津门杂记》记载：十一月冬至日，绘消寒图，食馄饨。

我幼年时，逢冬至日，吃不吃馄饨不大在意，但《九九消寒图》却是每年必画的。回想起来，那确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过冬方式。记下“九九八十一天”的天气变化，也可以供事后有某种需要时查看消寒图上阴晴风雪的记载，帮助记起发生过的某些事情。甚至有人把历年的消寒图积存下来，对比几年中天气变化规律。但那是对气象学有爱好的人所为，我可没有作过积攒和比较。

明朝人刘侗编写的《帝京景物略》有一段记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出，则春深矣。”说明《九九消寒图》的绘制由来久矣。

我画消寒图没有画过梅花。私塾老师教过我两种画法：一种是横竖交叉各画十条线，成为九九八十一个方格，每格中画一个仿古铜钱状，按照下面的歌诀，每天把天气变化画在铜钱中。歌曰：“冬至一阳生，滴水冻成冰。上黑是天阴，下黑是天晴，心黑天寒冷，心白暖气升，满黑纷纷雪，左雾右刮风。”另有个简易歌诀是：“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当中。”

第二种是写九个大字，每字九笔，如“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用笔把每个字每笔双勾，留下白空，成为九个空心字体。每个字代表一个“九”，逐日逐笔填黑，到九个字都填完，“九九”都过去了。这句话又含有在冬季盼望春来的诗意，我很喜爱它。

年岁老了，愈觉寒暑更迭得快。居港多年，这里气温较高，不像家乡入冬后寒气逼人。但是寒冬岁暮，终免不了季节更替的心情。在年终换置日历之前，我首先绘制了铜钱形的《九九消寒图》置诸桌头，以重温童年生活的情趣。

腊八节的来历

在中国民间的节日中，腊八节虽不及春节、中秋、端午、重阳那样隆重热闹，但由于历史悠久，传说故事动人，还是颇有影响的。

腊八节本是佛教节日。据印度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曾经出家修道，但是经过了六年的苦行生活，仍然没能在精神上摆脱人生的各种苦恼。这时他已经饥饿疲惫到了极点，幸好有一个牧女给他送来了乳糜（奶粥）使他恢复了体力。然后他又到河中沐浴，洗去了身上的污垢，最后在菩提树下静思七日七夜，终于觉悟成佛。于是佛教便把这一天作为“成道节”来纪念。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认为释迦牟尼成佛是在十二月（即腊月）初八，遂以“腊八”为成道节。古时候，每逢这一天，各寺院都要诵经纪念，并且仿效牧女献乳糜事，以各种香谷、果实煮粥供佛，称为“腊八粥”。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习俗便从寺院扩展到了民间。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时期，这一天各寺院都要办浴佛会，还要煮七实五味粥供佛并赠施主。是日，民间各家亦将果子杂料煮粥而食。明朝时，皇帝在这一天要向文武百官赏赐宫内煮的腊八粥，其用料自然十分讲究。到了清朝，这一风俗更为盛行，不仅家家煮腊八粥，而且有钱人家还用果料做成各色禽虫来装点粥面，相互赠送。自乾隆年间开始，皇帝赐给文武百官的腊八粥，都是在雍和宫煮成的。雍和宫内有一口直径约两米、深一米五的大铜锅，是专为煮粥用的。当年雍和宫总共要煮六锅腊八粥：前三锅供佛和献给皇家及王公大臣们享用，所以粥料特别精美，还要添放奶油、羊肉丁等；第四、五锅是送给百官及众喇嘛吃的；第六锅是施舍给老百姓的，质量自然就差多了。据说这口熬粥的大铜锅现在还保存在雍和宫前院的西鼓楼旁，也可以算是一件文物了。

腊八粥的原料，可多可少。小户人家用大米、小米、江米（即糯米）、红小豆、豇豆、红枣熬一锅粥，颇为香甜可口。昔日豪门大户若煮腊八粥，讲究起来可就无尽无休了。除上述几种普通原料以外，还要增添珍珠米、薏仁米（即苡仁）、菱角皮、鸡头米、赤豆、绿豆、豌豆、芸豆、莲子、花生仁、松子仁、榛子仁、核桃仁、白果、栗子、桂元肉、荔枝肉、红枣、金丝蜜枣、青梅、瓜条、橘饼、金糕条、梨干、桃脯、苹果脯、蜜饯温朴、蜜饯海棠，再加上瓜子仁、炒芝麻、青红丝、红白糖等，加上外用果料几乎上百种之多。

每逢腊八节，民间除煮腊八粥外，还有泡腊八蒜、酿腊八酒等习俗。腊八蒜是将蒜头去皮后泡在米醋内，月余后蒜呈浅绿色，味道鲜美，说是食后可驱疾病、避瘟邪。腊八酒，是腊八节用糯米酿制的酒，越年后酒呈暗红色，晶莹透亮，点滴成丝，酒味浓郁，饮后唇齿留香。可惜这种民间酿制的酒，一般数量不多，仅供家用，市场上很难买到。

“小年”祭灶

依照中国的传统风俗，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叫作“小年”。之所以如此称呼，恐怕是因为再过几天，作为“大年”的春节就要来临了。因此，也可以说“小年”是“大年”的前奏或序曲吧！

小年祭灶是大江南北共同的习俗。过去，到这一天人们都要在灶屋（厨房）锅台的附近墙壁上供奉灶王爷和灶王奶奶。佛龛神像的两侧还要贴上一副对联，上联写“上天言好事”，下联写“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横额是“一家之主”。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所以人们把灶王爷恭恭敬敬地奉为一家之主，这是可以理解的。

昔日北京，每逢农历腊月上旬，大街小巷的油盐店、杂货铺、南纸店、百货摊都代卖灶王爷。这种木版水印的神像，大多来自华北“版画之乡”——天津杨柳青。那和蔼、肃穆、善静的灶王爷、灶王奶奶盛装端坐，给人们以庄重的感觉。

每年一度，人们都要“请”回一幅新的灶王像（不能说“买”），来代替被烟熏火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陈旧不堪的旧灶王像。这似乎是在向人们预告，除夕马上就要到了。

给灶王爷、灶王奶奶奉上的供品，不需鸡鸭鱼肉、干鲜果品之类，更不需用牛羊三牲，好像灶王爷是“两袖清风”，不需什么珍贵的供品，只需一些“糖瓜”（用麦芽糖制作的像鸡蛋大小的瓜状糖块）就可以了。稍讲究一点儿的人家，再供上一碗用糯米蒸熟的莲子八宝饭。灶王爷骑的神马，还要供以香糟炒豆和清水。

俗云：“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这天人们称为“祭灶日”。在北京，这一天晚餐之前，每家家长都要先把糖瓜在灶门前烤化，然后

抹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嘴唇上。即使灶王爷不馋，人们也硬要把烤化了的糖饴放在他老人家的嘴边，看来灶王爷贤伉俪都是喜欢吃甜食的。至更尽时分，家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燃放鞭炮，举家男子跪拜，祝以抑恶扬善之词，送灶王爷上天去向玉帝启奏人间一年之善恶。而妇女不能参拜，只于内室扫除炉灶，燃灯默拜。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奶奶要新鞋，爷爷要毡帽。”祭灶过后，新年就临近，家家男女老幼迎新的欢乐和忙碌，各自对新春佳节的美好向往，都从这首童谣里反映出来。

其实，祭灶的风俗由来已久。《礼记·月令》郑玄注云：“祀灶之礼，设主于灶陉。”灶陉即灶边承器之物，以土为之者。那时祀灶被列为五祀之一。《战国策·赵策》云：复途侦谓卫灵公曰：“臣尝梦见灶君。”唐代罗隐《送灶诗》亦有“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的名句。可见两千多年前已有祭灶之礼，且历代相沿成习。

时令记趣

春饼、春菜和春酒

北国天寒，长城内外白雪皑皑，千里冰封。京津虽然不算高寒区，却一冬平均气温总在冰点左右，所以人们盼春的心情可谓甚渴。立春标志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立春这一天，讲究吃春饼、春菜，喝春酒，以点缀节日，抒发迎春的愉快心情。

立春吃春菜是古已有之的。据《四时宝鉴》载：“立春日，唐人做春饼、生菜，号春盘。”《武林旧事》载：“春前一日，后苑造办春盘，翠缕红丝，备极精巧。”

北方的春饼是薄烙饼，不同于平日吃的家常大饼。有的有夹层，有的像大型的饺子皮，比平时的大饼小得多，亦薄得多，卷春菜吃。春菜是把新青韭、豆芽菜、细粉丝、胡萝卜丝、肉丝等混合炒，有荤素两种吃法，又叫炒合菜，鲜香适口，正符合“翠缕红丝，备极精巧”的春菜形象。有的人家，在春菜之外，往往再配上几盘菜，如炒鸡蛋、麻酱蒜拌黄豆芽、炒豆腐干、炒肉丝或炒藕片之类，全属淡雅菜品，不动鱼肉大荤。

吃春酒之风，除一般市民家庭外，尤盛行于各行各业的商店中。当年的大商店立春吃春酒之风极盛。春节前商店结账、催欠、清仓、盘存，大忙特忙。一过了除夕，百事完毕，整个休市。于是，不问立春是哪一天，吃春酒习惯都从新年正月初一开始。同行间互请，一直吃到正月十六过完灯节为止。

商店请吃春酒，首先请银行、钱庄，酬谢资金融通上的支持；其次是同业互有交往之家；再有就是掮客，感谢生意上的互助，并约定新一年的合作。当年，天津旧法租界杨福荫路各钱庄，六号路益友坊

附近各棉布庄，针市街、竹竿巷杂货业的“老四号”，估衣街“祥”字号以及各业批发商等，在新年正月的上半月中，天天摆酒排筵，觥筹交错，极尽热闹。

后来，抗日战争的战火席卷全国，商界衰微不振，这种吃春酒的排场也就逐渐消弱了。

春回大地话风筝

久居城里的老北京人，不论穷富，总是一辈子也离不开玩乐。刺骨的严寒迫使他们闷在家里“忍冬儿”，一俟迎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春天，便兴高采烈地大放风筝，以散发一冬蕴蓄的内热，并舒展几乎待撒了的筋骨。

风筝，古称“纸鸢”，是一种既可做玩具又可供观赏的传统工艺品。考其源，与军事有关。据明代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风筝》云：“汉高祖之征陈也，韩信谋从中起，故做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遂入宫中，今谓之风筝。”

其实，“风筝”一词本来含有声响的意思。据明朝陈沂所撰《询黔绿·风筝》记载：“初，五代汉李业于宫中做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呼风筝。”由此可见，民国期间在北京尚可见闻的“簧鼓风筝”，系由五代后汉之竹笛纸鸢演变而成。

北京的三四月份，是放风筝的旺季。从杨柳枝头泛出隐隐的绿意到桃花乱落如红雨霏霏的暮春，民间的风筝艺馆与四九城的风筝摊，生意格外兴隆，到处可见风筝浮动，随时可闻簧鼓之声。

素有“藏龙卧虎”之誉的北京城，风筝艺人也层出不穷。善做八卦形风筝的李三爷，以糊猴儿、八戒而出名的“猴儿常”，因善制苍鹰而誉满京华的“四龙”，博采众长、誉满全球的“风筝哈”，以及只为自娱不图赢利的儒生王振亭，各以其迥异的风格独树一帜。此外，尚有内务府造办处（清代皇宫内掌管手工作坊的机构）绘制上品风筝的能工巧匠，因在宫中当差而其名不显也。诸多怀巧夺天工之艺的风筝艺人

中，以雕虫小技而历久不衰且世传四代者，唯有“风筝哈”。据孙建中《琉璃厂小志》载：“哈记风筝，在琉璃厂中间路北仁威观。今数十年，以哈氏制售之风筝为最著。”

“风筝哈”者，其名哈国梁，乃光绪年间京都南城寒门人氏。清末民初，即以匠心独具之造型奇特、形态迥异、色彩斑斓的哈记风筝而享誉朝野。其子哈长英，自幼受其熏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制风筝曾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银质奖。其孙哈魁明，家学渊源，各类风筝作品均以彩绘见长，既可放飞，又可悬于大雅之堂作为陈列，故曾数十年称雄于京城。至于其曾孙哈亦琦，以其家传技艺而就任北京风筝厂副厂长，厂中所产大批风筝常年出口，颇受世界各国风筝爱好者之青睐。

北京之风筝，形式各异，尺码有别。以其造型分，包括人形、拍子形、蜈蚣形三大类；以其尺码分，大则三十丈，小则若手掌。

人形类之风筝，其原型即“沙雁”，而由此行化者，则有哪吒、刘海、钟馗、孙悟空、猪八戒、哼哈二圣、合和二仙以及蝴蝶、蜻蜓、鲇鱼、龙睛鱼、鹰与雕等变形。拍子形大都呈八卦、三阳开泰、七鹊登枝、单双喜字诸形态。最奇者为蜈蚣形，由百余个环节组成，分量重且之间容易互相缠绕，故极难放。

好玩乐的北京人，因其经济状况不同而分三六九等，而各类人的风筝做工自然也有糙细之分。有钱的大爷于大庭广众之中玩风筝时特别讲究出人头地，于是每每不惜以重金定做。不仅对材料的选择、尺寸的比例、图案的彩绘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必须使某些风筝的眼睛和翅膀在空中颤动不止。就连那线桄子，也要选用红木或金星乌木所制。囊中羞涩者放个“黑锅底”（普通小沙雁），照样可以尽兴过瘾。至于一个子儿没有的穷孩子，大都自己动手用旧报纸糊“屁户帘儿”（一种长方形的简陋风筝，下缀长纸条做飘带，因形似小儿屁帘儿而得名），劈柴上缠些棉线便是线桄子。三五成群迎风而放，也能

飘起一丈多高，彼时社会对此讥笑为“穷人乐”。

曩年的北京城，空旷之处颇多。天安门前、什刹海畔、鼓楼左右、天坛内外，以及东单草地，均是放风筝的理想之地。酷爱风筝的儿童或成人，一俟购妥心爱的风筝之后，便呼朋引伴，成群结伙地择地去放飞。大大小小的风筝迷，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与和煦的春风里，说着、笑着、跑着。随着竹桄子和红木桄子的哗哗作响之声，数百只形形色色的风筝渐渐腾空而起，大有遮云蔽日之势。黄瓦的宫殿、苍翠的松柏、拂地的绿杨、荡漾的碧波，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山，同那些被温和的春风送上天宇的风筝组合成一幅迷人的图画。而风筝的主人们，连同那些悠闲的围观者，无一不在画中游。如此之雅兴，非至黄昏而不收。故旧京《放风筝》诗云：“不知黠索弄东风，只讶轻雷走碧空。试立御河桥上望，纸鸢无数夕阳中。”

最爱吃喝玩乐的慈禧太后，也是一位风筝迷。其所玩之各类奇巧风筝，除由“造办处六十一行”协力精制外，亦慕名以重金猎奇于民间。这位被朝野都尊称为“老佛爷”的女皇，每年总是刚赏罢上元花灯即下谕旨筹办风筝之事。而放风筝之地点，或宫中，或中南海。届期，自有深谙风筝之道的太监纷纷在春风中大显身手。

立夏尝新

春去夏来，万物欣欣向荣，多种时鲜纷纷上市。我国许多地方都有“立夏尝新”的风俗，有的地方还延至夏至，成为华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吃立夏蛋”是全国最为流行的，至今仍然存在于汉族饮食风俗中。立夏之日，男女老少都爱吃煮鸡蛋或咸鸭蛋。民间认为，“吃立夏蛋”能使人强身健骨，格外有精神。民谚道：“立夏吃蛋，石头都踩烂。”

江苏、浙江一带至今仍有人保留“立夏日，吃补食”之风俗。补食中较考究的是“五虎丹”（红枣、黑枣、胡桃、桂圆、荔枝）和“三两半”（党参、黄芪、当归各一两，牛膝半两）。

浙江的杭州地区有“烧夏夏饭”之俗。逢立夏前一日，儿童们乞一碗米（叫兜夏之米），在立夏日将米集中野炊，并于熟饭上置青梅、樱桃等，然后分送赠米之各户人家。据说，吃了可免疰夏（指夏日发烧的病，患者多为小孩）。也有从田中采摘新鲜蚕豆，拌入鲜笋、咸肉等做“烧夏夏饭”的。

江苏苏南地区最重视立夏尝新。苏州人是“立夏见三新”，即在立夏日以樱桃、青梅、新麦来供神祭祖，之后举行的家宴上时鲜纷陈。此时的集市，也称为“卖时新”。有疰夏之旧疾者，于当天取隔岁炭，烹煮从左邻右舍索取的新茶叶（叫七家茶），饮之以疗旧疾。镇江人讲究“立夏尝八鲜”，即尝樱桃、笋、新茶、新麦、蚕豆、扬花萝卜、鲥鱼、黄鱼。常州人所尝“三鲜”分为地上、树上、水中三类。地上三鲜是苋菜、蚕豆、元麦，树上三鲜是樱桃、梅子、香椿头，水中三鲜

是螺蛳、刀鱼、白虾。富庶的鱼米之乡常熟的“尝九荤十三素”可谓立夏尝新的集大成者。“九荤”是鲥鱼、鲚鱼、咸蛋、海螺蛳、叫花鸡（此鸡是当地名特产）、腌鲜、卤虾、鲳鱼、鳊鱼；“十三素”是樱桃、梅子、麦蚕（把新麦面揉成细条蒸熟）、笋、蚕豆、茅针、豌豆、黄瓜、莴笋、苜蓿（香港等地人称为草头）、萝卜、玫瑰、松花。

立夏过后，有的地方“尝新”要延续至夏至。如湖北的黄陂等地于每年夏至后逢卯日“吃新”，又叫“过半年”。届时农家要摘一穗新稻祭祖，企盼今年丰收；同时品尝时鲜以庆祝“过半年”。当地民谚道：“过了年（指春节），望吃新。”江苏海州等地于“小满”之日“尝三鲜”，即尝樱桃、黄瓜、鲜豌豆角。江苏人普遍认为吃碗豆或豆糕可免疰夏。所以泰县人于夏至日“吃时果”，即把豌豆煮熟拌糖吃；仪征人则喜将豌豆糕馈赠亲友，盼其去旧疾；南京人特别强调要坐在门槛上吃豌豆糕，认为这样才有疗效。

南京人夏日尝鲜中有一种“莴笋圆”。即把用盐腌渍后晒干的瘦长莴笋，铺、卷成扁平小圆饼状，然后用刀在盘中切片，若在饼中央放一片红色花瓣更佳。长居香港地区的南京籍著名作家叶灵凤在香港报纸上详谈此色、香、味俱全的家常小菜，引起不少人的乡思。

热在三伏

曩昔在京时，到了伏天，是另一番景象。

北京人的避暑胜地很多。承德避暑山庄，那是过去皇帝避暑之地，好固然好，路途遥远，一般人去不了。北戴河是达官贵人的避暑之所，老百姓未敢问津。北京城里引人入胜的地方也有，如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中南海公园。盛夏伏天，每每仕女如云，傍晚以后，老百姓不约而同竞相前往乘凉。但是，尤其吸引人的还是什刹海荷花市场，那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不仅风凉，更有那形形色色的消夏美食，如八宝莲子粥、苏造肉、鲜菱角、鲜核桃仁、鲜藕片等。这里每天从早到晚，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市民，一来纳凉，二来饱享口福，乐何如也。

早年在京时还听老人讲，清代，每年从暑伏之日开始到立秋为止，各衙署都有“赐冰”之举。由工部颁发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此外，清代还有“洗象”的趣事。那时每逢三伏，都要举办“洗象”例典。由内务府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门至护城河桥下的象闸，象奴挽索骑在象背上，在河中给象洗澡。但见许多庞然大物出没于清波荡漾之中，紧邻的城墙和两岸上，观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京城四季温差极大。冬天冷得滴水成冰，夏季热得脖子流汗，尤其数伏后，昼夜闷热得喘不过气来。谚云：“暑热无君子。”意即最讲衣着整饬的君子，盛夏亦可赤背而不被人耻笑。至于不在“君子”之列的粗人，则不仅赤背而且赤脚，袒露着黑中透紫、汗津津的肌肤穿行于大街小巷。五六岁的童男子们，干脆一丝不挂，赤条条地满街跑，那小巧的“阳具”，紧缩着、颤动着，显示着童男一种特有的美。少妇们见了亦不觉得害羞，而且应和着老爷们儿的叫法，美其名曰“小茶

壶儿”，只是不像老爷们儿那样戏谑与放肆——动手逗逗罢了。

伏天中的老妇人，说好听点儿，最为落落大方；说难听点儿，最为放肆，最不论“秧子”。乳房是妇女的第二道禁区，即便是热出了白毛儿汗，也得捂着紧绷绷的乳罩或者戴个绣花儿的兜兜，以示其神圣不可侵犯。然而，老妇人都是过来人，其诸道防线早已被攻破，更何况是浑身优美的线条皆已化成一堆囊膪，于是也敢不让须眉，光着上身，耷拉着松弛的乳房，在大庭广众之下谈笑自若，毫不以为失检。中国妇女们的“金莲”，自古以来便是性的象征，对其防守程度，甚至超过了乳房——几层裹脚布，一层袜子，三层（里、面及中间的袼褙）鞋帮，捂得严严实实。隆冬时其臭尚不可闻，盛夏时则能熏死人。有务实精神的老妇人，为了纳凉，既然敢将乳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凭千人瞧万人看，赤其那双不堪入目的金莲又有何不可？而且不会被官府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于是朵朵“金莲”原形毕露，为夏日的京城又添一景。

男女老少露宿街头，是伏天中的一大夜景。屋子闷热得如同蒸笼，午夜时也进不去屋。街头尚有些凉风，铺张凉席即能入睡。放眼望去，横躺竖卧，四脚儿拉叉闭着眼张着嘴，倘无交响的鼾声，便绝像枕藉的死尸。

盛夏处于四合院中，亦有诸多乐趣。

瓜棚豆架，不是天棚而胜于天棚。清明、谷雨之间，随意点种些丝瓜或扁豆，数日破土而出。几经浇灌则蔓叶虬蟠，朵朵黄花与紫花错落映衬，花谢后便现出柔嫩的果实——布满洁白毫毛的丝瓜和扁豆。那景致颇似农村，文人们有感于此，必歌之曰：“此地在城如在野，个人非佛亦非仙。”夜幕降临后，花阴凉儿中斑驳的日影被点点如水的月光所替代，凉风习习，于棚架下或坐或卧，不必摇扇，浑身亦觉凉爽。

择小院之隅，种几株碧绿的藿香或薄荷之类的芳草，不仅美化环境、清洁空气，而且可供药用。随手掐几片薄荷叶，贴在太阳穴上，其清凉的香味沁人心脾，清热、祛暑、黩汗、明目而又清醒头脑。而窗前盆栽的夜来香，黄色的小花儿缀满枝杈，入夜芬芳馥郁。其味颇能驱蚊，夜卧自可安然无恙。

酽茶和绿豆汤，是百姓消夏最理想的传统饮料。百姓们最讲实际，从不追求茶具的精美，而一向注重茶叶的汤色和味道。日沏三遍茶（清晨、午后、傍晚），是老北京人世代相传的习惯，那货真价实的“小叶茶”闷透了之后，坐在小院花间阴凉处款款而饮，自然会联想起唐代卢仝的《七碗茶》诗：“一碗喉咙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用砂锅熬熟的绿豆汤，放在阴凉处几个小时，即会变得清凉可口。此种天然保健饮料，具有清凉解热、明目败毒等功效，与热茶异曲同工。

养几只蝈蝈儿听其昼夜鸣叫，迄今仍是京城百姓之家消夏的一种最省钱最朴素的方式。北京土语所称的蝈蝈儿，形似蝗虫，绿色或褐色，触角细长，短翅大腹，善于跳跃，吃植物的嫩叶或葫芦科植物的花儿，雄性前翅有发音器，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清人顾禄所撰《清嘉录》卷九载：“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红楼梦》第四十回亦有如下描写：“板儿又跑来看，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入夏以后，售者捕自郊外，以秫秸皮自编小圆笼纳之，数以百计，肩挑过街而售。其声聒聒，群起而鸣，震耳欲聋。招徕众人围观选购，审视谛听，以求其须尾无伤而叫声清脆者。蝈笼之形式，普通者之笼眼里灯笼饰状或独梁雀罩；巧者双笼合一，或四、五重叠；更精者则编插成盘肠、寿字、牌楼诸形，每格置一蝈蝈，声尤聒耳。将各式富有艺术色彩的蝈笼挂在庭院中瓜棚豆架下，赏其笼形之美，听其蝈声之脆，感其天籁之音，悟其诗情画意，以此形式消夏，省钱、自在、销魂。

日暮之后，瞽人的弦子声荡漾于街头巷尾。拉着“先生”（北京人对瞽者的尊称）们的“马竿儿”（盲人所用探路的竹竿），将其延至庭院中，点几段《岔曲》、《牌子曲》或《昭君出塞》《黛玉悲秋》，此等家庭消夏之夜，其乐无穷矣。

黄昏时分，家家屋门前点起“火绳”驱蚊的小景，充满了民俗情味。火绳者，是用有特殊气味的草本植物蒿子晒干后拧成的绳状物。其色深黄似烟叶，燃烧缓慢，其袅袅腾腾的青烟，驱蚊效果极佳，其价亦极廉。

最能吸食鲜血的臭虫，伏天时越发猖狂。这种赤褐色、身体扁平而腹大的昆虫，繁殖能力极强。祖孙三代饱餐后，每每缘墙而爬，常常被捻死在墙上，那一道道的鲜血，呈现大头小尾的形状，颇似一条条鱼苗，纵横交错，密密麻麻。这种伏天小景，充斥于千家万户，给人留下的印象永难磨灭。

伏天话扇

扇子，是北京人度炎夏而不离手的家什。伏天里，虽说人人手中都摇着一把扇子，但由于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修养的不同，所用的扇子亦各有别。

用蒲葵叶稍事加工即成的芭蕉扇，以及用竹篾、麦秆编制的普通扇子，物美价廉，颇受大众欢迎。就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而论，则不如羽扇、团扇和折扇。

羽扇的历史最为悠久。据晋人崔豹《古今注》一书所载，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就已有用鸟类羽毛制成的扇子。唐以前宫闱中所用的扇子，皆由羽毛制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坐镇三军就是手持白羽扇。羽扇出风缓软，不入腠里，对人体有益。北京的老人或僧侣、尼姑等佛门弟子，深知古人“避风如避箭”这一养生之道的奥秘，故而于盛夏皆喜用羽扇纳凉。

团扇为圆形短柄的扇子，古代宫中常用，又叫宫扇，为古代年轻女子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手执一扇可以增添主人娴雅文静的风韵，有时又能体现少女活泼天真的个性。唐朝诗人王建《调笑令》中“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以及杜牧七绝《秋夕》中“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牛星”的诗句，把女性既文静又活泼的两重性格，描绘得活灵活现。

正因为团扇带有装饰性，所以扇面大都选丝绢绫罗一类的纺织品，以便在上面点染绘画，增加装饰美。故而梁朝的江淹有“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之句。

昔日北京豪门中的太太、小姐以及梨园里的坤伶多喜用团扇。北

京崇文门外花市的绢花作坊，每年夏季必集中人力、物力制作大批团扇，以供市场需求。其所制团扇，分素扇、字扇、画扇三种。字扇与画扇，是将成批普通素扇“过行”给画匠或写字匠，雇他们在扇面上书写唐诗、宋词，彩绘花鸟鱼虫。至于素扇，上面虽无字画，但都是工精料细的上等品。扇柄以象牙或沉香木为之，柄端系有小巧玲珑的翡翠或玛瑙雕成的“扇坠儿”，价格昂贵，专门卖与有钱人。

北京人喜用的折扇，又称聚骨扇或聚头扇，它本是外国的贡品。苏东坡记载说：“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二指许。”由此可知，折扇大约在北宋时由朝鲜传入我国。明代张东海亦以为折扇贡于东夷，永乐年间盛行于中国。据说折扇传入宫中时为太监所见，觉得此物展开即用，收拢易藏，非常方便，于是纷纷仿制，后逐渐传入民间。清代高士奇的《天禄识余》所载“折叠扇古名聚头扇，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高贵之目……今则流行浸广”等语就说明了这点。

久居北京的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及名优，不仅喜用折扇，而且对扇骨、扇面的选择非常考究。他们经常云集在琉璃厂的韵古斋和荣宝斋，选购扇骨与扇面。

韵古斋所售扇骨，有紫檀、象牙、乌木、棕竹、湘妃竹、毛竹、梅鹿竹、广漆、菠萝漆、嵌金银丝、嵌螺钿等精雅的上品，并时而出售从宫中流出民间的雕有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等极为罕见的老扇骨子。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皆为清宫造班房御制，所刻鱼龙鸟兽及蝇头细楷，刀法清晰，不失规矩笔意。

荣宝斋出售的扇面，有重金、红金、洒金、块金、发笺、白面、黑面、珊瑚面等。这些质地精良的扇面，价值并不昂贵，但一经配上张大千、溥心畬、陈少梅等著名书画家的水墨丹青，便成了稀世之珍。昔日的荣宝斋，还出售明清两代董其昌、文徵明、米万钟、郑板桥等名家所书的古扇面。据《坚瓠集》记载：“折扇至于挥洒名人翰

墨则始于成化间。作伪之徒乃取宋元明初名人手迹入扇，良可哂也。”正因为书画折扇现存最早不过明代中叶，故而董其昌等名家所书的扇面每每被殷实的官宦人家或富商大贾不惜以重金争购。

在折扇上挥洒翰墨并非易事。不但章法很难安排，而且纸面高低不平。明代祝枝山认为在折扇上写字，犹如令舞女在瓦砾堆上跳舞，“环肥燕瘦，终减态耳”。但熟能生巧，一旦掌握了它的特性，加上巧妙的布置，在这小小的天地中就能产生其他形式不能产生的另一番情趣，成为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一行长、一行短的特殊章法，加上楷、行、草、隶、篆各体书艺，疏密有致，静雅清丽，犹如满目珠玑，美不胜收。

六月浮瓜

欧阳原功《渔家傲》词咏北京岁时风土，其《六月》云："六月都城偏昼永，辘轳声动浮瓜井……"所谓"浮瓜沉李"，没有吃过井水，没有用辘轳绞冰凉的井水来浸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首词的情趣的。北京旧时吃井水，如家中有口好井，现绞出的井水即使在三伏天，也不过临近冰点的三四度的温度。用来浸瓜，浸透之后，吃起来，真如嚼冰咀雪，满口凉甜。

北京出产好瓜。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沙果门外，北面远郊区顺义、沙河等地，旧时都有不少好瓜地，也有不少世代以种瓜为业的好瓜农。先是甜瓜、香瓜上市，后是西瓜上市。《燕京岁时记》所谓："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叫卖，有旱金坠、青皮脆、羊角蜜、哈蜜酥、倭瓜瓤、老头儿乐各种。六月初旬，西瓜已登，有三白、黑皮、黄沙瓤、红沙瓤各种。"实际还不只这些品种，如甜瓜中的"灯笼红"、西瓜中的"六道筋"，也都是很好的品种。有一年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瓜农引进广东、台湾地区培育的瓜籽，种出花期早、上市早的"早花西瓜"。个子虽不大，但瓢中种子少，而且只只又甜又沙。现已成为北京西瓜中最好的品种了。

种西瓜最好是沙地，北京四郊这种地很多，瓜农们辛辛苦苦地世代经营。旧时种西瓜是很麻烦的，瓜藤要用沙土逐根压好，施肥一定要用大粪。开花时要养花、人工授粉，一定要按瓜秧逐棵把"根瓜""梢瓜"留好。瓜长到一定时候，还要用稻草、麦秸编个圈垫好。到瓜熟的时候，瓜地里要搭窝棚，住在里面日夜"看瓜"。有出京剧《打瓜园》，其背景就是这种瓜田、瓜农。看瓜的瓜农一早一晚，搬个小板凳坐在瓜棚前，抽着叶子烟，喝着酸枣茶，和人闲聊着，等着瓜贩子来趸瓜。过路人要吃个瓜，多少给两个小钱，甚至不给钱，叫声"大

爷”，道个“劳驾”就可以了，种瓜人和他的瓜同样的沙甜厚道。“斜阳古道卖西瓜”，诗的意境永远是值得思念的。

六月（指农历）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卖西瓜的。《燕京岁时记》云：“沿街切卖者如莲瓣、如驼峰，冒暑而行，随地可食，既能清暑，又可解酲。”卖西瓜的有一套切瓜的功夫，也有一套挑瓜的本事。捧过一个来，先看看四周光不光、圆不圆，有没有磕磕碰碰的地方；再看看瓜藤，要碧绿的“活秧”，不要焦黄的“死秧”；再看花蒂处，叫做“收花”，“收花”越小越好；再拍拍弹弹，听听声音，生瓜硬如石块，娄瓜音如败絮，拍上去声音如打足气的篮球便是好瓜。有此水平，便可以赌“打瓜”了。谁还记得此乐呢？

五月旱与六月雨

农历六月是大雨较多的季节，京畿老农谚云：“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五月间苗初出土，雨水一多，嫩苗容易烂死，野草反而易长，所以越旱越好。尤其是五月小麦黄熟，更需要晴好的天气，以便收割、脱粒和晾晒。但到六七月间，三伏炎暑，则雨是越大越好。大雨过后，田里都是水，红太阳又猛照着，高粱、玉米的大绿叶子上都是湿漉漉的水珠。老农扛着锄，钻进庄稼地里，虽然闷热蒸人，但在那肃静的田野中，听着高粱、玉米哗哗啦啦雨后猛长的拔节声，好像听着大地母亲的温馨蜜语一样，止不住心里乐开了花。

北京常年降雨量平均在四五百毫米之间，而三分之二以上的雨是六七月间降落的。几十年前，我在南方结识的一位朋友第一次到北京，正是农历六月底、七月初，赶上那年的雨水特别大，在北京玩了两个星期，天天冒着瓢泼大雨出去逛，弄得十分狼狈。回到南方之后，他逢人便说北京雨水比南方多，不管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因之我不禁想到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以“苦雨”名斋的原因了。老人生长在“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的稽山镜水之间，惯听篷窗雨声，惯走雨中石板路，却并不以为苦。后来定居北京，一下大雨，院中积水流不出去，倒漫进八道湾的书斋中，所以有了“苦雨”的感觉，便以“苦雨”名斋了。

北京伏天，片云可致雨。不但来得快，而且来得猛。“早看东南，晚看西北。”闷热一天，下午两点钟一过，西北天边一丝雨云，凉飙一卷，马上就是乌云滚滚，倾盆大雨来了。这时要赶紧找地方躲雨，不然几分钟内就要淋成“落汤鸡”。旧时单弦演员荣剑尘常唱一个“岔曲”，叫“风雨归舟”，有几句道：“西北天边风雷起，霎时间乌云

滚滚黑漫漫……哗啦啦大雨赛个涌泉。”说的就是北京的雨景，的确生动。

在北京上过学的人都该有鲜明的记忆吧，大雨连绵的季节，也正是忙于考学校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北大有一年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雨天”。考时正下大雨，一位考生结尾道：“……我来考贵校，适逢此时，适逢此题，真是‘天作之合’。如蒙录取，岂非‘天定良缘’乎？”这一小插曲，至今还没有忘记。

夏虫诗情

常常想起一句话，道是“夏虫不可以语冰”。到了夏天，昆虫不免多起来，虽然有的生命很短暂，但也足以点缀夏景，丰富人间情趣。

经常回响在我的忆念中的，是那嘹亮的蝉鸣。蝉声是特别能打动诗人心扉的。“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这是一种意境。躺在小小四合院的北屋里，午梦初回，睡眼惺忪，透过窗棂上新糊的冷布，望着荫屋的古槐，这时蝉声正在欢噪，像海潮般冲击着你的耳鼓，这又是一种意境。

北京方言习惯上把蝉叫“知了”。这种东西也怪，特别喜欢炎热，天气越热它叫得越欢。在北京夏天，早上起来，一听有聒耳的蝉声，不用问，今儿个肯定又是一个大热天。

在北京最好的听蝉的地方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盛夏午后，在边上找个座位，泡上一壶茶，往大藤椅上一靠，眯起眼来，你就听吧。这时赤日炎炎，槐影斑斑，不闻私语，但听蝉鸣一股劲儿地向你袭来。音波的海浪，像要把你浮动起来一样。夏日阴晴不定，一个霹雷之后，大雨瓢泼而下，这时蝉声顿歇。那成千上万的知了，似乎一下子都没有了。你不要着急，一会儿工夫，雨过天晴，斜阳照处，槐叶上挂满了闪光的水珠，一弯霓虹挂在端门金黄色的琉璃瓦檐角后的蓝天。这时，突然所有的知了又齐声歌唱了……

知了之外，是蜻蜓。在我到过的地方，似乎不记得有哪一个地方比得上北京的蜻蜓多。盛夏时，只要稍微有点儿雨意，院子里马上便会飞来数不清的蜻蜓，忽而往东，忽而往西，速度极快。北京儿童捉蜻蜓的乐趣，说来绝不亚于捉知了。孩子们在蜻蜓多的时候，可以一

大把一大把地捉到（一只手可以拿好多蜻蜓，所以叫一大把）。

蜻蜓之外，我还思念着那小小的萤火虫。“轻罗小扇扑流萤”，如今住在多层高楼中的人，是做梦也梦不到这种缥缈的意境的。小时在京，住在一个树木葱郁的院子里，夏夜乘凉，看着那黑黝黝的树木中，会跳出一个打着小灯笼的一身红的姑娘……

在热得“四脖子汗流”的盛夏，来自西陵（河北易县）和十三陵（北京昌平区）的山区农民挑着蝈蝈儿蜂拥进京，一路叫声聒耳。其价甚廉，购者踊跃，移天籁于家中，精心饲之而昼夜聆其声，为其乐也。满族八旗妇女更有奇特的玩赏方法——空其“花盆鞋”底，将蝈蝈纳其中，使其鸣声与履声相应，如同《周礼》乐章“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天趣盎然。

与蝈蝈争鸣的“山老虎”和“嗞拉子”，在千家万户的庭院中也有一席之地。“山老虎”的个头儿四倍于蝈蝈儿，肚子大得出奇。因过于肥胖而行动迟缓，在野外老老实实伏在草丛或石罅中，绝不像蝈蝈儿那样欢蹦乱跳。“山老虎”不叫则已，一叫便被捕捉者信手拈来，全无反抗或逃逸的能力，真是徒有虚名。它的叫声亦不似蝈蝈儿的有节奏，但毕竟是天籁，所以亦有人喜爱。

体形像蟋蟀而却大得多的“油葫芦”，其声悠悠，极为悦耳。叫声悠长而节奏鲜明的佳种，称为“十三悠”和“十八悠”，藏于郊野草丛中，不计其数。贩者夜间捕之，以灯光诱其聚于篓中，翌日清晨售之于市。因论“把”出售，故名“抓大篓”。一把十余只，雌雄兼备，雌者喂鸟，雄者撒于院中听叫。

“油葫芦”在夜间长鸣不已，其声如串串银铃，荡漾于花间月下，似山泉叮咚，给人几分凉意，甚至顿生遐心，在朦胧中入梦乡。

蝈蝈儿、“油葫芦”之类的草虫属于普通家庭玩赏听叫的大路货，而家道殷实者则尤喜养“金钟儿”，以聆其优美之声。

“金钟儿”体形略像西瓜子，黑褐色而油光可鉴，雄者阔翅，雌者硕腹，丝状触角长而黑白相间。饲养此虫，须将雌雄共置于瓷罐中，架隔香蒿，喂以毛豆和酸梨。长夜振翅，其声清越，借瓷罐共鸣而音若钟声，故称“金钟儿”。“金钟儿”以产于十三陵者最佳，故贩者吆喝：“十三陵的‘金钟儿’——真好听！”

绝大多数的“穷欢乐”（北京土语，即苦中作乐之意）者无瓷罐饲养“金钟儿”，不能讲究只能将就，取而代之的是破胆瓶、破帽筒，甚至破坛子，虽难登大雅之堂而听叫儿的效果并不逊色。

这真是京华的远梦，夏虫的诗情啊！

炎夏之冰

现在科学发达，有各种制冰的办法。而在一二百年前，在常年不结冰的“南方”，炎热的时候想要得到一点儿冰，那是十分困难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在北京，夏天还是可以享用冰之凉爽的。北京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冬天结厚厚的冰，打来藏在冰窖中，夏天正好慢慢地取出来享用，成本低廉，使用方便，真是炎暑的恩物。严辰《忆京都词》注云：

> 冰窖开后，儿童舁卖于市，只须数文钱，购一巨冰，置之室中，顿觉火宅生凉。余尝戏为水晶山，南中无此物也。

北京的冰窖，由来久矣。最早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至清代颇为发达，是达官显贵和富庶人家夏日特有的享受。到光绪末年出现私人冰窖后，平民百姓才有了享用天然冰的资格，从而解除了炎热带来的诸多烦恼。

德胜门城楼西北隅有东西街道名曰“冰窖口胡同”，此即万历年间兴建的皇家冰窖所在地。此地位于护城河北岸关厢西侧，天然冰窖凡八座，占地数百亩。窖底系石帮石底并以柏木打桩，上层围砌城砖，窖顶嵌盖黄琉璃瓦，窖内无梁无柱，拱形结构，坚实而美观，宽敞而洁净，近似地下宫殿。古代建筑构思之奇巧，至今犹令人叹服！按八卦方位于窖址北侧特修“窖神”庙一间，殿内所供之“窖神”，貌似古画所绘宋末僧人济公，衣衫褴褛，醉眼蒙眬，以其象征穷人的领袖和救星。

满人入主中原后，朝廷除沿用德胜门冰窖外，另在海淀和前门外东珠市口迤北新辟两座官窖。慈禧每年盛夏移居颐和园，则由海淀供

冰。送冰的仆役是个“独眼龙”，套冰车之役畜亦为瞎马。该奴仰仗老佛爷的淫威，驾驭冰车横冲直撞，无所顾忌。民间车辆不敢与之对抗，时人讥之曰“瞎人、瞎马、瞎横”。前门外之冰窖，旨在冷藏名贵果品和猪羊供品，以供天坛祭祀之用。

官窖制度极严，所招技工及壮工须经复审，合格者之姓名、住址登记于花名册，发放腰牌后方可进窖劳动。窖门前设辖客木四根、黑红军棍两根，竖立于虎头告牌（上书窑则）之前。触犯窑则者轻则体罚，重则法办。

王爷们建窖储冰，须按法度办事，只有领兵打仗建立汗马功劳者，觐呈皇帝批准后才有资格设窖。因此，清朝统治二百余年，府窖仅六处——恭王府窖、肃王府窖、礼王府窖、庆王府窖、豫王府窖、浚王府窖。其中，地处什刹海前海南沿的恭亲王府窖所储之冰最为干净。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英美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后，国库越发空虚，难以支付官窖、府窖所需之经费，遂允许民间经营冰窖。辛亥革命后，民营冰窖空前发展，百姓夏季用冰逐年普遍，而沿街叫卖“冰核儿”之小贩，亦如雨后春笋，与日俱增。

那时，在北京的什刹海、中南海、城外护城河边上，起码有几十处冰窖。入夏把冰窖打开逐日卖冰，供应量十分充足。买冰的最大的主顾是各菜市、鱼行、肉铺、鸡鸭店及各处大小饭庄子。每天一大早，就像现在送牛奶、送报纸的一样，套上一匹骡子拉着的大车，装着整方的冰（一尺多宽、三尺长、厚一尺的冰块，谓之“一方”），来到订冰户的家门口。订的是一方，就留一方，订两方，就留两方，有时也可以临时增减一些。

各个胡同里的住家户，中下层以上者，即好歹有个厨房的家庭，都向冰车子订一块冰。花铜元的时候，大约每五大枚（即十个小铜

元，20世纪30年代时约合三分不到）即可买块一尺见方的冰。中小户人家每天送十大枚的冰，便足用矣。一月下来，不过一元五角钱。这样伏天里不但可以天天吃冰镇绿豆汤、冰镇西瓜，而且剩饭、剩菜也可保存，不至于发霉了，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经济、实惠的冷藏方式。

有些没有预订冰的人家，或者没有在冰车子上买到冰，偶有需要，就自己到冰窖去买，也极为方便。走进冰窖门，顿时感到从下到上凉气飕飕。进去给五大枚铜元，便能买一大块冰，比冰车子卖的大一倍。用一根绳子在冰块上拦腰一捆，拖了就跑，冰是滑的，在马路上拖了跑比小车还快。童年买冰的欢乐，真是难以忘怀。

暑滞夏和贴秋膘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胃口不好，饭量减少，北京人习惯叫“滞夏”。夏天食物也容易变质，不易储藏，这样就促使人们在夏天更加注意饮食卫生。

旧时北京人居家过日子，没有什么冰箱空调之类的，虽然天然冰很便宜，但是不是家家都卖，时时都有。而且，即使有，也不能完全保证食品不变质。这样，北京人在夏天就想出另一个办法，这便是尽量吃得清淡些。比方说，老北京人在伏天，第一不买鱼虾之类的东西吃，第二不多买肉吃，第三不买豆腐吃，因为这些都是容易变质的食品。不吃荤腥，不吃豆腐，吃什么呢？大多是吃蔬菜，黄瓜呀、茄子呀、豆角呀、冬瓜呀、小白菜呀，而且喜欢凉拌了吃。

北京人有一种夏天最爱吃的东西，那就是芝麻酱。夏天吃凉拌面，少不了它；拌黄瓜，少不了它；拌粉皮，少不了它。天热，家里懒得做饭，到烧饼铺买几个烧饼，也是芝麻酱烧饼。不然在家中自己烙些芝麻酱饼，蒸点儿芝麻酱花椒盐的花卷，都是很好的夏令食品。我“平生塞北江南”，所到之处再没有一处比北京人那样爱吃芝麻酱的了。

北京谚语说伏天饮食道：“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饺子，照老北京的规矩，并不是吃肉馅的，而是要吃素馅的。所谓素馅就是把晒干的菠菜，加小虾米，加五香面儿、精盐，再用上好的小磨香油一拌，这样的馅，才是头伏饺子馅。很清淡，但很精美，吃起来香喷喷的。

暑天一过，转眼秋风渐起，北京最好的季节——秋天到了。《京

都风俗志》云：“立秋日，人家亦有丰食者，谓之‘贴秋膘’。”

“贴秋膘”一直是北京人迎秋的盛事，吃什么好呢？在我记忆中，最好莫过于羊肉西葫芦馅的汤面饺了。这是除北京之外，其他地方再也吃不到的美味！

蟋蟀声声秋意浓

中秋节后，气候一天比一天凉起来。树上的蝉声与田野里的蛙声相继消失了，就连蟋蟀也离开了野外的草丛或石罅，悄悄地躲进廊檐下，虽说还在苦吟，但已是凄凄切切的了。

夜寝帐中，梦魇后醒来，再不能寐。忽听得一只蟋蟀仿佛就在卧榻下叫着，那声音缓慢而微弱，远不如乍出生时叫得那样急促而响亮。这使我不禁吟起《诗经·七月》的诗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啊，蟋蟀由野而堂是为了避寒，这是候虫向人间发出一岁将暮的信号！

童年的我，与故乡的伙伴们一起捉蟋蟀、斗蟋蟀，是何等的快乐啊！提着小巧的丝笼，迎着灿烂的朝霞，踏着晶莹的露珠，在天坛的草地里、在太庙的松林内、在景山的石坡上、在故宫的朱垣下，到处搜觅可爱的蟋蟀。手被蒺藜划破了，鞋袜被湿漉漉的泥土弄脏了，也在所不顾。只要捉住一只七八厘重的“蟹壳青”或“江麻头”，便欣喜若狂，并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放入“万历章”或“古燕赵子玉”的大斗盆里，屏息凝神，观看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

几十只被放养在庭院花丛中的蟋蟀，夜间得了露水的滋润，欢唱之声不绝于耳。那声音颇像勤快的村妇们争先恐后地拨弄着机杼，尖厉而又急促。母亲笑哈哈地对我说：“促织鸣，懒妇惊。”我不解其意，母亲便解释说：“蟋蟀的别名叫促织，又名趋织或投机，谓其声如急织。立秋女红急，故趋之。懒妇自春而夏，直至秋凉，仍然游手好闲，而御寒之冬衣全无着落，闻候虫急鸣如何不震惊呢？”直至弱冠后，我才悟出：母亲所言，不仅是耻笑懒妇，而且也是启发我珍惜时光，期望我做出一番事业。

另一位像母亲一样关怀我的，便是小学时期的罗老师。她是一位温文尔雅而又博学的女性。有一次我居然在她的语文课上斗起蟋蟀来，一阵“？？”的长鸣把同窗们逗得哄堂大笑。罗老师遂捏着教鞭向我走来，我惴惴不安地忙用双手掩住头，吓出一身涔涔的冷汗。但她并未打我，只是没收了那个镌有“乐战三秋”字样的斗盆，然后讲起号称“蟋蟀相公”的明末奸相马士英的故事。那侃侃的言辞，激昂的声调，如同一声惊雷，终于使我从迷梦中觉醒，脱身于玩物丧志的歧途。

秋风吹来烤肉香

老北京谈起北京富有地方风味的吃食，一数就是一大串：月盛斋的烧羊肉、都一处的烧卖、鲜鱼口的炒肝、天桥的爆肚、虎坊桥的豆汁……而一到秋天和冬天，则以烤肉最相适宜。在北京，往往一家烤肉，飘香十里。肉香夹杂着松烟香，嫩香夹杂着焦香，清香夹杂着浓香，不但在店里吃的香，连在街上走的也垂涎欲滴。

烤肉不是地道的北京土产，是从蒙古传来的。但年头已很久远，早已入了“北京籍”。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都门杂咏》里就有咏烤牛肉的诗：“寒冬烤肉味甚饕，大酒缸前围一遭。”写的就是烤肉的情景。

吃烤肉的方法很特别，不用锅，而用铁箅子。箅子用几十条拇指宽的铁条排列而成，条与条之间留有间隙。如“烤肉宛”的箅子已用了二百多年了。黑糊糊的满是油腻，不用放肉，一烧就冒出浓香来。箅子下放个大火盆，烧松木。肉要选用上好的牛肉或羊肉，切片，煨上酱油、姜汁等，然后把肉堆在烧热的箅子上，撒上大量的葱丝。肉烤得吱吱作响，箅子上冒起浓烟，肉里的汁水蒸流殆尽，肉微微有些糊。这个火候上撒上一把香菜，搅拌均匀，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烤肉的吃法和姿势也很特别，讲究站着吃。站还要有个站样——一只脚踏着一条凳，半弓身，一手拿碗，一手拿双尺来长的筷子，围着箅子，边烤边吃。再喝上二两“二锅头”，或者北京的“莲花白”，那美劲儿，甭提了。

吃烤肉，不需要使用珠光宝气的景德镇杯盘，不需要陈列那一百多道满汉全席山珍海味，也不需要高堂华阁，一席动辄千金。吃烤肉

使人想起的是草原上那种幕天席地质朴粗犷的风格，甚至是樊哙拔剑劈吃“上彘肩”的豪迈气概。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北京富有地方风味的吃食，不该是一味的香嫩，该有一点儿大漠风沙之气。烤肉正是这样的。

北京两家著名的烤肉馆——后海的“烤肉季”和宣武门的“烤肉宛”，有些年不采用上述那种吃法了，是一大憾事。烤肉若是让别人烤好，放在盘子里让你慢慢嚼，就乏味多了。庆幸的是，听说他们最近已恢复传统吃法，以增加北京的独特风味。海内外的老北京以及久思去北京一游的朋友，我想都会闻之高兴而食虫大动吧！

北京的糖葫芦

一年四季，暑往寒来，只要节令一变，应时食品便立即上市。中秋过后，“郎家园大枣”的叫卖声刚刚销声匿迹，接踵而来的便是那音乐般的冰糖葫芦的叫卖声。

北京人出售糖葫芦的形式分坐商与行商两种。坐商中佼佼者，应属前门大栅栏东口的“九龙斋”。其特点是规模大、品种多、质量好，门脸儿非常宽敞。明净的橱窗里，摆着上千串用山楂、海棠、橘子、葡萄、荸荠、山药、山药豆、黑枣以及山楂中夹带豆沙和瓜子儿等干鲜果品蘸成的糖葫芦。果实新鲜而干净，竹签儿也刮得非常细致，裹在每个果实上的一层匀称的冰糖，晶莹得就像一面小镜子。精明强干的小伙计，穿着蓝布长衫，里面的白色小褂向外翻出半尺来宽的雪白袖口，不时地用一只手掩住耳朵吆喝一声：“刚蘸得的冰糖葫芦，开口胃呀——甜酸冰糖葫芦！”这一阵阵清脆的叫卖声在寒风中荡漾着，招来一批批的主顾。凡是到附近的庆乐、三庆和中和戏院听戏的人，总要买上两三串儿，一边吃着，一边步入戏院的大门。

行商叫卖糖葫芦，大都拿着一个棕色或黑色的筲箕，拱形的提梁上插着一把甩头鹅毛扫子和一副内装三十二根签子的小签筒。这些商贩除沿街叫卖外，还经常出没于浴池、茶馆、饭店或妓院，靠抽签的赌博营利。每只如毛衣针粗细的竹签上所刻的点儿，与每张骨牌上的点儿一模一样，三十二根签子即相当于一副骨牌。主顾下好赌注以后，卖者便开始“叠筒子”。那竹制的签筒并没有底儿，只蒙了一层马尾萝，筒子叠在桌面上，里面的签子便借着萝底的弹性转来转去，发出哗哗的声响，这就等于是洗牌了。既可一人独抽，亦可三四人同时抽，每次只能抽三枝，最后以所抽竹签上点儿的多少决定输赢，此谓之“抽大点儿”。赢者可以白吃糖葫芦，输者自然要白花冤钱。

正月初一至十五，和平门外厂甸庙会上所出售的大糖葫芦，则另有一番特色。百十个山里红用一米多长的荆条串起来，上面蘸满了牙黄色的饴糖，顶端还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彩色小纸旗，壮观且富有情趣。远远望去，但见千百只大糖葫芦在黑压压的人群上空缓缓地移动着，五彩缤纷的小纸旗轻轻地飘摇着，与那腾空欲飞的各色气球和呼呼作响的风车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实在好看极了。

十月一，送寒衣

北京的农历十月，一般都是好天气。地还没有上冻，也不算太冷，新棉袄上身，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在郊野，收割了庄稼的土地上，早晚之间，有霜有雾，白刷刷的。到了中午，经太阳一晒，黑土还显得十分湿润。赶上秋末冬初特别暖时，山桃花还偶然会绽开一两个粉红色的花蕾，绰约枝头，称“十月小阳春”。

每逢金秋十月，我就想起往昔北京居民在家门口烧“包袱”、送“寒衣”的旧事。谚云：“十月一，送寒衣。”这种风俗早在明代就有了，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得很细致，所谓“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等。意思是天气冷了，一家都穿新衣了，也应该给死去的亲人寄点寒衣去。虽然事属迷信，却寄托了怀念亲人深厚、淳朴的感情，对于常人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每年到十月初一，迷信的人总预先糊好“寒衣包”“金银锞子包袱”，完全像《帝京景物略》所说的那样。我亦曾替人在“包袱”外面写上地址，某县、某村、某处，写上外祖父、外祖母的称谓、姓氏，另外还要写个小包袱“土地酒资五锭”。这些举动虽自不以为然，但是古人云：“生死亦大矣。”

对于亲人的怀念，究竟用什么方式表示才好呢？想到过去每年“十月一”尚要送送“寒衣”，而今一般则再无此形式，便感到亲人之间似乎凉薄了。

据说在清代，十月一送了寒衣之后，还要颁发历书，由各处书局刻印出售。旧时北京，大小胡同中，常看到有人背一个布包，手中拿着一叠子历书，一边走，一边叫卖：“卖皇历！卖皇历！”叫卖声尖而促。北京过去是比较守旧的，尽管皇上已经退位几十年了，历书也早已不是“钦天监”所颁发的了，可是大家还是叫“皇历”，卖的人也还是

喊“卖皇历”。

农历十月到了，旧事远了，回忆上述小事是“衷心藏之，何日忘之”吧。

寒冬话火锅

到了冬天，过去在北京很喜欢吃火锅子。火锅子，江南人叫“暖锅”，实际不如北京的叫法恰当，因为它不单纯是“暖”，的确是生了火的。

铜制的火锅，中间是炉膛火口，四周是容纳菜肴的锅槽，上面是有圆洞的锅盖，正好套在火口上盖锅子。锅子中装好菜肴后，把木炭放在炉子上点燃，从火口放进去，用扇子扇旺炭火。劈劈啪啪的火苗从火口蹿出来，锅子中的菜肴便“吱吱”作响。烧开了，端上桌子，一掀锅盖，正像《老残游记》中写“一品锅”一样，这是“怒发冲冠的海参”，那是“酒色财气的鸭子”，大家便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火锅是一种非常方便实用的炊具。我不知道最早的发明者是谁。徐凌霄《旧都百话》记道：“锅子之类甚多，有菊花锅子，为肉类与菜蔬及花瓣之大杂烩。整桌酒席，在秋冬间视为要素……此等吃法，乃北方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也。”徐氏的话似乎有些道理，总之是在北方寒冷的地方创造出来的。南方有暖锅的历史并不长。光绪时严辰在《忆京都词》注中说到“火锅”时，还说“南中无此风味也”。可见那时还只是北京，或者说北方时兴吃火锅子。

几十年前，北京有一种铺子，叫作“盒子铺”，实际就相当于江南的卤味店、广州的烧腊店，就是卖酱肉、清酱肉、小肚、白肚、熏鸡、肉丸子等熟肉的熟肉铺。因为把这些熟肉切好装在一些花格食盒里，像“什锦拼盘”一样卖给人家，所以叫“盒子铺”。这些熟食统名之曰“盒子菜”。这种铺子，秋冬之际便准备很多只铜火锅，一一装好，可以根据需要一只、两只，甚至更多，送到顾客家中，送时还带好“白汤”。家中偶然来个客人，你去买了，小伙计给你送来，点燃木

炭，把火扇旺。锅子开了，端到桌上，说声“回见”，走了，明天再来收家伙，你好意思不给两个赏钱吗？

一般锅子里装的是肉丸子、龙口细粉，酸白菜垫底；上面铺白肉，叫“白肉锅子”；铺白鸡、白肚片、白肉曰“三白锅子”；铺清酱肉（也叫“卤肉”）、熏鱼、猪腰花等曰“什锦锅子”；铺海参、卤肉、鸡蛋等曰“三鲜锅子”；至于“菊花锅子”，那便是把白菊花瓣加入“三鲜锅子”的汤中，那更是清香绝顶，是饮食肴馔中的艺术品了。

风雪大酒缸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有一段“大酒缸”的描写。写一个风雪寒夜，一个年老拉洋车的车夫和孙子闯到一家小酒铺中取暖的悲惨景象。几十年前在北京这种酒铺是很多的，不同于江南的像《孔乙己》中所描绘的“咸亨酒店”。每家这样的小铺里，都有两三口盖着红油漆盖子的装酒的大缸，俗话都叫“大酒缸”。虽然正式名称也有，如什么“和益公酒铺”之类的，但是大家都不叫，习惯叫它的俗名。

这种铺子一般都是一间门面，有两三副座位，有个柜台，柜台后有两三口酒缸，也有的大酒缸的木盖就是桌子。店中人很少，掌柜兼账房先生在里面卖酒，再有一个小徒弟或内掌柜相帮照料就可以了。夏天，门口挂个竹帘子。冬天，当地生个煤球炉子，又烧开水又取暖，门口挂个夹板棉门帘子，一撩帘子就是一团夹着酒气的热气扑到你脸上。在北国的风雪寒夜中，这种小铺是各种各样街头劳动者的“避风港”。夹着大棉袄，一撩帘子闯了进来，把手中的钱往柜台上一放，说道：“掌柜的，来两个酒，一包花生米。”酒和一包花生米买好，便到边上的桌子旁坐下，边和熟人说话，边饮起来。这是干了一天活之后的一点点儿人生的享受——可怜的一点儿享受。有的索性一包花生米也不买，买一个酒，一口喝了就走。因为他们回去还有别的事要干，没有时间坐在大酒缸边上慢慢地咀嚼那几粒花生米。

这种酒店卖酒都是用提子从酒缸中提，用一种很粗的瓷碗盛酒。小提一提一两，倒入粗瓷碗中，谓之“一个酒”；两提二两，谓之“两个酒”。两个酒喝完了，尚未过酒瘾，便拿空碗到柜台上再买两个。一般喝“两个酒”就差不多了，如喝“四个酒”那就是大量了。因为大酒缸卖的酒都是烧酒，即“干榨白酒”，又称“白干”。那里从来不卖黄酒、药酒（如五加皮、竹叶青等）。至于洋酒，什么威士忌、白兰地等，

更是听也没有听说过。一个酒下肚，就热乎乎的，照当年的说法，就是“多穿了一件小皮袄”了。北国天寒，全仗它挡挡寒气啊！

在风雪之夜，北风呼啸的马路上，或者胡同拐角处，远远地望见有个透出红红灯光的小铺，那就是大酒缸。去吧，那里有温暖，进去买个酒吃吧！

围炉夜话

读《艺风堂友朋书札》，有几句道："光阴荏苒，又届围炉，诸同人必有佳集，酒酣耳热时，尚道及远人否？翘首燕云，不胜黯然。"这封信是陆宝忠在湖南学台任上写给在北京的缪荃孙的。陆与缪同是光绪丙子年（1876）进士。他在湖南想到昔时在都门时，每到冬天，友朋们围炉闲话，十分热闹，而自己此时却远在南天，所以"翘首燕云，不胜黯然"了。

围炉最好是晚饭以后，以炉子为中心，团团而坐，沏上一壶好香片，买上一大包落花生，边吃、边喝、边烤火、边谈、边笑，海阔天空，不拘形式。炉子上坐上一壶水，渐渐炉火越来越旺，越来越红，壶中的水吱吱地响着。这时不必开灯，尽可坐在暗中，炉中的红火照在顶棚上，形成一个很圆的、很朦胧的红色光晕，也照得炉边的人脸通红。这时谈兴更浓，谈锋更健。谈人生、谈哲理、谈艺术、谈轶事奇闻，固然很好；谈生意、谈金钱、谈柴米油盐、谈儿女情长、谈身边琐事，也无伤大雅。谈到忘情处，窗外呼呼的北风声、远处荒村的犬吠声、深巷缥缈的叫卖声、夜归人偶然的喊叫声，都隔绝在外面，这里只剩下温暖、友谊和欢声笑语。这样的围炉，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啊！

李越缦于咸丰九年（1859）十月二十七日记云：

> 寒甚，拥炉与叔子谈终日，夜与叔子围炉续话。三更，叔子招吃粳米粥，以瀹卜、生菜佐之，颇有风味。

《鲁迅日记》1912年11月8日记云：

> 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

旅人之苦。

这二位都是绍兴人，都是曾经常住在北京的。两则日记前后相差五十多年，都写到了北京冬日围炉夜话的情趣。把这两则日记并在一起看，是十分有意思的，由此可以想见这二位学人当年的风度。

翘首燕云，又届围炉之期，系以《忆江南》小词一首，以寄万里之思吧。词云：

京华忆，最忆是围炉。
老屋风寒深似梦，
纸窗暖意记如酥，
天外念吾庐。

冰床乐事

北京孩子们冬天常在冰上玩，玩的方式很多，其中有一种叫“冰床”。

冰床以木为之，长方形如床状，长约五尺，宽约三尺，无栏杆，可乘三四人，床腿嵌铁条，便于冰上行驶。行驶时，冰床主人在前牵绳，滑行甚速，故又名“拖床”。床主急行数步后，腾身跃坐床沿，借助惯性，冰床行驶如故。这一动作，身手矫捷，漂亮至极。乘客坐在冰床上，如置身水晶宫，目爽神怡。更有富裕之家，将冰床多具连在一起，驰走如飞，人在其上高歌畅饮，其乐陶陶。

北京城区的水域集中于西半部，所谓“三海”的中海、北海、南海，属于宫廷禁地，冬季虽有冰床，但非平民百姓可以享用。唯有什刹海、后海、积水潭平民始能问津。自什刹海银锭桥，经后海到积水潭汇通祠前，常有神采飞扬的玩童驰骋冰上。当时北京城墙之外有护城河，冬日乘冰床行驶更觉开心。护城河河道较宽，玩冰床可代步，兼供嬉游，一举两得。那时，交通不便，行人苦于跋涉，各城门都有赶驴脚夫，为客人代步。入冬河水结冰，则可乘冰床。由东直门去通州，可顺护城河入通惠河直达。中间经过五道闸口，每过闸口须另换乘冰床，因各段各有专人经营，不得任意破例。清人李朴园（光庭）有咏冰床诗云：

几日城隅水泛凫，坚冰似镜已平铺。
设来行榻如舟稳，看彼飞舆越蹇趋。
抵闸忽惊当路虎，移床幸遇在梁狐。
芒刺冻折绳牵断，赚得囊钱酒半壶。

其中“抵闸忽惊当路虎”一语，指当时每闸冰床各有专人管理，不得随意逾越。

清末，慈禧太后耽于游乐，城内三海和城外昆明湖都设有冰床。其用料之考究、饰物之华美，远远超过民间冰床。太后或帝妃等乘坐，由太监牵绳。有时还赏赐年老功高的王公大臣乘坐，以示优待。未经恩赏而私自在三海和昆明湖乘坐冰床者，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腊月京城有鲜花

鲜花，一向是北京人的爱物。从清静的宅门到人声鼎沸的大杂院，从布置典雅的华居到破烂不堪的陋室，一年四季皆有鲜花可看，春夏秋冬皆有绿叶可瞧。

北京人爱鲜花、养鲜花之历史由来久矣。明代刘侗、于奕正合著之《帝京景物略》即有“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的大段记载。有清以来，崇文门外之花市、东庙隆福寺集、西庙护国寺集，相继形成规模庞大的鲜花市场，生意四季兴隆，蔚为大观。

京城地处北方，早年冬季奇寒，且多风沙，对都市人生活威胁极大。凡久居京城者，无不苦寒，更苦风沙，于是将对春的企盼之情，寄托在岁首开放的鲜花上。在案头摆一盆水仙、迎春或腊梅，任凭外面风狂雪肆，室内却争奇斗艳、香满襟袖，一派春意盎然。

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水仙，必须经过北京西南郊区黄土岗花农的熏制加工，方能花叶并茂。虽说费了很多周折，但价钱极便宜。因其价廉，故家家户户皆购数株置于玲珑古雅的瓷盆或紫砂盆中，与那翡翠似的叶子、白玉般的花朵相映成趣。缕缕幽香，令人心骨皆清，顿生飘飘神仙气。

迎春花以早春花先于叶开放而名。经花农巧手修剪后，嫩枝丛生，花团环拱，灿如黄金，香细而清。北京人喜其“迎春”之名，且花期较长，能自腊月陆续开至翌年二月，故皆争购之以点缀年景。善养迎春之家，深谙修剪之术，精心护理老干令其矮而粗壮，使千枝万叶皆从老干旁逸斜出，状如圆伞，俟花盛开后，望之似金塔，其绝妙功夫，则使花农相形见绌也。

在冷洞子中培育出来的腊梅尤受青睐。此种岁首鲜花经花农精心养护、艺术剪裁，老干横生、盘根错节，以自然古朴、清秀淡雅见胜。其花以疏落为佳，娇艳玲珑，朵朵可数。以泥盆栽之，外面尚需有五彩细瓷套盆，则更见其典雅。套盆皆明清两代官窑所出，以“八骏图”“暗八仙”“喜鹊登梅”等吉祥图案者为上品，价值高于梅花数十倍。二者相得益彰，更增逸兴。碧桃比腊梅更为娇艳，其花色红白兼有，花瓣重叠，百媚欲流，望之醉眼。

穷人们点缀陋室春色，另有一套极省钱甚至不花钱的办法。喜看青葱绿叶，则以清水泡盘儿麦子或蒜瓣儿，并用红纸条拦腰一围，自有催人奋发的勃勃生气。想看鲜花，则种几棵“死不了”，碧绿的小碎叶，粉红的小碎花，那浓浓的春意，一发便不可收拾。

早在元朝，北京就有了花木业，历明清数百年，一直很兴旺。有名的花乡十八村，位于北京南郊丰台一带。这里得天独厚，酸性沙质土壤，溶肥渗水，适于花木生长，因此出现了很多花农。

北京一年有四五个月温度偏低，花农就创建了“花洞子”，类似于现在的温室。严冬季节，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照样培育鲜花。众多花农各有所长，各有绝招，互相竞争，争奇斗艳，促进了花卉品种的增加和质量提高。赵家楼村的牡丹，能控制在春节时开花，而这时的温度一般在摄氏零下十五度上下。樊家村吕家专养黄月季，开花早，花型好，香味浓，技压群芳。潘家庙村庞家，挖沟种植玉兰三百六十株，上建高大玻璃棚，玉兰长到三丈余，直径六七寸，为华北独有。当时只有广东有这样高大的玉兰。庞家玉兰花开时，一挑插花五六十斤，每斤卖银洋六元。

花乡十八村花木业的兴盛，与北京是几百年的国都有着直接关系。首先，皇宫中需要大量名花异草。慈禧太后喜爱佛手，大太监李莲英常亲自到以培植佛手著名的马家楼村卢家选购，有时一次买几十斤，一斤价值白银五两。皇亲国戚、达官显宦、富商大贾聚集京都，

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喜庆寿宴、送礼行贿，都不惜重金购买名贵花卉。过春节，不仅要买单株的梅花盆景，还要买松、竹、梅同植于一盆的“岁寒三友”和玉兰、迎春、牡丹合植于一盆的“玉堂春富贵”；过中秋节，要买桂花；婚嫁要买石榴，取“榴开百子”、人丁兴旺之意；办丧事者，要买用松柏枝和白色花朵扎成的“松鹤”“松鹿”之类，后来则改为花圈。

清末民初，清朝的遗老遗少赏花之兴不减当年，雄厚的家底足够满足他们的闲情雅趣。北洋政府的官僚、军阀，附庸风雅，购买名花亦不惜重金。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逐渐增多，花农适应其爱好，培植郁金香、石竹等外国花草，或扎成花篮、花束，卖给花厂子，供外国人选购。崇文门因地处东交民巷附近，这种洋花厂子有六七家之多。

很多商店也需要鲜花。北方人喜欢喝花茶，茶店大量收购茉莉花、玉兰花、玉簪花熏制茉莉花茶。中药店收购芍药、枇杷叶、藿香等鲜药材。糕点店收购鲜玫瑰花制作玫瑰饼。

市民为装饰房间、点缀庭院，购花木者也不少，尤以石榴、菊花、水仙、月季、夜来香、晚香玉销量为大。花贩沿街叫卖，古城四处飘香。

北京的腊月，天气最冷。谚云：“腊七儿，腊八儿，冻死寒鸦儿；腊八儿，腊九儿，冻死小狗儿；腊九儿，腊十儿，冻死小人儿。”可是，就在这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在花儿市、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等庙会上，以及大街店铺、中小巷深院里，随处可见鲜花。

每年一到腊月十五，那些来自花木之乡的花农们便纷纷挑着花担拥进城里，或集中于庙会集市，或走街串巷，争先恐后地叫卖各种鲜花。

花农的花担两头各是一个用荆条编成的圆柱形大筐，内壁糊有两

层高丽纸，筐底中间放有炭炉，筐口上覆有穹隆形的筐盖儿。如此严实而温暖的简易设备，足可以保护各种娇嫩的鲜花免受风寒的袭击。

虽说是寒冬腊月，但那鲜花的品种比起春、夏、秋三季却更为丰富多彩。打开筐盖儿，一股炭火的热气扑在脸上，暖烘烘的，热气中融合着馥郁的花香，钻入襟袖，沁人心脾。俯视筐中，映入眼帘的有腊梅、碧桃、迎春、瑞香、佛手、香橼、水仙、海棠、子孙石榴、子孙葡萄等各种奇花异草，碧枝翠叶，姹紫嫣红，令人目迷五色，心旷神怡。子孙石榴与子孙葡萄象征着多子多福，老人们盼望人丁兴旺，子孙满堂，都喜欢买一两盆，摆在八仙桌或几案上，终日笑眯眯地望着那些坠弯了纤细枝丫的石榴与葡萄珠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这些名贵的鲜花中，瑞香最受人欢迎。此花是世界名花，也是我国传统名花。《楚辞》称之为“露申”，民间称之为山梦花、千里香、雪冻花。之所以名为瑞香，源于宋代《清异录》中记载的一段神话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庐山一老僧于庙后石凳上入定，境中闻花香浓郁，欣然而起，若有所悟，便于四周枯草中寻觅，竟得翠叶香花一株，欣然移植盆中，供于佛前，名之曰“睡香”。未几，春节至，而花香不减，敬佛者益多，四方奇之，咸谓老佛所赐，乃一年祥瑞之兆，遂易名“瑞香”。宋代诗人王十朋《瑞香花》：“真是花中瑞，本朝名始闻。江南一梦后，天下仰清茶”写的就是这个故事。

市井闲趣

旧京庙会

旧时北京的庙会各有会期，每十天中逢“三”是宣武门外土地庙庙会，逢“四”是哈达门外花儿市庙会，逢“五”、逢“六”是阜成门白塔寺庙会，逢“七”、逢“八”是定阜大街护国寺庙会，逢“九”、逢“十”是东四牌楼隆福寺庙会。每到这些个日子里，这些庙中便百货云集，百戏杂陈，游人如蚁，拥挤不堪了。京都《竹枝词》云：“逢期庙会顾盼兮，三十六行色色齐，若遇人丛挨挤处，留神扒手窃东西。”

庙会是一种很古老的贸易方式。北宋汴京的大相国寺、南宋杭州的昭庆寺，都是有名的庙会之地。北京的庙会，在明代最热闹的是都城隍庙。明人《燕都游览志》记载：“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亘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即东城灯市口）同，在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当年西单旧刑部街西城隍庙的热闹情况，前人记载极多。不但珍奇货物样样都有，而且还有外国客商，所谓“碧眼胡商，漂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见明人笔记《谈径》），可以想见那时庙会的热闹了。一直到清初康熙时，都城隍庙的会期才停止，移到报国寺、慈仁寺，就是王渔洋、朱竹坨等诗人常去的地方。等到康熙末年，隆福寺、护国寺等大庙会就都有了。这在康雍时人柴桑的《燕京杂记》中，就有清楚的记载了。

庙会上的买卖，大都是租赁庙中的房屋、地段，固定设摊。如某家布摊、某家靴帽、某家服药、某家梨膏糖，这次会期在这里设摊，下次仍旧在这里摆，甚至几十年都不换地方，常逛庙会的人找起来是十分方便的。这些摆摊子的人，一个庙的会期结束后，再去赶另一个庙期。如初八护国寺庙会一结束，小商贩当晚便用排子车把货物拉到隆福寺设摊，好做初九的买卖。赶庙会是一种较特殊的买卖，说它是

坐商，却又不停地搬家；说它是行商，却又有固定的地方。庙会没有夜市，做的都是白天的买卖。在北京，热闹的庙会前后存在了足有五百多年吧。

民间花会琐谈

古老的北京城，庙宇梵宫星罗棋布，佛事活动四季频繁，几乎每隔半月便有一次庙会。因此，与庙会息息相关的民间花会，也日趋发展起来。其组织之严密，技艺之高超，影响之深远，均值得一谈。

民间花会源远流长，早自汉代即有之，彼时称作“百戏”，宋元时称“社火”，其活动内容多为高跷、旱船、秧歌、舞狮等。南宋范成大对它的评价是：“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清代以来，由于统治阶级及八旗庶民皆迷信神佛，从而使民间诸般花会披上了一层浓厚的佛教色彩。尤其进入晚清后，由于慈禧太后的赏识与推崇，京城内外的民间花会组织不断扩大，种类逐年增加，技艺日臻高超，影响日趋深远。迄今有些会种，依然活跃在北京乃至全国诸多城镇乡村。

绚烂多彩的民间花会，旧京谓之“走会”或“过会”。因其从会首家出发，前往寺庙朝顶进香，总要穿街过巷，边走边练，故曰“走”或“过”。凡名刹开放之日即走会之日，如正月初二广安门外五显财神庙祭财神，三月初三东便门里太平宫王母娘娘蟠桃圣会，四月十八日妙峰山碧霞元君诞辰，五月初十宣武门外都城隍庙城隍出巡，六月二十四日崇文门外关王庙祀关（云长）老爷磨刀，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什刹海广化寺盂兰盆会，等等。届期各花会云集于山门内外，歌之舞之，极一时之盛。

花会中的领袖曰“会首”，内部人则称之为“把儿头”或“大督管”，非德高望重、有钱有闲者，莫敢就其位。辅佐会首主持会务者谓之“前引”，一般由两位谙于会规、巧舌如簧、精明干练的中年人充任。会中之成员，统称为“会友”，均系五行八作中的穷苦劳动者与虔诚的佛教徒。

凡愿参加某档花会者，首先熟习并承认其会规，由充当中人（即介绍人）的老会友口传心授。其条目甚多，诸如“心有神佛，勿生邪念”“笼箱自带，茶饭不扰”“善事多行，莫与人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带着神秘与迷信色彩的会规，是促使众多会友团结共事的一条纽带。其人际关系就像梁山好汉那样，“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旧京民间花会，有文武之分，文会不表演任何技艺，其宗旨只是虔诚地为寺庙神佛奉献供品，并为各路香客热情而无偿地服务。每届大庙会之期，文会还须先行一步，在通向山门的各条道路上高搭席棚，并设方桌、条凳、炉灶、茶具等物，以备众香客及武会之友休息兼饮茶进食之用。

文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这些虔诚的佛教徒，平素各操其业，自食其力，每遇庙期走会，便暂停营业，心甘情愿地服从本会大督管的调遣，挑一副沉甸甸的“笼子”，内装供品及服务所需之品，步行一二十里土路，乃至三四十里山道。一身臭汗，两脚血泡，却分文不取，毫厘不要，且满面春风，毫无怨艾。对佛的一片虔诚，可见一斑。

文会名目繁多，诸如专为佛献四季鲜花的“献花老会”（多由丰台花农组成），为佛敬献高香的“盘香老会”，为佛敬献月饼与蜜供的“供碗老会”，为沿途所设茶棚贡献茶叶的“茶叶老会”，为沿途所设饭棚贡献食品的“馒头老会”，为茶棚、饭棚盘炉砌灶的“巧炉老会”（皆由炉匠组成），为沿途各棚帐提供夜间照明所用蜡烛或油灯的“燃灯老会”，为男女香客义务修鞋的“缝绽老会”（皆由皮匠组成），此外还有负责搭建席棚并捐献苇席、杉篙的“拜席老会”（皆由棚铺匠人组成），以及“献盐老会”“粥茶老会”“绳络老会”“修路老会”，等等，不胜枚举。之所以皆名之曰“老会”，盖言其历史悠久且受“皇封”也。

庙会期间，各种文会所搭之席棚鳞次栉比，一面面绣着“某某老

会”黑字的三角形杏黄旗高挑于半空中，被徐来的清风吹得飘飘悠悠，与次第而来的一档档武会及三步一叩首的还愿香客构成一幅富于神秘色彩的立体画卷。当金乌西坠、夜幕降临之时，席棚中纷纷点起红烛或陶质的香油灯盏，一束束昏黄的光线从席棚的缝隙透出来，与天际的月光星斗遥相辉映，加以从庙中传来的阵阵鼓磬之声和散自棚内的袅袅香烟，往往把人带到对极乐世界的美妙冥想中去。

文会每年糜费颇巨，会首尽管会因此而倾家荡产亦毫不心疼，此等“无我”之精神恰恰符合佛教的本意。

文会是各大庙会的慷慨赞助者与热情的组织者，但最能烘托庙会气氛的则非武会莫属。旧京大小武会近百种，而最常见且必不可少者，仅十余种而已。

每次走会，居首位者曰“开路”（亦称耍钢叉或舞钢叉），演练时钢叉上下翻腾，左右旋转，银光四射，响声哗然，大有逢山开路、不可阻挡的雄浑气势。

紧随其后的是“五虎棍”，以勇猛、火暴见长，表演赵匡胤与董家五虎搏斗的故事。因其师承不同又有“少林棍”“跟斗棍”“五路打虎”及“藤牌少林棍”之别。

继之是“高跷”。那十四副八十五厘米高的杉木腿子谓之“辖客木”，象征着山门前拦路的木栅。踩跷者个个披红挂绿，浓施粉黛，分别扮演渔樵、村妇、文武扇等人物，频击锣鼓，尽情戏逗，翻滚跳跃，无一闪失。

步“高跷”之后尘者，乃为“中幡”。凡练中幡之会友，皆彪形大汉。其幡高两丈，面料为红缎，上绣“晃动乾坤定太平”七个黑缎字，系于碗口粗的竹竿上，顶部缀以串串铜铃及筒状花伞，总重约四十斤。此物象征庙前之幡杆。按空门旧规，庙前幡杆平素只有木杆耸立，诵经有所“悟”时，立即挂幡于杆上，以告四方。表演中幡时，总

以扔得高、立得稳为准则。尤其是路经牌楼时，必须竭力将中幡扔向半空中，使其逾越牌楼而落下。表演者跑过牌楼后，以肩部或肘部承接；偶有以前额承接者，则更为精彩；至于以双手承接，虽美名曰“怀中抱月”，然实属下乘也。正因其难，故旧京有“中幡怕过牌楼”之俚语。

中幡之后是“狮子会”。此会所耍之狮子以“太狮”（即大狮子）为主，“少狮”为辅。太狮是娘娘庙山门前左右一对石狮子的象征。旧京狮子会以朝阳门外东坝的“大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最负盛名。这对自清代乾隆年间传下来的青、黄太狮，造型雄伟、凶猛，舞动起来精神抖擞，粗犷有力，节奏明快。这对狮子出动时，各路狮子都要闭目颔首，匍匐在地，为其让路，因此而受皇封。

列于狮子会之后者，依次是“双石头”、“石锁”、“杠子”、“花坛”、“吵子”、“杠箱”、“天平”（又名“莲花落”或“什不闲”）、“神胆”（即大鼓）。十三档花会排列有序，旌旗迎风招展，锣鼓响彻云天，绵延数里。

京城处处扭秧歌

最近几年，北京街头出现一种新景观：成群结队的中老年妇女身着彩衣，浓施粉黛，于清晨或黄昏，占据街头宽敞地带大扭特扭秧歌，为本已极度喧嚣的城市再添几分热闹。

如今北京妇女所扭之秧歌，系由清代之“地秧歌”演变而来。原始之地秧歌，是一种时令性极强的民间花会，随妙峰山等处各大庙会而出演，且皆由男性装扮成头陀、渔翁、渔婆、樵夫、农夫、傻公子、傻公子老婆以及文扇、武扇（手中持折扇）、俊鼓（小生扮相击鼓）、旦锣（青衣扮相打锣）等十余个角色，以俚歌小曲、诙谐对话、幽默动作表演八仙或梁祝等的故事。

秧歌在各大庙宇山门前演出时，内容分“堆山子”“走场”“别篱笆”“逗场”“演唱”五部分。它的舞蹈动作是根据头陀的几套基本动作演变成六十四个套路，节奏明快，强弱对比鲜明，动作幅度大，刚劲沉稳，给人以粗犷有力之感。并吸收了戏曲表演技巧，讲究手、眼、身、法、步的协调与统一，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

地秧歌作为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花会，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曾对北京人，尤其是儿童产生了极大影响。清顺治进士施闰章《愚山先生诗集·灯夕口号诗》曰：“秧歌椎击惹闲愁，乱簇儿童戏未休。见说寻常歌舞竞，大头和尚满街游。”并自注云：“都下儿童，竞唱秧歌，击椎相应，又扮大头和尚为戏。”诗中大头和尚者，即“大头和尚度柳翠”之神话故事：王母瑶池仙女柳翠思凡下界，罗汉度其重上天宫。故事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

自清初至民国期间，北京城内及郊区表演地秧歌的花会组织凡二

十余档，其资格最老者当数朝阳区弘寺地秧歌老会，迄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素享盛名，可谓鲁殿灵光。以其资深而技艺高超，并有推陈出新之改良举措，遂于1986年北京地区龙潭杯民间花会大赛中荣获优胜奖。

自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数以几十万计的妇女从不同工作岗位退休后，既无动荡之忧，又无凋敝之患，于是选择与自身文化素质相近之娱乐方式，求长寿之道。于是一支又一支的大小秧歌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乃至形成京城一大景观。

更令人欣慰的是，京城一切秧歌队的所有女性，皆一改昔日腼腆之故态，能在群众围观且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纷乱环境中旁若无人地翩翩起舞，确实达到了佛教“无我”“无畏”的境界，也真是一种莫可名状的享受。

闲话踩高跷

小时候在北京，我十分爱看“高跷”。腊月里、正月里，四郊农民一二十人扮上角色，一堂锣鼓丝竹，踏上高跷，扭扭摆摆进城串街走巷表演。北京人家一般都关着大门过日子，听见外面的锣鼓丝竹声，是什么呢？孩子们最好奇，打开大门一看，哦，踩高跷的过来了。进来玩玩吧，一个一个弯着腰，低着头，高抬脚，迈过门槛，从大门洞进来。孩子们好奇又惊讶地看着他们，觉得大门洞对他们来说太低了。看着他们，孩子们觉得自己更小了，真像小人国的人遇到大人国的人。

高跷能玩些什么呢？“大头和尚戏柳翠”“小二格赶驴”“傻公子上京”“渔樵耕读四时乐”，等等。高跷只能摇摇摆摆地走着表演，而且走的是一定步伐。领头的是大头和尚，手里敲着木头梆子，随走随敲。表演的人按照他敲的快慢来扭着走，手上再做一些动作，如扮小媳妇的，一手贴着腰，一手甩着手绢；扮小二格的，摇着赶驴的鞭子。表演时走的路线有走圆圈、走拗花（如大写两个英文字母“S”交叉）、走四门斗（四角对穿走三角），等等。

踩高跷的人休息时更好玩，既不能站立不动，又不能坐，必须靠在墙上或窗户边站着。只见靠在窗户边站着的大头和尚，把木梆夹在腋下，把头套推上去挂在头上，掏出烟袋、烟荷包、打火镰，悠闲地抽烟。我出神地看着他，但他并不注意我。他哪里想到他那瞬间的神态，会给我留下永久的印象呢？

高跷是秧歌的一种。《京都风俗志》云：“秧歌以数人扮头陀、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脚秧歌。”

《定县秧歌选绪论》也说：“北平唱秧歌的人，脚底下绑上三四尺高的木棍，叫做踏高跷脚。”这种形式，在清初就十分普遍了。这种古老的带有泥土气的玩意儿，给孩子们的欢乐，可以说超过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

骑毛驴逛白云观

骑小毛驴逛白云观，是北京人正月里的一件乐事。白云观正月初一开庙，初八顺星和十八会神仙是两大高潮。整个正月里，白云观摊贩林立，仕女云集，成了一个大型庙会。当时，进入正月的宣武门门洞旁，便出现一些来自农村的赶毛驴的，每人牵小毛驴三五头，伫立街头，等候主顾。笔者与友人曾各雇得小毛驴一头，前往白云观。

将钱给赶毛驴者后，即给你一条鞭子。骑上毛驴，无须多劳，小毛驴即直奔白云观而去。到了观门，照例将鞭子往鞍座上一插，那小毛驴不待我们指挥，便又自行奔返原出发地点去了。这样的“自动化”，从未听说出过任何差错。手续简便，较今日之“的士”别有一番风味。

入白云观，总要“打金钱眼”。白云观的山门外有一风桥，桥下是干地，桥洞中一老道闭目静坐，终日不吃不喝。桥洞前悬一硬纸做的大钱，直径盈尺，中间钱眼径四寸许，内挂一铜铃。香客游人求子嗣、求福，便以硬币向金钱眼中投掷。据说，能投入者即可如愿，入而又能掷中老道者更是多子多福。如身无硬币，桥旁即有道士专门负责兑换，可谓“道亦有道”矣。

白云观建于唐代开元十年（722），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初名天长观，金泰和三年（1203）改为太极宫，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改名长春宫，成为供奉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邱处机之圣地。邱死后葬在那里，被追谥为长春真人。明正统八年（1443），长春宫改名为白云观，沿用至今。每至正月十九，都人“致浆祠人，游冶纷沓，走马蒲博，谓之燕九节”。“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缙绅，或化游士冶女，或乞丐。故羽士百千，结圆松下，冀幸一遇之”。这是

会神仙的由来。清人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中有“才遇元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之句。

白云观是北京最大的道观，也是全国最著名的道观之一，观貌庄严，比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的玉清金阙还绚丽宽敞。全观有六进大殿，依次为大雄宝殿，供昊天大帝；灵官殿，供马魁胜、赵公明、温琼、岳飞四元帅，康熙间改祀关帝，仍称灵官殿；七真殿，供道教全真派教祖王重阳的七位高徒，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女）等；老律堂，供太上老君李耳；丘祖殿，供长春真人邱处机塑像，邱像传为元代雕塑大师刘元所塑，殿下埋真人遗蜕，道家称此殿为“龙门祖庭”；再后是三清殿，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神祇；最后一进是星宿殿，又名星神殿，塑有全部星宿神像。正月初八那天，天尚未明，就有人来争烧第一炷香。一时人如潮涌，烟雾弥漫。香客进入大殿，便由左至右往下数，如你是五十岁，便数到第五十位神像，那便是你的值年星宿，于是顶香膜拜，以求保一年的平安顺遂，此谓之“顺星”。

雍和宫“打鬼”

北京雍和宫过去有“打鬼”的传统。何谓“打鬼”？其正名曰“跳布扎”。这是蒙古语，是“驱魔散祟”的意思。是黄教喇嘛特有的宗教乐舞，是极为隆重的宗教大典。清代雍和宫跳布扎时，皇帝要亲临观礼或派王公大臣参加。

跳布扎，各喇嘛庙均有此活动。《燕京岁时记》云：“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攘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人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逸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打鬼日期，黄寺十五日，黑寺二十三日，雍和宫在三十日。”据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有喇嘛庙跳布扎。辛亥革命后，因经费无措等多种原因，北京只有雍和宫一家跳布扎了。跳布扎时，喇嘛们戴着奇形怪状、狰狞可怖的面具，穿着五颜六色的各式服装，在鼓乐和诵经声中翩翩起舞，场面庄严热烈。

雍和宫跳布扎在天王殿前广场，分三天举行。正月二十九日早晨开始叫“演鬼”（相当于剧场排练）。三十日从中午开始“打鬼”。二月初一凡参加跳布扎的喇嘛，绕雍和宫一周，叫“绕寺”。如正月是“小月”，则提前一天。

跳布扎共分十三场，第一场“跳白鬼”，第二场“跳黑鬼”，第三场“跳螺神”，第四场“跳蝶仙”。黑白鬼戴骷髅面具，一个衣白，一个衣黑；螺神面具是狰狞的笑脸，头上扣一个螺虎，穿绣花长袍；蝶仙也是笑脸，两耳似蝴蝶翅膀，穿绣花紧身宽袖衣裙。白鬼还斜挎一个盛满白粉子的布袋。刚开始时，白鬼往观众身上撒白粉子，叫“撒煞气”。撒到谁身上，一年衰气，观众自然退后，场子就腾出来，所以

又叫“净坛”。

第五场“跳金刚”，第六场“跳星神”，第七场“跳天王”，第八场“跳护法神”，第九场“跳白救度”，第十场“跳绿救度”。这些金刚、星神、天王，都是释迦牟尼派来擒拿魔王的，其面目更是狰狞可怖，很多是三只眼，服装也更加鲜艳。

第十一场“跳弥勒”，俗称“捉鬼”。上场共七个弥勒，一大六小。大弥勒穿黄绣花大袍。在弥勒出场后，变为梅花鹿的魔王出场了，这时所有的金刚、星神又都出场了，围着梅花鹿舞起来，场上气氛达到高潮。在弥勒佛法力的威慑下，众星神、金刚把梅花鹿捆起来，魔王被擒住了。

第十二场“斩鬼”。魔王现了原形，是个一尺多长的面人，被钉在三角钵里。大弥勒将一把金光闪闪的月牙斧交给金刚。金刚用大斧把魔王的头砍下来——祸国殃民的魔王被消灭了。

第十三场“送祟”。斩杀魔王之后，从此天下太平，庆祝胜利，一年一度的跳布扎活动就此结束。

荷花市场拉洋片

记得昔时在北京，夏天逛荷花市场，看拉洋片真是饶有兴趣。暑假到什刹海玩，是由太平仓、西皇城根、西不压桥绕过去的，一走完乐家花园北墙根，不远就到了。在大柳阴下，远远的就先听到一种声音：咚咚锵——咚咚锵——这是什么呢？这是老太太和十来岁的儿童最爱看的玩意儿——拉洋片。

今天，家家都有电视机，看电影也很平常，自然没有人再提“拉洋片”了。但是在旧时，那还是非常吸引人的玩意儿。

> 咚咚锵——咚咚锵——看了一片又一片。哎，来到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你看那呜儿地一声汽车屁股直冒烟；再看那一片杭州景，西湖上桃红柳绿三月天……
>
> 咚咚锵——咚咚锵——再来看这一片，那吴佩孚大战阎锡山，娘子关前迫击炮，轰轰、轰轰打上个没有完，眼看着阎老西儿玩儿完……
>
> 咚咚锵——咚咚锵……

那时，我坐在板凳前，趴在那个木箱子边，一只眼睁着从那个装有凹凸玻璃的洞眼贪婪地看着，听着那唱口汉子一边使劲儿地拉着锣鼓架，一边沙哑着喉咙唱着。我出神地张望里面放大了的彩色图片，仿佛真到了上海、杭州，真看到了吴佩孚、阎锡山。有的在“洋片”上还装了小灯泡，一拉动，那神奇的上海大马路洋楼上的电灯，真会“哗”一下都亮起来，太好玩了……

拉洋片正名叫“西洋景”，到现在还有“拆穿西洋景”的说法。因画片上有西湖的景致，所以也叫“西湖景”。一架像钢琴般大的彩画箱

子，用架子架起来。后面吊着八到十张大画片，前面有四个装有凹凸玻璃的洞眼，放下一张画片，即可从洞中张望到。箱子边上还装着锣鼓架，拉绳和片子连在一起，一拉，锣鼓有节奏地敲响，片子也吊起一张，演唱人按次序拉动演唱。旁观者看到上面的片子，产生了兴趣，再坐下来看放大了的图片。

拉洋片之所以十分好玩，除了景儿好，还在于演唱人的精气神和滑稽有趣的唱词。演唱的调子虽基本一样，但各人有各自编的唱词。北京拉洋片的也出过名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金牙”就是载誉京华的拉洋片艺人。他的箱子大，片子大，都是庚子以来的时事片，唱词也很吸引人，所以成为拉洋片演出界的闻人。

北京民间杂戏

旧京民间杂戏最能吸引人者，是起源很早的耍猴儿与耍耗子。

耍猴儿即古代沐猴戏，起源于南朝陈代。《陈书·始兴王叔陵》云：“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清代《燕京岁时记》叙述颇详：“耍猴儿者，木箱内藏有羽帽乌纱，猴儿自启箱，戴而坐之……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指挥。”

旧京耍猴者大都为两人合作，一人背木箱与猴并敲锣招揽观者；一人牵狗与山羊，择宽敞处拉开场子，先将一铁橛子于地，令猴儿坐其上，俟观众围拢后即行表演。猴子伴随着节奏鲜明的锣声，又翻筋斗又竖蜻蜓，露出那红得像火焰的猴屁股，逗得观众哈哈大笑。顽童们则纷纷高喊：“猴儿屁股着火喽！”围观者愈发大笑不止，于是招来更多人围观。

艺人相机变化锣声以为命令，猴遂打开木箱。听罢主人“打开柜来掀开箱，装一个三关杨六郎”一句唱词，即取一顶小纱帽戴在头上，坐于橛上闪目环视观众；主人接着唱“杨六郎回到三关上，装个坐殿的赵乾王”，猴即开箱换戴小王帽；主人再接着唱“赵乾王回到中军帐，装一个倒坐南衙的包丞相”，猴儿即又换上画着包公脸谱的面具，表情变化多端，憨态可掬；最后唱到“什么样的官儿都不怕，就怕衙门里的活阎王”，那猴儿便戴起一个“纬帘”（清代差役的官帽），并瞪着眼睛怒视观众，颇似凶相毕露的酷吏。

继而是狗钻圈儿，羊拉车。猴儿坐在车上，挥鞭赶羊，狗随车行，转圈儿表演。猴儿忽而跳到羊背上翻筋斗，忽而跳到狗背上倒立，表演已达高潮，掌声四起。最后便是猴与主人一块向观众打钱。

钱若打得不多，猴儿便跳上主人肩膀假装耳语，主人心领神会，假托猴儿的意思，再次向观众敛钱。

耍耗子即古代之鼠戏。《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鼠为耗子。耍耗子者，木箱之上，缚以横架，将小鼠调熟，有汲水、钻铁圈之技，均以锣鼓声为起止。”这段记录，失之过简。

耍耗子为单人表演，所驯皆小巧白鼠或花鼠。横架上设有楼、塔、瓜、桃、木鱼、木桶、秋千、转轮、软梯等模型，油饰得五颜六色。十余只小鼠分放于木匣中，轮流表演，各有所长，随着指挥棒（一尺长的竹棍儿）听着口令，绝对服从，且无半点差错。

艺人口念“白猿偷桃”，小鼠即沿软梯而上钻入桃瓢；再念“状元祭塔”，另一小鼠即钻进塔腹；念“吕洞宾三上岳阳楼”，又一只小鼠即爬进楼中；喝一声“姜太公钓鱼”，即有小鼠应声倒挂于横梁上，以前爪倒抓木鱼之线，往复做垂钓之姿；再喝一声“李三娘打水”，便有小鼠以前爪提木桶出井口……待“戏完讨赏”一声令下，群鼠依次顺梯而下，纷纷拱手而立，以示讨赏。观者无不笑逐颜开，掷钱激赏。

古拙的民间玩具

现代北京的儿童，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就连手中的玩具，也比几十年前的“土玩意儿”洋得多、阔得多。人类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玩具自然也随之而革新。老年间的儿童玩具，虽说土得掉渣儿，却有新式玩具不可替代的古拙之气和文化蕴涵，且富于浓厚的人情味儿。

土玩意儿的发明者和制造者们，大都名不见经传，但都是读“无字书”的状元。贫穷使他们过早地步入社会，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饱尝酸甜苦辣，于是便把喜怒哀乐的思想与感情寄托于雕虫小技，设计并制作种种儿童玩具，自娱而又卖钱——“面人郎”如此，“泥人张”如此，“风筝哈”如此，曹雪芹的后裔“毛猴儿曹”亦如此。

北京城过去的土玩意儿多如牛毛——泥捏的、木刻的、纸糊的、草编的、线缠的、竹削的、铜铸的、皮蒙的、毛栽的、玻璃吹的，无奇不有，且不乏栩栩如生者，故有“小玩意儿赛活的”之说。

大宗的泥捏玩具，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泥捏的小人儿、兔儿爷、脸谱儿，造型美观，彩画生动，其情态或笑或哭，或慈祥或狰狞，或面目可憎或憨态可掬。那些长于泥塑的民间艺人，没进过工艺美术的高等学府，更无雕塑家的称号，他们住在穷街陋巷，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日子，却用最纯洁的艺术美化着人们的生活。

木刻的玩具，除了击之清脆有声的小梆子、小木鱼外，更多的则是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与武林中所使用的真家伙毫无二致，只是缩小了尺寸，并添上了优美的油漆彩画。男孩子每每争购之而爱不释手，并常凑在一起“兵刃相见”，个个冒充英雄好汉，颇有尚武精神。“战斗”激烈时，那木制的兵

器往往折断，因为心疼或怕回家挨打，遂一扫英雄本色，哭天抹泪，不欢而散。

纸糊并彩画的关公、张飞、孙悟空、猪八戒等面具，囊括了京剧所有的脸谱，在相继开放的庙会上集中出售。面具摊是娃娃们的乐园，摊主则是娃娃们的启蒙老师，朝代顺序、人物名号、戏剧常识，均在交易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传播，娃娃们因此而兴致勃勃。

黄铜铸造的福、禄、寿、喜、财诸神像，以及犀牛、骏马、梅花鹿等象征吉祥的动物造型玩具，皆中空而高不盈寸，且线条清晰而流畅，与其说是儿童玩具，不如说是精美的工艺品。就其巧夺天工的艺术手法而言，理应登上大雅之堂，但只横七竖八地散放于地摊上，任孩子们挑选。

用马莲或蒲草编织的青蛙、螃蟹、蝈蝈等小动物，形象逼真，嵌入红小豆当眼睛，更加活泼可爱，并散发着青草的香气。其古拙的味道，尤为突出。

敲糖锣与捏面人

几十年前，古城北京最能招引儿童的声音是“打糖锣”的响器声。这种小贩，肩挑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纸糊的半人多高的小阁子，挂着木制的小型刀、枪、剑、戟之类的玩具，还有风筝、万花筒、彩匣和各种纸糊的花脸面具如孙悟空、猪八戒、张飞、李逵等。挑子后面是糖块儿、杏干、山里红、酸枣、桂花缸烙、糖薄脆、茯苓饼、泡泡糖等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小食品。

一些打糖锣的肩挑货担，不走大街，专串小巷，足迹几乎遍及四城的小胡同儿。至于每一个打糖锣的，则往往有自己一定的路线，到时候准来。有些孩子一到钟点儿，就盼着“当当”的糖锣声了。

还有一种民间艺人，俗称“捏面人儿的”。面人儿是把江米（即糯米）磨成面，再把面和水揉软，用颜料调成五颜六色，通过艺人的巧手，捏成各种古装戏曲中的人物角色。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西游记》中的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京剧《定军山》里的黄忠、《长坂坡》里的赵云等。他们身披各色铠甲，背扎四面靠旗，手执刀枪，威风凛凛，酷似戏曲舞台上的大将。这些民间艺术家往往是在街头巷尾当众表演，许多大小观众将他们包围起来，欣赏他们的绝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面人郎”和“面人汤”了。

“面人郎”姓郎名绍安，高鼻梁，一双深凹的眼睛，是满族旗人。十二岁那年，他在庙会上看到一位赵师傅捏面人，便爱上了这门手艺，就天天守着赵师傅。赵师傅渴了，郎绍安给他端茶；赵师傅被太阳晒了，郎绍安给他挪地方。就这样，赵师傅收下了这个徒弟，教他捏面人的手艺。赵师傅叫赵阔明，是当时有名的面塑艺人，人称“面人赵”，又称“面人大王”，活了八十一岁。

郎绍安的杰作，有孙悟空、吕布、达摩、嫦娥等，还有整出戏《二进宫》《三顾茅庐》《将相和》等，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生气勃勃。郎绍安没有文化，为了捏好《二进宫》这出戏，他省下钱来专门买票去看戏。他想捏一匹斑马，还特地到动物园去数斑马身上的斑纹。他最熟悉社会底层生活，最爱捏三百六十行的形象。像锔碗的、推车卖菜的、卖大小金鱼的、算卦的、要饭的、拉洋片的、卖风筝的……我见过他捏的“剃头”的面人：一个剃头匠手里举着把剃刀，正在给人剃光头。顾客围着块大白布，低着头，剃头挑子上有个脸盆架，架子上还飘着手巾呢！我还见过他捏的“打糖锣”的面人：小贩挑的担子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摆上了三个假面具——孙悟空、关云长，还有《女起解》里的崇公道。每个都只有黄豆大，可是捏得惟妙惟肖。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点名要他捏三百六十行。

听说有一次，一位女顾客要郎绍安按照自己的形象捏个面人，他便当众捏了起来。不到半个时辰，一个穿着翻毛皮大衣、踩着高跟鞋的女人就呈现在观众面前了——与那位女顾客形神毕肖，而且她戴着戒指的手还举着大糖葫芦、空竹、风筝、气球，一看就知道这是刚从厂甸回来的游人。不仅那位女顾客分外满意，连声道谢，围观者亦无不称绝。

1929年，郎绍安在北京目睹过孙中山先生的出殡仪式。前后六十四杠，还有大小篷车。出殡的队伍前面走到西四大街，后面还在西直门。后来他就凭记忆捏出了这样一个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出殡仪式。这是我所见过的面人艺术中最杰出的作品了。

还有一种“吹糖人”的艺人，他们能用麦芽糖饴（就是糖稀）吹出各种人物。色彩虽然是一色驼黄，不若面人那样绚丽，却别具特色。他们吹制的“耗子（老鼠）偷油”“猴拉稀”“黄鼠狼拉鸡”“鹬蚌相争”等动物造型颇能引起儿童们的兴趣。如“耗子偷油”，一只老鼠俯身向下，贪婪地望着坛内的香油，垂涎欲滴之神情姿态惟妙惟肖。

糖人既是糖稀吹成，当然也可以吃。不少顽皮的儿童往往在欣赏了老鼠、猴子之后把它们一口吞掉。不过，吹糖人的已把糖饴一再吹捏，孩子们把它吃掉，确是很不卫生的事。

据说“面人郎”“面人汤”的后裔们又将祖传技艺发扬光大，博得了国外人士的赞誉！

“鬃人儿”与“毛猴儿”

北京的鬃人儿，是清朝末年兴起的一种民间玩具。因其历史不长，故在记述北京岁时风物的古籍中均无记载。

所谓鬃人儿，是民间玩具艺人根据京剧和皮影戏创造的一种能够舞动的人物造型。其骨架用猪鬃扎成圆锥状，头部为彩塑，骨架外面套上五颜六色的古典服装，手持兵器或团扇等物，并按照戏曲演员“亮相”架势或“小车会”人物的舞蹈动作制成各种姿势的塑像，可谓集京剧脸谱和戏剧服装于一身。

一套鬃人儿数量的多少，取决于戏剧或花会中主要角色的人数。例如一套《三岔口》的鬃人儿，只有店主刘利华和任堂惠。将这两个鬃人儿置于铜盘内，以木棍敲铜盘，人物借着猪鬃的弹性，立即挥起兵器舞动，一招一势，攻防分明，逗得围观者忍俊不禁，故有“铜盘好戏”之称。

民国初年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庙会上出售的鬃人儿，其服装系用纸剪成，所绘花纹简单而粗犷。至第二代传人王汉卿，改用绢、绸、缎裁制服装，并对彩绘刻意求工。近期的王氏传人白大成，对旧工艺作进一步革新，将鬃人儿圆锥体的底部改为双脚或单脚（另一脚悬空），并根据力学原理使猪鬃的排列顺序和方向富于变化。这种运用新工艺制作出来的鬃人儿，受震后舞动得更加灵巧，已成为国际玩具市场的畅销货。

北京的毛猴儿，比鬃人儿的资格老得多。这种古朴的民间玩意儿，小巧玲珑，生动活泼，给人一种强烈的幽默感。它是用“辛夷”“蝉蜕”“木通”这三种药材做成的人格化的小猴儿。辛夷一名“木笔”，为木

兰科木兰属落叶乔木，入药用其未开之花蕾。《本草衍义》谓“辛夷花未开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用它做猴儿的躯干，颇为相似。用蝉蜕的口器和节肢两部分做猴头与四肢，极相像。至于木通，入药切成薄片后即卷成圆锥状，用其做毛猴儿的草帽或雨伞，都很得当。

这种传统的北京民间工艺，内容丰富多彩，既表现了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又反映了拜年、祝寿、堂会、娶亲、出殡、踏青等风俗与韵事。

毛猴儿论组出售，每组少则两三个，多则十几个乃至数十个，粘在纸板上或置于玻璃罩内。毛猴儿做工精细且价钱便宜，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把玩而不忍释手。

春意盎然小金鱼儿

北京人养金鱼，始于1190年金章宗修鱼藻池，迄今已有近八百年历史。上自官宦人家、贵胄大贾，下至布衣百姓，无不喜在鱼桌、泥盆或玻璃缸中蓄养几尾金鱼。闲暇时观赏，既可消遣解闷，又可颐养精神。

位于天坛北侧的金鱼池，即金章宗所建鱼藻池之故址，其地方圆数百亩，乃中国金鱼之摇篮。开春以后冰雪消融，水绿而鱼红，映日结队争游，将碧水荡起层层涟漪。那盎然的春意，虽丹青妙手而难以绘出，唯身临其境方能领略个中诗情画意。

杂居池畔的鱼把式，春日之劳作，决定着他们一年收益的多寡。除井然有序地准备繁殖仔鱼外，纷纷挑起古拙的鱼挑子，散入京城六街三市，高声吆喝："卖大小——小金鱼来！"这抑扬顿挫的卖货声，将春天的消息传递给千家万户，为古城描画出浓艳的春色。

金鱼商贩一副柳木高梁多格鱼盆挑在肩上，走街串巷，不时地吆喝着："卖大小——小金鱼来！蛤蟆骨朵（即蝌蚪）大田螺来！"男女老幼只要一听到这富有春意的叫卖声，便兴冲冲地跨出大门，将鱼挑子团团围住。或选购几条五颜六色的金鱼；或挑几个蠕蠕而动的大田螺；或买一小盆黑黑的蛤蟆骨朵，仿佛广州人喝活蛇胆一般，一仰脖儿便咕嘟进肚里去了，那味道于苦涩中夹带着土腥气，据说可以清眼、败火、解瘟毒。痴心的父母爱子心切，每遇金鱼挑子过街，必然张罗着给孩子们买些蛤蟆骨朵喝。胆小的孩子把黑糊糊的活物送到嘴边时，往往因疑虑而踌躇，甚至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金鱼挑子前后的两个木盆里，各用薄木板截成四至六个扇面形的

小格儿，分别放有红、橙、紫、蓝、墨、古铜、银白、五花等各色金鱼。其品种有鹅头、虎头、龙睛、丹凤、玳瑁、珍珠鳞以及水泡眼等，皆因其形似而名之。更有异种者，系曾国藩玄孙所开“知乐鱼庄”的老把式经多年杂交培育而成。在这些极其珍贵的品种中，白而朱其额者曰鹤珠，朱而白其脊者曰银鞍，朱脊而有七枚白点者曰七星，白脊而有八条朱纹者曰八卦。此外，尚有金目、银目、双环、四尾之属，奇特而多变，卖者每每昂其值，待价而沽。

北京人饲养金鱼，选择容器亦非常考究。小条金鱼一般放入玻璃盎或玻璃瓶中，转侧其影，大小俄忽，殊可一观。大条金鱼则置于庭院中的雕有龙头的泥质鱼盆或“鳝鱼青”陶质缸中。阳春时节，明媚的阳光透过清澈的水面，把鱼儿的倩影映在盆底。八九尾五色斑斓的金鱼摆弄着肥胖的头身与发达的尾鳍翕张而游，影随鱼动，似与主人相乐。忽然，一阵清风徐来，几片桃花飘落于水面，惊动了满盆金鱼，纷至沓来，吞吐落英，呷呷有声，或沉或浮，戏弄不已，真是趣味盎然，令人乐而忘忧。

以鱼桌养金鱼，多见于殷实人家。桌架以花梨、紫檀或红木为之。桌面及四围镶嵌玻璃与天然彩色光泽的螺钿，常年置于客厅，宾主坐在鱼桌四面的绣墩上，品茗兼观鱼，赏心悦目。

每年霜降后至翌年清明前，是小金鱼儿冬眠阶段，须将其置于室内阴暗处，不投饵料，亦不换水，使其静静地趴在盆底上，维持基础代谢，即可安全越冬。清明节后三四日，地气上升阳盛而阴衰，此时之金鱼爱好者皆像农民不违农时一样，将金鱼移到室外，谓之“出盆”。出盆后的小金鱼，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骀荡的春风，吞噬着鲜红的鱼虫，不消数日光景，那冬眠时呆若木鸡的状态遂逐渐消逝。观其畅游之情景，恰似柳宗元《小石潭记》所云“往来翕忽”而“皆若空游无所依”。鱼乐，人更乐——鱼乐春光，人乐观鱼，其乐无穷。而乐天知命，恬淡不慕荣华富贵，恰是长寿之道也。

老北京人悟出饲养金鱼之三昧者，不乏其人。小小的鱼儿并不像猫狗那样尚能以简单的鸣叫与主人交流感情，其舒服、欢乐或是痛苦之情态，只赖其游姿及色彩之变化来表达，即使受创伤而疼死，也是默默无声。这似乎是懦弱无能，实则是一种美德。它全身心地给人们以美妙的精神享受，一旦受到各种戕害，绝不像猫狗那样露出凶恶的獠牙和铁钩般的爪子。正因如此，诸多确有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越发青睐可爱的小金鱼儿。人人喜爱，家家喜爱，中国人喜爱，外国人亦喜爱，盖因它象征着平和与吉祥，盖因它点缀并美化着人类的春天。

鸟趣

老北京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一年四季除操持正业外，总不忘玩乐，而且讲究玩出水平，乐得痛快。就拿养鸟迷来说，十之八九因入迷而精通，因精通而自得其乐，因自得其乐而长寿。

老北京鸟迷是一支庞大的男士队伍。各府王爷、朝廷重臣、文苑名士，乃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古稀老翁、壮年大汉、翩翩少年，乃至黄口小儿无所不有。这成千上万的鸟迷连同他们各有绝唱的小鸟以及来历不凡的种种鸟具，也为北京的文化宝库蕴蓄了一串串灿烂的明珠。

鸟迷们所精心饲养的小鸟，可分为鸣叫、观赏、技艺、狩猎四大类。鸣叫类如百灵、红子，观赏类如鹦鹉、靛颏儿，技艺类如扑雕、交嘴，狩猎类如黄鹰、伯劳。其中，以鸣叫类最为普遍，最富乐趣，最受鸟迷青睐。而迷醉于鸣叫类之鸟者，因其身份不同而各异。一般而言，文人多喜养百灵，无须天天遛鸟亦鸣叫不已；即使遛之，亦不必摆动笼子。武夫则多喜养画眉，不仅每日须起早遛鸟，而且要腆着胸脯迈着黄瓜架的步子将笼子摆动起来，透出十足的尚武精神。此即俗谓“文百灵武画眉”者是也。

鸟迷们地位差异虽大，但只要提着鸟笼一路同行或坐在茶馆里，便“肩膀齐是弟兄”。彼此畅谈养鸟之道，气氛活跃而祥和，感情丰富而真挚，绝无高低贵贱之分。

既然是鸟迷，便对所养之鸟无不视为掌上明珠。鸟迷中之富人，为“架”过来他人一只好鸟或一堂名罐儿，花五六百块大洋在所不惜，鸟一旦死亡或失盗，其忧愤之情如丧考妣；鸟迷中之穷人，宁肯自己

挨饿也不能给鸟断食，宁可将破家典当一空，也绝不轻易撒手笼中之鸟。更有长年累月与鸟为伴而终身不娶者，虽不可思议，实则不乏其人。

鸟具的考究，是鸟迷们的另一精神寄托。笼子讲究合竹（竹皮相合）细条，工精而美观；笼钩讲究铜银合金，出自首饰楼，光泽而柔润，经久不生锈斑；鸟杠讲究红木或金星乌木，华丽而显富贵气质；盖板儿（笼顶上之圆铜片）讲究精雕细刻吉祥图案，古色古香，耐人寻味；鸟食罐讲究薄胎细瓷、彩色纯正、画工精美之官窑出品。这“一提溜”（鸟迷用语，提的意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金碧辉煌，皆能工巧匠之杰作，凡得之者无不格外宝之以图争奇争胜。

老北京的鸟迷们无一好睡懒觉者。当一般人还在梦乡时，他们已然提着鸟笼穿街过巷闲步十余里，并不约而同地聚会于茶馆，各自沏上一壶小叶茶，一来歇歇腿儿，二来互相听听鸟叫，或彼此欣赏一会儿对方的鸟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清晨的茶馆，既是人的乐园，又是鸟的乐园。茶桌上、屋檐下、窗户前，入眼皆是鸟笼，入耳均为鸟鸣。黄鸟的“七字炸”、红子的“腔腔音”、百灵的“家雀噪林”、画眉的“学小孩器”、蓝靛颏的“鸳鸯音”……种种妙啭之音，此起彼伏，争鸣不已。鸟乐不已，主人更乐而不已。于是借着兴头儿，互相谈谈茶经，论论鸟道，让让鼻烟，叙叙家常，诉诉苦衷，聊聊新闻。无论相识者与不相识者，多年的老友还是初交，只要是养鸟者，相见总是满面春风，有一股发自内心的亲热劲儿。

深谙鸟道的茶客，在众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茶馆掌柜为图赢利，更对其百般奉承，见面必点头哈腰，开言必称“某某爷”。凡精于鸟道者，其所养红子、百灵等鸟不仅有好音儿，而且全是“套子活”。就百灵而言，以能叫“十三套”者为上品，其顺序依次是：家雀噪林、山喜鹊、红子、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胡肖、小燕、小猫、家喜鹊、

鹞鹰、靛颏蕊儿、苇柞子、黄鸟套、画眉络儿与胡伯劳交尾儿。无论模仿哪一种鸟叫，均有一系列变化之音调，故曰“套”和“套子活”。

每年春秋雨季，茶馆掌柜均以花笺红封请帖邀请养有套子活鸟者莅临茶馆，轮流主持“串套”，为众人所养之一般鸟“押音”（亦称“押口”）。串套前三日，茶馆门口即贴出大红告示，如同戏院门前的海报一般，以工工整整的楷书写明日期、被邀请者姓名以及鸟之品种。届时，鸟迷纷至沓来，茶馆内外座无虚席，每人面前一个鸟笼、一壶香茶，既给各自的小鸟押音，又可同时大饱耳福。平素人声鼎沸的茶馆，此时此刻竟无敢喧哗者。无论老少皆静心细听每一套叫音的内容与微妙的变化，咀嚼其中的韵味，从羽族世界中撷取人间生活的温馨。

鸟迷若获得一只成套鸣叫的好鸟，真比得个儿子或孙子还高兴。“君子勿夺人之美”这句古训，对鸟迷来说无丝毫约束力。只要看到或听到别人有好鸟，就必须出高价求购。对方倘若爱不释手，则亦必多方求助朋友从中说和，并慷慨解囊请对方及说和者下馆子吃饭。花二三百块大洋弄一只好鸟，对老北京的鸟迷们来说，实为寻常之事。

空中音乐——鸽哨

曹禺先生的名著《北京人》中有一句台词道：“鸽子飞起来了没有？”配合着一只鸽子道具，后台效果中的鸽哨声响起，布景上窗外的蓝天、白云，使观众似乎是回到北京的古老的四合院中了。当然，如果要使北京味儿更足一些，这句台词还可以这样说：“鸽子‘起盘儿’了吗？”老北京玩鸽子的把“飞起来”叫做“起盘儿”。因为养的鸽子起飞之后，总是先绕着一个大圆圈盘旋着飞，所以叫作“起盘”。当然在戏中也不能完全用北京的土语或养鸽子的术语，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方言和术语，不但外地人、外国人听不懂，即使今天的北京人，也不见得完全能懂。

北京人玩鸽子讲究上“谱”，即叫得出名堂。《北京人》戏中奶妈送来鸽子，大少爷说：“还是个‘短嘴’呢！”因是上谱的名种，自然十分看重了。这些名目繁多的鸽子哪里来的呢？一句话，都是配种配的。这中间包含着“优生学”“遗传学”“胚胎学”“育种学”等知识，不要轻看玩鸽子，这里面有大学问呢。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世界上玩鸽子的国家很多，但多养信鸽。照北京人的办法玩鸽子的是不多的。北京人玩鸽子，简单说有三点，即看毛色、玩品种，看“起盘儿”、赏飞翔，讲“哨子”、品声音。

“起盘儿”如何玩呢？就是每天一早，打开巢门，赶鸽子起飞。鸽子飞在空中是很恋群的，一巢鸽子不会飞散，总是绕着自己巢的所在地，一圈又一圈地忽高忽低地盘旋。鸽子的主人，这时站在古老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高仰着脸，望着自己心爱的鸽子在碧蓝高爽的天空中，在朵朵白云下面盘旋飞翔，怡然自得。

单纯飞翔还不够意思，还把管状竹哨子、银哨系在鸽子尾部。飞翔之际，借着风吹，呜呜作响，名叫“壶芦”，又叫“哨子”。

北京养鸽爱好者成千上万，而养鸽系哨者，十之八九。每日清晨或傍晚放鸽飞翔时，阵阵美妙的哨音在空中回荡，令人迷醉。

鸽哨起源甚古，屈指算来已逾千年矣。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其五律《野鸽》中云：“谁借风铃响，朝朝声不休。”与梅尧臣同时代的词人张先亦有“晴鸽试铃风力软”之句。南宋诗人范成大黎明即起，以听户外打更、诵经、鸽哨声为乐，曾有七绝曰：“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已被两人惊梦醒，谁家风鸽斗鸣铃。”

有清以来，玩乐之风日炽，鸽哨亦然。光绪年间，富察敦崇在其所撰《燕京岁时记》中云：“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缀之于尾上，谓之壶芦，又谓之哨子。壶芦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筒、截口、众星捧月之别。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性陶情。”

北京的养鸽之家，鸽哨讲究品类繁多，质地精良。更有炫奇斗富者不惜重金搜罗稀世绝品，因而促使鸽哨艺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精选苇、竹、葫芦、匏、银杏壳、荔枝壳、莲子壳乃至虬角、象牙等材料，制造出名曰“四筒”“五联”“五排”“九星”“三十五眼”“梅花七星”“众星捧月”等千姿百态的鸽哨，以供养鸽者聆其音色之悠扬，或观其造型之优美。

鸽子大小与体力有别，佩系鸽哨亦不同。易驯而善飞的“点子”每每佩系以“众星捧月”的大葫芦，体型小巧的“黑玉翅”则佩系轻便的“二筒”或“三联”。北京养家称一群鸽子为“一盘儿”，百余只者曰“大盘儿”，五六十只者曰“中盘儿”，二三十只者曰“小盘儿”。盘儿的规模不同，佩系鸽哨的数量亦有别。一般而言，小盘儿鸽子其中仅有两三只佩系鸽哨，大盘儿鸽子佩系鸽哨则三十余枚矣。

鸽子放飞的形式，分为“飞盘儿”和“走趟子”两种。飞盘儿者，群鸽腾空而起，绕宅低翔，盘旋再三，逐渐升高，直薄云霄，良久而下翔，再次绕宅低飞数圈后降于屋脊。倘饲养有方而又训练有素，则可三腾三降而始落瓦面。鸽群盘旋于空中时，其哨口受风角度时有变化，故所发之音忽而洪大，忽而细微，忽而强劲，忽而缥缈。当鸽群“摔盘儿”时，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轮番回旋，其哨之音响瞬息万变，五声交错，八音和谐，与舞台之交响乐异曲同工，闻之则陶醉也。

所谓“走趟子”者，即鸽群凌空盘旋未几即飞向远方，天气愈晴朗，疾飞愈遥远，达于百里之外者，不足为奇耳。乍起时，鸽影徘徊，哨声缭绕，转瞬则声影杳然，不知其所。主人成竹在胸，品茶以待。忽听缥缈的哨声自天边传来，由细微而渐渐洪亮，则知其鸽群回翔归巢矣。较之飞盘儿，别有一番情趣矣。

玩交嘴雀

小时每于秋冬易节之际，总喜欢玩交嘴雀。交嘴雀是一种体长约16厘米、体羽大部分为紫红色或黄绿色的可爱的小型候鸟，因其上下喙尖反曲交叉，故名交嘴雀。这种小鸟并不像黄雀或“红点头”那样具有天然灵巧的歌喉，为了“藏拙”，从来不肯轻易叫一声。然而，它却极易被人驯服，一旦驯熟之后，即可在主人的指挥下表演一整套精彩的杂技，因而也就颇受孩子们的喜爱。

中国东北和河北山区的松树林，是交嘴雀繁殖与生活的乐园。当寒冬即将侵袭北方苍茫大地的时候，它们便挈妇将雏、成群结队地迁往温暖的长江流域。不幸的是，每当它们飞经北京的时候，为了觅食，往往误入鸟贩子的罗网，继而变成公子哥儿的玩物。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就有京师十月玩交嘴雀的记载，可见交嘴雀作为玩物是古已有之的了。

旧时在隆福寺或土地庙的鸟市上，花几枚铜钱便可买一只很好看的交嘴雀。乍买来时，它野性很大，必须捆上翅膀，戴上“脖锁儿”（铜丝制成的小锁链），架在一根尺余长的荆条上，谓之“上架”。主人必须终日与鸟儿形影不离，频频喂以食水。旬余，即可解开翅膀，投入由简而繁的训练。

交嘴雀的“叼技”非常高超。主人把小纸旗、小铃铛、彩绸条以及烫有小窟窿的胡桃等物通通放进一只特制的红色小纸箱里，置于高远处。只要“嗨”的一声令下，交嘴雀便展翅飞奔纸箱，以它锐利而灵巧的喙拧开箱口的插销，待箱盖儿“啪”的一声弹开后，依次将内中的玩意儿叼在主人手里，从而获得几粒苏籽、小麻籽或葵花籽的微薄奖赏。

最为精彩的是叼“八卦”。所谓八卦，是以马粪纸糊成的无底八棱台，高三寸，顶部中心穿一针孔，另具二至三张略小于八棱台周长的硬纸片，每张纸片的中心与八条棱边处皆穿细孔，各以棉线或曲别针固定九面小纸旗——位于中心的小旗儿红色，余皆绿色，而后以双股棉线及曲别针将硬纸片层层悬于棱台内。主人将八卦悬于树上，“嗨”声一落，交嘴雀便将外层八个绿旗顺序叼给主人，那速度如流星，似闪电，令人眼花缭乱。及至最后叼中心部位的红旗时，由于伸出了被曲别针所夹住的棉线，外层的八卦圆形立即脱离八棱台，忽忽悠悠地飘落下来。就在围观者情不自禁地交口称誉的时候，交嘴雀已然又奉主人之命继续叼第二层卦形上的小旗了。

驯养苍鹰

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养鸟者当中，最气派的莫过于养鹰了。论个头儿，一尺多高；论分量，二三斤重；论形态，纹翮鳞次、利喙钩爪。如此雄健威武的庞然猛禽架在胳膊上，怎能不引人注目，又如何不气派？

鹰，亦称苍鹰。从《诗经·大雅·大明》中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一语看来，远自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然把鹰这种猛禽看作是威武的象征了。

隋朝开皇年间，设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三年（607）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为鹰击郎将。足见当年的统治者在武将中极力提倡鹰的奋扬威武精神。

关于大批驯鹰使其成为狩猎工具的史料记载，亦始见于《隋书·炀帝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唐代沿袭了前朝饲鹰遗风，专设鹰坊，由闲厩使（官名）管辖。由于朝廷与民间养鹰之风日盛，因此以鹰为题材的诗词亦层出不穷。例如杜甫的“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力赞了鹰的形美与善飞；柳宗元的“凛然空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声情并茂地状出了鹰的敏捷与磅礴气势；而耿炜的“举翅云天近，回眸燕雀稀”，则描绘出雄鹰凌空搏风、杀气森森的威武之貌；而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那驾鹰出猎的气势，又是何等的奋发、昂扬。

清朝八旗子弟因受历代帝王行围狩猎之风的影响而最喜放鹰捕兔，以至进行“较猎”比赛活动，此风历时二百余年而未泯。

每年秋末冬初，皇帝必去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围狩猎。上万人的狩猎队伍随侍其后，架着鹰牵着狗，浩浩荡荡，势若出征。狩猎回宫后必举行庆功宴会，演奏《飞燕捉天鹅》（春秋战国时鹰捕天鹅的故事）等乐曲，并论功行赏。上行下效，八旗子弟皆不甘寂寞，纷纷雇佣鹰把式，以捕鹰、驯鹰、放鹰、较猎为乐。

刚捕获的生鹰，须经一个多月的驯养，昼夜熬着令其不睡觉，亦不喂食，以消磨其野性而逐渐与人亲近。正如古人总结鹰性所云：“饥则附人，饱则飞去，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羁绊，不可任其所欲。”熬鹰、训鹰的苦差一向是把式的分内事。把式熬鹰，经常于夜间架鹰步行四九城，俟东方既白遂回家换人接着熬鹰。这种歇人不歇鹰的残酷驯养，直至鹰不怕人并开口吃食即告结束。此时携鹰至野外捕兔，即可大显身手，令人非常快慰。

猎兔的情景是扣人心弦的。主人站在荒野的高处，除掉鹰帽、爪套及爪链，鹰便环视四周，跃跃欲试。主人的几名助手四散于方圆数百亩的荒草丛冢中，以修长的枣木杆儿在其中四下搜寻，徐徐前进，忽听枯草刷刷一响，随后便有一只野兔霍然窜逃。那躲在远处的猎鹰早已疾目而视，猛然腾空而起，恰似一道闪电凌空掠过，及至俯冲下来，那可怜的野兔立即鲜血迸溅，气绝身亡矣。无怪乎唐代诗人章孝标有诗赞鹰曰：“穿云自怪身如电，杀兔谁知吻胜刀。”而王维《观猎》中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则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了。

八旗子弟放鹰捕兔时，如同军中的主帅坐镇指挥，发号施令，吆五喝六，虽声嘶力竭而乐在其中。至于作为战利品的野兔，往往送给下人，或吃或卖。唯一所求者便是玩得高兴、乐得痛快。

冬日斗蟋蟀

昔日的北京城，每至隆冬，经常是寒风凛冽，白雪皑皑。莫说人总爱躲进小屋烤火，就是刚换出厚厚绒毛的猫与狗，也总是被冻得浑身瑟缩着。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在诸多朱门中，尚可看到一对对号称“将军”的蟋蟀，在古老的斗盆中鏖战不已，胜者振翅长鸣，着实为冷峭的严冬平添了勃勃生气，给人们带来了乐趣。

蟋蟀素有“百日虫”之称，其绝大部分自白露节被捕捉后，最多活至农历十月下旬即僵死。而北京善养蟋蟀的高手，诸如清室贵胄涛贝勒（载涛）、公爷德君如，以及博得“金霸王”美号的著名铜锤花脸金少山等人，每至深秋必以蟹肉、虾仁、生羊肝等精细食物饲养异品蟋蟀，俟冬至这天以虫会友，进行传统的“封盆”格斗。凡战而胜之的蟋蟀皆冠以“将军”称号。

被封为“将军”的蟋蟀，均系主人不惜重金从数百只鸣虫中精选所得的上品，名曰“金丝额”“朱砂顶”“三段锦”“琵琶翅”“香狮子”……种种雅号，不胜记之，而色与形之变异，尤难尽其详。

诸般名虫必用镌有“淡园主人”“恭信主人”等字样的青白色泥罐儿贮之。罐质抚之如绸缎，叩之似金石。每只上好的养罐里，必须放置一个扇形的小笼，作为雌雄蟋蟀求爱交尾的“洞房”。

两只体重相等的雄性蟋蟀一旦移进斗盆，彼此便用纤细的触须寻觅“情敌”。一旦相遇，遂同时张开大牙拼命地厮杀，大有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的英雄气概。如此娇小的昆虫，格斗的战术与姿势竟然千变万化——忽而拧成一个“麻花扣”，忽而对顶成“铁板桥”，忽而咬抱着连续翻滚出几个漂亮的“狮子滚绣球”，忽而猛一口将对方咬翻按于盆

底来一个“饿虎扑食”……这激烈的格斗，往往持续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二十余分钟，每每令围观的斗客拍案叫绝。

二虫鏖战，彼此皆有伤残，或伤须，或折尾，或掉腿，或被咬破头项与腹部而满罐流汤（相当于血液）。重伤者自然甘拜下风，逃之夭夭，而占上风者则振翅长鸣。这种胜利后的欢唱，似乎是在向“洞房”中的“爱妻”报喜，又似是在向精心饲养自己的主人请功。这时，其主人便欣欣然有喜色，于是备酒宴请观战诸公，以虫为题，限韵赋诗，陶醉于欢乐之中。

驯蛙、驯蚁艺人

两栖动物青蛙和小小的昆虫蚂蚁，居然也能听从人的指挥，有条不紊地表演节目，说起来似乎令人不可置信。然而在早年北京的天桥，确有具这种“特异功能”的民间艺人，专门表演驯蛙、驯蚁。

艺人所驯之青蛙，大小不等，皆为雄性，分别饲养于绿釉陶罐中。表演时，艺人以言语分别呼喊，青蛙立即相继跃出，依次表演列队、跳跃、翻滚等开人心颜的节目，比起耍熊、耍猴儿，别有一番情趣。而那最后一阵的呱呱齐鸣，仿佛把观众带到了郊野潺潺的小河边，或是茂密的芦苇荡，并由此而想起唐代诗人章孝标的田园诗：“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

凡未经目睹者，对渺不足道的蚂蚁能够俯仰由人这一奇异现象，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迄今健在的年逾古稀的老北京人，回忆起当年在天桥目睹驯蚁的情景时，无不津津乐道。但遗憾的是，始终不解其中的奥妙。

早年出现在天桥的驯蚁艺人不过两三位。所驯的两种蚂蚁皆为工蚁（无翅，生殖器官不发达，野生时担任筑巢、采集食物、抚养幼虫等工作），呈红褐色或黑色，分储于两个小瓦罐里。表演时启开盖儿，两罐中蚂蚁纷纷爬出，混杂于一处，主人喃喃自语一番，忽喊一声“排队”，同时喂一小撮米粒儿，两群蚂蚁立刻截然分成两队，毫厘不爽，观者无不以为奇妙。

当年天桥的驯蚁者究竟有何奥秘，至今仍是个谜。余以为，驯蛙、蚁等低级动物，绝非单靠喂食而奏效。据说20世纪20年代时，北京曾有善“聚马蜂”或善“聚蝎子”的奇特人，聚集前须运气并念“咒

语”，一般人皆以为神秘莫测。令人不解的是，那种能使动物受到感应的技巧究竟是什么？那种能招呼动物的“语言”又究竟包括什么内容？这些都无文字记载，致使包括动物学家在内的所有人对此都无不茫然。

余有感于此，遂咏《竹枝词》一首：

旧京卧虎又藏龙，
蛙蚁列阵也练兵。
留得疑团今未解，
虫豸缘何通人情？

哈巴狗与袖狗

北京人养哈巴狗与袖狗，可是有历史的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六十年风调雨顺，干戈宁静，王公贵胄及满朝文武大臣过着悠闲的生活，于是养狗、赏狗、斗狗，借以消磨时光，排遣寂寞。而小巧玲珑的哈巴狗与袖狗儿，因此也就备受人们的青睐。

哈巴狗之名称，源于明代。明刘若愚所撰《酌中志》记载：“万历间，神宫监掌印太监杜用，养一哈巴小狗，最为珍爱。”

北京的哈巴狗身材矮小而毛极长，高不过十寸，体重在七到十二磅之间，其颜色有白色、黑色、褐色、银褐色、杏褐色、红宝石色以及各种杂色。它们的外表优美得令人心醉，而且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故其身价比主人宅第中的仆人要高得多。北京的哈巴狗还有一个独有的特色，即它的脸总是团得圆圆的，给人以雍容而善良的感觉，这是其他任何洋哈巴狗所没有的。

哈巴狗儿对主人的气味、说话声与脚步声极为熟悉。主人回家叩门时，最先迎至大门口的便是哈巴狗儿。它以亲昵的叫声和挠门的动作表示对主人的欢迎，及至见面后更是频频地缠着主人的腿脚，又摇头、又摆尾、又打滚、又撒欢儿，这一系列的乞怜，如同给主人吃了一粒木香顺气丸，一切的忧烦与懊恼全都烟消云散了。

主人对狗的怜爱，除了喂以人所吃的一切膏粱美味外，还要把在首饰楼订购的一串银铃系在它的脖子上，并经常用潮脑（即樟脑）洗涤它的皮毛。太太们对哈巴狗儿更是宠爱得无以复加。

比哈巴狗儿身躯更小的是袖狗儿，其小可藏于袖口中，堪称世界上最小的狗了。然而此狗性情却勇敢好斗，故又名斗狗儿。

过去北京人看狗打架，瘾头是非常大的。当两条大狗站立着厮杀的时候，刹那间就能围拢一群人驻足而观。然而，有身份的人却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行列，他们所欣赏的是在家里观看袖狗儿在炕桌上打架。

有清以来，官宦人家饲养袖狗儿成风。闲暇串门时，把仅有一掌长的小狗儿藏在袖口里，在喝着茶聊着天的当儿，各自把袖狗儿放在炕桌上，观其咬斗以博一乐。

随着清朝的没落，这种珍贵的袖狗也逐渐销声匿迹了。听说现在在青海、西藏的一些喇嘛庙里还有可能找到。

角灯·泥花·铁蛋

新年到了，对大人们来说是送旧迎新，恭贺发财；对孩子们来说，则是穿新衣，戴新帽，企盼天天吃好的，此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就是已经放了寒假，有充裕的时间和伙伴们一起玩了。玩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现在的孩子可以买电动汽车、电动冲锋枪、声控彩灯……可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小孩玩的是自制的猪角灯、泥花和铁球。回忆起来，别有一番趣味。

农谚云："小寒大寒，杀猪过年。"猪身上虽说都是宝，但猪蹄角大概是毫无用处的。可是这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却有了大用场。那时候农村是没电灯的，伙伴们找来许许多多挖了空心的蹄角，里面装上猪油，将埋在底部的一根线绳拉出来，然后点亮，玩个通宵都不会灭。大家每人一手举一个，在街头庙前跑来跑去，似流星一般。那高兴的劲头，比如今买个灯笼提着跑可美多了！

玩腻了，孩子们就去放泥花。所谓泥花，就是事先将和好的胶泥捏成窝头状，顶部捅个眼，先用纸糊上，然后肚内装上花药，再封上底就成功了。这里面关键是花药，配花药的方法有个歌诀："一硝二磺三两炭。"这指的是配药比例，即一两硭硝、二两硫磺、三两木炭就可。硭硝哪里来？孩子们一人找一块瓦片和一个纸盒子，到那些背阴的老墙根下去刮，半天能刮一大盒子。硫磺家家都有，因为那时候乡间还没"洋火"（即火柴），是用火镰在火绒上打火的，然后再用蘸了硫磺的麻秸秆一点就着了，所以硫磺不缺。至于木炭，在用大锅炖肉时，灶膛里总要烧些大木棍之类，烧完岂不正好就成木炭了。聪明的孩子们真有办法，将这些原料用圆木棍碾成面儿，再按比例掺和好，装进泥窝窝。到晚上放时，揭开顶部的纸，用燃香去点眼里的药。哇！灿烂夺目的火花飞起一人多高，能持续一二分钟。大家叫着

跳着，又拍掌又欢叫。

还有一件有趣的活动，就是踢铁蛋。铁蛋即今天所说的铁球，核桃大小，圆圆的，亮亮的。实心的不响，有空心的，肚里还有一个小蛋蛋，踢起来咣啷咣啷发出清脆的响声。而今少年玩玻璃球是用手弹，这铁球却是用脚在地上踢的。有的脚下极有准头，丈八远的距离，一脚踢去，十有八九中。那时小孩子是不许玩真钱的。街坊家的二石头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清朝的铜钱，还有平时攒下的杏核，输了的给铜钱也行，杏核两个顶一个也行。实在什么都没有，就弹你个大脑门。真是乐趣无穷！

金华斗牛风俗

浙江金华一带有一种独特的斗牛风俗，其方式不同于西班牙斗牛，而是牛与牛斗。人与牛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牛与牛斗，同样紧张惊险，触目惊心。

斗牛一般从每年春播后“开角”（第一次斗牛），直至次年春播前“封角”（最后一次斗牛）。除农忙季节外，几乎一月一大斗，半月一小斗。斗牛既是娱神，也以自娱，故百姓乐于参加。

旧时，先由主持者出示通告，约期斗牛。场地周围打上木桩，拦以粗绳，场地两边各以青竹两枝弯成拱门，挂上红布，标名“场门”，这就是斗牛场了。

斗牛期间，邻县乡民都赶来观看，各行各业竞陈百货，小摊小贩也来凑热闹，甚至三教九流、杂耍戏班也参与盛会捞摸几文。所以人山人海，熙攘喧嚣，场面宏伟，比赶集还热闹。

参加比赛的牛大都短颈阔肩，腿健膘肥，体型高大，状如雄狮。牛主人教牛以撞、挂、拼等技法，并形象地给它取一个名字，如黄龙、乌龙、英雄虎、小金刀等，各绣在绸旗上，以资识别。斗牛开始，金鼓齐鸣，火铳震天，参赛的牯牛头簪金花，身披红绸，由四个身穿彩衣、头扎汗巾、腰系飘带的护牛壮士簇拥入场。评判者紧跟牛后，他们以青布包头，短裤赤足，兼管拆牛，俗称“拆牛人”，也称“牛头”。

斗牛汇集后，经抽签决定次序，才正式开角。参加角斗的两头牛，由两家护牛壮士护送到赛场中央，两牛近距离对立，互相注视，俟牛性初发，即进而互击。这时四角交架，尾巴夹紧，尖角相撞，碰

击有声。三五回合后，双方护牛者将牛强行分开，又让它们相互对峙。这样几经拆合，牛性大发，牛眼发红，越斗越紧张，越斗越凶险。万余观众则在紧锣密鼓声中呐喊助威。最后强者横冲直撞，以尖角直刺对方咽喉，弱者血肉模糊，夹着尾巴狼狈冲出赛场，斗牛才告结束。胜者哞哞长鸣，以胜利者自居，然后寻牛再斗。于是护牛者易牛再斗，再决胜负。

最后获胜的牛称为“牛状元”。众人为其戴花披红，鸣锣开道，护送它回“府”。牛主人摆筵设席，宴请亲朋，庆祝斗牛胜利。

曲阜祭孔

为纪念孔子诞辰，孔子故里曲阜恢复了祭孔古乐舞。曲阜祭孔大典，每年有春、夏、秋、冬四大祭祀，而以秋祭最为隆重，因为孔子诞辰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笔者早年曾躬逢秋季祭孔大典，当时盛况，犹能记起大概。

祭孔需要很多的祭器。按周礼规定，大祭须按“太牢”的规格进行，要准备两头纯黑色的公牛、二十六只雪白的肥羊、二十六只黑色的肥猪、五只梅花鹿。祭孔前三天，先由屠户用红色木笼，将牛羊猪等抬到孔庙东北角神庖内，百户官叩拜后，屠夫身着黑褂，将牛羊猪等一一放血解剖，刮净晾干，取出五脏，带着头蹄，摆放在孔子像前的供桌上。供桌之大，可想而知。

太牢之外，还有俎、豆、簠、爵、簋、罍、笾、黿、象尊、山尊、壶尊、铜镫、铜簋、香炉、烛台等祭器。里边盛满了稻、粱、鱼、兔、韭沮、笋沮、芹沮、菁沮、黄酒等祭品。

按照惯例，祭孔前三天，所有参祭人员必须到孔庙东西斋宿，在那里沐浴更衣斋戒。“小圣人”孔德成去孔庙时，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从庙正东的东华门进去。出来时，换上了绛紫色绣团花的祭服，宽大的袖口像个喇叭，肥大的下服像件裙子。演奏古乐舞的人员，更有一套特制的服装，一律蓝地五彩大领青边夹袍，方形平顶黑帽，青色皂布长靴，二百余人，阵势相当齐整。

祭孔大典从晚八点开始，共行三遍礼，称“三献礼”。演奏三遍古乐舞，表演场地是在大成殿前的宽阔凉台上。彼时，二百多支蜡烛一起点燃，满院灯光，亮如白昼。当鸣赞（司仪）高呼“舞乐生就位，

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分献官就位”时，隆重的祭孔大典就正式开始了。那响彻整个鲁国故城的鼓乐声，那雄壮有力古雅的舞姿，除了祭孔，平时是难以欣赏到的。

最令人难以忘怀者，是看“小圣人”孔德成的举动。他能从杏坛前走到几十丈远的大成殿内，眼睛不看地面，一步一块方砖，正好迈到方砖的正中。这一段路，要上下几十个台阶，足见其平时训练有素。

赵州龙牌会

河北赵州有闻名海内的赵州桥，那里一年一度的“龙牌会”亦相当有名。“龙牌会”盛大而热烈，其中蕴含着诸多古老习俗，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龙牌会是以敬祭龙牌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民间花会，多在春日举行。“龙牌”是一块雕有龙形花纹、中间写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字的木牌。与一般庙会不同的是，赵州有会无庙。龙牌平时供奉在会头家中，龙牌会期间临时搭棚供奉。在棚内，龙牌居中，龙牌的后面及两侧挂有佛、道、儒三教神像，也吊有扁鹊、华佗直至清代王清任等历代名医的画像。在赵州人民心目中，龙是天地之主宰，位居佛道诸神之上。这种独特的习俗，仅局限于赵州范庄一带，为全国独有。

龙牌会起于何时，史无可考，但当地有许多传说。相传共工怒撞不周山之后，天塌地陷，洪水滔滔，共工之子勾龙和部落百姓一起漂流到赵州。勾龙为补父过，为使百姓安居乐业，带领百姓弃牧从农，平整土地，种植五谷，部落日兴。后来，颛顼带兵前来征讨，要勾龙让出首领之位，否则要血洗部落。勾龙为使百姓免受刀兵之苦，化作一只白蛾，于农历二月初二这天驾日光翩然而去。当地百姓为纪念勾龙，遂将他作为社神供奉，并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至初四举行龙牌会祭祀。为感念勾龙教百姓弃牧从农之德，每年龙牌会期间，赵州一带百姓都一律食素餐，戒五荤。由于每年农历二月二左右赵州常有白蛾飞至，当地百姓便认为这是勾龙回来看望自己的子民，于是衍生出将白蛾与龙牌一起供奉的习俗。

龙牌会的主要内容为“请龙”“供龙”，此外还包括为期三天的秧

歌、高跷、戏曲、武术等娱乐活动。龙牌会期间，最郑重、盛大的场面是“请龙”，即将龙牌从会头家“请”到棚内。二月初一上午，着古装彩衣的花鼓队十几人一行便早早地列队等候在会头家门外。会头一声令下，所有花鼓队一起开始表演，近百面大鼓同时擂动，那气势真可谓惊天动地，气吞山河。每面大鼓四人同时擂动，节奏丝毫不乱。有些钹队由武术队改编而成，表演者将武术动作与钹糅合在一起，边敲边舞，粗犷刚劲。有些秧歌队则由六七岁的孩子组成，动作有板有眼，神情如醉如痴。表演持续约一个小时，在两只唢呐、两只笙的伴奏声中，龙牌从会头家中被请出，放入一个饰满花篮、纸花的大彩轿中，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缓缓向龙棚进发。花鼓队边走边表演，沿途鼓声不绝，场面热烈庄重。整个“请龙”过程表现出浓厚的敬龙、祭祖的民族特色。

太行山麓“捉黄鬼”

每逢农历正月，太行山麓的河北省武安县固义村村民都要化装表演名为“捉黄鬼”的文娱节目，说来非常有趣。

黄鬼是虐待父母、忤逆不孝者的化身。通过对它的捉拿和处置，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长辈，保持家庭和睦幸福。“捉黄鬼”又叫“大抽肠”。

“捉黄鬼”传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秦王十三太子而流传下来的。当时，十三太子周游到晋国，在大街上看到恶少“拦街虎”当众作恶，心中愤愤不平，上前将“拦街虎”打死。为躲避晋军的追赶，十三太子跑到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镇店村，只见大街上众村民头戴面具，身穿彩衣，尽情舞蹈娱乐。十三太子向村民们讲述了自己被追赶的情况，村民们很是同情，便让他也戴上面具，穿上彩衣和村民们一起娱乐。待晋兵追来，找不到十三太子，只好作罢。

后来，十三太子来到固义村南的雀娥山，身患重病，无法行走。村民们对他精心医治，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十三太子念念不忘顺德府和固义村百姓的救命之恩，便在太行山麓扶正祛邪，为这一带百姓办了不少善事。百姓为纪念十三太子，便为他塑了像，供奉于村南观音庙内，尊称之“伏魔大帝”，也称为“三郎爷”。每年正月，村民们便化装表演“捉黄鬼”。至明代中叶，此俗已极为盛行。

演“捉黄鬼”节目的人员众多，计有百余名，分为神、鬼、人三类。神方主要有玉皇大帝、土地、八仙、赵公明等，鬼方主要有阎王、判官、大鬼、二鬼、三鬼、黄鬼，人方主要有岑彭、马武、关羽、大头和尚、柳翠等。大鬼和二鬼是阴曹地府的差役，头戴黄毛

帽，身穿虎皮纹衣服，白面黑纹脸谱。大鬼手握铜钗、铁链，二鬼手持大刀、绳索，任务是捉黄鬼。黄鬼一般由讨饭人扮演，全身赤裸，只穿裤衩，身涂黄色，四肢上固定着四把涂红色的彩刀，看上去鲜血淋漓。

表演“捉黄鬼”时，在大街上行进，各路角色一一亮相。大鬼、二鬼引逗着黄鬼来回走三趟，模拟着拿鬼动作，经几个回合较量，用铁索将黄鬼套住，拉到判官跟前跪下。判官拿出《生死簿》，随锣鼓点宣读黄鬼的罪状，进行初审。初审毕，再押着黄鬼跪到阎王跟前，阎王阅卷后判决道：“按其罪恶，押至南台（捉鬼台）抽肠剥皮。”大鬼、二鬼便牵着黄鬼向南台走去。到了南台，把黄鬼押上去，这时便有人施放烟雾。此时，由判官带领，大鬼挥刀，二鬼开叉，开始行刑。行刑时，各路角色将台子团团围住，台上开始对黄鬼进行“抽肠”“剥皮”。出彩后，大鬼、二鬼等退下，黄鬼也从台上设的机关中躲走。到这时，“捉黄鬼”告一段落，观众的情绪也被推向了高潮。

妙趣横生“抬花杠”

“抬花杠”又名“抬皇杠”“抬杠箱”，乃旧时迎神赛会的祭祀形式之一，在河北省的井陉县、栾县、赵县一带非常流行。春节期间“抬花杠”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抬花杠”的由来很有意思。相传隋炀帝杨广极其荒淫奢侈。他在位时大肆搜刮天下奇珍异宝，然后组成浩浩荡荡的“皇纲”队，将珍宝运往长安。押队的是隋炀帝的叔叔杨林。“混世魔王”程咬金探听到消息，便组织人马在瓦岗寨附近将“皇纲”劫走。此举在民间影响甚广。至清代后期，朝廷腐败，列强入侵，民众怨声载道。井陉县青横庄的民间艺人触景生情，效仿当年程咬金“劫皇纲”之举，以杠会的形式借古讽今，创编出一道民间花会。他们制作了道具“皇纲”，兴高采烈地扛在肩上，一路上又扭又颠，“皇纲”上下飞舞，很有情趣。但是，在封建社会绝不允许宣传“官逼民反”，因而他们的借古讽清便冠以迷信色彩。

当年，“抬花杠”表现为祭祀苍岩山（在井陉县境内）主神三皇姑（俗称三奶奶，传说是隋炀帝之三公主，在苍岩山削发为尼）的仪式。其祭祀仪式为一年一小驾，十年一大驾。过“小驾”在村里进行，过“大驾”进苍岩山。届时，冀中各县和山西省毗邻苍岩山的一些县的老百姓，也前往朝山进香，场面相当壮观。

整个迎神赛会规模宏大，井陉县几个村庄组成的仪仗队蔚为壮观。前面十余杆三眼铳鸣炮开路，四只大灯笼为前导，十八面大筛锣分两列开道，四个大瓮号走几步便嘟嘟地鸣叫，拿着大铁链的“练会”杀气腾腾地要抓捕魑魅魍魉，和尚道士数十人随队后。接着，“帅”字大纛领前，金瓜钺斧、朝天蹬、龙虎旗、千人旗、万民

伞，分为两列缓缓前行。接着，雄壮威武、鼓声隆隆的鼓队走过来，绣着“杠会”两字的大会旗在众香头簇拥下出现，之后便是“抬花杠”表演。

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身穿黑衫子、头戴罗拱帽、手执方形大牌（上书“朝山进香”）的大汉走来。他举的牌子也叫“押杠牌”，由一群手执棍棒的汉子护卫着，这就是统领“抬花杠”的总指挥。数十盘花杠的表演全听他指挥，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同时，有八杆大瞄枪紧随押杠牌。杠之后是由二十四匹马组成的马队，其中有探道马、坐更旗，以及护卫三奶奶的文官武将。之后，是由十二人抬着的三奶奶銮驾，边走边舞，壮观威严。最后边是各式各样的文会、武会，浩浩荡荡的队伍有四五里路长，缓缓地走向苍岩山。

每盘“花杠”由杠杆、箱架、箱环、项架组成，一般有八十斤重。“花杠”是实打实的木制品。劳动人民从中演化出艺术来，而且表演着各种花样，实在令人惊奇叫绝。

蜀中药王会盛况

药王者，北谓扁鹊，南称孙思邈。四川中医药界及民众对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极为推崇，向有举行药王会的庆祀之俗。

据说四川新都药王庙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庙宇占地十亩，有正殿两幢、经楼一座，修竹扶疏，古柏掩映，环境肃穆幽雅。最令人惊叹者，前殿正中，药王金身七尺，坐虎针龙，栩栩如生，风范宛在。殿前高悬“龙虎院”金匾，殿柱刻有楹联一副，曰：“龙因目疾离沧海，虎为牙痛出杏林。”

按照建庙以来的老规矩，药王会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开幕，历时七天。期间四川各地的著名中医、药行大贾、名流士绅，或乘车或坐船，杂沓而至。加上本邑赶会的人流，使偌大一个场镇变得人山人海。

在药王盛会上，许多病家竞相向医生们簪花挂红，上香放炮，有些还赠送匾额彩帐。上边题赞因医生科别而异，内科多是“金鉴遗风”“和缓高风”“指下生春”等；外科则是“华佗再现”“是乃仁术”等；妇科是“女科圣手”“妇科独步”等；儿科是“如保赤子”等；眼科是“瞽目重明”等；针灸科是“十分火候”“万病一针”等。对医术全面、声望很高、不计报酬的医生，多分别奉贻“良医良相”“医德长河”“济世救人”“药王复生”之类的颂词。此外，场镇上各家各户都要恭请文墨先生作“药对”，贴于门楹之上。诸如讽喻人情世故者：人参在世为官桂，厚朴传家要细辛；描写化妆美容者：青黛画眉红粉涂颊，金钗压发新绛点唇；形容武将英姿者：大将军骑海马身披山甲，小红娘坐河车头戴银花；医师寓所题：手段能医国，丹砂可救民；药店门首题：论色彩尽是土里土气毫不惹人眼目，言品格都将赴汤蹈火慷慨为民捐躯。

在洋洋大观的“药对”之中，传说有一位绰号叫“烂肚皮”的前清老童生，在药王庙前贴出两封“药名信”，话一对离别夫妻的相思之情。女信曰：

> 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效寄生缠绕他枝，今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妾仰观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茹不尽黄连苦！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奈何！奈何！

男信答曰：

> 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苑，奈常山路远，滑石难行，姑待苁蓉耳！卿勿使急性子，骂我曰苍耳子。明春红花开时，吾与马勃、杜仲结伴还乡，至时有金银相赠也。

如此相思书札，情真意切，纳以二十四味中药名，妙趣天成，给古老的药王盛会增添了一点儿罗曼蒂克色彩。当时，在万头攒动的围观者之中，蜀中著名大学问家、“五老七贤”之一刘豫波先生不禁惊赞道：“有才气，编得好！”此刻，偏逢老童生站在刘豫波先生旁边。这位大儒亲耳听到大学问家赞赏他的才华，心里不胜荣耀，脸上顿时泛起了笑容。

金陵茅山会

金陵乃为佛教圣地。唐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想象当年佛教之盛。这种风气，沿至民国，亦未曾稍减，而且，庙宇较前还增了不少。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据南京警察厅的统计，全市寺庙有四百数十处，因此庙会也就特别多。春季有东岳、都天、茅山诸会；秋季有金龙四大王、古城隍诸会；六月十九日，门东石观音庵、城北观音楼，皆有观音会；七月晦日，清凉山有地藏会。凡举一会，均轰动一时，沿途茶寮密布，彩灯高悬，善男信女，扶老携幼，络绎于途，且有烧拜香烧肉香者。自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因事属迷信，曾严令禁止，各项赛会多不复举行，但茅山会尚存。

茅山在句容县，原名句曲山，山有三峰，皆有殿宇。据上年纪的人说，汉景帝时渭城（陕西咸阳）人茅盈，十八岁弃家入恒山修道，后隐于句曲山，修炼兼采药为人治病。其弟茅固、茅衷均在官，闻茅盈修道得法，白日飞升，遂弃官，于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三月六日渡江，求见于句曲山。后二人均得道成仙，世称"三茅真君"，因名此山为茅山。茅山会由来已久。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帝君传大帝之命，拜茅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经》云笈七签。据闻，石鼓路南边的三茅宫地名即与其典有关。记得昔日还有一小庙，供祭"三茅"道士。此后茅山附近农民遂每年朝山两次，祈祷、预卜当年好收成。茅山会从此沿袭下来，并扩及京郊各乡村。

每年岁首秋末，不论大小村落都必组会，定名为"大有老会""永兴老会"或"茅山新会"等，凡是村里人都是会员。出会前一周，由会长择定一日，事先将旗伞锣鼓等物备好。出去时，视人数多寡，分三人一

排，十二人一队，由会内理事、干事为队长。前行第一排二人各执高丈余会旗一面，其余人手持国旗及“朝山进香”等短旗。每一队有锣鼓各二，队末有人双捧“神灶”压队。每一村有四五十队，蜿蜒如长龙一般，煞是壮观！妇女头上还插有各色鲜花，身佩黄布袋，上书“朝山进香”。晨五时起行，中午竣事。茅山庙中道士为人祈福，燃灯多盏，如其人之齿数，灯中某盏为本命灯，灭之则凶。苏轼诗中曾有“待向三茅乞灵雨”之句，可见其流传之久广。

不过民国以来的茅山会与过去有所不同。会归后，各村农民相互畅谈当年的收成好坏，评定谷米卖价的涨落，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记得钟山的小茅峰有一山庙，附近的善男信女们亦举行茅山会，不过规模要小多了。

敖包相会

曲调悠扬的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可谓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不论是听着还是唱起它，总能把人的思绪带到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想象着有情男女正骑着骏马到敖包去幽会。

许多人都以为敖包是专门接待情人们会面的蒙古包，是处美丽幽静、富于浪漫情调的地方。其实，敖包并不是蒙古包。敖包又叫“脑包”，是蒙古语“堆子”的意思。内蒙古的草原广阔无垠，极目望去，天苍苍，野茫茫，天地相连，无山无河为记。牧民们为辨明方位和界限便在茫茫的草原上垒石为记，谓之敖包。以后年复一年，敖包逐渐演变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的场所。

敖包有用石头垒起的，也有用柳条围建的，富裕人家还有自设的“家脑包”。各地区敖包的形成大体一样，即在草原的高丘上堆积石头为台，台基分大、中、小三层，重叠成圆锥形。其数目各地不等，有的单独一个敖包，有的是“敖包群”。敖包群有的并列，有的呈放射状。中间大的为主体敖包，上面插有挂旌旗的杆子，各小敖包上都插着树枝，祭祀时在树枝上挂上五颜六色的布条或纸旗。

每年夏季，水草丰茂，牛羊肥壮，牧民们要举行祭敖包活动。祭祀仪式十分隆重、严肃、热烈，几十里远的牧民都要坐着勒勒车或骑着高头大马，捧着祭品赶来。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请活佛和喇嘛穿起法衣，戴上法帽，摆成阵势，焚香祝祷，诵经念咒。当活佛发出祭祀开始的经令时，法号奏出深沉粗犷的音调，众喇嘛和牧民双手合十于胸前，虔诚地念经为祭。最后，参加祭祀的人都要围绕敖包从左向右转三圈，祈神降福，保佑人畜两旺。

礼仪结束后，是蒙古人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活动，又叫“男人三种玩”。到了晚上，夜雾似轻纱飘荡在草原上，人们围坐一起开怀畅饮，品着奶茶，吃着牛羊肉，老年人拉起马头琴。青年男女则避开人群，溜到草丛中谈情说爱，倾诉衷肠，相约来年。这就是所谓的“敖包相会”。

这些都是早年时候的情形了。据说现在祭敖包仪式被丰富多彩的那达慕大会（即交易会）代替了。年轻人谈情说爱也不必一年一度相会于敖包了。但敖包在草原上仍随处可见，也经常有人为之添石祭拜，不过这多是慕名而来的游人和外国人了。

安塞腰鼓

安塞位于陕北高原，那里的腰鼓历史悠久，格调古朴。人们在欢度节日、庆祝丰收的时候，都要演出腰鼓助兴，每次演出的阵容都很大，一般都有六十名左右的鼓手。有时几个队连在一起，能拉开一两里路的距离。腰鼓手们的装束一律是古代将士的便服，或黄或红包头，素色衣服，显得整齐壮观。电影《黄土地》里的腰鼓手们穿着黑色，想必是为了渲染贫苦背景。实际上，过去上场表演的腰鼓手们，很少有穿皂服的。

安塞腰鼓内容很丰富，花样变化多端，较有代表性的有“童子拜观音”“绵羊碰头”“枣核掏心”等。腰鼓队过街表演时用鼓、锣、铙、钹和唢呐伴奏。领头的鼓手以哨子指挥，后面的鼓手们随其哨音变换动作。时而散开，时而聚拢，穿插交替，犹如龙腾虎跃，粗犷狂舒，表现出北方人憨厚、朴实、热情、开朗和坚强的气质。尤其是“鹞子翻身”时凌空扬腿的动作，令人叫绝。鼓手的动作强劲豪放，刚劲洒脱，鼓点儿雄壮有力，扣人心弦。

打腰鼓主要是打情绪，打耐力。鼓手打到兴头上，往往忘其所以，便随心所欲地发挥鼓点的节奏，脚步随情绪腾空而起，有如猛虎扑食，更似大鹏展翅。所以一场腰鼓打下来，气壮如牛的后生仔也有休克的。

安塞腰鼓起源于春秋以前，原有迎神驱邪之意，后来发展为民间舞蹈。北方的冬日地冻天寒，打腰鼓本身就是抗寒，而看那沸腾的场面，又何尝不是驱寒的好办法？因此，新年一过，冬闲的农民便以打腰鼓为乐，逐渐成为习俗，继而发展成文艺表演了。

据说近年来，许多外国人专门跑到安塞学腰鼓，想从中挖掘出奥秘来。但得其真传者无多，他们总感到胳膊腿不能自如地配合。

巷陌风情

北京的五大“镇物”

记得父老相传，清时北京设有五大“镇物”。所谓“镇物”就是用以震慑之物。镇什么？据说镇的是妖魔鬼怪。早年北京住户也有许多设“镇物”的，例如门上挂一小镜，或写“一善”“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或在门内正面摆福、禄、寿三星等。北京五大镇物设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东方甲乙木，用木来镇。“镇物”是广渠门外黄木厂的金丝楠木。该木长七十多尺，直径六点七尺，两人合抱不过来。因为是“镇物”，曾由官家建屋储藏。这屋七间相连，把巨大的金丝楠木放在中间，有专责看守的人。因为年代久远，多次变乱，屋子经风雨侵蚀，倾颓不堪，金丝楠木早已腐朽。

南方丙丁火，用火来镇。镇物是永定门外以西的烟墩，即古代燃放烽火的烟墩。早年有清代立的御碑，上刻“帝都篇”和“皇都篇”，都是用满汉两种文字。烟墩是一高两丈多的高台，周围用短墙环绕，碑阴面刻有诸神像，上有文龙。由于年代久远，墙倒台颓，碑早已不见。

西方庚辛金，用金来镇。镇物说法不一，一说是西郊妙峰山，但遍查《宸垣识略》等书，无此记载。又据父老说是“红山口演炮”。按前清旧制，每逢秋季，八旗士兵在红山口操练演炮，因红色属火，火克金，所以用此来克邪。再一说是西郊觉生寺（即大钟寺）的大钟，钟质属金，用此巨钟来震慑。

北方壬癸水，用水来镇。“镇物”一说是西城积水潭的汇通祠。这个庙最初名镇水观音庵，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名汇通祠，院中有

乾隆立碑。又一说是万寿山的昆明湖，此说也很盛行。

中央戊己土，用土来镇。“镇物”是景山，聚土为山，上立五亭，高踞京城中央，居高临下，气势绝佳。

五大“镇物”不过是封建时代出于迷信设置的。今天看来，这些“镇物”不但保不了江山，也保不了“镇物”自己。

京华“八”字何其多

记得往时，冬岁围炉，夏夜乘凉，常常说起与“八”有关的话题。确实，“八”与北京有密切关系，甚或可以说北京人离不开“八”。

传说，明初刘伯温建北京城便按八臂哪吒之形修筑，崇文、东便、朝阳、东直、宣武、西便、阜成、西直八门便是哪吒的八条胳膊。北京城中带“八”字之地名亦多，如八条胡同、八道弯、八里桥、八里庄、八王坟等，名胜如八大处、八达岭。

老北京人衣食住行亦离不开“八”，如老北京爱吃“八宝菜”，爱喝“八宝莲子粥”；爱逛“八庙”，即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东岳庙、蟠桃宫、雍和宫、大钟寺、白云观；买布必到“八大祥”，即瑞蚨祥、瑞和祥、谦祥益、聚祥益、东升祥、和升祥、同和祥、义和祥；北京过去盛行过吃山东菜，而山东菜的“八大楼”风靡京华，“八大楼”乃东兴楼、鸿宾楼、鸿兴楼、鸿庆楼、乐宾楼、华北楼、泰丰楼、新丰楼；上天桥也必看看当地艺人“八大怪”，即云里飞、管儿张、大兵黄、花狗熊、赛活驴、王小辫儿、大洋铁壶、大金牙；明清时的“燕京八景”北京人百游不厌，一直沿袭下来，“八景”即西山晴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蓟门烟树、琼岛春荫、太液秋风、玉泉垂虹、居庸叠翠，只看其名便有无穷诗意。

明清人沈榜《宛署杂记》中曾记当时的“都门八绝”，即李近楼的琵琶绝、苏乐壶的投壶绝、王国用的吹箫绝、蒋鸣歧的三弦绝、郭从敬的踢球绝、阎橘园的围棋绝、张京的象棋绝、刘雄的八角鼓绝。金朝（1115—1234）时的北京（当时称“中都”）也有八个著名风景区，号称“西山八院”，北京人知者不多。八院中有北京人常去的颐和园，那时山叫金山，水称金海，故称“金水院”。也有不常去的地方，

如北京台山麓的大觉寺（清水院），亦是西山八院之一。大觉寺在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时名灵泉寺，明代改称大觉寺。寺倚半山，一泓泉水环绕全寺，经山门流至山下，泉清洌而淙然。寺内不仅有珍贵之辽碑供人思古，且有名贵之玉兰、娑罗树，披襟观赏，堪称幽静雅致。

龙年说龙俗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中称龙为“鳞虫之长”。从古至今，龙与民俗是分不开的。元宵佳节，家家户户挂龙灯；端午时节，少男少女划龙船；中秋节，小小顽童放龙筝；除夕之夜，合家相聚点龙烛。至于各种各样的龙文化活动以及历代工艺品中所雕绘的龙形、龙纹、龙姿更是举不胜举。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把有才德有地位的人比作龙凤。诗圣杜甫曾写过“攀龙附凤势莫当”的诗句，后来，人们就以“攀龙附凤”泛指攀权附势、猎取荣华富贵的行为。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为人类始祖，其形象便是人首龙身。山东曾发现一块东汉时代伏羲和女娲的石刻画像，就是人首龙身。龙的传人，也许来源于此。

据晚清的史籍记载，元明之际，民间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传说。龙大囚牛好音乐，老二睚眦好杀，老三嘲风好险，老四蒲牢好鸣，老五狻猊好坐，老六赑屃好负重，老七狴犴好讼，老八负屃好文，老九虫离吻好吞。此后，无论是北方的匈奴人，还是南方楚人、越人、粤人，他们胡琴头上的刻兽、刀柄的龙吞口、殿台角上的走兽、钟头上的兽纽、佛座上的狮子、碑座上的鳌、石碑上的文龙、殿堂脊梁上的龙吻等，都是那九位龙子的形像。后来“龙生九子不成龙”这句话演变为比喻同胞兄弟性格志趣各异的意思。

在中国民间艺术中，龙的形象都是人格化了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描写孙悟空经过修炼后，往水晶宫向海龙王借武器，海龙王无奈，便把镇海之宝——定海神针给孙悟空做了金箍棒。戏剧《张羽煮海》描写秀才张羽与龙女恋爱，遭龙王阻挠反对。后张羽得到宝物，煮沸大海，制伏龙王，才得以与龙女成婚。实际上，人们是通过

这些龙王的神话来宣扬扬善惩恶的观念。

民间还有鲤鱼跳过龙门就能成龙的传说。难怪中国百姓喜欢用龙字作为男孩的名字。龙能行云施雨的说法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各地都有龙王庙，那是人们用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场所，是人们对超自然力的一种崇拜。

老鼠入年画

昔日京华，每逢春节来临时家家都要买几张色彩艳丽的年画挂在墙上。年画的内容极其广泛，有历史故事、戏曲人物、仕女山水、翎毛花卉，有象征长寿的松柏鹤鹿、象征吉祥福禄的梅竹桃杏，还有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八仙过海”“龙凤呈祥”“麒麟送子”“刘海戏金蟾”“猪八戒招亲”“耗子娶媳妇”，以及“胖娃娃抱大鲤鱼”……真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给。

“耗子娶媳妇”这一题材能入年画，颇耐人寻味。耗子尖嘴细腿，其貌不扬，而且牙齿如凿，性喜偷食，损人衣物，令人生厌。《诗经·召南·行露》中写道：“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可见百姓对其破坏性深恶痛绝。君不见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把玉鼠精与蝎怪同视为十恶不赦的妖魔。

历代画家们将鼠的“尊容”描绘出来，在题咏时却往往持否定态度。昔日寓居北平时，曾于西城跨车胡同齐宅得白石老人所画《鼠子闹书斋图》一幅，其所题词为：“吾友直支翁常画梅花百幅不厌（“直支”即鼠叫声；鼠足爪印纸上状似梅花——笔者注），吾画《鼠子闹书斋图》不数幅，不愿再为也。辛未冬白石齐璜并题。”之后，又在友人家见齐白石老人所绘之《鼠辈倾灯图》，其题诗为：

肆暴倾灯我欲愁，寒门能有几钱油。
从兹抱头扪床睡，谁与纸田护纸头。

诗后题字为：“一日画《鼠辈倾灯图》二幅，此诗亦书第二回。白石山翁。”足见画家对“直支翁”的态度是鲜明的。

余少年时，曾见过一幅天津杨柳青木版彩印年画《老鼠嫁女》，

画面上的老鼠至少有十五六只之多，都穿红衫绿裤。除新嫁娘稳坐花轿外，其余有的打执事，有的抬轿子，有的敲锣，有的吹唢呐，有的摇旗，有的抬箱子……鼠鼠各司其职，列队排成一条长蛇阵，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民间传说，老鼠聘闺女在腊月。旧时，女儿出阁俗称“送闺女”或“出门子”。由于老鼠为患人间，人们绘制这种年画，或许颇有“送出”的含义吧！但不管其最初的含义如何，这年画却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这大概是因为画面有趣、热闹、喜兴，能使人感受到滑稽喜庆的气氛，而且老鼠繁殖快，因此又含有人们多子多福的祈愿吧。到了鼠年，《耗子娶媳妇》的年画便会纷纷走进千家万户，成为百姓的吉祥画。

老北京人的称谓

老北京人最讲究称谓，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文化程度高低，交谈时所用的各种称谓，均非常得体，听着非常顺耳。绝不像今日有些年轻人，说起话来野调无腔，甚至敢骂他爸爸是“老帮壳”。这种人的“脏口”，听了令人厌烦。

老北京人的称谓丰富多彩且富于变化，同一称谓，却有尊称、谦称、别称之分。

对别人亲属的敬称，皆在前面冠一“令”字，含有美好的意思。称他人之父，谓之令尊；称他人之母，谓之令堂或令慈。这种必要的敬称如今已很少听到，取而代之者便是直呼“你爸爸”或“你妈”了。有人说这是率直，并指责老北京人的礼貌用语是穷酸，闲着没事儿总爱咬文嚼字。对此高论，余不敢恭维也。

北京人尊称他人之子为令郎或令嗣；敬称他人之女儿为令爱；女婿为令婿或令袒。令袒别称袒腹，其中有一段典故。据《世说新语·雅量》记载，东晋明帝在任时，太尉郗鉴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辅弼朝政。一日派门生致函丞相王导，欲择佳婿。门生回来后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几位公子都值得夸奖，听说要选女婿都特别拘谨，唯有一位公子裸露着肚子躺在床上，对选婿之事听而不闻。郗鉴听罢，对袒腹公子颇有好感。访之，方知是王羲之，遂将女儿嫁给他。

北京人对自己长辈的谦称是在称谓前加上一个“家”字，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或家君；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或家慈。如今的年轻人却称其父为“老头儿”或“老头子”，称其母为“老太太”。这并非谦虚过火，而是大不敬，是缺乏教养。更有不孝子弟称其高堂为“老棺

材瓤子”，这无疑是咒骂。倒退一百年，县太爷便要判他一个忤逆之罪，最轻的刑罚也要把他打得皮开肉绽。

老北京人对胞兄或胞姐的谦称是家兄或家姐；而对胞弟或胞妹的谦称则为舍弟或舍妹。“家”与“舍”仅一字之差，却显示出长幼有序，极有分寸。有文化修养的北京人对自己妻子谦称为拙荆或荆妻，拙者粗劣也，荆者以荆枝当髻钗也，谦逊而顺耳，且显得有造诣。如今之丈夫们，称其妻为夫人、太太、那口子、媳妇，这是时代的演变。

老北京人对别称亦非常讲究。称亡父为显考，称亡母为显妣。据《礼记·曲礼》载：“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而另加一“显”字是对亡父亡母的美称，含显耀、颂扬之意。

岳父的别称是泰山。其出处见于《酉阳杂俎·语资篇》：唐明皇封禅泰山，派中书令张说为封禅使。张说的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按旧制，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按次第升迁一级，唯郑镒因张说弄权而骤迁五品，并赐浅红色朝服与金带。在“廷宴”（皇帝诏赐群臣的宴会）上，玄宗发现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郑镒无言答对。近臣黄幡绰曰：“此泰山之力也。”此后，朝野遂称岳父为泰山。岳母的别称则为泰水。北宋元丰进士晁说之所撰《晁氏客语》云：“呼妻父为泰山……又有呼妻母为泰水。”清嘉庆进士梁章钜《称谓录》解释说：“案此即因妻父之为泰山而推之，知此称宋时已然耳。”

旗袍的变迁

旗袍是民国之初兴起来的女服，迄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清代妇女穿旗装，梳两把头，脚穿花盆底子鞋，身穿袍子外褂。辛亥革命后，制定男女礼服，男人穿西式大礼服、常礼服；女人即穿长袍，因系旗人式样，故称“旗袍”。1929年4月，南京又颁《服制条例》：“女用甲种礼服，色蓝，长至膝与踝之间。”简单说，就是蓝色旗袍。

旗袍刚时兴时，穿的人不多，式样也较一般。看民国初年妇女穿旗袍的照片，不管用料多么讲究，都是直腰身、直袖子，与男袍区别不大。这可以说是第一代旗袍。

“五四”运动以后，女人的旗袍就变成大袖口、大下摆了。那袖口又大又短，袖子上段瘦，下段肥，袖口最大，据说可以大到一尺两寸。下摆就是下襟，也很阔，呈圆形弧线。旗袍内已不穿长裤，均是着丝袜了，脚穿西式高跟皮鞋或中式绣花缎鞋、礼服呢鞋。

大肥袖子当时叫“倒打袖子”，因其自抬肩起，越来越宽，一反上肥下瘦之常规也。这种样式的旗袍，一直时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又由宽变窄，由肥变瘦了。

由肥变瘦，是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即所谓的表现“人体曲线美”。这样一改，才出现了裹在身上的瘦旗袍。瘦旗袍的出现，对于过去大肥袖子旗袍来说，有两个重大的突破：其一是照体型剪裁，穿在身上显出曲线；其二是有长袖有短袖，长袖及腕，短袖在肘上，直至短到腋下。茅盾的《子夜》中所写的旗袍，已是袖短得可见腋毛了，这是30年代初的时代风貌。

起初瘦旗袍缝制工艺还全是老式的，剪裁腰部挖去很多料子；一

律钉纽襻，疙瘩纽；高领上要钉三排甚至四排纽子；要镶边，有时镶两条，外宽内窄；很长，拖到脚面。抗战以后，也许是因为大家都穷了，所以时装也由长变短，长旗袍变成短旗袍，领子也越来越低。到抗战后期，旗袍短到膝盖，领子也低到几乎没有，纽襻也少了，只腋下一束，其他均用按纽。到40年代末，逐渐由短变长，领子由低变高了，而且变成后面高前面渐渐降低的斜领。这种斜领颈后托着头发，显得挺秀，颈喉部也不卡得难受。领口用暗钩扣紧，后改半只按纽互按，其改进十分科学，腋下用拉链，穿着也方便。老式旗袍，虽然瘦腰裹身，但仍有大襟、底襟，裁剪缝制都很麻烦，穿着也像男人的袍子一样，要纽襻全部解开才能穿能脱。新式旗袍则不然，腰胯间不开口，缝死，像个口袋一样，穿脱一套即可，极为方便合体。尤其夏天，腰间只薄薄一层，十分凉爽，比裙子都实惠。所以穿惯这种旗袍的妇女们口口声声总说这种旗袍最方便、最经济，也最美观大方，既能出门穿，也适于家居穿，是理想的女服。

解放前，北京的女大学生一年四季都穿旗袍，而且都穿朴素大方的蓝布大褂，套在各种棉旗袍、夹旗袍外，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制服了。老北京的小媳妇、大姑娘，夏天喜欢穿月白——俗名叫“缸靠”的大褂，也就是月白士林布旗袍，浆洗得挺括干净。黑鞋白袜子，头上戴朵石榴花，走起来腰板笔直。不用问，这是老北京的姑娘，也许是旗下的大格格呢。

闲话小脚儿

老北京人一向称妇女所缠之足为“小脚儿”。小脚儿的话题似乎不足道哉，但说起来却有点儿意思。

中国妇女独具特色的小脚儿，其历史源远流长。据清刻本《壹是纪始》考证，妇女缠足始于周朝。该书援引《史记》云：临淄（周初封姜子牙于齐，建都于此）女子弹弦缠屐，摇修袖，蹑利履。利者，言其小而尖锐也。

清以前历代帝王，大约都喜爱小脚儿。据《太平广记》载，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得宫娥所穿之玉履。曾被成帝刘骜选入宫中的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在其所作赋中有“思君弓履綦”之句。另据明代古籍《杂事秘辛》所云，汉桓帝建和年间，保林（汉宫廷女官名）吴姁，其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䵷，约缣迫袜”，遂下决心缠足，“收束微如禁中”。唐代时，缠足更尚纤小。名曰“太真雀头履”的小脚儿鞋，其长仅三寸。直至明代，朝制仍令妇女缠足，并规定头戴凤冠。小脚女子上身穿衫，下身着裙，走起路来，左一扭右一扭，那风摆荷叶的纤弱姿态，可想而知。

古人对朝廷提倡妇女缠足，并非毫无异议。在六朝乐府《双行躔》中，字里行间即可见其微词：“新罗绣行躔，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满人入关之初，尚无暇顾及禁止缠足，暂且因袭明制——妇女凤冠缠足。康熙三年（1664），朝廷下诏“禁裹脚”，“违者枷责流徙”，父亲是当官者要罢官，平民百姓则重打四十大板。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在解除满汉通婚禁令的上谕中，不仅禁止汉人妇

女缠足，而且大力提倡放足。

尽管清朝对汉族妇女缠足屡下禁令，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观念的影响与束缚，边远地区偷偷缠足者仍不计其数，致使小脚儿王国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东交民巷使馆洋人如同瞧“稀罕儿”一般，按动相机快门，大照特照老中青妇女之三寸金莲。不仅以此取乐，而且作为珍贵的图片史料收藏起来。

慈禧太后对汉族妇女缠足，可谓深恶痛绝。据20世纪20年代末期成扶平先生所撰《旗族旧俗志》载，光绪三十年（1904）时，慈禧曾下诏颁布《劝行放足歌》，颇为有趣。其歌词曰：

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
幼女甫离提抱，即与紧紧缚束。
身体因之羸弱，筋骨竟至断缩；
血气既未充盈，疾病随之暗伏。
轻者时乎痛苦，重者有成废笃；
举动极为不便，行走尤形踯躅。
懿旨屡经诫谕，士民尚不觉悟。
人孰不爱儿女？微疾亦甚尤郁。
唯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
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
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
意谓丰此不美，且将为人怨怒。
不知德言容工，女诫所最称述；
娶妻唯求淑女，岂可视同玩物？
父母于女何人，男子于妻何若？
是皆原其贤孝，岂忍摧伤肉骨？
美恶况由天赋，何必若此斫剧；
现当振兴实业，男女事各有属。
各省业已风行，纷纷会谈天足；

省垣识时绅首，竟思返本还朴。
联名禀请示禁，堪为女子造福；
应准通行晓谕，从此享衢同步。
岂唯感召天和，富强于焉拭目；
务各互相解释，切勿再事拘囿。

起源于中国北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因其妇女亦骑马游牧，故皆为天足，对南方妇女之缠足，讥为“小脚娘”；而南方妇女却笑“旗家打扮”的满族妇女的天足为“大脚片”。这种彼此的揶揄，整整持续了三百年，可谓中国妇女史上之咄咄怪事矣。

然而，更为怪异的是，清末民初以来，定居北京的外埠一些男子汉居然有“小脚儿癖”。这些庸俗之辈非小脚儿女人不娶，非小脚儿女人不爱。更有好事者，组织“亮脚会”，大比特比缠足样式之纤小与弓鞋之花样，聊博一笑。

汉族妇女所缠之足及其布条，恶味如同死尸，令人作呕。故当年某杠夫对正在洗脚的缠足内掌柜打哈哈说：“知道的，是您在洗脚哪；不知道的，还以为停着一口灵哪。”其语言之诙谐，比喻之贴切，以及骂人之不带脏字，实在令人叹服。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小脚儿作为中国社会独有的一种怪异现象也随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而泯灭。

柳阴蝉鸣话胡同

几十年前，寓北京的人都不会忘记柳阴蝉鸣的夏日胡同小景。清晨，胡同街头有提着鸟笼遛早者，有叫卖豆汁、杏仁茶、油条者，肩挑卖菜的与推车送水的也开始了一天的活动。中午，烈日当头，街上人很少，只有树上“吆吆”蝉鸣和树阴下卖冷食的“叮叮嚓”敲冰盏的声音，组成一曲街头小唱，娓娓动人。傍晚，街头巷尾乘凉者多起来，他们坐在小板凳上，挥扇拂暑，聊天品茶，借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记得乘凉时，有一老人曾经考我：北京城有四条胡同名，谁最重、谁最轻、谁最黑、谁最白？我一时无以对答。老人笑曰：铁狮子胡同不最重？灯草胡同不最轻？煤渣胡同不最黑？干面胡同不最白？我听后捧腹大笑。

北京胡同名称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胡同名称很俗，诸如“小哑巴”“羊尾巴”“猫耳”“臭皮”。亦有极雅者，如“百花深处”“什锦花园”等，听来令人悠然神往。相传明万历年间，有张氏夫妇在京城一带种菜为业，渐有积蓄，遂养名贵花草。张氏夫妇去世后，此处荒废，成为街巷，百花深处就成为胡同名。许多胡同的名称是有来由的。铁狮子胡同是因明代田弘遇故宅门前的铁狮子而得名，“顺城根”“宫墙夹道”等胡同名是因胡同所在的环境而得名。明朝定都北京以后，不少王侯府第所在成了胡同的名字。如定国公徐增寿（徐达之子）住过的街道，名为定府街（即现在定阜大街），武安侯郑亨所住的胡同名为武侯胡同，后被讹称为武王侯胡同等。而方家胡同、史家胡同也是因住户的姓而得名的。

“胡同”一词起源于元代。元曲中，在描述两军交战的情景时，有“杀出一条血胡同”的词句。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里，张生问梅

香："你家住哪？"梅香说："我住在砖塔胡同。"她说的是句玩笑话，却证明胡同在元代已是街巷的称呼了，而砖塔胡同迄今已有了八百多年历史。

关于胡同之称的由来，过去已有不少考证。明代《宸垣识略》中称胡同为"衚衕"。据明代《宛署杂记》云，"胡同"本为元人语，字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又有人认为胡同之称谓源于蒙语，是蒙语"浩特"的音转，"浩特"乃蒙语中城镇之意。

这些都是旧话了。北京许多胡同已成街市，昔日的坊巷已难辨认了。昔日的斑斑柳影、悠悠蝉鸣、街头茶话、暮霭朝霞，像一幅着色亦浓亦美的风俗画，谁能忘怀呢？

北京四合院琐谈

享誉世界的北京四合院都是平房。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取而代之者，则是高耸云霄的商厦或新兴的住宅区。这一跨时代的变化，确实翻天覆地，亦实为繁荣昌盛之景象也。然睹新而怀旧，难免发思古之幽情。

四合院在北京的出现，始于12世纪的金代，至清代“康乾盛世”时，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内涵与建筑艺术均已登峰造极，逐渐形成王公贵戚、富商大贾以及小康之家传统的住宅形式，并成为北京建筑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名满天下。

北京的四合院，以其建筑规模论，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其大者，如恭亲王等府第，乃清代瓦木石漆诸行老手之杰作，其气势有目共睹，自不必细说。小四合院，特色不突出，且知之甚多，亦无须赘述。在此着重谈及者，乃中四合院也。

旧京凡居中四合院者，系正四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的职官、富商、翰墨名士、儒医以及梨园名优。其占地面积，少则不足一亩，多则三亩有余，格局为一进或两进，以坐落在东西城者居多，即俗谓“东富西贵”者也。

北京中型四合院，由表及里，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浓郁的文化与艺术色彩。由文人、书法家、木刻家以及巧手的油漆匠共同创作的门联与门框千差万别，词雅而隽永，颇耐人寻味。大都有堂号，多为三字，如“四勿堂”，是取《论语》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义。又如“扶风堂”，乃梨园已故耆宿马连良之宅院堂号，其早年所办戏班曰“扶风社”，后改用为堂号，取自《淮南子·览冥

训》“降扶风，杂冻雨，扶摇而登之”语义也。

与堂号呼应者，是悬于大门里的影壁上或厢房山墙上的“堂字”。皆由二字组成，文词内容大都体现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以及对吉祥如意之祈望。例如“垂统”，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其义为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又如“景云”，源于《后汉书》，言祥瑞之气也。

旧时四合院之堂字，大都刻于木牌上，朱底黑字，以桐油、银珠漆之，光辉夺目，庄重典雅。亦有砖雕形式者，嵌于影壁上，另辅之以吉祥图案，鬼斧神工运用极妙矣。

铺首、门墩儿和懒凳，是中型四合院必不可少的设施与装饰。

铺首系门上兽面形铜制环纽，用以衔环。其上饰金者曰金铺，饰银者为银铺。此物始于西汉。清末民初北京铜铺所铸之各式铺首有青铜、黄铜之分，做工极为精细，叩之“声噌吰而似钟音”。

门墩儿为街门门框下放的石墩，多为石鼓形，其上雕刻狮头与吉祥图案，借此巩固门槛及门的枢轴。此业之能工巧匠皆来自北京西南房山县石窝村。

懒凳亦称“春凳”，是大门门道内两旁所摆的短腿长木凳，凳面宽而厚，腿极粗，上黑下红，大漆油之，不能随意搬移。此种设备，是为给仆人及来客的随从休息暂坐所用。

据《易·说卦》所云：“巽为木，为风。”所以四合院的街门均在东南方的“巽”位上，以利风水。街门与院落之间，以屏门、垂花门或影壁相隔，以遮挡正院、正房。屏门为两扇或四扇，绿油漆之并撒金呈细叶状，上段门心处红底黑字，书“四季平安”“天保九如”“飞鸿延年”“太平有象”“齐庄中正”等吉祥语。垂花门为第二重门，门上有似屋顶的装饰，顶部四角下垂短柱，雕花彩绘，金碧辉煌。

院内建筑的基本形式是由坐北朝南的正房、坐南朝北的南房与东

西厢房围成的南北稍长的矩形封闭式的庭院。全部结构皆为黄松木架、风火双檐，磨砖对缝并以雕砖装饰。砌在檐前的瓦头皆铸有蝙蝠、圆寿字、长寿字或“吉祥”“如意”等字样，顶部化锡水而浇之，名曰“锡背儿”。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北京连下滂沱大雨四十天，民谓“天哭”也，茅屋倒塌不计其数，唯锡背儿瓦房滴水不漏，足见其妙。

四合院之家庭成员，无不恪守伦理，按长幼而居之。长辈住正房，天经地义；晚辈居厢房，理所当然。

按照传统规矩，晚辈儿女居住或读书，皆在西厢房。严格的家教，令儿女辈无不规行矩步。南房则设佛堂与饭厅，或者供其他机动之用。主仆之间的关系，和睦而融洽。被称为“大奶奶”“少奶奶”的主妇，对车夫、厨子、奶妈等仆人在经济上并不锱铢计较；仆人们则报以忠心耿耿，绝不包藏祸心甚至反客为主。

旧时的四合院，亦颇讲究绿化和美化庭院环境，虽说是方砖墁地，但总要种几棵槐树、枣树或石榴树，并摆几盆花和虎头鱼缸。入夏则搭天棚，以供乘凉；冬季则添狗窝，以恤爱犬尽力看家护院。

天棚·鱼缸·石榴树

石榴花开，火红夺目。古人有“五月榴花耀眼明”之句，后世遂称农历五月为榴月。老北京人对石榴树颇有感情，早年中产以上的宅门儿，多用它点缀庭院，根据院落的大小，置数盆乃至数十盆，并以鱼缸杂列其间。每遇炎夏，高搭天棚以蔽烈日。闲庭信步，如置身清凉世界，顿忘尘寰纷嚣，是十分惬意的享受。

盆栽石榴，大小鱼缸，错落有致地摆列院中，上有高越屋脊的天棚。这种设置，大小富户几乎是千家一面。以前北京流行过一句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好像宅门儿缺少这几样，就不足以显示自家的身份，就不够谱儿。一家如此，户户雷同，已成定格。无怪乎《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先生以为这一俚语是“讥其同也”，实在有道理。

天棚的材料是席箔，有专门承应此事的棚铺，管搭管拆极为方便；鱼缸细者为瓷质，粗者为瓦质；石榴为盆栽，俱有大小之分。上等的宅门儿有鱼把式、花把式专司其事，中小宅门儿一般也有仆人，家主只需在旁指点，即可有赏心悦目之乐。俚语的妙处全在下句：“先生肥狗胖丫头。”不但有狗而且肥硕，摇头摆尾取悦闺中；丫头丰腴，主人的富厚可想而知，此盖烘云托月之法。

不仅如此，尤妙在这样的宅门儿还要有个执教的先生以培育英才，使家族能够发扬光大，显亲扬名。望子成龙，延师培育，自是天经地义，本不足奇。唯有一种附庸风雅的人家，以延师为具文，形同虚设。先生之地位与肥狗、胖丫头相似，甚或等而下之。有一个笑话：一户官宦人家，延聘塾师教其子弟。一日塾师因事请假还乡，户主令仆人担送行李。路上塾师忽发诗兴，即景口占得句：“墙内桃花

墙外红。”仆人应声续之曰：“长工挑担送长工。”塾师以为故意讽己，大怒，想辞退仆人而又苦无旅资，只好隐忍不言。事毕塾师回到馆舍，向主人诉说仆人无礼之状。主人便唤来仆人，先责其慢师之罪，并云，如能续全诗句可以免究。仆人立即续之曰：“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主人忍俊不禁，塾师也无可奈何。这虽是一则笑话，但也足以说明，有些富户延师，只不过为装点门面而已。

里巷徜徉话门墩儿

北京土语曰："穷养孩子，富盖宅子。"其含义隽永，耐人寻味，是旧京社会的真实写照。富人盖宅子，首先须请技艺高超的石匠，放线测量而后雕砌基石和门墩儿。奠基完毕，再由瓦、木二匠继续施工。如此建造之宅子，工精而料细，历百年而不朽。

石雕的门墩儿，是宅子的一种象征。没门墩儿的破瓦寒窑，北京土语谓之"塌塌儿"（满语，即小破屋）。其实并非无门墩儿，只是小得太可怜，自惭形秽地趴在柴扉下，没有资格与大宅门两侧那高大威武而又雕刻精美的门墩儿相提并论。

徜徉于北京纵横交错的古老街道，如同步入硕大无朋的石雕艺术博物馆，满眼皆是造型各异、雕刻奇巧的门墩儿。若走马观花，则美不胜收；若细心观察，则洞见底蕴。无论粗瞧还是细看，都得为石匠们那奇妙的构思和精巧的技艺叫绝。

北京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有精英。以石匠行论，绝大多数匠人只能凿基石、条石或磨盘，而能雕门墩儿细活儿者，则寥寥无几。20世纪30年代末，此行中之鲁殿灵光"石匠李"（名不可考）在其家乡——北京西南房山县石窝村，因中日军流弹而死于非命，绝艺随其而去，后继无人。而"石匠李"与其前辈们留下的诸多门墩儿艺术杰作，竟于"文革"初起时被视为"四旧"，斧斫之刀削之，优美而古雅的造型艺术被破坏殆尽。错把瑰宝当草芥，其损失不可估量！

旧京宅第前的门墩儿，皆以青石雕刻，盖因其质地坚硬而延年也。其大小与高矮、图案复杂与简单，则因宅门等级而有明显区别。其轮廓亦有别：明清时老宅子的门墩儿，上圆而下方；民国以后维新

派所盖宅子的门墩儿，通体则呈长方形，雕刻虽求精细，却缺乏古朴典雅的情调。彼时看虽不可取，如今亦成为十分珍贵的石雕艺术品。

老式的门墩儿，上部皆为石鼓形，两侧密排“帽钉”，匀称整齐，历历可数，仅此一点即见雕石技艺之精良。其上所刻之兽形，或狮，或虎，或麒麟，或獬豸；其态势，或卧，或坐，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门墩儿两侧及下面所刻之图案，或“云头”，或“绣球”，或“方胜”，或“盘长”，或“祥云锦”，或“如意头”，或“豹脚纹”，或“暗八仙”，或“花草拐子”，或“绳索拱璧”……真可谓千变万化，绝无雷同。至于其线条，清晰而流畅，立体感极强。老式门墩儿的雕刻艺术，内容与形式已臻高度统一的完美境界。

北京早年的优秀石匠，皆出于草泽寒门，并未入过什么工艺美术之类的所谓高等学府。其拜师学艺，只靠口传心授，“苦其心志而劳其筋骨”，拼命实践而毫不怠惰，遂跻身于艺术顶峰，为古老的京城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纸窗之趣

顷见清人郑板桥的一幅题画《竹》，上有一篇短文：

>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间，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光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余作画，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寥寥一百三十字，内涵之丰富，人情味之浓厚且不去说，只说这里边的纸窗，何其令人向往也！

在现代化都市中，人居住的都是玻璃窗的房屋，很少再看到纸窗了。玻璃窗有玻璃窗的好处，纸窗则有纸窗的情调。住过北京古老四合院老屋的人，大概不会忘记这种迷离的境界：在纸窗下听“嘁喳”的落叶声，呼呼的风声。如果是冬日晴好的日子，室内炉火，窗外阳光，白色的窗纸上可能有一两只冻蝇，撞在窗纸上咚咚作响。冬日黄昏，一边烤着煤球火，一边望着朦胧的纸窗，看着那暮色渐渐地暗下来，炉火反把纸窗照红。雨后的早晨，倚枕望着那闪着寒气的纸窗，越来越亮，最后发出耀眼的白光。类似的这些声色之感，在挂着窗帘的玻璃窗下，是完全领略不到的。

大抵玻璃窗的好处在于爽朗明快，而纸窗的好处则在于幽雅朦胧。不过纸窗也有一个最大不便处，那就是一年中有几次要重新糊。昔日北京腊月儿歌云：“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腊月里准备年事，扫房糊窗户是其中一件。趁着扫房，把一冬天烟熏火燎

的旧窗纸全部扯光，把木棂上的旧纸、糨糊迹用刮刀刮干净，用小扫帚把窗棂上的积土扫干净。预先打好掺好明矾的糨糊，用刷子刷在窗棂上，重新糊上洁白的东昌纸，或者粉连纸、高丽纸。高丽纸比东昌纸韧性好，又厚实，所以天冷了换糊高丽纸。窗框上所有露木头的地方，全部用纸裱糊过。这样，原来的昏暗老屋，马上便像雪洞一样，焕然一新了。

元代欧阳元功《圭斋集》中有《渔家傲》道：“十一月都人居暖阁，吴中雪纸明如垩。锦帐豪家深夜酌，金鸡喔，东家撒雪西家噱……”又道：“……花户油窗通晓旭，回寒燠，梅花一夜开金屋。”

诗人真是了不起，同样的纸窗，一到他笔下，便又是一派富贵景象。我国过去老式房屋，没有玻璃，南北各地都要糊纸窗。但江南冬日照常开窗，所以不大重视糊窗户。北京冬日天寒、风沙大，俗语云“针尖大的眼儿，椽头大的风”，所以特别讲究糊窗户。柴桑《燕京杂记》云：“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冬日又防寒气内侵，或易以高丽纸。至夏日，又于窗纸有一二，裱以疏布，便其余暑纳凉也。布外仍系以纸，有风沙则舒之，无则卷之。”

疏布，北京叫“冷布”，是一种上过浆的极稀、极廉价的窗纱。一般冷布装好后再糊上纸。“卷窗”，即窗纸在上头糊死，下一头糊在一根剥光的高粱秆上，四角钉小钉，用线绳崩紧，既可卷起，又可放下。这些，老北京人一看就懂，而隔了时代的外地人就看不明白了。

《水曹清暇录》记载，有一种透明的糊窗纸，所谓“油窗明亮，甚于蠡壳，光洁绝似玻璃，惜乎质脆”。又云：“仅三寸，不能得宽广者。”仔细思量，这可能是云母片。昔时江南雨水多，又有黄梅天，所以也真有油纸糊窗的。《越缦堂日记补》云：“念戊午春日，坐困学楼，午日正暄，据榻读《唐书》，命一僮以桃花油纸糊窗格。暖绿满檐，山蜂乱飞，案头瓶花，摇摇欲坠，遂觉春气充溢胸次……”李纯客真不愧为一代名士，一点糊窗小事，写得如此漂亮，有几人能臻

此境呢？

老年间的北京儿歌

北京是座文化古城，一点儿不假。姑不论高雅的诗词与黄钟大吕，单是垂髫总角朝夕所唱的儿歌，便足以编成一本厚厚的书。

北京城里出生于寒门的娃娃，虽说缺衣少食且无资格入学馆，但因其生活在自由洒脱的天地里，耳闻目睹皆“无字书”，故智力并不亚于豪门子女，从其所唱的丰富多彩的儿歌便可略见一斑。

旧京娃娃们所唱之儿歌，内容从植物到动物，从家长里短到伦理纲常，从现实生活到神话传说，可谓包罗万象。就其形式而言，则词句参错，琅琅上口。故童年时所唱之儿歌，虽兔走鸟飞至暮年亦记忆犹新。

最简单之儿歌，文词仅两句，反复歌咏而不觉其厌。例如：“拍呀拍呀拍燕儿窝，拍出钱来打酒喝。”又如：“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这后一首，颇有人间为父母者的苦涩之情，听后不禁有些凄然。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嚎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拿尿盆儿。”这首儿歌在民间流行了二百余年，主要供老人哄儿孙时自歌自咏。文词中流露出盼望儿孙长大早日成家立业的迫切心情。

另一首供老人哄孩子的儿歌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儿也要去。”唱歌者粗布烂衣儿，终年粗茶淡饭，听歌者食其母乳或“老米面”（陈米粉打成的糊状食品），唯有一曲儿歌使老小两代人同时沉浸于天伦之乐中，暂时忘却或根本不知世间一切忧愁与烦恼。

夏日天气炎热，孩子们都在户外玩儿，有趣的事情多，所以夏天的儿歌也特别有情趣。

夏天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用不着等什么“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头顶上一片黑云，西北风一卷，“劈里啪啦”就下起来了。小孩们欢天喜地地在小院中乱跑，大人在屋里、廊子上喊都喊不应，这时都会有一首动听的儿歌传来：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反复地唱，欢蹦乱跳。当然，也有十分顽皮的孩子，这时就拍着手乱唱了：

下雨喽，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喽——

这个儿歌是善意的玩笑，天真的粗野。如有正人君子认为这是骂人，那就似乎是不懂得生活的情趣，错怪了天真的儿童了。

夏天雷阵雨来了，又是风，又是雨，小小的三合院、四合院似乎是一个避风港，每间屋子似乎是一条条小木船，在风浪中震撼着。母亲抱着孩子，从窗眼里望着外面的雨，唱着儿歌道：

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至于为什么说“老和尚背着鼓来了”，却没有人注意，只是这样说。后来看到讲儿歌的书，说是“背着谷来了”，这可能是南方的说法，而北方仍然是读“鼓”的。

难道说北京夏天的儿歌只是这几首吗？非也，北京夏天还有一首最美的儿歌，那是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几场好雨过后，小小的四合院中，都是花花草草，绿油油的、香喷喷的、湿乎乎的，在当院荷花缸、大水缸外面，在各屋的墙角上，在大树的根部……都有小小的蜗牛在爬行。这个背着半透明躯壳的小动物，永远不会担心没有房子

住，或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它永远是那样善良而悠闲地，像绅士般地爬行着。北京话蜗牛叫“水牛儿”。孩子们把它轻轻地拿在手中，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一边盼望着它的触角快点儿伸出来，一边抑扬而深情地唱道：

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儿烧羊肉哎，你要不吃，可就让老猫叼了去唉。

妙就妙在似通非通之间。一童独唱或众童齐唱，男声女声杂然相混，那娇滴滴的声音忽而近忽而远、忽而洪大忽而细微，在古城雨后清新的空气中荡漾着，给为生活而终日操劳的父母们以莫大慰藉。

《打花巴掌》这首儿歌，是娃娃们兴高采烈时击掌群唱的“拿手好戏”，其词曰：

打花巴掌儿哎，正月正，小子放炮姑娘点灯；
打花巴掌儿哎，二月二，老龙抬头收雪花儿；
打花巴掌儿哎，三月三，王母娘娘庆寿诞；
打花巴掌儿哎，四月十八日，药王爷圣诞把香插；
打花巴掌儿哎，五月五，小枣儿粽子家家煮；
打花巴掌儿哎，六月六，骑驴城外看谷秀；
打花巴掌儿哎，七月七，鹊桥牛郎会织女；
打花巴掌儿哎，八月半，抬头夜看兔儿捣蒜；
打花巴掌儿哎，九月九，塔上登高瞅一瞅；
打花巴掌儿哎，十月一，别忘给鬼送寒衣；
打花巴掌儿哎，冬子月，老太太发愁哑巴爹（炉子）；
打花巴掌儿哎，腊月二十三，抓草抓料糖瓜儿黏。

长街叫卖声

幼时曾居西单牌楼之北，对门便是失火后重修之西单商场。身在小院，街头之叫卖声历历可闻。

每年春暖花开时，便可听到“卖小金鱼”之声。卖鱼小贩，挑着担子，一头是装小金鱼的扁圆小木盆，另一头笼筐内放着些玻璃鱼缸。

中午时分，便可听到隔壁小饭馆的卖包子声。饭馆小伙计一声“肉包子出屉，热啦——”清脆悦耳。随之端出一大铜盘热气腾腾的包子，行人为之注目。

夏天，一些人家院里搭起了遮阳的天棚。到了中午，竹帘低垂，大街小巷一片沉寂，只有树上的蝉叫个不停。这时，传来阵阵卖酸梅汤和雪花酪的冰盏声“叮叮当——”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冰盏声是用两个小铜碗夹在指上，互相叩击，发音清脆，颇为受听。小贩推着车子，除酸梅汤、红果酪、雪花酪、汽水外，还有凉粉。凉粉用小铜旋子旋成面条，加上酱油、醋、芝麻酱、辣椒油、蒜末儿、芥末等，食之，凉、辣、香、麻，亦为祛暑妙品。

到了黄昏时分，华灯初上，工作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回家，街头小贩也越来越多。卖羊头肉和驴肉的都提着小木篮，吆喝着“羊头肉啊”“驴肉香”。羊头肉用快刀切得特薄，撒上细盐面儿，为下酒佳肴。卖驴肉的吆喝声则颇为别致，先喊一声“驴肉”，声音短促高昂，有时吓人一跳，然后才是一声低沉而委婉的长音“香”字。卖卤鸡的则吆喝“肥卤鸡”，所提篮内，有整只卤的鸡、成串的鸡胗肝和五香茶叶蛋。另有一个签筒，里面的竹签上刻着大天、小地、人牌、长三、长二等牌九点子，供顾客来抽。胜者可以少量的钱吃到更多的东西，形

似赌博。门房老少，精于此道，他在门口一蹲，小贩均绕道而过，偶被他抓住，小贩只好满脸赔笑说：“你不用抽了，想吃什么你自己拿。”

秋末冬初，街上便出现卖烤白薯的，有的吆喝道：“栗子味的烤白薯——”散学归来，买上一块，既可果腹，又可温手，一举两得。

冬夜，人们围炉取暖，这时便传来“萝卜赛梨，辣了换”之声，在静谧的寒夜中，声闻数里。

旧京百业话绝技

旧京百业能人辈出，各怀绝技，观其技每令人诧为奇事。兹分别忆而述之，以飨诸君。

一曰接生姥姥断男女。妇女九月怀胎而一朝分娩，乃人生之大事。婴儿未曾呱呱坠地，常人不可断其男女。旧京以接生为业的姥姥，却有“隔皮断瓤”之神功。凡产前之孕妇，只要请接生姥姥观其面部肤色、腹部隆起形状与大小、行走之姿势，即可立断生男或生女，屡试屡验，迄今不知其奥妙何在。

二曰中医断生死。《论语》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古之俗语又曰：“黄泉路上无老少。”无论怎么说，人皆不愿死，正如另一句俗话所说：“好死不如赖活。”暴病或久病之人，受痛苦折磨可谓是“赖活”，延医求药旨在祛病延年。医道精通的中医师，望病家之五官即可洞察五脏之病变，听其声闻其味即可判断其痊愈或病死日期。人将死，出诊费再高亦婉言辞谢，否则必落个“庸医杀人”的罪名。

三曰杠夫背棺。小户人家办丧事，因其屋门或街门狭窄，不能抬棺而出，遂有杠夫独身背棺之举。有此等绝技之杠夫力能扛鼎且腰腿灵活，背棺时必须弓其腰，弯其腿（如同京戏武丑走矮子），唯有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地把极沉的棺木背出门外，才不致受到丧家的谴责，并可得到赏钱。

四曰撒纸钱高入云端。旧京之出殡，杠前必有撒纸钱者（丧仪执事之一种），将冥钱散与四方野鬼孤魂，以便家鬼畅行无阻。撒纸钱时，以扔得高、散得广为拿手。人称“一撮毛”（因脸上有一绺黑须而名）者，姓金名福，乃满族八旗落魄子弟，因其自幼常拉硬弓，臂力

无穷，故所撒纸钱高可五六丈，散开后漫天皆白如雪片儿，飘忽不定，颇给丧家露脸。“一撮毛”靠此绝技所置房产颇多。

五曰窝脖儿负重疾行不歇脚。“窝脖儿”又称“扛肩儿的”，是旧京一种有特殊技能的搬运工人，能以颈部承受搬运之物，低头小步疾行，其所扛之物多为硬木家具或精细瓷器。上肩后无论行程远近均不能撂地歇脚，且进街门与屋门时必须蹲下身子方可进入，其耐力与技巧，实为一绝矣。

六曰棚匠搭架如兔起凫举。旧京操办红白喜事皆讲究请棚师高搭席棚，操此业者谓之棚铺，其伙计谓之棚匠。搭棚所用之杉篙或毛竹，高皆丈余，纵横交错以麻绳捆绑。棚匠手攀脚蹬如兔起凫举、猿猱上树，其动作之优美不亚于现代之体操运动员。

七曰瓦匠扔接瓦快而准。旧京之老式瓦房，无论新建还是翻盖，均需大量运送拱形瓦和瓦当。运送时，房上房下各站一人，五块一摞，一扔一接，动作优美而节奏鲜明。

八曰捶金薄如蝉翼。旧京匾额之金字，皆以金箔儿贴之，历久而光泽如初。生产金箔儿者曰捶金作，其技师能将一两黄金捶成一亩三分地面积，微风吹之亦可飘向空中。

旧京测字先生

老北京城里，测字先生比比皆是。这类人属于“术士”之一种。术士之本义，其一指儒生，其二指儒生中讲阴阳灾异的一派人。测字、相面、算卦这三种术士，统称为“巾行”。所以如此称呼，系因此业发端于头戴巾帻的一派儒生。

测字也称拆字、破字或相字，内行人称作“小黑行”。测字是自宋代以来就颇为盛行的一种占卜之法。术士令求占者任举一字，而后把字形拆开，阅其偏旁点画，并离合参互他字，随机附会人事，以占卜吉凶。

北京的测字先生分三种：在桌上测字的称为“桥梁”，其设备为一桌一椅，桌前围一块白布，上书斗大的“测字”二字，桌上或备纸条、笔墨，或备石笔、石板，以供求占者书写用之。在地下摆摊测字的称作“砚上巾”，最为寒酸。串茶馆测字者名“踏青”。

旧时北京测字最有名者为王梦曾。此公出身于七品小官僚家庭，自幼通习六艺经传，诗、词、赋俱佳，并宗黄山谷书法，擅写一手潇洒大方的蝇头小楷。青年时曾考入南堂（位于北京宣武门内路北的天主教堂）攻读法文。1932年9月，张学良在北京东城煤渣胡同路北行营办事处招考秘书，应考者三百余人，但只有刚过而立之年的王梦曾以一篇骈文考取。他任张学良将军府第二秘书未满三年，因与同僚政客不合而丢官。后为生活所迫而沦落天桥，化名为“负平生”，以测字兼写扇面儿谋生。

负平生骨瘦如柴，其貌不扬，尤其是头颅小得出奇。但因其每每向众人诉说在梦中见过曾子，又因其书底儿雄厚，并且精通《易

经》，无论测什么字，也无论给什么样的人测字，均能自圆其说，无懈可击。于是，“负平生”三个字便披上了十分神秘的色彩，许多求占者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以为是三生有幸遇上了一位“活神仙”。老北京流传一句歇后语，叫做“负平生测字——写得了不改”。民国时，文人金松涛在其所作的竹枝词《天桥即事》中曾赞负平生曰：

学柳学颜更学韩，
露天挥翰冒霜寒。
好凭一管江郎笔，
倚马千言未是难。

闲话北京“打鼓的”

北京买旧货打小鼓的，其历史根源虽然未能深考，但也是很久的了。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记云：

> 有荷筐击小鼓以收物者，谓之“打鼓”，交错于道，鼓音不绝。贵家奴婢，每盗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卖；路旁识者，辄以贱价值得宋元字画、秦汉器皿。

这里不但记到打鼓，而且说到了打鼓的货物的来源。当然贵家奴婢盗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他们的货源还有哪些呢？大约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一般人家不用的旧货，这是大宗，但不甚值钱；二是在京住了一个时期后要回乡的人，如赶考举子，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大学生，或是去其他地方上任的小京官，临走时把不能带的东西卖掉；三是全家离京回乡或他往的人家，这大都是官宦，每遇搬迁，要卖大批东西；四是旗人官宦的后代，家道衰落，靠卖旧货度日；五是大宅门佣工偷出来的东西。第一、二宗是打小鼓的日常的交易，都是一般的旧货，即使贱买贵卖，也都是较为正常的利润。打小鼓的最喜欢后面三种货源，因为这都是收旧货发财的机会。《清稗类钞》说：“京师语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饿，日捡货。’盖相传操此业者，岁必有一暴富者也。”可见打小鼓发财是屡见不鲜的。

封建官吏在京多年，都有很大的宅子，单是木器家具就很多。一旦因事离京，行期在即，都急于清理，常以极为便宜的价钱卖给打鼓的，而且数量很大。因而打鼓的遇到一户这样的人家，便可赚不少钱。

打小鼓的总喜欢在北城一带旗人多的胡同中兜生意。据说有一次

一个打小鼓的，在一条小胡同里看见几个小孩玩弹球，一个小孩用的球是绿的，而且较大，他就要过来看。这个“球”中间还有一个洞，便同小孩商量，到小孩家中用几块钱买走了。小孩母亲不懂，以为一个小孩玩意儿，居然卖了几块银元，很合算。岂不知这是清代大朝珠上拆下来的一颗“翠珠”，而且还是很好的“玻璃翠”哩！打小鼓的转手之间，便赚了好几百元。类似这种故事，在旧时打小鼓的商人中，流传是很多的。

打小鼓的也有区别。普通小贩挑着两个筐子，沿街收买一些旧衣服、旧家具、旧报纸和旧瓶子等。更差一点儿的，则只能收些破烂、碎品之类。有一种资本较厚被称为“打硬鼓”的，则专门收购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古玩字画、毛皮绸缎等。这些人要经过学徒或有相当经验才行，没有一定的眼力干不来。

王府井附近有一家古玩铺掌柜，就是打硬鼓的出身。有一次，他从一户家道中落的王府花五百多块大洋买了二百多个旧鼻烟壶。别人认为并无特殊之处，他却说：二百多个烟壶，只要一个有用，别的都是搭配。说着，从中拣出一个进到屋里洗（打磨）了一下，然后拿出来再看，只见是一块圆形蓝宝石，晶莹透亮，光芒四射，放进盛满凉水的碗里，水都给照蓝了。大家见果真是一件宝贝，都十分佩服这位打小鼓的眼力。他悄悄说：这块宝石可卖到一万多块钱，但当时我不能只买这一个，那样，卖主就会起疑，肯定不卖了。

打小鼓的都会摸卖主的心理。有些破落户急需用钱，但又很顾脸面，不肯走到街上来卖东西，打小鼓的就主动登门，而且不能一开口就问人家卖什么东西，而是说：您这儿有什么好玩意儿，赏给我们看看，开开眼。如果主人有意卖，再说价钱。对一些根底较厚的大户，起初还往往故意多出些钱，以取得对方的信任，放长线钓大鱼，“垄断”几个大户，便建立了固定的“进货基地”。

打小鼓的经常串哪条街，走哪几条胡同，习惯上也有一个大致地

段的划分。例如，从前门外菜市口到虎坊桥一带，经常在那里窜的是一个姓刘的打小鼓的。他细高个儿，穿一件灰布长衫，外罩黑马褂，看上去斯斯文文。他很健谈，小鼓打得也很有节奏，人们一听就知道是“打鼓刘”到了。他很会做生意，常常在和人们的闲谈中，指着人家手上戴的戒指说：“这东西现在行市很不错，您这个能卖上二十块，等您想出手的时候，交给我办，也让我赚几块。”有时对方本无心卖，这么一说，一动心，买卖就成了。他和这一带的人都很熟，如果谁卖后又后悔了，他从不为难你，原价退还，所以信誉颇高。

更高些层次的打小鼓的，不但眼力好，会经营，而且还有其独到的技艺。比如过去有一种赤金笺纸，是用纯黄金的金箔捶制而成，可用来写字作画。20世纪30年代初，从荣宝斋买一副六尺长的赤金对联，要花上七八块大洋。有些喜对和寿联一类的东西，人们用后就当旧纸出售了。有的打小鼓的有一种绝招，买回去后，经过提炼，可以把上面的金子提取出来。要深问，却不肯细说，因为技术是保密的，否则，饭碗就让人夺走了。

茶馆·茶摊·大碗茶

北京旧时的小茶馆，生意实在小得可怜，比上海的“老虎灶”还不如。老虎灶以卖开水为主，摆桌子卖茶为辅，而北京小茶馆主要卖茶。穷茶客往往还自备茶叶，单买开水，坐上半天，也不过两三个铜子。几张破桌子、烂板凳，每天即使卖满堂，也不过几百个铜子儿。换银元，有时还换不到一块，还要除去煤钱、房钱、电钱、人工挑水费等开支，所剩能有几何呢？因而大小茶馆的生意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已无法经营了。

虽说小茶馆生意小得可怜，但好歹还有两间破房。还有比小茶馆更小的生意，那就是“茶摊”。在各大庙会上，如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在天桥、在鼓楼后头、在什刹海河沿上，常常看见支一副铺板，铺板上铺块白布，放着一些茶壶、茶碗，也弄得干干净净，边上还放着一两对老式的茶叶罐，罐中放着小包的茶叶，周围放着大板凳，旁边灶上烧着开水壶，这就是当年的茶摊。老爷爷带着孙子逛庙会，看完玩意儿，走累了，坐在茶摊上歇歇脚。孙子在一边吃糖豌豆，爷爷沏上壶三大枚的“高末”（沏半包，其余半包还要带回家去），坐下来安详地喝上两碗。这样的茶摊，这样的茶客，其生意比起小茶馆来又小得多了。

如果说茶摊生意小，那还有比茶摊更小的生意在，那就是“卖大碗茶的”了。在天桥也好，在各城门脸也好，在什刹海河沿也好，常常可以遇到上年纪的老头儿，或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挑着一副担子。担子前头是一个一尺多高、短嘴的绿色釉子的大茶壶，顶上三个“小鼻纽”穿着绳子，挂在担子上。担子后面是一个大篮子，篮子里一块布下面盖着几个粗瓷碗，有时还放一两个小板凳，这就是“卖大碗茶的”。一边蹒跚地走着，一边叫喊着：“谁喝茶水？”有人喝茶，就放下

担子，取一个粗碗，从壶中倒一碗“酸枣叶子”泡的茶水，很有礼貌地捧给你，可能还拿出小板凳让你坐下来喝。

时过境迁，如今北京有个鼎鼎大名的尹盛喜，是靠在前门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的，后创建“老舍茶馆”。几年前茶馆发展成年营业额数千万之巨的大企业，实在令人佩服。这在过去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井窝子与挑水的

历史上北京人吃水皆汲于井。彼时所凿之井，因缺乏科学常识与技术，其水大都苦咸且涩。以此水泡茶，即使是毛尖、雨前等名贵的茶叶，也喝不出什么香味儿。

北京的甜水井甚少，“甜水”自然就可贵了。而位于平则门（即阜成门）护城河畔的“蜜罐井”，则简直被视为宝贝。相传该井源于玉泉山之泉水，夏日饮之清爽宜人，凉可彻骨；冬日饮之，则略具暖性。慈禧太后曾饮此井水，欣悦之余，便随口封之曰“蜜罐井”。

小小的一口蜜罐井，不足以供大内所需，禁宫及显贵们吃水，便特备水车，间日至玉泉山汲取泉水。交通不便，所费亦属不赀。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不堪饮苦水，亦取水于玉泉山。终因交通不便，不久遂有一德国人在前门外樱桃斜街凿洋井一眼，以供饮用。翌年两宫回銮，德兵归驻东交民巷，洋井遂为一山东人所购，井水论桶出售。且渐渐有诸多以挑水为业的山东大汉来此趸水，遂开洋井业之先声。嗣后，商部为供应大内用水，乃聘请日本人先后在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等处凿井四眼。入民国，自来水因售价昂贵，未能普及于民间，洋井业遂极兴旺。

洋井所在地，北京人称之为“井窝子”。20世纪30年代时，北京的井窝子遍及全城。大凡井窝子都有茅屋一间、辘轳一架、石雕水槽一具。这里一年四季是挑水的集散处，也是赶大车、拉骆驼等劳动者经常光顾饮牲口的地方。

北京的小康人家及铺户，大都雇佣挑水的。那些以挑水为业的山东人，其全部生产工具只有一辆独轮水车、一副水筲和一根扁担。水

车的两侧各置一个长圆形的水箱，贮满水后有千儿百斤，推将起来须左右频繁地扭动着身子才能掌握平衡。而那木轮与轴瓦紧紧地摩擦着，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吱吱吱吱”的刺耳声响。

挑水者从水箱往水筲里放水以及将水倒进用户的缸里时，扁担一直不下肩，两只水筲也一直不着地，动作是那么麻利、协调、漂亮，给人以造型艺术的美感。

挑水的与用户彼此信任无疑。每挑一挑水，便用石笔在用户的门框上画一道儿，月底凭道数多少结算水费。挑水的绝不多画一道儿，用户也绝不偷着擦去一道儿，彼此讲究信义，颇为难得。

闯线·摸驴·拴娃娃

北京有句老话云："有剩男，没剩女。"意思是，总有些男子汉面临打光棍儿的厄运，而女子即便是瘸麻聋瞎、歪瓜咧枣儿，也照样嫁得出去。

因为种种原因而打光棍儿的男子汉，本人心急火燎、叫苦不迭，外人则言"婚姻不动必有邪祟阻挠"，于是便有"闯线"之俗。

朝阳门外之东岳庙，其西南小院里有月老殿，闯线之光棍儿无不涉足其间。殿中系红线于两柱间，光棍儿前行数步以腿将线撞断，则大功告成。至于香火钱，必定是要破费的。而且必须趴在蒲团上，冲着月老的尊像连磕三个响头，以示对神灵之虔诚及求偶之心切。

光棍儿闯线后，无不欣欣然有喜色，并纷纷做起"洞房花烛夜"的美梦，有些最终仍落得形单影只。老光棍儿之悲惨结局者，犹不乏其人矣！嗟乎！古今国人之愚昧，岂止旷夫耶！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农业为本的古老中国，世世代代把有无后嗣看得至关重要，甚至将其与"不孝"联系在一起，实在骇人听闻！此等封建腐朽思想之桎梏，迄今仍然束缚着千千万万的家庭与夫妇。于是专治不孕症的个体医生或国营大医院专家门诊部，求医者趋之若鹜，门庭若市。殊不知看破红尘的老北京人早有言曰："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无儿无女者，除有悖于种族繁衍之自然规则外，倒也落得个生无拼命的付出，死无任何的后顾之忧。然而在几十年前，女人婚后不生养，便会受到公婆、丈夫乃至社会舆论的谴责，并被安上"窑姐儿转世""断香烟的丧门星""有苦劳无功劳"等罪名。因其不生养，于是成为丈夫名正言

顺纳妾的理由。而一旦姨太太生下一儿半女，原配夫人即使捶胸顿足吵嚷“姑奶奶是坐八抬大轿过门的”，也丝毫改变不了被“打入冷宫”的厄运。有鉴于此，未得生养的妇女遂醉心于去庙中“摸驴”或“拴娃娃”，希冀神灵庇佑，赐以身孕。

东岳庙之文昌殿，旧有铜驴（实为偶蹄，名曰“特”）一匹，相传为文昌帝君之坐骑，抚之无子生子、有病祛病。求子心切之妇女，于每月朔望或农历三月初一至二十八日（是日为东岳大帝诞辰）开庙期间，三五相约纷至沓来。妇女每每因害臊而不敢公然抚摸，徘徊逗留良久俟殿中无生人时，方敢七手八脚尽情抚摸。盖因抚者众且日久天长，铜驴浑身乃至阴茎阴囊之部位，无不锃光瓦亮而人影可鉴矣。此神兽现藏于白云观，每逢春节庙会期间，少妇及黄花姑娘无不落落大方地抚摸之，不过是自寻开心罢了。

在东岳庙、白云观、蟠桃宫等庙宇梵宫的送子娘娘塑像前“拴娃娃”，更是旧时渴望生子的妇女的常见行为。娃娃者，即列于香案上之小泥人，高三寸许，五颜六色，栩栩如生。求子之妇女，择其一速以红头绳儿系之并揣入怀中。应验与否，拴之者自知也。

京都花轿

按中国旧俗，举凡嫁娶，则必用花轿，尤其在北京这个礼俗至重、传统色彩极浓的地方。即使是出身于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寒门中的女子，出嫁时也必须坐八抬大轿。否则，日后稍有不慎就会被长舌妇以“带肚儿过门”等骇人听闻的谎言弄得痛不欲生。

中国妇女极为重视的轿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典籍记载，唐代以前，轿子称为肩舆，五代时开始出现“轿子”这一名称。至宋代，以轿代车马，则已相当普遍。南宋绍兴年间，枢密院编修官王鼌在其所撰《默记》中云：“艺祖（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鼌，乘轿子，出居天清寺。”

继宋之后，历代乘轿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清代日趋兴盛。不仅出现了区别品级的红呢、绿呢、蓝呢三种颜色的官轿，而且兴起了供新娘、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乘坐的花轿。

花轿的主体名为轿厢，竹木所制，无须赘述。而关键的部位是供千人瞧万人看的轿围。这种奢华艳丽的装饰品，是以红绸或绿绸为底儿，外加平金刺绣精制而成的。其图案有如意头、祥云锦、柿蒂纹、团凤、舞鹤、子孙万代等，造型之美观、线条之流畅、色彩之艳丽、想象之丰富、寓意之隽永、格调之古朴，无一可挑剔，与其说是轿围，不如说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然而，尚有比此等轿围更加华贵者，即除金线刺绣各种吉祥图案外，并镶嵌钻石及红蓝宝石，而此等价值连城之轿围，非贵族之家而莫敢问津。

按老规矩，喜轿前面的全部执事包括：开道锣一对，红牌两扇（上书“肃静”二字），大号、歪脖号各一对，伞、扇各一对，大镜、

二镜、筛镜各一对，令箭一对，金瓜、钺斧、朝天蹬各一对，喇叭四只，大鼓八面，横笛两管，铜钹两副。诸般执事沿街款步而行，一路吹吹打打，给古都增添了热闹和迷人的色彩。

轿围的新与旧、执事的多与少，以租用者穷富而有天壤之别。小户人家，一般只用八抬红轿一顶、两只喇叭、四面大鼓而已，以不让亲友、邻居笑话为度。殷实之家，则必用崭新轿围的红轿（新娘乘坐）一顶、绿轿（娶亲与送亲太太乘坐）两顶，并全部之执事，耗财买脸在所不惜也。

在旧北京人的生活中，轿子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出租花轿为业的轿子铺和以抬轿子为生的轿夫便随着京都逐年人烟稠密而与日俱增，并由此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家财万贯者办喜事租花轿，常常不惜花数百块大洋用崭新的高级轿围（租金相当于轿围的工本钱），而且要求全部执事油饰一新，就连轿夫、吹鼓手及执事人等所穿戴的驾衣靴帽乃至帽子上所插的翎毛，也是一律簇新无褶儿者。这种全部租金上千块的大买卖，唯有本钱雄厚的一流轿子铺才敢承办。

为讲究排场、显示富有，并增添喜庆气氛，婆家于迎娶新娘前一日下午，令轿夫把花轿及一切执事在门前展览出来，谓之“晾轿”。于是招来四面八方的围观者的啧啧称赞。

翌日“发轿”（起轿出发）时，新娘所乘红轿居中，娶亲太太与送亲太太所坐绿轿一前一后，执事高擎，锣鼓喧天，号角齐鸣，穿街过巷，故意绕道迤逦而行。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的绿轿并无轿帘遮挡，其浓施粉黛、满头珠玑、怡然自得之情态一览无余。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而自得其乐矣。这种喧腾的景象，正如《光绪都门纪略》中之《娶亲》诗所云：“鼓乐旌旗辇路开，大红官轿坐徘徊。门前车马阗如许，也学官家大样来。”

北京城里的所有轿夫亦是杠夫，其共同特点是年轻力壮、健步如飞。负重行走，上身不动，稳而且快，以人马赶不上者为能。但是，在给大户人家抬花轿时，为达到主人充分显示气派与阔绰之目的，则必须耐着性子以小碎步蹭着走。如此之情景，每每撩拨少女怀春之情思，亦往往勾起薄命少妇忌妒之心怀。

轿子铺又称喜轿局，其字号均取诸如“吉庆”“天顺”“仁和”“合兴”等喜庆之类的字眼，大都开设于内外城繁华地带。这种买卖在三百六十行当中，与杠房合称为“红白口”，以租赁和服务这两种形式作为主要经营手段。轿子铺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营业，但以春秋为旺季，而且高度集中于“黄道吉日”。每应一号买卖，所派出的一拨轿夫、轿子、锣鼓、执事、红毡等谓之“一伙”。逢大吉大利的日子，小喜轿铺一天只能应一伙买卖，大喜轿铺则可应两伙甚至三伙。但对吹鼓手及打执事的杂役来说，由于时间的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参加一伙，故俗话说：“吹鼓手命穷——好日子重（崇）。”

“合兴”与“阜顺”两家轿子铺，在清末和民国期间，是饮誉京城的佼佼者。两家皆开设于崇文门外，实力旗鼓相当，竞争激烈。

合兴轿子铺开业于光绪末年，创办人系八旗落魄子弟，因其原在左安门内蓝旗大营房当差，头上盘着一条大辫子，人送绰号“大辫子兵”。营房撤销后，“大辫子兵”遂以全部积蓄开办了六间门面的大轿子铺，不惜血本地置办了簇新鲜艳的轿围子、全部执事，以及轿夫所穿戴的驾衣并靴帽。所用轿夫和吹鼓手，皆为出高价挑选来的年轻力壮且技艺娴熟者，故其生意日趋兴隆，客户遍及内外城。

与“合兴”抗衡者，乃后起之秀阜顺轿子铺。主人卢三，以善做驾衣闻名京华，人称“驾衣卢”。因看轿子铺生意兴隆、前景可观，遂于民国八年（1919）创办阜顺喜轿局，自任掌柜，自制驾衣，并以二子为左膀右臂，料理一切事务。父子同心同德，果然后来居上。

1929年初夏，北京某大户租用阜顺号的轿子，在前门外天寿堂饭庄大办红事。其“晾轿”场面十分浩大：红轿一顶，绿桥两顶，皆描龙绣凤，金碧辉煌；全部执事计有开道锣一对、弯脖号一对、大号一对、伞一对、扇一对、大镜一对、二镜一对、筛镜一对、令箭一对、金瓜一对、钺斧一对、朝天蹬一对；另有吹喇叭者四人、打大鼓者八人；轿夫与执事人身着绿驾衣，头戴黑毡帽，上插赤铜色雉羽。起轿之后，鸣锣开道，鼓号喧天，列队而行，俨然帝王出巡。路人见之，无不啧啧称羡。

两大轿子铺明争暗斗，互不相让。1930年春天的一个黄道吉日，“合兴”与“阜顺”两拨花轿仪仗队在东单牌楼大街迎面相遇。双方各抬红绿三乘轿子，伞扇等执事五彩缤纷，气派非凡，四顶绿轿皆高卷轿帘，内中端坐的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均浓施粉黛、满头珠翠，眉开眼笑，左右顾盼。南行北去的两伙轿夫于交错时皆放慢了脚步，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一寸一寸地往前蹭。六顶轿子四十八名轿夫的靴子底儿左右落地颇有节奏，但听一阵阵“沙沙”之声。轿子平稳至极，几乎静止不动。观者如堵，不禁为之喝彩。而观轿夫之神态，则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这种貌似文明实则激烈的角逐十年九不遇，称得上是一种形式特殊极为奏效的活广告，对提高并扩大轿子铺的声誉大有裨益。

京城澡堂子

中国人以盈利为目的的浴池业，明初才在北京出现。

元代时，北京的寺院始设澡堂，史料云：“凡内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内沐浴，并有专人为之擦澡讨赏。”寺庙内设澡堂，无疑是与礼佛有关——沐浴更衣以示虔诚。明代永乐年间，市井出现浴池业，至清代则日趋昌盛，凡人烟稠密、车马辐辏处，皆开设澡堂子。

明清时代北京的澡堂子，设备极其简陋，灰棚房屋，油纸糊窗，砖砌浴池，铁锅烧井水，井水以辘轳汲之，池四周设长凳与衣筐若干。浴巾乃农家土布，浴履则是剪去后半截鞋帮的旧布鞋，并备洗涤泥垢的碱面儿。

清末民初，开设于北京内外城的澡堂子有百余家，规模扩大，设备亦大有改善。其等级分为上、中、下三种档次，上等者如王府井北江的清华园，设有头等官塘、普通官塘、盆塘及池塘；中等者如前门外鲜鱼口内的兴华园，设有雅座儿盆塘和散座儿池塘；下等者，则仅设温、热、烫三种水温的大池塘。档次虽不同，但均附设搓澡、修脚、理发、代客洗衣、住宿五种服务项目。

头等官塘系由内外套间组成的豪华盆塘，外间摆设硬木桌、椅、茶几、橱柜、梳妆台、床及香水、香皂、发油、雪花膏等物，并装有电话，如同豪华宾馆的客房。官僚政客在此既可沐浴，又可会客、吃饭、打麻将牌、抽鸦片。常有官僚携好友在此寄居一旬或半月，北京土语称之为“澡堂腻子”。澡堂的伙计自然要充当仆人的角色，嘴里爷长爷短地叫着，一日三餐跑饭庄子为爷叫饭。而最后的赏赉，自然也是丰厚的。

普通官塘的服务对象，多为本地或外埠的商人。为做成一笔生意，他们往往借助澡堂的牌桌，在愉悦和谐的气氛中谈判，十有八九能拍板成交。至于一般的盆塘，则面向职员、公务员、教授或中学教师。

最有情趣者，当属面向大众的散座池塘。那些脱得赤条条的，分别浸泡在温、热、烫三池中的澡客们，无论相识与不相识，都能自由地交谈——民间的传说、社会的新闻、市井的现象以及家长里短儿这些永恒的话题。倘另花份儿搓澡钱，则可躺在宽大的木凳上，尽情地品味一下让别人伺候的滋味儿，过把“爷”瘾。浑身的滓泥儿被搓得一干二净，异常舒服。

令人欣慰的是，百姓涉足的池塘，充满着黄金难买的深情挚谊——走出浴池，即有伙计趋前用热毛巾为你擦背，并给你披上毛巾被，以防着凉；当你在床位上休息的时候，伙计会为你频频地续上茶水，频频地为你送来热得发烫的手巾把儿；甚至当你睡着的时候，为你轻轻盖严了毛巾被。如此周到而热情的服务感动得你不得不甩下菲薄的小费时，那账房先生的一声“谢谢”、满堂伙计无不高声应和，让你觉得有一股暖流，熨帖着你那颗或喜或忧的心。

街头棋摊

昔日京华，不乏象棋高手，一般小茶馆及天桥等处，都有棋手踪迹。有些心高气傲者，关心得失，每每为了一子的进退而脸红脖粗地计较。棋子打在棋盘上，俨然是州官问案时拍惊堂木的声音，旁观者亦不觉为之正襟危坐。

20世纪40年代，东西长安街、和平门内外，摆棋摊者甚多。靠此谋生的，大多已走入斯文末路。他们在地上仅铺一张旧白纸，随意拣一局棋谱上的旧套，以待主顾。一些不懂下棋奥妙或一知半解又想逞能的棋迷，必然落入圈套，自投罗网。胜的成分百不得一，碰到行家，也只下个平局而已。

通常，地上摆着一式残局，引人参战。摆摊人悠闲自得地坐着，口中不时喃喃细语。其旁早有与他一起的同谋者，状似与他不识。有的过路人如说："此局红棋必胜。"同谋者则说："黑棋必胜。"摆摊人始而笑言凑趣，继而与同谋者尖语挑衅，最终目的是引起过路人发火。摆摊人见火候已到，倡议说："你们可以打个小赌，凑凑趣儿，多少出点小钱，交给我，谁胜了就归谁，我做个中间人。"同谋者即向过路人提出打赌，过路人如犹疑不决，摆摊人即说："闹着玩玩，赢就赢，输就输，算得了什么？这和划拳行令一样，大家凑个趣儿，有何不可？"同谋者此时已掏出钞票，提出打赌数目，引得过路人乖乖落入套儿。

摆摊人和同谋者配合得天衣无缝，一言一语，一招一式，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过路人如出钱太少，则讽刺之；出钱多则鼓励之。谈到适当程度当即达成协议，过路人与同谋人把钱交给摆摊人，两人对弈。其实，这种残局谱中早有定招，过路人如是真正行家，也不过打

成平手，不可能胜。反之，必败。一局既罢，摆摊人先将钱交给胜者，继而向双方索要中费，两人都出若干。实际上，过路人又出一份冤钱。如果真的下成平局，也要出一笔中钱。反正是设下圈套，请君入瓮。摆摊当中，如无过路人发言，则同谋人不时发出议论，以引起不同看法的过路人中计。

这种街头棋摊，是变相赌博。虽然赌注都很有限，多不过一两斤酒资，少则一两盒纸烟代价，然则动机卑劣，已谈不到什么雅趣。

乞丐王国种种

乞丐俗称“叫花子”。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且人多势众，长期以来对北京的经济、交通、治安造成一定影响。

乞丐中的头目称“杆上的”，又名“扎铺的”。传说某朝一位皇帝，发迹前曾为乞丐，嗣后贵为天子，因不忌其贫贱时行乞的历史，遂恩准天下的叫花子逢门可乞、逢城设厂（厂者即大丐头，下设若干小头目）、逢镇设甲（甲者即丐头）。于是大丐头便成了叫花子王国中颇有威信的“国王”，终身受成千上万叫花子的供养，食美味而衣轻裘，娶娇妻而纳美妾，且有生杀予夺之大权。

旧时北京的店铺开张或民家办喜庆大事，首先要与“杆上的”接洽。喜庆之日，“杆上的”代表全体叫花子登门贺喜，账房先生笑脸迎送，并奉送大洋四角至一元两角不等（当年一般职员月薪为大洋六元）。“杆上的”得钱后，遂在门口贴一纸条，上写“宝号新张开幕，众兄弟不得骚扰”，或“贵府喜事，众兄弟不得骚扰”等字。众乞丐目睹字条如见圣旨，无不退避三舍。如若不然，众乞丐则采取“车轮战”法，接踵而来，或以“不给财，我不来，省下钱，买棺材”等语诅咒；或混入大门，伺机将宴席所用的铁锅砸漏；更有甚者则悄悄地放一把火，变喜庆为灾难。其破坏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乞丐王国里，丐头具有无上权威。乞丐们行乞的路线与地段，是由丐头划定的，彼此不能越雷池一步。乞丐间所发生的一切争端，均须由丐头出面调停。倘若不服，轻则受责罚，重则被打成残废，以至一命呜呼，或被驱除出帮。从外省市流入北京的叫花子必须先“拜杆儿”，否则就无立足之地。

丐头对其手下众多乞丐亦有应尽的一些义务——乞丐成家，丐头要为其张罗“份子”（礼金）；乞丐患病，丐头须为其请医购药并派人轮流服侍；乞丐死亡，丐头则为其集资埋葬或呈报官方处置。

丐头是终身的职业。老丐头死后，众乞丐才能举荐资格老、声望高的乞丐接任丐头的职务。新丐头上任后，照例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拜“杆儿”仪式，并经公议重新确定若干小头目。群丐则按年龄依次称老大、老二、老三……童丐统称为徒弟。

旧时北京的丐头所管辖的乞丐不下二十余种，其乞讨方式五花八门、各有特色。兹择其数种略述之。

以砖头频频拍打前胸或后背者，称为“勒砖”，此类乞丐皆有一定的气功基础。他们无论坐于市井还是走街串巷，总是手持青砖拼命猛击身躯，发出呼呼的声响，每击一下便高喊一声：“修好吧，老爷太太！”被击处由红而紫，由紫而青，而他们全然不顾疼痛。过往行人目睹此惨状，必发恻隐之心而舍以钱财。

手持一副竹板或两块牛肩胛骨，立于商店或宅门门前有节奏地敲打，伴随着“瓜吉瓜”的声响，唱出一段段合辙押韵的词句，其名曰“数来宝”。此种乞丐不仅口齿伶俐，而且头脑相当聪明，能够即兴编唱一套套的词句。例如：“竹板打来响叮当，眼前来到瑞蚨祥。宝号本是绸缎庄，锦绣绫罗闪金光。买卖做得真仁义，财源茂盛万年长。”又如：“竹板一打呱哒哒，转眼来到贵人家。老爷太太心眼好，子孙万代永发达。”无论铺户还是住户，听了如此吉祥而又极力奉承的词句，总不好意思一毛不拔。

北京的女乞丐，名之曰“女拨子”，别名“拍铺的”。她们聚居在天桥一带的小店里，个个衣衫褴褛，头裹青巾，手持竹板儿，每日成群结队前往各家店铺演唱快板儿。虽为女流之辈，而嬉笑怒骂竟无拘无束。因其人多势众且性格粗犷，故店铺掌柜与伙计从来不敢得罪她

们。只要看她们一进店门，就立刻付之以钱，避免因其骚扰而影响了生意。

最令人目不忍睹的行乞方法是“钉头”和“穿腮”。钉头行乞者，头顶上都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肉包，这是经长期磨炼而出现的头皮畸形。行乞时将大铁钉斜插肉包内，走进店铺以示要钱。倘若不给，便用砖头猛砸铁钉，鲜血随之而冒出。以此无赖手段将事态扩大后，往往达到迫使店铺多给钱之目的。

穿腮尤为惨烈，但不经常发生。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栅栏同仁堂药铺门口就曾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行乞者侧脸贴于门框，将五寸长大铁钉自口中穿透腮颊，钉在门框上，围观者不计其数。药铺掌柜无奈，只得以重金遣之，方得解围。

漫话拉洋车

人力车据说最先出现于日本，开始被称为东洋车，后来说来说去，便叫作“洋车”了。那个年头，北京的火车站前、街头巷口，成排地放着洋车，好似今日之“的士”。车夫坐在车斗上等待主顾。冬天，盖着件破棉袍子晒太阳、打盹；夏天，把车放在树阴下面乘凉，也有的沏上一壶香片，几个车夫一起慢慢喝。

顾客一嗓子“洋车”，车夫们一下子围了上去：“上哪儿，您哪儿？”于是展开了讨价还价。顾客心理不一：有的顾客考虑车子干净与否；年岁大的顾客多半愿意找岁数大一些的车夫，拉起来稳当；青年人性子急，喜欢找年轻的车夫，跑起来一溜烟。而车夫呢？有的愿意拉短途，这大都是年岁大一些的。有的乐于跑长途，毕其功于一役，图个痛快。有的在琢磨来回脚，如打东四到西四或西单、前门，就愿意拉，讨价还价有商量，因到终点很快又可找到主顾；要是从东四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像什么崇内老钱局后身、广安门外白纸坊，那就有的不肯拉，有的多要价，因为到了那里，还得拉着空车走一大段路才能再搭上主顾。要是出城，到颐和园或清华、燕京，从市中心去，非两三元不拉。

有的车夫中间往往“倒一把”。这样的车夫，或是体力不济，拉不完全程；或是快到了收车时间，要回车厂交车。这种情况下，车夫边拉边和别的车搭讪，一经成交，便请你倒车，价钱还是开始谈的那些，你不用管，反正将你拉到目的地。

就像小说《骆驼祥子》里那样，多数的洋车是从车厂赁来的。有的按月，有的按天向车厂交“车份子”。从车厂赁的车看得出来，多数是陈旧不堪的，车身掉漆，车篷上打着补丁，车胎垫着皮子，车弓子

缺少弹性，坐在上面齇屁股。要是车夫自家的车，车身漆得闪闪发光，车上的铜活通明瓦亮，雪白的垫子一尘不染。一些小姐、太太宁可多花几个钱，也愿意坐这样的洋车。

北京当年一些有钱人家多备有私家洋车。私家车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东家自己买车，雇车夫；一种是车夫自己的车，东家雇人又雇车；第三种是东家雇车夫，车夫又从车厂赁车。前一种自不用说，车夫有时吃住都在东家家里。后两种有的是全日包车，有的是只管接送东家上下衙门，余下时间则打打野食，当然是分等论价。

这三种车子也以第一种为上乘，崭新的车身，一色白铜活，大电石灯，一点倍儿亮。车斗上铺的是小块儿羊毛地毯，底下两只大脚铃，一脚下去，叮当作响。车旁插一根雪白的鸡毛掸子。人坐车上，洋洋得意，不亚于坐今日之劳斯莱斯一类豪华汽车。车夫的打扮也与众不同，夏天是白夏布或香云纱的对门蜈蚣扣小坎肩，下身一条青绸子扎腿裤，脚踩一双千层底“踢死牛”洒鞋，后腰别着一条羊肚毛巾；冬天则是一身青布或“海昌蓝”紧身小棉袄裤，头戴毡帽头，干净利索，分外精神。

这类私家车，夏天是漂白布的车篷遮阳，人坐车上，有一方绣着五蝠捧寿之类图案的白布，一端扣在扶手下方，另一头别在车头底下，遮住东家双腿。到了冬天，车子支上青布棉篷，四周严严实实，不透风。布篷两侧和迎面门帘上，各镶有一方玻璃。出车前，车夫先脱下棉袍子，卷好裹住东家双脚，再拿俄国毯子或狼皮、狐皮褥子盖住东家的双腿，才放下棉门帘，四周扣紧。皮褥子多用红布做里子，放时毛冲外。车把上也有棉或毛皮的手筒子，车夫拉车时将手伸到里面。街上的零散车虽也有棉布、油布车篷，但冬天灌风，雨天漏雨，和前者不可同日而语。

车夫的辛苦，自不待言。夏天，上有炎炎烈日，下有柏油马路的炙烤，一路跑下来，不仅是汗流浃背，就连车把也如同水洗的一样。

冬天，车夫要顶着呼号的北风，拉着兜风的带棉篷的车子，一步一喘气地挣扎着前进。跑完一趟，小棉袄从里到外湿透，然后凭自己的体温将衣服焙干。年迈体衰、腹中无食的车夫，拉着拉着就倒地不起的，当年屡见不鲜。《骆驼祥子》中所描述的，毫不夸张。

1945年以后，北京的洋车渐渐为三轮车淘汰。虽然三轮车遇到过桥或上坡，仍需下来推，但毕竟省力多了。

北京的四轮大马车

北京旧时人们喜欢说绕口令玩，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游戏。绕口令中有一则云：“门口有四辆四轮大马车，你爱拉哪两辆，你就拉哪两辆。”

我小时候常说这个绕口令玩，是很难四声咬清说好的。我想起这绕口令中的四轮大马车来，这玩意儿现在北京恐怕很难找到了吧？要注意，这四轮大马车，是西洋玩意儿。据说七十多年前此车曾出过风头。但不到二十年，便为汽车所代替。此后，更是身价大跌，只出现在出殡送葬的行列中了。

北京旧时畜力车辆，有三种叫法，即大车、轿车（也叫骡车）、马车。前两种是“国粹”，后一种是舶来品，专指西式马车。西方的华丽马车传到北京，那是很早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吉利使臣马戛尔尼入觐，其礼品中就有英王乔治三世送给乾隆皇帝的两辆华丽四轮马车，这是18世纪末的事。但是后来乾隆并未坐此车，一直陈列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上，直到咸丰十年（1860）火烧圆明园时，还光彩如新。后来大概也一齐化为灰烬了。

直到庚子（1900）之后，西式马车才在北京时兴起来。皇家亲贵如庆亲王奕□、贝勒载振，权臣大僚如袁世凯，名优名妓如谭叫天、赛金花等，都坐起西式大马车了。最出风头的是双马的，一般是单马的。坐双马的自然都是特别大的官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做了总统，入坐的是金漆、朱轮，饰以黄缎车垫的双马车。拉车的是两匹高大的阿拉伯种枣骝，北京习惯叫“大洋马”，不同于中国种的蒙古马、川马。大马车一定要洋马才能

拉，中国马不够高，驾不起辕。

马车后来逐渐衰落，我看到过御医韩一斋家中还有辆破马车，有如落日余晖。其他的，就只能在送殡的行列中去找了。

驼铃断想

骆驼原是沙漠中人家豢养的大牲畜，人称“沙漠之舟”。而北京郊区，主要是西山一带，养骆驼的也很多。当年北京城里就常常有一队队的骆驼，响着驼铃，漫步于通衢之上。

北京西山一带为什么养骆驼的多呢？一是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都是煤窑，北京城里烧的煤全是从门头沟运来的。门头沟一带多山路，不能走马拉的大车，运输工具就全靠骆驼了。北京有句歇后语：“门头沟的骆驼——捣煤。”这是谐“倒霉”两字的音，因为北京话把搬运东西叫做“捣腾”。从这一歇后语看出，在北京，骆驼基本上是运送煤炭的。这种情况从明朝就开始了。二是北京作为都城，几百年中土木营建不断，年年要用大量砖瓦石灰。北京旧时石灰窑都在北京西南的房山一带，这些笨东西，大车不能到的山路，也大多用骆驼运送。骆驼，实在可以说是几百年中经营皇都，供应细民，任重而致远的“功臣”。

一只骆驼能驮多少斤呢？八十多年前天津人华学澜《庚子日记》中十月十六日记云：“御煤十四骆驼，共五千六百十斤。”同月十九日又记云：“卸煤三骆驼，共净煤一千一百八十五斤，口袋亦按一个五斤算。”从这两条日记中可以看出，每个骆驼可驮四百斤。这在大牲畜中，负载力算是最大的了。当年南北各省行走山路的驮骡，即使十分好的健骡，驮物也不超过三百斤。比之骆驼，那要差多了。

在骆驼鼻孔中穿一个洞，可以挂一个环，拴一根绳子，再系在前面骆驼的鞍架上，这样一匹连接一匹。骆驼没有骡马灵活，骡马只在后面吆喝，它便会左右转弯，所以叫“赶驮子”“赶牲口”。而骆驼则只能拉着走，所以驾驭骆驼必须叫“拉”。京剧《苏三起解》中，苏三让

崇公道问问旅客中有无去南京的客人，好给王三公子带封信。崇公道向后台一喊，台帘里答道：“去南京的客人前天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去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这里用的便是“拉”。

骡子叫“帮”，每五匹为一帮，由一个人来赶。骆驼或三或五连在一起，叫作“一把”，习惯叫“拴一把骆驼”。骆驼怕热，夏天一般都拉到口外去“放青”，就是拉到居庸关或古北口北面，甚至拉到张家口北面草原上去吃草。放青对牲口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一般要放一个来月。一个多月之后，骆驼蜕过毛，新毛滑软，膘肥力大，秋风一起，就拉回北京，为北京居民运送煤炭和石灰了。

骆驼老了往往被卖到“汤锅”（专门宰杀大牲畜卖熟肉的铺子）中宰杀。这从感情上说，未免是太残忍了。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为了刻画祥子的淳朴善良，特地让他把三匹骆驼卖给老乡。在与刘四爷的谈话中，刘四爷还惋惜地说他为什么不拉进城来卖给汤锅，可多卖几十元现大洋。刘四爷的狠毒更衬托出祥子的朴厚。

在人们看起来，骆驼似乎走得很慢，但因其每步的距离大，实际还是很快的。蒙古人还对小骆驼加以训练，使之健步如飞，谓之“走驼”，一天能走五六百里路。不过北京没有这样的骆驼，只有一队队蹒跚于西风古道的骆驼，驮着煤缓缓地从西直门洞、阜成门洞走进来，驼铃叮当地响着，为城里人送来了温暖。如今驼铃为卡车的鸣笛声取代，不过我仍怀思着叮当的驼铃声。

旧京三次大出殡

所谓“死后哀荣”，丧葬大礼，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习俗。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代京剧大师杨小楼、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的出殡仪式，殊为隆重，迥异于“寻常百姓家”。

1938年，著名京剧武生杨小楼在京病逝。出殡之日，看热闹的人一早伫立街头，有钱人家则租临街楼上茶社或饭庄凭窗座位，居高临下，边饮边看。据说西单的“宾来香”“王强豆乳社”头一天就座无虚席了。大殡为全套执事，金瓜钺斧，“回避”“肃静”的虎头牌，以及香炉、雪柳、引魂幡皆系簇新之物。六十四杠高抬着用金线绣满“百寿图”花样棺罩的灵柩，鼓乐喧天，满街缟素，风光极矣！灵柩后，紧随着孝子孝孙以及全体梨园子弟，有的亲手执绋，有的捧香，浩浩荡荡，好不威仪！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抛纸钱的是鼎鼎大名的“一撮毛”。他的绝招儿是能将四五十张一叠的纸钱直线般地抛五六米高，中间绝无旁逸斜出，达顶端后，又如伞盖般向四面八方飘落而下，真是精彩纷呈，技艺绝伦。

越二年冬，北洋军阀首领、直系头子吴佩孚病故于北京东四杂锦花园住宅。

吴氏出殡，除与杨小楼大致相仿外，另有三大特色：讣告、行状编印得既大且多，遍发诸亲贵友、要员闻人，一也。送殡者按品级、亲疏一律发孝服。上等发白绸子大褂，中等为白布大褂，末等发孝帽一顶、孝带一条。仅此一项，即耗资达千元以上，此二也。送殡者每人给一枚以治丧委员会名义监制的蓝边、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铜版印成的吴佩孚半身戎装像的特制纪念章，蓝边上还有“吴佩孚将军治丧委

员会”字样，三也。

上述二人仪式虽如此，到底不如僧。广济寺原住持现明大师，生前鲜为人知，圆寂后因其出殡场面空前，反倒名满京都。

现明死于1942年。道场设在寺内千手千眼观音殿。殿内高悬幢幡宝盖，广列花罐鱼肠，绣工精美，色彩斑斓，令人目眩。加之香烟缭绕，钟磬悠扬，扑朔迷离，令人如入仙境。尤其所焚之香，有芸香、檀香、降香、龙涎香，还有长二尺、直径为四分左右的深棕色大藏香。每天晨钟暮鼓，早晚两课，午间、子夜亦要诵经。一百零八众佛门弟子身披锦斓袈裟，高诵佛经，和谐一致，音韵悠扬。

现明的出殡规模之大，远超过杨、吴。其殡列自西四广济寺始，绕道缸瓦市、甘石桥至西单折回，然后经白塔寺出阜成门直至八里庄白堆子毗卢火葬塔火化。送丧队伍三四华里长，有的手执法器，有的高奏梵乐，有的默诵佛经，热闹非凡。

白堆子有一座高约五米的石座砖身毗卢塔，内堆木柴并浇上了油。灵柩放妥，一声“举火”，顿时烈焰熊熊，黑烟滚滚升空而去。

平湖西瓜灯

浙江的平湖西瓜历史上有“江南第一瓜”之称，与它相关连的还有那丰富多彩、玲珑剔透的平湖西瓜灯。

西瓜灯在平湖地区家喻户晓，男女老少皆参与。每逢西瓜上市，当地的瓜农、居民大多喜欢刻灯、制灯、赏灯、品灯。人们只要随手取一西瓜，根据其体形、大小、皮色，先打画稿，接着用毛笔蘸上墨水在瓜皮上勾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Y”形小刀，依线阴剔阳刻。等到画（字）面刻毕，就将西瓜蒂头切去一小块，俗称给瓜儿“开顶”。后小心翼翼地挖去瓜肉，再在瓜口边装上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一根短竹竿上，瓜内点上蜡烛，即成一盏西瓜灯了。

入夜，若将西瓜灯置放暗处，那忽闪忽闪的烛光，把瓜灯上的图案映照得分外明亮。若提西瓜灯上街，晚风轻拂，烛光摇曳，那瓜灯上的龙、凤、鱼、鸟等宛如活了起来，可以说达到了集雕刻、灯彩、绘画于一体，融色、光、动三者于和谐统一。这里真如桃源仙境一般，那一盏盏、一串串西瓜灯，大的、小的、长的、圆的，不时漂动在凉风习习的河道上，或流动在月光融融的小路间，充满诗情画意。近观，那碧绿碧绿的瓜皮，透着柔和、嫩黄的微光，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远看，则碧映冷月，冰雕玉镂，频送清凉，别有一种神爽的惬意。正如清代康熙年间进士黄之隽在《西瓜灯十八韵》中所云：

瓣少瓤多方脱手，绿深碧浅但存皮。
铁锋剖出玲珑雪，薄质雕成宛转丝。
小篆曲蟠萦未了，回文层累积多时。
斜斜整整冰千迭，锁锁钩钩月一规。
苍壁镂为高士佩，湘波剪作丽人帷。

淡浓有色非烘染，窳突无痕恰蔽亏。

佛火八楞青琥珀，鬼工四方碧琉璃。

平湖西瓜灯历经数百年沧桑，至今仍久盛不衰。特别是近年来，平湖的瓜事越来越兴旺，刻瓜制灯的传统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每次举办西瓜灯比赛，数百盏瓜灯悬挂一堂，媲美争辉，别具风采。那渔舟小巷，那水乡风情，那如诗如画如梦一般的场面，在层层绿色的衬托下，怎不让人遐思联翩呢？

晋南民居地窨院

地窨院，是山西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形式，多分布在晋南濒临黄河的平陆县境内。

地窨院是深入地下的院室。这种院室的构造是，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几十平方米的平底大坑，坑的深度一般在十米左右，然后在坑底的四壁挖窑洞。为了解决人畜的上下、出入问题，就在四方大坑的一侧旁，挖一条向下的斜坡通道。地窨院内，院子四周的墙壁上用砖砌起了崖面，用瓦挂起了窑檐，并修建了窑柱，窑洞的门上还装有天窗，便于通风。窑洞内用石灰抹平，刷成雪白的墙壁，风格颇为独特。

地窨院内，为解决出水和浇地种植树木、菜蔬的水源，以及牲畜的吃水问题，一般都挖一口深达十米左右的渗水井，雨水自然地流入井中，避免造成地窨院内的水灾。同时，这些储存起来的水还可以调节院里的气温，并用来浇灌院内种植的果树、花卉、蔬菜等。地窨院中的植被由于小气候所致，发芽早，落叶迟，郁郁葱葱，院中的空气也颇为清爽。

窑洞房本来就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挖到地下，就更是冬暖夏凉了。窑洞内四季温差小，窑内温度一般保持在摄氏十度至二十度之间。夏季赤日炎炎，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严冬，外面冰天雪地，地窨院的窑洞内却温暖如春。

地窨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受到外界的噪声和大气层中的放射性物质影响极小，人的情绪能经常处于自然平稳的状态之中。

更有趣的是，人住在地下，地气养人。居住地窨院的人，不论男

女老幼很少有患气管炎、关节炎、风湿症之类的疾病。

地窨院所以能在黄土高原上产生，并延续下来，与黄土高原的高原特色不无关系。黄土高原的土层厚，气候较干燥，常年降水量少，适宜挖洞并长期居住。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上的不发达，也可以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穴居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晋南地窨院，近几年来受到了中外旅游者的欢迎。有的国外旅游者甚至在看到地窨院后，要求在这种地下窑洞内过夜，以体验这种地窨院的独特之处。

满族风俗拉杂

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进关后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就其风俗而论，自有独特之处，且在历久的民族融合中对汉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满族人好客的风俗，有口皆碑。早在清初，大凡过往满族故乡的行人，皆不必为食宿问题而发愁。路经满族人家，即可直入其室，主人会尽其所有招待，绝不吝啬；日暮则让出南炕宿客，而自卧北炕；客人的马匹，主人亦煮豆麦铡草以饲之；客辞行，主人拒绝任何报酬，只需与主人行“擦肩大礼”表示谢意即可。更为新奇的是，倘客人入室而主人不在家，可自行动手做饭吃。饭后收拾干净，物放原处，临行时拿束草放门前，草稍朝客人所去方向，主人回来时会备感荣幸。

满族人素有敬老的礼俗。呼年老者为“马法”，即汉语中老者、祖辈之意。出行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问声“赛音”（汉语中“好”之意），如乘马亦必下，让老者先行。家中幼辈对老人朝夕问安，三天请小安，五天请大安，违者视为不敬不孝。幼辈在尊长面前皆侍立，不命之不敢坐，亦不敢退。对老人吩咐恭谨听从，不敢懈怠。儿媳须侍奉公婆起居洗漱，饭后装烟倒茶，凡有使令必迅速应答执行。

满族取名习俗别具一格。为新生儿取名多在满月之后，俗传小儿满月之前常有鬼怪来家，恐取名后被鬼怪所知于小儿不利。满月时一般要设宴请客，由婴儿祖父、父亲或请有才学、有地位者为其取名。清中叶以前，取名方式多依旧俗，对男孩则以与之出生时辰相对应的动物名称、季节气候、婴儿习性、相貌、排行及生时采猎所获动植物名称等满语词汇命名，或以其出生时祖父年岁为名（如“五一子”“七六

儿”等）。如纯以汉语取名，则选择带有吉祥、高贵含义之字，多为二字名，前不冠姓。对女孩多用与花有关的满、汉字词命名（如慈禧即名玉兰）。许多男子有两个名，即大名（学名）和小名（乳名），或以满、汉语分别命之，满名用于本旗之内，汉名则用于社会交往。

满族人忌坐西炕。满族住宅以西为上，恰与汉族相反。因所供奉的“祖宗板”安设于西墙正中，下为摆供祭品之处，除礼待贵客和摆放祭品、祭器外，不得随意坐卧蹬踏或放置杂物，以示对祖先的尊重。

满族人不仅忌食狗肉，而且忌服狗皮。清代以来满族人不以狗皮做衣、帽、袖头、护耳及皮褥。外人入满人之家亦须将所着之狗皮衣帽脱去，否则不受欢迎乃至被逐出。据说其原因有三：一说狗为满族早期狩猎生活中之得力助手，不忍杀之而食其肉用其皮，相沿成俗；二是民间相传，狗曾救老罕王（努尔哈赤）脱险，其后命满族人不得杀狗食肉用其皮，以示报答；三是认为狗是满族的图腾，故部人不得伤害之。

旗人吃喝习惯

北京旗人家庭，极重视吃喝，俗云“三点儿”：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乐一点儿。

清晨梳洗之后，皆喝小叶茶，然后吃早点心。普通人家多为烧饼、油条、粳米粥。旗人家皆有“捧盒”（圆形木盒，外涂朱红火漆并饰金钱图案），常年用它装满各种精细饽饽（旗人对糕点的称谓）。早点饽饽，由主妇分散，每人两三块，谓之“人头份儿”。

旗人吃饭，分早晚两餐。普通家庭每天皆吃煮饭一顿，酒、肉、菜蔬必不可少，而且每日一换。菜之佳者，谓之“可以下饭”，总期能够“顺口儿”。另一顿，或饼或面，以调换新鲜为准则。至夜，则瓜果罗列。下等旗家，菜肴虽不丰，但亦备红果罐儿，以供老人享用。早年有“肝鸡大肉紫老米”之语，喻旗家吃喝之丰足也。

旧京俗例，时令节日，旗人必应时而吃。立春时，烙薄饼，炒合菜（即菠菜、韭菜、豆芽菜及粉丝）；夏天，讲究“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天，又有“冬至馄饨夏至面”之说，等等。

至清末时，普通旗家每宴来客，除自备酒饭外，多喜在盒子铺叫猪肉火锅子，摆在餐桌的中心。其实不在吃肉，纯属为排场。普通旗家过春节时，除了大鱼大肉，特别讲究做豆儿酱、玫瑰枣儿、炒咸什等下酒的小菜。

赛画眉

哪个青年不连伴？
哪个人家不养鸟（画眉鸟）？
结伴成双求白头，
养鸟玩耍乐悠悠。

这是湘、桂、黔界的侗族地区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民谣告诉人们，养画眉鸟是侗族地区人民的一种娱乐活动。

相传侗族养画眉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养画眉，一是为了听画眉鸟的叫声，二是为了玩画眉。玩画眉中最有趣的就是赛画眉，这在侗族地区几百年前就很流行了。

为了在比赛中取胜，人们得挑选好的画眉鸟进行喂养。挑选喂养画眉鸟，侗族人民是很有研究的，特别是老年人，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说，挑选画眉鸟，除选羽毛光泽、鸣叫声洪亮的外，还得精心观察，注意看画眉鸟的眼、嘴、头、脚、胸、须、眉、身、毛等，这样才能选出自己满意的能歌（叫）善舞（斗）的好画眉鸟来。

侗族人尤其是老年人只要发现山上有好画眉鸟，便不畏茫茫林海，不怕悬崖陡岭，不惜洒汗水苦跋涉，身背饭盒带着马尾套，提着鸟笼上山去追捕。从早撵到日头下山，直到抓住鸟之后才罢休。只要听说哪个村寨喂有好画眉鸟，不怕远道走访，不惜花费钱财买来。过去有用一头水牛换一笼（一笼一只）好画眉鸟的故事。如今，也有耗费几百、上千元买一只好画眉鸟的。

赛画眉一开始，大家都把笼放在赛场上，将鸟笼上的围帕揭开，每个笼相距一二寸，人们围在四周观看。先是画眉鸟练习“砍”铃、码

子，这时各个画眉鸟扇动双翅，边“砍”铃、码子边叫，寻找对手。比赛相斗时它们的“武艺”各有不同，打斗的门路、花样也很多，有的专抓“凤头”（啄对方的头顶），有的会纳“合嘴”（用嘴夹住对方的下巴），有的会“抓”，有的会“扯”，有的会“捆”（用嘴将对方的脚扯过来，用爪捆在笼上），有的专“放拐”（啄对方的腿拐子）。有时打得羽毛纷飞，头破血流，脚爪脱落，仍相持不退，有的相持个多小时难分上下。赛斗激烈之时，鸟的主人也时缓时急，时喜时忧，呼唤不断，指教鸟如何斗打。观众目不转睛，既看胜负，更看斗技的精巧。斗胜的画眉鸟在笼中跳跃，朗声鸣叫，鼓大眼睛虎视前方，迎斗下一个来战者。一连斗胜了几只、几十只，最后斗胜所有的画眉鸟后，主人兴高采烈，把鸟挂在树中央炫耀。人们围集四周，赞美声、恭贺声伴着鞭炮声响彻山坳。这时由赛雀（鸟）会的主持部门给获胜鸟的主人发放奖金或奖品，从此鸟和主人扬名四乡。

比赛过后，鸟主们把自己的鸟笼提起，放下围帕，一一挂在四周树枝上，开始买鸟、换鸟的活动。凭每个人的眼力，互相斟换、买卖。一般价钱是几十、上百元，也有高达千元以上的。要是遇到能叫善斗可以“坐坳”（比赛获胜的鸟）的“鸟王”，人们则不惜重金去买，认为可以为村寨和个人赢得荣誉。

渔民婚俗情趣

婚俗历来因国家、民族、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山东微山湖渔村，渔家儿女的婚俗是别有情趣的。

记得是一个风和日丽的阳春，笔者与友人驾一叶扁舟，荡漾在万顷湖波之中。突然，悠扬的唢呐声随风飘来，抬眼望去，原来是两簇挂彩的渔船。友人说，那是渔家儿女在举行湖上婚礼呢。受好奇心驱使，我们摇橹向彩船驶去。

在两簇披红挂彩的渔船中间，有一只竖着两把火炬的新船。船头上，并肩而立着一男一女，新装着身，披红戴花，显然是一对新人，船上还载着两位抱大红鸡的渔家姑娘。他们随着缓缓稳进的船儿，向挂着两条红彩带的新船移动。友人告诉我，装载新郎新娘的船，名曰迎亲船；挂红彩带的船，名曰洞房船。船上的火炬，象征着烈火驱邪，日子火红；船上的红鸡，意寓着新婚大吉，吉星高照。迎亲船的后面是送亲船，船上载着打扮漂亮的渔家姑娘；紧跟送亲船的，是新娘的嫁妆船，足有四五只。唢呐越吹越响，锣鼓愈敲愈紧，劈里啪啦的爆竹响起来了，迎亲船队在渔民的欢声笑语中，渐渐靠近了洞房船。待两船并排，新娘手持火炬，踏上洞房船，将火炬送进船上的灶膛内，然后走进喜气洋洋装饰一新的洞房。新郎新娘的喜床上，早已放了红枣、麸子、钱币等吉祥物。据说红枣、麸子，寓意“早生贵子”；崭新的钱币，象征年年有钱。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嫂子（亲嫂、姑嫂、表嫂均可）手持床用扫帚，一边轻轻扫床，一边笑吟吟地哼唱：“扫呀扫，扫新床，明年生个胖儿郎。”或唱道：“一把麸子两把枣，一年生个宝贝小。”美好的祝愿、欢快的歌声，更增添了渔家婚礼的喜庆气氛。

结婚喜宴使渔家婚礼达到高潮。丰盛的婚宴，醇香的美酒，凑热闹的亲朋好友都要开怀痛饮几杯。其饮酒规矩极多：有新郎新娘的交杯酒、亲朋好友的祝福酒、对长辈的孝敬酒等。渔民宴会，菜肴多用盆盛，而且一次仅上一两盆。一场宴会下来，几十盆菜都光了。另外，渔家宴会上言谈话语还有一些忌讳。如禁忌说“翻”字、“浅”字、“无”字等，因为“翻船”“搁浅”“无鱼”都是渔民的倒霉之事，万万不可出现。

“同帮通婚”是渔村儿女历代恪守的婚习。原来，微山湖渔民是分帮生活的。所谓帮，其实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说到底，是职业的行会组织。不同的帮，意味着有不同的职能、特点和技巧。虽然渔民被统称为“船帮”，但是仔细观察，船帮之内差别甚大。有的玩枪，以渔猎为生，称做“枪帮”；有的玩网，以捕鱼为生，称为“网帮”；有的以篮为生，靠篮捞鱼，称为“篮帮”；有的用船经商，称为“大船帮”。渔家的婚姻制度，就是建立在这船帮区别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帮，男女之间是不能随意通婚的，这虽无明文规定，但千百年来已约定成俗。

同帮通婚的制度，在现代大都市的人看来似乎有点悖于情理。其实，只要历史地、现实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这种制度天然合理，基础稳固。渔民的显著特点是以船为生，漂泊而存。不管哪种船帮，总是以船为家，漂泊而居。如是，同一船帮，必然漂泊在一起，捕捞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在共同劳动中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渔家儿女，其志趣、爱好、技能、性格、语言等必然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渔家青年男女到了婚嫁的年龄，选择意中人自然要在本帮本群的圈子里搜寻目标。因为这样挑选的恋人，彼此相互了解，双方十分熟悉，无形中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凝聚力。一旦结成伴侣，可以亲密无间，无陌生之忧，免分居之苦。

据说直到今天，在微山湖地区，异帮通婚的现象尚未出现。也有个别枪帮的小伙爱上了网帮的姑娘，但到头来总是以告吹而终结。试

想，枪帮的渔民习惯于驾窄条小船，手执长楫和渔枪，夜间作业，白天休息；而网帮渔民，习惯于撒渔网、布箔阵、下漫篮，白天捕捞，夜间休息。二者皆为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职业，两种不同职业的青年男女硬结合在一起，而又必须在同一条船上生活，不顶牛才怪呢！因此，异帮通婚被认作违反常规，同帮通婚，被视作天然合理。

微山湖地处孔孟故乡，故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根深蒂固。

渔民婚前的门联，皆与生子有关，如“红梅多结子，绿竹又生孙”“忠厚之家多贵子，善良门第福临门”等。婚礼中有两件求子心切的礼仪：一是新娘走进新郎的家门口，婆母要向新娘撒迎面麸子，以求有福有子；二是在新娘的床上放置大红枣、栗子、花生，还要找一个男孩子“滚床”，其寓意是早生贵子。

婴儿的满月庆典，产妇必须到娘家去过。妻子抱着婴儿，丈夫拿着桃树枝，带着礼品，到娘家去吃“喜面”。为什么手拿桃树枝呢？此地渔民认为，桃树枝是辟邪之物，能驱鬼免灾。夫妻二人返回时，娘家人还要在桃树枝上用红线拴上花生和大红枣。用意是，祝福婴儿长生不老，因花生又称“长生果”，祝福产妇再生贵子。

产妇回娘家带礼物，娘家方面也要回礼。大多数渔民的回赠品是一只染红脊背的大白山羊，经济条件较差者回赠一对鸡。按风俗，回赠品是绝不能自家享用的，必须送友人或者卖掉，否则，便被视为不吉利。如果回赠品被人偷去，主人家绝不能咒骂。若咒骂偷者，便被人笑话，众人会认为这产妇家快要有灾了。这叫“破财免灾”。

另外，这里渔民还有“留鸭尾”“剪鸭尾”的习俗。当男孩满月后第一次剃头或剪发时，要按照“七剪伶俐八剪巧”的风俗，在男孩头发上前面剪七剪，后面剪八剪，再在男孩的后脑勺上留下一小撮头发，祝愿孩子将来能活到八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内陆俗称“八十毛”，

而渔民称作“鸭尾”。“鸭尾”一直留到孩子六七岁，娇贵者要留到十二岁。这时则需要剪“鸭尾”。

“剪鸭尾”礼仪相当隆重。操剪者最佳人选是男孩的舅父。舅父把外甥领到大街十字路口，当着众人面，把鸭尾一剪剪下，放到早已准备好的木质盘子之内，让外甥的家人珍藏，直到男孩长大成婚为止。剪鸭尾后要举行盛大宴会，亲朋好友都赶来凑热闹。操剪者既然是舅父，当然不能空手去给甥儿剪鸭尾——一只大绵羊，脊背腥红血染，就是舅父的贺礼了。

渔民给男孩留“鸭尾”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在微山湖区，养鸭鹅多寡向来是衡量渔民财富多少的重要标志。

苗族儿女的自由恋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过去汉人的婚习。而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区域的苗人，他们的婚姻多是经过自由恋爱，而后才结合的。

正月元宵节与八月中秋节，是苗族青年集体结婚的佳期。这时，在山岭间宽敞地方特意搭一座“座坛”，作为头领的临时驻跸之所。晚间，皎洁的月光笼罩着山林，一对对的未婚男女分别站立，等候着他们的头领——土王的到来。土王到后，男与女开始比赛唱歌，持续三四个小时以上。接着由土王颁布命令：开始跳舞。于是青年男女便各找舞伴，大跳其舞。如果双方同意，等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寻个僻静的草地，谈情说爱。此时，男女青年都把腰间系着的条带解开，互相比较长短。假如某一对男女的条带恰好长短相等，便双双走到土王座前，表示同意结为终身伴侣，请土王证婚。得到土王的祝福后，男子便携带姑娘愉快地跑回家去。过了几日，再行通知女方家长。结为伴侣后，男方把一些兽皮或食品（如广西的土红糖）赠给女方，作为纪念，女方也用土布做的手帕还赠酬答。

除了这种自由恋爱、土王证婚的方式外，还有自选对象，而后取得父母同意的办法。女孩到了十四岁，父母便认为她已发育成熟，到了适宜结婚的年龄，于是每天晚上，在门外特意给她设置一架草床，令她在那里歇息。习惯上，这是她的征婚表示，表明她正期待着心目中满意的男人到来。当然，会有许多未婚男青年来应征，他们会多方献殷勤、献媚。被姑娘特别垂青、允许同榻的男人，即是中选的人儿。次日姑娘偕同男子去拜见父母。父母如满意，即由男方择吉日纳聘。聘礼非常简单，只是糯米数百斤和少量土产。有些地方，除上述聘礼外，还须送大猪头一个，叫作“红花”。女方收下“红花”，应该煮

熟，宴请同宗长者，当席介绍这位乘龙快婿。席后将猪头骨从中劈为两半，男女两家各留一半，作为订婚的凭证。订婚以后，女方仍睡在门外草床上，未婚夫每晚必去同房，待确定她已经受孕，才能举行结婚典礼。

苗族青年的结婚仪式别致而简单，男方要送给女方一些牲畜和兽皮，作为喜礼。再预备几桌筵席，请客人饱吃一餐，畅饮几杯，并当众并合双方分执的猪头骨，然后由一群女子陪伴新娘到男家去。新娘头上插满鲜艳的野花，披一块红布，同新郎尽情地欢唱。至此大礼告成。

畲族人的婚恋习俗

祖辈居住在惠东县北部莲花山一带的畲族人，旧时男女有“对歌求婚”“八仙唱佳期”等颇有趣味的婚俗。

畲族人由于长期隐居高山，咸与汉人接触，故规定：“四代子孙定与本族六姓内为婚，不得与外百姓交婚。”否则，被视为违背族规。这种“族内婚”习俗一直沿袭至20世纪40年代末。

畲族人能歌善舞，因而“对歌求婚”是他们恋爱的主要方式。男青年向女子求婚，往往先以山歌撩拨女方。如果女方以歌和之，则表明她尚未婚配。男方拣个月色溶溶之夜，在女方的门楣上悄悄挂上圆镜、剪刀、尺子、桃枝等物。三日过后，男方便可暗里窥视，若那些“探情物”仍高挂门楣，则说明女方应允，便可托媒说亲；若它被扔在地上，则表示女方拒绝，“自作多情”的小伙子只好知趣而返。

求婚成功者，还要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写在红帖上，在女方家的灶君前停放七天七夜。此间，如果双方家中未见不吉，则说明“合缘”。男方即可择黄道吉日，定下迎娶婚期。出嫁时，新娘头戴红色巾帕，坐在花轿内，由四位轿夫抬着走。不管途中道路如何崎岖，不管路程有多远，轿夫都不得停轿歇息，要一鼓作气抬到新郎家。

洞房花烛夜，则更具诗情画意。男家请眷属喝酒，不是大摆宴席，而是只请八个人参加，故谓之“八仙唱佳期”。此“八仙”分别冠予莲花、菊花、萍花、柚花、松花、梅花、茶花和烛花的雅号，由新郎把盏，依次斟酒。“八仙”之间相互叫唤着各人的代号，若错唤雅号者，则被罚酒一杯，多错多罚。如此反复嬉戏，直至“八仙”酩酊大醉，新郎方可道谢走入洞房。

已婚的女子不得再与男子对歌，以示“贞洁”。不论男女，婚后不满四十天绝不准到庙庵堂所拜佛，以免污秽神明。

女子婚后，发式须由原来的长辫改为“螺髻”盘于脑后，并插上三支银光闪闪的簪子。相传明末清初，一位畲族姑娘途遇好色之徒，急中生智将色徒诱入竹园，悄悄折下竹枝，用嘴剖削成三支锋利的竹箭，待色徒神魂颠倒之时，迅速将竹尖插入色徒眼内，致使色徒一命呜呼，那女子亦因不甘凌辱而撞石殉身。打那以后，畲族妇女的发髻上都插上三支锋利的簪子。

广西盘瑶入赘婚俗

地处广西金秀大瑶山余脉中的桂平、金秀、武宣、平南等县市的盘瑶人，以耕山为业，民风古朴，至今仍沿袭着母系氏族招郎入赘的婚俗，颇具情趣。

广西盘瑶人是从广东乐昌县千家洞迁来的。盘瑶人是瑶族中的一个小支系，为了防止女子外流，保持本民族的人口繁衍，特别盛行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男嫁女娶，即“招郎入赘”。

招郎入赘前，盘瑶青年男女通过对歌、饮婚嫁喜酒等社交活动，寻找意中人，谈情说爱。当男女双方一见钟情时，女方则主动邀男方上门帮工。在帮工劳动中，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感情。若帮工者人品好，吃苦耐劳，生活俭朴，尊老爱幼，姑娘与他情投意合，发展到山盟海誓的时候，便选为入赘的“定婚”人，反之则辞退。定婚后，女方备好槟榔、猪肉、酒、米等礼物送到男家，并择定吉日成亲。

入赘结婚，酒席由女方主办。男方之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以至全族全村均被宴请。故送嫁饮酒者有时多达数百人。

结婚之日，新郎在送嫁者陪同下至女方村寨边时，先鸣放鸟枪报信。若女方家认为吉时已到，一切准备就绪，即以鸣放鸟枪为号，表示欢迎。此时双方鸣枪一刻多钟，女方列队门前迎接。新郎进门，送嫁队伍放鞭炮，并高呼：“恭贺！”乐队吹唢呐者代主人答话：“辛苦行路！”然后迎接客人入座，一一敬烟、敬茶，鼓乐队奏起《安位曲》。新郎进屋前，新娘离家躲于山上，待新郎入厅堂后，才从山上回来，以免新郎新娘“相克”。

入赘婚俗要举行拜堂仪式。新郎新娘一要拜天地，二要拜祖宗，

三要拜父母和长辈。拜长辈时，要按辈分大小，上下尊卑，一一敬烟、敬酒。辈分长、威信高，在族中名望较大的，受拜要多些，一般少则三十六拜，多者七十二拜，最多者一百二十拜。受拜者，每人要给新郎新娘一个红包或一件礼物，钱物不拘多少。

拜堂后便开筵席饮喜酒。盘瑶人喜欢把几张长桌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大长桌，名曰“拉长桌饮”，此为最高之礼仪。主宾客人团团围坐，表示天长地久，和睦相好。此时，乐队奏起《慢贺杯曲》，以助喜庆。开宴后当晚，村寨便有“踩歌堂”，男女青年可以尽情对歌。

入赘结婚的第二天，男女双方还要签订“婚姻合同书”，对双方今后奉养两家父母及婚后子女姓氏之安排等，均在合同书上写清楚。双方各有两名证人，在合同书上画押签字做证，各执一份。婚后子女，俗话叫“谷牙（子女）两边顶”“一点灯两边亮”，即单数随母姓，双数随父姓。

浙东生育风俗

结橘树下夜三更，女伴相约去“打生”。
不管旁人来偷听，“会生”自己叫连声。

这是流传于宁（波）绍（兴）台（州）地区的一首民间“打生”歌。

当年每当金秋十月，蜜橘刚刚开摘时节，台州一些婚后多年没有生育的妇女，就相邀到结橘最多的橘林中去“打生”。一妇女手拿橘枝，去追打另一个妇女，边打边问：“会生吗？会生吗？”受打的妇女则满脸笑容连声答道：“会生的，会生的。”也有的妇女成婚后未怀孕，就结伴到城隍庙求子。求子者脱去粉红上衣，露出白嫩肩膀，跪在神前，其女伴则用细竹丝轻轻鞭之，女则喃喃向神虔诚祈求赐子：“愿神鉴我忱，赐我玉麒麟。”故清人石方洛亦有《且瓯歌·打生》诗云：“打生、打生，打尔何不把孩生。跪神前，袒而鞭之呼声声。”

浙东民间每当新生儿呱呱坠地，女婿就要去岳母家“报喜”，也叫“报生”。报喜时，除了带“喜蛋”（一种蛋壳外涂红的鸡蛋），还须提装酒的锡壶一把，俗称“报生壶”。壶内装陈年“花雕”绍兴黄酒，壶嘴上插柏树枝或万年青。柏树与“百岁”谐音，取其吉兆耳。如生男孩，则系红头绳于壶嘴；生女孩，则扎红头绳于壶把。娘家倒取壶里的绍兴黄酒后，要将米倒入壶内，给女儿烧粥吃。绍兴有的地方报生时要备酒一担送岳母家，名为“报生担”。岳母则回以糯米、粳米、红蛋、扎面等物。而后，由岳母给邻居分报生酒喝。

婴儿出生后三日开奶时，家人要给其品尝黄连。事前，请一善言的妇女，将黄连汤蘸数滴滴于婴儿嘴上，边滴边说：“好乖乖，三朝

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好宝宝，今日吃得苦中苦，来日方成栋梁材。”然后，再将用肥肉、状元糕、元红酒、鲤鱼、蜜糖等食品制成的汤水，用手指蘸少许涂于婴儿嘴唇上，并一边唱吉语：“吃了肉，长得胖；吃了糕，长得高；吃了酒，福禄寿；吃了糖和鱼，日日有富余。”最后让婴儿尝一口从一健壮哺乳妇女处讨来的乳汁，开奶典礼也就算结束了。

婴儿出生满一个月，要办“满月酒”，设祭敬神祀祖，并宴请亲友。这一天婴儿还要剃“满月头”。剃头时，请一福寿双全之老太抱着，坐在堂前请剃头师傅剃去胎发，俗称“落胎发”。剃发时脑门上的头发不能剃，有的还在后脑下部留一块头发，称做“孝顺发”。满月这天宾客告辞后，“出窠娘”（即亲生娘）还要撑着纸伞抱着儿郎去逛街，说是这样孩儿长大后有胆有识，走南闯北，风雨无阻。并将一本书置于婴儿怀抱之中，以示小孩长大后读书知礼。

浙东民间婴儿出生满一岁，要举行“抓周”仪式，也叫“试周”。即在小孩儿面前罗列百玩，任其拿取以测其性情爱好和志趣。“抓周”在传奇《聚宝盆》第十出中也有所载：“大公子右手擎剑，左手持一金冠戏看；二公子持书嬉笑，手弄乌纱，后未必定是文武状元。”《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有一段落说的也是“抓周”：

> 子兴冷笑道：“……那（指贾宝玉）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不甚爱惜……”

抓周习俗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北齐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即有如下记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之饮食之物及珍宝服丸，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示儿’。

亲表聚集，致燕享焉。”文中所云“示儿”，即抓周。

越过南北朝，至唐宋，抓周习俗更为盛行。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载：“……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宫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指者何物，以为佳谶，谓之‘拈周试晬’。”所谓“晬”，即婴儿周岁，“试晬”即为抓周。

至近代，抓周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流行，只是各地区形式略有差异。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北京是将文具置于桌上，给小儿梳洗完毕，穿上新衣，抱至桌前，任其随意抓取。若抓取的是笔，则说将来定是文人；若抓取的是算盘，则说将来一定是商人。上海一带是把书放在小儿的枕头下面，意为小儿长大后喜读书识字。还将花、布、钱、笔、泥人之类摆在小儿面前，小儿抓取什么就说小儿将来喜欢什么。江西地区是在桌上摆书籍、算盘、刀剪之类，若小儿抓取书，全家人必欢声雷动，认为孩子将来必能专心学问；若抓取算盘则为商；抓取剪刀则为工。在前清时，小儿所择器物又加上朝珠，一旦小儿抓取此物，家人尤为高兴，外人也必祝贺，说这孩子长大能做官。不一而足。

抓周果然有如此预见性吗？实际上，一周左右的孩子对周围一切都会感兴趣，在人们为他摆放的各种象征物件中选取什么纯属偶然。人们依小儿偶然之举占卜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显系荒唐。早在宋代，一名为楼钥者即作《阿虞试晬戏作》以讥诮抓周，诗云：

阿虞匍匐晬盘中，
事事都拿要学翁。
最是传家清白处，
不将双手向顽铜。

如今，抓周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已销声匿迹，唯在偏远落后省份尚有不同形式出现。

绍兴小儿“寄名”或“偷名”

绍兴小儿起名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叫作“寄名”。孩子出生后，父母怕其多病，或夭亡，就将孩子在文武财神、阎罗包拯或僧道前“寄名”为弟子，但不剃度出家，以求长命。

旧时，绍兴城乡独多“土谷祠”，祠内所奉土地神，绍兴民间俗呼“土地菩萨”。这“土地爷”，绍兴人又都塑的是文财神范蠡。春秋战国时，范蠡为越国上将军，事越王勾践，苦身戮力，深谋二十余年，最后灭吴。范蠡在越国首都绍兴所筑山阴小城（亦称蠡城），至今遗址尚存。勾践称霸，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乘舟浮海远行，终不返。相传他化名“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他精于理财，又肯于散财，三次致富，每次押千金之产以施舍贫民，所以他是绍兴人心中最崇敬的文财神。

绍兴人去土谷祠“寄名”时，其父母常携小儿到范蠡大夫像前烧香。先将小儿生辰八字具文书奏名于神前，并用红布制成一袋，置小儿年庚于其中，悬在佛橱上，俗名“过寄袋”。祠庙内僧人为小儿取名，唤作“范生”“范郎”，或取别的吉利之名。寺僧并将道髻、道衣以及刻着“金玉满堂”或“长命百岁”的银项圈，或锁形饰物、符录，赐给小儿，小儿呼神为“寄爷”。以后每逢年终，寺僧必备饭菜，送至小儿家中，其亲亦必回赠僧人以钱物，三年始毕。直至小儿成年完婚后，才将红布袋取回，谓之“拔袋”。

绍兴人也特别崇拜武财神关羽。千百年来，百姓敬慕其义气，官府厚爱其忠勇，故绍兴的大街小巷亦多建有关帝庙。绍兴小儿寄名于“义炳乾坤”“万世人极”的“关圣帝君”，便取名为“关宝”“关根”“关兴”等。

在绍兴水乡的河埠、桥堍和路口，也多建有“包公殿”，内塑包拯的神像。相传包拯是“立朝刚毅，执法不阿”的“四大阎罗”之一。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及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的说法。故绍兴人也最乐意抱小儿去铁面无私的“包爷爷”神像前，寄名为“包德”“包盛”“包贵”“包富”“包荣”“包灿”“包发”“包寿”等。

旧时，绍兴小儿除“寄名”于神佛外，起名还有一个独特的风俗，叫做“偷名”。其方法是，先探知某家人丁兴旺、福寿双全，便请人向其家“偷”一碗饭和一双筷子，并从其家长者的名字中“偷”一个字，用以取小儿之名。譬如其长者名叫“贵荣”，便取名为“荣华”，长者名叫“金福”，便取名为“福庆”。偷名者返时，母亲抱小儿于门前迎接，称为“接名”。偷名者即呼刚才偷来的名字，儿母便代为应之。

绍兴人为小儿“寄名”、“偷名”，目的均是一个，即为孩子求福、求吉，攘祸息灾，使之平安过日，健康长大。虽属迷信，实也无可非议，都是“天下父母心”。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

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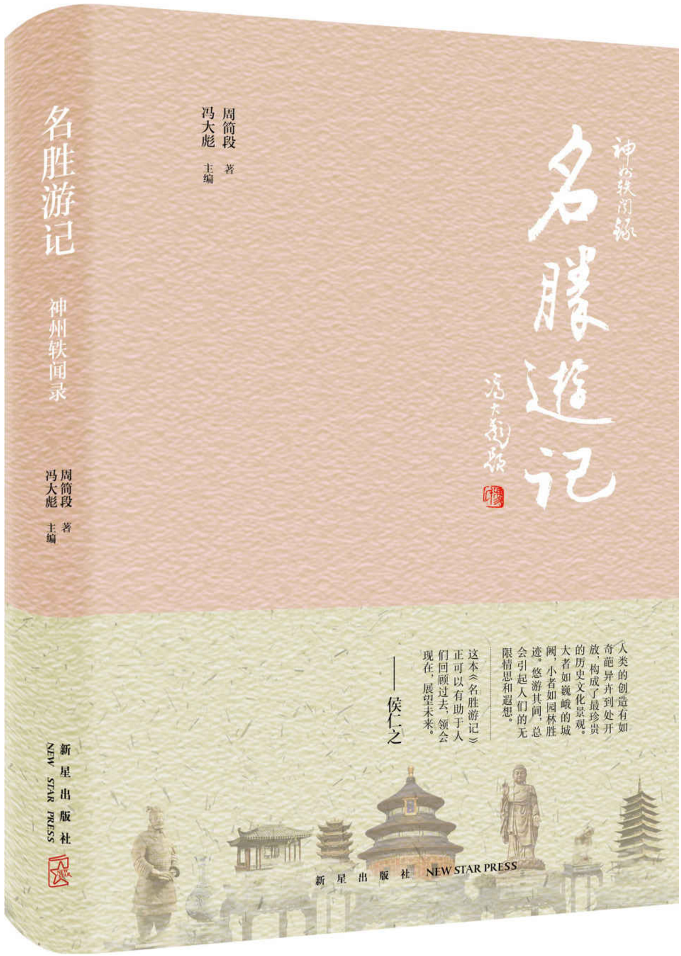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名胜游记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名胜游记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人类的创造有如奇葩异卉到处开放，构成了最珍贵的历史文化景观。大者如巍峨的城阙，小者如园林胜迹。悠游其间，总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情思和遐想。这本《名胜游记》正可以有助于人们回顾过去，领会现在，展望未来。
——侯仁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名胜游记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胜游记／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7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42-1

I．①名…　II．①周…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7940号

名胜游记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2.25

字　　数：225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42-1

定　　价：36.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皇宫城阙

　　太和殿的故事

　　清帝的“洞房”

　　乾隆花园在故宫

　　御花园中石子画

　　囚禁光绪的瀛台

　　角楼的传说

　　紫禁城的工程师——样式雷

　　煤山无煤话景山

　　皇城史话

　　皇帝的家庙——太庙

　　名标青史钟鼓楼

　　古观象台

　　天坛内有“小皇宫”

　　北京城门胜景多

　　正阳门话旧

　　大栅栏沧桑

　　德胜门历史五百载

　　漫话九龙壁

　　定陵地下宫

　　十三陵外又一陵

　　钓鱼台风物之美

金匮石室——皇史
北京的团城
“龙潜旧邸”雍和宫
盛夏话避暑山庄
慈禧的保定行宫
泰山岱庙天贶殿
恭王府并非大观园
“纪大烟袋”及其故居
园林建筑
北京最早的公园
朱启钤改建中山公园
荣辱坊随想
北海公园铁影壁
回声壁　回声塔　回声阶
天坛古树
北京两座“园中之园”
知春亭畔早知春
昆明湖畔说铜牛
美哉，十七孔桥
烟柳荷乡什刹海
陶然亭内本无亭
霜秋叶红游香山
漫话香山之“翠”
北京的教堂
孔府花园多逸闻
杜甫草堂何处寻
绍兴沈园情依旧
关山胜迹
北京地名谈趣
湖广会馆和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纪念馆
居庸关和八达岭
京东第一山
沙河镇北朝宗桥
“卢沟晓月”的联想
明陵毗邻古银山
北戴河的开发
“老龙头”怀古
“人间仙境”蓬莱阁
避暑胜地——庐山
黄山景色美如画
巍巍中岳古嵩山
乘筏漂游武夷山
峨眉仙山“琴”悠悠
黔江下游大藤峡
龙宫探奇
三游洞游记
水旱从人的都江堰
“东方威尼斯”周庄
神奇的黄果树瀑布
钱江秋涛天下奇
伍仁桥的狮子数不清
且说潮州湘子桥
万古名桥出越州
赵州桥“仙迹”趣话
云门山上巨字“寿”
清凉山上最清凉
苏州难忘天平山
话说南京“总统府”
夫子庙与十里秦淮

古城平遥史话

龙门石窟稀世珍

价值连城的“鲁壁”

祁县乔家大院

清代省府第一衙

山西洪洞大槐树

沧州铁狮“镇海吼”

景阳冈与狮子楼

寺庙祠塔

明代弘慈广济寺

京华古刹法源寺

京西古刹戒台寺

白塔寺及其庙会

白云观中会神仙

北京尼庵通教寺

康熙为礼拜寺题匾

京都朝外东岳庙

卧佛寺和樱桃沟

天宁寺古塔

永乐钟王有五绝

云居寺的石经、古塔

千年古刹红螺寺

智化寺内有“京吹”

顾炎武和报国寺

碧云寺和孙中山衣冠冢

千年银杏茏葱意

老北京的关帝庙

龙潭湖畔袁督师庙

西城五塔、东城无塔

寒山寺钟声的传说

天台国清寺及其他
天宁寺造殿风波
宁波古刹阿育王寺
蒲州明珠普救寺
燕南东光铁佛寺
陋巷故址有颜庙
“药都”安国药王庙
岳飞故里精武庙
杨家祠堂忠武祠
湘潭刘烈士祠
武侯祠的对联和塑像
太原名胜数晋祠
合肥胜景包公祠
悲凉壮观荆轲塔
六和塔威镇钱塘江
锦州多辽塔
西湖旧事话雷峰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　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

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　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

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在山河壮丽的祖国大地上，人类的创造有如奇葩异卉到处开放，构成了最珍贵的历史文化景观。大者如巍峨的城阙，小者如园林胜迹。悠游其间，总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情思和遐想。这本《名胜游记》或许正可以有助于人们回顾过去，领会现在，以至展望未来。我这样想，乃是出于个人的一点感受。

整整六十年前，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初次来到现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心那脍炙人口的未名湖畔时，妩媚多姿的湖光塔影，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只是住下来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这未名湖周围一带，原是清朝乾隆时期权相和珅的淑春园的故址，而相与毗连的，还有一处晚明的园林胜迹，即当时闻名京华的勺园。这勺园原是万历年间颇有盛誉的书法家米万钟所亲自设计的。他自称是仅仅导引“海淀一勺”之水，辟治了这座名园，故称“勺园”。时人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有记载说：“海淀米太仆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塔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与米万钟素有交往的诗人袁中道，在《七夕集勺园》一诗中也曾写道：“闻说园林胜，虽忙也爱游；到门唯见水，入室尽疑舟。”而米万钟自己也有《海淀勺园》一诗，更是描写说“绕堤尽是苍烟护，傍舍都将碧水涵”。这都说明引水虽然有限，而创造的意境却是无穷的，足见当时勺园设计手法的高明。实际上米万钟不仅长于园林设计，而且还是一位写实的画家，手绘有《勺园修禊图》长卷，至今珍藏在北大图书馆，堪称“校

宝”。

现在北大新辟专供宾客汽车出入的西门，入门之后，一线大道穿越一带碧波荡漾的荷塘，转而南下，右侧一组新起的楼群，是改革开放以来，迎接国际学者和留学生的居住中心。这里因为原是明代勺园的旧址，因此仍沿用了“勺园”这名称。从勺园楼群到未名湖畔，一水相连，近在咫尺。把历史上一带名园废墟规划建设、更新改造为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林的大学校园，这似乎还是别无先例的。因略述其原委，权当本书的小序，或许是小题大做了，尚希读者谅之。

侯仁之

1991年7月7日于北大燕南园

皇宫城阙

太和殿的故事

到古都北京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到明清两代的故宫一游，而故宫中最具有吸引力的莫过于太和殿了。

太和殿不愧为世界建筑史上光芒四射的杰作，它金碧辉煌，殿宇庄严，也的确担当得起人们对它的景仰与向往。那恢宏的气势与精妙的建筑结构，显示了帝王的尊严与建造者的聪明才智。

太和殿也称为金銮殿，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建造的皇宫中的主体建筑。太和殿原名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到清代顺治年间，才改称太和殿。它曾多次遭到火灾，又多次修缮，现在人们游览时见到的太和殿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建造的，也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太和殿庄严巍峨，仅殿基高度就有六七米，周围是三重汉白玉雕栏。太和殿高三十多米，殿宇开阔高大，共有七十二根巨柱。殿中有金漆雕龙宝座，皇帝登基之时，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历史上多少人为了登上宝座，或驰骋疆 场，杀人盈野；或钩心斗角，用尽机巧权术。可是，到头来，“多少前朝兴废事，尽付与渔樵闲话”！

康熙时正是清代的全盛时期，所以曾两次重修太和殿。当时主持此项巨大工程的是顺天府的一位木匠，名叫梁九。他从明末到清初，一直在紫禁城里任工匠。在没有现代设计工具的条件下，全部太和殿

的外形设计、内部结构、梁枋椽柱、斗拱飞檐，全凭梁九悉心筹划。他最常用的办法是制造模型小样，即先用木条制出小型木殿。据王士桢《居易录》记载：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室，规模悉具。”这种绝技，在当时是罕见的。

梁九这种技艺，是学自著名工匠冯巧。冯巧也是长期主持宫廷建筑的修缮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却不肯把技艺传人。尽管梁九在其门下做学徒，而且虚心好学，但是，多少年来仍未得窥门径，不得其传。但梁九并无怨言，而且工作更加勤谨，学艺更加恭顺用心，终于感动了冯巧。《居易录》载：“一日，梁九独侍，冯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冬宫，代执营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师承，不妄授受如此。”

太和殿是明清两代举行大典的场所。至于大典的盛况，只有在《垂帘听政》这样的影片中去开开眼界了。

清帝的“洞房”

幼年时就听父辈讲过清朝皇帝大婚时，如何隆重、如何热闹等，因此我同好友们去逛故宫时，对清帝的洞房也特别留意。那时主要还是出于好奇，但却不知不觉地留下了较深印象。

进入北京故宫神武门（北门），穿过御花园往南，第一层宫殿就是坤宁宫，宫殿里的东间是清帝的“洞房”。从东侧穿行，还可看到“洞房”东门上面的金边双钩大红喜字，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屋里的龙床、大红缎绣花帐子以及陈设的家具。

清朝皇帝是怎样结婚的呢？

清帝在选定皇后之后，为了迎亲时体面，就派人先到皇后娘家建筑宏丽的府门。迎亲之日，皇帝的老丈人要跪在府门当中恭接圣谕、凤辇。皇后登上凤辇，在銮驾前导下，朝正阳门前进。按照规定，皇后娘家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凤辇都必须进正阳门；宣统的国丈住在北城，凤辇仍须绕行南城正阳门。凤辇进了正阳门直往北行，经天安门、端门，直达午门。

提到午门，人们就不禁想起“推出午门斩首”这句传说里的话，似乎午门是个不祥之地，实则不然。凤辇行至午门停住，这时，午门城墙上正中有一只人工砌成的金色凤凰，利用安装的小滑车，从金凤凰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红绫，直垂到凤辇前面。红绫下端束有大红色诏

书，这就是皇帝给皇后的入宫凭证，叫作“金凤丹诏”，每个娘娘都凭此进入宫门。所以，午门并不是不祥之地，而是“金凤丹诏”下降的吉祥之地。

凤辇进了午门，经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到了坤宁宫，这就是皇后安身之地，然后在东间举行皇帝的婚礼。

行礼时，皇帝皇后并肩盘膝坐在屋里北面龙床上，西南角供着一个高约一尺多的身穿彩衣的木偶像“瓦利妈妈”。“瓦利”按照满文是“降福”的意思，“瓦利妈妈”就是“降福娘娘”。这时，屋里南面有一大铁锅煮着肉；帝、后吃一碗肉，由“神婆”在帝、后前面跳舞。“神婆”意为“瓦利妈妈”的化身，她用舞蹈给帝、后祝福。跳完舞，吃完肉，婚礼即告完成。

现在写来简单，其实那套繁文缛节真是数不胜数。尽管大婚仪式隆重，程序繁多，其目的不外乎炫耀豪华，故示威仪，乞求吉祥，愚弄臣民，甚至弄得民穷财空他们也在所不惜，因而没有必要去为此再浪费笔墨了。

乾隆花园在故宫

乾隆花园的结构应该说是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古华轩。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这里有一棵古树——楸树。这树已是第四代树了，老树枯死而复生，绵亘了四代。为了欣赏这棵树，乾隆皇帝在树的前面盖了个古华轩，还自题了楹联：

明月清风无处藏，
长楸古柏是佳朋。

乾隆皇帝喜欢题诗，走到哪里，兴致所至，随手留下不少“御诗”“御题”，并且还专有几个为他提刀刻字的人。古华轩左边是禊赏亭，亭里就是有名的流杯渠——传说北京只有四处流杯渠，这里是其中之一——“茂林修禊”，所以禊赏亭四周栏杆上画的都是秀竹。亭子的旁边有小井，太监从井里用辘辘打上水来，倒在两只大缸里，缸里的水通过管子流到亭内水渠里，象征着“曲水流觞”。古华轩右边是露台，台不高，但通过崎岖的山道盘旋而上，所以显得有些险峻。台上只有三四平方米面积，配上很矮的栏杆，看起来似乎就开阔了，从这里可见园林专家的一番苦心。

穿过古华轩，进入乾隆花园的第二部分。这是个三合院，正厅

叫“遂初堂”。这个院子似乎没有什么特色，倒是院中那只用碧玉雕琢的盆景引人入胜——三只小羊低着头在山道上走着，显然也是取“三羊开泰”的意思。从前富贵人家爱用这样的题材，图个吉利。

从三合院退出来，打开旁门，走完一条狭长的甬道，就进入乾隆花园的第三部分。这里有耸秀亭、延趣楼、翠赏楼、符望阁等古老的建筑。我们当时感兴趣的是假山顶上那座小亭子，亭子的五根柱子呈梅花形，亭顶用绛紫、孔雀蓝两色琉璃瓦筑成，亭顶上还有个石绿色的宝顶，上面画的还是梅花。走完假山上弯曲的石阶来到亭前，上面有乾隆御笔亲题的匾额：“碧螺”。

乾隆花园假山重叠，玲珑剔透，曲径通幽，生气盎然，不落俗套，完全是值得一看的。谁要是到北京去，我建议他到乾隆花园一游。

御花园中石子画

故宫御花园里的花石子路又称石子画，它们是由五色匀称的石子缀成的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其中有花卉、人物、博古、建筑、飞禽走兽及吉祥图案等七百多幅，色彩斑斓，丰富多彩。

我当年由神武门进入御花园时，每每为回环园内的石子甬路所吸引而流连忘返。

石子画是用砖雕成花纹，或以瓦条组成花纹，然后中间填镶石子，铺缀各种图案，如七巧图、什样锦、博古等。七巧图是用长方形、正方形、菱形、梯形、矩形等为轮廓，中间镶以花鸟植物图案，有荷花鸳鸯、双凤花卉、鹭鸶莲花、三松友鹤、鸣凤在竹等，千姿百态，错杂其中。什样锦以石榴、苹果、佛手、瓜、蝙蝠、古磬等为轮廓，画面有二老观棋、五子夺莲、渔樵耕读、犀牛望月、红日出海、狮子滚绣球、渔家乐等，人物形象生动，极富情趣。博古是在多种形式的多宝格里，铺缀上花瓶、缶尊、 盆景、花觚、卷书、山子等古玩陈设，造型古朴，雕琢精细。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宫廷深处竟有着一些反映民间生活的故事画，画虽俚俗但极诙谐幽默。其中一幅《怕媳妇图》，画面上表现了几对夫妻，有的是男的跪在一条木凳上，头顶油灯，妻子骑在他的身上；有的是男子跪在搓衣板上，头顶一条板凳，妻子在一旁举棍痛

责。种种情状，惟妙惟肖。过去笔者曾见一般男士至此均不欲多看，而太太们则细加欣赏。可谓大长女士们志气，大灭男子汉威风了。

还有一幅《十八学士登瀛州图》，描述唐太宗开文馆招揽天下名士的情景。画面上一位学士揽辔而行，悠然自得，小童挑着担子，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缓缓行走。人物不足半尺，而神态各异，举止如生。

当年的能工巧匠构思十分神巧，如以正在啼鸣的公鸡和牡丹表现“功名富贵”，以荔枝、桂圆、核桃寓意“连中三元”，以一个裂开的石榴表示“多子多孙”，以五只蝙蝠环绕一个“寿”字组成团花图案象征着“五福临门”等。

御花园里的石子路纵横花园南北，五颜六色，光润华丽，结构精巧，优美别致。在电影《火烧圆明园》里曾给了它一个特写镜头，虽只短暂的一瞥，却引起笔者美好的回忆。读者如至御花园观光，可千万注意脚下，不要错过欣赏石子画的机会。

囚禁光绪的瀛台

曾经有一位名叫德龄的满族女士，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本《瀛台泣血记》，比较详尽地记述了清朝光绪皇帝一生悲剧性的遭遇。书中所记事实，虽然有一些失真之处，对光绪的评价也未尽妥善，但还是有助于人们对这位推行变法、力图振兴的皇帝有一个全面认识。他在瀛台被囚十年之久，实为一高级囚徒。

人们或许要问：瀛台何在？何以竟能成为堂堂皇帝的囚笼？

瀛台在北京城中，在中南海的南海里。它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北部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并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奇石古木。它初建于明代，命名为南台。清顺治年间修葺扩建后，改名为瀛台。当年，康熙和乾隆曾多次在此听政、赐宴。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盛怒之下把光绪囚禁于涵元殿。涵元殿为瀛台正殿，坐北面南。北有涵元门与翔鸾 阁相对，南有香扆殿与迎熏亭相望，隔海便为新华门。瀛台建筑规模虽不如紫禁城，却也富丽堂皇。但是，自从光绪被囚于涵元殿，此地便被凄凉、惨淡气氛所笼罩。光绪除每天清晨被拉去陪慈禧上早朝外，其余时间便被囚禁在此，严禁外出。侍奉光绪的太监，均经慈禧的心腹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名为服侍实为监视。据说某年的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返

回。事后，慈禧太后居然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以防光绪逃走。

光绪被囚瀛台期间，身心备受折磨。据说涵元殿那纸糊的窗户破了之后，竟没人给补一补，这在北国严寒的冬天，确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光绪在凛冽的朔风中竟冻得浑身发抖，手足麻木。光绪登基以后，未能励精图治，复兴祖业，自身也落到“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地步，难怪他要不时慨叹：“我不如汉献帝！”尤其令光绪难堪的是，慈禧为了从精神上折磨光绪，竟把光绪唯一宠爱的珍妃打入冷宫，并永远不准光绪与她相见。

光绪皇帝在瀛台的囚禁生活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先于慈禧太后一天死于涵元殿东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的死与慈禧太后仅相差一天，有人便怀疑是慈禧把他害死的，也有人说是袁世凯用毒药把他毒死的。这都只能是历史疑案了。

角楼的传说

故宫是古代皇帝居住的地方，它的外围有宽阔的护城河，高大的城墙，城墙的四角还各有一个雄伟的角楼。

角楼可高瞻远瞩，所以遇有敌人侵犯，角楼就有了示警的作用。但是，故宫的这四座似楼非楼，似阁非阁的建筑，以其美的艺术，将其功能部分地掩盖了。民间传说它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从外观看，它们轮廓清晰，有凸有凹，四个金檐歇山顶的山花外露。顶上的十字交叉放置一铜镀金宝鼎，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灿灿，更显示出其玲珑典雅与辉煌。

谈起角楼，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明朝的燕王朱棣在南京做了皇帝后，总想迁都到他做王爷的老地方北京。一天在梦中勾出了一幅美丽的城郭，城的四角各建有一座像广寒宫一样美的角楼。醒来后，他便让画工按梦景画出了一幅巍峨的皇宫图。

于是工部大臣接了谕旨，调集全国最好的工匠，经过 十年的努力总算快完工了，唯独那四座角楼，按照图样，在施工中梁脊怎么也安装不上去。眼看日期一天天逼近，工部大臣说：“还有一百天时间，再建不起来，皇帝发怒要砍我的头，可是在砍我的头之前，我先要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转眼间，离最后工期只有三天了，许多工匠失去了信心，只好坐以待毙。当时正是三伏天，天气炎热，突然街市上传来叫卖蝈蝈的声音。有一工匠便走过去，见卖者是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他正用秫秸编蝈蝈的笼子。咦？这蝈蝈的笼子不正和皇宫画出的角楼一样吗？他便想买下，然而长者却说："只让你看，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卖！"工匠没办法，只好将卖蝈蝈的长者请到工地，招呼大家来看蝈蝈笼，顿时有人发现了个中的秘密：原来是用了九根梁、十八根柱和七十二条脊。

以后工匠师傅们就根据长者编的蝈蝈笼子的样子，立即投入施工。很快这四座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便建起来了，它像仙山琼阁一样屹立在故宫的四角。后来人们都说：卖蝈蝈编笼子的就是鲁班，鲁班爷看到人间有难，才下凡来救众生的。

1974年湖北收集了一部稀世文物——《鲁班经》，书中有"建工架式""曲尺用度""先师源流"，并配有木刻插图一百零四幅。此外，《鲁班经》对起造房屋日期的择定、曲尺的仗用尺寸，包括上山伐木的时日都有专门的说明。

紫禁城的工程师——样式雷

在一出京剧中，明朝的风流天子正德皇帝逛梅龙镇，回答卖酒女李凤姐的问话时说：在一个大圈圈里有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一个黄圈圈，他的家就住在这黄圈圈里面。他在这说的黄圈圈指的就是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宫廷所在之地。从明朝永乐五年（1407）开始修建，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

在这个黄圈圈里，重重殿宇，处处楼阁，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据史料记载，紫禁城共有房屋九千多间、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是现存最完整、最具规模的古代宫廷建筑。想当年，动工兴建这样雄伟壮丽的宫殿固属不易，就是五百多年来的维护保修工程，也不知耗费了多少名师巧匠的心血劳力！而在修建紫禁城工程中，最有名的一位建筑工程设计家，就是木匠出身的雷发达。

雷发达是江西南康人，其家世业木匠。幼年时，随父从江西去南京，所见宫殿、庙宇、城楼等，或精巧、或雄 伟，均细心观察、仔细研究。稍长，一面从事木匠工作，一面学绘图样，不久，他就成为南京著名的木工能手，时年不过三十岁。

十年后，清廷大修宫殿，其中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工程最大，且最艰巨。雷发达以著名工匠之才，被宣召入京，担当三大殿设计修

建之责。迄今，清宫仍保持经他修建后的风貌。

从那以后，雷发达高超的技艺受到清廷赏识，他遂一直在北京供职，负责皇宫的修缮设计工作。康熙三十二年（1693）病逝北京，享年七十三岁。

雷发达在世时，一面口传身教，一面见之于笔墨，把他的技艺知识传授于后人。所以，他死后，他儿子雷金玉继承了他的职务，直传到他的后人雷廷昌，其时已是光绪末年。他们一家祖孙，先后参与设计过的工程，除皇宫外，还有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和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以及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境）、西陵（在河北省易县境）等。这些工程都是当时最艰巨的工程，而其图样又出于雷家，他家遂成为这方面的权威，被人称为“样式雷”，或称“样子雷”“样房雷”。

一个从未受过工程设计专门训练的木匠，却能绘出如此繁复工程的设计图纸，说他是“匠心独运”当是再恰当不过了。

煤山无煤话景山

景山过去也叫煤山，位于故宫北面，和故宫后门相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崇祯）在李自成率农民军攻进北京城时，仓皇从后门逃到煤山，因大势已去，江山无望，在山之东侧一棵槐树上自缢而死。其殉社稷之处，至今还写有一块牌子说明，但树已枯死。

景山在很长时间被称为煤山，是因为当初在修建紫禁城和皇城时，曾经在此堆过煤。至于相传“其下皆聚石炭（煤），以备闭城之用”的说法，其实是明代“也先南犯，于谦守城”时，为安顿民心军心的一种策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法国军队驻在景山，听说山下有煤，即欲挖取之，但开垦纵横两井，都没有找到煤。

其实，景山不仅无煤，最早也无山，此山完全是人工堆起来的。先是金世宗在修建北海（当时称西华潭）时，将挖出来的土堆在此处。到元代时，又在上面栽种花草树木，同时也修建了一些房屋，逐渐形成了一处专供皇帝和 后妃们游玩的“后苑”。但真正较大规模地进行建设还是在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此处即成为其皇宫整体规模的一个组成部分。按“风水”学说，故宫北面是“宣武皇宿”之位，必须有山才行，于是又把开挖紫禁城周围筒子河的泥土压在原有的土堆上面，筑成了一座土山，名曰“万岁山”，其峰顶是当时北京城内之最高点。山之四周遍植松柏和果树，还饲养了许多鹤、鹿一类的动物，真是遍山青翠，百果飘香，鹤鹿齐鸣。登上山

顶俯瞰皇宫和北京城，可谓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清朝初年，景山更为苍翠清幽，为皇家“禁苑”，顺治皇帝下谕将“万岁山”更名为“景山”，寓“高大”和“永思”之意。到乾隆年间，又几次对景山进行修建，使其基本形成了现有的规模。在山的北面，建成寿皇殿一座，专门供奉皇帝祖先之影像。其正殿为九间，左右山殿各三间，坐北朝南，富丽堂皇，每月初一和四时节令，皇宫子孙都要前来祭祀。寿皇殿东面建有永思门，门内有永思殿，是专为帝、后停灵的地方，光绪死后的棺椁即在此停放过。再往东为亲德殿和忠义庙，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了一组典型的清代建筑群。

景山最高的建筑物是乾隆十六年（1751）在山峰上建的五个亭子。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万春亭，建在景山之巅，高十七米四，三重檐，二十二根柱子，黄琉璃瓦顶，绿剪边，雄伟壮丽，气势磅礴。其东西两侧，顺势向下又各建 两亭，先是周赏亭和富览亭，再下是观妙亭和辑芳亭。五亭依山势而建，相互辉映，对称协调，绘成了一幅异常美丽和谐的景观，堪称中国园林建筑之佳品。据说五亭内原来还各有铜佛一尊，称“五方佛”。但八国联军入侵时，均被劫走或砸碎，现仅在万春亭内竖有须弥佛座一个，高约一米，四周饰有雕刻花纹。

皇城史话

北京现在还有两条街名："东皇城根""西皇城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历史上有过"皇城"的关系。后来皇城虽然拆除了，但老地方却保留了下来。

明永乐帝营建北京城时，城墙就修了三层，最内紫禁城，其次是皇城，外面是北京城，后又修了个外城。这样就是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一层一层的城，再加众多的门，这就是"千门万户彤彤日"的帝都了。皇城并不像紫禁城、内城那样方方正正，如鸟瞰它的形状，大体如一"甲"字形，后面方形是城，中间一竖乃千步廊。

皇城共有六门：正门在千步廊端曰大明门，在承天门（后称天安门）前左右两面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皇城东面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面为地安门，俗称后门。皇城城墙不是很高的灰砖城墙，而是红墙黄瓦的宫墙。现在中山公园正门两边的黄瓦红墙，就是昔时皇城墙的样子。

明清两代天安门前是不准百姓经过的，一座皇城挡在中间，所以东西城来往很不便。行人车马要顺着东西长安街走，到了长安左、右门前，不能再往前走，要折向南，顺着红墙，一直绕到大明门前的棋盘街，才能各奔东西。

明代皇城内没有什么居民，大都是供奉内庭的机构，如西安门内

西什库、惜薪司，地安门内帘子库、腊库，北海东的大石作、小石作等。到了清代，这些场所都变为民居了。

明末崇祯时，李自成打破北京，由阜成门冲进来，直奔皇城西安门（俗称外西华门），远远射了一箭，射在西安门门洞中匾旁木柱上，记得其印记几十年前还在，常有人经过时特意寻找观看。

清代大官进宫上朝，一般先进皇城东安门，再进紫禁城的东华门。如1838年林则徐放钦差前，到京引见，十一月初十日记云："拟于明早递折，是晚到东华门外烧酒胡同关帝庙住宿。"1912年1月张光培等同盟会会员扔炸弹刺杀袁世凯，就是在东安门外大街上三义茶馆和祥宜坊酒店发难的，但未炸死袁，只把袁的侍卫管带袁金标等人炸死了。

皇城在30年代初叶，袁良做市长时，大部都已拆除，这已是近五十年前的旧事，但"东、西皇城根"的地方名，却仍保留到现在。至于何以没有"南皇城根"？因为它就是长安街的一部分。也没有"北皇城根"，而在地安门以东有一段也叫东皇城根，以西大部都叫西皇城根。

皇帝的家庙——太庙

所谓“太庙”，就是封建帝王的家庙，就是旧时习惯上所说的“宗庙”。在清代，这种前殿供的就是八旗皇室的始祖，清代被尊为太祖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这座太庙并不是清代的建筑，而是明代永乐营建的，清代用的是前明旧物。

太庙在建筑典制上同宫内相仿，共三层大殿，前殿十一楹、中殿九楹、后殿九楹，都是有“阶”、有“陛”。前殿阶三成，陛五出，可拟宫内“保和”等殿规模。前殿前有左右庑各十五楹，东面配飨诸王，西面配飨功臣。辛亥革命后，按照“南北军代表”所订“清皇室优待条件”规定，宣统本应迁居颐和园，城内宫殿坛庙等应归国家来管。但是宣统和逊清等王公并未执行这一规定，一直拖延到1914年。几经交涉，先将清宫三大殿以南部分划归当时北洋政府所管，包括太庙和社稷坛。社稷坛不久即开辟营建为中山公园，而太庙当时因宣统每年还要祭祀，所以 仍就封禁着。过去进太庙也是由天安门里面往东进去，南面与天安门平行线上，只是一带红色宫墙，并没有门。中山公园开辟南门时，为了建筑上对称，也在天安门东，太庙南墙上开一“起脊拱门”，就是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那座正门。而当时虽然开了门，却并未开放。直到1924年鹿钟麟进宫赶走了末代皇帝溥仪，才彻底打开了太庙的大门。此后太庙开辟为“和平公园”，不久又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按照公园办法，卖门票任人游览。不过在旧时代太庙的游客很少，园中古柏参天，寂无人声。在盛夏时，里面老柏林浓荫蔽空，暑

意全消。而在严冬三九，大雪之后，银白世界，既少脚印，更无人语，可说是旧时北京“心脏地带”的奇景，没有亲身感受的人有时是很难想象的。

太庙旧时还有一样奇物，就是“灰鹤”。这是一种在参天柏林上营巢的候鸟，春来秋去，浅灰色，比丹鹤小，北京只在太庙中有。太庙进门后东南一大片柏林，旧时四周有栏杆，人不能进去。小立栏杆边，静静地望着林中灰鹤来去，上下飞翔，是充满了寂静的生趣的。

名标青史钟鼓楼

北京中轴线的北端，巍然屹立着两座雄伟而壮丽的古代建筑——鼓楼与钟楼。它们饱经沧桑，历遭劫难，是北京历史演变的见证。

鼓楼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明永乐十八年（1420）在旧址偏东处重修，清嘉庆五年（1800）又重修。元时名为齐政楼，是元代首都大都的中心。

鼓楼建筑形式及高度近似前门等各内城之门楼，红墙绿瓦，七楹重檐，“螭吻”蹲于屋脊，神情雄劲，似有降妖伏魔、攘除水火灾星之无穷威力。楼上设置用以定时的“铜漏壶”和向全城报时的“更鼓”。更鼓横卧于架上，直径七尺，声如雷动，可传方圆数十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中日本兵用刺刀将鼓的一面划破，裂痕长二尺。六百多年古物旦夕间毁于外敌之手，焉不令人悲怆！清末民初，一度更名曰“明耻楼”。民国十年（1921）前后，于楼上展览图片与模型，用来昭示八国联军烧杀抢 劫奸淫之罪行。

沿鼓楼四面回廊而远眺，南望景山古木参天、亭影如画；西北而望，燕山逶迤、满眼黛绿；鸟瞰西南，三海（前海、后海、西海，统称什刹海）渺渺，烟景醉人；极目东方，古道尽头之雍和宫，则尽收眼底，入定澄神，似觉钟磬在耳。

鼓楼以北百米处，即钟楼也。此地于元代时，系万宁寺之中心

阁，明永乐十八年（1420）改建为钟楼，不久却遭火焚。清乾隆十二年（1748）重建，改为砖石结构，精致坚固，其高九丈九尺，与鼓楼相等。

楼中所悬巨钟，初为明代铁钟，高丈余，钟外口径约四尺五寸，上顶直径约三尺，钟钮高约三尺，钟壁厚约七八寸，重两万余斤。钟正面铸阳文“大明永乐年……造”等字样，乌黑光亮，笔画清晰，足见当年冶炼铸造技术之高超。清初重建此楼后，另铸铜钟取代铁钟，其尺寸和规格与原来大同小异，而工艺更臻精美，声音越发洪亮。

老北京人一提铜钟，必然说起“金炉娘娘”这段神话故事。钟楼西北角，乃明清两朝铸钟之基地，名曰“铸钟厂”。乾隆敕命铸造铜钟，而浇铸屡屡失败，监造官令工头克日完成，否则杀无赦。工头猜度死罪难免，遂回家与其独生女诀别。父女抱头痛哭，肝肠欲断。女儿固请父亲带其去炉前观看最后一炉铜水，其父应允，如期同行。至其工地，但见炉火熊熊、铜水翻腾，女儿看罢，忽跪地向 其父叩头决别，纵身跳进熔炉，化作碧血以明丹心，而铜钟旋即浇铸成功矣。众工匠感其孤忠，遂在铸钟厂修建“金炉娘娘庙”，长年香花供养。

撞钟所用之“杵”，乃一尺见方之柏木桩，质地坚硬，历久不朽。乾隆以前，钟楼昼夜报时，昼则正午鸣钟，夜则每更各报一次。乾隆以后，改为仅在夜间报更两次——即“定更”（晚7时）和“子正”（夜12时）。其声清扬而远闻，居四十里外大兴、通县者亦可聆及也。

古观象台

古观象台在建国门南侧的堞堵上。记得从前去建国门，距离数百步外，那浑天仪的圆顶便已粲然在目。此后数十年，记忆犹新，还会偶然想起那座蓝天夕照下光辉四射的古观象台。

观象台初名司天台，它位于元代司天台遗址上。据记载，元朝至元间初建司天台时，曾在台中盖有一座金碧辉煌的重檐大殿，巨扁御书“紫微”二字，高悬檐下。台上的浑天仪、简仪、铜毬、量天尺等诸般天文仪器，皆由擅长仪器制造学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主持造成。之后数百年，原来的建筑虽渐次塌毁，但这些仪器却留在台上完整无缺。等到清朝定鼎北京，从康熙十三年（1674）开始，陆续添造了天体仪、地平纬仪、地平仪、赤道仪、黄道仪和纪限仪置于台上。康熙五十四年（1715），造地平经纬仪。乾隆九年（1744），又造几衡抚辰仪。至此，新仪全部制造完毕，而将旧仪移到台下收藏。每逢玉兔东升，或 繁星满天，台上各种天文仪器，便一齐对准浩瀚的星空，观察宇宙深处的天体变化。这种观测手段，曾为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望尘莫及。

司天台的“浮漏堂”，曾放铜壶五件。首曰日天壶、次曰夜天壶、三曰平水壶、四曰万水壶、五曰分水壶。万水壶旁立一铜人，南向抱箭。从箭上临近水面的刻度，就可以读出具体的时间变化，无论雨雪阴晴，均可照测无误。白天测时，比用日晷可靠得多，夜间测时，又

比常用滴漏准确得多。

庚子之役，观象台仪器一度为西人劫去，后又归还。仍被置放在观象台上，民国二十年（1931），包括浑天仪在内的七件仪器运去南京，现存紫金山天文台。

离开京华很久了，最近，从题为“建国门新貌”的一组摄影作品上重又看到了观象台的容颜。只见天色湛蓝，白云如絮，在一树桃花掩映之下，观象台仍闪耀着昔日的风采。

天坛内有“小皇宫”

到北京去旅游的朋友，都要去长城、故宫一游，也有不少人去天坛、十三陵瞻仰一下往日皇室的威仪。可是在天坛里，有一处“小皇宫”却往往被人忽略。这座“小皇宫”就是位于天坛西侧的“斋宫”。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每年的冬至，皇帝要到天坛祭天，祈祷五谷丰登。按古礼，皇帝须在祭天的前三天，到斋宫进行斋戒。这三天里，不吃荤、不饮酒、不近女色、不听音乐、不理刑事等。对于一向锦衣玉食、纵情声色的皇帝来说，这当然无异于囚禁。于是，在雍正以后，又在紫禁城内另建一所斋宫。每逢祭天，皇帝先在宫中“致内斋”，到举行祭礼的前两三个时辰，才到天坛的斋宫“致外斋”。由此看来，天坛的斋宫成了皇帝祭天前的休息之地。

天坛的斋宫在祈年殿西南，圜丘西北，三处成鼎足之势。紫禁城有两道城墙——皇城墙与紫禁城墙。天坛的 斋宫也有两道城墙——外有砖城，内有禁墙。环绕紫禁城的外有护城河，内有筒子河；环绕天坛斋宫的，在砖城与禁墙外也各有一条护城河。横架在两条河上各有三座汉白玉桥。而且在砖城四角，各有驻军的房屋五间，也与紫禁城四座角楼相似，足见其建制同于紫禁城，只是规模小得多。

走进天坛斋宫两道宫门后，坐西朝东有五间大殿，绿琉璃瓦，重檐斗拱，雕梁画栋，整个建筑庄严华丽，这是斋宫的正殿。殿前左边

石亭中，供有铜人一个，据说是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像。他手捧写有“斋戒”二字的牌子，提醒皇帝勿忘斋戒。右边的石亭中放着时辰牌子，告诫皇帝按时辰斋戒、祭天，切莫错过时间。

按明清两代的制度，皇帝所居一律坐北朝南，且全部宫殿门廊都用黄琉璃瓦，何以天坛的斋宫却坐西朝东？原来这些皇帝自命为奉天承运的“天子”，既然是“天”之“子”到天坛来祭天，不啻是儿子来祭父亲，当然不能妄自尊大，所以斋宫只能坐西朝东，而且要用绿琉璃瓦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联军的总司令曾经一度住进天坛的斋宫里。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后，联军撤离了北京城，可是斋宫里的陈设古物也被囊卷而去。劫后的斋宫几经修缮，目前，游人至此大概又可领略古典建筑那流光溢彩的风姿了。

北京城门胜景多

老北京人都知道，北京的城门有“里九外七皇城四”之说。里九即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安定门、德胜门、崇文门、宣武门和前门，外七即东便门、西便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和永定门，皇城四即天安门、地安门、西安门、东华门。但说起它们的胜景来，则知者不多了。

民国以后，皇城一下子失去了昔日的威严，布衣出身者不仅可以徜徉于紫禁城周围幽雅恬静的古道，而且可以信步登上危楼百尺的天安门，凭眺天坛祈年殿及其左右擎云的苍松翠柏，彼时的感觉是碧空如洗，空气清新。而俯视横贯于城门前的“外金水河”，更是清莹如镜，映着云霞中雁阵的倒影儿，历历可数。

内城东侧是“朝阳谷穗”和“东直铁塔”。朝阳门旧时是进粮之门，因而得“朝阳谷穗”四字。此四字原刻在城门洞左侧的墙上，1900年被人毁坏。东直铁塔是在东直　　门外下关道南，现东直门外小街塔园附近，因有塔故名。所供之神像，据传是明代惠帝朱允炆。

北面是“安定真武”“德胜石碣”。在原安定门瓮城内有庙祀真武，这与其他各门所祀关帝不同。德胜石碣，也因在瓮城内西面有一黄色琉璃瓦亭，内有乾隆皇帝所写御碑文而得名。

城西侧是“西直折柳”“阜成梅花”。那是描写西直门外长河沿岸垂

柳成行，山清水秀相携至五塔寺、万寿寺游玩的盛况。阜成梅花讲的是在阜成门门洞城墙上曾刻有梅花，北京所用之煤取自西山，又多从这里进城，煤、梅同音可谓用心独具。

城南有“宣武水平”“正阳石马”和“崇文铁龟”。宣武水平所说的是在宣武门瓮城内有砖砌五火神台。此地低洼，雨季时城内之水多从此经过，流出城外。日久看城门的士兵即以此砖台为记，适时开门宣泄城中雨水，果然奏效，美称宣武水平。正阳石马所记的是正阳门箭楼与五牌楼之间路西的西河沿后身的河道中有一石马，长约二米，高约一米，横于河中，北京城的子午线之中的“午”说的就是它。午，是十二属相中属马得名。铁龟在崇文门外东北面，龟的直径有一米多，造型古朴独特。据传护城河桥下有一海眼，此龟用意即在镇保平安。

九门依次是：南正中为正阳门，左称崇文门，右称宣武门，东有朝阳门、东直门，西有阜成门、西直门，北有 德胜门、安定门。一座座巍峨的城楼点缀于古朴而雄劲的城墙之间，绵延不绝，无论在熹微的晨光中还是在朦胧的月色下，都有动人心魄的神奇色彩，并显示出睥睨八宇的大国气派。

选择风和日丽的时候沿着马道登上城楼，城内的万千景象尽收眼底——纵横交错的胡同、鳞次栉比的四合院、起飞或降落于屋顶的鸽群、枝杈虬蟠的古树、飘荡的酒幌子、袅袅腾腾的炊烟、鱼贯而行的市民、毂击肩摩的小贩……交织成一幅立体的鲜活画面。个中的情味儿，或酸，或辣，或苦，或甜，或咸，触景生情，禁不住遐想联翩，乃至对红尘之人事沧桑，感喟不已。

外城有“彰仪金人”“西便群羊”“右安花畦”“永定石幢”“左安架松”“东便游船”“沙窝黄木”。彰仪门即今广安门，“彰仪金人”是因城楼上有一石雕，呈三人背面形状，相传为金代遗物。“西便群羊”也是北京小八景之一，早年在西便门外护城河旁有数十块白石，远远望去如羊群吃草故名。“右安花畦”赞美的是右安门外花乡，春秋之季百花盛

开，一片繁茂景色。这里尤以春天的芍药，秋天的菊花最为驰名。“永定石幢”指的是“燕墩”，又称“烟墩”，在永定门外路西，刻有清代乾隆皇帝御制碑，是北京著名石刻文物。幢上镌满汉合文的《御制皇都篇》和《御制帝都篇》。清代所设的五方五镇实物之一的南方之镇就是烟墩，因在“五行”中南方属火，所以用它镇之。“左 安架松”在左安门外东南方架松村。这里是肃武亲王墓，原有建筑物很多，在碑楼与东西朝房之间有六棵古松，想见当时是非常壮观的。夏日炎热之时可以在此休息，令人神怡。

“东便游船”，记载的是东便门外二闸处，人们乘篷船消夏在通惠河上的生动概括，尤以端阳节前后更为热闹。“沙窝黄木”，沙窝是沙窝门的简称，即现在的广渠门，黄木指的是广渠门外的皇木厂。这里是明代永乐年间建造北京城时的贮存木料之所，因而驰名。

北京的外城共七座城门：正南为永定门，该门之东边为左安门，西边为右安门，正东为广渠门，正西为广安门，东北角向北有东便门，西北角向北有西便门。

登上外城的门楼，弥望的是一派野趣——汩汩的护城河、拂地的垂柳、摇曳的荻花，疾窜的野兔、翱翔的鹰隼，以及棋布的田畴、汲水的辘轳、耕地的黄牛……所见之每一景致，无不令人心旷神怡。

每座内城门和外城门，皆受过战斗的洗礼，皆浸染着爱国将士的鲜血，皆记录着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为中华民族历史见证的城门和城墙，四百余年来不曾被战火摧毁，却在和平时期被视为阻碍历史前进、妨碍城市建设的障碍而被荡除殆尽！

然而尚能得以慰藉的是，在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盘亘京城的时代潮流中，还有几只飘荡的小船——德胜门箭 楼、正阳门城楼及箭楼、东便门角楼安在。不知城楼能否旷世永存，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们评说先人的是非功过。

正阳门话旧

正阳门俗称前门，提到它，那熟悉的楼影立时映上脑际。犹记得当年晨曦初露，戎装的巡警们便在那里绕城跑操。日照渐高，城楼霞染，路上行人如流，时闻蹄声齎齎，鞭声响亮，马车快跑而过，在车后扬起一长串烟尘。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诏旨修建北京城垣。七年（1409），部分城楼建成，正阳门即其中之一。初名丽正门，正统初年始改今称。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为显示立国威严，曾对正阳门进行了两次大的修缮。竣工之后，气势愈雄，风雨沧桑数百年，屹立至今。

旧时正阳门城禁极严，为安全计，非遇天子出祭巡狩，正门终岁不启，车马行人皆从侧门出入。而左右二门，“向夕即闭”。长夜漫漫，更鼓声声，逻卒不断。至五鼓，左右门暂启一次，以便官员入城上朝。这时，因事而赶早进城的外城市民亦随之而入，叫作“赶夜城”，或“倒赶城”。庚子之后，外国人以使馆迫近城门，出入不便，要求弛禁。后来行了个变通的办法，即在入夜后闭门不锁，城门虚掩，遇有急事，随时可通。宣统时，更进而实行上半夜启左门，下半夜启右门。

明末松山之役，洪承畴被清军生俘，崇祯帝错认其殉国，乃于左门内建祠祀之。后知洪已降，遂撤其牌位，改奉观音大士。右门内有

关帝庙，神像如生而身躯矮小。相传其初塑像两尊，一祀大内，一供此间。明末，大内关帝像为火烧毁，而置于城洞者安然无恙。

正阳门轶事颇多。譬如，京师危急，则在城楼北侧悬灯示警：白灯一盏，表示敌军围城，形势危险；两盏表示短兵相接，战争十分激烈；三盏，则表示敌众我寡，京城危在旦夕。明末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据说就是因为正阳门上悬起了三盏白灯，才促使崇祯帝及早下了逃离皇宫的决心。

又如，户部尚书翁同龢酷嗜养鹤。某次有鹤丢失，翁乃大书“访鹤”二字，张贴正阳门城洞中。翌日，布告竟不翼而飞；再贴，依然；如是者三，皆被人暗中揭去。原来翁善书法，有人求而不能得，遂乘机将“访鹤”二字作墨宝揭去。以是鹤未寻成，此事却在北京城传扬开来，成为一段佳话。

听说在1976年地震中，正阳门城楼曾被损一角。但时过不久，不仅破损修复，而且整个城楼修葺一新，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大栅栏沧桑

北京的地名中，有写出来完全一样，而读音却不相同者。比如，前门外大栅栏是极著名的闹市，俗称“大什栏儿”，栅字音读“什”，发音极轻，在舌头上打个滚就过去了。而在西长安街，双塔寺东的一条胡同亦名大栅栏，读音则为“大栅（读乍）栏”，当年也是一条重要的胡同。一样的字，读法两样，是如何形成的，细说起来，很有趣。这很像旧时上海话中，大马路（南京路）读作“杜马路”，大世界则仍读“大世界”一样，不知是谁规定的。

北京前门外的大栅栏，作为北京最热闹的市场之一，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记云：

> 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点灯数十，纱笼角灯，照耀如同白昼，其在东西四牌楼及正阳门大栅栏者，尤为卓越。

这是文献的记载，如果再从著名老店六必居（虽不在大栅栏，但离大栅栏极近）、乐家同仁堂等店铺的年代推算，一家是严嵩写匾的明代老店，一家是二三百年的老铺，都可以推算出大栅栏作为闹市之久远年份了。

不但大栅栏本身热闹，和大栅栏连着的一些街道，如前门大街、珠宝市、粮食店、观音寺，也都是热闹的去处。《道光都门纪略》云：

> 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装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

大栅栏这种特有风貌，可惜在以前受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

庚子前，大栅栏路北有一家卖西药的老德记药房，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后，于旧历五月二十日放火给烧了。可能是因为药房中存有酒精等易燃物品吧，火势极为猛烈，烈焰飞腾，无法控制，四处蔓延，足足烧了一日一夜。不但大栅栏路北一带烧光，而且一直延烧过去，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直到廊房头、二三条，珠宝市、粮食店、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箭楼、东西荷色巷。火焰又越过城墙，一直烧到东交民 巷口上，一共烧了铺户一千八百余家，房屋七千余间。所谓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可这大火一场，即毁于一旦。

现在的大栅栏，那是庚子后新建的，不过恢复得较快。仲芳氏《庚子记事》中，1901年5月15日记云：近来后门大街、西单牌楼、前门大街、大栅栏被烧、被抢各铺户，均按原貌修复，比以前犹觉华丽。金碧辉煌，人腾马嘶，依然兴隆世界。作者字里行间，对一些商店重建比较迅速，新盖起来的房屋更加漂亮等，多有记述，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比以前更觉华丽”的话应该不假，试看路北瑞蚨祥、东鸿记、西鸿记几家字号的铺房，修得多么堂皇。门前有绿油漆的铁栅栏，门内

有高大的铁罩棚，阔买主的自用马车、包车可以停在这里。然后才是磨砖刻花，装着大玻璃门的楼房。楼上楼下的前檐上，都挂了许多块金字大匾，字号名称营业范围都写在上面；二楼前檐还有装饰性的匾额“云蒸霞蔚”“绮绣锦章”等。这些金字匾，都是十足纯金叶子飞粘，所以永远是光辉灿烂的。在大栅栏各种字号中，门面之华丽，除绸缎庄外，就数茶叶铺，所谓“高梦巨桶……绚云映日，绚是伟观”。东西鸿记、张一元等茶庄，都是极为壮观的铺面。大栅栏的大字号除绸缎在瑞蚨祥东号、西号，茶叶铺东、西鸿记，张一元而外，名店还有药铺乐家老店、同仁堂，香粉铺花汉冲，烟铺豫丰 号。现在没人知道后两家古老的字号了，但它们在当年却是出过大风头的。花汉冲的冰片鹅胰子、桃儿粉、棉花胭脂，豫丰号的京杂拌、兰花籽（都是烟草名），是全国闻名的啊！

当年北京还没有百货公司，瑞蚨祥虽然是绸缎店，但也兼营一些衣着百货，如皮筒子、绒线衫、围巾等。

北京南城最早的电影园子是大栅栏的大观楼，北京当年最高级的戏园子是大栅栏的庆乐和三庆。清末程长庚领梨园行，曾矢言不许梆子戏进入大栅栏。若干年后，梆子名伶刘喜奎、鲜灵芝等红极一时，却都先后到大栅栏演出，似乎替梆子戏争了一口气。大栅栏的买卖，在四十多年前，从来不做广告，一位老掌柜说：“咱们宁可少做些买卖，不能给大栅栏失身份。”这就是当年大栅栏的“谱儿”！

德胜门历史五百载

北京城墙大多已拆掉，唯保留了三座门楼：正阳门、东便门和德胜门。

北京有句老话：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此话道出了德胜门的来龙去脉。元朝末年，大将军徐达率领军队攻破了元朝的大都城（北京），元顺帝急忙从大都城的北门健德门逃走了，元朝从此灭亡。徐达便把健德门改成德胜门，也叫得胜门，可能是纪念明军取得胜利之意。这是洪武元年（1368）的事。到了永乐十八年（1420）修北京城时，就把大都城的城墙南移两公里，另外修了城门和瓮城，还叫德胜门。由此看，德胜门的命名早于北京城五十二年。

北京城建成了，只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在封建王朝时代，皇帝专门喝玉泉山的泉水，给皇帝运水的水车，从西直门出入。给宫廷运煤的煤车出入于阜成门。正阳门出入皇帝祭祀天地的车辇。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通 柴车，崇文门进酒车，宣武门出刑车，安定门出战车。出兵打仗，得胜还朝，要进德胜门。据说，清朝士兵们进德胜门时还要高唱“得胜歌”。听“老北京”说，这得胜歌就是八角鼓（单弦）的前身。

史载，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瓦剌军进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大军出安定门迎敌，一举击毙了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的弟弟

索卯那孩，把瓦剌军打得丢盔弃甲。于谦得胜，凯旋而归。这是于谦保卫北京的一次大胜仗，在历史上很有名。以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皇帝朱由检派吏部右侍郎李建泰带兵出安定门，开赴山西去打李自成的起义军。军队刚走到涿州，迎头碰上闯王的部队。兵士不战自溃，闻风丧胆而逃。李自成的大军乘胜追击，打下了北京城。朱由检见大势已去，只好在煤山上了吊。可见名曰德胜门，实际上胜败都有。

北京内城有九门，这九门都有城楼和箭楼。可是德胜门的箭楼却有点与众不同。拿正阳门来说，箭楼下有门洞和城门，而德胜门的箭楼却没有门洞和城门，也是北京独一无二的没有门洞和城门的箭楼。

清朝时，德胜门有重兵把守，派章京二员，骁骑校尉四员，马军二百名，由正黄旗管辖。

德胜门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在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康熙年间都曾经重修过，民国初年也修缮过，因为财力不足，只修了半个城台就停工了。民国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索性将城楼拆掉，卖了木料，用这笔钱给政府官员发了薪金。

漫话九龙壁

龙壁乃中国特有之建筑，由须弥座、壁身和庑殿顶三部分组成。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七龙壁、九龙壁诸形式，而以九龙壁最为珍贵。龙壁通常建于帝、后、王公居住的宫殿、王府等建筑的正门对面，有砖雕、泥塑、彩绘、琉璃等多种，而以琉璃烧制者色彩最艳丽，且颇具艺术价值。

九龙壁在北京有两处：一处在北海公园五龙亭以北，另一处在故宫皇极门前。若就造作精工而论，则推北海公园之壁为最。

北海九龙壁坐落在北海公园北岸，面向太液池，遥望琼华岛，翠柏掩映，石径相通，优雅的环境与独特的建筑艺术，珠联壁合，使北海九龙壁久负盛名。其高一丈五尺，厚三尺六寸，长八丈一尺有余，金碧辉煌，建造极为壮观。壁上九龙，辗转腾挪，各尽其妙。据记载，此壁始建于辽，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建。重建后的九龙壁， 较前壁更加雄浑壮观，虽历二百年风雨剥蚀，颜色不变，诚为最有价值的古文物之一。

九龙壁用色分黄、紫、白、蓝、红、绿、青。南北两壁，每壁用长方琉璃砖二百块拼组而成，每层四十块，计五层。若就龙的姿态而言，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跃身上腾者为升龙，俯身探海者为降龙。朝南向阳的一壁，绿海晴空，波涌浪卷。中央一条升龙，昂首冲霄，

势崩雷电。此龙两侧，各有降龙一条，色蓝，屈身蜿蜒，鳞光耀日。降龙之外复有升龙，色紫。最外面为两条升龙，色黄。天海之间，悬有巨珠六枚，光芒四射，群龙戏珠，摇首摆尾，活灵活现。

故宫九龙壁，在故宫皇极门前，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极殿为乾隆退位后颐养天年之所。传说，乾隆十分喜爱北海的九龙壁，故于此仿造。这座九龙壁长八丈八尺，高丈余，与北海的相比，增加了长度，减低了高度，其旨在于显示皇极殿之宏伟气势。

九龙壁下有座，上有檐，皆系琉璃制成。檐顶兽头亦为九龙，盘龙一条居中，冲震怒睛。每侧四龙，皆依次曲伏成朝拱之状，映日生辉，粲然夺目。檐下托以琉璃平拱四十只，庄重、厚朴、大方，充分显示出中国古建筑的传统特色。

九龙壁是清乾隆时著名匠师“样式雷”构思设计的。据说，当雷氏把烫样呈给乾隆审阅时，这位老师傅曾巧妙　　地解释九龙壁的意义道：“数至九九，壁长为暗九，乃应中华国祚万年。”乾隆大喜，厚赏“样式雷”，即降旨命工部依样建造。

除北京的两座九龙壁之外，听说山西大同尚有一座更大的九龙壁，被誉为中国“九龙壁之首”。

大同九龙壁为明朝代简王府门前的照壁，比北海九龙壁长一倍，早三百年，较故宫九龙壁长三分之一，先四百年。壁高两丈四尺，厚六尺，壁身由四百余块特制琉璃构件拼砌成，有九条巨龙腾飞于惊涛骇浪之间，并有奇山异石勾连相通，颇富于想象。龙有主次之分，颜色又有正黄、淡黄、中黄、宝蓝、黄绿之别，各具姿态，造型雄浑粗犷，气势磅礴。壁前设有映壁池，玉栏碧水，九龙壁倒映池中，龙影随波舞动，跃跃欲出，十分壮观。

定陵地下宫

在明十三陵中，只有定陵发现了地下宫。人人都希望知道皇帝陵寝在地底的状貌究竟如何，因此，定陵成了吸引人的游览地。

十三陵位于太行山余脉的燕山南麓。这里群山环抱，田林交错。定陵在长陵西南的大谷山下，陵中埋葬着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孝端、孝靖）。

万历十一年（1583），朱翊钧趁祭扫祖先陵墓时，率领文武百官和钦天监等，选定了这块地方为他自己建陵，这时他才二十二岁。据史料记载，从万历十二年（1584）起到万历十八年（1590），用了六年时间，每年役使民工三万余人，共耗费白银八百多万两，修成了这座定陵。

定陵的地面建筑并无出奇之处，与其他明陵类似，有陵门、祾恩门、明楼、宝城、宝顶等。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的地下建筑，经过发掘，已经大白于天下，并供旅客游 览，人们终于看到了地下宫殿的奥秘。二十多年前，考古家在定陵宝城（围着陵墓的圆形高墙）发现有几处下陷，并发现一处券门，于是从宝城内券门附近挖沟勘探。两个月后，挖出一条隧道，再挖至七米多深时，在隧道尽头，发现小石碑一块，上刻十六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遵循这一重要线索的引导，隧道越挖越深，在距地面二十多米深处，终于发

现用大砖砌成的金刚墙、金刚门，再经一道隧道券门，发现了地下宫殿。这新发现已在发掘的第二年以后了。

定陵地宫是一座石头筑成的大型拱券式建筑，比汉代已有的砖券更有抗压力，更为坚固。因此，虽已深埋地下三百八十多年，却没有一块石头塌陷。

地宫有前殿、中殿、后殿三重，中殿左右又各有一间配殿，全部石筑，没有梁柱。中间都以甬道相通，总面积约一千二百多平方米，殿高七米多，地铺“金砖”。中殿里，中、左、右各摆着一个汉白玉的宝座，前面有三个长明灯（实为三个盛满油的大龙瓷缸，因封墓后不久，灯火在缺氧情况下熄灭，油仍满缸，但已凝固）和黄琉璃制的“五供”。后殿是地宫中最大的一间，正中放着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后的棺椁，以及玉器、梅瓶等殉葬品。三百多年前全以人力修建如此规模的地宫，其艰巨程度实难想象。据说，所用巨石采自一二百里外，只有在严冬时节，筑路挖井，使水泼路面结冰后，才能以千百人之力拖运一 石。至于明楼等所用的楠松大木，多取自云、贵深山，在人迹罕至、猛兽出没、疫病流行的老林中采取。有人说：进山采木的人，是“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不过，光阴荏苒，物换星移，如今，古老的地宫的确不失为一个很有特点的游览之地了。

十三陵外又一陵

京北昌平县的天寿山南侧，有一片规模宏大的皇帝陵寝群，它就是著名的明十三陵：这里埋葬着从明初的明成祖朱棣至明末朱由检十三位皇帝。

但是，在京西北玉泉山的金山口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明代皇陵，名叫泰陵。因年号景泰，故又称景泰陵，埋葬的是明第七代皇帝朱祁钰。据《长安客话》载：景皇帝陵在金山口，西山不到十里，陵前坎窗，树多白杨及樗（椿树）。

那么，景皇帝朱祁钰为什么不和同宗葬于十三陵呢？

说来话长。明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入侵。明宦官王振独揽大权，怂恿二十岁的英宗朱祁镇仓促出兵，临行前令其弟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

朱祁镇既不懂军事，又无主见。五十万大军一出居庸关就遇暴风雨，前锋部队在大同被瓦剌军击溃，消息传来，只好退到怀来县的土木堡。此处虽地势高，但掘地无水，士兵饥渴劳累，被瓦剌军打得大败，数十万匹骡马、 兵器、辎重被俘，明英宗朱祁镇亦在内。此即史称的“土木之变”。

明军惨败，朝中无主，皇太后即宣布由朱祁钰总理朝政。朱祁钰

在于谦等文武大臣劝说下，继承了皇位，年号景泰。

景皇帝朱祁钰在国家危亡时刻，让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查抄了祸国殃民的太监王振的家产。之后，在北京西直门、德胜门外大战瓦剌军。敌人攻城时，他们用水浇城，凛冽的寒风中滴水成冰，城外很快结成一层薄冰，瓦剌军久攻不下，只好退兵。于谦伺机出兵，打得瓦剌军大败而逃。

公元1450年，居在塞外的瓦剌部落看到明朝已有新皇帝，便放回了英宗。朱祁镇抵京，被奉为“太上皇”，过起了清闲日子。但他并不死心，在景泰八年（1457），乘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他重登上了皇帝宝座。此一宫廷复辟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重登皇位后，将其弟废为成王，并杀害了保卫北京的功臣于谦。不久，景泰帝朱祁钰病故，由于其兄不承认他的皇帝身份，因此不准将他埋葬在生前已修好的坟内，而将他另外埋葬在西山。

至此，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明朝共有十四位皇帝在北京执政。其他皇帝均葬于昌平天寿山，而唯独景泰帝例外。

以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继位，这就是宪宗成化皇帝。他认为叔叔朱祁钰在多难之秋，保固京师有功，遂将原成王陵改为皇陵，把绿瓦换成黄色琉璃瓦，并扩建了碑亭和隆恩门。

至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帝在此立碑一座，并感慨赋诗：

迁都和议斥纷陈，一意于谦任智臣；
挟重虽云祛恫喝，示轻终是薄君亲。
侄随见废子随弃，弟失其恭兄失仁。
宗社未亡真是幸，邱明夸语岂为淳。

钓鱼台风物之美

北京钓鱼台宾馆，其风物之美，不可小记。

钓鱼台风物之美，第一点是水局、水趣。原来就有平地涌出的冬夏不竭的泉水，再加以从香山引来的活水，这就更构成钓鱼台风物的灵魂。刘侗《帝京景物略》有云："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闲，曲房人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

刘文是远追郦道元《水经注》、柳宗元《永州八记》，近接公安、竟陵的创体，清新冷隽，别具一格，只这几句，就把钓鱼台风光一角写透了。

风物之美的第二点，是山影、山色。北京西北面的西山、香山、玉泉山等，像是北京屏障，不但入山游览，景致无穷，即在城内、城边观赏，亦韵味深远，朝夕变化，晴雨变化，四时变化，各有不同，而在水边看山，更饶有佳趣。北京有名的看山风景点都在水边，从钓鱼台一带看西山，离山更近，又有水面衬托，尤其是夏雨初晴，冬 雪方霁，在此看山，正如前人所说的"苍翠秀爽之色，似欲与人衣袂接"。明人冯琢庵《登钓鱼台》诗道："是处堪垂钓，谁家常开关。树多偏近水，云薄更宜山。鸟语扶疏里，人踪香霭间。日斜仍策马，太息野鸥闲。"从这首诗中，更可想见钓鱼台水光山色的胜况了。

风物之美的第三点是花事。昔时从阜成门起，到钓鱼台，再到八

里庄，一路不少看花的所在。蒋一葵《长安客话》道：“从八里庄东抵都城，一路多僧寺，丹墙碧瓦，鳞错绣出，寺尽处人家稀阔，高垣颓圃。夹道皆是花果，艺植成列，杏子肥时，垒垒压墙外，行人可以手摘。”

嘉庆时樊彬《燕都杂咏》注云：“阜城门外摩诃庵，杏花极盛，人多载酒往游。”可见阜城门外直到钓鱼台一带的花事盛况，主要是杏花。查慎行（号初白）就有不少首看杏的诗，其中有句道：“艳入繁枝停昼鼓，淡教微雨洗花泥。”是极为形象的咏杏花的名句。除去杏花外，还有钓鱼台畔的荷花，也是很负盛名的。

风物之美的第四点是小驴和好酒。查初白老人《摩诃庵看杏花》诗前四句云：“偶逐肩舆出郭行，蹇驴斜照一鞭横。平分节物归僧舍，背指风沙带帝城。”这就是骑驴的情调。另外，阜城门、八里庄的酒最出名，是良乡白干，有著名的酒店，秋天干菜、野味上市，什么山鸡、兔脯、五香栗子等下酒菜极为丰盛，不少人骑了小驴到此来喝酒。清末曼殊震钧《天咫偶闻》中记道：“其地有酒肆，　良乡酒为京师冠，大凡往者，皆与红友论交耳。然寒风乍紧，微散初零，二三知己，策蹇行吟，黄娇半酣，紫丝徐行，望都门而竞入，顾塔影而犹眄，此中风味，亦自不恶。正可与汉代新丰竞爽。”

整段文章写得很是动人。所说“塔影”，是八里庄慈寿寺十三层塔，是模仿现在还在的西便门天宁寺隋塔建造的。

上述钓鱼台的四点风物，第一点、第二点自然现在还在，去过的人，自会领略，第三点花事还要继续培植。第四点好酒仍存，毛驴已为汽车所代替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3），营建钓鱼台行宫及养源斋、潇碧亭等殿阁，乾隆皇帝写了“钓鱼台”三字，悬挂在台殿的西面，从此钓鱼台算正式命名了。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记道：“平则门外迤南十里花园

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时，郡人王郁隐此，作台池上，假钓为乐，至今人呼其地为钓鱼台。”

可见钓鱼台的名字有其来历，在完颜亮营建同乐园时，这个地方早已得名。乾隆在这里修了离宫，实际规模并不大，也没有在这里住过，只是作为一个休息和打尖的地方。当时乾隆、嘉庆等皇帝经常住圆明园，要到城里天坛或先农坛祭祈时，并不进西直门，而是一早由圆明园起驾，顺海淀大路往南，走到钓鱼台，走了十五六里路，便在这里“传膳”。饭后起驾再往南走，进广安门去天坛或 先农坛。如果去易州西陵谒陵，饭后便直奔卢沟桥了。平时则只是一些太监至这里看管，打扫。辛亥革命之后，这里仍归清宫所管。大约在1920年，溥仪把钓鱼台赏给了他的师傅闽人陈宝琛。陈太傅当时住在西城灵境胡同八宝坑，并未搬到钓鱼台去住，但是曾在钓鱼台办寿请客。据一老人说那时钓鱼台并不残破，略事打扫，便可祝嘏称觞。

溥仪被赶出清宫之后，钓鱼台非正式地开放了一个时期，鲁迅日记中1925年、1926年两次记到游钓鱼台的事。此后钓鱼台便默默无闻地存在了若干年，直到1958年在这里建设国宾馆，钓鱼台才结束了数百年帝王离宫的历史，以簇新的姿态名闻世界了。

金匮石室——皇史宬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研究故宫历史的人，都注意“皇史宬”，这是明清两代朝廷的档案库，学者们相沿旧称，叫作金匮石室。它保存下许多历朝史录、圣训诏令、册封玉牒、重要典籍。过去皇帝在这里置官总管，是个宫闱禁地。

何谓金匮石室？据《前书》载，高帝“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注云：“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司马迁被任为太史令，写下闻名于世的《史记》，他就是曾在金匮石室里长期工作过的。

皇史宬是一组宫殿建筑，北京南池子东南御河边，原为明之“东苑”遗址，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清代几经重修，四五百年来，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动。主殿用拱形顶，又名无梁殿（样子与南京紫金山的无梁殿相同），全部石块结构，有易于防火之意。东西配殿，则是木结构 建筑。迤东还有追光殿钦天阁，刻清世祖顺治的钦天颂于石碑上。无梁殿面积约有两千多平方米，长方形，殿内分两行设立坚固石台，上置数以百计的雕龙鎏金铜皮樟木柜，扃以巨锁，编有字号，中间过道开阔，通风良好，皇室档案就贮藏在这些柜内。据《明官史》载，每年六月初六日，档案要晒晾一次，奏明皇帝批准之后，司礼监派一员监官提督，“董共事而稽覈之”。此外，还有监工看守，十分隆重，其体制的严密和布置的周到，是中国历史上金匮石室

的典型。

辛亥以还，历史变迁，皇史宬年久失修，日渐圮颓。20世纪50年代初，主管机构进行修缮，内部一度开放，让人参观。据管理人员告语，我国历史悠久，档案史料繁杂，但每每藏之不得其法，难于查阅，易于散失，未能发挥古为今用之效，应研究前人有益之收藏经验，云云。

本来，“火、水、虫、鼠”，为档案及图书典籍收藏的大忌。从参观中我体会到，皇史宬用加强警卫、注意防火、调节空气、定期晒晾、及时杀虫等安排，以消除“四害”，长期证明，这是个很有效的措施。但故宫老鼠多，对档案的保存，还是个威胁，后来翻阅王启淑《水曹清暇录》，据说：

> 皇史宬有大蜇蝎，长四五尺，风清月朗之夕，常出游，足迹大如饭碗，故中无鼠患，至今 尚存。

这段记事，当然是无稽之谈，中国的蜇蝎虫只有几寸长，夏出冬蛰，捕食蜈蚣而不捕食老鼠，但也从这里反映出档案管理人员对于消灭鼠患的强烈愿望。

北京的团城

在北海公园的南面，有个约五公尺高的圆形城台，这就是有名的团城，城不大，高踞中南海和北海之间，风景却很别致，有古树和亭殿，金鳌玉栋桥拦腰而过，像是一条玉带。1914年5月袁世凯通过李经羲在此曾召开“政治会议”，也称“团城会议”，订了个所谓“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和专制皇帝一样。

团城上的主要建筑是承光殿，形式特别，极为精致。正方形大殿的南面有正方形的月台，殿的东西北三方和月台的东西南三方，都有石级，曲径环绕。殿内横额“大圆宝镜”，是清慈禧所书，对联“七室庄严得玉镜，万年福寿获金瓯”，是咸丰“御笔”。殿中隙有四尺半高白玉观音一座，全身洁净无瑕，镶嵌宝石，晶莹夺目，雕刻艳美，面目表情慈祥端庄。玉佛是清乾隆时代西藏的贡品，其佛龛和宝座也来自西藏。但可惜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玉观音的左臂被砍伤，现已被修复，开放展览。

承光殿的南面有一蓝色琉璃瓦镜，白柱石亭，很引人注意，这是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雕刻的“渎山大玉海”的放置地。元代时放在琼华岛（北海）广寒殿中，据《金鳌退食笔记》载：“广寒殿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到明代时广寒殿倒塌拆除，玉瓮流落到西华门外真武庙（俗名玉钵庵）中，道人把它当作菜瓮。清乾隆

十四年（1749）在团城承公殿前建了一座石亭，亭名朵云，以放置这个玉瓮。玉瓮是一块大型黑玉雕成，直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圆周一丈五尺，据说可贮酒三十余石。玉瓮内壁刻有乾隆之玉瓮歌，外壁刻有鱼龙海兽，形态生动，游弋在波涛海浪之间。石亭的横额及楹柱上刻有乾隆及其内廷翰林四十人的咏玉瓮诗句。乾隆偶幸承光殿时，也赋成一篇：

几年萧寺伴寒齑，仍置承光焕彩霓。梦觉金源成故迹，声腾玉柱艳新题。若为巧合延津畔，竟得天全露章西。松杪照来千载月，夜凉依旧景凄凄。

这一具有七百多年历史的文物，还完整地保存到现在，供人们欣赏，是十分难得的。

团城原来是个小岛，和琼华岛遥遥相对。据《日下旧　　闻考》载，“元仪天殿在太液池上”，可见在元代时团城四面临水，而今东、南两面与陆地相连，是其不同的地方。当时仪天殿东面有木桥，与大内相通，西边是吊桥，即今天的金鳌玉栋桥。早在八九百年前，金朝时代就在这个小岛上修建了殿宇，直到现在还有金代遗物白皮松一棵。元代时在这里建仪天殿，又叫瀛州园殿，其形状同现在天坛祈年殿相似。明代时改为承光殿，清康熙七八年间，承光殿倒塌，后又草草重建，到乾隆十一年（1746）才建成今天这种形式。

承光殿两侧有东西配殿，后面东侧有古籁堂和朵云亭，后面西侧是余清斋和沁香亭，最后边是敬跻堂。以上各处，梁启超曾作读书的地方，北洋军阀时代，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职，与财政部同人，公饯于此。

另外，这里的几株古松，也是挺有意思的，值得一看。

承光殿东侧的一棵，名叫桔子松，它要算北京历史记载上最早的一棵松树了。八百年前，它就生长在这里。那时团城还是水中的一个岛屿，和北海琼华岛遥遥相对。传说金章宗和李妃来此游玩，曾在这棵松树下小坐并对过一副对联。金章宗刚说出“二人土上坐”，李妃立刻对了“一月日边明”，对得非常工整。这故事一直传下来，并被记入许多文献中。明、清两代，都有许多诗文记载这棵松树。乾隆皇帝特为它作了一首《古桔行》的长诗来歌颂它。 诗中说这棵松树与一般松树不同，叶是三针而非五针，所以不称松而称桔。这棵古松，树干苍劲，如龙爪抓空，针叶亭亭如盖，每当夏日，浓荫铺地，十分凉爽。因此，过去封建皇帝曾封这棵松树为“遮荫侯”。

团城西边有棵松，树根在城上，可是树枝扭转向北，探视北海去了，姿态极为优美。因此，它被称为“探海侯”。后因枯死而被刨除了。

此外，在昭景门之后和敬跻堂前有两棵大白松，名为“白袍将军”。

据说，这几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侯”和“将军”，那时每年都有“俸禄”，但它们哪里见得到银钱呢？还不是都被活人贪污去了！

“龙潜旧邸”雍和宫

近闻北京的雍和宫已修缮一新，重新开放，接待游人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雍和宫已多年没有开放过了，现在能修缮之后，加以开放，这对旅游者说来，实在是个很好的消息。雍和宫在北京内城的东北角，1723年之前，这里是康熙四皇子，雍亲王的府邸。康熙死后，雍亲王做了皇帝，住进皇宫，这里便成为出过皇帝的所谓“龙潜旧邸”，只能改为庙宇，不能再让别人居住了，何况乾隆帝弘历也是在这个府邸中出生的。

这座府邸在雍正当皇帝后，即改为“雍和宫”。宫里面的建筑物很多，前面是“天王殿”，中部为“雍和宫”，后面为“永佑殿”，再后为“法轮殿”，再后面是“万福”“永康”“延绥”三阁，还有“绥成殿”“寿皇殿”戒坛。在宫的东面，是一所书院，名“太和斋”。斋东有室名“五福堂”，斋西为“海棠院”。院西有楼为“斗坛”，名叫“祝龄坛”。宫西部的后面还有“关帝庙”，前面还有“观音　殿”。雍正初年改为雍和宫时，仍由太监看守。后来根据清代的所谓“家法”，“凡先皇临御与居之所，多尊为佛地”，因而在乾隆初年，便派西藏喇嘛来此驻守供佛，成为喇嘛寺了。

雍和宫大殿中供的佛像，墙上画的佛家故事，都十分优美。《天咫偶闻》记云：“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坛之像，飞阁复道，无非净筵，画壁璇题，都传妙

手。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情景，除建筑物外，还有不少假山石及花木点缀其间。

在清代，雍和宫的喇嘛除一般诵经礼佛之外，还分四种学科，一是“天文学”，二是“祈祷学”，三是“讲经学”，四是“医学”。宫中喇嘛，各分一科，终生不变。

几十年前，雍和宫最著名的是“打鬼”和“欢喜佛”。“打鬼”即“跳布札”，说起来比较复杂，需专文介绍。“欢喜佛”是作人兽交媾状的铜佛像，即佛经所说的“欢喜天”，大小都有，有人好奇想看看，实际都是很狰狞的，当年雍和宫的喇嘛以此为奇货，拉起黄缎幔看看要一块大洋呢。

盛夏话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地属原热河省，故又称热河行宫，俗名离宫。离宫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营造期间长达八十七年，占地五百六十万平方米，周围宫墙长二十华里。行宫园内围进了许多山丘，周围山岭环抱，康熙为其题名“避暑山庄”。

山庄内有大小山岭、溪谷、平原和湖泊。宫墙随山势的起伏而修筑，墙内分别布置了一系列宫殿、楼阁、亭台、庙宇、塔寺等，构成了一处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大型园林。康熙曾在山庄内题咏了三十六景“御诗”，并附入图画。后来乾隆也题写了三十六景，合共七十二景。整个山庄，湖水清澈，山峦苍翠，林木葱茏，殿宇巍峨，有各类建筑一百多处，分成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

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宫殿建筑。正宫主要建筑有丽正门、澹泊敬诚殿（俗称楠木殿）、四知书屋、烟波致爽、云山胜地等殿　堂，是清帝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地方。松鹤斋在正宫东面，曾经是乾隆母亲的住所。庭中养鹤并遍植古松，风致清雅。据说当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就是在这里开场的。

避暑山庄的苑景区又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

湖区在宫殿区北面，湖光变幻，洲岛错落，景色优美。据传，当年乾隆几次下江南，对苏杭一带的景色和园林心迷神醉，故在华北营

造大型园林时，要工匠们极力模仿。山庄的湖区就是把江南水乡风貌巧妙地移植到北方的突出范例。这里众多的岛屿、洲渚曲曲折折地分割掩映，其中散布着水榭、长桥、小亭、飞瀑等奇特景观，具有层次分明、山重水复、妙趣丰富、曲折多变的格调。

平原区在湖区以北，沿湖岸自东而西有甫田丛樾、莺转乔木、濠濮间想、水流云在四亭，以及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而建文津阁。文津阁里珍藏过一部《四库全书》。

山区在离宫的西部，山势起伏，苍松遍布，曲径通幽，极为清静。高峰上原有四亭，现仅存南山积雪、四面云山、锤峰落照三亭。登高远眺，磬锤峰、蛤蟆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承德奇峰怪石和外八庙幢幢建筑，都一览无余。

这样一座博采众长、雄奇秀丽的避暑山庄，在两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中，遭受了多次洗劫。慈禧为了经营颐和园供自己享受，置避暑山庄于不顾而任其倾圮。随着时光的流逝、风雨的侵袭，很多建筑物都已屋顶渗漏，木料糟 朽，其残破没落情景，酷似当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清廷又将避暑山庄里的文物珍宝运到北京，填补遭受八国联军洗劫的空荡荡的宫廷。民初北洋军阀时期，山庄更迭遭破坏，古物一再失盗。在汤玉麟主热河时，山庄文物建筑又一次蒙受劫掠和破坏。“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承德，山庄随之沦陷达十二年半。承德离宫成为日寇侵略军的大本营，日军师团司令部即设于山庄德汇门内的东宫，日军的一座弹药库设于狮子沟的罗汉堂。其壮丽景色，面目全非。日寇投降前后，山庄又遭掠劫焚烧，无数珍贵字画失踪，文庙的金钟玉磬下落不明，绥成殿变成了弹药库和榴弹营的驻地。日军撤离承德时，山庄里瓦砾山积，湖沼淤塞，满目荒凉。

近三十年来，山庄造林植树已逾千万株，并经三次疏浚湖区，名园渐成新貌。夏日，站在金山亭上眺望湖区，水面红荷绿叶，湖水清

澈如镜，不禁令人想起康熙帝形容山庄的诗句：“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

慈禧的保定行宫

慈禧行宫在保定古莲池畔，我早年曾多次到该地游览。在莲池北塘正东有一端庄秀丽的水东楼，楼分上下两屋，构造独特。下层宽展，上层内缩，空出豁敞的楼台，边沿有双层栏杆保护。凭栏四顾，可饱览莲池胜景。奇怪的是，此楼殿堂屋脊上有一“莲叶托桃”的石雕，其他殿堂上也多见“莲叶托桃”的造型。当年的建筑师在设计上为何如此别出心裁呢？

提起“莲叶托桃”石雕的来历，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是由当年慈禧西逃引起的。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吓得魂不附体，遂挟光绪等人慌忙出逃。他们装扮成老百姓模样，昼夜兼程，从北京一直跑到西安。同年11月，英、法、德、意军队侵入保定，莲池宝物被洗劫一空，亭台楼榭被摧毁殆尽。翌年，慈禧从西安经保定返京，提前几个月便通知要经过的州府，为她建造行宫。

负责这项工程的是新上任的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为讨慈禧欢心，便到处选调能工巧匠，强拉民夫，搜刮钱粮，不分昼夜地强迫人们赶修行宫，并修建莲池为“御苑”，这给刚遭洗劫的保定民众带来极大灾难，全城百姓怨声载道。

被召来的工匠们更是气愤和痛心，为了出气，大伙儿一合计，便

在宫殿屋脊上雕塑了一个大荷叶，荷叶上托着一只大仙桃。荷叶又名莲叶，“莲叶托桃”谐音为“连夜脱逃”，意在影射慈禧一伙连夜逃出北京的丑态。

当时，大太监李莲英看出了破绽，禀告了慈禧。慈禧恼羞成怒，下令杀害了工匠们，石雕也同时被毁掉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被杀害的工匠，让后人永记慈禧的这段历史，又在莲池的其他亭子脊上，重新建造了“莲叶托桃”的石雕。

泰山岱庙天贶殿

天贶殿在山东泰安岱庙内，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据《宋史》中记载：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真宗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六月乙未，天书再现于泰山醴泉北。十月，真宗东巡，封禅泰山。该殿即为此而建，因名“天贶”。明朝改称峻极殿，后恢复原名。殿阔九间，东西长48.7米，宽19.8米，高22.3米。殿筑在石台之上，白石雕栏，重檐歇山顶，琉璃黄瓦覆盖。

关于天贶殿，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小山神庙，断壁残垣，年久失修，不避风雨。庙里的道士决心自己攒钱修庙。道士把香客送的钱和化缘来的钱收集起来，藏在神台底下，年复一年，钱终于攒够了。他虔诚地对山神说：“山神爷，我给您老人家修庙的钱够了，过不了多久，您就不用再担心风吹雨淋，跟我活受罪了。”当晚，一个小偷趁道士睡下，把所有的钱　都偷走了。第二天，道士发现钱丢了，像丢了命一样。是晚，睡着的道士在朦胧中，只见山神笑着对他说：“别着急，庙自然要修，还不用自己动手。当今京城里皇姑得了重病，请了各地名医都没治好，我有三包香灰，你拿去给她诊治。到那时，庙自然就有了。”道士醒来，手中真有三包香灰，于是他便到京城去为皇姑医治。连用三天香灰，皇姑的病治好了。皇上要赏赐他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道士一概不要。皇帝甚为不解，问道士：“你想要什么？”道士把如何攒钱修庙之事说了，皇上

于是答应帮他修庙。问道士将庙修成什么样的？道士环视四周脱口便说：“我看你这屋不错，就修这样的吧。”皇上为不失信于民，就答应修了比金銮殿矮三砖的天贶殿。

诚然，这个传说有些离奇可笑，实际上天贶殿建在前，太和殿建在后。太和殿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初谓之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改名皇极殿，清朝顺治二年（1645）改名为太和殿。现存建筑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殿内共有七十二根楠木柱，重檐四阿庑殿顶，彩画为双龙合玺大点金，是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形式。

天贶殿前约三丈远处，筑有两座石台，一东一西，对称而设。台上各设一个硕大生铁桶，墩实稳当，不可动摇。桶高约三尺半，厚寸许，周长丈七，可盛水三立方米，工艺十分精致。桶的外壁有铸饰四层：首层为铭文，间铸花卉；次层为花鸟，间铸狮头形耳提四个；第三层为　龙；末层为狮。铭文为从左至右竖铸的正书。东者铭文“大宋国奉符县献铁桶会首李谅，右谅窃以神功默运，潜持祸福之杀，妙用无穷，密握生成之造。伏见国家尊崇庙宇，百物鼎新，而圣帝庙前阙少水桶二只”云云，西者铭文“莱芜监铜务李冕铸。右众人持发虔心，谨舍净财，共成胜缘伏望圣慈府照察。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会首李谅等献”。

从铭文可知，此二铁桶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奉符县水会会首李谅等三十一人，为天贶殿免受火灾，施钱铸造铁桶耗资计一百七十贯文，这为当时可观之数，可见造桶者对帝王用心之虔诚了。

然偌大一座岱庙，如遇大火，两只消防水桶何济于事？据清乾隆年间修纂的《泰安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大火，岱庙遭毁灭性破坏，“正殿门廊俱焚，古树碑刻亦多毁”。大火之后，岱庙天贶殿重新修复，两只消防铁桶却劫后余存，安然无恙。

此外，能与前两大殿媲美的还有山东曲阜孔庙内的大成殿，唐代

称文宣王殿，宋徽宗赵佶尊崇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更名大成殿，并御书匾额。明成化十六年（1480）重修，弘治十三年（1500）火后重建，清雍正二年（1724）遭雷击，又重修。此殿外形近似太和殿，但比太和殿略低，重檐九脊，斗拱交错，黄瓦朱甍，巍峨宏丽，气象庄严。

天贶殿、太和台、大成殿，为中国大殿之“三最”。

恭王府并非大观园

《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令人想象出一张幽雅的古典园林的蓝图来。于是有人提出北京的恭王府就是当年曹雪芹写大观园的模型所在。

有个叫徐珂的，在《清稗类钞》中说：“京城后城之西北，有大观园旧址，树石池水，犹隐约可辨。”

谢锡勋的《红楼梦分咏绝句题词》之六的原注中说：“十汉海，或谓即大观园遗址，有白石大花盘尚存。”

芸子的《旧京闲话》中说：“后门外什刹海，世传为小说《红楼梦》之大观园。”

《燕京贞明录》中也说：“地安门外，钟鼓楼西，有绝大池沼，曰十刹海，横断分前海、后海，夏植荷花遍满……后海清醇王府在焉。前海垂柳夹道，错落有致。或曰是《石头记》之大观园。”

上述材料指出的只是大观园址的大概轮廓，现今的一些学者，则更为具体地将大观园与恭王府联系起来，说：“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北京的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

但是传说终归是传说，不等于事实。根据乾隆十四五年间绘制出

的北京《乾隆京城全图》来看，此图绘制时，是采用最先进的测量技术绘制出来的，其测绘的比例尺为六百五十分之一。这张图经过多次的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性与精确性是不容否定的。从《乾隆京城全图》来看，在恭王府邸区域内，当时有九路并列的大院落，其面积大小不等，总计有四五十个；在花园区域内有七路并列的院落，总计约有四十多个，但都找不出规模大小及形状有恭王府及其花园相同的院落和房屋。

根据史料记载，恭王府原是乾隆宠臣和珅的府邸。和珅本出身卑微，由于他善于钻营，深得乾隆皇帝宠爱，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后爬到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等职。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还将其最宠爱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赐婚于和坤的儿子丰绅殷德。由于和珅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卖官鬻爵，贪污纳贿，积蓄了大量资财。乾隆死后，和珅失去了靠山。嘉庆亲政，将其治罪，赐令“自尽”并抄没全部家产。在被抄没的家产中有两个地方涉及房产：一是说和府所盖的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庆贤堂（恭王府）的锡晋斋里的多宝阁与隔断式样，都是仿照大内宁寿宫制度建造的；二是说和珅宅第花园里的观鱼台（恭王府花园原水池中的水榭），与皇家圆明园的蓬岛瑶台无异，但与大观园景物无干。

这完全可以说明，现恭王府地段，在和珅发迹之前，并不存在明代或清初的大宅第、大花园。恭王府的前身，最早只能上溯到和珅宅第。它是乾隆晚期拆除了原来的散落民房才修建起来的。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他生前写《红楼梦》，自然不可能以恭王府为大观园蓝本。因此，今天的恭王府，并非《红楼梦》的大观园。

“纪大烟袋”及其故居

清朝著名才子纪晓岚，又名纪昀，祖籍河北献县，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乾隆年间，纪昀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他不但才识和胆略非凡，而且在生活习性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其中最突出的两点：一是他从不好饮酒，不食谷物，吃饭时，桌上只摆猪肉十来盘，茶水一壶，日食肉十斤左右；二是烟瘾特大，他自行设计了一个造型独特的大烟袋，烟管长三尺，烟锅一次能装三四两烟，故人称其“纪大烟袋”。

有一次，“纪大烟袋”刚点上烟抽得正起劲时，忽然皇上召他前去议事，他急忙将烟袋插入靴筒便进宫见驾。但谈话间，他越来越觉得火烧火燎的难受，原来烟袋里的烟未灭，在里面逐渐燃烧起来。但他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暗叫苦。后来实在忍受不住了，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皇上见状，忙问为何突然伤心落泪？他只得如实禀报：靴内失火了。皇上只好恩准，待他到外面脱下靴子时，已是 浓烟四起，脚上肌肉被烟烧焦了一大块。

据说“纪大烟袋”这一袋烟，从虎坊桥的家抽到圆明园，几十里路都抽不完。

说到纪晓岚的家，现在留传下来的在北京南城虎坊桥之东，即而今的晋阳饭庄。据说北京市政局已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自

纪晓岚1804年去世，距今已将近二百年，老宅历经沧桑，数易其主，改建、扩建之处甚多，现已面目皆非，恐怕称其为故居遗址更加确切一些。

纪晓岚的这所住宅，并非他本人所建，而是其父姚安公纪容舒（曾任云南姚安知府）在刑部任职时购买的。此前则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在北京的临时住所，故其建筑并不很宏伟。传说院内有一太湖石，高七八尺，是雍正皇帝特意让人从中南海的兔儿山移来赐给岳钟琪的。纪晓岚很喜欢这块大石头，曾以“孤石老人”自居。他把住所内的书屋取名为“阅微草堂”，匾额也是他亲手书写的，后来人们常把“阅微草堂”作为纪晓岚故居的代称。到40年代那块太湖石就已不知去向，但“阅微草堂”的匾额仍悬于东院北屋门上，后来直隶会馆在此办公时，将匾取去。纪晓岚曾写过一本《阅微草堂笔记》，有人认为即是在此屋写的，其实该书是在滦阳和“槐西老屋”所作，只不过借用了“阅微草堂”之名而已。

至于“槐西老屋”，至今只知道是纪晓岚在海淀圆明园附近的另一处住址。据记载，其院子东面有一棵大槐 树，枝叶繁茂，树荫可遮盖大半个院子，似一个自然天棚，夏日可在下面乘凉避暑。这处住宅也不是纪晓岚自己建造，而是其二女婿袁煦借给他居住的。他在这里写的“槐西杂志”即为《阅微草堂笔记》中之一部分。此处离圆明园很近，可随时去园中游玩。纪晓岚很喜欢这个地方，闲暇时和退休后，常到此写书和休息。后来因这里变迁太大，原住址很可能已被改建或拆除，所以其具体地点至今仍难于查找和认定。

园林建筑

北京最早的公园

北京最早的公园——万牲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过去北京人习惯把它叫作“三贝子花园”。“贝子”全称“固山贝子”，亲王、郡主的儿子，有的封作“贝勒”，“贝勒”之子得封为“贝子”，“三贝子”是行三的“贝子”。实际这个园子最早名为可园，本来是高梁河南岸的园林。其东部是乐善园旧址，再往东是高梁桥。河北岸是倚虹堂船坞，是当年西太后那拉氏由水路去颐和园时，下御辇、登御舟的地方。可园在光绪中期已废，在光绪二十几年之后，那拉氏拨“胭脂银”二百五十万两，修建为御园。园中有座著名的西式建筑物畅观楼，是为准备太后临幸而建筑的。万牲园早期，畅观楼任人参观，楼上楼下都摆着很高级的红木家具，铺着很大的华丽地毯。在各家具中，有一件特别引起人们——尤其儿童——兴趣的，是两面特大的“哈哈穿衣镜”。它们被摆在楼下大厅左右两侧，一面照人细长，一面照人矮胖，同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 类似。不过畅观楼的那两面是紫檀螺甸边框、紫檀底座的穿衣镜形式，较之大世界的考究多了。

畅观楼最高处东西各有一个小亭子，虽然朴实无华，但可眺望全园，颇得“畅观”之趣，过去游人是可以随便上去休憩眺望的。畅观楼的东北面，有一座游廊环绕的庭院式的建筑物，那是有名的“豳风堂”，是准备迎接那拉氏观稼的地方。堂名“豳风”，取义于《诗经》中《豳风》篇《七月》章，是“颂圣”的意思。因《七月》章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头，而以“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句结束。这个“豳风

堂”造起来，当年也是为那拉氏祝寿的。不过她来过没有，传说不一。在“豳风堂”的东南，隔一条小河，过去还有两幢日本式房屋，全部是用木头按日本房屋样子造的：鱼鳞片式木头墙壁，做工很细的拉门，“障子”房外还有矮矮的苍翠的塔松，东洋味很浓。这两幢房屋原是供展览的，但后来却变为很好的一种风景点缀了。

万牲园是清代光绪末年施行新政时的建筑之一，在七十年前已经开放接待游客了。《鲁迅日记》记载他在民国元年（1912）五月中旬初到北京没几天，就同友人到万牲园游玩，当时已开放几年了。因此，如果编写《北京公园史》，无疑万牲园是北京最早的公园了。

万牲园有几年曾改名为农事试验场。但过了没多久，又改了回来。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都是叫万牲园的。所谓“万牲”，是指各种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在 最初设计上，东面展出动物，西面展出植物。昔人诗所谓：“入园分两界，中隔一湾水，植物與动物，划然分彼此。”好在万牲园的入园处，多少年来并没有改变，现在仍可看出旧时痕迹。只是旧时展出的动物少，只集中在东边二内那一小片地带，不但象房很小，其他几个猛兽馆也很可怜，都是养在房中，没有一点露天场所。那时大一点的猛兽，只有两头狮子、一头豹、一头老虎和两三只熊。这些猛兽分别关在三四座六角亭子似的兽馆中，里面像大铁笼子一样，有固定的铁栅栏，外面还有一圈玻璃窗。游人便隔在敞着的玻璃窗外面，看铁笼子中的猛兽。原来曾有过一头斑马，当年叫“文马”，老早就死了，后来制成标本，也供人参观。游客中不少人从动物学中知道长颈鹿，其又名麒麟，但万牲园中从来没有饲养过。至于熊猫，这种珍贵的“宠儿”，当年一般人就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了。那时经费不足，再加贪污，仅有的一些动物，不少后来都饿死了。蜀人邓忍堪20年代末曾有诗道：“豹房虎圈尽空虚，兽簿何从问啬夫。”并自注云：“园中豢养猛鸷，多以馁毙，唯猴类尚多，游人聚观，顿时有无英雄之叹。”从诗注中可以想见五十多年前万牲园凄惨的情况了。

不过当年的万牲园仍有它的可取之处。那就是因为它本是宗室的名园，旧时乔木比较多，又有河、有池，夏日颇得水趣，风景较好，这是别的地方的动物园无法比拟 的。湘人叶焕彬《观古堂诗集》中收有一篇七言长诗《游万牲园》，其中描写风景道："西行忽见飞桥连，下有曲涧鸣流泉，舟子抱桨眠柳絮，园丁缚帚扫榆钱，桃李杏梅柰柿枣，百果分种连花田……"因为当年除去动物展览之外，还有植物园。所以百花、果树，都得到应有的点缀。不然，单纯几样动物，像马戏团一样，又有什么意趣呢？

当年万牲园中另有最出名者，就是门口收门票的那两位巨人。现在年纪大的人，应该还有不少看到过这两位的，两人像两座塔一样，站在门前收票，孩子们特别感兴趣。其中一人，后来应美国好莱坞之约，出国表演，一时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概中外记得此事的人还不少吧。

朱启钤改建中山公园

1983年6月，张学铭先生在内地病逝，痛悼之余，不禁念及其岳父朱启钤，更想到朱启钤对辟北京的中山公园所做出的功绩。

中山公园的前身是清代的社稷坛。清亡后，坛中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豢养猪羊，任意践踏。1913年春，亡清的隆裕太后死，在太和殿治丧。当时的交通部长朱启钤担任现场交通指挥，借工作之便到社稷坛巡视，见状即有将坛改辟公园之想。翌年春，由热河避暑山庄运来大批古物和四十四只山鹿，无法安排。于是朱启钤亲自找尚未出宫的废帝溥仪交涉，将三大殿和社稷坛交民国政府管辖。议妥后，朱氏首先来到社稷坛南坛门外东侧的三间北房，他看到屋内杂物狼藉，灰尘积浮，便命人稍做清理，作为今后建园议事、筹划办公之所。并命名为“一息斋”，意即只要一息尚存，其建园之志不使稍懈。

经过朱启钤的各方奔走，大官僚之间发起募捐办法， 筹措建园经费。前后募捐积五万余银元，朱启钤自己也捐一千元，“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捐一千元。按照后来成立董事会时的章程，当时捐款五十元的即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各届董事会会长，各届公园委员会主席均为朱氏，前后约三十五年之久。募得款项后，又得到步军统领江朝宗的支持。由他派遣工兵一营来园协助，斩荆除棘，修路铺石。在此期间，朱启钤每天来园督工。1914年公园开放后，物议横生，流言四起，对朱氏改坛建园之举，多方谴责，众说纷纭。有的说

是破坏古制，有的说是侵占古物，更有的说是自好土木，以资娱乐。但朱氏建园之意，未因流言有所动摇。又经两年后园内建设才初具规模，当年非议一时的人们也来游春遣兴，踏雪抒怀，对来今雨轩的名肴佳馔赞不绝口，对那曲栏塘称闹市桃源。当年社会上的激情怪论，早已不平自消。

朱启钤常与梁思成等人，稽古钩沉，考察历代名园古刹之建筑。对于社稷坛的改建，故有既定之宗旨：添建只能在坛垣四周，坛内一切建筑，仍要保持旧观；其次对于园景的布局和塘榭亭台，也要保持中国园林之传统特色。所有新建工程，皆由泰生木厂承揽，因为该厂厂东马辉堂在清末时曾包揽颐和园和慈禧陵墓工程，既有传统建筑之经验，又有擅长古建筑的能工巧匠。

1916年朱氏解政退隐，侨居津门，1918年春重到故乡，仍念念不忘斯园之建设。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圆明 园遗址内尚有不少珍贵遗物，豪门权贵，争往攫夺。朱氏此时深感历史文物重遭劫祸，遂遣人前往，择石之较异者移置园内，借得永久保存。

1939年朱氏年事已高，隐居沪上，欢度晚年。行前曾与同人等在西坛门外土山下合影留念。后又亲自撰写《一息斋记》一文，今天读起来，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荣辱坊随想

坐落在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原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自1914年辟为公园以后，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文物古迹和苍松翠柏，而且还增建了一些新景观及奇花异草，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图景。

然而在这瑰丽多姿的园林内，也有一处使人望而生叹之物，那就是迎南门矗立的那座汉白玉柱蓝琉璃顶的牌坊。不仅因其色调与周围景色不和谐，而且因为它给中国人留下了一段受欺辱的记忆。

1900年6月20日，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大沽口炮台，拟向北京进犯。在北京，义和团正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城内紧张混乱。一队清军巡逻兵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受到德国公使克林德开枪挑衅，旋即还击，将其击毙。就是这位蔑视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德国公使和随员，曾于四天前开枪打死义和团民七人，激起了义和团民极大愤怒。这次被执行巡逻任务的清军击毙，总算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

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第一款便是要求清政府在克林德被击毙处“树立铭志之碑”。这是对中国人格、国格的巨大侮辱。该碑建成后称“克林德坊”，立于西总布胡同西口，让过往的行人低头从胯下通过。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协约国战败。中国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喜讯传到北京，西总布胡同的老人哭了，想用眼泪冲掉心里的屈辱。义愤的群众立即动手，将“克林德坊”拆毁。此事本可算了结了，但协约国的某些外交官们，却要德国将牌坊修好，移至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坊”。在他们心目中，《辛丑条约》《中俄密约》《中日马关条约》《中法新约》等不平等条约都是公理，将战前德国在中国窃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也是公理。直到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才决定将此牌坊改为“保卫和平坊”，郭沫若先生挥毫题写了“保卫和平”四个大字。

北海公园铁影壁

京华北海公园里的五龙亭、画舫斋、濠濮涧、九龙壁、静心斋等，会使游客流连忘返，但是北岸铁影壁却很少引起游客们的注意。其实，说起这铁影壁的来龙去脉，倒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沧桑史。

北海里的大多建筑和文物都是原来皇家园林里的遗物，唯独铁影壁是1947年从别的地方移来的。世间众说纷纭，笔者当年倒是做过一番调查的。

现在的北京城，是明初在元代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德胜门外的土城就是元代北京城北面城墙的旧址。明初将北面城墙南移，土城以南德胜门以北便成为一片荒郊，这座铁影壁就是在这一片废墟中发现的。它被遗弃的位置，正是元大都城内东北角落。由此可断定，它是元代的遗物。

这座铁影壁被发现后，有人便将它移到德胜门内东边的一座尼姑庵里。后来这座尼姑庵所在的胡同，大家便叫 它铁影壁胡同。自从铁影壁移到尼姑庵里之后，尼姑很珍爱它，经常为它扫尘水洗。师徒几代相传一直到民国，当时的住持尼姑法名青莲，她对待铁影壁的爱护一如既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有一天忽然有个美国人来到庙里，声称要以重价购买这座铁影壁；虽然受到青莲的婉言拒绝，但那美国人坚

持要买，并且临走时说道，第二天派车装运回国。尼姑青莲自那美国人去后，一直忐忑不安。哪一个中国人不又气又恼呢？青莲一夜未睡，在筹思应付对策，但始终没能想出什么好办法。直到天将黎明时，忽听邻居有人在劈柴生火，劈柴的声音凿凿不绝于耳。青莲这时心里一动，急忙拿起一把斧头，走到铁影壁跟前，忍痛东一斧，西一斧，竟把个完整的铁影壁砍伤多处。等到美国人来时，见到这座铁影壁已成残物，便愤然离去，从而这座铁影壁才保留下来。

1947年，这座铁影壁才移至北海公园北侧。如果细心的游客认真看时，还能看到几处伤痕。

回声壁　回声塔　回声阶

回声，俗称会声，它是声音遇到障碍后折射返回的声音。它的形成是有条件的，一是障碍对声波要能形成反射，二是声音折射返回的时间要超过五十毫秒。原声和回声若在相同时间到达听者耳中，则听者无法区别哪是原声，哪是回声；如果回声较原声到达听者耳中的时间延迟五十毫秒，便呈现为一清晰的声音。我们的老祖先把这一原理加以应用，建成了回声壁、回声塔和回声阶，在世界建筑宝库中，堪称绝妙的智慧。

北京天坛的回声壁，也叫回音壁，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回声壁正中用汉白玉砌成三层圆形台子，称“圜丘”。周围用两重矮墙环绕，内墙为圆形，外墙为正方形，这圆形的内墙便是回声壁。两重矮墙的四面建有白石棂星门，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栏板尺度和数量都比较符合声学原理。

后来人们模拟“圜丘”，在南京中山陵建造了一个音　乐厅，台上也有一座回音壁。在台上唱歌、小声说话，不用麦克风，台下也听得清清楚楚，使得中山陵音乐厅名噪一时。

回声建筑的另一佳作是山西永济县蒲州镇的普救寺莺莺塔，相传唐代儒生张君瑞和相府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莺莺塔高五十米，四面十三级，二层以上才有阶梯。以石投塔前，则声在塔

后；如投石其后，声又在塔前。塔基南面有一击石处，只要拣石叩击此处，就能从塔顶传来阵阵悦耳的“咯咯”声，很像夏天夜晚水田里的蛙鸣。这蛙声是哪儿来的呢？当地人传说是因为建塔时工人师傅在塔基里埋了两只金蛤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在音响效果差的剧场中看戏，常常有一种杂音在回荡、颤动，它破坏了演唱者的音质、音量、音色，使许多独特的赋有艺术魅力的歌声变得模糊，这是声音相互干扰造成的。莺莺塔却反其道而用之。塔底的叩击声通过塔内各种室形的反射、折射、叠加、干涉，混合形成模拟的蛙声，并通过若干孔道，传到塔的上层直至塔顶释放出来，传入人耳，即能“蛙声一片”了。

与莺莺塔相似的还有河南郏县的蛤蟆塔，以掌拍塔身，则能发出“咯咯”的蛙声。

另外还有回声阶，指的是四川潼南县大佛寺的石琴。据县志和碑文记载，回声阶在唐咸通年间建造。游人从大佛阁的右侧拾级而登，步履触处，“咯咯”作声，犹如古 琴悠扬。其中以第七级石阶音响最为清晰，俗称“七步弹琴”。古时传说石阶下面均埋有宝珠，故能发声，实际上这石琴也是回声原理造成的。

当人们拾级而登时，石阶因外力撞击而发声，再经过石阶各种不同室形的若干反射面，按一定的路线，通过孔道、缝隙释放出来便形成了悠扬的琴声。

天坛古树

看谈迁《枣林杂俎》中《荣植》篇，记北京古木有十七八处之多，这是明末清初的情况，距现在三百多年了。其中所记树木，不少在清朝末年也还存在，如报国寺挫松，左安门外韦公寺海棠等，也都还散见于清末一些人的著作中，不过后来也就再无人谈起了。他曾记载了天坛的榆树，文云：“京师外城，天坛拗榆钱，凡榆春钱，天坛榆之钱以秋。”这同天坛的龙须菜一样，都是奇迹，不只一次地见诸清人著作的记载中。但是在过去逛天坛，在天坛老柏树下喝茶时，一直未曾注意到这些奇迹，不知这株见于前人著述的拗榆钱，是否尚未遭到斧柯，仍有婆娑生意。真有些所谓“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意思，看到谈迁的记载，不免对这株“拗榆钱”更系以悠悠的遥思了。

天坛当年究竟有多少老树，向无统计记录。康熙时刘体仁诗云：“金鱼池上柳烟阔，祈穀坛边秋气高”，同时人 查容《咏归录》中说“五月五日游天坛松林”，可以想见三百年前天坛林木葱茂的情况。但所说松林，与后来所见的稍异，因为几十年前在天坛中所见到的树，是老柏、老槐多，松树并不多，松林似乎已没有了。

天坛范围太大，按古代旧址，内坛外坛全部在一起，沿着外坛墙走一圈，约有六七公里。在这样大的范围内，除去少数建筑物外，其他全是老树，郁然成林，虽没有原始森林深广，但在树间眺望，四周也是望不到头的。如果在夏天，一大早去，在树林缝隙中望朝阳穿过

树枝，照耀着晨雾、露珠，雾蒙蒙地，光彩闪烁着，也是一奇景。这在其他公园中，是见不到的。在几十年前，北京居民少，到天坛来玩的人是十分稀少的。公园大，游人少，老树多，如果一大早去，进园之后，能够走半个钟头，遇不到一个人。因为进去后是向东面走，面对着从树隙中斜照下来的一缕缕金色阳光，更显得树色碧绿，晨雾轻盈，朝露莹洁。踏着树间的乱草走过去，不一会儿，鞋袜自然打湿了。而草间的小蚂蚱，挂络卞（纺织娘）受到不速客侵扰，带着露珠飞起来，可又去不远，甚至会落在你衣襟上。这真是一种奇趣，会使人忘去自身的存在，都融合在这寂静而又充满朝气的天籁之中了。这种情味，也是在中山公园、北海等处打扫得十分清洁的林荫道上所体会不到的。

拗榆钱我印象不深，但皇穹宇外面那株上千年的辽柏 我是念念不忘的。不知在它荫下喝过多少次茶，它的一枝一叶都在我的记忆中。思乔木而怀故国，现在不知它怎么样了。

北京两座“园中之园”

过去久居北京的人，都对颐和园、北海公园十分熟悉，但对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的两个境清意适、超尘绝俗的“园中之园”却常忘怀，甚至未曾瞻顾。这两个“园中之园”，就是颐和园里的谐趣园和北海公园的静心斋。

谐趣园位于颐和园内的东部，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是一座风光旖旎，具有苏州园林特色的小园。当年建此园时，是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仿照江苏无锡惠山脚下的寄畅园的格局设计建造的。当时名为惠山园，到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时改为今名，乃取“以物外之静趣，谐寸田之中和”意。

谐趣园以一个圆形小湖为中心，四围亭、台、阁、榭环湖建筑。独具匠心的设计者用一条三步一曲五步一折的游廊串联起来，使之浑然一体，颇具幽美、恬静、深雅之情调。据说慈禧当政时也喜欢谐趣园的清幽宁静，常来这里游览、垂钓或赏荷。园中沿小湖建有五座小桥、一排房 舍，景物天成，颇具情趣。

或问谐趣园究竟趣在何处？答者谓有三趣：一是可以听到从西北玉琴峡传来的汩汩水声，潺潺不绝，声声入耳，这是“声趣”；二是有一座从外面看只有一层，而实际却是两层的瞩新楼，这可算是“楼趣”；三是园中有一座小桥叫“知鱼桥”，是借用庄子“子非鱼，安知鱼

之乐”的典故，刻画“水清鱼乐”“鱼水交融”之景，这可谓“鱼趣”。

第二个园中之园——静心斋，始建于1757年，即乾隆二十二年，原名镜清斋，乃取“明池构屋如临镜”之意。这是一座皇家御苑，人称“乾隆小花园”。当年乾隆皇帝把它作为读书养性的所在，后来却成为清代皇太子的书斋和后妃们避暑消夏之所。

静心斋的主景区迎门而建，红栏曲廊，金碧辉煌，充满御苑景象。室内陈列的都是宫廷什物，如螺钿镶嵌的龙榻、炕桌和座椅等。壁上挂着明代大画家仇十洲的《牧羊图》，慈禧太后亲笔画的《牡丹》等。静心斋园内东面是抱素书屋，西间是画峰室，这是当年乾隆帝读书、习画的地方。隔着一个水池是沁泉廊，那是一座桥廊式精美建筑。沁泉廊北依丘壑，南控中轴，廊下流水潺潺，泉声若有若无，时有时无，消夏纳凉，可叹为观止了！

知春亭畔早知春

作诗讲究“诗眼”，关键性的一个字用得好，便可成为千古名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着一“绿”字，便意境全出。因而我常想到园林艺术，似乎也有称作“眼”的东西。《红楼梦》中写到刘姥姥逛大观园，贾母带她坐在沁芳亭上纵览全园，把全园风景尽收眼底，因而这亭便可以作为“眼”。我也常常思念起颐和园的“知春亭”，觉是它也够得上是颐和园的“眼”。

颐和园的仁寿殿，是仿照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安排的，在殿后堆些山石，栽些松树，先挡住全园的景物，这叫作“欲露先藏”。转过仁寿殿，顺假山石前行，没多远便有“豁然开朗”之势了。但看得还不够全面，再进一步，来到“知春亭”上，便可把颐和园中北面万寿山，南面十七孔桥、龙王庙、西面六桥长堤，以及碧波粼粼的昆明湖尽收眼底，把偌大的颐和园一览无余。这是知春亭在园林设计上最成功的地方，也可以说，这里就是颐和园的 “园眼”吧。因此，今天谁要第一次逛颐和园，进园后也要先到知春亭坐上几分钟，把全园面貌看个清楚，然后再去仔细地游览其他地方。那种进来看完仁寿殿，便拥进乐寿堂庭院，踏上游人杂沓的“长廊”的逛法，不为智者所取。

这里为什么叫“知春亭”呢？为什么不叫“宜夏”“迎秋”“喜冬”而偏叫“知春”呢？因为这里得春最早，知春最先，感春最敏。这个亭子在昆明湖东岸正中，伸入湖面约五六丈远，地势低得接近水平，四周又

没有阻挡的东西，不要说园内的景物，连园外远处的玉泉山、西山也历历可见。春天一到这里，首先看到的是在阳光下泛着耀眼光芒、渐渐消融的春水和在昆明湖水面上浮动着的水气；远处所见，则是一层层深浅不同，天天在变幻着颜色的山色；高处，则是缥缈的春云，衬托着闪闪发光的佛香阁的大黄屋顶，这一切都熏染着游人的身心。坐在亭子的栏杆上，在暖融融的气氛中观赏一番，最后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啊——春天来了！”站起来，顿顿脚，然后再去寻幽访胜，登排云殿、佛香阁，逛后山，过十七孔桥，那就随你的便了，这就是知春亭的“知春之趣”！

知春亭畔杂树不多，如果说什么“向阳花木早逢春”，知春亭够不上；如果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则庶几近之。因而每到春天，常常想着知春亭畔那暖洋洋的波光就不足为奇了。

昆明湖畔说铜牛

在北京颐和园内十七孔桥东端，有一头和真牛大小差不多的铜牛，卧在雕有海浪的青石座上。它双目炯炯，栩栩如生，活像一个永不知疲倦的卫士，守护着昆明湖和万寿山。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它虽然形象非常逼真，但却是一头无尾之牛。

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大修颐和园时，要学王母娘娘，幻想把颐和园变成天上人间，用佛香阁象征天宫，昆明湖象征天河，对面八方亭一带象征人间。据传说，天河两岸分别有牛郎和织女，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于是，在石舫旁边又建起一座织女亭，而在八方亭下则铸起这头铜牛。

修建完毕，总管太监李莲英下令开闸放水。一天一夜后，昆明湖放满，只见波浪滚滚，好不壮观。李莲英看得十分高兴，心想这下又可向慈禧太后邀功请赏了。谁知看着看着，忽然发觉情况不对，只见湖水波浪翻滚，风声大作，象征寿海乌龟的圆岛居然缓缓动了起来，而且伸出了 一条十七节的长颈，开始向岸边游来。李莲英顿时吓得浑身发抖，瘫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正在这危急万分之际，只听岸边那头铜牛突然大吼一声，简直是惊天动地，那大乌龟立即吓得不敢动了，十七节长颈刚好搭到岸边。原来乌龟生来最怕牛吼，它的长颈后来便成为供人们行走的十七孔桥了。

事后，李莲英更加认识到了这头铜牛的重要，下令要进行重点保护，还让人在上面刻上了“镇海铜牛”四个大字。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年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在李莲英前来巡视时，突然发现铜牛也变活了。只见它两眼深情地望着对岸的织女，身子一晃，离开原来的位置，一步一步走向水中，慢慢向对岸游去。但是，因为湖面太宽，它游到中间便沉入湖底，再也出不来了。

李莲英迅速把情况报告了慈禧，慈禧半信半疑，她亲自赶到十七孔桥观看，发现铜牛果然不见了。她立即下令，仿照原来的样子再造一头，置于原位。为了防止它再跑，还让人用铁链子将其锁上。

到了第二年的七月七日，李莲英不放心，害怕铜牛再去会织女，便带人前来查看。待到中午时分，新铸的铜牛又动了起来，李莲英忙令七八个大汉上前去拉，一起拽住铜牛的尾巴拼命往回拖。由于用力过猛，只听“咔嚓”一声，尾巴齐根断了下来。尾巴一断，牛就没劲了，再加上 又有人找来更粗的铁链子，七手八脚，总算把这头铜牛给锁住了。不过，从此它便成了一头没有尾巴的牛。

当然这都是传说，不足为信。但为什么要在昆明湖边铸造这么一头牛呢？大体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是“五镇”说。传说北京城有金、木、水、火、土五大镇物。大钟寺有“钟王”之称的大钟是金镇，景山是土镇，昆明湖则为水镇，湖边的铜牛是为了镇水。

二是“洪水标志”说。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昆明湖在北京的西北，比紫禁城的地基高约十米。到了多雨季节，仔细观察昆明湖水位与铜牛地基的距离，可据以做好城里的防洪工作。

三是“牛郎织女”说。在昆明湖西堤的玉带桥附近，有一个栽着不少桑树的“耕织园”村。两百年前，那里的人们采桑养蚕，煞是热闹。而昆明湖东岸又有一头铜牛，于是把前者比作织女，后者象征牛郎

了。

美哉，十七孔桥

记得小时候读古文，读到《阿房宫赋》中“长桥卧波，未云何龙”一句，总生出不少遐想：“长桥卧波”，绿悠悠的水面，缥缈浩瀚，架着一道长虹似的桥，该是多么美丽的一种景色呢？可是北国山村中，山多水少，是很少见到桥的，更不要说“长桥卧波”了。后来到了北京，虽非江南水乡，但是也有不少名桥。先看见堆云积翠桥，后看到颐和园十七孔桥，真是像一下了到了神仙洞府一样。“长桥卧波”的美景是见到了，此时真是置身在“长桥卧波”之中了。

十七孔桥在昆明湖东面，连接东岸和湖中涵虚堂、龙王庙小岛。闽侯林纾在《游颐和园记》中追记庚子前到昆明湖畔的情况：“循河塘而东，至廓如亭铜牛之次，稍北有文昌阁，严扃其扉，寿富（人名）谓禁地不宜前，仍复南折，登绣漪桥，西望玉带桥，穹然高起……隐隐然，均不能至，而北望玉泉之上，微见楼殿数叠，出万树上。”这是光绪中期，林琴南进入颐和园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由东南角便门进来的。当年文昌阁的门是关锁的，文昌阁以北便是禁地了。

十七孔桥之美，有四时之美，有晨昏之美。但更重要的是从不同角度去领略，即站在园中各处望桥，和站在桥上望园中各处。一是站在桥上眺望万寿山，这是十七孔桥的最好镜头。扶着汉白玉桥栏，欣赏万寿山、水波、雕栏、长廊、绿树、崇阁、黄瓦、青天、白云，浑然一体。如果世界上真有“蓬莱仙山”，那绝不会胜过这里。北京春天

多风，在风天里站在桥边，望着昆明湖动荡着的波涛，似乎万寿山也会浮动起来，一线白石栏杆也成为一条晃动着的珍珠项链了。二是站在万寿山麓看十七孔桥。这在庚子前自然是办不到的，但颐和园开放之后，这便成为游人不可忽略的一个美丽的画面了。从知春亭一带，往北，再折而西，沿湖走，随处都能望到这一卧波长桥。宜晴，宜雨，宜雪，宜月，无时不是静静地卧在那里。如果你能坐船在湖中欣赏她，那就更美了。但读者中有谁知道吗？她并不是无独有偶的，她有个“姐姐”，在苏州石湖，“石湖串月”的“杏春桥”，同她的造型一样，只是没有她华丽。如果说十七孔桥是宫庭妃子，那石湖杏春桥该是江村的浣纱女了吧。

烟柳荷乡什刹海

北京虽然是旱地城市，但有水的去处也甚多，小自淙淙石泉，大至滔滔白浪。而人皆喜涉足者，便是烟柳荷乡的什刹海。

位于北京中轴线西北角的什刹海，乃是三泓碧水襟带相连的街头公园。考其渊源，本是古海港。公元1291年，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及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修通元大都至通州一段运河，什刹海遂成为漕运终点。因其烟波浩渺，故称大泊子，亦称海子。元代诗人傅若金，曾以“海子”为题吟咏什刹海，中有“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之句，描绘出当年粮船集聚之壮丽景象。

元代以降，海水渐退，运道中阻。而庙宇梵宫次第修建，古刹几十座，错落其间，“海子”一名，遂被“什刹海”取代。

古籍中不乏记载什刹海的文字。清末震钧的《天咫偶 闻》中有一段曰：“然都中人士游踪，多集于什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争趋。长夏夕阴，火伞初敛，柳荫水曲，团扇风清。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璃十顷，卷浪溶溶；菡萏一枝，飘香冉冉。想唐代曲江，不过如是。”此段文字虽有过分夸张之嫌，但什刹海以其烟波魅力而成为京城唯一的纳凉胜地，则确信无疑。

什刹海的魅力，恰如元代翰林宋褧的一首词所云：“浅碧湖波雪涨，淡黄官柳烟濛。”

什刹海的水，确实惹人贪恋——早春，薄冰初绽，波清微漾，好像情窦初开的少女，敞开纯洁无瑕的心扉，用她那娇美的眼睛渴望寻求到圣洁的爱情；盛夏，波光潋滟，默默地忍受烈日的熏灼和暴雨的冲击，用她那碧绿的乳汁儿恩泽着绿柳、红荷乃至消夏纳凉的游人。

垂柳匝堤，乍发芽时鹅黄如米粒，继而则翠绿飘柔，落花满路，拂着行人，拂着堤岸，甚至拂着水面，仿佛孝子对慈母竭尽拳拳之忠。枝头的麻雀，于晨光熹微时即开始“闹林”，千鸣万啭，欢唱不已。而日光炎炽时，则蝉鸣聒聒，响彻云霄，时有童蒙擎长竿而粘之，把玩之后送与遛鸟儿的老者，撒进竹笼，顷刻间即被小鸟儿啄食得皮开肉绽。

凭栏凝望荷塘，一片红裳翠盖，斗艳争妍。清风徐徐，温情脉脉地拂着花与叶，摇拽着，颤动着；而缕缕的幽香耐不住塘中的寂寥，乘风飘荡，悄然钻入襟袖，沁人 心脾，令人迷醉而流连不舍。

沿着长堤迤逦而行，转向东北犄角儿，便可一睹“银锭桥”的旖旎风光。石桥微拱，小巧玲珑，踞清波之上，为前海与后海之分界。伫立桥头西望，波光粼粼，岸柳蓊蔼，此即后海风致。倘有雅兴，则俟红日衔山、云霞涌起之时，倚桥远眺，则西山之重岩叠幛，尽收眼底，文人为之陶醉，必然情不自禁地低吟唐代王维的诗句——“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由此看来，前人将“银锭观山”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确实得其三昧而不虚夸也。

陶然亭内本无亭

北京的陶然亭公园一带，在金代原是京都东部城厢区。明清两代为著名的窑厂，专门烧制供应建筑宫殿和城墙的砖瓦。元明清三朝，不少官僚士大夫各自在陶然亭地区及附近，攫取一片土台、高岗、池塘、林荫，先后建起私家园林。陶然亭的名称，始于清康熙年间。当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窑厂南边的慈悲庵内，盖了三间西厅供他休息。他取白居易诗中“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陶然亭”。

江藻，湖北汉阳人，是一个喜爱山水的诗人，也是一个书法家。他所写的《陶然吟》和其族兄江臬所写的《陶然亭记》两块石刻至今镶嵌在敞轩的南山墙上。江藻自题陶然亭诗，后两句是：“愧吾不是丹青手，写出秋声夜听图。”推测当时，西有流泉，潺潺有声，令人神往。

陶然亭明明是三间敞轩，由于用了一个亭字，引起人们不少误会，过往游人常在慈悲庵中寻亭不得。原来，中 国古制规定，每十里设一长亭，以便行人休息。这种亭，并非今天园林中的凉亭，而是“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小房舍。江藻建三间西厅，也是作为自己临时休息的地方，与古制中“十里长亭”的作用一样，故此取了一个“亭”字。

陶然亭所在的慈悲庵内，珍贵的石刻还有彭八百的画兰石刻三块，均为中堂长幅，一大两小，嵌于大院文昌阁前西墙上；还有辽金石幢，如“慈智大德师佛顶尊大悲陀罗尼幢”，以及清末翁同龢的“城市山林”四字石刻，李鸿尯的“可以远眺望”五字石刻。

在陶然亭北有一醉郭墓。醉郭名瑞，字云五。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目睹清朝时政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凶残，于是佯装疯癫，讴歌往来于市，以此表示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反抗。他因佯装疯癫，如醉如痴，被人们呼为“醉郭”。死后，《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出资办理丧事，将郭瑞尸身埋葬于此。“醉郭之墓”四字由彭翼仲题，其墓志铭系林琴南撰、祝椿年书。

霜秋叶红游香山

秋风阵阵，桂子飘香，每年到了这时，便不由得想起学生时代到香山看红叶的情景。那时，年轻力壮，只要有一人倡议，便会一呼百应。总之“西直门见，不见不散”。

届时，一人一辆单车，打气筒、水壶、烙饼、鸡子儿、酱肉，自是必备之物。

出西直门第一站便是玉泉山。玉泉池水清色碧，细石流沙，池底气泡有如万斛珍珠，不断从池底涌起。我们先痛饮一番清洌的泉水，然后将水壶装满。池水经一小桥下，东流入西湖，为燕京八景之一，曰“玉泉垂虹”。明王英有诗云：“山下泉流似玉虹，清冷不与众泉同。地连琼岛瀛洲近，源与蓬莱翠水通。出涧晓光斜映月，入湖春浪细含风。迢迢终见归沧海，万物皆资润泽功。”

玉泉山顶有金代行宫芙蓉殿故址，相传金章宗曾在此避暑。过玉泉山，路边树木成荫，渐入佳境，已可遥见西山重峦叠翠，白云碧树，令人赏心悦目，不觉车行劳顿。

行至碧云寺小憩，瞻仰中山先生衣冠冢金刚宝座塔。从碧云寺折向东行，约六七里便是卧佛寺。寺中有娑罗树二株，娑罗树子形似橡栗，可做念珠。

过了卧佛寺，便可直奔香山深处，经青龙潭，探秘魔崖，入宝珠洞，最后在周家花园野餐。举目望去，山上坡下，果真是红紫烂漫，层林尽染。山中杂以柿叶、柿实，叶紫实丹，远看如满树金星。偶然阵风吹来，落叶纷纷，红紫遍地，如置身于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之中。多数红叶是一面红、一面黄，在风中红黄二色交替翻飞，只此一景，便令人心醉，流连忘返。

香山之美，在于红叶，这里的红叶并非枫叶，而是一种黄栌。站在高处向西南坡望去，遍山满坡的黄栌，展丫舒枝，迎晖饮露，叶焕丹红，如花似锦，不由得令人吟出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再东瞰颐和园昆明湖，平波如镜，玉泉宝塔，挺立呈奇。西北面永定河，奔出峡谷，宛若白练，卢沟桥隐隐约约横跨河上，似玉带长虹，真是气势磅礴，景象万千。

入大学后，每年一次香山之游仍不能废。学校亦常有全系学生作香山、西山游之举。届时，路过海淀，便将水壶装上该镇著名的“莲花白”酒。入山后，在饱览红叶之余，同学三五人择一山坡，清除杂草，架上携来的铁枝，捡来松柏枝，取出早已切成薄片的牛、羊肉及酱油、大葱。一刹那，便是烤肉香味四溢，佐以烤熟之马蹄烧饼， 有酒有肉，衬以四周山色、姹紫嫣红，诚为赏心乐事。脚下便是北京城软红十丈，尽收眼底。目中所见，有片片红叶；耳中所闻，是泉声鸟语。微醺之余，几忘置身尘世。一年容易又秋风，正是香山叶红时，如今匆匆便是三十余载，当年曾游香山者，不知尚复忆及此情此景否？

漫话香山之“翠”

朋友相聚，偶然谈及香山，交口称颂香山红叶之美。深秋时节站在山高处，俯视脚下莽莽苍苍的黄栌，泛红流丹，浩无涯际，真似波涛汹涌的红色海洋。然而香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翠”。它虽与玉泉山、万寿山不同，没有大面积湖水，但山峦林木之盛却远胜玉泉、万寿二山。

香山之“翠”，并非近代始为人赞赏，而是自古已然。明朝孙丕扬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人传宝地紫光收，天语香山翠色淫。”比孙丕扬稍晚的袁宏道也曾作诗予以肯定：“真人天眼自超伦，翠色香山此语真。”从这些题咏中可以看出，香山之翠是历史悠久的，它那绰约多姿布满林木的峰峦，像装点着翠玉似的蜿蜒起伏，翠柏苍松，无处不有。

香山山林之胜久已有名。金朝完颜雍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建成香山寺于此，尔后还做了皇帝的行宫，名气更大。元代以后，又有过一些修建。明代香山就具规模 了。“齿翠置殿树，级石上穹昊。高卑名称妙，曲尽结构巧。有泉如线缕，盘转出松杪……绮丽谁所营，民力为兹稿。”（明李梦阳诗）清乾隆十年（1745），又在过去的旧址扩建了许多殿宇、台榭、亭阁、塔坊，并改名为静宜园，作为清代皇帝避暑消夏和离宫之一，与静明园（玉泉山）、清漪园（万寿山）并称为“三山”。在弘历一番经营后，建筑更加精美：“依岩架壑，为殿

五层，金碧辉映，自下望之，层级可数。”当时就有所谓二十八景之说。从这些景物的名称看，也着实突出了一个“翠”字。例如，绿云舫、听法松、翠微亭、青未了，还有那称为“翘首眺青莲”的芙蓉坪，太阳落山时，翠色愈重的重翠崦。绚秋林更是“丹黄朱翠，幻色炫采”。从削壁山岩之间，刻满的题咏的用字来看，如“梦屏”“翠云”“留青”“飞秀”，等等，也都不难理解是因“翠”而作的。

若是从北门入园，遥望山岭重叠，更是苍翠欲滴。诗云：“山行弥日山亦奇，乱峰扶翠纷参差。”张养浩写的这个“翠”字，可谓到家了。游程最后的风景点，是静翠湖。这里的“翠”，更是惟妙惟肖了。绕行湖岸，随意四顾，你周围的景色，除了翠的还是翠的。垂柳是翠的，榛莽也是翠的，那密布的古柏古松，则是翠耸云霄，气势非凡。从湖的北岸相望彼岸，游人在翠微之间若隐若现，不禁使人想起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北京的教堂

北京保存了不少具有西方建筑风格的各式教堂。例如，明末清初修建的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亦称南堂），王府井大街八面槽的天主教堂（亦称东堂），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天主教堂（亦称北堂）。此外，在北京城内还星罗棋布的保存着一些较小的教堂，如米市大街、缸瓦市大街、交道口和朝阳门内大街的基督教礼拜堂或天主堂等。

教堂的建立是随着传教士的活动而兴起的。1540年教皇保禄三世命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耶稣会。于是明万历八年（1581），利玛窦、罗明坚和巴范济等人作为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根据中国当时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迎合中国人崇尚儒家思想的“合儒”“补儒”以至“超儒”的传教政策。其本人以及许多传教士均著“儒冠”，并精通汉文、历法和数学等知识，还想方设法打入宫廷。不久，利玛窦得到皇帝赏赐和允许，在今宣武门左侧买地建堂，即今天的南堂。

南堂的建筑属于庄严凝重的罗马式风格，就其历史和规模来说，均为国内少见。它之所以引起清帝重视，主要因为这里住着许多当时知名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汤若望原服务于明朝，曾参加过修制《崇祯历书》和制造火炮等工作。清兵入关后，他又投靠清朝，并得到顺治帝与摄政王多尔衮的赏识。顺治帝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可尊敬的长者），加封他为钦天监监达。

顺治、康熙两朝，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较快，仅从1651年至1664年，全国入教者至少有十万四千九百八十名。又如雍正三年（1725）前后，仅南京地区就建有教堂近百座，教徒达六万人以上。北京许多教堂也是此时修建或重建的。

王府井八面槽天主教东堂，亦属仿罗马式建筑，顺治十二年（1655）钦赐兴建。

西安门天主教北堂，属于高耸挺拔的歌特式建筑。今天的北堂不是最早的北堂，它原在中南海西畔蚕池口。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要修葺中南海，她顾忌坐落在中南海西畔蚕池口的北堂塔太高，在其顶部能望见宫苑内的活动，故下令让其搬迁，北堂塔乃于光绪十三年（1854）迁到此址。

原来的北堂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当时康熙帝身染疟疾，久治不愈，后经传教士洪若翰等人用奎宁治好。康熙非常高兴，除赏赐礼物外，并决定将坐落在蚕池 口的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旧府赐给他们建堂。

坐落在西直门的天主教西堂，亦是一座灰色西洋式建筑，规模略比南、北、东堂小。

此外，康熙执政期间，在北京东直门内建立了东正教堂。雍正初年在崇文门内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修建了另一座东正教堂，名为“奉献节”教堂。

孔府花园多逸闻

在中国，一个能完整保存九百余年的古老花园，大概只有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了。

孔府花园始建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当时的孔子四十六代嫡孙孔宗愿，封号由“文宣公”改为“衍圣公”，乃扩建孔府，同时修建花园。开始规模甚小，后经历代修葺，特别是明弘治年间的宰相李东阳、明正德及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以及清乾隆皇帝等，前后三次大修，把个孔府花园打扮得焕然一新，俨然可同皇家御花园媲美。

孔府花园位于孔府九进大院的最后，占地五十余亩，假山、池水、竹林、石岛、亭台、水榭、花坞、曲桥等一一俱全。40年代笔者曾往游。记得花园假山位于园之东南，皆由各地奇石怪岩构成。依山势而论，有远山近水之分，高峰低峦之别，巉岩幽谷，盘回曲折，洞邃峰奇，若隐若现，羊肠小道，台阶层砌，花木扶疏，从山下一直长到山顶。园林师别具匠心，为使假山喷珠撒玉，特别在山 边沿巧布太湖石，平时泉水滴滴，雨天瀑布飞挂，景色之美如同仙境。

孔府花园的名花异卉堪称独具特色。那五百余岁的铁树，躯干粗犷，叶肥茎硕，花开花落，依然生机勃发。生长四百余年的“王柏抱槐”，一株王干，槐穿柏身而生，声喧如虎豹、躯枝似虬龙。三百余载的蜡梅，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百折老干，千条青枝，给人以铮铮铁

骨，不可压摧之感。还有那二百余春秋之枣藤，盘根错节，扶树伸展，两人合抱，冠若天棚。尤其是北国稀有的佛手，更为花园一绝。那奇特的手形果实，色泽金黄，其香之清洌，抚摸片刻，周身的香味三日犹存。

至于花园的名贵之花，何止百种千种。孔府主人为一年四季都能观赏盛开的鲜花，集天下名花于一园，四季常开，月月不败。诸如一月的蜡梅，二月的水仙，三月的迎春，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六月的丁香，七月的百合，八月的凤仙，九月的桂花，十月的芙蓉，十一月的金菊，十二月的升牙红等，此起彼落，争放异香。尝阅《孔府档案》，读到《孔府花园诗稿》，厚厚一本，全是咏赞花园的。别的都忘了，尚记得孔子七十三代嫡孙孔庆镕写的四句：

园林亭榭好，
岁岁客凭栏。
九月寻篱菊，
三春就牡丹。

孔府的花园，可以说是由皇宫的银子堆起来的。第一次大修时，负责设计和监工的人是吏部尚书、太子太傅、华盖殿大学士兼国史总裁李东阳。

李东阳为何出那么大气力，苦心经营孔府花园呢？原来，李东阳有个女儿，是孔子六十二代嫡孙、衍圣公孔闻韶的一品夫人。这位长沙出生的大家闺秀，李东阳视若掌上明珠，不但模样长得美，而且对游山玩水观月赏花亦极感兴趣。有一天，李女闻得未来夫婿是当时的孔府小圣人，便告之乃父，虽然府邸、人品都称心，倘若花园不如意，也不能嫁。李东阳当场言定，要为爱女修一花园，不出孔府，就能饱赏江南秀丽景色。于是一座集南北风光特色于一园的孔府花园，

在他的督修下告成。为此李东阳曾四次作诗刻碑，记此盛举。

明嘉靖年间大修时，当朝的权奸严嵩，看到举国上下，除皇宫外，权势最大者，莫过于孔府了。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他决定与孔府攀亲，将其亲孙女嫁给孔子六十四代嫡孙衍圣公孔尚贤为一品夫人。严氏女进府后，严嵩一则为显示权大无边，二则为其孙女生活悠闲，便调集全国名园林师，广搜天下奇花异石，扩建重修孔府花园。后来，严嵩被弹劾治罪，其家产虽倾荡一空，但他修 建的孔府花园，却丝毫无损。据说，严嵩自罢官后穷困潦倒，曾去孔府孙女家求援。无奈朝廷有令，相助严嵩者皆从严惩处。衍圣公孔尚贤也担心舆论的压力，有意回避严嵩的求见。严嵩孙女便偷偷将严嵩藏在孔府花园内，一日三餐，靠她用餐时多留下的食物供应。府人问之，她就说在花园里养了一条狗，别人喂的食它不肯吃，喜欢女主人施舍给它食物。她身为一品夫人，谁还敢追究呢？严嵩落魄到如此地步，真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据说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老贼就一命呜呼了。

清乾隆年间，孔府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重修扩建，主持者是乾隆皇帝。原来，乾隆也看见了孔府这块万世繁荣的圣地。因此，也与孔府攀结起亲戚。乾隆将爱女嫁给孔子七十二代嫡孙孔宪培，做衍圣公的一品夫人。但乾隆是满族，孔宪培是汉族。按封建法规，满、汉不能通婚。群臣献策的结果是，乾隆让女儿改姓，认汉族中堂大夫于敏中为义父，以于氏之女嫁进孔府。

孔府花园经过帝、王、将、相、公、侯、伯、爵历代增修扩建，修筑得山林清幽，洞窟古雅，花团似锦，池桥涌波，使人难分北国江南。但是，事情有时也奇怪，聪明人做起糊涂事来，真叫人哭笑不得。下面说一件花园主人当代小圣人孔德成之父拆挖花园景物的事情。

据说清代末年，年届花甲的孔子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尚

未得子，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后听说家宅的风 水中有不吉利的地方，才妨碍了早生贵子，便请来风水先生诊断。此位风水先生装模作样，每日享用着山珍海味的“孔府宴”，花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察看孔府前后。最后他对孔先生说：“你这个府邸是按八卦样式建造的，七星楼上风水都不错，只是后花园的假山上凉亭建造得太高，超过了七星楼，压住了好风水，所以夫人们不能生子。”孔先生信以为真，急忙派人把花园山上那座金碧辉煌的古亭拆掉了。过了一些时日，夫人们还是没有怀孕的迹象。孔先生又把风水先生找来，此人一到就说：“我早就知道公爷要找我，上回我忘了说，你这个圣人府，地上不能挖坑弄井的，最忌讳‘坑’‘井’二字。‘坑害’‘陷阱’都是大凶。花园里那个养鱼池，挖得太深了，破坏了府邸的风水。”衍圣公一听，觉得有道理，赶快命人把个清水见底、碧水盈盈的养鱼池给填上了。接连两次，风水先生捞了两大笔财，然后溜之大吉，可是夫人们还是不生孩子。后来，孔先生爱上了丫鬟王宝翠，纳为夫人，接连为其生了二女一男，第三个是公子，这就是孔德成先生。

据说，孔德成出生时，孔府人为盼其早早降生，把孔府千门万窗统统打开了，连平日紧闭，只在帝王祭孔时才能开启的重光门，也毫无例外地打开了，并且挂上了弓箭，祈求“速到”“飞快”。事情偏不顺当，王夫人难产。有人提议，光打开孔府门窗还不行，“小公爷”是圣人之后，应该把孔子庙的大门也全部打开。结果还是迟迟未出 生，怎么办？于是，一位智叟公提议，将“鲁班高八丈”的大木牌，悬挂在孔府的最高建筑——后堂楼，那儿是孔令贻先生和王夫人的卧室。结果木牌一挂，小圣人孔德成竟出世了。

杜甫草堂何处寻

四川成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古城。仅举出名气最大、游人最多的两处文化古迹——诸葛武侯祠、杜工部草堂，便可足证此言不虚。

杜工部草堂即杜甫草堂。杜甫生前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尊敬他的人都不呼其名，称之为杜工部。

杜甫草堂在成都市西郊。那里有一个百花潭，已辟为百花潭公园。从百花潭再西行三四里，杜甫草堂在焉。成都人每到农历五六月盛夏时节，常与家人好友相携一游杜甫草堂。一则那里风光幽美，是消夏休闲的好去处；二则表达了人们对古代这位诗圣的怀念之情。

现在的杜甫草堂比原来的范围扩大了许多。杜甫生前穷愁落寞，死后却一千二百年来盛誉不衰。所以，草堂园区内除“工部祠”为旧时（可能建于清代）建筑外，其他亭台阁榭多为改建或经过整修的。

进了园区，走过一座浓荫下的小桥，便是一间大敞 厅，两侧有长廊通往诗史堂和其他建筑。诗史堂中有杜甫塑像，瘦骨嶙峋，傲然迎风。雨庑是据杜甫诗意所绘的名画陈列室，其中多是近现代名家的佳作，有林琴南（纾）、溥心畬、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等的人物画，有汤定之、陈半丁、吴湖帆、郑午昌、关山月等的山水画，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画馆门旁悬有一位当代诗人题写的

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人间疾苦，笔底波澜。"区区十六个字道尽了杜甫的生平遭遇，也赞颂了诗人和他作品的伟大之处。

廊庑的尽头有水槛，诗史堂对面有草堂书屋等建筑，其中陈设着自古至今出版的杜诗的各种版本，还有杜诗的近代各种文字的翻译本，也有一些评介杜诗的书刊。从这里走过，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诗人和他的作品是不朽的，它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在长廊环绕的不小的庭园里，万紫千红，百花竞放。凡是杜甫在诗中描写过的、提到过的花草树木，几乎收罗遍及，植于此处。

杜甫草堂也像诗人杜甫一样，历经了雨雪风霜，兵燹天灾。在30年代，这座园林一度沦为某军事机关的马厩。众所周知，杜甫虽为文人，但是却极为爱马。他写马的诗如"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一千多年来为人们所喜爱与传诵。想不到真的有马儿来与他为邻了。可惜马儿加"丘八"对草堂却有极 大的破坏性。屋顶洞穿之后，一位好心人为防风雨侵袭，还给杜甫塑像上戴上一顶斗笠，杜甫九天有知，也会感谢他了。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早已焕然一新了。

绍兴沈园情依旧

在浙江绍兴市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园林，它就是南宋时的名园——沈园。这是当年陆游与唐琬邂逅的地方，因此地原为沈姓旧业，故称沈园。

沈园小巷幽长，庭院深深，古桥流水，蛙声一片。园中的小池形如葫芦，故名“葫芦池”。池上有石板小桥，连同池边的假山、水井，均是当年旧物。身临其境，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南宋伟大诗人陆游初婚唐琬，后被迫离异。绍兴二十五年（1155），时年三十岁的陆游与唐琬在沈园相遇。当时唐琬已改嫁，陆游也另娶。面对金兵入侵国家，自己壮志未酬。国家危难，仕途艰难，再加之自己的婚情蹉跎，使诗人感慨万千，不禁挥毫在沈园墙壁上题下《钗头凤》词一阕：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 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江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琬面对《钗头凤》，情愁万千，一盆泪水，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和词，留给后人一段沉思：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晚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名，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这就是八百多年前，发生在沈园的一段缠绵的故事。有了这段故事，沈园不仅名声大振，而且增添了神秘色彩。沈园，传颂着一首千古绝唱的词话，一个讲不清的“红楼之恋”。

当年笔者进沈园，记得往右一拐，便是古朴庄重的双桂堂。那是用竹篱笆围起的园中小园，后被辟为“陆游纪念馆”。在这里，不但能纵观陆游坎坷一生，而且更能领悟到作为“剑南诗派”的开山鼻祖的陆游，为后人遗留的一首首耐人寻味的诗词。那近万首诗词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便是陆游一生的写照。清末民初学者梁启超曾赞叹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　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据闻，近年来在对沈园的陆续维修中，发掘出了自六朝、唐、宋、明、清各时期遗址遗物，尤以宋代的遗物——水井、假山最为壮观。而园西登高而建的闲云亭，以双亭连在一起，无疑是后人的一片诚心所在，也为沈园遗留的陆游、唐琬故事，平添了一层遐想的色彩。

人已去，楼已空；词还在，景依旧。这就是绍兴沈园留给笔者的情思。

关山胜迹

北京地名谈趣

记得聊天时，有一老人曾经考我：北京城有四条胡同名，谁最重、谁最轻、谁最黑、谁最白？我一时无以对答。老人笑曰："铁狮子"胡同不最重？"灯草"胡同不最轻？"煤渣"胡同不最黑？"干面"胡同不最白？我听后捧腹大笑。

这虽是笑谈，但也说明北京的街巷胡同密如蛛网，其名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说起来真是饶有趣味。

北京街巷名堂之多，外地少有，诸如街、路、门、条、巷、胡同、院、大院、厂、坊、桥、井、市、口、营、池子、寺、庙、潭、宫、司、库、河、河沿、栅栏、作、局、淀、境、窑、站、庄、楼等，多如天上繁星。据老者称，北京街巷原来大都没有正式命名，而是人云亦云地叫出来的，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而北京的地名，大体上可分为十多种类型。

其一是按数字排号的，如北新桥便有一条、二条、三 条等，棉花胡同、长巷等也分一条至几条。

其二是对称的，如天安门对地安门，南池子对北池子，东单对西单，左安门对右安门，还有北海对南海等。

其三是象形的，如椅子胡同、裤子胡同、耳朵眼胡同、抄手胡

同、罗圈胡同、沙滩等。

其四是因寺庙得名的，如真武庙、火神庙、报国寺、白塔寺、海潮庵、红庙、五道庙等。

其五是以该地所集中的行业来划分，如米市大街、花市大街、菜市口、鲜鱼口、果子巷、灯市口、缸瓦市等。

其六是以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得名的，如天坛、地坛、什锦花园、梁家园、泡子河、象坊桥、虎坊桥、灵境宫等。

其七是以特殊标志而得名，如甜井胡同、门楼胡同、四眼井、双井、三道栅栏、石碑胡同等。

其八是以明清时代衙门而得名，如护国寺、太仆寺、西什库、巡捕厅、石驸马大街、校场口等。

其九是以城门为名，如宣武门、复兴门、永定门、崇文门、前门、德胜门等。

其十是因汉字谐音而得名，如西四丰盛胡同原是明代熹宗的奶妈“奉圣夫人”的府邸。

北京的“胡同”名称，起源于元代。元曲中，在描述两军交战的情景时，有“杀出一条血胡同”的词句。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里，张生问梅香：“你家住哪？”梅香 说：“我住在砖塔胡同。”她说的是句玩笑话，却证明胡同在元代已是街巷的称呼了，而砖塔胡同在今北京之西四，已大约有了八百年历史。

关于胡同之称的由来，过去已有不少考证。明代《宸垣识略》中称胡同为“衖衕”。据《宛署杂记》云：“‘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又有人认为胡同之称源于蒙语，是蒙语“浩特”的音转，“浩特”乃蒙语中城镇之意。

这些都是旧话了。许多胡同已成街市，昔日的坊巷已难辨认了。

湖广会馆和孙中山

坐落在北京虎坊桥西侧的湖广会馆，是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它最早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由张居正捐资修建的全楚会馆，后改为私人住宅。清乾隆年间，大文学家纪晓岚曾在此居住，并写下了著名的《阅微草堂笔记》。嘉庆十二年（1807），将其重新修建，道光年间改成大舞台。慈禧执政时，名伶谭鑫培和田桂凤曾在此演出《坐楼杀惜》。晚清名将曾国藩庆贺六十大寿也是在这里举办的。但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曾数次莅临会馆，在此主持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对革命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演说，为会馆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1912年夏天，大野心家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多次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8月24日，孙中山以革命前途为大计，从南方到北京。次日上午10时，湖广会馆楼上楼下挤满了人，举行欢迎仪式，孙中山发表了重要演 说。他特别强调革命不能只靠一人一堂，而是要依靠全国所有同胞的支援和赞助。就是在革命成功之后，进行国家建设，也要群策群力，要以调和党见、容纳异才为宗旨。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三千多人的热烈欢迎，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湖广会馆。

当日下午，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当时，经研究确定，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在历时两

小时的演说中，以其卓越的口才、诚挚的态度征服了所有听众，场内掌声雷动。在谈到因大会政纲删掉了“男女平等”条款而引起争执的问题时，孙中山明确表示，政纲中虽然因意见分歧没有列入男女平等之条款，但他是同意这项主张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此项主张也必然会得以实现。由于他观点明确，道理讲得清楚，使各党派间消除了分歧，统一了思想，纲领得以顺利通过。会议经过民主选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被选为中央理事，阎锡山、李烈钧、于右任等三十人被选为参议。

紧接着，于8月30日和9月4日，北京学界等又继续在湖广会馆集会，欢迎孙中山和庆祝国民党的成立。孙中山到会并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共和时代，学生应是国家的候补公仆，希望学界将涤除旧思想、旧传统，尽快承担起国家公仆的义务，促使中华民国早日成为世界 上最文明、最优美的国家。他在解释“三民主义”时，指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要想使中国实业发达，就要好好研究实现民生主义。

由于孙中山多次莅临湖广会馆并在此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使该处成为历史文物价值很高的会馆，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它的修缮和保护。

孙中山逝世纪念馆

北京的张自忠路，原名叫铁狮子胡同。那里有一个为人熟悉和值得纪念的去处，即孙中山1925年在京逝世的纪念馆。1924年年底，孙中山应各界人士之邀，抱病北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安排他住在此处，作为行馆，直至其去世。

此处住宅，最早是明朝崇祯年间左都督田弘遇建造的。因其女儿田贵妃备受崇祯皇帝宠幸，得到了一对元成宗时铸造的大铁狮子，其造型生动，晶莹剔透！摆在大门两侧，显得特别威武雄壮。世人闻之，纷纷前来观看，后来，此巷即被称为铁狮子胡同。曾红极一时的歌伎陈圆圆，被田弘遇收养后，也住在此宅。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该院及陈圆圆被其大将刘宗敏据为己有，激怒了吴三桂，以至于开关降清。清朝以后，此处成为靖逆侯张勇的府第，经扩建重修，更名为“增旧园”。据《燕都丛考》中记载，此园院落宽宏，后有假山，山上树数围……《增旧 园记》中写道：园中景致计有停琴馆、秋月轩、妙香阁等八景……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接管此园，那对大铁狮子被移到鼓楼处保存。

此院建筑优美宏大，大门阔三间，上面朱漆彩绘非常精致，其中那两对并列的红柱子尤为罕见。宅院分东西两部分，东面的为西式建筑，西面的为中式建筑。孙中山住的是西面中式院，院内多植树木，四周均有走廊。正房是一座面宽五间的大殿堂，两侧各有两间耳房。

孙中山住在西耳房，里屋是卧室，外屋会客。房间不大，陈设也极简单。他住进此院时，病情已非常危重，而且一天天加剧。此前，他曾被送往协和医院做手术，由外科主任邵尔乐亲自主刀，但切开后发现其肝脏已坚硬如木，属肝癌晚期，无法再行切除，只有回行馆静养，吃些中药尽量延缓病情恶化。孙中山时常陷于昏迷状态，每日只吃很少一点牛肉汁。

但是，此时孙中山头脑还非常清醒。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中还挂念着国家的大事。1925年2月4日，他让人代笔立下三份遗嘱。在第一份“总理遗嘱”中，他说：余致力国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国自由平等……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二份是致苏联的遗书，他是用英语口授的，由宋子文、孙科等记录。他诚挚地希望苏联能以良友及盟国欢迎独立强盛之中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 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第三份是家事遗嘱，声明自己一生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均归夫人宋庆龄，以作纪念。

遗嘱写好后，本想即刻签字，但见大家都悲痛万分，便决定改日再签。到3月11日，孙中山感到神志清醒，即召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于右任等于榻前，由宋庆龄帮他扶腕用钢笔在三份遗嘱上签了字，然后又趋于昏迷。在弥留之际，仍断续说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等字语。第二天上午心脏停止跳动。

后来，此院曾由财政总长顾维钧居住。两年后，划归地方党部为办公地址，并正式定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馆。

居庸关和八达岭

居庸关之名最早见于《淮南子》，《汉书·地理志》亦有居庸县，并注“有关”。居庸关在八百年前之金代，即以风景胜地著称，为燕京八景之一，有“居庸叠翠”之称。

出北京往西北行约百里即可到关城。关城建在一条三十余里的溪谷中，谷名关沟，山峦重叠，林木葱郁，颇有画意。居庸关的名称据说是秦始皇修长城“徙居庸徒于此”而得名。历代皆有修建，现在的城关是明代遗物。入关可见一座汉白玉石台，称为“云台”。台上原有石塔座，元末明初被毁，后又于此建寺院，称为“泰安寺”。清康熙年间遭火焚，但塔和寺院的基座遗迹仍清晰可辨。台下券厅内亦可看到石壁上雕刻的四大天王和佛像，旁边刻有六种文字的《造塔功德记》和《陀罗尼经咒》。

记得年轻时，读过不少吟咏居庸关的诗文，自金元以来的作品尤多，但格调总不脱低沉。或惊叹巉岩峭壁断崖万仞，关山崔嵬鸟飞不度之险；或低吟长城似带山如叠嶂， 玉垒金汤危楼垛堞之雄壮；或咏诵云淡天高，随阳雁断，扑骑黄沙，漫关涧雪之塞景；或凭吊万灶貔貅百代兵戈，怨角悲笳，戍卒鬼雄之荒氛。萨都剌诗：

居庸关，何峥嵘，

上天胡不呼六丁，
驱之海外休甲兵。

这首诗也称得上是悲壮之作了。笔者独查清人魏源的那首，诗曰：

橐驼何部贡黄羊，
平世浑忘古战场。
春草绿如秦塞界，
桃花红迁汉封疆。

诗虽未属上乘，但吟之心旷神怡，令人愉快。明僧梵琦的七律《居庸关》诗云："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原来居庸关在辽金时属其内地，到元时是大都（北京）与上都（内蒙正蓝旗附近）之通道，元帝每年都要经此至上都避暑，故诗人有"飞鸟识衮龙"之吟。

居庸关以险奇著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誉。明代防务以北京为重，视此关如咽喉，设卫驻军，常 有五千军兵在此驻守。陈子龙曾赞叹云："险到居庸地派分，何须常戍羽林军。"然而墨迹未干，李自成军即从宁化、怀来经居庸关长驱而入，顿克北京。怪不得顾炎武感慨云："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可见关山险也莫如人心齐。

到居庸关不但可以登八达岭长城，而且也可漫游附近的望景石、五鬼头、六郎影、点将台等七十二景，有心人自可去领略其中之妙趣。

说到八达岭，它其时是位于北京延庆县境内的军都山的一小部

分。它是关沟最北端的一个谷口，又称北口（另有南口在关沟之南），也是居庸关的外口。由此往北可到延庆，往西可到康庄、怀来、张家口、大同，往东可到永宁、四海、密云，往南可经昌平到北京。交通四通八达，故称八达岭。自古以来，它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北京的防御前哨。八达岭依山据险，没有关城，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居庸关更加险要。“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建在这里的长城，随山就势，当然更加蜿蜒多姿，为人所乐游了。

明代，在八达岭长城驻有重兵。但是，世上没有攻不破的城堡。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闯王李自成率领他的部队，就是由宣化、怀来直指八达岭，夹攻居庸关，敲开北京的大门，打进了紫禁城。明代经营了二百多年的长城防线，毁于一战。

八达岭的关城，建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它东门悬有匾额，题为“居庸外镇”。在东门之外有一块约两米高的巨石，上面刻有三个大字——望京石。望京石的由来是，公元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见势不妙，携带光绪帝及宫眷仓皇出逃，路经八达岭时，曾站在这里向北京遥望，因而得名。

登上八达岭长城，使人想起清代诗人魏源的五言绝句：

一登八达岭，回视如窥井；岂意塞门关，更成云外境。

京东第一山

在北京以东蓟县境内有一名山——盘山，号称京华第一山。30年代笔者寓居北京时，曾邀友慕名游览，饱赏了盘山的壮观。其山势雄伟险峻，遥望云海松涛，近观水石清奇。每走一步都有迷人景色，逢景即有典故传说，是个名胜古迹很多景色宜人的胜地。盘山面积约有二十多平方公里。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中国名胜——盘山集”就把盘山和黄山、泰山、西湖等地并列为中国十五大名胜之一。

盘山景色以“五峰”“八台”“三盘之胜”称绝，主峰名挂月峰，海拔864米，为盘山之巅。登上之后，群峦竞秀，尽收眼底。峰顶有唐代“定光佛舍利塔”，峰下有云罩寺旧址，是唐道宗时所建。寺前一峰耸翠，形如伞盖，名紫盖峰。后有自来峰，与挂月峰相连。东有九华峰，因陡峭如削，形如莲花，故又名莲花峰。西望一峰矗立，名舞剑峰。相传唐太宗的名将李靖，曾在此峰舞剑，故名又叫“李靖舞台”。盘山有五峰，在唐朝佛教兴盛时期，亦　　称“东五台”。五峰处还有奇峰，自然形成为三盘之胜：上盘松胜，蟠面翳天；中盘石胜，千奇百怪；下盘水胜，涓流不息。古人曾有诗赞曰：“万米松影千峰石，一度经过半世思。”

盘山，原名徐无山，又名无终山和四正山。相传东汉末年，无终山田畴，因兵荒马乱率家族隐居于此。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军北伐马桓，请田畴为向导。因助曹操大破马韩有功，曹操召请田

畴“表封亭候，食邑五百”。但田畴坚辞不受，仍隐居于此山。为纪念田畴，人们将徐无山改称为田盘山，简称为盘山。《三国志》《水浒传》《蓟县志》《盘山志》都曾记载了有关盘山的悠久历史、碑文题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

据《盘山志》记载，从魏武帝曹操开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帝都先后在盘山大兴土木，劈山建寺，如云罩寺、万松寺、天成寺、上方寺、少林寺、盘谷寺等几十座寺院和舍利塔。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善男信女，进山逛景，参禅礼佛者络绎不绝。至清乾隆年间，盘山发展到极盛时期，除扩建和重建部分寺院外，还在盘山南麓修建一处规模浩瀚的离宫——静寄山庄。山庄建筑是仿照承德避暑山庄的布局，依山就势，高低错落，雕梁画柱，金碧辉煌，既是皇帝经常避暑的皇家园林，又是处理朝政的活动场所，难怪乾隆皇帝曾感叹道：“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沙河镇北朝宗桥

北京北郊昌平县沙河镇，有一座明代修建的大桥——朝宗桥。顾名思义，这是明代皇室贵戚去明十三陵朝拜祖宗路上必经的大石桥。迄今已历四百余年，其桥身之坚固，不亚于驰名中外的赵州桥和卢沟桥。

朝宗桥于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落成。俗称“北大桥”，言外之意还有座“南大桥”——安济桥。两桥相距五里，在沙河镇的一南一北，与沙河城——巩华城——成鼎足之势。

朝宗桥为花岗岩建筑物，略成拱形，七孔，全长一百三十米，宽十三米三，中间高七米五。桥两旁有立柱石栏五十三对，柱间夹栏石非常坚固，柱两端岩石雕饰“云头”。桥北端东侧有螭首方趺汉白玉碑一座，通高四米八，宽一米一，厚零点三九米。碑顶两面负屃（龙的九种之一，平生好文），相对处俱书隶体“大明”二字。碑身两面镌刻“朝宗桥”三个大字，阴面左侧标明万历四年岁 次丙子仲夏（1576年5月）立。这座桥为明代帝王北巡、饬边、谒陵的必经之路，又是北控居庸、白羊，东扼古北口的战略要道。古时，在这座桥的东南方向，垒有土台，并有军卒日夜防守。明代自嘉靖后的几代皇帝对此桥都很重视，为防山洪冲击，万历元年（1573）时，在桥西侧垒起高五米，长八十米的岩石泊岸，并精雕了一个狮首龙身的石兽放置在泊岸正中。当地居民对这一“神兽”有着很神奇的传说。

据说朝宗桥建成后，每值深秋季节，大雁南飞，过此桥时都要低飞长鸣；来年春天，大雁回归时亦复如是。但是因安济桥下有群鸥集聚，大雁不喜欢鸥鸟，来去相告，要折道而行，便不从安济桥上空飞过，因而有“春鸥秋雁各领一桥”之谚语。

1929年、1939年的两次山洪倾泻，漫桥东流，巩华城内水深数尺，而桥身无恙。几次地震，亦无撼迹。1937年7月侵华日军炮轰此桥也仅留下碗大的“疤”。

“卢沟晓月”的联想

沙浑石涩夹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条，
流出卢沟成大镜，石桥狮影浸拳毛。

这是青藤山人徐渭咏卢沟桥的诗，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作品。近看临摹画展，见明王绂《卢沟晓月图》，油然想起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

过去，从广安门出去，顺着当年北京的黄土古道，走上三十来里路，就到了这座有乾隆御笔题碑的，天下闻名的古桥边。“卢沟晓月”和“蓟门烟树”、“金台夕照”等同为“金台八景”。这里以“晓月”为景，是从“行旅”和“送别”而引起的。

卢沟桥以其黎明前的苍茫晓色，引起人们神往。旧朝时，卢沟桥是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经之路，所谓“仕宦往还，冠盖云集”是也。古诗云：“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行路又是要赶早的，从卢沟桥到京师市内，有二十余里路程，若是五更晓发，到了城里正是办事的时候。因此，进京的仕宦商贾，闻鸡早起，趁着月色动身，到了卢沟桥上恰好是踏霜见晓月的时分。“金鸡唱彻扶桑晓，残月娟娟挂林梢。”虽都不是特意来看风景的，但这桥头晨曦却不能不让人注意到。所以，卢沟晓月是对这种生活感受的形象概括，也包含了文人墨客的

着意渲染。

明王英诗云：

浑河东去日悠悠，斜月偏宜入早秋。
曙色微涵波影动，残光犹带浪花流。
疏钟欲渡千门晓，匹马曾为万里游。
题柱谩劳回首处，西风零雾满貂裘。

这是历史上过卢沟桥的情景。

卢沟桥跨卢沟水（永定河），上游即由山西流下来的浑河、桑乾河。桥是金代明昌三年（1192）所建，明代正统九年（1445）又重修的。桥长两百步，用房山县出产的汉白玉建的。最出名的是桥栏杆柱头上的石刻狮子，大狮子下面还有小狮子，大大小小，姿态各异。《帝京景物略》记道：“石栏列、柱头狮，母、乳顾抱负赘，态色相得，数之辄不尽。俗曰：鲁公输班神助也。”历史上有名的工程，民间往往传说是鲁班神助，亦可见民间对鲁班的尊崇了。

卢沟桥建成后大约一百年，世界知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来到这里。在他著名的游记里，对这座桥做过细致的描述，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外国人知道这座桥，多是由此而来。马可·波罗说，这桥“长三百步，宽逾八步，十骑可并行于上”。实际测量，桥长二百六十六米五，有十一个桥拱。

卢沟桥曾几经修葺，桥的东西两端，各立了一块碑记，记述着康熙、乾隆时候修桥的经过。乾隆书写的那块碑更为详细、有趣，写到发现桥有损坏，“司事之人有欲拆其洞门而改筑者，以为非此不能坚固”。但是拆开桥面一看，发现桥拱结构“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莫比”。由此而想到，“虽欲拆而改筑，实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

为其旧之坚固也”，犯不上弄巧成拙，结果只是在路面上进行了些修缮。对此，乾隆还发了一通感慨：“朕因是思之，浑流巨浪势不可当，是桥经数百年而弗动，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其固，则此桥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观其里，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如是其极也。”老北京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其实是数得清的，笔者亲自查点共有石狮四百八十五只。

清代北京城区，分作两个县治，东面是大兴，西面是宛平。卢沟桥边有一座弹丸小城，就是宛平县，是“七·七”事变的兵燹开始处。五十岁以上的人当还记忆犹新，在思念卢沟桥之际，多多祝福今后人间的和平康乐吧！

明陵毗邻古银山

游明陵的同时，还可以游览其东十余里的银山。

笔者好探幽览胜。久闻有“燕平八景”之说。所谓燕平者，乃昌平也。明十三陵即在昌平县境内，而“银山铁壁”则为燕平八景之一。为何称银山？为何称铁壁？原来银山从山脚到峰顶，大都由黑色的花岗岩组成，层层而上直插云天，远观如同“铁山壁立”。又冬日雪后，峰岭堆雪，阳光一照，如戴银帽。附近尚有花果山、水帘洞、朝阳沟、重石洞、白银河、西什湖等景点错落周围，更衬托出它的雅致。

银山不仅以山林泉涧幽美著称，而且又以寺多、僧众遐迩驰名。唐初，这里就是名僧阐扬佛教的道场，也是当时幽州最大寺院之一。传说唐将尉迟恭曾来这里，修建庙宇时他为总监工。到了宪宗元和年间，邓隐峰来银山时，途经蔡州还留下了神奇般的传说。由于他声望高，追随、皈依而来者越聚越多，银山为之名噪，与镇江的金山寺齐名，被称作“南金北银”。

碑文载，金代天会和大定年间，这里日常住有僧尼达五百余人。除重修了辽时建造的大延圣寺外，还增建了僧斋和尼舍七十余间，并修起铁壁寺、松棚庵、清凉庵等七十二座茅庵。当时北方最享盛名的高僧佛觉、晦堂、懿行、灵静、寰通五位禅师，在先后五六十年内，都曾来这里阐讲佛法。尤其是佛觉禅师，自五台山文殊院到中都（今

北京）后，深得熙宗（完颜亶）的英悼皇太子的隆礼虔敬，为其修了寺院，被誉为“极尽工巧，幻若天宫”。他所阐扬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快速而廉价的成佛之道，深切地迎合了金王朝的需要。因此，他被封为国师。拜他为师的各色人等数以万计。银山的名声也因佛教在这里盛行而更加显赫。

我曾见到了不少残存的舍利塔，这是高僧、和尚、尼姑、沙弥等死后，火化入葬时修的。舍利塔可谓等级森严，高僧塔高且大，逐次减制，沙弥塔最小。如此历经上千年，整个银山脚下，坡沟、巅涧之间，恰似密集的繁星，林立错落，这样便有了“银山宝塔数不尽”之说。元、明、清以来的历代皇帝及其臣仆、扈从和不少名士、游子、信徒来游银山者日益增多，因而景观也伴随增辟，如佛顶峰、佛觉塔、转腰塔、说法塔、雪堂、云亭、濛泉、茶亭、三峰拥翠、东山晚照、寒泉浸月、天清桥、太完石等。故后人就将“银山铁壁”誉为“燕平八景”之首了。

北戴河的开发

北戴河是中国北方的海滨避暑胜地，景色幽美，驰名中外。

北戴河地处河北省东部，濒临渤海，背依燕山余脉联峰山。海滨风景区东西长达二十里，海滩沙软潮平，是有名的海水浴场。联峰山上松柏苍翠，峦峰突起，名胜古迹，雄伟典雅。登上山顶，可以西望昌黎山峦，东望秦皇岛海港，南望大海，水天相连，海鸥飞翔，渔舟几点，时隐时现。日间朝阳染红海面，落日照澈波涛。入夜则松涛声与海浪声相间，抑扬协奏，悦耳动心。

北戴河是个美好风景的所在地，东北方有巨石一块，矗立海滨，过去常有鸽子在此栖息，故名“鸽子窝”。记得30年代笔者在北戴河一度小住，曾几次于拂晓前去鸽子窝、鹰角亭看日出。当时以为看海上日出的机会难得，所以，在看日出时，如遇有片云稍蔽即感到不满足，翌日一定再去，即使在万里无云天气，已看到一轮红日冉冉上升，归来亦意犹未尽，不惜连续早起徒步再去观赏。在小山亭畔，每天黎明前即有些小贩群集，有的摆摊售卖一些贝壳粘制的工艺品，有的则贩卖新出锅的熟老玉米。一面手持热腾腾的玉米，边看边嚼，一面欣赏大自然日出的壮观景色，饶有风味。

北戴河海边还有一些巨石露出海面，形似群虎盘踞，故名“老虎石”。潮退后登石远眺，白浪滔天，一片汪洋，使人胸襟开朗，充满诗

情画意。

老年人在北戴河多半是到海滨或林荫中散散步，呼吸一下海滩吹来的清新空气。年轻人则一天不闲：黎明前爬上东山的鸽子窝看日出，然后在退潮的海滩上拾贝壳；中午去洗海水浴，再躺在海滩的细沙上，晒一阵太阳，心身舒展，飘然欲仙；傍晚到海边看月亮，海风拂来，一身凉爽。

北戴河的古迹名胜不少，还有很多神话传说。印象深刻的有观音寺的罗汉松、虎皮松、龙爪槐，景色古拙。对语石是两石对峙，一高一低，似二人对语。旁边还有一怪石突起，人称莲实。据说，一人只用一手推石，石摇摇欲动，人多了反推不动。还有关于海眼的传说，就更神奇了。海眼为一石洞，深数丈，须弯腰进入。传说此洞通海，深处可闻涛声。海眼之名，也见于地方志书。还有一处是鹰角亭，地处北戴河东北角，孤峰入海，有一巨石状似雄鹰威立，故得此名。

北戴河是中国北方的旅游胜地。但很少有人知道朱启钤是这一胜地的开发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辟北戴河为避暑区。当时，很多外国人士，利用宗教势力，结伙并吞海滨土地，修建房屋，各自扩展势力。朱启钤在1916年到北戴河，他敏锐地发觉这个问题，就在1919年组织在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在莲花石成立地方自治公益会，他自任会长，下设副会长、董事长、董事和监视等职。公益会的任务是负责海滨的地方公益事业，以及市政管理、建筑规划、税务收支、开发建设等事宜。这样，就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

公益会成立以后，进行了聚义募捐，做了许多事情，如筑路修桥、建立医院、兴办教育、修建莲花石公园、引进树种兴建苗圃、整修名胜古迹、管理海滨秩序等。朱启钤本人从1917年起就陆续买入北

戴河原属外国人的房地产，在莲蓬修建房屋。每年夏季，他都到北戴河去避暑。他在北戴河修建了西山别墅，并修葺莲花山之观音寺。重修之观音寺，观音塑像由公益会出面，请雕塑名家郭世伍仿照北京广化寺的佛像雕刻而成。至于寺中的坐卧杂用供奉之具，也都是由朱启钤捐置。游客到观音寺游览时，还会看到附近有座钟楼。那钟铸自明朝嘉靖丙戌年（1526）间，原来放在北京宣武门御马监内，被人盗卖出国时被截获。朱启钤通过京师警察总监吴镜谭，把钟送到了北戴河。原来敲钟只是作为民工上下班的信号，后来成为游人观赏的古迹。位于莲花石公园与观音寺中间的那架小桥，因是朱启钤倡议修建的，据说现在已被命名为“护公桥”。朱启钤在莲蓬修建了墓地，其夫人1928年逝世后葬在那里，女儿浦筠去世后也葬在那里。现在游人到莲蓬山游览时即可看到这些坟墓。

北戴河西山原是座秃山，是朱启钤引进优良树种雇工种树，将其绿化的。附近马路两旁的青松，西一路、西经路一带的德国槐，也都是朱启钤引进来良种雇工种植的。朱启钤的房地产闲着没用，后来他就改建成旅馆出租，每年可收入房租四千元。

“老龙头”怀古

龙年看到不少写龙的好文章，深感龙在中国人心中是磨灭不掉的。在这旅游畅旺的时代，更是与龙分不开，因为以龙为名的地方到处可见，什么龙井、龙潭、龙门、龙江、龙洞……不胜枚举。而给人印象既深又有历史意义的一处，莫过于“老龙头”了。

记不起是哪一年了，一个盛夏时节，笔者曾偕知友二三往秦皇岛海滨一游。海水浴之后，自然想到要去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看看。这一看，方知不虚此行。

一般人都说，万里长城东起于山海关，西止于嘉峪关，其实不然。即以东端来说，山海关以东，仍有一段长城，直插入渤海之中。而且在明代初年，该地曾建有雄关一座，名曰“南海口关”，又称“宁海城”，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老龙头。“老龙头”在山海关南八里入海处的一座山头上，它扼守着万顷波涛的渤海，形势非常险要。明代初年中山王徐达修筑长城，选定此地为东端起点；明代中叶 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此建成入海七丈、周围一里的石城——宁海城。其后，兵部主事王致中又在宁海城上增建了澄海楼。澄海楼踞守宁海城上，恰似龙头朝天，气吞海岳，清帝康熙、乾隆都为之题诗撰联，御笔题写匾额，赞美这座海防要塞。

讵料清室末世，外患频仍，祖国山河，时遭侵凌。1900年八国联

军从天津大沽口进袭，8月14日占领北京，慈禧偕光绪出逃求和，联军又北犯张家口，南侵保定、正定，东占山海关。俄军为与英军争先抢占山海关，先乘火车于9月30日到达安山，要胁清军献关。英军刚从海路乘战船到达“老龙头”，清守将郑才盛不战而逃。英军于10月1日在“老龙头”登陆，首先占领了山海关车站，俄军随后才到。10月2日各国联合舰队相继驶至“老龙头”，宁海城和澄海楼就毁于侵略军的炮火轰击中。

次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准许各国驻兵。于是，山海关以南，东至长城，西至石河口，南至渤海岸“老龙头”周围，成为联军各国长期驻兵之地。他们建立营盘，盘踞了三四十年才撤走。

我们参观“老龙头”那天，风和日丽，海波不兴。一座长石垒墙高约三丈，屹立海中，雄伟壮观。迎面立石碑一通，上有“天开海岳”四个大字，据说是明朝抗倭名将 戚继光所题。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他在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率领“戚家军”抵抗倭寇入侵，用兵如神，连战皆捷的事迹，可说是家喻户晓。后来，南方倭寇之患肃清，他被宰相张居正调到北京，任命为保卫明朝北疆的蓟州总兵，负责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城沿线的防务。他到任之后，认真巡视长城，检查军务，并以五年时间，沿长城修筑了可屯兵、藏粮的“敌台”一千多座，使千里防线更为坚固。

近年重修长城，“老龙头”也随山海关的修复而重建，澄海楼耸立在“老龙头”入海石城上，复制了历代帝王将相的题字和碑刻，还把在英国营盘旧址搜到的英国侵略军遗物，铸有英国王冠图记的铁炮一座作为展览品，陈列于城楼上。楼前炮台旧址上，面对大海，竖立着“天开海岳”巨碑，八国联军入侵时推倒，今重新立起。

“人间仙境”蓬莱阁

素有人间仙境之称的蓬莱胜景，自古以来是人们向往的去处。它位于渤海和黄海交汇之滨的山东蓬莱县丹崖山。

蓬莱之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水经注》。书中提到：在秦汉时，众方士相传渤海海之东，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为神仙所居，山上有长生不老药。于是汉武帝多次亲驾胶东半岛，寻觅仙境。他来到登州丹崖山上，“望海中蓬莱”终未能见到，便在山上“筑城以名”，蓬莱仙境的名字由此而来，经过流传，逐渐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到了北宋嘉佑六年（1061），登州太守朱处约在丹崖山上建起蓬莱阁。继而北宋大文人苏东坡等在这里留下讴歌蓬莱青山碧海秀丽美景的诗文和手迹，使蓬莱阁和周围的景观，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吴承恩的《西游记》又将民间传说，八仙在蓬莱阁聚会，酒酣兴起，竟然 各显神通，借助各自的宝物漂洋过海，凌波而去，写进第八十一回。于是便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典故。

其实，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将此阁、此山视作“仙境”，大约与这里每年时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奇观有直接关系。海市蜃楼是阳光与海雾折射辉映的一种虚幻景象，一般出现在春夏两季。

与蓬莱仙境相呼应，蓬莱阁这一古建筑群中供奉了三组神仙塑

像。第一组是东海龙王敖广的龙王宫，第二组是海神娘娘林默的天后宫，第三组是以吕洞宾为首的“八仙”聚居的蓬莱阁大殿。这三组神仙均与大海相关，其摆放包含了许多当地独具特色的渔民文化。其中，天后宫与众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别处供奉的天后都称为“妈祖”，而这里称为“海神娘娘”；二是这里天后宫的陪神特别，是由四海龙王给天后当站官。据当地人说，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仁和的天后约束着凶神恶煞的四海龙王，对海上作业的渔民而言是件幸事。

蓬莱阁主阁供奉着八仙。他们有的背着硕大的酒葫芦，有的持剑，有的提着花篮，有的拿着大扇，个个潇洒飘逸。富有经济头脑的蓬莱人，如今不仅生产出“醉八仙酒”，而且还推出了“八仙宴”，让观光客品尝一下个中滋味。

站在蓬莱阁上，放眼四望，的确令人神怡。南面松柏滴翠，亭楼掩映。北面烟波浩渺，波涌涛滚，海浪击崖。　如在雾天，轻纱满山顶，云霭绕阁下，奇景怪象，万端莫测，更是如临仙境。

蓬莱阁的西侧有座“避风亭”，又叫“海市亭”，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避风亭坐南朝北，面对大海，耸立于陡峭悬崖绝壁上。这亭三面无窗，大门洞开，可是不管亭外刮多大风，亭里的人只听到风声，却不见有风吹进亭里。有人用火柴或打火机，点燃纸条，但见缕缕细烟直上亭顶，终不见火烟晃动，对此，中外游人莫不称妙。

原来建亭人为了使避风亭能让人在悬崖上很好地眺望海上奇观，巧妙地利用山形地势，设计了一座与天然石壁浑然一体的避风墙。由于东、南、西三面无窗，只有刮北风，气流才能入亭。但北边海上吹来的风，碰到崖壁和城墙，就被迫上升越墙而过。风力越大，上升的气流就越强，这更不容易吹进亭内。如此奇特的避风亭，引起成千上万的中外旅游者，对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赞不绝口。

与蓬莱阁相邻而居的蓬莱水城，水城由水中城墙环绕而成，周长

约三公里，面积二十五万平方米。它原是古代的海防堡垒，出入大海的地方，建有一座水门，设闸蓄水。平时，闸门高悬，船只随意进出；一旦发现敌情，闸门放下，海上交通便被切断。水门两侧各设有炮台一座，驻兵守卫，形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防御体系。

蓬莱水城建于宋代，时称刀鱼寨。至元末明初，因北方沿海屡受倭寇侵扰，明朝廷便在刀鱼寨的基础上开设 水闸，将海水直接引入里边的小海，并环筑土城，名备倭城，即今天的水城。历经几百年，如今蓬莱水域仍然保存基本完好，成为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海军基地。

避暑胜地——庐山

庐山，是江西省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它紧依鄱阳湖，飞峙长江边，虽然山高不过一百五十余米，绵延也只有二十五公里，但它奇峰群立，胜景险绝。仙人洞绝壁天生，五老峰日近云低，龙头崖深渊万丈，含鄱口气吞云泽，大天池千年不涸，九叠屏叠翠云张。还有那香炉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水帘玉泉，疑是银河落九天。真可谓：上山，可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下山，能随波万里，浪遏飞舟天地间。

庐山风景秀丽，四季如画。难怪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到此一游并诗歌吟咏。其中最能概括庐山避暑胜地特点的，莫过于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庐山气候湿润凉爽，空气清新洁静，与满山遍野的树木有关。忆及庐山林木，最令笔者难以忘怀的，是仙人洞以北的“竹林隐寺”。沿着由竹林组成的树洞前行，可见 一“竹林寺石碑”，这里便是锦绣峰。但只见竹林遍山，却不见有寺院的踪迹，只有一座观妙亭耸立峰上。据当地人说，山上确曾有过一座竹林寺院，不过，自从朱元璋慢待和尚的故事发生后，凡人便难得一见了。

相传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个名叫周颠的疯和

尚，口唱太平歌，说朱元璋一定能“做皇帝定太平”。果然，和尚料事如神，后被朱元璋封为军师，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朱元璋当了皇帝，和尚坚意辞行。问其住所，答曰：“吾乃庐山竹林寺贫僧也。”过了几年，朱元璋将天下治理已定，忽然想起疯和尚来。便派人到庐山寻找，但是，使者既不见竹林寺，亦未见疯和尚。焦急之际，忽听疯和尚大笑曰：“凡人看不见竹林寺，御使也请不动疯和尚。非朱元璋亲自来请，否则决不下山。”使者回告朱元璋。朱大惊，知自己慢待了疯和尚，于是日夜兼程，亲临庐山御请周颠。岂料，围着竹林转了几天，连周颠的影子也没看见，但他看到了竹林隐寺。朱元璋度其怪罪不见，便在锦绣峰上亲立御碑亭，御笔亲书“周颠仙人碑”，以彰其事。

记得此碑高约四米，石门上一副楹联，颇能表达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珍惜旧情的心态。联曰：“故从此处寻踪迹，更有何人告太平。”

庐山云雾终年缭绕，树木满坡葱茏。作为避暑胜地，庐山之水别具特色，为他山所未有。

其一是山泉众多。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满山皆水，遍地是泉。诸如花径泉、仙人泉、一滴泉、天池泉、龙首泉、三叠泉、九屏泉、黑龙泉、黄龙泉、神龙泉、招隐泉、海会泉、金井泉、青玉泉、观音泉、玉渊泉、聪明泉、义之泉……不计其数。

山泉众多，姿态又千差万别。“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描述的是崖泉，即山泉循崖而下，一泻千丈，形成挂川瀑布。香炉泉即是此类泉的代表。而“飞天如玉帘，直下数千尺。新月如帘钩，遥遥挂碧空”，此诗描绘的是悬泉。即泉水由崖口悬空而下，不循任何附着物，垂直飞落，酷似天降蛟龙。三叠泉就是庐山悬泉之最。该泉自五老峰北崖口悬注而下，似袅袅垂练，摧碎散落在坚硬的磐石上，激起万点细雨迷雾，经艳阳照

射，似万斛明珠，五光十色，晶莹夺目。那些“不见泉眼，但见水秀，溪流长远，千年不涸”的山泉是隐泉。泉水在石缝中缓缓流，不为人察觉，万条涓涓细流汇集一起，形成山溪，汇为小河，奔腾于绝壑峡谷之中，咆哮于松涛翠柏之间。庐山三峡涧诸泉即属隐泉之类。

另外，泉水冷热皆有，甘甜清洌，具有神奇的医学疗效，此乃一般避暑胜地所不及。庐山冷泉，凉若冰霜，无论多热的天，喝上几口，周身爽凉，从头顶直透脚心。招隐泉的泉水，烹之煮茶，自古为《茶经》乐道。唐代陆羽 曾盛赞庐山泉水为天下罕见“茶水”。明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庐山温泉可熟鸡蛋，一患有疥癣，杨梅疮者，饱食入池，久浴后出汗，以旬日自愈”。

黄山景色美如画

登过泰山，上过庐山，游过武夷，去过雁荡，相比之下，总觉得黄山有其独特之处。正如人们所说：黄山兼有泰山的雄伟，武夷山的秀逸，庐山的飞瀑腾空，雁荡山的峰石嶙峋……

黄山，可说是四时美景如画。春天，奇花异卉争奇斗妍，加上百鸟啼鸣，花间蝶影，使人沉醉不知归路。夏天，绿树成荫，翠谷流泉；雷雨骤至，立即瀑布飞挂，山间龙吟。秋天，层林尽染，却依然鸟鸣花艳，仿佛三春二度。冬天，时时银装素裹，峰石松草，顶琼佩玉，蔚为奇观。

黄山的松、石、云、泉，更为奇妙，非常罕见，人称“四绝”。

黄山松是黄山奇景之一，它针叶粗短，干曲枝虬，顶平如削，苍翠奇特。它们或雄伟挺立，或倒悬绝壁，或屹立峰巅，或如振翅欲飞的雄鹰，或似浑身披甲的武士，或冠平如伞，或尖削如剑，苍劲优美，姿态万千。明代钱谦　　益在《游黄山记》中写道：“黄山无树非松，无松不奇。”确是真实写照。

黄山石是黄山又一奇景。在奇峰林立的峰峦中，有无数灵幻奇巧的怪石与山峰巧妙结合，构成一幅幅绝妙的峰石图。如在半山寺前看到的“金鸡叫天门”，在蟠龙坡看到的“五老上天都”，在玉屏楼看到的“采莲船”，在北海看到的“猴子观海”，在西海看到的“仙人绣

花”……无不惟妙惟肖，逼真有趣。

黄山云海，最为壮观，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春、秋、冬三季最多。这些由水汽凝结而成的云海，时而堆棉铺絮，平静得像玉池一般；时而轻飘漫流，像款款舞动的素绢；时而风起云涌，像滚滚波涛，将万道山梁一齐淹没。

黄山泉水众多，且变幻奇趣，很吸引人。特别奇妙的是可饮可浴的黄山温泉（又名灵泉），它流量稳定，久旱不涸，水温常年保持摄氏四十二度左右。温泉边还有天然寒泉一眼，盛夏时可与温泉调节，严冬可自动干涸；泉源出于朱砂峰岩窟，隔若干年就出现一次水色变红的奇观。过去曾有人这样赞美它：“朱砂常饮愁能化，浴过灵泉骨自香。”

黄山除“四绝”外，还有飞瀑、碧潭、清溪等景色。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黄山四千仞，
三十二莲峰。
丹崖夹石柱，
菡萏金芙蓉。

巍巍中岳古嵩山

自从前几年以少林寺为题材的武打影片相继问世之后，位于河南省登封县的这个沉寂了几百年的“天下第一名刹”，顿时交了鸿运，大发其迹，四方朝圣进香者和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笔者不敏，直至今夏，始蒙友人之邀，作中原之游。听景不如见景。但见今日少林寺前车水马龙，商贩云集，熙来攘往，有如闹市，昔日古刹之神秘感已不复存。游人谑称游“少林寺”为逛“少林市”。一“寺”一“市”，反映了名刹的沧桑。

关于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已有连篇累牍记载，毋庸赘述。笔者但觉中岳嵩山确有诱人之处。

中国古分九州，河南省属于豫州，居九州之中，故称“中州”。登封县地处中州腹地嵩山南麓，东接五代都城汴梁，西连九朝古都洛阳，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区之一。四千多年前，大禹在此建立奴隶制国家，号称“天地之中”。此处原名嵩阳县，最初为祭祀太室山的场所。唐 代武则天时将嵩阳县改名为登封县，以示她登嵩山，封中岳之意。

嵩山位于登封县境内，自古以来即为文人荟萃之地，文物古迹颇多。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古代黄帝就游过嵩山，距今已四千五百多

年。

唐尧为庆百岁寿辰，专程到嵩山巡狩，不幸驾崩阳城。虞舜十五年，因太室山地处夏禹封域之内，遂命夏禹主祭太室。继舜之后，禹改虞为夏，改帝称王，建都阳城，并在嵩山开凿轩辕关，引洪归道，造福桑梓。

周公姬旦，营建东都洛阳城，立土圭测日影，求地中，验四时。至今，“测景台”仍存于周公庙内。

西汉武帝刘彻于元封元年（前110）正月登游嵩山，并令祠官增建太室祠。

唐高宗李治，三次到登封，683年，在他的行宫“奉天宫”住了十个月。

武则天于696年登嵩山，加封中岳；700年，又在阳城游石淙宴群臣，提笔赋诗，摩崖刻碑。

明清两代帝王也到嵩山祭神或游览，题词赋诗，树碑立传。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如鬼谷、巢父、颖叔考、李白、杜甫、欧阳修、王维、曹植、司马光、范仲淹、骆宾王、程颢、程颐等，都在此留下过足迹。

乘筏漂游武夷山

旅游免不了登山。登山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也是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竹杖芒鞋，拾级而上。这种方法太累人，于是，在四川等地就有人乘“滑竿”上山。滑竿也就是肩舆，两根竹竿抬一把竹椅，人坐其上。在重庆一带倒是常见这种东西，可总觉得不大安全。如今，登山工具最方便而常用的莫过于缆车。不过，那东西用于登山则可，若用于游山，悬在半空匆匆而过，快则快矣，可是什么景致、情趣，通通没有了，实在不敢恭维。前次应邀访闽，去游了一趟武夷山。游山中有一项为乘竹筏、伐九曲、游山景，那真是游山最理想、最舒适、最富情致的方法了。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也就是告老退隐后的随园老人，写过一篇《游武夷山记》。其中有一段写道：“凡人陆行则劳，水行则逸。然山游者往往多陆而少水。惟武夷两山夹溪，一小舟横曳而上；溪河湍激，则作声响。客或坐、或卧、或偃、或仰，惟意所适，而奇观尽获，洵游山者之最　　也。”袁老先生写尽了乘小舟游武夷的方便与安适，笔者乘竹筏游武夷之后，深有同感。

我们乘的竹筏上，并摆了几张座椅，大家坐在椅上，竹筏从星村顺流而下。真个是山挟水转，水贯山竹，山水之美，兼而有之。沿溪的峰岩千形万状，有的斜倚溪畔，有的直贯云霄；有的逼近溪水，人在筏上伸手可及；有的远离砂积之后，遥送竹筏飘摇而过。宋代的著

名贤臣李纲对此曾有诗曰："一溪贯群山，清浅萦九曲。溪边列岩岫，倒影浸寒绿。"可见李老宰相对他家乡的这种景物，也是十分欣赏的。

九曲溪发源于三保山，到了星村流入武夷山境，曲折形成九曲，流到武夷宫前汇于崇溪，曲折盘旋山中约七八公里。溪水澄澈清碧，有的溪岸崖畔生长着密密的翠竹，漫山碧透，更有丹崖、蓝天、白云映入水中，俨然一幅流光溢彩的山水画。

给我撑筏的壮汉，说的是普通话。我们一面观景，一面听他讲关于山水的传说，讲朱熹老夫子的故事，讲朱熹的《棹歌》，讲崖上高处的悬棺。我们既佩服他撑筏的技术，更佩服他对武夷山水的渊博知识，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导游。

凌波轻筏游武夷，真是人间至乐之事。

峨眉仙山“琴”悠悠

峨眉山人很自豪。因为他们有一支独特的野生“抚琴乐队”。

千百年来，一直以“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这样清脆悦耳悠扬宛转的“琴”声，伴守着峨眉山人世世代代，勤劳苦作，修生养息，安度春秋。

这支“抚琴乐队”是峨眉山中特有的一种稀有珍奇蛙。每到夏秋季节，这种蛙成群结队，叫声此起彼伏。因为它们的叫声近似琴声，所以，山里人就把这支“抚琴乐队”的“队员”叫作弹琴蛙。

相传唐朝时期，峨眉山万年寺有一个叫广智的大和尚，弹得一手好琴，每当做完佛事，都要抚琴扬声。一天傍晚，广智和尚琴趣大发，琴声时而如洪钟共鸣，时而如山风松涛，时而如淙淙流水，时而如莺歌燕唱。正当广智弹得如痴如醉时，一个仙女悄然来到他的身后，洗耳恭听。一曲终止，仙女含羞掩面跪在面前，要拜师学琴。广智爽快答应，仙女很快就学会了弹琴。不久，广智和尚圆寂了。仙女为了感师傅恩，决意留在峨眉山变成一种青蛙，继续弹琴，把优美动听的琴声留给人间。

传说终究是传说。其实，弹琴蛙是一种蛙类，重五十至一百克左右，常年栖息在峨眉山洪椿以下的天景和净水雨乡境内。千百年来，每到黄昏，它们就“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地叫个不停，叫声好似舞厅

里的中三步舞曲“呼嚓嚓”，很有乐感，一直伴随山里的人们进入梦乡到天明。

白天，弹琴蛙就停止了弹奏。但是，只要有人从它附近路过，它也会为你弹上一曲。

去年6月的一天，一位加拿大生物工作者，抱着好奇心理，专程前往峨眉山看琴蛙，听“琴”声。他连续在小溪旁守候了两天两夜，连一只琴蛙的影子也未见到。第三天，这位老外不死心，天还没黑又带上干粮到小溪边静候。一位放牛老人对这位老外的行动感到很奇怪，很有“警惕”地报告了村治保主任。治保主任带上治安员前去探问，才知道这位老外是在等“琴娃姑娘”出来给他弹“琴”，差一点儿没闹出“国际官司”来。当地人向这位老外介绍了琴蛙的生活习惯，并主动引导他到脚盆坝琴蛙最多的地方，让他如愿以偿，满意而归。

弹琴蛙不仅成为峨眉山人的终身“伴侣”，也吸引了不少的中外游人到峨眉山看琴蛙，听“琴”声。

据有关生物学家介绍，弹琴蛙属蛙科类。它与其他 蛙类发音不同，是由声带发音，通过两腮气泡而产生的共鸣。尽管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此蛙，但发不出这种声音来，这是由于峨眉山独特的气候和环境，适宜弹琴蛙的生长和繁衍所致。

黔江下游大藤峡

大藤峡位于黔江下游，其出口处距桂平市区八公里，以桂平、武宣交界的横石矶为入口，以弩滩为出口，全长四十四公里。其水力资源丰富，是规划中的广西红水河十大梯级水电站之一，拟投资八十亿元，装机容量为一百二十万千瓦，年发电量为七十亿千瓦。

相传当年，这里有一大藤，横亘两岸，南北瑶民，可以攀藤而渡，故得名大藤峡。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畅游后曾写下《大藤峡游记》，道出其峡“北自横石矶入峡，南出弩滩”。峡江两岸，不仅缀着怪石、奇峰、秀竹、清泉，在江水衬托下，构成一幅天然美景图画，而且河道曲折迂回，分别形成弩滩、碧滩两道险滩。峡江中，南北两岸分别有鱼形石和牛角形巨石伸向江心，使主航道收束至仅有三十米宽度。河流为这上下两道礁石所阻，上下水位落差数十米，因而激流翻滚，破峡而出，似离弦之箭，故名弩滩。

当年，瑶族人民就是凭借大藤峡天险，发动大规模起 义。据《明史》、《浔州府志》和《桂平县志》记载，起义军在韦公广、兰受义、侯大苟等瑶民首领领导下，“啸聚至万人”，从明洪武四年（1371）至天启年间，屡征屡起，持续斗争二百七十余年。其中起义规模最众，影响最大的是侯大苟领导的瑶民起义。成化元年（1465），明王朝派都督韩雍，领兵十六万，水陆并进，追杀征剿，明军在大藤峡处，被瑶民起义军打得横尸两岸。大藤变化无穷，沉沉

浮浮，韩雍察知大藤奥秘，用犬血以喷，随喷随斩，终至断藤。后韩雍生擒侯大苟，因而大藤峡又名断藤峡。如今，大藤峡南岸的绝壁上，镶嵌着一个威武雄壮、头缠盘巾的侯大苟石像。

韩雍因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有功，明正德年间，明武宗御书题刻“勅赐永通峡”，为韩雍歌功颂德，并在大藤峡出口处弩滩之下赐建韩雍庙，塑韩雍金粉身像一尊，奉祀香火。

民谣曰：“大藤峡，十六湾，十四滩，湾湾有景，滩滩有情。”整个大藤峡谷，分布着众多风格各异、意境独特的景点。这里有五马恋江、观音坐莲、狮猴迎客、猩猩观瀑、渔翁垂钓、大藤巨石、青龙出水、千佛屋、九层楼、仙人阁、三妹洞等，景景迷人，栩栩如生。两岸悬崖不时涌出股股飞泉，有的如同瀑布，直泻而下，有的如同轻烟细雨，在空中飞腾，真是“无处不苍翠，有水尽飞泉”。

大藤峡，已列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桂平西山的 八大景区之一，成为广西新旅游景点。桂平市人民政府计划在大藤峡畔的崖石上建一个巨型石碑，将毛泽东题写的“大藤峡”三字刻在石碑上；还计划将大藤峡与龙潭国家森林公园连接起来，开辟一条水陆旅游观光连为一体的旅游线，以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

龙宫探奇

龙宫本是仙境，然而在贵州安顺县马头布依族苗族乡确有这人间仙境。“龙宫”是一串珠式的暗湖溶洞群，五进五出，称为“五进龙宫”。现在只开发了“一进龙宫”，就足以使游客大饱眼福了。

“一进龙宫”包括五个小区，十多个景点。其核心部分由卧龙湖、迎宾洞、龙门飞瀑、天梯洞、龙潭天池、龙宫暗湖、蚌壳岩、虎穴八个景点组成。

未进入“龙宫”之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瀑布，因在洞中，又称地下瀑布。龙门高五十米，宽二十五米，宽阔敞亮；瀑布高三十四米，飞流直下，轰然巨吼，极其壮观。故有“天下第一龙门”之称。

龙潭天池在龙门飞瀑的天窗口上，需穿洞登山而上，有一万多平方米，三十多米深。由悬崖环抱，宁静幽深。悬崖上长满奇竹异树，越发增添了深幽之感。从天池登龙舟，就可以游“一进龙宫”了。

龙宫构造奇特，景观丰富。无论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诗人以及其他游客来到这里，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科学家关心它的成因和构造，艺术家欣赏它的自然美，作家可写出优美的篇章，诗人可即兴赋诗，至于广大游客则喜欢这天上人间的美景，产生各种生动有趣的遐思。

“一进龙宫”全长八百米，划分为五个洞厅。第一厅名群龙迎客。悬挂在洞门上的巨大、密集、多姿多态的钟乳石群体，宛若是龙宫的仪仗队，在一旁列队欢迎游客前往龙宫造访。第二厅名浮雕壁画。如果大自然是一位艺术大师，那么水应是伟大的雕刻家。左壁上那幅“巨型浮雕”，迎面那株“深宫古榕”，都是它们的得意之作。此外，还有一块令美学家叹为观止的具有流动感的石壁，科学的名称叫“石瀑布”。船继续缓缓行进，来到第三厅。过了“低头石”，猛一抬头，见五条龙庄严地守护着两块瑰丽的宝石，一大一小，光彩夺目，此谓“五龙护宝”。两侧观光，“龙王三公主卧室”的神秘清秀，“猪八戒探龙宫”的逼真形象，都能令人赞叹这大自然的魅力。第四厅是水晶宫殿。这是五个洞厅中最宽大，也最辉煌华丽的一个洞厅。宫殿门口有“武士把门”，警卫森严。这就是龙王居住的地方了。从右向左环顾，依序见“海马飞天”“仙妇赶猪”“龙女坐宫”“哪吒闹海”“老龙回宫”“少女看书”“群猴下水”“石葡萄”等钟乳石景物形象。最后一厅是高　峡幽谷。峡高八十米，谷长二百余米，宽三十米，水深二十二米。洞厅高峻、奇险，峡谷两边的钟乳石景物更具特色。左壁上有惟妙惟肖的“屈原行吟”，半岩上有一块十多米长的石幔，有如“锦帐高悬”。此外，“荷花倒挂”“仙翁醉酒”等景观，亦能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华夏神州是龙的故乡，炎黄子孙又是龙的传人。在龙的国度里开发龙宫，龙的传人进入龙宫游览，游人既是龙宫的来客，又是龙宫的主人。

三游洞游记

我在参观葛洲坝工程之后，顺便与友人结伴去游览著名的三游洞。三游洞在宜昌西北十几公里处的西陵山北峰。一路上景色迷人，上看，西陵峰顶怪石嶙峋，草木葱郁，又有各色野花漫撒翠岭；下望，一面是奔腾的大江，一面是涓涓的下牢溪水。下牢溪犹如一条碧绿的带子在深山峡谷中飘浮，若隐若现，不禁令人忆起杜甫的诗句：“始如云水峡，忽尽下牢边。”

我们沿山崖小路而下数十步，即见一青砖翠瓦的山门迎面而立。山门上书有“三游古洞”四字，字迹端庄而洒脱。待进山门后，顿觉豁然开朗，一巨洞深嵌在绝壁之中，深约二十余米，阔约二十米，三根似圆若方的钟乳石垂直排列，将洞隔成相通的前后两室。

前室明旷，诗文满壁。有白居易的“三游洞记”碑刻，据说原碑已毁，此碑乃明代万历年间重刻。上面记载着，唐元和十三年（818）冬，诗人由江州司马升任忠州刺史， 其弟白行简同行。当时，诗人元稹正由通州司马调任虢州长史。次年三月十日三人会于彝陵（今宜昌市），十一日到下牢，十二日同游洞中，置酒畅谈，通宵不寐，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书于洞壁。洞名由此而来，此为“前三游”。

后至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于嘉祐四年

（1059）冬，从故乡湄州赴汴京待任，途经彝陵，慕名而来，亦各赋诗一首书于洞壁，人称“后三游”。至今，我们仍可见到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石刻像和苏氏字画碑刻多件。

此外，我们还看到清朝及近代名人的题刻，冯玉祥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写的隶书“是谁杀了我们的父母同胞和兄弟”“不共戴天”，尤为赫然。

三游洞内室顶端有巨石垂下，经敲击，其声若钟鸣，故人称“天钟”。室内还有一石台，底空，重锤击之，发声如鼓，人称“地鼓”。洞后石壁上，有几个小孔，人称“洞中之洞”，但洞口小，可望而不可入。唯左壁有一耳洞，可容躬身扶壁前行，仅前行十余步，即可达于洞外。

三游洞景色幽美，曾被古人誉为仙境、幻境、桃源洞。至今洞壁上仍有“灵区”“隔凡”“洞天福地”等巨幅题刻。向导告诉我们，历代途经彝陵的文人墨客，无不以到此一游为快。除白、苏等大家外，欧阳修、黄庭坚、陆游及后世不少文人都曾到此游览，留下吟咏的诗词歌赋近 百篇和各种字体书写的石刻四十余件。

我们出洞后右行，再沿崖边小路而下百余磴，即达崖后的小亭。亭内有一清泉晶莹澄澈，水质甘美可口，名曰陆游泉。查陆游《入蜀江》可知，他于宋乾道六年（1170）曾来三游洞，并取此泉水煎茶，乘兴赋诗：“苔径芒鞋滑不妨，潭边聊得据胡床。岩空倒看峰峦影，涧远中含药草香。汲取满瓶牛乳白，分流触石佩声长。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陆游泉即由此得名。

在尽兴而归之前，我们转而登上了三游洞之上。这里既有突兀嶙峋的怪石，也有平坦错落的小园。临江处则有一座圆柱形石台自江边拔地而起，名叫“张飞擂鼓台”。相传建安年间，张飞任宜都郡守时所筑。由此西眺可见西陵峡口的南津关。南津关像被神斧劈开，山分左

右。大江奔腾咆哮，夺门而出。东眺则见葛洲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在大江之上，壮观无比。

水旱从人的都江堰

位于岷江上游的都江堰，是中国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始建于战国秦昭襄王时，由蜀郡李冰及儿子主持修建。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效益，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古名湔堰，又称都安堰、楗尾堰，自宋代起改称都江堰。早在春秋时代，蜀人已在今都江堰城南开凿了一条人工河，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以减轻成都平原的水患。李冰任蜀郡太守后，废弃了这个入水口，在玉垒山下凿开离堆修筑都江堰。

都江堰渠首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的有机结合，科学地解决了河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等水利难题，使都江堰绵延千年，至今不衰。“鱼嘴”形似河鱼嘴，位于江心，将迎面冲来的岷江水剖为内、外二江。外江宽阔，除供少量灌溉外，主要起排洪防涝的作用；内江经宝瓶口东下成都平原，滋润阡陌，惠及　苍生。飞沙堰设在宝瓶口前，具有自动泄洪排淤功能，它是用竹笼装卵石砌成的人字堤，当洪水达到一定高度，便会自动从这个排洪道溢出，重归岷江正流，特大洪水时，飞沙堰会自动崩塌排洪。飞沙堰还能借助自然弯道将上游冲下的泥沙和卵石排入外江河滩上，避免宝瓶口河床淤积。宝瓶口是内江分水口，它是从玉垒山山腰开凿出来的水道，两岸岩石异常坚固，两千多年来，它时刻在经受惊涛骇浪的冲

击，至今却仍岿然不动。都江堰的科学之处还在于它可以根据需要，人为调节内、外江水量。春耕用水时节，古人利用一种叫“杩槎”的临时分水闸，使鱼嘴向外江延伸，缩小外江的过水断面，于是江水按“外四内六”分配；夏洪来临，则把外江的一侧“杩槎”拆掉，向内江一侧投“杩槎”，按“外六内四”分流，达到分洪防涝的目的。

都江堰千秋伟业，世代称颂。后人为纪念李冰父子治水之功，在玉垒山麓修了“二王庙”。庙在江边，依山取势，拾级而上，可达望帝祠。庙内有李冰治水六字诀“深淘沟，低作堰”石刻和李冰父子塑像，后殿陈列有现代画家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等人绘制的“天马”“玉女”“黄粱梦”等碑刻。纪念李冰父子的另一建筑是伏龙观，殿宇三重相叠，巍峨壮观。站在伏龙观上，可俯视宝瓶口汹涌澎湃的江水。伏龙观内存有东汉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这是1973年整修河道时在江心发现出土的珍贵文物，石像高近三米，重四吨半。

“东方威尼斯”周庄

江苏省昆山市有个古镇叫周庄，俗称“避暑水庄”。

说周庄是“水庄”，的确不假。古人称它是“泽国”，有“镇为泽国，四面环水，港汊分歧，湖河联络，咫尺往来，皆须舟楫”之说。今人另给它起了一个雅号叫“东方威尼斯”。围绕全镇的澄湖、白砚湖、淀山湖、南湖和三十多条大小河流，面积将近两千亩，同耕地面积几乎相等。镇上有主河道四条，纵横交错呈“井”字形。房屋沿河而建，水镇一体，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

周庄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算起，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相传，宋代元佑元年（1086）有个姓周的迪功郎在这里设庄，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好事。人们为纪念他的功德，便将此庄起名为周庄。单从周庄得名至今已有九百多年。

周庄有一条用石砖铺就的古街道。在“井”字形的水道上，经过几代人的建设，形成了八条长街。街道两旁的 建筑，重脊高檐，古色古香，至少有一半是明、清时代的房屋。过街楼、河埠廊坊、小苑幽弄、深宅大院，随处可见，呈现一派古朴、怡静、明洁、幽雅的风貌。

穿过中市街，越过富安桥向南，便是闻名遐迩的沈厅。沈厅坐东朝西，是一座比较完整的古旧建筑物。它是明代“资巨万万，田产遍天

下”的江南巨富沈万三后裔建造的。前门沿街，后门依水，有七进庭院，五进门楼，大小房屋一百多间。厅内有两层楼阁，楼楼相通。楼板是用宽六十厘米、长六米的整块松板铺成。每间厅堂的栋梁上都雕有花纹和禽兽。五座门楼都有砖雕。砖雕是江南小镇大院的独特风貌。正厅松茂堂对面的砖雕门楼，最为精巧，高约六米，上覆砖飞檐，下承砖斗拱，额书“积厚流光”四个字，周围刻有红梅迎春浮雕，上刻人物走兽，内刻《西厢记》戏文，五层砖雕，层层透雕镌刻，工艺精致。只可惜部分砖雕已经损坏。据说，这些门楼砖雕均出自当时名匠之手。

周庄，历代隐士、名人荟萃，这给小镇的历史增加了光彩。西晋文学家张翰在南湖畔度过了他的晚年。明代刘基曾有“回首忆莼鲈”的诗句，引用的就是张翰见秋风起，思念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请求辞官，回到周庄的典故。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苏州任刺史时，曾经多次到周庄寓居，垂钓南湖，写了不少诗文。南社同人柳亚子、叶楚伧等人，经常在迷楼诗酒聚会，开展文学革命活动，写了不 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当袁世凯复古称帝时，柳亚子在《孤愤》一诗中写道：“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把个窃国大盗骂得淋漓尽致，讲来令人叫绝。

周庄镇声名远扬，国内外游人经常来这里探古寻幽。旅美画家陈逸飞，游访周庄时以双桥为素材，绘了一幅题名《故乡的回忆》的油画，在美国展出时被美国石油大王哈默购去，后来哈默访问中国时，将这幅油画作为礼品赠送给邓小平。

神奇的黄果树瀑布

对于抗战时期在滇黔一带住过的人来说，黄果树瀑布也许并不陌生。一次，我搭乘军车从贵阳经安顺赴曲靖（云南境内重镇）时，车过了镇宁不远，便听到水声轰轰不绝，而且越来越响，原来已临近黄果树大瀑布。这里离安顺约四十多公里，大瀑布像倒泻的银河，澎湃而下。经司机同意，我们还下车到近处观赏了一番。瀑布水面宽约七八十米，从峡谷间直泻潭内，落差也约七八十米，溅起千层水花，飘扬着水雾，声如雷鸣，惊天动地，真是奇观。可惜我们不能久留，稍事领略这神奇景观之后，登车西行，但是那印象、那磅礴的气势令我至今未忘。

可是，近来听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原来黄果树不止一个大瀑布，而是一个瀑布群。有的瀑布比黄果树瀑布还要宽，有的比它还要高，有的比它更美，有的水流比它更大。比如黄果树瀑布上游约一公里的陡坡塘瀑布，虽然没有它高，但瀑顶水面却有一百多米宽。在黄果树西面的 关所岭上，有一个三级瀑布排空而下，总的落差高达四百多米。其最上一级地势最高，波涌连天，称为连天瀑布；最下一级称滴水潭瀑布，也有一百多米高。妙的是这个瀑布随着四季山水的流量大小还会发生万千变化。据说瀑布群中形态最美的是银链坠潭瀑布，它高度虽仅十米左右，但它水流之处是一个个的石块，水流其上，如片片鱼鳞，银光闪闪，又如一条银链在抖动，最后坠入地下深潭。

就是黄果树大瀑布本身，听说也有新发现。原来在大瀑布的后面，有一条长百余米的石崖，如一条走廊通向石洞，从洞内向外望去，可以看到飞瀑下坠，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帘洞。在洞内耳闻水声雷鸣，眼见水花飞溅，整个身体和全部神经都感到震撼，真是惊心动魄。据说有一位浪漫的女诗人，迷恋上黄果树大瀑布。有人劝她离去，她不肯，大叫一声：“我嫁给黄果树瀑布了！”

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黄果树瀑布被多少画家画过，被多少摄影家摄入镜头，那都是无声的诗；而它那震荡山谷的涛声，却是有声的画。黄果树瀑布是诗，也是画。

钱江秋涛天下奇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闲居洛阳时，所写的一首《忆江南》词。近代著名诗僧曼殊大师（俗姓苏，字子谷，原名玄瑛）亦有诗道：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的确，人们不能忘情于杭州的，除美丽的西子湖外，就要算“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了。

钱塘江大潮景色之奇，据说全世界只有巴西亚马孙河的涌潮可以与之媲美，别的潮就都不在话下了。凡是看过钱江潮的，谈起来总是绘声绘色，终生难忘。钱江潮，以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的潮水为最大。潮来之前，江水 特别平静，大潮来时，由远及近，开始似一条白练横卧江上，雪浪翻滚，海鸟在浪花上翱翔，追逐觅食。大潮临近时，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刹那间，波涛千顷，万马奔腾，真有“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的壮丽气势。

钱塘江潮来时风浪险恶，史书早有记载。东汉袁康、吴平著《越绝书》就有浙江“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之撰述。司马迁的《史记》亦有秦始皇出游，“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波，上会稽，祭大禹”的记载。最可笑的是那个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他丢掉了黄河两岸的大片国土，刚刚从扬州逃到镇江，从镇江逃到杭州，歇脚钱塘江畔的“潮鸣寺”，喘息未定，夜半又忽然听到“万马奔腾”之声，赵构大惊失色，以为金军兀术追兵到此。后来寺里的和尚告诉他，这是钱塘江的潮声，惊魂未定。“十万军声半夜潮”，这句诗确是写得形象逼真的。

钱塘江潮之所以奔腾澎湃，成为千古奇观，是因为钱塘江身狭口阔，形如喇叭的缘故。从河口（以扬子角到镇海一线算起）到海宁，一百四十二公里的流程中，河宽从一百公里急剧收缩到二点六九公里，增强了潮流的强度。再加上钱塘江入海处有龛、赭二山，加大了对潮流的摩擦，“横直激射，盛不得骋”，更使潮势汹涌，故而出现了，“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的钱江怒潮。

从前，杭州城外沿江一带都可以看到巨潮。每逢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秋潮最高的时节，杭州合城若狂，都去“江干”一带看潮。在前人笔记中记载着看潮成市的盛况，有“看潮人看看潮人”之句，这正是这种盛况的很好写照。

由于江流的变迁，现在看潮最好是在海宁县盐官镇。盐官镇，离杭州约四十五公里，临江有弯弯曲曲的防波大堤，大堤上是石砌台阶，观潮人可以立看，也可以坐看。

盐官镇观潮处还筑有“中山亭”，那是为纪念孙中山当年在此观潮而建的。孙中山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就是那时看了钱江潮后说的。

伍仁桥的狮子数不清

京南有座卢沟桥，桥上多石狮，世人常谓“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有趣的是，保定府的安国县（今安国市）南九公里处，有座伍仁桥，桥上的狮子也难以数清。

伍仁桥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当年，这里是个水陆码头，每年春秋两季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有“祁南雄镇”之称（安国古称祁州）。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磁河，人们往来以木搭桥。但是，雨季洪水泛滥，木桥常被冲垮，于是百姓们欲建一座石桥，以利百世。当时有村民宋一实和苏进知等，发起募捐，集资建新桥，但因连年灾荒，未能如愿。后来，他们到京城，恭请内府募捐。正好遇上乾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王朴，请王朴奏明皇上。至明万历年间，官府特拨金银，差人前来督工建桥。乡人择吉日开工，选用西邻曲阳县黄山大理石，日夜兼程，历时数年竣工。还传说，乾清宫郑贵妃为省亲方便，除自己出资外，还发动内宫捐资，故在“三忠阁”内悬有郑贵妃佩剑 一把，圣旨一道，作为镇桥之物。

桥长六十五米，宽七米许，全部石质结构，建造严谨。桥面拱券和桥墩之间，都有铁腰和铁索相连。桥南口有一对高达二米许的大石狮。桥名原定“万寿桥”，后改为“伍仁桥”，俗称“贵妃桥”。

早年到伍仁桥游览，犹记除桥南口一对大石狮外，桥两旁望柱上

还雕刻有许多“子母狮”，母狮身上雕刻着数目不同、神态各异的小狮子，有的趴在母狮背上，有的偎在胸前，有的顶在头上，有的踩在脚下，有的蹲着，有的戏耍，有的只露半个头，大者如拳头，小者像核桃。那真是，有藏有露，大小不一，部位有别，数目不等。数起来，一回一个数，因为数的时候常常漏掉和数重了，故人们常说“伍仁桥的狮子数不清”。

相传，清朝末年，伍仁桥镇的两家当铺的账房先生，奉东家之命，手拿算盘，带着伙计，多次到桥上清点狮子的数目，结果是数一次一个数，再数一次又不一样，怎么也数不清。后有好事者，就是不信它数不清，而当到桥头一数，仍是一回一个样。

其实，伍仁桥有名，不仅仅因为它的狮子数不清，而更主要的是它那独特的雕刻艺术和精美的建筑风格。伍仁桥的石狮，在民间艺人的锤头、铁凿下，每个狮子已不再是无生命的“石头”，也不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人格化了，注入了人的动作和情感，个个生动自然，千姿百 态，栩栩如生。据说，二十六对，五十二个，没有重样的。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开采的石料，其形状、大小、石质、颜色不可能完全一样，石匠艺人也随之“量体裁衣”了，这自然雕刻出来的都不一样。

伍仁桥已历经三百八十多个春秋，现仍屹立在磁河之上，20世纪80年代初已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且说潮州湘子桥

友人谈到潮州湘子桥，云梭船浮桥已被新式的钢梁大铁桥取代，桥身提高了七米多，桥面两边添有回纹栏杆。唯有旧桥大石梁及余下的一只铁牛依原位保留，作为古迹，供人们观赏。

有道是“到广不到潮，枉费走一遭；到潮不到桥，白白走一遭”。这广东潮州湘子桥名声之大，是因为它与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及福建晋江的安平桥，并列为中国古代桥梁建筑艺术中的三大杰作，而且它还是世界上第一座开关式的大石桥。

湘子桥坐落在潮州市的东门外，东依架山，西连潮州城，势如长虹卧波，横跨于滔滔的韩江之上。它气魄雄伟，风格独特，八百年来，为潮州名胜之一。

湘子桥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全凭古人的血汗和智慧，开山凿石，把一条条重达四十多吨的花岗石料运到江边，造墩架梁，殊属不 易。前后花了五十七年的时间，才建成靠西头的九个桥墩。那石砌桥墩中最大的宽十二米多，长二十余米，高十多米，重约六千吨。靠东头的九个桥墩，也整整花了十六个春秋。中间一大段江面依然靠小船摆渡，当时称为“济川桥”。

此后历代虽有小修，但因天长日久，江水冲击，渐有崩溃，直至明宣德十年（1435），才得到重修和增建。西岸十墩九洞，东岸十三

墩十二洞，中间尚余一段九十余米宽的江面，用二十四条梭形木船架搭浮桥相连。到了明正德元年（1506）又增建一墩，减去木船六条，成了“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景观。每座桥墩之上建有一座望楼，而且式样各异。清雍正二年（1724），铸了两只铁牛置于桥上。在铁牛身上铸有“镇桥御水”四字。照五行学说，“丑银上止水”，一对铁牛是用来镇压韩江洪水的。但洪水并没有被铁牛镇住，反而在清道光二年（1822）将其中的一头牛冲入江中，连找都找不回来了。当地有首歌谣：

潮州八景好风流，
十八梭船二十四洲。
二十四楼台二十四样，
二只铁牛一只溜。

唱的便是这座桥的独特风貌。

据记载，当时的桥确实很漂亮，雕梁碧槛，倒影清流，美若彩虹映波，配上两岸翠竹森森，江上舟楫如林，恍似潇湘，故而又称之为“湘桥”。

由于湘桥华美壮观，因之产生了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其中最突出的是把这座桥的建造说成是八仙中的韩湘子和其他七仙叠石而成，故名“湘子桥”。

万古名桥出越州

绍兴素有“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之说，“出门坐船，抬腿过桥”正是绍兴的写照。清光绪年间的《绍兴县志》记载，城内有桥三百余座。现在绍兴市区较著名的桥也有近百座，而整个绍兴水乡多达五千余座。所以绍兴有“桥乡”“桥都”之称，又称“石桥博物馆”。

绍兴盛产青石。在山区小溪涧上，架一石板，即成一桥，简练到极致。当然更多的石桥则依势而造，因地而架，从而使石桥成为独特的建筑艺术。最普遍的属圆洞桥，洞分单孔或三孔。圆拱之形成，全属青石桥的巧妙架设。它不但节省原料，而且利于泄洪，又很美观，同时桥洞又便于船只往来。

绍兴石桥的另一特点，是一桥多用。有在桥上设亭子或走廊的，人们称之为亭桥、廊桥。更别出心裁的是，有在桥头建造简易戏台的，略似于绍兴原先的三面戏台，人们可坐于船上看戏。而闻名中外的绍兴古纤道，更是将桥 与路结合的范例。古纤道始建于唐代元和十年（815），卧于风景秀丽的杭甬运河和鉴湖之上或平铺岸边，傍野临水；或飞架水上，迎流而建，每隔数百米，有形态各异的平板桥、拱桥或梁式石桥相连，绵延百余公里，素有“白玉长堤”之称，现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绍兴“八字桥”，是我国最早的立交桥。虽已经历了近八个世纪的

风风雨雨及天灾人祸，至今仍极为完好。古书《嘉泰会稽志·桥梁》篇中载有：“八字桥在府城东南，而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得名。”

绍兴的桥不仅构造别致，千姿百态，而且桥名的由来，大都与这座古城的历史人物、民间故事和名人诗文相联系，饶有趣味，耐人深思。比如在绍兴县夏履地方有座石桥叫“夏履桥”。相传夏禹治水路过会稽时，曾遗履于该地而得名。据《吴越春桥》记载：“禹伤父功不成……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文中所指的“履遗不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还有“告成桥”，又名禹桥，在今禹庙前面，传说当年大禹治水，历十二年而大功告成，为纪念大禹这一功绩，后人便命此桥为“告成桥”。“都亭桥”位于今鲁迅纪念馆西南侧，据《越绝书》记述，秦始皇东游至会稽时，曾驾临都亭，位于都亭附近的这座古桥，就取名为都亭桥。“题扇桥”相传是晋书法家王羲之为卖扇老妪题扇的地方。西廓门外的“虹桥”，相传宋理宗赵昀少时曾在 这里游泳，故又名“浴龙桥”。至于说偏门外陆放翁故里三山附近的“杏卖桥”，则是附会陆放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而来。

“一请先生须记取，水乡总是赖桥名。”水道是古城绍兴的优势，因而不少集镇是建桥兴驿，建桥立镇。哪里有桥，哪里就成为交通枢纽、水陆中心，而桥头往往成为店舍林立之处，市井繁闹之地，由此再向四周延伸，方成集市。柯桥镇就是取自桥名，但实际上也正因为有了这座古桥，才孕育了一方繁华。

赵州桥“仙迹”趣话

侧闻，冀中赵州桥下清污工程已竣，桥下清水流淌，渔船往来，吸引着中外游客。不由想到赵州桥“仙迹”趣闻。

赵州桥正名安济桥，建于隋代开皇年间，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隋匠李春所造的赵州桥和沧州铁狮子、景县塔、正定大佛并称“华北四保”。史册上关于赵州桥的歌谣和文艺作品不计其数，民间也流传着许多美丽动听的故事，有代表性的是清代饶梦铭的诗作：“谁到桥头问李春，仙驴仙迹幻成真。长虹应卷涛声急，似向残碑悦故人。”

说起“仙驴仙迹”，还有段迷人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赵州即是华北的交通要道，流过赵州的洨河成了百舸航行的大动脉。由于洨河横断南北，老百姓都盼望在洨河上修座桥，鲁班路过此地，听到这个呼声后决定自己造桥，为民造福。鲁班的诚心感动了玉皇大帝，暗中相助。洨河水大浪急，龙王派来了镇水神，大嘴一张便把河水喝 光。玉皇又调天王、神役助战，并派仙人送来修桥石料。鲁班高兴极了，连夜修桥。第二天清早，一座奇特的石拱桥犹如长虹卧波，横跨河上。

一夜成桥的喜讯很快传到隐居在中条山的仙人张果老那里，他不相信鲁班有如此大的本领，便约柴王爷和赵匡胤同行，探个究竟。张

果老倒跨毛驴走在前面，柴王爷推车，赵匡胤拉车紧随其后。三仙在桥头上遇见鲁班，问道：“能让我们从桥上过一过吗？”鲁班心想，大车小车天天来往不断，你们这小毛驴和独轮车还能压坏大桥？便挥手让他们过桥。鲁班哪里知道，张果老所骑的驴的背上，褡裢里装着日月星辰，而独轮车载的又是五岳名山，三仙行至桥顶时，由于负担过重，桥身剧烈晃动。鲁班见状，大吃一惊，飞身桥下，举起一只手托住桥身，稳住了大桥。

这样，桥面上清晰地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和柴王爷的膝盖印；桥拱腹部印上了鲁班托桥时的手掌印——这就是“仙驴仙迹”。后来，人们将此列入“赵州十景”之中。

其实，这都是传说，但却有科学依据。原来，神话中传说的驴蹄印、车道沟等，均在桥面东侧三分之一处，恰成为车道的外挖线。它的真正用意，是标志车辆应在线内的桥面道上行驶。而桥下的鲁班手印则告诉后人，万一大桥发生裂缝时，手印之处正是支撑的最佳位置。

后人不得不折服当年造桥者的聪明才智和匠心独运。

云门山上巨字“寿”

山东益都（青州市），古称青州，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青州不但文人荟萃，还有众多文物古迹。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女词人李清照等，都在此留下过足迹。驰名鲁中的名山驼山、云门山留存着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石窟造像。

到过青州的人常听当地人说句话：“人无寸高。”说的是云门山上的大寿字，仅下面那个“寸”就有两米多，自然“寸”比人高了。

云门山坐落在青州的城南五里许。山虽高不过四百多米；但葱茏树茂，山径曲折，景致宜人。令人惊异的是山顶“云门洞”西侧的山崖上镌有一个大“寿”字。说它大，毫不夸张，它高达七米五，宽三米七。

关于这个大“寿”字是因何而镌，又是怎样攀上山崖的，当地人说法不一。较为可信的传说是：明朝时有云南籍某公在青州任知府多年。他爱民如子，清正廉洁，且为 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他对上不喜逢迎，虽有政绩但不得提升。后来年老卸任，竟无钱返回故里，遂在云门山下薄置田产，想终老于此。当地百姓主动集资助他，他却坚辞不受。于是有人提议，为祝他健康长寿，在云门山顶镌个大寿字，正冲他家门，让他朝夕能见，以表众人敬仰爱戴之情。

至于这么大的字又是怎么摹上山崖，再由石匠凿刻的呢？当地人

说法很有趣味：为了先把“寿”字摹写到崖上，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未成功，便榜示高价诚征能者。于是先来一僧人，他让人用筐从崖上吊下，他坐在筐内用石灰水写，口中指挥吊筐人上下左右移动。结果，寿字的肩架不准确，失败了。后来又来了一道人，他用长竹竿绑上棕刷，蘸红土水站在崖下大笔挥写，结果，把寿字写得头大身小，也失败了。虽出了重金，但无人敢写了。这时有一位老先生又自告奋勇，来摹“寿”字。他先在一块四尺宣纸上写好寿字，又找了几个精巧的石匠，用了半天工夫教他们如何扎架子，如何划格子，如何用“放大样”（九宫格）把寿字放大摹上去，再凿刻。果不然，仅用半月时间“寿”字即刻成，从山下就能望见那个大寿字了。

这位先生是谁呢？原来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衡王府内掌司翼阳周全。他写这个寿字时，是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

那位卸任知府为感谢当地民众对他的祝福，便在家中 设了一处私塾，凡是来求学的蒙童，他分文不收。每到春节，还写很多春联，送给左邻右舍和来看他的朋友。据说他活了一百多岁，才寿终正寝。看来这个寿字，果然为他增添了寿元呢？

清凉山上最清凉

今年夏季高温，南京气温陡然升至摄氏三十七度左右，显示出素有“火炉”之称的炎威。这使我想起“火炉”之中的一块绿荫消夏地——南京清凉山。

清凉山方圆仅约四平方公里，高不过一百九十米。但山上巨树参天、竹林茂密、凉爽宜人，又地处市区，交通便利，再加上汇集了众多人文景观，因而，自古以来就是游览、避暑胜地。

清凉山古名石头山，在千余年前的南唐时，因山上有清凉寺而易名清凉山。写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名句的南唐后主李煜，曾在清凉寺内建避暑离宫“德庆堂”，故明代地方文献称：“寺乃南唐李后主避暑处，故曰清凉，至今多竹。”其实，“清凉”一词源于佛教经义，意为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宁静的境界。可是，驱“天气热”易，除“心中热”难。历史上清凉寺的一则有名偈语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清凉寺的泰钦和尚性豪逸，不爱干具体琐事， 众僧都瞧不起他。唯独法眼禅师看重他。一日，法眼问众僧：“老虎脖子上挂的是金铃铛，有谁能解下来？”众僧绞尽脑汁也回答不出。只有泰钦回答说：“系铃铛的人能解下来。”后来泰钦继位做了法灯禅师。从此，“解铃系铃”便成为一则著名的成语流传至今，比喻谁做的事有了问题，仍须由谁去解决。泰钦禅师可谓除“心中热”的高手。这事在明代《指月录》中有记载。

昔日游清凉寺，寺僧以寺后的“还阳泉”井水烹茗饷客。此水口感甘醇清洌，尤能去暑解渴。常饮此水者，鬓发至老不白，且可白发转乌，故有“还阳”之称。所以寺僧无论老少胖瘦皆无一白发者。20世纪80年代，南京医科大学化验结果表明，此水含有较多“锶”的成分，为“还阳”之说找到了答案。如今，清凉山公园已为“还阳泉”井建亭加以保护。

清凉山上有扫叶楼，内挂中堂《扫叶图》。据说此楼原系清初号“扫叶”僧人所居。许多文人雅士、明末遗民与他时相过从，烹茗谈诗清游，使得扫叶楼名播遐迩，成为金陵著名胜迹，历时三百年而不衰。记得此楼还挂有一副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书于1912年的楹联：“戴甲满天地，诗赋动江关，惟战士文人，到今偏多千古恨；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只湖光山色，如今仍是六朝时。”该联回顾了辛亥革命时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流露出因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而产生的遗憾，抒发了登清凉山眺望六朝古都　金陵山水的怀古和旷达情怀。

当年扫叶楼以素面风味独绝，于暑天尤为爽口开胃。有人疑问是否用的荤汤。该楼主持星悟和尚笑答：“罪过！出家人哪敢破戒，汤是用笋尖豆汁做的。”民国初年，曾有人请星悟在上海开素菜馆子。如今，扫叶楼已成为明末清初隐居清凉山的大画家龚贤的纪念馆。中国书画有“特健药”之称。观赏馆内陈列的龚贤一幅幅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画作，不也能使游人情操升华而感到心境清凉吗？

苏州难忘天平山

青年时期客居沪上时，常作苏州游。上海虽为十里洋场，有物质繁华之盛，但却缺少可供游赏的山川园林之景。而苏州却是“园林冠江南”的所在。乘车行程一小时左右，来去方便，游人如织便不足怪了。

苏州地方不大，但可游之处不少。如虎丘、曲园、西园、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寒山寺、网狮园以及玄妙观、宝州桥、灵岩山、天平山等，或以园林艺术闻名，或以江南风光取胜。而至今使我难以忘怀的却是天平山。

天平山位于苏州西郊。论景色数不上第一流，但是因为它与一位第一流人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给人印象弥深，这位人物便是范仲淹。

天平山的枫叶、怪石、泉水各具特色，被称为“天平三胜”。两崖壁立仅容一人通过的“一线天”也是山中奇景。由于枫叶极好的缘故，这里的游人虽然四季不断，但是秋天来看枫叶的人更是多于他日。到时，遍山红透，清 泉淙淙，徜徉于石边林径中，顿忘城市的喧嚣，实一大乐趣也。

天平山下有一座咒砵庵，范仲淹幼年时在这里住过。他年幼家贫，有时三餐难以举炊，便把米煮成薄粥，待其冷凝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有名的“断斋划粥”的故事。由于他发奋苦学，“昼

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终于学有成就，二十七岁中进士。宋仁宗时，武官任至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文官任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成了一位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人物。而这座太平山，宋朝皇帝曾把它赐给范仲淹，当成他的“家山”，范的历代祖考也都葬于此山，故人们又称其为“范坟山”。

范仲淹从小在此居住、读书，成年后又任故乡的父母官——苏州知州。在这里做了不少好事，后人在山之西麓为他修建一祠堂，名曰“范公祠”；祠中高悬清代康熙年间名家手书匾额，上书“第一流人物”五个大字。宋人钱公辅曾说他是：“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论其文治武功，道德文章，确实可在当时士大夫之中列为“第一流人物”而毫无愧色。

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名垂千古，万人传诵，成为古文名篇中之典范。而其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范氏不仅是“先忧后乐”的倡言者，也是坚决的力行者。

在“一线天”附近，那些矗立如林的石柱，在游客眼中仿佛成了范仲淹上朝时手执的笏板。于是，这个石柱组成的奇景有了美好的名字——万笏朝天。若不信，可以到沧浪亭里去看看，供奉在那里的苏州历代五百名贤画像，就有范仲淹手持笏板站在其中。范仲淹的文治武功，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里。

范氏远戍西北，抵御西夏入侵，对巩固边防建有殊勋。他任延州（今延安）知州，招抚流亡，屯兵营田，整顿军务，不数年，西北各族人民安居乐业，连西夏的元昊也来请和。西夏人畏其声威，说他“胸中有数万甲兵”。当地老百姓则说他：“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他自己当时曾写有《渔家傲》词一首：“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道出了远在苦寒荒漠的边疆，他那御敌保民的襟怀，也显示出他

卓越的才华。

范仲淹是敢于“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人。谏官欧阳修向宋仁宗推荐他，从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以天下为己任，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他针对时弊提出的改革建议，史称“庆历新政”。

记得在苏州城内也有一些有关范仲淹的遗迹，例如范庄前的某中学，即为有名的范义庄所在地。他晚年自请罢相后，在杭州任知州。他用自己积蓄的俸金，在苏州买田 千亩，以其收入救济族中穷人，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当时有人撰文专记此事。

在离天平山范仲淹故居不远处的“高义园”，更是令人钦仰的所在。有一次，范氏命次子尧夫用船载麦五百斛，送回苏州老家。途中遇仲淹老友石曼卿正穷困无计，尧夫便将五百斛麦全部送给了曼卿。曼卿说，把麦子给我也解决不了困难哪，尧夫索兴把船也赠送给他。后来尧夫对范仲淹说起石曼卿的困境，仲淹说：何不将麦子送给他。尧夫说：连船都送给了他。范仲淹连声称赞。清乾隆南巡时，敕建了高义园，以表彰他的高风义行。天平山是难忘的，范仲淹更是令人难忘的。

话说南京“总统府”

南京“总统府”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统府”坐落于南京国府路。明初，这里是汉王陈理的府第；清顺治年间，改为两江总督署。1853年，洪秀全攻克南京，将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1864年7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陷南京，将天王府付之一炬，所存仅西花园一部分而已。何绍基有诗曰：“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芜野鸽飞。”后来，清朝在此重建了总督衙门，规模也不算小，计有屋宇一千一百八十九间。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将其地改为临时政府。北伐战争后，又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大门上有谭延闿所写的“国民政府”四个大字。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当上了“总统”，把“国民政府”字样铲掉，换上了周钟岳所写的“总统府”三字。

“总统府”建筑群分前、中、后三部分。前为大门和大堂，中为二堂和政务局大楼，后为子超楼。大门口本来 只有一个矮矮的圆门，气魄不大。蒋介石接受王正廷的建议，将其改造为三层高的大门楼，有三个圆门，八根抱柱，显得比过去堂皇多了。接着，又于1930年扩建礼堂，礼堂是蒋介石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国书的场所。按照外交礼节，大使一进礼堂的门，先要一鞠躬，上前几步，走到元首面前，再一鞠躬。礼毕，即后退几步，连鞠两次躬，然后出门。有一次，英国

大使许格森后退时，一不留心，几乎被门槛所绊倒。于是蒋介石下令翻造，将礼堂扩大了将近一半的面积。

子超楼是一座五层楼房，为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时所建。林森字子超，楼因而得名。二楼一百一十九号房间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室内有大写字台，有檀木方桌，有丝绒沙发。蒋介石坐的是皮转椅。对面一百一十八号房间是“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室，但“门虽设而常关”，他从未到过。三楼正中是召开国务会议的会议厅，长桌旁是两排高背皮靠椅，蒋介石的皮靠椅比其他靠背椅更高一头。

在“总统府”建筑群的西侧有花园，这是一座狭长的小园，原名曰“煦园”，内有夕佳楼、桐音馆、鸳鸯亭、水榭、石舫等建筑。石舫名“不系舟”，亭亭玉立于水池之中，有九曲桥可通。相传洪秀全曾在石舫上召开过军事会议；孙中山任大总统时，也在石舫上接见过中外宾客。西花园畔有一座三开间三层楼房，那是孙中山当年的办公 室和起居室，壁上挂有他亲书的“奋斗”两字。

孙先生奋斗一生，直到弥留时，仍念念不忘奋斗，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

夫子庙与十里秦淮

每座古城都有著名游乐之处，六朝古都南京以十里秦淮为最。

中国每个地区均有孔夫子祀庙，南京夫子庙堪称孔庙繁华之冠。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20世纪80年代修复一新的明、清建筑风格的十里秦淮，映照于传统的宫灯和新潮的霓虹之中，飞红点翠，风情万种，使人领略一派温柔福贵之乡、风流繁华之地的祥和景象。

崇峻高耸的大成殿，全国之最的孔子青铜像，象征人才荟萃的聚星亭，寓意文运兴旺的魁星亭，各呈丰姿，引人注目。似一首首凝固的音乐，如一段段华美的诗篇。

漫游十里秦淮，令人遐想万千。雅与俗相映成趣。峨冠博带的“天下文枢”牌坊，与其下一字排开的秦淮风味小吃大排档鲜明对照。两个半世纪前“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中举的江南贡院，门可罗雀，与门楼边的花鸟市场相 融成了夫子庙一绝。今日富丽堂皇的状元楼酒店，似乎尚可窥见往昔状元的一段风采。

闹与静友好比邻。夫子庙沿街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而广场前畔池码头至文源桥萃苑公园的百米长廊沿河曲折，错落有致。其中彩灯碑刻，雕梁画栋使人流连驻足。可在青瓷几

凳闲坐话秦淮，可在临河茶座品茗听笙歌。真是闹中取静的绝妙佳境。

风流文采赋新意。“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唐代诗人杜牧的《夜泊秦淮》，二十八个方块汉字，竟使多少离乡背井、宦海沉浮者，每游秦淮，必萌世事沧桑之感慨。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使“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名声大噪。至今来燕桥南侧的李香君故居仍在，但香君楼前天井的香君塑像与几株枯瘦竹、两面斑驳墙为伍，给人几许凄惶，比起桥北生意兴隆的香君酒楼，委实显得寂寞孤单。晚年移居秦淮的吴敬梓，把科举失意、仕途潦倒的愤懑一股脑儿注入《儒林外史》，让亦真亦假的文人雅士、侠客大老出尽了洋相，却把官场百态、秦淮风月刻画得绘声绘色，足以让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平添几分向往。

民以食为天，秦淮堪称饮食一绝。到了夫子庙，不难体会到“六朝金粉胜地”更是传统小吃的集中地。集有京、川、鲁、粤等菜系大成的奇芳阁、老正兴、晚晴楼等老字号的大菜，又有各种特色小吃，常使游人馋涎满口！奇芳 阁的干丝与面点，六凤居的葱油饼与豆腐脑，永和园的包饺与酥烧饼，蒋有记的锅贴、馄饨与牛肉汤，莲湖居的冰糖莲子与桂花元宵……多色多彩，滋味不凡，使人既悦眼福又饱口福。难怪游人对“小吃世界”大发“肚皮渺小”之感慨。

这便是秦淮，人们眼中包孕古今，并蓄雅俗，使人流连的秦淮。

这便是秦淮，再现传统华夏市井的韵致，浓缩金陵精华的秦淮。

古城平遥史话

提起山西省的平遥，知之者恐怕不能称多，然而，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实在值得一提。

首先，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建筑在明清时期的一个范本，欲知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发展状况，读读平遥这个范本，必是“开卷有益”。

位于山西中部晋中盆地南端的平遥，距太原市不过百公里。这座古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七百年前的西周宣王时期。那时，驻军为了抵御外敌的侵扰，在此地筑了一座土城，便是平遥的雏形。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从此，土城平遥成为县治所在地，并延续至今。

今日平遥古城的规模，据知是明洪武三年（1370）扩建的。六百年来沧桑变化，其城墙虽已遭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格局尚得以保全。最有特色的是，古城方正端 庄，遵循汉民族传统的“礼制”，严守方正三里所谓“礼”序等级。城里的布局亦左右对称：左城隍、右衙署；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寺院。体现了古时“人神共治”“三教合一”的文化内涵。

此外，古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基本是直线，只有南面城墙中部向北微缩，曲若龟壳状。城内的大街小巷互相交错，有如龟背的纹路。

原来，如此精心设计，为的是建成“龟城”，古人以为，龟城象征固若金汤，吉祥长存。

平遥的城墙上，可容两轮马车并行。墙顶上外侧建有两米高的垛口墙，为打仗时隐蔽护身用。城墙上每隔八十米左右筑有堞台，堞台上建有堞楼，夏可蔽日，冬可御寒，乃守城士兵栖息之地。而环城垛口三千个，堞楼七十一座、奎星楼一座，便有寓意所在了：古人云，圣人孔子周游列国时，追随者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位。如是，这三千个垛口，便象征着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一座堞楼，则象征七十一位贤士，此外还有一名子路，据说因其崇尚武力，被孔子列入了另册。故此，一心想过太平日子的平遥古人便将其排斥在外，在余下的一个堞台位置上，建了一座奎星楼。

平遥城内的古建筑有两座同古城一道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国宝级建筑。一座曰镇国寺，为典型的五代时期的殿堂，其主体建筑万佛殿是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殿内十一尊彩塑造型丰满，线条优美，极富盛唐之 风，与敦煌的五代彩塑一样为古代艺术珍品。另一座名双林寺，寺内的宋、元、明、清历代悬塑和彩塑两千余尊，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负有盛名，人称“东方彩塑艺术宝库”。

平遥之所以闻名中外，还因为它是“中国清代的华尔街”。早在16世纪，平遥城就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埠重镇，至19世纪，城内钱庄、布庄、典当铺、百货店、古玩店、首饰店等各行店铺无所不有，多达数百家，商业之繁荣达到鼎盛。便是在这繁荣之中，清道光三年（1823），晋商在平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业务的新型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字号。此可谓中国银行的鼻祖，其所在地，平遥的西大街，就是有名的“大清金融第一街”。

龙门石窟稀世珍

近读《白香山全集》，想起了白居易何以又称“香山居士”。原来白居易曾居洛阳十八年，经常住在香山寺里，他在《修香山寺记》中写道：“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因此，他不仅自号“香山居士”，而且死后亦葬于香山。

我尝游龙门石窟，其位置在河南洛阳南郊十二公里之龙门口。这里香山与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水中流，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又因正对九朝古都之洛阳旧城，故又称“龙门”。龙门山奇林郁，温泉增辉，寺院毗邻，千龛饰壁。自古以来，“龙门山色”就荣居“洛阳八景”之冠。凡曾游历至此的历代诗人，诸如李白、杜甫、韦应物、刘禹锡和欧阳修、司马光等，大都留下了美好的诗篇。如韦应物对高阙巍峨、伊水形胜的这洛阳第一胜境，就做过形象的描绘：

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
……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

龙门石窟群像似蜂窝一样密布在伊水两岸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一公里。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洛前开始，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北宋诸朝。其中北魏和

唐代大规模营造达一百五十余年。北魏洞窟约占三分之一，唐代窟龛几乎占三分之二。据查，现存窟龛两千一百多个，佛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三千六百块左右。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龙门石窟除受到自然风化剥蚀外，也遭到了人为的破坏，致使许多精美的造像残首断臂。笔者亲目所见，小者整像挖走，已成空龛。大者不易搬动，便将头部凿掉。尽管如此，丰富多彩的龙门石窟艺术，仍为研究中国古代的佛教历史和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以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为代表的群像雕刻，气势宏伟，雕琢精湛，是美术史上的奇观。另外，所创造的诸佛、胁侍弟子（罗汉）菩萨、护法天王、力士和凌空翱翔的飞天等佛教圣像等，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以其永恒的魅力，光照千古。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褚遂良书丹的《伊阙佛龛之碑》，堪称魏碑和唐楷书的 精粹。《龙门二十品》是二十则龙门造像题记，皆魏碑。康有为曾赞其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价值连城的“鲁壁”

“鲁壁”在孔子故居诗礼堂后面。墙高三米有余，长约十米。墙前有一块石碑，上书隶书“鲁壁”二字，笔法雄劲挺拔。这座古墙，残存至今，已有二千四百年的历史，比起万里长城，还要早上二百五十余年哩！

为何孤零零地保留这么一堵断了的古墙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焚书坑儒，矛头对准孔子及其门徒所代表的儒家学派。他登基不久，就急急忙忙地巡视全国，头一站就直奔儒家的发源地曲阜而来。当时，孔子的第九世嫡孙孔鲋，守护着祖传的故宅家园，并保存着许多祖宗遗留下来的经典书籍。听到消息，便连夜和弟子襄把《论语》《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孝经》等藏在祖堂的夹皮墙里。第二天一早，孔鲋悄悄离开故乡，跑到河南嵩山隐居去了。后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孔鲋出山投奔农民起义大军。他本是个博学多才、有政治头脑的儒士，加上他的朋友陈余在起义军里也是一员 要将，经陈推荐，被聘为陈胜队伍中的博士和太傅。六年之后，孔鲋病死在兵营之中。这样，上述经典著作终于未遭兵火焚毁。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子刘余为鲁王，史称恭王。刘余自淮南迁都曲阜，在故城内大建宫室，起建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雄伟建筑灵光殿。当宫殿扩建至孔子故宅时，据传说天空突然响起了有六律五音之美的金石丝竹之声，工匠们一时惊呆了。仔细查寻，结果在孔宅的古墙里，发现了当年孔鲋珍藏的这批无价之宝，也就是如今世间广为流传的《六经》等经典著作。但是，当时发现的这批经典著作是用蝌蚪古文写成的，不同于汉时通行的隶书、篆书，人皆不能诵解。这时，孔子的第十二代裔孙、著名儒家人物孔安国，根据汉代流行的一部《今文尚书》口授本，对照揣摩，将古文《尚书》一一翻译整理；别人又根据孔安国整理的《尚书》，陆续将其余的古文《六经》等整理成通行的隶书版本。

后人为了纪念鲁壁藏书的伟大历史功绩，在孔庙内专建了一座富丽辉煌的金丝堂，让世人牢记当年拆除孔子的故宅墙时，曾经传出的丝竹金石之声。讴歌鲁壁的碑碣，遍布金丝堂内。宋代文学家王禹偁在《鲁壁铭并序》中说：

> 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而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

这位王先生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兴完全归功于鲁壁，笔者不敢苟同。但是，说“鲁壁”可以称得上价值连城，拿一座十里长的金墙也不换它，恐怕并不过分吧！

祁县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座完整保存下来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建筑群。整个宅院分六个大院，二十个小院，共有房间三百一十三间，占地八千七百多平方米。建筑气势宏伟，布局严谨，外观威严高大，内视富丽堂皇。既有跌宕起伏的错落层次，又具变化意境的统一规范。总观，结构考究，选材精良，斗拱飞檐，石刻砖雕，牙版木镂，彩饰金装，堪称工艺精湛，各具特色。现已辟成祁县民俗博物馆，故当地流传着歌谣："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乔院三晋绝，民俗一精华。"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罕见的一颗明珠"。

说起乔家发展史，颇多神奇。创业者乔贵发，父母早亡，孤苦伶仃，先为婚丧嫁娶者拉风箱，后因受奚落，赌气走西口，在包头巧遇邻县做豆腐生意的秦姓老乡，便从其当伙计到合伙经营。四十余岁成家，始返乡建第一个大院。二次回包头已当上股东。由于秦家子女不务正业，渐 渐入不敷出，最后只好将股份全部归乔贵发。因乔出身寒微，又接受了秦家败落的教训，所以给后代子孙严订五条戒律：不准抽大烟，不准纳妾，不准嫖妓，不准赌博，不准酗酒，因此发家很快，致使包头一条大街，皆是乔家买卖，有房一千余间，起字号"复兴公"。至今包头的老人间尚流传着"先有复兴公，后有包头城"的歌谚。

乔贵发的子孙，买卖越做越大，渐渐扩展到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云、贵、川等地，并开始发展钱庄、票号。据记载，那时全国钱庄

有六十三个，乔家占了二十三个。其银号，一大德恒，一大德通，意在恒通天下，独领风骚。最后竟发展到全国许多省份皆有分号，而且在俄罗斯、蒙古、日本、朝鲜等国也设了分号。资金达一千三百万两白银，折合今天人民币八十个亿。

乔家鼎盛时期是第三代，乔家大院的主要建筑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它既保持了北方传统的四合院的特点，也吸取了古希腊及西方建筑的一些风格。整个格局，如果从空中俯瞰，成双喜字形，可谓独具匠心。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还是很落后的，但是乔家已经有了汽车。据说，当时乔家的六十余口人，佣工就有二百五十多个。家塾先生是从全国范围内高薪聘请来的，所以其后裔在海外获博士衔的颇多。

“七七”事变以后，乔家渐趋衰败，但是完整的大院却保留了下来。这里不但拍摄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而且拍摄过京剧《崔秀英》、电视连续剧《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等。同时也是旅游的好地方，乔家的堂号称“在中堂”，故近年来又流传着“旅游不到在中堂，白来山西走一趟”的顺口溜。

清代省府第一衙

在河北古城保定，矗立着一座古衙署。高高的灰色围墙，宽敞的黑色大门，威严而凝重，那就是名播中外的清代直隶省府驻地——直隶总督署。

直隶总督署建成于清雍正七年（1729），历经八帝凡一百八十余年，迄今保存完好。

在直隶总督署任职的总督，先后共七十四人、九十九任次，著名的有李卫、方观承、刘墉、那彦成、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雍正朝后很多历史事件，如镇压农民起义、兴农治水、察吏安民等，与该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谓“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后人把直隶总督署誉为“清代省府第一衙”，实不为过。

直隶总督署，建筑格局很独特，其房屋分布与使用功能多受“堪舆学说”之制约，随八卦方位图之涵义而占位；同时也受着北京皇宫的影响。该署以南北两条大道相隔，将衙署分为中、东、西三路。主体建筑在中路，主要有大 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并配以左右耳房、厢房。最显赫的是总督署那三开间大门，位于三尺多高的台基上。大门正中上方悬一白底黑字匾额，上书“直隶总督部院”六个大字，大门外还有东西班房、东西辕门、石狮和钟鼓楼，相当威严。尤其是门前那两根大旗杆，用水泥制成，高十丈又五尺，成为古城保定

的象征。

步入总督署大门，东西各有一过墙通往东西两院，沿通道北是仪门。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不同品级的官职有不同的礼仪程式。与总督品级相当的文武官员到来，宾主从仪门而入，共进大堂；品位较低的官员至此，只能走两侧便门。

大堂院中有两行粗大的松柏，苍劲挺拔，遮天蔽日，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每至冬季，总有数百只猫头鹰栖息古柏之下，昼伏夜出，群宿群飞，成为古衙的一大景观。大堂内有一巨大匾额，上书“恪恭首牧”四个大字，乃是雍正皇帝于雍正九年（1731）为总督唐执玉亲笔所书。大堂正南甬道旁有一“戒石坊”碑坊，石碑阳向刻有“公生明”三个字，即是对官吏们进行“公生明、偏生暗”之告诫。石碑阴向刻有北宋黄庭坚所书之太宗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告诫官吏万勿徇私枉法，否则天理难容。

二堂是接见外地官员和复审案件的地方，内有屏风、公案桌、太师椅、文房四宝等陈设。此堂室由元代“宣化　　堂”演变而来，台明宽绰，保留着元代古风。

二堂向里便是内宅，内宅中有官邸和上房两院。官邸是总督平时处理公务、习经写字的地方；上房是总督眷属居住之处，平时外人不得进出。这里，石榴、丁香、海棠、藤萝满院，小院幽径，花林扶疏，一派士子书香情调。

直隶总督署自1729年建成后，基本上没有遭受重大灾害和人为破坏，为人们留下了一座中国北方典型衙署的建筑。

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何处是老家？
山西洪洞老鸹窝。

民谣中的一棵老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怎么就成了世人的“老家”呢？

原来在山西洪洞县贾村附近，有一处浓荫盖地，槐柳相间的树丛，走进树丛，一座古朴的木牌坊迎面而立，它四柱三门，中门高大，门额有横匾，上刻“誉延嘉树”四个大字。过牌坊不远有碑亭一座，亭内矗立高大石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字。大槐树始于何年不详，据说当它在地面上的第一代干枯，又从根部长出一株小槐，人称第二代。二代干枯，又从它的根部生出第三代，并一年比一年高大，枝繁叶茂。

近年来，为解开这个谜，我翻阅了不少资料，从史书的记载里，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元朝末年，战争频繁，生产惨遭破坏。明初，虽有好转，又出现天灾。古书载：“永乐元年甲午，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庚寅，

山东蝗。丁酉，河南蝗。永乐二年八月，淫雨毁北京城。十月，黄河决口，冲毁开封城。”

新兴的明皇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时局，对自身的统治不利。因此，实行了“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史料载，明初从山西迁民六次，不仅送往山东、河南、河北、北京一带，还远送到淮河以南地区。北京郊区的村庄，如长子营、屯留营、霍州营等，均是保留山西的县名，这大概算是一佐证吧。

当时移民规定，迁民不管来自何府何州何县，都要集中到洪洞县贾村一带。此地有一古刹名广济寺，大槐树即在其旁。移民皆在广济寺登记，“发给凭证、州资”而后再上路。

百姓离开洪洞时，人人悲伤，个个哭泣。有的灌一桶霍泉（洪洞县的一股泉水）水，有的撮一把洪洞土，有的揣上几片槐树叶，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状极可怜。当广济寺在视线中渐渐消失时，人们总想在最后一瞥中寻找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今后思念故乡的标记。 当然，那棵苍老挺拔、高耸入云的古槐，以及树上的老鸹窝，便深深地印在移民的心目中了。

从此，父传子，子传孙，具有真实感的民谣便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沧州铁狮“镇海吼”

位于冀鲁交界的沧州，春秋时属齐国，战国时属燕国，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开始置县，北魏熙平二年（517）改称沧州，至今已有一千四百七十九年的历史了。

这座古城闻名海内外，与其说是历史文化悠久，还不如说应归功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众所周知，小说中写林冲发配沧州、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故事已脍炙人口。因此，沧州也就成了闻名天下的去处。

其实，沧州所以广为人知，大概还因为在它的地界内有一头世界上最大的铁铸狮子。距今沧州市东南二十公里，有个古州镇，即明代以前的沧州古城。从城北拐进一条歪斜的巷子，出巷就是田野，闻名的铁狮就在野外的开元古寺之中。放眼望去，便可看见昂首挺胸的立式雄狮，但见它毛须披散于颈项之间，背负巨盆，大张巨口，作怒吼状。狮身铸有北周广顺三年（953）“山东李云造”五个字，头部还有窦田、祁宝玉两个名字。腹内原铸有金刚 经，由于岁月悠悠，风雨剥蚀，早已无法辨认。狮体内外虽斑痕累累，前胸还残缺一块，但仍巍然屹立，威武雄壮，昂首天外，气势磅礴。从不同侧面观赏，都可以让人有不同的艺术感受，令观者不能不为中华民族古代艺人的高超智慧和精湛技术所震撼。

据说，这样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却长年被遗弃在荒野之外而无人问津。清朝嘉庆八年（1803）竟被台风刮倒，半截埋进沙土之中。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人们才将其从土中挖出。1984年，有关部门组织人力将其安置在砖台之上，四角用木柱支撑起来。砖台旁边立一木牌，牌上写明此狮身高五米三五，全长六米三，体宽三米，重四十吨，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铁铸狮子。

沧州铁狮的铸造颇具神秘色彩。有关史料记载，北周时期，因为沧州距海较近，海啸经常波及沧州，为此人们铸成铁狮以镇之，故又有“镇海吼”之称。狮之脊背，铸有巨盆，晚间燃火，可为海上航船作导航之用。在一千四五百年以前，人们铸成如此巨大的铁狮，据说还不是分别浇成铸件，然后用衔接方法焊成的；而是采用“泥范明烧法”，一次浇铸而成。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到了非常高超的地步。

因此，铁狮前胸残缺的那块，后人虽曾另行补铸出来，但多次焊来焊去，却怎么也不能令其浑然一体。

沧州老辈人讲，人们出于对铁狮的赏爱之情，地方上 曾为铁狮盖过一个亭子，以缓解风雨的剥蚀，但出乎人们的意料，处于亭中的铁狮比露天的剥蚀更厉害。因此，人们只得又将亭子拆除，重造水泥台座，让其承受大自然的风雨阳光。

景阳冈与狮子楼

地处水泊梁山西北四十公里，滔滔黄河的北岸，今山东省阳谷县，因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一书的广泛流传，这里的两处水浒遗迹——景阳冈与狮子楼，闻名遐迩，令人向往。

据《阳谷县志》所载，古时的景阳冈只是一个古木参天，莽草荡荡，禽兽栖息，虎狼出没的荒丘土岗，并不以“景阳”为名。相传宋代，有一位文人墨客来岗下探亲访友，恰逢旭日东升，曙光初照，周围景物浸润在云蒸霞蔚之中，展现出一派生机盎然、万木争荣景象。他触景生情，信手用拐杖在地上划了“景阳冈”三个字，从此景阳冈的名字便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登上景阳冈，驻足环眺。呈现眼前的是一个高约五米、面积约三百平方米的梯形土岗。岗上古柏，枝叶茂密，苍翠挺拔，岗中央原有北宋所建，清末重修的“山神庙”。当地人民为纪念武松打虎除害，而在“山神爷”的 宝座上塑起了武松像，山神庙遂改为武松庙。历代香火甚盛，慕名前来瞻仰、朝拜者络绎不绝，庙前左侧矗立一方石碑，上刻“景阳冈”三个笔力遒劲、潇洒飘逸的大字。

岗东南一公里半处，古运河畔的张秋镇，便是“三碗不过岗”的酒店旧址。张秋古镇原是一个水陆交通便利、四方商贾云集的繁荣集市。至今镇上仍有众多古老店铺。景阳冈东侧为景阳冈村，百余户人

家，相传是当年的猎户村，村中矗立石碑一块，正面“武松打虎处”五个大字依稀可见，背面小楷碑文因风雨剥蚀已无法辨认。此处原有明代古碑楼文物。

离开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向东北行近二十公里，便是昔日武松怒杀西门庆的狮子楼。

狮子楼位于阳谷县城中心，即《水浒传》中写的紫石街南端，十字街首，坐西朝东，楼高两层。1958年曾翻修，到1984年阳谷县人民政府又重修，由著名园林、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设计，曲阜文管会古建筑队施工，建筑面积四百五十八平方米，通高十六米，建筑式样为宋代歇山式。新建的狮子楼比旧楼扩大一百零一平方米，增高四米半。楼分两层，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古朴典雅。楼前两对石狮，神态各异，造型逼真，精雕细刻，栩栩如生。

二楼檐下匾额上的三个鎏金大字“狮子楼”赫然醒目，由当代文豪沈雁冰所写。他生前曾倡导成立“狮子楼文学　　戏曲纪念馆”并亲笔题名。陈从周教授还撰写了《重建狮子楼记》，已勒石树碑。这都为前来观光旅游者增添了游兴和情趣。

寺庙祠塔

明代弘慈广济寺

位于北京阜城门内大街路北的广济寺，是闻名全国的佛教寺庙，它是在金代“西刘村寺”遗址上，于明代天顺年间由尚衣监修廖屏出资赞助修建的，工期仅两年。落成后奏知英宗，得赐匾额“弘慈广济”四字。

清初，恒明老人立此寺为律寺。律寺即律宗寺庙。律宗是佛教诸多宗派之一，全称“南山律宗”。顺治五年（1648）延请玉光禅师传戒，历时十三年，广济寺遂成律宗道场。

1931年11月，寺毁于火。时大火熊熊，浓烟滚滚，寺周围之居民纷纷自发扑救，于僧房中发现绣花鞋若干只，丑闻不胫而走，一时传为笑谈。未几，住持广募众缘重修，四年后竣工。其建筑较前更为壮观。

广济寺山门临街，一排三座，以短墙环护衔接。顶敷琉璃彩瓦，黄绿二色相间，别致美观。入山门，依次为天王殿、大雄殿、圆通殿、舍利阁、多宝殿、戒台等。值得 一提的是：这里的一些佛像和法物，有与众不同之特色。天王殿前的一对石狮，双眉微蹙作怒相，更显威武。石狮是旧时皇宫、王府、官衙、寺观门前的镇邪之物，都是一雄一雌分列左右。雄狮足踏绣球，雌狮戏耍小狮，很有些人情味。而广济寺的石狮却都是雄性，似乎也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

天王殿内供奉的明铸铜质弥勒菩萨像，缨络环身，法相庄严，令人肃然起敬。这形象与常见的乐呵呵的“大肚弥勒”形象迥然不同。

弥勒原出生婆罗门家庭，后为佛门弟子，先佛而入天，从兜率天降到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广传佛法。

至于诸多寺庙塑弥勒为笑脸，是与另一则佛教传说有关。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佛祖历代通载》云，五代后梁时有个和尚叫契此，号长汀子，明州奉化人，常背一个布袋四处化缘，时歌时唱，似疯似癫，能预知人之吉凶。死前在岳林寺说唱：“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完即闭目圆寂。于是人们便以为契此是弥勒菩萨显化的，从此寺庙塑弥勒菩萨时，就塑成契此一团笑脸，袒胸露腹，肥肥胖胖的形象，全然没有半点古印度人的样子了。

广济寺圆通殿内的观世音坐像，头戴天冠，冠内有一小尊阿弥陀佛像，左手结“大悲施无畏印”，庄严而无女性相。这是一种最标准的形象，称为“正观音”。

广济寺特有的壁画和牙舍利，尤其值得忆及。广济寺大雄殿所供奉的“三世佛”像后面，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巨型壁画——《胜果妙音图》，画高五米，宽十米，纸质。这是清代名画家傅雯奉乾隆皇帝之命而作的指画。此画成于乾隆九年（1744）。画面中心是释迦牟尼佛，左右为文殊、普贤二位菩萨。众弟子围列四周，数十个人物各具特色，其神态有的庄严，有的威武，有的潇洒，有的慈善；其相貌或清或奇，或古或怪，画面既注意了人物形象的鲜明个性，又使众多人物彼此呼应，以求和谐统一，突出地表现了听佛说法的主题。傅雯指画极有名，画风古拙苍劲。《胜果妙音图》是他的代表作。

广济寺中轴线建筑的最后一层庭院，主殿是两层楼阁。一般寺庙称其为“藏经楼”或“藏经阁”。广济寺的藏经阁因为曾珍藏过释迦牟尼的牙舍利，所以称“舍利阁”。

“舍利”是梵文的音译，主要指释迦牟尼佛或高僧圆寂后火化结成的珠状物，其骨头——牙齿也为舍利之一。释迦牟尼佛入天荼毗后，留下两颗牙齿在人间，一颗在斯里兰卡，另一颗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从乌缠国（今巴基斯坦）传入我国于阗（今新疆于田县）。公元5世纪中，南朝高僧法献游于阗，将这颗佛真身舍利带回南齐首都（今南京）。隋统一中国后，佛牙被送往长安。五代时佛牙传到燕蓟（今北京）。咸丰七年（1857）佛牙舍利被供奉在北京西山 灵光寺招仙塔内。1900年庚子之乱，招仙塔被帝国主义军队炮毁，而佛牙舍利犹存。

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将佛牙迎往广济寺舍利阁中供奉。因这颗佛牙舍利是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的圣物，曾先后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佛教界护送到缅甸和斯里兰卡接受东南亚佛教信众的瞻仰朝拜。1964年中国佛教协会在西山灵光寺建成佛牙塔，佛牙安置在七宝金塔的舍莲花上。1964年6月25日举行佛牙塔开光法会，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朝鲜等国佛教界人士出席了隆重的开光法会。

京华古刹法源寺

法源寺是北京的名寺，到北京旅游的人不可不游。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笔者偕同学数人来到城南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的法源寺。在此之前，早就耳闻法源寺乃北京最古老的佛寺，寺内文物古迹甚多，如四大天王青铜雕刻坐像，青铜雕刻狮子，皆属明代旧物。“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泥塑贴金罩漆像，品相庄严，雕刻精美，乃明代塑像中之上乘者，为京华寺庙中所罕见。净业堂前的巨石钵，双层石座，雕镂极工，几可与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媲美。悯忠台壁上所嵌唐代苏灵芝行草《张石矜宝塔颂》，笔势飞舞。此外，明清石碑、石刻、经幢、御题匾额四处皆存，藏经阁四周所藏明、清两代所刻藏经亦弥足珍贵。法源寺为历史名刹，宋钦宗（赵桓）被金兵俘虏北来，曾囚居于此寺内“坐井观天”。至元二十六年（1289），宋遗臣谢枋得（号叠山）抗元失败，遁隐建宁（在今福建）唐石山中，后被元军俘至大都， 拒不降元，亦在此寺内绝食而死。清时，法源寺以花木著名。寺内花木种类繁多，每逢春暖花开，寺僧必备素筵，款待名流赏花。

走至教子胡同南端，东侧便是法源寺了。跨入朱红色大门，便是宽敞别致的第一层院落。院内清幽静雅，古树葱郁，草木馨香，令人心旷神怡。坐北朝南为雕梁画栋的天王殿，殿内东西两侧四大天王塑雕分立，威武神俊。

穿过天王殿，便是第二层院落。凸字形高台上，坐落着宏伟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为法源寺的主要建筑，东西阔五间，南北进深三间，檐下布五重昂斗拱、歇山顶，青灰色筒瓦，脊、吻兽、檐枋、檐栋均施以精美的描金彩绘。殿内供三世佛：中间供释迦牟尼佛，左供过去世的迦叶佛，右边供未来世的弥勒佛。东西二壁为二十圣僧像。

法源寺的第三层院落中央置观音阁，为唐中和年间（881～884）幽州节度使李可举所建（亦称悯忠寺阁）。阁东西外侧两壁嵌有唐、辽、金、清历代碑刻，其中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张不矜撰写苏灵芝书《无垢净光宝塔颂》，唐昭宗景福元年（892）的《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金大定十八年（1178）的《北部令史题名记》等。这些石刻有的是研究唐朝的重要资料，有的则清楚地反映了佛教的性质及统治者推崇佛教的目的。嘉庆十一年（1806）诗人余集、王昶等分题法源八咏也嵌于东西二壁。阁内供奉着木雕十一面三十二臂观音像，塑造精美，生动秀丽。

大通觉堂中供奉着玄奘法师顶骨舍利，这颗顶骨为宋端拱元年（988）金陵长干寺演纯大师可政在终南山紫阁寺得到的，辽开泰六年（1017）建于长干寺塔藏之。清咸丰四年（1854），其寺塔俱毁。1943年重修时，据出土石函铭刻记载，知是玄奘法师顶骨舍利，于是在北海公园内建塔藏之。大约五十年代后将佛宝移供于法源寺。

藏经阁位于寺院的最后一进院落，上下两层，均为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三间；外观呈朱红色，青灰色的殿顶；檐枋等施以花卉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精美彩绘。阁东西两侧有朱红小楼，庑廊将小楼与主楼连接成一体，使建筑物显得格外紧凑别致。

据史籍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曾拟在幽州镇城东南隅或城东门之东（今宣武门外）建寺以悼念、悯抚阵亡将士，至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但都未果。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寺始建成，并赐名“悯忠寺”。唐中和二年（882），寺遭火灾，塔阁均已无存。

至景福年间，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建，并盖起三层巨阁以供观音。五代时，一度改为尼寺。到辽保宁三年（971），幽州大地震，全寺倾圮后，随即奉诏修复。金大定十三年（1173），曾以此寺作为女真人进士考场。明正统二年（1436），寺僧再次修葺，易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名为“法源寺”。

京西古刹戒台寺

著名古刹戒台寺，坐落在京西三十五公里处的马鞍山麓。其本名叫高寿禅寺，因寺内有一全国最大的戒台，故习惯地被称为戒台寺或戒坛寺。

相传，该寺创建于唐代武德年间，由一位名叫智周的和尚在此隐居行戒。辽代道宗年间，闻名中外的高僧法均和尚，在此广募钱粮，大修土木，基本上建成了现今戒台寺的格局。他开坛“演戒”，成为轰动一时的佛教盛事。据说在此寺受戒后，可灭除以前身上的罪过，死后能去极乐世界。又相传，听了法均和尚“演戒”，聋子可听到声音，哑巴可开口讲话，驼背者能伸屈自如。因此，不仅国内许多人前来“受戒”，不少异国父老也争相来此求佛进香。当时，附近的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俱在路边设立驿站，施舍饭食，接济那些远道而来的善男信女。坛主法均被尊为“普贤大师”，道宗皇帝授予他“崇禄大夫守司空”官职。

在金、元、明、清等朝代，戒台寺几经兴衰。明代宣德年间，由知幻大师主掌重修。竣工后，英宗皇帝赐额“万寿禅寺”，封知幻和尚为万寿戒坛坛主。从此，戒台寺历届主持，大都由朝廷亲自选定，并委以僧录寺官职，大大提高了戒台寺及其主持在政界和宗教界的地位。

晚清时，曾任议政王兼军机大臣的恭亲王奕訢，在戒台寺居住长达十年之久。他本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兄弟，咸丰死后，他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杀掉了端华、肃顺等大臣，夺得朝政大权。慈禧垂帘听政，封奕訢为议政王，领导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内外大权。但当慈禧羽毛渐丰，地位稳定之后，即借故革掉了他全部职务。奕訢深知慈禧的奸险，为避免其进一步的迫害和排遣心中之不快，即来到戒台寺隐居，读书吟诗、坐禅悟道。还出资修复了罗汉堂、千佛阁、牡丹院等，对保护和建设戒台寺起了很好的作用。

戒台寺总体上是坐西朝东，南侧为中轴线，由山门殿、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伽兰殿、祖师殿等组成。本来还有一座中心建筑——千佛阁，其内有五个大佛龛，每龛又有二十八个小龛，每小龛有三座漆雕佛像，总计在一千个以上，但在“文革”动乱中被毁。

北侧为北轴线，由明王殿、戒殿、大悲殿和罗汉堂组成。戒殿也称选佛殿，是戒台寺初期的主要殿堂，大寺的核心——戒台即设在这里。它是一个“品”字形的高台， 共分三层，最上面有一尊高三点三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举行授戒仪式时，要在夜半三星高挂时开始，香烟缭绕，数百名僧众肃立在戒台四周，双目微闭，双手合十，随着钟声和鼓点，高声诵经。戒台上面，有十位老僧，即为“三师七证”。落发烧痂的受戒者跪在面前，身披袈裟，恭听坛主传讲戒律，仪式要拖到天亮才完。

从明代起，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五日，“天下游僧华会，商贾辐辏”“冠盖相望，绮丽夺目”。其实，在这游僧华会之际，真诚进香者并不多，大部分是趁春光明媚来游名胜古迹的。

戒台寺的古松是最令人称道的，曾有诗云：“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其中尤以活动松、卧龙松、自在松、九龙松、抱塔松等千姿百态，各负盛名。

活动松位于寺内千佛阁遗址南侧，树冠宛如天成巨伞，松枝叉牙，盘根错节，随手轻曳一枝，无一枝不哗哗作响。树下有一石碑，上有清乾隆皇帝为此松所作绝句二首。卧龙松在寺中路，陡壁高墙之上，躯干粗壮凌空横卧，酷似巨龙酣睡正浓，龙头龙尾惟妙惟肖。自在松犹如一潇洒道祖，面对台阶向人们挥手致意。九龙松为白皮松类，一树九干，直冲云霄，恰如九条银色蛟龙呼啸而起，蹿入云霄，此松形态在北京城郊堪称一绝。

寺西五里，是“一峰耸奇秀，数里诱人行”的极乐峰， 峰下有不少石灰岩山洞，钟乳、石笋很多，下有清泉，到戒台寺旅游，顺道前往，饮凉沁心脾的清泉水，领略“石乳挂四垂，仿佛百怪立”的洞天奇景，更当别有一番情趣。

白塔寺及其庙会

白塔寺原名妙应寺，始建于元朝，是由尼泊尔杰出的建筑师阿尼格主持建造的。开始定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因寺中心建有北京最大的白塔，故习惯地称为白塔寺。它既是当时皇室佛事活动的中心，也是向全国传播佛教的圣地。其地址和寺界均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选定，是北京最早的藏式佛塔和元朝建都的历史标志。元末曾遭雷击起火，殿堂烧毁，到明朝天顺年间才重新修复，改名为妙应寺。

白塔坐落在一个高出地平面两米的塔院中心，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全高五十一米。其中塔基九米，重叠起三层须弥座，用二十四个莲花围成一圆形莲座，上面托起塔身主体，其直径达十八米。顶部是一个节节拔高的锥形十三相轮，再往上是盘形华盖，厚木作底，铜瓦作盖，呈放射状，中央竖起一座铜鎏金塔顶，也呈塔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塔体上的七道箍，非铜非铁，灼灼 耀目，牢固地嵌在塔身上，使塔体牢固异常，经久不塌。

清朝乾隆时，对白塔重加修缮。据当时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记载：乾隆曾手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梵文尊胜咒》和《全套大藏真经》用以镇塔。但这些东西究竟藏在何处，长期不得而知。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顶部震损，经拆开塔顶修补时始发现，在一个用铜套罩住的长方形楠木箱里，除有乾隆手书经文外，四角还各有一个银鎏金宝瓶，内装有八宝、念珠和铜钱。箱内壁上有一个小

洞，洞内放着一尊高五厘米的赤金长寿佛，身上嵌有四十四颗宝石，手捧一颗舍利子。在一个圆形漆盒里，有一顶五佛冠和一件补花织锦袈裟，上面镶有一千多颗珍珠和红、蓝宝石，推测曾是乾隆穿过之“僧宝”。在另一个较小的箱子里，有一个加锁的铜鎏金小圆盒，里面珍藏着三十三颗舍利子。

白塔寺历来是北京著名的庙会地之一。旧时循例逢五、六为庙会期，即每月六天。届时，除烧香拜佛外，主要是起集市作用。寺门前，多是些卖冰糖葫芦、心里美萝卜和大挂山里红的，也有吹着口哨卖小花篮的。寺内头院，东侧是山货和日杂用品，西侧是年糕、切糕、江米粉等小吃。里院两边为百货、服装、花鸟等，中间更多的则是民间戏曲场地，评书、大鼓、相声、杂技都有。傅士亭的乐亭大鼓、“小蜜蜂”的滑稽大鼓都很有名气。那些唱小戏的，用布围一下，就在里面演起来，入口处收钱的边　收边喊：“五分钱看两出戏，《三娘教子》《空城计》。”老百姓花几分钱娱乐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在后院的空地上，几乎都是卦摊、测字、相面，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位“谈相牛乐天”卦金最高：粗谈一元，详解两元。有人认为“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宁愿多出钱也听他“神吹”一通，末了还不住地点头说：灵。在其他一些跨院空场上，还有变戏法和练气功的、耍猴玩鸟的、摔跤拉洋片的。有些行当现在已经绝迹了。

白云观中会神仙

泱泱中国自太古至现代，整个文化领域中皆有极富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从而曾使一代代人为之深感扑朔迷离，尤其对传说中那些能超脱生死、来去无踪的各路神仙，更是多元崇拜、虔诚祭祀，以企望诸神佑助。正因如此，旧京正月望日以后，白云观“会神仙”之举才得以延续数百年而不衰。

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二里许，乃中国著名道观之一。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金明昌三年（1192）重建，改名太极宫。其西十余里，为唐太宗袁忠墓，而西南五六里，为兰太后运粮河。元太祖时，因长春真人邱处机奉诏居大都太极宫，遂改从真人号，更名长春宫。邱处机享年八十而蜕骨。其弟子尹清和，始以师入龛，葬于宫内；继而又于宫东扩建道院，取名白云观。

邱处机，字通密，生于金皇统戊辰（1148）正月十九 日，系山东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十九岁辞亲居昆仑，年二十谒重阳真人请为弟子，道号全真。重阳蜕骨后，他又潜修于四川龙门山，形成龙门派。1219年10月，奉诏率弟子十八人赴雪山（佛经称喜马拉雅山为雪山）阿富汗境内军营中参见在西征的成吉思汗，以“不嗜杀人及敬天爱民，清心寡欲”之言论与太祖相契，遂赐号神仙，封为大宗师，并赐“神仙符命”金印，掌管天下道教。这位文化修养颇高的道人，在晋谒成吉思汗的万里行程中，在其弟子李志常协助下，曾将沿途见闻撰

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三卷，颇有史料价值。

明代，白云观遂为城外巨刹，其建筑之宏伟，冠绝都门而甲天下。李自成揭竿，入京都后欲将白云观捣毁，幸被观内于道人竭力保留，虽沧桑频经，而卒未稍受影响。邱处机当年亲笔所书之“万古长春”四字匾额，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行书“老子道德经”巨石，明塑邱处机白皙皴皱无须眉之神像，明代正统年间所刻五千三百五十卷道教珍贵文献《道藏》，以及大量碑刻等，迄今犹存。

清朝入中原后，于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均曾拨帑藏纹银大事修缮白云观，突出地体现了清代道观的建筑形制。其中轴线上之建筑，由南而北依次是：金碧彩绘的牌楼，精美生动的石狮，造型朴重的山门，斗拱飞檐的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邱祖殿、四御殿（二层建筑，其上为三清阁，藏书之所在）以及殿后幽静的戒石和云集山房。其东院之配殿有华祖殿、火祖殿、真武殿、南极殿，以及塔院；西院分别是八仙殿、吕祖殿、娘娘殿、五祖殿、后土殿，以及后院扎竹为篱叠石为山的花园。

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白云观每年正月初一起，开庙十九天，而以正月十九日尤盛，谓之“燕九节”，亦谓之“会神仙”。

据《天咫偶闻》与《帝京景物略》等典籍记载，“燕九”又谓之“阉九”或“阉邱”、“宴邱”，盖因邱处机乃自宫者也。民国三十年（1941），京华老报人成扶平、王柱宇两位先生曾几度至白云观，采访百岁以上老道人，问及长春真人邱处机自宫之事，得知其生日（正月十九日）亦即就阉之日；并悉其以自宫手段而达到色身清静，潜心修道，以成真人之目的。

遍览正史与野史，中国僧、道中之自宫者实属罕见，而历朝庙宇梵宫中之佛、道门弟子毕生着实元精未泄者，屈指可数也。由此看来，邱处机无愧为智者，亦无愧为真人也、仙人也。其自宫之举，尤

为群阉所趋附。明朝的魏忠贤，清代的李连英，均为白云观中天字第一号的大施主。

所谓“会神仙”者，相传正月十八日入夜以后，神仙必下降于白云观，或幻为缙绅，或化为乞丐，或变成老妪，或变作童稚，有缘遇之者，遂得以福寿康宁，祛病延年。故朱门冠、宫闱阉宦、北里群妓、布衣良民以及市井 狡狯之徒，届时猬集蚁聚，进香上供，冀与神仙一晤。晚清学者俞樾，在其《春在堂全书·茶香室三钞》中曾记当年之盛况曰：“此日僧道辐辏，凡圣溷集，勋臣内戚，凡好黄白（指道家所谓炼丹化成金银之法术）之术者，咸游之，访丹诀焉。”

凡涉足白云观会神仙者，大都于正月十八日午后陆续前往。日间的活动极为丰富多彩，或在主殿及配殿礼神佞佛，或在窝风桥打金钱眼以求利市，或至观西养老院一睹百岁道人及老猪、老羊、老鸡、老鸭、老鹅之姿态，或于货声迭起的席棚中择食几种传统风味小吃以饱口福，而腰缠万贯之达官显贵及民间富翁亦可散钱布施而动辄耗数万，以显示其“为善最乐”之佛心。至于观中出售的红色小漆佛，则是一切贫富香客于会神仙之前颇喜争购之物，盖借留游观之纪念耳。

夜幕降临后，欲会神仙者皆宿于观中而彻夜不眠，三五成群趺坐于观中各个角落，未见神仙而自家先成夜游神矣。而观中之道士，每喜作狂态奇行，假冒神仙以钓众愚。故《京都竹枝词》曾讥诮曰：“绕过年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

会神仙之夜，亦有烈火干柴不淑男女，于观中肆意风月，将一座梵王宫当作了楚阳台，诚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乐虽不亚于会神仙，但亵渎神灵之罪，真人与诸神可知之乎？又安能若无其事乎？

北京尼庵通教寺

昔日，北京城里的庙宇梵宫比比皆是：而所居僧、道、尼、番之比例，以尼最寡。

梵语称女僧为比丘尼，简称尼，俗称尼姑，北京土语亦称其为“幼僧”，即慈爱之僧。中国尼姑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前的北魏。北魏散文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胡统寺》曾有“入道为尼，遂居此寺”的记载。

自18世纪以来，由于政治腐朽，社会窳败、外侮以及兵燹等因，北京豪门闺秀与小家碧玉看破红尘削发为尼者指不胜曲，以致涌现出大慈庵、五圣庵等诸多小型的姑子庙。

位于北京东直门内针线胡同的通教寺，乃明代一阉官所建，清中叶时改为姑子庙，并更名为通教禅林，为北京现存的最大尼姑庵。

该寺原有面积仅一亩有余，与旧京诸多宏伟庙宇相比，微不足道，故诸多典籍中均未见记载。因年久失修， 至20世纪30年代时，已呈颓垣断壁，满目荒凉。民国三十一年（1942），闽南比丘尼开慧与其弟子胜雨云游至京，挂锡于北新桥广慈寺，近在咫尺，遂与通教禅林住持印和结为善缘，并由此而接管了行将关闭的通教禅林，凭其虔诚之心与舌敝唇焦的游说，感动了诸多军政界要人及商界名士慷慨解囊共襄善举，搬迁居民近百户，将破庙面积扩至四亩开外，殿宇数十

间，为旧有佛像重塑金身，更名为通教寺，复兴之后，八方尼众纷至沓来，香火极盛。老尼开慧自觉年事已高，遂令弟子胜雨为住持。

修行极深而又精明干练的胜雨，为传布律宗广育僧才之弘旨计，在南京国府与北平市军政界人士支持下，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创建八敬学苑，延聘尼僧巨擘慈舟、慧证两位法师每日开堂演法，主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北印度人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以及诸般戒律，听讲者近百人，开佛教一代之新风。

民国期间，通教寺尼众中不乏堪与名花相比的殊丽，为使其彻底皈依佛门，避免思凡，故而庙中戒律极为严格。当夏初之际，为杜绝尼众涉足软红香土而萌动春情，遂按丛林成规，于夏历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实行历时九十天的“结夏”（亦称“结制”），令其静居寺院，不出山门行动，终日于禅房诵读经卷，梵香燃烛，顶礼膜拜，礼忏前愆后过，以求正果。

十年浩劫中，盛极一时的通教寺与北京其他寺庙一 样，大多关闭山门，断绝香火，门可罗雀。寺中尼众，弃经卷而习针黹，自食其力，以度时光。

自从1981年宗教政策得以逐步落实后，原被迫嫁人之尼姑又纷纷削发离婚，陆续返回寺中，重参佛事。所有颓檐裂瓦、尘黯无光之殿宇一律按原样精心修葺，整饬如初。

康熙为礼拜寺题匾

北京回民居住最集中的宣武区牛街地区，近年被政府作为危改小区进行了大规模改建，现已基本完工。一座座新式楼房拔地而起，和位于小区中心的牛街礼拜寺相互辉映，形成了宣武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朝太宗年间，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最初占地很少，后经明、清等几个朝代的扩建，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修葺时，康熙亲自书写的“敕赐礼拜寺”匾额，一直悬挂在门楼上方。

传说康熙年间，皇帝收到一本奏折，说是伊斯兰教徒每天在礼拜寺聚会，蓄意谋反，奏请皇上下旨予以查封。康熙阅后大怒，立即派人前去查办。但查办人员调查后回来说：“伊斯兰教民只是在那里举行传统的礼拜活动，并无造反之意。”康熙听后也就不再过问了。谁知没过几天，又有同样的奏折呈上，康熙觉得纳闷，决定亲自微服私访。他穿上回民衣服，装扮成教民的样子，随同众人一起 来到礼拜寺，跪在那里听讲，发现阿訇教长讲的，不但没有谋反的意思，而且倒有一番忠君报国之理。再看看自己前后左右的教民，一个个都是虔诚温驯、老实忠厚之人，整个大殿纯洁宁静，毫无邪秽污垢。他心里有了底，便悄悄地回到宫里。

第二天，康熙召集所有大臣，把看到的事实讲给大家听，并当场揭穿了那个写奏折的大臣，指出了他图谋不轨，想挑起事端，激起教民不满，祸乱京城的险恶用心。然后，他又发布诏谕，重修牛街礼拜寺，还亲自为其题写了匾额，使广大伊斯兰教民深受感动。

扩建后的寺院，占地约六千平方米，属于典型的古代宫殿式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式相结合的建筑格局。中心以礼拜殿为主体，殿堂楼亭，布局紧凑，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可同时接纳一千多人参加礼拜。寺院大门向西，左右各有一座门楼，正中间则是一座平面六边形的亭式楼阁，名为望月楼，康熙所题匾额即悬挂在此楼的上方。

牛街礼拜寺不仅是各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而且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寺院东跨院内，有两座“筛海”坟，埋的是两位来中国传教并在该寺逝世的长老。一位是1280年逝世的艾哈迈德，伽色尼人。另一位是1283年逝世的依玛顿定，布哈拉人。这两座古墓至今保存完好，是国内少有的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几次拨款重修牛街礼拜寺，使 其更加宏伟壮丽，在国际上更享有盛名。

此次危房改造，居民按规定要异地安置，但为了照顾伊斯兰教民礼拜方便，决定允许他们全部回迁。牛街礼拜寺的辉煌将不会因房屋改建而受到影响。

京都朝外东岳庙

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五十年来一直封闭，而今修葺一新，不但对外开放，而且春节期间还举办了文化庙会。

东岳庙供祀着东岳大帝众神体系，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庙宇。其创始人乃元代的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他的弟子吴全节。

张留孙少时出家做道士，在江西龙虎山修行。后随天师张宗演进京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因其形象“七分神仙，三分宰辅”，且精于祷祀斋醮，故深得元帝宠信，并封为玄教大宗师，管理全国道教事务。七十一岁时，他自费在此购地，欲建东岳庙。元帝闻信，想予资助，但被其婉谢说：“我愿意自费建造庙宇。如果动用国库的钱财，劳费民力，就难以实现我报效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了。”遗憾的是未越二年，他便去世，遗愿由弟子吴全节实现。

吴全节十三岁在龙虎山学道，后师从张留孙。师殁， 继任玄教大宗师，秉承师志，不惜劳费，继建东岳庙。第一年先建成大门和主殿，次年又建成东、西庑殿。个人财力毕竟有限，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官府修葺扩建，始定格局。

人们对东岳大帝的信仰起源于古代先民对泰山的自然崇拜，尤其是巡守制度和封禅制度出现以后，泰山崇拜更被王者赋予正统地位。两汉以降，泰山神职能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能主宰人间生老病

死、祸福寿夭、命途修短、多子乏嗣、富贵穷通、福禄厚薄、贵贱高下、旱涝丰歉等，并被道教神团吸纳。至唐、宋，武则天尊其为“天齐君”；唐玄宗封其为“天齐王”；宋真宗加封其为“仁圣”，不久即加帝号。元代又加“大生”二字，至此，泰山神全称“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世称“东庙大帝”。

元代的《搜神广记》首次为泰山神整理出家谱世系。据该书托名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宣称：盘古的后裔少海氏之妻因梦中吞下两个太阳而怀孕，生下二子，长者为金蝉氏，次者为金虹氏，“即东庙帝君”也。人们还依照封建官府的模式，为东岳大帝添造了副贰佐辅以及职能机关——七十六司。故七十六司也成为东岳庙主殿周围环绕而建的一大特点。

北京东岳庙供祀的就是泰山神东岳大帝众神体系。神像众多是这里的一大特色。据1927年统计，庙内尚有塑像一千三百一十六尊。

中路正院所供奉的主要神祇自瞻岱门起。瞻岱门分前后两进。外进两稍间内，供奉的是道教护法神龙、虎（俗称哼、哈将）二将，冠兜鍪，环甲胄，持枪执钺，气势威猛。传说中他们都有制敌绝招：龙将的窍中能出二气，鼻子一哼，便射出两道白光，将敌人的魂魄吸走；虎将则只需张嘴一哈，便喷出一团黄气，令对手魂销魄散。

瞻岱门内进两稍间是岳府十太保环列司阍。他们依次为：正佑侯、孚佑侯、灵佑侯、显佑侯、顺佑侯、安佑侯、广佑侯、协佑侯、昭佑侯、威佑侯。其中以正佑侯温琼最为著名。相传他是岳府猛将，受玉帝敕旨，出入天宫，巡察五岳，人称“温太保”或“温元帅”。

主殿岱岳殿内供奉着东岳大帝及其文武大臣。其后工字形之对称殿称育德殿，是东岳大帝及淑明后的寝宫。

东岳庙融元、明、清三代建筑为一体，除神像众多外，另外就是以楹联匾额和石碑多而著称。

多数殿宇前都挂有白底黑字的行草篆隶楹联。它们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东岳大帝的崇仰，也表现出道教文化对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影响的印痕。既是对各殿、司神祇职能的诠释，也是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是“善恶有报”观念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即家庭伦理道德、政治伦理道德、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它们或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或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或意蕴深长，寓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瞻岱门悬挂楹联是“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东旁门楹联是“阳是阴非，在尔心还想欺饰；假善真恶，到此地难讨便宜”。西旁门楹联是“倚势欺人，人或容神明不恕；瞒天昧己，己未觉造物先知”。反映出早已深深根植在中国传统理念中的“善恶有报”观念。这些警世醒人的文字，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令人怦然心动。善报司楹联是“隐隐善根，枝叶荣华树奕；悠悠福报，取携谷禄宏多”。恶报司楹联是“对簿无差，举念及时猛省；亏心莫贷，到头何处欺瞒”。鲜明的对比，体现出人们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憎恶。

东岳庙碑石数量首冠北京城、郊群庙。因立碑年代不一，其排列次序又不规整，故老北京流传着“东岳庙的石碑数也数不清”的说法。据记载，庙内石碑多达一百四十通。到20世纪20年代末，尚有石碑一百三十八通，其中元碑一通，明碑三十二通，清碑九十九通，民国碑六通。

在众多碑石中，最为著名的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文、书丹并篆额的《张留孙道行碑》，俗称“道教碑”。该碑刻于元天历二年（1329），碑高四米，碑文为两面刻，各二十八行，行六十字，共二千七百八十六字。记述了东岳庙创始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生平事迹。通篇文字完整清晰，为赵孟頫晚期代表之作，价值极高。

碑石中，还有一些历代重修东岳庙的碑刻，主要有明正统十二年（1447）英宗朱祁镇的《御制东岳庙碑》、明　万历四年（1576）张

居正撰《敕修东岳庙碑》、万历二十年（1592）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赵志皋撰《敕修东岳庙碑》。

清圣祖御制《东岳庙碑文》碑和清高宗御制《重修东岳庙碑记》碑，皆螭首龟趺，碑体高约三点二米，满汉文对照，分别记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家出帑银重修东岳庙的经过。

洞门牌楼前立有两座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石碑，东边一座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高宗御制诗刻草书，表达了对东岳大帝的敬仰之情。由于年久风化，碑文已不甚清晰。西边的是一块无字碑，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写完东边的一块碑后，还没来得及写西边的那一块，就去世了。后人不敢再写，只好将一座无字碑立在那里。

除上所述，大部分石碑为民间善会碑刻。碑文也往往由官员和社会名流撰写。如建立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东岳庙六项进供白纸圣会碑》由民族英雄史可法撰文；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羊行老会碑》由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撰文，等等。

卧佛寺和樱桃沟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表姐由重庆来，住在我家。她要我好好陪她重温一下阔别十年的故都春色。城里几处公园，城外的颐和园、西山八大处都逛完了，只有香山还没有去。我问她：要不要爬“鬼见愁”。她摇了摇头。最后决定去香山旁的卧佛寺，时间是清明前后。

卧佛寺坐落在香山东北的寿山脚下。那天十点多钟，我们来到寺门前。一眼看去，密林翠绿，风景优美。卧佛寺历史悠久，远在唐初就在这里修建起“兜率寺”。到了元代改称“寿安山寺”。以后又改为“大昭孝寺”。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又改称“十方普觉寺”。因为寺里有卧佛造像，所以俗名“卧佛寺”。

我们进到“卧佛殿”，迎面便是这尊长约五六米的大卧佛，侧身作睡卧状。身上盖着很大的一床黄缎子棉被，只有头部和一只右手露在外面，因为它用这只手弯托着头部。殿内没有其他游客，管事的和尚直到我们快要离开时 才从后殿出来。他把盖着卧佛的被子向下拉了一拉，露出上半身。因佛身涂着金碧颜色，看不出用什么材料做成。和尚已经很老了，大约有七十来岁。他说：这是一尊铜佛，是元代至治元年（1321）“冶铜五十万斤”铸造的。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他说他在这里住持已有四十年，现已无经济来源。他的“家”就在寺后山村，靠种几亩地和游人的布施度日。我们给了他一张五千元的关金。他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并主动指给我们卧佛后面和两侧环立的泥塑“十

二圆觉”像，说这是引用“长阿含经”记叙的故事，表现释迦牟尼临终前向弟子们嘱托后事的情景。佛前两侧各放一只大玻璃柜。其中陈列着僧鞋，每只长三尺左右，用黄缎做成。柜上贴着“信士弟子某某布施”的字样。

我们刚要走出卧佛寺大门，一位乡下妇女进来告诉我们，“樱桃沟”的花树都已开放，要我们去看看。我们深谢这位大嫂，不然我们真不知道此间还有这个“世外桃源”。按照她指给我们的道路，向西北沿着一条清溪走约一里多地，便是“樱桃沟”。原有一座明代修建的庙宇，还剩下几间残破的殿堂。庙前是一个大果园，有一条石径回环曲折，盘旋而上，修筑得十分精巧。站在小路尽头，整个果园就历历在目了。樱桃花和杏花，正在盛开，居高临下，如置身花丛，别有风趣。尤其我们刚从卧佛寺出来，那里是庄严肃穆的梵王宫，而这里是繁花盛开的武陵源，相比之下，气象迥异。感触之余，就在这里吃了带来 的午餐。更惬意的是食品中还有表姐从四川带来的麻辣牛肉，边吃边欣赏这周围的美景，既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直盘桓到下午两点才动身返回。

天宁寺古塔

出广安门往北一转，就会望见一个古老的塔影，衬托在蓝天中。那就是比北京城年纪还大得多的天宁寺古塔。清初周筼《析津日记》记云：

> 寺在元魏为“光禄”；隋为“弘业”，在金为“大万安”，宣德中修之曰“天宁”。

如果从北朝的元魏算起，那还在公元四五世纪，比永乐修北京城，要早一千年，塔是隋朝仁寿元年（601）修的，即从隋代弘业寺修塔算起，也比北京城要早八百年左右，真可以说是北京古建筑中的老前辈了。

天宁寺最著名的就是这座隋代弘业寺的古塔，庙中过去有隋碑、唐碑。《长安客话》云：“天宁寺塔，每级缀数十百铃，风动声急，如万马奔骤可听。”记后并引诗：“塔势棱增欲倚云，微微仙梵半空闻……见说讲堂分倒影，坐　看松荫织斜文。”诗并不是好诗，但记录了天宁寺的风物。即古塔、塔铃、塔影、松荫。清初王渔洋《雨后至天宁寺》诗云：

凌晨出西郭，抬提过新雨，
日出不逢人，满院风铃语。

渔洋山人是讲“神韵”的，后面两句诗写来十分入神，使人好像听到这座古塔的铃声了。关于塔铃的事，《长安客话》记载不够清楚，明人徐善《冷然志》记云：

> 天宁寺塔，飞檐叠拱，又十二层，每椽之首，置一铃，八觚交角之处，又缀一大铃，通计大小铃三千六百有余，风作时，铃齐鸣，若编钟，编磬之相应也。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座古塔在建筑艺术上是多么精细了。天宁寺的经历也是无限沧桑，唐代的“天王”，金代的“大万安”，早在元末已“兵燹荡尽”。至近代，这座古寺，也因靠近广安、西便二门，常为军队驻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僧格林沁，胜保的军队就退守西南隅，驻扎在这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四日记云：“闻恭邸、瑞相居彰仪门外长兴店、僧　邸、胜光禄屯天宁寺……”

故事太多，不多引了，这座经历了一千三百七十多个寒暑、饱阅沧桑的古塔，居然还健在，真可说是劫后余生。

永乐钟王有五绝

农历除夕之夜，一阵阵钟声在北京的上空回荡。轻击，圆润、深沉、古雅；重击，纯厚、洪亮、庄严。人们知道，这钟声是由位于北京西北郊大钟寺内的“钟王”——永乐大钟发出的声响。

这口被誉为“钟王”的大钟，与世界同类大钟相比，具有“五绝”。

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永乐大钟通高六点七五米，最大直径约三点六七米，重约九万三千斤。其铸造历史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它产生的背景，是与明初的两个历史事件——“靖难之役”和明成祖迁都北京——相联系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永乐大钟是佛钟（钟身内外铸满佛经铭文），又是朝钟。它把神权（佛教）和皇权（政权）糅合在一起，反映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

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群是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 大的祭祀坛是北京的天坛；世界上铭文最多的大钟，就是与故宫、天坛同时问世的永乐大钟。永乐大钟的钟身内外整齐地铸有二十三万多字的佛经铭文，这就是它的第二绝。

永乐大钟具有第一流的声学特性，这是它的第三绝。我国古代声学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远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曾侯乙编钟。而作为一口钟的永乐大钟，其振动频率的丰富，远远超过了曾侯乙编钟

的每一口特定的钟。日本著名的声学专家北村音一教授在聆听了永乐大钟的钟声后说：“这是我所听到的世界上最好的钟声。”它不是一个音，而是由最佳泛音系列的各个分音组合而成，因而在较好的条件下，钟声可传至四五十公里远。

人们登上大钟寺的钟楼，还会发现永乐大钟的另一个秘密：这么一口大钟之所以能悬挂在主梁上，只是依靠一根长一米、高十四厘米、宽六点五厘米的铜穿钉。这根钉承受了四十多吨重的剪切力。为了防止由于穿钉表面不平造成局部应力加大，穿钉内部还铸进了一根相当于低中碳钢的芯子。这就是大钟几百年来安然无恙的奥妙所在。具有先进的力学结构，这就是大钟的第四绝。

永乐大钟于十五世纪初问世后，在这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钟。到了1727年，俄国沙皇为了超过北京的大钟，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用了五年的时间！铸了一口一百九十三吨的大钟。但是，由于铸造 工艺方面的问题，那口大钟浇铸冷却后出现了大裂缝，成了世界上从未敲响过的大钟。而我国的永乐大钟，采用的是我国传统铸造工艺的泥范法铸造，能工巧匠们运用这种工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永乐大钟的钟体一铸而成，经五百多年而完好无损。这和它科学的合金比率是分不开的，其成分是：铜百分之八十点五四，锡百分之十六点四，铅百分之一点一二，还有少数其他元素。

云居寺的石经、古塔

云居寺又名西峪寺，位于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之房山境内。始建于唐初，规模宏伟，寺门东向，中路为六进殿宇，以台梯式建筑逐级升高。五层正院之旁又有配殿，南北侧路为僧房和历代帝王行宫。寺的南北有二塔对峙，异常壮观，确是中国北方佛教圣地，但因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遭日军炮火破坏，寺院被毁。

云居寺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的石经和古塔群。尤其石经，不但是中国古代佛教经籍的铭刻，也是世界佛经最古最多的铭刻，全部石经共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佛经九百多部，三千四百五十二卷，自隋大业开始至明末结束，历经千载，其工程之浩大，刊刻之宏伟，堪称“世界之最”。

最早发起刊刻石经的人叫静琬，他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唐高宗永徽年间吏部尚书唐临所著之《冥报记》载：幽州沙门释智琬（静琬）精练有学识，　　隋大业中发愿造石经，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苑所造，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639）卒，弟子犹继其功。笔者尝问及当地老和尚，静琬法师何以在当时刻经？云主要是继承其师遗愿，并非仅为传播佛经，而是以备一旦再遭“法难”，可充经本之用。接着他又谈了所谓“法难”，就是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年间及北周武帝年间曾下令废佛、诛沙门、毁经像等，对佛

教打击极大，在佛教史上称为“法难”。

在老和尚指引下，笔者游览了静琬造刻的石经和存放石经的地方，该山称石经山，又名小西天，山上有九个石洞，分上下两层，上层雷音洞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版，殿中有四柱，周围雕刻佛像一千有余，极为精致，壁上石经多是隋唐时代所刻。其他八个石洞所藏经版，多以石门封锢。辽金以后，山上九洞已满，再刻石经藏于寺内南塔基下地穴中，故不得一观。另见石经山上有唐塔两座，其中金仙公主塔较完整，为一方形密檐石塔。此外，寺内外尚存有唐塔七座及隋唐碑刻等历史文物。

千年古刹红螺寺

距京郊怀柔县城五公里处，有一古刹红螺寺。

红螺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四年（348），扩建于盛唐，明朝正统年间易名“护国资福禅寺”，俗称红螺寺。古寺的历史已达一千六百余年。

相传，玉皇大帝的两位公主，因感天宫生活冷寂，便结伴下凡。她们来到一座大山前，这里山水相依，古木参天，万绿中掩映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寺院。从其幽雅肃穆中不时地传出笃、笃、笃的木鱼声和朗朗的诵经声。

这不是天堂却胜过天堂的神圣境界，深深地打动了这两位仙子，便想在此长久地生活下去。于是，她们幻化身形，化作了一对斗大的红螺，生活在寺前的湖水中。白天，她们化作人身，与寺中僧人一道礼佛诵经；夜晚，便化作红螺，放出万道红光，将寺院和山麓掩映在一片红霞普照之中。她们运用神力，暗中保护着寺庙和当地的百姓。从此这里风调雨顺，林茂粮丰，百姓们无不感激红螺 仙子的恩德。

元朝时，玉皇大帝把她们召还天宫。人们为了缅怀两位红螺仙子，同时祈盼有朝一日仙子能重返这里，便把寺庙北的山称为红螺山，寺庙南的湖称为红螺湖，进而寺庙也被称为红螺寺了。

红螺寺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占地百亩，分中院、东跨院、西跨院、东下坎、西塔院五处院落。历史上的古寺，拥有三百多顷耕地。据《怀柔县志》记载：红螺寺“自唐历金元，皆为巨刹”。

红螺寺为“十方常住持”，在中国北方属最大的佛教丛林，是佛教徒求经参学的地方。其住持、方丈，多由皇家命派。金代佛觉禅师初居真定之洪济寺，大定年间世宗遣使请至红螺寺主教；元朝至正年间，皇上命荣禄大夫领大司空佩一品银章的云山禅师，来红螺寺，“以领其宗教”。

清朝嘉庆年间，际醒大师住持红螺寺。他弘扬净土法门，创立净土道场，听讲僧众遍布大江南北。朝鲜、日本等国的高僧也不远万里来听他讲经说法。一时间，法席鼎盛。际醒大师后期讲演的遗稿，由其门人松泉禅师整理，并刻于万块木板上，后由香港出版，书名《梦东禅师遗集》。梦东是其号。书中云：“迄今百有余年，海内净土门庭首推红螺焉。”

“怀柔八景”之一“红螺呈秀”即在此。另有三绝景：一为六百年前元代云山禅师手植竹林，清康熙亲赏，称之 为“御竹林”。二为雌雄银杏，又称夫妻树。在大雄宝殿前，高达三十米，树龄一千一百多年。传说，世上每更换一次朝代，雄株便新生一枝干。三为紫藤寒松。两碗口粗的藤萝蔓如龙盘玉柱，绕松而生。俗云：藤绕松，松必死，而它们八百年来却能和睦相处，相得益彰。

智化寺内有“京吹”

北京东城有个智化寺，红墙黑瓦的院落里，时常传出锣鼓笙乐，小孩儿常跑去看热闹。在寺院的空场，十几个小和尚端坐在极窄的板凳上，跟着老和尚学吹笙、管、笛，学击锣、鼓、铙，他们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住在智化寺附近的市民管这叫“京吹”，而把其他寺庙的音乐叫“邪吹”，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些其中的原委。

智化寺是明代太监王振营建的家庙，明英宗赐名“报恩智化寺”。据史书记载，王振营任司礼太监，势倾朝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所以他的家庙——智化寺成为当时京城中最著名的禅宗寺院之一。

智化寺规模宏大，坐北朝南，前后六进，分中、西、东三路，以中路建筑最为堂皇，全盛时期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各种房屋二百余间。

中部的建筑又分为三部分，南部以智化门智化殿为主，形成两个院子；中部的如来殿是全寺的最高建筑，后　部以大悲堂和万法堂为主，组成两个院落，其中尤以前、中院的建筑最为精美。

智化寺不仅以“穷极土木”称著于京，还因王振将宫廷古乐移入此寺，而远近闻名。

智化寺的音乐以管乐为主，据考，其乐器如十七簧笙、九孔管；

词曲牌如“梅花”“献仙音”；宫调如皆止调（6E调）、月调（C调）皆承唐宋之风。从残存的康熙三十三年（1694）第十五代艺僧永乾手抄的《音乐腔谱》看，它是唐宋燕乐的余绪，由于历代艺僧奉其为神圣，严格坚持口授秘传，不敢也不允许有丝毫更改，使其历经数百年仍保持原有风貌，并留有北宋鼓吹教坊的遗制，成为清代京城寺院管乐的主要源泉。故清末民初的音乐界把智化寺的音乐称为“京音乐”。

顾炎武和报国寺

北京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有座不小的古庙，名字似为“大报国慈仁寺”，可是人们都简称它为报国寺。

慈仁寺是明宪宗时在辽、金报国寺的旧址上修建的，相传这里曾有幢金石窑、元代古松和明神宗时的窑变观音像，据古籍记载，这里还有过盛极一时的庙会，会期是每月的朔、望和农历二十五日。《顺天府志》亦有“慈仁寺庙市，初最盛”的记载，由于光阴的流逝，时代的更迭，古松已毁于炮火，窑变观音像也被人盗卖，但人们所怀念的不仅是这些古迹，这里还有明末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的祠堂。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居亭林镇，因号亭林先生，满州贵族入侵中原后，他便在家乡参加了抗清爱国活动。失败后，他漫游南北，到过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到处结交爱国志士，他曾被举为“博学”而不就，摆脱了清廷的种种胁迫和利诱，因而他的爱国行动和民族气 节，很为后人所崇敬。

顾炎武是一位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国家典籍，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糟，兵农之学无不淹贯精通”。在漫游的旅途中，他用两头骡子驮着书，把实地考察和书本资料参看比较。他那渊博的学识，就是这样不断加深和积累的，他的许多著作，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顾炎武对曾作明都的北京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足迹踏遍北京的畿辅。他对从北京直到山海关一带许多历史地理问题作了考证。为了《京东考古录》，他还六次拜谒明帝陵，实地踏勘昌平一带的山川地形，写了《昌平山水记》。

顾炎武在广安门内报国寺居住时，已是晚年了，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并不长，当山东莱州的“黄培诗词悖逆案”发，他就被牵连到济南下狱了。

“顾先生祠”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何绍基和张穆等在顾炎武曾卜居过的地方修建的，其后，1922年重修，这里原是报国寺西隅的一座小院，重建后规模较大，计有“易飨堂”三楹，中奉顾炎武神位及刻像。中门外尚有“炊羹庐”及“四柿亭”，并补植双松，以存故迹。

碧云寺和孙中山衣冠冢

北京香山东麓，山腰之间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古寺——碧云寺。

史载，碧云寺建于元代，距今六百多年。最初，由元朝开国元勋耶律楚材的后裔耶律阿勒弥“舍宅所建”，名曰碧云庵。到了明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御马太监于经相中了这块宝地。他扩建碧云庵，并改庵为寺。《天府广记》称扩建“所费以万万计”。于经死后百年，时值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三年（1623），宦官魏忠贤在于经所建基础上再度扩建。先后经过两次扩建，富有明代建筑色彩的碧云寺遂形成。

风景秀丽的碧云寺，吸引了清代的帝王和后妃。乾隆十三年（1748），清王朝又对碧云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其扩建主体就是仿宋代杭州净慈寺罗汉堂建造的闻名于世的五百罗汉堂。堂中五百尊罗汉，加上过道中七尊神像和左梁上蹲着的济公活佛，总计五百零八尊。这五百零八尊 罗汉都是坐像，每尊约高一米半，皆为木雕，外饰金箔，都是面对面排列，尊尊形象各异，个个栩栩如生。罗汉堂北跨院，是清朝帝、妃憩息之所，跨院内含行宫院、含青斋和水泉院。由此再北为金刚宝座塔，该塔与罗汉堂同期建造，是仿照印度菩提伽耶城的释迦牟尼成佛纪念塔而造的。塔高近四米，塔座三层，第一、第二层是由虎皮石砌就，第三层是用精美的汉白玉石砌成，四周还雕着许多西藏喇嘛教的传统佛像。高台上有五座十三层以汉白玉石砌成的

密檐塔，另有两座圆形舍利塔。高台顶都按井子形在中心与四周各放一个小塔。按喇嘛教的说法，井子中央是须弥山，系释迦牟尼所在地；而四周分布着的则是水、陆、山与代表它们的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即停灵于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中。遵照孙中山愿“归葬紫金山”遗嘱，故1929年5月26日，孙的灵柩由北平南移，6月1日安葬在南京的紫金山中山陵。此后，孙中山先生的衣帽便葬于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内，世人称这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冢前有隶书石碑，冢外铜门，辉煌夺目。每逢孙中山先生忌日，人们怀念先生毕生从事革命的勋业，谒墓致祭的人常川流不息。由此，碧云寺也就成了闻名中外的名刹，变成世人十分景仰的地方。

千年银杏茏葱意

近接春明友人来书，说潭柘寺已经重修开放，前去参观，看到千年古银杏，生长仍然极为葱茂，不但老干乔枝，密叶极为浓郁。即使十几围的老根旁，仍然会发出手指粗的嫩条来，一样长满碧绿的叶子，真是龙荪百代，生意无穷，有些近于奇迹了。

北京旧时古树不少，如天坛皇穹宇外面的辽柏，也是上千年的古树，中山公园事务所前的四株古柏，树围超过二丈，按年轮推算，也是近千年的古树。不过，这些古树虽然也生长得好，虽有参天之势，却无滋生嫩枝的能力。而潭柘寺这株千年古银杏，根部却能发出嫩条来，难道还不算作奇迹吗？

按银杏，只是别名，正名是公孙树，北京俗名则叫白果树，因其果实白色，故名白果。

银杏是史前期的植物，在冰河期以前就有了，经过冰河期，地球上不少东西都绝种了，而它仍能流传下来，这 是十分不容易的，也可见它的生命力之倔强与旺盛。

潭柘寺这株古银杏，已数见于前人记载。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嘉福寺，改名岫云寺时，三圣殿前这株银杏树就已经历了六七百年的风霜雨雪，高枝参天，密叶入云。但是这还不足奇，奇的是当时树的左右两侧，从根部各生长出一株小树，像是老年人左右手各拖着一个孙儿

一样，极为有趣。这棵树是辽金时代的遗物。另外在此树之西又种了一株，二者对称地挺立在三圣殿前，潭柘寺地处山凹间，周围环列九座峰头，金章宗诗所谓“碧莲花里梵王宫”，形容是很形象的。这个山凹中土质、水脉似乎特别好，树木丛生，长势极旺，所以四望全是翠色，较之远处的黄土秃山迥乎不同，所以叫“碧莲花”，这株千年古银杏长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

昔人吟此树诗云：“瑞扆九峰朝帝树，鸣阶一水肖龙泓。”为什么说“帝树”呢？因为乾隆认为这老树旁长出葱茂的小树，是爱新觉罗族的祥瑞，故封此树为“帝王树”。可是清代早已亡了，乾隆坟裕陵也被孙殿英毁过，而此树仍生意万千，异常葱茂，所谓“帝王”祥瑞，又安在哉！

老北京的关帝庙

北京的庙多，其中关帝庙的数量又高居诸庙之首。关帝名关羽，字云长，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老百姓称其为关老爷，他的庙被称为老爷庙。据《清乾隆京城全图索引》中记载，关帝庙有一百座，实际上可能还要多。

北京内城的九个门，除安定门外，门里都建有关帝庙。正阳门为国门，其关帝庙规格最高，明、清两朝皇帝都定期在此举行祭祀活动。地安门的关帝庙规模最为宏大，殿门覆盖琉璃瓦，殿内富丽堂皇，塑像非常华贵，其黄铜香炉、花瓶灶台等，也无不绚丽生辉。在宣武门外上斜街，一条街上就有三座关帝庙，而距此不远的西河沿、东河沿，也各有一座关帝庙……总之，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到了无处不有的程度。

在《三国演义》这部书中，关羽手持青龙偃月刀，身骑枣红赤兔马，其忠贞、义气、勇猛的形象，使人们有口皆碑，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不过，和其他地方相比，北京的关帝庙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白马关帝庙。众所周知，关公骑的马是红色赤兔马，为什么这里却是白马呢？原来这是由明成祖朱棣所定的。当时北京称作燕京，由燕王朱棣镇守。他北征时，路途艰险而遥远，据说在茫茫的翰海沙漠中

行军时，朱棣总是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位天神在大军前面开路，身着青衣绿袍，手持青龙偃月刀，俨然是关帝的形象，唯所骑之马是一匹白马。与此同时，在燕京家中，也出现一件怪事，一匹白马每天早上出圈后，不动不叫，但却大汗淋漓，喘息不止，仿佛长途征战归来，直到晚间，才肯饮水吃料。朱棣据此推断，一定是关帝骑了这匹白马在护卫自己。所以在他后来修建北京城和关帝庙时，一直把关公和白马同时祭祀。

关帝庙的祭祀活动，除朝廷和官府外，老百姓也都非常踊跃。一是烧香礼拜，表示敬仰；二是求其保佑平安、健康和长寿。关于关帝显灵的传说，在京城随处可听见。

朝阳门外东岳庙，乃华北第一道观。其门前有一座临街牌坊，前临日坛，远眺通惠河，庄严而雄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俄、日两支侵略军由通惠河绕过日坛，向朝阳门袭来。在一片暮色苍茫之中，他们眼前这座牌坊，突然变得高大无比，其形状颇似关帝，青巾绿袍，五绺长须、卧蚕眉、丹凤眼、重枣红脸、满面怒容地横在大街中间。俄国人见此情景，立时吓出一身冷汗，都悄悄 地从旁边溜走了。日本鬼子仗着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顾天怒人怨，继续向前进发。但从住进庙里之后，即开始不断有人拉稀，而且接着就口吐白沫，伸腿而亡。当时曾传出一首童谣说：小日本儿，喝凉水儿，一吐白沫就伸腿儿。可见关老爷不仅威力无比，而且还是一个爱国者。

龙潭湖畔袁督师庙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辽东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这是南海康有为给袁督师庙写的一副对联。对于袁崇焕的一生功业概括地给以推崇，而又毫不为过，殊为难得。至于对仗之工整，遣词之得当，犹其余事。

袁督师庙在左安门内，天坛以东，龙潭湖北岸。清代，如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地，都属皇家园囿，平民百姓自然不得入内。当时在内城一带，龙潭湖与陶然亭等地就成了庶民的游憩场所。龙潭湖面积不大，不过几十亩，可是，湖畔郁郁葱葱地长满了青槐、白杨、垂柳，岸边翠树成行，水面舟船荡漾，风光确是不错。就在这湖的北岸，袁督师庙在焉。庙门上的题额“袁督师庙”四个大字， 也是康有为写的。门内，大殿三间，庄严肃穆，规模称不上宏伟，但因袁崇焕抵御外患的动人事迹，以及他最后竟为国捐躯，所以人们至此莫不肃然起敬。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天启元年（1621）满族崛起于山

海关外，明军屡被打得大败，朝廷上下，一筹莫展。时任兵部主事的袁崇焕，亲赴山海关内外巡视之后，分析军事形势，认为可以击退敌人。明廷遂提升他为兵部佥事，并赐银二十万两，以为犒赏军功之资。崇焕受命之后，奔赴前线，一面安抚流亡，一面与将士共商破敌之策。他力主派五千人马进驻宁远、牵制敌人，另派主力去收复锦州。果然，按他的方案，击退敌军收复了失地。

崇焕的胜利，招致了朝中权奸们魏忠贤、温体仁辈的嫉恨。他们派退缩忍让、软弱无能的高第去当崇焕的上司，因而二人意见不合。正值此时，满州军大举进犯，崇焕率众奋力死战。在决战中，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被炮击伤后致死，又获大捷。捷报传来，明熹宗大喜，崇焕被升迁为右佥都御史。但因权奸们的排挤和压力，他竟不得不辞官退隐。

崇祯皇帝登位后，起用崇焕，并重任他督师冀道。后来，满清军队避开崇焕主力，进犯北京城郊的高碑店，崇焕闻警，率队星夜从关外赶回京畿。不料对方避而不与崇焕接战，派人在京城内外传言，崇焕与满州军队密谋迫使明廷与之订城下之盟。温体仁又在崇祯面前一再进谗，横　　加诬陷，崇祯遂捕崇焕，凌迟处死。这位“身系中夏存亡”的英雄，竟然冤屈莫辩，饮恨九泉。

人人的心中都是有一把尺的。袁督师庙的建立和存在，就是一个明证。

西城五塔、东城无塔

久居京华的老人们，常有“西城五塔、东城无塔”的说法，说西城有五座塔，东城则没有塔。

所谓西城的五座塔，指的是：阜城门内白塔寺的白塔，西长安街双塔寺的两座毗连的塔，西四砖塔胡同的砖塔和北海公园“琼岛春阴”的小白塔。

这五座塔各有春秋，白塔寺的白塔还有一个妇孺皆知的“锔大家伙”的故事。据说，有那么一年，白塔裂了个大缝。眼看就要崩裂，塔下面附近的住户恐怕遭到砸毁砸伤，有的思迁，有的欲迁不得，进退两难，非常着急。一天，有一户小铺子（据说是茶馆式小饭馆），晚上来了一位老年顾客，吃喝间见店主愁眉不展，询问究竟，店主说明塔要倾圮之事，老人临走付茶饭钱，店主不要，说，反正也长不了啦，算啦！老人说不要紧，我想法给修。店主当然不信，一笑置之。据说当夜，狂风大作，附近居民耳闻塔上叮当之声不绝，次日发现白塔裂缝已经用大锔子锔 好，群以为奇，这个店主才说出昨晚老顾客的事，一时传为奇谈。

西长安街的双塔是在一座庙内，据说站在塔的一侧向西看，双塔一线时能合成一塔。西四砖塔传说已在千年以上，但一座砖塔，始终屹立不动，确属罕见，据说砖制的塔在全国也很少见。北海公园的小

白塔，听说1976年唐山地震时，塔顶上的铁帽曾经震落，后来已经修复完整。

但是，为什么西城有五座塔，而东城确确实实连一座塔也没有呢？

据说清朝对于北京的一切工程土木建筑，虽然归属工部所管，但必须经钦天监的测量，认为合乎五行生克之理，才准动工兴建，由于塔形似鞭（鞭是古代武器的一种，非马鞭），鞭又是金属铸成，而西方属金，所以多建些塔以克制之。

另一说法，说是清朝为了防止西方谋反，因而在西城保留此五塔以止变乱，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几座塔能有偌大神通吗？

据说西城的塔除双塔寺两塔因扩展西长安街拆除外，大部仍然屹立，私心甚慰，可能是自幼居住京华，和五塔有了感情之故，自己东城西城都住过，当然喜爱西城的塔，但对无塔的东城，却也并不因之感到缺乏什么呢。

寒山寺钟声的传说

寒山寺是江南苏州著名的古刹之一，初名为妙利普明塔院，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相传唐代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拾得由天台山来此住持，塔院遂改名为“寒山寺”。

当时寺中有一口大钟，以钟声悠扬宏亮闻名。唐代诗人张继一次途经寒山寺，夜泊枫桥，半夜闻钟声，触发诗情，写下千古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诗问世后，诗韵钟声，脍炙人口，寒山寺更是遐迩知名。现在，每年除夕之夜，常有日本朋友专程赶来寒山寺，聆听古刹之声。这钟声流传着一段奇异的传说——

有一年天气反常，霪雨连月，发了大水，到处一片汪洋。一天早晨，寒山寺门前的古运河石头驳岸旁边，漂来了一口巨大的青铜古钟。钟口朝天浮在水上，顺着波浪起伏，撞在驳岸石头上，发出沉郁雄浑的声响。响声惊动了 寒山寺的大小和尚，一齐跑出来观看，和尚们见大钟载浮载沉，钟口里竟无一滴水珠，都啧啧称奇。当时，因为寺里正好缺少一口大钟，高僧寒山便吩咐众和尚合力打捞。

那时寒山寺里共有三十七个和尚，大家齐心协力，横抱直拉，可是把九十九条粗麻绳都拉断了，始终不能将大钟拉到岸上来。高僧拾得还不放弃，说是用稻草来搓绳子，也一定要把大钟拉上岸来。

拾得将竹竿往驳岸上一点，纵身跳到大钟里。待大钟摇晃稍停，便举竿对准驳岸一撑，大钟便缓缓驶向河心。谁知钟到了河心，竟飞快地逐波而去，朝着正东漂流，众和尚大惊失色，拾得也慌了手脚。

拾得乘着大钟漂流，到了一个叫萨提的地方。萨提地方的人听说高僧拾得来自中土，莫不诧异，便用九头牛把大钟拉上岸滩，热情接待。拾得把大钟和竹竿送给萨提人。他们把大钟挂在村子正中，又将竹竿插在地上，不久便长成一片竹林。出身农家的拾得自此也住了下来，在此农耕度日。

自从拾得离开寒山寺后，高僧寒山思念成疾，连做梦也不断喊着拾得的名字。这时，众和尚中有人出了个主意：敲钟寻人！他们希望拾得听见钟声后，可以循声而回。于是，寒山请钟匠照着神钟铸了一口模样相同的大钟，挂在寒山寺的钟楼上。

这样，寒山寺的钟声一敲便响彻四面八方，且漂洋 过海，传到了萨提地方。拾得听到了钟声，知道这是寒山寺的心声，于是他在萨提也敲响了大钟，钟声从萨提传到了寒山寺。虽然两地相距千万里，但钟声彼此呼应，就像故友重逢，诉说心事。据说萨提位于日本，拾得一直住在那里。

令人惋惜的是，张继听过的那个大钟早已失传，至明代嘉靖年间，一个叫本寂的僧人重新铸了一口巨钟悬挂于钟楼。后来，传说这口钟于明代末年流入日本，故而康有为有诗云：“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光绪三十年（1904），江苏巡抚于重修寒山寺时，又新铸一口大钟，悬挂在六角钟楼上。

天台国清寺及其他

浙江的天台山，不仅以奇岩异石、罕水怪瀑、奇花珍树著称于世，更有一座被称为中国寺院之绝的国清寺。国清寺的山门口有一副门联：

古刹著域中，创隋代，盛三唐，宗风远播；
名山传海外，依五峰，临双涧，胜迹长新。

这副三十字对联深切地道出了国清寺的起源、历史以及秀丽的山光水色。

入山门，重檐下是红底金字的“国清讲寺”匾额。矮墙、修竹之间是一条石砌甬道。过了“弥勒殿”，便是“雨花殿”，殿内供奉着“四大金刚”。一般寺庙都称“四金刚殿”或“四大天王殿”，唯独天台国清寺称“雨花殿”。相传国清寺的创始者智者大师在寺内讲述《妙法莲华经》时，感动了天上神灵，天降花雨，故以“雨花”为名。四大金 刚手中的“四宝”，既是佛门法器，又是有趣的寓谜之物。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手执宝剑；东方持国天王，名毗提河，手握琵琶；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手持宝幢（伞）；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琉博叉，手持水蛇。剑有锋，寓意为“风”；琵琶能拨出音调，寓意为“调”；伞

能遮雨，寓意为“雨”；水蛇可顺着抚摸，寓意为“顺”。合起来为“风调雨顺”——一个古老有趣的寓物谜。

过“雨花殿”，即可望见宏伟庄严的大雄宝殿。大殿前，有丹墀、花坛、铜鼎、古樟、古柏。大殿正中莲花宝座上的释迦牟尼像用青铜铸成，外贴真金，重达十三吨。分坐大殿两旁佛座上的是元朝时用楠木雕成的十八罗汉，形象逼真，神态生动，各具个性和动态，有的抱膝而坐，有的闭目坐禅，有的怒目而视，有的满面春风，其年代之久，变化之多，雕匠技艺之高，实为江南佛寺所罕见。

大雄宝殿右侧，古柏绿荫下有一块高约二米、黑底红字的独笔“鵞”字刻碑，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但到了清朝，由于风霜雨雪侵蚀，此碑上的一笔到底的“鵞”字，只剩下半边。当时天台有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叫作曹抡选，他把这一刻碑抬入寺院厢房之中，闭门苦练王氏笔法，整整练了三年，终于以千钧腕力将“鵞”字残缺的半壁补上。从此，王羲之独具神韵的“鵞”字刻碑，又出现在国清寺的大雄宝殿之旁，而“鵞”字两边浑然一体，竟一点也看不出是两次写成。

从国清寺前盘山北上，还有一处奇景，叫“石梁飞瀑”。石梁是指山腰间一块横空架在溪上的巨石，长二丈有余，最狭处不过五六寸，最宽处约一尺五六寸，上狭下宽，背似龟，身似龙，故又有“龟背龙身”之称。石梁的前下方为一泓碧潭，色如翡翠。溪水从石梁下奔突而出，成为几十丈的瀑布，直泻碧潭。石梁上满布青苔，令人望而却步。明代徐霞客曾两次来此探胜，他在游记中写道：“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离石梁不远，有一寺，名“中方广寺”。寺中亦有一联，其对自然之美、哲理之玄、刻画之入微，亦令参加游览者叫绝。联语云：

风声，水声，虫声，鸟声，梵呗声，总合三百六十击钟

鼓声，无声不寂；

月色，山色，草色，树色，云霞色，更兼四万八千丈峰峦色，有色皆空。

天宁寺造殿风波

江苏常州的天宁寺有“东南第一丛林”盛名，现被国家定为全国重点寺院。其大雄宝殿供奉的三尊佛像，每尊高达九米，高大巍峨，海内外罕见，大雄宝殿的建筑艺术亦不同凡响，并曾有过一场造殿风波。

天宁寺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式建筑，由柱、梁、枋、桁、檩、椽、瓦等构件组成，面阔二十六点四米，进深二十八米，高二十五点八米。一眼望去，那雄奇的殿脊、高挑的飞檐、巨大的红漆木柱、架构有序的铆榫斗拱，呈现出非凡的气势。

殿顶龙吻脊的两端各有蟠龙一条。龙身高四米半，龙须伸出丈许，势如飞向长空。中间的砖雕团龙和“佛光普照”四字用金箔贴饰，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

大殿的梁枋与出檐，由三层雕花斗拱承托。它们纵横交错，层层叠叠，渐次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雕花斗拱既使梁、柱、枋的结合更加紧凑，又增加了建筑 物的稳固，还兼有装饰作用。大殿的支撑物是八根直径为八十厘米的铁力木柱，如同八只巨掌擎天。进殿内抬头仰视，天花板布置成五十七块棋盘式方格，画着“云彩天狗护日”的彩绘。天花板正中，由大梁支撑着灯芯木、凹进去一个巨大的穹窿名叫“藻井”。藻井内绘有八层共一百零四只昂首展翅的彩凤，使大

殿的天顶显得五彩缤纷，雍容华贵。

晚清光绪年间，天宁寺住持冶开禅师在废墟上重建大雄宝殿。在竖柱时，有人提出，殿宇太高，宜将殿柱锯短为七丈二尺。为此，地方绅士特来察看并询问工匠。工匠回答，此殿进深八丈五尺，高度应达八丈余，再加上丈余的屋脊，才能匀称。绅士们遂谈定：殿柱已竖，无法再锯短；而且大殿将要供奉“皇帝万岁”的龙牌，不宜过矮，只能命工匠“做脊不得过高，只加八尺为度”。

岂知本城的一些秀才、贡生、举人听到消息后，集体上书官府，以寺殿过高，大大超过文庙大成殿，有碍本城风水、科举及防御为由，要求大殿停工。

于是工程被搁置下来，经过双方多次唇枪舌剑，最后官府作出判决：一、根据清朝法律条文，并无不准佛殿高于文庙大成殿的规定；且天宁寺为恭祝圣寿的道场，与寻常寺庙不同。二、殿高有碍本城风水、科举之说亦不能成立。常州自古称“龙城”，天宁寺在城东南，为龙之首，龙首理应高昂。从前，天宁寺内“巽宫楼”高十余丈，号 “文笔峰”。该楼毁之前，常州人考中状元，当上宰相的大有人在；楼毁之后，仅出了一甲进士二三名。原大雄宝殿遭毁之后，常州科举更一蹶不振。所以寺殿造高，有益于常州人。三、殿高有碍城池防御之说也无根据。天宁寺与城墙遥隔一河。查本城史志文献，自唐代以来从未因殿高而肇祸。所以，大殿可按照殿脊高八尺的原议建造。

这场官司足足打了三年，终于以主张寺殿高于大成殿的冶开禅师一派取胜。

宁波古刹阿育王寺

散来舍利自西方，宝刹名留阿育王。四面好山围佛地，一声清罄出禅堂。

清·李震

近闻宁波古刹阿育王寺修饰一新，四方游客激增，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游阿育王寺的一些见闻。

出甬城向东行驶约十六公里，便到了阿育王寺的山门口。寺门口原有一株“晋松”，古诗云：“更有老松传晋代，夜深万丈放灵光。”故此松又名“放光松”。这株松树高仅丈余，但“虬枝偃地，傍荫数亩”，异常可爱。清朝道光年间，松树的主根被寺里的和尚掘断，所谓“人老先老脚，树死先枯根”，“晋松”遂枯死了。后来寺僧把它迁移到山门内，四周围以花岗岩围石栏，中间竖有一碑，刻“放光松”三字，刚劲挺拔，锋生青光，当出于书法名家之手。

阿育王寺内佛殿建筑宏伟，大殿均用黄色琉璃瓦铺　盖，两厢禅房，幢幡宝盖，金碧辉煌，仪态万方，殿堂周围满是苍翠的参天古松和古柏。寺前，有白云山、金沙地、玉几峰。清末著名“白梅诗僧”敬安（字寄禅，别号八指头陀，俗姓黄，湖南湘潭人）有《游阿育王寺》诗云：

为寻殊胜境，来到白云边。平地金沙涌，当空玉几悬。
青松夹古道，碧殿入寒烟。舍利今犹在，追思独惨然。

当然，阿育王寺驰名中外的最宝贵的遗物，应是“释迦文佛真身舍利”（一颗释迦牟尼的顶骨），它放在一个高一尺四寸、方广七寸的小巧玲珑的宝塔里面，游客可以从塔孔中窥视“舍利子”。这是一颗暗红色的小珠，从不同的角度去窥此珠，因光线强弱变化，小珠有时呈红色，有时呈黄色，有时还呈别的颜色，令人感觉神奇。因此，某些信徒，也就以此定吉凶、卜休咎，当作“神灵”之物了。

关于这颗“舍利子”的来历，还另有一段传闻。据说，公元前273年，古印度孔雀王朝中期的阿育王，从父祖手中继承了这个强盛的帝国，一心要使它变得既富裕强大，又和平安宁，就大兴佛事，大建佛塔，并于塔中贮释迦真身舍利。这种塔，人们就称之为“阿育王塔”。至于舍利塔，《魏书·释老志》亦有记载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 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置敬慕，建宫宇，谓为塔。”

宁波的阿育王寺，就因寺中有个贮有佛骨舍利的阿育王塔而得名。这里的阿育王塔，是晋朝太康年间高僧惠达，经过千辛万苦访求得来的。所以，阿育王寺也奉惠达为始祖。

过去，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阿育王寺都要进行百果会，各地佛教徒前往普陀山进香时，必要先到阿育王寺参加百果会，瞻礼舍利塔。

蒲州明珠普救寺

在山西省永济县蒲州古镇上，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名曰“普救寺”。脍炙人口的《西厢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具城西北十二公里的土岗上。南面紧邻蒲州城，东连西厢村。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

这座寺院创建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原名西永清院。唐诗人元微之所著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有明确记载。据说此寺是武则天的香火院，当年十分壮观。有金碧辉煌的“三檐经阁，七层宝塔，百尺钟楼”，有“长松矮柏，名葩奇卉，千竿翠竹，潺潺流水”。紧靠西厢房的墙外，还有座花园。那花园是唐朝崔相国建造的佛居别墅，为女儿莺莺所住。“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和莺莺月下相会的地方 就在这里。

传说五代时河东节度使作乱，后汉刘知远派郭威讨伐，围蒲州一年有余，当地百姓叫苦连天。郭威召寺中僧人讨问良策，僧曰：“将军若友善心，城即克矣！”郭威当即折箭为誓，翌日城破，满城百姓得救，从此西永清院便更名为普救寺。

普救寺内西路有座著名的古塔，名曰舍利塔。因为当初红娘月下牵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动人故事发生在塔下，这座舍利塔也就成了

张、崔二人爱情的见证。于是，后人称此塔为“莺莺塔”。

莺莺塔，为十三级密檐式砖塔，高约五十米。虽然几经重建，塔身叠涩出檐，收刹很小，犹存唐制。它古朴端庄，清秀挺拔。塔的底层南面设门，塔内正面有佛龛。从二层到九层塔壁间有转角通道，内设台阶，游人可以盘旋而上，登临眺望。塔顶原来装有塔刹，高约二米，传说是风磨铜制，形状似葫芦，秀丽玲珑，可惜后来被人盗走。塔底一二层塔壁间嵌有碑刻多块，不但保存了历代名家书法，也是考证普救寺兴废的珍贵史料。

当地有首民谣：“普救寺的莺莺塔，离天只有丈七八。站在塔顶举目看，能见玉帝金銮殿。”天气晴朗之日，人们登上莺莺塔远望四野，颇有孤高耸天之感。

蒲州镇普救寺内的莺莺塔，不但传说动人，而且建筑精巧，数百年来一直以其独特的声学效应蜚声于世。被誉 为中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

“游人石击地，蛙鸣贯长谷”，为普救寺的一大奇观。回音，给莺莺塔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由此产生了不少有趣的传说。相传当年建塔时，工匠在塔上安放了两只金蛤蟆，游人以石击地，便可以听到两声蛙鸣。后来，一只金蛤蟆被人盗走，因此，现在击地只能听到一声蛙鸣了。

莺莺塔的声学效应，据说奇在它具有现代扩音器、收音器、窃听器以及模仿蛙鸣特殊声学原理的功能。这种以建筑艺术来体现多种声学效应的古建筑物，在古今中外还是独一无二的。

奇怪的是，在不同的位置，听到的声音也不相同。在距塔十米、十五米或二十米的地方拍手时，便可听到蛙鸣声，声音分别从塔底、塔腰和塔顶传来。在塔南端用砖石猛击时，人们便可听到洪亮粗犷的蛙鸣声，那叫声犹如雷鸣一般。若是夜阑人静时，在塔的西面拍手，

便可以听到三声蛙鸣；若连续拍手，便可听到群蛙争相鸣叫的声音。若是在夜间，如距塔五里远的蒲州镇演戏时，人们站在塔的附近，可以清晰地听到敲锣打鼓声和演唱声从塔里传出，好像塔里也在演戏一般。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平常人们在距塔六百米以外的地方窃窃私语时，站在塔附近的人也能从塔里清楚地听到。另外，在塔的里面也有奇特的声学效应。如有人站在 塔的九层处讲话，站在下面的人听到的话语声不是从上面传来，而是从塔底传来；若有人在塔的五层上讲话，声音便可以从塔底、塔顶两处向塔的中间反馈回去，形成一种立体声极强的效果。

山西大学的丁士竟、张荫榕等学者、专家，经多年测试研究，已揭开这个特殊的声学效应之谜，主要原因一是地形地貌特殊，塔四周坦荡开阔，无障碍物。二是建筑工艺高超奇绝，每一层塔檐长度均不同，且皆为内凹形状；塔的下面又有个呈收缩状的口子，可把塔中发出的声音来回反射，形成了共振源。三是建筑材料奇特，塔的外表全部用釉料漆涂，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具有良好的反射和谐振作用。

燕南东光铁佛寺

世界最高的露天青铜佛像——释迦牟尼佛像，矗立在香港大屿山的水鱼峰上。看到这座神韵生动、气势非凡的“天坛大佛”，不由想起燕南东光的铁佛寺。

“沧州狮子景州塔，东光县的铁菩萨。”这是北方民间常说的“燕南三景”。

铁佛寺建在河北省东光县境内，东、西、北三面乃朱红院墙，山门朝南，门额上书有“铁佛寺”三个苍劲大字。入门后，先见砖木结构的天王殿。殿里弥勒佛坐正中，慈眉善目，笑口大开。佛后是护法韦陀。东西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东方持国天王手执琵琶，神情专注。南方增长天王手持利刃，足踏小鬼，煞是威严。他倘能“哇呀呀”一声大叫，那可真要活了。

如果把天王殿比作通幽曲径上的一处壮景，那么它背后的铁佛寺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才是真正的幽处。

“大雄宝殿”高十四米许，殿角长伸高纵，呈凌空欲飞状。殿顶是黄澄澄的琉璃瓦，殿下是洁白的大理石台阶。“天王殿”“大雄宝殿”匾额的题字，古朴雄浑。进入正殿，但见三尊佛像面南而坐。中间最大的铁佛释迦牟尼，即为“东光县的铁菩萨”。它神态安详，双目微闭，

面露笑容，左手扶膝，右手高抬，拇指与中指相捏，掌心向外。铁佛高达八米，重四十八吨。这是中国最大的铸铁坐佛。左右陪佛分别为燃灯佛和如来佛，二佛均为泥质彩塑，身躯稍逊铁佛，皆双手扶膝。铁佛前侍立两位菩萨，一称迦叶，一称阿难。三佛背后是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尊女菩萨塑像，造型优美，观之可亲，极富古代神话色彩。十八罗汉分立两旁，形态各异。殿东西两壁上的巨幅壁画，其内容是介绍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采用沥粉法绘制，别具魅力。整个大殿庄重肃穆。

据《东光县志》记载，东光铁佛寺由吴桥镇张铁匠者铸成于北宋初年。关于铁佛，还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如铁佛是由河北香河一带顺运河漂浮而来。那铁佛在香河一带遍洒佛恩，使那里物阜民丰。一日，铁佛见东南方灾气蒙蒙，决计南迁，去拯救那一方人脱离苦海，香河人长跪哭求不放，夜晚索性用铁链锁住铁佛一臂。天亮，佛座上仅留一臂，铁佛早顺运河南下了。铁佛在水中漂流，水浪拍击，有“咚、咚”之声，说是告诉人们，它要移居东光了。

陋巷故址有颜庙

颜庙又称复圣庙，位于曲阜古城陋巷街北端的陋巷，据说那里是颜回的故居遗址。曲阜设专庙奉祀颜回，始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刘邦东巡过鲁祭祀孔子之后。经历代重修扩建，至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面积已达八十五亩的建筑规模，设殿、堂、亭、坊等一百五十九间，分中、东、西三路，南北五进院落，四周红墙围裹，院内柏槐挺拔，辉煌壮丽，气势磅礴。

陋巷街上有一座四楹三间的高大石坊，与颜庙南北相对。坊额篆刻“陋巷”两个大字。《论语·雍也》篇中有如下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身居陋巷破庐，家贫如洗，却能勤奋好学，刻苦求读，因而成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据说，当年颜回上学，总是第一个先到校。有一次，孔子问他，为何吃饭那么快，来校那么早？颜回笑而答曰：“回至家中勿需等，一碗香粥一张饼。”孔 子不信，后经了解，发现颜回每次回家，仅有一碗放在锅里的野菜汤充饥。由于汤水冷却后表层有一张薄皮，颜回美其名曰“麦饼”，其艰苦可想而知。

颜庙门前，记得有三座石构牌坊。中间一座，坊额篆刻“复圣庙”，东边一座镌刻“卓冠贤科”，西边一座，镌刻“优人圣域”。由复圣庙石坊向北，就是颜庙的第一道南大门。门阔三间，进深二楹，绿色琉璃瓦盖顶，八棱石柱擎檐，朱漆门扇，梁坊彩绘，十分古雅壮观。

进入深广幽静的大院，看到有一伞形屋顶的六角古亭，亭下立着一块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的巨碑，上刻“陋巷井”。有趣的是伞形亭顶有个圆形天窗，正好对准井口。不管阳光来自何方，总能透过窗口反射到井底水面上，使得古亭生辉，满井透亮。有人说，这是因为古亭建筑奇巧所致；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颜回当年饮用此井之水，成了儒家圣贤，上天有意光照示人的。笔者以为，颜回当年在无以给养的困苦环境里，能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不管如何解释，都起因于对颜回的崇敬和怀念之故。

由青砖铺地的甬道北行，翠柏绿槐之中，自东而西，并排耸立着三座别具一格的庙门。东、西门飞檐之下，分别悬挂着“克己门”“复礼门”三字竖匾，中门正额，匾上书“归仁门”三个金字。它记载了孔子和颜回一次流传　　　千古的谈话，《论语·颜渊》篇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段话，可视为儒家创始人对“仁学”的经典定义。

我瞻拜颜庙时，巧遇颜回七十六代嫡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颜世镛先生。我们穿过甬道两侧气魄宏大的明代碑亭，浏览了五门庞大的祭器库之后，由仰圣门来到矗立在高台之上的四角方形凉亭。凉亭内有一幢形制古朴的石碑，上面篆刻“乐亭”两个斗大巨字。方亭由八棱石柱支撑，透雕石栏花板围绕，十字结脊，绿色琉璃瓦盖顶，重檐八角，建筑精美。颜先生介绍说，乐亭是宋代熙宁年间建造的，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为此作《乐亭记》，抒发了其对颜回的敬仰之情。

乐亭之北，是颜庙的主体建筑德圣殿。大殿高耸在宽阔平坦的台基之上，重檐八角，九脊四坡，五脊六兽，穿廊回廓。殿高十七米有余，宽约三十七米，纵深也有二十几米。大殿四周，有二十六根两人合抱的巨大石柱围绕。前檐下的四根石柱，正对殿门，每根上面深雕

着两条上下飞舞的神龙，龙之大小神态，精美程度，与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的蟠龙柱如出同一工匠之手。其余的石柱，则浅雕龙凤、牡丹、孔雀、山水等。进入殿门，迎面就是复圣颜回 的高大塑像和牌位。圣像位于富丽堂皇的龛楼之内。龛楼前放满了各种祭器的供桌和香炉。中堂之上高悬一块蓝底金字巨匾，上面有乾隆御笔“粹然体圣”四字，赞誉颜回思想纯洁，品德高尚，从躯体到灵魂，都达到圣人标准，是圣人之精粹。据说，有一回，颜回在路上捡到一个小包，里面有一锭金子，金子的正面刻有一行小字，内容是：“天赐颜回一锭金。”颜回看过之后，也在金子上写了一行字，字为：“外财不富命穷人。”写毕，拂袖而去。

复圣殿后，是供奉颜回夫人宋国戴氏的寝殿。殿室五间，宽约二十六米，纵深十四米，高有十米，木柱擎檐，楠木为梁坊架，斗拱彩绘，上覆绿瓦。从殿宇庄严雄伟的规模，可以看出戴氏在颜氏家族中的地位。颜回三十一岁早亡，戴氏年轻守寡，千辛万苦，把儿子颜歆抚养成人，也算是个不平凡的女性。

颜庙的东路建筑群，主要有退省堂、三代祠、神厨等建筑。退省堂右侧有“进见门”一座，门名取自《论语》中孔子赞扬颜回的一句话：“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西路建筑群主要有供奉颜回之父颜路的杞国公大殿和供奉颜回之母姜氏的寝殿等古建筑。上述古建筑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杞国公殿。它是典型的元代建筑风格。歇山式大屋顶之下的拱条，每根按约六十度的夹角倾斜，整齐划一，结构别致。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在殿前实地考察，对此殿赞誉甚高，称之为元代卓越的宫殿式木结构建筑。

“药都”安国药王庙

河北省安国县，古称祁州，自宋朝初年就是著名的中药材集散地，故又有“药都”之称。据说至今仍坚持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全国性的中药材交流会。

说到“药都”，自然离不开“药王庙”。药王庙坐落在县南关，坐东向西，占地面积三千二百平方米。庙前建有旗杆、石狮、牌楼、马殿、钟鼓楼、碑房、配殿（厢房）、墓亭、大殿、后殿。殿前的两根铁旗杆，高达二十七米，上有飞龙舞凤，风格独特。马殿内塑有红、白战马各一匹，栩栩如生。

大殿（正殿）内塑有一尊邳彤坐像，即俗称的“药王”。药王邳彤乃安国县人，字伟君，是东汉光武皇帝二十八位主将中一个很有名气的人。他能文善武，精通药理，经常给人看病，看一个好一个，被称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有一年他为一个大官治好了“对口”疮，人家给他挂了一块门匾“药王邳彤”，一时名扬四方。不过，有件事却使 他烦恼。姑妈额头上长了一个小鸡皮，他怎么也治不好，姑妈只好扫兴而归。不料半个月后，姑妈的病却被一个山乡野医治好了。邳彤这才感到自己的医术并不高明，称不上真正的药王，于是，回家摘掉了那块“药王邳彤”大匾。此后，邳彤经常扮成串乡医生，走村串户，采方治病，终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药王。他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追封他为灵贶公，始建药王庙，以示祭祀。

药王庙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重修，明弘治、万历和清乾隆、道光年间均曾重修，并有增建。清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药王庙时，才在左右配殿内塑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张子和、张介宾、徐文伯、孙林、皇甫士安、刘河间十大医像。药王庙从始建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药王庙的兴建，大大促进了安国药业的发展。自宋迄今，“药都”的影响越来越大。据《安国县志》载，清道光年间，云集安国的药商中，就有关东帮、京通卫帮、古北口帮、西北口帮、陕西帮、广帮、宁波帮、禹州帮、亳州帮、山西帮、彰武帮和怀帮十三个较大的帮会。常往安国的各地药商曾多达一千五百多户。中国医药界多年来有“天下药材不经安国没有药味”的传言。

岳飞故里精武庙

庙在汤阴县城内，外廓呈长方形，布局严谨，雄伟整齐。正门“精忠坊”上悬挂明正德七年（1512）书“宋岳忠武王庙”横匾。建筑形式为“三间六柱五楼柱不出头”，斗拱型制属九踩四昂翘式。精忠坊扇面壁间分别嵌有“忠”“孝”石刻大字，肃穆庄严。

进入正殿，门楣上端悬挂一排巨匾，自右而左为：“百战神威”“故乡俎豆”“乃武乃文”“忠灵未泯”“乾坤正气”。中门楹联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殿内岳飞彩塑坐像端居正中，高丈余，英武魁伟，上方悬“还我河山”贴金巨匾。正殿庭院内有古柏数株，挺拔苍翠。庭院四周，被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名流显贵拜谒岳庙时留下的一通通石碑包围。有的刻着岳飞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有的刻着：“汤阴祠下吊忠魂，古柏萧萧感慨存。云影尚疑降虏阵，鸟声如诉贼臣冤……”每一块碑，每一首诗，都是后人对名垂千古、含 冤九泉英魂的凭吊和追慰。令人最难忘的是明董其昌撰并书写的《汤阴县重修宋忠武鄂王精忠祠记》，概括岳飞功名有八：一曰忠，二曰虚，三曰整，四曰廉，五曰公，六曰定，七曰选能，八曰不贪功。可谓概括准确而全面。

另有“御碑亭”，但亭内无御碑，御碑在山门外东侧的一座不显眼的牌坊下。相传，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自嵩山拜谒归途到岳庙祭祀。是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可是当皇帝迈上石阶时，骤然风

起，两扇敞开的庙门立刻关上。弘历皇帝作七律一首，门复开。其诗的后四句是：

道济长城谁自坏？
临安一木幸犹支。
故乡俎豆夫何恨？
恨是金牌太促期。

此诗刻成碑后，置于御碑亭内，直到清王朝灭亡，人们觉得它把秦桧奸党的跪像与岳大帅隔开，难合心意，于1915年将御碑移至殿外。

杨家祠堂忠武祠

山西忻州地区的代县枣林镇鹿蹄涧村，有个杨家祠堂，这是宋朝杨家将后代聚居的地方。

始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的杨家祠堂，是为缅怀杨业父子的丰功伟绩而修建的，因杨老令公战死于陈家谷（今山西朔州南狼儿村）后追赠为大尉、谥“忠武”，故后称祠为“杨忠武祠”，也叫“杨令公祠”“杨将军祠”，俗称杨家祠堂。据闻，这是元时北方“勅建”的一座正宗杨氏武将祖祠，距今有七百余年的历史。

杨忠武祠坐北朝南，建筑布局严谨而集中，肃穆而幽静。没有过多的粉饰，显得庄重而质朴。祠前，两株合抱的古槐粗壮挺拔，郁郁葱葱。石阶两旁，静卧着石狮一对，竖立着旗杆一双。祠前三间前檐，悬挂的“奕世将略”“一堂忠义”“三晋良将”金字横匾，是对杨家将功勋的高度评价。

杨忠武祠分前后两院。前院有相传宋太宗钦赐大郎杨 延平的金銮架一副。后院内，正殿五楹，殿顶为悬山式，廊中悬“勅建”竖匾。殿内正中龛塑杨令公与佘太君神像，他们八个儿子彩塑像分列两旁；东西南三面是杨族历代名将塑像，共二十二尊。东西厢房三间，墙上绘有杨家将故事的壁画；房内分别陈列着“天波杨府模型”和“杨家将历史文物”。除“六郎剑”“穆桂英甲胄”外，还有一重八十一斤的“五郎铁

棍”。

大殿前竖有“鹿蹄石”一块：形态奇特，上有鹿与鹿蹄图案，并刻有山形、水目、人物、鸟兽，石色青翠。关于“鹿蹄石”的由来，当时为龙宪卫上将军的杨友收代州时，一日与单武节将军杨山出猎遇见一只梅花巨鹿，杨友张弓搭箭射中鹿蹄，鹿带箭而逃。杨友紧追不舍，过一条溪涧追至联庄，梅花鹿忽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地深三尺发现异石一方，奇怪的是石上竟然刻有梅花鹿，鹿蹄上带着箭，周围还有蹄印。传说故事究竟是否真有此事，先不去研究，但鹿蹄石确实为联庄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后人将这块异石置于祠院，鹿蹄涧村由此而得名。清人有诗赞曰：“仙鹿留蹄去未回，巍峨祠宇建山隈。令公自是能全节，炎宋何曾能爱才。遗甲至今留战血，荒碑何代长霉苔。楹联题额纷无数，名宦诗人几溯回。”

祠内还存有“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杨族世系碑”“表忠阁碑”“弘农宗祖碑”等。楹联“丰功传烈著边疆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专城”；“天锡龙 光勤鼎铭钟统阅四朝承雨露，祠开鹿涧丹楹刻桷远从九塞护山川”等，都抒发了对杨家将的崇敬感情。

元天历年间，杨家十七代孙又奉旨大建祠堂。杨忠武祠成为代县著名胜迹，历代多有游人至此，因而鹿涧的名声逐渐远扬。

湘潭刘烈士祠

刘烈士道一，字炳后，号锄非，湖南衡山人。光绪甲辰，随其兄揆一入华兴会，联系会党首领马福益于长沙举义。事败，避走东瀛，与秋瑾等志士友善，并入同盟会。光绪丙午（1906），受同盟会本部派遣，回湘策动武装起义，择萍乡、醴陵、浏阳为首义地，部署稍定而谋泄被逮。酷吏施以严刑，道一厉声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1906年12月31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仅二十二岁，为同盟会中最早捐躯者。消息传至东京，同盟会会员无不震惊。揆一作哭弟八章，其语痛绝；孙中山及黄兴皆悲愤填膺，赋诗致哀。孙中山先生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馀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孙中山先生绝少写诗，这首七律为仅见，足见对道一的厚谊。

辛亥革命，大功告成。民国元年（1912）三月，黄兴、宋教仁、张继等二十人，联名呈请褒扬道一，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布"优恤刘烈士

道一令”，批准附祀忠烈祠。翌年三月，湘潭县议事会首次会议，决议将原县守备衙门改建为刘烈士祠。

民国时期，刘揆一先生寓守烈士祠。祠在湘潭城正街，气势恢宏。大门呈八字形，门首“刘烈士祠”朱漆金字直匾熠熠耀目。房屋共四进，各有正房七间，加上厢房，计有四十余间。每进中厅均高悬横匾，记得第二进为“衡岳正气”，第三进为“成仁取义”。烈士纪念堂在最后一进，布置肃穆而庄严。正中悬烈士遗像，两侧有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之挽诗，黄兴诗为黄兴所亲书，孙中山诗为民国六年（1917）章士钊先生所书，均为七律。堂中还陈列有刘揆一、章炳麟、谭延闿、梁启超、于右任、陈嘉言、黄自珍等人及亲友的悼念诗文。这些珍贵资料，民初汇编为《衡山正气集》出版。祠的前庭后院都很宽大而宁静，遍植松柏。每至清明，祭奠者络绎不绝。

刘烈士祠已修缮一新，近日开放，《衡山正气集》又将再版面世。这些消息甚令人欣慰。“谁与斯人慷慨同？”烈士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必将启迪后人。

武侯祠的对联和塑像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南郊，我游览时，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对联和文臣、武将廊的塑像。

对联中最好的，至今还记得几副，清人赵藩撰书的一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很明显，上联当指的是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臣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是用"审势"来称赞诸葛亮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当权者要从中吸取教益。这副对联提出"攻心"和"审势"两件大事来颂扬诸葛亮，确与一般浮泛的议论和颂扬比较起来，富有启迪性而为人们所称道。

刘备殿的对联有："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流传到宋代，岳武穆亲笔书写两表全文时，曾有感于衷，热泪横溢，挥笔一气呵 成。当时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宋廷，在那功败垂成，壮志未酬之际，书写此双表，确正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令人有相同遭遇的感慨。

武侯祠共有塑像四十七座，除六座为无名侍者外，其他四十一座都是有名有姓的蜀汉历史人物。在诸葛亮殿，有诸葛亮和他的儿子诸

葛瞻、孙子诸葛尚的塑像；刘备殿有刘备和他的孙子刘谌塑像；右偏殿有关羽和他的儿子关兴、关平、部将周仓、粮官赵累的塑像。东廊文臣廊，以为刘备占领益州出谋划策、立下大功的军师庞统为首，还有蒋琬、费祎、吕凯、马良、邓芝和陈震等；西廊武将廊，以勇敢善战、屡建奇功、被刘备称为“一身都是胆”的赵云为首，还有马超、姜维、王平、黄忠以及向宠、马忠和张嶷等。每一尊塑像前面，都立有小石碑，镌其事略。这些塑像都是清初重建庙宇时，由民间艺人塑造的，其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反映了民间艺人的高超艺术造诣。

武侯祠始建何代，难以查考。杜甫所写《蜀相》诗中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古柏行》诗中说“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当知在唐代以前即有武侯祠建成，那时，周围的古柏已经郁郁森森了。

太原名胜数晋祠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吕梁山悬瓮峰麓，晋水源头。原名唐叔虞祠。据《史记·晋世家》载：唐叔虞姓姬，字子于，名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叔虞作为晋国首位晋侯，被誉为晋王，故祠又称晋王祠。

20世纪40年代，我尝游于此，其风光着实不凡。园林背倚群山，面临晋水，流泉穿绕，亭桥点缀，楼塔耸峙，莲池绮丽。步入大门，唐槐葱郁的宽敞院落中间，有一集楼、台、殿、阁为一体的雄伟建筑，名水镜台。它坐东朝西，台后上部的重檐歇山顶，乍看上去像楼，可是下部宽阔，细看又像殿。台前上部的檐卷棚顶，看上去似阁，下部却是台，且四面有明朗宽舒的走廊。“水镜”，取《前汉书·韩安国传》中“清水如镜不可以形逃”之句，意为奸忠是非尽人皆知。台中高悬匾额，为乾隆年间书法家晋人王二酉所书。此台可唱戏，地下埋藏着八口大缸，唱起戏来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听清，可见古人之聪慧。

水镜台向西行，有水清澈见底，顺水寻源，便来到被称为晋祠三绝之一的难老泉。它是晋水的主泉，泉水从地平线下的石岩中涌出，清泉四溢，水温常年保持在十七摄氏度，雨天不增，天旱不减，晶莹清澈，令游人流连忘返。大诗人李白给晋水留下了“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的名句。白居易、范仲淹、于谦等名人也都写诗

赞颂晋水，并流传后世。查古人命名“难老泉”，乃取《诗经》中“永锡难老”之句。泉上有一“八角亭”，名“难老泉亭”。亭中傅山所写的“难老”主匾，与“对越”“水镜台”，被誉为“晋祠三名匾”。

难老泉北侧是晋祠现存最古木构建筑，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的圣母殿，它是宋建殿宇中的代表作。此座殿宇，殿檐曲线弧度很大，飞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互相映衬，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

被誉为“晋祠三绝”的还有齐年柏，即周柏，共两株，一株为东岳祠的长龄柏，另一株在苗裔堂前，树身向南倾斜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传为西周时所植，又传原为左右两株，同年所植，故名“齐年”。

合肥胜景包公祠

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在北京电视台每天黄金时间播出，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使笔者联想起瞻仰合肥胜景包公祠的一些情景。

包拯，字希仁，安徽合肥人。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史。他为官廉洁、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人称“包青天”。

据说，包公因有功于朝，在告老还乡之际，北宋皇帝仁宗，为嘉奖他为人刚正不阿和秉公严明的功绩，便将丰饶的巢湖赏赐给他。包公谢恩不受，因巢湖太大，只要了他生于斯、长于斯、嬉戏于斯的一条小河，后人称此河为包河。

包公祠的外一道围墙，高丈余，庄严肃穆，两扇大门写着八个大字“道德名家”“忠贤将相”。进门是一天井，两旁是厢房，左厢房陈列着包氏家系及其墓志铭。据史料记载，包拯于宋嘉佑七年（1062），逝于开封，次年葬于 庐州合肥县东。当地曾在十二座墓群中出土六块墓志铭，总计七千字，较详细地记载了包氏家族的事迹。右厢房陈列着包拯的手书，字如其人，笔势挺拔，苍劲有力，胸怀存浩气，笔底生雄风，诚然不诬。

在正堂的木栅内，拥有三副金黄色的龙头、虎头、狗头的铡刀。这是皇帝钦赐给包拯的。龙头铡铡龙子龙孙，皇亲国戚；虎头铡铡特

权谋私，贪官污吏；狗头铡铡违法乱纪的平民百姓。在包公的铡刀下是人人平等的，无王子庶民之别和至亲厚友之情。

在龙、虎、狗头铡前面两旁有一副对联：持一身正气，国贼权奸齐丧胆；感两袖清风，黎民寒士尽倾心。

正堂正中悬挂着“寒芒正色”的大匾，下面塑一座高大的包公巨像。他峨冠博带，双眉紧蹙，正襟危坐，仿佛正为国泰民安而沉思。

正堂右侧有一石碑，上刻“包拯书郡斋壁”其辞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可见包公是追求清心寡欲的，他担忧的是国穷民困。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和品德啊！

正堂左侧有一石碑，上刻“包拯家训”，辞曰：

后世子孙仕宦有贪赃枉法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墓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刻石，鉴于堂屋东避，以诏后世。

包公不但严己而且戒后，不为子孙谋。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无私的正气啊！

祠堂东边，有一水井，名曰“廉泉”。相传贪官污吏若饮此泉水，

立即头痛，这或许是对以权谋私者的一种警告。祠旁包河里，每逢盛夏，遍长红花藕。这种藕，节长无丝，鲜嫩甜脆，营养丰富。当地居民说，因为包拯大公无私，所以包河产的藕也无丝（私）。据农林行家考证，丝还是有的，不过比起一般的藕，丝少得多。这也是人们对包公的一种怀念之情。

在参观时，导游指着一副对联，娓娓动听地给游人讲了一则有趣的故事，上联“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下联“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这副对联仅三十六个字，概括了包公的一生。相传，包公曾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县）知州。当地出产一种名贵砚台，即闻名于世界的端砚。它和湖笔、徽墨、宣纸齐名，并称文房四宝。包公离任时，却 连一块端砚也不肯带走，老百姓过意不去，偷偷地用布包了一块，放进船舱，作为纪念。可是船刚起锚，便狂风大作，包公顿感不妙。难道有什么对不起百姓的地方？接着在船舱内发现了这块端砚，他立即明白了，当即将端砚投入江中，马上风平浪静。不久，在包公投砚处浮出一块沙洲，后人称为墨砚沙。虽系传说，但后人有诗为证：“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

悲凉壮观荆轲塔

公元前227年，在今河北省易县西南十五公里的中易水南岸，燕太子丹设酒为荆轲饯行，荆轲慷慨悲歌。传说当时荆轲歌罢，仰天呵气，直贯夕阳，化成一道白虹。今日易县的白虹村，即缘此得名。荆轲刺秦失败惨遭秦王杀害，后人为纪念这位古义士又建了一座荆轲塔。

荆轲塔位于易县城西南五华里的荆轲山村西山顶上，又称“圣塔院寺”。背靠“洪崖积雪”，右扶紫寨金城，左临“金台夕照”，南俯“易水寒流”，风景秀丽幽美。塔高二十六米半，须弥座八角十三层，白色砖木结构。每层八隅，挂有风铎，每当山风吹来，溪云初起，风铎随风摇曳，叮当作响，声传数里之外，为荆轲塔增添了神秘而悲凉的气氛。

荆轲塔建在由沙石堆集而成的荆轲衣冠冢上。相传燕子丹诀别荆轲，知其有去无还，便将荆轲的衣冠收集起来，在荆轲馆故址造了一个假冢埋葬。冢高三十四米，占 地面积二千四百平方米。大辽乾统三年（1103），开始在荆轲衣冠冢上建起圣塔和寺院，之后历代王朝都有过重建修葺，塔旁树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熊文熙亲题“古义士荆轲里”石碑一道。在大字两侧刻有核桃大的小字，是熊文熙对荆轲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荆轲塔的另一侧，还存有一块清代的残碑，碑额上刻有“重修圣塔寺记”的字样。碑文经多年风雨侵蚀已不易

辨认，大意为：古时荆轲塔旁有座寺院，叫作圣塔院寺”，寺院里建有亭台楼阁等，每当风和日丽，便有一些文人骚客在此聚会，饮酒赋诗，大有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之势。

颇值一提的是，在熊御史所题石碑旁有一块充满神奇色彩的蛤蟆石，用石块敲击，荆轲塔中便会传出“呱呱呱”的蛙鸣声。传说当年“饮饯易水上”之时，“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以至易水河中之蛙都为之动情，呱呱齐鸣，以示崇敬。荆轲刺秦失败后，身死异乡，后人建塔时，有一只金蛙从天而降，坠入塔基之中。但凡有人用硬物敲击碑体，塔内的金蛙便呱呱鸣叫，为荆轲招魂，以此引得游客纷纷用石击碑。后来金蛙给人托梦云：“此碑久击必损，可在碑旁立一石蛙供人敲打。”后来有人击打石蛙试敲，效果果然与敲击石碑相仿。

明清以后，又在燕太子丹城造起燕子塔，在樊馆故地造樊于期镇陵塔，在荆轲塔西南隅山头上建有左伯桃、羊角哀异性兄弟舍命全交的黑白二塔。此五座塔犹如五尊巨 像屹立于易水河畔，俯视州城，被颂为“五塔镇燕山”。

千百年来，荆轲塔饱经风霜，风姿不减，造型典雅，巍然壮观。游人到此，西望狼山高耸，北看易水低回，铃声凄切，天地如盘，既有“休论愚勇笑前人，士为知己情自真”的感叹，又有“函关东渡足无忧，何用荆卿去雪仇”的千古遗恨，缅古怀今，别有一番心绪。

六和塔威镇钱塘江

有一年夏天，不记得是第几号台风，从太平洋一直刮进了杭州湾，“天堂”杭州遭到一次浩劫。据说市内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被吹倒拔起的不少，“柳浪闻莺”和苏堤上的柳树，也折干摧枝，真是大煞风景。

而最使人担心的是六和塔。因为它“孤塔凌霄汉，天风面面来”，兀然矗立在钱塘江畔，台风来时，正首当其冲。不过，据说六和塔顶住了狂风安然无恙，阿弥陀佛！

六和塔何以令人关心？首先，它是杭州门户的一个标志，也可以说是杭州的象征。从宁波或绍兴乘车到杭州去，一到钱塘江，上了那座有名的大桥，就可以看见雄伟的六和塔，像一个老朋友站在江边相迎，人们这时都会知道：杭州到了。其次，它是太老了。从史料记载可知。它始建于北宋年间，是由吴越王钱弘俶为镇钱塘江潮而建。历代虽经修缮，但这样一座古塔，能经得起十二级狂风却安然无恙，实在是了不起。

六和塔耸立在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背靠群山，前临钱塘江，如一位威武的勇士，守卫在杭州的门口，而且给杭州西湖风光增添了许多风采。

塔名何以称为“六和”或“六合”，有两个传说。一说，古时，钱塘

江里的龙王，性格狂暴，喜怒无常，江水常泛滥成灾，生民苦之。一个名叫六和的后生，邀集乡亲邻里，运石填江，制伏了龙王，使百姓安居乐业。因而在六和率众填江处，建塔以纪其功，塔遂命名为“六和”。另一个传说，春秋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力以抗强秦。六国即在钱江之滨的月轮山上会盟。后人建塔以纪念其事，遂名“六合”。当然，这都不过是传说，姑妄听之而已。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会记得梁山泊的好汉花和尚鲁智深最终的结局，是圆寂在六和塔下。那位在景阳冈打死猛虎的英雄武松，后来也老死在这里。当然，目前的六和塔几经修葺改建，已非宋代的原貌。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都曾重修，而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则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缮的。砖木结构，多层密檐，共十三层，而塔内实为七级，当年笔者去游六和塔时，塔内有盘旋阶梯，可登塔顶。那时，钱塘江大桥建成不久，从塔上向下看，如一道长虹横卧江上，钱塘江波涛滚滚向东流去，蔚为壮观。

锦州多辽塔

辽宁锦州为关内外咽喉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虽然战争频繁，但是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仍然很多。比如义县万佛堂石窟，为北魏时期造像，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至今保存完好；又如辽代的奉国寺，明长城边墙和清柳条边（封禁界线）以及古代的边、台、堡、驿遗址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锦州古塔，“塔势如泉涌，孤高耸天宫”。“古塔昏鸦”则为锦州八景之一。

锦州古塔多为辽代所建，辽塔的特点是砖筑实心密檐式，八角十三层，塔座为仰莲式，塔身四周砌有浅龛，龛内雕有坐佛。

最具盛名的辽塔是广济寺辽塔。位于锦州市中心。每当夕阳西照，晚霞环抱群峦时，锦州城上空便有群鸦翔集，背驮金辉，绕塔回鸣。寂寂幽巷，喧喧乌鸦，一动一静辉映成趣，“古塔昏鸦”便是由此而来。明代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曾有诗捐给广济寺塔：

何年青玉华，
尚作天一柱。
寒鸦时复来，
半揽天花雨。

该塔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相传是当时锦州节度使专为收藏、供奉辽国太后赏赐的舍利修建的。舍利是梵语音译，指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及火葬时未烧化的残存物等。佛教中认为舍利是无上法宝，能降伏一切妖魔，如果得到它都要建塔供奉。这座塔身第一级保存尚好，雕刻也最精美。坐佛衣纹流畅，表情端庄，头饰华美；立佛戴花冠，披袈裟，佩缨络，比例匀称，动势各异。塔腰以上的坐佛、塔檐等均已风化脱落。原来每层塔檐间还嵌有铜镜，塔尖冠有鎏金铜顶，并有刹杆、相轮、宝瓶等物，现都已丢失。整个古塔，苍凉萧萧，古风极浓。

锦州辽塔中还有两个双塔，崇兴寺双塔和绥中双塔岭双塔。被称为“禅塔双标”的崇兴寺双塔位于北镇县城东北，两塔形状酷似，东西相望，间距四十余米。东塔稍高，是中国三千多座古塔中的一对姐妹塔，虽已建成九百余年，但保存完整，塔顶的莲座、宝瓶及鎏金刹杆、宝珠、相轮、八角檐上的风铃、壁面上嵌镶的铜镜以及基座所雕的各种造像、花纹等均已损坏。

绥中双塔岭双塔建于辽乾统年间，砖雕题铭有“辽天　　　　祚皇帝”与“宣赐舍利塔”等字样，塔的特点是塔座很低，第一级塔檐下作砖雕斗拱，以上八层为迭密涩式檐，其高度不及崇兴寺双塔。一般专家认为，这两座塔可作为辽代晚期砖塔建筑的标本。

西湖旧事话雷峰

友人从杭州旅游归来，畅谈见闻，并一再问我“雷峰夕照”一景是何时消失的，引起我对西湖旧事的怀想。

对于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我也是闻名久矣，只是余生也晚，到我能游山玩水的年龄，雷峰塔早已倒塌，自然无缘去欣赏了。不过雷峰塔的大名，并不仅仅因西湖十景而获知。凡是看过《白蛇传》的都会知道，白娘子就是被法海和尚压在雷峰塔下，后来，她的令郎许仕林中了状元祭塔时，祭的就是雷峰塔。人们对白娘子寄予深深的同情，所以，凡是到西湖游览的人，总不免殷殷探询，雷峰塔的遗址究竟在哪里？

雷峰塔就在西湖南岸、南屏山余脉的夕照峰。据《临安志》载，从前曾有雷姓的人筑庵居于峰下，故名雷峰。雷峰塔则是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为庆贺其宠妃得子而建，因名黄妃塔，而其真名实应为“西关砖塔”。它是一座砖身木檐的楼阁式塔，与钱塘江畔的六和塔形式相同。后来 外檐坏了，塔寺的和尚在塔外加了一层木衣。元朝末年的一场火，把木衣烧掉了，仅存塔心。

火劫后的雷峰塔，塔心呈赭红色，显得颓然苍老，有人把它比作陶陶然的醉翁！“雷峰颓塔紫烟中，潦倒斜曛似醉翁。”也有人把它比作正襟危坐入定的老僧：“湖上两浮屠，保俶如美人，雷峰如老

衲。”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满湖金波，天空霞光粲然，景色十分怡人，“雷峰夕照”遂成西湖十景之一。关于这一景，记得元代尹廷高有诗云：

烟光山色淡溟濛，
千尺浮图兀倚空。
湖上画船归欲尽，
孤峰犹带夕阳红。

这首诗可谓深得此景之意趣。

据有关材料的记载，在雷峰塔周围，有真珠园、甘园、胜景园等。当然，经过时间的风雨，这些园囿早已荒废了。而在翠芳园旧址上建起来的白云庵，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是革命党人秘密聚会之所。庵中的住持和尚得山，也曾为辛亥革命出过不少力。

愚昧是可悲的。西湖附近的乡民早就流传：谁能抬回雷峰塔的塔砖，谁家养蚕收茧就定获丰收。他们竞相到塔　下拆取塔砖，日积月累，它不塌将何如！1924年9月25日下午，轰然一声，塔倒下。“雷峰夕照”遂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名词了。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

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 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 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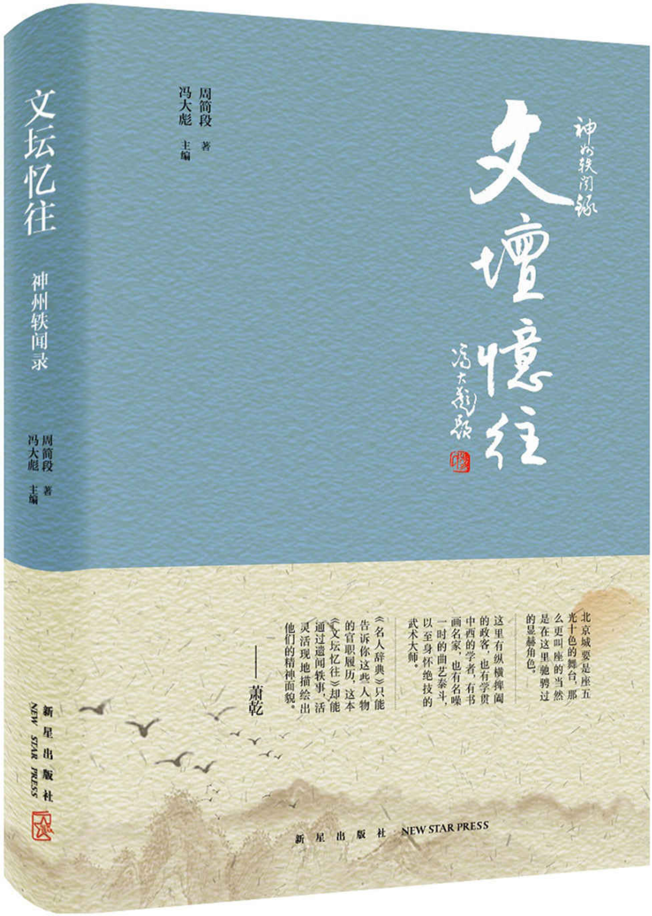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

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 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文壇憶往
神州轶闻录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
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
《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文坛忆往》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萧乾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文坛忆往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神州轶闻录

文坛忆往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忆往／周简段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6

（神州轶闻录）

ISBN 978-7-5133-2644-5

Ⅰ．①文…　Ⅱ．①周…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7941号

文坛忆往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2.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44-5

定　　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文人花絮
“怪教授”陈寅恪
张元济临难不惊
“名落孙山”梁任公
于右任名字趣谈
曲园四代人
蔡公五哭
胡适为齐白石编年谱
“张大胡子”脱险记
柳亚子的口吃
刘半农负气出洋获博士学位
鲁迅收藏刻印佛经
顾颉刚与俞平伯
林海音与《城南旧事》
陶行知的五柳村
郑振铎抢救古籍感人
泰戈尔在徐志摩家做客
沈雁冰孝亲之婚
马寅初过文武两“昭关”
诗人徐志摩之死
作家说相声
曹禺在津演戏剧
张恨水与天桥

范长江和沈谱的婚礼

李健吾险入殡仪馆

作家轶话

晚清小说家吴趼人

“东亚病夫”曾朴

爱情诗人汪静之

梁实秋怀念清华园

自学成才的沈从文

铁骨铮铮朱自清

“苏门啸隐”郁达夫

由《京华烟云》想到林语堂

柳亚子其人其事

少年聪慧郭沫若

拒绝称“王”的老舍

张天翼写作《包氏父子》

曹禺南京写《原野》

石评梅长眠陶然亭

夫妻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

萧军、萧红初相识

庐隐女士多灾多难

林徽因多才多艺

30年代女作家白薇

大胆的女作家苏青

刘云若和他的言情小说

孤独的张爱玲

一举成名话“女兵”

40年代的李霁野

李劼人的“菱巢”

学者实录

“人参状元”翁同龢

“冷籍”状元张謇
王国维死因离奇
于右任之悲歌
傅增湘藏书万卷
张元济印《四库全书》
爱国学者叶恭绰
清末三才女
王云五奇人奇事
章士钊与沈尹默
钱钟书记忆力惊人
李石曾与故宫博物院
《四库全书》与张宗祥
爱国文人沈兼士
“厚黑教主”李宗吾
“学人疯子”刘师培
马一浮轶闻
一代奇才李叔同
文人才子张伯驹
“二太子”袁寒云
“美学老人”朱光潜
严景耀其人其书
史学家罗尔纲
鲁迅的学生黄源
陈训慈的“书情”
民俗学家张次溪
司法女杰史良
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苏武牧羊》作者蒋荫堂
刘天华即兴作《良宵》
教授述林

“清华”名师漫忆
学人长寿遥祝俞平伯老
耆宿元老钱玄同
辜鸿铭佯狂嘲世情
爱国哲人熊十力
“一代词宗”夏承焘
爱国教授曾昭抡
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
“积微居”主人杨树达
传记文学家朱东润
郑天挺巧解东陵谜
北大卯字号人物刘叔雅
漫忆浦江清教授
吴宓教授剪影
性学博士张競生
缅怀顾颉刚先生
忆苦水师
忆燕大英籍教授贝卢思
邓之诚治学桑园
金庸恩师张印通
爱国学者赵景琛
周恩来师张皞如
溥仪老师朱益藩
杏坛记盛
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
教育学家陶行知
从“开国状元”到北大代校长
教育家陈垣著述等身
南开“校父”严范孙
张伯苓的南开精神

卢木斋矢志办学
兴办女学的温世霖
燕大校长吴雷川
浙大校长竺可桢
神学博士赵紫宸
末科状元办学校
毁家兴学的马相伯
“红头火柴”陈望道
雪艇先生与武汉大学
“浙一师”校长经亨颐
陈鹤琴尽瘁儿童教育
萧友梅二三事
杨荫榆的晚年
杨绳武与保定同仁中学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

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文人花絮

“怪教授”陈寅恪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的教授”“太老师”，这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常用的尊誉。据当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一文说：“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为此，清华园内有些学生便总是称他为“怪教授”。

堂堂正正的大教授，“怪”在哪里？人们都知道，这位先生曾留学欧美十多年，对西学十分精熟，然而他的衣着却着实“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儿：夏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羊皮为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完全是“三家村”里老学究的模样。

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总要将备用的书籍讲义用一块蓝方布包好，挟在右腋之下，一步一颠儿地低头走路。因为近视，所以走路只看脚下而从不旁视，也从不与旁人打招呼。

另外，陈寅恪在课堂上也有些“怪”。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包教材挟进教室，绝对不要助教帮忙。讲课时，他老是闭目而思，端坐而讲，滔滔不绝，全堂肃静。每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同样不需要助教代劳。他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每门课听上好几次，仍有新鲜之感。他教学认真负责，绝少缺席，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假。

陈寅恪的记忆力是极为惊人的。那时候在国学方面，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很不错了，而他却可以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不可谓不怪。

还有，陈寅恪十二岁就随兄衡恪（师曾）东渡日本留学。之后，又先后赴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留学。但他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取得文凭或学衔，而在于真正获得学问。所以，他犹如天马行空，时来时往，听到哪里有好大学，便赶去听课和研究，并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在国外断断续续二十年，不曾听到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个名牌大学的文凭也没拿过。然而，就是这个学识渊博，没有什么学衔的人，却由梁启超极力推荐，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稍后，他又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唯一的合聘教授，还兼有“部聘教授”的荣衔。

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低年级学生听他的课，自然难以消受！”他这种教学方式自然也让人们认为他“怪”。

陈寅恪治学涉及面很广，文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而闻名海内外。其外语，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自不必说，就是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有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简直是教授中稀有的“一大怪”了。

有一次，他到西单牌楼一家西药店买胃药。当时西药店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每种药的说明书上都是洋文。他将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与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根据他的外貌，看到他自言自语的样子，把他当成了精神病患者。当随行人员在一旁解释说“他懂各种洋文”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不久，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在京逝世。家中几位长辈都主张依习俗请僧众唪经，但他却坚决反对，并

对众人说，各种佛经他都读遍了，所有佛经都是骗人的。为此，他最后竟未参加为父亲诵经的丧仪，一个人随着清华的师生南下去了长沙。

陈寅恪1926年7月进入清华后，清华园里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的，都向他请教，因而被大家奉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其他经常前往听课的，还有朱自清、冯友兰等名教授。

当年，清华大学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说过，陈寅恪“不是书虫，是正义感非常之强的学者，并且是了不起的学者”。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陈寅恪自香港逃难至广州时曾赋诗曰：

万国戈兵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
袖中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投降。陈寅恪立即作《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张元济临难不惊

浙江海盐张元济先生，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后来致力于创办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士，他一生曾两次身历险境，几乎丧生；可是他临难不惊，镇定自若，终于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险是在1899年，张元济参加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的变法运动，与康有为一起被光绪帝召见，陈述变革主张。同年9月下旬，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时遍捕维新人士，纷纷传说张元济也在缉捕之列。在此危急情况下，张元济仍然每天到衙门上班，并且比平时早到晚退。他自己说是：

> 俾知余在署中，可以就近缚送，不必到家查抄，免得惊动老母。

张元济这种镇定态度，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误以为他不是“新党”。最后，张元济死里逃生，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张元济八十六岁时曾作《追忆戊戌政变杂咏》十八首，其中两首就是叙述上面谈到的这件事情。录之如下：

东市朝衣胡太酷，覆巢余卵亦难完；
只应沟壑供填委，士芥臣原一例看。
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
分作累囚候明逭，敢虚晨夕误衙班。

诗中的填沟壑、作累囚，说明他抱着必死之心以后，反而心地坦然了。“东市朝衣胡太酷”“满朝钩党任株连”，则是谴责了慈禧杀人、捕人的残酷。

第二次历险是在1927年9月下旬。张元济先生突然被绑票，在匪窟中困居六昼夜。他想读书，但无书可读，更无纸笔。他就默默地“口占十绝”，这十首诗展示了他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处之泰然的胸怀。其中几首幽默风趣，诗意隽永：

寂寂深宵伴侣多，篝灯围语意偏和；
微闻怨说衾裯薄，只为恩情待墨哥。

（张无济自注：第一夕天气寒甚，守者终宵瑟缩，自言为银钱，故不得尔。按：墨哥，则墨西哥的简称，该国产银，故以“墨哥”指银元）

眼加叆叇耳充绵，视听全收别有天；
悔被聪明多误我，面墙从此好参禅。

（自注：守者强余戴黑眼镜，并以绵塞余两耳，解释良久，始允撤去）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张元济先生临难不惊，可谓勇者矣。

“名落孙山”梁任公

提起新会梁任公启超，可称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大名人、大学者、大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参加过会试，但并未金榜题名，话须从头说起——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战事失利，清廷遂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是年，康有为、梁启超由广东赴北京会试。康、梁联络全国各省赴试公车举人一千三百余位，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愿，要求变法图存，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当时礼部尚书任命云南昆明人陈筱圃（本名荣昌、光绪九年进士）为本科会试房考官，分管第十八房（广东省籍）考生。康、梁两人均参加了会试。会试总裁主考官为粤人李文田，阅卷大臣为徐桐。

这次因中日战争而延期的考试，又因“公车上书”事件而蒙上一层政治阴影。

试前，主考官与阅卷大臣即召集各分房考官密议：“凡试卷迥不同众，言论犀利明灿者，即认为是康、梁之答卷，由各分房考官自行抽卷，不必上荐，即使上荐亦遏而不取；某房所荐者，即发还某房。”

陈筱圃在十八房中阅得一卷，观其文辞，详赡古雅，疑即康、梁之卷，限于密议之忌，未及上示。因距发榜日期尚多，筱圃再取此卷反复审阅，确认此卷作者实国家栋梁之材，不忍弃此明珠于不顾。今

国家急需人才，若不推荐此卷，则有失为国家选材之职守。于是，陈氏不顾禁忌，毅然将此卷补荐，上呈主考总裁李文田。文田细察其文，亦疑为康、梁之作，即批还十八房，筱圃又二次再保，仍被批还。他仔细阅读批辞，知总裁李文田亦有爱才之心，致有“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筱圃越不忍弃，时距发榜还有旬日，仍可补荐，陈氏仍不顾密议之忌，硬荐强保，并拟就长批大胆举荐，致函李文田总裁，慷慨陈词。经陈筱圃再三保荐，文田亦无可推诿，终于同意筱圃所请允其中额。及至填榜拆密封，康有为试卷虽列首位，但仅中进士第五。而筱圃三荐之卷，仍被削落，至此才知此卷乃梁启超之卷。

陈筱圃为之义愤填膺，后始知梁卷之落榜，乃阅卷大臣徐桐的主张。徐乃坚持原议，不允取中之故。陈氏三次硬保，终无济于事。

此次会议之后，在京会试各房考官皆非常钦佩陈筱圃的胆识，认为这样的长批硬荐，在有清一代的科举考试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于右任名字趣谈

于右任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一生，化名、笔名、自号、外号不下十多个，探讨起来，颇为有趣。

于右任先生名伯循，化名刘学裕、原春雨，另有笔名大风、骚心、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杜鹃、关中于氏等，自号牧羊儿、神州旧主、太平老人、髯翁、草圣、元老记者。

关于“右任”的来历，据说是“任”由“衽”而来。“衽”者，衣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一带人的右衽。于先生以“右任”为字，表现了他的民族观念。

右任先生因以诗讥讽时政，遭清廷悬令缉捕。他于1904年逃亡上海，后入震旦学院就读时易名“刘学裕”，以避清廷耳目。

“原春雨”，这个名字也有一段故事。1926年4月，奉军进入北京，于右任被奉军通缉，遁居在皇城根一座寺院里。适友人找他，让他去苏联考察并做冯玉祥的工作，以收拾旧部，东山再起。为出使方便，商定找一位俄文翻译随同。后来找到一个叫马文彦的人。这位友人写信一封，叫马去天津英租界国民饭店找原春雨先生，并说：“原先生昨夜已赴津，你二人的路费他带着。”马心想，不是叫我陪于右任先生去苏联吗？怎么又找原先生？及至见到了才知道，原先生原来就是于右任。

“大风”，是他主事《民呼日报》时的笔名。

“骚心”，寓意为景慕屈原。1946年先生曾与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先生在《民生报》发表文章时常用此名。

“牧羊儿”，是他1939年著《牧羊儿自述》——写二十五岁以前自传时用的名。

“太平老人”，是1943年3月15日，先生在重庆报纸上发表《太平海》一文，主张取消“日本海”，正名“太平海”。这一宏论引起各方热烈研讨，因此获有“太平老人”之称。并请杨千里镌刻“太平老人”印章一枚。右任先生时年六十五岁。

曲园四代人

苏州城内有一条小巷名叫马医科，巷中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叫做“曲园”，这是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故居。

曲园，因其庭园状如曲尺、弯弓，形似篆体“曲”字，俞樾取《老子》“人皆求福，己独曲全”之句意，题名为“曲园”，并自号“曲园老人”“曲园居士”。

俞樾自撰《曲园记》，开头写道：“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者也。”曲园的大门内有一块匾额，乃李鸿章所书，题为“德清俞太史公著书之庐”。俞原籍浙江德清，在清代中过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翰林又有“太史公”之称。俞樾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同属曾国藩门下，均是曾的得意门生。俞樾著作很多，因此当时曾有“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曲园拼命著书”之说。

曲园内有一座“春在堂”，它的来历，颇有一段故事。据说俞樾三十多岁时在北京保和殿礼部复试时，试卷中有诗题《澹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开首即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并以此名列前茅。故在“曲园”中以此题作堂名，诗集也叫《春在堂集》。匾额由曾国藩亲笔写，并有“附记”道：荫甫（俞曲园字）仁弟馆丈，以“春在”名其堂盖追忆昔年廷试“落花”之句，即仆与君相知始也。廿载重逢，书以识之。堂内还悬有一副俞樾壮年时自撰楹联：

> 生无补于时，死无关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于怀一笑，吾其归欤！

这副对联，语气畅达，文思纵横，如见其人，乃是俞樾自己对前半生事业的高度概括，故流传颇广，许多港台和海外老人至今尚能背诵。

曲园中还有一座“乐知堂”，是俞家当年举行喜庆活动的场所。其堂名，系取《周易》“乐天知命”之意，堂内亦有一副很有风趣的对联：

三多以外有三多，多德、多才、多觉悟；
四美之先标四美，美名、美寿、美儿孙。

此联亦为俞樾自撰。这副对联，更使我想起了俞樾的一首《曾孙僧宝双满月剃头诗》，僧宝乃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的乳名。此时即反映了俞樾晚年得曾孙的愉悦心情，便是诗中所谓的“美儿孙”。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俞平伯夫子寄来的一张照片：老夫子是侧面背影，正在仔细观看手里捧着的一本书，书的扉页上五个隶书大字“曲园课孙草”，清晰可见。照片后面题了几个字，“此照联接寒舍四代人”。老夫子欢乐之情，从照片中和题字中是可以想见的。

怎么说一张照片联结四代人呢？这就要作一点细致的解说了。《曲园课孙草》是一本书，是曲园老人特地为孙子编写的一本学习八股文的教材，如今拿在平伯先生手中拍了张照片，平伯先生是曲园老人的曾孙，曾祖父写的书，曾孙拿着拍照，不正好是“四代人”吗？

社会上往往误解俞平伯先生是曲园老人的孙子，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曲园老人的儿子去世早，没来得及中功名就去世了，社会上都不晓得，家中亦很少提起。曲园老人把孙儿当儿子，从小就着意培养，那就是俞平伯先生的父亲俞陛青。俞家起名字是按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排行的。如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等。曲园老人名樾，是木字边儿的字，他的下一代起名字便取“火”字边儿的字，

火字边儿的下一代便取“土”字边儿的字，所以曲园老人给孙子取名“陛云”，有一“土”在内，土生金，俞平伯先生学名“铭衡”，铭字有“金”字边儿。又根据《礼记·曲礼》中“大夫衡视”一句的注：“衡，平也。”取字“平伯”，伯是“伯、仲、叔、季”的“伯”，就是第一个男孩子。这就是从命名和表字中，都可以看出俞平伯先生是曲园老人俞樾的长曾孙。20世纪30年代初期，林语堂办的《人间世》杂志，每期扉页，都用米色道林纸印一大张学人的照片，印过徐志摩、朱湘、黄庐隐、周作人、丰子恺等位的照片，亦印过一张曲园老人拄着龙头杖、拉着曾孙拍的照片。俞平伯先生当年曾把这张照片大量印了送人，在《鲁迅日记》中清楚地记载着这件事。照片的背景是有方格子窗棂的老屋，这就是苏州马医科巷的春在堂老屋，亦就是李鸿章题匾的“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后面便是海内外闻名的“曲园”。曲园虽小，但在八九十年前，其名气远远超过什么网师园、怡园等。所谓“诸子峰经评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当时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学术界，谁不知道身兼苏州“紫阳”、杭州“诂经”两处书院山长（相当院长兼主讲教授）的大学者俞樾——曲园老人——呢？直到今天，他写的“枫桥夜泊”碑的拓片，还常常被游人买了带到海外，作为最高雅的投赠礼品。

曲园老人当年有三个住处，即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春在堂，杭州西泠桥下俞楼，栖霞岭下右台仙馆。这三处哪里是基本寓所呢？主要是曲园，因为老人培养孙儿、培养曾孙，都是在苏州，所以陛云先生的青年时代，平伯先生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在苏州度过的。

戊戌那一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俞陛云先生晋京会试，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即人们俗话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郎”的探花。中了探花之后，即入翰林院，授编修，从此陛云先生就住在北京，后来在东城老君堂胡同买了房子，院中有老槐树，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文章时，常常说的“古槐书屋”。俞陛云先生在翰林院做编修，是冷官，但这在清代是重要的进身上阶，几年中放两次主考，到外省取中一批举子做门生，就在官场中有了势力。编

修如外放，一般是道员，弄得好，很快升臬台、藩台、署抚台，就是封疆大吏了。陛云先生1902年放了一任四川副主考，写了一本《入蜀驿程记》，是仿宋人行纪的写法，记由京入蜀的行程。放主考之后，没有几年，清代就结束了。陛云先生未能再做清代的大官。后来一直住在北京，直到50年代才去世，享寿八十三岁。

陛云先生是著名的词人，他的词集有《乐静词》等，叶遐庵编《箧中词》亦收有他许多首词，他的词的格调是花间正宗，不沾豪迈蹊径。下面举一首《浣溪沙》可见一斑：

风皱柔怀水不如，碧城消息近来疏，嫩凉人意倦妆梳。
锦幄明灯鸳鸯梦，文梁斜日燕窥书，梦腾浑不信当初。

可以看出，从字句到意境，都是婉约一派的。陛云先生少年时，曲园老人特地为他编了《曲园课孙草》一书来教他制艺。到了陛云先生老年，又因为教孙儿、孙女学旧诗，编写了《诗境浅说》甲编、乙编两种，甲编讲五七言律诗，乙编讲五七言绝句。章式之老先生在序言中说，读到《诗境浅说》，很自然地想到当年的《曲园课孙草》，真是斯文一脉，累代相传，不但未堕家风，更重要的是几代人都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都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做出贡献，这是很不容易的了。《诗境浅说》甲编、乙编是开明书局出版的，是两本极为精简扼要的学诗入门书，可惜绝版多年，有哪家书局重印一下才好。由曲园老人到平伯夫子，四代人中，竟有三代学人，真可谓书香门第啊！

蔡公五哭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但又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人。他有几次惊天地、泣鬼神的痛哭，足以展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北洋政府下令镇压，当场逮捕了北大等学校三十多名学生。5月7日，在蔡元培的极力营救下，被捕学生获释。当许德珩、易克嶷等二十名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蔡元培亲率全校师生在北大汉花园广场相迎。二十名学生站在台上与大家见面，蔡元培饱含热泪上台讲话，讲到激动处，禁不住热泪滚滚而下。蔡元培为有如此好的爱国学生和可恨的卖国军阀而哭。

1921年1月9日，蔡元培夫人黄仲玉不幸在北京因病去世。当时，蔡元培正好在瑞士日内瓦考察，得此噩耗，甚为哀痛。萦念相依相守二十春的亡妻，痛定思痛，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祭文最后十分沉痛地写道：

> 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决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最后之通讯，以稍稍抒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由此，蔡先生与黄仲玉感情之弥笃，可见一斑。

1927年4月28日，蔡元培在北大的挚友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残酷杀害。那天，蔡元培正与马叙伦等人同游烟霞洞，在吃饭时，从《晨报》上看到此消息，顿时哀情大恸，热泪夺眶而出，餐桌上分不清泪水与汤水。李大钊是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不久恭请的著名学者，号称

北李、南陈（独秀）“两巨人”。李、陈进了北大，通过他们，引进了一批新人，这使蔡元培如虎添翼，旧势力闻风丧胆。从此，北大的教育质量日新月异。李大钊的罹难，怎能不使蔡元培悲痛万分？他是为痛失爱国俊杰和痛恨反动派的滥杀而哭。

1932年1月29日，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遣数十架飞机，对上海进行了狂轰滥炸。蔡元培多年经营的商务印书馆，亦在此劫中遭到毁灭。眼见随风飞扬的灰烬纸屑，面对断垣残壁的馆舍，蔡元培悲痛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与站在身边的张元济抱头痛哭。蔡元培是为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事业被毁而哭。

1934年的一天，年近七十的蔡元培在南京出席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举行的宴会上，苦口婆心地规劝汪改变亲日政策，站到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立场上来。蔡元培说到动情之处，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举座高朋无不为之动容，就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如坐针毡，显得十分尴尬。这是蔡元培为革命党人的变节和亲日派的卖国求荣而哭。

胡适为齐白石编年谱

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胡适编写，黎锦熙修订补充，后又经邓广铭润色的《齐白石年谱》。前不久在友人家才得见到，借来一读，颇多感慨。

白石老人一生画得最多的是花卉、翎毛、草虫、蔬果之类，但据说胡适早在1930年就珍藏他两幅女子人物画，弥足珍贵。齐白石自1919年就居住北平，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誉，久已倾心，只是无缘面晤。1945年，他特地刻了一枚篆字阴文“适之”石章，托人奉送给胡适。但直到这时，二人尚未谋面。

翌年秋，齐白石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胡适，请胡适为他撰写年谱，并把他多年积累的生平材料，亲手交给胡适作参考。其中有齐白石自撰的《自状略》《白石诗草》《日记》，以及《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还有与人来往的函件和报刊上评论齐白石的文章，甚至将王森然为他写的《齐白石传》也一并交给胡适。胡适过后曾说：“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编写年谱的事。”

但是，由于当时胡适刚从美国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校务繁忙，直到第二年暑期才动手研究齐白石送来的材料。这些材料给胡适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觉得他记叙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的妻子的文字，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素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叙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样感人的力量。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做文章的训练，他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并举齐白石记民国八年（1919）避兵乱北游时的文字为例：“临行时之愁苦，家人外，为予垂泪者尚有春雨梨花。过黄河

时乃幻想曰：安得手有嬴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同过此桥耶！”

胡适称赞这段文字，“是他独有的风趣，很有诗意，也很有画境”。胡适的这些评论，实际上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肯定、赞扬画家高超的文学技巧与文学素养。这恰恰是以往评论齐白石的文章中所少有的。

齐白石尝自谓：“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然而世人往往看重他的画和印，致使老人慨叹：“予不知知之者内真知否？”从这里不难看出，胡适绝非溢美和过誉，而是与齐白石自己说的“我的诗第一”的自评相一致的，成了真正理解齐白石的“知之者”。

胡适毕竟是位质直的学者，他恪守的格言是：“有一分的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我有七分的证据，不能说八分的话；有九分的证据，不能说十分的话，也只能说九分的话。”

胡适在阅读齐白石自撰的《自状略》时，发现其中有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即这里记的年岁同白石其他的记载里的年岁，竟有两岁的差异。

《自状略》白石老人署明是八十岁写的，其时当是1940年，由此上推，他的生年应该是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但白石早年的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篇，白石是生在同治二年（1863）。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胡适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揭示出来，他请白石老人的同乡黎锦熙先生与他共同合作编纂《齐白石年谱》。因为黎与齐都是湘潭县人，两家又有六七十年的亲切友谊，相互之间，知之甚深。

后来，终于在黎锦熙多方探询下找到了“两岁差异”的原因。原来，白石老人因为相信长沙舒帖上替他算的命，怕七十五岁有大灾难，自己用“瞒天过海法”把七十五岁改为七十七岁。胡适为这一发现

颇为得意，他曾写道：“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瞒天’，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的方法。”

一般说，对于齐白石这样的老人，多报两岁年龄，实在是区区小事，无关大节，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谱主既然在《自状略》中暗示出生年是辛酉（1861），作为受人所托的捉刀者又洞悉其“瞒天”的奥秘，何不来个顺水推舟，让他自得其乐，逍遥“过海”呢？胡适却不愿作伪。不仅对《自状略》作了订正，而且在《年谱》的序言里加以着重说明，把其中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地端将出来，不仅使白石老人知其“伤疤”所在，也让广大读者明白其中的真相。

1957年10月，胡适买到一本《齐白石画集》，在扉页上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白石死在今年9月，他生在1863年12月，故他死时还不满九十四岁。此册小传说他生在1861年，是用他自称的岁数倒推出的，其实是错的。他七十五岁，就自称七十七岁，故报纸说他死时九十七岁，其实只有九十五岁，实不足九十四岁。”

偶翻1980年上海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在齐白石条目下，有一行赫然入目的文字：“卒年九十七岁（实为九十五岁，因信术者言，跳过两岁）。”不难看出，是以胡适的话为依据的。

“张大胡子”脱险记

著名画家张大千，在青年时期即留起大胡子，人们常戏称他“张大胡子”。

1937年秋，日寇占领了北平。一天张大千偕夫人杨婉君去景山散心，返家途中遇上日本宪兵检查。宪兵一看到他的大胡子，连说：“你的于右任，嘿！大大的官于右任！”张大千急中生智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他不会画画。我叫张大千，是画画的。”说着，张大千就打开画夹，蹲在红墙角下画起来。他几笔勾出一个大螃蟹，那宪兵点头傻笑，索取了这张画，并要张大千留下地址才放走他。

宪兵下岗后，向日军北平司令官香月作了报告。香月一听到张大千的名字，哗地大叫起来，说：“张大千是中国大大的画家，大大的收藏家。”第二天，就派人去张家登门道歉，并提出要他出任日华艺术院院长，而且借张的藏画开个“中国历代名画展览”。张大千镇定地对来人说：“我张某是个画匠，画匠当官岂不让人笑话！不过，开个画展是非常好的。只是我的名画都在上海一个德国朋友家里，可去上海把它运回来。”对方走后，张大千自知风险，便先疏散家人，自己待机出走。

过了几天，那人又来了，声称奉香月之命，请张先生赴宴。张大千猜透香月的诡计，决定前往。席间，香月再次提出办画展之事，张大千故作高兴地说：“在日华艺术院开个名家画展，很有意义。不过我收藏的历代书画都在上海，原是要在上海开的，现在在北平开也好。可是最近有一个坏消息，上海方面说我……”香月接下话说：“说张先生被皇军杀害了，这是大大的造谣。”张大千接着说：“我先在上海开个画展，然后再搬来北平。上海方面一看到我，谣言就可不攻自

破呀！”香月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张大千由天津乘船去上海，行前很多朋友劝他把大胡子剪掉，免得再出乱子，张大千诙谐地说：“这条大胡子原无靠山，现在就靠这条大胡子做通行证，路上谁也不能阻拦我了。”一到上海，张大千就托人把二十四箱历代名画转往香港，自己带着家人连夜乘船经香港转到了桂林。

柳亚子的口吃

柳亚子是中国近代诗坛上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流畅自如，优美隽永。但在日常生活中的亚子先生，却是个有着口吃毛病的人，这大概是鲜为人知的。

柳亚子创办了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并任社长。在南社的一次集会上，柳亚子对中国古代词坛上的一些名家发表评论道：“从周邦彦起，词就开始衰落，到了吴文英，词就糟极了。”这周邦彦是北宋的词家，他一味注重词句工丽和音律严格，而忽视内容，因此他的词作的内容多单薄无聊。吴文英是南宋的词家，号梦窗，工于词，以研练见长，填词一贯只追求形式、音律和华丽的辞藻。他有梦窗甲乙丙丁四稿，被宋人张炎讥讽为七宝楼台，虽炫人眼目，但拆碎下来，却不成片段。可见亚子是反对这种纯形式主义的词风。他欣赏那些能反映时代和现实斗争生活的豪放激昂的词作，故而他推崇李清照与辛弃疾。只听亚子口吃地说道：“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辛弃疾）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他的这席话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座中有位叫庞树柏的，一贯崇拜吴文英，他立即站起与亚子展开辩论。这时，又有一位蔡先生帮助庞与亚子辩论。在座的朱锡梁见状，站起欲为亚子助阵。怎奈柳、朱二人均患有口吃病，愈着急就愈说不出一句话来。亚子见对方二人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表述见解和评驳自己，而自己满腹的宏论又一时说不出来，因而急得当场大哭起来。

朱锡梁因口吃未能帮上亚子的忙，深感歉意。但事后，亚子仍表示对朱的感激，同时，为再次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赠七律给朱云：

南宋词人谁健者？
瓣香同拜幼安来。
文场跋扈嗟侬独，
风气沦亡要汝开。
紫色蛙声都闰位，
铜琶铁板此真才。
别裁伪体吾曹事，
下酒何辞醉百杯。

柳亚子自幼起即有口吃的毛病。他平日说起话来，有时要很久才能继续下去。每每他说第一个字，聪明的友人揣其意帮他说出下面的话来。亚子虽然不善于讲话，但他的文章流畅有力，入木三分，讽刺渗骨。那时有人撰文大力提倡读经。面对这股逆流，柳亚子著文批驳道：“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儿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寥寥数十字就淋漓尽致地把那些提倡复古的道学先生们痛斥得无地自容也。

亚子与郭沫若既是诗友又是战友。早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广州便结识。他们时相作诗唱和，谈论时政，抨击时弊奸佞。郭沫若曾作《今屈原》一文，以颂亚子先生，把他比作当今的屈原。在亚子五十七岁生日时，郭沫若还亲赋祝寿诗，可见两人情感真挚笃厚。两大诗人的友谊已成为诗坛上的一段美谈佳话。

刘半农负气出洋获博士学位

自1917年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新青年》杂志便成为文学革命的“司令部”。刘半农原在沪上，担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辑、中华书局编辑，常在报刊上用文言文发表小说，为当时所谓“礼拜六”的重要作家之一。当时，他响应《新青年》号召，先后发表了《我的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章，积极参加文学革命。

1920年，刘半农出国前往英国深造，发愤要争个博士回来，据说是一气促成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陈独秀、胡适之等倡导文学革命时，他也随之倡和。但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有些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不起他，有的暗讽，有的明嘲，甚至当面训斥：“你懂得什么，也有资格来提倡？”一气之下，他便去了欧洲。

在英国一年多，他除了在伦敦大学研究语言学外，还致力于写作新诗和民歌。《扬鞭集》中三首杰作《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个小农家的暮》《在一家印度饭店里》均写于此时。

第二年夏，他转赴法兰西，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就读，专攻语音学。他在法留学四年，著有《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论》等文及《四声实验录》一书。此书后来由吴稚晖先生作序，在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之后，他又用法文写成《汉语字声实验录》及《国语运动史略》两篇长篇论文，获得法国国家文科博士学位，并被推举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受有法兰西学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其《汉语字声实验录》一文且由巴黎大学出版，列为《语言学院丛书》之一。他所获得的文科博士学位，乃是法国国家授予的，与普通的由大学授予的不同，他

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这年6月下旬，刘半农携带着大批的语音学最新仪器起程回国。第二年秋天，返回原来受尽明嘲暗讽的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课导师，中法大学文学院讲师，在古城北京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鲁迅收藏刻印佛经

鲁迅与佛教自小就有缘。他不到一岁时，就被父亲带到长庆寺拜僧人为师，以祈求佛家保佑。鲁迅由此得了法名“长庚”，即长寿之意。鲁迅稍大时，曾出入庙宇，与佛教徒有过往来。儿时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深入研究佛教文化奠定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学术界兴起了佛学研究热。其目的，有大力弘扬佛法者，有潜心整理国故者，亦有钻研佛学哲学者……鲁迅也受到这股学术潮流的影响，购买、阅读、收藏了许多佛学经典。他的好友许寿裳回忆说：“民三（1914）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从这一年的鲁迅日记得知，他本年度购书中的半数是佛经，约有八十余种，仅4月19日就买了三十五册。可见其执着之精神不亚于虔诚的佛教徒。但他此举并非为了避世、出世，也不是单纯为了收藏，而是想从中寻求直面人生的思想武器。他将佛学置于哲学、文学、史学等角度来研究、借鉴，以汲取精华，传之于世；但也不排除兼顾世人对佛教的信仰，这一点常被人们忽视或避而不谈。其实，鲁迅胸怀博大，笃于亲情、爱心，并非只是执戟砍杀一切的莽夫。他于1914年施资请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百喻经》就是典型的一例。

鲁迅共收藏有三种版本的《百喻经》，其中还有日本学者用日文校勘的。该书系古印度佛教僧人僧伽斯那著，南朝时来华印度僧人求那毗地译。经文中共有九十八则寓言故事，用来譬喻、解释佛教教义，每则故事后有一篇阐释性的议论。该经既富有哲理性，文学价值也颇高。饱读佛经的鲁迅对此评价：“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他施资六十银元刻此经的原因有二：一是鲁迅为纪念母亲六十岁寿辰；二是经文译笔生动流利，与

《伊索寓言》近似，可供翻译外国作品借鉴。

南京的金陵刻经处是驰名海内外的佛经出版机构，刻印的佛经被誉为上乘。该处于1915年1月将《百喻经》刻印成，“印送功德书一百本”，寄给鲁迅三十本。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删去佛教教戒的《百喻经》。鲁迅应邀为此版本作的题记说：“天竺（指古印度）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向读者点明了该书超出佛教范围的积极意义。

可惜的是，鲁迅当年收藏的佛经已大多不存，保存至今的只有二十余种。因而，金陵刻经处完好保藏的《百喻经》的三十块刻板，就成为纪念鲁迅的珍贵文物。刻经处将刻板中的尾板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以供陈列；并于1955年（鲁迅诞辰七十四周年）、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两次重印了《百喻经》。赵朴初为1981年重印本所作题记说，“复首印此册，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以佛学家的口吻评价了此书重印对佛法法运更新的意义，则是见仁见智、理所当然了。另外，解放后还出版了根据鲁迅断句的《百喻经》铅字排印本。近年，也有出版社出版了该经的白话译本、注释本等。

顾颉刚与俞平伯

顾颉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俞平伯是以《红楼梦》研究著称的学者，一史一文，如何能够相提并论？殊不知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们都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学生，后来又都是北京大学文学院著名的教授，而且在学术研究、著作等方面，还有过共同研讨和相互支持。

俞平伯十三岁时即读了《红楼梦》，二十岁时在赴欧船上又熟读并与傅斯年谈论《红楼梦》；至于精心系统研究它却是在1921年春天，受顾颉刚与胡适讨论《红楼梦》的影响后才开始的。俞平伯与顾颉刚采用书信往来讨论《红楼梦》有半年多，互相启发，彼此辩驳，受益匪浅。1922年，俞平伯在这些书信的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顾颉刚在极冗忙的工作中，抽暇为之作序，称赞《红楼梦辨》是“以实际的材料做前导”，用考证的方法研究出来的“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

应该说，当年如果没有顾颉刚与胡适讨论《红楼梦》开风气之先，如果没有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几大本通信，如果没有顾颉刚的热情鼓励和无私提供宝贵的红学资料，如果没有俞平伯不失时机的研究和写作，《红楼梦辨》绝不可能那么快问世。正像顾颉刚所说，《红楼梦辨》只是俞平伯发表《红楼梦》研究的开头。此后数十年间，他根据不断发现的新材料，不仅修订了《红楼梦辨》中的错误之处，而且写出了一系列红学研究论文，完成了集本校勘《红楼梦》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4年，因为《红楼梦》研究观点上的分歧，俞平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到批判。有趣的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居然敢于公开为俞平伯

鸣不平。1957年年初，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谈道，在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时候，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这是一种“围剿”的办法。指出“围剿”对开展“百家争鸣”妨碍甚大，它会使很多人有话无处说，或有话而不敢说。他认为俞平伯对于《红楼梦》的看法有片面性，说他为不全面则可，断定他最绝对的错误而且出之以谩骂的态度那就不对。他说，倘使把这种态度发展下去，那陡然高筑了宗派主义的壁垒，走汉武帝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哪里说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意见是够尖锐的了，只可惜他的话未引起官方足够的重视。

三十年后，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终于代表官方为俞平伯平反了。称俞平伯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承认他在20年代开始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承认1954年因《红楼梦》的学术问题而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俞平伯有幸以八十七岁高龄迎来了自己的河清日，顾颉刚九泉之下恐怕也会为此感到欣慰。

顾颉刚和俞平伯，自幼都生长在苏州。因为俞平伯祖籍浙江省德清县，所以，他只得承认“顾颉刚才真是苏州人”。虽然他们“少同里闬未相识”，可是，他们对苏州的方言、吴声的歌唱是熟悉的。1925年，顾颉刚编成《歌谣专集第一种》，也是他“生平出版的作品的第一种”的《吴歌甲集》时，除了自序，还高兴地请了胡适、钱玄同、沈兼士、刘复和俞平伯五人为之作序。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除俞平伯是小字辈，其余均为当时的北大教授。顾颉刚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要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古史辨》第一卷）他是这样做了，才会这样说的。如果当初俞平伯请顾颉刚为《红楼梦辨》作序是出于对学长的感激和敬重，那么，这次顾颉

刚请俞平伯为《吴歌甲集》作序就完全是出于友情了。

俞平伯不愧为《吴歌》的知音，在被请的五人中，他最先交卷。他由吴歌想到方言文学，认为“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从方言文学又想到“原始的诗与歌谣不分，即到现在，它们的分割也不是绝对的，即如此书中所收，名为山歌，尽有许多极好的诗”，“没有诗意的歌谣固然有，但打开名家的集子，没有诗意的诗又何尝少了”。从他主张新诗还淳返朴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以土话写的，且流行于民间歌谣的看重胜于诗。他寄厚望于《吴歌甲集》，谓“数千年之后，若再生一孔子，安见不把它著录于十五国风之外，另立一《吴风》呢”。俞平伯的序至今读来仍感到亲切、风趣，不失为一家之言。

顾颉刚是一位事事认真而又敢于讲真话的人。1980年12月25日，他因脑溢血逝世。他生前为了祖国的古史研究，古籍的辨伪、考证，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学识和才华；死后又将遗体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解剖研究之用。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崇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俞平伯先生追怀老友顾颉刚，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往事如尘，他痛定思痛，吟成了《思往日五章》。这情真意切的诗句，概括了他们数十年的交往。就让我以这五首诗作结吧。

昔年共论《红楼梦》，
南北鳞鸿互倡酬。
今日还教成故事，
零星残墨墨甄留。

少同里闬未相识，
信宿君家壬戌年。
正是江南樱笋好，
明朝初泛石湖船。

株守穷庐业已荒，
悴梨新柿各经霜。
灯前有客跫然至，
慰我萧寥情意长。

朋贊三五尽吴音，
合上耆英会上寻。
秘笈果然人快睹，
征文考献逐初心。

毅心魄力回无铸，
长记闲评一句留。
叹息比邻成隔世，
而看著述已千秋。

林海音与《城南旧事》

据报道，上海拍制的影片《城南旧事》在马尼拉第二届国际电影节获最佳故事片大奖时，一位日本人曾大声呼喊：“今天晚上是属于中国人的。”我看到这则消息，顿时衷心感奋，心中默念：我就是中国人——虽然我现在身不在国内。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我的一位老友老陈对她比较熟悉。她原名林含英，幼年住在北京，十二三岁时就在北京的小剧院当过小演员，后来考进北京《世界日报》开办的新闻专科学校。据老友说，从那时起，曾和她在《世界日报》同事多年，那时新闻学校有号称“关、高、林、夏”的四位女同学，其中的“林”就是她。在《世界日报》一次新闻联欢会上，老陈曾和她同台在一出话剧《虎去狼来》中演过戏。陈饰主角华裁缝，她扮演华裁缝的女儿。她的个性泼辣，按照剧本，有一场戏她应该给陈跪下，但她坚决不跪，陈叫她跪，她说：“你才比我大三岁，凭什么给你跪？”陈说这是剧本规定的，她说：“剧中规定也不行，为什么偏要跪？跪了你又没什么，我就不跪。”结果还是没跪，但据说在那出戏里她表演得确实是好，悲剧性的情节演得逼真动人，在一次对白中，扮演她父亲的陈被她的逼真表情感染得直哭，真流泪了。

林海音，个子不高，鸭蛋脸，五官清秀，天资聪明，反应快，理解力强，多才多艺。她的丈夫夏承楹是一位口琴名手、排球健将，当时也在《世界日报》工作。1947年他们和陈同住北京南长街一条时，初秋的一个傍晚，她曾到陈家去玩，那时她怀孕在身，已大腹便便了。

1948年，海音偕母亲、丈夫和孩子离开北京回台湾原籍，至今已

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她在台湾已有不少成就，她写过很多篇小说，经营过出版社和担任过台北刊物的主编多年，成为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但是，事隔三十多年，她对故地北京还寄予如此深情，《城南旧事》不就是这种怀旧感情的流露吗？此次《城南旧事》影片获奖，当又是她晚年文学生涯中的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城南旧事》影片获奖，使我感触良多。我想说，不管是台湾的作家还是内地的导演，反正这部影片评出的获奖者是中国，不是别的国，凡是中国人都应引以为豪。我只盼望中国人能够在国际上多多获得一些“最佳”一类的大奖，愿我炎黄子孙永远在地球上扬眉吐气。

陶行知的五柳村

劳山下有几间草房，与普通农舍无异，门前种了几棵柳树，陶行知命名“五柳村”，这就是他在晓庄时的私人住宅。他的歙县老家有五柳巷、五柳堂，他在那儿曾度过欢乐的童年。他所以喜用“五柳”，或许含有一点儿纪念祖上诗人陶潜的意思吧。

1932年年初，陶行知把家从北京搬来，一家老小八口，欢聚一堂，过着纯然农村的生活。他要在此为别人创造“乐园”，自己却并不想当隐士。他的一家是和乐的，可惜妻子得了精神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年迈，诸儿年幼，幸有妹妹文渼帮助料理家务，解除他不少后顾之忧。文渼自从丈夫死后，唯一的志愿就是竭尽全力帮助哥哥开创晓庄教育事业。她很贤惠能干，想要创造一个卫生的、科学的、经济的、艺术的与爱的家庭。她主张农村妇女教育应以生产活动为中心，为此她创设了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她深信进行乡村教育最有效的办法是“夫妻学校”，她对那些产生了爱情的“乡姑”和“牛郎”，都怀着敬意和希望。不幸的是，她因工作繁忙，积劳成疾，来晓庄才半年就去世了。文渼死后，陶行知十分悲痛，他说：“十年来，妹妹没有一件事不曾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她一直在我心里活着，我愿她仍旧帮助我做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陶行知一家在“五柳村”只住了三年光景，后因晓庄被封，自己被迫只身逃亡海外。1931年3月27日，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就挥笔写下两首《五柳先生》问答诗，表达了他对五柳村的深情怀念。诗是这样写的：

问：五柳先生今安否？
析疑请看大门口。

折腰不为五斗米，
缘何偏重折腰柳？
答：五柳先生笑致辞，
愿君且莫诬吾柳。
不是柳腰是柳手，
要招诗人与酒友。

这首五柳村问答诗，表明了陶氏的人格和风范，也表达了他对五柳村的深情。他一生为改革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多少惊人的成绩啊，可他生前竟连一个安身之所都没有。1941年，他在重庆与吴树琴女士结婚，只把一个旧碉堡改作新房。

他最后一百天在上海战斗着，呼唤着，是住在一个狭小的亭子间里。他很贫穷，可他一生却时时想着贫苦的老百姓。

五柳村现在只剩下一个荒凉的遗址了。与他相邻的“冯村”（冯玉祥所建）、“桃花村”（女生宿舍）、“樱花村”（幼稚园），皆已荡然无存，只有象征晓庄女青年蓬勃意志的桃花还在年年开放，象征幼儿轻盈可爱的樱桃还在年年结着鲜红的果实。

五柳村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

陶行知和他的爱妹文渼所开创的事业将永传后世。

郑振铎抢救古籍感人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士，他在抢救古籍文献方面，有着很多感人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暨大任教授。每天除授课外，将全部心血都用在了抢救中国的古籍文献上。

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大举进攻中国的同时，亦加紧对中国文化的掠夺，派遣文化特务来华抢购古籍文物，美国亦趁火打劫，其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亲自坐镇指挥，并公然宣称“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往华盛顿，以求深造”。

郑先生面对国家文献危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心急如焚，深感保护民族文化义不容辞，遂力鼎千斤，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记得当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庖者。”

开始，郑先生以个人之力，奋力拼搏。他风雨无阻，奔波于四马路的各家书店，访求、罗织了大批明清古籍。为购进书贾手中倒卖的珍贵版本，他将自己收藏的明清刊杂剧传奇等数十种，忍痛转给了北平图书馆，因为这毕竟还在中国。之后，他又感身孤力单，难以拯救更多文献之厄运，遂同张菊生、何炳松、张咏霓诸人联络，形成以其为首的抢救古籍之联合战线。

当时，北方的书贾纷纷南下，目标集中于江南几家有名的藏书楼散出的书籍。郑先生为国求书破费私囊，款待各方书贾，与之广交朋友，并以己之言行，唤起书贾之爱国热情，以此扩大了联合战线。这样一来，郑先生对书市信息、书贾动向、书价变化都了如指掌。江南所售古书，首先由郑先生过目挑选，山西、平津、广东、武汉等地的

许多古书与文献，亦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溜过他的慧眼，日美文化盗贼只能选走他捡剩下的那部分了。

郑振铎的行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曾派一名叫清水的文化特务，通过一个汉奸给郑先生送去一张数额颇巨的支票，并请他出来主持文化工作，以此进行收买。郑先生大义凛然，当场撕碎支票，怒斥汉奸。

抗战八年间，郑振铎冒着艰难危险，为国家抢救了古籍文献三万余册，不少书连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都无收藏。其中以购得丁初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最为珍贵。该套书包含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大半已湮没散佚，世所不传。郑先生之举，为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杂剧，可当功垂青史。

1949年5月，他看到当时北京一些珍贵文物、图书无人管理，散佚、被损、被盗严重，建议政府成立了文物局，郑振铎任局长。

郑振铎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逝世，是一大损失。

泰戈尔在徐志摩家做客

泰戈尔自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振，世界各国纷纷邀请他去演讲。当时由梁启超、蔡元培主持的讲学社也向泰戈尔发出了邀请。泰戈尔应邀访问期间，徐志摩以诗的语言进行翻译，流畅华丽，极为成功，泰戈尔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后，徐志摩在从欧洲返国途中，去印度拜访了泰戈尔，同时坚邀他再度来华。

1929年3月，泰戈尔践约来到上海。徐志摩和陆小曼都兴奋不已，并做好了准备。那时他们家有三间半屋，三楼一间亭子间虽然小了些，但结构相当精致，决定把它腾出来让泰戈尔住。徐志摩按照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在房间内铺上厚厚的地毯，只放几只软靠枕。

泰戈尔踏进徐家后，只说了一句：“噢，这就是你们的家！”待进屋，便一边饶有兴趣地观看，一边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当走到三楼时，志摩兴致勃勃地打开那间自己费了许久精力和时间准备的印度式房间，热情地说：“罗宾爷爷，这是我们专为您准备的卧室，请进。”

泰戈尔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和蔼地问：“那么你们的卧室呢？”徐志摩忙把他领进另一个房间。老人家十分有兴趣地看着，然后频频点头，说：“素思玛，我看这间房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就让我睡这里吧。”徐志摩愣住了，小曼却笑着用英语说：“我今晚就要到印度过夜了。”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三个多月后，泰戈尔前往加拿大、美国、日本讲学，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又来到上海。

此次见到的泰戈尔脸色灰暗，与三个月前的红光满面已完全两样，而且话也不多，有时还带咳嗽。在徐志摩家，他讲述了自己在美国补办护照时受到的粗暴对待，很是气愤，直到第三天，怨气才平息了一些。

闲谈间，泰戈尔发现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大书，装帧很精美。问徐志摩是什么书，他告诉老人，这是一本纪念册，因为他酷爱书法和绘画，又爱结交名流，这本由不同颜色的精制笺纸装订成的纪念册是专供朋友题词和作画的。当泰戈尔打开这本册子，里面已经有了胡适的题诗和闻一多作的画……

徐志摩和陆小曼都要求泰戈尔在这本纪念册上作画。泰戈尔欣然答应，在一张洒金的大红笺纸上作了一幅水墨画的自画像，笔调粗犷，近看像一位老人的大半身坐像，远看又似一座小山。他又在右上角写下了一句英文小诗，意思是：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重的负担。在另一页上，他又用孟加拉文题了一首小诗：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

题毕，他用孟加拉语念了一遍，才把画册递给了徐志摩。这时，徐志摩和陆小曼都发现泰戈尔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一会儿，他从手提箱里抽出一件极为珍贵的紫红色丝质印度长袍，赠予了徐志摩作为永久的纪念。从此，二人再也未见过面。

沈雁冰孝亲之婚

大作家沈雁冰（茅盾）先生是一个极孝顺的人，甚至在婚姻问题上亦是如此。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而夫人孔德沚却是“德而无才”的传统中国妇女。

在沈雁冰父亲灵位的遗像两旁，挂着他母亲工楷写的对联：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沈雁冰后来称这副对联对他影响极深。

在浙江桐乡乌镇，孔家和沈家是世交，沈雁冰祖父经营泰兴昌纸店，跟孔家的纸马店、蜡烛店有生意上的往来。沈雁冰五岁那年夏天，两家祖辈在玩笑间为孙儿（女）定了亲。

然而，他们后来才知道，孔家思想十分守旧，一直没让女孩子上学；而沈雁冰却已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了。沈母怕沈的“娃娃亲”妨碍前程，要沈雁冰另寻佳偶。沈很孝顺母亲，此时又想起那副对联，执意尊重父母之意，称不在乎孔家千金有无文化。

1918年2月，沈雁冰同孔家三小姐结了婚。婚后沈才发现，孔小姐只认识一个“孔”字，对“北京离乌镇远，还是上海离乌镇远”也搞不清楚，甚至连大名都没有。

从此，沈雁冰和沈母轮流教孔小姐识字。只是孔小姐一直没有名字，沈母便命沈雁冰为她取个名字。

沈雁冰想，据说天下姓孔的，都出自孔子一脉。其家谱规定，“繁”字下面是“祥”“令”。岳父名祥生，两个小舅子名令俊、令杰。沈于是给她取了两个名字“令娴”和“令婉”，由沈母定夺。

沈母膝下无女，心中寂寞，待儿媳如闺女，因此对沈雁冰的两个名字都不满意，要他按沈家家谱排序取名。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本辈人应有“德”字，女性名字又一定要有“水”旁，于是沈信口取名为“德沚”。从此，沈夫人便得了大名“孔德沚”。

孔德沚婚后一直成为沈雁冰的贤内助，这场婚姻真可谓“同甘共苦，白头偕老”矣。

马寅初过文武两“昭关”

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淡泊寡欲、潜心治学。同时，他性格刚毅、敢于直言，深得世人尊敬。

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任教。当时国难当头，政局混乱，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老百姓生活在恐怖与饥饿之中。报上传来政府宣布“法币外汇牌价猛跌一半”的消息，小有储蓄的人家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一夜之间即变为废纸。而那些达官显贵、金融衙门里的大员以及与这些大员暗中勾结的豪门巨贾们，则于事前得知这一消息，早把中国银行库存的黄金与外汇提借一空了。神通广大的，甚至一手从中央银行取得贷款，一手去外汇部抢购黄金与美钞。马寅初得知此事，气愤地说：“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他满怀义愤地向重庆《新华日报》与《商务日报》的记者慷慨陈词，痛斥了那些不知亡国恨的家伙。

随后，马寅初又提议提前召开“经济社年会”。会上，他责问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

> 听说这次调整外汇牌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拼命从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和白银，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手法套购外汇，一夜之间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作何解释？

几句话问得财政部长哑口无言。不久，马寅初又多次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言辞尖锐有力，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税。因此，郭沫若誉他为“捶不扁、炒不爆的一颗铜豌豆”。

1940年的一天，黄炎培请马寅初吃饭。饭毕，跑堂的递过来两只鼓鼓囊囊的信封，说是在门口站了半天的两位先生托他转交的。马寅初打开其中一封，一只派克金笔从中露出头来；随着又露出一张三寸

宽的纸条，上写“请马老先生笔下留情”。在旁观看的黄炎培已明白了几分，说道：“这是让你过过文昭关。”马寅初又拆开另一封，里边却是两颗子弹，也附一张三寸宽的条子：“如果你不识相，还要开口攻击党国要人，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味道！”黄炎培见状，又插话说：“这回让你过过武昭关！”

可是，文武两关并未能使马寅初动容改色，他坦然地将信封装进口袋，用手一招，叫过跑堂的说：“回头有机会见到那两位送信来的朋友时，请你转告一声，说这两份厚礼我马某都收下了。”

黄炎培既钦佩马寅初的胆识，又为他的安全担心，便劝他下星期的演讲不要去了。马寅初一顿足，激动地说：

> 两万里的江山落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这区区五尺之身？演讲我照旧去，而且不会迟到一分钟。

真可谓一铮铮男儿。

诗人徐志摩之死

诗人徐志摩先生不幸逝世已经八十多年了，光阴荏苒，思之令人有“时不我予”之感。诗人是1931年11月19日乘邮政局运送邮件的飞机，由上海赶回北京的途中，飞机撞在济南附近的白马山上死的（过去常有人写文章说是撞在泰山上，那是猜测之言）。当年在上海和北京之间，还没有客机航路，他乘坐的是运送邮件的小飞机，即使不出事，也是十分颠簸的，但他为什么还要坐呢？这是因为他那天急于要赶回北京。当时他匆匆由北京赶来上海，是因为其夫人陆小曼在上海开支不够。正巧友人蒋百里要卖掉一座大房子，让他来上海在契约上签个字，做个中人，可以分一笔“中佣”钱，以补贴其夫人的家用。签完字分到钱本来可以在上海多住几天，可是又因为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在北京要给外国人士作一次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他急着要赶回北京，一是听这次演讲，二是必要时还得担任“舌人”之职。因之来去匆匆，却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他死时只有三十七岁，正值壮年，是中国文化界、教育界很大的损失。

徐志摩1922年由英国留学回国后，不久即应北京大学蔡元培、胡适之等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他是“部聘教授”，工资高达银元五百。但他还不够用，主要是其夫人陆小曼女士的开支太大。当时他在北京做教授，虽又兼南方一些大学的课，如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但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因此他的家应该安置在北京才是。但其夫人嫌北京西洋化的娱乐少，把家安在上海，他自己一个人则寄居在北京景山东街胡适之的西式小楼上。

他住在北京，每月要汇四百多元给上海的陆小曼。而陆在上海置办时装，参加跳舞会等，维持其“贵夫人”的生活，还常感拮据。在最紧张的时候，他把每月工资，只留三十元自用，其他全数寄给夫人。

这样，这位月入颇丰的大诗人，反而日处困境了。三十元大洋，在当时如果给一个普通人，养一家人也绰绰有余，但给一位应酬频繁的大诗人、大教授，便不够用，难免破袖口的衬衫也穿在身上了。

作家说相声

几位朋友饮茶，聊起老舍先生的《茶馆》，称赞之余，免不了为他的撒手人寰更增几分哀叹。由此，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我和老舍先生相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未见面之前，就听说他在北京读书时，不但功课出色，而且非常健谈。当时学校每周末有讲演会，虽是为了锻炼大家的口才，但几乎每次都被他独占鳌头。这充分表明了他具有演讲的天分。等一接触，果然名不虚传，看上去似很严肃，一谈起话来，却幽默风趣，常常引得人捧腹大笑。这在后来，也成了他创作上的独特风格。

当时，他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就是梁实秋先生，也很健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总是海阔天空，聊个没完。这个诙谐地说东，那个幽默地道西，这个笑谑地说南，那个风趣地话北。抬不完的杠，顶不完的牛，常使人笑得肚子疼。大家常议论说，如果他俩说一段相声，一定是一对好搭档。不想这个想法于十几年后，居然成了现实。

那是抗战时期，我辗转到了重庆，住在风景如画的北碚文化区的一座小山上，正巧老舍和梁实秋也住在那里。其时的老舍先生已是誉满海内外的大作家了，在重庆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两人时相过从，见面仍是那么诙谐、笑谑，使人愉快。

1944年秋天，国文戏剧专科学校校庆，校长余上沅先生邀请了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席。会上大家各献节目，热闹非凡。有人乘兴建议请老舍先生和梁实秋先生说一段相声，顿时群起响应，掌声如雷。

他俩面带笑容，相互一瞥，就这一传递眼神儿，便把大家逗乐了。于是两人同时起身，各从怀里抽出一把破旧折扇，似乎早已准备好了的，摇摇摆摆登上台去。两人恭恭敬敬向大家鞠了三个躬，然后，一个面容郑重严肃，一个笑得直不起腰来，这就像传染一样，马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老舍先生用扇子向大家一指，全场立即安静下来。他们两人你敲敲我的肩，我戳戳你的头，用道地的北京话说起了相声。虽然两人事先并未商量，完全是即兴发挥，但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一会儿这个一本正经，一会儿那个笑容可掬，信手拈来都是笑料，表演得既熟练，又精彩，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令人拍案叫绝。全场笑声鼎沸，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的人笑得流出了眼泪。

1949年，老舍先生自美国飞回祖国，陆续写了不少剧作，梁实秋先生则去了台湾。而今，他们都已先后作古，空留下一段文坛佳话。

曹禺在津演戏剧

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不久前在北京仙逝，他是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这颗巨星最早是从天津升起的。

1910年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在天津海河边的一座老式院落内。他的父亲万德尊当时是直隶卫队的标统，相当于一个团长。他的母亲在他出生三天后便得病亡故。小家宝是在继母、奶妈的哺育下长大的。

家宝三岁时，继母就抱他到戏院看戏，稍大些，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戏，他从小对文明戏就很感兴趣，童年时代所看的戏，在家宝幼小心灵中播下了戏剧的种子。

十二岁时，家宝在天津南开中学入文学会，和同学们一起编辑《玄背》副刊。他写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该刊第六期上，到第十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家宝第一次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家宝姓万，草字头下一个“禺”，“草”谐音“曹”，曹禺的笔名由此而得。

1925年，曹禺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接受团长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排演了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后曹禺又出演易卜生《娜拉》中的女主角娜拉，获得巨大的成功，展现了他那天才的演技。他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被当时天津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

在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期间，曹禺改编了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并因之而结识了《大公报》的黄佐临，从此两位未来的戏剧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2年，曹禺从十九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开始孕育的《雷雨》，在清华园结果了。1934年发表在巴金、靳以编辑的

《文学季刊》上。翌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本校大礼堂演出首场《雷雨》。扮演鲁贵的是后来的名演员石羽。排练中，他们还特邀曹禺前往指导。

从清华毕业后，曹禺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担任外国文学教授。此间，他开始了《日出》的创作。上海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谣言和卑鄙诽谤中服毒自杀是触发曹禺写《日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多半发生在天津。《日出》第三幕中的下等妓院取材于天津南市“三不管”。像翠喜、小东西等人物都确有其人。为了学数来宝，半夜里曹禺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等两个吸毒乞丐，结果被打，一目险些失明。尽管遭受如此折磨、伤害，他仍把调查坚持下去，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36年6月，曹禺的第二部巨作《日出》在《文学月刊》开始连载，至9月第四期载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还为《日出》一剧向曹禺颁发了奖金。

同年，曹禺曾将日译本《雷雨》寄赠鲁迅先生校正。鲁迅收到赠书后，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张恨水与天桥

一代章回小说家张恨水，曾经是天桥的常客。他早年在《益世报》供职的时候，每得闲暇，必到天桥一游。

《益世报》是在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10月在天津创刊。该报在北京的分馆，设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路东。张恨水担任该报文艺版主编兼校对时，投寄给文艺版的稿件，有不少是取材于天桥艺人生活的小说、散文或诗歌。他对天桥有浓厚的兴趣，常约二三好友或独自去天桥合意轩听大鼓书，去福海居等茶馆听评书，或者徜徉于熙熙攘攘的游人中，观察、了解形形色色的艺人和游客。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而成的。

张恨水涉足的合意轩，位于天桥西市场东街，是一家阵容很强的坤书馆。主角金雪梅、伊惜兰等鼓姬，色艺双全，点曲每支大洋五角。张恨水与那些迷恋鼓姬的花花公子迥然不同，他从来不花点曲的冤枉钱，只是每听完一曲，破费几枚铜元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混杂于诸多听众之中的张恨水，在听鼓姬演唱时，确实是一位“醉翁”。其醉非在于酒亦非在于色，而是醉在曲高词雅，醉在洞察鼓姬与听众的内心世界，醉在捕捉各色人物的神态与动作，醉在出自大众之口的形象、生动的语言。他所塑造的沈凤喜、樊家树、沈三弦等人物，其原型无一不是来自天桥的坤书馆。

20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常约成扶平（满族镶黄旗人）、陈逸飞等文友到天桥福海居等茶馆消遣。在福海居这家大茶馆里，经常发现

一些提笼架鸟的满族人见面时仍然彼此请安。张恨水对满族的遗风很感兴趣，于是便约成扶平撰写有关满人生活习俗的文章。不久，以《旗族旧俗志》为题的长文，便在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连载。

张恨水亦经常涉足于天桥水沁亭内的武术茶社。这家茶社的创始人是北京会友镖局的老镖师李尧臣。《啼笑因缘》第一回中所描写的水沁亭那家茶馆，便是武术茶社。而那位举石锁的老者关寿峰，即为李尧臣。

张氏以《啼笑因缘》一书而闻名。自后，《金粉世家》《满江红》《五子登科》等著作，陆续问世，连载报端者，达数十万言。其在市民及小知识分子中影响之大，实不亚于巴金在青年学生中之影响。

张恨水之小说，以爱国故事为主，兼有揭露社会黑暗及侠义。不料盛名之下，贸利之徒、无聊文痞，往往盗用其名氏，造作俗恶言情小说，刊诸各地小报，一时“恨水”之名，泛滥成灾。

据称鲁迅先生之母，颇嗜读张氏小说，鲁迅并不以为忤。30年代，鲁迅旅寓沪上，曾数次托友人代购《金粉世家》诸书，函寄北京太夫人处。从鲁迅书札看，确有其事。

张氏成名后，为《新民报》主持人邓季惺、陈铭德所罗致，与老报人张慧剑诸氏，俱为《新民报》台柱。40年代，某公于新民报社会晤张氏，识荆之后，颇为惊诧。初意张氏为小说名家，又善于言情，必属多愁善感，楚楚文士，不料体态团团若富家翁，为之忍俊不禁，因笑问：“先生以说部名扬全国，诚抒情能手，大名‘恨水’，奇甚，是否亦有伤心事耶？”张氏闻之大笑，告曰：“吾名取自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词，李后主佳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吾名恨水，乃是自勉之意，不过是爱惜光阴而已。”交谈中，又询以“章回小说已属旧形式，

是否尚有前途”。张答：“以章回形式写新小说者，为中国风格、民族形式，尚为群众喜见乐闻。”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任《新民报》总编时，仍然于百忙中抽暇前往天桥听书看戏，其兴致之浓，不减当年。

范长江和沈谱的婚礼

1940年12月10日，重庆良庄沈钧儒的寓所热闹非凡，因为这天是沈老的女儿沈谱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结婚的日子。

尽管严冬是寒冷的，周围的暗探和特务横行，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但二楼的屋内却春光融融，贺客盈门。

住在三楼的茅盾夫妇主动为他们把新房布置得简朴、雅洁。新郎和新娘激动万分，十分感谢这诚挚的友情。他们陶醉在幸福的回忆中。两年前在武汉时，范长江和邹韬奋为商讨救国大计，经常出入沈家。一次，邹韬奋向沈钧儒老提出欲牵范长江和沈谱的红线，后沈老转告女儿。当时沈谱虽已知范长江是写《中国的西北角》的名记者，但终因年纪还小，学业未成，便婉言谢绝了。1938年沈谱在成都的金陵女子大学毕业，这时武汉失守，她只好随父来重庆。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正巧范长江在桂林与胡愈之等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后，因工作关系也来到了重庆，二人又相遇了。戏剧般的重逢，使二人都充满了喜悦。但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范长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而沈谱的上级则是邓颖超，他们彼此都不知对方是共产党员。直到“文革”后，一次沈谱去看望邓大姐，邓大姐还跟她开了个玩笑，说：“沈谱，你犯过一个错误，还记得吗？你一结婚就告诉了长江你是共产党员。”说得沈谱直捂起嘴来笑——这自然是后话。再说婚礼的当时，直到周恩来亲临祝贺，才使二人回到现实中来，急忙迎了上去。

周恩来称，邓颖超因为有病，不能前来参加，但是送来了贺礼，并专门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沈谱、长江先生：

从报上得知你俩的喜讯，今天又届你俩的佳期，不仅要向你俩热烈的庆贺，同时，凡是关心你俩的朋友们，都要感到愉快欣慰的！我本应，且极想能够亲来道贺，但因病后，体健未复，尚留乡间疗养中，致不克如愿，殊深欠憾！兹特专函，以伸贺意：敬祝你俩新婚快乐！今后共同生活，在恋爱与事业交织中，更加活泼与丰富，善处益巩固！坦白真诚，互助，互勉，互信，互谅，互慰，相爱始终！再依照你俩的愿望，在不损物资的条件下，将手头现存的两件微物——苏联乌拉山石制小像架，二年前购而未用的一花台布送上，聊表贺意，以资纪念，点缀新房，千祈哂纳为盼！

此祝

大喜愉快！

邓颖超

十二月十日

接着，李公仆带来两朵大红花，到处喊着找新郎和新娘。发现他们两人后，拥上前去边戴边说：“你们两个都穿着蓝大褂，跟大家一样，简直认不出谁是新郎新娘了！”博得大家一片欢笑声。

婚礼没有酒菜筵席，桌上摆的只是些糖果、糕点之类。大家川流不息，谈笑风生。实际上这也是革命同志借机一次难得的聚会。正如范长江和沈谱在“结婚启事”中所说：“新旧仪式，一概从删。”这里虽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非同凡俗。宾客们有的送来了花篮，有的送来了马列主义书籍。更引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此外，还有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诸先生的贺诗，以及周恩来写的“同心同德”贺词。

这天，沈钧儒老先生胸襟上缀着一朵最快乐的花，笑容在他的长髯上荡漾。他的惯于忧时虑世的脸上，展开了爽朗的丰采。这不仅是

因为爱女终身有伴，而且因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从今天起将获得最忠诚的合作与继承。从他写的签名册卷首的诗篇里，可以看出他对于爱女和佳婿是付托了怎样大的祝愿：

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
祝吾婿与女，绳勉同心结。
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
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
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
鸡鸣怀古训，毋恋衾枕热。
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
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

从下午五时起直到天暮，数百位来宾都尽情地享受了这难有的欢乐。

李健吾险入殡仪馆

1946年5月，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在上海戏剧学院执教，并与郑振铎联合主编《文艺复兴》杂志，故此文坛剧坛两界好友甚多。一天，郑振铎、柯灵、臧克家、黄裳等好友约李健吾看戏。他们到戏院后，先到后台看望剧坛好友。谁知后台正在着急，因为饰演巨商的演员临时误场。俗话说，救场如救火，这是义不容辞的，可是谁能上台呢？这种救场客串非一般人能办到，任务自然落到了在戏剧学院执教的李健吾身上。

在大家哄笑声中，李健吾身着西装，腆着肚子上场了。台下观众中不乏认识李健吾的，拼命鼓掌。李健吾自然更是信心十足。他不是第一次上台，但这种“客串”却是第一次。他挥了挥手中的文明棍，真是大商贾的风范，几句精妙的台词也恰当得体。谁知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按剧情规定，李健吾扮演的富商要吸雪茄，且要达到吞云吐雾的地步，这下笑话闹大了。那天后台老板因为李健吾是“名角”客串，特意给他准备了吕宋产大雪茄。当台上的侍者为李健吾点燃雪茄后，这可难住了这位戏剧家，因为他连纸烟也不会吸，哪里敢吸这吕宋产的大雪茄？

他接过雪茄，看了看，把它夹在手指间，这样台上自然便没有吞云吐雾的效果了。坐在第一排看戏的郑振铎、柯灵等人急得直冲他做吸烟的动作。李健吾也明白这意思，他何尝不知艺术在于真实的重要。他把雪茄放到了嘴边皱了皱眉头，又放下，这时台下发出了一阵善意的笑声。李健吾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他想把吸入的烟含在嘴里，然后再一吐，舞台效果一定错不了。于是他把牙一咬，猛地吸了一口雪茄，也许是因为用力过猛，烟没有在嘴里停住而直冲胸腔。只见李健吾满面通红，两眼一翻，雪茄掉在台上，人竟晕了过去。演员

们急忙将李健吾抬了下去。郑振铎等人也赶到后台。只见李健吾两眼紧闭，懂得点医道的郑振铎赶紧为他做人工呼吸。过了片刻，李健吾才睁开两眼，仍然觉得天旋地转。朋友们急忙为他叫了辆三轮车。

慌乱之中，三轮车夫也没问拉到哪儿。走出一箭之地，车夫问李健吾拉到哪儿去，李健吾有气无力地说了三个字：殡仪馆。车夫大惊失色，活人为何要去殡仪馆呢？也许客人喝醉了，车夫一路乱猜着，可又不能不照客人所说而行。殡仪馆是昼夜有人值班的，所以当三轮车一停，马上有值班人员迎了上来。一路上的新鲜空气已使李健吾清醒多了，知道又闹了误会，忙说自己的住处在殡仪馆的对面，现在自己身体健康，进殡仪馆为时尚早。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正巧当时有位报社记者路经此地，采访当夜新闻，见李健吾在此，忙问其故。第二天，便在报上发表了《李公吞雪茄，险入殡仪馆》一文。此事成了文坛趣闻，轰动一时。

作家轶话

晚清小说家吴趼人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名沃尧，又名宝震，字小允，后改字趼人。这个“趼”字原较生僻，常被人误写成“研”字。吴趼人自己写过一首诗来辨正这件事。诗云：“姓字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身。古端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诗前并有小序云：“余自二十五岁后，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吴趼人别号我佛山人。因吴是广东南海人，家居佛山镇，故号，意谓“我是佛山人”。他于当年《绣像小说》上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等均署“我佛山人”这个笔名字号。吴并著有《我佛山人札记小说》和《我佛山人笔记》。

吴趼人著《糊涂世界》《瞎骗奇闻》时，署名“趼叟”。撰《九命奇冤》时，署名“岭南茧叟”。著《胡宝玉》（一名《三十年上海北里怪历史》），署名“老上海”。

吴趼人与上海实有缘分。他于十八九岁时至上海，后即久寓沪上，直至病故。中间虽曾去汉口、山东和日本某地小住，但时间都不长，故自号“老上海”。因而在1912年编纂的《上海县续志》卷二十一《游寓传》中，也为他专门立了小传。吴趼人在上海主编过《字林沪报》的副刊《消闲报》，后又创办了《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1906年为《月月小说》主笔。

吴趼人是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小说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此当年吴趼人，被文坛推崇为“大文豪家”。笔者在一家图书馆见过一份1910年7月22日出版

的《汉口中西报》，此期报纸就以“版心”地位，发表了“大文豪家南海吴趼人君肖像并墨宝”。所谓“墨宝”，即指署名“我佛山人”所作的《还我魂灵记》一文。文末附载了吴趼人写给药房老板黄磋玖的信和上海中法大药房的告白。

吴趼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清宣统二年（1910）。这样一位文章“卓绝一时，斯世仰望风采及钦慕其著述之人，不知凡几”的大作家，临死时却家境贫困，身后萧条，只遗一妻一女，女仅六岁。吴的丧事，也是朋友为他料理的。

吴趼人逝世时，他的挚友沈敬学曾有挽诗一首云：

> 语不惊人死不辞，卖文海上病难支。李南亭后吴南海，容易伤身笔一枝。伯道无儿志未行，衔悲寡鹄复何如。佛山青翠浓如昔，谁访筠清馆里书。

诗中李南亭，即李伯元，亦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名作，比吴趼人早逝四年。

“东亚病夫”曾朴

岂真东亚病夫，是鲁男子热情奔放，到老要翻完嚣俄全集；
不愧一代文宗，写孽海花笔力雄健，至今已传遍震旦词坛。

这是近代著名小说家曾朴于1935年6月23日病故后，由沪上作家徐蔚南亲自撰送的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徐曾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上海艺术学院教授，善作草书，颇为世重。

曾朴，生于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即1872年3月1日。江苏常熟人，乳名“大大”，谱名朴华。字孟朴，与名并行。郁达夫曾著有《记曾孟朴》，载1935年出版的《越风》；蔡元培有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载《宇宙风》第二期。“东亚病夫”是曾朴的笔名，最早见于其长篇小说《孽海花》，小说的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曾朴墓至今犹存，在常熟市西门外虞山宝岩杨梅林，墓碑即刻有“晚清作家东亚病夫曾朴墓”十一个隶书大字。《鲁男子》为曾朴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实为曾“青年时期的自传”“晚年回忆的忏悔录”（见《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完稿》）。曾朴谙法文，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早期专家。孟朴曾自言：“我的法文，是读字典读懂的，不曾进过学校。”

曾朴于十三岁时，经名儒潘子昭指导，研讨课艺。一日，曾父曾君表（光绪乙亥举人，著有《登瀛社稿》）于孟朴抽屉见其所作骈文，辞意美妙，不禁拍案叫绝道：“大大（乳名）竟通了！”

曾朴十九岁，应常熟县试中第一名，应府试中第二名，后赴苏州应院试获第七名入学中秀才。是年，曾朴与汪圆珊结婚，曾朴因不满这桩封建包办婚姻，成婚之日竟借酒醉为辞，未入洞房。然而，曾朴

禁不住秀美妻子圆珊的温存熨帖，不到半月，一对小夫妇竟异常要好了。第二年11月，圆珊夫人产一女，产后便病，半月演成永诀。曾朴撰《祭亡妻汪孺人文》并作《悼珊六首》，兹引其中第一首：

> 萧萧落叶逼黄昏，三尺桐棺万里魂，愁到天翻不相识，眼看人去了无痕。错疑小别将归棹，准待宵回不掩门，梦醒忽惊真个事，锦衾一半总难温。

曾朴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一岁捐内阁中书，留京供职。时曾朴常出入于宰相翁同龢之门，力劝翁相主持正义，抗御外侮，为时人所传颂。

曾朴晚年因病返里，种花养病于常熟虚霩园（俗称“曾家花园”）。虚霩园临水厅前有一座太湖石，上刻有一则曾氏父子（曾君表、曾朴）合作题记，题记云：

> 余营虚霩园，倚虞山为胜。未尝有意致奇石，乃落成而是石适至，非所谓运自然之妙有春耶？即书“妙春”二字题其额。石高丈许，绉、瘦、透三者兼备。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曾之择并记，男朴书。

曾之撰，即曾君表名。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其时曾朴二十三岁。

曾朴六十四岁那年以感冒而病，故于虚霩园红楼。

爱情诗人汪静之

20世纪20年代湖畔诗社的创始人之一，爱情诗人汪静之不久前在杭州浙江医院辞世，享年九十五岁高龄。

汪静之的诗集《惠的风》曾震撼五四文坛，这与他的爱情经历是分不开的。

汪静之在出生前，便由父母指腹为婚，与比他小半岁的曹初兰定了亲。谁知在他十三岁那年，未婚妻突然夭折。从那时起他便与未婚妻的小姑母曹佩声成了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的伙伴。

十五岁那年，他鬼使神差地写了一首古体诗送给曹佩声，表明自己的爱慕之情。可曹佩声迫于封建势力的束缚，违心地拒绝了汪静之的求爱。但约定，待长大后同做隐士，脱离尘俗。

次年曹佩声由母亲做主嫁给了一个纨绔子弟，隐士梦自然也就破灭了。不久，聪明美丽的曹佩声考取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

1920年8月，汪终于按捺不住对曹的思念之情，和曹佩声的丈夫一同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此时，汪、曹两人依然情意绵绵，心心相印。望着曹佩声的小照，汪静之写下了深沉的相思：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四个眼睛两条视线
整整对了半天
你也无语
我也无言

为了回报汪对她的深深爱恋，曹佩声以极大的热忱和耐心，相继邀了浙江女师八位品貌不凡的女同学与汪见面，希望他们相识后作为朋友。谁知这八位美人对汪都不理不睬，看不中身材矮小的汪静之。这使得曹佩声叹着气说：“只怪你生得太矮，看来全没希望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呢？”汪说：“八个人中我最爱符竹因。”他请曹再邀她一次。

在不断的追求和失恋中，汪静之体验着爱的痛苦和甜蜜，在痛苦和甜蜜的撞击中涌动出了一首首美妙的诗。

在《拒绝》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
我听到了
“不爱你”三个字
这样婉妙的声音
……
你不爱我也不要紧
这声音够我陶醉一生！

又是一个星期天，四人同游西湖，符竹因仍没理他。临别，汪将一本夹着自己一首情诗的《唐诗三百首》，虔诚地用双手捧给符竹因。诗中汪静之根据《诗经》“绿竹漪漪”的诗句，替符竹因取了个“绿漪”的别号。

汪静之的情诗，如同丘比特的箭，射中了符竹因的心，终于打开了少女的心扉。不久，符竹因答应与他成为好朋友。为此，汪欣喜若狂，写下了一首赞美诗《赠绿漪》。

1924年汪静之与符绿漪在武汉结为伉俪。从此，他们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符绿漪于1986年春末去世，汪静之含泪将她1932年摄的一张黑白照片放大着色后，镶在镜框中，挂在卧室兼书房

的墙壁上。一首他在1960年1月14日抄写的《红梅——次韵和郭沫若赠绿漪》的旧体诗贴在遗像的左侧，以寄托自己对爱妻的无限哀思。

梁实秋怀念清华园

一代学者、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遽归道山。哲人其萎，海峡两岸凡知先生者，莫不痛惜。

梁实秋原籍浙江，生于北京。1915年，十四岁时考上清华，直到二十二岁，在清华念了八年书，所以对清华园有永难磨灭的印象和深沉的感情。到了晚年，他尤其念念不忘青年时代在古都北京的生活情况。春天，灰色古城墙上空的风筝；夏天，在太庙或社稷坛（中山公园内）大树下小憩；秋天，西直门至海淀的斜阳古道；冬天，护城河上的冰床和厂甸的大糖葫芦，都纷纷出现在他的忆念之中，并见之于笔端。老人何等思念他的出生之地啊！

当然，他怀念之深、思之更切的还是清华园。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清华门口的情况：

> 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他甚至没有忘记看校门的“张老头”：

> 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回来，快点回来。”

如此细微的情景，如此清晰的记忆，真是于细微处见深情！

清华园里的建筑布局在他心中了如指掌。“工”字厅是园中最早的

建筑，房屋轩敞，是招待宾客之所，但学生也可借来开会。厅后有小小荷池，池后为一小土山，尚有对联一副：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这大概就是清华园之所以得名了。

梁实秋曾回忆说：我在清华园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儿。

清华园以西的一片荒地上，有小河流过，却很少有人到那个地方去。有一回，梁实秋和翟桓到那里去散步，却听见泼泼啦啦的水声，仔细看去，水中有尺把长的鱼在欢跃。他们脱光鞋袜，挽起裤脚下去摸鱼，居然真抓到了。急送厨房烹煮，真是大快朵颐。

清华的学生们读书相当认真，尤其是跑图书馆读书的风气更浓。为了使学生免于成为“小老头子”，学校很重视体育活动。每到下午四时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课堂、自修室全部上锁，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开着，促使大家去运动。

清华体育馆在当时是第一流的。梁实秋也曾在那里练习过跳木马、攀杠子、翻筋斗、爬绳子、“张飞卖肉”，等等，但他就是不肯下游泳池。据说，第一，他怕水凉；第二，他怕不小心难免会喝一口。所以，据他回忆，临到毕业之日，游泳考试不及格者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另一个就是他了。

清华体育比赛活动也非常多，在校际比赛甚至全国运动会上，也曾出过不少风头，而一些擅长运动的学生，往往成为特殊人物。如果

他们达到某一标准就可以在特设的小食堂去吃饭，其名曰“训练桌”，有人则称之为“雅座”。清华学生本来就吃得不错，平时八菜一汤或四盘五碗，而“雅座”中则有牛奶和更多的肉类和鸡蛋。据说非如此，则训练不出为校争光的运动员来。

据梁氏回忆，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英勇迎战。南洋当时执南方各大学足球之牛耳，清华则为北方之强。赛球那天，北风凛冽，严寒刺骨，结果清华大胜，全校欢腾。清华的篮球也不弱，对手仅北师大与天津的南开可比，年年互相邀赛，各有胜负。梁氏喜好运动，虽非校队，据自称：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在临近毕业那一年，同学住进有暖气和现代化淋浴设备的大楼。那一年功课并不轻松，但心情愉快。梁氏还与吴景超、顾毓秀合作主持《清华周刊》的编务，常常秉烛不眠却乐而不疲。但究竟因即将与校园、师长、同学分手，心中难免依依之情。据梁氏回忆，他当时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淀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酒店）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点薄脆，归家共享。

梁先生对清华、对古都感情之深，是令人心颤的。11月初，台胞可回内地探亲了，恰于此时，梁先生作古，我为梁氏做三日哭。

自学成才的沈从文

已故的沈从文，一生从事过新闻编辑、大学教育和文物研究工作，著有《边城》《湘西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并有《沈从文文集》名世。其实，他原籍湖南凤凰，原名沈岳焕，只在幼年时读到小学毕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现代著名作家。

民国十年（1921）夏，二十岁的沈从文由湖南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他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学毕业，想进大学深造只能是幻想。为此，他便开始了自学。每天早上，吃过两个馒头，他便步行到宣武门内，埋头于京师图书馆，开始研读《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杂书，直到晚间关门时才返回住处。如果闭馆，他便留在会馆读随身带来的《史记》。

半年之后的一天，一位亲戚为他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公寓找到新的住处。此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不注册的旁听生不加限制。而北京大学就在沙滩，因此他便成了这所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北京大学的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间或也听过教授们讲哲学和历史。旁听生终究不是正式生，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由于底子太薄，结果以零分的成绩被淘汰。从此，他杜绝了正式进入大学深造的念头。此后，他一面继续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面在银闸胡同公寓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写成后便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副刊投稿。

民国十三年（1924）冬，他向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诉自己的处境。11月的一天，天降大雪，室内结冰，身着两件夹衣的他，用棉被裹着双腿，坐在桌前写作。这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推门而入。

郁达夫默默地听他倾诉离湘来京的打算和处境。他艰难的遭遇使郁达夫深感惊愕。于是，郁达夫将自己脖子上的毛围巾摘下，披在他的身上，然后邀他到附近一家饭馆用便餐。当郁达夫拿出五元结账时，除花掉的一元七角，找回了三元多全部塞给了他。

民国十四年初，边自学边写作的他，以“休芸芸”的笔名，继续将写成的文章向各报刊投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被刊登在1月31日的《京报·民众文艺》上。有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他寄身的公寓看望，经过交谈，他得知这两位编辑一位叫项拙，一位叫胡也频。

后来，他到上海滩，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与黑》和《红黑》杂志，并参加新月社的活动，还曾转到北平和天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编辑《大公报》和《益世报》副刊。由于他的刻苦自学与顽强奋斗，终于成为卓有成就的一代文化名人。

铁骨铮铮朱自清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有一处没有墓碑和供台，只有一方凸现出矩形水泥盖的墓地，盖上写着：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散文家、诗人朱自清教授，即长眠在此。

朱自清从1925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教授，向来以诲人不倦、治学严谨而著称。他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而且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联系实际，不论教材难易深浅，他都仔细剖析，认真备课。有一门“文辞研究”课，只有两个学生听，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讲解，课后还认真复习和考试。后来这两个学生都成为北大的著名教授和学者，被视为严师出高徒的典范。

朱教授是著名的诗人。他1922年写的《毁灭》和后来出版的《踪迹》等都被认为是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力作。但是，朱教授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散文，如《荷塘月色》《背影》等均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他先后出版的《欧游杂记》《背影》《你我》等多部散文集，在文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朱自清教授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5年“一二·九”运动，北平三万多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反对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他也热情参加。当许多学生被打伤时，他愤怒地谴责政府对学生过于残酷。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抗战两周年时，他热情歌颂抗战，在散文《这一天》中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不断地为抗战的胜利呐喊和呼号，认为只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问题就都解决了。但他却不曾想到，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

支持下，反动派又挑起了大规模内战。于是，他又为和平和正义而斗争，成为一名勇敢的民主斗士。

1946年的7月11日和15日，民主运动战士李公仆和他的老朋友闻一多教授先后被反动派杀害，使他愤怒到极点。在追悼大会上，他不顾特务们的恫吓，挺身而出，写了著名悼诗《你是一团火》。他说："闻一多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他通过搞签名运动，抗议反动派任意逮捕和杀害群众。他呼吁民主与和平，并为清华教授起草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宣言。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6月，他带头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严正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和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气节。

当时，他生活非常困难，患有严重的胃病而得不到起码的营养和治疗，体重减少到只有四十五公斤。但直到临终前，他仍谆谆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不吃美国面粉。"这就是一直为后人称颂的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英雄气概。

“苏门啸隐”郁达夫

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
难得张郎知我意，书眉还为画梅花。

这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于1945年春，在印尼苏门答腊写下的一首诗，同年秋他即被日本官兵秘密杀害。

这首诗是一首题画诗。据说，郁达夫的生前友人于抗战胜利后曾将原画及题诗影印照片寄与郭沫若。画为倒垂梅枝，有一画眉鸟栖于枝端，新云山人所绘。诗即题于画下，诗后署“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

郁达夫这首题画诗粗看似漫不经心，实际包含着深沉的爱国之思。抗战爆发后，郁达夫一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华侨周报》任编辑，宣传抗日，并身兼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做了很多抗日工作。新加坡沦陷前夕，因故羁留南洋，被迫与胡愈之等文化人流亡苏门答腊。为隐蔽身份和维持生活，他化名赵廉，集资开办了酒厂。在这期间，他曾偶然地被逼担任了短时期的日本官兵部队翻译，并曾利用这个职任，营救了不少印度尼西亚人和华侨。但在他终以各种借口摆脱翻译之职后，便被无耻文人和侨奸洪根培告密，继而在日本投降前夕被害。

郁达夫在隐蔽期间，无时不在怀念故国。据说他每日一诗，寄怀情思。“满地月明思故国”，他殷切希望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战；“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他多少回“草檄书生梦里功”，期望河山早日重光；“细雨蒲帆游子泪”，“长歌正气重来读”，是他苦闷的隐居

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曾于苏门答腊作《离乱杂诗》十一首，其中第十首完全可以作那首题画诗的注解：

千里驰驱自觉痴，若无灵药慰相思。
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
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
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只不过题画诗更含蓄、更深沉绵邈罢了。试看“每到春来辄忆家”一句，不正是这位异乡游子爱国赤心的肺腑之吟么？达夫题诗署名“苏门啸隐”，这亦很能表明作者心迹。晋时隐士孙登在山中土窖隐居，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名士阮籍在苏门山与他相遇时，向他请教，但孙登不发一言只是仰天大笑。阮籍不得已下山，正走到半山之中，忽听孙登长啸一声，犹如鸾凤之音。这即为“苏门啸”之来历。诗人恰好居于苏门答腊，信手拈来，表达了诗人欲为祖国抗战长啸效力的热忱。

郁达夫不愧是中国当代一位爱国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诗作在文学史上自有定论，而其坚定的爱国情操更是值得后人赞颂。近闻，在他故乡富春江畔盖起了“双清亭”，以纪念郁氏及其兄郁华，字是茅盾生前所题。可见热爱祖国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由《京华烟云》想到林语堂

台湾录制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已开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四十年的林语堂，又回到笔者的记忆中。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1939年问世的一部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整体结构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类似。故事通过姚、曾、牛三家的浮沉兴衰、悲欢离合，展示出一幅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画卷。1975年，这部小说曾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小说情节波澜起伏，文笔舒展自如，意境不凡，较好地表现了作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浮生若梦、无欲则刚、顺随自然的道家精神。

电视剧拍得怎么样，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港台看这部连续剧，年轻人也许不会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性格和社会情景。年纪大的人看了，又会觉得与书中所写实际人物形象相去甚远。如果此剧由内地影视界来演出和制作，想必更能体现原作精髓，收到形象、语言、情调逼真的效果。因为北京人演北京的故事更能贴切地体现京华风格。不知为什么，内地影视界忽略了这样一个好题材。

林语堂，1895年生于福建龙溪，在北京、上海都生活过。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后来，林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获利甚丰，成为绅士作家。20世纪30年代，他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灵性的小品文，遭致左翼文坛攻击，右翼文人又乘机落井下石，落得个两面不是人。名利双收颇风光了一阵子的林语堂只得落荒而走，到美国去闯荡江湖了。

林语堂在美国文坛赤手空拳地“开码头”，却也一帆风顺。他的《吾国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目中名列榜首，奠定了他在美国读者中的声望。步入中年后，他致力于把中国文化通俗地介绍给世界，四十年间，平均每年有一部作品问世。“七七”事变后，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

> 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他奋笔疾书，尽了一份中国作家的责任。

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1976年3月在香港病逝，享年八十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柳亚子其人其事

在中国当代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柳亚子应是一位很令人敬仰的前辈。他反对封建专制，抗御外来侵略，歌颂新的社会，博得了人们广泛的赞誉。

柳亚子（1866～1958），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被蒋介石通缉，逃往日本。抗日战争期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

据《南社诗人点将录》载，柳亚子在少年时，就能诗善文，颇有胆量，有的诗文矛头直刺清王朝的慈禧太后。

1904年，正当慈禧太后的寿辰之日，十七岁的柳亚子，面对清廷腐败荒淫、丧权辱国等行径，不禁义愤填膺，挥笔疾书《纪事诗》二首，其诗曰：

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

胡雏也解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风。

在清王朝慈禧太后的淫威下，柳亚子竟敢写出这样“触龙鳞”的“反

诗”，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胆量。于是，清廷两江总督端方为此通牒追捕他。

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三改书斋名称，更表明了他高尚的情操。他早年投身革命，因钦慕唐代诗人贾岛的《侠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豪侠之气，取斋名为“磨剑室”，并著有《磨剑室诗文集》。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他因病滞居上海。这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他避居上海法租界，环境险恶，行动极不自由。他眼看着祖国河山一片片沦陷，心中无比悲愤，于是取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意，改题斋名为“活埋之庵”。他在“活埋之庵”中隐居了三年，潜心研究南明史，写《南明纪年史纲》，以南明史实，来抒抗日救国之情。

1941年，柳亚子几经周折，秘密到了香港，住在九龙柯士甸道，他又以“羿楼”为斋名。羿即神话故事中的射日英雄后羿。他以“羿楼”名斋，寓有“射日（本）”之意。他身居羿楼，与旧朋新友频频往来，呼吁抗日，反对内战。皖南事变发生，他立即致电要求“严惩祸首”，但国民党当局却以“反对国策”的罪名，把他开除党籍。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柳亚子于1942年6月7日只身来到桂林，在信义路住下来。回顾九死一生的经历，他遂把书屋题名“更生斋”，以迎接抗战胜利，祈求新社会的诞生。

少年聪慧郭沫若

文坛巨星郭沫若，一生写过许多闻名于世的诗文和剧本，还写了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对联。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即兴对联，充分显示了他的敏捷才思和超群智慧，使人拍案叫绝，争相传诵。

郭沫若幼年读私塾时，有一天老师布置学生背诵《易经》和《周礼》。他和同学们感到枯燥无味，就趁老师外出，一起跑到附近的庙里偷摘桃子。后来，此事被僧人向老师告发，老师很生气地说："你们不好好背书，却去庙里偷桃，想必都学会了。现在你们跟我对对联，对不出的就认罚，若谁能对上就免罚。"说罢，即出了带有责骂、挖苦的上联：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只见郭沫若站了起来对道：

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郭沫若这对联，不仅敢于认错，而且显示出远大的志向。老师见他认了错，更叹服其才，不仅转怒为喜，偷桃的学生也就都免了责罚。

有一年中秋节，郭沫若的家里给了他一吊钱，让他作为节礼送给老师。但他买书买吃的把钱花光了，没有给老师送成礼。郭家历来没有失过礼，老师对此不太愉快，就出了一条上联让郭沫若对，借以试探：

竹本无心，遇节岂能空过？

郭沫若听出了老师的弦外之音，低着头很难为情地道：

松原有籽，过时尽是干包。

这下联暗含歉意：我家原是记挂着老师，本要送礼的，可是钱被我花光了，口袋里就像掉了籽的松包一样，空空如也。老师一听，笑了笑，只好作罢。

有一年春天，郭沫若随同学到四川乐山县城东郊任家坝高山寺游览。寺侧有一矮庙，内有石质的阿弥陀佛一尊，只雕有一个头像，身子却是一块七八尺高的长条石，并无四肢。长条石上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同学们提议郭沫若写副对联。郭沫若向高山寺僧人借来了笔墨，便在两侧写了副对联：

不必现身说法，只要有脸见人。

同学们回去讲给老师听，老师称赞这副对联是讽世之作，并说社会上这种人比比皆是。

还有一次，郭沫若与同学去看木偶戏，看完后，他写了副对联：

光是出头，总不说话，要是松手，又怕丢人。

老师听说后，说这副对联不仅诙谐，而且既讽世又警世，实在妙极了。

当然，就郭沫若来说，这些只能说是小试锋芒而已。后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等，是他天资加勤奋的结果。斯人者，真难能可贵也。

郭沫若之所以少年聪慧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

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杜邀贞虽自幼父母双亡，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仅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的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诗泉”，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20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己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清末时期私塾先生相当严厉，生性顽皮的郭沫若常遭到先生的责打。杜邀贞虽然心疼，但绝不护短，她深知“惜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的道理。于是，母亲不干预先生的教育，只是为儿子做了一顶硬壳帽子戴上，以抵御先生的鞭打。事隔多年，已成名的郭沫若回忆往昔，十分厌恶私塾的“刑罚”，但却念念不忘那顶硬壳帽子，不忘那帽子所凝聚着的母亲的深情。

为了激励儿子的读书兴趣，母亲曾教给郭沫若一首《翩翩少年郎》的游戏诗：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后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这首诗对儿童的好奇心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骑起竹马，抢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啊！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中国一位资深中科院院士认为，天才并非与生俱来，天才是茂林佳卉，必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母亲杜邀贞对郭沫若幼年所进行的诗教，就是这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氮、磷、钾，不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郭沫若这棵参天大树。郭母教子，给后人留下了幼儿启蒙教育和父母家庭教育的启示：在当今现代化教育方式普及之时，不能让传统的“诗教”“缺席”，应有其一席之地，以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博大精深。

拒绝称“王”的老舍

北京现在喜欢称“王”的人太多了，尤其在汹涌澎湃的商海里，不知天高地厚的市侩纷纷打起了“鞋王”“裤子大王”“栗子大王”“牛肉面大王”“板寸大王”（专剃寸头的理发馆）等封号，不胜枚举。由此而忆及拒绝称“王”的老舍，相比之下，更见其人格之高尚，修养之深厚，处世之英明。

老舍是中外知名的京味儿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即以非比寻常的幽默赢得读者的欢迎和文坛友人的赞赏。

1930年3月，老舍辞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职务后，于5月底返京，寄居西城淹通胡同六号白涤州教授家。5月30日，北京文坛名家陈逸飞代表“笑社”（彼时颇有影响的文艺团体）同仁造访老舍，未遇而留一纸书信，谈及欲请老舍做“笑王”事。

翌日，陈逸飞即收到老舍尺牍——“辞王启”，原文如下：

逸飞先生：

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其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按：白涤州教授之尊人）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去叫我一声，我还能抱着“不醒主义”吗？

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轿，其“不王”也明矣。

我星期三（廿八）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嘛！

敬祝

笑安！

弟舒舍予鞠躬

读罢老舍的“辞王启”，即使像褒姒（周幽王之宠妃）这样素不爱笑的人，也会忍俊不禁。至于老舍的幽默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不知使多少读者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岔了气儿。老舍这位出身满族八旗贫苦家庭的人民艺术家，无愧于幽默大师的称号，是名副其实的笑王。

老舍的拒绝称“王”，当然不能和现代商海中诸多自称为“王”者同日而语，然而前贤所树立的榜样，总不应该忘却。

老舍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的谦虚谨慎，深知“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这条万古不变的哲理，更在于他的实事求是，不作非分之想。他在信中所说的“无妃无府无轿”，是句大实话。30岁的老舍，虽过而立尚未娶妻，寄人篱下而无自己的寓所，出门行路安步当车，按照中国的逻辑，还真没有这样寒酸的“王”。与其“受封为王”，莫如“不王”，更何况陈逸飞的信，是“半开玩笑”（陈氏原话）呢。

现实生活中的热衷称“王”者，确实应从老舍的“辞王启”中汲取一些哲理，将其作为一面镜子。

张天翼写作《包氏父子》

《包氏父子》是著名作家张天翼最为有名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某镇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当门房的老包望子成龙，借债供儿子小包读中学，幻想有朝一日儿子出人头地，自己当老太爷坐享清福，因而对小包百般溺爱和纵容。可是小包不成器，只知道追逐虚荣，对女同学想入非非，整日和纨绔子弟厮混，最终闯下大祸而被学校开除。父子二人的迷梦双双破灭。该作品问世后轰动一时。“包氏父子”几乎成了小市民灰色人生的代名词。

张天翼是湖南湘乡人，1906年生于南京，在南京读过小学。1927年从北大预科辍学后至抗战前的一段时间，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常常往返于沪、宁、杭一带。他当过家庭教师、记者、报社编辑、机关小职员，也失过业。但他坚持不懈从事业余创作，终于成为具有高超讽刺艺术风格的著名作家。

张天翼在家族同辈中排行最小。他众多的哥哥、姐姐、姐夫，有当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有当高级军官的，还有当县长、教授的。但他情愿身居僻巷，靠每月三十几元的稿费为生，并不通过兄长去谋一官半职。在南京，他住在白下路八府塘六号他寡姐张稼梅家里。这座大杂院是一所典型的老宅，幽暗、阴森。白天，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空荡荡的大宅院里格外清静。这正是张天翼潜心写作的好环境。他原名张元定，张天翼这个笔名，是根据《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含义引申而来。当他的一个任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哥哥得知作家张天冀就是自己的弟弟时，十分惊讶，特地坐了小汽车到八府塘六号来向张天翼证实。

但张天翼并非只知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他在南京经常和文友聚会。他们或到鸡鸣寺喝茶评文，或登台城指点古今，或荡舟玄武湖上。他喜欢躺在小船上任其漂荡，仰天长啸，引吭高歌。他最爱唱的歌是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都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活力。他还主动和社会底层的各种人交朋友。八府塘一带是小市民很集中的地区，都是些拉黄包车的、杀猪卖肉的、机关小职员、商店伙计、阔人家的门房、剃头理发匠、走投无路的失业者……各种三教九流的人。张天翼都和他们交往，从他们的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小说《包氏父子》中的主人公，就是以落脚在八府塘六号大院的门房父子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由于张天翼长期观察、体验生活，洞察小市民的内心世界，所以作品笔锋犀利，语言幽默，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堪称那个时代杰出的讽刺小说。这部作品直至今日仍然有生命力，80年代还被搬上银幕。人们从《包氏父子》身上看到了不少“国民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近年重游南京白下路八府塘，只见昔日的深巷老屋已成为耸立的楼群，不免产生了沧桑之感。

曹禺南京写《原野》

1936年初秋，二十六岁的曹禺从天津来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上学期，校长余上沅就宣布请曹禺来教编剧，他一封又一封恳切的信件和电报终于打动了曹禺的心。

曹禺果然不孚众望，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他从不摆架子，平常也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邋遢遢。但上起课、排起戏来，却是独具匠心，一丝不苟。比他年轻不了几岁的学生们敬佩地说他是“三位一体”的老师，能编、能导、能演。指导排戏时，他几乎把每个角色都演了一遍。许多后来成名的导演、演员，如凌子风、谢晋、石联星、叶子和项堃等都是他的学生。

当时，曹禺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一到南京他又开始酝酿新作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农村题材领域是一个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农村的现实生活如水旱灾害、谷贱伤农、兵荒马乱、卖儿卖女、铤而暴动……一一摄入他的视野。他想起了儿时的保姆段妈。那是一个农妇，双亲活活饿死，丈夫被东家打死，婆婆悬梁自尽，孩子也被摧残夭折，只剩下她孤苦伶仃。她心地善良，给自小失去生母的小曹禺以深切的爱抚。她是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使他从小就知道，在他家的小洋楼外边还有一个悲惨的世界。

他更忘不了七八岁时在宣化度过的日子。他父亲当时做宣化镇守使。有几次他亲眼目睹了审讯拷打土匪的场面：大堂上“鬼气”森严，高高在上的军法官杀气腾腾，两边站着荷枪的士兵，还摆着刀枪、剑戟和刑具。军法官一声令下，皮鞭无情地在那些土匪的脊背上飞舞，凄惨的号叫声不绝于耳，那气氛活像阴曹地府的阎王殿！这情景给曹禺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一种说不出的悲愤，也许就是这些土匪使他孕育

了仇虎的形象。

宣化的环境也使他难以忘怀。他当时孤独寂寞，衙门的后院是他唯一的去处。这里盘踞着一棵古树，枝杈覆盖了大半个院子。在黑黝黝的树下，他感到仿佛置身于原始森林之中，恐怖极了，这种环境与《原野》中的一些恐怖场景又是何其相似！

记忆又把他带回了天津。离家不远处就是火车站，成天传来汽笛的长鸣和车轮的轰隆声。然而，不断涌入天津的灾民，又使他感到现实是那样的残酷无情。这也启发了他构思《原野》中仇虎和金子双双出逃，正是把火车当作救星，也是向往着铁道远方美好的天边。

曹禺回忆着、联想着、想象着……主人公仇虎的形象渐渐地鲜明了，这是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善良的反抗者的形象。也许是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敲钟人的启迪，作家凭着卓越的想象力和熟练的技巧，演绎出一个情节奇特，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复仇故事。不少剧评家认为作家借鉴了奥尼尔的《琼斯皇》。但据曹禺自己说，他那时并没有读过《琼斯皇》。不过，他对奥尼尔的其他一些剧作是烂熟于心的。他还想到波斯诗人欧涅尔的一首小诗：“要你一杯酒，一块面包，一卷诗，只要你在我的身旁，那原野也是天堂。”于是，他给这个新剧起名《原野》。

石评梅长眠陶然亭

顷闻《石评梅小说集》出版，不禁忆及她与高君宇的一段往事。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书店首由北新书局振臂奋起，随之景山书社、未名社、开明、神州、严华等书店相继开业，各书店受到不少作家的支持，支持严华书店的中坚人物便是女作家庐隐和石评梅。

石评梅，山西人，自幼酷爱文学，作品情意感人，文笔流畅。她的处女作《偶然草》在《蔷薇》月刊发表后，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以后又写了大量的文学小品和新诗，各书社竞相出版。1923年她任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在山西旅京同乡会成立的那天，与青年高君宇相遇。高君为人诚朴无华，品学兼优，曾代表中国出席世界性会议，赢得石评梅的钦佩。高对石女士的文学才华，也颇为敬慕。从此两人便经常往来。

是年秋天，高君宇从西山摘了一片红叶归来，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莫负三秋好光景，惜花持赠爱花人”，邮寄给石评梅。石收到后，已会其意，但无奈已有恋人，于是在红叶后面写了两行字，“我的花篮已装满，请君送往别家吧”，又将原物寄回。高见后痴心欲碎，忧郁成疾，终致住进了医院。

石评梅知道后，在友人的劝告下前往医院探望，以慰高的一片痴情。高在心灰意懒之时，得到石的意外“恩赐”，于是病势骤减，美梦复萌。石女士见高的病体逐渐康复，便好意托人向高婉转相告，自己早有情侣，请高珍重自为。但她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友善的劝告，犹如一股残暴的台风，又一次扑灭了高的希望之火。从此，高君宇病势急转直下，一病不起。

就在高病垂危之时，石女士突然发现自己的恋人原是一个浪荡青年，自己误受其骗。悲愤之余，她毅然与其断绝往来。

不久，高君宇噩耗传来，石评梅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决意亲自料理君宇后事，洒泪将其葬于北京西南角陶然亭，并在墓碑上刻下坚贞不渝的誓言：

>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再来看你的时候。

此后，石评梅常以泪洗面，每与人言：“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未及三年，石女士竟突罹急性脑炎而逝。友人遵嘱，将其葬于高君宇墓侧。

笔者曾游陶然亭，在残阳荒草中，凭吊过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合葬墓，抚碑认字，为之感伤不已。陶然亭一带今已辟为公园，墓亦他迁，不知这一段哀史，还有人记起否。

夫妻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

中国早年文坛上的一对夫妻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闻名于世了。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出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叔华是她的笔名。其父在清光绪年间，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并点翰林。她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在北平文化界崭露头角，当时与林徽因、韩素梅、谢婉滢并称为文教界“四大美女”。

陈西滢原名陈源，西滢是他的笔名。二十六岁在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即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凌叔华当时虽就读于燕大，但在校内外交际甚广，与文坛徐志摩、郁达夫、胡适之等均有往来。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陈西滢担任接待工作，凌叔华恰被燕大推派为欢迎泰翁的代表，由此与陈西滢邂逅。此后二人过从渐密，待凌叔华毕业后，终于结为连理。

1927年夏，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东渡扶桑，作蜜月旅行。翌年秋，陈西滢去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凌叔华偕同前往，二人下榻武昌城西北隅的昙华林。叔华在这里把对童年的怀念之情倾注笔端，写下许多散文和小说，并与邻居袁昌英、苏雪林结为文友，时称“珞珈三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西滢赴伦敦主持中英文化协会。1946年，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次年，凌叔华偕女儿陈小滢前往团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陈西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处境日渐尴尬。台湾当局认为他无所作为，连津贴也停发了。为了度日

他不得不靠鬻文卖画贴补生计。1953年凌叔华用英文写的自传体作品《古歌集》在英国出版后，随即被译为法、德、俄、瑞典等语种出版，颇有销路。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落魄异乡，在法国撒手人寰，享年七十有四。后来，凌叔华将其骨灰带回祖国，安葬于江苏无锡陈氏祖籍。

陈西滢逝世后，年届七旬的凌叔华孑然一身蛰居异城，他乡苦熬岁月，晚景凄凉。当时祖国正处于政治动乱，但她怀念故乡和爱恋祖国之情未减，期待有生之年能叶落归根。直到1989年，形势好转，她终于拖着病体，返回祖国。不久，住进北京石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度过了九十大寿。她的独生女儿陈小滢带着幼子特地从英国爱丁堡赶来祝寿，并为老母亲定制了一个四层高的巨型蛋糕。那天，一些文化名人也来献花送礼。她躺在鲜花、寿礼和生日蛋糕拥簇的病榻上，用微笑对着记者和朋友们，分别用中、英、日文讲了话，对大家的关心和祝贺致谢。此后不久，她的乳腺癌复发。这年的5月22日午后，九十岁的凌叔华老人在北京与世长辞。

萧军、萧红初相识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曾经有一对颇负盛名的作家。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而且同是鲁迅的学生，即萧军与萧红。

1932年，二十五岁的萧军，在哈尔滨认识了民办《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主编裴馨园，用“三郎”做笔名，开始了文学生涯。

这一年6月，裴馨园收到一位女读者的求救信，自称张乃莹，说自己因欠六百元钱被软禁在东兴顺旅馆，狠心的老板想将她卖到妓院。

萧军闻讯，受命带着介绍信匆匆来到东兴顺旅馆，在二楼一间储藏室里见到了落难的张乃莹。

当时，张乃莹二十岁，是个中学生，逃婚在外。未婚夫找到她后，满口应承供她上学，幼稚的她便与其一起住进东兴顺旅馆。时间已逾半年，她已怀孕，而未婚夫却弃之而去。于是，两个人的食宿费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孤女成了人质，老板只好向她一人索债。既然孤苦无援，最终只有被软禁在旅馆里。

萧军递过老裴的介绍信，张乃莹读罢，知道对方就是《国际协报》副刊正在连载的小说《孤雏》的作者三郎，内心十分激动，脸上立生红云，顿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一口气向萧军倾吐了自己曲折的身世和苦难的困境。

萧军虽有文名，但只是个穷作家，自然难以资助。但是，他从室内一张纸片上看到张乃莹写的《去年今日》和《春曲》两首诗，发现自己面前的女子竟是一个才女，怜爱心和同情心遂油然而生。于是，

他留下地址，告诉张马上就去想办法，接张离开旅馆。

事有凑巧，这年8月，因连降大雨，松花江决了堤，洪水浸至东兴顺旅馆，人们都争相逃命去了！危楼四周一片汪洋，张乃莹也无须还钱付债，便乘船离开旅馆，按地址去找萧军。张即将临产，萧军雇车将张送至哈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张不久便生下一女，因无钱付费，女婴也只好弃之医院。

萧军接乃莹出院后，住进哈市的欧罗巴旅馆，从此二人结为夫妻。

1933年，二十一岁的乃莹用悄吟作笔名，写出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在《国际协报》上发表，获得征文奖金，受到文化界的普遍赞誉。这年10月，萧军和萧红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跋涉》。第二年，二人一同到了青岛，萧军在写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开始了《生死场》的写作。

从此，萧军和萧红开始了与鲁迅的通信。不久到上海后就经常耳提面命，受到教诲。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萧红、叶紫组成了“奴隶社”，出版了三本“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三本书都由鲁迅写了序言。

庐隐女士多灾多难

1930年，有一件事情轰动了北京文坛和新闻界：女作家庐隐与比她年轻十来岁的李唯建相爱并结婚。

庐隐幼时名叫黄英。出生那天，恰巧她外祖母去世，迷信的母亲便把她视为不祥之物，不给她哺乳，还令人抱到下房去。奶妈见此，便把她带到乡下自己的家里抚养了两年。三岁时，其父黄举人赴长沙县当知县，船行中途为小庐隐的哭声所恼，一把提起她，就要向江中抛去，一个听差急忙夺下，才得以存活下来。

父亲死后，舅舅把黄夫人母女接到北京。只会念女四书的姨母，当上了庐隐的启蒙老师。由于她执拗的脾气，又挨了不少凶狠的毒打，后来被送到一所教会办的学校。辛亥革命后，她考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一位名叫林鸿俊的远亲向她求婚，她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便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与他订了婚。为了谋生，她先后在北京、河南、安徽等地三所学校里当教员。1919年，二十岁的庐隐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投身五四运动，进而执笔创作，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后来结成集子《海滨故人》。她敏锐地观察着社会和人生，寻找着那些具有较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她痛恨当时的官僚政体，由此遭到未婚夫的反对，于是决然与大学工科毕业要去考文官的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不久，在福建同乡会里，她结识了北京大学的高才生郭梦良，他们真诚地相爱了，但郭在故里有个家庭包办的妻子。经过剧烈的内心矛盾后，她终于不管世人非议，还是和郭梦良结合在一起。他们双双返回家乡，同婆婆及郭之前妻同住在一起。然而这对经过了艰难困苦才结合的伴侣，只在一起生活了两年。1925年10月，郭梦良患肺病

突然逝世了，终年不满二十八岁，遗下一个不足十个月的女孩。庐隐悲痛欲绝，这时，她无节制地喝酒，常常醉得人事不知，然后尽情地哭个痛快。三年后，由北京大学林宰平教授介绍，她结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唯建。李唯建深深地爱上了她，希望她忘记以前的残痕，勇敢地向命运宣战。庐隐乃重新焕发了生气，辞掉了北大附中的教职，和李唯建一起到了东京若干时日。回国后，从杭州到上海，她一面与李唯建过着恬静生活，一面继续着自己的写作生涯。她的著作甚多，除《海滨故人》外，尚有《灵海潮汐》《归雁》《成人的悲哀》《象牙戒指》《曼丽》等十多个集子。正当她乐观热情地投身于生活的时候，却因难产，于1934年5月13日以三十六岁的年纪，结束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林徽因多才多艺

凌叔华女士现居美国，已八十五岁高龄。日前于友人处，见女士近日函札，字迹端谨，文思周密，仍是五十年前典型，寿登期颐，定可预卜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着凌叔华女士的函札，不禁想起与其同时代的装饰艺术专家林徽因教授。林教授去世近三十年了，如果健在，也该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可惜由于长期的肺结核病，身体过弱，较早地凋谢，至可哀也。

林徽因教授当年是有名的才女，既是画家、建筑学家、装饰艺术专家，又是散文家、戏剧家，可说是多才多艺。其先德林长民氏，是著名学者，名宗孟，福建闽县人。清末在东京时，与梁启超是好朋友。民国初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设参政院，黎元洪任院长，汪大燮任副院长，林长民任秘书长，也是北京政府的著名人士。最后林长民给东北军郭松龄做高级谋士，郭松龄倒戈，失败了，为张作霖所杀，林长民也罹难了。以著名学人而不幸死于军阀权势之争，现作历史的回顾，似乎太遗憾了。

1918年，林长民赴英国，其女公子林徽因也跟随去英国读书。她高中都是在英国读的，所以英文特别好，尤其长于口语口译。印度诗哲泰戈尔游北京，演讲时，除了徐志摩担任翻译外，再有就是林徽因了。

林徽因教授是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的夫人。他们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门第相当，情投意合，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为什么说是新旧相兼呢？因为他们是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

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所结的秦晋之好；因为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为子女订了这门婚姻；又因为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所以说是门当户对。

林长民胡子很长，有美髯公之称。民国十年（1921）福建老诗人陈石遗入京赠以诗云：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老诗人的诗记录了林徽因教授的年龄，算到今年也只是八十二岁的老人耳。

林徽因、梁思成二位，一生在事业上也是志同道合。思成教授长期在清华任建筑系主任，夫人则长期任建筑装饰学教授。如果说思成教授的学术偏重于营造学史、建筑工程、工艺方面，林徽因教授则更偏重于建筑艺术的美学方面。思成教授生前，常常爱说“不愧名父之子”，那么徽因教授自然也不愧名父之女了。因而他们来往的好友，更多是文学、戏剧界的人士。近六十年前，他们来往最多的是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陈衡哲、江绍原、凌叔华等，那时，沈从文、焦菊隐等还是初露头角的新人呢。

我最初知道林徽因的名字，那已是远在上述盛会之后了，因为我的行辈晚他们二十多年。我最初知道林徽因，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丛刊》创刊号上。她的四幕剧本《梅真和她们》是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这是沈从文先生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创刊号上还有萧乾、

施蛰存等人的作品。过去我收藏有前四期合订本，思之如在目前，但早已无觅处矣。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世事自当作如是观。而我真正见到林徽因教授，则是更后十多年。我代表一个机关驱车去清华接思成教授审查图纸，这样才有幸见到徽因教授。后来在一次展览会上又有幸接待过她一回，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

关于她的情况，更多的是听另一位老先生说的。她与大诗人徐志摩有一段极为深厚的友谊。早在徐志摩于英国康桥皇家学院读书时，林正随其父在英伦读中学。林的祖辈曾任海宁州知州，同徐父申如先生是世交。异国相逢，自然来往十分密切，这样在英伦海滨种下友谊的种子。数年后，大家又都相聚在北京，不但都成为社会上文化界名人，而且又都是风华绮丽之时，过从甚密，风头之劲是少有的。林家住景山东街，院中有双桔树，名雪池斋；另西山有别墅，林徽因生肺病，住在其中养病，徐志摩经常去看她。用汽车接了她，开到燕园，故意由另一位女文学家窗下轻轻开过，一时传为韵事。一次泰戈尔生日，徐志摩主持在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举行的庆祝会，林徽因扮演“齐德拉”，陆小曼演“卡昆岗”。徐逝后四周年，林在《大公报》文艺版著文纪念，抄几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 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黯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灭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

30年代女作家白薇

近读内地出版的《白薇评传》，忆起了1937年4月，鸥查、董竹尹、王莹、陈波儿等十九位社会知名妇女，在《妇女生活》杂志上联合发起的为白薇筹钱治病的活动。

白薇是当时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的女作家。早年，她为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独自漂洋过海，在日本做工、学习，苦苦挣扎了九个年头。后来，她又毅然辍学返国，奔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投身北伐。她的许多作品，如多幕剧《打出幽灵塔》、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长篇小说《悲剧生涯》等都发生过很大影响。

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坎坷，然而，好像还极少有人像白薇那样不幸：精神上受刺激，经济上拮据，而且还患有多种疾病。

这一年，她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本来一个专靠卖文为生的人就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又重病在身，三五天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顾，而且还要求偶尔来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借药费。

刊登募捐启示的妇女都是白薇的好友，她们请求各界朋友合力为白薇筹一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早日恢复健康。

病中的白薇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之后了。她虽然感激朋友们的好意，但对女记者蒋逸霄说：“大家都在外面做事情，每月挣几个钱过生活，经济上自然不很富裕，还要省下一部分来给我，我心里怎能安适呢？”她迅速发表了劝止的文章。然而等她的文章登出来，上海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基督教会，以及南洋的华侨，已经纷纷

有款寄来。学生们每人捐一二角到一二元，有些工人省下一顿早饭钱。随同这钱寄来的，还有深表关切和同情的信件。笔者犹记当时募到六百零四元，要不是各方看到她谢绝募捐的文章，数目还会多些。当时的物价大约二元能买到一袋面粉，所以六百多元，也算可观了。

据说白薇还健在，居住在北京，算来已年近九十。对于一个曾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来说，这顽强的生命力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大胆的女作家苏青

再度被人们“炒热”的女作家张爱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古代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何许人也？竟博才女张爱玲的如此青睐？

苏青（1917～1982）原名冯和仪，浙江宁波市人。小时候受家庭文化熏陶，后进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学习，这为她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中西融会的根基。不过，年轻的苏青大学尚未毕业就结婚，做起家庭主妇。后来，因婚姻不幸夫妻反目，无以排遣愁闷。为了生活，苏青拿起笔来，写饮食男女，身边琐事，大胆真实，才华显露，成为40年代与张爱玲并驾齐驱、红极一时的女作家。

苏青的“大胆”，从其散文名篇《谈女人》《谈男人》中可见一二。在《谈女人》中，她把《礼记》中的一句话改了一个标点，遂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种大胆的言语，据知当时竟造成轰动。在《谈男人》中，苏青也语出惊人。譬如：“一个年轻的女人必定是爱贾宝玉的，也许等到她懂得世故了，才改变心态宁愿嫁给甄宝玉去。女人爱贾宝玉是想得到甜蜜的爱，嫁甄宝玉只不过想做一品夫人罢了。但亚当夏娃的子孙不幸没有现成的乐园中仙果可吃，要自己流汗而生活，于是男人便选了赚钱，女人自然轮到打扮了。——不过也不必自轻自贱，其目的还是一样的，互相取悦而已。”这种大胆，真是把当时社会笼罩在部分女人面上的一张张面膜给全部挑破开来了。

苏青在《谈性》中更是直言：“我以为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不过，苏青相当看重爱情，并且主张“惜福”，认为“只有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而且任凭有真性也得惜福，

别朝朝暮暮混在一起，因为刺激过度便麻木了”。

苏青的作品虽然受欢迎，但走红之时，也起起落落，一波三折。比如报社来找她写文章，先是叫她别用“苏青”的笔名，因为影响太大，后来又想借“苏青”的大名做招牌，招徕读者。还有人攻击她“小气”，称她为“犹太作家”。对此，苏青驳道：“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而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乱花钱呢，那倒是真的，因为我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我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对朋友不常请客，不过也很少跑到别人家里去吃白饭，我不请人看戏玩耍，不过人家邀请我，我总也是心领谢谢的次数居多。”

20世纪50年代以后，正当盛年的苏青在文坛上消失了。她先是改行为越剧团编写历史剧《屈原》和《司马迁》，不久因为和贾植芳讨论创作致使1955年的“胡风事件”受到株连。“文革”动乱，苏青又在劫难逃。总之，这位创作生命虽短但却富有特色的女作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终于成为一个悲剧角色。

刘云若和他的言情小说

四五十年前，天津有一位以写言情小说享名的刘云若，原名兆麟，天津人。他生于光绪末年，小学毕业后，肄业于天津官立一中，即俗称铃铛阁中学。青年时期富有才华，好写文艺小品，投寄报纸副刊。

王小隐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益智粽》。刘云若常为之撰稿，为王所赏识。后来王小隐转入天津《商报》，遂邀刘云若进《商报》编副刊《鲜货摊》。其后，冯武越创办天津《北洋画报》，沙大风创办天津《天风报》，也均请刘云若任过编辑。

小说《春风回梦记》是刘云若的处女作，连载于天津《商报》，凡此名传三津，为人称道。继又有《歌舞江山》《旧巷斜阳》《粉墨筝琶》《芳草天涯》《酒眼灯唇录》等小说问世，均属言情小说。与张恨水的小说齐名，当时有“南张北刘”之称。

刘云若身瘦而高，一派浊世公子姿态。喜作北里游，又染阿芙蓉癖，经常过着昼伏夜动生活。他的作品大都是在烟灯前偎红依翠，构思而成。所写的小说，多属妓院沦落人的题材；更因熟悉津沽旧事和市民生活情景，他的作品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所以深受读者欢迎。

当时，每当小说一问世，人们就争相购买。

刘云若写稿习惯沿着旧式毛边直行红格稿纸，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每行写一百多个字，却非常清楚。有时随手取一小片纸头，或利用撕下来的日历页，也可作为稿纸。他的连载小说都是每日写一段，足够日报一天排印的字数需要。用稿的报馆派信差到他的寓所或他常去的妓院去取稿。当时，天津各报竞相刊登他的小说。他能在同

一时期，分别为各报写几部不同内容的小说，虽是逐日分别零星写出，而情节层次，各不相扰，头绪不乱。他的身价提高之后，凡向他约稿的必先付稿费，否则迟迟不动笔；供稿中途如稿费偶有拖欠，他便以停稿来威胁。

“七七”事变前夕，刘云若在津自办四开小报《大报》，内容和编排，尚称新颖。因转载上海《新生》周刊杜重远写的《闲话皇帝》，上海发生杜重远被控案之后，这份《大报》在天津也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刊。刘云若长期居住天津，由于才思敏锐，又喜与各行业朋友交往，因而对天津社会有着深刻了解，对天津城各个角落、形形色色的人物非常熟悉。刘富正义感，对当时那些为了生活终日战战兢兢瞧人眼色行事的小职员，对那些沦落青楼、无依无靠的弱女子，皆寄以无限同情。他的小说中，总是以这些人为主角；而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军阀、买办、奸商、豪绅，则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挞，这类人物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是不得好报。

刘云若有一枝生花妙笔，任何故事一经他写来，就令读者入迷。当时京津各报争相登载他的小说。有的报纸，原来销路不畅，一登他的小说，销数立即上升。

刘云若出名比张恨水晚。张因《啼笑因缘》等名作成为上海滩最走红的通俗小说作家时，刘云若才初露头角。而不久后，“七七”事变，华北首先沦陷，张恨水于抗战期间到了重庆，名声远及西南，刘云若则只是困守天津一隅。但在华北、东北，刘云若的名声渐渐远在张恨水之上，尤其是天津，凡对通俗小说有兴趣，或常看报纸的人，可能有不知道张恨水的，但很少有不知道刘云若的。抗战胜利后，刘云若的言情小说难以恢复，加以吸毒多年，身体羸弱不堪，后来，据传说于1949年病逝于津门。

孤独的张爱玲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她的寓所里去世了，终年七十五岁，不禁更引起对她的怀念。

张爱玲生于192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的一名御史，与大名鼎鼎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公子缔姻，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但是张爱玲本人的生活并不幸福。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吸毒嫖妓的遗少，与她母亲——留过学的新派小姐——感情不和，终至离婚。张爱玲从小受尽后母的虐待，不得不于1938年在上海圣玛丽女校毕业后即离家去与生母同住。张爱玲极富文学天才，七岁就开始试写小说，十四岁时写出了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二十岁以《我的天才梦》一文获《西风》杂志征文三等奖。张爱玲二十三岁因发表《沉香屑》等作品而开始出名，就在这年，她与作家胡兰成结婚。但因胡兰成生性放荡，他们的关系以离异而告终。她的这段经历，后来被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写进了《滚滚红尘》。张爱玲在三十五岁那年从香港赴美国定居，第二年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十一年，直到赖雅于七十五岁去世。

从张爱玲成名起，人们就觉得她是一个欢喜离群索居的女性，她一向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她爱一个人独居，数十年里，她极少会见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靠的是信件，就是出版著作也都是通过信函委托别人代理。她的很多作品在台湾由皇冠出版公司印行，可皇冠的发行人平鑫涛与她联系达三十年之久，竟没有见到过她一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了能见到张爱玲，有机会与她交谈，有一位研究者特地搬到洛杉矶她所住的那幢楼房，与她做邻居，连张爱玲倒出的垃圾都作为可能利用的资料收集起来。但当这位研究者与她谈上话，说要访问她，张爱玲立即就搬家离开了这座楼房，使他哭笑不得。

张爱玲最亲近的人不是父亲，不是母亲，不是胞弟，也不是早年的情人胡兰成和后来的丈夫赖雅，而是她的姑姑张茂渊。张爱玲写的话剧《倾城之恋》，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上演时，她姑姑曾写过一篇精彩的剧评。80年代末，张爱玲虽与姑姑恢复联系，能够互通音信，互诉心曲了，但通信时断时续，并不频繁。她的住址对姑姑也是保密的，信只能寄到租用的信箱，信箱又经常变换。张爱玲姑姑去世后则是偶尔向她姑父倾吐情愫了。

张爱玲就这样从不与人来往地独个儿在洛杉矶的住所生活了几十年。

一举成名话“女兵”

在中国当代的女作家中，谢冰莹是成名较早的一位。她把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了《从军日记》。她没有想到，竟会这样顺利地走上文坛。《从军日记》1928年在《中央日报》发表后，得到林语堂的赏识，译成英文，后来又被转译成法、德、日三国文字和世界语。从此，她就成为闻名中外的女作家，甚至引得罗曼·罗兰的欣赏。她和诗人柳亚子相逢于上海。柳亚子非常爱护这株文学幼苗，著文揄扬，不遗余力，并且过从甚密，文友交相誉曰：白发红颜，相映成趣。

她于1922年进长沙第一女子师范读书。那时她经常阅读一些名家的新文学作品，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爱读法国作家如莫泊桑、左拉等的作品。在学生时代写过一篇小说《一瞬间的印象》，这是她的处女作。《大公报》副刊发表了这篇小说后，促使她决心从事文学。

谢冰莹的成名，除了因她学习上努力外，还由于她从小就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生于辛亥革命前七年，在家里激烈反对缠足穿耳，后又违抗母命进入一所男孩的私塾读书。接着转到新化县的女子学校，再转益阳的教会学校信义女子中学；后来是因为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被学校开除，才进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的。1926年毕业后，为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径自跑到武汉，参加了革命军办的军事学校，甘愿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投入了北伐战争。20世纪30年代初，东渡日本。淞沪战役时毅然回国，投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工作。1935年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西方文学时，竟被捕入狱，释放后立即回国。“七七”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写了不少战地通讯。

三年后，谢冰莹的新作《叛逆的女性》《一个女兵的日记》完成了，这次是由林语堂的女儿译成英文后在纽约出版的。林语堂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她坦率的爱国精神，对腐败政治的坚强斗争，对穷困和压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对中国社会传统歧视妇女的反抗，是五四运动后新中国的社会理想主义的典型。她的作品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文学记录。

无独有偶的是，现在在内地的谢婉莹（冰心），也是一位驰名国内外的女作家。比谢冰莹大三岁，人们疑为姊妹。可是，冰莹是湖南人，婉莹却是福建人，过去不在一处，现在也还是遥遥相望呢。

40年代的李霁野

20世纪40年代初，李霁野还不到四十岁，在文学界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人了。他翻译英国文学名著，严谨认真，文笔流畅，颇受读者赞誉。他得鲁迅先生提携创办未名社，辛勤尽责，公道正派，屡受鲁迅先生称赞。1937年华北沦陷后，北京许多文学界知名人士纷纷撤往内地，李霁野是留在北京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他在辅仁大学西语系任教，很有号召力，不少爱国青年团结在他周围。

“七七”事变时，李霁野刚结婚，去天津岳丈家，战火把他滞留在天津达一年之久。1938年秋天，他返回北京，寄寓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4号，这房子是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故居，在北方是一所极有名的宅院。但李霁野租住的却是其中最陈旧的一个小院。

40年代初期，北方文化界已是一片荒芜，出版界满目凄凉。李霁野想筹办一文学杂志，拟名为《北方文学》，以维持翻译界朋友们的生活，及向社会提供一些健康的精神食粮。但在那沦陷时代，怎能容得这种理想的实现？后来，连登记证也办不下来，办刊物终成泡影，他只得一边教书，一边译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百二十万字，大部分是他在这一时期译出的。可惜这部稿子竟在香港失陷时遗失了。

李霁野极重情谊。鲁迅先生的母亲周太夫人和原配夫人朱氏住在北京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21号，许广平在沪很难及时照料。周作人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家住北京八道湾，离西三条不算远，但因和鲁迅不睦，竟连老娘也不去看望。李霁野留住北京时期，便经常去鲁迅故居，承担了照料鲁迅家属的责任，直到1943年1月他被迫离开沦陷区为止。1941年秋天，我曾随李霁野去鲁迅故居看望周太夫人，并瞻仰

鲁迅先生的书斋“老虎尾巴”。周太夫人说绍兴话，我听不懂，便由李霁野做翻译。

四十个年头过去了，一直无缘再晤李霁野先生一面。记得李先生是1904年生，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吧。听友人来信提及，他现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还兼任天津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这位追随鲁迅先生走上文学道路的著名翻译家，诚可谓文坛耆宿了。

李劼人的“菱巢”

作家李劼人逝世已有三十几个年头了。他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都是以四川成都为背景，再现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尤其是那原汁原味的川腔川调，令人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劼人1891年生于成都，曾留学法国，翻译有福楼拜的《马丹·波利娃》、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等名著。他生前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四川文联主席等职。

李劼人的前半生居无定所，先后曾住成都磨子街110号、指挥街118号和桂花巷64号，直到1939年后才定居成都的沙河堡。

菱窠是李劼人后半生的住所。李劼人土生土长于成都，而他的住所却设在城外。那是1939年，日本人的战火已烧到大后方的腹地——成都。二十七架敌机盘旋成都上空，狂轰滥炸。盐市口一带被炸得瓦砾横飞，火海一片。城中的居民哪里见过这样场面，纷纷疏散到市郊。李劼人一家也随逃难大军出城，来到城外沙河堡的菱角堰，在这里购置了一亩土地，盖起了一幢草顶泥墙的乡间住宅，李劼人自名为“菱窠”，意为“菱角堰边的窝”。他在篱院的门楣上亲手书写了“菱窠”二字。

菱窠坐落于绿树繁茂、茵茵田畴之间，庭院旁边一鉴方塘波光粼粼，垂柳依依，一派田园风光。菱巢外形为典型的山川西坝子建筑，即明柱头、宽屋檐、谷草顶、泥巴墙。南端为一大一小两间卧室，中间是书房，北端一间起居室约有二十平方米。室内东西两侧都有木格窗，东窗用一扇屏风隔着外面的视线，屏风后是李劼人的单人卧床，

里面放着一张宽大的书桌，桌前一把木圈椅，南北两侧分别摆着两排书柜。这就是李劼人的卧室和写作室了。他的后期作品都是在这里创作的。

1959年，李劼人得到一笔稿酬，便将菱窠改成了砖木瓦房，并将原来的藏书阁楼正式改为书房。李劼人一生钟爱书籍，他的书库藏书五万余册，仅线装书就有一千一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零七册。

1962年李劼人去世，菱窠渐次荒芜，1983年重新修复。经修葺一新的菱窠，基本恢复了旧居原貌，并在园内增塑了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李劼人胸像。作者是李劼人生前好友、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菱窠内收藏有李劼人的手稿、他生前收集的字画和用过的部分家具。现在已成立“李劼人故居文物保管所”，正式对外开放。

学者实录

“人参状元”翁同龢

清代末年，江苏常熟的翁同龢，于咸丰六年（1856）中丙辰科状元，即入翰林，成为光绪的老师。关于翁氏高中状元，说来有趣，还与两根人参有关呢！

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于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后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对翁同龢热心培育，渴望儿子也状元及第。

清咸丰六年，各地举子云集京城，炫耀才学，问鼎春闱廷试。在这芸芸之众中，翁家的同龢与孙家的毓汶是夺魁呼声最高的人选。论才名，二者在伯仲之间；论书法，翁同龢钻研颜、欧阳，兼及米、黄，孙毓汶潜心董、赵，兼法翁方纲，二人皆称冠绝一时；论家世，翁同龢为大学士之子，安徽、湖北巡抚之弟，孙毓汶则是当朝尚书孙端珍之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状元孙毓龢之弟，皆是门庭显赫；翁同龢从乡试、会试过关斩将，步步登高，孙毓汶亦凭才华，锐意进取。孙家夺魁之意更切，冀望毓汶高中榜首，与其兄毓龢共成“兄弟状元”。

旧时习惯，考生进京城参加廷试（殿试），总是找一家离宫廷稍近的亲戚家或客店投宿。翁家在京城住的地方离内廷稍远。

廷试的前天晚上，孙家以“通家之谊”，接翁同龢到孙家住下。翁家不察孙家之居心，翁同龢之父只给儿子的卷袋里塞进两根人参，作了些叮嘱，便让他到孙家住下。

当天晚上，孙尚书以父执世谊，频频劝酒，将廷试之规定指点了一遍又一遍，一直谈到深夜，而这时孙毓汶早已借故休息去了。

蒙在鼓里的翁同龢，还以为孙家的殷殷之谊是对自己的关怀，颇为感动。散席后，翁同龢已是筋疲力尽，来不及脱衣服，便倒头而睡。不一会儿，孙家院里鞭炮大作，接连不断，翁同龢刚躺下便被惊醒，他一夜也没休息好。

第二天殿试，翁同龢尽管强打精神，无奈通宵未眠，因和衣而睡又受了点寒气，只感到昏昏沉沉，力不从心。他想，这次考试肯定不行了，只好把状元拱手让给孙家了。这时他才开始责怪自己不存防人之心，中了孙家的计谋。他心中一急，猛然想起离家时，家父曾塞给他的两根人参。他赶忙从卷袋里掏出来，一口含下了半根。

说来还真灵，想不到这上好的人参，顿时起了作用。翁同龢只觉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考试时，他挥笔疾书，一份策论一气呵成。

放榜之日，人头攒动，结果是翁同龢第一，授修撰；孙毓汶第二，授编修。这样，后来了解这段掌故的人，便称翁同龢为“人参状元”。记得后来有人还在1946年的上海《新闻报》撰文，称“爆竹声中争状元”。

为此事，事后翁、孙两家虽未撕破脸皮，但彼此却心存芥蒂，耿耿于怀，在以后的政见中常常不自觉地搀杂着私人恩怨。

“冷籍”状元张謇

“讴歌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

这是中国知识界、实业界所熟知并敬佩的张謇于1926年8月24日病逝后，大学教授王毓祥（湖南衡阳人）为其所撰献的一副挽联。上联说张謇在江苏南通致力于兴办实业和教育，对三千里淮海地区的空前贡献。下联除推崇张在东南的“地位”之外，“第一人”亦含有他的身份是“大魁天下”的状元之意。

张謇，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翁，别署啬庵、啬叟、简署啬，人称“啬公”，别号季子，乡人尊称“张四先生”（行四而称），幼名长泰，早岁学名吴起元（因父赘吴氏而兼祧，后还姓）。影射名“章謇”，字直蜚。

张謇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十六岁开始涉足科场。

按当时的习惯，一家三代无人考官学的，叫作“冷籍”。子弟应试颇费周折，张謇便属此类“冷籍”。张家万般无奈，经人介绍张謇便冒认为如皋（在江苏省东部长江北岸，东普置县，距南通约一百五十华里）人张驹的孙子，改名“张育才”，去如皋县应试。

张謇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州试，不过州试成绩不是顶好，取在百名之外。当时的学官宋璞斋，举人出身，很瞧不起这个少年学子，狠狠排揎道：“若有千人应试，录取九百九十九，那么剩下的那个必定是你！”张謇羞惭至极，在住所的窗户和帐顶上都大书“九百九十九”五字，发愤攻读，每夜必耗尽两盏灯油方入睡。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謇终于院试（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取中，名列第二十六名，成了“冷籍”张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秀才。后经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

锦斡旋，张謇仍改籍归宗，恢复原名，成为通州一名秀才。

张謇十六岁考中秀才，三十三岁取中举人。今后每逢“春闱”会试，他便放下幕府文案，奔赴京城应试。但他三进礼部贡院考场，三次都落选。光绪二十年（1894），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特举行一次“恩科”会试。其时张謇已四十有二，有些心灰意懒无意再去应试了。无奈老父一定要他再去考一次，“父命难违”，他借了几个友人的考试用具，极不情愿地步入考场。谁知，竟然取中会试第六十名，礼部复试又名列第一等第十名。

是年4月22日殿试，以一白昼为限。试题是关于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的四道，正中张謇的心意。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为张之万、翁同龢、常麟书、李鸿藻、薛允州、唐景崧、汪鸣銮、志锐八人。在这八人中，最赏识张謇的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阅张謇试卷后，立刻得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结论。“读卷大臣”把殿试前十名的卷子送呈光绪帝圣裁。光绪皇帝经审阅后，在张謇试卷的卷首御画朱书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笔力沉劲的正楷大字。

经过二十六个春秋的坎坷曲折，“冷籍”张謇终于考中了“鼎甲之首”的状元。

清末，江苏南通“冷籍”状元张謇，还是一位亦刚亦柔受人钦敬的人物。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名鼎鼎的张謇，一度还曾是窃国大盗、卖国贼袁世凯的老师。当年张謇曾指点袁读书习字，作文写诗，袁亦以师礼事张謇，在张的面前不敢有半点放肆。袁在书信中称张为“大人”“夫子”。后来袁世凯的官做大了，改称张謇为“先生”，继而呼为“季翁”（张謇字季直）。等到袁做了大总统，便直呼其名字，称他为“季直兄”。张謇在袁世凯政府中任农商总长，自认为是不入流的“十八品”。他曾写信指责袁世凯不学无术，并指斥袁“勿谓天下人皆愚，

勿谓天下人皆弱”，因此袁世凯对他冷淡起来。但当袁称“中华帝国皇帝”位之前夕，却又突然对张謇热情起来，尊崇他为“嵩山四友”之一（其他三友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可是，张謇早已洞悉袁世凯的为人，便写了一副对联挂在自家门前，“官居十八品，世阅一千年”，此联嵌入数字“十八”“一千”。上联道出不愿为“四友”之意，即不拥护袁世凯称帝；下联有阅尽兴亡之意，含有“看你怎样下场”的讥讽之意。不久，张謇便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去了，并痛斥袁为“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之人。

张謇不仅是一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他同时还是一位热情好客、爱才如命、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张謇在他所佩服的人面前，不论是学有专长者抑或是能工巧匠，均尊为上宾，推崇备至。他的住宅建过一阁，叫“梅欧阁”，就是为戏苑名流梅兰芳、欧阳予倩而建的。

张謇还与苏州女绣工沈寿格外有缘。沈寿，原名云芝，字雪君。八岁学绣，二十九岁创造仿真绣针法。三十岁那年，为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绣了《无量寿佛》《八仙上寿图》各一幅。慈禧见了十分欢喜，特赏赐她御书“福”“寿”字各一帧。沈云芝因此而易名为“寿”。1915年2月，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行万国博览会。沈寿所绣的“英女王维多利亚半身像”，获博览会第一金盾大奖。从此声名远播，以至有“绣圣”之称。

“冷籍”状元张謇也极欣赏她的绣艺，特于他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传习所，聘沈为所长。沈寿到南通，寄寓张家。张謇特整修“谦亭”别墅，供沈寿居住，并赠以七绝诗两首，其一为：

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转绾杨枝；因风送入廉波影，为鲽为鹣那得知？

其二为：

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合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

一墅加上两诗，于是众口纷传，颇多微词。沈寿于1921年农历五月初三因病谢世，年仅四十八岁。其时张謇已年近七旬，对沈寿的病逝甚为痛惜，撰联挽曰：

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

此联既痛沈之不寿，中年亡故，更表明他们的关系情同父女，意在辟谣言，正听闻。

王国维死因离奇

北京清华园中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座，碑文为陈寅恪撰。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去世已近百年。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安澜堂前昆明湖中。临终只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四句话，更无其他遗嘱，一代学人，就这样谜一般地自杀了。人们在惋惜伤感之余，不免思考起他的死因来。有的说罗振玉剽窃了他的稿子，有的说罗振玉欠了他的钱不还，等等，不一而足。总是把王国维的死拉扯到罗振玉身上，或者把王国维之死归之于钱，却很少从性格、信仰、学术理论上分析他的死因，所以，总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静安老先生弃世时，正在清华国学研究所执教，同时执教的有梁启超、陈寅恪、吴宓，以及在美国去世的赵元任先生。静安先生去世后，陈寅恪先生在一首挽诗中，有一段注解。其中说：“甲子岁，冯（按：指冯玉祥）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筑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不再辱’，意即指此。遂踏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即指此言。”

甲子逼宫，是指把溥仪赶出故宫。柯、罗是柯劭忞和罗振玉，即三个人相约同为清朝自杀，另外两个人只是唱唱遗老的高调而已，并不想真死。静安却真的学屈原的样子，跳到昆明湖去死了。他一死，一些围着溥仪转，准备重做大官的人，拿他大做文章，说他为清朝而死，为他请谥，让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封他为“忠悫公”。好像有了他做样子，溥仪就真能够再做宣统皇帝了，其实又如何能理解他的思想信仰呢？

实际上，他并未做过清朝的什么大官，也没有功名，只不过是清

朝末年学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而已。在他跳昆明湖自杀时，清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还多得很。连那些王公大臣也还活着，在北京深宅大院中，在天津、上海租界地里，照样吃喝玩乐，并没有人去死，却只有他去死了。因此又有不少人可惜他的呆气，觉得他太犯不着。而静安先生一死，倒变成了一些遗老们的好诗题。浙江诸暨周善培在一首题为《王静安投昆明湖殉国为诗哀之》的律诗中写道："入地觐天知慰藉，十朝待士竟何如？"好像清朝待读书人真的太好了，所以王静安跳湖殉节。人们却不禁要问：你自己又如何呢？清朝那些血淋淋的文字狱的账如何算呢？真是莫名其妙！

静安先生一死，写挽诗的人很多，连跟他相约同死而未死的凤荪老人柯劭忞也写了感怀伤殁诗：

历历三千事，都归一卷诗。
泰庭方指鹿，江渚莫燃犀。
管邴君无忝，唐虞我已知。
文章零落尽，此意不磷淄。

"管、邴"是指汉末的管宁、邴原，都是避乱隐居的人物；"不磷淄"是不薄、不黑，哀伤惜怜之意未变。柯凤荪哀悼王静安，没有把他扯到"殉国"，为大清而死等上去，这是这位清史馆馆长的高明之处。他只是叹息"文章零落尽"而已。从这点感慨王国维之死，多少还沾一点边儿的。

静安先生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始终是位学者，而不是清朝的一名官吏。他生于光绪三年，即1877年。读书之后，并不是去应科举，而是进了学校。1900年前后，他在上海东文学社读书，学日本及西方科学知识。1901年去日本留学，进东京物理学校。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苏州师范学堂教习，教授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罗振玉介绍，到北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当时清政府体制已改革，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领学部，把不少学者都网罗在学

部中。静安先生到京师图书馆编译，后调名词馆协调，这是在清朝所担任的职务。清代分“官”和“差事”，外官小的如典史、县丞，内官如主事、郎中等，再小也有个“衔”，差事是具体工作。严格说来他所任只是“差事”，还够不上“官”。一直到1923年，他才接受了溥仪的伪旨，“在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似乎已经身列清秘了。但那已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二年了。过了一年多，溥仪就被赶出故宫。他这个五品俸实际上是连剔庄货也赶不上的破烂。

在他死前没有多久，正值清华园花开之时，湘人章士钊（孤桐），蜀人曹让蘅、经沅曾去清华看他。死后挽诗起句云：“匆匆执手记花时，危语辛酸最可思。”亦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了。章行严先生逝去没有多少年，可惜生前没有写点儿回忆王静安的文字。陈寅恪有挽观堂长诗，序言对其死因论述甚当。现在《寒柳堂集》已出版，读者可以去看，无须赘述了。

于右任之悲歌

每当经过绍兴古轩亭口，映入眼帘的是那通巍然矗立于街心的秋瑾纪念碑。此碑建于1930年，碑文为学界泰斗蔡元培撰，字则由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所书。从这铁划银钩间，透出于右任对辛亥烈士、巾帼英雄秋瑾的敬慕之情。

一提起于右任，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临终写下的泪血凝成的悲歌三章：

（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三）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三曲悲歌，字里行间渗透着于右任对祖国和故乡亲人的无限眷恋和思念。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一户农家。青少年时代，因才华出众，被陕西学政誉为“西北奇才”。由于言辞激进，被清政府通缉。他亡命上海之后，免费就读于近代教育家马相伯办的震旦学院。与同窗邵力子结为莫逆之交。之后，他相继结识了章太炎、宋教仁、马君武、叶楚伧、李烈钧、陈英士、胡汉民等。由于他才思横溢，文笔犀利，深得《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的赏识，因函邀东渡扶桑一晤。1906年，于右任首赴日本。在那里，他不但见到了梁启超，而且还会晤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并接收了孙中山授予的“长江大都督”之职。

1907年至1910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由于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揭露和讽刺清朝反动统治的腐败黑暗，报道世界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故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也遭到清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其结果是报社被查封，于右任遭通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造成军阀混战，政治更加黑暗腐败。虽然孙中山等百折不挠地斗争，但仍屡遭失败。就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于右任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于右任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主张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在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撰文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今日之事，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同年10月，于右任参加了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之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时，曾多次和于右任恳切交谈，还通过王炳南、屈武（于右任的女婿）等，与于右任经常保持联系。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于右任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文章，伸张了民族正义，鞭挞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出笼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分裂倒退的反共高潮，使于右任深感痛心和不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右任非常气愤，手拍桌子大声地说：“国民党这样破坏两党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叹了口气说：“唉！讲又有什么用呢？”这席话，既说明了这位爱国老人主持正义，同时，也反映了他

当时有心无力的处境和心态。

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起重大贪污案，涉及国民党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执行监察院的职权，对这些权要人物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要庇护这些坏人。于右任对此气愤至极，要求辞掉监察院长职务。为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抗议，于右任负气离开重庆去成都居住。后经蒋介石指派的张群从中斡旋，于右任出于无奈，只好随张群又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亲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于右任。于右任设便宴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一再表示，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再次挑起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离。于右任此时心情十分沉重，常常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

1949年4月21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神速突破长江防线之际，年已七十一岁的于右任受蒋介石的挟持，被迫离开内地去了台湾。这位曾叱咤中国报坛的老报人、诗人、书法大师，从此，过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生活。

于右任到台湾之后，身边除长子外，原配夫人高促林、长女于芝等亲属留在内地，其他子女都居住国外。长期以来，于右任与内地亲友，天各一方，互不往来，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1961年，年届八十三岁高龄的于右任一直为一事焦虑不安。按照时间推算，这年正是夫人高促林的八十寿诞，他是多么希望能为夫人好好做寿呀！于右任的这桩心事，竟为章士钊知道了。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周恩来看完信后立即告知于右任在北

京工作的女婿屈武："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让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同时，周恩来还要屈武带上儿子、儿媳妇一道去拜寿。

于右任的晚年，在政治上颇不得志，常常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前途的悲观，曾几次想辞职。他因困居海岛，沦落天涯，欲返故乡夙愿难酬，内心苦闷不堪。反映他这种心情的诗词不胜枚举，如"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不尽的艰难路""如何久滞天涯"等，真可谓言为心声，情见乎词。

岁月催人老，于右任身体日衰，自感时日不多，乡思更为殷切。他为自己安排后事时，仍念念不忘故乡，他在日记中写道：

> 我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傅增湘藏书万卷

20世纪30年代，笔者在北京曾有机会结识著名藏书家藏园老人傅增湘，深为他那治学谨严、写作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藏园老人号沅叔，四川江安人，生于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十七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早年和父母住在保定，入莲池书院从吴汝纶学习。清末任直隶提学使，曾先后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唐绍仪顾问，出席南北和议。1917年在王士珍内阁任教育总长，以后长期从事古籍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

他和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旧书肆都有很深的交往。由于知识渊博，对鉴定古籍独具慧眼，所以在书贾收购的大量私家收藏的古旧书卷中，尽管已经历了不少古籍专家筛选，但他仍能从中发现极为珍贵的宋元版和名家抄本。因此，他一生搜集的古籍善本中，有的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有些是以廉价购进的。由于老人一生的辛勤努力，不知抢救了多少珍宝免于沦劫。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所收藏——包括祖传——的善本已达六万多卷。他把藏书楼名为“藏园”，又因收藏了两部宋元版《通鉴》，故另名“双鉴楼”，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几位藏书家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根据所藏古籍陆续在《国闻周报》等杂志撰写《藏园笔书题记》，用藏园老人或藏园居士署名。他的“题记”，对古籍版本的考订和评述，在中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评价。

当年笔者见过老人的手稿，除敬佩他对版本研究的精深造诣外，更令人陶醉的是欣赏他的书法。他的文稿，有的是请人誊抄，自己再朱笔点校，有的则是亲笔书写。尤其他那工整的小楷，胜过他的大

字。如以莲池书院法帖赵子昂的《蜀山图歌》和老人书稿对照，其笔迹颇多相似。我曾收藏老人手稿二十余篇，后均于乱中散失。其中最惋惜的是他撰书的《光绪戊戌旋蜀舟行日记》，记述戊戌年中进士后偕夫人序珊由京去沪沿江经三峡回乡的经过，有万余字，我珍藏若拱璧。还有一幅中堂，系老人应我之请而录《项羽本纪》中巨鹿之战的片段文字，不幸都一并散失，殊堪痛惜。现在只存留其两封信札，横十六开浅蓝色木印十行笺纸，左侧下方为篆体杏色印的“双鉴楼”三字，珍藏已四十余载。其他文稿散失后，这几页亲笔信笺就弥觉可贵了。

当年老人住在北京西城石老娘胡同。对于接待我们年轻人，总是以谦逊言辞，循循善诱。据悉，老人已于50年代初逝世，所遗“双鉴楼”藏书均献归北海图书馆庋藏。宝书得传，良足欣慰。

张元济印《四库全书》

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校印出版了大量书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便是其中的一部。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余册，分装六千多函。内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如果将全书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摊开，逐页相接，可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圈，其规模之大，可称得上“世界之最”。

《四库全书》成书后，当时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承德文津阁、潘阳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和杭州文澜阁。可惜未过百年，文汇、文宗皆毁于战火，文源阁后亦被英法联军焚毁。《四库全书》的命运，引起了社会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1919年，中国学者金梁、叶恭绰等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影印《四库全书》的建议。法国巴黎大学新创设的中国学院为扩大收藏，也想影印。翌年法国总理班乐卫访华，再次建议影印，得到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同意。徐旋召张元济至北京，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并愿资助周转款三十余万元，还确定以文津阁藏本按原版影印一百部。估计费时需五六年，耗资约二百余万元。张元济问此一百部将如何销售，对方说：每省一部，每督军一部，学校五部，哈同五部，个人有能力购者十五部，机构有能力者购六部，政府二十五部。张元济建议，要承印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政府出款，商务代办印刷出版等事宜；二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办，政府包销。后终因北洋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巨款，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到1924年，张元济打算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商务印书馆开业三十周年纪念。同时，考虑到商务印书馆若不印此书，在若干时期内，必无人肩此重任，于是呈请政府，要求借印文渊阁藏本。报告批准后，张即派人去北京，准备将全书运沪。谁知正要起运，直系军阀贿选总统曹锟的亲信李彦青忽然从中作梗，阻止藏书出京，影印一事再次搁浅。

1925年7月，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提出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仍用文澜阁本。但正当全书装点完毕，准备起运之际，政局有变，章士钊去职，全书南运事又被迫停止。对此，张元济十分焦虑，他在10月5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印《四库》事……弟尝譬之唐三藏取经，层层难关，均已渡过，此时总算望见大雷音寺矣，白马驮蹄，尚未知在何日，尚望诸大护法家始终保佑。"

1933年，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重提影印之事，决定缩小计划，影印文渊阁所藏中的珍本。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签订合同。商务印书馆聘请专家学者陈垣、傅增湘等十七人，选出二百三十二种，一千九百六十册，编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一千五百部，于1935年7月全部出齐。

爱国学者叶恭绰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二周年之际，笔者想起了爱国学者叶恭绰先生。

叶先生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七岁能诗文，十八岁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第一名。民国时期，历任铁道部、交通部部长等职，为中国早期的交通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叶恭绰先生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是一代著名学者。尤其他的高尚品德，更为后人所敬仰。

1931年，他五十岁生日。作为交通部长，收到的礼物、寿金很多，但他把所得全部捐献以赈济当时的水灾。他购藏了大量文物，但不是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而是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于外国人之手。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贴》真迹，慨然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叶先生曾画竹、松各一幅，分别自题诗曰：

报国效之心似铁，
论交终矢直如弦。

不随高柳弄柔条，
却伴霜松作后凋。

诗为心声，这两首诗道出叶先生赤胆忠心、刚直不阿的气节。

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践踏了大半个中国。叶先生时年六十一岁，避难香港。是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宣战，又攻占中国香

港。敌人的魔爪首先伸向居住在香港的爱国文人志士，叶恭绰首当其冲被列在黑名单上。为逃脱魔掌计，他决定去重庆，便购买了第二日的飞机票。不料，机票虽在手，在临上飞机时却被某党政要员强行占了座位，无法成行。自此，叶先生便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之后，汉奸政权想利用叶恭绰的名望，要他组织文化协会，他拒绝了；继而劝他出任广东省长，他也拒绝了；又请他另立华南政府，出任主席……花样百出，头衔一个比一个大，只要表示亲日，他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此时，他虽然贫病交加，又居铁蹄之下，但他宁死不从，坚贞不屈。一直坚持到第二年10月，才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移居上海。这时南京的汪精卫汉奸政府又派人来找他，请他出山为汪伪政权效力，叶先生仍置之不理。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台湾省被日本占领五十年后归还中国，叶恭绰欣然命笔，以诗致庆：

喜从海外赴炎洲，
百战功勋海底收。
施郑朱蓝都莫问，
且教呼酒酬唐刘。

清末三才女

清末有所谓“三才女”，即吴芝瑛、徐寄尘与秋瑾。这三人曾交换过兰谱，以生死相托。秋瑾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作诗词慷慨悲壮，又喜击剑走马，自号“鉴湖女侠”；后来参加光复会，组织反清起义，不幸事泄被捕，在刑讯中不吐一字，最后凛然就义。另一位吴芝瑛在当时是极享盛誉的女书法家和诗人。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夫是无锡举人廉泉，曾办文明书局，印行过大批珂罗碑帖书画。吴芝瑛书法工瘦金体，书名冠绝一时，并曾抄录经文、古碑、古诗及自写诗作三十余种行世，其斋署名小万柳堂。

吴芝瑛与秋瑾居北京的故宅都在南半截胡同附近，因而结识。秋瑾与其夫琴瑟不和之后，吴芝瑛即接秋瑾至家暂住。后来吴芝瑛又资助秋瑾东渡日本留学，并赠诗一首：

驹隙光阴，
聚无一载。
风流云散，
天各一方。

吴芝瑛在北京最煊赫一时的快事当为她上书袁世凯，劝其顺应潮流。后来笔者曾于琉璃厂书肆购过一册吴芝瑛上书的刊印本，名《万柳夫人上容盦先生书》，“容盦”为袁氏之室名。

另一位徐寄尘是浙江石门宿儒杏伯老人之女，为南社社员。其本名自华，因少年守寡，儿女早殇，孑然一身，故别署“寄尘”。她素承家学，师事南社大诗豪陈巢南，自号忏慧词人，著有《听竹楼诗集》《忏慧词》《秋心楼诗词》等。

寄尘与秋瑾结识于南浔女校，一见各相倾倒，日夕纵论家国，遂订兰契。随后与秋瑾赴上海办《中国女报》，吴芝瑛那时也由北京迁家沪上。吴、徐二人在经济上多方资助《中国女报》。报纸停办后，秋瑾回浙江组织起义，寄尘尝与秋瑾密侦杭州城厢内外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二人谒岳坟时，秋瑾相约如事泄赴义，即请寄尘埋其骨于岳王坟侧。后秋瑾因起义竭于资用，寄尘慨然将家产悉行变卖交与秋瑾。秋瑾大为感动，脱臂上翡翠腕环相赠为纪念。

秋瑾就义后，寄尘冒风雪渡钱塘江，于昏夜秉烛入文种山，将秋瑾遗骨舁至杭州西湖，买岳王坟侧地安葬，又含泪写了碑文。当时吴芝瑛正在病中，闻此大恸，亲撰《秋女侠传》《记秋女侠遗书》等哀挽诗文，又亲笔撰写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的墓碑及墓志铭。寄尘后来又与南社同人结秋社合办上海竞雄（秋瑾之号）女校以示继志。寄尘待秋瑾之女璨芝长成，将腕环交与，并撰《还钏记》。当时中学国文课本入选此文，笔者曾朝夕背诵，至今犹朗朗上口。

王云五奇人奇事

被称为“现代中国一奇人”的王云五，一生虽有过几段从政的经历，但主要是位文化名人，他堪以称奇的事迹亦主要是在文化方面。

王云五，原名日祥，生于上海，老家则是广东香山。其父早年从家乡农村到上海经商。这位外乡人，大概希望最小的儿子日祥能早早在上海商界立足，于是在王云五十四岁那年，送他到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未想到，这个在此之前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儿子更喜文化。他白天在店铺当学徒，晚上上夜校学英文，勤奋苦读，深得老师喜欢。一位师叔还据典故“日下现五色祥云”，为他取名为“云五”。

学徒期间，少年云五先后在上海虹口守真书馆和同文馆修业。为了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他还当过洋行的仓库助理，做过英文夜校的教生（助教）。1905年，成绩优异的王云五被上海私立英文专科学校——益智书室——聘为教员，该校百余名学生中有的已二三十岁，而王云五这年才十七岁。

在同文馆学习时，王云五除广泛阅读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哲学名著外，还开始攻读二十四史、《通鉴纪事本末》等中国史籍。他在益智书室的教员生涯，颇得益于这段苦读经历。

1906年，王云五担任中国新公学英文教员。他的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杨杏佛等。次年，在合并后的中国公学，他继续任教。教书之余，他依然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并通读了三十五册的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被众人啧啧称奇。这期间，不满二十岁的王云五还兼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和上海《天铎报》主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云五利用《天铎报》呼吁革命。1911年12

月31日，在旅沪香山同乡欢迎孙中山的集会上，王云五任主席致欢迎词，受到孙中山的赏识，邀请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不久，他又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科长。教育部北迁后，他继续留任，并兼北京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员。1913年年初，时年二十五岁的王云五离开教育部升任该校专职教授：除教英文，还授政治学和英美法概论。

王云五曾说："我常常好发奇想。"而今年轻人多所不知，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王云五由"好发奇想"而获得成功的一项成果。

20世纪2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从编辑《辞源》着手，开始改进使用起来颇不方便的汉字传统的部首检字法。如商务印书馆编辑所长高梦旦曾设计了字形定位部首检字法；林语堂计划从字的首笔着手，分为五母笔二十八子笔，等等。这些，因为皆不成熟，未付诸实行。但王云五从林语堂的研究得到启发，觉得唯以号码代替部首最为方便。他经过反复研究，苦思深虑，于1926年终于推出"四角号码检字法"。192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了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销路很好。接着，又出版用四角号码排列的《王云五大辞典》，使这种新的简便的检字法得以推行全国。据知，美国哈佛大学的汉文书名卡片、日本京都大学许多教授的索引卡、日本著名的《汉和大辞典》全部索引，均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

谈到商务印书馆，又有王云五的几段奇事。原来，王云五曾几度振兴"商务"，与"商务"的缘分很深。

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原先只是一家作坊式的小印刷厂。自文化名人张元济等加入后，定下"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十多年间很快发展成编辑、印刷、发行配套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五四运动后，时任监理之职的张元济感到商务印书馆应有所改革才能适应时代潮流。于是，先是坚请胡适来馆主持，然胡适却举荐他的老师王云五。这样，1921年9月，王云五应邀进入商务编辑所，并被高梦旦"让贤"任所长。

新所长果然不孚众望，很快写出一份长长的《改进编辑所意见书》，对改组所内组织、聘请馆外专家、精选出书选题等，都提出了远见卓识，深得张元济、高梦旦的赞同。1922年以前，商务印书馆每年的出版物一般只有二三百种，经王云五改革后，一年时间，就增达六百六十七种。五年中，商务印书馆出书之多，已俨然如一个小型图书馆。可以说，王云五使商务印书馆大大振兴，商务印书馆也使王云五在中国教育文化界的知名度日益提高。

1929年秋，王云五应蔡元培邀请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曾一度离开商务印书馆。不料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突然逝世，张元济等力主请王云五回馆接任总经理。于是，1930年年初，王云五正式出任商务总经理，并为实行科学管理，旋即开始了他的环球考察之旅。

他从日本到美国，又抵欧洲。短短半年，他考察了九个国家四十多家企业，访问学者专家五十余人，参观团体、研究所二十个，到图书馆研究十余日，阅书三百余册，搜罗刊物千余种，写成笔记四十万言。在回国的船上，他草成七千余字的科学管理计划，工作效率之高，令人称奇。

当然，王云五如此得到的科学管理办法，在“商务”获得了成功。

抗战期间，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再次立下奇功。

先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地处闸北地区的商务印书馆总厂遭日寇飞机轰炸，化为废墟。王云五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善后办事处”，日以继夜，连续一个多月抢救“商务”。为此，其时只有四十五岁的王云五已须发全白。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宣告复业。王云五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作为复兴口号。仅三个月，商务又每日出新书一种。至1937年年初，大批有影响的图书又从商务印书馆源源不断地进入千家万户和各地图书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商务印书馆再遭劫难。王云五毅然决然挑起商务印书馆第三次复兴的重担。抗战时期，物资奇缺，王云五发明一种书籍排印新版式，使每页增排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的字数；又采用轻磅纸印书，发明极薄的航空纸型，以利运输，商务印书馆再恢复日出新书一种的记录。

20世纪50年代初，王云五定居台北，直至1979年8月14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章士钊与沈尹默

长沙章士钊，字行严，号孤桐老人，一生写文用文言，直至九十高龄。章先生在十余年前完成洋洋巨著《柳文指要》，仍以文言行文，不改初衷，而居然能获出版；似此一生遭遇之隆，在中国文人中，亦只此一家，再无第二人矣。前曾写小文介绍他写白话诗，与胡适之先生交往。今又想到他与五四运动另一健将沈尹默先生的交往，虽为新旧文学战垒中不同主张的人物，而私交弥笃。

章行严十七八岁即出人头地。清末与太炎先生在上海办报，后又到英国牛津留学，学习逻辑，办《甲寅杂志》，鼓吹文言。1925年在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任上，为女师大杨荫榆事，与新文化健将战斗白热化，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被鲁迅称为“章士钉”。“三一八”惨案之后，营垒就更为清楚。

沈尹默先生与孤桐老人早于1907年在杭州时，即有深厚交往。1917年又因蔡元培、陈独秀的关系共事于马神庙京师大学堂（当时沙滩红楼尚未盖好）。陈独秀因沈尹默之荐，被蔡元培延聘到大学堂为文学长。与陈独秀与章士钊曾于1903年在上海共同办《国民日日报》，陈延聘章为大学堂图书馆长。这样故人重逢，诗酒往还，过从甚密。惟孤桐老人虽学识渊博，才气横溢，而毕竟是官场中人，大学堂的图书馆长，虽甚清高，当时工资有四百银元，亦不为少，而对一位想抓大印把子的人来说，是不屑于长久为之的。因此，只在大学堂一年多，便弃之而去。他积极周旋于安福系、交通系各北洋政治帮派之间，去做总长了。

1924年11月，段祺瑞组织政府，不设内阁总理，阁员为安福系骨干龚心湛、李思德等。章士钊出掌教育部，又因段置冯系人物薛笃

弼为司法总长，薛拒绝入阁，章士钊又兼了司法总长，这在北洋政府的各届内阁中是仅见的。因此，以办《老虎杂志》（《甲寅杂志》，封面为一只老虎）而出名的孤桐老人，此时又膺了“老虎总长”佳誉，都人说起，也无谈虎色变之感了。这是他仕途上最得意的时候。总长公馆在西四北街南魏儿胡同，大红门外，汽车、马车、黄包车不断，真是风光一时。而“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又是主要负责者，舆论自然集中在他身上，老友沈尹默也公开声明，指其为罪人，要天诛地灭，表示与其断绝朋友关系。

孤桐老人是诗家当行，同光俊哲。北伐之后，孤桐老人再度放洋，远走英伦，其《伦敦郊居寄人》诗云：

廿载天涯去后还，郊园小小足舒颜。
野眠独息怜幽草，晓坐枯眉润远山。
忧国不弹无益泪，读书宁为有心闲。
来禽怪少门前客，侧目窗棂代疑关。

《逸塘有孤桐抵英有诗见怀奉训通酬》云：

羸颠项蹶本同沦，谁与神州寒乱源。
阅世坐怜肠太热，解嘲失哭舌犹存。
沉沉举国方酣睡，惘惘思君欲断魂。
多少罪言今已验，伤心何忍话前番。

在章孤桐远游英伦的时候，沈尹默先生仍在北京。当时南京教育部把北京工业、医学、女子文理、农业等国立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平大学，沈尹默被任命为校长。但这个校长不好当，不久他便辞职，索性连北大教授也不做，回到上海卖字过日子去了。此际孤桐老人也由英伦倦游归来，息影上海，挂牌做大律师，词锋敏锐，有老虎律师之誉。知尹默先生来沪鬻字，遗书安慰之，大意云：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尹默先

生得信后，感到其意拳拳，因而不仅前嫌尽释，而且在上海过从更密，诗简往还，几无虚日矣。

抗日战争时期，二人都到了后方。1941年，孤桐老人旅居桂林，遥寄重庆尹默先生《玉楼春》云：

几多词句情依旧，折尽风林无限愁。
只缘知律眼前稀，说与前山客独秀。
别来总是愁时候，纵有燕翎书不就。
一篇花雨独思君，难问东阳先问瘦。

末句东阳指浙地及尹默先生别号“东阳仲子”。“瘦”用沈约瘦腰典，切人切事，押韵非常俏劲。尹默先生《答行严》云：

风雨高楼有所思，等闲放过百花时。
西来始信江南好，身在江南却未知。
花光人意日酣酣，容我平生士不堪。
说看江南放慵处，如君怎不忆江南。

胜利之后，二位又一同回到上海，孤桐老人时往虹口海宁路东阳（原“洋”）街看望尹默先生，沈有《答行严过访诗》云：

自笑居桓爱楚狂，归来行径却平常；
字同生菜论斤卖，尽取幽篁闭阁藏。
惯会底径遇赵李，剧谈时复见刘王；
烦君为说闲中事，已足人间一世忙。

诗中可以想见二人风度了。孤桐老人作古十年了，此文聊作纪念吧。

钱钟书记忆力惊人

近读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杨绛女士的新著《回忆两篇》，其中有一篇是写她的丈夫钱钟书先生的，从中颇获教益。

钱钟书先生是当今举世公认的大学问家。有人曾给他的《管锥篇》作过统计，说这部稀世巨著中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有近千人，被征引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百种，由此可见他学识的博大了。

20世纪40年代，笔者居京就学时，钱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惊人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喊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在图书馆中遍寻未获，正巧碰到了钱钟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哪一个架子的哪一层，哪一本书中便可查出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冷僻的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那时，钱先生只有40多岁，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围城》《谈艺录》等著述，早令世人佩服。钱先生的笔锋犀利，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产生敬畏之感。还记得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他没有好好思考，只是从几十本书中东抄西抄凑成一篇，草草交账。钱先生看后，不加一句评语，却把他所引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都笑话这位同学，但从心里不得不佩服钱先生的学识和记忆。

钱钟书治学十分刻苦，当时清华所藏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他的名字。那时流行的一本词典是《简明牛津词典》，别人的用了几年仍很新，而钱先生的已相当旧了，并且每一页的空白处都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可见他花的功夫之深。

有人问钱先生藏书有多少，他幽默地回答：“多乎哉？不多也。”可见他并没有藏书癖，但又常见他隔几天就去图书馆抱一大堆书回来。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他又最有藏书癖，只不过他的书都藏在脑子里了。学生们每次论文答辩前，都有一个想法：其他老师提问，或许能应付，若此老一发问，便会措手不及。

李石曾与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建院已经七十周年了，在庆祝和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为创建故宫，为保存祖国灿烂文化而做出贡献的李石曾先生。

李石曾是李煜瀛先生的字，他的笔名石僧，晚号扩武，河北高阳人，1881年生于北京。其父李鸿藻为清朝重臣，曾任清廷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青年李石曾震动极大。越二年，他前往法国留学。其间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反对殖民主义，鼓吹推翻清政府，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并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直到1973年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担任国民党政界上层职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李石曾作为国民代表、北京警备司令、警察总监率军进入紫禁城，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皇宫。之后，李石曾连日与清室会谈洽商解散清室警卫队、太监、宫娥、雇人等，并接收国玺三十颗及点收封锁各宫殿房屋，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为委员长。

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后，对驱逐溥仪出宫十分不满，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并设置重重障碍，干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段祺瑞政府的国务会议决议五项清查办法，遭到李石曾严辞拒绝，并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点查清室物件规则》十八条。排除了各种困难，使大量珍贵国宝在战争频仍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存下

来。经过近一年的清点、注册和整理工作，创立故宫博物院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

1925年，李石曾召开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和《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他亲自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悬挂于神武门上。而且亲自主持了在乾清宫举行的，有数万人参加的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典礼。从此，历代皇帝私有的皇宫变为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在192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李石曾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清故宫须为活故宫》的演讲。他说：“故宫为历史上遗留之建筑物……希望故宫将不仅为历史上遗留下一个死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的一个活故宫。以前的故宫，系为皇帝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个公字。”

1987年故宫博物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游览。

《四库全书》与张宗祥

在西湖孤山之巅，楼外楼菜馆旁，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飞檐挑角，碧瓦绿墙，高大轩敞，坚实牢固，显得典雅雍容，气势非凡。它就是国宝《四库全书》的藏书处，青白山居。

《四库全书》原藏于西湖文澜阁，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并称为“江南三阁”。它们和“内廷四阁”——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行宫的文津阁以及沈阳行宫的文溯阁各藏有一部《四库全书》。七大书阁现存四阁，其中江南三阁仅存文澜一阁了。而另六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大都毁于战火，唯文澜阁所藏基本完备。

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职的张宗祥，热心古籍，喜寻访善本、孤本，抄校古书。1922年他在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鉴于《四库全书》在咸丰年间被损，虽经丁氏兄弟搜集补抄，缺书尚多。他奔走沪杭、北京之间，筹款补抄，历时两年，抄得缺书四千四百九十七卷，重刻丁氏抄本五千六百余卷，并亲自题写全部书签，《四库全书》始得完整。

据说，张宗祥一生共抄、校过珍、善本六千余卷，常常是凌晨起来喝一杯水，准备好十多个装满烟丝的烟斗，即开始伏案抄书，一天能抄一万五千余工整的毛笔字。久而久之，抄写功夫愈练愈深，有人喻之为已到了“摆棋谱式”的高超地步。他打开一页古画，有时先从页中心写上几个字，接着从这几个字的旁边布局慢慢写开去；有时先在页的四角抄几个字，再像下棋似的布局抄去，竟能一字不误。有时家里高朋满座，他还可以“五官并用”，边抄边谈，亦一字不错。当时曾有人称赞他的抄书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来并不过誉。连鲁迅、茅盾等朋友都戏称他为“打字机”。他的许多手抄本及底稿，均

由浙江图书馆珍藏。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飞机经常到杭州上空轰炸。为保《四库全书》这一国宝无虞，浙江图书馆全馆工作人员投入突击搬迁任务，将《四库全书》和其他善本书分装成二百八十余箱，先运往富阳渔山，复转迁建德，再迁龙泉，最后辗转运到贵阳，安排于山区地母祠，设浙江图书馆《四库全书》管理处。到1944年12月独山战役爆发前，他们感到贵阳仍不安全，再由贵阳运到重庆青木关。其中爬山越岭，备尝艰辛，押解人员都分外的细心负责，使国宝安然无恙。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正欲将《四库全书》运回杭州，却又平地起波澜。贵阳、重庆两地均先后提出，要求将《四库全书》留在该市。作为《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主任的张宗祥深感责任重大，他又多方奔走，四处游说，终以乡梓之情，说服了两地政府，同意将《四库全书》放行，于1946年5月自重庆青木关起运，于7月上旬安抵杭城，这才结束了《四库全书》历时九年颠沛流离的逃离生活。

爱国文人沈兼士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游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并加入同盟会。1928年，他任天津中日中学校长。因日本人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屠杀中国人，他为此愤然辞职，以示不与日本人合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不久，他任该院文献馆馆长，在“七七”事变北京沦陷的第二天，他就拒绝去文献馆上班。后来敌伪在北京组织“治安维持会”，派人登门邀他出来主持文献馆工作，他拍案把说客赶出门外，并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做事！”

沈兼士在沦陷的北平发表不少文章，后均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文末落款“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又一篇题为《景、杀、祭古语同原考》，文末落款为“二十八年除日写于北平寓庐之识小斋”。还有一篇题为《吴著经籍归音辨正发墨》，文末落款为“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文章的款识使用“抗志斋”“打鬼节”“除日”等词语，反映了他反日、抗日、除日的坚强信念。

1941年，北平辅仁大学高步瀛教授病逝，他送了挽联。上联是“冀北马群空，后进何知失大老”，下联是“天上搀枪落，家祭勿忘告乃翁”。显然，上联是慨叹大雅云亡之意，下联借古喻今，是用爱国诗人陆游诗句言高氏虽赍志而殁，但雪耻之心是尚存的。其中，“搀枪落”是比喻。“搀枪”在《尔雅》里解释为彗星的别名，《广韵》解释为妖星。妖星陨落世人皆欢。言外之意，日寇完蛋之日，万民欢腾之时，家祭时千万别忘了奠告过世之人的在天之灵。当时，挽联是用篆文写的，虽能遮常人眼目，但略通文史的人都能懂其义，不少吊丧的人见了，都为他捏着一把汗。但他本人却大义凛然，应酬如故，处之泰然！

第二年，他时任华北文教协会主任委员，已被敌伪列入黑名单。在亲友和同事的劝说下，他于12月潜出北平，辗转到大后方重庆。在他写的《入蜀杂诗》小序中说：“去岁由贼中违难入蜀，自冬徂夏，家讯渺然。会有客从北平来，将余女君健近画雪景一帧，报平安，谓敌卒时至家中刺探余踪迹，属必寄书，恐为所持。”

沈兼士在为其二哥沈尹默亲家谌揖山写的挽词中，末两句说：“他时讨虏成功日，寄语贤郎靠祭筵。”又有《九日用少陵韵》一首，末两句云：“引领官军收蓟北，放歌燕市荡胡尘。”这些诗句，既表现了处在大后方的他对日寇铁蹄下敌我争伐的关注，也表现了他蔑视敌寇的豪迈气概。

“厚黑教主”李宗吾

近年来，《厚黑学》一书在内地十分畅销，一些盗版者还借此发了财。

该书作者李宗吾（1880～1946）是四川富顺人，原名世楷，字宗儒，后来因敬仰明朝惊世骇俗的学者李卓吾，而改字宗吾。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民国后历任中学校长、四川省议会议员、省都督府官产清理处处长、省教育厅督学、四川大学教授等职。

清末民初是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再加上四川特有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诸因素，而形成了当地纷呈百态的社会世情。这影响着李劼人写出《死水微澜》，巴金写出《家》《春》《秋》等小说名著。而同为四川才子的李宗吾另辟蹊径，写出了一篇篇嬉笑怒骂、刺世警世的杂文。

李宗吾出身前清儒学生员，酷嗜中国传统文化，熟读经史子集，入师范后又专攻理化专业，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也算得上学贯中西。他官虽不大，却久混迹于官场，身经宦海浮沉，洞察官场黑幕，再加上常与社会上五光十色人物打交道，熟悉世情民风，故常思考如何将种种人生感受形诸文字。

有一日深夜，他（当时任校长）听到隔壁教务主任的寝室内传出愤世嫉俗的狂呼：“方今之世，非脸皮厚、心子黑不可！”不由得触发契机，顿有所悟：“得之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遂以“成功的秘诀在于皮厚心黑”立论，搜罗古今中外由厚黑决定成败兴废的典型论据加以论证。如他说项羽之所以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全在于他的厚黑功夫欠佳，仅能逞匹夫之勇；刘邦则连自己的

亲生父亲和儿女的性命都不顾，厚黑透彻，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其实此论只夸大一点儿而不计其余，楚汉相争的结局是由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虽然李宗吾文章都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但在当时，处于重负之下的民众特别欢迎抨击人间不平、扬清激浊的言论，对李宗吾出语新奇，揭露虚伪丑恶的社会现象极易引起共鸣。

李宗吾的《厚黑学》全书分“经”与“传”两卷：“经”仿《老子》五千言的体例，“传”仿《左氏春秋》的叙事法。全书于1912年在四川《公论日报》副刊上连载一月余，声震遐迩。后书商遂出版了单行本，销量极大。某日，李宗吾路遇一军官，对他行军礼，敬佩地说：“我是您的忠实信徒。”从此，李宗吾常自称“厚黑教主”，而朋友们也以“教主”称之。

李宗吾后来还写了若干与“厚”“黑”有关的书和文章。抗战中，吴稚晖入川后，读了他的《厚黑丛话》，并对《心理与力学》等文章赞不绝口，急欲一识其作者。李宗吾闻讯，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到重庆拜会了吴。

“学人疯子”刘师培

近代中国，有三位国学造诣很深，来往密切，被世人称为“近代学人三疯子”大师，他们是章太炎、刘师培和黄侃。这里只说刘师培。

刘师培生于光绪十年（1884），出身于书香门第，精于音韵训诂学。他主张以字音推求字意，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他还擅长骈文。

刘师培早年醉心于民族革命，1903年在上海时，认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因所治学术相同，彼此一见如故，关系极好。他因赞成“光复”，特改名“光汉”。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他以“刘光汉”的名字和章绛（章太炎）、黄节、陈去病等在上海倡办“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刘的大作《攘论》《中国民族志》，均系鼓吹革命、传诵一时的名文。其后亡命日本，娶了风流一时的名交际花何震为妻。不久便回国入端方之幕，做了出卖志士的鹰犬。辛亥之后，差点儿送了命。多亏太炎先生“若杀叶德辉与刘光汉，则中国读书种子绝矣”的一封电报，才救了他的命，并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文科讲学。不料他在讲学之外，又为袁世凯所收罗，官封“上大夫”，成为筹安会的六员大将之一。因刘师培经常不修边幅，平时蓬头垢面，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看上去颇像一个疯子。有一天，有位朋友来看他，但见他一面看书，一面吃馒头，桌上摆着一碟酱油，边吃边蘸。因专心看书，入了神，不觉把馒头蘸到墨盒里而不知，弄得满嘴墨黑，全然不知。

1915年秋，袁世凯想要当皇帝，“筹安会”应运而生。刘师培发表了一篇《告同盟会诸同志》，大唱“民族革命已成”的论调。而在这之前几天，刘师培曾跑到黄侃家里，向他大谈“纪元”问题。他说：“我们

写文章要纪年，总写什么甲子乙丑，但六十年一转，这干支就弄不清楚了。而元年、二年地写下去，也不方便，你说如何办？”

黄侃听不明白他的用意，便说：“这没什么，用年号来纪年，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以前写文章的，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欧洲各国，都用耶稣生日来纪年，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刘师培听了，无话可说，只好辞去。

不几日，“筹安会”发起人的名单在报章上公布了，刘师培的大名，赫然排在第六位。黄侃见了，这才恍然大悟，方知前几天刘师培来谈话的用意，是在为袁世凯拟年号。翌日，刘师培又来访，对黄侃大谈“君政复古”，还说想邀请一班学者参加“筹安会”。话未说完，黄侃就大怒起来，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说道：“刘先生请！刘先生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这般书呆子，不配做‘佐命之臣’，你请吧！”说完，不等刘师培起身，自己已拂袖进屋里去了。

袁世凯称帝破灭之后，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一般朋友看他不是气节之士，都不愿与他再来往。

1919年11月，刘师培病逝前夕，特意把黄侃请到病榻前，从枕边摸出一本抄本，颤抖着递给他，说：“我一生只会论学，不该问政，一念之差，追悔莫及！这一本音韵学，是我毕生研究的成果。此学非公莫传，我把它交给你，算是我临终自赎的一点儿心愿吧！”说时，气促声嘶，音调异常凄咽，令黄侃激动，急忙跪下给他磕了个头，拜他为师。这一年刘师培只有三十六岁。

刘氏是一个贪图名利玩政治火把的政治投机家，但其等身的著作，却是他同时的其他人一般都比不上的。他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旁及释、道经典，几乎没有一门不精通。家居时手不释书，专心致志，常常到了如醉如痴的出神境界。

刘师培的著作在他生前刊行的并不多，有《国学发微》《左盦文

集》《读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数种。他去世后近十年，他的生前好友、曾在20年代出任过天津市长的山西人南桂馨，广泛征集他的遗著，捐资十万元为其次第刊印，并委托郑友渔整理校勘。其目录极为丰富，内容也极广泛，范围所及有：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周书、尔雅、小学、国语、管子、穆天子传、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白虎通义、杨子、道教、两汉、敦煌石室、楚辞……

此外，还有在北大文科时所编的经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伦理学、中国文学、中国民俗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籍及讲义，虽然有不少原稿均属未完之作，但大多数还是完整的，在其短短的生命史中，完成这许多著述，实在是不寻常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著述，如其重要著作《左传疏证》稿本，早在四川时就已散失了。

他的诗也颇豪放，有一首《书扬雄传后》五古，其结尾四句道：

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
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

今天谈论他，也有些“空踌躇”之感了。

马一浮轶闻

近闻马一浮弟子龚慈受的杭州故居辟为“马一浮纪念馆”，而且《马一浮全集》亦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想起他当年的一些轶闻。

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精研儒学的一代宗师，是深通内典深悟不二法门的当代维摩居士，堪称集哲学家、理学家、佛学家、翻译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师。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人。乳名福田，后更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父名廷培，曾任四川仁寿县令。母何恭人，出身于陕西丐县望族，擅长文学。一浮八岁学唐诗，九岁能诵《楚辞》《昭明文选》，记忆力惊人，有神童之誉。他初受业于郑墨田，稍长，他父亲为他延聘一位乡里中有名望的举人，来家教读。十六岁那年，与启蒙老师郑墨田同赴绍兴府参加会稽县考，发榜之日，师生同中秀才，而马一浮名列榜首。同考者还有会稽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马的一篇县考应试文章全用古人文句集成，竟然天衣无缝，宛如己出。闱卷流传，人人惊叹。当时的绍兴名流汤寿潜（蜇先）大为赞赏，挽人执柯，许以爱女汤孝愍，次年结婚。一浮十九岁丧父，翌年又遭丧妻之痛，他伤心欲绝，说：“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自此遂无再婚之意。”从此断弦未再续娶，一心向学。

马一浮早岁游学美、日诸国，通习英、法、德、日、西班牙和拉丁等多种外语，博研海外诸学，译著甚丰。1906年二十四岁定居杭州，潜心于祖国文献，广览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典籍，兼精佛乘与老庄之学。凡深知马先生者无不敬仰。弘一法师李叔同称赞马先生

是生而知之者。马一浮讲学，每次开讲前，都事先穿好袍褂礼服，端坐以待。案上必放鲜花一瓶，讲堂气氛肃穆安详。有人曾问马师法何人，他微笑答道："直接孔孟。"并以此四字镌刻一印，可见其自许之高。

马一浮在经、理、佛、史、文等方面皆有很高的造诣，因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享誉海内外。1911年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被聘为孙中山临时政府的教育部秘书长。到任不久，便提出"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让我回西湖去读书吧"。从此便一直寓居西湖，潜心经史子学，不再涉足仕途。其间，除1937年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去浙大讲学和随浙大一起内迁外，抗战胜利以后，即又回杭州。

说到马一浮对杭州人的贡献，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建杭州城站时，他的岳父汤寿潜在主持浙江铁路事务。铁路从嘉兴过来，原来地图上铁路线画到了拱宸桥的日租界。马一孚看了地图坚决反对，以为这是把市场送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后来改了图，把今日的城站做了杭州火车站。另一件是袁世凯曾送了数千大洋给汤寿潜，想贿赂他拥护自己做皇帝。也是马一浮帮着出了主意，把这笔款作为公用，后来建造了浙江图书馆。

马一浮一生中，受到众多人士的爱戴和推崇。在蒋庄生活期间，除了政府接济他的生活外，海内外的许多景仰者也给了他不少帮助。比如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就在他患白内障时，多次送钱物供养。为此，马老曾风趣地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连和尚的东西都吃到，可说是吃十一方了。"广洽法师还在新加坡出版了马一浮手书的《弥陀经》。

马一浮幼年时，即能诗善书，初习欧阳体，俊整秀发。二十岁后，通临魏晋南北朝书。其后，复探源于篆籀，穷奕于分隶，集众善而成家。他的手迹早在20年代已为名家所珍视，30年代即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当代书法家。旧时代学者文人多订立润格卖诗文，卖字画。

上海有李姓巨商，为纪念他母亲，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署笔题褒。因马一浮不卖艺，独缺其杰作。后来这位巨商探知马多与和尚交往，乃请一老僧陪谒马先生，一见便下跪叩头，求撰墓志，马为之感动，允其所请。他日撰就，手自端写与之。

50年代后，马一浮被任命为浙江文史馆馆长，后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享寿八十五岁。

一代奇才李叔同

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影片《城南旧事》，不久前在马尼拉电影节上被评为最佳影片，并获得金鹰大奖。影片中有一首插曲，名《送行》，歌词感人，不禁使人想到歌词的作者李叔同。

李叔同，名文涛，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一家“进士第”。他幼年聪慧，方成童，即对诗文、书法、篆刻学有兴趣。十九岁逢戊戌变法，自刻“南海康翁是吾师”石章一方，以示景仰。因而背上康党之嫌，奉母命避难于沪，崭露头角于上海文坛，有“二十文章惊海内”之誉。二十二岁考入南洋公学，与邵力子等同受业于蔡元培。不久，李加入上海城南文社。每月会文一次，“写作俱佳，名列第一”。文友宋梦贞曾赋诗赞其才华云：“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二十六岁那年，生母王氏病逝，他即率妻眷衔哀扶柩回津，易名李哀。他们举办西式丧仪，由吊唁者致悼词，李自弹钢琴合唱悼歌，举家服黑衣送母葬。其时还是清朝光绪末年，一改旧式丧礼烦琐陈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年秋天，李安置下妻儿，东渡日本，入上野美专攻绘画，又从名师学钢琴。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寻求救国之道。

1907年2月23日，李叔同为赈济祖国两淮地区水灾，与曾延年领导春柳社假东京骏河台中国留日学生青年会公演新剧《茶花女遗事》（法国小仲马原著）。李叔同以“息霜”之名饰女主角玛格丽特（茶花女）。白衣长裙，束腰披发，两手托头，自伤薄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演出结束，日本戏剧界元老松居松翁去后台与之“握手为礼”，赞

其“演得非常好”，一步一姿“优美婉丽，决非日本俳优所能比拟”，预言此举已“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李叔同1910年回国，一度在天津任教。辛亥革命后去沪，曾与叶楚伧一同编辑陈其美创办的《太平洋报》。加入“南社”，与柳亚子创立“文美社”，并任《文美杂志》主编。1912年应经亨颐之邀，到杭州浙江一师做图画音乐教员，造就不少人才。丰子恺、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他是早期学校音乐课的创始者、艺术教育的启蒙者。歌曲创作收入《中外名歌五十曲》中，书法有《李息翁临古法书》行世。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绝代才华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刚到中年，在人生道路上却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大转折。他在1918年，三十九岁的时候，竟跑到杭州虎跑寺，拜了悟和尚为师，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他专修佛教中以持戒苦行为主的律宗。经他探讨阐发，使中断了七百年的南山律得以重兴，因而被推崇为继唐代道宣、宋代芝照、明代智旭之后的第四位律宗大师。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深为中外佛学界所称道。

李叔同虽然中年遁入空门，而爱国之忱不减。晚年有人求书，则写“念佛不忘救国”六字以报。死前六年，挂锡厦门普陀寺讲律时，还为厦市第一届运动会谱写会歌，勉励体坛健儿在外敌猖獗之下励图自强。日军迫近厦门，他临危不避，仍以“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憾。1942年10月2日他圆寂于福建泉州，在遗偈中还殷切寄盼“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到来，可见他是如何眷恋祖国的河山了。

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编其遗著《前尘影事集》，收有不少弘一出家前所作的诗词。弘一年轻时即同情维新变法，仰慕康有为，后愤于祖国沉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学画，临行填《金缕曲》词呈诸同学，抒发其留恋祖国的深情。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天涯，暮雅啼彻，几株衰柳。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众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其爱国激情洋溢，堪称绝唱。他留日五年期间，无时不怀念风雨中的故国。“鸡犬无声天地死，风景不殊山河非”，是他发自心底的哀辞。回国后他即参加南社，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他放声讴歌，曾填《满江红》词赞曰：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等军阀政客粉墨登场。弘一写下了很多忧国感时的诗词，读来很令人伤感。1918年他于杭州西湖虎跑寺正式削发，这似乎是他向黑暗社会斗争的一种方式罢？

文人才子张伯驹

张伯驹先生辞世已数十年，其生前遗物、文献将长留人间。笔者对张老种种，略闻一二。

伯驹为著名“四大少”之一。所谓“四大少”盖指段祺瑞之子宏纲、张作霖之子学良、卢永祥（苏皖赣巡阅使、浙江督军）之子小嘉及伯驹。

伯驹肄业于天津新学书院，中年曾任陕西督军署参议，抗战胜利后任十一战区参议兼河北省政府顾问。三十岁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后任两京盐业银行经理、上海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七七”事变后，曾经被伪第三军刘培绪部师长丁锡之绑架，索洋百万。时伯驹正家道中落，存款选购古董，家无存项。经其夫人潘素四处张罗，由亲友孙耀东等处凑得数十万元将伯驹赎出。伯驹被困匪窟达八个月。

伯驹擅诗词曲，以词为最。他是李后主、晏几道、纳兰容若一脉流传下来的词学大师。早年名作《丛碧词》蜚声词坛。曾与郭啸麓、夏枝巢、黄公诸、黄君坦、关颖人等结成“蛰园诗社”。日寇投降后，又于西郊展春园墅组“庚寅词社”。老辈人如汪仲虎、夏枝巢等均尚未能参加。如此豪举，为当时所仅见。

伯驹收购古董书画，名闻中外，最著名者为陆机《平复帖》，范仲淹《道服赞》，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么庭摹《怀素书》，赵孟頫《千字文》，蔡襄仁《姚山秋霁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孟蜀官使图》《烟客山水瑞蔬图》等历代字画数百件，花费大量黄金银洋。据说只《平复帖》即花费银元四万，《道服赞》代价黄金一百多两。推而计之，数目可观。

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堪称国宝。经张伯驹捐献，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氏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当年曾卖掉自己的住宅，经过情形颇有可述者。

1946年年初，在中国东北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当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即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所有溥仪“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是经过鉴定确为精品者，亦作价收回。张氏认为那一千一百九十八件书画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只口头允诺，并未着手进行，遂使许多名作落于商贾之手。

当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巨川去东北最早，论文斋靳伯声继之。两人皆精于鉴别，有魄力。他们由东北收进许多碑帖字画，马巨川以一些赝品及平庸之作售与故宫博物院，真精之品则售与上海商人牟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绢本《八功图卷》、元代钱选《杨妃上马图卷》，均已流至国外。后来，这幅《游春图》又为马巨川所收，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知道后，亟向马衡建议，此为国宝，应收归故宫博物院；甚至提出如院经费有困难，他愿意帮助周转。但马衡不应。张只好自己去和商人商量，最后以黄金二百二十两成交。是时张伯驹已收购了一些宋、元巨制，手头拮据，不得已，以所居房产付款，收回此图。

在此之前，靳伯声收得宋范仲淹《道服赞》，后有文同的跋。当时张大千想收买过来，马衡知道，当即追索，靳故避之。最后由张伯驹变卖家产，将《道服赞》收购过来。

听说后来张伯驹将许多珍藏的名画书法全部捐献国家。张伯驹毁家保护祖国文物的精神，颇为友朋称道。

“二太子”袁寒云

美籍华人袁家骝及其夫人吴剑雄，研究物理学造诣精深，国际驰誉。如提起袁家骝的父亲袁寒云来，更是名士风流，当年曾蜚声国内。

袁寒云是项城袁世凯的次子，名克文，字抱存，又作豹岑，别号寒云，又曾自署龟庵。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前的1890年，为袁世凯第三如夫人朝鲜族金氏所生，是袁世凯的嫡长子克定的二弟。

寒云工诗词，精金石，书法秀劲，画富意趣，为人欣赞，又善于鉴别版本。喜京剧，擅长演文丑。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天津曾与著名票友王庾生合演《审头刺汤》，寒云饰汤勤，文雅脱俗，不同凡响。并喜昆曲，在津倡组“同咏昆曲社”，与好友常拍曲雅集。寒云多才多艺，性情豪爽，风流自赏，自名公钜卿，大江南北，多有交游，人称“袁二公子”。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袁世凯由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但他欲壑难填，竟妄图称帝。拥之者，固有“六君子”之流，而劝阻者，也不乏其人。寒云不同于长兄袁克定，系持反对态度者，但不敢明言，曾咏诗讽之。诗中有云：“须知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更上层。”用苏东坡“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意，委婉讽之。袁世凯见诗大怒，竟欲杀之泄愤。寒云避走上海，始得免祸。后来，寒云刻一私章，文曰“二太子印”，故意在上乃父书中，钤用此章。袁世凯阅后，转嗔为喜，不复追究前事。

寒云居沪时，参加青帮，是辈分最高的“大”字辈，故其寓所中经常有青帮中“三老四少”出入。1927年北返天津，住于英租界两宜里。

因从未从事生产，又不善于理财，而挥霍无度，以致时常处于拮据局面，有赖于青帮徒弟辈的金钱接济。1931年，因患猩红热病不治而逝，年仅四十二岁。

扬州名士方地山，曾充袁家西席。寒云从之学，两人半师半友，情谊深挚。寒云逝世，方地山伤痛至极。寒云逝世三周年忌辰，方地山仍深切怀念，撰联云：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魂梦依依犹昨日。
相期与来，同声一哭，生徒恋恋胜家人。

寒云遗著有《寒云诗集》和《寒云日记》等传世。其诗词著作，自有其清逸的感人处，其日记更随时流露其坦率的政治态度，为研究近代史实者所重视。

寒云有夫人刘梅真及如夫人三人，有四子二女。今日享名海内外的袁家骝，为其第三子。

“美学老人”朱光潜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近代美学园地的开拓者和耕耘者，亦是蜚声中外的美学家。近日翻阅其早年著作，想起这位中国的“美学老人”。

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1897年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教，为科举读书。进入桐城中学后，仍受古训，整日作八股文章。对此，他颇感抑郁，亟欲冲开精神枷锁，开阔自己的视野。其父有一书箱，装有各式各样的书，但从不许翻阅。对他来说，这些书真成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一次，乘父亲外出之机，他鼓起勇气打开书箱，翻出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试帖诗》《历代名臣言行录》《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等杂书，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偷食了“禁果”，心中激起了一股澎湃的旋涡。

还有一次，他的一家亲戚，从距家乡二三十里的牛王集，买回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朱光潜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书中思想激越，感情浓烈，文字酣畅，使其开始向往“新学”，崇拜起梁启超。甚至上海报上误传梁启超遇难，朱光潜得知，竟难过得大哭了一场。

朱光潜的大学历程，不同一般，曾先后进过六所大学，做了十四年的大学生。先是考进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因对该校头脑冬烘兼有海派习气的教师大失所望，仅学一年，便向教育部告了一状后，愤然离去。接着，考取了香港大学教育系。此校条件欠佳，寝室十分拥挤，虽然如此，但在其案头墙上却端然挂着“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以为座右铭。为其书者乃著名书法家方盘君先生。在港大，朱光潜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朱光潜又考取了官费留英。在爱丁堡大学，受康德专家史密斯之影响，开始研究哲学。之后，又在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有时他在两所大

学同时注册，今天在英国听课，明天渡过英吉利海峡，又赶到法国听课。学习中，他发现美学与其所喜欢的心理学、哲学、文学皆相通络，于是乎最终选择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朱光潜一面攻读康德、克罗齐等人的著作，一面广泛接触各种门类的艺术作品。读诗、看戏和雕刻，还曾独自一人跑到意大利的古罗马地下墓道，考察哥特大教堂和壁画的起源。

而且到巴黎的罗浮宫观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原作，并视为一生“最快意的事”。

严景耀其人其书

1995年，开明出版社出版了《严景耀论文集》，在这本近三十万字的论著里，作者不但精辟地论述了过去中国监管犯人的来源、罪因、狱政，而且论述了民主、法制和国体。

作者严景耀，生于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卒于1976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犯罪学、监狱学的学者之一。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增加对监狱生活的感受，他曾经自愿做一名“犯人”。征得监狱吏卒同意，入狱与真正的囚犯同吃同住同劳动，空闲时间便与囚犯谈心，从而掌握了早年北平监狱的大量真实情况。

犯人是从哪里来的？经过调查，作者说：“朝阳门外是北京穷陋无比的地方，只要能形容得出的龌龊、污浊，那里即能见着、嗅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社会的人民，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这与城里天桥一样，是犯罪的发源地。倘若不将这种地方先有相当处置，犯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犯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经过调查，作者说：“1925年大赦，释放了许多囚犯，可是有一个第一天出狱，第二天就在东便门偷一头牛被捕入监。”为此，作者议论说：“若不根本为他们谋生计方法，使他们能衣食足够，能安居乐业，专靠恢复自由，绝不能使他们自新。”作者还记下了一名囚犯的话：“老爷！你讲的实在有理，我现在都已明白了，以后当牢记在心，可是我出监以后，肚子要饿，又找不着事情，不知道老爷有什么法子可以救我。”

狱政如何革新？经过调查，作者说：“最根本的是把囚犯当人看，至于犯人在监生活切不可使其变态，当养成公民最不可少之精

神，如自立、自治、互助、快乐等。培植坚健之人格，使有高尚理想、坚忍不拔的志趣、自制的能力及勤勉的习惯，方能窥见成效。而监狱之管理员，于此当负重大责任，盖监狱乃社会之缩影，苟或犯人专在被治之下，过奴隶生活，而管理人员不以指导之法补救个人不足，不发展其特长的个性，则他日出狱再入社会，如骤入异境，使之无可适从，欲望其自新实不可能。”

面对大千世界，罪犯理应处置，但深层次的根治方法何在？经过调查，作者指出：“是的，为保护社会安宁和利益起见，非用相当方法处置他们不可。不过用铁面无私的专治平民的、只管目前事实不顾事前成因的法律，去惩罚这种变态社会中的牺牲者，以为制裁犯罪的方法，是否公平？”

作者就是通过周密观察，切身体验，并以大量文书案卷为依据，很有真情实感地写出了《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等论文，由此辑印成了《严景耀论文集》。

史学家罗尔纲

对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全面而系统研究其历史，且卓有成就的，是现代著名学者罗尔纲。

罗于1901年生于广西贵县一个书香之家。他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二十三岁时到上海求学，不久转入由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三十三岁到北京。当时，有两个职务可供他选择——一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文书，工作清闲而且月薪丰厚；二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工作繁重而月薪只及前者一半。他认为前者不是“学术工作”，而毅然选择了后者。

20世纪30年代初，他由张嘉祥传记辨误入手，开始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三年后，他撰写出《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交给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当时，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陈独秀想研究太平天国史，汪原放之父是陈的挚友，故汪常至监狱探望。一次，陈说明心思，汪便将《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未刊稿送上。陈阅后大加赞赏，并从汪口中得知罗尔纲是跟随胡适做学问的青年，便请汪传话给老朋友胡适，想请罗到南京面谈太平天国问题。胡听后大笑道：“仲甫（陈独秀）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罗尔纲去研究吧。”

经过数年努力，抗战开始那年，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全面系统的论著《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一些旧式学人将太平天国视为封建社会的“叛逆”，作为“粤匪”“流寇”加以贬斥；而另一些新式学者则强调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或一场反满的民族运动。罗尔纲面对浩瀚的史料，经过严格考证辨伪，指出“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

该书面世后，《大公报》评介该书是“一部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著名学者金毓黻将该书列入唐宋以来值得称道的私修史书之内，评论说“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以吾所知，惟罗尔纲之《史纲》着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明其因果演变之迹。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太平天国史纲》在大平天国研究史上确实具有开山作用。

多年来，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孜孜不倦，奋斗不息。20世纪50年代，有人将世传李秀成笔迹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认为《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李秀成所写。一位精通书法的专家看了罗提供的照片，也认为不是李秀成手迹。他听后，遂下苦功夫钻研中国古代书法，掌握了书家八法，写出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确证《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赝品。他考证出李秀成是学三国时姜维伪降钟会的典故，以便劝曾国藩反清称帝，实非叛徒，从而提出李秀成“伪降说”。关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事的准确日期，他是经过半个世纪的不辍考证，最后才被史学界公认的；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是他用了四十九年时间才完成的。

与罗尔纲相交五十多年的谷霁光说：“我的朋友都是勤奋的人，而罗先生是最突出的。他在北京居住三十年，只陪朋友听过一次京戏，至今没游过长城，日夜埋头斗室，出门不辨东西。”

鲁迅的学生黄源

承友人赠北京新出版的《鲁迅的学生黄源》一书，这是由著名作家、翻译家黄源的友人写的反映其一生经历的文集，为黄源的家乡浙江海盐政协所编。黄源今年九十四岁，是鲁迅当年的学生中如今健在的寥寥者之一。

说起来是缘分。1927年鲁迅从广东到上海，在江湾的劳动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演。黄源就职于该校编译室，有幸为之作记录。之后，记录稿经鲁迅审阅后，发表在《劳大周刊》上，后来又刊登在《劳大论坛》上。四天后，匡互生请鲁迅到立达学苑去讲演，题目是《伟人的化石》。因匡曾是黄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老师，于是又请他去作记录。如果说第一次是初识，第二次则跟匡互生一起陪鲁迅先生漫谈起来了。

但是，黄源真正同鲁迅熟悉起来，还是1934年茅盾推荐他帮助鲁迅编《译文》杂志。直到鲁迅逝世，参加他的葬礼，黄源一直在鲁迅身边。这使他得以在鲁迅晚年亲聆教诲，并在鲁迅指导下编《译文丛书》。这一时期，他自己也翻译了高尔基的《三人》和《日本现代短篇小说》。

1934年夏天，鲁迅找茅盾和黎烈文商定办《译文》杂志。其目的主要是对付国民党采取的书报检查制度，同时也是想通过《译文》来介绍一些外国的文学杰作，包括木刻，作为借鉴。黄源当时正在文学社当编辑，和承印的书店比较熟悉，茅盾就举荐他出面编辑和接洽书店的承印事宜。《译文》最初三期是鲁迅以黄源为助手，一手编就的。鲁迅对黄源说：“下期起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从第四期起，黄源就按着鲁迅所提出的方针去做。鲁迅仍不断地译稿，

找插图。他放手让黄源工作，而在出现问题时，却挺身而出坚持原则，不顾一切地保护青年。至今保存下来的鲁迅给黄源的三十八封信，大都是有关编辑《译文》方面的意见和指示。

这时，黄源由于主编《译文》和帮助鲁迅筹划、编译《译文丛书》，成了常常出入鲁迅家的人之一。鲁迅最后出版的创作、翻译和画册等，都在巴金、吴朗西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是中间的媒介却是黄源。

每忆及此，黄源总是感慨地说："我原来是搞文学的，最多是搞革命文学的吧，可是从接触鲁迅之后，我的人生道路起了显著的变化，最终走上了参加革命武装，为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而战斗的道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源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校对工作。等编完校对后，在鲁迅周年忌日前夕，黄源离开上海进入战场，于1938年年底参加了新四军。黄源晚年有两本回忆鲁迅的著作，一本是《纪念鲁迅先生》，一本是《在鲁迅身边》，充分表达了他对鲁迅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陈训慈的“书情”

陈训慈去世已八年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已把他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家收入《辞海》补编，记录了这位世纪同龄人的一生书情。

陈训慈1901年生于浙江慈溪。受其胞兄陈布雷的资助与培养，1924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宁波效实中学教师、浙江图书馆馆长等。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效实中学任教，创办了《爱国青年》杂志，宣传内除军阀、外抗强敌的主张。作为一位爱国学者，他的爱书之情和用书之情，在他于1932年至1941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十年生涯中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作为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以“寓书于教、教育救国”为办馆宗旨，推行普及社会教育和开展学术研究并举的方针。在杭州大学路图书馆新馆舍落成不久，他就力主图书馆应向社会开放，拟定了改进阅览工作的计划。从1933年开始，把原定每天下午5时闭馆的时间延迟到晚上9时，同时取消了每逢周一休假的惯例。他还想方设法为进馆的读者提供方便。他认为，图书馆不能闭关自守，坐而论道，而应当走出深院，接触社会，以书为媒，联系民众。在他的倡导下，浙江图书馆在杭州市内设有图书馆流通部三处，民众书报阅览五处，另有一流动书库每天在市内定点巡回。当时，在杭城的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随处可见图书馆提供的各类读物。如此一流的、广泛的服务，使图书馆名声大振。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倡导、开展学术研究之风，致力于创办《省立图书馆馆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随浙江大学西迁。陈训慈受竺可桢校长委派筹建浙大龙泉分校，并任第一任主任。为使馆藏图书免遭厄运，陈训慈

不顾安危，四处奔走，历尽千辛万苦。在竺可桢校长的帮助下，终于将《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一批珍善本暂运至贵阳后方和浙江龙泉山村，方使这些古籍安然无恙。讲起这些往事，老人感慨万千。他的一生，是与这些积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书籍紧紧相连的呀！

陈训慈还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用生动的历史以激发群众的爱国之情，是他的治学宗旨。他除娴熟中外通史，下功夫最多的是对地方历史和地方文献的研究。在《浙江省史略》《明清浙江文献概述》等史学专著中，凝聚了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浙江省政协一至六届的委员和民革浙江省委顾问。1991年，浙江图书馆为这位老馆长九十寿辰举行庆祝大会。会后，他激动的心情好几天未能平静，他说："我不求活到百岁，只望能再有五六年的时间，就能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他九十一岁高龄时，仍通宵读书，结果病倒住院，延续到次年5月，与世长辞。有老友送其一挽联，曰：

胸有五车史籍，心无一点尘埃。

民俗学家张次溪

张次溪生于1908年，系近代名士张篁溪之长子。张篁溪是近代学者、文学家王闿运的门人。张次溪自幼秉承家学，后又拜桐城派作家吴北江为师，故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

20世纪30年代初，张次溪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对北京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各类掌故须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于是广结友，勤采访，每夜挑灯奋笔，数十年如一日。有《琉璃厂志》《北平天桥志》《岭南文物志》等多种著作刊行于世，为后人研究北京文化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次溪先生与齐白石老人乃忘年交。白石老人与张篁溪同为王闿运门下士，故将次溪视为世侄，亦视为契友。1932年，次溪先生不遗余力，替白石老人编印《白石诗草》（仿宋铅字八卷本），诗稿前面印有白石自题诗五首，其第四首云：

书名惭愧扬天下，吟咏何必并世知，多谢次溪为好事，满城风雨乞题词。

并注曰："此集初心未敢求人题跋，张子次溪替人遍乞诗词，余老年因得樊山翁社中诗友数人为友。"

1933年10月2日，张次溪与徐肇琼女士于西长安街广和饭庄举行婚礼，白石老人证婚，并撰写一联一诗。联云：

花月长圆见天德，男人无过识贤妻。

诗曰：

昨夜星辰仙袂凉，有人月下与商量。赤绳在手长如许，系汝良缘做一双。

诗前并有小引云：

癸酉八月十三日次溪仁弟佳期，既请证婚，又想联语，再赠以诗圆联，老年人喜如人意，一一为之。

次溪先生对其评价是“谑而不虐，很见风趣”。

张次溪祖籍广东南海，其父篁溪与康有为既有乡谊，又是诗友。康有为晚年曾游历苏杭及泰山，最后到北京，篁溪、次溪父子与梁启超等人，曾陪同康有为到菜市口，凭吊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六君子，而后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忆及往事，凄然泪下。

篁溪、次溪父子，对明末蓟辽大将军袁崇焕极为崇敬。袁崇焕乃广东东莞人。1630年，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以“与后金有密约”罪杀崇焕于菜市口。崇焕故宅在左安门内龙潭湖南岸，清末废为民居，满目荒凉。张篁溪购置为别业，人称“张园”。张篁溪殁后，张次溪继续料理之，每逢盛夏，必约成扶平、金寄水、耿晓堤等文友小住张园消夏。

位于广渠门内的袁崇焕墓和位于张园附近的袁督帅庙，其房屋修缮费用多年来皆由张氏父子承担。解放前，张次溪每年均用稿费支付修缮款项。解放后，张园房地产收归国有，袁崇焕墓地和庙堂亦由文物部门接管。

1966年8月，噩运降临张次溪头上，数十名“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书，侮辱了他的人格，他不胜悲愤，旋即含恨离开了人世。

司法女杰史良

近年来，内地努力推行以法治国，这使笔者想起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司法界与救亡运动中的著名律师史良女士。

史良女士生于1900年，对于八国联军蹂躏祖国，在心灵上埋下了义愤的种子。父亲是教书先生，自幼常对其讲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悲壮业绩，潜移默化，亦影响其成长。五四运动时，她正在上海“武进女师”读书，被推为学生会会长。她带队游行，上街宣传，一马当先。没有纸墨写宣传品，她曾带同学闯入县府，向县知事索要，为县知事所惧怕。后知事将其父召去，责令管教女儿，史良闻知，闹到县衙，接回父亲。她利口指责县府，知事无以对。

30年代初，史良从上海政法学院毕业，开始当律师。当时妇女被社会歧视，作为女律师，维业为艰。但史良深谙法律，为人仗义，又口才锋利，办事干练，因而所受案件常常胜诉。在其承办的案件中，竭力为保障妇女的权利辩护，并对困难者，义务办案；对离家无所依者，为之谋职，颇受赞扬，遂声名蜚著。日寇侵华，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其中上海妇女救国会，是最早成立的爱国救亡团体之一。其发起及组织领导者之一就是史良律师。成立那天，何香凝女士参加了大会。史良女士作为大会主席，健步登台，气宇轩昂，慷慨致辞说：现在中国人民受压迫，任人残杀，我们二万万妇女，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不，绝不，今天我们各界妇女在此集会，就是我们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会后史良女士带领队伍，游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高喊救亡口号，冲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禁令，无畏地通过了南京路。此举气壮山河，威震沪市。

1938年，由宋美龄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及宗教界和社会知名妇女

四十余人，在庐山举行妇女谈话会。史良代表救国会参加了此会。会上，决议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联合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宋美龄任指导长，史良任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此间，其力主正义，不为名利所动，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抗日救亡而工作。

不久，史良在重庆开办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同时致力于民主运动，与救国会同仁加入了沈钧儒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第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她还致力于沦陷区儿童的保护工作，发起并组织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任常务理事。该会在全国设立了四十余所保育院，收容和保育了两万余名儿童。

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人们熟知梁启超有个儿子梁思成，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孰知他还有个女儿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举家东渡，流亡日本。1908年9月，梁思庄出生在日本神户。民国肇建，1912年梁思庄四岁，随全家回国。1925年，随大姐梁令娴到加拿大。梁启超要梁思庄学生物学，她却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修了图书馆学。1930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次年赴美深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当时，梁思庄的二哥梁思成、三哥梁思永都在美国留学。梁思庄结识了梁思永的好友吴鲁强。1930年吴鲁强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翌年归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化学系教授。翌年梁思庄回国，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越年，她和吴鲁强结婚，便到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工作。不幸，吴鲁强于1936年因患伤寒病逝世，年仅三十一岁。梁思庄才二十七岁就孀居，和女儿吴荔明回到北平，从此没再结婚，终生献身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

梁思庄深研图书馆学。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每逢新生入学，她总要向他们讲授利用图书馆学习的方式。1936年，北京大学开设各科讲座，请梁思庄讲授《西文工具书》。讲堂里座无虚席。她把馆藏的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外文书籍，分类编目，写成《东方学目录》；还编写了《非洲目录》和《拉丁美洲目录》，供读者查找资料。

梁思庄现已八旬高龄，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多年。晚年长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副馆长。她会英、法、德、俄等外语，擅长西文图书分类编目，尤其精通西文工具书有关资料。人们说：“梁先

生的脑子就是一部外文工具书大全。”不论读者向她提出什么问题，她都尽力帮助解决。她认为一个学校图书馆的水平，代表着整个学校的学术水平。所以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总是争取要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图书馆。她工作作风严谨，特别注重深入实际。她身为副馆长，却把办公桌安置在采编部人员中间，同大家一起劳动。从贴书号标签，到典藏阅览，买书、订书、分类、编目、制片、入库、借阅、咨询……她都插手过问，深得工作人员和读者的好感。

《苏武牧羊》作者蒋荫堂

一度流行于大江南北的《苏武牧羊》一歌，以歌词通俗易懂，情感悲壮、慷慨激昂，深受人们喜爱。而此歌作者却默默无闻。

原来此歌作者是辽宁盖平人蒋荫堂。

蒋荫堂名麟昌，生于清咸丰年间，天资聪颖，八岁入塾读书，十八岁时，为文只需略加构思，即能一挥而就。清末盖平成立“辰州学院”，聘蒋氏为国文讲师。1914年，又应聘至盖平县中级师范学校教书。《苏武牧羊》一歌即在那时写成。

一次，盖平福建会馆邀河北乐亭皮影剧团演出，学校师生前往观剧。在演唱悲调时，以打琴伴奏，音调悠扬动听。有些学生随琴声哼成一个调子，后由该校音乐教师田锡侯加工成歌谱，再请蒋荫堂填词，遂成此歌。歌词全文为：

>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可怜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四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
>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凭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定叫匈奴惊心丧胆共服汉德威。

歌曲初成之日，学生竞相抄录传唱，唱来委婉动听，扣人心弦；有用洞箫吹奏，音韵愈加凄婉感人，由此此曲不胫而走，流行全国。

蒋荫堂填写此歌，是鉴于清末民初时，政府对外卑躬折节，怯懦媚外，深感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与国家之威望，愤而作此以图振奋国

人，以警往惕来。

蒋荫堂在当地名重一时，然淡于功名，长期过着清苦生活。他住在县城文昌庙中，斗室一间，伴有老妻弱子。每日粗茶淡饭，粗衣布衫，辄盛暑不去。常穿双面布鞋，浆白布袜。他喜蓄须发，嗜关东烟，有一长杆烟袋，常不离口。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不恃才傲物，素为全校师生所敬重。他卒于1926年。

刘天华即兴作《良宵》

最近，喜得一盘录音磁带，是内地二胡演奏家王国潼独奏的刘天华十首二胡曲。听着悠扬的乐声，我无法抑制对刘天华先生的缅怀之情。

刘天华是江苏江阴人，生于1895年。五四运动后，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当时社会有很多一部分人对中国固有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诸如中医、国画、书法、京剧以及中国音乐等，都认为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统统予以轻视、排斥。甚至有些人连二胡也瞧不起，认为是叫花子乐器，不能登大雅之堂。刘先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二胡“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而且为了实现他“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的主张，刘先生选中二胡作为工具。他把二胡比作窝窝头和草鞋，说：“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他通过拜民间艺人为师和刻苦自学，创造性地掌握了二胡的演奏技巧。他又把小提琴的某些演奏技巧移植到二胡上，运用得十分自然，以致使人觉得这些都是二胡固有的技巧。

1922年，刘先生到了北京，在北大、艺专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把二胡列入课程之内，为二胡写教程、编练习曲，改变了过去“口传心授”的旧方法，培训出蒋风之、储师竹、陈振铎等一批二胡演奏家。同时他还组织创办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

1928年1月22日晚上，即旧历丁卯年的除夕之夜。笔者随几个同学到刘先生家去度节。刘先生身材魁梧，态度和蔼可亲。刘师母亲自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辞岁晚餐。饭后，我们尽情说笑聊天，心里感到

十分温暖畅快。

谈话间刘先生起身拿过二胡，先是坐着任意而拉。拉着拉着，忽然站起来，匆忙拿过纸笔，便飞快地记下所拉乐谱。就这样，随想随拉，随记随改，大约半个小时，一支二胡独奏曲就写出来了。曲成之后，刘先生谦虚地让我们起个曲名。商酌结果，决定用《除夜小唱》作曲名。刘先生又拉一遍，曲调是那么活泼、愉快，表达了我们除夜聚会时的愉悦心情。《良宵》这个今天通常采用的标题，是后来刘先生为《除夜小唱》另起的一个名字。

没有想到，四年以后的1932年6月，刘先生到北京天桥收集锣鼓谱时，染上猩红热，不幸逝世，终年仅三十七岁。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开创的这一学派的门生至今仍活跃在乐坛上，发展着二胡艺术；他创作的乐曲，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受到人们的喜爱。

教授述林

“清华”名师漫忆

清华大学自开办以来，不知进出过多少位名教授了。他们名气大，学问高，但是派头、架子却丝毫没有。过去有人说过：在北京公共场所若偶然遇到一位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先生，问他在何处工作，对方便会很随便地答道：“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情况如果在上海，那对方一定是一位穿着笔挺洋装、夹着大皮包、口含雪茄的绅士。问过之后，他便会马上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报给你听：“康奈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这就是“海派”和“京朝派”的差别。清华的先生是属于京朝派的，永远是那么谦虚、潇洒、有涵养。

有几位先生与清华关系极深，在清华待得时间长，甚至是从清华毕业后去留学，回来再到清华园任教。而且除去做教授之外，还做校务性的工作，这样就为更多的学生熟悉了。比如海内外知名的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在美国留学时，因踢足球受伤失去了一条腿的教授，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校友们对他是记忆最深的。

潘先生不只是举世知名的社会学家，他培育后进的热情也是被人传为美谈的。费孝通先生原是他的学生，是他介绍给世界学者的。后来在费先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潘先生反过来在费先生前称“门生”，虽然是说笑话，但也传为学术界的美谈了。潘先生教授种族学、遗传学，讲课时妙语连珠，那笑话是说不完的。他身体虽然伤残了，但体质很好，十分健壮，平时架拐走路，走得飞快。有一年暑期，清华、南开、北大三校联合招生，招生委员会临时办公处设在沙滩嵩祝寺夹道北大灰楼。潘先生坐在轮椅上，进出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处理工作。他双手转动椅轮，可进可退，转弯敏捷，这屋出来，那屋

进去，似乎比健全人还矫健。

马约翰先生，也是清华的一位知名人物，校友中大概没有一个不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他一辈子好像没有换过第二种服装，一年四季都是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装裤——北京俗话叫“灯笼裤”，因为它在腿肚子上束起来，像北京旧时的小纱灯一样，裤下是羊毛长筒袜子。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年到头吃饭要按照营养学的规定去吃，青菜、萝卜、豆腐、肉、鸡蛋等，都有严格的数量，算好热量的卡数再下锅。不过马老先生却是一位热情的忠厚长者。

清华的体育分数是很重要的，别的课程都通过了，体育没有通过，也要影响到升级、毕业、留学等，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马约翰教授，是十分尊重的。“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园上马先生的课，不但体育要过得去，而且英语要好，不但口令用英语喊，球场裁判用英语叫，而且学生同他说话也要说英语。等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之后，老先生的办法才改变了，不再坚持要求学生用英文同他说话了。

也有旧时在清华名重一时的先生，后来却没有再回到清华园。吴宓（号两僧）先生便是一位，这位留学法兰西的陕西人，是诗人、哲学家，又是爱谈《红楼梦》的红学家，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负责人。他主持清华研究院，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诸位先生在那里讲学，培育出不少知名学者，其功绩在清华校史上很值得大书一笔。

清华也有父子两代的教授，最著名的便是梁任公、梁思成二位先生。

另一位早年毕业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回国到清华做经济系主任，当时还没有结婚。他有部美国友人送的黑色雪佛兰小轿车，很引人注目。现在如果健在，也该是八十左右的老者了吧。

清华大学人才辈出，在中国教育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这是与清华众多名师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的。

学人长寿遥祝俞平伯老

报载，北京召开“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年纪念会”。我深为夫子贺，为夫子资。因为我感到，对这位按阴历算八秩晋八，按阳历算八十有六的老夫子说来，的确是一件喜庆的大事；即对中国学术界说，也不能说是一件小事吧。纪念会的内容，报上都登了，我这里无须再多说。我只想说一点儿我对夫子的敬意、情谊，作为遥远的祝贺。

话还得从四十几年前说起。地点是北京沙滩松公府夹道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后面的新教室楼。在这里我听了夫子八个学分的课（每周一课时，一学期为一学分），即杜诗、清真词门。当时各自选各自的课，人数不固定，教室也不固定。夫子的课是选课，在一个有三四十个座位的教室里上。我自童年读先生的《画舫灯影里的秦淮河》之后，对于先生的著作，什么《燕知草》《杂拌儿》《燕郊集》等早已看了不知多少遍，烂熟于胸中了，但对先生本人，还较为陌生。先生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听，虽说是的的确确的师生，但感情上还远远没有水乳交融呢。当时先生上课来，下课走，家住南小街老君堂，虽不甚远，可离沙滩也有一截子路。北大学生纵使白天不听课，但晚间却是欢喜跑教授家串门儿的。当时我常去的是沈从文先生家，他住西老胡同，出西斋宿舍门，转弯就是。对于俞先生老君堂的古槐书室，则始终没有去过，迄今引以为憾。

我做学生时，很不用功，上课常常不好好听讲，而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入非非起来。有一次先生讲杜甫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两句，举了很多例子，讲得十分生动。时正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很足，我有点儿浑浑然，老毛病又发，忽然放弃听课，注意起先生的衣着来：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

褂，里着藏青绸料棉袍，而大褂短于棉袍约两寸许，显见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了。内穿黑色棉裤，不绑腿，散着又比棉袍长了。如此三截式装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天南海北，春夏秋冬，每当想起先生，好像总是穿着那“三截装”一样。近若干年，与先生通信频繁，师生之情老而弥笃，前年先生寄了一张照片来，信中说：

> 附奉小照一纸，以代晤面。

我看照片，虽然苍老，但风神如昔，不过是戴黑边儿眼镜、穿白衬衫的。望着照片，我想起“三截装”，不由得笑了。

在现在的学人中，俞先生也真可以说是老前辈的老前辈了。五年前有一次通信谈到施蛰存老先生。夫子来信云：

> 施舍（蛰存）是我早年在上海大学时的学生，年七旬余，前说是办《词学》，迄未能出版，今又向足下征稿，想必有希望。

今年蛰存先生也八十多了。前寄新年贺柬来，为宋赵长卿小词《探春令》，结句云：

> 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并有跋云：

> 余弱冠时曾以此词歇拍三句制贺年柬，以寄师友。赵景深得而喜之，志于其文，去年一甲子矣。景深鹤化，忽复忆之。更以此词全文制柬，聊复童心。奉陈文几，用贺一九八六年元旦，兼丙寅春正。施蛰存敬肃。

多么别致的贺春帖子呀！而且一说就是一“甲子”，足足六十年呀！纪念俞先生学术活动，是六十五年；蛰存先生贺新春，“聊复童

心”又是六十年。白发老师，白发门生，学人长寿，婆娑人间，我这个小师弟，比起白发老师、白发大师兄，那真是稚气未脱的“小不点儿”呀。

中国香港过去常说“姑苏三老”，指叶圣陶老、顾颉刚老先生、俞先生三位。他们都是“三元坊”苏州高中的同学。如以学籍说，这个称呼可以成立。如以籍贯说，就不对了。叶、顾二位是苏州籍贯，而俞老则是浙江德清籍贯。不过学术界为了尊敬先生，习惯于这样叫，自是可以，那我的说明，似乎也是“废话”了。

再有人们对于先生和曲园公的关系，也常常弄错辈分，以为先生是曲园老人的嫡孙，实际是曾孙。俞先生府中是以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的关系起名字。曲园老人名“樾”，从“木”；“木”生“火”，俞先生祖父辈名字从“火”字旁；“火”生“土”，先生父亲陛云公，从“土”；“土”生“金”，所以俞先生学名“铭衡”，“铭”字旁从“金”。以名起“字”；《礼·曲礼》云，“大夫衡视”；衡，平也，所以表字“平伯”；后以字行。现在说起“俞平伯”，中外学术界没有不知道的；如说起“俞铭衡”，则知道的人就太少了。

耆宿元老钱玄同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著名的音韵学权威钱玄同先生逝世，曾轰动一时；还记得报纸用大字标题《耆宿元老返归道山，教界震惊》报道消息。笔者所接触到的教育界人士亦一致交口谈论钱老噩耗，莫不深表惋惜。

钱玄同先生原名钱夏，玄同系别号，曾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他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被京师高等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聘请讲授文学；其后，北京大学聘他任国文系教授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时兼任中法大学国文系教授；其后又任师大国文系主任及北平、清华等大学国文系讲师。钱老学识渊博，桃李遍大江南北，专研音韵学（彼时称为声韵学）。他又擅长书法，冶隶楷于一炉，极与魏碑相似，独成一格，有“钱体”之称；当时师大校匾即出他手，琉璃厂亦有他的笔单。

笔者经友人介绍，与钱老相识。钱老性格开朗，谈话爽快。还记得谈到他精于诗词但不轻易一吟时，钱老曾说：诗词之成，乃所以遣兴自娱，而不宜频犯牢骚。以故钱老著述方面，除音韵及中国文字学外，诗词方面很少见到。

钱老家住北京东城，住宅建筑古雅，颇具园林之胜。他生活安适，避免一切嚣杂，于静寂生活中得到人生乐趣，充分获得学识上的修养和发展。他曾患高血压症，医嘱静养；他却时常访友畅叙，友辈咸敬羡之。

犹记钱老逝世前数小时，还曾出门访友，返家不到十分钟即语老妻，感觉头晕，旋作咳嗽，亟送德国医院救治，讵料脑血管已破，抢

救无效，一代学者溘然长逝，年不及六旬。他遗有三子，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即其次子。钱老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对音韵学有极大贡献，平日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看书习字，身体夙健，不做无谓娱乐，屏绝烟酒，常喜与知己朋友谈心。当年的周启明、黎锦熙等名流为钱老最知心挚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初倡时，钱老为最早响应者。当时反对派虽亦迭有立论发展，但新文学趋势如火如荼，锐不可当。为表决心，钱老将原名“夏”改为“玄同”，且以“疑古”为字。钱老逝世后，时人谓钱老归真返璞，直进玄冥之大同世界矣。

转眼五十寒暑过去了，钱老的爽朗笑貌，犹长留脑际。思及其才华横溢，书法洒脱，实令人不胜唏嘘悼惜。

辜鸿铭佯狂嘲世情

早年的北京大学，有一位怪而闻名的学者。平时，但见他蓄发梳辫，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着绸长袍缎马褂，脚穿双凉鞋。张口子曰，闭口诗云，间或也用流利的英语讲话，既好辩，又爱骂人，他就是辜鸿铭。

原来这位老先生，姓辜，名汤生，字鸿铭，别号慵人，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华侨。十岁左右随英国布朗夫妇到英国读书，其后还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求学。因此，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几种文字，一生获得十几个学位，其中一个是清朝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他由此而入《清史稿》。日常，他自称是东西南北人，这是对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概括。由于他不同凡响，在外国人心目中便成十分神秘的人物，竟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见辜鸿铭”之说！

后来，蔡元培校长邀他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他欣然而至。在校内，他装束如故，脾气照常：大家都拥护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因为时兴剪辫子，他便留辫；设若大家都留辫子，那他肯定会剪辫子。他在校内尝言，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他自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由封疆大吏进京入军机。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请办事的。”袁的幕僚将此语转述于辜鸿铭，以此为袁得意之谈。辜听后竟说：“诚然。要看所办的事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真不知天下有何事竟是没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开临时会议，商讨挽留蔡元培校长之事。辜在会上慷慨陈词，也主张挽留，但他的理由竟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天下不可以一日无君，所以非挽留不可。另一件事，是他在婚姻上的言行。他娶妻，为中国的淑姑夫人；又纳妾，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在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世态下，他为纳妾辩护，理由出自王安石的《字说》。说“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的。有人驳他，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的累了，用男的做靠手，由此可以一妻二夫。他正色纠正道：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听说过一个茶杯可以配四个茶壶的。

有一年，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上皆是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听后一本正经地答道：“有，法子很简单，将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即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下来。”举座闻之哗然。事后，社会评论道，这种言论只有这位戴红顶瓜皮小帽并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说得出，也只有这位辜老夫子才敢说出来。

爱国哲人熊十力

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以其独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名世。他不但是一位著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满怀忧患意识的爱国主义者。

熊十力于清末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湖北黄岗县一个贫苦的农家。幼时为人放牛，在父兄的教育下粗通经史。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与熊飞宇等人联络军、学界人士成立黄岗军学界讲习社。年末，革命党人发起的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因其力主响应，为此清廷特别指名逮捕他；幸而有人暗通消息，遂得以亡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赶赴武昌就任湖北督军府参谋。同年腊月，为庆祝光复，被时人称作“黄岗四杰”的李四光、刘子通、熊十力、吴昆聚会于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顺次挥毫。吴昆早年两次东渡日本，奔走于孙中山、宋教仁帐下，为发动武昌起义做了不少工作；遂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道德经》思想，写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后来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当时只写了四个大字，“雄视三楚”。熊十力则借佛经所言，书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其幼年时就曾说过：“举头天外，无我这般人。”他幼年时的率真自负与自尊自信，可见一斑。

民国元年（1912），他编辑《日知会志》，力图保存革命史料。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他即入湖南参与民军，支持桂军

抗击北洋段系的进攻。不久赴粤，佐孙中山幕。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形势危急。他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力劝老友陈铭枢率十九路军抗日。“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因事路经杭州，顺便看望他。刚一进屋，他就劈头盖脸打陈两个耳光，责备陈不在上海打鬼子，却跑到杭州游山玩水。陈被打骂委实冤枉，然而他的古道热肠，凡听说此事的无不感慨系之。战事一结束，他又赶赴上海慰问陈将军及参战将士。民国二十四年（1935），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亡，当时他住在北平，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实在是忧心如焚。于是，联络邓高镜兄弟写信请汤锡予出面，敦请胡适对《何梅协定》公开表示反对。“七七”事变后，他乔装成商人，乘运煤火车逃离北平，历尽艰辛，回到故里。后到大后方，发奋著述，撰写《中国历史讲话》，宣传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其用意是为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抵御日本侵略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

他一生清苦，自视甚高。当时，他的著作印刷出版多靠老友、国民党元老居正（觉生）和弟子周封歧、吕汉财等人帮助。他的《读经示要》出版后，其友人曾将该书呈送蒋介石，蒋馈赠两百万元法币。他申斥友人鲁莽，拒不收取一分一厘。

“一代词宗”夏承焘

浙江千岛湖中有个羡山岛，林木森森，百卉争妍，有百果园之称。岛上有莲花岩、龙潭虎穴、将军帽诸景，是旅游胜地。在莲花岩上方的竹树丛中，新增一个引人注目的景点，它就是“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的墓园。

夏承焘墓依山面湖，以青石铺地，石栏围绕，中间矗立着长方形的墓体。墓体四面均用大理石贴面，正面刻着“词学家夏承焘墓”七个金色篆体大字。左右一副对联，上联是“浩荡文风，宙宇神游词笔健”，下联是“沧茫烟水，湖山睡稳果花香”，联语由夏夫人吴无闻亲撰并书写。墓顶是一尊用汉白玉石雕成的夏承焘半身像，是雕塑家汤守仁教授的精心之作。雕像凝神远望，表现了作为诗人、学者的夏承焘的神韵。夏承焘如今长眠在千岛湖畔的绿水青山之间，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

1930年，夏承焘与老友胡才甫同到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任教，同住“月轮楼”为邻，历时七年。夏承焘自学勤奋，暝写晨书，无间寒暑，并悉心鼓励老友写作。胡才甫得他指点帮助，编写了《沧浪诗话笺注》和《诗体释例》两书，夏承焘为此书作序。此外，在日寇侵占东北时，为发扬民族精神，胡还写成《民族诗选注》一稿，亦得夏承焘复核订正。据胡才甫回忆，他们平时谈论诗词，研讨学术，他均得益不少，夏堪称良师和益友。抗战时期，学校内迁。胡赴前线工作，夏承焘到金华英士大学执教，但他们仍有书信、诗词往还。20世纪60年代后期，夏承焘移居北京，曾复胡信附七律一首。诗中称胡为“邻翁”，有“小曲哦成容坐啸，稚孙学得莫嗔渠。壮怀昔之横江约，吟兴迢迢入蜀图。……”等句，足见其晚年安适，壮怀犹未已也。

夏承焘初到之江时，致力于研究词学。为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考订、笺校和编年。姜词附有旁谱，他按谱度曲，吟唱终朝不辍。他和吴瞿安、唐圭璋、顾颉刚等人书札往还，探讨琢磨，并自谦：如不与瞿安交好，学业成就不大。足见他虚心接纳，刻苦自励，为后学楷模。实际上，他对古文、诗词都有深入的钻研和卓越的见解。以后写成的词学专著三十余种。待整理出版的著作也有多种。其中如《唐宋词论丛》《唐宋词人年谱》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都是词林巨著。

夏承焘“桃李满天下”，国内海外，到处都有他的学生。据他的弟子回忆，他常说：“南面授之，北面师之。”意思是，告诉学生，今天你在这里听我讲课，也许不久你也会给我上课。夏承焘当年在浙师院任教时，住在“平湖秋月”。他同时到位于汪庄的私校讲课，两地隔湖相望。逢到他上课的日子，学校派工友划一只小船前去接他，他风趣地称自己是“湖上客”。

爱国教授曾昭抡

曾昭抡为曾国藩之弟的曾孙，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教授，并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20世纪20年代初，曾昭抡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学校性质）毕业，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劝他留校任教，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可是曾先生却谢绝说：“我爱我的母校，我更爱我的祖国。”一个“更”字，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

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攻打上海，策动华北自治。曾昭抡忧国忧民，为学生开设“国防化学”课程，研制炸药和防毒面具，并率领北京大学慰问团赴绥远（今内蒙）前线慰问抗日战士。日寇占领北平时，曾拷问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工友，并严厉搜查有关曾先生反对日本侵略的材料。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迁往湖南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翌年春，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曾昭抡和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自愿参加步行团，与数十名学生一起，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里，穿越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在前往昆明的步行途中，他还先后在贵州镇远县和云南平彝县，向当地学生和群众宣讲抗日战争的意义，论证抗战必胜和战后急需大量建设人才等问题。

曾昭抡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期间，十分关心抗日战争形势，经常向学生发表时事演讲，宣传抗战必胜信念。他在《民主周刊》上几

乎每周写一篇时事综述，分析欧洲战场形势，树立战胜法西斯的信心。曾先生渴望光明，追求进步，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鉴于曾先生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活动，以至有人这样说：“继李公仆和闻一多之后，下一个该是曾昭抡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曾昭抡从广岛的两颗原子弹爆炸，认识到科技已进入到原子能时代。1946年夏，他奉命赴美考察原子弹技术，其内兄俞大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采纳曾昭抡建议，举荐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同行，每人各带两名年轻助手。不期到美国吃了闭门羹。原子弹技术乃美国超级军事机密，岂容他人染指。考察未成，当后来闻讯新中国即将诞生，便于1949年2月，偕华罗庚、周建人等经大连，最早回到他久别的北京大学化学系。随身带来大批化学仪器、药品和图片资料，都是用他赴美考察时的经费结余购买的。随后，曾先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先生又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

五十年前的西南联合大学，人们都记得有一位金岳霖教授。他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895年，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教授，1984年病逝。

抗战期间，金先生随清华师生迁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开逻辑课和符号逻辑课。平时，他常年戴一顶呢帽，到教室也不摘下。每当新学年开始，给新生上第一节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究竟有什么毛病，学生们无从知道。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镜片是一黑一白，讲课时总是闪着不同的亮光。据说，后来他到美国讲学，眼病治好了。但西南联大师生在校园里见他眼神仍不行，走起路来，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金先生教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上课时在大教室，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金先生有时要提问，但面对那么多学生，究竟叫谁呢。于是，他常一进教室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同学回答问题。"由此，大教室里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又兴奋又紧张。那时，联大女生以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为时髦。问题回答得清楚流利也是件出风头的事。学生答问时，金先生总是很注意地听着，完了，总要说："Yes！请坐！"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他博览文学作品。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从《江湖奇侠传》到《红楼梦》，他都认真研读过。当年，西南联大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学生住在金鸡巷，有时沈从文先生亲临学生住地给大家讲课。有一次，金先生也被拉去了，他应邀讲的题目是"小

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动听的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红楼梦》呢？”金先生正色道：“《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后来，在场人看到，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道：“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小动物。”但见他抬起右手伸向脖颈，捉出了一个大跳蚤，捏在手里看，甚为得意。

当年，金先生是个单身汉。他虽然没有家室，也无儿女，但生活得蛮有乐趣。平时，他养着一只很大的斗鸡。每当金先生吃饭，这只鸡能把脖子伸上饭桌，和金先生一同进餐。他还常常带着大梨、大石榴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斗鸡。斗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然后再去买。堂堂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生活里倒也充满了不尽的童趣。

“积微居”主人杨树达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杨树达是一位建树卓著、影响深远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光绪十一年（1885），他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黄遵宪、谭嗣同等创办的时务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宣统三年（1911）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他毕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杨树达不但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问家，还是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教育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派遣一些披着“支那学者”外衣的文化特务来求见他，他一概拒之门外，有一次还当面怒斥了日本特务头子桥川时雄。“七七”事变后，他著《春秋大义述》一书，强调攘夷复仇，激励国人同仇敌忾，抗战到底。书中有《诛叛盗》一篇，借古讽今，是鞭挞与声讨汉奸卖国贼的檄文，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日寇最嚣张的岁月，他对抗战前景也未失去信心。抗战第三个年头，他写诗道，“未信暇夷能制夏”，深信“浮云蔽日须臾事”。及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德、日法西斯在战场上也惨遭失败，他高兴地赋诗曰：“且喜人间公理在，渐看斜日落西隅。”字里行间表达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了发扬光大祖国的文化遗产，他发奋著述，笔耕不辍，他所著《词诠》《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等著作极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杨树达学识渊博，学养深厚，为学界众人所共仰，其成就来自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抗战期间，即使为避日机躲在防空洞中，仍手不释卷。他的书房虽然异常简陋，光线也不好，但总是伏案读书或写作。他认为渊博的学识是靠平日点滴积累起来的，因

此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积微居”。

他堪称中国学界一代大师，但生活上却从不计较，平日总是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民国三十四年（1945），他六十大寿，湖南大学师生纷纷祝贺。中文系有个学生写了一支曲子云：“一领旧宽袍，两只粗布袜，拄杖儿不怕溜滑，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生动地描绘了他的俭朴风貌和崇高的学术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他完成了有关小学、金文、甲骨文的论文一百多篇，还编定了《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今文说》《积微居甲骨文说》三部著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十八卷《杨树达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积微翁友朋书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毛泽东、章太炎、梁启超、钱玄同、陈寅恪、朱自清、郭沫若、董作宾、罗常培、王力、顾颉刚、容庚、徐特立、马叙伦等致他的书信一百八十八封。《文集》和《书札》，既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社会地位。

传记文学家朱东润

复旦大学已经辞世的朱东润教授，原名世溱，字东润，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祖籍江苏泰兴。他十二岁考入南洋公学附小，时值清农工商部侍郎、近代古文大家唐文治任该校校长。有一次，学校举行国文比赛，教师出两道作文题，命学生择其一而为之。他却两文皆作，一并上交。经层层筛选，最后呈报唐校长，结果他的文章被评为全校第一，并获奖金四元。

辛亥革命前，他升上南洋公学中学部。两年后，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就读，他曾称："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作品；在传记理论方面，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络亚的《传记综论》。"

后来，为回国参加讨袁革命，先在上海办报，后到中学执教。不久，进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扬子江畔这座著名学府中，他读完了校图书馆所藏全部英文版传记，并对中国传统传记进行深入研究，教学之余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研究》、《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专著，取得了累累成果。

抗战开始后，他由老家江苏泰兴离妻别子，几经辗转，到了迁至大后方重庆的武汉大学。在课堂上，他强调传记文学的精神是写真实，但在写实中还要抒情，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要抒"爱国之情"。他不但讲，而且实践，最先确定的是为明代名相张居正写传。

明万历首辅张居正，为扭转国家危局，重用名将戚继光整顿军纪，推行"一条鞭法"增加财政收入。当时的中国已有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但在中国陪都——重庆——上空，却流行着各种主

义与奇谈，其中有一种说法，声称中国应该“面向北方，右手拉着东方，左手拉着西方”。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卖国的论调对团结御侮无疑是一种腐蚀剂。基于此，他着手为精忠报国的一代名相张居正写传，其良苦用心与匡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43年，《张居正大传》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他一生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自《张居正大传》问世后，他又先后撰写了《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文学作品中，无不洋溢着他充沛的爱国热情，体现着他拳拳爱国之心，并始终将探讨与揭示个人与国家以及其时代的关系作为写作关注的焦点。

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无锡国专任教时，他便开设《传记文学》课；60年代在复旦大学任教时，他开设《史传文学》课；80年代初，他又成为中国最早指导传记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他1988年辞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传记文学家。

郑天挺巧解东陵谜

郑天挺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执教六十年，其间还担任过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但他从未离开过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

郑先生治学严谨，对己学而不厌，对人则诲之不倦。他的学生遍全国，在国外扬名的也不少，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课余家居，对来访的朋友或求教的学生，总是热诚接待，有问必答。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个学清史的同学为撰写清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论文，曾到郑天挺家中郑重请教。他问："清顺治皇帝的生母吉特皇太后的昭西陵，为什么建在清东陵的风水墙之外？吉特皇太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在东陵所葬的帝后中，她辈分最高，莫非她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不光彩，因而不许葬在陵园之内？"

郑先生回答说："恐怕你没读过我写的《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那篇文章。多尔衮称为'皇父摄政王'是出于诸臣阿谀而作为最高爵秩的尊称，也源于满洲旧俗，并无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我已据史实批驳了吉特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至于昭西陵的位置是因为吉特皇太后寿命长，她看着儿子顺治死了，又看到孙子康熙登基以后才死去。她留有遗嘱，为避免动土破坏风水而不利子孙，死后不移灵沈阳北陵同丈夫合葬，就埋在儿子身旁好了。康熙依遗嘱办事，就在陵园之外原为停灵的地方，建了一座昭西陵安葬吉特皇太后。昭西陵不在陵园之内，原因在此。"

那同学犹有未足，又提个问题。清东陵中的定东陵是慈安和慈禧的陵墓，两陵并列，慈禧在左，慈安在右。而慈安是东宫应占上方，

慈禧是西宫应在下方，一般说左上右下，是否慈禧恃权占了上位？郑先生笑着回答：“慈禧和慈安的陵墓同时修建，规模本来相同。但慈禧为表现自己高贵，又重新修建，金碧辉煌超过了慈安陵。这才是她恃权专横的表现。但是慈安紧靠丈夫咸丰，同是一个丈夫的陵，慈禧陵却因慈安陵夹在中间而被分隔开，她的嫉妒将万世难消了。可见在位置上她并未占上风。”郑天挺风趣的解答，既解决了同学的疑问，也是对历史上弄权人物的嘲讽。

郑天挺精研史学，博古通今，孜孜治学且虚怀若谷。他平生著作，只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和《清史简述》三书行世。书名两用“探微”，既显示他治学的精细，又是高度谦虚的表现。据内地旧友函称，郑先生已于1980年在天津逝世，终年八十一岁。晚年主持清史学会和编辑史籍资料性典籍多种，主持标点校勘《明史》。最后还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可惜未等他亲自动手就谢世了。

北大卯字号人物刘叔雅

提起老北京大学的卯字号人物，人们多会想起胡适之、刘半农，知道刘叔雅的，恐怕就不多了。

先说卯字号来历。那是北京大学老宅偏西靠南的一组平房，地址在北京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为景山东街，又改为沙滩后街。据说，原是乾隆的四公主府。住在那里的北大教师有两位是光绪乙卯年生，三位是辛卯年生，故此居题名卯字号。卯的属相是兔，乙卯年生者为老兔，辛卯年生者为小兔，故“卯字号”又被笑称为“兔子窝”。胡适之、刘半农为“三小兔”之二，还有一位，就是刘叔雅。

刘叔雅是安徽合肥人，早年留学日本，二十几岁到北大任教，精于旧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等。据说年轻时倒很有革命朝气，但后来消沉颓废，一生很有些不合流俗的轶事传闻。

例如，他不畏权势。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学潮事件触怒了蒋介石。蒋召见他，态度蛮横。不料，刘叔雅毫不买账，竟伸出手指，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幸而蔡元培等全力斡旋，才算逢凶化吉，免职了事。

刘叔雅偏于消瘦，面黑，讲课时总坐着，闭目、沉思，像是自言自语。他讲六朝文章，常常闭目吟诵，吟完了，停一会儿，像是仍在回味。由于他学识渊博，自是赢得学生敬重。

抗战时期，刘叔雅到了云南，一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在那里，他依然特立独行，传出种种笑谈之事。

有一次，日军飞机来了，跑警报。一位也在联大任教的很有些名

气的新文学作家，急着往某个方向跑。刘叔雅见了，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了。"还好，那位新文学作家总算尊他为前辈，没有回击，躲开，逃之夭夭。

刘叔雅在联大讲课，名气也大的吴宓（号雨僧）常常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氏仍然是老习惯，闭着眼睛讲。只是，每讲到自己以为有独到体会的时候，必抬头、张目，向后排望去，问："雨僧兄以为如何？"此时，吴宓必是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各自回原校。刘叔雅其时因为已不在联大，没有回北京。以后，就一直留在云南，在云南大学任教，殁于1958年，享寿不过六十七。

漫忆浦江清教授

早年清华，后来北大，中文系曾有一位文弱瘦小而且戴眼镜的老师，他不但熟悉中文系教学业务，而且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吕叔湘先生曾称赞他“在同辈中以渊博著称”。这位“学贯中西，广博精深”的学者就是浦江清教授。

说起浦江清，他虽出身贫寒，但自幼聪颖，学习刻苦，靠学业优异而免费读完小学和中学。青年时期考入东南大学，主修西洋文学，辅修国文哲学，受到名师吴宓、吴梅、梅光迪、杨杏佛、柳诒征等人的教诲，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基础。毕业后，被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做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业余时间，又应吴宓之邀，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一方面补习德语、法语、梵文、满文、日语、希腊文、拉丁文，另一方面撰写不少评介东西方文化名人名著的文章。

由于他熟悉东西方文化典籍，驾驭中外资料时没有语言障碍，因此，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常常慧眼独具。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史诗问题时，他就说《三国志演义》是“很够得上中国史诗的资格的”，“不幸这部书的最后写定，用了章回小说体，不用弹词体”。而面对西方有关《天方夜谭》成书问题的纷纭众说，他则用中国话本形成的过程来解释。

他研究的对象，有时不限于文学，诸如天文、地理、民俗、考古、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戏剧、绘画、音乐、教育等领域，目光所及，都能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同时又善于熔各科知识于一炉。比如八仙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八仙因何缘由而会合？会合于何时？为何在民间如此盛传？其真实历史是怎样的？为寻根究底，他以严谨的态度，将有关材料搜集殆尽，剔抉爬梳，撰写成《八仙

考》，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科学的回答。自此，他考证的功力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八仙考》发表之时，他才届而立之年。

浦江清多才多艺，尤其爱好昆曲，二三十年代即是俞平伯等人组织的谷音社成员。在抗战期间，学校转移至昆明后，他多次参加曲集，课上讲到戏曲，兴致所致，常常高歌一曲。他坚持南昆唱法，与一般演员唱法不同。他还经常告诫学生："知识要结合实践。讲古文古诗，如果自己能写几句古文、懂旧诗格律，讲起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抗战胜利后，他接任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课，在中文系开设"楚辞"。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问题，正史没有提供材料，唯一的根据是《离骚》开头两句。他发现前人据此研究有误，原因是战国时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而非干支纪年法，而岁星纪年法有超辰。要搞清问题，就必须对战国时的岁星年作通盘研究，予以精确计算。为此，他利用微积分深入研究现代天文学和古天文历法，常常不顾寒冷，在后半夜起来观看星象，终于写出《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文。

他一生以学校为家。抗战期间，两次把子女留在敌占区，只身长途跋涉，赶回学校上课。在他心目中，学生的分量是比家人还重的。

吴宓教授剪影

偶从书箧中翻出一本20世纪2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禁想起了这位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教授。

吴宓是陕西泾阳人，别号雨僧，1922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班。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西洋文学。他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很有心得，曾在哈佛中国同学会上大谈《红楼梦》。回国后，吴宓先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又移讲席于清华，任该校国学研究所班主任。同时主编《学衡》杂志，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与胡先骕、柳诒征等被称为“学衡派”。不久，在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其中所载西方散文名作都用文言文翻译，诗篇则尽迻译为古诗或律诗，自己也常有吟咏，《吴宓诗集》就是这时自编的。吴编文学副刊达八年之久，因不能顺应潮流，而被《大公报》另聘他人。先后由沈从文、萧乾主编的新文学副刊《文艺》所取代。吴曾与留美女同学毛彦文相恋，不料毛后来弃吴而嫁给下台的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吴吞声忍泣，埋首书斋，聊遣愁怀，间以诗文抒发其丢失的恋情。

笔者对吴先生向往已久。1938年曾在昆华南院临时图书馆前，见一脑袋呈炸弹形，身着紧身细腿旧式西服的中年教授，经人指点才知他即是吴宓教授。吴先生作过两次关于《红楼梦》的讲话，并发表过有关“红学”的文章。他用大圈套小圈的方式比喻宇宙、社会、人生，其最内一圈即《红楼梦》的微观形态，认为此书宗旨涉及天人之际，可从一颗沙粒看世界。又认为在艺术手法上，书中一些回目名称妙手天成，得未曾有。又谓凡世界名作，其最高峰都在全书三分之二处，《红楼梦》亦复如此。

吴在联大教授“西洋上古文学”，又开设“中西诗的比较”。因他精

通中西文学，所以讲来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他在五十初度时，曾撰写《五十自寿》古长篇，犹记头两句是“平生爱海伦，至老弥眷恋”。显然，他还在眷恋毛彦文，因此将毛比之于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美人海伦。

抗战胜利后，吴转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并担任《武汉日报》副刊主编。不久也避战入川，到重庆女师学院任教。当时，他看到上海一家西报的“中国名人传”栏目中有他的小传，大为兴奋。饭后作讲演，话题仍是《红楼梦》。

1949年后，他仍留女师学院任教，后与一女助教结为伉俪。1978年，因病溘然去世。遗言曾嘱家人将其毕生所藏大量图书，包括一些西方文学珍本捐献国家。

性学博士张競生

半个世纪以前，北京大学教授张競生博士从学术观点出发，著书立说，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对千百年来中国最为避讳的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此一大胆作为，令当时之国人目瞪口呆，一些卫道士更是直斥其“胆大妄为”“毒害青年”，对他发起围攻、陷害。然而，时代总在进步，回首张博士的功罪是非，倒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競生原籍潮汕饶平，中学毕业后，曾因父亲阻挠其继续求学而在县衙门状告其父。此举获胜后，他先入京师大学堂，又转学保定军校，辛亥革命后更得以官费留学法国攻读哲学。后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文学院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具倡导作用。专事研究“美的生活”的张競生力主思想解放，性智识的解放，大概就是他的思想解放中的一脉小支流。

使张競生从哲学博士变成性学博士的，是他出版了一本《性史》。此书原定分四集出版，但第一集出版因过于畅销，当局即以“妨碍风化”为由予以查禁。之后，他便自创了一间“美的书店”，出版《新文化》月刊。此刊不是性杂志，但其中几个栏目颇吸引读者，即性育通讯栏、批评辩论栏以及美育栏。通过这些栏目，张一方面仍想在美育、性育方面作些新的倡导，另一方面也是其就《性史》向读者表明态度、答复来函以及笔战的阵地。张競生承认《性史》是“性书”，但绝对不是“淫书”。他在《新文化》月刊上写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严肃而科学地对“性史”和“淫书”加以比较、区分，并用逻辑方法说明了把《性史》当做淫书的人，本人就有心理上的病态。

张兢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讲授性学，招来许多诽谤中伤，甚至谣传他夏日在家不穿裤子，使女佣皆受惊而去。其实，张兢生是一个见了女人就脸红的好好先生。

据一位张的知友回忆，20世纪20年代张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时，因其一向好客，府上常常高朋满座，但极大多数是男客，绝少莺莺燕燕出入其间。

一次，有位风流女士慕名前来见张，向张一直讨教到夜晚仍毫无归意。此令张兢生大为尴尬，不知所措。后来，忍无可忍之下，设法把女佣找来，嘱其立刻雇车把小姐送走。

后来，张兢生再次旅居法国。1949年后改为从事农产种植研究，在家乡潮汕与人合作种植蜜柑。据知，因其改良种植，提倡“植物优生学”，一度又复成为新闻人物。再后，其踪迹何在，就不得而知了。

缅怀顾颉刚先生

香港报纸上过去曾有“京华姑苏三老”的说法，指的是顾颉刚先生、章元善先生、俞平伯先生。不过俞先生虽然年幼时生长于苏州，但原籍是浙江德清，按照习惯说法，不能算苏州人。因而这“京华姑苏三老”，于顾、章二位之外，应添上叶圣陶先生，这才真正符合“姑苏三老”的提法。

顾颉刚先生去年已归道山，享寿八十八岁，虽说寿登耄耋，但也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颉刚先生是地道的苏州人，而且出自名门，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秀野草堂顾氏的后人，学术渊源，其来有自。提起顾颉刚先生，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大禹王和大爬虫”的故事，这是顾老早期论文中曾提过的大胆设想。但当时颇为卫道者所非议。其实在学术上，探索一个疑点，提出一种假设，也并非是什么严重的大事。

顾老平生的著述有《古史辨》《浪口村随笔》《中国历史地图》，主编过在世界学术上有价值的刊物《禹贡》。一生精研《尚书》，精细标点《资治通鉴》，曾三次标点《史记》。其标点之精，真可以说是“明察秋毫”。例如标点《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在“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顾老标点这几句话时，在刘邦说的“令将军与臣有却”一句后面，不点句号，却写了一个破折号，是大有学问的。表示刘邦急于向项羽表白自己没有野心，话还很多，没有说完，就被项羽打断之意。太史公描绘刘邦的急迫、项羽的胸无城府的传神之笔，经顾老这样一个破折号一点，则神情完全跃然纸上。

20世纪30年代中，顾老在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31年四五月间，曾同洪煨莲、容希白、吴文藻诸位先生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处旅行：访问古迹，购买文物、书籍，还曾特地到大名去访问崔东壁家的后人，但清代这位著名的北方朴学大师的后代当时已十分凋零了。顾老此行却为燕大图书馆在各地搜求了不少古籍。当时参加者之中，容希白（庚）先生、吴文藻先生都还健在，可算是耄龄硕果、鲁殿灵光了。

颉刚先生晚年以七十七八岁高龄，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克底于成，是永照史册的胜绩。

忆苦水师

苦水是顾随先生的别号，他曾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20世纪30年代末期，我受业于他，曾选修他所开的“词”。

回忆起苦水师，总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来，因为他面庞瘦削，唇上有胡髭，双目炯炯有神，冬天总爱穿一件灰布棉袍，围一条又长又宽的黑色毛围脖，头戴一顶深灰色的一捋到底露出双眼的驼绒帽，看去多像鲁迅先生。

他讲课选用张惠言的《词选》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做教材。他讲词强调要有意有境，两者俱备才算好词。因而他推崇南唐李煜（后主）的词，对于《虞美人》中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击节赞赏，称为千古绝唱。他对秦观的《蝶恋花》，不甚喜爱“可堪孤馆闭春寒”一句，而赞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他认为“孤馆”句显得凄厉，而后者则堂庑特大，境界开阔。

苦水师身体孱弱，但讲课时每到紧关节要或欣赏赞叹之处，却精神振奋，毫不惜力，有时引起咳嗽气喘，亦要一气讲完。他常说，在课堂上讲授词章亦如一切学问一样，要用全力。他好引用当年京剧名武生杨小楼演戏为例。他说杨小楼的武生戏已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晚年登台演出时，仍能抖擞精神，一气呵成。上台前，老态龙钟，在后台要人搀扶，但锣鼓声一响，台帘一挑，他跃身出场，俨然变了一个人，精力充沛，唱念做打，无不精到。一抬手，一举足，都有分寸，恰到好处，毫无衰老之态。这是由于他功力硬，根底深，一登场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戏里。但一出戏演完，回到后台，便瘫软下来，赶紧由人架住，扶到榻前，躺倒休息。他说杨小楼是把精神气力都与戏

中人物融为一体了。他教导同学们写词亦要如此认真，如此下功夫。

我看苦水师在课堂讲词，确实有如杨小楼演戏那股精神。由于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有时谈佛论禅，有时引经据典，旁及诸子百家，一经引用，都能与词学融会贯通。至于讲三国，说红楼，论西厢，引聊斋，更是入木三分，听起来真如天花乱坠，美不胜收。

20世纪50年代，传闻苦水师在天津师范学院教读，音讯鲜通，近始知已逝世多年矣。海天阻隔，忆念殊深。

忆燕大英籍教授贝卢思

贝卢思女士（Miss Lucy Burtt），英国人，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开世界通史课。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个老处女，脾气有些古怪。看起来很厉害，很暴躁，其实却很和善，并乐于助人。她有“三快”：说话快，走路快，手势快。但又快中有细，讲课细致而认真。

她讲话好用一些语气强烈而夸张的形容词，诸如“奇异的”“奇妙的”“极大的”“怕人的”等，使她所描绘的人或事更加生动。她的讲话中要用许多惊叹号，如果你记录成文字的话。

贝卢思女士有自己一套良好的教学方法。讲世界史她要求同学们作年表，画地图，以加深了解和记忆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地域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作年表，是横向分为若干栏，标明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纵向按年代排列，分开“公元前”和“公元后”，把各洲（包括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大事，分列在各栏内，学历史所要求的五个“W”，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状况，都标明在纸上，一目了然。

画地图是把一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都画在地图上。如各国的版图、重要城市、战争中的进军路线等，都用不同的颜色、线条和符号标出来。这就把历史和地理结合在一起，非常便于理解和记忆。凡受过她教诲的，都会记忆犹新的。

同学们都说贝女士是个大忙人，从没有看她闲住过。不是匆匆忙忙地走在燕园湖边柳下，就是在图书馆里埋头紧张地翻书；不是在教室里口不停声讲课，就是在校园里和遇到的师生们打招呼，又匆匆地

寒暄着走去。真是马不停蹄，没有休息。她的生活可说是过于简朴，近乎清苦了。她冬天衣着单薄，蓬松着满头银灰色卷发，微显佝偻的身躯，走在漫天的皑皑白雪下，脸都冻得发紫了，仍是快步如飞，毫无瑟缩畏寒之态。如今想来，她的身影犹如在目前。

后来，我只知道她回国了，但多年以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不过一想起她那笑貌、语气、手势和坚强刚毅的性格来，就觉得一定是会享长寿的！在燕园曾受教于她的人们，还记得这位老师吗？

邓之诚治学桑园

最近看到再版的邓之诚先生著《东京梦华录注》。重读邓先生的著作，睹物思人，邓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加深了我对他的无限缅怀。

邓之城先生，四川人，是一位饱学鸿儒。他曾著有《中国通史》四卷，流传中外，为学者所称道。邓先生在燕京大学开中国通史课，为历史系同学所必修，而旁系选修者为数甚多。

邓先生总爱穿一件灰布长袍，外罩黑马褂，头戴一顶红疙瘩瓜皮帽头，足登礼服呢布底鞋。每到教室上课，双手捧着一摞书，目不斜视，迈着四方步走向讲台，把书往讲桌右边一放，然后摘下帽子，露出剃光的头顶，向同学们深深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头顶几乎碰到桌面，然后便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一部二十四史好像都装在他的肚里，年代、史实、人名、地名，记得滚瓜烂熟，讲得有条有理，津津有味。

邓先生唇上有点胡髭，戴一副深度眼镜。讲课时总是低着头，从来不向学生座位上看。下课时，重复一遍上课时的动作，鞠躬，戴上衬帽，捡起书来，踱着方步，走出教室。

邓之诚的教学与众不同。每学期开学之初，他只到教室上一两节课，然后就让学生到他家去上课。他家在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路北二号。他居住的北房既是书斋，又是他的会客室和教室。书斋中间有张大案桌，师生围坐一桌，听他用浓郁的四川音讲课，显得亲切、融洽。在书斋后院杂生着很多桑树，他因而名之为“桑园”。他后来把读书的题跋、眉批汇集出书，就命名为《桑园读书记》了。

书斋靠墙有张大长桌，上面叠放着各种书籍，其中也放着日记。先生允许学生翻阅他的日记。日记长盈尺，我翻过一次，只见密密地写上蝇头小楷，字端正，有时小得只有几毫米，人愈老字写得愈小，这是令人惊奇的。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那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京的一件名案。御史赵启霖奏参直隶道员段芝贵，贿赂庆亲王奕劻十万两银子，还以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天津歌妓杨翠喜，送给奕劻的儿子载振为妾，因得署理黑龙江巡抚。先生在照片旁边用蝇头小楷说明这场丑闻的始末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篇极妙的短文。照片拍摄了清末十三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

邓先生也善书法，常为人书写对联、扇面，字如其人，写得工整大方，遒劲有力。先生又研究金石文玩，所著《古董琐记续编》是部名著。他本人也精篆刻。我见过他所刻的四本《五石章印谱》，里面有为他朋友汤尔和等刻的印章，以及自己的名帖、闲章，刻宗汉印，刀法也好。从印谱看，他不喜欢明清那种路子的刻法。

邓之诚先生于1960年病逝，终年七十三岁，每当想起这位老人，我总要泛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怀乡念旧之情！

金庸恩师张印通

由金庸等校友捐资建造的以德育人的教育家张印通的铜像，业已在浙江嘉兴市第一中学隆重揭幕。

正面镌刻着“敬爱的张印通校长”八个大字，下署“学生金庸敬题一九九五年三月廿九日”。背后镌刻着张印通的事略。

张印通（1897～1969），字心符，嘉兴人，早年东渡日本，1923年毕业于日本国立东京高等师范。此后，一生从教，历任浙江省立二中、二师、松江女中教师。1931年8月起任省立嘉中校长。抗战爆发，日寇登陆金山卫，国运艰危，环境凶险。当时多数学校停办、解散。张印通爱国忘家，毅然率领彷徨无主的嘉中师生，还有沿途收容的别校学生数百名，向后方流亡。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经余杭，过于潜，抵兰溪，至永康，历尽艰辛，最后抵达丽水碧湖，就任浙江省临时联合高级中学校长。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战时办学，与师生同甘共苦，身教言传，战胜了日寇的侵扰和物质的困难，把学校办得充满生气，为国家民族造就了一批人才。

在流亡过程中途经金华，时任松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将军也带领部队后撤。张部曾驻防嘉兴，深佩张校长之为人，得知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地南迁，十分感动，特派他的高参敬赠大洋两千元。以后，就用这笔钱给南迁的困难师生添置棉衣和补助伙食。先生廉洁奉公的品德，给苦难中的师生增添了难以言说的温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1941年、1942年日寇两次侵浙南。张印通带领学生翻山越岭，迁到海拔六百米的青田县南田村继续开学。南田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的军师刘伯温的故乡，层峦叠嶂的一小块高山平地，几乎与世隔绝。饱受战争之苦的师生们又在这静谧的环境中弦歌不绝、书声朗朗，直到抗战胜利。

嘉兴第一中学，创建于1902年，当时定名为嘉兴府学堂，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省立嘉兴中学，是浙江省首批重点中学，专设高中部。学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知名校友灿若群星。如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文学家郁达夫、香港华润集团董事长沈觉人、台湾机电专家盛庆琜、气象学家戚启勋、联合国环保专家沈铎，以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等。当然金庸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金庸对于张印通有着特殊的师生情谊。金庸曾说过，“没有张印通就没有我查良镛”，称其为“恩师”。大概是他小小年纪，是张校长把他自家乡带出上学，在抗日烽火中，学校南迁浙南山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读书明理，受到无形的道德熏陶。

爱国学者赵景琛

惊悉赵景琛教授于1985年元月7日与世长辞，忆及先生音容，不胜哀哀。

赵景琛先生是现代作家、著名文学史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即以研究戏曲史和小说史方面的显著成就，享誉海内。那时候，笔者每去天津，总要到先生处求教。先生朴讷沉静，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一派儒士风度。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学术方面的深刻见解着实令人敬佩。而先生藏书之多，亦令我慨叹。他一生嗜书成癖，以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方面的收藏而言，搜罗之多，大概仅次于吴晓铃先生了，其中有些收藏在海内已成为孤本。

初见赵先生，我以为他只是一位终日困守书斋的学者。后来才知道，他外柔而内刚，也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民主人士。

赵景琛先生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中过进士，做过几任知府，父亲思想也并不开通。赵景琛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星期天还常躲在图书馆内，专心致志地抱着书本冥思苦索。然而，1919年当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时，他和一切爱国青年一样，再也不能缄默了。他满怀激愤，跑上街头，和同学们一起高呼："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他还参加了宣传队，写诗、写标语、唱歌。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把他关进书斋，强迫他"安分守己"，并且用断绝经济来源相威胁；母亲则哭哭啼啼劝他"回来"。他却回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过亡国奴的生活，我要爱国！"

1922年，赵景琛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毕业，家里人为他在纺织业

找到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务，别人都很羡慕，而他却拒绝了。他跑到天津《新民意报》担任了文学副刊的编辑，甘心接受菲薄的薪水。他尝言：“我本来相信实业救国，但是当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列强欲瓜分中国，于是想用文学作为救国的手段。”

后来，他果然在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作出了成绩。中年以后又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不断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年底，听说北京戏曲理论著作授奖大会上，上海七名受奖者多为赵先生之弟子，故大会特授予赵先生荣誉奖。当时我还很为他高兴。不想时隔数月，先生竟成古人！噩耗传来，悲恸不已，谨以斯文略寄哀情！

周恩来师张皞如

周恩来举世闻名，但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张皞如却鲜为人知。

张皞如是河北盐山人（今属河北沧州市），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清末考中秀才，后赴保定学习深造，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张先生深知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办教育，以唤起广大民众。

张皞如因在家乡“毁庙宇、建学校”的壮举冲破了封建习俗，且新式教学成绩卓著，曾被河北省参议会选为议员。时任南开中学校长的张伯苓正欲聘优秀教师，闻美籍教授麦迦利在保定执教时十分赏识张皞如，遂聘张兼任语文教师。

张皞如欣然受聘，以实现“教育兴国”之愿望。当时周恩来正在该校读书，对张先生诲人不倦、平易近人的精神极其钦佩，喜欢听其语文课，其所讲内容丰富有趣、生动活泼。当时，即使周末或节假日，学生们也结伴去张皞如的寓所提问，听辅导，当面领教。周恩来对张老师更是崇敬，师生之间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6年，师生目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言行，挥笔疾书，赋诗记之。

张皞如这样写道：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中国命运已断送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周恩来亦和诗一首：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两首诗载于1916年10月出版的《敬业》杂志第五期。张皞如的诗名《伤时事》，周恩来的诗为《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1917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天津学生积极响应。南开学生代表周恩来和“学联会”各校代表多数被警方拘捕。张皞如闻之义愤填膺，联合各界人士呼吁营救。当时有人劝张先生隐蔽一下。他说：“只有国耻得雪、正义得伸、代表获释才是当务之急，至于个人安危，在所不计！”不久，学生代表全部释放。

溥仪老师朱益藩

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著名的文物商店荣宝斋，有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在挂笔单卖字，前来求书者络绎不绝。老先生写的楹联、条幅、中堂、册页、扇面以及长卷寿屏，均可说是书法精品。他便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

朱益藩，字艾卿，号定国，清代翰林，江西省莲花县人。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授命南书房行走，兼经筵进讲大臣，颇得光绪的信任和赏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统被迫退位。这个变化对于朱益藩来说，确是巨大的打击。他抱定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一面读书教子，一面种花养鸟，准备终老乡里。

当时溥仪的老师共有五位。教汉文的是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教满文的是伊克坦，教英文的是庄士敦。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对朱益藩有这样的评述：“我是很敬重这位老先生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旧道德和传统文化。他虽然比陈宝琛年轻一些，但在精神上却是比陈宝琛更为守旧的。他对紫禁城里的种种黑幕与弊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他对太监制度的存在也认为实属必要。他认为太监制度自周朝以来就有了，今日20世纪的中国仍然保持这种制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1918年，张勋以调停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纠纷为名，带兵进京，企图以武力复辟清王朝。

张勋与朱益藩是江西同乡，关系密切。张进京后，便在江西会馆

内宴请朱，想请他为复辟出谋献策。但朱益藩看到，全国正被大小军阀纷纷割据，溥仪是无法整治这种局面的，故力劝张勋不可轻举妄动。结果，张勋的复辟闹剧只维持了十一天便寿终正寝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与郑孝胥和溥仪勾结，要成立伪“满洲国”，由溥仪当傀儡皇帝。溥仪举棋不定，便派人叫朱益藩赴津，想听取他的意见。

朱益藩到天津后，力劝溥仪不可立“满洲国”，不要“助纣为虐，集万民之怒恨于一身”。但终不奏效，只好愤然离去。

1932年4月9日，伪“满洲国”宣告出台，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溥仪成了亿万人民共诛的卖国贼。朱益藩羞辱难忍，气愤至极，便要儿孙们把悬挂厅堂内的溥仪送给他的六十寿辰诗取下来，以表示对溥仪的极大不满。

自此以后，朱益藩便在荣宝斋挂笔单卖字。1937年病逝于北京。这位极端守旧的清廷遗老，看来有时还是识时务的。

杏坛记盛

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校址在景山东街马神庙。1912年5月才正式改名北京大学。

1916年开始在校内运动场南旷地上兴建了新大楼，因为全楼都是以红砖红瓦建成，故称红楼。红楼平面呈工字形，砖木结构，东西面宽一百余米，主楼进深十四米，东西翼楼南北长三十四米，总面积一万余平方米。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死去，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此时，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正在法国。9月，蔡元培接获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旋即归国。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1月4日，他到北大正式就职，办公室设在马神庙路北一栋平房里。红楼建成后，他迁到红楼二层校长办公室办公。

蔡校长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网罗各派学者，实行学术民主，力主百家争鸣，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当时的北大，真是人才荟萃，盛极一时。新文化运动的名流云集红楼，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旧派学者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黄节、陈介石、陈汉章、梁漱溟等。还有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理料的李四光、颜任光、翁文灏、何杰、钟观光、夏元瑮等。他们都是当时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此外，还有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蔡元培锐意改革，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体制，组织评议会议，建立行政会议及各个行政委员会，设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研究所等。

他进行学科改革，扩充文、理两科，使北大成为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他创办文、理、法科研究所。

他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创中国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例。

他倡导平民教育，设立北大校役夜班、平民夜校。

他大力提倡美育。并亲自讲授美学；发起成立音乐研究会，出版《音乐》月刊；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

他重视体育，首创学生军，增强学生体质。

他十分重视德育，发起组织进德会等，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

他主张办好图书馆，出版学报，请中外学者前来演讲，扶植社团，百家争鸣。

因此，蔡元培时的北大，享有极高的威望。冯友兰曾深情地回忆道：“蔡校长能得到全校师生的拥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1940年3月5日，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先生逝世。人们深深地缅怀他的功绩，景仰他的高风亮节。

北大师生更不能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1947年，北大学生自治会为了纪念蔡先生，建立了“孑民图书室”；1948年，北大师生在校内建立了“蔡孑民先生纪念堂”。

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蔡元培先生的业绩是不朽的。

教育学家陶行知

陶行知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母亲曾在县城耶稣教堂做杂工。陶行知少年时经常挑菜进城，顺便去探望。英国传教士见陶行知聪明勤劳，就免费让他进教堂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

崇一学堂是一所不分高初中的中等教会学校。修业时间三年。设有语文、数学、理化、英语、医药、修身等课程。陶行知三年功课，两年修完，提前一年毕业。这年他十五岁。接着，陶行知又先后进杭州广济医学堂和苏州浸理学堂读书，但都因不合乎理想，很快就离开了。后来，陶行知到了南京，进入金陵大学学习，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该校毕业。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是美国人，对陶行知相当器重，一再鼓励他去美国留学。陶行知当然也渴望能出国深造，但却苦于没有旅费。包文校长资助了他一部分，他自己又向亲友借了一部分，终于在这年秋天，乘邮轮前往美国。

到美国后，陶行知先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与孙科同学，两人同一宿舍。不久，他感到学市政回国后只能做官，没有真正的救国本领，于是只读了一年，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使国家强盛的根本，于是成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得意门生。而杜威的另一个中国的得意门生，则是陶行知的同乡、安徽绩溪人胡适。

1915年，陶行知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当年秋天，二十八岁的陶行

知，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三年的留学生活，乘邮轮回国。

在邮轮上，座谈归国志愿时，陶行知说：“我要使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他觉得中国贫穷落后，乡村比城市更甚，于是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试图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创设一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积极推行农民教育运动，以此来解救中国。

1926年秋天，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一起筹划，决心办一所试验乡村师范。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选中了南京神策门外崂山晓庄作为校址，校名遂定为晓庄师范。第二年3月15日，学校正式开学。他作为学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风趣地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从这一天起，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便在这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

晓庄师范确实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在培养目标方面，作为一校之长的陶行知规定为：“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学生和农友兴建茅草礼堂，他亲手题名为“犁宫”，并在大门两旁配以“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的对联。后来，学校修建了图书馆，他又为之题名曰“书獃子莫来馆”。他在招生广告上提出：“小名士，书獃子，文凭迷，最好不来！”招生考试科目，除了作文、常识、演说外，还将开荒等体力劳动当作重要内容。他带着招收来的第一批新生，在荒山旷野搭起帐篷，光着两只脚，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劳动结束时，他笑着对大家说：“今天的考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你们的成绩足够一百分。”

1932年，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试图以教育为手段改善人民生活。后来，还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他1946年病逝，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歌集》等。

杜威十分赏识陶行知，而陶行知却没有把杜威的教育主张生搬硬套地搬到中国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如杜威提倡“教育即生活”，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杜威提倡“学校即社会”，陶行知提倡“社会即学校”；杜威提倡“在做中学”，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从杜威处接受教育，但却加以改革，成为中国式的新教育思想。后来杜威在考察苏联教育归国后赞叹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从“开国状元”到北大代校长

1644年满族入关后，效仿汉族开科取士，遂于顺治三年（1646），首开科考。山东聊城人傅以渐独占鳌头，考取“开国第一状元”。

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祖籍江西永丰，后徙山东聊城东南傅坟村。傅少时聪悟过人，三岁开蒙，五岁已熟读五经，十岁即能属文。幼时，因家境贫寒，夏日酷暑，乃彻夜用功，用艾蒿薰烟驱蚊，用蓖麻脱壳成串代烛。他曾以树枝代笔在房墙上写诗言志：“蚊虫听我读书声，蓖烛虽暗心自明；何日如登进士第，居官为民史留名。”

傅以渐，《清史稿》列传二十五有传。曾任《明史》纂修。顺治十年（1653）擢升秘书院侍讲学士，后加封太子太保，充任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康熙四年（1665），傅病逝于故乡聊城，终年五十七岁。

傅以渐著述颇丰，有《孤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内则演义》《四书易经制义》等数十种。

故乡村流传傅以渐故事甚多。如骑驴上朝，回乡收七旬阴阳先生为徒等趣闻，流传至今。傅以渐后人多有科举入仕者，傅姓遂成为聊城名门望族。1946年曾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即傅以渐七世之孙。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幼承家学，聪敏过人。十余岁即熟读十三经，十四岁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一岁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毕业后考取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因他国学底子厚

实，又研究了多门学科，回国后成为文史专家及社会活动家。

傅斯年在北大学习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影响下，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他除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等文章，又联合罗家伦，主编了《新潮》月刊。他先后在《新潮》上发表了四十三篇文章，积极鼓吹西方近代思想，批判中国现实的诸多问题。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傅斯年被北大学生推举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后因与别人赌气，竟脱离了运动。

据其同学回忆，傅斯年在北大是很突出的。一是他学问好，天分高，成绩优异，被同学戏称“孔子以后第一人”；二是他身宽体胖，言谈直爽，又恃才傲物，不修边幅。就连老师胡适也敬佩他的国学根底，称他：“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留学七年，于1926年归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持并参与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并多有史学方面的著述。

后来，他任北京大学教授。闻讯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在北大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慷慨陈言，提出“书生报国”的口号。当时，针对日本宣传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他联络蒋廷黻、方壮猷、萧一山等协作动手撰写东北地方史。他奋笔疾书，昼夜不息，很快完成了《东北史纲》第一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东北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日本土肥原到北平，与亲日的萧振瀛相勾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一天，萧在怀仁堂召集北平文教界知名人士座谈，以人身安全相要挟。傅斯年在现场无所畏惧，拍案而起，明确表示，所谓华北自治，就是分裂祖国，任何卖国求荣的行为，必将遭到历史的唾弃。与会者纷纷赞成他的意见，弄得萧振瀛狼

狈不堪。

傅斯年与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结婚。当孩子尚未出生时，他与夫人就预先给孩子取名“仁轨”，因为唐朝刘仁轨是中国第一个在朝鲜打败日寇的民族英雄。为未出世的孩子取古人之名，意在希望后辈也像古代英雄那样，长大后抵御外侮，忠贞报国。

为了国家民族的团结，1945年，他与冷遹、王云五、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赴延安考察，曾受到毛泽东的接待。应毛的邀请，两人畅谈一个晚上。毛连口称赞他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时的功绩。他谦逊道：“我不过是陈胜、吴广，您才是项羽、刘邦！”临了，他提出要毛题字。五天后，当他与王云五等返回重庆时，毛泽东赶赴机场送行。握手话别之际，遂赠其亲笔手迹。他登机后展开一看，上面原来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他深深感到，这是毛泽东对那晚他随口说出那个比喻的回答。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拟委傅斯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他则力荐胡适。在胡适未到任前，他甘任代校长。蒋氏政权去台后，他赴台任台湾大学校长。于1950年12月20日病逝于台湾，终年五十五岁。

教育家陈垣著述等身

新会陈援庵（垣）先生，为中国当代杰出之史学家与教育家。早在1917年，先生所著《元也里可温考》，即刊载于《东方杂志》，证实元史屡屡出现而不为人知之“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先生旁征博引，阐明元代基督教会行世，已是蜚声中日史学界。1935年由国立大学校长出面，推选学术界耆宿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先生当选为史学四评议员之一，另三人为郭沫若、胡适之与陈寅恪。

先生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先后达四十五年。北京沦陷时，辅仁始终不向敌伪注册。先生不接受敌伪津贴，虽威逼利诱终不接受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院系调整，辅仁、师大合并，先生继任师大校长。国内任大学校长之悠久者，人皆以为当推南开之张伯苓、清华之梅贻琦，其实他们不过二十年左右，实当推陈垣先生也。

五十年前，笔者负笈北京，曾亲聆先生教益。其时先生除任辅仁校长外，尚任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名誉教授，并按时前往授课。以是，先生弟子遍当时北京五大学府。

当年，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时，辅仁有三院十系，客籍教授来自美、法、德、意、荷、日诸国，校务不可谓不繁。而校长室内从无秘书以佐文墨，亦无助教以分其劳。先生虽久长大学，然始终未离讲坛，直至年逾古稀。先生所任课先后有“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魏晋南北朝史”、“史源学实习”“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虽课多事繁，然除讲课外，尚认真布置作业，并亲手批改。如授“史源学实习”，以顾炎武《日知录》为教材，按时指定段落，命学生找出文中人物及史实出处，并一一核对原作，以见征引有无错误。古人为文，多不注明出

处。欲寻征引，自需费大功夫。至于核对征引，有无错误，更需悉心查对。先生评阅学生课卷，则一丝不苟。虽一事之微，一字之异，从不放过。

先生于署理校务、担任教学、批改课卷之余，仍未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数十年来，著述等身。所著《元典章校补》《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早已为中外史学界所称道。而所编《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用功极勤，历经寒暑，尤为嘉惠后学。

侧闻，1971年6月21日，先生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九十一岁。先生遗命以多年珍藏图书四万余册，连同所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南开“校父”严范孙

世人一提天津南开学校就想到张伯苓，认为他是南开的创办人，一切功劳都归于他，竟忽略了有南开“校父”之称的严范孙。事实上，如果没有严范孙也就没有南开，因为南开是由严氏家塾发展而来的，张伯苓则是由严氏家塾的塾师成为南开校长的。张伯苓自己也曾说过，南开创办人是严范孙先生。当年严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英国考察教育，他闻讯后极为伤痛，尊称“严范孙先生是南开学校的‘校父’”。

严范孙名修，原籍浙江省慈溪县。先人移居天津，成为天津的盐业和典当业富商。严范孙于1860年4月2日生于京东三河县。1929年3月15日在天津病逝。

严范孙清代翰林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省学政、学部仕郎等职。戊戌之前任贵州省学政，捐资办学，聘名师、办学堂，开贵州办新学之风，影响及于西南各省。当时，他向清廷奏请废科举，开办经济特科，有声于时。

戊戌政变以后，严范孙返回天津蛰居，但深信中国欲图富强，非变法维新不可，而创办新教育实为救国之根本。他乃集中精力从事教育事业，首先在私寓设严氏家塾，聘请张伯苓和陶仲铭为塾师，教严家子弟以西学，这就是南开学校的胚胎。严范孙还多次偕张伯苓出国考察教育。办成南开中学之后又全力创建南开大学，还联合天津绅商改组“蒙养学塾”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从此，天津士绅继严氏之后陆续办起多所学堂。

1903年严范孙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就任直隶省学校司（相当教

育厅长）。在任一年，全力倡导创建新学。规定每个府县必须设立学堂一所、师范学校一所。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北洋师范、女子师范、高等法政等校都是当时严范孙主持建立的。

严范孙办学爱惜人才。他在南开学校设有严范孙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学子。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期间即深得严范孙的器重。据南开老校友透露，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及以后赴法勤工俭学，都得过严范孙的巨额资助。

严范孙家教严格，子孙均多成才。其子严智开、严智怡为教育家和美术家，其孙严仁颖则以“海怪”绰号蜚声于30年代的华北体育界。

严范孙逝世后，南开校友集资在南开中学内兴建了“范孙楼”，并建立铜像，以纪念这位劳苦功高的教育家。

张伯苓的南开精神

现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时值十六岁，即怀着武力救国的信念，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三年后，中日甲午一战，中国北洋海军惨败的事实，使他受到很大震动。后来，他在海军衙门前看到一个军官牵着一只哈巴狗，边走边逗，形神懒散。由此，他触景生情，痛感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人的素质差，故造成国力衰弱。要强国，必须兴教，只有培养出人才，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他曾深深慨叹道："国不自强即难图存，图存，舍教育无他道。"

这一年，他遂弃武从教，在天津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范孙家设馆当教师。光绪三十年（1904），在严范孙的帮助下，严家与王奎章两家私塾合并，成立敬业中学堂。四年后，学校迁址，改称"南开中学"。

当时，南开中学西墙外有个臭水坑，平时蚊虫孳生，气味腥臭。社会上的旧势力用封建腐朽的臭气向张伯苓进攻，说他不懂中国祖传旧学，不学无术，甚至造谣说他是光棍出身等。为此，他常在学校大会上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南开精神就是在这种臭味中熏出来的！"

他的办学宗旨是：育才救国，改造社会。他主张学生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他亲自制定的《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他感到日本对中国东北军事入侵迫在眉睫，遂亲赴东北视察，回校后亲自组织"东北研究会"。第二年，便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南开独有教材《东北经济地理》，列为中学部必修

课，使学生对东北经济地理有所了解。

1935年，日军魔爪伸向华北，日军兵营就设在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日军经常打靶，枪口常常对准南开。此时，他对全体师生发表谈话，总以沉重的语调问学生："你是中国人吗？""是！""你爱中国吗？""爱！"学生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战祸延及天津。日军从海光寺兵营用炮火轰击南开大学，一夜之内校舍便化为废墟。此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当获悉南开校舍被毁，想到四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结局，心里悲愤至极。这一年10月7日，是抗战后南开第一个校庆日，他郑重通电全国校友称："敌人所能毁者，南开的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精神！"

张伯苓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艰苦奋斗，整整五十年。南开学生未满千人之前，他能叫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而且说得上每个学生的家庭概况。为了办学，他经常解囊出资。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还说："钱不论是从哪里捐来的，用来办教育，这对国家民族总是有益的。"

卢木斋矢志办学

近代以兴办教育而负盛名者，在天津的有办南开学校的严范孙和张伯苓。与他们同时，还有一位给南开大学捐建图书馆，在天津办过木斋学校的卢木斋，也是一位终生矢志办学的有名人物。

卢木斋，湖北沔阳人，清咸丰六年（1856）生，青少年时期即喜好研求经世致用之学，厌恶八股文，好学数理。二十七岁写成《火器真诀释例》一书，为研究枪炮武器射击测算的著作，被地方官所赏识，知名于乡里。中学后，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委以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在该校任教的严复，对严译的《天演论》《原富》《名学肆言》等书极为推崇。《天演论》最早版本就是卢木斋刊行的。

他青年时期喜好数理和经世之学，而严译《原富》的经济理论，更形成了他日后弃官经营实业之念。严译名书介绍西学以广民智，也促成了他办学、建图书馆的信心。在大办洋务、讲求维新的清末，他果断地提出了“救国之危，化民之愚，惟普及教育之一策”的主张，直至晚年而弗懈。

卢木斋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一年半之后，历任直隶（今河北）省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的知县。义和团运动后，任职于保定直隶学务处并兼保定大学校长。其后，任直隶提学使和奉天提学使，以迄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辞谢各方礼聘，回归天津文化教育事业，以偿夙志。

在卢木斋任职提学使时期，经他倡导，在天津、保定、东北各地建立图书馆多处，设立了师范、法政、农、工、商、医、美术、水产

等专门学校，办了中学、小学。当时，津、保地区率先建立新式学校为数之多，冠于全国。

其后摆脱宦途，他在天津和冀教各县广置房地产和投资厂矿企业。但他聚财有术，散财有道。他对子女不留遗产，而是把房地产和股票都作为“木斋教育基金”，用来办文教事业。

卢木斋先是在天津元纬路的寓所办蒙养园，以后发展为小学、中学。后来计划在北戴河筹办木斋大学，终因缺少像张伯苓那样协助严范孙办南开学校的得力助手而未实现。他办图书馆，为世人所熟知者：第一是捐十万元和藏书十万卷给南开大学建立的“木斋图书馆”，可惜毁于1937年7月侵华日军轰炸天津的炮火中；第二是1936年在北京他的住宅创建的藏书二十四万卷的木斋图书馆，可惜也于1948年因有人强行借住，而被盗过半，损失甚巨。

卢老于1948年8月，以九十三岁高龄，抱恨自己的雄心壮志未尽实现而逝世，但他终生为开拓民智而作的努力，后人是不会忘怀的。

兴办女学的温世霖

在天津提起早年创办新式教育的，都知道严范孙和张伯苓，但还有一个同样热心办学的温七先生——温世霖，却鲜为人知。

温世霖字子英，又字支英，清同治八年（1869）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的望族。前辈中有人中过武举，他本人是清末秀才。他主要从事女子教育，在天津城内创办了天津最早的一个女学——普育女学堂。先从小学办起，后又办了蒙养院（现在的幼儿园）和女子职业班。他逝世后，温氏族人继其遗志，又在普育学堂基础上扩充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还在其故乡宜兴埠创办了一所普育女子小学。在温世霖一生办学过程中，他的母亲、妻子、儿辈和族人后代，连续为普育女学堂奔波效劳四五十年，开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1905年，普育女学堂在天津城里开班时，仅有学生五六人，转年才增至五六十人。蒙养院招生也仅二十多人。因为当时社会风气闭塞，对于送女孩子出门读书，许多人还不习惯。在当时，女子学校的女教员也很缺乏，温世霖就请他母亲徐老夫人和妻子安夫人出来教课，还聘请张伯苓之妹张祝春和友人陆文郁之姊陆阐哉也来任教。这就是天津的第一批女教师。后来，张祝春和天津的近代教育家马千里结婚，在普育女学堂举行新式结婚典礼，这是津门第一对行鞠躬礼的新婚夫妇。

在创办普育女学堂的同时，温世霖在天津还先后参与创办《醒俗画报》（天津第一份画报，主笔陆文郁）和《新民意报》（马千里任主笔），鼓吹新政，宣传革命。这两份报纸后来都因得罪当局，被迫停刊。

1915年，温世霖还在天津南市兴建了“大舞台”戏院，这是当时天津最大的一个剧场，首创转动舞台，演出新戏，轰动一时。

温世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0年被推举为全国学生界同志会会长，通电全国号召学生罢课以支持召开立宪的国会，因而于这年腊月初七被捕，充军新疆，辛亥革命后始返津。其间他著有《昆仑旅行日记》，记载西行情况。民国初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参加过反袁、反段的活动，著有《段氏卖国记》一书。但因其政治活动接近直系，1923年曹锟贿选大总统时，参加投票，造成终身遗恨。其后即退出政坛，1933年，六十四岁时故去。

燕大校长吴雷川

20世纪30年代末，笔者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那时，在文法学院教学楼——穆楼——门前，经常发现有位老翁，坐着人力车，自东北方向的朗润园缓缓而来。这位老人经常不戴帽子，光着头，露着满头白发，满脸寿斑，身穿布袍，脚穿布鞋布袜，虽年近七旬，可是面容红润，身体健康。老人下车后即步入穆楼。新来的学生们起初不知他是谁，还以为是位乡下老头来找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晚清翰林、燕大的校长吴雷川先生。他那朴素、庄重的仪表，令人肃然起敬。

后来，我选读了吴先生讲授的“应用文”课。除上课外，课后我还不断到吴先生住宅去请教，逐渐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吴先生对于课堂讲课很认真，偶感微恙，也从不缺课。他讲课时，细声慢语，字字珠玑，将满腹经纶全部倾吐给同学。他的板书一丝不苟，显示出具有“馆阁体”楷书功力。同学们都认真听课，感到受益匪浅。

吴先生是浙江杭州人，出身诗书望族。在家排行第四，在清末，与其二哥同榜考取翰林榜首，在杭州传为佳话。

先生早年曾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现在的校长）。后移居北京，住西城保安寺街，莳花种竹，诗酒自娱。后来又任教育部参事。先生信仰基督教，为中华圣公会所推举，曾被聘为燕京大学前身的协和大学中文教授。北伐成功后，经其弟子邵元冲、陈布雷等力劝，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当时教育部规定，外国在我国办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始得立

案。燕京大学迁至海淀北侧新址时，燕大托事部（校董会）决议，聘请吴先生北来任燕大校长。先生到燕大后，寓居校园北侧朗润园内。先生虽名为校长，实为名誉校长（Chancellor），学校实权操纵在校务长司徒雷登之手，而先生怡然任课讲授“应用文”，从不计较。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寇封闭。汉奸王克敏等，强请先生出任伪职，均遭坚决拒绝。其后，他蛰居北海公园内松坡图书馆，读书自娱。其时，先生年事已高，朝夕徘徊湖畔，忧国忧民，乃至愤而绝食，不久即逝世。灵柩暂厝浙江义园。

吴先生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有孙亦颇不肖，内心含痛，难对人言。幸有老仆文子，侍奉先生十分周到，先生亦待如家人，令其全家同住于朗润园。

浙大校长竺可桢

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全校师生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对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思怀弥深，不禁回忆起他爱国爱校、献身科学的感人事迹。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竺可桢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开始他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后调往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并设立了地学系。1927年与蔡元培一起筹办“中研院”，他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气象科学从理论到设施、组织，就是他在这时开始奠定的。

1936年，竺可桢被委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广聘学者。一批才华横溢的教授如马一浮、李四光、苏步青、谈家桢、卢嘉锡等相继到该校任教。同时购置了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并开始严饬校纪，提倡求是学风。至今，浙大校门口墙上还镌刻着他当年的一句警言：“诸位到浙大来，有两个问题要问问自己：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于是浙大声名鹊起，很快成为全国青年学子最向往的名牌大学之一。

1937年爆发了抗日战争。在日寇向杭州逼近时，他率领全校师生，带着全部图书资料、设备和仪器，向西迁移四次，跋涉五千里。每到一地，哪怕只有两三个月的安顿，也要开课，做实验。他还用分段分批西迁的办法，尽量不耽误学生的学业，并且在浙南龙泉设分校，还继续招收浙江的学生入学。浙大迁到江西泰和时，他的妻子张侠魂和第二个儿子染上了痢疾。当他赶到时，妻儿都已离开人世。他把个人的悲哀咽在肚里，硬挺着继续办理师生西迁事宜。为了鼓励学生上进，也为了纪念他的夫人，他还决定把自己全部积蓄，连同当月

薪俸，拿出来作为“侠魂女士奖学金”，用以每年奖励一名优秀女生。当时，浙大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如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王淦昌等，都宁愿跟着他跋山涉水，茹苦含辛。大教授常常当押运员，没饭吃就吃地瓜干，但谁也不肯荒废讲课和科研。苏步青把黑板挂在脖子上作学术报告。他的论文《投影微分几何》就是在桐油灯下完成的。

抗战胜利那一年，孙晓楼博士在美国为浙江办理救济工作。他与竺氏私交甚深，特拨一批营养物资救助该校营养不良的学生，并言明教师也可同样享受。竺校长在分配时，坚决主张应全部照顾营养不良学生。1947年，浙江举行全省运动会，浙大学生也参加。分配奖品时，当时教育厅长李超英提出要把蒋介石送的一面写有“国之干城”的锦旗送给浙大。竺可桢婉言拒收，他说：“省运动会，以中等学校为主体，何况浙大团体总分并不高，应奖给别的学校。”这些事情都反映了这位气象学家的坦荡襟怀。

竺可桢一生对学业、对学问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对人生，对朋友坦坦荡荡，忠贞不渝。他的气象学造诣，蜚声世界气象学界。

神学博士赵紫宸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神学和哲学，荣膺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后来，宗教学院院长伍庭芳逝世，赵紫宸即继任院长。由于他博学多闻，造诣精深，刻苦钻研，勤于写作，而且教学有方，诲人不倦，不仅名噪燕园，并且驰誉华北，终至声闻海内外，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宗教界少有的杰出人物。

赵紫宸中等身材，面庞清瘦，戴近视眼镜，鼻直而高，唇薄而秀，完全一副学者风度。他有时穿深色西服，有时穿灰色长衫，足登黑色尖头皮鞋，潇洒飘逸。他学问大、名气大、地位高、声望高，但却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没有架子，而且乐于助人、提携后进。他的学生或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为他诚挚和谦虚的神态所感染。全国宗教界人士，提起赵紫宸来，也无不敬服。

赵紫宸虽是造诣很深的神学家，可是神学思想在他一生当中，却一再发生变化。初期，他是属于“新神学派”的，或称“现代神学派”。他曾写过一本《耶稣传》，把耶稣看作是品德完美的人，而不把耶稣看成神。中期，大抵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世界局势动荡，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逐渐归于“基要（基本要道）派”，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及他降生尘世钉十字架舍己救人的道理。到了后期，也就是中国内地解放以后，他的神学思想又倾向于“属灵派”。这时他受到标榜“早已实行共产主义”的山东马庄“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的影响，把敬奠瀛请到燕大宗教学院讲道，并亲率学生数人到马庄“耶稣家庭”去体验“凡物公用”的共产生活，甚至赵紫宸竟然也追求起“圣灵充满”来。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赵紫宸是既信神又爱国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曾逮捕了赵紫宸，囚之于囹圄。赵紫宸在狱中写了不少抒发抗日爱国感情的诗作。抗日胜利后，他整理了狱中诗句，出版了一本《系狱集》。

赵紫宸在燕大宗教学院任职期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神学学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大江南北许多教会和团体中工作。他还写了许多本关于神学思想和教会建设的书籍，成为宗教工作上不可多得的读物。

他在燕大的学生中，提倡基督教的“团契”精神，大力发展团契运动，进行集体教育，活跃了学生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给燕大学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末科状元办学校

刘春霖幼时在老家河北肃宁县北石宝村读私塾，深知农村儿童读书之不易。所以，他高中状元之后，不在老家修状元府光耀门庭，而在北石宝村修建了一所小学堂。学堂的房屋、桌椅、教具，均由刘春霖出资捐助。他在学堂门口题有“铸才炉”匾额一方，并立有石碑，刻有他作的《劝学篇》一文。这所北石宝小学堂是肃宁县唯一的“义学”。

刘春霖关心乡梓教育，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尽心尽力。有一年，肃宁县建立“师资讲学所”和“高级小学堂”。刘春霖的入室弟子、校长吴友梅（清朝末科秀才），特请刘春霖为学堂书写抱柱对联。刘春霖大笔一挥，写下“天开新学界，地廪古遗风”十个大字。同时，吴友梅又请刘春霖为学堂编写校歌，刘春霖亦欣然应允。那校歌歌词是：

> 地廪古遗风，毛公设帐，董相传经。荆轲故里，武垣城。儒文侠武，燕赵遗风。莘莘学子，负笈来从，普被时雨并春风。春风暖，雨露浓，高门桃李及时荣。

毛公，指汉时毛苌，以传讲《诗经》闻名，曾住肃宁设帐授徒。董相，指董仲舒，曾住肃宁讲学。荆轲系刺秦壮士，相传曾在肃宁境内，该处有荆轲村。武垣城，汉时建，在肃宁城南。刘春霖在歌词里运用这些典故，说明肃宁自古以来便文风很盛，以此激励家乡人努力学习。

刘春霖不仅在家乡兴学，而且把教育扩展到京城。他在北京居住多年，结识了旅居北京的许多河北籍知名人士。辛亥革命以后，他在北京建了一所“燕冀中学”，供同乡在京子女们学习。这所中学分男、

女两校，男校在宣武门外大街路西，女校在内城西什库后库。刘春霖为建校捐款赠书，并任“燕冀中学”董事会董事。

时间不长，这所中学在京城有了名气，规模日益扩大。学生来源不仅仅限于河北一省，也招收各省市的学生。当时的女校，成为北京市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刘春霖与当年著名抗日将领宋哲元将军交谊很深。刘春霖向宋哲元建议创办一所学校，以教育培养青年。宋哲元接受了刘春霖的建议，便很快筹建了“明轩中学”（宋哲元，字明轩）。嗣后，该校成立董事会，宋哲元为名誉董事，刘春霖为董事，并捐赠图书，使学校建起了图书馆。

据闻，当年刘春霖在肃宁县北石宝村学堂立的那块刻有《劝学篇》的石碑，迄今犹存。

毁家兴学的马相伯

提起享誉中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它的前身震旦学院，说到震旦学院，又会记起它的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又名良，系天主教徒，江苏镇江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徐家汇公学。十八岁毕业时，法国领事想聘请他当秘书，他谢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而学的。”

后来，他出任徐家汇公学校长，也当驻日使馆参赞。1898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他目睹清廷的腐败，从此绝意仕途，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一年，已届花甲之年的他，退隐在上海土山湾，心里筹划着办一所新式学校，要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主意已定，他回到老家，将其长兄所遗十五万平方米的地变卖了，所得钱作为学校基金。然后，又以仅存四万块银元，以及在英、法租界的八处地皮（价值十余万银元），用来在上海卢家湾购置建校的土地。其“毁家兴学”的举动、热爱祖国的赤诚，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赞叹与支持。

1903年2月，他一手创建的震旦学院隆重开学。他自任监院，下设总干事和会计各一人，其余各项行政，都由学生自行管理，实行“学生自治制”。他在校内“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并以“挈举纲领，开示门径”之法启发学生自己研究探讨。由于学校创建时借助了耶稣会的力量，而学校却不谈教理，于是引起了教会的不满。1905年，在震旦任课的外籍教师趁他有病之机，改变办学方针，致使全体师生大哗，摘下校牌，相率离校。虽然他信奉天主教，但并不依附教会，支持师生的正义行动，毅然同大家一起退出了学院。

他退出震旦之后，偕同离校学生于右任、邵力子、叶仲裕等，又得到各界知名人士赞助，另行筹建复旦公学，意思是“复我震旦”。在经费和师资都告紧缺的情况下，他决定摆脱洋人挟制，向各方告急。后得到两江总督拨地拨款，同时又由严复、张謇、熊希龄、萨镇冰、袁希涛等二十八人出面发表《复旦公学募捐公启》，向社会广泛募捐，得到各方响应。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诞生，他任校长，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一时间，这所学府，人才济济，气象一新，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争相竞出，校内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他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团结抗战。1935年，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领导了抗日救国会工作。“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9年，他在越南谅山病重时，回忆自己毕生走过的“教育救国”的道路，无限感慨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教），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同年，病逝于谅山。遗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红头火柴”陈望道

陈望道年轻时，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

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浙一师”在经亨颐校长和新派教师的倡导下，推行三项教学改革。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新派教师为各年级的语文主任教员。这四人后来被旧派称为一师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而陈望道为“四大金刚”之首。他们从《新青年》等杂志上选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作为新教材。这些文章大都是白话文。当时旧派的老先生认为白话文不教也可以懂。陈望道就选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给学生阅读。到讲课时，不讲文章本身，只讲一些文艺理论，学生反映看不懂。“四大金刚”即抓住这一点，说明白话文不讲也是不行的，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是看不懂的。他们的主张和做法深得学生的赞成。但他们并不排挤文言文。他们根据学生的情况，教材中也适当选了一些文言文。例如王充的《论衡》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文章。“四大金刚”还讲授语法、新式标点符号和注音符号等。

有一次，陈望道出了个“白话文言优劣论”的题目叫学生作文。其中有个学生受了官方的指使，便在作文中以文言文的体裁大骂白话文，但文章做得很差，文句不通。陈望道打了批语：“写文言文也该写得通顺一些，理路不通，无从改起，重新做好再改。”这学生一看到批语，当场发火，在教室里抓住陈老师的领口，要把老师抓到教务处去。后来校务会议作出决议：“除非陈望道老师同意，不然要开除该生的学籍。”当然，陈望道是反对消极地开除学生的。后来，该学生哭到陈望道面前，请求宽恕原谅。经过教育，这学生后来也转变

了。由此，也暴露了后台指使者的面目。

1920年年初，陈望道趁回义乌老家过年，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同年6月，该书出版后，他曾写信并寄赠给鲁迅，请求指正。鲁迅在接到书后即翻阅了一遍，认可翻译这本书，“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后来，他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编辑，以后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在此期间，陈望道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组织工会、发动工运等筹建工作。后来由于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陈独秀闹翻了，便拂袖而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刚烈性格来。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校长，这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深谙世态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但他仍保持着一向的个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民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

雪艇先生与武汉大学

说到武汉大学的历史，自然就会想到曾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派人物王世杰。王世杰，字雪艇，祖籍湖北崇阳。辛亥之后留学英、法，回国后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并组建“现代评论”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创议筹建武汉大学，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旧址成立建校筹委会，并定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校址，积极进行筹建活动。

1929年2月，王受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接委任状时对教育部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随后，他制定了一个创办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且十年后学生扩充万名的宏大计划。就职后，面对旧式官僚和地方势力的种种威胁，他据理力争，誓不退让，务实办事，步步向前。筹款项，购土地，备材料，置设备，奋力从事营建工作。仅三年时间，新校舍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从此挤住在旧校舍的师生全数搬进珞珈山的新校舍。

同时，王世杰效法蔡元培北京大学时的办法，选聘教授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身为国民党员，但教授里却极少国民党员，他聘任教授的首要标准是学术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门户之见。这样做的结果，使学校里出现了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并存的局面。范寿康当时在校开“哲学概论”课。20世纪80年代初，他由台湾回内地观光，仍由衷赞叹五十年前王世杰在武汉大学“办学有方”，多次表彰“开明办学”的难能可贵。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三省，全国各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湖北省当局却百般阻挠武汉大学学生前往，甚至扣押学生。王世杰两次出面交涉，迫使对方释放被扣学生，允许武汉大学三百名学生乘轮船去南京。他告诫启航远行的学生要“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他做到了支持学生运动而又使之“不逾矩”。

卢沟桥事变后之第二年，日寇进逼武汉三镇。当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时，王世杰曾久久伫立珞珈山头，俯视学校的园林楼馆，凝视武昌的山水草木，不禁潸然泪下。

1949年，王世杰去台湾。1981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在台湾去世。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武汉大学，遗嘱告亲人说，在他死后，他的墓碑只须刻上“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十五个字，他即可含笑九泉了。

“浙一师”校长经亨颐

在杭州高级中学（前身浙一师）喜迎百年华诞之际，校园里竖起了“一师风潮”纪念碑，不禁忆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浙一师”校长经亨颐。

八十年前，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涌进杭城之后，当时的“浙一师”校长经亨颐认为，对于时代思潮，应该“迎”而不应该“拒”；时代前进了，精神变了，教育工作也必须采取革新措施，以适应时代潮流。因此，他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他打算把教育会和它的机关刊物《教育潮》，作为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而把“一师”作为推行新教育的试验场所。

首先，他在“一师”试行四项教学改革，即学生自治、国文改授国语、教员专任、学科制。在校内倡导“自动、自由、自治、自律”，并聘请“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担任语文教员，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一时名扬江南。学生自治会成立这天，学生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共同齐唱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自治歌》。有人称这次会议是“空前光荣的纪念”。

当时，“一师”学生施存统等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废孔”与“非孝”思想。浙江省教育厅受北洋政府之命，下令开除施存统并解聘陈望道等教师，遭到经亨颐的拒绝。省教育厅长夏敬观即派人把经亨颐请了去，指责说：“据本厅查明，贵校教员陈望道等四人，所选国文讲义，全用白话，弃文言不授，此乃与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之要旨未尽符合。而此四人，又系不学无术之辈，所选教材，夹杂凑合，未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将使全校师生堕入魔障，本厅责成贵校长立即将此四人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经亨颐回答

说："我校教师所选文章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来的，如果使学生读后会产生'思想中毒''堕入魔障'之恶果，政府何以不干脆取缔京、沪的出版之刊物呢？至于教师不学无术，请教何以见得？！且学期中途，如何能随便解聘！再说，学生未教好，那是教育者未尽到职责，不能以开除了之，开除学生非为教育之本旨；学生即使言论失当，但没有犯罪，不能开除。何况，新思潮这样勃发，新出版物这样多，其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如果空气能排得尽，新思潮才能禁止。盼望官厅明白这一点。"经亨颐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说得堂堂的教育厅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20年2月，省教育厅趁学生寒假之机，颁令免去经亨颐校长之职，同时，非法宣布解散"一师"，派军警强迫学生离校。这一暴行引起杭州各界人士与学生家长的强烈谴责。在"一师"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当局不得不与学生代表进行谈判，并请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蔡谷卿（蔡元培之弟）出来调解。

这次斗争，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校长去留之争，而是新旧文化、新旧教育思想之间的斗争。结果，虽然经亨颐与陈望道等四人自动辞职，离开"一师"，但新任姜琦校长，就职后向学生表示，自己当极力贯彻经校长的教育革新精神。他聘请了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等人来任语文教师，堪与"四大金刚"相媲美。

陈鹤琴尽瘁儿童教育

友人从内地带来再版的《家庭教育》，使笔者想起该书的作者、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老教授。

陈老先生是江苏南京人，生于1892年。其一生竭尽全部精力，贡献于儿童教育事业。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十九岁的陈鹤琴，出于对儿童的热爱，为了儿童的幸福和健康成长，即立志从事儿童教育，虽遭种种挫折，亦不改初衷，且一生矢志不移。

陈鹤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我国出国留学生专门学习儿童教育的第一人。1923年获硕士学位归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儿童心理学教授。

其时，国中幼儿教育刚刚萌芽，幼儿园多为教会所办。向儿童灌输封建迷信，其方法亦全系国外搬来。陈鹤琴为了改变此状及探索中国的幼教理论，决意自己创办幼儿园，遂组织教授、研究员、讲师数人，筹募资金。在校教育科的资助下，于其家场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性幼儿园，即鼓楼幼稚园，陈亲任园长。经三四年之实地研究，写出幼儿教育的专题论文《我们的主张》。文中的理论，对以后之幼稚教育，颇具影响。

陈鹤琴极重视第一手材料，以作研究。从其子出生第一天开始，他就仔细观察记录达八百零八天，一日不遗，积累笔记十数册。其对孩子的哭、笑、爬、坐及动作、表情、身体、智力的发展，皆细察入微，一一记下。还常把孩子抱到课堂，尝甜，尝酸，尝苦，让学生看其表情，以为活教材。

陈教授根据其观察研究，于1925年写出《家庭教育》和《儿童心

理之研究》两书出版，而《家庭教育》一书，至今已再版十数次。友人带给我的这本，为1981年版本。该书提出了家庭教育的原则一百零一条。条条具体生动，亲切易懂，颇受欢迎。教育家陶行知尝称该书为“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是“做父母的必读之书”。

为培养幼儿师资，陈鹤琴放弃做官机会，赴江西泰和县创办国内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学校，亲任校长。此两所学校，为国内培养了大批幼教人才。抗战期间，陈先生在上海，还为逃难而颠沛流离的儿童，热心开办“难童学校”，为卖报儿童开办“报童学校”。

陈鹤琴老先生一生为儿童教育呕心沥血，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其教育文集分上、下两卷，共一百万字，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萧友梅二三事

萧友梅是我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他曾在日本和德国学习音乐。1920年归国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任教。

为了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编写了大量的音乐技术理论书籍和教本。当时国内创作的歌曲很多，他随写随教。1922年，他的《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出版，成为当时音乐界一件盛事。

萧先生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还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这个乐队虽然只有十七人，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第一支管弦乐队，向人们介绍了西洋的器乐曲，以至大型的交响乐曲。记得有一次徐志摩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学生们说根本没有听过夜莺的叫声，徐先生就带领大家去听萧先生指挥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乐》。听着音乐，同学们仿佛来到乡间的小溪边，陶醉在田野里多种鸟儿动听的鸣叫声里。

萧先生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1927年到上海后，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前，音乐这个专业不被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唱。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终于两科分立，音乐科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向全国普及，萧先生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若干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这样一来，这座高等音乐学府里，也有了来自边远省份的“土包子”了。

1936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吕到上海指挥一个外国管弦乐队。

为了表示“亲善”，他提出回国后要送给音专一架钢琴。过了一些时候，日本领事馆写的一封信中说，近卫秀吕的钢琴已经运到，请音专派人去办交接手续，萧先生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抗战期间，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南京伪政权，也曾企图拉萧先生下水。但是他始终在上海这个孤岛上维护着那个风雨飘摇的音专，一直到1940年病逝，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记得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公司曾经邀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并把这些字迹汇印成册，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用于写中国字。其中有一页是萧先生写的，内容是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作为一个辛勤创业的爱国音乐教育家，他的作为不正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吗？

杨荫榆的晚年

杨荫榆，当年在北京读过书的人，对这个名字是熟悉的。她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曾因开除思想激进的学生而遭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轰动全国的“女师大学潮”。1934年春，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挥泪离别了女师大，回到家乡苏州，在苏州中学英语班任教。其时，她已年近花甲。

杨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她曾经缠过足，却偏穿高跟鞋、黑大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样子非常滑稽。由于她沉默寡语，不苟言笑，治学态度极其谨严，所以学生们都很怕她。

1937年，卢沟桥枪声一响，抗日战火很快蔓延到南方。苏州中学被迫停课，杨荫榆也无奈地同她热衷的教育事业告别，赋闲在家。

193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几个日本宪兵在苏州盘门城楼下拦住一名中国少女，借“搜身”之名，将其轮奸，事后又用利刀把她刺成重伤。手无寸铁的姑娘就这样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那天，住在盘门一带的杨荫榆出门买菜，刚好路过现场，看到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当场晕了过去。少顷，她清醒过来，认出了那姑娘，正是她教过的学生。

杨回家之后，愤怒与悲伤使她无法平静，连夜便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书。翌日凌晨，她穿上一件好久未穿的黑色大氅，披着一头银发，闯进了日本驻苏州领事馆。守门的日本兵想把她挡住，但被她那身特殊的打扮与一口流利的日语慑服了，只得带她去见领事。杨荫榆向日本领事发出了强烈抗议，严厉地谴责了日寇的强盗行径，要求日本领

事严惩杀人凶手。她的抗议义正词严，日本领事只好接受。当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表面越发不敢怠慢。

杨满心以为日本领事馆对盘门血案会作出反应，然而她太天真了，根本没有料到罪恶的魔掌已经向她伸去。几天后，她像往常一样，去盘门菜场买菜，走至吴门桥，几个跟踪她许多天的日本宪兵悄然而至，未等杨荫榆发出一声惊叫，一个宪兵的大马靴就重重地踢在她的后腰上，杨掉进冰凉刺骨的河水中，悲愤地死去了。闻讯赶来的人们，只看到一条杨常戴的鹅黄色围巾和一只竹篮在水面上漂浮着。

杨绳武与保定同仁中学

20世纪20年代初建于河北保定南关的同仁中学，学子遍布海内外。世界著名科学家牛满江即毕业于此。当年张学良少帅驻旌保定时，与同仁中学的创始人杨绳武亦多有往来。同仁中学是当年北方影响很大的一所中学。

同仁中学的创办人杨绳武是河北清苑县人。其父业医，早故，杨绳武与母相依为命。杨母在保定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培基女校任教，薪饷低微，生活困难。杨绳武在同仁小学读书时，在美国牧师家中充当小侍者勤工俭学，有机会学习到英语。小学毕业后，他升入京东的通州潞河中学，毕业后，又考入燕京大学，专攻教育及文史学科，与谢冰心、许地山、崔友善、陈嗣哲等系同期校友。在燕大期间，杨绳武曾发起组织“教育改进协会”，矢志从事教育改进工作。1923年夏，毕业后，邀上述校友赴保定，筹备创办同仁中学，首届报考五十多名学生，并于当年秋开学。

翌年，又招收新生五十多名，为第二班。因办学成绩优良，于1924年呈请河北省教育厅，准予立案。

同仁中学以德、智、体、群为施教宗旨，注重培养学生爱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除课堂教学、早晚自习外，杨绳武校长黎明即起，带领学生跑步，做八段锦体操。午后的课外活动、球类比赛等，他均参加，或任裁判员。张学良驻保定时，曾到公理会与杨校长打网球，或打成平局，或互有胜负，他的球技甚蒙少帅赞许。

自1925年后，同仁中学学生逐年增多，又大多来自外地各县，都需住校，亟须增建宿舍。虽动用三年来所蓄资金，仍不够用，乃向银

钱商号息借，又向教会中同仁老校友求助，在学校操场西上坡建起了一排学生宿舍。1929年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达德将军之夫人到保定，杨校长特去谒见。达德夫人对于同仁中学的办学成绩甚为称赞，杨校长乘机向她叙述教室不足、筹建困难之情事，劝她捐款兴建新教室。蒙其慨允，愿将其继承的达德将军恤金捐建一座四面均有教室，围成四合院式的教室群，并命名为“达德堂”，以志纪念。记得这座四合院式的教室群，庭院里种满了香花。每到夏季，丁香花开放，院内一片幽香。

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攻陷保定。杨校长率领部分师生南撤，负责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支持到抗战胜利，后又赴美留学。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

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武林拾趣
神州轶闻录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冯大彪题
武术是中国的一种国宝。止戈为武，武即和平。
武术，虽以技击为核心，处处暗藏杀机，但习武者"以德为先"，"以德帅武"。
武术，既是防身术，又是健身术，还充满人生哲理、处事谋略；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品质；又能自娱自乐，施乐于人。
武术谚语、歌诀，既意义深远，充满辩证法，又含蓄优美，颇具神韵，素有武术"唐诗"之誉。
——昌沧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武林拾趣

神州轶闻录

冯大彪题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林拾趣 / 周简段著．--增订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6

（神州轶闻录）ISBN 978-7-5133-2645-2

Ⅰ．①武…　Ⅱ．①周…　Ⅲ．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9010号

武林拾趣

周简段　著

冯大彪　主编

责任编辑：简以宁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0.8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645-2

定　　价：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总序一

总序二

总序三

序

武林豪杰

- 八卦掌大师董海川
- 太极拳宗师王矫宇
- 北京陈氏太极拳传人陈发科
- 大成拳宗师王芗斋
- 少林正宗何世珍
- 岳飞后裔传岳拳
- 传奇大侠黄飞鸿
- 大刀王五
- “南北大侠”杜心武
- 精武英雄霍元甲
- 霍东阁与精武体育会
- 武林英豪蔡桂勤
- 武林奇侠孙禄堂
- 武师程廷华
- “神枪”李书文
- “闪电手”张占魁
- “隐侠”张三爷
- 清末武探花敦凤举
- “霸州李”及其传人
- 镖师李尧臣
- 京北大侠崔兆麟

“神腿”佟忠义
王子平三打洋力士
“天下第一拳”李宝玉
“燕子”郭长生
“沱南侠”的“梅花桩”
沈三力挫俄力士
“白猿”陈凤歧
侠女威慑俄国力士
“神拳大龙”蔡龙云
大盗“燕子李三”
武林杂录
北京镖局史话
燕赵多豪侠
武健泱泱话沧州
太极圣地陈家沟
梅花拳乡在武强
漫话吴兴拳船
闽南国术团
文武兼备谭嗣同
华侨豪侠司徒美堂
尚武将军杨虎城
龙云打翻法国拳师
周恩来的武术教师韩慕侠
孙中山先生的女保镖
少帅保镖高嗣斋
提倡“国术”的张之江
“燕市奇人”马礼堂
“国考第一”万籁声
武林女侠王侠林
“飞叉”技惊希特勒

“飞贼”左青甲
程砚秋痛打伪警官
一次蹊跷的“武术表演”
万籁声著《武术汇宗》
金警钟其人其事
还珠楼主二三事
武侠小说家不肖生
宫白羽和他的武侠小说
杂艺大观
古时击鞠运动
清朝善扑营
冰嬉杂谈
南苑赛马会
保定踢毽古有名
保定铁球健身宝
培养灵魂之揉核桃
宝三的氍跤和耍中幡
天桥“大刀张”
天桥艺人“飞飞飞”
天桥一绝朱国全
天桥怪杰“大兵黄”
技绝“坛子王”
北京二闸的“狮子会”
鸟语“画眉张”
亦趣亦绝抖空竹
冬末春初踢毽子
名噪欧美的“北京班”
国际杂技明星史德俊
中国的“杂技卓别林”
马戏名家孙福有

戏法大师韩敬文
古典戏法圣手罗文涛和冯书田
张慧冲击败外国魔术师
体坛纪事
北京的第一次运动会
宣统二年以来的七次全运会
华运会的特别风景——南开拉拉队
中国早期体育教育的摇篮
南开中学的体育锻炼
天津回力球场漫忆
到青年会打球去
于学忠与华北运动会
张学良与第十届奥运会
足球运动感旧
“足球之乡”大直沽
“北宁”东征四战四捷
北师大“五虎将”
“南开五虎”篮坛扬威
“老鸡”篮球队
中国女篮忆旧
女子排球今昔谈
著名体育家马约翰
天津篮球运动先驱李清安
田径健将郭毓彬
全能冠军朱恩德
“短跑怪杰”刘长春
足球大王李惠堂
北师大“五虎将”之首李洲
著名拳击手靳贵第
体育发展侧影——利生体育用品厂

棋苑剪影
古代围棋趣话
《当湖十局》古棋谱
中国象棋的故事
百岁棋王谢侠逊
轰动九城的棋战
棋联撷趣
代后记
返回总目录

总序一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丛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神州轶闻录》，那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其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自1980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冰心

1991年2月26日

总序二

我顶怵写序，怕没话找活，空空洞洞，所以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唯独对周简段先生（我没见过这位，所以不便加个“老”字儿）的《神州轶闻录》，我不能推辞。一则是我翻阅了曾在香港出的五辑选本，简直叫人拿起来放不下，实在有看头儿，二则一沾北京的边儿，我就不好意思溜掉。在下到底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呀。

我出生在东直门羊倌胡同，中小学都是在安定门大三条上的。最后，又在海淀戴了下学士帽儿——就是那种挂着穗子的黑绸方帽。刨去跟学校春游到过一趟南口，十八岁前我就没出过城圈儿。可后来当上了记者，就跑起江湖来啦。不但国内，连大半个地球都跑遍了。可是不论漂到哪儿，我怎么也忘不了我的老北京。

这着实是块宝地。不但历史悠久，掌故丰富，城里城外满是名胜古迹，而且叫人怀念的，是在这里活动过的非凡人物。北京城要是座五光十色的舞台，那么更叫座的当然是在这里驰骋过的显赫角色。那真是三教九流，行行出状元。这里有纵横捭阖的政客，也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书画名家，也有名噪一时的曲艺泰斗，以至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师。《名人辞典》只能告诉你这些人物的官职履历，这本《神州轶闻录》却能通过遗闻轶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1990年7月10日

总序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序

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忆旧。读了老友冯大彪主编的《武林拾趣》，令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我从五岁半起，就开始读私塾，上启蒙馆。可算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挺喜欢念书的。

我老爸在外地做事，一去就是一年半载的。有一天，他回家了，进门还没喝完茶，就检查我的学习，叫我背诵《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我一口气背了下来。老爸是个慈祥又让人敬畏的人，他拉着我的手，心疼地说：“看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瘦得像个小猴似的！叫你妈给你多做点儿好吃的。你要注意锻炼身体！”接着老爸给我讲了“强国强种，壮我筋骨”的重要性；又谈到在那饥馑的岁月里，我们整个国家受苦受难，人民体质羸弱，帝国主义列强讥称我们为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生命在于运动，老爸鼓励我要振作民族精神，加强运动，健全体魄，一定要洗刷掉这奇耻大辱！

我的家乡在洪湖边上，四面环水。因地制宜，我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不仅学会了“狗刨”、“击水游”，还会潜泳、仰泳、踩水；放学后，还去钓鱼，甚至下河摸虾、捉蟹。冬天就练跑步、滚铁环。我常在天朗气清、皓月当空时，和小伙伴们一道玩“跑麻城，破关抓俘虏”的游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短跑赛，胜者有奖（俘虏）。

上洋学堂后，听老师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刘长春先生的逸事。

刘先生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唯一运动员，参加过1932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因未取上名次，被美国报纸用漫画讽刺为背心上画着“鸭蛋”跑的短跑健将！老师以此来激励我们要强身健体，奋发向上，为国争光。七十多年过去了，在2004年第二十八届雅典奥运会上，在二十八个大项目中我国一举获得了三十二块金牌！昔日的“东亚病夫”，如今成了体育大国，真令人高兴，既彻底洗刷了“国耻”，又让国人扬眉吐气。

当年，我就喜欢踢皮球、打篮球，经常爬山、腿上绑沙袋练习长跑，还是业余棋手。后来，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一直保持着锻炼身体的好习惯。现在我八十开外了，脑子仍然不算太糊涂，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坚持写作；还喜爱钓鱼、骑自行车逛大街，以锻炼四肢和头脑，延缓衰老。

——适当体育运动，终生受益！

我作了一点统计，《武林拾趣》这本书，共收有一百多篇文章。有写田径运动的，也有写足球、篮球、排球、棋艺的，写武术的占了一半多。这说明作者对武术的热爱。我曾在《中华武术》杂志上谈过“武术需要宣传，宣传需要武术”的观点。我一向为武术尽心竭力地鼓与吹，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位知音。我和作者都是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的“老记”，又都爱好书法，不过他比我强，他造诣高，是“中国百杰书法家”，我还停留在起跑线上。他还是武术行家，我最多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他自幼习武，且擅长多种拳械，我自愧不如。

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为我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拳种繁多，套路更“海”了。它虽源于“争斗”，但不是就止于“争斗”。它的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功能也是多方面的：既是防身术；又是健身术；还充满着人生哲理、处事谋略；不但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品质；而且能自娱自乐，施乐于人。武术谚语、歌诀，既意义深远，充满辩证法，又含蓄优美，颇具神韵，

素有武术“唐诗”之誉。它虽以技击为核心，处处暗藏杀机，但习武者“以德为先”，“以德帅武”。止戈为武，武即和平。

窃以为，武术不失为我国的一种“国宝”，应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提倡。其普及和发展，也不能仅囿于体育项目内，应重新定位，应堂而皇之地走进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且应如语文、数学、外语等一样地重视，纳入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排课施教，让我炎黄子孙都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如果这样，我相信若干年后，不仅平民百姓都会拳脚，从士兵到将军，以至国家总理和国家主席，也都会武术。正是“喝了黄河长江水，都会两下拳脚加腿！”也像外国人理解的那样：“中国人，功夫！功夫！”那该多好啊！

大彪嘱我为他主编的《武林拾趣》作序，我当义不容辞。”于是，我就开始思索，趁今早凉爽，就欣然命笔撰写。这就算是交了卷，但感到特别汗颜！

昌沧

2005年7月9日于龙潭湖畔

武林豪杰

八卦掌大师董海川

北京东直门外，东向约五里之遥，当年是一片空旷郊野。疏林枯木，榛莽丛生，唯见一座荒冢隐现其间，很少有人祭奠。有一年的清明时节，忽有三五豪客寻迹到此，面向荒冢伏地而拜，拜罢依恋不去，俯身默读碑文。

墓中何人？原来这座荒冢所埋葬的，是清代咸同之间名震四海的八卦掌名师董海川，当地俗称董老公坟。墓前碑碣为董海川第二代传人所立，此时寻迹而来者，是董海川的第三代、第四代传人。

八卦掌在武林中独树一帜。董海川授业弟子很多，当时在京师最著名的是程廷华，字应芳，他以开设眼镜铺为业，故人称“眼镜程”。还有开煤厂的马唯骐及卖翠花的刘凤春，俗呼之为“煤厂马”和“翠花刘”。他们都承袭了乃师八卦掌的真谛，造诣极高。第三代传人甚多，“眼镜程”之子程海亭、程有切、程有信以及马世清、马俊义、宫宝四等，都是后起之秀。20世纪30年代，笔者在京曾与程有信晤面，了解到不少有关董海川身世的事。

董海川生于清代嘉庆年间，河北省文安县米家坞人，幼年喜学各家拳术，及长访师江南。一日，在桃花山上见一年幼和尚不断向树击掌，并盘树绕行，董自恃勇武上前和小和尚交手，结果大败。于是他拜见老和尚，虚心求教。历经几个寒暑，尽得其艺。临别时师傅叮嘱董海川：技艺已有成就，切忌少年气盛惹是生非。董唯唯应诺。然而回家之后偶与人争，以致出手伤人。官方缉拿甚紧，董遂净身在京师肃王府中做了一名司菜太监。

一日，太极拳名师杨露蝉奉召在肃王府与府中拳师比武，连战连胜，最后竟将一拳师掷于园网之上。是时董海川手托菜盘经过，立即飞身上网救起拳师。董海川遂与杨露蝉相斗，双雄对峙，胜负难分。从此太极拳与八卦掌各立门户，桃李盈门，流传后世。董海川寿享高龄，临殁昏惘，仰卧床上，两手仍做换掌式，直至气绝。

八卦掌流传国内外，迄今不衰。董氏传人层出不穷，其墓已迁至北京西郊，重修一新。

太极拳宗师王矫宇

20世纪80年代功夫片《少林寺》的风靡，使得少林功夫成为世人的关注焦点。“天下功夫出少林”是不错的，但是，要论普及程度，太极拳应居首位。说到太极拳，不能不提太极拳的一代宗师王矫宇。

王矫宇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1936年恰满百岁。那时，他已被徒众奉居于北京和平门内的吕祖阁。每日雄鸡首唱，众多弟子齐集于吕祖阁前。待众人进得庙中，庙门即闭。据一位目击者讲：王矫宇闻鸡即起，常端坐于神殿外向弟子授拳，虽天降大雪亦不辍。弟子有盘“老架子”者，有对练“推手”者，有习练太极刀、枪、剑者，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王矫宇看至兴浓时，还常常在众人面前挥剑起舞。只见王矫宇银须飘洒，精神抖擞，雪地红绸，剑光夺人，实为吕祖阁一道新景。

王矫宇是近代太极拳宗师杨露蝉的再传弟子。清咸丰年间，杨露蝉被聘至北京端王府中，向端王载漪传授太极拳六十四式。载漪习练技击时需有人陪练，而府中旗人皆不堪一击，王矫宇当时在王府任管事人，因身体剽悍成为载漪的陪练。王矫宇天资颖慧，充当陪练几年，竟将杨氏拳偷学到手，载漪不胜惊异。此时杨露蝉已死，载漪遂将此事言于杨氏传人杨班侯。杨班侯破格收王矫宇为入室弟子，王遂正式列入杨派门下。

太极拳要求灵活沉稳、刚柔相济。据王矫宇说，练拳贵在坚持不懈，锻炼活动须分步骤进行：五十四岁以前应“炼体炼器”，借以活通筋络，强健四肢。五十四岁后乃可“炼神炼气”，此时重在涵养内功，

一至内外功融为一贯，神完气足，自然益寿延年。王矫宇用四十年时间走完了这两步。他从六十四岁起始习练“静功”，研习呼吸导气之法。他曾长期在德胜门外真武庙中静坐习功，每日只进中午一餐，但并不感到饥饿。1926年，王矫宇年满九十，依然牙齿整齐，面色红润。当时国内太极拳名家很多，却极少有人能够超越王矫宇。

王矫宇为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遇有慈善事业必踊跃施助。其得意高足共有两人，一为拳术名家范培铮，一为名医刘睿瞻。1939年，王矫宇以痰症复发骤逝于吕祖阁中，终年一百○三岁。王矫宇因偶然的机会得窥拳术之妙，而后青出于蓝胜于蓝，将杨氏太极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作为一代宗师，他对中华武术的贡献，芳馥长存。

北京陈氏太极拳传人陈发科

著名太极拳家顾留馨先生编著的陈式太极拳套路《炮锤》一书出版后引起许多武术爱好者的关注。顾先生是陈家沟陈氏第十七代著名拳家陈发科之高足。由此我想起了陈发科的一些旧事。

1928年，陈发科应邀到北京授拳。陈氏太极这一古老拳种，自明初以来一直在陈家沟一隅，在陈家本家相传，陈发科到北京后，其本来面目才为外界所认识。之前，杨式太极拳在北京盛行，陈发科到北京后，其精湛的功夫和陈式太极的独特风貌顿时震惊了北京拳坛。当时诗人杨敞（季子）曾做诗赞曰：

都门太极旧称杨，迟缓柔和擅胜场。
不意陈君标异帜，缠丝劲势特刚强。

一时拜倒在陈发科门下者芸芸，其中不乏名人，如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一代京剧武生宗师杨小楼等。其他带艺投师者亦为不少，出类拔萃者有沈家桢、李剑华、唐豪、顾留馨、冯志强等。

陈发科为人忠厚，平时少言寡语，尝对弟子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损人利己的事咱们可不能干，就是连想也不应当想！”一次，民国大学想以高薪聘他为武术教师，而辞去原来的不如他的武术教师。他说：“若两人一起教，我就去，若打掉别人的饭碗，不中！”此事因而作罢。

一次北平的武术比赛会上，陈发科和摔跤名手沈三相遇。二人试手，不料未到一分钟，俩人都松开了手，相视哈哈一笑。次日晚间，陈发科正在家中授徒，沈三提着四包礼物进来。陈发科赶忙起身迎接，沈三说：“那天，多亏陈师傅让我。”陈发科笑答：“哪里，哪里，彼此，彼此。”众人听后愣了。沈三激动地对众人说：“咳！你们的老师真好，好好跟着学吧。他不但功夫好，武德更好！”又说：“你们认为我们那天没比试吗？‘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陈师让我握住他的两条胳臂，我想借劲借不上，腿也抬不起来，我就知道他的功夫比我高得多，可是陈老师当众人面儿并没有让我出丑！”

陈发科于1957年去世。后来，北京陈式太极拳研究会正式成立，陈发科的高足冯志强任会长。这一古老拳种后继有人，行家深感欣然！

大成拳宗师王芗斋

武术界友人来舍，谈及北京昔年大成拳宗师王芗斋登报公开向同行请教之事。笔者当时正在京华，略知一二。

20世纪40年代初，有几位名士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大成拳宗师王芗斋莅京，在京小住期间，愿与同好共同切磋拳技。据报载，每星期一下午，王芗斋便在大羊宜宾胡同一号接待拳学名家，以交流技艺。

王芗斋自幼拜师学拳于郭云深，光绪三十三年（1907）离师后，走遍大江南北，结交拳学名家甚多。王芗斋登报向同行请教的消息传开后，前往拜访者甚多，多系来求教的，同道中仅有卢、邵二君欲作推手，即内行所谓“听听劲”而已。推手能反映出拳家动作之快捷、功夫之高低，却不伤人。

王芗斋从来推重者为武德，故每次交手，总以礼让为先。年老者让，谦和者让，技弱者亦让。据说卢君初来时，王芗斋略作推手，卢君以为王芗斋技仅如斯，不肯降心服气。屡次光临切磋后，始知自己与王芗斋相比相差甚远，终则一变而为忠实之门徒。

笔者尝问王芗斋，近百年来，拳界真正造诣深厚者有哪些人？王芗斋认为百年来之武术先辈当推董海川、车毅斋、郭云深诸师尊，但中国地广人多，道中人未识者甚多，亦不敢妄加评论。后又问及太极名家杨露蝉如何？王芗斋谓杨先生亦为拳学先辈，工太极，人多宗之，唯从各方面观测，露翁所得，仅为明王宗岳先生之道。不过宗岳先生曾得到岳武穆双推手之局部，以三拳而变成十三式。至于命名太

极，人云系张三丰所传，实无考证。

谈到拳学要义，王芗斋认为，拳套招法、拍、打都是表面的。至于大成拳之要义，不在外表形式之优劣，其步骤是训练神经，试力、试声和自卫。王芗斋谓学拳之第一步即训练神经，是为基础练法，目的在于理解四体百骸蠕动之工作，第二步为试力、试声之练习；第三步为自卫。

最后王芗斋说，本人年事渐高，生活尚可自了，名利之心全无，愿趁此身尚健之际，与海内贤达，共同将人生所悟得之技能，提倡而发扬光大，并革除误己误人之旁门左道。

四十年前之事，今日回忆，拉杂琐碎，难得其详。王芗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京作古。

少林正宗何世珍

以少林武术为题材的电影的涌现，让笔者想起了20世纪40年代初，京华少林正宗何世珍辞世的一段往事。

何世珍去世前住北京南池子普渡寺内，平时以授徒为业，桃李甚众。据说他身体原无疾病，一日夜间，忽觉腿疼，并未在意。因他擅长按摩针灸，自扎数针，即行入睡。次日，腿疼仍未愈，即时起时坐，不意傍晚病忽转剧，未容医治即与世长辞。

据说何世珍八岁入少林寺学艺，历二十年艺成。何世珍武术精湛，功夫纯真，会使兵刃数十种，拳术技击、软硬功夫无不精通，尤擅点穴。按少林寺规矩，学艺成功，须打过三道山门，始能下山。据说少林寺每道山门有暗器数十种，一触即发，其惊险如小说中之“铜网阵”。何世珍连打两道山门，仅肩头中了一箭，其师遂许其下山。

是时，袁世凯视何世珍为奇才，派他周游欧美各国。他虽与当时的吴佩孚、江宇澄相友善，但他不慕权势地位，淡泊名利。何世珍逝世的噩耗传出，往何家观看者甚众。当时，何世珍所住仅矮屋一椽，四壁萧然。夫人年龄与他相仿，子仅四岁，棺木无着，母子相抱痛哭，闻者鼻酸。

何世珍平日授徒众多，著名京剧武生李万春、武丑叶盛章等均曾从其学武习艺。他的曾徒曾参加全国运动会，荣膺国术冠军。何世珍逝世后，夫人不知弟子地址，亦无法报丧。后经某报发起募捐，才获得一些资助。有一位夫人慨赠棺木一口，才发送入土。

其后，盛传何世珍系因贫困而服鸠自杀。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他晚年生活贫困，则是事实。

谁曾想到，何世珍这位曾经打过山门两道，经师尊特许下山的著名武术家，竟以贫病交加终此一生，故去时才五十多岁。人有幸运，有厄运，若何氏者，可谓生不逢时。如生在今日，当可能在“少林”之风中一显身手。

岳飞后裔传岳拳

京城武林有一种岳氏心意十二形拳，据说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传袭下来的。由于岳氏族人视此拳为珍宝，故只在族人内传习，到清末，才传至族外。

岳飞的后裔岳青山精于岳氏心意十二形拳。他排行第二，人称“岳二爷”，为河南镖师，在武林中享有盛誉。岳青山内功卓绝，据传在下雪时，曾打坐庭院，雪不沾衣，周围亦无雪落。

光绪初年，岳青山携妻进京，慕名造访者一度络绎不绝。

起初，岳青山甚秘其术，不授与人。当时京都端王府有总管姓王，名永泰，号兰亭者，曾拜太极拳一代宗师杨露蝉为师，深得太极之妙谛，技艺超群。王永泰闻岳青山之名，仰慕之至，便偕同师弟李瑞东前往求艺。然岳氏之技历来只允许传授族人，并以非常严厉的门规来约束，如有违犯者，将被处以“金盆放血”之重刑。故王、李初次登门，遭婉言拒绝。但二人并不因此而灰心，仍多次至其住所，与岳攀谈，日久渐熟。然每谈及拜师之事，岳即不悦，必请二人离去。如是者，王、李对岳恭敬之情无稍减，岳亦渐喜二人之人品、武功与学识。

一日，王、李二人见时机成熟，复提拜师之事，此时岳虽慑于门规之严，面有难色，然终无逐客之意。二人察言观色，即跪拜于地，声言如不应允，即长跪不起。

岳青山夫人亦擅武功，其造诣不在丈夫之下，且性情豪爽。此时见状，遂有成全之意，便附先生耳语，先生含笑点头。岳夫人旋对二人说：“这样吧，假若我走出房门，你兄弟二人能追上我，就收你们为徒；若追不上，日后休提拜师之事。”言毕，起身出了房门，立时不见踪迹。王、李二人追出门外，竟不见人影。二人施轻功跃上房顶，见岳夫人正站立于房脊之后。岳夫人笑曰：“你二人果然能追上我。既如此，我夫妇绝不食言，先回房内候我。”二人喜出望外，遂从房顶跃下。但进房内一看，不由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岳夫人已经与岳先生对坐于屋内笑望着二人，二人于是急忙跪拜于地。

岳青山夫妇居京多年，王、李终得岳氏心意十二形拳的真传。数年后，王辞去端王府总管之职，李遂受聘，并被端王荐为朝廷侍卫。由于王永泰未对外传授此拳，故此拳唯李瑞东这一支传袭至今。

传奇大侠黄飞鸿

近几十年来，黄飞鸿系列电影、电视剧不断上映，单是著名艺人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电影就有近百部之多。由此可见，黄飞鸿这位传奇大侠为后世的关注与喜爱。

黄飞鸿出生于南海西樵禄舟村西隆社黄甲坊，六岁开始随父黄麒英习武。他继承了师祖陆阿采的少林武术，后又在佛山拜“铁桥三”梁坤的高徒林福成为师，学到“铁线拳”、“双飞铊”等绝技，同时向叶大成学习“八分箭拳”，向宋辉镗学习“无影脚”。他将学到的技艺融会贯通，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绝招。后来，黄飞鸿在广州第七甫水脚设馆授徒，在仁安街设宝芝林药店悬壶济世；并先后任吴全美部、刘永福部的军中技击教练，随刘永福赴台湾抗击日本侵略军。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纵火劫掠，黄飞鸿苦心经营多年的宝芝林药店被大火焚烧，片瓦不存。年迈的黄飞鸿经受不起这次沉重的打击，忧郁致病，医治无效，数月后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黄飞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南海、广州度过，亦曾多次莅临香港。香港同胞不会忘记，十九岁的黄飞鸿首赴香港，为了惩戒欺负小贩的恶棍，他在水坑口大笪地以单人独棍击退数十人的围攻。香港同胞更不会忘记，有一年，一名洋人携带一只凶猛的狼狗来港设擂台比武，咬伤多名华人。黄飞鸿应香港武术界的邀请，赴港斗狼狗，用“点子脚法”踏断狼狗的脊骨，使香港同胞扬眉吐气。那一年二月初二，香港同胞目睹了黄飞鸿醒狮队“飞铊采高青”的绝技。晚年的时候，黄飞鸿应他的徒弟林世荣之请，赴港旅游，香港各社团轮流设宴款待。席

间，年近七旬的黄飞鸿应众人邀请，表演“铁线拳”等绝技，让观众大饱眼福。

黄飞鸿凭着过人的勇敢、智慧和技艺，经历了无数次恶战，挫败了国内外的许多高手，成为中外闻名的武术大师。

黄飞鸿通过设馆授徒，培育了许多武术人才，他的绝技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他的徒弟中，技艺最出色的是梁宽、陈殿镖、林世荣，黄飞鸿特别将“无影脚”秘传给他们三人。黄飞鸿的徒孙更是遍布海内外。黄飞鸿辞世后，继室莫桂兰继承夫业，在香港设立武馆，教授“子母刀”等绝技。现在，黄飞鸿的后代大多居住在香港。

黄飞鸿还是一位精通跌打医术的名医，上至将军，下至百姓，遇有伤病，多乐意求诊。他研制的“通脉丹”等成药曾畅销国内外，至今群众中还流传着“宝芝林伤科跌打酒”的验方。

大刀王五

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彬，是清光绪年间京城有名的源顺镖局的镖头。他祖居河北沧州，自幼即崇拜当地著名武师李凤岗，但李凤岗是回民，从不收教外之徒。于是，王五慨然加入回教，这样，他便成了李凤岗的亲传弟子。

王五学成之后，踏上了闯荡江湖的人生旅程。光绪初年，王五来到北京，在东珠市口西半壁街买下了几间房子，创办了源顺镖局，开始了他的保镖生涯。由于他性格豪爽，武艺高强，重信用，讲义气，很快便赢得众人的爱戴和信任。他结交了众多的武林高手，和十八人结拜为兄弟，因排行第五，又惯使单刀，故被人称为“大刀王五”。源顺镖局的镖车，只要插有王五的镖旗，走到哪里都通行无阻。盗匪闻其大名，从不敢轻易冒犯。有一次，有重镖送往新疆，因路远且沿途盗贼猖獗，各镖局均无人敢接。最后王五挺身而出，顺利完成任务。此后声威愈加显赫。

源顺镖局走的镖，旱路由北京到济南、开封、太原、榆次、张家口等地；水路由北京齐化门（今朝阳门）经通县，顺运河至天津。1891年夏，镖局接了一宗大买卖，由北京押送几十万两白银去天津。王五亲自押镖，并选水性好的镖师同往。白银整整装了三船，王五在第一条船船首负责警戒观望。当船队行至下河西时，迎面驶来一条大船，船头站了三四十人。王五心里明白，此船来者不善，于是急令停船。

原来，来船是横行于下河西一带的水寇“赛蛟龙”等人。“赛蛟

龙”早从耳目那里得知消息，知道是大刀王五押镖。

双方答话后，赛蛟龙说：“掌柜的，你看我手中的枪如何？如若你能胜我一招，那就各不相扰。”王五从身后镖师手中接过大刀，说“请进招”。“赛蛟龙”挺枪便向王五刺来。王五见对方出手不凡，也就不敢大意，在枪尖离胸寸许时，他用大刀猛力把枪挡开，把“赛蛟龙”震得虎口发麻。“赛蛟龙”正想抽枪变招，王五却先他急换招势，一刀劈在“赛蛟龙”左臂上。“赛蛟龙”左臂疼痛难忍，枪也脱出右手，众强人见状皆吓得面如土色。“赛蛟龙”见王五并未乘胜逼进，再看左臂也并未砍伤，心想，王五真乃侠义之士。于是，他把大枪扔在船上，拱手施礼道：“久闻掌柜的大名，今日方得一见，三生有幸。兄之义举，令弟敬佩！”王五忙道：“在下一时失手，望当家的多原谅！”“赛蛟龙”说：“王五兄，武清这一带，今后有插贵镖局镖旗的船只通过，我‘赛蛟龙’当尽力保护！”王五见他连名字也说了出来，足见他的诚心实意。原来江湖的规矩，只准劫镖人问镖师的姓名，镖师不能问对方姓名。此后，他们以武结友之事在武林传为佳话。

王五出了名，也有了钱，但他对劳苦大众的感情未减。每年夏天，他都在门口放置两口大缸，里面装满绿豆汤，供行人随意饮用。冬天，有的穷人冻得没办法，找上门来，他便拿出棉衣相送。到了年底，他总要乘车走街串巷，遇到过不去年的人家，不论是否相识，都送上钱财。由此，京城百姓对王五更加敬佩。

但是，对那些贪官污吏，王五却是嫉恶如仇。那年，京城接连发生数十起贪官赃物被盗案件，官府怀疑是王五等人所为。但因证据不足，又惧怕王五的声威，不敢贸然追查。后来，刑部堂官令提牢太守濮文暹查办此案，濮便派出数十名役卒包围了王五的家。役卒们深知大刀王五的厉害，谁也不敢往里闯，只是在门前空喊，到了晚上，便自行退去了。第二天，濮文暹正在犯愁，忽报王五主动前来投案。王五进门后直言不讳，供认行盗之事皆自己一人所为。

濮文暹也听说过大刀王五侠肝义胆之名，但两人从不相识。今日见王五之举，远非一般保镖武师可比。他本来为官清正，瞧不起那些贪官小人，面对王五之气概，从内心油然升起敬慕之情，遂决定设法搭救。他略加审理，即作出了“各盗劫案与王五无关”之判决，只打了他二十板子便释放了。王五明白这是濮文暹有意开脱自己，决定日后寻机报答。

濮文暹故意放走王五，难免招来贪官们的非议和排挤。光绪九年（1883），濮文暹被调离刑部，外派到河南任南阳知府。因其一贯廉洁清正，生活甚是清苦，待要去河南上任时，竟连路费也拿不出来。王五得知后，立即前往赠银二百两，并亲自护送上路。不料行至辉县时，连日暴雨，黄河猛涨，耽搁数日，费用用光了。王五又找当地朋友借银五百两，才把濮文暹送抵南阳。

通过朋友介绍，王五结识了谭嗣同，俩人意气相投，交往颇深。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捕下狱。王五曾组织武林高手扬言劫牢救谭嗣同，未成。谭嗣同被杀后，王五毅然前往伏尸痛哭，并冒死收尸装殓入葬。“庚子事变”时，王五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前门，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南北大侠”杜心武

驰名中外的武术家杜心武，出生于武风极盛的湖南慈利县。他从小拜武林怪杰为师，学得一身惊人的功夫，早年做过镖师，威震四方，被誉为“南北大侠”。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经宋教仁介绍，杜心武也参加了同盟会，并做了孙中山的保镖。

杜心武担任保镖，并不是每天跟随孙中山，主要是遇有重要会议时，组织几个人在会场内外负责保卫工作。此外，便是在车站、码头担负接送孙中山的任务。事虽不多，担子却相当重。

有一次，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柳亚子等在日本东京牛町区若宫町共商革命大计。清政府早给驻日使馆密令，暗中派人盯梢，伺机刺杀。那天，杜心武在门外发现三个中国人行踪诡秘，便说道：“我知道你们三个人身上都有铁器，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行吗？”那三个刺客很为难地说：“对不起，没有值得一看的！”杜心武说：“你们不借，我会自己取出来的？！”话音刚落，杜心武一个转身，伸手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一摸，动作快如闪电。等到三个刺客转过身来时，身上的手枪全到了杜心武的手中。三个刺客恼羞成怒，挥拳向杜心武打来。杜心武不慌不忙，只在中间走圆圈，一边走一边用手招架，身子像泥鳅一般滑溜，令那三个人看得见却又摸不着。最后，杜心武使出他的神腿绝招，飞起右腿横扫一周，三人应声倒地，然后爬起拔腿而逃。

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宋教仁担任农商部总长，杜心武在农商部

担任参事。一天，宋教仁住宅前来了个陌生的磨剪人，坐在板凳上吆喝。此人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约五十多岁，貌似门神。杜心武一见，便知此人绝非善类。他不声不响，悄悄走到磨剪人身边，用“双龙捧珠”的招式，将磨剪人悬空举起。磨剪人大为震怒，对准杜心武的头部用“五雷掌”劈下。杜心武将头一扭，右腿来了个“横扫千钧”，把磨剪人踢出一丈多远。随即一个跳步，跳到磨剪人的身后，将其双手反扣，问道：“你要说实话，来此有何目的？”磨剪人吞吞吐吐说：“听说宋总长家里有能人，想来见识见识！”杜心武说：“宋总长身边的能人很多，你心服了吗？”磨剪人的双手被杜心武反扣着，痛得流出了眼泪，连连说：“我见着能人了，求你开恩吧！”

后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殉国，那次杜心武没有同去。如果杜心武去了，也许历史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精武英雄霍元甲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霍家是武术世家，霍元甲的父亲霍恩第曾在镖局谋生，性格豪爽，喜好交游。霍元甲继承家传的武艺“迷踪拳”，又吸收各家之长，形成了有名的霍家拳。

霍元甲出身寒苦，少年时期曾以打柴为生，其后当过脚行。后来结识天津北门外竹竿巷怀庆药栈掌柜农劲荪，遂去药栈干活。当时药栈进货，每捆药材重达五百斤，健壮的伙计两人抬一包还很吃力，而霍元甲却能独自挑两包。其神力为观者惊叹，也引起一些人的嫉恨。有一天早晨，药栈刚开门，只见两个约八百斤重的轧路石碾堵在门口。又有一天，药栈门前井台上被人放置了两块大青石，稍一触动即可将井台砸毁。这两次挑衅都被霍元甲飞脚挥拳，一举排除。从此，“霍大力士”之名传遍天津。

霍元甲性情刚直，好打抱不平。某日，皇粮漕运船队在天津北大关停泊，船上保镖李某依仗官势，为打桩拴船，要将临河岸的一家果子铺的棚房拆毁。店主老汉跪地哀求，反遭毒打，人们虽然气愤，但无人敢出头拦阻。霍元甲适行经此地，立即挺身而出，狠狠地教训了那恶保镖一顿。李某被打，大呼“有强盗抢皇粮”，船上清兵一拥而上，将霍元甲抓了起来。幸好有一京官经过此地，问明情况，才将霍元甲放开。

事过不久，李某所在的北京源顺镖局的掌柜到天津拜访霍元甲，这人就是“大刀王五”。两人一见，交谈甚欢，互相欣赏，乃结为好

友。后来，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王五杀敌牺牲。霍元甲闻讯，赶往北京，会同王五的友人、《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一起为王五料理了后事。

光绪二十七年（1901），有个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国拳师到天津卖艺，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后，立即赶去和他比武。那俄国人从翻译口中得悉霍元甲的威名，怕当场出丑，一直不敢出场比武。最后接受了霍元甲提出的条件，登报向中国人道歉，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

1910年春，一个叫奥皮音的欧洲人到上海南京路张氏味纯园献艺，扬言要和中国人比武。沪方邀请霍元甲出面。霍元甲遂偕弟子刘振声赶到上海，要与“大力士”奥皮音比比高低，并登广告说：“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之一病夫也。愿世界健者来较，有以一拳一足加我身者，奉金表金牌各一面，以为胜者纪念。”然而，未等比赛，奥皮音已不知鼠窜何方了。

霍元甲目睹中国人体质孱弱受到外人轻视的现状，便立志倡导体育，弘扬武术，在上海创办了精武体操学校，自任教师。精武体操学校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创办最早的团体，在全国各地以及国外许多地方设有分会。

正当霍元甲致力于武术教学时，不幸遭到歹人暗算。霍元甲身患咳症，有几个日本人邀他比武，他推辞。这帮日本人竟一齐涌向他，撒野行凶。霍元甲被迫还手，三招两式便把他们打得纷纷倒地，不敢上前了。

霍元甲取胜后，由日本医生秋野继续治病，不料服药后，病情突然恶化。一代英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三岁。后经化验，霍元甲是服了剧毒导致身亡的。

霍元甲逝世后，由门徒刘振声继任精武体操学校的教师。数年

后，霍元甲之子霍东阁在精武体操学校的基础上，将其改组成精武体育会。

今朝精武体育会再度复兴，人才辈出。忆及霍元甲英雄，君于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矣。

霍东阁与精武体育会

霍元甲的次子霍东阁1895年2月生于天津西郊小南河村。霍元甲1909年在上海为日本浪人谋害时霍东阁才十四岁。他闻此噩耗，满腔悲愤，决心继承父志，完成其未竟事业，遂与叔父霍元卿同往上海，接办精武会务。他们叔侄苦心经营，一方面扩大组织，广泛吸收会员，一方面邀请南北武林高手任教，并加强纪律和武德教育，贯彻“尚武健身，强种卫国”的宗旨，使精武会的声望日益提高，在社会上树立了学体育、练身体的新风气。

随着精武体操会业务的扩大，1916年，霍东阁在上海提篮桥倍开尔路建立了新会所，把会名改为“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把有造诣的武术家介绍到上海南洋公学、水产、甲种商业、中国体操等学校担任武术体育教员，并在绍兴、松江、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会员由初办的几十人发展到上万人。

1919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匾额，并为该会会刊《精武本纪》作序，赞许它“于强种卫国有莫大之关系”。

1923年，霍东阁为满足南洋华侨学习武术的需要，由香港启程，赴南洋各地筹办精武体育会。6月抵达爪哇泗水，在华侨中宣传发展武术教育之意义。1924年8月，霍东阁成立了泗水精武会；1925年12月在巴达维亚城（雅加达）建立巴城精武总会；然后又在巨港、芝利昆、三宝垄、梭罗、万隆、北加浪等地成立了精武分会。至此，精武会在国内外的分会已有四十多个，会员超过四十万人。

精武会集合各门各派的武术名家如黄河流域少林名家赵连和、螳螂派罗刚玉，长江流域陈维贤，闻名华北的翻子门鹰爪派大师陈子正等。大家皆打破门户派别之见，精诚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霍东阁在天津家乡结婚。其妻于氏及子文亭都留在小南河村未随他去南洋。霍东阁去南洋后曾两次回国到故乡看望妻儿，一次是1926年，先回上海小住，然后到天津拟接妻儿出国而未果；一次是在1935年，霍东阁在天津大营门附近租了一间门面挂牌为“东阁药房”，拟用来筹建精武会，但因没有办起来。次年2月霍东阁又只身一人重去南洋。

霍东阁于1956年在万隆逝世。万隆中华总会、长黄公会、南华公会等华侨团体，曾联名发出讣告，以示哀悼。

武林英豪蔡桂勤

霍元甲的大名可谓家喻户晓，其实在当年的上海精武体育会里，还有一武林英豪与霍元甲同样名声赫赫，他的名字叫蔡桂勤。

蔡桂勤，山东济宁市郊蔡家村人。蔡家村是鲁西南首屈一指的武术之乡，可谓家家习武，户户练拳。相传，唐时华山有个叫蔡茂的武师，因打死长安一个横行霸道的权贵，逃至山东济宁隐居，后把华山路名拳传给了蔡家村。蔡桂勤自幼继承祖业习武，练站桩，一站就是半天，尤其是看家绝招“迎面三腿”，一踢就是五百次，“拿顶”，一拿就是两三个小时。他自己所创造的“单风灌耳”、“钩挂连环”、“黑虎掏心”等招法，更是融大江南北诸路名拳之精华，器械方面集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之大成。

蔡桂勤十六岁那年辞亲仗剑只身闯荡江湖。他到苏州锦源镖局当镖师，被派往西北丝绸之路担任镖子手。当时西北有一名武师叫张风，外号“铁拳”，闻新镖师上任，有意较量。张在路中摆上五张八仙桌，每张桌面各放一个大石墩，每个石墩足有三百斤重。他躲在暗处，看蔡桂勤如何搬动。蔡桂勤见此情景，不慌不忙行至桌前，伸出长长的铁枪，使出“二龙出水”的绝技，左二右二前夹一，一下子挑了个干干净净。张风一见，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蔡桂勤教过秋瑾剑术，还在广州黄埔军校当过武术教官。

蔡桂勤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1943年，外国拳师在上海耀武扬威，藐视中国武术，而且口出狂言，不可一世。蔡桂勤闻悉，带领儿子蔡龙云前往应战。蔡龙云不孚父望，两个回合就将对手打倒在地。

自此以后，蔡桂勤创造的“蔡家拳”，很快风靡上海。

据闻，解放后蔡桂勤仍在上海以授拳为业。1956年，蔡桂勤以七十三岁高龄病逝。

武林奇侠孙禄堂

提到中国近代武林高手，知道霍元甲者多，而知道孙禄堂者寡，这实在是一大遗憾。

孙禄堂何许人？简而言之，乃清末民初人士，武林称“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绰号“赛活猴”。孙禄堂自幼习武，深得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家宗师之真传，且遍拜天下武林名家为师，融会各家之长，创出自成一家的“孙氏太极拳”。他一生遇到过无数武林高手，较技中却不曾一负。为了民族尊严，七十岁时他还拼着老命去打擂台，“教训”过俄国大力士彼得罗夫，打败过日本天皇钦命武士道大力士坂垣，大振国威。孙禄堂不仅武艺超群、武德高尚，而且博古通今，学问精深，一生著有五部拳学著作：《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八卦剑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故也被誉为一代“儒侠”、“武圣”。

孙禄堂又名孙福全，晚号涵斋，河北完县人。生于1860年，卒于1933年。十三岁在保定有幸拜在形意拳名家李魁元门下，两年后，李魁元又推荐他到自己的老师、形意拳大师郭云深门下深造。孙禄堂从师祖学艺八年，形影不离。郭师祖出门骑马，他则手揽马尾随后步行，马行快即快，马慢即慢；遇泥泞处，则跃上马背。他跳上跃下，行走如飞，如是习以为常。

在郭师祖的推荐下，孙禄堂又师从八卦拳祖师董海川的弟子程庭华学习八卦拳。仅三年功夫，即将八卦拳的奥妙并点穴之功练至上乘。郭、程二师曾对他大加赞赏：“此子聪颖过人，又能苦学，复怀亲

仁之心、朋友之义，来日必不辱其师门而成大器。”

1914年仲夏，河北永年太极名师郝为真到京访友未遇，又患痢疾。孙禄堂将他接到家里，请医服药。郝为真月余而愈，后将太极精奥悉心传授孙禄堂。形意、八卦、太极，孙禄堂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又一。他认为虽是三派，实为一家，后融形意、八卦的创立“孙氏太极拳”。

孙禄堂尊程师嘱，曾到江南云游，寻师访道，先后到过少林寺、峨眉山、武当山。云游让他眼界大开，尤其是在四川访得方外人士知真大师，授以《周易》，使他通晓内家拳与易理之关系，拳艺更上一层楼。

1921年，日本的武士道高手久闻孙禄堂之威名，认为要使日本武士道精神称雄世界，必须击败这个中国“天下第一手”。于是大正天皇特派日本著名武士道高手坂垣一雄到中国与孙禄堂决一雌雄。

坂垣初到中国，目空一切，扬言要折断孙禄堂一臂。通过官方公证，二人立约比试。坂垣的监护人为大正天皇的书记官龟田英夫，孙禄堂的监护人为当时的财政部长王克敏。比试地点在北京府右街罗圈胡同孙禄堂住所。

坂垣身材高大，孙禄堂比他低两头，状似文弱书生。坂垣当即轻蔑地说：“我来支那多次，从未遇对手，可见你们中国武术是不堪一击的。”孙禄堂闻言，微微一笑，说：“你遇到的不是真正练拳者，如果是真正练拳者，恐怕你就不堪一击了。”

坂垣听了这软中带硬的话，气得额上青筋暴起，但又强装镇静地说：“孙先生，我看你本人及你家中陈设都似一个文人，比起武来，别忘了中国的古语‘武不善作’。”孙禄堂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中国人从来是文武兼修，文而不弱，武而不粗。”

坂垣被这凌厉的话锋刺得野蛮原形暴露无遗，他大声叫喊：“不用斗口，快来比比高低！”又问如何比法，孙禄堂说：“你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是客，由你先说。”坂垣出了个馊主意，说：“听人讲你内功驰名四海，那就请你仰卧于地，右手压在背后，左手置胸前，我坐在你的腹部上，两手按着你的左手，由裁判喊一、二、三口令，三字出口，你能翻身跃起，就算你胜。”

对此无理要求，孙禄堂众弟子皆抱不平，而孙禄堂却毫不计较，表示同意。

坂垣换上武士道服装，然后趾高气扬地跨坐到孙禄堂腹上，两只熊掌般的大手使劲按住孙禄堂胸前的胳臂。只听裁判“一、二、三”刚出口，只见孙禄堂如闪电般挣脱左手，用食、中二指点在坂垣腹上，坂垣像被马蜂蜇了似的，身子一晃，脸色突变。就在这一刹那，孙禄堂敏捷地将右手抽出，一跃而起，坂垣却跌出了数尺之外。

坂垣不服，二次再来，结果比前次跌得更重。坂垣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大吼一声猛扑过来，直将孙禄堂逼至西墙，后退无路。这时孙禄堂像闪电一样发出一拳，足下只进半步，坂垣却像只被抛起的黑熊，腾空二尺多高跌出两丈以外。

孙禄堂走过去，含笑将坂垣扶起。坂垣许以重金要拜师，孙禄堂说：“国人练武，是为光我中华，决不收外国人为徒。”天皇书记官也出面说：“天皇陛下请先生到日本教拳，月俸薪金两万元。”禄堂正色道：“给我二十万元，我也不教日本人。二位先生请便吧！”

武师程廷华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后，在城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掳掠，无辜百姓惨遭涂炭。此时，一位民间武师挺身而出，与洋鬼子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最后惨死在八国联军的枪口之下。

这位武师叫程廷华，河北省深县程家村人，早年曾拜在著名武术家董海川和郭云深门下，精于八卦掌和形意拳，还擅长轻功，在武林中颇负盛名。后来，为生计所迫，程廷华弃农经商，只身到北京，在崇文门外大街开了一家眼镜店，因此绰号“眼镜程”。

一天，程廷华进内城看望一位武林朋友，途经东单牌楼时，见四五个洋鬼子在调戏一位少女，不由得怒火中烧，便上前干预。其中一个洋鬼子满身酒气，摇摇晃晃地向程廷华扑过来，照他面门就是一拳。程廷华一闪身，飞起一脚，将醉鬼踢出丈外。那几个洋鬼子哇啦哇啦吼叫起来，一拥而上，把程廷华围在中间，挥拳踢腿。程廷华越发恼怒，挥动铁臂，把几个洋鬼子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走。

这几个洋鬼子不罢休，从东交民巷的老窝里搬来了大队人马，企图抓捕这位身手不凡的中国人。程廷华用随身携带的七节钢鞭抵挡了一阵子，打倒了十几个洋鬼子，最后寡不敌众，翻越城墙逃走。

那时，他住在崇文门外打磨厂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白天带着几个徒弟经营眼镜店，晚上便教他们练功习武。大约是在他打了洋鬼子后的第三天，他的一个徒弟风风火火跑来说：“师傅，不好了，八国联军的长枪队抓您来了。”程廷华走到门口一看，果然整条胡同里都是

端着长枪的洋鬼子，还夹杂着不少清兵。他心里明白，这肯定是清兵给引的路，不然，洋人是不会找到他家的。过去，军机大臣荣禄曾要他到内廷做慈禧太后的侍卫，被他婉言谢绝了。因此，荣禄对他心怀不满。

未过多久，程廷华的小院里便涌进了许多洋鬼子和清兵。程廷华怒目而视，随即抖开七节钢鞭，只见鞭起鞭落，银光闪闪，十多个洋鬼子被打倒在地上。洋枪队和清兵见势不妙，便向他举起了枪。程廷华一看他们要下毒手了，便一拧身蹿上了房顶，准备逃走。可惜他脑后的大长辫子被房瓦挂住，一时挣脱不开。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代武师倒在了血泊之中。

“神枪”李书文

河北沧州是享誉中外的武术之乡，历来门派繁多，高手层出。近代武林神枪李书文，亦属其中佼佼者。

李书文生于1864年，卒于20世纪30年代。他身材矮小，有一股倔强脾气。他练武成癖，如痴如醉，有人称他“疯子”。他听说罗疃有个黄士海，是八极拳五世传人，也是以使大枪而驰名的张克明的弟子，曾以武功得授六品顶戴，便跑去磕头拜师。黄士海出身贫苦，为人家守墓，住在村外，见李书文真心学武，品行端正，是可造之材，便精心教他八极拳和六合枪。不到三年功夫，李书文拳械俱精，尤以大枪最为精湛。据说，枣林之下，他大枪一抖，一枪一枣，百枪百枣；另外，苍蝇落壁，枪点蝇落，壁上无痕。

李景林在天津任直隶提督时，邀李书文赴津教授武艺，北京的技击家们听说此事有点不服气，遂邀了两位高手赴津较量。李书文设酒款待，不愿交手，来人一再请战。李书文不得已撤席下场，请来人进招。对方一拳打来，李书文侧身闪过，还报一拳，击中对方头部。“头入于项内，睛出尺许”，倾刻毙命。剩下的那位还不服气，又上来较量，又被李书文击中肩头，肩胛骨立即粉碎。

一次，李书文在北京与人以枪较艺，两杆大枪搅在一起，他怎么也挑不起对方的枪来。过后听说孟村八极五世传人吴麟书枪法最好，便又前往学艺。他怕吴不教他，就来了个激将法——他人坐车头，大枪一横，让车夫在孟村街上大喊：“闲人闪开，天下第一枪来了！”开始让孟村的“铁巴掌”吴会给截住，李说：“论拳脚我不如你，论枪法你

还不行，快请你们的枪大王吴麟书来！”吴麟书被激出来。两人交手时，李书文故意让两杆枪搅在一起。只见吴麟书撤步拧身，一个“挎马枪”便把李书文的大枪挑飞了。这时，李书文双手抱拳，说：“吴老师，我就是来学这一招的。”遂磕头拜师。等他第二次进京时，一杆大枪所向无敌，遂有了“神枪李书文”的美称。

“闪电手”张占魁

张占魁，字兆东，绰号“闪电手”，1867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一户农民家庭，是清末民初威振天津的著名武术家。

张占魁幼年家境贫寒，刚念完《三字经》就辍学了。他十二岁时，跟本村王武师学练滑拳，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学苦练，武功进步很快。他有着农民憨厚淳朴的气质，又有着侠客豪爽侠义的性格，好打抱不平，每遇横行霸道者，总是挺身而出，助弱抗强，维护公道。

张占魁十八岁那年初春，河间县衙一位催收钱粮的小吏骑着毛驴向村民敲诈勒索。他听说后很是生气，便只身一人藏在路边的道沟里，当县衙小吏骑着毛驴经过这里时，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小吏从驴背上揪下来，好一顿拳脚。直打得小吏鼻青脸肿，连连告饶，并把勒索来的银洋全交出来才罢休。

不久，张占魁到了天津，又认识了很多武术界的朋友，功夫更加精湛。一天清早，他在一肉铺门前见一个满脸凶相的顾客向卖肉伙计吆喝：“喂，给割五斤猪肉，要不肥不瘦的！”卖肉伙计连忙割了五斤肉递过去，那个人分文不给，提着肉哼着下流小曲就走了。第二天，那个人又来割肉，仍是分文不给就走。张占魁挺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呢？就问卖肉的伙计，伙计用目光一扫，看附近没人便凑近他的耳朵说：“人家是混混（即流氓集团的成员），俺们掌柜不敢惹！”张占魁听后一跺脚，便急了，大声说：“他们天天白吃肉不给钱，这不是骑在脖子上拉屎吗？”

第三天清早，混混像往常一样来割肉，他刚把割下的肉放在篮子里要走，站在一旁的张占魁说话了：“你站住，给钱！”那家伙扭头一看，仍不理睬，抬腿又走。张占魁一步冲上前去，伸手从篮子里夺回那五斤肉，扔到肉案上。混混横行霸道惯了，动手就打。张占魁闪身躲过一拳，来了个扫堂腿，把混混扫翻在地，半天爬不起来。张占魁教训了他一顿，放他走了。隔了不久，来了一大帮混混，领头的就是那个挨打的家伙，一见面就指着张占魁说：“就是他，打！”混混们蜂拥而上，朝张占魁打来。张占魁施展拳脚，把这帮混混统统打翻在地，混混们四散而逃。

混混和张占魁结下了仇，便要阴谋害他。他们假意请他赴宴。张占魁心想，赴宴必然会遭暗算；不去却要遭耻笑，以后在天津无法站脚。想来想去，他拿定了主意：去！

张占魁按时赴约。吃饭时，一个混混头目用刀尖从盘里挑起一方肉说：“敬张先生一口！”话未落音，尖刀已经刺向张占魁的喉咙。张占魁不躲不闪，张嘴迎了过去。只听“咔嘣”一声，张占魁咬断了刀尖，并将刀尖“叭”地吐到八仙桌上。混混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嗖”地向他的脑袋甩过一把尖刀。张占魁眼疾身快，身子往下一蹲，拳头往上一卷，尖刀在空中翻了个个儿，正好扎到桌面上。接着，张占魁用刀劈断八仙桌腿，抄起一条桌腿和混混们打将起来。不大一会儿，十多个混混被打得纷纷跪在地上求饶。

张占魁不仅痛打土流氓，也严惩洋流氓。在他任职天津营务处期间，办了许多除恶安良的好事。那时候，天津港口很不平静，外国海盗把天津港闹得乌烟瘴气，市民很不安宁。张占魁决心为民除害。他与师兄程廷华作了周密的安排后，自己化装成天津的阔商人，让徒弟韩慕侠化装成随从，备了一份高级礼品，乘一条小船登上贼船。

他们走进船舱一看，舱内有的人在狂饮，有的人似狼嚎一样跳舞唱歌，到处是血红的嘴唇、金黄的长发、蓝色的眼睛。他们迅即施展

八卦掌绝技，打得四十多名外国海盗腿折胳膊断，叽里呱啦怪叫，跪在地上求饶。张占魁、韩慕侠让他们签字画押，然后把这伙海盗交给所在国驻天津的领事馆，限期让他们离境。为了表彰张占魁智擒海盗的功劳，时任代总统的冯国璋特书写“闪电手张占魁”的匾额送给他。

更使人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的是，张占魁几次战胜外国大力士为中国人争气。有一年，一个外国大力士耀武扬威到天津设擂。之前，他已经游历了六国，同一些拳击家、柔道家、击剑家多次交手，无一不胜，获得六枚金牌。张占魁的名气传到他的耳朵里后，他便在心里盘算：张占魁的名气如此大，如能将他打败，就可立即见报扬名。于是，他带着一名翻译、两名公证人找上门来，气焰十分嚣张。张占魁非常气愤，说：“我本中华堂堂武林志士，怎能容忍外国大力士如此狂妄！”他们商定“三战两赢定胜负”。比赛开始，张占魁施展八卦掌中的“九宫步”绝技，满院子游走，外国大力士越是追击张占魁，越像步入迷宫，打不着张占魁，反而连连遭到痛击。最后，洋力士只好认输，拱手把六枚金牌送给张占魁。

1918年9月，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周游十一国后来到北平，向中国武林界示威。时任天津武士会会长的李存义和张占魁带领韩慕侠、王俊臣等也来到北平，要与康泰尔进行较量。当知道康泰尔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后，张占魁便一声不响地出去了。他回来后对大家说：“康泰尔没什么功夫，只是有些力气罢了。”

经追问才知，张占魁考虑到中国拳术和武士会的名誉及徒弟们的安危，独自到六国饭店找到康泰尔，说天津来了一位武艺高强者，咱们在此随意比试一下，你若能赢了我，才有实力与那人对阵。比试之前，张占魁通过中文翻译得知，康泰尔第一招是双手抻断手指粗的铁链，其实铁链中有一环是木制的。张占魁知道其中的奥秘，便来了个先发制人，顺手抄起康泰尔的铁链，像玩弄一条死蛇，然后用力一抻，“叭”地就断了。康泰尔闹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接着又往下比，比试结果以康泰尔不敌告终。

“隐侠”张三爷

当年，北平《小实报》曾登载过一段张三爷的逸事。那是夏季的一天，他邀同院某君在东单一家澡堂洗澡。是时，外边暴雨不止，路上积水约四五尺深。浴罢，二人同往“大酒缸”（即小酒馆）去喝酒，结果只雇到一辆洋车。张三爷令某君先往。但当某君到“大酒缸”时，只见张三爷端坐在桌前，而脚下那双新鞋，泥水未沾。

文中所谈“张三爷”，真名张长祯，字寿亭，人称“隐侠”，1868年生于河北束鹿，1945年病故于北京。他身怀绝技，当过清朝“练勇局”武师、把总，保钦差去过西藏，也曾为富家保镖护院。一些武林高手上门与他比试，无不败北，但又不知他练的是何种奇功，故把他的功夫列入“黑门”。

张长祯喜饮酒，长得骨瘦如柴，走路弓腰驼背，两腿磕绊摇晃。常见他左手提一鸟笼，右手握一杆长烟袋，给人以醉意朦胧之感，人称之“醉鬼张三”。其实，他的这种姿态，是他藏形隐色，掩饰真功以防暗算的一种做法。他曾说：“我年轻时一次可喝白干二斤，老了也可喝十两（十六两为一斤），但我从来不醉，不滋事生非，不打人骂人。”

笔者有幸结识张三爷，过问他《小实报》登载的那件事。他说：“人无翅膀岂能会飞？我是找干地方跳跃而去的。”我想，水深数尺，哪里去寻干地方？想是他不肯透露奥秘。他还说：任何门户只要肯下功夫，总可以练成功夫的。我留心观察张三爷的手指肚、脚趾肚，状如盘珠。他向我表演过绝活：两个铜钱夹在食指和中指间，两

指只一卷，铜钱便成圆筒；他两肩向后一挤，两个肩胛骨可以并在一起；脚面上翘，可以贴到迎面骨；弓步一踏，头向后转，使人以为他的头向后长着。

不但如此，张三爷还使得一手好枪。一次，有绰号“山羊胡”的使枪高手找到张三爷比试。张三爷从篱笆上抽出一根竹竿，捏起一撮湿土，揉成泥蛋，插在竿头，对“山羊胡”说：“兄弟，进招吧！”“山羊胡”一招“怪蟒出林”，挺枪直刺。张三爷竹竿一拧，“山羊胡”觉得胡须一动，急变招势。张三爷却将竹竿一扔，扭头回屋。“山羊胡”忙叫：“三哥，你怎么走啦？接着比呀！”张三爷道：“别比了，摸摸你的脖子吧！”“山羊胡”伸手一摸，大惊失色，原来那个泥球不偏不倚正粘在他的喉部。

张三爷逸事颇多，且脍炙人口。笔者撰文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想说明，中华武术真的是奥妙无穷。

清末武探花敦凤举

1901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仲春，北京的武科场在进行比武考试，各省的武子怀着兴国安邦、光宗耀祖之心，跃跃欲试，力争夺魁。只听武科场上叫道："正定举子敦凤举！""在！"一位身高八尺、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来到主考台前。主考官端详着这位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问："敦凤举，你善用什么兵器？"小伙子道："马上枪，马下刀！"

敦凤举提枪上马，来到武场。只见他长枪一抖，一会儿"怪蟒翻身"，一会儿"银蛇吐芯"，看得人眼花缭乱，主考官赞不绝口。接着，敦凤举下马舞刀。那大刀足有一百二十斤，在敦凤举手中挥洒自如，只听风声呼呼，只看见一片刀光。主考官连连拍案叫绝，评定他"枪法出众，刀法新奇"，当场点为探花。

光绪皇帝见敦凤举仪表堂堂，武艺超群，钦命他留守紫禁城，任禁卫兵总管，并赐匾一块，上书"御前侍卫府"，落款是"光绪御笔"。

皇帝题的匾由军队护送到敦凤举原籍岳村，正定府总督、获鹿知县和村民也分别为他献匾祝贺。这三块匾分别写着"探花及第"、"魁星高照"、"五世同堂"。

敦凤举是直隶正定府获鹿县岳村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弟兄七个，他排行老三。年幼时，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百姓受苦受难。他目睹这一切，决心习武，为国家效力。

有一年夏天大旱，敦凤举的父亲带着大哥和几个帮工去掏井。由于年代已久，井壁有几处裂缝，随时有塌陷的危险。这时，不满二十岁的敦凤举说服父亲，自己下井。他上井不久，井果然塌了。人们都夸敦凤举心眼好，关键时候为别人着想。

1902年，敦凤举中探花后，他的结义兄长、正定府督军潘大人要在他岳村为他建造探花府第。敦凤举得知后，复信督军潘大人：国难当头，你我兄弟自当为国为民，万万不可劳民伤财。后来，他的探花府第只盖了个像样的门楼，庭院内部仍保持原样。

由于敦凤举看不惯宫内后妃们的奢侈生活，便消极度日。一天，他正坐在神武门旁打盹，皇上恰好路过，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说："敦凤举是个自在王！"事后，宫内太监问他："皇上说你是自在王，你为什么不赶快谢封？"敦凤举笑笑说："我无功无劳，受封有愧于天下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敦凤举被调往山东省东昌府任总督军。当时的山东洋人横行，盗匪出没。他到任后，为安定民心白天操练军队，晚上到民间查访，惩处骚扰民众的地痞、恶棍。不幸的是，第二年，他为追击抢粮的土匪，被暗杀在半山腰。死后，灵柩送回原籍。

“霸州李”及其传人

友人函称：天津成立了“振华武术馆”，馆长是“霸州李”之女李文贞女士。笔者不禁想起雄驰武林数十年、被尊为功力门一代宗师的“霸州李”——李茂春先生。

李茂春祖籍河北省霸州。他幼时体弱多病，父母常去庙堂烧香拜佛，以求佛祖保佑他，后来为还愿又令他在淀神庙“带发修行”。该庙之和尚皆练武，因此李茂春渐渐对舞拳弄棒产生了浓厚兴趣，常于晨钟暮鼓之中，诵经习武。后来他遇到武林高手王绛云，据说王乃义和团拳师，其拳术刀剑，属于宋朝传下来的“功力门”，此门功夫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李茂春抱定中兴武术之志，拜王绛云为师学艺。苦练十年，终于学得奇功绝技。

李茂春武艺学成，便结束佛门生活。他因用气功一口气吹死一条多次伤人的恶狗为乡里除害而名震霸州。不久，他又遵师训，离开故土，闯荡江湖，访求名手，先后到过北京、天津、江南、东北，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最后到天津安家落户。

记得早年在北京天桥亲睹其功，确是不凡。李茂春所练一口大刀，是仿三国名将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造的，上铸“曹州刀王”字样，三个壮汉抬不动，而他却挥舞自如，毫不费力。他练就的“双剑入鞘”堪称一绝，即练完双剑收势之时，令人平举剑鞘立于远处，他将双剑同时抛出，不偏不倚，正入鞘内，准确无误，观者无不叫绝。

上海武林界多善练棍棒者。据说有一次李茂春与练棍棒者比武，

棍击李茂春胳膊，断为两截，而胳膊无恙。为使舞棍棒者心悦诚服，李茂春做下骑马势，双手叉腰，不作招架，甘愿挨打。三个壮汉各持棍棒，同时猛擂其胸、肩、胳膊，他像一尊铁打的罗汉，纹丝不动。待其裸出胸臂验伤时，只见擂及处落得几个白点。从此他被人誉为“神功”，获“铁胳膊李”绰号。

李茂春于1939年病逝，时年六十四岁。

李茂春共有子女四人，皆练武，长女李文贞为最，被誉为“霸州李”的传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文贞便在天津武术界崭露头角。那时她才十几岁，豆蔻年华，英姿飒爽，登台献艺，颇引人注目。

李文贞原名李亚男，自幼随父练武，无论严冬酷暑，终年不辍。其父常以声音判断她练功是否用力，凡不合要求的，就得重练。即使仅剩下最后一招一式，也要从头做起。冬天寒风凛冽，十指开裂，鲜血顺指缝流，生性刚烈的李文贞，咬牙含泪也要坚持。为练脚底功夫，她常在石板地、洋灰地上摔跌滚打。踢、打、摔、拿诸项武功，每天要练上十数小时之久。

名师严父，使李文贞学得一身精湛武功，刀枪剑戟，长短兵器，无所不通。她打“飞虎拳”，秀如猫、抖如虎、行如龙，轻捷顺畅，潇洒自如；她练“太极十三剑”，点、刺、崩、扎，寒光耀眼，气势慓悍，观者无不喝彩。记得天津东南城角的亚细亚电影院落成时，特邀她去剪彩，报纸和画报曾刊登消息和照片。其父厌恶这种吹捧，遂将其“亚男”之名更为“文贞”，以期她成为贞洁之士。

1939年天津闹大水，李茂春猝然病逝。天灾人祸，给年仅十七岁的李文贞压上了千斤重担。她带着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妹入京卖艺，养家糊口，闯过了难关。

日本占领时期，天津南市“三不管”一带地痞流氓横行霸道。李文

贞用帆布搭篷卖艺为生。一次有个汉奸来到武场，企图占李文贞便宜，寻衅滋事，刺破篷布。李文贞上前理论，汉奸出言不逊，被她一拳打歪嘴巴，狼狈逃窜。翌日，汉奸邀四五个恶棍前来报复，被李文贞及其武友的真刀实砍所震慑，一个个溜之乎也。

解放后，浪迹江湖的李文贞成为国家武术队第一个女队员，1953年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首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比赛大会，荣获特别奖。后担任天津武术队队长兼教练，业余写作出版了《太极十三剑》一书。

镖师李尧臣

李尧臣生于1876年，病逝于1973年，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他在北京会友镖局走过镖，在慈禧太后面前表演过八仙庆寿剑；他教过京剧武生宗匠杨小楼演《安天会》（即《闹天宫》）中的猴拳动作，教过京剧旦角大师梅兰芳演《霸王别姬》中的舞剑手法；他开过鼎盛一时的“武术茶社”，也主持过名声赫赫的“北京精武体育研究会”；他在擂台上击败过日本拳师；1949年以后，他多次作过精彩的武术表演。

李尧臣，河北冀县李家庄人。家乡习武风气很盛，他学过太祖拳，在家乡小有名气。

光绪十六年（1890），李尧臣刚十四岁，就背井离乡跑到北京谋生。先是在荷包行当学徒，四年后经人介绍进了会友镖局。

会友镖局是北京八大镖局中经营时间最久、信誉最高、规模最大的一个，位于前门粮食店南头的路西，南京、上海、西安、天津等地都有分号，甚至在李尧臣的家乡绢子镇上，都设有会友镖局的南柜。镖局的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当时，会友镖局共有师徒一千多人，拳术以三皇炮锤见长。三皇炮锤的第四代传人宋迈伦，江湖上人称“神拳宋老迈”，也是冀县人，这为李尧臣能入会友镖局创造了条件。

李尧臣虽然在家乡学过些功夫，但作为一名专职镖师，自然还不到家，所以进镖局后第一件事就是拜师。他的师父宋彩臣是宋老迈的得意弟子，他学的当然也是三皇炮锤拳了。后来又学六合刀、练大

枪，三十六点、二十四式等十八般武艺练得差不多了，他又学水上功夫，尤其是在水中使短家伙，如分水揽、雁月刺、峨眉刺、梅花状元笔等。水陆功夫学会了，就学使暗器，如飞镖（也叫斤镖，因为一个镖有一斤重）、紧背花装弩、飞蝗石子等。

学会了软硬功夫，还要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的功夫。所谓蹿房，就是用手攀着房子的椽头，往上一翻身，一丈多高，轻轻落在房檐上，不能有响声。越脊，就是在房脊上行走，如果踩在瓦片上，嘎嘣一声把瓦踩碎，就容易被人发觉。翻身跳下时也不许出声，有时还要先投石问路，如没有动静，才能跳下。

李尧臣在会友镖局前后共走镖二十七年，直到1921年火车和邮电事业开始发展，以及火器盛行，会友镖局解散，他的保镖生涯才结束。

李尧臣离开会友镖局后，在天桥水心亭开了个茶社，倡导武术，起名“武术茶社”。茶社方圆二十丈，能容一千多人，备有各种武器，来的人可以随便练武、比武。看的和练的都不花钱，只是喝茶才付两个大铜钱。

茶社买卖很兴隆。偶尔也有来砸场子的，可是都被李尧臣应付过去了。

有一年八月节，来了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一个劲儿地叫阵。李尧臣只好和他比试，没想到交手几个回合占不到一点便宜，最后只好拿出三皇炮锤中看家的绝招“夫子三拱手”，才把少年制服。

少年刚下场，一个六十多岁的银须老人跳进场子，施礼笑道：“刚才是我的孙子，初学乍练，让你见笑了。现在我这小老儿愿意领教领教。”老人说着，立了个门户。李尧臣双手一抱拳，说了声：“请！”二人便交起手来。李尧臣用尽了在镖局中学到的绝招，如“夫子三拱手”、“炮锤四肘”、“三十二擒拿”等，但打在对方身上就同触到棉絮一

般，力量全化没了。对方并不反手还击，李尧臣知道是遇到了高人，便跳出圈外，双手一揖说：“老先生，我的功夫没练到家，服输了。”接着把老人请进室内，磕头拜师。

老先生见李尧臣直率、真诚，虽闯荡江湖多年，有功夫，有名气，但仍虚怀若谷，不存任何门户之见，不禁由衷感动。于是便在李尧臣家住下来，传他武艺。

原来这老先生练的是绵掌。这绵掌连绵黏随，变化莫测，能以柔克刚。李尧臣学得此术，并将它糅进三皇炮锤中去，使刚劲的炮锤拳刚中寓柔，硬中带软，真是如虎添翼，功夫又高深了几层，形成了新的风格，也为炮锤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英勇的二十九路军将士秣马历兵，准备迎击日寇。副军长佟麟阁特请李尧臣到军中去教大刀。李尧臣根据战刀的特点，结合无机子路刀法，创编出一种刀法套路，起名无机刀。这趟刀法实战性很强，挥舞起来，既可当刀劈，又可当剑刺，大大提高了士兵白刃战本领。在长城要隘喜峰口战役中，二十九路军将士充分发挥了大刀的作用，追杀日军六十余里，砍杀敌人近百名，缴获大炮十八门。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李尧臣还保存着二十九路军的一盏马灯。他在北京护国寺隐姓埋名教场子，经常向徒弟和观众慷慨陈词，大讲二十九路军用大刀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

日寇侵占北京以后，由于暗探告密，日伪警备司令部把李尧臣抓了起来。一个叫武田熙的日本特务，会八卦和柔道，提出要和李尧臣比武，如果李尧臣赢了，就可以释放；如果输了，就要向武田熙磕头拜师。比赛选在三月三这天在蟠桃宫庙会上进行，日本宪兵荷枪实弹维持秩序。先比拳，武田熙哪里是对手，两次让李尧臣打倒在地上。武田熙恼了，走到两个宪兵旁边，抽出两把战刀，扔给李尧臣一把，口里喊着：“器械的比比！”说着举刀就朝李尧臣头上、身上雨点般劈来。李尧臣拔挡搪架，闪展腾挪。比试不到一分钟，李尧臣便抓住破

绽，猛地飞起一脚，正踢在武田腕关节上。武田的刀被踢飞了，人蹲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最后，武田只好把李尧臣放了。

还有一次，日本人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四处摆擂和中国人比武。李尧臣在南京和日本人较量。一上台，日本人看他是个老头儿，就问："你还行吗？"李尧臣说："来吧，小子，我先让你三拳！"等日本人三拳打过，李尧臣把对方的拳路也摸清了。他大喝一声："你下去吧！"猛的一拳，对方便一个倒栽葱跌下台去了。

李尧臣生前曾任全国武协委员、北京市武协理事，多次应邀担任武术比赛裁判长。他年逾九十还常常手持龙头拐杖，往来于南北城之间，在天坛、地坛、东单、景山、陶然亭、中山公园等处指导青年习武。每当他扔掉拐杖，以龙腾虎跃之独特英姿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群中必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京北大侠崔兆麟

谈过李尧臣，又想起京华另一位著名武术家崔兆麟，因其籍贯在北京昌平县沙河镇，故有“京北大侠”之称。

崔兆麟自幼喜爱武术，嗜技如命，精于多种拳械，尤其形意拳有独到之处。因专心研究武术以致对家中毡铺无暇顾及，造成家境日渐困窘。虽如此，其练功之心未有片刻松懈。每日凌晨三时必到巩华城扶荆门外（即沙河城南门外）练功，先站技击桩一小时，然后演练形意拳之“五行”、“十二形”数趟，再反复钻习十二形中的“虎形”。有人尝见其如虎一扑，能蹿出一丈有余。平日与人交手，无论对手出何拳式，用何招法，他接手化开后总以虎形扑击对方，对方无不应声而凌空跌出。

巩华城内有叫安鹏者，其人身高一米八五，体重近二百斤，虎背熊腰，力大如牛。20世纪40年代，巩华城威漠门内有座关帝庙，内有关圣君坐像，旁立周仓手持浑铁大刀重一百六十斤，安鹏经常在人前将刀举起舞几个式子炫耀。一日，安鹏舞毕，见崔兆麟在场，便要与他较量，崔兆麟微笑答应。二人一接触，只见崔兆麟用虎扑将安鹏腾空掷起，摔出丈余外。安鹏爬起后仍不信崔兆麟之功力，再试。结果两次交手均飞出丈外，这才拜伏于地，要崔兆麟收自己为徒。崔兆麟念其豪爽，便欣然答应。授技五载，安鹏亦有名望。

崔兆麟三十五岁时，经人介绍与形意拳名家尚云祥相识。尚在武林中人称“铁足佛”，对形意拳造诣极深。尚将形意拳中之深微奥妙及平生习拳心得尽授与崔兆麟。崔兆麟技艺更进，如“鸡形四把”、“碎步

蛇形”、劈拳等俱能臻入化境，器械中则以刀、枪、棍、剑最为擅长。

1938年，崔兆麟去海淀苏家坨访友，途中见一日本兵端枪追逐妇女。崔兆麟愤怒填膺，上前阻拦。日本兵见有人干涉，便端枪向他刺来。崔兆麟赤手空拳和日本兵周旋。崔兆麟右臂向上举起，顺势落步用“虎扑”中的双拳打去，日本兵应声跌到丈外水渠中。崔兆麟看被追妇女已经脱险，随即飘然而去。

崔兆麟晚年将拳技尽授其徒。崔兆麟于1959年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神腿”佟忠义

“神腿”佟忠义是沧州众多武林高手中的佼佼者。

佟忠义之先祖佟国荣随清兵入关，被派镇守沧州，遂在沧州落户。佟忠义，满族人，生于1879年，卒于20世纪70年代初。其父佟存为武林高手，曾开设有名的天兴镖局。佟忠义自幼聪颖，父亲传艺又严谨，他十二岁便把六合拳的套路练熟，学会了六合剑、孙膑拐、大刀等器械；十五岁掌握了摔跤技术中的三十二个大绊子；十九岁时已集摔跤、射箭、六合拳、器械等武功于一身；三十多岁时，腿力过千斤，被誉为“神腿佟”。

一次，佟忠义进京赶考，途中遇到有人设擂比武。擂台上交手的两人的一人欲用暗器伤害对方。佟忠义看不惯这种阴损行为，便跃上擂台，将使暗器的人摔在台上。佟忠义进京后因考试成绩优良，被慈禧太后召进宫中表演拳术和摔跤术，旋被留在宫中，封为“站殿将军”。但佟忠义对清政府妥协媚外、政治腐败颇为不满，毅然弃官为民。

1937年秋，日本人金大力在上海摆下擂台，声称要踏平东亚病夫。金大力立擂七天，打伤了不少武林高手。佟忠义闻讯后，连夜赶往上海。他看到一连上擂台的两人都被打伤败下阵来，便大喝一声，跃上擂台。佟忠义在台上站定，像一尊铁塔，台下爆起雷鸣般的掌声。他先向观众深施一礼，然后转向金大力。金大力并未把佟忠义放在眼里，先来了个“饿虎扑食”，佟忠义来了个“鹞子翻身”，闪过第一招。金大力扑空后，翻身第二次进招，使了个“黑虎掏心”，佟忠义一

个“鲤鱼打挺”，紧跟着一个“大僵尸”，身子贴在地上。金大力见佟忠义躺在擂台上，便欲下毒手置他于死地——抬腿向他的腹部狠狠踹去。在此危急之际，佟忠义右脚尖勾住金大力站立的那条左腿，用左脚用力向对方的迎面骨踹去。这一招叫“勾踹连环腿”，只听咔嚓一声，金大力腿折而应声倒地，台下齐声喝彩。

“八一三”事变上海被日寇占领后，张发奎的大刀队曾使日军闻风丧胆。佟忠义闻讯大悦，在一个月内赶制了五百把朴刀，欲投其门下。不料此时一个汉奸带着日本人来到他家，极尽诱惑之能事，要他传授浦东大刀队的刀术。他拒绝说：“我有病伤，这件美差事我干不了！”日本人连请三次，都被佟忠义施计骗过。日本人第一次来时，佟忠义用桂圆、楮熬汤洗面又擦腿，使皮肤变色；第二次用栀子、蛋青把腿部擦成青紫；第三次用棍子在腿上敲击了几下。日本医官确认他有伤，只好作罢。佟忠义见日本人不再找他的麻烦，便偷偷地将五百把朴刀密运到浦东支持抗日。

佟忠义在上海开办过武术学社、忠义拳术社、忠义摔跤社，门徒逾百，女儿佟佩云得其真传。

王子平三打洋力士

关心中国武术事业的人，对王子平这个名字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因为这位武术家，在20世纪初就威震武坛，名闻遐迩了。

王子平字永安，河北沧州人，生于1881年，卒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身武术世家，祖父“翻杠子”的本领绝冠四乡，父亲则以“粗胳膊王”的称号远近闻名。王子平自幼嗜武入迷，天天五更起来拿大顶、站梅花桩、举砘子、打沙袋，功夫日渐精进。他虚心向各派名家学习，哪怕是点滴所长，都认真求教。有时人家不肯传授，他就以祖传技艺作为交换条件。他在沧州曾拜师沙宝兴、马云龙学滑拳，在山东拜鼎鼎大名的杨鸿修学查拳。十九岁时王子平便成了武术高手。

济南是有名的泉城，处处有泉景奇观。一天，王子平正在柳园喝茶，看到一群茶客围着一个“水推磨”看热闹。那水推磨似车轮一般飞转，旋力很猛。王子平看得出了神，手头觉得直痒，脱口说了句：“我可以揿住它，叫它停止转动！”旁边看热闹的人听了，多不相信，有人甚至用鄙夷不屑的眼光斜睨他。看到这种轻蔑的神态，王子平心气一升，便拨开众人，上前两步，站成骑马蹲裆式，身略前倾，气沉丹田，揸开五指，朝那飞转的水磨按下去。这一按，似泰山压顶一般，足有千斤之力，那水磨颤悠了两下就纹丝不动了，看热闹的人都给镇住了。从此“千斤王”的大名在济南府叫开了。

王子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19年，青岛举行赈济日本大地震的募捐大会。济南的武术团体

联合在青岛作武术表演。王子平表演的节目最多，被当地报纸推崇备至。不料，这引起美国人的不满，派出大力士阿拉曼前来挑战。当王子平与阿拉曼握手时，感到对方腕力逼人，不怀好意，便使了个“铁腿摔跤”的法子，迫使阿拉曼不但立刻松手，而且站立不住，跌倒在地。第二天，有个叫柯兰麦的德国大力士又找上门来，要和王子平见个高低。此人本领平平，一交手就跌了几个跟头，只好服输。

1921年，有个叫沙利文的美国人，伙同英国人乔治（体重二百九十五磅）和法人彼得（体重三百零五磅）到上海摆所谓的“万国竞武场”的擂台。并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说凡能打上他们一拳者赏洋五百，如把他们打倒在地赏洋一千。他们的狂妄自大激起了许多爱国人士的愤慨，上海武术界便公推王子平前去应战。

王子平刚走上擂台，沙利文突然从身后窜出，冲王子平就是一记冷拳。王子平觉得脑后有风，敏捷地一闪，躲过了。第二记冷拳又接着打来，王子平再也遏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用连环腿把沙利文踢翻在地。另外几个狂妄的外国拳师一见此景，吓破了胆，都悄悄地溜之大吉了。

之后，著名画家齐白石挥毫写下“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的条幅，赠与王子平，赞扬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威震中外的武功。

“天下第一拳”李宝玉

在朋友家偶然翻到一本《武林》杂志，内有一篇追忆河北邢台技击大师李宝玉先生的文章，不禁浮想联翩。

李宝玉，名景清，字香远，光绪己丑年（1889）生，河北邢台县人。他自幼家境贫寒，经亲戚推荐，拜在老拳师刘瀛洲门下学艺。

刘瀛洲的三皇炮锤威镇京、津、冀一带。李宝玉经过八年的勤学苦练，深得三皇炮锤真谛，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远近来找他角力者，无不败在他的手下。刘瀛洲见他外家拳功夫已学成，又介绍他拜在太极高手杨老振和郝为祯门下学内家拳。

1923年4月，在邢台驻防的于右任靖国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自恃有功夫，闻李宝玉大名，提出比武之请。李宝玉担心对方受伤，吃罪不起，便婉言谢绝。胡景翼说：“不交手也可以，我坐在这里，你若能将我拉起来就算你胜。”说完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气运丹田，千斤下坠，压得凳子咯咯作响。李宝玉走到胡景翼跟前，抓住他的手腕说：“长官请起来吧！”声音刚落，胡景翼不仅被凭空抓起，还因功力所致，那条长板凳也粘在臀部离了地。连试三次，都是如此。胡景翼羞得无地自容，抡起大拳就朝李宝玉打去，李宝玉急忙应战。几个回合过后，李宝玉纵身跳到一边，抱拳认输。胡景翼洋洋得意地回到师部，副官替他脱下上衣，只见后背上影影绰绰印着两个手印。

1929年秋天，李宝玉在报纸上看到英国大力士在南京摆擂比武的消息，决定带徒弟前去打擂。

在南京立擂的英国人名叫艾斯波尔。此人生性暴烈，力大无穷，拳击术十分精湛，被誉为“无敌拳王”。开始几天，李宝玉没有贸然上场，立在台下观察来自各地的武术高手同艾斯波尔的较量。当他看到一个个中国拳师相继被打下擂台时，再也忍不住了，便决定上台。不料就在他准备上台的头天晚上遭人暗算，被人用石灰烧伤了双眼。无奈之下他只好让徒弟董文科代他上台比武。李宝玉将自己多年揣摩的绝技和几天里观察到的艾斯波尔的拳术破绽一一密授于董文科。为了保护董文科不受暗算，李宝玉仍用自己的名字挂牌打擂。打擂那天，董文科依照师父的指点，始终占据主动，最后将艾斯波尔摔出一丈多远，又上前劈手一掌，打得艾斯波尔好半天爬不起来。

“燕子”郭长生

郭长生祖籍河北沧州市，生于1896年，卒于20世纪60年代初。郭长生青年时代受孙中山先生“提倡武术，健身强种”的思想影响颇深，怀着强身救国的满腔热情，去拜闻名南北的通臂拳、苗刀大师刘玉青为师。

刘玉青见郭长生器宇轩昂，双眸闪烁，身手矫健，便将平生武艺倾囊相授，亲传通臂拳二十四式、苗刀、左把枪等。郭长生嗜武如迷，每天四更起床练“北斗功”，一式打两千下，行步要打三十趟，只一年，便把通臂二十四式式式掌握得扎实精纯。刘玉青大悦，又让弟子赵士奎将家传劈挂拳授于郭长生。不到一年，郭长生又得劈挂拳之精妙。郭长生因身法绝妙，行拳溜步如紫燕凌风，武林人士称他“郭燕子”。

1927年，南京组建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欲从应试的几百人中挑选一部分聘为教官。郭长生闻讯赴考。他演练劈挂拳时，两臂抡劈快如雨，开合爆发似闪电，进退辗转，跳跃起落，身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好身法！”“好身法！”四座皆赞。国术馆科长马英图高兴地连连搓手，赛后把郭长生请到酒楼，亲自把盏接风。郭长生遂被聘为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官。

一年夏天，郭长生在老家沧州歇伏。日本驻沧州最高司令官太田少将派人以高薪聘请他去教授苗刀。日本人三顾茅庐而郭长生不去，一气之下，派一擅长西洋剑的汉奸王氏以切磋武术为名，欲加害郭长生。王找上门来，开口便问：“你懂剑术吗？”郭答：“略知一二！”王

急不可耐地与郭长生过手。由于求胜加害心切，王氏猛然进招，一个“白蛇吐信”刺来，郭摆剑相迎，两剑平行交叉。霎时间，郭长生腰一挫，腕子一抖，一招扫点，猛击王的虎口，鲜血溢出，宝剑落地。王败北。郭长生为防日人纠缠，躲到姚官屯亲戚家避难。

一天，郭长生在姚官屯附近看见一队盐务警在毒打一位卖盐的老汉。眼看老汉已奄奄一息，郭长生便上前劝阻。这帮盐务警张口便骂郭长生“多管闲事！”还一窝蜂向他扑来。郭长生藏头收臂，侧身上步，先照一个黑大个下手。一招“鞠躬扒打”带掌拳，腾地一声，黑大个一声惨叫飞出丈远。后面又一个家伙扑了上来，郭没容对方近身，一个“反点鸳鸯谱”，一脚把这个家伙蹬出十来步远，“啪”地跌了个四仰八叉。郭长生左劈、右横、前撑、后扫，又放倒几个，其余的不敢上前，撒腿跑掉。

郭长生一生授徒颇多。其得意高足有曾在全国武术擂台赛上夺魁的韩俊元、曹砚海、郭景春、高玉清等。郭长生以武传家，长子瑞林，精于技击，次子瑞祥，可传其家学。他著的《苗刀》、《疯魔棍》已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沱南侠”的“梅花桩”

笔者早年认识的武林名家中，有一位是“落地干支五式梅花桩”的传人韩其昌。

韩其昌籍贯河北省深县，因其早年以武艺高强闻名乡里，又在滹沱河南，所以绰号“沱南侠”。其所练之梅花桩功夫起源于明代，即栽一百根桩，在桩上练武。拳法按天干地支分做五式，五式宛如梅花盛开，故称干支五式梅花桩。后因栽桩费钱且麻烦，便改在地上练，因此在名称前加了“落地”二字，叫作“落地干支五式梅花桩”。

据说，梅花桩是从山东传到河北的，说起来还有一段传奇：当年河北武强县牛家庄村头庙前有个大拳场，一个人称李老头的外乡人在这里落脚以卖油条和火烧度日，晚上时常看众人练拳。一天晚上，两个小贩的布匹被强盗抢劫，跑来哀求练拳的人帮忙，李老头也随众人追去。当人们走到半路时，却见李老头挑着布匹已经往回走了。原来这老头叫李庭吉，山东威县翟家庄人，他深得梅花桩真传，因打抱不平，打死富家护院，便逃亡至此。此后他开始收徒授拳。后来，其弟亦来此授拳。诸徒中，以任俊杰功夫最佳，任又传授功夫给尹墨池和赵应廉。尹和赵即是韩其昌的授业老师。

1917年，韩其昌经李存义介绍到天津，会见了师叔张兆东，并与师兄弟尚云祥、韩慕侠等名家相识。后又经张兆东推荐，到保定曹锟的武术营做了一名教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全国十四个省两千多名武林高手的杭州“国考”擂台赛。他充分发挥了梅花桩腿法灵活的优势，连败数人，最后荣获银樽一座，上刻“赛孟贲”（孟贲是战国时齐

国英雄，力大无穷，能生拔牛角）。从此，韩其昌的威名传遍武林，而“落地干支五式梅花桩”也始为人所识。

1932年，韩其昌到了北平，先在志成中学、师大女附中、贝满女中教武术，后又成立“北平健族国术研究社”，亲任社长，正式授拳。从此，京都武林中才开始有“落地干支五式梅花桩”的拳式。

韩其昌仙逝时享年九十有六。其子韩建忠和诸徒皆承继衣钵，有的还到日本表演过，深得日本武术界的称赞。

沈三力挫俄力士

中国近代史上曾力挫来华挑衅的外国大力士的武林英杰不在少数。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天桥卖艺的武林英雄沈三，亦有挫败俄国大力士的壮举。

沈三原名沈友三，出身于北京宣武门外牛街一个寒苦的回族家庭。少年时拜在满族头等扑护德二爷（名世庭）门下，潜心学习掼跤技艺。嗣后，又拜师承北平国术研究会会首白锦兼学炮拳。两种技艺相辅相成，沈三很快成为当时北京跤坛上无出其右的魁首。

当时，前门外珠市口大街开明戏院迤西半里地，有一家坐北朝南的戏园，名曰“第一舞台”。北京的京剧与梆子等大小戏班，在这里轮番演出。1921年底，这家戏园大门外贴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海报：“俄国大力士彼得洛夫，威震中华，天下无匹，莅临献艺，为期三天。”门楣的上方，悬挂着洋力士的半裸体广告画，洋力士肌肉隆起，傲视一切，一副无与匹敌的样子。

海报与广告画的诱惑力，再加上无聊的帮闲文人在几家报纸上的大肆吹嘘，于是乎像“彼得洛夫力能扛鼎”、“斗死犀牛”等不经之谈，便传遍了六街九衢。

艺高胆大、血气方刚而又富有民族正义感的沈三，耳闻有关彼得洛夫的传言之后，义愤之情油然而生。为了考查这位洋力士的功底，他破费了大洋一元买了前排的一个雅座。

彼得洛夫的表演，是在洋鼓洋号伴奏下缓缓进行的。他先用双手托起一个黑糊糊的大铁球，在台上绕行三圈儿，而后又举起一副白花花的杠铃，连续做了几个下蹲动作。仅这两下子，便把台下一帮观众唬得目瞪口呆，自以为大饱了眼福。殊不知武林中有这样一句谚语：“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沈三的眼中，彼得洛夫不过是一只只有拙力的笨熊，凭着中国武术的灵巧敏捷身手与变幻莫测的招数，挫败这个不可一世的洋力士，易如反掌。

北京的12月，朔风凛冽，天寒地冻。然而，“第一舞台”里却是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彼得洛夫为期三天的带有挑衅意味的演出，已经是最后一场了。台下的观众显然比前两天增加了许多，那些不惜破费五块大洋买“飞票”进来的看客，因为连“加座”都找不到，只好在戏园的三面“贴大墙”。

沈三和几位前来助阵的朋友夹杂在前三排的人群中，伺机而动。

舞台上，彼得洛夫洋洋得意地晃动着毛茸茸的身躯，酱赤色的横肉随着音乐的节拍不时地颤颤悠悠，仿佛一只贪婪凶狠的棕熊，在寻觅着猎物。他稍微做了一些准备活动之后，先卷弯了一根钢条；待一阵掌声响过，又单臂举起一个沉甸甸的石锁，得到了比刚才更热烈的掌声。彼得洛夫踌躇满志，转身对坐在台上的矮瘦的翻译嘟噜了几句。只见那翻译如同领了圣旨一般，立即冲着台下阴阳怪气地嚷道：“彼得洛夫先生刚才说，石锁本是中国武术家练功的玩意儿，台下哪位武林高手如不服气，欢迎上台来试试！”

台下千余名观众屏气凝神，面面相觑。沈三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脱去长袍，露出褡裢，一个箭步蹿到台上，愤然说道：“我堂堂中华，素有武德十戒。彼得洛夫狂妄虚夸，自诩天下第一，斗狠逞强，横行不轨，且高抬票价，大有奸商铜臭之气。如此犯我武林戒律，理应除之！”言讫，顺手操起石锁提梁，轻轻一抖腕子，嗖地一声抛至空中，接着又以“苏秦背剑”之势接住了石锁。满堂喝彩声震耳欲聋，再

看那彼得洛夫，先是瞠目结舌、呆若木鸡，继而恼羞成怒，像只恶熊向沈三扑来。

沈三毫无惧色，矫健纵跳，眨眼间绕到对方身后，飞起一脚，正踢中对方腰下“命门”处。彼得洛夫踉踉跄跄，半天才回过身来。沈三看出他的破绽，猛然进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左拳佯击对手面颊，发右拳猛击其胸口。左右两拳，犹如二龙出水，既刁又狠。沈三趁着对手方寸已乱之机，猛然将右腿插其裆中，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跪腿得合”。彼得洛夫再也站不住了，似塌了的一面山墙，“通”地一声跌倒在台上。自恃力大无穷、天下无匹的彼得洛夫，最后在一片喧嚣中悻悻离去。

沈三挫败了俄国大力士，维护了民族尊严，从此益发声名远扬。当年的《晨报》与《群强报》由于报道了这则消息，居然创造了销售一空的历史纪录。

“白猿”陈凤岐

陈凤岐生于1905年，沧州市郊大孙庄人。他生于武术世家，其父孙玉山是沧州著名的武林高手。《沧县志》载：“陈玉山艺精绝，曹锟经略四省时提倡武术，聘为教习随营教练，得有奖章。”陈凤岐幼时在父亲指导下刻苦练功，学得了一身好武艺。因其行拳走式轻灵敏捷，故武林中有“白猿”之称。

1930年，陈凤岐决定到外面去闯荡闯荡。他听说南京中央国术馆里名家众多，高手荟萃，就打算去那里见见世面。嗜武入迷的陈凤岐，一到中央国术馆就虚心向武术高手求教，天天苦练，功夫日精。几个月以后，中央国术馆要举行擂台赛，陈凤岐跃跃欲试。抽签结果，他和外号“体育健将”的徐甲庚对阵。他知道对手人高马大，武艺高强。比赛开始，第一局和第二局都是平局。第三局一开始，陈凤岐来了个“大鹏展翅”，一撤步直立出拳，一拳就打在徐的脸上。紧接着陈凤岐一个侧踹连环勾脚，上手使招“抹眉冲拳”，打得徐站立不稳，连连后退，最后重重地摔在地上。裁判宣布：陈凤岐得胜。

1944年夏的一天，陈凤岐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说和他切磋武艺。陈凤岐谈起武术滔滔不绝，乘兴又练了一趟燕青拳。来客连连道好，却说不出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原来他是山东刘佩忱手下的汉奸庞友德。庞见陈凤岐果然名不虚传，就恬不知耻地说：“我们队里有四名皇军，他们想学中国武术，听说陈师傅的赫赫大名，今天特派我前来请你去！”

“请我？”陈凤岐怒目一瞪：“教日本人武术，哼！”一甩袖子进里

屋去了。庞碰了壁，又不死心，怕请不回去不好向皇军交差，于是也进了屋，皮笑肉不笑地说：“陈师傅，咱丑话说在前边，你若不去，皇军怪罪下来可不好办！”陈凤歧“啪”地一声一张大手拍在墙上，土墙被震得嗡嗡作响，大声说：“让他们来，我等着！”庞只好悻悻溜走。

1946年9月，驻扎在沧州城外的土匪扬言要袭击大孙庄。这天晚上，星月隐没，四周漆黑一片，整个大孙庄寂静无声，陈凤歧带领抗匪队伍蹲在房顶上放哨。不大工夫，陈凤歧听到黑暗中有“嚓嚓”脚步声，借着水坑的弱反光，看见一队黑影正悄悄地向村里摸来。陈凤歧毫不畏惧，大声喝道：“土匪小子们听着，你凤歧爷爷在此！”土匪们一听他的大名就慌乱起来，四下里逃窜。土匪袭击大孙庄的图谋就这么结束了。

陈凤歧授徒颇多，并指导后辈写出了《燕青拳》书稿一部。

侠女威慑俄国力士

在中国近代史上，打败外国大力士之中国武林高手不少。堪以称奇的是，还有一位巾帼英雄，以其娴熟精湛的武功，威慑俄国大力士，使之不敢交手。

那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中央饭店的经理陈雨亭，为避免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请了一个流落北平的名叫石金的白俄做副经理。石金初上任，为炫耀一下自己的威风，请白俄大力士麦加罗夫到北平献艺。麦加罗夫当时下榻在前门外西河沿金台饭店三楼二十四号。石金先在中央饭店院外铁栏杆上挂丈余长红布，上书“俄国大力士麦加罗夫来平献艺”，以招徕观众。麦加罗夫在“哈尔飞”（今西单剧场）表演，节目有臂缠铁板、掌击铁钉入木、手断铁钉、十六人用铁链绞拉麦氏脖颈而使众人跌扑等。麦加罗夫身高一米八九，体重二百多磅，年龄在四十上下，腱肉块块，青筋隆起，胸前长着一络黑毛，样子甚是凶恶。表演真假姑不论，令观众气愤的是其耀武扬威，目空一切，口吐狂言，称“东亚病夫”无人敢与自己比试。

此事惊动了华北国术研究会会长马礼堂，他迅即写信给在河间的老师——神拳李洛能的再传弟子杨福山。这杨福山人称“华北三山”之一，所谓“华北三山”者，除杨福山外，还有刘仓山、刘位山。此三人各有一绝，即杨福山的枪、刘仓山的棍、刘位山的刀，一般无与伦比，故又有“华北三绝”之美誉。且说杨福山，跟前只有一女名剑霞，视若掌上明珠。杨剑霞八岁随父习武，十岁就将形意拳里的五形、十二形练得精熟。十六岁时参加河间武术比赛，夺得银樽。后随父到保

定又拜在刘为祥门下学习散打，技艺猛增，多次比试，从未败下阵来。这年的阴历十一月十九，杨福山携女专程来到北平。杨剑霞时年二十整，头梳大辫，身背宝剑，凛凛然有侠女之风，她这次跟来就是要出马为中华扬眉吐气的。

杨氏父女抵京后，径到西四南边路东的旧礼王府华北国术研究会所在地，找到马礼堂。马礼堂当晚在龙泉居设宴为他们父女洗尘，应邀的陪客都是京城武林名家，有形意拳名师尚云祥、交通大学武术教授刘彩臣、北京大学武术教授恒泰山、清华大学武术教授李剑秋、中国大学武术教授刘文海等。席间，马礼堂读了麦加罗夫在报纸上的声明，又介绍了他的傲慢气焰和表演项目，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共商对策。突然，杨剑霞猛地站起，慷慨陈词：“宰鸡焉用牛刀？晚辈不才，学艺不精，但有众多前辈做后盾，为保住中华武林声誉，小女愿前往迎战！”她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当晚，大家就拟定了“战书”，即杨剑霞致麦加罗夫函，并派专人送到中央饭店石金手上。

翌日，《觉今日报》以显著位置，特号铅字登载“战书”如下：

麦先生大鉴：

昨阅报载，先生自负天下无敌，谅无真实本领，决不敢如此之夸。霞虽一弱女子，愿与先生一较身手，藉资历练。如肯赐教，请示地点日期，至为盼荷。

此致麦加罗夫先生。

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该报记者的访问记。大字标题“女英雄函请一战”，标题上面写“难为了大力士”，下面写“杨剑霞由河间到平，

比赛后即在平传技”。

麦加罗夫读罢“战书”和访问记，不禁惊慌失措，倒吸一口凉气，便派出秘书探听杨剑霞底细。正巧二十日这天，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做东在同和居饭庄宴请杨福山父女，作陪者有二十多人。宴罢，众人回到西斜街北平国术馆，有人提议要看看杨剑霞的功夫。许馆长便与杨福山商量，杨福山笑道：“好啊，正好在诸前辈面前领教！”

杨剑霞先是演练了一趟八极拳，接着又演练一趟五虎断门枪，目的是舒展一下腰腿。众人皆知杨福山练的是形意门，所以有人提议看看杨剑霞的形意拳。杨老先生说：“单是练练五形、十二形的套路，没多大看头，还是让她练练燕形的功夫吧！”

这燕形的功夫是什么样呢？大家一时不解。杨福山在许禹生耳边咕哝了几句，许禹生随即派人出去，没多时搬来十二条长凳，并排摆成一米左右的等距。杨剑霞旋即拉开架子，霍然真似一只灵燕，匍匐身体从第一条长凳下钻过，未容停歇，旋又蹿起，从第二条长凳上跃过，接下去，一钻一跃，如此往复，一口气通过了十二条长凳。练毕，文静泰然，面不红，气不喘，场外立刻爆发出一阵长时间的掌声。

杨剑霞不愧是门里出身，功底扎实，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交起手来又如何呢？有人窃窃私议，这话传到了许禹生耳中，许禹生又找杨福山商量可否切磋技艺，杨老先生满口应承：“都是自己人，玩玩有啥不可呢？”回过头来，又叮嘱女儿：“只露‘二龙吐须’一招即可！”杨剑霞默默点头。

许禹生一听“二龙吐须”，知道这是形意拳龙形中很厉害的一招，是用中指和食指直取对方双眼的。如果真取，这是切磋，那还了得？如果不真取，又何以体现杨剑霞的真功夫呢？这一下难坏了这位武术名家，思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妙法：交手前，请杨剑霞中、食指先

蘸上墨，交手中，趁墨未干，如能点上对方的眉宇间，自然就能说明可直取对方的双眼了。座中有绰号“谢快手”者，愿一试。经两较，每较皆中，只好抱拳认输。另有许某不解：平素谢某以快手称雄，怎么在杨剑霞面前就显得慢了呢？也想一试，结果数次都被杨剑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中，这才表示服气了。

未料，此次演练被麦氏秘书探得。麦氏闻言，摸摸双眼，不由得全身战栗。想来想去只好拜请许禹生出面，表示愿登报公开声明服输，并付五百元大洋补偿费作结。

“神拳大龙”蔡龙云

蔡龙云是我国著名的技击家、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他1929年生于山东济宁，出身于武术世家，是著名武术家蔡桂勤的儿子。

济宁地近梁山，盛习武之风，多义士侠客。蔡家历代好武，家传武艺享有盛誉。蔡桂勤武艺高强，他的拳出手敏捷如电，力似千钧，打遍山东，未逢敌手，人称“拳魔”。蔡桂勤十八岁时应招到苏州锦源镖局效力，曾屡次到强盗出没的西北一带走镖，从未出过差错。蔡龙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跟随父亲学武习艺的。

近代以来，洋人看不起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的武术。他们耻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那些搞武术的人是“走江湖”、“耍拳头”的，“中国武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西洋拳击界的一伙人曾多次向中国武术界进行挑战，试图比个高低。1943年12月，西洋拳击界又提出要与中国武术界进行对抗赛。这一挑战，激怒了整个上海武术界，以著名武术家王子平、蔡桂勤等为首的武林前辈，为了给中华民族争气，毅然决定应战，并选出八名选手和他们决一胜负。

在这八名选手中，年龄最小的是蔡龙云，当时他刚满十四岁。蔡龙云四岁时便跟随父亲习武，受着严格的家教和训练。他练起“迎面三腿”、左右腿，常常一练就是一百次，一口气踢三百腿，马步桩一站就是半个小时。由于他好学勤练，功底扎实深厚，练得了一身好武艺。后来，蔡龙云来到上海，广拜名师，又学会了少林、形意、八卦各种套路。当然，他最拿手的还是祖传的华拳。华拳是唐代流传下来的古

老拳种。蔡龙云操练的一套华拳，讲究动迅静定，式正招圆，心动形随，意发神传。十二套拳路，具有刚猛、飘逸、挺拔、俊美的风格。一位武术老前辈曾这样称赞蔡龙云的华拳：“动如奔獭，静如潜鱼，进如风雨，退若山岳。”

听说要与外国人打擂，压抑在蔡龙云心头的激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激动地对父亲说：“让我参加吧！”父亲回答：“你的年龄还小，等长大了再说，仗有你打的。”“不，咱得为中华民族争这口气！”蔡龙云斩钉截铁地说。

1943年12月8日，上海各报纸发出这样一条消息：“国术亦为世人所重，唯中西同冶一炉，则殊属空前之创举。13日晚8点在回力球场国术与西洋拳举行对抗赛。”消息一发出，顿时轰动了整个上海。五十、七十、一百、一百五十元四种价格的门票一抢而空。看热闹的、助威的，把一个三千多人的回力球场挤得满满当当。

经过抽签，蔡龙云的对手是西洋拳击界名手、俄籍拳师马索洛夫。马索洛夫年约三十，体格魁梧，技术全面。当他步入赛台，那傲慢的神情，使得不少观众为蔡龙云捏了一把冷汗：“这么小的孩子能对付得过这么个大个子吗？”而蔡龙云面对强手，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牢牢记住父亲在比赛之前对他讲的话：“为了咱中国人的尊严，要灵活多变，沉着应战，一定得把洋人打败。”

当地一声，锣声响了，马索洛夫晃着那高大的身材像猛虎一样向蔡龙云扑来。蔡龙云为了试探对方的实力，有意露出破绽。马索洛夫用直拳连续猛击蔡龙云的脸部，机智灵活的蔡龙云一面左躲右闪，一面注意观察对方的拳路。抓住对方的破绽后，他用少林拳的“连环”手法和华拳的“迎面三腿”向对方反击。他长短拳法兼用，上下连环兼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刚柔相济，变幻莫测。“迎面三腿”用得最为精妙，使对方防不胜防，马索洛夫的头部不时地受到重击。在蔡龙云的连续重击下，马索洛夫难以招架，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在地，上

场时的那股傲慢劲儿已无影无踪。这时，蔡龙云抓住有利时机，步步逼近，乘胜追击。不到五分钟，刚打了两个半回合，马索洛夫已被打倒十三次。第三个回合即将结束时，马索洛夫孤注一掷，倾尽全力，猛然突击，朝蔡龙云脑门狠狠挥出一拳。蔡龙云早有准备，一个下蹲，避开拳锋，尔后看准破绽，乘隙飞起一脚，正中对方腹部。只听得“啊”一声，马索洛夫高大的身躯晃了两晃，倒了下去。“……七、八、九、十！”裁判员数到十秒，马索洛夫躺在地上仍无反应，蔡龙云获得了胜利。回力球场内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比赛全部结束后，《新闻日报》以“中西拳击对抗，中华队获大胜”为标题，发布了“中国队以五胜二负一和获得大胜”的消息。

中国代表队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他们使中国武术界扬眉吐气。因蔡龙云的小名叫“大龙”，故被武术界誉为“神拳大龙”。

可是，战败了的马索洛夫并不甘心，他四处扬言，我们西洋拳击是用拳不用腿的。他向蔡龙云挑衅：“不用腿你敢打吗？”蔡龙云坚定地回答：“敢！”三年之后，马索洛夫挑动美国重量级拳手鲁塞尔（黑人）与蔡龙云打擂。三年来蔡龙云从未停练，技术上更加娴熟。经过较量，他用中国华拳、少林中的拳法，又战胜了鲁塞尔，再次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威力。他的武功技艺威震上海十里洋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在赠给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少林拳击世莫当，动迅静定力蕴藏，蔡君得之制强梁；柔非终柔刚需刚，刚者先折柔转强，妙门洞辟唯东方；技与道合乃有此，一洗东亚病夫耻。

大盗“燕子李三”

北京早年的富户，一提起燕子李三，便谈虎色变——这个极善蹿房越脊的飞贼专窃豪门富户，来无踪去无影，防不胜防，就连侦缉队亦对其束手无策。故此，这位梁上君子颇有些传奇色彩，迄今仍未被人们遗忘，甚至成了文艺作品中的“侠客”。

“燕子李三”原名李景华，原籍涿州，幼年随叔父落户沧州，替人放牛兼做短工。沧州自古乃武术之乡，李三遂投师学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软硬功夫。不满二十岁那年，他随沧州走江湖的杂技班赴河南洛阳卖艺。古都的市井繁华与经济繁荣，使他大开眼界并油然而生邪念。李三后因在杂技班住所鼠窃狗盗而被主开除，自此蹀躞洛阳街头，专靠偷盗糊口度日。

“燕子李三”偷盗有两个特点，一是专偷豪门富户，二是作案后总要留点痕迹，为被盗户的仆人开脱。因此社会上就流传着他是个“侠盗”的说法。其实，他偷的大部分是金银首饰贵重物品，偷到的东西也给过穷人一些，但绝大部分被他吃喝嫖赌挥霍掉了，送给穷人的也不过是便宜处理，并不是什么专门劫富济贫的侠义之举。当然，也不能说他对穷人没有怜悯之心。

1927年前后，身轻如燕的李三往来于京汉铁路线，在河南、河北等地频频作案。出身微贱且又饱受穷困折磨的李三，一向对军阀富豪恨之入骨，于是在河南行窃的第一目标便是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的府第。白氏怒不可遏，下令逮捕李三，却似大海捞针。殊不知李三得手后旋即化名匿伏嵩山少林寺，与和尚结缘，并切磋武艺，进而学会“缩

骨法”。

少林绝学使得李三如虎添翼，益发胆大包天，他索性潜入京城大肆行窃。李三有一双闪光的“夜眼”，并身怀“蝎子爬”的绝技，头朝下将身体紧贴墙壁，弹指间即可爬上房顶。他在京城作案的目标不是富商大贾就是军政要人，府第警备极其森严的段祺瑞（住吉兆胡同）、国务总理潘复（住毛家湾），以及张宗昌、褚玉璞等叱咤风云者的宅第，无不遭“燕子李三”的光顾。这成为当时大小报纸的头条新闻。久在江边站，总有湿鞋时。侦缉队队长林宴宾绞尽脑汁布下天罗地网，曾七次捕获李三，均被其使用缩骨法脱落脚镣逃之夭夭。这位李三之传奇色彩愈加浓厚。

1934年春，李三又被捕，警方改弦更张，将其送至感化所。该所巡官史海山宽厚以待李三，供其酒肉，且免其劳役，又与他结为盟兄弟。这李三非但没有被感化痛改前非，反倒勾结史海山，在他的庇护下继续作案，二人坐地分赃。是年8月某夜，李三潜入西单牌楼二条丽华绸缎庄经理潘国英宅内行窃，所获颇丰。潘家有钱有势，立即报案并通知有关店铺协助查访。不久，史海山将李三所送潘宅之毛背心拿去洗染，染房收衣服时细问明来人姓名及住址，而后报告潘宅。侦缉队当日即将史海山等接受赃物者一并抓至前门外鹞儿胡同警厅严加审讯。李三得知后，前往警厅房顶偷听，不料被侦缉队团团包围，束手就擒。官方为防其再逃，割断其双脚大筋，把他关押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看守所。

北平地方法院听信原告一面之词，说李三偷盗时还用枪对潘宅仆人进行恫吓，认定李三有“强盗罪”，从重判处徒刑三十二年，并为防止他再逃，给他戴上“木狗子”。这种原始的、野蛮的刑具，在脚上戴三年，双腿就会残废走不了路。李三不服，向当时的河北高等法院上诉，由于无人肯为李三辩护，高院指定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的会长蔡礼给他担任辩护律师。蔡礼向法院提出不应以“强盗罪”判处，要求减刑并解除虐待犯人的“木狗子”。李三很感激，写了一封公开信在《实

报》发表，对蔡礼恭维一番。

但是，李三上诉还未得到最后裁决时就在看守所内患病身亡，年仅四十岁。其尸首埋于京南义地，并勒石为记，上刻“李景华墓”四字。

武林杂录

北京镖局史话

清代，北京有不少由山西人开设的票庄，专门从事银钱汇兑。遇到大笔的银款，必须用车马运往各地。那时交通不便，沿途穷乡僻壤荒山野岭中劫道者出没无常。所以从北京运往各地的银两，必须聘请武艺超群的人沿途护送，就和《水浒》中杨志押运生辰纲一样。北京镖局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专门从事押送货银工作。镖局由清初到清末逐渐形成一种专门行业。在兴建京汉铁路时，运往各国工地的工款都是委托镖局押运的。

北京的镖局大都由武林中人经营。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房舍，只凭几个人在客栈房里租赁小屋一间，挂上一个小木牌，一写某某某镖局就算开张了。这些镖局多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一带，如宣武门外的下斜街，前门外的西河沿、打磨厂，崇文门外的兴隆街等处。经营镖局的武林人士多是具有声望、交游广泛的人，凭的是名望和信用。每个镖局有一个写账先生，有人送来货物或银两，写账先生在账上写一笔，交某地某处查收即可。全凭信用，不打收条。一百两银子只收镖金一二钱。当年流行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没有本钱没有房，租间房子就开张。
成千成万交银两，字号全凭姓名香。

民国初时，北京有大小镖局若干，比较有名的有“八大镖局”，分别是：会友、永兴、志诚、正兴、同兴、义友、光兴、源顺，其中以

会友最为著名。

会友镖局设在前门外粮食店街南头路西，是一座车店式的院落，房子不漂亮，也不高大，临街的白墙上写有四个大黑字：会友镖局。据说它始建于清初，至1921年关闭，存在了三百多年。进入民国以后，镖局业日渐衰落，但会友镖局一度还很兴盛，除北京外，还在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设有分号。管事的、镖师与厨役等共有一千多人，仅北京也有二三百人。镖局总管事的称为“当家的”。会友总管事的叫孙一廷，外界人称“老孙四”，内部人称“孙四掌柜”。孙一廷是河北衡水人，是三皇炮锤的掌门人。这三皇炮锤是少林拳的一派，为清初一位叫穆从清的人所创，内外功皆俱，拳势威猛，打起来呼呼生风，出手既快又重。

会友镖局承揽的业务，一是为客商护送货物，二是为钱庄和其他客商代办远途银钱汇兑。镖局的第三项业务是为私人保镖，受雇充当私人护卫。请保镖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能请得起的主要是大商人和大官僚。会友镖局曾受李鸿章之请，派镖师为李宅守夜护院。会友镖局亦为当时的库丁充当私人保镖。所谓库丁是清政府银库里的差役，他们直接与银两打交道，人们称他们是肥差。这些人可以从库里偷拿银子，当时有一些混混儿，专抢库丁。所以库丁上下班，都得请保镖保护，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在清朝，有的当官老爷走马上任，或卸了任发了财返乡回籍，都需要保镖来保护，离开保镖寸步难行。

进入民国后，京城发生过两起大动乱，部分地区皆亏了会友镖局的保护，才得以保全，避免了损失。

一次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辫子军到处抢劫民财，商民损失惨重。大栅栏和珠宝市由于会友镖局的保护，躲过了这场兵灾浩劫。第二次是1921年1月，袁世凯密令心腹曹锟发动兵变，制造他不

能南下的理由。兵变从东城开始，大肆放火抢劫，繁华的东安市场化为灰烬，前门大街有些商店亦受很大损失。但大栅栏和珠宝市两条街由于会友镖局的保护，安然无恙。

北京镖局保镖的路线多数从北京往深州、冀州、太原、榆次、太谷以及济南、开封等地。保镖有“软镖”、“硬镖”之分。所谓“软镖”就是由镖局事前和沿途强人打招呼，逢年过节还要馈送礼物。“硬镖”就是凭借镖客的高强武艺制服强人。这样的保镖路线，仅有北路，即由北京至内蒙一线。保镖的人称为镖师或镖客，有的镖师名声很大。装银钱货物的车子称为镖车。每当镖车出动，车上插有镖旗，上写“某某镖局”。在夜间赶路时，遇庙逢桥必呼口号，音长而高，十几辆镖车前呼后应。一般情况下高呼“耀武扬威”，如果突然发现紧急情况，高喊“啊——喉”，也是打招呼之意。白天以镖旗为标记，夜晚以口号为记，以便平安通过险区。

保镖有行话，词虽稍欠典雅，但颇有意思，以下括弧内为行话：保镖（唱戏的），镖旗（眼），钱褡裢（蛇腰），一个人（流丁），门半掩半开（夜扇马散），松林（林子马哈武），寺庙（神堂），晴天（天高），天黑（明路），走远（卜长），走近（卜短），墙头（马），庄稼把式（上等土风子），护院人（镇山虎），贼（芒古），人胆大（点粗），胆小（点细），心眼多（全海），火药（夫子），洋枪（黑驴），有钱（海拉），无钱（念拉），等等。

燕赵多豪侠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名句。从实际情况看，韩昌黎此言不虚。

今之河北，为古代燕国、赵国的疆土，尚武之风代代相传。远的且不说，就从近百年来看，出现了不少武术名师高手。俗云“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八极拳，就是浙江少林寺魁元僧云游至河北沧州后，授给孟村吴钟才传播开来的。天理教农民军领袖冯克善大师隐于饶阳、蠡县，用二十余年时间创编出北腿代表性武术——“戳脚”，其重要传人段老绪是河北饶阳人，刘观澜、刘俊杰、刘景山是河北蠡县人。以闪战、翻转和鹰爪为特点的“鹰爪翻子拳”，是“中国拳王”、河北雄县的陈子正在其师刘成友指导下创编成功的。另外，被武林尊称为“臂圣”的张策是河北安次人。

清末镖行因崇拜沧州六合拳名家李冠铭，而立规“镖不喊沧州”。武林称颂的“赛胜英”陈善、“双锏李”李凤岗、“郭燕子”郭长生、“神枪”李书文、“神弹子”李五、“大枪”刘德宽、大刀王五、“神力千斤王”王子平等，都是河北沧州人。

武术界称赞的“单刀李”实有二人，或说李存义，或说李彩亭，他们都是河北人。形意拳名家李洛能、郭云深、刘奇兰、王芗斋都是河北深县人，张占魁是河北河间人，张树德是河北安国人，八卦掌祖师董海川是河北文安县人，八盘掌重要传人“杆子李”李振清是河北霸县人。河南温泉陈家沟的陈氏太极拳传河北永年县杨露蝉后，杨氏太极拳又传播中外。清末诗人杨敞曾感慨道：“谁知豫北陈家技，却赖冀南

杨氏传。”此外，由杨氏太极拳派生出来的武式、孙式、吴式、李式等太极拳，其重要传人杨澄甫、武禹襄、李亦畬、郝为真、李瑞东、孙禄堂等都是河北人。

河北一些拳师在推动全国武术运动发展中也作出过卓越贡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南京中央国术馆任教的河北沧州拳师就有三十多人。馆长张之江、副馆长李景林、少林门长王子平、武当门长高振东、编审处长姜容樵、太极拳教授杨澄甫、形意拳教授孙禄堂等，都是河北人。

创建天津中华武士会的张兆东、李存义，创建天津武德会的李瑞东，创建天津第八国术馆的翟树珍，创建北京武术协会的马兴义，曾在早期黄埔军校任武术教官的刘书云等，也都是河北人。

河北武师不但众多，而且保持并发扬了燕赵古地的豪侠遗风，许多著名拳家谱写了一篇篇扬国威的新曲。

1676年，两个俄国人在京摆擂。河北沧州孟村拳师丁发祥闻讯连夜赴京，揭“皇榜”上擂，力劈“大牯牛”，吓死“二牯牛”，名噪京都，皇帝亲自授奖。1902年欧人康斯顿在上海摆擂，沧州武术家王子平到沪应战。康斯顿听说王子平在上海旅馆高楼栏杆上表演倒立的消息后，当夜逃走了。次年王子平又击败摆擂的美人沙利文、英人乔治和法人彼得。国画大师齐白石欣然写下了“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的对联赠送王子平。

1922年，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到沪，参加德、英两国武师联合举办的国际拳击比赛，登报狂称不与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交手。河北定兴县形意拳家“朱氏四杰”之一的朱国福适在上海，闻讯愤慨异常，决心洗雪国耻。双方签订“六个回合定胜负，打死勿论”的协议后开战，结果到第四个回合时，裴益哈伯尔就被朱国福的“穿心崩拳”击中，倒地不能站起。

原西北军的二十九军训练刀术多年，威名远震，其教官之一是河北雄县的姚建华。

燕赵之地的武林豪杰男士固然很多，而巾帼英雄也不少。1934年，白俄大力士麦加罗夫在北京中央饭店设台比武，河间著名拳师杨福山携二十岁的女儿杨剑霞专程到平。杨剑霞的绝技被麦氏密探探得后，麦氏登报声明服输，并赔偿五百大洋了事。

武健泱泱话沧州

古人有咏沧州诗：

渤海岩疆笔底收，
长荒名郡今沧州。
巍巍雄峙齐燕际，
北镇京津居上游。

这首诗说的是沧州的地理形势。沧州地濒渤海，中贯运河，是京津门户，水陆要冲，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兵灾战乱给沧州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再加上官府压迫、地主盘剥，逼得百姓不得不练武自卫。这就形成了沧州地区崇侠尚武的民风。

古沧州位于今日沧州市东南四十华里处，现在人称旧州。据说林冲就发配在这里，现在已成平川，只有一个村落。从村外野地残存的瓦砾看，瓮城痕迹依稀可辨。武林中所说的沧州，实际上是指沧州市所辖沧县、南皮、盐山、青县、孟村等一带。

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武健泱泱乎有表海之雄风”。《汉书·龚遂传》中说：龚遂担任渤海郡（沧州的前身）太守时，曾经张贴告示，令百姓“卖刀买犊，卖剑买牛”。这证明，早在先秦两汉时，沧州地区已经习武成风了。到明清时，沧州更是拳场棋布，名师辈出。《沧县志》曾记载说：“吾沧技击之风，宿著于大河之

北，白山黑水之间。”

由于自古以来沧州人民尊师重义，崇侠尚武，因此一些失意拳师、被缉剑侠、刺配军犯、溃军武士、少林寺云游和尚及逃僧，往往来沧州隐身，留传武艺。如，“闯王刀”（又称“五十三刀”）是明末李自成余部流落沧州时传授的；“青萍剑”是清末山东人杨棣园“因避难到盐山”传授的；沧州的通臂、劈挂、八极都是隐居的僧人传授的。再加上各地拳师频来沧州拜师会友，更使这里成为武林豪杰荟萃之地，故素有“小梁山”之称。

沧州武林名宿层出不穷。他们的趣闻逸事，多少年来广为人们所传颂。

沧州武术拳种丰富，门派众多。现在查到的拳法就有六合、燕青、通臂、劈挂、八极、太祖、华拳、查拳、功力、明堂、迷踪、沙脚、绵掌、翻子、二郎、弹腿、洪拳、八卦、形意、螳螂等二十二种，真是群芳争艳，异彩煜煜。器械有刀、枪、剑、戟、鞭、钺、斧、剪、棒、钩、镗、镰、镖、拐子、流星等，其中有些器械是外间少见的，如苗刀、象鼻刀以及相传是窦尔敦传下来的虎头双钩等。

太极圣地陈家沟

河南温县陈家沟是太极拳的发祥地，故有“太极圣地”之称。

陈家沟距温县县城五公里，虽说仅是个两千余人的小村庄，但太极拳史书无不记载着它的大名，太极拳爱好者无不梦想着到这里寻根问祖。

据陈氏家谱载，明朝定鼎之初，由山西泽州经洪洞迁移来此的陈姓始祖陈卜，擅长内功拳械，族内世传武功。第九世陈王廷，文武兼备，曾保镖山东。崇祯十五年（1642）任温县乡兵守备，屡挫掠城之敌。清初入文庠，后无心仕途归乡，在其祖传武术和民间武术的基础上，参研周易太极之理，兼取《黄庭》导引、吐纳之术及中医经络理论，融会阴阳开合、虚实变幻、刚柔相济、快慢相间之各种招势，演成意念、内气与外形高度统一、浑然一体的新型拳术，并创造了双人推手、双人粘枪的技击对练及由浅入深的系统练功方法。因完整地体现了太极原理，陈王廷创的这套拳遂定名为太极拳。此即陈氏太极拳的由来。

陈氏太极拳在族中累代相传，代代出名手。至十四世，有“牌位大王”之誉的陈长兴始收外姓河北永年人杨露蝉为徒。陈家沟现有杨露蝉学拳处。这里原是翰林院侍诏陈德瑚故居，为两进四合院。道光年间，陈家设武场，特聘族人陈长兴在此授拳。时杨露蝉在陈家当雇工，所居两间坯屋犹存，其余建筑因年久毁坏。后来台湾杨氏太极武艺总会师承长、杨家太极第六代传人邓时海为纪念祖师杨露蝉，慷慨解囊二十余万元按原貌重新修建了此院落。大厅中间有陈长兴白色半

身雕塑像，两侧各有金色巨型雕塑“陈长兴收杨露蝉为徒并赠《拳经》”和“杨露蝉与师兄陈耕耘对练太极拳”。南墙为《杨露蝉学拳记》连环画，北墙为陈家历代名师代表人物画像和小传。后院杨露蝉学拳处竖有画着太极图并刻有文字的纪念碑。笔者亲眼见过杨氏第四代嫡孙杨振铎和嫡传弟子傅钟文在这里举行过“五体投地”的大礼。

杨露蝉后来到京师传艺，为适应王公贝勒“益寿延年不老春”之健身要求，便把陈氏太极拳由繁变简，由快变慢，渐演进为而今的杨氏太极拳。之后传吴全佑，又演成吴氏太极拳。杨露蝉在陈家沟学拳后，河北广平人武禹襄亦慕名前来，时陈长兴老病，转荐学陈青萍，后派生出武氏太极拳。武禹襄传李亦畲，李传郝为真，郝传形意、八卦名家孙禄堂，由孙又衍生出孙氏太极拳。这就是杨、吴、武、孙诸家太极拳的来历。考其鼻祖，皆源于陈氏太极拳也。

现在陈家沟有陈氏太极拳学校，港、澳、台及内地各省皆有学员在此学拳。近年来，有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三十七批三千五百人次到这里学拳旅游。陈家沟人百分之八十都练拳，俗云：“喝喝陈沟水，都会翘翘腿。”其后起之秀甚多，成绩卓著者有十九代传人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朱天才，他们有“四大金刚”之称。

梅花拳乡在武强

冀中武强县不但是年画之乡，也是梅花拳之乡。

一百多年来，武强县一些村庄的农民坚持打梅花拳，练梅花枪、梅花刀、梅花棍。每年正月十五日以后，习练者云集，表演各种徒手和器械，算得上是梅花拳门的技艺大展演。

梅花拳的起源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明崇祯年间，拳师邹宏义集各派之长，潜心锤炼，创出了闪、展、腾、挪、跃、滚、翻、打别具一格的拳术。比拳术内外功兼修，刚柔并济。因其桩步五势宛如梅花开放，行步三法犹如梅花枝干相连，故起名梅花拳。后来，邹宏义及儿子邹文聚在平乡定居，开场传艺，广收弟子，将梅花拳传遍冀、鲁、豫三省。

据《武强县志》载，梅花拳由平乡传入威县，1844年之后，由威县翟家庄李廷玉、李廷桂兄弟二人将梅花拳传到武强。李氏兄弟为梅花拳第十三代传人，天资聪颖，武艺高强。后来兄弟俩率众焚烧外国传教士的教堂。因清政府缉拿，李廷玉逃至武强大王庄，靠给人打短工栖身，李廷桂被捕入狱。李廷玉在大王庄收徒弟一百多人，传梅花拳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二十名徒弟功夫有成，各擅所长，号称“京南二十大侠”。李廷玉出狱后，也到武强教拳，和其兄教二十大弟子内功三年，方回原籍。

在二十大弟子的带动下，武强县二十八个村设了拳场，还影响到深州、饶阳等临县的村庄。深州院头村的韩其昌，十二岁开始练初级

拳，后练形意拳，二十岁在深州已有名气。因和梅花拳十五代弟子比武受挫，特拜武强赵英连为师，苦学梅花拳，造诣很深。他在杭州“国术”竞技中获银樽奖，曾参加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韩其昌九十余岁在北京无疾而终，生前任北京大学武术教练、北京梅花拳研究会会长。其子韩建中现为北京武警大学的总教练。

1934年4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持立擂台，号召天下武林高手登台比武。擂台设在济南市千佛山下运动场中央，九丈见方，高九尺。武强梅花拳派出参加打擂的有李万兴、尹桂芳等八人，最后李万兴获第一，尹桂芳名列第二，每人获宝剑一把，银樽一个。

山东打擂之后，梅花拳在武强声势大振，练习的人员越来越多。据说，如今梅花拳在武强已发展到第十六代、十七代，参加者上千人，已专门成立了武强县梅花拳协会。

漫话吴兴拳船

吴兴拳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吴兴民间传统的水戏，起源于越王勾践操习水战。从那时起，拳船活动就在吴兴四乡八镇，以至杭、嘉、湖水网地带盛行，并历代相传，沿袭至今。

吴兴拳船是用两条农船拼扎而成。船头用跳板铺设拳台，约一丈见方，供武士打拳踢腿，舞枪弄棍。船舱挑扎彩楼，上扎“鱼跃龙门”，左右“二龙戏珠”，船身遍插彩旗，顶端竖有××村（镇）武术团的牙边标旗。标旗下太师椅分置两旁，两员骁将各执竹篙，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以防拳船在行进中搁浅或与兄弟船只碰撞。中舱挂有布幔门帘，一副对联引人注目，上联是“拳打南山猛虎”，下联是“脚踢北海蛟龙”。拳台左右置武架，刀、枪、剑、戟，长短兵器安置有序。船上刀光剑影，十分威严，又称“水上擂台”。行拳时，船舱内有鼓乐手吹吹打打，为武士助威。船艄上两只大橹协力行驶，行至村、镇，便开拳献技，岸上群众竞相观看，不时为精彩表演热烈鼓掌。

吴兴拳船表演的拳术自成一派。它以南派少林为主，似南拳，而非南拳。其风格特点是：刚劲遒健，神形合一，步稳势烈，闪躲灵活；进攻时出招敏捷，收招迅速；防御时以守为主，似开似闭，以身为轴，原地转动。据笔者当年所见，吴兴拳船演练时，通常以“五虎拳”揭开序幕，套路甚多，有“燕青拳”、“六合拳”、“小洪拳”、“大洪拳”、“武松独臂拳”、“梅花拳”、“罗汉拳”、“天罡拳”、“地煞拳”、“醉打山门拳”等；器械套路有四门棍、六合刀、梅花枪、单剑、双剑、九节鞭、流星锤等；对练有“单刀杀枪”、“烂刀杀盾牌”、“棍进三节

棍”、“空手夺四枪”等。

当时拳船活动往往与庙会联系在一起，在长期的民间活动中，自然形成了各地拳船献技比武的日期与地点。寒食节、清明节大多汇集在吴兴、德清、桐乡三县交界处的含山头，拳船达百艘之多。表演精彩的拳船，当地群众奖以糕点、果品。在长期的拳船活动中，各地拳船常常把兄弟拳种的优点融入自己的套路中，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有的拳船以拳见长，有的拳船以掌为主，有的拳船则以器械著称。

据说，吴兴民间拳船活动曾一度沉寂，近年又逐渐活跃起来。

闽南国术团

现在，中国武术团出国访问已经司空见惯。据笔者记忆，中国武术团最早出国献技的，当推1929年赴南洋表演的“闽南国术团”。

闽南永春一带，自清代康乾以来，盛行白鹤拳。白鹤拳内容丰富，拳势朴素明朗，为福建七大拳种之一。1928年，永春潘世讽等七人，参加首届国术考试，获得优胜，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赠以“国术超群”金牌，以资嘉奖。同年冬，根据张之江、朱渊源建议，永春成立“中央国术馆永春分馆”，潘世讽、潘孝德先后出任馆长。

翌年8月，应陈嘉庚先生之邀，永春分馆组成二十八人之“闽南国术团”，以潘世讽为主任，于10月赴南洋巡回表演。表演项目有舞狮、闹狮、徒手、器械及对练等，深受海外侨胞欢迎。此次出国访问，陈嘉庚先生积极倡导，不仅资助经费、赠送全套武术器械及道具，还要求他们穿太平军服饰表演，以弘扬民族精神。

陈嘉庚先生对国术团关怀备至，多次接见并与他们合影。还曾作联二副，一曰“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威武维扬”；一曰“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肉，相率中原豪杰为国干城”。

闽南国术团在南洋表演历时近一年，表演收入的一半作为该团经费，一半捐赠给当地侨团和学校。闽南国术团第二年中秋载誉归国时，部分拳师应海外侨胞请求，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设立国术馆，传武授艺。这使永春白鹤拳风行于东南亚各地。

潘世讽、苏显忠等归国后，应陈嘉庚先生之聘，先后在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担任武术教练。

此次中国武术家出国献技，使古老的民族瑰宝成为联结海内外同胞之纽带，亦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之开端，在中国现代武术史上是应有其位置的。

文武兼备谭嗣同

近读梁任公先生的《谭嗣同传》，读到谭“好任侠，善剑术”处，颇有感慨。笔者早年居京华时，离谭嗣同被砍头的菜市口不远，听年长人谈了不少关于他的轶闻，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仰。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他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受王夫之《船山遗书》影响颇深，少年时即有强烈之民族意识，不但学兼中外，且对技击、剑术、骑术等均有浓厚的兴趣。

在政治思想上，谭嗣同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而在武术上则以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名致廷）为师。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在北京期间，住在浏阳会馆，据说胡七常与他见面。谭嗣同向胡学习锏、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胡七认为，双刀不及单刀实用：第一，单刀易学易精；第二，单刀用处比双刀多；第三，单刀便于携带。谭嗣同深以为然。但单刀非胡七之所长，于是他将“义侠”王五介绍给谭嗣同。从此，谭嗣同便“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许”，二人交从甚密。谭嗣同曾对王五云：“处夷四侵，国事日非，好男儿当以这三尺青锋杀出一条新路！”王五也慷慨陈词曰：“有用我处，当誓死报效！”

谭嗣同不独对武术很有兴趣，且对武学有相当的研究，他曾写过《剑经衍葛》一卷。此书可能因“戊戌政变”而散失，至今尚未被发现，殊为可惜。在谭嗣同文集中，关于武术方面文字并不多见，只有《单刀铭并叙》，文中有两句：

单刀神者葛稚川[1]，谭复后以千有年。

此外，谭嗣同还作有《双剑铭》：

横绝太空，高使天穹，矧伊崆峒。
蕤宾之铁，蚁鼻有烈，服之有截。

已故戏剧家欧阳予倩之祖父是谭嗣同的老师，据他讲，幼时“曾见他（指谭）蹲在地上，叫两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人都跌一跤。”看来谭嗣同的确武功非浅，身手不凡。

---

[1] 葛稚川，即东晋炼丹家葛洪。

华侨豪侠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志士，而且是一名出色的武林英豪。他所领导的“美洲中国致公党”以爱国美名名扬海外，载誉华侨界。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县一个贫苦家庭。司徒美堂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常受人欺侮，因此，他自幼立志习武，以抵外侮。十四岁时，司徒美堂远涉重洋，到了美国。由于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华侨备遭蹂躏，他毅然加入了推翻清王朝的华侨组织——洪门致公堂。入洪门后，他习武练功更是寒暑不辍，终于练得了一身好功夫。

他初到旧金山时在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子。当时美国流氓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华侨身居异乡，势单力薄，屡受欺凌而不敢反抗。但是，司徒美堂“孔武有力，打抱不平，手持一刀或一棍，十数人莫能近”，常常三脚两拳将流氓打翻在地或扔到街上。1888年，司徒美堂年方二十，血气方刚，一怒之下失手将一流氓打死，几乎被判绞刑。幸亏洪门人士多方营救，才幸免于难。

1894年冬，司徒美堂又组织“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武林壮士成立了“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深得华侨赞誉，故洪门弟子威震美洲。

1904年，孙中山先生抵美进行革命活动，在波士顿会见了司徒美堂。司徒美堂一面给孙中山先生当厨师，一面担任保卫工作。他聆听

了孙先生的教诲，将洪门组织逐渐改组为革命团体，给孙先生以人力物力上的支援。著名爱国人士蔡廷锴、杨虎城、陶行知、冯玉祥到美国后，司徒美堂也总是设法予以照顾和警卫，以免发生不测。中华武术威震海外，洪门组织影响日益广泛。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在未当总统之前，曾任安良堂法律顾问二十年。

1941年冬，司徒美堂自美返港。日本特务矢崎威胁利诱，要他任香港地方维持会会长，遭坚决拒绝。司徒美堂化装脱险离港时，已七十五岁高龄，由于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练功，身板硬朗，他手持拐杖，步行三百里辗转到达重庆。

司徒美堂1955年5月8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九岁。先生爱国至诚，民族气节高尚，不愧为众华侨及吾辈之楷模。

尚武将军杨虎城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喜爱武术，武艺高强。笔者曾与杨将军之秘书长武志平及武术教官陶志禄交谈，承告若干详情。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虎城的父亲以谋反罪被清政府处以绞刑，杨虎城立志要报杀父之仇。这年中秋，他联络家乡陕西蒲城的一些穷苦兄弟成立“中秋会”，晚上大家聚集一起，习拳舞刀，切磋武艺。杨虎城练武最刻苦，力气也大。为了练轻功，他打了一对“铁瓦”，整天绑在两条小腿上。在辛亥革命前夕，中秋会已有会众数百人。武昌起义后，杨虎城即率会众参加革命军。由于中秋会弟兄身体强壮，人人会武，屡败清军，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篡夺后，杨虎城愤然离开部队回乡谋生，并重新组织中秋会，习武练功。他们打了一批“关公刀”，组织起大刀队，操练劈杀技艺和防御本领。有一次，他们侦察到澄县县城的一批税款要经蒲城解往西安。杨虎城便率大刀队员埋伏在路旁，趁夜出击，劫走了税款。大刀队用此款购置了武器。不久，队伍向同州、朝邑、邵阳转移，走上了武装抗暴的道路。

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虎城率抗暴武装加入陕西讨袁“护国军”。由于杨虎城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第二年即升任营长，第三年升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司令，以后历任师长、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前，他已是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杨将军在军事训练中一贯重视体育锻炼和武术训练，经常利用作

战间隙开展长跑、单杠、双杠、木马、跳高、跳远及球类活动。1933年，他聘请著名拳师陶志禄担任教导营武术教官。陶正当而立之年，身怀绝技，对陕西地方拳种极有研究，且酷爱足球。他任职后兢兢业业，每天早上和下午对士兵进行武术及劈刀训练。杨虎城见士兵们练武刻苦，高兴地说：“这样练下去，我们的弟兄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何愁不打胜仗！”他还常常现身说法，示范劈刀招式。为了检阅训练效果，这年秋天，杨虎城在新城演兵场举行了盛大的体育运动会，项目除田径、足球外，还特设了武术及团体操表演。他身穿军礼服，雄赳赳地踏着鼓点步入会场，还亲自到场地为运动员们加油鼓劲。

1937年，杨虎城出国考察，临行前将自己佩带的单剑赠给武术教官陶志禄。

龙云打翻法国拳师

龙云是滇军重要高级将领，在云南主政十八年，是我国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武术家，1914年，他曾登上擂台打翻了不可一世的法国拳师。

龙云，字志舟，彝族人，1884年11月19日生于云南昭通炎山。他父亲纳吉瓦蒂，原是四川凉山的彝族奴隶主。龙云幼年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他曾流浪于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的金沙江两岸地区。后来，龙云遇到江湖术士马德胜，遂拜他为师学艺。龙云勤学苦练，一丝不苟，学得了一身好拳法。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云南响应起义，龙云积极参加。在魏焕章的带领下，他与卢汉、邹若衡等人一起投入滇军谢汝冀梯团，被委为候差员，随部队入川支援川军。回滇后，龙云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国家政权，中国依然处在外侮内患的多事之秋。龙云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准备报效祖国。

1914年秋，有个法国拳师到了昆明，自称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力士，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比武三天，扬言“有谁打败我，我就不在昆明立脚，无人打败我，昆明就是我的武术天下”，气焰十分嚣张，大有独霸春城武坛之势。第一天无人打败他，第二天仍无人打败他，他得意扬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第三天，正在讲武堂学习的龙云，穿着一双草鞋，大大方方地走上擂台。龙云观看了前两天的比武，总结了经验，决心以智勇取胜。法国拳师连胜两天，傲气十足，

没把龙云放在眼里。只见龙云漫不经心地把脚一提，草鞋闪电般地从法国拳师头上飞过。法国拳师尚未反应过来，龙云已飞身向前，拳打脚踢，虚实并举。法国拳师颇感意外，仓促应战。龙云攻击迅猛有力，法国拳师被动招架，频频挨打。龙云乘势采用“和尚撞钟”之式，双拳和头一齐向法国拳师撞去，将人高马大的法国拳师撞翻在地。法国拳师像肥猪一样躺在地上，尚未缓过劲来，龙云又一个“饿虎扑食”，将其死死地压住。法国拳师挣扎不动，只得低头认输。第二天卷起行李，灰溜溜地离开了昆明。

龙云出奇制胜地打翻法国拳师，轰动了昆明，人人拍手称快。一时间，龙云成了昆明的新闻人物。是年底，龙云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分配到昭通独立营任中尉排长。次年底，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向四川进军前，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副官邹若衡为副官，邹若衡又把龙云推荐给唐继尧。唐继尧听说是打败法国拳师的龙云继任他的随从副官，十分高兴。这是龙云跟随唐继尧发迹的起点。

周恩来的武术教师韩慕侠

1916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曾向著名拳师韩慕侠拜师习武。

韩慕侠又名金镛，自幼酷爱练武，只要听说哪里有好拳师，就不顾山高路远前去拜访。他到过很多名山古刹，其中在西岳华山学艺时间最长。应文天、张占魁等几位著名拳师都教过他武功。他谙熟多种武术套路和器械，其中尤以形意、八卦见长。为了弘扬武术、强国强民，他于1912年在天津创办武术馆。他授徒甚众，名声很大。1916年，南开中学增设武术课，韩慕侠被特聘为武术教师。

在学生中，韩慕侠发现一位身穿蓝布大褂，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长得很英俊的学生。这名学生平时彬彬有礼，练起功来格外认真、刻苦，领会快，模仿能力又强，进步超出常人，韩慕侠不禁格外喜爱他。这个学生，就是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这年十八岁，借住在天津的伯父家中。当时的南开中学是私立学校，学费较高，开始学杂费由伯父供给，后来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学杂费渐由学校的奖学金代替。血气方刚的周恩来志向高远，深知体育健身的重要性，平日除去学习奋进以外，课余对篮球（当时叫筐球）、网球（当时叫挖力球）、跑、跳都非常喜欢。

韩慕侠的侠肝义胆，武艺精深，周恩来早有耳闻。而且还听说，有一次韩慕侠去看戏，见依仗军阀主子权势而横行霸道的恶奴在大庭广众之下欺侮一位看戏的妇女，盛怒之下，他双手一提将恶奴扔到了

戏台上。周恩来对他这种主持正义、敢抱打不平的精神深感敬佩。只是无缘相识，这次正好学校请他来，一接触，果然名不虚传，与自己很投缘。于是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韩慕侠不但在学校特别指点周恩来，而且还请他到自己的武术馆中去学习。

韩慕侠的武术馆有两个一式三间的练功房，里面摆着刀、枪、剑、戟等器械和各种不同型号的沙袋，周恩来每天放了学便跑到练功房来练功。韩家藏有一口宝刀，据说是清代名将僧格林沁用过的，韩慕侠视为珍宝，轻易不肯让人碰一碰，但特准周恩来练武使用。周恩来每天练过套路后，为了长臂力，他还双手交替击沙袋，一击就是上百下；为了脚底下生根，他还练站桩，虽然枯燥，每次都做得很认真，常常大汗淋漓，直到老师说该休息了，才停下来。在韩慕侠的精心指导下，周恩来的八卦掌练得相当出色，从手法、步法到身法有板有眼，恰到好处。韩慕侠逢人便夸："翔宇（周恩来的字）如能长期练下去，定能出类拔萃！"

周恩来在馆中习罢武，晚上没事的时候，韩慕侠就留下他吃晚饭，畅谈。从武术基本功的训练，谈到健身防身；从武术的起源，谈到民族气节；从办武术馆，谈到当前政局，进而又谈到国家的前途，等等，一谈就谈到深夜。韩慕侠认为，要富国则必须强兵，并列举了抗辽名将杨业，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抗倭名将戚继光，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这些深明大义，武艺高强，救国于危难、救民于灾祸，不惜牺牲自我的民族英雄，然后感慨道："我一定要为中华培养一批武备人才，哪怕碧血神州，在所不惜！"周恩来对老师这种炽烈的爱国热忱深表敬佩。

韩慕侠对周恩来善于动脑筋，为拯救中华而不断探讨真理的精神，也由衷佩服。他曾向人说："翔宇年小志高，心怀天下，深思熟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教我怎样做人！"由此不难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超出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早已成为忘年知己了。

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还特意为韩慕侠的武馆题写过“武术专馆”的匾额。

孙中山先生的女保镖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于11月2日乘“地湾夏号”邮轮从新加坡启程绕道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上海都督陈士英率众前往欢迎。孙中山先生登陆后，陈士英的随员中有一位女子立即紧随中山先生左右，用锐利的目光扫射着四周欢迎的人群。她就是陈士英指定担任中山先生登陆后的现场保镖——浙江女英杰尹锐志。此后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日子里，凡在公开场合下，总有这位身携双枪的女保镖的矫健身影。

尹锐志是秋瑾的学生和好友，光复会会员，浙江嵊州县人。1903年革命党人在浙江嵊州县创办了爱华女学堂，从小爱习武的尹锐志即入学读书。在学校里，尹锐志受到了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熏陶，立志要推翻清王朝。当时光复会驻嵊州县的秘密机关离学校不远，有一次尹锐志看到几个行迹诡秘的陌生人在秘密机关外活动，她机警巧妙地将敌情报告给光复会，从而避免了一次险情。革命党人见尹锐志聪明机智，有革命志气，虽然她当时只有十三岁，仍破格吸收她加入光复会。尹锐志成为了光复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

第二年，因革命需要，尹锐志带着九岁的妹妹尹维俊来到上海，在光复会一所秘密机关做通信联络工作。由于二人机智勇敢，工作中没有出过一次差错。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陶成章、陈伯平等人组建了“锐进学社”，表面上这是个小型的民间文化机构，实则为光复会的总机关，是联络江浙各地会党的枢纽。而这里的日常工作就是由年幼的尹氏姐妹担任。就是在这里，尹锐志和秋瑾建立了深厚的

友情。

1907年7月，光复会准备发动皖浙起义，尹锐志带着妹妹赶到嵊州县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于徐锡麟在安庆先行起义失利，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皖浙起义失败。危难中，尹锐志带着妹妹返回上海。这时清政府对革命党人加紧了剿杀，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遇到很大困难。尹锐志和妹妹穿着单薄的衣服，顶着寒风，到街上叫卖书报杂志，借此一面进行通信联络、侦察敌情，一面维持生活和接济同志。姐妹俩小小年纪，忍饥受冻，革命党人王金发的母亲很心痛，常常接济她们。

后来，尹氏姐妹学会了制造炸药，她们决心用自制的武器为秋瑾等先烈复仇。1909年姐妹俩来到北京，准备刺杀清政府权贵，以示革命党人斩不尽杀不绝。由于人地生疏，清政府防范极严，姐妹俩终未得手。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光复会负责人李燮把指挥部设在“锐进学社”，姐妹俩负责递送情报。筹集物款、联络同志，工作十分繁忙。

尹锐志负责联络沪军，尹维俊奔走于杭州、上海之间，联络朱瑞、吕公望等人，准备起义。后来姊妹俩又争先参加了蒋公率领的浙江光复军敢死队。1911年11月4日夜，姐妹俩带领一支敢死队攻打杭州抚台衙门。她俩用炸弹将抚台衙门炸开一个缺口，带人冲进衙门。经过激战，浙江巡抚增韫被活捉。杭州光复后，11月下旬，尹锐志又率领敢死队奔赴南京，助战江宁。

在革命斗争中，在名家的指点下，尹氏姐妹学练出一身高强的武艺，精通各种拳法，枪法更精湛。尹锐志能左右手打枪，百步穿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鉴于尹锐志的英勇事迹，被嘉誉为“浙江女英雄”。

后来尹锐志嫁给了曾被日本人称为“半个军事家”的周亚卫。20世

纪30年代初期，周亚卫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训练副监，专门负责选考、培养出国留学的军事人才，向英、法、德、美等国派遣有文化的青年军官。周亚卫开设了各种外文培训班，对入选人员进行培训。当时尹锐志已五十余岁，仍好学不辍，她与丈夫均随班学习法文。她与大家一道上课，按时交作业，并常在课余与外籍教师会话，或请法语好的同学辅导，她则教他们各种拳法和如何使用双枪。这位五十开外的双枪老太婆，无半丁点儿老气，打拳使枪，身段灵活，动作迅猛。

少帅保镖高嗣斋

少帅张学良当年叱咤风云的壮举，文章、话剧、影视都有不少反映，其中提到他的贴身保镖高嗣斋的，却不多。

高嗣斋系河北省沧州人，自幼父母双亡，生活无着，投奔舅父门下。舅父乃武林高手，授徒极严，每日练功之后，要求在土筐里蜷缩着睡觉。据说，练功之人为防止伸懒腰走功、散功，才想出这等妙法。舅父除去教高嗣斋拳术和刀、枪、剑、棍之外，更多的是教练内功。其中，最难也是最精到的功夫就是“闭口箭”。所谓“闭口箭”，就是在运足底气之后，吃一升生绿豆，喝大量生水，将绿豆水保存于胃中，发功时，只需张口，绿豆即可“万箭齐发”杀伤敌手。高嗣斋凭借此技在二十二岁时就名噪武林。

当时张学良的保镖是武师许志凡，徒弟中有的功夫长进了便想谋他的位置，于是他特地到沧州邀请高嗣斋一起做张学良的保镖。高嗣斋欣然前往，但是许的徒弟心中不服，待过招连连被击败后才服输。高嗣斋威名大震，深得张学良赏识，被任命为东北三军的武术总教官。许、高二人便成了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张学良驻军西安时，一次应邀赴宴，发现大厅里七个圆桌坐的都是军官，其中有许多人都认识。当举杯畅饮时，一位军官向张学良敬酒，高嗣斋和许志凡突然发现那人袖中藏刀，意欲行刺。说时迟，那时快，高嗣斋猛然张口发功，绿豆似子弹般射出去，只听得大厅内声声惨叫。在许志凡的掩护下，高嗣斋背起少帅夺路而逃。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举行过一次军队大比武，武林高手云集。按例，参加者必先表演一套功夫。高嗣斋表演了他的绝活戏“闭口箭”。观众看他吃下一升生绿豆，喝下二十斤生水，个个傻了眼。待他运足气，将绿豆像箭一样喷射出来，发出“嗖嗖”的声响时，全场一片欢呼。这一表演，参加比武的人设有敢与他比试者，只好选他当了比武总裁判长。

“西安事变”后，许志凡解甲回山东老家，高嗣斋在陕西关山陇县龙门洞当了道人，成为龙门派弟子。其师“邹懒王”亦武林中人，他从不动烟火，只吃生花生米、生萝卜，终日“盘息打坐”，活了一百零八岁。“邹懒王”圆寂后，高嗣斋继任道长，亦吃生食，不动烟火，其功夫大有长进。他身穿六十五斤重的道袍，一夜可行二百多里。

20世纪50年代后，高嗣斋行医济世，70年代中期去世。徒弟赵宝林多次在武术运动会中夺魁，为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并继承师业开办“武林伤骨科”诊所。

提倡“国术”的张之江

张之江，河北黄骅人，生于1882年，卒于20世纪70年代。少年时上过七年私塾，十七岁入伍，成为冯玉祥的部属。张之江任旅长时，感到军官没有文化不行，便开始习文。凭着坚强的毅力，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但因此身体素质也大大下降，所以在他四十四岁时，开始跟教官李元智习武，后又跟吴俊山学八卦掌。他坚持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先骑马半小时，后练功打拳，身体很快就强壮起来了。他体魄雄壮，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威风凛然，曾有人误以为他是张飞的后代。

冯玉祥兵败下野后，张之江也离开了军队，退居林下。当时，张之江家住北京，他就投身于武术事业。他认为武术是中国传统的强身之道，应该重视起来，他主张把武术称为“国术”，号召成立“国术社”，人人参加武术锻炼以健身强国。经他奔走呼号，北京国术社于1930年建立，张之江任首届社长。后来，南京成立了国术馆，张之江又任馆长。他提出“强种救国，自卫奋斗，强我宗族，壮我国魂，洗刷东亚病夫，振兴黄帝子孙”的口号。在他的倡导下，国术馆学员运动服前心印有“强种救国”、后背印着“自卫奋斗”的大红字。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原先身体很差，未老先衰，头发花白，是练国术使我返老还童，头发变黑的。”

张之江曾受北京的教会学校育英中学校长李如松的邀请，到校演讲。他的讲题是“国术与健身之道”，边讲边作武术表演，同学们一再起立，鼓掌欢呼。

那时，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萧洄濂（友梅）也慕张之江之名，常邀请他到青年会的体育馆作国术表演，每次都是座无虚席。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学武之风，与他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

张之江军旅生活多年，又有武术功夫，但态度和蔼，为人直爽热情，毫无一介武夫咄咄逼人之势。他生活简朴无华，平时总是穿长袍，戴一顶礼帽，不摆谱，不端架子，不抽烟，不喝酒，俨然一副老夫子的形象。他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凡是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对他留下了难忘的良好印象。

张之江受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很深。他待客摆筵，也学冯将军的办法，在餐桌上首先摆上一盘窝头，表示不要忘记艰苦朴素的传统。他在治军方面，也如冯玉祥将军一样，要求军队爱民不扰民，所以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张之江除喜练武术之外，还喜研读兵法战策。他搜集了不少古代名将的资料，尤对战国时期和东汉名将的战绩殊为爱好，与友人交谈，常是津津乐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之江创办的中央国术馆被迫迁址，初迁长沙，再迁桂林、龙州、昆明、重庆、北碚等地。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张之江六十岁寿辰时，冯玉祥与西北军高级将领特请画家画了一幅“松竹梅三友图”相赠，冯玉祥还题了一首打油诗。

“燕市奇人”马礼堂

北京“中山健身会”举行庆祝活动，让我提起其创立者——“燕市奇人”马礼堂先生。

马礼堂原名马步周，河北省河间县人。河间地区自古以来习武成风，清末时各村还都设有拳场，一直以来高手辈出。

马礼堂七岁始学少林潭腿、华拳，十三岁随表叔——威震武林的拳师张兆东学形意、八卦拳。1931年，经张兆东介绍，马礼堂拜著名拳师郭云深的得意弟子、河北大学武术教授、河北省武术馆馆长刘卫祥为师，学习形意拳。此外，他还向太极名家刘彩臣学习太极拳，向“南北大侠”杜心武学习推手。由于马礼堂武功扎实，精通多种拳术，功力超群，攻防能力强，故有“坦克车”之美称。

马礼堂与韩慕侠、王子平、姜容樵等是师兄弟，交往很深。当年韩慕侠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时，他正在北京。十一块金牌他都见过。

1932年，马礼堂考入华北大学教育系。不久，便组织“华北武术研究会”，聘请孙禄堂、尚云祥、刘彩臣、恒寿山、许禹生、张策、郭树棠等武术名家担任导师，研究和倡导武术。马礼堂尚喜作诗文，在校期间，组织过“椟玉诗社”，出版过《椟玉诗集》。“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他曾感慨赋诗：

泪洒山河半壁残，雄心未死发冲冠。

公众黍熟私家食，商女袍温织女寒。
傀儡登场凭线牵，娇花弄媚依栏杆。
误民误国曾知否？多少英雄血变酸。

后来，马礼堂到山东济南，一面在省立高中教书，在青年会教剑术，在国术馆教形意拳和国术教育课；一面以志然作为笔名在《求是月刊》上大力倡导国术革命，提出打倒是己非人的师承门派观念，揭露武术神秘化，反对武术舞台化，主张武术一要强健身体，二要技击胜敌，当时在武林中颇具影响。

1935年，马礼堂又发起组织“健康实验学社”和“技击实验学社”。上海、南京、武汉、山西、北京和东北的知名武术名家纷纷响应，不远千里，奔赴济南，共商国术改革大计。参加学社者达数百人众，可谓盛极一时。

马礼堂晚年致力于儒家气功《六字诀》之研究，经常应邀赴各地讲学，徒弟遍布大江南北。

“国考第一”万籁声

1928年冬天，华北五省武林高手云集北京，参加赴南京“国考”（即擂台赛）的选拔赛。几十位选手，各献技艺，打来打去，最后只剩下了万籁声与一个叫郭瘸子的人。郭瘸子虽然腿脚有疾，但擅长劈挂铁砂掌，胳膊似鞭子，手掌似利斧。万籁声以自然门气功与他比试，双方打成平手。最后比赛绝技，万籁声以朝天绝腿和两指（中指和食指），将十八斤重大刀夹平而获第一。随后，由二十二人组成的华北武术代表队，由他带队赴南京参加“国考”。

这次“国考”规定：不许戳目、扼咽喉、踢打下阴；三场两胜为胜利；以臀部着地或自愿认输，或受伤不能再战者为负；双方还必须戴护具。其他条件万籁声都同意，唯对戴护具的规定提出异议。他说：“我们中国的武术比赛，不同于西方的搏击。平素练习，从来没有戴过头罩、手套一类的护具，现在突然戴起来，从何显出功夫？一只凶猛的老虎，给它的利爪套上皮套子，岂不限制了它的威力？”

主持者认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

比赛开始了，万籁声的对手是福建领队倪某，双方虎视眈眈，相对而立。裁判员的红旗刷地往下一落，万籁声就以自然门的闪电般的手法，一个箭步蹿到倪某的眼前，倪忙用龙拳招架。岂料这自然门是没有固定招式的，刚一接触，万籁声随即变招，这拳却改变方向，正冲着面门打来。姓倪的猝不及防，着实地挨了一拳，他晃了两下，没有倒下，同时又向万籁声回敬一拳。这一拳快如流星，少说也有几百斤的力量。万籁声并没有躲，略一侧身，对方的拳头就落了空。紧接

着，万籁声又还了他面门一拳。这一拳又刁、又重，快如疾风，倪某一仰头，还未及躲开，拳头早扫在了他左嘴角上，立刻四个牙齿被打落，其中一个还粘在万籁声的右手食指节上。那姓倪的“冬”地仰面倒了下去，半天也没挣扎起来。

这场比赛结束后，万籁声突然患感冒无法继续参加比赛，当然也就不会拿到第一名了。

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二十余人蜂拥来到万籁声的房间。他们把万籁声高高举起，高兴地大叫大嚷，手舞足蹈，弄得他莫名其妙。为首的一位姓朱的告诉他：“万先生，祝贺你！刚才国术馆张馆长向我们训话说：你们什么第一？打打摔摔，不成样子！真正的第一是河北总代表万籁声！人家那才是功夫，相隔两三丈远，一个箭步就到了眼前，两拳就把对手打倒了……所以，我们特来报喜，您应当是这届‘国考’的真正第一！”

万籁声对众人笑笑说：“这是张馆长勉励大家的话。我病了，没参加后面的比赛，怎么能说我是第一呢？”

过了几天，万籁声的病彻底好了。这天，大约上午八点钟，那位姓朱的又把那二十余人带来了。这回可都是短打衣裤，好像是刚从武场上锻炼完来的。

姓朱的进门就说：“万先生，这次比赛，我们有二三十人拿了优等，可是平素交手，谁也不是老顾的对手，我们都称他‘无敌手’。我们倒有个建议：您是不是跟老顾比试比试，一来让我们开开眼，二来也好证明馆长的话对不对。如果真赢了老顾，我们在外边一宣传，您这第一也就名副其实了。”

万籁声笑道：“宣传大可不必，玩一玩，大家开开心倒是可以的。老顾呢？”

老顾在一旁含笑点点头。他也是短衣打扮，大有跃跃欲试的意思。

于是众人在屋中间闪出一条小道，约莫有三四丈距离。双方摆好架势，开始比试。万籁声身材矮小，灵巧如猴，一上来就伏身进击。老顾匆忙接手，刚要进招，万籁声突然又改用“吐手若始奔”的招法，抽撤急进，使老顾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频频后退，一直退到墙壁前。正无路可退，忽然看见旁边有一把椅子，老顾急忙跃了上去。立足未稳，万籁声已闪电般向他鼻端点了一指。老顾马上抱拳喊道：“师兄，打不得！打不得！”

老顾摸了摸鼻子，众人不由得哄堂大笑。比试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人们无不称赞万籁声是这次“国考”的没得第一名的第一名。后来，他留在南京中央国术馆担任武术教练，名声日震。

1930年的一天，两广主席李济深在秘书长的陪同下光临南京中央国术馆。他们找到万籁声说：“广东要办国术馆，听说先生武功极好，想请先生出任馆长，不知意下如何？”当时杜心武正在一旁，他见万籁声有点犹豫不决，便劝道：“既然李主席要你去，你就去吧！到那儿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于是万籁声爽快地答应了。

万籁声乘船来到广州，受到热烈欢迎。珠江长堤上挂着一幅醒目的大标语：“欢迎第一届武状元万籁声先生！”

不料，万籁声到广州的第五天，就接到几封匿名信，大意是说：广东民风强悍，听说你为馆长，究竟是你当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当你的老师，现在还说不定呢！你若敢挂出招牌，我们就敢给你摘掉！

万籁声心想：这肯定是有不服气的人。牌子早挂晚挂要什么紧？关键是先要威服这些人！于是，他不忙于挂牌，天天等着看到底什么样的人找上门来。

没过几天，有一个道士找上门来。这道士个子高大，态度傲慢，自称是练铁布衫、金钟罩的，一进门就单刀直入地问道：“你就是万先生吗？”

万籁声应道：“是的。您有何贵干？”

“我想领教领教万先生的功夫！”那道士毫不客气地说。

“好，那就请便吧！”万籁声说着，就地立了个门户。

那道士二话没说，腾地就扑了过来。万籁声急忙闪过，顺势用两指弹向他的心口。道士躲闪不及，万籁声底下一个勾脚，咕咚一声，那道士便平躺在地上了。他爬起来，羞得满面通红，双手抱拳作个揖，赶紧溜掉了。

就这样，整整三个月，找上门来的武林高手不计其数，都是趾高气扬而来，垂头丧气而归。直到再没有人敢上门较量了，万籁声才堂堂皇皇地把牌子挂起来。

广东省国术馆建立后，万籁声带徒授艺，练功不辍，影响日大。他为推动广东省武术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武林女侠王侠林

王侠林是全国武术协会委员、北京市武协副主席，人们都称她王大侠。

王侠林1907年出生于河北省安次县廊房镇麦剿村的一个武术之家，父亲王荣标是位著名拳师。她幼年习拳，到十几岁时便打得一手漂亮的通臂拳。尔后，她又四处拜师求教，吸取了一代名拳师刘月亭、田祥、贺福元、修建池、刘志等的武术精华。她练功勤奋刻苦，持之以恒。每天清晨打吊袋，一打就是千百次；挥抖一根两丈长、碗口粗的大杆子，一口气就是百多下；练单式，每次不下百次。二十出头，她的通臂刀、通臂枪、通臂拳已经娴熟精通。她臂软似鞭，拳重如锤，喝声一出，拳随臂去，千斤之力可破砖瓦。有人描绘她的高超拳艺说："通臂加劈挂，神鬼也不怕。"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举办全国武术大会，各方能人云集，都希望争标夺魁。然而，当时政府腐败，武术界大权被一帮政客控制，比赛中常有裁判徇私不公现象。因此，有些人为了得个名次去奉承大会总裁判长褚民谊。当年，王侠林虽只有二十几岁，名气却很大，任北平武术队队长。褚民谊十分赏识她，曾邀她单独谈话，并当面称赞她。许多人正愁巴结褚民谊没有门路，见王侠林如此好运气，甚为羡慕。有人就劝她说："褚民谊这样器重你，这真是个好机会。只要你去磕头拜他为师，不愁在决赛中取不到名次，说不定还可以留在南京的高等学府任教哩。"王侠林生性耿直，一向傲视权贵，她气愤地说："比赛凭的是武艺，褚民谊没有教过我一天，我为啥去给他磕

头！”事情传开了，褚民谊当然对这个年轻姑娘十分不满。王侠林也不含糊，第二天便宣布退出比赛。她的这种气概和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武林豪杰无不竖起大拇指赞叹道：“有骨气，真是一位侠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王侠林正在济南市的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武术教师。有一天，校长慌慌张张地跑来对她说：“王老师，最近风声不好，你为人正直，坏蛋恨你，还是先避一避吧。”于是王侠林不得已乘火车北上。当时国家遭劫，百姓四处避难，列车拥挤不堪。王侠林找不到座位，被挤夹在车门旁边。车到德州站，一群日本兵和汉奸要中国人让开，让他们上车。一个日本兵蛮不讲理地挤了上来，还又骂又打。没料到这小子脚还没站稳，便被人一脚踢了下去。接着一个人“呼”地一声随之跳下列车，站在月台上摆好架势，此人便是王侠林。此时，二三十个日寇和汉奸一拥而上。她对着这群豺狼冷笑，上来一个劈倒一个。她的大掌如同劈刀，铁拳若重锤，接二连三地把这帮凶顽打翻在地。王侠林面不改色，应付自如，旁边的旅客无不为她的英雄气概和高超武艺拍手叫好！这时，火车开动，有人在车上呼喊王侠林，她一阵风似的跟着火车跑几步，接着纵身一跳，轻巧地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横杆铁链，一跃而上。气喘吁吁地追赶她的日寇和汉奸都傻了眼，等他们反应过来时，火车已飞奔而去。王侠林站在列车上，向月台挥手大笑。

王侠林的精湛武艺，义骨侠风，大为人们所敬佩，济南人都亲切地称她“王大侠”。解放前，她还先后在北平、山东等地任专职武术教师。解放后，她一面带徒传艺，一面以祖传正骨之术为人治病。她不计报酬，对来自各地求医的人都悉心医治，受到人们的赞颂。

“飞叉”技惊希特勒

1936年夏天，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希特勒作为德国元首和纳粹党党魁，为了笼络人心，亲任这届奥运会的总裁判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派出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连连受挫，唯有武术表演队出足了风头。

1936年8月7日，柏林城郊杜陪利兹军营，几名纳粹官兵怀着好奇的心情，兴致勃勃地观看中国武术队的表演。中国男女武术运动员，身穿白绸黑边练功服，脚踩软底布鞋，个个精神抖擞，先后表演了少林拳、对枪、对拳等节目，博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轮到上海武术运动员郑怀贤上场表演飞叉绝技了。突然，会场肃静下来，两个重要人物走了进来——希特勒和柏林城防军司令李切尔中将。在场的纳粹官兵没有想到他们的元首也会对中国的传统武术感兴趣，顿时情绪高涨。希特勒来到前排，和中国体育官员握手。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代办宋如海向希特勒介绍武术队的情况的同时，心里不免多少有些担心，运动员表演若出点差错，影响就不太好了；万一失手伤人，那更是难以交代。

在台后，中国武术队领队兼主教练郝铭和副教练顾舜华更是紧张。郝铭是霍元甲的弟子，是著名的武术家，多年兼任天津南开大学武术教师。他一把拉过郑怀贤说道：“你是不是换个项目？改八卦掌吧！”“为什么呢？”郑怀贤不解地问。“我担心万一飞叉有失，那可不

得了！”郝铭说。“郝教练，你放心吧，不会出问题！”郑怀贤很有把握地说。

郑怀贤自小喜爱武术，他跟武林前辈学过少林拳，也学过武当派的形意拳和八卦拳。在十八般武艺中，他擅使飞叉。一柄飞叉在他手中使得宛如蛟龙戏水，出神入化。沪上武林中人称他“飞叉阿贤”。

郑怀贤待两位表演大刀、对枪的队友退场后，便手持钢叉从容不迫地登台了。他先向全场观众鞠躬，尔后，以意导气，以气运身，进入练武状态。他挥动钢叉，舞将起来，只见吞吐开合，闪跃腾挪，动作凌厉如闪电，钢叉呼呼而生风，上下左右犹如蛟龙盘身。德军官兵们纷纷鼓掌，就连希特勒也看得目瞪口呆，然后连连鼓掌，不住赞叹。

表演完毕，希特勒当即要求德国国家摄影团尽快把已拍摄的有关中国武术队几次表演的资料妥善保管并整理成纪录片，供研究学习之用。他还委派秘书代表他向中国武术队赠送了纪念册等礼物。

“飞贼”左青甲

距沧州市九十华里的盐山县，流传着“飞贼”左青甲的故事。左青甲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自幼跟祖父、著名的劈挂拳师左东震学马面拳、青龙拳、八卦掌以及“白猿三出洞”等拳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参加了游击队。

那是1945年旧历正月二十六深夜，他正把柜橱上的铜皮、锁钥起下来，用脸盆端着出门去埋，突然四五个伪军从外闯入，围成扇面形，用枪对准了他。

其中一个喊道：“离他远点，他会把式！”

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左青甲把盆放下，顺从地让他们将自己五花大绑起来。这时，妻子和孩子听到了响动，哭喊着追出来，但都被枪托打了回去。

左青甲被带到村南的苇塘边时，伪军让他站定，然后举起枪瞄准他。他面不改色心不跳，睁圆了眼睛，怒视着伪军说：“小子们，开枪吧！在这儿逞威，有能耐去打日本鬼子！”

这时，一个领头的轻咳一声，其他人把枪放下来，然后问他：“你怕死吗？”

“怕死就不配做中国人！”左青甲斩钉截铁地回答。

又问：“你寻思打死你吗？”

左青甲答：“嘿嘿，打死我你就不能向你主子进贡了！”

威胁、恫吓不起作用，伪军就把左青甲带到了三里外的岗楼。敌人开始想用棍子打、凉水灌撬开他的嘴，可是两三个人都按不倒他。后来没办法，只好用电话线将他吊在檩条上动刑。敌人打累了，灌够了，才各自走了。

第二天自然又是一番严刑拷问，仍然是毫无所得。左青甲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身上的血肉跟衣服都粘在一起了。敌人没办法，决定第三天将他送进县城。

左青甲得知消息后想：到了日本鬼子那里，更是没好，无论如何要及早想个办法。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运起气来，硬是将捆在身上的铁丝挣断。接着摸到栅栏门上，双手紧紧攥住大铁锁，用力一拧，铁锁叭地断了。他屏着气息，静视一会儿，打开门，一个箭步闪到院里。抬头望望围墙，足有三层楼高，怎么办？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不远处有座平房，左青甲一蹿抓住屋檐，翻了上去，然后扒着墙砖，一步一步爬到围墙顶上。

他学猫行步法，悄悄溜到岗楼边，探头向下一看，黑糊糊的，星光下只隐隐约约看到壕沟里泛起的水光。他打定了主意，跳！三层楼高，就像腾云驾雾一般，直飞下去。可巧，正好跳在壕沟坡上。他跨过壕沟，越过铁蒺藜网，成功逃跑了。当敌人发觉时，左青甲早已无影无踪。此后，“飞贼左青甲”的绰号便传开来，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丧魂丢胆。

程砚秋痛打伪警官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知道他艺术大名的人多，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武术家的人很少。

程砚秋自幼习艺的同时，还拜著名武术家高紫云为师，学习太极拳及太极门器械。他学戏认真，习武亦非常勤奋刻苦，加之老师高紫云的严格训练和要求，他的武术功底非常扎实。但是，程砚秋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后又多方投师，拜在自然门大师、有“南北大侠”之称的武林高手杜心武的门下。经杜心武的精心指点，程砚秋的武艺有了很大长进。

程砚秋对拜杜心武为师之事从不向他人提及，也从不向人炫耀自己的武功，但他毕竟还是露过一手，那就是被梨园界乐道的痛打伪警官事件。

那是1914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在北平前门火车站遇一伪警官盘查，双方发生口角。程砚秋平素正直，对这些为虎作伥的伪警深为痛恨，遂打了这伪警官一记耳光。伪警官欲上前揪打程砚秋，又被程砚秋一拳击倒。两个伪警察上来助战，也都被程撂倒。正当伪警察欲群殴之际，伪警察局一头目路过此处，因他认识程砚秋，便出面调解，让程砚秋上了火车。

这个伪警官怀恨在心，意图报复。等程砚秋乘火车归来时，他以检查行李为借口，将程之戏衣全部摊放在地上。当时正值雨后，地面有大量积水，戏衣都被水渍玷污。程砚秋的戏衣多系苏绣，非常贵

重。程砚秋蒙受此损失后，悲愤之余，遂息影剧坛，不再演戏。他退隐北平西郊青龙桥，置田数亩，躬耕其间，一直到抗战胜利始重返舞台。

程砚秋蛰居青龙桥期间，对武术仍练习不辍，每日打拳舞剑，从不间断。高紫云当年送给他一把宝剑，他视如珍宝，一直珍藏到病逝。

一次蹊跷的“武术表演”

1943年，正当战火纷飞之际，日本侵略者要求平津等地派出武术队到日本表演。这年夏天，北平、天津十四个国术馆的共一千六百多名武术高手，聚集在北平中山公园进行选拔。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选定二十九人组成一支武术队前往，领队是北平武术协会主席马良。

武术队到东京后，仅在宾馆休息了一天，第三日便进行表演。表演场很大，黄土铺地，周围是梯形观众席，正前方搭着大台。武术队列队雄赳赳地进入表演场，在大台下一排木凳上坐定。不久，日本天皇入场，在大台上就坐。台上和场内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观众也全是士兵。表演开始，我武术队员白焕文率先上场，表演了一趟双鞭；接着，牛德海和他的师弟对练了空手夺枪、三节棍对枪；王保英和龚玉福表演了双手带群枪……大家精神抖擞，龙腾虎跃，场上一片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表演即将结束时，天皇突然要中日双方比赛摔跤。来之前，大家早料到会有这一手，因为日本人擅长刺杀、摔跤、举重，故选了宝三同行。宝三擅摔跤，向来在天桥撂场子。这时，一个身着柔道服的日本黑大汉来到场中。此人粗壮高大，浑身长着黑毛，远看好像是座黑塔。宝三中等身材，比日本黑大汉矮了一头。看着这对很不和谐的对手，观众席上发出哄哄笑声。比赛口令发出，那个黑大汉“啊”地大吼一声，拉开架势。宝三神情坦然，瞥了对方一眼，也拉开架势。两人在场上转起来，各自寻找对方破绽。走了两个回合，那黑大汉自恃身

材高大，大吼一声，向宝三盖过来，想把宝三抱起压在身下。宝三待他快贴近自己时，往旁边一闪，脚下一个绊子，上边顺手一拔，那黑大汉便重重地倒了下去。黑大汉恼羞成怒，又大吼一声，向宝三扑来。宝三用“拉笆子手”招数，用左手将黑大汉的双手拨开，一探身，用右手将他的大腿撩起，用力一提，黑大汉又仰面倒了下去。

日本天皇见摔跤不是中方对手，又让双方较量举重。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扛着一个大哑铃进场来。大哑铃重一百六十斤，扔下时，深深陷进黄土里。然后又一个日本大汉上场，两手抓着哑铃，将哑铃举了三下，而后用轻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中方，退下场去。马良让王保英上场。王保英是顺义县人，以力大著称，可以举起用木杠串起的两个磨扇，上面再坐两人，面色不变。王保英来到哑铃跟前，探下身去，单手抓住哑铃，轻松地提起后，一翻腕举过头顶，然后放平，再翻腕举过头顶。如此三次，色不变，气不喘。他的出色表现，不仅令同伴叫好，就连场外的日本士兵也不禁鼓掌表示折服。这时，马良对天皇说：“你们的再试试？”天皇伸出大拇指称赞道：“我们的不行，还是让你们中国！”

表演结束，中国武术队在全场观众的注目中，气昂昂地退出赛场，吐出了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下郁积多年的闷气。

万籁声著《武术汇宗》

万籁声先生的《武术汇宗》为研究武术者必读之经典。近年来，此书在香港几家出版社一版再版，颇受读者欢迎。笔者当年曾与《晨报》有缘，对此书成书经过甚是了解。

1928年春，北京农业大学的林教授寄给《晨报》一封信，推荐几篇武术方面的文章，稿件署名万常青。林教授于信中对万常青先生介绍颇详。说他二十六岁，北京农业大学助教，对武术很有研究，曾先后师从永胜镖局镖头赵鑫洲学少林六合门外功、北侠王荣镖学通臂摔跤、“南北大侠”杜心武学自然门气功，对少林、武当，内功、外功，拳脚、器械均有很深造诣。

武术历来多为口传心授，偶有人笔录整理，不过是你抄来，我抄去罢了。林教授推荐的稿子内容充实，文字生动，涉笔成趣，《晨报》遂决定在副刊《随笔》栏内连载，每天一篇。连载一段时间后，因版面较紧，突然停止刊载，万先生也只好搁笔了。未料，停载后，读者每天电话不断，纷纷询问停载原因。编辑部只好请万先生继续撰写。因此，万先生又每天一篇，从夏天到秋天，一直连载了几个月。举凡武术中的内外功、南北派诸拳种、各类器械，以及自然门气功的练法和溯源，无不包罗在内。《晨报》此举可谓开创了报刊介绍武术之先河。

后来，林教授又建议万先生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出一本书，书名暂订《武林随笔》。万先生整理散稿期间，其兄万籁天自海外归国。万籁天为田汉挚友，两人同留学日本，一起研究话剧，听说弟弟

著书，极表支持，并建议说："内容如此丰富，书名何不响亮些，不如叫《武术汇宗》好！"

万常青说，中国武术门类繁多，包罗万象，这样大的题目，恐难符实。其兄则鼓励说："内容如嫌不充实，可再补充，'有志者，事竟成'。此书意义非同寻常，应鼓起勇气，不避艰辛，竭力完成。"

万常青听从了哥哥的意见，几经增补，改名为《武术汇宗》。

对署名问题，万籁天亦提出意见："书名响亮了，署名也要响亮。我叫万籁天，你就叫万籁声吧。万籁齐鸣，定能振聋发聩，唤起人们对中华武术之重视！"万常青欣然赞同，即以万籁声署名。

现在，万常青这个名字大概很少为人所知了，而万籁声的名声却传遍海内外，越叫越响了。

金警钟其人其事

近来整理旧书，偶尔翻到一本《少林七十二艺》，这还是当年在北京时朋友赠送的。这部书的作者是20世纪30年代享誉京津的著名武术家金警钟先生。赠书的朋友是金警钟的弟子，与我友善，闲暇时常带我去观看他们习武。

金警钟本名金恩忠，字泽臣，号疯癫客，警钟是他的别号。金警钟出身于北京望族，曾就读于京师私立育英中学，后弃学从军。他曾得家传斛斗术及少林拳，又拜著名武师朱冠明习潭腿、杨德山习少林六合、殷德魁习性功拳，最后得真传于少林寺方丈妙兴法师。金警钟先生曾对我讲过妙兴法师的身世。妙兴幼习技击，兼工翰墨，尝遍游大江南北，至弱冠技已精纯。因感国势衰微，百姓颠沛，遂出家于嵩山少林寺。在少林寺又精习少林功夫，有“金罗汉”之誉。妙兴主张“发扬武术，强种强国”，打破少林寺历来秘技不传之旨，同时广为著述。金先生就是随军游少林寺时拜他为师的。金先生著《少林七十二艺》，大概也是继承乃师之志吧。

除此之外，金先生还有几种著述，其中《国术名人录》已成为现在研究武术流宗的必备书了。金先生为人和蔼可亲，毫无武夫之概，有一种书卷气。练武之余，还雅好读书，书斋名曰“破书钝剑楼”。妙兴法师圆寂，金先生曾亲书挽联，笔势劲烈，文辞亦贴切：

瞻被昂昂金罗汉，拳剑枪刀，交发并至，跳龙卧虎，尚武精神，豪气鹏鹏贯牛斗。

叹我堂堂勇禅师，胆坚铁石，志烈秋霜，发扬国粹，救我民族，大义凛凛满乾坤。

金先生有弟兄三人，他居长，两个兄弟也均以武名著称。二弟金恩良，拜北京太极名师杨静清为师，专习太极拳剑。三弟金恩善，幼习斛斗术和少林拳，后又拜北京著名摔跤手戴洛三为师，专习摔跤术。戴洛三俗名戴三秃子，与著名摔跤手沈三、宝三齐名。以功夫论，老二金恩良功夫属柔，老三金恩善功夫属刚，各有千秋。

金先生的《少林七十二艺》一书深得当时武术界人士好评。八卦、形意名家、孙式太极创始人孙禄堂为其题词曰："如数家珍"，可谓评誉得当。现今此书已极不易看到。

金先生之侄金宗超曾来函谈及金先生轶事，颇有为世人所不知者。

金先生以少林七十二功驰誉南北，被当时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将军聘为武术教官。时值日军不断在宛平挑衅。某日，张将军因事与日军军官会晤，后共进餐，金先生亦陪席。数巡过后，一日军军官口出狂言，竟拔出战刀挑肉一块，送至金先生嘴边。金先生泰然自若，一口咬定，气发丹田，竟将战刀刀尖咬断。张将军及所有随行官皆鼓掌，那挑衅之日军军官则惊出一身冷汗，起立大鞠一躬。其他日军军官亦对金先生的神功钦佩不已，凶焰顿收。金先生振我国威的壮举一时传为美谈。

中年以后金先生卸甲归隐，出入如一般和蔼老叟，外人丝毫不知此为当年赫赫有名、威震平津之武术大师。闲居时，金先生每每润笔铺纸，研学书法。

金先生著述除《少林七十二艺》、《国术名人录》外，传世极少。

还珠楼主二三事

著名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寿民（1902～1961），20世纪30年代崛起于京华，所著《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书流传颇广。在当时的通俗小说界，与张恨水、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宫白羽的武侠小说齐名。他所写的剑侠小说，情节虽多离奇荒诞，却充满人伦世情，引人入胜。人称李寿民生于峨眉青城山麓，其笔下的胜域奇景，多有所本；所记剑客侠士，也以见闻所及润色加工；即使志怪谈异，也源于实物之想象，具有独到之处，因而为人爱读。

李寿民以“还珠楼主”为笔名，缘于两次缠绵的恋情。

李寿民本名善基，四川长寿县人。幼年随父李光甫（清光绪年间曾任苏州知府）读书，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父丧后随母亲住苏州，就读于当地中学，成绩亦常列榜首。后与苏州邻家女文殊发生恋情，私订终身。但文殊成年之后不幸坠入烟柳为娼，李寿民惋惜不已，乃以“还珠楼主”为名，以记旧情。他在《女侠夜明珠》中，特意塑造了一个美丽而忠贞的女主人公形象，为旧恋赋以新生命。

1924年，李寿民只身北上天津，在地方政府机关中谋得差事。1928年，他给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当文牍人员；次年做了天津电话局局长段茂澜的私人秘书，同时在天津的大中银行股东孙仲山家中教家馆，以增加收入奉养母亲和幼弟。

孙仲山名鸿猷，也是长寿人，1928年在天津创办大中银行，成为金融界名流。李寿民到孙家教馆不久，与二小姐孙经洵发生恋情。事

为孙仲山知晓，李寿民被解聘。但孙二小姐仍与李寿民互通音信。后来孙二小姐愤而离家出走，李寿民遂被控告“诱骗良家妇女”，时在1930年冬。法院开审时，孙二小姐从听众席中站出陈诉，声言婚姻自主，别无他情。结果是孙家败诉，有情人终结良缘。

此后，李寿民即以专业小说创作为生，写出《蜀山剑侠传》在天津《天风报》连载。两年后有所积蓄，与孙经洵正式结婚，并迁至北京定居。当《蜀山剑侠传》出版单行本时，李寿民经得孙经洵同意，仍以“还珠楼主”署名。这次是用来纪念新婚了。

还珠楼主是个京戏迷，常看名伶演出，因而结识了尚小云和沙大风等名伶。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以演任侠好义的角色著称，他的戏路也最适于演巾帼英雄。他特别欣赏《蜀山剑侠传》，便请还珠楼主将其改编成京戏，二人因此结为金兰之好。从此，还珠楼主由武侠小说家而成了编剧，先后为尚小云编过《青城十九侠》、《比目鱼》、《汉明妃》等剧。在尚小云帮助整顿“富连成”科班时期，还珠楼主还为叶盛章编了一出《酒丐》。

还珠楼主想象丰富，文思敏捷，在津时能月出二十万言，且文笔优美，飞珠溅玉。其长篇巨著即有几十部之多，许多作品至今仍风行港台及东南亚。1961年还珠楼主在沪病逝，享年不到六十岁，实在可惜。

武侠小说家不肖生

谈罢还珠楼主，又想起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作家不肖生先生。

肖生原名向恺然，湖南省平江县人，1889年生于富商之家。其父为湘潭一带颇有名望的儒生，对子管教甚严，向恺然五岁时即被令读诗书、习武术，文武并进。向恺然十四岁考进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只学一年，因对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倍加推崇，被清政府视作乱党开除。

向恺然无法读书，便请求父亲变卖田产，自费赴日留学。后如愿以偿，考入东京宏文书院学法政。留日期间，他认识了著名武术家王润生，于是又学拳习武，日不间断，技艺精进甚速。

1913年向恺然毕业回国，与王润生在长沙创办“国技会”，并写了第一本书《拳术》，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不久，向恺然由湖南省军事厅厅长程潜先生介绍到军队做军法官。不久，他再次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向恺然生性喜爱文学和武术，终日与日本柔道家切磋技艺。一次与日本柔道高手松平比赛，向恺然伸腿欲将对手勾倒，不料出腿稍高，误碰松平小腹，评判诬其故意伤人并找来警察干预。向恺然邀评判及警察至场外，对准电杆一脚踢去，大块表皮落地，然后说：“松平的腹部，总没有电杆结实吧，若在下有意踢他，起码也会踢他个窟窿啊！”评判和警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1915年向恺然回国，因随江西革命军总司令董福开倒袁而被捕。翌年，袁世凯毙命，他亦获释来到上海，以卖文为生，专事武侠小说写作。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出版了《留东外史》、《留东新史》、《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玉镯金环录》、《江湖异人传》、《铁血英雄传》、《拳术新传》、《拳师言行录》等数十部武侠小说。其中《江湖奇侠传》以“平江不肖生”的署名发表，轰动一时，且广销东南亚各国，并一续再续。明星影业公司曾改编这部小说，拍制成电影《火烧红莲寺》，久映不衰。

抗战期间，向恺然任二十一集团军总办公厅主任，兼安徽大学文学系教授。据说向恺然先生于1957年病逝，终年六十有八。

宫白羽和他的武侠小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曾有位颇享盛名的武侠小说家“白羽”。白羽本名宫竹心，20年代初，曾受过鲁迅先生热情教导和帮助。在鲁迅先生书信集中，还存有当年给他的信件。但是，宫竹心在中年以后，没有沿着鲁迅先生指给他的道路前进，而是经历了一番贫愁潦倒的生活之后，从1938年冬开始，以“白羽”为笔名开始撰写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并在敌伪报刊上连续刊载。嗣后又陆续写了《偷拳》、《扬镖记》、《毒砂掌》、《牧野春风》、《武林争雄记》、《血涤寒光剑》、《大泽龙蛇传》等武侠小说。其时，“白羽”这个名字流传各地，宫竹心本名反为所掩。

宫竹心祖籍山东东阿县，父亲宫文彩是清末民初的一个营长。1899年，宫竹心出生于他父亲在天津南边的驻地马厂。辛亥革命后，宫竹心到北京读书，后因父病故，家庭生计无着，他不得已退学另谋生路。那以后，他当过军队司书、教员、邮局职员、税局小吏，还做过小贩、卖过报，饱尝人生疾苦。后得鲁迅先生的帮助，得在北京《世界日报》工作。1926年又为天津《东方时报》副刊写稿。1928年返回天津，先在《商报》当记者、做编辑，后自办中华通讯社，还在天津社会局和救济院做过科员。后因积劳成疾，退居乡间养病。“七七”事变后重回天津，操笔写起武侠小说来。

宫白羽本是一个瘦弱书生，并不懂得舞枪弄剑，更不会拳脚功夫。他为写武侠小说，临时向评书艺人和武术界人士学得武艺习用的招数、刀枪和拳术的歌诀套语。他写武林比武场面，居然头头是道，

很像内行。又因他研究过新文艺的写作，能独辟蹊径，不落俗套，使得故事引人入胜，深受读者喜爱。那几年里，宫白羽为报刊争相约稿，稿费从优，生活很是宽裕了一个时期。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那些荒诞不经、脱离现实的武侠小说就失掉了市场，宫白羽乃逐渐被读者舍弃。他在消沉中度过了晚年。据说宫白羽1966年在天津病逝，年六十有七。

杂艺大观

古时击鞠运动

马球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体育竞技项目，以阿根廷水平为最高。而是古代的马球运动，较早出现在中国、小亚细亚和印度次大陆。在我国古代，马球称为“击鞠”，始于汉魏，流行于唐宋。南宋诗人陆游在《冬夜闻雁有感》中，对军队里的击鞠活动曾描写道：

军日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
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球场日打球。

北京作为几代京师，又有善于骑射的北方民族，故史书中多有击鞠的记载。

据《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即今北京）……皇城……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金史》亦载，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八年（1168）在常武殿击球，大臣马贵中谏言：“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世宗听后，觉得马贵中并不了解击球的目的在于强身健体，便说：“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金人击鞠，先于球场南端立华表式双柱，柱间置板，“下开一孔为门”，门后“加网为囊”，此为单球门比赛。另外，还有双球门比赛，即“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所击之球是以木为之，“状如小拳”，内掏空心以增其弹性，外饰朱漆以显其色泽，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参加

比赛者，“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击一球……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金兀术之子孛迭，时称“击鞠为天下第一，常独当数人，马无良恶，皆如意。马方驰，辄投杖马前，侧身附地，取杖而去”。这反映出金人的击球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明永乐十一年（1413）重五日击球，明成祖朱棣曾前往东苑参观击鞠比赛。据《续文献通考·乐考》和《明史·礼志》记载，参加此次击鞠比赛的有驸马及皇太孙等人，还有“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中书舍人王绂为此特作《端午赐观骑射击球侍宴》赋，曰：“忽闻有诏命分明，球先到手人夸能。马蹄四合云雾集，骊珠落地蛟龙争。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鼉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乐人间无。”

传世的《宣宗行乐图》中，绘有朱瞻基观赏击球的场面。做过宣宗时修撰的王直，亦曾写过《端午日观打球应制》，曰：“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鞚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欻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可见明朝宣德年间击鞠运动仍很活跃。

击鞠运动由于受场地和装备等条件的限制，多出现在宫廷贵族和军营中。但有时亦见于民间，如吴宽在《匏翁家藏集》中即载有：“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

清朝善扑营

摔毷跤现名摔跤，几百年前始于东北、内蒙古等地。清人入关后，在北京大力提倡，逐渐成为一种民间体育运动。清政府曾设有专门管理摔跤活动的机构，名曰“善扑处”，带有侍卫宫廷的责任。清人吴熊光的《伊江笔录》有云：

> 康熙间俄罗斯贡使入京，仁圣（康熙皇帝）令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凡俄国一使一役外出，必有一善扑者随之。俄人虽高大强壮，而两股用布束缚，举足不灵，偶出扰民，善扑者从其后踢之，辄仆地不能起。以此凛然守法。

可见当时俄国使节也是欺软怕硬的，踢到他“仆地不能起”，才肯“凛然守法”。

善扑处后又改为善扑营，由王公贵族轮流兼管事务，即在正职之外，附带领导这一工作。据青年时代参加过善扑营的满族摔跤手徐子才回忆，庆王（奕劻）、礼王、端王、伦贝子（溥伦）、涛贝勒（载涛，溥仪之叔，“解放”后在炮兵司令部马政局任职）都曾先后主其事。

善扑营的组织分左右两翼，每翼管四族，左翼在东城大佛寺，右翼在西四北大街。每营设“正印”一人，负责日常工作。新人初入营时级别比较低，只是“效力兵”。入营后经过比赛获胜（赢跤），每月发

饷银四两，每年发饷米四石。以后再凭个人的技术体力，依次递升三等“扑虎”（意为勇敢）、二等“扑虎”、一等“扑虎”，然后升为头目，可以自立“鼿跤场”，主持训练和比赛。演练时穿摔跤服，扎牛毛绳带子。每月演习比赛三次，逢八举行（初八、十八、廿八），赢跤的得钱四吊，以示鼓励。

善扑营有时像开运动会那样，联合比赛。东城地点在金鱼胡同东安市场后，西城在德胜门里庆王府西北。获胜者提到“御前比赛”，皇帝出来观看。每逢正月皇帝亲阅一次，地点在紫禁城内乾清宫门前，地下铺上棕毯，有大臣陪同。获胜的再依次递升，直到当几等侍卫（吃侍卫的粮，不一定当侍卫的差）。善扑营由上到下多是满族人，偶有汉族人加入。

辛亥革命后该组织解散，有名气的师傅就组织了私人的摔跤场，收徒授艺，然后在天桥或庙会上设场演斗，观看的人要给钱。大名鼎鼎的沈三就是其中的一员。

冰嬉杂谈

从前的北京，冬天异常寒冷，刚一数九，呜呜的西北风刮在脸上，就像刀割似的生疼，棉衣虽厚，也总是被阵阵疾风吹得透心儿凉。那些被称作海、湖、池、潭等一切积水所在，一改往昔碧波粼粼之貌，完全变成洁白晶莹的冰上世界。这造物主的变化，赋予了不甘寂寞的北京人滑冰取乐的理想天地。

北京人崇尚冰上游戏，由来已久矣。清康乾盛世以来，上自宫中帝后，下至茅舍黎民，无不以滑冰为冬季之最大乐事。

起源于长白山的满族入主中原后，对冰雪的眷恋之情不减当年，特意把滑冰作为典制，钦定于《大清会典》中。其目的并非只为娱乐，旨在健身，并培养将士的尚武精神。此项锻炼兼娱乐的活动，称为“冰嬉”。

每年冬至，帝王驾临天坛祭天之后，便令内务府筹备一年一度的冰嬉事宜。至腊月初八前后，即正式举行。地址或北海五龙亭，或南海瀛台，盖视冰冻坚硬程度及冰面光滑与否而定；具体时间，则以黄道吉日为准。届时，冰场上队列井然，旌旗招展，彩球高悬，支鼓架鹰，扬弓挎箭，以迎迓帝后御驾。及至皇帝与太后分乘支以黄幔的船形冰床驾临后，爆竹巨响，号令齐发，一场紧张、热烈而又多彩的冰嬉即告开始。

所有演练之旗兵，以数十人为一队，各有统领，分伍而立，均带护膝，足登嵌有铁条和铁齿的冰鞋，沿弯道风驰电掣般速滑，且花样

各异，或舞旗，或弄幡，或击鼓，或耍刀，或射箭，或掷球，或戏鹰，或斗鹞；而其身段亦于瞬息间千变万化，忽而腾空，忽而倒立，忽而“凤凰展翅”，忽而“白猿献桃”、忽而“童子拜佛”……诸般美妙绝伦之技艺，无不令皇帝及伴驾之王公大臣目悦神怡，叹为观止，而优胜者遂因此而喜获极重的赏赉。

酷爱冰嬉的乾隆皇帝，有以冰嬉为题材的御制诗赋。他在《冰嬉赋》中对当年掷球之戏曾有描绘：

> 思摘月兮广寒之窟，齐趁星兮白榆之街。未拂地兮上起，忽从空兮下回。突神龙之变化，蕤毅翔凤之髹髵。

清道光皇帝亦有御制《观冰嬉》诗多首，如：

> 坚冰太液镜中边，翠辇行时竹爆喧；距躍甗然齐贾勇，超腾条尔竞争先。鸟翔旗色初分队，鱼贯鶬声每应弦；训饬貔貅兼沛泽，丕承家法亿龄延。

清朝统治时期，列为禁苑的前三海，平民百姓不能越雷池一步。百姓若想冰嬉遣闷，则奔清幽淡远的后三海或陶然亭，甚至干脆直奔金鱼池、龙潭湖乃至护城河。只要有冰，什么远点儿近点儿、深点儿浅点儿的，都不在乎。

20世纪30年代，北海五龙亭冰场上曾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穿一身黑缎子紧身棉袄、棉裤，在冰上能拿“朝天凳”，据说还能“倒踢紫金冠”。他就是当年给西太后表演过冰嬉的旗丁。

当年活跃于北海五龙亭、漪澜堂、南海、中山公园筒子河等处冰

场上的，绝大多数都是学生。说也奇怪，那么冷的天气，不少女同学都穿着棉袍、蓝布大褂溜冰，小腿上只是一层薄薄的袜子，有的甚至是丝袜子，居然不冷。男同学则穿棉袍子、蓝布大褂，穿着长袍子溜冰，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了。

好莱坞拍摄的溜冰影片《凤舞银冰》当年在平安电影院放映时，真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女溜冰健儿都学着片中女主人公的舞姿，在冰场上一条腿翘起来，不停地打旋子，大大地出过风头，当然也有不少人大大地摔过跟头。

北京北海公园等处的冰场，一般也只是溜溜冰，没有其他花样。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南小街一个棚铺的掌柜，很有生意头脑，在王府井南口东长安街路边租块空地皮，搭了大席棚，装了电唱机、彩色电灯，开音乐舞蹈冰场，做了两个冬天的好生意。

南苑赛马会

据老年人说，清朝北京城玩马之风很盛，直至民国才渐衰。清代，每年正月都要在天坛西墙外之马道及南苑赛马场举行盛大的赛马大会。民国时，赛马活动则多于周末及礼拜日在南苑举行。

南苑赛马场位于南郊大红门西，距前门十五里，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场内设有票房、彩房各一排，场西侧筑有看台，东侧辟骑士、马夫休憩室。每逢比赛之日，京中各界爱好者纷纷前往，马场内外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据悉，当年马票票价分一元、两元、五元、十五元四种。每一售票口及发彩窗口，均分别标明骑士和赛马的号码，光顾者既可专购一种赛马票，亦可兼购多种赛马票。一般观众只须花上一两元，便可买一张票，观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然富商大贾或酷爱此道者，必破费巨资，成批购得一种或多种票，以求获得重彩。

参赛之马多据毛色而得雅名，如银波（白色）、旭阳（红色）、乌龙（黑色）、青莲（浅紫色）、黛骥（青黑色）、斑豹（白中兼绛、黑二色）等，不胜枚举。骑士身着五彩条衫，头戴五彩长檐马帽，帽前后皆标有号码，英姿勃勃，颇有尚武精神。每场比赛，历时约三十分钟。主持者先将红色三角旗摇动，五六匹（最多八匹）同量级的骑士和马匹（赛前，骑士与赛马均须过磅，重量相等者编为一组）各就各位，严阵以待。随后鸣枪为号，众骑士精神抖擞，扬鞭策马。只见一匹匹赛马奔腾飞驰，疾如迅风，快似电掣，观者无不高声喝彩，兴奋、紧张、激动之情，莫可言状。

经过三圈（约合一千五百米）的激烈角逐，头马、二马（冠军、

亚军）得彩，于是，凡购得这两匹赛马之马票者，当即到彩房领取彩金。彩金之数目，一倍于票价。不过，每场比赛得彩者总是占少数。常有骑士与马场老板沆瀣一气，以每匹马当场之售票金额来决定胜负。比如，某场比赛，多数观者把赌注下在“银波”身上，“银波”售票总额超过他马，于是“银波”马的骑士便操纵马在即将冲过终点的一瞬间，巧妙地败下阵来。据说，有时为使某匹气力欠佳的赛马获彩，竟在赛前为其注射吗啡。

时过境迁，昔日南苑之赛马场，如今已是航空机场。

保定踢毽古有名

河北古城保定，踢毽运动自古有名。民间流传一则灯谜："别看翎毛有限，身带两文铜钱。你我眉来眼去，我你两脚不闲。"这个灯谜的谜底便是"踢毽"。

踢毽运动各地皆有，但保定踢毽特别讲究，花样多、难度大、姿势美、技巧性强，且踢毽者多为六七十岁的老翁。在保定古莲花池前，早晨或傍晚，经常见一些老人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踢毽，毽儿犹如流星飞燕，在踢者的身前背后、身左身右上下穿梭、左右翻飞，煞是有趣。

保定的踢毽运动，历史相当久远。据传，三国时期蜀将关羽率兵出征，半路上被占山为王的周仓所阻，两人交起手来。关羽武艺超群，而周仓力大无比，交手难分胜负，互相敬佩。关羽看出周仓勇而少谋，于是想出一条计来，便对周仓说："我们这样打下去，何时是个结局？不如咱们比试力气，谁输了谁就投降。"周仓一听，正中下怀，道："谁不知我周仓的力气举世无双，这回你是输定了，开始吧！"于是，关羽拿出几根鸡毛递给周仓说："你把这几根鸡毛扔过大树顶如何？"周仓使出全身力气也没有扔过去。关羽冷笑了一声："可惜呀，可惜，有勇无谋！"关羽从周仓手中接过鸡毛，插进一个铜钱眼内，往上一扔，飞过了树顶。周仓目瞪口呆，然后跪地投降。从此，人们便把关羽说成是毽子的最早发明者。

到了隋唐时代，开始有了踢毽子的游戏；宋元时，踢毽子游戏的技巧有所提高，出现了技巧踢毽和技巧踢球。《水浒传》中所描写的

高俅踢球，说明当时民间游戏中脚上功夫的花样，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明清时期，踢毽从城市发展到乡村，其规模、技巧也达到了鼎盛。当时，保定府风靡踢毽。

当年踢毽有二十八项花样，如“双风贯耳”“佛顶珠”“仙人过桥”“顺风旗”“双飞燕”等。明末清初，保定府踢毽高手有王字街的张揖田、城北“古德行”当铺老板尹戴虹、“城隍行”（商号）的吴保三，个个都有绝技。民国时期，保定踢毽最热闹的地方有王字街口、清苑县政府大门口、旧县街口、古莲池门前等。每到春节前后，踢毽高手们便纷纷献技，招来众多观赏者，把节日气氛点缀得很浓。

保定铁球健身宝

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三宝之一的铁球，即当今之健身球。铁球造型美观，球面光洁，发音清脆，小巧玲珑，具有强身益寿之功能，深受国内外老人之欢迎，素有“老人乐”、“老年健身宝”之雅号。据清朝皇室大内档案记载，纪晓岚曾把铁球推荐给乾隆皇帝做日常保健之用。传说，乾隆皇帝之所以能活八十六岁，纪晓岚活到八十四岁，皆得益于玩铁球。

保定铁球历史悠久，早在明代，保定古城之民间艺人，即已生产和出售。当时以铁为原料，高温淬火，锻打磨制成球，外表光滑，内为实心体，无音响之声。老人们用以活动关节，锻炼身体，也兼做随身防护器具。及至清朝，铁球制作工艺水平大大提高，球由实心体改为空心体，加进钢簧、音板。两个大小相同、音响各异之球为一副，置双球于掌中，用指拨动，使球按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发出清脆悦耳之声。两球音响设为一高一低、一扬一抑，美其名曰“雌雄”二球。

自古以来，健身球经医学界推崇流传民间，成为行之有效的健身器械。实践证明，它具有促进血液循环、舒筋健骨、调节大脑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消除疲劳和延年益寿等功能，是防治老年人手麻、手抖、上肢关节炎、高血压、腱鞘炎等疾病的绝好器械。

据说，1982年美中贸易联合公司主席阿尔弗莱德·皮尔斯从中国带回一副保定铁球，送给一位患有手臂神经萎缩症之友人，试用三个星期之后，手臂即开始舒展而有力。美国一位华侨朋友告诉我，现在美国已有两千多个体育活动中心在推广使用保定铁球。

据悉，目前保定铁球已远销美国、日本、丹麦、新加坡、英国、罗马尼亚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大有成为国际老年人健身之友之势。

培养灵魂之揉核桃

笔老有两个核桃，为了活动手中筋脉，几十年来经常在手心揉动，所以圆润光滑。由此忆起京城老人多有揉核桃的习惯。一位老人向笔者谈过揉核桃的“奥秘”。

那是三十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在西长安街便道上看见一位身穿灰色纺绸大褂的老人，背着双手，右手拿着两个核桃，核桃在手中顺序旋转。老人神态恬静、安详，笔者不禁问他：“这揉核桃有什么讲究吗？”

老人和蔼可亲地说：也说不上什么讲究，不过，这里面也有点趣味。核桃就是普通的核桃，但要两个要一样大、一样周正，纹路要深，不能有一点伤损——他出示他的两颗紫红发亮的核桃——我的那两个当初也是普通核桃，现在已经很古老了，我的高祖在世时就玩它，已经有一百年左右了。

揉核桃是中国人很古老的一种健身方法，古到什么年代，说不清楚，但起码要在千年以上，从古画上就能看到这东西。核桃越旧越宝贵，经过长久年代，不裂不坏，完好如初，很不容易。

老人指着他的核桃告诉我，这东西由于每天玩，人身上发出的气息浸透到它的整体里，所以它的周身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气息。时间一久，人就不愿和它分离。按照迷信说法，如果失掉或弄坏一个，就是不祥之兆。一般古玩铺里的核桃大多是人工装饰成古色古香的，是假的。碰上一对真正的“古董”，很不容易，而且要花一大笔钱。

老人又以核桃示我说：“这东西，谁不玩谁不知其中奥妙。它有‘培养灵魂’的功能，它有韵律和迟慢的动作，使一个人的精神感到松弛和舒适。当人筋疲力尽或烦闷不乐时，拿起这对核桃，很缓慢很温和地揉，全神贯注在上面，一切不快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样揉，度过许多个钟头，就能感到有一股热气渐渐爬上臂膀，慢慢伸展到全身，最后觉得神经好像被一双嫩软的纤手抚摸，烦恼事一桩桩消失，身心沉浸在一种无限畅快的感觉中，像沐浴一样轻松舒服。它真是灵魂的按摩术。”

老人说完爽朗一笑，向我点了点头，恢复了他原来的“身段”，两手放在背后，缓缓走去，又培养他的灵魂去了。

这段经历记忆犹新，笔者今天已与那老人年龄相若了，我也选了两只核桃，笔耕之余揉揉，深感确有无限奥妙！

宝三的觔跤和耍中幡

旧时，凡到过北京的人，大都要逛天桥；凡逛天桥的人，大都看过宝三的觔跤和耍中幡。

宝三原名宝善林，出身于寒苦的八旗兵家庭，少年时拜二等扑护宛永顺为师，学习觔跤。宛永顺人称“宛八爷”，这位宛八爷原是善扑营的教头，曾经制服过行刺光绪皇帝的刺客。后来在红庙附近摆摊授艺，宝善林即拜其为师，艺名宝三。由于他肯下功夫，领会又快，所以深受师父器重。

当时，有两个师兄弟见师父偏爱宝三，心里很不服气，总想抓宝三点儿短处治治他。有一天晚上，他二人见宝三一个人在屋里拿个铅笔头在写东西，便一下子把纸抢过来，到师父面前告状，说宝三小小年纪就给姑娘们传书递信，不务正业。宛八爷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两句话：“我要好好学艺，不欺人，也不被人欺。”旁边又画了些条条杠杠。他叫来宝三问：“这些画的是什么？”宝三说：“这是师父上次救人时摔跤用的招数，我怕忘了，就画了个图。”宛八爷仔细端详一番，拍手笑道：“这是一幅好跤图啊！武艺是门极高的功夫，你学得快，就是因为肯动脑子。”两个师兄弟见势不妙赶紧溜走了。

这时宛八爷拿来一个铁簸箕，指着院里的一堆土说：“你明天起五更练搬土，搬到西墙根再搬回来，要记住搬一次走多少趟。”宝三想，还等明天干啥，今晚就练。当宛八爷起早练功时，宝三已把土搬完一遍。宛八爷非常高兴，问宝三一共走了多少趟。宝三说：“一千零八趟。”师父称赞地点点头，知他未说谎话。原来这堆土宛八爷自己已不

知搬过多少次了，装满后，一千零八簸箕，一点儿不差。

三个月后的一天，宝三正和师父说话，猛不防师父给他使了个拨脚，宝三脚跟微动，但未离地。接着师父一压他的肩膀，下面又是一个扫堂腿，宝三晃了一晃，仍未被绊倒。宛八爷说：“好，脚下有根啦！”

宝三出师后，很快在天桥出了名，但也逐渐有点骄傲了。他每天开跤前，先要自夸一番：“宝三摔跤，以武会友，不是自吹，自出师后，尚未见敌手。”

有一天，话刚说完，就听人群中一声冷笑。宝三问道：“何人发笑？请下场指教！”连问三声，无人答话，但刚一转身，笑声又起。宝三急了：“背地笑人，算什么英雄？有种的给我站出来！”话音未落，人群中挤出一个老者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老人说：“久闻宝三爷大名，却如此压不住火，日后会吃亏的。”宝三说：“别讲空话，有本事当场练练。”老人说：“你可先跟我这小孩子试试。”宝三见那孩子样子文弱，很轻蔑地扔过一副褡裢：“来吧！”谁知一交手，宝三便感到不妙，果然三个回合输了三次。老头二话不说，领着孩子就走。宝三愣了一下，忽然若有所悟，立刻收了场子，向老人追去。追到永定门外一片树林中，宝三向老人深深作揖。老人说：“谦受益，满招损。太傲气，功夫就没长进了。”宝三真诚地表示了悔改之意，旋拜老人为师，又学到了很多真功夫。

宝三翫跤有五大特点：一、头脑清醒，判断准确；二、技艺纯熟，灵活多变；三、刚柔并用，巧拙兼施；四、动作优美，神态轻松；五、手、眼、身、步法，达到高度统一。

1925年，二十六岁的宝三又拜北京著名艺人王小辫为师，学到了耍中幡之绝技。中幡重三十余斤，幡柱是一根四丈高的毛竹，幡面是一块长三丈五尺、宽二尺的红布，幡顶用竹竿搭一小架，上列三个黄

布小伞和三面小旗，两端各系两个小铜铃。要将如此高大而沉重的玩意儿举在空中，并做出种种令人动魄惊心的动作，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宝三每次耍中幡，只要小旗在半空中呼啦啦一飘摆，铜铃哗啦啦一阵响，游客便潮水一般地涌来，把个小小的场地围得水泄不通。霎时间，喝彩声、鼓掌声响成一片，像是要把整个天桥都震得摇动起来似的。

宝三的中幡技艺名目繁多，“大小盘肘”“左右担山”“左右背花”“金鸡独立”“童子拜佛”“苏秦背剑”等，不胜枚举。最扣人心弦的要属“封侯挂印”和“老虎大翘尾”了，用一个小拇指托住中幡，做出各种惊险而优美的动作，是“封侯挂印”；然后中幡忽从头顶直滑至尾脊骨处，向后倾斜良久，似静又动，似动又静，称为“老虎大翘尾”十分恰当。此时，看客早看得目瞪口呆了，而宝三依然心平气静，泰然自若。

天桥“大刀张”

从前在北京居住的人，很多都知道张宝忠。张宝忠的名字是和天桥连在一起的，有人就爱大老远到天桥去看他耍一趟大刀。张宝忠的父亲就在天桥卖艺，叫张玉山，拉得一手好弹弓，能够用弹击中别人耳朵上夹的和嘴叼的泥丸，还能蒙着眼拉弓射弹，百发百中，人称“弹弓张”。张宝忠除了继承他父亲那份儿拉弹弓的绝技外，还耍大刀。一把二百四十斤重的青龙刀，在他背上、臂上来回翻飞，人们又叫他“大刀张”。20世纪30年代，一个外国人还专门拍摄了他耍大刀的影片。

张宝忠虽然以拉硬弓、耍大刀闻名于京津，但他主要的收入靠卖自制的“大力丸”。拉弓、耍刀只是为吸引人，不收钱。

笔者早年曾看过他的表演，一到场子边，就看到正当中放着五张硬弓和一把笨重的青龙大刀。张宝忠面带微笑抱拳向围看的观众说：“在下张宝忠，今儿个给乡亲父老、朋友们表演拉硬弓和青龙刀，练得好与坏不收分文。请大家赏眼吧！”只见他取过一张硬弓，左手握弓，右手食指中指扣住弓弦，大喊一声“开！”一下便把弓拉开了。他举着弓又对观众说：“请哪位进来帮帮忙，试试弓！”语音刚落，人群中走出两位青年，每人拉了一下，都未拉开；接着二人合拉，一人双手握弓背，一人双手握弓弦，同时使劲向相反方向拉，才勉强拉开半尺许。

接着张宝忠又叫徒弟拿来三张弓，左右手各握一张，脚蹬一张，吼叫一声，同时拉开三张弓。此时，观众喝彩声迭起。最后拿出五张弓，都被他同时拉圆，观众掌声雷动。有人悄悄说：“这五张弓至少得

需要七八百斤的力量！”这时，他取下弓，向观众一拍胸脯说：“要想身体棒，您得常练练身子骨，还得吃‘强身壮骨大力丸’。”他一转身从箱子里取出“大力丸”，每次购买者都十分踊跃。

售完“大力丸”后，张宝忠开始表演青龙刀。这把大刀重一百五十多斤，他把大刀搬到场子中央说：“请哪位朋友给挪动试试，掂一掂重不重？”又上来两个小伙子，一个人握刀柄，一人握刀头，两人用力把刀掂了掂说：“这刀可真够分量！”

接着张宝忠赤臂开始耍大刀。只见他双手提刀柄，轻松地做出劈、砍、扎、撩以及背花等动作，最后单臂托刀，身体旋转，青龙大刀在头顶飞舞，可见其臂力大得惊人了。张宝忠那一组组造型、一幅幅神奇力士的形象，多年来一直深深印在人们记忆里。

人们喜爱张宝忠，不光是因他会耍大刀和拉弹弓，而是从一个江湖艺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凛然正气。日本侵华期间，一个号称“无敌大将军”的日本人来到北京，趾高气扬地叫嚣要和中国人比射箭。天桥的人对张宝忠说：“就凭你这一手好弹弓，难道比不过日本人吗？咱们和他比试比试吧！”张宝忠答应了。他和日本人经过几番较量，最后，“无敌大将军”只射中一箭，而他连中三元，为中国人争了光。日本人不服气，硬要张宝忠到日本去和他们比武。张宝忠留起了胡子，说不干这一行了，没有去。从此，张宝忠声名大噪，慕名去看他拉弹弓、耍大刀的更多了。1948年我在天桥看到张宝忠时，他就是个留着胡子的老头儿，他的儿子张英杰也在地摊上表演拉弹弓和耍大刀，已是个很优秀的艺人了。

“解放”后，张宝忠还去国外表演过。他的儿子张英杰当了东北长春杂技团团长。他呢，因为年事已高，就当了长春市杂技团的教员，培养青年演员。1960年他退休回到天桥，还坚持练功，有工夫就琢磨改进杂技。1979年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张宝忠故去了，他的孙子张少杰和孙媳王大珍继续在中国杂技团表演拉弓和耍大刀。当天桥一带的老人看到这个节目演出时，总不免感慨：真可谓将门出虎子，青出于蓝胜于蓝！

天桥艺人“飞飞飞”

当年北京天桥方圆二里许，每天从早到晚各种杂货的叫卖声、耍把式卖艺的锣鼓声不绝于耳，非常热闹。这地方是一般市民娱乐和买廉价物品的场所，笔者闲暇时也常去逛逛。

得1939年的初冬，是个中午，半阴天。我信步来到宋家茶馆门前，想看看“飞飞飞”练杠子。当时“飞飞飞”在北京的名气很大，他的场子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场子中央架着龙头杠子，杠子是木制的，稳稳地架在木架上，木架又用绳索紧紧地拴在地面的铁物上。只见场中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艺人抱拳向观众说：“诸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来看我们练的玩意儿！练得好，您捧捧场，给扔几个零钱。您身上没带钱，请帮个人缘儿，您给站站脚助助威！说练就练！”北京的初冬已是很冷了，可是这时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赤臂小伙子，穿着黑色灯笼裤，腰系练功带。他纵身一跳，双手握住杠子，双腿摆浪，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坐杠动作。紧接着便是几个“大车轮”，令观众眼花缭乱，拍掌叫绝。刹那间，他突然收住动作，在杠子上做了个单手“卧鱼”姿势，收势后，又在杠子上做了个双手“八字顶”动作（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开，在杠子上拿倒立）。在这节骨眼上，场子上开始收钱了，观者向场内纷纷扔零钱，当然我也不例外。足有五分钟工夫，收钱完毕，那青年才收势下杠。

有人窃窃私语，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飞飞”。我不禁又多看了他几眼，因为他使我大开眼界。

“飞飞飞”，姓曹字鹏飞，天津人，从小跟父亲练杠子。后来随父

亲到北京卖艺谋生，先托人找到宋家茶馆掌柜的，想用门前一块场地。宋掌柜一盘算，门前有个卖艺的，一者可以三七分红捞到好处，二者人来人往，茶馆生意也可兴旺，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于是爽快地应承下来。

从此，曹鹏飞和父亲等人便在宋家茶馆门前以“盘杠子”卖艺为生。为了全家老小能吃饱肚子，不论酷暑严寒都得咬着牙出场。除非遇到下雨天没办法，只好停演。

日久天长，曹鹏飞在天桥以他那精湛的杠子技艺打开了局面，爱看他“盘杠子”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他在杠子上耍的玩意儿漂亮，绝活多，能在杠子上轻松自如上下翻飞，所以人们就送了他一个美称——“飞飞飞”。

天桥一绝朱国全

旧时久住北京逛天桥者，无不赞叹朱国全惊险异常的气功绝技。

朱国全十一岁时即拜山东统领马良部下武术教官孙占奎为师，学习少林长拳。年稍长，又受业于广盛镖局老镖师孟继永，苦练硬气功。十八岁时即以“力开硬弓”“镖打金钱”“双风贯耳”“钉板开石”等武功闻名于北京。每张拉力为一百六十斤的硬弓，在朱国全手里如同面条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弓开如满月。更令人叹服的是他可以手脚并用，将六张弓（拉力合计为一千二百六十斤）同时拉开，浑身的肌肉因用力而块块饱绽，而他脸上的表情却轻松愉快，笑容可掬。

如果说拉硬弓是以力取胜的话，那么飞镖则是朱国全以巧见长的绝技。镖是形似枪头用以投掷的武器。1935年，朱国全的师爷孟继永曾在天桥表演过“镖打香头”，朱国全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绝技。他表演的“镖打金钱”，是将一枚铜钱立放在助手的耳朵上或平放在前额上，只见一锐利雪亮的钢镖蓦然飞出手心，如同一道闪电，不偏不倚恰恰击中钱唇，当的一声响，镖与铜钱俱落于地。再看那助手的耳朵或前额，安然无恙，一根汗毛也不曾损伤。如此稳、准、巧，盖因得镖术真传而又功底深厚。

朱国全表演的“双风贯耳”与“钉板开石”，每每把观众吓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表演双风贯耳时，朱国全侧卧于条凳之上，下耳垫两块青砖，上耳压四块青砖，由助手抡锤猛击。铁锤落处，青砖崩裂，朱国全腾身而起，向观众抱拳微笑致意。“钉板开石”，更是惊险，在众目睽睽之下，朱国全脱光上衣，仰卧在钉着三百五十根五寸长的铁

钉板上，七八名剽悍的小伙子将一块三尺长、二尺宽、半尺厚，足有四五百斤重的大石条平放其胸腹部。接着，几个彪形大汉轮流用一把十八斤重的大铁锤猛击石条。火星四溅，粉末横飞，一声巨响，石条破碎，围观者无不屏住呼吸，为这惊人的场面捏一把汗。正当观众惊骇之时，朱国全轻松跃起，前胸后背毫无损伤的痕迹，观众为之鼓掌叫绝。

气功起源于我国，两千多年以前就有文字记载。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形体气血，意运内行”的论述。朱国全早年曾语人曰，练硬气功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必须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方能成功。听闻朱国全年逾古稀时功夫仍不减当年。

天桥怪杰“大兵黄”

被老北京人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名叫黄才贵（后改名黄德胜），字治安。因身材魁梧，且行伍出身，故得“大兵黄”之绰号，而其本名反而少为人知。

“大兵黄”少年时曾拜董海川第一代传人学习八卦掌和八卦门器械。二十岁以后，先后在张曜、马玉昆、蒋桂题、张勋等军阀部下当兵，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4）参加甲午战役。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大兵黄”从张勋的“辫子军”中退役，因生活没有着落，遂落魄至天桥卖艺。初期，“大兵黄”尚练些武艺收钱，后来专门对军阀权贵人物进行嬉笑怒骂，每骂完一阵，便卖一回药糖。

20世纪30年代时，北京的一些报刊均刊登过“大兵黄”的照片，其形象为头戴青缎帽儿，花白胡须胸前飘，上身穿绛紫色马褂，下身着黑绒套裤，足蹬青缎面千层底双脸儿鞋，手持一个油光红润的葫芦和一挂香木念珠。如此不伦不类的打扮及其跳脚狂言的特殊表演，使他排进了“八怪”的行列。他的表演不仅引起彼时广大游客及天桥其他艺人的兴趣，而且为各报的新闻记者甚至当局所瞩目，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大兵黄”骂军阀，如同说书一般，每段自成一回，淋漓尽致地揭露各军阀的内幕与丑闻。虽不免有些夸张或不实之词，但总的来说与事实基本相符。

譬如骂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把他出身土匪以及先后投靠直系军

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情况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以“他妈的小舅子”这句口头禅将话一转，骂张宗昌有三十三个姨太太，是“望乡台上摘牡丹——不知死的鬼”！张宗昌在山东任军务督办时，有一年庆寿，宴请麾下师长、旅长，席间命一最得宠的爱妾品箫，曲罢满座皆叹服。爱妾说：“奴家吹箫不如我翁公吹得好。”翁公者，乃张宗昌之父，原是吹鼓手。张宗昌闻听此言，恼羞成怒，以为扬其家丑，当夜就将爱妾枪毙了。“大兵黄”绘声绘色地说至此处时，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将手中的白蜡杆子（练武的器械）往地下啪地一摔，大骂一声：“他妈的小舅子，张宗昌活畜类！”众人听了，咋舌的咋舌，缩脖的缩脖，点头的点头，在深感快慰和钦佩的同时，也不免为他捏着一把汗。

“大兵黄”骂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更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曹母乃麻脸、缠足，有一年赴天津看曹锟，坐马车逛街，无意中将小脚儿露了出来。曹锟拜见母亲时便说：“有件事禀告母亲，孩儿乃堂堂大总统，希望你今后出门别再把脚伸出来。给我留点儿面子。”翌日，曹母又外出，故意露其金莲。是夜，曹锟复上堂拜见，未及开口，母先曰：“有道：‘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似你这般忤逆子，不配做我儿子，更不配当总统。你当总统，百姓遭殃！从今以后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此时的“大兵黄”亦敢大骂日本兵。他将耳闻目睹的日寇的种种罪恶行径大胆披露，严词斥骂，因此而被外五区警署多次拘禁。但一俟释放，依然照骂不误，表现出一股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凡是当年听过“大兵黄”骂世的人，无不称道他是一个性情耿直而不畏死的硬汉子。这位奇特的天桥艺人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具有无穷的魅力。只要他斜背着满满的一口袋沙板糖（长方片形，内含薄荷）一露面，立刻就被众人围拢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买他的药糖，不是为了解馋，而是要听他的“骂世”，以排解各自心中的忧烦。

“大兵黄”屡被拘押，他全然不放在心上，每次开骂之前，他总说：“我身上带着殃榜呐！”所谓“殃榜”，是旧时迷信之说，人死后要请阴阳先生将死者姓名、性别、年龄及其“出殃”（指灵魂脱离躯体）和“回殃”（谓灵魂回家探望）的时辰写在一张黄纸上，于入殓时焚化。“大兵黄”带殃榜之说，犹如武将抬棺而战，含有拼死之义。

记得文人金寄水作过一首咏“大兵黄”的竹枝词，略谓：骂不绝声立广场，群皆瞩目大兵黄。官僚军阀从头数，博得游人笑断肠。

技绝“坛子王”

“耍花坛”是中国杂技保留节目之一，以其动作优美惊险而颇受中外观众欢迎。

这种力气与技巧相结合的玩意儿，自古有之。《通典·乐典》记载：

>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突厥染干来朝，帝欲夸（占据）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即东京洛阳）。于华林宛积翠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绳柱等，如汉故事（指后汉天子于正月旦受契丹舍利官朝贺时，命倡女做绳戏事）。又为夏育（战国时卫国著名勇士，传说能力举千钧、生拔牛尾）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盆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

由此可见，我国的耍坛之戏，源远流长。

至清代，宫廷生活日益奢侈，凡民间之百戏，无不招至宫中，以尽四季之欢。于是，诸般艺人不得不顺应形势，力求花样翻新，并不断扩大组织，广收门徒，以便择出佼佼者赴宫中演出。

晚清时，耍坛之戏颇受宫中欢迎。为此，北京的耍坛艺人纷纷结成若干团体，各聚一处，并悬挂不同的吉祥字的招牌，如位于东安门外奶子府的“万寿花坛”、东交民巷鞑子馆（蒙古进京贸易所居处）内

的“长清万年花坛”。这些坛会皆高手荟萃，经常奉命至宫中或中南海、颐和园等地献艺。

在北京的大庙会上以耍花坛而享有盛名者号称“坛子王”，其膂力过人，技艺绝伦，不仅名满京华，而且为诸多外省市游客津津乐道。“坛子王”所耍之花坛，大则百余斤，小则十余斤，其上均有“云头儿”“飞龙”“翔凤”等古朴的彩绘，光洁美观，与艺人特制的古典服饰相映成趣。如此沉重而滑溜儿的花瓷坛，一经被“坛子王”抓在手里，就仿佛变成了一粒弹丸，轻轻地抛起来之后，或以前额接之，谓之“脑尖盘”；或以两肩交替接之，谓之“二郎担山”；或以两肘交替接之，谓之“左右盘肘”；或合掌并翻腕接之，谓之“童子拜佛”；坛子忽而下坠，即将触地时速以脚面承接并左右频频颠倒之，此谓之“仙人蹴球”。诸般花样儿循环交替表演，但见花坛儿上下翻腾、左右摆动，而落于艺人身上时，或直立，或横卧，或倾斜，或静止，或转动，恰似鳔胶粘在身上，绝无半点儿失误。

“坛子王”最惊人的绝技有“蛟龙戏珠”“朝天一炷香”“倒接紫金冠”。所谓“蛟龙戏珠”，是将十余斤重的小号坛子抛向空中后，以下颌承接，继而抖动下颌，令花坛悬空转动一百八十度或三百六十度，使其倾斜着正立或倒立于下颌处。“朝天一炷香”是以一拇指或一食指承接大花坛底儿，其高度的准确性与异乎寻常的指力，令人瞠目。表演“倒接紫金冠”时，他先摆出“骑马蹲裆式”，而后将坛子从胯下向后上方抛出，刹那间以头顶接住，坛口儿朝下，若戴冠之状。其技艺之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坛子王”早年曾是“万寿花坛”的主要成员。现在所练花坛儿者皆为其再传弟子，他对弘扬中国杂技表演艺术功不可没。

北京二闸的“狮子会”

北京二闸的民间杂技——“狮子”，远自清乾隆年间就已名满京华了。当年，老人们一提到二闸的狮子，无不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娃娃们一说起二闸的狮子，无不指手画脚，眉飞色舞。

从崇文门外东行二里许，便是蟠桃宫，再北行过一座石拱桥，穿过残垣断壁的东便门，即到了二闸。这二闸本是元代郭守敬所凿通惠河（后改大通河）的第二道闸口，附近有一个赛会组织，名曰“狮子会”，会首是德高望重的武林英杰佟二爷。这支实力雄厚、独树一帜的民间杂技队伍，除每年中元日各寺院设“盂兰盆会”时献艺外，另于正月初一至十五，在京城巡回表演，为北京的春节增添绚丽的色彩与欢乐的气氛。

八名大汉分别扮演“太狮”和“少狮”。一阵紧锣密鼓之后，人群深处蹿出一对太狮来。那血盆般的大口，灯烛般闪烁的眼睛，竟把初次围观的胆怯者吓得两股战战，冒出一头涔涔冷汗。两只气势凶猛的狮子，忽而摇头摆尾，忽而抖动鬃毛，忽而弹爪搔痒，忽而相对而卧。突然间，一个斗大的金色缕空绣球自空中落地，惊动了正伏在地上昏昏欲睡的两只狮子，于是两狮霍然纵身扑向那绣球，激烈地争夺起来。闪转腾挪，翻打扑跌，将那金光灿灿的绣球时而衔在口里，时而立于头上，时而在腰间滚动，时而又倒踢于空中。及至四只小狮子跳跃出场后，老狮子立即显出怜爱之态。或闻闻其头，或挠挠其腿，或任凭其滚着绣球嬉闹，着实把动物界的母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围观的妇女无不发出会心的微笑。

二闸狮子会的老规矩是：只要走会时沿路过桥，必表演“下桥戏水”之绝技。根据桥的大小与水的深浅，有“单狮戏水”、“双狮戏水”或“三狮戏水”之别。笔者当年曾在天安门金水桥目睹三狮戏水之奇观：只见两只太狮与一只少狮在桥栏处依次首尾相接，倒挂下来。那最底下的一只少狮，将头部与前爪浸于水中，时起时落，时沉时浮，搅乱了一片春波，把万点珠玑抛向空中。而后三只狮子同时抖动头身，把系在颈上的一串铜铃摇摇得哗哗作响。其技艺之精湛让人叹为观止矣！

据说，二闸狮子会的几位末代传人如今也已桃李满天下，许多高徒还被聘为杂技团的演员。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宗师的绝活，正活跃在各地的舞台上。

鸟语“画眉张”

早年的杂技艺人，由于擅长某种技艺，人们就爱给他们起上一个风趣的绰号，像“快手卢”“狗熊程”“坛子王”“云里飞”等。老北京大多知道，天桥有一个以模仿画眉鸟叫而闻名的“画眉张”。“画眉张”原名张增才，据说是河北肃宁县人氏。20世纪40年代，笔者曾看过他的表演，果然名不虚传，那忽而洪亮高亢、忽而低沉幽咽的嗓音和那潇洒的身姿，便令观众喝彩不断。后来有人送了一张“河北画眉张，天下第一名”的条幅。未料，条幅挂出，竟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次“画眉张”正表演到精彩处，一个外号叫“杨拐子”的无赖，领着几个打手闯了过来。此人乃一富绅恶少，自小不务正业，整日以养画眉为乐。据说他那只“眉太后”是花了五百大洋从内蒙古购来的，别说鸟本身不同凡响，单那金钩玉挂的鸟笼，就令众人咋舌。

“杨拐子”挤到场中，先是阴阳怪气地揶揄了“画眉张”一番，接着竟蛮横地要他的鸟与人对叫。

“画眉张”毕竟闯过江湖，连连向“杨拐子”鞠躬作揖，想说几句好话息事宁人。然“杨拐子”不依，“画眉张”被逼无奈，只好答应。

人与鸟对叫，怎个比法，难以想象。只见“画眉张”不卑不亢绕场一周，谢过观众人，然后双目如炬射向“杨拐子”，要他道个比赛章程。

那“杨拐子”自恃为地方一霸，目空一切，声言“画眉张”先叫，后

由“自己”的画眉学，如难不倒画眉，“画眉张”便为输。如果输了，要当众拜他为师，且从今再不准进京城一步。

好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画眉张”端详了一番那只画眉，便来了个“蚊群低鸣”。只听“嗡嗡嗡”，真个似蚊群漫空飞来，时强时弱，时远时近，时断时续，不绝如缕。

那“眉太后”虽非徒有虚名，但怎么也学不上来。那“杨拐子”无地自容，只好提着鸟笼悻悻地走了。

亦趣亦绝抖空竹

早年在北京东安市场升平茶社看什样杂耍，王雨田、王葵英父女一边抖空竹，一边说：“抖起来了，抖起来了——”北京人习惯把升大官、发大财、出大名叫“抖起来了”，一语双关，十分有趣。

抖空竹既是儿童游戏，又是杂技表演。它在北京的历史也很长了，而且受到学人的重视，被写入文学作品中。嘉庆时前因居士的竹枝词《日下新讴》云：

杨柳抽青复陨黄，
儿童镇日聚如狂。
空钟放罢寒冬近，
又见围喧踢毽场。

诗后注云：“京师旧谚云：‘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至今犹然也。空钟截竹为之，高二三寸。实其两端，旁开一孔，中心贯梃，梃出筒外，绕以长线，一手持线急抽，乘势放脱，就地旋转，嗡嗡有声，为放空钟。”此处所说“空钟”，就是“空竹”，所谓钟者，因为抖起来声音嗡嗡作响。如单空竹（一头圆扁，一头尖，如葫芦尖），抖转之后，倒放在地上，即旋转不停，嗡嗡作响，如钟声余韵。更有一种小的，两头尖，如前面注中所说“中心贯梃”，“乘势放脱”。这就好像放陀螺一样，不能抖，只能绕上绳，一抽一放。这后来北京叫作“风葫芦”。再有“钟”“竹”音近，而且空钟圆筒、圆盒都是竹

制，所以又叫作“空竹”了。康熙时人柴桑的《燕京杂记》云：

> 京师儿童有抖空钟之戏，截竹为二短筒，中做小干，连而不断，实其两头，窍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端而擞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

柴桑所记，更为明确，是“抖”而不是“放”，竹筒是二而非一。如用现代物品来比拟，则其形状如举重运动员之杠铃，或练臂力之哑铃耳。两则记载，所说并非同一形状。这种玩意儿北京叫空钟、空竹，外地叫地铃、扯铃，以北京的最好。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云：

> 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即外省之地铃。唯京师之空钟，其形圆而扁，加一轴，贯两车轮，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

一个小小的玩意儿，有这么许多文献可证，足以看出它亦是中华悠久文化的一个细胞。

竹枝词注解中所引的谚语“杨柳儿青”，那在明人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之《春场》中就已引用了。可见这首儿童歌谣至少是明代的产物，迄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

空竹什么年代变为杂技项目的，一时说不清。清代的杂耍园子，杂耍有文有武。“文”即单弦、排子曲、各种大鼓评书、相声等，“武”即武戏法、弄盘子、抖空竹等。但台上表演和摆地摊又不一样。有的武玩意儿，只能在地摊上表演，如拳棍、摔跤、耍叉等。至于空竹，则既能在台上表演，也能在地摊上表演，比较自由。我最早看空竹表演，还是在西单商场地摊上，表演者是王雨田、王葵英父

女。那时王葵英岁数小，学艺未成，只能在场子中跟着打下手，或者拿着小竹箩向观众讨钱。王雨田是耍叉的，北京杂耍武档中，耍叉是单一功，叉上有铁环，耍起来哗啦啦乱响，光闪闪上下飞动，叉还能在脖子上不用手扶，自动绕来绕去，十分惊险。当年著名武生俞振庭唱《金钱豹》耍的就是这种叉。老式戏台有柱子，一挑台帘，把叉先扔出来，钉在台口柱子上，叉环乱响，叉杆乱颤，坐在台前的人虽然吃惊，但还爱看这一手。王雨田耍叉，无此惊险动作，只是叉环哗啦啦乱响，先耍一通，吸引看玩意儿的游客。等到四圈板凳上坐满人，圈外站了不少人，父女二人就表演空竹了。抖空竹以王葵英为主，其父把场做配角。

照例王雨田先把空竹抖转了，一松绳子一扔，他女儿在一丈外一张绳子接住，一边抖一边还要说笑话。先抖双的，再抖单的，再抖茶壶盖，再抖酒葫芦。前两样是竹木制品，掉了不会摔坏。后者是瓷的，不能掉，一掉就碎了。

王雨田、王葵英抖空竹，有一套动作，把空竹抖转之后，接着抖出各式花招，有“风摆荷叶”“黄瓜架”“回头望月”“片马”“流星赶月”等。

冬末春初踢毽子

踢键子是我国独具民族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之一。把一束鸡毛插在铜钱上，再以布条缠牢，扎成一个惹人喜爱的毽子。毽子的踢法多样，可以比次数、比花样，对活动关节，加强韧带，促进身体灵敏和平衡均有良好作用。

踢毽子是从古代“蹴鞠”演变而来的。蹴鞠本是军中习武之戏，类似今之足球赛，相传为黄帝所创。经过几千年，鞠被毽取而代之，娱乐范围亦由军中扩展到民间。

踢毽子之记载，最早见于元代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之《小经纪》。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所载歌谣云：“杨柳儿死，踢毽子。”反映出踢毽子活动集中在冬季与初春。至于清代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之《踢毽儿序》所云：“缚雉毛钱眼上，数人更翻踢之，名曰攒花，幼女之戏也。”不仅指明了毽子的扎法，而且阐述了玩法与娱乐对象。

从朔风凛冽的寒冬到和风荡荡、杨柳依依的阳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或大杂院里，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女孩儿，一边唱着儿歌，一边踢着五颜六色的毽子。有一首儿歌歌词至今记忆犹新：

小毽子，飞起来，姐姐妹妹赛一赛。里踝踢，外踝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

花花绿绿的毽子在儿歌声中上下翻腾，左右飞舞，女孩子们兴致勃勃，其乐融融。

以踢毽为业的翔翎艺人，讲究用染成红绿等颜色的雕翎扎毽，蓬松柔软，绚丽斑斓。表演时手舞足蹈，运用磕、蹬、弹、拐、跃等基本技巧，表演里外帘、耸膝、拖枪、突肚、剪刀抛、佛顶珠等多种名堂。一整套动作由简而繁，由易而难，不稍停息，再看那雕翎毽儿，忽腾忽伏，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良久不坠地，令人眼花缭乱，啧啧称叹。

1940年前后，北京翔翎艺人谭俊川以奇巧的踢毽绝技而蜚声中外。谭氏技艺的特点是：动合机宜，娴熟优美，舒展大方，变幻莫测。毽子一经被他踢起来，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能够随其意准确而巧妙地落在手、面、背、胸、肩、膝等不同部位，亦可将毽子依次滑至胸、腹、膝、脚，毫厘不爽。谭氏最拿手的是“倒勾雕翎”，猛地一脚将毽子踢入空中，旋即躬身向后倒立一腿，刹那间以脚掌接住毽子。喝彩声未绝，又见其轻轻一翻脚腕，再次将毽子弹向空中。如此高难动作，绝非一日之功矣。

名噪欧美的“北京班”

河北省吴桥县是中国的“杂技之乡”。据说国内大小杂技团都有吴桥籍人，故流传着“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的说法。由此想起了早年的“北京班”杂技团。

1920年夏，吴桥县杂技艺人孙凤山、孙凤鸣、刘君奎、韩恩玉、史德俊、杨开景、王新桥、孙振声等八人组成“北京班”杂技团，应一位挪威外交官的邀请，去西欧各国演出。

孙凤山率领的“北京班”由天津经俄国西伯利亚，到达德国。开始时，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处处受刁难。有一次过一个关口，那里放一横杆，先过杆才能过关。孙凤山知道这是在欺侮中国人，也未言语，向班里的人使个眼色，全班人心领神会，每人一个“单蹦”轻轻地跳了过去，守杆人惊叹不已。那时，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杂技班要在异国找到第一流的剧场演出，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孙凤山鼓励大家：“咱吴桥是中国杂技的发源地，有几千年的历史。咱们一定要演好，为中国人争气！”强烈的民族感，朴素的爱国心，再加上一身绝技，“北京班”终于登上了外国的艺术舞台。

在德国，他们首次演出了“百丈旗”“杠子”“飞去来器”“转碟”“武术对打”等节目。由于他们的节目独特新颖，技艺高超，一下子轰动了柏林。演出时，他们身着龙袍，威武庄重，极富民族色彩，故而被誉为“中国北京皇家杂技班”。自此，许多西欧国家的一流大剧院，纷纷邀请他们出场。他们先后去过法国、匈牙利、捷克、巴拿马、智利、美国、瑞士、巴西等二十多个国家献艺，赢得了很高的评价。有一次

在美国演出后，旧金山的《华侨日报》载文称：“孙凤山君等人来埠演出，技艺精湛，为国争光。”

孙凤山因技艺高超，被吸收为“旅美中国国技研究会”会员。

国际杂技明星史德俊

在中国杂技之乡吴桥县，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两次下西洋、在国外度过三十多个春秋、名震欧美的国际杂技明星——出自杂技世家的史德俊先生。

史德俊八岁学艺，自幼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十一岁时就以“水流星”“耍碟子”“软杆子”“古典戏法”等十几个高难的杂技节目被誉为“童星”。这年秋天，他随从西洋回乡招人的杂技艺人王秀清去了德国，加入德国卡尔·毫其米拉马戏棚（类似大篷车），到各地流动演出。

史德俊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同各国杂技表演者的交往中，逐渐学到了更多的节目，如“手技”“口技”“魔术”“滑稽”等，技艺日臻全面，成为马戏棚里的“台柱子”。他们的马戏棚先后到过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以史德俊肖像为标志的海报吸引着无数观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史德俊受聘到德国阿尔及拉马戏棚挑大梁。在这个马戏棚里，史德俊以他精湛的技艺，特有的风采，征服了更多的观众。大报、小报纷纷刊登他的照片和演出消息，阿尔及拉马戏棚所到之处，观众十分踊跃，人们争看这位东方杂技明星的风采。

在与众多国家演员的接触中，史德俊学会了俄、德、英、法、意、葡萄牙等六国语言，能熟练地与外国人交谈，这便增进了朋友之间的交往和他自身技艺的提高。

在国外演出十多年，史德俊饱经沧桑。他看到中国杂技艺人在国外漂泊流离，地位低下，大部分都是跟随外国马戏棚演出，便决心回国修整、组建自己的班子。1924年他回到故乡，挑选了三十多名技艺超群的杂技演员，经过集中排练，组成杂技班。翌年，以“北京皇家班”的正规杂技团体名义二次下西洋献艺。

“北京班”一出现在国外便打响了，当时颇有声望的柏林“冬季花园”剧场盛情邀请他们去演出。在那里演出数月，场场爆满，史德俊既当掌班人，又做主力演员，声誉更高。

在柏林演出期间，史德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外国姑娘——杂技同行埃米小姐。埃米身材亭亭玉立，会走钢丝，在钢丝上翻、转、走、卧，婀娜多姿。她每次演出，史德俊都要做她的场外指导，埃米也深深迷恋着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青年。俩人结婚后恩恩爱爱地生活了三年，生下儿子，起名为“中西”，作为两人结合的纪念。史德俊在欧美演出多年，深深眷恋着故乡，后来决心回国。回国时埃米不愿同归，最后他只好下狠心抛下妻儿回到故土。

近翻杂技史料，在《世界天下艺人之家》会员表中又见到他的名字。不知如今史德俊的杂技艺术可有传人否。

中国的“杂技卓别林”

卓别林是电影艺术大师，他的表演幽默风趣，别具一格。中国杂技界有一位“卓别林”，他的名字叫赵凤岐。

记得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看过一次他的表演：大幕拉开，他身着旧西装，头戴小礼帽，嘴上蓄小胡，领前系着领结，脚蹬尖头大皮鞋，手拿文明棍，迈着鸭子步摇摇摆摆出场，宛然“卓别林”的派头。接着他端来一把椅子，怎么也放不平。忽然瞪起圆圆的眼睛，四下搜寻，竟找不到一块垫平椅子的瓦片。于是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垫在一条椅腿下，椅子居然平稳了。他悠然自得地坐在椅子上，拿起文明棍，从下端、上端以及手握的拐弯处吹了起来，奇怪的是都让他吹响了，观众爆发出一阵哄笑。

赵凤岐是“杂技之乡”河北吴桥人，外号“麻子红”。据说早年因脸上有几颗麻子，在各地演出时，一出场就说：“诸位，我脸上有麻子，不是红的是白的；可是我演出，你们一笑，麻子就变成红的了。”久而久之，便有此艺名。

赵凤岐何以又有“杂技卓别林”之称呢？原来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八九岁时，曾随师傅在英国一家大马戏团表演过中国传统杂技。正巧卓别林也在这个团，赵凤歧细心模仿卓别林，卓别林也尽心教他，他们常常同台演出。几年之后，赵凤岐与师傅离开英国，跑遍南洋，最后落脚在印度孟买。正巧，这时卓别林也到孟买演出，借此机会他又向卓别林学习了鸭子式走路、翻椅子、吹笛子、拿文明棍、臀部和两手撑地走路，以及面部做各种笑的表情等技巧。卓别林见他学得惟

妙惟肖，因此又邀他同台演出。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他离开孟买时，卓别林特地送给他一顶小礼帽。我观看的那次演出，那顶小礼帽大概就是卓别林的赠品吧！

后来，赵凤岐又流浪到日本，加入了木下马戏团。翌年，又流浪到朝鲜汉城，加入了普田马戏团。

这时，他除了表演拿手的串场滑稽节目外，还表演马上蹦步、钻火圈、马上跟斗、后翻等马上节目。由于他的技艺过人，马戏团老板十分赏识，视他为台柱子，主动为他置办行头、道具，还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之意。但他辞谢了老板的好意，毅然告别马戏团，踏上了归程。后来听说赵凤歧发展了马上的功夫。他表演的“马上斩蔡阳”节目，穿戏装盔甲，戴髯口，脚蹬粉靴，手舞青龙偃月刀，骑在马上，活似真关羽再现。

马戏名家孙福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戏名家孙福有在上海、南京、桂林、重庆等地很有名气。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表演“空中飞人”的马戏团，他的“有盖大篷”也为中国首家。他携带一批从南洋买来的野兽，如狮、虎、豹、象、熊、蟒等，随团演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

孙福有是河北省吴桥县孙龙庄人，幼年家境贫苦，以“耍猴”为生。青年时期随同乡去俄国，在俄国的马戏团学会了“空中飞人”节目。归国后，即招集了家属、亲友及同乡少年，自组马戏团。在国内表演出名后又到新加坡、缅甸、暹罗等地演出，名声大噪。

1933年，笔者在上海“大世界”看过孙福有马戏团的演出，印象最深的是孙福有之女孙玉香表演的走钢丝。她在钢丝上骑独轮自行车前后滑行，还在她头上立一人“拿大顶”，当时堪称绝技。

孙福有自幼失学，不会写汉字，却写得一手流利的俄文。他练功十分刻苦，教徒弟也十分严格，虽亲生女儿也毫不放松。孙福有还擅长杂耍表演。他同时抛出雪茄、礼帽和手杖，三者长短不同、轻重不一，最后帽子落在头上，雪茄被嘴叼住，手杖被手接住。他还会“飞刀”，五把利刃连续掷出，投向对面木板前立着的人的头部，结果是头上方一把，左右各二把，刀锋紧贴面颊，观众为之瞠目。

孙福有曾以营利所得一万四千元在故乡吴桥孙龙庄建筑一所洋楼。竣工不久，孙玉香回乡探亲，土匪闻讯前去“绑票”。孙玉香因抗拒被杀害，孙福有之母被绑走。其后，在吴桥遂无孙福有的亲人，其

新筑楼房亦未悉归属何人。

孙福有1944年病殁于重庆，终年六十三岁。听说，他的马戏团中的许多成员现已是国内各大杂技团的重要演员，有的做了杂技教师。这真令人欣慰！

戏法大师韩敬文

杂技者，古之“百技也”。旧时跑马走绳、弄蛇耍熊、吞剑断石、舞狮、耍碟、抖空竹、耍花坛，以及戏法幻术、武术杂技等，皆包括在内。然单以戏法与魔术论，却大不相同。戏法为我国所故有，魔术则由海外传入。戏法以演员本身之功夫取胜，魔术多以奇巧之机关、道具为基础。魔术演于舞台，后屏悬幕布，三面对观众，有遮掩余地，且袖阔囊多，便于藏掖。戏法来自“撂地”，四面空旷，众目围睹，有时裸露双臂，无可遮掩。看看戏法表演之“仙人摘豆”“平地抠碗”，与魔术表演之“纸牌缩小”“丝巾染色”，孰为难易，即可知矣。

韩敬文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戏法大师。他把中国的戏法传播到欧洲，同时将西洋魔术首次介绍给国人。

韩敬文是河北滦县麻坨韩家哨村人，自幼跟随叔父韩私谦学习“韩家门”武功和戏法。少年时代，就练出一身腰、腿好功夫，掌握了“小搬运”的技巧，能把百余斤的坛、罐、碗、碟等挂在身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稳、准、快地用手去撕、采、择、解这些光滑的器皿。他演出的戏法丰富多彩，如变功有“仙人摘豆”“大碗飞水”“金盆托火”“刀铡席卷人”等；武功有“吞宝剑”“上刀山”“耍坛子”“顶人”等。他的表演技艺精湛，变幻莫测，很受观众欢迎。

光绪三十年（1892），韩氏叔侄挑着担子到北京天桥卖艺。他们那精彩的表演，使观者眼花缭乱，一时名噪京城。有个德国军官对韩氏叔侄的戏法非常佩服，邀请他们到柏林演出，并答应给予协助。于是他们搭乘德国兵舰漂洋过海抵达柏林。自此，“韩家门”的中国戏法

踏出国门，走向世界。

韩氏叔侄给自己的班子起名叫“环球幻术团”。该团在德国的各大城市演出，场场爆满，赞扬之声不绝于耳。随后，又到其他国家巡回演出，声名大振。该团在欧洲各国演出六年有余，韩敬文则提前三年回国。

韩敬文买回许多魔术道具，并在奉天（今沈阳）购房产、买行头，组织了“亚细亚大魔术团”，自任班主。演出时，他身穿燕尾服、头戴高顶礼帽、手持文明棍，率领弟子们登上舞台，在洋鼓洋号的伴奏下，表演西洋戏法，让国人耳目一新。当时他主演的西洋大型魔术节目有“大变活人”“炮打真人”等。后者即在台前上空高悬一个两层的木箱，舞台上放一尊木制模拟大炮，将小孩装入炮筒，再糊一张白纸于炮口处。他一点火，后台炮声大响，顷刻，烟起纸裂，炮筒空空如也，放下高悬的木箱，逐层打开铁锁，小孩已在其中矣。

古典戏法圣手罗文涛和冯书田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大观园”杂耍园集曲艺、杂技于一堂，名曰“十样杂耍”。登台艺人皆为当世之冠，演出常常轰动津门，盛极一时。当时表演古典戏法的高手为“罗满台”（罗文涛）与冯书田。

罗文涛与冯书田长期搭档。登场后略向观众交代数语，先由冯书田表演“手彩”，如“目中取簪”“口内穿针”等节目，手法神速干净，喝彩声不绝。

罗文涛即在冯书田做表演时，悄悄退回后台，俟其再次出场时，已换肥大长袍，长可及地，步履蹒跚走至台前正中。他手执一布制方毯，只见将布毯向右肩一搭，略一折腰，随即捧出直径逾半尺之瓷盘，上置寿桃、寿面及干鲜果品之类。递交与冯书田，冯即应声高呼“八仙上寿”等吉祥贺词，再将瓷盘放置台板上。每遮方毯一次即捧出一盘，随遮随变随放，速度极快，一霎时，盘满舞台。罗文涛被称为“罗满台”即源于此。

精彩处还在于“满台”瓷碟寿礼之后，罗文涛又搭上方毯，只见略一矮身，双腿向后一撤步，腿底出现二尺高之古瓶，上插古戟；继而又一蹲，又捧出一巨型玻璃盆，满贮清水，内有活鱼嬉游其中。最惊绝者，为最后一场。罗文涛纵身跃起，翻一“吊毛”（前滚翻），人站起时，一口黄铜大盆出现于台上，盆中有熊熊火焰高达尺余。二人在雷鸣掌声中退场。

在罗文涛易袍蹒跚登场之际，观众何尝不知所变之物尽夹带于肥袍之内，但须臾间陈列满台，神速敏捷，干净利落，不能不令人惊叹。此种戏法明知其假而仍爱看，盖欣赏其功夫也。其技为世界所罕见，诚非虚夸。

余离故土四十余年，罗文涛恐早已作古，观国内杂技光彩夺目，有继承、有创新，料想罗、冯定有传人矣！

张慧冲击败外国魔术师

20世纪20年代，有过中国武术家打败外国拳师的事，一时传为佳话；而中国魔术界，亦曾有击败外国魔术师的一段趣事。

打败外国魔术师的中国魔术师叫张慧冲。张慧冲当过领航员、副船长，并主演、导演过无声影片十多部。著名电影艺术家吴永刚、韩兰根都与他合作过。他还办过“联合影片公司”“慧冲影片公司”。照理，他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家的，未料，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将他从影界“抛”到了魔术界。

1930年7月，德籍魔术师聂哥拉到上海演出。本来，各国的魔术是有自己特色的，可是，这个狂人竟用此来侮辱中国人，在报上登出一则广告：“聂哥拉的魔术独霸全球，华人如能与我匹敌，照样全部表演一次，我即赠予一千金元，并永不在中国登台。”

这简直是欺我中华无人，张慧冲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禁拍案而起。他想起了十九岁那年，在兰心戏院看外国魔术师戈定的表演，因为自己是中国人，退场时只能从边门出而不能从正门出；他也想起了在上海谋生时，就因为是中国人，只能当副船长而不能当船长；他更想起了他拍的电影不得在上海所有洋人办的影院首映……他再也坐不住了，想把自己平素学习、观摩来的魔术技艺展露一下，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第二天张慧冲便在报上针锋相对地登出广告，赫然写道：“国际魔术比赛，张慧冲演出聂哥拉全部节目。”

经过十二天的准备，“比赛”正式开始。张慧冲表演几个小节目时，聂哥拉还不以为然。当张慧冲表演他最得意的节目“腰斩活人”时，他惊呆了，口中念念有词：难道这个中国人也能演？

聂哥拉演此节目，是女助手进入一个长方形木柜，合上柜盖，拦腰插入大铁片后，打开中间柜盖，表示腰已斩断，但上下两部分都不向观众交代。而张慧冲的表演呢，只见他照样“腰斩”后，一下子把上、中、下三部分盖子全部打开了，聂哥拉看到上面孤零零悬挂着一个头，下面只有两条人腿，唯独中间一无所有。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张慧冲胜利了。

第二天，报上登出大字标题：“聂哥拉偃旗息鼓而去。”从此他果真未再到过中国，当然，金元是一个也没有留下。但张慧冲由此出了名，从此走上了魔术表演的道路。

体坛纪事

北京的第一次运动会

北京各学堂以前从未举行过运动会，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大学堂有开运动会的消息。于是京师译学馆自四月十九日起，在北河沿望恩桥北侧（东安门内北河沿）开辟了临时练习场所，以一百二十步为竞走标准（当时尚无田径赛名称），十人一排，每天分两次练习，次日又增为二百三十步。

四月二十四日午，京师译学馆全体学生赴大学堂运动会，会场在北河沿北银闸胡同附近。会场广阔，中树当时的国旗（龙旗），四周缀以万国旗帜。有天津派来的警察乐队，四面为各学堂特设座位。比赛项目有竞走、跳高、掷槌、拔河等。

四月二十五日为正式会期，亦为北京学界第一次体育运动会的纪念日。各学堂队伍齐集后，由大学堂监督李家驹领导举行开幕仪式，奏乐、升旗、唱国歌（本人第一次听到的国歌）。场之北面为京师译学馆座位，稍东为实业学堂和进士馆座位，西为顺天中学堂、五城中学堂、八旗高等小学堂、蜀学堂、湘学堂的座位，正东为京师大学堂本堂（师范馆）及崇实学堂、求实学堂的座位，大约共有十多个学堂。开幕时，李监督发表了《告学界文》。

开幕第一日上午，为大学堂竞赛，下午为各学堂竞赛。比赛成绩各学校自为比较，并不与其他各校互相评定。散会前，颁发奖品。翌日京中各报登有新闻，赞扬各学堂队伍整齐，精神活泼，练习项目娴熟，得到观众好评云。

在这次运动会的影响下，各校体育活动、设备日有改进。如译学馆除体操外，增加了足球、篮球、网球、哑铃及步枪，并设天桥、浪木、沙坑等。农历五月初四趁端午放假之便，译学馆还准备举行一次军事演习。译学馆购买了一批旧乐器，让学生练习。演习那天，以鼓号引导，由译学馆监督黄绍基（校长）及教务提调张缉光、体操教员张金芳等率领甲、乙两级全班列队到安定门外神机营操场进行演练。在军事演习中，凡侦察报告、望护卫、埋伏追击等动作，均做示范指导。学生们既增长了军事知识，也体会到了体育锻炼的好处。演习之后，还组织步行参观北郊六铺炕附近的黄寺。黄监督当时年逾六十，由北河沿出安定门至黄寺，自晨至夕，往返几十里，一同步行前往。这种尚武精神，学生们甚为钦佩。

宣统二年以来的七次全运会

中国最早的全运会举办于宣统二年（1910），系青年会西籍教士倡办。当时由于近代体育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体育工作殊少经验，一切设施、筹备不得不借重西人，因而此届大会职员亦多为西人。是会定名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简称“全国学界运动会”。由于筹备仓促，规模较小，故参加者仅有华北、武汉、上海、吴宁、华南等地选手。裁判员大多为美、英籍人，大会讲演、各种文件和裁判术语完全使用英语，径赛距离采用码制，田赛丈量则用英尺制。参加选手只限男性。此届运动会虽非名为全运会，但中国体育界根据其范围、性质，仍公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

第二届全运会于民国三年（1914）在北京天坛举行。比赛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竞赛项目比第一届增加了足球与棒球，大会职员、裁判仍多是外国人，女性依然“望会兴叹”，不能参加。运动会的组织者是北京体育竞进会，实际负责人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干事，名字记不清了。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于民国十三年在湖北武昌举行，是由中华业余运动会主持。这次较前两次有进步，裁判员除游泳和棒球的一部分项目为西人外，其余项目均由中国人担任，一改运动场上由洋人包办的局面。是会，女子运动员首次参加。量度由此届起，改为世界通用的公尺（即米），直至今天仍是如此。还记得北京有三位选手在大会上夺得单项冠军，一为撑杆跳高冠军夏翔，一为三级跳远冠军郗明，另一为标枪冠军尹商屏。

以上三届全运会，前两次笔者尚未出生，第三届开会时，笔者方在小学读书。各届概况系后来在大学读书时，听体育教师讲的。老师们指出，这三届全运会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的全国运动会。

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第四届全运会，实际为南京政府自己主办之第一届全运会。大会会场可容万余人，只游泳场设在某大学游泳池。此届大会工作人员全部由我同胞担任，从此全运会内再无外人置喙余地。此次大会竞争激烈，各项成绩破纪录较多。记得当时的“短跑怪杰”刘长春首次现身大会，荣膺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三项冠军。北京选手赵文藻夺得标枪冠军。

第五届全运会举行于民国二十二年，地点在南京。当时南京政府热心体育的人痛感体育之重要，原来决定民国二十年举行第五届全运会，并在南京建筑全国最大的中央体育场，后因国内水灾严重，兼之“九一八”事变发生，遂延期定于翌年举行。未料是年又发生淞沪战役，又被迫延期到民国二十二年举行。此届运动会规模宏大，运动场设备较为齐全，可容纳观众六万人。大会规定选手年龄：男须满十八岁，女须满十六岁。记得察哈尔省因抗战未及参加，东三省被日寇侵占，而三省旅京选手继续参加竞赛，并发表宣言，激励全国人民共起救亡图存，收复失地。这次运动会在一万米竞赛中发生了记圈之争执。跑道周长四百米，一万米应跑二十五圈，每一运动员有特派的专人记录所跑的圈数。江苏的金仲康第一个跑完全程后，有人发出少跑一圈之疑问，金遂被取消冠军资格，而将第二名山西的谷得胜升为第一名。事后江苏代表队提出抗议，但未能改变大会评判之决议。另外，20世纪30年代闻名全国的香港游泳健将、绰号“美人鱼”的杨秀琼首次参赛，囊括了女子游泳个人比赛的全部项目——五十米自由泳、百米自由泳、百米仰泳及二百米蛙泳四项冠军。报纸纷纷刊载她的照片，一时“美人鱼”名噪华夏。

民国二十四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运动会，场地建筑规模超过南京中央体育场的大体育场，用地三百多亩，有运动场、体育馆、游泳

池等主要建筑。此运动场当时在亚洲应算首屈一指。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仪式最令人注目者为东北五省市的代表，均着丧服，周身黑色，所举旗帜，黑白各半，以示关外白山黑水，见者黯然，且多有泪下者。记得当时东北五省的总领队王卓然说：“东北五省市参加目的，不在竞争胜负，唯希国人勿忘东北而已。”大会竞赛中，出现女子短跑健将李森，她一人夺得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三项冠军。著名短跑健将刘长春只获得一项一百米冠军。“美人鱼”再次参赛，但风头已不如前届，仅保持了一百米自由泳和一百米仰泳两项冠军，而五十米自由泳及二百米蛙泳冠军均为广东姑娘获得。

由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原定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举行的第七届全运会，推延至民国三十七年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组织庞大，参加范围扩大到华侨团体以及陆、海、空三军，联勤和警察。项目增添打靶、摔跤、器械操、水球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次运动会不仅运动水平低下，而且竞赛组织工作也一团糟。各项竞赛大多是在争吵谩骂、逞凶打架的气氛中进行的。例如，在篮球比赛中，有的运动员打了计时员，还有的运动员用铜角子、橘子皮等投掷裁判员。排球比赛中，裁判员竟被人从高凳上拖下来质问。垒球比赛中，教练员甚至抡起球棒打裁判。足球比赛时情况就更严重了，开赛不久就发生空军队员打裁判员朱缪一记耳光的事件。但大会无能力处理，致使后来这类事情愈演愈烈。在上海队战胜大连队时，大连队竟迁怒于南京裁判员徐某，将徐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徐告到法院，法院竟以这是球场上的纷争为由而拒不受理。逞凶者不能绳之以法，挨打者无处说理申冤，最后不了了之。场内如此，场外亦不例外。一些所谓“特殊观众”，恃强凌弱，“各保其主”，呼哨谩骂，械斗行凶。最严重的一场是香港队对陆军队，这场比赛自始至终气氛紧张，充满火药味，抢球动作十分粗野，大有伤害对方企图，简直不是足球比赛，而是一场暗箭伤人、踢人与角力的比赛。裁判员邓效良秉公执法，双方被警告者各有六七人之多，还有人被罚出场。半场休息时，一些身着军装的人气势汹汹地质问裁判，说香港队在禁区手球犯规，你有无眼睛，为什么

不罚？还挥舞拳头威胁说“当心！”下半场香港队攻入一球，陆军队红了眼，更加野蛮粗暴；香港队又进一球，陆军队某队员故意将球向裁判猛踢，裁判急躲开，对该人提出严重警告。此时，场外穿军装的人大声喊打，该队领队在场内拿出手枪指向裁判说：“开枪打死这个裁判！”终场后，裁判在一些便衣警察的保护下进入更衣室，却发现自己的皮夹不翼而飞。最后一场决赛，警察队对陆军队，结果零比零平局。冠军究竟属谁呢？香港队虽以二比零胜，但在比赛中替补队员两次登场，违犯大会规程，是判输还是重赛？结果出人意料，大会做出了一个“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的决定，将胜一场应得的两分平分给警、陆两队，于是，警察队、陆军队、香港队三队积分相等。大会又造了两只银杯，每队一个，都算冠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华运会的特别风景——南开拉拉队

1934年仲秋，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天津南开学校啦啦队的二百多名学生手持紫白色小旗，高呼“誓雪国耻，收复失地”等口号，使全场三万观众对日本侵略者产生了同仇敌忾的共鸣。此举引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驻津总领事向天津市政府提出抗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炮制了伪满洲国，还进一步把侵略魔掌伸向华北。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就是在华北形势危急的情形下，在天津市北站外新建的体育场举行的。南开学校的体育活动一向很活跃，校长张伯苓受邀担任这次运动会的总裁判。大会决定请南开学生组织拉拉队，张校长就派出他的学生、在天津体育界很有名的“海怪”来组织拉拉队。“海怪”是南开大学学生严仁颖的绰号，他是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的孙子，喜好运动。由他来出面组织拉拉队，自然有号召力。

运动会开幕前的一个月，严仁颖就召集了南开初中的男女学生二百余人，每天午饭后，借南开女中礼堂练习。南开中学的男女生向来分校上课，界限很严，那次居然男女生一起排练，还借用女中的礼堂，真是破例。

训练很紧张，既要练习拉拉队的歌词，又要背诵好多口号。最难的是排字，男同学坐在中央，女同学分坐两旁，男同学负责组字，每人手持两面小旗，一紫色，一白色，根据需要举出某色的旗，以拼出

不同的字。在开幕式上，随着严仁颖的口令，拉拉队席位上彩旗变换，出现“勿忘九一八”或“收复失地”等大字。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也是唤起同胞爱国激情的号角，引起观众席上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啦啦队的“啦啦歌”和“啦啦词”也有好几套，如用河北民谣改编的《金不换》给河北省选手助兴：“河北省的哥儿们金不换啊！”齐呼：“吱嘣啪，吱嘣啪！河北，河北！Rua，Rua，Rua！”很新颖，引发人无限兴趣。但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振奋人心的组字和誓雪国耻等口号。

中国早期体育教育的摇篮

西方人扣在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早已摘掉，而今，中国体坛健儿早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使笔者想起了中国早期培养体育教育人才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专修科。

清朝末年，内政腐败，经济凋敝，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1898年，清政府不得不废科举而办学校，坚甲利兵，以济时艰。当时，办新学体育教师匮乏，便以行伍军人代替。一些兵痞流氓借机混入体育教师队伍，致使体育教师被视为“不学无术”“品行不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

1917年，北师大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体育专修科，以“养成完全体育教员”为目标。学级主任焦莹，字斐瞻，后曾任北京教务局长。当时，由于体育师资力量薄弱，设备不足，体育专修科至1937年才培养出一百七十一人。抗日战争爆发，北师大一部分内迁西安。后因临汾失陷和日机轰炸，1938年3月学校再度内迁陕南城固，与其他内迁的大学合为西北联大。1946年复员返回北京，与留京部分师生又合并为北师大体育系。

此系随校变迁，师资变动较大，当时体育界知名学者几乎都汇集在此。名家首推袁敦礼教授，他初任本科主任，兼北师大教务长和英文翻译；后又去美留学、讲学；回国后，1946年任师大校长。还有董守义教授，他在篮球技术、裁判与指导法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曾任奥委会委员。其他如马约翰教授、徐英超教授，舒美珂、沙伯哥、桑德等美国人士，也都在北师大体育系任教。

体育系体育教学内容，可分为技术与理论两类。技术科目有田径、球类、体操、技巧、武术、舞蹈、摔跤等。理论科目有体育教学法、生物学、卫生概要、应用解剖、国术研究等多门学科。还设有专供女生练的竞技运动，并有自选英文、德文、法文等外语课目。

学生成绩较佳的，有个叫朱恩德的，在1919年的第四届远东运动会上，两天内连获“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项冠军，双双打破该项远东运动会纪录；还有金岩，在1928年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上获“十项”全能冠军，打破全国纪录并保持四年，“十项”中的百公尺纪录为十秒八。此外，该系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篮球运动员。以该系为主力的男子篮球队曾获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冠军。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二届奥运会上，该系学生牟作云、刘作章曾作为主力运动员随篮球队参赛。

南开中学的体育锻炼

过去天津的南开中学，不只以智育和德育出名，还以重视体育锻炼而闻名。南开学校在毗邻校舍的南边建起一座宽敞的体育场，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体育锻炼场地。这个大体育场中有田径赛的跑道和跳高、跳远沙坑，有各种球赛的场地。在校舍楼区内，还有十几个网球场、篮排球场、单双杠和吊环等设备，学生们可以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做适当的活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南开中学就培养出了以魏蓬云、唐宝坤、李国琛、王锡良、刘建常等优秀篮球手组成的“五虎”篮球队，不仅威震津门，闻名全国，而且在远征日本和东南亚的比赛中建立了功勋。

1934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的南敏排球队作为河北省代表队参加比赛，荣获冠军。因为当时的天津是河北省省会，河北省代表队队员多是从天津选拔出来的。

南敏排球队当时是全国排球界中的一支劲旅，与拥有名手曹廷赞的上海复旦大学校队并驾齐驱。南敏排球队的队员刘志聪、娄光后、卢开周、金阿督及王大纯等在天津排球界中很有名气，他们的拦网、轻吊和鱼跃救球技术，都有独到之处。

南开的“鱼雷”足球队，主力队员有雷邦珺、陶光业、段昌义等人，曾参加过天津外国侨民主办的万国足球赛乙组比赛。

被选进河北棒球队的南开学生有方才政、罗宗兴、关福纳等人。当年在天津的棒球队，以外国侨民组成的为主，中国学校中开展棒球训练的仅南开学校等两三所。

冬季，南开学校在大操场搭建席棚冰场，供学生练习滑冰。夏季则在距学校南三里许的李公祠附近的水塘，圈设天然游泳池，供学生练习游泳。校门附近还有私人养马户，对学生出租马匹，可以练习骑马。

天津回力球场漫忆

解放前，天津有一个回力球场，这个同赛马场相似的大型赌博场所在上年纪的天津老人们心中留有深刻的记忆。

1935年，这个回力球场在意租界花园旁建起，是几个中国买办集股投资五十万元建成的，由意商义多利公司挂名在意租界登记注册，取名“意商运动场”，以取得意租界的保护。

回力球赛是以回力球员比赛胜负为赌注，观众按比赛名单购票，跟买马票的方法相近。回力球运动员系从国外招聘而来，有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还有菲律宾人。观众凭所知情况与眼力，预测输赢，成千上万元买票，赢了就得几十倍的彩头，输了就等于白扔钱。而回力球场方面，不管谁输谁赢，稳拿百分之二十的红利，确实是发财的营生。回力球场开业之初的一两年，轰动津沽，人们趋之若鹜。平素以幽静著称的意租界，立时喧嚣起来。中日战争爆发后，股东怕担风险，要求撤股。

1943年，犹太人李亚溥乘回力球场股东无意经营之机，会同天津正金银行买办魏采章，用八十万美金，将回力球场接手过来。李亚溥和魏采章派了代理人充任正副经理。首先整顿场厅，增设皮沙发座位；成立酒吧间、西餐部，并大做广告，吸引赌客。进入这里的赌客，每天从第一场开赛到末场打烊，只要囊中有钱，不出球场就能在灯红酒绿之下吃喝玩赌，尽情享受，直到输光口袋里的钱为止。在李亚溥的经营下，球场一天开赛八场，场场客满，每年得利润美金二三百万元。

这个李亚溥，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逃兵，花钱买到一张瑞士护照，辗转流窜到天津，自称瑞士侨民，在法国洋行充任职员。此人乖巧伶俐，而在珠宝翠钻业中发了大财，后来开办了利华洋行、利华房地产公司，盖起了利华大楼，又办起了利华放款银行，成了暴发户。

抗战期间，天津沦陷，回力球场在意租界的保护下依然生意兴隆。但魏采章深恐一朝有变，提出撤股之议，李亚溥就收购了魏股，改为独资经营。抗战胜利后，回力球场于1947年宣告关张。

回力球场旧址后来改为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昔日热闹非凡的大赌场，终成往事了。

到青年会打球去

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和金鱼胡同的拐角处，有一块石碑，一半埋在地下，上面镌刻的字还依稀可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民国元年建。这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址的界碑。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以来主要的贡献是把那时刚刚由欧美传过来的体育运动推广到北京，普及到这个号称全国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从那时起，北京出现了体育运动的萌芽。通过青年会的提倡，体育运动思想传播发展到了大中小学校和社会上。

1915年青年会成立之初，吸收了东单一带的几个中学——萃文中学、淮文中学等一部分学生参加青年会的体育活动，每周举行体操、楼上跑圈、爬吊绳、软垫、打篮球等活动，运动完了淋浴。青年会的建筑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室内运动场、篮球场、餐室、浴室、楼上跑道、图书馆等设备很齐全，吸引着大批青年前来参加体育运动。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青年会的体育运动不断发展，有成千大、中学生参加活动。

青年会组织过北京市春季篮球赛、秋季篮球赛，全市大、中学最强的队都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老鸡”篮球队，开始时队员有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孟广礼、郭宝林等，后来又吸收了各大学一些篮球名将如李洲、佟复然等，成了北京地区最强的篮球队。青年会还组织过学生夏令营、夏令会，到西山卧佛寺等地锻炼。

青年会组织的活动繁多，五花八门，参加的会员数以万计，一直

到1957年以后才停止了活动。

于学忠与华北运动会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于1934年10月10日在天津举行。事先组成筹备委员会，由当时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委员长。

天津原无适合组织大型运动会的体育场。于学忠出于对体育事业的热忱，从省财政中拨款三十万元，择定天津北站外种植园旧址，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体育场。场内田径、球类赛场以及看台设计布局新颖，气势雄伟。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召开之时，恰在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局势紧张之际。开幕那天，有两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开幕式上，南开中学的啦啦队，手举不同颜色的旗帜，在看台上摆出“勿忘九一八”和“还我河山”等组字。同时，河北省保安队进场表演武术，使参赛人员和全体观众群情振奋，意兴昂扬。当时在来宾席上的日本领事悻悻不快，中途退场。

二是“九一八”东北沦陷后，辽、吉、黑三省无法组成代表队参加，而百米“短跑怪杰”刘长春一人高举辽宁省旗入场参赛。当刘长春随运动员队伍绕场一周时，成千上万的观众含着热泪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于学忠也为之动容。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1911年从通州随营学堂毕业，初隶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吴失败后，于学忠返回山东原籍，后受张作霖和张学良的邀请，做了张作霖东北军“镇威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军

军长。1931年，经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进关。东北军纳入南京政府编制后，改为五十一军，于学忠任军长兼河北省主席，坐镇天津。当时日本侵略者企图进军华北，扩大侵略，他们对于学忠威胁利诱，均不得逞。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的爱国行动又触忤了日本驻津领事，所以次年，国民党政府在签订《何应钦·梅津协定》后，罢免于学忠，并将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于学忠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离开西安，于学忠受命统率东北军大部。抗战期间，于学忠率部参加了淮河、台儿庄等战役，屡立战功。

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内战争又起，于学忠避居四川乡间。解放后，于学忠曾出任河北省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64年于学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于学忠几十年前主持建成的华北运动会体育场，如今仍屹立于天津北站外。

张学良与第十届奥运会

早年中国政府对体育运动极不重视，国际竞赛更不敢涉足。自1924年与奥委会建立联系，从未参加过比赛，第九届奥运会也只是派了代表前去参观。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当局仍以缺少经费为由，不打算参加。此时，心怀不轨的日本，为使“满洲国”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便授意伪满傀儡政府派刘长春、于希渭为“满洲国”选手，参加该届运动会。此事公诸报端，立刻引起了平津等地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

张学良将军与日伪针锋相对，于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体育科第一期毕业典礼上郑重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消息传开，国人为之振奋。随即张将军令东大体育科函电当时兼任中华体育协进会负责人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和当时兼任全国体协负责人之一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两位先生。经磋商，由张伯苓急电奥委员，为两位运动员报名。几经交涉，多方活动，终使国际奥委会取消了伪满参赛资格，接纳了中国。但是，当时中国政府不拨给经费，又给赴会设障。张学良将军力排阻力，慷慨解囊，拿出八千圆现洋，作旅费之用。宋君复与刘长春于7月8日离沪去洛杉矶。于希渭因伪满在大连严密监视，未能成行。

刘长春之所以成为田径国手，踏进国际奥运会的比赛场，皆赖张学良将军以心倾之，不惜破费，一手栽培。刘长春生于大连，少年时在体育方面才华毕露。1929年进入由张学良将军批准成立的东北大学

体育科学习，之后在比赛场上历显雄威。曾挫败日本短跑名将隆杰，连创三项全国纪录，颇得张学良将军赏识。张学良将军待刘长春甚厚，曾亲自批示并责成东大副校长刘凤竹专事办理，每月发给他三十圆现洋的特别补助费，而且还以每月八百两白银的重金，专为他聘请了一名德国教练。

足球运动感旧

足球现在几乎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运动了，要知道，足球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据《轩辕皇帝传》载：

黄帝令作蹴鞠之戏，以练武士。

当时不但蹴鞠流行于民间，而且被采用为军士体育之一种。《太平清话》载：

蹴鞠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以草为圆囊，实以毛发。

可见是球艺在中国始于黄帝无疑。

《汉书·枚乘传记》载：

蹴，足蹴之也，以鞠革为之，中实以物，蹴鞠为戏也。

由此可知，“蹴鞠”就是足球的雏形。

战国时，齐国人犹喜这项游戏，《战国策》载：

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

蹴，亦作蹋，蹋鞠就是蹴鞠。此项活动到了汉朝还很盛行。《汉书·东方朔传》载：

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走马、蹴鞠、剑客，辐辏董氏。

汉朝皇帝也很爱好蹴鞠，《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载枚乘之子枚皋赋辞曰：

（武帝）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会稽典录》载：

汉末三国鼎峙，年兴兵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

可见汉时蹴鞠游戏已经普遍流行于民间。

蹴鞠到了唐朝也很盛行。王定保《唐摭言》载：咸通十三年（872），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蹴鞠会，四面看棚栉比。当时进士尚

且娴熟这项游戏，蹴鞠盛行可知。所谓集约为会，实际类似现今的运动会。

宋朝的蹴鞠，是沿袭晚唐的旧辙，在宋徽宗时更是盛行。汪云程著有《蹴鞠图谱》，所列规则很是详尽，大意是：

> 赛时分左右两军，拈阄分先后，或赛二筹（即场或次）或赛三筹。开球后用脚踢，如能将球踢撞网上，守网人不能接住，则为一筑，过筑较多者为胜。

可见当时蹴鞠的规则，和今天足球规则很相似。

《元史》上说：“有近臣蹴鞠帝（元武宗）前，帝即命出钞十五贯赐之。”可见元武宗也喜蹴鞠。

民国以后，中国足球运动伴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而再次逐渐盛行。笔者年轻时就读北京，非常喜欢足球运动，课余练习不疲，而且遇有重要比赛，不辞遥远，步行前去参观，连吃饭也顾不上。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那几年，北京盛行踢足球。其盛行程度不仅是每天有多少场比赛，重点是常常汇集各方足球名将和外国足球队比赛，赛不过，增添硬手再赛；败了，再增添硬手再赛。当时中国人主要的竞赛对手是英兵队和意兵队。比赛经常由他们的武官担任裁判员，这些武官评判不公，袒护他们队员的事常有，往往激起我方队员和中国观众的强烈不满。赛后，观众拥进场内，热情慰问运动员，那种情形十分感人。

当时社会上最强的足球组织是震寰足球队，经常和英兵、意兵比赛，连续几年不辍。后来，震寰足球队囊括了北京各路足球健将，一举挫败英兵、意兵，当时万千观众欢呼雀跃。

震寰足球队最初由足球爱好者宋心灯、关铁龄等发起组织，后来杨氏三兄弟杨维廉、杨彼得、杨约翰加入后，比赛越来越多。再后来又吸收了在京各大学和单位的足球名将，当时的师大、民大、清华、燕京等校的足球名将几乎都加入了震寰队。

在比赛中，有些情节至今还记得，例如有时裁判员偏袒不公，中国队员非常愤慨，观众更是不平。报纸记者观毕回去，便在翌日报纸上发表题为“评判不公，攻进说‘欧西’焉得不输”的批评文章。有一次和意兵比赛，号称“神腿”的陈家驹带球迅速，两名意兵后卫上前迎撞，“神腿”一跃，连人带球由他们中间穿过，直捣黄龙。报纸便大字报道，“无为意兵败运早定，终场前数分钟，又由陈家驹攻入一球”。一次和英兵比赛，“震寰”约了人高体壮的金岩加入。笔者曾亲往看过，眼见这位铁罗汉般的“大金”满场驰骋，每次拦截率皆奏效，所向披靡。在和对方合理冲撞时，也很少吃亏。散场时，观众蜂拥向前，“大金”“大金”之声不绝于耳。那种热烈场面，几十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张德江善于卧地倒勾球。一次终场前，他连续两次卧地勾球，球撞脸上。赛毕，观众上前慰问，有的观众掏出治伤药给他，情形感人。

“足球之乡”大直沽

天津人喜欢足球运动，天津河东区的大直沽更有“足球之乡”之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之后，地处天津河东的天津机械局东局子变成了法国军营。西洋人经常在营盘内举行足球比赛，足球从此传入天津。河东大直沽人也由看球转为玩球、踢球，最后踢出了名堂，几十年来培育了几代足球豪杰。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直沽先后组建了乐群、震华、联华、三友、新津等足球俱乐部。大直沽人踢球、看球、论球、赛球之风盛行，同时也影响到河东的大王庄、唐家口、复兴庄、郑庄子一带，当时在大直沽周围地区有足球俱乐部不下三十个。大直沽的震华队，阵容整齐，经常在法国营盘以及英租界球场（现新华路体育场）与外国球队交锋，屡战屡胜，势不可当，蜚声津门。

1934年，在北京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上，由胡宗义（胡宗南之弟）领队，陈而德守门，球员孙思静、袁世俊、李广祥、李玉海、毛宫合、孙文明（后五人均是大直沽人）等组成的河北省足球队，与北京足球队展开了激烈交锋。大直沽的李广祥一记“狮子甩头”，攻破北京队大门，河北省足球队以一比○的战绩获胜，夺得华北运动会足球赛的冠军。当时的报纸都有“李广祥一头定乾坤”的报道。

1935年，大直沽的震华队获“高纪毅杯”足球大赛冠军。同年，以大直沽球员为主的中华队战胜西洋各国联队，一举夺得国际“爱罗鼎

杯”足球大赛冠军。1937年该队东渡日本，以四战四捷的战绩挫败日本各队，翘首称冠。

大直沽的足球运动蓬勃开展，并在历次大赛中取得佳绩，这得益于当时南开大学体育系主任侯洛荀。侯先生早年曾赴欧洲九国考察过体育运动的教学、设备、管理以及科学训练方法。他看到大直沽有很好的足球运动基础，有一批具有足球运动资质的优秀球员，便亲临现场为球队进行规范的训练和指导，亲自教授球员学习英语，以提高球员在国际大赛中的交流能力。因此，大直沽球员们的文化素质、球技、战术等都有较高的水平。他们当时以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中国的李惠堂为楷模，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踢球。

大直沽足球运动的发展，影响了附近的工矿企业，大、中、小学校，它们都组织起了自己的业余足球队。每逢节假日，便在河东体育场举行足球友谊赛、锦标赛。

大直沽的足球运动也深受国家的重视和关怀。20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委派足球司长黄中到这里视察、指导，并给予支持。在原河东体育场的基础上，扩建了三个大足球场，完善了体育训练设施，建立了业余体校，培养出了孙霞丰、张俊秀、蔺新江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优秀足球运动员。

“北宁”东征四战四捷

北宁足球队东征日本，那是1937年轰动全国足坛的一件大事。日本筹备奥运会，场地建成后，想找个合适的足球队到日比赛，拿客队“开刀”以振奋士气。初约德国队，因德国队索价八万马克，价昂而作罢，乃改由冈部平太来华约北宁队。北宁队为当时国内第一流足球队，拥有名脚健将多人。

4月初北宁队东渡，抵日后共战四场。第一场战东京文理大学队于该校场，以六比一旗开大胜。第二场在奥运会球场战当时日本的国家队。开赛时，场上竟不挂中国国旗，“北宁”领队马一民立即提出抗议，声明如不悬挂中国国旗，北宁队拒绝比赛，将立即返国。日方理屈，挂上了中国国旗。马一民在场上向全队讲话，指出日本侵我东北，我等应在球场上争口气，全队士气大振。比赛结果，北宁以二比一获胜。第三场战日本的大学生冠军队庆应大学队，又以三比一胜。最后，在大阪甲子园球场战日本最强队全关西队，这个队有西方球员参加。结果，“北宁”又以三比一大胜。

“北宁”征日大捷的消息不断由日本传到国内，京、津、沪等各大城市报纸纷传喜讯，举国球迷欣喜若狂。该队返国后，即出版了《东征回忆录》，详载东征战况。此次东征的主力队员有守门员杨春英，后卫李凤楼、张学尧、李清玉、安源生、谭福桢、孙思敬，前锋孙福来、曹秋亭、王鸿宾、孙永泉、姜璐、梁铭宗、金阿督、管学仲等。

北师大“五虎将”

看过一场篮球赛后，油然想起北师大“五虎将”来。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到今天，体育界老朋友们、老篮球迷朋友们，还会想念他们。

北师大“五虎将”是1925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的，他们是指李洲、佟复然、金岩、赵逢珠、金德耀五位篮球健将。他们的体魄坚实、高大，篮球技艺精湛，入校后即被选为校代表队队员。当年冬天代表北师大在北京市冬季篮球公开赛中夺得了冠军，由此一鸣冲天，声势大震。

“五虎将”以篮球为主，兼长田径，像李洲的“五项”运动和跳远、金岩的“十项”运动和高栏、佟复然的铅球、赵逢珠的“五项”运动、金德耀的中距离赛跑，在体坛都是赫赫有名的。

那时，北京每年照例举办全市冬季公开篮球赛，另外还有“五大学”篮球赛，“五大学”指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这五所大学的篮球队各有千秋，每届比赛都吸引成千上万的球迷前来一饱眼福，有些比赛的确是紧张万分，令人惊叹。

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是1928年冬季篮球赛。北师大和燕大两队决赛，地点在米市大街梅竹胡同基督教青年会室外篮球场，裁判员是陈福田。时间未到，球场已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这次比赛之前，北师大队的金岩因骂老师被学校开除，由宋炳琳顶替了他。燕大方面，出了一员猛将陈盛魁，他速度快，体质强，投篮准，给北师大造成一定

威胁。师大“五虎将”虽少“一虎”，仍然强悍，打得精彩，打出了水平。两队比分一直接近，多次平局，这场球赛把球迷们看呆了。由于观众都是站在平地四周看，里三层外三层，大批观众不时拥进球场，后面看不见的人往前拥，以致场上乱作一团。在北师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比赛无法进行，裁判员鸣笛暂停。经竞赛委员会研究决定，暂停比赛。球迷们未窥全豹，不得不离去，一路上还议论纷纷，情绪激动，似比场上的队员热情还高。

在球赛中止期间，竞赛委员会派人修建了看台。那时的看台非常简单，只不过用杉木搭架，木板为座，比平地无台稍强一点儿而已。

搭看台的同时，两队回校积极备战。由一些同学出面说情，北师大经过商议认为，金岩本来是个好学生，只因一时冲动犯了错误，还是允许他承认错误回校。几天后，比赛继续进行，球场看台上人山人海，临时调来多人维持秩序。

球迷们都知道，北师大“五虎将”最拿手的一招是，中锋佟复然跳球时跃起一拨，前锋金岩或金德跃向前一跃接到球，足未落地时，球交前面队友，用快攻上篮得分。那时篮球比赛规则，每次得分后，都得到中线由双方中锋跳球。北师大“五虎将”这一招使熟了，往往成为制胜绝招之一。这次比赛一开始，金岩即连入两球，独得四分，先声夺人。终场以师大胜利而结束。

有趣的是这场球赛过后，燕大猛将陈盛魁转学进入北师大，成了北师大代表队健将之一。北师大篮球队真是如虎添翼。

1929年“五虎将”毕业，他们的后继者中锋王玉增，前锋陈盛魁、赵伯荣，后卫刘冠军、赵文选五员大将，不辜负师长的教导、师兄们的厚望，成为北京篮球劲旅，多次获得全市冠军。球迷们不约而同把这五员大将也称为“五虎将”。

在“五虎将”活跃的那个年代里，体育运动条件非常艰苦，说起来

今天的青年运动员可能难以置信。拿赛球用的球来说吧，全国第一流的篮球队北师大队，总共也不过有两个球。而且一个新的留正式比赛时才用，平时练习用的一个旧球不但旧，有补丁，而且圆都不圆。其他球队的状况可想而知。“五虎将”们的三餐也很简单；他们出门比赛，没有交通工具，往往步行去球场；到了球场，脱下衣服没有专人看管，只好由未上场的同伴或同学朋友代管；比赛完了分道扬镳，肚子饿了自己掏腰包买点吃的果腹。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北师大队和美兵比赛。王玉增由北师大出来，到了和平门，穿过没有几盏路灯的半黑暗胡同去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球场。比赛时，他脱下衣服交给朋友拿着。赛完，在回北师大的路上，他肚子饿得受不了，出了和平门到路东的“新华楼”要了杯牛奶。王玉增一边喝一边指着杯子说：“你看，尽是水，哪有什么奶味！”王玉增和其他同学比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至于平日宿舍里同学因没钱买牙膏，互相抢着使用别人的，常有的事了。

前“五虎将”毕业后都从事体育工作，其中李洲未毕业前已被市立二中聘为体育主任，后来在市教育局担任体育督学和市立体专校长等职多年。另“四虎”金岩、佟复然、赵逢珠、金德耀也一直从事体育事业，担任体育教授、主任、教练等。

几十年倏乎过去了，听体育界人士说，昔日北师大“五虎将”今天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李洲曾叹息地说：我们是生不逢时，“虎”也是穷“虎”、饿“虎”，如果晚出生五十年，我敢说，我们不但是“虎”，而且是“飞虎”，无论什么强队来了，都得叫他们够受。

“南开五虎”篮坛扬威

“南开五虎”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闻名全国的篮坛劲旅。

这里的南开指南开中学，该校篮球队很强。“五虎”美名是从山西太原举行的华北运动会篮球赛取得冠军后得来的。

1924年，南开校队与清华校队在北京清华园进行篮球友谊赛，南开败北。球赛后，清华放映电影。不料，银幕上首先映出的是幻灯片《一只大纸篓》。北方俗语中“篓子”是“拙劣无可取”之义。这个玩笑传到南开校园后，引起很大反响，喜好篮球的学生下定决心要图强雪耻。1925年，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等人发起组成篮球队，为不忘清华的讽刺，就以“篓子”作队名。后来，又有新同学刘建常考入南开，也参加了“篓子队”。他们苦练篮球技术，在校内名声渐起。翌年，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刘建常和学校少年队的唐宝堃，被选为南开代表队主力队员，在体育教师齐守愚的指导下，参加天津市篮球赛，获得冠军。

1928年，“篓子队”又以南开大学代表队的名义参加华北区男子篮球比赛。那次篮球赛分大学组和中学组，南开一来实力强，二来想得到破格的成绩，硬是报名参加了大学组比赛。比赛中初战胜东北大学，次战胜冯庸大学，取得与北京师范大学争夺冠军的资格。北师大队在那时是全国篮球最强队，北师大“五虎将”闻名全国。在当时的比赛中，北师大已战胜燕京大学和天津新学同门，而新学同门在津曾经战胜过南开中学队，所以北师大以为冠军已稳拿在手，思想上很轻敌，前半场只上两个主力队员。南开队在教练董守义的精心指导下，

用快打快攻、强中有巧的战术，上半场净胜二十多分。北师大见势不妙，后半场“五虎”全上。南开越战越勇，北师大急躁心切，屡屡失误，最后南开获胜，取得冠军宝座。从此，球迷赠他们“南开五虎”的美名。

不久，“南开五虎”应邀赴沪，与上海篮球“三强”交锋，首战华东区篮球冠军沪江大学获胜。

当时，正值菲律宾圣堤托马斯大学篮球队在日本比赛得胜回国，途经上海，要与”南开五虎”较量。菲律宾队是历届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两队比赛，“南开五虎”又以六分领先得胜。在场观众将“五虎”高高举起，祝贺他们为国争光，从此“南开五虎”名扬神州大地。

“南开五虎”自上海载誉返津，又在暑假进行了刻苦训练。1928年冬去大连、沈阳远征，六战六捷。1930年，“南开五虎”先在天津获得万国篮球赛冠军；后在杭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以全胜获得全国冠军。

不久，“南开五虎”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中国篮球代表队赴日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不幸为日本队和菲律宾队所败。其后，“五虎”从南开高中毕业，离校他去。“南开五虎”虽分散了，但“五虎”的美名永留南开校史和中国篮球史册。

“老鸡”篮球队

1982年11月12日在加尔各答的男子篮球锦标赛上，中国队第四次夺得亚洲冠军，将代表亚洲参加1982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第九届世界男篮锦标赛。这使我想起昔时在北京雄踞篮坛二十载的“老鸡”篮球队。

“老鸡”队是当时的一支最强的篮球队，拥有篮球名将多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队员虽然一批批新陈代谢，但始终是一支劲旅，并且培养出了不少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老鸡”队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队员有孟广礼、郭宝林、王瑞生、王文麟、曹玉珍、林赓扬等，孟、郭等都曾被选为国手，参加过远东运动会。20年代以后，“老鸡”队不断扩大阵容，北京篮球名将李洲、佟复然、王玉增、范宝恩、张守义等先后加入，“老鸡”长鸣，声势赫赫，战功累累，在北京篮坛上首屈一指，那时是“老鸡”队的全盛时期。

30年代，“老鸡”队一些老将年龄日长，并且有了其他工作，体力及时间有限不可能继续驰骋疆场，但仍有名将牟作云、崔峙如、王馨吾等多人压阵。“七七”事变前后，受时局影响，体育活动不若以前之如火如荼，“老鸡”队也分化成为两支队伍，风趣地号称“老鸡黄”队和“老鸡青”队，意即鸡蛋黄和鸡蛋清。“老鸡黄”包括老将牟作云、范宝恩及李鹤峰等，“老鸡青”则包括以范政涛为首的一批后起之秀，由“老鸡黄”来培养“老鸡青”。范政涛球技精湛，突出侪辈，“老鸡黄”大为欣赏，把他吸收为“老鸡黄”成员。

40年代“老鸡”队又青、黄合成一体，新队员有号称“白大个”的白子平等多人，仍为京华篮坛强队，但此时已是“老鸡”队黄金时代的末期。

中国女篮忆旧

笔者幼时在北京上学时，乃一球迷，对几十年来中国女篮之演变略知一二。

中国女篮肇始于上海，最早诞生在上海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上海爱国女校体育科和女青年体育师范学校，时间大约是在1916年前后。此后，篮球运动在女子学校逐渐活跃起来。上海爱国女校派篮球队去扬州，在江苏省运动会上做了篮球表演赛。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女子篮球表演赛。

当时，女篮运动的场地与男篮不同，是用区线分成相等的两个区或三个区，两区制每队六人，三区制每队九人。直到1930年在杭州举行第四届全运会时，才把女篮列为大会锦标赛项目之一。这次比赛用的是两区制。

至于北京女篮，笔者记忆所及，其开始兴旺乃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在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北上以后。记得当时“两江”队出场，身着短裤，北方各校师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运动装束。

应战的队以北京师范大学女篮队员为主，主力有王景芝、滕爽、滕肃、黄淑慎、钟贞荪等。这一战，北京女篮被上海姑娘杀得丢盔卸甲。

北京市场上曾出售“两江”全体队员合影相片，销路甚旺。由此北京女篮逐渐风行。

女子排球今昔谈

听到中国女排荣登世界冠军宝座的消息，凡我炎黄子孙，无不欢欣鼓舞。综观此次世界杯赛，波浪汹涌，险象环生。中国女排姑娘们汗水淋漓，电视机前的亿万同胞，亲睹此世界最高水准的赛事，深感胜利的来之不易，不知多少人掬洒激动之泪。

笔者青年时酷爱球类运动。排球，当时名为“对球”，九人上场。据那时的老前辈说，最初为十二人上场，后来才改为九人。现在的六人登场，记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推行的。中国某体育代表团访问德国回来，成员李洲曾说在德国见到六人排球，六人排球随后风行。中国女排参加正式国际比赛，是自1925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开始。那时远东运动会排球赛只有中、日、菲三国女排参加，我国选手有张爱新、林月清等。1930年中国女排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排球比赛，选手有邓志豪、吕莲英等。不过，中国女排从未拿过冠军。

当时在华北京津一带，女子排球并不盛行。只有中国男排声势甚盛，尤以广东队一向为全国男排执牛耳者。一次在京比赛，在该队名将曹廷赞的重扣之下，北京各队难以抵挡，一一败北。报纸曾渲染曹氏一记扣球重达四十五磅或八十磅。

如今中华姑娘为国争光，见到她们那样英勇顽强，技艺精湛，觉得郎平和张蓉芳的重扣，已远远超过当年曹氏。“拦网”——在过去叫作“关门”，中国女排姑娘们一跃，网齐胸下，铁臂冲天，有如铜墙铁壁，对方难越雷池，真是使中国人扬眉吐气。

观罢决赛，心潮汹涌，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在坐享祖国荣誉之时，怎能抑制心中对可爱乡邦的深切怀念之情啊！

著名体育家马约翰

中国著名体育家马约翰，生于光绪八年（1882）。他毕生坚持体育锻炼，年逾八十岁后，仍身体健康，鹤发童颜，生气勃勃，被世人誉为运动长寿的活榜样。

马约翰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自幼苦寒无怙，常与其他幼童在野外跑跳、爬树、钻山洞，跑海滩、捉鱼虾，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为他造就了良好的身体素质。

十三岁那年，马约翰入私塾读书；十八岁到上海读中学；二十二岁考入圣约翰大学。大学期间，他热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主力队员，在学校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八百八十码、一英里等项目赛跑中皆获冠军。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举行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的有中国人和各国侨民。一英里赛跑冠军争夺十分激烈，开始有四个日本人一字排开跑在最前面，故意挡住其他运动员，紧跟在后面的是一个中国学生，而马约翰在这个中国同学后面十码远的地方，其他五十多名选手都被远远甩在后面。当倒数第二圈终了时，他突然加快速度，超过了前面的中国学生。离终点四百码时，中国观众高呼：“约翰，加油！约翰，加油！”他意识到该是最后冲刺的时候了，向那个中国学生说了句：“跟上我！”就猛地从日本人右侧冲过去。这时，全场观众的呼声已由“约翰！约翰！”改为“中国！中国！”他终于以领先五十码的距离首先到达终点，他身后那个中国学生第二个到达终点。他顿时成为运动场上的明星。

由于马约翰具有突出的体育运动才能，1914年秋季，他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他的职务由助教到教授，由教授到体育部主任，直到1966年逝世。马约翰早年提出“运动是健康的泉源”，1954年出版的《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书中又重申这一观点。他认为要坚持天天运动，但要科学运动，适量运动，运动既要持久经常化，又要全面多样化。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直到晚年，他在日常生活中仍严格执行一套雷打不动的作息制度：早晨六时起床，先做一套徒手操，再练几路太极拳或太极剑；上午课间操时到体育馆练拉力；下午四时后到学生中去，一起锻炼并进行指导；临睡前散步片刻。数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1958年，七十六岁高龄的马约翰和一位中年教师合作，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创下了七十六岁老人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的奇迹。他酷暑不怕热，无论室内室外，总是穿一件整整齐齐的白布衫，在太阳下晒几个小时不头晕；严冬不怕冷，从来不穿棉衣，最冷的时候，只在白布衫外加一件毛线背心，到室外时才罩上一件短外套。

1961年，清华大学师生聚会祝贺他八十寿辰。国家体委代表荣高棠在会上讲话说：“马老以八十高龄还能有这样的身体，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健康，马老就是一个活证明。”

天津篮球运动先驱李清安

惊闻天津体育事业的先驱、八十四岁的李清安先生在津病逝的噩耗，不胜震惊。回忆当年他的音容笑貌和种种往事，仍历历在目。

李清安是河北通州人，毕业于基督教公理会开办的潞河中学，在校时即经常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尤其喜爱篮球。1932年，李清安到天津体育用品厂门市部任副理。利生工厂是在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倡议下，由孙润生出资创办的，经理为曾在美国留学、专攻化学和制革的齐守愚。“利生”专门制造足、篮、排球，闻名遐迩，驰誉海内外。

基督教青年会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当年是天津市体育活动的中心。青年会东马路会所大楼内有一个体育馆，除了在英租界的耀华中学的体育馆，这里是唯一可供公众使用的体育场所。虽然场地较小，但在当时也算难得的了。体育馆主要供篮球队和排球队的训练和比赛使用。李清安参加青年会，又因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主任李守珍有深厚的友谊，就积极协助青年会开展篮球运动。由他号召组成的“竞进篮球队”，二李都是主力队员，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在篮球场上来往穿梭、飞驰的身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清安的篮球技术超群，有独到之处。他机智灵活，判断准确，无论接球、传球、运球、防守、进攻还是投篮，都有不少绝招。尤其是晃人的假动作，常把对手弄得瞠目结舌，无所是从。

李清安对天津市的篮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

绩。他组织球赛，培养篮球队员，功绩累累。他对队员不仅做技术培养，还注重体育道德教育。他曾留学美国春田大学，常以该大学提倡的运动员精神教育学员。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篮球事业上。他做篮球裁判，更是明察秋毫，公正无私。遇到比赛双方有异议争执，他能当机立断，不徇情面，做出公正裁决，而且以理服人，使双方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李清安为人正直，说话快如连珠炮，性格诙谐，出语幽默。他急公好义，热心公益，对青年会举办各项服务活动无不踊跃参加，慷慨解囊。

1936年，李清安曾率领中国篮球队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并被选为国际裁判。晚年，他担任中国体育总会天津分会秘书长和天津体育学院的顾问。

田径健将郭毓彬

与远游归来的友人谈起曾在1915年远东运动会上为中国首次取得田径赛项目荣誉的郭毓彬教授。据说郭老九十余高龄时仍精神矍烁，和人谈话时声音洪亮，同他交往的朋友们无不称羡。

郭毓彬在远东运动会上获得过八百八十码和一英里赛跑冠军两块金牌，这是中国在远东运动会田径场上第一次得到的荣誉。

郭毓彬在体育界曾显赫一时，但他并不是体育工作者，数十年来是生物学权威。他年轻时，热衷于体育运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他异常赏识，曾送他去上海参加青年会体育训练班学习。他上了一学期课，后又被公费保送美国学体育。1918年他到了美国，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这个大学的体育系学生都去参战了，学校叮嘱他先学体育辅助课，如生理学、解剖学等。学了一年左右，战事结束，学生回来复课，这时他已对生物学课程发生浓厚的兴趣，遂决定不学体育而改攻生物学。他先后在美国两个大学学习生物。1922年毕业，北京师范大学的聘书寄到他手里，他即回国在师大生物系开始了生物学教授生涯。

郭毓彬在北师大任教时，常带着学生到协和医院实习，参观解剖。协和的大夫大都认识他，有时见他带着学生来了就说：你还参观什么？给你个尸体你去手术房解剖叫他们看就好了。因此，协和医院的手术房曾多次成了郭毓彬的教学实验室。郭毓彬到北师大不几年就升任生物学系主任，直到1965年退休。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岁月中，郭毓彬苦心孤诣培育出的桃李成千成万，遍布海内外。

全能冠军朱恩德

孩子们问我，在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有没有在国际田径赛上获得冠军的运动员？这让我想起了在1919年第四届远东运动会荣获“十项”和“五项”全能运动冠军的朱恩德。

朱恩德获冠军时我尚在幼年。后来我上中学后去北师大体育系看朋友，无意中见到了他。那时他已患病，颠三倒四，一贫如洗，在师大时常向熟人借钱。记得有一次他同北师大校长李蒸相遇又要借钱，李蒸给了他不是十元就是二十元，记不太清了。北师大的朋友告诉我朱恩德一些情况，至今还记得一点。

朱恩德从小就爱好体育。他的老家靠近白洋淀，他常常逆水游泳，还天天练长跑。他好胜心很强，常说，一定要把身体练好，为国争光，不叫外国人说咱们是“东亚病夫”。二十二岁时，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就是后来的北师大体育系。

1919年，朱恩德作为中国田径队队员，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高温，朱恩德在气候条件极不适应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夺得“十项”和“五项”全能运动冠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十项”和“五项”全能是田径赛中最高难最艰苦的项目，朱恩德的优秀成绩震动了远东体坛。

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后不久，朱恩德从专修科毕业，到北京市立二中担任体育教师，后来又到湖南长沙岳云中学任教。那时一些外国人飞扬跋扈，常常欺侮中国人，朱恩德看不惯，时常与他们争吵。据说

有一次篮球赛，理应朱恩德所在队获冠军，由于裁判员受贿，执法不公，把冠军判给了别队。他愤而说理交涉，得罪了上司，最后被解雇。失业回家后他愤愤不平，思虑忧愁，不久就精神失常，常常站在大街上高喊：“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甚至把人家饭馆的烧饼散发给乞丐和穷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进朱恩德的家乡，百姓纷纷外逃，只有他不离家门口。后来，日寇在他所在的村子设了据点，他仍不当“顺民”。1942年，日伪汉奸竟卑鄙无耻地使用欺骗手段，用大卡车将他送到北京，于是他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一天，在北京天桥附近，他打了一个日本军官，被抓进监牢。一代体坛名将最后竟受到不可想象的法西斯酷刑，惨遭杀害，年仅四十八岁。

朱恩德是名将，是好汉，只是生不逢时，时运不济，落得个悲惨下场。我为朱恩德惜，为我国体育界惜！

“短跑怪杰”刘长春

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932年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的唯一运动员代表“短跑怪杰”刘长春，1983年春天在大连病故。噩耗传来，衷心痛惜！

20世纪30年代的刘长春，其威名可称国内外皆知。他的百米成绩是十秒七，当时被时人称为“短跑怪杰”。

刘长春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情况是非常复杂的。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刘长春是大连人，日寇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千方百计拉他代表伪满参加比赛，他断然拒绝。在敌人跟踪监视下，他一面将同班同学赵凌志安置家中，以蒙蔽日人眼目，一面让妻子连夜赶回娘家，多方设法筹资七十元，然后独自一人离开大连经天津逃到北京。当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无耻地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二人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消息传到京津，教育界反响强烈，刘长春义愤填膺，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说：我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他的声明得到全国教育界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热烈喝彩。

当时南京政府借口经费问题，宣布不派代表出席奥运会。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上亲自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二人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三人前往参加奥运会，并且捐资八千元资助他们出国参赛。但是于希渭在大连受到日寇阻止和监视，加上交通不便，未能进关，因此只好由刘长春一人参加奥运会。

在奥运会上，刘长春首赛百米，前五六十米一直领先，八十米时，后来者纷纷赶过。最后，第一名为辛卜森，超过他四码，成绩十秒九，他居第五，当在十一秒左右。据说失败原因是由于赛前毕业考试一个月，加上舟行劳顿二十多天，缺少练习，未能正常发挥。次日二百米预赛，他在一百七十米时尚居第二，不幸后二十多米被人追过，结果第四。第一名胜他三码，第二三名均在两码左右。尽管如此，刘长春的成绩当时还是得到各界推许，他的威名将永远载入中华体育史册。

足球大王李惠堂

绰号“亚洲球王”“足球大王”的李惠堂，在香港逝世已多年，一代球星，迄今尚为后人津津乐道。

李惠堂十六岁入选香港南华足球队，从此开始了他的足球生涯。1926年，他率领国人组成的上海乐华队，击败了独霸上海二十年的洋人足球队，勇夺三项冠军，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他第一个率领中国队，荣获第十二届远东国际足球赛冠军。他第一个以足球运动员身份在大学任教，1926年就任复旦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1928年，他又第一个用文言文阐述足球理论，出版专著。李惠堂获得这么多个第一，凭的是高超的技艺、出色的修养、高尚的爱国情操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在他二十五年的足球生涯中，竟然没有被裁判罚过，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世界第一吧！

在20世纪30年代，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在足球还远非今天这样受人关注的时代，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声誉竟然能同京剧大师梅兰芳并列，足见其球艺高超，深受观众爱戴。

李惠堂当年驰骋体坛时，体质棒，身材好，头脑清晰，能于万马阵中镇静裕如，从不慌乱。其球技最大特点在于带球时球与脚的距离不远不近，总相适应。因而随时可以举足射门而勿庸整理球位。他射球时，你很难测知他何时起脚，有时球稍远一点，他即倾身斜卧，一脚射出，又准又快，使人对他难以看守。

30年代李惠堂有两次漂亮进攻得分的故事：一次是1936年在第六届全运会，香港队与广州队决赛中，广州队在三十码外犯规，被罚任意球，因不属技术犯规，可以直接射门。李惠堂主罚，同队梁荣照面向李惠堂立于他与球门之间。李惠堂起脚猛射，梁荣照立即低头俯身让球过去，球破网而入。此次系他两人默契好的，妙在梁荣照以身遮住对方守门员视线，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惠堂的球，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必须又准又硬又快。梁荣照俯身，球已到球门，守门员猝不及防。这精彩的一幕使全场掌声雷动。另一次是乐华队在沪与葡萄牙队比赛。葡队在球门区右侧技术犯规，李惠堂主罚，对方人墙横列，严阵以待。李惠堂与中锋戴麟经默契好了，届时李惠堂猛然一脚，球自对方人墙上越过，戴麟经飞驰赶上头顶入网，干净利落，国人欢喜欲狂。

大家之所以都喜欢与李惠堂同场配合作战，是因为他供球合适。他无论传球给谁，球不前不后，不偏不倚，恰到该人身前，接球人感到非常舒服。另外，你传球给他，他总会接到，不会失球，也使人满意。

李惠堂球艺精湛，名闻国际，每次比赛，对方恒欲阴谋伤之。但李惠堂头脑聪颖，明知对方恶意相加，却冷静对付，不为之所乘，以保存本队实力，是亦难能可贵。

我与李惠堂相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当时上海足球本不兴旺，他到沪后即组乐华队，参加各种比赛，与外国队鏖战。每战多有取胜，大大激起观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国人对足球的兴趣，立时踢足球蔚然成风。今日回忆，上海足球界一部兴旺史，李惠堂厥功至伟。

20年代末，上海的电影制片人将李惠堂率领乐华队大胜洋人的事情编成电影，这是他第一次走上银幕，充当演员。另外，还有三部电影《上海三女子》《同居之爱》《二比一》中都有李惠堂精彩的足球

表演镜头。

老一辈文艺家爱看李惠堂踢球者甚多。夏衍、李宗义、孙钧卿、谢添、郑亦秋、袭盛戎、马彦祥等，一提起李惠堂便眉飞色舞，赞不绝口。但他们只能作壁上观，无缘与这位球王同场竞技。只有京剧程派名旦赵荣琛，曾有幸与李惠堂同场进行过比赛。

40年代，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而陪都重庆却是“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卞州”。赵荣琛在重庆有“小程艳秋”之称，李惠堂以体育教官的身份蛰居无事，便常去听戏，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当谈起足球时，赵荣琛说，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酷爱踢球，曾司“三道中”，即“前卫”一职。李惠堂一听便兴致盎然，于是约定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一队由李惠堂率领，另一队以赵荣琛为首，队员多为京戏界同人。

比赛开始，并无人关心结果输赢，比赛之认真，踢抢之积极，俨然与正式比赛无二。赵荣琛重点防守李惠堂，如影随形。一次头球争抢，居然被赵荣琛顶出，自然也有李惠堂的谦让。比赛气氛十分热烈，但名旦究竟不是运动员的对手，李惠堂一人独进数球，以绝对优势结束了这场比赛。事后，赵荣琛常对人自豪地说：“我跟球王李惠堂同场赛过球，你们谁有过？即使输了，也很光荣！”

想到今日我国足球，条件比李惠堂时代不知好多少倍。但何时能称雄世界呢？寄希望于李惠堂式人物的涌现。

北师大“五虎将”之首李洲

笔者曾与北师大“五虎将”之一的李洲相识多年。李洲原名李敉寰，20世纪20年代在北师大体育系读书时，为名震全国的北师大“五虎将”之首，担任北师大篮球队队长。

李洲体格剽悍，打起球来勇猛顽强。他的斜竖着的两道浓眉，望去令人生畏。有时和美国兵比赛，他兴起时横冲直撞，偌大个子的美国兵也不敢和他拼。我则在旁为他鼓掌助威：“好李洲！加油！”记得他在北师大读书时，不喜欢音乐课，一遇这门课他就到球场打球。音乐系教师柯政和亲自到球场找他，他伸着手指叫柯看，并且“诉苦”说：“你看这手指挫的肿得这么粗，怎能弹钢琴？叫我唱歌，我这嗓子也唱不出个调儿来。”

由于名气大，李洲还未毕业就被市立二中聘为体育主任。翌年，二中在全市运动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在20世纪20年代，体育课在学校居于“小四门”之末。“小四门”即音乐、手工、图画、体育，是最被轻视的功课。各校只有教务、训育、事务三个主任，由于李洲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并向市当局提出建议，30年代时各校增设了体育主任。体育能在重要会议上得到发言权，不能不说是他的功劳。

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是李洲倡议，并由他全权指挥兴建的。在此之前，北京没有公共体育场。记得他请到当时的三十二军商震部的两个团的士兵到先农坛平整土地、铺土，用砖砌跑道沿。是年的北京市

秋季运动会就在先农坛举行，以后各次大运动会也都在这里举办。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时，李洲参加了中国的体育考察团。公毕回国后，他继续修建先农坛体育场。不料“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炮弹落到体育场北门内，把看台炸了个大洞，还炸毁了不少松柏树，工程不得不停下来。

李洲还担任过北京市立体专校长，培养出大批运动健将，名将王士林、王强等许多人都是他的学生。今天，大陆和台湾地区许多体育界主要工作者都曾是体专的学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洲在市级、华北级以及全国级运动会担任过总干事、总裁判等职务。

著名拳击手靳贵第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优秀拳击运动员就参加过第十一届奥运会，并引起国际拳击界的瞩目。其中最有名的拳击手是靳贵第。

靳贵第是河北省灵寿县人，生于1916年。他自幼习武，随著名拳师张思桐学过少林派的大、小红拳，又练过耍石锁，举石担，因而体魄强健，臂力过人。他十七岁当兵，被编入商震部的第三十二军。商震早年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平时很注重士兵的体育锻炼，军中开办了武术队、摔跤队、拳击队。其中拳击队最为出色，队员中的佼佼者有靳贵第、李梦华、王润兰。

商震不惜重金从天津聘请德国拳击家克赖特到三十二军担任教练，克赖特施教认真，实施科学而严格的训练。两年后，靳贵第的拳击水平提高很快，曾在比赛中屡次击败来华的欧美各国业余拳击手，因此名声大噪。1936年初，中国报名参加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为了挑选参赛的拳击运动员，体育代表团在上海申园健身房进行拳击选拔赛。当时，三十二军拳击队全体队员赴沪，靳贵第等四人过关斩将，以前四名入选。

商震为了让靳贵第等人顺利参赛，慷慨解囊资助拳击队银洋五千元。

在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万国拳击台上，来自亚洲的日本、菲律宾等国选手普遍受挫，被欧美等国拳击手打得招架不住。中国唯一的重量级选手王润兰出师不利，被荷兰名将福克击败。而中量级的靳贵第，

顺利地通过了预选赛，先后击败了加拿大选手库克、埃及选手阿里尤素夫。他拳风凌厉，勇猛善战，令德国观众欢呼不已。

在其后的正式比赛中，靳贵第不畏强手，勇气大增，打得英国拳击名将希立姆敦左右招架，频频后退。拳击台下的中国运动员、教练员和侨胞们一起为靳贵第喝彩鼓劲。希立姆敦没有想到，这个黄皮肤、留平头的中国选手如此厉害。他在羞恼之下，竟故意违反比赛规定，以左胳膊猛然将靳贵第撞倒在地。靳贵第还没有爬起，又挨他几拳猛击，再次栽倒，口鼻出血，腰部受伤。出现这种场面，场上一时秩序大乱，嘘声四起，许多欧洲观众也对希立姆敦大为不满。

现场裁判罗林（法国人）判希立姆敦出击过早，取消胜利权，判靳贸第获胜。但是英国籍主裁判格林不予支持，反判定希立姆敦为胜。在场的爱尔兰籍检察员也昧着良心做出了有利于希立姆敦的伪证，一时会场大哗。

这时，中国拳击队教练余衡之气愤地提出严正抗议，仍不起作用。尽管如此，靳贵第那种敢于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永远写在了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史册上。

体育发展侧影——利生体育用品厂

很多人对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比较熟悉，但是对伴随体育运动一起成长发展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却不是很了解。在很多次的国际球赛中，我国的“金杯牌”篮、排、足球都曾大展风采。“金杯牌”系列球是由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制造的。

说起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厂，就不能不提齐守愚。

齐守愚是河北武清县人，基督教徒，在通州潞河中学上学时，他就对体育和音乐十分爱好。后来，他在燕京大学皮革专修科学习，奠定了后来从事制球事业的基础。1927～1929年，他赴美国留学，专攻化学。归国后，先后在北京育英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主要担任音乐和体育课教师。在南开中学任教期间，他创立了篮球校队，号称“南开五虎”的唐宝堃、王锡良、魏蓬云、刘建常和李国琛，就是在他的授业下成名的。1932年齐守愚离开南开学校，就任利生体育用品厂经理。

利生体育用品厂的创办人是孙润笙。孙和南开校长张伯苓过从甚密，张伯苓听说孙润笙有志兴办实业，就建议他办个体育用品厂，制造球类。张伯苓认为发展体育是强国之本，很有必要自办制球工厂，以免利、权外溢，并可抵制洋货。孙润笙欣然同意，集资兴办了利生体育用品厂。名为“利生”是寓“有利于国计民生”之意。孙润笙也是基督教徒，早就和齐守愚相识，知道他学过制革工艺，又在美国专攻化

学，因此，特聘他为利生体育用品厂经理。

利生体育用品厂设在天津市的河北区，在劝业场和东马路都设有门市部。工厂以制造各种球类为主，也兼做其他体育用品和器械。东马路门市部紧靠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内有天津最早的一个体育馆，当年各种篮、排球赛，多在这里举行。齐守愚、李清安、李友珍等，都常参加青年会的各种体育活动，组织比赛、担任裁判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天津体育界的名流。

齐守愚后来又和马更生合资创办了中美实业公司。为了业务需要，他于1948年去美国，以后在美国定居。

棋苑剪影

古代围棋趣话

围棋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种，早在五千年前，据说是尧帝为教育小儿子丹朱而创造的。

历史上有不少帝王好棋。唐玄宗爱对棋，但有时耍赖。一次玄宗与亲王下棋，杨贵妃观战。快到终局玄宗败势已定，杨贵妃将怀中小狗放到棋盘上胡搅一气，借此保住了皇帝的面子。唐玄宗还叫宰相张说赋过一首棋诗：

方如棋盘，
圆如棋子。
动如棋生，
静如棋死。

当时年仅七岁的围棋神童李必在一旁解释说：

方如行义，
围如用智。
动如逞才，
静如遂意。

玄宗听后大悦。

宋太宗也喜爱围棋，曾邀贾元陪棋，贾元不敢胜太宗，盘盘败局。太宗先让二子，贾元仍输；又让三子，贾元还是输。太宗知道贾元有意不赢，便说：“要是这局再输，便叫人捶你。”贾元知君无戏言，于是下了一盘“不生不死”的和棋。太宗仍不满意，便说：“再来一局，如果你胜了赏红绸衣一件，不胜将你扔到水塘里。”古时候讲三纲五常，只有君王取胜的理，岂有臣民赢的份儿？贾元小心翼翼地又走出个平局，太宗指着贾元一针见血地说：“我让了你三个子，你怎么还输？”于是叫下人将他抬出去扔进水塘里。贾元见皇帝动真格的了，才高喊起来：“我手里还有一子。”太宗大笑起来，赏贾元红绸衣一件。

据说明太祖下棋更荒唐。每局他必先下子，且对手只能在他的子相对应的位置下子，亦步亦趋，不得违例。对到终局，皇帝总是先胜一子。似这种不平等的竞争，岂有不胜之理？

唐朝时围棋已传入日本，据苏鹗《杜阳杂编》记载，当时已有日本棋手到中国来赛棋。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王子来到唐朝，他善棋技，宣宗命围棋高手顾师言与王子对弈。对至三十三下，不分胜负，双方都很谨慎。日本王子终于沉不住气了，小声问旁边的侍从：“顾是中国第几手？”答曰：“第三手。”王子说要见第一手，侍从又答道：“王子须将第三手赢了，才得见第二手，赢了第二手，才得见第一手。”日本王子只好服气地说：“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第三，果然如此。”

围棋有“手谈”之说，这需要惊人的记忆力。《集异记》中记录了一段“手谈”的故事。安史之乱，玄宗携众官员离京入川逃难时，一位叫陈积薪的翰林学士投宿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只有姑嫂二人，茶饭之后，天色已晚，各人入寝休息。良久，陈积薪忽听姑对嫂说：“今晚我们来对一局如何？”嫂应道：“好，你先开棋。”陈积薪纳闷，这黑灯瞎火的，姑嫂又各在一屋，这局怎么个对法？只听姑说：“起东五南九

下子了。”嫂对道：“东五南十二下子了。”良久姑又说：“西八南十已下。”嫂应：“西九南十下子。”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下起了围棋，下到四更天，走了三十六子。只听姑对嫂说：“你输了，我胜你九子。”嫂也认输。陈积薪次日早起向姑嫂讨教，但终未将这招学到手。

《当湖十局》古棋谱

出版社寄来装帧精美的陈祖德著《当湖十局细解》，要我向读者推荐一下。

陈祖德是大名鼎鼎的“棋圣”，这是为世人所知的。他1945年生，上海人。七岁开始学习围棋，1964年、1966年、1974年三次获得全国围棋冠军。1965年，他分先战胜日本九段棋手岩田达明，成为中国第一个分先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他的胜利，为中国围棋的新发展竖立了光辉的里程碑。1982年经国家体委批准，他升为九段棋手，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谈到陈祖德与《当湖十局》的关系，说来话长。

这里先述说一下《当湖十局》是怎么回事。一句话，这是一本颇具代表性的古棋谱。这本古棋谱是我国古代的两位围棋巨匠范西屏和施襄夏在他们的家乡浙江平湖县（“当湖”是平湖的别称）呕心沥血的对弈之作。

范、施二人生活在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当时国泰民安，国运兴隆，中国的艺术奇葩——围棋，在那时开放得也最为绚丽夺目。施襄夏名绍奣，号定庵，浙江海宁人。他着子严密，称全国第一，著有《弈理指归》二卷，及《二子谱》等。范西屏，名世勋，也是海宁人。著子敏捷，灵活多变，有棋圣之称，著有《桃花泉棋谱》等。据说乾隆四年（1793年），范、施两人受东道主张永年之邀请，于平湖鏖战十数局，难分胜负。后人将棋局选编成册时，以十为成数，故称

《当湖十局》。

当时范西屏三十一岁，施襄夏三十岁，两人精力充沛，棋艺处于巅峰时期。对局中，两位高手出神入化，技惊四座。所以，后人选编的《当湖十局》不仅在当时被围棋界一致推崇，就是后来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棋谱中的典范。

1960年，十五岁的陈祖德由于棋艺才华出众，被选入上海的围棋队参加集训。后来，集训队“精兵简政”，精简来精简去，最后只剩下陈祖德孤零零的一人。这时的他，既失去了老师的辅导，也失去了朝夕在一起切磋的伙伴。好在集训队里有不少古棋谱，这些古棋谱便陪他度过了那些孤独的日日夜夜。古代的那些高手成了他的老师，又成了与他密不可分的“忘年交”。他们的杀力那么强大，计算那么巧妙，感觉那么敏锐，这让陈祖德开阔了思路，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此后，他的棋风从书房棋变为力战型，并逐渐形成了他惯用的对角星布局。

后来，《围棋》月刊连载发表了陈祖德解说的《当湖十局》，颇具影响。后来应出版社之嘱，又经修改和充实，才汇编成书。

细心的读者从《当湖十局细解》不难看出，范、施两位高手在棋艺上所表现出来的统筹全局的方略、惊心动魄的杀法、精妙深奥的技巧，以及沉毅坚强的风格，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才华、精神和气质的体现。

中国象棋的故事

棋分三种：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而在中国普及率最高的是中国象棋。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韩信发明中国象棋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因屡建战功先后被封为齐王、楚王的大将韩信，被吕后诬以谋反罪诱捕入狱。韩信自知寿命快到尽头了，就打算在狱中写一部兵书传给后人。不料这事被吕后知道，便下了一道懿旨，说他身为犯官，不得擅著兵书。韩信悲愤难忍，仰天长叹道："这个婆娘太狠毒了！不但要本王的命，连本王的名也要除掉啊！"当时有个狱卒听到他这句话后，跪在他面前说："王爷！你就把用兵之法传给小人吧！"韩信苦笑了一声说："本王若不知用兵之道，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如今悔之晚矣，怎么能连累你遭受杀身之祸呢？"狱卒再三恳求，韩信只是不允。

一天，这个狱卒给韩信送饭时，眼里含着泪花，韩信感到不妙，就问狱卒："那个婆娘是不是要对我下毒手了？"狱卒忍不住哭出声来。韩信大笑道："打完兔子杀猎犬，射尽飞鸟折良弓，灭了敌国诛功臣嘛！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没什么可怕的。"说罢，韩信取来一根筷子，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又在框中画了一条界河，河中写了"楚河汉界"四个字。接着又在河界两边各画三十六个小格，说："本王今年刚好三十六岁，一生助汉灭楚，屡立大功，到头来却死在一个女人手里。你平时对我百般照料，今生今世再没机会报答你了，就把生平所学的奇术传给你吧。"说完叫狱卒取来白布和毛笔，他用毛笔在地上画门界河和分列界河两边的方阵；然后把白布裁成三十二个小片，放在

界河两方。一方的十六块布片写着帅、仕、相、车、马、炮、兵等字，另一方的十六块布片上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字。摆好后，韩信边移动布片边告诉狱卒：“这个方框就是千军万马的大战场，两边各代表一方的兵力。用兵之道，贵在主帅多谋善变，通盘筹划，奇正配合，以变制变……”他具体教狱卒如何跳马、出兵、驱车、驾炮、仕相左右拱卫老帅等。狱卒边听边称赞：“奇！王爷真是个奇人啊！”

从那天起，韩信每天与这个狱卒守着方框（棋盘），研究兵法，继而对弈（演习）。韩信执“帅”棋，狱卒执“将”棋，霎时方框内硝烟四起，战火横飞。但见帅棋一方，车辚辚，马萧萧，炮隆隆，众兵越过楚河汉界长驱直入，杀得“将”棋一方车仰马翻，炮毁卒亡，最终老“将”授首。狱卒屡战屡败，心悦诚服。

不久，韩信被吕后杀害，狱卒也伺机逃走了。他躲藏到一座深山里，研究韩信授给他的奇术。因布片易烂，就换成了扁圆形小木柁儿，为好区别将木柁儿染成红黑两色。又按照奇的谐音，把奇叫作“棋”。他还写了一本《棋谱》，传给了他的儿子，以后代代相传，象棋便广泛流传民间了。

后人认为棋虽可布阵，但不是真正的两军作战，只是一种象征，所以称它为“象棋”。

百岁棋王谢侠逊

谢侠逊，1887年生，浙江温州人。其父精通棋艺，他幼承庭训，六岁解棋识法，九岁时已能将《百局谱》背诵如流。同时谙熟《适情雅趣》《梅花谱》《橘中密》《竹香斋》诸棋书，十岁时已是“战遍平阳无敌手”，十三岁起即扬名温州城。那年他赤脚乘小船去温州找曾获象棋大赛银牌的名棋师陈笙对弈，陈笙以轻蔑的态度嘲笑这个后生。经谢侠逊竭诚请战，陈笙应战，最后二人战了个平局。

1905年，弱冠之年的谢侠逊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开辟棋艺论坛，张扬棋道。此为中国报刊开辟棋坛之伊始。他曾创作《八国联军》《沙俄割地》等棋局，表达对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之无比义愤，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屈辱、自强不息之气概。辛亥革命胜利后，他精心创作了《鄂军起义》棋局，发表时还特意附上两行诗句：“匹夫倡义武昌城，扫尽鲸鲵草木惊。”其振奋之情，跃然纸上。

谢侠逊不仅精通中国象棋，对国际象棋亦颇有研究。1925年，他在上海倡导国际象棋，并于1927年参加上海国际象棋比赛，与国外名手角逐，名列前茅。这是中国人参加国际象棋公开赛最早的一次。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谢侠逊数次北上平、津，南下广东，与海内师友协力提倡棋道。在辗转奔波中，他眼见祖国古老的象棋艺术日趋衰弱，深感痛心。他认为要振兴象棋艺术，必须诉诸理论。于是他苦心孤诣，搜集古籍遗谱，潜心研究整理，历经数载，于1928年撰成《象棋谱大全》。此书被列为棋界之经典巨著。此后他著书更加勤奋，先后出版了《金鹏梅花诀着谱》《海外象棋谱》《新编象棋谱》

等著作近三十本。

1927年，棋坛上发生了一件趣事，即谢侠逊被推为“全国棋坛总司令”。随即，谢侠逊以总司令名义宣布成立“象棋点将台”，分别委任各路棋手以“军衔”，一时轰动四方，弈林随之活跃。翌年2月2日，为纪念棋坛总司令部成立一周年，谢侠逊特发表文章，畅叙各地棋坛风起云涌之势，为象棋运动的发展击鼓吹角。

1935年，谢侠逊为推动中外棋艺交流，首次出征南洋。当时，东南亚棋坛有号称“虎将”“金刚”的八大高手。谢侠逊一到，八位高手纷纷前来“领教”。谢侠逊抖擞精神，一连数日与他们展开轮番大战，所向披靡，八大高手招架不住，个个拱手称臣。

在1935年6月5日的马来西亚报纸上，曾以“棋王谢君到了”为题，报道谢侠逊和东南亚象棋高手进行比赛的消息。消息中说：“棋王谢君侠逊曾任十七国棋坛联总军总司令，这次挟其高超棋艺，负着宣扬国粹的使命，南游马来群岛，一登星岸，即把星岛各棋坛健将，杀个淋漓痛快！后集合全星十八路诸侯同一战线进攻，亦给谢君单力所胜！随而乘战胜之余威直入吉隆坡斩杀，弄到吉方战阵只有招架之势，而无反抗之能。后虽曾拨二十员大将会攻，作最后之反扑，卒为谢君帅威所服。棋王！棋王！斯真名不虚传也。”

抗日战争初期，谢侠逊接受委托，到南洋一带筹款购买军火。凭借着在象棋界的崇高声望，他在南洋华侨中筹得五十万元巨额捐款。此举受到周恩来的赞扬，章士钊曾有诗赠之：

自古长安道，兵戈靡定家。
棋王神自主，圣手智无涯。
袖遣河湟复，胸容龙象挝。
唯羞双燕子，到处受风斜。

谢侠逊纵横棋坛八十年，对中国象棋技艺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对名谱《橘中秘》重“当头炮”和《梅花谱》重“屏风马”做了新解。

谢侠逊棋艺风格幽柔缜密，对各方都应用娴熟，尤善用马，有一套“以兵制马，以马制炮，以士制车”的实战经验。他临阵稳健坚韧，不贪不怯。他以为“贪则无功，怯则必败”。

谢侠逊一百岁时据说仍精神矍铄，被港澳报界称为“百岁棋王”。

轰动九城的棋战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夏天，北京曾有过一场轰动九城的马拉松式象棋赛，对弈者是那健庭和张德魁。

当时社会上下象棋风气很盛，一般棋迷推崇那、张棋技为最高明。那健庭是满族人，在家赋闲，有一妻，五六个孩子，家境非常困难。张德魁为回族人，也在赋闲。二人年均四十来岁。有人征询他们愿否出赛时，那表示同意比赛，唯以十盘为度，地点可在前门外劝业场三楼饮春园茶社。张也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和饮春园约定，每周比赛一次。报纸宣布了这次棋讯。棋赛开始那天，劝业场三楼观者如堵。饮春园老板喜笑颜开，茶客骤增，生意兴隆，真是难遇的好买卖！

比赛开始前，室内已有一些名手在对棋，记得有北京名手侯玉山、柴华亭、谢小然，东北名手侯玉轩等。那、张坐在当中一张茶桌两端，公证人是胡兰荪。那、张每走一步，由胡宣布路数，室内各桌有棋盘不约而同照方走棋。他们结束一盘休息时，有棋迷仍在议论方才双方的棋路。记得第一次对了两局，二人各胜一局。

两人对过几局，总是难分轩轾。那健庭的棋法犀利多变，尤其是用马神出鬼没；张德魁则稳健持重，在固若金汤的防守中，突然发起迅猛攻势，给对方以威胁。记得下至第六七局时，那健庭患了眼病，棋赛有难以继续下去之势。张德魁建议说：“害眼不要紧，可以谈棋嘛！”那健庭也同意了。对局开始了，那、张坐在窗外，背靠墙壁，饮春园特备的直径三寸的大纸棋子挂在屋里墙上，每走一步，用竹竿挑

动棋子移在指定位置上。记得第一盘中有一步，那健庭说：“炮七退五。”说完，又说：“大家看看是不是砸了个死车？”众看果然。这一局那健庭胜了，但次一局则张德魁胜。

那次比赛，延续两月有余，早已超过当初的“十局之约”，由夏天赛到中秋节，尚未终了，二人始终胜败不分。后来有人看见饮春园老板和那、张在赛后同到西单西来顺吃饭，就私下议论说：三人是不是捏好活局，老战不完，为饮春园增加收入，二人分红？是耶非耶，无关宏旨，但那、张棋艺确实精湛，棋迷们大饱了眼福。

那健庭于20世纪40年代在贫困交加中病故。听说张德魁50年代时还在北京象棋比赛中担任评棋，决赛终了时为观众讲解双方对棋的得失与胜败关键，为棋界所尊敬。

回想起来已是将近几十年前的事了。可惜那健庭去世太早，否则，今天他也必然是中国象棋元老而受到尊敬。

棋联撷趣

旧时，人们下棋，往往在棋盘的河界上写一副对联，用以表示棋中的乐趣和“用兵”之道，内中蕴涵着深奥的哲理。这些棋联读来颇为有趣。

“河界三分阔，计谋万丈深。”此联体现了下象棋高深的境界。一个小小的棋盘，河界虽不宽，却包藏着深奥的韬略和战术，读之令人思忖。

“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此联将旁观者、对弈者的棋品、人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观者不多嘴，默默看赛棋；下棋者只要放下了棋子，错与对绝不改变，多么豪爽的场面。

有趣的是，清代有一位名士，以棋之名来命句，作为上联来征对，上联是：

大帅用兵，士卒效命，车辚辚，马萧萧，气象巍巍，视此去一炮成功，方不愧出将入相。

名士的上联出来后，很久无应者。后适逢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及光绪出走，李鸿章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时，有人以这个背景，嵌入“牌九”名，续出下联：

至尊在野，长短休论，文泄泄，武沓沓，议和叠叠，到后来万众失望，直落到抢地呼天。

此联虽属游戏笔墨，然独具匠心，工整贴切，且针对当时形势，描写得绘声绘色，极为恰当。上联中嵌入了“将”“帅”“士”“相”“象”“车”“马”“炮”“兵”“卒”诸棋子名；下联中嵌入“至”“尊”“天”“地”“人”“和”“长”“短”“文”“武”诸骨牌名，相当巧妙。

旧时有一人，痴迷棋艺，只要一有时间便与人横车跃马，终日不倦。他的书屋中，摆满了有关下棋的书，美其名曰“弈舍”，并自题一联云：

局里乾坤大，棋中日月长。

此联生剥“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将两句之首各改一字，虽然意境大为逊色，但也别有一番情趣。

明代的解缙，幼年时被称为“神童”。有一天，他与一老者对弈，老者有意戏谑他，便指着墙上一幅画说：

旧画一张，龙不吟，虎不啸，花不闻香鸟不叫，见此小子，可笑可笑。

说罢得意扬扬地看着解缙，看这个神童有何反应。

解缙听罢，知道这是老者在取笑自己，于是不露声色地吟道：

残棋半局，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卒无粮，喝声将军，提防提防。

老者听罢，觉得虽与上联离题万里，但对仗工整，意境不俗；又很得体地告诫自己，对弈不要急功近利，只顾吃掉对方的兵马；而要紧的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棋盘不是战场却似战场，千万不可自恃力强而小瞧对方。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

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